

群衆

第十卷

(第一期至第二十四期)

群 衆

第十卷 第一期



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本 期 目 錄

學習運用民主作風

世界與中國

從海洋到大陸
論日寇救死掙扎的內幕
新年寫落日
解放區如何發動民衆堅持抗戰

歷史能夠證明中國不需要民主嗎？（批判）

★讀者之真

新的時日，新的希望

新年中的我們
教書匠的願望

無題

耳光和竹棍

談微發

春秋之義
會參殺人

他其及評書

人生、文藝、文藝批評
人民需要的是豐衣足食
評「肥沃的土地」
「中國經濟的現狀與對策」
盟國反攻日寇的戰略點

今 韋

石西民

左 思

寶 府

沈友谷

凡丁頁

過望之

楊利者

朱金

★

蘆 蕪
蘆 蕪

胡 風

秦彌堅

鉗 耳

何 浩

佚 雪

本 刊 啓 事

本期原定之文章中計有「迎一九四五年」，「學習運用民主作風」，「從海洋到大陸」三文，均奉命免登，謹向作者及讀者致歉。

羣 衆

第十卷 第一期

三十四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發行者

羣衆雜誌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新華日報館

總經理

本 刊 價 目

本期零售 十六元 六期 八十八元
十二期 一百六十元 廿四期 三百零四元
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照加

論日寇救死掙扎的內幕

石西民

一九四四年匆匆而逝。這一年雖已過去，然而回首前塵，在整個民主反法西斯的大戰過程中，歷史却已記載下這重要年頭的許多重大的史實。

誰也知道，一九四四年確實不平凡。在歐洲，蘇聯紅軍的不存休的鏖擊，不僅逐退它國境內的德寇，而且解放了東歐無數被納粹蹂躪下的國家的土地；同時在四歐，盟軍實現了世界戰史上空前的大登陸戰，使西歐許多淪陷國家獲得了新生。從東面的，從西面和南面的英美蘇盟軍的攻勢正圍困了德寇，戰爭已帶到納粹德國本土。把納粹野獸在其巢穴中結果結的神聖事業的完成是愈來愈接近了。

從西方看到東方，日寇的光景也確是日益黯淡。太平洋上美軍的攻勢日見凌厲，一九四四年的一月攻入馬紹爾羣島，接連是一片片的勝利登陸。六月攻入馬紹爾羣島的塞班島，這二大勝利使日本的海上長城突破了，「這是在對真正日本領土的首次打擊」。東京的震動，有如晴天霹靂。敵酋東條說：「塞班島終陷敵手，我領慮慮，實不勝恐懼之至」。於是在戰事失利，內部不滿交相煎迫之下，小磯米內聯合內閣辭職而上台。然而小磯米內的命運並不比東條強，接連而來的是關島、帛琉、菲律賓的登陸。日寇儘管高喊決戰，可是山下奉文阻止不住美軍在菲律賓羣島中雷伊泰島的登陸與佔領，乃至明多羅的登陸。而大批從塞班島根地起飛的B二十九超級空中堡壘，也說不再吝氣，巨量的炸彈，不斷地投向扶桑三島。

繼在日寇面前的是神恩的失敗的遠景。假如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珍珠港偷襲到一九四二年夏緬甸之戰，及阿留申登陸為止，日本人民元被關關大吹大擂的「赫赫戰果」所迷醉的話，那末，轉眼間，從這年八月美軍反攻所轟門起，日寇的信心就開始動搖，經過一九四三年美軍主動的馬島與迪島進攻而失敗的氣氛更趨濃厚，去年這一年無異地，失敗的陰影就顯見擴大了。日寇統治者的論調，特別在去年（一九四四年）一年中，也顯得愈益悲況。去年春被八十四屆議會開會，盟軍給殲滅的禮物是馬紹爾羣島的登陸。敵

議會在這缺拳鏖戰之下，緊張萬狀，高喊「一億決鬥，擊滅美英」，會中說的整副是悲壯的：「豹狼已逼近門口，不將其粉碎，實無面目對自己祖先」。現在戰局嚴重，皇國興廢在此一舉。可是這種決議與言論，並不能挽回它海上的失敗。七月十八日塞班島上的日軍玉碎了，接着，美軍在關島登陸，東條成爲替罪羊。小磯米內登台，想以海陸軍聯合的內閣，以拯救危局，成立之初，極力想掙扎一下。上台不久就奏請召開第八十五屆臨時議會，據說是爲了「令國民澈底明瞭戰局實況，表明政府完遂戰爭之確乎決意，並向中外闡明對於決戰之政府施政方針，以求堅強凝聚一億國民之總力於決勝之途」。

小磯米內內閣於九月初舉行八十五屆臨時議會，在這會議中反映出日寇掙扎的新措施，舉其最重要者說來，①小磯在施政方針演說中揭示五點：第一點即戰意的昂揚與必勝國家體制的確立；第二點爲戰力之增強，尤集中於航空戰力之急速加強；第三點糧食增產；第四點勞務與國民動員的加強，要做到「國內無論男女老弱，不容有一人之休閒」；第五爲國土防衛之強化，以應付盟軍空襲。②二百餘億軍費追加案通過。

「小」米內閣對加強戰力的努力，確實是認真的，以動員爲例，在國民登記命令之下，十二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男子，和十二歲到四十歲的女子都要實行登記，即是所謂「從量的動員轉變爲質的動員」。此外，更以敵艦一再襲擊的飛機增產案說，去年一年無異也有增加，照敵人所吹是增加了一倍。

然而，戰爭總是實力的競賽，這是血淋淋的事實。在盟軍雄厚的海空實力進擊之下，十月十二——十六日，台灣海面的大海空戰，不曾雙方損失對比如何，日寇無力阻止十月十九日美軍在麥克阿瑟領導下登陸菲律賓的雷伊泰，儘管有十月二十四——二十六菲律賓海面的海空戰，美軍還是勝利地在雷伊泰登陸，並於十二月十五日在明多羅登陸。

六星期的死傷不及在佔領馬里亞納羣島時死傷於日軍砲火下的美軍四分之一。少數裝備不良的日軍，使美軍在這種相當小的區域所付的代價，比遠東盟軍在法國廣大而重要的戰場所付的代價更高。

即以最近幾個月有餘的雷伊泰島戰事而言，雙方兵員傷亡，據美方估計，敵人傷亡十一萬餘，美方傷亡一萬一千餘人，日寇則宣佈說，去年一年美軍在太平洋戰場死傷二十二萬餘，日寇則死亡十六萬八千人。不管如何，人員損失是巨大的。另從軍需消耗而論，美軍進攻雷伊泰島第一個月所耗彈藥，其數量和耗過去整個太平洋戰場十六個月的消耗總額，這種戰爭的消耗，今後規模更見日見擴大，可說是必然的定論。我們今天還不能來估計整個菲律賓的解放，是在那一天完成，因為呂宋，民答那峨兩大島尚未發生戰事，日寇的頑強抵抗對拖時日的作用是值得我們注意。

日寇拖延戰事的戰略，更注意於中國大陸，這是很清楚的。因為，時至今日，誰都知道太平洋的戰爭是海空的戰爭，而解決日本的決戰則靠陸上的戰爭。尼米茲一再聲明要在中國大陸登陸這正說明了美國戰略重心所指。

中國戰場是日寇生死存亡的關鍵，這一點日寇也很清楚。去年十二月十八十九兩日，日本「每日新聞」東亞欄連載「美國對大陸決戰的理念」一文，其中說：「美艦隊進攻日本本土，乃以中國大陸為反攻基地的主要戰場，而以海洋進擊為副戰場……所以美日大陸決戰論，早已是鐵固不變的定論」。而敵酋加德六早就堅認「太平洋戰爭的核心仍在大陸」。

針對着這一點，當美軍日登接近中國大陸的時候，日寇在去年一變而以軍事進攻為主，接連爆發河南戰役，湖南戰役，黔桂戰役，打通了平漢、湘桂，以實現其大陸聯絡線並在東南沿海用兵，同時加緊敵後的掃蕩戰。我們正面戰場的節節失利，毫無疑問要影響到戰爭的延長，這也正是日寇企求的最大目的。

無論在菲律賓或中國大陸的戰事演變如何，從日寇基本戰略意義上說是一貫的，不論是採取防禦或進攻形式，都是藉此以求達到她拖延的目的。

其次，她另一主要的方面，時刻不放鬆政治的發動。最近一連串歐陸的紛擾，如英國干涉希臘之戰，意大利政潮，比利時內部問題，乃至波蘭法蘭西問題，總而言之，目前德黑蘭路線，正受着威脅和考驗，而這正是日寇挑撥離間的最好時機。她的宣傳機關不僅在大量散佈盟國糾紛的誇大宣傳，散佈英美與蘇聯所關係恢復原狀，同時也不放鬆在英美之間播弄空氣，

勾引舊日的盟友。

敵舉行八十六屆議會之先，翼政會臨時代議士會席上，小林總裁一再強調這次議會的政治意義，並再三說明「我方對敵美英所企求者乃係令其放棄削弱世界之野心及殘忍之戰爭手段」，這話也可說委婉之至了。

但是，日寇的政治賭注，很大一筆，今天正押在亞洲大陸上。她要盡一切力量，把東亞暫時佔領的國家內的各民族，拴在她的戰車上去，她的中心目標是在大陸上。不難記起，小磯米內內閣的外相是過去的駐英大使重光葵，當他就職之初東京廣播說：「重光既為外相又兼大東亞相，自將加強地位，使成為日本外交政策的推動力，而以全力實現日本與它國共存共榮的政策」。

日寇今天對大陸的政策是軍政雙管齊下，軍事的逼，政治的誘，其理想目標是在整個消解大陸戰線，即使做不到，也要期望凍結大陸戰線。為了企圖實現她的陰謀，她正從政治上努力做這樣三件事：一件是挑撥中美關係，一件是促助中國內部的分裂，不團結。再一件則是大宣傳中日共存共榮。

從第一件說來，日寇在華作戰，屠殺的並中國軍民，但嘴上只說與美國作戰。中美邦交更趨緊張，史德威將軍之返國，她可以慷慨稱譽我們為英雄，就是最近一位美籍司機肇事法院宣判徒刑四月，同盟社就大肆廣播中國政府已予美人以厚懲了。日寇在這方面是很下功夫的，在一篇「美對日戰略與專慶」的文章中說：重慶的目的與美國的目的不同異常明顯。重慶始終採取革命為首抗戰為次的政策。重慶要接受外人援助但反對外人軍事統制戰術干涉。又說「美國目的在壓迫重慶以持久戰方針改變為短期戰」。此外又如這次政府人事變動，日寇也大為讚揚中國的自主不受外力壓迫。

從第二件說，日寇宣傳反共和平是達到中國真正統一的道路，以上情形正如去年六月號「Asahi Review」中所說：「日本方面目前正以密切的努力，來造成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不睦，此為盟國遠東政治最弱的一環。日本另一努力，或在繼續轉變中國人民使之反對英美」。

從第三件說，那就更多得不可勝舉。漢奸陳公博的僕僕南京東京之間，偽駐華大使谷正之的往來中日二地，東京的太事慶祝所謂中日同盟三週年，無一不是與政治誘惑陰謀有關。陳逆公博在南京的演說，口口聲聲同胞，同志，這都是舊陰謀的花樣翻新。不可忽視，由於日寇太平洋上軍事失利，大陸戰略價值的提高，她在

大陸上的花樣是會愈翻新，愈弄愈奇的。她今天明知消解大陸戰場的不易，但絕不動搖其凍結大陸戰線的陰謀。

我們深信凍結乃至消解大陸戰線的陰謀，到頭來是不可能實現的，她只能從那可憐的幻想坐待勝利果實的人羣中，從那些醉心於私利的人們中找到少數同調。中國軍民要積極準備反攻，以配合太平洋上勝利盟軍的前進，同時盟軍在華的積極作戰也打碎了這個陰謀的實現。特別是最近盟軍大舉轟炸漢口和其它各城市，敵後運糧軍事勝利，已把碼打碎了日寇幻想的一半了。

客觀事實發展的邏輯總要打碎主觀的願望。日寇對盟國團結破裂，厭惡情緒增强的幻想，既難以實現，而對消解和凍結大陸戰線，也同樣不可能。儘管徹底摧毀日寇的日子還長，中途仍多荆棘曲折，但是日寇的命運是注定的了。

徹底擊敗日寇的決戰在大陸，日寇敢死掙扎的最後地點也是在大陸。因此我們必須看到在今年，日寇在華還會有更多的軍事進攻，她不會忘記對

打通粵漢路和鞏固沿海佔領區的企圖，也更不會忘記在阻斷我國交通線和掃蕩敵後的陰謀。去年年底到如今，冀東，山東，太行區，淮南一帶許多地區接連發生大規模掃蕩與反掃蕩戰。我英勇的軍民擊退敵人的瘋狂進攻，並獲得巨大勝利。

一九四五年，日寇要同樣以軍事政治雙管齊下相互配合來對待中國。軍事上的再度緊張，應該是意料中事。中國要得到抗日戰爭勝利，需要有大規模大轉變，要始終認識消滅大陸上擊潰日寇，我們的責任負得很大，我們今天對敵只有加強軍事反攻一途，沒有其它可取巧之處，也沒有什麼權術可用。去年失敗的教訓，應該吸取的太多了。但是最主要的，還是要看清局勢的嚴重與任務的重大，認真刷新政治，走向民主，團結全國全力認真準備進行反攻，藉以打破日寇的陰謀，取得加速勝利的條件。這想來怕是新年開始，臨在人人面前最主要的課題了。

一月三日

耳光和竹棍

編者先生：

昨天在本市×報上讀到一篇論學校軍訓的文章，我又想起前一兩天我的弟弟的來信，他在涪陵縣立中學讀書，今年還只十四歲，這裡，我且抄錄他一段來信：

「……我們這裡的幾位先生，都時常對我們講『不打不成人』的，因此，只要有一點不合先生們口味的地方，他們就『兇神惡煞』似的打『手心』，用竹棍亂打。我們的軍訓教官叫毛通文，舊同學都說他『一竅不通』，打人却算是他的『拿手好戲』，上月（按指十一月）二十六日開會時，據說：開會時發現有同學在講話，他不問青紅皂白的拉出一個姓陶的新同學，一連就打了他幾耳光，接着又用拳頭打，打了還嫌不夠，又把姓陶的同學拉到辦公室取下門簾竹竿全身亂打，打得姓陶的同學遍體傷痕，昨天，有同學去看他，回來講，他還躺在牀上不能動。……其實，真冤枉，開會的時候，我就在陶同學附近，講話的根本不是他……」

我相信，我的弟弟沒有說假話，因為這個學校的管理方法的專橫，暴虐我是早已聽說過的；先生，你看這算是暴君的統治，還是學校教育呢？在這種拳頭，耳光下面，在這種竹棍的鞭打下，對於學生的人格力量，還存有任何一點尊重的心理嗎？

在這種專橫、暴虐的教育方法下面，能夠訓練出甚麼樣的學生呢？據我想，要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小老頭子，恐怕就會是『在人面前是羔羊，在人背後却又走狐狸』的市儈罷。

我想問，這樣的教育『誰為為之』？

（朱企）

大陸上的花樣是會愈翻新，愈弄愈奇的。她今天明知消解大陸戰場的不易，但絕不動搖其凍結大陸戰線的陰謀。

我們深信凍結乃至消解大陸戰線的陰謀，到頭來是不可能實現的，她只能從那可憐的幻想坐待勝利果實的人羣中，從那些醉心於私利的人們中找到少數同調。中國軍民要積極準備反攻，以配合太平洋上勝利盟軍的前進，同時盟軍在華的積極作戰也打碎了這個陰謀的實現。特別是最近盟機大舉轟炸漢口和其它各城市，敵後還編軍事勝利，已起碼打碎了日寇幻想的一半了。

客觀事實發展的邏輯總要打碎主觀的願望。日寇對盟國團結破裂，厭戰情緒增漲的幻想，既難以實現，而對消解和凍結大陸戰線，也同樣不可能。儘管徹底摧毀日寇的日子還長，中途仍多荆棘曲折，但是日寇的命運是注定的了。

徹底擊敗日寇的決戰在大陸，日寇救死掙扎的最後地點也是在大陸。因此我們就必須看到在今年，日寇在華還會有更多的軍事進攻，她不會忘記對

打通粵漢路和鞏固沿海佔領區的企圖，也更不會忘記在阻斷我國交通線和掃蕩敵後的陰謀。去年年底到如今，冀東，山東，太行區，淮南一帶許多地區接連發生大規模掃蕩與反掃蕩戰。我英勇的軍民擊退敵人的瘋狂進攻，並獲得巨大勝利。

一九四五年，日寇要同樣以軍事政治雙管齊下相互配合來對付中國。軍事上的再度緊張，應該是意料中事。中國要得到抗日戰爭勝利，需要有大副對敵只有加強軍事反攻一途，沒有其它可取巧之處，也沒有什麼權術可用。去年失敗的教訓，應該記取的太多了。但是最主要的，還是要看清局勢的嚴重與任務的重大，認真刷新政治，走向民主，團結全國全力認真準備進行反攻，藉以打破日寇的陰謀，取得加速勝利的條件。這想來怕是新一年開始，在人人面前最主要的課題了。

一月三日

耳光和竹棍

編者先生：

昨天在本市×報上讀到一篇論學校軍訓的文章，我又想起前一兩天我的弟弟的來信

他在魯陵縣立中學讀書，今年還只十四歲，這裡，我且擷錄他一段來信：

「……我們這裡的幾位先生，都時常對我們講『不打不成人』的，因此，只要有一點不合先生們口味的地方，他們就『兇神惡煞』似的打『手心』，用竹棍亂打。我們的軍訓教官叫毛通文，舊同學都說他『一竅不通』，打人却算是他的『拿手好戲』：上月（按指十一月）二十六日開會時，據說：開會時發現有同學在講話，他不問青紅皂白的拉出一個姓陶的新同學，一連就打了他幾耳光，接着又用拳頭打，打了還嫌不夠，又把姓陶的同學拉到辦公室取下門簾竹竿全身亂打，打得姓陶的同學遍體傷痕，昨天，有同學去看他，回來講，他還躺在床上不能動。……其實，真冤枉，開會的時候，我就在陶同學附近，講話的根本不是他……」

我相信，我的弟弟沒有說假話，因為這個學校的管理方法的專橫，暴虐我是早已聽說過的；先生，你看這算是暴君的統治，還是學校教育呢？在這種拳頭，耳光下面，在這種竹棍的鞭打下面，對於學生的人格力量，還存有任何一點尊重的心理嗎？

在這種專橫、暴虐的教育方法下面，能夠訓練出甚麼樣的學生呢？據我想，要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小老頭子，恐怕就會是『在人面前是羔羊，在人背後却又是狐狸』的市儈吧。

我想問，這樣的教育『誰為之』？

（朱企）

約有三：一、飛機的對期生產。二、增加海陸運輸力及統一運費。三、增進糧食以維國民生活。二十一日陸軍參謀總長杉山元電報，由陸相東條英機發任。後官海軍參謀總長。海軍軍令部總長水野修身發報，由海軍大臣島田繁太郎兼任。其理由為「使統帥與國務毫無關係的緊密化，一元化」。二十五日發交瓜加林及羅伊島日本守軍由二月一日至六日全數戰死。羅伊島指揮官為海軍少將山田道行，瓜加林指揮官為海軍少將秋山門造。

三月十一日小倉正澄任南京偽組織高杉滋濟顧問。三月五日起各官廳廢止星期休養及令各娛樂場所自動閉門。十一日下關門司海底隧道第一通車。二十五日第八十四屆通商會議閉幕。三十日蘇日漁約延長五年（自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起算起）。

四月十一日發表日鐵九州作業所（即八幡）一九四三年生產成績打破預定生產額而增加百分之五，鋼塊百分之五，鋼材百分之五，特殊鋼百分之五。二十七日文部省發表東京大學及專門學校的結果，公立大學文科學生縮減六成，約剩三千三百名。專門學校文科生縮減五成，剩下一萬二千名。新設工業專門學校十七所，其中工業專門九所，航空工業四所，航空工業一，電波工業二，石油工業一。以前文科學生百分比為七五比二五，現已成為五〇比五〇。二十九日宣布由五月一日起日鐵兩鋼廠在大東亞戰爭中免除關稅，以回捐物資交流。

五月十一日朝鮮總督小磯山京城返東京據報。五日大本營發表：「聯合總司令部長官古賀峯一於本年三月在前線搭飛機，指揮作戰殉職。遺缺日命野田副武繼任。吉田善吾補遺缺守備司令官。日命野田古賀列位元帥（為日本第二十九命全軍滅亡。該島陸軍指揮官為藤原中將，海軍

元帥）。六日「小磯朝見日皇，報告朝鮮狀況：去年八月一日起實施徵兵制，適齡者二十三萬人。前年去年因旱災關係，米麥收穫不佳，今年米生產目標為二千六百萬石，將以六百萬石供給日本。朝鮮運輸率，旅客佔百分之十六，貨物佔百分之八十四」。九日「一九四三年造船成績為一九四二年之三倍，一九四四年生產目標擬為一九四三年之三倍」。

六月十一日朝俊六賜給元帥。三日發表由生檢皮製造石油成功。生檢皮一噸可製百分之八十的一般潤滑油，或百分之五十的飛機滑油。十五日美軍登陸塞班。十六日北九州第一次被超級空中堡壘轟炸，八磅鐵錘所炸彈，火燒三小時。十七日：「貨物汽車運量增加指數：一九三六——一〇〇，一九三七——一四一，一九三八——一八七，一九三九——三〇一，一九四〇——四〇二，一九四一——五七六，一九四二——六九二，一九四三——二八〇」。以上為小營業汽車的統計。二十一日「日皇召集軍臣會議，出席者：若槻、岡田、平沼、近衛、米內、廣田、阿部及前樞府議長。東條列席」。二十四日雜誌「改造」自動停刊。

七月十一日北九州再度被炸。十一日情報局令「中央公論」停刊，理由與「改造」同，「因思想指導不適宜」。綜合雜誌已恢復「公論」現代二種。十七日海軍大臣島田繁太郎發報，遺缺由海軍大將野村直邦繼任。（島田專任海軍軍令部總長）十八日陸軍人事異動：（一）陸軍航空總監後官淳孫繼任，菅原道大繼任。二、梅津美次郎任參謀總長。三、山田乙三任關東軍司令官。四、杉山元任教育總監。同日發表海軍日軍艦隊至十六日

指揮官為越川武九少將。二十日發表：「東條內閣十八日上午十一時總辭職。是晚開重臣會議。午後八時半天皇命小磯閣閣米內光政組閣。二十二日午後一時小磯入宮呈遞閣名單：總理大臣小磯國昭，外務大臣重光葵，大東亞大臣東光葵，內務大臣大連茂雄，大藏大臣石渡莊太郎，陸軍大臣杉山元，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司法大臣松阪廣政，文部大臣二宮重治，厚生大臣廣瀨久忠，農商大臣島田俊雄，軍醫大臣藤原銀次郎，運輸總長大臣田米藏，國務大臣河野忠治，兒玉秀雄，精方竹虎（兼情報局長）。」（法務局長三浦一雄，書記官長田中武雄）。東條閣入預備役。野村直邦任軍事參議官。同日美軍在關島登陸。二十三日美軍在欲寧島登陸。二十四日阿部信行任朝鮮總督。二十五日任四尾登陸軍大將為東京都長。

八月十一日海軍人事：「及川古志賀任軍令部總長。野村直邦任橫濱鎮守府司令官」。吉田善吾與島田繁太郎皆補命議員。同日發表防空狀況：「自去年十月起全國各大都市皆實行人口疏散。東京疏散工廠職員六十六萬五千人，預算七億零七百萬圓」。五日小林清繼任內政會第二任總裁。（第一任為阿部信行）。九日海軍大將鈴木實太郎任樞密院議長。（前任議長原嘉道死去）。十五日「東京已疏散學生二十六萬人。拆毀建築物，已造出空地三五七處」。十六日建川美次就任大日本實業社年團團長。二十五日「閣議決定於九月六日召開臨時議會，會期五日」。同日發表：「日本銀行貸款四億元與偽中央儲備銀行」。周遊佛海訪日活動結果。二十九日松井石根任朝鮮總督。

九月十一日閣部直三郎任華北方面日本陸軍最高指揮官。阿部與影佐中將同為偽滿總督。一九

四三年二月晉陞大將。現年五十八歲。一九三七年到中國，在華北作戰二年餘。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返國任陸軍技術部長。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任陸軍大學校長。與山下奉文在陸大同期。五日發表一九四四年度一般會計追加預算三億八千五百萬日元。六月第八十五屆臨時議會召集。同日通告國民總登記，由十一月一日起，凡男子十二—六十歲女子十二—四十歲皆須登記，以備動員。同日發表臨時軍事費追加預算二百五十億元。其財源（單位百萬）：各佔領區借入金一八、二〇〇，公債五、一九七，雜收入一、六〇二。八日超額徵收百架第一次轟炸鞍山。十二日第八十五屆臨時議會閉幕。十五日一九四四年度備蓄目標改訂為四百零十億元（原為一、二六〇億）。國家資金新計畫如次（單位億）：國民所得六五〇，財政資金四七五，產業資金六〇，國民消費一一五。十四日宇垣一成飛京城。十六日野村直邦任海上護衛總司令。十七日發表「十五日美軍在帛璃琉及摩羅泰同時登陸」。十九日「日本國有鐵道運輸噸數指數：一九三六——一〇〇，一九三七——一〇九，一九三八——一二一，一九三九——一三五，一九四〇——一四九，一九四一——一五五，一九四二——一六三，一九四三——一八三」。二十日發表：「騰猛日守備隊於九月七日至碎、騰備日守備隊於九月十四日至碎」。

二十一日宇垣一成與坂西利八郎到北平見王逆克敏。二十三日「全日本宗教師三十萬人，神道十三派，佛教二十八派，基督二團體聯合組織大日本戰時宗教聯合會。定三十日成立。國庫津貼經費二十萬元」。同日接到芬蘭對日絕交書。二十五日宣布對波人民戰線派徒刑：山川均三年，鈴木茂三郎二年，向坂逸郎二年……共十九名，保於一九三七年以後被捕者，去年十一月開始審問。二十八日「今年火車生產至八月止，比去年同期間增加百分之四十。其中火車頭增加百分之二十六，貨車增加百分之十四」。三十日宇垣與坂西到上海。十月——四日頭山滿逝世。十二日美機開始大炸台灣，（台灣總督長谷川清適在東京焦腸日皇）十六日大本營發表台灣大海空戰戰果：日方損失飛機三一二架。二十日美軍登陸雷伊泰島。二十三日內三級法師遺骨已葬於南京郊外，日本佛教會分其一部於二十三日捧持分骨乘飛機返日，不久將擇吉奉安。二十四日，日本艦隊出動，菲律賓發生大海空戰。二十七日發表菲律賓大海空戰綜合戰果：

（被略）

日方損失：飛機一沉一傷，艦艇一沉一傷，驅逐艦二沉。未返飛機一二六架。二十八日設內閣閣員制，閣員十二名——有田八郎，末次信正，豐田貞次郎，結城豐太郎，山下龜三郎，鮎川義介，安藤廣太郎，小泉信三，正力松太郎，小泉又次郎，吉田俊之助。

（被略）

十一月——八日「山下奉文任菲律賓日陸軍最高指揮官」。十日汪逆飛歸病死於名古屋醫院。二十二日陸軍人事：「加後六元帥調充教育總監，岡村寧次大將接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下村定任華北日軍最高指揮官」。海軍發表使用新舊式及雷電式戰鬥機。二十四日「超級艦首次轟炸東京」。二十六日發表在菲律賓使用國產最新戰機戰鬥機「屠龍」。二十七日超級艦再炸東京。日本海軍發表在

菲律賓使用新舊戰機（雙發動機）「碧星及新政戰機」（單發動機）銀河。二十九日發表海軍「一式陸上攻擊機」（雙引擎中型攻擊機）。十二月——七日日本傘兵降落雷伊泰及棉蘭。八日大本營發表太平洋一年戰果（至十一月底止）。

（被略）

海軍新銳攻擊機（單引擎）「天山」，曾在台灣菲律賓使用。十五日陸軍公使到東京。十六日發表一九四五年日本一般會計歲出入預算總計（單位百萬）：二二、二四四。其中經常歲入一二、〇三五，臨時歲入一〇、二〇九（公債七、四九七），經常歲出九、一一七，臨時歲出一三、一二六。同日大東亞省召開駐華公使會議。出席南京大使谷正之，北平公使楠本實高，廣州公使田代重德，上海公使土田豐，張家口公使八里知道。同日發表「美軍十五日登陸明多羅」。十八日美超級艦集七十架空襲各古屋。十九日小磯內閣閣員改組：軍需大臣藤原銀次郎免職，遺缺吉田茂繼任。任命小林清為國務大臣。二十日加藤寺井久信（代表船舶會），前閣閣山下龜太郎已死。大谷光瑞（代表宗教）為內閣顧問。二十四日召集第八十六屆通商會議。

附錄已發現的「神風」肉彈機隊隊名：

屬海軍的第一神風特別攻擊隊有如下各隊：大和、朝日、山櫻、菊水、若櫻、初櫻、水母、梅花、左近、武藏、敷島等。屬陸軍的特別攻擊隊有如下各隊：宮嶽、磐石、八柱、一字、西尾、靖國、勤王、石川、丹心等。

會殺人 蘆蕪

談微發

記得在不久前的一个中午，自己照例是舖在房裡睡午覺，一個朋友突然把我從睡夢中推醒，在昏眩中帶着幾分愠怒的問他：「幹嗎？」他却興高彩烈的說：「美軍在福建已經登陸」。我搖搖頭表示不深信。他氣急敗壞的解釋說：「大家都傳遍了，街上說話都有說外」；他還沒有說完，又跑來了一個鄰居，他馬上補充說：「真的！真的！」

我親自看見……我問他看見甚麼了？他說「牆上貼的號外」，自己雖然還是疑信參半，但也從從上爬起來，心緒上自然也分增了一點喜悅。唯一的是等待明天的戰爭證實了；心裡想了一下，這對於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將發生一些甚麼影響。第二天早上，正在洗臉的時候，昨天報告消息的朋友，帶着一張報紙，滿臉沮喪的走進來，口裡連說「上當！上當！」他指給我中央社剛論的消息，我也應和着他說了幾聲「上當！」

昨天，這位朋友又來了，這回他是說：「……你聽說嗎？別人看見有照片呢？……聽說在山西照的。」接着他補充說明：「說的人是在公開的演講，他還說可以用人格、性命……來担保……」

於是，我想起了一個「會殺人」的故事，據說：這位大賢的母親正在織布的時候，有人跑來告訴她：「會殺人」，他沒有動；第二個人來同樣的告訴她，她仍然沒有動；當第三個人來告訴她的時候，她終於沒有動。這三次大賢的母親應該是最知道自己的兒子的行爲了；但當這三個人三傳三到地時，她也動搖了對兒子的信念，終於投杆而起

。如果信任會黨的還不嫌他的母親，恐怕她不會等到賊官再三傳到時，早已投杆而起吧！何況，時移勢易，造謠者的伎倆早就變賣他們的先輩呢。

據說，世界上製造謠言的伎倆，是算戈培爾博士最精明了。據他自己的宣稱，他自己造謠的態度是：「謠言要越說越容易使人相信，造謠者的態度是愈肯定愈容易使人相信」。雖然戈培爾的徒從，還不及他們的「宗師」，但對於造謠的信念却是「共通」的。

至於那些胡言亂語，其詞吧馬廐的小丑，那些以「祇痔瘡」為業的幫閒，除了應景應趣，討好主子以外，恐怕就是散佈流言謠言，以「奴才的唾沫」噴灑戰士們的面孔了。如果你真的相信他還有甚麼「人格」，「性命」來作担保，那就只能怪你自己太忠厚了；我們不會經看到過一些鼻樑塗粉的小丑，幾次賭掉了他的狗頭，和那不值錢的狗命嗎？爲着對主子的「先意承志」，他不僅會煞有其事的拍着胸脯的向你担保；如果他幸而變成一個女人，他決定會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向你哭泣着：「有人誘惑了我，他破壞了我的清白」！試想想，誰能相信這種來屈辱自己，誰還會相信這是造謠，於是他就到了憐憫，同情與信任……至於那些被譽的，既使是腳下惠也會被疑成「登徒子」了。這就是四川人說的：「黃泥巴滾褲襠——不是屎也是屎」。

至於這種任人作踐，猶恐不夠，尤復自己作踐的行爲，這正是幫閒們「自毀以求憐」的職能。而向這些「人」去我良心，要相信他們有可作担保的「人格」，那真是「見鬼」。

然而，高明如戈培爾，造謠的伎倆早已就顯不了清淨的人民；要用謠言來煽惑人民，讓被事實的真象，終於不過是一種心勞日拙的想法而已。既使像會黨的母親那樣，暫時動搖了對於會黨的高尚行爲的信任；但事實不就會證明造謠者的無恥，和會黨的偉大嗎？

對於這些卑鄙的幫閒，我一向是守着一種沉悶而最高的輕蔑的「」，但當着他們這種造謠，把奴才的唾沫噴灑在飛騰的時候，我也決不住掉頭更投向他們一聲「」！

談微發

解放區如何發動民衆堅持抗戰

寶府

「游擊戰爭，是被壓迫的民族或人民，由於他們與侵略者或壓迫者之間的矛盾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時不可避免的產物」。抗日游擊戰爭，是整個抗日戰爭中的一部份，而且是取得抗戰最後勝利不可缺少的一部份。它正是中國民族及其人民在遭受日本法西斯壓迫侵略於忍無可忍的時候爆發起來的。在領土廣大，技術貧弱與交通不發達的中國現在的條件之下，要戰勝強大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無疑的是應該廣泛的發展羣衆性的游擊戰爭，使之與主要的正規戰爭相輔而行，才是戰略指導的正確方針。不這樣做，要達到戰勝敵人的目的，是很困難的。

七年來，由於廣大地區的敵後游擊戰與正面戰場的「奇」「正」配合的作用，使我抗日戰，堅持至今，而猶繼續艱苦的抗擊下去，這種光輝燦爛的戰績，將永遠載在史冊。

堅持敵後作戰的各部隊，在這七年多來的收獲，是極其豐富而難以計量的，據一個材料的統計，截至三十三年九月止，十八集團軍對敵作戰共七萬四千餘次，平均每天對敵作戰二十九次。斃傷日軍三十五萬一千餘名，斃傷偽軍二十二萬九千餘名，俘敵軍官兵二千四百餘名，俘偽軍官兵十四

萬八千餘名。這等於消滅了侵華日軍之半數及全國偽軍之半數。××軍對敵偽作戰一萬七千五百餘次，斃傷敵偽二十四萬一千餘名，俘敵偽三萬四千餘名。在這幾年的殘酷戰爭中，十八集團軍××軍共傷亡指戰員三十九萬九千五百六十七名，其中陣亡團級幹部五百五十五員，（華南戰場尚無統計），解放了八十三萬七千方里的土地，解放了九千萬的人口，建立了華北，華中，華南十五個抗日根據地，奪回了縣城三十三個，建立起六十五萬正規軍，二百三十餘萬民兵。據新華日報十一月份的報導，在河南的黃汎區，沿平漢鐵路及其以西地區，在湘鄂邊，洞庭湖以北及其以西地區，在粵漢路以東及衡陽附近各地，羣衆性的游擊戰爭，也普遍的發展起來了。他們在分散敵人，牽制和疲憊敵人，配合正面戰場打擊敵人，起着不小的作用。

二

講到敵後發動游擊戰爭，是有幾種不同的方式的：

一、第一種方式，如衆所周知，是由敵富有游擊戰爭經驗的八路軍發動起來的。冀察魯與晉綏邊區的游擊戰就是這樣，當八路軍最初開赴華北前線時，敵人的鐵路，早已斷絕了冀西，察南和山西北

部 (被略)

。抗戰無人領導，難民遍地逃亡，土匪乘機起，散兵游勇，到處擾亂，流氓地痞趁火打劫，幾個日本鬼子拿起日本旗子，得到漢奸引誘幫兇，就可隨意佔領縣城，荼毒人民，老百姓處在這種境地之下，真有「呼天不應，入地無門」的苦痛。「八路軍來了」。由於八路軍的出現，使這種局面，並沒有繼續好久。八路軍深知要戰勝強大的周身武裝的日本法西斯，必須要發動全民的全面的抗戰。因此，所有八路軍的將士們，都是非常熱心誠意的幫助人民自己組織起來，武裝起來，人民有了自衛的力量，就敢於進行捕捉深探奸偵察敵人行動等各種工作，担負起保衛家鄉的任務，這樣，八路軍就有了幫手，就便於集中全部力量對付敵人。故當折口，太原戰事吃緊，八路軍奉命轉戰于關及其以南地區的時候，縱然在這些地區僅留下不滿二千人的兵力，（當時只留下一個獨立團，一個騎兵營和兩個不完整的連），然而由於八路軍的指導者能够大胆的武裝人民，相信人民的抗戰力量，能團結人民共同赴敵，所以很快的就建立起馳騁冀西、雁北、五台山的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創立起冀察晉模範抗日根據地。

冀中游擊戰，又是另一種方式發展起來的。

當敵人沿津浦、平漢兩鐵道線平行推進，我國大軍南撤之時，冀中的形勢，是非常混亂的，冀中的老百姓所遭受的苦難，比較路西的各地老百姓的遭遇，迥有過之無不及。這時，具有遠見卓識的呂正操將軍，瞻望着錦繡山河，環顧災黎遍野的家鄉，他立下了誓死守土抗戰的決心，再不聽着大軍南撤了。他堅決率領所屬兩個營，穿過了敵人的陣營

，直向敵後的冀中平原挺進，經過很短時間的艱苦奮鬥，就摧毀了深澤、正邱、安國、河間、獻縣、安新、高陽等偽組織，肅清了這一帶的土匪和漢奸武裝，展開了平原的游擊戰爭。

冀熱遼與山東游擊戰爭的發展方式相近，最初，都是由當地的共產黨員領導起來的。譬如山東，當敵寇壓境之時，失敗主義者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不顧山東人民的死活，自己早就逃之夭夭，對敵不敵一鎗的，就把山東拱手送給了敵人，韓復榘的政權崩潰後，山東全境除少數如范縣先專員之外，各級行政長官大都逃竄潛逃了，留下來的只有走頭無路的廣大人民。整個山東入於無政府狀態，更談不上什麼抗戰動員。於是山東各地的共產黨員，當即自動積極起來，擔負起守土抗戰的責任，號召山東全省人民武裝起來，保衛家鄉，抵抗日寇的侵略。泰安起義，可算第一聲號炮，領導這次起義的，是共產黨山東省委書記黎玉同志，同黎泰安的三十幾個黨員。起義後不久，就匯合了新泰、萊蕪的游擊隊（這兩隊的起義也是共產黨員領導的）這樣，就奠定了魯中山區游擊戰爭的基礎。

膠東游擊戰爭，是在濟南失守的當天晚上發動起來的。在那天，膠東人民聽聞名城陷落的噩耗後，是非常憤恨而對前途又感到彷徨。這時，文登的共產黨員，就在膠東地委書記李瑛同志領導下，集合了十七個人，攜帶兩支步鎗，就在文登的大佛山組成了一支人民抗日游擊隊，不到兩個月的工夫，這支游擊隊，就擴大成五六百枝槍一千餘人的大隊，成爲今天膠東的主力的前身。

冀東，初次爆發游擊戰爭，是在二十六年冬天，領導這支游擊戰爭的，是中共冀熱邊特委書記王平同志，他組織人的壓力太大，於平陸同志犧牲之

後，不再不暫時潛伏起來。次年，八路軍某部到達冀東前線後，遂掀起了人民抗戰的熱潮，於是灤縣有高培之，張光宇等同志的起義，兩月的奮鬥中，集中五千餘人。陳寰宇同志起義於昌黎，洪麟閣，楊裕民與李德昭同志等紛紛起義。李運昌，孔慶月兩同志領導起義於岩口，鐵廠一帶，王宗實同志起義於薊縣及廣龍高遷之、張德民等的起義。八路軍冀東挺進軍在各縣人民抗日起義響應之下，很快的壯大起來，組成了抗日聯軍，這就是今天堅持冀熱遼區游擊戰爭的主力。

太行區游擊戰爭的發動方式又不同。最初，是由平津逃回家鄉的青年學生組織的抗日救亡團體，中國共產黨當地黨員所領導的各種組織及山西新興進步勢力——犧盟會，決死縱隊等發動的。等爾後，八路軍一二九師開入太行山區後，就先後匯合了這些抗日團體，並派出大批幹部幫助他們進行組織動員組織等工作，這就是名聞天下的太行山游擊戰爭的起源。迄今，這支龐大游擊軍仍屹立太行山頭，成爲日本法西斯的死敵。

華中游擊戰，發展的時間，雖稍後一點，但發動的方式，亦大同小異，其中值得注意的，這支游擊軍發展最快而能普遍華中各地，倒是在民國三十年一月以後，從此時起，才建立起華中各地抗日根據地。目前計分蘇北、蘇中、蘇南、淮北、淮南、皖中、鄂豫邊、浙東各根據地，成爲將來戰略反攻時收復上海、南京、杭州、武漢等中心城市的基本力量。

東江游擊戰爭，目前範圍雖小，然已引起國際間的重視。這不僅因爲他的地位是毗連香港、九龍、廣州、橫跨廣九鐵路與珠江三角洲，主要的理由於他們幾年來對敵鬥爭的堅強，憑着自已體有的力

在廣大人民配合之下，粉碎了敵僞重兵不斷的「清剿」，「掃蕩」。在戰鬥中鍛鍊了自己，鞏固並擴大了根據地。在太平洋戰爭發生後，東江游擊隊，很英勇的穿插於敵寇層層封鎖之間，救出了許多國際友人與政府官員、文化人，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人士，大都經過他們這種威動護送回到後方。此外還救出許多抗戰器材。將來，在配合盟國軍隊在中國沿海海岸登陸作戰上，將具有頭等重要戰略意義。

這支游擊隊，是本地地方人民發起的。當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廣州失守後，廣州以南，廣九路兩側，就陷入了無政府狀態，這時，人民遭受到底層摧殘破壞的慘禍後，（被略）深深感到武裝自衛的迫切，於是拋出了過去埋藏下來的槍枝，拾起遺棄丟下來的武器，把自己武裝起來，游擊戰就此打响了。

二二

敵後各解放區的成就，昭示了我們，堅持敵後各部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與廣大人民結合後，很機變而巧妙的解決了一般人所認爲困難解決的許多問題：

一 人員問題，有人會這樣問過：游擊隊既無薪餉發給，生活又是那樣艱苦，兵員的來源與兵役的補充，又是怎樣解決的？這個問題可以這樣解答：第一，敵後人民既有了抗戰的自由，武裝自衛的自由，他們就勇於擔負起守土抗戰的責任，就有保衛家鄉，殺敵致勝的信心。第二，爲保證每個游擊隊員的抗戰的積極性與高度的抗戰意志，在徵求隊員的方式上，首先避免了強迫硬派的方式，而

採取了自願參加的原則。第三，經過當地共產黨員在黨軍中的直接宣傳和模範行動，吸引了廣大羣衆中的抗日積極份子，並經過抗日民衆團體的發動介紹，也湧現出許多精幹的游擊隊員。第四，游擊隊經常是以自己的英勇戰鬥來激發羣衆的抗戰熱忱，並在戰鬥中吸收廣大參加的羣衆加入游擊隊。第五，爲嚴防敵探漢奸的混入，隊員在入伍之前，一般的是經過了一番審查，這樣就可發揚每個隊員的戰鬥意志，又可愛國情緒，這就是人員的來源。

二 幹部問題 游擊隊的幹部，必須是忠於人民，忠於民族解放事業的優秀份子，同時又必須是能够與羣衆打成一片，善於組織羣衆和領導羣衆鬥爭並能具游擊戰爭知識的幹才，且最好是本地人。當然，這並不是說，每一個幹部一開始都完全具備了這些條件。就是各抗日根據地的創造者，也多半是從不斷的殘酷的戰鬥中鍛煉培養起來的。這樣的幹部，無疑的能够把這個游擊隊迅速而穩健的發展起來。八年來艱苦奮鬥的歷程，証明了今天堅持敵後抗戰的各部隊的領導者，不單是能帶領大隊人馬衝鋒陷陣，鞏固擴大部隊方面有其卓越的成績，而且對於搞政權，搞經濟建設，搞文化教育等工作，也有他的天才，這些幹部，爲什麼這樣多？多數是這正因爲他們是忠於人民，忠於民族解放事業的優秀份子，他們毫不吝惜的把全身心力獻給抗戰，建設新民主主義新中國的偉大事業。所以，他們無論做什麼事情，都做得有聲有色，縱然一時對這件事情不能幹，經過訓練，也就變成了能幹，困難也就變成容易，他們的智慧，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依靠羣衆，向羣衆學習，羣衆是他們的母親，他們的教師。

三 武器問題 游擊隊發展和鞏固的時候，武器是很少而且多半是破爛不堪的。然而由於中國社會的特點，過去連年軍閥混戰的結果，不少的槍枝散失在民間，加上各地的民團保安隊等地方武裝與地主官人家裏的自衛槍枝也很多，游擊隊經過了當地政府或民衆團體向之徵調借用，這是武器來源之一。其次，在抗戰初年幾個大敵役中，散失在戰場成千成萬的槍支，除一部分被漢奸土匪利用外，大部份成了游擊隊的武裝主要的來源。復次，努力奪取敵人的武裝，消滅土匪漢奸部隊，把他們的武裝來武裝自己。以及在可能範圍內購買或自製一些槍枝，如：土槍、土砲、步槍、手榴彈、翻子彈等。當然這些武器，還顯得十分貧弱，但對於利用這些武器，加上緊強的戰鬥意志，是能够打擊敵人，保衛家鄉的。

是很少而且多半是破爛不堪的。然而由於中國社會的特點，過去連年軍閥混戰的結果，不少的槍枝散失在民間，加上各地的民團保安隊等地方武裝與地主官人家裏的自衛槍枝也很多，游擊隊經過了當地政府或民衆團體向之徵調借用，這是武器來源之一。

四 給養問題 初期的游擊隊，既無財源開支，又無外援接濟，更不能獨立關卡，課糧收稅。因此，解決游擊隊的吃飯穿衣問題，是相當困難的。但他們能與人民結合，所以終於能羣衆來維持，採取的方式，由地方的動員委員會，各界抗日後援會及其他各救亡團體進行募捐，或由當地官有家庭的慷慨樂捐與採取合理負擔來解決。其次，是發動民衆的鍋缸運動，沒收日寇，漢奸的財產，燒燬敵人的糧食，如最近山東某縣攻下沂水，奪獲的戰利品，除八百九十一支步槍，十二挺輕機槍，十二門炮外，還有糧食七十多萬斤，花生米一萬多包（每包二百四十斤），油七萬斤，及食品罐頭六百多箱（見十月十五日新華日報二版）。至於沒有不脫離生產的羣衆游擊小組，則更是吃自己的飯，穿自己的衣，托着自造的武器，自動的担負救國的責任。

五 編制問題 游擊隊的編制，大體可分爲兩種，一種是基幹游擊隊，這是脫離生產的羣衆（或詳），基幹游擊隊在五百人以上的，按正規的三制編制，團的編制，編爲獨立營，獨立團等。游擊小組，同按鄉村分別組織之，有時，也可以集中成立一個區隊，大隊或支隊，共同打擊敵人。在編制中，一般的設隊長，政委或政治指導員，參謀長等分別担任指揮和指導，訓練管理的責任，村游擊小組，人數可不限制，三五個人可以一組，三十人，五十人也可以一組，須按具體情況而進行組織。

六 地方治安問題 游擊隊爲了打擊敵人，當然要游也要擊，故地方上，還必須組織自衛隊，編好隊，巡邏隊等，担任守夜，放哨，檢查外來人，檢查路條等工作，當然，担任這些工作的，不可能都是壯丁了，而是由年紀較大的或不及兵役年齡的人與及壯年婦女，這些人，一經組織起來，就是力量，人無分老幼，性別不分男女，只要有救國的決心，皆能担任保衛家鄉的責任。這種全民動員，在各抗日根據地，是司空見慣了的。

七 爲了統一領導，便利人民，發揮人民抗戰的力量，抗日民主政權也就逐漸形成起來了。於是政權的三三制，發展生產，減輕負擔，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等逐步實施。這就鞏固了抗日根據地。

四 敵人幻想消滅我堅持敵後作戰各部隊和各抗日根據地，連年來采用了所謂未雨綢繆的手段，其最危險的演變，也是無奇不有的。由短期掃蕩，進到長期掃蕩，由分散掃蕩，進到集中掃蕩；由中斷掃蕩，進到循環掃蕩（少者亦三兩個月）

；由點線式的掃蕩，進到縱深掃蕩；由分進合圍，進到分區清剿；由長驅直入，進到步步為營（乘隙進）；由逐步推進，進到鐵壁合圍。由就地使用兵力的掃蕩，進到輕騎別快掃蕩，梳篦清剿；由無組織的燒殺，進到有組織的三光政策；由經濟政策，進到政治、經濟、文化、特務聯合進攻的「總力戰」；由治安肅正，進到治安強化運動；由因循政策，進到掃蕩奔襲，洩水戰術，鐵棒式的三層戰法等。爲了便於清剿、捕獲、敵人又把各根據地及其周圍，如鐵桶式的包圍起來，週地務業封鎖溝。牆及星羅棋布的碉堡據點。（據點周圍與鐵路公路兩旁，有多至七層的封鎖溝牆。據點的密度，以冀中爲例吧，計有一千八百餘個敵偽據點，有一萬多公里長的汽車路，把這些點、線、溝、壘相互聯結起來，中間的空隙，平均約五里上下，最大的空隙，沒有超過十五里以上，在這種狹仄的地區內，再來進行清剿、捕獲、把八路軍「消滅」。然而八路軍並沒有被消滅掉，八路軍與堅持敵後抗戰的人民，團結像一個人樣，日益堅強壯大起來，成爲（被敵）

敵後軍民是怎樣粉碎了敵人這些慘絕人寰的進攻掃蕩的呢？從下面的幾段描寫，就可以看到敵後軍民與廣大人民，如何經過艱苦戰鬥與靈活巧妙的戰術，戰勝了敵人。

「此外，尤不可忽視者，即與此游擊戰相配合之政治活動，於共產軍地區中，無分老幼男女，皆被彼等所訓練，於情報之探聽及傳遞，更爲特長，以此與游擊戰相配合，實有不可漠視之點。」「化整爲零，化零爲整」，尤爲彼等之拿手戲，化整爲零，則兵員分散，易使追剿軍隊喪失目標，難於搜查。化零爲整，則力量集中，亦可收擊敵之效，以上所述，皆彼等共產黨軍所用之戰法」。（見偽山西「新民報」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該報隨軍記者張文心作「癸未春太行作戰紀評」）

「（一）共產八路軍之軍事活動特徵爲游擊戰，八路軍採用此游擊戰之根據，依彼等所言，由一般戰術而變之，日本進攻，則中國防禦；日本希望速決，則中國以持久戰應之；日本外地作戰，則中國爲內地作戰；在如此之條件下，爲打破優勢之日軍之各個戰鬥中，保持主動性，由敵活之兵力之集中分散乃至轉用，應反覆奇襲，……其具體之手段，先努力偵察，完備情報網，調查我方情況，如薄弱即行襲擊。又在日方進擊之時，任意利用地形地物，加以射擊，埋地雷，此地雷戰法，最近特別顯著，在五六月掃蕩之時，在阜平縣五支溝，以李勇爲中隊長之游擊隊，利用地雷，收極大效果，作爲炸彈英雄，係游擊戰之重點。於此，此次對日方之肅正作戰，以「有組織之地雷激戰」之展開，爲「反掃蕩必須任務」之一。

「（二）游擊戰八路軍特別注意者，即爲與民衆之關係，八路軍由裝備之點觀之，與精強之日軍相比較，當然不成問題。然彼等若能進行游擊戰者，係因民衆有力後盾。換言之，用強力之政治力把民衆，自在活用，即由政治，經濟，文化諸工作，來謀福利民衆，尤重大多數貧農利益之維護，「一線子弟兵與人民如魚與水，應一線團結掃蕩敵寇，保衛我等邊區，保衛我等祖國」，八路軍將兵中，有八項注意：言辭和氣，買賣公平，借物必還，破

壞物必須賠償，八路軍爲民衆如此，使與民衆關係良好，作民衆或裝組織，直接間接協力游擊戰。」「此種民衆，各以年齡，力量爲游擊戰各執一役。對八路軍之觀念，若想像爲荷槍之士兵，則爲極大之錯誤。冀西之住民，悉爲八路軍，絕非「參看偽「庸報」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戰地通訊」。

從上面這幾段的描寫中，從敵偽報紙對八路軍戰略戰術之評價中，已够我們了解游擊戰在整個抗戰中的價值及其重要作用，要善於掌握游擊戰的規律，必須善於團結民衆，爲民衆謀福利，尤其照顧大多數貧苦的工農大衆的利益。這就是游擊戰的神秘地方」。

五

今天，敵寇攻勢的攻勢尚未停止下來，企圖得捷再犯我瀋陽乃至四川的野心，並未死去；在我華北總敵擄掠了的魔王，敵酋岡村寧次被任爲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進至黔桂前線指揮作戰，其用意之毒辣，是顯而易見的。我們應毫不遲疑的研究各抗日根據地發展經過，及堅持敵後苦戰八年的各部隊對敵鬥爭的經驗，把這些經驗運用到敵佔區區域去，凡是有廣大人民生活居住的地方，就堅決把人民組織起來，凡是能發展組織的地方，就一寬大胆的把他們武裝起來，就一定按照當時當地的具體實際情況，發展抗日游擊戰爭。只要廣大人民能自由組織或武裝起來，他們就一定自動而有力能保衛那塊地方，一應是這樣，一區是這樣，推廣至一縣，一省，何嘗不可這樣？只要這樣做，敵人就是把我們沒奈何的。只要肯普遍的發動羣衆性的游擊戰爭，使之與正面戰場正規戰相配合行動，就一定能夠戰勝敵人，新中國就一定能夠建立起來。

在街頭，偶然瞥見一個舊時的教師，望着他鬚髮蒼然的神態時，我又想起他教書時的情境：當東北四省淪陷後，有些人在提倡「共存」、「提攜」，報紙上在希望某些人因為私人關係而到盛中日與交時，這位老教師特別選出「史可法致多爾袞書」來教我們，而且在上課前，總是諄諄訓誨着要明敵我之分，義利之辨，而注意出處進退，辭受取予這些做人的道理。當他每一大節說到：「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也……」的時候，總是老淚縱橫，咽不成聲，自己當時雖然不完全了解他的意思，但對於他這種愛國的忠誠，却是衷心感動的。

春 秋 之 義

蘆 蕪

寒夜挑燈，又想起這位老教師，又想起當時唸書的情形，在書架上翻出「史可法致多爾袞書」一讀：畢竟年餘校長，閱歷也多了一些；如果當時還只是感動於老教師的愛國忠誠，今天，却已經共感於他當時的孤憤了。

當讀到「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也……」時，閉目凝思，想想史可法信譽，所謂春秋之義的出處；想想大概是布衣梁傅樞面。大意是祭伯在十二月來，但經上不稱他為朝，據梁解經是說：沒有天子的命令，就不能會諸侯，要不就是「不正其外交」，而不使他朝見。

想想，今天雖然早就沒有「君」這些皇帝老官，但這個話，似乎很有道理，如果一個當官的（大夫）和別的國家——尤其是敵國，私相授受，互相的往來，你想，這還成甚麼體統。所以孔老先生當時說「大夫無私交」，正是與「不正其外交」的原故。

至於「大夫」而有「私交」的，在中國歷史上不難找到很多這類例子，張松獻地圖固然已經很遠；近者如像屍骨未寒顧亭之的汪精衛，在他公開投降以前，不早就和敵人勾勾搭搭，眉來眼去，信使往還嗎？雖然在人民面前披着莊嚴的袈裟，但結果是從局部苟且的「私交」，終於走到完全背叛中國人民的投敵了。

至於婦孺皆知的例子，宋朝的大漢奸秦檜，公開出賣宋室，殺害岳飛以前，不早就和金人信使往還，互通消息嗎？

至於那些倚仗於敵我之間，賣身投靠，兩面三刀，一方面以英雄的姿态欺哄人民，一方面又以奴才身份乞討饒幸冷炙。而且海上歸來，便成新貴，搖身一變，又是英雄。至於執戈之士，偷生事敵，原本李陵，便於一變又成蘇武，獎券出於官方，頗耐見於報紙，「春秋大義拋於腦後。至於那些勾勾搭搭，信使往還，「不正其外交者」又豈少也哉。

「種族家國，滿胸孤憤者又豈止於鬚髮蒼然的老教師而已，我輩

談 微 發

歷史能夠證明中國不需要民主嗎？

沈友谷

有人說，中國古代的政治理論是民主主義的，歷代的實際政治也是合於民主主義的。對於這種說法我們曾經批評過，並且指出，把那為封建專制主義辯護的理論當做是民主理論，把那對封建專制主義的實際政治當做是民主政治，那與其用意無非就是主張保持、復活這舊有的理論和實際政治，而美其名曰：實行民主，實行「中國式的民主」。（見本刊九卷三四期，「評錢穆先生的『教育與文化』」。）

拿四千年來的中國歷史來看，其中並沒有任何時期實行過民主政治，這是確定不移的事實。在古代的種種歷史條件之下，本不可能有現代的民主。那種拿歷史開玩笑，對當前實際有害的主張自然不免於受到一切有識之士的排斥。譬如在「自由論壇」（昆明出版）二卷三期的社論中說：「或謂中國傳統的政治，自有其民主之成分，中國將自成一獨立之型式，造成中國式之民主。持此種論調者，當思牛世紀前，我不志青年紛紛身碎骨以企推翻者，果為何物？如中國傳統政治中而果可發揮民主，則國父當年領導政治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豈不全成無意義之舉動？故此種說法之荒謬，不問可知。」又如「憲政月刊」（重慶出版）上周谷城先生說：「或以為中國歷來是一個民主國家，他們的言論足以阻礙民主的進行。中國既是一個民主國家，則今日的民主運動當然為多事，故這一種意見，隨便就把民主運動一筆勾銷，而成了民主的障礙。我們認為中國一向不是民主國家並不是中國之恥。世界任何國家只要他有民主，都是否定歷史上的專制而成。若說一個國家自古至今都是民主的，倒實在歪曲了歷史的進化公例。」（該刊第九期）。本刊第十期上張友漁先生有「民主運動和復古傾向」一文，詳細地指出了在

中國歷史上並無民主理論，更沒有民主政治，指出封建專制者御用的辯護論說不能解釋為民主思想，封建時代的專制主義官僚主義的政治更是和民主政治絕對相反，所以他說：「我們萬不可牽強附會，硬說：中國數千年來的封建專制君主專制政治是民主政治，更不可說是中國式的民主政治。因為這會妨礙了民主運動的發展，並惹起全世界的誤會。」

但還有一種說法，也是以本國歷史為根據，同樣要達到在現實中反對民主的目的，但不同的是另一套花樣。這種說法不是把歷史亂加解釋，以證明中國過去早已有民主政治，而是老實承認，中國過去的確沒有民主政治，但他們說，過去秦漢唐宋歷代所實行的雖然不是民主政治，然而是很好的政治，那種政治會造成國富民強，民安物阜的好時代，由此就可證明，中國的情形特殊，要把中國弄好，並不需要民主政治。

很容易看得出來，這種論說也是經不起一擊的。首先，一種制度，在從前的種種條件之下縱然行之有效，也不能由此證明到了現在的種種條件之下還行之有效。而且從前的那種政治是否說好的，值得讚美的呢？是不是一真的造成了什麼值得我們留連回味的時代呢？除非是站在專制統治者立場上說話，是無從對這問題作肯定的答覆的。

我們更指出，根據一部封建專制主義時代的歷史，並不能證明中國情形特殊，不能或不必要實行民主政治，而且恰恰相反，中國的一國情一也和世界一切國家的「國情」一樣，可以證明只有民主政治才是好的政治，不民主的政治只能產生壞的結果。在中國的土地上並沒有任何特殊條件使得民主政治永遠不能產生。

有人說，中國古代早已有最好的「政治哲學」。比起「中國的政治哲學」來，什麼孟德斯鳩，什麼盧騷，都是不值得理會的。

所謂「中國的政治哲學」是什麼呢？說來說去，原來不過是什麼「大學」中的「八目」，「中庸」中的「九經」。

所謂「大學」中的「八目」又是什麼呢？大家都知道，那便是「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套道理。據這套在科學時代，兒童們必須念得滾瓜爛熟的「大學」中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必先修其身。」等等。這就是說，一個人把自己的一身修養好了，就能把自家弄好，能把一家弄好，就能治國平天下了。我們且不問這所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實際內容是什麼，只看，憑這樣簡單的邏輯而能把現代的國家大事做好，那是連說給小孩子聽也不能相信的。

所謂「中庸九經」的內容也差不多。「中庸」上說：「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這更顯然的，不過是在向專制君主說，你應該好好地任用你的臣下，你對人民應該像對兒子一樣地慈愛，你對你的本家和姻親也要多給他們點好處，不要使他們抱怨。（「尊其位，建其祿，兩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到現在，假如還以為這些就是一個國家的內政方針，以為「來百工」就是經濟財政政策，「柔遠人」、「懷諸侯」就是外交政策，那豈不是滑稽而荒唐的事麼？

自然，這些「八目」、「九經」的「政治哲學」是無法附會為民主主義的。而事實上，這些也正是在封建專制時代產生和發揚的。封建時代的十大史本這套「哲學」來勸導帝王當做進身之階，專制統治者也樂得用這套「哲學」來粉飾和美化專制統治的秩序，來欺騙和蒙蔽被統治的人民。

假如帝王真正照這套「哲學」所要求的那樣做了，他在封建專制時代自然要算是一個好皇帝，但專制政治還是專制政治，是否就能達到國泰民安的目的，也還是個問題。而且事實上，歷代統治者儘管是宣傳這套「哲學」，其實並不真按這套「哲學」做。

說「修身」吧。歷史上有幾個皇帝不是窮奢侈汰，縱慾淫亂的呢？（所以偶有如漢文帝，隋文帝那樣「節儉自守」的皇帝便更談不上了）。又有幾個時代在官僚集團中不是充滿着達達苟且，貪污腐化等現象的呢？（所以偶有所謂政風整飭的時期便更談不上了）。說「齊家」吧，那麼專制統治者的家恰恰是最不「齊」的。所謂「親親」固然是做到了的：宗室都是封侯賜爵，外戚也都位尊祿重，但是在這「皇家」里面，相繼衝突的事情也最多。或外戚擅政，或母后竊權，有兒子殺掉父親的（如隋煬帝），有嫡庶爭位，兄弟互相殺害的（如唐太宗，明成祖），有兄弟叔姪之間大興干戈，引起巨禍的（如漢代七國之亂，晉代八王之亂）。皇家的内幕當成為寫官閥秘史的好材料，這些在我看來，固然是什麼重要的歷史現象，但也正可證明統治者的一齊「治國論」原來不過是說來騙人的。

至於「治國平天下」更常是只存在於士大夫的幻想中的景象。這種幻想倘若實現，也不過是有一個比較善良的皇帝在上面，他能暫時地調劑並緩和各種矛盾，使一切有資格做官的人都有官可做，使「庶民」，「百工」都能為奴為婢，安居樂業。但這種「好景象」在綿延二千年的封建專制主義時代中也只是偶一出現。實際的歷史是繼續地循環「一治一亂」的規律前進，而亂時總是比治時長得多。假如以為在古代有這種「好的政治哲學」，就可以證明古代一向有着好的政治，或者以為只要現在恢復這種「好的政治哲學」，就能夠實現「治國平天下」的黃金時代，那都不過是癡人說夢而已。

三

雖然也有人稱頌乾隆六十年的一「開疆闢土，治國安民」的偉績，也有人把蒙古的披都西征當做是中國民族的光榮，但是究竟無法否認元、清二代是異族在中國專制統治。歌頌傳統政治的人，既不便公然贊美異族的「治國」，便想拿這兩代的情況為例以證明中國的文化優越，能夠同化異族，這不過是阿Q心理的表現而已。

那麼開元濟二代，去看看宋明兩代吧。傳統政治歌頌者也還是難於振振有辭的。這兩代都是力求強化中央的集權統治。但強化專制統治的結果，

却只得得到國亂民亂的現象。在宋朝是始終對外族的侵略委曲求和，弄到偏安江左，還向侵略者納幣稱臣，自居藩屬。在明朝是初期困於北虜南倭，國無寧日，繼則在一個初興的滿洲部族前，節節敗退，終於亡國。在宋代的專制政治下，養成了秦檜，秦檜，賈似道一類的奸人當政，弄得朝政紊亂，民情怨憤。在明代的專制政治下，實際權力更落到了目不識丁的太監手里，宵小當朝，賢能去位，酷吏橫行，民變四起。這一切都是任何人無法為之掩飾的。

固然在這些朝代中，也會一時有過振作有為的氣象，像宋神宗之任用王安石，勵行變法。但王安石的變法並沒有刷新宋朝的專制政治，這正是因為他的變法的辦法，不能根本打破封建統治秩序，所以總是無濟於事的。

所以歌頌傳統政治的人也不得不讓步說，中國的政治哲學雖然很了不起，但是近一千年來的實際政治却的確是不大高明；要看到中國傳統政治的成功，應該到一千年以前去找。——於是他們就找到了漢代和唐代。

但假如把整個漢代和唐代的歷史都當做優美政治的典型，那却是連這些歌頌者們自己也不敢承認的。漢代有外戚母后宦官迭相擅政，唐代後期的官餘年間也是宦官執掌軍權。漢代有黨錮之禍，關了幾十年，唐代也有朝臣間的朋黨之爭，結果總是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漢唐二代都以武功強盛著稱於史，然而兩漢的國力強盛為期甚短，很快就對外國戰爭中消耗殆盡，東漢的羌人以烏合之眾起事，竟至動搖國本，唐代在中衰後甚至連請異族兵力來平內亂，以致肅宗回乾吐蕃縱兵盤據國都。漢代的中央集權不久即趨渙散，形成了各州牧和郡太守的擁兵割據，唐代經安史之亂後也造成藩鎮割據的形勢，中央政令，行於一隅。——這一切顯然是封建專制主義的病態的發露，而在兩漢的四百年，和唐代的三百年中一大半時期都在這種局勢下過掉。這使得傳統的禮贊者又不得不再度讓步，使他們禮讚的對象只限於漢代的武帝以前的一百年間和唐代的貞觀以後的一百年間。

就讓我們承認這兩百年的確是「黃金時代」吧，但是在封建專制主義綿延兩千多年中，充其量也只得十分之一時期的好光景，還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呢？

誇耀漢唐的人無非是說，在那時，有過「國富兵強」的時期。但我們必須進一步來看一下那時的所謂「國富兵強」的實際情形，到底怎樣。於是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所謂國富兵強是建築在千百萬農民大眾的血汗

之上的。漢代開國以後，加在農民身上的田賦是田賦和口錢算賦（人口稅）。田賦名義上是十五分之一乃至三十分之一，但「賦名三十，實什稅五」（食貨志）這就是說實際上農民的負擔是百分之五十。人口稅從三歲起就要開徵，弄得「民重困，以致生子輒殺」（漢書食貨傳）。此外還有種種雜稅和臨時稅，如諸侯王入朝時徵「獻賦」，皇家建進宮室，對外發動戰爭時也要抽特別稅，牲口也要抽稅，「貨及六畜」。再加上豪強的兼并，官吏的貪酷，所以到了武帝之世，農民失去土地，輾轉流離，賣身為奴的已經很多了。武帝時，進行對外戰爭，就大量地徵發這些奴隸和囚徒（亡命）去組成軍隊，甚至為了西域的幾匹名馬就使十萬人葬身於大漠中。這就是漢代的國力強之下的實況。唐代也是同樣。開元盛時的詩人已經說破了長安城裡的繁華富貴的内幕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杜甫），也指出了「天可汗」的威風不過是「士卒塗草莽，將軍空關良」（李白）。原來封建專制主義是從全國各地分散的農民大眾身上用強制方法聚斂，粟帛和勞役，集中起來，構成了一時的富強；整個統治機構淹沒在全國貢獻的積累中安富尊榮，自然而然地一天天腐化下去，而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嚴對的因素和混亂不安的危機了。這就是武帝的「雄圖大略」已埋伏下後來的漢室衰微的根子的原故，同樣這也是開元天寶之際，唐朝國力雖臻極盛，但禁不起「漁陽鼙鼓」的一擊，立刻如冰山一樣頹廢的原故。好像是急轉的舞臺面一樣，「國富兵強」的黃金時代在一轉瞬間就變成了內憂外患的極景，這難道是偶然的嗎？這豈不正是在證明，寄生於人民的供養上，姑息和人民敵對地位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富強是靠不住的！

固然我們可以承認，文景之治（漢文帝景帝），貞觀之治（唐太宗）算是封建專制主義政治的最高樁樑。但不論我們可以對此舉出多少優點來，牠們終究只是專制主義政治，不能真正使萬民安康，也不能克服在統治機構內部滋長起來的腐爛毒害自己的因素。我們應該從一定的歷史條件上來給以估價，却不能像那些妄人一樣，以為唐太宗型的政治，就是實際政治中的最高理想。

四

反對民主政治的人常說，在民主政治下，不能產生强有力的、統一的、

穩定的政權。
雖然民主政治不能產生這樣的政權，難道不民主的政治倒能有這樣的結果麼？

拿現有的各國政治看，德國、日本的法西斯統治政權固然似乎曾一時地表現得統一、穩定、強有力。但是到了現在，任何糊塗的人也不能不看出來，在這種強制執行的統一和穩定中是已埋伏着激烈的洩憤互解的根子。這種和人民的意志相對立的權力結果總不免於全面的崩潰。

拿歷史來看，歷代封建專制主義政權的命運也是證明着，在民主的政權下，是最不穩定的，最易於渙散分裂的，最易於承受起危險困難的艱難的。

難道說秦漢所建立的政權，是一個穩定鞏固的政權呢？雖然當時他自以為是萬世不壞的帝業。西漢時人指為秦的政治說：「任不肯而信聽賦，官望適度，時感無極。民力疲盡，賦斂不節。矜奇自賢，賢臣忠諫。臨深履薄，不顧風波。妄賞以隨喜，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重，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國。秦之吏，乘其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東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亂離皆危，內外咸怨。雖逃遁散，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通鑑的賢良對策》）——這所描寫的秦代情形可以若做是在封建專制主義政權下的一般表現出來的病態和必然達到的結果。漢代秦而興，雖然國祚綿延四百年之久，但也經常在不穩定的危機中動盪着。上引通鑑的話正是引了秦代的先例作為警戒的。

通鑑上書在文帝時，其時上距漢開國已五十餘年。這算是政治清明向上的時期。但是就在那時，眼光比較深遠的人已看到潛伏的危機了。當時還有賈誼也在向皇帝的對策中直說道：「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且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即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撥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即燃，因為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這警喻是非當明切。專制主義的統治政權正是經常在埋伏着火種的積薪之上，當火還沒有燒近身體的時候，就叫做「治平之世」，一旦燒到了跟前就叫做亂世了。

賈誼上書中提出了當時勢中「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

太息者六」。錄他的意思，其時最去應注意者是兩點：第一是諸侯王國的分裂的危機，第二是社會中上層階級迅速，下層的飢寒傾軋，他說：「飢寒傾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虛矣，盜賊區區時耳。」至於他指出，當時匈奴的力不適當漢一大器，而漢竟不能制，這自然是因為內部危機大大減弱了其對外力量的原故。

專制主義者雖然力求把一切權力都集中控制在一人之手，但在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却永遠無法根本消滅。漢朝期分封子弟為諸侯王而造成的危機，用賈誼的話說人的獻策算是削平了，可是在統治集團中的內部矛盾以後仍舊在別的形式下更猛烈地表現了出來。其他漢代也無不深受這種危機的侵蝕。無論是皇室中嫡庶的爭立，或是后妃與外戚的奪政，或是朝臣中的朋比傾軋，都是這種危機的表現，都是在統治集團內部這一部分力量與另一部分力量因分割與爭奪而形成了尖銳的糾纏不濟的鬥爭。最後現得樞要的便是一權的分散和地方的割據了。如漢代末期的州牧與郡太守，唐代末期的藩鎮節度使，魏或名義上還承認中央政府，但已勢成兩斷，終至形成三國和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由此可見，專制主義政治想在帝王一人之名義下維持向心力於不墜是極不穩的；在統治集團內部都不能形成真正的統一，這政權怎能穩定呢？

而且，專制主義政體的成立本是以剝削全國人民的血汗為基礎，則其與人民間的對立更是無法消除的。雖然用所謂愛惜民力，行施仁政的方法，也解決不了問題。漢代雖有輕徭薄賦之名，不過使大地主大商人得自便宜，對於農民並無好處。漢朝時也有過不加田賦的詔諭，但農民實際負擔仍是一天天地加重。這種情形自然造成了人民對於統治者的怨對的情緒，使人民對於國家過不了官做機構而發動的任何事情都不能發生興趣。專制統治者的一切政令與措施既不是為人民的利益打算的，在實際執行中更常常是擾民害民，自然是不可免地遇到人民的消極怠工和破壞，因此專制統治者對政權也就更加不能穩定與鞏固了。

專制統治機構的腐敗和它內部的渙散對立的危機，使得她在一遇到災變的時刻時，自然無力應付。所謂突發的災變，最嚴重的便是水旱天災和外寇的入侵。人們常說，中國封建時代之所以需要統一的政權是為了從事兩項工作，第一是治河防災，第二是防止外寇。是的，這兩項都是大事，是和人民大眾有切實利害關係的，也可說是和專制統治機構生命最關的。但是歷代的

專制統治者是否能把這兩件事做好呢？

在古代的技術條件下，絕對消除天災對農業的威脅，固然是難以做到的，但是以剝削農民為生的專制統治者，總敢貪污的貪婪搜括不但不敢減輕天災的為禍，反而是更把它加深了。治河雖列入歷代的要政，但河工却成爲官僚們發財的好差使。結果河自然水患治不好，而一遇災禍，立刻就弄到不可收拾了。

歷代入僱異族的武力其實並不是擁有絕對優勢的武力。中國方面所以常常失敗不能歸咎於政治上的弱點。宋明兩代是顯而易見了。契丹、女貞、蒙古、滿清之所以得逞，宋明之所以放棄許多艱難戰的良機，自甘屈辱，步步妥協，實在是因爲專制統治者顧全自己的地位，更甚於對外寇的原故，也因爲官僚機構內部因循推委，排擠傾軋的原故。譬如宋朝在南渡以後，以韓岳軍力和北方民軍的力量未始不能一戰，而且當時的戰局已開始有轉機了，但是宋當局仍爲了貫徹中央集權的目的，寧可殺岳飛、罷韓將兵權、斥民軍爲寇盜，卒至自趨於亡國的道路。明末肅清、袁崇煥諸將以少數兵力守邊，滿洲已不得逞，然而結果呢，將才被黜，邊防空虛，寧肅外邦，不與家奴，開門揖盜，造成了三百年亡國的慘禍。

不能逃天災，就失去了富的保障，不能禦外寇，就談不到強大。由此，怎能說專制統治者能形成富強的國力呢？

五

還有人提出一種說法：不管民主政治怎樣好，在中國却實行不了民主。因爲民主是要人民來管理國家，做國家的主人，而由歷史可以證明，中國人民向來是忍苦耐勞，並不願意過問國家大事；而且中國人民向來是無知無識，並沒有能力管理國家大事；假如讓他們來管事，就不免於出亂子。

這實在是對於中國人民的極不公平的估計。
在封建專制主義時代，究竟是人民自己不願意去過問國事呢，還是人民得不到過問國事的權利呢？是人民沒有能力管理國事呢，還是人民沒有機會學習管理國事的權力呢？——這問題是清清楚楚的。

歷代封建專制主義者都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策下用愚民教育，奴才教育來愚弄人民。秦始皇焚書了天下書籍以愚黔首，滿清的皇帝

頒佈「聖諭廣訓」來誦誦人民。他們又在實際政治中壓制人民的活動，使人民沒有一點政治權利。政治被認爲只是士大夫做官的人的事情，老百姓是沒有分的。魏晉以後至唐初，只有高門大族的人才能做官。科舉制度實施時，雖然好像人人皆可應考，考中就可做官，但是實際上，不僅有許多下層社會的人根本沒有應考權利，而且在當時，讀書入學必須脫離生產，十載苦讀，也決不是一般老百姓家庭所可能做到的。——在這種情形下，人民當然無從過問國事。

有許多人說，能「忍」是中國人民的優美的品德。忍苦耐勞固然可說是一種美德，但也不能由此得到結論：所以中國人民的生活無須改善。更假如把這一點誇大，把中國人民忍受專制政治的壓迫也當做優美的品德而誇揚，那就更不對了。因爲這其實應該看做是一種缺點，這缺點的產生是因爲人民一向過的是分散的個體勞動的農村經濟生活，更加上了專制統治者的愚民教育和壓制政策，所以在人民中就增補出了這種安分守己，少管國事的態度了。由此可見，這種缺點雖是有的，但並不是天生的，不可改變的性質，更不該把缺點當做優點來捧場，以爲還要發揚光大。

但就是在封建時代的經濟生活和實際政治中，人民也並不是永遠逆來順受地容忍一切的，他們對於所身受到的苦難也會表現出一些反撥的行爲。這種反撥行爲雖然只是向欽差大臣的「對與告狀」吧，也說明了人民對於政治不是沒有意見的，不是沒有過問政治的要求的。「告狀」是專制統治者唯一允許人民表示意見的方式，雖然人民從實際經驗中知道「官官相衛」，「與虎謀皮」而且會「惹禍燒身」，但也還常常冒險運用這種方式。

超過了統治者所允許的方式而作過問政治的表示，這在歷史上也並非偶見。如在北宋欽宗時，抗金有功的李綱，師道被罷免，主和求降的李彥博高居，人民就起來表示意見了，宋史有這樣一段記載，雖是簡略，但也可見如火如荼的場面：

「大學生陳康等及鄉民數萬人伏闕上書，請復用李綱及韓侂胄。且言李邦彥等疾縱韓其成功，謂綱足傾金人之計。令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吳敏傳言，衆不返。遂令開城，山呼動地。殿帥王宗彥恐生變，與上勸從之。遣歐陽仲誠於衆曰：已得旨宜納矣。內侍朱拱之宣稱復期，衆憤而殺之，並殺內侍數十人。乃復糾右丞，充京城防禦使。」
由此可見，雖是在封建時代，一到國事最危急時，人民也要自應出來過問國

事。他們有他們的非判斷，有他們的主張，並不真是一切俯仰隨人，聽憑在上者的一意孤行的。由這種方式更進一步，就是歷代所謂農民叛亂了。歷代農民叛亂雖然往往套着宗教迷信的外衣，但總是含着一定的政治內容，尤其明清兩代的農民叛亂更是明白地標出了政治主張。由這些事例更不能證明中國人民向來是不願過問國事的了。

至於說，人民沒有能力管理國事。在全部歷史上，人民既然從來沒有得到過參與政治的權利，更從來沒有站到過管理國家的地位上，那麼這段歷史怎麼能拿來測量人民管理國家的能力呢？

在李自成進了北京城以後，在太平天國建都南京以後，都可以算是在封建時代，人民自建國家的試驗。假如由這些試驗的失敗來證明人民沒有管理國家的能力，那是很不對的。是的，這些試驗是失敗了，但是應該看出，這種人民隊伍是由封建社會中的農民組成，並由農民中產生自己的領導者的。所以牠較難以避免游民浪人在它內部所起的破壞作用和城市對它所起的腐蝕

作用，而當這些危殆牠的作用逐漸增高的時候，牠在組織上的散漫性，行動上的破壞性，和缺少遠大方針與其體計劃的現象，也就更加突出了。所以在歷史上人民的失敗倒可以反證，當人民的隊伍的組成分子及其領導成分有了變化的時候，他們就能够做得更好，做得成功。

而且即以封建時代來說吧。純粹由農民自動組成的軍隊和國家雖然有着種種缺點，但是比起專制統治者的庸庸軍隊和官僚機構，我們很難說，前者一定不如後者。相反的，我們可以看到，這雖然是農民的自發的行動，但仍常能保持內部的紀律，組成龐大的隊伍，運用靈活的戰略戰術，並用適當的口號和方式來團結人民，尤其是太平天國的各種政制文物，更充分表現出了中國人民在政治上的創造才能。——這些實在可說是中國封建時代人民所創造出來的奇蹟。

所以，從過去時代的中國歷史中，仍可以證明中國人民是願意而且有能力參與政治生活的。歷史是嚴格地拒絕為我專反民主的理由的人作証人的。

代 郵

△化平先生，感謝您對本刊提出的批評意見。您提出的一些問題，我們覺在今天知識青年中具有相當的普遍性，準備在本刊讀者之頁提出，請本刊讀者參加共同討論。並望以通訊地址見示；以便對其餘問題作覆。

△黎子、旅震、周均三先生：賜信均已收到，黎子先生來信提到成都市中事件，我們會為之評論，但不幸登不出來。因為三位提的問題都談及目前學校教育，我們寫了一篇雜的答覆：「誰使我們消沉與苦悶」，但也登不出來，謹此致歉。希望今後隨時提出問題、共同商討。

△炳光先生：賜信及抄引之「聖經」均已讀到，有暇請到本刊編輯部一談。

讀者之頁

編者按

本欄原定刊載之文章尚有「誰使我們沉與苦悶」(黎黎子、周均、旅維三先生的信)一文。「新年展望」中尚有「先生活」未來時日的希望」均奉命刊登。

新時期的新希望

今天又是新年的開始。以往請諸君去罷！我們把希望放在下一代，不，我們更要把希望放在自己身上，更要把現在努力！

過去的一切，是太不遠回憶了！黑暗恐怖的气氛，彌漫了整個世界，貧、愚、病、苦、酸、痛楚，始終伴隨着我們。雖然，有的人仍就在花天酒地，可不知多少人在流離顛沛，多少人在含憤呻吟！這，一年復一年，要何時才能結束這人間的磨難？何時才會得到安寧！

新年中的我們

凡丁

舊世界的血腥統治，儘管可以摧毀每個人的生命，却無法摧毀我們反抗的意志，環境愈困難，只有徒增我們的刺激，只會鼓舞我們的勇氣！

爲着人類的延緩，我們要求生存，我們需要自由呼吸，我們要求自由的天地，我們要爭取一個真正民主的世界，因爲這是人民的世紀。

自由不是可以哭得來的，我們必須從實際做起，我們不矜驕敵，我們不能言粉飾，全世界人民的要求，已匯成了民主的洪流，一切不民主的軀殼，已繼續被這洪流所沖擊、激發、可，這多是別

人奮鬥的成績，自問我們在奮鬥了畢生的努力！革命不是平坦的大道，今後將是一串艱苦的歷程，在又一次新年的今天，我們確一新民主的陣營，我們要新生自己，我們要嚴肅工作，我們要加緊學習，我們要提高政治的警覺，我們要進一步的去認識友敵，我們要隨時準備着應付時局的激變，我們更須最正確的去把握住現實。

是的，我們要與世界的民主洪流匯合在一起，但決不可以別人的成就，作爲我們的勝利，更不可以別人的勝利，沾沾自喜，更不可以別人的勝利，沾沾自喜！

雖然，中國是世界的一部份，我們的民主抗戰與世界不可分離，但我們一點也不等待，一點也不坐視，爲了大家的命運，不管敵人是怎樣頑強，前途是如何艱巨？我們要站在自己的崗位上，誓爲人類的自由——首先是新中國的誕生而付出一切。

我們希望明年的今天，不再是今年一樣。我們希望明年的今天，會給我們帶來真正民主的勝利！

教書匠的希望

這年頭，凡是聰明人，誰也不會去幹教書這一門了。我呢？天生窮骨頭，聰明人幹的事也幹不來，還是想頭教書吧！可是教了二年書，真是百感叢生，心力皆疲。看看瘦骨嶙峋的中學生，以及自己一家啼飢號寒的情景，想想學生意志的消沉，程度的低落以及自己的毫無長進，每當與同事聊天，莫不感慨系之，今天教育的病沉重了，我將我們平日常常談到的幾件事寫出來，向社會人士呼籲一下吧！

現在學校弄得一團糟，首先有個相當嚴重的問題，似乎已有很多教育家談到了，可是迄今依然未有糾正的，什麼問題呢？是學校衙門化，貪污侵入教育機關。我們的學校，每一學期開始，校長起碼可以收到學生的學費幾百元以上，這筆款子，他就拿去作起生意來了。我們的校長是有壽山的，誰也勸不了，他平日作生意的興趣和專心都在商學校之上。因此一來，學生吃不飽，健康大成問題，雖說伙食錢不少。同時教員的薪水也可以一槍再擄，毫無辦法。今天許多學校的最大毛病幾乎都是這種官僚制教育，貪污過學校所引起。

其次，目前許多中學校小學校的地址，都選在荒僻之處，不講衛生，特別是我們在鄉間開設的學校，吃的水都是田裡的或池塘的水，又臭又臭，沒有辦法只敢吃，因之，疾病便成爲我們教員學生的親人，不時來光顧。學校照例每學期要向學生徵收若干設備費，這費用化到那裡去了，沒有人能知道。至於其它各種雜費就更不必說了。這毛病說

遺望

還有一個最奇備自己的問題是學校沒有自由研究的空氣。我們同事間談天，常常說教書匠這一行字對於我們是再沒有比這更好的名詞了。什麼是匠，簡單說，就是沒有思想。整天教學生的就是一套規定的公式，八股。我們看書的自由是沒有的，要說有，那就是孔孟之道，你不僅可以大看特看，而且可以大講特講。只要你滿口仁義道德忠孝節義，子曰詩云，上面一定大會稱讚。

在這樣死水一般的環境裡，教出來的學生，我們未來的國家主人翁，不是呆頭木腦，就是巧語花言，想想真是可寒心。我們自己體面不算，還要小孩子教成無生氣的成人老人，使他們生命力萎縮，未老先衰，這是多可怕呀！

末了，我想說說教員的生活了，不須開口，人家一定知道我總要來訴窮了。是的窮，確實是太窮了。一個中學教員普通一共六七千元的薪水，怎麼達到溫飽二字。現在不是很多大人先生在提倡尊師重道嗎？記得今年的教師節，孔聖人的生日，我參加了一次尊師重道大會，許多中小學教員也參加了。向我們講話的人，再三教訓我們的不是應該：「安貧樂道」，便是說：「原意居魯，陋巷長歌」，聽起來似乎教員愈窮愈好。

尊師重道這四個字，我們實在受不了，我們只望學校真正不要衙門化，辦學的人不官僚化，給我們自由研究的空氣，並且改善我們的生活，能維持家庭溫飽，能如此就心滿意足了。

現在又是二年過去，歲序更新，我們盼望教育

無題

楊利

一年容易的過去了，倘若我們以新年入股的方式，來讚揚今年爲「勝利年」，那無事說是一個最艱難的年度。

東西兩面的魔手，曾經染污了大部份土地。現在我們捨去西方不談吧！單從我們自己方面來看，七七的號砲，曾激發了每一個愛好自由的人，因此，才會產生出這樣的，一個全面性的戰爭。八年的時間不算短，眼着着千萬里的土地，變了顏色，千百萬的人民，在忍痛犧牲，他們用着滿腔熱血，寫下了偉大的詩篇，也無非是奠定一條走向光明的平坦的途徑，所以，我要使這大戰爭所流的血不是白流。

民主——像春天的河流，泛濫到每一個污濁的抑或乾淨的地方，人造的河堤，是無法阻止這潛在的力量，如果今天有人想盡方法，用來脫離現實，進而強姦民意，將歷史倒退千年的話，那無疑的，是爲自己斷絕了喪鐘，因爲今天是一人民的世紀，一切均有它自己的選擇和主張，不容有任何違反人民意志的事情存在，否則，這大戰爭就會漫長無期。

(下被略)



作亞所

了麼歐京好我給帶年五四九 ——
•的來會我兩好，把窗開打——

新者的論

不，希精這策，爲 覺直太批。現勢的努整及我因已會 在和的一本 多我的我它
 主望湛發談提我自 書接接評像實力也改力衆大必爲經經 此類任從有 靈們將們和
 免大能批書會出們已 訂戶 一 本 性 不 變 。 化 多 準 最 迄 之 表 見 一 洋 迎 送 份 刊 一 和 者 一 期 一
 是家意評評一來答發於訂戶 中 期 文 但 忽 從 數 備 近 到 之 表 見 一 洋 迎 送 份 刊 一 和 者 一 期 一
 本 期 萬 望 出 ； 宜 其 題 這 形 的 務 免 萬 要 定 的 了 對 在 一 貫 讀 爲 收 多 徵 迎 意 的 文 大 五 期 的 港 ； 的 家 而 一
 期 對 但 見 他 目 裡 式 圖 之 免 費 多 的 刊 篇 使 於 今 期 化 者 短 到 求 一 的 命 陸 四 中 的 在 時 一 時 繁 衆 一
 備 這 我 自 關 覺 面 地 頁 必 贈 字 一 出 幅 文 過 後 起 來 長 很 本 遍 羣 一 運 不 一 五 力 還 日 樣 衆 一
 者 評 的 不 我 定 望 決 茶 時 現 一 沫 我 不 已 期 我 們 中 爲 選 該 者 一 還 的 論 一 門 新 新 願 好 正 一
 一 論 態 敢 們 大 不 由 加 希 在 孔 羽 一 敢 經 中 們 當 時 地 在 的 的 爭 希 這 是 我 們 的 的 新 的 新
 些 的 度 說 也 希 下 家 願 希 價 望 次 以 先 導 刻 作 繼 在 爲 一 間 讀 這 意 內 容 者 都 總 寄 期 ； 我
 選 意 是 希 望 一 就 意 覺 的 本 定 的 生 備 烈 的 續 內 職 敢 再 者 一 見 察 一 我 們 幾 洋 學 回 顧 過 去 的 用 去 展 望 將 來 的 一
 的 真 論 得 者 我 身 是 刊 登 印 判 一 載 於 前 方 諸 希 結 來 中 直 我 們 先 文 爭 運 過 去 的 用 去 展 望 將 來 的 一
 意 至 的 着 者 們 邀 像 的 者 單 一 古 定 學 改 而 君 望 大 的 作 到 們 向 冊 代 時 不 術 進 開 的 一 家 一 目 在 去 年 結 止 年 底 時
 書 同 者 家 多 準 的 時 者 對 因 究 思 想 自 作 同 衆 意 ； 總 爲 年 及 於 爲 出 等 方 然 了 意 一 見 因 結 止 年 底 時
 自 刊 時 說 的 提 備 各 的 都 本 全 登 附 其 面 局 向 更 此 我 們 者 能 們 ； 能 望 們 以 賞

編者

書評及其代

人生·文藝·文藝批評

胡風

——試答「怎樣作文藝批評？」——

文藝批評對象是具體的作品，具體的文藝現象。

讀了一篇作品，讀者從那內容一定有所感應，對於那里面的人物或者崇拜，或者同情，或者惋惜，或者憎惡……然而，這感應，或者這崇拜，這同情，這惋惜，這憎惡……，是由於什麼根源呢？一般地說，是由於讀者底生活經驗和讀者底人生願望。所以，批評家，我們所要求的批評家，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以及被生活經驗所培養出來的銳敏的感應能力，要有堅實的人生願望，以及從人生願望所產生的勇敢的勇氣。批評家，我們所要求的批評家，得是認真的生活者，積極的戰鬥者。

這就首先碰着了一個問題：作為對於作品的感應的根源的，是怎樣的生活經驗，怎樣的人生願望呢？有性靈底不同，所謂「受養既異，所感斯殊」；更有深度底不同，或者能夠從「一粒砂里看世界」，或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樹不見林」。

人，因而也就是作家和他所創造的人物，是歷史發展底產物，從社會結構里面取得他底成長和他底存在，在社會結構里面受着一定的限制或取着一

定的方向。因而，要解明作品底真實意義，一方面要了解產生它的這個社會或歷史，另一方面要了解產生它的作家。這就使文藝批評底範圍一方面擴展到社會思潮，文化思潮；另一方面追溯到作家底發展，文藝傳統底發展。到這里，批評家就更進一步地和一般讀者現出了區別，他非具有對於現實的社會發展的科學的分析和哲學的透視能力不可。所以，批評家，我們所要求的批評家，他底感應能力和突擊氣魄一定要被人類對於歷史發展的正確認識所武裝，所培養，所完成。儘有不少人用狹隘的生活經驗和己的惡感去衡量從作品所得的感應，那當然算不得批評。批評不是經驗主義。

然而，文藝作品並不是社會問題底圖解或通俗演義，它底對象是活的人，活人底心理狀態，活人底精神鬥爭。人底心理或精神雖然在各個產生自一定的社會的土壤，但它却有千變萬化的形狀和錯綜變化的色彩，作家通過自己的精神能力迫近它，把握它，潛合它，提高它，創造出一個特異的精神世界。它有時比現實更高，使千頭萬緒的大宇宙結晶在還個小宇宙里面；它有時使現實變形，使藝術的精神世界和人生的現象世界看起來並不相同。所以

批評家，我們所要求的批評家，他應該正確地認識所武裝、所培養、所完成的世界，非得能够理解而且擁抱一代的精神生活底奔流和衝激不可。他要透過法則底世界去游歷精神底世界，或者更正確地說，他要游歷法則世界所統攝的精神世界與浩瀚的人生的大海，指出這個大洋底每一個波頭在法則世界裏的來機去迹。儘管不少的人僅僅從作品裏的社會見解底表白或生活細節底寫實去判斷，那當然也算不得批評。批評也不是公式主義。

這還只是「一面」，還有同樣重要的另一面。

作品，有了某一種程度完成性的，能够成爲批評對象的作品，總是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體。正像黑格爾所說，「形式是向形式移行的內容，內容是向內容移行的形式」；就形式說，它是由內容產生，而且被內容含有的。作品，有了某一程度完成性的，能够成爲批評對象的作品，總是作家底主觀精神和客觀對象的結合而創造出來的統一體。正如學風所說，「風格就是人」；就形式說，作家一定要創造或採用能够適合內容底美學的要求的形式。因而，愈是完成了的作品，和從內容所感受的同等，讀者能够從它底結構、句法、語言底節奏和色澤等感受到它的力量；或者更正確地說，對於內容的感受正要通过對於形式的感受。作品不僅在內容上對讀者思想的地發生作用，同時也在形式上對讀者美學的地發生作用。一定立場上的內容底美學的要求，同時也就是形式底美學的要求。所以，批評，我們所要求的批評，應該是社會學的評價和美學的評價之統一的探尋。這才是文藝批評底基本任務。在市儉主義得勢，用諛諛的心拾做大題目以迎合讀者的現象到處皆是的今天，批評底這一任務更特別重要，只有它能够執行使爭是非的鬥爭不致落空的爭真假的鬥爭。在價值向作品要求直捷的機械主義依然有刀的今天，批評底這一任務更特別重要，只有它能够滿足文藝現狀底複雜的戰鬥，也只有它能够保衛文藝發展底豐富的生機，不致弄到自己窮途，解明不了各種各樣的作品底真相，實際上等於使表現了新的人生追求的作品受屈，空出地盤來讓有害的或帶着腐爛的人生氣息的作品橫行。

所以，批評，我們所要求的批評，首先是從實踐的立場出發，爲了探求這時代底文藝性格，爲了通過對於文藝性格的探求去探求這時代底心理狀態或精神生活，它底來源，它底狀態，它底去向。因而文藝批評底戰鬥的任務一方面表現在對於落後的心理意識及其美學特徵的批判，一方面表現在對於進步的心理意識及其美學特徵的發揚。一方面是對其舊的生活傳統及其美學

傳統的反抗和摧毀；一方面是對於新的生活萌芽（新的性格底萌芽）及其美學萌芽的發現和養成。文藝批評底任務是要在活的過程上說明文藝世界裏的已經衰落的，正要衰落的，開始成長的，含有待放的，各種生命底性質和它們底社會基礎。批評家底任務是要和作家協力地發掘而且改造這時代底精神。

從這里就可以回答一些對於文藝批評的不正確的流行意見和實踐態度。有人說，創作過程是主觀的，神來的，批評家無從追尋，好的批評只能是批評家從作品得到的主觀的內心的感應，即所謂「靈魂底冒險」，決不能依據什麼客觀的標準。

不是這麼玄虛的。創作雖然是作家底精神燃燒過程，但總有它底社會根源，總是在某一方面上對於現實人生的反映。批評家雖然要心領神會地深入作家底內心世界，但他總是爲了探求那個世界是在怎樣的根源上形成，對於現實人生能够發生怎樣的作用。批評所追求的一定是只有一個而不能有兩個的那個真理。

有人說，批評底任務是教給作家應該寫什麼，不應該寫什麼，教給作家應該變成藝術主題的政治課題。

不是這麼簡單的。批評家雖然應該指出時代精神底主要方向，實踐要求底主要特徵，一般地號召作家去追進，去追求，但但決不能離開作家底個別的精神狀態，強迫作家都去立正看齊。而且，批評家所探尋的不僅是「寫了什麼」，而且是「怎樣地寫了」，尤其是「在怎樣的精要求而寫了」的開題，因爲，一切的事物都和真理相通，問題只在於是不是說出了那相通的路徑，只在於是不是爲了說出那相通的路徑。批評家應該做的是指出作家底個別的精神狀態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指出怎樣地通過作家底個別的精神狀態或怎樣地改造作家底個別的精神狀態去接近那個真理。

有人說，批評家底本職，是要能够指導作家底創作技巧，指出哪一點寫得好，哪一點寫得壞，哪一點寫得潦草，哪一點寫得成功……，由這訓練作家底創作能力，幫助作家寫出成功的作品。

不是這麼實用的。批評家不是手藝師傅也不是作文教師，他對於作品形式底表現成就的指摘僅僅是爲了對於作品內容底思想分析上的要求。如果是好的作品，他指出那寫得成功的地方是由於怎樣的內容底基礎，那寫得失敗的地方是由於怎樣的對於內容的主觀把握不夠，如果是有害的作品，他指出

那寫得好的地方怎樣地加強了反動的力量，那寫得壞的地方又是由於內容底怎樣的必然。而且，我們所要的表現能力（一般所說的「技巧」），只能是內容產生，而且為了表現內容的，只有從統一在社會學的評價里面的美學的評價上才能夠使本質得到闡明，也才能夠使作家得到啓示。批評所追求的只能是一元的思想真理。

有人說，對於批評的數量要看他能不能說服被批評的作家，這被批評的作家是不是表示同意；知道作品底內容的莫過於作家自己，如果作家自己都不同意，那批評不是等於外行話或胡說八道麼？

不是這價值觀的。當然，批評家要深入作家底創作心理過程，但那不是一定是和作家共鳴，反而更多地是向作家反抗的；在現在，批評底戰鬥性正是由於更重地偏向着後一任務的原故。當然，批評也希望得到說服作家的結果，但批評底真正任務是向着廣大的人民和進步傾向的讀者，在廣大的人民和進步傾向的讀者里面開拓思想底方向，建立思想底影響，培養健康的文藝欣賞力量；批評只有對於廣大的人民和進步傾向的讀者有權威的時候才能對於作家有權威。批評家要和廣大的人民一道，和進步傾向的讀者一道，在一定的條件下面應該是經常地，但現在却只是間或地和作家一道通過文藝作品去探求人生的真理。

有人說，批評不能違反讀者底公意，讀者少的作品而批評家說好或讀者多的作品而批評家說不好；這是不從作品本身底力量出發的，批評家自己底偏愛或偏見。

不是這麼便當的。批評家應該和讀者一道，然而却是要和進步傾向的讀者一道，是要和不但在一般社會見解上是進步的，而且對於新的生活萌芽（新的性格底萌芽），及其美學的要求底萌芽能夠有銳敏的感應力的讀者一道；在意識上的要求，特別是美學上的要求一般地落後於實踐要求的這個原則下面，批評不但要和作家鬥爭，而且要和讀者鬥爭的。偉大的批評家往往在一般讀者底惰性的意識狀態里面提示出新的文藝生命，從這開闢了反映一代的社會要求的文藝思潮。在現在這樣的變革時代，新的生活及其美學的要求底萌芽已深明顯地出現了，但却苦悶着得不到發現，這一鬥爭就可能而且重要，然而，由於文藝上的各種市儈主義底壓力，由於社會生活上的和文化思想上的阻滯，這一鬥爭又遲緩而且艱難。然而，真正的批評要在這鬥爭上受到最後的考驗，能不能夠有這種眼光，這種氣魄，就決定他能不能夠通過

文藝世界底真理。

所以，一篇批評底出發或一個批評家底出發，那最基本的東西是實踐的生活立場，是對於現實人生的新生的期望，不是在思想概念上的，而是化成了生活知識和感應能力的，對於現實人生的新生的期望。批評家當然重視他自己從作品得到的感應，但他還得要求他所得的感應是由於他自己里面的什麼根據，還得要求他他自己的感應和現實人生底行程有着怎樣的相關的意義；批評家應該從作品給他的感應出發，但首先要在生活實踐上具有和時代底脈搏合拍的感應能力。這樣的感應能力，雖然不一定就能達到對藝術意義上的批評任務，但却是批評底最本質的基礎，最健康的雛型，因為，實踐的生活立場保證了接近思想內容的可能，從這立基於實踐的精神狀態出發了反抗舊的美學影響和接受新的美學影響的可能。一個真正懂得活的人生的實際戰鬥者，或積極的生活者，他對於文藝作品的意見有時要比其長於理論的政治概念或抽象的玄理論的「批評家」要好得多，那原因就在這里。從帶着這樣的感應能力的實踐的生活立場出發，一方面對於歷史發展和時代生活求得科學的分析，另一方面從人類創作實踐和藝術理論底遺產獲得對於文藝特質的理解，那麼，批評家底批評力就能夠養成而且發展了。這樣，批評家才能從作品底追尋者變為時代思潮底開拓者，從職業的藝術評論者變為精神戰士。

我們所要求的是這樣的批評家和這樣的批評。

人民需要的是豐衣足食

評「中國戰史研究」東方著

秦 彌 堅

在中國歷史上朝代更迭，戰亂相尋，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每次分合，總是老百姓受其害，家破人亡，骨肉分離，自身難逃一死！這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大悲劇。東方氏所著的「中國戰史研究」敘述了秦、漢、三國及魏水三個戰史，它有著地也解了歷史上的這悲劇。

「由秦始皇的統一，分而為六國子孫的割據，這可以說是封建制度的反動。中間經過楚漢戰爭，由割據而又轉到西漢的統一，這又表明了封建的殘餘力量究竟脆弱，而統一的要求才當當時的主潮。」（第一頁）。作者所講的「封建」，不過只是指「封建侯，建諸國」，這種陳腐的咬文嚼字的史觀，我們這不予詳細批判。只提出一點：我們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由秦始皇統一而始，這是一點代定型的社會。直到一千年前，中國的社會基本上都還是封建社會，雖然是封建地主勢力的統治的社會，不論是戰爭時代（如楚漢、三國、五胡亂華），或和平時代（秦統一，漢統一，隋唐統一），都沒有改變封建地主統治的社會本質。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像作者所說的「保證和平的封建統一政府」。秦、漢統一時代，農民們生活在封建地主的沉重剝削壓迫之下，楚漢、三國戰爭時代，也沒有消除這種剝削與剝奪的沉重負擔。把反對封建經濟的這個民主主義的事業，理解為帝王野心家的中央集權的統治，這個錯誤是嚴重的！

是的，在封建時代，農民們是願意有一個和平的中央統一政權的，但這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必須這個在形式上統一，能保障一個相當安定，和平時代的政權，能保障他們以最優厚度生存的保障，而不是像作者所胡構的，人民會認為「超於侯國之上的，有一個天下；這天下，應該統一」。而體現這統一的人，便是「新中國的希望」，他們「擁護這個（統一的）領袖」！（第三——四頁）實際上，在中央集權統治初建的秦漢二朝，儒家的尊王統一的封建思想遠沒有和人民的精相結合，還不會如後來的愚民那樣相信一個高高在上的皇帝，秦、漢中央集權政治的建成，只是因為人民願望一個和平環境和對邦，虛政聰明地採取了有利於人民的一些政治、經濟改革。

作者也曾指出對邦的成功是「除秦苛法，約法三章，司法與行政的簡單化，最短期內的和平。」（第五九頁）。這倒是說得對的。（然而作者却竟把這解釋作「反對封建的統一政府」！）封建時代的農民，當然不會想到一個現代的民主主義的自由經濟，他們所能願望的是一個較好的，較溫和的對邦，而拚死反對秦漢無窮的剝削。對邦的成功就是他們給人民以這樣一個溫和的使經濟生活恢復的對邦統治，反之，以羽的失敗，也就在於他發覺太多，不知性民，民心背叛，離開了民衆自願無可避免地走向滅亡！再回溯上去，秦漢承襲大動亂之後建立中國第一個中央集權政權，原因也在於他在政治、經濟上執行了相當有利人民的政策，證明當時，限制貴族特權，發展生產，人民生產最多的得免繁役負擔，增加耕種，增加耕地，劃一度量衡制。而後漢的失敗，也在他任徒太多，伐西胡、南越）藩籬太多，（蒙萬里長城，建提攜，馳道

中國經濟與現狀對策

沈志遠編著

何 洛

中國戰時經濟，隨着抗日戰爭之長期性與最近湘桂戰事之失利，過去戰時經濟已發生的或者是潛伏的危機，及至今天，這種情形越加顯出嚴重了，為了支持抗戰，為了建立新中國，我們都不能任由它就這樣繼續下去。

承來，中國戰時經濟在抗日戰爭過程中的一切設施，識者早已認為它必會遭遇到無可救藥的地步，所以，不論親邦友人，或者國內專家學者，年來不但提出許多批評意見，而且也積極提出解決途徑。無獨有偶，「中國經濟的現狀與對策」一書，都是想作這種努力的。

「中國經濟的現狀與對策」是一本薄薄的小冊子，但是牠里面所選擇的文章，都涉及及當前戰時經濟的重要而又是最嚴重問題——如工業建設問題，農村經濟危機，游資問題，物價問題，黃金政策問題，通貨膨脹，利用外資等。而這些問題在過去一年來各方面都爭論的很厲害，以及提出許多不同的主張，這小冊子所收集的文章，都是當時論爭中的產物。雖然我們不能說這本書所收集的文章完全是帶着論戰的批評文章，但是我們可以從這本書知道每一個戰時經濟問題的產生以及各方不同的意見，對策，而每一個作者所處理的問題的觀點與方法，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假如我們要說這本書具備什麼特點的話，那麼這就是一本從現實與具體問題

「耗費太多（表神信，造宮室墳墓），使民不聊生，民不堪命，因而就不可免地爆發了農民戰爭，這才是秦室傾覆的根本原因。」

事實上在封建社會中，所謂中央統一政府，從來也不過是真正的統一，秦統一六國後，努力消滅他們殘存的勢力，使天下豪富十二萬戶到咸陽（秦都），可是事實上，項羽強盜都是六國世家之後，秦始的失敗，過份地削弱六國強盜，使他們不得不反叛，恐怕也是失敗的原因之一。作者分析項羽的失敗，認為是他要「恢復封建」，大封諸侯，使秦的封建，而到封建的成功就在廢諸侯，立郡縣，削平諸國。事實相反，如作者所說，劉邦是嚴厲得以前位，從貴族、世家、到屠狗、流氓都有，而項羽則吝嗇賞爵，使他的部下因為怨憤、不滿而反叛（如英布、陳餘）。劉邦是善於籠絡並且扶植地方的豪強諸將，使他們各做地方的小皇帝而擁護他做中央的大皇帝。漢代的那種封建是不統一的，強逼諸侯仍舊獨霸一方，各行其是，在封建的時代中真正的統一政權是決不會有的。

歷史上，和平時代統一中央集權的傾覆，常常因為農民起義，農民暴動開始的，一個中央集權統治建國，開始時能夠聰明地安撫流亡，生息人民，可是越發展下去，地主階級生活越趨奢侈，豪華，淫樂，農民被壓抑，被剝削得越趨是厲害，終而到了「民不聊生」不堪不挺而定險的地步，中央集權的統治不得不被顛覆了。這個平易的道理，作者也不能不知道吧？他就也說出東漢之亡，是在「外戚、宦官輪流把持政權，輪流對於人民為極度的剝削」，大將軍梁冀失勢後，「他的家產經過拍賣，價值幾三十萬萬以上，抵得全國稅收的一半」。梁冀以後的宦官，「兄弟兩成，宰州郡，辜殺百姓，與盜無異」（第六三頁）。貪污腐化，只知道壓迫人民者國必敗，因為人民看得最明白，感到最痛切的是他們自己的生活，要是他們生活不下去了，就

治階層的統治也就維持不了！東漢末的官僚階級，正是「貴中」戰爭之因。這是一個很明白的歷史教訓，然而作者却把這平易的道理了解為「下層無知的農民，沒有分析的頭腦，只有模糊的直覺，以為漢朝如此，遠不及以前，大概是氣數已盡，該換朝代」，這又是匪夷所思了！人民們何嘗如作者所說的「無知」呢？他們的判斷是簡單明白的，他們是要求一個可以溫飽，可以生活的豐衣足食的天地。

歷史上由農民戰爭發展到「統一」集權趨向，恰相反的，却正是農民革命鬥爭悲劇的起點。他們洒了鮮血，他們革命成功了，但是他們却難以有足以拯救他們走出奴隸地位的明確的政治，經濟目的，革命的果實減少數野心家所收獲，新地主代替舊地主，新貴族代替舊貴族，新皇帝代替舊皇帝，舊王朝傾覆了，新王朝建立了，中央集權統治又恢復了，而農民却及照舊的被束縛在封建的農奴勞動的牢籠中。這樣下去再過幾百年，於是他們又起來流千萬人的鮮血，破千萬家，替新的野心家造成新的王權。這個悲劇就這樣連續了幾千萬！

封建的中國已經過去了，這種農民戰爭的悲劇循環已經走到終點了，農民今天已經有了新民主主義的明確要求，也有了新民主主義的明確的領導，他們要求一個永遠都豐衣足食的新民主主義的農村經濟，和這樣一個民主自由，打破一切封建的特權的真正的統一的政治。

在軍事上作者那樣強調游擊戰爭的作用，這是「聰明」的論斷，然而游擊戰爭只能依靠人民才能發動得起來，劉邦彭越的時代過去了，曹操存疑的時代也過去了，民主是時代不可抗的潮流，封建君主「統一」專政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作者寫道：「歷史：向我們證明這原則：『只要肯幹，就能成功』。好的，難道希特勒、東條、墨索里尼、汪精衛輩不都是這樣『肯幹』的基礎麼？」

題出發，同時在每個具體問題而又加以分析與批判。可以說是這本書特點之一。

其次，這本書第二個特點，經濟民主是貫徹到這本小冊子各個問題上面去。根據這本書作者意見，中國經濟的現狀，為什麼險象叢生，危機重重，根本原因是在政治上與經濟上，所以在各個問題上的基本的對策，都是針對着這病症而提出辦法。所以我們為要把握中國當前的戰時經濟，必要站在這個觀點才能了解他的本質，這本書恰好在這方面提供了我們不少的意見。

最後，我們覺得研究這本書時，提出一點意見，如果我們是以了解中國戰時經濟的現狀的話，那麼他每一篇都是反映出當時的經濟問題，要是我們能夠加以聯系起來，中國戰時經濟的輪廓也可以略見。假如我們單從個別的問題或是具體的問題去研究，這本書里面所收集的文章，每一篇都是關於一個專門問題。我們能好好的把這本書每一篇文章深入的閱讀一下，把一個一個問題都加以研究與分析，再去閱讀與研究有關的問題，其收穫必定較以前所研究與了解的大。自然，這本書每一篇文章（或者每一個問題），都是彼此聯系的，因此我們在研究時，也不必過於強為割裂，這里我們不過是提供一個參考意見罷了。

當前中國戰時經濟雖然嚴重，但是我們必須要找出辦法去解救它，我們為要達成這個任務，那就必須深入到每一個經濟工作領域里去熟悉情況，去調查研究，這本書雖然是盡了幫助我們了解與怎樣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作用，但是深入了研究中國經濟問題還須要我們向各個經濟問題作深入研究。

評「肥沃的土地」

碧野著 三戶圖書社版

鉗耳

讀完了碧野先生的「肥沃的土地」，是很有點失望的。

戰爭會使人們脫離了現實，會使作家的筆鋒遠遠地回觸到多少年代以前去，這是現實的悲劇。我們已看過不少體現這悲慘意味的作品了，「肥沃的土地」只是其一。為什麼作家對這關係中國歷史命運，四萬萬同胞的生存的現實的殘酷、悲感的生活百象，不能自由地付給以全生命的熱愛或憎恨，用筆鋒來透視世界，改造世界？這不是哪一作家所可回答的，這是時代的激流所激蕩，所沉澱的災害。但是，在生和死之間還有寬廣的道路，在今日的輪船和明日的旅程之間還有從容的時間，作家，心靈的導師，責任，應該從這被狂瀾，繁瑣治理，推離歷史的正當方向吧。

救世者的命運是悲慘的，他若要遭逢大苦大難，他們要忍得住辛酸，支得過磨折，以為作家的資本只是一支筆，這是對於作家的侮辱。文藝是生活的鏡子，作家的八十一難，難難都是怎樣通過生活的關，透明生活之鏡。

歷史的中心是人民，只有人民能幫助作家完成他們的偉業。以全心的靈魂抱負著大眾，因為他們是真正歷史的創造者，是歷史的奧秘，任何旋轉乾坤的大英雄，都不得看人民的眼色行事。真正地鍾愛他們，理解他們，你就把握住了中華民族正在創造的史詩。的，現實的逆運對於文藝工作者的阻礙就在這裡，然而什麼樣的逆運能夠挽回他們歷史的命運呢？什麼樣的逆運能夠挽回他們歷史的命運呢？什麼樣的逆運能夠挽回他們歷史的命運呢？不是有過推心泣血的一歌一哭使它土崩瓦解嗎？人民不在這處，人民就在我們的屋旁，真正地以

一個聖者的謙虛和熱情去尊敬他們，學習他們，到他們，接近他們吧。

我想，這樣的一點一滴的工作，是創作最豐富的素材。

「肥沃的土地」的歷史背景，至少可以回溯到十年二十年以至更遠上去。不是說不可以回溯到為現實的鑒鏡，不可以使我們聽的人，看的人，覺得太遠了！

碧野先生有著對於農村，對於大自然的深摯的愛。這是我們從他的其他著作中都可看得出來的。

「大野是廣茫茫而又無邊的寂靜，圓圓的也是藍色的，那得那樣的調和，融治而美麗，好像天地間就永遠沒有過紛爭，永遠保持着這樣的安謐。」

但是，從這部小說中所展開的故事，所表現的人物，使我們感到這種愛，似乎相當病態的。作者寫下了天順和老五，破羅筐之間的社會的關係，但是這種關係却為其他許多糾葛所掩蔽，使讀者不能從這種關係中看出許多糾葛。使讀者不能從這種關係中看出許多糾葛。使讀者不能從這種關係中看出許多糾葛。

是的，在農村中和在城市中一樣，少男少女們也有不可遏止的熱烈的青春之火，不是像紳士們所以為的，農民們只曉得吃，給他們以糧食，他們翻地，不為的頂上。但是，我們必須注意農村的現狀，到地球上的農村，農民們生活中最主要的苦命是怎樣來。而所有這些，在這部小說的人物身上，似乎都善化了，都忽略了給予它正確的估價。

我想，作者沒有把那些最平常，最重要的人物，加以深刻的思考與分析。反之，作者著重於，却過份地知子化了，過份地注意於那些少男少女的戀愛故事了。我們承認農民們有這樣的熱情，但並不是說農民們在何種環境下都能有這樣的熱情，水獺他，比較為我們所認識的人物，是黃老五，水獺他，和在這現實中的農民們真實的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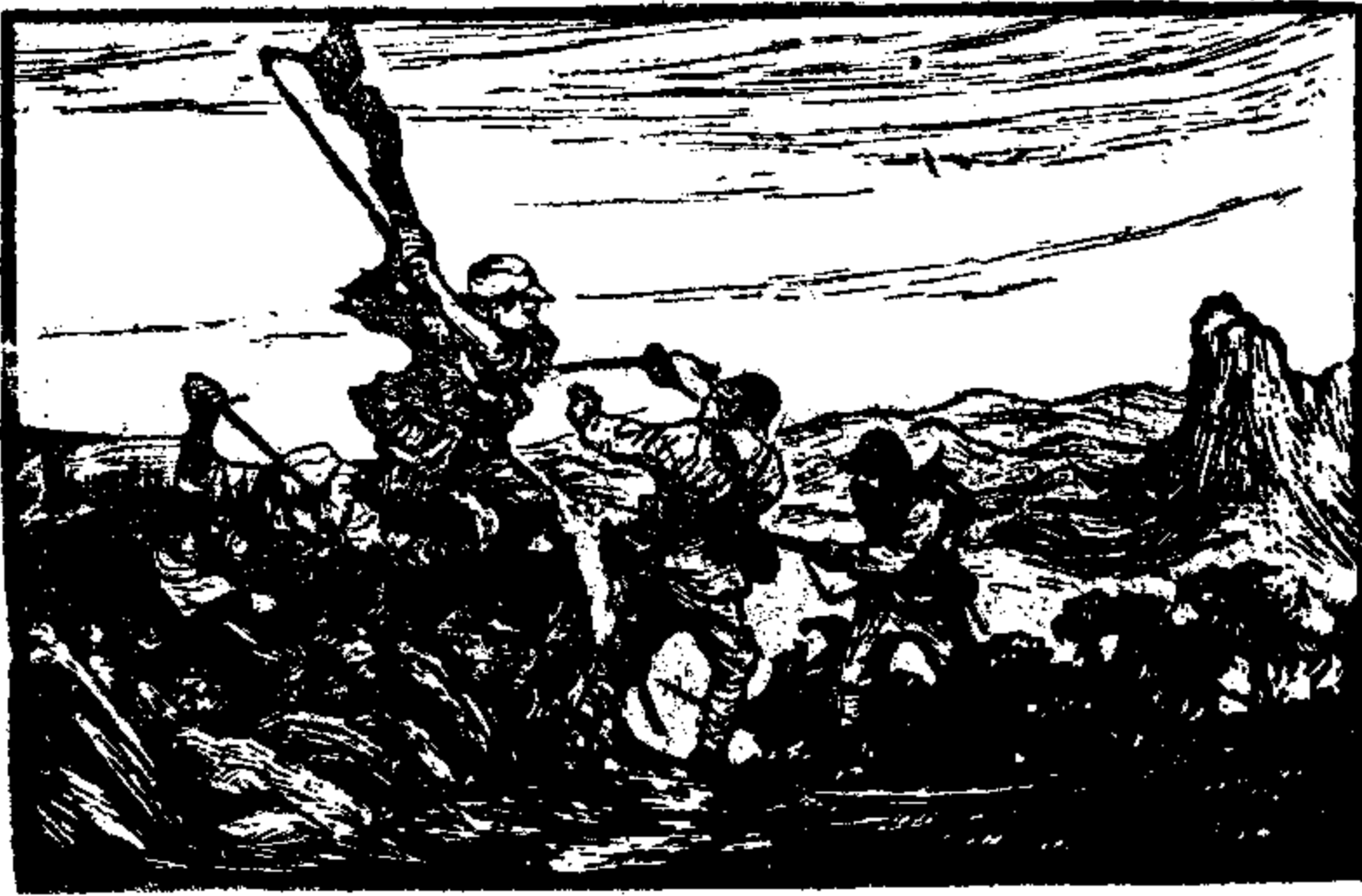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作者又對於他所描寫的農村人物，都有一種可憐的同情，這正在於它們表現了農村中的現狀，和在這現實中的農民們真實的性格。

這種同情，是作者對於他所描寫的農村人物，都有一種可憐的同情，這正在於它們表現了農村中的現狀，和在這現實中的農民們真實的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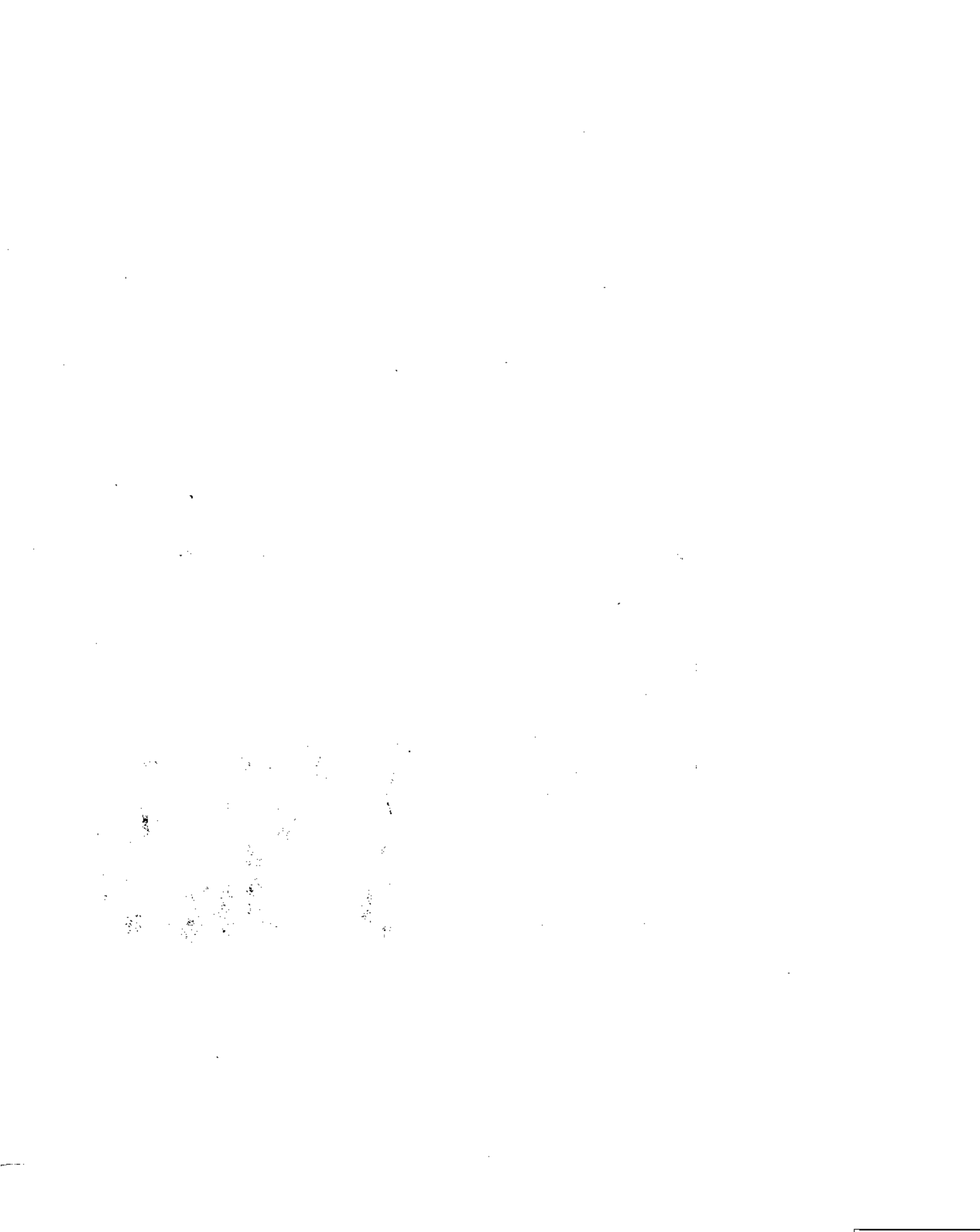
作者對於他所描寫的農村人物，都有一種可憐的同情，這正在於它們表現了農村中的現狀，和在這現實中的農民們真實的性格。

衆 群

期 二 第 卷 十 第



版 出 日 十 月 二 年 四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本 期 目 錄

注視敵軍的動向

◆紀念列寧逝世二十一年週年◆

羅曼羅蘭論列寧

二十一年後

法國解放後的政治形勢

解放區文化統一戰線方針

展開大規模的群眾文教運動

當前我國大學教育的病態

談訓育

山東印象記

論甲午中日之戰

知識份子的道路 (關於「經理」)

我們需要「春風化雨」

談談「讀書雜誌」

敵人眼裏的八路軍

編後記

(三六)

戈實權譯 (三七)

杜斯拉夫斯基作 (四一)

茹 純 (四三)

毛澤東 (四九)

羅 橋 (五二)

岳 鈞 (五四)

施 貽 (五九)

奧·羅生特 (六二)

葛伯贊 (六一)

舒介震 (七十)

編 者 (七二)

胡 繩 (七四)

羣 衆

第十卷 第二期

三十四年二月十日出版

編輯者

羣衆雜誌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發行者

新華日報館

本刊價目

本期零售 十六元 大期 八十八元

十二期 一百六十元 廿四期 三百零四元

外埠郵費在內·國外照加

注視敵軍的動向！

對海敵人退到桂境之後，戰事沉寂了一陣，加上中印公路的打通，以及美軍在太平洋上的活躍進展，美機的不斷轟炸敵國本土和沿海佔領區，國內一部份人士，就從幾月來的悲觀頹唐，轉到盲目的樂觀，認為這下日本可快完了，再也不能有所作爲了。

由於美軍在呂宋登陸之成功，和美艦在中國海面的活動，日本強盜爲了對付美軍行將在中國沿海登陸，爲了「確保」它的大陸交通線，因之，又動手進行其所謂有敵的佔領和鞏固中國沿海的基地了。敵人新的攻勢是從一月十四日由粵東沿海進攻開始的。這門攻勢是企圖東進與潮汕乃至廈門聯成一線。據報廿五日隨豐敵已佔至海豐，揭陽敵西北犯豐順。同時，敵人又一個攻勢是由十五日開始南北分路向粵漢兩段進攻。這一攻勢企圖是打通粵漢全線並由此配合西寇會犯贛州，並打通浙贛與華中打成一片。現在這一方面，據報粵曲江廿八日已遭敵軍佔領，東陽，都羅一帶尚在激戰中，贛境則敵人擬自遂川進襲贛州。

敵人的進攻，在本質上是一個被動的攻勢

，但有人就認爲這是防禦的攻勢，因此無足重輕。

如果從盟國來看，敵人這次進攻可以說是防禦攻勢，防禦的是美軍在中國沿海登陸，但對我們中國來說，問題就不同了。敵人是我們自己的土地上打仗，同時在一步步擴大它的佔領。如果這也算是一「防禦」，那什麼才是真正的進攻呢？因此我們說，不能自欺欺人的輕視敵人的這次進攻。我們應當重視敵人這一攻勢企圖是正在逐步實現着。除非我們能夠有效地阻止它，否則敵人是可能完成它的「打通粵漢，鞏固沿海」的企圖的。

有人又這樣的認爲，即使敵寇真能實現上述企圖，也不要緊，好在盟軍馬上就會登陸，到那時敵軍一定挨不住炸、轟，還不要它活該死！因此，我們現在還可以「暫時的穩定」和另作他算一下，豈不美哉！

現在我們可以這樣的提出問題，假使敵人在完成目前的企圖後，是否就會真的等待美軍在中國登陸而挨打呢？或者還會繼續向西南或西北進攻呢？我們認爲後一可能性是更大的。日寇曾經通過某些渠道向新加坡于透露它的上中下三策。透過法西

蘇份子的轉讓，與英美謀取全面的和平，是爲上策。設法爭取中國的和平中立，爲中策。如此二策不成，則採取下策，那就是撤退南洋大軍，在中國大陸進行毀滅性的戰鬥。以目前的情勢而言，上中兩策的現實性是較小的。所以敵人退守中國大陸，準備進行大體決戰是定了的。既然這樣，那麼它除了繼續進攻之外，還有什麼辦法？這是從敵人方面來說。

再從盟國方面來說，美國要在中國登陸的要求，是一天比一天來得迫切，對中國物資裝備的援助，不斷的在設法增加。如果，菲律賓克服了，日本強盜與南洋的交通，便會受到威脅，此時日寇必定撤退南洋駐軍，移到中國大陸。你說西南後方，它會置而不顧麼？

因此，今天我們不能盲目的認爲美軍即將登陸，反攻指日可期，而以爲勝利就會來到，更不能將敵人的最後失敗，看作我們今天的勝利，要知道敵人還很頑強，今天仍緊壓着我們。在這情形下，我們到底應該怎麼辦呢？加緊裝備，積極訓練，改善士兵待遇，提高作戰士氣等，軍事問題固然需要解決，可是如果今天我們不能從政治上來根本解決問題，那末一切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是不會產生任何效果的。（被略）

羅曼羅蘭論列寧

戈寶權譯

羅曼羅蘭的這篇文字，原題為「列寧」，副題為「論藝術與行動」，最初發表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份的「歐羅巴」雜誌上。這篇文字不只是一篇通常的紀念文章，也是一篇很好的文藝論文。一月二十一日是列寧逝世的二十一週年紀念，現特從俄文將這篇文字翻譯出來，一方面紀念列寧，一方面藉以紀念新近逝世的羅曼羅蘭。

列寧整個的人，在生活的每一瞬間，都是在戰鬥中。他所有的思想，是預先由他從一個軍隊指揮官的瞭望地點所觀察過，——這些思想是在戰鬥中和為了戰鬥的。從沒有一個人能像他這樣，在自己的身上顯現出人類活動的那個歷史時間，而這個歷史時間正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無論是個人的憂慮、無論是精神上的片刻的休息、無論是思想上的涉獵愛好，什麼事情都不能使他分心。動搖、懷疑，這都不是他所具有的本性。從這種地方，就產生出了他所顯現的專業的力量和勝利。

為了行動，他動員了一切精神上的力量：藝術、文學、科學，——他動員了一切，一直到自然的現象，一直到生活的潛在意識的底層，一直到夢想。

他帶着諷刺的口吻這樣寫道（註一）：

「『應該夢想！』當我寫好這幾個字的時候，我禁不住驚慌起來了。我覺得好像坐在「聯合代表大會」的會議席上，在我的對面坐着的就是一個「工人專業報」的編輯和同事。於是馬爾丁諾夫同志站起來，帶着威脅的語氣向我說道：「請問你，假如你有自主權的編輯部，事前沒有向黨委員會詢問，是否也有夢想的權利呢？」繼而克羅夫斯基同志也站起來（他在哲學上加深了馬爾丁諾夫同志的意見，而馬爾丁諾夫同志則早已就加深了普列漢諾夫同志的意見了），用着更加威脅的口吻說道：「我還要更進一步。我問你：假如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忘記，馬克思的說法：人類始終只能提出那些能夠

實現的任務，並且沒有忘記：策略就是與黨共同成長的許多任務的一種增長的過程的話，那麼，他是否也有幻想的權利呢？」

「一提到這些威脅的問題，我渾身就戰慄起來，我心裡只好這樣想：我與羅蘭對什麼地方去呢？好吧，讓我暫時回到比沙勒夫的背後去罷。

「比沙勒夫在講到夢想與現實之間的差異這個問題時曾經寫道：

「有着各種各樣的差異。我的夢想可以超越事件的自然進程，或者它可以完全跑到另外一個方面去，跑到任何事件的自給過程都始終達不到的地方去。在前一種情況之下，夢想是沒有什麼害處的；它甚至可以支持和增強勞動人類的毅力……在這一類的夢想中，沒有什麼可以毀壞和磨滅勞動能力的東西。甚至是完全相反。假如一個人完全被剝奪了這類夢想的能力，假如他 sometimes 不能跑上前去，並用自己的想像全部而完整地來觀察那正在他面前開始形成的創造，——那麼我與不能夠想像；究竟是種什麼樣的刺激力推動人們在藝術、科學和實際生活的部門中從事和徹底進行廣大而勞苦的工作……假如夢想的人只認認真真地相信自己的夢想，仔細地考察生活，把自己的觀察和自己的空中樓閣互相比較，並且努力於實現自己的夢想，那麼，夢想和現實之間的差異，是沒有什麼害處的」……

列寧又繼續寫道：

「不幸得很，像這樣的夢想，在我們運動中是太稀少了。而在這一方面最大的罪魁，就是那些以自己的警惕性和對於「具體事件」的「切實生一

「合法的合法批評與不合規的「屠巴主義」的代表們」。

在三十年前，在沙皇統治最黑暗的日子裏，這五人運動不過剛才誕生的詩歌，列寧以其這般理想的。他的理想是這般理想的行動。

在歷史上有過不少這樣的行動的，有過不少愛國的人民的領袖，他們把自己的生活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爲了行動，另一部分是爲了思想的遊離；而後者對於這些人們，則於逃避行動。這類人物的典型的一個最顯著的例子，也許就是凱撒大帝了。當他行動起來的時候，他整個地都投身給行動（那是怎樣的一種行動呀！）但是他又正像英國的政治家一樣，需要有一週末（Week-end）：那時候他休息一會兒，馳騁於優美的思想、美麗的言辭，並和四塞羅漫談（註二）。這位羅馬和高盧的征服者，從本質上和內心上講起來，始終不過是一個愛娛樂消遣的人；對於他，行動本身既是一種遊戲，一種最大的遊戲，一種最值得這個真正的人物、這個真正的羅馬人去幹一下的遊戲；但它依然是種遊戲，換句話說，它在本質上不過是一件虛幻的事而已。

在列寧的心中，是沒有虛幻的事物的！他倘沒有逃避到虛幻裡去！他具有一種現實的感覺，一種強有力的、經常的和沒有間斷的現實的感覺。至於那些缺乏這種感覺，和那些逃避行動的人們，他們引起列寧發出了一種由嘲諷、諷刺、善意的憐憫與輕微的蔑視所交錯而成的絲實的嘲笑；這正像一個強有力者對於那些年長的、笨重的、但却具有着一個兒童的「幼稚的」頑固的人們的嘲笑一樣。

他把這種現實的感覺，他放到藝術的夢想裡面去。他夢許藝術，他對於藝術所表示的態度，決不像某些人所肯定說的是種冷淡的態度（註三）。「他深深地瞭解並且熱愛古典名著」。他把托爾斯泰的作品讀之又讀，盡他來娛樂自己，並且還因爲他是他的一位同國人和思想上的同伴而引以爲驕傲。雖然他承認自己沒有資格來討論新詩歌的問題，但是他却有着足夠的敏銳，感覺到瑪雅科夫斯基是他的一位同盟者，並且還讚揚了他的辛辣的政治諷刺詩（註四）。同時，音樂又是怎樣地吸引住他呀！他是懷着怎樣的熱情來傾聽音樂呀！誰能忘記他關於悲多汶的「熱情交響曲」所講的那般熱情的話語呢？他這樣地愛好音樂，他這樣有力地感覺到它，他甚至不得不修飾自己，想將自己從音樂的吸引中解放出來。……毫無疑問地，他是深知藝術的夢想的。但是在進行鬥爭的時候，——在鬥爭中是存有他的法則和他的任命的

，——他希冀藝術的夢想，應該正像他自己的夢想一樣，成爲鬥爭的力量和支援，並且這夢想時刻地應激着亦行動的。

實際上，藝術時刻地應激着亦行動的，這並非言官使人相信，好像它只應激鬥爭，並且這用幼稚的藝術「藝術的藝術」的語言來裝飾自己的時候，也還是如此的。這句話是列寧說的。退出鬥爭，——不管你是有意識地還是無意識地——，這都正像這特一譯（註五），在社會的不義之前洗淨了雙手，這就是說，爲歷史者消出了一片地方，並且默然無語地助長了壓迫者的鎖鏈。

應該認得英軍直一點。絕大多數的資產階級的作家，他們都認得自己是非政治的，實際上他們並不是非政治的，雖然這因爲他們並沒有想推翻資產階級的秩序的任何要求，但在他們的心底，他們是想保存着資產階級的各種特權的，即使這不是從金錢的關係方面來講，那也可以從它阿諛了他們的自尊心這一方面來講的；這些特權爲了要更好地來顯耀他們，就狡猾地先承認了他們。他們並不準備手執武器來保衛這些特權，因爲從他們的職業上講起來，他們並不十分勇敢，並且這因爲他們想保持自己的兩隻手的乾淨。但是他們自己從沒有想到，他們正是站在劍子手的一邊的。在巴黎公社之後，這種情形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時候小仲馬、法蘭西西克、麥爾塞（爲了不露出那些更偉大的名字，此處就僅限於他們兩個人爲止吧！）兩個人都聲嘶力竭地，向着被槍殺的兩先生和加里季侯爵所射死了的野味狂叫（註六）。

列寧在他一九〇五年所寫的許多文章裡告訴我們，只要我們有一天是生活在階級社會裡面，在我們精神生活的各種表現中，就沒有並且也不可能有一種非階級的觀點。不管文學的願意與否，它總從屬於社會鬥爭的利益和熱情的，它不能擺脫並且也不可能擺脫任何階級的影響；所有的一切，都從屬於那些在鬥爭中的階級的影響，特別是從屬於統治階級的影響，因爲它有着更現實的和各種多樣的脫服與強制的力量來供它安排。甚至那些最偉大的作家，那些非常稀有的作家，由於他們性格的力量，能够脫離他們當代社會中起着支配作用的各種偏見和專橫的社會意見而獨立（或者他們以爲他們是獨立的）；甚至這些強有力的個性，這些創想和批評地思想着的人們，也從來不能並且不可能從當時的時代氛圍中隔離開來，他們永遠是「地奧尼修斯」的耳朵（註七），回響出他們這一代的一切轟響，他們永遠是高度敏銳的地震儀，能感應出那使這世界變形的最奧秘的震動。他們的思想的洪流

們清楚地看見那個應該跳過去的機關，但在二瞥之下，他們就為之頭暈目眩和兩腿搖擺了。爲了要重新建立起那被動搖了的脆弱的均衡，他們就退回去，遠離那引導着他們的時代而前進的快流，回到「道義的秩序中」去，回到那再使他們平靜和他們曾經看見而不想再看見的資產階級的秩序中去；這真是逃避到有限制的環境和穩妥了的生活裡去。

在這種地方，蘇列寧這樣一位行動的巨匠的理智，是和他們的理智有着根本上的矛盾，他用他自己特有的邏輯來反對他們，靠了這種邏輯，他的思想和他的行動就組成一個整體，——這不是一種化石似的和被剝奪了人性的塊狀物，這是一條唯一的洪流，它和向前邁進的時代的生命，它和時代的基本法則是相一致的。

從沒有人能像斯大林這樣（在偉大的列寧回憶錄中），光照出列寧的這個特點，光照出列寧這面西至和其他大多數的理論家及革命政黨的領袖所不同的特點：這就是他在羣衆中所表現出的自發的力量有着密切的聯繫。

列寧經常和羣衆聯繫着，什麼東西都不能割奪他對於羣衆的自發的力量的堅強的信心。斯大林引用過列寧在某次談話中所說的幾句精確的話，當一位同志擔心「革命的混亂」而發言「在革命之後應當立即建立正常的秩序」的時候，列寧諷刺地指出道：「假如這成爲革命家的人們，竟然忘記了革命的秩序是歷史上最正常的秩序的基礎，那就糟透了」。

斯大林又補充道：「相信羣衆的創造力量，——這是列寧活動中的這樣的一個特點，它使得他有可能去理解羣衆的自發力量，並且把這個自發力量的運動，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路徑上去」。

這就是一個行動的人所應該能夠把握偉大的才能。在這裡就存在着——一個科學的人所有的任務：洞察現象的本質，洞察它的奧秘的力量，它的法則和潮流，——以便去把握住它們。

讓這一點成爲藝術的最高法則吧。假如大多數的藝術家都太無能力來接受這一點，那麼他們之間的那些最偉大的人，是會本能地來執行這個法則的。自古及今的一位繪畫的盟主達文西（註十二），會把這樣一句話作爲他的座右銘：「*Trascurtare nella pittura meno decorata*」（「和自然的力量融化起來，去改進你的精神吧」）。

像達文西和托爾斯泰這樣偉大的藝術家，他們就是這樣和自然的生活力

相結合起來的。像列寧這樣的行動的巨匠，也就是這樣和社會生活的法則及其律動，和推動及支持着人類永遠向上發展的生活的激發力相結合起來的。

（註一）下面的這一段話，是從列寧的「做什麼？」一本書中引出來的。「工人階級報」是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二年時國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盟的機關報，他們組織國際社會民主黨中的機會主義及俄國的經濟主義派的思想，布爾喬維克的「火星報」及「光報」當時曾經和這派人作過尖銳的鬥爭。馬爾丁諾夫及克里如夫斯基兩人，俱係「工人階級報」的編輯。比莎勒夫是俄國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一位著名的文藝批評家。

（註二）西塞羅是羅馬的大演說家及政治家，是位和凱撒大帝同時代的人物。

（註三）原註——克魯普斯卡亞在她的「列寧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有人告訴她，說馬拉地米爾·伊里奇只讀最壞的書，他在生活中從來沒有讀過一部长篇小說」。後來她才知道了，這是不正確的。「馬拉地米爾·伊里奇不讀閒書，而且時常將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的作品反覆地讀着。……他是很瞭解並且很熱愛古典作品的」……。

（註四）此處指列寧稱瑪雅科夫斯基的「閉會迷」一詩而言。

（註五）西拉特特是羅馬的太守，耶穌即在其治下釘上十字架。當他判處了耶穌的死刑之後，他又洗了雙手，表示其清潔而與此事無關。

（註六）小仲馬是「茶花女」的作者。法蘭西斯克·沙爾遜是和小仲馬同時的一位法國劇評家。梯愛爾是法國的政治家，其所領導的政府曾經撲滅過巴黎公社的活動，而加里孚則是屠殺巴黎公社社員的有名的劊子手。

（註七）這是一個警報，據說敘拉古的暴君地奧尼修斯（紀元前四三〇——四六七年），曾經在他的宮中造了一條地道，與監獄相通，凡監獄中所發出的一切聲音，他俱可以因此聽到。

（註八）列寧在一九〇八年（托爾斯泰八十誕辰時）和一九一〇年及一九一一年，都曾寫過關於托爾斯泰的文字，其中五篇曾由本文譯者譯出，列第八卷第六——七、八、九、十等期的「羣衆」。

（下接四十二頁）

二十一年後

扎斯拉夫斯基作

——為紀念列寧逝世二十一年週年而作

英國作家韋爾斯先生，在他晚年的時候，一定有許多事情值得回憶，而他生平最有趣味的事件之一，大概就是他在莫斯科向列寧的訪問。過了幾年，過了幾十年，韋爾斯所寫的作品，會被人忘却的，而他在克里姆林宮向列寧的訪問，却是必將永垂史冊的事件。

當時，莫斯科全市就像一處大建築的基址——土地已經挖開，舊建築已被推倒，一切都凌亂不堪，要架，臨時梯子，東倒西歪的木料和磚瓦，到處一團糟，一個平凡的人在這樣紊亂的地方，大概不能夠找出他的進路的；人們慌慌張張，一會兒走到那裡，一會兒走到那裡，分明毫無秩序的樣子。這位英國作家，滿有秩序的舒服的舒適慣了，發現列寧在這些「大羣苦力，泥水匠，木匠和機器匠的中間，從事着巨人似的，玄妙到不可思議的建設工作。列寧那時在外國還不大有人認識，人們說着關於他的許多荒唐的奇譚，他是當時流行的一切惡毒的反蘇聯言的靶子。西方只有很少數的人相信：蘇聯「實驗」的殿堂總有些地方值得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注意。韋爾斯對於社會的空想，已成為專家，並且醉心於另一世界的人的福音，他要用他自己的眼睛去觀察他和他的兩人認為具有社會主義新奇性質的一些東西。

列寧就是這顆巨大的蘇維埃建設工程的建築師、總工程師和經理人，而斯大林就是他的左手。韋爾斯發現列寧一心一意地埋頭從事他的工作。列寧以工程師的資格，領這位作家參觀建設基地，並且對他說明正在建造中的是一座多麼莊嚴華麗的大廈。但是，韋爾斯只是看到亂七八糟的樣子。在他看來，列寧依然是克里姆林宮中的夢想家，依然是社會主義的幻想家。韋爾斯敘述莫斯科之變的經過時，設置了流行的見解，以為布爾塞維克的實踐注定了必然失敗。

自從列寧逝世以來，已過去二十一年了，在那二十一年間，許許多多有着依照資產階級民主的最好的理想擬定出來的舊的和新的憲法的大小小國家，吃不消緊張的局面，相繼崩潰了。成打的總統和內閣總理湮沒無聞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興起的許多國家之中，只有一個國家證明了能夠經得起所有一切考驗，這就是蘇維埃國家，蘇聯不僅依然健在，而且已表明是一個強盛的大國。蘇聯人民使法西斯主義受到目瞪口呆的打擊。建立蘇聯的政治家，依然站在領導地位，這個事實就表現出蘇聯的力量。全世界的人民，都認為斯大林是我們時代中最英明睿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沒有一個蘇斯大林為「夢想家」像韋爾斯說列寧那樣了；正相反，我們同時代的人，都看出斯大林是現實主義的一個政治家。

偉大的俄國詩人普希金，把彼得大帝所進行的戰爭，比喻成鐵匠的鐵錘：「沉重的大錘，打碎了玻璃，也鍛造了寶劍」。

許多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鎗擊下都已成了粉碎的「玻璃」，而蘇聯卻是「寶劍」。正和若干新聞記者和戰略家的預言相反，蘇聯到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反而大大強化起來，而並不是現出脆弱和疲憊的樣子。這是怎麼一回事，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了解，而且有些人心里害怕，不敢去了解它。

列寧的遺教，在馬克思主義中間，有着最正確地合乎科學的基礎。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是一種社會科學，這種科學把人類歷史看成社會形式方面的不斷的變化，由於鬥爭與矛盾而引起的不斷的進展，以及由新的代替舊的，那種不斷的變遷代謝。從關於俄國的研究出發，列寧引出了結論：舊俄國社會形式和國家形式不待不由別的形式來代替。他不肯

把資本主義和議會民主當做歷史發展中的定論。列寧教導我們說：要創造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工人階級，構成人民的主體的農民，會跟隨着自己的領導者工人階級，為建立更好的更高級的更符人民的需要的社會秩序而鬥爭。資本家和舊形式國家官吏，是沿途的障礙物。沒有他們，沒有他們管理，人民會得做事的，而且更會在自己中間發現更有能力，更有天才，自然也是更忠實的領袖和指導人。人民必須將政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裡——這是真正的民主。蘇維埃國家就表現着純正的，高度發展的民主。

這是落後的人士所不能了解的事情，這是舊社會秩序的主人不要了解的事情。是凡他們不能了解或不了解的事情，他們都說是不可能的。大家會記得：並不是關於這個問題的所有一切爭論，都是嚴格地屬於學院性質的。舊秩序的維持者，使用武器了；工人階級及其農民朋友，也以武器；這種歷史性的「討論」的結果，大家都知道。蘇聯方面參加辯論的領袖就是列寧和斯大林，由壓倒的大多數的人民擁護着。限隨着這些領袖的那些人，決沒有後悔的理由。我們很可想像得到：如果在俄國，政權是掌握在資本家和地主的手裡，而不是掌握在工人和農民的手裡的話，如果在俄國，軍隊是由沙皇的將軍們領導的話，如果俄國工業依然像在第一世界大戰時期那樣處在可憐情況中的話，「如果俄國農民依然像當年那樣貧困，無助而落後的話」，那麼在現今的戰爭中，俄羅斯，俄羅斯人民，以及蘇聯的其他各民族人民，就會受到什麼遭遇呢。我對知道：希特勒德國會指望着俄羅斯的這種落後性。她心里存着一種關於蘇聯的陳腐的觀念，她不相信蘇聯的活力。然而正是在蘇聯，希特勒的戰略計劃和政治計劃，已被紅軍的實力，被強大的蘇維埃經濟，被蘇維埃各民族人民的團結打粉碎了。蘇維埃政權，使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以及蘇維埃其他各共和國得救了。

列寧，和斯大林一同創建了紅軍，這是已經依照列寧主義的一貫的原則變革了、發展了的一種軍隊。斯大林實現了由列寧和他自己在蘇維埃政權最初年份中所擬定的蘇維埃工業發展計劃。斯大林為各民族人民間的友誼奠定了基礎，依照關於各民族人民平等與親密合作的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諸原則，而把蘇聯聯成團結一致的渾然一體。

列寧的外交政策，嚴格地符合關於所有各民族的友誼與平等的道義政策。列寧并不以敵意回絕差不多普遍抱敵意的資產階級政府。他并不會叫蘇維埃人民把自己關閉在自己的蘇維埃的殼子裏，認為自己不屑和世界其他

地方的人來往，或者要用武力強迫世界接受自己的見解和自己的國家形式。蘇維埃人民熱愛自己的祖國，對於自己的國家異常尊重，并且忠實於自己的社會制度，然而，各民族人民間的和平與友誼，是列寧在外交政策方面開宗明義的第一句。

列寧是偉大的愛國者，他熱愛自己的人民，以自己人民自能和其他獨立感為榮。列寧對於所有不侵犯其他民族自由的一切民族，都異常尊重。他教導我們進行毫不留情的鬥爭，以反對一切方式的極端愛國狂，反對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蘇聯所有各民族人民以及國外的千百萬勞動人民，都認列寧為自己的良友和導師。斯大林便是列寧的最親密的戰友，列寧工作的繼承人。

今天，我們在蘇維埃生活的一切表現中，都看見列寧。無論在什麼時代，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和蘇維埃人民在一起。他的著作更是不用說之不竭的蘇維埃思想的寶庫。列寧高瞻遠矚，透視過他的時代。他的人民都示出一條鬥爭與勝利的真正大道。斯大林正在繼續引這蘇維埃這條大道向前邁進。

(上接第四〇頁)

(註九)原註——列寧在另一篇文章中，把這一段話得更正，他說「托爾斯泰的思想」(托爾斯泰的思想)是通常一八六二年至一九〇四年的時期」的，這正是俄國的這樣一個崩潰的時期；這時候，西的東西無可回復地在大家的眼前崩潰下去，而新的東西剛剛才安排起來；……：「(見「托爾斯泰及其時代」)。

(註十)原註——莫爾泰教授的這本著作，係於一九三三年由巴黎的阿爾曼·科朗書店出版。該部著作，糾正了法國文學批評家對托爾斯泰現代法國起源的許多著作中的不正確的資料，證明出他的各種探究的真相的見解，而這些探究又是常常為偏見所左右的。此外該部著作，又將一七一五至一七八九年整個時期的法國思潮，作了一個檢討。

(註十一)原註——托爾斯泰說過：「人類向前發展的公理法則是沒有的，像東方永恆不變的許多民族，就向我們證明出了這一點」。而列寧在「托爾斯泰及其時代」(一九一一年一月)一文中則指出道：「一九〇五年，是「東方的」永恆不變的終結的開始。……而跟着俄國一九〇五年的事變之後，在那許多所謂「東方」的國度中也發生了類似的變遷，——而托爾斯泰在一八六二年正是引證過這種東方的「永恆不變性的」……」。

(註十二)這文西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大藝術家。

法國解放後的政治形勢

張純

(一)

法國獲得解放，已有半年光景了。時間對於愛好自由的人民是寶貴的，法國人民沒有一刻放鬆他們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部門，從事全面建設新民主主義法國的勞力。在法國的廢墟上已經呈現了一個新的強大的民主法蘭西的粗略的輪廓，吸引了全世界的驚異的目光。

在法國，已經成立了民主聯合政府，這就是戴高樂將軍領導下的法國臨時政府。法國臨時政府具有與歐洲其他國家的民主聯合政府相同的一般特徵，因而與歐洲若干國家的「倫敦」流亡政府有着本質上的差別。它是由法國抗戰各黨派全國規模民主的原則聯合組成的，是堅持抗戰團結實行民主進步政策的，同時對法國本身解放的事業和聯合國共同的事業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法國臨時政府是在法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和民主團結的基礎之上成立起來的。先是在一九四三年五月，法國國內抗戰各黨派全國規模的廣大進步人士聯合組成了「全國抗戰會議」，作為領導國內抗戰運動的中心政治組織。接着，在同年六月，又在諾爾及爾成立了「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作為與全國抗戰會議並行而領導國內外抗戰運動的聯合機構。在全國抗戰會議推動之下，法國各省市城鎮鄉村都成立了解放委員會。就這樣，從下到上，從國內到國外，把抗戰運動推動了起來，而且打成了一片，結成了法國人民抗戰度過艱苦的民族統一戰線。

一年半以來，在名義上代表法國國家權力的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隨着國內外抗戰運動的高漲和法國人民民族團結的鞏固發展而不斷進行了改組，逐步走上了民主團結的大道，直到去年五月歐洲第二戰場開闢前夜，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對根據全國抗戰會議的發起和臨時會議的決議，正式改稱為

法國臨時政府。

改稱臨時政府的理由是簡單而易解的。

首先是基於客觀環境的實際需要。當時，蘇軍已飲馬魯魯特河，歐洲第二戰場開闢在即，法國全土解放的日子已經很接近了，戰爭的進程迫切要求成立統一的民主的政府，以便對內更進一步領導和加強法國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而對外保持法國人民的充分發言權，以維護法國人民的國家權益，爭取更廣泛的國際援助。

再則是民族解放委員會本身的發展在政治上達到了成熟的階段。民族解放委員會經過兩次改組後，擴充了本身的民主機構，加強了民主力量的團結。特別是法國共產黨派出了自己的代表比勞和格萊尼二人參加委員會的工作（比勞任國務委員，格萊尼任空軍委員），這樣就在實際上把法國人民的力量更加緊密地團結了起來，使民族解放委員會變成為抗戰各黨派團體實行民主合作的真正的聯合機構。法國共產黨負着在國內組織武裝鬥爭最主要的責任，是代表法國人民最大而生氣勃勃的力量，它的參加政權的執行和國家的管理正是民族解放委員會在政治上成熟的最主要的標誌。只有法國共產黨參加後，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才加強了它與人民的聯繫，提高了它在國內關係和國際關係上的政治威望。

巴黎解放後，法國臨時政府就回到了國內，由諾爾及爾選出了原來的首都。

(二)

應該說，法國臨時政府是有它底先天的弱點，而且是帶着這個弱點回到國內的。這個弱點就是：主要抗戰黨派和抗戰團體（首先是法國共產黨和

法蘭西工總同盟），或者在政府中的比重要它在抗戰運動中的地位與影響不相適應，或者根本沒有自己的代表。這就說，法國臨時政府與法國各階層廣大人民的聯繫是極不充實的。這種情形只要拿來與法國人民配合起來，在法國發動武裝起義，法國全境絕大部份是人民以自身的力量使法蘭西的各個階層對照起來一看，就顯得法國臨時政府這種階級構成上的先天弱點，是極難適應法蘭西解放後的政治環境的，尤其是不能適應在軍事政治和文化各部門從事全面復興工作的廣大要求。為了改正這種情況，所以，法國臨時政府回都巴黎後不久，就不得不與全國抗戰會商，而於去年九月實行民主的改組。

改組後的臨時政府，閣員擴大到二十二二人，其中九人是新參加進來的，大半是國內抗戰運動的領袖，如國務員若望斯，是前任上院議長，巴黎解放委員會主席，外交部長皮杜爾，是巴黎大學歷史學教授，全國抗戰會議主席，空軍部長狄隆是共產黨國會議員，全國抗戰會議第一著名組織者和領導者，財政部長勒柏爾克（去年十一月間因車逝世，遺職由前任殖民部長布立澤繼任），是金融界巨子（歐洲聯合銀行董事長），巴黎解放委員會委員，郵電部長福朗是法北社會黨領袖，情報部長戴蘭是抗戰運動宣傳部總幹事，生產部長賴各斯與勞工部長加洛第都是職工運動領袖。

經過這次改組，法國臨時政府就在社會成份和政權構成上包括了更加廣泛的各階層各黨派的代表，而成為真正由各階層各黨派在團結合作的基礎上共同組成的民主聯合政府。

但是，應該在這里特別指出來：法國臨時政府雖然是全國民民主力量的大聯合大團結，并由此贏得了全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而由於它所處的國內環境和社會背景的特殊複雜的性質，它本身政權構成上的先天的弱點并未因去年九月的改組而得到完全的克服。這也就是說，法國臨時政府雖然基本上與人民的聯繫加強了，它所執行的政策雖然基本上是以人民的意志為根據，但直到現在為止，還并不在對內對外關係的一切方面都完全代表法國人民的意志。這也就是說，法國臨時政府的政策，隨時都有可能受到反對倒退因素的影響而發生與人民的意志相脫離的傾向。而最後，這也就是說，對於法國臨時政府的政策活動的進步民主的方面，還需要發動和依靠人民的力量來監督和促進，才能夠得到充分的保證。

經過了這次改組，特別是經過了四年的奮鬥，法國的政治——社會生活

的面目完全改變了，國內階級力量的相互關係，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和新的結合。那些舊統治階級中最腐敗黑暗的部分：金融資本家，農村貴族和教士，保皇黨餘孽，海陸軍的高級軍官，官僚政客，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投機份子和冒險家，以及各種各樣的法西斯黨徒、工賊和反猶太主義者都在法蘭西淪亡後，自覺或不自觉地變成了一種「合作主義者」和「維琪份子」，直接出賣了法國人民和國家的利益。法蘭西解放後，他們只有極少數隨同貝當——賴伐爾逃到德國，其餘大部份都還留在國內，好結的只圖怎樣隱藏自己的醜惡面目，逃避應得的懲罰和清算；壞結的竟千方百計，進行「第五縱隊」的陰謀活動。那些舊統治階級中的開明的資產階級以及中小資產階級的廣大進步愛國人士則和勞動人民團結了起來，發動了反德反維琪的民族解放鬥爭，而在最後的時刻，以團結一致的力量和行動把法國從法西斯德國的奴役下解放了出來。他們代表著法國人民的新生的力量。所有這些情形，反映到臨時政府內部，便自然使臨時政府本身也產生各種社會力量相互關係的相應的變化和結合。

法國臨時政府內部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種政治力量：首先是以前吉羅德為首的右派。吉羅德本人雖然在民族解放委員會成立後，就逐漸失去了自己的權勢（解放委員會成立時，吉羅德與戴高樂同任主席。第一次改組時，吉羅德辭去主席，受任法軍總司令。第二次改組時，吉羅德又辭去總司令，受任軍事顧問，因吉羅德不就職，最後就被編入後備役），但他這一派的勢力直到現在還依然保持著在政府中的地位和影響。現任交通部長梅亞和住房難民事務部長德萊奈就是吉羅德派（兩人還在吉羅德繼任主席時出任法屬北非行政長官時就是他的助手）。吉羅德派在政治傾向上是極端保守的，同情維琪的。他們曾在國內外一直不斷地進行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活動。法國解放後，他們和遺留在國內的維琪份子與「合作主義者」發展了新的結合，力圖在法國人民用血澆灌的土地上恢復舊日的統治。其次就是以戴高樂將軍為首的中間派。他們的組成份子和政治傾向都非常複雜，但基本上在政治上代表法國的開明資產階級。他們有的傾向保守，有的傾向進步。傾向保守的與吉羅德派互通聲氣，傾向進步的則與左派互相結合。也有在保守和進步兩種傾向中間搖擺不定的。他們在和舊日統治階級中的右派，特別是希柏林——維琪統治下得到機會伸張自己勢力的金融資本集團實行分裂時，甚至比左派還表現得更激烈，如前財政長勒柏爾克，自己是金融界巨子，但卸職後參加了抗戰運動，那在短促的財政長任內，還曾大膽採取許多措施以收縮通貨、穩定金融、

平抑物價，如沒收若手續商級官員財產和廢棄財產者的全部利潤，廢止舊幣，發行新幣，對海外法僑財產實行徵稅等等。最後就是包括共產黨、社會黨、勞工總同盟等等的左派了，他們在政治上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對抗戰運動盡了最大的貢獻和努力。儘管他們在政府中的比重還不能與他們在抗戰運動中的地位相比，但，他們與中間派的廣大進步人士結合起來，就在法國人民的政治社會生活中佔了壓倒的優勢，而成為法國內部政治發展形勢中的決定性的因素。這就是法國戰時戰後統一戰線的社會基礎。

(三)

很顯然的，反映到政府內部的這種法國階級力量相互關係的變化與結合，自必形成交互消長的因素，而不能不影響到法國臨時政府在國家——社會措施上的各種政策。

法國解放後，法國人民和政府都面對着全面復興法國的嚴重任務，而在目前，就有四個亟待解決的建設性的問題，提上了法國人民和政府從事全面復興法國工作的議事日程。

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把解放戰爭進行到底。對希特勒法西斯的戰爭還沒有結束，法國人口約有三百萬（兩百萬俘虜，一百萬勞工）還被押禁在德國做苦工，而西線的大戰也還在法國的邊境進行。法國的人力物力還必需全部動員起來，把現行反法西斯戰爭進行到最後打到柏林為止。只有把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徹底撲滅，法國才算獲得了完全的自由和解放；只有把希特勒法西斯在德國的統治被推翻，法國人民所渴望的安全與和平才算有了堅實的保證。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起見，首先，法國人民必須立刻着手建立一枝超階級有百萬人員和現代化武器的新的法軍。法國在戰前總共有少數師團的地面部隊。法國空軍還只有幾百架飛機和二萬五千空軍人員。法國的海軍，還只有大小三百多艘巡洋艦（其中有主力艦三艘，重巡洋艦三艘，輕巡洋艦七艘）總共不過三十萬噸，海軍官兵則只有六萬三千人。這個數目是太少了。建立一枝現代化的新軍，人力可說完全不成問題。除海外軍外，法國還有由各抗戰團體領導的內地軍，大約五十萬。把海外軍和內地軍加以合理的整編，就能够把新法軍組織起來。可是，在整編中，總是在政府和抗戰團體以及政府內部

各派之間引起了紛歧。右派堅持解散內地軍，左派則主張內地軍應以爲解放區單位參隊參加正規軍。法國臨時政府起初打算解散內地軍的婦女隊員，遭到抗戰團體的堅決反對，沒有成功，接着就同意把內地軍併到正規軍中去，但在指揮權上又發生了爭執，右派以內地軍軍官沒有經過正式訓練爲藉口，主張把指揮權交給舊軍軍官，左派則堅持內地軍軍官的官銜是他們從血與火的鬥爭中得來的，如果把他們的指揮權剝奪，人民一定不答應，全國抗戰團體對組織新法軍問題提出了有力的決議：「法國政府將看到法國內地軍，法國人民的軍隊，在他們的勝利和英勇行動得到獎勵的條件下，與法國陸軍合併」。經過這番力爭，法國政府最後才決定把內地軍的百分之八十編入正規軍，但即堅持解散內地軍中的「愛國民兵」，這是法國左翼政黨領導和組織的人民武裝。愛國民兵曾在巴黎舉行示威反對政府這一決定。據最近路透社電傳，這個問題已獲解決，但詳情如何，尙不知道。其次，法國人民必須立刻開始把戰爭資源動員起來，在法國自己的工廠中恢復和加緊作戰工具生產。在這問題上，左右派也有不同的意見。右派藉口原料困難交通紊亂，一心指望從聯合國供給作戰裝配，認爲在聯合國沒有充分供給以前，新法軍無從成立起來。左派則主張：爭取外援固然是必需的，但主要的應依靠自力更生，不能單是指望由聯合國供給作戰裝配。生產部長賴各斯脫曾指出，法國工業百分之八十還完好如初。原料缺乏固是事實，但並不是無法解決，空軍部長狄隆更用具體數字指出，法國現在仍保有航空工廠四百餘處，而領一百八十餘萬方呎，機器二萬二千多部，即合其他工廠，每年可造飛機二千多架。勞動力也不成問題。法國現有失業工人六十萬人，單是巴黎一地就有三十萬人。應該把他們大批吸收到軍事工廠中去。成問題的倒是：過去曾經爲德國製造軍火的工廠都轉歸門來了，這些工廠的老闆過去都是「合作主義者」，利用了法國淪亡的機會而使生產集中起來，發了橫財，現在眼看到人民力量的興起，便都對生產實行怠工來了。因此，爲了恢復工業生產，必須進行比較有力的運動，以反對這些怠工的企业家，並對他們進行無情的清算，追究他們應負的責任。法國政府曾下令沒收「雷諾公司」和逮捕「雷諾公司」的董事會的人員。但在目前，法國政府對肅清的工作做得還是不太够，而怠工破壞依然成爲法國恢復軍工生產中的嚴重現象。

第二個問題就是如何恢復正常的經濟生活，解決糧食、燃料、原料等等的恐慌。法國在這次戰爭中遭受了極大的破壞。自被德國佔領之日起，法國

的經濟生產總額於德國和停戰前德國以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控制了法國的各大企業，使之為德國的作戰機構服務。法國的經濟生產幾乎整個兒變成了德國作戰機構的單純的附屬品。法國工業生產減少了百分之五十，農業生產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一九四三年底，中小工商企業倒閉的達百分之五十。貨物差不多完全麻痺了。人民消費受到極嚴格的限制，如石炭、糧食的百分之六十都運到了德國。捐稅的苛重，黑市的猖獗，以及對德國軍費的龐大數目的贖付，特別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減少了人民的購買力。物價平均比戰前漲了十倍，國債增加了四倍，通貨總額增加了五倍。一九四三年夏季法郎的價值只及戰前的六分之一。總之，在德國佔領期間，法國的國民經濟是陷於崩潰破產的深淵，而人民的生活則處在異常貧困的境地。現在法國解放了，法國經濟的復興就成為迫切而嚴重的任務。為了恢復正常的經濟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要使法國的國民經濟不再受金融資本集團的控制。法國的金融資本集團對法國人民和國家犯了最大的罪惡。差不多五十年來，這個集團為了追逐利潤而不惜降低法國人民的生活條件，在經濟軍事政治各方面削弱了法國的力量，而特別從一九三三年以來，他們從狹窄的階級偏見出發，一向向希特勒德國邁步並破壞法蘇之間的任何接近，結果用削弱自己孤立的辦法，使德國強大起來，最後縱容法西斯匪徒進行戰爭，把法國的大門向強盜打開，把法國人民的每一件東西都獻給敵人，並藉此分得杯羹，吞肥自己。新法國經濟建設的主要關鍵便在於，對於這個必然產生賣國資的經濟獨佔制度究竟應該維持還是應該抑制。無疑問的是應該抑制，應該讓人民自己來監督經濟生產。這裡，一方面必須做到的便是取消托拉斯，要使他們可能重新獲得對國家經濟生活的決定權力；另一方面要做到的便是給予人民以監督經濟生產的權力。為了消滅托拉斯，就得從各種經濟部門中把賣國罪犯肅清。把大企業由私有變成公有，或在特定時期內，採混合管理的方式；把一切賣國罪犯的財產完全充公。為了保證人民對經濟生產的監督權力，首先就得提高勞動階級的政治地位，改善他們的勞動條件，增加他們的工資。法國政府在戰方面進行許多賢明的措施，如關於取締托拉斯，會把若干大企業收歸國有，會規定凡在戰爭中獲國難財的全部利潤一律充公，會逮捕許多大企業和銀行老闆等等，如關於保證人民對經濟生產的權力，會決定在各企業中成立由工人和職員代表組織的生產委員會，其任務就是與企業管理當局密切合作，以改善職工的工作與生活的物質條件，並對生產的進行有廣泛的諮詢權。

同時並會下令調整全國職工薪資，自去年九月起，一律增加薪額，惟不得超過每小時三十法郎和每月六千法郎。經過法國人民的努力，法國的經濟情形已逐漸好轉，石炭產量已達每週二十五萬噸，一千二百三十八座火車站已經通車，塞納與波爾多間運河已經復航。除自己生產外，還有聯合國接濟的物資，只是，法國政府對各企業和經濟行政中的腐敗工作還是做得不夠，許多賣國罪犯還佔着經濟機關的負責地位，以致法郎的糧食、燃料和原料的恐慌，還沒有能够及时的克服。

第三個問題，就是如何徹底實現真正的人民的民主政治。人民的主權必須成為生活中的事實，而不是一個空洞的原則。只當——賴伐爾制度必須完全消滅。只有這樣，才能把法國變成一個真正的民主的國家。臨時政府會給予法國人民以莊嚴的允諾：等到戰爭結束後三個月，即法國俘虜和流亡者都回國後，即進行大選，成立國民會議，制定民主憲法，到那時，臨時政府就要把政權還給人民的代表。同時，在選以前，政府將以一切辦法來保證人民的各種政治權利，給予人民以最大限度的自由。這個諾言是敵高樂將軍於巴黎解放後的第十八天向全國人民廣播時宣佈的。現在我們來看，臨時政府是不是在實踐它的諾言。在目前，法國抗戰各黨派團體是公開存在的，自由活動的，法國各黨派團體都出版有自己的報紙，對政府的政策提出自己的意見和批評。全國愛國政治犯已由政府下令釋放，法西斯團體和維琪民團已由政府下令解散。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身體、職業以及示威武裝的自由，可說基本上是得到了保障。此外，法國全國現正熱烈展開初選運動，準備於今年二月間選舉各省市縣鎮的地方政府和省市議會。巴黎市政選舉中，登記人數已達一百六十萬人，比一九三九年多三倍。法蘭西婦女也有了選舉權，巴黎婦女七十五萬人熱烈參加了選舉登記。但是，在實現這些進步措施方面，臨時政府並不是沒有遭到阻礙並因此發生不堅決和動搖猶豫的現象。如有派在國內用各種各種詭譎詭異的方法，煽動了反共反全國抗戰會議的運動。用反共來破壞民主，雖然這是過時了，但有派人士和他們的報紙却堅持解散全國抗戰會議和各地解放委員會，特別反對在選舉以前以各地解放委員會代替維琪政府的行政機關。政府只是由於全國抗戰會議在人民中的威望和各地解放委員會實際上成了地方政權機關的事實，以及它和抗戰運動的傳統密切關係，才沒有公然採取右派的觀點。法國共產黨領袖多列士的回國問題，直到去年十一月間臨時政府解除禁令後才得到完全解決。人民的武裝自由權

受到相當限制，解散內地軍的間諜雖然已經過去了，但對一切賣國罪惡的懲罰還沒有澈底實行，在軍隊中和行政機關中肅清法西斯黨徒和維希份子的工作還做得太慢太不。繼普秀之後，被判處死刑的，還有極少數的人。而最嚴重的是第五縱隊份子這在全國異常活躍，戴高樂將軍本人就在巴黎遇刺。對黨集會的破壞和對愛國人士的襲擊還繼續時有所聞。這些第五縱隊不但利用各種職位對復興工作實行了怠工破壞，而且還企圖製造恐怖來破壞法國人民的民主團結，這是法國臨時政府目前在內政上所遭到的最大危機和考驗。

第四個問題就是如何恢復法國人民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威信，加強法國與反希特勒聯盟，首先是英美蘇三大強國的友好合作關係。法國臨時政府是直到去年十月間才得到聯合國家的一致承認的。但同時，法國在解放後，却遭受了遭受像比希等國人民相同的命運，在內政上沒有受到外國的干涉，犯這兩件事務系起來看，就明白：原來比希等國政府是反對原樣的被稱為「合法」的舊統治者，不是根據人民的意志而是依靠外國的支持搬回國內的，它們的企圖是恩賜舊的統治帶回給他們的人民。戴高樂將軍領導下的法國臨時政府則是從抗戰運動中產生的新的民主聯合政府，不是依靠外國支援而是依靠人民力量回到國內的，帶給人民的也不是舊的統治而是新的民主。正是因為這樣，才沒有演成像比希等國的悲劇，也才不願外交上的重大困難而獲得國際的承認。解放後的法國是處在國際關係極端錯綜複雜的局勢之中，由於法國在歐洲的傳統地位，法國是被英國統治者集團當做在政治上與蘇聯維持均勢的平衡法碼，而同時法國與蘇聯同是與德國接壤的國家，法國本身的利益要求與蘇聯相互友好合作，要求成為保證歐洲戰後和平的建設性的因素。法國人民必須在這種複雜的環境中找到恢復國家地位的正當途徑，而不是時便把法國的命運與世界大戰後那幾不成功的有背利益的結合。這就是說：法國必須選擇兩道途徑中的一條：史末資（南非總理）的均勢平衡的途徑和德黑蘭的民主團結的途徑。事實證明：法國臨時政府是堅決地選擇了德黑蘭的道路。據說，阿吉爾去年十一月間訪問巴黎，與戴高樂舉行會談，會談法提議組織「四歐軍事政治集團」，戴高樂將軍雖然拒絕了。接着不久，戴高樂就偕同皮杜爾訪問蘇聯，在動身以前，皮杜爾曾在法國臨時議會報告法國的外交政策。皮杜爾說：「戴高樂和我就要到莫斯科去，這次訪問必須認為對法國的將來及世界的和平具有重大意義，我們需要一個

西方的聯盟，也需要一個東方的聯盟」。戴高樂和皮杜爾到莫斯科後，就與斯大林與莫洛托夫舉行了懇切的會議，結果締結了兩國二十手友好同盟條約，其精神與英蘇蘇捷同盟條約完全一樣。在法國人民看來，這是法國外交上的偉大成功。巴黎「解放晚報」就曾說：「斯大林和戴高樂所訂立的同盟條約，不僅是這兩大國家傳統友誼的恢復，而且是戰後歐洲和平建設的重大因素。」此外，根據蘇聯的提議，法國還派代表參加歐洲和平委員會，巴黎換機會議也把法國包括在安全委員會內，當作第五常任理事國。法國人民和政府就以他們這種對內對外實行民主團結的進步政策，而開始恢復了他們的國際威信和國家權威。戴高樂二月五日夜在巴黎的廣播，則更講得清楚：「我們需要盟國共同保證歐洲和平，我們所以同英勇強大的蘇聯，締結良好和真實的盟誼，就是這原故，由於這一目的，我們希望：等到英國同意關於德國方面我們所引以為重要的問題，我們雙方能消除我們對這區或那區相互爭執的一些痕跡後，就同英勇善良和古老的英國締結盟誼。我們最迫切的需要，就是生存。我在不久將來，就聲明法國的原則和計劃。人們都知道：無論在內政和外交任何方面容納各派共產黨共慶國事的團結計劃，終究是必要的。」

(四)

從一路來的敘述中，已可以清楚看見：不管環境的困難和艱難，戴高樂與抗戰運動的密切聯繫，法國臨時政府基本上表現着人民的意志，在全國實行着民主進步的政策。

法國目前政治局勢的最基本的特徵便是：法國人民站了身了，現在，主權法國命運的不再是「二百萬法郎」及其所象徵的統治者們的集團（不管主權願望是怎樣），而是法國人民自己了。

法國國內進步民主的力量在團結，正在空前規模上消滅着，更新着，鞏固着，擴大着，為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法國而奮鬥着最大最偉大的努力。

法國人民這種民主團結的消滅過程，首先表現在法國全國抗戰會議在全國的威望和地位的逐日增高上面。法國全國抗戰會議共分兩個組成部份，一

備是由左翼各黨派組織的「民族陣線」，包括社會黨、共產黨、天主教黨的皮杜斯派、勞工總同盟、商人聯合會、學生聯合會等等。一個是由維希黨派的各黨派組織的「民族解放會」，包括「解放會」、「戰鬥社」、「抵抗會」、「法蘭西不亡會」、「解放志願隊」、「大眾民主黨」、「天主教黨」等等。法國解放後，全國抗戰會議，已決議決不解散，擬設作為法國人民政治——社會生活中的黨派組織而存在與發展下去，以便在重建民主法國的偉大工程中起重大的作用。職工運動領袖，法國總工會書記路易·奧利巴繼皮杜斯被選任為全國抗戰會議主席。全國抗戰會議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曾在巴黎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各省市解放委員會都派有代表出席，在這次大會上，提出了全國抗戰會議對重慶民主法國的政治綱領，並以一致熱烈通過，支持法國臨時政府實行這個政治綱領。法蘇同盟條約也在大會上得到了熱烈的歡迎。抗戰會議的軍事委員會並已擴大組織，以便幫助政府進行新法軍的編組工作。全國抗戰會議，並已根據民族陣線的提議，對二月間的初選進行着廣大的準備工作，造成選舉的熱潮，並在選舉中力求更進一步團結所有愛國的民主進步人士，由各抗戰黨派團體共同召開各地選舉大會，討論共同綱領，提出共同的候選人，以便使民主進步人士，人民的真正代表，能夠選舉到省市城鄉的地方政權機關中去。

法國人民民主團結的增進過程，其次表現在法國人民的政治——社會活動的廣泛展開上面。在克里西西舉行了全國總工會大會，這次會議，加強了法國工人的階級團結，把由社會黨、共產黨和天主教黨領導的工人運動統一起來，同時還通過決議，派代表團，出席今年二月間在倫敦召開的世界工會大會。會後，由路易·賽蘭親自領導的代表團會先後訪問英國和蘇聯。在莫斯科時，並曾與蘇聯職工會中央委員會舉行談判，成立兩國職工會聯合委員會。在巴黎則舉行了社會黨和共產黨的全國大會。在社會黨大會上，開除了一百多名通敵賣國的在維琪政府中擔任重要職務的社會黨員，其中包括九十多名社會黨的國會議員。社會黨總書記丹尼爾·梅耶曾在他的政治報告中反覆說明法國工人階級團結的重要性，并提議大會不得採取反共政策。大會贊成了梅耶的主張。共產黨的大會，提出了自己對法國目前時局的主張，這就是團結一個進步的民主愛國人士，進行共同的鬥爭，以便把反法西斯戰爭進行到底，把法國建設成爲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此外，在巴黎還舉行了全國學生大會。大會的「人權保障同盟」也在巴黎再議成立，恢復了過去的

反法西斯的工作。

最後，法國人民民主團結的增進過程，還表現在抗戰各黨派之間的廣大的團結合作的關係日益增強上面。「民族陣線」會通過決議，與「民族解放會」成立聯盟。決議中說：「爲了加速勝利，懲罰賣國賊，肅清行政機關，實行全國抗戰會議的新的綱領，全體法國人民的一致行動是必要的」。民族陣線已派出一個包括共產黨的總領，社會黨的哥達和天主教著名神父費利浦的代表團，準備與民族解放會進行談判。法國共產黨與社會黨的合作關係也增進了。法共派出的包括法共書記杜克洛在內的一個六人委員會，與社會黨派出的同樣數目的代表進行談判的結果，已成立兩個「永久瞭解委員會」，以便在復興法國的專事中間時時磋商合作中的一切問題。

應該在這些特別指出的，是法國共產黨在法國人民政治——社會生活中所起的重大的領導作用。法國共產黨已它在抗戰運動中的振奮前鋒的光輝成就和幹部黨員的重大犧牲，博得了法國人民的熱烈擁護和信任。法國共產黨現在是法國最大的政黨，它擁有黨員六十萬人，青年團員二十五萬人，由法共領導的人民游擊隊（內地軍的一部份）在法國全境武裝起義的時候，也約二十五萬——三十萬人，佔內地軍總數的一半以上。法國人民像潮水一樣，參加了共產黨的行列。許多著名的文化科學界人士，如世界著名科學家郎之萬和居里，以及西班牙著名建築家皮加索都先後參加了法國共產黨。在法國的一個小小的市鎮萊納，三天之內，請求入黨的就有二千七百多人。法共機關報「人道報」目前是法國銷行最廣最大的報紙，每天約五十萬份。法國共產黨在法國政治發展中所起的決定性的影響，我們不必舉出太多的例證。奧國哈卜斯堡結去年十一月號會就有基督教科學報駐巴黎特派員勃朗尼的「臨時通訊」巴黎漫遊記，里面就曾說到：「今天法國政局是爲抗戰運動所決定的，而法國共產黨則是抗戰運動中最強大的力量」。許多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青年，「從事抗戰運動之後，思想就有劇烈的轉變，他們都突然轉變過來，反對資產階級的保守主義，而他們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但卻有着強烈的共產主義的傾向。」

法國共產黨和全國其他黨派愛國人士一起，現在展開廣大的工作，以加強法國人民的民族團結和促進全國實現新的民主。新的強大的法國的燦爛前途，已經呈現在世界的面前。難道有甚麼力量能夠阻攔法國人民的前進步伐，阻止法國新生的歷史車輪麼？

解放區文化統一戰綫方針

毛澤東

——一九四四年十月卅日在邊區文教大會上的講演——

毛主席首先說：我們的一切工作的總目標，就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和希特勒一樣是快要滅亡了，但是它還有力量，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解放區必須繼續努力，才能達到最後消滅敵人的目的。這個努力，首先是戰爭，其次是生產，然後便是文化。沒有生產的軍隊是飢餓的軍隊，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日寇解放人民和建設工業化的新中國的。所以我們必須有文化。有一部份同志曾經輕視文教工作，這是錯誤的。在這次會後，大家都應該對文教工作予以應有的重視。

關於我們的文化的性質，毛主席指出：它應該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也就是人民大眾反日反漢奸反黑暗封建傳統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政治經濟基礎，就是民主政府，就是減租減息，就是各種規模的工廠與各種形式的合作社，為領導的個體經濟。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方面是這種社會形態的反映，一方面又推動這個社會形態的繼續前進。

毛主席說：中國的工業現在還很弱小，解放區的工業更是弱小，但它們是有無限前途的，中國必須以此為基礎，克服自己的落後。解放區的經濟有其進步的方面與落後的方面。解放區的文化也有其進步的方面與落後的方面。解放區有作為領導方向的人民大眾的新文化，但也有廣大落後的封建遺毒，如陝甘寧邊區即有一百多萬文盲，兩千個巫神，封建迷信的思想還在經過文化生活的各方面影響着邊區的羣衆。反對封建迷信，反對封建遺毒，甚至比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還困難。邊區文教會議的任務，無不教育、藝術、衛生、報紙、通訊、不衛生等舊習慣作鬥爭，爲了進行這個困難的鬥爭，就不能不有廣泛的統一戰綫。如在教育方面，即不但要有比較真中，比較正確的中小學，而且要有普通分教，比較不正規的村學、讀報識字組；不但要有新內容的民辦學校，而且要利用和改造舊的村塾。在藝術方面，即不但要有話劇，而且要有秦腔、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和改造舊戲班，特別是百分之九十的舊秧歌。在醫藥衛生方面，尤其如此。陝甘寧邊區現在嬰兒死亡率至百分之六十，成人死亡率至百分之三十，去年死牛七千八百頭，死驢四千頭，死羊二十一萬隻，死騾二千三百隻，人民和牲畜普遍地相信巫神，在這種情形下，僅僅依靠少數機關部隊的醫藥是不可能的。爲機關部

隊服務是很重要的，四醫比中醫是重科學，但西醫如在這種情形下不關心人民，不爲邊區人民訓練更多的醫藥，不聯合幫助和改造邊區的一千個中醫，和舊式的醫藥，就是實際上幫助巫神，幫助邊區人民的死亡，所以新形式與舊形式的統一戰綫是完全必要的。統一戰綫的原則在此完全適用：第一是團結，第二是批評，或教育改造，投降舊形式是錯誤的，排斥舊形式也是錯誤的，我們的任務是聯合一切可用的舊形式、舊人物而幫助感化與改造他們，爲了改造他們，就首先要團結他們；只要我們做得恰當，他們是會歡迎我們的幫助與改造的。

我們的文化是人民大眾的文化，因此任何方面的文化工作者，必須具有爲人民大眾服務的高度熱誠，在這一點上，毛主席諄諄囑咐：一切知識份子，一定要拋棄脫離羣衆的惡習，以鞠躬盡瘁的精神獻身人民，與工農兵密切結合；而工農幹部亦應重視和信任這種革命的知識份子。

關於聯繫羣衆的工作作風，毛主席在結束他的講演時，特別指出兩個基本原則，就是按照羣衆的需要和自願，一定要從羣衆的實際需要出發，而不從任何良好的個人願望或歷史教條出發，要因時因地制宜，譬如陝甘寧邊區與各解放區的指導原則則是相同的，但在陝甘寧邊區適用的各項具體辦法，如果不適用於其他各解放區的直接戰爭環境或人口較密、文化較進步等條件，即不應照搬照用，而應採取適合當地條件的辦法。如果羣衆在客觀上雖有此種需要，但在他們的主觀上尚無此種覺悟，則領導者與工作人員應該耐心地等待，直到經過自己的工作使羣衆有了覺悟，因而自願實行之時，才去實行，決不應強迫命令。凡是與羣衆需要相符合的工作，沒有羣衆的自願與自願，就只會流於形式主義而失敗（欲速則不達）。一切工作都是如此，對於改造羣衆的思想的工作尤其如此。

毛主席在這次講演中，指出邊區文化工作的統一戰綫，必須重視文字工作，如能給予工農兵羣衆的互相幫助，文字工作中的需要與自願原則，因爲恰當地解決了邊區文教工作中的幾個重要問題，所以引起了到會代表，尤其幹部們的極大注意，邊區文化統一戰綫的方針，必將更廣泛地與文化工作中正確地貫徹成，將是這個講演的好處。

開展大規模的群眾文教運動

羅 邁

陝甘寧邊區，從去年十月十一日開始舉行文化教育工作大會（簡稱文教大會），大會共進行三十七天，參與大會的代表一共有四百五十多人，這其中大部分是從人民當中生長起來的工農兵代表，也有著名的醫生、學者、作家、詩人、畫家和蒙回民族的代表，共同討論新民主主義的羣衆文化運動，主要的內容是：衛生、教育、藝術、報紙四部門。通過同志的這篇文章，便是這次大會的總結報告提綱。至於大會的過程和它的成果，本刊擬另寫專文介紹。

（一）邊區文教的總任務

邊區文化，有其進步的利落的兩個方面：新民主主義文化，是其進步方面；封建文化殘餘，是其落後方面。邊區人民從政治上、經濟上破壞了封建統治；反映政治經濟的文化生活，也應破壞這種統治。從領導方向與新文教工作的政治地位看，文化上這種舊統治也已經破壞了；從邊區的軍隊、工廠、公立學校和許多羣衆組織來說，這種舊文化的統治也已經基本上結束了；從農民的文化形態的最主要方面看，封建的束縛也已經被打破了。但從多數農民的文化活動的廣大領域看，則封建文化的殘餘，還是存在著；並在某些領域，如衛生上與藝術上，暫時還佔着優勢，與邊區的政治經濟生活相反而不相稱。因此，從舊到新，破壞封建文化殘餘，爲新民主文化打開廣闊發展的道路，使之正當地反映新的政治經濟生活，仍是邊區文教工作的重要歷史任務，需要付以巨大的努力，才能成功。

與破壞封建半封建的政治和經濟同時，邊區人民即建立了新民主的政治和經濟。這個建設，在近幾年來，尤其長足的進步（抗日民主、民選政府與三三制、合作社與變工隊、工廠與作坊等等）。可是另一方面，由於封建文化的破壞不徹底與新民主文化的發展不足，在邊區人民的前進道路上還橫

着巨大的絆腳石：若干地區成人百分之三與嬰孩百分之八十的死亡率（還有在生產上最重要地位的牲畜的死亡率也很大的），百分之九十的文盲與識字（嚴重防害了他們政治經濟生活的繼續發展。因此，邊區人民迫切需要生理上（衛生）與心理上（教育）的解放，也就是說，要衛生運動與教育運動（報紙和文藝也都是教育的形式）。從無到有，從極少數人到大多數人，使文化生活適應於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使政治經濟的發展獲得完全的解放。

因此，邊區羣衆文教工作的當前任務，是開展衛生、教育、報紙、文藝的大規模羣衆運動，在生產第一與繼續發展生產的基礎之上，五年至十年之內，消滅百分之三與百分之六十的死亡率，大大增加人口繁殖率，消滅男子四十歲與女子三十五歲以下的文盲，大多數能寫，健康愉快，享有新文化生活，從而充分能力向前發展政治經濟。

（二）新的時期開始了

因此，應該重視文教工作與文教運動。過去不重視的，應該轉到重視。動員一切可能動員的力量，一致奮鬥。

邊區文教工作的歷史，大致可以分爲三個時期。現在開始進入第三個時期。

內戰暴風雨時期：人民把教育權奪到自己手裡，為革命事業服務。文藝方面，除各種劇團外，革命歌曲普遍流行，報紙也能反映黨義的戰鬥生活。這時的文教工作，雖是比較粗疏與簡陋的（受當時環境的局限），但由於密切聯繫了羣衆和實際，對革命事業起了鼓舞羣衆意志與動員羣衆行動的積極作用，新鮮活潑，又極壯有力。

抗戰後，至一九四三年：邊區因尚未遭敵人蹂躪，處在相對和平的環境，大批外來知識份子進入邊區參加文教工作，數量上和規模上都有發展。但由於教條主義（內容上和方法上）與形式主義（作風上）作怪，日益同實際脫離，同羣衆需要違背。初期猶有一種活潑氣氛，一九三九年後更轉入沉悶與軟弱無力。一方面，代表正確方面的因素被擠掉，或退居於次要地位；另一方面，客觀上幫助了封建文化殘餘的活躍（教育方面，特別是文藝方面）。

一九四三年以後，特別是今年，開始了一個新的局面，從沉悶轉向活躍，並轉向大規模發展（村學，識字組，簡報識字組，黑板报，秧歌等）的局面。由於生產發達，羣衆的文化需要提高了。更重要的是，由於整風運動，文教工作從與實際脫離，轉而與之聯繫，知識份子從與工農隔絕，轉而與之結合，因而羣衆所感到的。新時期與以前，是第一期優良作風與第二期發展規模相結合的產物。其前途將是大大規模發展文教的展開。

教令第一，我們大會特地把羣衆衛生運動放在羣衆文教工作的第一位，教育、報紙和文藝，都要充分反映和指導這一運動。但它在第一，第二時期是沒有地位的，因為過去根本沒有重視過它，這主要是官僚主義作怪（也有一點教條主義）。現在，應該迅速官僚主義濫流濫尾結束的時候了。

這一切工作，現在都還在開始，但已預示了光明的前途。羣衆創造能力的開門，被打開了，我們已經發現了木少的模範醫生，模範醫藥組織，各衛生模範村，各模範小學與識字組，各模範黑板报，讀報組，工農通訊員，模範秧歌隊……只要我們善於堅持下去，一定能在數年之後，使邊區面目為之完全改變。邊區將在各方面都成爲全國的模範。

（三）組織廣泛的統一戰線，團結爲主

羣衆運動大會上指示我們組織文教戰線上廣泛的統一戰線，不要開真

立主義，這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的敵人是百數十萬羣衆腦子中的封建遺毒，我們的建設是百數十萬人的識字與健康，而我們的幹部如此缺乏，我們的物質力量也深感不足，如果沒有廣泛的統一戰線，便不要幻想大規模的文教運動的成功。統一戰線的實質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爲要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中間力量，向封建文化的殘餘進軍，是爲要在文化上解放羣衆的腦子，從帶有若干封建殘餘的腦子變爲完全民主的腦子。又一方面，是爲要動員一切可能動員的進步力量，大踏步開展新民主文化運動，是爲要在文化上擠壓羣衆的新腦子，從他的這一點，從今天出發，又能應顧明天。由此，兩條戰線鬥爭會在各個問題上發生，也勢必發生。要反對投降封建殘餘的傾向，又要反對打倒一切的傾向。一般說，以團結爲主，從團結達到改造，達到消滅封建殘餘。暫時允許三字經，是爲要消滅三字經，開始中時是爲要改造中醫，聯合「改組派秧歌」是爲要發展新秧歌。

何者應團結或爭取，何者應改造或批評，要從各個問題的具體性質與具體情況出發。比如中醫的理論是缺乏科學的，而能治病的藥方，則未必不正確。舊秧歌的內容是封建的，調子唱「兄妹鬧鬧」，則未必封建。報紙一般沒有封建問題。所以本可一概而論，要加以具體分析。譬如關於文藝形式問題，不是抽象爭論所能解決的，要看它包含否表裏的內容，或能表現何種程度，凡是能够表現新內容而文爲人民喜歡迎接受的，就應讓它們發展，給以幫助。凡是不能表現新內容，或只能部份表現的，則應加以批評和改造。在羣衆文化戰線上，即使是應該反對的東西，也不應簡單地打倒。巫神及各種封建迷信是敵人，不發生聯合問題；但也不是用簡單打倒的方法所能解決問題的，要經過羣衆與本人自覺的消滅。動動熱熱地像改造二梳子一樣去改造巫神，破除迷信，這就是我們的目的與方法。

（四）發動羣衆，加強領導

四項文教工作，都要發動羣衆，造成羣衆運動。羣衆運動必須羣衆路線，就羣衆文教運動說，必須是內容（目的）上爲羣衆，形式（方法）上經過羣衆的路線。內容上應講具體實現（即根據具體情況的具體需要來實現）新民主主義的文教方針（即人民大眾反封建的方針），這個問題已經明確地解決了，並且說過了。現在要說的，是形式上如何經過羣衆的問題，

是任何方式最難為羣衆接受和最容易及的問題。這個問題的適當解決，則就要從適應今天的具體條件出發。今天邊區還是農業為主的經濟，還是地廣人稀，村莊分散，勞動力不足的條件。在這種基礎和這種條件之上，羣衆文教工作宜於分散經營，以村莊為單位，以村莊的形式出現（如村學，村的識字組，讀報組，衛生組……），才為羣衆所接受，才易於普及。過去由一個或兩個鄉辦集中的初級小學，與上述條件不合，即使採用了強迫辦法，實際上也辦不通。所以一般說來，羣衆文教運動的推廣與普及需要採取分散的形式，主要靠羣衆自己覺悟與自己動手，主要靠村民自己主動。由此，提出了民辦公助政策。民辦公助的目的，就是經過羣衆自己覺悟與自己動手，也即是毛主席所說羣衆自願這兩個原則的具體實現，自然，民辦公助不是任何工作非如此不可，也不是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非如此不可，而是羣衆文教工作特別在邊區今天具體條件下的產物。

我們的民辦是羣衆公辦，是小公辦，與舊社會的私辦不同。我們的公辦是民選政府辦，是人民辦，與舊社會的官辦更是根本不同。小公與大公是統一的，是可以互相轉變的，是不可互相脫離的。反對脫離小公的大公，也反對脫離大公的小公。所以民辦必須公助，所以民辦不是不辦公辦。

今後一個時期裡，邊區羣衆文教工作將是大量民辦。大量民辦需要大量公助，例如幹部，課本，部份地還有經費，沒有公助是不行的。特別重要的是加強領導，決不能削弱領導。領導的作用，首先在於使民辦文教的内容能够符合於新民主主義的文教工作方針，既能密切聯繫勞動生產，聯繫衛生工作，並適應地適應家庭的需要，又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覺悟，解放他們被封建文化殘餘束縛的腦子，轉向民主文化邁進。

領導的作用，在於能够發動羣衆的創造性，照顧民辦形式的多樣性，既不機械地限制他們的手足，又善於選擇最能持久最易於普及的形式，加以提倡。譬如經驗告訴我們，在有些熱心積極份子為骨幹，在有良好的黨工隊、團將黨子、合作社主持的民辦文教工作，就特別可靠，特別能堅持。我們更要在羣衆文教基礎上提倡雙工與合作的方法。譬如經驗又告訴我們，請報與識字結合的形式最能起作用的形式。因為識字與請報，讀報與識字，兩者又互相關連。我們就要求在可能條件下提倡請報識字與識字的結合形式。

領導民辦比領導公辦更不容易，所以更應加強領導，注意更複雜更細致的領導方法。

在今後邊區的羣衆文教運動中，一方面要展開大量民辦，以資普及；又一方面需要小量公辦，真正辦好，作為民辦的骨幹與核心，以資提高。放棄或忽視小量公辦，是不對的。但現在某些脫離羣衆，脫離實際而為羣衆所不滿的小學（包括所謂普通小學與中心小學），必須在短時期內徹底改造成為羣衆所滿意所愛護的學校，雖為羣衆所擁護的公立小學，不必轉成民辦，但不能因為要維持公辦而限制民辦（如限制學生轉學等等）。

在民辦公助的問題上，已發生了各種偏向與誤解。以為民辦只是解決經費（由羣衆出錢）問題，以為民辦無需公助，或不要過問，以為民辦即是廢止公辦等等，這是一類。還有另一類，對於民辦則採取命令主義辦法，所謂「官逼民辦」，對於公辦則強迫維持現狀，不敢發動批評和實行徹底改造。前一類是放棄領導的傾向，後一類是惡劣的官僚作風，都是錯誤的。在今天情況之下，主要的危險還是強迫命令與懼怕批評，所以尤應努力糾正。

（五）質量並重，反對形式主義

文教工作不要質量？不要質量？要的。在五年至十年的時間內，要求消滅百多萬文盲，百分之三與百分之六十的死亡率，消滅戲劇與秧歌中的封建內容，又要求成千的村學，讀識字組，黑板报，新秧歌隊與醫藥衛生組織。這些要求都是應認的，並不是左傾空談。全邊區幹部與人民應有此決心，應作此努力。誰對此不抱着十分熱心，而繼續帶官僚主義的冷淡態度，是完完全全錯誤的。

但要切記，我們要求質量、量並重，而不要變了質的量；要求有步驟的進，而不要不成熟的急。要十分明白，羣衆文教工作的目的，是通過羣衆自己的覺悟，自願地改造他們的腦筋，自願地清除封建傳統，自願地接受新民主文化。毛主席指示我們，改造千百年的習慣比打倒一個日本帝國主義還困難些。這是一件非常需要體貼的工作，命令主義毫無用處。這又是一件非常需要細心的工作，形式主義也同樣毫無用處。

我們之間，有些同志，求成心太切，任務一經提出，恨不得馬上成功，這個熱情是好的，但是缺乏實際的計算，於是採取了簡單命令的辦法催逼下去。將領導上發了的東西，當作下級幹部與羣衆也應有的東西，不加解釋說服，不顧時機，因而下級幹部與羣衆接受不了，鬧上不鬧下，數字很多，

內容減少。命令主義產生了形式主義，好心腸引起了壞結果。要請欲速則不達，就是這個道理。

也有這樣的官僚主義者，實際無知，架子十足，不調查、不研究、貪便宜、怕苦幹、愛好形式，輕視內容，追求數量，忽視質量。這樣，官僚主義就與形式主義結合在一起，成爲更頑固的病症了。

這種虛假的形式主義，在許多工作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這種與實際求是完全相反的不良作風，大大妨礙我們對於現實的了解，大大妨礙我們工作的深入。必須隨時隨地警覺，揭開批評與自我批評，認真糾正之，尤其在文教工作中。

這次大會之後，各位同志回去，千萬不要重復命令主義與形式主義。必須在自己機關中、團體中和村莊中，進行思想發動，首先在幹部中和積極份子中開辦，然後在羣衆中開辦。首先搞通思想，然後商議具體辦法。只要幹部和大多數羣衆的思想搞通了，障礙就消失了，辦法就會很快地產生出來，羣衆就會自願地動起來，新的人物，新的創造，新的成就，也會隨之出現。這次大會上許多受轉變態度的同志，團體和村莊，不是這樣產生出來的嗎？因此我們學習——要與實際的原則，熱情與計算的原則，羣衆與細致的作風，是應該來開展大規模的羣衆文教運動。

(六) 培養大批的邊區知識份子，是開展文教運動的關鍵

我們上面說的，主要是農民羣衆中的文教運動。但我們還有八路軍戰士，工廠工人和機關學校人員的文教運動。這些方面的羣衆在數量上比農民少得多，在質量上比農民更重要。只有把這些組織發動起來，才是邊區羣衆文教運動的系統。但是因爲時間關係，我不來敘述這些方面已有其他同志敘述過的問題了。現在，我再說一個總的應用於各方面的重要原理，就是：邊區文教運動既然是黨次於生產運動的嚴重任務，既然是爲發展生產，提高邊區一切工作所必要條件，那麼，這個工作要誰來做呢？

青年也好，教育也好，以至生產也好，決定了方針，剩下的就是組織幹部。我們現在已經有很多幹部，在羣衆運動中表現了許多幹部，但是我們幹部缺了沒有呢？差得遠！在文教工作方面尤其差得遠！我們要提高現在幹部，要繼續發現和培養羣衆中的幹部，我們還要在各級學校中訓練幹部。這就是幹部教育問題。只有解決了幹部和幹部教育問題以後，我們大會的各項

決議才能實現，才能達到提高邊區，發展羣衆文化落後的邊區，變爲羣衆文化先進的邊區之目的。所以高崗同志特別指示我到，幹部教育等項重要！

高崗同志指示我們，邊區一級的領導機關要負責把邊大辦好，分區一級的領導機關要負責把中級和地帶辦好，各縣的領導機關要負責把完小和區鄉訓練辦好，各級政府機關都要辦好幹部文化夜校，在兩三年內消滅幹部中的全部文盲，這是極其重要的。我們一定要把現在的工作幹部知識份子化，尤其要爲邊區培養大量的足夠的本地知識份子（外來知識份子是不會永遠留在邊區的），這是邊區今後一切工作的關鍵，當然更是開展文教工作的關鍵。

我們的幹部教育，一定要有明確的實際目的和適合目的方針，制度，應採取底地黨教條主義內容和教條主義方法，但也要防止和反對教條主義內容和死搬硬套方法。除必要的政治、文化、科學知識與專門技能外，應該着重學習邊區建設，學習邊區的經濟政策和文化政策，尤其注意新的人生觀的培養，使每個幹部具有爲人民大眾服務的無限熱情和向人民大眾學習的真心決心。這是知識份子與工農兵結合的決定關鍵，又是業務成功的決定關鍵。這在我們這次大會上也完全得到證明。只要回憶一下大會的討論或發言，就可以明白，誰能轉變向羣衆，鞠躬盡瘁地爲羣衆，虛心從羣衆中學習，不驕傲，不浮誇，誰便獲得羣衆的真心愛護，誰便有創造，有成績，有真本領，有大進步。我們應該獎勵表揚這種人，我們應該教育出這種人。只要合於這些要求，無論知識份子或知識份子，我們都歡迎。我們應該充分重視和信任革命的知識份子，他們同樣是邊區寶貴的財產。

我們的羣衆文教工作和幹部教育工作是這樣艱巨的任務，沒有各級首長負責，親自動手，沒有黨政軍民學一切的力量動員，是不能完成，甚至不能進行的。我們要求各方面的負責同志都能切實注意這兩項工作，共同來執行這次大會上毛主席和高崗同志的指示，共同來執行這次大會的各項決議。政府和黨，要把羣衆文教工作和幹部教育工作的幹部作政治上重要的幹部，邊區人民，政府和黨的重型幹部。校長、醫生、獸醫、護士、助產士、編輯、記者、通訊員、讀報識字組長、秧歌隊長、作家、演員、總之，一切文教工作者，只要在自己崗位上做出成績，就是對抗戰，民主和經濟建設作了積極貢獻，就是對革命事業盡了一定的政治責任。對他們應該給予政治上的指導，和學習的機會（參加會議，聽報告，讀報紙和其他出版物，在職學習和學校學習等），並應關心其物質生活，家庭生活，解決其工作上的困難，鼓勵他們努力前進。

同志們，我們應該以身作則，不疲倦不自滿地完成邊區人民所給予我們的艱巨任務！

當前我國大學教育之病態

岳 鈞

十幾年前，牛津大學出版部曾出版過一本論英美德大學教育的書。作者佛里斯奈（A. Freeman）先生，是英國著名的教育專家，在這本書中，他對美國大學教育的病態及種種怪現象，曾作過極烈的抨擊。美國大學是有許多為人稱道的優點的，但佛里斯奈先生仍認為非加以澈底改造不可。當前我國的大學教育，多半仿效美國制度，而其病態之嚴重，則尤過之。如果佛里斯奈先生能够研究一下我國的大學教育，真不知要作何感想呢？

當前我國大學教育之腐敗，早已引起社會人士的譁聲，尤其是考試舞弊（如去年庚某些大些新生考試時的種種怪象及監試試題等），學生程度低落，拜金主義及功利思想的抬頭，各種壞人心術的鬥爭的蔓延，尤為一般人所痛心疾首。但社會上普遍所知道的大學教育的腐敗，只是枝節節的一部分，還有許多更根本的嚴重病態及怪象，如非大學中人，是不易看出的。

四年前，我以一個偶然的機會，接受了一個大學的教授聘書，這給予我進一步認識我國大學教育的好機會，並且引起了我的研究大學教育的興趣。四年來，我對大學生活的各方面，都曾在過詳細的考察，為了補救幾個大見聞的不足，我一方面在其它大學教書的朋友和在學的學生，調查各校的情形，同時又從研究書籍中找我的太太，去到另外兩個大學作教授，代我蒐集材料。現在事實雖不允許我將所有的見聞，完全揭露出來，但僅就下述的幾點來看，已足見當前我國大學教育病態之嚴重了。

民主精神的缺乏——大學無自由

我國大學的腐敗，雖自歐美，但我們只仿造了別人的皮毛，而未學到其真精神，大學在歐美，不過是一國的最高學府，而且是學術文化的中心，歐美各國有大學，由其精神，而清的小門，內容固不一致，但他們都有一種為人

樂道的優點，就是其民主主義的精神。歐美大學的民主精神，包括兩點：一是大學自由（Academic Freedom）一是校會均等。大學自由是學術自由與學自山，校會均等即大學教育的平民化，使人人有受大學教育的平等機會，前者為各國大學共有的優點，後者則為美國大學的特色。他們的大學原理性，崇自由，不聽受他種自由不受政治權力的干涉，即其行政制度，亦符合民治的原則。倫敦大學的拉斯基教授，主張印度獨立，大企業經營，提倡社會主義，但反對印度獨立反對財產國有反對社會主義的保守黨政府，卻從未受過斯基的思想，這背國家利益，加以反動的罪名，命令解聘或逮捕。希特勒上台前，德國大學內都行政，行政投治被制，校長由教授推選，這種民主的精神，德人每引以自豪。至大學教育機會均等的原則，西歐各國因受歷史傳統的影響，雖尚未完全做到，但他們已在積極改革學制，打破大學機會均等的種種限制，并努力發展成人高等教育，以資補救。歐美大學，因其具有這種優點，所以能成建一領學術文化的中心，負起發揚文化的責任。因為必須大學自由，學術研究始不受黨力的壓迫束縛，必須機會均等，大學不至為少數人所壟斷。反觀我國大學，雖然在形式上，與他人類似，實際上卻未脫他種人的優越，學制其民主主義的精神。

每一個在大學讀書的人，無不感覺我國大學民主精神的缺乏。學術自由固然談不到，大學科目及教授內容，也有許多受政府規定的限制，所謂教學自由也沒有了。尤其是校長兼校長的行政組織，更違背了民主的原則。學術自由與教學自由，我們來便多談，現在且看校長兼校長的行政組織，有些什麼弊端。

根據大學組織法，我國大學校長，由政府簡派，綜理校務，教授及職員，由校長聘任或任用，完全對校長負責。校長在組織上，其權力之大，超過普通行政機關中的首長，而作為大學主體的教授，反降為附屬的附屬。這和德國實行大學組織一級，是一級制相類似，事權都於校長一身，這就與

斷專橫的局面，而且校長既由政府任命對政府負責（私立學校校長雖由校董會選任，但須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的認可），所謂「大學獨立」就不能不受政治權力的干涉。校長在校既有無上的權威，則院長系主任以及職務教務課等各處的首長，也就像行政機關中的次長司長科長之類，無形中變成一種官階，形成大學行政的官僚化。負行政責任的校長，既綜攬一切，具有無上的權威，則大學中自然就形成事務第一的現象，教授及處受事務人員的支配。某大學校長曾通告全體教授，規定「接見」教授的時間，校長空函告教授習用「奉校長諭」字樣，令人看了不知是學校還是衙門。大學組織法中，雖然有所謂校務會議的組織，事實上只是校長向諮詢或顧問機關，對校政不能左右的。現在除極少數大學因為歷史的關係行政上尚有一點民主治的氣息外，大多數大學是校長獨裁。獨裁就是集權，所以事無巨細，都要校長來辦。譬如我那一個學校，從經費支配，課程重訂，教授聘請以至校園清潔，廁所掃除，工役勤惰，會客室之佈置，教授薪俸之安排，一切都由校長親理，校內事務要問校長，校長在校，一切由校長負責，校長不在，天大的急事也要等校長回來。某次宿舍病死一學生，竟三天無人過問，因為校長不在，而訓導長與總務長在未請示校長之前，不敢有所主張，結果是由學生將屍屍弄出葬埋。試想在這種集權制度之下，大學行政如何能存有效？大學教育還有什麼生機？

大學機會均等，乃為代各國公認的原則，歐洲四歐各國，因受歷史傳統的束縛，對於大學教育的平民化尚有一種限制，但近數十年來，他們已在改革學制，力求大學機會均等原則的實現，我國大學雖不像英法德各國一樣，對機會均等的原則在學制上加以種種限制，但就現行大學學制，專科以上學校招生學額規則，大學招生章程，及各院系公費生差別待遇辦法來看，其所加於機會均等的限制，實是很多的。

根據前定大學規程及取科以上學生學額規則的規定：「大學或獨立學院入學資格，須曾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入學考試及格者。」這是一句國民如未受完高級中學或同等學校教育，就無進入大學的資格，雖具備上項資格，如不經過入學考試及格，仍不能進入大學，在這層限制之下，所謂大學機會均等，就根本無從談起。後來在部頒大學招生規程中，雖然曾有招收同等學力學生的辦法，但所謂同等學力，仍限定數最高中二年級，且其錄取額，限定不能超過百分之五，這番補救

的辦法，其效力也就幾乎其微了。

在英德等大學機會均等受限制的国家，為使一般不能進大學的人，享受高等教育，乃另設成人高等教育的方法，如德國的人民大學（Volkshochschule），英國的大學擴張部（University extension movement）以及勞工學院（Workers' Educational Society）人民學院（People's College）設立，都是為謀大學教育的平民化，其史如牛津的費斯金學院（Fisher College）且著名世界。但在我國，一般被認為大學門外的人，竟想受大學的教育，就太困難了。

至於現行公費生制度，更困難的予大學機會均等以限制，現行公費待遇，因院系而差別，文法兩科，或全無公費待遇，或有公費而名額有限，而農工醫科，則可享受公費待遇。這樣，有自費能力的學生，入學機會較多，而非自費不能就學者，只有在規定的公費名額中去競爭，而且自費能力者的學習志趣，不受經濟條件的限制，而不能自費的人，無論志趣如何，必須接受公費的規定而競爭，所以貧賤的學生與富有者競爭，在投考大學時就失去了公平競爭的機會。在政府之意，固在利用公費制度以培養實用科學，但公費的意義究竟與獎學金不同，如用公費予大學機會均等以限制，則非但無益於貧賤學生的學習志趣（因為貧賤學生未必都願學實用科學），實在是很不合理的。尤其不合理的表現在各大學新生入學時，其保證書的辦法，一個學生入學須有具備一定資格的人保證其「思想純正」，這不但是一種異質，而且對於純良青年的一種苛求。試問一個無名無姓或與將來舉目無親的學生，豈不將因這種不合理的限制而不能入學嗎？

課程教材與教學方法

我國大學課程，最初即由政府規定，清末奏定學堂章程及民二職制頒佈之大學規程，屬於大學課程，均列有單條。民十二頒佈的國立大學條例，因受學制自由思潮的影響，曾有由各教授會自行規畫課程的規定，但在民十七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中，又決議規定大學課程標準，到廿七年八月，現行部頒大學課程即開始實行。現行部頒大學課程，就內容論，固較奏定學堂章程及民二大學規程所定者周詳，但缺點仍甚多，尤為遺憾者全國大學課程標準劃一的硬性規定，更毀滅了大學自由的精神。

現行大學課程之缺點及其應加修正之處，各科專家教授，已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但仍有許多基本的缺點，如重複機械，分科過細，不切實際，凌亂繁複等弊病，尙未為一般人所注意，尤其那些不合戰時需要的地方，更應加以徹底改革的必要。

在現行部頒科目表公佈前，我國大學課程，由學校自行訂定，其缺點為因人設課，基本訓練科目，往往不齊，且各校課程既不統一，難免重複繁瑣程度不齊之弊，但其優點則為各校可因人地之宜，自由發展，無須受與設備的課程，可以不設，所以凡開設的課程，大都內容充實。自部頒科目表訂後，各校課程的訂定，大受限制，不管師資與設備如何，必須開完部定全部必修科目，結果就難免因循舊章形式的弊病。現在各大學因為課程太多，無不感師資缺乏，因而聘請教授乃成為大學校長最頭痛的問題，有的就原有教授增開課程，有的到校外去請包工教授，有的請系主任唱獨腳戲，有的請助教開課，有的請不到教授就索性不請。某大學其系四年級，必須修習十四個學分的課，其中竟有十二個學分找不到教授。學生向校長要請假回家，等請到教授再上課，那位校長竟慷慨的說：學分修不滿沒關係，到學期終了我送你們學分就是了。加之有些校長，對各種課程內容，未必完全瞭解，為強拉硬拽，竟有法學博士可以包辦法學院全部課程，倫敦大學經濟政治學院出身的可以包辦政經兩系課程的笑話。我有一個學法律的朋友，他在某大學曾先後開過十幾種課，在法學院中，無論政治、經濟、法律及社會學系，只要有「法」字的課程，他幾乎都教過。就我個人來說，因為學校聘請教授不易，四年來曾忽忽政治經濟的開過性質不同的五種課程，而學校要求我拒絕的還有八九種之多，我真變成俗語所說的「萬能博士」了。然而像這樣的大學，目前正多着呢！現代學術研究，分工日細，學者各有專精，試想教授的精神有限，如何能擔任這些功課呢？結果是教者疲於奔命，學者興味索然，如欲學生程度不低落，那有可能呢？

現代學術研究，分工既細，新興科學，名類亦多，所以大學每一學門，都包羅幾十種科目，但就我國現有的環境以及各級學制來看，大學分科過細，課程繁雜，難免支離破碎之弊。我國大學生，大半未受過嚴格的科學訓練，根底太差，大學分科過早，學生已感困難，而有些專門課程，在外國大學研究院開設的，我們的大學科目中，也竟列入。我們既無那師資，又無那設備，一般學生對許多專門學科的概念尙弄不清楚，更那能談到

去專攻研究，結果教者累者，同感痛苦，難怪一般大學畢業生都說：畢業四年，只重拼西漢的學了些零碎常識，對專修學科的理解，既不深入，也不成系統。這和佛里希奈所說的英國大學生的情形，完全相同。

我國大學，現分文、理、法、商、農、工、醫、師範等八科，除醫科外，各科分系至少三四系，多者八九系，合計有四十七個系，其中有若干學系，係分組設立，所以共計有五十餘學門，分科不為不細，這種過細的分科，不但在研究體系上失之支離瑣碎，而且師資缺乏，設備不足，各科內容，無不失之空洞貧乏，有些學系雖分別設立，而課程則大致相同，如商學院之國際貿易與商學系，必修及選修科目，相同者有十種，相異者僅有四種，可謂大同小異。各校對這種共同科目，多採合班授課方式，科目同，教授同，教材同，僅學生所屬學系不同。這種分系除表示學校規模大多支一些行政費用外，不知還有什麼道理？有些學系，就其課程性質與所需時間來說，不必在大學設置，只須設立二年制或三年制的專科學校即可，如師範學院的體育系，法學院的畜牧系、森林系，商學院的銀行系會計系等最好另設專科學校，不必在大學附設特別的系，化費四年或五年的時間，有些重複的科目，可以合併，內容空洞的科目，可以取消，過於專門的科目，可以留到研究院開設，將基本而重要的課程加重，這樣學生對重要科目，可以精深的研究，不必再在瑣碎課程上浪費許多精力和時間。

我國大學課程，除少數特殊系外，大都仿照外國大學擬定。不但科目名稱同，即學科的內容及安排，亦多抄襲外國成法。殊不知中外社會環境不同，抄襲他人成法，自必陷於內容空洞不切實際。譬如說社會學系的民族學，本為資本主義國訓練殖民人才的學科，我們的大學開設此課并用人成當作教材，不但沒有什麼用處，簡直是有害的。再就工學院的建築工程學系來看，其必修及選修科目中，主要的有徒手畫、初級圖案、陰影法、木工建築圖案、營造法、模型素描、透視學、單色水彩、水彩畫、鋼筋混凝土、美術史、古典裝飾、壁畫、木刻、彫塑及泥塑、庭園、內部裝飾、人體寫生等，這些課程在國外的高等工科學校雖的確有，但不知中國大學的工科學生，學了這些有什麼用了？法學院的課程，未必不如人體寫生壁畫木刻重要，然而文法科的學生不能享受公費待遇，而這些學壁畫木刻的學生，又可領取公費，就顯得不公平。

今日我國大學中教材的缺乏，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在眼前，大學教學

用書，或採用成書，或自編講義，或指定必讀參考書，指導學生自由研究，原沒什麼大困難。現在則出版印刷困難，國際交通阻斷，圖書供應，來源缺乏，成書無法買，講義不能印，而各校又有圖書，又多不敷用。教者無書可教，學者無書可讀。教育部雖設有大學用書編輯委員會，編印大學教科用書，但供應種類有限，內容亦參差不齊，真能切合用者，寥寥無幾，而且大學究非中小學可比，中小學可以採用固定教科書，大學用書如果也由固定，那又何必讀教授？由助教上課就夠了。

教材既如此困難，因之最通行的教學方式是教授口述，由學生筆記。有的教授根據其自編講義或成書，逐句朗誦，然後再如中央廣播電台報告新聞時的逐字逐句的解釋，以便學生筆記，教者如電台播音員，學者如報館收音員。有的上課如普通講演，教授作講演人，學生作聽眾，講者侃侃而談，聽者越聽越聽，教者非有流利口齒，講解不易清楚，學者非受速記訓練，記錄難免遺漏錯誤。加之各校盛行兼課，兼課多用包工，每將各科授課時間集中。如某校對六個學分的課程，會請一位包工教授在二月之內授完，在限定的時間之內，學生停修其他科目，那位先生則無分星期假期，每日授課八小時，風雨無阻的連續一個月，在最後一天舉行考試。這種教學方法，在講者固然心力交瘁，聽者更無法消受，這又怎能稱學生程度低落呢？

現在的大學生，上課堂，沒有書，進圖書館，找不到書，抱着莫大希望，化費了四年的光陰，在大學裡竟沒讀到書，這事實，簡直令人不敢相信。會有人指責現在大學裡的小冊子教育，其實學生除要看小冊子，又能讀些什麼書呢？每年暑假，學校照例送給一批畢業論文，要我審查，這裡面內容空洞的還不算大缺點，有的甚至題目不適當，章節目次，從標題不通，再看下面的參考書目，則不外是報紙和期刊，另外是聽講筆記和小冊子，大學四年，成績如此，局外人看了，誰敢相信這是事實！

學生管理與導師制

大學的任務，據政府頒大學組織法的規定，為「研究高深學術，造就專門人才」。但就上述種種看來，今日之大學，如何能完成上述的任務？捐棄了勤，今日有許多大學，既不研究學術，也不訓練人才，只是毫無目的的一批

批的製造畢業生。每年一批批的招進來，又一批批的送出去，至於造就這些畢業生作什麼用，以及學生程度應達到怎樣的水準，則概非所問，有些學生進大學，不是為了讀書，而只是為了那張文憑。而想讀書的學生，在今日之大學中，也得不到研究的便利和機會。現在大學教育已破產，已不能完成政府所付予的重大任務。

大學的目的既專在製造畢業生，為達到這種目的，乃有現行的學分制度。規定學生在一定年限之內，修滿規定的學分，或試及格，即為畢業，授予學士學位。學生在學年限及各年所修科目及時數，均有硬性規定，在質量的不能多修，實質差的也不能少修。而且除修科及師範科為五年制外，其他各科不論課程之輕重多寡，一律規定修習四年。有些課程較輕不需四年即可修完者，也必須四年方准畢業，有些課程較重非四年所能修畢者，也只限定修習四年。所以課程重的學生大呼吃不消，課程輕的學生則去演戲賽球，作課外活動。至於學業成績，所謂七十分八十分，公憑教授主觀，也無確定標準。各校考試，寬嚴程度不同，如不及格，則有一種補考辦法，以資補救。所謂補考，原為因故不及參加考試者而設，但現在一次考試不及格者，仍可參加補考，甚至畢業考試，如有一兩科不及格，也准補考。這樣考試越嚴，實際也等兒戲了。

有些大學當局，曾引考試嚴格辦理認真以自豪，殊不知考試寬嚴與學生程度好壞並無什麼關係，考試太寬，固然不足以鞭策學生，如舉課程空洞，教授太差，考試雖嚴，也提高不了學生程度。沒有考試，肯讀書的學生，也許還有自由研究的機會，有了考試，好學生也要一樣陪著壞學生死啃筆記或書本，而筆記所記書本所載，未必真正有價值，所以現在大學的考試制度，不是為了督促學生讀書，只是為了壓抑學生自由研究的興趣。

大學內幕既如此腐敗，上課秩序，自難維持。然而也有補救的辦法，這就是各校盛行的點名制。大學點名，學自美國，美國大學因厲行點名制，所以歐洲大學習見的缺席遲到早退等現象是罕見的，尤其如哈佛、哥倫比亞等規模較大的大學，從公共課演以至實驗，無課不點名，在我們的大學裡，因為有的課程內容空洞或教授不良，以致學生不肯上課。許多學校當局，乃採用美國大學的點名制來補救，強迫學生每課必到。不但上課點名，甚至升旗降旗也點名，紀念週、開會、請人講演，無不點名，一次點名不足，甚至兩次三次的點名。有些學校裡，每小時上課僅五十分鐘，而各式各樣的點名，

便耗費很久的時間。在我那個學校裡，學生不足一千，而專司點名的職員就有好幾個，儘管點名有專人負責，不勞教授點名，然而教授學生在課堂上的精神集中，却不願為點名員的厲聲喝問而破壞。許多學生說：只要學校教授好，不願着他們的也來上課，如果教授不好，雖點名點名，他們也不肯上課，實際上我也常見許多教授的課堂上無虛席，甚至不修課科的學生，也臨時加裝，講義聽講，有些課堂則學生不肯專心聽講，有的海歸名員一去，就溜出校門，點名員一叫，又跑進來，出出進進，秩序紊亂。一般人多主張大學應重自由研究，此種中小學所用的點名制，行之於今日之大學，除用強制的方式，勉強維持秩序外，不知還有什麼用處？

學分、點名、考試，是現在大學管理學生管理學生的工具，也是不肖學校與教授管理學生保護自己的武器。大概學校辦的愈壞，管理愈嚴，教授人選愈差，考試愈嚴，因為既不能以提高學術空氣的方法，陶冶學生心性，就只有用強制高壓的手段，維持學校秩序。所以在許多學校裡，無論教授如何壞，學生因懼點名，不敢不上課，無論課制修習的課程，內容如何空洞，學生為了應付考試，也不能不聽講筆記。許多學校當局，以此誇耀他們的學校辦的好，殊不知他們是在新教育大學的先機！

考試與點名，是管理學生的舊辦法，此外還有一種積弊的辦法，就是部令所行的導師制。我國大學的導師制，據說是仿的英國師範訓導制，仿效英國牛津制而進行辦法而制定（具體部二五二六號訓令），法良意美，無可厚非。但及實施之際，儘管教育部三令五申，而各校及風潮行，違令而辦者，多數大學不但沒有導師自由，而且到因流行流傳人心中的門學，教授當局則派派「第五級隊」（各校通行稱謂），人人自危，處處是非。教授不敢直接見學生，學生也不敢直接與教授來往。同時訓練工作既由專人負責，包辦一切，導師也就有名無實。依規定，專任導師應由主任導師，所以四年來任於學期開始後，我照舊收到導師印發的一份訓練講義，和一封校長具名的導師聘函，但就所聘的究竟有多少學生，他們叫什麼名字，我完全不知道。當我接到這些文件後，就無下文了，直到學期終了，訓練處纔給我一份學生名冊，要我訂定訓練成績，我既無法訂定，只好原封退回，請訓練處代勞，我的導師的任務，就算終了。我有許多在其他大學教書的朋友，他們作導師的情形，大致與我相同。這樣的導師制，不知有什麼用？而且所謂導師制的推行，不在形式而在內容，如果大學真有民主精神，尊重學術自由與

自由，使師生關係親如家人父子，常保持密切接觸，導師訓練好，也無法推行有效。而從點名者流，反可利用導師制，混水摸魚，向學生濫注各種虛心術。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在我們的大學裡竟沒有臨時助教。如果沒有臨時價米伙食太壞，私設國學生領取貨者，我們的大學簡直不知道是在什麼。就課程來說，一切如平時。廿七年四月頒佈的抗戰臨時教育及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對改革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戰時課程，雖有所宣示，但在大學裡，竟沒引起什麼反應。廿八年夏季教育會議所頒佈的專科以上學校實施戰時課程的科目，空洞浮泛，完全不切實際，而且除醫科增加戰時救護外，其他各科也未見有確定的臨時課程。最奇怪的現象是現行大學科目頒佈於抗戰前，而頒佈的大學科目卻無適應戰時需要的規定，近兩年來在大學裡，很少有人研究戰時問題，在兵役修業之前，甚至有的私立大學竟提高學費濫收學生作了及罷工的逃役所。年來教育當局在訓練，我們的大學生仍如平時的訓練，上課聽講，他們不受到戰時應有的訓練，也得不到戰時應有的知識。前去年年雖有徵調學員及志願從軍，但這些戰時教育并非一回事，而且正因為我們的大學教育，不願配合戰時的需要，使許多大學生雖欲報效國家，也苦於力不從心，最近成都第九大會提出改革大學教育適應戰時需要的建議，這足以反映我們現在的大學教育，是如何不能適應戰時的要求了。

有人說：教育是有百年大計，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好，但新式大學在我國已有幾十年的歷史，政府應該仿效歐美大學教育亦應有年所，我們的大學實不應再如此腐敗。當然腐敗之來，非自今日始，但我國都應在今日剷除這些腐敗。最近對新式教育及戰後中國時會說：「除非等到一個英國學生能舉很自重的要從牛津或劍橋到北平去留學，像現在的中觀學生，他北平到牛津或劍橋去留學一樣，中國不能算是達到了他在世界國家中所應該達到的適當地位」（十月八日大公報星島論文）。拉那基教授的希望，並不是一種奇談，因為一個現代的好國家，應該有現代的好大學，但如我們不能改革歐戰大學的腐敗，改革我們大學的病態，我們的大學怎麼能與世界這一流的大學如牛津劍橋相媲美呢？

談訓育

施貽

談到訓育，這是一個教育上的問題，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不能在教育原理上有所闡明。然而，近年來眼看著我們的青年學生，從賭博、抽煙、帶手槍、「飛機」、講「哥老」，到買賣試題，「廢航」、頂替，這一大串的怪現象，可說是無一不使人痛心疾首，感憤萬千。青年為國家主人，瞻念前途，豈有不能感嘆者。

如何提高學生知識水準，培養學生生活技能，固是一件緊要的工作。然而，教學生如何去運用自己的知識，與夫如何做一個正當當的人，更是當前急務。人格健全，則知識之益，必隨之而進。人格敗壞而知識健全，於國家社會之害大，久矣。教養教育中所佔的比重當遠大於知識訓練的。

今日的青年學生，以我國服務教育的經驗看來，一般的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頭腦清楚，思想進步，勇於學習，知識求光明的，熱情的人，但佔極少數，而往往又遭學校「另眼」相看，第二種是在課本上用功，成績好，守規矩，狹義的愛國主義者，學校的好學生；這在一間學校，要佔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數。第三種便是殘名諸君，專務不正當勾當的傢伙，這又要佔三分之一以上的數字。其實我們是不應根據今日某些青年學生所顯出的現象，就認定他是麻木、墮落、懶惰。而應當首先檢討我們的訓育工作，究竟作得如何？勇敢的負起責任來，把這一逆流堵塞住，使不致泛濫開來之禍國家，受無盡的災難。

我所見過的訓育人員，都是「教條」式的訓練。並且有意無意的在那裏用不怎麼健康，甚至完全不健康的藥品，硬要學生吞下去，不讓學生明白社會制度的演進，不讓學生面向現實，而這一切又早在「精神講話」中粉飾過去了，或者是根本把事實扭曲。關於「人格教育」的科學的知識，一點也沒有，更不明白「必德教養」之完整性，與完滿心理之構成要素。只是一味的欺哄戲詐，以讓學生住，只求不出「亂子」，從沒有想到過青年時期直的人格與深自的心靈，是否會因此而被傷害。

而他們平時所採的手段又再大別為兩種：第一是根本不理青年，不信任青年的力量，專事高壓，稍不滿意，重則開除，輕則罰鍰，甚至體罰學生，辱罵學生，而學生往往不致反抗。稍有爭辯，就是「侮罵校長」，「予以退學處分」；再不然是「索賄」，「危險份子」，應當「開除學籍」，送請政府法辦」。完全忘記了教育用字的涵義與功能。甚至許多學生因參與校外活動，或閱讀新書刊而遭驅逐的。學校當局因為要維持其秩序，用以維繫其統治，於是學生受種種剝削與剝削，也只有「三級其口」。

第二種是視青年如洪水猛獸，步步設防，組織並利用少數不肖的學生，結果學生互相猜忌，包圍了團體，造成不必要的恐怖。而且在青年結潔的心靈上，給予以不良的印象，而學校亦從此多事矣。此外甚有不願訓育二字，却一味去作某些活動

，除了訓練學生作特種人物外，毫無一分正當工作。青年的身心，深受損失。

自然，也有許多訓育人員不像上述那樣，內心亦單純而無成見，但他們的訓育工作往往是消極訓練，缺乏積極的訓練。只能應處學生的過失，而不能事前設法避免，引導學生入於正軌，以致學生行動盲目，動輒錯誤。同時不讓學生犯過的主觀和主觀的原因，不了解過失學生的心理。而把握學生犯過的原因，正解學生病態的心理，正是訓育人員的責任。

其次是訓育工作人員（一般的教師也有這關係）若果不能以身作則，不能為學生表率，這也使訓育工作失敗。因此教師的一言一行，一動一靜，都在學生的心理動向上，給以最大的影響。事實常常如此，教師如有許多不良的習慣，學生效法效，格學校風紀於不可收拾之地。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若學生染此惡習，然後變本加厲，由社會帶到學校又由學校帶到社會去，眼轉轉，拾遺棄民流貽害無窮。

上述種種現象，是迫切要糾正的，我們應當面向現實，確實改善，否則其惡果有不堪設想者。糾正的方法應首先研究今日訓育制度與方針，加以變革，其次獲得訓練師資。訓練要有新方法，不可使用死的「教條」，要民主和啟發，不能填鴨和灌輸。同時歡迎進步人士參加教育界，去直接担負指導學生生活的訓育工作，使產生巨大的澄清作用，積極作用。自然，進步人士不一定是具有教育專業技能的人，不一定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只要他對教育有認識，有熱誠，就可以勝任愉快的。

山東印象記

奧·羅生特

本文作者羅生特大夫，係奧國著名醫學家，十四歲即從事革命活動，在反希特勒鬥爭中曾被捕入納粹集中營，受盡各種苦刑，但羅氏始終堅持不屈。蘇德戰爭爆發後始被釋放。羅氏本英國國際主義偉大精神，通過重重封鎖，遠涉重洋，到達中國敵後解放區，參加中國人民反法西斯鬥爭，一九四三年由華中新軍，到達山東，現任山東軍區衛生部大夫。

神聖的私有財產在山東並未侵襲，地主的租稅已實行了二五減租。從前地主得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現在減到百分之三七·五。在一切八路軍新四軍的根據地的農民們，在七年抗戰的過程中，他們的生活比過去更加富裕了。很明顯的，他們願意積極的準備為他們自己的民主政府而戰鬥，和進行反「掃蕩」，但在地主這一方面，並不是不幸，百分之三七·五的收入是很好的，並有軍隊來反抗日軍的掠奪，因此大部份的地主們是擁護和支持民主政府的。

表面上看來，山東有德國那樣大，居民有法國那樣多，這是山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有利的條件。八路軍一一五師在羅榮桓司令員領導之下，光復了山東大部份的土地，日軍在山東的日軍，已經沒有很多力量來作大的進攻了。在今年八月裡，日軍在濱海地區的一掃蕩，用了一萬以上的兵力，經過十多天，結果敵人俘獲和死亡約兩千人，而八路軍的損失非常的微小。

二千里的沿海地區在八路軍的手中，一一五師有十萬以上的正規軍，民兵和游擊隊大約有四十至五十萬。武裝很缺乏，但是部隊給養好，戰鬥情緒非常的高，軍隊與「三三制」民主政府團結一致，日軍難以優勢的武裝，無法征服卓越的戰略戰術的中國革命軍隊。

山東在地理上是一個非常好的地區，看到那些大山，深谷，使我回憶到德國南部的秘密（係奧國與瑞士意大利交界處的山名）。人民個個強壯忠實。他們今天正好像幾百年前反對封建皇帝的塔塞刺刺的暴動一樣，那時候的歷史情形，我們在水滸傳中可以看到。他們那種模樣，真像奧國的山民們反抗拿破崙軍隊一樣。

農民們都是用水牛、驢牛、雞牛、騾、去耕田，他們的主要食糧

常常是營養不足的糜子、高粱、小米、地瓜、麥子及大米的產量較少，但在許多地方，生產異常甜密的梨子，桃子、蘋果、葡萄和西瓜，栗子和胡桃也很多。植了許多優良的煙葉，製造成很多不壞的煙。

這裡被俘的日軍，受到優待的，每人每天發二十支香煙，每餐兩個菜（青菜或肉類）。被俘日軍的給養，比中國軍隊士兵和軍官好得多，無論如何，比國際規定的優待條例好的多。他們不做什麼工作，中國的同志們很友誼的和他們講日本話。這些不假說明了政治上的寬大，而且充分的証明了中國革命部隊，在新民主主義培養教育之下，有高度人道的修養。他們早已懂得目前的戰鬥是反對日本侵略軍閥的。這些俘虜們將從政治上了解到八路軍並不是反對日本人民，而是反對日本法西斯政府而戰。我親眼看到在最近這「掃蕩」中被俘的六十個日本士兵和軍官們，他們戰鬥意志逐漸崩潰了，他們也知道德軍在歐洲東西戰場處處敗北的地位。我更看見他們餅乾內充滿了小蟲。

……中國兒童的死亡率大概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山東自然不能例外，新民主主義政府將以近代保健預防，和經過良好的國民經濟狀況，把此數目減少減去一半，使新中國的人加倍繁榮。山東山岳地帶的金、煤、鐵礦，幾年以後，將經過近代的交通設置和電氣工程等，成爲一個工業地區，中國將是廿世紀年代發展中不可限量的國家。

中國是一個古老的文明國家，現在他們以新民主主義來和日本帝國主義作最後的決戰。他們希望着在山東，江蘇敵後的戰場上，得到愛國的援助。

新民主主義真偉大！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論中日甲午之戰

翦伯贊

一

一八九四年爆發的中日甲午之戰，到現在，已經五十年了。在五十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已由朝鮮渡鴨綠江而北，深入遼東，其別軍由花國港登陸，已進攻旅大連旅順。當此之時，首都為之震動，皇室為之動搖，高麗廟堂的建宮顯靈，廢居京津的豪麗巨富，都在準備遷家移眷，向着安全的地方逃命，貧窮的小民，則惶惶不知所措，「怎麼辦？」之聲，揚溢乎道路。這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緊急的時代。

幸而當時的統治者還有最後的一着棋，這就是對日投降。不久投降的使者，李鴻章就到達了日本的廣島，簽訂了有名無實的馬關條約，這一個歷史上的緊急時代，就算度過了。

五十年的時間飛逝地過去了，假如我們不是在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誰也不會再想到一八九五年春天的緊急。可是我們偏偏在五十年後，又在與五十年前的敵人作戰，而且我們今日所遭遇的歷史危機，較之五十年前我們前輩之所遭遇，何只百倍千倍！因此便不覺捧今道昔，想起甲午之戰。

我記得當甲午之戰結束以後，當時海軍上將曾有人這樣的評論。他說：「中國若仍抱殘守缺，不求進步，一二世後，將為日本之印度矣。」（「甲午中日戰爭」二六〇頁）。甚至前清伊藤博文也說：「中國若不力求進步，採行西法，而空談復仇，於日本何害？」（同上二三〇頁）。五十年來，中國究竟有些甚麼進步，這是我們應該自我反省的。

甲午之戰，已經成了過去，但現在再翻開這一頁歷史，還是如在目前。假設知新，再談談這天戰爭，也是好的。

首先，說到甲午之戰的爆發。這個戰爭的爆發，是以前朝對東洋的發動為導火線，但東洋的發動之所以成為中日戰爭的導火線，則是由於日本自

在朝鮮埋下了戰爭的火藥。同時，也是因為有一個偏敗的中國，望着日本侵略自己的邊境而視若無睹。

早在東學派的發動之前二十年（一八七五年），日本的兵艦，就已經駛入朝鮮的釜山，日本的大砲，就已經轟擊朝鮮的江華島，并迫中國允許日本和朝鮮通商。當時中國的政權，掌握在以慈禧為首的保守派手中，這一套保守派，昏庸庸懦，腐敗透頂，為了拒絕日本的要求，竟向日本宣稱：「朝鮮屬我藩屬，而內政外交，雖其自主，我尚不與聞」。這就無異的日本聲明，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因此，日本便根據這個宣言，壓迫朝鮮和他訂立了日韓商約。這商約中的第一條，就是承認朝鮮為獨立自主的國家，這樣就取消了中國對朝鮮的宗主權。同時並脅迫朝鮮政府與日本互派使臣，建立直接的外交關係，又趁其開放元山仁川為商埠，允許日艦隨時進出朝鮮的海岸。這樣就奠定了日本進出朝鮮的基礎。

一八八二年，朝鮮爆發了以李熙為首的保守派政變。李熙是當時朝鮮國王李熙之父，當李熙幼時，李熙曾主持國政，幾天後君。後來李熙年長，其死國氏專政，李熙雖遠在國外，李熙曾派李熙之子，又曾派政府對日本的照會，遂利用兵變，想殺執政，幽閉國王，委親日本使臣，謀殺日本派往朝鮮的軍事教官。這次政變，顯然是對日本侵略者的一個威脅。政變發生之後，清政府派兵至朝鮮境內，日本的軍隊也藉口進入了朝鮮。但是結果，中國所得到的，是一個存傍大隣者，而日本所得到的，却是駐京朝鮮首領的特權。這樣，日本軍隊的刺刀，便漸漸刺進朝鮮政府的大門

一八八四年，朝鮮又爆發了所謂「甲申政變」的政變，實則所謂「甲申政變」，不過是一批親日份子，而其領袖，則為日本在華僑所煽動。當時朝鮮的親日份子金玉均、李滄植、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等，與日本駐朝鮮使臣

勾結，在首都發難，打進王宮，擄持國王，殺戮大臣，放逐反日份子，並且自署官爵，組織政府，企圖一舉而復朝鮮脫離中國的關係。這個陰謀，雖然被中國的武裝破壞了，但是日本却藉此而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他要求中日兩國能朝鮮之兵，同時撤退，而且以兩國如派兵至朝鮮，須事前互相通知。這就日本對朝鮮便僭越以主人自命了。

日本資本主義的侵略，就這樣一步一步向朝鮮發展。當時中國的統治者，正忙着剿捻平回以及鎮壓將老會的暴動，以全力對付國內的人民。同時，他們又仗着國家財源甚多，可以讓他們揮霍，人民的脂膏未盡，可以供他們搜刮，所以對於日本之侵略朝鮮，並不十分關心。因而日本遂得寸進尺，以至噴噴發主。即至甲午戰爭的發生，中日戰爭，遂不能避免。所以說，中日甲午之戰，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有一個腐敗落後的中國。

「維新黨」的叛亂之後十年，朝鮮爆發了東學黨的暴變。東學黨的組織，由來已久，據說在治年間，就有這種組織，其創始人名崔福成，其黨義，係刺取儒教佛老各種學說。這種組織，是朝鮮人民反政府的組織，他的產生，是朝鮮政治的反映，至其發展為叛亂，則是日本主義侵略的刺激。關於這次叛亂，所發生的動因，據說是東學黨人為了他們一個在同治四年被冤殺的同志舉行葬禮的詔願，在請願時，他們的領袖數人，又被政府屠殺，於是他們就號召人民，在全國道的古阜縣暴動起來。

對付這個暴動，朝鮮政府，立即發動大軍，前往進剿，但是剿滅人民的大軍，却反而被人民剿滅了。白山一戰，朝鮮的官軍，幾乎全軍覆沒。因此暴動不久便由全羅道大烈忠清兩道，大有直搗首都之勢。朝鮮的統治者在暴動之前，於於財糧極端，求援於中國。中國的統治者，對於日本之侵略朝鮮，可以不管，但對於朝鮮人民的暴動，是非常熱心的。當朝鮮告急文書到達中國時，慈禧的助手，李鴻章，立即派道員韓德督率志超，太原鎮守使士成職率軍東渡，參加朝鮮政府屠殺人民的戰爭。但當清軍軍隊開到牙山之時，而東學黨的暴動，已告平息。

當時中國的統治者，一面要在朝鮮人民面前，耀武揚威；一面又畏日如虎，不敢忘記在出兵朝鮮之前，通知日本。所以當中國軍隊到達牙山之時，日本軍隊，也就在大島圭介的統率之下，開進了朝鮮的首都漢城。

東學黨的暴動，已經平息，中國通知日本同時撤兵，但日本却藉口更改

朝鮮的內政，堅持不肯撤兵。這樣中日兩軍，在朝鮮便展開了敵對的形勢。當時日本政府已經準備與中國一戰，以掃除中國在朝鮮的勢力。當時中國駐朝鮮的總辦袁世凱，已看出日本有戰爭的準備，他屢次電請李鴻章速發艦隊至仁川，並增派陸軍駐守馬坡，以備非常的事變。但是當時中國妥協派的巨頭李鴻章不但不增兵備戰，而且還要撤退牙山的駐軍，以緩和日本的敵氣，新皇帝是光緒皇帝的反對，日本簡直可以不戰而復朝鮮。

當中國的妥協派這以為和平尚未絕望時，而且軍已在朝鮮開始戰爭的行動。他們一面通布水雷於漢江之口，以堵塞中國海軍的進路；一面充圍進朝鮮王宮，逮捕朝鮮國王及反日份子，組織以大院君為領袖的傀儡政府。這樣的消息，傳到中國，朝鮮上下，無不憤慨，痛切李鴻章的奏摺，雪片風來。當時，以光緒與翁同龢為首的主戰派，也極力主張與日本一戰。李鴻章在舉國上下的督責之下，才勉強備戰。

依照當時的緊急形勢，中國的當局，應設立即派遣北洋艦隊，以最快的速度，運兵朝鮮以援牙山之孤軍。但是李鴻章總以為和平尚未絕望，恐因此而爆發戰爭，因而他所派遣的軍隊如衛汝貴、豐仲阿、呂玉琢、左寶貴等各軍，皆命其由遼東陸路，迂迴前進。同時為了虛應故事，才以英法高陞和提江巡艦護送少數陸軍和軍械由渤海東越，以援牙山之軍。傷是這兩隻船，行至中途，便遇着日艦的襲擊，操江降敵，高陞沉沒。同時，駐漢城的日軍，也開始向牙山的中國駐軍進攻。直至此時，妥協派的首領慈禧太后，還沒有與日本作戰的意思，只說：「不受辱」，但是朝野上下，都在一戰呼聲戰爭，這樣才於七月初一日發布了對日宣戰的上諭。

由此看來，中日甲午之戰，乃是當時統治者中的妥協派最不願意的一個戰爭，也是全國人民逼出來的一個戰爭。即因中國妥協派對戰爭的猶豫，所以提供日本以準備戰爭之充分時間，並爭取到戰略的主動。嗚呼！「誤國之罪，同於賣國，豈不然耶？」

二

在宣戰以前，日軍就向牙山的中國駐軍進攻。沒有對峙的戰爭，僅僅在敵軍有幾次前哨的接觸，中國的駐軍，就在牙山守將葉志超、聶士成的指揮之下，棄城而逃。葉志超一聞潰退，一面向政府請戰，成歡的大捷，於是葉志超以敗軍之將，而拜受總統請軍之榮命。

葉志超自牙山，北奔平壤。時中國大軍皆棄平壤，牙山僅殘軍，遂與大軍會合。平壤為朝鮮舊京，負山阻河，形勢險要，而當地人民，又素親中國，當中國軍隊圍抵平壤之時，當地人民，爭奉牛酒，熱烈歡迎，正如古書所云：「糧食盡棄，以迎王師」。是中國軍隊在平壤，既據地利，又得人和，戰爭的條件非常優越。

同時，中國政府亦知平壤的得失，關係中日戰爭的勝敗，已派遺後援部隊，增援平壤。時四川提督宋慶，以毅軍飛旅順，提督劉盛休，以銘軍發大連，將軍依克唐阿以鎮撫等軍發黑龍江，皆奉命會師於九連城。是平壤之軍，又有大批援軍以為後盾。

平壤之戰，中國方面若能指揮得宜，或攻或守，皆可立於不敗之地。但是統帥葉志超，儒庸無能，不願督率諸將，部署軍隊。諸將則環視自守，每至酒肉高會。而士兵，特別是衛隊，則到處搶劫財物，奴役壯丁，姦淫婦女。因而地利無用，人和盡失，戰爭的優勢，已完全失去。

戰爭在平壤展開了。九月十五日，日第一軍在其友對山縣有朋的指揮之下，開始了對平壤的進攻，一戰而攻佔北門要塞，再戰而平壤遂趨降。即其當日之夜，統帥葉志超意率諸軍棄城而逃，日軍緊追不捨，中國的敗軍，潰於山隘，回旋不得出，自相踐踏，日軍乘勢猛擊，中國敗軍，人仰馬翻，死者兩千餘人，被俘者數百，軍備器械，公文密函，皆委之日軍。

葉志超率殘軍萬餘人，狼狽北逃，過安州定州，皆棄而不守，狂奔五百里，渡過鴨綠江，才敢駐營。

投降後，這就是所謂平壤之戰。自平壤失守，中國的軍隊，遂不復再出現於朝鮮境內了。

平壤失守的後兩天，海上也發生了戰爭。說到海上的戰爭，那更無光彩。本來朝鮮海軍發生之初，李鴻章就應請下令出動北洋艦隊，控制朝鮮海面，以保持海上的交通。但他却要保存海軍實力，僅派濟遠兵艦一艘，率揚威平遠，往護朝鮮。及日軍大集，濟遠督帶方柏藻，竟以濟遠逃歸。不但如此，當時李鴻章還在幻想和平，遂盡召諸將回國。

等到日軍俘虜朝鮮國王，又才再命濟遠、威遠、廣乙、先後駛至牙山。而當時朝鮮海面，已被日艦控制了，所以中國兵艦，行至中途，即遇日艦襲擊，廣乙受傷而逃，濟遠避之，日艦吉野速浪追濟遠，方柏藻擊白旗，再請日本旗，日艦仍道不已，有冰兵發砲中日艦，方柏藻得生還，遂告大捷，

以後海軍即逃匿不出。

即至牙山失守，中國大軍棄平壤，中日大戰，迫在眉睫，於是李鴻章才派海軍提督丁汝昌率艦隊前往應援。這時日本海軍，已籌備進攻朝鮮海面，即以其中國艦隊行至鴨綠江口大東港附近海面時，便遭日艦的攻擊，因而發生戰爭。

這一次中國方面參戰的兵艦，計有鎮甲二、快船十，共三萬五千餘噸，此外並有水雷艇四艘。日本方面參戰的兵艦，有十二艘，約四萬噸，此外有改裝之商船西京丸一艘。從量的方面說，雙方實均力敵。又中國的鎮甲艦大於日本，中國各艦之砲，亦重於日本，惟日艦的速率，大於中國，艦上之砲，亦較中國為輕便。故從質的方面看，雙方亦互有優劣。量與質均相稱，因而勝敗之數，只有決定於戰鬥技術。換言之，若中國海軍統帥指揮得宜，則這一次的海上戰爭實無敗於日本的理由。

但是中國的海軍提督丁汝昌，原係陸軍將領，不知海戰為何事。又係淮人，而海軍官兵，則十之九皆係閩人，以是威令不行。說到海軍官佐，左右翼副兵以下，在平時都帶着家眷住在陸上。至於海軍士兵，亦多離離島，視兵艦為衙門，只有照例點卯領餉，才回到兵艦。每當北洋封凍，海軍照例南巡，官兵皆賒於上海香港，留連忘返。以這樣的海軍官兵和日本的海軍作戰，勝敗之數，已可預見。

戰爭終於被迫展開了，中國的艦隊，列陣作人字形，張雨翼以得敵艦。日艦初作一字形，以後相繼變化，爭取有利的形勢，而中國艦隊則以不變應日本之萬變，最初是人字形，以後也是人字形，最後還是人字形。

在戰鬥中，龍定遠（中國的鎮甲二）領遠超勇最奮勇，而超勇被日艦擊沉，致遠彈盡。當此之時，其他各艦，多作壁上觀。定遠管帶劉步蟾竟至驚惶失次，幸有洋員漢納根代為指揮，才沒有被俘。方龍領首先率濟遠逃，轉戰時誤撞自己的揚威艦，日艦乘機擊沉揚威。致遠亦中水雷而沉。自是諸艦紛紛逃竄，人字陣也亂了。

戰爭歷四小時，中國艦隊大敗，一共損失五隻兵艦，其一（經遠）被俘，其四（致遠、超勇、揚威、龍定遠）被沉。其餘之鎮甲二，亦被日艦擊傷，只有七隻兵艦（定遠、鎮遠、來遠、靖遠、濟遠、平遠、廣甲），已經不能成軍了。從此以後，中國的兵艦，遂深藏於旅順，不復再見於朝鮮海上了。

陸軍既大敗於平壤，海軍又覆沒於大東港，中國的失敗，於此皆已決定

「甲午中日戰事」續前

「奈何兵既既開，邊疆迭起，牙山則先遭，庫倫則被殺，撫二則就

捕，猶可曰，聯軍兵家常事耳。更奈何統帥戰艦，不能得力者，既有派軍
撫育了故舊，臨敵通商，致潰全軍，冠扣軍餉，殺兵檢校者，厥有統帶
總軍之軍費而致者。於是海軍則戰艦失律於大東洋，陸軍則死傷臨倫生
於平壤，此皆得勝為難事也！」

自平壤失守，日軍的前鋒，進至鴨綠江沿岸，中國的大軍則集九連
城。以了各處將帥，極感主氣，以圖扭轉戰爭的趨勢，於是當時的統治者，
令董樂道巡撫致書連開，而另派宋慶龍統師軍。

宋慶龍也勇敢，但胸無點墨，亦非統帥之才。而且資歷甚淺，與持行
聯軍若，聯軍軍隊，防務多不嚴約束。故當時九連城將帥，雖有七十餘營，
而無統帥。

以當時情勢而論，應以重兵扼守鴨綠江沿岸，以阻止敵人渡江。但是宋
慶龍僅以少數哨兵駐於江岸，而大兵皆集九連城。一切防守計劃，皆係佈
置，坐守江北一月，以待敵人進攻。

十月二十五日，日軍一切進攻準備已經完畢，遂以敵艦掩護，強渡鴨綠
江。宋慶龍九連城，北趨鳳凰城。又以鳳凰城不可守，再退摩天嶺，以守德陽
州，日軍遂佔鳳凰城。

當時，日軍的另一支隊，已由滿洲渡江，向西北進擊，連陷安東，岫巖
，樹木城，最後進陷海城，截斷了摩天嶺與後方的交通。

第一軍之後，日第二軍又在其次大嶺山的統帥之下向中國出發。當
時中國的海軍，已逃潰無蹤，故日第二軍得以安全到遼中國海岸。

十月二十四日，日一支日軍，在花園港總子登陸，連陷岫巖十二日，
而中國海軍，似乎都不知道。因而他們得以從容展開其對大連鐵甲艦隊
的進攻。

當時中國駐守大連和旅順的軍隊已由守將宋慶龍盛休率領增援九連城，
無隨海軍向是提督姜桂題程九和所募的新兵，填防大連的，是總兵徐邦道，
銘明分統趙德益所募的新兵。當日軍向金州進發之時徐邦道力言金州失，則
大連城不守，徐將分兵迎擊，但當時旅大諸將，各不相屬，都不肯發兵
守金州。

十一月六日，日軍攻金州，徐將這營軍所部連軍，應徐益的部下，有體

提金州者，趙德益，「吾等奉命守旅順金州，不聞赴援降備撤也」。徐邦道兵力
單薄，金州將不守，趙德益勢急，而趙正督率部將，張勳宜，作援海軍亡
的準備工程，並不派兵，金州遂落。

七日，日軍三路南進大連，趙德益播救逃旅順，而大連的大隊一百二十
零，膠察營械，全數送給旅順人了。日軍在大連休戰十日，至二十二日，日軍
海陸並進攻旅順。

當日軍進攻旅順之前，旅順將帥，已將糧餉運送旅順，俾備亡之計。營
務總的趙德益照例，聽到金州失陷，即請旅順，就由旅順南運糧食，一口氣
跑到天津去了。自從這位運員逃去以後，旅順人心惶惶，船塢的工人的工廠
，也無着落，遂悉起械舉而各自散去了。

旅順的六個統領，原不相轄，至是，共推姜桂題為主，而姜恐閣，憤憤
然不知所措。只有徐邦道是一員勇將，他以少數之兵，迎擊敵入於土城子，
給敵人的前鋒以一個很大的打擊。但日軍大隊繼至，徐邦道孤軍無援，也敗
退下來了。

日軍登陸後，趙德益等遂率部搶掠，率民船飽戰而逃。敵軍未至，而旅
順已成廢墟。

以後徐邦道孤軍再戰，士兵幾乎死傷殆盡，而日艦又已縱橫海峽，因事
即分據敵台，旅順已無可挽救，乃與姜桂題程九和，張光勳，維亂軍中逃去
，散歸遼陽。

至西曆「甲午中日戰事」有言曰：
「牙山不守，平壤又失，安州城尚有殘皮之師，鴨綠江邊返清流之，權
是報軍之救難者，虛有其名，韓王之暴卒者，竟隨成實有其事也。九連鳳
凰城，相繼淪陷，揚威超勇諸將，一戰沉沒，於是日本之陸軍，應騰於發
辟之地，日本之水卒，餘散於渤海之濱，是朝鮮之亂不暇謀，中國之亂大可
懼也。守旅順與登父期如魏軍軍（魏軍）；武則如衛軍軍（衛軍）；黃軍提（
仕林）姜軍軍（桂題）程軍軍（九和）等，以監司提鎮之舉，當金城湯池之
固，又有天險之足恃，地利之足憑，乃屢戰不遇敵數戰，斃命不過數百輩，
忽焉爾士崩瓦解，鼠竄狼奔。嗚呼嗚呼！中國之亂，匪朝鮮之亂也，亦匪日
本擾之也，直食生民死，天良喪盡之徒始之也。」

戰事雖敗，而日軍益盛，政府以淮軍不可依靠，改用湘軍，即用故
湘軍將領光燾、陳提、李光久等，令皆派兵北上。召兩江總督劉坤一，提

督蘇省，

督蘇省，

欽差大臣，督辦軍務，以湖南巡撫吳大澂及宋慶龍之。這時的李鴻章，已辭去了三眼花翎，擢去了黃馬褂，並且受了革職留任的處分，但仍然掌握海軍軍事的實權。

不久湘軍將領，率軍出關，但是魏光燾敗於牛莊，李光久棄軍而逃，吳大澂棄田莊夜奔入關，湘軍又潰。日軍乘勝追逐，進陷營口，於是遼河以東，遂非復中國所有了。

准軍刑軍，相繼敗潰於遼東，中國的陸軍，已零落不堪，但中國殘餘的艦隊，尚逃匿於威海衛。爲了徹底地殲滅中國的艦隊，日軍又發動了對威海衛的進攻。

日軍之襲威海衛，係用膠東鐵路西的戰路，明攻登州，暗襲榮成。當中國軍隊往救登州之時，而日軍二萬人已自榮成登陸，由榮成西擊，以拊威海衛之背。

自軍於一月十日（一八九五年）登陸，三十日攻陷威海衛的砲台。同時自艦二十五艘，包圍威海衛的海口，於是海陸兩軍，夾攻停泊於劉公島的中國兵艦。不久，定遠來遠兩艦，中魚雷沉沒，靖遠則爲砲擊沉，魚雷艇十二艘，亦爲日艦俘虜，餘艦已不能動彈。於是水兵登陸鳴槍過市，挾丁汝昌投降。

當威海衛失守以後，丁汝昌從德員環乃爾之言，命諸將統船，徒手投降，諸將不從。又命諸艦突圍而出，亦不從。汝昌乃入船仰藥自殺，諸艦遂降。自是以後，中領遂無海軍。（參看羅博羅「威海衛艦隊」）

王炳燾「劉公島降敵雜記」云：

「據字林西報言，威海之降日者，一曰定遠……二曰鎮遠……三曰平遠……四曰濟遠……五曰靖遠……六曰來遠……七曰威海衛水雷機房船，皆被擊沉沒。七曰威海衛水雷船，八曰廣濟水雷船，九曰廣濟水雷機房船，十曰沿雲木質小兵船。又曰蚊子船四艘，曰鎮北，鎮邊，鎮西，鎮中，又有水雷船五號，砲船三號皆未傷，另有寶鏡一船，亦已沉沒。統共劉公島內，或傷或完之船共大小三十餘艘，悉爲日本所有，俄逃出之水雷船十三號，子然海上（作者案後亦爲日本所虜）。嗚呼噫嘻，天降人欺！又查鴨綠江之戰，遼東、揚威、致遠、廣乙，先已沉沒。牙山之戰，廣甲、揚威焚燬，操江小艦被虜。旅順之役，被虜者輪船三，大板船二。大連之役，被虜輪船一，小砲船二，日運等，日漢江，船被虜所失者不下五十餘艘矣。靜言思之

可勝痛嘆！

戰爭發展至此，中日兩國，已開始停戰議和的談判。但在和議的進行時，日本的艦隊又佔澎湖羣島，進窺台灣，不過澎湖之役，已是戰爭的尾聲了。

總結這次戰爭，中國方面，人的傷亡，並不很多，即因人的傷亡不多，物質之喪而資敵者，其數甚，就甚爲浩大。關於甲午戰爭中中國方面之人的傷亡和資敵的物質，當時日本某報，曾有如次的統計。

「牙山之戰，死約二百人，傷約三百人（日兵死三十五，傷六十）。平壤各戰，死約二千餘人，傷約三千人。（日兵死一百八十二，傷五百一十二）。九連城各戰，死約五百人，傷約一千人。（日兵死三十三，傷一百一十）。金州各戰，死約四百人，傷約一千人。（日兵死廿，傷五十）。旅順各戰，死一千五百人，傷約三千人。（日兵死四十，傷二百七十）。豐島之戰，死一千二百人，傷者不知細數。（日兵傷三人）。鴨綠江之戰，死約六百人，傷約三百人（日兵死八十，傷一百八十六）。草河口之戰，死二十人，傷約一百人（日兵死十一，傷四十一）。金家窩子之戰，死約一百人，傷約三百人（日兵死五，傷二五人）。海城之戰，死四十人，傷約百人。（日兵死五，傷六）。瓦崗寨之戰，死約百人，傷約五百人。（日兵死十二，傷三百五十七）。都計自光緒二十年五月初九日，日本大島混成團，由仁川登陸以迄旅順之戰，其間凡大戰七十次，華軍死者約六千六百六十八人（日兵死者約共四百十三）。傷者約共九千九百六十八人（日兵傷者約共一千七百七十二），此外被俘者尚有一千一百六十四人。（「甲午中日戰事」一四〇一—一四一）

「自中日開戰，以至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日軍劫得華軍各物，共值日銀七百三十一萬二千圓。內計

大砲：在牙山劫得八尊，平壤四十八尊，九連城七十八尊，鳳凰城五尊，金州及大連灣一百二十九尊，旅順口三百三十尊，岫巖州五尊，海城四尊，共六百七尊。洋槍：在牙山劫得八十三支，平壤一千一百六十五支，九連城四千三百九十五支，金州及大連灣六百二十二支，旅順口一千八十支，金家窩子五十支，共七千三百九十四支。砲彈：在平壤劫得八百四十顆，旅順口九萬六千三百七顆，金州及大連灣二百四十六萬八千二百顆，九連城三萬六千三百七十四顆，共二百六十一萬一千七百廿一顆。槍子在平壤劫得五十六萬粒，九連城四十三萬六千六百七粒，金州三千三百八十一萬四千粒，旅順

八萬四千一百二十五粒，共七千七百四十五萬八千七百八十五粒。米穀：在牙山割得日糧二萬谷古（每谷古合華糧二百二十五斤），平壤四千六百谷古，九連城四千五百谷古，鳳凰城五千五百三十七谷古，金州及大連灣，二千六百谷古，旅順無米，大奇，共三萬九千一百五十七谷古。馬：在平壤割得二百五十四匹，金州八十五匹，旅順三十三匹，共三百六十八匹。金銀銅錢：在平壤割得金二十五貫目，三百五十刀（一貫目合華糧一百兩，一刃即一錢），銀一百十三貫目九百十刀，零物四貫目六百刀，高麗錢，二萬八千二百四十千文，日本錢鈔五千九百九十五圓，九連城鳳凰城，制錢二萬一千九百十千文，金州及大連灣，銀錢六十圓，共合日本銀錢約一百萬元。行帳：在平壤劫得一千八百頂，九連城，四百一頂，旅順口，一百二十一頂，共二千三百二十二頂。旗：在牙山劫得三十三面，平壤三百面，金州及牛島一百四十四面，共四百七十七面。船：在花園口劫得民船十五艘，大連灣劫得三十噸小輪一艘，旅順口劫得小火輪一艘，帆船二艘，雲程，海鎮兵船二艘，在豐島劫得江兵艦一艘。此外尚有鼓劍、刀、槍、號筒、車輛、工作具、磁器、銅器、地雷、水雷、火藥、傘、伏擊、衣服、器具等不計其數」（同上書一三八—一四〇頁）。

以上數字，威海衛及澎湖兩役的人物傷亡，尚不在內，威海衛一役。中國海軍投降，軍艦擄獲數艘，已於前述，至士兵傷亡，則不知其數。澎湖之役，死傷人數，亦無數字可查，惟物質之被劫者，則日軍曾載有一概統計。『東報云：澎湖之役，日本房產軍砲山砲共二十尊，來復槍一千九百四十六枝，藥彈一千九百八十二匣，格林砲彈六萬八千九百枚，鉛彈六十二萬二千五百枚，火藥三千九百七十包，米九百一十袋，刀槍等一百三十枝，槍十九副，帳篷五十座，鐵鏈一百八十隻，銅八十個，其餘小件甚多」（同上書一三三—一三三頁）。

以上所記：不過是戰爭中的直接損失之有數可稽者，此外因戰爭而被敵人屠殺之人民，以旅順一地而論，即有二千餘人。因戰爭而間接受受之物質損失：如商務之所阻滯，農事之荒廢，則更不可以數計了。所以中日戰爭的受害者何種氏為之數曰：

『嗚呼！中國竭數十年之精力，萃二十一省之菁華，始得壯其軍容，備茲一戰，乃一旦蕩蕩無存，竟至不保疆土，悉數委之敵人。幾寇兵而置諸死地，不惟憤於敗兵之懼將戰！』（同上書一四〇頁）

中日甲午之戰：終於以對日投降結束了。一九〇五年四月十七日，李鴻章在日本廣島簽訂了馬關條約。馬關條約中：最要條約有五款：一、中國承認朝鮮為完全獨立自主國。二、割讓遼東半島、台灣、澎湖羣島。三、賠款二萬萬元。四、開放蘇州、杭州、沙市、重慶為商埠。五、允許日軍駐紮旅順、大連灣。後來雖由俄德法三國之共同干涉，日本放棄了遼東半島，但台灣、澎湖羣島，從此就劃入日本的領土了。

三

甲午之戰，中國一開始就失敗，以後也是失敗，最後，還是失敗，這是什麼原因呢？非常明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落後腐敗。

我們知道，在甲午戰爭以前的世界，早已是資本主義的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民主主義的政治，自由主義的文化，是當時世界史的主流。在這個歷史主流之前，不動的推起走，落後的清算，反動的滅絕，這是歷史的命定。在世界史的主流之前，只有順應潮流，才有出路，雖與各國玩弄倒轉歷史的遊戲，難免滅亡。具體地說，不自動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就難免為殖民地。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以後，地主資產階級即聯合一致，實行自上而下的產業革命，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追上了世界的潮流，到甲午戰爭時，日本的維新，已經二十餘年了，這時日本精力飽滿，正是資本主義的青春時代。

中國，雖然早在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先後受到殘酷的歷史教訓，但這些教訓對於當時中國麻木不仁的統治階級，並沒有發生教育作用。從鴉片戰爭到中日戰爭，其間將近半個世紀，他們都把時間和精力，浪費在關中中國人民的戰爭之中，所以一直到甲午之戰的時候，他還是落後腐敗，不異過去。

當着整個世界走向資本主義的時候，而當時中國的統治者，却還在夢遺夢資本主義的世界中，翻出一塊特殊的地盤，來保持他們最珍愛的封建專制主義。在這裏，讓他們繼續推行手工業的生產，獨裁的政治，中世紀的文化。一言以蔽之，讓他們利用社會的落後，人民的無知，來以毒藥毒害他們。但是他們不知道，這就是上帝的兒子，也是做不到的。因為世界史發展的

事不是全權運籌帷幄，而是局勢服從全體。不是倒進，而是前進。

甲午之戰，從表面上看，是中日戰爭，但從實質上看，則是日本資本主義對中國殘餘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清算。而這就是中國失敗的最主要的原因。其次，是中國統治階級內部對國家的主張不一致。當時以光緒朝劉銘傳等為首的維新派，極力主張對日抗戰，以慈禧李鴻章等為首的保守派，則始終主張妥協，而當以袁世凱國家大政海軍軍權的則主張妥協的保守派。

保守派自袁世凱起這一個戰爭，用妥協方法，解決朝鮮問題。當日日本雖已無開朝鮮首都時，而李鴻章對主權讓與兵回國，避重就輕。後來光緒下了兩道嚴厲的上諭，不許撤兵，並且進一步要李鴻章備戰才沒有撤回牙山的軍隊。

袁世凱的上諭之一云：「彼領兵不動，我先撤兵，既先示弱，且將來進剿，在勢往返，殊屬非計。現在和商之議，迄無成就，恐大舉攻討，即在指顧。」

其二有云：「懷遠前旨，將有撤兵一詞專旨，迅速覆奏。若顧慮不前，能事延宕，則至貽誤事機，定備該大臣是問！」

李鴻章接到光緒的上諭之後，因為有慈禧的靠山，並不把樞密回事，乃電告總督與日使小村協定中國撤兵之事。

直至日軍已開始進攻牙山的中國駐軍之時，而慈禧仍不欲宣戰，僅曰：「不受辱」。後來因為袁世凱憤激，才被迫決定。即因保守派對戰爭之猶豫搖動，所以日本便取得了戰爭的主動。

宣戰以後，保守派雖然繼續撤兵，但是戰爭的最高指揮者，還是妥協派的領袖李鴻章。以妥協派的領袖而主持戰爭，當然對戰爭不持有誠意。所以當戰爭發生以後，便不以陸軍增援牙山，又不令海軍揮師朝鮮海面，因而使牙山不守，平壤不守，這便不是有意進行失敗主義，也是對戰爭的不負責任。

妥協派當然不會忘記投降。所以每當戰爭一有失利，和平運動便勃發高潮。早在平壤之敗李鴻章便企圖中止戰爭，與日本談判和議，但以當時民氣方張，不克屈服，即至旅順失守，負都歸趙，於是和議運動，遂一變而不可中止。

當敵人在旅順屠殺中國人民之時，中國的投降使節，却在上海待船出發。當敵人砲轟威海衛之時，而李鴻章却在馬關與伊藤博文握手言歡。

一個人是戰爭的最高指揮者，而又是投降的全權代表，這在世界史上還是少有的。一面要前線的將士去抗戰，一面又公然去投降，這個戰爭，怎麼不失敗了妥協與戰爭的平行發展，是這一個戰爭失敗的第二個原因。

第三、是沒有動員全國的人力與物力，這一個戰爭變成全面的戰爭，人

民爭

以當時而論，當戰爭發生之際，政府就應該有全國的人民，武裝全國的人民，使他們為着保衛祖國而鬥爭。但是我到從官報的上述中，只看到「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及派兵大員，應所設行」的命令，這有清到一國子民，而人民們，所以任官軍東顧西望，而官軍都吃錢，而「其他各將，畏敵於野，偷竊於市，工民於肆，甚至官吏懼息於林頭，師旅逍遙於河上；晏然不知有兵革也。」（「中日甲午戰爭」）

即因這官僚階級的動員計劃，所以募兵，則到處難募，籌餉，則處處難籌。以募兵而論，淮軍已潰，然後才募湘軍；湘軍再潰，遂曰募兵。而且當時淮軍而軍費，尚可收聚，如果百人之統計大致不錯，則截至旅順淪陷，中國軍隊死者不過六千餘人，傷者不及一萬，是關外之兵，並未消滅。即使糧數減少，中國豈無人乎？

以籌款而論，庫款將盡，然後才商借洋債，洋債年息太高，遂曰籌餉。實則當時地方稅，尚未移作軍費，洋債亦非不可舉借，即使盡所有的稅收而亦不足以應國家之急，乃至洋債亦不能借到，而當時軍家貴族連官地主義而，尚未為國家拔一毛，中國豈無人乎？

以戰爭形勢而論，九道風聲，而官軍尚在；旅順大連兩港雖失，而威海衛在；牛莊營口兩地雖失，而旅順還在；然而戰爭至此，遂曰無險可守。實則即使松遼不守，遼瀋全陷，威海亦失，山東淪陷，乃至日軍入關，首飾失守，中國豈無險可守乎？

有廣大之人力而不知動員，有豐富之物力而不知徵發，有遼闊無比之領土而不知利用，而竟以淮湘兩軍之潰，洋債利息之高，旅順大連之失，遂曰中國無兵無餉無險可以支持戰爭。這自詡中國已無人無地在，中止戰爭，決心投降，中國豈無被敵人按倒在地乎？曰，未也，被敵人按倒在地，不是中國的人民，而是這毫無能力的妥協派的政府。

當馬關條約簽訂之後，泰晤士報曾有一評論曰：「中國如海運船，任人擄掠而問，他事仍感不相關。假如歐州亦有如旅順口者，碎為敵兵所奪，則全國丁男子女，無不引為已憂。反是以額，華人誠痛之至矣。」

泰晤士報的評論，可以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當旅順失守以後，中國的人民，何嘗不思奮起，殺敵報國，但當時中國的人民，已被妥協派的政府按倒在地，不能動彈。妥協派的政府害怕人民，比害怕敵人還更厲害。他們以為如果把武器交給人民以後，比交給敵人更為危險，敵人要求者，土地與金錢，他們多的是祖國的遺產，有的是人民的膏血；反之，人民一旦拿起武器，則有革命的可能，革命一起，他們根本要讓下寶座，所以自始至終

不肯動員人民。若人民自動抗戰，那便逼土匪，格殺勿論。因此當時中國的人民，只有這無能的統治者，天天打敗仗，好在「日寇國百里」古亦有之，古亦有之者，即不妨今亦有之。

雖然如此，中國的人民，自始就反對投降，以後也是反對投降，最後還是反對投降。當中國被侵略使臣出使之時，上海人民反對投降的標語，貼滿街巷。當投降使臣既發之後，全國的輿論，一致抨擊議和的失策。當賣國的馬賊被殺以後，在北平舉國之憤，出巡了以康有為為首的幾千人的反投降的大遊行。而且台灣的人民，竟至宣佈獨立，拿起武器與敵人戰鬥，直至彈盡而後已，這都於事實。所以李鴻章與伊藤博文飲櫻花之酒時，不覺說出了幾句真話，他說：

「和局既成之後，中國必須辦理善後事宜，在在需款，即如運散兵勇，籌備海軍，拾起生靈，國家自必設法籌募。且百姓不以國家之屈志求和，而為之，亦必憤而思亂，國家辦事，必更棘手。不但新添之稅難收，且恐原有之稅絕矣。」

從這里，可知當時妥協派，一面投降，一面並未忘記備因投降而引起人民之反抗。所以我說不是中國人民不抗戰，而是政府不准他們抗戰。不助員全國的人力物力把戰爭堅持到底，這是失敗的第三個原因。

第四、是軍隊的腐敗。這腐敗，首先表現於自上而下的貪污。如以海軍經費作額和的建築，致使艦隊的設備不全，乃至以石子代替彈藥。皇軍如此，等而下之，則無不貪污。當時太晤士報評曰：

「中國當承平之際，人不論文武，官不論大小，半皆徇私而忘公。旅順威海既設砲台，其安置於台上之砲，竟有不堪一放者。其採購之人，固係極廉官也。只知七折八扣，售者又因以爲利。譬如一砲也，報銷千金，經手者僅值二三百金，售主則僅以值五六百金之砲應命，皆不問其可用否也。」（「甲午戰報」一三四頁）。

又王炳耀朝鮮紀亂四亦云：

「平壤海軍所執之洋槍，係專於牟利，不顧喪師喪國之監司大員所採購，藥不配彈，子不對槍。」

以上不過舉例而已，由此已可推想一切。此外，扣餉吃缺，以軍餉而飽私囊者又爲普遍之情形。如「衛汝貴西報謂其私運餉銀八百兩回籍，以致軍心潰散，臨陣先降」（同上書七八頁）。「台莊營參將陳佑和，缺短防兵額數，扣扣口糧」（同上書一四五頁）。這也不過是二二例子。器械不可用，軍隊吃不飽，而將官則腰纏萬貫，怎不不打败仗？

「衛汝貴西報謂其私運餉銀八百兩回籍，以致軍心潰散，臨陣先降」（同上書七八頁）。「台莊營參將陳佑和，缺短防兵額數，扣扣口糧」（同上書一四五頁）。這也不過是二二例子。器械不可用，軍隊吃不飽，而將官則腰纏萬貫，怎不不打败仗？

當時的軍官，「事先一無培植，一聞招集，各營皆以領謀爲能事，不以稍略爲高，是兵官先不知戰，安能教兵以戰？」（同上書一八六頁）而且「若稍習一戰，委留一差，先自較量肥瘠，絕不計利國利民之事。」（同上書一三四頁）。所以當時的將官，皆爲升官發財而來，並非爲赴敵死國而戰。因而大抵皆臨陣脫逃，捲款私逃。羅德林中日兵本末云：

「衛汝貴西報謂其私運餉銀八百兩回籍，以致軍心潰散，臨陣先降」（同上書七八頁）。「台莊營參將陳佑和，缺短防兵額數，扣扣口糧」（同上書一四五頁）。這也不過是二二例子。器械不可用，軍隊吃不飽，而將官則腰纏萬貫，怎不不打败仗？

「君起軍戎行，致位轉帥，家既饒於財，宜自顧養，且春秋高，望善自爲計，勿當前敵。」汝貴守歸誠，益避敵軍。敗逃後，日人獲其書，後引諸教科書，以戒國人。」

「君起軍戎行，致位轉帥，家既饒於財，宜自顧養，且春秋高，望善自爲計，勿當前敵。」汝貴守歸誠，益避敵軍。敗逃後，日人獲其書，後引諸教科書，以戒國人。」

「君起軍戎行，致位轉帥，家既饒於財，宜自顧養，且春秋高，望善自爲計，勿當前敵。」汝貴守歸誠，益避敵軍。敗逃後，日人獲其書，後引諸教科書，以戒國人。」

「君起軍戎行，致位轉帥，家既饒於財，宜自顧養，且春秋高，望善自爲計，勿當前敵。」汝貴守歸誠，益避敵軍。敗逃後，日人獲其書，後引諸教科書，以戒國人。」

「君起軍戎行，致位轉帥，家既饒於財，宜自顧養，且春秋高，望善自爲計，勿當前敵。」汝貴守歸誠，益避敵軍。敗逃後，日人獲其書，後引諸教科書，以戒國人。」

敵人眼裏的八路軍

【華北軍發表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度綜合戰果，充分說明了過去以重慶軍為對手的華北軍，在今天已完全轉變為以「掃共」戰為中心的事實了。……（下略略二段）

【「特殊的戰鬥」……特殊的戰鬥是和南方戰線上不同，每一個士兵都不得不是樸素的，各自成為戰鬥單位去奮戰。……現在在華北的中共正規軍總計二十萬，若連游擊隊包括在內，則有八十萬之多。

【並且他們以冀東為中心，進入到熱河方面，企圖在那裡建立新的邊區，而不斷的躍起工作。

【因此，華北軍今後的任務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在這次對中共軍的作戰中，華北軍於他們所防範的游擊戰術以及三分武力七分政治的擾亂民心工作等，都有了深刻的認識。這具體的表現在去年秋以來對中共軍的連續的剿滅作戰上。……只有對於華北致命傷中共軍的總滅作戰，才是華北軍今後的重要使命】（敵西部「朝日新聞」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載北平十三日特電）。

【交戰回數一五、二三八，交戰的兵力二、〇五四、五六一……去年一年中華北作戰目標，係以中共為主，此就交戰次數約七成為對中共作戰的事實，當亦了然。……這也說明中共軍是怎樣得意的運用游擊戰術並依其政治優勢來擾亂華北】（敵同盟「時月報」第八卷第一號（東京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四日發行）敵部華北軍一九四三年綜合戰果）。

【有人稱中共為「共匪」或者「赤匪」，……我想還值得考慮。……從目前發表的自一月至四月華北軍戰鬥狀況看來，在四個月中間，交戰回數是六千零四十二次，其中四千五百五十六次，佔全數七成以上，都是和中共作戰，即一天平均作戰三十次。在這裡每天平均有×人被犧牲。當想到這樣的現實時，單是稱中共為「共匪」，那恐怕也是針鋒相對的「匪」吧！】

【不肖中共的奉命而浮淺的說：中國共產黨的武力八路軍，只要皇軍一打就，中國共產黨政治思想上的社會主義已經不合時代了，人民不會依歸他的等等，這種中共觀，應當從對中共作戰六年後的今天現實中，大大加以改正】（敵西部「每日新聞」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南滿北馬」欄載敵記者阿部作「改正中共觀」）。

中國的兵種，甚至一有遇見本國軍隊之類，即已倉皇逃遁者（前上二三七）。這誠如當時西報所云：「中國至今日雖稱白種，其確知木理廣，其人如紙糊老虎。」其所以如此，都是軍隊腐敗所致。

當戰爭失敗以後，泰晤士報有一評論曰：「吾輩向所望於中國者，至此皆喪然若矣。嗚呼，惜哉！其水陸各兵，皆不知戰陣為何事。誠使早經西人為之訓練，餉銀則奉不封扣，兵器則悉屬精良，吾知必有能專心力戰者。今乃有兵之名，而無兵之實，問以行陣之分合，而未獲者不知也，問以槍砲之利鈍，而徒成徒手也，即有，亦不能用也，問以糧餉之多少，而無糧餉也，即發亦必扣成也。戰此之故，彼當哀者，無不心灰意懶，但冀有可搶劫財物之處，即惟肆其搶劫而已。為之勇將，無使赴敵，幾如逼之至行刑之地，其誰肯用命乎！有不知而竟去者，然亦不過殺之云爾，於戰事豈有助乎？至於戰敗之後，或竟被殺於敵，或則四散逃往，無人照管，遂如流離散遺之乞丐，其悍者，遂相率而為盜民，間亦殺不聊生，豈不大可哀乎！」（「中日戰報」一三五頁）。

這一段評語，我們今天讀起來，猶覺毛髮悚然。

總之，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不外以上所述各端。以上各端，有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治者，明了一點，即自己的軍隊不行，於是積極購買新式武器，訓練新式軍隊，但是他不知道新式的武器，如果配合新的政治和文化，還是不能發揮他的威力，所以不久又有八國聯軍之戰。而且這一羣擁有新式武器的腐敗軍，終於在辛亥革命中被掃除了。

甲午戰爭，以割地賠款結束了，但由此而引發的後果，却是非常嚴重。因為在這次戰爭中徹底地暴露了中國統治者的無能。固然，鴉片戰爭與中法戰爭，都以中國的失敗而結束，但前者尚可以說中國當時有革命，後者也可以說在戰爭的進行中，互有勝負。而且戰爭對方，都是大國。甲午之戰，中國既無內亂，而竟敗於最弱三島之日本，並且自始至終，沒有打過一次勝仗，如果說有，那也只是捏造。據「朝日新聞」載：「甲午之戰，中國人，如果說有，那也只是捏造。」

因為甲午之戰，歐美列強便穿過了當時中國統治階級，原來是一羣毫無能力的頑固東西，於是紛紛要求租借土地，承認特權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進而高唱瓜分中國之說。而中國之半殖民地地位，亦即從此決定了。因為甲午之敗，英國看到中國的統治者無能，也一變其原來稱頌清政府的政策，轉而聯合日本以制俄國。也是因為甲午之敗，俄國也看到中國統治者的無能，也轉而地隨時運軍，以引起一九〇四年的日俄之戰。一嘗以蔽之，甲午之戰，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戰爭，這一戰敗下來，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一月十五日，改變了中國，一九四五年。

知識份子的道路

讀賴奮著：「經歷」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再版 生活書店發行

舒介震

賴奮先生的「經歷」，為我們畫了一條不凡而深刻的真理：「知識份子應如何不斷進步，體認着他是否願意和人民相結合」。

賴奮先生留學多年，這種精神活動的勞績，曾經過教育和教育過很多青年，使他的在戰爭與革命時代裡，辨清歷史的行程，自身的道路。從他轉動活動的遺產中間，我們可以吸取豐富的滋養；從他一生的生活實踐，更提示了一條知識份子生活的道路——這就是和人民大眾相結合的道路。

賴奮先生是一個知識份子，但他卻擺脫了中國知識份子從舊的士大夫階級承襲下來的壞的習染；那種或天虛算清個人的窮通禍福，得失利害，不關心別人，不關心身外事情的「獨善其身」，「玩世不恭」的思想。在他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新的氣質，這就是他的「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他自已說過：「我自己做事，沒有什麼別的特長，凡是擔任了一件事，我總是要認真，要負責，否則寧願不幹」。這種認真負責的精神，可以說是貫注在他一步的行動中間，無論是在做教師，辦刊物，辦報紙……都保持著毫不苟且的工作作風。在編輯刊物上他真是與會淋漓，全神以赴的熱中於自己的工作；發現了一篇文章，他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的歡喜」，對於撰寫文章也決不草率從事。從「經歷」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他這種勞心焦思的情形：

「每期的『小言論』雖僅數百字，却是我經過最費心血的一篇，每次必使我心力交瘁。一般讀者所認為最該說幾句話的事情，發表我的意見。這一欄最受人注意；後來有許多讀者來信說，他們每週讀社會上發生一個轟動的案件或問題，就期待這一欄的文字。其次是信翰欄解答的文字，也是我聚精會神的一種工作。我不敢說我所解答的一定怎樣好，但是我却盡了我的心力。有時並代為請教我的朋友」（第九九頁）。不僅是對於自己負責的工作這樣心神專注的作，對於一些並不是自己愛好的工作，只要是負

担下來，也同樣的認真負責。譬如他為着救窮而擔任了家庭教師，他却沒有絲毫敷衍塞責的想法：「在執行家庭教師職務的時候，一點不願存着『患得患失』的念頭，對於學生的功課是異常嚴格，所談然保持的態度是：『你聽我做，我就是這樣，你不聽我這樣做，儘管再聰明』（第四六頁）。他不區以認真、負責的態度來處理重要的、大的問題；他並且以這種精神在對待各種細小的瑣屑的問題上。舊的知識份子常常是自誇着『大節不逾，小節出入可也』，照他們的意見，大事應該認真幹，小事却不屑為；賴奮先生却沒有這種『不拘小節』的名士派頭，他不但注意各種細小的事情，他更不忽視任何細微的改進。譬如他擔任編輯各種科學名詞時，他的任務是先把手

子裡的名詞或成字條，分成順序，再一條一條的貼入一本空白的紙簿上，以備排印。但他是怎樣對待這種機械呆板的工作呢？「就是這種機械呆板的工作，我既已接受下來，却也要認真地幹。譬如字母的前後不要弄錯，各條的名字裁下之後，粘時不要有所遺漏，半天的工作不叫有所間斷」（第六三頁）。他這種求實的工作作風，他這種不拒絕細小工作的精神，使他成爲一個傑出的文化工作者；爲革命文化的事業創造了堅實的基地；有了這種堅實的基地，才支持了他發生的奮鬥事業。

但如果只看到他求實的工作作風的一方面，那他不這是一個負責任的文化工作者，一個幹練的實際管理的人才，而並不能獲得應有的評價，因爲他有着很多爲着個人的利害，埋頭苦幹的人。但賴奮先生懂得建設的地方，決不止於這種求實的工作作風，一個認真的人文化工作者，一個優秀的職業管理的人才……而在於他是一個知識份子而堅決的走向爲人民大眾服務的道路。他這種思想的轉變，決不是偶然的；他能够鍛鍊出那樣堅強的人民大眾的立場，爲人民，對人民負責的精神，這是因爲他具備着一種優秀的品質——

這就是為大衆服務的高度的品質。

胡喬先生向這種爲大衆服務的道路，在思想上是經過一段變革歷程的。在學校生活結束後，他開始作的是職業指導的工作，因爲他在工作中能夠不斷地觀察、研究新的事物，能夠向羣衆的實際生活學習；從這種實際觀察與研究出發，他逐漸對職業指導工作感到懷疑，他說：「我對職業指導，愈在實際方面接觸職業指導，愈使我深刻的感覺到這職業指導的效用很有限，愈使我感到這職業指導的工作……我在這時期裡增加了職業指導運動，對於青年究竟有什麼實際的效果，我實在不敢說，可是對於我自己確有着很重要的「指導」作用！什麼「指導」作用呢？使我從這方面感到慚愧，感到苦悶，感到我的思想應該由原來的「牛角尖」裡解放出來；換句話說，這現實的教訓使我的思想不得不轉變！」（第八七頁）。

爲甚麼他感到職業指導沒有效果呢？還是看他自己的說明吧！
「現在不是從個人主義做出發的所謂獨善其身的時代了，要在這怎樣的大集團中的一個前進的英勇的鬥士，在集團中能夠獲得個人的解放，關於這一點，有一點雖然細微而明顯的事實可以舉例子。從前實施所謂職業指導的人們，總是把應該怎樣努力吃苦的活動說出來，這對於當時有業可就而不會吃苦的青年說，當然不能算錯，但近來有不少青年，很吃苦的青年，因爲大衆民地的經濟破產，不是因爲他們自己個人運失而遭着失業的痛苦，指導者再對他們發揮「拚命努力，拚命吃苦」的高論，便是把着牛頭不對馬嘴的毛了。」

在他主持「生活」週刊的初期，他也是持着從個人的努力出發，求得生活的改善，但一個真誠的鬥士是敢於涉透人生，是敢於向舊的舊我訣別的。他這種思想的變革，也體現在他主持的刊物內容的變革上：「生活週刊」既一天天和社會的現狀發生着密切的聯繫，社會的改造到了現階段又決不能從個人主義做出發。……和整個社會的改造脫離關係斤斤於個人問題，這條路是走不通的。於是「生活週刊」應着時代的要求，逐漸注意於社會的問題和社會的改造，漸漸由個人出發而轉到羣衆的出發點了。」（第一一五頁）
從這種不滿足舊的看到「生活週刊」的轉變，是因爲和現實發生着密切的聯繫，才能「應着時代的要求」而改造嗎？正因他和羣衆的生活實際密切相聯，屬於向羣衆學習，因此，他才能真正明瞭羣衆如何生活，如何生活，羣衆的要求，他們的追求，和他們呼吸相通，痛癢相連。因

爲他的思想不斷地向羣衆發展，他的工作變革不停滯，不落後，逐漸地改造，創造，與時代的脈搏相一致。

明瞭了他這種轉變生活，向羣衆學習的精神，我們就可以說已經找到他思想發展的軌跡。對於他所說的「轉變」，就不會感到其意外。我覺得如果用「轉變」來說明他這種走向爲大衆服務，思想變革的過程，不如用「發展」來得更爲貼切；因爲前者往往容易使人覺得這或者是一種偶然的遊變，而後者是更清楚的指明了，他這種思想的變革是有其內在的基礎的。知識份子能走向大衆，是有一定過程的，他必須首先清算自己思想中的各種個人主義，然後用集體的思想來武裝自己的頭腦。胡喬先生所以能夠突破個人主義的思想，而用集體主義的思想來武裝自己，是因爲一貫的作爲羣衆服務的工作。他沒有因爲生活可以過得舒服而去作工程師，他沒有把自己和活實際，人民的苦樂隔濶開來，而在書齋裡盤算着自己如何成爲專家，他的願望是作一個「新聞記者」說出大衆所要求的話。他沒有甚麼發着個人私利打算的企圖，他反對那種只是爲着個人私利打算而研究學問的人，他以爲：「爲個人利害而研究學問，檢討問題，是充滿了自私自利的意味，而且也將不到出路，無疑的是要落落的；爲大衆福利而研究學問，檢討問題，乃至談一段話，作一篇文章，以及其他種種活動，都以此爲目的，方向既有所專注，心神自有所集中，隨時隨地都會有推進新時代車輪的可能性。」

他更以他的行動來實踐了他這種思想，他自己說過：「我的立場是中國大衆的立場；我的主張是自備必能有益於中國大衆的主張」（第一一五頁）。他這種態度，我覺得一點沒有誇大，他的願望是作一個新聞記者，但要作一個真正能代表人民說話的「新聞記者」，就不能要有代言人民底痛苦，傾聽他到底願望的決心，而且要有不畏艱危保衛自己發言的勇氣。如果沒有真正爲人民服務的決心，不知道人民的苦樂和願望，就無法說出人民所要求的話；如果沒有不偏不倚，不投個黨派定不移的節操，就不敢說出人民所要求的話。因爲他真正站在大衆的立場，因此，他思考的，探索的是最要緊關係大衆的切身利益，甚麼是他們的切身需要；他熱烈接受的是一切合於人民大衆切身利益和對羣衆，對於那些不符合於人民利益的思想，他能夠勇於的突破和拋棄。

因此，他雖然地以一個民主主義的知識份子而生活跨出了他的腳步，但在革命的生活實踐中不斷地把自己的思想推向前去，最終是和羣衆的社會主義相結合，和人民大衆發展的方向相一致。從他精神活動的成果上面，我們已經吸收過很多的滋養，從他所經歷過的生活道路，我們應該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道路。

讀者之頁

「雨化風春」要需們我

——生先諸……銘仲穎，明珮覆——

最近我們曾收到明、仲、穎、珮四先生的來信，共同提到今天的學校教育問題；同時，我們也收到其他讀者對學校教育的來信，我們很感恐慌，是別人的感觸，個別人的問題，因此，我們願以此提供一點意見供諸位參考。

明先生指出今天學校裡「同學的思想是在凍結下，生活是在半死不死的狀態裡，沒有青春的熱望，沒有高遠的理想，更沒有執著的追求，放眼四週，充滿着的是消沉、痲痺的氣息，這是一種可怕的「冷靜」啊！有的同學成天在寢室裡玩牌，飲女人，徘徊咖啡館，出入跳舞場，進去他們是忙於「X X」交換黃金了。……」因言及此，這些現象，明先生更感到痛苦與憤慨，但如我們再靜下來，去探求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就決不會像一般大人先生採「感憤致歎」而大嘆其「人心不古」。我們要問：近來這部份同學這種追求物慾和色情的享受，為甚麼造成他們這種「可怕的冷靜」呢。我們想，從這些同學身上是難找到根本原因的。

仲銘先生的來信指出另外一些事實，「前些時在聯席緊急時，在長街失守，桂軍淪陷，獨山陷敵，敵鋒進逼都勻的時候，同學們對於時事的前途增加了。同學中看報紙的比較多

起來，但是代替了對時局底冷淡態度的，是一種憂懼的情緒。……他們看報自然也不過注意政局的發展……有些人在想方法，找門路，準備去放洋，也有一些人在準備怎樣設法救家。他們多半是懷着對於時局悲觀失望的情緒」。在另外一對周均先生的信裡也說到：「同學們雖然很虛度於軍局的動盪，但在政治的動盪仍不覺其痛苦，噴噴着的是憂慮，大家也不大感到興趣，過去所經驗已經把我們弄得更聰明。他們現在已經不再感於莊嚴的氣氛，而轉於空虛的語言。我們一般的要求是拿事實來答……雖然這是在地獄的香德轉變到應變的過程中，但他們畢竟還過得時間時時來看看……」。……「但這種轉變却已逼使一些人感覺不安了。在我們舉行了幾次座談會後，這種五個學校的講壇長就忙於舉行會議，之後，學校之間舉行聯合會議，這種禁止，這種用教室，拖拉桌椅，都要受到記過的處分」。……但女同學們參加舞會，學校當局却表示可以抽以考慮……事後該校已答應可以參加正當的舞會。……一個對時局比較關切的同學，有人已經被找去作個別談話，受到警告了。」

我們想：上面幾位先生的來信裡所提出的學校的現象，雖然不能概括了今天所有的學校，但可以說是具有着相當的普遍性的。青年同學對於政治興趣的消沉冷淡，究竟為甚麼形成？難道這些同學主觀上都不願意去注意與自己息息相關的事務、政治問題，都不願意關心國際國內局勢的發展嗎？難道青年在抗戰初期不是有過極大的政治興趣嗎？在前些時局緊張的時候，不僅有極多青年同學在關切着時局的發展嗎？但正因為同學們對於時事、政治的興趣很高，就不能不對各種感受到的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因為青年們多半具有一種不能自己的爭取上進的精神，他們對於是非辨認，有着勇於的精神，也有着毫不掩飾的憂憤，這往往容易使一些人感到這是意外的「麻煩」。……這種對青年同學對於政治興趣的增高，正如像他們不願意人民的政治興趣的增高一樣。譬如前而周均先生聽到的，學校當局可以考慮女同學參加舞會，却阻抑同學們的討論國事不正是一個例證嗎？

對於上述這些問題的瞭解，我們同意明、仲、穎、珮先生指出的：「還是缺乏民主的實質」。……因為缺乏民主的實質，辦教育的人往往沒有看見青年們的關心，對於青年的思想不是採取誘導，而是採取壓抑的方法，這就使青年們的關心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的機會。這就如像明先生指出的：「同學們感到精神是在一種被壓抑的狀態中」。……但我們知道：教育的功能不僅在於傳授知識，而且更在於培養青年具備着「一種崇高的理想，產生

這種一種精神教育的探求的精神，對真理的堅貞不渝的保衛精神；假如青年這道向上的意志被忽視，思想力被禁錮，就不可能希望培養出他們探求生活，保衛真理底精神的。

對於今天學校教育，輿論界已經相當注重對教育改善，我們同意十二月十五日渝市某報提出的意見：「世界大勢的主流是民主化……教育方針應該認定這個大趨勢，任何統制思想強迫信仰的方法都應該放棄。因為這不僅違反民主的潮流，而且實際也無用，那種教育的結果是少數學生投機取巧，而多數優秀的青年因而頹廢消極，或者走入偏執之途。……要創造高度的文化，要培養優秀的人才，必須使他們研究的領域廣闊，從而比較切實，才能求得真知識，才能獲得真理解，真學問。」

我們覺得今天這種思想禁錮的現象必難消除，我們也同意顧仲銘先生的意見：「我們需要的是『春風化雨』。只有民主的領導，才能使同學的消沉與冷淡改變過來，只有民主的領導，才能使青年的向上意志得到充分的發揚。」

至於部份同學養成「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情緒，自然也是一種病態。瑛明先生指出的：「這類同學多半是對一切都失掉信心，對於自己也失掉自信，他們養成一種對生活的微溫的態度，雖然他們也時常考慮到歷史的行程，人類的命運，但他們很快又會懷疑自己的思想。這種消沉，覺醒只能說是某一瞬間的現象，他們又會轉向意識的昏倦。這些同學多半帶着得過且過，無所奈何的心境。他們現在時常滿足於一種細微的幽默，冷淡的諷刺。……」對瑛明先生指出的這些同學，我們可以肯定的說，這些同學都有着明辨是非的正義感，對於國家民族具有着深沉的愛；至於目前他們這種「對生活的微溫」，這種「懷疑一切，否定一切」，都只是一時的病態，造成他們這種病態的正是今天這種政治環境與學校教育。自然這種「懷疑一切，否定一切」是一種不健康的病態，瑛明先生所批評的很對：「雖然他們也憎厭虛偽與醜惡，但他們對於美善的東西也同樣予以菲薄」。我們覺得這種病態的產生，多半因為這些同學目擊着醜惡與不義的事情太多，而天沒有能夠看到那種新起的，像江河，像海洋的人民的力量。今天，學校環境既阻礙了他們貢獻自己的力量。他們也就養成懷疑一切而冷淡與諷刺了。

約翰遜勸有過一句話：「專制的統治使人變成冷嘲」。有人曾經引伸過這句話，他說：「權力治下的人民，沒有行動的自由。於是以為世間都是虛偽，你想修正它，便被人指為過激等等，生命先自危險。強的人們，嚴然反

抗，得了悲慘的末路了。然而中人以下的人們，便以為這世間是浮世，吸着烟捲，講點小笑話，敷衍過去……於是他就成為冷嘲的人而老去了」。我們想：如果這些同學一旦認識了自己，認識那已經存在，而且逐漸在生變的人民的力量，他們就會恢復他們的自信，改變他們這種冷淡與微溫底態度的。

對於三位信裡所提出的，造成青年同學消沉冷淡的緣由，我們試作如上的分析。我們知道要根據上述這些現象，是需要在民主政治民主的教育下才能做到，是不能單憑憑藉其一些局部的改良可以作到的。因為這種冷淡與消沉有着直接產生和助長的客觀環境。

局部的努力，要根絕消沉與冷淡的現象，固然不可能，但這決不是說可以忽視主觀的努力的。

今天我們要求進步的青年，突破自己固守的小圈子，我們不應該老是把自已限制在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中間，應當和更多的同學建立朋友關係，應當使這些同學能夠逐漸和我們一起來認識當前的現實，要大家共同來注意時局的發展，討論一下在當前所處的環境中應該做些甚麼？可能作到些甚麼？對於現實環境不滿意要認清醜惡的、垂死的一面，而且要看對新生的光明的一面。我們希望今天負有教育責任的人們，讓青年能夠真正的去認識現實。對於現實不要再希望傳粉塗金的醜惡青年，因為青年已經不再是可以被蒙混的了。廢札紙糊的東西遲早會被拆穿，莊嚴的袈裟也掩蓋不了醜惡的軀體。要知道現實是光明、美好的東西，固然可以激勵起人們的嚮往與追求，但醜惡和腐敗也可以激發起正義的憤恨，鞭策起要求改進的。

對於瑛明先生所舉例的：「追求物慾與色情的享樂」的同學，我們希望進步的同學，對他們不要採取完全驅逐和決裂的態度，我們應當去分別他們中間，那些人有着向上的要求，我們應該去啟發他們，誘掖他們，讓他們從私慾和物質的享受中擺脫出來，看到生活的更崇高的目的。

對於那些消沉和冷淡的同學，我們最需要做的是恢復他們的自信，使他們能夠從醜惡的腐敗的中間，看到那些新生的、光明的一面。當他們能夠把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命運，和人民大眾的前途，人民大眾的命運結合在一起的時後，他們就會真正看到人民大眾的力量，看到自己的力量。他們就會從消沉與冷淡變得積極奮發了。

周均先生還問到：「是否應該馬上離開這種環境，去參加到更激烈的戰鬥崗位去」。我們覺得這應該根據你的具體條件，如果今天沒有考慮到對國家民族能貢獻更大力量的崗位時，學校也不是就該馬上離開的。

談談「讀書筆記」

胡繩

編者按：得到一些讀者的來信，詢問到作筆記的方法，我們特請胡繩先生就自身作筆記的經驗，寫出供讀者參考。

一般人都說，做筆記對讀書是極有好處的一件事。但事實上，並不見得凡經過讀書筆記的人都能由此得到很多好處。在這中，所用方法的是否恰當是極其重要的事；但怎樣的方法才算恰當，又應由所企圖達到目的是什麼而決定。

有些朋友只是聽說做筆記很有好處，所以就做筆記，他們並不能明確地說出自己做筆記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因此他們也就不能為自己找到最適當的方法，只是聽人家說什麼方法好，就採用什麼方法，結果也就不能從讀書筆記中得到任何好處，往往做了一個時期筆記，只覺得疲勞力，勞而無功，便不知不覺地半途而廢了。

我想，先把目的確定是一件最要緊的事。要確定在每一時期，對於每一本書，做筆記的目的到底是什麼，目的確定，方法也才能確定。假如我們在讀書的不同時期，讀不同的書時，都能獲得適當的筆記方法，那麼做筆記的興趣也可以提高，因為從這里是可以得到很多好處的。

其實不僅做筆記，做任何事情也都是一樣的。所謂有幾有益處是在於是否能達到預定的目的。假如本來並沒有確定的目的，怎麼就說不到什麼益處而有幾有益處呢？

所以做筆記並沒有一成不變的方法。譬如延遲著一種方法，反而是毫無益處的事。以下原就是筆者個人的幾點經驗。

舊時候，人們很重視一種讀書方法，就是抄書。把自己覺得好的文章抄書，成篇的，成段的，甚至成本的照抄下來。至今恐怕有人做筆記還是採取這方法，以為這可以「幫助記憶」。

是的，在有些時候，在讀有些書時，我們是需要用筆記來幫助記憶書的內容的。但問題是：我們要做讀書中的什麼東西？——是記書中的文句呢

，還是記得藏在這些文句之內的精神實質呢？很顯然的，假如只記得文句，而忽略了書中的精神實質，是沒有意義的事。因此，為了「幫助記憶」而做筆記，也不應該採取這種死板的抄書方法。

舊的讀書人的目的本是要把他們所讀的書逐字逐句地背誦下來，因此抄書就是能夠完成他們的目的的一種方法。但目的的不同是如左，我們正要求不圖圖本逐地讀書，因此也就必須避免圖本逐地做筆記。一般地說，當我們在各個科學部門內讀一些基礎知識的書時，做筆記的目的為是為了幫助我們通讀書中的文句而領會和記憶書中的內容，那麼筆記方法就應該適應這個目的。

常有人告訴我們一種筆記方法，那是他所讀的書用分段落的方法來記出其要點來，在讀了一篇或一章或一本書中的一章一節之後，我們可以想一下，在這一篇，一章或一節中按照其內容的層次結構可以分成幾個段落，每一段落中或又可分成幾個小段落，每一小段落中或又可分成幾個更小的段落，於是我們就在筆記本上把每個大段落，小段落，更小的段落的原本內容用最簡單的文字，按次排列記下來。在這記錄中最好完全不用原書的文字，儘可能根據自己的了解，用自己的文字。

筆者在中學時，曾用這方法來對付許多書，自覺得益很大。我以為，這種筆記方法的作用並不是在於把所讀的書，從其結構上來分析成許多片段，以便於理解，而是在於弄清楚，這些片段怎樣由於它們的內部的邏輯系統而構成一個整體。把這一本書的敘述內容上的邏輯系統，我以為，就是理解一本書的可靠出發點。（雖然也並不能說，已經完全理解）。

我們大概都有過這樣的經驗。在讀一本對於我們內容比較深的書時，一路讀下去，只讀到零零碎碎的字句，片片段段的意見，不能捉到這些字句

與片段意思之間的關聯，這時就不能不感到十分苦惱。但終於看到有幾句詞子或有一段話似乎就是這本著作在這里所要說的中心意思，所要達到的最後的結論。於是，如釋重負，「好，這下手被我捉住了！」就拿起筆來，把這幾句，這一段照抄下來，以為這樣就算是把握到書中的精華，書中的靈魂了。

但是很顯然的，這樣做法很不對。也許是我們根本弄錯了，這抄下來的話並不是什麼最重要的結論。雖然並沒有弄錯，這整本的書所要說明的確實就是這一個可以用幾句話包括盡了的結論。但是假如我們以為只要知道這一個結論，其餘的話語可以不管，那就是大錯特錯了。其餘的話中一定是包含着對於這個結論的必要的提前提，達到這個結論的種種論證，對於這個結論的某種條件的限制和應有的補充等等。說白了這一切，我們就不能算是理解了這個結論；縱然我們已把這個結論抄在紙上，記在心頭，也還是空空的，一本書的靈魂並不在於抄所最後達到的某一個結論，而是在於如何達到這個結論的全部過程中。因此，我們必須改變那種只注意書中的結論是什麼的習慣，而要把把握書中的邏輯系統真正地把握讀通。因此我們也不能在那種幫助了解與記憶的讀書記中，只抄錄一個個的結論，而要注意這書中的邏輯系統。換句話說，就是不僅要注意結論是什麼，而要注意這結論是怎樣產生的；再換句話說，就是不僅要知道其然，而且要知道其所以然。

把這一點弄清楚，於是我們來用如上所舉的方法來做筆記才有意義。我們是把一本書的全部內容進行分析，在我們自己的筆記上便這書的全部內容，按照其本來的邏輯系統，改寫為一個簡單的記錄。自然，按照原書的敘述方式的不同，筆記的形式也可以有種種不同，有時還可以採取圖表來做輔助，使邏輯結構更加簡單明瞭。

用這樣的方法做筆記可以使我們在讀書時同時發展思考，幫助我們了解原書，接續書中的靈魂；可以幫助我們漸漸發展我們在讀書時不能書寫文字，而是注意其內容，不是片段地了解，而是具體地了解的習慣；也可以幫助我們在獨立地進行思考與寫作時更能够有條理。

我並不以為，在任何時候，讀任何書時，都該用這種筆記方法。我自己也只是在有一個時期，採用這方法。後來在讀譬如資本論那樣的時候，對於其中內容特別繁複，分析得格外精細的部分，我還覺得有用那種筆記

方法來整理讀時所得到的印象的必要。

在有些時候，或者對於有些書，當我們讀的過程中，已能對其全部內容一目了然，并無記下來留供參考的必要，所值得特別注意的不過是其中個別的地方，那麼，自然就不必再做上述那種筆記。我們就應該按照需要與目的的不同而創造出種種不同的筆記形式來。

我以為，做筆記固然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因為一面讀書，一面筆記總要多化點精力；但同時，做筆記時也必須知道如何偷懶，就是如何節省精力，筆着自已就曾經浪費許多精力做了些並沒有什麼用處的筆記，結果反而使讀書和做筆記的興趣都受了損害。我想，每個人都會有過這樣的經驗的。——所以，我要再重複說一句，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需要來做筆記。

假如不過是為了使自已能把握到書中更精妙的地方，那麼有時是在書上畫線是可以的。但，我常見有人在書上畫線，結果幾乎把所有的句子下都畫上線了，那豈不除了表示他在讀書時還有枝餘筆在手想以外，別無其他意義了？我想，我們應該更靈敏地畫線，最好自己規定不同的符號來表明出各種不同性質的重要地方。

假如為了以後容易翻檢到原書，那麼在筆記本上記上「關於某某問題，見某書某某頁」或再加上幾句簡單的提要也就够了。

假如以後翻檢原書不方便，那麼筆記自然就可記得較詳細一點。假如在讀書時自已有所觸發，或者記書中的話和事實印證有新的了解，或者為了注意於一問題曾翻檢過好些書並且自已好好地想過一下，那自然就可以把原書重讀一遍，因為事後也許忘記，再要翻檢和查考出來不容易。總之，我的意思是，不要給自己太多的不必要的麻煩。反過來說，也就是要強筆記，總要求有用處，有意義。

我們固然應該眼光遠大，但我以為，我們在做筆記時却寧可以當前的需要為範圍，假如為了也許將來對自已有用處，所以現在隨時隨地一看到什麼似乎很有意思，很有趣味的话和知識，都一一記錄下來，使我們的筆記本成為一本雜亂的大堆棧，那麼做筆記的真正功效便沒有了。一個為供給公共用的資料或應酬可能備集各方面的材料，但個人的筆記却總是為個人的需要而作。我們做筆記的內容不能沒有範圍，或者是和自已目前的工作有關的範圍，或者是目前自已所注意的問題的範圍，或者是目前自已的研究範圍。

為公共應用而設的資料編集方法自然和個人的讀書筆記方法不同，有若干人力的研究室的整理資料的方法自然也和個人的讀書筆記方法不同，甚至一個專門家的筆記方法和我們普通的讀書人的筆記方法不盡相同。所以接受旁人的經驗固然是應該的，但是隨便移用旁人所用的方法却常常會失敗。

以卡片與筆記本二者的優劣比較來說罷。筆者以前曾聽見很多人說，用卡片是最方便不燥的。於是我也嘗試一下，然而我失敗了。我發現，既然並不是準備較大地搜集許多材料來從事某一方面的專門研究工作，那麼用卡片實在是反而增加麻煩的事。

於是仍舊用筆記本。先在橫寫的每一頁的右邊留下一點空白，用橫線畫開。使得我所記下的每一段筆記在我的右邊可以有一個題目。這樣，檢索起來，也很方便。在寫完一本後，把全部筆記的題目做一個索引表，那就更不必說。太誠信這一種方法。我的做筆記的經驗之談其實不過只有這一點。

編後記

在十卷一期出版後，我們心中就懷着極大的歉疚：一方面由於主觀力量上的限制，使得原訂的編輯計劃已經打了折扣，再加以審查上所遭遇的困難，又使得內容方面受到很大的影響。許多已經弄好的文章都擱置了，雖然這些文章有些已在報紙上和讀者諸君見了面（如毛澤東的「一九四五年來的任務」，如今章的「從海洋到大陸」）。當時我們為着趕上出版時間，就只好倉促地出版了。在這一期刊出版之後，我們已接到和聽到諸君的許多意見，尤其是傅芬先生提出的意見很中肯，我們希望能經常得着這種善意的督責。

這一期刊在審查方面，也遇着同樣的困難，為着不重復第一期的情形，我們只得將出版時間稍加延遲，這種不得已的情形，想來是可以得到讀者諸君的原諒的。在這期原定的計劃裡面，本有「大家想辦法」（時事評論），薛子正的「展望太平洋遠局」，張仲賢的「一個優秀的中國人」（論胡適先生的生平、思想和生活），美國記者丁·麥羅斯的「邊區印象記」等等，可惜這些文章都不能和讀者見面。這一期刊，我們本來還專請郭初民先生為我們寫了一篇「人民的政權」（這篇文章是他的「人民的世紀」的續篇），但因審查稿採取的關係，一時還不能刊出，請向郭先生致歉。

講到這一期的內容，我們特向讀者推薦幾篇文字：羅邁同志的文章，雖然只是對於邊區文教工作的一篇綱要式的總結，但這篇文章已說明了邊區文教

內政部重慶登記部字號第... 伍號

方便了。後來我又改用活頁的本子。

自然，我並不是一般地反對卡片，而是說，在有些情形下，用卡片或反而不如用本子。這也就是說，在用卡片還是用本子這一問題上，也要看具體情形而定，未可一概而論。

最後我還要說，雖然做筆記可以是一種好的讀書方法，但究竟只是一種輔助的方法。讀書方法的根本要點還是在於多思考，從書中所說的全部內容上來思考，從這本書中所說和那本書中所說的相互對照着來思考，尤其重要的是把書中所說的和實際相對照來思考。用筆並不能代替用腦子，假如因為一味用筆寫筆記而打斷了打斷腦子多思考，那麼這是不做筆記的好，用任何形式記的筆記都應該是經過思考以後的結果才有意義。與其多記而少想或不想，寧可不記或少記而多想。從做讀書筆記中固然可能得到好處，但也太誠信這一種方法。我的做筆記的經驗之談其實不過只有這一點。

的根本精神——為人民服務的方針，至於關於邊區文教大會的詳情，我們在下一期中還有介紹。蕭伯登先生的專文，向我們提示了造成甲午之戰的悲劇的原因，在今天讀出來，是值得再三深思，我們也將從此得到更深的警惕。蕭伯登關於法國解放後的政治形勢的文字，這是有系統地介紹西歐許多獨立新國家的文字之一，我們在以前各期中，已經介紹過南斯拉夫、波蘭，此後還將介紹其他的國家。

此外，這一期的「書評及其他」，「談微談」也和上一期不同了。我們原來把「書評及其他」改成「書評及其他」，是希望擴大介紹的範圍，但十卷一期出版後，有好些讀者提出，書評介紹可與「新劇」分工，「書評及其他」的評介，範圍上應有所專注，多偏重於思想理論的介紹及批判方面的。這期本有兩篇文章，另一篇因為篇幅關係移在下一期。「談微談」原是擬在讀者閱長篇文章後得到一點評語，有讀者提出這種文章可由「新劇」刊載，同時我們覺得這種針對時事的短文，因為出版時間的限制，往往趕不上事件的發展，因此，這一期刊就沒有刊載。但我們希望讀者惠賜有關文化思想批判的短文。

下期的文字，現在可以預先告訴大家的，其中有全面介紹邊區文教運動的文字，並請郭先生的一篇「孔墨的批判」，印為附冊，和本刊一起發行。

編者

衆 群

期 四 三 第 卷 十 第



版 出 日 八 月 三 年 四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本 期 目 錄

怎樣走到舊金山(時論)

清算墨尼黑的幽靈

人民的政權

意大利的民主運動與聯合政權

論克里米亞會議的歷史意義

從敵議會看敵情

紅軍——新型的軍隊

紅軍的集體英雄主義

論陣地戰與游擊戰

孔墨的批判(附冊)

人民文化的時代

從兩本三思樓月書論士大夫階級的生活態度

解開時局的謎

知識青年怎樣推進民主運動(第一次筆談會)

阻礙同學們團結的是甚麼?

附錄：邊區文教大會的幾個決議

關於開展軍政衛生醫藥工作的決議

關於培養知識份子與普及羣衆教育的決議

關於發展羣衆報章通訊工作的決議

關於開展工廠的文教工作的決議

E·白勞德(八一)

鄧初民(八四)

舒翰(九〇)

喬木(九四)

黎華(九七)

瓦西利耶夫(九九)

科斯特羅夫(一〇〇)

斯科魯威(一〇一)

郭沫若

周而復(一〇八)

蘆蕪(一二七)

龍恭(一三〇)

浪川(一三五)

參 函(封面)

羣 衆

第十卷 第三四期

三十四年三月八日出版

羣衆雜誌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新華日報社

本刊價目

本報零售 五分

六 期 八十八元

十二期 一百六十元

廿四期 三百零四元

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照加

怎樣走到舊金山

在今年的二月初，世界上發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這件大事就是羅斯福、邱吉爾、斯大林這三大強國的領袖，在克萊米梭所舉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會議。它確定了徹底消滅法西斯主義和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原則，討論和發表，並於十一日發表了一篇三大領袖共同簽署的聯合聲明。

這次會議，這個聯合聲明，所涉及的雖然都是有關歐洲的各種問題，但它對中國有重大的影響，是不必說的。尤其值得我們特別重視的，是它決定於四月二十五日要在舊金山召開聯合國會議，並且說，聯合國會議的召開，要由美英蘇三國和中法兩國磋商，邀請參加共同發起。

舊金山的這次聯合國會議，無疑的要討論到遠東問題，要討論到中國問題。它將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個重要關頭，而且中國將和英美蘇法共同發起召開這次會議，這是多麼光榮的一件事！然而，從中國走到舊金山這一段路程，却不是怎樣近，更不是怎樣容易走，須得有好好的準備才行。我們要怎樣才能走到舊金山，要怎樣才能走進這個會議的大會堂去，這是今天提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的重大課題。

舊金山會議將討論些什麼問題，要具體的說，目前自然還無法預測，但有一點是可以斷言的：第一、舊金山會議將決定遠東的命運，決定中國的命運；第二、舊金山會議的討論和決定，一定要符合英美蘇法四國會議的原則和精神。就是說，它所要討

論的問題，當不出於怎樣使中國反抗日本法西斯戰爭勝利後結束和以及怎樣建立遠東的持久和平這兩大範圍。因此，我們怎樣準備去參加這個會議，取到自已的光明前途，要怎樣準備去參加這個會議，尤其是怎樣準備去參加這個會議的發起人，就必須根據克萊米梭會議所確定了的原則來進行。

克萊米梭會議的基本精神和原則是民主主義，這個精神和原則，貫澈在那次會議所討論所決定的一切問題中。羅斯福的聯合聲明，把戰爭的目的（即戰爭的勝利結束）和平的基礎說得異常明確。聲明中說：「要掃除滅絕種族，肅清的毒害，組織和發展，使德國人民中的公共機關中，從文化生活和經濟生活中，消除所有一切納粹的和軍國主義的影響，……我們的宗旨決不是要消滅德國的人民，但是惟有當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已經根絕了的時候，德國人才有過適當生活的希望，他們才在國際交際中佔一席地位的希望。」這就是說，要使戰爭得到勝利的結果，須要從思想到制度消滅法西斯主義。只有這樣的國家，人民才有適當的生活可過，也只有這樣的國家，才請在國際民主大家庭中佔到一席之地。聲明中又說：「我們相信：經由一切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密切而繼續的合作，以防止侵略並消除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上的戰爭原因，都是必要的。」這就是說，戰爭是為了民主主義，和平的基礎也是要建立在民主主義的上面。

這個原則和精神，在「關於波蘭和南斯拉夫的决定」中，在關於波蘭和南斯拉夫的决定中，表現得

更爲具體。「關於波蘭和南斯拉夫的决定」中說：「民主主義方式解決他們迫切的經濟問題和經濟問題，歐洲秩序的穩定，以及國民經濟生活的再建，必須是使波蘭和南斯拉夫人民能自由地發展和組織其經濟和社會制度的最後形勢，並使他們自己選擇的民主制度的程序來達成。」並且說：「每個國家應恢復主權和獨立民主自治的政府，有三個必要條件：一、確立內政和平；二、實行國際義務；三、成立臨時政府，當使波蘭和南斯拉夫人民能自由地發展和組織其經濟和社會制度的最後形勢，並使他們自己選擇的民主制度的程序來達成。」

對於人民意志負責的政府。關於波蘭問題的決定則說：「現在的波蘭臨時政府應是更大的基礎上，實行改組，以容納波蘭國內外的民主領袖。」關於南斯拉夫問題的決定也說：「反法西斯主義的南斯拉夫應予以擴大，以容納沒有參加合作妥協的南斯拉夫最後一屆會議的黨員。」從以上的一些聲明中可以看出，一個國家要獲得自由和獨立，要使自己

的抗爭得到勝利，從波蘭和南斯拉夫之下解放出來，而建立和平的秩序，必須是民主主義方式解決迫切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並使他們自己選擇的民主制度的程序來達成。所謂民主方式，民主程序，就是所有切切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當使波蘭和南斯拉夫人民能自由地發展和組織其經濟和社會制度的最後形勢，並使他們自己選擇的民主制度的程序來達成。因爲只有由一切民主份子的代表廣泛參加而成立的臨時政府，才能確保儘可能從速經由自由選舉以建立對於人民意志負責的正式政府。（下被略）

從中國走到舊金山，這一段並非不遠，更非容易走的路，然而，給我們的时间却不到六十天了。在舊金山會議以前，英美蘇法三國還須先和法法兩國磋商，我們要求遠東以前就走完這一段路程，其時間就更短了。短的時間，長的路程，再沒有一時一刻可以容許我們拖，容許我們等了。（下被略）

清算慕尼黑黑的幽靈

白勞德

這是美共領袖白勞德去年四月間寫成的關於德黑蘭會議的一本書中的一章，專論蘇聯，白勞德的估計在基本上依然是正確的，特別是對於波蘭問題，他好像在那時就已預見了今天的發展。此外他對於戰後歐洲經濟的分析，尤其有獨到之處，現特譯載於此，以供讀者參考。

——編者

戰後歐洲是個什麼樣子決定于現在歐洲是怎樣解放出來的。

這在一九四二年，國務卿赫爾就定下了這個基本原则，那時他就在一篇提綱式的演詞裡，警告歐洲各國不要完全依靠外力得到解放，他們的發言權要看他們參加解放鬥爭的程度來決定。莫斯科會議在英國宣言中提出同樣的警告。

換一句簡單明瞭的話，建築戰後歐洲的工程師們是從那些在戰爭中表現出最大能力，事實上用最大能力消滅納粹的人們當中選擇出來。可是這是在美國往往被人忽視的一件現實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實，在美國幾乎沒有一位專欄作家不能一個月憑空想出一張歐洲新地圖，任何一個玩辭的專家可以在他空閒的時候想出一張戰後世界的地圖而得到婦人俱樂部、茶會、各式各樣的「知識份子」和紐約時報書評欄底廣泛的稱譽。

德黑蘭會議根據這一權利基於成就的原則，成立了一個協定和實現這一協定的臨時草案，使所有參加反納粹戰爭的人們不致互相抵消，而最後互相殘殺起來。德黑蘭會議具有歷史的重要性，因為它是阻礙反納粹戰爭最大責任的三大主要強國，為了更有效的得到這一共同結果成立的一個協定。

因為我們沒有制定無所不包的計劃的野心，我們對於戰後歐洲的討論可以限制到一些具體的例子，看看在這些具體情況下，問題是怎樣提出的。從波蘭開始。

戰前波蘭政府，當它憤怒地拒絕一切和蘇聯合作，投身于希特勒懷中，參加瓜分捷克斯克的時候，它已宣佈了它的死刑。後來，當戰爭快要爆發的時候，它又一次地拒絕蘇聯的援助，其結果是當希特勒轉過頭來對付他的波蘭「朋友」的時候，波蘭在幾個月之內就被征服了。那時蘇聯地進來，連時地

救出了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領土，這是一九二〇年波蘭從蘇聯強佔過去的。這樣，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在倫敦形成的波蘭流亡政府，除掉等待一些事情發生而外，沒有任何希望，任何作用。後來希特勒侵略蘇聯，甫考斯基就代表波蘭流亡政府和蘇聯簽訂一個條約，因此在一九四一年就成立了一個協定，假如流亡政府來實地執行那協定的話，它的地位將一定會大大加強的。

但是事實證明了流亡政府不能忠實執行它的義務，當它把留在蘇聯的難民和戰俘組成一個軍，並且用蘇聯的錢把它裝備和武裝起來的時候，流亡政府拒絕把那軍隊用在東線，它把它通過伊爾庫到東，為英國擔任駐防工作。它利用它在蘇聯境內設立的代表機關搜集情報，而這些情報却很神秘地落到希特勒的手裡，它利用這些機關進行失敗主義和顛覆蘇聯政權的犯罪活動，因為這個緣故，「社會主義者」愛爾利希和阿爾特被槍決了。最後，它參加了希特勒關於卡丁森林的無恥挑釁，這是希特勒的一宗罪惡，但波蘭的流亡政府卻把它寫到蘇聯的賬上，直接做柏林的應聲虫。因此，蘇聯和波蘭流亡政府斷絕一切外交關係，於是留在蘇聯境內的波蘭人就組織了波蘭愛國者聯盟，同時着手組織波蘭的軍隊，和紅軍攜手作戰。

當紅軍高舉着解放的旗幟向波蘭邊境進軍的時候，這個出賣祖國的波蘭流亡政府向它的國內黨徒們發出命令，叫他們隨時隨地抵抗紅軍，雖然三年來它不斷有系統地命令他們不抵抗納粹。在波蘭，人們找到了無數證據，證明了在這期間，那些和納粹合作來消滅進行游擊戰爭的波蘭愛國份子的，正是這一批傢伙。

波蘭流亡政府的要求非常簡單，紅軍應該把納粹趕出波蘭領土，把一九三九年解放了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領土交還波蘭，用紅軍的刺刀把流亡政府

的先生們搬到波蘭人民的頭上，這後好讓他們在國際的規模上繼續他們陰險的計畫。他們想讓波蘭的力量向蘇聯激進「做小的」要求，因為，不管他們怎樣，他們自己是一點力量都沒有。

德黑蘭結束了波蘭反對者們的這種陰謀的、危險的、有害的把戲。蘇聯在英國議會和英政府認為蘇聯對於波蘭的政策是完全正當，而且是根據遠在一九一九年英政府就已提出的公平的判斷的。毫無疑問，華盛頓將追隨倫敦採取這一不可避免的步驟。波蘭的流亡份子用他們自己造出來的煙霧籠罩在空中，他們好像已經下了決心不肯下來。

不過，真正的波蘭底遠景却一天天光明起來了。紅軍在無情地前進着，和紅軍一道前進的有柏爾察格將軍指揮下的波蘭愛國軍。不用絲毫懷疑，當紅軍進入波蘭領土的時候，波蘭人民將立即成立他們自己的自治政府，用他們所有的力量參加他們自己的解放鬥爭。他們將清除掉那些把他們帶到深淵去的賣國賊，建立他們所求有的強大的民主的波蘭。

假如波蘭流亡份子不夢想以為可以把莫斯科和倫敦華盛頓煽動和生疏開來，他們是不會對蘇聯進行這種盲目和自殺性的冒險的。他們集中力量來反對德黑蘭協定，他們唯一的希望寄託在反希特勒聯盟的分裂上——一言以蔽之，他們還夢想希特勒主義在歐洲會勝利。和一切反德黑蘭的人們一樣，他們行走在懸崖上。

和波蘭流亡政府完全相反，流亡中的捷克政府却採取了一套積極的和一貫的政策。這一件事實足以警告我們不能對所有流亡政府下一概的結論。捷克政府有弱點，而且是嚴重的弱點，但是它沒有陰謀詭計或者分裂英美蘇同盟，也沒有企圖在列強間不和中檢便宜。它不斷的努力團結，而自從慕尼黑以後，它益發認識了捷克和蘇聯的親密合作是戰後持久和平最好的保障。它主張各民主黨派，包含了共產黨的團結合作。戰後捷克的前途是光明的，光明的，目前唯一可慮的是他們爭取勝利的鬥爭進行得遲鈍，他們的武裝起義發動得太遲。

南斯拉夫是歐洲解放和復興的又一例證。一九四四年春天，當這本報在起稿的時候，所有的美國人知道了在納粹德軍轄下的南斯拉夫內部，興起了一個驚人強大的人民的政府和軍隊以及它抗擊侵略者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代理人的奇蹟式的成功。這一個運動的領袖的名字德拉瓦元帥已是舉世皆知了。英首相邱吉爾在英國議會裡發言，坦白而慷慨地承認了德拉瓦元帥和他的政府對

于聯合國家的偉大貢獻，同樣坦白地讚賞和擁護了賈國脫米海洛維奇。

僅僅兩個月以前，這些消息是怎樣不同啊。

為了說明美國對於歐洲問題制定一個正確的政策的原因，我破例來講一個「內幕」故事。一九四二年十月，紐約市美國勞工黨裡的杜賓斯基——新領袖一派，為了拔掉他們的眼中釘，勸告監獄長監禁對工人日報。為達到目的，他們以為最好的方法是指搗工人日報破壞聯合國家團結，因為工人日報攻擊米海洛維奇將軍——「我們的同盟」。他們把這一計劃提到他們親朋的朋友和夥伴，助理國務卿柏利前頭。柏利欣然同意，要次寫道謝，這道為此召開了一個司法會議。會議經過了一番複雜作態的討論後決定在原則上同意柏利的提案，但在未正式提出前，決定和陸軍情報部與國務院弄清這件「事」——工人日報報停得很久，情報部和國務院都決定把米海洛維奇與希特勒的關係問題暫時擱置不談，因為那說，這是一動不得的東西。

儘管如此，這一件事發生後的一年多，美國的報紙依然繼續他們對於米海洛維奇的支持和對於德拉瓦元帥和他的政府的抨擊，他們認為他們是「共產黨匪徒」，除掉工人日報，我們美國的所有報紙有系統地對於南斯拉夫執行不正確的報導，雖然從一開頭英美政府對於米海洛維奇和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勾結就知得清清楚楚。只有到了一九四三年終，亞當密克出版了「我的祖國」，用無可爭辯的事實才打破了美國報紙對於南斯拉夫真相的封鎖。亞當密克之後跟隨有紐約時報記者蘇茲曼打回來的電報，在那一個電報裡他承認他早已知道但不敢報告的事實。

很顯著的，英美蘇三國團結一致支持德拉瓦，並舉認米海洛維奇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是和敵人勾結的賣國賊——這是所有聯合國的一大勝利。可是現在美國大報還繼續認為米海洛維奇的倒楣是英美的一個挫折，「斯大林的一個令人不安的勝利」，我們應該怎樣說呢？就在我寫這段文章的時候，紐約時報透過它的軍事專家施爾文，認為德拉瓦的興起是「許多擾亂的潮流」中的一股，這些潮流使「莫斯科、開羅、德黑蘭會議後大家對於戰後世界的崇高希望」暗淡了起來。

鮑爾文和紐約時報真是以為德黑蘭的希望是在各大強國應該支持米海洛維奇而不支持德拉瓦嗎？美國的利益真是在於替希特勒底那些腐化的和破產的團體作伴，用美國的刺刀把這些人搬到南斯拉夫的頭上，這樣來作為我們推翻他們的主子——納粹底軍事行動的一部嗎？美國真害怕一個能團結天主

步達到共產主義者的真正的民主運動在歐洲興起嗎？民主在歐洲的每一勝利是英美政策的「挫折」，「斯大林勝利」嗎？

假如美國不能消滅的這四等這一問題，歐德漢然和德爾文及其一流不同，對爭這一問題加以否定的回答，那麼德黑蘭協定在歷史上不過有浮光一閃的重要性而已。因為德爾文及其一流的路線，其精華只有在歐洲引起廣泛的內戰，而這一內戰即在希特勒打垮之後還要繼續而且加緊的。在這一內戰中，德爾文將把英美和所有野蠻反動勢力聯合起來，而把一切民主力量投入蘇聯的懷中。這就是說，英美最後不得不担負起希特勒已經失敗了的工作——軍事上毀滅蘇聯。

德黑蘭協定的具體目的是最後而且永久的清算蘇聯的幽靈。它的任務在取消這種在歐洲範圍內用蘇聯政策來對抗英美政策的分裂路線，而代之以親英美蘇的團結路線；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德黑蘭是必要的。

我們對於歐洲復興問題的舉例已經足以顯示這一個問題在政治上的基本性質，全歐洲在基本上的都是一樣，這一個國家和那一個國家的差別只限於小節而已。為了說明這本論的論點（即指白氏的「德黑蘭」一書——譯者），我們不必從一個國家到一個國家地討論。

為了把戰後歐洲的中心問題，在德黑蘭協定所要實現的美國利益底觀點上，更尖銳的提出，還有一點必須說到，那就是歐洲的經濟問題。

還在戰爭之前，歐洲的經濟已經緊密的安排在國際加特爾的制度之下。這一個加特爾制度是一種獨占資本和封建的或半封建的政治力量的混合體。這是戰前納粹向它的鄰邦滲透底主要的河道，而在歐洲被征服之後，這一套制度又被希特勒作為歐洲新秩序的骨幹，原封不動的接受過來。英美資本家的某一些人物參加了這個加特爾制度，而且從沒有斷絕過關係，他們希冀當納粹打垮的時候，他們還能把它救了出來。

這是使得英美對於法國的維琪政府，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權，意大利薩伏亞皇室，南斯拉夫的米海洛維奇和彼得王室，希臘的喬治王室及其法西斯幫手們總總不捨離最大的力量。它所發生的影響顯比威官所喜愛的專制原則和合法主義的憤懣，要嚴重到幾百倍。這是實現德黑蘭協定最主要的障礙。

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絕不能像典型的美國自由主義者所提出的那樣：簡單地解散托拉斯和消滅加特爾。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只要它還存在，它的支配時鐘不能不在加特爾形式下的獨佔資本的結合。不如此，其他唯一

可行的辦法，只有那在蘇聯實行專制社會主義國家，專制的鐵路是最高例。

不過歐洲加特爾底經濟底政治底結構，絕不能在那種希特勒失敗以後繼續存在下去，更不能由英美資本底獨佔地收歸己用。它必須全部加以毀滅，而歐洲新生的民主底經濟底在這一毀滅工作，因為歐洲的加特爾制度底政治的社會的外層是絕全由以下的幾個因素構成的：

- 一、封建制度底腐朽了的殘餘。
- 二、對於工人和農民的高度壓迫。
- 三、絕對主義和權力主義。
- 四、軍閥制度。
- 五、對於少數民族的壓迫。

六、從外邊來的對於整個民族的壓迫和支配。

掃除這些封建殘餘，這是歐洲人民民主革命的本質，是打垮希特勒主義必然的後果，它不可避免的要提出把歐洲的資本主義經濟（包含了加特爾）重新在一個完全新的政治的和社會的結構上建立起來的問題。

認為美國的利益，即便是獨佔資本的利益也好，和歐洲這一必然的人民革命勢不兩立，那是一種最愚魯的看法。實際上，這是唯一能把歐洲轉變或美國的有效市場的辦法，美國經濟假如要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繼續生存下去，這市場是絕對必要的。舊的蘇尼恩的歐洲必然要走進歷史的博物館，一個新民主的歐洲必將取而代之；因為——假如不是為了別的原因，因為只有一個民主的歐洲才能在世界市場上買進和賣出，償付它的清單，在形式和規模上，足以和美商一致，組成一個單一的世界秩序。

為得把問題簡單化到使交易所裡的最怕和最不考慮問題的顧客們都能懂，我們可以說歐洲的問題像債在米海洛維奇所發行的公債票的市價上；在今天，和鐵托的公債票比較起來，美國沒有很光的債票收買者，不會出一分錢去買米海洛維奇的債票的，而另一方面，鐵托的債票只有當交易所對於全歐洲命運的判斷改變了，才會改變行情。很清楚的像如歐洲能避免幾十年的混亂，鐵托的名字在美國金融市場上要比納粹統治下的國家中任何一個人的名字吃香。這是一個很具體的標準來決定，對於歐洲問題，它的解放和復興，美國資本的利益究竟是在那裡。

（德黑蘭，白勞德，德黑蘭，二七——四五）

人民的政權

鄧初民

人民的政權，是「人民的世紀」的一個最主要、最基本、最鮮明具體的標記。如果沒有人民的政權，人民的世紀，就只是一句空話。我在前著「人民的世紀」一文裡（見本刊第九卷第十九期），曾說：「人民的世紀的真實意義，是人民一面在創造歷史；一面就在支配歷史。他是歷史本身的真正創造者；同時，他就是歷史本身的真正主宰者，為着人民大眾真正的永久的共同利益，共同幸福，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各方面，人民有最高和最後的發號施令權。」接着又說：「在『人民的世紀』裡，一切是人民在那裡發號施令，再不是暴君獨夫或政府在那裡發號施令，是人民大眾為着他們真正的永久的共同利益，共同幸福，要政府跟着人民走，再不是政府，尤其不是暴君獨夫為着他們的私圖，要人民跟着他們走。總之暴君獨夫的全部命運，都拿在人民手裡。」

「人民的世紀」的真實意義，既是這樣，然則「人民的政權」的真實意義又是怎樣的呢？我以為（一）它是由人民自己創造出來的政權（由人民自己打出來天下）；（二）它是真正掌握在人民自己手裏的政權（非任何暴君獨夫所能竊據）；（三）它是時時刻刻不放鬆的緊密的密切的依靠人民自己全部力量保障其實現、生長、鞏固、發展（離開了人民，沒有人民真實力量的支持，它就要夭折）；（四）它是為人民大眾真正的永久的共同利益，共同幸福奮鬥的，一句話，它是為人民服務的（它是人民的勤務員）。

這樣一種「人民的政權」，它必然要有其理論基礎，它的理論基礎，就是新型的民主主義；它必然要有其實踐形態，它的實踐形態，就是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或聯合政權，而且它必然還要有其一定的歷史背景，它的歷史背景，是由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衰落，引起了舊型民主的衰落，因而需要有一種新型民主的改革。而它的產生，可以說在這次全世界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戰爭以前，亦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在歐洲的政治舞台上，有過若干實

試。例如希特勒納粹匪幫攫取政權以前，德國人民大眾為了阻止德國大資本所有者殺戮民主的陰謀而醞釀的人民革命的政權，就是一例；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共和政府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的共和國政權，又是一例；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以法蘭西各階層人民聯合組成的人民陣線為支柱的反法西斯反獨佔資本的勒魯姆內閣，是第三個例子。此外，還有第四個例子，例如芬蘭民主共和國的人民政府，在當時還提出了要實行如下的政綱：「一、建立芬蘭人民軍隊；二、設立國家對於大的私人銀行與大的工業企業的監督，并實行幫助中小企業的設施；三、實行完全消滅失業的設施；四、減少工時到每日八小時，保證工人有兩星期的暑期休假，并減少工人與僱員的房租；五、沒收大地主的土地，但不觸犯農民的土地和財產，并把所沒收的土地轉交於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六、農民不償付所欠的賦稅；七、國家實行多方幫助來提高貧苦農民的經濟，首先是從所沒收的土地主土地中分給他們以加添的土地，牧場，以及可能範圍內的供給家用的森林；八、實行國家組織義務法家庭的民主化；九、增加國家對於文化需要的津貼費，改組學校教育事業，保證工人及其他貧苦人民的子弟有可能入學，并且多方促進民衆教育、科學、文學、藝術，在進步精神之下的發展。」（見人民政府宣言）這不僅是實踐，而且相當具體化。不過它們都暫時遭受失敗了。只有經過這次全世界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戰爭的砲火，亦即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砲火，才把這個「人民的政權」熔鑄成器，而且一個個的壯大，結實，更具體化起來。試看它一往無前波瀾壯闊的精神，表現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蘇聯本國條約裏面，表現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二十六國共同宣言裏面，更表現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莫斯科會議公報及附屬宣言裏面，以及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德黑蘭會議公報及其宣言裏面；你看它壯大，結實，具體化地

人與的集

國聯盟，即經德法法羅西、意大利、希臘、比利時、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

一、法蘭西——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盟軍開闢了西歐第二戰場。在第二戰場開闢前夜，即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五日，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根據國內抗戰運動的要求和臨時諮詢會的決議，正式改稱法國臨時政府。...

二、意大利——意大利自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向盟軍投降，一九四四年六月四日盟軍攻入羅馬，意王遜位，太子安托伯為王儲，內閣改組，由巴多...

三、希臘——希臘於一九四四年三月，原已宣佈成立希臘解放臨時政府，當時政府的主席兼外交委員為巴吉爾吉斯。...

四、比利時——比利時聯合政府成立於一九四四年九月底，比埃洛任總理，部長十九人，天主教黨佔七人，社會黨五人，自由黨三人，共產黨二...

人，無黨派二人。五、南斯拉夫——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路透社：南斯拉夫聯合廣播，...

六、羅馬尼亞——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塔斯社電：羅馬尼亞各黨派成立民主陣線，商討組織聯合政府。...

七、保加利亞——保加利亞各黨派，也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組織組織聯合新政府。...

八、波蘭——波蘭臨時政府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改組成立。...

九、匈牙利——匈牙利臨時政府成立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這是一篇流水賬，如果把它總結一下，我們就可以總結出：自去年（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五日法國臨時政府正式成立起至本年（一九四五年）一月二日希臘新政府正式成立（雖然這還不能作為希臘人民之獲獲的政府）止，不到八個月的時間，而在炮火中湧現出的新政權，就有了八九個之多。這還只是概數，此外如芬蘭，捷克，實亦應算進去。這決不是偶然的。

再則我們從這歷史是過於簡單的疏淺瞭解，還可證明在各國獨立的新政權，有如下幾個共同點：一、這種新政權的產生及其成立的過程，都是從各該國人民反抗希特勒強盜，及抗國內國外的法西斯匪幫一切親法西斯子，半法西斯份子，血與火的鬥爭中產生出來，以至具體形成起來的。例如波蘭，早在一九四二年，國內人民就開始起義並發展成抗戰的游擊隊；到一九四三年，便在盧布林和拉多姆之間，建立了游擊根據地；一九四三年底，波蘭各民主政黨，在極端秘密中，開會決定波蘭國民會政的組織法，成立國民會議，通過其綱領；一九四四年七月，由國民會議決議成立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又於一九四四年大除夕（十二月三十一日）波蘭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成立波蘭臨時政府。波蘭的例子，也是各國的例。二、這種新政府一成立，立即發表成立宣言，在宣言中公佈其政綱的民主綱領。例如波蘭臨時政府在成立宣言中，宣佈立即奉行其一九二一年的民主憲法，恢復波蘭人民各種民主權利。匈牙利臨時政府亦於宣言中發表其政綱如下：

(一) 動員匈牙利全部人力物力以反抗德國；(二) 廢除全部反民族平等法律，如反猶太人的法律是；(三) 保障民主權利與自由；(四) 解散「十字軍」組織及其他類似組織；(五) 廢除舊法，並重新施行戰時政綱所保護的工法律。波蘭、匈牙利的例子，也是各國的例。三、這種新政權所包括的組織成分，都是各階級，各黨派的民主大聯合。這在上邊各種新政權中，都有說明，不多贅。

這種新政權，亦即人民的政權，是否僅限於上述歐洲新產生的這幾個國家呢？不，決不僅限於這幾個國家，將來凡屬從法西斯極權下解放出來的國家，或在法西斯政權被消滅以後的德國，日本，乃至法西兩國的民主大國如英、美、如中國，都將是這種新政權。其最本質的經由或其根據，就是戰後的世界，必然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世界，戰後各國的新政權，必然在各黨派各階級聯合的民主政權。

這種我們似乎要把這新民主主義政權所以「新」的究竟，交代一下，它「新」到什麼程度，它「新」到何等怎樣。總括的說，就是新民主主義與舊新政權，它一面不是蘇聯型的社會主義民主及其政權（這是最新型的民主與政權）；它另一面也不是歐美型的資本主義民主及其政權（這是舊型的民主與政權）。這種聯合政府與聯合政權，並不是一般民主的轉變，因為蘇聯與歐美一階級與其共產黨一黨派新政的政權，仍是民主地政府與政權，且是

最高級民主政權。這種過去資產階級一階級與其政黨一黨派（在英國或美國守舊，或是自由黨，在蘇聯則是其共產黨是民主黨）執掌的政權，也是民主的政府與政權，不過是較形勢的轉變的舊有與政權。這種聯合政府與聯合政權，它是在於說「新」民主，「新」政權的轉變。因為新民主與新政權的資本內容，正在於說「新」民主說，它不再僅僅是政治民主，同時是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再不僅僅是國內民主，同時是國際民主，世界民主。民主是擴大了的，是「新」的。正在於說「新」政權說，它不再是一階級一黨派來執行統治權力，政治領導，而是由各階級，各黨派來聯合執行統治權力，政治領導。政權是擴大的了，是「新」的。任何東西都不是「舊」政權的奇跡，這還是說都有它的歷史背景，而前已說過，新型的民主政權，也是它的歷史背景，舊型的民主與政權，新型的民主與政權，都是「新」民主的產物，亦即「新」民主階段的產物。是歷史的，這就是說它未曾發生於那一歷史階段以前，亦將不能立足於那一歷史階段以後，是歷史的，這就是說它並非一成不變，永遠如此。轉動新型的民主與政權，它是否定中世紀封建制而興起的資本主義時代的產物；新型的民主與政權，它是否定沒落的資本制而興起的帝國主義階段的產物，亦即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產物，它完成了它一定的歷史階段所付與它的使命以後，還仍不免為另一更高級階級所揚棄，即為最新型的民主與政權所揚棄。這道理不難此理，便派定別人把聯合政府當做「新」民主的特徵之非是，因此要為新民主，這件事聯合政府是早有的，聯合政府，不是民主的特徵，一黨的政治，也是民主（見去年十二月三日蘇青「歐洲低聯合政府」一文），很難為他犯蘇聯的一黨政權，也認為民主政權，實際上只在辯護法西斯一黨政權，也是民主政權。殊不知這是絕對不容混淆的，社會主義的一黨政權是民主政權，法西斯的一黨政權，決不是民主政權。這種蘇青說「一定不假，說：同為一黨政權，為什麼「為民主」，「非民主」呢？這沒有什麼奧妙，這就是孟子夫子說的，「有伊尹之志而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的淺近道理，今之伊尹，就是人民大眾，蘇青主義的一黨政權，是掌握在無產階級，亦即大多數人手中，所以是民主。法西斯，半法西斯的一黨政權，是掌握在少數金銀寡頭，政治寡頭的手中，所以不是民主。因住人民是標準的衡尺，不是掌握在大多數人手中的一黨政權，「一黨政權」，固然是民主，即各黨聯合政權，也不盡民主。單是在大多數人手中的政權，各黨聯合政權固然是民主，一黨政權，也

是最高級民主政權。這種過去資產階級一階級與其政黨一黨派（在英國或美國守舊，或是自由黨，在蘇聯則是其共產黨是民主黨）執掌的政權，也是民主的政府與政權，不過是較形勢的轉變的舊有與政權。這種聯合政府與聯合政權，它是在於說「新」民主，「新」政權的轉變。因為新民主與新政權的資本內容，正在於說「新」民主說，它不再僅僅是政治民主，同時是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再不僅僅是國內民主，同時是國際民主，世界民主。民主是擴大了的，是「新」的。正在於說「新」政權說，它不再是一階級一黨派來執行統治權力，政治領導，而是由各階級，各黨派來聯合執行統治權力，政治領導。政權是擴大的了，是「新」的。任何東西都不是「舊」政權的奇跡，這還是說都有它的歷史背景，而前已說過，新型的民主政權，也是它的歷史背景，舊型的民主與政權，新型的民主與政權，都是「新」民主的產物，亦即「新」民主階段的產物。是歷史的，這就是說它未曾發生於那一歷史階段以前，亦將不能立足於那一歷史階段以後，是歷史的，這就是說它並非一成不變，永遠如此。轉動新型的民主與政權，它是否定中世紀封建制而興起的資本主義時代的產物；新型的民主與政權，它是否定沒落的資本制而興起的帝國主義階段的產物，亦即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產物，它完成了它一定的歷史階段所付與它的使命以後，還仍不免為另一更高級階級所揚棄，即為最新型的民主與政權所揚棄。這道理不難此理，便派定別人把聯合政府當做「新」民主的特徵之非是，因此要為新民主，這件事聯合政府是早有的，聯合政府，不是民主的特徵，一黨的政治，也是民主（見去年十二月三日蘇青「歐洲低聯合政府」一文），很難為他犯蘇聯的一黨政權，也認為民主政權，實際上只在辯護法西斯一黨政權，也是民主政權。殊不知這是絕對不容混淆的，社會主義的一黨政權是民主政權，法西斯的一黨政權，決不是民主政權。這種蘇青說「一定不假，說：同為一黨政權，為什麼「為民主」，「非民主」呢？這沒有什麼奧妙，這就是孟子夫子說的，「有伊尹之志而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的淺近道理，今之伊尹，就是人民大眾，蘇青主義的一黨政權，是掌握在無產階級，亦即大多數人手中，所以是民主。法西斯，半法西斯的一黨政權，是掌握在少數金銀寡頭，政治寡頭的手中，所以不是民主。因住人民是標準的衡尺，不是掌握在大多數人手中的一黨政權，「一黨政權」，固然是民主，即各黨聯合政權，也不盡民主。單是在大多數人手中的政權，各黨聯合政權固然是民主，一黨政權，也

是民主。因此，這裡所謂「新」民主與「新」政權，是以各階級各黨派聯合為其特徵的，即以聯合政府或聯合政權為其特徵的。因為它還不是已經達到最新型的社會主義的民主及其政權，如果是，它將是無產階級一黨政權；它也不是已過去了的舊型的資本主義的民主及其政權，如果是，它將是資產階級一黨政權，兩者都不是，所以各階級各黨派的聯合政府或聯合政權，便成爲其「新」民主與「新」政權的惟一特徵了。不過其統治權力，政治領導，儘管是聯合的，但其聯合的結實紐帶，則是人民自己、人民大眾才是聯合政權的真正重心，人民大眾才是支持聯合政權的堅強柱石。任何黨派、任何階級、聯合執行政權時，都要服從於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任何黨派、任何階級、聯合執行政權時，都要使政權成爲表達和執行大多數人民意志的有力量。這就是說要使廣大人民，不僅享有政治民主（政治的平等），而且享有經濟民主（經濟的平等）。政治民主的實現，要以經濟民主作條件，因爲「貧窮的人決不是自由的」（見維斯福爾會者文），反之，經濟民主的實現，也要以政治民主作條件，因爲「經濟民主之能否實現，是要決定於革命民衆的力量」（見沈志遠著「戰後世界新民主體制之而面觀」）。這就是說要使廣大人民，不僅享有國內民主，而且享有國際民主（民族的平等），國際民主的實現，要以國內民主作條件，因爲「對外要求民族平等獨立的國家，對內決不容許實行獨裁或專政的。假如要實行，其必歸失敗無疑」（同上引）；反之，國內民主的實現，也要以國際民主作條件，因爲「對內實行民主政治，對外決不能實行侵略併吞或法西斯式的民族奴役。假如真是這樣實行了，那就證明這種民主是少數人的民主，是大資產者形式的民主，它非被送進歷史博物館去不可」（亦同上引）。從這些地方我們都可以完全看出這種新民主與新政權，是人民的政權，是由人民自己創造出來的政權，是掌握在人民自己手裡的政權，且是由人民自己的力量來保證其實現、生長、鞏固、發展、爲人民自己的共同利益，幸福、忠誠服務的政權，它是大大不同於舊型民主及其政權的，一言以蔽之，它是新民主與新政權，舊型民主政權沒落的終點，正是新民主政權興起的起點，這次全世界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戰爭的炮火，就做了它臨盆出生的助產婆。

因此，這種「人民的政權」，就成爲「人民的世紀」這一歷史階段的重要標記，也就成爲這次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戰爭的重大目標，這次戰爭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爲的要建立各階級各黨派聯合的新民主政權。所以在這次

戰爭以後必然要使人人有豐衣足食的生活，人人有安居樂業的保障，人人有參與國家事業和社會事業的全部權利，也就是說要便過去一切人對人的壓迫與榨取的罪惡，不再存在於世界；而且最後還要在世界各國各民族的人中間，建立起互聯合作的友愛關係，而永遠不再有法西斯的殘酷與奴役行爲。

以上是「人民的政權」一般發展的規律，也可以說是它的共型，是它的主流。但它發展的具體過程，就決不如此簡單，我們如果就其各自不同的特點，亦即其發展的不同性，兼加以各別考察，必然還可以從其共型中找出其特殊的類型來，如新民主政權（亦即人民的政權）之法國型，新民主政權之南斯拉夫型，新民主政權之中國型等等，這我們不難在這種詳加分析，只好另立專章來論述。此外，我們必然還可以從其主流中發見其許多迂迴曲折的支流，例如：其具體發展過程，在上述各國新政權中，我們就可以一下指出以下一些不同的點，試看有些國家的「新」政權，是在各該國被納粹匪幫佔領後，各該國政府隨即倉卒逃離，流亡海外，再由各該國真正熱愛祖國的人民團結起來打游擊，從血泊中樹立起來的，如南斯拉夫、希臘、波蘭等國家；有些國家的新政權，則是在各該國政府甘心附逆，與納粹匪幫結成一夥，各該國人民受雙重壓迫，採取地下行動，一直對盟軍勝利，壓迫各該國政府投降後，才由人民出而樹立起來的，如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等國家，這些新政權所由樹立的國家背景之不同，即或爲納粹的佔領區，或爲其附屬國，波蘭西與意大利是例外，法國開始收退巴黎，它的大批國土，是被佔領了，是佔領國，但貝當甘心出賣民族利益，投降納粹，又可以說是納粹的附屬國，而它的新政權，則是由海外戴高樂所領導的自由法國，戰鬥法國，及其後團結國內外的抗戰黨派，抗戰人民共同樹立起來的。意大利則是在墨索里尼倒台後，軸心自行瓦解，來了一次內部改變，才由抗戰各黨派樹立起來的新政權。從這一發展具體過程的不同點，就發生以下不同結果。大概凡是從被佔領國中樹立起來的新政權，不管被佔也好，希臘也好，都不免多多少少要鬧一些流亡政府的糾紛，人民流了汗，他們仍有法統，而且在法統問題上，雖賢達亦不能免俗，而從附屬國中樹立起來的新政權，反而沒有這些麻煩。

再則有些國家的新政權，是樹立在盟軍蘇聯軍事解放區域中的，例如波蘭、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等國家。有些國家的新政權，則樹立在盟軍英美軍事解放區域中的，例如比利時、意大利、希臘等國家（

但希臘則完全在英國軍事解放區域中。這是新秩序所關切之希臘解放區域之不同。根據這一發展其過程的不同點，也發生如下不同結果。這就是，不獨被佔領國與附屬國，因為所屬軍事解放區域之不同，有的則比較安定，鞏固，有的則比較動盪，不穩，甚至發生不幸的內戰。這法國也是例外，只有它能超然，主動，不受所屬區域的任何影響。

此外則在各國聯合政府或聯合政權的形式與實質上，還可看出有領導的階級和領導的黨派之不同，有絕大多數資產階級及其政黨所領導（實質上這一階級及其政黨的單獨領導是不可能的），有的為大多數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所領導；有的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所共同領導，但在新民主政權的實質上，却只有這種可能，不是兩個階級共同領導，這是一個代表大多數人民的階級與政黨單獨領導。否則不是新民主政權。這是單獨領導與共同領導之不同。根據這一不同點，也可以發生以下不同的結果，即領導的階級與黨派，若能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其政權就有基礎，愈鞏固，否則將不免發生波折，將不為人民所擁護，而遭受失敗。

由於以上各新民主政權國家發展的具體過程之不同，有的剛流亡政府糾紛，有的有糾紛，有的安定，鞏固，有的動盪，不穩；有的得到人民擁護，日益擴大，鞏固其政權基礎，有的則否，因而趨結為有的新民主國家則沿著新民主與新政權的大道，較為順利的放開人民沉重而快捷的腳步，一直往前邁進了，如法蘭西、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國家，尤其是波蘭西，在其內政外交的成就上，於短時間內就恢復了它已往革命的光榮傳統，建立了新民主政權的第四共和國。有的則遲遲種種坎坷，一折三折，如比利時，意大利，希臘等國家，尤其是希臘，因為親法西斯分子巴本德與歐，回國不久，隨即乎聯手為祖國的解放付了血的代價的人民及其解放軍為敵，不借援引外力，屠殺自己的同胞，以致爆發了相當長時期的內戰，而真正人民的政權的建立，直到現在還無把握。這就使我們明白看到不惟於新政權的共型中，還有其特殊類型，而且明白看到於新政權的主流中還不免隱伏一般逆流。這股逆流，一則是由於墮落的無恥的流亡政府，其繼續統治的數年，企圖重建威權，前親法西斯的軍事獨裁，拒絕與人民合作，甚至仇視人民，畏懼人民（單純仇視、畏懼、較之對於希特勒匪幫的仇視、畏懼，是只有過之無不及的），一朝權在手，就使解除那恢復國土有功，把他們請回來的人民軍的武裝，這

在比利時的比埃洛是如此，希臘的巴本德與歐也是如此。再則由於民主大國的某些綏靖分子，迷戀舊歐洲秩序的傳統，希圖在便於私圖的打算上，把某些小國變成自己的衛星，因而造成自己的勢力範圍，不能衷心的「尊重各民族有權自由決定其所願以生存之政府形式」的大西洋憲章，而且希圖為混亂的舊秩序留一個最後的避難所。在這種自然就不能不發生舊秩序與新秩序之爭，因而就不能不發生主流與逆流之爭。本來是隱伏的逆流，在這種情況之下，也就公然表面化了。

這不是別的，這正是由於一切法西斯流派，對於人民的政權的恐懼，對於人民的仇視。他們——一切綏靖主義者，孤立主義者，親法西斯分子，半法西斯分子，黨棍惡徒、政治流氓，封建餘孽，流亡領士，一言以蔽之，一切法西斯流派，確有恐懼，仇視人民和人民政權的充分理由，因為人民和人民政權，代表戰後世界建國的將來，不代表戰前世界建國的過去，堅決要把自己創造出來的政權——自己打出來天下，掌握在自己手裡，來為自己服務，這樣就斬除了一切民賊獨夫，竊取政權的機會。民賊獨夫也就不能不出各種卑劣手段，下流辦法來作最後掙扎，把昨天的朋友——人民大眾，當做敵人，把昨天的敵人，甚至於今天還是敵人，還是強大的敵人——法西斯匪徒，當做朋友。企圖來阻撓歷史的發展，堵塞人民政權的主流。殊不知歷史的意志，人民的力量，是誰也阻撓不住的。人民的政權，必然要突破千難萬阻，達到最後的成功與走向最後的勝利。因為當前歷史村與它的負擔是太重了。首先它擔負著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重任，法西斯的殘酷統治和野蠻侵略，沒有各該國內人民的政權，決不能把各該國從法西斯的統治與侵略下解放出來。因而也不能把各該國從法西斯的統治與侵略下解放出來。其次，它擔負著全世界戰後復興的重担，法西斯野獸的毒爪，磨滅了被佔領國及其附屬國，對付財，墟城市，熱滅了幾平關於政治經濟建設的全部文化，沒有各該國內人民的政權，則對於恢復或重建各該國內的法西斯分子或賣國奸賊，及從事於政治經濟之改造與建設，皆不可能，因而其復興計劃不能實現，甚至於影響全世界的事業。復次，它擔負著全世界戰後持久和平的重担。戰後的持久和平，不論是在國際國內，都要建築在新民主主義與新民主政權的堅實基礎上，都要建築在經濟平等，政治平等，民族平等的根本原則上，沒有各該國內的人民的政權，則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國內民主與國際民主，都不可能實現，因而戰後的世界持久和平亦不可能實現。最後，它

據實說，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精神團結，友好合作的重担，東西法西斯聯盟，都寄托在他們的希望，或屢屢以我們的陰謀毒計，寄託在被侵略的各國內或各聯盟國間的內部關係，內部不團結上，因為恰恰是只有被侵略的各國內或聯盟國間的內部的精神團結，友好合作才是反侵略反法西斯戰爭最後勝利之保障。沒有各該國內人民的政權，亦即沒有各該國內廣泛的民主生活與廣泛的聯合陣線，反法西斯聯盟的國內團結與國際團結，都將是不可能的。

因此，人民為勝任歷史所付與的重担，必然要突破千難萬難，走向最後勝利與成功，而人民政權的主流，也必然要淹沒任何反動的逆流。全世界的人民，尤其是在多年戰爭的苦難中，用血和淚洗滌了他們靈魂的人民，正在努力要換新的，更廣大的，更健全的原則，把法西斯侵略使他們喪失掉的國家地位，經濟地位，民族地位，恢復起來，把形式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統制分子，孤立分子，政治流氓，一齊永遠連根剷除，而且要使他們的新政權，在全世界到處勝利。

這就是說，人民自己的力量，就足以阻遏住種種反動的逆流，不肯它是潛伏的，或者是已經表面化了。也就是說人民自己的力量，總是阻遏或淹沒種種反動的逆流的。前文已經指出，人民大眾是聯合政權（亦即人民的政權）的真正重心，人民大眾才是聯合政權的基礎。凡屬統治階級與資產階級之爭，總要與逆流的爭，人民才是最後的決定者。服從人民利益，依人民力量辦事，否則，慘哉！

除了人民自己的力量，是消滅種種反動逆流的保障以外，另一個可靠的保障，就是蘇美英法世界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戰爭中，蘇聯這一社會主義國家之有固強爭勝，戰後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世界之左右全局的決定作用，前文已經指出：不論納粹統治的波蘭與附屬國，舉凡相立新政權的國家之在蘇聯軍事解放區域者，則較安全、鞏固；否則動盪、不穩、甚至發生不幸的內戰，就充分足以證明蘇聯已成為阻遏種種逆流的有力因素，今後蘇聯是一定要領導全世界一切被解放的人民為建立人民的政權而奮鬥到底。最近報載蘇聯贈送的紅軍於解放南京布達佩斯，波京華沙而後，已數路直趨柏林，納粹匪幫的最後殘餘了，人民的勝利，人民政權的建立，已獲得更多把握的保障。

此外，蘇美英三民主義國之始終一貫的合作，也是阻遏種種逆流之可靠的保障。前文雖然已經指出逆流的來源之一，就是由於某些民主風國的緩

慢分子，還不肯放棄英法歐洲已經破產的制度，還迷戀着舊統治秩序的傳統，但這是不能阻遏三民主義國之共同需要的，尤其不能阻遏在三國中起決定作用的蘇聯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而且客觀的情勢，使他們在戰後新民主主義的建設中，非密切合作不可，美國是特別懂得這一點的，其餘一切壞蛋雖然裝作不懂，但於希特勒問題已經碰過釘子，其他問題的釘子，將來必定碰得更大，現實的教訓是容不得那一個不接受的。蘇聯的捷報頻傳，美國太平洋的政勢，也一日千里的進展得特別快，你說其餘一國能跟不上來嗎？史羅姆三亞頭會議的日期已見告了，任何不愉快的心情及任何潛伏的逆流，都將要在這一次會議中，得到澈底的清除與最後的阻遏。

逆流的只是逆流，「人民的政權」，必然要在「人民的世紀」中最後勝利，澈底勝利，永久勝利！

一九四五、一、廿一、於陪都

（上接一〇七頁）

希特勒軍政人員在對運動戰與陣地戰，「閃擊戰」與持久戰所作的種種演說，是有趣的。希特勒之徒在指望着運動戰的勝利時，卻又低價了軍事的抵抗力，尤其是於戰爭的最初幾個月斯大林鎮壓的防禦戰，最高限度的消耗了敵人和消滅了他的有生人力及技術而他們實現了勝利之際。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冬天，希特勒份子在前線戰場上遭受了幾次重大的失敗之後，他們才初次想起這句話，戰爭可採取長期鬥爭的形式，他們自覺地為了戰略的轉變而縮短陣線（！），他們是用陣地戰來控制（！）蘇軍，好像在這個階段對希特勒繼續地有益處的。這些武斷之辭多麼虛偽，可由希特勒與戈林自己於一九四二年四月——五月之中所承認的德軍於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冬季幾次戰線來看。據外報所傳，德軍的某些名將如勃魯齊爾、波克以及其他人，早在莫斯科外國大勝以前，就主張停止進攻而轉為防禦。

但德軍也沒有建立不可撼動的防線的能力。法西斯罪首建立這種防線不能成功，正如「閃擊」戰不能成功是一樣的。盟軍在具備了堅定不動的勝利信心與藝術的領導之際，必克服敵人的任何一種防線的抵抗。這個包圍紅軍無數次突破德軍防線的事實以及他在蘇德戰場上許多陣地的強有力的攻勢而證明。

意大利的民主運動和聯合政權

舒翰

意大利北部是意國抗戰民主運動的重要支柱，意北米蘭、都靈、熱那亞等大工業城市，廣大的工人羣衆有着堅強的地下工會組織，他們經常以罷工和破壞運動，向法西斯政權作鬥爭。一九四三年三月以來，米蘭、都靈以及其他城市繼續不斷的大罷工，加速了法西斯的崩潰，促使巴多格利奧停戰。墨索里尼垮台之後，意北的鬥爭發展成爲同德寇的武裝衝突，開始了游擊戰爭，成千成萬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湧進游擊隊；同時，大批意軍拒絕德寇解除武裝，也紛紛參加進去，這支人民的武裝，變日趨浩大，在山谷中建立根據地，設置最高領導組織，統一指揮。現在已經發展到四十萬人。他們控制着德國對意大利的唯一交通線——布倫納山隘，破壞鐵道，襲擊敵人，他們率領德軍十個師團的兵力。他們在都市中，則普遍組織武裝破壞小組，炸毀敵人的物資。德寇的軍火生產，在罷工和破壞運動之下，幾乎全部陷於停頓。意北人民在敵後戰場的這種戰鬥，並不比正面戰場不重要，而對敵人的威脅却更大些。各民主政黨所形成的民族陣線，也首先在米蘭出現。所以說，意北是意大利抗戰民主運動的重要支柱，而這個支柱的基礎，就是廣大的工人階級。

工人階級之所以在民主運動中起着主導的作用，首先是共產黨的領導；其次，意大利和法國、波蘭、捷克等國家一樣，是共產黨和社會黨的團結。同時，兩黨的團結，在這些國家中又成爲民族民主陣線的重要因素，在意大利則更成爲團結奠定了民族陣線的基礎。

自一九三二年法西斯統治意國後，民主勢力遭受極度的摧殘，過去的一些精神，有的背叛了，有的流亡國外，或者隱匿起來默然無聞，獨有年青的階級仍依然挺立在人民中間，一直保持游擊戰鬥的組織，領導地下運動，發行

秘密報紙，號召進行反對獨裁的鬥爭。當法西斯最初奪取政權時，在人民中相當地起了一些欺騙作用，所以鬥爭也就萬分艱苦困難，但人民決不會永久被騙的，法西斯的面貌逐漸暴露出來了，危害人民的罪惡一天深似一天，到了三五年，意大利人民的鬥爭就比較廣泛地展開。那年十月，共產黨和社會黨團結起來，簽訂一個協定，爲了意大利人民爭取自由和民主，採取共同的反法西斯行動，他們決議共同到法西斯職工組合裡去活動，以建立人民的力量。由於揭發法西斯剝奪人民的權利，工人沒有組織工會的自由，沒有選舉權，法西斯黨派來的職工組合的負責人，貪污腐化，無惡不作等等，工人們鬥爭的情緒被提高了，參加的人越來越多，由日常的經濟鬥爭，而走上政治鬥爭的道路。

納粹侵略戰爭的爆發，歐洲被佔領國的自由解放鬥爭，進入了新的階段，意大利也一樣，十月中，共產黨和社會黨的代表，組織了行動委員會，來領導民主運動，這個行動委員會，打下了不久以後各民主政黨團結合作的民族陣線的基礎。

早在墨索里尼垮台之前，意大利地下的民主政黨，已在人民中生了根。斯大林格勒一役，扭轉了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局面，確定希特勒必敗的命運，至此，歐洲人民的團結，又進了一步，各國人民先後結成民族的民主陣線，各黨派放棄歷來的政治成見，在一個共同的綱領之下，統一領導對德寇的英勇鬥爭。意大利由於共產黨和社會黨的發起，團結了自由黨，基督民主黨，行動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這五個民主政黨在米蘭舉行第一次黨派會議，組成了民族解放委員會——意大利首先出現的民族陣線機構，後來這個委員會又擴大爲意大利北部的最高領導機關。但是全國性的民族陣線中央，到一九四四年一月才形成的。這之前，各民主政黨雖然已活動起來，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但彼此的聯繫很貧弱，活動也只以個別城市和省區爲限，有些團結起來的地區，都成立了民族解放委員會，作爲地方性的統一組

一九四三年七月下旬，意北各大城市紛紛舉行遊行示威，要求意大利退出戰爭，立即和盟國談判和平，都山當地的各黨派或民族委員會領導的。七月二十八日，五政黨代表又在都靈舉行會議，聯名向巴多格利奧提出要求，恢復正常的民主政治活動。在南部，各地民主政黨也活躍起來，以波諾索為首的羅馬民族解放委員會，也在地下組織了。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八日起，在解放區巴利城舉行各省區民族解放委員會代表大會，全意大利都有代表出席，代表中除上述五政黨以外，又新添了勞工民主黨，大會決議要求國王退位，成立臨時政府，支持對德戰爭，並籌備戰後憲法大會。同時選出一個常務委員會，作為全國民族解放委員會的中央執行機關，其中包括六個民主政黨的領袖，後來的聯合政權就由這機構產生的。

二

意大利六個民主政黨，代表着各階層的人民，他們雖然有着不同的政見，但是更有着共同的目的——反對法西斯，要求民主自由。他們為了民族國家，捐棄成見，團結抗德，並且還要團結建國，因此，他們能够在一個共同綱領之下，結成以民主為基礎的民族陣線。他們曾經宣佈：「意大利政治團結的保持，有賴於各黨對各項社會和政治問題爭論的解決，維持不輟，直到意大利全部獲得解放。」各黨同意嚴防反動力量的再生，並保護國內一切人民的自由。大家也同意配合行動，達成這種目的。各黨的共同目的，就是謀意大利的解放和建立一個民主國家。陶格利亞特（即愛爾柯里，係意共創始人之一）在返國途中對記者的談話，說明意大利共產黨的政策，是「國家自由與再建的戰鬥中民族團結的政策」，他指出：意國人民當前的基本任務，是儘可能迅速地把意大利從德國侵略者及其走狗墨索里尼手中，完全解放出來。「意大利是能够把在戰鬥中團結起來的全民族的力量，驅逐德寇，摧毀法西斯主義的殘餘，並恢復國家的統一和自由的。共產黨人願意竭盡力量來團結意大利全國」，國外自由意大利運動領袖佛卓回國後，就在巴利向全國廣播說：「我早已準備，從反專制的自由主義者起一直到共產黨，都要向他們團結起來，共同對德作戰」。他特別排擊那些以反共來分裂各黨

派團結的陰謀，他說那是法西斯份子的老手法。意國民主政黨和各階層人民，就在這種抗戰與民主的共同目標下，團結起來。

各黨派在民主的基礎上合作，大家都有着自己的光明前途，而彼此之間的團結，也加強起來。首先共產黨和社會黨進一步結為同盟，訂立最低限度的共同政綱，成立同盟委員會，並且發表聲明：「深信由制憲大會形成民主共和國，是意大利人民的真正願望」。國黨也希望和基督教民主黨進一步合作。在工人中，這種團結早已形成，羅馬解放以後，天主教徒（基督教民主黨）和非教徒工會（社會黨和共產黨領導的），破天荒地團結在統一的工會中，總工會的三個秘書，就是三個政黨的代表。去年五月底，基督教民主黨在那不勒斯召開大會，特別邀請意共總書記陶格利亞特參加，這是兩黨第一次的親善。陶格利亞特在大會演說中，指出兩黨的團結，不只是因為有着一致的目的，而且因為有着羣眾的擁護，所以希望保持彼此的協議，「誠懇地在一起前進，以建設民主和進步的意大利」。

這三個政黨，是意大利的大政黨，法西斯統治以後，都成為地下黨。社會黨在失敗中糾正了過去右傾的錯誤政策，領袖曼西尼和納尼等，都經過了很長時期在羣眾中的堅苦工作，前者是律師，一九一四年即加入社會黨，是意國南部最有權威的領袖，羣眾中很有信仰，後者是職工運動的領導人。共產黨在解放的區域，目前已有黨員二十萬人，其中羅馬有三萬五千人，意北的人數更多，游擊隊中共產黨所組織的「加里波利」縱隊，已有六十支隊，總數達二十五萬人。陶格利亞特以外的領袖如現任農業部長古羅，是老國會議員；國防次長巴勃摩，是那不勒斯律師，在法西斯統治的年代，經常替許多政治犯辯護，第一次大戰時他曾做過船長，得過勳章，後來是軍人協會的主席；財政部長貝蒂諾是政治經濟學教授，曾經坐過五年牢，是開辦中年紀最輕的（三十四歲）一個；外交次長李萊博士是有名的外科醫生，意共那不勒斯區書記，盟軍解放時才從獄中釋放出來，也過了五年的監禁生活，後來就出任那不勒斯醫院院長，在任外次以前，他是那不勒斯的市長。基督教民主黨是代表天主教社會觀點的政黨，黨員都是教徒，因為教廷所在關係，力量相當大，一般主張則比較保守，領袖為羅弟諾男爵。但一部分青年知識份子，不久以前分化出來，另組左翼基督教黨。其他三黨則是新創立的地下黨，自由黨（又名復興自由黨）黨員多知識份子自由主義者，領袖克羅斯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有幾十年反法西斯鬥爭的經驗。行動黨內也多

知識份子，領袖即海外自由意大利運動領袖史佛卓。勞工民主黨較小，只在南部有組織，是社會黨右翼的改良主義者。

三

民陣陣線所要求的，也就是意大利人民所希望的，是一個民主的聯合政權。代表薩伏亞王室的巴多格利奧政府，決不能把反法西斯的民主份子都圍在自己的周圍的，這不僅因為王室過去二十年來和法西斯全力合作，鎮壓民主運動，最後成爲國際強盜的同謀者，而且巴多格利奧本身便是強迫人民對同盟國作戰的統帥，因此，當時會造成意大利政治上嚴重的僵局，特別表現在王室問題上，各民主政黨堅持王退位，以另一政府來代替巴多格利奧政府。由於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爲重團結各政黨，在加緊對德作戰，以求意國全部解放這大前提下，結束了這僵局，答應王室問題到戰後由人民自己去決定，巴多格利奧則聲明請馬解放後立即辭職，這樣雙方得到了協議。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巴多格利奧政府改組，容納各民主政黨參加，意大利第一個聯合政權便形成了。內閣中除原有閣員八人留任外，其餘都是各政黨代表和無黨派人士，於是政府陣容爲之一新。不管部閣員五人，由共產黨社會黨，基督教民主黨，自由黨，社會黨領袖分任，其餘閣員中還有：

- 共產黨——農長，國防次長，財次
- 社會黨——實長，內次
- 自由黨——司法
- 行動黨——社會
- 基督教民主黨——內長
- 勞工民主黨——交通
- 無黨派——財長

這一改組，因爲民主政黨的參加，改變了巴多格利奧的政策，第一次部長會議上，就作了明確的決議，強調意國和同盟國並肩作戰，直到德寇完全打敗爲止，並且要忠於大西洋憲章的原則，建立一切人民的自由與繁榮的新的國際秩序。「自由意大利外交政策的最高目標，是幫助建立國際秩序與合作，基於民主觀念和原則，去避免新的戰爭的危險」。因此，「新政府必須

採取同法國、希臘、南斯拉夫、蘇聯、阿爾巴尼亞等國的友好合作的政策，……所有法西斯的破壞和暴行，必須懲罰」。

羅馬解放以後，人民的力量更加強大了，政府自應多吸收解放區代表參加，以擴大民主的基礎；同時，巴多格利奧不能堅決執行新的政策，也不得不履行去職的諾言；於是政府又經改組，這一次，更進了一步，完全由六個民主政黨的代代表組成，地下運動領袖之一的羅馬民族解放委員會主席波諾米出任總理，閣員中包括共產黨四人，社會黨三人，行動黨三人，基督教民主黨二人，自由黨二人，勞工民主黨一人，無黨派人士三人，其中不曾有閣員三人是共產黨、行動黨、和自由黨的代表，波諾米本人是無黨派的人。

這之後，在去年十一月下旬，意大利又發生過一次政潮，原因是盟國對意政策的不調和而起的。意大利人民支持下的各民主政黨的聯合政權，能够採取各種進步的措施，使政治走上民主的軌道，而爭取意國的獨立自主的地位，但當時英國的政策，却由於種種原因而轉爲干預的態度，因此，王室方面乘機活動，陰謀破壞民族團結的團結，幸而這個政潮不久就平息，波諾米再度組閣，行動黨和社會黨爲了種種原因，沒有入閣，這固然是件憾事，但六個政黨依舊團結在民族陣線中，共同爲意國的解放和民主建設而努力。意國這次改組，取消不管部閣員，設副總理兩人，由共產黨領袖陶格利亞特和基督教民主黨領袖維諾諾分別担任。共產黨在這新閣中，負了更多的責任，除原有農業部長古羅下國防次長巴勒摩繼任而外，原任財次貝魯迪出任財長，史科錫瑪繼出任海陸軍行政部長，李萊出任外次，凡諾出任某部（電訊電碼不明）次長。

四

民主的聯合政權形成以後，意大利政治在飛躍地前進，這是很明顯的事實。同盟國家在去年十月二十五日，同時承認了意大利政府，正式恢復外交關係，互派使節，意國的國際地位因而提高了。盟國的援助，逐步減少，把政權完全交給意國政府。

內政方面，最急迫的是戰爭的動員，法西斯份子的肅清，以及糧食問題的解決，這些都有了顯著的成績，特別是糧食問題，是意國人民當前的嚴重問題，農業部長古羅制定了麥子和麵包的價格，建立民主的檢查制度，使國

民減少痛苦。對法西斯份子的清除，是一件艱巨的工作，現在解放區有一百六十五個下級清除委員會，在執行職務，到今年年中收集到了一萬六千多人從事法西斯活動的證據。司法部組織了特種委員會，廢止法西斯的法律，研究民主法制的製訂。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承認游擊隊和意北民族解放委員會，因而，意大利的民主力量得到更廣泛的基礎與堅強的團結。民族解放委員會中央在羅馬舉行會議時，就強調「自由意大利的解放軍」在對德作戰中的作用，要求政府承認游擊隊是意軍的組成部分。這種要求，完全爲了加強游擊隊，早日解放意國全部國土而提出的，一切打擊敵人的武裝部隊，應該獲得合法的地位，和同等的待遇。民主的聯合政府能執行此種合理的政策，波諾諾內閣採取了以下兩點措施：第一是承認游擊隊和法西斯作戰的愛國志士的武裝部隊，是國家軍隊的一部分；第二是要求盟方成立協議，承認游擊隊的合法地位，並給以物質和精神的支援。據三月二十日羅馬電訊，意北游擊隊即將編爲正規軍。我們相信，在未來意北的解放戰爭中，意北游擊隊一定像法國內地第一線創造輝煌的戰績。

(上接第一〇〇頁)

親友也喪失了。
警衛軍士兵馬邁，徹爾尼果夫州伊凡哥羅德村的人，在答案中寫道：「希特勒分子用煤油澆在他的村子里的一百二十個老人和女人身上，把他們活活燒死了。」

警衛軍中士科楚維奇寫道：「德寇把我的父親、母親和兩個姊妹都燒死了；我的八歲的兒子瓦羅維奇，以及我的嫂嫂和她的兩個小孩一齊被殺死了。」
讀者可以想像得到這個部隊中的人員覺得德寇怎麼樣。在我們看來，那是很明顯的；蘇維埃人對祖國的愛，和他對敵人的憎恨同樣的強烈，那敵人迫害蘇維埃人民，要廢除蘇維埃國土已這變長久了。對祖國的熱愛以及對敵人的憎恨，便是紅軍人員集體英雄主義的泉源。

人民號召自己的軍隊以完成剛勇的助功；它要求爲了自己所受的一切苦難，實行復仇的報復。成

意北民族解放委員會是抗戰運動的領導機關，波諾諾政府因此也承認了它的合法地位，並且授權該委員會，「在德寇佔領的意北區域，發出一切組織和指揮抗戰的命令，救濟當地居民，照料糧食分配，建立聯系以及在盟軍進展時加強愛國人士行動的力量」。波諾諾更發表文告，要求意大利北部全體人民，和民族解放委員會合作。明確地說，這就是意政府承認意北民族解放委員會，是北部的地方政權機關。意政府爲了更加強與意北的關係，特別設立淪陷區行政部，由共產黨代表史科錫瑪擔任部長。同時，盟國的最高統帥部在去年十一月，和意北抗戰運動領袖文成立協定，由盟國保證意北解放後，民族解放委員會不只是意北人民的代表機關；抗戰運動領袖保證履行義務，就是在解放以前，地下組織承認波諾諾政府的管理權。這種協議，完全是在民主基礎上求統一的正當的解決。

各黨派的聯合組織，是過渡的臨時性質，意國全部解放後的民主政府，還是由人民普遍選舉，意新內閣已決定今年春天在全部解放區內先舉行普選，二十四年來意國人民被剝奪的權利，即將重新還給他們。意大利人民的幸福的日子到了，但這是二十幾年來法西斯殘酷統治下鬥爭的收穫。

千成萬的信從後方寄到前方去，要求軍人做一個對實表明了後方勞苦大眾對前方的英雄們的偉大的愛

人民毫無愧色的英雄。
被德寇釘在十字架上的蘇聯英雄羅里·斯密諾夫的母親，馬里雅·斯密諾娃，老遠地跑到東普魯士境內他的兒子的部隊裡來，祝他的兒子的同志們一路福星，向他們表示母親的愛，要他們完成正義復仇的使命。

蘇聯軍人從自己和人民之間存在的血肉相連的關係中，從蘇維埃人民對祖國保衛者的熱愛中，汲取到精神上的力量。報紙上給我們帶來了關於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連續不斷地貢獻他們的積蓄，以增強紅軍威力的範例。名字叫伊凡·巴爾諾夫的一個農民，請政府用他捐的錢，造一列大砲，贈給前方的他的兒子所屬的一個砲隊去。那蘇聯明星克區約工人們，用自己所捐的錢建造兩架飛機獻給蘇聯英雄庫爾森科夫弟兄去。

這類事實，證明了什麼呢？這類事實表明了人民的偉大願望，急於要從速取得最後勝利，這類事

列寧——蘇維埃國家的奠基人和紅軍的組織者，在一九一九年就說過：「人民之中的大多數，工人和農民，如果知道他們正保衛他們自己的政權，保衛蘇維埃政權，保衛勞動人民的政權，如果知道他們正在保衛着的事業的勝利，就是意味着他們和他們的兒子都能享受一切文化福利以及人類勞動的一切果實的機會，那麼，這一種人民，就決不會被人征服的。而這些名言，在今天，在紅軍士兵們的集體英雄主義中又加以證實了。」

戰爭正在進行着，而且必將繼續進行，直到德國的最後一砲歸於沉寂而後已。這是人民的意志，紅軍必將繼續挺進。蘇聯的集體英雄主義不僅引起了蘇聯人民的，而且更引起了所有進步人類的一致讚美。這便是關於對敵人的取得最後勝利的希望與信心的根源。

論克里米亞會議的歷史意義

喬木

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快要結束的時候，曾經有過一位不知名的詩人戰鬥者寫過如下的詩稿：

……我們死了。幾天以前
我們還活著，每天看西下的夕陽，
愛過人，被人愛過，而現在我們
却埋葬在梵蘭台的原野。

把我們對敵人的鬥爭繼續下去！

我們死了把正義的火把傳給你們！

把這火把高高舉起是你們的責任。

假如你們欺騙了我們，我們雖死了，

我們也不會安眠，儘管要花年復一年的開闢梵蘭台的野原。

這幾句詩的確是說盡了第一次歐戰時一代的憂傷，因為那時人們贏得了

戰爭，但却輸去了和平，不到二十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又爆發了。

這一次世界大戰在性質上是和第一次的基本不同了。時至今日沒有一個
人再懷疑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了，但是我們的勝利不成問題了，我們能
有持久的和平嗎？持久的和平必須奠基於全世界範圍內的民主基礎上，我們
有了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今天，我們能有民主和平的明天嗎？

這是今天緊迫在千百萬人心坎上的大問題。克里米亞會議肯定的回答了
這一問題。從歷史的發展上看，假如德黑蘭會議決定了勝利的今天的話，那
麼，克里米亞會議則是保證了徹底的勝利和奠定了持久的和平——簡單的說
，德黑蘭會議決定了今天的勝利，克里米亞會議決定了明天的民主，今天是
勝利的民主，明天是民主的勝利。

爲着了解這一次克里米亞會議的歷史意義，我們得先回憶一下從德黑蘭
到克里米亞的道路。

德黑蘭會議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底召開的，到目前整整經歷了十四個月
，這十四個月是些勝利的日子，但也是些考驗的日子。只有了解這些考驗的
嚴重性，我們才能了解克里米亞會議的重大性。

在德黑蘭會議到第二戰場的開闢這一段時間，國際間雖然有些不合拍的
調子，但那不過是一種暴風雨前的絮語而已，不能發生任何決定作用的。

去年六月英美盟軍在西歐登陸，接着蘇軍在東線的夏季攻勢展開了，六
月七月的勝利在東線，東歐各國大部解放了，八月九月的勝利在西線，西歐
各國也大部解放了，這是些輝煌勝利的日子，同時也是英美蘇在軍事上合作
最好的日子。

九月十月蘇軍的東線攻勢向兩翼展開，四線盟軍的攻勢在荷比連受了挫
折。於是問題來了，最顯著還不在軍事上，而是在政治上。東歐和西歐的大
部份國家解放了，英美蘇三國不能對於這些被解放國家的內政取得一致的
見解和行動呢？你們說英美蘇三大強國不僅在戰時團結，而且在平時也能團
結，那麼現在這種就是考驗了。不幸的是不僅英美對於東歐的被解放國家不
能和蘇聯取得一致的態度，即在西歐和南歐的被解放國家裡英美的態度也差
別起來了，意大利問題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更壞的是，比利時的內政問題
在十二月應蘇聯提議成內戰，希臘的問題在十二月初真的爆發成內戰。而法
國因爲拒絕參加蘇聯提議的國際聯盟和蘇聯簽訂了尚盧協定，更把戰後歐洲

問題提高到現實的水準。這是些危險的日子，這是些考驗的日子。英美蘇維在和平中團結嗎？

希特勒的西線大反攻是在這樣陰暗的背景之下發動的，他發動這一攻勢的目的，嚴格說不是在美國第一軍和第三軍之間掘進一個楔子，而是掘開英美蘇的國際民主團結，讓每一個解放國家內部的民主團結，這是他在今天唯一可以想像的出路；他不是早在一九四四年就說過：消滅了他就等於引起歐洲歷史空前的社會大混亂，消滅了他就會立即引起英美對蘇聯或是英國對美國的第三次大戰嗎？

希特勒的政治攻勢落了空，倒是他的軍事反攻提醒了同盟國家內部的若干人：希特勒還沒有垮，現在還不是乘機起閘的時候。從事後看，的確去年年底爆發的歐洲危機，有不少一部份的原因是出於有些人把對希特勒的勝利看得太容易了。

今年正月蘇軍在東線發動的冬季大攻勢及其輝煌的大勝利利用鋼鐵的語言證明了：沒有英美蘇的合作固然解決不了被解放國家的問題，更不可能有澈底的勝利。

這就是從德黑蘭到克里米亞的歷史的道路，這是一條充滿了考驗的道路，正因為是受過了考驗，克里米亞的決定才是歷史性的決定。

二

那麼，克里米亞會議決定了些什麼呢？

第一、它決定了使納粹德國「徹底敗北的軍事計劃」，「從東進，西進，北進和南進向德國心臟發動新的更加強有力的打擊的時間、規模和協調都已商得完全同意並已詳細制定計劃」。然而單是在軍事擊收納粹還是不夠的。

第二、它決定了納粹德國必須接受的無條件投降的條款，其中包括了關於德國的佔領，控制和賠償的三大項，其「不屈不撓的宗旨就是要消滅納粹德國的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確保德國決不能再擾亂世界的和平」。戰爭結束了，並不等於和平，和平是需要組織的。

第三、它決定召開聯合國會議，成立一般性的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組織；去年九月間在巴黎舉行的會議中未能解決的關於投票表決的程序問題也解決了，第一次聯合國會議決定四月二十五日在舊金山與中法共同召開。一般性的

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組織的建立是重要的，但未來的世界和平與安全能否維持在基本上決定於英美蘇三大同盟強國能否繼續團結，而這又取決於英美蘇三國能否對於當前具體的現實問題在一體共同的基礎上執行的一致政策，採取共同的行動，這是問題的核心中之核心。

第四、它決定了對於被解放的歐洲的宣言，這是英美蘇在戰後問題上執行一致政策和採取共同行動的政治綱領，這宣言的外長會議是執行這一一致政策的機構，而波蘭和南斯拉夫問題則由英美蘇採取共同行動的實例。原則性的政治綱領，根據這綱領的一致政策，執行這政策的永久地位，有了這三者我們可以說英美蘇在戰後繼續團結的基礎，是奠定了。自然，目前，這綱領，這機構，這政策適用於範圍還限於歐洲被解放國家，但在實質上它是具有世界性的，被解放的歐洲的宣言實際上就是被解放的人類的宣言，從歷史的角度看，我們要是把這比成美國獨立宣言，法國的人權宣言，英國的大憲章是毫不為過的。假如這一宣言是人民的世紀的話，那麼被解放的歐洲的宣言就是這個人民世紀的憲章。

三

克里米亞會議的基本精神是在所有的問題上強調英美蘇三國不僅要為戰爭而團結，而且要為和平而團結正如為戰爭而團結，「唯有我們三國之團結及一切愛好自由的各國之間繼續增進的合作與了解，才能夠實現人類最高尚的志願，——一種安全而且持久的和平，用大西洋憲章的話來說，那就是：「確保在所有一切土地上的所有一切的人，都可以在不受恐懼和不安的自由的自由中生活」，這種精神是德黑蘭會議所已有而未曾強調的，但重要的不是強調一般的原則，而是實現這一原則的具體政策與機構，德黑蘭會議沒有它，克里米亞會議有了它，這就是克里米亞會議比德黑蘭前進了一步的地方。這是它的特質，這時具體的表現在被解放的歐洲的宣言當中。

這宣言的要點：
它「規定使三國強國政策一致，採取共同行動，以便按照民主原則實現被解放的歐洲的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

「當被解放的歐洲暫時不穩定的時期，他們應共同考慮使他們的政策一致，以協助從納粹德國統治下獲得解放的各國人民以及歐洲的軸心國人民，用民主的方式解決他們迫切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歐洲秩序的建立以及國民經濟生活的再建，必須憑藉那足以使被解放各國的人民一方面能夠消滅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最後形跡，而另一方面又能夠建立自由選擇的可能的民主制度來達成。」

「為了達成被解放的各國人民可以使用這些權利的條件，三國政府對於歐洲任何被解放國家的人民或前軸心附庸國人民予以協助，他們認為必要：

- 一、確立內部和平狀態。
- 二、實行緊急措施以賑濟難民。
- 三、成立臨時政府使民衆中一切民主份子的代表廣泛參加，確保從速經由自由選舉以確立對於人民意志負責的政府。
- 四、必要時當加速進行這類選舉的地方，三國政府當與其他聯合國以及歐洲的臨時政府當局或其他政府，在考慮到對他們有直接利益關係的時候，互相洽商。」

「當三國政府認為歐洲任何被解放國或前軸心附庸國中的情況有採取這類行動的必要時，他們當立即共同磋商，履行這個宣言中所舉為共同責任必有的措施。」

總括這些要點就是說，英美蘇三國用他們之間民主團結的力量來保證所有歐洲被解放國家內部的民主團結。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有這樣一個巨大的外方來「干涉」一羣國家的內政，但是這「干涉」不是爲了帝國主義的私利，幫助倒退的反動力量壓迫進步的民主力量，而是爲了世界的持久和平與安全，幫助進步的民主力量，壓迫倒退的反動力量。過去，快過去了的是英美蘇團結起來消滅法西斯，而現在則是英美蘇團結起來建立和保衛民主。這一來，歐洲不可能再有一種國家是親英美的，有一些國家是親蘇的，而是大家都是親英美蘇的，把親英美和親蘇外交對立起來的日子過去了。這一來歐洲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國家內部是法西斯，而對外還同民主國家相交遊，把內政

和外交機械地對立起來的日子過去了。這一來，英美蘇的團結不僅是在軍事的國際問題上有了保證，而且在具體的一國家的內政問題上有了根基。英美蘇國際民主的團結保證了解放各國的國內民主團結，而解放各國的國內民主團結則又穩定英美蘇的國際民主團結。自然這不是說有了克里米亞會議，歐洲解放各國的民主就不需要各國人民來自動爭取了；不，恰好相反，只有解放各國人民自下而上的民主鬥爭的昂揚，配合着英美蘇的自上而下的民主前途的保證，這一個世界才能走上今後幾十年的和平、進步、繁榮的大道。德黑蘭會議決定了今天的勝利，克里米亞會議決定了明天的民主，今天勝利的民主，明天是民主的勝利。

X X X

有人說，這是歐洲的事情，和我們無關。

這不是歐洲一地的事情，這是全世界的事情，今天的歐洲就是將來的歐洲。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條路是法蘭西的道路，立即自動實現國內的民主團結，一條路是南斯拉夫的道路，硬不自動解決問題，而最後不得不爲人所解決。時候近了，轉瞬當是舊金山會議，我們還能遲疑嗎？

(二月二十二日夜)。

啓事

本期「書評及其他」欄中，原有舒危震所寫的「一切的問題在民主」一文（內容是介紹昆明出版的「民主週刊」一至六期）因奉令免登，未能刊出，謹向作者及讀者致歉。

從敵議會看敵情

黎 華

敵第八十六屆議會於一月廿一日復會後，到一月二十二日敵國廣播中傳出：「這屆議會於考慮所審的重要議事後，將於十三日自動休會」。在這種議會中反映了一些什麼？它所反映的是些什麼結果？這些是值得我們重視的。爲了說明這些問題，我們不得不先說明小磯內閣本身及其遭遇的內外情勢。

小磯內閣的出現，正如蘇聯的日本問題專家所指出：「它是於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由於軍事上的失利帶來了尖銳的內部政治危機而組成的。它企圖擴大內閣的基礎，延攔以前議會各政黨領袖入閣。大家相信，這會在新的比較民主的基礎上，加強『團結一致』，以解決國內困難而進行戰爭。可是小磯登台以來，它所獲得的不是戰爭勝利的進行，相反的却遭受了台灣與菲律賓兩上兩次大海空軍的慘敗；在戰略地點上失去了關島、狄寧、帛琉、塞班、甚至菲律賓羣島，也全部陷於絕望，而日本本土也連續不斷地受到敵艦的轟炸，最近美軍在菲律賓的登陸，更是對日本本土的一個大威脅。在這種軍事不斷吃敗仗的情況下，無疑的是會增加小磯內閣的處境困難，而這屆議會又在這種條件下進行，一方面是想利用它來解決戰爭的困難問題，但同時它也將露出敵國戰時的各種弱點。所以倭皇在議會開幕時就這樣喊出：『太平洋戰爭現已進入嚴重階段，國人應加強團結與集中力量，以打擊敵人』；小磯則以「此次議會之運轉，以放寬簡單爲宗旨，以期解決戰爭之高度」；而「東京朝日新聞」就

更加說出這屆議會所遭遇的困難，因此提出：「此次議會真可謂爲戰爭議會，蓋在閉會期間，隨時可達警報。無論如何，休會二十餘日未免過長，議會應以決戰速率進行」。從這三方面的發言，我們可知知道這次議會舉行的用意了。到目前自動休會爲止，小磯雖然渡過了風險，然而在這次議會中實在暴露了不少的破綻：

第一是暴露了統治階級內部的不和，小磯內閣的組成，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它是得到敵國統治階級的各方面支持，但它要能安穩不動搖，那就一定得靠戰爭的勝利。不幸的是小磯閣運不好，組閣以來，一向都是打敗仗。所以在每次重大軍事失利時都會發生內部門爭的暗潮。我們就拿這次議會舉行前一些時間（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小磯內閣的局部改組——軍務大臣藤原銀次郎繼以吉田茂代替，同時又變了實質政治會小林靖造入閣爲國務大臣，這就表示着軍部與財閥因戰爭失利（十二月十五號軍在明多羅登陸）所引起的暗鬥，鬥爭的結果，是代表財閥的藤原失敗下台而告一段落。然而到了議會初次休會期間，美軍在呂宋的登陸，又給與日寇國內以嚴重的波動，這可從下開的事實看出：（一）小磯十一日召集政府領袖討論「各種事宜」。日方領袖極力促國家採取結束戰爭之新方針。其主要報紙尋求國內團結。（二）日政府十三日宣佈採取緊急措施，其中主要爲加強防空，增加軍火生產、徵集食糧、動用全國原料及擴充征兵等五項。（三）日內閣閣員，於十三日午後一時在

小磯官邸舉行會議，就當前諸問題交換意見，並決定每星期從本週（十五日）起，每星期四午前十時，各顧問會議商討，並向首相通告事項，每星期六午後二時至三時各顧問個別或會同與首相會談，議政府施策之運籌問題。（四）小磯定十三日與所有高級軍事人員（包括前作戰者在內）會面。（五）一月九日，小林靖造向小磯進言：「如有必要，雖解散議會，亦所不惜」。同時從新聞報導中也透露出一些消息，如一月十五日美國戰時情報局宣稱：「日本國內正有一種運動，迫使日本政府辭職，並謂日本通訊社說若干新近成立之派系，正與勇敢參與空前未有之政治革新」。同日東京亦有類似的消息：「與敵局之深刻化相呼應，咸望必須急速確立貫徹戰爭之國內態勢。此種希望，已被提出至我國政府問題的最前線」。由於盟軍呂宋登陸的結果，小磯內閣漸呈不穩，當時有人引出過去東條演說下台是起因於盟軍登陸而將小磯垮台可證，並非無故的。小磯內閣雖幸未垮台，但是最後結果，實質政治會於去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會議中決定解散，而組織「新黨」以替代。在人事更動上，是本月十日內閣的局部改組，改任國務大臣兒玉秀雄爲文部大臣，調厚生大臣藤原正忠爲國務大臣，內閣當局官長，而以厚生次官相川勝六升任厚生大臣。到十四日小磯召開閣員會議後，又拉攏前任的運輸總長大臣八田嘉明與藤原銀次郎爲內閣顧問官。就是這些事實也足以說明敵國統治階級內部發生許多不和。這並不是如日寇自己所解釋的，說此次小磯內閣之局部改組，會使內閣更趨加強，相反地，倒是小磯內閣這次因爲得到財閥與軍閥的擁護，才暫時將倒閣危機穩定下來了。

可是軍閥與財閥的矛盾、陸軍與海軍長期積習的不

事，他們是會在新的軍事失利下再次爆發的。

第二，我們可以看到敵國的軍需生產的困難。在這次議會中，日寇雖相與海相的報告，都是滿篇歌功頌德的，他們的結論是歸於軍需生產不足。海相米內認爲「在目前戰爭情形之下，對於飛機之大量需要仍在增加」，而陸相杉山則強調「陸軍航空及海軍航空隊特別攻擊隊之繼續」。簡單的說，日寇是以武士道的冒死攻擊精神，來代替前線軍需最供給不足。其次，就是在這次議會的質問中，也反映出一些事實，像議員船田垣毫不掩飾的說：「現內閣成立，已有六個月，對於軍需增產，並未請求適切之手段，缺乏實行力，觀乎最近之與國，可知國民對於軍需生產之不安，已顯露於外」。而小磯與吉田的答覆不能不承認：「必須設法渡過目前下之時局，現在軍需生產對於必要之生產量，仍有不充分之處，乃屬事實」，與「飛機之生產，該資源關係，實爲困難問題」。還有更值得注意的，是十一月十七日東京廣播：「飛機不足是國民普遍的呼聲。這是誰的責任？飛機工廠的職工說：我們幹死工作，爲何還是不足？國民文說：你們儘管苦作，我們仍然看不見飛機。問飛機生產局長遠藤吧！遠藤說：你們不用管。可是飛機到那兒去了」。美艦一段話里，那就充分表現出日寇飛機缺乏之苦。由於飛機生產不足，不但如米內所宣稱由於制空權委諸敵手，以致致在菲島戰事失利，並且暴露出日本本土空防的脆弱。在今後盟軍海上與空中的打擊下，日寇的軍需生產，必定要受到工廠疏散，資材缺乏，工人勞動情緒低落的影响，這些困難日寇是無法解決的。

第三是糧食供給不足。糧食不足本來是日寇戰時一個嚴重問題，當它打下南洋各地的時候，日寇曾聲言宣傳「南洋是帝國的谷倉」，可是自去年下半年以來，海上戰事連綿失利與空襲頻繁之下，更加使日寇糧食供給的困難，所以在東京廣播中就這樣透露着：「戰局之發展，已不容許對岸之滿洲、糧食全幅依存政策，自不待言。隨盟方空襲之頻繁，已痛感力謀急速確定糧食之國內自給及盡量之地方自給之必要」。同時在議會質問戰中，農商相島田關於糧食的答覆也承認：「糧食問題，余既不樂觀，但亦無不安」。並保證：「關於主要糧食，當堅持相當之基準，絕對不再減低」。繼相石渡一月二十一日在衆議院演說，則指出「下一財政年度之預算，將集中於作戰力量及保證糧食生產之充足」，從此就可以見到日寇糧食問題的嚴重化。在太平洋戰爭開始，日寇節節勝利下，日寇還不能解決糧食問題，至於今後整個戰爭局勢發展，自然會使日寇更感頭痛。

第四是敵國民氣日趨消沉。日本國民，誰也知道他們是深受軍國主義與武士道的訓練，一般上說他們是有強烈的擴張愛國主義思想，可是這些思想在今天已經經不起日寇連綿戰事的失利而受到打擊。在菲島前線上雖然出現所謂「神風攻擊隊」，但也有發現整批的日本士兵的投降，在後方呢，這種對戰爭感到無希望，悲觀消沉的暗潮已是相當普遍。所以後基於議會致詞中，就喊出「集中力量團結一致」，而小磯更露骨的吐出：「關於戰後總務，其進行精神之確據，今日仍不充分，實引爲遺憾」。在議會質問中，石渡也承認敵國人民已有輕視通貨之風。特別在今後盟國空軍大舉空襲與軍事失利及食糧缺乏的條件之下，誠如美國國務院司長指出：「他們對天神和日本種族不可征服的迷信，就造成『道德和感性的混亂』」。

從這次議會所反映出的這些弱點，我們是否就可以像某些人一樣誇大敵人的弱點而認爲敵國要求和平已普遍全國，並且這個和平運動已迫使小磯垮台，以便執行投降政策的人登台呢？或者看到敵國政局稍爲變動，就以爲這是日寇改變國策投降求和的朕兆呢？甚至還有人專想靠盟軍的出力，使日本先於德國屈膝投降的這種沒有出息的想法。但是在這次議會中所得的結果，已證明他們的想法是落空的。爲了回答上次所列表的論點，我們對於這次議會所收到的結果，就應有一個認識，我們認爲有三點：

一、通過空前未有的預算案，我們知道這次預算案，在一般會計歲出入爲二百二十四億餘萬日元，追加預算爲四十一億日元，共計二百六十五億九千二百萬日元；在今年即臨時軍事費八百五十億，二者合計起來，共達一千零三十八億，像這一筆巨大的無比的預算，在選議會中竟寂然無聲地通過了，這不能不是說明日寇政府如何操縱着議會，爲所欲爲的執行自己的意志。同時另一方面又說明了敵國在財政上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仍然通過這倒楣大預算案，正是日寇表示作戰到底的決心。正在準備着上與陸上的決戰來臨。

二、這次議會所收到的第二個結果，是全國支線小磯爲進行決戰所提出的如何增強防禦與戰力，增加軍需的生產及確保糧食的方策。其明顯的，就是上述的總預算的通過，其次在二月七日議員山本英輔等所提十條具體案作爲實行緊急國策。其具體內容與一月十二日敵國閣議所通過的實行決戰措施：一、加強防空措施；二、嚴格施行軍火增產計劃；三、徹底增加糧食生產；嚴行自給自足；四、加強國民勞務；以及全國人力之總動員；五、使一舉

紅軍——新型的軍隊

為慶祝紅軍節第二十七週年而作

瓦西利耶夫上校作

紅軍的冬季攻勢，已使那從喀羅巴汗南麓起至到波羅的海的全線德軍瓦解，這種冬季攻勢已引起舉世讚美。那是很可以了得的，因為戰史上從來沒有看見過在戰鬥行動的規模和深度方面，以及在向敵軍以強固的，準備有素防線為後盾的龐大而頑抗的敵軍，實行進攻的速度方面，和紅軍的這次冬季攻勢可以相提並論的大會戰。如你想一想紅軍的這次冬季攻勢，是在三年半的大戰之後進行的，直與去年夏天，紅軍始終對全世界最強大的軍隊之一——德軍進行那種大戰，如果這還想一德軍，紅軍這次冬季攻勢成就的莊嚴宏大，就更加使人驚愕了。這一戰就足以證明：和希特勒的作戰機構不同，紅軍在戰爭的進程中，並不會消耗了它的實力，反而使它的威力和戰鬥力更著著增進，直到它已變成全世界中最強大的最精銳的軍隊了。

紅軍在進行一種奮力的戰爭時，竟能夠同時增進自己的實力，不僅保持住，甚至更增進了自己的戰鬥力和精神上的強韌性，紅軍是從什麼地方得到這些素質的呢？

要說明這一方面的根源，那就在於紅軍所固有的一些特點，紅軍是一種新型的軍隊，是在本質上與世界所有其他一切軍隊不同的一種軍隊。

紅軍是新型國家——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武裝力量。在這個國家中，所有一切政權都屬於人民，國家的所有一切財富和生產工具都是公共的財產。蘇聯的對內和對外政策，與人民的利益完全和一致。對於外國的霸佔，以及對於別的國家人民的征服，是與蘇維埃國家背道而馳的觀念。因此，這是一種國家的武裝力量所以能維持着，決不是

為了擴張領土的目的，而是為了要保護祖國的安全與獨立。由此可見，紅軍是專為保護人民的利益，而創立，而存在的，如果說紅軍畢竟作戰了，那也只是進行一種正義的進步的戰爭。歷史教導我們說：到底誰是那追求着具有歷史進步性的目的軍隊，即使是對比較強大得多的敵人作戰，也常常是打勝仗的。這一點已一般地由戰爭史，而且特別是由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的國內戰爭史所證實了。

進行一種正義的進步的戰爭的軍隊，對那被征服動機所支配的軍隊，總佔有一種道義上的優勢。紅軍官兵們都知道正為什麼而戰，知道是為他們祖國和人民的利益，因而也是為他們自身而戰。對於他們正為之而戰的正義感和高尚的目的，在他們的中心培養成一種不可征服的精神，作自犧牲的準備，防禦中的剛毅和堅強，及戰中的決心和氣勢。要儘可能迅速把敵人打敗的熱望，創造性、機智，以及關於增進軍事訓練的不斷的要求。在這一方面，紅軍始終勝過它的敵手。

使紅軍和所有別的軍隊有所區別的另一件事，便是：紅軍的官兵們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起積極的作用。紅軍有極其繁茂的政治訓練系統，以增長士兵們的政治智識與一般文化水準，以便他們能更清楚地了解戰爭的目的，和作為一個軍人應盡的天職，並且能更更有才智地行使作為一個公民的權利。這種機關擁有很適當的訓練有素的人員，擁有對官兵們進行政治教育和一般教育以及官兵們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紅軍的政治工作人員，就

是由官兵構成的，他們積極協助指揮官進行軍隊的政治教育，促進紀律，並激勵士兵們運用他們的精力以貫徹他們的軍事任務。他們的智力和軍事品質方面，他們是軍隊中的精華，他們憑藉他們的威風，以身作則，剛毅果敢與英雄主義，把他們所屬的部隊團結起來，在完成軍事使命中起領導作用。

紅軍是一種純正的人民的軍隊，是為保護祖國和人民的利益而建設起來的，紅軍是決不會和人民衝突起來的。紅軍不知道什麼階級的敵對，軍官們都是從那和士兵一樣的社會階級中來的。由於沒有一切社會的限制，這就使每一個士兵都能够在經過一種適當的訓練以後，擢升為一個軍官或一個將官。軍隊中的社會同一性，一方面決定了官兵之間的關係，一方面決定了關於教誨並維持紀律的方法，那大致是基於每一個列的士兵對於履行義務所抱的自覺態度。

種族的和民族的偏見，對於蘇維埃社會是毫不相干的。因此，雖然是在山許多種不同的民族人員組成的軍隊，而在它的隊伍中却不知道什麼叫民族的仇恨與敵對。紅軍反映出把蘇聯許多民族連結在一起的種種太說。所有官兵們，不管他們屬於什麼種族或民族，無論就軍役的年限和性質說，無論就擢升說，都處於同等的地位。

我們只是才列舉了紅軍的一些基本特徵，這些特徵就決定了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所獨有的素質。這些特徵，正像蘇維埃社會的特徵一樣，使它具有別的任何軍隊都不知道的——一種力量的源泉。正是這一點，使紅軍具有了作為一種新型軍隊的特性，使他們能完成決不是別的軍隊的力量所能完成的任務。

紅軍的集體英雄主義

尼古拉·科斯特羅夫作

當戰鬥向德國中部各州進軍的時候，莫斯科不

斷地發出祝捷的禮砲聲。過去幾個月來，巴便來世驚愕：紅軍向前推進了好幾百公里，粉碎沿途的頑固防線。紅軍差不多已把波蘭全境的人擊潰，掃進了波美拉尼亞、勃蘭登堡、和上西里西亞；紅軍已把東普魯士和德國中部各區之間的聯絡切斷。紅軍的力量在這次攻勢中又顯示出：紅軍軍事組織的優越性，總的將領們的才幹，以及蘇聯英雄軍人優越的精神素質。

英雄並不是超人，他是一個尋常的蘇聯軍士，準備完成剛勇的勳業，準備為高尚的理想而犧牲自己。一個人不必特別費事就可以在前方隨時隨地找到這樣的英雄，在每一連，或每一砲隊，或每一騎兵中隊里，我們都置身在英雄們的行列中。

從前方來的大量文書，在在流傳着蘇聯軍人的英雄氣概。士兵克爾諾夫，中了幾個德軍的彈藥，陷在戰場中，拒絕活活投降。他急急取掛在身邊的手榴彈一擲，在隨即發生的爆炸中，克爾諾夫壯烈犧牲了，但是他的敵人也同歸於盡。士兵馬特羅索夫，用自己的身體阻擋住一座防舍的槍眼。他死在機關鎗的洪流下，但是，他的犧牲使整個部隊都能移動過去了。一九四二年在塞巴斯托波爾，有一批水兵用手榴彈在自己的身體四周，投身到進犯的德軍坦克底下去。英雄們殉國了，但是，敵人的坦克也阻止不住啦。

我們怎麼能瞭解這種壯舉呢？蘇聯中間的這種集體英雄主義的根源是什麼呢？

俄羅斯人民久已就因為他們的勇敢而著名。在戰鬥中的大無畏精神，是我們光榮的傳統精神之一，它的根源應追溯到我國古代的過去。但是，俄羅斯軍人的光榮的過去，已由於我們今天在戰場上所看到的場面，相形之下而減色了。

紅軍是一種新型的軍隊，它是從那許多世紀以來處於線絀之中一旦獲得解放了的人民中間湧現出來的。經濟上與精神上復興的時代，在蘇聯採入的身上灌注了巨大的力量。蘇聯軍人，是一種進步的人，不久以前還是在集體農場上和工廠中，以及學術機關中，把自己的精力用在社會事業上面的一種人。他是勞動技術和藝術方面的革新家。創造力形成他的生存的中心了。

英雄主義在戰前，在和平建設期間，就早已成為蘇聯生活的一部分。它具體表現為巨大的新的建築和運河，具體表現為對北極和空中的征服，蘇聯人民盡心盡力勞苦操作，以創造新的幸福的生活。勞動變成了榮譽的，英雄主義的，有顯赫的事業了；每一年，勞動都由新的成功和成就作為報酬，國家榮譽感盛起來了。

他們就這樣生活着，他們就這樣辛苦着，直到戰爭爆發。但是，那時，這種和平建設的生活由於德國匪徒的入侵而中斷了。千百萬人民離開了

他們的工廠和農場，在紅軍的隊伍中找到了他們的地位。他們對勝利的信念是無可動搖的；但是，要作實際行動以爭取這種勝利，並且要犧牲——這一點蘇聯人民知道得很清楚。和平生活的英雄，變成戰爭的英雄了。

在戰爭的進程中，紅軍士兵們顯示自身的力量，使他們的敵手喪魂落魄。蘇聯軍人懷着最深刻的憤恨注視德寇，當他看出德寇是個什麼東西——蘇聯的暴徒，殺戮孩子的劍子手——的時候，他的心中就充滿了如焚的輕蔑。蘇聯士兵們看到了被德寇焚為焦土，化為廢墟的各城市和各鄉村，他們看到了被蘇聯孩子們的屍體塞滿了的井，看到了被朝地開闢天用繩子吊着的女人們，看到了被迫害、被驅逐的老弱子們。在蘇聯士兵看來，德寇不僅是來使他的國家喪失自由，來把它變成奴隸的一種外來敵人，這種敵人不僅要毀滅由蘇聯人民所創造、所建設的一切。蘇聯士兵所面對的這種敵人，並且使他發生最大的人身的悲哀。紅軍中的每一個官兵都感到有這些私仇要對希特勒份子算賬。

「在這次戰爭進程中，德寇曾使你們中間的每一個感到什麼悲哀？」有一個部隊藉前線報紙談出這個問題，徵求答案。

從答案中間可以看出：三百個官兵有二百二十八個親戚被德寇殺死了，有二百二十九人被押到德國當奴隸去了，他們的故鄉各鄉村和各城市之中，有八十八處被焚為焦土了。三百份答案看了使人不能不深深地震動。

士兵希洛維奇，是白俄羅斯人，他在答案中寫道：有一百十三個人，在他那曾經繁榮的塔雷羅村的大火中被燒死了。在希洛維奇住過的那地區中，五十個鄉村已完全毀滅。希洛維奇自己的父母也

(下接第九三頁)

論陣地戰與運動戰

蘇·斯特魯威作
焦敏之譯

（本文譯自馬克思主義雜誌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期合訂本）
 這篇文章是於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期合訂本在馬克思主義雜誌下「維諾中譯出來的。作者先介紹了陣地戰與運動戰兩種作戰方式產生的原因及演進，更進而批評了歐美許多軍事家的戰術思想，和指出了一九四三年，但依然能幫助我們瞭解蘇聯紅軍這次偉大勝利的成因。

（一）上次大戰中陣地思想產生的原因

一九一四年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才三四個月，交戰國雙方的軍政官員們便已經因為軍事動作所表現的那種奇特，而主要的是那種空前未有的性質，太感困難不安了。在那時，一切的新聞簡報和評論報導，益發表現出了這種「打硬仗」，「膠着戰」以及「無出路」的傾向。許多人認為可以把一個舊的術語「圍攻戰」適用到新的軍事現象方面，這在軍事術與雖然為陸軍而鬥爭的時期，表現的尤為顯然。然而轉瞬之間，對於新的現象的觀察，人們又廣泛地佈着另外一個新的術語「陣地戰」。這個術語，固然在軍事藝術上絕不是一個新的東西，可是恰與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在西戰場上（法國）所形成的那種局勢以及一九一五年在東戰場上（俄國）所造成的那種局勢非常契合。

自然，「陣地戰」一概念，是與「運動戰」——即是說，在戰場上可以自由機動的運用龐大兵團的戰爭——的概念對立着的。運動戰的條件，其特點是軍隊在寬廣距離中的移動，實現廣泛的包圍迂迴運動，在側後予敵人以打擊等等。

一九一四年抄與一九一五年初的新形勢，是在於基本的陣地穩定後，形成了連續不斷的戰線以及敵對兩方所構築起來的其它防線。在西戰場，接連不斷的防線，在一九一四年抄，由北海伸到瑞士邊境；而在東戰場，於一九一五年中夏，則由里加灣起至羅馬尼亞邊境，其總互不絕的陣線，也都趨於穩定。輔以不絕的陣線及防禦地帶均向縱深發展着：在第一道防線之後，跟着築有第二道防線，第三道防線，甚至後方防線等等。在部署軍隊進而改善他的防線的時候，不僅可用它來發展向縱深的防線，並且也可用來去改善

防禦工事本身以及網線系統。在廣積不絕的防線中構築射擊築城之際，不該開始廣泛應用了泥土及樹木，而且也採用了鋼骨及水泥。因此，火力體系，機關槍以及大砲火力的構成的防禦體系，其構築必須是堅固不留一切射擊不實的地段存在於接近防線的地方。鉄絲網加強了起來，上面通着電流，此外又建築了各種的障礙物及陷阱等等。自然，要攻克這種防線的陣地，是要求最大的努力以及前此開所未開的人員及彈藥的消耗的。

結果就發生了一種論調，認為由這種陣地的「無出路」的「死巷」中，想打通這一條出路步上廣闊機動的領域，總是不可能的，雖然可能，也須付出空前的代價。平日習於野戰——這種戰爭以戰場上龐大兵團對的自由的移動，以及各種側翼，迂迴和其它機動的實現為特徵——的將領們，在他們硬「啃」堅強設防的，佈滿了射擊武器以及那些向縱深發展的敵人的梯陣之際，不覺迷途失手足無措了。

當時許多政治家，的確也不紙他們，他們的心理已表現在法蘭德統拉伊曼德·普恩卡萊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初所作的下述札記之中了：

「現在，前方到那都有穩定的趨向。在克努及第斯區我軍祇推進了二三百公尺，在恩尼及香賓——幾公尺，而在阿爾登及海庫——則祇幾公分。照這種速度發展下去，我們勢非再經過幾百年，才能解放法國」（拉伊曼德·普恩卡萊：「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回憶」第二六五頁，一九三六年莫斯科國家社會經濟出版社版）。

過了幾天之後，十二月十七日那天普恩卡萊又悲嘆地寫道：「我們必須承認，在很久的期間中，運動戰是不可能的」（前揭書第二七四頁）。

是年十二月底，協約國的另外一位政治家勞合·喬治，當時仍任英國的財政大臣，曾分發給英國的軍事委員會委員們一份「關於前線狀況及政府任務」的備忘錄，在這份備忘錄中，勞合·喬治於題名為「在西線所造成

的無出路「死巷」的第一節中，引出了這樣的結論：在當時聯盟國所拿獲的「一切軍事手段的條件之下，……任何一處在西戰場上相當地突破德軍堅強防線的企圖，結果都必定失敗而遭受可怕的犧牲」（連維特、多合、喬治：「戰爭回憶」第一——二卷第二六頁。一九三四年莫斯科國家社會經濟出版局版）。

這決不祇是協約國的軍隊，而且敵軍也是處在這種狀態之下。儘管德軍方面在那個作戰時期在重砲及山砲方面仍佔優勢，在攻擊時有非常便利的防線，德軍亦無突破防線之能力。不但如此，陣地防線的產生，其對於德軍的不利，尤較協約國而上之，因為這就是意味着他們速戰速決與閃擊勝利的破滅，意味着持久戰對德軍的不利。

法爾曼及因德道：德軍「最高統帥部，很清楚地領會到它轉到陣地戰的這一切害處。它是人們所選擇的（？）可能害處最小的一種」。當然，他最後所說的一句話，我們是不可以老老實實的相信它的，因為德軍統帥部決非「選擇了」陣地戰的作戰形式：它也是因為有許多原因和環境的逼迫而不得不如此啊，這一點，待我們在下文敘述。

（二）現代陣地戰的形成

早在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以及過後幾年，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當無數的人們對這次戰爭的經驗企圖做一綜合而理解其意義時，屢屢地發生了這樣的問題：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中所進行的陣地戰有什麼意義？在過去的歷史上有過同樣的先例嗎？

如果我們不能將十九世紀後半和二十世紀初年的戰爭為陣地戰（如現今所理解的這種術語），那麼，不論怎樣，在大多數這些戰爭中已發現陣地戰的因素了，對這些戰爭作過仔細考察的人們便不能不指出這種因素增多的某些傾向。

由漢斯·德爾布呂克起頭而後承繼他撰寫了一本宏文鉅著「在政治史範圍中的軍事史」的愛爾斯·達尼爾斯（順便說一句，他是沒有多少成績的），他特別列出了一章研究一八五四——一八五五年的塞巴斯托波爾保衛戰，他妄稱它為「世界史上的第一次的陣地戰」。無疑地，塞巴斯托波爾保衛戰的經驗（塞港並沒有由陸上加以築城式的掩護）證明，由砲兵與步兵

的火力所加強了的野戰築城以及由精神鎮定的軍隊所衛護的野戰築城，是在保衛戰中起過偉大的作用了。然而要將一八五四——一八五五年的塞港保衛戰為「陣地戰」却是不正確的，因為問題祇是說到一個面積不大的巨城中的圍攻及防禦，而在其他戰場上（多腦河及高加索）則展開了機動性質的動作。

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的俄土之戰，尤其是波列夫尼之圍，再次證實了步兵自己所構築的防禦的野戰築城的重大意義了。但關於這一點，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的經驗，才更充分地證明了它。

可是祇有鳳毛麟角的觀察家及研究家們才於這種經驗中看出了軍事藝術發展上的某些新的現象。許多人都認為日俄戰爭時，祇因射擊的威力，軍隊才爬在地上，挖掘壕溝，構築伸長綿延的野戰防線，似乎這祇是因為東三省戰場的特性。甚至連那聲權威的軍事作家如斐丁南·福煦，他也說東三省戰爭所以發展的「緩慢」，祇是因為戰場的特性，同時這次戰爭的教訓，由歐洲戰場上大概將要發生的作戰性質來看，好像也沒有什麼直接的利益（見福煦元帥著：「關於作戰」第十四頁，一九三七年莫斯科軍事出版局第二版）。

福煦及當年許多國家中大部分的軍事作家，都往往不加批判地把他破壞時代特殊的作戰形式及方法，搬到完全不同的新時代，即軍事技術各方面猛烈發展，軍隊數目驚人增加以及鬥爭的戰略戰術形式空前複雜的時代。但福煦與其他許多的軍事作家及實際的指揮將領不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勇敢地打破了自己過去謬誤的成見，而加入了那些在戰爭進行中慎重研究戰略戰術上諸新現象的將領之列，特別是他們都企圖追求打進軍事史的所謂「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陣地戰」的那種現象的意義。

福煦在他底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戰爭的回憶錄中所寫的轉向陣地戰的原因的分析，以及他對這次戰爭問題的設法，有不少的趣味。

早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福煦就在致法軍總司令霞飛的信中，述到當時應有的陣地戰的問題。福煦在特發鬥爭的這一時期時，在他底回憶錄中寫着：「伊泊爾一帶的戰鬥屢次表明因為射擊武器的發展，尤其是因為機關槍的應用，防禦有多麼大的力量了。攻擊的力量沒有照同一比例增長了起來。這就引到了軍隊彼此相持不下的停滯局面及拖延。在這種現象中，顯露出了戰爭的新形式——與所謂運動戰對立的陣地戰。在事實上這只是我無力的承

是軍事動作的危機」(福煦著「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戰爭的回憶」第一七六——一七七頁，一九三九年莫斯科軍事出版局版)。

這與保衛手段的連續不休的競賽，是軍事技術發展的特性。恩格斯巨屢次地指出了軍事技術進化的這一方面。譬如在「反杜林論」中分析海軍技術發展時，恩格斯曾指出了砲兵大砲的轉變，而到以後，一方面是魚雷艇，另一方面是保護兵艦的裝甲。在這種戰爭中，恩格斯正確地看出了海戰方面內部的辯證運動法則的呈現(參見「反杜林論」第一四二頁，一九三八年國家政治出版局版)。在陸戰方面，也進行着攻擊武器與防禦武器不間歇的鬥爭。在軍事發展上，每有在一個時候和整個時期某些武器開始對戰鬥及作戰的性質發生絕對優勢的作用，此外，進行戰爭所採用的武器的質與量，以及為戰鬥任務的解決最妥當地改變這些武器的能力，即指揮官及士兵的軍事訓練，也有最重大的意義。

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所發生的空前未聞的軍事動作的陣地形式的規模，實軍事發展階段上的一個新階段，是由以前的一切進化以及技術經濟，政治軍事領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期所形成的那些具體而客觀的條件下所必然地產生的。

福煦正確地指出了機關槍火力對強化防禦的特別作用。正是因為機關槍和野戰砲的接合，才給予防禦者以特別的堅定屹立性。至福煦的另外一個論斷——攻擊武器的力量沒有防禦力量增長而增長，却還值得一加討論。砲兵技術發展已經在那個時期(在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之前)給進攻一方以非常強烈的武器。大家都知道，甚至持久形式的築城也在其砲火自徑山砲砲彈致命打擊的砲火時無能為力了。但是大多數的軍隊，重砲是少的；在參戰軍隊整個的砲兵中而射的大砲，其比重不十分大的，通常地雷不足，野戰砲只是在戰鬥激烈的進程中才必需應用，坦克在下次大戰的最初兩年還完全沒有。所有這一切便於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戰爭的頭兩年造成了防禦武器對攻擊武器的顯著的優勢。這是形成固化的防禦陣地的先決條件之一。

福煦在提出自己的主張說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陣地戰，這不是戰爭的特殊形式，而只是「戰鬥動作的危機」時，他是與當時最流行的意見一致的，即是說：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的陣地戰是防禦陣地的不學無術而

產生的。許多人認爲相持的陣地戰，這個不是整個軍事危機的結果，而是指揮藝術危機的結果。勞合·喬治也與這種觀點相近，他在他底軍事備忘錄中就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以及到大戰進行時仍然長期「得勢的反應」的將領們猛烈加以攻擊，勞合·喬治說到軍事機關的政策時非常刻薄，這種政策，「不是引到對未來戰爭的準備，而是對早先過去了的戰爭加以準備」(勞合·喬治「戰爭回憶」第一——二卷第一一〇頁)。

的確，一切國家之中戰前戰時的動員計劃，都是按照短期的運動戰計劃而定的，而德軍於開戰後的一個月，即在馬恩河會戰之前夕，自備地聲稱，再經過六星期，整個戰爭就要結束。交戰國雙方將領們沒有在軍事上預見到新的現象——戰爭的持久性以及鬥爭所採取的那些陣地的形式。

但由此便得出一個結論說，只是這「客觀的因素事先規定了陣地鬥爭形式的產生而作為極長時期中的優勢的形式，那也是不對的。問題不只在於多數將領的落伍及無能，甚至也不在於自動射擊武器火力對防禦有特別的力量，實則起了最大的作用的，在一定的時期，交戰國雙方的兵力在決定的戰線上是勢均力敵的。當然，這不是說人只與武裝數量的數學的相等，而是說不論在那一方都沒有具備足夠的力量在正面的攻戰中獲得重大的成果。此外，基本戰線的界線——譬如法國戰線——由北海到瑞士邊境——不論它與過去戰爭比較起來如何廣闊，總還是對於大規模的運動戰，在新的條件之下，是一個制約。佛龍茲說：

「在敵對的交戰國雙方無力的基礎上所造成的陣地性，追求着直接用力打擊的解決。在另一方面，以有限的領土及最豐富的技術爲首的客觀條件，允許每一方，在固定的陣地轉到防禦拒絕迅速而解決。這兩種變化的結果，就是陣地戰術以及特徵了它的戰線的固定性及停滯性」(選集第六三——六四頁，一九三四年莫斯科軍事出版局版)。

(三) 紅軍綜合了戰爭的陣地形式與運動形式

式與運動形式

蘇聯紅軍在最初成立的期間，就認爲必需把戰爭的運動形式及陣地形式結合了起來。列寧與斯大林要求紅軍聯隊時時準備採用伸展自如的運動戰，

備同時也應到組織各個陣地的可能，以保存運動的戰鬥方法。

在國內戰爭時侯以及到往後的幾年中，斯大林同志曾告誡說：「在未來的板板戰時，隨時指出俄國軍隊採用各種戰術的必要性，及在必要時，則大軍在盡力設法培養紅軍部隊勇敢堅決機動作戰的能力時，同時又要求他有一種在複雜中作戰的本領。」在國內戰爭中，必然地要遇到這種或那種作戰條件的。

比方在一九二〇年七月蘇俄戰爭時，斯大林同志曾指出：「以各種戰術及組織不絕的戰術網屏蔽着戰地最重要的據點，而頑強順利地將運動戰及戰事結合了起來。」

在一九二二年的「俄國共產黨的戰術問題」中，斯大林同志指出：「戰術的組織形式，各兵種的組織形式，通常適應着作戰的形式及方法。」因此，運動戰及陣地戰中，各兵種的作用是不同的。

「在現代戰爭下作戰的組織——斯大林同志寫着——在於掌握一切的合作形式，與各個個個戰中科學的一切成就，合理地運用它，勇敢地把它結合起來，及及時地適應環境的不同而採用這種形式或那種形式。」（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四日「真理報」）。

斯大林的這個典型的命題，是建立在紅軍各方面戰鬥訓練的基礎上的。佛龍關於戰爭的運動形式及陣地戰形式所說的話，以及關於軍隊在各種條件下作戰的適當的訓練，是非常有趣的。

關於運動戰及陣地戰的問題，關於某一門等戰形式及其結合的優勢問題，佛龍不能不說明及尋求已往戰爭之經驗而提出，且為規定未來戰爭的性質而提出。佛龍在許多論文及演說中屢次着重指出：「蘇聯被加入的未來戰爭，必完全帶着運動性。」這個學問的條件（其中連軍事動作展開了的領土的廣表在內）以及主目的（軍事計劃）來決定。紅軍必須會進行高度運動的機動作戰，必須培養最大的積極精神及攻擊精神。其次，佛龍於當年指出，在最近的幾年中，紅軍必須以其高度的機動作戰，以補充技術的相對的薄弱。雖然佛龍於說這話時，也未提及蘇聯武裝力量技術的實力，在將來也是不可限量地增長的。他本人為提高這種實力努力不懈。

佛龍對於機動作戰及陣地戰問題的提法，是對複雜的軍事現象綜合分析而所得的例子。佛龍是由他的經驗，由一切的多量材料而得這些提法。

解決戰爭片面的結論。

「……對我們說來，是既無絕對不變的東西的……指揮官的藝術與表現在他利用他掌管各式各樣的手段的能力方面，而選擇那些在一定的空間及時間所能發揮最大效果的手段」（「選集第六四頁」）。

佛龍正是從這觀點提出了結合運動戰與陣地戰鬥爭形式的問題。在我們黨中有些大們認為，既然肯定了機動作戰，就可以完全把與所謂陣地有關的一切東西放棄……當然這種結論是很大的錯誤而對紅軍非常危險的。這後來使俄國軍隊把這些原則對立了起來，一般地是不正確的。從來沒有那一種最機動的戰爭是沒有含着陣地成分的……我們未來戰爭基本的佔優勢的性質就是運動戰的性質。但同時這種機動作戰，本身要求對作戰的陣地形式作廣泛而充分的認識」（同書第六三及六四頁）。

在紅軍訓練之中，這種指示已成為戰鬥行動的主導原理，它永遠指示出軍隊必須掌握作戰的及戰術的靈活性，有實現巨大的勇往直前的進攻及巧妙機動的術，同時又善於進行最高限度的沉着穩健的防禦。

佛龍上的這命題，已由蘇聯於此偉大愛國戰爭之前與蘇聯敵人的若干次衝突中實現了。大家都知道，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冬季的蘇芬戰爭，在主要的戰線上——卡累利亞地峽——採取了堅強的陣地戰的性質。斯大林防線是一連堅固的防禦，是利用最新的軍事工程技術建造的，防禦防禦的防禦，以水為憑依，而充分的利用了地形的地形（有湖、森林及山岩）；其性質又格外加強了白芬的防禦陣地。但不管這些條件下鬥爭的特殊困難——零下四十度的冷天，且白登很矮，雲霧遍地籠罩——，限制了空軍的活動，然紅軍突破了曼納林防線而攻克了它。

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冬天卡累利亞地峽的戰役，一方面證明在現代戰爭中可能發生一個陣地，而在陣地上必然產生某些陣地鬥爭的形式，另一方面說明最新的攻擊武器——坦克、飛機、大砲、重砲、自動步槍、兵工廠械等等——的英勇剛毅而頑強作戰的軍隊，是可突破任何一種最新的防禦工事及最堅強的防禦的。紅軍在現行戰爭中運用它的行動屢次證明了這一點。

以下我們就專來檢討一下現代戰爭的經驗，同時先看一看在第二次大戰爆發以前各國軍事著作中對陣地戰及運動戰的問題是怎樣提法的。

(四) 德軍閃擊思想及英法陣地思想的對立

對立

關於未來戰爭及作戰動作的性質，在第一第二世界大戰期間在外國所發表的意見，是很不一的。一派作者的意思，認為決不能由特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陣地鬥爭形式的安眠狀態中解脫出來，同時斷定形勢將來臨的新的世界大戰，必然是陣地性的非常持久性的戰爭。反之，另一派的作者認為軍事技術的猛烈發展，首先是空軍及坦克，却早已注定了為一種截然不同的性質的戰爭——運動戰，連決戰。外國軍事學家之中從它的一切複雜性及多樣性方面正確處理問題的實在是鳳毛麟角，正確地判斷在世界最大列強之間未來大規模的戰爭中，以什麼樣的形式進行戰鬥及動作的，也是很罕見的。

很典型的，法西斯國家的軍事作家企圖以一種片面性來解決這些問題。誰都知道，意大利杜黑將軍的作戰的觀點，是由陸上戰鬥解決不了而出發的。照他底意見，陸上的陣地必然穩定，必然表現凍結的形式，不論那一方都不能對陣地實現決定的突破，所以祇有奪取制空權，基本上由轟炸機所構成的驚人的無敵空軍而應敵方的抵抗，才能獲得解決。

另外一些軍事作家則不是把一大賭注投在空軍方面，而是投到坦克方面。比如奧國的愛曼斯伯爾格將軍就是屬於這一派作家，所著「坦克戰」於一九三四年出版於希特勒德國（慕尼黑），無疑地是替希特勒德國寫的。愛曼斯伯爾格不否認空軍的意義，但認為有決定作用的是龐大的機械部隊。據他說，自坦克發明以來，「戰略上已回歸到古代的因素」，優勢的進攻。所以，現在，迅速行進的師團，其數量的優勢——主要是它現在與空軍相結合起來——在時間及空間上可表現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形式，它可引到空前未有的規模的失敗」（愛曼斯伯爾格：「坦克戰」第三〇〇頁，一九三七年莫斯科軍事出版局版）。

法西斯名將古德里安，屢次被蘇軍打敗的將領，是主張採用成羣裝甲機械及建立龐大的坦克突擊部隊的佈道者。他曾經寫道：「集中兵力的出敵不意的使用，實勝利的最可靠的保證」（「國外軍事」一九三九年第七期第六頁）。

這是怎麼的一個片面的意見，已由德國維特美爾將軍於一九三五年在德軍主編的一種軍事雜誌上所發表的他的底一篇論文證實了，他底意見竟到連這種地步：「由於坦克的發展，攻擊的砲兵的最大的工作降落了」。維特美爾這個觀點決非偶然的，僅見的。德國法西斯軍事的統帥部正是把自己的「閃擊」理論，建基在損害其他兵種而過分估計了空軍坦克作用的估計上，尤其對砲兵的損害很大；甚至從歐戰開始兩年後，在侵蘇戰爭的第一個時期，希特勒統帥部也未將砲兵視為攻擊和防禦的手段而輕視了它，尤以在反坦克防禦中為然。

希特勒對閃擊戰爭中決定勝利的「閃擊」的成說，把用數萬龐大的摩托機械化兵羣及各種武裝力量迅速擊潰敵人以前線軍隊的組織，做為他軍事學說的奠基石，自信他們是保了持久戰的險的，陣地戰一線地是會被排除了的，因為最堅固的築城設防及障礙物，一定被德國裝甲的機械兵羣在龐大轟炸機隊除由上空的援助下突破。然而奇特的是，在宣揚這種觀點並編力用一切方法同時他向敵說，特別是在說，不論什麼樣的「馬奇諾防線」都不能把他由德國機械化部隊的進攻之下拯救出來的時候，法西斯自己建設了「這防線——德國西邊邊界的「齊格非防線」。

應該指出，就是在德國的軍事出版物中，有時對於未來戰爭的性質也發出了非常顯明的諷刺。格倫登·佛里希在他一九三九年出版底「今日與明日」的軍事藝術一書中寫道：「摩托機械化部隊又使會戰迅速了結的意見是錯誤的，因為在這種却忘記運動性也對敵有利；縱然陣地戰是暫時的性質，却也不可以從未來大戰圖畫中掉」（「國外軍事雜誌」，一九三九年第十二期第四〇頁）。

但希特勒上層領導者沒把這種意見看到眼裡。一九三九年九月以三體拜的工夫戰勝波蘭之後，一九四〇年五月——六月法國全軍留後之後，希特勒的政府要人們和希特勒德國的大部分將領們，都把真實的感覺丟的一乾二淨。希特勒德國的軍政大員們相信德軍的武器在反對一切敵人的戰爭中是「無敵的」，非常誇大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估低了他敵人的力量，自大的以為他們在軍事藝術上進行過一次革命，開創了一個取得決定勝利的新的方法。「德軍武裝力量最高統帥部」在「波蘭日誌」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日寫道：「這三種拜消滅敵軍的途徑，實為歷史所僅見」。而「德意志國民雜誌」的主編有名的若爾丹則寫了：「波蘭之役，實屬新的技術工具相稱的作戰新

方法的象徵，他可以使廢滅戰復活再生」（『國外軍事雜誌』一九四〇年第七期第四九頁）。甚至美國，某些軍事作家如萊伊爾旅長，許多『閃擊戰』論文的著者也肯定說德軍底武裝、編制、戰術及戰略均允許他實現這種戰爭的原理。

但就在這個時候，速決戰與持久戰的問題，運動戰與陣地戰的問題，却每每有站在完全另一個觀點上討論的。美、英、法及其它國家的許多著者則肯定未來的戰爭開頭是陣地戰的性質，因為早在和平時期，一直頂到國境所構築起來的堅強的防線，已造成一個組織堅固的綿延不斷的陣線的先決條件。

拉薩上校於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美國報紙上所登載的文章中，將具備了連續不斷的防線的戰爭與在戰爭性質上佔優勢的陣地戰之間的均衡，立了一個標幟。拉薩認為戰爭的持久性是必不可免的，他一般地是傾向於否認實現突破陣地及廣泛機動作的可能性。

「由於現代的武裝——拉薩斷言——陣線是非常強有力的，甚至具備了很大優勢的兵力亦不能將它迅速克服……就是到今天也有許多人幻想在廣闊的戰鬥中，不會取得決定的迅速的戰果的。最近戰爭的實際，使這種可能性成爲一個疑問。必須領悟現代防禦的退阻力量，以及迅速趕到後備兵和供應物品的可能」（『國外軍事雜誌』，一九三九年第二期第四〇頁）。『在敵軍尚有後備軍和物資，在敵軍尚有將其由一地調赴另一地的可能之際，陣線的突破是可能的』（引自書第四三頁）。

上述那位作者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寫着：

「……不可肯定說運動戰是可能的，即使說國防的界已被突破」（上引書一九三九年第九期第八二頁）。

美國的另外一位作家菲利浦少校在一九三八年於一篇『戰爭的新面目』中寫着：『現在接連不斷的防線已在戰爭開始前組成了……明日的戰爭，必於上次世界大戰所結束的那些不斷的防線開始』（『國外軍事』一九三九年第五期第二六頁）。

在菲利浦的話中，還可引出一個非常重要的意思，就是連接不絕的陣線，並非它穩定的一個同義語。

的確，如斷定連接不斷的陣線就一定把它提到陣地戰中，那是不正確的。在掌握了成羣的軍隊和龐大的物資的各個大國他們之間發生軍事衝突之際

，接續不斷的陣線是必然要產生的，即或不是在全部綿長的戰線如綿長不絕的築城地帶，然無論如何在這種防線上，是不會留着一個不能射擊的和不可觀察的中間地帶的。連接不斷的陣線，在沉寂時期以及在具有優勢發動作戰性質的戰爭是有的，而在積極的運動戰的期間，陣線的形勢，照例必發生特別大的飛躍的變化。

將各種概念——關於陣線的連續不斷性及其的穩定性及不可克服性？關於運動性的作戰及其『閃擊』性，關於陣地戰與持久戰等等——的混淆及等同看待，是上述許多外國軍事作家們的特徵。在他們這一切形形色色的意見和種種複雜的觀感之中，我找不出一個人能真正達到戰術戰術經驗的科學的綜合，真正科學的預言到現代的軍事動作究竟是採取什麼性質才有益。在這一方面，蘇聯的軍事學說和蘇聯的軍事思想，因為掌握了馬列主義不可戰勝的科學武器——唯物辯證法，所以甚至比先進國軍事理論家的觀點時時能，而且現在也能有很大的優點，至於所謂法西國家的『理論家』更不必說了。

許多外國軍事作家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預言說戰爭整個地表現爲陣地性質，在廣闊的幅員上陣地必然穩定，陣地形勢的變化一定是演變的緩慢的，尤其是因爲有這種先決條件；特務了二十世紀的兵器的空前增多，必然要引到了它流動性的減落。如所週知，曾經有一個時候，在英國，在德國以及在其它國家之中，祇是在理論上展開了宣傳，但在實際上擴張軍力的建設——必需用摩托機械化部隊所組成的精兵作戰觀點；這一派意見的擁護者，通常把這種小兵羣高度的流動性及機動性和基本上由步兵所組成的龐大兵羣的緩慢性及呆板性對立了起來。

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證明了這些意見是成立不住的；反之，恰恰完全證實了恩格斯早在『一八五二年神聖同盟反對法國戰爭的可能性及其先決條件』一文中的天才的預言，他說，軍隊的羣衆性，並不與它戰略的運動性相抵觸，廣大軍羣的動員入伍（到人口的百分之一五——二〇），『同時又比現代軍隊所具有的那種機動性，具有更大機動性』（『軍事論文選集』第一卷第三十頁，一九三七年莫斯科軍事出版局版）。

蘇聯各族人民抵抗希特勒德國侵略者及其夥伴的偉大愛國戰爭，其最豐富的經驗已予我們一個可能性從各方面明確地解答這個問題了：現代大戰作戰的性質？什麼是佔取優勢的？現行戰爭的陣地戰，抑或運動戰？

蘇聯人民及其武裝力量的勇敢抵抗，在戰爭的最初幾月中澈底葬埋了法西斯「閃擊戰」的神話。儘管希特勒份子計劃迅速消滅紅軍，預設蘇聯埃國家，蘇聯也堵擊了世界上最強有力的軍事機構的打擊，在戰爭中阻止了在軍事技術方面在戰爭初期比紅軍最佔優勢的兇猛狡詐的敵人。戰爭採取着拖延的性質，但這決不是說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所表現的戰線凍結長久的時期。現行戰爭雖然表明將拖延的（持久戰）戰爭與陣地戰兩個概念劃一等號是怎樣不正確了。戰爭可能是持久戰，但它主要的總是運動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陣地戰的時期由一九一四年尾拖延到一九一八年年中，甚至一九一八年下半年，在主要的（西歐的）戰場上，使威廉德國全軍覆沒的戰爭，本質上還不完全都是運動戰的性質，同時比較地還是變地將德軍的陣地戰的防線由西向東逐漸消滅。

現行戰爭的性質完全兩樣。現在，在偉大的愛國戰爭中，紅軍早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的冬季在莫斯科外國以及其它主要各路的會戰中展開了廣大的運動戰：譬如在羅斯托夫、耶列茨、梯爾文及托洛拍茨方面。在這個時期，紅軍將敵軍向西驅逐四百公里。早在這個時期，已把德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打破，同時證明了現代戰爭中作戰的性質，佔優勢的是運動戰。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冬季戰役，在戰史上從無先例的斯大林格勒大戰中，首先實現了完全的殲滅戰而將德軍法西斯三十三萬大軍消滅，而以同一動作在其他許多最主要的戰場（在北高加索、頓河、佛羅內茲——庫爾斯克方面；在中路及西北路，在列爾格勒）實現了殲滅戰，以堅強攻擊行動於一九四三年夏季完成了殲滅戰（解放了奧勒爾，比爾哥羅德及哈爾科夫等地）。紅軍作戰勇敢地證實了他大規模的運動戰的日益增長的能力。

在積極運動戰的長久期間以內（譬如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多，這種時期約長了半年以上），有過比較短期的沉寂時期，因當時兩方都在鞏固各自所佔領的防線，重整自己的兵力，建立新生的後備軍，加緊準備新的積極的戰役。然不是這些沉寂時期規定了現行戰爭的基本性質。也不是那種在廣大的蘇德戰場上若干地段已進行的和現在進行的陣地鬥爭規定了這種性質。

具有盛大的人源和物資後備，且在戰爭中抱定了堅決的目標的各大國的殘酷的衝突，其所表現的現代的大戰，在現今軍事技術和軍事藝術的發展水準下，主要地是表現為運動戰的性質。然而這決不是意味着陣地戰鬥形式的

完全取消，恰恰相反，在某個地段和在一定的時期還是要有它。

必需先分清「陣地戰」和「陣地鬥爭」這兩個術語的不同。「陣地戰」的術語，祇可拿來特徵一次，在整個戰爭期間或幾乎全部戰爭期間，陣地鬥爭的形式整個地佔了優勢的戰爭。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典型的陣地戰就是這種意思。至於「陣地鬥爭」的成分，在任何戰爭中的個別階段和個別地段都是有的，紅軍抵抗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那種戰爭中也是有的。在奧得薩，塞巴斯托波爾以及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中，尤其是在二斯克區，塔曼半島以及其它若干地區的爭奪戰，在現行戰爭的各個時期，鬥爭都帶着純粹陣地戰的性質。這種鬥爭，伴隨着改進陣線形勢的地方意義的戰鬥，掌握個別關鍵點，俯視高地以及鎖鑰的戰鬥，內線縱深梯形防禦地帶及整個築城區域的戰鬥。但這一切並沒有造成一次世界大戰研究家們所說的「無出路，陣地死路」或「無望的停滯」。不論防禦手段如何增長，尤其是廣泛採用了機械化武器的和特別的機械以及迅速構築法（水門汀的迅速堅結法等）的一切形式的火器和築城技術的防禦手段，可是現代的攻擊武器——砲兵（連塹壕砲在內）的、步兵的、裝甲坦克隊的、空軍的以及工兵的——都不亞於防禦武器。不獨如此，如果這些武器是在那些勇敢胆大，不怕犧牲和藝術的官兵手中如像紅軍戰士，那麼現代的攻擊武器，可能是比防禦武器真正更堅強的。

規定現行戰爭的運動性的基本的東西，就是對於賦有很大的攻擊力量，突擊力量，那些高度靈活的鬥爭武器，如坦克，空軍以及自動推進砲的廣泛而普遍的運用。由於這些鬥爭武器的猛烈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大戰以後所沒看到過的那種大規模編制的坦克，摩托機械化部隊，以及空軍砲兵聯隊，具有特別巨大的意義。

對於運動戰的發展，戰場的廣闊與擴大有大的意義。然而最重要的還是反希特勒同盟國家所抱定的擊潰敵人的決心以及百折不撓的激昂的爭取勝利的意志。當然，為達成運動戰，還必須有一種能力完成迂迴包圍的運動，深深地突入敵人的陣地，包圍與消滅敵軍。

凡不欲落伍的進步的軍隊，必須培養成他的靈活的機動戰術的精神，廣泛的勇敢的運動戰的精神。攻擊中最偉大的堅毅精神和機動能力，必須與防禦中最偉大的沉着堅定精神結合起來，並同時與防禦中的積極性結合了起

人民文化的時代

周而復

——陝甘寧邊區文教運動的成果

- 一、一個創舉
- 二、和迷信不衛生作鬥爭
- 三、新的教學方法
- 四、羣衆的文藝
- 五、大家看報大家辦報
- 六、一幅輪廓畫

一 一個創舉

陝甘寧邊區文化教育工作大會從十月二十二日開始，直到十一月十八日才勝利結束。大會共進行三十七天，參與大會的代表一共有四百五十多人，這中間，不僅有從人民當中生長起來的工農兵文教代表，也有著名的作家、詩人、醫生、學者；不僅有藏回等少數民族的代表，也有基督、天主等宗教團體的代表。大家檢討邊區的文教工作，吸收其經驗教訓，研究各個工作部門中的好壞典型，決定今後開展文教工作的方向。動員「全邊區一百五十萬人民自己起來和自己封建迷信文盲不衛生等惡習的鬥爭」。邊區文化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一種前所未有的創舉。

從這一次大會上可以看出文化教育教育是少數人專有的時代，早已成爲過去，要把文化教育歸還給人民大眾，在邊區已經實現了。

陝甘寧邊區原來是一個很落後的地區，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封建，迷信，貧窮，文盲，不衛生……這些東西給予人民毒害之深，從幾個簡單的數目之中，可以看出來：在邊區一百五十萬人口當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文盲；革命前，這一百五十萬人民大部分是在飢寒線上生活，食不飽腹，衣不蔽體，有了疾病，就求救於巫神。巫神是邊區最大的毒害，舊社會統治者製造了六十一種鬼神，遺留下二〇二九個巫神，僅僅安縣一年的統計，全縣一年消耗於巫神的招待費，是三千三百六十一萬元，而五十九個巫神當中就一共治死了二百七十八人。若以每個巫神每年治死五個人計算，則二〇二九個巫神，每年要治死一萬人左右，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此外死於不衛生和疾病的，更是可駭！成人的死亡率是千分之三十，而兒童的死亡率竟達百分之六十！牲畜的死亡也是驚人的。造成人和牲畜的嚴重死亡率的原因，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人民不衛生的習慣，迷信的毒害，和醫藥的不發達。

等到邊區土地革命以後，在革命政權下的人民才可能把文化教育的權利

在舊自己手中。過去那種文化生活上的悲慘狀況，推開給有了初步的改變。但在土地革命時期，由於處在緊張的戰爭的環境里，文化教育工作的進步不可能有充分的發展。抗戰以後，邊區轉入相對和平的環境，邊區文化運動，才比較大規模地展開。但由於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作祟，定向和實際脫節，和羣衆需要相違背的道路，使得這一運動不能及時蓬蓬勃勃地展開，相反地，却失去了活躍的生氣。但經過了兩年來的整風運動，文教工作者在思想得到了改造，掌握了毛澤東同志的從實際出發的羣衆觀點。另一方面，邊區人民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下的經濟生活，日益繁榮發展，生產運動在一九四三年收到更大的成效，使邊區文教運動「取得了各種規模的工廠和作坊，各種式樣的合作社和變工隊，豐衣足食的人民戰士和機關學校人員作為物質基礎」，另一方面，則是已經取得了總結新文化運動歷史經驗的「新民主主義論」和「文藝座談會講話」作為精神基礎（「解放日報社論」）。所以說，邊區的文化運動真正成爲大規模的羣衆運動，是自四三年開始到文教大會開幕，這一運動已在邊區各個角落普遍地展開了。

十月三十日，毛澤東同志親自出席大會，宣佈了新民主主義文化運動中的統一戰線的方針，指出「新形式與舊形式的統一戰線是完全必要的。統一戰線的兩原則在此完全適用：第一是團結，第二是批評，或教育改造；投降舊形式是錯誤的，排斥排擠也是錯誤的」。另一方面又指出，一切工作對接羣衆需要，和羣衆自願的原則出發。這方針解決了文化運動中久久未解決的新舊形式問題，成爲大會中和今後羣衆文化運動的旗幟。

大會是按照下列程序進行的，衛生，教育，藝術和報紙，而開會的方式是：大會報告，小組討論，典型報告，總結報告。在大會上湧現出大批模範的文教工作者，模範家庭，模範村子，光輝的範例，……開闢了邊區文教工作的新天地。（概略）

二 和迷信不衛生作鬥爭

首先談談衛生工作。

在邊區運動以前，邊區羣衆衛生的情形是怎樣呢？邊區的經濟落後，衛生，醫社，在飢寒交迫中，是沒法談到衛生的；革命以後，生活雖然改善，但注意力量集中在政治經濟的建設上，對衛生工作未能用力推進。而舊

社會遺留給邊區羣衆的迷信，愚昧，和不衛生習慣，牢固地存在着，所以造成了嚴重的死亡率。死亡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是不衛生。飲食不衛生，帶來了傷寒、痢疾、吐瀉水；由於身體衣服被子不衛生而生虱子，造成出水痘、和回歸熱；由於舊法接生，使大部份嬰兒得「四六風」死去。邊區還有不少地方是人和畜牲同居，造成環境衛生與公共衛生的嚴重障礙，大大地影響了人肉健康。

其次是迷信。邊區二千多個巫神散佈在農村，他們欺騙人民，攔財奪命；而人民也迷信他們那一套胡言亂語，老百姓生病，總以爲是鬼神作祟，常說：「沒有神，人怎麼會生病呢？」有一個男子病倒了，他母親硬說是有鬼，相傳鬼怕鹽東西的，她就以月經布塞到兒子嘴里，這樣怎麼會好呢？另一種辦法，生了任何病，就請巫神，巫神來了，手持三山刀，吊神安瓦，家繩繩，說是有鬼，要病家化多少錢送？知病者不信，他就說有鬼附在病者身上，用鞭子抽之，直抽到病者忍受不下，只好也承認有鬼了。他更可以騙人，倘病者被打死，他也可以不負責任，說是命中註定，他也無法挽回。

從上面事實看來，可以知道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迷信毒害之深，成爲阻礙邊區衛生運動中的一大障礙。

人民不衛生和迷信的程度是如此，邊區醫藥條件是怎樣呢？全邊區只有一〇七四個好的中藥，五十個個數醫，機關部隊的西醫只有二百多人。以邊區人口來算，一千一百多人中只有一個醫生，而且絕大多數是中醫。若以西醫來說，七千多人中，才有一個。中西醫的總數還趕不上巫神。藥品是少到可憐的程度（概略）試想想，在這樣惡劣的衛生條件之下，來開展羣衆衛生運動，那困難，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但邊區政府和人民是不怕任何困難的。羣衆衛生運動，首先是從鄉村展開起來，這個運動在鄉村展開，主要的是依靠勞動英雄，變工隊長，小學教員和村長等推動起來，成立衛生委員會，或者是衛生檢查委員會。一般說，開始先進行宣傳，比如在發動全村大掃除以前，先舉行「爲什麼要掃除」的座談會，引起羣衆對衛生工作的重視。然後發動羣衆打井修廁所，人畜分居，改造環境，滅蟲，除毒，婦孺衛生……學校放學，讓學生回家幫助打掃各家衛生，教員，勞動英雄，帶着學生幫助人手少的和最窮的人家，羣衆都很感動說：「教員都來給我們打掃了」。這樣，在村里造成了衛生運動的熱潮。

這里面，有時就積生了困難，例如人畜分起，羣衆也知道好，但實行不
够怎麼辦？村里就設法調整窖洞，勸員畜洞多的讓出來，搬移圈欄，人手少
的也感困難，全村就實行變工互助，這樣，便解決了。

爲了堅持下去，村里訂了一個衛生公約，事先在學校里（村里的人全都
要上夜校，半日班，識字組的）。徵求大家意見，在羣衆團體里討論，然後
公佈。這樣發揚了民主作風，大家都能够遵守，實行。白塬村的衛生公約是
這樣的：

- 一、碗筷鍋盆案，飯後要洗淨。
- 二、若要不得病，不吃生和冷。
- 三、人人手和臉，每天洗兩遍。
- 四、要將衣和褲，每月洗三回。
- 五、窖內和窖外，天天都要掃。
- 六、廁所經常刷，牛圈兩次墊。

邊區人民不衛生的習慣是很深的，不是一次運動就完全可以改變過來的
，也有些頑固保持着舊習慣的，這就，必須要教育解釋和批評。白塬村小
學教員知道村里席蔴背的婆婆是很懶的，她常常很懶的抹布去擦砂眼，飯後
碗等也不洗，她馬上法進行解釋。現在她家每人有了一條毛巾，飯後吃了飯
就洗。有的勸說也不行，就給他登村裡的黑板报，批評他。大都怕黑板报的
批評，全收拾得乾乾淨淨的。連白塬村最懶的趙開科家，也乾淨了。

僅僅有了衛生運動，並不能說就可以完全不再會生病了。有了病須要醫
生看，需要藥治療。普及醫藥培養醫生是這運動中的重要的二環。中西醫
和藥師的親密合作便被提到重要的地位了。中藥科學化，西藥中國化——中
西醫合作，這開闢了很久的口號，在任何地方被認爲是不容易實現的口號，
在邊區已經開始初步實現了。

邊區的巫神數字遠超過醫生，羣衆有病，僥無醫生，一定會去找巫神。
中西醫團結起來，給老百姓治病，反對共同的敵人——巫神，在邊區，是完
全必要的。反對者以爲中醫不科學，治死人。是的不科學，但中醫在中國
這土壤上有他的悠久的歷史傳統，有許多很好的處方（例如林特立同志的夫
人四十年前患氣結核一年多，大如雞蛋，久治不愈，後來服中藥「七葉一枝
花」就好了。針灸方法也有不少地方可供學習和參考），並且也確實救活了
很多的人。問題是要中醫科學化？學習西醫的診斷，生理病理的知識，消毒

辦法……西醫也可以研究中醫的長處。

去年五月，邊區一些地方相繼召開了中西醫的會議，如延安縣的會議上
，中醫自我批評了自己過去不向西醫學習，西醫也檢討了過去不重視中醫的
某些長處，大會上中醫公佈了秘方百餘種，成立了研究會。文教大會上，特別
召集中西醫百餘人，開了兩整天的座談會。有些地方則更進一步推動了這
工作，不僅成立了研究會，並且實行中西醫會診，醫院裡添設中醫，甚至
增加西醫門診，研究會和醫務機關互贈中西醫藥務學術報告，組織中醫到
醫院去參觀學習，像原縣的中醫張先生就到國醫和平醫院去學習接生，他們
治不好的病如關節炎就請教西醫，中醫處方治好了病人，也介紹西醫，例如
「竹瀝」治小孩百日咳，介紹到醫院看，西醫試用，也有成效。這樣過去被社
會保留下來的中西醫的門戶之見，在新社會裡可以保障大家生活和工作之下
，不合作的成見也消除了，中西醫團結了，共同研究怎麼爲人民服務的辦法。
所以，中醫整理其經驗，以現代的科學爲基礎，使之科學化，而西醫，
則豐富其經驗，吸收中國醫藥的成藥。這條路子，不僅在邊區，在現在是通
常的，即在全國，在將來，也是普遍適用的。

至於解決醫生問題，大會準備開辦中醫訓練班，提倡醫生帶徒弟，擴大
延安醫科大學的學生名額，準備招收海關畢業生約十分之一，給邊區做醫藥
生工作。其次就從開辦助產訓練班，訓練新的助產士，和改造民間的舊有的
接生婆。

藥材問題，擴充和改良中藥鋪，以爲人民服務爲主，大量的挖藥和製藥
，羣衆挖了藥做爲股金入藥鋪，來發展它。西藥和器材，是自己在困難環境
中用一切的東西來代替來創製，自己解決了一些藥品和器材，如葡萄糖，糖
準血清，水銀金合粉等藥材百餘種，另外的像圍邊視野鏡，血球昇降器，切
片機，牛角聽診器，都是自己造的。

羣衆開始講衛生了，醫藥條件也逐步改善了，但迷信鬼的心理，還
固地存在人民中間。反巫神和改造巫神的工作便成爲衛生運動中重要的一環
了。

巫神有舊社會留下來的廣泛的羣衆基礎，人民中間有着長期的迷信傳統
，反巫神，簡直說得上是一種艱巨的戰爭，而改造巫神，要比改造二流等
困難得多。但這種戰爭必須進行，巫神必須改造。反巫神主要是通過下面
種方式：

第一是通過廣大羣衆反巫神——到處在羣衆面前揭發巫神毒弄人民的欺騙伎倆，對巫神進行說服教育，使他知道沒有鬼神，他的那一套都是騙人的。巫神最初大半都說有神，各級政府負責同志用事實證明，再三地耐心說服，巫神這才轉變。巫神轉變之後，便延安就召集羣衆大會，讓九十九個轉變的巫神，揭發自己的罪惡，使羣衆了解。

其次就是依靠衛生醫藥工作，來進行反巫神鬥爭，——事實勝於雄辯，一切騙人的把戲，就怕事實，而事實對這些人是無情的。石錫三是四代祖傳的巫神，自己得了腹瀉病，當然照例請別的巫神來吊磚安瓦送鬼送神，但是沒有效果。不得已，乃請當地中醫崔岳瑞醫治，服藥後即痊癒了。當地羣衆就傳開：巫神到處給人治病，自己有病卻沒法治，治也治不好。以後有人再去找巫神治病，他說神上天開荒去了。巫神感信便一落千丈，從此當地羣衆就不再信神。

在定邊還有這樣的事：羊圈裏的羊，常常被咬死，遂請巫神來，他一送鬼送神，果然就不再被咬死了。迷信者又抬起頭來：你能說這是沒有神嗎？許多人無以為答。然而崔岳瑞不信，他每天到羊圈四週去研究，知道圈內四週有洞，有黑老鼠是牠咬死羊的。巫神不過是以水銀硫磺拌飯喂之，毒死了，自然就不會再有羊被咬死。在羣衆中揭發了這事實，到處傳開去，連附近的羣衆也不信神了。將神燒了，開展反迷信運動，成立衛生檢查委員會。這就是邊區有名反迷信的模範下掌村的故事。

常言道「鐵要打，賊要賊捉」，反迷信以巫神來反巫神最為有力，在羣衆大會上，在展覽會上轉變了的巫神，把他交給政府的三山刀等法寶，擺在臺法台上，巫神站在那兒對羣衆宣佈自己的罪惡，勸羣衆以後有病就請醫生。巫神轉變之後，對不肯轉變的巫神，和隱藏的巫神，他一向向政府報告，一面又向他們做說服工作，他是知道其中底細的。這樣到處不斷地有巫神轉變。他們自己又訂上反巫神公約，大家遵守。轉變了的巫神政府照顧他的生活，使之生產，以免從巫神又轉變為二流子。許多巫神參加了生產，有的還成爲村鄉的勞動英雄。

邊區由於經營繁榮，生產發達，運輸增加（在邊區的運輸工具，主要的有騾、馬、大車），騾馬也逐漸增加，改善牲畜管理，加強飼養，減少死亡，也是衛生運動不可少的一部份。首先是人畜分居——邊區的傳統習慣，和畜洞少，大半是人畜同居，不是居在一個窩里，就是人的窩和牲畜的窩相距

很近。人畜分居，掃除環境衛生的障礙。

蓬勃的醫藥衛生運動展開之後，有些什麼收穫呢？在這次文教大會上據顯地可以看出：到處大批湧現了衛生積極份子，爲人民服務的模範，有的半夜起來爲羣衆看病，有的爲羣衆看病竟忘記了吃飯，有的大夫親身跑二三十里外去給病人治病。農村里在這個運動當中，出現了很多的衛生模範家庭。個人的模範和家庭的模範，是運動中的骨幹，創造了村的模範。

衛生模範村，以新的整潔的姿態出現在人們的眼前，這樣的村鄉，已經不少了。像在大會上被獎的新寧縣的寶家灣村一變過去的不衛生和迷信的習慣。在環境衛生方面，過去村中只有五個毛房今年增到十四個，牛羊圈每天糞兩三次土，灶房清潔，碗裏有一定位置，窖洞內外每天掃地。飲食方面，不吃生冷，現吃現做，剩飯剩菜，必有布蓋上。個人衛生是每月洗一次被，三天晒一次，衣服常洗，男女常洗澡，男子夏天每天二十天理一次髮，冬天是每月一次。婦孺衛生方面，月經來時，改用溫水洗，以布和棉花墊之，不吃生冷，生產時改爲鴉片衛生，剪刀棉花都消毒過。這樣，由於講衛生的結果，今年這村就沒大疾病發生，有病也不請巫神。同時這一時期全村生了十二個娃娃就活了十一個。過去的，如吳旗一孩生婆，六十二歲，收生三十餘年，接了六十個，却只活了九個。這是一個長足的進步。

嬰孩死亡率降低，另一個原因是接生消毒衛生工作的改進，和助產訓練班的開辦。現在已開了十八個訓練班，其中十一個是公辦，七個是民辦公助（即羣衆自己籌劃訓練，公家給予必要的幫助）。訓練班的開辦和學員的招收的過程是很不容易的。開辦是廣泛向羣衆宣傳，羣衆了解以後，選其中積極份子，參加訓練，另一方面又吸收民間的老接生婆，吸收其經驗，加以改進，教授她們接生方法生理衛生知識。訓練的地點，根據具體情形，或集中到專署和縣，或分散在鄉區。

在開辦醫藥社方面是這樣的：全邊區根據已有的合作社組織，成立衛生合作社，設立診所，供給醫藥，創辦和發展中藥舖發動人民以藥材入股，現在邊區已有三百九十四個中藥舖了。因農村分散環境，有病不可跑出一二百里去住醫院治病，有時也不經濟，有些藥舖和衛生合作社就在附近找兩三個窖洞，設立小規模病房，使病者就近治病，家中可以送飯來吃，也節省了用費。

機關部隊等公家醫院和醫生，爲羣衆治病，在衛生運動當中，也起了不

少推動作用。邊區生齒每天以整個上午時間做爲羣衆門診，各衛生機關，半年內免費給羣衆治療二萬多人，住院的人也很多，醫藥是完全免費的，只是自帶伙食而已。去年國際和平醫院第一院的羣衆住院的，佔全院的百分之十五點八。另外還派臨時性的防疫治療隊下鄉，去年派了十一隊下去，僅在幾個縣，就治療了四千六百一十四人。因爲這樣主動地給羣衆免費治療，通過治療，被治好的病人，又推進了這一工作，如延安市一老漢，患了二三十年牙病，到五十歲嘴中無一好牙，而腫，經總衛生局治療，全部換上好牙，面部消腫，回復正常。他這才知道吃了不衛生的虧，回家後，即連忙買了牙刷，漱口，并且他家從此每人都有了牙刷，而且見了鄉戚，就勸人講求衛生。

在提高防疫治療上，也有了很大收穫，在邊區建設廳指導下，邊區光華農場，已試製牛瘟血清，先後到各處進行防治。治癒了病牛一〇三頭，預防注射了三〇一九頭，收到很大的功效，延安縣前年全縣死牛四二四頭，去年防治後，只死了九頭。

衛生運動中的這些成績，僅僅是一個初步的收穫。許多工作，如培養更多的醫生護士助產士，創製更多的藥品，爭取改造更多的以至於全部的巫神，都是有待于今後的努力。

三 新的教學方法

邊區的教育，講起來大概可以分爲三個時期，就是：抗戰前，這一時期教育的方針是正確的，配合了當時的需要而辦的；第二個時期是一九三九到四三年，教育工作走了偏向，表現在形式上，所謂要正規化，主張重質不重量，把一些學校合併，未注意到邊區是農村分散的環境，村與村之間相隔很遠，而每一村的人口也很少，從十幾戶到幾十戶不等，要求學生離開家庭，在學校起灶，非特不能使羣衆普遍入學，反而加重了羣衆的負擔，自然會引起羣衆不滿，認爲上學是一件苦事，甚至學生要政府去動員。在內容上是與羣衆的需要脫節，學的東西不是羣衆生活當中所需要的，比如學的是什麼太陽系，神經系統，呼吸系統，而不是日常所必需的自然常識婦女衛生等，這樣教出來的學生，不但對家庭沒法去幫助，就是自己也少有實際能力。而在文教工作者身上，擺着智識份子的包袱，脫離羣衆，沒有真正爲羣衆服務的決心，擺着智識份子的架子。結果呢，當然是不被羣衆所歡迎。文教工作者自己

則覺得工作做不通，頗爲苦悶，而羣衆則非自己所需要的教育，要去受教，也得覺是苦事。

這苦惱，不久，就被整風運動所掃除了。

一九四三年後，邊區文教運動開始走上正確的道路，這是第三時期。這方向就是：爲羣衆服務，從羣衆利益出發，通過羣衆路線。在一九四四年，有了更大的發展。

從羣衆的需要和自願出發，這是邊區文教工作的基本原則。這原則應用在學校教育上，就是民辦公助的方針，由羣衆根據他們自己的需要，由他們自己來辦學校，使他們把教育和生產運動一樣，看成是給自己謀利益的事。公家則加以幫助，像這樣民辦公助的學校在邊區已經有三百多個了。

民辦學校的創辦，有許多是由勞動英雄發起的。在邊區，勞動英雄實際上是「個村，一個區縣的人民領袖，他的發起，一面反映了羣衆的需要，一面也容易推進一定地區的工作。藍莊小學就是勞動英雄田二鴻創辦的，勞動英雄張振材也是城壕村小學的創辦人。其次，有許多是從變工隊的組織，發起而辦的，合作社發起創辦的，由識字組轉變而成的。

民辦學校經費的來源是從下面幾方面解決的：捐款，節約，開學田（大編集體開田，以此收穫爲學校開支之用），組織文教合作社，——有子弟者，以一定股金入股，由合作社去經營所得利潤，做爲股東自己子女的學費，這樣可以一直供給子女上學畢業爲止；變工隊的砍木柴來賣，做爲資金……

至于民辦小學的類型，根據各地具體情形，綜合起來，有這幾類：

- 一、米脂高家溝式——這類村學的特點是：第一是羣衆自己辦，自己管，自己教。高家溝老百姓，會幾次吃了不識字的虧，深感文盲之苦。早就想辦學校，由變工隊創議，由羣衆選出村幹部和積極份子五人成立理事會，管理學校，推全村識字多的高懷山爲教員，他的地由全村變工代耕。其次特點是學科教育內容教學方法等等，完全按照羣衆需要而定，教學時間分全日半日兩班，沒有一定年限，學到能寫會算就畢業。教學內容包括生產衛生政治常識等，大部分由教員編寫，採取歌謠故事等易于接受的形式。第三、學校成爲一村的文化政治活動的中心，通過它成立變工隊員讀報識字組，婦女識字組，與鄉村政府配合各項中心工作。學校又成爲全村俱樂部，供給村人來玩。
- 二、延安市橋梁溝式——由民衆中積極份子創辦和發動，經過政府積極

演導，得到公家機關贊助成立的。教員是智識份子幹部（稱導子），在寒暑中組織苦幹，與羣衆結合。按學生家庭體質，自己編寫實用的兒童愛好的教材。教學先從實際事物入手，然後再教認，寫，用，如先拿尺子量布，然後寫出。此布尺等字來教。另外還採用小先生制，集體教學和個別照顧相結合外，打破了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界限，開展成人識字教育，通過小學生及其家長，推動全村衛生運動，使楊家灣村成爲邊區最好的衛生模範村之一。

三、米脂楊家灣式——楊家灣村的貧農，他們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經濟上經過減租減息運動，窮人翻了身，自然就要求求文化，這一式的學校，是在識字班的基本上創辦的，完全是貧農僱傭自己的學料。其特點是教育對象包括兒童婦女成年人，而且是完全不脫離生產的，教員分早晚班，午班，和夜班進行。一切教學活動都和生產密切聯系。

四、新形式的過週學校——以鄰近的村莊（這些村莊大半是相距四五里左右的），由一個教員輪流到各村教課，學生不離本村，各村以有威望的人爲當村的學董，負責管理學校；在學生中各村也選有學習組長，幫助學董督促導學生上課和複習；教員一天跑兩村，每村每兩天能輪到一次。教員輪到這村，即由該村學生家庭管飯。其特點是：所有學生都不脫離生產，教學上無固定形式，教員在路上遇到學生隨時可以進行教育，這學校完全適應於分散的農村經濟環境。這類型的學校有許多好處：學生一面唸書一面仍可以幫助家庭，父母放心讓子弟上學，因爲不離本村，不出門，不出糧食，也不必做新衣服，同時也可以減少教員的數量。

五、舊式輪學——是由幾個村共請一個教員輪流在每家上課十天半月，然後再全體搬到另一家上學，輪到誰家，教員學生一起在他家吃飯，上課。六、家庭學校——這是以家庭爲主的家庭學校，以自家幾個娃娃吸收本村其他兒童成立家庭學校，教學按季節不同而有所變動，前面的舊式輪學學生脫離生產，後面家庭學校則可以與家庭生產密切聯系。

這些類型學校，特別對前面的四種，已日漸普遍而被採用。不管走那一類型，基本的方針還是民辦公助。在實行當中，要防止兩種偏向：其一是只重民辦，忽視了公助；其二是官辦民辦，這都不是民辦公助的真義所在，反而會阻礙了教育工作的開展。所謂民辦公助，首先是應在民辦自願的原則下來辦，而公家要主動地多方面的去幫助。

在根據羣衆需要和自願的原則下，邊區學校，不論是公辦，民辦，都有

了許多新的創造和辦法，最重要的是：

在學制上——打破了舊的一套，不定年限，學到能寫會算就可以畢業。不死的分班次，而是根據各種對象來劃分小組，不機械地主觀地規定上課時間，根據當地羣衆情況，他們生產情形，定早班，午班，晚班。放牧的時間，也不是墨守過去都市成規，按照暑假春假寒假禮拜來放，而是根據羣衆需要，在農忙時放假。

在教學內容上——掃除了教條主義的毒害，教的是羣衆需要的東西，如應用文，寫信，寫路條，記賬……；教各種生產知識，了解周圍事物和這些字如何寫法，特別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的勞動觀點，教員和學生一同進行生產，而且要學生回家時也幫助家庭生產。一反過去子女上了學，回家就輕視勞動，不幫助家庭，成爲新生的「二流子」（就吃好吃懶做的社會寄生蟲）。本來在家不肯聽話的學生，現在變好了，家長也喜歡了，願意送子弟上學。這就是教學與家庭生產相結合，學生幫助家庭，同時也改造了家庭。解決了學與用的脫節。

在教學方法上——先生教學生，課程是根據各個不同的對象出發，仔細研究每個入，甚至有的教員對每個學生都有詳細的記載，他的智力，他的進度，如是先生教授時可以得到許多幫助，不至於主觀地去注入了。教員不備注意集體，也同時照顧到個人，有的甚至進行個別教授。教學上，也創了新的辦法，用形象的形容，教，使學生易於記憶，如教「告」字，則對學生講「一口咬了牛尾巴」是「告」，這樣學生第一次講了，便不易忘記。對學生品性的教育，完全廢棄了打罵制度，採取說服的方法。例如一年長女生打人，先生即問其姊打她，不，答不，告以她年長就等於姊姊，爲什麼要打人呢？女生理解其道理，以後就不再打人了。另外還採用學生教學生的辦法，程度高的教程度低的。在學校生活中，提倡學生自治，從小便養成他們的民主作風，許多問題，他們自己就解決了。如某校中一女生偷錢，大家開會檢討，教員只是從旁幫助，說明偷別人的東西是不對的，女生在大家教育之下，承認了，她馬上就得到會場一致的歡迎，說以後不再偷了。

這樣的新式教學方法，不僅在校內它得到很大的效果，而且另外一個特點：是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結合。一個學校不僅僅是教書，同時它又是這一村的文藝運動的宣傳者，勞動者，組織者，這在衛生運動中運動中表現得特別明顯：學生放學回家，就幫助家中打掃衛生，組織識字組，優進

辦五十多條婦女兒童識字班學生，他們回去以後，組織了一千多人識字，米糧中學和島嶼小學學生回到家鄉，就組織了三十幾個兒童成立一個識字組。回校時，這些識字組學生組織一個合作社，買賣手推車，以所得辦學校。

邊區目前的社會教育主要的是識字組和多學。在平常是識字組到了農閒的時候，就成立冬學。現在全邊區約有三千多個識字組，有些村子，差不多全村的人，不論男女多少，都參加了識字組，像關中嶺底村，幾十戶人，全編在識字組內。有一個老太婆，並且做了識字計劃：最初沒有信心，準備十二天認一個字，結果二十六天中識了六個字，差不多四天就識了一個字，超過了計劃，自己很高興，影響了別人，大家情緒很高。識了字，他們又學會了唱歌，每逢有人參觀，和他們飯後閑談時，村子裏經常聽到他們的歌聲。識字組和多學成為邊區消滅文盲的有力機構，它適合於農村的分散環境，又適合農民的時間和生活工作，本身有這樣兩個特點：

一、學習與生產結合——男的鑿工組，女的紡織組，它本身也就是識字組，利用生產的空閑識字，學習服從生產，而不妨礙生產，多學亦復如是。編去冬學，也有教條主義的傾向，有些地方不照顧到農民冬天的生產，一定要他們上學，而且是集中在一起辦冬學，不僅妨礙了生產，並且浪費了時間。現在是克服了過去那一套，辦了新的冬學辦法：識字組和多學主要的以業務性質不同而劃分的，像把運輸的編在運輸組，出發時領導，在路上共同學習。放羊的、種小生食的、編在一起，這種就不妨礙他們的業務。教學內容也是根據他們的業務需要而不同，選擇他們日常生活中所常見習聞的字來教，這樣學習和生產就沒有矛盾，且進一步，可以幫助業務，如做小生食的，他識了字，服務方面就有了幫助。

二、實行民辦民助的辦法——就是會的不會的，父教子，子教父，夫教妻，讓中有九歲兒子提了父親的手，教父親寫字的。在年輕的夫婦之間，更是學習情緒不斷高漲，互相競爭，互相比賽，這樣一來情緒更高，進步更快。

邊區一百五十萬人口當中，文盲佔了百分之九十。毛澤東同志提出，要在五年至十年以內，消滅男子四十以下，女子三十五以下的文盲，這雖是一個艱巨的工作，但根據這一年來文教運動開展的情形來看，是完全可以用辦到的。但是，單單就現有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需與聯合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共同進行這一項任務。因此私塾和團結與改造民間教育者，使成為教育

運動中重要的一環了。

在邊區，由於羣衆需要，存在不少私塾和民間教育家，在邊區的私塾就有一百多個。這些私塾，有的的確好的，有的還很落後，好的私塾，他們自動地採用了新的課本，有的却還是用三字經千字文。有的教師，如高樓山就夠接受新的教學形式和內容，但也有的很落後，保持舊有的一套。對於這些私塾和民間教師，我們一方面是團結他們，因為他們在消滅文盲上還可起不少的作用；另一方面，要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提高他們，只要他們有微小的成功和進步，就加以表揚。在邊區這樣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里，事實的教育，改變了每一個人的面貌。邊區像一個大的熔爐，即連二流子巫神之流，在邊區熔爐里都得到轉變，改造。難道民間教師比巫神更不容易改造嗎？所以改造他們是完全可能的。然而改造絕不是遷就，誠如羅邁同志所說的一樣：「目前允許三字經存在，正是爲了將來消滅三字經」。

凡是能夠消滅文盲增加識字的機會，也不應放棄。有些地方在教堂里做禮拜，就進行識字，讀報。因為在分散的農村環境里，很不容易集中許多人，而在做禮拜時，利用其集中時，進行教育是很方便的。

開展普遍的教育運動，許許多多知識份子參加了這一運動，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時他們也在運動中得到了改造。在這次文教大會上，各地就湧現了許多知識份子的模範工作者。他們因為溝通了思想，真正有了爲羣衆服務的決心，覺得爲羣衆服務是一個人的光榮事業。自己有了這樣的決心，和羣衆格格不入的障礙，打破了，自然得到羣衆的歡迎和愛戴。像上面曾經提到過的陶端予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過去她是一個十足的小姐，什麼工作也做不好，自從她了解了要爲羣衆服務要和羣衆結合，擺脫了小姐的架子和生活習慣，從生活上和羣衆打成一片，給羣衆掃地，給羣衆看病（她爲了接近羣衆，給病人看病，她特別去學了一些初步衛生治療知識），這樣推動了衛生運動，使那個村成爲衛生模範村。許多教員，不特是先生，同時又是學生的母親，父親，他們像父母一樣的愛護學生，照顧孩子，注意孩子的生活。羣衆看見了非常感動，甚至安泰女小的一位家長感動得哭了，她看見自己小女兒在學校里得到這樣的愛護，過着活潑愉快的生活，而她的大女兒呢，則是在過去的舊社會里，因為沒有能够享受這種生活而悲慘地死了的。

在邊區的一個小學教員，他的職責，已經不只是教書而已，他要幫助羣衆工作，是羣衆許多羣衆工作的領導人，同時，又可以幫助政府推動各項工

作。

在教育運動里面，以至於整個文藝運動里面，即使有了方針，有了計劃，主要的還得靠幹部去實行。所以幹部教育問題，誠如高崗同志在大會上所說：是頭等重要。

邊區的幹部教育機構，有延安大學、醫科大學、抗日軍政大學、中學……每年培養出來的幹部遠不夠社會上的需要，不解決幹部教育問題，文藝運動是不易向前開展的。解決幹部問題，第一是提高現在的幹部，使工農幹部知識分子化，其次是培養訓練羣衆中的幹部，——這是展開文藝運動之門的一把鑰匙。

四 羣衆的文藝

邊區文藝運動的發展上，曾經有一個短時期走上偏向，這主要的表現在關門提高上面。這並不是說文藝不要提高，相反地，是要提高的。問題是怎樣提高，在什麼基礎上提高，不應該忽視了文藝運動是在什麼具體環境里開展，什麼對象。關門提高的偏向，正是忽視了這些。在那個時期也還有機關團體的藝術活動，他們主要的工作是對着工農兵，如邊區文協的民衆劇團。不過在文藝運動上，這不是主流，只是一個支流。

文藝爲工農兵服務成爲這一運動的主流，是在毛澤東同志所召集的文藝座談會以後，他在座談會上的講話，解決了文藝問題上許多久難於解決的問題，那就是：文藝主要的是爲工農兵服務。目前主要的工作是普及，但並非否定了提高，提高不是平空就可以做到的，要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文藝工作者從思想上解決了這個問題，進一步向工農兵結合了。放棄了過去所努力的不爲羣衆所需要的關門提高工作，而從事於羣衆所需要的文藝工作。

在另一方面，羣衆生長在新的社會里面，過着民主自由的政治生活，豐衣足食的經濟生活，一洗過去被壓迫的災難，因此羣衆本身自發地要求文化生活，文藝生活，僅僅政治經濟自由生活已不能滿足他們的慾求了。

羣衆要求的是能反映他們生活情感的新文藝，目前還是在「萌芽」狀態的新文藝作品，還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同時，封建性的舊文藝，在羣衆當中仍然有廣泛的基礎，佔着優勢，這些封建性的舊文藝，有的是可以吸收的，有的是有毒素的，都需更加以改造，使它適合於社會的需要，爲人民服務。

所以，開展新文藝，改造舊文藝，是目前文藝運動中的兩個重要的課題。開展新文藝，在目前的階級上，是以普及爲主，廣泛地把文藝普及到羣衆中去，適合羣衆的需要。羣衆有了文藝生活，增加了文藝活動，他們在實踐中，就自然會提高了欣賞水準和創作能力，對文藝的要求，也一定會一天天提高的。當然即使這種提高，嚴格說起來，也不過是一種普及。

在文藝工作者方面，從過去關門提高，轉而面向工農兵，進一步向工農兵結合。這結合，有別於過去走馬看花式的「作客」，有別於帶着優越感生活在工農兵中間，這些實際是和工農兵保持着相當大的距離；而是擺脫了文藝工作者的架子，參加實際工作，從思想上，情感上，生活上和工農兵打成一片，從而前變成爲工農兵行列中的一個成員。現在就有許多多文藝工作者，到工廠里去，到農村中去，到部隊里去了到合作社去，當鄉長，鄉文書，指職員，合作社秘書……他們在工作中也同時幫助文藝，把羣衆文藝推前一步。在實際生活中，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也更容易得到改造。這是個人方面。

劇團更是有計劃地分發到各地方去，前年每一個分區（專署）除它原有的劇團以外，上面都派了一個劇團去開秧歌，使劇團觀衆跳出狹小的城市圈子，較過去更有計劃地發展到農村中的每一角落，使一些劇團，轉而主要的爲工農兵服務。這就是「秧歌下鄉」。

這還不夠。還只是把文藝（目前主要是秧歌）給與羣衆，爲羣衆服務，而還沒有發動羣衆起來，自己動手。所以，去年的劇團有了新的方針，這就是：「鄉下秧歌」。不是劇團下鄉演秧歌給老百姓看，而是劇團工作者，分成許多小組，分工地，有計劃地去幫助羣衆自己動手，起來鬧鄉下秧歌。

文藝工作者進一步和工農兵結合後，大大地把羣衆文藝向前推進了一步，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作品的水準，使作品內容豐富，現實，深刻，有力，提出了當前社會上諸問題，也解決了這些問題。所反映的生活，是羣衆的真實生活；所提出的問題，是羣衆所關心的切身問題；這種作品，自然是爲羣衆所歡迎的，同時它就完成了藝術作品的社會任務。

像變工隊（小規模的一種互助集體勞動組合形式）在邊區剛提出的時候，有些地區，由於農民長期的是個體勞動，一時不易接受這種勞動組合的形式，一個區經過各種動員和說服，農民對參加變工隊還是沒有認識和信心，始終徘徊不前。但等到「動員起來」（動員以參加變工隊爲主題的秧歌劇）

在這個區演出以後，軍隊就自動地要求區長村長組織工隊。

一個秧歌團為什麼能超過這團的作用呢？因為劇作者和工農兵結合，體會了農民對工隊遲疑不前的心理問題，解決了這些問題，寫作過程中農民參加，寫好又讀給他們聽，徵求他們的意見——成爲和他們結合以後的產物。不僅劇作者如是，演員也是如此，演員爲了裝場一個動員，往往在農民中生活很久，觀察他們，體會他們，表現出來自然就真實。如「兄妹開荒」秧歌劇中，許多動作就是從農民那兒來的，有的則是經過他們修正的。

文藝創作上，也是採取同他們合作，在寫作過程中，或者作品完成後，都直接請教工農兵，讀給他們聽，艾青的「吳淞有」一詩，便是其中的一例。

文藝工作者進一步和工農兵結合，僅僅是開展羣衆文藝運動的一面，而且不是主要的一面。

主要的是：發動廣泛羣衆自己動手，用他們自己所熟悉的藝術形式，來表現他們自己的生活，創造他們自己的新藝術。政府方面，只是站在幫助的地位，如像上面所提的，派文藝工作者、劇團下鄉，從各方面來推動與扶助，計劃能做到每鄉有一秧歌隊，每區還有個中心秧歌隊。這些組織形式，根據各地的需要，和原來有的組織形式，如社火、道情班子、自樂班子、秧歌隊等等，在這些舊有的組織上，展開新的藝術活動。本鄉民對公助的方針，由羣衆自己起來辦理，領導、管理。這些教起、領導的人，多半是勞動英雄，民間藝人等。

這個運動展開以後，長期就辦沒了的民間藝人，得到他們發展才能的方面，長期被壓制和輕視的羣衆創作才能，也有了施展的園地。羣衆創作的內容，特別着重在注意作品的真實性，內容多半是實有其人，實有其事，有時甚至把真人真事編排到創作里去，從來不寫虛無的故事。這種精神，要求反映現實，是值得推崇的。但也有時候，不完全根據事實和真人，而加上和綜合一些別地方的人和事，這樣，又豐富了作品內容的典實性。

他們的創作方法，大半是集體性的，可分爲兩種，一種是：純粹是工農兵自己在一塊，三五個人，或更多的人，來湊故事，大夥商量。另一種是工農兵和知識份子合作，這些羣衆作家，並不一定識字，他們想好了故事，湊成句了，再由知識份子加以整理、潤飾。現在可以拿「放日報」這秧歌劇舉例來說，這是四個農民的集體創作，事先他們共同商量好了一個故事線索，用本

區的一件事實作爲題材，寫一地主不肯減租，經過說服教育才肯減租了。大家一想，還不完全。單肯減租是不夠的，減租以後，必須租租，於是加上地主不肯換約，佃戶不肯交租，換約後，佃戶繳了租子。又有人想起，地主不肯減租時，鄉長來了（鄉長是地主的親戚），地主想借鄉長權勢不減，鄉長却不肯什麼親戚是否，堅持要減，這樣又表現了新社會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此，全劇的反映了政府法令，不僅要減租減息，還要保證農民，值得主題更加完整了。至於人物的刻畫，言語的加工，是以最熟習劇中人物的人來創造，熟習地主的人談談地主的生活語言如何表現，但儘就由佃戶自己來刻畫表現。

像這樣的作品，正不斷從羣衆中產生出來，廣泛地得到羣衆的愛好和擁護。當然，這些作品，藝術上還很幼稚，粗糙，但內容上有豐沛的生命力，有無限的前途。

由於邊區羣衆文藝運動的開展，到處湧現出許多勞動詩人、作家，動手，像不識字的勞動詩人孫萬福，他寫了許多詩篇，在「放日報」發表，爲人所傳誦，如：

咱們毛主席比一個太陽，
比如東海上來一盆花，
照到咱們邊區人民是一家，
比如空中過來一塊金，
邊區人民歡到一條心。

用太陽，花，金的形象來比喻人民的領袖，表現出農民的熱烈的感情。又如移民英雄馮雲鵬的移民歌曲，也都爲羣衆所愛好，歌唱。至於出席這次文教大會的工農兵代表，更是充滿了才能的羣衆藝術家，比如練子鵬（接近一種快板的形式）專家拓開科，他出席文教大會，即席就編了下面的歌詞：

文教大會把會開，代表同志各地來，
所有的材料拿出來，民辦公助能解開……

拓開科這種有才能的民間藝人，是很多的。但現在因爲篇幅關係，不再多說了。

因為封建性的舊文藝——在邊區主要的是舊秧歌，在民間還流行着許多，全邊區將近一千個秧歌隊之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就是舊秧歌。這樣，改造舊秧歌這個人，來發展新秧歌，便成爲開展羣衆文藝的重要任務之一了。劉志仁式的秧歌，是改造舊秧歌的模範和先鋒。

什麼叫做劉志仁式的秧歌呢？

秧歌本來只是打場子，唱一點簡單的歌詞，恭賀慶祝之類的意思，沒有什麼內容，也沒有什麼表演的。劉志仁從一九三七年起就開始鬧秧歌，他是第一個把秧歌和革命結合起來的人，從那時候起，秧歌開始有了革命的內容。其次，他把秧歌和故事結合起來了。所謂跑故事，共分兩種：一種是地故事，人化裝好在地上表演各種故事；另一種是馬故事，騎在馬上表演故事，故事大半是歷史上的，如「三戰呂布」之類。地故事和馬故事，都只是表演性質，接近所謂「噱頭」那一種，沒有唱的。劉志仁把它和秧歌結合起來以後，豐富了秧歌的形式，使簡單內秧歌，開始走上了秧歌劇的形式，得到羣衆廣泛的歡迎。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羣衆對藝術的要求，就是簡單的秧歌已不能夠滿足羣衆的慾望，需要更充實的政治內容，反映他們鬥爭生活的秧歌劇了。羣衆甚至這樣說：「專看劉志仁的社火，不看又人的戲」。羣衆是嚴公正嚴格的批評者。

劉志仁的社火，產生了許多富有社會價值的劇本，如「救國公報」，「自衛軍放哨」……秧歌從此有了新的生命。

邊區大部分地區是陝西北部，這兒流行的另一種文藝樣式是：秦腔。改造秦腔，是改造舊劇中的一個重要部門。秦腔和話劇結合，以富有生命力的活的語言，代替那沒有生命的道白，表演手法上也加以現實的基礎。多半表現歷史上事件的秦腔，裝進了新的內容：反映現實鬥爭的生活，如「五里坡」，「兩親家」……這些劇便是改造後秦腔的一例。

平劇在農村，還有它的羣衆基礎，也須要加以改造。這改造，主要是偏重於思想方面的。平劇全部是反映中國歷史上的事實，而中國歷史，幾乎全部是統治階級所編寫的，是少數人的生活記事，廣大羣衆鬥爭生活是沒被談及的，或者是被歪曲的。這樣的一部中國歷史，它所能反映的歷史上的真實，也就很有限了。平劇所編歷史既如是如此，反映在劇本的內容，也就值得大大商榷了。改造平劇主要是從這兒入手，恢復歷史的真面貌。被統治階級小丑化了的真正歷史主人的羣衆，使他恢復本來面目，而讓那些舊文藝的好貨，也恢復了他的面貌：小丑。

「通上梁面」便是改革平劇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這劇里羣衆是中人，表現了羣衆的力量，羣衆是正派，丑角倒是那些高球，官衙內之流的人物。演技方面，吸收了許多話劇成份，舞台而生動而富於變化，演唱的時候，每一個角色，甚至跑龍套的，也表現出各個不同性格成份的內心情感的表現。至於民間的其他形式，如皮影戲，如傀儡戲……也都加以改造，給予新的內容，爲工農兵服務。

舊藝人長期生活在舊社會里，各種不良的傳統習慣和制度，養成了他們許多嗜好和不好的作風。鬧劇和改造舊藝人，主要是從思想上，政治上，對他們進行耐心的教育工作，使他們了解藝術不是爲少數人服務的，爲羣衆服務的藝術，才是真正的光榮事業。同時，在藝術上也幫助他們改造，改寫和創造出新的劇本，只有新的作品的不斷產生，才能代替以至取消封建性的舊的作品。在改造舊藝人方面，開始曾有人存着懷疑的心理，以爲這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事實却否定我們的看法。民衆劇團的李卜，是個很好的例子。他是一個老藝人，有了鴉片烟的嗜好，他聽到人家說他不易改造，他下了決心，戒了大烟，拋棄舊的一套，接受新社會的思想，他說在邊區沒有一個人不能改造的，連二流子都能轉變，難道我就不如二流子？結果，他以一個新藝人的姿態做爲代表參加了文教會，並且受到獎勵。

平劇工作者，也同樣得到了改造。由於羣衆對秧歌這形式熟悉，容易樂聞，容易接受，自己動手搞，故開展羣衆文藝運動，是以秧歌爲主，而秧歌又有它的特點，綜合了許多藝術形式：音樂，戲劇，舞蹈……秧歌運動展開以後，其他的藝術形式，也就跟着發展了。至於話劇，音樂，繪畫……也同樣發展，不過不是主流，不在這兒多說了。

五 大家看報大家辦報

在邊區發行的報紙一共有三四種：第一是帶有全國性的「解放日報」，在邊區發行的份數只佔一部分，新邊區性的有「邊區大眾報」（四開鉛印

週報)，四種分區報，(五日的或一週的，有鉛印和石印的兩種)，十一種縣報(大都是油印，週報，四開紙)。這些報，邊區內一共發行二一五〇〇份，平均每七十人就有一份定期的報紙。還有邊區部隊出的報紙二十三種不在內，部隊每班平均有三份到五份的定期報。第三種是黑板报和壁報，全邊區現在已經辦了六六八塊黑板报，至於壁報，每個連隊，機關，學校，工廠……都有。

不管是一種報，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代表羣衆的意見，大家看報，大家辦報。看報的人就是辦報的人，這樣就消除了編者與讀者之間的隔膜，讀者的意見能及時反映到報上去，成爲編者的意見。每一種報紙，在每一部門，在邊區每一個角落，都有它的通訊員，如「解放日報」，就擁有一千〇九千個通訊員，建立了廣泛的通訊網，各級幹部有責任組織通訊員寫稿。凡是羣衆有意見就可以即時反映到報上，做到真正的言論自由，報紙代表羣衆說話，工作不好的受到批評，工作好的得到表揚。

因此，用業工農通訊員，成爲報紙的方針，有許多通訊員，他們一方面看報識字，提高文化，一方面又爲報紙寫稿。現在全邊區一共有一九五二個通訊員，平均每七十個人，就有一名通訊員。

現在發展最快的是黑板报。黑板报是在鄉村活動中心地設立起一塊黑板，有的由鄉文化工作委員會辦，有的成立編輯委員會來編，參加編委的人，大半是小學教員，鄉文書，農民和土人等，從投稿到出版，純粹由羣衆自己動手辦的。小學教員和鄉文書常常是從旁加以幫助。

黑板报內容：主要是邊區和本地的消息，每期刊約二三篇文章，總共不過二三百字。黑板报周圍也是圍結了許多通訊員，如鐵塔城的黑板报，有三十名通訊員，全鄉一百八十戶，平均每家就有一個通訊員。而從通訊員的成份上看，富農二人，中農十三人，貧農十人，小商人三人，半工半農二人，可以知道這些通訊員是代表各方面的人，如此，各方面的意見都能夠反映到報上，可以引起這個黑板报，真正成爲羣衆的報紙。

這地的黑板报編委，覺得通訊員投稿更有經常性，必需有組織，遂成立了通訊小組，每個行政村都有一個小組，民選出組長來。規定通訊員，二十天投稿一次。這些通訊員，有的並不識字，他們怎樣投稿呢？其方法有二：一就是請識字的人代寫條子投稿；二是請話給編委，由他們代寫登出來。如果寫了話，而不登怎麼辦呢？有一次羣衆要表揚該鄉一個小學教員，搶了話去，恰巧這期是那個小學教員編的，就讀把它登出來，投稿的人說識字的吃虧，誰見沒有？他馬上就托人補寫在上面了。羣衆有言論自由，這樣做了，編委什麼人去了誰他。

欄目的形式有各種各樣的，有數文的，有歌的，有小調的……

小區最受羣衆歡迎，如牆上黑板报上，就有這樣一篇投稿：

延河水，響又響，
婦女識字插模範，
中莊有個高清秀，
洋芋渠有個基金蘭，
高清秀是個範，
一個識字一百三，
基金蘭，真能幹，
又織布，又紡線，
才空還把書來唸，
能文能武兩雙全。

羣衆運用黑板报成爲批評和表揚的武器，把作好事的人登報表揚叫「上黑板报」，做壞事要批評的叫「爬黑板报」。黑板报成爲鄉間的輿論陣地。如有兩個人在黑板报前爲小事亂打架，羣衆即說你們再鬧給你們「爬黑板报」，當時兩人就不打了。一個政府工作人員，工作不好，羣衆要給他「爬黑板报」，他知道了，馬上改正了。這一來，黑板报又成爲羣衆督促政府的輿論機關了。

黑板报一方面也表揚好人，如賀天才積極生進，報上登了：「賀天才家中新做紡車四架，彈毛弓一個，現在正在做手拉機。勸員全家男女紡織，成爲家庭紡織工廠。」

賀天才看見了，更爲高興，更加積極。另一方面，黑板报也幫助政府推動了整個時期的中心工作，如像上面所談的衛生教育諸項工作，黑板报把本村，別的區，別的鄉消息公佈，刺激了本村，推動了本村的工作。

這是一種新型的報紙，它的發展前途是無限的。

在大家辦報大家看報的方針下，邊區的報紙真正做到了羣衆的喉舌。

在讀者方面，全邊區組織了一萬多人讀報，所讀的是「解放日報」，「羣衆報」和各分區的報。讀報的人，主要是小學教員，鄉文書，和鄉裏識字的人。邊區農村環境，很不容易把讀者集中起來，同時農民很忙，讀報時也得照顧他們的時間。讀報組大半是與生產相結合的，如勞動組織的鑿工隊，磨粉班(鑿工隊的另一名稱)——同時也就是讀報組，在勞動閑餘的時間裏，既不必從新召集人，也節省了時間。還有許多識字組，同時也是讀報組。

組。有的時候利用農民教徒，到教堂做彌撒的時候，人未到齊，尚未開始彌撒...

讀報已成爲邊區羣衆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一頁。他對報紙爲什麼會發生興趣呢？因爲報紙上所登的，大部份是他們自己的事...

報紙在這方面，不僅盡了宣傳的作用，同時又起了組織作用，完成了一個命革的報紙所應負有的宣傳和組織的兩大任務。

六 一幅輪廓畫

從這次文教大會上來看邊區的文教運動，那內容是極爲豐富而多采的，非這篇短文所能盡述的。這兒所接觸到，僅僅是羣衆方面的文教運動...

就是已經接觸到羣衆方面的文教運動，也還是很概括的，很簡略的，只是一幅輪廓畫而已；並且這幅輪廓畫仍舊是粗枝大葉的...

不過從這個運動中，我們可以看出：在一切爲了羣衆的總方針下，邊區最近二年來大大的發展了羣衆生產，得到很大的顯著收穫...

這就是陝甘寧邊區文教運動的一幅輪廓畫，及其遠景。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編後記

這一期合刊，最初是原定在二月底出版的，但因爲在二月二十二日這一天下午，本報編輯部因事停刊，以致原定出版時間不得不推遲...

(上接第一三六頁)

的東西，這種脾氣是從家庭里帶來的尾巴，少爺小姐，嬌生慣養，呼奴喚婢，隨指氣使，這種習氣帶到學校里便倒置了...

第三是不肯承認錯誤，改正錯誤，有的同學講究面子，明知自己錯了，多方設法掩飾，雖經具體指出，死都不肯承認...

第四是祇知自己，不知別人，有的同學只要他們幫助自己，自己從來不關心他人，自己有一門科目不及格了，便埋怨起來...

這裏，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們反對個人主義，並不是否定個人利益，而是個人利益必須從團體利益中求取。我們爭取自由，但是反對自由主義...

附錄 邊區文教大會的幾項決議

關於開展羣衆衛生醫藥工作的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邊區文教大會通過)

邊區二屆二次參議會批准

一、邊區人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獲得解放，在支
 戰爭發展生產的運動普遍展開以後，衛生運動就
 爲羣衆文化運動中的第一等任務。邊區人民由於
 過去長期封建統治的遺毒，直到現在，還遭受大量
 疾病死亡的嚴重威脅，這一個威脅如不加以克服，則
 人民的解放就不能完全達到目的，同時對戰爭與生
 產的努力也發生嚴重的影響。抗戰以來，邊區衛生
 醫藥部門對此雖曾作了一些努力，但全面的、有系
 統的工作，還未開始。大會爲此嚴重喚起全邊區各
 方負責同志的切實注意，要求他們迅速動員一切力
 量，爲撲滅邊區大量的疾病死亡而鬥爭。

二、要撲滅大量的疾病死亡，第一項重要的工
 作就是普遍的開展衛生運動。根據調查，邊區人口
 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都是可以預防的傳染病；因喝
 生水，吃腐敗的或霉爛的過期的食物而引起腸
 胃傳染病（傷寒、痢疾、吐瀉水病等），因嚼帶
 不潔而往往引起的嬰兒破傷風，因常年不洗澡不洗
 衣服被而往往引起蟲子所傳染的各種病（如疥癬
 癬癩、回鹲熱病等）尤爲普遍。相反的，凡是注意
 衛生的村莊（延市閭家場，新寧家等）和家
 庭（如米脂常樂鎮，新寧傅老太太等）就可以避免這

些疾病的襲擊，因此全區各界人士，必須針對各地
 具體情況，利用一切機會和方法（如小學校、幹部
 班、自衛軍、讀報識字組、黑板报、歌謠、戲劇、
 秧歌、書報、畫圖、展覽、展覽會等）進行對人民
 的衛生教育。在普通衛生方面，主要是多吃營養品
 ，不喝生水，不吃死氣飯，食物防蠅，滅蠅滅蛆，
 修好井水窖，人畜分居，修廁所，開大窗，通煙筒
 ，勤洒掃沐浴洗衣晒被等等。在婦孺衛生方面，主
 要是多辦接生訓練班，普遍改造接生婆，產婦生產
 時要鋪着，墊的灰要炒過，帶菌的奶子要煮過；
 生產過要睡下，多休息，多吃營養品，月經帶要
 用淨紙或用開水洗淨的舊布片；要注意兩性衛生等
 等。爲要普遍的衛生運動，需要動員一切縣、區、鄉
 幹部，小學教員和中小學生勞動英雄和其他積極
 分子的份子，駐軍和機關人員都來學習衛生知識，
 並成爲衛生運動的領導者和宣傳者。而教育家庭婦
 女使能了解衛生常識，尤爲工作中的中心環節。在
 工作中應防止強迫命令和形式主義，並須注意發現
 、創造和表揚一個人、二個家庭、一個村、一個鄉
 、一個區的範例，用以推動全局。在運動開展之後
 ，即應根據具體情況，加以組織領導，以求持久。

三、醫藥工作是衛生運動的後盾，也是推廣衛
 生反對迷信的有力促進者。邊區現在只有部隊、機
 關中有西醫，農村中只有中醫，好壞合計約有一千
 人；藥品也極中藥多而西藥少，此外就是巫神的
 勢力範圍。因此必須動員一切部隊機關中的西醫除
 爲部隊機關服務外，兼爲羣衆服務，盡量給老百姓
 看病和住院，並於必要時組織巡迴醫療隊下鄉。必
 須動員和幫助一切中醫和一切藥舖認真爲羣衆服務
 。西醫應主動的與中醫親密合作，用科學方法研究
 中藥，幫助中醫科學化共同反對疾病死亡和迷信巫
 神，中醫應努力學習科學與學習西醫，公開自己的
 秘方和經驗，技術好的醫生尤應幫助教育技術差的
 醫生進步。必須有計劃的研究、培植、採挖和製造
 邊區土藥及製造其他外來中西藥的代用品，在可能
 條件下組織羣衆的醫藥合作。對於熱心羣衆服務者
 有成績，或有新創建的醫藥工作者或衛生醫藥組織
 ，應該予以充份尊重和支持，他們的經驗應該予以
 推廣，對於工作中有缺點者，應予批評，以求改進
 。應該大量培養衛生醫藥人才，擴大醫科大學的邊
 區名額，開辦全邊區與各分區的中醫訓練班，助產
 訓練班與司藥訓練班，各分區中學應設衛生醫藥常
 識課，並提倡醫生和各種醫藥工作者多帶徒弟，以
 解決邊區醫藥幹部的巨大需要。

四、邊區的大量巫神，主要是邊區文化落後以
 及醫藥缺乏和衛生教育不足的產物。因此，要消滅
 巫神的勢力，首先要普及衛生運動和加強醫藥工作
 ，否則就是主觀的空想。採取脫離羣衆，強迫命令
 的單純行政手段，是無濟於事的。但巫神的存在也
 促進了人民的死亡，並增加了衛生運動的困難。因

此，隨着衛生運動的展開，應該在各地推行救濟運動，抓緊適當的時機（如巫神的敲詐害命，和醫生的治病救人的事實）進行喚起羣衆在自覺的反抗運動與巫神坦白運動。巫神之以酷刑治病人死亡者，助應快查究辦。至於一般的反迷信運動，則應依據羣衆的覺悟與自願進行之，以免與羣衆相對立。

五、各分區應根據地方具體情況，作出衛生醫藥工作的具體計劃，列在地方施政計劃中，以求在數年之內達到若干衛生項目的普遍實施，到一個區有一個能治病的醫生，一個藥舖與幾個會辦法接生的助產婦。為此各縣區在邊區政府統一規定的制度下，應進行人口與出生死亡登記，及疫病報告；各醫務機關及醫生應進行疾病登記，以作為執行衛生工作的根據及衡量工作成效的尺度。關於開展衛生醫藥工作的經費，除由邊區政府統一籌劃事業費與獎勵金外，各地應在羣衆自願的原則下（必須是羣衆自願的，絕對不准強迫），提倡振振財、振振舉式的衛生互助金辦法，以為鄉村保健事業的基礎。

六、衛生運動的開展和醫藥工作的加強，有賴於各方面的通力合作與首長負責，因此，幹部思想的打通就是這一工作的決定關鍵。大會要求黨政軍民學各方面各級的幹部和邊區各階層的人士，都能響應毛主席和高崗同志的號召，切實糾正過去一切不重視衛生醫藥工作，不願作衛生醫藥工作，對衛生醫藥工作必要的人力物力不予解決的錯誤態度。無論何人何時何地，只要有可能，都應該親自動手參加或幫助衛生醫藥工作的進行。今後各分區各縣、區鄉村的衛生醫藥工作，是否深入，是否有效，將成為邊區政府對各地考查工作成績的重要標準之一，各級、國衛生部門對地方衛生醫藥工作幫助的大小，亦將成為職司考在工作成績的標準之一。直接負責衛生醫藥工作的同志，尤應重視自己的神聖崗位，加強自己為羣衆鞠躬盡瘁的精神，以求邊區大羣疾病死亡現象能夠迅速減輕和消滅。

關於培養知識份子

與普及羣衆教育的決議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邊區文教會通過）

邊區二屆二次參議會批准

（一）邊區幹部教育中培養知識份子的任務與羣衆教育中掃除文盲的任務，由於戰爭形勢和邊區建設的發展，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更為重要了。抗戰以來，邊區的幹部教育與羣衆教育，在規模上都較前有了大的發展，但在領導上曾經有一個時期受過教條主義傾向的嚴重妨害，直至整風運動以後，領導工作中的這個傾向才被糾正。另一方面，多數幹部和學生亦受整風運動中已廣泛認識到知識份子與羣衆互相結合的需要，而人民羣衆由於近年的生產發展與生活改善，也開始認識到學習文化的需要。因此以正確的方針和廣大的規模，來有系統地培養邊區的知識份子，掃除邊區的文盲，現在不僅完全必要，而且有了相當條件了。

（二）培養大量的邊區知識份子，是今天邊區的頭等任務之一。各級領導幹部必須了解：要完成長期建設邊區的任務，沒有一萬到幾萬個高小畢業至中學畢業程度的本地知識份子，是不能設想的，要達到這個目的，須經過提高現任工農幹部的文化和培養與工農相結合的新的知識份子兩個方法。在提高現任幹部方面，凡不識字或文化水平過低的同志，均應分別經過各中學地幹班、幹部訓練班、幹部文化夜校、幹部讀報通訊等，在兩年至三年內一律消滅文盲，達到至少能看報聽報的程度。已識字的亦應努力學習，達到具有高小畢業至初中畢業的程度。以求自己的工作能力與時俱進而不落後。在培養未來幹部方面，應確定應大及其相當於高中之預科除訓練一般外來知識份子外，並須多收各分區畢業生，按實際情況與需要予以一定時期的教育，使為邊區服務。各分區中學及其地幹班均應在提高質量的條件下擴大數量，使區鄉級現任幹部及能升學的高小畢業生有學習的機會。完全小學中的高小部份，在文化發展地區是屬於所謂國民教育範圍，但在邊區目前情況下，高小亦負有幹部教育的一方面任務。各縣應盡量設法克服高小學生入學的困難，其畢業後的出路，原則上應由學生本人或其家長決定，但應盡量爭取其在地方服務或升入中學。邊區各級領導機關，對於所屬在職幹部的文化教育與高小以上的各級學校教育，均須以首長負責親自動手的精神認真領導，按時檢查工作的執行狀況，使培養知識份子的要求在兩三年內達到一定的成績。

(三) 各級幹部學校應徹底肅清教條主義的惡習，這就是說學校的教育內容應從邊區工作的實際需要出發。中等學校以上應按其性質培養出了解政策並具有相當實際工作技能的人才，同時必須注意一定的必需的知識水平，各中學尤應加強實際結合的文化知識與科學知識的教育。現在有些學校由於各種原因所形成的教育效率下降的現象，應該迅速克服。脫離實際脫離羣衆的惡習，對於任何學生和教職員都是應予繼續嚴格糾正的，但我們所要求培養的知識份子，應該不僅具有為人民服務的滿腔熱忱與實際技能，並且具有一定水平的現代科學知識。

爲了提高各學校的質量，有關的各級領導機關應該負責督促這些學校及其主要負責人（包括主要教員）使其與實際保持密切聯繫，了解本地工作的具體情況與各個時期訓練幹部的具體要求，以便在編制與課程上更切合實際，某些課程並應由有關領導機關直接擔任。高小、中學和師範預科，其招生標準應依具體情況規定之，但各級學校的程度一般應大致銜接，其升級與畢業考試應認真舉行；各中學和高的課程，雖因各地需要不同須有伸縮，但應分別取得其上級主管機關的同意，學校的生產主要應由學校專門部門負責，學生的生活應不防礙其必要的每年至少九個月的學習時間。學生課外活動（如學生會工作、羣衆識字、衛生教育、戲劇工作等），亦均應不防礙學習，並應有目的地配合輔助學習，使成爲學習計劃的一部份。

(四) 羣衆教育應從邊區羣衆的實際需要出發。在目前邊區情況下，羣衆教育的中心任務就是掃除廣大成人失學兒童的文盲，提高其文化與政治覺悟。羣衆目前迫切需要的是起碼的讀寫算能力，而

成爲羣衆生活中最大問題的生產與衛生兩項知識則應構成讀寫算的主要內容。羣衆教育的形式，也應適合於邊區環境。在邊區農村分散，勞力不足，羣衆學習要求尚未普遍的條件之下，爲了廣泛地發動羣衆學習的積極性，廣泛地發動羣衆與政府合作解決教育中人力物力的困難，邊區的初級學校應以民辦公助的村學爲主要形式，其年限與學制視各地情況決定之。不強求整齊劃一，以不誤生產爲原則。爲了便於貧苦兒童尤其是成人的學習，所有小學校（包括完小）均應按照需要與人力設立早晚午班晚班，並由有能力的學生組織校外識字組，在冬季應着重組織冬學。在沒有學校的地方，則應發動政府機關、駐軍、合作社、縫工隊及其他熱心份子領導成立識字組、夜校、冬學等等學習組織。組織上述各地形式及其他適用的形式，各縣應按照具體情況，計劃若干年內首先吸收學齡兒童與青年男子之大部分，及其他學習積極份子（如勞動英雄、及若干青年婦女，一般婦女首先學習衛生），都能參加一兩學習組織，然後逐漸推廣，在若干年後，做到彼時十歲至四十歲的人口之絕大多數都能識一千字以上。

(五) 掃除邊區文盲的任務是巨大而艱難的，但在領導骨幹和廣大羣衆積極思想，大家動手，通力合作之下，是可以實現的。羣衆教育不但應該服務於羣衆的需要，而且應該經過羣衆的自覺自願，依靠羣衆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因此必須廣泛採取已見成效的民辦公助和民辦民辦，領導方面，必須首先在思想上作風上肅清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拋棄脫離羣衆的頑固命令辦法。民辦學校成立之前，應先在羣衆經過必要的組織，以求積極份子的出現

與多數羣衆的支援，又須適當解決教員與經費問題，而教員能否在教學內容與方法上體現羣衆的需要，尤爲一個學校能否獲得羣衆擁護的關鍵。民辦必須公助，教員材料經費，都須要政府的幫助解決，而更重要的則是方針的領導，這比領導公辦的學校更要細心。民辦也不是不要公辦，一般完小的初級部和好的公辦私小不但仍應存在，且應予以加強，使在民辦學校中起核心的作用。至於識字組冬學等，則民辦公助適應的範圍更廣。無論學校或識字組，爲了吸引羣衆參加都須要親自看到學習的利息，因此都須建立獎學，培養典型，表彰模範，以便由小而大，由少而多，平均主義和急性病是有害的。總之，只有在符合羣衆的需要與自願的條件下羣衆教育才能達到目的。

(六) 爲實現上述邊區教育建設的任務，必須切實解決教育幹部問題。各級領導機關對於教育幹部必須在政治上、學習上、生活上予以親切的關心，並對他們加以必要的尊重，提高他們的工作能力與熱情，同時並應動員與徵詢有教學經驗或教學能力的知識份子到教育崗位上來，以充實與加強各級教育行政機關與學校的幹部。各級政府應責成所屬各級學校依其性質有計劃地分別培養各級教育幹部，以應日益增加的對於教育幹部的廣泛需要。各級學校應與羣衆教育的教材應於一年內全部完成。最後，各級教育行政領導機關本身必需予以加強，提高行政效率改善工作作風，如此方能貫徹正確方針的執行，引導邊區教育達到巨大的輝煌的成就。

與多數羣衆的支援，又須適當解決教員與經費問題，而教員能否在教學內容與方法上體現羣衆的需要，尤爲一個學校能否獲得羣衆擁護的關鍵。民辦必須公助，教員材料經費，都須要政府的幫助解決，而更重要的則是方針的領導，這比領導公辦的學校更要細心。民辦也不是不要公辦，一般完小的初級部和好的公辦私小不但仍應存在，且應予以加強，使在民辦學校中起核心的作用。至於識字組冬學等，則民辦公助適應的範圍更廣。無論學校或識字組，爲了吸引羣衆參加都須要親自看到學習的利息，因此都須建立獎學，培養典型，表彰模範，以便由小而大，由少而多，平均主義和急性病是有害的。總之，只有在符合羣衆的需要與自願的條件下羣衆教育才能達到目的。

關於發展羣衆藝術的決議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邊區文教大會通過)

邊區二屆二次參議會批准

一、反映人民生活指導人民生活的藝術，已證明是一個偉大的教育武器。新的藝術，乃是新的政治、經濟所必不可缺少的伴之一。藝術工作有普及與提高兩方面的任務，而在邊區目前情況下，由於羣衆藝術運動的薄弱與藝術工作者與羣衆聯繫的薄弱，普及更是一個主要的任務。

雖然邊區羣衆及其藝術工作者，已經爲了教育自己的地位在鬥爭中創造了自己的藝術，但由於過去二時期的被重視不，藝術在羣衆中仍未得到充分發展，宣傳封建迷信的舊藝術在羣衆中（主要是農民）中仍佔着相當的優勢，所以迫切需要用大力在羣衆中發展新藝術和改造舊藝術，使新藝術在邊區建設中，發揮它的力量。

在一九四二年文藝座談會之後，藝術工作者已開始爲藝術與羣衆的結合而奮鬥。但要在羣衆中完全以新藝術代替舊藝術的陣線，要在藝術工作者中完全以聯誼羣衆的陣線代替舊藝術的內容，還需要一個長時期的和各方面的巨大的努力。加強對於藝術工作的領導，團結一切藝術工作者，來達到上述的目的，便是今天邊區藝術建設上的中心任務。

二、藝術的新舊，基本上決定於其能否爲羣衆的利益服務，能否爲羣衆的戰爭、生產、教育等服務。因此，凡能正確表現新生活（與新社會的歷史）的藝術，都應得到發展，反之都應受改造；同樣，凡能正確表現舊生活的藝術，也都應得到發展，反之也都應受改造。

要在羣衆中發展新藝術和改造舊藝術，不是簡單的依靠輸入的外力和行政的權力所能奏效的，主要的必須在羣衆中扶助新力量的生長和輔導舊力量轉變。羣衆是歡迎或能創造新藝術的，這不僅表現在部隊生產中，而且表現在以劉志仁爲代表的農民的生活中。但又必須承認，舊藝術與羣衆的不可忽視的歷史，也不僅表現在民間和其他職業性的舊藝術的活動中，而且表現在廣大農民的春節娛樂或平時娛樂中。因此，今天發展邊區新藝術的任務，必須從兩方面同時進行，即一方面在新基礎上發展，一方面在舊基礎上改造。

羣衆藝術無論新舊，戲劇都是主體，而各種形式的歌劇尤易爲羣衆所歡迎。應該一面在部隊、工廠、學校、機關及市鎮村中發展羣衆中的話劇和各種歌、新樂隊等活動，一面改造舊秧歌、社火及各種遊戲。其他藝術部門也是如此。應該一面在羣衆中發展新文學（工農通訊、牆報、黑板报、新的唱本、故事、新的春聯等）、新美術（新的年畫、木刻、剪紙、新的連環畫、畫報和畫冊、新的洋片等）、新音樂（新的歌謠、新的故事等）、新舞蹈和新的藝術組織（俱樂部、文化室、文化台、文化棚、展覽會、晚會等），一面通過團體和教育羣衆中舊有的說書人、故事家、雜耍、皮紙的婦女、小調家、鼓子書家、吹鼓手等，使之爲人民的新生活服務。

在這個方針下，邊區羣衆藝術在一個時期的努力以後，應該呈現一個嶄新的面貌：無論在新基礎上發展，在舊基礎上改造，都應在一個時期的努力以後，應該呈現一個嶄新的面貌：無論在新基礎上發展，在舊基礎上改造，都應在一個時期的努力以後，應該呈現一個嶄新的面貌。

關於發展羣衆讀報辦報與通訊工作的決議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邊區文教大會通過)

邊區二屆二次參議會批准

隨着邊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報紙在羣衆中的作用已日益加強，最近一年來，全邊區有一萬多羣衆加入讀報組，各分區許多村鎮都已辦起羣衆讀報組的組織，工農通訊員已發展到一千人以上。這些活動，已經證明是發展民主，幫助領導，改進工作，和舉行文化的極有力武器。凡是有了讀報組和通訊員的地方，那對政府政策法令和上級機關就容易貫徹，生產衛生教育各項工作就容易展開，而且可少開多少會，凡是有好的通訊員的地方，那項工作的情況和經驗就容易了解，而且宣傳在政治和文化上就能得到迅速的進步。因此，更大的發展這些活動，並使這些活動真正充實起來，向各地已經發現的模範看齊，是今年邊區羣衆文化工作的任務之一。爲此，特決定：

(一)各地尚未進行讀報的識字班、縫工隊、合作社、婦紡組等，在可能的條件下，均應組織讀報組，各地區鄉幹部、小學教師、工作人員及一切文

上發展，或在舊基礎上改造的，其內容是新的和豐富的，其形式也都是新的和豐富的。藝術能與人民的生活相協調，而藝術的內容與形式也自相協調，這種新時代的藝術，那時將在羣衆藝術生活中獲得完全的統治。

三、發展邊區羣衆藝術運動，基本上就是發展與改造農民藝術。秧歌社火爲農民藝術最普遍最重的一種形式，它的活動主要在春節，春節是羣衆藝術的節日。不論是秧歌、社火或其他形式，也不論是在春節或平時，舊基礎既然尚佔優勢，舊基礎上改造就成爲一個十分必要，同時也十分嚴重的任務。

舊基礎上改造與新基礎上發展分不開的。首先必須加強羣衆藝術中已有的新基礎，因爲這些新基礎還很薄弱，經驗還不完全，他們還需要在羣衆的實踐中經受更多的考驗，所以在已有的新基礎的地方必須加以鞏固，扶助它們的發展，增大它們的作用。同時，盡力在舊基礎上進行改造。在沒有新基礎的地方，尤應着重在舊基礎上改造。改造應從思想入手。改造的對象有急緩、輕重、難易之分，必須先改造急而後及於改造的，必須擇其要者。改造的對象中又必須區別民間舊形式與統治階級的舊形式，羣衆中業餘的藝人和藝術團體與職業的藝人和藝術團體。但對一切舊藝術、舊劇人、一般的都必須採取改造的方針，而不能採取簡單的打倒的辦法。

發展或改造農民藝術均應注意到今天邊區農村的實際條件，特別要注意不脫生產與羣衆自願的原則。藝術上的民主必須在組織與創造各方面充分發揚出來。這並不是減輕對羣衆藝術活動的領導，而是真正地加強領導。各級領導者和各文藝團體應該密切合作，根據各地情況，在羣衆中佈置工作，培養典型，組織競賽，推動全局。政治上與藝術上的指導幫助尤爲重要。應該供給和教給各羣衆藝術團體與民間藝人以新的或改編過的唱詞和劇本，發動和幫助羣衆自己動手創作，提高和獎勵他們多演新

劇教育，他們去改造他們藝術組織內部的生活和廢除不良習慣。這一切對發展羣衆藝術運動有決定的作用。

四、隨着普及工作的發展，就必然要相對的和逐漸的提高。提高的任務主要應由兩個力量來完成：其一是部隊、工廠、學校、機關的藝術活動；其二是各級政府所領導的專門藝術團體和專門藝術工作者的活動，而羣衆中有特殊藝術才能的人物，亦應注意發展培養，使大家參加提高工作的進行。邊區戰士、工人、學生和機關人員中的戲劇、文學、美術、音樂、舞蹈等活動，對專門家來說當然是普及工作的一部份，但比之一般農民則代表着更前進的力量，因此各主管方面和各藝術團體應給予更大的注意，更多的鼓勵他們從事藝術的學習、表演和創作，除了他們本身範圍內的活動外，並應組織他們利用機會（春節、假期、市集、廟會、集會等）在附近羣衆中進行工作，成爲推動羣衆藝術活動的據點。

延安和各分區（以及可能的縣）的劇團，文工團，其他文藝團體與專門的藝術工作者是指導普及工作的支柱，他們負有羣衆教育與幹部教育的雙重任務。爲了教育，他們首先需要學習——政治的、藝術的與實際生活的學習。他們應經常和下層藝術組織保持聯繫，了解工農羣衆各項藝術活動的情況，予以幫助和領導，尤其是供給他們以各種創作或演出，並視需要與可能與他們進行聯合表演，或集中其積極份子進行短期訓練，一面教育他們，一面向他們學習。分區與縣的劇團，應適應各地地方時期工作的要求，經常下鄉，尤其要注意利用廟會、馬大會等演新內容的戲，並應視需要與可能進行其他各種文化藝術工作。一切藝術工作者，均應深入羣衆，他們對於羣衆的了解愈深刻，則他們對於羣衆和幹部可能做的貢獻才愈大。各有關的領導方面應該重視上述這些藝術團體與藝術工作者的工作，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給以細心關切，使他們步伐一致的配合羣衆的努力，爲發展藝術與邊區建設的遠大前途而奮鬥。

化工作者，均應積極組織這個工作，在工作中應該注意防止形式主義；應該細心研究羣衆的興趣所在，以便引起羣衆參加讀報的熱情；應該使讀報工作與羣衆的生產、衛生、識字、娛樂及各種日常問題的解決相聯繫，並應注意培養羣衆中的積極份子，以便使讀報組織成爲能夠持久的團結羣衆推動工作的核心。

（二）在各個市鎮或人口較集中、識字者較多的村莊，創辦真正起作用的大衆黑板报，並使之真正成爲當地羣衆有信心的善於表揚而慎於批評的輿論機關，成爲推動鄉村生產、衛生、識字、娛樂、傳播新聞與改革舊習的武器，爲了更能發揚羣衆的積極性，在可能條件下，各地黑板报應由羣衆主辦，政府則盡量予以幫助指導（而不是粗魯的或官僚文章的干涉）。暫時尚不能辦到這一步的，亦應吸收當地羣衆中的公正積極份子組織編委會，經常搜集羣衆的意見，以求不斷的改進，直至完全交由羣衆接辦。

（三）以區爲單位，普遍的組織工農通訊學習組。這個工作主要是以區級幹部及本區內熱心的鄉級幹部與小學教員爲基礎。在適當條件時亦可吸收羣衆中的積極份子參加。區級幹部應把工農通訊工作與自己的業務研究，工作報告，文化學習及讀報工作結合起來，把參加工農通訊工作當各人的業務工作之一。

（四）上述各項工作的開展，均要求我們的報紙能夠增加份數和加速發行。因此紙廠及其主管部門應從各方面力增加報紙的產量，以便各種報紙能夠按照需要與可能增加份數，並以分區及縣爲單位，統一籌劃調劑，保證每個讀報組、通訊組與黑板报編委會都有它所需要的報紙。在發行方面，政府主管部門應努力加強邊區各地通訊站的效率，各縣均應建立負責的發行登記制度，並負責規定縣區報紙的運送辦法，以便加強由縣到區鄉的發行進度。

關於工廠文教工作的決議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邊區文教大會通過)

(會次二屆二區邊，過通會)

一、邊區現有公私大小工廠八十八個，職工一萬二千餘人，目前數目雖小，但這是一個最有發展、最富於生命力的，足以引起一切變化的力量。他們的文教工作，是邊區文教運動中的一個極重要的，但是尚未被重視的問題。爲了立即結束現在的停頓或自流現象，各工廠首長及有關主管機關，應澈底檢查工廠文教工作一次。

根據本決議原則訂出切合實際的計劃，並在主要職員中指定專人負責擔任此後文教工作的一切領導事宜，邊區抗聯會與邊區文化衛生機關亦應協同各主管機關督促幫助文教工作之進行。

二、現在工廠中文育半文盲還佔多數，各廠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務，就是在兩年至三年內堅持掃除五十歲以下的一切工人職員與事務人員中的文盲(五十歲以上者依自願)，並提高他們的政治與技術水平。爲了學用一致，最好由各主要機關幫助各廠自編切合實際的、包括政治與業務的文化教材，爲了適應學習者時間、程度、進度不一致的情況，最好把學習單位儘可能分散縮小，多設收廢中知識份子擔任教員，並舉行工廠工的小先生辦法，以補不足。對文化較高的職工，則應按照需要建立各種研究業務與繼續提高政治文化的

自修組織，並儘可能保持其經常性。

三、工廠簡報是推動生產、加強團結、發揚民主、教育羣衆的重要工具，應實行全廠職工大家辦、大家看的方針，糾正少數人辦、多數人不管，或工會辦、廠方不管的現象。簡報的編輯應與廠大羣衆保持密切聯繫，在工人中廣泛建立通訊組織，鼓勵與幫助大家積極寫稿。其內容除着重表揚模範、鼓勵積極份子之外，並應提倡具體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以改進生產管理與勞動態度。簡報的文字應短小精悍，應該把目前許多枯燥空洞的大報，改造爲生動活潑的小報與黑板报。

四、工廠的藝術娛樂活動，兼有教育羣衆、調劑生活的兩種作用，亦應予以適當的重視。在目前人力、物力、時間、材料均感缺乏的條件下，應多

(一)機關學校的簡報爲了達到推動工作、發揚民主、加強團結、教育羣衆的目的，應成爲大家共同、大家看的報紙。其編輯應在機關學校首長指導之下工作，並與機關學校羣衆(工作人員、學生與雜務人員)保持密切的聯繫，以便使簡報更善於表揚，又勇於批評，既提出問題或爭論，又供給答案與討論。簡報的形式應該克服大報的缺點而學習黑板报的優點，短小生動，一目了然。雜務人員無論有無單據的簡報，均應注意組織和幫助他們向寫稿，應使簡報更善於幫助他們學習文化的的作用。

(二)在機關學校雜務人員中，文盲半文盲佔着很大的比重，各主管方面應糾正漠不關心的態度，負責於兩三年內掃除他們的文盲，使獲得必需的實用的寫字技能與閱讀邊區羣衆報的能力，這對於提高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及工作質量與效能，對於增強他們的信心，和加強機關學校各種人員的團結上都是有益

提倡簡便有益能吸收多數人參加的形式(如歌謠、短劇、球技等)，並鼓勵職工大家動手進行劇本、歌曲的編製與各種娛樂方法和工具的發明創造。爲加強工廠與農村的聯繫，各工廠並應在不妨礙生產的條件下，對附近居民舉行宣傳性的和聯歡性的遊藝活動。

五、職工的健康是工廠最寶貴的和易受損失的資本，應認真加以保護。工廠的工房、廚房、宿舍、廁所、水井等建築設備，應力求合於衛生，對易染職業病的生產過程，應力求改善工作條件，又鑒於多數工人尚缺乏衛生習慣，應加強工人的衛生教育，各工廠應由其總務部門會同工會，勞動保險部及醫務人員組織統一的保健機構，負責領導、研究、計劃及檢查全廠的衛生保健工作。

關於機關學校文教工作中幾個問題的決議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邊區文教大會通過)

中共中央辦公廳與邊區二屆二次參議會批准

的。在教育中應採用一致的原則規定他們的課程內容，並編訂的工作及生活中環境教材，並應應編務人員了解時事的要求，進行讀報工作，藉以加強其政治學習，俾能和社會共交在學習上，為適合業務人員業務、年齡、程度、時間均不一而足的特點，一般都可採取集中領導、分散教育的辦法，並提倡知識份子經過教育與工農交朋友，及業務人員學習互助的小先生制，以解決教育問題。

(三) 娛樂工作為調劑生活與恢復疲勞所必需。目前大部份機關學校的娛樂工作，都太簡單而不普遍。應利用多種多樣的娛樂形式，吸收各種愛好不同程度不同的同志都參加，對業務人員更應派專人幫助推動，組織球類和歌、舞、奏、樂、平劇等小組，使娛樂活動成為羈繫性的東西。

(四) 機關學校的衛生工作，應照決執行預防衛生、消毒、營養、體育、環境衛生與飲食衛生(營養與消毒)；凡今天的條件可辦得到的，都應在不鋪張不浪費的原則下力求改進。機關學校的醫務人員，應與總務部門配合，親自動手發動家室，造成羈繫性的衛生運動，尤應加強業務人員的衛生教育。

關於加強榮譽軍人教育及娛樂活動的決議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邊區文聯大會通過，邊區二屆二次參議會批准)

(一) 為了使回到後方的榮譽軍人便於在後方條件下繼續為戰爭與革命服務，提高他們的文化與政治是必要的。為此，應加強榮譽軍人學校教育工作的人力與領導，使現在學校工作的殘廢幹事及休養的殘廢同志在兩三年內提高至會黨會算的程度，並能在政治學習上得到及時的長進。估計到榮校學員的勞動生產能力的

具體情況，應請當地政府協助，發給一部份教育經費，並由出版機關贈送或廉價供給他們以各種通俗讀物與教材，對於分散在各機關學校及農村中的榮譽軍人的教育工作，各有負責部門亦應注意加強之。

(二) 為了使榮譽軍人得到更多的精神安慰，應注意給他們參加娛樂活動的一切機會。各文化團體、機關、學校、部隊，於舉行娛樂晚會時，應注意邀請當地榮軍參加，對新出前方也來回榮譽軍人，應儘可能由主管機關組織歡迎晚會。在榮軍月內，延安與邊區各地政府及機關，亦應儘可能組織招待榮譽軍人的晚會，並分派劇團、歌隊、電影團等到各地方及院及榮校進行慰問。對榮校的日常娛樂活動及其「血莊」劇團，應給予物質上與技術上的幫助。

(上接九八頁)

可用物資，均為作實努力，是如出一轍的。小國內閣由於敵國議會的支持，今後無疑是更加堅決執行決戰的決策。

三、解散翼贊政治會，另組法西斯的新政黨。翼贊政治會成立於一九四二年五月，是東條在太平洋戰爭初期勝利的條件下面組織起來的法西斯議會，它把絕大部份的議員都網羅在內，使他在議會中無條件地支持政府的戰爭政策。可是由於翼贊會包括了各派黨派份子，內部矛盾和意見分歧並不能根本消除，從最初成立時就帶來了這個弱點。在目前盟國攻勢日趨威脅之下，日寇需要總動員所有國民來繼續揮汗的時候，舊的機構已經不適用了。因此，在這次議會閉幕後，組織新黨呼聲更加擴大，我後翼贊會特別組織了一個委員會，研究組織「新黨」的具體方案。而小內亦表示贊成建立新黨，並聲明準備將大政翼贊會，暫留壯年團改為政府「行政的補助機關」，以免妨礙組織新黨。從小內支持「新黨」的組成，即然可以看到這個「新黨」在新條件下更能打開時局與更徹底廢除翼贊會，而願使他們作為執行決戰的總動員。

所以總動員來說，且這這次議會，一方面固然暴露出日寇在軍事失利上所受到的種種困難，但同時也可以看出日寇企圖作最後決戰的準備。誠然，日寇所遇到的困難，在今後盟軍的積極打擊下，是無法加以克服的，但並不說我軍就可以坐待勝利的前來。因此，在敵人最後的掙扎的時候，我們就應該注意敵人對於大體決戰的準備與不準備，任何協商和平之手段的政治欺騙，如果我們不使迅速走向死亡的道路，那末就應該迅速切實準備反攻，機鋒敵寇的大舉決戰的準備與政治的陰謀。

書評及其他

從兩本三思樓月書論士大夫階級的生活態度

蘆 蕪

筆者在「新劇」所發表的「夢與幻中的內容」一文裡，曾就兩本三思樓月書（「鬼戀」、「荒謬的英法海峽」），論述了在徐許先生作品裡包含的思想內容的實質。筆者的意見是兩部份，原來打算分為兩篇文章；因此，在前一篇文章裡僅僅包括了我的意見的第一部份。原就海德爾斯文一文，但當前的現實生活裡，感觸迫，最要緊的東西很多，把太多的氣力花費在這些編織夢幻的「才子」們身上，也並不怎樣合算；因此第二部份意見也整理還沒有寫出。

照理說，要論述到一個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現的思想內容時，最好是從作品到人，從人到作品的全面去理解；因為一個作者的生活方式也就決他思維方式的體現。要全面的去理解一個作者的作品，也就是要從作品中看出一個作者底思想，情緒的變革與發展，要看出他這種變革適應了什麼實際的思想歷程，他可能的發展方面。但徐許先生的作品筆者讀得並不多，因為作者僅有兩部出版「月書」，每一部缺乏多餘的錢去購置這一類的書，更沒有這一份「便閱」與「即讀」的心境去欣賞這一類高蹈的藝術。因此，單是憑着「鬼戀」與「荒謬的英法海峽」兩書來論述作者的思想內容，恐怕也難於十分週到。

我之選取「鬼戀」，「荒謬的英法海峽」，不單是因為三思樓月書裡，這兩本流行得最廣之，最重要的是在這兩本書裡顯露出作者的思想、情緒以及他的理想與追求。在「鬼戀」的後記裡，作者更直白的表示了：「我忠實於我的技術，在於這些的是我更忠實於我的思想和感情。」因此，選擇就這兩本書來論，想來不至於對作者的思想有歪曲和塗抹的地方。

在徐許作品裡究竟包含着甚麼樣的思想內容？簡單的就是「虛無主義」，「個人主義」的思想；這種個人主義並不是在神權教條中討，要求人的解放，性靈的解放那種帶着進步意識的思想。他底「虛無主義」的思想也不是屠格涅夫的英維巴扎洛夫身上，那種否定一切，不承認一切權威，在當時得着進步意識的思想；一方面是新時代的進展早已超越了前二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彼得羅夫；另一方面徐許的「虛無主義」的思想也有他不同的內涵，或者說是有着中國社會所形成的特殊屬性。

在作者的思想上，無疑地，猶時時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會留下影響；這在「荒謬的英法海峽」裡表現得最明白。他期望在一個與世隔絕的海島上，去培植一個自由的王國，這雖是自由，平等，沒有階級，沒有官僚，沒有錢，沒有戰爭。作者呼這理想化的王國叫「浪漫的革命與建設的社會」。這些理想他實行者呢，都是：「……一個海盜的血統，與一個社會主義的教育」。因此，我們就不能單純的看到這種理想在故事外而白日夢的外衣，而且應看到作者是在傾述着他的空想的理想。

這種理想並不新奇，因為這不過是近幾個世紀以來西歐一些宗教家所說的關於「烏托邦」社會的空想小說的變遷，最多不過是編添一點變化的故事和渲染一點瑰麗的幻覺而已。

上面的討論是顯而易見的，在徐許的作品中，「虛無主義」，「個人主義」以及空想社會主義給予作者的影響；但作者的「虛無主義」，又並不侷限於上述這些思想；在上面我會提到是帶着中國社會的特殊屬性；也就是我們所最着重指出的一種屬性。

三思樓月書在今天之所以能够有某種程度的流傳，徐詩的思想能够部份的感染青年，（據一個在學校唸書的朋友告訴我，讀譯外書的同學中，很多人是喜歡看三思樓月書的），我們不能把它孤立的看成只是文字技巧能够迎合他們的口味的問題，正如我們不能把徐詩的思想看作是個人人的思想一樣。（最近渝市某報有人指出：徐詩作品的得以流行是因為剽竊外國作家的原故，此點固亦不失為因素之一。）

我以為貫串在徐詩作品裡的思想，正是舊的士大夫階級那種逃避現實，玩世尚個人主義的思想，如果勉強杜撰一個名字，無妨叫做「中國式的虛無主義」。這種思想在士大夫階級的身上可以說有着久遠的傳統，對於今天的知識份子，這種思想仍然有着不可忽視的影響。從他們這種思想的方式表現到他們生活的方式上，就是觀世生活，玩世不恭的生活態度。

在士大夫階級裡，可以說一直是分割成兩種不同的類型，這就是廟堂之土的儒家和山林之士的道家。這種「玩世的個人主義」可以把「老莊」「莊」為首的思想作代表；從表面上看廟堂之土和山林之士是相對立的，道家思想在表面上似乎也受到統治階級的冷淡，但實際上不僅是「廟堂之土」和「山林之士」相互轉化，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也同樣地被統治階級作為聖賢巨下，鞏固統治的方法。譬如漢宣帝教訓他的兒子元帝說，我們漢家自有制度，難用儒道兩家，你個重儒學，非把漢朝弄壞不可。後來元帝果然把漢朝弄壞了。自從魏晉以後，士大夫階級更高度的發展了道家的玩世的思想。之後加上外來的佛教的虛無思想的影響，更使這種玩世的個人主義覆蓋着虛無主義的外衣。從魏晉士大夫一直到明末的「公安」、「竟陵」，都代表着這種傳統。他們一貫的對待生活的方式，他們的一套適應環境的辦法：或者是山林隱逸，或者是濳諷諷諷，或者是急流勇退，或者是明哲保身。照他們的說法就是把自已的思想與情感，寄託在一個虛無飄渺的「境界」，從現實逃避開來，躲藏到「自我」或「精神領域」。

士大夫階級這種逃避現實，玩世不恭的個人主義，這種成長於中國土壤上的「虛無主義」，是絕不同於巴扎洛夫的虛無主義的。這種中國式的虛無主義，常常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表示在自我擴張「唯我」的精神狀態，這就是所謂的「獨與天地相往來」。另一方面表現在「忘我」的精神領域時，就是「與世相遠」的主觀唯心思想。在這種思想裡，包括着很多市儈的內核，因為他們的「清談諷諷」，或者是「急流勇退」都不過是為了要「明

哲保身」。雖然他們愛以「山林之士」，「居士」，「山人」的姿態出現，但他們隨時可以插身一變而成為「廟堂之士」。作「山林之士」時也許還「清談諷諷」，一朝附風攀龍，馬上就會變成歌功頌德的「廟堂之士」。

在「鬼戀」和「荒涼的英法海峽」裡所表現出來的，正是這種士大夫階級的思想；因為在今天的中國社會，產生這種思想的社会基礎依然存在（自然，今天知識份子所表現的和舊時士大夫階級有別）。我們知道中國知識份子的出身，多半是農村的小的土地佔有者，或者是城市的小行產者；這種玩世的個人主義正是上述兩種人最容易有的思想（尤其是第一種人）。他們用不着汲汲於各利的追逐；他們希望從主觀的支想中來尋求心靈的安適。在「鬼戀」中，作者一再表白了這種思想。

「我歷過了這人世，嘗過了這人生，認識了這人心，我要做鬼，做鬼。」

「我可還要冷觀這人世的變化，所以我在這裡扮演鬼活者。」這裏就正表現出對人生的厭倦，對生活的疲乏，希望從現實生活裡逃避開來「冷眼旁觀」，這樣就是想生活在現實世界中又不為現實生活所苦惱，生活在人世間又不為人世間的痛苦所纏縛，不必對「人世的變化」負任何責任。

這種對生活的厭倦與疲乏轉到逃避現實，觀照生活的根源在甚麼地方；這就因為他們一方面憎惡現實的醜惡，一方面又缺乏那種意志的強力去抗拒醜惡和醜惡的方量。既不甘於為跟着腐腐的力量墮落下去，也缺乏那種面對困難，戰勝困難的勇氣。這很像高爾基「在人間」裡面所寫的：

「……我的心中有兩個人，一個對於卑鄙醜惡的事情，知道得太多了，因此，多少有點懶惰；他被每天所發生的慘事所牽擾；因為對於生活，對於人們的態度，是不確定而懷疑的，對一切人，對自己都抱着悲憫的心情。這個人想離棄家屋，靜靜的讀書生活，又夢望着修道院，森林中看守小屋，波斯，以及什麼地方市外的守夜人之類的職務，儘可能想丟人少的地方，儘可能想離開人世……」

是的，他們就成天的想着離棄家屋，靜靜的讀書生活，或者是隱藏在一個「墳墓」的地方，去「冷觀」人世的變化；或者是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孤島上，去實現自己的「理想」。雖然這些人還多少保留有一點「明辨是非」的認識，憎惡醜惡的正義感，但他們已經失掉了「有所為」的決心，失掉了堅

維持着保衛真理的勇氣，對真、善的理想失去了追求的力量。

這種消沉、麻木的狀態如果繼續下去，對罪惡和不義的憎惡漸漸淡了，對正義和真理也完全失去了信心和希望。他們漸漸和現實生活隔絕開來，避免在精神生活上和現實生活發生糾葛。自欺欺人地想把自己閉在一個主觀的小天地裡，爲了避免由現實生活激起的苦惱、憎恨，退而在自己心裡製造出一些海市蜃樓的幻境。

這些人常常會辯解他們初衷是要否定庸俗、習慣，反抗因襲的歷史傳統；結果却不可免的被歷史傳統俘虜了去。他們迷惑着、苦惱着、追求着，至少對現實還有感覺，還有懷疑，他們相信自己已厭惡自私與虛偽的。但積而久之，他們不再關心人類的命運，歷史的行程，成天計較的却只是一己的苦樂。尤其是在這種消沉、麻木形成一種生活態度以後，他不僅會以爲這是一種合理的生活態度，希望傳染給別人。甚至，他們會覺得那些面對現實，滲透人生的戰士只是十拿九穩的傻瓜，也就是「鬼戀」，「荒謬的英法海峽」的作者所鄙視的爲世俗生活所纏縛的人。他們會認爲生活的道路就是從現實的戰鬥生活退避下來，退到自我的「精神領域」。外界儘管醜惡，自己大可不必管他，因爲自我的精神生活，還保持着一己的高潔。在這些漂亮的外衣下面掩藏着一些甚覺真實的內容呢？他們追求着一條阻力最小的道路，用逃避現實來掩藏自己的怯懦。從這種局部和現實相苟且的企圖，走到完全和舊社會相妥協的道路。

這種玩世的個人主義，對於自己是逃避現實，追逐享樂；對於自己以外的一切事情呢？是懷疑一切，否定一切。對於那些追逐私利，在虛偽的泥沼中生活的人，他們固然也表示鄙棄；但對那些執着於生活，辛勤的在爲人類謀取幸福的人，他們却又像「哲人」似的，表示出自己的清高，自詡着可以超脫這種市俗的桎梏。保持着對於一切的虛無觀；他否定一切，這不光是壞的一面，惡的一面，對於善的一面，好的一面，也同樣加以菲薄。這倒不是他對一切都已經明白，而是想用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態度來遮蔽事實的真象，隱蔽自己的真象，自稱「歷遍了人生」的「鬼戀」的女主人不是以這種宣教者的姿態出現嗎？

其實，在這種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態度下，他們混淆了對於是非，美醜的辨別。對於醜惡的東西，他們缺乏真摯的憎惡，對於美善的東西他們也缺乏衷心的愛好。「人生不過是一個大舞台」，人們也不過是一種不得已的

「應景滑稽」者而已。他們相信的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這種直覺的哲學。這就養成了他們唯唯諾諾的遷就態度；是非不明，愛憎不清，對於有所爲上有所不爲缺乏堅持執着的態度。「一切的問題，原只有是和與非的兩難答案，他卻想追尋是和與非以外的第三者。」他們既不願隨波逐流，又不願認識自己，反執醜惡，既不願做一個被動的奴隸，又不願做一個主動的革命者。他們看不清自己的力量，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獨立自主的自我被廢棄。他們喪失了對於生活的突擊力量，喪失了戰鬥的主動性，結果，就常常聽到他們自怨自艾的抱怨着「一方面不見容於統治者，一方面也不見容於人民大眾，永遠扮演着悲劇的角色。」

作爲一種病態的傾向，在這裡我們分析了這類作品中思想內容的實質，掘發了這種病態的根源。今天這一些含毒的作品，雖然有着某種程度的流傳，但我們確信這不過是文藝運動發展的河床裡，激盪起的某種漩流，它必然會被澎湃的主流所沖激、新換波是完全可以預見的。在「鬼戀」的後記裡，徐許先生擔心他的作品會是煙塵裡噴出的油煙，是一種有損於人的廢料，如果我們公平的說，煙塵製造的廢料雖然有損於人，但它還沒有意識地要去損人。這些傳播的「月書」就不僅是損人的廢料，而且是作者意識地要用這種思想去感染人，感染一些年青而純潔的心靈，這就簡直是行騙的走方郎中在販售着包裹着毒衣的毒藥了。對於這種不能用藝術的良心去說服的人，我們要用筆去誅伐，我們不能目擊着年青的飢渴的心靈去吞食這些含毒的食糧。

新的中國在孕育，在成長，舊的士大夫階級所憑藉的社會基礎也正在分化，在崩解；現實的戰鬥生活已經顯示了中國的知識份子，今天，除了和龐大的人民大眾相結合以外，任何其他企圖都是行不通的死路。要想能身似的騰着自己的眼睛就以爲可以逃避現實，始終不過是一種夢想，現實生活會嚴峻的擊碎他們的好夢。

解開時局的鑰

龍恭

讀「民意」雜誌一至十期

世界政治的潮流是和平，是民主，是各階級各黨派的聯合進步的政治，一切民主國家都希望於戰後世界的和平安定繁榮，以便能蘇復在戰爭時期的破壞，而提高人民的生活幸福水平。任何國家的法西斯政治，都要破壞這種世界和平，任何國家的反民主傾向，都要使其國內戰亂不安，這樣的國家，必不能勝身於民主的世界，也更不能為民主的世界所容。美國經濟界和輿論界對中國民主團結的迫切，對反民主及團結的批評，就是這種民主潮流的一個潮流。

讀「民意」雜誌第一期張君勳先生之「確立中國國民對於國際系統之關係及其地位」一文，頗具同感。張先生認為中國目前所以被列為四大強國之一，「謂為外交上之同盟相應，同氣相求也，而國內政治上之實至名歸不可也」，其引英國泰晤士報之言說：「論中國不足為強國，即在數十年之內，因戰後之解放，中國獲得內部團結，與經濟開發，尚不足為強國也」。中國不足為強國，這在今天國士日趨情形下，我們自也無可申辯。如何始足為強國呢？如何才能真正行收復遼、收復失地，使河山盡光呢？泰晤士報的意見：是內部團結，經濟開發，亦即張先生所稱的「可知內政上既著成效，而後

外交上成爲強國，自爲程序之當然者」。團結，經濟與內政，綜合一句話，應該便是民主。

左舜生先生的「努力與思索」（同前）一文中，具體揭示五點：一、和平統一；二、民主；三、文化進步；四、經濟開發；五、現代國防。而這五點之中，民主是最根本的條件，「欲實現和平統一，則必須民主，不民主則成民主而成份不高，則和平統一之實現，必增加困難或減低其可能性」。這就是說不民主則必不能統一，欲統一必先行民主。而文化、經濟之提高，「係指文化和經濟在提高的過程中，即得以民主的態度出之，否則即令提高，不獨於民主的實現無益，或反而成爲實現民主一種更有力的障礙」。這就是必須先有民主的文化和民主的經濟政策，如思想自由，學術自由言論自由，經濟自由，而後才能有民主的經濟和文化的提高，不然便是如德日法西斯民主式的提高，終只能供少數軍閥財閥藉勢橫行斷送國運而已。至於國防，左先生引述了甲午之役中國海軍的失敗和英人勸導之話：「海軍者，現代文明國家所關之者也，不若眼於根本，而徒着顧於枝葉，決無是處」。而後慨嘆着：「五四運動底前後，去今已二十五年了，當時明白的中國人已高呼着張先生（民主）張先生（科

舉），可是到了今天，要在中國實現真正的民主仍有待於全國人一致努力」。這也就是說：無現代文明國家的民主政治，必不能沒有現代文明國家的強大國防，軍事實機關於政治。

陳啓天先生闡述民主政治之真義說：「民主政治所要求的理想政府，不是神聖政府，也不是全能的政府，而是人民政府，所謂人民政府，即是爲人民所有，由人民所治，並爲人民所享的政府」。在近代民主政治尚未出現以前，國家與政府兩個觀念，每每易於混同。身居政府的人，常常以爲政府就是國家，如像法國路易十四所說「朕即國家」一樣，要人民用服從國家的忠誠去服從政府，並且服從政府中的人員，即人民也多以忠君就是愛國，服從政府就是服從國家，分不清君與國，也分不清政府與國家。到近代民主政治出現以後，始能認清政府與國家，嚴格劃分。在民主政治下，政府也是國家，但國家必須機關，但政府的形式須依人民的意向而規定，政府的人員須依人民的意向而更迭，政府的政策須依人民的意向而決定。所以人民在政府之上，而不在政府之下，人民直屬於國家，而非直屬於政府。一權力雖是政治上必要的一種工具，但欲使政府不濫用此工具，致禍國殃民，必須人民將最高的權力或最後的權力，即主權，拿到自己手裡。人民有了政治的權力，然後才能有政治的自由。人民沒有政治的權力，便無所謂人民政治自由。所以近代民主政治運動，從一方面看，是人民向政府爭自由的一種運動，從另一方面看，則是人民向政府爭權力的一種運動。第六期，「民主政治的哲學問題」上論。若人民有了國家的最高主權，政府在其下產生，並向它負責，這就是民主的國家。

如果人民沒有這種主權，政府不向人民負責，那就不是民主的國家，這種論議是非常明白的。

綜合張先生、左先生、陳先生的意見，都認為民主政治的內容除了進步之外，還得同時注意秩序。左先生說：「爲急於求治，莫備了必遂的步驟」，張先生說：「第一內亂頻仍之國不能有良政治；第二，主權不統一之國家不能有良政治；第三，政權之更迭不能於和平狀態行之者不能有良政治」。陳先生則指出「民主政治只以秩序爲手段，而不以秩序爲目的。換句話說，民主政治不但要有秩序，而且要有進步。秩序只是進步的必要手段，而非政治的唯一目的」。政治進步路途上的秩序，對於人民說來，確乎也是有利的；在真正的民主了的時候，這當也不成其爲問題，如張先生所說：「近代國家一方實全國人民以服從政府，他方界人民以批評與進退政府人物之權利，均爲言論自由，議會討論，選舉時對政府之信任或不信任。一方有中央政府以統一全國，他方則許人民有地方自治之權，俾得自處理其政務且收因地制宜之效。一方則遵守法律爲人民之義務，他方則訂法律出於人民代表之自由討論。一方人民有不得反抗政府之義務，他方則人民有批評之權利，有思想之自由。……」這一方面，也就是張先生在另一篇文章「大愛國心」，第二期中所揭明的「公平競爭」的「政黨道德」。必使競爭之各黨派建立於公平基礎上，絕不假手於武力，亦絕不許有任何防範限制的法令，坦白諸諸民意而定進退。這樣才是真正的民主秩序，變而不亂的真諦。

陳啓天先生又指出：「民主政治所以能獲致政治進步的方法，通常約有三種：一爲輿論制度，二爲代議制度，三爲多黨制度」。這就是說民主政治的基礎必須保障言論、思想、學術的自由，從而獲得輿論，必須保障集會、結社、旅行、通信、身體、居住、購學、論政等等的自由，以鞏固代議和多黨制度。沒有以上的自由，就不是民主，沒有保障以上各種自由的政府，就不是民主的政府。

張中府先生在「我們爲什麼要民主與自由？」一文中（第六期），擴大以上諸種自由，認爲還要有職業自由，及免除匱乏，脫掉恐懼，不至賦閒之自由，就是經濟自由。這也是很重要的，人民由於沒有職業和生活之保障，就不能自由地參與政治活動，而便少數上層份子得以操縱其間，使雖有民主之名，而仍無民主之實，這正所謂「洞見此點，乃提出上述之經濟自由，以爲補救作職守取之目的之一。劉清揚先生在「婦女對憲政的認識」（第九期）一文中指出的最後解放區普通婦女擔任縣長，區長，部長的事實，也可以用來說明這點。因爲在那些地方，婦女們正和男人們在同等的條件下，職業保障，政治自由，所以才能發揮那種勃然的民主活力的。

今天不能不說實現民主政治，完全要看我們的決心，一切條件都成熟了，人民也是有力量的。張中府先生對此有很精到的意見，他說：「憲政應在憲法之前，以便憲法有事實的根據，不應憲法在憲法之後，幻想社會作機械的變革」。因爲內外的推進，中國的民主運動，顯而易見已經非山口的階段走上實行的階段不可了。他以為人民各種自由權利固然重要，但如無憲法保障這些自由或權利，實屬空談，然後才可以談民主，那就要要求一方面說只是自欺，就給予者一方面說就是欺人。事實上在今日那不但緩不濟急，簡直且是不可能。在理論上

自由與民主是不相離的，在今日事實上，簡直是必待有了民主，所謂人民的種種自由或權利，乃能具體，有實，而不落空。而這種民主的實質是指什麼呢？「一個時候，在一個國家，對於國家大事，總不外幾個意見。在一個國家緊急的時候，政治上必須全國一致。所謂全國一致者，就是使全體不同的代表意見融治爲一。使各個方面都將有所表現，都將爲國家盡其所能，而不因一己而抹殺其它」。那就是在政治基礎上，在人事上，在政策上，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政治基礎上，各黨各派的不同派別，不同意見的全國一致。作到這一個地步，作到統一，作不到這一個地步，也就作不到統一。民主哲學，第十期）這就是挽救時局打敗敵人，建立新中國，實行民主的真正關鍵。

「民意」雜誌的編輯，筆者在上述一點論述所感，自難免掛一漏萬，影列已出至十一期，主編者爲左舜生先生，謝委會國共兩黨以外之黨派的領導人。

代 郵

一讀者先生：

賜示悉：尹啓民先生的

「中國歷史講座」，因爲第

六章以後都被審查機關檢扣

，刊不出來。

第一談

讀者之頁

編者的話

本欄從原來的「信箱」改成「讀者之頁」時，我們曾經向讀者諸君說明過，這不僅是意味着一個名稱的更換，更主要的是感到編輯者的人力和知識都有限，專是過去那種「問」與「答」的方式，所能解答的問題既不多，而且也很難說是圓滿和切當。因此，我們把「信箱」改成「讀者之頁」是希望讀者諸君提出的問題，在「羣衆」的讀者中間來展開討論，用集體的力量來解答問題，自然更能深入的揭發問題的本質。而且也使我們向讀者諸君學習到更多的東西。

這一期我們開始了「讀者之頁」的第一次筆談。題目是從許多讀者的來信中抽取出來的。也許有讀者提出疑慮的詢問，今天，爭取民主的實施是全國民的戰鬥要求，爲甚麼要把推進民主運動的討論題目，限制在知識份子呢？我們想：首先需要弄清楚，這裡提出的知識青年決不只是指今天在學校里唸書的同學，而是包括一切在學和在業的青年，只要他們對今天的現實還有感應，有着要求民主的願望，那無論是在學和在業的，他們都會同樣的感到這一個問題，也同樣會提出他們的意見。我們相信在民主潮流的衝擊與奔流前面，誰也不可能作一個「與世相遺」的旁觀者。

一個先驅者曾經說過這樣的話：「知識份子有兩種形態：一種像鎗一樣動搖不定；一種像指針一樣，告訴人們甚麼時候是清晨、正午、和夜晚？」我們不能否認知識份子有一種時代的敏感（自然決定人類命運的是廣大的工農大眾的力量）。在近代革命運動史上，知識份子也一直顯示出他的先鋒和橋樑作用。今天我們認識到要求民主是全國民眾共同的慾求，而廣大的工農要求民主的願望還有待覺醒的知識青年去啓發和組織。知識份子一方面負有這種啓發工農的任務，但同時也必須向工農大眾學習，和工農大眾相結合，成爲工農大眾中的一員，這樣才能形成巨大的力量，完成歷史所付予的艱鉅任務。今天，我們說要推進民主運動，正是要使民主運動普及到廣大的人民中去，使爭民主的力量從溪流、湖沼、變成江河與海洋，這樣，人民的力量就會推動一切，主宰一切。

下面摘錄發表的幾封信，有的是提出了問題，有的是揭發了一些現象，從這些現象我們可以看出甚麼力量阻止了民主運動的推進。另一方面，既使在各種困難的條件下面，在青年朋友中間大部份人已經認識到，如果沒有民主政治的實施，抗戰的勝利就不可能；因此，他們已經逐漸成爲民主運動的積極推動者。林建屏、語林二位先生的來信都很長，這裏只是摘錄有關的一部份，其餘的問題想個別作答。現明先生提出的問題，在第二期的「讀者之頁」裡，有過一點答覆，希望參看。現明先生的來信，揭發了一些知識青年本身存在的病態傾向，這些缺點，阻礙了他們對民主運動貢獻出自己的力量，阻礙了他們和

衆接近，和人民大眾相接近。我們應當指出，在爭取民主的運動中，對於知識份子本身就是自我變革的過程。沒有這種自我改造，民主運動也就缺乏一種堅實的基礎。我們應當首先探究這些病態傾向的社會根源，和造成與培養這種病態傾向的社會勢力作鬥爭，在向這種社會勢力作鬥爭的時候，我們也就不斷的變革了自己。我們所以更應發主觀上造成這些病態傾向的思想根源，也就是要指出主觀力量如何加強，如何改造，來適合於今天爭民主的鬥爭。

我們讀「羣衆」的讀者諸君，熱烈地來參加討論，這種無論如何是摘錄的來信和讀者所加的說明，都不適於這個問題，提供一些材料和提出一些問題。希望用在「羣衆」的讀者中展開討論。至於應該如何來解答提出的問題，怎樣從認識而進到行動的實踐，就有待於讀者諸君來討論、來解答了。我們準備從下一期起，就發表各種討論的意見，經過一些時候，再根據大家的意見，總結出結論。這只是筆談會的開始，爲着使我們以後能夠繼續討論一些問題，希望不要拖得太久。

來信摘要

(一)

「……同學們逐漸的從過去那種「獨善其身」，「少管閒事」的態度改變過來，不僅對於時局的關心提高，而且很多同學都希望就自身力量所及作一些事情；以前對於學生自治會，大家不是說它是「傀儡」，就把它當成「御用機關」，除了某些「特種人物」是很少人過問的；但這次却出人意外的有兩星期熱烈的競選，同學們都很熱烈的來參加，自治會候選人有二十多個，競選人都發表了他們當選後怎樣爲同學們謀福利的競選演說，在這一次競選後，那些「特種人物」多數滾蛋了，同學們從這個小問題上看到了民主的好處，同學們似乎也由此體認到民主並不是甚麼遙遠和空洞的東西，而是切身的問題。……」

但幾年來抑鬱和低沉的氣壓給同學們情緒的影響太深重了，在長期的沉默和寂寞的境遇下，養成對政治普遍冷漠的現象，這種現象的改變恐怕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改得過來的。」

——林建屏 一月七日

(二)

「隨着同學們對時局的關心的增加，而招致起一種新的苦悶，大家雖然都知道了，爭取民主是自己的任務，既使一向埋首書本的同學，今天也感覺到，這世界規模的民主戰爭已日益走向勝利，我們仍然是在政治食污，民

力萎縮，軍事失利的情形下，有人把這比成「蔚藍中的一點黯淡」，大家也覺得除了澈底實行民主也很難有辦法改變這種局面。但究竟怎樣爭取民主政的實施，許多人却還想繼續「一二九」或抗戰初期的那種爭取民主鬥爭的方式；他們多數習慣於登高一呼，大刀闊斧的作法，而不太願意沉着、堅實、埋頭苦幹的作法，常常因爲這種操切求速的心理，影響到和週圍比較落後的同學的接近。

我時常和幾個朋友們在想，同學們這種注意時事政治的興趣，怎樣才能更加廣泛，怎樣才會使同學們從這種對時事的關切，進一步的去探究根源，在大後方的環境下，應當採取甚麼樣的民主鬥爭的方式。我們爲此有過一些爭論，意見也很零碎，希望聽到各方面的意見，我想，總還有很多朋友有着相同的苦惱。……」

——語林

(三)

「……我們和一些同事中比較關心時局的，時常作一種談天似的座談，交換一些對於時局的意見，最近一次，輪到一位留德多年，學有專長的工程師發言；他除了對於時局提出了一般的看法後，他沉痛的說：「我過去以爲只要切切實實學習點有用的技術，就可以報效國家，用不着關心什麼政治。但現在我知道這是行不通的。你不關心政治，但政治却來影響你。」

談不上報效國家，連生活都發生問題，

用不着你的本領呵！這種殘酷的現實，迫使我覺悟到：無論學什麼的，都必須關心政治，進而爭取改良政治，所以我決心跟隨大家多研究政治」。回答他這一番講話是大家的感嘆。

這位講話的工務員，是在本國大學畢業後，赴日本研究有年，曾與德國研究該項工程，傳授其工程師學位，為我國航空界有識的專家。……回國後在各工廠及XXXXX各機關，擔任高級技術的職務，應付種種困難了，但事實卻得其反。由於他不拉人事關係，不善逢迎，竟先後不容於位。最後，他終於不得不離開他原來的馬牛不兩及的機關裏來糊口。在這這難於維持的站住脚，但對於他已經是「身非所用」了。

……他這是一條「雙料黃金」的洋學生。
……他這不如他別的人，更不用說了。
從這也可以看到，政治不良的影響，有多麼深，多麼廣泛。對於一些把政治的改良，民主的實施，看作與自己無涉的朋友，這應該是一個有力警策吧！

——水 晶 二月二十一日

(四)

……
能將聯合國會談只有七十天。同學們也都有著這種焦慮，究竟誰能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者，還是讓自己的命運去受別人的決定呢？

主宰者，所必須的：

(一) 今天要求民主的力量，應當聯繫起來用「追」的方法使民主能夠得到真正的實現，應當使一切報章、雜誌、儘量的傳達出人民的意見。

(二) 今天，中國是全世界民主陣線的一份子，因此，民主之能否在中國實現，不僅是個別國家的問題，而是全世界民主陣線中是否還要保留一個特殊的問題，因此，我們不應應該團結一切國內的民主力量，而且應該團結一切國際的民主力量，要得到他們的聲援與幫助。

……我覺現在現有的環境下，最痛苦的是現有的知識份子，但就今天的情形看，知識份子依然表現得很軟弱，在國家危難的時候，既使只是要他挺身而前，他也不會公認的。
……甚至要研究這對於自己是否不利的。我覺得今天的知識份子應該完全去拋棄個人利害出於私利的觀念，不是苟安求活，也不是隱忍待時，才能夠達到他們對國家民族應有的觀念。

……但我們得能真正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者，所必須的：

(五)

……
學校僅僅補補了，我曾多少數的同學曾來過意見，希望儘速恢復校務，獲得活潑一點。……這是一個長期的艱苦的工作。……我若百分之五的同學，也起了更會因困難，眼光放得遠，有思想。百分之五的同學自願犧牲下去，不可救藥。最大的一份的困難、胆小、吝嗇、得法的同學們了，要救他們不是一說可說的，但我們却應該以最實際努力去發揚和團結這些同學……

——伍 敬 二月十四日

(六)

……
我們現在在着手籌備救國軍第一師工程營，搜集一些關於後方工廠生產和技術的資料。為着新民主主義中國工業化的前途，我們需要有一些有進步思想，堅定的志願献身於人民事業的青年工程師，以結合成一支精銳人員的龐大的隊伍，投向新民主主義下的新中國。

……
我們現在在着手籌備救國軍第一師工程營，搜集一些關於後方工廠生產和技術的資料。為着新民主主義中國工業化的前途，我們需要有一些有進步思想，堅定的志願献身於人民事業的青年工程師，以結合成一支精銳人員的龐大的隊伍，投向新民主主義下的新中國。

——邱 良

(七)

……
至於部份同學產生了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情緒。……他們對一切都失去了信心，對於自己也失去了自信，他們產成一種消極的、被動的情緒。……雖然他們也時常考慮到歷史的、個人的、大眾的命運，但他們又會懷疑自己的思想。……這這同學多學着得過且過，無可奈何的心態。他們現在非常滿足於一種細微的困難，給渡的渡。……

——明

阻礙同學們團結的是甚麼？

浪川

浪川先生文章，原名「怎樣加強同學團結」，全文復長，係以在學者來檢討青年同學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這種發表的只是此文的一部份，浪川先生在文章裡首先指出，在這個歷史的偉大時日裡，中國的知識份子的肩負，負荷着艱鉅的任務。青年同學帶着他們的熱情，誠實，愛護真理，嚮往光明的優良品質；但他們從社會裡生長出來，他們也帶着因襲的負荷、陳腐的習染，譬如自私、散漫，貪慾虛榮，容易動搖這些缺點。但今天要戰勝敵人，爭取民主的實現，都需要青年同學能够團結起來，凝成巨大的力量，但舊的習染却正阻礙着這種團結；今天要使青年同學能團結，和外在此的阻力鬥爭時，對於自己優點也就是批判和變革的過程。只有這種勇敢的自我批判，才能够使自身鍛鍊得更堅實，更有力。這，浪川先生指出了今天學校裡，防礙同學團結的原因，更希望在校同學提出意見來共同討論。

編者

誰阻礙着我們的團結呢？

法西斯及其走狗首先阻礙着我們團結。法西斯是最害怕和最仇恨青年團結的，他把青年視為危險份子，以為青年是替牠挖墳墓的，所以牠時常叫着：「要提防青年啊！」牠像魔鬼一樣到處伸出毒爪，抓住青年，迫害青年，在牠的專制與暴虐的作法下，青年像石縫里生長的幼苗一樣，隨時有被壓死的可能，牠所認為最好的標準青年是廢木的奴才；如果你不合於牠定的標準，牠的持槍就會像蜜蜂採花一樣的跟蹤你，監視你，不但要考到你平日的生活態度，還要統治你腦子裡的思想，於是，許多家庭最好的子弟，學校最好的學生，社會最好的青年，不受威脅利誘，便被開除，被監禁，被暗殺。大批的青年被放逐到死亡的路上，他們從甲地被趕到乙地，從乙地又被趕到丙地，逼着飢餓恐怖非人的生活。這便是法西斯及其走狗毒害下的青年的厄運：

1. 生命無保障，身體不自由。
2. 生活無保障，工作不自由。
3. 思想被統治，言論不自由。
4. 關在學校裡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

在法西斯的統治下，真是人間地獄！沒有正義，公理，良心可言，更無所謂民主，集會十分困難，研究毫無自由，連兩個人講話都成問題。大家都把真實的心關閉起來，同學間團結是萬分艱難的，意大利有句流行的話：「許多人在一起是擁護法西斯主義者，一個人的時候是反對法西斯主義者」。這是最好的說明，這說明了法西斯統治下的青年團結是非常艱難的，如果不展開反法西斯及其走狗的鬥爭，青年是無法團結的，這也說明了在法西斯統治下青年團結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義的火種埋在人們的心底，隨時隨地都可以點着，熊熊地燃燒起來。

宗派成見與關門作風

其次宗派成見與關門作風阻礙着我們團結。什麼是宗派成見呢？宗派成見就是小圈子主義，認為「自己的一己」，什麼都是對的，沒有一點錯誤。有功則彼此標榜，有過則互相隱瞞，如果，不是「自己的一己」，什麼都是錯的，或者明知是對的，還要在乎地亂打一通，這是「行幫主義」「同鄉觀念」發展的結果。什麼是關門作風呢？關門作風，就是一關起大門來做皇帝，不估計客觀環境的變化，不關心羣衆的情緒與要求，害怕與羣衆接近，合作。這是閉戶造車，一定不能適合軌道，宗派成見與關門作風恰好是一對雙生的姊妹，是血肉相連的。因為有宗派成見才有關門作風，也因為有關門作風才有宗派成見，宗派成見像一付有色的眼鏡，我們戴着便看不着真實的世界；關門作風像蓬萊着尖刺的刺蝟，我們帶了，便斬斷了自己與周圍廣大羣衆的連繫，這付有色的眼鏡，如果不打破；如果不丟掉滿身的刺；我們是無法與他人合作團結來改造這險惡的世界的。不可否認：宗派成見與關門作風在我們中間還嚴重存在着，重要的有下面幾種表現：

第一表現在小圈子主義。無原則的爭鬧，有些同學因為言論，地域、學校、班級、興趣、以及性別的不同，習慣地結成一個個的小圈子，圈子內的都是「好朋友」，錯的都是對的；圈子外的都是一羣不住口，對的都成問題，對圈子內保持一團和氣，或者再擠出去幾個；對圈子外總要嘖嘖咕咕，或者再種糧米幾週，藉勢欺人，於是講這種話的和講那種話的鬧起來，附城的與鄉下的鬧起來，這個學校的與那個學校的鬧起來，還姓與那姓鬧起來，

老班們做，談不起新班的；新班的與小，不敢和老班的接近，愛談社會科學的談笑愛好文藝的做「詩人」、「藝術家」；愛好文藝的諷刺愛談社會科學的做「革命專家」，男同學罵女同學：「小姐」、「賢貨」；女同學罵男同學：「少爺」、「痞子」，互相攻擊，刀槍齊出，甚至弄得頭破血流，淚眼汪汪，大家仔細一想，不知到底爲了什麼，有的說「爲了出氣」。忘記了大敵當前，專門向自家人出氣，這是小氣，陰陽怪氣，損害了人家，放蕩了大敵，這是最卑劣的行爲，要不得的。

第二，表現在害怕「領袖」不敢與他人合作，有些同學佔據自治會或班會，藉口說不到「能幹的同學」，便一個人或者少數人包辦，即使我同學來工作，也是找自己的「好朋友」或者親戚同鄉，拒絕與廣大的同學合作，甚至「包而不辦」，寧肯放棄工作，不肯別人去做，一定要佈置「自己的人」，造成個人勢力，以便欺上瞞下，作威作福。其實，這種「佔着廟所不屬屎」的官僚主義的臭架子是保不住「領袖」的，因爲不會與廣大的同學合作，領導的「天下」便會一天天地縮小，甚至寡人一個，衆叛親離。還有：害怕同學批評，害怕同學進步，靠迎合同學的落後性來鞏固個人的地位，也會是這個下場。

第三，表現在公式主義和片面想法，有的同學不去好好地解同學共同點與不同點，不關心同學的環境與變動，祇是用一個公式談話、作文、待人、做事，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一樣，好像數學上「 $2+2=4$ 」，永遠不變的，這樣的談話一定枯燥，這樣的作文一定無味，這樣的待人一定糟糕，這樣的做事一定壞事，公式主義是害死人的，是妨礙團結的。

有的同學片面的想法是錯誤的，只看見自己的長處，不看見自己的短處，就驕傲起來，以爲了不起；只看見自己的短處，不看見自己的長處，就悲觀起來，以爲無希望；只看見同學的優點，不看見同學的缺點，就以爲天生成的；只看見同學的缺點，不看見同學的優點，就以爲無法進步，只看見事情的順利，便會驕傲，只看見困難，便會畏縮，這些都是片面的死板的眼光，不知道自己，同學和事情是變動的，不懂得「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的道理，不明白「要看見森林，也要看見樹木」的方法，談天片而，或有問題，結論錯誤，行動自然不會正確的。

第四，表現在麻木苟安與張惶失措，有的同學對周圍的事情漠不關心，不看報紙，不想國事，同學病了，也不理睬，更懶得幫助落後的同學，糾正錯誤的見解，什麼都不管，連腦子也麻木了，以爲自己生活在世外桃源，可以平安度日，一旦敵人打來，還莫名其妙；或者聽到一些謠言，便張惶失措，庸人自擾。「平日不燒香，臨時抱佛腳」，是害人害己的。

這些成見偏見與不好的作風，必須徹底改正，我們不要麻木不仁，將敵人看做朋友；也不要疑神疑鬼，到處都是敵人，把自己縮到牛角尖裡去，我們要有堅定的立場，民族的氣節，臨大難不變，見大難不苟；但也不要固執己見，脫離羣衆。我們不要善與人鬥，臨時應變，才能保持這種立場和氣節。再次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阻礙着我們團結。什麼是自由主義呢？自由主義是感情用事，只顧至上。感情衝動，與遇來時，放縱大膽；感情低落，與退步時，什麼也不管。只管個人高興不高興，不顧及對團體的影響怎樣。只知道個人自由，不顧破壞

團體的紀律，什麼是個體主義呢？個人主義是一個以個人利益爲前提，當事情適合個人利益的時候，可能幹幾下子；但是當事情轉入困難階段，妨礙個人利益，即使對團體有利，也不斷幹了，甚至回頭來破壞事情，個人主義是只顧自己，不顧團體；爲了個人的利益，可以犧牲團體的利益。自由主義的根源還是個人主義，個人自由主義與團體利益是相反的，它使團體鬆懈，工作消沉，紀律廢弛；力量削弱，我們要堅決與它鬥爭，才能加強團結。不可否認的，個人自由主義在我們中間流行，主要的有下面幾種表現：

第一是個人第一團體第二，有的同學做自己的事情，精細負責；做團體的工作，敷衍了事，自己的筆記寫得非非常整潔，看了又看，團體的雜務抄得錯字連篇，毫不在乎；有的同學做演員，出出風頭，還算可以；幹團體的事務，麻煩瑣屑，費時費力，很少人知，便老于「懶懶」，做反正是有得與；有的同學管理自己的東西十分周密，非常愛惜，團體的東西到處亂丟，掉了也不要緊，自己的一隻筆筒不見了，便大驚小怪！「我的筆筒誰拿了？」其實筆筒還在他自己手上，團體的報紙丟在地上，却懶得拾起，團體的書簿塗壞，遺失，好像沒有什麼關係的，這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表現。

第二是團體公約不遵守，我的個性是這樣，有的同學藉口不合個性，破壞團體公約，稍有不如意，便想推翻大家的議案，採取單獨行動，心目中毫無團體的紀律，像講做，不顧大局。我高興與這樣便這樣，大家都應該服從我，即使你對我笑，我可憐，我對你拍桌子，瞪眼睛，也不算無禮。我的脾氣是這樣，其實這種脾氣並不是大上掉下

(下接一一九頁)

內政部重發新登記證警字第陸捌肆一伍號
川東郵政管理局第六七〇號登記執照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本期零售三十二元

群

卷 6 + 5 第

衆



版出日五月四年四十三國民華中

群衆第十卷第六期目錄

在民主和平的大道上前進(時論)

特載

兩三年內完全學會經濟工作

關於勞動英雄模範工作者問題

專論

從克里米亞到舊金山

論克里米亞會議的偉大成果

附錄：克里米亞三強領袖的聯合聲明

研究

新民主之法蘭西型

羅曼羅蘭的生平、著作和思想

華北解放區的新女性

邊區婦女剪影

一朵紅花(秋承)

樺A·托爾斯泰

★筆★ 面向羣衆，面對困難

民主不能坐待

★談★ 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

附錄

千百萬人民和我們在一起

論及其他

我們向哥白尼學習些甚麼？

——在哥白尼誕辰下的「歐國法」理論

「高爾基精神」與「前線」

致讀者

勞動英雄回家(封面木刻)

(一四〇)

毛澤東(一四一)

李富春(一四四)

于懷(一五〇)

「戰爭與工人階級」(一五六)

鄧初民(一六三)

戈登(一七〇)

余為基(一七八)

韋明(一八二)

一朵紅花(一八六)

蕭三(一九二)

李全望(一九五)

希冀(一九六)

浪川(一九六)

編者(二〇一)

克河(二〇四)

刀星(二〇六)

古元(封面)

羣衆

第十卷 第五六期

三十四年四月五日出版

發行所 羣衆雜誌社

上海民生路二〇八號

總經理 浙報日報館

零售每份

本報零售 三十二元

六期 八十八元

十二期 一百六十元

廿四期 二百元

外埠郵費在內 函購照加

在民主和平的大道上前進

「我從克里米亞會議後回來的時候，堅信我們已經在世界和平大道上開始前進。」——羅斯福

羅斯福的話是對的，克里米亞會議開闢了世界走上和平的大道。它討論了最後擊斃德國的軍事計劃，佔領和控制德國以徹底消滅納粹政權、純粹的法律、組織和度，並廣濟人民各種生活中的法西斯主義影響的原則；它決定了以民主的方式處理解放的歐洲的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它決定了在本年四月二十五日在英國新金山召開聯合國大會擬訂一個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普遍國際組織章程。這一切的一切，是在「實現人類最高尚的志願——一種安全而且持久的和平，用大劑洋蔥的甜來說，就是：「確保在每一切土地上的所有一切人，都可以在不受恐懼、不安、缺乏的自由中度過一生」。

世界和平的基礎，是建立在國際民主合作與各國政治制度民主化兩個動搖之上的。惟有國際間的民主合作，才能消滅戰爭。因為那種專制政治對立矛盾的法西斯主義，如不被人們社會中加以根絕，則世界和平是永遠實現不了的。而各國政治的民主化與國際間的民主合作，則為杜絕法西斯主義的保證。因此，克里米亞會議提出了以民主方式解決國際間政治問題的政治問題，並提出了「一切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向密切而繼續的合作」，由此可見這個會議的基本精神是民主主義，世界和平的基礎是建立在民主主義之上，和平與民主是不可分割的。

克里米亞會議是奠定世界民主和平的初基的會

議，全世界每一個愛好和平民主的國家或人民，都在熱烈的衷心的歡迎它、讚揚它。這從二十餘天來世界各國的輿論可以反映出來，但在另一方面，自然有人在涕泣、在恐慌、在督罵的。德日法西斯強盜，波蘭流亡政府和各色各樣的變種的法西斯帶，就是如此。納粹德國在奧斯三巨頭會議已經除德方的一切道義責任，強盜日本亦愛護它會聯為聯合國的公敵；波蘭流亡政府則在否定三國會關於波蘭問題的決定。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甘願為法西斯侵略者張目的人，公然在魯斯克里米亞會議為「流氓橫行」，為「侵略主義」。這種人的勇氣的確可與波蘭流亡政府「媲美」，我們對於希特勒的這種主子徒孫之狂吠，不但覺得奇怪，反而覺得當然。如果法西斯主義者也真心求接護民主和平，那才是奇怪哩！

克里米亞會議已舉行二十餘天，舊金山會議的聲望亦已向十四個國家發揚了。在這裡，中國是參與這偉大的。這是世界上自光榮。這顆光榮，明明白白，因為八年來我們犧牲生命流盡汗的偉大的中國人民。這就是說，沒有廣大人民的積極抗戰，則這種光榮的國際地位之取得，是不可思議的。而中國人民之所以茹苦含辛願為抗戰而犧牲，那是體貼了日本強盜法西斯與中國的民族解放不能並立之故。這為了民族解放同時亦為了世界和平，我們只有以自力更生為主要原則，才能在國際政治舞台上

打開自己的局面。那幾何謂「中國在野強主義」的妥協條件下，並不是不能苟活的說法，是漢奸敗類的基本思想，同時亦是厚顏無恥要挾鼓譟的流氓腔調。中國人民是堅決拒絕這種說法，反對這種想法的。

舊金山聯合國會議今日勉有多少天了。這一個會議不管它專門討論國際組織建設也好，或者同時討論及遠東的戰局也好，作為戰時盟國之一的中國，是不可不以民主國領袖的資格參與自己的。在克里米亞會議的聲名之下，這個聯合國會議一定會充滿着民主主義的新精神。我們希望聯合國第一屆會議如果沒有民主主義的空氣，那末，我們便何況是邀請國因此，我們希望：第一、應在四月二十五日以前自行解決國內的團結問題。

第二、國內問題的中心點是民主政治的實現。

第三、應在四月二十五日以前自行解決國內的團結問題。

第四、應在四月二十五日以前自行解決國內的團結問題。

兩三年內完全學會經濟工作

毛澤東

——一月十日在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模範工作者大會上的講話——

各位勞動英雄，各位模範工作者：

你們開了十幾天大會，總結了很多的與很好的經驗，大家歡迎你們，尊敬你們。你們有三種長處，起了三種作用。第一個，帶頭作用。這就是因為你們特別努力，有許多創造，你們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範，提高了工作標準，引起了大家學習你們，你們是生產運動和各項建設工作的帶頭人。第二個，骨幹作用。你們的大多數現在還不是幹部，但是你們已經是羣衆中的骨幹，羣衆中的核心，有了你們，工作就更好推動了。到了將來，你們可成爲幹部，你們現在是幹部的後備軍。第三個，橋樑作用。你們是上面領導人員與下面廣大羣衆之間的橋樑，黨和政府的政策通過你們傳到上面來，上面的意見經過你們傳下去。

你們有許多好處，有偉大功勞，但是你們切勿記不可驕傲。你們被大家尊敬，是應當的，但是也容易因此引起驕傲。如果你們驕傲起來，不虛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幹部，不尊重羣衆，你們就會當不成英雄模範了。過去已有一些這樣的人，希望你們不要學他們。

你們的經驗，這次大會作了很好的總結。這個總結文件說得很好，不但這裡適用，各地也可以適用，我就不講這些了。我懇請一點我們的經濟工作。

近幾年中，我們開始學會了經濟工作，我們在經濟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成績。但這還只是開始。我們必須在兩三年內，使陝甘寧邊區及敵後各解放區，做到糧食及工業品全部或大部自給，並有盈餘，使農業、工業、貿易三方面都比較現在有更大成績。到了那時，才算學得更多，學得更好。如果那一個地方的軍民生活沒有改善，爲着反攻而準備的物資基礎還不穩固，農業、工業、貿易不是一年一年上漲，而是停滯不進，甚至下降，便證明那個地方的軍政黨工作人員還是沒有學會經濟工作，那個地方就會遇到很大的困難。

有一個問題必須再一次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是我們的思想要適合於我們目前所處的環境。我們目前所處的環境是農村，這一點好像並沒有什麼問題，誰不知道我們是處在農村中呢？其實不然。我們有很多同志，雖然天天處在農村中，甚至自以爲瞭解農村，但是他們並沒有瞭解農村，其中有些人至少是瞭解得不深刻。他們不從建立一個經濟基礎上的，被敵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擊戰爭的（在前方）農村環境這一點出發，他們現在處理政治問題上，在處理軍事問題上，在處理經濟問題上，在處理文化問題上，在處理黨務問題上，在處理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等問題上，常常不適當，或不大適當。他們帶着城市觀點去處理農村，主觀地作出許多不適當的計劃，強制施行，常常碰了壁。近幾年來，由

於發展，由於在工作中碰了釘子，使得我們的同志有了很多進步。但是還須注意，還須使我們的思想完全適合於我們所處的環境，然後才能使我們的工作獲得見效，並迅速見效。如果我們真正瞭解了我們所處的環境是一個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的，被敵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海軍戰爭的農村，如果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從這一點出發，看來收效很慢，並不轟轟烈烈，但是在實際上，比較那種不從這一點出發，而從別一點出發，例如說，從城市觀點出發，其工作效果會怎麼樣呢？那就決不是很慢，反而是很快的。因為，如果我們從後一點出發，脫離今天的現實，做起來不是效率很快的問題，而是老碰釘子，根本沒有效果的問題。

即如我們提倡採取有樣式的軍民生產運動，發生了很大的效果，就是一個明顯的證據。

如果我們要從農村根據地打退強大的日本侵略者，並且要準備攻入城市，收復一切失地，這就不是短期的事情，需要準備長期戰爭。抗戰已有八年了，農村的財富，被敵人摧殘，我方消耗，都是很大的。但是我們還要堅持戰爭，並且還要積蓄力量準備反攻，然後才能把日本打出去。在這種堅持戰爭與準備反攻的工作中，除了軍事、政治、文化等項以外，物質力量的準備，就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了。沒有這個條件，現在的堅持與對來的反攻，都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們是在個體經濟的分割的游擊戰爭的農村環境中，怎樣能夠達到這個目的呢？……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那麼，有些什麼辦法呢？我們就用軍民兩方同時發動大規模生產運動這一種辦法。

由於是農村，人力物力都是分散的，我們的生產和供給就採取「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方針。

由於是農村，農民都是分散的個體生產者，使用着落后的生產工具，受着封建的地租剝削。為了提高生產與增加生產力，我們就採取減租減息與組織互助兩項方針。減租提高了農民的生產興趣，互助提高了農民的生產力。我已得了華北華中各地的材料，這些材料都說：減租之後，農民與地主的關係，願意組織互助。這固然是「互助」的方針，而採取「同心說服，典型示範」的方針，那麼，幾萬之內，它可能使大多數或全體農民都組織在農業生產的與手工業生產的互助團體中。這種生產團體，一經成為習慣，不但產量大增，各種製造都出來了，政治也會提高，文化也會進步，衛生也會講究，流氓也會改造，風俗也會改變，不要很久，生產工具也會改良，到了那時，我們的農村社會，就會建立在新的生產力上面了。

如果我們的工作人員用心地研究這項工作，用極大精力幫助農村人民展開生產運動，幾年之內，農村社會會有豐富的食物及日用品，不但可以堅持戰爭，不但可以對付荒年，而且可以貯備大批糧食及日用品，以為反攻敵人之用。不但要組織農民生產，而且要組織游擊戰爭，游擊戰爭也可以生產。

由於是農村，由於是敵人經常摧殘的農村，由於是長期戰爭的農村，部隊機關必須生產。由於是分散的游擊戰爭，部隊機關也可以生產。在我們陝甘寧邊區，則更由於游擊機關的人數和邊區人口比較，所佔比例數太大，如果不自已生產，部隊機關餓飯，如果取之於民太多，則人民負擔不起，人民也勢將餓飯。因此，我們決定了大規模的生產運動。拿我們邊區說，部隊機關每年給細糧（米）二十六萬担（每担三百斤），取之於民的佔十六萬担，自己生產的佔十萬担。如果不自已生產，則軍民兩方，勢必有一方要餓飯。由於展開了生產運動，現在我們不但餓飯，而且軍民兩方都吃得很好。

我們邊區的機關，除糧食被服兩項之外，其他用費，大部自給，有些單位則全部自給。另有許多單位，並且自給一部分糧食，一部分被服。邊區部隊的功勞更大。許多部隊，糧食被服及其他一切，全部自給，即自給百分之一百，不領政府一點東西。這是最高的標準，這是第一標準，是從幾年之內逐漸達到的。

前方要作戰，不能採取這個標準。前方可以設立第二、第三兩個標準。第二個標準，是除糧食、被服兩項由政府供給之外，其他如油（每日五錢）、鹽（五錢）、茶（一斤至一斤半）、肉（每月一斤至二斤）、柴炭費、辦公費、雜支費、教育費、保健費、檢驗費、早煙、鞋子、手套子、襪、手巾、牙刷等，一概生產自給，約佔全部費用百分之五十，可在兩年內逐漸做到，現在已有做到了的。這個標準，在鞏固區內可以實行。

第三個標準，是在邊沿區及游擊區內實行的，他們不可能自給百分之五十，但是可能自給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能過這深，也就很好。總之，除有特殊情形之外，一切部隊、機關、於戰鬥、訓練與工作的關係，一律參加生產。部隊及機關，除利用戰鬥、訓練及工作的關係，增加生產之外，應組織專門從事生產的人員，如製鹽場、菜園、牧場、作坊、小工廠、運輸隊、合作社，或與農民夥種糧、菜。任何機關、部隊，都應建立自己的義務。不願建立家務的二流子習氣，都是可恥的。但須規定按質分等的個人分紅制度，直接從事生產人員能得全得紅利，否則生產的成績，又須有長長實實，自己動手，請總幹與廣大羣衆相結合，一般幹部與具體指導相結合，方能有效推進生產工作。

有人說：部隊生產，就不能作戰與訓練了；機關生產，就不能工作了。這種說法是不對的。最近幾年，我們邊區部隊從事大量的生產，衣食住行，同時又進行大練兵，又有政治與文化的學習，均比從前有更大的成績，軍隊內部的團結與軍民之間的團結，也比從前更好了。在前方，去年一年進行了大規模生產運動，可是去年一年作戰方面有很大的成績，並且普遍地開始了練兵運動。機關因為生產，生活改善了，使得工作人員更安心，更有工作效率，機關和前方都是這樣。

由此可見，邊區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中的機關、部隊，如果有了生產自給運動，他們的戰鬥、訓練與工作，就更有勁，更加活躍了；他們的紀律，他們的內部團結和外部團結，也就更好了。這是我們中國長期戰爭的產物，這是我們的光榮。我們學會了這一條，我們就對一切困難都不怕了，我們將一年一年更有生氣，更有精力，愈戰愈強，只有我們去壓倒敵人，決不怕敵人來壓倒我們。

但是，有一點還須引起我們前方同志的注意。我們有些地方機關不久，還頗富足，但是那裡的工人自恃富足，不肯節省，也不肯生產。這樣就不好，他們在將來一定要吃虧的。任何地方必須十分愛惜人力物力，決不可只顧一時，濫用浪費。任何地方必須從開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計算到將來很多年，計算到長期堅持戰爭，計算到反攻，計算到敵人走了之後的建設。一面決不濫用浪費，一面努力發展生產。過去有些地方缺少長期打算，既未注意節省人力物力，又未注意發展生產，吃了大虧。得了這個教訓，現在必須引起注意。

關於工業品，陝甘寧邊區決定於兩年內，做到花、紗、布、鹽、紙及其他很多用品完全自給。原來根本沒有，或出產很少的，現在也一概自種自造自給，完全不靠外面。所有這些，由公營、私營與合作經營三方面完成任務。一切產品，不但求數量多，而且求質量好，耐穿耐用。邊區政府、國防司令部、西北局，對於這些抓得很緊，這是非常之對的。希望前方各地也是這樣做。有許多地方，他們已是這樣做了，希望他們得到成功。

我們邊區及邊區解放區，還要有兩年至三年工夫，才能完全學會全部經濟工作。我們到了糧食與工業品全部自種自造自給，並有盈餘的日子，就是我們完全學會在農村中如何做經濟工作的日子。將來從城市趕跑日本人，我們也會做新的經濟工作了。中國黨我們來建設，我們必須努力學習。

關於勞動英雄模範工作者問題

李富春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廿二日在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學校、部隊羣英代表大會上講話

中共大會和各單位的大會都開得很好，很有成績。一九四四年，中央直屬各機關、學校、部隊、工廠一萬兩千人的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的選定運動，比較去年，的確認真實行了「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的方針，發揚了自我批評，發揚了民主。我們到了一年來中直工作、學習與生產的成績，以及大批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的湧現。一萬兩千人的中直各單位，共選定了特等、甲等與乙等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二千一百人，差不多達到了百分之十，來到我們這個會場不開會也有三百四十五人，真正感到「羣英輩出，美不勝收」。在這個運動中，又推動了大家的進步，學到很多東西。我現在就幾個問題上來講一點意見。

一 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如何生長起來的？

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如何從羣衆中生長起來的呢？爲什麼能產生這許多的英雄模範呢？蘇維埃時代的「革命競賽」的一股因素爲何能發展提高成爲今天的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的普遍的全面的羣衆運動呢？羣衆中所固有的正氣、積極性與創造性，爲什麼能發揚與發現，使羣衆能自然而然的革命化，大家以全力爭取黨的政策與口號的實現呢？

我認爲這是由於領導與羣衆雙方進步合作的結果。這種進步與合作，是從四個方面來的：

第一、由於思想的改造。經過三年來的整風運動，在所有機關、學校、部隊、工廠中的同志，思想上都有了改造。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有了勞動觀念與羣衆觀念。對世界的看法，有了明確的統一認識。這就有了產生勞動

英雄與模範工作者的思想基礎。世界是勞動創造的，是屬於勞動人民的，勞動是光榮的。這種簡單的道理，在整風以前，恰恰在我們勞動人民的隊伍中，尚有兩種人，在思想與實踐上都未搞通。一種人是從剝削階級出身，參加革命不久的人。他們的想法，是以爲自己是天生的大人物統治人民，是沒有勞動觀念，鄙視勞動，不願勞動。還有少數人，雖然參加革命隊伍不久，但由於長期脫離生產，脫離羣衆鬥爭，勞動觀念逐漸模糊，對勞動是輕視的。經過整風與生產運動，經過自己血汗的體驗，對勞動觀念是認識了，而且提高了。因此，就生長了勞動觀念最強烈的大批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

談到羣衆觀點，中央直屬各機關的同志說，也經過二三年的認識過程與實踐過程，才解決了關於羣衆觀念的一連串的問題。首先是不要羣衆的問題。在整風以前，我們中間有些人是不愛羣衆，看不起羣衆力量的。這是與不正確的勞動觀念相聯繫的。一種人是官僚主義者，形式上似乎在給羣衆做事，實際上不是羣衆的知心人，脫離羣衆。一種人是有軍閥主義思想殘餘的人，打罵羣衆，脫離羣衆。還有一種人，是從剝削階級出身，革命鍛鍊不夠，他們以前既無勞動觀念，也沒有無羣衆觀念，是用剝削階級的眼光對待羣衆的，爲自己服務而不是爲人民服務的。經過整風，大家有了爲工農兵服務

的認識。

其次，是「羣衆在那裡」的問題。有的人，以爲要爲羣衆服務，要有羣衆鍛鍊，只有「下鄉」。因而等待下鄉，不安心機關工作。有些同志要下鄉鍛鍊，是好的。但要了解，機關、學校、部隊、工廠的內面與附近，到處都有工農兵，在每人的工作崗位上，都能爲羣衆服務。在今春，我們機關機關學校、部隊、工廠，在外面要進行附近鄉村的居民工作，在內面要注意團結在自己工作崗位上共同工作的同志們，以及智識份子與工農份子的結合，互相幫助，互相學習的方針。實踐的結果，解決了各單位內部與外部的羣衆

關係問題，解決了「羣衆在那裡」的問題。

其次，是「究竟爲誰服務」與「對羣衆的態度」問題。究竟真正認識自己是羣衆的一員，了解羣衆的正氣、毅力、熱忱，而以人民的憂喜爲自己的憂喜，而爲人民服務，爲人民解決問題呢？還是形式上爲人民服務，實際上却仍然從個人打算呢？因此，也就有兩種對待羣衆的態度。一種，自命爲羣衆的先生，凌駕在羣衆之上。一種，是當羣衆的小學生，向羣衆學習，然後去幫助羣衆。這問題，已爲大多數同志所了解，所力行。但少數同志了解還不多，還帶着錯誤的認識與實踐的相互提高中，徹底解決了這一連串的問題。「羣衆觀念」的問題，才會領會到羣衆是推動我們「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的思想方法，也是學習方法與工作方法。

第二，由於工作作風的改進。大家的思想，既有了解革命負責，對羣衆服務認識，因此不論領導、幹部、與羣衆方面的意見，均有了顯著改進，特對中間，曾經嚴重存在着自由主義已覺克復了。

大家回想這以前，中央直屬各單位，不是曾經有某些人（連我自己也在內），或多或少均有過種種各色的自由主義的表現嗎？有的「不關己，高高掛起」，有的「發給終日，宵小及終」，有的「只講感情，不論是非」，有的「口是心非，到處搖擺」，有的「得過且過，滿不在乎」。不是有某些人，曾經或多或少有過各種各色的官僚主義表現嗎？有的「上下隔離，彼此隔閡」，有的「問起下情，一清不知」，有的「談到工作，「大概」、「似乎」，有的「不講民主，一手包辦」，有的只爲「完成」自己的「任務」，而不爲羣衆解決問題。在這種種現象中，脫離羣衆的自由主義與官僚主義下，羣衆的正氣與積極性是無法發揚的，學習只能是教條主義的，工作只能是形式主義的。這種錯誤，曾經被特科份子利用，作了很多壞事。整風以來，經過三年的訓練，這些歪風克服了，這些「二流子」被改造了，大家的眼睛也亮了。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朝氣勃勃、奮發有爲、急公好義、積極負責、安心業務、改進工作的革命精神，正在生長起來，代替了某些人的腐朽的自由主義。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眼睛向下，發揚民主，發揚自我批評，親自動手，深入下層調查研究的領導與羣衆日益密切結合的作風，正在生長起來，代替了某些人腐敗的官僚主義。有了這樣的作風，才能使黨的戰鬥力加強，使革命隊伍團結鞏固，使政策貫徹，工作改進，幹部進步，羣衆革命化。這就是生長勞動羣衆模範工作者的第二個條件。

第三，由於發展生產，改善了生活。三年來，在生產與節約上，貫徹了

「大家動手，豐衣足食」，「組織起來，公私兼顧」，「民主評定，等級分紅」等一套經濟的政策，造成了生長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的物質條件。我們完全用自己的勞力進行生產，從未投機取巧，認真建立了生產與節約的基礎。發展生產，就產生勞動英雄。有了勞動英雄，又更推進生產。這已有豐富經驗證明了。去年中央直屬生產，節約共四萬餘石（三百斤一石）細糧（米）。今年中直各單位共生產了六萬四千石細糧，節約共五萬九千四百三十三石。兩者合共六萬九千八百八十九石細糧，就這細糧增加生產者來說，平均每人生產的有五石八斗多。我們除了大家必有的物質生活與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經生產勞動中，又生長了新的勞動英雄，這是一個巨大的成績。

第四，由於黨的政策正確，改善了工作。有了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的生長條件，還需正確的根本中直各單位的特點，發動與組織羣衆，執行黨的政策，進行各項工作的運動，從運動中推動大家的進步。從而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就具體的湧現出來。三年來，我們就是這樣作的。

在此，我附帶把三年來中直各單位，執行中央各種政策的成績，作初步總結，供大家參考。

除上層所應的思想改造，生活改善，是得到正確的實行了三民主義，時事教育，發揚生產政策所獲得的成績外，由於實行了精兵簡政與節約一元化，中直各單位收到了精簡、統一、節約、提高工作效率的成果。克服了曾經存在着的各自爲政、上下脫節的散漫現象，本位主義與山頭主義傾向。因此，上忙下閒，無事可做的「中門子」的現象，和優秀人員的嬉游懶惰，吵嘴打架的現象，也沒有了。嚴密了組織，建立了必要的制度。由於進行了整黨整風與反特鬥爭，保證了黨在思想上、組織上的嚴肅性，又學習了蘇聯的買大政策與黨路線，取得了黨空前未有的豐富經驗。雖然，我們犯了一些錯誤，而且決不應忽視這些由於粗心謹慎不夠所產生的錯誤，但是這些在執行黨中央正確政策的方針下，可以糾正的錯誤，並在一年來的整黨工作中負責糾正了。由於執行了擁護農民，我們建立了附近各鄉村的居民工作，根據羣衆的自願與需要，先後有步驟的組織農工、扎工、婦紡、貸部担子、學校與秧歌隊等，幫助了附近各村人民生產的發展，與文化物質生活的改善。擁護的最高表現，是堅決遵守了蘇聯政府的法令，遵從了地方政府的命令。因此，我們解決一個原則問題，即是我們有了「擁護蘇聯」與「村籍」了，外來人員與本地人民脫離現象被克服了。由於認真實行文化建設，首先響應了毛主席的文化建設的具體教召，在附近各村中，幫助建立適合農民的模範小學

夜校與夜學，所有衛生機關，實行法為家治病，幫助建立衛生模範村。又派員編譯、翻譯、學校、工廠內部的具體情況，自己也展開了文化學習運動，貫徹了學習用的教學方針。用知識份子與工農結合及小先生制，用新報章等刊物，用獎勵等各種方法，提倡工農學習與寫稿，很大的提高了中直各單位工農學習的熱情。一九四五年，就可以有經驗有根據的提出：二年之內，消滅脫離學校和工廠中的文盲的口號與學習計劃。在模範衛生方面，我們掌握了預防重於治療的方針，創設了模範學校部隊工廠中的衛生機關與衛生人員眼睛向下，注意環境衛生，注意事務人員衛生的新方向。所有這些工作的成績，都是經過羣眾運動，由大家的努力獲得的。而最大的收穫，是我們許多同志學到了黨的政策，與如何實現了黨的政策。在行政政策的實踐中，我們才開始真正懂得了一般與具體結合，原則性與靈活性結合，黨的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原則，才不再是被教條主義的背誦了。

三年來，在思想的改造，作風的轉變，生活的改善，工作的進步中，我們大家有了進步，使中直各單位面目一新。但是，進步只是開始，而且進步的大小快慢極不平衡，決不能自滿驕傲。我們必須糾正，要繼續努力，繼續前進。我們不滿意才開始體會了毛主席的思想，掌握了毛主席的政策，運用了毛主席的作風所得到的一些進步。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的生長，是建築在全體同志的進步的基礎上的，是建築在毛主席的思想、政策與作風之基礎上的。離開了與大的羣眾，離開了黨的領導，任何個人的英雄事業，是不存在的。我們是集體的英雄主義！

二 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的選舉運動

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的生長，既有如此生動豐富的內容，要用甚麼形式表現出來呢？具體化了的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用什麼形式使之為羣眾所公認呢？這種形式，就是勞動英雄的選舉運動。

獎勵制度，是從一九三八年邊區政府建設獎勵得力的生產人員開始的，一九三九年的第一次邊區工業展覽會又獎勵了工業方面得力人員。一九四二年我們發現了吳滿有、趙占魁這樣勞動的典範，開始提出了獎勵的方向和趙占魁運動，在西北局的高幹會，又獎勵了一批人。一九四二年開始進行了勞動英雄的選舉運動。但當時，只限於生產範圍，且偏於上面的指定。從一

九四三年邊區第一次勞動英雄大會以後，到一九四四年，才開始認真全面的展開了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的廣大羣眾的選舉運動，因此勞動英雄運動，是經過上面指定到羣眾選舉，從局部到全面，從個人英雄主義到羣眾英雄主義，從上面的獎勵到羣眾與羣眾共同獎勵的過程的。

一九四四年中直各單位的運動，經過四個月之久，做得相當細緻與深入，真正動員了羣眾。從現有經驗看，要使運動成為廣大羣眾的，不僅選舉得好，而且能經過運動，推動進步，必須解決下列二個問題。

第一，對選舉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的認識問題。首先，要羣眾「解」行行出狀元」的道理。要大家懂得，凡是省工作、學習、生產的地方，不論幹部、羣眾，只要努力，就可以成為英雄與模範。千萬萬的人民羣眾，是要選出許多人民中的模範份子去領導的。所以，從廣大羣眾中生長起來，真正合乎標準的英雄與模範，是「多多益善」的，而且希望從個個的英雄與模範，進而創造模範的模範單位（模範村、模範連隊、模範學習小組、模範工廠、模範機關等）。這樣，就可打破某些消極落後份子認為選舉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是和他自己無干的想法，打破某些領導幹部認為勞動英雄與模範無關的消極態度。

其次，要使大家了解：個人與集體的關係。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是為人民服務的，是關係整個地區，整個人民事業的利益的。而不僅僅為一個人，一個單位的利益的。英雄與模範，不只是個人的努力，還要靠本單位全體同志的努力與贊助。如果沒有生長英雄與模範的集體條件，英雄即無用武之地。因此，英雄與模範不僅是個人的光榮，而且是集體的光榮。只要集體的效力，很多人就可成為英雄與模範，以至模範單位。還要提倡與解釋一九四四年如不能當選，一九四五年再努力的英雄氣概，以此糾正某些領導幹部認為選舉是作風的本位主義，歸標主權的傾向，防止當選者驕傲，落選者喪氣的情緒。

再次，是認真說明：「既不埋沒英雄，又不造神充數」的原則，使領導幹部認識，只有認真，深入羣眾，才能不埋沒人材，羣眾的正氣才能發揮，大家才敢於積極負責，慎重將事。如果以官僚主義的態度對待選舉運動，就會產生濫筆充數，不能發揚羣眾正氣與熱情的毛病。

要使上面所說的認識搞通，發動廣大羣眾投入運動的熱潮，運動就從從檢查與總結每個人的、每單位的工作開始，吸引所有參加。從檢查工作的過程中，不但可使人這些認識，勞動的標準也更加具體與實際。好的典型了！

能選出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的物，也自然而然從集體的討論，集體的比較中湧現出來了。

第二，對選舉運動的領導方式問題。勞模選舉運動，要達到應有的效果，決定於領導幹部的工作。

首先，是發揚民主，領導與羣眾相結合。領導幹部要有依羣眾，向羣眾學習的認識，要認真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原則，展開討論與批評。不要怕羣眾發生偏向，不要過早糾正偏向。要傾聽與考慮羣眾的意見，即時改正領導的缺點。要善於帶頭羣眾，採取羣眾所能接受的步驟，經過羣眾醞釀成熟，逐漸提高羣眾的熱情與自覺性。在選舉時，必須打破過去某些幹部不願羣眾力量，擅從上而下提名單的保證包辦的老一套方式。在整個運動中，要實行「經過羣眾，醞釀成熟，等到被選者真正為羣眾所熟悉，所公認時，自然瓜熟蒂落，用無記名投票法選舉出來，而且選舉得過不會錯。做到這樣時，才算發揚了民主，領導與羣眾才真正在的結合起來。

其次，是發揚自我批評與發揚優點相結合。自我批評，是兩革命精神密切結合的一種獨特拉朽的武器，所以毛主席常常教導我們要「天天洗澡，去積灰塵」，要「常常照太陽，以免發霉」。在勞模運動檢查工作中，我們首先以與人為善的精神，發揚大衆自覺，用自我反省的方式，發揚了自我批評，揭發了我國工作中的錯誤與缺點。而且檢查了領導，揭發了官僚主義與自由主義殘餘的毛病。結果，羣眾熱烈的起來，工作、學習與生產更推進一步，如果我們對自我批評，惟恐人家刺痛自己的短處，而不自覺的隱瞞自己的毛病，只敢對人隱瞞成語，隱瞞缺點，這種小資產階級的誇大狂，不但阻礙個人進步的更惡敵人，而且也無法發揚羣眾積極性，無法改進我們的工作。因此，各小單位、各鄉、各村、各區、各廠中，領導羣眾之間，上級與下級之間，官與兵之間，政府與人民之間，發揚自我批評的反省會議，應建為制度，每半年舉行一次。

但是，單單只有自我批評的一面，還不夠，還要有發揚優點的一面，才是完全的。我們不怕承認自己有些缺點與錯誤，也應當承認對人民的解放事業很多的好處，發揚了成績，因此，在勞模選舉運動中，我們提倡大衆的一致讚揚，一面之長，實事求是，不誇大，也不隱瞞，指出每個人的優點與缺點，發揚長處，正和學習；我們對的模範，鼓勵羣眾向其看齊。這樣，更提高了羣眾的熱情與自覺，提高了對每個人，對每個單位的全面認

識，更具體了解了如何糾正缺點與發揚優點。

從這次運動中，運用發揚自我批評與發揚優點相結合的方針，使我們更深刻的體會了毛主席的領導方式。回想過去，有某些同志常常不適當的盲目的採取批評方式。某一地區，某一隊伍，某一工作做得不好時，只找壞例子、壞人物，只用「批評」，「鬥爭」來企圖解決問題與改進工作，而不研究好的典型，以致阻礙進步。雖然批評鬥爭之後，工作或可改進一時，但不從思想溝通，從全面的了解與解決問題，使大家心悅誠服。結果，問題未徹底解決，工作終究還是搞不好，也無教育作用。這就是應辦主義與打擊政策。再回想抗戰初期，由於某些自由主義與宗派主義的存在，又曾經發生某一部門，對人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只知道無原則的獎勵，拋棄了自我批評的武器，助長了小資產階級的驕氣與風頭主義。

歷史證明，發揚自我批評與發揚優點相結合的方式，是教育羣眾，揭發思想，改進工作的正確方式。我們應當有批評，又有獎勵，而以獎勵為主，批評為輔。應當有是非分明，賞罰分明的獎勵制度。其目的在於教育羣眾，實是經常的，罰是不不得已的。勞模運動，就是這種制度之一。我們反對對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的兩種偏向。怕是我對選出防止用平均主義來對待這種正確方式，要根據問題的具體條件，與當時情況，來確定某地某地某事某人，以發揚自我批評為主，或以發揚優點為主，來教育大衆。是非分明，賞罰不分，實則不明平均主義偏向，是錯誤的。

發揚與羣眾相結合，自我批評與發揚優點相結合的民主作風，不僅在勞模運動如是，一切工作中均應如是。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兩項任務的指示特別提出了發揚作風，我們就應當從勞模運動中做起！

三 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的作用

毛主席指示我們：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的作用有三：第一是工作榜樣的標準作用；第二是發揚優點與批評作用；第三是教育羣眾的作用。這是完全合乎實際的。我們在為此三項作用，加以具體說明。

關於工作與生產的榜樣作用。在這次直大會中，我們曾聽取許多勞動英雄，都是各單位各方面工作與生產的榜樣。而模範中直大會選出來的五名模範，都是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也是中直大會選出各方面工作的榜樣。那天即開幕的邊區勞模大會所選出的邊區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就是全邊區

工作與生產方面的最高標準。我們大家都應向他們學習，向他們看齐，在此，我們向這批出類拔萃的模範與普及兩個問題。

關於普及的問題，我們應有兩方面的認識：一方面，是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在生產與工作方面，決不是不能超過的。工作與生產的發展，日新月異，模範與普及在技術、經驗與知識方面，在過去所創造的各項最高標準，不是去年所創造的標準，而是今年所創造的標準，在這些方面，不是超過了去年所創造的標準，而是今年所創造的標準，因此開了普及與模範的新方向，也由此而開了普及與模範的新標準。普及與模範的工作任務，創造新的工作標準而奮鬥，決不能保守與自滿。另一方面，是改善標準問題。在現有的工作環境與生產條件下，某些標準有一定限制性的。特別應從數量的提高，轉到質量的改善上去。如杜林森同志的開荒，已達每天六畝三分五，以現有的工具與人的體力說，不應再提高，應向勤耕細作努力，否則就會傷害身體。如王國勳同志的撈紙，已達到邊區的最高紀錄，今後的任務，主要不是繼續提高撈紙量，而要改善紙的質量。這就向大家提出了新任務，要大家進一步精通業務，從實際的可能出發，改善我們的標準。

關於標準的普及問題。有人認為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的生產與工作標準，是天才的創造，普通人是無法學習，無法普及的。我以為這是「懶漢」與「二流子」的理論。我們都是同一生活環境，同一生產與工作條件下，共同生產，共同工作着，為什麼別人能積極負責，能有創造，能當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我就不能學習，不能趕上他們呢？世界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標準是普及的，而且只有在大家努力的普及的基礎上，標準才更能提高。

所謂「普及」，並不是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個人特有的，是經過大家集體的努力工作，總結經驗，經大家公認而普及的。在大家進步的基礎上的集體創作，是大家都能學到做到的，並不是什麼懸空掉下來的「奇蹟」。

所謂「創造」，決不是小資產階級的唯心空想，只是千百萬羣衆的生活與鬥爭中，在最平凡、最習見、最爲羣衆所需求、所熟悉的事物中，我們留心觀察，細心研究的結果。因此，在廣大羣衆生活與鬥爭基礎上，創造有二種：一種是較初級的，從熟悉生活與鬥爭情況，憑自己的經驗，由「熟悉生活」而生出的新辦法，使工作與生產得到部份的改進。這種創造，是工作與生產中需要的，是高級創造的源泉。一種是高級的，是更進一步的，是整理與總結經驗中的經驗，成爲方針，成爲原則，從而再提高羣衆的生活與鬥爭的創造，這就是毛主席的「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的創造，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創造。每個革命者，如果有對革命的責任心與羣衆觀點，有實事求是的方法與虛心學習的精神，就能從較初級的創造，發展到高級的創造

我們的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就是這樣的人物，向着創造的大道前進。關於領導羣衆之間的橋樑作用，還意味着領導與羣衆之間的，要能好好結合，做到上下貫通，團結一致，就經過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這許多骨幹的努力。因此，領導人員方面，勞模方面及廣大羣衆方面這三方面關係，要能得到好，是難得恰當，然後勞動模範的作用，才能發揮，這要羣衆才能密切結合。

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之對待領導人員，應是對待本單位、本鄉村、本連隊的領導人員，必須尊重、服從、並幫助他。必須與領導人員一致，把向領導人員共同商量出來的方針、計劃、辦法，以自己身體力行的模範，去影響推動羣衆，決不應聽聽本人直接領導，自高自大，任意行事。同時，應代表羣衆的公意，向領導人員提出意見。領導人員與英雄模範之間，要互相幫助、互相監督、共同前進。

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對待羣衆，特別是對待本單位、本鄉村、本連隊的羣衆，要同他們打成一片，好好的幫助他們解決困難，教育羣衆，多帶徒弟，代表羣衆利益，爲羣衆服務，組織羣衆，完成邊區所建設的任務。不要自高自大，站在羣衆頭上。不要只憑自己的主張聲聲而強迫命令羣衆，也不要用自己的模範作用當急先鋒，衝在羣衆前面很遠，使羣衆跟不上。更不要只爲私利而個人名譽而不顧羣衆。這些都會說離羣衆，使羣衆不滿的。羣衆對英雄與模範如有意見，英雄與模範要有自我批評，而不是埋怨羣衆。

我們學習模範的模範王德彪同志，能與鄉村幹部及本村人民團結得好，商議得很好，共同建立模範王家坪與模範村。要學習解放社修玉新同志，同羣衆與羣衆關係好，能建立模範生產組。要學習王家坪同志，同羣衆同甘共苦，又團結羣衆，起了建立模範生產組的作用。但是不要學習王德彪同志，他去年在邊區勞動大會回鹽池後，自高自大，說說生產，又說說羣衆。

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對待本單位的本鄉村、本連隊的直接領導者，對待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要認清自己的左右手，工作與生產的方針、計劃、辦法，要經過他們，再到羣衆中去，幫助他們解決工作中的困難，教育他們，幫助他們，要讓他們認識模範性與身體健康。不要只有羨慕、愛護，而缺乏批評教育。許多英雄與模範的垮台，不爲羣衆所擁護，主要是由於領導的幫助與教育不够。特別是高壓的領導者，除特殊原因外，不要越級的去直接幫助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解決問題，不要使他們過於突出，而脫離本地領導與本地羣衆。

羣衆對待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應當認識，他們是大大進步的模範與光榮，他們是羣衆的好朋友，好先生，他們是爲大家服務的。因此，要尊重與關切他們，向之學習，而不諷刺與忌妒。要幫助與監督他們使之進步，而不是冷眼旁觀。

由於勞動運動的發展，模範作用的發揮，就很容易由個人英雄與模範，發展成爲羣體的英雄與模範，從領導、模範與羣衆三者密切結合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模範單位，模範連隊與模範鄉村，才是真正有羣衆基礎的，生了根的模範。這與過去靠外力「突擊」而成的一時的形式的模範，那就有天淵之別。

最後，關於幹部的提高與準備作用。有許多當選的模範工作者與勞動英雄，原來就是幹部，他們之能當選英雄與模範，證明他們是進步了，提高了。有些原來不是幹部的，我們就應以他們作爲選拔幹部的後備軍。這是領導與羣衆相結合的正確的政策。不管在幹部標準上，幹部的引進上與幹部的審查熟識上，都是經過羣衆路線的。從幹部的標準來看，選拔英雄與模範工作者的四個標準：忠心耿耿，鑽研業務，聯繫羣衆與力求進步，這是經過羣衆討論，羣衆創造的標準，與我們選拔幹部的標準，基本上是相同的。從選擇與引進幹部說，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是經過羣衆選舉與公認的，是與羣衆有聯系的，這種來自羣衆的英雄模範，是幹部後備軍之不竭的源泉。再從審查與熟識幹部說，勞動運動，是最好的經過羣衆審查與熟識幹部的形式。我們這次的選舉，每一個當選者，都是經過了各單位，各「行」，各業的小組大組羣衆民主討論，審查而後選拔的，不是羣衆的陌生人。這些，都說明黨的幹部政策的新方向。這與官僚主義者，宗派主義者，只從上對下，不經過羣衆考驗的幹部政策，是有原則區別。

但是，在使用與提拔勞動英雄模範工作者時，要防止領導方面可能發生的各種偏向。首先是不敢大膽引進的偏向。領導者怕他們能力不足，不好使用與幫助他們，給他們更好的工作條件，使之充分發揮其長處，發揚其積極性。另外，就是輕易提拔的偏向。不是有步驟的，根據其力能勝任的事業，擺在恰當的工作崗位，一下子提拔過高，結果，反而使他工作成績少，以至垮台。還有，就是亂使用的偏向。不根據勞動英雄模範工作者的長處使用他們，以便發揮其長處，而是甚麼工作叫他做，甚麼會叫他參加，甚麼事都帶他當英雄與模範，結果，他忙得不得了，「誤工」很多，甚至脫離羣衆，專向上層，生產與工作成績退步，反而損壞了他們。所以，領導者對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的使用與提拔，要善於使用其長處，要有步驟的培養、提高。否則，反而失掉了他們應有的作用。

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有模範、橋樑、榜樣三種偉大作用，領導者要好好的注意發揮。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本身，則要特別注意自己，保持英雄模範的光榮。特別是一九四五年，我們抗日任務很重大，我們不僅要緊進工作，努力學習，而且還要大生產，大節約。這就要勞動英雄模範作用來完成。因此，要力行三愛三戒：

第一、要虛心戒驕傲。要虛心幫助別人，虛心聽取羣衆意見，絕不可自高自大，自以爲是，目空一切。要不斷學習求上進的精神，而不可自滿自足。第二、要學習，戒自滿。要不斷學習求上進的精神，而不可自滿自足。這要特別注意。第三、要團結，戒嫉妬。互相排斥，鬧本位主義，個人主義，而要互相團結，互相學習，萬衆一心，才能把事情辦好。毛主席再三告訴我們，要天天洗臉，照鏡子，晒太陽，以防止驕垢納污，發霉、生銹，而要永遠身強力壯，精神飽滿，保持與提高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的光榮。

最後，我提議：各機關、學校、部隊工廠的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他們的家人如果在邊區，或解放區，各機關的負責同志應該分別寫信告訴他們的家人說：某某當了我們這機關勞動英雄，或模範工作者，把他們的獎品替他們寄回家去，使公家與老百姓，更加密切的結合起來。爭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解放的最後勝利。

四 幾點意見

根據三年來特別是一九四四年的經驗，勞動運動，羣衆大會，是發揚羣衆熱情，推選建設，發現人材，改善作風，增強團結的好辦法。這種好辦法，只有真正進行革命的三民主義的抗日民主的解放區，才能實行。我們應當把這種好辦法，保持之，發揚之。

第一、勞動英雄模範工作者運動，應成爲經常制度。各單位，各系統，各區，各地方，應加強了戰鬥英雄，而且應第一位的，應當每年舉行一次，各區及各解放區，每二年舉行一次。

第二、建勞動英雄模範工作者按級選舉制，政府從縣、縣到分區，軍隊從連、團到軍，機關學校從小單位、大單位到全系統，工廠從各部門、各廠到工廠會議，然後以最高級的好英雄，參加全邊區的羣衆大會，發成廣大人民與幹部向前進一步的指示，增加了模範工作者的選舉，這就使運動全面展開，工作的改進更有保障。我以爲模範工作者的運動，應更展開到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黨務的各個工作部門中去，應更廣泛的包括更廣的一定的人員使領導幹部不僅經過上級的檢查、考核，而且經過羣衆民主的檢查與選舉。

第四、高級的羣衆大會，其作用應總結過去，開闢將來。因此，這大會應開過之後，各系統、各部隊、各地方，應分別召集各「行」、各「業」、各工作部門的大會，由各「行」、各業的英雄、模範，分別參加，傳揚大會的任務，進一步總結討論各「行」、各業的業務。中直羣衆大會，完後，中直管理委員會，應分次召集中直各單位的羣衆大會，新的羣衆大會，應由人員大會等，羣衆大會的總結，正是新的任務，新的羣衆運動的開始。一九四五年，我們將看到一九四四年的羣衆大會，更加進步，更多的新英雄與模範生長起來，勞動英雄、戰鬥英雄、與模範工作者萬歲！

德黑蘭會議與世界和平

德黑蘭會議是三大領袖國家和平底共同基礎。它宣佈了那些試探了幾世紀最後多麼成功的所有一切嘗試。它宣佈了那些試探了幾世紀最後多麼成功的所有一切嘗試。它宣佈了那些試探了幾世紀最後多麼成功的所有一切嘗試。

戰爭決定和平，未來的世界和平是怎樣一個面目決定于今天的世界戰爭是怎樣進行的。戰爭與和平是不可分割的。

德黑蘭會議的主要任務是在軍事上打敗德國，那是一個軍事性的會議，但即在那一次會議中英美蘇三大反法西斯戰爭的領導國家已經對於未來的世界和平有了一個原則性的諒解了。德黑蘭會議的公報說：

「我們確信：我們的和協，必將使和平成為永久性的和平。我們完全承認我們以及所有聯合國國家負有真正的責任，要創造一種和平，那和平必是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數人民的好感，而在今後許多世代中排除戰爭的苦難和恐怖。」

這是很自然的，因為沒有一種政治上的諒解，軍事上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從純粹軍事的觀點看，第二聯軍的條件早在一九四二年初就成熟了，然而德黑蘭會議到一九四三年底才召開，這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英美蘇之間的這種政治諒解還沒有實現。

沒有政治上的諒解不可能有軍事上的合作，這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同樣不能忽視德黑蘭會議的主要任務依然是軍事性質的。德黑蘭會議對於歐洲問題的主要着眼點雖然不是忽視政治問題，却是以軍事上打垮希特勒為主的，例如德黑蘭會議後英外相對於南斯拉夫問題所提出的三原則，其第一項就是：

「我們對於所有積極抗敵的份子都予以一切實際的援助」（一九四三，

十二月十四日，英外相在下院發言）。

因此，德黑蘭會議後雖有不少人不重德黑蘭協定，他們以為英美蘇在德黑蘭會議的團結不過是迫于當時的軍事要求所成立的一種不得已的臨時辦法而已，一旦這種要求沒有了，這不是分道揚鑣，各走各路？

這種懷疑從來就沒有動搖過英美蘇的團結基礎，但是到了去年的最後三個月，在比利時、意大利、希臘、南斯拉夫、波蘭所發生的一連串的內戰外約不平等事件，的確使人們懷疑英美蘇的團結是否能夠持續到戰後。

世界走到了十字路口，全世界的人民要求一個解答。

克魯米亞會議否決了這個問題，假如德黑蘭會議的歷史意義是在表示英美蘇能在戰爭中團結的話，克魯米亞會議的歷史意義則是在表示英美蘇在戰後不能團結的。德黑蘭會議決定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克魯米亞會議決定了民主的和平。

從理論上說這是很自然的，要不是這樣為什麼要打垮法西斯呢？難道是爲了打垮德國而西來讓另外一種法西斯制度發生下去嗎？這是不不能想像的，從而也絕不容許發生的。

然而重要的不是從理論上去推演出這一結論，而是英美蘇三大領袖國家的領袖在克魯米亞確立了這一民主和平的原則，並根據這些原則解決了實際問題。第一它確定了最後歐洲戰事的計劃和根據德法兩國法西斯「最後形勢」的具體辦法；第二它確定了歐洲被解放國家的宣言，並根據這宣言的具體解決了波蘭和南斯拉夫的問題，而且建立了三大國家共同負責解決歐洲被解放國家問題經常性的機構；第三，它解決了教巴爾幹會議關於世界安全機構的未解決的投票程序問題。

從克里米亞會議所實際解決的問題看，我們可以說克里米亞會議主要地是一個關於歐洲問題的會議，但是我們要問英美蘇是根據什麼樣的原則解決歐洲問題的呢？

用英首相邱吉爾的話說，那就是：

「我們處理歐洲大體上被解放國家所有一切問題的兩個指導原則是清楚的：一，當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我們援助任何能殺死一個德國人的人；二，當戰爭結束的時候，我們解決問題的原則是經過一個自由的無拘無束的民主的選舉」。前一指導原則是戰時的原則，後一指導原則是民主的原則，德黑蘭會議確定了前一原則，克里米亞會議確定了後一原則。這樣看來，克里米亞會議所決定的實際問題雖然都是歐洲問題，但克里米亞會議所確定的原則卻是世界性的。

正是因為英美蘇的合作基礎，一不取於戰時，二不取於歐洲，而是基於世界性的原則上的合作，我們才能了解克里米亞會議的深遠意義，我們才能了解四月二十五日在雅爾達召開的聯合國會議為什麼可能。

二

克里米亞會議在軍事上和政治上解決了歐洲問題，但從歐洲問題的解決到世界和平實現中間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一條很長的路程，因為日本雖然在太平洋上遭受不斷的失敗，但嚴格說來打垮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任務却正在開始。

這一條路怎樣走呢？

假如歐洲的道路是從德蘇的勝利路線走到克里米亞的民主路線的話，那麼亞洲的情況便會有不同，它是絕不可能從德蘇的勝利走到失敗主義的路線上去的。歐洲戰爭的勝利是定了，民主主義地產生了明天的和平；亞洲呢，亞洲的國內民主問題不替關係于明天和平，而且關係於今天的勝利。為了勝利，我們婦女應上戰場，我們婦女應作犧牲的中國非走上民主團結的道路不可。

三月三日美國國務卿格魯關於爲了「應付未來若干月間的巨大危險，我們必須團結以完成軍事努力向統一」的談話，就指示着亞洲戰爭的發展，已經到了歐洲戰爭的德蘇兩會戰前後的階段了。自然，這不是說亞洲戰爭的發展必須重複歐洲戰爭的道路；恰巧相反，我們有一切理由可以相信，我們

是能用更短的時間，更少的苦痛來走上歐洲所已走上了的道路的。

這就是爲什麼必須要一切的力量來促成國內的民主團結在舊金山會議以前實現的緣故。

打垮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任務才正在開始，亞洲戰爭還包含着豐富的發展性，但不管發展的路徑如何曲折，表現的形態如何複雜，它的前途是確定的，勝利與民主，爲勝利非民主不可，爲和平非民主不行。有些人不願說中國特殊，說中國能特殊到做出個星球外面去嗎？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四月二十五日在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會議，就是制定這一個星球上的和平憲章。

三

三大國對國際——美蘇英四國結定了世界和平的基礎，爲了維持和鞏固未來的世界和平必須具備一個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機構。

這樣的的安全機構在歷史上出現已經不是第一次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有過國際聯盟，如所週知，國際聯盟是悲慘地失敗了。不少人因爲國際聯盟的失敗從而對目前的世界機構也失去了信心。事實上這一次聯合國國家去年秋季在波茨坦議定和最近克里米亞會議確定的世界安全機構提案在基本精神上是和第一次國際聯盟毫無不同的。

首先，過去的國際聯盟並不是鞏固和發展了上次戰爭中所已形成的條約國家間的團結基礎而形成的，國際聯盟對於團結作戰的條約國家，是另起爐灶，所以它不叫條約國家，而另起名國際聯盟；但這一新的世界安全機構，對於團結作戰的條約國家，却非另起爐灶，而是把在戰爭中團結起來的條約國家的團結基礎和發展起來，成爲一個世界性的機構，所以它也不起別的名字而單獨的稱爲「聯合國」，這就指示着這一次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機構是建築在條約國家在作戰中的團結的基礎上，這一個新的機構的成立不過是把戰時的團結延長到和平時期而已。中國有一句話說「患難之交」，聯合國國家的世界安全機構正是建築在「患難之交」上的。

其次，過去有國際聯盟是在戰爭結束之後才着手組織的，然而這一次的「聯合國」却是在戰爭還在進行中就已開始組織了。這就保證了一種比較不同的不同，但更保證了有極大的差別，國際聯盟是戰後才組織的，所以國際聯盟很多人早已忘記戰爭中的團結了，而國際聯盟是一種共

安樂的組織，共事難於日子早已就忘記了；聯合國家在戰爭中就着手組織這世界性的和平與安全機構，它指示着聯合國家將以進行作戰的團結精神來進行維持和平的事業。人們已經開始了解和平的艱難不下於勝利，取得了和平才能說取得真正的勝利。和平不是一件禮物可以來分取的。

然而，最後，「聯合國家」和國際聯盟最大差別還不是在這些名稱和組織的時間的外表上，而是在它的基本性質上。在這裡我們可以列舉出以下的三點：

(一) 爲了真正有效，一個世界性的安全組織必須包括主要的世界列強；不然所謂集體安全的原則就不符合真實的力量對比，從而也就不能產生效力。在這一點上國際聯盟一開始的時候就漏了強大的美國，丟了新興的蘇聯，國際聯盟與其說是一個國際聯盟，不如說是一個以英法爲主的「西歐聯盟」；在這樣情況下它能夠發揮集體安全的作用嗎？和國際聯盟相反，這一次的「聯合國家」包括世界的主要列強，相當着反法西斯戰爭的三大領導國家的英美蘇都包括在內，亞洲的中國和歐洲法國的參加更加强了它的世界性。

(二) 在性質上，國際聯盟一開始就是反蘇的，它是作爲反對歐洲人民革命的一個反動的工具而組成的，後來它雖然以蘇聯的參加而稍稍改變其性質，但已經遲了。國際聯盟以援助芬蘭進攻蘇聯而露其真面目，正說明它是反蘇的，以反蘇爲目的。國際聯盟和「聯合國家」不是以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對立爲基礎，而是以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團結、合作爲目的。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英美則代表着強大的工業力量和堅實的勞工運動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這兩系列的強大力量在戰爭中團結了，而且已經證明他們在處理戰後問題上同樣能夠團結，戰爭中團結的基礎爲了打垮共同的敵人，和平中團結的基礎是保障反法西斯的民主。這樣，一九一九、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幾年中國際聯盟所幹的是撲滅歐洲的人民革命，但自前英美蘇在歐洲所做的却是歐洲人民的民主解放。歐洲的解放宣言，其所處理的具體對象雖然限于歐洲，但它的基本精神却是遍及于全世界的。

(三) 組成不同，性質有別，但作爲一個維持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機構，「聯合國家」與國際聯盟的基本差異是國際聯盟把維持世界安全的責任平均地分配到所有大小國家，而真正能負擔維持世界安全責任的主要列強却在形式上的集體安全制度的口號之下把它們應負的責任閃避了；「聯合國家」(賴巴頓建議)的機構却是清清楚楚把維持世界安全的責任直接地放在實際上

能維持世界安全的主要列強身上。國際聯盟作爲一個機構的缺點很多，但有一點却是特別值得提出的，那就是在執行任何決定與行動之前，要求其所有會員國家的一致，形式上其名曰尊重小國發言，但實際上却往往是大國不願負責，找出一兩個小國出來反對一場，任何決定與行動都推翻了，西班牙戰時，英法的逃避責任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出現的。和國際聯盟相反，這一次之「聯合國家」憲章，却明白的把決定行動的責任放在五大列強——五常務理事國的身上；這五常任理事國代表和六位另外選出的理事國共同組織安全理事會，下設軍事參謀委員會爲「聯合國家」的執行機關，負責維持世界安全；至于國際聯盟過去用以敷衍塞責的關於經濟和社會制裁的機構完全劃歸經濟與社會理事會，與負責行動的執行機關完全分開。作爲一個機構說，「聯合國家」和國際聯盟最大的不同點在此，它比較國際聯盟進步的地方主要地也在這裡。但正是在這一點上，教巴頓檢閱會議的初步建議受到抨擊，投票程序的問題由此而生，克萊米耶會議解決了投票程序，但直至今日各方面對於「聯合國家」憲章的批評還是集中在這裡。

怎樣批評呢？人們說：五常常任理事國，他們的權力太大了，他們好像是維持世界和平秩序的警察，不過警察的秩序用誰人來維持呢？假如警察們自己打起架來呢？「聯合國家」不應當給我一個憲兵嗎？(事實上憲兵也不能解決問題的，因爲有了憲兵，人們又會問誰來管理憲兵呢？有了管理憲兵的人，誰又來管理那管理憲兵的人呢？)如斯而支之又支，變成了紫紗之門。

這裡面包含兩個問題：第一是大國權力太大，聯合國家有形成大國獨裁的危險，這是最近泛美會議對教巴頓檢閱建議(二月八日)所作建議的中心；第二個問題是大國之間不易一致，無從決定問題，這是最近法政府拒絕爲舊金山會議邀請國家的主要理由之一。第二個問題不能成立，因爲和平的基礎就是建築在英美蘇的團結與一致上，假如說大國之間不易一致，那就是根本否認英美蘇團結一致的可能，在那種情況下和平尚且不可能，安全根本談不上了。

關於第一個問題，這是假定了大國團結了，小國還有不滿意的可能，事實上這種情況自從世界力量的對比發展到這個世紀以來所不曾有過的事情。以國際聯盟爲例，如做過十四年國際聯盟秘書(一九一九——一九三三年)的英國波斯爵士就在去年三月十六日的新聞記者會上寫過如下的話：

「凡與密切參與過國際聯盟的職事經過的都有了一個共同的經驗，那就是當大

國團結了，小國們總是滿意的，只有當大國之間發生了不和，亂子才出來，在那種情況下小國常常可作大國的代理人來擴大不和……」（一九四四，三月十六日同報）。從這裡可以看出，只要大國能團結，小國的不滿是很少可能的。

四

事實上，作為一個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機構，敦巴頓橡樹的建議雖不至善至美，但已能證明願現實不忘理想的能事了；不過另一方面也很顯然的，任何完美的機構是不能代替強列強國的政策，國際聯盟的致命傷不在它的機構不好，而在國聯國家的領導國家沒有一個團結合作的政策。假如一旦英美蘇互相衝突起來，怎樣好的機構也不能拯救和平，假如英美蘇繼續團結，集體安全可行，世界和平有望。敦巴頓橡樹的建議不過是把這個世界和平的基本前提弄得非官清楚，而不把它隱藏在任何抽象的公式後面而已。有團結有和平，這是從事實方面說；為和平，非團結不可，這是從三大陣陣的責任上說。於是問題又回到出發點的地方：英美蘇三國之間能長期合作嗎？

這裡面包含兩個大問題：
 第一個大問題是英美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和蘇聯社會主義民主國家的團結合作問題。這一個問題在實際上又分成兩部份，一部份是以英蘇合作為主的英美蘇在歐洲問題上的團結合作，一部份是以美蘇合作為主的英美蘇在亞洲問題上的團結合作。

關於以歐洲問題為中心的第一部份的問題，我們知道，由于德黑蘭到克里米亞一路的發展，已經指明了英美蘇是可能在民主的基礎上建立起長期的合作來的。在這一種合作中，英美蘇雙方是互有讓步，但具有共同的基礎的。共同的基礎是歐洲解放宣言中所規定了的民主程序，至于讓步，在英美蘇方面則是不支持和反對歐洲團結的對峙力量，在蘇聯方面則是不用自已的刺刀在歐洲團結的主義的革命的。歐洲和南斯拉夫問題的解決都指示了只有空想互讓的條件下即民主決定的基礎上，歐洲問題才能求得合理的解決，而這一解決的方式絕不如此一些左派幼稚病者之所想像，實際上是一條無路可走，也不是一條有派幻想家之所描畫，實際上英美蘇的勝利，事實的真相，正如美總統羅斯福三月一日在他的國會報告裡所說的一樣，是雙方都有所讓步的。

然而假如英美蘇在歐洲的合作僅僅是為了應付急務的一種無原則的臨時措置，我們是沒有理由相信，這種合作是會久遠的。事實證明了這種合作不是一種無原則的應付措置，而是建立在一個共同的原則基礎上的，那基本的原則就是民主。在這一意義上我們說歐洲解放宣言具有世界意義，它不僅奠定了英美蘇在歐洲合作的基礎，它同時奠定了英美蘇在世界規模上合作的基礎。

亞洲方面，有這樣一點不同，蘇聯直至今日還沒有參加對日作戰，不過不管戰爭的發展將來採取什麼途徑，縱則不是為了對日戰爭的勝利，為了世界和平的維持與鞏固，以美蘇合作為主的英美蘇在亞洲的團結合作是必然的，而那團結合作的基礎，不可能和在歐洲的同樣。

所有這些已產生的和將產生的形勢是偶然嗎？不，不是的，世界變了，由于蘇聯生長成爲一個世界的領導列強，整個世界的力量對比變了，例如索來以保守和現實見稱的南非總理史末資將軍就對這一問題說過如下的話：

「（紅軍打敗德軍的勝利是人類史上稀有的一件大事）。假若這一件大成功的領導者的領導使全世界驚奇。人們可以說共產主義不行，不過假如這樣的成就使共產主義底果實的話，他們就不能不面對一個新的事實，而在未來的幾個世代中，人們是不能不對這一新的事實加以估計的。」（一九四四，三月三十一在南非議會上的發言）。

同樣美國務院的發言人，助理國務卿柏利說過：

「蘇聯的力量將要增強，那不僅是因為它的人口增多的原故，而且是因為它的工業效能和科學效能是在不斷地增強。四歐諸國和美國獨佔近代科學，工業和交通發展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一九四四，六月二十七日）。

以這樣強大的軍事力量和工業力量為基礎的蘇聯，這一新興的政治力量走上了世界舞台，要使它的力量不在全世界的範圍內首先和它接壤的歐洲兩洲產生影響是不可可能的。這是一件新的事實，英美蘇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以怎樣的情緒來面對這一新的事實呢？兩條路，一條路是固守舊有的政策，舊路，這一條路是徹底破產了；另一條路是克里米亞會議所指示的新路，這一條路不僅在克里米亞會議確定了，而且已經在歐洲戰場獲得了成功。

那成功的輝煌和第一次歐戰一比就可將如觀火。第一次歐戰是怎樣結束的呢？歐戰的結束分成三部，首先是沒有進步意義的戰爭，其次其繼續戰爭而來的是普遍於歐洲的人民革命，而最後一幕則是列強用暴力來撲滅歐洲革命。

和反蘇；但這一次的歐戰却不同了，歷史的發展不是分成三步來進行的，它只有一幕，英美蘇三國聯結成一條反法西斯的戰線，而法西斯則在和平地解決了歐洲人民的民主革命，竟走了英美蘇三國聯結的後塵。歐戰地說，在第一次歐戰時，因為戰爭並沒有進步的意義的，所以戰爭和革命連續發生的，人民的革命失敗了，戰爭的勝利也失敗了。可這一次呢？因為戰爭是革命的，戰爭與革命不是兩次革命的，而是戰爭勝利了，革命也勝利了；因為它是一個革命的戰爭，所以它在戰爭中完成革命。

由於蘇聯作爲一個盟國的列強之一躍上了世界政治舞台，由於歐洲兩洲人民的覺醒和力量的增強，由於英美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內部的進步力量的抬頭，由於英美的團結合作不是一種純粹的聯盟，而是基於雙方利益的長久利益——我們是有一切理由希望經過一次戰爭，歐戰兩洲的民主主義的革命是可以和平地完成的。這是英美蘇在全世界範圍的長期間的合作的基礎。

然而英美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和蘇聯社會主義民主國家的在民主基礎上的合作還不全問題的全部，英美之間能夠長期間的合作嗎？

假如英美和蘇聯之間的合作將變爲政治經濟重於經濟性質的話，那麼英美之間的的合作基礎是經濟重於政治的。

萬人皆知沒有經濟上的聯繫，世界和平是不容易保障的；沒有英美之間在世界市場上長期的合作，世界安全是沒有根據的。

爲了調整這一問題，聯合國去年曾在布里斯本制定了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復興開發銀行兩大經濟機構；但很顯然的，任何美善的經濟機構本身是不能夠解決當前的現實問題的，假如當事者的領導列強是沒有一個合理的政策和執行這個政策的決心的話。

當前的現實問題是那些問題呢？
經過了這一次戰爭，英美資本主義經濟的生產力是空前地提高了，資本主義的世界生產力是幾何級數的提高了，但世界市場的範圍却沒有增加；那麼，這些空前提高了的生產力究竟到哪裡去找尋市場呢？
雖然今天的世界是一個被戰爭的砲火摧毀了的世界，把這一個世界的殘廢平復就是一個廣大的市場，因此有了善後和救濟的工作，這是重要的，但是作爲解決世界市場的問題的方法是不夠的。

其次，經過這一次戰爭，德國和日本從世界市場上退出去了，這是一塊不小的空間，填補這空間就是世界市場的擴張，這也是很重要的，但作爲解決世界市場問題的這種解決是不夠的。

關於這問題，上次大會的經驗和教訓都一再地指出了。把有與的與世界市場來作瓜分，是解決世界市場的辦法，不僅解決不了問題，而且會引起這一次大戰的戰爭。

現在，人們又一再地提醒歷史的教訓了，我們應當如何防止這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爭呢？
問題是出在當前的世界——開戰的開端；美國擁有資本主義世界最強大的生產力，英國擁有資本主義世界最強大的鋼鐵工業和英國最強大的生產力，在全世界市場上競爭不遺餘力，而日本則擁有最強大的鋼鐵工業，美國則擁有最強大的鋼鐵工業，而它又具有最強大的生產力，所以它主張，開放一個世界市場，從事自由競爭，這是英美兩國對等的和互利的力量。對於這一問題，我們認為：假如我們不能在這兩項力量之間保持一種合理的平衡的關係，英美在世界市場的矛盾是不會解決的，只有加強的，而這種不合理的平衡的關係對於世界和平的威脅是嚴重的。

首先我們得承認英國的當前的世界市場上的地位是有問題的，據一個統計的資料，自一九零六年美國工人在一五零小時中的生產量在平均每一刻英工人生產量的二又二分之一倍至三又二分之一倍。以這種經濟優勢的生產力，市場一旦開放，英國是有充分理由想從美國商標的競爭的。

因此要對我們所考慮到英國現有的境況的話，同時這是不可能的世界市場的絕對封鎖或絕對開放，要是爲了使得英商能夠並且願意開放市場，英國必須照顧到英商的特殊情況，和英國成立一個合理的分配協定。不然，一方面要求無條件的開放市場，一方面主張無條件的保持現狀，世界市場不僅得不到解決，而且世界和平還會遭到危險。

然而當如此，還不能解決問題。因爲這只是一種合理的分配而已，世界市場並沒有擴大。不僅沒有擴大，假如英國還是繼續過去那種殖民地政策，世界市場內容是不僅不會增加而且還要縮小和對地縮小的。試以印度爲例：

自一九一三至一九三八，英國雖然能相當經常地維持從印度輸入相當於全英國輸入額百分之五的原料，但由於印度被英國人工地停滯在半封建經濟的狀態下，千百萬人民大眾仍得在飢餓線上，英國對印度輸出額逐年減少了：一九一三年英國向印度輸出相當於全英國輸出額百分之十五，到一九二九年這輸出額已減爲百分之十點七，而到了一九三八年只有百分之七點三。

了。這至理地說明了，殖民地政策即對於英國的本國而言，在久遠的發展中是不僅擴大世界市場的。

再舉一例。當英美兩國殖民地的北美十三州和美國獨立後的英美貿易關係。

當初英政府不肯放棄北美十三州，其原因之一就是因為英國統治階級恐懼北美一旦獨立了，英國將失去一塊安全的後保障的市場，但美國獨立了，英美間的貿易關係怎麼呢？一八二八年英首相加爾特說：「從獨立後的英國，英國獲得了比在它們仍為英國殖民地時更多的商業上的利益」。

從這一個最歷史的，一個現實的舉例中，我們可以看出殖民地政策不是擴大世界市場，而是縮小世界市場的。殖民地制度一天不改變，世界市場一天在縮小，而英美的資本主義生產力却一天天在發展，在提高；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經濟正常發展的可能性是很少的。因此為了擴大世界市場，為了獲得英美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能正常發展，殖民地制度的廢除是絕對必要的。

時至今日，擴大世界市場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放棄殖民地制度，在讓殖民地人民自決——獨立的基礎上，即即把廣大而全世界上落後地區的開發計劃，在這一開發計劃中英美必須合作，但開發決定權歸英美兩國。正如向在這一問題上，英國手中擁有政治的鎖鑰一樣，美國的手中擁有經濟的鎖鑰。一旦這開發計劃能在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的政治基礎上展開，世界市場於二十年之內擴張十幾倍是完全可能的。

只有在一個不斷擴張的世界市場的基礎上，英美在經濟上的合作有基礎，世界和平的健全的發展才有保障。

英美和蘇聯之間的關係是政治性的，英美之間的關係是經濟性的，這兩種關係上來看好像很不相同，但實際上却是一脈相通的：政治上的民主進步不僅是英美和蘇聯之間的合作基礎，而且是英美之間合作基礎。民主不僅是通向永久和平的大道，而且是走上長期繁榮的階梯。

五

世界和平的條件解決不了世界和平的問題，世界和平的問題決定於英美蘇能否長期合作，英美蘇能否長期合作的前提條件是具備了，然而客觀條件的具備不是說和平會自動地到來，不，和平是不會自動到來的，正如同勝利是

不會自動到來的一樣；勝利需要爭取，和平更要爭取。因此解決世界和平的問題，首先要看聯合國家的各國政府是不是代表各國人民的全國性的民主政府？（按略）

其次，即便政府具有代表全國各方面民主意見的全國性的政府，他們派赴舊金山會議的代表團依然是以誰代表全國各種政治意見為原則。英美的代表團內民主共和黨氣平分春色，英國的代表團包含了保守黨和工黨這兩大主要政黨，其袖如法國、澳洲各代表團亦莫不如此。這理由是顯而易見的，戰爭既然是人民的戰爭，那麼和平必定是人民的和平，只有真正代表人民的人才能組織人民和平。（按略）

因此，世界和平的問題歸根結底是決定於人民大眾的意志。如果沒有人民大眾自下而上的民主團結的鬥爭，世界和平與安全從沒有真正保障的。條條道路通到舊金山，但條條道路都是鬥爭的道路；只有在這種不鬆懈的鬥爭中，我們才能創造那種和平，那和平既能一方面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數人民的好感，而另一方面又能在今後許多世代中排除戰爭的毒根和惡苗。

更堅強的戰鬥下去吧，黎明已經不遠了！

啓事

本期送審稿先後被扣達七萬餘字，因臨時補稿一再延滯，致出版時間脫期甚久，事非得已，尚望本刊讀者原諒。

論克里米亞會議的偉大成果

「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

這篇文章是「戰爭與工人階級」的社論，原文載一九四五三月二十五日雜誌第四期中。

斯大林、赫斯、邱吉爾三大同盟領袖所舉行的克里米亞會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公正地評價為一件具有歷史性的政治意義的事件。毫無疑問地，就在克里米亞所通過的各項決議，不僅僅對於戰爭現階段，並且對於戰後世界秩序的建立，都有着巨大的影響。克里米亞會議和德黑蘭會議前後相距，總共不過十四個月。在這個時期當中，整個的軍事戰略與國際形勢，都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紅軍不僅僅將歐洲的人民從希特勒暴政的威脅之下拯救出來，並且還使得法西斯德國瀕於崩潰的境地。希特勒的殘暴集團已經分崩離析，德國先前的各附庸國已經把武器轉過來反對它了。由於德黑蘭決議實現的結果，英美兩國的軍隊已經在歐洲開闢了第二戰場。法西斯的野獸正在兩線之間受到夾攻，戰爭的烽火現在已經在德國本土上燃燒着，而這個戰爭正是由於德國逼着愛和平的人民來進行的。當德黑蘭會議的時候，紅軍還在哥美爾和基輔一帶作戰，而現在紅軍則在柏林的外圍擊給敵人以致毀性的打擊。隨着戰勝敵人的勝利日益臨近，在同盟國的前面所提出來的政治問題的範圍，就日益增長和擴大起來。無庸諱言的，就是希特勒的叛徒以及他們在同盟國內的公開的和暗藏的辯護士們，他們的打算，是希望着在同盟國前面所提出來的許多問題的日益增長和日益複雜化，會加深他們之間的意見分歧，乃至最後引起他們彼此之間的分裂瓦解。

克里米亞會議及其成果，已經證實了這類打算的毫無根據和不合現實性。我們從第一眼看可以看到的，就是克里米亞會議檢討了和解決了許多遠比德黑蘭會議更為廣泛的問題。德黑蘭會議的決議，主要是關於軍事問題，首先就是關於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問題。克里米亞會議的決議，除了軍事範圍之外，還包括了有關目前局勢以及戰後世界建設的許多廣泛的重要政治問題。這的確是同盟國之間合作的增長與鞏固的一個最無可爭辯的證明；這種合作還具有着更重大的意義，就是因為這種合作，是由於社會制度與觀念不同的各列強的代表們，在他們克服了各種困難（這些困難是由於他們對發生出的各種問題抱着不同的觀點這一不可避免的事實所引起的）的過程中鍛鍊出來的。

克里米亞會議的結果，又再度而且特別顯明地向全世界證明出，就是同盟國家不僅僅具有一種願望，並且還具有一種本領，足以消除所發生出的各種意見上的分歧，而以互相瞭解與行動一致的精神來解決各種問題。

在戰爭的現階段上，當最後擊潰共同敵人這一件事已成爲同盟國家的唯一的軍事目標時，在克里米亞所達成的軍事努力，要比以前任何一個時候都更爲切實協調。關於對德軍和空軍要從東邊、西邊、北邊及南邊向德國的心臟發動的更加有力的打擊的時間、規模和協調，都已經商得完全同意，並已詳細擬定計劃。這一段話，就正像是對於希特勒德國的一個死刑的判決。現在，問題就在於實現這些計劃，問題就在於使得我們同盟國的軍隊，也能用紅軍在德國本土上消滅及追逐敵人時所用的那種摧毀的力量去粉碎敵人。擊潰共同的敵人——希特勒德國，這是目前階段上的一件最重要的目標，但這還不是各愛自己的人民因而團結起來共同奔赴的一個唯一的目的。在這次戰爭中遭受了各種難以言傳的苦難的人民，他們希望大戰結束後，能夠保證他們有一個更長的和平共處的時期。從歷史的經驗來看，特別是從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三十年的經驗來看，固然地，就是行將來臨的和平的性質與久遠性，要全靠這次戰爭是怎樣結束來而定。這首先要看德國潰敗之後對德國的態度，其次要看愛和平的各列強的戰後合作的保證而定。不啻是前者還是後者，歷史已經把主要的責任，放在三個領袖及希特勒聯盟的三個偉大同盟強國的身上，因此全世界的民主人士，都認爲克里米亞會議對於這些問題的決議，是足以令人慰藉的。

在克里米亞文獻中所敘述出的三大同盟國對德國的共同政策的各項原則，同是爲了達成一個確定的目標，根絕納粹主義，消滅德國的軍事實力。由德國人所開辦的和使得世界各愛和平的國家遭受了重大損失的這一次戰爭，應該要這樣結束，就是要使得德國強盜完全不再爲人害，要使得德

國永遠不能再破壞全世界的和平。這就是愛自由的各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意志，並且在克里米亞所制定的綱領也正是符合這個意志；這個綱領的內容所包括的就是：同盟強國的軍隊（也包括法國的在內）佔領德國，在軍事上及經濟上解除德國的武裝，公正而迅速地懲罰戰爭罪犯，要德國人用實物賠償因其破壞行為所遺成的損失，根絕法西斯的組織、法西斯主義的有害精神及在德國有著鞏固的巢穴的軍國主義的思想。

無庸諱言的，講到在德國潰敗之後對德國的態度，目前還存在著一個問題，就是英美某些有影響的集團對於這個問題所採取的立場，並不是由這些國家的民族利益或者是聯合國的公同利益出發，而是由這些集團的個人狹隘的經濟及政治的打算出發的。這些打算，主張要保存一個強有力的德國，但同時這就是要保存著德國在不久的將來新的侵略的威脅。這些來自天主教反對派的（他們是團結在梵蒂岡的周圍的），和來自工業家與金融家階層的所謂與德國講和的擁護者們，首先就是這些在他們錢袋中生活的愛國志士們，他們用對於基督教的仁慈與人道的假仁假義的呼籲，他們用各種隱晦的經濟的理由，說為了世界貿易的繁榮必須保存德國的經濟機構，說賠償制度的對於貿易與勞動市場會發生有害的影響等等話，來掩蓋起他們真正的目標。但是請問一聲：這些為德國的新的侵略和再造成千百萬新的人民的無辜犧牲打開一條出路的提議，究竟和人造及仁慈有些什麼共同之處呢？再問一聲：這些允許德國強盜經過一個短時期又重新把成代的人的勞動成果化為灰燼的提案，和經濟的繁榮又有什麼共同之處呢？

無庸驚奇的，就是克里米亞的決議，已使得這些為德國辯護的人們驚愕失措了。現在他們之中有些人，正像倫敦的「經濟學者」雜誌所做的一樣，想表明出克里米亞的文獻並不怎樣十分明確，認為很難說出這個提供出來的和平是硬性的還是軟性的？甚至懷疑到同盟國會不會擱置這個問題的決議或者是採用了這個堅定的決議？當這個雜誌寫道：「一切都要解釋而定」這一句話時，這個雜誌就明顯地告訴了我們那些為德國侵略辯護的人們將要怎樣行動的情形。然而我們必須在此指出，就是絕沒有一種對於三強會議決議的明白的和曖昧的曲解，能夠幫助這些為德國辯護的人們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至於講到希特勒黨徒們本身，那麼他們絲毫都不能懷疑這一件，就是同盟國在克里米亞會議中，已經對德國通過了充分堅定的決議了。在克里米亞會議的前夜，也正像在德黑蘭會議的前夜一樣，希特勒的黨徒們對盟國

發言，說好像同盟國正向德國人民提出了各種允諾和賄賂，而其目的就是想「摧毀德國人的道德精神」。

創造這種預言的法西斯說謊大家們，又再度落空失敗了。各國的報章雜誌都特別指出了一點，就是克里米亞決議的嚴峻而堅決的語言，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所公佈的威爾遜總統十四條款中的誇張而散漫的語言，是有著天壤之別的。那時候，打了敗仗的德國軍國主義者，他們還能夠創造出一種奇談，好像他們並沒有打敗仗，而是被內部的敵人出賣了的。現在德國人是親身痛感到而確信自己的失敗了，什麼東西都再也不能幫助他們從這種失敗中得到拯救了。同盟國對於賠償問題的決定，不僅僅是合乎正義的，並且從經濟和政治的觀點上看起來，毫無爭論地也是非常合宜的。德國必須就其對於同盟國家所造成的損害用實物來賠償，並儘可能地賠償到最大的限度。像把德國生產機構的一部分立即轉讓給希特勒匪徒所破壞了的國家，像經常地提供國民經濟的實物來作賠償這些步驟，是不可能有什麼嚴重反對的。同樣的，要使德國人，首先是那些參加了希特勒對別國侵略的人們，儘可能地用辛苦勞動去恢復那些他們在掠奪的遠征中那樣輕易破壞了的一部分的東西，這也是不可能有什麼嚴重的和合理的反對的。假如我們注意到歐洲像一片汪洋大海似的灰燼荒蕪、貧困和痛苦，並且由於德國人的罪惡而使得歐洲千百萬的人民流離失所和失掉了謀生的最基本的基礎的話，那麼像美國勞工聯合會主席格林反對對德國人的「強制勞動」這一類的德國侵略者的虛偽的哀傷，又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呢？

克里米亞會議對國際安全組織的建立，有著非常實際的貢獻的。這一個工作，是由莫利科三國外長會議和德黑蘭會議所開始而得到好的成果，後來又在賴巴敦橡樹會議的非正式談話的過程中繼續發展下去。大家都知道，在這些談判當中，已經奠定了國際安全組織的基礎，並且和這個問題有關的十分之九的問題，都已經用完全一致的精神解決了。克里米亞會議也本著同樣的完全一致的精神，解決了將來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表決程序的那一個重要的問題，而在賴巴敦橡樹會議時，這個問題是沒有得到一致的同意的。

據外國的報紙所載，特別是美國的報紙，這個問題是這樣解決的：凡在與採用懲處手段無關的一切情況之下，理事會的決議都由大多數的表決決定，而參與爭端的國家，在解決這些爭端的問題時是不應該參加表決的。但在有需要採用懲處手段和軍事制裁，這一類的懲處手段的情況時，安全理

專會的決議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是當理事會會員國的大多數（其中包括它的五個常務理事國：蘇聯、美國、英國、中國和法國）都表示贊成這個決議時才能採用。

對於投標表決這個問題的解決，在建立國際聯盟以維護和平與安全的事業上，顯現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可能性。這不僅是就表現在關於在舊金山召開聯合國會議這一個具體的步驟的決議中。我們應該在此指出，這是這個會議在促進國際間和平的基礎這一點上，是有着重大的作用的。由於歐洲很多國家從法西斯主義之下得到解放的結果，就發生了許多急待解決的政治與經濟的問題。有時，對於這些問題，在同盟國之間是有着分歧的意見的。從另一方面講，隱藏在同盟國列強陣營中的團結的敵人，他們盡力地鼓吹各種已經存在的和查撥出來的分歧意見，特別是熱心地對於「瓜分歐洲為勢力範圍」的各種非難從事投機性的活動。在克里米亞所通過的「關於歐洲的宣言」，顯然是對於在同盟國經久合作的事業中的各種敵人的陰謀的一個嚴重的打擊。在這種文獻中，三大同盟國的領袖都表白了他們自己的意志，願在「在援助和維持國際團結之下並得解放的各國人民，以及歐洲的各種必需而所關的人員」在他們用民主方式解決他們迫切的政治與經濟的問題時，採取「一致的政策」。在目前艱苦的條件之下的歐洲被解放國家的人民，他們是希望根據民主的原則建立他們自己的生活。用動員人民一切力量開方式來克服法西斯主義的殘餘，來消滅法西斯主義的基礎及其破壞的影響，這已是一件用不着再加以證明的事實了。

為將來的歐洲着想起見，現在最重要的就是不容許再保存法西斯主義的殘餘的巢穴和蘇聯的禁地。因此，歐洲各國解放國家的團結問題，和根據法西斯主義的任務是互相交織着的。在這一方面，三大同盟國必須依照民主的原則來採取解放了的歐洲的人民，並且在他們需要作這些行動的情況之下，共同協商採取一致的行動。關於波蘭問題的解決，應該就是克里米亞會議的決議的成就之一。聯合國共同事業的敵人，特別是極端流亡「政府」中的那些早已破產的波蘭反對派，他們對波蘭問題之間對於波蘭問題的分歧意見，會成爲一個不能解決的障礙。這種對波蘭沒有議成爲事實。波蘭的問題，在多次多難的波蘭從德國侵略者統治之下爭取解放的過程中所成就的現實的基礎上，已經獲得了解決。很明顯地，就是只有這種解決才會有生氣，至於那些不願理解這一問題的份子們，就應該到歷史

之外去了。在克里米亞所達成的這種諒解，無論是對於波蘭政府的問題，還是對於波蘭的各種組織的問題，都是從這樣一個新的形勢出發的，而這個形勢，就是因爲蘇聯的軍隊完全解放了波蘭的結果而在這個國家形成的。

在波蘭成立起來和順利工作的波蘭臨時政府，因爲採用了吸收波蘭本土與國外波蘭人士中新的民主份子的新途徑，這更爲鞏固了和擴大了它的民主的基礎。因此，在這種途徑之後的波蘭臨時政府，不僅獲得到蘇聯方面的承認，並且獲得對英美方面而承認，這就使波蘭會結束一個非常的情況：就是蘇聯和華沙的波蘭臨時政府維持外交關係，而我們同盟國和倫敦的流亡政府維持外交關係的狀況。現在這個流亡「政府」，是最近提出政治舞台了。至於波蘭的議界，同盟國國家則是從波蘭臨時政府看是一個強大、自由、獨立與民主的波蘭的最大的願望，而商得了同意。爲了波蘭的利益起見，波蘭東部的疆界，依照卡廷線而在這個區域稍後提出。波蘭方，是已經最後地動定了。同時並根據波蘭北方和西方領土真正解放的原則，解決地指出了一個解決波蘭西部疆界問題的道路。關於波蘭與蘇聯的邊境解決，爲波蘭與東方偉大鄰邦之間的邊境關係，以及爲防止德國對大國重新佔領，已達成了一個波蘭的基礎，並且這解決是符合波蘭人民的生存與利益的。

波蘭「政府」的成立或波蘭的統一，曾他到大波蘭與克里米亞的決議是「第五次瓜分波蘭」時，他們已滿腔地發出他們自己是希特勒的傀儡人了。據「蘇聯郵報」發表的記者行期之波蘭的親希特勒的記者們，他們曾對波蘭意見，這是蘇聯用不滿意者的，當同盟國就波蘭問題而進行商議時，同時波蘭的這些敵人的人士的基址據說時的時候，他們一無所有了，同時波蘭的這些敵人的，就是做美國「新亞夏利報」這樣有聲望的報紙，竟也在克里米亞會議的第二天發表出其「不安」，提出了許多波蘭的「有學」問題，要如：「三三三三」之所謂波蘭的卡廷線，是不不以其爲是公正的，或是這是因爲形勢是這樣變化的呢？關於這些問題是及正的人，應應爲什麼又承認波蘭「新亞夏利報」在波蘭西方獲得真正波蘭「呢？雖然在波蘭上並沒有直接證明，可是很多的人都承認這是一種「補償」。爲什麼要這補償，假使這不是補償，那麼這又是什麼東西呢？

這些報紙的波蘭人，現在那些頭等輪船定各種原則的人們而所提出的問題，正是這波蘭的價值，願三波蘭的領袖在這些原則可能通過的時候，使

這些原則進行並且運作決定。事實上，這些問題，應該說是向那些願意解決了舊憲法之遺囑上就在同盟國之國再造成新的意見分歧的人們提出來的。

克里米亞會議對於南斯拉夫問題的決議，指定了要安插南斯拉夫各民族的所有民主力量於團結的事業。克里米亞會議認為必須向鐵托元帥和蘇伯西奇博士建議，立即迅速地將他們兩個人之間的協定付諸實行。大家都知道，這個協定在三個月以前就已經成立，並預備建立一個統一的民主政府和攝政會議，但是由於鐵托在流亡國王彼得第二的反動力量反對和對他的包圍，以及在同盟國家中的某些反動力量的支持，一直到現在都沒有能實現。現在，蘇伯西奇政府已經到了伯爾格萊德，準備在當地和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員會，成立一個在去年十一月間鐵托與蘇伯西奇的協定中所籌備的聯合政府了。

克里米亞會議提出了一個同盟國更進一步鞏固與合作的方案。當時決定每三四個月定期召開一次三大同盟強國的外長會議，來就各種發生了的問題作經常的磋商。全世界廣泛的民主人士，都非常滿意地接受了克里米亞會議的構思。民主的精華雜誌及社會閱人，都一致承認這次會議的成功結果，是遠過於一切的期望的。克里米亞的決議，被評價為是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建設性的文獻；它不僅提出了一條能滿足被解放的人們的願望與期待結束戰爭的道路，而且還指出了各種從前所未能提供的保護世界和平最實際的方法。從另一方面講，用不誇張的說，就是那些把自己的政治打算指望着盟國之間的意見分歧的人士，他們是不滿於克里米亞會議的決議的。這些人士，譬如美國最反動的參議員們，羅斯福和斯克里普斯——霍瓦德系統的維法西斯的報紙，以及英國的某些報紙。他們早已在用傳單或在迷離，想趕忙來證明出他們的「懷疑」及「可疑」，或者就是對克里米亞的決議加以這一種或另一種「中傷」的攻擊了。因此，這些人覺得難免的問題是「不滿意」。我們只要翻開一看地圖，就知道在這些問題上絲毫都沒有有一點不明白的地方。關於維法波羅的海各共和國的問題，雖然很明白的，就是克里米亞會議也正確地說此後同盟國代表的任何會議一樣，簡直沒有討論過這個波羅的海「問題」的理由，比方說吧，就有如我們沒有討論加里福尼亞的「問題」的理由一樣，但是這些問題中的某些人士，還是對這個問題在大散發其挑釁的疑問和聲明。

在同盟國中的反動份子和親法西斯份子，無疑地，他們是反對克里米亞

的決議的實現表示激烈的反動的，而我們也必須為了幾百萬人民的共同利益，來堅決地克服這種反動。

三大同盟強國領袖所舉行的克里米亞會議，形承重負，並成爲在國際擊潰及消滅法西斯主義獨裁的遺囑上，以爲我們出了一條最自由的尤小民族的利益而保證全世界和平與安全的道路之一個堅實的基礎。

蘇聯人士在其對於克里米亞會議的決議的評價中，是這樣說的：「我們這些決議中，到了同盟國之間日益增長的相互瞭解的基礎，這可等補償了國際關係的解決，於是順利地解決他們目前所面臨的最重大任務——無論怎樣後完爲擊潰共同的敵人，還是維護着世界的公理而經久的和平——一個偉大的（基 譯）」

啓事

這一期決定刊載而不能和讀者諸君見面的文章有

- 和平、繁榮與進步的道路 白勞德
- 這五年中國經濟史話 許濟新
- 論中山先生到民主之路 沛然
- 評林語堂作「枕戈待旦」 福爾曼
- 甚慶力能阻止着民主運動的推進 星仿
- 謹向讀者、作者致無可奈何的歉意

附錄 克里米亞三強領袖的聯合聲明

過去八天來，三個同盟強國的領袖——大不列顛首相邱吉爾、美利堅合衆國總統羅斯福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主席斯大林借向外長、參謀長和其他顧問，曾在克里米亞會晤。除三政府首長外，參加會議的有下列的人：蘇聯方面：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長莫洛托夫，海軍人民委員部長海軍上將庫茲納佐夫，紅軍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安東諾夫，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副部長維辛斯基，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副部長邁斯基，空軍元帥胡第雅科夫，駐大不列顛大使古塞夫，駐美大使葛羅米柯。美利堅合衆國方面：國務卿斯退丁赫斯，總統私人海軍參謀顧問海軍上將李海，總統特別助理賀浦金斯，戰時動員局局長貝爾納斯，美國陸軍參謀總長美國陸軍元帥馬歇爾，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兼全美艦隊司令海軍上將金氏，陸軍後方勤務部長陸軍中將索維威爾，戰時航運局長海軍中將蘭特，美國空軍總司令美國陸軍參謀總長少將庫台爾，駐蘇大使哈曼，國務院歐洲司司長馬太，國務院特別政治事務局副局長希斯，國務院常務副總長，暨政治顧問、軍事顧問、和技術顧問。聯合王國方面：外相艾登、戰時海軍大臣李德，駐莫斯科大使卡爾，外務部次官賈德幹，戰時內閣閣員布里斯奇，帝國參謀總長布魯克，空軍參謀長波多德，海軍第一次官兼海軍總參謀長肯寧漢，國防部長參謀長伊爾邁，地中海戰區盟軍總司令亞歷山大，華盛頓英美參謀聯席會議英方主席威爾遜和英方代表薩維爾，暨軍事顧問和外交顧問。

下面是美利堅合衆國總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主席和大不列顛首相關於克里米亞會議結果的報告：

一、德國的敗北

我們已經考慮過而且決定了三個同盟強國爲使共同敵人徹底敗北的軍事計劃。三個同盟國的軍事參謀，在這次會議的全期間，始終每天會商。這些會商，從一切觀點來看，都是最令滿意的，結果已使三個同盟國軍事努力的

的協同比一向更密切了。我們已經互相交換了最充分的情報。關於我們的陸軍和空軍要從東邊、西邊、北邊和南邊向德國心臟發動的新的更加強有力的打擊的時局、規模和協調，都已商得完全同意，并已詳細擬定計劃。我們的聯合軍事計劃，唯有當我們執行這些計劃的時候，才使人知道。但是我們相信：三國參謀部之間在這次會議中達成的十分親密的合作，結果必將使戰爭時期縮短。三國參謀部的會商，今後遇到必要時將繼續舉行。納粹德國已註定滅亡，德國人民如果企圖繼續一種毫無希望的抵抗，將徒然使他們自己因爲敗北而受的損失更重一些罷了。

二、德國的佔領與控制

我們已就共同的政策與計劃商得同意，以便實施在德國武裝抵抗最後被打破後，我們要共同使納粹德國接受的無條件投降的條款。這些條款，在德國的徹底敗北終於完成之前，不能使人知道。根據已商得同意的計劃，三個強國的軍力將各自佔領德國的一個別區域。這計劃規定，經由一個中央管制委員會行使互相協調管理與控制，中央管制委員會由三個強國的最高司令官組成，總部設在柏林。我們已經商得同意：法蘭西如果願意的話，三個強國當邀請她承受一個佔領區，並參與管制委員會，作爲第四委員。關於法蘭西所佔領區域的範圍，將由有關四國政府經由她們的代表在歐洲顧問委員會中共同商定。我們不屈不撓的宗旨，就是要消滅德國的軍國主義和純粹主義，要確保德國決不能夠再擾亂世界的和平。我們決定要把德國一切武裝力量解除武裝，予以解散；把那曾經一再極力使德國軍國主義復活的德國參謀部永遠解散；把德國所有一切軍事裝備撤去或者破壞掉，把所有一切會供軍事生產之用的德國工業排除掉，或者予以統制；使所有一切戰爭罪犯受到公正而迅速的懲處，要實行和德國所造成的破壞相當的精確的實物賠償，要捕滅納粹黨。納粹的涉謀、組織和制度，從德國人民的公共機關中，從文化生

活與經濟生活中消除所有一切納粹的和軍國主義的影響，並且要在德國和歐洲採取對於世界未來的和平與安全實屬必要的其他措施。我們的宗旨決不是要消滅德國的人民，但是惟有當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已經根絕了的時候，德國人才有過適當生活的希望，他們才在國際交誼中佔一席地位的希望。

三、德國的賠償

我們已經考慮過關於德國在這次戰爭中使同盟國家所受損害的問題，並且認為應由德國用實物將這種損害儘可能賠償到最大限度，將設置一種損害賠償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將奉命考慮關於德國使同盟國家所受損害賠償的範圍與方法問題，這個委員會將在莫斯科工作。

四、聯合國會議

我們決定儘可能從速和我們的盟邦建立一個一般性的國際組織，以維持和平與安全。我們相信，經由所有一切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密切而繼續的合作，以防止侵略並消除政治上的、經濟上和社會上的戰爭原因，都是必要的。在賴巴敦機密會議中已經奠定了基礎。然而，關於投票表決程序的問題，在那兒不會商得同意。現在的會議，已能解決了這個困難。我們已經商得同意：當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在聖利堅合衆國舊金山召開聯合國會議，以便依照在賴巴敦機密非正式會議中建議的方針籌備這一組織的憲章。我們當立刻向中國政府和法蘭西臨時政府磋商，並邀請和英利堅合衆國政府，大不列顛政府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共同發起這個會議。一經和中國與法蘭西磋商完畢，關於投票表決程序的建議案全文，就要公佈。

五、關於被解放的歐洲的宣言

我們已經擬就並且簽署了一種關於被解放的歐洲的宣言。這個宣言規定使三國政府政策一致，並規定由他們採取共同行動，以便依照民主原則處理被解放的歐洲的政治、經濟問題。這個宣言的全文如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主席、聯合王國首相、和美利堅合衆國總統，已經就他們本國人民的和平解放的歐洲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互相商議。他

們聯合聲明：當被解放的歐洲暫時不穩定的時期中，他們互相同意，當使他們三國政府的政策一致，以協助從納粹統治下獲得解放的各國人民以及歐洲的無軸心附庸國人民，用民主方式解決他們迫切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歐洲秩序的確立，以及國民經濟生活的再建，必須應藉足以使被解放的各國人民能過渡到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最後形勢。並創造自己抉擇的民主制度的程序來達成。這是大西洋憲章的一個原則！所有各國人民有權抉擇他們生活在那下面的政府的形式——使那些被侵略國用武力剝奪了主權和自治政府的各國人民恢復主權和自治政府。為了造成被解放的各國人民可以運用這些權利的條件，三國政府當對於歐洲任何被解放的國家人民，或歐洲前軸心附庸國人民予以協助，在他們認為需要：（甲）確立內部和平狀態；（乙）實行緊急措施賑濟難民；（丙）成立臨時政府，當使民衆中一切民主份子代表廣泛參加，確保儘可能迅速經由自由選舉以建。對於人民意志負責的政府，並且（丁）在必要地方當加速舉行這種選舉。三國政府當與其他聯合國，以及歐洲的臨時當局或其他政府，在考慮到對他們有直接利益問題時，互相洽商。當三國政府認為歐洲任何被解放或歐洲任何前軸心附庸國中的情況，有採取這類行動的必要時，他們當立刻共同磋商，履行這個宣言中所負共同責任所必需的措施。我們由這個宣言重申我們對於大西洋憲章中諸原則的信心，重申我們在聯合國宣言中提出的保證，並且重申我們的決心，要和其他愛好自由的各國合作以建立一種在法約約束下的世界秩序，致力全人類的和平、安全、自由與普遍的福利。在發表這個宣言時，三個強國表示希望法蘭西臨時政府可以協同處理所建議的程序」。

六、波蘭

我們來舉行克里亞亞會議，決定要解決我們關於波蘭的異議。我們充分檢討了這個問題的所有各方面。我們重申我們的願望，要看見建立一個強盛的、自由的、獨立和民主的波蘭。由於我們討論的結果，我們已就一個新的波蘭全國團結的臨時政府可能依照取得三個大國同意的方式成立起來的條件，商得同意。商得同意如下：「波蘭，由於她已遭紅軍完全解放出來，產生了一種新形勢。這就要求建立一個比波蘭西部最近解放前可能建立的基礎更廣大的波蘭臨時政府。現今在波蘭執行臨時政府，因此臨時政府在更廣大的基礎上實行改組，以容納波蘭境內外的民主黨派。這個政府

那時應儘量爲全國團結的波蘭臨時政府。莫洛託夫、哈里斯和卡爾；受命以一個委員會的資格，首先在莫斯科與現今臨時政府委員會並與波蘭國內其他波蘭民主領袖進行會商，以便根據上述方針改組現政府。這個全國團結的波蘭臨時政府當保證：儘速根據普選選舉與秘密投票方式舉行自由的無限制的選舉。在這些選舉中，所有民主的和反納粹的政黨，都有權參加，並提出候選人。當全國團結的波蘭臨時政府已無條件上上述波蘭正式政府時，如和平波蘭現在臨時政府保持外交關係的波蘭政府，以及聯合王國政府、與美利堅合衆國政府，都應和新的波蘭全國團結的臨時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並互派大使，各該政府應派大使的報告，將經常波蘭波蘭情形。三國政府的首長應爲：波蘭的東部，當派派卡德維，而在若干區域派出五公里到八公里，對波蘭有利益。他們承認：波蘭必須在北方和西方獲得廣大的領土上的權利。他們覺得對於這些領土上的權利，當於適當時機，徵詢波蘭政府對全副團結的波蘭政府的意見，並且覺得波蘭政府應得和會解決。

七、南斯拉夫

我們同意向鐵托元帥和察伯西奇提議：他們之間的協定，應立刻付諸實行，並根據該協定成立一個臨時聯合政府。我們又建議：新政府一經成立，應立刻聲明：○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大會應予以擴大，以容納所有和華人合作安穩的南斯拉夫最後一個議會會議員，這樣來組成波蘭臨時政府的一種團體；○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大會所通過的立法案，應提交憲政大會批准。對巴爾幹其他問題，也已作了一般的檢討。

八、外長會議

在會議的全過程，除了各政府首長與外長日常會商外，并且每天由三國外長和他們的顧問另行會商，這些會商已證明具有無上的價值。這次會議已經同意：當設置本月的會議，以便三國外長間舉行經常會商。所以他們於必要時可常會商，大約每三四個月會晤一次。這些會談，將輪流在三國會部，舉行第一次會商，定於聯合國關於世界安全組織會議後在倫敦舉行。

九、爲和平而團結正如爲戰爭而團結

我們在這兒，在克羅米亞的會晤，已重申我們的共同決心，在今後的和平時期中，一定要保持并加強在這次戰爭中已使聯合國家勝利成爲可能，並且穩定無變了的目的和行動方針的團結一致。我們相信這就是我們政府對於我們本國人民以及對全世界所有各國人民的一種神聖義務。唯有我們三國之間以及一切愛好自由的各國之間，繼續增進的合作與了解，才能保證人類最後最高的志願——一無安全的而且持久的和平，用大西洋憲章的話來說，那就是：「確保在所有一切土地上的所有一切人，都可以在不受恐懼，不感缺乏的自由中生活」。在這次戰爭中的勝利以及建議中的團結，組織與建立，將提供一切歷史中偉大的機會，能在今後年代中創造一種和平的必然條件。

簽字者：邱吉爾、羅斯福、斯大林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

代郵

徐鳳、習人、張堯、XX讀書會、XX座談會……諸先生，筆談時討論意見均已收到，當於下期刊載

新民主之法蘭西型

鄧初民

一 概說

戰後的世界，必然是新民主主義的世界。戰後各國的政權，必然是各階級，各黨派大聯合的新民主政權。這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而新民主主義的理論體系，則表現在大西洋憲章、二十六國共同宣言、四國普遍安全宣言、德黑蘭會議宣言，乃至各政治領袖人物所發表的意見中。

「尊重各民族有權自由決定其所願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促成世界各國經濟上之全面合作，以謀各國人民勞動標準之提高，經濟之進步及社會之安全」；「使各國俱能在其疆土以內安居樂業，並使全世界所有人類，悉有自由生活，無所恐懼，亦不虞匱乏。」（羅邱大西洋憲章）。

「我們漸漸明白認識一項事實，即如果沒有經濟的安全和獨立，個人自由決不是自由的人，而失業的民衆，是獨裁制度產生的溫床。」（一九四四年一月羅邱對七十八國國會議文）。

「新的民主主義就是全人類的民主主義，它不僅包括人權宣言的原則，並且還包括經濟的民主主義，種族的民主主義……」（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新共和國週刊」雜誌士讀文）。

上引各節，就是新民主主義之簡明的理論體系，而它的具體內容，就是要把政治的民主擴展到經濟的民主，把國內的民主擴展到國際的民主。

至於各階級各黨派大聯合的新民主政權，則是建築在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上的實際形態。這在歐洲新民主黨略下解放出來的新國家、新政府，都是典型的新民主聯合政權，例如法蘭西、意大利、南斯拉夫、希臘、捷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等。這種新民主聯合政權或聯合政府，是不僅限於上述各國，就是法西斯主義滅亡以後的德國、日本，甚至反法西斯的民主大國，如英、美、中、蘇，都要在其政權或政府的實際形態上不能有所例外。

惟此種戰後世界新民主政權之一般發展的規律，或者說這是戰後世界新民主政權之一般型或共型。但任何國家都不能不有其獨具之民族特點，亦即在各國所同具之一般型外，不能不有其特殊型，如新民主之法蘭西型，新民主之南斯拉夫型，新民主之波蘭型，或意大利型等。本文僅先就新民主之法蘭西型，加以論述。

二 新法蘭西之成長

這獲所說的法蘭西，是指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七日納粹德國所佔領後，經過四年間苦難而又侵擾生長以致於復國的法蘭西。當法國淪陷，民族員當出於民族利益與希特勒簽定康邊森林停戰協定第二天起，戴高樂將軍即隻身出走倫敦進行自由法國運動。戴高樂在倫敦說：「法國雖然打了敗仗，但是她並沒有停止戰爭」；一個月後在巴黎發表恢復用版的法國共產黨機關報也說：「法國雖然打了敗仗，但她永遠是一個獨立民族」。這是兩種呼

聲，兩種號召，新法蘭西的生長，已在這播下了種子。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四日（法蘭西國慶紀念日），法國共產黨在國內發出國慶紀念宣言，主張組成抗德民族統一戰線，並與法國社會黨組成共同鬥爭委員會。同年九月二十四日，戴高樂在海外所領導的自由法國也組成了一個「民族委員會」（因其以此為一戰鬥體），簡稱「戰鬥法國」，這樣就把法國內外的人民力量都團結起來，進行反抗德寇法西斯侵略的共同鬥爭了，這是新法蘭西成長的第一步。

到了一九四二年一月間，由法國共產黨領導，召開各抗戰黨派各抗戰團體代表聯合大會於巴黎，組成「法國獨立鬥爭民族陣線委員會」，通過共同

門爭綱領，並派出法共中委格萊尼，社會黨中委菲立浦，總工會領袖格齊爾三人到倫敦參加高樂將軍的戰鬥法國運動。同年六月間，高樂將軍亦在倫敦發表「戰鬥法國」宣言，其內容注重說明團結法國人民抗戰的目的，並保證在法國原民主制度，這個宣言成了法國反抗納粹的聯盟憲章，亦即抗戰民族戰線的共同綱領，這是新法蘭西成長的第二步。

日曆又進展到了一九四三年五月。此時由於國內抗戰運動的擴大、發展，各抗戰黨派，各抗戰團體，更進一步和文化、科學、青年、婦女各界，聯合組成「全國抗戰會議」。此時又正值盟軍佔領了北非，由維琪逃出的吉維德爾達爾朗（被刺後）為北非之海外負責人，與「戰鬥法國」高樂將軍進行「戴吉談判」，因此，全國抗戰會議亦組成，即刻發出有力的呼籲，希望當時進行已久的戴吉談判達成協定，成立具有法國臨時政府性質的機構，藉以統一領導國內外抗戰運動，終於同年六月三日在北非阿爾及爾成立了「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這一機構的成立，便把法國抗戰運動，推進到了民主團結內外一致的一個新階段。但因吉維德爾朗不能斬金截鐵的脫離維琪的曖昧關係，在民主團結的政治路線上，與戴樂高將軍還不免有很大的距離，而委員會內，也還沒有容納各黨各派分子，所以這一新政權的基礎並不穩固。接着，同年九月十七日，法國臨時議會又在阿爾及爾成立，人民力量生長了，與人民的聯繫也加強了，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便於同年十一月九日，進行了第一次改組。這一改組，參加了各黨各派（共兩派二人）也被選參加，加強了團結，但仍為諮詢式的，共產黨議員二人（密台爾，法戎）終於拒絕了這種諮詢方式的參加；因此，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又進行了第二次改組。這次改組後，法共才以代表黨的身份，由法共中央委員會批准，派出格萊尼，比勞二人參加新的委員會，同時，臨時議會也擴大了組織，所有議員，或由全國抗戰會議選派，或由有關團體自己推選。臨時議會具有臨時國會性質，所有大措施及法令，都須經它討論通過，始能發生效力。第二戰場開闢前夕，即在一九四四年六月三日，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根據臨時政府議會的決議，正式改稱法國臨時政府，這自然又把統一領導抗戰機構向前推進了一步。但政府雖然改稱了，而在政權構成上，仍不免有不夠的弱點。抗戰黨派與抗戰團體在政府中的成份，遠不及其在反納粹鬥爭中地位的重要，尤其沒有工人、青年、婦女、文化各界代表參加。等到巴黎於同年八月二十三日由內地軍解放了以後，人民力量特別高漲，臨時政府一般到巴黎，更加顯出其內不夠充實而軟弱無力，於是為了切實聯繫民

衆，依靠人民，爰於同年九月十一日重新進行了在民主原則上的改組和擴大，這可以說是第三次的改組。改組後的政府，仍由高樂任主席，閣員二十二人中，參加新閣員九人，完全容納國內抗戰有力代表。這樣，法國臨時政府，便真正成爲全國各主要抗戰黨派和抗戰團體聯合組成一種在新民主主義原則上的聯合政權或聯合政府。這樣，新法蘭西的成長，便最後完成了。以上便是新法蘭西成長的一幅輪廓畫。

三 新法蘭西的民主措施

建築在新民主主義原則上的各階級各黨派聯合政權的法國，即是新民主的法國，這是在被納粹匪幫蹂躪了整整四年之後重新建立起來的法國。直到本文執筆時爲止，這一法國進步的民主力量的團結還在不斷的更新、鞏固、擴大，努力爲建設新法國而奮鬥。努力爲完成新民主的措施而奮鬥。然則其新民主的措施究竟怎樣呢？請看下文：

「新政府成立後，法國全國抗戰會議，已決議決不取消，繼續作爲法國人民政治社會生活中的羣衆組織而存在與發展下去，以便能在重建民主法國的工作中起重大的作用。職工運動領袖路易·賽爾（總工會書記），已擔任杜爾被選爲抗戰會議主席。全國抗戰會議並決定在十二月（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筆者註）十五六日召開大會，各省解放委員會都將派代表參加。抗戰會議軍事委員會（抗戰會議內設各種委員會——筆者註），並決定擴大領袖機構的組織，以便推進新法蘭西的編組工作。其他法國抗戰黨派和抗戰團體也作了重要的決定，以便使法國反法西斯運動獲得更廣大的團結，進行共同的鬥爭，而滿足人民的願望，在克羅西舉行了全國總工會的會議，在巴黎舉行了社會黨的大會，開除了一百多名通敵賣國的在維琪政府中担任重要職務的社會黨員。法國共產黨在全國各地召開黨的和羣衆的大會；共產黨和社會黨並在進行協商，成立聯合委員會。此外，法國臨時政府議會（臨時國會）也移到法國本土，於十一月七日（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筆者註）開始了工作，正在進行籌備國民大會和大選的立法工作，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了法國內都民主進步力量團結增強的過程，正在空前的規模上發展着。

而法國新政府，則遵循着人民的意志，靠與抗戰運動的密切聯繫，而在全國順利實行着民主進步的政策。在內政政策上，我們看見，必

實行了立刻逮捕和懲辦一切賣國投降的分子，沒收賣國賊的財產，解散一切反動的法西斯團體，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機關中進行肅清法西斯分子的工作，實行了大赦，開放了言論、出版、集會、示威的自由。在經濟政策上，我們看見：它採取了有效的物價管制，收縮通貨，嚴厲打擊囤積居奇，組織了職工生產委員會，由政府和工作共同指導國民經濟，恢復了工業業的生產；許多大企業，大銀行，大礦山，都逐漸收歸國有。在軍事政策上，則正在進行以內地軍為骨幹而編組新的法國人民軍。在對外政策上，則正在加強與反希特勒聯盟首先英美蘇等國的友好合法關係，英美蘇中加澳以及其他歐美國家，都一致承認了臨時政府的合法地位，互相派遣了使節。賴巴教檢校會議已把法國包括在安委會內，作為第五常任理事國；歐洲顧問委員會，已有法方代表參加，阿吉爾，艾登巴黎之行，增強了英法友誼（按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已成立英法協定——筆者註）。戴高樂將軍最近已決定訪問蘇聯，蘇法兩國將結成與英蘇二十年同盟條約相同的同盟關係（按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戴高樂已離法訪蘇，隨即成立蘇法協定——筆者註）。所有這一切，都是法國外交上新的成就，同時也是法國人民國際威信恢復的開始。在將來歐洲和平組織工作中，法國人民必有巨大的貢獻。現在聯邦看得到清楚：正是在這種對內對外實行民主團結的基礎上，法國人民的國際地位和國家權威才一天一天地增強了起來，滋養了舊日的恥辱，擺脫了四年的苦難，而獲得了今天的新生，恢復了歷史的光榮。（見賴純著「新法國的成長」一文）

以上便是新法蘭西民主措施的一幅輪廓畫。

四 新民主之法蘭西型的特點

我們從以上「新法蘭西的成長」及「法蘭西的民主措施」的兩幅輪廓畫——儘管只是兩幅輪廓畫——，已經充分顯示出了新民主主義與共新民主聯合政權的一般型——即所謂新民主政權的共型。但我們可能從那裡找出它的特點，亦即所謂特殊的「法蘭西型」來呢？這必須從它的生長過程和民主措施的發展中，再加以分析，而成為分析之最基本的論據的，有如下四點：（一）新法蘭西的抗戰任務，（二）新法蘭西的抗戰動力；（三）新法蘭西之抗戰的領導；（四）新法蘭西之抗戰的結局。試分別論述如下：

（一）新法蘭西之抗戰的任務

我們知道法國人民從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打破「巴士的」一獄，爆發出資產階級之刺時代的大革命，建立歐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以後，一直承襲着民主主義革命的光榮傳統。雖經資產階級民主——亦即舊民主，隨着資本主義之體制日趨衰落，其虛偽性也日益顯露，尤其在此次大戰前若干年，即自勃魯內閣崩潰後，法國政治日益反動，代表金融寡頭利益的賴伐爾、佛蘭亭一派人，已甘心不顧法國大多數人民利益，把他們的實際利害與納粹匪首希特勒結合一起，但在形式上，法國仍沒有在政治上公開法西斯化。等到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七日，在納粹的閃擊之下，世界第一等強國的法蘭西傾倒了。民賦具當，隨之賴伐爾竊取在納粹刺刀之下的法國政權，假借國會，另制憲法，這樣傾倒下來，便不值是法蘭西的軍隊，而是法蘭西的民主——雖然這是形式的虛偽的民主。不料在整個法蘭西傾倒之後，偏有人不明事理，以為德法一勝一敗之速，其原因即為德強法弱而法民主，殊不知正因為法國此時僅有形式的虛偽民主招牌，以致不啻有效動員全部人力物力，而佛蘭亭賴伐爾之流，且懼怕人民不肯動員全部人力物力，甘心為保存少數金融寡頭的財富，向其在表面上是敵人，實質上是盟友的希特勒投降。所以法蘭西傾倒之速，決非因其政治的民主，乃是由於其政治的民主不夠，或由於其政治民主的虛偽性，亦即由於民主的缺點。

「民主制度的缺點，只能由更廣泛更純粹的民主來補救」。貝當，賴伐爾，却與此背道而馳，戰前既已震驚於法西斯之風靡一時，對希、墨二魔之獨裁政治，備極羨慕，拚命壓制本國人民力量，增長敵人勢儀，及一戰而敗，便欣然歸結德蘇森林協定，解除自己武裝，不僅認爲法國是敗定了，而且認爲英國也無倖免之理，到殖民地去作戰之說，等於夢囈，於是在對外政策上，毅然決然拒絕了邱吉爾英法蘇聯合國的提議（貝當在波爾多流亡途中），破壞「任何一國保證不單獨媾和」的諾言，一意投降；而在對內政策上，則壓迫人民言論思想及一切愛國自由，惟法西斯非法統治之步趨是效。所以戴高樂在康邊森林停戰協定簽字後，即隻身出走倫敦，領導自由法國運動，繼之國內各抗戰黨派（首先由於共產黨），國內各抗戰團體（首先由於職工會等團體），起來就召開結鬥爭，自始就具有兩大任務：反對納粹，保衛民主；反對納粹，保衛民主的鬥爭，就是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不過

組織的民主主義，不是虛偽的宣傳，而是實質的民主主義。其目的在於實現法國的解放，這並非有人與人之間的剝削的新法國的基礎，以前是以廢除私有財產制為代表的，現在是這那幾種資產了，相反的，大多數公僕轉為財產，可以發展、加增，而且得到保證，因為沒有人與人之間的剝削，明確的權利和義務，取消人與人之間的剝削，其結果是法蘭西的團結，在這樣的法國之中，就再沒有階級鬥爭了。……這些問題，必將在明天解決。……法蘭西的兒女在階級鬥爭中與資產階級的階級，維持和發展階級的團結，以保證將來。」（同前引）

「民主的階級，其目的在於實現法國的解放。第三共和國的基礎，不在於階級對階級的剝削作用，而是階級對階級的作用不平等，國民不能起有效的剝削作用，金錢的權力對階級剝削民主的機構，階級政治，妨礙選民的意志，使法蘭西共和國完全失敗。改革之道，不在於取消民主，而是在民主的完整和擴大。這就是：一切人向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公共自由的自由，國家不可侵犯的自由，通信秘密的自由，對於個人人格的尊重，以及一切公民在法律面前的絕對平等。」

「然而階級權利上，如果不加上若干基本的社會權利，如：工作休息的權利，一切工人獲得國家保險的社會保險利益的權利——這社會保險權利一切意外和疾病損失，并給予年老工人以充分的養老金，以及普遍的受教育的權利。那麼，這民主是不完善的。法國一切男女應有這些權利。因為他們，在野蠻的階級的剝削之下，曾打算永遠剝奪法國人民的這些自由。他們曾說：『階級的剝削，階級的剝削。』」（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七日「自由法蘭西報」法蘭西報來一文）。

以上引文，可作為較完善的民主主義——即階級民主主義的註釋，階級剝削階級為不平等，階級剝削階級為不平等，在於明確的剝削階級。階級剝削階級，只有「在托拉斯階級剝削階級下去，大規模的生產手段收歸國有之後，國民經濟將由國民自己組織階級的適當的階級來指揮，這之後，才真能按階級階級生產，分配生產品」。又說：「計劃的目的是在發展國民經濟。國民生計的改善，需要每個公民所勞動的階級勞動的生產品不斷增加，為了增加這些生產品，全國工人必須生產得更多。由於這個緣故，計劃是根據生產的不斷增加而規定的，在托拉斯階級統治之下，生產的增加，是由於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在托拉斯階級統治下的經濟中，生產的增加一起來的，並不是國家階級的剝削……這就是：一方面生產增加，同時又有貧窮的緣故。……在不受托拉斯階級剝削的經濟中，生產的增加決定於階級的剝削。……在托拉斯階級剝削下的經濟中，生產的目的是利潤，而且首先是獨佔性的利潤。在不受托拉斯階級剝削的經濟中，生產的目的，將是滿足人類的需要。

。法蘭西的解放運動，其目的在於實現法國的解放，這並非有人與人之間的剝削的新法國的基礎，以前是以廢除私有財產制為代表的，現在是這那幾種資產了，相反的，大多數公僕轉為財產，可以發展、加增，而且得到保證，因為沒有人與人之間的剝削，明確的權利和義務，取消人與人之間的剝削，其結果是法蘭西的團結，在這樣的法國之中，就再沒有階級鬥爭了。……這些問題，必將在明天解決。……法蘭西的兒女在階級鬥爭中與資產階級的階級，維持和發展階級的團結，以保證將來。」（同前引）

。像這樣一種民主主義反對階級主義的鬥爭，或者說，階級主義與民主主義的鬥爭，其目的在於實現法國的解放。這並非有人與人之間的剝削的新法國的基礎，以前是以廢除私有財產制為代表的，現在是這那幾種資產了，相反的，大多數公僕轉為財產，可以發展、加增，而且得到保證，因為沒有人與人之間的剝削，明確的權利和義務，取消人與人之間的剝削，其結果是法蘭西的團結，在這樣的法國之中，就再沒有階級鬥爭了。……這些問題，必將在明天解決。……法蘭西的兒女在階級鬥爭中與資產階級的階級，維持和發展階級的團結，以保證將來。」（同前引）

。像這樣一種民主主義反對階級主義的鬥爭，或者說，階級主義與民主主義的鬥爭，其目的在於實現法國的解放。這並非有人與人之間的剝削的新法國的基礎，以前是以廢除私有財產制為代表的，現在是這那幾種資產了，相反的，大多數公僕轉為財產，可以發展、加增，而且得到保證，因為沒有人與人之間的剝削，明確的權利和義務，取消人與人之間的剝削，其結果是法蘭西的團結，在這樣的法國之中，就再沒有階級鬥爭了。……這些問題，必將在明天解決。……法蘭西的兒女在階級鬥爭中與資產階級的階級，維持和發展階級的團結，以保證將來。」（同前引）

「四年來法國的解放運動，其目的在於實現法國的解放。這並非有人與人之間的剝削的新法國的基礎，以前是以廢除私有財產制為代表的，現在是這那幾種資產了，相反的，大多數公僕轉為財產，可以發展、加增，而且得到保證，因為沒有人與人之間的剝削，明確的權利和義務，取消人與人之間的剝削，其結果是法蘭西的團結，在這樣的法國之中，就再沒有階級鬥爭了。……這些問題，必將在明天解決。……法蘭西的兒女在階級鬥爭中與資產階級的階級，維持和發展階級的團結，以保證將來。」（同前引）

中，尤其是在亡國民族反奴役侵略的戰爭中，一定會把抗戰動力的範圍，擴展到包括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身上去；但在法國解放鬥爭中，抗戰動力的增漲，作為主要基礎的工農階級的作用，尤其是工人階級的作用，是不能被忽視的。試看英國新聞處倫敦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二日電，據「標準晚報」載：「法國內地軍青年戰士二百人，其中包括女子五十人，由維多利亞區補給元帥銅像列隊，步行到行政大廈，倫敦市長就在該處迎接，這些法國青年游擊戰士，都是屠夫，麵包師，農夫和礦工等的子女，他們走過大街時，倫敦人民熱烈歡迎。」這就說明這些游擊戰士，都是工農分子，再如據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在阿爾及爾共產黨大會上的報告：「德國人處死的人之中，總工會會員佔百分之九十七。」法國總工會的組織，毫無疑問的是工人階級的組織，這就可以明顯的看出法國抗戰動力中工農階級的決定作用了。在民主反法西斯的戰爭中，工農階級成為主要動力這一點，本來是歐洲各國歷史發展一般的規律性，但法國是一個工業高度發展的國家，因而有着特別強大的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法國共產黨，是其特點，這在後面就有較詳盡的說明。

(三) 法蘭西抗戰的領導

如上所述，抗戰動力，是可以有多社會階級的，但抗戰的領導，則不能說所有抗戰動力，都能負起這個責任來。在民主反法西斯的戰爭中，尤其是像法國這樣同時需要完成一面反納粹，一面反賣國賊的民主的民族戰爭中，抗戰的領導，可能是工人階級，也可能是明智的遠見的資產階級，甚至於是這兩個階級的共同領導。所謂領導的階級（或領導的動力），不是說的任何一種階級，而是指這樣的一種階級——它具有自己獨立的確定的政策與路線，具有自己堅強的獨立的階級組織（首先是黨的組織），具有自己對於廣大民衆的聯繫以及對於他們實際運動的指導（組織、訓練、宣傳、鼓動、武裝等等），這在法蘭西的抗戰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情况，恰恰是法蘭西的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法國共產黨。試看下面一段話說：

「法國人民的動員和武裝，所以能夠得到這樣偉大的成功，是因為法國共產黨堅決的執行了新民主主義的政綱。在國內，不管德寇、貝當、賴伐爾、和陶里歐的法西斯統治多麼殘暴，還是到處都成立了城市的和地方的解放委員會，包括一切黨派、工農組織、青年、婦女、科學、教育、和宗教等團體的代表，成為有廣大人民基礎的民主機構，也就是組織和領導鬥爭的行動機構。在北非，則積極參加臨時政府和諮詢會議，在參預政策的決定中，使法國走着新民主主義的道路。肅清維琪份子，嚴懲叛國奸賊，確立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取消新聞刊物的政治檢查制度，釋放反法西斯的政治犯，接濟國內武裝，和國內反法西斯

斯力量密切聯繫，對殖民地採取民主措施，和加強與蘇美英的親密團結等等，都是共產黨代表所提出，而為諮詢會議或國務會議所接受，才由政府逐漸執行的。正是因為有這些新民主主義的措施，才使法國人民有這樣強大的力量，使法國的國際地位一天天的提高。」（見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法國國慶日「新華日報」的社論）。

再則法國共產黨的負責人總是有計劃的宣示他們獨立的確定政策與路線，試看法國共產黨議員羅塞說：

「比勞和格萊尼（按即由法共委派參加法臨時政府的兩位共產黨員——筆者）在政府核心中出現，其意義是法國共產黨為了實現一個明確的行動綱領，能夠堅決的和一切愛國人士的代表完全合作。這個綱領可歸結成下列五點：

- 一、使法國本部和殖民地的一切力量行動起來，創造一枝強大的反希特勒的法軍，來武裝在法國本土作戰的愛國志士。
- 二、懲罰一切賣國賊，以昭炯戒，並肅清行政機關裡的希特勒的第五縱隊。
- 三、發展民主的社會政策，以感召一切法國人的精力，造成一切人參加解放戰爭的熱情。
- 四、滿足當地民衆的合法要求，實施團結法國本部和殖民地民衆的政策。
- 五、在法國獨立和恢復法國過去的偉大性的基礎上，加強法國在聯合國集團內的作用。

這顯然並不是共產黨的綱領，而是戰爭和民族解放的綱領，各種意見不同的法國愛國志士都能做到的共同綱領。而法國共產黨的參加政府，使政府增加了實施這綱領的力量。那就是說，政府能以法國的名義來說話和行動，能把一切法國人的作戰努力增加十倍，能在法國迅速回到國際家庭中的時候，担任法國所需要的經濟和社會復興的任務了。」（見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新華日報」所載的羅塞作「法國歡迎他們」一文）。

上引兩段文字，都可以充分證明，具有自己獨立的確定的政策與路線，具有自己堅強的獨立的階級組織，具有自己對於廣大民衆的聯繫以及對於他們實際運動的指導的法國共產黨，是怎樣在領導法國的抗戰。這樣，我們很可以得出結論說，領導法國抗戰的階級是法國的工人階級。

但在形式上（也可以說在某種程度的實際上）領導法國抗戰的，却為戴高樂將軍。如前所說，戴高樂自貝當簽定康邊森林協定的第二天起，即出走倫敦，領導自由法國運動，由自由法國而戰鬥法國，而民族解放委員會，而正式臨時政府，這都是確實的。但戴高樂將軍決不是以他個人的資格領導的

，而是以一個階級的武裝資格領導的。高樂將軍的階級屬性怎樣呢？「這位將軍是嚴肅的，宗教的色彩非常濃厚，他是巴黎天主教一位教授的哲嗣，生於不產葡萄而居民樸實的法國北部寒冷的里爾，在嚴格的天主教清教主義的教養下生長起來。後來進入法國埃塞爾的陸軍大學，畢業之後，不但成爲一位輝煌的青年軍官。而且也成了一位超類拔萃的受有教育的紳士」（見美國前駐法大使布列特作「法國的前途」一文。）「戴高樂接見「皇后週刊」之記者時，就關於彼之政治傾向若干問題，提出答覆。記者問曰：「外間謂彼乃極右傾之人物，是否屬實？」（見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倫敦路透社電。）「法國人民懷疑戴高樂將軍的專制傾向，懷疑到什麼程度呢？」（見前引「倫敦論壇報」一位記者問。）他們不知道戴高樂將軍的詳細身世，但從這幾段零星記載中，可以斷言戴高樂將軍的階級屬性，實是接近於資產階級的——但是明智的遠見的資產階級。布列特在「法國的前途」一文中更說：「他的內閣是最能幹的人物組成的：他們來自各種絕不相同的政治黨團，一位極端能幹的保守派梅爾，爲投資鐵路及電氣事業的羅斯查爾德銀公司的主要代表，就與第一流聰明而勇敢的共產黨領袖畢普克斯並肩工作。羅健派、自由黨、過激黨、天主教進步黨、社會主義黨、以及無黨無派的分子——如外交界名譽素著的馬雪，在解放祖國的宏大希望之中，發現他們的立場一致，他們組成了強大的陣容。過去二十五年以來，法國沒有一屆政府有過這樣多有意志有才具有品格的人物，他們需要領導，而不需要驅策，戴高樂正領導着他們。」這都說明戴高樂將軍對於法國抗戰積極的領導作用，亦即說明法國進步資產階級在抗戰中的積極領導作用，而且在形式上表現得特別明顯，雖然實際上仍是法國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強大，我們在這裡也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法國抗戰的領導是由於法國工人階級與法列進資產階級的共同領導；這種兩個階級的共同領導，正是它的一個特點。

(四) 新法蘭西抗戰之結局

這種所謂抗戰的結局，是指反納粹反維琪的勝利程度，及法國民主傳統之恢復的程度，廣大人民所得政治自由與經濟利益的程度而言。道在上述「新法蘭西的成長」及「新法蘭西的民主傳統」兩節裡，已見其梗概。我們可以說，它的結局是勝利的結局，而且它的勝利是很徹底的。試看下面的記載：

「在過去一週內，在法國充滿着許多重大的政治事件，三個處於領導地位的同盟強國——蘇、英、美，邀請法國參加歐洲顧問委員會，法蘭西以一個民主國家的資格，一個在西歐的德國的龐大鄰邦，應無疑的對於組織和維持將來和平有相當的貢獻的，在賴巴敦檢閱會議草擬的世界安全組織計劃，規定法國包括在安全委員會內，作爲第五常任理事國。法國參加歐洲顧問委員會，是法國恢復它的國際威信的開始，法蘭西的國際威信，將隨着國家權威的增進，和它的內部的進步勢力的團結鞏固而增漲。新民主法蘭西出現的過程，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全世界都懷着關切與同情的心情，追隨着這個過程的演進。十一月七日法蘭西（法蘭西時代雜誌編譯）開始工作。在這一週內法蘭西社會黨曾舉行政治大會，在克里西開過了全國總工會的會議。由共產黨支持的民衆大會，在全國各地舉行。這些事件，雖說他們的意義不同，但是表明了，法國國內政治力量正在復興着。堅定着，正在爲建立新民主基礎而努力。」（見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莫斯科電）

「戴高樂說：法國制度將來需要重大改革，一旦全境解放，俘虜回國之後，就要舉行男女公民的普選，重新建立議會。」（見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二日路透電）

「法政府今日宣佈恢復共和國憲法，戴高樂將軍特發表演說道：我們今日應實現我們對民衆的諾言。各抗敵領袖也說：法國必須實現民衆自由政體，即共和政體，以前對猶太人的特別法令也已撤消。」（見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一日巴黎電）

法政府已批准關於在各工業企業中成立生產委員會所草擬的法令，據法令規定所有有僱有工人至四百人的各企業中，須成立生產委員會，委員會須由工人和職員代表組成，委員會的任務，在於與企業管理通力合作以改善工人和職員的工作與生活條件。（見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日巴黎電）

從以上這些記載中，很明顯的可以看出新法蘭西反納粹，反維琪的勝利程度，也可以看出新法蘭西民主傳統恢復的程度，以及廣大人民所得政治自由與經濟利益的程度。這樣我們就可以說新法蘭西抗戰的結局是勝利的結局，它的勝利是新民主主義的勝利，是新民主政權，亦即各黨各派聯合政權的勝利。

在歷史上，革命結局，當然不會都是勝利的結局，在此次民主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中，所有抗戰各國，也當然不會都是勝利的結局的，新法蘭西抗戰之勝利的結局，也正是它的一個特點。

五 結論

總上所說，新民主主義法蘭西型的特點，在於其任務爲反納粹，同時，還要反維琪，而其反維琪恢復民主的鬥爭，非但艱苦，在於其動力，是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而成爲法蘭西動力工人階級及其政黨非常強大；在於其領導爲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共同領導，雖然在實際上工人階級領導過渡資產階級，而在形式上則反而好像資產階級領導；在於其結局是勝利的結局，而且是很徹底的勝利。

一九四五年二月

羅曼羅蘭的生平、著作和思想

戈實權

二十世紀西方文壇上的一位最偉大的文豪和法國西人間的維多利亞之子，羅曼羅蘭，終以七十八歲的高齡，去完他生活的長途旅程了。這是一條充滿了光輝的旅程，然而這條旅程並不是平坦而順利的。記得羅曼羅蘭在他所寫的一篇「向高爾基致敬」的文章中，曾經將他和高爾基的出身及生活的旅程，作過一個有趣的比較：

「把我和高爾基的結合起來的，是特別奇妙的；原來我們兩個人，是接近平線上兩個極端相反的端點。我出生於一個純血統的俄羅斯人；而我却是一個純血統的法國西人。他是直接從民間來的，有力的、堅實的；而我卻是從精緻的中等階級來的，病的、可憐的、可憐的、一種不可克服的思想。他的足跡遍及各地，他的腳跑得以及於出血，而這正是他的教育；而我卻僅僅在中等學校和大學的書架上，接觸了我的知識和經驗。我這知道他的生活，假如從一種物質的意義上來說，它是極其單薄的；可是從一種道德的意義上來說，他卻不如此。這是我與西人都不過不偏不倚的變態和亂石中找尋我們的道路。我們，有出自民間的，也出自中等階級的，不過，我們從中產階級找尋我們的戰士，往往比前者所定的一條道路更為艱難。在這個艱難和艱難的旅程中，創造的困難，這是一件艱難的工作！不過，有經驗的：就是我們各自在二邊尋路，及達到了我們所追求的最終的目的地時，我們彼此相互碰見了。並且在頭一瞬間，我們就認出了我們本來是同胞和親友……」

羅曼羅蘭的這一段話意味深長，並且事實上他的確如此，他走過了一條比高爾基更為艱難的道路的。在過去的這七十多年中間，他為了追求人類珍貴的前途，內心也不知道經過了多麼的艱難，他為了保衛正義與人進了與現社會也不知道進了多少次的鬥爭，他這一切到了晚年，方才走到了他所追求的光明的道路。在過去的這七十多年中間，他好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前進，他忍受了數不盡的內心的痛苦，經歷了許多生活的困難，但是每一次的困難和磨難，不但沒有能夠摧毀他，卻反而把他更向前推進了。他有一女還嫁與他的妻子瑪利耶·巴甫洛夫娜：

「我的朋友，我的妻子，我把

我的靈魂和創作都獻給了你。

這就是你給我的最好的東西，

因為你使個個生命都充滿着前進的一步」。

他的這種不斷地向上和向前的進取，就正是他的偉大之處，這樣直到他七十歲的時候（一九三六年）為了感謝蘇聯人民慶賀他的誕辰，他才從生活的迷宮，帶着無畏喜悅的心情，回頭了一下他的舊路，他當時曾經這樣寫道：

「親愛的同志們！你們會記得我的六十歲。這好像是一個旅程的終點——從這裏走到莫斯科。我也已經走到了。但旅程並不平坦，然而它卻很很好……（羅曼羅蘭在「快樂」(Dreizehn Jahre Arbeit) 中寫了七十五年來他的戰鬥與勞動五到更遠的旅程，他才對我們所進行的「快樂」，這世界人類的社會……）」

我們大家都知道，羅曼羅蘭是位被譽為多产的，他把他多产的精力，都用在「羅曼羅蘭的創作」——「羅曼羅蘭的創作」。

他說過：「我挑選痛苦，我的這句話做我的座右銘，然而我用的並不是「受苦中的快樂」或是「受苦的昇華」這一類歪曲的意義，這是苦痛擁有者，我用的却是這句話的真意：「經過苦痛，而且不願苦痛——然後快樂」。或甚至說得更有力量些：「朋友們，受苦的你們，抱起快樂來吧，讓我們來征服它」。假如我們把這句名言，視為是他一生的精神的象徵，也未嘗不可。

羅曼羅蘭現在已經離開我們而去了，讓我們就藉這個機會，來回顧一下他的光輝的生活與思想的路程吧。

一 「從另一個世界來的 音」

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於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誕生在法國中部克拉克內城的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裡。他的父親是個律師，母親是個虔誠的獻身於宗教及音樂的教徒。在他的祖先中，還有人參加過法國大革命，甚至為了信心而不惜流去血去鬥爭。像這種家庭的光榮傳統，不僅流傳在他的身上，同樣也表現在他後來的事業中。

他從小就是在音樂的氛圍中成長的，他把音樂視為是生命的乳汁，是「回復永恆的生命的火花」，而悲多汶從很早的一個時期起，就成了他生活的導師，他後來把悲多汶所說的「經過苦痛而後快樂」這句話作為他的座右銘，這並不是無因的。當十六歲的時候，他的全家遷居巴黎，這時候就進了當地中學，過了幾年（一八八六年）又考進了巴黎著名的高等師範。在當時，這所學校訓練知識份子而組織的，羅曼羅蘭就在這所學校的院附屬，受過類似寺院隱居的訓練與研習的生活，研究歷史、哲學及藝術史等；此後又被派到羅馬去過兩年，在教皇宮殿的書院中去做考古的工作。及至他的博士論文「論現代歌劇之起源」發表後，他已擔任了高等師範和巴黎大學的教席，並且開始從事於文學與音樂的著作生活了。

羅曼羅蘭早期的生活，雖然是沉溺在音樂和歷史的典籍中，但這一切並沒有能使他從現實逃避開，這我們只要看一看他所出身的時代和他在青年時期所遭遇過的一次內心的危機，就能瞭解他早年的旅程了。

羅曼羅蘭會這樣告訴我們：「你可知道我是從什麼地方，從什麼年代的深處來的？我是從潰滅的巴黎公社，從一八七〇年慘酷的普法戰爭的時期來的。（據他的回憶，當他四歲的時候，他曾在結了冰的田野的小路上走着，聽着巴黎的轟轟的砲聲）。……我的來處是在戰爭期以及在革命期兩度被征服過的法蘭西，是當我的童年時代及青春時代一直在悲觀主義的重壓之下屈伏過的法蘭西」。這一個時代的顯明的烙印，曾經留在許多法國知識份子身上。他們為了避免生之痛苦，不是在懷疑主義的冷嘲諷面，就是在藝術

的夢想裡面找到一個藏身的避難之窟，但是羅曼羅蘭永遠忘記不了生活的艱難與殘酷，鬥爭與痛苦，所以逃避生活這一件事，並不能使他滿意。就在這

時候，羅曼羅蘭又陷在另一種苦痛之中。原來他當時非常崇拜托爾斯泰對於正義及人道的許多見解，但是托爾斯泰對於現代藝術所採取的否定的態度，更嚴厲地斥責「音樂是種引導人們忽視職務的娛樂」。羅曼羅蘭為托爾斯泰的這種否定態度所困惑了，他在經過了長久的考慮之後，就毅然地寫了一封信去請教托爾斯泰（一八八七年）。在這封信發出之後，他以為是沒有多大的希望，可是過了不久之後，托氏就寄來了一封三十八頁的以「我的親愛的兄弟」開頭的長信，發揮了他後來在「藝術論」一書中所包含的對於藝術的全體見解。托爾斯泰認為現代藝術已成了少數特權階級的享樂品，其前途只有日趨衰頹，因此他認為唯有深入於人民的藝術，唯有把人民結合起來的藝術，才是真正而有價值的藝術；並且唯有為信心而犧牲的藝術家，才是可貴的藝術家。這個思想，給了羅曼羅蘭以很深的啓示，堅定了他終身以藝術為正義、自由與人道而奮鬥的信心。羅曼羅蘭曾經稱托爾斯泰的藝術的著作，是「從另一個世紀，從另一個時代傳來的聲音」，這句聲音使途途上拯救了他，「這個聲音粉碎了一切的偏見和虛偽。尤其托爾斯泰是這樣的真誠而獨立，甚至在他的話裡面透發出永恆的氣息」。在另一處地方又寫道：「托爾斯泰幫助我找到了生活的道路。我永遠忘不了他那充滿了熱情的聲音：『我們將怎麼辦呢？』（這是托氏的一本書名）……但是我呢？……就立誓將我所有的藝術，以及所有的力量，都獻給給為人類的解放了」。羅曼羅蘭這類的思想，同樣地也表現在他後來所寫的「民眾戲劇」的論文集（一九〇〇—一九〇三年），指出了「藝術應該要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人民來過就藝術的」。

二 「呼吸英雄的氣息吧！」

羅曼羅蘭在走出了學校的大門之後不久，就開始從事著作了，這正是十九世紀最後的幾年。這時候帝國主義侵略的威脅日益在增長，古老的資產階級的歐洲日益在解體，青年的一代智識份子，在反動力量重壓之下喘着：

這道時候的法國，到處都充滿着不義和醜惡，文藝界的「節操」上（羅曼羅蘭在「約翰·克羅斯朵夫」一書中曾經描寫過這種節操），更是一片混亂，薄薄腐朽、庸俗和令人窒息的空氣。像羅曼羅蘭在「悲多汶傳」的序言中，就曾經用浮腫的筆調，刻畫出這個時代的面影：「我們四周的空氣是鬱悶的。古老的歐洲在一個沉重和腐朽的氣團裡面發霉了。……全世界沉溺在它的狡猾和卑鄙的自私心中。世界透不過氣來了。」羅曼羅蘭就在這時候，懷着他不屈不撓的信心，像吉阿德先生一樣地走進了法國的文壇，他盡力地呼籲道：「再打開窗子吧。再讓自由的空氣進來吧。呼吸英雄氣息吧！」這時候，對於強有力和自由的個性以及英雄主義的渴求（雖然這種渴求是有着烏托邦和浪漫主義性質的），已成為青年一代人的普遍的呼聲，這也正如羅曼羅蘭後來所說的：「對於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青年知識份子，自由和強有力的個人主義，已成為一種人的最高尚的品質了。」

就在這個時期，羅曼羅蘭開始寫他的「信心的悲劇」（一八九七——一八九九年），「革命戲劇」（一八九八——一九二七年），「英雄傳記」（一九〇三——一九二一年）和他的一生的不朽之作「約翰·克羅斯朵夫」（一九〇二——一九二二年）。在「信心的悲劇」中收了「聖路易」、「阿曼爾特」、「理智之勝利」等幾個劇本；在這幾個劇本中，羅曼羅蘭顯出了每一個人必須戰勝他本身的一種強有力思想。在「革命戲劇」中則收有「七月十四日」、「丹東」、「羣狼」等劇本，內容多半是取材自法國大革命的事蹟，目的是想把當時人民爭自由、爭正義與人道的鬥爭精神重新再現出來。像其中著名為「聖正義」（Saint Just）的一個劇本「羣狼」，就是描寫當時轟動了法國全國的經書猶太軍官德萊夫斯的案件而作的。至於「悲劇」、「悲劇悲劇」、「托爾斯泰這三個悲劇的傳記」，用羅曼羅蘭的話來說：「這不是為野心家的驕傲而寫；它們是獻與那些不幸的人們」，作為他們「神聖的痛苦的油膏」和黑夜的明燈的。

除此之外，羅曼羅蘭又在高等師範時代的一位同學查理·伯吉（Charles Feytaud）創辦了「兩週評論」（Cahier de la Quinaine）。他們創辦這個刊物的目的，是因為痛感到當時巴黎的文壇太庸俗和太腐朽了，要是直接去攻擊它吧，他們的力量還不足以去轉動這塊怪現象，因為當時所有的定期刊物，差不多都被這個怪現象所盤據着。他們所辦的這個刊物，前後在艱苦的條件之下，一共維持了十五年之久，像羅曼羅蘭所寫的「悲多汶傳」、「阿曼爾特」、「約翰·克羅斯朵夫」等書，就都是在這個刊物上面發表的。

這種社會對於羅曼羅蘭實在是太不仁，像他所寫的劇本都只上演一晚就收場了，「兩週評論」也銷行不廣；而他「為那些不幸的人，那些受着痛苦的人」所寫的「英雄傳記」，也就只完成了三部，其餘就只能中廢了。但羅曼羅蘭並沒有失望過，他用精神的活力來征服痛苦，他的信心絲毫不減，這就正像他在「約翰·克羅斯朵夫」中所寫的：「他的目的不是成功，而是信仰」，這句話正好是他這個時期為正義與信心而奮鬥的一個有力宣言。

但是這偉大的創造的天才，並不是永遠沒沒滅絕的，什麼東西都挫折不了他的信心，什麼東西都掩蓋不了他理想的光輝，特別是從他的五卷「約翰·克羅斯朵夫」在「兩週評論」上連續以來（一九〇二——一九二二年）一氣他相繼而和不相識的讀者，就開始閱讀在他的周圍，他們漸漸着個個被吸引到一直讀下去，並且一再地傳誦着，像聽到這巨著作者成名為止。這些讀者不只是住在法國境內，他們也散佈在全世界各地，他們已經成了克羅斯朵夫的精神上的朋友和弟兄們，羅曼羅蘭再也不是孤獨的了。

「約翰·克羅斯朵夫」（Jean Christophe）這部著作，是羅曼羅蘭具現了個人英雄主義思想的一部最有力和最偉大的作品，同時也是一部創新的個性對腐朽的資產階級的制度反抗的碑石似的史詩，至於羅曼羅蘭為他所創造出的這個德國音樂家約翰·克羅斯朵夫冠上一個「克羅斯朵夫」（Christus）的姓（這個姓在德文中是「力量」的意思），這並不是偶然的。羅曼羅蘭在「約翰·克羅斯朵夫」第七卷的序言中，也曾經告訴我們他創造出這一個人物的原因，他當時這樣說道：「我那時是孤獨的。像法國多少的人士一樣，我在一個精神上敵對的世界裡面感到窒息；我要呼息，我要反抗一種不健全的文明，反抗被一般庸碌優劣階級的毒害的思想，我想和這個階級說話：『你撒謊，你並不代表法國』。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必須有一個眼目清明，心無雜念的主人翁，有相當高卓的靈魂以便有說話的權利，有相當雄壯的語言以便令人聽得真切。這個主人翁，我耐心地造成了」。在這部整整寫了十年的十大卷的著作中，羅曼羅蘭用英雄人物似的克羅斯朵夫，來反抗當時社會中的一切反動勢力，發揚了「唯有創造才是歡樂」；「創造就是這死亡」的思想來祛除當時陳腐的氣息；批評了當時整個西歐的文化思想，還又指出了歐洲的新文化的途徑。羅曼羅蘭曾經說他這部作品，是不能以「小說」這個名詞來限界的（「在這最後幾卷『節操』和『戶內』裡，如在書其他的部分裡一樣，我從沒有寫一部小說的用途；這是顯而易見的」），所以我們說這部著作是部十九世紀後半葉和二十世紀初葉的歐洲文藝思想史

的批判也不為過言；此外在外部巨著裡面，不僅體現了羅曼羅蘭早期的全部思想，甚至在這部巨著裡面還刻劃出了他本人的部分的身影。當他完成這部巨著的時候，羅曼羅蘭已是快五十歲的人，「約翰·克羅斯夫夫」帶給他無限的光榮，一九一三年法國學生會給了他以獎金，還出版了他的全集。假如說羅曼羅蘭的前五十年，是在反波蘭的困苦勞作中渡過去的，那麼這時候，他已成為全世界人士崇敬談論的中心了。

當他完成了「約翰·克羅斯夫夫」的時候，羅曼羅蘭就擱下筆來，回顧了一下久遠的過去，重新想到他離開了多年的布根威的故鄉，結果就寫成了另一部代表他本思想的傑作：「科拉·布蘭農」(Colas Breugnot, 一九一四年完成，一九一九年出版)。科拉·布蘭農可以說是約翰·克羅斯夫夫和「迷人的史密」中的特殊的親弟兄，他本人是一個十六世紀的木雕刻工，是一個人道主義者，是一個反抗的、大膽的、爽直而魯莽，他全身充滿了對於生活與勞動的熱愛，充滿了對於門徒的以身而精神。他說道：「奮鬥是堅苦的，然而奮鬥又是快樂的」。羅曼羅蘭本人的藝術的管慧，深刻的生命感，以及人道主義的精神，顯然好像都從科拉·布蘭農這個人物脫胎的，因此科拉·布蘭農便不但是他實際的先驅，至少也是他的精神上的祖先了。假如把約翰·克羅斯夫夫和科拉·布蘭農這兩個，並列起來看，這可說是羅曼羅蘭的早期的英雄個人主義思想最有力而化身，這種思想雖然是帶着抽象的和烏托邦的性質，但它在當時的一代青年的心中，的確是起過進步的啟蒙的偉大作用的。

三 「超越戰爭以上」

當羅曼羅蘭開始了全世界的感傷的時候，第一次大動地的歐洲大戰爆發了。這是一場非正義的戰爭，成千萬的無辜的人民，都被在「假衛國」的欺騙的口號之下，驅進了人類互相殘殺的大屠場。當德國軍隊佔領了比利時和比利時發出最後通牒的時候，羅曼羅蘭帶着像絕望了的心情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我完全像受了重壓一樣，簡直寧願死了的好，住在這被了狂一般的人類之中，無力地有着文明的毀滅，這該是多麼可悲的事呀！」尤其使羅曼羅蘭痛心的，就是「在七十年的時候，至少還有一部分知識份子站在反對侵略戰爭的陣線上，像倍倍羅就頑強地反對過阿爾薩斯，洛林的佔領，然而可怕的事，在這次戰爭中，任何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們，竟

都毫不猶豫地擔起戰爭的任務來」。像羅曼羅蘭早年的同學和戰友查理·傅雷，也從一個人道主義者和對社會主義同情的立場，變成了一個國家主義者，而於戰爭最初的日子裡死在戰場上。我們大家都知道，羅曼羅蘭本人是一個人道主義者，非戰爭主義者，當然不會去參加這種帝國主義的互相殺戮的戰爭，他為了避免國內被戰爭主義者對於他的迫害，就避居到日內瓦去。而他對於戰爭的態度就成為他個人人生旅程上的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標，從這標誌起，他更走上了一個新的光輝的旅程。

在日內瓦的時候，羅曼羅蘭開始在「日內瓦報」上發表他寫的反戰論文「超越戰爭以上」。這時候他雖然站在戰爭以外，但是他並不是「一個消滅的旁觀者。他寫過激烈的文字(『Pro et contra』)來抗議對於文化寶藏的毀壞；他揭破過民主主義與愛國主義的拜物思想(『論物像』)；他寫過公開信給德國的作家霍爾特曼(『給H的信件』)和比利時的詩人魏哈倫，號召他們起來衝破歐洲的精神王國。這許多文字在當時立即震動了全歐洲，而法國的熱誠愛國主義者則污蔑他是法蘭西的「叛徒」，是德國的走狗，我們只要看看當時A·瑪西所寫的一本小冊子的題名：「羅曼羅蘭反對法蘭西」(一九一五年)，就可想見反動力量對於他的憎恨了。但是羅曼羅蘭始終都沒有動搖他自己的信心，他除去文字的工作之外，還又正像在南北美戰爭時的美國詩人惠特曼一樣，參加了日內瓦紅十字會的救護工作。在連續的十八個月之內，他每天都在醫院裡為病人服務，為傷兵寫信、讀書、安慰他們，做各種瑣碎的工作，並且把他自己所得到的諸具利和全獎金都捐出了作為救濟事業之用。很多的兵士、母親、妻子都為羅曼羅蘭的這種精神所感動了，他們紛紛來感謝他，從他得到鼓勵，得到安慰，在他們他們自己已是一無所獲的自由靈魂之共和國的公民」(這是羅曼羅蘭所想像的這是在各交戰國之間的一則共和國)。「羅曼羅蘭的著作對於社會的貢獻是好的：一九一四年是羅曼羅蘭私人生活結束的一年。最後他的事業，是屬於全世界的；他的偉大是歷史的一部分，他個人的經驗，再不離開他公共的行動了。……一九一四年以後，他就成了和他自己理想合一的人，而且他更進一步的理想而奮鬥的人了」。

在戰爭的年代裡，羅曼羅蘭過去的許多幻想也都被毀滅了。他體驗到人類最大的悲劇，尤其是當他親眼看到在他的思想上所培養出的成年的青年，怎樣成為帝國主義戰爭的犧牲品，他就意識到他過去所提出的那種崇慕但是抽象的英雄個人主義的思想，是怎樣蒼白無力了。從一九一六年起，羅

曼羅蘭又時常為日內瓦的「明日報」撰稿，當時列寧和盧那奇斯基都是這個報紙的撰稿人，他因此就認識了當時在瑞士亡命的列寧。這時候，羅曼羅蘭已經跟反對戰爭的戰爭發生了關係，像他在「致殺害的人們」（一九一六年）一本文集中，就初次揭破了當時戰爭的本質，而他在「先驅者」（一九一九年）一本文集中，則紀念了在歐戰中幾位英勇犧牲的革命志士和社會主義者：法國的茹萊斯和德國的李卜克內西及盧森堡。

這樣到了一九一七年的十月，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勝利了，這更給了他以無限的精神的鼓勵。

四 「和過去告別」

歐戰結束之後，羅曼羅蘭更加積極地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他先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的「人道報」上，發表了他的「精神獨立宣言」，他號召國際間的知識份子的團結，來消滅戰爭的危機，共謀人類的幸福和建立起精神之不可見的共和國。他這樣號召到：

「有腦子的工人們，伴們們，散佈在全世界的被軍隊、檢查官、交戰國之互相的怨恨隔絕了五年的人們，現在障礙物要丟掉了，世界要打破了，我要向你們發出一種呼聲，再造我們兄弟的結合，使之成一個新的結合，比以前的基礎，打得更穩固、更雄壯。

「……我們的職務，我們的義務，是要去做堅忍的中心，在星夜熱情的旋風中，把極星指出來。……我們只推崇真理，真理是自由的，無國界的，無限制的；真理不知有所謂種族與階級的偏見。……我們是為人類工作的，不過是為人類的全部。我們不知有所謂民族。我們只知道人民是無匹的，普遍的；……這種人民，全人類，都同樣是我們的兄弟們。……我們要在這盲目的戰爭中，把他們救出來，而送到同盟之艇上去，——這艇便是心，是自由的，一與一切，都是永久的。」

這個「宣言」在發表時，立即有好幾百人在上面簽名，並被大家視為是個新的福音。除此之外，羅曼羅蘭在同年還完成了一本對資本主義的諷刺劇「里呂里」（Lili）。里呂里是虛幻與靈惑的女神的名字，劇本說一羣人出發走上大路，他們以為在他們前面存在着的是幸福，但是帶領他們走路的却是虛幻的女神里呂里。當他們走到一個峽谷時，對面也來了一羣找幸福的人，軍火商、外交官就挑撥起他們戰爭，他們全像被蒙了眼睛似的演戲了

一場。這個劇本，是針對當時剛結束的戰爭的，但是羅曼羅蘭並沒有為此指出一個出路。一九二二年時他又寫了一本小說「克萊朗波」（Clémentine），描寫在歐戰初起時，克萊朗波先受了狹義愛國主義者的蒙蔽，及至他的兒子犧牲之後，他逐漸地明白了，成了一個和平主義者，而於最後在街頭進行和平主義的宣傳時為暴民所殺。他曾經稱這本書是「戰時一個自由良心的故事」，是部描寫「一切反抗」的小說。

在這個時期中，羅曼羅蘭參加了革命知識份子的國際組織「光明團」（O.T.，一九一九年成立）。但這時候的羅曼羅蘭還不能和他過去的思想完全分手，像他所發表的「精神獨立宣言」，依然還是沒有找到真能澈底消滅戰爭，為人類謀幸福，開闢新世界的歷史行程所必出的道路，因此他的戰鬥總不免是孤軍奮鬥，停滯在知識份子的獨唱的階段。而在「光明團」中，他剛好和巴比塞相反，代表着右派的立場。一九二二年至二三年，這可算是「光明團」中以巴比塞為首的革命派和以羅曼羅蘭為首的羅蘭派經常激烈論戰的時期，特別是在關於暴力、專政和紀律等各種問題上，還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最後「光明團」終因為內部的矛盾而解散了。這時候，羅曼羅蘭為了找尋一條出路，他又重新回到托爾斯泰的不抵抗主義，曾經一時傾心於甘地的思想，並著過「論甘地」一書。後來，他曾在「十五年的奮鬥」（一九三五年）一書中，稱這許多年代（一九二〇——一九二七年）是「探求與動搖的年代」，隨着當時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開始和法西斯主義威脅的日益增長，羅曼羅蘭更加看清了資本主義舊社會的腐朽性和達到垂死的階段，而最後和他過去的思想告別。他在一九三一年所出版的「和過去告別」的一本文集，可說是這個轉變期的一部重要的文獻；在這本集子裡面，他批評了他過去的和平主義的幻想，並公開地宣言走進了新的革命的陣營，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戰士。在一九三二年所出版的「保衛新世界」一本文集中，更明顯地表現出他堅定的立場。記得當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後，列寧曾邀請羅曼羅蘭到蘇聯去，但是他拒絕了，因為他當時害怕參加進政治而「毀害了一個知識份子的作用」，換句話說，當時羅曼羅蘭還是抱着一種「非政治」的立場。但是羅曼羅蘭現在已經宣佈社會主義的國家是他「精神上的祖國」，並「準備去保衛蘇聯所領導的英雄的事業」，這又這樣說過：「假如它（蘇聯）消滅了，我再不會對歐洲的未來發生興趣了。」

羅曼羅蘭現在是無比的堅定了。他說過這樣的話：「我已經毀了，我身體的橋樑，不管我的身後面有橋還是沒有橋，我永遠不再回頭了」，這時他

感覺他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堅定，「不再是一個在水面上漂浮的人」。假如他在歐戰期間，他還是一個「超越戰爭以上」的人，那麼他在一九三五年所寫的「在戰鬥中」，則指出了他的立場的政治的尖銳性。

五 反法西斯的戰士——和晚年

從一九三〇年以後，羅曼羅蘭不僅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戰士，同時還又是國際反法西斯運動的領導人物之一，這也正是他的思想發展道路的必然過程。當一九三二年時，他參加過阿姆斯特丹的國際反戰大會，一九三三年時他被選為國際反法西斯委員會的名譽主席；他抗議過德意法西的暴行；他要求釋放季米特洛夫和台爾曼；他援助過西班牙人民的英勇抗戰，還發表過聲援捷克的論文。羅曼羅蘭對於我國也是極表同情的，遠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他就首先發表過題名為「快援助呀，捉住兇手！」的宣言，號召國際上來援助被進攻的中國，（被略）羅曼羅蘭在這個時期中所寫的文字，是充滿了雷霆萬鈞的力量，我們只要看看他對於希特勒迫害文化人士的抗議和呼籲，就可見一斑了：

「世界已被陰險的暴行弄得疲倦了。自從世界第一次大屠殺以後，自從在千百萬的屍體上和千百萬被奴役和壓迫所污損了的靈魂上建立起法西斯制度以來，簡直沒有一天不帶給我們一種新暴行的回聲和犧牲者的呻吟。在我們西方各國，在抵抗法西斯瘟疫的過程中，有許多優秀的份子終於在每天重覆的苦難和羞恥的衝擊前屈服了；他們除了表示一種無效的同情外，就沒有什麼了。他們轉過自己的視線，躲在一種恐怖的不關心中。」

「英美法的自由的公民們，古代民主政治的自由精神幾世紀來一直追求着爲着人類的自由和進步的驕傲的鬥爭，不要讓步！仍舊挺直身體，睜開眼睛，接受被絕不能寬恕的暴君們所傷害的自由之求助呼聲！時刻刻須記着那些爲着全人類的主義而在牢獄中受苦，等待着劍子手的人們！」

同樣地，羅曼羅蘭在一個時期的思想，也表現在他晚年的一部最偉大的作品：「迷人的靈魂」(L'âme égarée)中。這部巨著是從六本連續的

小說：「安提特與希臘維」(一九三二年)，「夏天」(一九三二年)，「母與子」(一九二六)，「一個世界的死亡」(一九三二年)和兩卷的「羅生」(一九三三)所組成的。在這六本著作中，羅曼羅蘭描繪了資本主義世界的死亡和新世界——蘇聯的誕生，並在這個像巨幅油畫的背景上，表現出西歐的知識份子從舊世界走向新世界的路程。在這裡，羅曼羅蘭創造了一個可與約翰·克里爾斯夫並美的女英雄——安提特，當她的兒子馬爾克成了法西斯主義的犧牲者的時候，母親就走上了兒子的崗位，拿起兒子放下來的旗幟，成了新時代的新女性的化身。

到了一九三五年夏季時，羅曼羅蘭第一次訪問蘇聯。凡是他所到的地方，他都受到蘇聯人民的熱烈歡迎，向他致敬的信件，從蘇聯各地像潮水一樣地湧向莫斯科，羅曼羅蘭後來曾寫出他當時的喜悅：「在這裡，我的藝術的夢，我的生活的希望，約翰·克里爾斯夫」和「科拉·布蘭德」的精神實現了。在我所收到從蘇聯各地寄來的一切問候的信件中，最使我驚奇的是這種從心坎裡發出的呼聲：「羅曼羅蘭同志，你到這裡來，見了你一生的夢的實現，你一定快活得了不得！」

從蘇聯返回之後，羅曼羅蘭就長居日內瓦。到了一九三九年這一次戰爭爆發後，他從日內瓦回到了法國。法國淪陷之後就被德國法西斯所監視，據過四年多的苦難的歲月，而於去年十二月三十日長逝。據最近從法國傳來的消息，羅曼羅蘭晚年在維希來城的隱居期間，完成了一部「真理、福音評傳」和他的自傳的首卷：「內心的旅程」。當去年九月間巴黎解放之後，這會應全國著作家委員會的邀請，爲「法國西文學」雜誌撰詞，他這樣寫道：

「我全心贊助著作家委員會的呼籲。請把我的贊助之意賜予傳達。是的，自從法國的生存本身一度成爲問題以來，大家——我們與世界——對於法國的價值就更爲了解。誰談到法國，誰就要談到，應該談到自由與人類。保護自由與人類，是她的使命。更有進者：這是她的本質，這是真正的法國的實質。我們不要辜負她！對不起她的無論什麼事都不要作。」

「我們對她忠實，戰鬥在所不辭」。

六 永遠植根在黑土中了

從上面的敘述，我們對於羅曼羅蘭的一生，已有一個概括的認識，現在

再讀我們對於他一生的思想，作一個總的回顧。

羅曼羅蘭本人在他的晚年，也會經多次地批評了他的過去，指出他早年的思想，只是當時四歐一部分知識份子的個人主義的，無力的幻想而已。他這樣說道：

「在十九世紀末三十年的一個青年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眼光裡，自由的、廣闊的、堅強的個人主義，便是人的最高價值，人類的前途；這種個人主義的任務，就是抽着背後的隊伍向進步的路上邁進，並且反抗一切反動勢力的侵略……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使我那時還未完全擺脫的民族主義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時代的偏見完全解除了。然而，我那時候並沒有放棄我原來的希望，想建立一個廣大的精神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是獨立，不附屬任何民族，不隸屬任何黨派，却保持着一個超利害的客觀性，作為一種科學的觀察台，以清明的眼光來照耀着全人類的前途……」。

羅曼羅蘭在一九一九年所發表的「精神獨立」的宣言，便是這樣一種企圖，這種企圖是將知識份子和無產階級兩種戰士的隊伍聯合在一起，而由具有着「清明的眼光」的知識份子來負起領導權。但後來他經過了好幾年的「摸索和徘徊」，終於毅然決然地過渡到他的思想綱要了。當他在一九三一年所寫的一篇論高爾基的文字中，他又這樣說道：

「過去我們中間最優秀的份子，都不曾能夠脫離個人主義的掣肘。我們只是孤立地行動着，憑我們的良心作為行動的指導；這種有礙我們的強處，却也有着我們的弱點。我們的獨立和我們的無力，都是得自於個人主義的。對於這一點，我自己所感到的要比別的作家們來得更強烈。當一九一四年歐戰開始的時候，我會經大聲疾呼地「反對世界的大屠殺」，用了被征服者的淒慘的自傲寫着：「我並不是要為了脫離歐洲而寫作，我似乎只是為要寬慰我的良心而寫作的」。我們的立足點是不穩的。我在一九一四年所理解的，以及我後來號召民眾起來的「精神獨立」的宣言，只是一株向天空伸出了樹枝的好看的樹吧了。然而那裡並沒有泥土可以使那株樹生出根鬚的。假如不把那株樹本身移植到人類中去，移植到民眾中去，移植到積極的民眾中去；假如不移植到比一種消滅的民眾的泥土更深沉的地方去，那就是說，假如不移植到黑土的深處去，那株樹畢竟還是會死去的。高爾基正是一株從黑土裡生長出來，一

邊又把他的根盤纏在黑土裡的。至於我，在這三十年的路程中，為了我專我的民眾，為了把我的根盤纏到民間中去，我的路就困難得多了……我期待着這些民眾，我從兒童時代以來，一直是竭力在指導這些民眾，然而我的周圍的泥土，竟是這樣的乾枯，這樣的荒蕪！於是，我漸漸地向着全歐洲伸展我的根鬚，使我自己和俄羅斯民眾的多產的部分，和蘇聯的深處發展起來的豐富的生活結合起來了。就在這悠久的地下的工作之後，我的根鬚碰見了高爾基的根鬚，而且像弟兄似地和他們結合起來了」。

這段話可說是羅曼羅蘭的自白，他講出了他多少年來尋求與探索的歷程，而最後終於實現了。在此地也可以看出，羅曼羅蘭多年來是怎樣不斷地自我批判，不斷向前進步，假如我們說前期的羅曼羅蘭，還只是一個「克羅斯朵夫型」的英雄人物，還只是一個深受了托爾斯泰影響的和平主義者及人道主義者，那麼經過了第一次歐戰和大戰的「要求與動搖的年代」，他終於最後「與過去告別」了，進而成了一個社會主義者、反法西斯的戰士和人類事業的衛護者，而他最後二十年的事業，更像王冠一樣，籠罩了他的全生。從此地，我們也可以看出一個知識份子的發展與光輝的道路來。

羅曼羅蘭逝世了，但是他的精神並沒有死，他的一生的著作，將永遠成為我們的珍貴的遺產；他的道路，將永遠成為我們的一個光輝的榜樣。他曾經向蘇聯的人民作了一段意味深長的忠告，讓我們也抄錄在此地，作為他留給我們的最好的遺言吧：

「千萬不要把今天的勝利看得滿足！尤其是不該依據那些得到的成功！成功一次是不能持久的。必須天天成功才行。每天早上，我們都應得把新的工作担當起來，——把上一天開始的鬥爭繼續下去。人類的生命永不停止。誰停止了誰就落後。我們必須一直前進。對於錯誤，對於不公正，對於死，我們必須不停地方爭着更大的勝利。這是你偉大的歌德的話：「只有必須力爭着自由和生活的人，才應該得到自由和生活！」」

寫於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羅曼羅蘭追悼會之後。

約翰·克羅斯夫向中國的 弟兄們宣言

我不認識歐洲和亞洲，我只知道世界上有兩個民族：——一個上升，一個下降。

一方面是忍耐，熱烈，恆久，勇敢地趨向光明的門，——一切光明：學問，美，人類的愛，公共的進化。

另一方面是壓迫的勢力：黑暗，愚蒙，懶惰，迷信和野蠻。

我是附隨前者的。無論他們是生長在什麼地方，都是我的朋友，同盟，弟兄。我的祖國是自由的人類。偉大的民族是他們的部屬，衆人的寶庫乃是「太陽之神」。

羅曼羅蘭

一九二五年一月

(註)羅曼羅蘭的名著「約翰·克羅斯夫」，我們現在已有全譯本。這部書最初曾由羅曼羅蘭過開頭的一部分，發表在「小說月報」的「法國文學專號」中，我們此地所發表的這篇「宣言」，也就是羅曼羅蘭當時爲中國讀者們而寫的。

羅曼羅蘭著作的中譯本

羅曼羅蘭一生的著作是非常豐富的，但直到目前為止，還只是一部份被介紹到中國來，現特將已有的中譯本一一列舉於此：

在小說方面，羅曼羅蘭的著作，約翰·克羅斯夫，已有了傅雷的全譯（商務版）。這部小說全部共分爲十卷：「黎明」、「清晨」、「少年」、「反抗」、「節操」、「安多納德」、「戶內」、「女朋友們」、「燃燒的荆棘」、「復旦」，中文是分爲四卷出版的。最近這部書又有鍾志民和齊蜀夫的譯本（世界出版社版），才出了第一卷，即用原名「黎明」。此外羅曼羅蘭的自傳與傳記，一書有葉冰鳳的譯本，現代版。

在戲劇方面，羅曼羅蘭的劇本被介紹過來的，計有「七月十四日」，賀之才譯，商務版；「孟德拉斯特夫人」，李瑞譯，商務版；「沈起子」，沈起子譯，見「世界文庫」第六卷；「與死之戰鬥」，羅有兩種譯本：一爲李西香譯，文化生活出版社版；一爲夏來帶譯，創造版。

在英雄傳方面，三本代譯的英譯傳記都有了中譯：「悲多汶傳」，從前商務版的譯本，現有新版；現有歐古元的譯本，明出版社版；「德高納琪傳」及「托爾斯泰傳」俱爲傅雷所譯，商務版。此外被譯爲中文的傳記，有「悲多汶與他的時代」，梁宗岱譯，商務版；「甘地」，歐陽德譯，商務版；「盧梭評傳」，俞慶棠譯，見「改造」第九卷第九十兩期；「米德德」，張定璜譯，見「改造」雜誌；「回憶雨果」，周行譯。

關於音樂著作方面，「古代音樂家」的專言「音樂之史的發展」，有傅雷的譯文，見「音樂知識」；「布爾茲傳」，有蕭乾的譯文，見「譯文雜誌」；並見傅良編「名音樂家傳」，立體出版社版。

在關於羅曼羅蘭的傳記方面，現只有一本刺外格的評傳（中譯名「羅曼羅蘭」），樓人樞譯，商務版。

（葆荃輯）

華北解放區的新女性

余為羣

暗影

最近我看到一張名片，上面寫着：「徐玉秀英」。像這樣已婚女子名片的寫法，是由來已久，並不是奇的。但這裏面說明了一個問題：中國婦女是以一個從屬地位在社會上生活的。這并不能怪婦女本身，統制階級的代價人，早就規定了一條：「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再加上一條「女子無才便是德」，這種「愚女政策」實行以後，婦女在社會上從屬的奴隸的命運，便注定了。而法律，又都是站在男子立場上擬定的，舊禮教所規定的「七出條例」，女子有犯的，就可以合法逐出家庭；男子則可以「消遣性外」，而討小老婆，更成爲一種權利。

女子從她一投生到中國這腐朽的社會上來，就受到無邊的災難，壓迫，剝削。溺死嬰兒的，多半是女嬰；少爲兒女了，往往被迫去做童養媳；即使能得工作，和男子做同樣的工作，所得報酬却少於男子，際遇起來，又多見男子佔先，同等爲社會服務，却不能和男子一樣享受權利；政治權利被剝削了，經濟上是不發達的，更談不到財產繼承權；在生活不能維持下去時，就被迫爲娼，——當做商品在出賣了。抗戰後，更加上一種壓迫：日本軍閥的暴行，較男三犧牲更多的更大的，是婦女。

一部中國婦女生活史，上面充滿了災難，壓迫，和剝削的悲慘暗影。這暗影要到什麼時候才能消滅呢？

只有在民主政治的陽光下，合理的社會里，暗影才會消逝，婦女才能開始得到解放。

這兒，我想到敵後解放區的婦女，她們開始了一個獨立的人，生活在社會上，置身在民族戰爭和民主運動的激流里，以新女性的姿態，出現在中國的土壤上了。

生產戰線上

敵後解放區的婦女運動，是隨着抗戰而展開的。平津等大城市陷落到敵人手裏以後，大批知識青年進入了鄉村，八路軍則以他銳不可當的氣勢，開赴北戰場，從敵人魔掌中收復了廣大的土地，就在這土地上建立了新的人民的政權。羣衆組織起來了，婦女也組織起來了，各地方都成立了婦女會，改善了婦女生活，提高了婦女地位，她們在社會上享受了和男子一樣的特遇，得到了婦女所應有的權利，只是失去了一樣：這就是封建勢力的枷鎖。

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和所享受的一切權利，都是被她們經濟上的地位決定的。敵後解放區的婦女，已不是男子「玩弄的工具」和什麼「造人機器」，而是以一個「勞動單位」，參加了生產運動，這兒沒有失業的痛苦；在田地里，在紡車布機旁，到處都活躍着勞動婦女的行列。被獎爲晉察冀邊區婦女勞動英雄的任德蓮，便是成子成萬的勞動婦女的代表之一。

在舊社會里勞動是受壓迫的，婦女勞動更是被人看不起的。任德蓮說：「人家都笑話咱，咱穿的遮不住肉，臉黑的像個女人，我請到了只賣幾錢兒，咱不勞動就餓死。人家說女人家不能上地，怕交不了租子，租地也租不到，就是租到三二畝地，打下的糧食，除了租子就沒有自己的了……」

在新社會里呢？她說：「現在可好了，地也有人種，給租子也不多，因爲政府減租了，總有剩餘，要不是遇上這年月，就是再活五十四歲，也吃不餓。」

現在她一人種了十六畝八分地，每次上地都帶着簍子，在路上拾糞，到地裏就把糞埋到莊稼根底，回來時簍里不是放着菜，就是柴火。每天早上都起來拾糞，一個冬天拾了八十多畝糞。去年打的糧食，除繳一點公糧和租子外，還能剩餘二石五斗多穀，和一石多菜。

四三年冬季晉察冀邊區號召紡織運動以後，有生產力的婦女，大部份都參加紡織了。根據易縣滿城曲陽等十二個縣的不完全統計：從事紡織的婦女就有三八、九八三名之多，去年春天開始兩三個月里，織八個縣的統計：織出綿花布一三〇、一七四斤，收回線子有六一、二九一斤，織成布有七、九

八八正。許多婦女從此起了家，兜縣的尹春花，紡線三十斤，織布三匹，以所得工資去做生意，得了九百元，買了一畝八分地。

民主的政治生活

由於婦女參加勞動，經濟地位提高，同時婦女有了財產繼承權，在警察署選民已開始實行。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提高了家庭地位 and 社會地位。

在家庭里，普遍禁止婆媳虐待媳婦，丈夫打罵妻子，婦救會幫助解決了不適合的婚姻，取消了買賣婚姻，和重慶媳，婦女有選擇對象的自由，有離婚的自由，但又防止了隨便離婚的現象。開解了家庭的糾紛。一方面爭取婦女在家庭里的自由權利，一方面又團結了家庭：提倡「好婆婆愛媳婦，好媳婦敬婆婆」的態度，消除了家庭間的對立。

政治上，婦女獲得了和男子一樣的自由和權利。提高了廣大婦女參政的熱忱，據不完全的統計，晉察冀北區區共有二十九萬多婦女，參加選舉的女公民就有一百三十五萬多，有一千九百二十六個婦女被選到村區級政權里，參加了政權工作。在縣級方面，有唐縣女縣長韓舜玉；在專署一級方面，有晉東南女專員劉亞雄，在邊區一級方面，有許多邊區女參議員，她們的政績是和男子一樣有聲譽的。另外還有五千多個女村代表，她們有權利向政府請願建議，對在中國婦女史上是嶄新的光輝的一頁。

婦女選舉和減租，和男子一樣，是沒有任何職業，經濟，地位等等限制，凡十八歲以上的女公民都有這種權利。在每一次村選，區選，縣選的會議上，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手持蒲扇兩柄杖的老太太，手里抱着孩子的少婦，年青的閩女……這些人當中，有的是穿得很齊整的地主富農的婦女，有的是衣服並不齊整的貧農貧苦的婦女，這種權利不僅是男女平等，就是貧富婦女也是一樣的。她們說：「當村長，也是辦救國的事，男人能辦，咱們女人也能辦」。

在選舉時，婦女鬥爭的情緒是很高的。事先每一個公民小組婦女們都憤激地討論審查那一個合格，選舉那一個，然後才在大會上提出。女候選人，往往走上講台，發表競選演說。這里摘一段易縣一個村女代的話：

「如果大夥兒選上我，我一定積極抗戰到底，一定徹底實行減租減息，想法改善生活……」

大家如果以為她好，就選上了她。倘將來不好，如完縣一個村莊的婦

女，見選出來的村長不好，大夥爭取罷免掉，再選別人。結果她們得到了勝利。

廣大婦女參政，在中國是一個創舉。有些頑固的男子是看不慣的，他們起來反對，不准婦女參加選舉，馬上得到婦女反對；她們參加了選舉，選了她們所擁護的人，頑固的人在解放了的婦女面前，也就無可如何了。她們獲得了民主，懂得了怎樣爭取民主，也懂得了怎樣實行民主。（被刪）

她們獲得了文化

政治上獲得了平等地位，教育上也獲得了權利。各地開辦識字班，冬學，使廣大的婦女，特別是青年婦女，都有了免費讀書識字的機會。許多婦女做完了工作，整理好家務，都拿着識字課本走到教室去上課，有小孩子的大牛是放在家裏，給年紀大的人帶着，甚至年紀大的老太太也要識字唸書，她就在家裏的婆媳母親，在學校里所學的，回到家裏來又普遍展開了學習的熱潮。晉察冀中區來說，四個分區，有三十四個縣辦識字班，擁有三三〇、二九四個會員，設了一、二、四七處的婦女識字班，要掃除青年婦女的文化盲，不到兩年時間，全冀中區的女識字課本的佔百分之七十了，讀課本的佔百分之二十了，讀完一冊只佔百分之十。這里面，識字最多的已讀到五百個字，識三百個字佔百分之二十，識二百個字的佔百分之十，才識到二十個字的佔極少數。短期內，冀中區青年婦女文化盲是完全可以掃除的。

在新的地區里，「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時代早已結束，成為落後的污辱的稱謂，現在是「女子有才方是德」了。每年各地區的三八節紀念會上，可以看出解放區的文化，在不斷的提高；晉察冀的婦女，平均起來，差不多每個人都能唱十個左右的抗戰歌，懂得一般政治形勢，識字的逐漸加多，有婦女還參加排戲、演話劇、排話劇，自編自導。

一貫被認為落後的婦女，特別是生長在解放區山溝溝里的婦女，政治認識提高了，文化水準提高了，這遠超過了敵佔區城市的婦女。許多從敵區來的大學中學程度的知識婦女，在新的女性面前，自愧不如了。

武裝了自己

她們不但以政治文化武裝了自己，她們在戰鬥中也實際以長槍短棍大刀武裝了自己，各解放區都成立了婦女自衛隊。婦女自衛隊的組織是這樣的：大隊，中隊，分隊，她們學會了各種基本動作。每年三八節上，都進行大檢閱。在檢閱後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婦女：穿一身農民服裝，頭上却戴着軍帽，腰上打着綁腿，有的槍在肩頭，手裏拿着手榴彈，這就是軍人却又不是軍服；說她是老百姓，但說她是軍人又打綁腿，這也是一部分的婦女自衛隊隊員。單是晉察冀邊區，就武裝了二十七萬的婦女，這比一個師有三萬多婦女自衛隊。我們知道敵後那殘酷的鬥爭之所以能堅持，主要是靠羣衆武裝和軍隊的配合，而婦女武裝是羣衆武裝有力的部分之一。她們經常代替男子站崗放哨，盤查行人。鈔票子作上，各地不勝枚舉。光輝的例子。像平山錫石村的婦女自衛隊員封枝枝，一天在菜園裏摘菜，看見兩個人趕着牲口只走小路，心裏便懷疑他們是漢奸。她走上前去，說道：「這條路走不通，你往村里走吧，那是大路。」那二人却不理她。她接着又說：「你們是走後路修路吧，其實我們村里的人，還沒有回來，沒人在這條路，你過去吧。」那兩個人信以為真，大膽走進了村子。她也連忙跟着進村，叫自衛隊員們捉住了。從這個人身上，查出偽村長委任狀一張，和日本旗子宜傳品等。他們兩人知道露了尾巴，隱藏不了，說出後動還有六個人。封枝枝以同樣的方法，又捉住了那六個漢奸。

在反掃蕩中，更可以看出她們的英勇。她們在後方常常擔任起男子的任務，抬担架，運子彈，掩護軍隊上堅壁的東西。曲陽武家灣的婦女，因為軍隊緊壓的棉花沒有送完，而敵人快要到建村了，幾個婦女便抬着走了幾十里路，送到安全地方，沒受損失。

軍隊在火線上打仗，村里的男自衛隊都配合作戰去了，她們往往擔任起戰時後方的勤務，慰勞隊伍等等。如平山縣的孔岔山村婦女救會長和宣傳委員，領着婦女會員做了許多白麵餅玉菱子餅，她們雖然大都是小腳婦女，但怕隊伍餓着肚子，自動地就把乾糧送到火線上，把乾糧交到戰士手裏，她們又回來煮了一大鍋的綠豆湯，一桶桶抬上火線去。戰士們看着羣衆這樣關心她們，消滅敵人的勇氣更高了，怕火線上危險，叫她們不要再送了，她們却說：

「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事，算不了什麼！」

她們還是一種種地送上去。可是她們的脚確實太小了，走路很不方便，聽了長水山，脚都走腫了。然而她們却無怨言，相反地，心裏感到一種安慰。

和滿足。

軍隊到什麼地方，馬上就得到羣衆的擁護，愛護和幫助，這樣的軍民關係，怎麼會不打勝仗呢？

法國大革命時代，巴黎的婦女，會舉手執武器，進攻去進，參加佔領巴士的獄。並且以羅莎·拉薩爾爲首的婦女戰士們，進攻凡爾登，拿上雷長把法王帶送到巴黎，——這批婦女參加革命戰爭的光輝史實，永遠照耀歷史。但今天的敵後，有着更多的羅莎·拉薩爾，她們直接參加了戰鬥，當敵人在平山涇源鎮增兵，經常到附近村莊去燒殺姦淫，機關已八區婦女自衛隊，她們在八區婦女救會和婦女自衛隊的中隊部領導之下，集合出發了。每一個人的身上都披掛三個手榴彈，手裏拿着手槍，踏着茫茫的寒色，向敵人的隊伍裏有一個行婦女救會會長，她是一個小脚，她雖科科地擡動着手裏的手榴彈說：

「怕什麼，咱們幹一場！」

半夜，她們悄悄地到了灤縣城外圍，頓時一陣槍聲和手榴彈聲，驚醒了睡夢中的鬼子，連忙以機關槍和大砲來抵抗。任務完成以後，女戰士們靜靜地撤退，歡呼着勝利的歌聲，回到了各人的家裏。敵人疲勞了一宿，消耗了無數的子彈和彈藥，他們還不知道對方只是一羣毫無作爲的婦女們。

婦女自衛隊的人員受到巨大的損失，敵人就以高價的贖賞，想來搜捕婦女英雄。晉察冀邊區武家灣大陽村的婦女自衛隊長段鳳英，她是一位著名的女神槍手，在一次戰鬥中，曾打死了四個敵人，到流傳着她的英名。敵人想應當捉捕她，但是到處有段鳳英式的女英雄出現，敵人是沒法捉去的。不僅在戰鬥中給敵人這樣威脅，就是在敵佔據區之間，在政治攻勢的鬥爭中，也常使女英雄活躍着。一個區的婦女救會武裝部長徐長，她常帶着婦女自衛隊員，背上槍和手榴彈，懷裏藏着標語傳單和「英雄傳」，走到各軍據點之前，到好敵人的地方，就她專心調查好的集結地，叫出敵人的名字，告訴他們所做的事我們都知道，做好事的，在他名下劃個紅點，壞事的就劃個黑點，要是真做壞事下去，反攻時候要清算欠賬的。說把着惡毒掛在壁龕附近，留給他們看。另外還給他們談國內國際形勢。……備軍從此就不敢再敢壞事了，軍心也動搖了，加速瓦解了偽軍。徐長這做法，許多婦女看見有效，也都自動地去給偽軍上課去了。

她們自己固然是這樣英勇地走進戰鬥中去，同時，她們知道：如果沒有強大的正規武裝，是不能保衛解放區和自己的幸福自由的生活的。在每一

上級號召武裝動員的時候，婦女在擴大隊伍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不少婦女動員自己的丈夫，兄弟，兒子參加八路軍，她們知道參加隊伍抗日是一個人義務，也是一個人的光榮。在動員熱潮剛起之時，婦女會就開始工作，反對拖尾巴（就是在家里磨磨丈夫不讓他去報名參加），大家互相勸導，於是連會黨裏有了「妻子送郎上戰場，母親叫兒打東洋」的美談。有一個鄭老太，親自把三個兒子送到八路軍去；在晉察冀邊疆區，長治婦女會曾發動了丈夫和另外幾個工人上前線，高平的婦女在黨大會替丈夫報名入伍。在解放區，當兵成爲一個光榮的事業。軍隊如果做到真正爲了人民，那兵源是不斷的，用不着拿手槍和繩索去網羅的。用武力網羅來的壯丁，中途自然會不斷開小差的，是作不得數的。自願從軍的人是不會開小差的，即使有個別落後的人想回家，在解放區，這樣的人，是爲人看不起的，連他家里也引以爲恥辱，要竭力把丈夫和兒子送回部隊上去的。這就鞏固了部隊。

爲什麼能够這樣呢？

因爲羣衆認識到自己的部隊，並且政府給抗日軍人家屬以生活的保障，晉察冀邊區就組織了優抗委員會，這是由政府和羣衆團體共同派代表組織起來的。凡是家中男子參加了部隊，家中貧苦不能生活的，優抗委員會每月發給抗屬每人三斗米，四兩鹽，二兩油。他還組織代耕團，給抗屬代耕，下種，收割。平時常給抗屬挑水送菜；過年過節時，給抗屬拜年送禮；開會時，抗屬坐在前面的光榮席上，總之使她們生活不發生問題。有時，在平時也經常募集東西送給抗屬，如晉察冀邊區保德縣，在「三八」大會上，就發給了一碗米的運動，贈給抗屬。

抗屬家庭生活的安定，也鞏固了在前線的戰士。

人民、政府、軍隊——三位一體

解放區的婦女知道，她們之所以能够從舊社會裏的封建勢力壓迫下翻轉了身，真正成爲一個獨立的人生活在社會中，享受新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平等自由，是新政權和八路軍的賜予。因此，她們對政府和軍隊的愛護也就無微不至了，甚至於犧牲了生命財產也毫不吝惜，保衛政權和軍隊，實際上就是保衛她們自己獨立自由的生活。

冀東保衛冀東英烈的張蘭英，有這樣一個故事，她自已丈夫出去有事了，恰巧這時一個區級工作人員誤入她家從後面

追來，他跑到張蘭英住的村莊，而且就在她家隱蔽起來。這時敵人包圍了這個村子，搜到張蘭英家時，她承認區級工作人員是她的丈夫，敵人信以爲真，走了。剛出去，真的丈夫回來了，他被敵人盤查時，說是張蘭英的丈夫，敵人就帶他進來對質，她怕犧牲了區級工作人員，堅認丈夫不是她的丈夫，真丈夫被敵人打死了，結果救了區級工作人員。這是何等動人的故事啊！敵人是壓迫人民的，敵對人民的，不但不會救區級工作人員，恐怕連收留他也不會吧！人民只希望這政權早日崩潰，那兒會肯救他呢？

在擁軍上，也有許多動人的範例，我想，只要說一個就可以看出來人民是如何愛護他們的軍隊。一九四四年晉察冀邊區黨政軍民聯合決定給予我冠秀以北城區擁軍模範——子弟兵的母親的稱號，那決定是這樣寫着：

平山下盤松村，連任六年婦女會主任的夜冠秀同志，一貫積極負責愛護軍隊，爲人表率。去年三個月反「掃蕩」中間，她對過往部隊，多方關心，解決困難，保證部隊順利執行任務，會經幾次救護傷員，不避艱苦危險，接待安慰，無微不至，發生情況，則親自安撫傷員，親自放瞭望哨。一次，×團一個重傷員，到了下盤村，他已昏迷四天四夜，水米未曾入口，人羣不省，夜冠秀同志馬上親自看護，先用滾水向其口內灌送，傷員逐漸睜開眼睛，用豆腐湯兒慢慢餵他，傷員開始能說話，再饋以稀飯。夜冠秀同志又拍傷員受冷，把自己女兒的棉衣內襟扯下，給傷員包脚防凍，這樣足足一整夜，未幾傷員左右，未幾一會覺，終於使傷員神志清醒，肢體能以轉動，而將之送回部隊休養。這種偉大的愛護的精神，實是邊區人民擁護子弟兵的意志的集中表現……

在這簡略的數百字里，深刻地表現出來軍民合作的那種血肉關係，是工幅多麼感人的圖畫啊！

平時對軍隊的慰勞，如晉察冀邊區只一年的慰勞成績就是：

- 鞋子二十九萬五千七百雙，
- 雞四千六百十六隻，
- 蛋五萬三千五百餘個，
- 豬羊七百八十二隻，
- 各種物品（如鞋襪軍衣等）四十萬件，
- 錢五千五百三十五元。

至於洗衣縫衣那更是經常的事了。她們甘心願把自己捨不得用的，輪車
 廠用，捨不得吃的，給軍隊吃；爲了什麼呢？因爲軍隊是保衛她們的。

光榮

解放區的婦女，在戰鬥中，在敵人面前，在法庭上，表現了她們崇高的
 品質，和不屈不撓的精神，爲了民族戰爭，爲了婦女解放，她們獻出了自己
 最寶貴的生命。

魯察察各個劇社女演員們，經常和男子一樣出入敵偽據點之間去演戲，
 宣傳敵佔區的羣衆，瓦解敵偽軍，隨時都有生命的危險。女演員方璧，抗戰
 前的一個年青的小學教員，就被敵人亂槍打死了。死的時候，手里還擊着手
 榴彈，要戰鬥下去！

晉東北韓聯救會主任薛子晶，她從楊縣出發，衝過四五道敵人底封鎖
 線，去參加邊區第二次主任聯席會，中途被敵人包圍了，敵人想屈辱她，她
 絕不拒絕，英勇犧牲了！

中共山東中央分局婦委會委員，山東省婦女救國聯合會的常務陳素克同
 志，在四一年反「掃蕩」的時候，因爲身體孱弱，腹內有孕，在十一月七日
 她便落在敵人的手里。在法庭上，敵人問她：

「你的丈夫是誰？」

「我的丈夫是抗戰的。」

「你呢？」

「也是抗戰的。」她要敵人快點槍斃她。

「槍斃？」敵人訕笑的說，「還得賠顆子彈呢！」

「那就刀殺！」

「刀殺還得用力量呢！」

「隨你的便！」

敵人硬硬的辦法失敗了，想用軟的辦法來騙她。給這小孩牛吃，她把牛
 奶奶棒了，給她吃飯，她不吃，要奶食。看守逼她吃飯，她說：「要殺就殺
 吧，要砍就砍！」敵人對這樣一個孱弱的女子，却毫無辦法，只有把鋼槍斃
 了。

這種高尚精神的光輝的範例，是舉不勝舉的。

這是中華民族的光榮！

這是婦女的光榮！

從解放區婦女所走的道路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幾千年來被壓迫的
 婦女，要取得解放，路子只有一條，那就是爭取民主。只有在民主政治的
 陽光下，婦女才夠享受一個獨立的人所應該有的平等自由幸福的生活。
 向鐵道路上邁進吧！

一九四五、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紀念日

張西曼教授主編

民主與科學

雜誌

訂閱全年運郵千元

全國各大書店代售

通訊處重慶中一路一九八號

第一期要目

- 民主與科學是中國革命的兩大目標.....張西曼
- 中國工業化與民主是不可分割的.....楊寅初
- 三十年來我國科學的進展.....盧子道
- 植物和水.....錢崇澍
- 佛洛伊德理論的限度.....丁瓚譯
- 益母草的研究.....朱肅
- 河池南丹第四紀冷川現象略述.....吳燕生
- 中國工業訓練計劃.....丁雨山譯

第二期要目

- 怎樣準備參加舊金山會議.....張西曼
- 草根樹皮有何用.....經利彬
- 鄂西書畫調查.....李鳳藻
- 遠東聯科學院.....梁純夫譯
- 中英生物科學的交流.....陶大鏞
- 貨幣會議與中國.....丁雨山
- 烏拉那哈薩克考.....張西曼

邊區婦女剪影

——三個女人的故事

軍明

邊區婦女在過去所過的生活，和中國的其他各地沒有什麼多大的差別。在舊社會里，一個平平常常的女人，誰能逃出痛苦的命運？這里，我只介紹一個女人的身世，就可以看到她們在從前是如何過活的；如今又怎樣的生活着。

在邊區，誰都知道有個折聚英。

她是一個窮苦的佃農的女兒。三歲時，折聚英的爸爸就死了，她的寡婦媽媽，變牛變馬的土地販去種地種柴，才能一面交租納稅，一面嚼稀吃稠的養活一家人！可是不幸的事件，一樁又一樁的襲到這個幼嫩的小女孩身上。在她剛滿九歲時（民國十七年），陝北的高原上，彌漫了個連年成，成月成月的見不到一滴雨點，土地龜裂了，窮苦的人更加窮困，折聚英只好拖着兩條小腿，跟着媽媽逃荒去，就在那一年，「借糧不如減口」，九歲的小折聚英，只抵了兩斗粗谷子，被人家引去當了童養媳，緊跟着，她的媽媽也餓死了。

誰當過童養媳嗎？那才是耗子送到了貓嘴里的生活啊！那個男人比她大十來歲。整天不務正，真是個賭博，嫖女人的流氓煙桿子。趕明到黑吊蕩在外面，一回窩就抽下抽大烟。小折伺候他，他是湯來飯口，飯來伸手，對小折却從來沒過好眉眼，更沒過好言語，那雙凶煞神似的眼睛老是瞪得她抬不起頭、直不起腰來，折聚英在他的面前簡直連氣都不敢出一聲。她接的打會少嗎？他的臉上總是眉青眼爛的啊！只要家里剩下他和男人兩個時，他就把她壓在褥里打得糊里八塗，死去活來，而小折呢？成天的砍柴打水，推磨做飯，什麼都幹，可是男人見她吃飯就討厭，總是罵她：「誰叫飯還沒尾巴的豬兒！」

她的公公和婆婆雖然比她男人來要好一些，但對小折也沒啥好聲氣，

到底是「公婆媳婦、婆媳漢，廟子，廟子兩張皮」不親的啊！

她，沒有一個親人的小孩子，一天又一天過着那不是人過的生活。

一九三五年折聚英十六歲了，她那男人在舊軍里吃糧，混成一個兵油子回家了，他的神通也更大了；她好怕呀！眼着着可怕的惡魔又回來了，她受不住那虐待呵，公公給她的磨折就够受了。五月里，正是她要她成親的那一天，革命把她解放了，那一天，小折聚英正坐在磨門口愁得沒辦法，X軍的女宣傳員到了劉家溝（她就在那村子里），從此，她跟隨着那些穿着軍帽的女宣傳，離開了那個可怕的家門。不見天，她到一個訓練班去聽課了，後來她被分配了工作。

住在劉家溝的公公，這時也免了租，免了稅，得了足夠的土地才覺得了足夠的牛羊，這樣，竟然變成了一個好脾氣的公公了。有次折聚英回家去，她的公公眉歡眼笑的迎着她，她在公公的面前也敢說敢笑了。……

折聚英是翻身了，她在區里當婦女主任，後來她又進了學校，現在折聚英，這個從地獄里爬起來的小女子，這個只值兩斗粗谷的童養媳，却被黨人選下了邊區參議員，她是那樣昂起了頭，走進那莊嚴的邊區參議會大殿裏呵！

這里寫的雖然是一個女人的歷史，但從她的身上可以看出，同樣是一個婦女，在兩種不同的社會里，可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其實，在邊區何止折聚英一個，在女參議員里，與她差不多遭遇的就有好幾個呢。（如做路芝，也是八歲時，以十二吊錢賣給人家當童養媳的）。

一一

一九四二年，邊區出現了第一個婦女勞動英雄馬杏兒，她的名字和消息經常在報紙上登出來，人們的口口傳說着，她的照片，那健壯的胸脯掛着二朵大紅花的照片，在街頭到處張貼；各種的會議上，都被搬運着去講話。

這十八歲的女子，成爲了邊區婦女在經濟上依靠自己努力成爲一個獨立的人了。

馬杏兒現在是翻身了，但有人訪問她時，她却常常這樣說：

「真想不到會有今天！」

這是真的，她雖是那末年輕，但已經經歷過兩個時代，痛苦與幸福的兩種不同的生活了。

她的老家是米脂縣。那地方在過去一直是過着黑暗的日子，（她是永不會忘掉的！）當她還只十二歲那年，貧窮就迫使這個小女子離開了自己的親人，去到一個財主家當婢女了。

「媽，我轉頭在家陪你挨餓，不要讓我去伺候人吧！」

她哭着，哀求着，但是饑餓呵！杏兒的母親淌着淚，忍痛帶着自己的親生女兒，走進了那座可怕的朱漆大門。從此，馬杏兒過着牛馬不如的度過了三年的歲月，那是苦痛的歲月呵，難日病了，主家還要罰銀錢，看一一看呀，馬杏兒病了連息都不能息一下。忍到到媽的勞後，換來的只是辱罵與鞭打！

杏兒的幼軀，是在被人毆打與踐踏下度過的，她忍了，新的痛苦却緊跟着又來了。在她剛滿十五歲時，這個還沒發育完全的女孩子，又以婢女的身分從財主家換到了一個破客棧，與一個比她大得多的男子結婚了，丈夫對她是陌生的，公婆對她是冷酷的，她在這個家庭裏，連抬起來看人的地位都沒有，她挑了水做好飯，自己却只能看丈夫公婆兒孫吃，最後當她捧起空鉢子來喝幾口稀湯時！婆婆還惡毒的指着罵她：「生來是這樣的窮相！幹嗎這末急呀！」

這些辛酸的日子，硬是不好過的，直到今天，她一想起來，還是要流下淚來。

一九四〇年馬杏兒的婆家，下南路到了延安，第二年，馬杏兒也因為顧不上吃，跟着來了。她又親親的看見了丈夫的合夥，給邊區政府的最高安撫，農場答應給他們一頓鴨子，三把雞頭，和供給種籽，牛草料和人吃的口糧，收穫量是對半分，真是「裏地有地，裏糧有糧」呵！但是杏兒的夫家不聽她的勸，一個人自去做工了，杏兒，這個十七歲的少婦，整夜的啼哭着，當天剛亮的時候，她下了一個決心，跑到自己父親的跟前說：

「他不來，我來！」

一個女子，一個沒有上山種過地的女子，怎能抵一個勞動力呢？馬不想

看看自己的女兒，擰着面說：

「不成！……」

杏兒自己也沒有信心，但是她想，我爲什麼一定要靠他！終於，她頂上了夫婿的名額。

最初幾天，杏兒的手上，打滿了水泡，當到城上，腰酸背痛，骨頭像是一根一根的。她暗暗的流淚，「老是這樣，能熬得過去嗎？……」一個禮拜以後，杏兒手上的水泡變成了老繭，臉頰與腿都好了，她伸出一雙粗繭的手，對母親說：

「媽，好了，不用愁了，我一定能夠熬下去了！」

這樣，馬杏兒每天跟着她的父親馬丕恩上山去，光着腳在破太陽裏受着燒的土地上勞動着，從春耕，夏耘到秋收，她沒有落在她父親的後面。這一年，父女倆，打下的糧食就有四十二石（老石）谷子，又不受地主公糧，這些收穫是够她吃好幾年了。

當杏兒，這十七歲的少婦，被大家選爲勞動英雄，窮苦受人尊敬時，她的丈夫的公婆都笑臉的來迎接了。她不再是不受尊重的婢女了，她的小媳婦了，而是以一個主人的身份接待他們。

今天，馬杏兒的腰杆子是挺起來了，這全靠了自己的勞動力獲得的！也是「時勢變了呀！」

二二

去年三八節，延安的婦女在梅家園大禮堂開紀念大會。當一個個身軀不高大，穿着灰色棉布衣服的女同志，出現在禮堂的入口處時，全場的眼睛都注視着她，排擁擠的掌聲響了足足有十分鐘。這時，她被人們簇擁着，推上了主席台。

這二十幾歲的青年婦女，就是全邊區的家園和機關女同志學習的對象。她是一個國政委的老婆（邊區的女同志，是拒絕別人稱太太的），兩個娃娃的母親，又是××被服廠的政治指導員。

她是黨中深洋人，父親在後方工作，母親雖然早死了，但家庭的經濟是還可過得去的。七七事變那年，她正在定信仁中讀書。敵機打散了這個十八歲的女孩子的好夢，她不能升大學了。那時黨中的平原已經失去了國家的保護，熱心的青年男女只好自己拿起了槍，走上抗日戰場。陳傲的堂嫂，首先走出了家庭，當了縣婦救會的主任，陳傲和她的姊姊也跟着集起了村婦救會的工作。她那頑固的二祖父，生氣的吹鬍子，瞪眼睛，罵她們

是「瘋子」不守「家規」，可是她到是不顧當亡國奴的啊，她的姊姊先出走了，不久，陳敏和她的弟弟也偷偷的出了家。姊姊參加了火熱劇社，陳敏也進了軍中抗戰學院。她的大伯父大罵着：「家門不幸，出了叛徒」，還罵要掛牌她們，但是這個反共、反人民、反八路軍的大伯父，却自己成了叛徒，這了漢奸！

陳敏同志就這樣參加了革命，後來在工作中，她知X黨的政治委員相識了，彼此戀愛起來，就結了婚。在部隊裏面，她是政治區的組織幹事。記得有一次，隊伍到了山西靈邱，所有的指揮員都閉上前線去作戰了，後方只留下了陳敏和教育股長六個人。夜里，敵人却包圍了她們的所在地，情況是那樣的緊急，而六個人，却只有陳敏帶着一支小手槍。她沒有一點害怕，憑着這支手槍，所有的同志都衝出了敵人的火網，在一天兩夜里，她們沒吃一點東西，也沒休息一下，到了好幾處高山，一直到第三天，她們才到了部隊。

足足有三年，她都是艱苦的戰鬥着，生活着。爬山越嶺，跟男同志一樣自己揹着包，還要精米袋。陳敏却從沒叫過一聲苦！陳敏是剛強的。一九四〇年五月她跟隊伍一起由華北轉來邊區，那時陳敏已經懷孕四個月了，而每天却要走七八十里地。上馬關心她，給了她一匹馬，但是陳敏拒絕了，她說：「我不騎，我不騎，照規定我不應騎，而且騎了會料人說怪話，影響不好！」結果，她把馬送給了衛生隊。

陳敏，她不要作一個太太，而要以一個女戰士的資格，工作在戰鬥的隊伍裏的。

到了邊區她生下了第一個娃娃，但不久就死了。冬天，陳敏又回到了戰鬥的前方，在雁北，在那寒冷的塞外，隨着隊伍，日夜穿插在敵人的據點之間，那時，那個地方是最艱苦的。有一次，敵人四面包圍住我 的山頭，而且已經衝上山崖邊，入夜時，我 留下了少數的隊伍任保護，就開始轉移了。夜是灰白灰白的，大朵大朵的雪花飄落着，塞外的寒風狂吹，傍道路已經被濃密的雪團蓋住了，肚子是空的，他餓得加上寒冷，在滑人的山道上運動，爬過了一座山又一座山，他走出一百多里地，才能通過敵人的封鎖線，到達安全地帶，陳敏 跌跌又 起來的步行着，當隊伍登上了一個險峻的絕頂時，大風吹動了人的帽子，但，這個女戰士，却緊跟着隊伍沒有掉隊，也沒有叫一聲苦。行動是真實在的，許多戰士這樣說：「團政委的老婆是行，她都能走，咱也得趕上！」

作為一個女政治工作人員來說，這才是真正的激發了士氣呵。

一九四二年春天，她從敵後又回到了邊區，她已經又生下了兩個娃娃了，親自撫養着。上級分配她到鞋工廠做指導員，當她剛接手的時候，全廠的財產只有八千元現款，三百斤爛麻和一點小米。那正是邊區最困難的一年，鞋工廠常常領不到經費；後來，上級又給她一個任務是要完全自給。她管理這個工廠，比自己的事操心得多，她心里想着：「這工廠是我們黨的，而是一個黨員！」她親身參加製鞋工作，她研究如何做得好，做得快。她細心精確的計算着原料、成本，她不肯稍鬆一根繩子，一塊爛布，常常這樣說：「不要小看一分布，一雙鞋省一分，百雙鞋就是一尺呀！」這樣不久，工廠的生產擴大了。

那年四月一日，陳敏剛剛吃過晚飯，正在給孩子換奶時，上級忽然送來了一個命令，要在六月中旬，完成二千二百雙鞋子，而全廠只有十個小鬼，兩個技工呀，又是這樣短的時間，要完成這樣大的任務，她的心里是驚慌的，但是她并不着慌，她召集了全廠工人會議來商討這個問題，她又改變了全廠的伙食，自己更是半夜不睡覺的，糊鞋面，縫鞋口，情情直是走歸也縫，談話也縫，讓小孩媽的時候也在縫呀，一天她竟能縫到六十雙鞋口。在她的影響下面，工人的情緒是空前提高了。終於她在兩個月裏，提早半個月完成了上級的任務。

在她的領導下面，鞋工廠不但完全自給，而且供給了全團X千雙鞋子，年終結賬時，還盈餘了二十萬元。

去年，上級號召部隊的家屬要自給，陳敏首先響應了這個號召，全年要紡六十斤紗，來作為自己和兩個娃娃的生活費；這後來減輕全家的負擔。她不僅靠她的丈夫生活，也不願吃公家的伙食，過去她在前方時，是一個好的女戰士，回到後方，又是一個好的勞動者。

陳敏是小姐出身的知識分子，是團政委的愛人，但她在戰鬥中，勞動中，轉變成了一個嶄新的女性，所以，她在三八節那天，受到了那樣的榮譽呵！

一朵紅花（秧歌劇）

人物：大媽

胡二

胡二嫂

胡二

婦聯會主任

第一場

（開場時，音樂奏五更調過門，過門中，胡大媽扭上場，手中用簸箕簸玉米）

媽：（白）勤儉生富貴，懶惰出貧因，

老來光景好，勝過年青時。

（唱）家住在邊區，好呀好地方，

滿地的黃金用呀斗量，糧食足來兵又強。

多虧那共呀產黨，趕走那惡呀豺狼。

給咱百姓一滿是福了，光景好過不發愁。

我的好媳婦，一人管家務，

好勞動來勤生產，種地養過那男子漢。

媽：（轉身喊）胡二，胡二，——胡二！

二：（轉身的聲音）

媽：看你呀睡得美的，快起來，給你娘担水，做飯。

二：（伸懶腰，打呵欠的上場）看你呀睡美的，叫我幹啥哩？

媽：幹啥？太陽都過山咧，還睡着，真是懶蟲！

二：太陽過山，誰敢能把它拉住！

媽：別說胡話，快担水去。

二：担水？我哪裏哪裏去了？

媽：哪裏去咧，她一天勤勞的，紡線線，還領着

判單的生產小組，像蜜蜂，好吃懶做的！

判單的生產小組，像蜜蜂，好吃懶做的！

二：誰知她阿婆串門子去了，她再出門，我可不讓！

媽：你冤枉人！有你外甥兒子，我可要愛息我那好媳婦咧。

二：嘿，怪咧，兒子麼是你阿婆媳婦可是我的，你管我，我管她，大家公平。

媽：你這個狼吃的，可把我氣炸咧！

媽：（唱）罵胡二，駁二話，把我氣炸，

我的外，好媳婦，誰敢管她！

二：（唱）我的媽，你罵我，罵的是誰？

我婆媳，再出門，我不讓！

媽：（唱）誰要你，懶高生，光吃不拉，

我就要，送政府，把你鬥爭！

二：（唱）好兒子，壞兒子，是你養下，

送政府，誰管你，家務事情。

二：門爭我？鄉政府的事可多着呢！

媽：鄉政府管的就是生產事，你不生產，不批評你，還批評誰？我不給你說了，快去担水去！

二：看你鬥爭我，我就不去！

媽：真的不去？

二：說不去就不去。

媽：看我把你……

（胡二喊着「胡大媽，胡大媽」跑上）

媽：胡大媽，我二嫂哪裏去了？

二：不知道，誰知她到那串門子去了。

媽：誰跟你二嫂干說話！

二：胡二，別聽他，有話跟我說，

媽：胡二，別聽他，有話跟我說，

媽：胡二，別聽他，有話跟我說，

媽：胡二，別聽他，有話跟我說，

媽：胡二，別聽他，有話跟我說，

媽：大媽，我告訴你一件喜事，我今兒早上到鄉長

說：二嫂今年生產有成績，地種得好，糧打得

多，村子里紡線小組領得也好，她自個紡的

外棉，又白、又細、又勻、又緊，還上織呢

織做勞動英雄呢！

二：胡二，你說啥！我婆媳當了勞動英雄，這話可

是真的？

媽：怎麼不真，人家還說，今年那個不好好勞動生

產，給他戴高帽子送衙，還鬥爭他！

媽：胡二，好娃兒，你說的可是真的？

二：大媽，你還不信？

媽：嚶——我怎麼不信呢！我眼巴巴的望都望不到

咧！（白話）我高興的……（對胡二）這話的歡

府，可一滿是為咱老百姓做事哩！（情不自禁

的哭）

二：可不是，還說後縣上派人來接我二嫂去縣

開會咧！

媽：可是真的？

二：嘿。我去找二嫂去，告訴她，讓她好高興高興。

二：胡二，胡二！

媽：看你外二流子！

二：媽，胡二說的可是真的？

媽：真不真莫你的份！

（唱）聽她話，喜得我心花開放，好媳婦，愛

獎勵我也榮光。想從前務莊稼，人說受

苦，到如今，不勞動才算人！

（胡二）

（白）我想當了勞動英雄咧，你還有啥說

？你還不讓呢！

二：媽，我，我要……

媽：你要啥，快去担水做飯！

（二下）。

（二下）。

（二下）。

媽：真是官清民安樂，選選的政府，眼睛真是亮得
太太呢！老百姓一點點的小事情，（人
家）都都看得到。

二：水挑好咧，灶里火也生着咧，今兒個貴客臨門
，買哈優待優待呢？

媽：唉，今日個你也難性起來哩！唉，要是你像
像婆姨……

二：媽，別說咧，買哈不？

媽：哪。還是五百元，都兩斤肥兒的豬肉，再買
格一斤酒，配着呀沒？A，你可別胡化囉！（
自語）今兒個我可要親手下灶，做幾個好菜，
優待優待貴客哩。

第二場

嫂：（唱）這家走來那家轉，領導生產要經常。

秋收完畢發糧倉，全村婦女紡紗忙。

漢河么着輕口去，到那三邊把塵吹。

我要做個好榜樣，紡紗織布還要多開荒。

（鋼調）

（白）我看時間不早咧，怕我婆婆操心，趕緊回家
去呀。（自語地）嘿，到家咧。

（胡二嫂進院，放下裝滿棉花的籃子，取下
頭巾打土對內喊）

嫂：媽，你，媳婦回來咧！
（胡大媽新請兩手的麵，匆忙地，高興地跑出
）。

媽：哎呀，我的好媳婦，你回來咧（伸手想抓二嫂
，但感覺自己兩手的麵，就連拍帶擦的去掉手
上的麵）你煮了吧，快坐下！

嫂：媽，我不煮，你看你忙的樣子，他那個去囉？
要你老人家下灶做飯？（捲袖子）讓我來。

（欲下灶，胡大媽急忙拉住她）

媽：好娃呢，一年到頭是你做飯給我吃，今日格，
該我做一頓飯給你吃咧！（二嫂不解）這刻咱
胡家的貴氣就出在你身上咧，咱一家都光榮的
……

嫂：（莫明其妙）媽，我有啥貴氣嗎？

媽：對，做了勞動英雄，這不貴氣？一會兒縣上就
要派人來接你咧。這麼大的喜事，我高興的！

……（不由的又笑起來）

嫂：（半信半疑，又喜又羞）。我想哈當勞動英雄
？是你想的！

媽：哪，不是我想的，是這班聽縣長說的，說你今
年生產的好，還說……（突然想起）看，拉話
，拉話，讓給忘咧！怕把鍋燒焦咧，我去看看
你歇歇。（急下）

（胡二嫂望窗邊進去的方被擲，若有所思
的笑，如上）

嫂：（慌張又高興地邊過邊喊）二嫂！二嫂！你到
那邊去啦，我尋了你半天，尋得我心慌的！

媽：哪，可苦了你咧，我領完了棉花就到後莊去啦
，敬喬三婆姨、宋女、二嫂，還有那河南來的
難民，王家、劉家……教她們織布紡毛去咧，
讓，還有那鄰家婆姨不好好（的）紡線，
我還勸了她半天咧，唉，你的線會紡哩沒？

嫂：（焦急而又不耐煩地）學會囉！學會囉！（高
興地）現今兒早上在紡線的時候，縣長跟我說
，你今年紡線紡得好。地也種得好，糧打得多
，還教會了我們三十九個女子織布紡線。說你
做了勞動英雄咧！聽你是我們的模範，要我們
向你學習呢！）另外，縣上就派人來接你咧，
快去換套衣裳，我在這兒等你！（推胡嫂）快
，快！

（回轉看見婦女主任由遠處而來，急忙拉住二
嫂喊）

姐：喂，婦聯會來咧，婦聯會來咧！
（婦女主任手拿一朵紅花上，二嫂如雷化重
）

嫂：婦女主任來咧！

姐：（興奮地）婦女主任，這是我二嫂。

嫂：（親切地）胡二嫂，你中了狀元咧！應當派我
來接你，說你今年生產有成績，賽過全縣婦女
，你紡的線又多，又細，還選你當勞動英雄咧（把
紅花掛在胡二嫂胸前，贊美滿堂紅調）你真
是咱婦女的光榮！

（姐如獲至寶，胸前的紅花，二嫂也滿臉花。

媽：（上場）貴客來咧！你就是婦女主任吧？
（一團看見二嫂胸前的紅花，狂喜，上前捧換
紅花，激動而又誇耀的向婦女主任說）這……
這就是我的媳婦！

嫂：大媽，二嫂當了勞動英雄，你高興吧？

媽：（樂極）我……我高興的心都快跳出來咧！當
官說，好兒不少多，一個個十個個！我高興的
太太呢……（發覺自己說溜了口，有些不好意思，
急忙地轉話）我給你倒茶去！

嫂：媽，我去！

媽：不……

（胡二在後台唱：「你媽打你，你跟哥哥
，為啥要把洋煙嗎？……」（酒醉上）

二：A，婦女主任……這……

姐：這啥，我二嫂當了勞動英雄咧，你不見掛的一
朵紅花上！

二：一朵紅花，（酒不自禁的）我說我的婆姨是好
婆姨嗎！

媽：媽是好婆姨，你是壞男人，（聞酒氣）哪，你

這倒狠吃虧，又落了錢糧酒喇！(拾過籃米)

媽：(唱)我是那輩子虧了心，養下你這個壞呀壞東西！叫那婦女主任，把他帶到縣上，遊他的街來，丟他個人！

嫂：(唱)我說你也該收收心，好吃懶做有啥好收場。人家指著脊背，罵的是你來一家不光榮。

媽：(唱)大媽二嫂聽我說，年輕人改過也是容易，只要下定決心，勤勞生產就會受人敬。

(月詞)

媽：嘿，你好好生產，我叫你胡二哥，不生產，我就叫你二流子！

媽：好說爛說都沒用，婦女主任，到屋裏去息息，吃了飯，請你把他帶到縣上去，給他戴個高帽手遊街！

媽：不吃喇，大媽，天不早喇，我們還要趕早到縣上開會，選代表到延安去開勞動英雄大會，毛主席朱總司令都親見到喇，說不定二嫂會當選代表呢！

媽：(驚喜地)見毛主席？真的！

媽：哪裏的。

媽：嗚，我那輩子修下了這個好媳婦！(撲着二嫂的手)好娃呢，像要是在延安府見了毛主席，就替我問個安，——就說我老婆子以前過的一滿是苦日子，開刻的光景可過美喇！這些都是你毛主席給咱老百姓的福氣！記住，不敢忘了！

媽：(說)請他老人家來收收他的骨頭！

媽：二哥，你咋哩！

媽：我沒說的，媽，我不是你的好兒子，我以後一定好好生產。

媽：空口說白話，聽信來！

媽：二嫂！我對天賭個咒，要是再不好好生產，我把

我炸喇。(跪下)

媽：二哥，你別推搡，官話起來講。

二：媽，我對不住你，今日格你叫我上街去買酒割肉，我扣了一百元，喝了三兩酒，買了一包洋汗烟，剛到我不愛喇，都給你！

媽：只要你真心改正，我也心寬哪！

二：我婆姨，你見了毛主席，給我帶上一半句話，說我剛到我一滿解下問題喇，今年格一定好好生產，開三十畝荒地，好讓咱老人家高興高興。

媽：好嘛，大媽，今日格正是雙喜臨門喇。二哥，你好好生產，明年格也能帶上紅花兒去見毛主席喇。

二：婦女主任！我也能帶紅花兒去見毛主席！

媽：噲不能！(看天色)，看天不早喇，二嫂，我們還是趕快走吧。

媽：走，走，飯都做好了喇，吃了再走！胡二，快去切肉去！

二：(熱情地)吃——吃了再走嘛！(下)

媽：不吃喇，早點到縣上，二嫂也好早些見毛主席嘛！

媽：媽，那我們就走吧。

媽：貴客難留，那就去罷，好娃，你早去早回來。

媽：大媽，咱送二嫂一陣！

媽：對，胡二！(在里：「啊！」)你也來送送婦女主任。

二：(上)

媽：走吧，咱們送一陣。

衆：走喇！

(五人起程，桃花，唱主題歌)

主題歌

(一)

毛主席，好比那，高山明燦。

引導着，咱百姓，好呀好路行，

給咱們過的是好呀光景末囉，

哎哎哎，給咱們過的是好呀光景末囉。

(二)

咱這區，真是好，地上天堂。

享幸福，多福那，共呀共產黨，

家家戶戶喜洋洋，家家戶戶喜洋洋。

(三)

婦女們，要解放，要生產。

媽：胡二嫂！(這三句話，在曲子中只佔兩拍子)

媽：我婆姨！(的時間)

二：我婆姨！

(接唱)

你本是，女中的狀元，

一朵紅花掛呀前末囉，

哎哎哎，一朵紅花掛呀前末囉。

(四)

從今後，你(衆)就要，勤勞生產。

保衛咱，好光景，有吃又有穿，

快快的加油快快的加油幹末囉，

哎哎哎，快快的加油快快的加油幹末囉。

囉！

(五人在綠叢中跳下) (剪剪花調)

一九四三年正月。

本劇經送中央戲劇電影審查所審查，已得有審總字第一四八八號准予刊載通知

五 頁

<u>2 2 5 5</u>	<u>2 2 5 5</u>	<u>2 2 1 7 6</u>	1 —	<u>2 2 5 5</u>
<u>2 2 5 5</u>	<u>6 6 5 2 5</u>	1 —)	
<u>5 2 1</u> 5	<u>2 5 5 5</u>	<u>4 2 2 1</u>	5 —	(<u>0 5 4 5</u>
<u>6 5 4 5</u> 2)	<u>2 5 5</u>	<u>4 2 4 5</u>	<u>4 2 1 7</u>	<u>2 5 5</u>
<u>4 2 1</u>	7 —	5 . <u>6 5</u>	4 . <u>2</u>	<u>1 1 6</u>
8 —	<u>1 1 6</u>	<u>5 5 4 2</u>	5 —	<u>7 1 5 1</u>
<u>2 5 .</u>	<u>2 5 .</u>	<u>4 2 1 5</u>	<u>4 2 1 2</u>	5 —
2 . <u>1</u>	<u>7 1 6</u>	(<u>7 1 2 2 2 1</u>	<u>5 1 7 5</u>	<u>5 2 5 5</u>
<u>2 5 7</u>)				

樂 符

<u>1 5 0 5</u>	<u>2 5 1</u>	<u>1 5 0 5</u>	<u>2 5 1 0</u>	<u>5 . 5 5</u>
<u>5 . 5 5</u>	<u>5 5 6</u>	1 —	<u>6 . 6 5</u>	<u>6 . 6 6</u>

6 6 3 | 2 — ||

剛 剛

(4 4 2 1 | 7 7 7 1 | 5 1 2 1 | 5 1 5) | 5 2 5 |
2 5 5 | 1̇ 1̇ 4 | 5 6 5 | (1̇ 1̇ 6 5 | 4 4 4 2 |
5 6 5 1 | 2 5 2) | 5 2 5 | 2 5 5 | 5 5 6 |
4 2 1 | (4 4 2 1 | 7 7 7 1 | 5 1 2 1 | 5 1 5) |
(落板) 5 2 5 | 2 5 5 | 2 1 7 2 | 1 — ||

滿 堂 紅

3 2 3 | 6 5 6 | 3 2 1 7 | 6 2 2 5 | 6 7 6 |
5 6 5 3 | 2 1 2 | 5 5 3 2 | 3 5 1 | 3 5 1 |
6 5 6 1 | 3 2 1 7 | 6 2 2 5 | 6 7 6 | 5 6 5 5 3 |
2 1 2 | 2 5 3 2 | 3 5 1 | 6 5 6 1 | 6 5 6 |

月 圓

$\dot{1} \dot{1} \underline{6} \underline{5} \mid \underline{3} \underline{2} \underline{3} \mid \left(\dot{1} \dot{1} \underline{6} \underline{5} \mid \underline{3} \underline{2} \underline{3} \right) \mid \underline{5} \underline{5} \underline{3} \mid$
 $\underline{2} \cdot \underline{5} \mid \underline{2} \underline{1} \underline{1} \underline{6} \mid \underline{5} \text{—} \mid \underline{5} \cdot \underline{1} \underline{6} \underline{5} \mid \dot{1} \underline{3} \underline{0} \mid$
 $\left(\underline{5} \cdot \underline{1} \underline{5} \underline{5} \mid \dot{1} \underline{3} \underline{0} \right) \mid \underline{5} \underline{5} \underline{3} \mid \underline{2} \cdot \underline{5} \mid \underline{2} \underline{1} \underline{1} \underline{6} \mid$
 $\underline{5} \text{—} \mid \left(\underline{5} \underline{5} \underline{3} \mid \underline{2} \cdot \underline{5} \mid \underline{2} \underline{1} \underline{6} \mid \underline{5} \text{—} \right) \mid$

剪 剪 花

$\dot{1} \underline{6} \underline{3} \mid \underline{5} \text{—} \mid \dot{1} \underline{6} \underline{5} \mid \underline{5} \underline{1} \mid \underline{1} \cdot \underline{6} \mid$
 $\dot{1} \cdot \underline{3} \underline{5} \mid \underline{5} \cdot \underline{1} \mid \underline{2} \text{—} \mid \dot{1} \underline{2} \dot{1} \mid \underline{3} \underline{4} \underline{5} \mid$
 $\underline{5} \underline{4} \underline{5} \dot{1} \mid \underline{5} \underline{4} \underline{2} \underline{1} \mid \underline{221} \underline{7} \underline{1} \mid \underline{2} \underline{5} \underline{2} \mid \underline{1} \underline{6} \underline{5} \underline{1} \mid$
 $\underline{5} \text{—} \mid \left(\underline{1} \underline{2} \underline{0} \dot{1} \mid \underline{5} \underline{4} \underline{2} \underline{1} \mid \underline{221} \underline{7} \underline{1} \mid \underline{2} \underline{5} \underline{2} \mid \right)$
 $\underline{1} \underline{6} \underline{5} \underline{1} \mid \underline{5} \text{—} \parallel$

悼A·托爾斯泰

蕭 三

標誌了現代最卓越的俄羅斯作家A·N·托爾斯泰逝世的噩耗，心中感傷無以復加。蘇聯以及全世界又損失了一位文化大師，又損失了一位對野蠻性所帶的有力的戰士！

A·托爾斯泰是偉大的文豪。——他寫作的規模異常廣大，創作異常豐富而深刻。他是那樣深，那樣博與深，對於他，似乎沒有文學底層一部門是不可缺的。什麼題材，什麼形式（小說、論文、劇本、電影劇本、童話……）他都能寫，而且都寫得很好。很少的作家能像他這樣涉及各種各樣的題材。他給讀者開闢了一個巨大的世界，顯示了許多時代的人物——從十七世紀初俄國人民戰爭的「混亂時代」及彼得大帝的一直到對社會主義時代的今天，他描寫了非常豐富的人的形象，而且永遠是活生生的、動人的、永遠使人驚、怒、哀、樂的形象。

高爾基在其「論文學」雜誌及蘇聯歷史小說的成績時，將A·托爾斯泰列為「彼得第一」放在第一位。

蘇聯作家協會信給A·托爾斯泰說：「我讀你的創作的或力無窮盡的豐富……使我特別驚奇的是你的藝術、牢固的和真實的，善於在圍繞着的環境中，選擇人物。你的人物成爲空氣、土地、日光，自己時代圈子之不可分割的部份。你善於大筆一揮，表示這圈子細微的陰影、意味。」

蘇聯作家A·包期托夫斯基在A·托氏被選爲科學院會員時（一九三九年一月）寫道：「許多的書，甚至最好的書對於我們只是文學的現象罷了。但是個別的，稀少的書，——他們活在人們的意識裡，如同我們生活中的事。他們和我們的存在分不開，他們成爲我們自身的一部份——我們日常思想，喜與悲的一部份……A·托爾斯泰的書就是這樣的。對這些書的第一個印象——和強大的及難得的天才相接觸——是不可磨滅的。一經發現，它就成爲我們意識裡佔着牢固的地位。A·托爾斯泰不僅是我們新的社會主義時代最偉大的名匠，而且是從舊式度、果戈里、契可夫、高爾基以來高尚傳統的繼承人……」

「托爾斯泰具有銳利的眼光、聰慧的頭腦，他誠而述人的語言，爲我們對於人們的知識」——包氏又說。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托氏的文字，極爲有光輝的、民衆的、簡潔的、有力的和古於表現性的文字。大概在我們國家的作家裡，他是具有俄國語文之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他應用這種美妙的語言時非常輕鬆、容易、非常自然。他生平時時處處，在民衆間；在一切豐富的策源地研究這種語言。因此托氏很愛民間創作、民間成語、歌謠……他會主編一部很厚的蘇聯各民族民間成語的書，這個工作，除文學價值之外，還有科學的意義」。

但是，我們應該知道，托氏的寫作道路是非常複雜而豐富，艱難而艱苦的。他曾未立即懂得與接受十月革命，他自己說：「我後來慢慢地成熟了，慢慢地加入了現代生活，但是，一經加入，我就用一切感覺接受了它」。是的，當他走向革命，接受了它時，他就用其全部心力爲革命服務。關於他，最鮮明的是，當全蘇聯第八次蘇維埃非常大會時（一九三六），莫洛托夫在報告中說：「……還有一個蘇維埃民主主義的例子。在我之前，大家知曉的作家A·N·托爾斯泰舉了。誰不知道，這是從前的一位伯爵，可是現在呢？蘇維埃土地上是優秀和最著名的作家之一——A·N·托爾斯泰同志。（鼓掌）。這裡面是歷史有罪過。但轉變是往好的方面來了。這是我們和A·N·托爾斯泰自己都同意的」。

是的，蘇聯民主主義改造力最鮮明的例子，A·托爾斯泰成爲了蘇聯最卓越的作家之一，最有力的蘇聯文化的建設者之一。他是蘇聯文化與文學的光榮，整個蘇聯的光榮，也是全人類進步文化的光榮。

A·托爾斯泰是積極的社會活動家——政治家，熱烈的蘇維埃愛國者，反法西斯的戰士。——還在馬德里開的全世界反法西斯作家大會上，托爾斯泰就乘其政治家的安聲，號召一切前進的和進步的人們，保障文化，反對法西斯的野蠻。「我們向所有的人，凡是心愛他的安聲地聯在播種的孩子們，凡是愛護他的灰白頭髮的母親的，凡是尊重生命、自由、美的，我們……」

們說話。和法西斯主義是木能商量之餘地的！不能再動搖了，不能再遲疑了！……法西斯主義應該在西班牙被鎮壓下去。共和軍的西班牙應該得救；法西斯主義在西班牙的失敗，將是整個反法西斯陣線的高漲和世界法西斯主義毀滅的開始」。

一九三七年，當托爾斯泰夫人民選舉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時，托氏在對其選民的演說中說：

「……地主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使得在上一大戰爭中，死去了一千五百萬人……現在法西斯的德國、日本、和意大利用盡一切力量製造新的世界大戰。我對過西歐，親眼看見了的。原因是，這三個單獨是最侵略的國家……我說，叫俄羅斯人民生活得窮困、饑餓、愚昧？法西斯要我們這樣。」

「二十年前德國比沙皇地主的俄國強些，文化些。今天蘇聯埃俄國不比比德國，而且比日本及意大利一起都更強些，更有力量些。你們問：「也更文化些麼？」是的，也更文化些，雖然我們還要作到許多事，還要養成許多的文化的習慣，和培養我們的那些仇敵份子進行無情的鬥爭。我們更文化些，因為人民的文化，在於人民在其歷史道路上提出什麼樣的任務和目的。我肯定說：我們的鄉村小學教員，在深夜埋頭讀書，從那裡吸取蘇聯埃人道主義思想，他比那們在大學裡講學，講德國人種長長的頭蓋骨優於一切別的頭蓋骨的德國大學教授，不知要文化多少倍。」

「我們集體的農婦，她答應那大林同志提高產量七倍和不脫離生產地學習，教那個德國教授的老婆文化得無比地多，那個老婆的一生的任務就在於生孩子，而且，不要多於兩個，作飯，拭去桌椅檯台上的灰塵，而在閒暇的時候和同樣的市儈婦人們聊聊天，吵吵嘴。」

「我們建設着高度的文化和保衛全世界的和平，而法西斯則毀滅文化和燃起戰爭。」

「我們蘇聯埃文化的支柱，我們有保證將勝利地前進，朝着指出社會主義的道路，走向它的完成點——共產主義。它的支柱是保證我黨領袖，最高蘇維埃第一個代表、斯大林同志的領導，我們的新大林憲法和我們的不可摧毀的保衛者——工農紅軍……」

在又一篇演說辭中，托爾斯泰夫述俄羅斯過去的貧弱，受外資剝削及革命受外國武裝干涉：「現在卻不同了。他說：

「俄國地主和資本家，佔有全俄國工廠、礦山、森林的外國人，誰不肯知道，不曾了解俄羅斯的民族。他們覺得，假如俄國人民貧窮和不識字，那

麼，容易當作出力的牲畜來支配他。他們想，俄羅斯人民沒有那種過幸福、富裕生活，不要沙皇、地主、資本家和外國人的幻想。他們希望，俄國人民不會有足夠的常識聰明和革命的激憤。在十月革命中，俄國人民斷給他們了，所有這些都是足夠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領袖：共產黨。有偉大思想家——職工黨列寧與斯大林為首的黨，引導了人民獲得了從來誰也沒有見過過社會的和經濟的建設——社會主義。」

「同志們！你們知道——什麼是社會主義。這就是——二十年以來把半殖民地的俄國，有百分之六十五的貧民，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文盲的俄國，變成全民識字的，豐收是實的，世界上最強大的強國……」

我們，新民主主義的建設者，聽了托爾斯泰夫這些熱情愛國的言辭，想到我們中國的現狀，當感到莫大的興奮！他還有更使人興奮的話：

「列寧與斯大林底戰略所領導的俄羅斯人民在一九一八——一九二二年在空前的饑餓與疾疫的嚴重困難條件之下，在無糧缺境和燃料缺乏的狀態中，在戰場上得到了決定的勝利，把白黨將軍和外國干涉者：德國人、波蘭人、日本人趕出國境。和他們一道，趕掉了一切地主、資本家和外國人。俄羅斯人民不是第一次為自己的祖國而浴血（鬥爭）過的。……」

接着托爾斯泰夫述歷史上俄羅斯人民反抗鞑靼人、德國人、瑞典人和拿破崙的英軍鬥爭：「人民為自己保衛了祖國。而且「在「混亂時代」，當俄國的都市變成了灰燼，道路上一片白的是人民的骨頭，當俄羅斯的土地被莫斯科的貴族們賣給了波蘭人和瑞典人的時候，人民不願意作奴隸，自己武裝起來，趕走了外國人。」

是的，我們中國的人民也正在這樣作，不管（侵略）中國人民是不願作奴隸的，人民要自己武裝起來，趕走日本人。現在一萬萬中國人民已經有了自己的武裝約八十萬人（八路軍新四軍）再加二百多萬人（民兵）了，解放區逐漸擴大了。沒有別的，「人民為自己保衛祖國。」

蘇聯的人民這一次又在這樣作，為保衛自己的祖國，趕走外國人。進而幫助其他被奴役的民族得到解放，蘇聯人民的力量到今天越發加強了。當德國法西斯匪徒背棄蘇聯同盟進攻之時，全蘇聯人民像一個人似的站起來了。作家們都在自己的崗位上作戰。六十多歲的A. 托爾斯泰夫立即投身而前，用他絕妙的，熱烈的，懇切有力的文字，號召人民保衛國家。同時辛辣地詆毀法西斯匪徒。在刊物上，廣播裡，舉國大會上，人們聽到他的聲音更加激憤，鼓舞。他寫了無數的論文，通訊報告和小說。這些文字起了重大

作用。在關於「祖國」的一篇文章裏，托爾斯泰寫道：

「這幾個月以來，在嚴重的決定的鬥爭中，我們都更深刻地認識了和我們
的血緣，更痛苦地愛你，祖國。……我們的國家祖國，佔有了充滿了我們
一切的感覺。所有我們周圍的事物，我們從前也許沒有注意到，不重視它，
比方從蒸了雪的農舍裡冒出來有香氣的裸麥麵包的烟，——現在對我們是可
歸地貴重。人們的臉，變得如此嚴肅，所有人的眼睛，因為具有一個思想，
彼此都互相像的眼睛，以及俄國語言的說話——這都是我們的，親切的，我
們……是我們祖國的保管者和守護者」……

「我們肩負着我們祖國在歷史面前的重大的責任。在我們的後面——偉
大的俄羅斯文化，前面——我們的無限的財富與可能，這是法西斯德國想永
遠佔有的。但是這些財富與可能，——無邊無際的土地和森林，無窮盡的地
下珍寶，遼闊的河、海、洋，巨大的作坊和工廠，那些成堆的精密的器物，
那熱氣在山坡上紅太陽下面的無盡的歡笑，我們獲得了的生活的豐足，我們
向幸福的前途，——所有這些——是我們永遠不應離去的，這都是我們強有
力的愛自由、愛真理、聰明的和不缺少天才的人民底遺產。難道可以其重租
到，我們不能勝利！我們比渾身長鬚子的德國人強了沒他的蛋吧！他們有幾
百萬，我們有兩個幾百萬！他們現在佔優勢的是武裝，特別是坦克（按托氏
此文是剛開戰寫的）。但放槍的是人，紅軍要剷滅那個射擊的人。我們的
軍隊一天天更有經驗，更有信心，更加訓練地作自己的事——剷滅德國侵略
者……我們的祖國……什麼也不能搖撼它。父輩祖輩留下來的這塊大地吞噬
過不少跳來侵略它的屠屠。……它同樣要吞噬這羣德國流氓的……」

開戰的第二個年頭——元旦日，托爾斯泰寫道：

「……紅軍——人民底兒子底憤怒的驕傲和英雄主義。我們的兒孫們將
昂起頭來在地球上走。他們將說：『我們的父輩在血的困難和痛苦中，還不
屈不撓的精神，更無前例的犧牲性，為自己和我們取得了權利，作為第一等
的人』……戰爭開打了俄羅斯的靈魂。向着它，在它寬宏大度的保障之
下，烏克蘭人和喬治亞人，烏茲別克人和阿什格羅人，白俄羅斯人和阿爾美
尼亞，卡薩赫人和塔吉克人……這些兄弟們都緊握着槍加入進來了。蘇聯
人民在前線，在後方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軍隊。……」

下面托爾斯泰敘述他自己參加一個從莫斯科搬走而在兩個多月之內在新
地方建立起來的一個巨大的飛機工廠的開工典禮和文學晚會，敘述民間航空
事業如何幫助訓練，如何出入敵佔區，如何救護受傷的官兵，敘述一個女飛

行師如何「從敵後飛出，帶着游擊隊的重要文件。飛機被擊落地。她只得步
行。路上遇見另一個被擊落的飛行師，她對他說：『同志，你等着』，到了
河邊，她把文件繫在頭上，自己穿一條短單褲子，游過冰河，『我到了我們
的隊伍，交了文件，她要求一套工衣褲和一架飛機，再飛過前線將那受傷
的飛行師扶上飛機，載到醫院去了。從現在我們面前的一堆廢報裡，我可以
引一百個我們民間航空員底勇敢，堅決，靈活和自我犧牲精神的例子……」

在一九四二年出版的「偉大的祖國的戰爭」一書中，選收集了A.
托爾斯泰幾篇論文和報告：『人民的血』、『第一課』、『勇敢的人們』、
『我們是不能被征服的』等，讀了都令人興奮，感覺得在戰鬥。這些文章選
都只是在開戰以後不久寫的。也都是針對當時戰爭形勢和國內外事變的。每
篇都非常生動，有力。托爾斯泰對國內外政治形勢和戰爭階段分析、總結得
這樣好，便使我驚奇。此後托爾斯泰還寫了不少的文章，但因交通阻隔，
書報郵件都收不到，我們未能讀到，至為可惜。我們願在這裡再引「祖國」
裡的一段話：

「俄羅斯人民創造了巨大的口傳的文學：聰明的成語，和狡猾的謎，甚
伴隨着法咒的治療藥方，快樂的和悲愁的各種儀式的歌謠，莊嚴豪華的物
，——絲絨伴奏的搖籃的歌，——歌謠靈便之靈，土地與人民之保衛者的重
功偉績的英勇的，飽滿的，日常生活的和嘲笑的歌……沒有一個歐洲民
族具有這樣豐富的藝術的寶藏。……人民的創造力從其奴制度那兩個
污濁下乘乘地浮到表面上來了，於是到了普式庚這顆明星打開俄國文學
與藝術輝煌的世紀……俄國人民全部底創造的、熱情的、強烈的靈魂，
在十九世紀我們的藝術裏得到了反映。它成了全世界的，並且很多地引導了
歐洲的藝術發展前途。俄國的科學給了世界以偉大的化學家，物理學家和數
學家。第一個蒸汽機是在俄國發明了，電池，無線電報及許多別的發明是
是……難道可以想像到我們不會勝利！……我們的祖國……」

A. 托爾斯泰在其祖國遭受侵略之日，提及自己人只過去與現在的歷史
的貢獻，大大地提高了蘇聯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的驕傲，與自尊心。托
爾斯泰自己就是這一偉大人們的優秀的兒子，就是這一偉大藝術的卓越繼承
者與發揚者。讀了他的這些話，想到我中國人民五千年來光榮的歷史與今
日英勇戰鬥的現實，我們能不興奮嗎？就讓我們把托氏這說話，作為這篇會
報及紀念他的短文的結束吧。

第一次筆談

知識青年怎樣推進民主運動(二)

面向羣衆，面對困難

李全望

這個問題，我們不該再當作個理論問題來看，也不該再作個空泛的概念出發，而應該從對實際的探究和瞭解中，青年們自己來一個徹底的反省。我們不該否認：在青年們中間，我們中的多數除了悲憤嗚呼外，很少有腳踏實地的來談！

在陰沉的低氣壓下，比較有韌性的，向上與青年朋友們，大半以友誼為基礎而形成了許多小小的圈子。在這羣狹窄的圈子內，雖是苦悶、有笑、有希望、有崇高的理想；然而，他們很少實行一致，很少與現實鬥爭聯繫起來。不特如此，而且相互間也不談坦坦與勇氣，自然也就談不到開誠布公的討論一些事情，或如何應付一些事情。因此，在許多事情上，是各憑自己的機智與才能；有何困難，大都「諱莫如深」。他如對現實黑暗面，對某些反動的思想，對需要出現的一些陰謀活動，也只是相互通報一聲，至多藉詞地聚在一起談，很少去積極的揭發或攻擊！如有，也只是各別的。

所謂「諱莫如深」，更不該在困難面前自己先消沉起來！所謂「諱莫如深」，更不該在困難面前自己先消沉起來！所謂「諱莫如深」，更不該在困難面前自己先消沉起來！

上述諸現象所以存在？可以簡單的總結一句：傳統的客觀教育訓練了青年們。從好的一面說是慎重；從壞的一面說，便是退避。長此下去，很可能變成實際的逃避現實者。

所謂「諱莫如深」，更不該在困難面前自己先消沉起來！所謂「諱莫如深」，更不該在困難面前自己先消沉起來！所謂「諱莫如深」，更不該在困難面前自己先消沉起來！

在此，我們不能不仔細研究一下，在我們中間確實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惶惑與不安，我們不是還不能達到「以君子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們犯了

所謂「諱莫如深」，更不該在困難面前自己先消沉起來！所謂「諱莫如深」，更不該在困難面前自己先消沉起來！所謂「諱莫如深」，更不該在困難面前自己先消沉起來！

把一切估計過低的老毛病，也就是不折不扣的「英雄主義」。自然，這是有個前提的，就是我們相互間確實有了高度的了解。而以上所說，也有個基本原則的，就是我們所爭取和推進的是民主。除此，還在標榜什麼，便是不願離開現實了！

所謂「諱莫如深」，更不該在困難面前自己先消沉起來！所謂「諱莫如深」，更不該在困難面前自己先消沉起來！所謂「諱莫如深」，更不該在困難面前自己先消沉起來！

當然我們也決不能一味地苛責自己。可是，假如我們相信自已，相信這時代是「人民的世紀」的話，我們只能苛責自己！我常常這樣想：空談熱情在今天不特無用，甚且有弊！時代需要我們的是沉默而勇毅的實幹，那怕是一點一滴。

所謂實幹，不外下述方式：(一)爭取可能爭取的朋友；(二)宣傳可能宣傳的對象；(三)教育可能教育的同胞，至於如何具體的去作，自由各個人的特殊條件而定；但有我個人看來，覺得特別重要：第一、民主問題在今天「合法」的，上一個主體的，我們儘可從大處我論據，舉實例，光明磊落。第二、說法要具體，莫要亂弄名詞；各先進國家民主生活情況，應盡量介紹。第三、盡量利用自己的長處作為推進的武器。

誠然，「廣大的工農要求民主的願望還有待具體的知識青年去發覺和組織」。對此，我有一個意見！我覺得我們應該通過自己的關係和才幹，老老實實的去作。譬如如下宣傳，或是聯絡朋友好辦個通俗簡報。如果我們有決心，肯思考，其他的方式，還是多的。

所謂「諱莫如深」，更不該在困難面前自己先消沉起來！所謂「諱莫如深」，更不該在困難面前自己先消沉起來！所謂「諱莫如深」，更不該在困難面前自己先消沉起來！

所謂「諱莫如深」，更不該在困難面前自己先消沉起來！所謂「諱莫如深」，更不該在困難面前自己先消沉起來！所謂「諱莫如深」，更不該在困難面前自己先消沉起來！

所謂「諱莫如深」，更不該在困難面前自己先消沉起來！所謂「諱莫如深」，更不該在困難面前自己先消沉起來！所謂「諱莫如深」，更不該在困難面前自己先消沉起來！

團一能切一切一團

浪川

民主運動不能只是停留在幾個團體的門前，而是應該匯集一切的力量，團結一切可能的團結力量。

怎樣加強我們的團結呢？

第一要有堅定明確的……努力方向。這是很顯而易見的問題。……我們努力的方向，……我們努力的方向，……我們努力的方向，……

首先要求我們全面的深刻……了……環境，今天的環境變化得……了……環境，今天的環境變化得……了……環境，今天的環境變化得……

冷靜的頭腦，冷靜的思考，冷靜的行動，……的變化，不僅看到近處，還要看遠處；不僅看到正面，還要看反面。……

民主不能坐待

希民

目前世界的潮流，是趨向民主；但是我們不能以為這是一種自然的趨勢，便可以坐待民主的來臨。無疑地，這種潮流是受到多少頭強的障礙和反動，假如我們不努力障礙之掃除，那我們便會很容易的墮入匯集污穢的泥濘當中，智識份子足時代的階級，尤其應該振興公憤，負起爭取民主的責任。

我對於智識份子怎樣推進民主運動，有下列幾點意見：

（一）智識份子應有的認識與覺悟，專責告訴我們：在不民主的國家裡，沒有研究學術的自由，即使你的專長經驗都很豐富，如果不同時具有遠迎的本領，或人事關係，就很難得到發展的機會，即使你已在工作，而且很有成績，也會容易被忽視，受阻礙，甚至遭到破壞，使你辛辛的成績，化為烏有，那麼，智識青年理想在學校裡求得真實而豐富的學識嗎？智識份子以為只要有了本領，就可以施展出來嗎？智識份子以為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把國家社會建設得很好嗎？我們絕對不能袖手旁觀，或埋頭工作，以為政治民主不民主，與我們所做的工作沒有關係，這樣便會使我們真正熱心工作的人們遭到無窮的阻礙；我們一方面認識當前的政治，需要民主，同時，更覺悟到民主不只是一種好聽的口號，說說談談而已，要認真不斷的去爭取，并且從切

（二）智識份子應該團結一致，一切尋求民主的智識份子不分職業，特別團結在一個目標之下，不拘方式，不拘時間，不拘地域，不拘工作，為爭取民主而努力，而團結，不要為反民主勢力所各個擊破，在這裡我們應先尋求有言論、出版與集會的自由，而主持輿論的，尤應盡宣傳的責任。

（三）智識份子應該與羣眾結合。中華民國成立到今天，已經有三十四年，為什麼還在國民不民主的黑暗，這事實說明：革命要和羣眾發生關係，智識份子應不拘形式，不斷地和羣眾結成一體，隨時啓發他們的民主思想，羣眾的力量發揮時是偉大的，民主洪流激漲的時候，便可以衝破民主運動的障礙，洗盡一切污穢。

星仿先生的討論意見：「甚麼力量阻止着民主運動的推進」。登不出來

觀事情的表面，尤其要深追事情的本質；一點都不能疏忽，一點都不能懈怠；這樣，才能在艱危複雜的環境中，不至迷失正確的方向，不為危險所嚇倒。才能沉着鎮靜，履險如夷，有向同以習慣於艱難的工作：喊口號、動標語、唱歌、演劇、開會、遊行、為極熱烈地幹一場。環境變化了，好像熟視無睹，還是過去的一套，不知改變方式，只憑一股熱情，不顧客觀環境，瞎子摸魚，橫衝直撞，結果一經打擊，不是得個破血流，便是紛紛作鳥獸散，斷不想打聽是團結不夠的表現。這些寶貴的教訓難道還不肯接受嗎！

其次要求我們善於把握住兩條路線的鬥爭。我們了環境是為了適應環境，改造環境，我們必須根據實際的情況，規定具體的工作計劃與方法。這時候，總算於把握住兩條路線的鬥爭，必須與過左過右的傾向作頑強的鬥爭。過猶不及，過左過右的傾向形式上看來不同，實際上是一樣害人壞事，都是要不得的。比如：我今天需要與苦幹的作風，埋頭苦幹不分開的。如果只看見環境的困難，不看見克服困難的條件，只求埋頭而不苦幹，環境的影響擴大，自己把自己孤立起來，脫離了羣衆，連頭也不能埋下來。這是明哲保身的過右的傾向。如果只看見環境順利的這一面，不看見環境艱危的那一面，放心自然而不埋頭，在小天地裡為所欲為，一旦遭受惡劣的打擊，工作損失必大，連幹一下子都不成了。這是自動離群的過左的傾向。這兩種傾向嚴重的結果是相同的。我們要把事情弄好，一定要埋頭而又苦幹。只有埋頭的苦幹才能長期持久而有收穫，也只有為苦幹而埋頭才不是苟安苟且。

也決不是那些清談家與牛皮家所能做到的。我們必須充分地估計困難的艱苦性與持久性，必須以最大的毅力與耐心按照預定的計劃去做去，一心一德，貫徹始終，我們必須堅強地相信：無論環境怎樣艱苦，我們還是可以而且應該團結起來的，漢奸走狗雖然猖狂，畢竟佔少數，分裂危險雖然嚴重，畢竟只是短時間的現象。大多數的人還是具有正義的，依正義大的正義力量一定可以克服困難，把分裂的現象壓倒下去。有的同學在環境艱難的時候，以為團結不成問題；可以一和環境艱苦的時候，便以為無從團結了。這顯然是錯誤的見解，必須糾正的。

第二要靈活地運用多種多樣的方法。用多種多樣的方法。我們團結的對象是相當複雜的，各人的政治認識，文化水準，家庭環境，社會關係都有着許多的差別，各人對抗建國的所能貢獻的程度也不齊。我們要把各種不同的人組織到一支隊伍上來，為共同的目的而奮鬥，必須因時因地因人不同，運用多種多樣的方法，才能加強團結。

這里，首先要用多種多樣的方法接近同學，了解同學。我們應該儘可能地利用親戚、朋友、同鄉、老同學的關係和同學接近，互通情愫，暢談衷曲，感情自然增進了。從這些談話里，我們漸漸地會發覺同學的靈魂的深處，對同學會有更深刻的了解，平日寂寞的同學也許潛藏着強烈的正義，喜歡說深奧話的同學也許懷抱着自私的企圖。我們必須幫助同學發揚優點，克服缺點。發揮同學對抗建國的熱情，掃除消極悲觀的陰影，啓示抗戰建國前途的光明，加強同學對團結勝利信心，克服麻木不仁的現象。這是一件非常艱苦的事情，需要我們不怕麻煩地委曲折地去完成，一點都不能住意地，平日爲了個人的私事去委曲求全，或爲自己所不

顧意的，現在爲了中華民族的前途，我們可以犧牲一切，受一點委曲算得什麼呢！

其次要求用多種多樣的方法教育同學，幫助同學。我們必須善於從日常生活中教育同學，幫助同學。同學在日常生活中心所遇到的困難問題是切身問題，最現實的，我們應學會幫助同學解決這些困難問題。同學對家庭包辦婚姻不滿，我們要給予同情，不應嘲笑。同學無錢繳費，我們要盡可能地幫助，不應漠不關心。同學病了，我們要盡可能地照顧，不應視同路人。甚至同學不勤於東西，我們幫助他拿，都是應該的。我們不應看輕這些事情，也許是很細微的事情，我們不過一舉手之勞，却使人深深感動，永遠不會忘記。我們必須善於把最高的理想與日常的生活連結起來，幫助同學了解生活的偉大的意義，才不會苦悶彷徨。我們應把同學的痛苦當作自己的痛苦，把同學的問題當作自己的問題。我們要具體地幫助同學工作，預先指出工作上可能發生的困難，提供克服困難的方法，幫助同學總結經驗教訓。我們要幫助同學提高文化水準，用批評的態度吸收課內的好的東西。介紹同學閱讀書籍，要適合同學的興趣、要求、程度與環境，要多種多樣，反對公式主義。還要幫助同學消化書籍上的東西，不可貪多，我們應利用各種各樣的機會，與同學進行各種各樣的談話。我們必須學會談話的藝術，由淺入深，由近及遠，由其體到抽象。不要一見就滿口術語，使人聽不懂；不要千篇一律，使人覺得無味；不要裝腔作勢，嚇唬他人；不要油腔滑調，令人討厭；不要一見傾心，什麼話都談，不要板起面孔，什麼都不談。我們應用和藹的態度，真摯的口吻，熱活的談話。對那種入談話的態度，談話方音歡聲響亮的話，談有助於團結的話。這樣，我們成爲同學的兄弟，知己與親切的老師，使他不

能請同學嗎？

還有，要求多種多樣的方法組織同學，團結同學，從學生自治會，班會到小組會，從三民主義研究會、文藝研究會、社會科學研究會到自然科學研究會，從校友會到各種球類隊，從請到到合作社，按照各種環境的允許與廣大同學的要求，我們應該盡可能地把廣大同學組織起來。這裏要改正只具招牌不具工作的現象。我們要求實際組織的內容，多採用活動來團結同學，在實際活動中，同學才會發現自己與團體的密切關係。這裏要克服同學中那種等待工作的傾向。不要看輕團體與合作性質的工作。說老實話，也許讀一本書，唱一支歌，試一操劇，說一說話，寫一篇文章，對於我們是不算很熱的事吧？如果我們把這事弄得像很清淨，計算不會錯誤，油鹽柴米買進來價廉物美，管理到到，不會失職，也不會腐爛，使同學花錢很少，吃得飽飽，個個紅紅通通，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是基本上沒有的學問，我們必須從實際的工作中去體驗去學習。尤其是在今天，環境困難了，物價高漲了，一般同學都因營養不足而面黃肌瘦，改善同學生活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我們為什麼不更實際地去研究更切實地去改善呢？這件工作做得好，對民族有利，同學也有一個不感滿的。

要有正大光明的民主作風。

光緒的民……我們站在抗戰建國的立場，為國家盡忠，替民族盡孝，是光明正大的，用不着什麼鬼話陰謀。我們不怕改正自己的錯誤，永遠站在真理這一面，是力求進步的，一點用不着諛媚。同時，今天的事務決不是少數人所能解決得了的，我們必須養成民主作風，善於和各種不同的人合作，才辦成就事業。一切偏狹陰險的做法，除了教養朋友送自己以外，是別無好處的。

……要慎重的處理……當的對付壞人。我們生活在新舊交替的社會里，不可避免的要遭

這里，首先要求集體領導，集體工作；反對個人武斷，一手遮天。我們為大家的利益而工作，自然可以請大家來參加。一方面請大家發表意見，引起大家關心工作，集思廣益，這不好嗎？另一方面請大家積極參加工作，讓大家在實際的活動中體會到工作的艱苦和自己的責任。這里用不着就心一般同學才做不飽，也用不着就心力量分散。

實際工作的教育力量很大。每個同學切實地切實地工作，不但容易學會工作，而且會非常熱心地把工作做得更好。我們不是自私自利，根本不用獨裁，也不用包辦。我們不但要關心教育同學，還要虛心地向同學學習。我們必須依靠進步的同學，把落後的同學提高到應有的水準。我們必須同心同德，合力前進，拋開大家，有幾個人能像樣便可成就不世之業的時代已過去了。

其次要求光明磊落，大公無私；反對鬼鬼祟祟，偵察告密。有句老話：「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這是對的。今天除了對法西斯及其走狗，我們都應相見以誠，相互幫助。只有這種態度，才能策羣力，完成大業。如果專用時務方法來統治同學，監視同學；那學校就會弄得烏煙瘴氣，不可收拾。前任廣西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程恩遠先生說得很好：「從事青年運動的人最可怕的特務的眼光去觀察人家，經過這特務眼光的透視，許多人就成了『不可靠』、『危險』、『偏激』、『可怕』的分子。於是就帶來某某派某某派的帽子給人家，結果造成青年團與分裂，致使國家民族遭受不必要的損失。」

其次要求自我批評，互相策勵；反對背後攻擊，說風涼話。民主作風並不是無政府狀態，讓大家東說一句閒話，西說一句閒話，也不是分散力量，讓大家東講一槍，西要一刀。民主作風是加強領導

，使中……要慎重的處理……當的對付壞人。我們生活在新舊交替的社會里，不可避免的要遭

還有，要求深入同學，實事求是；反對官僚架子，形式主義。團結同學是改變同學意識的事，決不能空談所能成功，也不是下命令所能做到的。我們必需實事求是，以身作則，為人模範，從日常的生活學習和工作影響同學。我們必須學會關心同學，幫助同學，只有這樣地長期幹去，才能團結廣大的同學。團結是老老實實的功夫，絕不是一點兒假的。吹不得大炮，拍不得馬屁。專講風涼的官僚架子，一定失敗；專講拍馬的市儈作風，也不會成功。威脅利誘都是要不得的。有的團體雖然許多人在一起，不過是一堆堆積。形式雖大，實際上沒有什麼力量。我們的團體不是要變成拉幫結派，而是要像士敏土一樣的緊強、嚴密，只有這樣的團體，才能打倒敵人，發揮無比的力量。

……要慎重的處理……當的對付壞人。我們生活在新舊交替的社會里，不可避免的要遭

……要慎重的處理……當的對付壞人。我們生活在新舊交替的社會里，不可避免的要遭

過境事，破壞壞人。我們在現境事或壞人進行必要的鬥爭的時候，必須特別機警、慎重；必須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與實際環境，必須有確定的原則，必須有步驟和方法，決不能急躁，任性；必須注意這種種鬥爭要達到對壞人有益處，對抗戰有幫助，決不能鬧私人氣，當作兒戲；決不能把野人當作壞人看，把朋友當作敵人打。

首先，我們必須具體地分析了壞人的組織及環境的方式，必須深刻地分析壞事的根源及影響。壞人常常裝做滿腔的熱誠出現，讓常常也有一套冠冕堂皇的理論來掩飾其實質。我們一定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其次，我們不要把壞人作一律看待，要爭取大部分的好人，打擊最壞的不可救藥的壞人。漢奸是壞人，賄徒也是壞人，但對前者要打擊，對後者要爭取。和壞人或錯誤的理論鬥爭時，要把握住對事不對人的原則。

再次，一般的要孤立壞人，阻止壞人的影響，要大家明白壞人的醜態面孔，清楚壞事的錯誤實質怎樣有礙於團結，不是倚靠某種權威，而是依靠輿論的制裁與羈束的力量。

還有，打擊最壞的壞人與揭穿最壞的事情時，要抓住適當時機，要徹到仁至義盡。如果對時機沒有成熟，大家還沒有了解，不願當時對地的實際情況，忍耐不住，就魯莽地行動起來。結果壞人沒有打倒，壞事沒有克服，反有害於團結，損失了自己。這是不幸萬萬要不得的，自然，放縱壞人壞事，好像沒有看見。對團結漠不關心，甚至還助紂為虐，為虎作倀，這是錯誤的。

第五要爭取多方面的幫助。加強同學團結是一件大事。不是壓起門來做得了的。我們必須善於爭取

多方面的幫助，爭取校當局可能的援助，老師的積極指教，工友的熱心幫助與社會的廣大同情，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

爭取學校可能的援助，是有許多對同學有利的事情，我們可以根據環境的許可與同學的需要，積極而又妥協地向學校建議，爭取學校改善同學的生活，不是很好的事情嗎？忽視了可能爭取的援助，一位採取對立態度。這種現象也是要不得的。自然，不是爲了把事情弄好，故意爲難，提高高的要求，使學校當局和同學無原則地對立起來，這是有弊無利的。

怎樣爭取老師指教呢？爭取老師指教不是叫同學盲從老師，不是說老師講黑就是白，同學也應跟着叫黑就是白的。但這種糊塗的老師畢竟是少數。儘有許多老師是認清現實，明辨是非的，對於民主的要求，他們也具有很強烈的欲望。也有很多教師的學識比我們的高超得多，經驗比我們豐富得多。只要我們虛心，努力，從老師那裏確是可以學到一些寶貴的東西。靠自己摸索，究竟要多走許多冤枉路。多耗費一些時間與精力呢！有的同學看過幾本書，有點小聰明，就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以爲老師都是做桶，老師講的都是廢話。這種態度顯然是不對的。

爭取老師指教也不叫同學捧老師的大腿。但是，今天的老師沒有去做教機生意，還能保持自己的崗位工作。這種志願是值得我們尊敬的。許多老師的處境是非常艱苦的。他們天天教育我們，和我們生活在一塊。也許他們的父母正在抱病呢？也許他們的妻子正在飢餓呢？也許他們的兒女正在失學呢？假如我們從老師那裏得到一些什麼，我們爲

什麼不能給老師一點安慰，鼓勵和可能的幫助呢？我們的青年熱情可以爭取老師更多的指教，我們的集體力量還可以改造老師的頭腦呢？可是有的同學即使對待好的老師，也吝惜一語笑容和溫情，非常刻薄自私。這種態度是不應該改變的。

怎樣爭取工友幫助呢？爭取工友幫助，自然不是用金錢來收買工友。但是我們必須尊重他們，不要小視他們。他們受了教育不是和我們一樣嗎？我們不要侮罵他們，要高興和他們做朋友。他們的生計經驗與技能比我們多呢！還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比如：要改善同學的膳食，就須向廚房里的工友學習，要買價廉物美東西，就須向負責採買的工友學習。我們不過比他多讀幾年書，有什麼可以驕傲的呢？有的同學講的寫的是同請勞動大家，解放勞動大眾，實際上常常數少數小如脾氣。設想工友，甚至虐待工友，這是不行的。這也不是要我們迎合工友的落後性，應該儘可能地教育他們，提高他們的政治認識與文化水準。使他們懂得生活的意義。才是正確的態度。

怎樣爭取社會同情呢？爭取社會同情自然不是要我們向社會屈服，但是我們要求社會必須適應社會。比如：女同學到男老師房裏談話，房門必須打開。談的話有改進社會的意義，打開房門便是適應社會。我們打破封建社會的男女界限，除了基本態度要嚴肅外，還要求地方檢點，這是完全必要的。我們團結是爲了改造社會，就須學會運用各種變通的折衷辦法，取得社會廣大的同情，才能達到目的。自然，我們努力的總方向是向前邁進的，有的同學幼稚浮燥，經常要鬧，引起社會反感，遭受不必要的損失，這是極力要避免的。

「附語」

很遺憾，「筆談」的第一次討論，原仍先生提出的意見，其要為限制新民主運動的推進？「就無法和讀者諸君見面。在這種「困難」的時代，人民所見的狀態，原已「很」平凡的事，但讀者諸君不也從這裡看到其壓力阻止着民主運動的推進嗎？

關於這次「筆談」的討論，全望先生的意見是中肯的，「不應再當作理論問題來看待，也不該再從各個空洞的概論出發，而應從對實際的探究和瞭解中，青年自己來一個澈底的反省」。忽略了這一點，往往容易把民主運動看做高遠而不切實際的東西，「筆談」也會變成一種概念的遊戲。在這次參加討論的來信裡，也有人把「民主運動」單純的看做一種巨大的「政治行動」，是遠離自己的生活實際的，有人說：我在唸書，我作一個公務員：對於今天的民主運動我能够做甚麼呢？這不能不說是在思想上對於「民主運動」存在着「一種形式的了解，民主運動並不是遠離實際的東西，也決不是遠離生活實際來「推進」的；以近取譬吧，你如果果在學校裡，能與周圍的同學，讓他們能真正認識，明辯是非，可能的為反法西斯戰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你是公務員吧，你儘可能多請教一點自己的同事，去關心他們，幫助他們，那怕是一點細小的關係大家的福利事業，甚至個人的困難問題，都應該用全心全力去關心、照顧他們推助、引導他；注意時事政治的問題，讓他們清楚抗日戰爭怎樣才能取得勝利，人民生活怎樣才能改善……這些，也許初看之下，對「民主運動」無關吧；但如果通過我們能使周圍的同學，

同事都能夠認識現實，這種醒覺不就是很大的力量嗎？如果我們把推進民主運動看與自己的生活實際無關，也就是忽視了各種細小而可能的改進，在這種想法下面，常常懈怠了我們自己對於環境的變革與創造的努力。有一些朋友認為這種討論和自已沒有甚麼密切的關聯，或者是覺得無從談起，都只是因为把問題抽象化、概念化的原因。

「民主不能坐待」（希民先生語），民主也不能希望誰的恩賜，今天要清掃各種反民主的力量，加速民主的到來，就必須發動人民的力量來爭取，來鬥爭；對於知識份子而言，首先就應該徹底的去除那種「獨善其身」，「苟安求活」的心理。浪川先生的意見極關於埋頭苦幹的說明很值得重視，如果我們說埋頭苦幹是着重要說明需要養成一種沉着、踏實的工作作風，今天，我們就必須糾正各種「埋頭不幹」的偏向；我「說要「埋頭」是為着要使我們的工作得到更大的效果，而不是脫身式的所謂「明哲保身」。戰鬥者尋覓增進的掩護，決不能和怯懦者逃避戰鬥相混同。對於今天的青年朋友，要「埋頭」，更須要「善幹」了。一切……以務實和等待處理着自己的生活，用冷眼來觀察這個世界，

其法的線在自己所幻想的天地裡」。這些現象都應該是終結的時候了。

全望先生指出為甚麼在許多覺醒的青年朋友中，還不能作到「坦白與真摯」，為甚麼一些青年朋友，還不能突破舊時拘守的小的樊籠，根本的原因，恐怕是在於「民主作風」的缺乏。不善於虛心的傾聽別人的意見，來改造自己，突破自己，不善於和各種不同的人合作，不善於結合各種可能團結的力量。今天，要使民主運動真正形成強大的力量，舊的圈子就必須突破，要學會團結一切力量，也是要求我們對於民主作風的培養了。

民主運動怎樣才能逐漸和人民大眾相結合呢，全望先生就自身的環境提出了辦法：「我覺得我們應該通過自己的關係和才能老實實去作『譬如下鄉宣傳，或者是聯絡農村友好辦個通俗讀報』。自然，別的朋友自然有別的全望先生不同的生活環境，自然應該有不同的切實環境的具體辦法，我們想，問題的根本恐怕還是在於是否真正的認識了人民大眾的力量，有沒有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決心，是不是真正的去思索考慮辦法。希民先生提出的、過去民主革命失敗的原因，是值得我們深長思索的。

我們希望更多的朋友，參加這次「筆談」的討論，尤其是盼望提出實際的經驗。或從深入的研究自身的環境，從生活實際中總結出的意見。感謝一些熱誠的讀者為此而舉行的座談會，討論會，我們的願望，把這方法推薦本刊的其他讀者，因為經過具體的討論、辯證，能夠使意見更深入，更完密。

千百萬人民和我們在一起

——覆敬公先生

「……在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都和我有關。……」

敬公先生：

讀了你的來信。特別是你困囿中還給我們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使我們很受感動。

我們的缺點還很多，還不能完全符合讀者們的要求和希望。就論先生的來信所說的，關於開揚革命理論的文章還太少，關於思想鬥爭的作品也不够等等，就是這些缺點的一部分。我們當按照你的指示去努力，使它在這方面有更多的表現。但誰也曉得，以抽象的概念說明抽象的原則，很容易變成概念的遊戲，對現實的鬥爭既無裨益，思想也會因而失去內容，而不能前進一步。理論不能脫離實際，它從實際的革命鬥爭中產生，它也以實際的革命鬥爭來證明。但作者們的筆尖稍以接觸嚴酷的現實，相繼而來就是不合理的誣殺。這就是我們的困難，想讀者都是知道的。當然，在困難面前，我們並不怕，因為我們曉得，為讀者為人民服務的義務，我們不能推辭，因此，我們不應該叫苦，而更應該工作。這就是我對你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的回答。

第二個問題，就是你提出的：「我一再被學校驅逐而陷入『孤軍作戰』的飢餓線上，九死一生，覺力力費太薄了，我應當怎樣地應戰？怎樣地和我們的隊伍取得聯系，才能加強抵抗力量，戰勝敵人，否則，白白地犧牲，未免過於浪費了我們的精神力量。……」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願意和你討論，同時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發表他們的意見。

先說為什麼會「一再被學校驅逐」，你不是學校成績優良，從「跌出過五名之外嗎？用常識來說話，你是應當受到獎勵的。學校應該號召大家向你學習。但於你竟被驅逐，不得不到另一個都市的大街上，過着流浪的生活，天天在飢餓線上掙扎。只是因為，你在紀念黃花崗先烈的壁報上，說了一二

句真心話？就被「那些人」注意，包圍，毫不放棄地從門。這是你的冤枉和不幸。對你的遭遇我們實深表同情。但是常識告訴我們，這不是單獨你一個人的不幸，還有成千成萬的青年，因為不滿意於現狀，不忍把國家民族弄到悲慘的境地，看不慣「那些人」的實行和嘴臉，也常常在忍無可忍的時候，表露自己一點真心話，也同樣地被學校開除，工廠辭退，機關離職了。所以，你個人所遭遇的問題，也這是一個社會問題，也就是政治缺乏民主的問題。

為什麼「那些人」連別人一二句真心話都不敢讓他們自由發表呢？這是一點點說話的自由都不給呢？就是因為他們所作的完全是違反人民心意的事情，因此不能不藉住人民的嘴巴。在他們想來：如果讓你有說一二句話的自由，你就可以有說更多話的自由，讓你一二個人說了，就會有更多的人說，那他們是吃不消的，所以控制的鐵箍始終抓得緊緊的，一點也不能放鬆。如果有人敢於不顧忌地天聲要向他們反抗的話，那就不管氣，開除、失職、就會隨之而來了。（在略）

但是世界上也決不會有無敵的如意算盤，畢竟還有不批不怕威脅，不顧犧牲的戰士，他們敢於挺身而出地與惡魔挑戰，向黑暗搏鬥，此起彼落地使這個世界不能那樣寂寞下去。

這些鬥爭大都是民主的鬥爭，它將日益激發，走向偉大羣衆性的民主運動，這是關聯着廣大人民切身利益的一個偉大運動，它的發展是任何人或任何勢力不能阻擋得住的。

正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樣，一點一滴的努力都會有助於整個的運動。（被壓）任何小的努力都必然是整個運動的一部分。因此，你的不幸也反映了社會上千百萬人的不幸，你的鬥爭也反映了社會上各個角落的許多

鬥爭。因爲，你一般地提出所謂「孤軍作戰」是獲得這意義的。

結果，我們的確在這種意義上，私人的目的，比如說爲了個人的升官發財，爲了個人的名譽地位，或者爲了私人的私利，爲了某一個私利的小集團。那末這種爭鬥是不會有廣大的意義的。因爲這並不是代表着人民的要求的和人民的利益，人民也沒有生活的義務去管他們的「閒事」。但事實上，無論與個人無關的或與個人有極相等的關係，因此，那就不再有這種極端大的問題之外，它總是和個人有極相等的關係，因此，那就不再有這種極端大的問題了。既然要幫助別人發生鬥爭，那就有可能是便利別人，或損害別人。一般說，自私的利己的鬥爭，大半都是損人利己的。前面我們說過，有些人爲了自己地位的鞏固，專肯封住別人的嘴巴，犧牲人家的自由。就是這種例證的代表。可惜在許多地區，這種人還佔有顯赫的地位，作出許多害人民，害國家的事情。而且從表面看來，他們很有權勢，隨附合的很多，戰線並不孤立。這又是什麼原因呢？仔細想來並沒有一點奇特。作壞事也需要聚集成一夥，團體目標相同的一夥，漸漸到他個人利己的目的。但仔細分析，這一夥酒肉朋友並不結，在某種情況之下，不能滿足私人慾望時，就會瓦解、垮台。而且社會上，這樣的人始終只是少數，我們不能爲它最顯赫的表面所蒙蔽。而不取應酬之分毫。其實，非禮學不壞德是絕老虎。惡戰之後或不爲害人民；才能使他則趨向於善。這些自私自利的個人或集團，才是真正孤立的，得不到人民擁護的，總歸歸於零，但人民所認識之後，終歸歸於零。

我們鬥爭則完全不同，我們不是爲了個人的什麼目的，而是爲了反對社會上的黑暗，爲了爭取社會的光明，換言之就是爲了人民。而且像做公事一樣而遭受不幸。但鬥爭的目標是極公正的，鬥爭本身也是極公正的。正因爲這樣，我們的鬥爭就不會是孤軍奮戰。我們背後有成千成萬的人民——他們呼之在黑暗的日國中，渴望民主；我們的行為正符合他們的請求，他們是一定會同情我們的。雖然，他的大多數還不能夠直接行動起來，但他們已經不斷地用生活的語言表達了他們的意見。而且，今天已經走過和正要走進民主運動之中的並不是少數人了，民主運動已是相當帶有普遍性的了。那末，怎麼能說自己是一「孤軍作戰」呢？這是不合於事實的，時時不合乎今天正在發展的事實。這是一「孤軍作戰」嗎？這是一「孤軍作戰」嗎？這是一「孤軍作戰」，不是嗎？我們的努力，我們的鬥爭正和千百萬人民鬥爭的請求是一樣的，我決不孤軍，我們有着廣大人民的贊助與支持呀！

爲什麼會產生「孤軍作戰」的感嘆呢？我想有幾種可能的原因吧！

第一，可能是深深認識到：（被略），也是一個羣衆觀點的問題。我們許多知識分子出身的同志，連我們自己在內，因爲習慣於個人的活動，常常喜歡或者不自覺地去單獨地或單獨地奮戰。從一個人所能發揮的英勇與智慧來說，他們都不能說不能幹的。但革命的民主運動究竟不是任何少數人的力量所能辦成的，（雖然這也十分可貴），必須是廣大羣衆的行動才成。如果少數先鋒不緊密地聯繫着羣衆，就不能發揮偉大的力量。這是一切革命工作者所應有的。這就是說：革命的力並不在於孤立的個人，而在於羣衆。羣衆的個人，要發揮其作用，必須和羣衆保持着聯繫，並且是羣衆的一部分。真正有羣衆觀點的人，必定是聯繫着羣衆，爲了民衆，並且使羣衆的人。這種人對羣衆永遠有高度的信任與聯繫，他們任何時候都是有力量的，任何時候都是不感覺自己孤單的。

第二，對現實情況的認識不深刻也容易產生這不羣衆的感嘆。現實的情況是什麼呢？就是世界民主的潮流已經越發強有力地影響着中國的政治，激發着人民的熱情。大家都要求出現一個民主和平的新中國，都要求一個能立足於世界強國之林的新中國，目前正是這樣一個絕好的千載難逢的時機。全中國的人民都要求這迅速改變現狀，而且人民勇氣是大大地提高了，過去不願講話或不敢講話的人都談話了，羣衆是日漸覺醒起來了。那種種的猜測對策，越來越不能騙騙人了。這就是現實的狀況，雖然民主運動的困難還多，羣衆的活動還是分散的，受限制的。但不論如何，運動是要發展的，各個角落的努力不台是孤單的，我們不必覺得自己力量太薄弱，浩蕩長江也是由無數的支流匯集成的啊！

第三，是由於生活所迫，得不到援助。我相信上面所說的粗淺道理，教公事都是知道的，但當前的困難却是最現實的，連每天啃大餅的錢，也得不到求助於衷心厭惡的「那些人」。羣衆的主力軍並沒有給一點實際援助啊！難道不是在「孤軍作戰」嗎？

天天在飢餓線下掙扎的生活，當然是很苦的，難怪來信中说：時時在寒雨冷風裡奔跑，一個年青強壯的小伙子，而今竟變成白髮斑斑的老翁了。生活的壓力斷了你的青春。但是正像不能因爲「那些人」給了你生活上的援助，就說他們當做自己的援軍一樣，我們不能因生活上暫時困難無助，就叫孤軍無援。須知你的鬥爭是有廣大羣衆的援助的。所幸，你並不以這種

民主週刊

社址 昆明府甬道十四號

重慶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第二十二期目錄

- 時評三則 勞生
- 多黨政治與團結的學習 潘光旦
- 怎樣做一個新時代的婦女 曾昭掄
- 工業化的難產 沈來秋
- 第四根鐵釘 艾茵

增刊一期要目

- 柏林門前和東京道上 思慕
- 物價的新波動 雲錦
- 民主運動史話 柏泰
- 一部廿四史從何說 胡繩
- 武器式的命名 曾昭掄
- 從冬天到春天 李公樸
- 西班牙內幕 坤紀
- 以民主作風改善士兵生活 黎明

生活爲苦，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相信我們也是一致的。

最後，對敬公君說來，怕是最主要的原由了，就是所謂沒能和我們的隊伍取得聯繫，這方面我們也應分別談談。首先政治的聯繫是已經有了的。只要爲民主與抗戰的一切努力，大都和我們的方向一致，都是整個力量中不可少的，都會對人民的事業有貢獻的。我們主要的聯繫應該是這種戰友的聯繫，這世上最可寶貴的。此外，從報紙雜誌通信中，我們還可以保持更密切地直接聯繫。從報刊中，你可以經常看到我們和各方面朋友的意見。只要你努力設法看到報刊時時研究它們，就可以熟悉我們和各方面朋友的意見。然後在行動中實踐，再把所感觸到的問題和實際鬥爭中的許多經驗告訴我們，使我們的意見得到補充，缺點和錯誤得到改正，或寄也會對你有些幫助。這就是可能有的最好的聯繫。你是可以立即做到的。相信有了這種聯繫，說可以用集體的力量，在相互學習中增加我們的作戰能力。有了這種聯繫，在目前的情況下，已經很好了，其他的聯繫暫時可以不必的。

擺在面前的鬥爭仍然是很艱苦的；困難是很多的。這特別需要我們和人民結合在一起，把自己鍛鍊得更堅強。只要時時刻刻聯繫着大家，依靠着大家，就不會孤單，就能克服困難。如果敬公君現在生活還沒有着落，希望從就近的朋友中想點法子，我個職業糊口，又可作爲進一步爲人服務的基礎。以你這樣的能力我個職業是不會很困難的。如果城市裡困難，可以到鄉村中去想辦法，比如說，做一個鄉村學校的教員，合作社的職員。只要有機會能爲人民服務，一切的困難都不必過於顧及。我們親眼見到的大學畢業生走進農村，只是做一個傭工。但他們不覺得這是精神力量的沒收。結果他能在當地聯繫起來，幫助這業，取得了羣衆的信任。在目前這個人們的時候，他就能引起保衛家鄉的抗戰鬥爭；這種鬥爭在最後是屢見不鮮的。如果你能到這樣一種職業，不是立刻就可以不再做「那些人一鬼混了嗎？」

這是我們的意見。如果你覺得有什不妥當或還有什麼意見的話，希望寫信。

他其及評書

我們向哥白尼學習些甚麼？

——斥在科學偽裝下的「戰國」派理論——

克汀

大家都知道，「戰國」派的理論是五十年來在中國大後方出現的一種法西斯理論。他們從希特勒那裡搬過來了「暴君學」，搬上了他們的「領袖」尼采所創制出來的「超人哲學」的解釋毒劑，於是，這便成了「戰國」派的思想內容了。當然，為了使這種毒劑易於推售，他們除了用些「漂亮」的言論來裝飾這些「毒劑」的表面外，他們更在這些毒劑之外，包上了一些「庸俗」的外衣。因此，他們的「尊容」便在科學偽裝底下出現了。近兩年來，許多先進已經對「戰國」派的哲學思想、文藝理論等等作了較有系統的批判，可惜，在自然科學偽裝下的「戰國」派的法西斯理論——「力的宇宙觀」還沒有受到應有的批判；現在，我且揭開了他們的科學偽裝，請讀者們看看「戰國」派思想的本來面目。

我們知道，法西斯為了要實行他們的「暴君主義」，為了要奴役全世界的人們，於是，他們便不得不欲求暴力，讚美恐怖，提倡英雄崇拜（或稱「超人」，其實是不折不扣的「暴君」），這是一種思想，顯然是反民主反科學的。當然，法西斯是害怕科學的，因為科學無可避免地要證明法西斯理論的破產和他們自身必然走向敗亡的歷史命運。因此，希特勒之流曾經不斷地作着反科學的「孔」企圖消滅真正的科學，但如果完全沒有了科學呢？那麼法西斯警察的面孔便更顯明了，為了要欺騙奴才們，為了要偽裝成神聖無恥地凌虐科學，強姦科學，把科學變成了奴役人民的工具，變成了殺人的武器。我們中國的「戰國」派仿「英雄」（？）們也學來了老希這一套本領。他們也一樣地在歌頌暴力，讚美恐怖，提倡英雄崇拜，為了要達到使人們相信他們這一套謊語的目的，他們又提出了所謂「力的宇宙觀」和「力的人生觀」來作為他們的理論根據。但是，什麼「力的宇宙觀」這一套荒謬的言詞實在太簡陋幼稚了，大家雖然地是不會相信的。於是，老希的歪曲和強姦本領出現了，他們便是無恥地宣稱這是「哥白尼宇宙觀」，這就是「歐洲人的精神」。

哥白尼的宇宙觀是甚麼呢？一位「戰國」派的小丑「無恥地」回答道：「無窮的空間，充滿了無數力的單位，在力的相對關係下，不斷地動，不斷地變。」（見「時代之波」四二頁）

說完了這一段話以後，這位「小丑」於是可以笑地聲稱：「力」無窮！相對！動！變！這「幾個重要概念可說是建造整個歐洲物質文明的最根本的基石，而歐洲精神文化的底蘊也就根據在這幾塊基石上頭。」（見「時代之波」四二頁）

其實，這一位「小丑」所要做的，不過是歌頌暴力而已，所謂什麼「無窮」「相對」「動」「變」，不過是一種陪襯的語句，以便他們的言論不致於太明顯和太單調罷了。但「龍點睛」他們不得不坦白立論，說出他們的主旨。以希望收到他們預期的效果。因此，這位「小丑」所唱的「戲」終於到了最重要的一段這白了，這段這白坦白而直率，簡單地說來，他們不過是企圖牽哥白尼，說哥白尼理論的中心就是「暴力」（！）現先把這一段這白寫在下面：

「哥白尼系統以「力」為主腦概念。變，動，相對，無窮各點可算是對「力」的說明或註釋。」所以抓住了力字，便抓住了哥白尼的核心」（見「時代之波」四三頁）。「拿起任何東西或事實，第一步必要先從我們這種所謂力之立場去觀察，去估量——這就是哥白尼系統的作風！」於是，我們的「小丑」結論道：總之，一切都是力的表現，力的關係。據說所謂「力」在自然界便是「能力」，在生物界便是「活力」，在人事界便是「權力」（其實是一「暴力」，不過他們不大好意思太直率罷了，因為在「力人」一文中，他們便坦白地宣稱「力人」就是「主人」，「非力人」就是奴隸，主人統治奴隸不是靠了暴力是靠了什麼呢？說到這裡，這位「小丑」便「得意忘形」地大呼：「力即是力！」這樣之後，「戰國」派的招牌便正式地打出來了。開端之後便接着打開招牌賣膏藥，這原來是意中事。「戰國」派的招牌上面是寫

機巧的呢？我們且看罷！

「現在世界文化已經演到了空前的大戰國時代。本來國與國間的形勢，其性質不折不扣，恰恰哥白尼，就是說力的單位與力的單位，在力的相對關係下，不斷地動，不斷地變。大戰國時代的特徵乃在這種力的較量。任何時代都絕對地以「國」為單位，不容局限於個人與階級，而也不較容易擴大而修言天下。」

這是什麼理論呢？一句話說來這就是希特勒的「暴君學」和「國家觀」的東方版，這就是公開歌頌暴力和侵略，讚美奴役和戰爭。可憐他們還無恥地要中國採取了老希的「優待政策」。多產生一些「力人」以準備被趕上戰場去當炮灰。

我們哥白尼學得到什麼呢？學習到的是民主和科學的思想和精神呢？或者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和精神呢？我們的答覆是：我們學習得到的將是前者而不是後者。哥白尼的實質的科學遺產中我們可以吸到了民主和科學的氣息。這一切就是「反民主」和「反科學」的，也就是說，它是反法西斯主義對法西斯主義的民主和科學的遺毒。

我們知道，中世紀是「黑暗時代」。這時，封建的專制主義統治了一切，結果，在這時代裡，充滿的只是傳統、因襲、迷信、盲從、偶像；這一套套的東西，在這時代裡，看見到民主，也沒有看見科學。聖經和亞里士多德的東西，被當做權威和科學方面的權威，人們一直崇拜着這一類權威的傳統，科學變成了「神聖的婢女」，大抵只限於解釋和注腳。如果，一發見有真正的科學思想而在實際上和聖經或亞里士多德的東西違背的，便動輒地用這些科學來處死，宣佈他們都是些異端。因此，在這時，科學被當做異端邪說，而遭遇到撲滅和禁止。但是，由於商業的勞動和工業上的發展，漸漸地出現了近代的市民。這是封建社會的掘墓人，他們在當時是背負着社會革命的負擔的。因此，他們生氣勃勃地走上社會舞台。工商業的活動使他們需要實際的科學知識。如像商業經營是和航海分不開的，而航海則非天文學和地理學的知識不可。同時，航海經驗的增進，又大大地幫助了天文學和地理學的進步。大約在十四世紀的時候，天文學的知識已經非常豐富了。由於這些知識的提供，新宇宙觀發生的可能。

在中古時代，有一種傳統的學說，認定了地球是太陽的中心。但在十六世紀的時候，許多天文和地理方向的知識都證明了只有太陽才是太陽系的中心，而地球却是繞着太陽而運行的星球。這一種新的學說是和傳統的學說相反的，這一個學說的建立者便是哥白尼（Copernicus）。但是，顯然地，如果哥白尼立即將這種學說公諸於世，那末，無可避免地會受到了教會和封建主的殘酷的檢校。因此在當時，科學上的研究和發見，不折不扣的是一種革命的工作，這一種科學思想上的革命是近代法西斯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哥白尼的學說終於在死後才出版，當然，在我們今天有些人看來哥白尼

也許還不偉大，但我們却不應該過於苛責。應該明白當時的社會環境而在歷史的態度上去估量它。無可否認地，哥白尼的學說，變成了一紙空文，而直接投到當時反科學和反民主的陣營，即是直接地同教會和封建制法鬥爭。

哥白尼的學說終於變成了民主和科學的號角，變成了當時一切先進力量的旗幟。以後，教會和封建主義雖然用盡了一切力量企圖撲滅這一種危及他們自己的科學思想學說。為了要達到目的，他們在「異端裁判所」的名義下，濫用一切最殘忍的刑罰來對待哥白尼學說的追隨者。天不假年，哥白尼（1543）被處死刑，伽利略被下獄，謝爾維特特發發明血液循環說了，而加爾文燒死了他，在燒死之前還活活地烤了兩個鐘頭。

看了上面便知道，近代科學的歷史就是爭取民主主義和科學的存在和發展的歷史。在十六七世紀時代的天才學者都是革命家和戰士。他們在當時，一切活動，盡至用血和肉來爭取民主和科學的存在和發展。他們在當時都生氣勃勃地幹着各種活動，他們沒有一個不是用了許多地方，幹着各種活動的，他們大都精通幾種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有兼學富而學識。他們不但用筆，而且也用古劍和刀劍來向教會及封建主義戰鬥。他們在當時，也有着偉大的氣魄，和不屈的氣節。布魯諾在當時也不肯放棄他的思想，伽利略在獄中雖然會經為迫而寫了一紙悔過書，但結果在獄中又完成了「科學的著作」，這一本著作又好像一顆炸彈直接投回反民主和科學的封建陣營。

民主和科學是市民社會的變生兒！我們看了封建末期的科學家，如像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聖威羅、聖威羅的歷史經過，便知道，他的一生受盡了教會和封建主的迫害，結果，終身顛沛流離，甚至受到了慘害。聖威羅在流亡中，便知道他的生活是多麼慘痛了。科學和民主是不可分離的，只有在民主生活，的土地上，科學才能開花結果，而民主生活，只有靠了科學，它才能發展和鞏固。因此，當法西斯和科學還沒有建立起來的時候，我們必須學習哥白尼的精神，為爭取民主和科學的存在與發展而努力！

我們中國今天正是處在「一方生未死」之間，民主與科學兩大課題正擺在我們的面前。因此我們一方面應當學習哥白尼的尊重真理的精神，另一方面更應當學習他為民主與科學的存在和發展而努力的精神，也就是說學習他們的向反民主和反科學戰鬥的精神。

哥白尼的思想和學說並沒有告訴我們什麼法西斯思想，更沒有告訴我們什麼「力的宇宙觀」，他只告訴我們怎樣向民主和科學的大道邁進，如果有和道相反的，那只是法西斯徒從的無恥歪曲和強姦。

「高爾洛夫精神」與「前線」

刁 星

讀完了蘇聯名劇作家考納瓦克度「前線」，真

是無限的感動，無限的快活。

這劇本的內容，主要的是拿蘇聯戰爭中紅軍攻取一個名叫科洛考爾車站的故事為中心的。這車站，依劇中敘述的青年軍長奧格洛夫說：「不備是一個車站，而是一個堡壘，奧格洛夫將軍在它四周圍奔馳了兩個月，什麼結果都沒有。」開始的時候，指揮這個戰役的是前線總司令高爾洛夫。他是「內戰時期」的功勳，大有威靈頓的「老戰士」，現在訂下了一個假設德國侵略軍兵力薄弱，不能增援，又有「蘇聯將軍在幫忙」的作戰計劃。軍事委員會委員達達爾和奧格洛夫提出了敵軍可能增援和迂迴包抄的疑問，他斥責是「瞎扯」，又警告前線的將士：「命令一定要準確地執行」。恰好他又在這時得到第四師團章，並且，他周圍那一幫「不學無術而專事拍馬屁過生活的人」，還在稱讚他底戰術是俄國著名特「蘇瓦羅夫式」的呢。攻勢一開始，奧格洛夫攻下了他自己的故鄉伏朗形。普洛特，然而可憐的情報却是：敵軍底坦克等兵力比高爾洛夫底估計大得多倍數，更重要的是，敵軍在車站附近出人意料地修成了一條最富戰略意義的新公路，這就是說：敵軍增援的可能遠比估計大得多；而紅軍克軍團底燃料又斷絕了，前線總司令說：「被打壞了」。於是，奧格洛夫和他底部隊被包圍，陷入最危急的困境。高爾洛夫為挽救危急形勢，只有「建

議」叫奧格洛夫「突圍後退」，「立即退到原來出發的陣地」。奧格洛夫却說：「他是在找死」。「現在看起來，我們的軍隊也會被摧殘的」。我呀。我的這支軍隊要活下去，要打仗，並且要打到勝利。於是，他依照由莫斯科軍事委員會批准的自己底作戰計劃打下去，結果，在最危急的危險下把戰局扭轉來，從強大的敵軍手中拿下了科洛考爾車站，這是何等輝煌的戰績啊！但是，高爾洛夫對這樣的勝利却不高興，他對參謀長卜拉高恩拉伏夫說：「他們是依誰的命令行動的？」「抹煞前線的指揮我是不答應的」。奧格洛夫就是這樣好逞強。當後來奧格洛夫報告：「我們根據自己的計劃行動的，這計劃已經得到莫斯科方面的批准。你是知道的。科洛考爾車站克服了，德軍戰艦的部署被擊潰了」。他又說：「這樣一來，我在這裡算是什麼人呢？是前線總司令不是呢？」說這話又要「修正修正」別人的「腦筋」了。但是，「世界上總還有真理」，達達爾交給他一道莫斯科來的命令，他被解職了。代替他担任前線總司令的，却正是差一點被「修正腦筋」的奧格洛夫，莫斯科這座公正和英明的「處理」，使「老戰士」科洛考爾少將軍得稱讚着去擁抱那英雄的青年總司令，全劇也就正在這裡閉幕了。

這位高爾洛夫，依照「真理報」底論文說：「是個勇敢的人。有過光榮的過去。是天賦很高的人。在內戰中他很有功勳。很可以成為頭等的將領。指揮官們和戰士們都愛他。繼承着父親的勇敢的兒子，也愛他。他有多年積累起來遠遠沒有失掉價值的豐富的經驗。前途仍然是過大的」。但是，「在他的自述中，他是這樣描繪自己的：他「沒有上過任何大學」，沒有進過軍事學院，不是「一位理論家，而是一匹老馬」。他到過德國，對德國參謀部所準備的現代戰爭却說是一「枯燥無味」。在這次戰爭中，他輕視軍事科學，根據「國內戰爭」的經驗，低估機械化的作用，不用現代化的方法打仗，堅持原始式的襲擊戰術，固執的格言是：「我們打敗任何敵人，用不着靠無線電通訊聯絡，而是靠英勇，果敢」。『軍事的實質』是「數量決定一切」。總之，「他糟糕的地方，不僅在於沒有在戰爭中學習。就在戰爭之前也不願意學習」。『然而實際上，戰爭是一所軍事科學的高級學校，戰爭——這就是知識的考驗。他經不起這種考驗』，並「這就使自已底部隊打敗仗，於是，他垮台了。『物以類聚』，他親信的部屬，首先要數前線情報處長烏倫維吉爾尼，做情報時總要夾雜一些『我想』，『大概』，『或者』，『也許』的猜測之辭，簡直就是說謊話，好在總司令訂作計劃是不用精實情報作根據的，所以參謀長對米朗雖然說了：『他不過是個淺薄的人，能力有限』，却也只說一句『

他不是我任命的」那樣卸責任的話。前線通訊聯絡受難，在前線上，這幾年打陳年的白衛地，大概是因爲這通訊司令用的，對於自己底工作呢？一個坦克軍團打那去了，是不該讓軍擊潰消滅了，那弄不清楚。前線的却是讓高爾洛夫是「蘇瓦洛夫派」，一會兒又是「光輝的將領，天才的戰術家，軍隊所愛戴的兒子」。簡直就是一個「馬屁精」。——所以，這一類人到底性格或精神，簡單說，就是不學無術，自滿自欺，粗率魯莽，不求進取；甚而至於有的愛虛名，有的就「拍馬屁」。這似乎也可以定名爲「高爾洛夫精神」的吧？

由其備着這種精神的高爾洛夫所統率的軍隊怎能不打败仗呢？事實告訴我們：自從一九四一年六月德軍侵襲蘇聯以來，直到第二年九月紅軍在斯大林格勒把法西斯侵略攻勢停止下來，紅軍在許多戰線上都在退却的。那裏怎樣呢？正如像這劇本中莫斯科命令把高爾洛夫解職，用奧赫洛夫來代替他担任前線總司令一樣，在斯大林元帥領導之下的紅軍部，曾調換了不少年老將領，而代之以有材幹的青年將領。在這兩年多的過程中，他們領導蘇聯的英勇紅軍，把德寇從蘇聯的疆土趕出去，並且先後解放了波蘭及巴爾幹各國的土地，而於最近進逼柏林。蘇聯這樣震動世界的輝煌勝利是怎樣獲得的呢？簡單說：是斯大林元帥能迅速而勇猛的，英明的組織紅軍，公正的，堅定的指揮能幹的指揮官，尤其是青年的將領，如像朱可夫以外，砲兵元帥佛羅諾夫才四十三歲，白俄羅斯戰線總司令舍維科索夫斯元帥才五十五歲，「世界十大名將之一」的，在莫斯科保衛戰中打敗德軍「坦克戰術家」隆美爾底上司名格古德林的高利科夫才四十八歲，這羣青年將領底共同特點是像奧赫洛夫那

樣，使勇敢同技術密切結合，使作戰的精神同軍事科學密切結合，「精密思想，大膽實行」，力求進步，最要的是能運用現代化的方法指揮現代化的戰鬥，結果，他們打勝了敵人，把德寇趕出了國境，而今快要和盟軍會師柏林了。——那麼，斯大林這位紅軍最高統帥究竟是有着什麼樣的特性和人物？他又在什麼樣的認識下改組他們國家底軍隊的呢？伏羅希洛夫在「斯大林與紅軍」那本書中說：「自從斯大林同志領導我們粉碎了丹尼金以後，他作爲一個頭等組織家和軍事領袖的威信，已是無可爭辯的事……他自己會寫道：他使「變成清洗軍事機關污穢垃圾的專家了」。他就是這樣具備統帥性格的人物，運用下面的理論領導着蘇聯的紅軍：「戰士們，必須學會精通自己底武器。指揮官，必須成爲指揮戰鬥的巨匠，在現代這樣的戰爭中，是不能够停滯不進的。在軍事上停滯不進，就是等於落伍。大家知道，落伍的人，就會挨打的，因此，現在主要的事情，就是使全體紅軍與日俱進地完善自己的戰鬥技能，要紅軍的全體指揮官和戰士研究戰爭經驗，學會怎樣打仗」（見一九四三年五一節命令）。他認定「在老幹部中，還有這樣一部份人，他們有時懷着一種頑固的守舊的僻性，拘守成規的僻性，於是說看不見實際生活中的新事物。這是嚴重而危險的缺點」。那些從前有過某項功勞現在儼然以顯貴自居的人……他們以爲自己是無可代替的人物……應該如何處置這種工作人員呢？應該毫無遲疑地撤銷他們的領導任務，不管他們從前有何功勞」。高爾洛夫和大大小小的「高爾洛夫們」所遇到的，也就正是這種頑固。他又認定「年輕幹部，他們當然是沒有老幹部所具備的那種經驗，訓練，諸如事物的知識，決定方針的力量。可是，第一，年輕的幹部是佔絕大多數的；第二，他

們雖然年輕，但得不會衰老死亡故；第三，他們具備着持續有餘的對於新事物的感覺；第四，他們是長進得和開明得非尋常迅速，他們向上飛奔得很快，在不遠的將來，就會趕上那些老頭子，而同他們並肩前進，成爲他們有資格的替班。」所以，「要及時和大胆地提拔年輕有才幹的將領到領導的職務上去，和老年的將領們同在一起工作」。奧赫洛夫和大大小小的「奧赫洛夫們」就是這樣被「提拔」起來的。這正如一個美國記者雷爾斯說：「不論從心理方面看還是從物質方面看，這都是一個新的紅軍。它的成就將高過了它的聲望，似已可稱爲世界無匹的武力」。

而考納丘克底「前線」恰恰就抓住了紅軍由落後到進步，由脆弱到堅強，由偏僻精神到配合科學同技術的改組過程，又用他在蘇聯戰局轉捩點斯大林格勒戰役（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三日）到一九四三年二月三日止的「戰報」上，對紅軍中的「自我批評」，檢查和改進，激起了巨大的思想和社會的準備。所以，這作品，有着最豐富的軍事和社會的意義。抓住了一個時期的中心問題，抓住了最具體的現實，這不能不說是偉大的現實主義的傑作。

並且，它不僅只是抓住了最具體的現實，它還結合着歷史的體精神呢。想想看，高爾洛夫不是忠實於自己底工作和祖國的人呢？不是，塞爾蓋批評自己底父親，只說他「是一個眼光淺薄的人」。軍事委員會速爾尚米朗說：「應當記得軍事，但是這軍事已經顯內戰時期的不是同一回事」。又說：「內戰的經驗他是有的，並且在指揮官裡面有廣博的，現在他是把他所能的去打仗」。這對高爾洛夫自己說：「你爲人勇敢，並且獻身於我們的偉大事業。爲了這偉大事業人家都尊敬你」。這就可見別人

對他的議論，他還是頗有戰鬥經驗，忠實於「蘇聯」，為人勇敢，受人尊敬的人，只是不懂得現代戰爭已經開「內戰時期」的戰鬥大不相同，眼光有點後進罷了。而連步調「內戰時期」呢？「真

理」或那篇論文說：「在當時，技術——飛機，坦克，自動步槍——這些新式武器的作用」。這種戰鬥的經驗，「使他的估計不足，因此，也就使他的估計過於科學估計得不夠」。所以，他這青年將領與格魯夫，說：「他懂得什麼內戰的事情？當我們打十四個列強的時候，他還在桌子底下呢。我們打任何敵人，用不着無線電通訊網絡，而

是蘇聯，果敢」。這就是說：內戰時期的勝利與成僅一種習慣，相信蘇聯老的一套兵法在現代戰爭中還是能建功立業的；也就是說：他底固執和保守是有其歷史根據的。何況當時紅軍中還流行着「一種風氣，就是蘇聯所說的：『這種風氣，這種風氣在我們高級指揮官裡面，還起着巨大的作用。不知是怎麼有才幹的青年指揮官，假使沒有和他的一塊兒參加過內戰，那大家就不承認他』。這不是更

格魯夫助長他那「土包子」底固執和保守思想發展到於斷和頑固的程度麼？事勢到了這田地，不是他固執的軍隊打不贏，而是他自己從軍隊中排除了，這當中有第三條路可走了，結果，是他被「解職」，從他自身看來，這不能不說是悲劇。——這兒，最值得注意的是這悲劇底歷史根源。

又如像高爾洛夫底烏維維諾甫尼，卜拉高恩拉伏夫說：「還在內戰的時候，他就跟着總司令一齊打仗。他這個老的工作人員，正直而有功勞的人，就他體力強壯一點」。可見他也是好人，更在平時，甚至於在戰時，他都能把工作做好，那時，不幸，他又恰恰站立在複雜而猛烈的現代戰爭的旋渦中，他負着危險，多難，艱難，危急的

前線情報工作，這是多麼破壞着工作本身，也傷損着這個老好人。——這不也是從歷史產生出來的悲劇麼？

所以「前線」這作品，不僅僅抓住了一個時期的中心問題，不僅僅抓住了最真實的現實，他還從廣闊地帶了現實的歷史根源。——所以，這作品，也有許多豐富的歷史意義。這也就說：他表現出了紅軍底過去，更表現出了紅軍底現在，而現在呢，「紅軍在波蘭的三路攻勢，實已創造了歷史」(一月十八日勃列日涅夫氏語)。

說到這個劇本的典型性，底真實性，普遍性和永久性呢，就馬上就想起「蘇聯文學」那論文底論點，他說：「亞歷山大，普希金的作品的力量，它所以能引起讀者中間發覺成功的泉源，是在於藝術形象底真實和生動，是在於描寫的勇敢和公正」。是的，本劇底藝術描寫，都有大將底威嚴的風格和天賦的偉大，它對於蘇聯底革命，更不用說以「土包子」和「老戰馬」自命的高爾洛夫和滿口「大敵」或「世許」的烏維維諾甫尼們，記得有人報導過：這戲劇在莫斯科初次演出的時候，有些蘇聯將領看者在中途就變臉變色的走出劇場了。這不是由於描寫和表演得太生動和真實，而後亂了人心底不安和不安寧麼？所以，對這些「主角」型的偉大人，我不想多話。現在，只提出一兩個「配角」型小人物來看一看，就如像彼欽卡吧，他說：「把我們留下了，嗎，弟兄們，看起來我們沒有活命了。把我們留到鬼門關去了」。說着這些話的時候，他不禁害怕得心跳在打抖的肌肉裏，經過奧斯塔平科「給他解脫」以後，他就得出「誰

戰鬥，誰就不會滅亡」的話了。彼欽卡不科打了身光以後，只要出手者懇求「不要生我的氣」，他就能自自然然的伸出友誼的手，這是何等的質樸和

天真？當女護士瑪麗亞對他說：「坦克很多」。他絲毫也不張，非常自然的安眠道：「不要怕，女護士，我們打得退」。這才是徹底而毫無保留的勇敢。看着那底底克捷斯，他唱歌樣的低聲呼喊着：「滾了，滾了，滾了，滾了」。這歌不是簡直天

真得傳小孩子嗎？在瑪麗亞報告打斷他耳光的奧斯塔平科陣亡的時候，他讀地死於底遺囑就說：「滾了，那神神真的友誼和同志愛，會幫助得任何人都回回他——齊流淚的吧？最後，勃列日涅夫底入攻勢來了，中隊長蓋爾蓋一下命令，他見拿起手榴彈，這不礙，單純而平常的履行到最後的線：「但這是何等徹底和樸實的英雄主義的精神啊！——在這偉大的戰鬥中，對他底犧牲不多，我總覺得：這也不他不能說是一個完美了的人呢。

又如像那女護士瑪麗亞，這她一舉一動都帶着的好炮聲互互。索科科，就在最危險和緊急的戰鬥中，他也向一心不開的戰士們談着：「但是，她也要一切為祖國戰鬥的戰士們，她曾經從最前線回陣點來報告奧斯塔平科的死，而今，她看見那蓋爾蓋被包圍了，她那時那個補充兵「拿着手榴彈去幫忙」。那補充兵說：「我不能，我手榴彈了」。她罵了一句「混蛋」，奪過那補充兵底手榴彈，就自己跑過去了，她這種英勇的自發的戰鬥精神，誰看誰能够不被感動呢？說到這兒，使我想起了西蒙諾夫的「俄羅斯人」一劇中底同類情節。在「俄羅斯人」第二幕第二場中，有一個老人代表一

些參加過日俄戰爭和上次俄俄戰爭的老兵來見戰區某城防司令薩方諾夫，要求給給他的文憑槍，說着他們「又好幾年青了」，他「打打槍的人」，那老人走了過後，薩方諾夫向軍務格羅巴說：「這是一種什麼戰爭呢？……好幾是人員枯竭了，但

天裏，當女護士瑪麗亞對他說：「坦克很多」。他絲毫也不張，非常自然的安眠道：「不要怕，女護士，我們打得退」。這才是徹底而毫無保留的勇敢。看着那底底克捷斯，他唱歌樣的低聲呼喊着：「滾了，滾了，滾了，滾了」。這歌不是簡直天

真得傳小孩子嗎？在瑪麗亞報告打斷他耳光的奧斯塔平科陣亡的時候，他讀地死於底遺囑就說：「滾了，那神神真的友誼和同志愛，會幫助得任何人都回回他——齊流淚的吧？最後，勃列日涅夫底入攻勢來了，中隊長蓋爾蓋一下命令，他見拿起手榴彈，這不礙，單純而平常的履行到最後的線：「但這是何等徹底和樸實的英雄主義的精神啊！——在這偉大的戰鬥中，對他底犧牲不多，我總覺得：這也不他不能說是一個完美了的人呢。

他叫馬士又會自動補充上來。有時他感覺到自己一氣力氣也沒有了，但是起起落落很有勁，自己都驚奇這道奇蹟。——是的，這反侵略的正義戰爭，戰鬥員們大多數都是「自動補充上來」的，他們雖然沒「無名英雄」，他們却是廣大的民衆，他們雖然沒「武裝到牙齒」，他們却能够不平常和自自然然的去戰鬥和去死。這也就因爲他們是如像「俄羅斯人」中的小瓦麗一樣，一提到「祖國」她就會想到她家門前底「一條小河流兩頭小白樺樹」，她「在兩頭樺樹中間會經過一葉小綠草」。他們和他們英勇的戰鬥和死是有目的的，那樣的戰鬥和死不僅止於爲了「祖國」和世界，爲了民族和人類，爲了正義和真理，也爲了他們和他們自身底安樂和幸福呢。所以，這一次的反侵略戰爭，不僅止於要取得單純的軍事勝利與和平，而且還要取得有理想有目標的勝利與和平。這理想與目標呢，就是在戰後要建立經濟民主，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的世界上生活秩序。誰要是夢想用陰謀手段偷竊各國民衆用血淚凝成的戰果，他總會碰着鼻子或破破腦壳的。「前線」和「俄羅斯人」(孫師毅先生底改訂本名叫「爲國爭光」)這些作品正就在表現民衆底英勇作事精神，同時也把他們底願望實現得那麼具體和生動；這想來也就是大多數人愛好他們，喜歡他們的原因了。

對於我，最重要是事實，而其餘的一切我自己會編造出來的。所以當塞爾蓋戰死以後，他把這中隊長寫成生龍活虎了，讓那編出高爾洛夫戰利兒死訊的時候，眼裏裏沒有一點眼淚，而燃燒着的是「神聖的復仇的火焰」。這真使人忍不住要說：這話大家了。還有，就是他這句「全國人民應當知道他的自己的傑出的將領們」，就把前線總司令高爾洛夫捧得忍不住的高興了；又像高爾洛夫只叫他寫出「戰士們」的悲壯精神，却不管他寫得真實或不真實；這樣看來，「易地而處」，高爾洛夫若是克思，也會同他一樣寫作的。所以，高爾洛夫有着愛國媚的習氣，也就可能這個人；不深究作偽，也就可能作偽，也或是說：讓這種習氣發展下去，甚至於可能對自己底工作，事業和理想不忠實的。所以，我想說：克思空是高爾洛夫底鏡子，他照出了高爾洛夫沒有顯露出來的秘密性格；同時，他底精神不過是高爾洛夫精神的一種表現。所以說：高爾洛夫精神是不僅僅存在於軍事生活中，而是存在於一切社會生活中的；就是說：這種精神是有着普遍性的。

因此，我同意詩人梯航諾夫的話，他說：「你們大家都知道考納丘克的劇本『前線』的巨大的社會意義。甚至說是當它所提出的各種問題都變得陳腐了的時候，它還會作爲一個歷史劇而永遠地流傳下去」。是的，由於他製造了一個真實的典型，這典型有着最豐富的，時代和歷史的，民族和人類的，社會和藝術的意義；似乎這位高爾洛夫將軍慢慢會走入罕姆雷特，吉訶德先生和浮士德們的行列中的吧？那麼，這劇本爲什麼不「會作爲一個歷史劇而永遠地流傳下去」呢？

但是，爲了我們自己和我們子孫底安樂和幸福，爲了各民族和人類底繁榮與自由和平，爲了生活

同文化的合理與進步，我們應該在一切生活中徹底地檢討自己，澈底的消滅了高爾洛夫精神。在今天，爲了獲得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勝利，爲了迅速建立新民主世界的持久和平，我們實在應該在一切地方底一切生活中消滅了高爾洛夫精神。

註：戈賓德：「考納丘克及其得獎的劇本『前線』」……載『前線』卷首真理報：「論考納丘克的劇本『前線』」……載『前線』卷首雷爾斯陀：「紅軍是怎樣進步的」……載『天下文章』第二卷第四期西萊諾夫：「俄羅斯人」，孫師毅改訂本「爲國爭光」……英學出版社考納丘克：「前線」，謝伊譯，戈賓德譯序……新知書店出版

代郵

希民先生：「筆談」意見已收到，日前曾有信奉達，但被退回，請見示通訊地址。

致 讀 者

諸位親愛的讀者：

本刊自從去年十一月間廣泛徵求讀者意見以來，在這三個月中間，曾先後接到各地讀者的踴躍來信，向我們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在這些意見中，既有嚴格的批評，也有積極的建議，使得我們今後的編輯工作能有所遵循。在採集意見的方法上，有的是個人逐項提出，有的是經過具體討論提出的，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讀者諸君對本刊的愛護與督促的熱忱，這是我們應該在此特別表示感謝的。我們為了不辜負讀者諸君的熱忱，在接到各方寄來的意見之後，立即加以整理，凡是有所詢問的地方，當時都作了個別的答覆；凡是有所建議的地方，我們從去年十二月份起就開始採用實行，關於其他的各類意見，我們想留在此地再作一個總的答覆。

第十 第

回顧過去各期的「叢報」，無論在內容上，無論在編排的形式上，都遠遠不能符合讀者諸君的希望；這是我們應該引咎自責和抱愧的。首先是由於我們主觀力及主觀時間的限制，使得我們不能多多地注意各方的需要，和及時地對內容有所改進，這正和很多的讀者所提出的「叢報」內容的現實性不夠，並且在過去幾年「叢報」內容的

到在審查方面所遇到的許多困難，也使得刊物的內容受很大的影響；很多的文章都過不過，很多讀者所要求刊登的文字都不能和讀者見面，這對於我們從去年十月以後各期被扣稿的情形中就可以看出來。當然，我們並不因此就推諉了自己的責任，而是希望今後讀者諸君能經常提供我們許多寶貴的意見，使得我們能有不斷的改進。

我們現在謹就讀者諸君的意見，在此擇其要者逐一答覆：

時局方面，我們暫時還是保持每期中刊載一兩篇關於重大問題的時評。專論方面，我們當儘量選擇最現實性的問題，並對各種重大的事件有所解釋。讀者諸君的意見中都希望多談民主問題，介紹各國民主運動的成就，這只要在審查可能範圍內，我們一定盡努力的去作。

研究與批評方面，很多讀者認為我們過去研究與批評的文字太專門和太深了。我們今後當儘量注意這一點，務必要使得研究與批評的文字，寫得深入淺出，通俗明瞭。但這並不是說我們此後就完全不理理論性與學術性的研究文字，而是想使得這些文字在刊物中的比重少佔一些，必要時印成附冊，（據上期的附冊：「孔慶的批判」）。讀者的意見中，也希望我們今後多多刊載研究經濟

（特別是農村經濟的）的文字，這我們儘可做到的。

關於「中國歷史講座」也有許多讀者希望繼續刊載，但數次送審，俱未能通過，雖經交涉，亦無結果，所以這一個講座只好暫時缺之，但我們還是想拿個別的歷史問題的研究與論述，來彌補這個缺陷。

邊區與後方介紹方面，我們當儘量作有系統的介绍，並用文藝的寫法來報導，避免有生硬與公式之感。

書籍評介方面，讀者們都希望我們能普遍地介紹各種書籍，但在這一方面，我們和「新副」有一些分工，「新副」的書報批評介紹的範圍比較廣泛些，「叢報」的範圍較有專注，多偏重於思想理論的介紹及批評方面的。當然，我們對於好書當儘量推荐，對於含有毒藥的書當儘力指摘與批評。

信箱方面，過去只是讀者詢問，我們答。從十卷起我們已把它改成為「讀者之頁」，希望這一欄能變成讀者諸君的論壇，像我們上一期開始的第一次座談會，就是這樣的一個嘗試。

在編排形式及封面方面，我們當力求精美。篇幅方面，我們仍暫定為八萬字左右（四十八面上下），必要時出合刊或特刊，凡較專門之學術性的文字，均印為附冊。有許多讀者向我們提議，希望我們能將「叢報」改刊週刊或十日刊，我們曾經一度這樣打算過，但由於審查往還臨時甚久，在目前還只能保證每半月出一大。

新華日報圖書課

★新書出版了★

的、的得章內的目的
 文、張青和。容的
 字、中、年、方、道、分、是、怎
 俱、府、讀、法、些、文、成、樣
 通、王、者、有、文、章、都、自
 俗、劍、們、是、的、思、想、我
 淺、秋、非、是、是、政、治、解、學
 顯、胡、常、告、請、青、年、學、習
 ，、風、費、大、家、的、前、一、條、學、習、的、要、求、而、編、成、的、他、的、主、要
 是、幫、助、青、年、們、學、習、的、一、本、最、好、的、入、門、書、。
 是、胡、風、費、大、家、的、前、一、條、學、習、的、要、求、而、編、成、的、他、的、主、要、
 是、胡、風、費、大、家、的、前、一、條、學、習、的、要、求、而、編、成、的、他、的、主、要、
 是、胡、風、費、大、家、的、前、一、條、學、習、的、要、求、而、編、成、的、他、的、主、要、

怎樣自我學習

郭沫若等著 每冊定價一百八十元

最後我... 許多意見都是很好的，但因為「羣衆」篇幅有限，「羣衆」是羣衆的代言人，羣衆在羣衆... 能反映「羣衆」的意見... 全對的，我們希望今後... 也希冀讀者諸君... 編

本刊調整價目啓事

本埠自十卷七期（外埠自五月一日）起，調整價目如下：

每期零售	三十元
三月（六期）	一百八十元
半年（十二期）	三百二十四元
全年（廿四期）	六百一十二元

附：1 工人、學生訂閱（有確實證件者）可享受原定價對折之優待。

2 公教人員訂閱（有確實證件者）可享受原定價七折之優待

羣衆半月刊誌啓

本刊九卷合訂本

即將裝竣發售希讀者注意

群

卷

十

第

衆

版出日十三月四年四十三國民華中

羣衆雜誌第十卷第七期目錄

哀悼羅斯福總統……(二二六)——這裏沒有猶疑……(二二七)——
小磯滾蛋，鈴木登台(二二八)

民主巨人羅斯福

介紹頓巴敦橡樹會議特輯
論頓巴敦橡樹會議關於國際安全組織的建議案 茹純(二三三)

關於頓巴敦和平建議案的十六個問答
國際聯盟為什麼失敗的？ B·夏特羅夫作(二三七)

1945 第一
季大 卷方 經濟
還在度着冬天 許滌新(二四一)
工業圈內 卓芬(二四五)
三個月金融 劉芳華(二四九)

抗戰期中大後方的農村經濟 金明(二五二)
農民在歷史上的創造力 沈友谷(二五六)
漢奸創子手會國藩的一生 范文瀾(二六〇)

★ 在民主運動中知識婦女應該做些甚麼？ 座談記錄(二六八)
學校與民主運動 徐颯(二七〇)
認識人民大眾的力量 有石(二七一)
投向人民的海洋 習人(二七二)
從自己的週圍作起 張莞(二七二)
附語 編者(二七五)

郭沫若先生與中國古代研究 尹達(二七五)
精武覆蓋着甚麼？ 蘆蕪(二七九)
羣英會(本刊特約邊區報導) 吳伯蕭(二八二)
村選(木刻) 彥涵(對面)

羣衆

第十卷 第七八期

三十四年四月三十日出版

編輯者 羣衆雜誌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總經售 新華日報館

本刊價目

本期刊費 六十元

六期 一百八十元

十二期 三百二十四元

廿四期 六百一十元

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照加

時評 哀悼羅斯福總統

美國大總統羅斯福於十二日因病逝世，噩耗傳來，實深哀悼！羅斯福總統的逝世，恰在克里米亞會議開幕不久的現在，恰在歐戰勝利在望，太平洋對日反攻正趨緊張之際，恰在舊金山會議行將召開的前夕，對於整個美國人民，對於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無疑的都是一件很大的損失。特別是中美兩大民族的友好團結，在羅斯福總統執政以來，得有長足進展，他的逝世，使我們中國人民深感到哀悼！

羅斯福總統執政如於一九三二年，迄今十二載有餘。在這悠長的期間之中，他曾經歷了國內外各種大的事變。高舉了反法西斯的大旗，進行了歐亞兩洲的反法西斯戰爭，他始終站在全世界人民的最前面，担負着最重大的責任，成爲美國歷史上傑出的傑出領袖。

羅斯福總統能於一時見到孤立主義的罪惡，毅然走上國際合作的道路。而尤其偉大的，是在首肯認爲到反法西斯的道路上，必須與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反法西斯的侵略者聯謀取合作。羅斯福總統執政不久，由於孤立主義及緩進主義的罪惡政策，使西歐民主的侵略者，籠罩着整個歐洲，羅斯福總統並不顧孤立份子的一切反對，在一九三三年與蘇聯恢復了邦交。這四年來羅斯福總統更採取了聯蘇的政策，使自由主義的美國與共產主義的蘇聯在沙俄西歐戰爭中結成了鞏固的聯盟。當德寇背信棄義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進攻蘇聯的第二天，美國政府便發表聲明，以痛斥德寇對蘇聯的「奸詐的攻擊」，表示願意援助蘇聯，翌日羅斯福總統又正式宣布：「美國決於可能範圍之內，全力援助蘇聯」。一九四二年五月，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訪美又簽訂了美蘇租借物資及經濟互助協定，同時在軍事上對蘇聯要求開闢第二戰場也達到完全諒解。自此以後，美蘇關係即保持著很親密的團結。兩國的關係，在德黑蘭會議與今年的克里米亞會議，才其表現了空前的友好。

關於他的聯蘇政策，羅斯福總統在去年大選時曾這樣說：「我引以自豪

的早期的外交政策行動即一九三三年的承認蘇聯」。他稱克里米亞會議爲美國「歷史的轉捩點」。他清楚認識到：美國本身的利益，即與目前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和戰後世界和平與民主是分不開的，也就是說，只有包括蘇聯大強國的國際團結，才會是持久的團結。

羅斯福總統對於倡導建立世界安全制度的理想，有光輝的供獻。他於一九四一年發表了關於未來世界人類四大自由的原則，同年八月發表的大西洋憲章也就是他起草的。大西洋憲章的原則，在克里米亞會議的決議中，轉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他領導的聯巴拿馬會議，奠定了戰後安全機構的開端。

羅斯福總統的偉大建樹，不僅表現在國際外交政策上，而且也運用在處理國內問題上。自從新政實施以來，例如社會安全法，全國勞工關係法，工資與時間法等社會改革，在美國現有的制度下，對於廣大美國人民與工人是有着一定的利益的，誠如美共協會副主席丹尼爾所說：「美國歷史上從沒有像羅斯福政府那樣給工人，黑人和一切民衆力量以這樣大的組織自由和權利」。因此也不難了解，爲什麼在去年大選時，擁有六百多萬會員的產業工會聯合會及其所領導的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那聲熱烈擁護羅斯福的選票。主要原因就是因爲羅斯福在美國是一面民主的旗幟，是美國各階層反法西斯人民民主合作的象徵。

至於對於我國的抗日戰爭，羅斯福總統一貫地採取同情和友誼的態度，自太平洋戰爭以來，美國成爲我國的戰友，羅斯福總統並不願孤立主義分子

的阻撓，採取促進我國團結和積極援助我國的政策。現在，這位偉大的反法西斯政治家和他戰中良友——羅斯福總統不幸逝世了，我們中國人民在同樣哀悼之際，希望繼承他的政治家按照羅斯福總統的方針，領導美國人民，完成他的遺囑法西斯主義，建立民主的和平的世界的遺志。

這裏沒有猶疑

——迎舊金山會議

舊金山會議不因羅斯福總統之死而延期，正是紀念羅斯福總統最好的辦法。他死了，他的事業正在開花。

然而重要的，不是舊金山會議的延期問題，而是舊金山會議的能否如期開會。在這一點上，由於羅斯福總統的逝世，參議院對舊金山會議的延期及代表團的責任加重了，聯合國各國人民的責任加重了。

如所週知，自從二月初克里米亞會議決定於四月二十五日召開舊金山會議以來，各聯合國開會地點，舊金山會議的討論和決定的有關問題，曾發生了不少的困難。舉其大者：

(一) 第一次參加聯合國會議的會員國問題：這問題包含了該國臨時政府出席會議以及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共和國兩個獨立國參加會議的問題。這是蘇聯和英美之間的主要問題，這一問題直至今日尚未解決。

(二) 對於賴巴敦換領會議案本身的問題：丁奧爾諸共和以威爾遜總統方案，聯合國全體大會權力太小，安理會權力太大，他主張加強全體大會的權力，使全體大會和安理會之間的權力趨於平衡；法蘭西曾提議賴巴敦建議和克里米亞會議一致同意，其意甚難，它主張加強國際和平與安全機構所許可的國際制度來補充和挽救五大常任理事國所負一致同意權採取行動的困難。這是聯合國中小國和英美蘇等大國之間的主要問題，這一問題大會中才能解決。

(三) 舊金山會議中的實際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指出的是關於戰後世界經濟的布魯森森林方案，這一個方案是戰後大會所採納，作為戰後世界經濟復興的藍本方案呢？這一方案是四十四個聯合國國家的專家所建議，但直至今日英美內閣反對此一方案，英美不承認其入。這一方案是在舊金山會議中提出的，其主眼地是英美之間的問題，但可能在英美之間引起更大的爭論。這是一項極大的責任，英美雙方應尋求一個基本的解決。

所有這些問題都指出了英美蘇之間存在着很不小的距離，要求參加聯合國會議各，在會前和會中的努力才能得新解決，但不可忽視：高壓強迫而的談判程度遠大於他。差別程度，儘管舊金山會議目前通過了若干當時的政治困難，同盟國家是有充分可能克服這種困難的。今天同盟強國在和平問題上的分歧，不大於往日在作戰問題上的分歧，假若同盟強國能克服這些困難，那末，戰後國際的團結，他們是有充分把握的。克應當前困難，鞏固戰後國際的團結，使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基礎。

然而防止新國際危機，消滅戰爭的政治和經濟原因，假若舊金山會議只能制定一個妥善的防止新國際危機的憲章，而不能在消滅戰爭的政治和經濟原因上有所收穫，那末舊金山會議只算是完成一半的任務。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國際聯盟之所以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把它的注意力完全放在消滅戰爭的防上去了，這一次聯合國會議不願重

覆國際聯盟的覆轍，就得一開始就着手於消滅戰爭的政治和經濟原因的工作。一當這一個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上還沒有法西兩細國的話，這一個世界不能算安全，當這一個世界的任何角落上還沒有和平的人沒有飯吃的話，這一個世界不能算和平的。為要達到這一目的，只有一條路：在全世界的範圍內建立起足以保證消滅法西兩細最後形跡的民主政治，在全世界的範圍內建立起足以消滅飢餓和貧困的工業經濟，在全世界的基礎上執行世界規模的工業化計劃，把全世界所有落後地區上的一切落後制度推過工業化的洪爐，不遺餘地忘記。這是一項世界性的三分之二的土地和人口沒有走上工業化的途徑。

這就是舊金山會議，不，是全世界的進步人類所實現的明天，這是一項明天的偉大事業。實現這一偉大的客觀條件是具備了，當前的困難是主觀上的準備。這是一項偉大的事業，這是一項偉大的事業，這是一項偉大的事業。

這是一項偉大的事業，這是一項偉大的事業，這是一項偉大的事業。這是一項偉大的事業，這是一項偉大的事業，這是一項偉大的事業。這是一項偉大的事業，這是一項偉大的事業，這是一項偉大的事業。

(四月十七日晚)

小磯源蛋·鈴木登台

八個半月以前，盟軍在塞班島的勝利，打倒了東條內閣；現在，盟軍在沖繩島登陸成功，打破了日寇「轉換戰局的希望」(合衆社傳東京「讀賣新聞」的評論)，和蘇聯廢除蘇日中立條約，又推翻了小磯內閣。

除了軍事上的失敗以外，從破產的納粹德國手中，日寇看到了自己的前途；特別是現在，日寇不願想到英美在歐洲強大的陸海空軍不久將出現在東方；而且強大的紅軍也不知在什麼時候會出項於日本的北方陣線。最近，不僅日本人民對於軍部和勝利的信心在顯著的降低，而且日本統治階級內部，也有一部份人對戰爭發生了動搖，一般妥協的暗流，在潛滋增長。「時局嚴重，小磯內閣遂決定辭職了」(敵情報局公報)。

打著「舉國全力內閣」的招牌而上台的小磯內閣，實際上並不「強力」。雖然他拉攏了日本統治階級的大多數派來組織戰時內閣，可是各派派系的分歧，使小磯不能迅速而徹底地執行一定的政策。他個人好比一隻笨牛，鼻子上套着許多繩子，誰把繩子拉得緊些，他就多採納一些誰的意見。結果，小磯的具體政策，便只有不斷動搖，不斷發生漏洞，又不斷補綴起來，始終落後於戰爭形勢發展的後面。

先看經濟方面。以如何增產飛機為例：軍部單純從眼前戰爭的需要出發，要集中一切力量於飛機部門的增產；財閥則主張發展生產機噐，比較全面地提高全體軍需生產力，在這基礎之上來增產飛機。可是，去年末，小磯把三井財閥從軍需大員的椅子上拉走，代之以官僚吉田，以他執行軍部增產飛機的政策。可是這種只顧眼前成效的方法，使別的軍需生產部門遭受犧牲，將有招致整個生產力降低的危險。這種方法，敵報社評論之為「賠本生意」。於是，小磯不得不又來請教財閥。二月中，藤原當了內閣顧問。三月，其他一些財閥的代表又當了軍需顧問。

然而，八個多月以來的軍需增產成績呢？連小磯在最近的議會上，都不敢承認能維持水平。據日本官方的調查全要知縣(即以名古屋為中心的日本最大的飛機工業地區)六千個飛機工業的部份品製造工場，由於資材不足、熟練工人缺乏和工人的怠工，裝備不齊等原因，有六千多個設備閑置不用，而機器實際有效工作率，不過三五——四一·四%(見去年十月廿日東京「朝日新聞」)。加上盟機集中轟炸日寇軍需(飛機)工業的結果，日寇軍需(飛機)生產開始發生了危機。

除此以外，南方資源的被切斷，個別財閥(如專門投資南洋的石原)的瀕於破產，疏散工業的不就順利進行，上月十日起全國股票市場的一時停業，通貨膨脹的無法阻遏等等，說明着日寇經濟界發生了相當大的震動。

再看政治方面。小磯企圖維持和利用的急進派軍人堀川和浦本，由於小磯支持總體派，打散了他們將黨贊壯年轉化為納粹黨政變的野心，變成了小磯內閣公敵的反對派。新黨運動，也是雷聲大，雨點小，原來小磯想利用它來彌縫統治階級內部的裂隙，結果反而引起了更大的分歧，急進法西斯黨員分化出去了，新成立的「大日本政治會」，比解散的「黨政政治會」只多兩條腿(地方支部)，不過是舊政黨份子一張新畫的虎皮，沒有很大的政治力量。原來小磯想利用它來爭取更多的黨派，可是敵國的輿論已經對新黨表示冷淡，不是期待新黨如何動員全國的黨派，而是與新黨反骨。

敵統治階級內部對於小磯內閣的批評和責難，在他上台兩個月後便開始了，批評它「政治不連貫」，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不起作用。最近，這種責難更加劇烈起來。議會上，議員們進行了尖銳的質問戰，指出「內閣的政策力薄弱」，要求小磯說明「必勝信念的根據」。報紙的輿論也不斷對小磯的政策進行了大膽的批評，說他的政策是「偷安的敷衍政策」。

特別是日寇軍部內部，海軍和陸軍之間的齟齬，最近似乎發展成爲政策上的分歧。

首先是戰略的分歧。由於日寇是以有限的機噐軍，來抵抗不斷增加的艦

厚的盟方兵力，所以海軍方面主張：集中一切力量防衛日本本土；日本的艦隊，只用來防守日土沿海，以及保持日本海，黃海內本土和大陸的交通；南洋的戰線可以縮短。但是陸軍方面却不願縮短戰線，而打算在各地頑強抵抗。最近，琉球和琉球羣島的戰役，日本艦隊都沒有出來阻止盟軍登陸；戰爭只是讓陸軍打了，但海軍却把戰敗的主要責任推在陸軍身上。

其次，是對蘇政策的分歧。雅爾達會議後，當日寇延長日蘇中立條約的勢力已經絕望的時候，陸軍主張必須準備對蘇作戰；特別是少壯軍人和反蘇的關東軍閥，更主張仿效珍珠港的偷襲，首先侵入蘇聯國境，攻佔海參崴及其他戰略基地。但是海軍認為，日蘇中立條約雖然廢止，還並不等於宣戰，如果立即向蘇聯挑釁，燈蛾撲火，是非常愚妄的下策；應該儘量避免對蘇作戰，或者拖延開戰的時間。

在上述的鬥爭中，官庭，軍臣也站在海軍一邊，陸軍沉默了。於是，小磯只好丟下了日本法西斯那件破舊的百衲衣，留待「更加強力的內閣」來收場。

二

可是，新閣內的陣容，絲毫也不給人以「強力」的感覺。海軍在新閣中佔了四名，即首相鈴木、上次內閣留任的海相米內、軍需大臣豐田、和國務大臣左近司；「蘇聯通」東鄉茂德當了外相，陸相僅僅有一名新任航空總監不久的阿南大將，政治傾向不甚明顯；只能算是陸軍中的三等貨；像藤原那總的大財閥的公關代表一個也沒有；三個黨政黨份子（岡田、太田、櫻井）和一些二三流的官僚擔任着配角。不過，內閣的成份比小磯內閣要來得單純，因此，執行政策時可以減少一些動搖性。

鈴木當過八年的侍從長，和官廷方面關係極深，曾經是「二、二六事變」當時法西斯少壯軍人刺殺的對象。他代表着重臣和海軍，依仗着背後天皇的支持，壓抑着陸軍方面的不滿，迅速地組成了新內閣。這個內閣，是以官廷、重臣為背景的穩健派內閣，但同時仍然是軍部（海軍）內閣，戰爭內閣，帝國主義的侵略內閣。

那麼，這個內閣的政策將有什麼樣的特徵呢？

在太平洋方面，鈴木大體上將按照上述海軍的戰略方針，繼續戰鬥。對於蘇聯，雖然新內閣並不放鬆戰爭準備，但同時表面上却作低頭，讓步的

樣子，作各種「友好的」外交活動，以儘量避免，或者是延遲對蘇聯的戰爭。同時，新內閣將利用各種機會，或明或暗地離開，挑撥美蘇間的關係；並且用隱秘的方式，伸出和平觸角，窺伺着有利的時機，務求妥協的出路。對此，我們必須提高高度的警惕。

和鈴木組閣同時，反蘇的關東軍閥，朝鮮軍司令官板垣大將，和參謀次長秦彥三郎中將，都被換上了新人，任「現地某要職」的臭名遠著的土肥原大將，也被突然調回本國，當了一名沒有兵權的教育總監。為了防衛本土，兩名元帥杉山元和畑俊六當了最高指揮官，其他重要的軍事領導機關，也進行了大批調動。而且，日寇不顧犧牲，在琉球海面又進行了大海空戰。這一切，都顯示了新內閣政策的特徵。但是，無論如何，鈴木的政策是沒有成功的希望的。

首先，鈴木不能避免軍事上的失敗。其次，盟國無條件投降，消滅軍部的原則，將粉碎他一切和平妥協的陰謀。而且，與法西斯勢不兩立的蘇聯，決不會饒恕「幫助了德國反蘇戰爭」的日寇。還有日寇內部的經濟危機，鈴木也沒有辦法克服。當他的政策發生嚴重破壞的時候，少壯軍人和陸軍將會起來反對他，或者是統治階級內部會產生投降的傾向，總而言之，鈴木內閣不是一個強力的內閣，而是一個過渡的內閣。

啓事

本期計有下列文章被審查機關檢扣，不能與讀者諸君見面：
民主世界的道路
過去一年的財政

民主巨人羅斯福

華民

美國大總統佛蘭克林·德羅諾·羅斯福，受命於危難之際，十二年來始終站在美國人民的前面，領導美國從經濟危機走向穩定，從孤立主義走上國際合作，參加了消滅全世界法西斯主義的戰爭，創設了保證戰後世界和平的機構的雛型。

正當德國法西斯瀕於崩潰，日本軍閥四面楚歌的時候，正當舊金山聯合國會議快要開幕，世界各國開始以民主的方式，規劃戰後長期和平合作的時期；羅斯福總統不幸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以腦溢血逝世。羅斯福之死，對於美國，對於世界，都是一個難於彌補的大損失。這位民主的巨人是怎樣一個人呢？這里打算就他生平事蹟，作一個概略的敘述。

羅斯福於一八八二年一月二十日，生於紐約州的海德公園。父親是一個地主，母親是一個船商的女兒。美國第二十六屆總統共和黨的提奧多·羅斯福，是他的繼房堂叔。

他在幼年的時候，就旅行了不少地方。他曾在哈佛和哥倫比亞大學求學，當過短期間的律師，一九一〇——一三年任州參議員，一九一三——二〇年任海軍部副部長，出席凡爾賽會議。

一九二八年，他當選為紐約州長，兩年以後連選連任。他在州長任內進行了很多進步的社會福利法令，如減輕農民賦稅，實施保護土壤工程，廣設植林等。一九三一年經濟大恐慌襲來時，羅斯福繼任其他州長會商應付方針。紐約州是第一個撥款救濟失業的州。一九三二年，他當選為總統，一直對他的日子還擔任著總統，先後共四次當選，為美國歷史上總統任期最長的人。

他在一九三三年春上任，正當瀕瀕於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恐慌達到最高峯，富人一天比一天富，然而非常不安，窮人愈來愈窮，而極度憤慨的時候。其時三十家銀行，控制二百家企業，統治著全國全數的工業和半數的存款。物價因不景氣而狂跌，人民的購買力十分低落。失業工人達一千七百萬，連同他們的家屬，佔全國人口三分之一，各地公家救濟機關已無法維持。數百萬赤貧的農夫，受高利貸的壓迫，捨棄了他們的田莊，走投無路。

羅斯福總統在一九三三年春上任，正當瀕瀕於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恐慌達到最高峯，富人一天比一天富，然而非常不安，窮人愈來愈窮，而極度憤慨的時候。其時三十家銀行，控制二百家企業，統治著全國全數的工業和半數的存款。物價因不景氣而狂跌，人民的購買力十分低落。失業工人達一千七百萬，連同他們的家屬，佔全國人口三分之一，各地公家救濟機關已無法維持。數百萬赤貧的農夫，受高利貸的壓迫，捨棄了他們的田莊，走投無路。

「新政」救了美國

以一九二三年至二五年的工業生產指數作為一百的話，那麼一九三三年則只有五十九，建築業則降至十四，工廠產出的指數低到五十九，工廠所付工資的指數低到三十七，通貨火力的指數低到五十五。農民一塊金圓的購買力僅值半圓。「合理化」的辦法和「新資本主義」的口號，已經無法挽救這樣的危機。

在羅斯福總統以內行逆施的辦法，加深了這樣的危機之後，在美國經濟瀕於崩潰之際，羅斯福登台實行「新政」，以當風行的手段，把美國從瀕瀕之中搭救出來了。

羅斯福的「新政」，主要是在限制獨佔金融資本和企業資本的非法利得，縮小其投機的範圍，使其不至成為社會的大害，同時，扶助中小企業和工農大眾，使其不致受資本家和地主的過重剝削。

他在競選前指出反動的胡佛政府的險惡道：「據說拿破崙在滑鐵盧所以戰敗，是因為他忘記了他的步兵——他太倚賴於騎兵了。目前美國政府的情形正和他相似。它不是忘記了，就一定是忘記起我們經濟軍中的步兵了。這偶不愉快的時期，需要……由下而上，而不是由上而下的計劃，需要當局把信託委託在形成經濟學字塔底層的那些被遺忘了的人們身上。」

他的競選演詞說：「一七七六年時我們曾從英國皇室中獲得特權的保皇黨手中取得自由……在現代文明中，經濟保皇黨們編成了各國新的皇朝」

。新的皇室建立在集中統制一切物資的手段上。通過通用社會，銀行，工業新機構，勞力和資本——這些是祖先們夢想不到的——等等新方法，現代生活的全部機構已經被迫替換他——忠誠地服從了。……在經濟的不平等之下，我們所爭取到的政治平等是毫無意義的。一小集團的人已經完全操縱了別人的產業，金錢，勞力——生命。

由於這種，他的「新政」第一次措置就是發佈「緊急銀行法」，以控制所有的資金。貧民本來就沒法買，所以受打擊的，只有富人。

他的「農業調整法」和農村經濟委員會，保證了農民的收入，提高了農民的購買力。他的「工業復興法」和國家復興委員會，則提高了一般人與購買力，減少了失業恐慌。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的整個計劃的目的是在「增加工人和農民的購買力，由此使農產品和工業製造品能得到市場，資本家，工人和一般消費者都獲得利益」。這樣的辦法，當確乎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因為在貧民方面，購買力提高的意義就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富家方面，在驚慌恐慌，產品毫無銷路，前途一片黑暗之中，覺得羅斯福替他們找到了市場。

然而托辣斯和大銀行家們，在驚魂稍定之後，眼見經濟崩潰的危險漸漸消除，就開始對羅斯福進行凶狠的攻擊，一九三五至三六六年間，新政的一些根本法案先後被美國最高法院，以與美國憲法相抵觸為理由而宣布廢除，這之後，羅斯福和保守的最高法院和國會之間，一直進行着相當尖銳的鬥爭。從大體看，勝利却大半是屬於羅斯福的。

孫哲生先生說得好：「美國有政治民主而無經濟民主，蘇聯兼而有之，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是沒有經濟上的民主的，但羅斯福的新政，却減

殺了經濟專制主義者的氣憤，可以說，羅斯福政府把美國引上了立憲經濟的道路。他的主要方法是安撫窮人，聯絡富人，而打擊富人中的頑固份子——經濟上的獨佔資本家和政治上的獨立派和專制派。這種政策，和獨佔資本家所應聲呼胡佛，柯立芝和哈丁政府的政策，是截然不同的。

羅斯福就任總統以後，一反前任胡佛的反動做法，容許工人有組織的自由。一九三五至美國各工會會員只有四百二十萬人，今天有組織的工人已經有一千五百萬以上，對於政治的影響也一天比一天大了，這是特別值得注意的事情，因為從這一個例中，可以看到把民衆的手腕縛住，國事一定弄得一團糟，讓人民有團結起來的機會，國家才能欣欣向榮。

不妨拿希特勒和羅斯福比一比。羅斯福當任總統是希特勒當任不久以前。德國在一九三三年時遭逢着同樣的經濟大恐慌。在希特勒當任總統的時候，希特勒也進行極端黨一次果斷措施。而對於同樣的難題，兩人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解決辦法。

在執政的最初幾個月間，羅斯福把銀行暫時封閉，減低了官吏的薪俸，制定了許多重征富人捐稅，農業貸款和救濟失業法，命令國會長期開會，研討改革計劃。他在這期間，未對一家報館，未干涉任何政黨，未取消民主憲法中一個字，未逮捕一個人。

希特勒怎樣呢？在執政的最初幾個月間，他以武力來解散國社黨以外的一黨政敵，逮捕政敵四千，把共產黨員處死，所有報紙全受檢查，下令凡其他各黨開會，均將加以開槍射擊，逮捕國會超然派議員一百多人，出版，集會，舞臺上和私人通訊的言論自由權，完全被取消。

羅斯福的道路，是限制獨佔資本運動的道路，希特勒的道路，是鞏固獨佔資本統治的道路。

十二年前如此，到今天，我們看到在希特勒領導之下的德國人民，遭逢着大災難。在蘇聯和盟軍下的美國人民，却面對着勝利和光明。

國際民主的戰士

在對外政策上，羅斯福高瞻遠矚，接受了威爾遜總統空想主義的教訓，同樣，毫不留情地切實地和國內的孤立派鬥爭。這些孤立派的政客，是最近視門反動黨和法西斯主義的應聲蟲，他們說大門雖主觀在今天條件之下，仍應完全適用，美國的利益只存在於西半球之內，太平洋阻礙很可藉保護美國；美國的經濟和政治的獨立地位，根本不會受到任何方面的威脅等等。一部份孤立派，如波拉尼，尼伊，克拉克等人，是農業三十區的代表，這些農業州區距離海岸很遠，在大陸腹地，因而這些地帶的人，很多以為世界其他部分的戰爭，是決不會把他們所居的地方捲進漩渦中的。在這「安」全感下面，他們目光如豆，用十九世紀的眼光來描繪二十世紀的世界。孤立派中另一批代表——參議員惠勒和塔夫特，前總統胡佛和前總統威爾遜，以及林白上校之流，則反映着德國資本有密。聯繫那些資本集團的利益。這「孤立」條伙，在美國參議院中，一貫地宣傳他們對中國，阿比西尼亞，西班牙，捷克斯蘭等國侵略事件的「不干涉」態度，同時却在事實上給全世界視民主的反動勢力以同情的支持。在美國參議院，他們一會兒主張「西守東攻」，一會兒主張「立即和平」，惟恐德日法西斯失敗。在「反對權力政治」的煙幕之

也，他們反對美蘇的團結，在「歐洲未化的宣傳」之下，他們反對美蘇的團結，在「同情弱小民族」的藉口之下，他們想吞吃英國的殖民地，在「中共力量不足道」或「中共力量過份強大」的說法之下，他們想阻中國進行內戰。一句話：他們唯恐天下不亂，不主國際合作，而主張「美國第一」的帝國主義。

羅斯福對於這些政客，一貫地進行無情的駁斥和打擊。他在今年一月間的國會咨文中說：「永久和平所賴以建立的國際工作，不是一條筆直的路，國家與個人一樣，觀點未必相同。……我們不要忘記二十五年前，我們所以選擇獨立主義……上次的戰後我們的幻想破滅以後，我們寧願國際無政府主義，而不願與我們觀感不盡相同的國家採取國際合作！我們放棄了逐漸實現較好和平的希望，因為我們在一個公認不完美的世界裏沒有履行我們責任的勇氣。我們不要再讓它發生，否則，我們就要再走向那條悲劇的歧路，遇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遺毒。」

這樣的話，代表著這位大政治家的遠大眼光。早在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事件前後，羅斯福還是二個中學生時，他就在學校的辯論會中主張保護中國土地權的完整，主張菲律賓應獲得獨立。對於國際政治的這種進步的看法，他一直保持到死的時候，在他晚年尤其顯得堅定。

羅斯福就任總統不久，就和斷絕了十六年邦交關係的蘇俄，恢復了正常關係。自一九一七年蘇維埃政權建立以來，美國始終不曾承認蘇俄。羅斯福第一舉動，當然是美國外交政策上的一個重大步驟，也是當時國際關係上一個重大事件，它的歷史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假如沒有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的英蘇復交，後來的英美蘇反軸心同盟也就無法想像了。美國的正式承認蘇俄，可以說是國際反法西斯陣營最輝煌的里程碑。

羅斯福政府既不願和希特勒在歐洲的侵略妥協

也不願和日本在中國的侵略妥協。一九三九年夏，英國的張伯倫政府還在向日本作新的讓步，而於七月二十四日簽訂英蘇協約，有出協定，接受了不給中國抗日軍民以任何援助的約束，過了兩天，羅斯福就宣佈廢棄美日通商航海友好協約，以相抗衡。一九四〇年十月，當德國於艦隊被圍後企圖順勢向東侵略，而對美國作調人，來和英法開始和平談判的時候，羅斯福拒絕了這種請求，而且往後他又拒絕了一切類似的企圖。羅斯福預見美國日後終有一天要和侵略國家發生軍事衝突，很早就提出了他的「海軍建設計劃」，作未雨綢繆之計。

他在一九四〇年底的「爐邊講話」中說：「過去兩年的經驗，使我們知道沒有一個國家是可以和納粹妥協的。沒有人能用手段而使猛虎變成小貓的。對殘暴惡心的人，是沒有妥協可言的。和一個危險的強者是不可可能的。……我們必須是民主政治的大兵工廠。」所以，他不管反對的國會軍事舉動，會用一切力量來幫助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蘇聯，英國和中國。

日本於一九四一年挑起了珍珠港事件，使美國終於參加戰爭，這件事證明了美國的孤立派反動派的叫囂完全違反民族的利益，孤立派的信譽一落千丈，羅斯福就更放手推行他的促進國際合作，保護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

在美國參戰之前不久，羅斯福和邱吉爾在海上草擬「大西洋憲章」，提到了「尊重一切民族有自由選擇其統治形式之權」。一九四三年，和邱吉爾在卡薩布蘭卡開會，發表了軸心國須「無條件投降」的聲明。同年十二月，和斯大林及邱吉爾在德黑蘭開會，制定了東西夾擊納粹的計劃，奠定了戰時戰後美英蘇合作的基礎。今年二月間，又和斯大林及邱吉爾在克里米亞開會，更具體地確定了確立全世界戰後和平的辦法。

羅斯福總統所親自參加了的德黑蘭會議和克里米亞會議及其決議，對人類的前途，關係極大。那是因為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主要的

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在戰爭與和平的主要問題上如果沒有協議，不但這次大戰將拖延時日，多犧牲千百萬人的性命，而且戰後和平也不易持久。第三次世界大戰也就不易有必能避免的保證。羅斯福是認識這個問題的。所以他和英蘇兩國領袖鄭重宣言：「我們表示我們的決心：我們的國家在戰爭方面，以及戰後的和平方面，都將共同工作。」這樣的決心，鼓舞了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對於未來歲月的信心，同時，使人類中的波濤洶湧不起頭來。

羅斯福對於這次克里米亞會議的決議，既重視，又積極。他把這會議稱為「美國歷史上的轉捩點」，在國會中報告會議經過的時候，他說：「希特勒所希望的就是我們的意見不能一致——就是在盟軍團結的緊要中或將發生一絲微小的縫隙，以致使他和他的黨羽持有最後逃脫其惡運的希望。這是他的宣傳機轉動以來的目的。但希特勒失敗了。過去主要盟國從容決定這團結一致。——不但其作戰目標沒有後遺症，和平目標也沒有像這樣團結一致過。決定繼續使愛好和平的國家彼此團結——這樣，維持世界和平的理想，才可以成爲事實。」

對於世界和平，羅斯福一貫具有崇高的理想，認爲和平的基礎在於民主自由。他說：「在我們正想獲得安全的未來歲月中，我們預期世界和平的基礎將建築在四種人類自由的要素上：①言論與發表的自由，②宗教信仰的自由，③生活需求自由，④無所戒懼的自由。」這四大自由，現在已經爲全世界爭取進步的人民的家喻戶曉的標準了。

不幸，羅斯福來不及看到自己的理想的實現和對外政策的開花結果，竟死在聯合國會議開幕之前，死在希特勒和日本滅亡以前，死在各國明和的的法西斯細菌完全殲滅以前。對於美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這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全世界進步的人民在沉痛的心情中，將加倍地努力和法西斯惡魔搏鬥，爲全人類爭取民主自由，完成羅斯福所遺留的偉大事業。

論頓巴敦橡樹會議關於國際安全組織的建議案

張純

(一) 矗立在一九四四年的政治激流中

在二十幾年的時期之內，人類竟兩次陷入了世界戰爭的慘禍之中。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間只有一段極不穩定的和平，這只是個人從出生到成長為壯丁年齡的時期。當第二次戰爭進入結束階段的時候，全世界自由人類便不禁要想到：我們能不能在這次戰爭以後，永遠避免另一次戰爭的災難和不幸？我們能不能為全世界愛好自由的各民族人民保證一個和平幸福繁榮的勞動生活？

當然的，贏得戰爭，並不能保證獲得和平。所有一切變好自由的國家都是抱持和平的志願，參加到這法國戰爭中來的。需要和平與安全，這是大衆一致的目的。這道理實在淺顯，法西斯侵略者既然進行戰爭，挑動戰爭來破壞了世界的和平，毀滅了人類的文明，以它底獨夫統治的殘虐和殘暴來壓迫人民，窒息理性，毀滅文化，踐踏科學……那末，所有抱持對法西斯野獸不共戴天的仇恨而團結起來共同作戰的愛好自由的國家，當然就不能僅僅以打敗法西斯侵略者為滿足。換句話說，沒兩樣事情雖然以流血的戰爭加在世界人民身上，那末，世界人民就要求以獲得他們作重大犧牲的和平，以對得起他們所流的鮮血的和平，當作代價來償還給他們。在這裡，像和我，誰都不能逃避這個重大的責任。

自從斯大林格勒大捷轉變了整個戰爭形勢，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進入了戰略反攻的階段，在歐洲打贏希特勒法西斯的日子就逐漸逼近了。而隨着戰爭形勢的發展，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的一個共同的需要——保證戰後給他們以永久和平的需要也日益成熟，而把在戰時就必須確定戰後和平基礎的歷史課題，提上了反法西斯民主聯盟的議事日程。

一九四三年十月間，在莫斯科召開了蘇英美三國外長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除討論對德戰爭中的軍事——政治問題外，還曾在特別邀請中國政府參

加之下，討論到戰後和平問題。會後發表了著名的「中美英蘇四國普遍安全宣言」，在這宣言中，四國一致承認「必須在可能實行的最早時期，確定一種普遍的國際組織，以所有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為基礎，這些國家不論大小都可加入為會員國，以維護國際的和平與安全」，宣言中所提出的四國政府所同意的諸原則，就是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廣泛組織必須以合作為基礎的一般原則。正因為只是一般原則，只是國際和平機構的創意，因此，它說還不是國際和平機構的最後的已經成為法律形式的規章。莫斯科會議以後，在各國內部和各國之間，便熱烈展開了對於國際和平與安全組織的廣泛的討論。

這種關於戰後和平組織的討論，在美國輿野更是廣泛展開了。美國報紙連篇累牘發表了許多國際問題專家的意見，出版界中也充滿了關於戰後和平問題的書籍，官方的和民間的研究所戰後問題的機關團體也紛紛發表意見。起來，國務院的檔案裡堆積了個人或團體提出的關於戰後和平的計劃。這些並不稀奇的事情：美國的對外關係很久以來就受着獨立主義路線的指導，美國人民渴望參加到戰後世界民主大家庭的建設事業中來。就在這種對戰後問題的討論中間，還可看見美國孤立主義者以各種偽善新姿，繼續欺人玩弄的喧嘩。但是，在所有關於戰後問題的討論中，起指導性影響的是美國參院以八十五票對五票通過的「康納利決議案」，這是美國參院非黨派委員會主席康納利所提議美國應該參加戰後世界和平組織的提案。一九四四年初的幾個月內，美國國務卿赫爾即曾與德羅斯科宣和康納利決議案的日期，和美國參院民主共和兩黨領袖共八大，進行了連續的會商，以擬定美國對於戰後和平組織的初步計劃。這項工作於同年五月間大體完成，而於五月二十九日，赫爾就發表正式聲明，美國準備就和平機構問題，與英蘇舉行「非正式會議」。羅斯福總統後來與國務院官員繼續就國際組織的戰後工作進行了多次會商，並於六月十五日第一次發表關於戰後國際組織問題的談話。其後，七月十七日，赫爾就宣佈已向中英蘇三國發出邀請參加非正式會議的請柬，但同時聲明

，中蘇兩國代表將不參加這一會議，各機關分兩階段進行，第一個階段是美蘇英三國會談，第二個階段是與中法三國會談。分爲兩個階段會議的原因是蘇聯尚未參加對日作戰，不便和中國代表同時商討。三天後，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情報局發表聲明，蘇聯接受邀請，定期和英美就「普遍安全組織」的主要問題，舉行非正式的討論。

會議日期原定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四日，後來因便於蘇聯政府獲得充分時間從事準備，三國會商停頓，改在八月二十一日在華盛頓郊外賴巴敦橡樹（勞佛大·研究院大廈）舉行。美國代表團由當時副國務卿斯退丁紐斯率領，英國由外交員德爾率領，蘇聯由駐美大使葛羅米柯率領，中國由駐英大使顧維鈞率領。

英美蘇三國會談於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一日開幕，而於九月二十八日結束。原定舉行三週，後來又延長了三週。延長的起因是因爲討論到一些具體問題時，由於意見的分歧而發生了若干困難，因此需要作較長時間的討論，以期獲得廣泛的協議。到會議結束時，據斯退丁紐斯於九月二十七日宣佈，三國在討論各點上已有百分之九十成立了協議，其餘各點則成爲懸案，保留到後來三國外長或三國領袖會議去解決。第一階段會議所完成的工作是具體決定性的，因此，第二階段會議——美中英三國會談，於九月二十九日開始，後一個星期內（十月七日）就結束了。

兩個階段會議結束後，中英美蘇四國便就成立協議各點製成一個「國際和平與安全組織建議案」，而於十月九日同時在四國首都發表。這個建議案就是建立在一九四四年世界政治激盪中的俄大砥柱。這個文件所以稱爲「建議案」，則是因爲它是由四國「非正式會議」產生的，獲得四國政府批准，然後作爲基礎，召集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於一九四五年內舉行聯合國大會，予以討論和通過，才能成爲法律形式的憲章。

（二）能夠期望發生充分效果嗎？

賴巴敦橡樹會議的偉大決議，是走向戰後世界民主大家庭的一座新的里程碑，充分標誌着反法西斯民主聯盟的團結合作關係的鞏固發展。

建議案中規定未來的國際和平機構名稱應爲「聯合國」，其組織系統包括：（一）全體大會，由參加會員的一切大小國家組成，每一會員國都有一投票權；（二）安全理事會，有理事十一席，其中五席爲常任理事，由美

英蘇中法五國充任，其餘六席爲非常任理事，由大會選出，任期兩年，每年更換三國。（三）國際法院，所有會員國都是當然參加份子，非會員國只要安全理事會向大會建議通過，也可參加。（四）經濟與社會理事會，由大會選出十八會員國代表組成，任期三年。在經濟與社會理事會之下再設由專家組成的經濟委員會和社會委員會。（五）秘書處，包括由大會經安全理事會之推薦而選出的秘書長和若干必要辦事人員。（六）軍事參謀委員會，由安全理事會中常任理事國的參謀總長或代表組成。（七）其他必要的輔助機關，隨時可以設立。

這件建議案內容，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關於國際組織的宗旨和原則，有極明確的規定。我們常說「只有團結，才有和平」，這雖只是消極的一面，積極的一面應該是「爲了和平，必須團結」。建議案中所規定的國際組織的宗旨充分表現了這種國際團結的積極精神，如第一章第一節規定「採取有效及集體步驟，以防止並消除對於和平的威脅，並防止侵略行動或其他破壞和平之行動，並以和平方法解決足以破壞和平的國際爭端」；第二節規定「發展國際友誼關係，並採取其他適當步驟，以加強普遍和平」；第三節規定「在國際經濟社會、道等問題方面，求得國際之合作」。而在原則方面，也充分表現了國際團結的精神。國際組織的原則不是別的，就是民主集中制。民主的一面表現在它尊重一切愛好和平國家的主權平等，規定國際組織必須以各民主和平等爲基礎；表現在它嚴厲會員國以和平方法解決爭端，避免在國際關係中採用與宗旨不符的武力。集中的一面，表現在它把會員國必須援助國際組織所採取的一切行動，而不得援助國際組織的對象，規定爲會員國應盡的義務；表現在它對非會員國也有政治上的約束力，國際組織要使非會員國行動符合宗旨。

第二、防止戰爭維持和平的大權，集中在安全理事會，安全理事會擁有第八章所規定的特殊權力。根據規定，安全理事會有權調查任何爭端，責令會員國以和平方法解決爭端，並提供適當的程序和方法；安全理事會有權採取外交經濟和軍事的制裁行動，以維持和恢復國際和平與安全。凡需採取行動的國際爭端，以及正爲安全理事會所處理的問題，大會均不得自動有所建議。同時，根據規定，安全理事會在履行自己的職務時，代表所有會員國，因此各會員國應負責接受安全理事會的決議，警備安全理事會應隨時召集，並依據憲章切實執行。安全理事會是常設機關，工作是繼續不斷的，每一理事國都有常川駐會代表。正因爲這樣，所以，未來的國際組織就擁有充分的力量

，掌握着一切必需的手段，足以隨時採取迅速敏捷有效行動，來防止和消除對和平的任何威脅，及時制止侵略的行動，在侵略情勢處於萌芽的狀態時，就把它消滅；也正因为這樣，通過安全理事會，就把維護和平的直接責任放在居領導地位的國家的身上，而使其無法躲閃和推諉。

第三、未來國際組織有一個反對侵略防止戰爭的特殊機構，這就是「軍事參謀委員會」。建議案中規定，軍事參謀委員會有權在軍事需要問題有關的一切方面，向安全理事會提供意見和予以協助，並在安全理事會之下，對於提供給安全理事會的武力，擔任戰略上的指揮責任。換句話說，軍事參謀委員會在平時對制敵侵略的軍事需要作經常的研究和計劃，而在採取軍事行動時則負責實際上的作戰指揮的責任。這項特殊機構的設立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安全理事會只有在這項特殊機構協助之下，才能充分發揮它的制敵侵略的職權。建議案中還規定安全理事會得在軍事參謀委員會協助之下，在特別協定範圍內，規定武力使用的計劃，包括會員國所應提供的軍隊數目和種類，此項都除實力的準備程度以及隨時聽令調遣同一目的計劃。

第四、就是區域辦法。建議案中明白規定不排除區域組織的存在。為了應付以就地處理為宜的與維持國際和平有關的事件，安全理事會可以用和緩區域辦法和區域組織，採取與宗旨和原則相符的在其權力範圍之內的行動，來解決地方性的爭端。我們知道，任何國際爭端或足以引起爭端的情勢，在其發展的最初階段，都具有地方性質，因此，必須採取這種因地制宜地解決的靈便辦法，來在國際爭端發展的最初階段，就把它解決。由此可見，協約性的區域辦法確是一種防止和平威脅的必要而靈便的手段。

第五、就是設立經濟和社會理事會，作為在大會權力之下的一種專管區域，負有在實際上協助國際經濟社會以及人道問題的解決，促進對於人權和基本自由之尊重的責任，以造成國際間和平友好關係所必需的安定與幸福的情況，消除戰爭的社會的經濟的原因。這是一種極為合理和必要的措施，因為設立這種一種促進國際經濟社會合作的事務機構的結果，可以使安全理事會集中全力於防止戰爭與維持和平的重大責任。

最後，就是建議案中關於投票程序的規定。除了安全理事會的投票程序當時沒有解決外，其餘關於大會和經濟社會理事會的投票程序都有明確的規定。建議案中規定：每一會員國在大會中有一投票權。重要決議，包括有關維持和平與安全之建議，選舉安全理事會之理事，選舉經濟社會理事會之理事，接受新會員國，停止會員國權，開除會員國，以及預算等問題

，均應以到會會員國投票三分之二決定之。其他問題，包括開列問題之否否以三分之二表決一，概以過半數決定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之決議，則應以到會投票之多數決定之。這種明確的規定，顯示了對於威爾遜總統的願望，所謂威爾遜願望，即一切決議概須全體出席代表同意，如有一國代表投反對票，該決議案即不能成立。舊國際聯盟的投票程序就是根據這種不台民主集中原則的觀點，因而使國際聯盟變成軟弱無能，極易遭受破壞的一種國際結合。

願巴教檢樹會議建議案內容上的這些特點，生動地顯示着對於人類將來是有遠大意義的一個巨大成功。自然，計劃和機構無論怎樣完善週密，其本身並不能夠保障世界和平。世界和平的維持要靠反法西斯民主聯盟，特別是美英蘇三國的團結合作。願巴教檢樹建議案不過是提供一個特別機構，經過這個機構，民主聯盟各國之間的合作才能發揮有效的作用。斯大林說得好：「我們能期望這種世界組織的行動是有充分效果嗎？那會有效果的，如果在對希特勒德國進行戰爭中肯當其衝的偉大強國繼續以一致和諧的精神採取行動的話。那會沒有效果的，如果這個必要條件被遺棄了的話。」

(三)令人驚奇的不是爭端的存在

不庸諱言，也不必諱言，關於國際和平與安全問題，在蘇美英三國之間，是存在着爭論的。國際和平與安全問題，是一個極大的複雜的問題，解決的途徑，不是那麼在短促的時間內就可以找尋得到的。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必須考慮到一切愛好和平國家的共同的直接利益，必須考慮到歷史提供的經驗。因此，更難在解決這樣重大問題的時候，不會或不應發生爭論，那倒是令人覺得驚奇的。

依舊是斯大林說得好：「爭論自然存在的，關於若干別的問題也會引起爭論的。就選在同一政黨中的人士之間，也會有意見的衝突。在不同的國家間不同的政策的代表間，就更會發生意見的衝突了。令人驚奇的事實，並不是三大國家間爭論的存在，而是爭論竟這麼少，並且實際上，在每一點上，總是以團結和協調的精神解決了。關係重大的倒不是爭論，而是這些爭論並沒有超過三大強國的團結利益所允許的範圍，並且這些爭論畢竟依照這種團結的利益而解決了。」

那末，在願巴教檢樹會議上到底有一些甚麼樣的爭論，這些爭論到底是

怎樣使國際利益解決了呢？

的確，爭論是並不多的，主要的集中在下面這樣幾個問題上：(一)安

理事會的組織問題；(二)安理事會的投票程序問題；(三)武力維持和平問題。

如上節所述，安理事會案擬着防止戰爭維持和平的大權，負着保障國

際安全的主要責任，因此，對於安理事會組織的爭論，本質上也就是對

於怎樣才能保障國際安全組織發揮有效力量的爭論。在討論的最初，英美

提出由四個常任理事國和七個非常任理事國組成安理事會，蘇聯不同意這

種組合，因為在這種組合中，顯然較小國家的地位是太大了，蘇聯主張較小

理事國的席位不應超過大國。對這個問題的討論發展下去，就成為小國的表

決權問題，小國和大國的關係問題，小國的職權責任和大國的職權責任問題

。這些問題在原則上就是保障國際安全的責任應該直接由大國來負擔呢，還

是國家無分大小一律平均負擔？在原則上，三國都同意各國在國際安全機構

中的責任和權力，必須和它抵抗和防止侵略的力量成正比例，都一致否定威

爾遜的陳腐觀點，即各國在國際機構中的權力和責任應該「平等」。可是，

在這原則的解釋和具體的運用上，三國便發生了程度上的分歧。蘇聯認為：

國際和平組織必須適應世界力量關係的實際情形，如果目前戰爭證明租

界對德日作戰的主要責任是落在大國身上，那麼也將證明在戰後，決定的力

量依舊是在大國身上。如果較小國家比大國還分擔着較大的權力，則未來的

國際和平機構的效力必不可避免將受到損害。英美則認為忽視小國的權力，

特別是忽視小國的感情，則國際機構的效力可能同樣受到損害。討論到後來

，連同法國的地位一併考慮，才成立協議，安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增加一

席，由法國擔任，非常任理事國則減為六席，仍就是十一席。

關於安理事會的投票程序，比較上是一個更大的爭論。這個問題，頓

巴會議後會議上並沒有解決，後來在克里米亞三國領袖會議上才把它解決了

。頓巴會議後會議上討論到一般的投票程序問題，三國也只在一般的原則上

同意修正舊國聯的缺點，放棄威爾遜的「理想主義」的觀點，而贊成到會投

票的多數或三分之二，即可成立決議，可是在討論安理事會的投票程序時

，三國的意見就發生了分歧。蘇聯當時認為安理事會的一切決議，無論以

多數或三分之二投票通過時，其中必須包括五大常任理事國的投票在內，換

句話說，安理事會的一切決議，必須五大強國一致贊成。英美方面（中國

也一併）則提出不同意見，認為如果常任理事國為國際爭端當事國的一方，

則該常任理事國對安理事會的決議沒有投票權，而由其他常任理事國和非

常任理事國投票過半數（七票）通過，即可成立。這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

一個表面問題，而在實質上則是五大常任理事國對安理事會的一切決議是

否必能一致贊成，任何理事國是否對涉及自身的爭端的決議都有絕對的否決

權（只要他反對，決議就不能成立）。這個問題當時無法解決，後來在克里

米亞會議時，就直接由三國領袖在懇切的會議中把它解決了，蘇美兩國隨

公佈，解決的辦法是這樣：

①「安理事會理事國每國應有一投票權」。

②「安理事會關於程序事項的決定，須由理事國七國投票贊成」。

③「安理事會關於一切其他事項（投票程序事項以外的一切其他事項

）的決定，須有包括五常任理事國在內的七國投票贊成。但依第八

章第一節及第八章第三節第二項而作決定時，爭端的當事國不参加

投票」。

依第一項規定，即國家無分大小，地位一律平等。依第二項規定，就是

安理事會對程序事項（詳第六章第四節）作決定時，只須理事國的七國

投票贊成，而在這七票中，可能不一定完全包括五個常任理事國，即使一個

以上的常任理事國不贊成，只要其餘七國投票贊成，決議便可成立。依照第

三項規定，情形就比較複雜了。因為，照這項規定，安理事會對除程序事

項以外的一切其他事項作決定時，必須有包括五常任理事國在內的七國投票

贊成，反過來說，如果有一個以上的常任理事國反對，則議案就不能成立。

可是，這項規定却有一個「但書」，就是安理事會根據建議案第八章第一

節和第八章第三節第二項作決定時，與爭端有關的或為爭端的一方的理事國

，就沒有投票權。這裡，我們要弄清楚的，就是：必須五個常任理事國一致贊

成通過的是那些事項？爭端當事國之一方的理事國沒有投票權的又是那些事

項？

先說爭端當事國之一方的理事國沒有投票權的事項。根據建議案的規定

，第八章第一節是關於「和平解決爭端」的規定，而第八章第三節第二項則

是關於「利用區域辦法」的規定。這幾節規定中包括的事項主要有：(一)安理事

會對於某一國際爭端可能引起爭端之形勢，不要調查；(二)安理事會要

不要責令與爭端有關各國自行利用談判、調停、妥協、仲裁等和平方法解決

該項爭端；(三)爭端各國不能自行解決時，安理事會不要提供適當的解決

辦法；(四)安理事會不要將司法性質的爭端提交國際法院解決，並提供解

決意見；(五)安理事會不要對某一地方性爭端授權區域辦法和區域組織解

決。對上述這些「要不要」做的事項，在安全理事會作決定時，爭端當事國之一方的理事國就沒有投票權。而這些事項，就其性質來說，都只是維持和平的初步的措施，並不需要動員和使用國際外交經濟軍事力量的措施。常任理事國之一，在這種場合，即使失去投票權，對世界政治形勢沒有影響，情理上可以不加阻止。

至於五個常任理事國必須一致投票贊成的事項，根據建議案的規定，就是第八章第二節「威脅和平和侵略行為之判斷以及應付此種情形之辦法」的規定和第五章第二節關於安全理事會有權向大會建議的事項。其中主要的包括：(一)安全理事會對任何威脅和平的侵略行動的判斷；(二)安全理事會對採取武力以外的外交經濟等辦法維持和平的決定；(三)安全理事會對採取必要的軍事措施以維持和平的決定；(四)安全理事會對管理軍備制度的建議；(五)安全理事會對新會員國，停止開除或恢復會員國資格大會的建議。對上述這些事項，安全理事會作決定時，五大強國必須一致贊成，才能付諸實施。這些事項在性質上則是關於在初涉紛爭不能解決爭端時為維持和平所必需的後期的措施。這些措施，本身就是巨大的政治轉變，影響國際政治至為深巨，所以，必須把這種維持世界和平的主要責任直接加予五大強國身上。這道理極為淺顯，五大強國擁有世界絕大部份武裝力量和经济資源，只有他們才能充分地擔負起進行現代的戰爭。

至於動員武裝力量以維持和平的問題，頓巴橡樹會議上，經過長期討論，已經成立一致協議，具體表現在建議案第八章第二節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各項。自然，在未成立協議以前，也是存在着爭論的。本來，未來國際和平組織必須有最低限度的武力，以便為了避免和防止戰爭起見而發生軍事需要時，立刻動員和運用這種武裝力量，這是蘇美英三國大體上所共有的觀點。可是在實際辦法上，在動員和運用武力的程序上，三國却有不同的意見。蘇聯主張成立國際航空隊，以便適應緊急情況的需要，而由指導機隊隨時出動；並主張各大國應彼此成立協議，負起以武力供給安全理事會的責任，而隨時進行防禦侵略的準備。英美則反對包括國際空軍在內的任何國際警備隊的計劃，英國主張由「四大盟國」最高軍事當局合組軍事參謀委員會，受安全理事會節制；美國則主張各國應供給安全理事會使用武力的數量種類以及各種便利的「一般協定」，並附保留條件，即凡有美國參加的此類協定，必須經美國參議院批准後，安全理事會才能在包括美國代表在內的大多數代表通過採取行動時，有權動用美國的武力。後來，綜合三國觀點，才成立了廣泛的協議，在建議案中規定，所有會員國必須保證，一經安全理事會決定和號召，便須依照彼此締結的各種協定，供給安全理事會以使用武力的一切便利。武裝力量的動員和使用，只須安全理事會決定，不

必經過大會討論，發應立即予以執行，以免拖延時日，行動遲緩。此外，並規定成立軍事參謀委員會，在軍事的需要一切問題上，協助安全理事會，並向其負責。

除開上述這些主要爭論外，其他如關於聯合國大會的職權問題，國際機構中政治組織和經濟組織的配合問題，國際法院章程問題，中立國家或退出戰爭的軸心國家參加組織的問題等等，都會發生了若干意見上的分歧，但都不是主要的，而且在會議上一般的很快就以和諧一致的調解解決了。

在解決這些爭論時，無論在當時頓巴橡樹會議上和後來克里米亞會議上，蘇美英三國所遵循的原則是：第一，維持和平的主張責任，必須由民主強國直接負擔；第二，民主強國對國際事件的處理，必須採取共同政策和一致行動。

(四) 理想主義呢，還是現實主義呢？

歷史不止一次提出關於組織和平防止戰爭的課題，對這問題最大的經驗就是上次世界大戰後產生的「國際聯盟」。可是這大試驗却遭受了嚴重的失敗。二十幾年的經驗證明：「國際聯盟」不但沒有能力負擔保障和平防止侵略的任務，而且在許多場合甚至助長了侵略的氣焰，到這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便不得不歸於完全的破產。很顯然的，在設計和討論關於新的國際和平組織的時候，是不能不考慮和估計國際聯盟的這種悲慘的失敗經驗的。

在形式上，頓巴橡樹計劃和國際聯盟，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都有獨立的平等的國家組成的大會，常任理事國和非常任理事國代表組成的權力機關，國際法院等組織；對和平解決爭端和動員外交經濟軍事力量以制衡侵略，都有若干相同的字樣；都承認集體安全制度是維持和平的唯一原則。但是，在實際上，頓巴橡樹計劃和國際聯盟是有着本質上的差別的。

第一，新的國際和平組織是一個具有廣大的世界性的組織，不但將包括在現行反法西斯戰爭中負有領導責任的所有世界各國，而且將包括一切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就是非會員國在維持和平所必需的時，也要受這個新組織的政治上的約束力。新國際組織的這種廣大的世界性，是與國際聯盟係是完全符合的。如果作為領導國家的主要國都對新國際組織中來，那麼，戰爭時期發展起來的他們之間的團結合作就能夠在戰後繼續保持下去，就能够在這種團結合作的基礎之上保證國際的和平與安全；如果所有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都能夠獲得機會對世界和平的共同事業貢獻出自身的努力，而取得各民族國家間密切有效的合作，則世界和平的保持是完全可以指望的；又如果非會員國也要在政治上受世界組織的約束力，則任何以非會員國

的地位或以退讓組織其手段來破壞世界和平的共同事業，就成為不可能了。這就說，這種世界組織的集體力量，在戰後的任何時期，都比可能的復原力是強而固的。國際聯盟則不是這樣。國際聯盟不是這類的初期直到共式徵的年代，而排除了蘇聯，而中國則從未包括在內。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美國則在二十世紀末佔世界第一位的頭等的資本主義國家，而這兩國，國際聯盟曾有幾十年來，組織中來，這就使國際聯盟在實際上不是一類有巨大的世界性的組織，而不是一類排他性的不成功的聯合，這和特種的聯合是截然不同的。這也就說，愛好和平的國家應力是組織國際聯盟，而沒有組織起來，而且是被人工地分開了。在國際聯盟成立時，對蘇聯力是永遠是落在落後的情況之中。這就使蘇聯與巴爾幹在下一個階段上，四月廿五日在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大會將討論和通過巴爾幹提議案，而聯合國大會的發起國包括目前的主導國（中、美、英、蘇）在內，這就使蘇聯在國際聯盟成立的最初，就沒有參加組織中來。

第二，新的國際和平組織反映着「人民世紀」的政治潮流，反映着今後國際國內民主團結的主要政治傾向。「人民世紀」世界合作的決定關鍵直接表現在「聯合國」的組織與構成之中。新國際組織的巨大的世界性，同樣，是和國際國內民主形勢的發展相適應的，特別是與國際和各國內部民主力量相結合而適應的。我們只要舉出五大常任理事國的國際關係和國內關係來，就可以證明這理論的正確。在這五個國家中，蘇聯是以消滅了階級為特徵的社會主義的強國，英美則是以先進的民主主義和強大的勞工運動為特徵的資本主義。中國是以進行武裝的民族民主革命為特徵的東方各民族解放鬥爭中舉國的代表，法國則是歐洲從烽火中鍛鍊出來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代表。戰後將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長期和平共居的局面，也將是先進民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相輔相依的局面。新國際組織的構成，很明顯的是和這種局面完全適應的。國際聯盟與此相反，它開始組織起來的時候，就被設計為反對蘇聯及人民反任何民主革命的政爭的一種工具，在它的初期十四年中，它反映着戰後戰勝國反對蘇聯領導革命的白色恐怖主義的政治傾向，因而和戰後世界民主革命運動的高漲不相適應；而在它從一九三三年起最後衰微沒落的幾年中，它又反映着西歐列強一貫縱容侵略國家的「緩靖主義」的政治趨勢，和這何時世界反侵略陣線的發展，更是不相適應。這種反對侵略的固有性質，於在它垂死的行動上表現了出來，如在一九三九年底，以反對的芬蘭統治階級的行動者自居，而排除了蘇聯的會員國籍。

第三，新的國際組織把維護世界和平的主要責任，通過安全理事會，直接加於民主強國首先是英美蘇三國身上。民主強國如果聯合使用他們的力量

，世界的和平就能夠保持；反之，民主強國如果走入衝突，則任何世界機關都不能夠挽救和平。任何世界機關，既然不能夠改變世界力量的實際關係，則就不能夠不根據實權和權力的大小，使之適應各國阻止戰爭維持和平的實際能力的不同。這是很明白的道理：比方，在歐洲，我們就不可能想像，對英美蘇三國不能夠保持合作，直接引起和平的。實來的時候，波蘭、捷克斯、希臘、土耳其、南巴尼亞的聯合力量，究竟能夠對歐洲的和平起什麼決定作用。同樣，這也說明自衛的道理：假如民主強國在處理任何國際爭端的時候，都對付面而來，既不能要外交在頭，又無法玩弄各種規避政治責任的手段，這就存在着多大的和平和爭論，最後仍不得以國和議的方式予以解決。這道理，可以知道，任何有效的國際制度的關鍵就在大國能，能負起這類的責任。國際聯盟恰恰就是這種情形，它把國際安全問題，拋給法國獨自來，按照自負為「民主」的義務，把防止戰爭維持和平的責任，拋給法國獨自來，平均負擔，因此規定一項盟約，要求國際聯盟的一切政治決定，都需全體會員國一致通過，其結果集結安全的表面責任，便非常虛弱地分配在各個不平等的大國身上，而若干小國又在國際中起的作用，就和他不負責任政治中的地位，全不適合。這種規定便使若干大國可以在小國後面，玩弄花頭，規避責任，甚至如德意侵略國，更利用了小國代表，當做他們的開路，對國際的決定進行了無限制的破壞。

最後，新的國際組織具有維護和平所必需的軍事手段。巴爾幹提議案中規定由常任理事國參議首長或代表組成軍事參議委員會，作為安全理事會的軍。計劃和軍事手段的執行機關，而為了執行緊急行動，並在條文中規定了特定國度的空軍部隊立刻受調遣，執行聯合的國際或備行動，安全理事會在此這軍事參議的決定時，可以不經過大會討論，便可付諸實施。從這些規定看來，新的國際組織是強大的，有武力作後盾的，就有一切必要的手段，憑藉這些手段，就應能充分發揮維持和平的作用和效果。國際聯盟就不是這麼一回事，國際聯盟具有關於軍事制裁的含糊的規定，而缺乏任何共同行動的軍事機關的準備。同時，國際聯盟在執行任何軍事需要的決定時，還須交付大會討論才能生效力，因此，實際上，根據這些空文的條文而希望運用武裝力量是困難的。當行動比條文重要的時候，條文對行動便成了桎梏，束縛了行動的自由。

以上所述各點，是巴爾幹提議和國際聯盟本質上的主要差別，那末，巴爾幹提議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呢？這就是：巴爾幹提議是根據出於的，根據經驗的總結，而不是無主觀的幻想，不是離開世界實際力量關係去設想和平的。國際聯盟則恰恰相反，不從世界實際力量關係出發，而是憑主觀的願望，想法，而是新世界實際力量關係去設想和平的。一個是設想求現的現實主義，一個是掩蔽反動意識的幻想主義。這就是兩者本質上的區別。

頓巴敦橡樹會議商定的國際安全組織的建議案

茲建議設置一命名為「聯合國」的國際組織，它的憲章應包括足以使下列建議案發生效力所必需的條款：

第一章 宗旨

本組織的宗旨應是：

- (一) 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並且貫徹那種目的之採取有效的集體的措施，以防止並消除對於和平的威脅，制止侵略的行動，或其它破壞和平的行動，並以和平方法使可能引起和平破壞的國際爭端獲得調解或解決。
- (二) 發展各國間的友好邦交，並採取其它適當措施，以加強普遍的和平。
- (三) 在解決國際上經濟的，社會的和其他人道問題方面，求得國際的合作。
- (四) 產生一個中心，協調各國的行動，以達成這些共同的目的。

第二章 原則

爲了實現第一章中所述的宗旨，本組織及其會員國，應該遵照下列原則而行動：

- (一) 本組織應以所有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的主權平等的原則爲基礎。
- (二) 本組織的所有一切會員國，應履行依照憲章所負的義務，以保障他們全體都能享受由於爲本組織的會員而應享的權利和利益。
- (三) 本組織的所有一切會員國，當以和平方法解決他們的爭端，務使不致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
- (四) 本組織的所有一切會員國，在他們的國際關係中，應避免與本組織的宗旨不符的任何方式從事武力的威脅或使用。

- (五) 本組織的所有一切會員國，對於本組織依照憲章條款所採取的任何行動，當給予各種協助。
- (六) 本組織的所有一切會員國，對於本組織正對它採取預防性或強制性行動的任何國家，不得予以協助。本組織應保證：舉如果在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上有必要時，非本組織會員的各國，也應與本組織共同而行動。

第三章 會員

所有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都應加入爲本組織的會員。

第四章 主要機構

- (一) 本組織應有的主要機構爲：
 - (甲) 大會；
 - (乙) 安全理事會；
 - (丙) 國際法院；
 - (丁) 秘書處。
- (二) 在必要時本組織應設立其他的輔助機關。

第五章 大會

第一節 組織

本組織的所有一切會員國，都應爲大會的會員，各會員國代表人數應依照憲章的規定。

第二節 權利與權力

(一) 大會應有權考慮在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方面的一般合作原則，包括關於統轄裁軍和調撥軍備的諸原則，有權利討論由本組織的任何一個會員國或幾個會員國所提出的與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有關的任何問題，并得對於任何這類原則或問題，有所建議。凡必須採取行動的任何這類問題，在討論以前或在討論以後，應由大會提交安全理事會。大會不得自動對於由安全理事會處理的對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有關的任何事情有所建議。

(二) 大會應有權根據安全理事會的建議，接受新會員國參加本組織。

(三) 大會應有權根據安全理事會的建議，停止由安全理事會對其採取預防行動或強制行動的本組織任何會員國的任何會員權利或特權的行使。這樣被停止的權利或特權的行使，可由安全理事會的決議予以恢復。大會得根據安全理事會的建議將不遵守憲章中所含諸原則的本組織任何會員國，從本組織中予以開除。

(四) 大會得選舉安全理事會的非常任理事，以及在第九章中所規定的經濟與社會理事會的理事。大會得根據安全理事會的建議，受選選舉本組織的秘書長。大會得按照國際法院規程執行和選舉國際法院法官有關的各種職務。

(五) 大會得在本組織各會員國之間分攤經費，并得授權批准本組織的預算。

(六) 大會爲了促進在政治經濟及社會領域中的國際合作，并爲了調整將妨礙公共福利的情勢，應發起研究，并有所建議。

(七) 大會得提供建議，以便國際經濟的社會的以及其他專門的機關，依照這類機關和本組織之間的協定而和本組織發生聯繫，在政策上取一致行動。

(八) 大會得接受并考慮安全理事會的常年報告及特種報告，以及本組織的其他團體的報告。

第三節 投票

(一) 本組織的每一個會員國，在大會中都應有一投票權。

(二) 大會的重要決議，包括關於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建議，安全理事會理事的選舉，經濟與社會理事會的選舉，會員國的入會，會員國權利與特權行使的停止，會員國的開除，以及預算諸問題，都應由到會的會員國三分之二的多數投票表決。關於其他諸問題，包括屬於應

由三分之二的多數投票表決的諸問題的另外種類的決定，大會的決議，只要由過半數投票表決。

第四節 程序

(一) 大會應在定期常年大會中集會，必要時并得召開臨時大會。

(二) 大會得採擇本身的程序規則，并推選每次會議的主席。

(三) 大會得授權設立爲了行使職務認爲必要的團體和機關。

第六章 安全理事會

第一節 組織

安全理事會應由本組織的十一個會員國各推派一個代表組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美利堅合衆國的、大不列顛與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的、中華民國的、以及經過適當時期法蘭西的代表，都應爲常任理事。大會當選舉六個國家以充非常任理事。那六個國家當被選出爲期二年，每年有三國退席。他們不得立即連選連任。在第一次選舉非常任理事時，應由大會指定三國任期爲一年，三國任期爲二年。

第二節 主要職務與權力

(一) 爲了保證能由本組織採取迅速而有效的行動，本組織的會員國應由憲章使安全理事會對於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負起主要責任，并應同意：安全理事會根據這種責任而履行這些任務時，就是代表各會員國行動。

(二) 安全理事會於履行這些任務時，應遵照本組織的宗旨與原則而行動。

(三) 爲貫徹這些任務而授予安全理事會的特別權力，規定在第八章中。

(四) 本組織的所有會員國應接受安全理事會的決議，并遵照憲章條款予以執行。

(五) 爲了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建立與維持，爲了儘量使全世界的人力和經濟力不致喪用於軍備起見，安全理事會，由第八章第二節第九款所述軍事專家委員會協助，應負責擬定關於建立軍備調整制度的計劃，以便提交本組織的各會員國公決。

第三節 投票

(一) 安全理事會理事國，每國應有一投票權。

(二) 安全理事會關於程序事項之決定，須有理事國七國之贊成票。

(三) 安全理事會關於一切其他事項之決定，須有理事會七國之贊成票，但常任理事國之同意票在內，但依第八章第一節及第八章第三節第一條第二句而作決定時，爭議之當事國應不投票。

(註) 本節投票權在巴拿馬會議中，並未決定，在克里米亞會議上，經美英蘇三強領袖會議以後才獲得協議。本節修正全文，係依照本年三月五日舊金山會議邀請對各聯合國所發出之請柬書所申述者。中文原文則係我國外交部所譯出發表者。

第四節 程序

(一) 安全理事會應如此組織，以便能繼續不斷行使職務，而安全理事會之每一個理事國，應有代表常川駐在本組織的總部。安全理事會應在認為最便於工作的其他地點舉行會議。安全理事會應定期開會，安全理事會的每一理事國，如果願望，可以由政府大員或其特派代表出席會議。

(二) 安全理事會在執行它的職務上認為必要時，有權設立其他團體或機關，包括軍事參謀委員會的地方分會。

(三) 安全理事會得採擇自己的程序規則，包括推選主席的方式。

(四) 安全理事會對任何問題的討論，如認為該項討論對本組織某一非理事會國利益有特殊影響時，該會員國將參加討論。

(五) 在安全理事會中沒有理事席位的本組織的任何會員國，以及非本組織會員國的任何國家，如果他們是在安全理事會考慮下的爭端的關係國，就應被邀請來參加和這種爭端有關的討論。

第七章 國際法院

(一) 應該設立國際法院，以構成本組織的主要司法機關。

(二) 該法院應依照附在本組織憲章之後而成為本組織憲章一部份的規程組織起來，並執行職務。

(三) 國際法院的規程，應該或者是(甲)國際常設法院的規程繼續生效而加以合意的修改；或者是(乙)以國際常設法院規程為基礎，而草成一份新規程。

(四) 本組織的所有一切會員國，都應該承認國際法院的規程上的當然關係。

(五) 非本組織會員國的國家，可能成為國際法院規程上的關係國的情況，應由大會根據安全理事會的建議，就個別場合予以決定。

第八章 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包括防止與抑止侵略的辦法

第一節 爭端的和平解決

(一) 安全理事會應受權調查任何爭端，或可能引起摩擦或產生爭端的任何情勢，以便決定這種爭端或情勢的繼續發展下去，是否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

(二) 任何國家，不管是不是本組織的會員國，都可將這類任何爭端或情勢提請大會或安全理事會注意。

(三) 凡繼續發展下去會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的任何爭端的關係國，理應首先由磋商，調停，和解，仲裁，或司法解決，或自行抉擇的其他和平方式以設法解決。安全理事會應要求關係國用這類方式解決他們的爭端。

(四) 然而，如具有上面第三段所述的性質的爭端的關係國沒有能够用那一段中所指明的方式解決這種爭端，他們就理應把這種爭端提交安全理事會。安全理事會應在每一場合決定分別的爭端的繼續發展下去在事實上是否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並由此決定安全理事會應否受理這種爭端，如果應該受理，就決定應否根據第五段採取行動。

(五) 安全理事會在具有上面第三段所述的性質的爭端的任何階段，應受權建議相應的解決程序或方法。

(六) 具有司法性質的爭端，應以正常手續提交國際法院。安全理事會應受權將與其他爭端有關的法律問題提交法庭，徵詢意見。

(七) 第一節到第六段的條款，不適用於根據國際法純粹屬於有關國家國內司法管轄範圍以內的事項所產生的情勢或爭端。

第二節 威脅和平及侵略行為的判斷及對付此事的行動

(一) 倘安全理事會認為沒有能够依照第一節第三段所指示的程序，或沒有能够依照安全理事會根據第一節第五段所指示的意見以解決爭端，而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構成威脅時，它應應照本組織的憲章和原

期，採取必要的任何措施，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

(二) 安全理事會，在大體上，應證實任何對和平的威脅，和平的破壞或侵略行為的存在，並應提供建議，或決定關於維持或恢復和平與安全的措施。

(三) 安全理事會應受權決定當採用何種外交的或不致牽制到武裝力量使用的其他措施，以實施它的決議，並號召本組織的會員國施行這類措施。這類措施可包括鐵道，海運，航空，郵政，電報，無線電，和其他交通工具的完全的或局部的中斷，以及外交與經濟關係的斷絕。

(四) 倘安全理事會認為這類措施不夠，就應受權由空軍，海軍或陸軍採取必要的行動，以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與安全。這類行動可以包括由本組織的會員國的空軍，海軍或陸軍實行示威，封鎖及其他軍事行動。

(五) 爲了使本組織的所有一切會員國對於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都應有所貢獻起見，他們當保證安全理事會，一經號召，就能依照他們之間所締結的一種或幾種特別協定，享用必要的武裝力量，便利及援助，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這類的一種或幾種協定，應統籌提供提供的軍隊的數目和種類，以及給予便利和援助的性質。一種或幾種特別協定，應儘可能從速商定，在每一場合，當應提交安全理事會認可，並應由簽字國家依照他們本國的憲法規定的手續批准。

(六) 爲了使本組織能採取緊急的軍事措施，本組織的會員國應依全國空軍分遣隊隨時能立刻調遣，以便參加聯合的國際強制行動。這些分遣隊的實力與準備的程度，以及他們聯合行動的計劃，應由安全理事會，藉軍事參謀委員會的協助，在上面第五段所述的一種或幾種特別協定中所規定的範圍內予以決定。

(七) 爲了執行安全理事會關於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決議所必需的行動，應由本組織的所有一切會員國合作一致採取，或由若干會員國採取，經安全理事會決定。本組織的會員國，應由他們自己的行動，並且經由他們是會員國的相應的特別組織及機關的行動，以貫徹這種義務。

(八) 關於應用武裝力量的計劃，當由安全理事會，藉下面第九段所述的軍事參謀委員會的協助，予以擬定。

(九) 關於設置軍事委員會，它的職務應該是：在爲了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理事會的事務需要有關的，和供安全理事會支配的武裝力量的使用。

指揮有關的，和軍備的調整有關的以及和可能的裁減軍備有關的所有一切問題方面，向安全理事會提供意見，並予以援助。它在安全理事會之下，負責關於供安全理事會支配的任何武裝力量的戰略上的指揮。這個委員會應由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的參謀長或他們的代表組成。本組織的任何會員國，沒有委派代表常用駐在委員會的，在爲了有效率地負起委員會的責任，需要那個這樣的國家來參加它的工作時，就該由委員會邀請與委員會共同合作。關於統率軍隊問題，當於隨後擬定。

(十) 本組織的會員國應共同互助，以實施安全理事會決定的措施。

(十一) 任何國家，無論是不是本組織的會員國，遭遇了由於實施已爲安全理事會所決定的措施而發生的特殊經濟問題，就應有權諮詢安全理事會關於解決那些問題的意見。

第三節 區域的辦法

(一) 憲章中不得排除區域的辦法或機關的存在，以便處理適合採取區域行動而與維持國際和平安全有關的事件，只要這類辦法或代辦機關以及他們的活動，與本組織的宗旨和原則相符。安全理事會應根據有關國家的創議，或根據本身的創議，鼓勵經由這類的區域辦法，或由這類區域代辦機關，解決地方爭端。

(二) 安全理事會，在相當的地方，得利用這類辦法或代辦機關採取它的權力下的強制行動，但是在區域的辦法下，或由區域的代辦機關，如未經安全理事會授權，不得採取強制行動。

(三) 安全理事會對於在區域辦法下或由區域代辦機關爲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所已採取的或意圖採取的行動，當始終經常獲得充分的情報。

第九章 國際經濟與社會合作的辦法

第一節 宗旨和關係

(一) 爲了要造成各國間和平與友好邦交所必需的安定與幸福的情況，本組織對於國際經濟的，社會的以及其他人道問題的解決，應予以便利，並應促進對於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尊重。關於這種職務的執行，應歸大會以及在它權力下的經濟與社會理事會負責。

(二) 各種特別的經濟的，社會的，以及其他組織和代辦機關，應負起他們

各自領域中照他們的規程所規定的責任。每一個這樣的組織或代辦機關，應和本組織發生關係，而依照經濟與社會理事會和特別的組織或代辦機關的相應的當局之間的協議所決定而提交大會認可的條件。

第二節 組成和投票

經濟與社會理事會，當由本組織的八十個會員國代表組織。爲了這事應選代表的國家，當由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三年。每一個這類國家，應派一名代表，有一選舉權。經濟與社會理事會的決議，應由出席理事投票表決。

第三節 經濟與社會理事會的職務和權力

(一) 經濟與社會理事會應受權：

(甲) 在本身職務範圍內執行大會的各種建議。

(乙) 對於有關國際經濟的，社會的，以及其他人道的事件，自動提供建議。

(丙) 接受并考慮和本組織發生關係的經濟的社會的以及其他組織或代辦機關的報告，并且經由和這類組織或代辦機關協商，與提供建議，以調整他們的活動。

(丁) 審查這類有關的特別組織或代辦機關的行政預算。

(戊) 使秘書長能對安全理事會供給情報。

(己) 應安全理事會的請求予以協助。

(庚) 執行他的一般權限範圍內可能由大會指派的這類其他職務。

第四節 組織和程序

(一) 經濟與社會理事會應設經濟委員會，社會委員會，以及這類其他必需的委員會，這些委員會應由專家組成。應有常川辦事人員，當構成本組織秘書處的一部份。

(二) 經濟與社會理事會應作適當的佈置，以便各項特別組織或代辦機關的代表得參加它的商議以及參加它所設置的委員會的商議，但沒有投票權。

(三) 經濟與社會理事會應自訂程序規則，以及推選它的主席的方式。

第十章 秘書處

(一) 應改設置秘書處，由秘書長和必要的辦事人員組成。秘書長應爲本組

織的行政長官。他應由大會根據安全理事會的建議而選出，任期和情況，悉照憲章規定。

(二) 秘書長在大會的，安全理事會的以及經濟與社會理事會的所有一切會議中，都應以這種資格行使職權，并應每年向大會報告本組織的工作。

(三) 秘書長應有權使安全理事會注意到他以為可能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任何事件。

第十一章 修正

憲章的修正，在由大會會員國三分之二投票通過，並且由在安全理事會佔有常任理事席位的本組織的會員國，以及半數以上的本組織其他會員國，依照各該國憲法程序予以批准時，就應對本組織的所有一切會員國都發生效力。

第十二章 過渡辦法

(一) 在第八章第二節第五段所述一種或兩種特別協定發生效力以前，依照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在莫斯科簽字的四國宣言第五段的規定，參加那個宣言的國家應互相商議，並且時機一到就應與本組織的其他會員國商議，以便代表本組織採取爲了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而必要的聯合行動。

(二) 憲章中的任何條款，不得妨礙由於現行戰爭的結果，由負有行動責任的政府，對敵國採取的，或受權執行的行動。

附註：

應該指出：若干別的問題也還在考慮中。

關於頓巴敦橡樹會議和平建議案的十六個問答

美國國務院在去年頓巴敦橡樹和平建議案發表之後，曾就這個建議案的內容，提出了十六個問題，並用簡明的語法解答了建議案全文的精神。這十六個問題最初發表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紐約時報」上，現特譯載於此，供大家作為參考。

一、問：何謂頓巴敦橡樹建議案？

答：頓巴敦橡樹建議案，是為建設一個國際性的組織而提出的建議，這項建議已由美、英、蘇、中四國代表，在華盛頓頓巴敦橡樹國會議時一致同意了。這個建議案發表於一九四四年十月九日。

二、問：這項建議案的用意何在？

答：這項建議案現在正由這四國政府考慮，目的在完成幾項留待進一步考慮的問題。已完成的建議案，然後將正式提交各國政府，作為全聯合國會議上的一個討論基礎。這項組織的憲章，即將在這個會議上起草。這個憲章應由各簽字國依照憲法手續批准。

三、問：這個建議案所設想的組織，將適用於那些主要方面？

答：在安全方面，這個組織應該設法防止戰爭的爆發，其方法是：一，鼓勵和平地處理或解決國際間的爭端；二，防止並消除對和平的威脅；三，如必要時，以聯合的力量鎮壓對和平的破壞。在經濟社會合作方面，這個組織應便利國際經濟、社會以及其他大道問題的解決，並促進對人權與基本自由的尊重。

四、問：這個組織將如何組織來施行職權？

答：藉全體大會，大會包括全體會員國代表，每年召集一次，在特殊場合亦可舉行之，每一國在大會中有一投票權；

藉安全理事會，由十一個會員國代表組成，其所以如此組織，是為的要能繼續不斷地工作。美、英、蘇、中以及法蘭西佔有常任席位，同時另外六個國家應由大會選舉，任期二年；

藉國際法院，本組織所有一切會員國，均應為參加國際法院的當然份子；

藉秘書處，包括若干專門人員，以一秘書長為首，秘書長為行政人

員首長；

藉經濟與社會理事會，由大會選出的十八會員國代表組成，任期三年；藉軍事參謀委員會，由安全理事會中常任理事國的參謀總長或其他代表組成，並規定必要時他國亦可參加。

五、問：什麼國家得成為這個組織的會員？

答：所有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均得加入為組織的會員。未成為原有會員的國家，得經安全理事會的建議，由大會接受其加入。

六、問：大會主要任務是甚麼？

答：其任務應該是：

一、為了促進政治、經濟、與社會各方面的國際合作，並為調整可能妨害公共福利的情勢起見，應發起研究並提出建議；

二、應研討並建議有關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一般合作的原則及問題，但大會不得自動地對於自由安全理事會所處理的任何有關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問題有所建議；

三、為調節各種與本組織發生關係的各專門機構的政策，大會應有所建議；

四、選舉安全理事會的非常任理事以及經濟與社會理事會的全體理事；並

五、對本組織之財政負責。

七、問：安全理事會維持和平的主要權力是甚麼？

答：它有權：

一、調查任何爭端或任何情勢，以即引起國際爭端或爭端之情勢；

二、召集各國以其自行選擇和平方法解決其爭端；

三、向各國建議，調查可能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爭端之適當程序或方法；

四、決定任何情勢是否危及和平或引起和平的破裂，並依照本組織的宗旨和原則採取任何必要的辦法以維持或恢復和平；

五、採取外交的、經濟的或其他辦法以實施其決議；並

六、如此種缺少武力的辦法於不足時，得使用海、陸、空軍以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

八、問：安全理事會將如何取得維持和平所必要的軍隊？

答：會員國之同意應為一種特別協定或他種協定，這項協定應由安全理事會核准。並由簽字國依照其憲法手續批准之。這項協定應規定軍隊的數目和種類，以及給於便利和援助的性質，使其便於安全理事會的利用。安全理事會得就本組織的若干會員國，或必要時就其全體，以提供軍隊、便利或如此商定的援助，包括會員國為使本組織可以採取緊急軍事措施而準備立時供用的國內空軍部隊。

九、問：安全理事會將如何使用其利用的軍隊？

答：除安全理事會調遣的武裝部隊，應按照安全理事會所擬定的計劃，由軍事參謀委員會的協助，在其當局統帥之下出動。這項軍隊的統帥問題，應於來日再行擬定。

十、問：關於管制軍備有何規定？

答：安全理事會應負責擬具管制軍備制度的計劃，提交各會員國。關於管制軍備及可能的裁減軍備的問題，軍事參謀委員會應對安全理事會貢獻意見。

十一、問：國際法院的職權是甚麼？

答：國際法院是本組織的主要司法機關，應對可以根據法律原則解決而提交給它的那些爭端，加以審議並行使判決。法院亦得根據請求，對安全理事會提供關於法律問題的法律問題的意見。

十二、問：經濟與社會理事會的主要任務是什麼？

答：在大會權力下行動的經濟和社會理事會，應負責：
一、便利國際經濟、社會以及其他人道問題的解決；
二、促進對人權及基本自由的尊重；
三、建議國際組織與可以同本組織發生關係的各種機構的行動，如已設計的「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國際勞工組織」

，已經提議的「國際貨幣基金與國際建設與發展銀行」，以及在教育、文化合作、衛生等方面的可能的其他專門機構。
十三、問：爲什麼美、英、蘇、中及法國，在安全理事會上應有常任理事席位？

答：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重要責任之所以落在這幾個國家身上，這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因爲從它們的力量和資源講，這些國家是最易於最有效地行使這種任務的。這種責任，應在全安全理事會權力之下並代表全組織履行之。

十四、問：在本組織中小國將有何等地位？

答：在大會中，小國的代表應與大國有平等投票權，在安全理事會中它們得享六個非常任理事席位，並參加一切重要的安全決議。本組織的一切會員國，在國際法院之前，均有平等的地位與平等的上訴權，並有平等的資格當選爲經濟與社會理事會中十八個會員國之一。

十五、問：聯合國之建立，對美洲體系及其他此類區域辦法有甚麼影響？

答：與聯合國組織的原則及宗旨一致的區域組織或區域辦法，將不受禁止。無論由當事國的提議或安全理事會的囑託，均應鼓勵此種區域組織或區域辦法從事適於區域處理爭端的和平解決。區域機構亦可用於強制行動，唯必須經過安全理事會的授權並由其監察之。

十六、問：在所提議的這個組織與國際聯盟之間，有些甚麼重要的區別？

答：一、與國際聯盟不同的是，在國際聯盟中，無論大會與理事會，都有同樣的一般權力，而在所提議的這個組織中，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重要責任是交給安全理事會的，同時大會得有主要責任，便利國際經濟、社會與其他人道問題之解決，並促進對人權及根本自由之尊重。

二、所提議的憲章，將使與本組織宗旨相背之任何方式的武力威脅或威脅，成爲非法，這與只以公然戰爭爲非法的國際聯盟的，是相反的。

三、所提議的這個組織將有權確保，非本組織會員的國家，只要對於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有必需時，即須依照本組織的原則行動，而國際聯盟對於非會員國進從契約的原則以維持和平，則無規定。

四、這個新組織，將不像國際聯盟，只有一個理事會，而是將更多

民主周刊

目要期三五十一、四十、三十

- 團結與軍權統一
- 釋黨派會議之說
- 團結要表裏如一
- 教育與民主生活
- 英國的民主生活方式
- 論效率
- 吃得飽與吃得到
- 法國戰時文藝
- 浙大民主浪潮
- 軍校學生生活

王 曉 愚
魯 小 詹
勞 生
胡 毅
黃 耳 興 譯
費 孝 通
胡 劍
聞 家 題
楊 明
天 父

★介紹閱定稿投迎歡★

號四十四道甬府明昆：址社

的專門理事會，包括安全理事會和經濟與社會理事會，每一個理事會在明確規定的各方面都有責任，都有不同的組織與權利以適合其特殊任務。

五、安全理事會，在軍事與非軍事的強制辦法上，將有比國聯所有的權力更大的權力，尤其因為在會員國間這幾個已設計的協定與辦法，將把兩個基本的義務加之於國聯所未明確承認的諸國，這兩種義務是：(甲)提供安全理事會維持和平所必須的軍隊，便利與援助，以及(乙)準備國內立即可以動用的空軍部隊，以便通過國際聯合強制行動實現緊急軍事措施。

六、在大會權力之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將有權不僅考慮經濟與社會合作方面所列表舉的各種問題，如國聯那樣，並且還要一就地便利這方面問題的解決。

七、國聯規定只把現存的國際機構置於國聯指導之下，目前的建議案規定，則與此相反，每一專門的經濟、社會、及其他組織或

機構，現有的或計劃的，都要在彼此協定的條件上與新組織發生關係。

八、行使於國聯中的一般規律，將不應用於新組織，除非以限制的方式與限制的事件範圍，但須另行確定之。大會應以三分之二的票數處理重要問題，經濟與社會理事會應以絕大多數投票提出建議。

九、國際法院為本建議的組織的重要機關之一，其法規為本組織的憲章的一部分，而非如國聯之國際常任法庭為一個從屬機關。

十、軍事參謀委員會為國際組織中一個新的特徵。

十一、將有條文規定，本組織中任何會員國，如已對之採取限制或強制行動，則其會員資格之任何權利或特權之行使即須停止，這是國聯盟約中所未包括的一項規定。

十二、本建議組織的憲章為一獨立文件，不像國聯盟約那樣被合併於凡爾賽條約及其他和平條約之中。

(光譯)

國際聯盟為什麼失敗的？

B·夏特羅夫作

國際聯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產物，它是和凡爾賽和約同時產生的，並且是作為一個號召維繫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組織而建立起來的。但是事實上由於它本身所有的各種缺陷和弱點，再加以在國際聯盟中起領導作用的幾個國家的政策，使得它在這二十年來的脆弱的和平中，不但不能解決國際間的糾紛，防止侵略與戰爭的危機，和真正地成爲一個維繫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機構，却反而成了一個縱容侵略和被利用作爲反蘇的工具。到了這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它終於和凡爾賽和約同時結束了它實際的存在了。英國的一位論國際聯盟的著作的作者齊門，曾經這樣講過：「張伯倫把國際聯盟一揆半賣的擲地，說有一天它將會長大，掩護在它枝葉下的人類。但是經驗告訴我們：國際不是一株樹木，而是一根對着吹過的每陣風都低頭的蘆葦而已」。這可說是對國際聯盟的一個最有興趣的比喻。

當此全世界各國的代表，正聚集在舊金山討論新的國際和平機構時，爲了不再重覆舊的國際聯盟的錯誤，就實有記取國際聯盟失敗教訓的必要。我們因此特將夏特羅夫的論國際聯盟的一篇文章譯載於此（原文載「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以供讀者參考。

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莫斯科英美蘇三外長會議的工作總結公報中所發表的四國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其中曾經這樣說過：「他們承認必須在可能實行的最早的日期，確立一種普遍的國際組織，以所有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爲基礎，這些國家不論大小都可以加入爲會員國，以維繫國際的和平與安全」。

大家都知道，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就曾經作過建立一種號召維繫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組織的企圖。國際聯盟的建立，就是這樣的一種企圖。這個組織的盟約，是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凡爾賽和約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樣地，這個盟約也是這個時期中其他許多和約，如聖日耳曼和約、特利安和約、納伊和約及塞佛爾和約的一個難以分割的部分（註一）。國際聯盟前後存在了將近二十年。它和凡爾賽和約同時誕生，它差不多又和這個和約同時結束了它實際上的存在。國際聯盟在形式上雖然並沒有解散，可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以來，它在實際上早已就不存在了。

現在，當聯合國最後戰勝希特勒的日子快隨近的時候，並且正在準備建立一個國際關係的組織，要以更大的可能保證愛和平的國家的自由與獨立不再遭受侵略者的危害和保證一個永久的和平的時候，來研究一下有關第一個以保障普遍安全爲任務的國際組織的失敗的原因的問題，實在是非常重要的。而更加重要的，就是因爲關於這個未來的維繫普遍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組織的形式與性質的問題，在各國的報章雜誌上已經常被討論着，並且還時常

成爲某些政治家們發表意見的對象。我們現在並不準備對這個問題的所有的意見，作一個完整的概述，而只想提一提其中那些專講國際聯盟及對於其活動的批評的意見。

在目前，當一部分的政治家、政論家和歷史家贊成建立一個與此前的國際聯盟毫無共同之點的組織的時候，另一部分的人士則傾向於復興國際聯盟，並想藉此來改正那些造成國際聯盟破產的弱點和缺陷。

對於國際聯盟失敗的原因的分析，也是非常複雜的。美國的財政家和學者米爾班克，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曾經這樣寫道：

「國際聯盟不可避免地是應該要滅亡的，因爲它是太理想了和太不現實了，並且它已經成爲一個保持現狀的工具和反對一切改變的敵人。爲了實現它最初的目的——保障普遍的和平，國際聯盟是更加無用，這是因爲它催眠了那些非侵略的國家，給與它們以各種虛偽的安全的感覺，而這些感覺就軟化了他們的意志，並且成了侵略國家可以利用的一個屏風，這些侵略國家就躲在這個屏風的後面，繼續安靜地實行他們的計劃，和用難以使人置信的殘酷來進行戰爭」。

美國的另一位活動家、華盛頓大學的卡爾拜特森教授，曾經給國際聯盟作了一個非常尖銳的特徵的描寫，說它是：

「誇張的豪談家和貪心的政治家，進行貪心的軍事政治國際企業組

自所發表的演說中，曾認爲：

「國際聯盟之所以破產，首先就是因爲英國、法國和美國決定要在新的情況之下保留舊的殖民地帝國主義的政策。國際聯盟對於遠東的各種困難重視得不多，並且也沒有足夠的力量來解決各種經濟問題。」

其他關於國際聯盟組織機構的缺點，特別是強調它的弱點，都認爲是因爲它沒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否則國際聯盟盡了這個力量就能實現自己的決議了。最後，有某些意見是批評國際聯盟內部的大國與小國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像路易吉·斯士爾茲在一九四三年二月份「現代評論」上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就這樣寫道：

「國際聯盟是企圖調和個體主義的趨勢與階級集團的趨勢。幾個大的強國都是國際聯盟理事會的常任理事，而其他的國家是只能被選進理事會或者是按次序加入理事會的。因此，幾個大的強國就起了支配一切的作用。但是大會的決議，是只有在它們被全體一致通過的情形之下，才能發生效力的。這種不合理的規則，看起來好像是每一個國家都有獨立主權的表現。而在實際上，它是麻痺了國際聯盟的活動。」

在進而分析那些造成國際聯盟崩潰的原因之前，我們必須揭破國際聯盟好像獨立存在的這個假定的真實的內容和政治的意義；因爲作爲一個組織，國際聯盟和它的各會員國的總和是並不相同的。好多年以來，像「國際聯盟決議了」或是「國際聯盟表現出弱點」這一類的說法，是成了個別的政府（主要是戰前的英國和法國的政府）規避各種政治決議的責任的手段，他們就利用這一類的聲言，而把自己掩藏在國際聯盟的神話性的獨立存在的屏風後面。我們在此應該注意到的，就是國際聯盟在它整個存在的期間，它從來沒有通過一個爲國際聯盟中幾個主要領導的政府所同意的決議（就是從它的組織機構而言，它也是不能夠作決議的）。這一類的決議，也是不可能存在的。這正是爲什麼對於國際聯盟在它存在的二十年間的政治活動的批評，同時也正是對於在國際聯盟中起領導作用的許多國家的外交政策的批評的原因。國際聯盟各會員國的政府，無論在過去和現在，都應該要負國際聯盟在這個時期中所做的一切事情的責任，和它在這個時期中所沒有做的

一切事情的責任。只有徹底地廢除了國際聯盟這種虛構的獨立存在的假象，我們才能夠拋棄出這個組織的各種缺點和弱點，因爲這些缺點和弱點就使得它的領導國家有可能被限制到「國際聯盟一致決議」的範圍內而去。

從國際聯盟最初創立的時期起（甚至在它誕生以前的時期中），國際聯盟會章的創制者就賦予它一個全世界組織的性質，這個組織的任務是調整各種國際的關係與糾紛，而不管這些關係與糾紛是發生在或將發生在地球上的什麼地方。可是自從國際聯盟產生的時候起，它就是在這個方面存在着兩個主要的缺點，這兩個缺點在它後來的整個活動上打下了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烙印。第一，在國際聯盟最初參加者的組成份中，是沒有蘇維埃共和國的；這正像大家都知道，蘇維埃共和國直到一九三四年以前，換句話說，就是在國際聯盟存在的最初十四年中是都沒有加入國際聯盟的。第二，在國際聯盟的組成份中，是沒有美國的。大家都知道，美國總統威爾遜是國際聯盟的發起人，起草了它的章程，甚至還是國際聯盟第一次大會揭幕的人。可是由於美國參議院的外交委員會拒絕批准凡爾賽和約和加入國際聯盟，它就從來沒有再參加過這個組織。

只是這兩個情況，就完全足以使得國際聯盟失掉一個作爲調整國際糾紛與國際關係的機構的任何有效的力量了。

美國沒有參加國際聯盟，馬上就使得國際聯盟只具有歐洲的意義，而不是全世界的意義。國際聯盟和這個大西洋彼岸的大共和國之間缺少聯繫，這是國際聯盟在它存在的各個時期中都切身感覺到的。在國際聯盟中雖然加入了十七個美洲的國家，可是缺少了一個作爲世界強國的美國的參加，這種情形不僅僅在決定國際聯盟的一般的問題上（舉如一九三三年關於採用制裁的問題），就是在解決美洲各個別國家之間的糾紛上也可以看出來。

當然，在國際聯盟存在的最初十四年當中，蘇聯沒有參加也是具有不小的意義的。在這個時期中間，國際聯盟公開地成了一個進行反蘇政策的工具。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這個時期當中，國際聯盟是實行武裝干涉政策反對蘇維埃國家的一個中心。在一九二一年國際聯盟的幾次會議上，曾經討論過利用俄艦來作爲鎮壓蘇維埃國家的一個武器，想將蘇維埃國家殖民地化。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期間，當芬蘭的匪徒被從東卡萊里亞趕出去的時候，國際聯盟曾企圖幫助芬蘭。在一九二四年時，國際聯盟利用喬治亞孟塞維克派的叛變，想重來實行干涉蘇維埃國家的反蘇企圖。像國際聯盟這種

反蘇的活動，是舉不勝舉的。可是只從上面所列舉的情形，就足以看出國際聯盟在它存在的第一個時期的反蘇活動的性質了。因此，在國際聯盟最初存在的十四年當中，不僅僅因為蘇聯沒有參加，並且因為它在這個時期中的確定的反蘇政策，也損害了它作為一個號召保障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組織的威信。

在研究國際聯盟的失敗的原因時，我們應該區別兩個問題：就是在國際聯盟中的許多領導國家的政策，和國際聯盟作為一個機構的缺點。我們很容易明瞭的，就是國際聯盟失敗的責任，應該是由那些個參加國際聯盟和領導它的主要的國家來負責，而完全不應該由這個機構的盟約來負責。毫無疑問地，就是國際聯盟的盟約，在基本上是有可能用來執行普遍安全的政策的。假如說這個政策沒有能實行，並且還儘力地被延擱下去，那麼這個責任是不應該由國際聯盟的盟約來負。在這個盟約中的第十六條，是關於對侵略者採取制裁的（註二）。制裁的這個觀念，是有計劃地被縮小了，最初決定是不採用軍事制裁，繼而剩餘下來的經濟制裁也遇到許多修改和兩可的解釋，但是國際聯盟的章程本身是並沒有責任的。

當時在國際聯盟中的幾個領導國家的政府，他們不僅僅沒有利用國際聯盟的章程和它在爭取真正的集體安全的鬥爭中所給與的那些可能性；相反地，他們却用一切的方法使得這個盟約，變成了反侵略鬥爭的道路的一個障礙物。他們正是爲了這種目的，才利用盟約本身的缺點和更外增加強了這些缺點。

國際聯盟章程中的一個最重大的，和使得它喪失掉真正調整國際關係的可能性的缺點，就是要求國際聯盟的一切政治決議，都必須經過全體會員國的一致通過。由假想的民主觀點所出發的這種一致通過並認爲各國都是一律平等的，因此就要求各國對任何決議都要有普遍一致的同意，而其結果就會使得某些小國在國際聯盟中起了和它們在世界政治上實際重要性不相符合的作用。這種一致決議的要求，在有許多情況之下，就破壞了通過與這一個或是另一個問題的重要性相適應的決議的可能性。有時候，當因爲某幾個小國的反對（可以說，他們是完全不關心所討論的問題的），就不能讓其他的國家能按照他們對前面的問題的本質去有所行動和作決定。這種一致決議的要求，經常又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就是爲了要使得它達成目的，就應該用一種廣泛的和有彈性的語言來寫決議，而這不是爲了要使得爭端的兩方，在沒有作協議的時候也能參加到這些決議的表決而已。

這種一致決議的要求，還使得那些專心想到對國際聯盟的侵略國家能爲所欲爲，他們經常利用小國的代表作爲他們在國際聯盟中的直接的代理人，這些代表是唯命是聽地執行他們的指令，和儘力破壞國際聯盟的各種可能的決議。假如在德國和意大利的影響之下的南美洲的某幾個國家，他們就有計劃地想破壞對國際聯盟會章中關於加集集體安全一部分的修改。其他一些在侵略國家影響之下行動着的小國的代表們，他們破壞了對意大利實行有效制裁的可能性。像奧地利、匈牙利、阿爾巴尼亞及瑞士等國的代表們，就是這樣的。

至於這些小國的虛偽的民主的立場，還造成了另一些相當嚴重的後果。像在前述研究許多非常重要的政治問題的委員會的組成成份中（並且這些問題在理事會和大會中的命運經常是有繫於這些委員會的決定時），經常是指定有小國的代表參加，可是這些小國，他們對所研究的問題是絕對不感任何興趣，並且也不能有什麼明確的立場的。這種委員會的組成成份，其動機好像是為了公平和客觀的關係，說不關心的代表們，在決定這些問題時，也可以發表意見。可是在實際上，結果却完全不是這樣的。這些代表們經常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出那些盤在他們背後的大國的觀點，而這些大國就靠了他們的幫助來破壞通過必要的決定。

在研究國際聯盟在它存在的整個時期中間的活動時，我們必須注意到，就是國際聯盟中的幾個領導的國家，他們是有計劃地從國際聯盟的管轄範圍中，提取出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四〇年中間的許多最重要的國際政治的問題。每一個這類重要的問題，在國際聯盟存在的各不同時期中，是交付給任何一個指令負責解決它的機關去解決的。在國際聯盟存在的第一個時期中，同盟國的最高會議就是這樣的一個機關。也正是這個機關分配了德國的殖民地，而國際聯盟只不過是批准了這個分配而已。當最高會議取消之後，它的位置就由大使會議取而代之。大使會議曾解決過像分割上西里西亞，確定蘇俄疆界（卡廷線），解決維爾諾問題，以及解決因爲佔領科爾孚島而引起的意希糾紛等問題。關於海軍軍備的問題，是完全列到國際聯盟的管轄範圍以外去了。這個問題是先後由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一九二七年的日內瓦三國海軍會議及最後由一九三〇年倫敦海軍會議所決定的。同樣地，當佛郎科將軍變化的時候，國際聯盟也被剝奪了研究和通過有關德意志在西班牙進行武裝干涉的問題的決議的可能。和在西班牙進行武裝干涉有密切聯繫的問題，特別關於地中海上的海盜行爲的問題，同樣地也是交給一九三七

年九月在尼翁所舉行的非常會議去討論的。因此，國際聯盟中的幾個領導的國家，他們是完全有意識地減少了國際聯盟的政治活動的範圍，從它的管轄範圍中提出各種重要的國際關係的問題。

我們上面已經講過國際聯盟中幾個主要的國家對侵略者的制裁所採取的政策。一般對國際聯盟的指責，都說國際聯盟軟弱，是由於國際聯盟沒有自己的武裝力量能用來對付侵略者。但是問題完全不在於國際聯盟之有無軍事力量。對侵略者實行軍事制裁的盟約第十六條的規定，就是從這樣一點出發的：就是當國際聯盟決議採用這些制裁時，每個國家都應該將自己的武裝力量的一部分供給國際聯盟使用。因此，以國際聯盟的決議為基礎而運用的武裝力量，完全是可能的。雖然規定是這樣，但是國際聯盟中的各國領導家自身，是拒絕對侵略者採用軍事制裁的。因此，問題並不在於國際聯盟之有無武裝力量，而在於這些主要的國家願意不願意採用武裝制裁的武器。

在拒絕國際聯盟用軍事制裁之說，剩下來的是還有經濟制裁。大家都知道，這些制裁只被用過一次——這就是在一九三五年對付意大利時採用的。結果怎麼樣呢？國際聯盟中幾個領導國家實行了對侵略者讓步的政策，拒絕對意大利實行最有效果的經濟制裁，毫無疑問地，這種有效的制裁在一方面是封鎖蘇彝士運河禁止意大利船隻通航，在另一方面就是禁止向意大利運送煤油。可是後來對意大利的一切經濟制裁的制度，並沒有產生什麼結果，也沒有能阻止意大利對於阿比西尼亞的強盜式的掠奪，這是絲毫用不著驚奇的。

我們現在作一個總結。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中，國際聯盟是和盟國列強所實行的整個國際政策，有著最密切的關聯的。正因為這樣，它就在自己的榜標中和活動中，反映出這些列強的基本的政治趨向。在它存在的最初的十四年當中，國際聯盟在其活動中表達了在國際聯盟中幾個領導會員國所反對的趨向。當英法當時的統治集團的這種趨向，在一九三九年又重新趨於尖銳化的時候，國際聯盟反映了這種趨向，就作了一個將蘇聯從它的組成份中開除出去有名的決定。從一九三三年起，國際聯盟又同樣地反映了幾個領導國家的政治趨向，尤其是所謂「不干涉政策」；這個政策本身就是有計劃地企圖和侵略者妥協。毫無疑問的，無論是哪一種趨向還是一種趨向，它們是都不能促進鞏固和平與安全的。

從另一方面講，國際聯盟的章程，特別是所有政治問題要經過一致決議的要求，就使得各方面有可能來完全破壞國際聯盟的任何行動，從侵略者方面來講，他們或者自己來直接行動，或是通過了他們在國際聯盟中的代理人來行動而破壞國際聯盟；從另一方面來講，那些不贊成通過一致決議的國家，則方便了侵略者，並且還和它妥協。

作爲一個國際組織的國際聯盟，它是沒有力量來鎮壓侵略者和保護和平的。在歷史的許多急轉的和重要的關頭，當侵略的威脅發生了的時分，國際聯盟就不能爲它所宣佈的目的服務。這時候代替了有效的反對侵略者的政策的，就是對侵略者的「緩慢」政策。這種政策的實施和國際聯盟的無力，就使定命的結果成爲可能——這樣就發生了山崩地陷的侵略者希特勒德國所開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由於對侵略及對侵略者的放任政策，經驗告訴我們，爲了想給這種政策的再生留下一條出路，人類是已經付出了很高的代價了。在今天，當擬定在四國普魯安宣言中所講過的維維耶爾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組織的基本原則時，就必需考慮到這國際聯盟的一切錯誤，並且永久防止不致重演這些錯誤。毫無疑問地，此種所要求的，不僅僅是不再重演這些錯誤，而是要建立這樣的一個國際組織，它應該擁有真正的獨立不移的力量，足以保證永久的和平。在今天和明天的各種情況之下，蘇、英、美、中幾個民主強國所負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領導作用，無論在今天和明天，都是組織永久的和平與安全的一個基本的因素。德羅爾會議的宣言曾經說：蘇、英、美、中四國將要「力求所有大小國家的合作和積極參加，那將國家的人民，能和我們本國的人民一樣，都用全副心機，抱着深切的希望，來消除暴政和奴役，壓迫與苦難」。在這次戰爭之後這更趨進來的國際組織，應該是所有其他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的一個堅強的支柱，並且必須具有必要的權威。但是爲了達到這一個目的，這個戰後的國際組織，就應該具有一種力量，足以粉碎動搖永久和平與各民族友愛合作的任何一切企圖。

(註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協約及參戰各國曾和德、奧、土、保等五國在巴黎簽定各種和約。凡與德和約是對德的，於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簽訂於凡爾賽宮，國際聯盟盟約就是這個和約中的一部分。與日耳曼和約是對奧的，簽訂於一九一九年九月十日，特利安和約是對匈的，簽訂於一九一九年六月四日；納伊和約是對保的，簽訂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號；索非利和約是對土的和約，簽訂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在這幾個和約當中，就包括有國際聯盟盟約的部分。

(註二) 國際聯盟第十六條是這樣規定的：凡國聯會員國如違反盟約而從事戰爭，則根據此事實即視爲其對於所有的會員國有戰爭行為；其他各會員國當立即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財政上之關係。同時國聯理事會並應向關係各政府，建議同盟會員國各出陸海空軍，組成軍隊，以維護國際盟約之實行。

(完)

還在度着冬天

——民國三十四年第一季——

許滌新

一 連語言和思想都追不上

時間跑得快，一九四五年已經消失了四分之一了。這四分之一——三個月時間並不算長，但在這個短短的時期中，後方經濟却經歷着一個波瀾起伏的過程。

波瀾起在物價上，同時亦起在黃金和外匯的市場裡！

物價的新飛漲，是從去年十二月下旬開始的。在這以前，曾經有幾個月穩定期。從去年六七月至十二月中旬，都可以劃入這個時期。這個時期的物價，並不是完全不漲，而是漲得和緩一點。特別是米價，曾經有一些回跌。可是，這個穩定期畢竟是相對的，到了十二月下旬便結束了。重慶的糧食，山米從十二月中旬之五千四百元漲到十二月下旬六千二百元，元月中旬又突破九千元。河米從十二月中旬之五千元漲到十二月下旬之五千四百元，元月中旬又漲至八千二百元。菜油（每担）從十二月中旬之九千五百元漲至元月中旬之一萬一千八百元。百貨自新年過後，都一致提價，三十支線紗襪由年前每打三千元提到三千八百元；新光襪衫由每打二萬六千元提到三萬四千元。白糖，亦由每斤一百九十元，提為二百六十元了。新曆新年是一個關頭，物價都朝著這個關頭而飛漲！

新曆的年關過去之後，接着還有一個舊曆的年關。這個舊曆的年關更可怕，物價跳得更兇猛。舊曆除夕是二月十二日，在二月上旬，山米每市担已突破一萬大關而為一萬一千餘元了；嵐炭每市担亦從一月下旬之一千八百元漲至二月中旬之二千一百餘元。過了這二個年關，遇到這二次的跳躍，大家滿以為從此就可苟安下去，但是不幸得很，在大家喘息未定的時候，又來了第三次的波動。

三月初的波動，比前二次更加利害。山米漲到一萬六千；河米漲到一萬五千；豬肉每斤漲到三百六十元；黃豆每担漲到一萬五千元。三月中旬雖然

回跌一點，但到下旬，山米還保持一萬五千八；河米還保持一萬四千四；而豬肉黑市，則達到每斤四百元的程度了。

以上所說，是以重慶為例的。但是，重慶並不是漲得最兇的地方。貴陽的上白米，在三月中旬，每担漲到四萬五千元，下白米亦達三萬九千左右；昆明的中白米，在三月中旬漲到二萬六千元，次白二萬五千元，黃豆二萬七千元。比重慶較為「溫和」的成都，上熟米（雙市担）在三月上旬亦漲到二萬一千餘元。如果從西南幾個大城市來看，貴陽的物價漲得最可怕，昆明次之，重慶和成都算是比較「和緩」的。談到農村，可惜我們找不到很多材料，但從各報的地方新聞所露出的一點零碎的消息，無一個地方的物價呈現穩定的。就以接近農村的萬縣而言，春節過後，那兒的米價亦漲到一市担一萬六千元左右了，還不要說到那些在鬧荒災的地方！

說這三個月波動了三次，當然祇是指大的波動而言的，其實，何嘗祇是三次，實際的情況是每一週，每一天每一點鐘，都在跳動的。昆明「民主週刊」的增刊中有一篇談到物價的短評說得很生動：「物價上漲的速度，連作家的筆尖和排字工友的手指頭都追不上，連老百姓的語言和思想都追不上」。

回頭來看看金融市場吧！

黃金和外匯在這幾個月，亦盡着波瀾起伏的能事，但它們的曲線，有一點與物價不同。黃金和美鈔的波動亦是從十二月下旬開始的。此時的黃金從三萬三漲到三萬四，美鈔大票從五百二漲到五百五十，小票從五百一漲到五百四十。元月上旬繼續上昇，但情況頗為沉緩，二月上旬反而回跌一點，二月下旬才又繼續回漲。這樣的緩緩走，走到三月半才突破四萬元；十七日達到四萬九千六百元；而由於十八日官價提為三萬五千的標度，三十一日會一度突破六萬的大關，這個時候，美鈔大票亦漲到六六〇，小票亦漲到六三〇了。從這條曲線看來，黃金和外匯在新曆年關同物價是一齊上漲的；一到舊曆年關就走着不同的方向了。三月下旬的狂飆，却又落在物價的波動之後。

物價波動和金融投機的浪花，傾壓了整個後方的經濟界。

二 並不完全是「年關」的關係

這三個月物價變動得如此之快，究竟是什麼原因呢？有不少人把它歸諸年頭歲尾的關係，認爲物價之漲，是出於人民在年頭歲尾的時候，消費得比平時多，並且由於送禮的頻繁，對一般用品要求比平時更多。商人預見這點，預先購進，因而形成市場的活躍。反之，因爲年關結賬和進貨的關係，所以購進資金和外匯的行動不得不暫時拋出或不購進，因而形成二月上旬中旬間金融市場之疲淡。這種看法，並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我們承認它的作用。不過，單單從這種「季節性」來解釋，是不能解決這問題的。因爲：

第一、它不能勉強地解釋了新舊年關和舊年關二次的物價波動，但不能解釋三月初的大飛躍。三月初，距離舊年關已是半個多月了。在社會購買力日益低下的今日，假定新舊年關，大家都多買一點消費品（其實，一般民衆在過新年時是與平常差不了多少的），到了半個月後，總不至於仍在過關，仍在製新衣和多購消費品吧！

第二、縱然縱橫說法能勉強把新舊年關與這二次的物價波動聯系起來，但是它不能說明爲什麼今年這二個年關的物價，比去年同期，漲得更快和更兇。去年重慶的自由山米（上等的）一月每市石只有二千六百元；二月底只有三千八百元；三月中只有五千四百元，三月下旬最高峯亦祇有六千五百元而已。如果單單是季節的關係，如果單單是國戶爲準備青黃不接的關係，爲什麼今年的物價比去年同期超過二三倍呢？

可見單從季節性來解釋三個月來三次物價之波動，是走不通的。「年關」只是物價波動的因素之一，而且是不大重要的因素之一。要明白這三個月的物價之不斷跳動，只有全面去把握它——不但從經濟領域中的因素去把握它，而且必須進一從軍事政治各方面去把握它。如果從種種或消極的作用看來，我們可以把它們分成有利的條件與不利的條件。前者是有益於物資之供應及穩定物價的，後者是削弱物資之供應及促進物價之飛漲的。

現在，先從有利的因素說起。

幾個積極的因素

對於今年後方經濟發生積極作用的因素，我認爲有下列幾項：

第一件事，是去年十一月成立的戰時生產局。這個機關是在羅斯福總統私人代表納爾遜先生等協助之下成立的。這個機關的本身「克服」了一種極其錯誤的路線。那種路線認爲中國的生產條件落後，成本太貴，不如從國外輸入物資更爲合算。這是一來，不但軍火要依靠盟邦，就是布疋亦要依靠盟邦了。不管戰時生產局將來的成就如何，但在政策上，我們認爲這個機關之成立，是具有極其積極的意義的。最起碼，它證明中國應該在現有的條件之下，盡量的發展戰時生產。

戰時生產局在去年十二月間，向「渝廠」、「中興興業」、「渝廠」及「中國製鋼」等廠，發出第一批定貨五百噸，定製兵工器材等類貨。今年一月底，又向「渝廠」、「中國興業」及「上海」、「重慶」、「順昌」各機器廠，定製地雷壳及炸彈壳。此外，還有刺刀、電話機及酒精的定貨。從三十一一年以來，後方的冶煉等業機器業，便在停工關門的狀況中轉轉，去年入春以後，情況更加危殆。生產局這樣的定貨無疑是起了一點挽救的作用的，它的基金，祇有一百萬元，數量實在小的很，而三四個月所使用的資金，截至三月底，恐亦沒有超過三十萬元。在目前物價這樣波動之下，三十萬元能夠定得多少貨呢？能够把垂死的重工業推動起來跑得多遠呢？這是可想而知。以機器業而言，第一區大小機器廠會員約三百餘家，有資格承造之廠不過三十餘家，而每廠分得的工作，只達全生產力百分之二十而已，至於鋼鐵業所接的定貨，則只佔各廠生產力的百分之十而已。故大家都認爲這是，純屬消極救濟性的定貨。可是，不心而論，戰時生產局的救濟性質的定貨，是有它的貢獻的。它的定貨推動了鋼鐵業和機器業。鋼鐵業除直接定貨外，還由於機器業之需要，又促進了生產。截至三月中旬，今年二個半月的鋼鐵生產較舊條時，月增一百噸，約共鋼五百噸，鐵一千噸。酒精方面，產量亦多了一點。

第二件事是一月中旬中印公路的通車。自從一九四二年春敵人佔領緬甸以後，中國西南的國際運輸便告切斷了。差不多有三年的光景，中國的國際運輸，完全依靠飛越喜馬拉雅山的航運。雖然航運可以帶一些物資和軍火進來，但數量畢竟是不大的，中印公路通車之後，這種困難便可減少了。

由於軍事運輸的需要，今年上半年的中印公路，仍未能發揮其對後方經濟的積極作用。爲發展生產所需要的器材之進口，是談不到的；爲推動農村副業的生絲桐油等出口貿易，亦是談不到的。當然，出口貿易的主要難關乃是統購統銷政策，但中印公路如不能運輸，則困難是分明多一層的。

不過，影響並不是沒有的。中印公路的通車，使某些準備買器材的廠家，多買一點外匯，因而促進外匯投機的活躍；同時，某些從事出口貿易的商家，爲了業務的存在和發展，對於廢除統購統銷的政策，就更爲努力了。

第三件事是湘桂一部份內遷工廠之復工。去年湘桂戰事之失利，衡陽、鄒陽、桂林及柳州等地公私廠礦的器材，只運出百分之五十。費了千辛萬苦，四十二家民營工廠集中於金城江的四千餘噸（實委會的廠礦的器材，並不在內）器材，却抄一把無情火焚得乾乾淨淨了。除此之外，柳州至宜山間損失一千餘噸；獨山損失數百噸，都勻損失一二百噸，安抵貴陽的只有九十二噸而已。這是湘桂產業界的浩劫，亦是中國國民經濟極大的損失。但是，湘桂內遷的廠家，是不會因此就灰心的，他們還繼續奮鬥下去。「中大」、「新中」、「中華」、「新民」及「華成」諸廠，都在重慶復工了；桂林十二家及衡陽十六家實力較小的工廠，亦在貴陽籌備兩個聯合工廠。他們的器材可說是拋得精光的，由於他們的開廠復工，必然需要新的機器及其他設備，這就要推動機器業以至鋼鐵業的生產了。

這便是今年對後方經濟的有利的因素，這些因素，在一定的限度以內，刺激了工商業並發生着一點緩和經濟危機的作用。但是，在另一方面，還有發生反作用的因素。

四 物價爲什麼不斷跳動？

反作用的因素，都是在促進物價之飛漲的。有那些因素呢？

(一) 去年四月敵人發動了攻勢以後，洛陽、長沙、衡陽以至桂林，都相繼失陷了。國土的喪失帶來市場的縮小與物資供應的減少，但同時，游資與人口，却不斷地流入內地了。人口的集中，使需求增加；游資的集中，使它的活動更加深入，更加有力。過去重慶對衡桂等地的匯兌，每日四五千萬元是極其平常的，現在呢，省外的匯兌，只有西安、貴陽、老河口、三斗坪、貴陽、蘭州與昆明而已。匯款數量，每日有二千萬元就算上乘了。這種情形不但指明游資活動的地區是明顯地在縮小，而且指明東南各省的商品之流

入內地亦明顯地被切斷了的。總之，去年軍事失利所引起的人口與游資的更加集中和物資供應的更加減少，無一不是在促使物價上漲的。貴陽物價之漲得這麼利害，戰事所引起的影響，發揮着極大的作用。

(二) 去年收成一般據說有七八成，但豫、湘、桂以至貴州一部份，都成戰場，農事當然受到打擊，湖廣之米，是沒法內運了的。故本年度征實征借總額從八千四百餘萬市石，減少至六千六百餘萬市石。前方後方軍公民糧之供應，更加惟川省是賴了。川省去年農事，川北及川中一部份縣份，因旱災歉收，其餘各縣，雖說豐收，但實際情況，亦並不如一般所傳之豐碩，且於八月以後，即苦雨連綿，潮月不開，相當影響收成。特別是川北方面，去年一年之中，乾旱之後，加上淫雨，水災之後又是雪災，上下兩季收穫平均只有二三成，還有不到一成的（如樂至縣）。今年冬末春初，又是先旱而後雨，天氣轉寒，人民所依爲命的紅苕完全凍壞了，小春亦因受凍不能生長，於是二十六縣二千萬人民的生活便陷入絕境了，其在川東，長壽、涪陵、忠縣、奉節、開縣及雲陽等縣都在鬧旱荒和雪災；川南的宜賓、南溪、慶符及高縣等地，則在大鬧牛災。四川有這種種的農情而又爲前後方軍公民糧的仰給地，聰明的地主不但不會拋糧出賣，而且必會與商人同謀，競相囤積，以迎接青黃不接的時期了。以如此之情勢，要糧價不作惡性波動，自然是不可能的了。

(三) 通貨的發行量日昇月異的在發展着，到現在，發行額不知幾千億元了。通貨膨脹降低了幣值，同時又提高了子金，而幣值之跌落與子金之提高，都是直接促進物價之上漲的。自民國三十二年秋天起政府推行黃金政策，企圖吸收法幣回儲，但截至今年二月止，出售期貨共一百〇八萬兩，黃金存款共七十萬兩，兩項合共一百七十八萬兩，收回法幣三百六十四億元。這一個數目，雖不能說小，但比起發行額來，那是微乎其微的。如果一面在大量發行而另一方面却只能收回其極小的一部分，幣值是沒法使其不跌的，何況黃金政策的本身，還具有相對降低幣值的作用？何況發行之增加，不但減低了幣值，而且增強了游資的力量呢？由於增加發行所引起的種種影響，使物價不能不走着上坡路，不能不呈現着今年第一季的物價，較諸去年同期，飛漲了二三倍。

(四) 在這個期間，生產衰落，物資缺乏的現象，亦是頗爲嚴重的。一個棉荒和一個煤荒，就可以作爲代表。棉荒是在紗布管制局的限額統購政策所造成的。因爲官價規定得太低，棉農沒利可圖，產量逐年減少。陝川與豫

鄂、湘未論稅部分之產量，三十二年為二百九十五萬担，而三十三年則減至一百五十五萬市担。今年在陝鄂收購價格，每担為一萬二千元，而成本却在二萬九千至三萬元之間，同時，敵人又以四萬元一担的價格，進行搶購，於是，棉花便告倒流。去年管制局收購的棉花還有五十萬担，今年竟跌至二十萬担。這二十萬担棉花，只是供後方十二個大紗廠四個月之用。要使紗廠不至停工，還缺四十萬担，此外，軍用棉二十萬担及造紙棉四萬担，尚不計算在內。在這種情形之下，棉荒如何不出現呢？其在煤礦，過去只有嵐炭是限價統購，自今年二月起，煤焦都一齊限價統購了。今年二月四日調整後的煤價，每噸定為四千元，但嘉陵江區的大礦成本每噸是五千元左右，小礦則達六千元左右，如以官價出賣，則大礦每噸將虧一千元，小礦每噸將虧二千元了。因此，煤產自然會一天比一天減低了。嘉陵江區煤產，由前年每月之八萬餘噸，減至去年之七萬餘噸。去年秋末會減至三萬噸。冬季雖稱旺月，但年底月產量只有五萬噸而已。入春又在下降了。反之，單以重慶一市而言，每月之需煤量却在七八萬噸之間。供求之間，相差至巨，煤炭黑礦，是沒法不使其飛漲的。燃料一貴，冶鍊、機器、動力以及人民伙食，都受到影響了。這些事實，說明不合理的統制政策是具有促進物價飛漲的作用的。

(五) 戰時提高稅率以裕收入，原屬無可非議之事，但提高貨物稅與營業稅的結果，必然會影響到物價之上漲。以最近廢除專賣而論，這是一件被人稱道的事情，因為鹽、菸及火柴的專賣，本來是望其能增加財政的收入，但實際上，極大一部分的專賣收入，是被拿去作爲專賣機關的開銷的，同時，稅品一經專賣，便發生轉嫁的現象物價之上漲，是必然的了。所以，專賣制度之取消不失爲一件好事，因爲，至少可以減少國庫的一筆開銷，但在另一方面，不但「食鹽專賣的管制機構沒有廢，人事沒有變，管制的辦法沒有變，只是將鹽務局合併於鹽政司改名爲鹽政局，並改征統稅」，而且把稅率提高了，三月初，鹽稅每斤增加五十元。捲煙火柴的統稅，則將有所調整。各類改征統稅之後，稅率驟比以前增加一倍。食糖以前專賣時是照價從征百分之三十，現時則按統稅徵收物價百分之三十，關於酒精，原來統稅每加侖二十八元，免稅統稅之後，須繳百分之三的營業稅，以三月中旬的價格計算，即須四十餘元。在直接稅方面，今年的預算，所利得稅增至四十億，營業稅增至四十億，還有徵金二百億。現行辦法是以營業額爲攤派標準的。這實際是營業稅的加稅。如今稅額提高了，商人個個難道不是把這些負擔加在商品

的價格之上嗎？

(六) 在這個時期，後方游資，特別壯大，雖不能說牠「絕後」，但很爲難說它是「空前」。它的壯大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通貨的巨量增發；另一方面則由於湘桂各地的資金之內流。壯大的游資，雖然有一部分被黃金及外匯所吸住，但數量是極其有限的。今年一二兩個月出售的期貨不過二十萬兩，依法價每兩二萬元加搭二成計，折合法幣不過四十餘萬萬元。雖則黑市金價已超過三萬（截至二月底），但應集在黃金週轉的游資，頂多亦不過七八十萬萬元而已，以此數來比諸游資總體，相差是很遠很遠的。因爲這樣，故儘管黃金市場入三月以後，波瀾起伏，瞬息千里，但在基本上，絕未能削弱游資對於商品的追求。以黃金政策的作用而論，誠不能忽視它的削弱游資對於商品的追逐力，但在游資力量太大，通貨發行日益增加的情勢之下，黃金收法幣回籠的作用，是有限得很的。反過來，黃金價格漲得太快太高，就會反襯出通貨價值之相對跌得更快更甚了。這種微妙的相互關係，是不能不在相對的意義上提高了物價的。

由此可見，這三個月後方的物價與金價之大波動，是與整個戰時財政經濟脈相通的，把握了物價金價波動的原因，同時，亦就可以把握了戰時財政經濟的全貌及其總動向。

在這種，我們還應回頭去照顧前面所說的那些有利的因素，應該把那些有利的因素與這些消極的因素合攏來觀察。我們認爲那些有利的因素，還未能發揮它的應有的作用，戰時生產局之限於救濟性的定貨與中印公路之未能便利於商運，就是明證，反之，後面這些不利的因素，正在這個時候發揮其促成提高成本，萎縮生產，破壞市場與提供幣值的作用。不利的因素是在壓倒有利的因素的。

(下波路一設)

工業圈裏

卓芬

小引

入春以來，工業界似乎有着新的氣息，少數鋼鐵廠開爐了。湘桂運渝的工廠陸續復廠了，機器業也隨之而活躍，但是春光究竟能透進這冷寂的工業圈裏？不是氣是不是能為之而冰解麼？讓我們不妨翻說一翻吧。現在先從煤業談起：

煤荒的癥結

從去冬至今，煤荒黑市的現象始終存在，雖然

時期

調整價

最高礦成本

最低礦成本

備考

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一月

每公噸一八二九元

五九五〇・〇〇

二一七・七八

以九月為準

三十四年二月

每公噸三二〇六元

六四四七・八九

二六五三・九六

以十二月為準

春節過後，物價不斷高漲，使煤業所受的壓迫更趨沉重了。二月四日所調整之價格係依照一月以前之物價調整，成本與售價是相差太遠了。不論大小礦都感經營困難，尤以小礦為甚，茲將三月初煤產主要物資上漲情形列表如下：

品名單位	調整前價格	上漲價格	上漲指數
下等河米	石 九〇〇〇	一三三〇〇	一二三・一
菜油	斤 一二二	五〇〇	二二五
桐油	斤 一一五	三八〇	三三三・〇

(百分比)

需要量是增加了，但實際的供給量還差得很遠，在春節前，為了缺煤，一些市民們不得不改燃價昂的木柴，使電力公司不斷停電，因而又影響到自來水的供應與工廠的工作了，煤荒更使航業交通不能按班次開行。這筆鉅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費，是數不清的。為了挽救煤荒，生產局曾令各廠在春節中不准停工休息，並撥發獎金一千元作獎勵。春節獎金，同時在煤業界的不斷呼籲中，二月四日重新調整價格（從去年三月一日核定的煤價到現在才重新調整），但是各礦的困難毫未減少，下表告訴我們一個梗概：

同時煤業統制更進一步的新辦法又出現了，在二月四日以後燃料管理處進行統購煤焦，對嘉陵江區煤礦擬定辦法四項：(一)分甲乙丙組管理，甲組每月產量為一千噸的大礦，乙組為每月產量為一千噸以下的小礦。(二)甲組所產之煤應遵照政府限價，按月由燃料管理處優先分配各用戶，憑證購用，如額交足，不再予以補貼。(三)乙種礦所產之煤應由燃料管理處隨時酌需情形，在出口地收購，其價格由燃料管理處審查生產成本配加

利潤核定之。此項煤斤，由燃料管理處按限價在配售，不得由各礦運向市面銷售。(四)乙種礦之煤斤收購價格如因成本過高，超過限價時，其差額仍按補貼辦法辦理。所謂統購統收的辦法，照其內容看，似頗到礦商之合法利潤，然而事實上限價是不敷成本的。資金問題也沒有合理解決而黑市的利益又轉移於官方手裡，故所謂增產，是很困難的。據說三月份煤業管理處發給煤商提貨單七千餘噸，這比前幾個月僅一千餘噸，產量根本無幾可提。雖然煤業規定有運輸補貼費，但各礦虧折每噸達一千元至二千元，產量不但沒有提高，並且有停工減產之趨勢。自煤業統購的辦法公佈後，黃粉樹一帶乙等小礦各工百分之五十，其產量較去年十二月份減少六百噸（去年十二月產煤千萬噸）；另一方面，因為在煤焦統購前數月，大家部預備煤焦，由煤焦商預先付款定貨，使各礦能補助生產費用，現預購煤焦之運銷，已經不能繼續直接運煤焦，反急於追收前款，而燃料管理處收小礦煤款又須待驗收後才能照價撥款，因此，使小礦資金週轉益困難。目前各小礦停業者已達十餘家了。

紙江區的煤礦也在奄奄一息中，在前些時期我們的管轄境似比嘉陵江煤區略好一點。但在最近不合理的管制底下，物價高漲的威脅中，生產者是無不受其打擊的。該區在二十八年本有礦產二百餘家，從三十二至三十三年停業者達到五十餘家，佔全數四分之一。到了目下僅存大礦七十餘家，每月產煤由七萬噸減到三萬五千噸，對於煤業和市民的供應都感不敷，因此也產生「煤荒」的現象了。

最近嘉陵江區乙等煤礦曾請求改善煤產收購的辦法，煤礦業界也建議政府幾項辦法：(一)請供給所需食米及採購材料；(二)在未發給糧物前請求政府發給糧物差額代金，如當月所需代金未曾發

上月底以前領得，各廠得商請用戶墊付；(三)用戶墊付差額代金，自四月一日起實行。其次，船運高漲也請當局核給差額補貼。現在煤的旺月已過(冬季農閒時)，目前已到平月，到農忙時即為淡月，上年冬季旺月所產之煤，不但無存，且將夏秋兩季所存餘煤，也已用盡。煤礦危機，並未成為過去！如不實行煤業界之要求，「減產」是將會與日俱增的。

鋼鐵業的難關渡過嗎？

生產局成立之後，在工業增產方面，第一掃帚就落在鋼鐵業身上。去年十二月間，向各廠發出訂貨單，並發貸款百分之八十，使沈睡好久的鋼鐵業，復甦過來。於是人們展開了一個新的希望地說：「鋼鐵業的難關渡過了」。但事實却不能過於樂觀。第一個原因是訂貨太少，生產局對各廠貸款是少得可憐，許多資金枯竭的廠家，都仰望能沾甘露，然而生產局一百億元的總貸款，自去年十二月起，先後向機器鋼鐵訂製成品及協助復原添置設備等款，截至三月中旬止，計訂成品定金七十四筆，復原款五筆，設廠款十筆，獎金及補助款三筆，共計九十二筆，總計支出二十五億餘元。在九十二家得到實惠的工廠中，機器廠佔三十餘家，「民營冶鋼廠所接受生產局之訂貨，僅佔該生產局五分之一，對鐵則無訂貨」(見三月六日新報)。至今年二月鐵生產數量較前維持時期不過月增一百噸，約月產鋼五百噸鐵一千噸而已。到目下第九區冶煉廠(中國興業、資治、資潤、中國製鋼、渝鑫五廠)每月鋼產量已達八百噸，鐵未逾千噸，如能合理發展鋼鐵業生產，該區每月可產鋼一千五百噸鐵三千噸，可惜訂貨有限，煉鋼廠的煉鋼爐，仍有一半

不得不擺置着，故生產局對鋼鐵業極為敷衍性質，僅能維持其現狀十分之一二。因之各廠也只能維持其「吃不飽，餓不死的生活」而已，對於增加生產，研究技術，更談不到的了。

資金週轉不靈是鋼鐵業的致命傷，因為鋼鐵業需要鉅大的流動資金，一如煤礦，礦沙及石灰等項原料，分布零星廣遠，又賴運輸為之集中，致各廠須經常積存足供三個月至四個月消耗的原料，如此呆滯資金亦屬至劇，加以工資及其他費用的開支，約計五項爐設備的備產，每噸須流動資金三〇、〇〇〇元，每月出產一百五十噸，即需四、五〇〇、〇〇〇元。設以四個月週轉計算，每設五噸爐一座，即須經常有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元之流動資金，始足應付。製鋼的情形，尤過於此，計每月產鋼一百噸的廠家，每月需流動資金八、〇〇〇、〇〇〇元，每四個月即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元。(見二月一日國民公報)。倘以現下市價計算，當不止這數目。如商務日報說的更為清楚：「在目前物價變動劇烈的情形下，如週轉靈活，各廠能預存六個月的原料，則每噸生產成本約可減低八九千元，各廠在同一條件下，或盈或虧，要以週轉金之多寡與遲早為衡。如週轉金充足，本年度三月份生產之鐵，在八月份出售，則每噸售價可較三月份多一萬二千元，所以成本減低，待價而沽，惟充分週轉金是賴。此為今日經營工廠業的秘訣」。

不合理的限價成為鋼鐵業的鎖鍊。經過調整的價格，也是永遠不上原料之上漲的。鋼鐵調整價只百分之四十或者百分之四十五，鋼由十六萬改為十二萬四千，鐵由六萬改為九萬五，現在鋼的每噸成本已達四十萬元，鐵的成本為二十萬左右，虧本已成無底漏洞，像這樣下去鋼鐵的難關能算是完全渡過嗎？

機器工業的特殊繁榮

去年湘桂的戰役，使機器業損失得很多。西南一帶的機器業，很有若干是規模大的。衡陽、邵陽和桂柳等地的民營廠家，接受內遷貸款的工廠，就在四十二家，機器四千幾百噸。可惜這些遷出的廠材都在金陵江毀滅了，能够安抵貴陽的只有九十二噸。還有許多法遷出而為商人所劫奪或變賣的機器廠，是使人難以統計的。這一角拉戰後興起的工業精華，都隨煙灰地而喪失淨盡了。談起來，仍為每一廠家的餘痛！

今年春天，渝市的機器有好轉的現象。「已能運用原有生產力百分之三十以上，機器出品中工具機銷路最好，如車床刨床已銷售一空，動力機(如發電機等)銷路亦佳，但一般而論，動力機原料困難，產量也微，工作機現僅剩紡紗機等一小部份，造紙機等早已售完，作業機因機器製造複雜，自衛柱失守後已無法製造」。機器業之好轉主要的原因：是生產局之訂貨，使各民營廠參加軍火生產，製造迫擊砲彈，炸彈引信，刺刀等物，但在第一區三百多家機器中僅有三十幾家有訂貨而已；另一方面是湘桂遷渝的工廠復工開廠，需要大批工具機。機器工業巨擘馬維冠先生說：「以湘桂工業之全軍俱沒，來助我重慶工業的繁榮，也屬割肉補瘡，令人啼笑皆非」。這幾句話是多麼沉痛啊！

「不聞機杼聲，但聞人嘆息」

好久以來紡織界就在濃霧的繁雜中，如今更遭受新的困難。近三個月來，棉荒像大災似的煩擾了大廠家與小織戶。他們不得不用在棉紗壟斷工

據說也只能維持至五六月而已，下半年的布疋就要格外接濟。照大後方棉產看來，產量是一比一年減少了。三十二年產量為二百九十五萬担，到去年減少為一百五十餘萬担。全後方需要量，除民間自用約七八十萬担不計外，紗廠用棉約須六十萬担，軍用棉二十萬担及其他公用棉合計九十萬担，供應相差，不過十萬萬担，但從去年冬曆年底止，陝棉收購只十九萬八千担，預計今年收購總數，不過二三十萬担。這一數量還不夠軍用，其他各方的用棉更成問題了。

棉荒造成了嚴重的黑市，這是管制不良的惡果。收購棉花困難的原因在那裏呢？從現實的例子中，可告訴我們一個底細。例如陝棉收購最高價格為一萬零八百，黑市已達四萬餘。三斗年的情形是這樣：(一)俄幣每市担增加獎金五千元，商人價格則超過四萬元。(二)農民因過去受了欺騙都不敢出售，恐怕收購棉花的官員不給錢。(三)政府核發購棉的資金雖大，但都給經手人利用去做生意、放高利貸。(四)雇不到運輸工人，這是因為過去官方不照諾言，支付工資，以致工人不相信，又不願意運輸棉花。(見二月十五商務日報)。因為官方收購不到棉，而工廠又不能購買，這就造成棉荒了。棉荒嚴重的結果，花紗布局怕紗廠全部停頓，特令各廠減縮生產。現在各廠都實行減產，「有減縮至原有生產力百分之五十者。最少亦在百分之三十左右」。照原狀下機紗產量，本年最多僅能維持原有產量百分之三四十，去年與前年每年機紗產量約十萬件(以十七萬紗錠計)織布四百萬餘疋，今年僅能達三四萬件。如統制政策不變祇能勉強出產機布二百萬疋左右，僅足供後方人民需要八分之一。若要供應軍需，即須三百萬疋，以需要量與供應量相比，相差過半。嚴重的棉荒又造成了布荒

了。

「不開機杼，但聞人嘆息」。這是眼前土布業的寫照。全重慶市土布業在三十二年本有織戶一千戶，機杼將近七千台，至現在織戶僅剩四百餘戶，機杼僅存二千餘台，未斷機杼不及的十分之三，江北織戶停工百分之九十六，土布業自被管制後，危機日重。花紗布局的新標準更使織戶生存不易。因為：(一)照規定，分布為三等，甲等須有經紗五十四根機紗五十根，長四寸碼〇五，寬三十六吋，四項不能缺一，每疋布僅發給棉紗二十支〇五絨，工繳一千二百元，實際各織戶每疋布新標準棉二十支九絨，則每疋布須虧棉四絨，而工繳方面則因物價飛漲不敷更甚，照三月物價，每疋布成本加合法利潤百分之二十總計，每疋應得工繳費三千四百三十七元餘，而官方所給，只有一千餘元，相差將三分之二。(二)不按期發給原料，花紗布局往往以花換紗，以紗換布之辦法，但是本市的土布業往往有購布中月以上仍領不到底紗者約三分之一，以致停機，增加費用。(三)發下原料又往往因長度不足，粗細不均致織成之布難免有不合規定，加以驗布人員多方挑剔，扣原料，扣工碼。各織戶受盡磨難，只有以宣告停業作為最後的一條路！

土布業為手工業的生產，它們的設備簡陋，資金薄弱，所耗人工原料，都較大工廠多。在管制上倘不顧及合法利潤，它們是不易維持下去的。從軍需民用着想，紗布是應增加產量的，要增產對於大小紡織業都應扶持，因為僅靠大工廠不能解決今天生產的問題，然而照今天花紗布局的做法，却是與民爭利，多方給予小紡織業以打擊，同時並行剝削生產者。例如由花至紗每件紗可織布四十六匹半應須工繳成本與利潤二十餘萬元，而管制局僅給費十餘萬元即可得布四十六匹半，售價三十餘萬，最近

竟售八十餘萬元，每件紗由花至布制前生產者達二十至六十萬元，在管制兩年中，除該局開銷二十餘萬萬元外，猶盈餘一百五十萬萬元以上，花紗布局的管制政策，從表面看似乎為國庫生財，但這一財源，是竭澤而漁的辦法。倘為未來中國的紡織業打算，為國家財政收入開闢稅源打算，分明是不應如此的，何況目前的紡織業的停工減產，棉荒布荒已經影響了國庫民生呢？準備運外布來供應，國庫要付出外幣，用幾幾萬兩是等去了軍運的噸位，而土布業的停工使工人失業。難道這損失不鉅大嗎？今年一月十五日織業工會致函當局的呼籲，和最近土布業公會對花紗布增產意見書都是不能漠視的。

酒精業進退維谷！

酒精業曾有過美麗的夢，隨着戰局緊張，軍運頻繁，西南國際通道的打通，作為汽油代用品的酒精的需要量增加了。生產局對它有過一番計劃訓令，管理處本年度酒精產量目標必提高至三千萬加侖。(去年一千二百萬加侖)。以前來華的酒精專家斯塔林士也為了它煞費苦心，但另一方面，液體燃料管理處却於二月初曾令第一區酒精業減產百分之三四十。為什麼減產呢？因為當局未能將訂購酒精之油筒如期發給廠家，使若干廠家無法生產，停工達一月之久，每月損失不下百萬元(第一區酒精公會負責人語)。裝酒精空桶的缺乏，原料的飛漲，價格調整之不合實際情況，在在都給予酒精業以打擊。調整後的價格依然是苦惱的問題，每加侖酒精由八百元提高至一千三百元了，而成本的不敷與日俱深，像酒精原料乾酒精每斤由七八十元漲至一百七八十元現已達二百元以上。製造每一加侖酒精需乾酒十二斤左右，在二三月份，每加侖酒精成本需二

三千萬元，加製糖費實爲二千七八百元，各廠資金有限，貸款購料，子金尤高。而「核價與成本相較，二月份每加侖本千元以上，若每月生產二萬加侖計，則須折本二千萬元。故誠實營業者比出皆甚，因此之故，資金雄厚廠家多以購回原料以牟利，而製糖酒精，低價供銷，反必虧本」(四月二日新報)。生產越多，虧本越大，增產既不可能。門又怕傾產，酒精業走陷於進退維谷之中了。

誰限制了生產？

不論其重工業或輕工業，八年來都在緊要的支撐着祖國的抗戰，在生產線上揮汗着，同樣的，它們也遭受着一個共同的劫運，這就是統制政策的施行。統制政策漸漸地逼着它們走上減產停工，負債歸門之路。如所周知，各業的呼籲，日有所聞，廠際管制的嘆聲也越來越響亮了。統制統銷的政策服成了煤荒棉荒，布荒以及黑市飛騰濫製粗造等現象。統制目的本來在於掌握物資以量控價，但像今天的形勢，却使生產部門被縮產量，物資倒流，造成無物不黑市了。這是個明白的事實，沒有甚麼能說明掌握，物資缺乏，控價也控不了。谷春帆先生說的頗好：

「以統制購則不免要官定過低之限價，因而阻礙生產，助長黑市。以統制銷又不免要酌收較高之售價，以謀財政上之利益。貼補之款項，又將因財政困難而不能如期發給。限價過低，又應貼補過多不堪負擔。貼補減少又不能提高限價，因而失去平價之效，在平價與財政負擔的夾縫中，政府當前途後，沒有出路。而生產日以萎縮，供給日以減少，物價日以漲高，人民日以痛苦，政府負擔日以加重。俗語說

「瘦了石白做戲，吃力不討好」。統制統銷與限價貼補正是此類。現在煤、布、水電許多生產事業及公用事業均在這種政策下掙扎，平價限價本屬好意，因爲認識上不准確，執行不免錯誤，要利，利未見而弊先著，尙不知一切放任比較好些。

望息生產的另一個原因是捐稅過於繁重。試想滿身負債的生產者，資金的問題已使他們走頭無路了，再加以重稅，不是給工業多一條鎖鍊嗎！如獻金獻糧運動，工商業規定捐獻百分之十，若與捐利得稅合計算，則工商業負擔之稅率高達百分之三十。以工商業不景氣的現狀來說，絕不能獲得百分之三十的合法利潤的。故提高稅收，無異勒死工商業。

近來財政當局正在廢除苛雜，但進行之不徹底，換湯不換藥的辦法也不能減輕工業的困難，看把許多工業正在受着不合理的捐稅的壓迫，如鋼鐵業每噸鋼成本須四十一萬，就附加營業稅百分之三，所利得稅百分之八，同盟勝利公債及總備儲蓄公益百分之十，印花稅百分之點四。這種重負實令民營

鋼鐵業無法生存。如白糖自廢止專賣後，糖業的負重更重，專賣是照假征收百分之三十，現時是按實征收百分之三十。如酒精業統稅每加侖本爲二十八元，現在統稅取消了，但須繳百分之三的營業稅，以現時價格算須四十餘元，課稅較前將加一倍，這樣的負擔不是更重嗎？假如不管生產者的實際情況，一味課予重稅是不合理的。如土布業不與說無合法獲得利潤，虧本過多生存已不容易，對它們繼續征收所利得稅無論如何是促其破產而後已！此外物價的高漲，資金缺乏，原料供應的問題都是阻礙生產的。

在工業不景氣的氣氛中，人們都感到有迫切解決困難的必要，因此唯一的希望是寄托在生產局身上，生產局雖不爲今天工業界的支柱，但工業衰落的關鍵並不它它可以扭轉的，它只能起着技術的輔導，資金的救濟等輔助而已。從現在的情形看，不過盡着有限的救濟作用，所以依靠生產局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解鈴還須繫鈴人」，只有廢除壟斷生產事業的統制政策，和一切腐敗的統制機構，才能讓苦難中的工業滋長起來！

四月六日

本刊九卷合訂本

業已裝竣發售

敬希讀者注意

三個月月的金融

劉芳華

一 引言

金融是經濟界最敏感的觸覺。社會經濟的繁榮與衰落，在金融市場上就很快地反映出來。去年一年間，由於戰爭的失敗，工商業的蕭條，金融業也跟著他們走同一個命運。李榮廷在對於過去一年來重慶金融的問題中概括地說：「過去一年來之銀錢業，已遭遇最艱苦之階段。表面上熙熙攘攘，尚稱熱鬧，而個中核心，已表現破綻，正業務，實不致經常開支，逸論贏利，今後戰局急轉，金融市場，不斷波動，銀錢業務，時有率連之可能，風濤驚險，未可樂觀」。到了今年以來，現在已經過了三個月，金融市場不但如去年，在風險中趨平靜的渡過，而是風險越來越大，經營越做越枯澀，金融市場已頻頻發出警號了，要是從銀行、實業、公債幾方面的動態來靜心看一看，也許就能給我們畫出最近金融的輪廓了：

二 銀行

銀行業曾經被當作是戰時的龍兒，可是在這一年來，特別自從去年湘桂對峙的失利，引起行莊的撤退，商運路線的斷折，匯兌地點的喪失，貨幣損失的慘重，此外再加以政府的緊縮信用政策，在在都使得銀行界大傷元氣。因此到了今年開頭，

大家已看出金融業危機重重，都在擔憂着他們的未來的歲月。是的，從一月以來，在金融市場所表現為件事情實在值得我們注目：

(一) 存款與放款

銀行之能發揮對金融的職能，主要是靠着存款與放款為其主要業務。由於這幾個月來市場上突起風波，使銀行業在這方面受到很大的打擊。讓我們先從放款方面來說，根據渝市銀錢業放款委員會統計，本年以來放款總數如下：

一月份：六萬三千餘萬元，

二月份：五萬餘萬元。

但是渝市銀行存款數目是二十八億，而放款只達六億。這里可以看見銀行不輕易放款，多存放款同業或自行運用資金。但是我們可否從上面存款大於放款的數目，就說銀行存款是充足的。事實上並不如此，下面的數字便足以說明：據一個銀行專家說：「目前銀行能吸收存款，其總額只有二十倍，但是在黑市打滾的游資數則在二百億元以上」。銀行公會吳君航氏也說：「全國存款小，五十餘億，不及發行數百分之一」。這里就很清楚的表现了，一方面是存款多而不敢放出，另一方面是銀行的存款與游資在黑市大量的打滾而相形見拙。

(二) 二月底的風險

由於本年一月以來，金融市場的波動太大，銀行業大家都在提心吊胆地看市場風色，因此貨幣不敢放，向業也不敢放，銀行業都在煩悶中過日子

。但是由於銀行業的開支浩大，不得不在投機與囤積中找出路，特別美鈔黃金更為銀行界的救生地帶，因為銀行業競相搜括於黃金市場，遂致在二月底發生了重慶市銀根奇案，為抗戰以來空前未有的現象。根據三月一日，商務日報報導該日銀根奇案的情形是這樣的：「中央銀行交換差額竟達九萬萬元，差款行號竟超過行莊半數在四十餘家以上。昨夜陝西街燈火輝煌，行莊人員趕辦頭寸至夜十一時尚有二十餘家未曾辦妥，差額尚達三萬萬元」。去年六月底，渝市也曾發生過一度銀根奇案，當時差額不過二萬萬元，但是這次差額（九萬萬）大約四倍，這比去年為甚，又平日各行莊差額總額最多不過二億，比時差額不過四億，此差額九倍，其中特增五億，是由於黃金投機所致。這次風波從二月二十八發生，到了三月二日始有「收尾」，可見這場風險並不是小的。

(三) 從永美厚到豫立

卅三年的金融業，他們整整一年都在風險中過着生活，幸而渡過了，可是到了今年一月二十四日，終於爆發了永美厚銀行倒閉。這次永美厚倒閉，主要是開支浩繁，虧累頗重，主持人又挪用存款，影響頭寸不足，結果便造成本年十二月底缺同業頭寸七十六萬萬元及無法向交換科提出抵解的現象。由於永美厚的倒閉，已使金融業提心吊胆，人人自危，而且又迫近舊曆年關前後，大家都預料今後銀行業續永美厚而出頂者當不在少數。事實果如所料，成都福利銀公司與濟泰均告倒閉，新亞銀號也出頂（二月九日商務日報），互利信託公司也遭擱淺（三月五日同報）。由於成渝幾間行莊倒閉，自然更會使金融業處境困難，在重慶不但看到了二月底比期驚風驟浪的險象，而且三月十七日又有豫立錢莊的擱淺。從一月到現在，為時不過三個月，

但是金銀業已經爆發了不步的困難，在今後一年內所遭遇到何種困難，誰說斷定不會再出金子。

(四)川籍行莊聯合自救

自從宋美厚發生倒閉以後，銀行業咸認爲：「政府對銀行業並無保障。中央銀行在金融危急之時，應出面救濟，但近年來中央銀行對任何銀行之危急，均坐視不救，銀行業毫無保障。因此銀行界對聯合準備庫，及憑公庫證折款，均不願嘗試。銀行之自救必將由川籍行莊聯合準備會開始」(二月二十八日銀行公會吳晉航語)。在過去期間，川籍行莊聯絡上在某一部分做得較好，并未像今日所需要團結自救之急，事實上這種團結自助，在二月底金融市場的大混亂中已發生了效果，根據「商務日報」三月一日報導：「此次差款行莊在四十餘家以上，到當晚十一時尚有二十餘家未曾辦妥，截至十二時七分爲止，尚有一家銀行，五千萬元差額未曾辦畢，但尚未有動用公庫證折款者，預計五千萬元亦可由行莊自行辦足，由此證明川籍行莊團結自救之決心。」

又根據三月二十三日「金融導報」亦有報導：「川籍金融界領袖康心如，吳晉航，潘昌猷，楊榮三，胡子昂等，前擬發起組織川籍行莊聯合準備金庫事宜，迭經會商，最近擬具具體化，其目的係在於團結自救，應付萬一發生之金融風潮，屆時可起互助之作用。同時並研究有關各項金融管制法規，俾必要時建議政府，妥謀改善之道，即川省各商業銀行錢莊均將參加，詳細辦法正研議中」。在當前金融市場常遇風潮，川籍銀行爲免於風險所淹沒，團結自救，未嘗不是一種辦法。

三 黃金

黃金在今日的金融市場上，不但是它的光采眩

人，而且還有魔力左右金融市場，因爲在政府方面靠着他回籠法幣，調劑金融，而銀行業則靠着他爲唯一的出路。所以在去年從九月一直漲到十二月的黃金價格，居然連續維持四個月，使去年下半年的金融市場平添不少活躍的姿態，但是一到今年，黃金市場又是另外一回事。無疑的，在今春以來金融市場上到處都掛起「紅球」，黃金當然最能吸起人們的注目，究竟黃金動盪如何，擬從下列幾方面來說：

(一)黃金價格的漲落

從去年九月至十二月黃金價格一連保持上漲價格(去年九月爲二五、〇〇〇元，十月爲二四、五〇〇元，十一月爲三六、〇〇〇元，十二月爲三六、〇〇〇元)，可是入春初便降落爲三五、〇〇〇元，一直繼續降至二月十一日前後仍爲三萬五左右，回顧去年冬季金價扶搖直上，再着當前市價，黃金市場不免有冷落之感。但是當時誰也不會替黃金前途發生悲觀，因爲當時人們正忙着投機於久疲的商場，而且大家又準備應付跟着新年而來的舊曆年關，銀風緊急，誰也都要保持寬動寸，以備萬一，果然舊曆年關一過，黃金市場開始活躍了。假如拿舊曆年關這兩週黃金市價的波動，就可以說明了。

二月十二日	三五、九〇〇元
二月十三日	春假
二月十四日	三七、〇〇〇元
二月十七日	三四、一〇〇元
二月十九日	三六、六〇〇元
二月廿四日	三七、二〇〇元

但穩定，而且不斷在高漲。於是大家競相向着黃金市場投機，終於爆發了重慶市空前未有銀根奇緊的

險象。

三月初，由於昆明成都兩地提價，本市隨之上漲，購者踴躍，行情歡快，到了十二日突破四萬大關，到了十七日又突破五萬元，其後稍爲降落一些，但始終盤旋在四萬五左右。及至三月三十日又突破五萬元，總觀三個月來黃金從三萬七千直高漲到六萬元，可見黃金事實上已成爲金融市場最令人追逐的對象。

(二)黃金政策的成績

黃金政策原爲收縮通貨平抑物價，爲使我們明瞭黃金政策的效果，讓我們看一看「商務日報」所開列黃金政策的細賬，「黃金政策自三十二年以來，吸收法幣爲數甚大，截至目前爲止，已售出黃金共一百七十八萬兩，約收回法幣三百六十餘億元，茲將各項細數略誌如下：

- 出售黃金(現貨及期貨)
 - 出售國內黃金(三十二年三十三三年四月) 八萬一千七百兩
 - 收回法幣 十四萬萬四千萬元
- 出售美運黃金(三十四年起至三十四年底)
 - 售出現貨期貨八十萬兩
 - 收回法幣一百六十萬萬元
- 出售美運黃金(三十四年元月起二月止)
 - 售出現貨約二十餘萬兩
 - 收回法幣約五十萬萬元
- 約計 售出黃金 一百〇八萬兩
- 收回法幣 二百二十四萬萬元
- 黃金存款
 - 卅三年度黃金存款(自八月至十二月) 十九萬一千兩
 - 收回法幣 三十六萬萬元

三十四年度黃金存款(自元月至二月底)

黃金存款 約五十萬兩
 收回法幣 約一百萬萬元
 約計 黃金存款 七十萬兩

收回法幣 一百四十萬萬元
 總計售出黃金一百七十八萬兩，法幣回籠三百六十四萬萬元(註：元月至二月均為概計數，三月十四日開報)

根據上面開列數字，今年一二兩個月，黃金的出售數目雖然比去年各月份為大，但是我們如把法幣發行數額之增大來比較，其能吸收法幣回籠仍是微小的，關於黃金政策成績，「經濟新聞」曾有論列：「二月廿八日一日間黃金期貨出售共九千兩，黃金存款出售五千餘兩，收回法幣共十四億元左右……黃金政策收效了，看吧！自實行黃金政策以來，售出黃金一百七十萬兩，收回法幣約三百六十億元儲大一筆數字，對於游資吸收，自有莫大補益，但是回籠的法幣，是否能夠彌補發行的差額；且備數千萬的游資，法幣回籠的數字終嫌過小，況且多少特種者低利借款購買黃金，又把黃金送回銀行作抵押借款，這樣一來，回籠的法幣究有多少？」(三月二十二日)

(三) 黃金的舞弊與私

黃金的官價與黑市價格之間距離很遠，各方面都主張把黃金價提高，因此三月二十八日黃金價格調整之舉。但是這有價格的提商，事前走漏消息，市民紛紛賣金，輿論也提出批評，羣情洶湧，於是參政會對於此案曾有四點建議，而政府也在四月八日發表舞弊的經過：「該日本市各承辦行局收存之法幣折合黃金存款，比較以往數日情形，超出一萬餘兩之鉅，不無情弊可疑，當即指派稽核人員分往各承辦行局澈查當日出售黃金現貨及經收法幣折合

黃金存款賬目，查得該日收存之數，確較往日為多，且多以一本票或一支票化名分存多戶。例如有以連號收票三紙，化名二十四戶，存儲三千三百兩者，又有以本票一紙化名一百十戶，存儲九百兩者，又轉賬申請者，本係供交換時用已過，各行莊間相互在中央銀行划抵寸之用者。該日各行局亦互觀收受，准開存單。查以一本票或一支票化名分存多戶，顯有弊情，其收受簿據申請書，開列存單者，亦與定章不符。對於此案的澈查，各方亦有表示意見，要是果能這種再發生，即非頭痛醫頭脚痛醫脚所能奏效。

黃金走私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本市黃金市場的活躍，如果從裡面一看，原是有來源的，「金融導報」曾於三月二十日指出：「現貨市場，極為活躍，尤以最近淪陷區金價奇漲之消息傳來後，投資者至為興奮，購者多，賣者又待價不願拋售，遂造成一週內兩破大關之紀錄」。誰都知道西安與老河口兩地是黃金流入淪陷地所必經之地，現在把兩地與重慶同一天黃金的售價相比，便可以得到證明，比如以三月四、十五、十六日三天來說，金價在重慶逐日上漲，(十四日四萬三千三，十五日四萬六千二，十六日漲至四萬八千一)，其上漲原因，是由於西安淪陷購所致，而西安在十六日金價則狂漲至五萬五千(三月十七日與廿三同報)，又老河口與重慶在同日開，兩地金價也相差很大。如以三月廿一日來說，老河口的價格為五萬三千，而淪陷期只在四萬五千三(三月廿三日同報)。由於黃金走私獲利頗大有時殊關係者也就敢作敢為，因此三月下旬，在川，陝線航機上，發生了一千磅黃金走私的破獲(三月廿六「商務日報」)，而西安一帶更為猖狂，四月三日「中央日報」通訊說：「西安

金價市場之活躍，其根基完全建築在黃金倒流入淪陷區這一點之上……據此則本月十九日陝西縣通訊「本縣匪徒猖獗，時有不肖之徒，私帶黃金，經此東運往洛陽，鄭州一帶金價每兩合法幣十萬元左右」，此外由陝西東南角經公路往南陽而私運黃金入淪陷區的，亦已成爲公開的秘密，因此最後作者又指出：如何防止黃金私運入敵區，應該是目前一件大事。

四 公債

我國目前戰費主要是倚靠通貨發行與賦稅收，募債乃成爲籌措戰費次要方法，但是抗戰以來，我國發行公債次數也不少，由於募債不良，故其所收到的效果並未如預期。目前我們還不能用具體說明在現在消募的情形如何？但是爲要說明今後的籌募成績不樂觀，所以我們引用去年年底推銷公債的統計：(一)三十一年度同盟勝利國幣公債，額定十萬元，已收庫約五萬萬元，但報庫者約已達七萬萬元，約達七成。(二)三十二年同盟勝利國幣公債，額定三十萬萬元，已收庫者四萬萬元，報庫者有七萬萬元，約達二成(三十三年年十二月十八日商務)。假如就拿本市今年所推銷三十二年勝利國幣公債，重慶原配爲四億二千二百八十二萬餘元，這項公債從去年四月開始攤派，期爲八月，應於年底結束，但至目前爲止計收到的僅二億二千餘元。至其三十三年度全國籌備公益儲蓄，預定爲二百二十九億，但由於國土日蹙，只能收一百二十億，一百億將完全不能征收，一百二十億額，於二月底可望繳納入八成，即九十億之譜，但十二月底，繳庫者僅十餘億元，限期勢將延緩(三月三日商務)。今年當局吸收游資，收縮通貨，將來其收效如何？現在我們還不必過早論斷。

抗戰期中大後方的農村經濟

金明

中國的農村經濟，近百年來一貫的在走下坡路，農民的貧困，農村的凋敝，早已達到難以想像的程度。

抗戰本是一個最偉大的滯留換新的過程，整個中國的新生工作，是必須在這次抗戰中完成的。但在農村經濟方面，目前所及，却到處看到半封建關係的加強，看到農民貧困程度的增加，這不能不說是可慮的現象，中國農民是抗戰的脊梁，中國農村經濟是抗戰經濟的命脈，如果在這兩方面不能獲得有效的改善，那末民族的獨立幸福，便無從談起。

爲了解抗戰以來大後方農村經濟的趨勢，讓我們從具體的租佃關係，借貸關係，捐稅關係，以及商品關係四方面來觀察一下這幾年的變化。農村經濟的榮枯，這四種經濟關係地起將決定作用的。

一、租佃關係

據國府主計處統計局數字，民國二十六年中國每百戶農家中佃農佔百分之三十，半自耕農佔百分之二十四，二者合計就是說有百分之五十四的農家，是與租佃關係有密切關係的。抗戰以來，各省地權雖有相當變化，但佃農與半自耕農在總農戶中所佔成分，大致仍與戰前相去不遠。這百分之五十四的農戶，經營着至少半數以上的農地，他們農作經營的良窳，與租佃關係的是否合理，完全是正比例的變化。

由於農村中半封建的經濟關係，中國各地的租額，一般地本來就是很高。據國立法院統計，民國十九年各省地租佔產額百分率各租大多在百分之四十五以上，符合於土地法所規定的百分之三十七五者絕無，而除谷租之外，普通尚有雜租、魚租、力租等額外交納。這種高租的地租負擔，會使進步人士一談起高租就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非改革不可的。但抗戰以後情形如何呢？據農產促進委員會所作川、康、浙、鄂等大後方十二省二十六年至三十年無償租額變動調查，則各租之變動情形，平均如下：

水田	谷租(斗)	二十六年	三十年
分租	谷租(斗)	二·一	一三·七
平原地	谷租(斗)	五·〇	五·〇
分租	谷租(斗)	八·〇	八·四
山坡地	谷租(斗)	四·七	四·八
分租	谷租(斗)	五·二	五·三
分租	谷租(斗)	四·二	四·二

(分租一項指地主所得數)

一般地說來，二十六年至三十年間地租增加的趨勢已經是很明顯的表現出來了，雖然增加的情形尚不嚴重。但我們知道，在卅年以前由於糧價地價的增漲，農民負擔有相對的減輕之勢，所以地租增加也尚不劇烈。卅年以後，由於賦徵實物，土地負擔增加，地主企圖轉嫁，加租之風才大盛起來。加租的方法大約不外三種：一是直接增加租額，這比較困難，而且易於糾紛，所以大多只能以換佃的方式實行；二是不再議讓，即是無論收成是否良好，地租都要十足收租，因為普通所謂能收一石的田，多指豐年標準，平常是不收足一石的，戰前地主於歉收年份，對於佃戶租額，多予讓讓一部份，如全不問豐歉，全不減讓，無形中就使佃戶負擔增加不少。這種情形卅一年四月「大公報」巴縣農村小景曾有如下記載：「自去年政府實行征購實物，地主們以此爲藉口，肆意增加租額，過去可以議讓的，現在則紛紛收租，因此，租佃而涉訟的糾紛，在今天的鄉村，成了一種普遍的現象」。另外一期新聞稿：「據新從川南某縣來人談，某縣近數月來租佃糾紛甚多，幾佔全縣民事訴訟的十分之九」。去年四月「新華日報」載粵北和平縣農村素描，也有類似情形：「這種租額是相當高的，通常最低的一丘田每年能收十担谷，六石，稱子肥料還是佃戶自己的。由於近年糧價不斷的高漲，連年的旱災，結果是一方面地主希望從土地上獲得更多的利益，一方面糧食的歉收，佃戶要求減租，因爲地主不肯減租，許多佃農因爲這不起租而被迫離開

了土地」。三是加租。據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所作豐山附郭四鄉區農村調查，一百廿五戶佃農及半自耕農每市畝田歷年所付租金數額前為二十七元，二十八年六五·六元，二十九年七四元，三十一年三六三·七元，三十二年七三·五元，卅三年則達二、三六二·八元，本年二月三日「新華日報」有篇農村通訊談到加租的情形：「用錢來繳租（押租）的，有些簡直高得嚇人，最普通的是二石租繳兩千元糧首，一個繳三十石租的佃戶，就算在豐年可以淨得十幾石谷子，還是不夠交一年的糧首的……有些地方地主們在和佃戶訂換佃字的時候，因為租了糧首幾平年年在加，於是就同佃戶商量，少出一石租子，多交一萬元糧首，這辦法目前在鄉下相當盛行，看起來好像是少租加糧，互不相虧，實際上租子一年後才收起來，少一石租子，多加一萬元糧首，等於佃戶早一年付錢，過一年得貨」。加租就這樣成了加租的最普遍方式，而和農村的借貸關係配合來看，他的意義是比直接加租更嚴重的了。

二、借貸關係

和租佃關係同樣的在農村經濟中演着極其角色的借貸關係，所不同的只是一個是通過土地所有權的形式，一個是通過借貸或質物所有權的形式；一個尚有條件可言，一個更殘酷的無條件可言而已。

借貸關係在農村中的形式就是高利貸。由於貨幣的借貸不是像土地的租佃那樣容易調查，更由於農民為了怕降低自己的社會地位，對負債情形諱莫如深，所以各地農民的負債程度，是很難確知的，而以抗戰期間與戰前相比照，更無法找到具體材料。但抗戰期間，農戶負債的情形，根據各方零星調查材料看來，其嚴重程度是較租佃關係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國立社會教育學院三十三年七月調查豐山附郭四鄉農戶，除地主外，二六一家農戶中負債者達二二九家，約為百分之五十五，平均每戶負債額九、三五三元。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三十三年調查湖南會同對縣兩縣六鄉農民負債戶數為金竹鄉百分之六六·五，優子鄉百分之七三·六，維溪鄉百分之六二·八，沙灣鄉百分之七五，江市鄉百分之四七，秀州鄉百分之八三·五。王合智等經濟研究會三十年（大災前）調查河南西縣西侯村負債戶數，約佔總戶數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從這些數字中作出結論，說中國農戶一半是在債台上過日子，我想決不算過火的。

利率的提高，在抗戰以後本是普遍現象。因為通貨膨脹和物價高漲，對

於債權人都是不利的，所以債權人補救的方法，就是拚命提高利率，就事實所知，在北方農村中戰前普通利率，多為百分之三十，但二十七八年以後，大加一成為最普遍的了。然而單只提高利率，其補救的程度終究是有限的，抗戰期間高利貸的特色，尚不在提高利率，而在把握着物價高漲的趨勢，普遍施行着「貸款收買物」的吸血方法。「中國農村」八卷四期（三十二年三月）與寧農村社會速寫談到粵北農村中高利貸的情形：「抗戰以後，由於物價高漲和通貨膨脹，放利錢的人不是月息四分或五分，而是每百元一城六日為一城期，城即押場」之利息為三元或四元，每城結數，送到谷利，即每百元之利谷為五斗，照這二年的糧價看來，利率還大過本金……倘有一種「拿谷錢」放款法，即定青黃不接，地主貸款給貧農時，預先訂立谷物的低廉價格，到收穫時不論谷價如何昂貴，都須按原借款所訂立價格還谷」。拿谷錢的方式，現在是普遍的應用了，去年八月「新華日報」載董公君高利貸下的閩粵農民一文，所述農村借貸情形，已經和兩年前大不相同了，他的記法是：「閩粵兩省高利貸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除了少數城市中還有錢貸進行外，廣大的農村，差不多一致是質物借貸。借的是錢，還的是質物。一種舉出了十一個例子，完全在借錢還質物的，如折合幣價計算，則其利率最低是百分之二百，最高是百分之四千，普通為百分之三百、四百。這種現象，其實不止閩粵為然，他已經成為高利貸者的共同法寶。地主們為什麼拼命加押加租，而不一定直接加租，因為加押的收入來放高利貸，其利得是較諸加租更為巨大啊！

三、商品關係

商品關係像高利貸一樣，對於農村經濟的破壞，是把殺人不見血的刀。近百年來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過程，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是個最主要的力量。抗戰以後，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在範圍上是縮小了，但自整個大後方而言，商品與農產品價格的剪刀發展，並沒有削弱，除掉極少例外時期外，農產品價格經常處於極不利地位。

根據金陵大馬路凱教授所蒐集的材料，在抗戰以前，農村生產品與消費品物價，如以一九二六年各為一〇〇，則至一九三三年時農家所得之消費品售價指數為七一，而農家支費之消費品及生產品售價指數則上升一

○四，就是說一九二六年一年糧食所能交換的商品，在一九三三年時便減少了三分之一。商品的生產一方面破壞了農村的工業，增強了農戶對市場的需要，一方面又在價格上不斷加強對農民的剝削。

抗戰初起，農民消費物品的價格即步步高漲，而農產品的價格反有低落之勢，所以抗戰初期農民購買力受到的損失最大。二十九年以後，糧價上揚，農民購買關係的不利地位，一度略有改善，但消費品的價格不旋踵就又超居前茅，而糧食因為政府加強統制，漲價困難，以致很快的便仍然陷入不利地位。據中國農民銀行三十二年調查全國十四個省份（每省一縣）鄉村物價，其中有九個省份農民購買力指數都較戰前跌落甚鉅，只有五縣是較戰前稍高的，可見農民的購買力一貫地是走着跌落的傾向。以四川榮昌縣為例，這是一個比較正常的大後方縣份，則抗戰後歷年農民所得付物價指數如下：

所得物價指數	所付物價指數	購買力指數
廿六年	一〇〇	一〇〇
廿七年	一〇五	一一六
廿八年	九二	一一八〇
廿九年	九二	五九〇
三十年	二、〇二二	一、七五二
卅一年	四、三四三	四、五六三
卅二年（十一月）	一六、二七六	二二、〇〇二

這裡我們應當注意的，即三十年以後農民購買力雖漸有利，但很明顯像三十年那種糧價黃金時代，是稍繼即逝的，不到一年，便又轉為跌落中了。中國農民銀行此項調查，所付物價中物品共二十二種，而有半數以上是非農村可以直接生產的食品，如麵粉豬肉，豆油，菜油之類，所以實際尚不能完全表示出農業產品與工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度，倘以該行所統計的各地零售物價指數與衣着類數字相較，則差別更大，然而農民消費的物品中完全購買者，則以衣着類所佔比例最大啊！

四、捐稅關係

抗戰以來農民負擔的捐稅征派，大家都知道是愈來愈重了，而最嚴重的增加就是三十年起實行的田賦征實，這是顯著的事實。但是如乘因此而即說三十年以前農民的負擔會由於糧價上漲而一度大為減輕，那是不正確的。抗戰初期只有田賦一項，較戰前比較相對的減輕了一些，而絕對數字仍是增加

的。其他物價的騰漲與人力的征用，則可以說隨着抗戰一開始就有了起來的，到抗戰第二年則已在農村中發生了重大的影響。如廿七年十二月六日「西京平報」秦川記行載實錫的情形：「實錫民衆，的確為抗戰竭盡了他們最後的力量。據當地縣府的調查，每日平均要動員七千個壯丁作軍事工作，其餘車輛驟驟的征調，更是多不可計，記者在鄉村調查所知，差不多全實錫的鄉村都為這種征調所苦」。三十年工合會豫區經濟研究室調查鞏縣一農戶廿九年捐稅負擔情形所指出的事實是：「（該農戶）共有地二五、七畝，田賦銀一、〇三兩，每兩征洋十五元八角（廿六年為九元），每兩納雜捐四九、八元，出軍麥三六〇斤」。可見即在三十年以前，農民的負擔已經增加很重的了。

卅年以後增加的情形最顯著，雖然歷年可資比較的數字不易得到，但增加的嚴重程度是有諸項確切事實可以證明的：一、田賦改征實物及實行隨賦購糧，即以實物來計算，農民的田賦負擔，因為隨賦購糧的關係較戰前也差不多增重一倍。二、軍公糧的派征，這一項負擔在卅九年以前還很少，抗戰前根本沒有。三、軍事征派，這也是抗戰前所沒有的。而若干「代購」物品，由於物價高漲，較價與市價相差日鉅，而農民的賠補也就不斷增加。四、保甲經費攤派。由於保甲經費與實支經費的差額日大，於是攤派的數目也不斷增加。這幾項，都是普遍存在的事實，而這些為農民負擔增加的鮮明指標的。

農民的捐稅負擔，現在究竟增加到什麼程度，全國性的數字是無法找到的，根據各種可靠材料，單糧食一項，包括田賦征實，實賦購糧，軍公糧及積谷，農民每年應交給政府的大約佔收益百分之廿五至五十之間，平均常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其他臨時攤派，數目或幾與此相等。據卅三年二月會在洛陽調查臨時攤派，發現每保每月派款，平均在四萬元以上，以一月份攤派第四保的派款單而言，則其項目有以下各種：鎮令本捐費，鎮令總巡捕房經費，防護團費，國民兵團募捐，隨汝運麥費，防護團乘洋，電廠運煤車價，赴郭家寨送煤費，保鐵鐵把子，元旦節募捐，難民募捐棉襪三件，農民導報費，勞備隊二名津貼，消防隊茶洋，赴七星河送堡壘，赴郭家灣送車脚力，打更費，麵換麥不敷，冬不學校酒飯，學校文具費，作堡壘工十一個，草價，缺價，保長受訓費，七里河柳樹二百根，保辦公文具費，堡壘材料費，堡壘費，送麥脚力，料費，火食費，還有兩項看不清楚，共三十三種。而且以各月派款單比較，則不惟數目逐日遞增，即項目亦有日益增繁之勢。假如把經常的與臨時的負擔合在一起，那末最低恐怕也要佔收益的百分之六十，很多地方，也許已經超過總收益以上了。

田賦和軍糧的征收，大都是以土地為對象，故佃農與半自耕農所受影響往往向較間接。但一般臨時攤派，却並不一定都以土地為標準，所以佃農也往往逃不脫。據調查各地攤派標準，大約有四種：一為按地畝平攤，二為按賦

劃分派，一為按成分攤，即按一戶之財產，不動產及收入情形，酌估高下，定其成數，担負一定百分比之攤額；一為按人，畜，房，地四大件分攤，每人一口，畜一頭，房一間，地一畝各為一平等攤款單位（這一項辦法見之於清陽，其他地方，當亦有類似情形）。前兩種標準只限於土地所有者，但後兩種標準，即佃農與雇農也逃不脫攤派的重壓了。

高利貸與重利盤剝的借貸關係，農產品的不利價格，以及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捐稅重出。這就是八年來大後方農村在抗戰中所獲得的進步！誰能說爭對建國的農村經濟制度不發生變化呢？八年來它的變化是劇烈的，這種存在於剝削關係，已經達到了極度的高潮。

五、幾個顯著的變化

在這種不斷加重的剝削關係下面，農村經濟發生了些什麼現象呢？第一，最明顯最足觸目心驚的是農民貧困程度的增加。糧價竟至不能蔽體的衣履，風雨刺蝟東西垂的棚屋，飢寒憔悴的面色。每一個踏進農村的人，在這方面必有鮮明的感覺。第二，由於負擔的加重，貧困程度的增加，尤其在什九年的物價暴漲後，農業方面雖政府不斷有增產的努力，而實際上整個生產是在減退。第三，很多統計都指明十九年以後佃農的戶數在劇增，土地大多集中在依賴特殊勢力，可以逃避捐稅征派的官僚士紳的手裡。由於農業經營利潤銳減，與戰時商業的畸形發展，一方面加速了農民破產的程度，一方面又以極大的引力吸收着農業資金。於是不能地主在過去投向農業生產的資金，比例減少了，多數富農也以所得來經營投機商業，因此更加重了農村資金的枯竭及高利貸的猖獗。

對於八年來的艱苦抗戰，農民提供了最大的貢獻，出力，出錢，出糧，出款對草架，出所有的一切。在外人的眼光中，中國農民成了一種神祕的力量，而在中國的上層人士中，它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沒有錢，就派，沒有糧，就征，兵額缺了，手少了，就拉。有人警告說，農村的人力物力都已到了山窮水盡，殺雞取卵的方法最危險的啊！但他們說這完全是杞人憂天，只要派下去，總是可以派起來的。是的，只要派下去，總是可以派出來，這好像是經驗證明的事。但是，看一看這一兩年征糧的情形如何？征兵的情形如何？看一看這一兩年農村災荒及農民死亡流徙，俱一看農村的情形，與農民生活又如何呢？

中國農村經濟需要新的改革，中國經濟的穩定與發展，也只有有農村經濟的繁榮與發展上才有前途。但改革是不容易的，他不能需要新生的力量，而且需要舊制度本身來為新生培養條件，舊制度本身不自己破壞自己，是沒有人能使之破壞的。歷史的發展，是非難不變，從這一觀點來說，抗戰以來大後方的農村經濟發展，又是向變的方向加速前進了。

（上接二六七頁）

宋仔封建權利，這樣一個典型，中國一天不解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反動統治者一天不放棄這個典型的繼承。太平天國雖然失敗，但無疑地已極大地、沉重地打擊了滿清的統治，動搖了它整個統治的基礎，滿清朝廷的聲威，從此一落千丈了。歸根到底，曾國藩之流究竟還是沒有救活了滿清朝廷，只讓它多延長了幾天的殘喘，而太平天國的人民革命精神也並沒有死亡。這種革命精神的種子，經過太平天國英雄的戰士們是更深地種下在人民的心中，甚至由湘勇發展的哥老會的心中了。孫中山先生自幼即以太平天國的繼承者自許，並終於完成了太平天國推翻滿清的未竟之業。

另一方面，就反動方面說，曾國藩創湘軍，主觀上雖是爲了挽救滿清，客觀上也起了些削弱滿清的作用。

滿清侵入中國，軍隊主力是八旗兵，平吳三桂到鴉片戰爭，主力是綠營兵，兩種軍隊清政府都有充分的指揮權。湘軍准軍是近代漢族軍閥軍隊，清政府要通過漢族軍閥才能使用，這樣，滿清的武力削弱了。

太平軍起義前，地方軍政長官（總督、巡撫、提督、總兵）極大多數是滿洲人。咸同兩變，湘軍轉戰全國，督、撫、提、鎮（總兵）不得不用湘軍中人。這樣，滿清對地方的統治也削弱了。

鴉片戰爭時，滿清獨攬外交權。咸同以來，曾、左、李與上海紳商，實辦、反革命的洋人打成一片。例如上海道吳煦劣跡昭著，被人參劾，曾國藩奏稱吳煦聯絡洋人，廣交洋商，厚結洋將華爾，吳煦的逃退，即繫英法各國對中國的態度。清政府得奏，不敢撤換吳煦。左宗棠經營辦胡雪巖介紹，向英商借款（中國第一次借洋債），作為出兵新疆的經費。李鴻章身兼官僚軍閥買賣三項性質，與反革命的洋人關係尤密，滿清不得軍閥同意，不能單獨進行外交。這樣，滿清對外關係也削弱了。

曾國藩爲首的湘軍，挽救了滿清，同時客觀上也削弱了滿清，滿清統治者之間勢力，起著顯著的變化，從此滿清政府，逐漸向漢族軍閥轉移。但這種變化，當然是出乎曾國藩這批反革命漢奸劊子手的主觀意識之外，其結果倒不是加強反革命，而是成爲有利於新的革命火種爆發的因素之一了。歷史發展規律之不可抵抗的力量，正在於此。

農民在歷史上的創造力

沈友谷

一部二十四史是寫給王侯將相看的，也是以王侯將相為主角的歷史，並不能傳達出歷史發展的真實。真正歷史上的主角其實並不是王侯將相，而是人民大眾。

中國經過長期的封建社會。在封建社會中的人民大眾就是農民。有許多農民被徵募入營伍，成為兵士，也有些農民失掉了耕地，到了城市，成為手工業者。這些兵士和手工業者在基本上是農民。所以要寫出這三千年的真實的中國歷史，就應該寫一部以農民為主角的歷史。

在這長期的封建歷史中，社會的物質財富都是農民所創造的。漢書食貨志寫漢代經濟最繁榮的時期說：「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詩人杜甫寫唐代經濟最繁榮的時期說：「憶昔開元全盛時，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庫俱豐實」。農業生產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基本。農民是基本的生產者。人民日用的手工業生產品是農民的副業經營，至於城市中專門的手工業，其生產品多半只是供貴族享受的奢侈品。漢代賈誼上書，反對富商大賈之坐食，說：「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飢，不可得也」。——其實不僅富商大賈，一切貴族官僚地主士大夫都是寄食在農民的勞力之上的。

封建國家的國力，依靠在農民的身上。田賦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財政收入中絕對大部分直接取於農民的血汗中，其餘的小部分也是間接取於農民的血汗中的。但農民對於封建國家的貢獻不只出一錢，而且出一力。萬里塞外的邊疆，築長城，開運河的工程，人們常看做是個別帝王的豐功偉績，但沒有千萬農民的力量，那里能得了這些？唐代的萬里之平大軍越葱嶺而西，近人考古家斯坦因在那一帶考察地形，贊嘆不已，認為這是越過阿爾卑斯山的漢尼拔軍隊所不及。這也正是依靠農民最能吃苦耐勞的中國農民所創造出來的奇蹟。

在那沒有任何幫助人力的機械的時代，農民只是依靠着他們的雙手。但就是靠着無數雙手一點一滴的勞力，農民把幾萬萬畝的土地變成了滋長百穀，供給生活資料的良田。據古代的一些不大可靠的統計數字，在第六世紀末葉（即在隋代）全國耕地在二十萬萬畝以上，這數字恐怕是太大了。明代耕地最多時有八萬五千萬畝，清代墾地最多時是九萬一千萬畝。這都是千千萬萬農民用他們的雙手所造成的成績。必須考慮到歷史上天災人禍對於農民生產力的反覆破壞，那就更可看出農民的辛勤勞動的可驚。水旱瘟疫固然有着很大的破壞作用，但還不如封建統治者所造成的「人禍」那樣可怕。在封建時代歷史上，幾乎不斷地有兵災戰亂，每一次「亂世」常有繼續到數十年之久的，結果在廣大的區域內，「城郭蕭條」「白骨蔽野」，「千里無遺」。人民流離的流離，死亡的死亡，田野荒蕪，荆棘成林。農業生產受了大火的破壞。但是戰亂稍平，辛勤的農民又漸漸聚集起來了。他們在廢墟上而重新造起家宅，在荒蕪了的土地上重新種植，用他們的血汗重新恢復起了農村的生產。兩千年來，農民是經常這樣地用他們的雙手抵抗着一切天災人禍，憑他們的堅忍勤勞供給整個社會以生活資料。

假如在歷史上除了農民的手，還能有什麼東西呢？

有些人雖不否認如上所舉的事實，却決不願意承認農民是創造歷史的決定力量。他們服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規律，認為歷史上的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創造者是少數的勞心的統治者，而不是那千百萬胼手胝足的勞力的被治者。「一將功成萬骨枯」，農民的白骨不過是給那個別的威勳的將軍作基石而已。

按照這種看法，農民雖然是以勞力而為封建社會中的唯一的生產者，但農民是沒有獨立意志，沒有創造能力的，他們只是聽憑別人的指示着道而行的。——但事實難道真是如此麼？

有人甚至相信，就是農民日常所從事的耕種方法，也不是他們自己所創造，而是「先知」的一聖人「教給他們的」。所以有神農氏製耒耜教民稼穡的傳說。這種傳說雖不始自封建時代，但封建時代的人加以傳播，確定其為真實的歷史，用來證明生產勞動者是毫無創造能力的。至於耕種方法的逐步改進，那也被認為與直接從事勞動的農民無關。總是要牽強附合地去找出一個「發明」者來。

譬如從粗放的耕種法到集約深耕法，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這是在農民長期的勞動實踐中造成的進步，但有人却居然因為莊子則陽篇中有一「昔予為禾稼，而幽莽之」……予來年深其耕而熟之」這樣的話，便認定深耕法是莊子「發明」的！又像使用耕牛又從「農桑勞動力的」一個大進步，這也決不是某一個個人所「發明」的。但有人以為這「漢武帝的一搜粟振農」超過所「發明」的。其實至遲在戰國時已有歷史記載可以證明當時是用牛耕的。不過農民常因生活困苦而養不起牛，越過又設法使牛耕之制普遍。漢晉食貨志上，同時又有「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深……過教民和馬牛（人功）就犁」。難道可以說，越過一面發明牛耕，一面又發明人力耕麼？恐怕實際的情形是，越過一面考察了農民牛耕的方法，一面考察了沒有牛的農民用人力拉犁的方法，發現了最好的方法，便加以推廣。趙過發明「代田」，大概也是這種情形。因為所謂「一畝三畦代田」的方法本是「古法」，並非由越過所創始。

自然，像越過這樣的人是應當受到尊重，因為他知道怎樣幫助農民提高生產力，並且從實際上研究如何改進勞動工具和耕作方法。但是也決不能以為有了這越過，於是耕牛「發明」了，好的耕具「發明」了，好的耕種方法「發明」了，農業的生產力就提高了。越過把社會生產力提高的原因歸在某一個人的身上，抹煞了千萬農民在實際勞動過程中的不斷進步努力，正可以代表舊來一般人對歷史的看法。

兩三千年間，農具和耕種方法幾乎沒有什麼大的改進，辛勤勞作的農民始終只是使用着極簡陋的工具，停留在極簡陋的階段上。不可否認的，這是由於加在農民身上的殘酷的封建壓迫大大地限制了農民的創造力。當農民終歲勤勞所得，絕大部分都要為地主取去，所剩餘的連養活自己都不夠的時候，農民怎樣會有興趣來求工具的改良，耕種方法的改良，以提高生產力呢？所以假如以兩三千年來農業生產力的很少進步來證明農民愚笨，無知，那

是不公平的。

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農民在自己的勞動生產的實踐中的創造力的表現，也還是極微弱的。封建統治者，一般地說來，對於如何幫助農民提高生產力，改進生產方法是不管的，他們所關心的只是如何從農民身上，愈多愈好地擷取其血髓；灌溉事業和對於水旱天災的防止，雖列為封建統治者的要政，但也往往只是有名無實。所以農民就只能運用他們自己的經驗和智慧，從事一點一滴的改進，作一點一滴的努力。這些改進和努力的成績雖然很小，却是不容人們抹煞的。

各種農具雖似乎一向保守舊法，因循不變，但其實質還常常有些改進的。像基本的農具——犁在現在的全國各地農村中，我們可以找到種種不同的形式，有極簡單原始的，也有比較複雜，效力也較大的。這從簡單到複雜，很顯然的，是反映農業史上的長期演進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就有着農民的智慧的運用。為了運用水力，風力，農民在物質條件的限制之下，也曾很靈敏地創造了些器具。至於如轆轤和車，在歷史上逐漸進步的痕跡也可以看出來。其中也有農民的創造才能的表現在內。為了和水旱天災作戰鬥，農民也會從苦痛的經驗中，創造出些聰敏的辦法，所以認真要治水防災的官吏當不該不夫向老農請教。

要證明封建專制統治究竟不能完全壓殺農民的智慧，還可以從文藝發展史上看出。

專制統治者對於人民的無知。他們竭力使「勞力」者沒有「勞心」的機會，把一切精神活動都為貴族士大夫的專利品。但是農民的文藝創作並不能而停止。專制統治者，在一部文藝發展史上真正發着創造力的並不是貴族士大夫，而是勞動人民大眾。一種文藝形式到了士大夫手里，就只是代復一代地因循沿襲，在內容上也就不斷地湧現出新鮮活潑，富於生命力的作品，提供出新的生活的土壤，而不斷地湧現出新鮮活潑，富於生命力的作品，提供出新的文藝形式。假如封建統治者曾經別出心機創造出「八股文」的話，那麼人民大眾却會創造出五七言詩，戲曲，平話種種形式。假如不是有農民的創造力行爲源泉經常供給了新的東西，那麼一部士大夫的正統文藝史是不見得會那樣日新月異，繁縟多姿的罷！

我們自然不能忘記，農民的創造力的發展是在不自由的情況下的。無論在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上，他們都是受着沉重的約束與束縛。這種封建統治

的約束與束縛，阻止着農民創造力的發揮，同時也就是阻止着封建社會的進步。

但農民也不只是在封建社會關係規範以內極有限度地表現他們的創造力，而且還在長期封建歷史中，時起時而作突破這種社會關係的束縛的鬥爭。歷史上常常遇到這樣的時期，整個的社會政治秩序都已支離破碎，秩序不安。在上者惶惶莫知所措，因為封建社會的統治者，是除了因循成規，墨守陳法以外，別無其他辦法的。在這時候，就只有從廣大農村中起來的農民力量，成爲打破現狀，展開新的局面的動力。從秦末的陳勝吳廣，一直到清末的太平天國，幾乎每一個朝代都重演着這種情形。

有兩種看法應予糾正。一種看法是說，歷史中的農民起義都是在生活壓迫之下，出於無奈而被迫造成，純爲自發的騷亂，並沒有方針和自標。由此又有一種說法，說農民起義只是消極的破壞，一點也沒有什麼積極的創造作用。

自然，不必否認，農民起義是由於極度的生活壓迫所激成的變亂。本來，任何性質的革命，在基本上都是由於大多數人民得不到充分的物質生活資料的原因，而封建時代的農民更難是在剝削皮包骨頭的時候才爆發而爲行動的。但是，假如以爲只是由於客觀條件到了一定的情況，四處農民就自然而發地一呼百應，蜂擁集結起來，那却不是事實。因爲假如是這樣，那就只是一股流民，而不會形成那樣大規模的、有組織的行動的。事實上，我們看到，像東漢末年的「黃巾」之亂，這是一次影響極大的農民起義。其領袖張角在起義之前，已作了十餘年的準備。「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連結郡國。青、徐、幽、冀、荆、揚、兗、豫九州之人，莫不響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稱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後漢書皇甫嵩傳）有了這樣的準備與組織，更有專人往來京師，約定內應，才預定時期同日而起。這當然不能說是一時的烏合之衆。又像太平天國，在起義之前，也長有了多年的有計劃的準備。洪秀全、馮雲山早年就抱定目標，流亡異鄉，以紫荆山爲根據，以傳教的方式組織羣衆，十幾年中，團結了很大的力量，終於在洪旗一舉時，就揭出了和滿清統治者對立的政治方針，成爲有組織，有紀律的大軍。這更不能說是盲目的自發行動了。

自然，封建時代農民革命的自覺性是很低的。他們的目標方針很朦朧，常常不經受客觀環境影響走到和自己理想相反的方向去。但是在過去歷史上任何革命本體不絕於如此。就像法國大革命，其領袖又何嘗能明確地指出

革命的目標和預知革命的方向？更何況在那樣落後的社會條件下的封建時代的農民呢？

這些農民的領袖，在那樣強大的專制統治之下，竟然敢於相信，依靠着廣大的飢餓的農民的力量，就能擊和專制統治者對立起來，而他們也竟能想出辦法，把這一盤散沙的農民力量，團結起來；這難道不是極其可驚的事麼？

至於說，農民的破壞性。這些農民本是打破委在自己身上的枷鎖而起來的，其行動鮮如不具有強烈的破壞性，倒是奇怪的事了。其破壞行動有時高到非必要的程度，也是在一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難免的。尤其受到殘酷壓迫而處於失敗時，破壞性常發展到最高度。但並不能由此而認爲，農民的起義單純地只具有破壞性，因爲在事實上，每一支農民戰爭不僅就其影響看，是存着一定的積極意義，就其行動本身看，也是創造了許多在歷史上可貴的東西的。而且還有人根本否認歷史上有農民戰爭。他們以爲封建時代一切戰爭中的軍隊都是以農民組成的。洪秀全的隊伍是農民，曾國藩的隊伍也是農民。

——提出這種說法的人是不懂得，或故意抹煞，封建統治者的軍隊雖也徵募農民，却是在封建統治者利益的支配下進行編組與從事作戰的，而農民戰爭的隊伍中自然也有個別的領袖，但一切行動却都是按照消全體農民的利益的。正因此，封建統治者所進行的戰爭中只有個別的「英雄」，其兵士都是被動的，受僱傭的人。而農民戰爭中的英雄却是全體的戰士。他們都是自動地積極地參加這戰爭，因此就能在戰爭過程中，集合羣衆的智慧，而在各方面表現出驚人的創造力。

按照歷史事實來看，真正當於破壞性的其實是統治者所進行的戰爭。在這種戰爭中，並不能建立任何對於人民有好處的事。封建統治者的屠戮軍隊從來不可能對於人民保持嚴明的紀律。如像古代的「八王之亂」，唐代的「安史之亂」，這種在封建統治者內部的混戰，對於國計民生，一點積極的意義也沒有。正如前文所說的，封建統治者在平時是以對農民慘酷的剝削而阻止了社會生產力的進步，而到了「亂世」，更是直接表現爲毀滅農畜生產力的劍子手。相反的，在農民方面，在平時，受剝削剝削時，還作了偉大的積極貢獻和表現了生產勞動的創造力；一旦拿起武器，成爲自由的人，自己支配自己的命運時，當然更無拘束地爲了自己的利益而發揮其創造才力了。不過因爲究竟是在戰爭環境中，農民的創造才力一時解脫了封建勢力

真轉，又不能不受戰爭環境的限制。而且這方面的史料非常殘缺，也還未經過有系統的蒐集和整理，因此人們常常忽略了這些「叛亂」的農民運用聰敏才智的創造。

就是從戰爭技術上看吧，像南宋時的楊么，據宋史上記載：「么浮舟湖上，以筒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這是很可驚的。固然宋時本已有人試製「機輪船」，楊么或許是仿效成法，但是把這預備用為戰艦，却是當時的「官軍」也還不會的。這顯然是楊么所率領的農民隊伍自己的創造。

農民戰爭在軍事組織和戰略戰術上的創造更是值得稱道的。他們之所以能以比較低劣的武器和未經訓練的隊伍，常能取得勝利，正是依靠他在軍事組織和戰略戰術上的成功。他的中間的領袖多半並沒有軍事的經驗，並沒有能充分接受封建統治者在軍事上的經驗的積蓄，但正因此，他們在實際行動中，便能大膽地運用適合於他們需要的方法，機動靈活，不拘成規。農民戰爭中的這方面的成就，到了太平天國，是得到了高度的發展。當太平天國開始起義時，就把他們的軍隊從最小的四個人「一伍」起，一直到數萬人的大軍團，形成了嚴密而靈活的組織，並確立了軍隊內部生活的紀律號令等。有很多都是他們所新創的。這是保證了他們在十多年中軍事組織能一貫強韌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他們的敵人也這樣稱贊道：「蔓延數省，未見窮乏，所恃無他，蓋始定軍目不置於法，有以致之。」（賊情彙編）

在太平天國中出了許多名將，如馮雲山，楊秀清，石達開，李秀成，陳玉成，他們都是出身於閉塞的農村中，然而指揮大軍，從容作戰，攻守有度，使敵人無術可施。唐代的黃巢，明代的李自成，也有同樣的成功表現。他們在戰略戰術上的創造，可以說是屬於我們現在所說的運動戰和游擊戰的範疇內。雖然他們並沒有能加以概括，提高為理論，但是他們在實際的戰鬥中突破了封建統治者的軍事家們所定下的戰爭規律，却是不容否認的。這並不能只歸功於他們中的個別領袖的天才。倘不是廣大羣衆自動參加戰爭，在戰爭中集體地發揚了積極性，創造性，這樣的戰略戰術的實現是不可能的。

不僅農民用新的方法打仗，而且用新的方法從事社會的建設，提出他們的社會理想。這也在太平天國中表現得最為驚人。不管他們的方法和理想都帶有烏空想色彩，但是在那樣長夜漫漫的時代中，這種偉大的空想發散着光芒，雖在實際中失敗，仍舊繼續閃爍在千百萬低頭勞作的農民的心上。假

如認為農民只是牛馬一類無知識的人，那是絕對和事實不符的。

歷史著作一向被統治者所霸佔着，在那裏面幾乎沒有一點篇幅記下農民的血汗。農民不但不被看做歷史的主角，而且被看做是最不值得重視的「配角」。

把歷史的真面目揭開，就必須重新寫過，寫出真正以人民為主的歷史。對於長期的封建時代而言，就是以農民為主角的歷史。自然，在這部歷史中，也必須很忠實地寫出客觀的條件怎樣地限制了農民的創造力，使農民的思想與行動都表現着很多缺陷。

但這部歷史必須寫出，農民怎樣地從事生產勞動，又怎樣地受苦受難；怎樣地一次次起而鬥爭，又怎樣地一次次走向失敗；更必須寫出農民在生產與戰鬥中，怎樣地運用羣衆的智慧，不斷地創造出新事業，成為推動歷史前進的主要力量。——向真實的歷史去探索，我們就一定能夠從這備滿痛苦的人民大眾的創造力無窮的物質生活，政治生活，靈長精神生活上，掘取豐富的源泉。

怎樣自我學習

郭沫若等著

「怎樣自我學習」這本書，是許多青年朋友們所關心的。這是一本關於如何學習的書，它不僅告訴我們學習的意義和目的，而且還介紹了許多有效的學習方法和技巧。書中強調了主動學習的重要性，鼓勵讀者通過實踐來鞏固知識。此外，書中還談到了如何克服學習中的困難和如何合理安排學習時間。這本書對於廣大青年讀者來說，無疑是一本非常寶貴的參考書。

每册定價一百八十元

報日新傳經
號八〇二第民華中

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

——中國近代史稿的一節

范文瀾

滿清中央政權——軍機大臣，六部尚書，名義上滿漢平分，實際上主要權力均在滿員之手。地方政權——各省督撫滿員常佔十之六七。總之，滿員掌握軍政大權。例如鴉片戰爭時，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直隸總督琦善，山東巡撫託渾布，兩江總督伊里布，浙江巡撫烏爾恭額，閩浙總督（駐福州）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欽差大臣兩廣總督林則徐，沿海各省除林鄧二人，其餘全是滿員。帶兵大員奕山、奕經、薩和、大員考善、伊里布、耆英，又全是滿員。這些滿員都極昏庸貪污，對中國人民沒有絲毫愛護的心理，而如林則徐這樣「漢員」，又被滿員所壓迫排擠，不能有決定的權力。

但是，這種情形，到會同藩時代起了一個變化。會同藩是滿清賦與大權的第一個漢人，因為他以血腥的拳腕撲滅了漢族人民的大反抗，暫時拯救了滿清統治者——大危機。

太平軍起義，人民響應，勢如破竹，以咸豐帝為首的滿族統治集團驚惶失措，束手無策。咸豐帝首先向程朱道學求救，令國巨獻上朱熹「大學講義」，又編呈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四篇講義。他親自到孔廟行禮，召集滿漢百官聽他講「中庸」致中和一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尚書」四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歸，惟德之懷）。從這些講題看來，他也知道政治太不「中和」太無「德」了。但空談是無補的。他轉向奴才請求，大罵奴才道：「試問：臣午夜捫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將來有不堪設想者矣！」又說「願等甘為大清國不忠之臣，不亦愚乎？」但腐朽入骨的百官，不會怎樣痛罵，還是無濟的。他再向士子們討好，斬髮擊主科柏樹（滿族大學士），表示公平取士，但科場積弊極深，並不能「為士林維持風氣」。他灰心失望，索性懶管政務，專玩女色，寵妾那拉氏（西太后）替他批閱奏章，嬖臣肅順替他找美女，同時也出些政治上的主意。一八六一年秋天，他在熱河發病死了。

會同藩就在這個時候，由於肅順和那拉氏的提拔，出任滿清統治者壓迫漢族人民的急先鋒。那拉氏肅順二人是當時滿洲皇族裡最有「政治頭腦」的

，他們知道了挽救滿清的統治不能依靠漢人而要靠漢奸。肅順公開宣佈「滿族沒有一個人中用，國家有大事，非重用漢人不可」。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會同藩率湘軍攻陷太平天國的武昌，咸豐帝得報大喜，對軍機大臣們說「會同藩不過一個書生，想不到能立這樣戰功」。漢軍機大臣琦善、蘇廷楨道：「會同藩一號召，就得成萬兵馬，怕不是國家的福利」。咸豐帝聽他提陞，臉色變了，半天轉不過氣來。從此他照守慣例，不敢信任會同藩，專指望向榮（江南大營）、琦善、托明阿、德興阿（江北大營），和春（兼統江南北兩大營）這些滿族將領（他們又專靠張國棟一人支持所謂大營）的勝利。不過，會同藩時運得家握，部分兵權，這就全靠肅順的竭力保護。一八六〇年，即咸豐帝死的前一年，和春張國棟被李秀成擊潰，湘軍軍勢大衰。咸豐帝死後，那拉氏親自執政，她馬上改變政策，給會同藩兩江總督節制四省（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的重要地位，讓他充分發揮漢奸作用。

會同藩從此不但與滿清皇帝更親密地結合在一起，而且與外國侵略者也結合在一起，履行所謂「安內攘外」（正確的說法是「攘內安外」），終於將太平天國的革命火焰淹沒在幾千萬人民的血泊之中。會同藩的這個「事業」，使他成為百年來一出賣民族的漢奸與屠殺人民的劊子手的開山祖。

會同藩是湖南湘鄉一個富貴家的子弟，他應科舉成翰林（道光十八年），道光末年已升官侍郎（比尚書低一級）。他從滿、倭仁湖南人唐鑑麟習程朱道學，又被老師穆彰阿（也是講道學的）認作特等人才，向道光帝密保，替他設法取得道光帝信任，因此升官特別快。這些經歷說明會同藩開始就是穆彰阿的私黨，又是肅順理學大師倭仁（官至首席大學士，西太后尊重他）的講學後輩，他和滿洲貴族有親密的關係。他的前輩唐鑑麟在湖南望城高，學徒衆多，再加他本身侍郎資格，對他後來的「飛黃騰達」，這都有力的條件。會同藩學得道學的虛偽，却不會受束縛於道學的迂腐。那拉氏（

（文墨家）當面責備他的虛偽，說他對人能作幾副面孔。曾國藩說：「我生平以誠自信」，專標一個誠字來用人、辦事；左宗棠與他因派別衝突，結成讎仇，就專標一個信字來揭穿他。事實上虛偽和殘忍是結合在一起的，虛偽乃是殘忍的一對面，這兩方面正是曾國藩這個反動派代表者的特點。沒有虛偽就不能表現他反對革命的風貌。

當時滿清統治，內政則殘暴貪污，外交則變賣賣國，這是無論何人不能代為隱諱的。連曾國藩這樣一個「誠實」走狗也不能不承認滿清「餽糧太重，民不聊生；官吏害民，甚於盜賊；冤獄太多，民氣難伸」（咸豐元年備陳民間疾苦疏），「外面完全，中已潰爛」（道光三十年應詔陳言疏）。這樣真實痛惡的政府，人民還不敢革命自救麼？曾國藩却堅決屠殺數千萬革命人，（照容闈估計約二千五百萬人死在戰爭中），來保持這個萬惡的滿清政權，除了他的階級貪婪性和愛好卑劣，任何理由也不能說明他和他所領導的「大軍」為什麼必須這樣的原因。

曾國藩深研經史遺蹟、熟諳滿清政制，當京官時已顯出他的一副手腕不低於一般官僚。帶兵以來，雖不斷受了革命方面的打擊，但反革命却極堅決，自稱能在「受挫受辱的時候，咬牙立志，取得經驗知識，毫不氣餒」。他是「軍事能手，兼識指揮，自己更加加心明力定，從耐煩二字痛下功夫」。後來一切反動統治階級辦事還領首「女正公」作模範師，認他「是我國舊文苑（封建文化的反動派暗喻）的代表人物，甚至於理想人物」，把他的漢奸反革命方法及其投降妥協的外交路線，當作統治人民與腐敗青年的經典，完全是合理的。

曾國藩的活動與滿清這一時期的歷史是分不開的，從一八五二年（咸豐二年）至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可分為下列四個階段：（一）辦團練，（二）與太平軍相持，（三）戰勝太平軍，（四）保守既得成果同時反動派內部各種分裂表面化。

（一）辦團練（一八五二年——一八五四年）

太平軍在湖南永安時人數不過一萬（上帝會員，老兄弟），入湖南後，人數大增，他們多是天地會會員，洪天全（衡山人，湖南天地會首領，與洪秀全同稱萬歲，在永安城外被捕）死，天帥會和太平軍中地位降低，不得享

老兄弟待遇，一部份人逃回原籍，影響本地會黨起事，股小而多，力量微弱，曾便利於官紳辦團練來對付他們。

團練一方面保護地主官紳財產，一方面地主官紳藉此魚肉鄉民，斂財自肥，它是地方性的暫時武裝，沒有出縣作戰的意圖，更說不到出省作戰。從保甲團練以至編成正式軍隊，轉戰全國，這是由於當滿洲反革命軍隊的腐敗無能，而一切反革命派——從滿清皇帝到各種大小漢奸——却都要求有一個反革命動旅來和太平天國作戰所促成的。曾國藩所以能夠進行這樣大規模的反革命活動，就正因為湖南當時是處在革命與反革命衝突的要衝，同時他與滿人關係親密，善諷滿清統治者所需要的程朱道學，有堅決反革命的決心和手腕幾個條件也幫助了他。咸豐二年，曾國藩養母在家，咸豐帝叫他幫助湖南巡撫辦理本省團練，任務止是「搜查土匪」。次年正月，他到長沙辦事，首先區別了團與練。他所謂的團就是保甲，選擇所謂「公正紳士」（事實上是最兇惡的紳士）當團練，在本地清查戶口，捕捉「匪人」（主要是當時的革命份子）；他們說的團就是訓練鄉兵，集中縣城，隨時出動鎮壓反抗。他表面上所重在辦團，不重在辦練。凡是紳士族長來請辦團，就給給「鄉團執照」「族團執照」，使「約束（壓迫）」「鄉」「族」，「放手辦事」的權力。辦練必須地方官主持，兵數不求多（約四五十人），更不求各縣都練。實際上却是授權反革命紳士普遍辦團，自己在省城聚勇辦練，不讓地方官紳練練分他的權，引起人民新的反抗。他說他辦的是「官勇」不是「團丁」，足見他開始就有以官勇（臨時招募）代官紳（練勇兵）出省作戰的野心，不過形式上採取所謂「保鄉自衛」藉以減輕、避免各方面阻礙（如本省文武官視、排斥、鄰省求援，咸豐帝嚴令出教，新兵不願離鄉土），並藉以實現他的訓練不完成、準備不充分、決不出省境的主張。

曾國藩辦團的方針是大張紳權，在省城設「發審局」，凡團練送被捕人到局立即殺死，禁止屍親呼冤，又禁止向團紳請理，他竭力提倡團紳捕人，地方官殺人，捕人要多，殺人要快，官殺人「不必拘守常例」，紳捕人「不必一一報官」。他那種瘋狂的屠殺，連巡撫等文官也看得太無人理，人民更陷入朝不保夕的險境，大家叫他「會剿頭」，形容殺人像割頭髮那樣多。他感到公論不容，給咸豐帝上了一個奏章說「臣身勢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自然，咸豐帝大加褒獎，鼓勵他繼續屠殺，巡撫也也不敢和他為難了。這樣曾國藩成為湖南反動派的首領，同時也得排除某些阻礙，進一步完

成了他的訓練計劃。

會國藩訓練的方針是封建團結。練勇與將領全用湘鄉人（湘軍、湘勇由此得名）。練勇招募後的農民充當以便制。將領選取至親、密友、以及秀才、童生、這些人多是羅澤南（會國藩同學，也講程朱道學）的學生，平時講究所謂「忠誠」，尋稱願為保衛「聖道」「倫常」而死戰。事實上他們主要目的還是為了求官，會國藩也不願章羅澤南勢力鼎盛，用收門生的方式，使羅氏學徒皆拜會氏做老師。湘軍大將王珍（即王鑫）不願，說「我的老師止有羅山（澤南）一人」，大遭他的嫉忌，終被排去（埋伏後來會五分製的根源，左系湘軍即王珍舊部）。會國藩用同鄉、同學、親友、師生種種關係團結湘軍，造成私人軍隊誰招募、服從誰的作風，同時又奉他為唯一的獨裁領袖。在湘軍服從會國藩一人，每個營止服從營官一人。各個營獨立，彼此不相統屬，除服從會國藩，不受其他任何人節制。近代軍閥軍隊從會國藩湘軍開始，李鴻章淮軍、袁世凱北洋軍等軍閥軍隊一直繼承到現在。太平軍佔領長江沿岸，非水師不能決勝負。因此會國藩向廣州購買力量籌辦「長江水師」，大造船艦，尤其重視洋炮，要求咸豐帝向廣州購買千餘尊，武備咸備，洋砲不到，決不出戰。他崇拜洋砲，贊美備至，認為戰勝決定因素。

咸豐四年二月，湘軍水陸兩軍組織完成，大舉出戰，陸軍五百人為一大營，非湘鄉人營官所統勇稱小營，附屬於湘軍各大營。陸軍凡十三營，五千餘人。水師戰船二百四十，坐落二百三十，凡十營，五千人。官員、練勇、工匠、夫役水陸共一萬七千人。湘軍將士在思想上有封建主義（程朱道學作基本）的武裝，在組織上有相當周密的準備，在湖南後方有豪紳地主的擁護，算是當時有力的反革命軍隊。湘軍出境，會國藩請求咸豐帝發給他空白執照四千張，內指虛銜執照、捐監生（與秀才有同等資格）執照各一半，派專人在湖南（湘軍根據地）、江西（湘軍進攻的目標）、四川（湘軍餉源之一）等省募捐。大規模開捐，籌餉是目的之一，主要還在讓那些缺乏社會地位的反動份子取得紳士資格，在本地辦團，他的主意是「以紳輔官，以民殺一賊」，助兵力之不足。

會國藩反革命事業的主要依靠之一，是在善於爭取滿洲皇族的信任。他辦團設「發審局」，設人如麻，負責局員二人，其一是滿人裕麟。他練勇勇，遣綠營將領（多是滿人）猛烈反抗（甚至採用兵變方式），他用色飲額絲管營務，保舉塔齊布升任湘軍大將。二人都是滿人又都是綠營出身的軍官，

使綠營反抗不成大害。後來出境作戰，總是上奏章，誇張塔齊布的忠勇和戰功，說他們「二人親如兄弟，合如膠漆」。塔齊布死後，特別舉出多隆阿，推他繼統帥，指揮湘軍大將攻安徽陳玉成軍。會國藩力求取得滿洲統治者的信任，以便放手屠掠漢族人民，就在小事細節上，也避免引起猜忌。

（二）與太平軍相持（一八五四年——一八六一年）

咸豐四年二月，會國藩率水陸軍進備出戰，首先頒佈一道叫做「討粵匪檄」的文字。這篇檄文充分表現湘軍將領的封建性漢奸性，大意如下：

（一）「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江（江西）、安徽、江蘇）被脅之人，會大家牛馬之不若」。針對太平軍老兄弟弟兄弟兄的區別，操縱內部分裂。

（二）「粵匪崇天主教。謂田皆天主之田也，貨皆天主之貨也。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視，不思一為之所也」。針對太平軍崇奉耶穌，宣傳原始共產主義，尤着重號召「讀書」人反對天主教，保衛孔孟道。這一號召不僅對當時的「讀書」人有很大的作用，而且也迎合了當時還散佈在民間的守舊觀念。

（三）「粵匪毀佛州之學宮（孔廟），無至聖（孔子）之木主。所過州縣，先毀廟宇，爾帝岳王以至佛寺道院，其廢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此又鬼神之所共憤」。針對士人尊孔思想，人民迷信心理。挑動宗教仇恨。

太平軍宣佈的民族大義，會國藩却一字不取，到止說幾句「今天子憂勤傷腦，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連他自己也不相信的鬼話。在宣傳上，太平軍在民族主義方面佔優勢，湘軍在反對天主教，保護孔孟方面佔優勢。在軍事上，太平軍紀律嚴明，得廣大人民擁護。湘軍攻城奪地，盡其燒殺搶掠，將士得名（湘軍保舉軍功極濫）得利，故作戰非常兇悍。在政治上，太平軍領土內一般人民安居樂業，生活比較改善；湘軍實權會國藩率領若干股股匪，用省悉二股掠，但他代表全國所有反黑暗勢力，尤其是善於調解最大的滿漢矛盾，以及中國與外國矛盾求得內都某程度的反革命團結，基礎也還不弱。太平軍和湘軍在這些條件下進行十二年戰鬥，相持階段佔了八年。最後太平軍失敗了，這却不是因為湘軍有什麼特別的本領，而是因為太平軍一部分領袖的短見——他們一到南京就不圖進取，日趨腐敗，以

至中途腐化分裂——的結果。

太平軍到連南京，即採取保守主義。不乘勝以主力北上，發動北方民衆，直取反革命的基本巢穴——北京（在當時是完全可能的），給敵人得以縱容腐化力量，這是戰略上最大的失策，成爲後來失敗的張本。不僅如此，太平軍在下游不取上海江浙，滿清仍得享受漕米（北京滿人及官員的生命），地丁、關稅、鴉片捐、外交權等利益，上游不發動領袖軍及其他起義軍，空耗兵力與滿清爭武漢三鎮，旋得旋失，終不能守，在這些方面，戰略上他已處失敗地位。湘軍作戰計劃，先取武漢，扼上游形勢，推胡林翼坐鎮調度，他的反動才能至少同會國藩一樣，有時還要高些，湘軍後方鞏固了。第二步入江西攻取九江，第三步進安徽取安慶，最後取南京。會國藩固守據備方針，即使在緊要關頭，也死不放鬆（如在江西星子縣與安徽祁門縣之不移營）。太平軍有石達開攻江西，陳玉成攻安徽，李秀成攻江浙，固不能牽動他的主力（會國藩都爲基幹）變換方向，甚至英法聯軍進攻北京，也不會動搖他的這個反革命戰略步驟。

正當湘軍出發的時候，太平軍攻入湖南，進軍長沙附近。會國藩自率一部分水陸軍攻堵港，湘勇潰散，會國藩三次投水尋死，都被隨從人撈起。隨軍主力堵齊布、水軍主力楊啟福、彭玉麟攻湘潭大營，挽救了他的湘軍。他描寫這次戰功說：「水勇開放大砲，火彈火箭齊發，專心焚燒『賊』船。恰河北風大作，順風放火，遇船即着，一天燒『賊』船六七百隻。長髮（老兄弟）短髮（新兄弟），逐浪飄流，紅巾黃巾（太平軍服裝）隨波上下，岸紅水濕，同歸浩劫。水戰火攻，未有痛快如此者」。他把慘殺當作痛快，後來每次戰勝，總是用「痛快」的表情，繪聲繪色的寫出屠場慘景，宛然一幅一幅的地獄圖，向滿洲皇帝報功請賞。他的漢奸創子手立場的堅決，真像頑石一般。

靖港湘潭戰後，太平軍退回岳州，會國藩乘機重整水陸軍，裁去潰勇五千，補進羅澤南等營。羅營軍官全是羅門學徒，戰鬥力很強。陸軍有塔、羅、水軍有彭、楊，湘軍進一步堅強了。咸豐四年七月湘軍攻陷岳州，九月陷武昌漢陽，十二月進圍九江，完成了第一步作戰計劃。

會國藩出城作戰，感到三個困難：第一，太平軍作戰勇敢，「愈剿愈多，愈擊愈悍」，湘軍死傷極重，「銳氣挫損」。會國藩提倡獸性來報仇洩忿，「擬作士氣」。例如與興與火治戰門，獲俘房一百三十四名，「一概剃髮凌遲」，九江城外獲俘漢十二人，立即「凌遲處死」，又生擒十三人，「就

地挖目凌遲」，武昌城外太平軍新兵戰敗，「長跪乞命，帶同七百人，全數斬決」。崇陽戰鬥擄獲七十餘人，殺死祭陣亡將士，祭畢，令兵勇吃人肉。在會國藩獸性不範下，湘軍的殘忍是從古少有的。例如同治元年七月，湘軍攻破寧國府，「大呼直入，一律斬盡無遺」。過了兩個月，還是「城內外屍骸狼藉，無人收埋」。事以上湘軍攻破一城，就是屠滅一城，也就是洗劫一城，所謂「城破時，百物同歸於盡」，就是全城生命財物，頓時化爲烏有。第二，人民擁護太平軍，敵視滿清。許多記載都說：「民賊合一」，「民不恨『賊』而恨兵」，「賊如梳（沒收富貴人財產），兵如篦（無所不取）」。會國藩自己也說「自岳州至南京數千里，經民膏髮納貢，成爲習慣，不服從難發命令。官軍（清）略有挫敗，鄉民四面攻擊，餉道斷絕」。又說「官兵過境，居民逃避一空」，「買不到貨物，找不到糧草」。

「官兵有騷擾之名，『賊匪』有要結之術，百姓不怨『賊』，不恨『賊』，甘心『從逆』，却怨『官軍』騷擾（燒殺）。派出探兵，多被鄉民擒獲」。於是會國藩的獸性發洩到人民身上，縱兵濫殺搶掠，殘留的人民，強迫難安，作爲投順的標記。英人令利「揚子江日記」稱太平軍紀律嚴明，沿途破壞大多爲清軍所爲，責英國援助清軍爲不義。容闈對太平軍「官軍」曾作公平的記載，他說：「人民對太平軍較有信用，而不賴棄，農不耕，無荒涼景象。而太平軍對人民，亦未有虐待事，相處甚得」。又說「運河（江南運河）兩傍之田，皆已蕪蕪，草長盈尺，滿目蒿萊，絕不見稻秧麥種，旅行過此者，設不知其中真象（指清軍燒殺破壞），必且以是歸咎於太平軍之殘暴，殊不知實由於官軍之殘暴，以予等沿途所見，太平軍對於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護，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虐者，治以極嚴之軍法」。就是會國藩在同治二年，「沿途察着軍情賊勢片」裡也承認太平軍「禁止姦淫，聽民耕種，民世耕種，公私各半，傍江人民安之若素」。南京攻破以後，太平軍還是「民心未去」。他爲要取得勝利，大膽大殺，做到「男婦逃避，烟火斷絕，耕者無顆粒之收，和軍廢棄」，使太平軍「行無民之境，騎魚游無水之池，居不耕之鄉，猶鳥居無木之山」。他見長髮人便殺，實際就是見人便殺，從前滿清入關，留髮不留頭，殺死中國人民無數，會國藩又大殺言愛人民，強令中國人民留滿洲貴族的奴役。第三，湘軍是匪匪組織，目的在搶掠，搶飽了就想逃走。咸豐四年在襄河打仗，軍隊就動搖起來。會國藩對咸豐帝說：「水師搶掠太多，私藏貨物，破城（武漢）以後，水陸弁（官）勇各攜財物有飽則思歸（逃起）之意」。田家鎮戰鬥「各勇奪獲『賊』船五百

像說之多，彭玉麟逃船隻太多，爭奪誤事，久經衆勇圍困，遂將奪回之船，一並燒毀。這還不是個盜賊的圖畫？這算是「抱道君子，赫然震怒以衛善（孔、孟）道」（討粵匪檄）？會國藩率領湘軍，慣用一暗一明兩個辦法。暗的辦法是縱兵殃民。列如湘軍駐紮石壕城，紳士訴苦連連，「兵勇拆毀房屋，以作柴薪，捉去歸民，爲伊（兵）搬運，所有店舖，被兵勇輩佔居罵罵，更有夫役人等，借多砍伐竹木，而實運取室中器物。城廂內外，房屋完全者百無一二，如此橫行，以致歸民有官兵不如長毛之歎」。這是平時駐軍的情況，戰時殺掠算作軍功，誰敢向他訴苦呢？他在軍情無可掩蔽的時候，訓斥軍官一頓，表示維持「紀律」和「榮譽」。明的辦法是虛報戰功。憑他善於做文章，把湘軍寫得戰無不勝，一方面取得滿清皇帝的信任，一方面籠絡軍心，湘軍保至三品以上的軍官不下數萬人，事實上湘軍幾乎全部是軍官，小官變大官，兵勇變軍官，使這些人貪利又貪官，升官無止境，貪利也無止境，繼續留在軍營當賊匪。也有些營的官和勇，搶飽了不願打仗，會國藩只好發給解散，另招一隊「深山窮谷寒苦之民」來補充。湘軍始終依此「貪」一途「維持它的戰鬥力」。

咸豐四年十二月湘軍圍九江，至八年四月陷九江，九年六月陷景德鎮，江西入湘軍手，前後凡四年半。中間經無數次大戰，饒軍主將塔齊布、羅澤南（六年三月回教武昌時斃命）都被太平軍擊斃，水軍戰敗後分爲內湖（鄱陽湖）外江（長江）兩部，形勢常在危急中。會國藩出死力保持通浙江的道路，從浙江方面獲得餉銀、食糧及上海的關稅、鹽金，湘軍不斷潰敗，終得免於敗滅。太平軍不出兵取江浙，却在江西與湘軍苦戰，是極大的失策。石達開主持江西軍事，會國藩最怕他，說他「發悍爲諸「賊」之冠」。六年八月，洪、楊、韋內訌，石達開離回南京，咸豐帝出意外，令會國藩準備石達開來投降。會國藩到底是最老練的，他答覆咸豐帝，深怕石達開執朝政，說「若其石一逆」勝而洪章敗，則該「逆」挾詐以取衆，假仁義以要民（結民心），方且飛揚自恣，未必遽有投誠之心，他又知道石敢進不會投降，說他會勸太平軍九江守將林啟容歸順，製造文件騙瑞州守將賴裕新歸防地，「向無成效」，還是切實備戰要緊。果然，石達開出南京後，率兵自江西攻浙江，會國藩大恐慌，急令大將會國藩、李元度率湘軍主力攻石軍後路，大將李續賓（羅澤南的統將）出全力攻陷九江，石達開是孤軍，不得不退出浙江。

咸豐九年十月會國藩四路進攻安徽計劃，會國藩會同李元度第一路攻安徽

太平軍安徽主將陳玉成驍勇善戰，聯絡捻軍，八年十月，三河鎮大戰，玉成擊斃李續賓會同李元度，羅澤南率部全軍覆滅，會國藩畏懼陳玉成呼爲「四眼狗」出全力對抗，才能支持。十年閏三月李秀成陳玉成合攻江甯大營，和春、張國樞敗死，大營潰敗。秀成軍攻取蘇州，直入浙江境，滿清朝廷感到生命危險，發生前所未有的慌亂，第一次給會國藩地方政權，叫他署兩江總督，帶兵親往投敵，「保全東南大局」會國藩却認爲安徽城圍一撤，全片敗壞不可收拾，堅決不離開安徽。但形勢逼迫，他不得不離開一下會系湘軍獨佔戰功的思想，保薦左宗棠幫辦軍務，當自己的助手（實際是胡林翼保薦的咸豐帝專用左，分會軍權），保薦沈葆楨（林則徐女婿，不滿穆彰阿派的會國藩）守江西，保薦李鴻章辦淮軍。他對李鴻章特別重視，說「該員勁氣內斂，才大心細」，挑選長江水師打仗得力的將弁，交李鴻章使用，從此出現左系湘軍和李系淮軍。

江南大營（向榮自廣西尾隨太平軍到南京，駐兵孝陵衛，號江南大營）統帥向是滿人（純向榮到粵），軍隊是綠營兵，駐地在南京附近。照咸豐帝的看法，滿清統帥與漢人會國藩對立，綠營兵與湘勇對立，瓶。在外圍戰勝太平軍，滿清統帥就近取南京居首功，可以保持滿清統治者的威信。大營潰散，咸豐帝的計劃失敗了，會國藩率兩江總督，表示湘軍勢力大進了一步。但當時局勢非常危險的。太平軍李鴻章文金攻入江西，陳玉成、張洛行縱橫安徽、湖北、河南，尤其是李秀成攻江蘇、浙江兩省，給滿清致命的威脅，再加英法聯軍佔天津攻北京，全國震動。會國藩堅持他的軍事計劃，自己專攻安徽，江西交給左宗棠，準備從江西入浙江，對英法的侵略者方面預定議和，要學在所不計。他在「奏復勝保請飛召外援（指湘軍）摺」裡說，「侯（等待）該夷（英法）就擒（請和）」。當時咸豐帝對湘軍說：「情形萬分危急……勿得藉詞延宕，坐視國之危急」，會國藩即派胡林翼，直截提出「撫」的辦法，他知道對英法侵略者投仗，止而喪失兵力，破壞革命的內戰計劃，不如講和較爲便宜。滿清昏庸廢國，會國藩精明賣國，他的才幹勝任反革命的內戰首魁，因之他也能任賣國能手。

正當英法反動派聯合的軍隊火燒圓明園，咸豐帝逃往熱河，清政府訂城下之盟，——北京條約的時候，會國藩正在江西安撫頭作反革命的內戰，還打敗仗。中、英、法和緩成功，法國俄國的反動派要求出兵助攻太平軍，美國反動派要求從海運糧米（十年十一月），會國藩贊成「目前資夷力以勦剿清賊，得訂一時之憂」。法國剛把他的「皇上」即逐出北京還不會回來

，也要「然而尤之，許其來助」反對太平天國。他的頭腦確是除了反對革命的人民以外，再沒有別的思想。滿清訂北京條約後，曾到英國的利查，咸豐十一年五月幫助清英人辦德（管理中國海關）建議進口鴉片每箱課稅四十五兩，買外國大小輪及槍炮，法國也願出賣槍炮並派人傳授製造法，咸豐帝很滿意，徵詢會國藩意見。會國藩完全贊成，認為「我皇上聖慮周詳，安內攘外之至意」，「購辦洋槍洋炮，為今日救時之一要務」。他要求咸豐帝在訂購洋槍洋炮未到期先撥給兩隻破舊輪船（從英商租來）使用。歡迎外國反動派的殺人利器來維持中國的「無道綱常」（實際是專制特權），是會國藩傳給後來統治階級的「不朽」衣冠。

會國藩堅決圍攻安慶，十一年八月終於被他攻破，屠殺城中太平軍二萬餘人（老弱婦女在外）跳水圖逃的又被水師殺殺，「實無一人得脫」。他自稱大快「人」（獸）心，向咸豐帝報功，不料這個滿洲主子七月裡因貪色過度死去了。他接到消息，笑得「伏地動絕」（昏暈），說是不得趁主子活著的時候博他一笑。

（三）戰勝太平軍（一八六一年——一八六四年）

咸豐帝死去，西太后鄧拉氏當權，她知道要滅太平軍必須使會國藩，而會國藩的漢奸忠實性又確信可以保險，因此大膽給他兩江總督節制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大權（十一年十月）。他獲得漢員空前未有的信任和權力，在這一時期中，高度發揮了他反革命才識，尤其在對外關係上，他善於把封鎖勢力與外國侵略勢力相配合，依賴外國取得反革命內戰的勝利。

上海是外國侵略中國的根據地，李秀成軍取江浙，官僚豪紳地主富商多逃奔上海，上海成為反動份子的集中點，咸豐十年，上海反動份子組織「愛國會」，出資備美國的一個在本國犯罪逃亡到上海的流氓華爾成立「常勝軍」，與太平軍作戰。會國藩從「人民如海，貨物如山」，「關稅每年數百萬兩」一點看，上海是最大的一「餉源」，從取得洋船洋砲洋兵「助剿逆」一點看，上海是求外國軍艦援助唯一的途徑。他看到上海是決定反革命與太平軍內戰勝敗的關鍵，他就主張「聯絡洋人，協力守禦」上海。同治元年正月「請撥借洋兵餉片」裡說「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華洋人之財期可，借洋兵以助剿蘇州，代復中國之疆則不可」。前面的「可」是直率的，後面的「不可」如是一時的裝腔作勢，等到必需的時候，他也就同樣地亦操操地

做了。隨後他就主張軍隊與西兵「會剿」內地了。初時，英法駐軍北京公使要求出兵助剿，浙江紳商向清政府請願借洋兵，清政府動搖不定。同治元年三月會國藩派李鴻章帶勇往上海，準備「會剿」。四月，「常勝軍」聯合英法反動派的軍隊攻入嘉定青浦兩城，太平軍圍城猛擊，外國兵逃回上海。左宗棠說：「夷人畏長毛，亦與我同」。會國藩看洋兵戰敗，對於洋兵入內地的主張，又表示冷淡。同治二年，英人反動派戈登代華爾（在浙江慈溪縣作戰被擊斃）統率常勝軍，與李鴻章親密合作，共同進行江蘇境內反太平軍戰爭，屢獲勝利。李鴻章左宗棠用洋兵攻陷江浙兩省。會國藩看到「會剿」的利益，卻又贊成清軍與洋兵合攻城池，洋兵得財物（搶掠），清軍得土地（當然也搶掠），會國藩主張的所謂「會剿」辦法，李左在江浙把它執行了。

會國藩本人駐安慶，同治元年五月會國藩率湘軍主力進至雨花台。八月，李秀成猛攻湘軍，血戰四十六日，秀成軍敗退，南京合圍。二年十二月李鴻章帶兵來助。會國藩拒絕李鴻章，說最好教他帶餉銀來，李鴻章也就託故不敢來。這是會國藩最顯著的一次內部矛盾表現，像他那樣老奸巨滑，為什麼不能掩蓋這個矛盾呢？湘軍起初利用餉銀招誘破產農民當練勇（餉比綠營兵多三倍），出境作戰以後，官兵主要收入是搶掠財物，搜獲金幣珍寶不可勝計，流行着「軍興不之財」的諺語。會國藩（咸豐七年「謝天恩奏摺」）也說「湘中勇夫，以投營為名（官爵）利（搶掠）兩全之場，以戰陣為日用常行之務，赴江西、湖北投效者，絡繹不絕，父缺子代，此往彼歸」，造成湖南省紳士流氓猖獗大發財財的熱鬧狀況。搶掠，鼓舞了湘軍的「戰鬥勇氣」，也鞏固了湘軍的戰鬥目標——南京。當時「中外紛傳，「洪逆」之富，金銀如海，百貨充盈」，這就是湘軍拒絕准軍來助，各營輪流苦攻，不惜任何嚴重損傷，圍城二年以上，病死二萬人，殺死八九千人，而作戰竟始終不懈的原因。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軍攻破南京，「分段燒殺，秦淮河屍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殺十餘萬人」。會國藩也不得不承認太平軍的勇敢，他說「李開方守馮官屯，林啓容守九江，葉芸來守安慶，皆堅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眾自焚而不悔，實為古今罕見之劇寇」。從敵人的口中，正顯出了太平天國將領士兵，乃是中國民族偉大的英雄的戰士。他們為了反對滿清統治者、外國侵略者和漢奸的聯合反革命勢力

爲了爭取中國人民的民族自由和社會改革，忠貞不屈，視死如歸，悲壯激昂，可歌可泣。會國藩軍隊無情地殺戮這大量的民族精華，世道堪稱「萬惡」而已嗎？他大報殺人功，對財物却說「僞官賊館，一炬成灰，並無所謂「賊庫」，克復老巢而全無貨物，實出微臣意料之外，亦爲從來罕聞之事」。『金銀如海』的南京，忽而變爲『全無貨物的空城』，其實南京的一切財物，特別是江甯民間的財物，已都完全被湘軍洗劫一空，會國藩只好說一句『爲從來罕聞之事』來掩飾。會國藩看到李秀成自傳，揭露出湘軍歷來虛報戰功，諱敗爲勝等等的内幕深以爲忌，所以決定這抗「御旨」，把李秀成留下自行處置。很顯然的，如果遵照滿清皇帝命令，送李秀成到北京「獻俘」，會國藩和湘軍的「名利兩全」，在滿洲皇帝一怒之下，可以變爲名利兩喪。他這時再也顧不得他一生標榜一個「誠」字的假面具了，他刪改了（至少刪改了兩次）李秀成的自傳，忽地地殺了他以滅口（秀成死後傳出，南京居民罷市哀悼這位偉大的英雄）。清政府本想從審問中查出金銀所在，但在會國藩提供捕獲湘軍三四萬人的交換條件下，也就這道拒絕獻俘，換殺李自成爲「合法」。會國藩給李鴻章信裡說：「李秀成擒獲後，弟備刺以錐，流血如注，隨即傳置檻車（囚籠）中」。會國藩對這位民族英雄施行如此的毒手，不是簡單的爲了洩忿，更不是強迫投降，而是逼供所設藏金的秘密。李鴻章給友人信說：「沉翁（會國藩）百戰百勝而得此地（南京），乃至婦孺怨詛，當局固無如何。後賢（後來的地方官）難免厥施（無法恢復），似需百年方冀復舊也」。湘軍燒殺搶掠的慘狀，可以想見。會國藩殺李秀成，大戮湘軍，令會國藩稱病歸家（國藩得寶物金銀最多，在家鄉大建私第，聲名惡劣不堪），都是爲了掩護湘軍賊匪的暴行。

會國藩的湘軍始終是如此兇惡的一幫殺人放火的匪賊，但是他們却始終口口聲聲稱太平軍爲匪賊，爲殺人放火。但是究竟誰是匪賊，誰是殺人放火，不是明明白白的嗎？

會國藩入南京，急辦三件大事：首先是蓋造貢院，當年舉行考試，接按江南士人（地主紳商子弟）；其次建築南京旗兵營房，請北京隨營旗兵南來駐防，發給金餉，同時強力裁撤湘勇（不發欠餉），一部份交會國藩押解回籍一部份流落南京，因索欠餉及其他非法行動，又被會國藩殺死無數。會國藩不僅消滅了農民起義的太平軍，而且也消滅了農民從逆的湘勇，食賊勝之果的只是滿清統治者及一批擁護封建舊制度的士大夫，大買賣，大地主。

（四）保守既得成果同時反動派內部的各種

分裂表面化（一八六四年——一八二七年）

會國藩正在江南鞏固他的勝利成果，北方另一支反抗的農民軍拾軍勢力又已大張，滿清兩個大帥——欽差大臣僧格林沁與湖廣總督官文東手無策，不得不再用湘軍，同治三年十月令會國藩帶兵到皖鄂交界處督「剿」。會國藩深知滿清想在反捻戰爭中造成滿蒙將帥的威望，對抗湘軍將帥，自己再出「立功」，將更招滿清猜忌，有利不保。他一面繼續裁撤湘軍，一面推薦後起的淮軍並湘軍一部份，歸僧格林沁、官文調遣，保證各軍服從命令，這正合滿清的願望，令會國藩仍回兩江總督原任。

僧格林沁憎惡湘軍，說他們都不能作戰，喚使苗沛霖（安徽地主武裝首領）殺湘軍幾營，又令部將陳國瑞與湘軍五門，奏劾湘軍爭功。湘淮軍方面，會國藩止服從會氏兄弟（國藩、國荃），左系湘軍止服從左宗棠一人，淮軍止服從李氏兄弟（鴻章、鶴章、昭慶），會國藩地位高，指揮淮軍，仍需通過李氏兄弟，左李互不相統，更不能統會系湘軍。僧格林沁、官文統率淮軍，結果引起滿漢兩系間趨著的分裂。僧格林沁敗死，滿清只好又整會國藩出來統軍，維持北方的危局。

會系湘軍大部份經會國藩竭力裁撤，兵勇和下級軍官非常憤恨（次要原因長官尅扣軍餉），兵變到處發生。例如同治四年，鮑超部（川勇，在湘軍中作戰最悍，搶掠也最兇）在湖北、江西、福建兵變，李、時、成三軍在湖北，調、義兩軍在皖北，金、唐、朱各軍在皖南，相繼變亂，再加被捻軍擊敗，湘軍基本上消滅了（攻捻中湘軍止服從會系張詩日，左系劉松山兩部）。湘軍失官官勇，深抱不滿，相率加入秘密反滿團體哥老會，影響在廣官勇也秘密入會，會國藩嚴令「查獲「哥匪」」，立予正法」，與湘軍士兵形成嚴重的對立。從此哥老會代天地會動興，成爲有力的反滿團體之一。湘軍紀律，人民早有「官兵不如長毛」的定評。淮軍同樣「與民爲仇」，會國藩無法約束，指揮不靈，屢戰屢敗，只好讓位給李鴻章，使淮軍享滅捻的軍功（劉松山部戰功最大，招滿清及李鴻章的獎賞，抑功不賞）。攻捻戰爭中，湘軍本身分裂，實力保存無幾，湘淮軍又分裂，於是李鴻章政治地位追上

會國藩。

徐軍敗後，滿清認湘軍為「隱患」(淮軍後起，成功較小，兵勇很少，加哥老會，滿清扶植淮軍，使與湘軍對立)，定計消滅湘軍，令左宗棠帶劉松山部與西北回旗起義軍戰鬥。同治八年：劉松山部據綏德，高連陞部在宜君兵變，起因都是查拿哥老會員。將領不信任湖南士兵，招募北方人充當，跟左宗棠到新綏的湘軍，士兵不全都是湘人了。

消滅湘軍，滿清與會國藩意見一致，起初利用落後的一部份農民，消滅革命的一部份(轉過來又消滅被利用者)，所謂冤死狗彘，查治階級。慣用這套計策來鞏固自己的權位。滿清在人民起義反抗中得轉危為安，會國藩得享受富貴尊榮，自然獲利極大。單就湘鄉一縣說，二品以上文武官將近一千家，他們都是漢紳大地主，佔地不離租稅，官吏強迫貧民代辦，造成普遍破產的現象。會國藩號召為保衛聖道，維持傳統文化而戰，結果止於少數人富貴，多數人死亡和破產。

會國藩在內戰中獲得勝利以後，竭力期滿保守個人的反動成果，他又轉滿清製造半殖民地政府的期許理論來鞏固國內統治。他認為「洋人之患，此天所為，實非一手一足(人力)所能補救」。『我輩分內之事』，專重在反對革命人民的內戰，應該「借洋人之力，開誠布公，與教和好，共保人財」。『應請』從大處着眼：咸豐十年八月洋人入京，不傷我宗廟社稷(不滅滿清)，目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我攻剿「髮匪」，二者皆有德(一)於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他把外國侵略者看作天神一般，侵略是「有德於我」，要聯絡他「共保人財」？半殖民地統治階級的媚外心理，以會國藩為代表而理論化了。同治九年，天津民間訛傳教堂誘拐人口，挖眼製藥，羣情憤激，有人與教徒在教堂口角鬥毆，法國領事豐大業洶洶來見直隸總督崇厚，向崇厚開放手槍，又向天津知縣劉傑放槍，擊死僕從一人。人民激動義憤，嚴死豐大業，焚燒教堂，殺傷教民數十人。這一仇教巨案，本質上是人民原始的自發的反侵略運動。法國藉口仇教，提出許多無理要求，滿清令會國藩往天津查辦。會國藩不敢據理力爭，却力主「和平」(屈服)辦理，退讓到連政府中人(包括李鴻章)也不能忍受，羣起抨擊。會國藩堅持自己的主張，與法使議定「重辦」滋事人犯，斬二十人，充軍二十五人(天津知府知縣也辦充軍罪)，又由政府特派崇厚到法國謝罪。經過大屈辱外交，會國藩聲望大落，全國朝野呼為賣國賊，人人欲得而誅，連他自己也覺得淒涼，說是「外侮清議，內疚神明，為一生憾事」。同治十一年，這個

漢奸劉子手在國人皆曰可殺的呼聲中死了。
被後來直到現在的一切反動派所詬歌的「曾文正公」，他的一生的真相就是這樣的。

會國藩是封建中國數千年尤其其南宋以下封建統治階級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體現者，又是鴉片戰爭後百年來一切對外投降對內屠殺的反革命的漢奸劉子手們的「安內攘外」路線(正確的法是「攘內安外」)的第一個大師，在這一點上，他的確是盡了「繼往開來」的任務。他精通極端專制主義的哲學——程朱道學，運用在言論上，就是滿口「誠」、「禮」、「仁義」，「道德」等字樣，運用在行動上，就是極度的殘忍，屠殺數千萬中國人民，認為「痛快」。他被「天朝田賦制度」廢倒了，要挽救地主階級的權利，犧牲數千萬人生命，說是「衛吾道」，所謂「道」，就是地主階級的「道」，從人民看來，恰恰是大道不道。

會國藩及其領導的一幫人，絲毫沒有民族思想。他甘心做滿洲皇族的忠實奴隸，屠殺漢人。對新來的外國侵略者，又甘心當忠實代理人，說反革命的洋人不滅滿清，直接參加反革命的內戰為有德於我，不必言計較「滿清之多難」及洋奴、教民、漢人民一類「小處」(事)。他有意識的認清了要維持國內統治，必需依賴外力，必需不惜喪權辱國的條件去交換外力。他規定這個對外公式，也就是中國封建統治階級與外國侵略者規定半殖民地依附關係。對國內弱小民族，左宗棠殺回民數百萬，屠殺田畝苗民一百萬，這人把殺人當做事業，他們殺漢民數千萬，當然不會放鬆對回苗的屠殺。

會國藩是屠殺同胞的內戰能手，一切思想行動都以反革命的內戰為中心。他反對太平天國獲勝的原因，主要依靠外國反革命的助力。在湖南鎮長江水師，洋敵不到決不出戰，「湘潭岳州兩次大勝，實賴洋敵之力」，因此得出「必需洋敵繼續接濟，乃能收愈戰愈精之效」的結論。駐軍江西安徽，逐步進逼南京，軍餉來源多數是上海關卡的稅銀(主要是鴉片捐稅)。保衛上海，攻陷江浙，得力在洋兵直接參戰。沒有外國的反革命援助，就不能勝太平天國。會國藩以後，凡是反革命的內戰能手，也定是賣國能手，會國藩給這些能手啓示了實例。

鴉片戰爭逼迫中國走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太平軍起義揭開了教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會國藩創造了走殖民地道路的民主革命的反動典型。文化方面，堅守舊文化黑暗面，拒絕外來的進步文化，政治經濟軍事方面，依賴外國侵略者的援助，合力鎮壓民衆，在外國侵略勢力保護下，

第一次筆談

知識青年怎樣推進民主運動(三)

在民主運動中知識婦女應該作些甚麼？

座談紀錄

編者

爲着避免麻煩，參加諸先生的名字，作了必要的更易，希望參加諸先生原諒。

到會人數：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馮、陳、褚、衛先生。
主席報告：「羣衆」的「讀者之頁」開始了第一次的讀者談話，題目是「知識青年怎樣推進民主運動」。這是我們切身的急難明白的一個重要問題，不容緘默，讓我們盡量揮自己的意見吧。我們知識青年在這個時代應担負起推進民主運動的先鋒和橋樑的責任與使命，那是無疑的，可是問題在「怎樣」兩個字，大家請注意，踴躍發言。

趙：我以為推進民主運動，不是一二人的事，不能脫離羣衆，在各種不同的人民集團中，都應當有組織力量存在，把民主運動展開起來。

錢：知識青年推進民主運動，首先應該知道，乃是由瞭解民主的推進到不瞭解民主的人中間去，然後應該分別以不同的人，不同的知識，不同的環境，不同的地域，掌握其對象，再推進民主運動。

孫：工農的力量是最強大的，例如組織田賦事，如果沒有廣大工人羣衆的力量是不易辦到的，所以我們應該推進民主運動到工農中去。

馮：知識婦女青年應幫助農村的無知識的婦女青年，使她們瞭解民主，免得遭受過大的利用和壓迫。
陳：我以為目前民主運動還未普遍到各階層的民衆

中間去，特別是小市民階級。我們應該設法培養他們的民主意識，使他們明白民主政治是什麼，民主與獨裁對全民的利益與危害是如何。目前我們一方面要要求民主，另一方面還要努力宣傳民主。

周：儘管有些知識青年口裡知道，他們在抗戰以前就深深感到不民主政治的壓迫和苦悶，但至國一發抗戰開始，他們是快活到像心上去掉了一塊大石頭，那時候他們是毫不遲疑的接受了各種政治號召，一切在抗日的條件下，個人吃苦勞力，甚至犧牲生命都不計較的。但是到最後方以後，眼看見，多少人民的抗日力量受到無情的摧殘，個人與團體，受到無理的打擊，有些心灰意懶了，什麼都不想幹了。再往後，對看到政治的不清明，貪污濫用，特權橫行，官商

合一，狂吃爛賭，越弄越不成樣，規規矩矩的大連生活都維持不了，處處顯出不公平，他們忿憤之下，實在不想生活在這樣腐敗環境中。想一個青年人，在抗戰期間，爲什麼會越走越消極，那就去一句話，「不民主」。所以我們知識青年以切身痛苦，對推進民主運動要努力做去是毫無疑問的。至於怎麼做法，我的意思第一是首先自己學習民主精神，第二是團結左右的青年朋友來認識民主，學習民主，推廣民主精神，促進民主政治之實現。

吳：怎樣推進民主運動，這是一個方法問題，故必要求求根源，把阻礙民主的原因找出來，克服，然後推廣。知識青年首先須自己認識民主，推廣民主，同時應該爭取反對的青年。

鄭：知識青年應該先去除本身對民主的懷疑與責任，並且應該避免利用知識上的優越以操縱羣衆。同時努力使民主精神普遍。

王：我們今天討論的問題是「怎樣」兩字，我以為可以目前政治設施與社會上種種不民主的現象傳達與人民，使大家有正確的瞭解。而且要把實現向自己接近的人們中去推進民主運動。

馮：是否我們應先明瞭民主運動的主力所在，才好決定怎樣去推進？
吳：主力是在大眾身上。
陳：「民主」兩字，好像由抗戰到現在，更感其需要，因爲各種黑暗的情形，在抗戰中已明顯的

張壽鴻道，故稱「民主」就成爲今天全國人民的戰鬥要求。這我們應該在學理思想上加深認識，同時在事實上來訓練自己。我以為指導民主方法應該利用已存在於民間的民主形式，並加以宣傳、組織，必要時輔以鬥爭來爭取。

林：我以為民主運動即是反對封建獨裁。今日之中國爲一個半殖民地國家，立刻進行民主仍有其困難；但是必須以鬥爭來爭取民主的實現，民間已有民主趨向，我們需要加以組織，使中間生出力量。

周：對的，在人民大眾確實已經有了民主的傾向，這是由於國內政治不民主及同盟國均重視民主權利原因造成。我以為指導民主，應先正己，洗刷本身不民主的意識，去掉英雄主義自由主義的色彩。決定人類命運的是廣大的工農大眾的力量，我們知識青年，是思想上的覺醒者，我們負有激發和組織工農大眾的使命與責任。祇是在我們的理智上雖然同情工農大眾，而在我們意識上還是不够的，我們應該盡力去瞭解他們，向他們學習，從而推進民主運動到廣大的農村中去。方寸有人提到組織問題，我想起文化界婦女界工業界都有了對民主的主張和宣言，可是不見有青年的宣言書（願者按：周先生所說的宣言，我們曾讀到很多，因爲言論不自由無法在報刊上和大眾見面了。）

，是見一般知識青年，還沒有一個大的組織。我們爲知識青年的力量是偉大的，我們應該有一個組織，可是組織的方法要慎重考慮，大的組織能否能，或是廣泛的以其不同性質不同環境不同區域立無敵小組織，一旦如小西之匪或江川，加之之匪或海洋，就可以變爲出類拔萃的民主力量。祇不實行民主我們就打倒他。

陳：林、周二位之意見我很同意，關於組織太小的問題，我以為目前急不及待，爾後即刻發動，應儘速民主運動青年。

周：關於組織一點，誠所提熱烈贊同，似須考慮，能去自然好。否則由小處着手也一樣。至於如何組織，應另定時開長計議。

吳：還有一點我們應當注意的，就是我們對黨派民主反對民主的知識青年，我們應該採取爭取態度，不能把他們當作敵人似的，得適當的對他們，而我們爭取的方法，自己首先要在思想上對民主有更深刻的認識，更豐富的認識。否則我們去說服爭取來了一部份青年，和我們立場相反的一些知識青年，他們有他們的說法，他們同樣的在爭取青年，甚至把我們說服了的知識青年說動搖了，說倒過去了。

林：這就是所謂政治鬥爭，果能一方面要在理論上對民主更深刻的瞭解，採取說服，一方面消極的多多聽取反民主的一切事實，也是爭取的好辦法。

鄭：爭取知識青年，應以不同的對象，用不同的方法。例如對方以至曲的理論來反對民主，我們就要用正確的道理根據來對付。

陳：抗戰加強了民主的要求，平時老百姓對民主是擁護的，可是現在他們都知道了。因爲在選全抗戰時期，利害關係到每一個人每一個角落了，因此，大家都感覺民主非常重要，人人需要民主。鄉下人不懂得民主嗎？他們祇是不知運用「民主」這兩個字眼而已。例如四川各鄉鎮盛行的「舵把子」，他們如有違反碼頭規矩或做了不該行的時候，弟兄們就召集大家喝茶討論決定地消遣「舵把子」的地位，他們還是民主的。又如鄉下人對抽壯丁，對苛捐雜稅

，他們要出人出錢出力，還是他們自己這做都吃不起，受保甲長是縣長屬下，自己每一無好處，也一聽不能作主，他們是反感極了的。所以，我說，抗戰使老百姓的一面面子，看清楚了他們所受的種種「不民主」。

周：據上所述，祇不能說對黨派指導民主運動有了爭分具體的辦法，大致可以說到幾點：

- 第一、是知識青年對民主對自身的要求；
- 一、思想上加強認識（知識青年在民主運動中的重要性及對民主的認識）。
- 二、生活上的民主作真的培養。
- 三、加強組織青年本身的組織。

- 第二、是知識青年應向各階層擴大推行民主運動：
- 一、去爭取，去激發不正確的民民主意；
- 二、爭取對民主黨者其妙地吸引青年；
- 三、說服組織團體的知識青年；
- 四、爭取熱衷的民民主知識青年以無情的鬥爭與打擊。

- 二、向廣大民衆宣傳民主運動：
- 一、以自己實行民主運動爲楷模；
- 二、以實際生活來說明民主的意義；
- 三、以種種事實來說明民主運動對人民大眾之必要。

其中加強本身的組織一點，我是認爲非常必要的，因爲這可以加強我們本身對民主的學習與民主理論的研討，而且有組織才有力量，我們知識青年應團結起來，作推進民主的先鋒。

陳：因爲時間不早，關於組織問題，以後再詳加討論。

（完）

學校與民主運動

徐 顯

在讀了「知識青年怎樣推進民主運動」中的「編者的話」及林建屏、語林、瑛明諸先生的報導，和提出的問題後，使我在學校與民主運動上，想起了很多要說的話。

的確，在今天要求民主是全國人民共同的慾求，也是我們的盟友——英美先進民主國家對我們迫切的要求；也是世界政治潮流必然的依歸。中國是今後世界和平運動中在亞洲的一根有力的柱石，不能民主便不能躋身於世界民主陣線的行列，不能民主便不能得到英美先進民主國家的諒解，因而不能獲得完全的勝利，更何遑論及建設新中國的大業！所以儘管有某些喪心病狂之徒談：

(被略)

在不民主的政治制度之下，產生了不民主的教育制度；在不民主的教育制度之下，產生了不民主的學校制度；在不民主的學校制度之下，產生了大批的被剝削、被限制、被摧殘的知識勞動者——教員，與大批的麻木不仁、馴羊、耕牛似的奴才——學生。於是人才訓練被廢、國家前途無所託付，且更令人難以想像的後果，這是必然的事實。查一問學校裡，往往是這樣：用人不公開，經

濟不公開，對上敷衍討好，對教員兩面三刀，對學生欺哄駁詐。作校長的人總是和事務人員勾結（事務人員照例是校長的私人），吃空額，濫報開支，用公款放子弟，讓學生伙食費，巧立名目，苛派學生。同時，榨取教員，從教員身上獲得利潤，而向時却把教員當成替他維持秩序的工具。但又怕這些工具不忠實地供他使用，於是便利用部份和自己有關係的教員，作種種活動，監視他們。這樣一來，一個教員往往很難安穩的在一個學校多執一些時候。功課教得好，但是愛管「閒事」，請你滾蛋；功課教得不好，但是特別受學生歡迎的，也請你滾蛋；功課教得特別好，但是不願從他意志作事的，還是請你滾蛋。還有一種是功課教得不能敷衍學生，以致失掉了維持秩序的作用的，當然也不會讓你白站一處的（有私人關係自屬例外）。至於那些能夠長遠在一個學校執下去的教員，則大半是「服務熱心」，安份守己的好先生。

至於對付學生，那更輕而易舉；首先是頒布一部若干條款的軍規，其次是記過、淘汰、開除（甚有校長向××機關告密學生的）。另一個方法是粉飾現實，讓學生一個個變成文盲，或是來一個政治組織，用金錢，甚至用成績以收買少數學生充作特務。更有公然用外力來鎮壓學生，廢殺學生的（如成都市中事件是），於是，黑暗的統治遂賴以穩固，而本來純潔有為之青年，却都變成了書獃子，綿羊，或變態的成爲流氓了。像這樣的的教育，何嘗是在造就人才？簡直是在毀滅人性罷了。這是在爲國家掘墓爲敵人鋪平道路，這是絕對的錯誤。最令人痛心的是在這種偉大的民族戰爭中，我們的教育却不能與戰爭配合，並且簡直可以說與抗戰無關了。不但如此，甚至還有禁止學生集會結社討

論國事的（成都某某大學等訓導會議議決），就只這把「休談國事」列入校訓了。

自然，有時學校也自動向學生講新政治，但意圖往往在錯誤，且不乏用內戰時的偏見來衡量今天的統一事業的。這無異是在灌青年的「迷魂湯」，不，我們這青年畢竟是可愛的，雖然有一小部份人對一切都失掉了信心，對於自己也失掉自信，他們養成一種對生活的微溫態度；多半帶着得過且過，無可奈何的心境；（瑛明先生的報導）。然而，另一面「同學們逐漸的從過去那種「獨善其身」，「少管閒事」的態度改變過來，不僅對於時局的關心提高，而且許多同學都希望就自身力量所及，作一些事情」（林建屏先生的報導）；同時，一向埋首書本的同學，今天也感到全世界規模的民主戰爭，已日益走向勝利，我們仍然是在政治貪污，民力萎縮，軍事失利的情形下；大家也覺得除了徹底實行民主，很難有辦法改變這種局面；（語林先生的報導），這正是告訴我們，雖然今天的教育在讓我青年麻木，但知識青年却十分關心時局，正視現實，熱望民主。而且，都希望就自身力量所及，做一些事情。因之，我覺得我們就應當趕快把民主運動在學校展開，清算過去一切不民主的，反動的怪現象。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道路，也就是今天的教育道路，讓我們努力吸取青年底「自身力量」來開拓這一條道路吧。

至於如何展開學校民主運動？我認爲應從下面各方面同時下手：一是使學生認識現實，給以充分的政治修養，二是選舉校長，給學生以擇師的自由，三是修改宣傳忠孝和一切歪曲意識的教訓，四取除學校黨團組織給學生以思想的自由，五頒布一部學校的「憲法」，六保證教員生活與工作，七保障師生研究閱讀之自由，八立求學校生活與社會生活的聯繫，九取替填鴨式的教授法，注重啓發，十提倡學生勞動，掃除「士」的階級意識。以上十點，只是原則的擬定，等在這兒與讀者一同研討。

卅四年三月。

投向人民的巨大力量

——人習——

在今天，已有許多青年朋友，因為環境和其他種種關係，一時不能走進民主的潮流裡來，所以感到苦悶，感到煩惱。為了爭取人民的勝利，為了解除當前青年朋友的苦悶，怎樣使我們所有的青年朋友，都能走到這偉大的熱潮裡來共同努力，是急待解決的問題了！因為我本身是青年，也是在為這問題而苦悶的青年，所以願將自己的意見提出就教于關心這問題的青年朋友？

我們中國青年朋友的處境，是較任何人，任何國家的青年，都要艱苦。我們從專制時期直到現在，沒有一點不在艱苦的環境中掙扎掙扎，但也正因為我們是在艱苦中成長的，在困難中磨練的，所以我們的腦子是漸漸地充實起來了，經驗和教訓也漸漸地豐富起來了！直到現在，我們已經能以過渡的艱難教訓來把握世界和歷史的發展，更由于過渡的艱難，我們也清楚地認識世界和人類需要的是什麼，我們自己本身和後代需要的又是什麼？當我們發現今天的民主浪潮是歷史的必然產物時，也就是我們找到了我們和人類所需要的共同目標的時候了！因此我可以武斷的說：民主就是我一青年和大多數人們的共同要求，除了這個之外，沒有別的要求和需要，比它更重要的了！

好！我們的共同需要是發現了，但這個要求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它從發現到真正到來的那一天，還需要經過一段極艱鉅的路程，這段路程什麼時候可以走完呢？那便要看我們自己的勇氣和努力的程度來決定。所以，今天僅僅是發現了我們

認識人民大眾的力量

有石

我是一個生活的幼稚學徒，對於討論如何爭取民主這件事，覺得在生活經驗尚還沒有足夠認識以前，可說是一種頗不自覺的舉動。但時代的潮流！民主的巨浪是衝擊着世界上每一個自覺或不自覺的人的，它關係着每個人現在和未來生活的幸福與不幸，它同陽光與空氣一樣，我們發生着密切的關係，它使我們不能閉口不言。

很明顯的，我們是非常迫切地需要民主，需要民主才能夠給我們的自由和光明的生活。不過這民主的民主——魯迅先生所說的——「鐵屋」，現在雖然有些反民主份子不敢堂堂皇皇的把牠擺出來，而玩個在牆壁上厚厚的塗皮壁畫，儘管壁畫裡的人，覺醒起來的已經比較多，但顯露還不夠，因為壁畫是又堅又韌，力量太小的攻。而不容易奏效；固然這塗皮壁畫的立足之點已被民主的浪潮震得搖搖欲墜，如果我們不喚醒所有的人民大眾起來起來全力推翻牠，那殘廢的氣息豈能深深鑽透我們的，何況那些爭得來的果實，是更有利於我們的將來，是更值得向世界誇耀的呢。

我現在爭取民主的聲浪當然只有這「喚起民眾」；用堅強的鬥爭事實，用無窮的犧牲和血汗，去教育民眾，去喚醒民眾，去組織人民大眾潛伏

着的正義感，喚醒他們再不要自甘自賤，再不要認為自己是只可以聽便別人奴役的牛馬，「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只是對封建主義者所玩弄的卑劣欺騙手段。要他們知道自己才是世界的主人，「命運」，天是不能主宰的，要他們自己才能夠主宰。

現在無論你同小市民或莊稼人談起他們切身問題的生活狀況來，他們就都痛心疾首於他們的毫無生活的權取下連喘氣的餘地也沒有。但許多年來的經驗告訴他們，使他們經常都有一種被騙的感觸，對於某些人給他們上當够了的「恩惠」，令他們常常運用疑感的眼光去對待外來的事情；（披薩）如果說別人給多便宜宜的給他們以民主，那是自甘以犧牲的誘情，那簡直是一種要領。

人民大眾並不要恩惠的，他們只不過是被反民主份子弄昏了頭腦了，他們心裏是在盼望着清淨的，要讓他們的朋友去幫助他們組織起來打擊反民主份子的，一旦他們對於民主的真理覺悟，他們的力是無窮的，是無比的巨大的，到那時，民主主義只會是「和平，和平」的假象，黨會變為自欺欺人的。

的困難，是復不勝了，這得爲實現它而爭取它而奮鬥。換句話說：我們不但要民主，且更要求爭取民主而付出最大的努力。

民主是大多數人的共同需要，那爲民主而鬥爭也應該是大多數人的共同鬥爭，決不是我們這少數所謂「覺醒」的知識份子所包辦得了的事。所以，我們必須放遠眼光，去爭取這大多數的戰鬥伙伴——羣衆。

無異地在中國，佔農地百分之八十以上，在農地中佔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這種，如果我們的鬥爭沒有他們參加，就絕對不會有勝利，更不會有成功。簡單的說：沒有農民大眾作基礎的民主，就不是真正的民主，更不是徹底的民主。

然我們拭目一看，現在的農民大眾，是不是已經都參加到這個運動的熱潮裡呢？沒有，他們爲了傳統的觀念，生活的壓迫，更加上封建殘酷的剝削，他們不但無法自動起來組織起偉大的神聖任務，而種種阻礙勢力，正加緊在摧殘着他們，壓迫他們，使他們永遠看不到行將到來的光明。假使是我們的一大批人。我們爲了大眾的需要，爲了自巴的需要，我們必須將這種強大的力量聚集起來，使他們團結爲爭取民主而奮鬥，但又誰去把他們團結起來，充實起來呢？這責任便毫無疑問地是

落在我們青年朋友的肩上了，今天的知識青年如果實在在要爲民主而努力，那再也不能限於這小圈子——城市圈子了，是應該走向那廣闊的土地——農村去，邁去我們的努力，我們的犧牲不會得到滿底的勝利，就是因爲我們完全忽視了這一點，這種沉痛的教訓我們是不應忘記的。

當然，到農村去，向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決不是像在城市裡喊喊口號，寫寫文章那麼痛快，更沒有像城市裏進行那無窮無盡的鬥爭，這種是要實際的腳踏實地地去做，並且這一種也不是三兩個月可了的事，是要一年二年，甚至五年——十年的長期幹下去，一直到真正的民主實現的那一天爲止，所以我們應該清楚，到農村去是一件極艱苦的工作，到農村去是一段長期的艱苦，雖然艱苦，但是今天現實已再不容許我們作任何逃避了，如果我們不能勇敢地担負起這時代所賦予的任務，我們是沒有第二條路可循了！

青年朋友們！沒有一個時代比今天更清楚的替我們指出我們應走的道路，我們不能再猶豫也不能再不決了，如果是沒有必要，我們這大城市的人，我們大家攜手開步，踏上那廣闊的土地，投到那多數的羣衆，爲我們的需要，爲人類的需要，好好地戰鬥吧！到那個時候再不會有苦悶和煩惱了！

三四·四·一。

從自己的週圍作起

張亮

參加幾次談話會，令我感到非常的興奮，不過一時要我來提具體的提議，倒又有些感到困難，不知一部廿四史，從何處起是最好，還是「當我沈默

我們自處所受的，所見的，處處都是反動的壓迫，思想的統制，無窮的欺騙。譬如教育這塊地，學校裏說吧，到處是貪污，到處是壓制，合作社，公利互助社，都是一種什麼長之類，發財聖地，發財地，——除了兩位有特權關係的——助教們，很少享受到這些「合作」，那些「互助」。當然，既到我們同學，那可真是如一位同學所說：「你與他們合作，他們就不與你們合作」了，這社會一定有你份，否則不准註冊，你怎能不給呢？當助理專，有一個虛有其名的額子，感到權力，就沒有你說話的餘地——可是這也有選舉呢，天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報紙上「遊檢」、「開天窗」、「……」、「×××」的現象，在我們的壁報上，一樣的出現了，據說這是「訓練」的成績，特種人員——指我們同學中間的——辦伙食，食污了，做小偷——地偷了我們少得可憐的公費獎金去享受了，同學們查清，提出質問，而結果却吃了虧，這說這也是一訓練——有方，增加的副食費，被總務長拿去「款比期」，「做生意」了，同學中有人提提有人提出質問，也會受到了警告。

同學們之間，有些因爲死讀書了，對書以外的一切的事，都是摸樣摸樣，付帳帳，雜誌成半年的難得翻它，然而至於有一位同學把張伯倫當做是我們中國的唐朝人！然而這種種的過失呢？是同學們的過失嗎？這種無比的功課，壓得喘不過氣來，成天的要爲着「三分之一」，「二分之一」學分的得失問題而煩惱，因爲這關係着公費，獎金——吃飯的問題，啊即使你有了閑空吧，去圖書館一坐，除了少數書之外，就儘是些令人打盹的那一套

(被時)

教育與科學

這，好得很。新強調、唯心論簡解、隨你選擇，你
要讀政治書，左一個X主義什麼什麼，右一個X
主義的什麼什麼，開開來就是大學、中學、修、
齊、治、平、的大道，好像除去了這些，世界就沒
有其他的學說似的。當然，我們並不認為三民主義
是不好，是不值得信仰，相反的，我們承認三民主義
是中國建國的救國主義是中國的建國準則，然而，我
們是在讀書呀，我們是在學習，在研究呀！我們有
句話：「真金不怕火來燒」，只要真是好的，爲
什麼不許我們研究別的，拿別的主義來比較呢？再
舉一淺顯的，只要把這些能夠弄好，寫得有內
容，有道理，亦未嘗沒有人看，但是翻開來，十有
八九，不啻是雜誌也好，哲學也好，政治經濟也好
，總是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的書方法，「中國有特別國情」，好像我們中國不
是這世界上的一員似的，當然，既有「特別國情」
，也就只有「特別」的方法，一直「特」下去了
，於是乎弄得大家不看報，不看雜誌，不看課外書
，恐怕都成了廢物了。

讀書，變成了滿天飛的雞毛，最近復旦大學特
聘人員發動的一個什麼宣言，又堂而皇之的貼在那
個人不讀書的什麼欄內了。

這難道「特別」的國情，壓迫，禁制的事實，可

算是得牠的，上面列舉的這些，儘不過是我們
這小國子，由這臨時應有的，然而就是這
點吧，我們也就可以看到了我們國家的落後、腐敗
、與危急了，在今日，每個有感覺有良心，願生存
，要生存，想自由，要自由的中國人，無不渴望這
民主渴望自由了。

看到第一次筆談的讀者之頁，知道有那樣的「
同輩們逐漸的從過去那類「讀書其身」一步實際事
」的態度，改變過來了，然而，正確編排先提出
的，同輩們這種注重時事政治的興趣，怎樣才能更
加廣泛，怎樣才會使同輩們從這種對時事的關心，
進一步的去探究根源呢？從上面我提出的一些事
實中，我們知道有一些同學，並不是對此一直就沒
有興趣，而是被那些「修、齊、治、平」，「特別
國情」之類的東西，弄得沒有興趣的；所以，我認
爲我們現在最容易做，而且最應當做的，是喚起他
們的注意，提起他們的興趣來，對於這，最有力的
辦法，是利用我們的報，寫出一些批評與介紹的
文字。不過對於此有一點我覺得有特別提出的必要
，就是我們這一類的文字，要寫得生動，有趣味，
甚至於滑稽一點，幽默一點都不緊，最可怕的是板
起面孔，寫出一些堂而皇之的，拒人於千里之外的
大作，術語要少用，甚至不用，文字的篇幅亦不宜
長，總之，一切我們不妨做到以趣味爲中心。當然
，這並不是說以趣味爲目的，我們的目的，是喚起
同輩對政治、科學的注意與興趣，趣味不過是我們

的方法而已。其他如座談會，討論會，只要環境是
許，我們總要盡力做得活潑一點，客觀一點，如編
的這這這人等把我們看成可怕的人物。

其次，我認爲我們應當負，但是比較確的工作
，是教育我們學校鄰近的工農大眾，發發他們的知
識，向他們解釋「民主的意義」，因爲「決定人類
命運的是廣大的工農大眾的力量」，單是我們知識
青年是不夠的。至於怎樣做呢，我認爲第一步我們
必須學習他們的語言，生活、習慣，關於此，舊聯
期刊上的討論已很多了，用不消我再囉嗦，何況談
對這一方面也正是一個摸索者呢？

至於「在大後方的環境下，應當採取什麼樣的
民主鬥爭的方式」的問題，我相信這是我青年團
友們最費心的問題了，是繼續「一二九」的鬥爭方
式呢？是採取比較穩重沉着的步驟呢？我認爲這
要看各人處的環境來決定的，什麼方法都可以，
做了總比不做好，「有一分熱，發一分光」，這不
是形式的問題，而是有成效與沒有成效的問題。

這是一個學工程的，我知道有不少學工程的同
學，認爲學工程是當然的，是不受政治、經濟、一
切的限制的，他們以爲不會在什麼制度下，工權應
總是歸身於人羣福利事業的，總是對人羣有利的，
這種錯誤的觀念，我們必須指明。這紙與將美國「
新經濟」的分發實工辦法加以說明就夠了，必須要
他們明白：工權雖不在政治不民主的情況下，爲
人民謀不獨福利，並且不在經濟民主的情況下，仍
舊是枉然的。

談 運 階 階

雖然，參加討論的來信，都有一些短見，指出：知識份子中間對政治的冷淡現象，仍舊、老道、雖然他仍舊考慮的多少是個人的得失，一己的安全，認為今天的民主運動和自由沒有甚麼多大的關係；對於這輩人，我們相信現實會使他們漸漸清醒過來的。（這是一天段）因此，我們用那那種冷靜的現狀一定合該漸改變過來。就全世界範圍講，民主是世界政治的主流；「時代的潮流——民主的巨浪是衝激着世界上每一個自覺或不自覺的人的，它關係着每個人在現在和未來生活的幸福不幸，它同陽光與空氣一樣和我們發生着密切的關係，它使我們不能不談說不說。」（有石）

對於不關心民主運動的人，我們是希望現實的教習能不斷的使他們覺醒；對於我們自己就如何使他們看清楚一切，使他們漸漸的認識到，要改變這些不合理現象，只有組織政治，苦悶的產生出自已的力量。至於對一懷疑民主、反對民主的知識份子，我們應該採取爭取態度，不能把他們當作敵人似的，很殘酷的對待他們；（應該把與吳先生於發言）。這提，提出了一個推進民主運動的方式問題，是值得我們考慮的：今天除了對法西斯份子以及各種變形極端的法西斯份子外，其他的懷疑和反對民主的人，都是可以爭取的；在爭取和說服他們的的時候，應當表現出民主的作風，不以林救一切，也不應強人從己。

怎樣使民主運動推測廣大人民中去，參加討論的意見可以說是一致的，張先生的意見是從自切近約原則作起，而且認為「第一步我們必須學

習他們的語言，生活習慣……」；但今天我們說「人民大眾」一語，應該會比張先生說「如果更確當的說」是使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大眾（關於這一問題，詳有專文討論）。而有人先生說「要更明瞭一點……」，他雖然青年如張實等在努力為民主而努力，那再也不能限於這小圈子——以市視了，是應該走向更廣闊的土地——農村去。過去我們的努力，我們應該不會得到底層的勝利，就是因為我們完全忽視了這一點。有人先生所說的「自然條件可能下落的」，今天，要使得民主運動真正形成巨大的力量，是決不能不把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大眾組織起來了。我們在思想上是不是已經有足够的認識，是不是有到農民大眾中去、為人民服務的決心，使份子如果和農民大眾相

際接長期的努力，其目的在於使不的農民大眾能參加到運動的行列中，以廣言定人民大眾要求民衆的改善。而運動精神則是在於提高民衆人的不憚得民主鬥爭他們只是不知道用何種途徑去實現「民主權利」。有人先生對意見也作「民主的權利」補充了。現在無論如何小新我或莊稼人談起他的困難問題的生活狀況，他們就都痛心疾首於他們的毫無生活自由……「人民大眾這種感覺雖然是不斷的覺醒，但還可以預見的，這種階級的情形，會不斷的覺醒，加深的，只有肯定了人民大眾這種民衆的要求，我們才能在推進民主運動中發揮我們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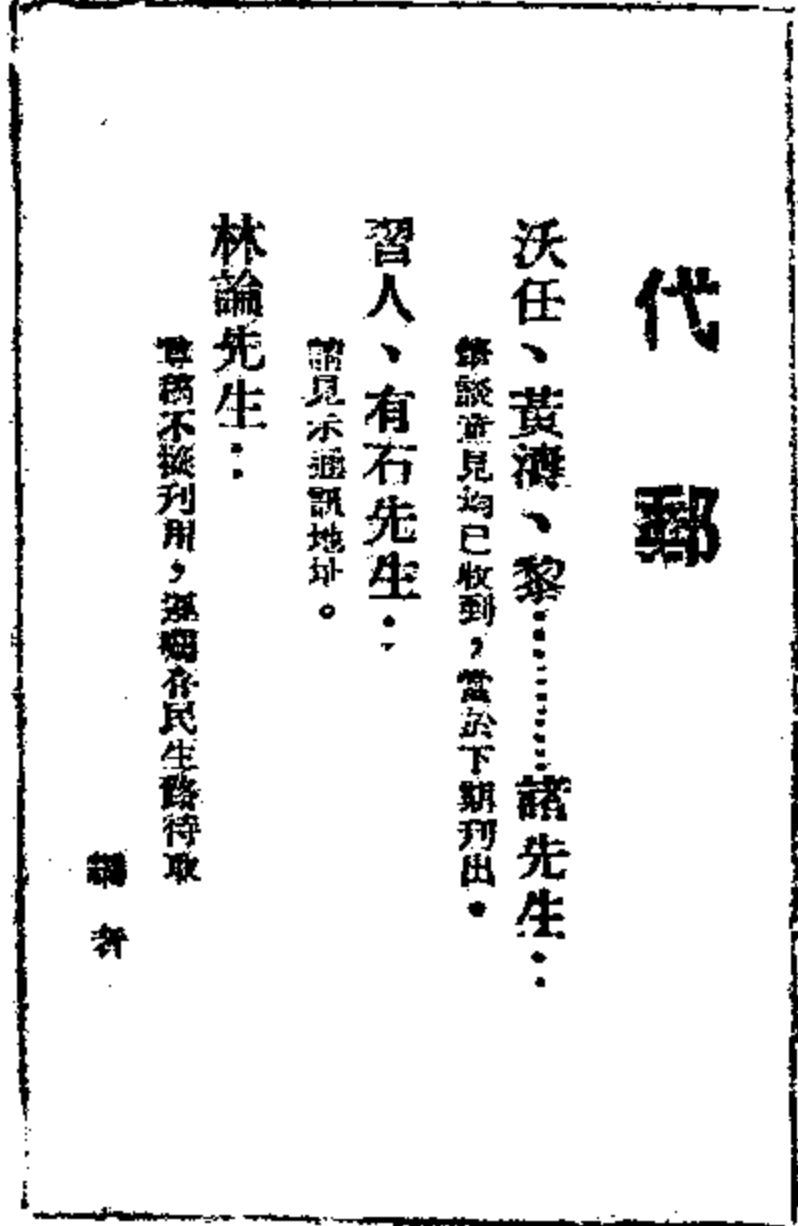
代 郵

沃任、黃濤、黎……諸先生：

習人、有石先生：

林論先生：

專務不擬利用，運通各民生務待取



書目評及其他

郭沫若先主與中國古代研究

尹 達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之後，不少的青年知識份子大都徬徨歧途，無所適從；他們對中國革命的信心是減低了，對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和動向存在着一種糊塗觀念。這時候，正迫切的要求着這一問題的解答。

正是這個時候，郭沫若先生以杜衍的筆名，在「東方雜誌」上，陸續發表了幾篇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文章；後來把它們集起來，加上了其他的幾篇，就印出那本「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記得在他出版以後，銷路就相當的好，不僅僅一般大學生爭先恐後的購買，不少的中學生也都以先覓為快，捧讀至再。所以再版三版不斷的印出，依然是供不應求，翻版的本子也就應運而生。

這大批的青年真正了解了郭先生這本著作嗎？我想，他們是不能够完全了解的。但是，在那裡明確指出，中國存在過氏族社會和奴隸社會，證明中國社會的發展，並不會逃脫一般社會發展的規律，同時指出了未來的動向。他以鋒利的文學手法，把枯燥的中國古代社會寫得那樣生動，那樣富有力量，對當時的青年知識份子，正像打了一針強心劑。

這是郭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出版之後的一方面的功績。但是郭先生這一本書的功績絕不止此，在中國，這是以唯物史觀的觀點研究中國歷史的第一部巨著，從中國歷史科學的發展上看，它確是一部劃時代的作品，由於它的誕生，才把陳腐的中國古代史料點活了，才奠定了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歷史的基礎。

二

郭先生在這部書里明確的提出兩個問題，確認殷代是氏族社會的末梢，西周是發展到奴隸制度的社會。這正是他苦心鑽研史料所得到的成果。

郭先生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態度是非常審慎的，他深刻的了解古籍的特點，並不會醉心於那些真偽莫辨的古書，而別開生面，從最可靠的史料着手研究。關於殷代，他在一九二八年到二九年的九月，寫成了「卜辭中之古代社會」一文；但因「印刷關係，凡原文原字均不便過於綴引」，就把研究的成果寫成了另一部「甲骨文字研究」。這部書出版之後，很快的就轟動了國內外的古文字學家，他們看到了這許多新穎的創見，也不能不驚嘆不止，甘拜下風了。

郭先生在國外那困難的條件下，繼續研究甲骨文字，幾年的時間，寫成了『卜辭通考』一書，它成爲中國空前的，綜合性的，關於甲骨文字的傑作，每一個研究古代社會和古文字學的人，都依據着它作爲最可靠，最珍貴的讀物。

殷代的小辭出土的不少了，後來依據着它們作爲史料的人，大都混然一團，不曾將卜辭本身的發展弄清楚；董作賓先生根據着各方面的材料，將卜辭分爲五個時間（詳『甲骨文斷代研究』）。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每一辭或每一甲片是屬於那一天的約對年代了，這便更增加了卜辭的史料價值，在卜辭本身中我們可以看出發展了』（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評』）。這的確是中國古文字學上的創見，同時也正是研究殷代社會的學者所必須重視的收穫。

董先生是殷墟發掘者之一，手頭備極豐富的材料，加以以深入的研究，必然得到這種極好的成績。但是，深察異國，失却自由的董先生，頭腦材料所受到極大的限制，又不可說見到那些『龜頭考古』所得到的資料，與同樣能夠發現這一斷代的方案。他說：

「余爲此書，初有發於書後附以『卜辭斷代表』，……繼得董氏來書，言有『甲骨文斷代研究』之作……（詳『卜辭通考』）由此可知，『斷代』的方案雖出於董先生之手，而郭先生也有同樣的着法，就兩人所處的不同條件看來，我們不能不佩服郭先生學識的卓越。

在郭先生開始研究『殷代社會』的時期，殷墟的科學發掘還不曾開始，由於當時材料的限制，他只有依據那些可靠的卜辭和古書，高價購得相傳的殷代銅器。後來殷墟的發掘開始了，郭先生就非常關懷這批可貴的史料。他說：

「然我輩所急欲知悉者，適殷墟之地層關係與商室之人孫問題（此事由地層中發掘之人骨可以考訂）……」（詳『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追論』中）

於此可知，郭先生絕不會以已知的銅器爲限，而是不停地在這逐漸發新的史料，新的發見，尤其其重要而可貴的考古學上的收穫。他最近發表的『殷代研究的自我批評』里說：

「靠着殷墟的發見，我們得到一大批研究殷代的『第一手資料』，是我們現在考古學最幸福的一件事。就靠着這一發見，中國古代的美面目才顯露了出來」。

在這篇文章里，他依然是重視着殷墟的發掘，且經過他十餘年研究的結果，對殷代社會的結論有了修正，他確認當時是奴隸社會。

從開始發掘殷墟到現在，業已過了十八個年頭，不少研究古代社會的學者都熱望着這大批材料的印出。但是，由於發掘的團體還沒有有一個總的全面的報告，所發表的只是很少部分的零星文章，且多係早期發掘所得的材料，因此這些寶貴的史料還不會讓一些學者看到它應有的面貌，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學術史上的大損失！假若郭先生能見到這全部的資料，我深信對殷代的確研究一定會有更大的收穫。

現在且來說一下郭先生研究西周社會的過程。

郭先生明白的知道『周代的社會應來以爲是封建制度』，這一固定了幾千年的傳統『不易翻案』，但是他絕不因循傳統的束縛而裹足不前。首先他以嚴密的方法分析了新近下來的一些史料。他說：

「以易書爲研究資料大有問題。易書雖可證明其爲古書，然已傳世數千年，正不知已有多少變易；而幾千年的傳世法流更是汗牛充棟。……（詳『殷代社會研究』二五三至二五五頁）。

在當時，中國的『龜頭考古』還不曾開始，真正的可靠的材料，只有殷代出土的一些銅器。郭先生說：

「這些古物正是目前研究中國古代史的絕好資料，特別是那些銘文，那所記載的就是當時的社會的史實。這兒沒有經過後人的篡改，也沒有什麼繁瑣附會的疏注的麻煩。我們可以單刀直入的看這些個社會的真實相，而且還可以判明以前的史料一半半都是虛偽。我們讀這些青銅器來說出他們所創生的時代」（同前二八四頁）。

他說以這樣追求真理的精神，週密的鑽研着西周的銅銘文，寫成了『周代社會史』一文；在這里，他認爲『周代上半期是奴隸制度，同時也提出了它的並非封建制度的創設。正因為他用最真實最可靠的史料，與做了傳統的束縛所以確定的說：

「我自後我這觀點是十分正確，我想凡是無成見的人，見到本稿所舉的一些古物上的證明，當然不會以我爲誇說」。（同前三一四頁）

在他的『甲骨文字研究』中的『釋臣宰』一文，也正是能論有力的補遺。爲了探究這些史料，他絕不會掉以輕心，而是經過科學的研討，『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一書，正是這一研究的成果。它同樣是一部轟動國內外的著

極的巨著。

沫若先生對銅器銘文的研究，是在極短時間內，經過他五六年的工夫，又寫成了一部「兩周金文辭大系」的圖錄和考釋，使「一片渾沌」的周代最可貴的史料得到了一個明晰的系統。這不僅在中國古文字學上是一部很好的著作，而且這批寶貴的史料價值，也因其次被發掘。

上面我敘述了郭先生爲了殷周的史實，怎樣努力的鑽研那時期的全部史料，怎樣從這史料中找出一條條莊大道。但是，郭先生的業績，並不止此，研究史料的基礎上，還有許多的貢獻，除上述諸著作之外，還舉凡有關古代在社會的其能著作開在下面：

金文考

金文錄釋之餘

古代銘刻考校錄

清劍果

今昔果

由周代變遷到現代社會（見「中原」第一卷第四期）

其他有關歷史的書籍和論文還有許多（如「甲申三百年祭」等），均超出古代社會研究範圍，且限於篇幅，不再列舉了。

三

郭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發表之後，在學術界——不論是國內國外——曾引起了極大的爭論，但到現在為止，基本的觀點各或不同，而這部書的價值並不會受到影響。郭先生根據將近十五年的研究，把這一時期的史料詳加分析，完成了八種有關史料的專著，寫出了許多檢討史實的論文。一九四四年的十月間又發表了有極大意義的文章——「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評」。

這篇文章從郭先生自力研究的經過裡，檢討了中國古代社會中的許多問題。

顯，幾十年研究的精華隨筆的寫出來了；這的確是古代研究中的一件極寶貴的文獻。關於那許多問題的論斷，郭先生已經有了明確的敘述，這極不再多說了。我覺得特別值得提出的，正是郭先生嚴肅的科學的治學精神。郭先生在這篇文章的開始，就說：

「無論作任何研究，材料的檢討是最必要的過程。材料不夠固然成問題，而材料的真偽或時代性如未規定清楚，這比缺乏材料還要更加危險。因爲材料既真或真不真，而材料不正確，更難發現錯誤的論斷。這樣的論斷比沒有更要有害。」

的確，不論任何研究，如果粗心大意不仔細分析所依據的材料，就草率的做出結論沒有不弄出錯誤的。研究歷史自然更不能例外，自己如果先有了成見，然後又不分材料的可靠程度和時代性，只要會於自己的公式，硬硬鑽進去，這樣沒有不錯之理！郭先生這句真理，表面看來似乎是誰都知道，但檢查一下那些歷史著作，就自了解不少的學者還不會認真注意這點。郭先生的指示是極當記起的，這深望其分析史料的精神，正是我們研究歷史的人們所應當學習的精神。

分析史料是第一步的和最重要的工作，但中國的史料實在太少太雜，絕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完成的；且分析或識別還許多古代史料，已經分別時期的發展成各種專門學問了：如版本、考據、金文、甲骨文、以及考古學等等，所有這些，都在日新月異的前進着，如果不懂得各種專門學問的最新最高的成果，不批判的吸取學術界的新收穫，就會走到閉步自封，漏網百出的境地！郭先生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評」中說：

「新史學家對於史料的徵引，首先便沒有經過嚴密的批判。……對於舊文獻的批判根本沒有做，不但「古史辨」一派的階段沒有充分達到，甚至有時比康有為，閻百詩都要落後，這樣怎麼能夠揚棄舊史學呢？」

對於舊文獻不加批判，忽視了過去「辨偽」的業績，於是就把神話傳說作爲信史，搬上歷史舞台，這難道還不會變成錯誤嗎？

不但對舊的文獻，我們要批判的吸取過去許多學者所得到的成果，即其他材料亦應有「迎頭趕上」的精神。郭先生說：

「卜辭的研究是新興的一種學問，它是時常在變遷着的。以前不認識的事物後來認識了，以前認錯了的後來改正了，我們更根據他作為社會史料，就應該採取「迎頭趕上」的辦法，把它最前進的一線作為基礎而再出發。目今有好些新史學家愛引用卜辭，而卻沒有追蹤它的整個研究過程，故往往把錯誤了的仍然沿用，或甚至援引錯誤的舊說以攻訛改正的新說，這是絕對得不到正確的結論的。」

「甲骨文字的研究是方興未艾的一種學問，前人的成說每每不久便被推翻，我們如不去全面追蹤或趨於輕信，便每每以不狂為狂，以狂為不狂。」

郭先生在這里不但指出對舊文獻和甲骨文的誤用，同時也指出把「傳說無批判的視為信史」是不對的，指出周代彝器「一種統活脫脫地使用着，不肯從分別時代上去着眼」是不對的。

所有這些，正是郭先生為我們指出的一條研究古代社會的大道，我們應當根據這種精神，來檢討自己！在前面我們說過了郭先生研究古代社會的業績，從那裡正看出他對史料的分析判斷如何的勤奮，在這方面的成就可以說空前的了！

總之，我們說郭先生的治學精神是嚴肅的、積極的、前進的和科學的精神。這種精神是值得每一個新史學家學習的。

郭先生在國外的文學學識，後來又從事文藝運動，很快的就成為這一運動的健將，不少的人都讀過他的文學作品（如「女神」等），那裡富有活生生的生命的力，對一代青年真是極可珍貴的東西；他介紹了文學的、社會科學的以及科學的名著（如「經濟學批判」，「生命之科學」等）；在任何一部份工作中，他都有很大的功績！尤其是最近幾年的歷史劇——「屈原」、「虎符」、「高橋離」……等等，他根據着豐富的歷史知識，以文

學的銳利的筆鋒，寫出封建統治者的罪狀，在推動中國的社會的前進中，都起了極大作用。

郭先生是文藝家、是詩人、是新史學家、是古文學家、是考古學家……；他有豐富的各方面的知識，加以這樣的治學精神，必然能寫出了不少傑出的作品！但是，郭先生虛懷若谷，以誠懇的態度，根據十幾年研究的成果，對最初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進行了自我批判，這不僅是郭先生對古代社會研究的進一步的發展，同時也正是今後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人們的指標！郭先生在「謝陳代新」一篇短文裡說：

「對於古代的批評應有一個整齊的看法。儘可能據有一切材料，儘允出對象的本來面目。是什麼還它什麼，是最嚴重的批判。「瘋狗過路，人人喊打」，只要你把瘋狗的姿態劃出來，你就不喊一聲打，別人自然要打牠了。」

「歪曲了的矯正過來，粉飾着的把粉給它剝掉。但用不着矯枉過正，用不着分外給烏。矯枉過正，分外給烏反授敵討者以口實，會使全體努力化為烏有，甚至生出反效果。」

「對於意見不同者是在設限，除別有用心的頑固派之外，只要有公平的正確的見解，人是可以說服的。設使多數的人便減少頑固派的力量。」

「我們應該要比專家還要專家，比內行還要內行，因此不可掉以輕心，隨便的感用用事。不要讓感情跑到了理智的前頭，不要強不知以為知，一切的虛矯、武斷、偷巧、狡捷、諂媚、諷刺、謾罵，都不是辦法，研究還有別家最好不要說話？說了一句外行話，敵對者會推測你九個的亂山」（「羣衆」九卷第十八期）。

這說話正是今後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人們的正確方向。

糖衣裹蓋著甚麼？

——評坊間的幾冊「特務文學」——

蕭 燕

就全世界的規模來講，行將到來的是「人民的世紀」；在這世紀，再不會有獨夫的專橫，暴君的淫虐，英雄的頂禮、膜拜……而是人民力量的興起，人民主宰着一切，決定着一切。

八年來的戰鬥實踐，中國人民實踐了抗日戰爭是「人民的戰爭」。它不是僅僅幾個卓越的英雄，少數自視優秀的先進者，而是依靠全中國的人民。過去憑藉人民堅持了戰鬥，今後，同樣的，要依靠他們，才能戰勝敵人，取得勝利。任何卓越的英雄，優秀的先進者，都只有在和人民大眾生活的聯繫，戰鬥的慾求相一致，戰鬥的力量相結合的時候，他們才能對於抗日戰爭盡到最大的貢獻。

這似乎不易的道理，却往往受到一些人的忽略，或者是受到意識的歪曲。對於今天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本質，還流行着「一種有實的理解。他們以為今天的抗日戰爭只是某某「英雄」，「先進者」……的事情，他們抹煞了廣大人民對於抗日戰爭的貢獻（儘管他們在口頭上不這樣講）；看不見中國人民戰鬥的慾求，對於民族的忠貞。由於他們不了解抗日戰爭是人民性的本質，因此，他們不願意去發動人民的力量。他擔心如果人民一旦從他的被奴役的生活境過擺脫出來，他們就不會再安於被奴役的命運，因而，更進一步的去阻遏和壓抑人民的力量。

這種思想在文藝的領域裡，有着它的反映，這就現在那種無視人民的力量，對個人英雄主義盲目頌讚的病態傾向上。

今天代替了那些「秘史」、「私生活」、「談鬼說夢」這些無聊的作品，是色情的歌謠，稀奇怪誕的間諜作品充斥在文化市場上。讓小市民覺得對感官的刺激，有聞道味的滿足。但因為作賊心虛，不敢以醜惡的內容示人，多半裹蓋着莊嚴的裝束，誘人的糖衣。在這種莊嚴的裝束下面是醜惡的軀體，在包裹着的糖衣裡面是含毒的藥物。對於一個思想力量堅強的讀者，毫無

疑問的也會有嚴正的批判和擷取的能力；他們會刺透那裝束下面醜惡的心腸，糖衣下面含毒的藥物。但對於那些氣滿而又缺乏批判力的讀者，無疑的說會受到誘惑。要根除這種病態傾向，自然應該消除培植這種病態傾向的社會勢力。但在今天黨爭鬥爭的領域中，對於這些病態傾向的誘惑，也是有機體成的一部份。在精神營養的攝取中，如果自身抵抗力很強自然很好，要不然，在事前選擇的時候，增強一點鑑別力，恐怕也是不無裨益的。

要在這些特務文學中，選取一點出來作為批評對象，似乎也不是容易的事。但我們說一般的情形看，色情歌謠的作品，是在使一些尋常的讀者的人們，得到滿足；使那些腦滿腸肥的人在茶餘酒後，得到一種情慾的滿足；這些特務文學的特點却都是充滿着離奇怪誕的細節，綠林好漢式的行徑，個人英雄的膜拜。和色情文學更不同其他，多半裹蓋着一層抗戰的外衣，帶着宗教者的姿態。譬如希爾用「間諜」的「離奇」，「夫人」的「色香」來顯取銷場的「間諜夫人」（刺有轉作）。曾經唱過「精神病者的哀歌」，顯露過「成人的童話」，發過「鬼戀」的奇想，作過「荒謬」的白日夢的徐行，在談鬼說夢還嫌不夠之餘所寫的「黑靈靈」（掃蕩報過臉），和新近看到的「鬼樂記」，「美子的畫像」，「相思債」（王藍作）等。如果說一般的色情作品，是在戰時的年月裡而忘記了戰爭，但他們還有一點老實的地方，他們沒有把抗戰作為裝飾的裝飾，使人一望而知道它的內容是甚麼了；但這些特務文學的「作品」，妙就妙在不僅和抗戰有關，而且簡直是「抗戰的」。既然有了一襲美麗的抗戰外衣，於是一切私情的糾葛，色情的繪寫，稀奇怪誕的情節，綠林好漢似的英雄行徑，這一切新舊小市民的愛好，都被適合在一起。只要主題「抗戰」，有了這一個偉大的「主題」（然而這種主題又和舊的內容多麼不相稱呀！），不就堵住了人們的嘴嗎？於是這些聰明的作者，可以放心大胆的販賣一切，及在書店老闆盤算的長壽的銷場；坊間的小市

是滿要的是色情與趣味的滿足。這樣銷路自然沒有甚麼問題，但些所謂「作家」，自然也就名利雙收，心安理得了。如果說這些作品中的一些作者還只是寒世風俗，希望獲取銷場，個別的更墮落到為那些戕殺人民力量的轉種人物服務了。

這一類的作品，都共有着一些英雄的人物，「風蕭蕭」裡的梅濤子、白蘭，「問羅夫人」裡面的趙丹華，「笑子的畫像」裡面的趙秀、瑞、香，這些人都在敵人佔領的都市裡作着反間諜的工作。他（她）們曾經奮身一擊的行刺敵人、漢奸，或者是犧牲色相刺探消息，最後是死在敵人的手裡，完成了他們「英雄」的業績。但一個「英雄」的成長，是離不開他生活和成長的環境的，我們看看這些作品底英雄的生活吧！「問羅夫人」裡的趙丹華平時過着隨處腐化生活，李素為丈夫報仇的心理到了上海，和一個以前的朋友，現在做了漢奸的同居。「笑子的畫像」的趙秀是一個漢奸的兒子，平時的生活中電影院，溜冰場，舞馬場，賭博廳。「風蕭蕭」裡的梅濤子，白蘭是交際花和舞女，仍然是過着一種放蕩的生活；在這些人身上所體現的民族感情是極稀薄的，對敵人的憤恨也是概念的。因此，他們這種奮身一擊或者是請求一逞的心理，常常成爲一種不可解的事情。從這些人的出身，他們的生括環境，這種奮身一擊自我犧牲的行爲，並不是概念的民族感情可以說明的；自然，我們不是說在舞女、交際花、執槍子弟中不可能有一些對民族忠誠的人；但作者應當從這些人物的行爲中使人看到，他（她）怎樣培養出這種對民族的忠貞，對敵人的憤恨，必須從理論的概念的變成他們思想和生活的血肉，他們這種自我犧牲才有可能。

這些作品裡面人物的行動是可以從這些作者的思想上尋找出來，這些淫逸、放蕩的生活，在這些作者眼裡，正在他們所謂的「英雄」的正常生活，如果我們說這些作品還有一點甚麼風氣的地方，那就是對這些人物荒淫、放蕩的生活的描寫上面。從他（她）這種日常生活中，我們當不難想到那種奮身一擊，伴隨一逞的行爲對於這些人物都是一種理想的附加。

既然，我們承認這些人物和事件在現實生活裡不是沒有可能找到，但人物典型的塑造，決不等於對現實生活的描寫，這應該是常識以內的問題。這些人物必須比現實的人物有更高度的綜合性、典型性；這些人物的身上應該體現出典型的環境。可是，在上述這些「英雄」身上，我們看不到這些人物與自己週圍的環境有甚麼關係，與人民大眾有甚麼關係，也看不到他們那種自我犧牲精神被培養起來的環境。

像情節的離奇與怪誕是這些作品在寫作上的共同特點一樣，在內容上，這些作品是一致讚譽個人英雄的行徑。這種對個人英雄主義盲目的頌讚，是根植於前而我們所指出的，對民族解放戰爭本質的誤解，對於人民大眾在抗日戰爭中，在大規模更創造上，他們的力氣沒有正確的認識和估價。他們不知道抗日戰爭的堅持與取得勝利，決不是憑着任何個人英雄的行徑可以取得，必須依靠廣大人民的力量，也只有依靠廣大人民的力量。在上述這些作品裡，不能在任何地方看到人民的感覺與人民的力量。有的只是一些從現實生活裡游離出來的英雄，這些脫離大眾的「特殊人物」的英雄行徑。在這些作者的想像中，似乎抗日戰爭之所以堅持，就全靠了這些舞女、交際花、問羅夫人、執槍子弟……這真是對於人民力量的無稽與侮蔑。這些作者意識到或者非意識地混淆了抗日戰爭所應有的主要和次要的力量，這不僅是阻礙了這些作品的讀者，正確的去認識今天所進行的民族解放戰爭，去認識人民的力量，而且說那點點和過得人民力量的人總感到理論的含糊。因爲抗日戰爭原不過只需要少數的英雄，少數英雄的英雄行徑，根本就不需要人民的力量，因此，任何訓練和發動人民力量的行爲，都成了多餘的舉動，這難道不是那些反人民，反民主的人強自嗎？儘管這些作者編織了一套「抗戰的」題材，神氣十足的在國內人前宣戰。但實際上，他們混淆了對於抗日戰爭的人民性的認識，使人不知道今天的「抗戰」應該如何「抗」，「戰」應當如何開始的「抗」得持久，怎樣才能「抗」到勝利。

抗日戰爭是持久的，中國人民的任務也是如何長期、堅韌的和敵人作持久的搏鬥；中國人民不吝於對民族解放戰爭自己的生命，但這種對民族的忠貞，決不止於奮身一擊，孤注一擲的賭博行爲，而是堅毅地和敵人戰鬥到底。在上述這些作品裡的「英雄」，多半是帶着一種絕望的掙扎，支持他們的似乎只是一種伴隨一逞的心理。不錯，在敵人佔領的地方，這種不泯滅的，不背祖國是應當得到頌讚的；但如果我們承認文藝作品應該有它的教育意義，我們就決不能對這種個人英雄主義作盲目的頌讚；必須對於這些人物給予正確的批判（至於那些有意識地爲這些反人民的特殊人物洗刷，其卑劣自衛更應超於這些盲目頌讚之上）。不錯，這些人物曾經用刺刀和炸彈去屠殺和報復過敵人，但中國人民要索償的是全民族的血債，所要屠殺和報復的是切製造戰爭，支持戰爭的一切人和制度。在歷史上刺刀和炸彈曾經屠殺過獨夫和人的產賊，但我們也別忘記刺刀和炸彈也殺死過林肯和考林斯（美國獨立運動的領袖）；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對敵人漢奸的懲處，炸彈動到

既使，我們承認這些人物和事件在現實生活裡不是沒有可能找到，但人物典型的塑造，決不等於對現實生活的描寫，這應該是常識以內的問題。這些人物必須比現實的人物有更高度的綜合性、典型性；這些人物的身上應該體現出典型的環境。可是，在上述這些「英雄」身上，我們看不到這些人物與自己週圍的環境有甚麼關係，與人民大眾有甚麼關係，也看不到他們那種自我犧牲精神被培養起來的環境。

這並不是完善的辦法。在上述的這些「英雄」身上，不僅看不到與敵佔區人民大眾有任何關係，更沒有看到怎樣去聯繫人民對於民族的忠貞，對敵人的憤恨，怎樣去團結、激發這股力量，去發動敵人，打擊敵人，讓敵人的統治在人民的海洋裡成爲孤島。如果這樣，敵佔區的抗敵運動，就不再是某種「英雄人物」體力強行的行爲，而是逐漸聯和形成的羣衆力量。

這並不是所謂高調呢？好在敵後戰線有這許多實際的例子，在冀中平原上，敵人的高壓、據點，星羅棋布，封鎖溝壑，偵察縱橫的情形下，那些敵佔的城市裡，抗敵戰士仍然自由的活動着。他們不單是羣衆個人的覺悟，個人的英勇，而是依靠人民的力量，因爲得到人民的掩護、資助，他們就能像魚龍自由的游泳在人民的海洋裡。

由於這些作者無視人民的力量，他們所創造的「英雄」，都是和現實生活脫離的，這些個人主義的「英雄」在激情的熱淚，雖然可以不計生命的去獻身，去謀刺，但一經挫折，激情消失之後，主筆他們的就會是沮喪和失望。看他們的自白吧！

「這受着如此兇狂的暴風雨，我的生命已迫近到萎謝，凋亡……支持着，一口微弱的氣，決揮着，一顆刺疼的心之創傷，走，回到天津去罷！我應該珍惜我自己這殘餘的殘渣……美子的畫像：第五六頁
既使在激憤重新激盪的時候，仍然只是一股怨艾似的傾訴，而且是低沉的，無力的。

「瑪爾，瑪爾，多麼對不起你們，也多麼對不起國家！我太缺乏了，我飛翔得太久，我是在歇養一下自己的疲憊，在這暫時棲息處！我是更飛翔的，我是更飛翔的呀！……向書：第五頁
今天新的羣衆的時代，離開了羣衆的支持，不從羣衆中間去發掘和汲取力量，這種個人主義的姿態既使在激憤之下，可以不顧一切的一擲千金，但一遇挫折、頓挫，從這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自暴自棄是這樣容易的事。

這些作品裡，也偶然而然一些在敵佔區抵抗的游擊隊，但出現在這些作者筆下的游擊隊，却在幹着綠林豪傑似的行徑，他們幹着那日本商人的勾當，情節是離奇的，故事也是怪誕的，在游擊隊的根據地裡，幾乎祇有這一面寫着「替天行道」的杏黃旗，一塊「忠義堂」的匾額，如果有了這些，那就和當年的水泊英雄沒有兩樣了。自然，從那些朝鮮中國人的日本商人身上，取得一些有助於抗敵的經濟收入，並不是甚麼罪惡的事；但必須要弄清楚，那些活躍在敵佔的大城市週圍的游擊隊，他們應該有更重要，更現實的

鬥爭對象；更急迫，更艱鉅的鬥爭任務。把一個在現實鬥爭中並無甚麼重要意義的日本商人作爲鬥爭對象，爲着從這個商人身上取得數十萬軍費，不惜花了兩年的時間去進行詭秘的偵伺，買賣的綁架，這真使人懷疑這些游擊隊與江湖好漢有甚麼多大的差異。如果認爲這就是一個天賦的後門爭的軍民，那是無恥的惡毒，更何況他們艱苦的鬥爭，如果這些是指那種在一個時候裡打過「游擊」招牌的隊伍，那的確有過，如鑽石友三……但這種所謂「游擊隊」，早就和敵人勾勾搭搭，他們所作的早就不是對敵鬥爭的事情了。（註）

也許有人問，在今天的文藝創作上是不是一能處理這些題材呢？我覺得這並不是題材選擇的問題，而是寫作者的態度和立場的問題。作者的任務是通過他的思想活動的成果，來爲民族解放事業服務。寫作者通過了他對於抗日戰爭的本質的了解，經過作品，使讀者能夠進一步的去理解抗日戰爭，去爲抗日戰爭貢獻自己的力量。但上述這些作品却恰恰相反，總價和次要的因索，來掩蓋抗日戰爭的本質，儘管這些作品叫作「抗敵」，實際上却是要人忘了抗敵。

正像有人在讀到「問談夫人」時曾經指出的：作者所寫的人物雖然不一定有，但他所說說那幾行還頭事情的時候，却是真實的；作者不僅企圖以色情的描寫來麻痺人，而且更企圖地爲一些直接壓迫和摧殘人民的力量辯護，還藉用心就這比用色情來麻痺人更爲卑劣了；應該補充的是這些作品還出顯的一些「英雄」，今天多半在幹着爲敵佔區中國人民勾當。兩面三刀，明明是奴才身份勾結敵人的點綴，但却插身一變儼然以英雄姿態誇弄人民，這些作者的用心所在，自然也是顯而易見的。

市場上這種種文學的流行，我們是不能簡單的看作是書商的「生意眼」，這和書商的生活實際是分不開的。今天，我們看到這些種種人物對於人民力量的摧殘、斬殺、毀壞與摧殘，另外我們却看到這些作品在爲這些罪惡的力量辯護、遮蓋、傳粉塗金；從這些我們不難看到這些人在這些罪惡洗刷、出醜；希望這樣來緩和人民的憤怒，因此，這些作品的流行，就正和這些種種人物的畫像，有着一樣的道理。

我想起是在不久前吧，一個御用的質問，宣稱這文壇的罪狀是「製造苦悶」與「助長麻痺」；這些確實出於官方的「作品」，大概不是「製造苦悶」與「助長麻痺」而是製造歡樂吧；不過，能夠歡樂的恐怕正是幹着摧殘人民力量，而又被洗刷的人們。儘管是捧場道好，響聲喧天，但明眼人是不難從這種虛假的排場中，看出一幅破落相來的。

（註）本段所引關於游擊隊的描寫見：王笠作「銀町」
胡世合死後第三天寫於橫濱村

寒 英 會

——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模範工作者代表大會印象

吳伯蕭

一 在寒英會裏

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代表大會，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開幕，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四日閉幕的；大會報告，小組討論，按地域或業務分組漫談，參觀展覽會，參加隔一天一次的歌樂晚會（聚聲：「黃梅棧」，「玉鏡台」，「人心」，「櫻花舞」；秧歌：「陳家福」，「大家歡喜」，「種樹」；平劇：「翠英會」；雜劇武術），加上元旦放假，總共開了二十四天。

這廿四天，正趕上新年，正趕上紛紛揚揚揚揚的幾場毛大雪：「瑞雪兆豐年」，原野繁榮的延安市，更添了一番明麗燦爛的熱鬧。街市上家家商店，擺出了九道彎的羊皮筒，就地取貨就地熟好的黃狸皮，豹皮；擺出了用果樹樹根，茶樹皮，杜梨根，桂重殼，藥樹皮，羅漢草（狼爬爬草），五倍子，紫膏藥色的各種茶湯；草蓆、絨氈、灰、黃、黑、深灰、色調或鮮豔絢麗，或樸素淡雅，質地結實耐用的毛毯，呢絨；擺出了用土棉紡紗，土法織成，十幾釐就的各種細而勻的寬窄花布；土布；皮革廠出的皮衣，皮鞋，皮鞍，皮叉口，藍頭，大紫廠出的「豐足牌」的一擦即燃而又絕無並湖質的墨頭紅頭火柴；石油廠出的洋蠟；玻璃廠出

的燈罩、玻璃；新華化學工業社出的肥皂牙粉；各家紙烟廠出的「金星」，「駱駝」，「飛馬」各種牌號的紙烟；馬蘭紙，染皮紙，「寶塔牌」的蠟紙，油盤，地球儀，以至書店裡擺着的各種村讀物：「莊稼種子」，「新秧歌集」，「怎樣養娃娃」，和五彩石印的表現新社會生活的年畫窗花……沒有一家商店，沒有一樣東西不呈現着歡欣和喜悅的勞動英雄們的手。因為所有那些堆成山場的豐饒物品，而勞動英雄正是各家商店最殷實的主顧，正是或多或少這樣或那樣物品底出產者，製造者和消費者。

自己的糧食，穿在自家，或社裡；自己種的棉花，織的布，穿在自己家人的身上；而又親眼看見，親身聽見自己底英雄輩為大家所讚頌歌頌：人世間還有比這再光榮的事麼？所以在展覽會上劉玉厚（劉玉厚是蘇家橋底勞動英雄）看那於蘇家橋的連環畫（劉玉厚是蘇家橋底勞動英雄），石明德看「新織出來的白布」（石明德是白布村底），那樹才說老白姓說：「這把錫頭也與錫頭！」（那錫頭的是錫頭「氣死牛」部隊勞動英雄）那錫頭才用它掏過一七五五分地的錫頭，往往笑的嘴再也合不攏，而一趨兩趨流連在那錫頭親來底讚美和讚揚戀戀不捨了。老英雄吳滿有，走在新市場口「吳滿有牌香烟」的招牌底下，街上的孩子指着牌上拿了一盒香烟的畫編的人說：「吳滿有笑哩」。穿着羊皮，敲着豬鬃，乘乘走着的吳滿有

就真的笑了，從嘴角邊掛下的兩鬚鬍子和畫上的一模一樣。傍了老吳走的甘泉縣勞動英雄王希，繼續老吳底肩膀：「老吳哥，說我吸烟囉！」「唔唔唔」，老吳這一下可笑了，那笑聲，暢快，又噴亮，引得街土鋪小攤的人都笑了，在跟前走路的人都笑了。

這笑聲是證明。

從參議會禮堂到延安大學那一段路，每天早晨都有二三十個商人買着源源的寒風在那裡打掃，早起的人向他，這辛苦，他說：「勞動英雄們天天要走這條路，所以得掃得乾乾淨淨的。」

勞動英雄在客棧裡，掌櫃、學徒、甚至管賬先生，都「心裏像燒着三盆火一樣」來殷勤地招待他們難得的客人。大會秘書處還在每個客棧裏派了招待員，專管英雄們底飲食起居（英雄們的家屬朋友來了哩，英雄們要請中央醫院底名醫生檢查一下身體哩，英雄們要去看飛機哩；招待員都替他們想辦法）。勞動英雄住棧客棧，每晚燒，烤饅頭，燒的木炭火。烟茶是現成的。吃的是大米飯或白麵蒸的，經常四菜一湯，會務會終和新年那幾天，都大酒大肉變成筵席。大司父忙不過來，有的掌櫃親自下廚掌刀。勞動英雄們說：「我們簡直是天天過年過節哩」。

市場上有一付老滿寫的對：

喜今日各客棧英雄滿座

慶來年全邊區五谷豐登

那是店家在元旦那天用梅紅紙寫在黑油鐮赤的門框上的，配合了兩扇門上「兄弟開荒」「人財兩旺」的彩色年畫，再映襯着新年來山上下白銀燦的積雪，正好表現了不是「農天吃飯」而是「親自動手，豐衣足食」，邊區新社會的一種蓬勃高揚的歡騰氣象。

二 翻了身的人們

五工八作，七十二行，在勞模大會上操縱人物都有了。

從農村裏來的莊稼人：有靠自己底好勞動，好主意好辦法，推動地裏，創造糧飽鄉村的；做到全鄉家家有飯喫，有衣裳有書讀，並存有隔年的餘糧；有「剛槍根（農具）」，農地畔，挖地旁，填水壕，「深耕淺種，薄地種上麥」，農作法上有經驗有改進的；有二十年種棉又推廣全村種棉的；有在俗稱「火眉山」的草山梁上種樹而蔚然成林的；有在楊家畔擊石山洞，修沙壩引水排沙，將一抹沙灘修成一萬至二萬五千畝水田，有種藍打膠給邊區顏料；有安置移民，把荒山變成良田，在僻野建起鄉村的；從工廠裏來的學徒、師傅、工人和工程師，有的改進了煉鐵爐，熱風爐，鼓風爐，用細砂石為燃料煉出灰生鐵；有的用廢鐵造子彈殼；有的廢棄忘食地煉鋼汁，設計製造彈簧的機器和翻砂機替前方戰士造出砲彈和擲彈筒；有的試驗製成甲，燒青鋼，煉焦油；有的提高打井效能，增加煤油產量，改進洋燭質量；有的改良織布機，用廢紗也織出好布。部隊裏來的兵士：醫生（不要公家任何給養，反而減輕老百姓負擔，給公家種公糧），有的

創造糧飽地的人，開荒一千二百畝，收米一百三十

三石，一年打糧收米九萬；有創造糧飽連的人，創造耕一餘三，在曲子縣東嶺溝的荒山裏平地起一處村莊，羣衆就以它隊伍番號給那村莊一個好聽的名字叫「六連莊」。會戰門（與得飽，穿得暖，體力壯，他訓練兵習武更有精神，打敵人能獲得更多的勝利啊！）有的人一手辦到敵人步槍一百五十枝，重機槍一挺，輕機槍四挺，擲彈筒二個並俘虜上百的敵人，有的人擅長夜襲，連拔敵人「向陽店」「土地堂」幾個堡壘。有以改造五家川動人的故事成爲薩政愛民模範；有以不識字的放牛娃，在部隊學習兩年，創造了「做啥學啥，學啥會啥，學啥用啥」的學習方法，能讀報寫信成爲部文化學習典型的。其他：真正替老百姓辦事的好區長，好鄉長；化監獄爲學校的好典獄長；政治警備性高，偵察辦法好，感化力強，舍而忘私的優秀的保安人物。辦合作社的，創辦養蠶的，組織流動紡織廠的，組織鹽工隊，扎工廠，唐將班子的，都「把公私勞動組織起來，發動了羣衆生產的積極性，提高了勞動效率，大大發動了生產」。不論夜間白天，不分刮風下雨，不分貧富或公家私人，都樂於給人看病的好醫生，看護別人愛孩子像自己底孩子一樣的好保姆，二十年趕車（車叫「英雄車」）的「大把式」（司機員）；戰鬥中從來不誤戰士與飯反能個人敵，離隊後敵人火鎗的十八年如二日的炊事員；專能把握馬嘔肥的飼養員；担任着工作，帶三個孩子，而還能生產自給不要公家一針一線的家屬；丈夫參軍十年，而奉養公姑，刻苦持家的女抗屬；在戰場光榮負傷，肢體成了殘廢，還要用袖能用的五官四肢建立革命軍的榮譽的人；修橋的，護路的，爲大眾服務的作家，畫家，導演，演員，學校的教員……；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人數是五百二十六位。

這五百二十六位，都是從鄉村、工廠、部隊、學校、機關、一級級上來的。鄉村的村上選到鄉上，鄉上選到區上，然後到縣，到邊區；部隊的也是選到排，選到連，而團，而旅。不是憑條件，是憑成績；不是自己封，是大家擁護。像天上的星座，每個勞動英雄都是一顆繁星中放射着最璀璨的光亮的星。

十六位。

幾千年了，勞動的人民用黝黑的雙手鑿地，用辛苦的汗水澆田，播種五穀，畜牧牛羊來哺育一代一代的人類，使她在這塊土地上綿延繁榮。敵人來了，是勞動人民拿起武器，拚了生命和鮮血把敵人趕出去；災荒來了，是勞動的人民首先透過那災荒，然後從飢餓和死亡裏忍受熬煎，把災荒克服。但是，幾千年了，勞動的人民却從來沒有過人的地位。一把汗一把淚換幾十年，到頭是兩手空空，看着自己底老婆孩子忍飢受寒。不必說這，吳滿有在舊社會裡沒喫過三歲的女娃；農民詩人孫萬福，年給人家攪工，被野驢子（地主）罵作是「爛驢嘴」；長工馮，吳保模的架子；夜受着，到而今駱駝成羣的喀達王國寶，民國初年還給人家攪羊。——現在的勞動英雄，那個從前不是被人當作牛馬使用呢？直到了邊區新民主主義，毛澤東同志底偉大理想把工農兵一切勞動人民帶到了社會上應有的主人翁的地位！

天是一樣的天，地是一樣的地，社會制度一變，人民立刻不同了。石家畔的楊步浩說：「民國十七年我還要飯喫，現在家務可開好幾種：種二十幾畝麥，喂五頭牛，兩個驢，婆姨也縫鞋縫帽。一喫米忘不了所谷人，一無田忘不了八路軍，今年我學毛主席代耕兩石麥子！」話語裡看得出他底滿

快歡喜，和對共產黨的一腔感激。新寧縣的農民勞動英雄劉自冉說：「在外邊我是挨打受餓的小兵，到邊區剛開三年，今年我就種了三十畝地，打了二十五石糧，加上去年存糧五石，我一個足够十年喫了。」攪工出身的馬得江，開革命種算有了土地，今年也有五十石糧，十頭牛，兩驢一馬，五十多隻羊了。

「英雄，是只有勞動人民纔配當的。只是說說勞動的社會，勞動者的功績被埋沒了罷了。豆腐房的家流同志說得好：『過去我在太原拉了二十年的洋車，也有落雨天拉個連夜的時候，也有一天排車拉它二百里的時候，果真心跳肺炸，汗像水一樣流，可是從來沒有人獎勵我，稱我拉洋車的英雄！』——但是有人讚仰千里馬，替跑馬場的頭馬披紅。——『現在』，『英雄』感動地說：『你有一點好處別人就注意，公家都關心了！』因為這里是勞動人民當家的世界啊。廣東的勞動英雄潘運珠說：『毛主席是大家的掌櫃，我們勞動英雄是小家務的掌櫃。』那是很樸素的兩句老實話。受苦人在這區這樣合理的社會裏第一次這樣理直氣壯地表達出自己主人翁底感覺。大家四面八方地跑來聚集在壯麗的大禮堂裏聽講，像兄弟們坐在自己家的炕坑上拉話。當我們看見主席台上坐席的人，是披羊皮的，拿旱烟袋的，是短村的婦女，穿軍衣的士兵的時候，有誰不像秋雨過後的季節忽然出現了暖融融的太陽那樣心曠神怡一脈脈的愉快呢？當英明的人民領袖毛主席走進會場，和坐在前排的勞動英雄一一握手，而坐在後排的，一聲熱烈的鼓掌，一聲聲一下湧起的熱浪一樣，都站起來，翹着脚尖望着，從滿臉笑容裏透露着濃濃的景慕的時候，有誰不忘記了個人底一切，只感到請大一廳堂，滿屋過

千的那麼許多人，像一團團火一樣點燃在一起呢？是盡了身的人們啊。

三 英雄本色

「革命隊伍裡，事有大小，人沒有大小，好比一雙鐵錘，大針轉，小針也轉」。老故事員徐中其同志這樣說過，他有一口很重的冀中口音：「我就牙根淺小看我這個老伙夫，人無論做多大事，你總得喫飯不是，誰能睡得了飯碗的呢？」——重親自已底工作，忠實於自己底工作，並在工作裡傾注他全部的熱情和精力，這是每個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的品質。石明德說：「咱們是替天崇德事的：大團圓做的多，小團圓做的少，麻和牛比，可是五臟俱全哩」。他引一個很恰當的譬喻：「建設邊區就比蓋大廟堂，你說那是塊大石頭，但光搬一塊石頭來可就蓋不成；磚頭雖然小，一塊塊疊起來可成蓋成廟」。

打破舊農民自私和保守的傳統，從個人經營，走上集體勞動，從小門小戶，發展到一鄉一村，是勞動英雄們走的道路。「打虎膽不丁親兄弟，上陣還是自己人」；「英雄見了英雄愛，虎豹見了虎豹親」；新社會教育他們，使他們深切地懂得了團結互助的道理。石明德領導的白樹村生產班子底三個原則的例子：「先公後私」（先種公田，後種私田），「先貧後富」（先給抗屬孤寡和貧窮的人種田），「先客後主」（先給移民移民種田）。那個老老實實，默默寡言的模範共產黨員申長林幫助別人的事蹟也是例子：把自己打的糧食五分之一（十石）拿來借給鄰家；難民景三，借別人一把鋤頭不好使，老申就拿一斗四升麥子打一把新的鋤頭借給他；

正月二十七，老申推一斗麥子，買四斤豬肉，把整家的二流子請來喫飯，給每個大人調五斗糧食，幫他們訂生產計劃，組織他們生產，結果二流子都有了轉變。

面向羣衆，替羣衆謀利益，而爲廣大羣衆所愛戴的合作社英雄劉建章不必說；把領導，英雄和羣三者結合起來而在部隊裡展開「張治勳運動」的張治勳不必說；所有勞動英雄那一個不是以幫助別人成家立業，解決別人衣食住的困難而博得遠近的好譽呢？一位退伍軍人住在移民英雄湯家莊家裡，老湯教給他三項熟地，借鋤頭教他開一畝荒地，引他到山上挖藥材，叫婆姨替他洗被窩，退伍軍人因而有了餬口生活，稱呼老湯「一家子」。過年臨定的時候，退伍軍人對老湯說：「我家去一定用我底餘糧換一身新衣裳回來，不然我對不起「一家子」」。部隊勞動英雄郝正業，用自已得的獎金替戰士買肥皂，手巾，做鞋子，補衣服，戰士都叫他「班長」。模範隊長李占魁，爲了羣衆利益，經常深入各村工作，羣衆送他個讚美的綽號「跑圈鞋」。那團伙員底族職——羅貴，長征時候，戰士幾月喫不到肉，他買着飽火割肉煮給戰士喫，行李都因此丟掉了；部隊住下來，他拿自己生產的錢買了棉花捻了線給戰士縫衣服；戰士病了，他煮了麵糊送到病牀底床前，戰士們說：「簡直像母親一樣」。有了那麼生產底經驗，替大家做那麼多好事，勞動英雄知道是得虛心的，爲了不斷進步，隨時都檢查自己底缺點。創造了房家溝模範鄉的安運勞動英雄陳德發，曾以青年模範的銳氣，坦率爽直地說：「……：號召大家種棉花，看苗子出的不好，認爲不頂事，我打頭把地翻了，人家說：勞動英雄能翻地，咱們也翻吧，把幾十畝棉花幾乎翻完了。再我的豬喫了人家一次莊稼，羣衆說：說勞動英雄底豬能

「我們到延安是取『經』來的。取的是『真經』，可不是一問三不知的『阿彌陀佛』。」

這是被譽為「馬青天」的馬錫五專員講的兩句話。兩句話到了勞動英雄們底心裡。什麼是「真經」呢？馬錫五同志解釋：「那就是勞動英雄互相交換的生產經驗和各位領導同志底總結和指示。」

學了，帶回去，把經驗普遍宣傳到邊區各個角落，使大家獲得大米小米，多產棉花棉布，每人衣服食足，生活過得更美，難道那不是「普渡衆生」的「真經」麼？

「我們到延安是取『經』來的。取的是『真經』，可不是一問三不知的『阿彌陀佛』。」

這是被譽為「馬青天」的馬錫五專員講的兩句話。兩句話到了勞動英雄們底心裡。什麼是「真經」呢？馬錫五同志解釋：「那就是勞動英雄互相交換的生產經驗和各位領導同志底總結和指示。」

學了，帶回去，把經驗普遍宣傳到邊區各個角落，使大家獲得大米小米，多產棉花棉布，每人衣服食足，生活過得更美，難道那不是「普渡衆生」的「真經」麼？

於是，爲了相互學習，勞動英雄們忙起來了。有的像農忙時候在家裡一樣，鵝鴨就起來。三邊實保區那一組，起來就在燈下討論問題。盤算種樹的，盤算辦學的，組織紡織，提倡畜牧，與辦合作社，每人都有一套。都是想替本鄉本縣謀利益，求發展，真個担負起毛主席在大會上親口告訴他們的那三大作用：帶頭作用，骨幹作用，橋樑作用。更熱心的，甚至就先行動起來。靖邊模範支書張玉珍，會開到一半，就買了四十斤棉花捐出去，給他們鄉底小學紡織廠備來年紡織自用。張振財，那個以醫術生辦學校著名的城壕村勞動英雄，在小組會上聽了別人生產成績和經驗，到晚上就想擬定明年的生產計劃。爲了吸收別入底長處，還和李胡一塊去幫助吳滿倉。三個人蹲在山坡上一拉話就是半天。老吳告訴他領導生產的三條辦法：不願做自滿，要幫助別人；勤儉節儉。年輕些的張振財專的像拾了黃金，逢人便說。

於是，爲了相互學習，勞動英雄們忙起來了。有的像農忙時候在家裡一樣，鵝鴨就起來。三邊實保區那一組，起來就在燈下討論問題。盤算種樹的，盤算辦學的，組織紡織，提倡畜牧，與辦合作社，每人都有一套。都是想替本鄉本縣謀利益，求發展，真個担負起毛主席在大會上親口告訴他們的那三大作用：帶頭作用，骨幹作用，橋樑作用。更熱心的，甚至就先行動起來。靖邊模範支書張玉珍，會開到一半，就買了四十斤棉花捐出去，給他們鄉底小學紡織廠備來年紡織自用。張振財，那個以醫術生辦學校著名的城壕村勞動英雄，在小組會上聽了別人生產成績和經驗，到晚上就想擬定明年的生產計劃。爲了吸收別入底長處，還和李胡一塊去幫助吳滿倉。三個人蹲在山坡上一拉話就是半天。老吳告訴他領導生產的三條辦法：不願做自滿，要幫助別人；勤儉節儉。年輕些的張振財專的像拾了黃金，逢人便說。

「我們到延安是取『經』來的。取的是『真經』，可不是一問三不知的『阿彌陀佛』。」

這是被譽為「馬青天」的馬錫五專員講的兩句話。兩句話到了勞動英雄們底心裡。什麼是「真經」呢？馬錫五同志解釋：「那就是勞動英雄互相交換的生產經驗和各位領導同志底總結和指示。」

學了，帶回去，把經驗普遍宣傳到邊區各個角落，使大家獲得大米小米，多產棉花棉布，每人衣服食足，生活過得更美，難道那不是「普渡衆生」的「真經」麼？

於是，爲了相互學習，勞動英雄們忙起來了。有的像農忙時候在家裡一樣，鵝鴨就起來。三邊實保區那一組，起來就在燈下討論問題。盤算種樹的，盤算辦學的，組織紡織，提倡畜牧，與辦合作社，每人都有一套。都是想替本鄉本縣謀利益，求發展，真個担負起毛主席在大會上親口告訴他們的那三大作用：帶頭作用，骨幹作用，橋樑作用。更熱心的，甚至就先行動起來。靖邊模範支書張玉珍，會開到一半，就買了四十斤棉花捐出去，給他們鄉底小學紡織廠備來年紡織自用。張振財，那個以醫術生辦學校著名的城壕村勞動英雄，在小組會上聽了別人生產成績和經驗，到晚上就想擬定明年的生產計劃。爲了吸收別入底長處，還和李胡一塊去幫助吳滿倉。三個人蹲在山坡上一拉話就是半天。老吳告訴他領導生產的三條辦法：不願做自滿，要幫助別人；勤儉節儉。年輕些的張振財專的像拾了黃金，逢人便說。

四 眼睛睜開學習種種

但是，「沒有文化，啥事也幹不成！自己有好意見，好像茶壺裡煮餃子，肚裡有口裡倒不出；別人的好辦法，自己聽了也落不下；說要回去告訴大家哩，自己可就先忘記啦」。有的勞動英雄還說「不識字簡直是瞎眼睛子！」也有這樣說。綏德模範變工隊的馬生財，悔恨着：「過去一滿解不下念書的重要，到了延安腦筋總算展開了」。——念書識字，是延安會中掀起的一個大的熱潮。

馬錫五同志，給陝東全區底勞動英雄每個人發了一本『莊稼雜字』，他到住的大生棧就立刻變成了一座農民學校。開會以外，大家都帶着念書；早晨不識字，念，晚上點了燈也念；分成了小組，提出了競賽，會的教不會的，認多而教認少的，嘻嘻哈哈的談笑聲，可透進戶外；真是點火朝天啊。五十七歲的李風辰，有些眼花，黃昏時常看不清，他能大冷天裡到野外念。也有走在路上，不時地還翻開胳膊窩裏夾着的本本念的。八天，有的竟能通本背誦，有的能默寫出七十個單字。

別的客棧，別的勞動英雄也都在這取學習浪潮裡，「而學習的方法則形形色色的：安西的溫漢生半夜裡起來在肚皮上劃字；石明德隨口編幾句話，請招待員替他寫出就是認本：「因爲不便，借麥子兩石，今年沒打下，明年再見」。棧到邊區兩年的難民王富富，者自己編了詩句請別人寫出來教他。

毛主席，爲人民，常常思想發愁：又怕人民吃不飽，又怕人民受凍困。希望全國同胞們，團結起來打敵人。早到會場，認字，抄字，課堂就成了課堂。一個不識字的勞動英雄，而能將兩壁上那兩條大字標語比着讀下來：『第一一不不不：一模範工作者：忠於革命，精於業務，勤於學習，善於創造，團結幹部，聯係羣衆，勞動英雄：好勞動，好學習，又能公私兼顧，不自高，不誇大，不脫離羣衆。』

扶犁把，握鋤刀斧頭的粗壯的雙手，現在拿起鉛筆，毛筆，像在田野裡撒谷粒，他們在白紙上寫黑字散播着文化種籽了。幾十年沒有識「之」一「無

「的機會，被統治者像瞎子一樣牽着，過天昏地暗的日子。現在把眼前的障礙掃了去，眼睛一下亮起來，從黑暗中，到光明。」一個老的勞動英雄在開始發誓自己將生輝的時候，他說：「國際形勢我就不再說了」。會引起人會心（心照不宣）。到一縣一村，他們什麼都關心，都想了，也都能够了解。無可語言，這不少不少是一個個了社會革命之後偉大的精神革命。當我們看見，一個道地的莊稼漢，爲了舉一個極高的字，或說下一句比波長的話的時候，他低眉，他沉思，他十級百遍地描畫，他翻來覆去地自問自答，你不感覺到一字一句的理和字，在認真像探險的人發現了鐵苗，掘井的人掘出了泉眼那樣的快活麼？說農民天生就感嘆的人是愚昧的！工農勞動者有這種無不盡，使用不完的創造性智識的寶藏哩。

不說別的，勞動英雄擅長遊藝，富有文采的人就很多很多：石明德唱一口好秦腔，他唱「渭水河」，「歐家城」，聲音在老宏亮，深厚有味，大會上曾引起唱樂和鼓掌。新華縣的李俊發用悠揚婉轉的腔調唱「十種金區」，「二月刮春風，金區結的紅；金區結的紅，金區結的是邊區陝甘寧」。唱「五更鳥」：「一更一點月上東山紅，邊區的婦女真也真能成；……二更二點月上柳梢明……」都恰當寫出了邊區人民安樂豐足的生活。

村裡英雄自三唱，唱秧歌，唱秧歌是能手；他用「打緊更」的節奏編的三大燈會，下面是這種描繪邊區農村的唱詞：

什麼叫邊區「燈子會」？
三大燈會有奇蹟，
勞動英雄一齊來，
實行民主發展開，
農民把頭抬。

內政部發重新登記證書字第陸捌伍號

個個首長好意見，
調來農民把話說，
各樣藝術向他，
普遍邊區都教下，
這是好辦法。

又轉變二流子的一節：

叫聲二流子快轉變，
不要賭博開賭，
還要生產種田，
慢慢熬在人眼前，
我們要向前。

調句都通俗恰當，意思也很明確。但是白雲瑞是不識字的。同樣一字不識的楊鳳林，去給毛主席

獻旗：甘當犧牲了。首詩：

隨東分區六大開，
慶陽夜裏來延安，
十五見了主席面，
天天笑美騰酒筵，
有朝一日回家轉，
努力加油要生產。
毛主席說石天下傳，
豐衣足食都喜歡，
新一區一粟不寬，
各位首長心放寬。

赤裸裸地說出了勞動英雄內心的愉快，和對人民領袖的崇敬與願望。

勞動人民偉大，這需要說得更多麼？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日



有讀者問及「孔慶的詩中『它布』一詞之含義，當曾作提，後曾去信郭先生，茲得其覆信，摘錄於後：

「它布」即是 Tarp。的音譯，本是澳洲土語，意謂可爲遮蓋，但於澳洲不盡含蓋，故各國均通用原語。原語與「阿勝」有隔。物或人被認爲神聖不可侵犯，或認爲爲神聖不可接近，其事均謂之「它布」。拙文乃用爲神聖不可侵犯之意。

（下略）

羣衆雜誌第九期卷十第衆群

知識青年與民主運動(時評)	(二九〇)
馬克思主義對美國的貢獻	E·白勞德(二九二)
論克里米亞大憲章	杜 德(二九五)
五四課題的重提	郭沫若(三〇〇)
農村工作的幾個思想問題	蘆 蕪(三〇一)
歐洲各解放國家的職工運動	B·萊翁尼多夫(三〇九)
世界工人大團結	廖 青(三一三)
·筆 談·	
怎樣提高積極性和團結中間同學	黎 (三一四)
民主與農村工作	沃 任(三一六)
解放區的民兵工作	紐約時報(三二二)
書評及其他	
科學與人類正義是背道而馳嗎?	克 汀(三一八)
——論「啼笑皆非」中的反科學思想	
評林語堂的「枕戈待旦」	N·威爾斯(三二〇)

羣 衆

第十卷·第九期

三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羣衆雜誌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總經售 新華日報館

本刊價目

本期零售 三十元
 六 期 一百八十元
 十二期 三百二十四元
 廿四期 六百一十元
 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照加

時論

智識青年與民主運動

「五四」二十六年紀念

「五四」是智識青年的一個光輝日子，它以民主與科學為旗幟，在中國的政治與文化的革新上開出一個光輝燦爛的運動。中國的智識青年在民主革命中成爲一支優秀的有力量部隊，是五四運動的領袖。「五四」，就一躍成爲智識青年的優秀傳統。

在中國，爲實現民主而奮鬥的呼聲是一天天的震響而響亮有力了，每一個關心自己國家民族的前途的人都異常興奮，尤其是承受着「五四」傳統的熱情青年更是興奮，都想使自己在這個大時代裡，把二十六年來的光榮傳統揚光大，去爲那油然興起的民主運動盡着最大的努力。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也是極應該的事情。

今年五四，更和往年大不相同。反民主的法西斯惡魔有的已經就擒，有的已在它的老巢中完了蛋，有的雖還在苟延殘喘，但也決然喘不了幾天了。保衛民主的反法西斯戰爭，甚全盤勝利，已經爲期不遠。聯合國國家正在舊金山開着會議，共商保證戰後世界和平安全的機構如何建立。全世界的人民，在保衛民主的戰鬥中已鍛鍊得異常剛健，新民主主義的潮流已泛濫得直浪拍天，形成誰也抵抗不住的力流，它衝進了南斯拉夫，衝進了波蘭，衝進了捷克，衝進了法蘭西，衝進了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奧地利，和意大利，也衝進了中國——在中國

，已有一萬萬人民游泳在這個浪潮裡，過着自由生活，形成了實現民主的急先鋒，和主力軍。在世界民主的浪潮在奔騰，在中國，民主的號角在怒吼。肩負着「五四」傳統的智識青年們，看看當前的形勢，想想已往的史蹟，誰也不能不極興奮，投袂而起。

今天，確是發揚「五四」的精神，完成實現民主的使命，最適當，最有利的時機！

智識青年們肩負着這一面「民主」的鮮明旗幟而奮鬥，已經二十六年了。迄今還沒有完成使命，這是由於什麼呢？要發揚「五四」的精神，完成它所留下的使命，必須要把這一問題研究清楚。是不是由於缺乏一種主觀的熱情或願望呢？不是。它的一直沒有能夠完成使命，所缺乏的，不是主觀的熱情或願望，而是實際方面的力量。不是實際上沒有這種力量的存在，而是由於客觀上和主觀上的限制和缺點沒有把這種力量發揮出來，組織起來。

「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主要是農民問題」這句話，我們似乎早就知道了，但我們却始終沒有真正懂得這句話的道理。直到近年來根據敵後艱苦抗戰的經驗和陝北努力建設的成績，大家才具體地了解到這句話的意義，了解減輕農民負擔，發展農村經濟，改善農民生活，提高農村文化這種農村工作，在中國革命現階段的的重要性——抗戰主要依靠農

村來支持。民主政治首先應辦農民生計，發展農村經濟，從農村出發，新文化也是首先應辦農民生計的落後和愚昧。農民中儲蓄着不可估計的巨力。過去民主運動沒有得到成果，在主要的一方面主要是由於忽視了農民，沒有把他的一力量組織出來。五四運動在當時確是普及於全中國，其熱烈的發揚，史無先例。但其限於大小城市，未能切實照到當地的農人提出「到民間去」的口號，把這運動深入農村。北伐時代，農民運動曾盛極一時，使大批農民投入爭奪自身民主權利的浪潮，所賦帶的風聲雨聲的把當時的軍閥統治者推倒。但那也只是「南部的少數省份，而且不久就摧殘了。真正是大革命仍未能完成任務的主要原因。到抗戰前後，一二九運動風起，大批智識青年走入了農村，動員組織，爲抗戰打下了一個基礎，使抗戰能夠堅持到今天。但到武漢撤退，這運動又在許多地方遭受頓挫下來。在全國範圍內顯出極不平衡的發展狀態，使抗戰形勢也顯現出敵後和正面戰場極不相同的面目，而民主運動也就在這顯現出被阻礙。

道理是容易明白的，人民是力量的源泉，廣大人民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在農村，不問什麼運動，抗戰也好，民主革命也好，發展經濟也好，新文化也好，如果不伸展到農村裡去，這運動儘管在某些城市裡搞得轟轟烈烈，始終有如種植在瓷盆裡的盆景，可以開花而不能結實。目前在大後方，開展民

主運動是當時之急；但試想，如果這運動只停留
在城市，不使佔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參加進
去，成爲它的基礎，成爲它的主力，它會有什麼力
量呢？在遭受這流變的時候，它會依靠什麼來堅
持下去呢？民主運動是反對封建革命運動；封建統
治的社會基礎（政治的和經濟的）是在農村中，如
果不把農民的力量發動起來，組織起來，爲爭取自
身政治上經濟上的民主權利而鬥爭，那封建勢力就
總是搖搖不動，中國的革命任務也就無法完成。

在紀念「五四」這一個自己的光榮日子，要爲
完成它所留下的任務而奮鬥，智識青年們就必須接
受歷年以來各種各樣的鬥爭經驗與教訓，成功的和
失敗的，割莫滿足於留戀於大家聚集在該個城市高
呼怒吼的轟轟烈烈，而無視了隱伏在它背後的危險
，必須掃除殘餘的「救亡」作風，消納實質，走進
農村中去，從基礎上一番功夫，使民主運動具有
切實的內容，堅實的力推。

開展農村工作，就是要幫助農民與剷除弊。在
政治上，經濟上以及文化上，一滴地爭取民主權
利。這是一個長期而艱苦的工作。農民比較散漫，
比較保守，比較落後，要把他們啓發起來，組織一
個隊伍，形成一個力量，很不容易。同時，農村中
的封建勢力還很頑強，要去進行幫助農民的工作，
會遇到很多障礙和困難。由此種種，種了農村，非
經過長期的艱苦（細心耐氣，堅韌刻苦）奮鬥，不
能展開工作。

開展農村工作需要有很好的準備，需要多參閱

查研究，熟悉農村情形，了解農民性格，認清農民
的苦痛和要求，熱愛農民，需要從多方面搜集農村
工作的經驗，研究農村工作的方法和作風。統一戰
線地作一切工作的總方針。在這一原則之下做農
村工作是相當複雜的。在地主與農民之間，有鬥爭
，也有聯合，鬥爭與聯合，互相起伏，互相錯雜
，都要做到恰如其分，過與不及，都是有害的。不
鬥爭，農民就拾不起頭來，他們的力量就無從發展
，無從組織；一味鬥爭而沒有聯合，統一戰線就統
不起來，鬥爭也會終於遭受挫敗，農民的力量也就
不能生長起來，強大起來，農村工作仍是展不開。
這一些都必須先要有個適當的估計和準備，雖然無
法估計得十分具體，但至少要在思想上作充分的準
備。

住慣了城市，做慣了城市工作，要轉到農村去

工作，是一個苦痛的過程。首先是農村生活不
，其次是知識份子不易接近農民，第三是農村交通
閉塞，文化落後，初到時精神上受不了。對於這
些，不但重在思想上有決心吃苦的準備，而且對於
這些問題到底如何解決，也要在思想上精通。否則
事到臨頭，一時找不出解決的辦法，問題存在那裏
，終於要成爲工作的障礙。

智識青年是中國革命的優秀戰士，民主運動是
他們今天肩負的艱巨任務。光明的前途在眼前閃
耀招展，光榮的史蹟在背後鼓舞督責，爲完成「五
四」所留下的使命而鬥爭，已使他們的熱情與勇氣
，高漲得萬丈雲霄。把他們和廣大的人民結合起來
，和各個角落的農民結合起來，就將成爲一支不
可戰勝的巨力！

啓事

本期尚有「爲獨立與民主而戰」（論準備成立
中國解放區職工聯合會）與「川北災荒問題」二文
奉令免登
又「敵後職工運動近況」一文，因尚未發還，
這一期也無法刊出。

馬克思主義對美國的貢獻

E. 白勞德

許多批評家各有各人的目的，把美國馬克思主義者發展的政變解釋為馬克思主義的放棄。那些過去最仇恨馬克思主義的人現在却趕着來為他辯護，或應馬克思主義者對他們的信條的「叛道」。甚至那莊重的紐約時報也說：「馬克思主義者失掉了最後的一點信任，因為他們背叛了他們自己的主義。」

那點以前至少是他們可惡地忽視馬克思主義的人，現在對馬克思主義的動員和組織起來，這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這值得共產黨人答覆。

美國共產黨人目前的政策是一心一意為了解決美國在所有歷史中最主要的危機的一些問題。問題主要地應從這點來討論。假如她真實地對這目的有所貢獻，那末她是正確的；假如她如果對這目的沒有貢獻，那末她就是不正確的。

既然這本書指其所著的「德黑蘭」一書是以世界形勢和美國的地位來說明我們政策的好處，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對美國有什麼貢獻」這問題作一最後答覆。對這問題的答覆也就是對那些說馬克思主義被遺棄的人的答覆。

馬克思主義是用科學來解決政治問題。她把這些問題作為整個歷史過程中的特點來提出。她認為整個歷史過程是按照某種發展原則，某種運動規律——可以觀察得到，記錄下來，和能夠了解的。在這樣對歷史原則的了解基礎上，她為自己立下任務：武裝人類使他們可以統制和指揮今天歷史的創造，而對我們便是解決美國目前國內問題。如果馬克思主義在這意義上真正是一種科學的話，她今天必須首先正確地答覆所有戰爭提出的問題。

一位先生近來向我表示：「我可以了解你們的政策完全是為了戰爭勝利而定的，但是我弄不懂，這樣一來，馬克思主義不曉得可變成怎樣了。」

「我回答他說，我很高興，他懂得爭取戰爭勝利需要什麼；但我很抱歉他錯誤馬克思主義為使戰爭致敗的理論。」

馬克思主義在今天對美國，首先是戰爭勝利的指南。既然勝利對美國人民是最高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成敗就要看對勝利的貢獻。假如馬克思主義

不能有所貢獻，甚至於勝利的障礙，那麼我們倒要問：「馬克思主義怎麼樣了？」但是假如馬克思主義說明了是勝利的最大幫助，那末她就經得起最大的考驗並有一顆大前途，不必我們為她擔憂了。

這本書所提出的綱領是馬克思主義訓練和思想的結晶；她從頭到尾是依照馬克思主義原則的。假如這綱領是健全的，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並且在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的意義來說是「正統的」。

當然，這在重複一些過去馬克思主義者在不同的歷史情況下所用的舊政策和公式的意義來說，她並不是「正統的」。不是的，這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也不是正統的。但是假如我們生活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形勢中，科學的正確政策一定是個前所未有的政策。假如政策是在依照過去的模樣的意義來說，是「正統的」，這却證明她是錯的；假如她是沒有前例的，就說明了她可能是正確的。

我們政策是否正確必須以考察她對我們所處的環境所給與的好處來證明。而最後的證明必須得之於行動——在她應用到生活的成功。

馬克思主義最高的目的即為指導行動的沒有前例的綱領的形成。馬克思主義並非一堆教條；而所有企圖把她貶低為這樣的人是毀滅馬克思主義。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自己有一次對他幾個學生不耐煩的時候宣佈：「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只有對「正統的」形勢才拿出「正統的」綱領。然而歷史上最有決定性的時候是那些並無前例的，拿正統的綱領來應付便要失敗的。

馬克思主義把歷史看為不斷變化的過程。這就是為什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是那些教條主義者——總是最先認識並正確地估計一個新形勢的人。

馬克思主義對美國思想應有的最大的貢獻是幫助她，使她逃出教條主義的網羅。我說這話時，是充分地意識到大多數的美國自由主義者聽了會認為

是笑話的——因為我們的自由主義者以為他們才有自由的頭腦，而共產主義者有的却是精神的枷鎖。這問題值得更進一步的考察。

我在最近和自由主義的報紙紐約下午報的一位編輯討論中，他向我發牢騷：「一般共產主義者總是表現着好像他們剛和上帝開過會議似的」，並說這說明了為什麼自由主義者和其他的人對共產主義者感到拘束，和不喜歡跟他們在一起。我回答他說：我們看來，自由主義者根本反對自從幾代以前上帝給他們最後一次音信以來所說的話。這是用美國流行的開玩笑的話來說明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在哲學上的爭論。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真理是可以探討的；一旦被發現了便應極力地把他盡可能地廣為傳播，而自由主義者則認為對每一個問題都有兩個對立的合理的答覆，我們今天最多可能做到的便是在這些之間不為特殊利益所限制，選擇一個，在這些可能性的答覆中抽籤，其成功之程度是不下於其他方法的。自由主義者拒絕了一個權威主義的教條，但却把和他相反的多樣答覆的教條來代替他。他們以為他們的理想是自由的；因為他們徘徊在對人類問題的多樣回答中，不需要指導；因為他們可以隨便任性。但是這新自由是純粹的幻覺；因為只有獲得確定的運氣，他才會對生活的實際問題產生正確答案。他是科學方法的反面。

馬克思主義對美國生活有最高貴的貢獻是把科學應用到政治中。就是把那舊的和已知的設想新的和未知的科學理論來代替盲目的「試驗與錯誤」的方法，懂得了世界是在運動中和運動規律，才可預見尚未出現的事物；人的精神才不致於達到一大連串的出其不意的事件而毫無準備。

在美國社會生活的一個滑稽特點便是新聞報紙拼命地把共產黨人描寫，像是對事情的任何一點轉瞬，變動，總是毫無準備的，他們對每種新的事情都感到驚愕。這種別有用心的詭辯是用來掩飾說這話的人的毫無準備和為難狀態——並不是共產黨人的無準備和為難——而只有在同樣別有用心的歪曲共產黨人真正的立場，這詭辯才能堅持下去。在美國除了在共產黨人自己的刊物裡，幾乎是不可能獲得共產黨對任何重要問題的意見的。其他如報紙，雜誌，書，演講，無線電等等，一面時常而且長篇大論地談到共產黨人，另一方面却總用盡一切力量去隱蔽和歪曲共產黨人自己說的話。

關於這方面最有意思的例子便是在一九四二年出版的書「勝利——和勝利之後」所遭受的事。他們對這本書的主題沒有刊登過任何分析和批評。少數這方面的意見（美國經濟評論，一九四三年九月份，美國學院年報一九四

四三月）是用老的辦法斷定這本書既為一共產黨員所寫，因此除了為蘇聯辯護而外，什麼也沒有，然後又把所有除了可以朝這方向歪曲的一切關於蘇聯的關心」的證據——而這關心就會使共產黨人反對和看不見美國的利益的。人們只把公式排列一下，就算把我們的觀點作了最後的清算了。

我已經可以預測到這本書的幾乎每一篇書評的內容。牠的顯著的特點——即尖銳地要求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地位和分析這領導地位實際上如何造成——整個這樣的公式地被「白勞德讚頌德黑蘭，因為斯大林參加了；他拒絕讚頌斯大林，因為斯大林不在；由此可見白勞德不過是斯大林的應聲虫而已，別理他說的是什麼！」所隱蔽起來了。美國關於國內共產黨員的見解的公開討論竟墮落到這樣！

只要這種接近問題方法支配着一般人對共產黨員的態度，就不可能得到對任何一個問題的健全意見。這並不是說共產黨員總是對的，甚至不是說他們對任何特定的事物是對的。問題是這種對於共產黨的態度到了歪曲所有國民思想和整個美國公共生活的程度。

假定——可怕的思想——共產黨員可能技巧對某一極重要問題的意見是對的吧！就說共產黨員多半是錯誤的，人們應極力和他們鬥爭吧，但是依然有可能他們會有一次是對的。然而照目前在美國一般的意見來說，這可就糟了，因為這就是說整個國家自然地不應對這問題採取正確的立場。除非改變這態度，否則共產黨員對他們國家福利的貢獻唯一的出路只有通過小心翼翼總是站在錯誤的立場的策略，以求得因此美國便可自由地採取正確的立場（假如偶然有其他人提出的話）——這在美國文化生活中是相當發達的理論，那就是「死亡的接吻」。甚至有價值的專業，一經接受了共產黨員的支持和同意的「死亡的接吻」，即變為咒咀。那個不值一提的新聞記者華特曼，發佈命令給美國有些最大權勢的男女——他們跳起來服從，對美國大總統的命令從來沒有這樣迅速地服從過。

馬克思主義者憑他們的存在，對美國作了不可估價的貢獻，即揭穿這可能摧毀美國的思想毒藥的存在。如果說馬克思主義者，美國為了本身利益起見必須創造他們。一個個其他公民中的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可以有把握地因為他在那裡而揭示那個社會被非理性和愚昧主義的崇拜（即希特勒主義培植

泉源)危險到什麼程度，因為只經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一接觸，德國社會就會騷動起來。沒有馬克思主義者的話，毒氣是會進行殘忍的工作，靜悄悄地，看不出來——一直到發覺時已經太晚了的時候。

當美國人一旦學會理智地並不歇斯底里地地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員相處，並根據他們的優點來考慮他們的見解，像對其他公民一樣，或者是接受或者是拒絕並不顧計到來源，那算是全世界以及我們國家進步重大的紅色日子了！

在目前狀況，甚至談到「紅色日子」都是危險的；因為「紅」一字就會引起一番卑劣的活動了；而「日子」呢，則是要馬丁·路德和他的議會委員會去調查的！

如果任何一個人會懷疑我製造這樣的諷刺怪事，那麼讓我請他們參考美國內務委員會關於如何偵察破壞份子以便把他們從公務職守上撤走的條例。他們會看到「高度的愛國」便足以認為有嫌疑。似乎只有馬克思主義者才對「為生存而戰」有系統地作一切合理的結論；因而任何其他的人這樣的都是有危險的。這是美國和中國情形相似的。在中國，學生們被認為有共產嫌疑因而有被關入集中營的危險的，以疏忽他們的工作，逃匿于來擺脫嫌疑，這樣立刻在中國的F. B. I. (聯邦調查處)目中清洗了自己而且被認為沒有危險，頭腦清醒，品行端正的公民。

美國馬克思主義者所負的任務是極其困難的，他們要教育他們的國家去了解共產黨人是人，除了他們發現了一些有趣的新的思想方法之外，和他們的同類的人是差不多的。

任務是必須完成的，不管他怎麼困難；因為比國內政策的困難更迫切和更重要，是美國完全不能解決其外交政策上的問題的，假如她一時「共產黨」便歇斯底里起來。共產黨人是今天世界形勢一個不可避免的部分；如果美國在世界上打算負起重大的任務。我們就會知道以一個民族來應付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人的時候，必須不面紅耳赤，叫罵，騾蹄，發昏，或是表現其他不穩妥的恐懼的徵象，而沒有比較在這種跟我們自己國內的共產黨人開

始學這一課更好的了。

在與外國共產黨人有理地，客觀地相處之中，美國會逐漸地忘記所有關於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所受的錯誤宣傳，我們將知道一幅——狂野眼目的，極端的，喜怒無常的，破壞性的，嗜殺的，褊狹的，不顧民族國家利益，教條式的煽動不顧一切的革命——圖畫是錯誤的，是真理的反面，經過一代時間的高壓和非常動聽宣傳，這幅圖畫是印在人們的腦子裡的。

他們將發現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者是非常鎮靜和頭腦清楚的。他們與其說是感傷的，不如說是講理的，與其說是極端的，不如說是現實的；與其說是喜怒無常的，不如說是他們學會了在地震和暴風雨中保持平衡；與其說是破壞的，不如說他們學會了在混亂中建設，與其說是嗜殺的，不如說他們整個個人生觀和行動是人類愛的表現；與其說是褊狹和教條，不如說他們把耐性提高到高深藝術；並將伸縮性提高到原則的水準；他們從來不玩弄革命的概念像一種好玩的冒險或是客室裡的遊戲那樣，他們對政策的一切考慮一面是嚴格地根據民族利益的基礎的。以此為據，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有一個思想系統——她對世界所有人民的問題發射新的和更深刻的光明，這光明是人人能享受的，不管他們的思想怎樣，只要他們肯去想通。

在這世界危機時期內，每一個民族都在經歷着考驗，美國最必需的是去學習怎樣想得快，想得透。如果我們繼續以成見和無稽之談作為我們政治思想的根據，或是我們對現代世界的現實生活學習得太慢，趕不上歷史，那末，沒有一樣東西可以拯救美國於一個長時期的災禍的。

假如我們能夠面對現實而不畏縮，用現代的語言來復活起林肯的偉大傳統，美國便可以團結一致而對世界，並担負起德黑蘭提出的拯救全人類的集體任務不可缺少的一部份任務。

德黑蘭向我們指出戰爭與和平的道路，我們必須學習怎樣走這條路，不屈不撓地到達它的光明的終點。

本刊九卷合訂本業已裝竣發售

敬希讀者諸君注意

論克里米亞大憲章

英P. 沙德維爾
鍾穎譯

新世界的輪廓

克里米亞會議的結果，超過了一切人對這次會議的任何大膽的希望。克里米亞宣言稱「將提供一切歷史中最偉大的機會」，就已達成之各項重要決定而言，這句話是一點也不誇大的。歷史上的從未有過一次國際協定，在範圍上有這麼深廣，在內容上又是這麼明確肯定，而又有如許應與優勢的力量支持它實現它。克里米亞會議不祇是在對行動，對縮短戰爭及加速勝利等方面達成了合乎實際需要的直接的決定，在對德治德國及解放歐洲等問題上，也達成了初步的協議。此外，克里米亞會議又對世界經濟，以及實施和平推進民主等問題擬定了一個長期計劃，這個計劃將支配未來的若干年，德國的謠言已在逐步地付諸實現了。

籌劃未來

有人說，自從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後，不自覺的歷史在開始變成自覺的歷史了，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發展的科學似乎第一次能夠產生世界事件當中起一斷實際的作用，正如在遙遠的將來，新世界的人類或自己命運的主人不再是盲目無助的東西一樣。從世界規模上說，這一段話當然不會到來。但隨着具有決定性的三大世界強國（其中包括一個社會主義的強國），在德國和雅羅連地簽訂合作的協定以後，我們已經開始看見第一個在計劃中的未來世界的輪廓了。德黑蘭和雅羅連的宣言中，並沒有詳細不清的，使德黑蘭願望的條文，而是根據當前迫切的要求和政治社會環境與點，所擬定下的各項具體的目標。三大強國並準備用全部力量來實現這些目標。未來的世界發展，我們今天，雖然還祇能望見一個輪廓，但在未來的若干日內，將會愈加靠近我們以至落入我們的掌握中。

為實現克里米亞決定而鬥爭

儘管我們對克服障礙自然是很多很多的。但引導人類前進的道路，絕不會是一條無阻礙的坦途，不僅在達成最後目標時如此，就是在走向最後的下一步也如此。克里米亞宣言絕不祇是一通外交文件，它是指引人類歷史下一階段的階梯，所有的政策願望都必聯放在克里米亞宣言的光輝下來檢查。克里米亞宣言正在給所有的民主國家、民主黨派和組織，開闢一條平坦的大道。世界工會大會已正確地強調指出為促進和有效實現克里米亞決定而積極戰鬥的重要性了。若干報紙，在消遣維谷中，在投機和煽動中，作出令人感到驚異的欺騙之辭，不過，這並不能夠使我們不去注意那些仍然在暗中繼續着的不合法的謔子。如果一切歷史中最偉大的機會必須加以保護的話，那些仍舊在繼續中的反對是應該要擊倒的。

加速勝利的到來

在克里米亞各項決定中最生提到的軍事決定，因為這些決定所有其他各項目標的先決條件。「關於我們的陸軍和空軍要從東邊、西邊、北邊和南邊向德國心臟發動新的更加強有力的打擊的時間，規模和協調」上所獲得的「完全協議」，並不比德黑蘭「我們將從東邊、西邊及南邊採取行動的範圍和時間」的協議次要一些，誰都知道第二種協定在德黑蘭會議以後開始起來的。雖然克里米亞公報說：「納粹德國的命運已經注定了」，「抵抗」已經「沒有希望」，但完全擊破納粹戰爭機器要繼續進行許多個月。克里米亞會議的美國戰時動員局長貝爾納斯在會議後說：「還得繼續發給大量物資以準備將在三月間發動的更大規模的行動。所有的努力將繼續集中起來支持這次的大勢。由於納粹對歐洲的破壞和毀滅每天都在進行，加強對東歐戰

的這一課總是更來得百倍的重要了。

一九一八年和一九四五年

要考察這次攻勢的前途，我們可以注意一下「戰爭與工人階級」最近一期上面的托爾捷夫上校的文章。他指出在一九一八年三月間，魯登道夫發動最後一次攻勢時的情勢和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間倫斯德特企圖反攻的情勢是不同的。在一九一八年三月間魯登道夫發動攻勢的時候，德國還擁有一九三個步兵師（精幹部隊的百分之八十均在西線），和百分之九十的砲隊，只有五十個師（內中尚有一部係奧匈師團）用來在波羅的海、比薩拉比亞和烏克蘭等地對付蘇維埃俄國的軍隊，而當時西方盟國則祇有一百八十個師和一點點品質低劣的砲隊。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間倫斯德特發動攻勢的時候，德國軍隊在四線的是七十五到八十師，在東線的有二百師，「單是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個月內，德寇就從其他各戰場抽動了三十二個師到東線」。其時「英美軍隊比德寇兵力要多兩倍到三倍多，無論砲兵、坦克、和空軍都毫無問題的有着壓倒的優勢」。魯登道夫可能集中六十二個師的兵力來發動攻勢，倫斯德特祇能集中十五個師。魯登道夫攻勢的失敗給盟國西線攻勢鋪好了最後勝利的路。隨着倫斯德特攻勢的失敗，盟國最後從東面、西面、北面、南面對德寇施行總攻擊的條件已經齊備了，這一次最後的總攻擊的戰爭將是終結歐戰的戰爭。

「無條件投降條款」

克里米亞聲明，三大強國已經確定了在軍事勝利以後加諸納粹德國的「無條件投降條款」。這一聲明是最後的把那些紛紛的爭論終結了。所謂「無條件投降」既不如某些人所說的完全無「條件」，也並不拒絕德國人民自己來反對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並結束那「無希望的抵抗」。「無條件投降」並不意味根本沒有停戰「條件」，而是德寇人投降以前，絕不和敵人談判，絕不和德國代表接洽任何條款，要等到德人軍事完全失敗以後，才把投降條款加諸敵人。這樣，德國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就再沒有可能利用外交陰謀來挽救它的失敗命運，就再不能利用談判的藉口來掩蔽它軍事的絕對失敗了。如所通知，沒有談判，「德國軍隊未被擊敗」的神話是無法編造起來的。同

樣，威爾遜的十四點也就沒有使用的餘地了。十四點，事實上其爲了反對布爾塞維克革命提出來的。那個時候，駐在彼得格勒（現在的列寧格勒）的美國宣傳代表爲要對付布爾塞維克革命發出了迫切的要求，於是十四點馬上提出來了，這以後納粹就把它用來掩飾德國一九一八年的軍事失敗。

一百萬自由德國人

但是，其來源並不是由於盟方而是由德國人向德國人民所發出的坦誠的呼籲，則是不能一體看待的。這個呼籲要求擊潰納粹主義並認識到「德國人民如果繼續無希望的戰爭是沒有價值的」，祇有消除德國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德國人才能够在「國際交誼中獲得適當的生活和地位」。

這一呼籲的成就可以由自由德國運動的工作上表現出來。自由德國運動在蘇聯的德人俘虜營中已有了一百萬人的會員，在清洗戰後德國的時候，這是一支極不容忽視的先鋒部隊。可是，在英美兩國的德人俘虜營中，相反的情形仍然佔着優勢，在那里，納粹的教義仍然保持着的，納粹的宣傳在可以任意流佈，反納粹的文化思想正式遭到盟國政府的禁止。反納粹的戰士被迫害，以至於遭受可怕的威脅和暗殺。盟國政府就這樣在盟國土地上保護着納粹的溫床。顯然的這種措施，其結果祇不過把受過納粹教育的軍隊在戰後仍然送回德國而已。這種污糟的情形應當迅速的予以改變。英美的設計師們，與其在那里製作戰後如何再教育德國人的學院式的方案，毋寧在現在集中注意來再教育英美德人俘虜營中的德國人，這才是最現實不過實際工作。要是這些設計師們又能够和英美的自由德國運動合作，那就更好了，其成就一定是可以預期的。

納粹主義、軍國主義和德國人民

克里米亞聲明明白而確切地宣佈盟國的宗旨是要「消滅德國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並不祇是希特勒主義）「並保證德國絕不能夠擾亂世界和平」。此外，它又確切地宣佈了要解除「德國所有的武裝」（凡爾賽和約曾允許德國擁有若干職業化的常備兵用以反對布爾塞維克主義，而其最後則是變成了軍事復活的基礎，有了上述規定，就再沒有這樣的空隙了）。解散德國總參謀部（納粹主義的鼓吹者和設計者），毀壞或撤去所有德國的軍事裝備

，排除或撤去所有供軍事生產的德國工業。

「所有戰爭罪犯」（這就包括了希特勒、希姆萊、赫斯和其餘的人們）均須受到「公正而迅速的懲罰」（這就不是那愉快的流放）。盟國所有損壞均須獲得「相當精確的賠償」。所有納粹組織機關都須予以解散，「所有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影響」均須從「公共機關」中以及「文化與經濟生活中」予以消除。

對於德國人民以及所有全世界的人民這是一個完整的莊嚴的行動綱領。讓我們真誠地相信它吧，這個綱領是需要實現到最後一個字的。

文明世界的判決

毫無疑問地，德國人民是需要支持法西斯主義的代價的。支付代價是實行再教育的一個主要部份（再教育工作決不是用星期學校的幾篇演講所能完成的。英美大學的無知之徒，他們雖然是很熱烈的，但是他們自己就不懂得政治）。克里米亞會議各項嚴正決定是代表文明世界的覺醒。每一個民主國家都是以全心全力來支持這些決定的。代表六千萬有組織工人的世界工會大會是支持這些決定的，甚至於他們還強調地提出了須要採取各項必要的手段。梵蒂岡方面的反動份子，無條件的反對戰爭者，以及一些別有居心的個人，他們會若斷若續地發出了一些反對的叫聲，但是他們是沒有人民支持的，他們並不能夠阻擋正義的車輛。

法西斯主義的果報

我們崇敬德國那些英勇的反法西斯戰士，共產主義者及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他們遭受過無形無狀的恐怖，他們曾存在人世間的已經寥寥無幾了。他們是德國過去光榮傳統唯一的代表，他們也是德國民族將來唯一的希望。他們首先承認並歡迎克里米亞的正義的決定，並預備分担起從災難和腐朽中拯救德國民族的苦痛。對於那些納粹野獸和納粹罪犯們是絕不持有任何憐憫的，對於一般的德國人民，他們的罪過最標本的是奴隸般地服從政府，分贓，成為搶劫的從犯，這可以由現在的佔領區情形得到了了解。德國人民的德性，經過十二年的納粹統治以後已經腐敗爛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了（德國軍官命令他們的士兵在國內不得像在佔領區那樣任意搶掠及強姦。在德國境內甚至一些

婦女也隨意搶東西，如此，蘇軍會不得不下令禁止）。處治戰爭罪犯如果採用溫和及「免役」的辦法，不但沒有任何用處，反而是在給納粹主義建築新的溫室，並提高他們卑劣的信心，這些納粹流氓和軍國主義者們，和一九一八年以後的情形一樣，他們會忘記這些好意，要教訓他們就得讓他們吃一點苦頭。

一次嚴厲的教訓

遭受納粹蹂躪的國家，他們國內人民曾遭受了很大的犧牲，這些犧牲的代價，德國應當全部賠償，因為這是納粹主義所造成的罪惡。只有這樣德國人民以及全世界各國人民才會留下深刻的記憶。世界各國的每一個人民，都應該懂得一個實行法西斯主義的國家必然要受到應得的懲罰，應該懷然地認識到，如果摩斯萊（英國法西斯黨的領袖——譯者）及其同類還能夠在大眾面前露臉，那麼，擺在大家面前的道路，正是一條引向無底深淵的道路。其唯一的結局並不祇是戰勝國軍隊在自己領土上縱橫蹂躪或一時的混亂及征服而已，而是要把侵略者化為灰燼，並進行嚴肅而殘酷地長期的報復。

這完全是必要的，祇有在這樣的基礎上，德國人民才能够希望將來可以「過適當的生活，並在國際交誼中佔一席地位」。

民主主義和法西斯主義

克里米亞會議所決定的一些不能不推行的必要的破壞工作正是更其重大的各項建設目標的補助工作。在克里米亞會議舉行以前，世界民主運動的不可計量的進展，比克里米亞對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表現得清楚得多。德國黑爾會講提出了軍事擊敗納粹德國及建立世界安全的各項目標，並提出了「消滅專制及奴役、壓迫和苦痛」的總目標。克里米亞宣言則對這些目標定下了具體研究的條款，在解放後的歐洲要從精神上到政治上來消滅法西斯主義，並爭取民主主義的勝利。把消滅法西斯主義正式定為聯合國在擊敗德意兩國以後的共同目標，這還是第一次。

不讓法西斯逃脫

到今天為止，美國官方如羅斯福總統和國務卿赫爾的表示，蘇聯官方如各領袖以及各報紙的表示，都已充分認識到了消滅各國法西斯——民主主義和世界和平的仇敵——的必要。國務卿赫爾現在已經卸職了，他在去年四月間的坦率的廣播中，曾經說：「在這個世界上，自由政府和納粹法西斯政府是不能並存的……終不和法西斯主義妥協，絕不讓法西斯主義死灰復燃」。

但是英國官方在這極點上，一直到現在為止，所表現的卻是某種程度上沉默和猶豫，如同承認意大利和意大利法西斯制度是我們的敵人一樣，他們祇承認德國和德國納粹制度是我們的敵人，他們不願意承認法西斯本身，不管其存在於世界上那一個國家都一樣是我們的敵人，也不承認法西斯是產生對聯合國，反對民主及和平的第五縱隊的根源。

這種例子是很多的，巴克斯特(Baxter)一個典型的慕尼黑黑份子，不久前，他在制橋一次討論會上說：「法西斯主義是在派發明的一個鬼怪」(究竟法西斯主義不是左派發明的鬼怪，最好讓他自己去問那些成千成萬而在佛朗哥、撒拉茲爾、梅塔克撒斯、霍爾第、希特勒、墨索里尼手中受過苦難的人們吧！至於在倫敦受過黑衫流氓毒害的人們就更不必說了)。

這個問題已經由克里米亞會議解決了，克里米亞宣言說：「歐洲秩序的確立，以及歐州經濟生活的再建，必須憑藉足以使被解放的各國人民能消滅納粹主義的最後形跡，並創造自己抉擇的民主制度的程序來達成」。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佛朗哥(西班牙)，薩拉茲爾(葡萄牙)以及貝隆(阿根廷)等體不是無可逃避的，宣言的這一重要意義世界工會大會已曾備加讚譽過了。

民主的新認識

其重要意義並不下於正式承認在解放後的歐洲「消滅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最後形跡」的，是對於反法西斯的民主有了新的和確切的了解。民主和民主發展二者間目標是實地與克里米亞宣言的主調或基本精神

●三大強國日後將採取共同行動，以便「依照民主原則處理解放後歐洲的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他們將協助各解放國人民「用民主方式解決他們迫切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其於短期內即須加以實現的目標是「成立臨時政府，當使民衆中一切民主份子的代表廣泛參加，確保儘可能從速經由自由選擇以建立對於人民意志負責的政府」。擴大集團團結的波蘭臨時政府，當「儘速根據普遍選擇與秘密投票方式舉行自由的無限制的選舉」。在這些選舉中，「所有民主的和反納粹的政黨，都有權參加，並提出候選人」。

這個宣言的重要還不祇在於協同的基礎上，不採取破壞性的內訌衝突來解決被解放歐洲的各類迫切問題。也不祇在於給社會與政治制度均不相同的三大強國的共同行動提供了共同的基礎，用民主方法解決因社會政治制度不同而產生的種種難題。更其重要的是他們第一次在一個正式文件中表明對民主的了解有了巨大的進步，這種了解本身就造成了這種共同基石——了解——的可能，重要的是在整個的將來，民主包括各種平等權利和所有民主黨派(包括共產主義)的參加，而法西斯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支持者則是在外的。

劃時代的進步

在兩次大戰期間，民主的意義被反共的理論曲解污蔑，今天的事實證明，反共的理論本身正是法西斯的遺產。凡是在工人階級和所有反法西斯人士密切團結在一起的地方，民主主義往往就被人抽象地曲解成爲「反共反法西斯主義」，其目的祇不過是在分裂民主的力量，把戰鬥的工人階級——最堅強的民主戰士，從民主戰線上劃分開來，讓反法西斯人士跌入法西斯的掌握中。

實際上德佬維護民主主義就是「反共反法西斯主義」這一公式的人們是在直接地對着共產主義開火，在歐洲的若干國家雖不承認共產黨有合法地位，禁止共產黨有在工人運動中活動的權利，而另一方面却對「自由共產黨」及「民主權利」等名目之下容忍法西斯存在，以至於對法西斯採取「緩消」的辦法。

這就使得法西斯有了擊倒民主而取得勝利的可能。法西斯的主要口號「反對共產主義」，被那些官僚份子利用份于論說民主陣營中來了，「反對共產主義」是民衆陣線的「經濟里斯之陣」(Kritik des Sozialismus)。

者)，法西斯主義是會繼續通用這一弱點來求取勝利的。他們企圖在國際範圍以內造成致命的分裂，把西方民主國家和蘇聯分開，在國內則分化民主陣綫，拒絕和共產黨合作。反法西斯共同鬥爭的艱苦經驗已經深深教訓了我們，要徹底擊敗法西斯，民主陣營就不能有任何的分化。現在這一教訓整個歐洲今天都已懂得了。

克里米亞宣言業已證實了這一教訓，並宣告了對民主的新的和深切的了解，把民主看成是聯合國家必需共同信守的基本原則了。

民主的團結

德黑蘭協定彌補了舊的成見和誤解的裂痕，它宣告，不管英美蘇三國的政體有多大的差別，均將「用全副心靈為消滅專制、奴役、壓迫和痛苦而努力」。克里米亞宣言，又向前發展了一步，它建立了推進歐洲各國民主的基礎。「成立臨時政府，當使民衆中一切民主份子代表廣泛參加」的這一原則現在早已次第實行，在歐洲已有九個國家有了共產黨代表參加政府。在波蘭，即將舉行的「自由無限的選舉」，「所有民主的和反納粹的政黨」都有權參加，這就是說，包括共產黨不包括法西斯。同樣的原則已在世界工會大會和正在組織的世界職工聯盟(W. F. O. I.)中建立起來了，對於上述二種組織，共產黨均有充分和平等的權利參加，而法西斯則是不能參加的。

克里米亞宣言定下的民主原則是所有各歐洲解放國家，共產黨應被認為是廣泛的民主陣綫的一個主要部份，他們享有充分而平等的各項權利。法西斯和法西斯的夥伴的則認為是不合法的。

對民主的深一層的了解，現在已被聯合國家正式認可了，這種被聯合國家正式承認的深一層的了解對將來的眞誠的希望是：過去的罪惡，愚昧和不幸將來是不能重複了，也就是說祇有現存的民主繼續向前推進才可以達成人民的各種目標。

世界和平與戰爭因素

最後，克里米亞宣言已決定了建立保持世界和平反對法西斯並制止第三次大戰的機構。這一項決定，和德黑蘭宣言一樣，是克里米亞宣言的主要精神。但是克里米亞宣言的決定却並不局限於德黑蘭宣言，而是發展了德黑蘭

宣言，這一重要的發展，使克里米亞全部內容更顯得光輝燦爛了。

德黑蘭宣言表示了建立和平的決心，使若干條件不受戰爭的災難和恐怖。很明顯地沒有深刻的社會變化，任何一個機構也不能夠保證「若干世代」的長期和平。而克里米亞宣言則是這麼決定的：

「我們決定儘可能從速和我們的盟邦建立一個一般性的國際組織，以維持和平與安全。我們相信，經由所有一切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密切而繼續的合作，以防止侵略並消除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上的戰爭原因，都是必要的。」

每一個社會主義者都懂得要最後的消除戰爭必須首先消除戰爭的原因，這就是說，要改革社會制度。但是每一個嚴肅的社會主義者及馬克思主義者又同樣地懂得這並不是說一定要等到社會制度已經變革以後，反對戰爭和制止戰爭的努力才不致於落空，恰恰相反，動員進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切民主力量來制止戰爭仍然是重要的。要進行最後消滅戰爭的社會變革，就必需動員一切民主力量來反對戰爭。

克里米亞所顯示給我們的道路，並不祇是在解決今天擺在各國面前的幾個迫切的問題，克里米亞所採取的各項政策，通過消滅法西斯的堅定步驟，通過加強民主力量及國際合作的政策，把解決當前所有問題及發展社會變革的最有利的條件提供給我們了。克里米亞的各項政策也把工人運動各項目標達成前後勝利的最有利的條件提供給我們了。

(原文載英國勞動月刊一九四五年三月號)

「五四」課題的重提

魯迅

「五四」運動的課題是接受賽先生（科學）與發展德先生（民主）。這課題依然還是一個懸案。科學既接受並未成功，民主底發展在今天差不多才正在開始發軔。因而也有人甘脆否認「五四」運動的成績，甚至於想從歷史上抹去「五四」這個紀念，這不用說完全是一種逆流。有這種逆流存在，也正是「五四」精神之須得繼續發展下去的一個主要的因素。

封建社會底長期停滯，對於改革事業實在是一個過重的累贅。外來資本主義的洪水不僅沒有把這累贅沖掉，反而使新苗失去自己的基地，得不到暢遂的發育。在這樣的情形下邊，拖延了二十八年，毫無疑問，運動當初所應有的，依然還沒有達到。

今天底任務我們依然繼續「五四」精神，加緊解決我們的懸案：接受科學並發展民主。純粹的翻譯已經過去了，今天要接受科學，主要的途徑應該是科學底中國化。要使科學在中國的土壤裡生了根，從那兒發青出來，開花結實。科學底理論和實踐要能和中國的現實生活配合得起來，要使它不再是借來的衣裳，而是很合身的裁製或甚至自己的肌肉。

要做到這一層，總要有政治的民主化以爲前提，學術研究得到自由，科學者的生活得到保障，一切都以人民爲對象，科學才能够脫掉買辦性質，而不致遭受惡用。科學精神也才能够得到鼓勵而發揚起來。

這課題不僅限於中國，它有全世界性，科學的應用，在這次大戰爭中，落在法西斯手裡，已經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要救濟人類，就須救濟科學。救濟科學的要徑也就是國際民主。在這國際民主精神的保障之下，科學的利用厚生之道必然會更加幸福而安全的。

我們更重提「五四」精神，爲拯救中國，爲拯救全人類。

（三十四年四月廿七日）

農村工作的幾個思想問題

盧 瀾

爲着實踐「爲人民服務」的宗旨，爲着完成農村的民主革命，「到農村去」的戰鬥實踐任務，被提到每一個進步的知識份子面前；許多革命的知識份子，已經放棄了都市的生活，毅然地走向農村，走向農民大眾中去。當然在這中間，也有人發生疑問、感到懷疑；這固然是長久的都市生活所養成的思想情緒、生活習慣在作怪，一方面也是因爲在思想上還沒有認識到這問題的重要性。這裡發表的這篇文章，就是企圖從思想上來解決一些青年朋友的疑慮。我們本來準備備另外一篇文章，是論述戰時農村的現狀和如何作農村工作；因此，這兩篇文章的內容是相互補充的，但不幸這篇文章「登不出來」，因此，現在發表的這篇對實際工作上的一些問題就談到較少，這只能希望知識青年朋友在實踐中用自己的經驗來補充了。我們堅信詩人歌德的名言：「理論是蒼白的，而生活則常青」。相信，在實踐中，我們的認識是會逐漸被推向前進的。

編者

中國的知識份子身上，常常是悲劇的背負着一種歷史的重壓，要從這種歷史的重壓中掙扎出來，常常需要長久而艱苦的戰鬥，在這種戰鬥前面，很多人是沒有通過這嚴峻的考試的。

就中國社會看，農業經濟仍然是社會生產的主要生產方式；中國知識份子大都是從農村裡生長起來，當知識份子還在農村的時候，生活上雖然和勤勞的生產大眾保持着一定的關係，意識上早就被社會環境所隔絕，當他們一旦離開了農村生活，他們就不僅在意識上加深了對勤勞的生產大眾的對立，連他們在生活上和農民的一點接觸也被隔絕了。也許他們在都市裡學得了知識，但不幸的是他們和勤勞的生產大眾中間已經築起一堵難以逾越的高牆。從這種實際生活的教育制度下面，他們所學到的是與勞動生產無關的知識；在意識上加深了「勞心者治人」的剝削觀念；在生活的習慣上，他們養成爲「四體不動，五谷不分」的寄生者。對於舊的士大夫或知識份子，這種隔離是原不足怪的。因爲他們原就想怎樣高踞在勤勞大眾的頭上，用他們的血汗作爲一己的奉養，勤勞大眾的辛勞艱難，徒供他們的放縱志願。

對於另外一些已經意識到這種剝削意識之卑劣，寄生生活之可鄙的知識份子，這種傳統的負荷就是一種精神的重壓。雖然他們已經認識到剝削生活

的罪惡，但因爲長期的脫離勞動生活，常常容易養成鄙棄勞動的觀念，他們所學得的是抽象化了的理論知識，他們却缺乏勞動生活中心的生產鬥爭知識，加上在都市裡的生活習慣和語言，雖然他們多半從農村裡生長起來，但他們却和農民大眾中間隔着一層「可悲的障壁」，他們從人民大眾的生活中來，但他們却和生長哺育他們的土壤分隔開來。在這種「可悲的障壁」前面，有人被過沉重的哀傷與嘆息；也有真的勇者，帶着戰勝一切的勇氣，突破了層層的障壁，實踐了「到人民大眾中去」的理想；當他從一個勞力者的知識份子，真正走向人民大眾中去的時候，他就像溪流注於江海一樣，他所體現的就是人民海洋的力量。我們的導師曾不憚煩的告訴我們：「知識份子只有和工農大眾相結合，才會成爲不可戰勝的力量」。就是這個道理。

但對於知識份子，要突破這種「可悲的障壁」常常是長期而艱苦的過程，這種障壁的形成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這就必須和傳統的社會勢力作鬥爭。在長期的歷史生活下面，知識份子這種脫離勞動人民的生活，被認爲是當然的事情。教育和勞動生活的隔離，「勞心」與「勞力」的區分，也就是「治人」和「被治」的營壘的劃分。而「習慣的力量，傳染了千百萬人，是一種可怕的力量」，知識份子本身自然也免不掉這種習慣力量的傳染。因此，單

是反對歷史傳統，社會勢力的外在鬥爭是不夠的，知識份子自身還必須反對歷史傳統、社會習慣所加於自身的影響，譬如看不起勞動生活，妄自尊大的知識份子的自我優越感，「勞心者治人」的剝削思想。自然，這門內在的鬥爭，就等於宋明儒者丟開了一切而談內心修養，自然得不到甚麼結果，但如果離開了知識份子對於自我的思想、意識的改造，外在的社會鬥爭就會是無力的，因為知識份子並沒有把自己的力量和人民大眾的力量相結合，仍然是一知自外於勞動人民的「客卿」。從歷史上我們不難尋到有力的證明。

「到民間去！」這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口號，「五四」運動、大革命後這句口號就被提出過；「九一八」、「一二九」以後，又有「到農村去！」的口號，抗戰以後也有過「到前線去」、「到農村去」的口號。在每一次口號的提出後，都會有過很多青年到農村去，尤其是大革命以後和「一二九」運動，這中間有過很多感人的故事。大革命以後，由於知識份子的下鄉，對於建立中國革命的武裝，發動農民的革命力量，有過很大的建樹；「一二九」知識青年的下鄉，為解放區的抗日戰爭奠下有力的基石。在這些革命的知識份子結合了農民的廣大農村，不僅成為革命力量前進的據點，而且在革命形勢逆轉的時候，保存和蓄積了革命力量。但我們應該認識，這仍然是很少數覺醒的知識份子的行動，在廣大的知識青年中還沒有造成一種共同的認識。因此，知識青年和勞動大眾中間這種「可悲的障礙」仍然不能不繼續到今天。自然，這是思想準備不夠的原因，但更重要的一點，是沒有把知識份子到「到民間去」、「到農村中」看作一種自我改造的過程，而只是當作一種外在的工作任務，或者是某一時期的應急工作；從觀念上接受了這個口號，但並沒有過更深的思考和認識；結果是帶着知識份子的思想、情緒，以至生活習慣、語言、興味到民間去，到農村去，事前既缺乏深入的思考和認識，在實際工作上一經挫折，就會從懷疑、苦悶，一直到失望、動搖，於是原封原樣的仍然帶着他們從前那一套思想、情緒、生活習慣……回到都市來。

錯誤對於我們並不可怕，但如果我們不能從錯誤中尋找失敗的教訓，而重覆着舊時的錯誤，這才是最可怕的事。今天，對於同時代的知識份子，和人民大眾相結合的道路是應該拓開，歷史的障礙是應該被突破的時候了。

知識份子的自我改造，雖然主要地是二種內在的自我鬥爭，但知識份子這種不健康的意識之所以產生，仍然是由於歷史傳統和社會勢力所造成，因此，自我改造仍然可以說是一種和「外在」力量鬥爭，不過這種「外在」的力量，已經成為左方自己的思想、生活，和自己的意識相溶鑄的力量了。讓我們來看看，這種歷史傳統、社會勢力，在我們的思想意識上究竟起過甚麼影響，在知識份子和人民大眾中間，在意識上還存在着一些甚麼「可悲的障礙」呢？

傳統的教育、文化所灌輸的「勞心者治人」的觀念，知識份子得得了知識與文化，常常自視高於勞動的生產大眾，因為這種自我優越感，往往認為自己的剝削與寄生的生活是合理的；久之，他們把歷史創造，社會發展看作是某些「英雄」、「豪傑」、「聖賢」……庶天才和意志，而沒有勞動人民的行動包括到歷史行動中去，而且根本忽略勞動人民與社會，創造歷史的作用。因此，在舊的史家的歷史觀上，這為累積非記載皇帝、貴族、豪傑、士大夫少數人的言語行動，一部二十四史就是帝王、將相的家譜，至於人民大眾的生活境遇，歷史行動上所表現出的羣眾力量，是完全不受注意的。這些傳統的史家甚至愚妄的傳播自己的觀念，認為：從歷本人類歷史中間剔除了百十來個「英雄」與「偉人」，根本人類社會就無歷史可言。至於廣大的勞動人民，不過是供這些「英雄」們隨意塑造的泥土而已，至於這些人民大眾之存在與否，是和歷史發展、社會變革並無關係的。這些史家以帝王、將相、英雄、豪傑為主體的歷史記載，是根本無法表達歷史的真實的。我們希望從歷史記載中間，探求人類社會前進的道路向前發展，而這些歷史却竭力掩蓋或歪曲歷史發展的事實，盡量揚揚得意、停滯、阻礙社會發展的「功業」。這種長期的反動的歷史教育，對於知識份子是不能沒有影響的。這便使知識份子看不見人民大眾創造的動力，是社會財富、人類文化的真正創造者，在歷史變遷中，知識份子就常常因為看不見人民大眾的力量，而怨艾自己的勞動力量。這種時候歷史變遷的動搖、怯懦以至動搖的。至於那些受歷史傳統所支配的知識份子，一方面固是只會頌讚「英雄」、「豪傑」的功業，一方面也是生怕勞動大眾的力量，因為勞動人民從階級中躍躍進來的時候，「勞心者」者的統治地位就會受到震動。這

些人如果說他們看不見人民的力量，毋寧說是害怕人民大眾的力量。今天，知識份子如果要想動勞的生產大眾相結合，首先就應使自已從歷史的偏見中清醒過來，從舊的史家的蔽障中間，重新來認識人民大眾在人類社會歷史的創造力量。也就是說：「不能把社會發展歸結為帝王和將相的行動，歸結為國家開創者和征服者的行動，而應看作物質財富生產者底歷史，勞動大眾的歷史，各國人民底歷史」。

不僅生產物質財富的是勞動的生產大眾，任何重大的歷史變革也同樣是決定於人民大眾的力量；今天，全世界規模的反法西斯的民主革命，固然是依靠全世界人民大眾的力量，就拿過去各個軍事的歷史轉折的鬥爭作證，也同樣可以說明：千百萬奴隸為封建主打出天下，十七、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的革命，也是依靠廣大佃農民和手工業者；不過他們奮鬥的果實是被竊取，他們鬥爭的結果不過是更換了一個新的主人，自己却仍然帶着一付枷鎖而已。

從理論概念講，勞動人民這種歷史創造力，在進步的知識份子中間比較容易得到共同的認識，但這種認識常常不過是停留在理論概念上的，而在實際的解決問題時，仍然表現為傳統的歷史偏見所左右。在革命行動中，我們常常是看重「領袖」人物的作用，而低估人民大眾的力量。對於自己並不是想怎樣成為人民大眾中的一員，而是希望成為高出於人民大眾的「英雄人物」。在革命行動中不願意「有一分熱，發一分光」把自己看成革命洪流中的一磚一瓦，常常是渴望成為油漆粉飾的門楣和棟樑。儘管口頭上承認了勞動的生產大眾的力量，實際上仍然是沒有認識的。

就一般的社會學的觀點，來認識勞動人民創造歷史的力量，仍然是不夠的。因為這仍然不免於變成抽象的概念。我們可以進一步從中國社會歷史的實際來探究。

一一

中國社會曾經長期的停留於封建社會，封建社會的主要生產方式時，傳統社會的物質財富的創造者，主要是農民。也可以說：封建社會的生產力，是農民。這中間農民因應服役，有很多被徵募入營伍成為士兵，有一些因為年成的荒歉，地主階級的過份重壓，喪失了自己的耕地或者是耕作的機會而流向城市，變成一些手工業者、小商人、或者是販夫

走卒。這些士兵、小商人、手工業者、販夫走卒，在本質上仍然是屬於農民的。在這種長期停滯的封建社會裡，農民大眾被束縛在封建的土地上，對地主對於農民大眾的榨取，不僅採取經濟的方式，而且採取超經濟的剝削方式。保護這種剝削制度的，便是地主貴族的封建國家。在這種封建國家中，皇帝有至高無上的絕對的權力，為着對於農民大眾的剝削和統治，聚集着大批的臣宰，並依靠地主紳士階級為封建統治的基礎。在這種封建社會中，地主貴族官僚士紳，都是脫離生產，過着寄生性的「治人者」；只有農民大眾是創造社會物質財富和社會文化的基本力量。

農民大眾的歷史創造力，也不僅表現在為封建社會創造物質財富這一方面，當中國社會停滯過渡的時候，農民大眾會不斷地以革命行動把社會推向前進。

在中國歷史上由於生產力被阻滯過甚，封建地主對於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會不能不在歷史上掀起無數的農民叛亂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秦朝的陳勝、吳廣，漢朝的赤眉、黃巾，隋朝的李密、竇建德，唐朝的黃巢，宋朝的宋江、方臘，元朝的彌勒「教匪」，江南「羣盜」，朱子真（不僅是反抗社會制度，而且反對異族統治）。明朝的李自成、張獻忠（後期並反對異族侵略），以至清朝的「太平天國」，前後不下數百餘次，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都是農民的革命戰鬥。中國歷史上農民叛亂與農民戰爭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沒有的。只是這種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企圖摧毀在他們身上的沉重的負擔，掃除阻礙生產發展的腐爛勢力，才是推動中國歷史進化的真正動力。因為每次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的結果，都多少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此也多少變動了社會的生產關係與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自然我們不應該忽視，在封建社會裡所發生的農民叛亂或農民戰爭，因為沒有新的生產力與新的生產方法，沒有新的社會力量，更缺乏一種有組織的先進力量的領導，因此，歷次的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總不免於失敗，總是在革命中或革命後被地主階級和貴族剝削利用了去，當他們到被剝削時代的工具。這樣，就在每次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停息以後，雖然多少有些進步，但是封建的經濟關係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其大體仍舊繼續下來。這種情況，直到近百年來，才發生了新的變化。

在社會文化方面，農民大眾雖然表現出他們極大的創造才能。專制主義者自然是利於人民的愚昧的，因為人民大眾愈無知，越便利於他們的統治。他們把社會分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階級，為階級於「

「勞心」者的統治，他們儘量的加強對於生產的勞動大眾的壓榨，使「勞力」者不再有「勞心」的機會。一切教育與文化的工具是完全掌握在統治者們的手裡，作為自己私利的工具。但人民大眾在他們的勞動生產過程中，仍然創造了很多樸素、豐富、直接生活的藝術作品，這就是士大夫階級所稱謂的「村夫牧豎」，「引車賣漿」者流所自有的「街頭文學」或者是「口頭文學」。在文學藝術上有過很多寶貴的遺產，如像「樂府」、「戲劇」、「小說」、「平話」等。我們要認識農民大眾這種創造，是在封建統治阻礙和禁錮下的。不僅民間文學時常被毀滅、被湮沒，民間藝人時常被迫害。每當民間文藝興盛的時候，一方面是統治階級直接的禁錮，一方面是士大夫階級處心積慮的來打擊。如明嘉靖、萬曆年間，以唐順之、歸有光為首的古文運動，就是士大夫階級對於當時流行的「平話」、「小說」等民間文化底反動的最好證明。士大夫階級一方面是要剝奪民間文化，一方面也常常吸收民間文化的優良素質，士大夫階級的文化就因為得着這種新的血液而變得更有生氣。

爲甚麼在這種不合理的作這種舉證呢？因爲我們被歷史傳統的偏見所束縛得太久，知識份子不覺時常把今天的農民大眾看成愚昧、落後，對於中國歷史上的農民大眾也常常是看成愚昧無知，只是「英雄」、「豪傑」爭王奪位的工具。如果對於中國農民大眾這種歷史創造力估價不夠，不僅無法認識歷史的真實，也無法認識今天的農民大眾的。

三

上面我們對中國勞動的生產大眾，或者說農民大眾的歷史創造力作了歷史的考察，現在可以進一步的來考察今天的社會實際。

中國社會的性質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對於中國知識份子，這已經是一個常識以內的問題。今天，中國人民在進行着抗日的革命戰爭，就全世界的規模來講，這是反法西斯的民主革命戰爭；就中國民族來講，這是民族民主的革命戰爭；這也是常識以內的問題。由此，我們就要進一步的追究一些問題：中國革命所憑藉的力量是甚麼？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是甚麼？對於這些看似簡單的問題，如果我們經過邏輯的平面來探究，就還可能有一些在思想未解決的問題。

中國革命所憑藉的力量是甚麼？我想一些朋友很快就會回答：依靠廣大勞動大眾，這種回答不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嗎？有的朋友會根據革命導師的

話：「今天的抗戰，實際上就是農民戰爭」。自然，這都沒有錯。但我們接受一個理論概念僅止於這樣描述稱引一下麼？如果是這樣，不仍然是一個「食而不化」的拙劣學生嗎？是不是還能够在思想上更深入的掘發呢？自然，引述這句話的朋友多半會指出：中國人口農民佔百分之八十以上，在抗日戰爭中他們出糧、當兵都佔了絕大的比率，在戰爭的支援上，他們的貢獻最大。這些說明都是非常重要而本質的說明，但爲了闡明農民在實際的對日戰爭中的地位，這些本質的說明顯然是不夠的。如果要了解這句話的豐富含義，我們必須進一步的探究到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今天，中國人民面對着的是——一個強大的帝國主義的國家，在中國內部勾結有反動的同盟者——一切爲敵作優的漢奸、走狗。敵人憑藉其優勢軍備，佔領了中國的中心城市，中國的抗日戰爭爲着要堅持奮鬥下去，就必須使革命的武裝得到準備、蓄積和鍛鍊的機會，不斷的增進力量；因此，戰鬥的初期，就不能採取堅守城寨的陣地戰，游擊戰爭成爲反侵略以前的重要鬥爭形式。游擊戰爭因爲要避開敵人的主力接觸，必須避開敵人強大武裝所統治的城市，而散佈和活動在廣大的鄉鎮，以在自己力量不夠時和敵人作決定勝負的戰鬥。游擊戰爭是全民的戰爭，在農村必須得到農民大眾的積極支持；以全民的力量去疲困敵人，孤立敵人，削弱敵人，消滅敵人。同時，不斷地蓄積和鍛鍊自己的戰鬥力量，把落後的鄉鎮變成先進的鞏固的根據地，造成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偉大的革命陣地，造成以廣大的鄉鎮來包圍、孤立敵佔的城市，在長期戰鬥中逐漸爭取革命的全部勝利。這就我們需要認識到中國農村的性質是對於抗日戰爭的；由於中國經濟生產的落後，中國農村多半還沒有脫離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對於城市的依賴很少，甚至可以說是完全不依賴。相反地，敵人佔領的城市反而成爲失掉了鄉村支援的孤立的都市。由於中國農村的廣大，人民的革命的武裝就有很大的迴旋餘裕。更重要的一點是，革命的武裝以廣大的農村爲革命的根據地，另一方面，這就使得中國農民大眾，得到了先進的有組織的革命力量的領導，這就保證了農人大眾不會再蹈歷史的失敗命運。這就我們就可以補充上面的一句話：今天的抗戰，實際上是在先進的有組織的革命力量領導下的農民戰爭。

從上面，我們看到抗日戰爭所憑藉的力量是廣大的農民大眾，革命武裝所憑藉的是廣大農民的武裝，這不僅是中國民族革命鬥爭的特殊屬性，而且是一般弱小民族對強權大侵略者的規律。斯大林曾經指出：「民族問題實際上就

是農民問題」，這當然不是把民族問題與農民問題完全混為一談；因為民族革命的任務除掃除農民問題以外，還首先包含民族獨立自決建立民族國家，發展民族文化等問題，把民族問題和農民問題混為一談是錯誤的。但同時我們應該認識「農民是民族運動的基本軍隊，沒有農民這支軍隊，就沒有而且不會有強大的民族運動。所謂民族問題，實際上說是農民問題，正是指這點而說的。」（斯大林）。

抗日戰爭實質上是一個「農民戰爭」，我們還可以從中國革命的任務來探究。自然，對中國革命的任務作一般性的考察，在這裡並無必要，在很少的篇幅裡也不大可能。如上所說，中國革命是民族民主的革命，今天在進行抗日戰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而我們說：民主革命的最低任務是要解決土地問題，也可以說是農民問題。民主革命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要達到一個工業化的生產；工業化的前提條件必須要有充分的購買市場，不虞匱乏的原料供應。要達到這兩者，就必須提高人民大眾中佔絕對多數的農民大眾的生產情緒和購買力量；然而，在殘酷的封建剝削下，農民生活已經陷入極端貧困之下，購買力已低減到極限，工業生產根本就缺乏受容的市場。由於生活的極端貧困，生產資金的缺乏，農民的生產情緒也決不可能提高，原料的供應說不上，工業化自然也無從說起。淪陷區的土地問題不用說了，除了在實施了新的民主政治的地區以外，大後方的農民大眾可以說是在忍受極端殘酷的封建剝削。自然，今天中國革命的對象主要是日本法西斯，應當團結一切的抗日力量，而不能提到一般的反封建的口號，但我們決不能忽視如何減輕農民大眾身受的封建剝削。抗日戰爭既憑藉農民大眾的支持，如果我們不能使農民生活得到適當的改善（如改善租佃關係，廢除苛捐雜稅和合理的負擔國稅、兵役、勞役），那就是說我們沒有能夠發揮支持抗戰的最主要力量，如果在戰時不能適當的解決土地問題，或者說是解決農民問題，那就是沒有照顧到人民大眾中最廣大的人民底問題。離開了廣大農民的支持，抗日戰爭是無法取得勝利的。對於我們伊里奇的話是值得三復思索的：「只有農民大眾加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的條件之下，無產階級才能成為在民主制而奮鬥中獲得勝利的戰士」（兩個策略）。

在民主革命中因為合理的解決了土地問題，使革命能夠徹底進行獲得成功的，一七八九年法國第一次大革命是很好的例子。歐洲新解放的國家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在這方面都有很顯明的措施（註）。

要提高農民大眾的生產情緒，增進農民大眾的購買力，先決的條件是政

治的民主化，如果政治不民主，不僅無法改善不合理的租佃關係，減輕農民大眾所受的封建重壓；而且現存的不合理的兵役制度，繁重的捐稅，將迫使農民走到貧窮苦痛的絕境。如果稍一想想：全國士兵中間農民佔百分之九十以上，他們生產了全部的軍糧民食，負擔了絕大部份的國稅，但他們過的却是飢寒凍餒、疾病、死亡的日子；從這種我們不難明瞭，如舉沒有政治的民主化，任何改善農民生活的願望都不可能。今天我們要解除土地對於農民的束縛，要改變農民大眾今天所受的痛苦、黑暗的生活，我們應當首先爭取政治的民主化。這裡，我們就需要認識，農民大眾在這種痛苦的生活下，已經逐漸成長起民主的要求；雖然他們不一定會講「民主」這兩個字，但他們却知道要求改變不合理的「租佃」關係，合理的負擔兵役、勞役、減輕繁重的苛稅，免除保甲的滋擾……；因此，我們應該肯定農民大眾這種民主的要求。怎樣誘發他們從朦朧的覺醒到清醒的努力。如果今天爭民主的運動，不能得到廣大農民的參加，也就是說缺少了人民大眾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數的支持，民主運動仍然會是漂浮而無力的。

我們不僅認識到政治民主化是改善農民大眾生活的根本問題，農民大眾逐漸成長起來的爭民主的願望，同時我們應該糾正一些對戰時農村些錯誤的認識。這裡不可能全面的處理這些問題，只是借一兩個例子說明和一些朋友討論中提出的一點問題。

對於戰時農村不確當的認識大約有兩種，一種是把農村從想像中美化起來；另一種是把農村看得黑漆一團。這兩種想法都可以說是對農村缺乏了解，要糾正這兩種最好地實際進入農村，因為事實是最有力的證明。這兩種看法中，把戰時農村過份美化的人比較少，最多的是把農村看得和十年、廿年前一樣，以為不可能有甚麼變異，這當然是不切實際的。我們必須把抗戰對於農村的影響作足夠的估計，淪陷區、解放區不用說了，就是大後方的農村，抗戰也使它受到很大的影響。譬如戰時人口的變遷，就使得後方的農民和外面人有很多的接觸；因為戰事的發展，農民也增加了一些地理、時事知識，農民的保守性也多少有了些改變；十年、二十年前一個農村的女人和陌生人的談話，是不容許的，現在，大部份農民對這樣的事也不會感到太大的驚異了。由於兵役問題很多青年農民離開鄉村到都市來，這也可能改變一些他們對土地的觀念。舉一個小的例子來說：譬如在四川農村裡，「哥老會」是農村裡潛在的帶有組織性的力量，過去我們把這種「哥老會

「的組織成份看作鄉村的浮浪者，看法也較比單純；筆者在一個小地方曾經作過短期的觀察，聽到過一些明瞭內情者的講述，就不能不驚於戰等所促使的變化；如果我們再憑着舊時的一知半解的來對待他們，那一定會碰釘子。我們必須看到這種力量的本身已經逐漸在蛻化，必須看到他們和地主資本、官僚資本、商業資本……採取了一些甚麼形態在錯綜複雜的糾結着，必須看到它們裡面已經滲入買辦資本的力量，大部份已經和鎮壓人民的力量相結合，尤其是要研究牠對於基層政治的影響和把持的情形；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去分辯他們中間各個具體的人代表的不問力量 and 性質，去考慮對待的方法。此外，如像農民因為地租、捐稅的繁重，徵收、糧政的腐化，造成他們生活的極度窮困，以及由於這種實際生活的苦痛所促成的農民的覺醒，雖然這覺醒還是萌芽的、曖昧的，但我們必須分辨和認識這種新的因素和力量。從這些舉述的事實，我們應該看到戰時農村裡的新因素，我們再不能憑着一半解的社會學常識來論斷今日的農村了。」

四

我們對於生產的勤勞大眾的歷史決定作用，中國農民在歷史上所表現的創造力，「今日抗戰，實際上是農民戰爭」這幾個問題作了理論性的考察。但單單有了這種理論概念的認識是不夠了呢？我們的回答是「絕對不夠的」。在知識青年朋友中間，理論上求得一致的認識常常是容易的，如果我們只的接受僅僅停留在理論概念上，農村工作究竟還有甚麼意義呢？如果我們只與口頭上承認農民的歷史創造力，農村工作的重要，而不從行動中來實踐這一個真理，我們不仍然是「言語的巨人，行動的矮子」嗎？不仍然是前世紀五十年代俄羅斯原野上的羅亭，以語言來炫惑人的美麗的劍鞘嗎？既不能用以戰鬥，而只能為別人裝一裝門面；這種羅亭式的悲劇不應該在今天中國知識份子的身上來扮演了。我們在思想理論上來討論這個問題，是為着加深我們的認識，更有助於我們的實踐，要能使這些思想得到更充實的內容，得到更有力的檢證，這就有待於我們自身的實踐了。在實際行動中會遇到很多全新的問題，這決不是憑着一些既定的概念，可以解決了的。這就必須在實際工作中憑着自己的研究與調查來進行解決。在這裡，願意抽取兩個問題出來討論，一個是「為什麼人？」的問題，一個是知識份子自我改造的問題。我們的農村工作是「為甚麼人」呢？回答起來自然又是很簡單：「為農

民大眾」，但我們應該指出：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朋友中間，仍不免於一種概念式的理解，因為在他們的實踐中常常是違背於這個原則的。「到農村去」的口號提出來以後，已經有過一些青年朋友，勇敢而離開城市，走到農村，但這些許多人中間，有一些人是帶着無目的的到農村去的。他帶著深奇微異的心理到農村去觀光，希望改變一下因為都市生活過久而產生的厭倦的心理，他們以為到農村去可以搜集到一些寫作材料，或者希望遇到一些民間藝術品，或者是記錄一些民間語言，或者是準備到農村去發揚一些社會調查材料；有的人甚至以為到農村去可以適應個人的本領打天下，創造出「英雄」的業績，可以出人頭地……儘管是想法各有不同，但有一種共同的概念——那就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人民大眾。這樣，到農村中去了，但決不可能到農民大眾中去。因為他們和農民大眾，在意識上仍然保持着「一層」可悲的隔膜。

到農村去，首先應該建立「為人民服務」的觀念，革命的導師指示我們要去做「人民的勤務員」；試想想吧，一個好的勤務員能夠丟開自身的任務，而專門為自己打算嗎？還能夠有高瞻在自己的上司（人民）的頭上的念頭嗎？今天農民大眾的要求是打敗日本，政治上得到民主，生活上得到保障；因此，我們到農村去的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幫助農民達到這目的。知識份子本身是不是還需要學習呢？我們說：需要的，但一切的學習必須服從於前者，必須是為了達到前述的目的。難道知識份子，爭取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一個偉大的鬥爭過程？不是一個偉大的學習過程嗎？還有甚麼知識比這歷史變革的鬥爭過程更偉大呢？

「為人民服務」不應該是宗教家「悲天憫人」的想法；想到農村去作一個救世主，這種想法實質上仍然是一種高懸農民大眾頭上的烏紗帽。在已既以為是滿腔悲憫去救助農民大眾，那嗎，一到鄉村，農民大眾對於他就應該是頂禮有加，感恩圖報。但他們真正一旦走入了農村，遇見了真正的農民大眾，對於他這種偉大的抱負既不大理解，對於這種密情也不大感到興趣；於是，悲憫的心情一變而為憎厭。說不定很快就會帶着這種憎厭的情緒，由鄉村轉回到都市。如果說沒有到農村以前，他們對農民大眾的生活環境還抱着極大的同情，那一去之後這種起碼的同情心都淡淡下去了。要他們勉勵強和農民大眾同列，已經感到極大的「玷辱」，要他們去為農民大眾作「勤務員」，自然更是不成了。

問題的根源在甚麼地方呢？仍然是由於一種舊的自我優越感，自外於人

民大眾。把爭取抗戰的勝利、民主的實行、人民生活的改善看作是農民大眾的事務，自己是站在「從旁贊助」的「幫忙」性質，沒有把這看成自己的一份責任。沒有看到抗戰的勝利、民主的實現，自己就有一份。至於那種帶着個人的本領到農村「打天下」的思想，更是一種傳統的歷史偏見所造成的病態思想；不知道真正的人民英雄是必須從人民大眾中生長起來，使人民大眾成爲人民意志的執行者，才能成爲人民羣衆的領導者。想憑着幾個人的本領「打天下」的時代是早就過去了。

到了農村並不等於和農民大眾相結合，正如像「到了水裡並不等於學會游泳」。這就有一個知識份子思想情緒的改造問題。

前面，我們在檢討到「五四」運動以後，各個革命階段所提出的「到民間去」、「到農村去」的口號的實踐情形時，對這問題有過一些分析。過去失敗的教訓，應當教育了我們，不，這二十餘年的探索就成了白費。今天，我們從思想上認識了人民大眾的歷史決定作用，中國農民大眾的歷史創造力，以及抗日戰爭的農民性的本質，這是在思想上認識上的改變；但必須認識這只是改變的起點。我們在這種思想認識的基礎上走向農村，這是我們的思想變革向前跨進一步。但當我們走向農村的時候，大部份仍然是帶着自己的思想方式，生活方式的，或者說是小資產階級的生活習慣、思想、情緒在我們身上仍然佔着主導的地位。帶着這種舊的思想、情緒到了農村後，在實踐工作中，在和農民大眾一起的生活中，舊的思想意識在實踐中必然遇到很多困難、挫折，知識份子的思想、情緒必和農民大眾的思想、情緒相碰撞、相軋碾，舊的意識帶着習慣的頑強力量，拚命把自己拉向舊的自我，理智的根源又驅迫我們去和農民大眾的思想、情緒相結合，知識份子自身在這時候常常會經過苦悶、動搖、克服的過程；再加上農民大眾實際生活中的教育，如果革命的意識戰勝了，那就是完成了自身的改造。這種改造所經過的途徑是：

思想認識（變革的起點）——實踐（這中間就經歷困難、挫折、動搖、克服這些過程和農民大眾實際生活的教育）——思想、情緒的改造（和人民大眾的思想、情緒相結合）

舊思想、情緒的變革，不是一次，也不是短時間可以完成的，而是經過不斷的挫折、動搖、不斷的鬥爭、克服；舊的思想、情緒才不斷的被清洗，新思想、情緒才不斷的淨化；沒有或他得道的虔誠，這種自我改造是不可說的。誰要果看見這種的變革，就可以看這個小虫腐爛得新的生命，

而忍受的蚊蚋的痛楚，何如知識份子的改造，決不只是體魄的改變，而必須和歷史傳統、社會勢力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思想情緒作鬥爭呢？革命的導師不是爲我們發達過他自身動人的經驗嗎？

「我是個學校裡學生子出身的入。在學校裡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羣層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士乾淨的人只有知識份子。工農兵總是比较懶的。革命了，同工農兵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的變化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和工農兵比較，就覺得知識份子不但精神上有許多不乾淨，就是身體也不乾淨。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裏黑的，脚上有牛屎，還是比小資產階級都乾淨。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文藝問題）

要真正成爲人民大眾中的一員，這種長期的、痛苦的磨練就必須忍受。前面雖然指出到了農村並不等於已經到農民大眾中去，但如果我們不到農村去，那永遠是無法到農民大眾中去的。正如到水裡游泳，但如果始終站在那岸上，那永遠是不可能學會游泳的。因此，我們由思想的認識進一步的走到農村時，也許認識並不完全正確，但實踐的行動會不斷的糾正我們的思想，不斷的豐富我們的思想；也許我們初到農村去的時候，仍然帶着歷史傳統，社會勢力所造成的病態的思想，但不要緊，實踐中舊的思想是會不斷改造的。人類的社會歷史都能修養，難道我們自己舊的思想，情緒不能改造嗎？

五

「註」一七八九年第一次法國大革命，可以說是徹底的消滅了封建制度的典型例子；恩格斯說過：「大革命中，法國破壞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純粹的資產階級的統治；其典型的純粹性，是歐洲其他任何國家不能比擬的。」（見「拿破崙第三政變記」，恩格斯的序言）。也可以說是土地問題解決得徹底的，在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四年，就是在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專政的時期，徹底的摧毀了封建統治，消滅了封建制度的最後殘餘，將土地交給農民。一七九三年六月，由農民人取得

權時，就會以法令宣佈：一切的公共土地分歸於居民的全體或公社團體，每一公民包含農村的勞動者及在公社一年的人，同樣有分受土地之權，十年之內分給每個農民的土地不得因債而沒收。稍後又頒佈法令取消舊時對領土的徵收，舊時保留的特權，毫無代價的取消；一切已沒收的地契，應該銷毀。因為農民得到了土地，廣大的農民向自由的所奮鬥轉移；就使得得到土地的農民更堅決、更廣泛的支持與從事革命鬥爭，使得封建制度失掉了支持和依賴的力量，使法蘭西革命能夠不斷地向前發展，很快的走上工業化的途徑。

反法西斯戰爭中重建的波蘭，在民主的聯合政府下，很快的就進行了土地改革；使波蘭從一九一八年復國以來承襲的中世紀的封建重賦摧毀了。波蘭臨時政府在宣佈的政綱中就說：「……德寇的土地，人民羣衆的土地，都將歸入土地基金。德寇的土地和人民羣衆的土地，都將予以沒收。地主莊園將移充土地基金，並不依照莊園的大小予以補償，不過原來的所有主將領得糧食」。土地基金將開闢農場或擴大小農場，以平均每一農民領有可耕的中等土地五公頃，作為基本標準量。而據波蘭臨時政府的土地改革部長柏諾爾特在三月份演說：「已經有三十萬農戶獲得土地，波蘭農民每家約分得土地七英畝半（約合中國畝五十二畝半）。由於這種土地改革，波蘭的農民大眾一致認為臨時政府是他們權益的保護者。波蘭農民也因此而更加積極的參加了政治活動。」

捷克和羅馬尼亞新政府的政綱，對土地改革也有了明確的規定。

余若愚先生的一當前
農村工作的幾個問題
——彼檢扣免登謹向
作者讀者致歉

（大衆論叢刊）

林大師應着粗野的態度去大膽地批評一切。他不懂哲學，更不懂科學。在談到了「光」時，他提出了「光」是什麼的問題，接着便說關於「光」的解釋「我們又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了」（頁四四），於是他便又大膽地嘲笑了「量子論」。其實，這只是表明了無知，如果給現代物理學家聽到了「一定要大笑的。誰都知道，在現代物理學中已經將光的波動說（惠更斯所倡）和光的微粒說（牛頓所倡）統一起來了。現代物理學中稱光的構成爲「波粒」。即是說，光是由實際的物質構成的，在個別方面它是微粒，而在總體上却是波動。因此，光的構成是表現爲「波粒」的狀態。「歐歐不如識拙」，却是不言，我勸林大師還是識相些罷。

其次，我們指出了林大師對於真偽科學不辨。這只好怪他自己「色盲」，實在怪不了誰。法西斯的科學是偽科學，這是我們所同意的。因爲一切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義者都是不敢正視真正的科學真理的。科學真理的存在使無可避免地要證明法西斯的死亡，因此科學真理的存在對於希特勒之流實在是一種很大的威脅。所以他們便要消滅科學真理。但爲了統治上的方便起見，他們又不惜無恥地歪曲科學真理，強姦科學真理。因此便出現了各色各樣的偽科學。偽科學就是法西斯統治者的工具。同樣，我們也不否認，在科學陣營中出現了某些冒牌貨色，這些科學是滲入了偽科學的成分的。但這一切，只不過是民主科學大洪流中的一股小暗流而已。而且，民主科學本身便是一種「照妖鏡」和戰鬥武器，隨着民主科學強大發展，一切形形色色的或隱或現的偽科學也必然地要被清算的。

而且我們還要知道，決定了科學性質，任務和作用的是社會生活本身，特別是政治。有法西斯主義便有法西斯的偽科學，同樣，只要世界的民主主義有強大的發展，那末，民主的科學也必然地要強大發展起來。總之，有什麼樣的社會生活便有什麼樣的科學。今天，世界的民主力量保證了民主主義的徹底實行，保證消滅了一切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義。這就是說民主的科學的強大發展以及偽科學的消滅是已經不容置疑了。

最後，林大師又反對所謂「自然主義」。當然，我們也不主張應用自然科學的成果來同樣地解釋社會生活。對於引用達爾文學說來解釋社會生活的牛物學我當竭力反對。但因此而主張「須更捨棄一切科學的假面具，而使一切事物基於信心」，這我們却不能不說林大師是在開倒車了。解釋社會生活的社會科學，經過了幾十年的努力，正確的社會科學已經創造出來了。林大師的理論不過表現了自己的「個體」和無知。

林大師高呼：「科學與人類正義已背道而馳」。而我們却要說：「不，經過了這一次反法西斯的決戰，科學與人類正義的結合將更緊密了，民主和科學的緊密結合，將更創造一切，產生出人類歷史上的奇蹟」。

歐洲各解放國家的職工運動

B·萊翁尼多夫作

在歐洲許多從德法西斯佔領之下解放出來的國家裏，被希特勒侵略者所剝奪的人民的各種民主自由，現在又重新恢復過來了。這種民主權利恢復的一個最顯明的例子，就是自由的民主的職工會的迅速再建。

在這次要自由的國家反對希特勒主義的鬥爭中，作為工人階級的廣大組織的職工會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希特勒匪徒們認為自由的職工會是他們所實行的「新秩序」的經常威脅，他們不僅在被他們佔領的國家中，並且還在附庸國家中粉碎這些組織，這決不是徒然的。雖然他們解散了民主的職工會，逮捕和槍斃了他們的領導者，但是佔領者並不能從此就窒息自由的職工運動。在許多被希特勒強盜所佔據的國家裏，職工會都躲藏到地下去了，他們就從那兒繼續進行着解決地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

在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中，南斯拉夫的職工會表現出了一個堅忍不拔和首尾一貫的榜樣。選擇在希特勒德國侵略之前，正當南斯拉夫的軍事獨裁企圖禁止自由的職工運動時，工人們就在各企業裡和機關裡建立起職工會的委員會。據不完全的統計，在一九四一年四月間，這些委員會團結了十五萬工人和職員。自從希特勒匪徒侵入南斯拉夫的國土之後，全國的工人階級都在反對侵略者的解放鬥爭的口號之下團結起來了。各地的職工組織都躲藏到地下去，他們盡全力地推進了在南斯拉夫所興起的空前未有的民族團結的獨立工作。

英國的工人們，特別是在一九四三年九月，當斯洛文尼亞工人團結總委員會打了一個賀電給工會代表大會時，他們才知道了這樣一個組織的活動情形。在這個賀詞中這樣說道：

「我們希望英國的工人階級，能知道我們鬥爭的真實情況，並且能瞭解到我們是在怎樣艱難的情形之下，已經第三年在進行反對佔領者的生死存亡的鬥爭了。」

關於挪威職工會地下活動的情形，大家是知道不少的。自從德國人逮捕了工會聯合會的羅斯、唐根、隆奈爾、歐德高爾德、漢森等領袖和槍斃了工會聯合會的秘書維克斯特勒姆及法律顧問漢諾頓等人之後，他們就進入秘密

的狀況了。希特勒匪徒儘力企圖將挪威職工會法西斯化，並且通過工人贊成惡名昭彰的法西斯的「勞動陣線」，但結果是遭遇到有組織的抵抗。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吉斯林頒佈了一個組織「勞動陣線」的法令，並且強迫職工會加入。工人們就用集體退出職工會的辦法來作為答覆，三分之二的工會聯合會的會員都表示了退出。挪威地下自由職工會的聯合組織，有計劃地粉碎了希特勒匪徒和吉斯林份子的各種新的挑撥離間的行為，組織了企業中的怠工，並且鞏固了挪威人民的解放運動的團結一致。

波蘭的工人在聯合國家的共同鬥爭事業中，是有不小的貢獻的。當德蘇聯們在這個鬥爭中的貢獻時，盧布林出版的波蘭職工運動的機關報「斯維斯利科威茲」報，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八日這一天曾經寫道：

「波蘭工人階級的團結一致，是在和德國侵略者及國內的反動派的鬥爭的火焰中所產生的。」

在從敵人統治之下解放出來的好多國家裡，自由的，民主的職工會之所以能夠迅速地恢復，其基礎就是建立在這種經過戰爭嚴格考驗的團結一致之上的。並且在有些領土已經完全從德國法西斯侵略者壓制之下解放出來或大部分解放出來的國家裡，各種事實更證實了這個結論的正確性。

在南斯拉夫，恢復合法的民主的職工運動的事業，已經達到顯著的成功。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在伯爾格萊德舉行了各區、各工廠和作坊的工人代表會議，選舉了城市職工會委員會。據今年正月二日「自由南斯拉夫」無線電台的廣播，由於伯爾格萊德各區職工會委員會的建議，在兩個月裡還召集了一次羣衆大會，其中並有從烏日茲、察察克、尼希、克特萊伏、克拉克古耶瓦茲、瓦萊伏、萊斯科瓦茲、斯美德勒伏及其他許多城市來的工人代表參加。參加羣衆大會的兩萬人，一致通過了伯爾格萊德工人關於建立南斯拉夫職工聯合會的提議，並且選出了一個組織委員會。南斯拉夫全國的著名職工運動家，像從一九一九年以來就領導職工運動的一位領袖杜拉·沙拉伊，像從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九年任聯合南斯拉夫中央工人同盟的總書記拉左·斯維勞諾維奇，前而已經提過的斯洛文尼亞工人亦團結委員會的會員

來。法伊發爾以及其他等人，都參加了這個組織。大會任命組織委員會和全
國其他各區的工人聯繫，來建立南斯拉夫的第一個職工運動。

組織委員會開展了廣泛的活動工作，在伯爾格萊德已經舉行過好幾次職
工會會議，選出了各業的組織委員會。運輸、礦工、職工、裁縫和其他等類
的工人的組織委員會，都已經建立起來了，並且正進行着積極的工作。

在戰爭的大敵中，南斯拉夫的工人階級恢復了全國團結一致的自由的職
工會，藉此來加強同盟國家迅速戰勝希特勒德國，和迅速恢復南斯拉夫的國
民經濟生活。

在波蘭解放了的土地上，正大規模地進行恢復自由的職工會的運動。這
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底時，在海爾姆和盧布林，就恢復了職工會的組織。在
這些地方恢復職工運動的發起人，就是從侵略者恐怖之中殘留下來的那些老
工運動家，和參加了反對德國人的武裝鬥爭中的新的積極份子。從這時起，
在整個解放了的波蘭城市和軍區中，都迅速地恢復了舊的職工組織和建立了新的
組織。在盧布林、拜希斯托克、和謝爾夫都建立了包括整個軍區的職工會的
區委員會。所有的職工會，都其在完全團結一致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解放了的波蘭的職工會，展開了多方面和熱烈的活動工作，他們積極地
參加了恢復被破壞了的工業與運輸業，和投機者作鬥爭，實行土地改革，以
及組織全國武裝力量等類的工作。

現在在他們對面的職工會的更進一步發展和新的任務，就要求他們必
須將全解放區的活動，集中化與互相聯繫起來。在一九四四年的十月間，盧
布林區職工會評議會，就提議建立一個臨時中央職工會委員會，在同一個月
所舉行的代表了六萬五千個有組織的工人的盧布林區職工會會議上，就選
舉了參加這個委員會的代表。同樣的會議，繼而在拜希斯托克和謝爾夫也舉
行過，更稍晚在華沙和凱爾斯哥克兩個軍區也舉行過，他們也同樣地選舉了參
加這個臨時中央職工會委員會的代表。十二月間，在盧布林就舉行了這個委
員會的第一次組織會議。

波蘭聯合職工運動的整個活動的領導就這樣建立起來了，在這個組織中
，已包括了十萬多參加職工會的有組織的勞動者。

法國的合法的民主職工運動的恢復，更其有特別重大的意義，法國職工
會的鬥爭與再生，是一個相當廣大而重要的題目，可惜在這一篇文字的範圍
內，是沒有可能將它敘述出來的（在「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中，曾另有專
文介紹法國的職工運動——譯者）。

從上面所列舉的許多事實（這些事實還可以舉出很多的來），證明出在
從敵人手中所解放出的地區裡，職工會組織的一致的願望，就是迅速地聯合
和團結工人們，用最好的方法來保護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恢復起來的職工
會和它們的領導者，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工人階級只有聯合各民主的組織，
並和其他民主國家的職工會建立起密切的聯繫，才能够保護他們自身的利益
。波蘭臨時中央職工會委員會的成立大會的決議，和挪威職工聯合會領導
方面對於參加在倫敦所舉行的世界工會大會的聲明，就是這種願望的一種
表現。假如說——歐洲各解放國家的職工會不表示這樣一個願望，就是未來
的國際職工大會要是號召動員所有民主國家的工人羣衆的力氣和精力，為完
全和最後粉碎法西斯主義，並創造出完全戰勝希特勒德國之後樹立永久與堅
固和平的條件，那倒反而會是非常奇怪的。

所有民主國家的工人羣衆的團結，為了迅速達到戰勝法西斯黑壓勢力和
建立戰後的鞏固與持久的和平的鬥爭——這就是今天國際職工運動的最重要
的任務。在此地我們不能不估計到一個情況，就是紅軍和同盟軍軍隊的軍事
勝利，使得有些國家能回返到民主發展的道路上去；這些國家並不是由於工
人階級願意，他們雖然曾經抵抗過，但是由於他們的統治階級所玩弄的犯罪
把戲的結果，是曾經置身在敵人的陣營中的。

保加利亞的工人階級在秘密的職工會的領導之下，為了自己的經濟的與
政治的權利，曾經進行過反對希特勒匪徒的統治與反對法西斯當局迫害職工
會及逮捕其會員的頑強的鬥爭。這個鬥爭在一九四四年十月時達到了它
的頂點，這時候波羅維的拜爾尼克職工罷工，就成了索非亞、布洛甫地夫
和其他許多城市的羣衆激進罷工的一個信號。自從祖國陣線的政府領導全體
以來，各種民主的組織就迅速地恢復起來了。報紙上登滿了關於職工會組織
的恢復和個別的職工會組成新的臨時領導的消息。當時剛組成的保加利亞總
工人同盟臨時中央委員會，就宣佈將消滅職工組織中的官方法西斯領導及恢復
保加利亞工人民主權利。

聯合在職工會總工人同盟中的二十三個職工組織，包括了所有勞動活動
的部門。現在十七個職工會已有了自己的中央的領導，在這十七個職工會中
，就有鐵路工人、五金工人、建築工人及農業工人等的組織。

在合法活動的最初的三個月當中，保加利亞職工會總工人同盟的會員，
已增長到二十萬人。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總工人同盟的第一期附刊的機
關報（「勞動旗幟報」）上登了同盟中央委員會的一個指令，在這個指令中
着重指出，建立在民主基礎之上的保加利亞職工會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全面
地保護保加利亞整個工人階級的日益發展經濟的與精神上的利益。

保加利亞的職工會的聚集，他們以全力來支持祖國陣線的政府，這個政府是堅決地站在聯合國家一方面，使得保加利亞的經濟與武裝力量能服役於迅速戰勝希特勒德國的任務，並且領導着全國按照民主發展的道路前進。新的保加利亞以自己孩子們的血，證明了它和愛自由的國家的及希特勒集團的聯盟，並用實際的事實，證明出它準備爲了迅速及完全戰勝希特勒主義而不惜作任何犧牲。

保加利亞的工人階級及其職工會，他們想參加建立國際職工會聯盟的工作。他們在寫給英國工會會議秘書瓦爾遜。齊特林的信中，曾表示出了這個願望，並且這封信的內容曾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由索非亞的無線電台廣播出。在這封信裡面，講到保加利亞已建立起自由的職工會，它們積極地參加了和法西斯主義的鬥爭及建立新的民主的保加利亞的事業。並且，「置身在那些爲了和偉大的民主國家，首先是蘇聯、英國和美國，建立友好的關係的職工們的最前列」。這封信的結尾，是要求保加利亞的職工會的代表，能參加在倫敦舉行的國際職工大會（即通稱的世界工會大會——譯者）。

一九四五一年一月七日，羅馬尼亞的聯合職工運動組織委員會的主席布勒希特期曾從無線電上發表了同樣內容的聲明。當時他報告在目前的羅馬尼亞，已有五十萬職工會的會員和幾千個工廠委員會，他的演講主要的是專講即將舉行的羅馬尼亞職工代表大會的任務的。代表大會應討論關於建立總勞動聯盟，關於全國的經濟狀況，關於勞工法令，關於提高全國的作戰力量，以及在全國根絕法西斯思想等許多問題。繼而布勒希特期曾又聲言道：

「羅馬尼亞的職工運動，絕不應孤立於它的國境以內，它要和其他國家的職工會建立聯繫，因此在職工會的代表大會上，邀請英國、法國、南斯拉夫、保加利亞、意大利和蘇聯的代表參加。

「羅馬尼亞的聯合職工運動要派代表參加在倫敦即將舉行的國際職工大會。」

羅馬尼亞所有的工人，都同爲一個新聲鼓舞着，就是要在反希特勒主義的戰爭中供獻出他們的力量，和建立一個自由的、民主的和獨立的羅馬尼亞……

從此就可以知道羅馬尼亞恢復自由中的職工會的事業，已達到了很大的成功，羅馬尼亞的工人階級，好多年來爲反抗法西斯的統治，特別是在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之後（這是羅馬尼亞接受蘇聯所提的和平條件及投降的一天——譯者），羅馬尼亞的職工會便開始參加了積極的活動。武裝的工人立即組成隊伍去反對德國人。當德國軍隊被佈加勒斯特趕出去的時候，由於全國民主陣線的建議，立即舉行了一次討論建立統一的職工會的會議。

當時就組成了一個組織委員會，在這個組織的領導之下，開始了在企業中大規模的復興職工會組織的工作。職工會的組織是建立在從下到上的真正的民主的基礎之上，是建立在爲滿足工人的要求的鬥爭的基礎之上。在工人的大會上，選又選舉了工廠委員會。

在羅馬尼亞的各企業中建立職工委員會的工作，是已經完成了。在各城市裡，產生了各區的職工委員會，團結了這一個地區中的所有的職工委員會。在各區職工會的會議上，建立了這些職工會的中央機關，而在一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的全羅馬尼亞職工會代表大會上，將建立起羅馬尼亞總勞動同盟。

職工會在全國民主陣線基礎上將所有有組織的工人聯合到自己的隊伍裡去，它們成了在民主基礎上復興羅馬尼亞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它們動員羣衆，參加了爲正確執行條件與在反對德國的戰爭中擴大作戰努力的鬥爭，爲了改善工人與職員的生活條件而鬥爭，並積極地參加了國家機關中及企業中肅清法西斯份子的工作。在所有這些工作部門裡，職工會已經得到許多的成功。舉如，他們獲得了提高工資的法令的通過，並且管統那些迅速戰勝希特勒德國必需的企業的生產與勞動生產力。『斯金台亞報』在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寫道，由於職工會的後一種措施，瓦萊亞——特羅士希礦坑的職工已將生產力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科馬尼希特礦坑的全體職工和「彼特羅爾煤礦公司」，則已大大地提高了煤的產量。

因此，羅馬尼亞的這些復興的民主職工會的努力（它們是全國工人階級的最羣衆性的組織），在反對希特勒德國的鬥爭中，就和所有民主國家的工人階級的努力的共同河道，合流在一起了。

此外意大利的復興的職工會，也是起着很大的作用的（『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亦有專文介紹——譯者）。

從此就可以知道，在從法西斯統治之下解放出來的許多國家的民主職工會的恢復，是適應工人階級和全人類利益的，因爲這就意味着所有愛自由的民主國家在迅速戰勝法西斯野蠻力量及確立永久和平的鬥爭中的陣線的加強。將來的國際職工會聯盟，就是聯合工人階級在這一方面努力的一個中心。我們應該提出，就是在這些解決地處在國際一方面並用血肉將自己的命運和它們相聯繫起來的國家裡，他們的職工會是應該成爲將來這個全世界職工聯盟的最好的會員的。

（萊翁尼多夫這篇文章，發表在今年一月十五日第二期的『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中，適在世界工台台在倫敦開會之前，凡是其中提到工會大會的地方，請參閱本期的『世界工人大團結』一文）。

（蘇 譯）

世界工人大團結

——世界工會大會和歐美工人運動鳥瞰

廖青

和克里米亞會議同時，全世界有組織工人六千萬人的代表在倫敦開會，議決成立世界職工聯盟，以代替舊的黃色國際工會。對於戰爭與和平，對於全人類的將來，這次世界工會大會的進步歷史意義，實在並不在克里米亞會議之下。

六千萬人的團結

出席大會的代表共有同盟國的三十八個團體，中立國七個團體和十個國際性工會的代代表二百五十餘人，所代表的工人將近六千萬人。

世界工會大會召開的擬議，開始在英蘇工會委員會成立之後。它是英國總工會發起的，本來定於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在倫敦舉行，但因共時開闢第二戰場迫在眉睫，英政府限制旅客出入，因此延期舉行。一延期，英國總工會有顧下來的樣子。美國產業職工大會主席摩萊會致函英國總工會秘書齊爾林爵士，要求儘可能於十二月初舉行。也有在加拿大開會的建議。終於，大會於一九四五年二月六日至十八日在倫敦的泰晤士河畔舉行了。

美國代表團由產業職工大會政治行動委員會主席希爾曼率領，代表產業職工大會的會員六百萬人。英國總工會有會員七百萬人，它的代表團由總工會秘書齊爾林爵士率領。蘇聯代表團代表着工會會員二千七百五十萬人，代表團人數也最多，由職工會主席庫茲納佐夫率領。法國代表團團長是總工會秘書賽爾，法國總工會會員有四百五十萬人。拉丁美洲工人聯合會主席托萊夫諾，也代表着會員四百五十萬人，他是墨西哥人。中國去的代表，是重慶中國勞動協會的朱學範。

在此次大戰中，各國工人的數目激增，西歐和美國等地工人的政治認識，也有飛躍的進步，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不同。這次世界工會大會充分反映了這一點。四十五個國家內的工人代表出席了大會，討論了有關工人利益的大小事情，並且組織或重新組織的工人自己的國際組織，其團結和偉大的意義，在全世界工人運動史上是空前絕後的。這和大會之前，在全世界代表伊薩克斯所說「這是一場大會，這是一場世界工人階級歷史上的轉捩點」。

大會主席由英國的喬·伊薩克斯，蘇聯的庫茲納佐夫和美國的汽車業工人領袖托瑪斯擔任，副主席則由中、法及拉丁美洲代表擔任。會議結束時，選出了一個執行委員會性質的臨時委員會，以準備成立新的國際組織——世界職工聯盟。

這屆世界工會大會，是英蘇工會委員會出於蘇聯的要求，美國代表也參加了大會的籌備工作。

在三月下旬選出了行政委員會，委員十三人，於四月間在華盛頓開會，起草了工人的和平與戰後謀議，以便提交德金山聯合大會審議。該委員會負責起草世界職工聯盟的章程，並已決定世界工會大會於今年九月在巴黎再度舉行全體大會，以規定聯盟的章程，確立永久機構。籌備工作現在已經開始了。

世界職工聯盟

大會通過的決議，主要有下列各點：

一、加強盟國的作戰努力。宣言中並且說：「我們必須以在歐洲作戰相同的英勇精神作戰，直至日本無條件投降為止」。宣言中號召全世界工人援助英勇抗戰的中國人民。又，到會代表一致認為如果盟國和法西斯國家西班牙、葡萄牙及阿根廷不一刀兩斷，則法西斯主義還有死灰復燃的機會。

二、和平會議上要有工人代表參加。大會駐會委員會的行政委員會將於四月間在華盛頓集議，起草工人的和平與戰後計劃，以便提交德金山聯合國大會審議。大會同意頓巴教樓會議的建議案，認為「避免戰爭的唯一辦法，是大而強的國家用力量來防止侵略」。

三、戰後建設。這方面大會特別提出工人生活程度的提高，為戰後建設之所必需，而要使工人生活提高，就必須：①工資和生活費成比例，②同樣的工作得到同樣的報酬，不問國籍、種族和性別的差異，③要有更好的房屋和社會保險，④糧食的適當分配，⑤加強團體訂約。

四、成立一個新的世界工人組織——世界職工聯盟。這個議案是美國代表希爾曼提出來，由庫茲納佐夫和賽爾附議而通過的。

大會自始至終，洋溢著團結、友愛、坦白的空氣。從上面簡單的敘述看來，也可見大會的決議都是切實而進步的。自然，這並不是說會上沒有小爭論，但這些爭論，都在團結第一的原則之解決了。一開始，印度總工會代表另吉被選為審查代表費格委員會委員，但官方的印度工人聯合會代表聯

開張聲明反對之丹吉區不願一開會就引起無聊的爭執，聲明收回自己的名義。

議事委員會(由美、英、蘇、法、歐洲其餘部份、英屬地、拉丁美洲、中國及國際性的工會各派一人組成的)提議邀請過去的敵國芬、保、羅、意、葡參加，為時過早。討論時，拉丁美洲的托萊大諸首先提出贊成議事委員會的提議，結果，大會議決贊同議事委員會的提議。

議事委員會提議准許波蘭解放區工會代表出席，齊特林爵士反對，理由是英政府尚未承認蘇布林政府。法國代表賽爾說：「代表們代表的是工人，不是政府」。爭論結果，大會議事委員會再加考慮，再考慮後，議事委員會認為可在下期開會時再邀請，因為這次大會的邀請權是在英國總工會手里。

齊特林又反對

議事委員會提議大會決定重要問題時須投票表決。而不採取全體同意法，齊特林又反對。他的表面理由，是蘇聯投票權太多，實際上，他是主張這大會僅具「諮詢」性質，而不解決問題的，這是主張大會的決議沒有約束性的，因此他不主張投票表決。討論結果：每國只有一個投票權，但議案仍須投票表決。

關於大會閉會期間，如何籌備新的國際組織，蘇聯主張大會成立「執行委員會」，美國主張成立「駐會委員會」，英國主張成立「臨時委員會」，辯論結果，議決成立駐會委員會，大家對於這委員會的職權的意見也一致了。

但根本的分歧點不在這裏，而在美蘇主張以新的世界職工聯盟來代替舊的黃色的國際職工聯合會(I.W.O.)，而齊特林爵士，開始時認為新的世界職工聯盟應在擴大國際職工聯合會的基礎上成立，後來，則主張新的世界職工聯盟正式成立以前，不取銷國際職工聯合會。

在會議的爭論之中，常有即然有差別的兩種意

見。一方面，以齊特林爵士為首，附和的有波蘭流亡政府官方工會，印度官方工會以及國際勞工聯合會的代表，另一方面，則是美、蘇、拉丁美洲和法國工會的代。大會的議決案和宣言，則主要地反映美蘇等代表的意見，而並不反映齊特林他們的意見。所好的，是齊特林有達成協議的決心，因為要不然的話，英國總工會下層羣眾會把他轟走的。

歐美工會鳥瞰

筆者就見聞所得，對於世界職工聯盟的成立，以及世界工人在戰後對國家政治的影響的擴大，抱無限的信心。為使讀者們多明瞭一點工人運動中一般情況，再說幾句：

歐美工人運動中可以說有兩派人：一派比較進步的，是美國產業職工大會(C.I.O.)，蘇聯職工會，法國總工會，拉丁美洲工人聯合會及其他工會中許多普通會員，他們對於這次世界工會大會是積極的，擁護的。另一派，是比較保守的工人資族，現在領袖的是美國勞工聯合會(A.F.L.)的領袖格林和華茲，英國的總工會領袖齊特林等人，對於這次大會或則反對，或則消極參加。

蘇聯是一個工人當家的國家，其工人的團結和進步，自然是誰都比不上的。別的国家可就不然了。以美國而言，由於勞工聯合會領袖們的頑固，勞工聯合會一直和產業職工大會不能團結。這次世界工會大會也邀請了美國勞工聯合會出席，但它的主席格林召集了一個不足法定人數的執行委員會匆匆宣佈不派代表出席。格林一方面說凡有蘇聯工會參加的會議，他們都不參加，另一方面，則罵齊特林為騎牆派，罵希爾曼為共產黨的傀儡。所幸格林之流，在自已工會中的威信一天天在低落。

英國總工會的齊特林爵士和霍爾斯等人，也在受着清風低落的痛苦，和羣眾脫了節，這是免不了的。不過他們的痛苦更嚴重些，因此，對外比較客氣，企圖用這辦法，來緩和內部的不滿。對內，可是仍然擺出奴隸的總督的樣子。這里一般估計，若工黨與共產黨在下屆大選中合作，即將取保守

黨的地位而代之，但以總工會上層份子為基礎的英國工黨，竟一再拒絕共產黨的合作提議。目前英國已有許多地方的工黨支部不聽自己領袖們的號令，選自和共產黨合作了。

法國總工會不像英國那樣是一個統一的組織，除總工會之外，法國還有一個相當大的基督教工會，但也不像美國那樣兩大工會實力相差不多。法國總工會要比基督教工會大得多，而且是大體上兩個工會合作的。

國際性的工人

國際性的工會，主要的現有三個：

第一、是去年四月間開過會的所謂「國際勞工大會」，其實際名稱為「國際勞工局會議」，那是國際的附屬品，國際已死，這國際勞工局實際上也是名存實亡了。按照它的規章，「各國出席會議代表團，由政府代表三人，僱主和工人代表各一人所組成」，其中工人投票權只佔四分之一，可見不是什麼「勞工大會」。蘇聯未參加該會。

第二個是上文說起的「國際職工聯合會」，於一九一九年，在阿姆斯特丹成立，在這次戰爭以前早就不活動了，但如今忽然趁工人代表雲集倫敦開世界工會大會之際，在二月一日開了一次大會，據說到會代表七十餘人，代表十三個國家的工會會員二千二百萬人。現任主席是齊特林，最積極的會員，則是美國勞工聯合會。蘇聯職工會和美國的產業職工大會，一向不是該會的會員。該會派了代表出席世界工會大會，力爭自己不必解散，如今大勢所趨，在新的「世界職工聯盟」成立之後，是非解散不可的了。值得注意的是該會開會時主席齊特林沒有出席，可見齊特林也不重視這玩意兒，只剩美國勞工聯合會代表垂青唱獨腳戲了。

還有一個，就是擁有着最大多數工人的，這次世界工會大會議決建立的「世界職工聯盟」，這個組織將在今年九月間正式成立。這是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之中鍛鍊出來的團體，一個工人自己的團體。(三月二日寄自倫敦)

第一次筆談

知識青年怎樣推進民主運動(四)

怎樣提高積極性和團結中間同學

黎

——關於推進學校民主運動的意見

普遍說來，民主運動在目前大後方的學校中，已呈現出空前活躍的現象。但是，由於各個學校所在的地域和歷史傳統不同的關係，民主潮流的發展，還是很不平衡，不能彼此互相配合。我所在的這個學校，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因為當局控制特別嚴厲，敷衍胡混甚至甘受利用的人特別多，所以民主運動不能立即像其他幾個大學那樣開展。在這種極不自由的狹小的環境中，推進民主運動的工作就更加迫切，也就更為困難，需要高度的覺悟性和戰鬥的堅韌性，需要更靈活的宣傳方針和組織形式。我想針對我們在這種環境的經驗，提供出來作其他環境可能相同的同學們的參考。

我們這個學校雖政治中心，但最近，政府中的官僚政客，富商大賈，乃至冒險的文化人士，都容易通過私人的和官方的關係，進行拉攏同學的工作，因此，學校中為將來出路打算的小集團非常盛。他們多半不問大我，只顧私情，不大管正義是非，只顧自己小圈子狹隘的利益。並且誤以為出路有保

障了，生活不成問題了，變成一種遊手好閒悠游歲月，月的脾氣。學校當局無一點開明的氣息，教授多半只講課本。而一切學術講演完全由官方包辦，這樣，同學接受啓發和能認識客觀現實的機會不多，而聽見反動之詞聽得太久，也不免近墨者黑，受到不良的感染。一般地說，大部份的中間同學多妄自尊大，不善思想，對舊事物有不滿，對新事物也持非薄的態度，對民主運動也覺得可有可無，不關痛癢，至少用不著自己來帶神苦幹。

幾年來，鐵板下的重壓，給這個學校青年同學的影響，實在够深刻了。中間的同學不說，就是進步和覺悟的同學，心靈上也籠罩着一片暗影，表現出積極性不够，畏懼心很重等病態心理。我們不能

一味責備這類進步的同學，要明瞭他們的情形，要弄通他們的思想，一句話，我們的工作，多方面的。工作。

半年來的經驗給我們證明：我們是有辦法的！就是在這個受反動壓迫最厲害的角落，力量對比極端不利的條件下，照樣可以促使民主運動前進。現有的狀況下也可能改善一些，將來還要堅持下去，開展下去！

提高進步同學的積極性，並不是一種只能單方面下手的工作，這需要聯合起生活工作和學習，並且還要有經常的優良的領導。更重要的，是把積極性不够的原因搞清楚：有時是因為認識低，思想準備不够；有時是信心還欠缺，儘管起碼的認識具備了，但孤獨的生活，惡劣的環境，使他只看得見黑暗，猜不透光明；有時是工作能力差，作風不對頭，鬧得只愛幻想，不敢接近實際的活動。毛病個人活著的不同，因此，對症下手，個人應該採取有所偏重的補救方法。學習固然地是片刻不容緩的辦法，不過只是學習了革命的基本原理還不够，還得來一個思想上的大轉變：就是，要確認推進民主運動是自己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我就遇到過這樣的同學，思想很進步，學習讀書都極其努力，但是並不熱心來担起推動民主的担子。他靈魂中還存在着一塊自私的地盤，對學習問題的看法偏了向。他

現在書本中去，藉口功課太重，而對自己則引一現在多增加點技能，將來工作效果大。這言以自慰。這是客觀主義和無為思想暗中作祟的結果。我們要鼓勵進步和覺悟同學在認識上，縮清這類偏向，來一個思想上的轉變。其次，我們不要不為惡劣的環境所壓倒，更不要被第五種人的氣餒所掩蔽。這類人的花樣儘管卑劣，但不足不能戰勝的天神。他們那些手段也沒有甚麼了不起，是可以利用我們集體的力量，用我們的智慧和覺醒來克服過來的。越民主，他們就越狼狽；越對民主注意，他們更會凶殘。

當然，上面兩點主要的認識，首先要思想上弄清楚，但還應該立即到實踐中去證明它的正確性。比如，要個別的進步同學不感到工作上的孤獨，那麼就需要讓他在工上有商量的地方，能夠得到其他進步同學的幫助。這，也就是進步同學間的聯繫問題。我們反對在聯繫下犯形式主義的毛病，因為這將使我們自己，給壞蛋們開退避的機會；不過我們也反對彼此疏遠，對個別進步同學抱不問不問的態度。根據我們的經驗，三四個進步的同學，依照最自然的關係，生活得密切一點，不時聚下頭，討論下時事，通氣一下彼此所知道的事情，這可能辦得到，而且對提高大家的積極性，確有意想不到的裨益。

再就是怎樣用工作的勝利來提高積極性，維持信心的問題了。在敵人特別陰惡頑強的地方，一點一滴的勝利就特別富有意義，特別是從教育自己着眼，更是如此。每一個進步的同學最好有一套工作計劃，不必太大，更不必只求一時的熱烈和興奮。舉例說，我們不防探討自己週圍的中間同學，分別那些人最容易轉變來担當民主的大業，然後想出轉變他們的方式、態度、時機。我們幫助一個個弱

的，中弱變強，變成強，一個弱變強，變成無所懼怕的民主鬥士，這會大大地推進了民主工作，也會提高自己對事業的積極性和信心。只有工作的勝利（暫時微小一點也不要緊），才能燃起新的希望，復活我們旺盛的精力，這已經是顯而易見的道理了。

我們提議，進步覺悟的同學，為了在學校中推動民主，要把民主工作作為第一位，要承認做一個民主鬥士的貢獻和光榮並不比一篇博士論文來得渺小；要善於應付惡勢力的迫害，但不必存心畏縮；要彼此傾軋職友的善愛和協助，但不必拘泥於形式上的來往；要多想，多討論，多提出和解答問題；最後要多多爭取工作上的勝利。人和性格中的積極性從這裡就備有不竭的泉源了。

X X X

第二點經驗，我想談談怎樣團結中間份子。

我們認為有兩項原則，要把握得很穩當。第一點就是用現實主義的眼光來觀察事物；第二，以完全民主的方式來處理問題。關於第一點，我們常說美國式的求實精神，不過由於缺少這種傳統，口頭上承認，實踐中却不能做到。因此，或者把對象估計得過高了，向他們提出了一時不能接受的要求和建議；或者又疏忽了他們那極可寶貴而又短暫的自發情緒，喪失了引導他們更進一步發展的良機。比如，曾經有過幾個和我相處較熟的家鄉人提議辦個壁報，當時我覺得他們寫作技巧不熟練，怕將來丟人，就輕易地回絕了。其實，要求辦壁報做事，就是這些中間同學趨於覺悟的最初的暗示，這點是原可寶貴的。我當初不能接受辦壁報的提議，也應該轉移來作其他學習教育的工作，不應該回絕拉倒了事。我想，像這類的機會，其他覺悟的朋友失之交臂的，一定不少，原因就是我們沒有用現實主義

的眼光來觀察事物。

疏忽和漫不經心是毛病的一面，另外的一面就是對中間同學疏遠或者輕視。我們對人生社會的見解，也許比中間同學高遠些，容易養成輕視別人的優越感，許多人的生活態度懶散自私和狹小，也助長了進步同學瞧不起別人的情緒。對一般中間同學生活態度的指摘和批評，當然很能暴露不健康的一面，不過，單是這並不够，澈底的現實主義的眼光還應該從中間同學身上找出許多優良的能改造好的品質，替中間同學服務的觀念應該養成，疏遠冷淡的氣息應該消解，然後互相溝通關連的障礙才可以消除，進步同學和較落後同學脫節的現象才可以減滅。

關於第二點用民主方式處理問題，我是指不單單和接受中間一般同學的意見，還要讓他們自己站起來作事。推動民主事業的軍隊，其本身一定是民主的，而民主的真義也就是組織大多數人，使他們動用手和腦，一步緊跟一步前進。這是舉辦壁報的例子吧，如果只有少數覺悟的同學主辦，固然會有聲有色，辦事順利，但我相信所收的組織效果，絕對不及集合較多數的中間同學主辦來得廣泛深入。其他社會活動，座談會，講演會等，同樣不單希望一般同學來當觀眾，而且希望他們參加活動，在組織和工作中領略教訓和磨練。寫過文章，辦過壁報，才曉得檢查制度多麼不適合人類的理性。眾人是會是愚蠢的，他們絕不會體驗不到不民主的痛苦，然而先決的條件是要眾眾活動起來，組織起來。至於結團一般同學的方法形式等等，此地就略而不談了。

民主與農村工作

沃任

能獲得得今天的殘酷時代艱難的青年，是值得驕傲的。我們要站得住腳跟，也要站得住腰桿，黑暗是不會長久了，然而光明就植根在人民、全國青年的堅強鬥爭上，正因為黑暗是殘酷兇狠的，我們就一定要用更堅韌的力量去壓倒它！

將來的歷史會證明今天我們所努力的事業的承先身後，開闢文明的偉大意義。這是中華民族五十年歷史發展的轉捩點，這是民主主義與封建法西斯主義搏鬥的生死關頭，這是人民世紀的發揚對奴隸的狂暴的決定的一戰。光輝的任務，光輝的前程，我們要把歷史的命運掌握於自己的手裡，我們的鋼鐵光芒四射，讓魔鬼戰慄去吧，讓法西斯政客騙子們被斬成肉餅吧！

我們不是孤獨的，我們與全世界的人民共同共濟地在狂風暴浪中前進！勝利屬於覺醒了的人民，歷史是人民所創造的，人民不再是昏迷的被鞭撻的牛馬了，人民了解了他們尊嚴的地位，把握了他們創造者的力量，確定了他們民主主義的方向，在浩瀚的海洋中他們毅然地前進着，壯大與發展起來。

這就是為什麼一切法西斯主義，半法西斯主義的政客騙子們那樣地害怕和逃避民主政治，因為他們是把他們的獨夫寡頭利益建立於人民的愚昧上，建立在牛馬般的被鞭打的人民努力上，民主政治將帶來人民的更大的覺醒，他們不能再是逆來順受任人宰割的奴隸了，因此反動者要盡一切力量阻礙我們的努力，用一切健全人性所不能想像的無恥手段，

來妄想阻撓運動怒長的世界民主潮流。

他們一定要失敗，要滅亡，然而勝利不是坐而可得的，今天青年的任務就是要怎樣用一切的力量來推進民主運動，這就要在依靠人民，依靠羣衆，游泳在人民的海中去吧，魚是不能離開水的，青年是不能離開羣衆的。

到人民中去，到農村中去，為那被重刑制與壓迫下血汗流盡的勞苦工農們的解放獻身。首先，中國的生命是在農鄉中，苦難的農民是歷史的砥礪的，那還是沒有經過絲毫文化雨潤的荒涼的處女地，帶給廣大農民的文化，以政治的覺醒，讓他們從昏睡中甦醒過來，讓他們認識到他們的力量，發揮出他們的力量。這種力量本來是散漫的，不自覺的，一旦它從散漫中組織起來從不自覺中自覺起來，它就成爲了民主主義的最堅實的基礎，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推動機。

然而「到農鄉去」的口號不是今天才提出來的，在五卅時代，歷史的先驅者已經作過這樣的召了。那時還沒有解決這問題。二十多年了，中國的農民不是比這更難了，而是比這更難，更壞，更多的災難，更多的追害，但今天，是到了應該要解決這問題的時候了；民主的怒潮正在澎湃，法西斯主義的罪惡接近了結清算的日子，反動的黑暗正在世界一切角落中動搖，沖滅下來，今天的世紀是民主

主義的世紀！

我們也更要求清算自己，澈底的清算自己，我們的任務太重大，要肅清一切舊世紀靈魂的殘餘，舊世紀思想的腐爛，在民主主義光照下澈底地武裝起來，更堅強地生活，更現實地鬥爭！……

我們曾經經過嚴重的教條主義的惡劣傾向，我們青年中不少有過羣衆似的這種人物，他們誇誇其談，以辯論教條來自鳴高鳴，他們不懂得中國，不懂得現實，不懂得歷史，他們死抱着幾套公式，不屑於去注視，去解決，去研究具體問題。（我不諱言我自己曾經是此輩中的一個！）

我們到農鄉去，我們是面對着一個全新的，需要我們用最大的誠懇去瞭解的現實，我們是小學生，農民是我們的教師，我們要真正具體的懂得中國農村的事情。我們要用全部精力去鑽研，去探察。洋教條，舊公式在這裡都沒有用，只有現實的知識能夠武裝我們，使我們懂得應該怎樣爲農民服務。農民所需要的是我們能够在具體實際的問題上幫助他們，而不是願意聽我們背一套書本上的革命公式，革命教條。

深刻具體地瞭解農民，瞭解農鄉各階層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情緒，瞭解農村中各種民間組織和鬥爭形式，尋覓出怎樣好好地利用它的方法，耐煩地替農民作具體生活上的幫助，使他們從生活上來信任你，感激你，然後進行有意義的文化教育及政治教育的工作，把自己認爲農鄉中的一份子，抓住使農民痛苦、憤怒和激奮的問題，這樣才能促使他們組織起來，發揮出爲民主而鬥爭的力量。

農鄉工作是艱苦的，在地主、豪紳、滑吏七手八腳地踐踏蹂躪下的今天中國農鄉，已經整個地是黑壓壓的一場糊塗，汗血和骨骸在憤怒而混亂地流

滑。以勞動者的態度，以知識份子的幻想，是絕不能在今日的農運中立足了。我們應該有決心把自己的命運和農民大眾的命運聯繫在一起，與他們同艱苦，共患難，為農民的解放而努力。艱苦的生活的洪流沖開了兩片土地，一邊是黑暗的製造者，一邊是黑暗的犧牲者；我們進入農運，如不成為歷史的渣滓，則必定要勇敢地走進那在黑暗中一天天更有力地揮扎著的農民的巨手，中間的道路再也沒有了！社會的分化已經使中間份子一天天更難立足了！怎樣應付這艱苦複雜的鬥爭呢？農民大眾在長期歷史的農民主義統治下他們的反抗常常帶着很大的原始性，零碎的，不持久的，要使他們的力量自我覺醒起來，凝聚起來，團結起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與此對比，豪紳階級則有「豐富」的威嚇、利誘、屠殺的經驗。參與這種民主活動，一分的教條主義，半分的旁觀態度，就會使你被碰得頭破血流的！

必須由身地注意整個農運中的每一小節，怎樣對待和應付各種黑暗勢力，避免不適當地方的衝突；怎樣幫助農民，抓緊他們關心的問題，進行教育；鼓勵起他們的自信與勇氣。所有這些都必須能隨時進行精細具體的調查估計和佈置。經常地反省，和研讀歷史上農民民主鬥爭的情勢，聯想我若當事時的對事對人種種方法和策略，然後配合現實加以運用。這些，都可以是克服自己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一二有效方法，然而，基本上是要我們有堅定的革命立場，為羣衆服務，為人民的解放而奮鬥。

躬盡瘁，吃得苦，耐得勞，毫不動搖地把自己投入長期的現實的鬥爭中去！

我們背上的包袱，還有那種自我英雄主義。到農運去既是長期的艱苦的工作，不能有忍辱負重，鑽而不捨的精神，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的堅定立場，是不能長期堅持的。我們青年慣常有嗜好大圖功，急於表現的習性，他們只看得見自己的努力並急於獲得了解，用這種態度進入農運，結果只有失敗。

我們應該看到整個民主運動的成就和需要，應該摒棄個人突出的思想，置身於民主運動，一切應以有利於民主為依歸，而不能考慮個人的成功。鬥爭

是必須在一切方面普遍地進行，正如一個健全體是由許多部份合理的配成一樣，越是艱苦的崗位，沉默的崗位，越是值得我們給予最大的尊敬，因為在這種崗位上的戰士，那至少已表現了他為人民，為歷史獻出整個的身心的精神。

民主運動正在日漸高漲，我們中國的青年不能再讓歷史又倒流幾十年，使我們下一代，下一代，再遭逢着如我們今天所遭逢的這殘酷的傷痛了！我們要千百倍地奮湧起來，掌握自己的命運，一切為了民主主義啊！

啓事

本期「筆談」還有黃濤先生的「認清這座牆」一文，是指出今天反民

主力量雖然真強，像一座牆樣阻止着民主運動的推進，但這座牆已經從基礎上動搖起來了，是一座「已經腐朽的牆」，是經不起外力的衝擊的。但這是篇文章被審查機關扣掉了拿不出來。謹向作者致歉。

書評及其他

科學與人類正義是背道而馳嗎？

——論「啼笑皆非」中的反科學思想——

克汀

林語堂大師前年回國「觀光抗戰」，在忽忽地作了幾回所謂「東西文化」以及什麼「心理建設」的演講以後，便在「老屋過書，人人喊打」的聲勢下，不得不迅速地離開美國去滅其洋「紳士」的「寓公」生活了。這一位開口「左傾思想」，閉口「左派份子」的紳士的影子，在我們的腦海中已漸漸地模糊了。但是，中國的出版界却沒有把他忘掉，林大師於返國前在美出版的大著：「啼笑皆非」，一下子便出現了兩種譯本。有一位美國的批評者，在論及「啼笑皆非」時，曾經嘲笑過：「說想不到以林大師這樣一位「文質彬彬」的紳士，却寫出了這樣「粗野」的一本書。這一位美國批評者的話，真是「一針見血」。用這句來批評「啼笑皆非」是再適當也沒有了。林語堂大師的「巧妙」(?) 邏輯像一根紅線似地貫串着這一本書。在選中間他曾經以主觀肯定的態度否定了科學的存在和價值，特別是自然科學在林大師看來是應當讓位於，代替它的應當是東方的「精神文明」。關於林大師其他方面的「妙論」，過去已有許多人作過批評，現在我就就林大師關於科學的妙論作一分析批評，看看林大師是怎樣無知，而他又怎樣地在發出無稽的謔。

林大師的「巧妙」(?) 邏輯地對面簡單的，這倒正合他自己在序言中所說的一句：「簡單明瞭」。林大師的邏輯根據，是在於一些現象。林大師首先引用了一九四二年美國生活雜誌底報告，宣稱在美國各大學中開了約近一千五百門關於地緣政治的課程，什麼是地緣政治呢？林大師說這是「政治行動的指南」(同上書頁九四)，「是征服世界及世界鬥爭的政治學，有

實的將政治建築在地理戰略的概念上」(見同上頁)。在引用了這一些現象上的材料當做根據了以後，林大師便抄成了一個「和平使者」登對了。他開口便對科學，主要地是自然科學，太加非難。他以主觀肯定的態度宣稱：「地緣政治學之所以有危險性，是因為牠也號稱科學，不幸世界上許多罪惡是借「科學」一詞而成的」(見同上書頁九四)。特別地是因為「洛德羅(Roads)的雅利安民族超越論是偽科學」(頁九九)較為明顯，而「地緣政治之為偽科學是不十分顯明，因為政治地緣學家所談的大陸是「世界島」的外形」(頁九九)，而它是「用了自然科學的術語和態度的」(頁九五)。正因為這樣，林大師對於自然科學大起恐懼之心了，他認為自然科學研究的擴大和加深，對於人類和平實在是一種嚴重的威脅，而在林大師看來，「另一次戰爭的影子已經在我們面前若隱若現」了(見著者自序)。「而不幸世界上許多罪惡是借「科學」一詞而成的」(頁九四)，由此，在林大師看來，為了要消滅「世界上許多罪惡」，於是乎便不得不消滅科學了。

地緣政治學的科學淵源是什麼呢？於是我們的火師又裝做一個學者的口吻發言了。他說道：「地緣政治之為偽科學而不太明顯的原因，就是因為它根據源遠，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的自然主義，而自然主義又是脫胎於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說，這種自然主義是十九世紀末歐洲思想的特點……自然主義的傾向是使社會世界的法則藉科學的名字應用到人類世界中來」(頁九九)——(一〇〇)。在說完了這一段話了以後，林大師便感慨地論斷道：「自然

主義之所以有弊端。是因為變成事物的太多了。蠻荒的法則在我們學術界心目中是自然的，屠殺無辜是自然的，轟炸小學生也成為自然的。一切充滿了自然主義的色彩，我們對於非人道的科學已不以為非了（頁一〇一）。

林大師的巧妙邏輯已經完了，於是便以粗野的態度作結語了。結論中他主張科學應讓位於東方精神文明，他洋洋得意地寫道：「我們必須懸崖勒馬，假如我們不捨科學的假面具，而使一切事物基於信心，則這一代的人類文明是無法挽救的。假如我們不屏絕自一九一四到一九三九年間的文物法則，而或使自然科學與人類的界線劃清，則我不知道西方文明如何逃避毀滅之途。許多事，我們無法依據科學，因為我們不能以科學來證明或衡量它們，人類與民族的平等無法證明，世界合作的可能性也永遠無法證明，這種事只有待信心來解決。人類價值應取自然主義價值而代之，我們的真理標準與對真理本身的觀念應完全改變。孔子所提倡來的標準仍不大謬。『惟性與天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這是孔子對自然主義的答覆。」

「歸根結底，只是一個人類意志之自由對定命論的問題，是一個良心能否有力量來改變我們所創造的世界的問題。我再說一次，世界的和平是信心的表現，沒有信心，我們只有陷入萬劫不復之境」（頁一〇一——一〇二）。林大師的「尾巴」完全露出來了，他的邏輯只表明了他：「東方既不贊，西方也不通」。

在我們分析林大師的邏輯，而說明他的理論和思想底反動時，我們不妨回憶一下，在許多年以前，曾經有些人，扮演成「說教」者的面目，而企圖在文詞的掩飾下，出賣一種包有糖衣的毒藥。他們認爲西方的物質文明（他們認定就是西洋科學）的路子是走不通了，從此以後，東方的精神文明主宰一切。這一種反動的思想，否定了物質生活，也否定了科學。一物質消滅了，從此以後，人類的精神宰制一切。這就是他們的公式，林大師的理論也不外是這一種理論的改裝，他不是說過了嗎？「歸根結底這只是一個人類意志自由對定命論的問題」。在林大師的理論中不過是重複了馬哈主義者的意見，認爲定命論破產了，物質也已經消滅，從此以後，人類自由意志和良心將要宰制一切，總之在實際上林大師也不外是企圖在「危言聳聽」的背後，將歷史上沉澱了的舊東西重新翻動起來，這只的沉澱的泛起。其實這是一種理論，再也不會引起我們什麼興趣了。

首先，我們應指出林大師企圖以一種主觀的態度去對待科學真理，在林大師的邏輯裡，不但世界和平是應當求之吾心，求之於抽象的主觀的良心和

信念，而且科學的客觀真理在林大師看來也是沒有什麼正確的標準，而只能求之於抽象的，主觀的「人心」。洛森堡的雅利安民族超種論是偽科學。爲什麼呢？林大師回答道：這并不是洛森堡的理論和客觀真理相違背，而是因爲我們說她是偽科學「比較近乎人心。我們甚至用不着反駁，因爲我們的心根本否定它」。洛森堡的民族超種論誠然是種法西斯的偽科學的說教，係借科學的外衣來歪曲現實；但是林大師說科學的結果應當用「心」來衡量的尺度，那就大或問題了。科學真理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在林大師粗野的三言兩語下，便被否定了。

科學的任務是要依着事物底實際樣子而不加以任何增減地去說明它。正因爲這樣，科學才能說明實際，而同時指導我們怎樣去變革實際。因此，簡單地說來，科學的精神是「如實」的。正因爲這樣，科學才成爲一種客觀真理。誰要是否定了科學真理的真實性和客觀性，誰就是否定了科學本身。因爲我們「心」中認爲對的東西在實際上不一定不對的。我們日常生活中，許多人認爲爲神鬼是存在的，而科學真理却否定了它。真理在於吾心的反動理論，我勸林大師還是把它收起來罷。

林大師的理論不僅這樣，而且他在得意洋洋中，又從康德和馬哈那裡搬來了一些劣等貨色。我們且看看林大師的自白罷：「在物質世界領域中也切不可忘記科學可能解釋『如何』，而決不能解釋『爲什麼』和『何以故』，它只能處理『過程』，而不是最初的原因，更不是最後結果的價值。過程是在數學範圍之內，價值和最初的原因則不在其內。科學解釋了原子如何行動，但沒有解釋爲什麼那樣行動。它能描寫熱和發兩個分子如何合在一起，但未解釋爲什麼要合在一起。……」（頁四一）。林大師這一大段冗長的敘述，其實，如果用一句話說來，那末不外是說：科學只能說明事物的表面現象，而不能深入到事物的內部本質裏面去，更不能找出它的因果關係和運動法則。這是什麼理論呢？這就是康德的「不可知論」的復活。他又認爲科學只能描寫現象，記述現象或敘述現象的情形，而不能夠深入內部去把握它內部的實際情形。這是什麼理論呢？這是馬哈主義的荒謬理論。如果我們不大他忘的話，我們便會記得馬哈曾經說過：「一切的科學都是記述科學，科學並沒有反映客觀事物內部的實際，科學的任務只是在於記述或描寫現象的過程。其實康德的『不可知論』和馬哈主義的錯誤學說，已經早給我們的導師恩格斯和列寧批判過了。這些反動理論的錯誤，在今天只是常談問題，在這裡我不再和林大師囉嗦了。」

（下轉第三〇八頁）

評林語堂的「枕戈待旦」

N. 威爾斯作
杜 布 譯

照中國文人的傳統，多才多藝是深受歡迎的。林語堂以新聞記者，教員和才子起家，後來又變成語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小說家（「京華煙雲」是他的一等傑作）。現在越拉越開，竟為一個旅行家，政治評論家兼時代家了。

作為插篇一九四三——四年他在中國六個月的旅行記一本遊記：「枕戈待旦」(又名The View of a Nation)，具有使林語堂過去在美國受到一般人所喜歡的種種同類的輕鬆性質。當他坐在西方的咖啡館上，帶着中國祖先的精神談天的時候，他還是他的朋友們一向所稱讚的可愛的林語堂。他寫他的朋友所看到的東西，談起來頗頗有趣的。可是當他在苦悶的政治空氣中，從別人那里道聽塗說的事情，却就不是那麼可信了，當他一提到「共產黨」三個字，他那種固有的懷疑主義(Skepticism)——一種哲學心情的實質——就立刻不見了，這裏是教人吃驚的。

作為一個政治評論家，林語堂是並不那麼成功的。多才多藝在有些地方還是會碰壁。老實說，他似乎很不高明。他的缺點也許是他在旅行沒有更向北去，如果他到了延安，他或許不會把共產黨寫得那麼嚇人了。

我覺得他做一個討伐的企圖，是和吉詞德先生一樣悽慘，他是為一種除了在他自己的理想以外並不存在的觀念在作戰。(下段略一大段)

他把中國戰反動和最後失望的份子說得富有魅力，而同時他似乎下意識地把他共產黨統治下的八千六百萬人看作不是他本國的人民。至少他說一個中國人自然喜歡把戰爭的任何部分——包括游

擊隊在內——都說得富有魅力，不過——我只祈求中國人民能避過那些區域內的農民的命運」(隱斷是本文作者所加的)。

「枕戈待旦」的主要部分，是暴虐和解釋國共之間的矛盾。林語堂解釋說：「我是迫不得已而來敘述這個共產黨糾紛的全部故事的，因為這影響着美國對於中國的供給和戰後中美的國際地位」。

他這矛盾幾乎全歸於共產黨，他說：「我相信共產黨按照這同樣的策略，會很快獲得河南，湖北，江西的統治——那就是說，凡是日本人所到地方。我不相信，這種情形繼續下去，會有什麼方法可以阻止他們，除非一個正式宣布的內戰」。在這本書內，林語堂顯然自己負起責任來自行宣佈那末宜的內戰了。

林語堂相信，一旦美國人認識中國赤色威脅的嚴重，有如他所看到的一樣時候，他們就會大量的增加對於重慶的供給，以加強它的地位的。因此來，美國人民對於他這本書的反響，那會是很興趣的。(在美國，舉例說，英國對於希臘解放軍的政策，是大失人望的。)

在「枕戈待旦」中間，我應該說，讀者會感到他所舉的，絕大部份例子都是偏袒重慶和國民黨的。而絕大部份例子是反共的。我沒有看到過任何前的一本書，有像它那樣黑白分明。林語堂毫不負責任的把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攻擊以及許多殘酷的故事轉述一遍，却沒有一點事實證明。所以那是應該打折扣的。

自然，共產黨方面是描述出完全相反的圖畫。這在每個國家內都有這種同樣的情形。在蘇聯一斷止

自由的智識份子有時確會失去他們的客觀性，選取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林語堂覺得這樣時機已經到來了，這真是一個可憐的對中國形勢的評語，雖然我却不相信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會同意他的見解，而相反仍然是贊成調停和繼續談判的。

這是很難，要使一個美國人去了解中國激烈的階級仇恨，這種仇恨使所謂「共產黨問題」的討論弄得那麼的不合理，雖然事實上共產黨已經把他們原來的綱領緩和了十之八九。當我七年以前訪問華安的時候，我並不會看到過那樣可怕的人物。我覺得那邊的人民正和其他的中國人民一樣，是極可愛的。

讀者會更容易理解林語堂的觀點，只要記得他所指出的，在四萬五千萬中國人中間，該有四萬四千九百萬人是有窮苦的和容易發生騷亂的。因此少數的統治者自然是很害怕任何關於武裝和組織這些人民時觀念了。

這是基本的理由，為什麼有人今天那麼熱烈地反對游擊運動，甚至在日本人佔領的區域內的游擊運動。不論游擊隊是民主的，有如到那些區域去訪問過的人所相信的，或者像林語堂所堅持說它是「個體主義」的，對於任何害怕騷亂運動的人，都不能作為一種安慰。即使那些游擊隊中並沒有共產黨存在，這種同樣的憎恨心理也還是會起來的。

在林語堂書中的最後一章裡，是有些好的意見，值得指出的，是勸告現政府必須實行人權法案，不論憲法政府是否建立起來，還有他主張廢除該產業案多多對政策上發表意見。

這使人感到是一個悲劇，林語堂沒有更進步看到這些進步的觀點必須和中國民主運動中進行的巨大歷史力量結合起來，因為顯然，他的政治地位是建立在對於這些力量基本的誤解上，特別是表現在他對於共產黨運動的性質以及它所想實現的底線觀念。

解放區的民兵工作

紐約時報

六年來，我一直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作戰部隊，在中國人和日本人手中反復奪過來的鄉間。

不同於黃河以西的繁榮的地區，那裡的人民正在收穫多年教育的碩果，正在有力地增加生產，還有的鄉村裡，農民以嚴肅的面容，講着日本的暴行，只有在說到他們怎樣痛恨敵人，把敵人趕走時，才有些笑容。

每一個村的進口處有便衣民兵守衛着，他們帶着各種各樣的俘虜的日本武器，從自動步槍到手榴彈，各種各樣的當地武器，從前膛砲、地雷到紅鞭槍。當任何人走進時，村人，常常是婦女或兒童，或在放羊或在紡線，擋住了路，要路條。

如有任何遲延，游擊隊馬上從鄰近的茅草屋下或是樹叢後面出現了。路條是一點也不會不得的。倘個人都得出路條來，無論是穿軍衣或不穿的。

一個旅長，帶着兩連人在今夜通過封鎖線時，他常常下馬來，拿出他的路條，和平地站在那裡，讓那個衣衫不整的十三歲的娃娃一個個的點清人數，到他認爲路條上的人數相符才走了。兒童是時常派作這種事的，因爲他們往往是全村唯一的識字的。

如果敵人移動，最近村子裡的人們馬上就得到駐在日本駐屯的大門口的騎馬的偵探的報告。警鐘響了，人們把糧食收藏起來，躲到山裡去，民兵去設置地雷，和佈置好圍套。消息以簡單的方法，如烽火，或方下山頂上的旗桿之類傳到別的村子去。

去。

關於敵情的消息往往在敵人動身之前，已從廚子，担水的，還有據點內和八路軍合作的偽軍那裡得到了。

戒嚴的狀態是經常的，因爲這是收割的季節，日本人一定會來搶糧。男的、女的、戰士、游擊隊和民兵在田裡，從天還未亮工作到天黑盡，打谷和藏谷。「變工」就是共產黨在此一種節省人力的集體在田裡工作方式，採取各種形式，適應前線部隊的情況。一種是民兵和老百姓的變工。前者在平靜的季節在自己的地，和老百姓的地上工作。當他們動員出夫時，老百姓就收割他們的和自己的糧食，因此戰士們去偵察或阻擋敵人時，無後顧之憂。

另外還有鄰村的變工，和個人間的變工，因此一村的家畜被搶，男人被殺之後，仍然能耕種，能收割和打谷。

個別的農民過去必須自己收割，打谷然後又收藏。現在由於農民和戰士共同勞動，這些事情可以同時進行，一個團體專門做一種工作，播種收割和收藏，這樣就從兩個月之久縮爲兩週。

結果是在忻縣，日本人在一九四〇年的搶糧戰中，殺死了一千三百八十四個農民，掠奪六千八百七十九担糧食和四百六十六條牛，以後逐年減少，直到去年，他們只殺死四十八個老百姓，掠奪二百八十担糧和十三條牛。

在同一時間，變工增加了耕種面積和總產量至戰前水平以上，因此戰後損失之餘，人民比以前更有得吃，而且對提高生產鬥爭效率的信心，已增加了農民參加武裝鬥爭，或者配合軍隊或獨立行動的數目。

在一九四二年有一千四百個人，在這裡幫助軍隊担糧或担架傷兵。在一九四三年秋季戰役中，在一個九萬五千居民的區域，出了兩萬六千人幫助軍隊。去年有一支千人以上的日軍被消滅了。

軍隊和民兵允許日本人進入到某種距離，使遭到一連串的埋伏和臨時性的包圍。一堆堆的骨灰標記着日本固守的和斃死人的據點。日本步槍、手槍、迫擊砲、機關槍，軍毯、大衣和行囊現在已歸屬敵人的保衛者所用了。軍隊以其他軍用品和彈藥幫助之。

八路軍駐軍的指揮員的義務之一，是給民兵軍事訓練。當民兵最初組織起來時，他們的人員和正規軍一起去作戰，一兩個人參加到一個小隊裡去。等他們獲得了信心和知識之後，他們在自己選舉的指揮員之下，獨立作戰。

八路軍軍官說，他們開始要教育民兵，但是現在時常發現他們自己在學習民兵的機巧，和對本地情況的熟悉。民兵只在自己村子二十英里周圍以內作戰，除此之外，民兵和正規軍的界限就沒有了，而且也給以同樣的任務。

這裡有兩連人在晉綏邊區總部訓練了兩個月之後，正在回到敵後去，這個區域裡有八個區，每一區，每半年派一個連到總部來受訓。訓練授以最後的經驗，新的敵人的戰術及新的任務的準備。然後他們回去又去轉授給分區內其餘的人。

這些連隊來回都經過敵人封鎖線，而且自帶武器。百分之六十四的步槍，百分之四十七的迫擊砲和全部的重機關槍都是從敵人和偽軍手中奪來的。雖然日本的駐軍現在大半是不足和已過兵役年

群 衆

第十卷七、八期目錄

時評

哀悼羅斯福總統

這裡沒有狗屎

小磯滾蛋，鈴木登台

民主巨人羅斯福

介紹頓巴教檢樹會議特刊

論教巴頓檢樹會議關於國際安全組織的決議案

附：頓巴教檢樹會議議案全文

關於頓巴教檢樹會議和平建議案的十六個問題

國際聯盟為什麼失敗？

B

夏特羅夫

第一 還在度着冬天

季大 工業圈裏

1945 修方 三個月中的金融

經濟 抗戰期中大後方的農村經濟

劉芳華 金明

華民

茹純

美國國務院

許滌新

卓芬

劉芳華

金明

農民在歷史上的創造力 沈友谷

漢奸劊子手會國藩的一生 范文瀾

★在民主運動中知識婦女應該做什麼 盧詠詠

學校與民主運動 徐鳳

認識人民大眾的力量 有石

投奔人民的海洋 習人

★從自己的週圍作起 張莞

附語 編者

書評及其他

郭沫若先生與中國古代研究 尹達

糖衣覆蓋着甚麼？ 蘆蕪

——附：關於「特務文學」

黨英會（本刊特約通訊報導） 吳伯蕭

村選（木刻） 函

（本期售價每册六十元）

歸的後備兵組成的，武器也較差，但是他們仍然頑強地抵抗，而偽軍却士氣不振。人力的不足，迫使日本以偽軍駐防封鎖線的樞紐，而八路軍正在進攻以消滅他們，而且在收穫季節保持着主動。牽制敵人不出據點。

昨晨和今晨，在數英里之內的戰士，奪取了兩個有一百個偽軍的據點。在奪取第一個據點時，他們俘虜了偽軍的指揮兩個據點的隊長，然後他們命令他們第二個據點裡的人出來投降，因為他們被優勢的部隊所圍，這樣佔領了第二個據點。

戰士們答應了投誠的偽軍以良好的待遇，使投降容易些，以自己的運糧工具為投誠的偽軍到公路附近附近的村子裡去接家屬及其私人的用具。偽軍是些拖泥帶水的，彷徨的，精神不振的人，被日本人壓迫服役的。他們和那些有知識的，快樂的戰士截然不同，好像是完全屬於另外一種動物那樣不同。

這些每一個被燒過的村子裏，都有一塊黑板報，寫着中國和世界的最近的消息，消息由最近的軍隊中的無線電人員供給的。在這裡，膠東人說「保衛秋收」，「不給敵人一頭牛，一顆穀」，並排寫着「打倒法西斯主義」。

羊 群 衆

第 十 卷 第 十 期

目 要

論舊金山會議第一階段的成就

茹 訥

現階段的殖民地問題

E·儒科夫

論戰爭罪犯

D·替立德

晉察冀解放區的土地政策

方 草

減 租

周而復

評沙汀的「淘金記」

石懷池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六 月 一 日 出 版

羣衆第十卷第十期目錄

歐戰結束後的遠東戰局(特稿)	懷(三二六)
論德金山會議第一階段的成就	茹純(三二八)
現階段的殖民地問題	E. 儒科夫(三三四)
論戰爭罪犯	D. 普立德(三三七)
晉察冀解放區的土地政策	方草(三四四)
附錄	
晉察冀邊區租佃債息條例	(三四七)
晉察冀邊區租佃債息條例施行條例	(三五〇)
減租(特約報導)	周而復(三五二)
評沙汀的「陶金記」	石橫池(三六〇)

羣衆

第十卷 第十期

三十四年六月一日出版

發行所

羣衆雜誌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總經售

新華日報館

本刊價目

本報零售 每份 五十元

六期 一百八十元

十二期 三百二十四元

廿四期 六百一十元

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另加

歐戰結束後的遠東戰局

歐洲戰爭勝利地結束了。

五年八月等五天的漫漫長夜終於成爲過去，歐洲的地平線上昇起了民主和平的曙光！光榮啊，偉大不朽的紅軍！光榮啊，同盟國家的全體戰士和人民！光榮啊，從納粹的枷鎖下掙扎起來的全歐洲抗戰的人民，你們的血不是白流的，你們的戰鬥已經贏得了今天的勝利，奠定了民主歐洲的基礎，開拓了人民世紀的道路。

德國法西斯是在戰場上徹底地打敗了，但他們還沒有被消滅；他們正在紛紛從地上轉到地下，爭取「生存空間」的地帶，他們還在圖謀離開同盟國家的枷鎖，作爲「東山再起」的本錢，從而戰爭雖然結束，但在同盟國家面前的課題還是非常艱鉅，所謂歐戰結束，贏得和平更不易，不過，歐洲戰爭是勝利地結束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從歐戰的勝利中學得了些什麼呢？簡單的說，歐戰是怎樣勝利的？

從歷史的發展看，歐洲戰爭在它輝煌的勝利歷程上有三道不可磨滅的里程碑：一，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間斯大林格勒的大反攻，這是整個戰爭的轉捩點，這一戰指明了紅軍是歐戰中的主力，他們是英雄中的英雄；二，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間的德黑蘭會議，在這一會議中英美蘇三大同盟強國制定了以人民戰爭爲基礎的共同作戰的綱領；三，一九四四年六月，西歐第二戰場的開闢，這是共同作戰綱領的具體展開；英美盟軍登陸後法國內地軍英雄的奮起指明了人民戰爭的特點已非爲中東歐所特有，

而是整個歐洲戰爭所共具的性質了。這三大歷史的發展證明了歐洲戰爭是一個以蘇軍爲主力的同盟國家共同作戰的人民戰爭。

這一箇基本特點形象化地表現在如下的一個數目字上，即，一九四四年夏季歐洲戰場敵我軍事力量對比。那時候德軍總數控制了約一千一百萬的兵力，而同盟國方面的兵力則有一千六百萬，即同盟國對德國的兵力優勢約爲一·五比一，但這一〇〇分之二一五〇的優勢是怎樣構成的呢？盟軍一千六百萬人中：蘇軍佔一·〇〇〇萬

- 美軍 四〇〇萬
- 英軍 一〇〇萬
- 法軍 五〇萬
- 地下軍 六〇萬

這裡的軍事兵力估計過高，地下軍的部隊估計過低，不過單從這幾個數目字，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假若歐戰不是以蘇聯爲主力的同盟國家共同作戰的人民戰爭，這壓倒的優勢無法構成，歐洲戰爭的勝利是不可思議地迅速到來的。

現在歐戰已經勝利結束，當前的問題是：如何在最短期間用最少的犧牲擊潰日本；歐戰是那樣的勝利，亞洲戰爭應該怎樣打呢？

在沒有分析這一問題之前，我們得先指出日寇的妥協和平的陰謀。

日寇在這個時候發動妥協和平的陰謀，其主要根據有三：一，歐戰結束，他們以爲不僅是英美和蘇聯之間的團結失去了基礎，即英美之間在遠東方

面的矛盾亦將增加，同盟國家的可能矛盾是日寇發動妥協和平攻勢的物質基礎；二，歐戰結束，英美局部復員，英美國內必將發生陶醉勝利與厭倦戰爭的現象，這是它發動妥協和平攻勢的心理基礎；然而更加重要的是：三，歐戰結束，已和日本廢除了中立協定的蘇聯必將採取更積極的行動，這是日本所最懼怕的，因此它必須在歐戰結束後，蘇聯行動前發動這一攻勢，因爲這是最好的時機，形勢一變，這樣的時候就一去不復返了。

截至現在爲止（五月十八日）日寇的妥協陰謀是失敗了；但必須警戒，日寇的這種陰謀是不會中止的，在這一問題上，鬆弛就是犯罪。

日寇妥協和平的毒藥除掉上述三大政治理由而外，在軍事上它還是有本錢的，它的本錢在它自信還能拖延戰事，它自信還能給予同盟國家以巨大損失。只有把這毒藥拿掉，日寇才會放棄妥協和平的幻想，接受無條件的投降。

擺在同盟國家面前的任務是以最小可能的犧牲在最短可能的時間之內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歐戰結束，英美同盟國家對日的優勢是空前地增加了；但得注意，姑不論盟軍東調在技術上所遭遇的困難（三〇〇萬人費時六月），這空前增加了的優勢是不足以迅速地順利地取得對日的勝利的。據最樂觀的估計，英美盟軍在亞洲——太平洋方面所能使用的兵力最高限度不能超過他們在大西洋歐洲方面所使用的兵力，即：美軍三百五十萬，英軍一百萬，共四百五十萬；而遠四百五十萬的兵力對日寇四百萬的兵力不能算是佔有壓倒的優勢。

英美盟軍不把他們的希望放在兵力的優勢上，他們把希望放在火力的優勢上，特別是空軍的優勢。同盟國家內部不乏人以其爲主要地靠空軍的轟炸就能解決日本的。他們的計劃主要地好像是：集中

轟炸日本本土是現實的第二步，直接到日本本土登陸是將來的第二步。這不是一夜在中國登陸的可能；他們以為這是在最短期間用最代價打敗日本最好的戰略。

這種空軍決定一切的戰略思想在歐洲不是沒有出現過的，這在一九四三年夏季，英美魁北克會議當時，這種戰略思想曾經支配一時，但這種戰略思想不懂得能迅速地贏得勝利，而且阻礙了同盟國家共同作戰的人民戰爭的形成，從而也就是延緩了戰爭，加重了損失。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今天出現在英法盟邦內部的這種以空軍為主的戰略思想，其結果是不可能兩利的：它將阻礙同盟國家共同作戰的人民戰爭的形成，它將延緩戰爭，它將加重同盟國家全體的損失，它將加強日寇發動安協陰謀的可能。

從任何一個觀點看，亞洲戰爭已經發展到需要

形成一個同盟國家共同作戰的人民戰爭的綱領的時候了，什麼東西在阻礙這一個綱領的實現呢？

一、英法荷對於南洋殖民地態度——這阻礙着英美之間不可能在太平洋形成一個聯合作戰的戰略，更無從去發動這一帶人民來積極參加作戰。

二、中國內部的團結問題始終不能解決——這阻礙了同盟國家在這一帶決戰的地區不能制定一個合理的戰略，迫使中國的抗戰力量一方面不能動員起來，另一方面動員起來的不能獲得應有的裝備。這兩大弱點不僅是阻礙着一個合理戰略的形成，而且變成了日本侵略者挑撥同盟關係的漏洞，發動政治攻勢的溫床。

假如同盟國家要認真的要在最短期間內用最小的犧牲消滅日本侵略者，那麼就必須把這兩大問題——尤其第二個問題提高到有關于整場戰爭的關頭高度，促其解決。另一方面，我們自己而臨這一途

東戰爭的新形勢，絕不能自安于估計對日勝利何時到來，而必須面對這一嚴肅的現實，加倍的力量用來自動解決這一問題，因為這不僅是關係于整個戰爭結束的遲早，所付代價的小大，而且關係于我們整個國家的地位和全世界的和平——在這裡任何欺騙的手段和花巧的語言是不能掩蓋強硬的事實的。

在這種必須提到遠東有關的另一強大國家蘇聯，歐戰結束以後，已經和日本廢除了中立協定的蘇聯，其對採取更積極的步驟是顯而易見的。現在我們姑不問蘇聯的積極步驟採取何種形式，但上述兩大問題，特別是關於中國內部的團結的第二問題的解決上，有加強英美蘇在遠東問題上團結的作用。

歐戰結束，亞洲戰場已處于決戰的前夜，姑不問英美同盟國家的對日優勢是如對日大，但在最短期間用最小的犧牲消滅日本侵略者的道路只有一條，同盟國家共同作戰的人民戰爭。（續）

（上接三三六頁）

然陳腐了的觀點的再評價，還是相當強烈的。譬如一九四四年八月間英國的「國民評論」雜誌上所發表的一篇H.史托克斯的文章，就總結了關於殖民地發展的各種不同的計劃。在他所列表的許多計劃之中的一個所謂「殖民地發展的建設性的計劃」，可以說是對殖民地問題的最反動的觀點。這一個計劃的證明。舉如在這個「建設性的計劃」中，有一點是建議不要讓英屬非洲的居民受現代化的教育，因為他們「沒有一種確定的宗教基礎，因此這種教育帶給他們的會是害處多於益處」。

天主教的領導人士，也提出了對於殖民地問題的類似的觀點。天主教「國際和平協會」的代表人卡羅爾，曾經引用過羅馬教皇在一九三八年秋天所作的一個指令，說「真正的殖民地政策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去開化劣等才能的種族」。

從此可以看出，對於落後的與附屬國家的人民的這種充滿了種族的、優

越的和殖民者的精神的眼光，還是相當強烈的。這種精神也滲透在許多關於殖民地問題的演講與發言中。有時他們時常準備好一種對於許多國家的殖民地現狀「改革」的世界輿論，可是這種改革只限於外形的，而不是改變經濟關係的本質的。這就可以證明出關心保存自己舊殖民地國家中的地位，以給與及永久保存殖民地制度的許多強有力的影響的所達到的程度。

毫無疑問地，這些力量對於取消或者削弱殖民地壓迫的任何肯定的步驟，一定當作頑強的抵抗。但是同時也可以看出，就是奴役千百萬人民的殖民地制度，是全世界社會進步道路上的一個特別危險的障礙和反動影響的堡壘。取消這種障礙，就是將各大國家和住居在這些國家裡的人民，同列於世界的經濟、政治與文化發展的一條共同的河流中的必要條件。

（譯自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五日第六期「戰爭與

工人階級」雜誌）蔡奎譯

，可以立刻動員世界的軍事政治經濟的全部力量，實行迅速有效的制裁。首先，這個機關是根據舊國際的經驗設計的，並非「舊瓶裝新酒」。舊國際沒有這樣的權力機關，而是把防止侵略保障和平的責任和權力，非常薄弱地平均分配在參加世界組織的四十多個大小國家身上，其結果，就使許多小國，就其抵抗侵略的力量和可能担負軍事行動的效果來說，都是很薄弱的，而相反，却担負了超過它的能力的責任，正是因為這樣，舊國際就變成軟弱無力，極易受人操縱和破壞。新國際可以說在小國後面，惟知自己的政治責任；侵略國家則利用小國來破壞它的一切決議。賴巴敦計劃的最大特點就在於禁止了舊國際的這個致命弱點，而把權力集中在安全理事會身上，通過安全理事會，領導強國就無法推脫自己的政治責任，在任何問題上，民主國與強國必須一致，即在這些問題上發生了爭論和分歧，也負有責任使之限制在國際所允許的範圍之中，而最後仍不得以團結的方式來求得解決。其次，這個機關是根據了世界力量的實際關係來設計的，反映了世界實力關係的對比。世界力量的實際關係是這樣一幅圖畫：一方面是社會主義世界和資本主義世界的對立發展，一方面是新民主主義力量和舊民主主義力量的對立發展。這兩種對立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事實，超越任何人的主觀而獨立存在的事實。戰後世界和平的關鍵就在於這兩種對立的發展是在國際所允許的範圍之內呢，還是超越了國際所允許的範圍？假如超越了國際所允許的範圍，衝突和戰爭就會不可避免，而當進入衝突和戰爭的時候，任何世界強國都會有用處。而假如這兩種對立是在國際所允許的範圍內發展，就是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能夠和平共存，新民主主義和舊民主主義能夠和平相安，那末，國際和平就有保障，世界機構就會發生效果。這也正說明，安全理事會不做需要擁有最大的權力，同時在投票程序上應該承認五大常任理事國有絕對的否決權。問題是在這後的想根本上考慮的：為了和平，必需團結，只有團結，才有力量。缺乏這個前提，世界和平機構就不會發生任何效果。這是我們對安全理事會的基本看法。

安全理事會是這次會上批評得最多和爭論得最激烈的對象。反對者所憑藉的理由是各種各樣的，在這些中自然不少是小國的天賦願望，但卻顯然夾雜着反動集團的惡毒的喧囂，如像杜威及其一夥，就把自己假裝成小國權益的衛護者，硬說這是強國的「獨裁」。反對者的共同論點就是大會權力太小，各種各種縮小安全理事會權力而增加大會權力的修正案都提到了舊金山會議上來，根據執行委員會和指導委員會整理的結果，已把這些提案歸結為如下九項基本問題：①大會對於安全理事會有關並且正由該理事會處理中的問題，是否應能自動提出建議。②安全理事會對於正在處理中的和維持和平安全有關的任何問題，是否應通知大會。③安全理事會是否應在停止處理這一問題時，是否應立即通知大會。④是否應通過一項程序，使大會在獲得理事會報告之後，即可決定理事會是否已停止運用職權維持和平。⑤大會是否應能要求

理事會調查大會認為可能危及世界和平的情勢。⑥大會是否應有權促使理事會注意其認為可能危及世界和平的情勢。⑦理事會對於維持安全和平任何問題的決定，是否應由大會一定大多數會員批准或否決。⑧大會是否應有權勸導理事會在理事會中要求理事會報告其已採取或採取足以影響和平安全任何問題的任何措施。⑨大會是否應有權勸導理事會用理事會第八節第二項第八項規定的任何措施。⑩大會是否應有權決定關於國際關係的問題。這九項原則則由第二組委員會的安全功能小組委員會和第三組委員會的實施辦法小組委員會分別予以詳細的討論，討論結果，否決了其中六項（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八），而通過了其中三項（第二、第五和第九），因此，就總的方向來說，基本上與四國聯合修正案的精神是符合的，而四國聯合修正案，則如前所述，基本上並沒有改變賴巴敦原案和雅爾達協定。

在這里，我們要把大會的相對的權力和大會構成上的平等在原則上分開，不能混為一談。在形式上，大會的權力的確是不大的，但在構成上，每一會員國都有一種投票權，就是說，大會是按照不分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的原則組成的。可是，為了使世界安全機構能夠發揮充分的效力，就不能也按照表面上的平等原則，把維持和平的大權經過大會平均分配在大小國家身上。因為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能够擔當得起進行現代化戰爭的只有民主強國，如果民主強國走入衝突，世界戰爭便不可避免，而任何世界機構都沒有實際意義，而如果民主強國能夠團結和諧，則和平就可維持，世界機構的存在就有其必要性。因此，在戰後時期，只有經過安全理事會這樣的權力機關，把責任直接加諸領導強國身上，則戰時團結就可以維持到戰後，而和平也就有了基本的保證，因為這是從機構上奠定了和平的基礎。只有這樣，才不僅符合民主強國的直接利益，同時也符合所有愛好自由和平的各國的直接利益。

（四）沒有法西斯藏身餘地

關於區域制度和區域辦法問題，這在舊金山會議，也引起了很大的爭論。這個問題首先是發生在汎美各國所持的態度上面。汎美國家在舊金山會議上，成了一個集團，他們還在舊金山會議以前，就在墨西哥的蒙雷利城開會，締結了一個「汎美協定」，這個協定中規定汎美國家在遭遇侵略時，有權在本區域單獨使用武力，而不必事先經過安全理事會通過或授權。汎美國家的這個願望自然不能忽視的，但問題不是這樣簡單。汎美國家中若干國家（這些國家受着強國政治的影響），用了這個藉口來堅持把汎美集團和國際組織絕對對立起來，一方面想把汎美區域化為獨立的地區，一方面却又

企圖參加和決定歐洲和亞洲區域有關的問題。換句話說，西半球的事不要人來過問，而大西洋和太平洋彼岸的事自己又偏偏要過問，這是一種明白白的新孤立主義的傾向，此其一。參加英美集團的國家，自然不少是民主國家，并且還有實現了民主聯合政府的國家（古巴），德國，也好像巴拿馬阿提廷這樣的法西斯國家。德國的獨裁者，統治了巴西十餘年，殘酷地壓迫了巴西人民，以經濟放蕩動，巴西民族領袖熱斯提斯（巴西民族解放聯盟主席，即熱斯提斯）等，至今還在監獄中。這是一種「西半球的事自己來過問」，而「大西洋和太平洋彼岸的事」，則是一種「西半球的事不要人來過問」，而且是在「歐戰中」和「戰後」兩個時期，阿提廷軍事獨裁統治中，充滿了「西半球的事自己來過問」的「西半球的事不要人來過問」精神。更奇怪的是，這些所謂「西半球的事自己來過問」的國家，在國內也布定召開國民大會，實行大憲法，甚至像巴西還開國民大會，還在國內宣佈「西半球的事自己來過問」，而混進了民主國家的詞彙，而且這一類「西半球的事自己來過問」，還說明法西斯殘餘勢力還在暗中活動，而且這一類「西半球的事自己來過問」，還說明法西斯殘餘勢力還在暗中活動，而且這一類「西半球的事自己來過問」，還說明法西斯殘餘勢力還在暗中活動。

更奇怪的是討論到這個問題時，有人提出了國際安全組織有權修改在戰爭期間所締結的條約。這種提法，好像提法不知道這些條約包括這方面；一方面那些打敗了的侵略者締結的條約，另一方面是聯合國國家為了在戰後阻止戰敗的軸心國家發動新的侵略而締結的條約。很顯然的，提出修改第二種條約是不合理的。因為從實際上的效果來說，正如莫洛托夫所說：「提出修改第二種條約的必要性，一定會落在敵對國家的陰謀中去，因為他們一定會想方設法來破壞和阻撓第二種條約，引起國際上的互相猜忌」。而從法律的根據來說，也正如莫洛托夫所說：「把這些條約交與國際安全組織去考慮，就等於破壞簽字國家的主權。這和賴巴敦的原則相違背的，賴巴敦建議案強有力地承認了國際安全組織的主權獨立」。其實，這種提法，一眼可以看出來是針對蘇聯和英法捷南波各國訂立的二十年同盟互助條約。有人會把蘇聯和這些國家締結條約，看做是努力範圍，這是不合乎事實的。這種看法，必須有這樣一個前提，就是這些國家必須是蘇聯政治的附庸和經濟的尾閘，這些國家必須是在蘇聯的影響下而喪失了自己國家的主權獨立。事實難道是這樣的嗎？不！事實是：首先，這些國家是在互相尊重平等權利的原則基礎上締結了這些條約的，他們與蘇聯締結這些條約是根據自己國家人民的利益和對外實行民主團結的政策；更不要說蘇聯也是站在同樣的立場上去和這些國家締結這些條約的。其次，這些條約包含着顯然的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德國帝國主義的復辟，要用保證團結互助的辦法來維持歐洲的持久和平。再其次，這些條約不是排他性的條約，同樣的條約，也可在這些國家與其他國家之間訂立起來，只要雙方是根據自己國家的利益和追求。最後，正因為上述的原因，歐洲並沒有因為這些條約的存在而化為與世界

聯系孤立起來的區域，恰相反，有關歐洲的一切問題，無一不是提到世界範圍的議事日程上來解決，首先是提到蘇英美三大國國的廣泛協議上來解決。

四大國聯合修正案在討論這個重大而複雜的問題時，維持了賴巴敦原案的基本精神。英美國家的正當願望，經過延遲兩週之久的討論，也根據這個基本精神，給予了適當的考慮，由於蘇英美兩國互換折衷的結果，使各方觀點逐漸接近起來，而最後經中英蘇法五強討論，終於成立了一般的協議，這協議已使英美協定和國際安全組織的一般原則及機構得到了調整，抑止了新孤立主義的傾向。

那末，賴巴敦原案的基本精神是什麼呢？首先，區域制度和區域機構不是勢力範圍，不能有完全獨立的權限，不能對世界安全組織絕對地對立起來。所謂勢力範圍，就是一種帝國主義的對外政策，這是某帝國主義國家對某一區域，認為對自己已有特殊的利益關係，而採取一種措施，使這個區域從世界的政治經濟的體系中隔斷起來，以保存自己單獨在這個區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的獨佔一切的影響。這樣的區域就是勢力範圍。但是，國際憲章所容許的區域制度，卻是同一地區的各國，為了防止侵略保障安全起見，可以締結以主權平等為原則的條約，而由安全理事會授權，在該區域發生國際爭端而爭端是屬於地方性的事件同時以因地制宜就地解決為宜的時候，就根據世界安全組織的一般原則，而予以適當的解決。其次，區域制度或區域辦法，必須適合世界安全組織的一般原則，世界安全組織必須保有最後和最高的優先權。這意思就是說，區域機關和區域辦法在處理適合採取區域行動而維持國際和平安全有關的事件的時候，它們的一切活動，必須和世界組織的宗旨和原則相符合，必須同樣遵守憲章中所規定的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包括防止侵略、裁減軍備、各項辦法和手段。但是，在採取強制行動的時候，也就是動員經濟軍事外交手段的時候，必須經過安全理事會授權，而安全理事會則有權在相當的地方，利用區域辦法和區域機關以採取在它的權力之下的強制行動。再其次，區域制度和區域辦法必須針對具體的情況，要求其具體的行動。此方說，在歐洲，為了防止德國法西斯主義及其同盟國侵略勢力的再起，同一地區的各國就應該針對這樣的具體情況，採取具體的行動，各國可以根據主權平等的原則而訂立各種各樣規定互助義務的條約，直到大家感覺世界機構能夠真正有效負責條約中所規定的防止侵略的任務以前，繼續有效。只有這樣的區域辦法和區域制度才能夠發揮充分的效果，而

不但和世界組織適合，並且是加強了世界組織。最後，在不排除區域制度和區域辦法的前提下，世界和平安全機構自然就不應再有繼續修改各國根據以主權平等原則為基礎以防止侵略保障安全為目的而訂立的條約。

根據這幾個原則來看，我們就知道，區域制度和區域辦法和國際和平組織就不是矛盾的對立的，而是國際組織的有機的一部份。世界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任何危及世界和平的國際爭端，都應該提到廣大世界性的規模上來解決，而區域辦法和區域制度則不過是在這種爭端還在其發展的初期階段，只具有地方性質而就地解決為宜的情況下所採取的靈便手段。在這裡，絕對不容許發生這樣的情況：即某一大國把某一區域認為與自己的特殊利益有關，而企圖藉口區域制度和區域辦法，把這個區域從世界的聯繫中孤立起來，和世界組織完全對立起來。這種主張和見解就是不折不扣的新孤立主義，就是帝國主義的企圖。這種主張和行動還包含着這樣一種很大的危險，就是可以在這個孤立的地區，讓法西斯殘餘勢力被小心翼翼地保護起來，替法西斯開道方便之門，佈置一個安穩的溫床。

(五) 廢除腐敗的殖民地制度

在舊金山會議上，還有一個爭論的問題，至今還沒有獲得一致的協議，這就是國際託治制度問題。這個問題在實質上也就是殖民地問題，也就是領導強國如何確定對殖民地的共同政策和共同路線的問題。目前這個原則問題的分歧暫時還只限於處置國聯委任統治地和敵國的殖民地領土。這個原則問題的分歧意見的發生，主要是由於這樣一種世界範圍內的實際關係：一方面，在資本主義各國中，分為殖民地領有國（如英法比荷）和殖民地很少或沒有殖民地的國家（如美、中），而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蘇聯從他的立國精神出發，根本反對任何殖民地制度，認為殖民地是和自己國家的最高利益不符合的一種制度。在這種情形之下，民主強國要找到對殖民地問題的共同政策和政治路線，自然是非常困難的，爭論和分歧自然是無法避免的。

在一般原則上，大家都同意在世界安全組織之下，建立國際託治制度，但是，其應有的領土必須置於託治管理的範圍？是不是包括所有的殖民地？和附屬國？託治制度的目的是甚麼？對各殖民地及附屬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態度應該怎樣？託治制度的實施辦法應該怎樣來規定？託治國家的責任和權力又如何？在所有這些問題上，都發生了爭執和分歧。

就託治制度的管轄範圍來說，英國首先表示了自己對明的態度，反對把自己的殖民地置於託治制度之下。英國代表克爾波於五月二日發表談話，公開聲明：英國反對改變現有英國殖民地委任統治地的任何片面的託治制度。除非得到領有國的同意，任何領土不能置於託治制度之下。克爾波舉出馬來越南為例，說這兩個地區就必須得到英法的同意。在回答記者關於印度的詢問時，克爾波很乾脆的表示，印度不得置於託治制度之下。法比荷三國的態度，基本上與英國相同。法國外長皮杜爾也在五月二日曾經表示：國際託治制度不能適用於法屬越南一類的領土；法國對委任統治地有全部最後主權，但願和有關國家討論這些地區的共同安全。美國則把託治地區分為兩類：①置於理事會之下向戰時島嶼；②置於大會之下的非戰時島嶼。美國認為這個計劃可以適用於雅爾達所規定的三種島嶼，即①委任統治地；②敵國領土；③根據協議置於託治之下的地區。蘇聯的觀點如何，官方一直還無表示，但從雅爾達協定的精神，不難看出蘇聯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

至於託治制度的目的，分歧就更大了，而且爭端還在繼續發展。英國主張「自治」，主張「為不能謀自治區域的人民謀福利」，法比荷諸國都支持英國的觀點。美國最初主張「獨立」，後來又改變，支持英國的觀點，認為「自治」也應該是託治制度的目標之一，認為殖民地人民可以在獨立希望方面採取其他形式來謀取進步。中國在自己的提案裡，規定了如下的條文：「視每一領土及其人民特殊環境所宜，向獨立及自治作進步之發展」。中國把獨立和自治並提，本來希望由此調和美英最初對立的觀點。後來，料不到美國會改變態度，中國代表團就堅持在自治之外，必須加上獨立，認為自治使託治制度的目的太受限制。美國代表團要求中國代表團撤消自己的提案，被中國拒絕了。蘇聯的態度則更明確，也更堅定。莫洛托夫在五月七日招待記者時就曾聲明說：「我們正面對着一個事實，當附屬國家能夠走上民族獨立的時候，聯合國應該有一個特殊的機構來促成它的實現，這一組織必須根據迅速促成民族平等與自決做它的行動的指標」。在託治委員會討論這問題的時候，蘇聯會表示，託治制度的最後目標應該是「完全獨立」，憲章中既然有民族自決原則的規定，就不應該對附屬國人民違背這個原則。當中國代表團堅持自己的提案的時候，蘇聯就馬上表示完全的贊同。因此，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就發展到中國蘇聯兩國觀點和美英法各國觀點的對立。美國的態度的改變，正像對阿根廷問題一樣，引起了美國輿論的大嘩，紛紛起來質疑。到後來，對這問題的討論幾乎變成了空泛的爭辯。英國代表克爾波一會兒

說，獨立的前途是渺茫的，一會兒文說，續巴蘇原案本來就有限制發展獨立，被保護的人民的最後自由是有途可歸的。美國代表史塔生甚至說，這是細節，為這種不重要的細節進行辯論，徒然延宕和影響了獲得一致的協定，因為目前重要的是擬定大家同意的草案。

美國態度為什麼改變呢？內幕情形我們當然不知道。但從對託管制度實施辦法上的一些傳說，不難找到蛛絲馬跡。在實地訓練上，也就是託管國家的權力和責任上，美國首先提出了自己特殊的要求，就是美國在打敗日本後，必須永久保持太平洋上的戰略島嶼，不管這些島嶼是委任統治地或歐國的領土。美國的這個要求是由美國有力的軍界和政界人士的支持做背景的。美國在太平洋的野望將領，特別是美國海軍部都一致主張由美國控制太平洋上這幾個人的島嶼。英國一方面主張英國的委任統治地不能改變，他方面又主張所有託管地區都是受託治國家的永久領土。英國反對世界被擁有權撤銷某一國家的託管權力和責任。這和美國對太平洋島嶼的要求是極其同樣的態度。蘇聯的態度就不是這樣。蘇聯主張國際安全機構對託管地區應有主要的權力和責任，這權力和責任不屬於蘇聯託管的個別國家。換句話說，對於託管地的處理，要通過世界機構，由領導強國共同負責。託管地區不能視為受託國家的永久領土，領導強國必須共同負責，應用一定機構來促進這些地區人民向獨立發展。據路透社十七日舊金山電：美國曾向英方表示，願支持美國永久佔有太平洋上這幾個與美防務和世界安全有關的日本戰略島嶼，英國表示希望以委任統治地方式分配給美國，而不受託治理事會或託管制約約束。據說，英國甚至曾對美國，因美國所提要求與合併沒有什麼不同，不如直接合併，倒是名實相符。假如這個消息確實，那末，英國態度顯然也有改變，英國原先本來是不向蘇聯單獨佔有太平洋上的戰略島嶼的。

從這些爭論的性質看來，分歧點是發生在這樣的原則問題上：為了世界的和平進步與繁榮，何底不要廢除古老而腐敗的殖民地制度，要不要對殖民地制度進行必要的民主改革。在恢復和維持任何過去腐敗的殖民地制度形式之下，世界是不可能完全穩定的和平與安全的。一個完全穩定與繁榮的世界和平與安全，需要所有殖民地和附屬國家都能走上自由獨立的道路，需要把這些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力量完全開放出來。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民主強國能不能共同負責，共同保證，提供這樣一個前途。任何一種對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政治經濟計劃都必須是民主強國所共同贊同共同參加的一種計劃。對國際託管制度，我們就作如是看。

(六) 走向和平進步和繁榮

和平事業是一個艱鉅而重大的任務，再說一遍，會議當做和平的起點來看舊金山，無論如何，它的成就就是值得我們重視的。不錯，舊金山會議上存在着兩種政治路線，兩個戰後政策目的之間的鮮明分歧：一方面是具體表現在德黑蘭——克里米亞會議歷史性的決定中民主強國同盟政策的路線和目的，一方面是一心企圖對這些決定實行怠工破壞，並想把這些決定任意修改的某方面人士的分裂主義的路線和目的。為堅持同盟政策的路線和目的，反對分裂政策的勝利和目的，在舊金山會議上展開了堅決的鬥爭。但是，經過這次反法西斯戰爭的鍛煉，全世界人民的覺醒已經提高空前未有的高度。『戰爭教育了人民，人民必將贏得戰爭，贏得和平，又贏得進步，這是目前世界形勢的規律』（毛澤東語）。世界必將引向進步，而不是引向反動。任何反動勢力猶如勝利果實被破壞和平進取的陰謀企圖，都將受到世界規模的已經覺醒起來團結起來的人民有組織力量的堅決反對。蘇聯在舊金山會議上，也完全反映了世界人民的這個作用和影響。任何分裂主義者的陰謀，任何新級別主義和蘇聯獨立主義的傾向，都沒有能夠阻撓舊金山會議的進行。民主強國在追求共同政策和共同路線上的努力，像一根紅線一樣貫穿着他們在和平問題上所達到的廣泛協議。因此，我們就抱有信心可以這樣說：國際間的任何問題只要提到世界規模的諸事日程上來，只要提到三強或五強的廣泛協議上來，就可以獲得解決。自然，暫時的反動勢力還是強大的，潮流還是存在的，歷史曲折還是可能發生的，然而，總括一句話，人民是創造的動力，人民的力量會推動世界走向和平進步與繁榮。

現階段的殖民地問題

E. 儒科夫作

由於對戰後各種問題的關切的增高，民主國家的輿論對於殖民地問題，也開始與以很大的注意。殖民地的命運，殖民地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的前途，在戰後利用殖民地國家的天然資源問題，關於殖民地的行政管理問題，以及最後對於殖民地解放的展望，——所有這一切問題，在各國不同的社會階層中，都正被廣泛地討論着。

在研究戰後各種問題時，殖民地問題之所以引起特別的注意，是由於兩個原因。第一有許多大小國家和民族的殖民地的現狀，經常是充滿着國際糾葛與紛爭的。正因為這個原因，很多的外國觀察家都認為解決甚或是部分地轉移複雜的殖民地問題，是保證鞏固的和平的一個最重要的條件。第二，在這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很多的殖民地國家在經濟和政治方面，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這個根據出發，很多人就認為在這次戰爭結束之後，殖民地的現狀是應該有一個相當的變動的。

殖民地及附屬國家的絕大多數的人民，他們表示出他們和正在進行反希特勒主義戰爭的各民主國家，是有着密切的聯繫。德國和日本的開闢，希望他們反對屬於民主陣營的殖民地宗主國家的鬥爭中，能得到殖民地人民的援助，可是他們的這些企圖都完全失敗了。殖民地國家的人民，對於侵略者的這一套虛偽的允諾，是完全置若罔聞的。殖民地人民，他們雖然知道自身所處的情境很複雜，但是他們感覺到他們自己是愛和平國家的偉大集團的參加者。他們知道法西斯主義的勝利，並不能帶給他們民族獨立，只有完全粉碎法西斯主義，才能使得他們民族獨立的日子更加臨近。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最恐怖和包容一切壓迫的禍害，其中也包括着最殘酷的殖民地壓迫，毫無疑問地，它引起了殖民地及附屬國家的人民的必然的憎恨。因此，殖民地國家的人民對於反對法西斯侵略力量共同鬥爭事業，在過去曾經作了一定的貢獻，而在今天還繼續有所貢獻，這完全是極其自然的。

當戰爭期間，在很多的殖民地國家裡都興建了工業，培植出產業無產階級的幹部，在國民經濟的某些部門中的產量也增加了。但同時據許多客觀的觀察家的證明，在這次世界大戰中，殖民地制度整個地講起來，是暴露了許多最嚴重的缺點。在反對侵略的鬥爭中利用殖民地的龐大物質與人力的資源

的任務，是遭到了各種阻礙，而這些阻礙正是從殖民地現狀的本質中所產生的。戰爭在多方面都暴露了殖民地與宗主國家之間的關係的真實的性質。這個情況，就成了外國某些報章刊物批評目前殖民地制度的一個起點。舉如美國的「幸福」雜誌，在一九四四年十月間總結戰爭的經驗時，曾經這樣寫道：

「在這次戰爭期間，殖民地帝國的破產，已表示出這些帝國不能保衛殖民地，而殖民地的人民也不能保衛他們自己不受外來的侵略。」

甚至假如說「幸福」雜誌對於殖民地帝國「破產」的這種斷然的肯定，是有着某種程度的誇張，但是這個雜誌所指出的，說由於殖民地人民的現狀，使得他們自己不能保證自己不受外國的侵略，這是應該認為是一個無可爭論的事實。

因此，在殖民地與附屬國家的現狀問題上，必需而且必不可避地要從事激烈的改革的觀念，甚至已經深入到了同盟國家某些最保守的政治階層人士的意識中去，這是絲毫值得驚奇的。

在討論戰後的前途的時候，大家時常表示出這樣一種意見，說必需根據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的大西洋憲章的精神，來重新考慮殖民地問題。可是大家都知道，大西洋憲章中並沒有包含任何解決殖民地問題的確定的方式。在這個憲章中所包括的一般的原則，是帶着普遍性的。在某種程度上，它們是可以應用到附屬及殖民地國家的，但是這些原則的一般性質，反而為各種不同的解釋開了一個方便之門。而實際上，這些原則是被各國的代表人士作過各種不同的解釋的。

舉如，美國、英國和荷蘭的當局，他們都同樣引用大西洋憲章的原則，但是我們立刻就可以看出他們對於殖民地問題的看法的差別，美國人首先認為殖民地現狀的這種改變，可以使得殖民地成為美國資本無阻礙投資的勢力範圍和成為美國商品的一個自由市場。

美國的「外交政策報告」曾經這樣表示出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國（即指美國）對於殖民地問題的意見：

「毫無疑問地，我們的國家非常關心一件事，就是要廢除在外國的

獨佔貿易和獨佔投資的制度，其中也包括殖民地。

無疑地，從這種觀點就可以找出一把瞭解美國政界與商界對於殖民地國家的命運，特別是對於戰後印度的前途的增進密切的鎖鑰。從另一方面講，印度的某些人士，他們希望利用美國資本的趨向，來打破英國在殖民地的經濟獨佔。近幾年來，美國想參加解決印度問題的願望，是特別地增長了。這特別是因為美國人希望在對日作戰中能有可操縱地利用印度的資源。美國某些著名的人士的批評，都認為英國的政策是阻礙着爲了同盟國的軍事努力而利用印度的富庶的資源。同時美國的實業家和商界，正擬擬戰後擴大美國與印度的貿易往來的途徑。當然這是不會得到英國的同意的。在印度德里出版的「阿爾密泰·巴比爾·巴特卡卡報」(Lakshya Bazar Patra)不久之前曾經說，印度駐美國的商務代表團的團長馬漢得拉已被召回，據華盛頓所傳出的消息，這是因爲印度的總督不贊成他所擬定的戰後擴大印美貿易的計劃。

在英國，大家時常提起這樣一件事實，說在戰爭期間(從一九三九年起)印度不僅償還了它對於宗主國的大部分債務，並且由於倫敦的作戰費用的結果，印度在實際上已經成了英國的將近五萬萬鎊的債權人。可是這種情況，並不能改變這一事實，就是印度始終還是在英國的政治與經濟完全管治之下的一個殖民地國家，我們前面引用過的「外交政策報告」，曾經這樣說道：

「我們有一切根據，認爲印度在目前也死像在前線一樣，是全世界所有殖民地中一個最有價值的殖民地。」

美國對於英國的殖民地制度的批評，時常是遭到英國方面的反駁的。舉如在去年年初美國的「新共和」雜誌上，曾經登了一篇英國的自由主義的政論家朱里安·赫胥黎的文章，他熱切地證明出英國的殖民地制度，並不是最壞的制度，並且除去英國的殖民地之外，在世界上還有法國、荷蘭、比利時、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及其他國家的殖民地，可是這些國家，對於大英帝國政策的批評家們，他們的言論忘掉了二件事實，就是：經濟的和社會的發展，有時能比政治上的獨立具有更大的意義。他在此地就黑人共和國里比地亞來做例子。

「這個共和國是『自由的』，但在實際上這種自由造成了這樣的情形，就是大部分的黑人是被解放了的奴隸中的少數無能與墮落的人所統治着，而站在他們背後的，就是白種人的企業。」

從另一方面講，美國的輿論界時常對一件事表示不滿，就是殖民地強國都認爲在太平洋對日作戰的美國，是一個將被日本人暫時佔領的殖民地。總之給它們原主的力量。美國的一位新聞記者哈里斯在「新共和」雜誌上所發表的「英國及其殖民地」一文中寫道：

「由於日本人代替而確立的一種更壞的帝國主義形式的這一事實，不但不能使土著人民重新回到他們白種的統治者那兒去，相反地，却刺激了他們的民族主義的增長。」

在目前已經提出的可能的解決方法，或者是立即宣佈爲敵人所佔領的殖民地國家有獨立自主權，或者就是在戰後建立一種附有緩慢的專家機構的實際管理制度，來管理舊有的殖民地，並準備他們將來的解放。可是這種意見並不能得到英國、荷蘭、法國及其他等殖民地強國方面的贊成。而同時殖民地強國必須實行嚴格的改革，甚至必須將殖民地根本來研究殖民地問題，在民主國家的輿論界，其中也包括英國，是得到相當廣泛的承認的。

爲了和建立統一的殖民地管理機關的計劃相對立，在英國的人士中間，就提出了一種國際管理機關的計劃。這種計劃是根據上管制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五項條件。他們建議在這些條件下，應將所有事務轉讓殖民地強國，土著民族和來自其他獨立國家的第三方面的代表人士參加。他們的權利，是應該爲了發展殖民地的自治，而制定出一條經濟與社會政策的總路線來。這種區域組織，同樣地也要做各種調查之類的工作。

管理殖民地的這種國際管理機關，是特別得到英國某些自由主義者的熱烈支持的，他們在這種辦法中，看出一個最妥善的對殖民地強國的分動意見的方法。他們認爲，這應該使英國在協助比地亞環境中的領地的利益而成立的新加坡比地亞託治委員會的活動，就是這是一方面的「具體的」例子。

英國自由黨的報紙「泰晤士報」，曾經這樣指出上面所提議的區域託治委員會的性質：

「這些委員會不僅僅包括在區域內擁有殖民地領土的主權，還包括其應盡的責任，區域中所有重大應盡的義務與利益均歸於該國。」

這些報紙的意見，區域託治委員會的任務，是在於將大英帝國和美聯邦劃分開的「心理障礙取消掉」。這個報紙繼續寫道：

「除掉讓美國人和殖民地政策的困難有所接觸，並鼓勵他們參加和

他們所負的責任相聯繫的工務計畫，是沒有其更寬的辦法的。

在美國某些人士中間，建立區域自治委員會的意見，是得到贊成的。可是這些人士却用另一方式來解釋區域自治委員會的活動功能。據美國人士的意見，美國和其他國家參加區域自治委員會，不僅應讓該委員會在英、法、荷、比、利時等國的殖民地中各民族的命運的進取上的責任，還要在實際上參加管理殖民地。可是同時，美國一位對於殖民地問題有權威的專家海萊爵士的「未來的殖民地各民族」一書中所表示的，從英國的觀點看，區域自治委員會，不應對擁有執行權，並且它們的作用，應該只歸於相互商討和利用專家諮詢的辦法來使總的政策「達到一致」。

海萊爵士堅決反對建立國際機關來負責直接管理殖民地的任何計劃。他認為英國殖民地發展的最理想的途徑，並不在於建立一種國際管治制度或者是給殖民地獨立自主權，而只是希望它們能逐漸形成自治領。海萊爵士這樣寫道：

「允許參加各自由民族的大英聯邦組織的前途，應該成為英國各殖民地的一個理想，這種理想可以鼓勵它們發展到某種程度，足以被接受入大英各民族的大家庭」。

英國殖民地大臣斯坦利今年一月初在英國外交政策協會之前，曾發表了同一個思想。他發給組織區域自治委員會的意見，並着重指出：「英國不能和其他的國家去享行政的責任，它只能專為自己負責起自己殖民地的行政責任」。斯坦利會經指出英國的殖民地政策特點，說它是一種趨向更可能的殖民地完全自治的願望，——但這項願望只限於大英帝國之內。

英國殖民地大臣的這個發言，會經引起美國方面熱烈的反應。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華盛頓郵報」觀察家林德萊的發言，他着重指出美國對於解決太平洋殖民地問題的特別關心。他這樣寫道：

「甚至在許多殖民地裏，這些問題原有的殖民地的條件下，看起來，美國希望解決管理這些地區的問題上，能更多的傾聽美國的意見。」

不久之前在華盛頓（Hot Springs）所舉行的太平洋學會的定期會議上，曾擬定了一個特別在太平洋地區中建立區域自治委員會的計劃。顯而易見的，就是這個計劃的起草人，是使使得英美在這個問題上達到相當的協調。這個計劃建議提供區域自治委員會以足夠的寬廣的全權，但同時在管理殖民地時，並不剝奪殖民地國家考慮管理殖民地的具體步驟的責任。這個計劃

特別考慮到給區域自治委員會以權限，「能使殖民地當局在區域自治委員會的職權決定下來發展在自治領治之下的地區中的自治權限」，同時並給與他們權利，能「使在這些區域中的任何殖民地國家，為了改善殖民地人民的幸福而作經濟與社會政策上的一般決定」。

美國的遠東問題專家奧文·拉特摩爾，在他不久之前所出版的一本「亞洲問題之決策」的新書中，向美國國務院完全和其他同盟國對殖民地政策區分開來，並且決不在任何形式之下利用美國在遠東的軍隊來恢復前殖民地制度。拉特摩爾證明出凡是倚賴於無視各民族平等的原則的殖民地政策，而保證「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他是這樣稱美國和美國的）在亞洲的影響，這都是無益的。

很明顯地，英國在考慮到這些批評的意見時，在「恢復」英國殖民地政策上就採取了相當的步驟。今年二月間英國的下議院關於政府的「殖民地發展與幸福」的法律草案的辯論，是具有極端的象徵意味的。英國的殖民地大臣斯坦利指出，這個計劃是「想提高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水平，擴大購買力和建立新的市場」，「無疑地，英國人一定會得到益處的」。

至於講到附加的經費用什麼地方去，斯坦利認為必須用於將來組織和重新訓練殖民地軍隊復員的士兵。除掉發展土著人民的技術裝備之外，斯坦利還又指出必須建立飛機協和發展殖民地空軍事業。

獨立黨的議員布朗在辯論中會說，他不想信這個法律草案會使得英國能解決殖民地問題。布朗着重指出必須重新研究對於這個問題的整個態度，並且表示出這是一項「就是根據英國為了殖民地人民的利益而修補殖民地人民自己處理得一樣好或者還更好的說法」，認為英國並不能因此「就證明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地處大英帝國的領地的」。

保守黨的議員文泰爾頓爵士，認為這項法律草案是「一個有窮盡的政策」的起點，「這個政策應該洗刷掉英國政策的廢物上的一個可恥的團體，而大英帝國為了這個政策，好多年以來都留在停滯不前或緩慢發展的情況中」。在作辯論的結論時，英國的殖民地大臣斯坦利表示他所提出的這個法律草案，並不是對於殖民地問題的一個決策，僅僅可以視為是向着這個方向所作的一小步前進。

在英國，對於殖民地必須「改革」的原則上的承認，有時候就引起了各式各樣的草案與計劃的出現，但是這些草案與計劃，對於殖民地問題的關

論戰爭罪犯

英國國會議員 D. N. 普立德作

懲辦戰爭罪犯問題的重要性是得清楚的，在軍事勝利確切獲得以後，跟隨而來的許許多多的問題，如果更能够獲得滿意的解決，幾乎每一種事情都將要依據對德國的正確估計及處理德國如何而定。就這方面說，處理德國高級的及低級的戰爭罪犯，對於世界的前途，將有巨大的影響。

三點意見

戰爭罪犯問題受懲辦。戰爭罪犯希特勒、希姆萊、赫斯、戈林、戈培爾及其同僚們，應該在懲辦罪犯的時候，便受懲辦之罪。各主要犯及流賊頭子的懲處，應該法庭依法審判以後執行。一般輿論在不同的程度上，提出了這三點。

這三點都應充分履行，如果對於戰爭罪犯不進行普遍的懲罰，在世界各國人民的良心，首先是會經受驚嚇的各國人民的良心，必然會感到這是恥辱。這就會激發深刻的不安和苦痛。各地的受難者必然會無情地以私刑處置戰犯，果然如此，就會使得一些無辜的人遭受不必要的犧牲。最主要的還是便宜了那些納粹流氓，他們會由此得到鼓勵去繼續進行地下活動，並補充新的力量，以準備另一次統治世界的戰爭。——「我們的上一輩人爲了準備一九三三——一九四五年的流賊時代，曾去掉了「一層皮，讓我們也掉一層皮來準備下一次大戰吧」。

有層層等重更意義的，是流賊頭子們應當和其餘的人同受懲罰，自由世界的眼睛都集中在他們身上，他們的脫逃會使得與論界震動，會使得人們感受苦痛，幾個大頭子脫逃比幾百的小頭子逃走的影響要大得多。如果他們不被解決，那將準備解決世界軍閥精神帝國的戰會這些人。

戰爭罪犯應該經由法庭審訊施行懲罰。如果他們只受到政治懲罰，我們就會失去人民大眾真正澄清德國的渴望，要真正澄清德國，必須由司法予以檢查，藉以證明他們的所作所爲，動機及政策的真正性質。這樣，也只有這樣，才是真正所謂由全歐洲人民大眾來審判他們。法西斯主義的真正性質，

流賊頭子們的領導本質是什麼？才能舉大白於天下；由此，我們更可以集合各地一般人民以抵拒納粹們的每一種企圖，不管納粹們怎樣變裝，怎麼努力再謀騙入它的圈套，它最後必然仍將歸於失敗。

英國政府沒有決意通過懲辦政策及消極怠工辦法，這可以由英政府對於上述三點的態度上看得出來的，特別是最後一點，這對於英國政府是一次最尖銳的考驗。任何大國都不能用「英國人民天性純良」的話來做藉口。任何軟弱的做法，其意義就是他們懼怕全面的司法檢查，因爲司法檢查的結果會把法西斯主義及德國工業後台對英法兩國經濟及國際關係資本之關係的聯繫暴露出來，而且暴露出來的會是無數的事實。

不幸得很，聯合國委員會歷次會議的公開談話及其意情形，已經在人民未蒙當面造成了普遍的焦慮。人們要問，究竟審判戰犯的預備工作是不是在認真地進行，大罪犯案件是不是已經準備和一般罪犯案件作同樣的處理，簡單言之，我國政府（指英國政府）和其他其他國家的政府是否已把處治罪犯當成一回事務來做。

提出「戰罪」問題的經過

談到這裏，我們想研究一下「戰罪」問題提出的經過。

我們不必追溯得太遠了。一九四二年十月七日，西門爵士代表英國政府在上院發表聲明，說英美兩國政府業經決定（並將是項決定通知其他有直接關係之聯合國，其內包括蘇聯）「迅即成立一聯合國戰罪調查委員會」用以調查對聯合國人民採取不利行動的戰犯，並搜集有效證據，將各地發生的犯罪案件隨時公佈，並確定任何人之犯罪行為應由其本人負責。調查戰罪罪犯，應不問其職位之高低，而且經確定應受懲罰的戰犯必須在停戰的時候交出，並且根據一嚴厲條件的條件之一。

並不願及處理戰罪問題迫迫需要，聯合國調查委員會到了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日才正式成立。而有人說這是戰罪調查委員會的濤頭，由

有代表參加。

到它成立的時候，名稱已改為「聯合國罪委員會」了，一共包括了十五個國家的代表，蘇聯並不在內。它的職責權力，西門爵士已在年報的演說中加以說明。我們已引述如上。顯然此一職責權力有相當的限制。它的工作範圍限於調查各締約國人民所犯之罪，實際上既不過問關於公法訴訟之事實而已。但等到該委員會成立以後，它的工作範圍已有所擴大，對於保護職罪受審問題，它已可以同政府接洽建議。

莫斯科宣言

自然，關於懲治戰爭罪犯最權威的聲明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德蘇斯科宣言」。宣言中關於蘇聯懲治戰爭罪犯的聲明，曾提出了「嚴正的聲明」和「充分的警告」，宣言中並說明三項領袖是代表三十三個聯合國締約國發言，「允許和德國可能建立的任何政府停戰的時候，凡曾經負責或同意參加上述罪行，屠殺或集體執行死刑的德軍官兵和納粹黨員，均應予以回他們犯下可惡罪行所在地的國家中，以便可以依據這些被解放的國家以及因此而建立的自由政府的法律來審判並且治罪。……」

這就是說，所有的罪犯均應和一般戰爭罪犯同樣治罪，不同他們在什麼地方犯罪，他們將在盟國政府共同的決定之下受到懲罰。

記者招待會激起的焦慮

委員會的工作，到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日委員會哈斯爵士（一位有名的司法官，年七十四歲）舉行記者招待會以前，都還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哈氏在記者招待會中說，該委員會成立的本來目的在調查罪行證據，並擬定犯罪證據確鑿的罪犯名單。但問題是什麼叫做「罪行」，那樣的證據才算確鑿的證據呢？這個問題不但是對於委員會是一個難題，對於政府也同樣是一個難題。特別值得注意的，委員會並沒有一個調查證據的機構。哈氏的這種說法，曾經使人們有點迷惑，那並不是哈氏或該委員會本身有什麼過失而原因有許多，誤以該委員會改了名字，十分重要，而不知這委員會不過是外使堂英領事官的調查部一類的東西。

令人更感到失望的地方還不在這里。哈斯爵士除了這種口口聲聲強調政府人員在戰時進行搜集證據有許多困難以外，又提出了英美法律系統的大

陸系統差異方面的困難。他更暗示犯罪名單，並不需要在和平實現以前，即準備完成。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哈斯爵士以委員會的觀點表示，「戰爭罪行」（作者按：何為戰爭罪犯至今並無官方的解釋）並不包括那些和敵人合作的份子或吉斯林分子的無端行爲。軸心國家，由於缺乏罪狀，及證據不同，對其國內所施行的種種暴行也不能算作「戰爭罪行」。可是，許多國家的許多官方人士已經發表過聲明，說這些罪行是應該受到處罰的。

更廣的說，他的談話並沒有明白指出希特勒也應該算做戰爭罪犯。他僅祇暗示了一下，說要是希特勒到中立國去了，就無法使納粹正統派屈服。

一般人通常立刻會想到委員會根本沒有準備把希特勒及其他戰時領袖列入犯罪名單，而這些領袖在一般人看來，卻又恰是應該列入名單最當列的。有的入甚至懷疑到沒有一個參加委員會工作的政府人員，記住，委員會並不包括蘇聯）會把這些流氓的名單向委員會提議來。

公眾的評論

由於輿論的敦促，德法約就產生了本報各欄所登載的這篇評論。

第一項結果是，哈斯爵士在此後不久就發表聲明說，如果大家認為現存的引渡非犯罪證據，不合現時的需要，是可以採取一些臨時措施。隨後，九月二十六日，哈斯爵士在下院中答覆質問的時候說，報上發表的哈斯爵士的談話，與原案不符，而且和他看來，「哈斯爵士所說的話，政府方面的意見可加以修正，必要時作廢」。

隨後，赫爾的漢文談話把處理大罪犯問題弄得更清楚些了，他表明各戰罪頭子並未列入委員會的名單內。這些大罪犯雖然一定要予以懲罰，但並不一定要用審判方式。

西門爵士的答辯

到十月三日，這一問題又提到上議院去了，西門爵士在上議院中提出了這樣的保證。他說：「盟國政策是不會縱容大罪犯的，大罪犯們被處決並指壞了這次無窮盡的罪惡戰爭，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同盟國家會容許他們逃脫他們的應得之罪」。

接着他又指出：「小罪犯們的犯罪行爲祇不過是受大罪犯們的煽惑，

他們不過是大戰罪犯們的僕從，如果我們放過了那些大罪犯，而致力小罪犯的懲處，世界的良心會因此遭受殘害。

這是值得注意的，西門爵士沒有說起審判大戰罪的問題。他說：我想，我早已估計到，在這次討論中，你們會把處治大戰罪的問題看成爲一個司法問題。

我想，由西門爵士的這些談話，一切的一切都已十分清楚了，英國政府並不要求經由法庭審判任何罪犯頭子，理由很簡單，祇要你讀過「墨索里尼審判」這本書，你就不會有什麼奇異之感了。

「我們有名單了」

很明顯地，對於這些大罪犯的名字，在委員會接受由政府提供出法庭審判的人以前，委員會所開列的罪犯名單上是不會有的。這就是說：如果政府不預備審判某一罪犯，委員會的罪犯名單上就永遠不會有某一罪犯的名字。

這之後一天，邱吉爾首相在下院中告訴大家：「在英國政府擬議草擬戰罪名單的時候，希特勒、戈林、戈培爾及希姆萊等人就已在里面了，但並不能假定對這些人一定要採取審判方式來處理。」

邱吉爾這段談話，似乎較爲清楚地說明了英國政府不會把任何大戰罪名單提供給委員會，他們的名字祇不過是列入了政府草擬的戰罪名單，當然這樣的辦法是有好的保證的，但是，截至現在爲止，英國政府並不會和委員會在工作上取得合作，將任何大戰罪流傳的名單及其犯罪證據，提供給委員會，這就令人太難於理解了。

輿論在這一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不滿，自然是應該由政府，而不是由委員會來負責任。第一，委員會的職責如何，在它成立的時候早就表明過了。其次，這項職責，無論從那方面講，都是有無限的。第三，委員會的主宰者並不是委員會本身而是各聯合國，他們才能够擴大它的權力增加它的工作。委員會迄今並未接觸過迫切的工作，也沒有做過什麼工作，而時間却早已溜過去了。

原則和政策

各項原則問題已引起大家的注意了，這些問題主要的是：

① 什麼叫做戰罪？

② 需要採用怎樣的法律？

③ 要經過什麼樣的手續？

④ 是不是需要我立國際（或聯合國）罪犯法庭？

⑤ 委員會的職責要不要予以擴大？

對於第一個問題，聯合國所表示出來的意見是並不明確的，這個問題又可以分作下列幾部份：

(甲) 是不是準備戰爭及發動戰爭就是一種「戰罪」？

(乙) 危害侵略國人民利益的暴行是否可由侵略國確定其爲戰罪？

(丙) 因種族、宗教或政治信仰所施之暴行（不論其對那一國人民），是否也應算做戰罪？

要討論第一個問題即「什麼叫做戰罪」的問題如果不用時在一定程度去確定「需要採用怎樣的法律」的問題加以研究，是無法進行的。「需要採用怎樣的法律」這個問題，又可以分爲下列三個問題：

(一) 「戰罪」這一術語是否應確定其爲「普通法或習慣法」？

(二) 如果不是這樣，是不是說，一項行爲是不是戰罪，應依照所在國的法律來判定？當然這里所謂所在國的法律並不包括納粹的法律在內的。

(三) 是不是違反人類共同意識，或國際法，或人類的普通律例三項或三者之一的行爲都可以叫做戰罪？

什麼叫做戰罪？

讓我們先來討論第一個問題，看究竟準備戰爭和發動戰爭本身是不是叫做戰罪。我們可以想像得到正統派的法律學家們，他們是會堅決反對這一點的。但是，我們如果不去抽象地而是具體地來考察這一問題，我們就會發現，納粹準備了多年的總體戰爭，它進行的方法便是一種犯罪的方法，它的目的，純然是爲了消滅和奴役全世界的各民族。這就有充分的理由證明準備這樣一種戰爭的本身就是一種罪行。指出這一點，有助於持荷歐洲的工作。

雖然，我理想論上如此，實際上是不必這樣做的，只要懲辦進行戰爭的人就夠了。因爲準備戰爭的人，差不多都犯有無數足以定罪的罪行，而準備戰爭準備了戰爭，是極費力而易引起爭端的事——那樣的話，一定要浪費許多時間。

至於侵略國家危其本國人民利益的暴行是否可由侵略國政府確定其為戰爭罪行？及因種族、宗教或政治信仰等關係所用之暴行（不論其對那一國人民），是否也應算做戰爭罪行？這兩個問題比較上是容易解答的。

對本國人民採取暴行不能叫做戰爭罪行，因為這和反對其他國家的戰爭沒有關係。因種族等關係所犯之暴行，暴行發生地點的國家，在法律上如不視此等行為為犯罪時，是不能叫做罪行的。

援用什麼法律？

我已經提到過，要解答這個問題的時候，必須要研究下列（一）（二）（三）三個問題。這些行為我已經說過，它們是不會觸犯「戰爭法律」和「慣例」的。同時，它們也並不觸犯行為發生所在國的法律。但是，它們違背了第（三）項所說的法律，如果法律是如此的。

當我們作一個國際法案件的時候，正義的常識兩者都是必需的。所有的這些行為都應當由各該國法律，國際法或聯合國法處予以裁處。很清楚的，在法學上現在已產生了一個與時俱進的內容，但世有十足的條件，使這些新內容的罪行有方法裁判。法律如果不能與時俱進，它本身不是一個可憐的東西，增加辯論沒有什麼必要的，但我們可以引用一九〇七年海牙會議的結語，它說：

「在更完善的戰爭法規制定以前，簽約國認為便宜行事計，宣佈：在簽約國通過的條例之外的條件中，在國際法的原則底護及情勢之下的居民和外交雙方，可引用文明民族的習慣法，人類律例和公共良知的規則。」

這似乎已經很清楚了，應用法律，如果那個國家不是德國或德國之同伴，在一般情勢之下，是否判定其為罪行，應依照罪行發生所在國的法律來判定的。如果犯罪案件是發生在像納粹德國那樣的國家，它根本沒有文明法律，或者由於案件全盤是奇異的以及其他的特殊理由，使得世界各國沒有一國的法律有效及適用時，那就只有用世界各國的法律及人類良知的意旨來判定了。

在我看來，並沒有什麼實際的困難，我們應該記得法律的總的原則是犯罪行為發生地點的法律來判定，我已經說過，最大部分的案件應該是聯合國的共同法律來判定。英國處理謀殺案的法律（我們（指英國）的統治階級最樂於使用最具有神祕性的武器），或其對立的大陸法，正在做着一件老實

的工作，判定數十個在柏林或其他國家大屠殺中下令殺人的高級官吏有屠殺責任。

要經過怎樣的訴訟手續？

其次一個問題是關於訴訟的手續。這一點在我看來，對於委員會並沒有引起多大的麻煩，用不着什麼解釋。委員會的調查手續是常用什麼證據的手續上。目前，英國的法律學家們，還是把委員會的證據這一點看成是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而大陸國家法庭在審判案件時則又根本不重視這類東西。雖然對案件的法律，將依照他的規則的訴訟法處理。如果是國際法庭，自可依其本身的訴訟手續處理。附帶的證據在審判戰時的證據，那將會有的，如果國際法庭的訴訟手續上，實質上深表懷疑。

聯合國國際法庭

再下一個問題，就是不要建立一個國際法庭（或者更確切地說聯合國法庭）。自然，各個國家的法官都可以處理許多犯罪案件，但很明顯地，有些案件並不能看成是只有司法性，特別是自來一國來處理的。因此，當要有一個國際法庭，有國際法學家們都贊成，使它能進行裁判。

最後的一個問題，是委員會的權力應當加強。從我們上面所說的話看來，委員會的權力是太少了，它所擔任的任務應當加強。委員會應當有權力，聯合國家應當重視這一點。目前我們討論三種證據，委員會應當有權力調查所有屬於這三種證據的條件，同時又能處理這類案件。

但是更重要的，是委員會有代表參加第一委員會，以與各國國家有決心處理這一問題在分派代表或其他問題上是不會有多大的困難的。同時，聯合國應當發表一個明白的宣言，說明委員會的職責，以澄清各種懷疑和一般人的焦慮。這一宣言應當說明所有最高級的職責以及至最低級的職責，都要付諸審判，並對委員會的權力及新職能有所解釋。

結論

總之戰爭罪必須令人滿意，其重要性比初見的要重要得多。此外，在懲治戰爭的時候，不要忘記，應該受懲罰的，不僅只是納粹和納粹的後台，所有英美的暴尼黑份子和孤立主義者也應該加以注意。而後那些急於恢復他們對德國的投資，去和德國斷斷的卡特其建資本上的聯繫，以至熱中於「樹立以布羅維克主義」的行動，應該停止而受懲罰。無從從那一方面說，和蘇聯合作者不可估量的利益。（朱丹譯自英勞動月刊）

晉察冀解放區的土地政策

方 草

一

戰前邊區農業生產手段的分配是極不合理的，據北岳區二十八個縣中的八十八個村莊的調查，一九三七年抗戰以前佔地村戶數將及大半的貧雇農，每戶平均兩畝半至七畝半左右的耕地，而地主所有土地總平均每戶則在九十七畝以上，各階層的土地分配狀況如下：

階層	戶數	%	每戶平均有地畝數
工人	二·一〇%		一·七八畝
雇農	五·八二%		二·五四畝
貧農	四一·六三%		七·四〇畝
中農	三五·七九%		一八·〇九畝
富農	七·二六%		五六·二七畝
地主	二·〇三%		九七·八九畝
其他	五·三七%		二·八一畝

另一調查戰前地主富農在農村總戶數中合計為九·二九%，佔有土地三〇·〇四%，佔有水地四五·七〇%，中農、貧農、雇農、和工人佔總戶數的百分之八十五·三四，佔有土地百分之六十一·〇一；佔有水地百分之五十二·九三；在勞力分配方面，地主富農合計佔有全部勞力的四九·九三%，牛一〇·三五%，豬三〇·一八%，工人、雇農、貧農、中農佔有勞力合計：豬馬的八·〇%，牛七八·九三%，豬七八·一二%。如果把這些數字組成簡單的比較，則地主富農在農村經濟中的優勢就更加顯赫了：

階層	戶數	地	水	牛	豬
地主	一	一	一	一	一
富農	一	一	一	一	一
中農	九	一六	一一	一一	三

僱農（強）（強）（強）（弱）（強）（強）

工人

統籌說，戶數比地主富農多九倍多的貧、中、雇農及工人在全部土地佔有上只多〇·六倍，而水地只多〇·二倍，在畜力的佔有上，雇農的畜力（馬）是掌握在地主富農手中，中農以下各階層牛和豬也不多。很明白，土地及主要牲畜（特別是從貧富來看時）是集中在地主富農手中，因而大無地或土地不足而貧苦農民，不得不租地主及富農的地，忍受極殘酷的封建地租剝削。

地租剝削形式，除物品地租以外，部份地方還存在着最落後的力役地租的殘餘，如佃戶給地主無償的耕種一部分土地、拔草工「幫忙」及服雜役等。平漢線附近及大河沿岸則有貨幣地租形式。這種貨幣地租是「上打租」（頭年秋季交租），租一年歸一年，不請長租子，這是一種地租剝削，商業投機和高利貸互相結合的剝削形式。無論那種地租形式，實質上都是封建地租，其租額一般收穫量的五〇%——七〇%。除正租之外，還有各種各樣的額外榨取，如「管租」（一斗租子加一升豈或一細草），「管移」（除正租之外，地主給外要的菜、水菜、草料……），「小租」（如「租草」，「租料」，「租雞」，「租雞蛋」等），及收租時所請的「加一租斗」，「加二租斗」等，所以地主的剝削實遠超過農民所得的剩餘生產物。和兩湖地主是最大地主（五台山喇嘛寺院每年收正租八十石以上），佃戶給地租時，走一寺院地租數目一即，焚燒香燭……當他回來時，地租子時，往來還待我等悉數佃戶負擔。其地地租喇嘛地主對農民的要求，還享有「住夜權」！

高利貸剝削其次上有四種：一、地主土豪商賈及部份富農所放，年利率在一分七至三分、五分，利大利小要看「人值不值」（有無房屋），貧農借錢，和錢特別大。在年頭或急用時，常以月利四分到五分借錢，並須以土地作抵押，一般比期都很短，到期如不上錢土地即歸債主所有，農民因之失去許多土地。此外，還有所謂「現扣利」（在借錢時先扣下第一個月利息），「出門利」（借錢出門之後，不管年天一天都算一個月），「臭虫利」

，「利源利」等黑暗的高利貸剝削。另外一種是商業買辦及一部分銀行所放的款，年利雖在一分左右，但他對的放款，大部份就是買青，或者放給地主，讓地主以投機或放高利貸。

在這種情況之下，再加上過去農民所受的繁重賦稅，遂使農民日益貧困，不斷發生飢荒，大量死亡或逃荒，土地遂飛速的向地主富有者集中。

另一方面，農村經濟上及帶有深刻的半殖民地性質，在日本帝國主義「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經濟掠奪政策之下，蒙蔽居平漢線之南的農民，將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均種上棉花，替日本帝國主義生產原料。而日常必需品，甚至一部分食糧，都要依靠輸入。商業買辦階級則從中操縱剝削。舊有的小手工業及家庭副業迅速趨於破產，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支配日益加強，農村經濟日益向落後農村的道路前進。

很清楚，如果不實行一個正確的土地政策，不改善廣大農民的政治、文化，特別是物質生活，從經濟上給以援助，農民便沒有精力與心情參加抗日戰爭。而如果没有廣大農民羣衆自覺的積極的參加與支持，則晉察冀邊區——敵後堅強的抗日民主根據地之一的創造與堅持是不可想像的！

二

七年以來，在不斷的殘酷戰爭中，晉察冀邊區堅決的執行了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使廣大農民從戰前的貧困悲慘的境地超脫出來。首先，在邊區絕大部份的地區普遍實行了二五減租，並以年利一分為標準去清算了過去的債務關係，取消一切正租之外的雜租，小租送工等額外附加。現在邊區一般的租率已減少了原租額的三分之一。在減租減息後農民所得的實際利益，僅據一九四〇年六月，四個專區不完全的統計，減息數已達三十二萬六千餘元，只二、五兩專區減租額即達一萬二千二百九十餘元。近年來推行政策日益普遍深入，糾正了那種對佃種地不減租或減租後租額仍超過百分之三三五等現象，使減租工作更加貫徹。

其次在深入的減租減息中，依據以民政府民法債權補所定的清理債務原則，又掀起了清理舊債和「抽地換約」運動：即「未死」之抵押地，得按年利一分訂立新約，將土地抽回。結果使許多抗戰前被高利貸者巧取豪奪的土地（農民稱之為「割地割心頭肉」）部份地歸農民抽回了。據第一、二、三、五四個專區不完全的統計，到一九四〇年六月已抽回土地六萬四千九百餘畝。

。在執行中曾有些與地與抵押地混淆不分，同樣處理。或將死契地抽贖的錯誤，但經過及時糾正，已大體糾正了。

再其次是適當保障佃戶的土地使用權，這對貫徹減租保證交租與提高農民的生產熱情都有莫大的作用。因為地主常以奪回佃地來報復實行減租的農民或假借各種名義如典、贖、收回「自耕」，以及改定租為伴種等抵抗減租，以達到明減暗不減，造成農民對減租的顧慮和生產信心的降低，特別是從去年以來許多地主強購未定契約或契約期滿（大部份是一九四〇年所訂的三年至五年的租佃契約，到現在已經滿期），不願佃戶生活，曲解政府法令，大量收回土地，甚至用收地的威脅來強迫佃戶，或轉移負擔到佃戶身上，引起羣衆嚴重不滿，影響農民羣衆抗戰的積極性。如北岳區有些農會會員在佃權沒有得到保障之時，曾自動退出農會，以示抗議，甚至激成個別農民走到另一極端，抗不繳租，同時生產情緒亦大受影響，不積極地改良土地，只消極地割佃土地。已經很清楚，適當的保障佃戶權益成了最迫切的問題。故益發證明去年邊區參議會通過的租佃條例，規定尊重業佃雙方契約，但在抗戰期間由租人收回土地致承佃人無法生活時，應減收一部或暫時不收，並鼓勵訂立較長期的租約的正確。在這種精神的切實執行之下，已獲得一個適當的解決。

第四，經過民主的動員說服地主調劑二部份土地（多餘的自耕地，或無力耕種的土地），租給無地或土地不足的農民。邊區在方式上過去曾發生過一些缺點（如個別的強迫現象），但確實解決了一部份無地農民的耕種問題。最後，廢除了過去三十餘種苛捐雜稅，實行了公平合理的負擔政策，大大減輕了人民的負擔，抗戰初第二、三年執行「合理負擔」及「救國公糧」，都是戰爭動員的性質，費者羣衆一般負擔都很輕，一九四一年以後更停徵田賦廢免一切捐稅，實行了一年徵收一次的正規稅則，與有免徵點與累進最高率的統一累進稅，並且這種統一累進稅的稅率也是在逐年地減低中：

- 一九四一年 統累稅每分 一、五市斗
- 一九四二年 統累稅每分 一、二五市斗
- 一九四三年 同上 〇、九市斗
- 一九四四年 同上 〇、八五市斗

除此以外，民主政府又給農民以各種直接的援助，農貸是逐年增加的，一九四三年政府雖在極端困難之下，仍發放了三百萬元的農民貸款，今年光農貸貸款就有二千萬元，並貸出籽種一萬六千石，使農民補充了牲畜三萬二

千餘畝，補助費共二十六萬餘元。遇有災荒，優稅酌減，每年由春耕到秋收，派員逐戶調查，無代價的助耕，助收或「換耕」、「換收」（職權請見下）。

對於地主方面，黨的政策是保障地主土地所有權，即在減租減息之後，保證租額和利息。黨實業家與農工發動之初，曾有部份農民憤於過去地主的壓迫，不種租不交息，對黨的這一政策表示不滿，稱之為「黨的右傾」。但經過這一番苦悶與解釋的工作，也將正了黨案中的這一傾向，並在不大影響農民的生活，不使廣大農民失去土地使用權的情況下，地主有自由處理其土地（如轉租或收回自耕等）之權，及轉租契約之自由。今天強調適當保障佃農，是照顧抗戰期間農民生產與抗戰情緒，而非確定永佃權。而且為了保障佃農的生活，我們也在多方面加以照顧。如：在負租政策上，負擔面已達到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使過去集中在地主富農身上的抗戰負擔大大減輕；又如由於抗戰後貨幣跌價，影響錢租地主的收入，黨曾動員農民自動將錢租改為半錢半租，因此，這一政策也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擁護。

三

上述土地政策實施以後，農民對於土地的要求和對於擴大生產的熱望大大地提高了，他們也就有興趣，並且有能力來不願購買、典進或贖回土地，遂使七年以來在農村經濟關係中，特別是土地關係和階級關係中引起了若干非常明顯的變化。首先土地關係的變化是階級與抗戰前相反的方向前進，即土地由集中走向分散：

(一)從典當關係來看，抗戰以來，當出土地者多屬地主與富農，而當入土地者則主要為中農貧農。

據一九四二年阜平八個區的調查，一月至八月份內當地共一、〇〇八畝，佃戶依法承當的（原佃戶有依同等條件承當之優先權）有八二二畝，其他人民承當者一八六畝，佃戶承當的在八一·五五%。

又據北岳區二十四個村的調查，從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二年各階級典當關係：在八三四·五七畝的當出土地中，地主和富農共五九九·〇四畝，即佔全部當出土地的七一·八%（關），佃、貧、中農當出二三五·五三畝，不到二八·三%。在當入土地一、〇一九·八七畝中，地主和富農當入者共計九〇·二〇畝，佔不到總數的百分之九，而九二九·六七畝，即百分之九

十以上皆為中農及中農以下各階級所當入。

(二)從土地的買賣關係來看，抗戰以來賣地者多為地主和富農（特別是地主），而買入土地者多為貧農中農及至佃農和工人。據一九四二年阜平的調查，當年頭八個月內共賣出土地六二〇畝，佃農承買（出租人出賣其土地時承佃人有依同等條件承買之優先權）四九二畝，其他人買入一二八畝，原佃之承買佔總數的七九·三六%。

再據北岳區一九四三年的調查（靈石區二十四個村莊）抗戰以來土地買賣關係如下：（單位畝）

工人	佃農	中農	富農	地主	小工商業者
4	7.3	492.46	765.60	1061.36	1450.61
0.11	0.2	13.47	20.88	29.06	36.13
38.88	106.15	929.89	132.16	113.7	35.25
1.33	4.62	30.39	51.1	5.16	1.59
					2.71

如上表所示，中農、貧農、佃農、工人和小工商業者所買的土地是絕對地增加了，尤以中農貧農增加的最多，總計中農貧農人土地佔各階級買入全部土地中的一半以上（五四·一%），其次為貧農佔三〇·三九%，佃農、工人及小工商業者買入合計為八·六九%，而地主買入者只佔一·五九%。富農買地者亦僅五·一六%。但在出賣土地中主要的則是地主，佔三六·一三%，其次為富農佔二九·〇六%，二者合計佔總數的六五·一九%。中農以下各階級買地合計佔三四·八一%，大部份是買地置近地，置地買好地，或買地換水地，小部份是因迫了水、旱、窮災才轉業或轉地謀生而賣出土地的。

由此可見戰前土地飛速地向地主富農集中的情況是結束了，相反的土地是從地主及部份的富農手中逐漸向廣大缺乏土地的貧農中農以及新起的富農手中分散。

這種土地關係的變化，再加上敵人對我經濟嚴重反覆的破壞，就引起了農村階級結構的變化。北岳區靈石區四五個村莊的一個調查，就清楚的回答這個問題：

(一)地主經濟在逐漸削弱和下降中：地主在抗戰前（一九三七年）佔總戶數二·四二%，到一九四二年下降為一·九一%；土地佔有上從戰前的一六·四三%降到一九四二年的一〇·一七%，在畜力的佔有上，驢馬從一

八。九〇%降到六。六%。中。農亦同樣是減少的。但地主土地的減少有一部分是抗戰初期被徵收出去的。

(二)富農經濟時期財產下降，現在又開始有些上升。如在同一調查中關於富農的統計如下：

年 份	戶 數	土 地
一九三七	八。四%	二一。九三%
一九四一	七。七八%	一九。一五%
一九四二	七。八八%	一九。五六%

從這說，富農經濟會從戰前到一九四一年為它的下降的頂點，到一九四一年以後又開始恢復上升，以戶數來說，從戰前的八。四五%降到一九四一年的七。七八%，但從四一年到四二年則回復到七。八八%。土地佔有從戰前的二一。九三%，降到一九四一年的一九。一五%，但到一九四二年又回復到一九。五六%。富農經濟的一度下降，除了戰爭環境中敵人的掠奪破壞其經濟原因外，就是因為中國的富農帶有許多封建的成份，他們往往和地主一樣出租一部份土地且經營高利貸進行殘酷的剝削。為中農貧農們不滿，在執行減租減息時對富農的租息仍照減，所以富農在開始時期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但由於根據地對封建剝削和半殖民地性的完全被根絕，使得資本主義的發展完全暢通起來，這對富農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近一二年富農的比重有些上漲，可以證明這一點。根據調查，有不少中農已經發展為富裕中農。其所以沒有大量轉變為富農經營者，基本原因是受了戰爭環境和敵人反動政策的影響，一旦進入和平環境，富農經濟發展的前途是很大的。另外，在新民主主義的統治下部份地主已經轉變為富農經營形式，這種轉變也會繼續下去。

(三)中農經濟大量的暢快的發展，一九四三年中農在農村戶口中所佔的比重已由一九三七年的三五。四二%上升到四二。三三%。土地佔有一九三七年僅四一。六九%，但到一九四二年差不多已擁有全部耕地之半(即佔總土地量之四九。一四%)，畜力上馬馬佔五二。一六，牛力佔七九。四一%，體力佔六一。八八%，中農經濟是目前農村經濟中發展最迅速最膨脹的力量。

(四)貧農經濟迅速上升，貧農佃戶數合計，在戰前僅佔全農村總戶數的一半(僅農七。〇六%，貧農四〇。四七%，合計為四七。五三%)，到一九四二年即達為四〇。九五%(佃農減至三。一三%，貧農減至三七。

七二%)，土地佔有從一九。一〇%，增至二〇。一二%。

至於抗戰後邊區農村各階層階級的具體變化根據同一地區的調查，從一九三七——一九四一年四年間的變化來看：

地主：保持其原來社會地位者僅七六。三八%，其他主要的轉化為富農(一一。〇二%)，其次是下降為中農(四。七二)及少數降為貧農或其他成份(合計為六。八%)，下降為貧農中農或其他成份的，一部份是因為家所獲。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由於減租減息，減弱了地主階級的封建剝削之權，地主階級感覺到坐吃地租比不上種業或直接參加其他生產過程更為有利。因此有一部分地主自動轉化為富農的經營，或者自己用僱工經營一部份土地成為經營地主，例如：遼北年來北岳區大部份中小地主都開始參加了耕種(在不使佃農失去土地無地可耕，不使影響佃農生活的條件之下，對這種地主向資本主義經營的轉化，我們是允許的)，也有地主將其土地變賣，放棄其封建剝削而轉向別業，如平西一部份地主，由於羊毛稅的減免，大量變賣羊隻轉向畜牧業方向發展這是一個明證。雖然轉向工商業方面的經營，在目前尚因為戰事的頻繁，敵寇的掃蕩而有所顧慮躊躇不前(目前確有一部分地主留戀着土地，留戀着封建剝削的剝削，甚至少數收租佃租子也願意，因為民主政府保護他們的土地所有權，敵人無從破壞其剝削)，土地總量是不定的)，但在戰的和平環境中一部份地主湧向經營道路是可以預見的。

富農：抗戰後大部份是保持原來地位(八〇。三二%)，一部份下降為中農(一五。一五%)，甚或貧農(一。二九%)。(下降為中農或貧農的，中農一部份是因分家所致)。也有一部分因戰爭中勞動力的減少(敵人是殘酷地剝奪與掠奪我們的勞動力的)，不得不拋棄其土地而變成地主。

新富農：由於深入的減租減息及合理的負擔政策(統累稅)，貧農中農發展了上升為新富農，而新富農的發展將不再階級資本主義的剝削(即富農經濟的發展完全建築在剝奪廣大農民的土地，使他日益陷於飢餓貧困與破產的境地，從而殘酷地剝奪他們成為農奴階級勞動者，並進而剝削其全部的剩餘勞動力)，他們將要成為一種新型的富農，即與舊有式的富農，這種富農的發展在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中將擁有其一定的地位與作用。

抗戰後中農的比重不斷增加，但原有中農本身的變化也是不少的，計保持原有地位或變成富裕中農者佔八八。三七%，上升為富農者一。六七%，轉變為小工商者〇。一一%，下降為貧農者八。一八%，少數變成地主或游民。貧農上升為中農者，佔原有貧農總數之一八。六六%，下降或轉變或

其他階層者合計不滿佔三。五四%，上升為富農者佔〇。二四%，其餘七八%雖仍為貧農，但因為負擔減少，土地增加（當入，買入，「調劑」，租入，或開荒、修濬等），經濟生活也已大大提高，接近於中農的水平者不在少數。說到雇農和工人較大一部份上升為貧農（合計佔四四。〇四%），甚至中農（合計為一六。二五%）或富農（一。〇二%），在戶口中所佔的比重是日益銳減者。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各階層的變化，仍說明同樣的趨勢。

四

正因為實行了這樣的政策，所以七年來冀東邊區的人民才那樣廣泛地不顧身的進行對敵鬥爭，掀起那樣高的生產熱潮，與那樣積極的擁護民主，否則是不會這樣的，茲將要分述如後：

自一九三七年冬八路軍開到魯冀邊區，提出「二五減租」「一分利息」等改善民生的口號後，廣大人民就逐漸發動與組織起來，而特別表現他們的威力的，則是在一九三九到四〇年上半年普遍實行減租減息以後，當時敵人正進行春季「掃蕩」，冀東就以無比的英勇配合主力軍作戰，讓邊區農會的總計，當時十七個縣農會會員參加的達二萬人，配合作戰三十二次，獲敵軍人二百八十四次，破獲敵交通四千里以上。其後，冀東地帶的廣泛展開，冀東地帶的創造及數達六十三萬民兵的發展，對根據地的堅持，起了異常偉大的作用。僅從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五年中之統計：北岳民兵參戰次數達一萬〇六百四十九次，擊傷敵一千五百一十七人，俘虜敵三百六十八人，除奸一千六百五十八人，繳獲武器軍用品及破壞道路橋樑封鎖溝等達六千餘人，而民兵之幹部及隊員共犧牲者達一千六百餘人。敵一六四三年秋季三個月內「掃蕩」中，不顧犧牲夜襲門，殺傷敵人在三百六十四人以上的民兵爆炸英雄李勇和他本村十二個人的游擊小組，像常在敵人出沒的地方，緊密鬥爭及為敵人捕獲嚴刑拷打時，對敵不供一字，始終仍痛罵敵人的平山村黨古道同志等人民的英雄和烈士是不勝舉的。這種羣眾創造的「奇蹟」，顯然是與土地政策的實施，農民生活之獲得改善分不開的。他們的切身利益與抗戰利益已密切結合起來。冀中平原在敵人圍攻如林，公路如網的分割期間，燒光、搶光、殺光的摧殘下，我們的陣地始終堅

持並於近來取得新的勝利，如果沒有土地政策執行後大農實民的發動，這種「奇蹟」更是不可能有的。

減租減息對羣眾生產情緒的播揚亦是顯而易見的。北岳區從抗戰到一九四三年六年之中恢復了耕地和修築濬地共達五十五萬畝，開水渠鑿井使旱地變為水地者共計十四萬七千八百餘畝，一九三九的空前大水災的破壞，抗戰以前要十年八年才能恢復，我們則在四〇年中就基本上恢復了過來。

這如果不是羣眾在廣大羣眾的生產熱忱之下，那是不能完成的。雖然自從一九四二年以後，由於戰爭的頻繁，敵寇蹂躪的破壞和曾有一時期，領導上沒有用大力在減租減息過程中加強推動，致使羣眾的生產運動未能達到應有的程度，但當領導一振奮，武力與生產結合以後，羣眾的生產情緒乃空前高漲起來，如前年秋季，敵寇大「掃蕩」，雖給邊區人民帶來了災難，但羣眾的生產熱潮，自前年以來即有很大的發展。據邊區十七個縣不完全的統計，做了農戶計劃的共四萬五千六百九十七戶，截至去年十月北岳區羣眾方面組織農工、鑿工、包工共七萬七千組，參加之男女勞動力在二十萬人以上，佔全區所有的勞動力百分之三十三。有的村子如曹莊等勞動力全部參加了農工組，女勞動力參加互助的達百分之九十三，半勞動力組織起來的亦有百分之九十，他如魯九天等中來農工二百二十一個，經過去冬一時間內，省了一百四十九個牛工，勞動率提高了百分之六十六。據北岳區去年十月間的總結共開荒三十三萬五千餘畝（開荒荒在內），修築濬地七萬七千餘畝，平毀汽車路、封鎖溝、修築八千六百餘畝。總計較去年增加耕種地四十二萬二千餘畝，變平地為水地九萬五千餘畝，修築肥二萬一千九百餘畝，增加肥料一千一百萬担，土地實做到者達三、四萬。在大生產運動中，並且湧現了鐵胡順義、安其成等大批勞動英雄。羣眾的這種生產熱忱和勞動互助的發展，不僅克服了敵寇破壞所造成的人力和畜力不足的困難，而且克服了今天土地日益分散於小農手中，土地使用更加分散和隨之而來的生產力降低的困難（這原是資產階級經濟學所不能解決的矛盾）。因為這種建築在個體經濟之上的集體勞動的生產方式，其生產力之高，不僅超過了分散的個體生產，而且也超過了社會主義的經營方式的。

邊區民主運動的經驗所證明的亦是如此。一九三八年一月間各界代表大會選出邊區行政委員會後，即於進行村建（一九三九年春）改造村政，但當時由於區在廣大羣眾身上的對敵鬥爭尚未普遍減輕，羣眾沒有把投權看或與自己有什麼切身關係，所以投權的現象亦不普遍，羣眾被投權與「抽地繳納

「普遍展開以後，一九四〇年七月的大民主運動，才真正普及到農村

的每個角落。北岳區十九個縣的統計平均八〇%的選區公民參加了選舉，最

高的（平山）達九〇%。其中七個縣各階層參選的情形和選舉的結果是：

僱、貧、中農參加村選者佔其公民數八七%，當選為村各委員會主任者

佔總數八七·九%，當選為村主席者佔九〇·九%。參加縣級選區者佔其公

民數七二·六%，當選為議員的佔全數八二·一%，說明了廣大農民羣衆是

積極參加了政權的。

但同時地主和富農參加政權的積極性也是不落入後的，他們參加選舉

亦佔公民數的七二·四%（縣）至八七·二%（村），當選為村各委員會

主任佔六·八%，村主席七·六%，當選為縣議員一七·七%，他們在農村

人口中那樣小的比例（合計只佔九·五%），竟這樣大的百分比，可見他們

對新政權是非常熱心的。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呢？原因是很簡單，就是避開的

雙十綱領、中共的土地政策決定都給了地主和富農以人權、政權、財權的保

障。保障他們的土地所有權和保障在減租減息之後，給他們交租交息。同時

他們也已經看見，在淪陷區的地主富農者，並不比一般人民更好些，他們除

們自己本身的利益。地主的態度如此，農民的態度也就很清楚了，農民對土

地政策的反映說：「一面改善生活，一面鞏固統一戰線，交了租可以顧住地

主的生活，這是應該的。這樣地主願意出佃，我們也有地種了。」

因此土地政策實施後，不僅發動了廣大農民自覺的參加抗戰，提高了各

階層人民的生產熱忱，而且也鞏固了農村統一戰線，和緩了農民與地主之間

的尖銳矛盾。

五

綜上所述，魯察冀邊區在土地政策的執行過程中，雖然會發生過別的錯

誤與缺點，而且今天在土地問題上也還有些糾紛需要解決，但是確已創造了

豐富的實踐經驗，使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

我們過去所執行的政策是正確的土地政策。

它發動了廣大農民羣衆——抗戰的主力軍的抗戰的高度熱情與生產的積

極性，也創造了廣大人民的民主政治之物質基礎，真正鞏固了農村各階層的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它是完全適合於抗戰建國的需要的。

它削弱了對農村的剝削，促進農村經濟的向上發展；過去集中在地主

富農手中的土地逐漸分散於廣大的貧苦農民手中。同時農村的階級關係亦發

生了變化：僱農、貧農甚至中農上升已成了一般的趨勢。抗日民主根據地的

附錄 察冀邊區租佃債息條例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察冀邊區第一屆參議會通過，同年二月四日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公佈。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保障邊區人民之土地所有權，及土地使用法，發展農業生產，活潑社會金融，特依中華民國民法中華民國土地法之基本精神，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關於租、佃、債、息，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悉依民法土地法之規定。

第三條 本條例之施行條例另定之。

第二章 租佃

第四條 凡出租佃之土地，不論其地租為實物或現金，出租佃個人應一律按照原租額或百分之二十五。

第五條 前項原租額係指本條例施行前之租額而言。在已實行減租地區，新訂之租額不在此限。

第六條 依前條之規定，實行減租後之租額，或新訂租佃契約之租額，均不得超過新地正產物收穫總額百分之三十七點五。超過者應減為百分之三十七點五，不及者依其約定。

第七條 佃戶耕作地，出租佃人供給承佃人以農具肥料耕畜或其他耕作上必需之物資者，得視其供養多寡，雙方就正產物依約分配。但除扣還出租人所供物資之等值代價外，出租佃人所得不得超過總額之百分之三十七點五。超過者應減為百分之三十七點五，不及者依其約定。

第八條 以農作物主兼種菓木之耕地，其減租及減租以後之租額適用第四條之規定，以菓木為主兼種農作物之耕地，及專種菓木之菓木地，其

減租之標準及減租後租額之限制，由各縣依當地習慣按菓木性質分別具體規定之。

第九條 前項兼種菓木之耕地，其菓木之收益，以正產物論，但雙方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

第十條 耕地產物收益之分配，應依雙方約定為之，無約定者，從其習慣。

第十一條 前項無約定之副產物，超過正產物收穫總額十分之一者，其超過部份，以正產物論。

第十二條 莊園、二東家之中間剝削，雜租、小租、送工、非運租斗、上打租等額外索取，一律禁止。

第十三條 出租佃人借給承佃人以糧食者，有無利息依其約定。

第十四條 地租之交付以實物或以現金，均依其約定為之。

第十五條 地租一律於產物收穫後一月內繳付，兩年作物與約定分期繳付者從其約定，收租或送租亦依雙方約定為之。無約定者，從其習慣。

第十六條 前項地租之交付，承租人不應按期繳付，逾期者應先以一年繳付時，出租人不應拒絕收受，承租人亦不得因其收受，而准其為減租之承諾。

第十七條 因不可抗力之災害，正產物全部被毀者，得免付當年地租，因災歉收者，出租人應依實際收穫之正產物按三十七點五，與六百二十五之比例分配之。

第十八條 土地之租佃，須一律締結書面契約，契約期滿，出租佃人得收回其土地，但在契約期間，出租佃人收回土地致承租佃人無法生活者，應減收一部或暫時不收，並另定新約。

第十九條 契約期滿，出租佃人收回土地仍行出租佃佃佃或自耕未滿一年再行出租佃佃時，原承租佃人有依原租佃條件承租佃佃之權。其自耕已

滿一年後再行出租，但原承租人有依同年條件承租承佃之優先權。

第十四條 定有期限之租佃契約，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解除之：

- 一、因不可抗力之災害，耕地全部毀壞者。
- 二、承租承佃人有故意毀壞地產行為，以及損壞租地之附屬物不負法定之賠償責任者。
- 三、無故荒廢耕地在一年以上者。但備耕地，經官廳不在此限。
- 四、承租承佃人力能應租而無故不租，或積欠地租達二年之總額者。
- 五、承租承佃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或有其他原因，不能繼續耕作者。

第十五條 不定期限租佃耕地之契約，非有左列情形之一時不得終止之：

- 一、承租承佃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時。
- 二、承租承佃人拋棄其耕作權利時。
- 三、出租承佃人爲自任耕作或爲維持一家生活直接經營耕作收回土地時。
- 四、有第十四條一、二、三、四款之情形之一時。

依前項第三款規定出租佃人收回土地時，應於一年前通知承租承佃人。承租承佃人如因土地被收回無法生活者，適用第十二條規定。

第十六條 不定期限租佃之耕地，出租佃人收回土地自耕未滿二年再行出租時，原承租承佃人有依原租佃條件承租承佃之優先權。再行出租佃人時，原承租承佃人有依同等條件承租承佃之優先權。

第十七條 果實承租承佃之土地，視爲承租承佃人取得其永佃權，非承租承佃人自願放棄其使用權者，出租佃人不得收回。但承租承佃人有第十五條第一、四兩款情形之一者，出租佃人有要求停租停佃之權。

前項果實承租承佃之土地，其尙未訂立文契或文契遺失者，應即補立文契。

第十八條 租佃關係存續中，出租佃人出賣其土地時，承租承佃人有依同等條件承買之優先權，如承租承佃人願放棄其優先承買權而爲第三人所承買者，承租承佃人仍得就其土地繼續租佃至契約期滿。

第十九條 租佃關係存續中，因不可抗力之災害致土地之一部被毀者，承租承佃人有要求出租佃人減租之權。

第二十條 承租承佃人得自由在租佃之土地上，施行土地特別改良，出租佃人不得因土地改良而要求加租。

前項所稱土地特別改良，係指承租承佃人於保持耕地原有性質及效能外，以地加勞力資本之結果，致增加耕地生產力或耕作便利者而言。

第二十一條 租佃契約依法解除或終止時，當事人彼此尙未終了之權益關係，依左列規定辦理之：

- 一、承租承佃人依第二十條規定，而爲土地特別改良者，出租佃人應給付承租承佃人以土地特別改良費，但以未失效能部份之價值爲限。
- 二、承租承佃人於不影響耕地原有性質及效能在承租承佃之土地上培植有苗木或其他樹木者，得視苗木或其他樹木成長情形，出租佃人應給付承租承佃人以相當之代價，但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
- 三、承租承佃人積欠之地租，應全數清償，其一時無力清償部份，得改爲借貸關係，另立新約。

第二十二條 貧苦抗日軍人家屬及孤兒寡婦，因家中無勞動力出租土地以維生活，其所收租額及其他收入平均每人每月在統一累進稅滿兩個月以下者，不受本條例第四條第五款之限制。

前項富力包括免稅富力在內。

第三章 債 息

第二十三條 凡新訂之借貸契約，其利率得由雙方自由約定之。

第二十四條 現和利、出門利、印子錢等高利貸一律禁止。

第二十五條 舊債之清理，其利率在年利一分以上者，一律按年利一分計算，債權人已付利息超過原本一倍者，停利還本；其超過原本二倍者，視爲借貸關係消滅，本利停付。

前項舊債係指本條例公布之前之債而言。債務清理後，債權人應將原有債權憑證債務人，原約遺失者債權人應對債務人出具借貸關係消滅之證明。

第二十六條 依第二十三條規定新成立之債，及依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減息後之債，債務人應償付之本息對債不能償還時，債權人得依法追訴，或依民法規定處理其物質或抵押物品。

第四章 典地與抵押地

第二十七條 出租出佃人出典耕種地時，承租承佃人有依同等條件承典之優先權。

前項所稱之典地，係指收受典價將土地移轉他人為定期或不定期佔有供其使用及收益，而於期滿後或隨時得以原典價回贖者而言。

第二十八條 承典人將典地出租出佃時，原土地使用人有依同等條件承租承佃之優先權。

第二十九條 出典人將贖回之典地出租出佃時，原土地使用人有依同等條件承租承佃之優先權。

第三十條 在租佃關係存續中，出租出佃人將其土地出典者，承租承佃人仍得就其土地繼續租佃至契約期滿。

第三十一條 典地定有期限者，承典人將其轉典，或出租出佃時，所定期限不得逾原典期限，典地未定期限者，承典人將其轉典或出租出佃時，亦不得定有期限，轉典之典價不得超過原典價。

前項不定期之租佃，承典人得於出典人贖回其土地時，終止租佃契約，不受第五條之限制。

第三十二條 在租佃關係存續中，出租出佃人將其土地抵押於人，因清償債務而土地所有權轉移者，承租承佃人仍得就其土地繼續租佃至契約期滿。

第五章 調解與仲裁

第三十三條 因執行本條例而發生之爭議事項，爭議之任何一方，得依本章之規定請求調解，調解不成時，得請求仲裁。

第三十四條 將得請求調解及仲裁之爭議事項如左：
一、承租承佃人因出租出佃人收回土地，無法生活，而不願放棄租佃權利者。
二、因本條例第六第七條規定，而區分主種兼種正產物副產物者。
三、因本條例第十一條規定，而免付當年地租，或按比例分配正產物者。
四、因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三、三款規定，解除租佃契約者。
五、因本條例第十九條規定而減租者。
六、因本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一款規定，而給付土地特別改良費，及第二款規定而給付相當代價者。
七、因本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而發生爭議者。
八、本條例施行條例所定事項。

第三十五條 行政村公所，及游擊區控敵區之區公所，均為調解機關。

第三十六條 調解委員會由該區行政村調解工作條例為之。

第三十七條 仲裁機關定名為仲裁委員會，由縣議會政府代表各一人，縣執事代表二人，及區司法機關審判官一人組織之。

第三十八條 在游擊區、接敵區、或特殊情況下，縣政府得授權區公所設立仲裁委員會分會。

前項仲裁委員會分會，由區公所代表一人，區執事代表二人組織之。

第三十九條 第三十四條所列之爭議事項，逕向縣司法機關調解者，縣司法機關不得受理，應由調解機關或區公所仲裁機關調解或仲裁之。

第四十條 仲裁委員會或其分會對所受理爭議事項之仲裁，由全體委員會會議行之，取決於多數。

仲裁委員會會議，以縣政府代表為主席，仲裁委員會分會會議，以區公所代表為主席。

第四十一條 爭議當事人，於仲裁委員會或其分會進行仲裁時，須將證據事實，並提出意見。

前項當事人，因故不能蒞場，得委託人代理之。

第四十二條 仲裁委員會應於仲裁終結後，二日內作成仲裁書，由縣政府加蓋縣印登記備案，送達於當事人，當事人之一方，如不同意，得於五日內聲明不服，向專署以上行政機關請求復核。

專署以上之行政機關，於接到前項請求後，須於五日內發回原仲裁機關復核，或仍維持原仲裁之決定，但復核以一次為限。

在前項復核期間，第一次之仲裁書，暫不執行。

第四十三條 在區公所之爭議事項，其仲裁結果，當事人均認可時，由區公所製成仲裁書，加蓋區公所印記，當即發給當事人，並報請縣政府登記備案。

當事人之一方，對區公所不同意見時，得當場聲明不服，向縣政府請求重行仲裁，區公所立將該項爭議及結果報請縣政府核辦。縣政府於接到此項請求後，須於三日內令區公所重行仲裁。

前項之重行仲裁以一次為限。

區公所之爭議事項不得依第四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請求復核。

第四十四條 爭議當事人之一方，對第四十二條第一項之仲裁，未為不執行，或對第四十三條第一項之仲裁，未為不執行，或對第四十二條第二項之復核，第四十三條第二項之重行復核，並不執行時，他方得逕向該管法院請求強制執行。

第六章 附則

第四十五條 本條例自公佈之日施行。前項營業邊區及游擊區執行條例及其他施行細則，同時作廢。

晉察冀邊區租佃債息條例施行條例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晉察冀邊區第一屆參議會通過。同年二月四日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公佈。

第一條 本條例依晉察冀邊區租佃債息條例（以下簡稱租佃債息條例）第三條之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租佃債息條例之解釋，除該條例已有解釋者外悉依本條例之解釋。

第三條 本條例之施行日期及區域與租佃債息條例同。

第四條 租佃人承租土地係包括自然人在內一切法人之總稱。出租人承租人在本條例中與出租人承租人有同。

第五條 租佃債息條例第六條所稱以穀物或菓木為主，其區分以穀物或菓木收穫之總值為準。穀物收穫多於菓木收穫者以穀物為主，菓木收穫多於穀物者，以菓木為主。

第六條 因前項之區分而發生爭議時，依租佃債息條例之規定調解或仲裁之。

第七條 菓木地之所有人，於其生長或成熟前與他人訂定契約出賣其菓木者，不得以租佃債息條例第六條之規定。

第八條 正產物與副產物之區分，依當地習慣或雙方約定確定之。因前項之區分而發生爭議時，依租佃債息條例之規定調解或仲裁之。

第九條 定期契約之現金地租，於契約滿期前，經雙方之同意或一方之提議，得將原租之一部或全部改為實物地租。

第十條 一方提議，種方如不同意，而發生爭議時，依租佃債息條例之規定調解或仲裁之。

第十一條 因租佃債息條例第十一條之規定而免付之當年地租，或依該條之規定實行分配正產物，承租人以原租及交之地租，均不得以欠租論。

第十二條 租佃債息條例第十三條所稱之低租地，指現有租額不及承租土地全年正產物總額百分之十五者而言。

第十三條 承租、承典、承買優先權，承租人在接到出租人之通知後須於十日內為承受或拒絕之表示，此項表示以書面或口頭行之，並須有第三人之證明。承租人在接到出租人之通知後，為拒絕之表示，或逾十日而不為表示者，前項優先權即為消滅。

第十四條 因前項優先權而發生爭議時，依租佃債息條例之規定仲裁之。

第十二條

租佃債息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所稱積欠之租租額指民國三十年三月三十一日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民地字第一號通告以後之欠租而言。前項欠租，如因未經該租佃積欠者，應依本條例第四條第五條之規定辦理之。

第十三條

租佃債息條例第二十二條所稱訂立之借貸契約，係指該條例施行後所訂立之借貸契約而言。

第十四條

租佃債息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所稱之舊債係指未依本條例之規定辦理者。

第十五條

租佃債息條例第二十六條，所稱之買或抵押物品，依民法物權編第六百六十條第八百八十三條之解釋。

第十六條

本邊區所稱之荒地，指尚未開墾無主之荒地，即租佃債息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二項所稱之荒地。

第十七條

本邊區所稱之抵押，以土地抵押債權債務所稱之買賣地租租佃債息條例第四條所稱之抵押。

第十八條

典地定有期限者，於期限屆滿後，出典人得以原典價回贖其土地。出典人於典期屆滿後，經過二年不以原典價回贖者，承典人即取得典地所有權。但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九條

前項二年之期限自租佃債息條例施行之日起算。

第二十條

典地之約定期限不滿十五年者，不得附有到期不贖即作絕賣之條款。

第二十一條

租佃債息條例之抗辯代表二人，由該會及抗辯會各派代表一人充任之。無抗辯會組織之縣份，抗辯代表二人，由該會代

第二十二條

租佃債息條例第四十一條第二項所稱當事人之代理人，須由當事人出具書面證件，交由仲裁委員會備案者，始為有效。

第二十三條

前項之書面證件，以有當事人之簽名蓋章或所在村村公所之圖記為限。

第二十四條

租佃債息條例所規定之仲裁會，由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另定之。

減租

一個片斷

周而復

外號叫做「燒碗豆」的地主徐紹堂，剛清一換長旱烟袋，用勁吸了一口，蹙起兩道淡淡的眉頭，深思着。他慢吞吞地走進王興發家，推門一看：只見王興發盤腿坐在炕上，手裏端着一個水烟袋，悠然自得地在呼嚕呼嚕抽，一看見徐紹堂，馬上要下炕來招呼，徐紹堂舉着旱烟袋的左手，連忙直搖，止住道：

「別下來，我告訴你一個消息！」

「什麼？」王興發伸下炕來的腿，立時驚慌地打住，就掛在炕沿上，詫異地問。

「你聽說區長他們下來沒有？」

「沒有。」王興發緊張地請他上炕坐。

「呀，你老兄真是閉塞，這件大事你都不知道。我打聽出來，他們來調查減租的事，牛頭峪的肉吃了，（指牛頭峪已經減了租。）現在該吃咱們的肉了。」

王興發弄清楚了原來是這層關係，方才鬆了一口氣，慢條斯理地說：

「政府認真減，誰也難處辦法了。」

「噢，你這人，說的倒容易！」徐紹堂把鬍子一翹，用旱烟袋敲着炕桌，不平地說道：「減租，佃戶太便宜了，咱們吃虧的事，不幹。——沒咱們的地，佃戶吃甚？連西北風也喝不上。現在出了什麼新花樣，要減租。我問你，興發兄，咱們先人聽說過這回事嗎？」

王興發放下水烟袋，仰起四方臉，注視着粉白的煙頂，倒想上去：的確的，不僅先人沒有過這回事，就是他王興發這輩子，也是沒聽說過，還是目

前的新規矩。他搖搖說：

「確是沒有過。現在世道變了，窮小子都伸直了腰了。可不減，怕也不容易——」

「誰不是想揀順口的吃，你我從小就沒受過罪，現在減租，老來再叫喚，誰窩窩？你老兄，受的來，我可不行。」他暗中斜視着王興發，對方靜無一挑，有點激動，四方臉上泛起了紅暈。

「能不減，當然是上策。」

「還要着咱們想辦法。」他湊過去緊靠着王興發低聲地說，「只圖咱們省心，把佃戶捏在咱們手裏……」講到這兒，好像更機密似的，怕給人知道，乾脆對着王興發的耳朵，說了半句。

聽完以後，王興發意味深長地搖了一搖頭，然後顯得有點困倦，試探地問：

「要是佃戶不肯呢？」

「不肯？」他咬緊牙，咬定地說，「把地抽回來，自己種！」

「要是抽去呢？」

「唔——」王興發還是有點猶豫。說，「區上的人呢？」

「區上的人，那好辦，請他們吃頓飯，送點禮，就打發回去了。」說到這兒，徐紹堂拿起身掛在胸前的那把小牛角梳子，梳一梳鬍子，正在悠然自得的時候，猛可地想：區長他們該要到村子了，立時站起來，向王興發恭了一恭手，說道：「告辭了，我得去佈置佈置，你也得早點下手……」

「好。」王興發心中却提出反對的意見：「這怎麼行啊？」

徐紹堂回到家裏，找了許多紙，一個人關起門來，誰也不讓進去，他用毛筆迅速地在一張紙上寫去，寫完了看看，很得意自己的傑作的樣子，顯

嘴吃地笑了。他把紙放在口袋裏，旋即飛也似的向五里外的馬家莊跑去，跑到他的夥子陳五兒的窩洞側面時，已經是氣喘吁吁，上氣不接下氣地直是喘，但是他也不喘口氣，就一直衝進去，一把抓住陳五兒，劈口說道：

「你說，這十多年，我總算待你不壞吧？」

他的話，像是丈八和尚摸不着頭腦，陳五兒不知道他究竟是什麼意思，心里不山地悚然起來，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麼災難降臨到自己身上。他不儘可吞地點點頭。

「你，你要給我幫個忙……」他一邊說着，一邊從身上掏出一大疊白紙條來，在其中找出一張來，放在他的面前，說，「請你在條條上打個手印。就說是去年的租子，按公示四六分了。」

陳五兒愕然抬起頭來，發問道：

「去年，你不是不肯減，夜里我給你補了租子去，對半分的嗎？」

「哦，」徐紹堂急燥地，嘆息地說，「你這人，腦筋轉不過來，現在寫個條條，就做為四六分的。」

「那做甚？」

「區里下來人調查，看這個條條好說話，你就打上吧，——你家有墨嗎？我知道你不會寫，就給你寫好帶來了。」

他把條條往桌上一放，那上面寫着：

今有陳五兒租到徐紹堂名下耕地九墩收租四石四斗按政府公示四六對分應交一石七斗六升恐後無憑立此為據

立字人陳五兒

他怕陳五兒看不懂，唸了一遍給陳五兒聽，對方聽完了，連忙更正道：

「一滿不對嗎，我裝給你二石二斗嘛，你條條寫少了，你改一改，掌櫃

！」

「哦，你這個人真是死心眼，租子是租子，條條是條條，條條是給政府看的嘛。」

「那，那不是騙政府了麼？」

「什麼騙不騙，你們沒見過市面，公事嘛，就是這樣！」

「我不敢這樣！」

徐紹堂的臉立時沉下來，冷冷地問道：

「你這想不想種我的地？」

這是有有力的一擊，——這一擊里面：含着一般不可捉摸的力量。陳五兒立時想起那天晚上在穀倉前平台上的情景：如果單按照徐紹堂的意思去做，他知道：那九墩地是不會歸他種的。徐紹堂看楊楊在那兒，就問道：

「你家有墨嗎？」

「有。」

「去拿來。」

陳五兒像是失去了主事似的，隨着徐紹堂的指示，在穀倉。徐紹堂接過墨來，在一小塊的石硯上磨了磨，指指條條上陳五兒的名下，說：

「就在這兒打個手印。」

陳五兒站在那兒，癡癡地，也不動，也不說話。像個木人似的，聽他擺佈：心里很不願意，表面上却又不敢抗拒，徐紹堂走過去，擊過他的右手的食指，按了點墨，在條條上打了個手印。徐紹堂拿過條條來，對着沒有乾的墨跡，張開嘴吹了吹，臉上堆下了笑容，滿意地說：

「過一天，請你到咱家喝兩杯，今天我還有事，不久坐了……」

徐紹堂帶上條條走了。他在村里又跑了幾家租戶，然後才回去。當區長賀志功和三鄉鄉長胡九林到他家的時候，他已經安然自得了。

「區長為咱們老百姓辦事，真辛苦，整天價跑來跑去，」徐紹堂見他們進來，假裝不知道什麼事，說，「今兒個到咱們鄉上來，有甚公幹？熬了個？在咱家坐坐。」

「不熬。」區長坐了下來。

「區長下來，要了了解咱鄉上的減租情形……」胡九林補了一句。

「哦，好嘛。」徐紹堂顯得很殷勤的樣子，說，「你們坐坐，我到隔壁

鄉里去說句話，一會就來。」

他匆匆到隔壁鄉里去，一會笑盈盈地走回來說：

「剛才招呼家里人，準備點飯，區長和鄉長都飽了，在咱家吃飯，

喝兩盅酒，大家好久不見了，聚聚，嘻嘻！」

賀志功性急地站起來，想要走的樣子，但一想：事情還沒辦，便站下來，阻止道：

「咱們剛吃飯來的，不要準備。——你府上去年的租子減了沒有？」

「租子嗎？減了減了。」徐紹堂一個勁的點頭，滔滔不絕地說下去，「減租是好事嘛，政府說的好，減租是爲了抗戰，也是爲了增加生產嘛。年時

專署頒佈的減租法令，那上面的道理，咱們一滿都解下哩。……」

區長聽他的話彷彿說不完的樣子，便攔腰打斷他的話，問道：

「你收的租子是怎樣和夥子分的？」

「政府的公示不是夥種四六分定租三七分嗎？」

「去年秋上咱們鄉上都開會傳達了，……」胡九林怕，從旁補充了一

句。

「這個咱記得，鄉長，你在大會上不是還講了話嗎？咱如今還記得一清一楚呢。」他轉過臉來對區長說，「咱家的租子，一滿是按四六分了。」

「哪！」

區長不注意地思索地這麼「啊」了一聲。

可是徐紹堂却大吃一驚，他似乎有預兆：覺得區長不信任他，他虛心地補充了一句：

「夥子還寫下條條哩，區長不相信，可以看看……」他打開炕下邊的朱紅色的門晃晃的油漆櫃，準備抽出賬子，找給他們看。

「你說寫了條條，咱們相信你，不用看了……」區長說。

「咱鄉三鄉個個都像你，」胡九林高興地說，「唔，甚事都好辦！」

「這是應該的事嘛，算不了甚。夥子們成年四季在地里流汗，辛辛苦苦的，應該多分點租子，咱們只要夠吃就是了……」

「這次來，咱到還想知道，減租方面，你有什麼意見？」

「沒有，咱一滿贊成，」他欠一欠身，看區長那樣虛心徵求他的意見，低頭一想，試探地說道，「別人倒是有點意見？」

「什麼意見？」區長從桌子那邊，伸過頭來問他。

「這些意見，不，不很對……他們覺得減租不大公平……政府方面沒照顧到地主的利益……」

區長默算了一下，旋即接上去說：

「地主的利益，政府方面是照顧到了。咱們拿種一垧地來算算，就看出來了。種一垧穀子，從做種地算起到收穫，區長屈指算了算，說，「就拿夥種算，也要十個工，除了一個雇工以外，夥子出八個工，一工按四十五元計算，合三百二十元。按一垧地收六斗穀子計算，——去年才五斗收成——穀子照政府法令才分到三斗六升穀子，穀子一斗一百元，穀子長四十五元，要是穀價一斗八十元，六斗穀子是二百八十八元，夥子白貼三十二元，這是穀子。穀草，夥子分三十斤，現在穀草是一塊三毛錢一斤，總共才四十五元

，除過三十二元，下剩十三元，這是夥子辛苦一年到頭的紅利。地主呢？只出一個雇工，分三十斤草，算四十五元，二斗四升穀子是一百九十二元，一道算起來，要拿二百三十七元，徐紹堂，請問你，誰的利大？誰的利小？你說政府照顧到地主利益沒有？」

徐紹堂一聽，暗自一算，確是有利，馬上改口說：

「照顧到了，照顧到了，兩個新政府辦事，一滿都照顧到了嘛。——那些

些人腦筋不開化，道理還解不下哩，多給他們說說，開化開化他們的腦筋……」

區長看徐紹堂這兒是調查不出什麼來，起身來，告辭道：

「打擾好久，咱們還要到別處去看看……」

「別忙，吃過飯去，」他走到窗門口高聲叫道，「飯好了沒有？」

隔壁響傳出低微的聲音：「快好了。」

「咱們還有事，過一天再來吧。」

「過一天一定來啊，大家在一塊聚聚，真是的，連頓便飯都沒吃，就走了。」

一走出門，胡九林得意地說：

「現在徐紹堂的腦筋可開展了哩，政府有個甚號召，他都執行，響應。」

「你怎麼知道？」

「別的不說，就拿減租來講：你看，他的租子都是四六分了，——在從前，你敢動他一根毛？小孩子看見他來，連哭也不敢哭了。」

「你以為他真的完全減了租嗎？」

「唔，區長，你說甚？不減，他是說，還有條條嗎？」

「鄉長你是老實人，要不過徐紹堂。條條是條條，我看有點靠不住，紹堂肯這麼爽快減租，這就有點可疑。」

「區長，我說句不客氣的話，你是個多心眼。」

「不是我多心眼，你看就是了。」

「那你看時爲甚不一——」

「爲甚不指破，是不是？咱還沒調查清楚，沒證據，說個甚。地主方面，如今不用再調查了，從他們那兒調查不出名堂來，咱們要集中力量和區署那個小組，一塊先調查佃戶——」

區書李德霖和三鄉農會主任關爭先一個小組，一塊在佃戶當中進行了一天的調查研究工作，首先調查出白長成按對半分，區書找他來問，他起初不承認，後來經過說服，才實講出來，接着又查出八家對半分。再問下去，就不大有人承認，都說是按公示分了。區書以這九家的情況斷定不止這幾家，他和關爭先商量了一個辦法，召開租戶會。

晚上，村里人都吃完了飯，租戶陸續陸續走到關爭先的密里來，炕上擠滿了人，炕下也擠滿了人，都圍着熱烘烘的，使人在僻處竟忘記是高原上二月的寒冷天氣。密當中的方桌上，放着一張小茶油燈，燈光很暗，一陣陣發出油燭子燒得有點噓噓。區書在人叢當中站了起來，向四周掃了一眼，看人到齊了沒有。人到了差不多，但是他沒有看到陳五兒，便問關爭先：

「陳五兒通知了沒有？」

「通知了，他——」關爭先從地上站起來看。

「咱沒這錢。」陳五兒伸出他滿佈辛勤的皺紋的臉孔，他原來臉紅（厚）在角落裏。

區書開始說話了：

「今兒個找大家來開個會，不是為別的，就是減租，去年減租不徹底，有的根本就沒減。減租是為咱們大夥謀利益，大家要執行，分了柴能燒火，分了糧能吃，分了草能喂牲口，能賣錢……咱們知道許多人都沒有減，有的人已經說出來了，白長成，你長交了多少租？」

「個年青的小孩子站起來了，他抹了抹嘴說：

「一石二斗四。」

關爭先坐在方桌旁邊，在一張白紙上，用他歪歪扭扭的那手毛筆字記着，他一個個記，把九個長交租子都記了。他聽見區書在問：還有誰長交租子，可是會場上悄悄地，沒有一個人吭聲。關爭先抬起頭來，聽見陳五兒，在角落上慌慌去，有點不安的神情，問他道：

「陳五兒，你呢？」

「咱交了——」陳五兒的聲音有點哆嗦。

「你按照公示成的？」區書接上去問。

「按公示四六分了。」

「裝了多少租子給徐細查？」

「裝了多少？」陳五兒只記得一共是交了兩石二斗，按四六分該是幾少，條條上寫的究竟是假的，沒記住。現在要計算一下，一時計算不出來，含糊答道：「記不清了。」

「長交了多少，說出來吧。」

「說出來，好退租。」大夥催他。

「交的租子咋個會記不清？」區書感到奇怪，「沒減吧？」

關在密當中的許多長交租子沒說出來的佃戶，都低下了頭，生怕問到已，同時暗中在計算按四六分該是幾少，待一會問到好答覆。陳五兒咧咧地，說話有點吃力，勉強地答道：

「是減了嘛。」

「多少呢？」關爭先急着問。

「這，這？」陳五兒一急，更說不出話來，「咱婆姨知道，她經的乎！」

……

正在這時候，區長賀志功和鄉長胡九林從徐順家溝回來了，密當裏一陣熱烈的掌聲，響在地上的，都站起來，過去親愛地抓住區長的手，像一句一句把他包圍起來了。在亂哄哄當中，陳五兒抽了一個空子，他悄悄地回家去了。

密當的人慢慢安定下來，區書叫大家坐下，他看大家不敢說多裝租子，就進一步向大家解釋，說：

「政府早有減租法令，多交租子是錯誤的，自己吃虧。減租法令是保護你們的，地收不回去的，你們多裝的租子，帶出來，好退租。」

「減了租，地真收不回去嗎？」有人懷疑地問。

「真的。」

「關爭先的功呢？不是叫徐細查細查了嘛。」一個中年漢子不信任，補充了反證。

「這是前年的事，地還是交交涉回來的……」

佃戶們當中交頭接耳地談開了，聲音很細微，只有附近的人才聽得見，這可好！你多裝了多少？

誰不想退，就是地……

區書不是說了，不抽地……

說出來吧……

要大夥都說，咱一人可不敬……

變繞在佃戶腦中唯一猶豫不決的重要的問題給區書幾句話說開了。白長成見大家這猶猶豫豫地不說，他火了，蹲在炕上，指手劃腳地，像一個演說家似的說：

「咱們苦人，一年到頭在地里熬，披星戴月，風吹雨打，這個苦，咱們都是身受的。衆人都知道：下不了籽，出不了苗兒，開不了花，結不了籽，收割了，打下了，才吃到嘴里，一下子叫地家糧袋去一大半，咱早就想種租了，好容易才到到新政府，給咱們老百姓辦事，誰多裝了租子，肚裡有數，馬上不說，還裝？」

他的一句句話，都說到佃戶心里，那話如同火種一般，在大家心里勃起勇氣來了。開始有人說了，你多裝了三斗，我多裝了一石，一共有十二個人說了，還有少數胆怯的人仍舊不敢說。這時，問到陳五兒時，大家才發覺他已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睡去了。

散了會，區長給區書談了談在徐紹堂那兒的情形，區書同意他們集中力量調查佃戶方面。在會上還不肯說的佃戶，再分頭去詳細調查，區書和區爭先担任陳五兒他們五個佃戶，當時就分手進行了。

三

陳五兒那姨婆陳五兒那麼早回來，村里的人還沒散會，她追根問到底，等她完全知道了他早回來的原因，便把桌子一拍，破口罵道：

「看你這個糊塗松（糊塗之意），吃了虧，往肚里瞞，那個政府來調查了，清口白牙，上四十的人囉，爲甚不說？」

陳五兒沉默着，想等了一會，才怯生生地吐出低沉的聲音：

「租子長裝出去了，割去的肉就不疼了，本鄉本土的人，明和人家去要，見面花前熱的，實在難爲情，咋個好開口。」

「有甚難爲情，你少給這窮窮豆租子，他就不答應，他長裝了糧食，也不怕難爲情，你怕個甚？」

「講了，就怕租子不回來，地又被人家要去了，弄得騎驢騎馬，兩頭不着地！那顆已經長裝給人家，拿出去就不疼了……」

「不痛，過兩個月，看你吃甚？打下的顆顆，都裝給那窮窮豆去，你不說，咱跟區長他討去。」

陳五兒嘆息從炕上跳下來，攔住她，哀求道：

「不能，千萬不能，你一說，壞窮豆會抽地的，爾們有地種，還有顆的，抽了地，連種的也喝不上……」

說到這兒，他忽然聽到有急促的腳步聲落在窗外邊，他連忙閉住嘴，走過去，外邊有敲門的聲音。他去開門，進來的是區書李德海和區爭先。他婆姨立即歡天喜地走上前去，說：

「區書，咱們正想找你說話呢！」

「什麼事？」

陳五兒急得一頭大汗，趕緊拉一位他婆姨的衣裳角又插上來問：

「你，你給區書燒點水喝，老話話慢慢再說……」

「好，區書，你伸伸，我端水去！」

她端了兩瓢水放在爐里，煮了一點米粥，在爐火。

「陳五兒，去年的租子裝了多少？」

陳五兒回來的時候，在路上就算好了，信口答道：

「一石七斗六。」

「租子真減了嗎？」

「減了，誰敢取虧？」

他在鍋邊旁的陳五兒婆姨，伸出頭來說：

「區書，咱們的租子……」

不等他講完，陳五兒從中截斷，說：

「水燒開了沒有……區書渴了，等水喝吧！」他轉過頭對區書說，「咱們一滿是按公示分的。」

區爭先問她：「你給租子怎麼樣？」「沒什麼，沒什麼，她說租子服順去分了。」陳五兒搶上去說。

「聽說，你給徐紹堂寫了條條，有這回事嗎？」區書關心地問。

「有，我還打了手印印哩！」

「那條條，」她不知道他到在說什麼。

但知把陳五兒嚇了一跳，臉上白粉撲撲的，生怕她說出來。他接上去說：

「就是那條條……」他過去端了兩杯熱水放在區書他們面前，說，「先喝杯水吧。」

他婆姨兩個眼眼木瞪木瞪地瞪着他。

區書從陳五兒嘴裏沒聽到什麼更多的情況，他給區爭先商議，包明天帶到二班去調查，三班的租子長裝的可以去退，沒長裝的，也要去，他區長的

說法，這是一個事實。

四

天剛破曉，地上鋪着一層薄薄的寒霜，山下遠遠傳來一聲聲富有韻味的鈴聲：叮叮叮……悠長地劃過山嶺的寂靜的晨空。這清脆的響聲慢慢地下去，終於消逝了，向遙遠的曠野着風沙的寒外走去。

圍爭先披掛着那件破羊皮襖，冒着迎面吹來的寒風走去，到陳五兒家來，他在門外邊高聲叫道：

「陳五兒，起了沒有？」

「起來了。」陳五兒捲着被，扣子還沒有扣地，開開門，揉着惺忪的睡眼出來了。

「到順家溝租子去……」

「我減了租了，不用去……」

「減了租去看看也好，鄉長說租戶不肯減減，都可以去……」

「你們要去，你們就去吧。」

陳五兒婆姨在窗里聽見他這話，見丈夫又不肯出頭露面，她大步邁出來，像一挺機關槍似的，急聲說：

「退租是好事，爲甚不去，你不去，我去，爭先，咱們一塊到順家溝我攪完豆去！」

陳五兒看了她一眼，說：

「你又急了，密里還有那些事，你一出門，娃娃就不管了？」

「你爲甚不去呢？」

「好，我去，我去。」

陳五兒無奈何地應承下來。那失去的五斗谷子和谷草，有力地閃上他的面前來了。他頓時鼓起了勇氣，說：

「政府的人在跟前，才好辦事。」

「這不用說，能辦到。鄉長早去佈置會場了。」

「只要大夥去要，咱也搭把手看看……」陳五兒扣好扣子，說，「去了，我可沒說的，你說啊！」

圍爭先點頭。

馬家莊底的佃戶們，三五成羣，東一堆，西一夥，集到村口的打谷場上

來了。分成五個小組，由農會主任圍爭先領着，四十多人，浩浩蕩蕩，熱熱哄哄，一條長長的行列，向徐順家溝去了。

一輪紅日，從東山的背後，露出頭來了。

選租的行列剛進村，就被徐順家隔見了，站在他旁邊，和他拉話的王興

發說：

「鄉里那股活人來了，怕還要吃飯呢！」

「喝雄！」徐順家氣呼呼地厭惡地吐口痰。

「人家還要留宿住呢！」

「爛糠，長王腿，就在露天地裏睡去吧！」

佃戶們漸漸向他們面前走來，徐順堂一把拉過王興發，說：

「到咱家去住吧，咱見這些活賊，咱就生氣。」

佃戶們走到街上，便轉向東去，到村頭的三棚的小學教室去了。這是一間大平房，一進門裏牆放着一塊黑板，上面懸掛着紅紅綠綠的萬國旗，又地成了「十一」字型，「十」字中間掛着一個大紅地球，球下面垂着一長條的綠繩子。屋子裏已經坐了一大半人，亂哄哄的，他們在雜亂地交談着，議論着。馬家莊的佃戶走進去，吸引了教習里所人的注意力。先到的徐順家溝的佃戶興奮起來，他們以主人的身份，讓出了座位，自己則擠到後面去，有的乾脆坐在窗戶上，坐在課桌上。只有地黨權他到這後來。胡九林派人去請，地黨權才一個個慢慢走來，最後走進來的徐順堂，他對屋子裏每一個人都掃了一眼，在人叢當中，他發現陳五兒居然也在地黨權，不過他的眼光碰到陳五兒的眼光時，對方有點躲躲閃閃地，有意避開他視線，擠到人背後去了。今天陳五兒胆子大了些，人多勢眾，雖然躲閃，却仍然無懼地站在那兒，他第一次感覺到徐順堂面前也可以伸直了腰站着。

徐順堂看完了大家，最後他的視線有意地落在圍爭先的身上，那眼光彷彿說：「看你這個窮後生，今兒可抖起來了，可是孫悟空鬧不過我如來佛的手心？」——咱手里捏着佃戶被租的條條，你能把我咋向？」他走到窗戶的一張凳子上，在陳五兒的面前泰然自得地坐下來，旋燃了一根火柴，點上旱煙袋，呼呼地抽了起來。

他一坐下，背後的佃戶們便擠眉弄眼地指着他的脊背，爲難的交談聲低下去。現在只是低低地私語着。

胡九林站起來，看了看衆人，說：

「開會吧！」

這時，就窗外邊又來了一大羣婦女，抱着孩子，拖着娃娃，推推拉拉地趕來聽信了，屋子坐不下，就站在窗戶外邊，有的就蹲在門階上。屋子的聲音慢慢消逝，靜下來，胡九林才又接着說下去：

「咱鄉上去年沒認真實行減租，今天壓和地主營面把賬算清，長年的租子照退，退了租，以後大家有糧吃，要好好種地，多多生產，堅持抗戰，建設邊區，減租以後佃戶的地種好，租子也可以多交，交好租子，對地主也有好處……」

閻爭先接着說：「長交了租子，在會上說出來，今兒個好退。」

「咱去年長裝了一石二斗四……」

白長成說完了，一個老頭子接着說：

「我可不曉得得公示，叫人家口說的裝走了，我的一定要他退。我長裝了九斗。」

「我的租子，昨天向地堂退，」那個中年人指着坐在對面的徐紹堂，說，「他不肯，他說他等錢用，還要抽地錢呢！」

閻爭先聽完中年人的話，頭上直冒火，忍不住跳起來說：

「徐紹堂會對咱們要這一手，提起抽地錢來，我就傷心，我種徐紹堂十垧陰坡地，咱剛墾出來，地地碎，挖坑場，填水壩，深耕細作，薄地上莖，兩個地錢十一垧地了——他轉過來對着徐紹堂說，徐紹堂，你做事太無情，把我的地全收回去，說自己種，後來又租給李老漢種，你把咱的飯碗端去，鬧的我兩年沒地種，咱們今天要講個清白！」

徐紹堂站起來了，他却没有閻爭先那股火氣，心平氣和地先冷笑了一陣，然後才慢悠悠地說：

「閻爭先你別血口噴人，咱去年收租子，一滿是按着公示定的，減了租，少收了好幾十石顆顆，」他從懷裏掏出一張公示紙紙來，大聲地說，「政府的公示，我這連都有，你們看！」他把紙紙向大家照了一個遍，「這這租佃條例草案你們解下不？」

大家沒一個人理他。他搖頭擺尾地噙下去：

「第二章減租，第九條夥種：佃戶減租之後，其租額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土地副產物依約定，無約定者依習慣，」他轉過臉來笑嘻嘻地對那個中年人說，「二虎子，咱多收你的糧食，因為家里沒有，教會後，趕明兒，咱趕緊去買米送你！」

那個中年人一腔不平之氣，聽他這句話說得平服下去，軟下來了。徐紹

堂看那個中年人果然對自己幾句話給拉過來，他馬上對遠圍圍坐，沉下臉來說：

「咱收回的地，是依照第四章，租佃契約及佃租第二條，有下列情形者得收回土地……」

胡九林拿過他手裏的紙紙，打斷他道：

「你搞甚鬼，別拿草案嚇人，條例上那一條叫佃戶對抗減租，任意抽地？」

閻爭先搶着說：

「徐紹堂你別胡日鬼，騙什麼人，因為前年佃戶要減租子，你才把咱的地抽回去，你說你自己種，你自己為甚不種？」

這一問徐紹堂無話可說了，大家聽的很不平，全站起來，教習里四面八方湧起了呼聲：

「叫徐紹堂把地退給閻爭先種！」

「退地！」

「咱們佃戶，沒有地，拿球種！」

胡九林望着徐紹堂說：

「你不應抽地，這地還是讓閻爭先種？」

徐紹堂看衆人的情緒高漲，勢頭很猛，不答應下來，對自己是沒有好處的。他當時答應下來了，衆人憤憤的說這才平下去，又坐下來。但這件事鼓起了陳五兒那些人的勇氣，覺得「三人一條心，黃土變成金」，人多勢重，就是著名的硬豌豆也不得不低頭的。陳五兒看接着又有許多人提出多收租子的事來，他想了想，眼望着徐紹堂保地，胆子大了，準備站起來說，但是被徐紹堂嚇見了，（徐紹堂就一直在注意着他的行動。）暗中拉了他的衣襟的角，止住他，私下用食指和大姆指比了一個圓圈，往他面前一送，暗示給他：只要他不說話，過去以後給做錢。

陳五兒在人叢中露了一個頭，旋即坐下去，引起了大家的懷疑，有人對主席胡九林提議，要他說話。他被大家拉了起來，有人問道：

「徐紹堂把你拉住做甚？」

他說：「他叫我不說話……」他看了徐紹堂一眼！徐紹堂，從肉多得打了摺紋的脖子紅起，一直紅到耳根子上了。他低下了頭，一會把那桿旱煙袋拿在右手，一會又放到左手裏去，不知道怎麼是好。

「叫陳五兒說！」大家叫嚷。

「咱也長發了五斗租了……」
佃戶中有人低低地說：

「真想不到陳五兒也長發了！」
「可不是嘛，他從前都說減了！」
「看不透這些事……」

陳五兒的話說完，就給徐紹堂的話打斷了！

「你！你！」徐紹堂拿旱煙袋指着他的鼻子說，「你做甚，咱們的租子不是減了嗎？你還寫了條條。打了手印。」

「那是假的，是你寫好叫我打的，咱那天夜里不是又給你送去五斗糧糶……」

人聲當中浮起不平的驚詫的聲音！

「嘻嘻，徐紹堂這傢伙真厲害！」
「他嘛，他共事都想的到，做的到！」

「原來那條條是假的，這玩意還逼他打手印哩！」
「壞玩意只憑他那張嘴，說的好聽，——明減暗不減……」

徐紹堂的臉子，一陣紅一陣白。
「賈賈，徐紹堂有點急了，」那，那是人情！——

「是你硬要我送的，咱自己不惜願……咱一平給你挑五六百挑水，那才是人情呢！」

圍爭先插上來說：
「什麼人情？你爲甚不送陳五兒五斗糧食，別叫日鬼了，你壓迫人，造假條條。」

「媽也呀！咱他爹在假條條上打手印，咱家長發了九斗租子。」隱在門邊上一個青年婆姨，站起來說。她的丈夫今天沒到場。

「你的斗還是活裝，一斗要多裝三合多米，你要對半分還不算，還多裝了兩五升多糧食。」陳五兒又補充了這幾句。說到這兒，他不禁掉下眼淚，嗚嗚地哭了。

大家憤怒不平的情緒給熱燒起來了。年青的人，心裏想，買料不到徐紹堂有這一手，但李老漢却無動於衷，他覺得，像這樣的苦頭，他已經吃了一輩子了，租戶在地掌櫃面前，是沒有一件事不吃虧的。所以他還是很安穩地坐在那兒。但年青人不同，有七八個人向徐紹堂衝過去，舉起拳頭來，想對他的脊背打去，被胡九林看見了，就走上來攔住，用手對大家按了按，說：

「大家還是坐好嘛。——造假條條，不減租，要多送五斗糧食，還用大斗，是誰的過！」

「是地掌櫃逼迫要，難道我稀活人，誰願多交嗎？」陳五兒急得說。
「是徐紹堂的過！」

「是徐紹堂！」
徐紹堂掉過臉來，對着大家，說：

「不錯，這是我不是。我要問鄉長一句話：四不楞種了幾十八畝地，裝了二石五斗租子，還短五斗租子不裝，這是誰的過？」

胡九林的眼光向人羣中搜索，他的眼光停留在一個坐在窗戶上的中年農民，問：

「四不楞，按政府公示減租，是不是還短徐紹堂五斗租子？」
「對着咧。」四不楞點點頭，說，「有那回事。」

「那是你不对，」胡九林大聲的說，「政府的法令，一方面要保護租戶，一方面要保護糧租利息，你不把租子裝够，是你的不对，你裝時候短了。」

徐紹堂聽着胡九林的話，心裡平靜下來，覺得政府這樣：地主的權利就有保證了。

四不楞從窗戶上跳下來，向前擠了兩步說：
「我沒裝够租子，是有原因的嘛。」

「有啥原因？」主席問。
「徐紹堂沒給我換約。」

「有這事嗎？」鄉長問徐紹堂。
徐紹堂點點頭。胡九林又說：

「你換約給他換了。四不楞你回去把租子給徐紹堂裝，政府法令要保證減租租。」

「能成。」四不楞坐下去了。
從人羣當中，傳上來一個條子，一直傳到胡九林手裡，他打開來一看：

是地主王慶發的，他自己坦白承認他有五個夥子的租子沒減，這是不對的，自動要求減，散會以後到他家去量發。主席報告了這消息，敲鑼馬上掀起了雷雨打在洋鐵片上似的響聲。

接着到會的人都講出長發的租子，胡九林叫白長成一一記下來了。算完賬，問爭先提議道：
「松林會組織減租會退租，咱們要不要組織個減租會？」

「要，唯有這個好！」

「人家有會，咱們也要。人家有那麼大的權，咱們也可以有，有了權，就能保住，還怕個甚？」

「咱們組織減租會，你們同意嗎？」主席問。

「同意，這還有不同意的。」李老漢說。

胡九林宣佈道：

「大家都同意了，那你們就報名，願意參加的就報名，不願意的就不要，報了名還要打手印。」

話還沒說完，白長成就走到主席台前要打手印了，引得大家都笑了。有人說：

「名字還沒寫上就打手印哩！」

於是，一個個租戶都報了名，打了手印。

陳五兒也打了手印，他說：

「咱們要選個頭兒！」

「選幾個？」主席問。

「五個。」

「甯多不治水，選上三個夠了。」

「選上五個，」主席說，「選三個好不好？」

大家都同意，但是陳五兒還有點補充：

「選要選抗硬，能辦事的。」

結果選出三個人：閻爭先，白長成和李老漢。在會上又展開關於租戶會工作的熱烈討論，最後大家一致通過保佃地要經過租戶會，租戶會通過了才能抽地；按公示交租分租，交租分租時，租戶會的負責人不到，不准自己私交私分。同時租戶會保證到時向地主交租，沒有特殊情形，不准拖欠不交。佃戶對地掌權無酬的零碎活，如挑水，鋤草，喂牲口……一律取消。壓在佃戶身上的沉重的負擔從此取消了，陳五兒的臉上第一次浮上了笑影。他在盤算怎樣給他那九塊地多上些糞。白長成低低對他說，租子減了，要把莊稼務的細細的，今年多鋤兩遍草。陳五兒答道：

「種地不修畔，三畝變成二畝半，咱今年要修畔畔，還要多上糞呢。」

胡九林聽見他們在拉話，就對徐紹堂說：

「你聽：減了租，大家生產的勁都熱火起來了，多打顆顆，你的租子也可以多收了。比方說，打四斗顆顆，對半分，你不過得到二斗租子。兩個一

減租，佃戶們多上幾多鋤草，深耕細做，打個五斗多顆顆，就是按四六分，你頭要拿二斗多租子呢。不減租，莊稼一年壞一年，你的租子減少了，地也使不上幾年啦。」

徐紹堂心裏想：的確是這樣的，要是我一個人不減，我的夥子務莊稼不熱火，就是對半分，也分不了多少啊。他給鄉長幾句話一說，想通了。自己也不禁好笑起来；精明一世的徐紹堂先前却沒想到這些。他說：

「鄉長，我從前解不下減租的道理，我現在可真解下了哩，減租對咱們也有利，政府又保證交租，可美哩。」鄉長，你算給我上了一課，真的開化了，我這個頑固腦筋了哩。」

胡九林笑了笑，他宣佈結束大會，說：

「咱們現在到地掌權家盤糧去！」

徐紹堂首先站起來說：

「好，先到我家去盤！」

胡九林按照各個地掌權的佃戶，分成小組，自己推出小組長，分頭到各個地掌權家去盤糧。陳五兒被選為徐紹堂那些佃戶的組長，他在前面，領大家向徐紹堂的家走去……

這時，太陽已昇到中天，放射出溫暖的陽光，使人忘記了春天的寒冷了。一個個小組的人影，出了我屋前的院子，向外移去……

一九四五，四月，十二日晚。

民主周刊

廿、廿一期要目

五四運動的歷史法則	聞一多
論五四	吳晗
大獨裁者的下場	駱掄
讀蔣主席六次大會演詞	勞生
民主政治與民主教育	鄧初民
如何推進青年民主運動	孟南

評書 評沙汀底「淘金記」

石懷池

沙汀底「淘金記」，是一本好書，不管是站在社會學的立場或藝術的觀點，都是如此。特別是在目前黨團和市會把持着文化市場，一些「進步者」也隨波沉浮，帶着虛偽的浪漫主義的幌子，在幹「色情加抗戰」的欺騙人民的勾當的時候，這部以拘謹的態度來描寫四川——大後方的心臟——，地底荒涼落後，愚昧以及各種人物型底掙扎和追求底世態的「淘金記」，也就更顯得難能可貴了。雖然，不可避免地，她本身也存在着許多缺點，其程度地帶有幾絲自然主義的陰暗的氣息，給與人們的是失望多於希望，莫名的憤怒多於合理的抗爭的意志，很少能捉摸到將來的遠景；但是，這比起以戀愛和花朵來裝飾奔白的日常生活，因而自命為浪漫主義急先鋒之類作品，我們倒是寧願取此而捨彼的。

正如同某一位批評者所指出的，沙汀是一位農民詩人。他自己出身農村，大半的生活也都在農村的環境中度過，他底全部創作也沒有離開農村一步，像一位忠於職守的某種特殊病理的醫生一樣，他一直在研究和剖解農村的爛瘡和毒瘤，雖然到今天，他還沒有從這一大堆的病狀材料中得出迅速治療的具體的方案；可是大膽疾呼地把病患的嚴重性挑示出來，這個偉大的功蹟却是不可抹殺的。

從一九三一年開始，作家沙汀拘謹地，小心翼翼地，不聲不響地送出他底一枝一枝的泥土的花朵：「航線」、「土餅」、「苦難」、「日軍軍在前線」、「敵後瑣記」、「磁力」、「奇異的旅途」、「淘金記」、「因獸記」和在「堪察加小景」總題下寫成的，許多零散發表的意味雋深的故事，很明顯的，一股濃郁的泥土氣味浸潤着他底全部作品，農民，地主和農村知識份子差不多就是他底全部創作活動的天地，即便是在十里洋場的上海，也纏

懷着淒涼的故鄉；即便是在前線，也纏着淒涼的一條大的農民革命運動的袖口將軍」，而「敵後瑣記」裏的這些戰士，也大都是不久前還纏着鋤頭和泥鐵的農人。「從農村中來，回農村中去」，這是小錯的，沙汀確是一位卓越的，自然，多少有幾絲感傷的農民詩人。

沙汀生活在農民的海洋裡，他底農村的爛瘡瘡地，敲打着那些善良的人們的靈魂的門扉，更向那些農村魔王（地主紳士和流氓）擲出毒辣的嘲諷和控訴。但是，如果要在這許許多多的作品裡，找出一本最能代表沙汀底主要創作特質：——他底對於農村的豐富知識和透澈的理解，對於地主紳士和流氓底可怕陰森的猙獰和剝奪——同時，却也由自己的出身地位和生活現況，對廣大貧苦農民始終保持着一段小小的距離，常常把他們看作愚昧和無知，最多也祇是心地善良和靈魂清白，再就是如同所有的農民詩人一樣，沙汀在他底創作裡，也還無意間常常露出幾聲傷感的嘆息。——這樣一本書，假如要找出的話，那就是一「淘金記」。

二

關於「淘金記」的十分確定的創作年代，我們不知道。但參考作者「這三年來我的創作活動」一文，我們也不無線索可資探尋。「八一三」上海抗戰開始後，因為他「似乎只有熱情燃燒着，住在租界裡極端權利的權利」，「我於是回到了四川」，他說，「我夢想我的故鄉也會有如如火如荼的場面的，那麼憑着我對它熟悉，我會能夠對它接近，而且了解它」。

沙汀回到故鄉後，雖然沒有住多久，就被一股熱情鼓舞着，「多少帶點浪漫成分」地，「走向晉西北和河北中部一帶游擊地區」去了；但是，這一個短時期內，他却很有一點收穫。在川北，他感覺着，「一切的舊，一切晦淡無光」。他也注意到，抗戰的巨浪也已波及到這些偏僻閉塞的地區，開始有新的事物發生，「比如一些有組織的抗文和命令，一些官家的和民衆的

組織，而許多人是頂着新頭衝撞了。」——「但可憐的很」，他得出結論說：「這些新的東西是底面不符的。表面上是爲了抗戰，而在實際上他們的用不過是一種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供人們你爭我奪的飯碗。所以人們們自然也就依然按照各人原有的身分，是在發笑着，呻吟着，製造着悲劇。」

這是一種頗令人憤怒的現象。由於政治上不民主，於是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反被一些敗類——在上層是達官貴吏，在底層便是獄吏兇惡，總領保長之流——來利用，作爲他們的增加財富和滿足貪慾的工具，這裡，作家沙汀問自己：「這些東西不應該寫出來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說：「因爲我們底抗戰，在其本質上無異的是一個民族自身的改造運動，他的最終目的在創立一個適合人民居住的國家，若是本身不求進步，那不僅將失掉戰爭的最根本的意義，便就把敵人從我們底國土趕出去一事來說，也是不可能的出乎情理之外的幻想」。因此，「將一切我所看見的新的和舊的痼疾，一切阻礙抗戰，阻礙革命的不良現象指明出來，以期喚醒大家的注意，來一個清潔運動，在整個抗戰文藝運動中，乃是一種必要的事」。

在這樣的見解下，沙汀寫出「防壁」，「氣包大爺的救亡運動」，「到西北去」，「聯保主任的消遣」，「從軍記」等等短篇，而「淘金記」是否已經開始寫，我們不曉得，但可以斷定的，至少是在孕育着了。然而，「淘金記」這部作品，却應該算是沙汀底對於整個不民主制度產物的農村全面的抗議，是一個總的攻擊，要害的進攻。他像刺果于似的，一下緊一下的敲擊着，終於硬殼破裂，農村的真像暴露出來，我們開始知道，保甲制度是一樣甚麼騙人的東西，那些農村的紳士們是一付如何猙獰可怕的面目，而那批行政幹員，如所長主任及幹事之類的人物，又是一些甚麼出身的行業，所以掩蓋在「生產」、「禁政」、「救國」等等漂亮外衣下的醜惡不堪的欺騙的勾當，——在這個意義上說，沙汀不僅是一位白描聖手，是一位卓絕的解剖家，一位農民詩人，更是一位向不民主控訴的戰士。

「淘金記」底主要糾葛是藉假燒箕背的金銀的開採而展示的，燒箕背現在是一塊墳地，「在金廠標子最高的地方，產金，而且還不是砂金，是成顆成粒的，成色同章臘金不差上下，這是一個劉豬牙的槽子上的老工匠漏出來的；他十七歲開始當馬尾子，在金洞裡爬上爬下背砂的時候在那裡，而且他還發現過一個金門呢」。但燒箕背底主人是一家沒落的士大夫的後裔，他們底祖墳位置在那裡，按風水的流行說法，墳地是千萬動不得的；主婦「何

家母是全個市鎮有名的富婆，她的有名，是不僅有錢，還因爲她是鎮上門第較高的人家，自己又是一個能幹的女人，而且，三代人守寡，三代人都祇有一個獨苗苗兒子」。

作者告訴我們，親親這個金銀的是兩個光棍：一位是「一個健忘的老人，很長很瘦，蓄着兩撇濃密的鬍鬚。他早年的綽號叫林么長子，現在叫林X嘴」。因爲自從民國十五年失勢以後，他忽然變來歡喜叫鬧，更加縱容着自己的嘴了。他曾經是有名的哥老會的首領，但他手下的光棍多半是老實的鄉下人，被他半強迫擄入流的。因此，在他底流水賬簿上有人會發現這樣一類有趣的項目：李老大來米兩斗，去光棍一個，如此等等」。他在鎮上的地位是屈辱的，無望的，但是野心却又沒有完全死盡，是在野派的領袖。另一個光棍是白醬丹白三老爺，「一架大爺，一個沒落的神士，在金廠標子上是沒有他的地位的，但却普遍的對他感到恐懼」。他的家產早光了，但是自視甚高，並不感覺屈辱的尷尬。他紐扣上吊着銀質的牙籤，手裏是響水煙袋，「紅綳褲底，白綳刊出——看來很是神氣」。白醬丹在鎮上的地位是相當奇特的。說他是紳士吧，他的田產在二十年前已經完了。他現在生活的實況是零落的和可笑的，就經常仗着兩三個賞識他的大人物的提攜，以及那無窮盡的五福會和田國會過日子」。就這樣，經過淘金的糾葛和發展，三股勢力——以何家母代表的日趨沒落的地主階級，以林么長子代表的下層流氓階級，和白醬丹代表的附身於城市力量而上層份子的流氓紳士階級——展開一幕勾心鬥角，陰森可怕的悲劇，因而顯示出農村全貌：地主、貧農、流氓、商人……。

最後，結局是：林么長子悲慘地失敗了，何家母苦等打地波屈辱和欺侮了，白醬丹聯合城市的士紳力量，和當地執政人士和投機商人，勝利了。但是，白醬丹還沒有勝利，他還取到燒箕背的開採權利，但燒箕背依然是一塊完整的墳地，因爲，不民主的政治是不法投機事業的保障，甚至這種可憐的卑劣的生產事業，也沒有喘息生存的餘地，「他（白醬丹）決定做個隱士，而半年以後，事實證明了這種簡單方便的法門倒比挖金子賺錢可靠。他已逐漸脫離了借貸請會的可憐生活，他那發花煙袋也擦得比從前更放亮了。」

讀着「淘金記」，一個生長在城市的讀者甚至會疑心走入一個魔魔的世界，是炫奇而陰森森的。這是沙汀底勝利。但是，這個世界是太絕望了，太可怕了，太陰暗了，甚至希望的影子也見不到，這固然是現實應担負其全部責任，然而，沙汀沒有在那些模稜善良的人民的靈魂裡發掘出足以使自己和祖國新生的力量，即使是萌芽的新綠或一星星啓示也好，這却不能不說是沙

汀氏小小的失敗。

三

在將要出版的新作「困獸記」底題詞裡，作者說：

「若果一篇作品須得向讀者指出一條道路，這點穿插，也許可能阻擋這一項任務吧（這裏所謂穿插，是指「困獸記」裡故事：「一個勇敢的出去了，一個則一直勤勤懇懇的固守着崗位」——懷池）。然而，還在諷刺暴虐的作品裡，却不必一定的，因為作者所引起的情緒，以及嘲笑，便相當於別樣作品裡的對於所謂出路的指示了，他叫你恨他所表現的一切，更從而消滅它，這還不很够嗎？因此，關於這個問題，我很同意一位朋友對於「淘金記」的頗為通達的意見。」（見藝文志創刊號）。

關於這個所謂「對於「淘金記」的頗為通達的意見」，作者沒有說明，我們不知道，不能多談。但是，作者在這裡所表示的對於諷刺文學的意見，（其實，嚴格地說來，沙汀的作品並不能歸於諷刺文學之列）和對於他自己作品的辯解，我們却不能同意。

首先，我覺得，所謂「憤怒以及嘲笑」並不能等於「出路的暗示」，我們知道十九世紀俄國羅斯曾有大批偉大的諷刺文學家出現，其中也有全部火力都集中在農奴問題上的，例如薩爾蒂柯夫、謝德林和格萊伯。烏斯賓斯基，都深深地體驗到農奴制度生活的苦痛和不合理，具有着豐富的關於農村的知識，他們的筆鋒辛辣得不得不使沙皇以牢獄和放逐甚至被刑來對待他們，但是，他們底作品正如沙汀所說，只能引起「憤怒以及嘲笑」而已，沒有指示出路，由於時代和出身的限制，他們根本也找不到出路，於是烏斯賓斯基精神失常了，最後跳進瘋人院，絕望地喊道：「天才毀滅了！他們毀滅了我，又殺害了我呀！」但我們讀高爾基底作品，他底對於市儈社會和專制主義的諷刺也是犀利無比的，然而，高爾基却指示出路的，他號召人民鬥爭，並說出鬥爭的方法和策略。今天，作為一個新時代的進步的作家，應該不以沙爾蒂柯夫和烏斯賓斯基而滿足，我們要追上高爾基的，我們是新現實主義者。

應該特別着重指出的，所謂創作方法，如果脫離了實際生活內容去理解，不可避免地將成爲一件難以捉摸的東西。正如作者所說：「至於風格，則是由題材，和作者對於題材的理解而來的，並非一個獨來獨往的英雄。……」

所以，作家沙汀表現在創作方法上的或多或少或多的自然主義的色彩，和流於在作品裡的陰暗和悲觀的氣息，也應該拿作家沙汀自己的真實生活和性格特徵作實據，然後才能有理解的可能。

我們已經說過，沙汀是農民的詩人，他出身農村，也生活在農村，因而獲得豐富的關於農村的知識，但是這手頭的材料得知，沙汀該是從士大夫家庭走出來的，在上海度過一個頗爲長久的時期，抗戰後，或是「救書」，或者以「寫家的身份」居於陪都（見「困獸記」），他所接近的，大概以社會的上層份子居多，這或許也就是出現在「淘金記」裡的地主、士紳、保長和高級流氓之輩都栩栩若生，而一般貧苦農民則顯得愚昧無知，好像是自覺的善良忠厚的緣故吧。這種醜惡黑暗一面的糾纏也就不可避免地多於潛在的力量和新生勢力的振發，因爲，那種對於本來的自信，也就是「出路的暗示」，是祇有從那些「愚昧無知，白癡似的善良的人民」才能獲得的。

再，他自己常常承認是「一個帶着拘謹的人」，「頑固和保守的成份也不可少」，我想，這種農民式的性格傾向，也應該是沙汀創作底障礙甚至顯得呆板的風格原因之一。楊晦先生分析農民作家的悲哀說：「有的，積習過深，不能適應新的環境，有的頭腦頑固不肯適應新的環境，於是討厭而且憎惡這種環境以及在這種環境裡應運而生的人們。有的，經過殘度掙扎，却終於沉下去，或者回到了他原先是跳出來的家鄉，或是另謀了別的生活；有的，雖然始終都在掙扎，却突不破他的重圍，陷於悲觀和苦惱裡邊，感到生新的空虛，心境的憂鬱，沒有沉淪墮落，也沒有力量自拔，好像懸在那裡一般。」自然，沙汀並不是這樣的「悲哀」的農民作家，不過，我們從他底作品裡，却也不難看出他從這種「農民派作家的悲哀」裡掙扎和解放出的痕跡的。

沙汀是一位優秀的農民詩人。但是，假如在他底作品裡，除去忠於現實和憤怒的控訴外，再有一種樂觀的遠景的期許，這豈不將更爲健康的人民所樂於接受嗎？

我們預祝沙汀底更遠闊的將來。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五日

羊群衆

第十卷 第十一期

目 要

論世界政局

于懷

美國的需要和任務(上)

E·白勞德

歐戰是怎樣勝利的

舒翰

作為戰後市場的中國

L·羅辛格

抗戰期中大後方的租佃問題

葉民

敵寇統治地區農村破產實況

李侯森

從古代史到近代史

懷湘

哥尼斯堡之陷落(附註)

V·魏里奇科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版

論世界政局

轉載

于懷 (五六一)

美國的需要和任務(上)

本論

E·白勞德 (三七二)

歐戰是怎樣勝利的

從「看守」內閣的成立到大選

舒翰 (三七六)
羅清 (三八〇)

哥尼斯堡之陷落(附冊)

V·魏里奇科作
戈賓權譯

研究

作黨戰後市場的中國

L·羅蒂格 (三八六)

抗戰期中大後方的租佃問題

葉民 (三九八)

敵寇統治地區農村破產實況

李侯森 (四〇一)

密洞陣地戰(參見軍事雜著)

華山 (四〇八)

專論

大後方知識青年應如何爭取民主

亦為 (四二二)

書評及其他

從古代史到近代史

懷湘 (四二四)

論蘇聯科學院版「世界史」第三卷

「布爾什維克」雜誌(四一八)

對黑格爾思想解釋之錯誤與缺點

專事

羣衆

第十卷 第十一十二期

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羣衆雜誌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總經理

新華日報館

本刊價目

本報零售 一百二十元

大期 一百八十元

十二期 三百三十四元

廿四期 六百一十二元

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照加

兩週評論

論世界政局

于懷

戰爭罪犯——露尼茲政府——波蘭和奧地利——特里雅斯特——敘利亞和黎巴嫩——法國地方選舉——義政府改組——英國大選展望——美特使分訪英蘇——日寇和平攻勢——日寇在中國的新佈署——美國的對日破略——舊金山會議是一面鏡子——史塔生事件的意義——美國人民關心美蘇關係——英美蘇三強關係的變化——美國孤立派份子與波蘭問題——一部分海軍將領企圖控制太平洋島嶼的動機——孤立份子反對蘇聯參加對日戰爭的內幕——美蘇關係前途

一 向着寬闊的彼岸

六月六日蘇美英法美蘇聯國委員會的代表在柏林開會，同時公佈了德國無條件投降條款與管制德國條文，歐戰結束後一月以來的混亂情勢已經開始走上澄清的道路了。

這自德國無條件投降的那一天起，歐洲的混亂局勢就開始高漲，有一些人不願意德國法西斯完全消滅，他們在德軍作戰機噐剛崩潰的時候，就已經着手把德國保存起來作為第二次反蘇的創頭；有些人不願意歐洲民主政權的建立，他們在反法西斯戰爭的砲聲還沒有完全消逝的時候，就已經採取公開反對歐洲人民政權的步驟；有些人不願意整個歐洲形勢所已發生的變化，他們在整個歐洲已經發生了基本變化的時候，還是念念不忘於他們舊的帝國主義政策，他們企圖控制海峽羣島以至封鎖那已從戰爭的砲火中誕生的新的大陸。

這是一股逆流，在運進流的激盪中反映出同盟國家對於戰後歐洲的兩條路線。

這是兩條路線，這是一個鬥爭：一方面是不願意德國法西斯完全消滅的路線，一方面是堅持並保證德國法西斯消滅的路線；一方面是反人民反民主的路線，一方面是人民的民主路線；一方面是蘇英美美合作的路線，一方面是英美和蘇聯對立的路線；一方面是反克里米亞的路線，一方面是堅持克里米

亞的路線——人們只習慣戰場上同盟國家軍隊和德國法西斯軍隊的鬥爭，而不習慣於這兩條路線的鬥爭，於是有些人只看到表現在水面上的逆流，而看不到深藏在海底的主流；只看見反動者氣焰的高漲，而看不見進步人民已有的，正有的和將有的勝利；只看見混亂，而看不見澄清，這是完全錯誤的一種想法。需知取得戰爭的勝利固然需要鬥爭，流血的鬥爭，取得民主的和平，更加需要鬥爭，嚴肅的鬥爭。

鬥爭是艱苦的，但贏得勝利的人民已經開始贏得了和平與進步。有些人不願意法西斯完全消滅；在這一個動機下，人們對納粹戰罪採取了寬宏的態度，和不明身份的露尼茲政府實行了曖昧的合作。這是對於千萬萬在希特勒的暴政下，在延長了五年的戰爭中倒下去的男男女女之寡婦孤兒的一種不能忍受的侮辱，人民憤怒了，人民要求嚴懲戰爭罪犯，人民要求取消露尼茲政府。在人民的壓力之下英美盟軍開始對戰爭罪犯採取了比較合理的政策（五月十四日）同時取消了露尼茲政府（五月二十四日），這是人民勝利的開端。現在同盟國家管制德國委員會已經建立起來，德國無條件投降的條款和管制德國的條文亦已公佈，管制德國的區域正在劃分——將來的問題（例如撤兵賠償等）還很多，但不能不指出，處置德國的問題已經獲得了第一步的澄清。

有些人不願意歐洲民主政權的建立；在這一動機下，不僅是在克里米亞會議已經確定了的波蘭問題的解決方針不能實現，而且在奧地利的問題上增加了新的困難。如所周知，奧地利的民主政府早在戰爭中的四月底就已感

立了，成立當時英美盟邦儘管表示不承認，但是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是否認它是符合於莫斯科會議關於奧地利宣言的原則的，他們所不滿意的僅僅是成立之前蘇聯方面沒有和英美協商，換句話說問題僅在手續上，倫納政府的民主性是沒有問題的。這樣看來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但五月二十四日英美盟軍忽然宣佈在奧地利成立軍政府，這一舉，其目的顯然是對抗倫納政府，其結果使得問題的解決就更加困難了。

今天成問題的不僅是個別的波蘭問題或奧地利的問題，而是英美盟邦對於整個東歐和中歐的政策問題。經過了這次戰爭，整個中歐和東歐的形勢改變了：人民翻了身，他們在英勇紅軍的協助之下，打走了侵略者，懲辦了同謀犯，建立了保證法西斯永不再起的民主聯合政權，粉碎了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專制勢力，解決了土地問題——這是一個新的形勢，英美同盟國家以怎樣的態度去對待這新的形勢呢？還是像上一次大戰最後一樣把東歐轉變成為反對——進攻蘇聯的基地嗎？不少人有這樣的企圖，他們計劃把以反蘇為導線的波蘭流亡政府的軍隊調到德國西北部是這一企圖的明證，而目前所有關於波蘭，奧地利和德國在本質上都包含著這一基本傾向。這是可能的嗎？不可能。你不能叫一個已經覺醒了和組織了的人民放棄他們所自願建立起來的政權，這道理是不分東西南北的，當前的問題是這些人民政權不僅已經建立和鞏固起來，而且已經和它的東方強大盟邦結立起友好協定，換句話說人民已經取得了戰略的主動地位，而目前某些頑固份子的企圖不過是一種戰術上的反攻而已。中東歐的大勢已定，這是誰都改變不了的。

有些人不願看整個歐洲所已發生的變化，在這一問題下他們企圖用控制海洋的辦法來封鎖進步的歐洲。倫敦經濟學者雜誌就早已指出過：蘇聯的東歐防禦線橫貫歐洲，而這一條線的南北兩端都是座落在北部德國的波羅的海大港斯泰丁和意大利北部的亞特利亞大港特羅雅斯特，這是代表英國官方的這種看法——不正確的看法。這種看法雖不正確，但從這種可以看出英國對這兩個區域的政策——一言以蔽之，他們生怕任何進步力量完全擁有這兩個區域的港口和島嶼，因為從他們看來，只有控制住這兩個地區方能一方面保證大英帝國的海上安全，另一方面阻止進步的東歐大陸出洋。這就產生了丹（英）蘇之間的領土佔領波荷海峽問題和英（意）南之間關於佔領特羅雅斯特問題。波荷海峽問題由於蘇軍的堅持，已告暫時解決；特羅雅斯特問題，由於雙方讓步，亦告一段落，問題的最後解決與否和平會議的召開，但是我們問：西方盟邦的這種復活帝國主義政策的全圖能够成功嗎？不能，當一個

大陸已經走上了進步途程的時候，一個反動的海洋是阻止不了它的前進的。

逆流激盪，不限於歐洲：敘利亞和黎巴嫩的問題指明了，西方同盟國家復活帝國主義政策的企圖不僅表現在英美盟邦對於歐洲的某些問題上，而且表現在法國企圖使用武力維持它在它的舊託治地區的敘利亞和黎巴嫩的特殊權益以及英國運用法敘之間的矛盾來鞏固乃至擴張它在中東的地位上。

敘利亞和黎巴嫩的獨立要求是完全正當的，但不可忽視敘利亞問題不僅關係於法法兩國之間，而且關係於英法在中東的權益的爭奪，不僅關係於敘利亞和英法，而且是一方面關係於整個阿刺伯國家，另一方面關係於整個同盟列強——英法美蘇，這便使得問題呈現了一幅非常複雜而錯綜的圖面。

一般的說來，波斯灣——蘇彝士——捷紐海峽這一三角地區，由於它扼歐亞兩洲的咽喉和保有豐富的石油產量，自然就是英美法蘇關係交錯的地帶，特別是經過了這次戰爭的變化，它更確有取戰前巴爾幹而代之的趨勢，這是問題的一方面，整個中東和近東的阿刺伯民族的獨立運動是再也不能阻遏了，阿刺伯聯盟的成立是這一發展的指標。

任何關於中東問題的解決必須照顧這兩方面，一方面它必須照顧到阿刺伯民族的獨立要求，另一方面它必須照顧到英法美蘇的利益；任何種族歧視阿刺伯人民的獨立和加深英美法蘇矛盾的辦法，都是個世紀的經驗所昭示了的一樣是命定要失敗的。現在，用來打擊法西斯的大砲（美國的租借物資）第一次在大馬士革向爭獨立的人民開出了（三十一日）。問題怎樣解決呢？兩種方法：英國所主張的英美法三國會商的辦法，蘇聯所提議的英美中蘇法五強共同解決的辦法。很顯然的前一種辦法只能有一個結果：繼續壓迫人民，加深列強矛盾；而後一種辦法不僅能解決當前的敘利亞問題，而且還將為整個中東問題的解決鋪平道路，把整個近東的落後地區拉向民族獨立，國際和平和工業建設的道路。

歐洲變了，企圖把歐洲恢復到原來面目的一些國家也在變着。五月初法國地方選舉中以共產黨為首進步各黨派的獲得壓倒優勢，證明經過了戰爭教育的人民不會長期地讓他們的統治者恣意橫行下去，很顯然的法政府目前對於敘利亞的政策是不能代表法國人民的意見的，因為剛從希特勒的鐵蹄下解放出來的他們，深深地知道這壓迫的民族的國家本身是不能自由的，實際上法國對於敘利亞的這一舉把新生的法國榮譽降低到怎樣可恥的地步啊！羞恥是沒有用的，法國人民恢復法國光榮的辦法只有改變現政府的機構及其政策，五月初的地方選舉指示着這日子是不久就會到來的，法國的大選已經不遠了

這是從四歐地下即將昇起的烈火。

某次被人假借名義和南斯拉夫獨亂的意大利亦在激烈的變動之中。現在去年六月間波蘭和捷克斯拉夫時，他就答應了一旦意北解放，意政府即將大改組，現在意大利完全解放了，意政府改組之期不遠，而意政府只可能有一個前途：更加民主化。在這種困難的個不是意大利的王室——專制主義者——帝國主義者這一批法西斯的匪徒本身還有多變大的力量，而是英國的反動份子在此時這一批人阻撓意大利的民主化。例如意北盟軍總部藉口地方安全，拘留過社會黨領袖索尼，禁止意共領袖陶爾格羅里亞特演講——這些都是背莫斯科會議對於意大利的決定，德黑蘭協定和克里米亞對於歐洲解放宣言的基本精神的舉動。從這裡可以看出意大利民主前途的困難，但是戰爭教育了人民，人民終將獲得進步與和平，我們對於人民的信心是無窮盡的。一旦意大利的政府真正的民主化起來，意大利就不再可能是西方強國用來攪亂歐洲和平發展的工具了，這是從南歐地下即將昇起的烈火。

選自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以來，英倫三島就一直導演着種種不名譽的脚色；反動的英倫三島監視和撲滅歐洲大陸的革命——一七八九年以後如此，一八四八年以後如此，一九一七年以後亦如此，屈指算來，這不光榮的歷史已經前後貫串三個世紀了。好像是一種不可破的歷史的惰性在支配着人們，這一次人們又在導演這一套把戲了；這套把戲去年希臘事件以來歐洲所發生的「一切不幸都可以追溯到這一個根柢源去；英倫三島還能像過去一樣的完成這「不光榮的任務嗎？姑不論歐洲的面目是變了，英國自己也在變了。這表現最近英工黨退出聯合內閣，邱吉爾政府解體（二十一日），保守黨（邱吉爾）崩潰守內閣（二十三日），並決定六月十五日解散國會，七月五日決定大選——這一連串的發展上。

英國的現國會是十年前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選出來的；十年來世界翻了一個身，英國的政策也經歷了重大的變化；以十年前選出來的國會其不能反映英國人民的意見是顯而易見的。現在，歐戰結束，英工黨決定退出內閣，舉行大選，這一次大選的結果對於整個世界發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大選的開端如何呢？從英國兩大主要政黨——保守黨和工黨所標榜的政策上來，根據他們在紙面上所發表的：兩黨政綱在國際政策上（和美法蘇中合作，保證對日作戰到底）的差別不知在印度問題上的差別，而在印度問題上兩黨之間的差別更不知在國內問題上的差別，難題這三方面的差別都不大，保守黨看到它的重大弱點了：一是在印度問題，所以他們目前正在集中力量於「解決」這一問題；可以想像，這一問題最近將來會有若干開端

。倘今天更重要的是保守黨擁有邱吉爾這樣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而工黨的領導政策却一直到現在還是拒絕和其他進步黨派結成選舉同盟，這兩股上層階級的一股一頭就阻礙了英國內部階級力量的改組適當的反映到選舉中來。因此，儘管英國內部情況是激烈的改變了，由於選舉機構的複雜性，和工黨領導階級的錯誤政策，這改變可能有相應的反映到選舉結果上來，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儘管保守黨再度以很少比例的優勢而當選的可能，但回復到目前保守黨在國會中佔有三五九名壓倒優勢的多數，而工黨只保有一六三名少數的情況是絕不可能的；這就是說，保守黨儘管有可能再度當選，但它對於其他黨派的優勢是相對地減少了，這可以說是一定程度的變化，而這種變化是不可避免的。這反映到政策上來，自然，這種變化是一估計，大選的真正結果還要看最近一月內英國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和進行的進行；預言具體結果，現在還不是時候。但目前可以斷言的是，不管選出的具體結果如何，回復到一九三五年去的可能性是一去不復返了，英倫三島過橋的世界變了，英國人民變了。

而且當前問題是非解決不可的，這要求的迫切性，英美英於蘇聯，美國蓋於英國，因為從英美雙方說，戰爭才打勝了一半，歐洲和平問題不解決，英美特別是美國無從真正集中力量去打日本，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要求；於是在英美人民的督促之下，在現實要求的壓力之下，美總統杜魯門終於派了賀浦金斯和哈維斯分別訪問蘇英，作為英美蘇三巨頭會議的前導，同盟國家管制委員會的成立顯示了美總統杜魯門使活動的結果；據六月一日杜魯門總統的談話，三巨頭會議的日期已經不遠。混亂的局勢必須澄清，英美蘇三國必須團結，當人們認識到團結問題不是一個主觀的願望問題，而是一種客觀的必然的時候，團結的前途就已經有了保障。

歐洲的人民已經贏得了戰爭，贏得了戰爭的人民一定會贏得進步與和平；因此，目前歐洲的逆流雖然相當高漲，但英美蘇團結的主流一定會衝破各種各樣的困難和阻礙，而達到和平發展的寬闊的彼岸。

二 站在政變的門前

由於歐戰的結束，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形勢起了基本的變化：從整個世界觀而言，戰爭結束了，從美英的對日作戰而言，美英的形勢也從從同時對待日用的兩線戰爭一變而為集中對日的一線戰爭，而日本則由於美英

無畏的勇氣，不僅在戰場上受了一頓不輕的打擊，在力量對比上，它已陷
於不可挽救的劣勢地位。

這真是大轉變的前夜。

於是遠東的和平線上昇起了兩道曙光：一方面是同盟國家的陣營中的孤
立份子相繼降旗，以為單獨投降即將到來的巨大優勢已經可以迫使日本無條件
投降，一方面是日本法西斯向各方面伸出了妥協和平的觸鬚。日本的希望
有三：一，由於歐戰的結束，英美蘇的團結已經失掉了基礎，英美蘇關係感化
是日本文安協和平可釀成功的物質基礎；二，由於歐戰的結束，英美同盟國家
內部必然會發生獨斷專制的現象和及早結束這一半廢物的希望，這是日本安
協和平可釀成功的心理基礎；三，由於歐戰的結束，已經對日廢除了中立協
約的蘇聯必將採取進一步的行動，而蘇聯的這一步驟必將使日本永無回頭之
望，因此歐戰結束後蘇聯行動前是日本文安協最良好的時機。

這樣，日寇的安協陰謀就從四面八方施展了開來，然而儘管同盟國家的
孤立份子對於它抱有很大的興趣但陰謀是到底不能成功的，理由很簡單，
儘管同盟國家的優勢是空前的增進了，但那優勢在今天還是潛在的，潛在的
優勢不可能取得柏林的無條件投降，而另一方面正因為那優勢是潛在的，
它更不會放棄它的妥協和平，這是一。其次，英美同盟國家內部雖然有一部分
聲稱勝利的地現現象，但另一方面戰爭也教育了人民，英美人民是絕不
容許對日妥協和平的。最後，目前任何英美對日的妥協和平必然地在本質
上向德意政策的陰謀，而蘇聯是絕不會讓這陰謀實現。

妥協和平絕不可能，盲目的樂觀空氣依然籠罩着天空。人們說，日本雖
曾孔祥，它的消滅已經指日可待了；一方面在空中燃燒逐漸地轟炸着日本本
土，一方面在菲律賓島的佔領已經不久即可完成，再向前去就是日本本土，
美軍登陸日本本土的日子不能遠了。美軍即將登陸日本本土，日寇在中國大
陸的前途只有撤退，最低限度是在華南撤退。(被略)兩週以來戰事收復了
如下的地區：

- 一、福州(五月十八日)及其附近諸據點。
- 二、河池(五月二十日)及其附近諸據點。
- 三、南寧(五月二十七日)及附近諸據點。

由於歐戰結束盟軍第二次登陸的迫切性，由於蘇日中立協定的廢除，蘇
聯採取積極行動的可能性，遠東戰局的根本形勢變了，在這一個新形勢下，
日軍有重新佈置它的兵力的必要：這一新形勢的戰略趨勢是加緊華北，鞏固

華中，準備華南，這一新佈置的戰略原則是改變平面的佔領為重點的佔領，
根據這原則，敵人在華南某些更重慶地區的撤退還是可能的，但據此
，美軍至今日還沒有看出敵人從這個華南撤退的徵象。(被略)

然而，盲目的樂觀空氣依然籠罩着四方，這是因為對日戰爭的轉機估計
儘是支離破碎太平洋的這一邊，而且支配了太平洋的那一邊的原始。

在妥協和平的曙光漸露在太平洋彼岸，美國的孤立份子們踴躍欲試的時
候，六月一日美總統杜魯門的國會咨文是有着極大作用的，這是一
咨文杜魯門重申了美國對日作戰到底的決心，堅持無條件投降的和平條
件，這是值得我們鼓掌歡迎的。在這裡，杜魯門並不估計日本抵抗的力
力，他認為美國軍隊還沒有和日本的全力接觸，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問題
的作戰方針呢？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和麥克阿瑟及尼米茲會商已決定我軍在太平洋
上發揮最大的打擊力量，將於一年以內，迅速獲致最後勝利。維持這種規模
的軍隊我們就能使我們目前在太平洋上的力量增加一倍以上，並且能確保
本比會和我們盟國比肩作戰以摧毀德國國防軍和空軍的三百五十萬大軍團
大的海外軍隊來打擊日本。」

很顯然的，這一比三百五十萬大軍團要大的海外軍隊和日軍四百萬
一線作戰部隊比較起來不能算是決定性的優勢，怎樣取得決定性的優勢呢？
一個是從戰略上爭取同盟軍，共同作戰，一個是從戰術上靈活運用，適應
區域性的決定優勢，美總統採取哪一條路線呢？很顯然的，為了取得迅速而
犧牲最小的勝利，兩者同樣重要；但美總統杜魯門咨文的重點却是放在後者
，而關於爭取同盟軍作戰的一點，在全部咨文中美總統只提到一句，這當然
常值得注意的，因為它指示了：美總統所宣佈的這一戰略是美國準備單獨
以日本的戰略。(被略)但從迅速而犧牲最小地擊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這
點看，從戰中決定戰後和平的觀點看都是值得加以研究的。

在今天重要的倒不是這戰略本身，而是根據這戰略出發的美國的對戰政
策以及它的一般遠東政策(其中包括對蘇)，這些政策所產生的後果在戰
上不是加速了對日的共同戰爭，而是阻礙了對日共同戰爭的迅速勝利。但
人們不認真地考慮這一點，因為他們自信他們那一套是能夠迅速而又穩妥
小地打敗日本的。但一旦戰爭曠日持久了，特別是傷亡日漸加大了，再回頭
頭來考慮爭取同盟軍共同作戰的時候，發現過去的政策在主觀上是因為自
有把握能迅速而又犧牲最小的打敗日本的，實際上正是這一政策產生了障

長戰爭和加重犧牲的後果。

事實教人，歷史的邏輯是誰都逃避不了的。

三 駛經淺窄的峽道

由於五大同盟強國對於否決權問題協議的成立（六月七日），在舊金山會議目的舊金山會議已經達到快要結束的階段了。目前，尚待決定的問題還相當多，但根據過去一路來的發展推測，舊金山會議之必將完成它那建立和平機構與制定和平憲章的偉大歷史任務是毫無疑問的。這是聯合國家在建立世界和平的艱難道路上，一個劃時代的進展。

但如所週知，舊金山會議的目的是建立和制定一個維持和鞏固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機構與憲章，不管這機構與憲章是如何的至善至美，單靠它是不能維持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世界和平與安全的維持和鞏固決定於聯合國全體——首先是英美蘇中法，特別是英美蘇三大同盟強國的團結和合作，有了它就有和平，沒有它任何美善的機構是不能創造和平的。在這一意義上，舊金山會議是一面鏡子，英美蘇同盟關係的一面鏡子；從這面鏡子裡，我們可以看出英美蘇同盟關係的發展和變化。而這關係的發展和變化對於將來世界和平而言，實際上是比舊金山會議的成就更具決定性的影響的。

舊金山會議自從四月二十五日開幕以來到現在已經有四十五天了，一連串被克服了或者部份被克服了的困難已經遠遠拋在後面，而且會議就將順利的結束了，但是研究一下這些困難的真相及其來源在今天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因為它指出了潛存在今天的關係中的一些矛盾和裂痕，爲了今天對日戰爭上順利結束，爲了明天全面和平的迅速到來，這些矛盾和裂痕是非加以澈底克服不可的。我們對於全世界和平——進步——民主的前途抱持着不可搖撼的信心，但那信心不是建築在盲目的樂觀的，而是建築在對於客觀歷史法則的深刻把握，整個世界力量對比的週密分析和對於全世界進步人民不知懸解爲何物的鬥爭上面。

那麼，舊金山會議一路來所經歷過和正經歷着的一些困難具備那一些特別需要我們注意的性質呢？大大小小的問題是數不盡的，我們沒有意思在這裏寫一部舊金山會議的實錄；然而具有本質意義的問題却是大家稍一回想都能歷歷數出的。在會議的第一階段中引起國際間軒然大波的問題是民主的波蘭政府被拒絕參加會議，而法西斯的阿根廷却在英美盟邦的支持之下混了進

來。其次在英美法蘇中五強完成了共同的修正案之後，在會議的第二階段中，引起的波瀾最大，爭執時間最久的是區域制度和託治地區的兩大問題；特別是託治問題幾幾乎形成了美蘇之間一時不能解決的問題。

事情發展是具有充分的戲劇性的。在這一問題尚未正式提出以前，英國代表團的要求保有太平洋戰略基地的一事，雖未表示正式反對，但亦不作明確的肯定表示；而美國代表團雖有一部份竭力主張保有太平洋戰略島嶼，但其全體對於英國代表團實質上維持其現有殖民地之觀點，雖未表示完全反對，但亦未作明確的肯定的支持。這是代表一個擁有大批殖民地國家和一個沒有大量殖民地國家可以想像的不同的態度；誠如五月七日莫洛托夫所說：「英美觀點不同，「值得研究」。問題提出了，英國代表反對以獨立一詞作爲委託地域的目標，美國代表則堅持美國單獨佔有太平洋上從日本手中奪得的戰略島嶼，這表示了英美之間對於這一問題所持態度的差異。但且夕之間，五月十七日，美國代表團代表史塔生忽然改變態度，轉而支持英國立場，反對規定以獨立爲託治地區的終極目標，很多人不明白史塔生爲什麼忽然改變態度；事實上很簡單，英國提出了交換條件，支持美國佔領或合併太平洋上的戰略島嶼。這樣一來，英美兩國因爲一個有大量殖民地而一個沒有大量殖民地之故而發生的矛盾，就一晝夜之間在已有殖民地將有殖民地的基礎上統一起來形成了對蘇聯和中國的對立。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其重大不是因爲這一問題因此而形成僵局，使得舊金山會議無法進行；不，問題是在解決中，舊金山會議是在順利的進行着，問題的重大性是史塔生事件指明了激湧在美國國內外的一股激流，假如讓它自由發展下去，其後果將是不堪設想。

總觀舊金山會議三個階段中的爭論過程，不論是在準備階段中的波蘭——阿根廷問題，第一階段中的美代表團提議國際機構有權修改條約的問題，第二階段中的區域制度和託治制度問題，甚而至於最近的否決權問題，在爭論中形成尖銳對立的是美和蘇聯，美蘇之間是不是已經發生了些問題。舊金山會議討論的是機構和憲章的形式問題，英美蘇的真正關係才是問題的實質，那麼，美蘇之間的關係究竟怎樣了呢？這正是比舊金山會議本身的成敗利害更重大的問題，不弄清這一個問題是把握不住問題的本質的。

從太平洋那一邊傳來的一連串演詞指明了美蘇關係已經變成了全美國進步人民注意的焦點。那一連串的演詞是：

- 一、五月二十四日美商務部長華萊士在紐約世界時事研究會的演講。
- 二、五月二十六日美助理國務卿麥吉利希從華盛頓廣播的演詞。
- 三、五月二十六日美負責歐洲和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鄧恩從舊金山廣播的演詞。

四、五月二十六日美國務院副司長希克森從舊金山廣播的演詞。
 五、六月四日美商務部長華萊士在接受教會人獎金的晚餐席上的演詞

這前後相隔僅十日間連續發表的五大演詞都是闡明美國外交政策，特別是遠東政策（鄧恩）的，在這當中都一致強調美蘇之間並無利害衝突，美蘇之間的關係必須加強。爲什麼在這個時候有必要重三國四的強調美蘇之間的關係呢？五月二十八日美國國務卿斯退丁紐斯在舊金山發表的總報舊金山會議一月成就的廣播詞中透露了問題的真相。在那裡他說：

「美國在可能範圍內，將設法恢復其在英蘇兩國政策間之中間地位，即有時居調停人的地位，有時居領導者的地位」（五月二十八日中央社舊金山專電）。從這裡可以看出，直至羅斯福總統死前美國在英蘇之間所佔有的居間地位已經喪失了。如所週知，美國的這種居間地位在整個英美蘇的複雜關係中起着巨大的作用的，但如今這地位是喪失了，這是英美蘇同盟關係中一個重大的變化；現在的問題是美國這居間的地位是怎樣喪失的，喪失了之後，美蘇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了。

美國怎樣喪失這中間地位的呢？第一個不能不指出的重大原因是羅斯福總統的不幸逝世，在羅斯福的死亡中，美國喪失了一位保持這中間地位的老能工。第二，歐戰的結束使羅斯福總統登台的新手更加不能控制美國國內外的混亂形勢。第三，舊綏靖——孤立主義者加新帝國主義的聯合活動加深了這一危機。所有這一些因素集中地反映在舊金山會議；一位敏感的觀察家對這這一轉變有過如下的深刻分析：

「在複雜的情況中，大不列顛的外相艾登在舊金山會議表演了一套最馴熟的外交手段。他已經成功的做成各方面的朋友，在一切之中最重要是他已取得了美蘇之調停者的地位了，換句話說，他已把羅斯福總統的舊角色完全倒轉過來了，因爲直至他死前，羅斯福總統一直保持著美蘇之間的調停者的地位。

邱吉爾和斯大林之個意見上的差別不僅是屬於個人性質，而是有着歷史的根源的。那不僅是因爲那是邱吉爾在第一次歐戰後竭力主張運送大軍幫助白俄去推翻布爾塞維克政權的原故，而且是因爲他曾經勾搭過克萊夫登系的

人物，這批人物在一九三九年主張德蘇之間應該發生戰爭，而英國則應坐山觀虎鬥。這是邱吉爾之固不易互信的基础。在歷史上邱吉爾是一直在執行那有百年之久的英國孤立俄國的政策。一百年來，那擁有全世界最大陸地的俄羅斯被那擁有全世界最大海軍的英國阻止着不能獲得一個暖水海港。在這一個政策下，英國和日本結成同盟，好這樣通過日本來阻止沙俄獲得滿洲和太平洋上的暖水港口，在這一政策下，英國在伊蘭（波斯）建立了勢力範圍，阻止沙俄利用波斯灣。在這一政策下，英國發動克里米亞戰爭，英國軍隊和軍艦曾經在三巨頭會議的地方——雅爾達登陸；在那裡英國軍隊行了一個血腥的戰爭去阻止沙皇獲得韃靼海峽，和到地中海的出口。在這一政策下，在第一次歐戰後，英國從蘇聯奪去了拉特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和芬蘭以阻止它向波羅的海的出口。

這一個矛盾同樣出現在德黑蘭——雅爾達會議裡；在那裡英蘇是對立的，但羅斯福坐在當中。在德黑蘭會議中爭論的問題是在何處開闢第二戰場，邱吉爾主張在巴爾幹，斯大林主張在法蘭西；最後，羅斯福決定了支持斯大林——在法國開闢第二戰場。……在雅爾達，羅斯福依然是很聰明地保持着中間地位，雖然那時他的身體已經不行了。

現在美國已經不知不覺的滑到作爲蘇聯的主要的競爭者和潛在的反對者的地位，而英國却通用手腕站到中間去了」（五月八日堪特基，交通報，皮爾遜專欄）。

（下被略一千餘字）

有三大理由使得我們相信民主進步的政策終將取得了勝利：
 一、歐戰結束，歐洲戰後問題非求得一個解決不可，而由於既成力量對的改變，任何可能的解決，非採取英美蘇團結合作的政策不可。

二、美國對日的優勢是空前地增加了，但那優勢從任何一個觀點看都不足以取得美國孤立——帝國主義者之所想像的那樣迅速而損失輕微的勝利，一旦對日戰爭的時間和損失特別是損失超出了他們的預料之上，整個問題就會重現出完全不同的面目；而且，更重要的是有許多決定性的因素是這些孤立——帝國主義者所不能控制的。

三、英美蘇之必須團結不僅是因爲面對着共同的危險的原故，不團結無以致勝；而且是因爲他們追求着共同的希望，不團結無以和平。天下人都知道希特勒和希特勒的蘇聯結盟的因素，而不知道戰爭教育了人民，覺醒了和組織了的全世界進步人民迫使英美蘇團結的正因素；而這一千萬人的力量正是保證英美蘇一定團結的進步世界的脊梁。

歐戰結束，世界命運的大船正航進一個淺窄的峽道，儘管那淺窄的航道還可能需要一些時間才能渡過，但是到頭來是誰也不能阻止它駛進寬闊的太平洋的。
 （六月八日夜）

美國的需要和任務(上)

E. 白勞德

一 戰時團結與戰後團結

假如我們能把美國的全部力量動員起來，儘可能迅速而徹底地贏得戰爭而把戰後問題解決得最妥善，那將是一國思慮不周的策略。不過，正如我們在國際關係的分野上，為了充分展開聯合戰爭，對於戰後世界的面目必須有一個基本的構想一樣，在英美的國內問題上，戰後問題已經日益顯著地作為維持戰時團結的一個因素而出現了。為了保持美國的戰時團結，必須把戰後問題延長到戰後時期。將來問題影響現在，它要求我們今天就予以適當的解決。

舉一二例以明將來的問題怎樣影響現在：一個大公司的董事會考慮它和工人的關係。一位老董事要求公司的行政部停止對工人的「緩衝」政策，把工會攔腰，廠方「重做自己屋裡的主人」。公司的經理說：「在戰爭的緊急時期之必須服從政府政策，和工會來往，但戰事一結束，我們一定立即停止所有這些可笑的蠢事」。約莫同時，工人的執行委員會也在開會。一個衝動的執委會要求立即罷工來糾正幾月來積累起來的工人方面吃的虧方的苦頭。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告訴他：「不，當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我們不能罷工，不過一旦戰事結束，你看我是第一個人要對他們進行一個真正的戰爭」。從此以後，廠方和工人方面只是一個思想支配着：準備那戰爭一停止後即將爆發的大崩潰。

把這一例子擴大幾千倍，然後再看這同樣的原則是怎樣在影響着我們這一個社會中各式各樣的對立和衝突，這就說明了為什麼緊張的「不可磨滅的氣氛」瀰漫在整個美國，甚至即便在那些認真地同意繼續戰爭是當前最重要工作的人們當中亦復如是。

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九四四年根據美國憲法是大選的一年，要選出今後四年美國的大總統，選出整個參議院和三分之二的眾議員，不必說其他各州和地方的選舉。各種特殊利益對於政府的壓力紛紛活動，要達到他們的目的，所有派別的和個人的政治野心也發展到白熱的高潮。對於這些人——好像團結是沒有一點利益的，他們的利益在那條條的美國式的「打槍子，拖起走」，不顧一切在競選中獲得權力。

這對於希特勒在美國的朋友再好也沒有的一種形勢。這些形勢在社會的各個階級和各式各樣的混亂，好運後來破壞來即弱那隨着西歐第二個關閉而來的對於希特勒的打擊，他們的目的在把美國從德蘇聯盟中拖出來，取消希特勒主義於死命的長期同盟和持久和平的遠景。他們必須分裂美國的國內團結，他們一定要把美國反法西斯主義者挑撥起來互相鬥爭取消力量，使得他們不能把反希特勒的鬥爭引到勝利。

一九四四年春，種種分裂勢力在美國橫行無忌，毫無顧慮，他們真是在享受着一種假期，他們威脅着我們國家和世界的將來。他們必須被停止，置於控制之下。

直接的壓迫這些分裂勢力，雖有時必要，但並非控制情勢最主要的方法。實際上失敗主義者和網網糾紛份子正想利用這稍鬆弛來造成國內的無秩序和混亂，最主要的方法是加強所有一切真正愛國的美國人的團結精神和信心，假如這一點能做到，那麼，那些野心分裂的份子是可以不用得費錢錢就能加以壓制的。

因此為了求得勝利，就要求我們把戰時的團結延長到戰爭結束後相當長的時期。同樣為了實現德蘇盟約所指定的持久和平的遠景，這種延長也是必要的，因為一個充滿了內部鬥爭的美國是不能在戰後實現它在英美蘇同盟中應負的任務的。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我們最好一開始就把它當做一件非常艱難達到目的的工作，需要我們全心全力去爭取的工作。不過，同樣我們在接戰這一問題上必須放逐一切失望和宿命主義的情緒，要決心的認定，這問題是能解決而且一定會解決的。用這樣的態度去處理這一問題，我們會被引導到執行行動的道路，只要我們堅持下去，那道路是會一步一步地提供出問題的答案的。

現在的所謂戰後計劃大部份是和我們目前所解決的問題沒有直接關係，不僅沒有關係而且不少一部份這樣的計劃是解決問題的障礙，因為它主張了這種或者那一種高度可變的辦法，因此我們認為最好的出發點是規定出如下的目的：我們的戰後計劃是實現德黑蘭前途的國內團結。

這種規定對於那些為計劃而計劃的人，以及那些抱有特殊目的和企圖而計劃的人是不受歡迎的。我們必須冒這種人的不高興，希望以後能幫助他們在那大團結的範圍裡找到他們的地位，而對於這種大團結，他們的計劃可以服務，但却不能創造出來。

美國的國內團結不能在一個事前設想好了的計劃上建築起來。它只能逐漸的形成立，在行動中找出一些協調之點來，在這些協調之點上，那些一直對現在憤於鬥爭的方式才能解決的各階級集團和傾向的觀點和利益可以統一起來。

而對着我們最大的危險是美國民主——進步的多數陣營中的團結由於互相衝突的計劃而破壞了，而那些反動者的少數都因為目標一致而產生約團結掌握了權力，沒有一個計劃是值一文錢的，假如它不能團結國內的大多數，能夠付之於實行。

在所有足以分裂進步——民主的多數陣營的不同趨勢中，再沒有比那美國走向社會主義前途和美國繼續不變保存現行制度的這兩種趨勢更為不可調和的了。

這是美國社會的一個明顯事實，即現在在美國並沒有一種現存的或潛在的大多數，這種大多數是為美國的社會主義前途而採取團結一致的行動。即使我們把所有一切關於社會主義不同理解的人揉成一團，他們依然是一個很小的少數。因此，我們必須明白地確定地指出：能把美國的大多數人團結起來支持德黑蘭的實際綱領必須接受美國現存的經濟制度作為它的工作基礎和出發點。

經過了慎重的考慮，我認爲美國人民在主觀上對於美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深刻轉變是如此地沒有準備，任何以社會主義為目的的戰後計劃，其結果不僅不能團結多數，而且會分裂全國。而它所分裂和所削弱的正是民主的和進步的陣營，而它所團結的所加強的一部份却是最反動的力量。在它的實際效果上，這種計劃至有幫助美國國內的區區黑蘭勢力掌握政權。

因此，社會主義的份子，爲了在廣大的民主陣營中起着積極的團結作用，必須說明他們決定不在危及或削弱國內的團結的形式和方法下提出社會主義的問題。在所有一切的實際問題上，他們必須把他們的社會主義的信心從屬於大多數的共同綱領之下。

對於社會主義信徒，這一個問題不是新的。自從希特勒在德國登台以來，聚積力量把這一個威脅從這個地球上消除出去已經日甚一日地變成當前中心問題了。

選在一九四五年夏天，我就指出了問題會在今天這樣的形式之下出現，那時我寫道：

「美國，假如它能順利地經過這次戰爭的殘酷試驗而對勝利供獻出它的一份的話，幾乎是必然的要作為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重心而出現於戰後世界。因此，它在國際家庭中將要擔任一個非常主要的角色。

「這一個戰後世界的中心問題是這個戰爭中造成的聯合國家的團結合作，能否繼續和延長到戰後去集體地處理世界經濟和政治的再建設。戰後世界的性質要看這一個問題的解決而定。

「假如作為世界合作的中心的聯合國家能夠繼續和延長下去的話，那麼這一個世界有充分可能迅速的恢復戰爭的創傷，爲所有的人民達到那像在大西洋憲章中所指出的文化的和經濟的進步的目的，有可能把那在國際戰爭過程中所製造，緊跟着戰爭的結束而將爆發的暴力革命和內戰減低到最低限度，有可能把所有國家的和平與有秩序的發展提高最高限度。」（播者：「勝利及其後」，二五一頁，國際出版社，一九四二）。

這個在一九四二年我僅能當作一種好的可能性處理的前途，現在經過了莫斯科和德黑蘭會議，在邱吉爾、羅斯福、斯大林的簽署之下已經變成全世界實際的行動綱領了。假如我們相信這一個綱領是現實的，應該有的，那麼我們一切的計劃必須集中於一個目標，那就是爭取這一個綱領的實現。

不管在別的國家是一種什麼情況，在德黑蘭會議的後果是指向一個前途：在戰爭結束後的短暫期間以及未來的許多年月中，美國的遠景是擴大

生產與充份就業，在現存制度的範圍之內加強民主！——而不是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遠景。

這是美國在戰時和戰後團結領袖唯一可能的基礎。

因此，所有馬克斯主義者及社會主義信徒們的政策，是面對在戰後世界建設期間一個資本主義美國的前途及其所有的後果，在這一基礎上估計一切的計劃，和國內最民主和最進步的大多數合作，造成一種廣泛和有效到足以實現德黑蘭政策的國內團結。

一一 美國資本主義的特點

我們現在檢討的美國內團結必然地包含着，必須包含着大資本家的決定部份，那就是說要包含那些對於國民經濟擁有直接的和有力的控制權的一部份人。這是決定我們這個綱領的許多特色的一個事實，我們的國民經濟將在這一綱領的指導之下工作。因此假如我們能研究一下美國資本主義及其領導者們的一些特點，那將大大地有助於許多問題的澄清。

首先，得弄清楚一種引起許多混亂的矛盾現象。這種矛盾現象可以用這樣的方式說明：美國資本主義是世界最前進的資本主義；但不是最成熟的資本主義。它是最前進的，因為它是最強大的，它把生產的技術提高到從來所未有的最高峯，同時它帶來最少和保存最少前資本主義時期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形式。它不是最成熟的，那就是說它還沒有顯示出它的內在傾向的充分展開，它還保留了一個年青的資本主義的某些特點，它在自知和自覺上是落後的。

美國資本主義這種相對的不成熟性，典型地表現在它像野蠻人緊抓住他所崇拜的神物似地緊抱着「自由企業」的口號，任何細緻的對於「自由企業」不敬的態度，馬上就會使美國資本家組成一個強固的集團起而自衛，這種對於「自由企業」不敬態度所產生的反應，要比任何其他東西所引起的來得更快，更徹底。歐洲甚至加拿大的資本家們就比美國的資本家老練和現實得多了，因此在他們思想上也就不像美國資本家那樣為這種教條所束縛。對於美國資本家，愛爾的說，「自由企業」是神聖的，不可侵犯的，特別是在言詞和理論上；雖然在實際上他們違背了這教條，但只要能夠在掩飾性的沉默或小巧的藉口之下，自認爲那些行爲並不違背「自由企業」，也就過去了。

自然，我們不能在我們的思想方法裡採取這種對「自由企業」的拜物教態度。但我們在制定一個團結美國大多數，包含資本家重大部份在內的大多數的時候，我們必須對於這種情形加以注意，我們必須避免對「自由企業」這一口號的真實性直接挑戰。這和宗教自由與容忍的情形差不多，它要求人們對於一切和每一種宗教及其信徒保持一種尊重的態度，但並不要求每一個要把其中任何一個宗教作為信仰對象。

美國反對德黑蘭領袖的人正在保衛自由企業、家庭、母性、宗教和民族主權的口號之下糾集他們的力氣。他們類似於資本家的口號是「自由企業」的口號。他們以爲這樣可以引起民主——進步陣營中的混亂，因為參加這個陣營的人，大部份是把自由企業當成和母性與家庭一樣具有神聖性質的，因為他們從吃奶的時候起就已經吸收了這種意識了。自由企業是資本主義的一個可愛的小名。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是堅定的社會主義者，不過我們既然認爲在一個相當的時間裡我們有和他們合作使得美國資本主義爲美國和全世界的利益而工作的必要，我們就不肯因爲要對資本主義的小名「自由企業」恭恭敬敬地傾聽而感覺不舒服，因此，我們事先宣佈：我們自己參加的民主進步陣營是保衛「自由企業」的，我們認爲這一個詞類就是在美國存在的資本主義的同義語，我們不反對這個口號，我們也不提出任何對立的口號。

因爲，爲了鞏固那團結德黑蘭領袖團體的大多數，這是必然的步驟之一，我們決定用一切方法把這個錯誤的和混亂的「自由企業」問題從一九四四年的選舉運動中清除出去。

這還必須指出，美國一些資本家對於他們自己制度的初期非常留戀，這表現在他們死抱住「自由企業」不放，但另一方面對於資本主義制度向更高階段的發展抱強烈的反感。他們不能分別出作爲被他們心愛的制度更強的組織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和奠基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消滅上的社會主義之間的差別。他們以同等的狂熱，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國家資本主義。這就是爲什麼在一九四四年的競選中民主進步陣營不能提出即使是

溫和的銀行、鐵路、鑛山，公共事業……國有的網領的緣故，雖然這些辦法將大大地改進資本主義的效率，使得它能夠更爲他解決它自己的問題。

雖然是在戰爭的巨大壓力之下，爲了使得經濟合理化，政府方面的強有力的干與非常必要（衆院多蘭委員會的報告和建議，參院吉爾戈爾——瑟勃委員會的報告和建議以及由這些委員會在衆院共同提出的法案都把這種必要性記錄在文獻上面），羅斯福總統都認爲向着這一個方向使用他的權力不適當，而國會也沒有採取行動。即便是總統提出的那溫和的控制通貨膨脹的「七項綱領」都被國會否決了，不惜冒着長期的有害的勞動危機和國民經濟中不穩固的成長危險而拒絕了。大概羅斯福總統的判斷是正確的，那就是假如他一定要向這方面不顧一切的做去，勢將引起資本家方面對於作戰努力的冷淡，激起他們的偏見，而這對於戰爭的損害是更遠大於執行了那網領所產生的經濟效率的增加的好處的。

然而對於民主進步陣營的團結更加危險的是那一部分自由主義和中產階級份子的傾向，他們把「自由企業」的口號認爲地、熱烈地當作一種行動的口號，他們主張把這口號當作實際上取締托拉斯和獨佔資本、消滅加特爾的網領。這一來一定會把資本家集團投進反動的和失敗主義的陣營中去，正如你拒絕他們的「自由企業」的口號所產出的效果一樣。前者將傷害他們的團體，而後者則將傷害他們的靈魂。他們對於「自由企業」的態度正如他們對於基督教的態度——就是說那是不容許人家追究的，那是專門爲節日與祭日用的，而不是在平常的日子裡實際去做的。因此，在一個民主進步陣營的網領中任何取消托拉斯的規定只能有裝點門面的意義，不能付之實行的，這不僅是因爲我們不能把一個雞蛋打開叫它回到尚未成蛋的初級階段去的原故，而更直接和實際的理由是因爲這樣一來將引起整個資產階級的反對，而我們面對着一個團結的資產階級的反對是不能贏得一九四四年大選的。

冷酷的事實是這樣的：今天美國的所謂自用企業在實際上就是資本有向更大的單位、向企業組合、托拉斯、加特爾這些組成獨佔資本最高階級的形態去集中和集結的自由的意思。

戰爭結束，美國資本主義這種獨佔的性質要更加尖銳化。現在美國全部巨大的戰時生產不下於百分之七十是操縱在一百個最大的公司的手裡。百分之五十的戰時生產是由十家巨人的公司進行的，國民經濟的這種大踏步向集中和集結方向的發展是不能夠取消掉的，討論和提議砍斷這發展是那一些只會講空話的人們的事情，是那一些只愛聽自己說話的聲音，除掉談話無事可做的的人們的事情。

讓資本集結的不可避免性，不是說我們應該對這種托拉斯和獨佔資本所顯示出來的各種傾向毫無反抗的屈服。和獨佔資本所傾以發展的高度的技術進步一道，發生了一種向反對方向發展的寄生的傾向，它犧牲技術的進步而加強剝削，像土匪一樣地摧殘中小資本，把自已狹隘的私利置於國家利益之上……這種寄生性的傾向，假如不加嚴格的阻止，是會把整個資本主義制度趕進那更加迅速循環的危機中去的，他須保護小企業，使其有發展的餘地，特別是在那些獨佔資本已經不能加速而只能阻止技術進步的部門裡邊。

在一個獨佔資本具有支配地位的社會裡，要對獨佔資本加以管理和限制不是一個簡單而容易的事情。假如大資本團結起來和整個社會鬥爭，以取得無限的支配權的話，在那種情況下除非經過巨大的政治和社會鬥爭，通過社會主義革命的危機，我們是很難想像獨佔資本是可以順利地控制得住的。

不過假如在大資本家的行列裡，那些認識了這種不把大資本的活動從屬於一個以擴大民族的和國際的所有人民的利益爲目的的寬闊而明確的網領之下，其所不可避免的產生的後果對於他們自己的制度是致命的，只要認識了這種後果的有遠見有理解的人多起來了——那麼，這些人和民主進步陣營配合和合作起來，是可以成爲大資本家們決定性的領袖的，他們可以促成大資本家用最限度的自制，來配合政府方面最小限度的統治，來削弱大資本的、反民族和反社會的傾向，可以促成他們來參加以支持德黑蘭綱領爲目的的舉國一致的團結。

有不斷增加的證據，證明這種有遠見和理解的人在在大資本家的行列裡是存在着的。他們的數目在增加，他們的積極性和領導權將增強，這樣終於有一天他們會發現一個實際的網領，在那一個網領下他們是可以，而且是在和廣泛的包括了有組織的勞工在內的民主進步的陣營團結的，而這一網領是以推進全民族的利益爲目的的，我們必須學會了歡迎這些人物的出現，在實際生活中證明給他們看，這種在舉國團結精神下的合作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利的。從和美國有關的一方面看來，再沒有比我們民主陣營中的工人階級和進步份子對於大資本家採取一種一致的不加以區別的敵對態度一事對於實現德黑蘭綱領更加有害的了。那只有有一種後果，就是把有思想的資本家趕到他們最反動的同伴們的懷抱，把美國社會中最強有力的集團團結起來一致反對所有一切的進步。

在美國，假如不包括那些能爲德黑蘭綱領而鬥爭的大資本家，最低限度爭取大資本家全體中最小限度的某一部份來參加，要實現一個爲獲得和展開德黑蘭綱領而鬥爭的有效的美國團結是不可能的。

歐戰是怎樣勝利的

舒翰

在全世界人民狂熱的歡呼聲中，歐洲反法西斯戰爭宣告勝利，結束。黑暗暴虐的法西斯奴役制度，終於由人民的拳頭把它最後摧毀，一個輝煌的新世紀，也由人民在血泊中重新創造起來。

自從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歐戰爆發，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德寇無條件投降在柏林蘇軍總部批准為止，戰爭的時日達五年八個月又五天之久，這樣漫長的歲月，是歐洲人民最苦難的日子，同時也是他們充分考驗的日子，他們在苦難中已經鍛鍊得無比的英勇堅強，終於走完了黑夜的迷途，踏上黎明的大道。但這段艱苦的路程，是用無數萬人的血汗和生命換來的，仰臥蕪草樹下，垂瀝着勝利的果實，只是癡人說夢而已。

歐戰的勝利結束，使歐洲的面貌完全改變，世界的面貌也改變了。可是，整個反法西斯戰爭還只是完成一半，日本法西斯這個頑強的敵人，依舊奴役着亞洲廣大土地上幾萬萬人民，徹底消滅日寇，仍然是一件艱巨的工程，爭取亞洲的勝利，也就是爭取世界人民的最後勝利，這個重任，主要是放在中國人民的肩頭上。我們應此遠東大反攻的前夕，來檢討歐洲戰爭是怎樣勝利的，應該是一重要的課題。

一 團結統治一切

歐戰的勝利，決定於盟國的團結。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成，是在納粹斯德維約進攻蘇聯之後開始的。蘇聯戰爭的爆發，使希特勒的野望起了根本的變化，全世界民主國家——資本主義的英美和社會主義的蘇聯，在法西斯奴役世界的暴政威脅之下，利害趨於一致，因而清楚地劃分了兩種勢力的根本界限，形成兩個敵對的陣營，一個是代表民主勢力的蘇英美同盟，另一個是代表德意日為首的法西斯集團。斯大林的作用，就把戰爭的性質、目標和前途，說得非常明白，他指出：這不是普通的戰爭，而是人民對法西斯力量的戰爭，因此蘇聯不僅為本

國的自由而戰，並且要援助呻吟在法西斯鐵蹄下的所有歐洲各國人民，所以這一戰爭，必然會跟歐洲和美洲各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爭取民主自由的戰爭融化為一片，一定會有一種擁護自由、反抗希特勒法西斯軍隊所施暴政和威脅的各國人民的統一戰線。正由於蘇聯人民保衛他們祖國自由的戰爭，和全世界人民爭取民族解放民主自由的戰爭匯合起來，而成為全世界自由人類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偉大正義戰爭，於是以前蘇聯領導的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建立起來了，一切愛好自由民主和平的民族國家的人民，團結在一個共同目標之下。儘管希特勒直到它的末日還不放膽毀滅這種團結，儘管一切暗藏的法西斯份子押着英美蘇不能合作的寶，而進行種種挑撥離間的勾當，但四年來的事實，證明團結終究是統治一切的，也惟有戰鬥中的團結，才保證了戰爭的勝利。

蘇英美團結的道路，並不是直線的，但却是發展的，前進的，一般說來，表現為這樣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蘇德戰爭爆發到斯大林格勒大捷。在這個時期內，反法西斯的民主同盟首先確立了共同作戰綱領，這是奠定了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思想基礎；其次，規定了聯合資源的合理運用，這是給民主協盟準備了物質條件。由天西洋憲章到廣泛參加的二十六國宣言，由英蘇協定，莫斯科三國會談，到英蘇二十年同盟條約和美蘇協定，是這個時期盟國團結合作的具体發展。

納粹侵蘇，原來打算掠奪蘇聯資源來最後打敗英美，建立法西斯的世界統治；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也作着東西法西斯在印度會師的幻夢；當斯大林格勒苦戰的時候，也正是軸心軍隊在北非進入埃及叩着近東的大門，而在遠東，則日寇侵略了西南太平洋和東南亞廣大地區後，出現在澳洲近海和印度洋的邊境，軸心國暫時的優勢，當時操縱着戰爭的主動權，整個世界處在嚴重的局面下，而歐洲則蘇聯獨力擔當着保衛的主力，西線還沒有戰事。但這種嚴重的局勢，由於蘇英美的團結而克服了。

第二個時期，是斯大林格勒大捷到第二戰場開闢。在這個時期內，蘇英美之間不但解決了戰爭中最重要的問題——戰略上的配合，也就是迫使希特勒德國兩線作戰，而且確定了戰後合作的基礎，這就是莫斯科——德黑蘭的歷史性的決定。這些決定回答了怎樣勝利和怎樣和平的大問題。

斯大林格勒的大捷，扭轉了反法西斯戰爭的整個局勢，但是，要迅速擊潰德國，仍須蘇英美三國的共同努力，沒有第三戰場的會戰，戰爭拖延時日，這又正是希特勒所一心願望的，它把它的戰略和戰術計劃，放在拖延戰爭時間上面，想由此增加同盟國的困難，而從政治上進行挑撥離間的陰謀。希特勒這種願望，在某種程度上竟得到了結果。當莫斯科——德黑蘭會議之前，首先是戰時問題發生分歧，蘇聯要求英美從速開闢第二戰場，而英美的緩慢份子和孤立份子則極力阻撓，利用一些戰後問題來破壞三國的合作，其次，是戰後的許多問題，如對待法西斯的殘廢，被解放國家的政策，也留下了暗影，特別是波蘭和南斯拉夫的問題，墨索里尼垮台後的意大利的問題等，在國際間引起紊亂和紛擾。羅邱在卡薩布蘭卡和魁北克的兩次會晤，並不能滿足客觀的要求，當時蘇聯還是負擔戰爭的全部重担，因此只有英美沒有蘇聯參加來共同商討，決不能解決問題。所有一切阻礙團結的現象，經過莫斯科——德黑蘭會議，就完全澄清了。這是蘇英美團結重慶的決定性的發展，這一發展，才在軍事上加速勝利的光輝。

第三個時期，是第二戰場開闢以後到歐戰勝利結束。在這個時期內，主要地解決了戰後的幾個重大問題，包括德意兩國，建立世界安全機構，穩定處理被解放國家的民主原則等，這就是克里米亞會議後所發表的勝利，和平，民主的大憲章，它把反法西斯戰爭的徹底勝利，以及戰後世界的民主與和平三大問題，總其大成，為戰後合作開闢了康莊大道。

歐洲第二戰場開闢以後，接着蘇軍就發動大攻勢，兩線夾擊之下，勝利是空前的，東歐和西歐的被佔領國家，先後獲得解放，問題也就更加複雜了，特別表現在解放國家的內政上。波蘭、南斯拉夫、意大利、比利時、希臘等國的問題，使人感到歐洲普遍地存在着危機，甚至希臘竟爆發為內戰，其程度是已經嚴重了。這些問題的形成，是表現出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就是在打敗敵人以後，也還是存在着的。法西斯份子的「保護士」們，舊統治階級的官僚政客，那些反民主反人民的敗類沒有消滅以前，法西斯主義就可找到最好的寄托，他們繼續國際上某些集團的支持，圖謀私人和黨的利益，反對並阻止歐洲人民改造他們的國家，而恢復歐洲的舊統治與舊制度。這

些問題，影響着盟國團結，而必須提出給以適當的解決的。克里米亞會議對解放歐洲宣言，嚴重地出現在第一線戰雲中間，把它們吹散了。

以蘇英美三國領導的反法西斯民主聯盟的團結，就是在各種具體問題上由爭論而得到共同的解決這樣來發展開的。我們不必諱言，民主聯盟之間是存在着意見上的分歧的，但「令人驚奇的事情，並不是三個偉大強國間爭論的存在，而是爭論竟這麼少，並且實際上每一種合，總是以團結與協調的精神解決了。關係重大的，倒並不是有爭論，而是些爭論並不會超過三個偉大強國的團結利益所許可的範圍，並且這些爭論畢竟照那種團結的利益而解決了」（斯大林語）。這也就是說「團結就是統一切的」。

二 蘇聯的決定作用

歐戰的勝利，決定於蘇聯。

蘇聯在軍事上所起的決定作用，是誰也不能否認的。首先是斯大林格勒的大捷。這一戰役的意義是空前的：它決定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改變了敵我力量的對比，扭轉了戰爭的主動權和戰略優勢，把反法西斯戰爭從戰略撤退的階段，帶上戰略反攻的階段，這就軍事上而言；政治上來說，則粉碎了一切失敗主義的謠言。他們說定蘇軍是世上所向無敵的，他們估計蘇聯一定會被打敗，但事實恰恰相反，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中史無前例的英雄主義，使希特勒匪徒遭受慘重的損失，同時也使那些為了掩飾對德軍恐懼心理而杜撰的無聊的話，消聲匿跡了，這對全世界人民是無上的鼓勵，加強了對他們勝利的信心。

斯大林格勒扭轉了整個戰爭形勢。在蘇德戰場上，緊接着這一重大捷之後，蘇軍全線展開戰略的全面反攻：一九四二——四三年的冬季戰役，把敵人從伏爾加河趕到頓內次河；一九四三年的夏季戰役，又把敵人從頓內次河趕到第伯河；一九四三——四四年的冬季戰役，更從第伯河跨到普魯特河，越過羅曼尼亞，深入羅馬尼亞，把解放的旗幟插到喀爾巴阡山的山麓；整個蘇聯被佔領區域復了四分之三。這說明了雖然西歐還沒有第二戰場，而蘇軍的攻勢戰役自斯大林格勒以來，是一個接一個的連續着的。正由於蘇軍把最大多數的德軍主力吸引在東線，並且不斷打擊它們，使敵人只有增援，無法他調，因而盟軍在地中海戰場渡過了嚴重的局面，進而在北非反攻，獲得一九四二年秋季艾爾阿拉曼的勝利。一九四三——四四年的冬季戰鬥中，把敵人

趕出北非；一九四三年夏季，先後在西西里島和意大利南部登陸，踏上第一塊敵人的領土，促使墨索里尼的垮台和意大利的投降。沒有斯大林格勒這一個轉捩的關鍵，歐洲戰爭的迅速勝利，是很難想像的。

其次，從歐洲戰場上軍力的對比和構成上來看：一九四四年夏季，德軍擁有一千一百萬人，盟軍擁有一千六百萬人，盟軍對德軍的優勢約為一·五比一，而蘇軍的兵力，差不多則佔盟軍總數的三分之二，其構成情形是：

蘇	軍	一千萬人
美	軍	四百萬人
英	軍	一百萬人
法	軍	五十萬人
地下部隊		六十萬人

這種估計固然還不够正確，首先對美軍部隊的估計過高，而對地下部隊的估計又太小，譬如南斯拉夫（四十萬人），法國（二十萬人），意大利（二十五萬人），希臘（十五萬人），捷克（五萬），比利時（六萬）等國的解放軍和游擊隊，已經有一百多萬人以上，其他歐洲各國的游擊隊沒有計算在內，特別是蘇聯龐大的游擊隊沒有估計在內。但即使根據這個數字，我們也可以看出歐洲戰爭中，蘇聯是怎樣起着決定性的作用的。

再其次，蘇聯對解放歐洲人民和擊潰納粹德國的貢獻來說。正由於蘇軍在歐洲戰場上担負着主要的角色，因而它的戰果是偉大，輝煌。它把本國敵人完全肅清，並且先後堵進了歐洲十一個國家的領土，解放了八個國家的首都，這些國家是：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芬蘭，是全部由蘇軍解放的，南斯拉夫、捷克、奧地利、德國，大部份是由蘇軍解放的，蘇軍並解放挪威和丹麥的一部份領土。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柏林之役，最後促使了納粹德國的無條件投降。柏林，這是法西斯主義的神經中樞，柏林的攻下，不僅意味着希特勒的心臟，并且挖掘了法西斯的老根，雖然當時希特勒把一切可調的力氣，投入柏林的烈火中，雖然以毀滅柏林來頑抗蘇軍，雖然高喊着對德國南部去繼續作戰，但是都不能阻止蘇軍在短期內（從四月廿二日攻入到五月二日）完全佔領，為時只十天）完成佔領。柏林佔領以後，納粹德國便完全崩潰，六天之後蘇軍條件投降了。

三 第二戰場

歐戰的勝利，還決定於第二戰場。

早在一九四一年蘇聯十月革命二十四週年紀念日，斯大林在演講中就說到：「紅軍失利的因素之一，就在於歐洲沒有第二戰場去抵抗德國法西斯軍隊」。過了一年，斯大林在另一個紀念的講演中，再度提出第二戰場的必需。他分析德軍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以後，仍然能够握着攻勢的主動權，而在那年夏季中，還能大體上取得戰術上的成就，其主要原因，就是歐洲沒有第二戰場，使德寇能够順利地一切可調的後備隊，都調到東線，可以沒有後顧之憂，而形成了實力上很大的優勢。當時德軍的分佈是這樣的：

「德寇現在共有二百五十六個師團，其中在我們戰場上的德軍不下一百七十九個師團。如果我們再加上羅軍二十二個師團，芬軍十四個師團，意軍十個師團，匈軍十三個師團，斯洛伐克軍一個師團，以及西班牙軍一個師團，我們就知道如今正在我們戰場上作戰的敵軍，共有二百四十個師團。……利比亞戰爭一共就只牽制着德軍四個師團和意軍十個師團。」（斯大林講詞）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德軍怎樣利用歐洲沒有第二戰場，用一面倒的形勢，瘋狂地進攻蘇聯。如果當時有了第二戰場，能够牽制德軍六十個師團和軸心附庸軍二十個師團，那麼敵人的處境，也就不難想像了。所以歐洲第二戰場是打垮希特勒德國的必要途徑，是由德國的地理上和戰略上的形勢，以及反對法西斯侵略的總經驗來決定的。也就是只有從東西兩面夾擊德國，逼使它進行兩線作戰，才能擊敗德國。並且，第二戰場的必需，不只是蘇聯，更重要的，英美盟邦的需要，並不減於蘇聯，因為不能不認清：「自從法蘭西淪落得喪失戰鬥力以來，沒有第二戰場對抗法西斯德國，可能招致對所有一切愛好自由的各國都不好的結局，包括盟邦自身在內」。

當一九四二年五月間，莫洛託夫訪問倫敦和華盛頓的時候，曾和英美特別討論第二戰場的問題，在英美蘇的聯合公報中，都提到了「對於一九四二年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迫切任務，已得到完全同意」。但是，第二戰場並不能如期實現，而遲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德黑蘭重作決定之後，於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才正式開闢，到底是什麼原因呢？我們如果檢討一下整個歐戰過程中英美的戰略思想，就可以得到回答。

一般說來，整個歐洲戰爭中，英美戰略思想可以分作三個階段，每一個階段中，一種錯錯的戰略觀念，起着主導的作用。這三個階段，可以這樣來劃分：

第一個階段，主張以海軍封鎖為主。歐戰爆發到法國崩潰之前為止，他們覺得海上的封鎖，就可以使敵人在經濟上陷於孤立，因而就因死敵，取得勝利，所以只着眼於用強大的艦隊封鎖，而沒有去積極地動員，來和敵人極上決戰，結果，希特勒德國不但可以從中立國家可以同樣取得物資，並且以閃擊戰席卷整個歐洲大陸，弄到英倫三島岌岌可危。事實第一次打破了這種錯誤的想法。

第二階段，主張以空軍轟炸為主。因為英美，特別是美國，擁有空軍的優勢，所以在德黑蘭會議決定開闢第二戰場以前，他們把戰爭的重心放在對德轟炸上面，以為憑藉空軍的優勢，就能使納粹屈服，特別是一九四三年夏秋兩季，英美空軍對德國工業重心萊因和魯爾兩區域的轟炸，其規模之大，每次出動飛機數千架，並且日以繼夜地進行。我們不能否認，德國所遭受損失的慘重，但却不能使德寇屈服，並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要勝利，還得從陸上來決戰。於是，事實第二次打破了又一種錯誤的想法。

第三階段，主張以物資優勢來壓倒敵人。第二戰場開闢了，英德憑藉物資的壓倒優勢，順利地在諾曼第登陸，於是一種錯誤的想法又支配着英美的戰略思想，認為只要堆積物資，就可解決戰爭，巴黎解放以後，樂觀心理的影響，甚至連美國的軍火生產，傾刻減退下來。雖然軍火生產減退，但英美的物資還是佔着壓倒優勢的，可是在齊格非防線受到挫折，在阿登山戰役中，仍然會一時抵擋不住德軍的反攻，這說明了只有足夠的物資而沒有足夠的兵力，還是不能決定戰爭的勝負的。

正因為英美戰略思想上，有了這種錯誤的觀念，所以常常表現出對戰爭過左過右的偏向，一個勝利的到來，就發生危險的樂觀，如在巴黎解放後，好像就能馬上佔領柏林，因此，軍火生產也減退了，這就無形中對戰爭怠工。而當在某些地方遭受挫折，則又陷入非常悲觀的境地，如阿登山之役，盟軍被迫退到摩塞河時，又覺得戰爭的前途非常渺茫。其實，這種戰略思想上錯誤，以及動搖不定的對戰爭過左過右的偏向，其根源還是由於他們在戰略思想上有一種不徹底不正確的看法，換句話說，也就是對於徹底消滅法西斯缺乏足夠的信心和決心。而這一個弱點，也正是敵人最樂於利用來進行破壞盟國團結的利器。德寇在垂死前的一霎，還想出一「西線東併」的政策，表示願向英美投降，而對蘇聯到底，這種陰謀的勾當，便是造成後來英美方面的寬容戰爭罪犯的事情，我們能說這不是敵人最後一着還得到了相當的成功嗎？

歐洲的那些陰險的事實，應該使遠東的最好的經驗教訓。

四 人民的戰爭

歐戰的勝利，最主要的，因為它是反對法西斯的人民的戰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的動力。蘇聯人民創造了強大的力量，充當了打倒法西斯的主力軍。英、美、中、法四大國及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國的人民的偉大努力，使打倒法西斯成為可能」。

人民戰爭的特點之一，便是全世界範圍內各國人民的空前廣泛的團結。蘇聯，由於她的社會主義的優越的制度，真正達到了全民戰爭的規模。在戰爭中，蘇聯的各族人民，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在「一切為了前線」的口號下，所有能夠動員的人力，物力，都參加到戰爭中間去，這種動員的迅速與普遍，作戰努力的驚人，戰時生產的發展，以及戰線敵後與後方無數的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簡直有不能想像的情形。

英美在戰爭中，人民的力量更加團結，更加增強了。英美，特別是美國工人在生產前線上的努力，使美國成為「民主國家衛兵工廠」，而英美的戰士在世界各戰場上打擊敵人，也表現得無上的英勇。更重要的是人民力量的團結和增強，把反動勢力從政治舞台上大批的推翻下去，去年英國大選中，反動的孤立派被擊敗，是一個最好的證明。人民的力量，推動着政治的進步。

歐洲其他國家遭受希特勒殘酷統治的結果，使所有社會各階層的人民，在保衛民族獨立民主自由的共同口號下，廣泛地團結起來。他們不分民族、宗教、階級、黨派、工人、農民、智識份子、自由職業者、開明的民族資產階級……，在民主的原則下，融為一體，形成了巨大的力量，他們組織了統一領導的機構，共同進行反法西斯的地下鬥爭。南斯拉夫的全國反法西斯會議，法國的抗戰會議，波蘭的國民會議，意大利的民族解放委員會等等，都是全國性的抗戰的統一戰線組織，各國的這種團結運動，都是以民主改革為骨幹而發展的，特別是各國共產黨，振臂前導，因而各階級的工人運動蓬勃展開。他們在對敵鬥爭中始終起着領導的作用。

人民力量的增強，改變了社會關係，民主原則的廣泛運用，產生了全新的內容。如是在歐洲各國普遍形成了目前以各民主政體聯合專政的新的民主政體形式。

(下接三八五頁)

從「看守」內閣的成立到大選

羅 清

十年沒有改選過的英國國會，在五月二十一日工黨會議議決退出混合內閣，邱吉爾重新組成「看守」內閣，宣佈國會將於六月十五日解散，七月五日進行大選之後，又開始醞釀起競選的浪潮。這一選舉意義的重大，正如波立特在三月二十日的競選演說里所提到的，是「有關英國所必須決實現的有定性的社會變化的前途」的。這里，我們試來分析一下英國過渡內閣組織和作用，研究一番過去的議會和現在各黨派對大選的準備，從而盡選選變的前途。

(一)

一九四〇年五月邱吉爾上台，組織起以保守黨，工黨和自由黨為組成份子的第二次聯合內閣，直到「看守」內閣的組成，中間經過了五年之久。在這五年中，英國的聯合內閣在外交方面領導了英國取得了戰爭的勝利，大體上也遵循了大西洋憲章，德黑蘭會議，克里米亞會議的方針，但在歐戰接近勝利的時候，却發生希臘解放運動的橫遭鎮壓，意大利問題，波蘭問題，奧地利「軍政府」問題，的里亞斯特這一連串違反上述原則的各個問題。而另一方面在內政上，由於大企業的壟斷而引起的變化局勢起，一直到社會保險，住宅，燃料，嬰孩營養，戰後問題上，無一不是軒然巨波，引起人民的普遍的不滿和反對。從下面四月份「自由世界」倫敦通訊里摘引出來的幾小段，可以看出這些內政上的小問題的嚴重性。

「最使英國頭痛的問題，就是住宅和育嬰問題。山地斯·邱吉爾的女婿和英國工務部長負責處理這個問題。人民都在熱切期待著美國預先做就的三萬所平房的到臨，特別是遭爆炸最嚴重的倫敦東端區的人民，那兒五分之一的新房舍都變成了平地，四分之三以上的房舍都遭受損壞。

「關於小孩問題，一般人士都為他們之被虐待和疏忽所震驚。內長莫理遜提出調查十萬兒童和兒童的生活情形。也有人指出至少有五萬人在貧民窟條件下長大的。這都遭受過嚴酷的檢查。……」

「就房子來說，在英國關於德國轟炸的確是一個大問題。據倫敦泰晤士報載，英國共有房屋一千五百萬所，在戰爭中被毀壞的達四百五十萬所之多，

其中有二十萬所完全垮台，於是這一問題就成為人民生活上一個迫切的要求解決的問題了。據一個數字看，政府在今年初正準備建築房舍七十五萬所，這情形不得而知，但人民的需要，當然不止這個數目。這類問題，都成為人民反對政府的鴉片。

在這種人民輿論的浪潮下，特別是在最近兩次工會的大會中（一在去年十二月，一次即最近五月在布拉克普爾舉行的大會），工人羣眾普遍表示對內閣的不滿，所以有二十一日工黨執委會提出內閣的決定，上層領導份子，儘量文過飾非的人物，也只好退出內閣，不得已求其次的另作打算了。

「看守」內閣

「看守」內閣經過短期的準備，很快就在二十五日產生出來了。原來參加聯合內閣的工黨和自由黨兩個反對黨的黨員，包括貝文、莫利遜、柯特里、辛克萊等重要份子，除去個別的自由黨份子以外，都一致退出了聯合內閣。

聯合內閣是在什麼情形下解散的呢？從一九四〇年戰時內閣成立以來，每年差不多都有過一次大改組，閣員人數也隨時有所增減。內閣又分成二部，一為戰時內閣，一為普通內閣（即不在戰時內閣中開會）。

戰時內閣包括八個固定閣員（首相邱吉爾，副首相阿特利，外相艾登，財相安德遜，內相莫理遜，勞工大臣貝文，生產大臣里特蘭，建設大臣特蘭頓）和南非代表史末資將軍（當他在倫敦時就參加）。八個閣員當中，工黨三人（阿特利、貝文、莫理遜），保守黨二人（邱吉爾和艾登），三個貴

族和大資本家(如里特爾教士生產大臣也和保守黨有血統關係)，而南非總理史末賽將軍則過邱吉爾的至友，他是大英帝國的非正式的喉舌，並是帝國最忠實的擁護者。

戰時內閣以外的閣員還有二十九個(一九四四年底)，此外閣員數大臣還有七個(一九四三年底)。閣員的數目年有增加，例如到四三年底普通閣員只有二十五個，一九四四年底就有二十九個了。這個龐大地主與保守黨員組成的內閣，對內對外做的事情又是那樣令人不滿，在人民普遍反對下，自然就走上台的途徑了。

新的過渡內閣，就組織上說是簡單多了，成份比較單純，質量都比較精練，但是，它的性質恐怕還不止於過渡——如果選舉推遲，這個內閣，很可能就是未來保守黨內閣的基礎。閣員人數雖說總共有四十個，但真正只有十六個人參加閣議，而戰時內閣也取消了，「對日作戰有關的大事，將由邱吉爾所領導的國防委員會決定」。所以，就國防委員會和已知道參加內閣的閣員加以分析，大概就不難明瞭現內閣的作用了。

國防委員會包括十人，除陸海空參謀長為當然委員以外，其他七人中有五個是以邱吉爾為中心，共事多年的保守黨員(邱吉爾、艾登、教育大臣瓦爾氏、海軍大臣布拉克，和空軍大臣麥克萊)，和兩個不屬保守黨但對該黨政策頗有貢獻的爵士(財相安德遜，陸相克里格)。一九三八年慕尼黑會議以後(十月)，曾有過二十位大臣級的閣員用各種方式反對張伯倫外交政策，這五位保守黨員全部在內，實際上在領導這個運動。以後不久(十一月)，還有過三十四位保守黨員，支持艾登外相二月去職而所主張成立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在下院通過「全國努力以克服目前危機」的議決案，它是在艾登、邱吉爾和羅梅利等領導之下作出來的，這五位大臣自然也在內。

再就十六個內閣閣員(十二個屬保守黨)中擔任的九個來看，除去多數是保守黨黨員以外，有四個是上述反對張伯倫的綏靖政策的(邱吉爾、艾登、羅梅利和克爾波)；但還有兩個是張伯倫時代的閣員(史丹萊——商務部主席，赫德森——海外貿易部大臣)，安德遜和克里格爵士，是以善於治理印度起家的——安德遜一九三二年任孟加拉省長，他的恐怖政策至今仍然有名，而克里格在一九三四——三九年以做印度政府的財政工作聞名，專維勃魯克則是在邱吉爾登臺後以糧食大王(擁有每日快報、星期快報、標準報刊等)入閣輝煌的。

除去這兩個領名車之外，新任閣員(參加內閣或為閣員級大臣)中，至少尚有六個著名的張伯倫時代的人物，頗堪重視，即(一)司法部大臣西門子爵，他曾任鮑德溫內閣的內政部長，一九三七——四〇年任財政長，一九二二年曾任自由黨副領袖；(二)國民保險部大臣倍立度，他是一九三七——四〇年的部長，史末賽將軍所主張的「歐洲集團第一」，「國際合作第二」的強力支持者，也是自由黨著名人物；(三)情報部長勞德，他是一九三五——三九年的內務部次官；(四)教育大臣白特勒，他在一九三七年以後任勞工部主席議會次官；(五)民用航空部長史文敦，他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一九三八年五月間任空相；(六)內相萊維爾，他從一九三六年到最近內閣改組前一直任檢查長之職。

幾個特點

從這些人物的簡單歷略中，有幾個特點值得注意。

第一，鮑爾溫、張伯倫時代人物，在現內閣中至少有十人以上，而且他們都高居內閣要職，這次過渡內閣成立，他們有的位置更為顯要，如情報部長勞德，內政部長萊維爾，勞工部長白特勒等。

第二，二十六個保守黨閣員中，除去一部份公開參加張伯倫內閣的以外，還可分為二類，一類為內反對張伯倫綏靖政策而出頭的，這包括國防委員會中五位保守黨員和其他若干閣員。另一類也在那時候反對過張伯倫，包括印領事務大臣羅梅利，內閣中代表「克爾波爵士，他們是幾個「真正藍色」帝國主義的團體的核心，其中之「殖民地聯盟」對外交政策有如下之聲明：

「對公眾提出不列顛殖民地帝國的重要性，並且特別對德國的要求英國退出殖民地領地，要加強人性的，道義的和政治上的反對」。

在這幾個「陸軍、內政與國防聯盟」，「海軍委員會聯盟」，「帝國空軍聯盟」，「殖民地聯盟」的一套組織內，包括有各種各色的親密份子，參加者當中還有山地切(邱吉爾女婿，前任供應部出席國會次官，也是上述三十四位擁護艾登外交政策中的一位)，羅奔(糧食部出席國會次官)和尼科爾遜(曾在一九四〇——四一年任情報部出席國會次官)等。而領導人物史丹萊，是英國鐵路，鋼鐵工廠的理事長，也是黃金海岸，西南非馬拉維，澳洲等地各種公司的理事，在政治上有的說他比倫敦德雷(公關親屬人物)

張伯倫幾死硬。他當了五年的印領事務大臣了，其死不放鬆的態度從英國對印政策中可以想見。

有的懷疑，爲什麼邱吉爾和艾登等要和亞梅利合作呢？這要從保守黨的組成去看才能了解它。這留在下一部議會中各黨派的政策分析中去研究。這里可先指出一點，保守黨雖有所謂左右派之分，但實質上是代表貴族資產階級的政黨，對外保留帝國主義的政策是不肯輕易放棄的。亞梅利不過是其中比較典型的人物而已。

綜上簡略分析，我們可以推論，現存的保守黨「看守」內閣，比改組前更能體現大英帝國的要求，更能代表英國的大資產階級和皇家的利益，也就是說更顯得右傾。邱吉爾等一九三八年反對當時緩靖政策的活動，配合着彼時廣大人民改革政策的熱烈要求，一時的確起了很大的左右時局的作用。但是，這時許多反動的大資產階級代表，像亞梅利之流也乘機以反對派的面孔出現政治舞台，藉以鞏固反動資產階級的陣地，而邱吉爾等本質上也是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平步登天就忘記了人民的利益，和亞梅利等緊密的合作，內閣更保留着許許多多的張伯倫時代的人物，一年年內閣的變動，直到這次「看守」內閣的成立，保守黨的政權越來越抓得緊，顯得以邱吉爾爲代表的內閣越來越右傾，越來越不足以代表人民。人民的要求是來一個劇烈的調整。

(一)

下面我們從現存議會的組成，各黨派選舉的政策來推測選舉可能的結果。

現存議會中下院議員共有六百一十五名，截至一九四四年底爲止，分配情形如下：

保守黨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一九四四年底
工黨	三八七	三五二
國民自由黨	一五四	一七二
自由黨	三三三	二八
國民工黨	一七	一九
農民黨	八	六
農民黨	三	五

獨立黨	一五
民族主義黨	二
U. S. T. C. 聯合黨	一〇
聯邦黨	三
愛爾蘭節政黨	一
共產黨	一

★即凡勃拉爾黨的，主張愛爾蘭獨立的黨。
★原文爲Commonwealth意即聯邦，含有進步的意義，有的譯爲公安黨，似不妥當。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選出的議員中尚有獨立白黨四名，獨立工黨四名）

從上面比較可以看見保守黨議員在十年之後減少廿五名，工黨增加十八名，自由黨增加三名。這至少可以看出保守黨地位的大大降低，因爲一般執政黨派，是很容易利用權勢增強自己的力量，而保守黨却在十年執政之後減少了不小的名額。

保守黨的組成和政策

現在下院保守黨的議員，是在鮑爾溫內閣時代選出的，中間經過張伯倫內閣，因爲這個內閣一貫採取對希特勒德國縱容的政策，對法西斯進步的態度，所以到一九四〇年幾乎把這個老帝國斷送給了納粹德國。邱吉爾出組聯合內閣，加上國際形式的好轉，纔得使英國轉危爲安。邱吉爾的聯合內閣的組成如本文上述又是那樣包容了許多張伯倫時代的舊人，而在抗戰的偉大的時代中，人民受了戰爭的鍛鍊，認識到只有廣泛的民主政府，才能適合戰爭中人民的要求，所以形成了對聯合內閣的異常不滿。這和議會中保守黨議員的成份，出身，和對陸軍的控制等都有關係。

要知道保守黨政治家的社會背景，讓我們先看看三百個保守黨的家庭的職業成份的百分數：

工業家、銀行家、商業家：	百分之廿九
土地所有者、收地租者：	百分之二十
軍官	百分之十六
職業政治家	百分之十五

教會

高級文官、外交官

各種職業(教授、醫生、藝術家等)

例如現任農林部大臣赫德遜從父親處承襲十五萬鎊的財產，而包括現任勞工大臣白特勒在內的科多爾家族(Comauud)三天之內的紅利竟達一百九十萬鎊之多(見一九三八年八月六日每日快報)。

其次，就出身來說，據一九三八年統計，四百一十五位保守黨議員中，有一百二十五位出身於伊登和哈羅公學，佔保守黨議員百分之三十。而所謂伊登或哈羅公學者，一年至少要花費三百鎊，交費就交到二百三十鎊，這絕不是一般中等階級家庭所能供給的。現內閣的閣員，大多出身這兩個貴族學校，如哈里法克斯勳爵出身伊登，而菲利則出身哈羅。而他們的兒子們，又大多沿例送到這兩所貴族學校去唸書。進牛津或劍橋過書也不在少數。這都要很有錢的家庭才可能。

還有九十六個保守黨議員都在正規軍隊里担任過軍官的職位，參加過大戰的還不在內。其中有七十九個都任過陸軍部的軍官。所以這些保守黨議員們事實上控制着全國的武官部隊。

從三分之二的保守黨議員的成份中絕對多數出身富裕家庭，他們的教育，他們的生活(貴族的)，不難想像他們政策的重心，是如何在保持他們既得的權益，維持他們帝國的統治。所以我們看到邱吉爾在三月十五日保守黨大會的競選演說里強調反對工黨和左翼，以投合一般保守黨員聽衆的要求和情緒。邱吉爾在這次競選的政綱中，也提出了許多動聽的詞句(五月廿七日倫敦電)，它的實現，恐怕只有在羣衆力量增強，壓迫保守黨不能不這樣去做時才有部份的可能。

工黨

這個擁有七百八十萬職工會會員(一九四二年底統計九百七十六個職工會，擁有會員七百七十八萬一千人)為基礎的工黨，有六十九個工會，參加工黨作黨員的有二百二十萬以上(二、二〇六、二〇九人)，其他尚有個人黨員約及二十二萬(二二八七、八三人)，合作社等參加的黨員約三萬人(二八、九四〇)，合計二百四十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人(一九四二年底)。

工黨選選政策，在去年十二月年會上已有決定，要點為在對德戰爭結

百分之七

百分之五

百分之八

東以後即脫離英吉爾內閣，並且以單獨的政黨來參加十年未有的大選。最近工黨已退出聯合政府之後，貝文和阿特利先後都辭工黨的外交政策有所論列，阿特利五月二十七日發表的競選演說更是這樣提的：

「(一)對日戰爭方面，必以最大力量壓制日本，直到勝利為止；(二)建立國際組織，防止戰爭的基本要素，在於各大國間的合作，尤其是英美蘇三大國的合作；(三)社會安全和个人都有職業的問題，在這次戰爭中是土地、金融、運輸，以及大規模工業等的恢復，所有企業和採取公有制的問題」。

在討論工黨政策的時候，必須了解它上層領導份子和廣大黨員之間，在政治態度上有着很大的差別。工黨領袖阿特利之庸碌無能(他并不出身工會)，貝文之陰謀有勢(爲了排擠阿特利的領導權，他請求晉升爲內務大臣，工會出身，有實權)，莫理遜之反動爭權(他在一九四三年底借日蘇放了英國的希特勒——摩斯萊夫婦等法西斯份子，與貝文絕不相容)，造成了領導上的混亂，以及對下層的對立。貝文和莫理遜專事支持英國政策反對的一面，貝文在希臘問題上，全力代表內閣支持所謂「自由，民主的希臘選舉」，更給人民以醜惡的憎恨，他們對於英共所主張的聯合選舉運用全力去進行反對。

可是，同時我們應該看到工黨廣大羣衆的進步，力量的日益擴大，這對工黨的進步起着莫大的作用。貝文爲政府辯護希臘政策，遭到下院工黨議員貝高(A. Lovell)嚴厲的攻擊，他「把英國利用軍去破壞希臘的抗戰運動，比爲佛郎哥使用摩爾軍隊去打西班牙的共和政府」，受到下院廣泛的歡迎，因而下院以大多數表決通過了一個妥協的決議案。以後不久在十二月的代表大會中，貝高氏第一次當選爲工黨執行委員。工黨大會中還通過許多進步的決議案，其中包括「和印度人民領袖談判立即結束政治僵局，以便成立一個負責的國民政府，以鼓勵全印人民從事反法西斯戰爭」，決議呼籲立即釋放尼赫魯和其他國民大會黨的領袖。

工黨有廣大的進步的羣衆，上層份子這時又不能不表示他們打敗日本的決心，只要他們能建立一個工黨和進步份子的運籌帷幄，就能實現結束保守黨在議會中的多數，并能恢復三黨和進步份子的多數。這個工作還有待工黨羣衆和英國廣大人民去爭取。

自由黨

這個一向自為英國第一大黨的自由黨，這次隨工黨退出聯合內閣，也把它的黨員撤退了（個別例外）。它今天在議會中的人數比國民黨自由黨還少（國民黨自由黨廿八，自由黨十九），但它是一個有歷史性的大黨。一六七九年組成民黨，一八三八年正式公認為自由黨，因為它深受法國革命的影響，提倡個人自由，一時力量雄厚。從上次歐戰到這次大戰，自由黨只有二次參加組織，其餘時期都居於反對黨地位。

自由黨對這次選舉的政綱，我們還沒有看到，但它對大選的態度，我們可以從該黨領袖辛克萊給國民黨自由黨領袖白朗（過渡內閣的飛機生產部大臣）的一封信中後者的申請加入自由黨的信件，可以看出一點輪廓：

「自由黨同意十月卅一日（一九四四年）邱吉爾氏表示的意見。第一，歐戰結束後不久即解散國會。第二，現內閣和從此重獲人民的信心，是一種不公平的測驗人民意向的方法」。

同一信里，他也表示自由黨將以單獨政黨參加競選。

共產黨

共產黨對於這次大選的態度，在波立特同志三月廿日的聲明中表示得再清楚沒有了。

首先他指出：「目前議會里保守黨的多數，是在鮑爾溫和張伯倫獨攬法西斯政策的時候選出來的，是完全不能代表目前公眾意見的。在這次大選中，必須代之以工人和進步份子的多數」。

提到新的內閣時，他說：「這個新的內閣應該包括支持克里米亞會議的決定，支持國際經濟合作的一切黨派的代表，應該有一個為了英國人民的經濟和社會進步的大家同意的最低綱領」。他提出了明確的政綱。

「共產黨主張，並且繼續致力於工人和進步團體的選舉聯盟」，他說，「進步份子票數的分裂，是能使保守黨候選人重新當選的」。

共產黨這一主張，雖然還沒有獲得工黨執行委員會的通過，但在工黨所屬的十個大小工會中得到通過，其中包括有擁有會員八十萬（一九四二年總數目為五九九，二四一人，但目前已擴大到八十萬人）的鐵工工會等。更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援。

候選人

據英國新聞處五月廿八日電，各黨派提出候選人數目預列如下：

保守黨 五百五十名

工黨 五百名

自由黨 五百名

共產黨 五十——六十名（據英國工人日報載為五十二名）

公安黨 四十名

獨立工黨 六十三名

國民自由黨 四十名

國民工黨 二十名

其他 五十

總計 一千八百名

在估計選舉結果以前，就保守黨和工黨加以比較，和對一般趨勢加以推測是必要的。

保守黨多年都是執政的黨，有許多從政的經驗，領導者如邱吉爾又善於運用權力，掌握時機以從事活動，加上這次戰爭還沒有結束，部份人仕心理上還是歡迎邱吉爾，這些是保守黨保有的——些優點。

另一方面，一般民衆對於連續執政五年的邱吉爾多少感到厭倦不滿；他們對於在鮑爾溫，張伯倫時代選出的議員從而組織的內閣，都是大大的反對的——因為就是這兩屆保守黨內閣，才給人民大眾帶來了戰爭的災禍和痛苦；一般人民都歡迎年青一些的人當選如「各主要黨的人選對青年入似乎均有所偏愛，似欲將十年來均由老人主持的國會，澆輸若干生氣，使之更形活躍」（見五月二十八日英新聞處電）。保守黨的議員，絕對多數都是老氣橫秋，都是十足的貴族和資產階級的代表，當然現在的其他政黨的議員，年紀大的也很多，經過部份議員不斷的努力之後，通過了海外服役軍人也有選舉權，到今年一月份，有百分之九十的海外服役人員都已登記參加選舉，這正是人民要求參加選舉的一個勝利。這些一般的要求，也正是保守黨的缺點，

或弱點。

再就工黨來看：它有七百八十萬的職工會會員，二百四十餘萬工黨黨員，黨案基礎是很雄厚的；它的動向——保守黨——有着人民普遍不滿的缺點，這也就給工黨競選以有利的條件；工黨和職工會的羣衆一般都更左傾，對邱吉爾內閣本質有清楚的認識。這些是工黨特有的優點。

它的最大的弱點是上層領導份子的反動，不能堅持羣衆指出的方針，並且相反的背叛了羣衆的意見，所以上層份子不能得到他們羣衆的擁護；這次選舉中最大的錯誤，就是和上兩次大會一樣，竟又在上層份子的堅持下，拒絕了英共所提出的「工人和進步團體的選舉聯盟」。分裂了工人進步份子的團結；領導份子的反動行動，如莫理遜之釋放英國法西斯黨領袖摩斯萊，給人民以深刻的惡劣的印象。這些錯誤或缺點，都是上層領導份子造成的，這是一個莫大的遺憾。

從上述情形看來，保守黨與工黨，各有優點也各有缺點，都有取得多數

(上接第三七九頁)

人民力量的日趨強大，這就是法西斯主義的日趨孤立，這種力量對比的比例化，決定了人民戰爭的必然勝利。

人民戰爭的特點之二，是進行武裝對敵鬥爭。

歐洲許多國家被納粹侵略而相繼淪亡以後，黨的就治者鬥也就此結束。但是，各國人民却從淪亡之日起，就開始了堅強的對敵鬥爭，而這種鬥爭，實際上一開始就是以武裝鬥爭的形式出現的。著名的南斯拉夫的游擊隊在德軍侵略伯爾格萊德幾天後，就組織起來襲擊德軍。在歐洲，無論被佔領國家或納粹附庸國家，都由最初城市的破壞運動，以及鄉村小規模的游擊戰，而逐漸在鬥爭中發展了一支龐大的人民的軍隊。

南斯拉夫解放軍，以自己的力量解放了大部分的國土，法國的地下軍，尤復巴黎，馬賽等大城市，意北的工業中心米蘭，都整齊地由游擊隊解放的，希臘的京城和大部分國土，也都是希臘人民解放軍光復的，其他如捷克

羅馬的可能，許多因素未定現在還無由決定結果如何。然保守黨比較可能得

大些，邱吉爾很可能再度當選議員，繼續組閣，但是，邱吉爾內閣的組成是那樣的令人不滿，張伯倫時代的人物，現內閣中還保有十個之多，而工黨上層又是那樣反動，許多人不免覺得前途悲觀。這里，我們應把眼光注視到羣衆上去：第一，隨着各國人民在戰爭火燄中的百鍊成鋼，英國人民更深深感受到需要立即結束現議會，而代之以工黨和進步份子多數的議會，工黨下層對領導人物已經起過而且會繼續起很大的作用，數百萬新的選民也將有着極大的左右力量；第二，工黨和進步份子不可能取得多數時，更需要一個國民政府，因為在未來的議會中，人民的力量一定會更加壯大，就是在另一次邱吉爾的內閣下，議會通過任何案件，一定也不能像以前通過那樣順利。

未來內閣的性質和成份？這里無由揣測，但有一點是確定的——只有能代表人民需要和希望的政府，纔能徹底消滅法西斯建立永久和平。

(六月三日)

，波蘭，比利時，以及保加利亞等國家，都有着支人民的軍隊，在不斷進行着武裝對敵鬥爭，而當解放戰爭開始時，他們就起着很大的作用。

各國人民武裝對敵鬥爭展開。成爲敵人的心腹之患，因此鬥爭就異常艱苦殘酷。但是，他們雖然處在敵人的後方，各種條件非常困難，更不會去想外援，可是，這種敵後鬥爭的發展是驚天動地的，他們不但經常攻擊敵人，牽制敵人的兵力，而且以自己的力量解放廣大地區，建立了人民的政權，實現一盟軍反攻，完成最後的勝利。什麼力量使他們成爲不可戰勝的隊伍呢？很簡單，因爲他們是人民的軍隊，這種軍隊具有自覺的紀律，不是爲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爲正義的人民戰爭，爲廣大人民羣衆的利益，爲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鬥的。所以雖然他們困難到萬分，却變爲人民戰爭中的主力。

歐戰勝利地結束了，歐戰的經驗教訓，值得我們去研究學習。

作為戰後市場的中國

L. 羅辛格

為目前戰爭所推動的深遠經濟變動，正引導着美國人民去重新評價國外市場對美國生命的重要性。在戰敗日本之後，美國究有多大的力量能把本國的商品和勞務不僅推銷給傳統的大規模僱主，而且還推銷給至今滿腹苦水的美國民族，這一事與美國工人所能得到的工作數量是有極大的關係的。在一九三〇——三九的十年間，美國的輸出量得獨於一、六一一、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與三、八四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之間，但在目前我們每年的輸出量約值一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在後一數值內，有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代表正常的出口貿易，剩餘的一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則代表租借法案項下輸出的物資（註一）。顯然，在勝利之後，如果美國想維持充分的就業，或即使僅想維持一種不令人滿意的就業水準，如晚近三十年代的那種，則美國——除去可能在國內採擇一些經濟步驟而外——便需要比過去更劇烈地向國外大量推銷。

這是，何以不僅許多官方的機關，包括國務院和商務部，而且還有美國的高人們和經濟學者們都對中國市場的可能性加以縝密研究的原因。國家對外貿易局，通過他的遠東委員會，以及中美工商協會對這問題都深感興趣，美國的航空界和金融界的私人代表們正在非正式的會議中和他們同行的中國朋友商討着貿易和投資的問題。最後將出現的「中美經濟合作方案」迄今尚未能確定，但如在中國國內和國外能形成適當的條件，則該國在戰後十年中將可能吸收大量的入口物資。

中國的潛在發展力

沒有人知道，這將牽連到多少的外資，但華萊士副總統在最近的一本小冊子中假定美國或聯合國的公私機關在戰後的最初五年間可能在太平洋區域每年放款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註二）。在這些值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中的頂大成數大概會用到中國的工業化上來。另據估計，如果在中國的工業投資（中外資本均包括在內）能比照人口和面積的不同採取和日本一九〇〇——三六工業化期間相同的標準，則中國在戰後的最初十年間將需要一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第二個十年間需要二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第三個十年間需要四四、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第四個十年間需要六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如果，和日本的情形相同，有同等百分比的資本從國外輸入，則在最初十年間將有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資本來自國外（註三）。必須極端強調來說，這並不是說，中國的未來發展，將真就循這條道路，但它却指出了，如果進行迅速工業化的條件存在，中國將會具備的龐大經濟潛力。

戰後或者立即將有大量的供應品運入中國以充救濟之用，因為屆時中國人將需要糧食，製衣服的原棉和棉花，農具的物品（例如肥料，家畜和種籽），藥品以及在重建交通系統方面的種種協助。同時中國將是消費美國廉價通利器材的市場——例如，軍用卡車，吉普車和鐵路沿河的掘土機，陳舊的機器和工具機，業經使用過的鐵路器材，廢鐵和廢鋼，過剩的軍火工廠等（註四）。但不管是否把過剩的貨品加以消納或加以支配，這都不能代表貿易的持久性的一面；如果，要如一個中國人所提議的那樣，使增加對華貿易便是一使五十萬人經常得到工作，那麼便還需要一些更遠的實質的東面（註五）。

美國在中國所需要的那種長期貿易是只有通過中國的工業化才能實現的，此事對於世界經濟整體的意義可由一件事實來說明，即中國的人口數實超過聯合國內各高度工業化成員國的人口總和。誠然，資源的缺乏使中國不能工業化到美蘇兩國的程度，但她仍保有進行適度工業化所必需的儲蓄（六）。如果在戰爭結束時能選擇前進方向走的必要步驟，則照一位中國貿易學者

的估計，中國戰後每年輸入的總值約可達三五四、七〇〇、〇〇〇美元，即約略較一九三五——三七年中平均輸入量多百分之二十。如果把這個數值再加大百分之三十一以照顧到戰前戰後期間物價可能有的上漲，則輸入值將達四六一、一〇〇、〇〇〇美元（七）。

這個總數必然地只能是一個推測值，在這裡把它提出純係為了說明的便利，是不可拿來作為預言看的，這裡有一個基本的假定，就是資本將不是大規模地一次地輸入進來，因為——只舉一個例子——如果就在緊接戰後的幾年中中國便向國外每年借款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則入口的貨物值顯然將遠超過四六一、一〇〇、〇〇〇美元。但不論在開始時輸入量較此為高或使達到適當的程度，輸入品都總將包括兩項主要的項目：工業化所辦的財貨和消費的財貨。這便是指機器和工具，鋼鐵，石油產品，食糧（小麥，麵粉，大米），鐵路器材，卡車和車輛，電話和無線電器材，化學品和藥品，棉織品和原棉，紙張和紙製品，木材，以及染料，顏料和油漆等。許多其他的項目還可以列入這清單裏，但這對於中國的需要已經提供了一些概念。如果工業化進行得尚稱順利，則中國採購的重點將逐漸從初期善後所需的消費財貨轉移到工業所需的輸入品上去，因為如可以預期的，中國在若干年後將會把自己的衣食生產量發展到一個高度的水準（八）。

夢裏的中國樂園

然而，當研討論論的各種可能時，美國人必需腳踏實地去考慮戰後的中國市場問題。這並不恰當等於是估量一下中國將會需要些什麼，而是要觀察中國是否真會適宜一種為了開展廣大市場所必需的對內政策，而且還要判斷憑中國的力量究竟能準備購買多少東西。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為對於中國市場的迷夢絕不是新近才有的，半世紀以前美國的商人們已經在掃視着中國人民的購買力了。這種掃視也曾驅使我們採取菲律賓羣島，我們曾以希冀的眼光把菲律賓羣島是抵達中國海岸並與滿洲帝國的繁榮的巨民建立貿易的踏足石。

爲要鼓勵這種樂觀的精神，一位中國的駐美大使伍廷芳曾描繪了一副誘人的紡織市場的圖畫，他說，只要能把普通中國人的袍褂加長一寸，則這個市場便成功了。不過，堪注意的倒是這個加長尺度的事從未能實現，換言之，中國人民的購買力，雖在抗戰前的幾十年中略有增長，但在世界的市場上仍大受停滯爲一個潛在的力量。如果把對戰後入口量所作的穩健估計，如前面所引用到的，折合爲一九三六年的物價水準，其值也小於同年瑞典（人口六百萬）的購買力。

對別國的生產品而言，中國從不會是一個龐大的市場。在西方和「華夏」接觸的初年，外國的商人難於找出中國人所願接受的商品，用以換取絲、茶、棉布和瓷器。直到十九世紀的末葉入口才真正開展，包括這些門類的商品如棉織品，火油，和麵粉。而且只在這一世紀的末尾，中國購買機器和鐵路器材的事才出現。在那個時期，聯合王國在對華貿易中佔先。但在一九三六年——中日戰爭前的最後一年——美國在對中國售貨上佔據第一位，達入口總值的百分之十九。六。其次爲日本，達百分之十六。三，德國第三，達百分之十五。九，聯合王國第四，達百分之十一。七。（此外，印度和緬甸佔百分之二。六，香港佔百分之一。九）（九）。

中國市場的狹小性可用幾個數字來說明。在一九三六年，中國約佔世界人口總數的五分之一，却僅分得世界總輸入的百分之三，世界總輸出的百分之二。〇。當時，日本的對外貿易總額比中國大三倍還多（一〇）。如考慮到列強曾採用過非凡的手段以擴張中國的貿易市場，那麼中國市場的這種未開發性便更行刺目了。外人在中國的國土上有特別的居住和管轄區域並且——在治外法權的系統之下——享有在中國引用其本國法律的權利。不但如此，從一八四二年到一九二九年中國的關稅因受條約的拘束恆保持在從價抽百分之五左右的標準。換言之，中國的關稅除供維持政府的稅入以外不得有更多的作用。

簡言之，列強壟斷了外交上所能做到的一切，以推倒中國的貿易壁壘，並在許多的場合下運用了武力，但却仍週遇到令人失望的結果。外人的經濟活動依那條約是限於在某些主要的城市裡，而且除去長江流域的幾個內地中心外，並不會向海岸內延伸多遠。廣大的內地更停留於一個落後的農業腹地，儘管有——在西方產品確曾深入了這些地方，大部的內地仍係置身於世界經濟的主流以外。誠然，外資曾受到「保護」，但我們受到這種保護的投

實則比這一購工業化的中國所將需要的投資額是幾乎其數的。例如，在一九二一年，外人在華的投資總額估計是二、二四二、五〇〇、〇〇〇美元（十萬萬），這是一個不能抹煞的數值，但比這一個進行全盤工業化的中國在十年中所需要的數值來却是太少了。據估計全中國大部分的地區尚未經開發而一事實的是投資總額的百分之三四，三是在上海一隅。上海從其在一九〇三年佔百分之十起，一九一〇年佔百分之十八，一、一、一，看來，它所佔的份額數額自本世紀以來是有顯著地增加。這種資金積中於單一滬滬的現象指明了一件事實，即外國對華經濟關係的治外法權體系雖會使有關的商家和個人獲得利潤，但從未促成把這些國家真正加以開發並把它的真實潛在經濟力量發揮出來。

購買力便是為味着農業改革

當外人被強迫到對中國市場的熱心時，他們常趨於把它想像為一個成熟的，可任意從樹上摘取下來的果實。其實，那樹並沒有果實。中國毋寧說更是一個管理失當的農莊，它由於本身缺乏現代的農業方法，而鄉村中又缺乏適當的經濟社會關係，以致那肥沃的土地都荒蕪了。這不僅此喻地說來是如此，而且照字面來講這也是真實的。因為中國市場的困難基本上是一個中國生活水準以及國家現代化的問題。一個真正開發了的國內市場有賴於先建立一個全國性的鐵路網，劃一的海關制度和關稅，和穩定統一的幣制。但這些也需對中國農業制度的徹底改革，這種制度的低效率產力和低抗抗病是阻礙着鄉間的變革和健全工業化的進行（十三）。

這種情形可以說便便說明。除非中國工業化，她不能成爲一個龐大的市場的，因爲一個窮困的農業基礎優勢的國家是不能購買或甚至不能使用大量的外國器材的。但是，使工業化本身能健全，或能盡其全部力基於經濟提高生活水準，則除非把農業基礎加以技術的設備，而且加以社會的改組，使得農民有力量來購買工業的產品，藉以形成一個廣大的國內市場。如果中國要完成工業化，而它的農民們仍在尋高的租金，苛重的捐稅和費與存在的高利貸之下來耕種小塊的土地，結果只能是加速農村的動亂和不安的危機。而同時，城市勞動者必然只能得微薄的工資，因爲農村中的過剩勞動力將隨時準備被吸收到工廠中去。這種情形下所形成的工業中國可能會

更復日本的經驗，日本便是未能徹底改革其農村而僅建立起工廠來的，結果由於國內政治結構的腐爛性，以及國內市場之全然無力以消納日本工業品而導致其推走了侵略的道路。

爲了增進農民和城市工人雙方可能有的衣、食、住的享受，農業改革是必需的，因爲中國的生產力還沒有達到任何足以保障人民接近最低生活水準的地步。誠然，用純技術的方法對農業基礎某種程度的提高是可能的，例如施用改良肥料和人造肥料等，但就是這種重要的技術革新如果缺乏較深入的社會改革也不見得能普遍化。在中國目前農村生活的環境下，一個普遍的自耕農，即使他相信改良辦法是必要的，也將會遲疑不起這些，至於普遍的佃農，他對任何的新新新深疑是一種向他徵更多榨取的藉手法，而地主們，一經地說來，也都會提防着這些東西或會借端地問所熟悉的工作方法。

要打開局面便得有進步的政治改革，這種政治是藉給了農民對農村事務的發言權、並實施減租，減稅和減息來爲人民展開一番新的氣象，只有當普遍的農民身受到增加生產的獎勵而朝一個新的方向動了起來，並且只有當廣大——地主集團的現行阻滯性的影響被整個地削弱了，才可能產生健全的條件以擴大中國的市場。因此，重慶政府戰時政策的完全不提農業改革對前途並非是好的徵兆。這使得一個批評者批評道：「在中國所有討論戰後建設的出版物中最刺眼的漏洞便是不提農村改革。土地佔有方式以及和它相關聯的一切繁複的信用，財產和租佃關係是一切改進中國社會問題的基礎」（十四）。

中國將如何付款？

必得承認一個美國普通的銀行家，製造商和出口商，當考慮到向中國輸出貨物或在中國進行投資的可能性時，他的注意力並非是集於於中國農村結構的問題上，而是在一些別的問題上，例如：「中國怎樣來償還她的債務？」因此考慮這一類的問題是必需的，它們對於中國市場的前途是有深遠的影響的。

爲了償還借輸入的貨物和外人的勞務，中國在戰後的幾年應儘量籌集輸出，但那時的條件對此事不見得是有利的，因爲農業勞動力受到了損失，

農業生產力是衰敗了，國內交通遇到梗塞，國內也將需用大量的糧食。而且由於綜合物品 (Synthetic)，代用品和各種新來源的原料的種種發展，更加以戰後對戰略價值的原料的需要減少，以及國外入口關稅的提高，這都使得中國也許會發現它已經喪失了某些市場，或在那裡會遇到更劇烈的競爭。

在一九三六年中國主要的出口物資包括紡織纖維和紡織品 (絲、棉、毛、麻)；牲畜產品 (豬鬃、雞蛋、腸子和皮毛)；油類 (備置油、乾油、漆油、帶的木油或桐油)；糖 (花生、芝麻、亞麻仁)；金屬和礦石 (錫、鉛、錫)；以及茶葉等等。其中，絲、糖和錫在某種程度內將受線和物價的排斥，而錫將受到來自別地的代用品和競爭的影響。然而，儘管美國國內的桐油生產是在發展着，美國仍將需用大量的桐油，而且對許多其他的產品也仍將是一個市場。這一大部分要看中國會不會把舊有的絲、茶葉和植物油等類輸出品品質提高 (十五)，會不會利用更有效的方法減低生產成本，並且會不會保持一個穩定且令人滿意的物價。中國甚至或可希望代替日本取得美國小巧玲瓏物品的市場。而美國也可能藉了推行大量儲存原料的政策增加對中國國產的購買量。隨着工業化的進展，中國還可以在戰後幾年裏提出一些新的出口物資。

也毋庸置言的，中國是正在籌劃把重點放到東南亞市場上去，在這里戰前日本曾銷售了大宗廉價的物品，這愈顯得是初建一個均衡的，三形的貿易網：中國——東南亞——美國。中國將由美國購進其輸入品的一大部分，廉價地把它們售給東南亞的人民，再轉了從這些區域運送天然橡膠、錫和其他的原料去美國所賺得的利益以收回一部分美元 (十六)。無疑地，這在某種程度內定是可以做到的，但這裡至少牽連到兩件無法測定的事物：中國能排斥日本到什麼程度，以及把原料輸入美國，特別是橡膠，能換得多少的美元代價，因為這些物品都將深受到綜合物品和代用品之發展的影響。無論如何，中國的出口總值將遠低於她的入口值。在一九三四年——三六年的三年中她對美國的平均入超額是一二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而在戰後最初幾年中可能更顯增加目的加大一些。入口值和出口值間的這種差額是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方法來補救的。

在戰前時期內，美國政府貸予中國六七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而英國所給予中國的貸款則達六八、五〇〇、〇〇〇英鎊，前者到戰前結束時

大約還餘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英國的信用貸款為時約也還存有二五、〇〇〇、〇〇〇英鎊 (約值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這總數值約達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信用貸款可能是——不計出口的收入——戰後最初幾年中支付中國入口物資的主要財政來源 (十七)。此外，有大宗款項被中國的富翁們為了戰時資金逃避的原因遺送到國外去了。約三年前，南開經濟研究所所長方顯庭教授曾估計這筆款項的總值在三億到四億元之間 (十八)。如果，中國的政府能依照許多中國人民的儲蓄採取步驟以控制這些存款，改以國幣借還原主，其影響所及將等於是給國家的財源增添了一筆可觀的數目。然而，即使不照這樣去做，也仍可把這筆款項的某一部分用原主對華再投資的方式提供中國應用 (十九)。

另一個來源便是中國政府還可用現行中美經濟協定下的存款差額。目前中國的大部分入口物資都出自租借名義之下，但中國運抵美國的少量輸出品即是換取到美元的，美國陸軍在中國購置物品也是支付了美元的。看來在戰後還可能從美國匯寄中國的宗教和文化經費以及旅行遊覽生意之中 (假定中國達到了政治穩定的程度，並採取了其他必要的方法以鼓勵旅行遊覽事業) 得到幾筆小款。中國也將會要求日本賠款的，這也許還包括日本在美國和英國的現金餘額在內。

另一方面，存在的困難在戰前和戰爭初期國外匯兌的單與泉源却將受到嚴重的打擊，因為指望出售貴重金屬已屬不可能了，而海外華僑的匯款在戰後的最初幾年中也將停滯在一個很低的標準上。其原因是，美國在一九三四——三八年對白銀的收購實際上已承受了中國剩餘白銀的全部，而東南亞殖民地所遭到的戰時破壞竟促成了該地華人市區的凋敝。匯款固將繼續，但不能指望它在若干年內能上升到一九三六——四〇。這五年中的標準，據估計這每年的平均數值約達一五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 (廿)。

需要長期的信用貸款

看來，中國在戰後初期的財源——包括未動用的信用貸款，黃金儲存，美金存款等項，新的收入，甚或還有現金存款，——是斷不可忽視的，儘管在某些範圍內收入是在減少。有些觀察家相信，在戰時日本之後，中國將會有將近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以供應用。這筆款項足以應付戰後

初年的開支，但如果中國想從事大規模的工業化，並動用一部分美元以穩定深受影響的通貨，則大量的，建基於長期信用上的新借款在以後將是需要的。如果這些貸款隨時可兌現，則中國將有充裕的時間來償還，它在這段時間內工業化的效果將有機會發生作用並能協助建立一個更強有力的，更有償付能力的經濟。

重要的是，這些貸款的利率要低，這樣才可使償債的重負擔保持為一小數。一個看來，這似乎違反國外投資的本旨——至少就貸款人說來是如此——即取得利潤。但需切記，雖然在戰後的最初幾年中全球似乎並不缺少投資的機會，但經過十年左右的物質建設以後，便將不同了。無論對借方或貸方而言，為了避免把信用市場濶竭，以低利把資本投出去總比把它完全閒置起來要好一些。對於如美國之類的國家，為了達成當前的任務，把工廠經營得在高度水準之上，事情更是如此。以低利向國外貸款可能招來一些訂單，而為了保證許多工廠和職工得以經常工作，這些訂單是必要的。這種方法所提供的利益與比從貸款本身所取得的微薄收入要大得多。

不論是短期或長期的信用貸款而言，總盼望能讓中國的或是他方面的借戶得到有最大伸縮餘地的償付期限。這是何以美人對華直接投資，無論是取外人獨營，或與華方合辦的方式，頗為值得推薦的一個理由。因為這種投資的收益並非依照死板的規定，而是會反映商業情況的變化，並且在順利的情況下，所帶來的利潤會比從貸款中所能盼到的更高。這就提出了美國或他國和中國經濟合作所能採用的諸種形式的問題。

有一種可能是由有政府開簽定協定，如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〇年的進出口銀行的貸款那樣，根據這協定，中國保證讓交桐油、錫、鎢之類的貨品以抵債務。投資的第二種方式將是由中國借用國外私人資本或購買某些外國廠家的材料，而由其中最主要國家的政府對其本國國民予以某種財政上的担保。當英國私人對華貸款時，其政府便是這樣做的，而美國可以更大規模的遵循這種途徑，美國本為此事設有一個進出口銀行的。第三種方式將是由國外給予中國政府或商家以純民間性的信用貸款。第四種方式將是對華作直接或半直接的投資，例如，由美國公司建立分廠，把入口物品或在華製就的另件裝配為成品。美國的公司也可能建立合辦的事業，由他們和中國商人共同來經營。

還有不能忘記的是一個正從事工業建設的中國將需用大量的中外技術人

員。在中國比缺乏機器更嚴重的是缺乏運用機器的必要智識。從工程師到修理匠各等級的技術都深感缺乏人才。美國各公司因此不僅需要深切地注意於輸出資本，而且還得注意於輸出專才，此外並得實施訓練方案，以期協助中國人儘速而有效地經營這些新工業。朝這方向前進的某些步驟業已被採用了。

但外國的商人們，在激頭激尾地置身於此事之前，必先要求個人方面獲得確信，就是不論投資係出於何種形式，中國都能提供最起碼的必要條件，足以保證資金的運用確屬安全有利。不用說，投資人不能要求欽板似的担保——如他在美國不能這樣做一樣——但是他們將要求某些作為保障他們的錢財所必要的因素。他們所要求的保障在性質上自然有種種的不同，因為——只舉一個例子——一個做短期信用放款的美國汽車出口商要比一個有意在漢口創辦汽車裝配廠的公司更容易獲得滿足一些。前者僅需要判斷中國的進口商是否有力償付這批貨物，而後者却需要考慮長期內在中國可能佔優勢的政治經濟條件是什麼，以及這些條件能在什麼程度內提供一個基礎使得事業確屬有利可圖。

關於中國情況的質詢

在這裡，列舉一些常會為美國商人們問到或可能問到的關於中國未來情況的問題也許是有用的。例如，他們願意知道：

一、中國會有國內和平嗎？

美國普遍地重視重慶和共產黨所領導的游擊區之間的糾紛所內含的內戰危機（二一）。而且也不難看到這糾紛將深重地觸害到中國和盟國的未來關係。這大半要看戰事結束以前重慶和共產黨之間能否成立協議，保證戰後的國內和平。如果在戰敗日本之後中國將進入一個內戰的新階段，則一切想在不久的將來就開起一個廣大的中國市場的希望都要變成泡影了。固然，在過去當中國某一些地域被牽入內戰時，在別些地區的貿易是在繼續進行的，有些時候甚至還擴大了。但毫無疑問的，再一次的內戰將意味着貿易的絕跡，而除非是有真正的國內和平，中國一定不能工業化，一定不能呈獻一個真正的，亙古未有的廣大市場。因此，在維持和鞏固中國的統一上，美國投下了一筆鉅大的經濟賭注。因此，華萊士副總統，當他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九

提到中國需要外資的時候會宣稱道：「我們美國有成千的技術人員和商人，他們可以供給這項援助。然而商人們特別要求對一件事情的保證。他們在建立根基付必要的開銷以前，願意徹底地瞭解，在中國內部或中韓之間並不存在有任何可預見的類似糾紛的事情」（二二）。

二、中國將有一個穩妥的幣制嗎？基本上此處的問題是中國政府是否會對業已膨脹的戰時通貨做一合理而滿意的措置？並是否將藉指稅和借款來平衡預算。

三、中國將償付她的債務嗎？在這個混合下需要提議的是重慶政府曾否徹底履行了戰時債務所規定的一切義務。例如一九三八年的一千萬元貸款便是先期償還的。

四、中國政府對於外人事業採取何種態度？這可以分解為許多更細微的小問題：甲，所有的投資人，不論中外，都將受到同等的待遇嗎？乙，經濟條例是否相當的固定不變，或者他們真可能在投下大量資金之後被任意加以修改嗎？丙，對於涉及外人商行的法律條文所做的解釋是否將更趨簡單化和明確化（二三）？

五、中國國營事業的性質將如何？如所週知，在戰爭期間中國政府曾在經濟活動中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它期望在戰後也仍然如此。美國的商人們因此願意知道那些範圍是政府事業可能將染指的，而那些是將留給私人事業的。

六、關於這個問題將更多地談論到。

六、中國有一幅內容詳盡的工業計劃嗎？這是特別重要，因為只有當中國向美國，以及別國所提出的要求已臻於詳盡列出的地步，具體的商業穩定才能夠成立。本館不承認，要中國在這樣的時候就簽定合同實在是很難為情，當它，例如一箱煤不知道在打敗日本之後戰前的中國工業區將變成何種情況，而中國如果想在商情美國的信用放款和剩餘物資上不落人後，就必須得立即進行某些接洽。行政院和其他的政府機關曾專心致意地設計了許多草案，而蔣介石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出版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內又費了許多篇幅，利用統計數字來說出中國戰後的需要（二四）。但直到一九四四年九月，中國政府把所估計出的本國戰後救濟事業的種種需要提交給善後救濟委員會，中國戰後初步計劃的細目才為人所知。根據這些估計，中國在開始被解放的最初十八個月內所需的物資和勞務將達三、四三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其中百分之二十七（九四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將出自善後救濟總

署，餘款由中國政府撥給。申請善後救濟總署撥發的款項，百分之四十五是充直接救濟之用，百分之五十五供運輸、交通、農業、工業之用。善後救濟總署是否真會批准像所申請的那樣鉅大的援助，現時還不能斷言，但是中國這一計劃，提供給美國商人一個新的根據，藉此以判斷中國市場的現況會比以前他們所有的根據更令人滿意。

這並不是說這種不明確性的責任完全落在中國政府的身上。美國商人和商業公司所面臨的環境是他們所從未遭遇過的。至今為止，治外法權的體系，以它那對外人獨特適用的法律、規章和地域會維護了外人的利益，並且給他們佈置下超乎尋常的保障。可是，根據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的條約，英美放棄了治外法權，以致使得戰後英美在華僑民和商行將完全遵守中國的法令，一如外人在英美從事活動必須遵守該國的法令一樣。這就是說，商業界將被延遲來參與開發中國，這一開發的規模是空前的，但他們的處境却是他們所非常不熟悉的。這就與外國的經濟團體們把這種新的環境認識為一種必須接受的挑戰，而並不把它認為是行動消極的根據。

中國投合外人批評的方法

需要提醒的是，在關於政府法令的一點上，中國政府已注意到平息外人的恐懼心理。在一九三〇年三月，戰前的南京政府曾有規定，在任何中國的公司內華人的股本需超過總額的百分之五十一，在董事會中華人董事需佔多數，而董事長和經理都需由華人充任（二六）。這些步驟，是反映了中國願感到帝國主義的對華經濟侵略，而其一般效果却是限制了外人對在華事業加以投資。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日，為了要鼓勵外人在新環境之下投資，中國當政的政策，國民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兩項關於全國工業建設和外人投資政策的決議案。前者宣稱政府將要草擬戰後工業計劃，並將規定何項工業劃歸國營，何項劃歸民營。政府將對於合乎工業建設計劃的民營工業予以特別獎勵，並予以技術運輸的協助。決議案的第十六項申明「歡迎外人資本與技術合作」。第二個決議案規定（一）外人資本在合辦事業中所佔的比例額將不受限制，（二）合辦事業的董事長須由華人充任，但總經理不必如是；（

(三)前二項之任何具體規定一經雙方當事人取得協議並獲得政府的批准即行生效；(四)依照中國法金並取得政府許可，外人即得在中國創辦單獨事業；(五)國營事業商借外資事宜須集中辦理；(六)民營事業亦得商借外資，但須經政府批准後始行生效；(七)政府須於短期內決定何項國營事業得接受外人投資，或籌借外資(二七)。

國民黨的這些決議案曾相當地迎合了外人的批評，但是——除了聲明修改一九三〇年有關合營事業的各種限制以外——關於政策的問題還沒有予以解決。其中某些問題也許在中國依據廢止治外法權的條約進而與英美簽訂新通商和通航條約時會更具體地予以處理。根據一九四四年十月中國官方通訊的報導，重慶當局已擬就中國通商法案，且已把它呈送政府，而經濟部也已訂定利用外資和外人技術協助的辦法。據說這些條文的精神與宗旨是爲了「賦予進行投資與技術合作的外人以最大的權益，並保證外資能安全有利(二八)」。

其後，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舉行於紐約州萊城的國際通商會議上，中國代表團的主席陳光甫又宣稱：「中國政府所採擇的一切規章和法令都是趨於給外人投資以公平待遇的」(廿九)。浙江興業銀行的總經理且也是代表之一的李銘也響應他，申言外資會受歡迎，而且會有寬闊的活動地盤。這些聲明，雖未把重慶政府表達進去，却似乎反映了該地的官方意見。這種推測不久便被一位高級官員孫科在下開將討論到的一稿演說中予以證實。現在需要答覆的主要問題是：要經過多長的時間才能把自由經濟的原則消納到具體的法律條文裡去。只有做到了這一點，而且只有中國國內政治局勢經過澄清以後，才能說決定中國市場上外人投資利益的基本政治經濟的決策是已經擬就了。

中國的經濟將統制到什麼程度

美國方面的關於允許外人資本在華活動將受到些什麼條件的討論，是和中國方面的關於工業化的要求政府採行怎樣的工業政策的劇烈討論同時並進的。中國人都將近一致地認爲，由官方加以頗多的干預確屬必要，但對於干預的程度及其實施却尚有重大歧異之處。這些討論大部分的學理出發點都是中國著名的民族領袖孫中山所抱的見解是如何如何。當他在一九二五年逝

世以前，孫中山是主張外人大量投資和政府堅強統治的。他對於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某些見解也反映到中國在一九三六年所草擬的五五憲草裡，這憲草還沒有通過，但却表示官方已在接近着憲政了。這一文件的第一一八條說：「附屬於土地之礦，及經濟上可供公衆利用之天然力，屬於國家所有；不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而受影響」。而第一二二條則宣稱：「公用事業，及其他有獨占性之企業，以國家公營爲原則，但因必要，得許國民私營之」(三十)。

目前中國政府幾乎擁有全國的鐵路，主要的軋鋼廠和機器廠，所有的軍火工廠和石油礦，並保有最大的鐵煤礦藏。此外，由於四家政府銀行立於主宰的地位，私人銀行無論用何種方式結合起來都不足以控制金融市場。據中國行政院政務處長蔣廷黻稱：「我們寧願把這種狀態一直繼續到將來。我們希望把工業和金融業的據點都握在政府手裡，同時把一切其他的地盤開放，讓私人經營。這樣做，我們覺得可以受到機器時代的一切益處，而不致如過去的先進國家那樣被一些不願有的後果的拖累」(三一)。從這個以及其他聲明看來，固然重慶所企圖的是「混合經濟」，不具備統制經濟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一個把民營事業與高度的國家管制相結合的經濟。自然，這種見解並不限於中國，在英國和歐洲大陸上，當討論未來問題時，也被人廣泛地主張過的。例如，這也會具體表現於戴高樂將軍的「經濟指導」一語中，以及倫敦「泰晤士報」所提到的英國政府與民營事業密切合作之內。

集權主義式的經濟管制何以這種獲得中國經濟學者的讚許，其理由可以簡單地說明如下：(一)中國民營工業和金融業是脆弱的，凡需用二千萬元——三千萬元——一萬萬元的計劃是超乎他們的力量之外的。而且，據說這種缺點也使得管制成爲必需，爲了以防止外人的不良影響。再者，中國的重工業多半只熟悉於家族式的事業，而在許多適合對合營形式的事業既缺乏認識，又無信心。這就妨礙到把中國私人的資本拿來供現代商業組織的使用。(二)既然現代的工業是非常複雜，而中國在工業方面又遠較別國落後，則爲了能有飛躍的進步，政府的參與便成爲必要了。(三)一些極端重要的計劃——如鋼鐵生產之類——在某段時期以內可能是無利可圖。政府絕不能容許全國建設事業來向私人投資者，供他們圖利，而必需獨力地實施這些計劃。(四)在事關國外貿易的商品範圍內，美國及他國的貸款曾使得控制有關的出口事業成爲必需，而同時入口也得加以管制，以便保護中國市場的繁

外匯兌換是在促進工業化的或別的方面所必要的物品上。

雖然這些全面的經濟計劃是動人的，但官方計劃的實施情形與太難令人滿意了，因為戰時的政府法令非但不能補助私人的經營，或增高他們的效率，反而幫助私人的經營。對於工業界所深領受到的通貨膨脹的各種惡影響，政府也不會予以減輕，而撥發給經營工廠的工業貸款也是極不慷慨的。

一年以前蔣委員長是認識到造成當前局勢的某些因素的，當他宣佈說：『近來生產事業確有此種情形，即由於物價之上漲或是對政府管制方法生疏而抱恐懼心理，以致生產停滯，或竟離開了原有的生產階級』(三三)。

幾個月以前倫敦『經濟學』雜誌的一位記者便已從中國警用報導，稱：『軍費的政府事業不僅要延長自己的壽命，而且是愈益茁壯起來。隨着它自身的擴張，和地位的加重，它就更排擠民營事業的殘餘地盤。民營事業還能應付的領域，現在也漸漸被它佔領了，而在從前尚屬有利可圖的領域，就更把民營事業逐漸地驅逐了出去』(三三)。還舉補充一件事實，就是食肉和缺乏效率標誌着非現代化的中國經濟，而中央政府也缺乏了監督全國經濟生活的各方面所必需具備的許多行政技術手段。

在中國主張徹底統制和統制的兩派間所存在的一個重要歧異點，就是對戰後經濟的宗旨的爭論。它將首先是國防經濟呢，抑或是民生經濟呢？主張後者的人士強調提高生活標準的重要，他們提倡發展輕工業，以製造消費品，並贊成在經濟方面官方僅作有限度的干涉。而那些願意絕對強調重工業的人士却着重指出中國軍事上需要，他們贊成對經濟生活的各方面都加以嚴格的管制。事實上，一個基礎健全的政府是可以對重工業給以充分的注意的，同並時促進人民的直接福利的，而不健全的政府，則二者都難於作到。危險的是，違反人民利益的狹義的愛國主義份子，在戰後將會在中央機構佔得上風，那個經濟的觀點可能放在軍事準備上——不僅是為了保衛自己，對抗外來的侵略，而更直接的却是從事於國內的紛爭。在這種情形下，要美國供給大量資金似乎是絕對辦不到的，因為在這種中美經濟合作的真實基礎是不存在的。

但是孫中山先生的公意，立法院長孫科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所發的一篇演說顯示出來：在中國的徹底統制派和溫和統制派二者的鬥爭中，擁護後一派的人士最近獲得了重大的勝利。孫科在重慶所做的這篇演說露

出，自從國民政府通過一九四三年九月的決議案以後，行政院會同立法院下的一個特別委員會對中國戰後經濟結構加以縝密的研究。根據研究的結果，擬定了一件一般原則性的聲明，並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初送呈國防最高會議，以便作最後的決定。因為正式的聲明還沒有公佈，孫氏曾用自己的言語來闡明各點，並附以簡短的解释(三四)。

孫科所宣示的政策

按照孫科的說法，這一綱領包括有一系列的基本原則，而凡和開發戰後中國經濟的詳細法令條文的起草實施執行等事宜有關的政府部門都應該奉此基本原則為準則。他並且敘述這些原則如下：

- 一、戰後開發實業應於官商雙方參加的原則下進行。
- 二、一切經濟事業，無論國營或民營概與經濟建設總計劃配合。
- 三、國營事業的數量和種類應加以限制，並明確規定，不應過於擴張，或過於具備一般性質，此種國家獨營事業應包括郵政電訊，主要鐵路，大規模水力發電廠，兵工廠，鑛務以及河港水利工程水利等類公用事業。
- 四、一切其他不嚴格屬於國家獨營事業範圍的事業應准許私人承辦，佔有及經營……
- 五、規模過大的事業，雖不包括於國家獨營事業的範圍內，仍可由政府承辦，或官民合辦……
- 六、凡官民合辦的事業均應組成公司或會社形式。
- 七、應強調國營公司和會社的商業性質，而置國家的利益於次要地位。國家的參與亦應該以政府獨佔的基本公司法所規定的一般股東之權利和義務為依據。
- 八、國營事業，凡不屬國家獨營範圍之內的，無論係由國家機關管轄經營，抑仍與民資外資合辦的，均與同類民營事業的權利義務同一待遇。
- 九、所有民營工業企業，就(甲)設廠地點；(乙)生產力；(丙)生產品的種類和品質；(丁)債券和股票的發行須行登記立案等項而言均應該和經濟建設總計劃的規定相符合。
- 十、民營工業事業合乎經濟建設總計劃的，政府應予以獎發資助，如予以技術協助，運輸便利等。

「十、凡對中國民衆開放的合辦事業，外資所佔的比例數額應不受固定拘束，但董事長必須由華人充任。」

「但此條並不是以制止其數種對國家具有特別重要性的工業爲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受有限制。」

「十一、業經審查的事業，無論係國有，民有或官民合有，均得經由主管機關商洽外資的金融協助，或經主管機關核准後自行商洽國外的金融協助。」

「十二、外人在華直接投資，單獨經營的事業，應依照中國法令辦理。其特種事業須得特許方得創辦經營者，應先呈經我國政府審核後特許之……」

「十三、政府人員不得參加經營其主管或監督範圍以內的事業，以圖私利。」

但，在其結語中，孫科着重指出中國經濟的發展將受國內外政治形勢的限制。「對內而言」，他說，「我們需要一個和平的國家，這國家確已跨入了安定的憲政民主政府的階段，對外而言，我們需要一個遠東，這遠東已經而且永遠是擺脫了對日本侵略的恐怖心理」。

美國與對華貿易

前面幾頁的討論提示到美國商人和中國交往的主要問題還不在於中國的官方經濟統制是否將比美國爲多（戰後大多數國家恐均將如此），而是中國是否已組織得能和外國民間人士從事令人滿意的商業關係。問題並不在於管制本身，而在於選用管制的方式，以及這方式是否足以對商業和投資安全而言確屬必要的條件作爲出發點，例如金融穩妥可靠，政治統一，外人企業得享公平待遇，以及管理有效等等。看起來，中國雖然需要許多的統制，但如能避免推行阻止中國民間積累資本的政策，並採取鼓勵外人投資的溫和步驟，則中國似將獲得裨益。

但，就最好的情況而言，中國的階級在戰後的短期內似乎尚是隱憂。因此爭點便在於外人政府，特別是美國政府，在鼓勵對華投資和貿易中將起怎樣的作用。政府的這種作用在英人看來毋寧是當然的。例如，倫敦「泰晤士報」便宣稱：「我們之能合作（特別是經濟方面和中國合作）的一般條件須先經中英政府取得一致。一旦這些一般條件獲得解決，英國政府即可邀請工程，化學及其他工業部門各自組織代表團研究業經提出的開展途徑，並承辦

各項必要的事業」（三五）。但在美國，對政府的強有力的領導或者會有些反對，其根本的理由是，這樣將干涉到自由企業的經營。

但就對華貿易所提出的問題加以考查，即可看到，政府的領導對於扶助私人事業可以完成一項有價值的機能。例如，一個美國的鐵路器材製造商，它的力量或不足以貸予中國一筆四五千萬美元的器材放款，但如進出口銀行可墊付餘款，它將能自中國貸放一部份。看來，如果中國要工業化到它本身的舒適以及美國的需要所要求的程度，則許多計劃非得華盛頓的援助是不能完成的。美國政府如願顧慮到下列各種可能，如在一定限度以內担保美國的資本不受損失，協助商人應付由於廢止治外法權而產生的各項問題，以及將發生經濟蕭條，或某種工業缺少訂貨時，藉對華作穩健利溥的放款以刺激美國的工業之類，則美國對於中國工業化的進行會給以便利。個別的商人和公司必然地要考慮到兩件事情：即目前信賴中國人所會予冒的風險，以及即使風險不大，對這些中國人即担負起重大的干係是否明智。如在政府，雖也經常考慮風險的因素，但因為它掌管有龐大的資源，是可以根據整個美國經濟的需要，來全面地去接觸這問題。在聯繫到中國市場時，我們可以採用這樣的基本原則，就是美國政府的行動應限於輔助和鼓勵民間的活動，也就是專作民間人士在特定時期所不能不承擔的事情。

在中國的未來商業競爭

無論中國市場是否將有頗大的擴充，看來總會引起劇烈的外來的商業競爭的。在這競爭中，美國將佔有利的地位，因為它將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資本輸出國。其他的資本輸出國，如英法的削弱，以及德日的戰敗，使中國如不向美國商借外資的大部份，就或將不可能迅速而廣泛地進行工業化（三五甲）。這不過是用另一種方式來說美國將在對華貿易中起極大的作用。事實上，根據季昌（譯音）的估計，如果戰後短期內中國的人口總值達四六一、一〇〇、〇〇〇美元，則其中，約百分之四十三——一九五、七三二、〇〇〇美元——將來自美國。如不把消費品包括在內，而僅計算資本和生產財貨，則美國將佔有百分之五十三（三六）。

美國具有對中國學生加以最新工業方法訓練的能力，這事大有助於美國的對華貿易，因爲——這是值得強調指出的——在日後對華出口貿易中，工

作的一個重要部分便是訓練如何使用和待奉機器。同時德日的猶致失敗，消除或削弱了兩個重要的競爭者。例如，德國在輸出機器和工業器材方面，如工具、鋼軌、工具鋼、黃銅鑄銅原料及其產品、化學品及藥品、內外輪胎、以及其他等等會起過重要作用。許多部門將會形成部分的真空，這將特別由美國英國（除聯合王國外，尚包括印度、澳洲等）來填充。還有值得注意的，是，多年來便歸日本領斷的滿洲和台灣的貿易，在勝利之後也將對美國開放。滿洲斷然是中國最高度工業化的一部分，而且，儘管在日本戰敗之前或遭受到破壞，恐仍將維持這種局勢。滿洲作為市場而言，其重要性可以從這一事實看出，即在一九三四——三六的三年間其入口值達大陸上中國其餘部分的百分之五十八（三七）。

為滿足中國的需要，美國却有一個極大的缺點，就是價格昂貴，即使貸款的條件寬大，利率微薄，但用美國機器來進行工業化恐怕是工業化用費最浩大的一種。另一方面，英國除得力於熟悉遠東市場之外，更對許多類貨品可以貢獻比較低廉的價格。無可懷疑的，英國是切盼在戰後能在對華貿易中起重大的作用，因為那時出口貿易對於它將比對美國更屬重要。倫敦「泰晤士報」提到說：「似乎已臻一致的是，如在戰後英國要維持充分就業和良好的生活水準，我們便須增加出口貿易。我們承得起把對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貿易置之不顧嗎？」（三八）「泰晤士報」承認，經過新加坡、緬甸、馬來的退戰之後，英國在遠東的聲望和力量是受到了損失，但堅稱：「對中國有識的英國人確信我們能克服目前時局的困難，贏回中國人的尊敬和友誼。」儘管如此，許多問題是未得解決的，例如，中國對於沿海及內河航運權的決策便影響英國航運界，如怡和、太古公司的利益。美國的態度如何也並非最無關緊要的事——這個國家是否將承認和英國經濟合作的重要性抑或我們將完全不顧及到英國維持世界和平所起作用的後果，而遵循一種唯利是圖，不經過每一機會的政策。

日本在中國市場上的未來地位是一個特別大的問題。從純經濟的條件而言，日本的工業由於出品價廉對中國的工業化能有極大的貢獻。但這一點自身並不能影響到對日本未來工業經濟所作出的決定——作這一決定所依據的似乎是，最適合於維持遠東和平的是什麼。但是，只要日本尚保有它自己的工業，實物賤價的爭執便將發生，因為這種賤價對中國是會有用的。這局勢充滿了許多棘手問題。例如，如果日本重工業大部分被破壞或拆卸了，而

輕工業却可以頗為自由地發展，則在輕工業產品方面日本不會成為中國市場上的主要角色嗎？而且日本不會統治這些商品的東南亞市場嗎？當然，這除非是它們在這兩方面的銷路都遇到了專為對付它們可設的高額關稅的限制。對這些問題要做廣泛的分析，却由於篇幅和現有材料的缺乏尚屬不可能，但所提出來的各項問題指明中國市場的前途在今天還是如何的未臻解決。

世界經濟的責任

本文的主體是論及中國的經濟政策，以及中國對外貿易可能增加的遠景，但顯然西方列強的國內國外政策對中國市場也有極大的作用。被牽扯到的問題有一些可以簡單的論列如下：

（一）貿易壁壘。如果中國要更多地購自國外，並建立長期貸款的健全基礎，中國早晚便需大量擴充自己的出口商品。要作到這點，便須列強方面，特別是美國，減低關稅。如果這個國家既期望對華推銷大量商品，又不願減輕中國對美出口的限制，這是不合邏輯的——例如，在一九三七年佔中國對美入口第一位的桐油便是免稅的，但中國不僅可從世界各國減低關稅壁壘所造成的貿易增進裡以獲得利益，而且可從美國對其他物品減輕關稅而獲得利益。此事大部將看美國國內採擇怎樣的經濟步驟，因為如果國內政策是趨於促進大量就業的，這就會增加對進口物資的購買力，而恐懼進口或將損害美國工業的心理也會減少。一件必得承認的重要事實是，正如美國為了自身的繁榮需要擴大中國的購買力一樣，中國的繁榮也需要美國生活水準的提高。

（二）通貨。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足以妨害貿易穩定的匯兌變動，國際間的共同行動是必要的。由於戰時的通貨膨脹，中國將面對一個艱難的通貨穩定的問題。一九四四年七月布里頓森林貨幣會議所建議的國際標準基金當可對此有所幫助。

（三）國際貸款。當把進行工業化的國家的要求與先進國工業方面接受訂貨的需要相接合時，如能設立一個國際機構以保證並補助民間方面的貸款，這是有利的。這將是布里頓森林會議所建議的復興開發銀行的一部分工作（三九）。

（四）租借物資。租借物資的解決途徑是否將成爲未來通商關係的一重要負擔也有極大的影響。

(五)殖民地亞洲的前途。其他亞洲市場的情況也將影響中國的出口貿易以及海外華僑匯款的數量。例如，把馬來的經濟在擴大的基礎上加以改造，對於中國是至爲重要。

(六)美國與英蘇的關係。如果由於英美的商業競爭，或美蘇間的爭鬥而致世界分裂，其影響所及對中國是非常有害的。關於後一點，一個美國商業雜誌的出版商會稱，美蘇如果拒絕合作以維持和平，則在目前孕育階段上即將打破一切計劃把中國規模工業化的夢想(四〇)。

結論

從這篇報導可明顯看出。中國市場，雖曾久被討論爲伸手即可取得的，却還沒有具備任何現實性。製造一個大市場的條件是存在的——廣大的土地，四萬萬五千萬的僱主，對工業化的需要——但這些必要的成分尚未能形成一件成品。尚缺乏的是一個適當的中國國內的政策和一個適當的國際的環境，如這點能做到的，世界似乎將要看到一個強大進步的中國成長起來；儘管它的成長會需要把國際經濟活動加以調整，但別人不必畏懼它會成爲一個可怕的競爭者。正如一個中國官員所宣稱的：「世界上每五個人中有一個中國人。如果四萬五千萬人民能過像樣的生活，且願意對世界繁榮所供獻，則世界的面目勢必大有改變」(四一)。換句話說：已經工業化了的國家從一個自由，工業化，且有前途眼光的中國所獲得的利潤遠會比從一個外人佔有特權，但僅享有窄小市場的古老中國所獲得的利潤爲多。

註釋：

(一)關於現行出口值的數字係根據國外經濟管理局副局長勞克林·居里，於一九四四年九月廿八日對衆議院後設計委員會對外通商航小組委員會所做的報告(華盛頓複印本)，第七——八頁。

(二)蕭萊士：「我們在太平洋的工作」(紐約，太平洋學會，一九四四年出版)第十八頁。

(三)尤金·斯特萊：「世界經濟的開發：對前進工業國家的影響」(蒙特勒爾，國際勞工局，一九四四年出版)，第七——七二頁。此數值是以一九三六的物價爲依據的，如以戰時或戰後可能的物價水準作依據，數值就要高出很多。日本一九〇〇——一九二九年間投資的數值

是：一九〇〇——一九二九年七三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一九二〇——一九二九年一、六五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一九二〇——一九二九年三、一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一九三〇——一九三六年二、四七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第一個十年間，資本財貨的入口值約達總投資的百分之四十，第二個十年間達百分之三十六，第三個十年間達百分之三十四。

(四)須提醒，「價廉合用」是購買時的一個重要考慮點，因爲中國人會儘量避免把他們的工業化建立在陳舊而過時的設備上，特別對他們想參加國外競爭的部門更是如此。

(五)前重慶交通部長張嘉璈，見一九四四年三月十日的紐約大美晚報。

(六)G. B. 格黑德：「亞洲的土地和人民」(紐約麥克格魯——黑爾圖書公司一九四四年出版)第七十五頁。

(七)季昌(譯音)：「中國的戰後市場：一個初步的估計」(紐約太平洋學會，一九四四年出版，複印本)，第八七頁。

(八)同上，第八八頁D. V. 克尼卜：「挑戰性的中國戰後市場」，載一九四四年十月七日國外商業週報(華盛頓，商務部出版)，第九——十一頁。

(九)調查從略。

(十)關於中國所佔的世界進出口貿易的百分比見一九三九年「商業年鑑」(華盛頓商務部一九四二年出版)，第三一六頁，關於日本的數字見第二六八頁，關於中國的貿易見第二四六頁。

(十一)C. F. 雷末：「外人在華投資」(紐約麥克米爾圖書公司，一九三三年出版)，第七六頁。

(十二)同上，第七三頁。

(十三)關於中國農業的性質會由R. H. 陶尼，陳錦奎，J. L. 布克等人在許多論著中討論過。布克教授根據他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間所作的廣泛考察，發現中國農民的半數是自耕農，三分之一是半自耕農，百分之十七是佃農。一般的規律都是經營小塊的土地，就是說農民的土地是許多塊分散的小土地，而不是一塊完整的土地。此外，墳墓約佔農田的百分之二。布克估計，如果把墳墓和田界取消，將可再獲得將近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畝的土地，而如果把農場的整個面積加大

，則農務建築物所佔的比例面積將減少。中等農場的耕地佔二、三七畝，出產一畝小麥需要二十六天的人工，而美國僅需一、二天人工。每畝的捐稅要比美國的高出很多，利率也是奇高的。見L·H·布克著：『中國土地的運用』（南京，金陵大學一九三七年出版），第九，十，十一，十四，十六，十八頁。

（十四）白修德：『中國的戰後計劃』，紐約一九四四年十月份的『幸福』雜誌，第六三三頁。

（十五）對外貿易委員會和其他中國政府機關會企圖改進若干種商品的生產，分類和包裝標準。

（十六）見孔祥熙博士的演說詞，載於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八日的『紐約先鋒論壇報』上和羅遜著『中美合作與中國之經濟開發』，載於紐約一九四四年十月份的『國際經濟』雜誌上，第六三三頁。

（十七）季昌：『中國的戰後市場』第一一五——一六頁。關於最近美國對華金融協助的詳情見一九三一年以來美國對華援助』，載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五日國務院『公報』，第三五七——五九頁。

（十八）方顯庭：『中國戰後的工業化問題』，載紐約一九四二年三月廿三日的『當代中國』雜誌。

（十九）一個最近的報導指出中國政府正在採取步驟以便控制在美的存款。但是要想說這種步驟有多大的效率似尚嫌過早。見紐約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的『中國之聲』。（中國新聞社的復印本）

（二十）根據方顯庭：『中國戰後工業化問題』內所引用的數字計算出來的，華盛頓，國家設計協會，一九四二年六月出版的設計問題小冊子，第十二——十三期，第七十三頁。

（二十一）重慶和各省的一些軍事領袖間也有矛盾，但這種分歧比起重慶共產黨的關係來是次要的。如果中央政府和共產黨——中國的兩個主要政治勢力——能有所接洽而避免內戰，那就沒有什麼省的領袖有力量來從事軍事衝突。

（二十二）見一九四四年七月十日的『紐約時報』。

（二十三）關於這一問題的討論見『外人公司必須在中國登記』，載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的『國外商業週報』，第七頁。

（二十四）蔣介石著『中國之命運』（一九四三年重慶出版的中文本），第二四三——五二頁。

（二十五）『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與中國』，載一九四四年十月份的『中國經濟新報』（紐約，中美工商協會出版），第十二頁。

（二十六）雷末：『外人在華投資』，第一〇六頁。

（二十七）關於此二決議案的原文見一九四三年十月的『戰時中國』（紐約中國新聞社出版），第六八——七〇頁。

（二十八）一九四四年十月廿八日的『中國之聲』。

（二十九）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的『大美晚報』。

（三十）憲法草案的全文見羅幸格著『一九三七——四四年的中國戰時政治』，（一九四四年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印刷所出版）第七〇——八五頁。

（三十一）蔣廷黻著『中國經濟前途』，載一九四四年五月廿九日的『當代中國』。

（三十二）紐約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一日出版的『遠東觀察』。現在還要看中國的戰時生產局——一九四四年秋季成立的，對於增加自由中國的生產力是否有效。

（三十三）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六日的同一刊物，第六八六頁。

（三十四）演說詞的全文見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大美晚報，本文所引的僅是提要形式。

（三十五）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的『遠東觀察』。

（三十六）甲本文始終假定在工業化中的中國將是一個鉅頭的資本輸入國。但必須提及這種可能，就是中國可以主要地靠發展自己的財源來進行工業化——加以外人的技術協助——如俄國那樣。在這種得注意到中蘇間的兩個不同點：（一）中國比起一九一七年的俄國來，工業建設和工業智識的水準是低得多。（二）中國人民比起一九一七年俄國人民的生活水準也要低得多。由於這些事實，要想僅用少量外資而『自行工業化』差不多一定會進行得非常緩慢，因為要想像中國能在短期內便儲蓄起大量的資金來是很困難的。顯然地，如果別的路途是關閉的，中國是沒有什麼理由願意走這條路的。

（三十七）根據一九三八年的一『國外商業年鑑』第三〇三，三〇七頁編撰的。

（三十八）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的『遠東觀察』。

（三十九）關於銀行和平準基金二事，見『布里斯頓森林貨幣會議』，載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的『外交政策報告』。

（四十）J·H·麥克格魯著：『俄國是威脅？抑或希望？』載紐約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的『商業週刊』，第七十五頁。

（四十一）孫科著：『中國經濟前途』（紐約，約翰德蘭書公司一九四四年出版），第二三五頁。（章開沅）

抗戰期中大後方的租佃問題

葉民

現在大後方川、康、滇、黔、陝、甘、寧、青、新九省，據筆者研究所
有各種官方報告和私人材料結果，約共有農民七千五百萬人，就中佃農佔百
分之三十九，自耕農佔百分之三十四，半自耕農佔百分之二十二，佃農佔百
分之五，共有極簡陋的生產工具而沒有耕地，或者耕地不敷必須全部或一部
向人租地耕種以養家活口的農民，要佔到全體農民人口底百分之六十一，同
時就全體耕地來說，除開新墾地以外，其它八省共有三億個作物畝（一畝地一
年中有二次收成就算一個作物畝，一年中有兩次三次收成就算兩個三個
作物畝），其中也有百分之六十二，即一億八千五百萬個作物畝，都要支付
地租，這就是說在今日大後方，不論是農民生活，或者農田生產，都百分之
六以上全要租佃制度發生關係而受到其阻礙。

抗戰原是最好的除舊更新的機會，只要政府有適當的政策，切實推行，
很可以使租佃關係改善而致流毒其阻礙。因為全國人民在大敵當前，同舟共
濟的情形之下，什麼事情都容易商量，「新」在解放區當局，從抗戰一起，
就切實推行減租保佃辦法——一方面保證地主們收租的權利，並鼓勵他們
把投在土地方面的資本逐漸向工商業方面轉移，以發展工商業而減少農業上
的壓迫；一方面使佃農們可以減輕一部分田租的負擔，以發展農業生產改善
日常生活——使主佃雙方都能減輕佃佃關係底束縛，大家集力攻擊敵人，這是
已行而有效，人所共知的。

但在大後方增進租佃關係的法規公佈實施，但因只說不做，或
更在相反方面努力，因此使形成完全不問的現狀，所有大後方各地的租佃關
係，不但沒有改善，反有惡化現象，農民欠債的趨勢，不但沒有減輕，反而
更加增強。據農林部農產促進委員會調查，地主所佔農地的百分比，在四川
，從民二十六年的百分之六十九增加至民三十年的百分之七十；在西藏，從
民二十六年的百分之六十七增加至民三十年的百分之七十二（見該會抗戰以

來各省地權變動概況），在抗戰初期地主所佔農地的百分比，即已在不斷增
加。所有各省地土較肥沃交通較便利的區域都是他們有錢有勢的人競相購買
霸佔的目標。「當民二十八年時永登縣屬尙無不在地主，即皋蘭縣屬亦僅七
戶，故其勢力甚小，但自洮惠渠開鑿以來，至去年（民三十一年）為時僅三
年，竟竟流鑿於該地水利之興修，生產力之增加，於是……或高價收買
，或持勢佔有，土地集中在注指是。據調查所得，達家川一帶已有百分之四
十轉移於不在地主之手。其次為張家河灣，大溝兩子，夾灘堡子等地，雖距
蘭州市較遠，但亦有百分之二十落於不在地主之手，而此等不在地主多係官
宦、紳士、鉅商、大賈、大發財財者」（引自魏寶法：洮惠渠灌區之扶
植自耕農，「人與地」，第三卷第七八期，頁六二）。

從抗戰以來，因為政府財政經濟政策失當，一方面使少數人去發其國
難財而無處投效，另一方面，使許多實際從事生產的農民租負過重而不能維持
，於是有人賣地，有人買地，田地主權自更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寧夏中國農
民銀行陳德起君底「寧夏農貸業務之回顧與前瞻」文中即有這方面的記載，
「目前寧省二省農村社會，頗有商業游資流入，而農不助產之趨勢。……
蓋戰時游資農村負擔較重，女農已感不能維持，間有將地歸公之說，自持
苦於營生，入不敷出，兼之日用必需品價值或動太劇，而農產品之升漲相
太遠，故農村資金日感枯竭，而商賈之週利資金則流於農村，結果大農得
中農，中農得為小農，而增加商業性之地主，此種趨勢，在寧夏之靈武，省
垣附近，已呈顯著之象」。

民三十一年金陵大學曾在川西彭縣調查農村經濟，據報告所有該縣的農
地實質，百分之八十六都是在四、九畝以下的小塊土地，在該縣調查每大
出賣的田地面積平均只有四、八六市畝。賣出的人家原來有的租畝數完全都
在三十畝以下，而且百分之五十都在九畝以下。這說明大農佔地半自耕農，

小部分是自耕農。買田者百分之二十四都來自外鄉，百分之三十五是原有田一百五十畝以上者；百分之二十九是原有田四十至六十畝者（見嚴鏡滋：關於戰時土地問題的幾個舉例，『農林新報』六九七、六九八、六九九期），據上述農促會調查——四川大地主平均有田四百五十一市畝，中地主平均有一百四十八市畝，小地主平均有四十市畝，可見這買田者大部分都是大地主，只有小部分是中小地主。

民三十二年四川省銀行吳健生社在鄂縣調查報告，鄂縣佔戶口百分之六十的佃農全無田地，而佔戶口百分之七地地主却佔耕地之百分之七十。同年該行亦農君在廣安調查經濟，據報告該縣「一千零十戶大小地主即佔有耕地半數以上」（見四川經濟季刊一卷二期）。地政署鄂慶署署長也說：『鄂縣的全縣土地幾乎都被某一人買光，就是重慶附近的土地也有這樣類似的現象』。今後大後方農地，十分之六以上，而且都是比較肥沃的一部分，全在佔全人口不到百分之三的地主手裡。

他們過去以至現在，正盡可能地從一切方面加租。第一從增加正租和附租方面。據上述農促會調查，四川的田租正額，水田從民二十六的二·二·二市斗加至民三十的二·三·八市斗，平原旱地從民二十六的一·五·四市斗加至民三十的一·五·七市斗，山坡旱地從民二十六的一·〇·六市斗加至民三十的一·四·三市斗，平原旱地從民二十六的一·五·五市斗加至民三十的一·八·一市斗，山坡旱地從民二十六的一·二·三市斗加至民三十的一·三·七市斗。川東一帶在民三十一收租十石的，至民三十二便要收十一石，並另加包谷若干，麥租若干（見三十二年十月三十日國民公報）。合川廣安一帶也都從六成加到七成，地主租六十石谷的田給農民，就得要收租四十二石以上的谷，農民只能有十八石左右的谷底收入，而上年的包谷、大豆、下季的紅苕，第二年的麥子，都得與地主議分（見民三十四年一月九日及三月二十六日新華日報）。隆昌最近二三年來，地主藉口糧價增高，紛紛加租至七成八成。成都一帶則加至九成，甚至有全數歸地主而僅以田賸及附近山地出產給與佃農者（見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大公報）。在巴縣一帶，還有把租額增加到超過正產物總產量，叫做『乾加』的一種辦法，一戶只能產五十石谷子的田，租給佃農，竟以糧額五十石或六十石的租，迫得佃農必須買了谷子來贖納田租（見民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新華日報）。

第二是從加押減扣方面來增加租額，民三十年中國農民銀行調查四川省農村經濟，即曾發見這一事實，它在報告中說：『近二年間……押金每有巨額增加。據此次調查所得，抗戰以來，各地地主增加押租者最高達十倍，餘則增至四五倍不等』（見該報告第七號）。如此逐年增加，到民三十四年年初在重慶一帶已增至二百倍至四百倍。據該地每石田押金少則過一錠銀子（合法幣十四元）的，到民三十四年年初則已增加到三千元至五千元（見民三十四年二月二十日新華日報）。這所增加的押租就無息地讓地主使用去營利生息。在川西一帶則不但加押，而且還要『減扣』。以前該地佃戶繳納了押金之後原可照規定扣繳一部分租谷以爲所繳押金底利息，但從抗戰以來，尤其從田賦改徵實物以後，地主就一般地採取減少『扣租』的辦法。佃農押金戰前每一百四十元扣租谷四石，到三十二年便最高只能扣一老石。甚至取消扣租，在佃約上明白寫出『清扣』即不能扣租的字樣（見陳洪濤：三十二年四川之農業，『四川經濟季刊』一卷二期及仲慶：農民節談農情，民三十四年二月四日國民公報）。在一般無水草之處的山土，地主更改收實物押租，以提高押租租額。在川東一帶的佃戶，地主便從民三十二年起即改收實物，民三十一每石谷收押金五百元，民三十二年即改收押租谷四斗或五斗，（見民三十二年十月三十日國民公報）。

第三從改變田租的形式方面來增加租額。自從通貨膨脹物貴幣賤之後，各地田租便紛紛改收實物。據上述農促會調查，截至民三十年為止，四川的錢租即已有百分之四十六改爲實物定租，百分之二十改爲實物分租，西康的錢租也已有百分之五十改爲實物分租，貴州的錢租改爲實物租的有百分之四十八，雲南的錢租改爲實物租的有百分之三十三，甘肅有百分之二十六；陝西有百分之十九。截至民三十年為止，所有川、康、黔、陝四省，都已十分之七是實物田租；雲南收取實物田租的更有十分之八，甘肅也有十分之六。地主可以毫不受物價飛漲產成本增加的影響，而坐收糧價高漲的利益。而且各地地主都盡力使田租定額化，截至民三十年為止，所有川、康、黔、陝的田租都十之七八已是定額物租。不管年成如何不好，地主必須收取其定額的租籽。

以上種種都是地主加高田租租額的方法。他們所藉以要挾佃農的就是『退佃』，他們可以毫無理由地取消佃戶底佃權。據上述農促會調查，佃農們被地主退佃的百分比，從抗戰初期起即在年年增加。西康從民三十六的

百分之八增加至百分之三十；四川從民二十六的十二增加到民三十的百分之二十三；雲南從民二十六的百分之四增加到民三十的百分之十一；陝西從民二十六的百分之七增加到民三十的百分之十二；甘肅貴州增加較少，前者從民二十六的百分之四增加到民三十的百分之八；後者從民二十六的百分之六增加到民三十的百分之七。而民三十以後的各地退佃之風更比以前不知凶上幾倍，甚至有一年一退佃的，這是去年參政會開會時王雲五等四十八參政員在提案中所說的。

今日大後方的佃農極大多數都是最可憐的貧農。他們一旦被地主退佃，便食住都成問題，帶着女人、小孩、農具無處安置。只得逢人說情，送禮服役，一方懇求其他地主給田承租，一方懇求鄉保甲長給以緩役保證，佃農得保證後才能正式承租田地，還得籌借巨額的押租。如此所得的田地，其條件決不會比舊主人所提的好，甚至還要更壞。因此迫得佃農們只能咬牙吞淚地接受地主們加租加押以及變更租形式的條件。

可是地主們之所以敢如此苛待佃農的，第一是因為有地方政府作為後盾，所有鄉鎮保長都在他們手裡。鄉鎮保長可以在憲法範圍內農民；而農民則說什麼話的權利都沒有。政府規定農會是農民職業團體，而以鄉鎮會為農會基本組織，一鄉面積底半徑，小則十數里，大則數十里。這樣大的一個地域範圍，在今日大後方鄉間交通不便，郵政缺乏，而一般農民又多農事忙碌，經濟困難，他們即使想參加農會底活動，也無法參加。其結果所有農會組織全操縱在地主劣之手，而徒為他們添製了一具可以任意使用的工具。一無組織的佃農，自不能不屈服於保甲農會左右挾持之下的地主面前。

但是政府對於租佃問題却很早就注意到的，政府於民國十九年六月三十日即公佈了土地法，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五日公佈了土地法施行法，民國二十五年三月一日正式宣佈把土地法和土地法實施法施行。可是因為經濟「切實執行」，所以「實施」了「迄今已及十年，多未見諸實施」(見國民黨六全代會對於政治報告的議決案)。土地法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地租不得超過耕地面積收穫總額百分之三百七十五，約定地租超過百分之三百七十五者

應減為百分之三百七十五，不及百分之三百七十五者依其約定」。但現今大後方各省的租額上不算押租、附租、力租、以及一切其它的供應和需索，單就田租正額而論，四川平均佔耕地面積收穫總額百分之七以上；雲南、西康、貴州、陝南平均佔耕地面積收穫總額百分之六；關中、寧夏、平均佔十分之五；甘肅、青海平均佔十分之四。所有各地的租額，不但未見減少，而反年年之增加，同條土地法規定「出租人不得收取押租」。但現今大後方各地不但押租都普遍在收取，而且押租租額更在不斷增高。又同條土地法規定「出租人不得預收地租」，但現今大後方各地地主部一般地毫不給息地收取押租，以前原規定要扣租的，現在也「減租」或「清扣」。這所收押租免息部分，就是出租人所收取的預租。土地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百八十二條，第一百八十四條，對於佃農的保障都有相當嚴密的規定。但現今大後方各地地主部可在任何藉口之下取消佃農底佃耕權。這種任其退佃的，且在逐年普遍增加。

所以黃至王普等四十八位參政員也在請政府調劑土地行政實行土地政策以增加農村生產改善農民生活的提案中大聲疾呼地說：「本席來自民間，深知……土地兼併之風依然猛烈進行中，並未看見各級政府有禁止取締之事實！地租仍是自由訂定，亦未見有最高額之限制，耕作權之期限這是由地主任意決定，甚至有一年一換佃戶者！」「徒法不能以自行」，這是我們中國的古訓，吾們不要專為華美的「法」而喜歡，一個政策一條法規不管它立字上講得怎樣好，其終極價值還要看做得如何！「空頭支票」因為它根本就是「空頭」，所以是任何人所不願意接受的。

這次國民黨六全代會底政治報告決議案中對於土地法底實施也曾有下述地批判：「自二十三年公佈土地法及二十五年公佈施行法迄今已及十年，多未見諸實施。此次總報告亦略未提及此國家關於民生之大法，誠恐迅速切實執行，不容再事延緩」。一緩十年，誠不容再緩。(下被略)

敵寇統治地區農村破產實況

李侯森

被日寇以殘酷手段，統治着和統治過的地區，農村經濟究竟被破壞到何種程度，表現出那些特徵呢？農村的階級關係又起了怎樣的變化呢？

由於資料的缺乏，目前很難對這些問題作全面的系統的解答。但根據各方面比較零星的材料，可以看出，八年來敵寇統治下的農村經濟，表現出如下幾個特徵：勞動力大量減少，人民負擔奇重，耕地面積縮減，生產總量急降，以及因此農村階級發生了巨大變化。

本文擬從幾個方面試作一大概的敘述。所依據的材料，主要是中共北滿區黨委一九四二年秋所作的北滿區農村調查中遊擊區部份，和太行區黨委一九四二和四三年所作的太行游擊區的調查。前者包括二十一個縣四十二個村，後者包括十九個縣的抽查；其中不少是敵佔據區和老「愛國村」(這些地區現多已轉為我佔優勢)。此外則是散見於最近兩三年的解放日報和晉察冀日報中一些文章和新聞的摘引，以及部份敵偽官方公佈的數字(註)。

對勞動力的掠奪和破壞

敵寇對人力的掠奪和破壞，一方面是無止境地抓丁與屠殺，一方面嚴酷程度的不停的勞役。

勞役是敵佔區游擊區人民感覺最痛苦的一種負擔。其中以修路、挖溝、築壩等為主，隨軍「掃蕩」支差最苦，其他如蓋房子、燒木炭、站崗放哨、偽村公所雇工、替敵偽人做飯等等，任何小事，敵人莫不強迫徵收。

據太行調查，勞役最重地區，每一壯丁每月出伏二十五天，一般也在十天到半月左右。特別在敵人趕着築壩、挖溝、修路時，則一切人力均被榨取。青(島)西敵人修城時，八歲到六十歲的人力全部被徵，每人每天給米六兩，不許回家，不少人受不住飢餓與皮鞭，就輪倒被埋於城壕中！

下面是晉察冀六個村莊一九四二年對敵勞役的統計(全工數即所有勞動力全年的總工數)，其中小四邊、龐白土是老「愛國村」，西回會是游擊區。

村名	全戶人口	勞動力數	對敵勞役佔全工數之百分比	一月內平均對敵勞役數
龐白土	1,395	558	48.44	12.11
西回會	518	285	51.03	12.73
小四邊	1,237	881	42.86	10.83
游擊區	628	120	22.83	5.76
龐白土	893	149	12.84	3.22
西回會	1,183	465	50.32	22.58

這個統計並不完全的，有的村莊只計了出伏數，未計偽村公所「辦公廳」上的人數，這種「辦公廳」有的每天要四五十人才行。敵強迫去受罰的，亦未計入。從這個材料可大略看出，對敵勞役最重，一般和最輕的三種情況，這三種分別是由對敵鬥爭的強弱，以及據點的大小和周圍據點的多少而決定的。

最能表現敵人之有意識進行勞力破壞，即其常選擇農忙時派伏，而且「淨門伏」(全家人力均得出動)，迫使農民生產無法進行。

造成農村人力枯竭最嚴重的原因，還在敵寇之無止境地抓捕壯丁，據山東新華分社估計，到四二年六月止，五年中華北被敵掠奪之壯丁為數在六萬以上。偽「華北勞工協會」發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份華北輸出勞工總數一二一、一七四人，去年初敵佔在北平舉行之一年度的一「外出勞工檢閱會」，決定四四年度輸送數目為四三年之二倍。山東分社的估計未言及來歷。

，或過高一些；但由上述幾個數字看來，八年來敵寇從北熱綏的佔了，包括逼往滿洲、內蒙等地的，補充偽軍的，以及強迫在華北各礦山、工廠中勞役的，總數是極爲驚人的！

敵寇在廣大游擊區的嚴重屠殺政策，始於百團大戰之後，這是敵人「確保統治」的重要政策。這一筆血債難作估計，現舉幾個例子，以觀一斑。

太行調查：敵在壽陽前後共屠殺萬餘人；柳林背全村人口二二一人，一次被殺者七十一人；另外一個村八十戶人家，就有八十一個寡婦。屠殺最殘酷的是冀中平原，惜無統計數字。北嶽靈壽第一大鎮慈峪（去年七月敵被迫撤退），抗戰以來遭敵殺害者達二百人，佔全人口百分之七，這是很一般的情況了。

疾病死亡等間接的災害亦很大。據北嶽二十九個村莊，自抗戰開始到一九四五年十月不完全的統計，疾病死亡率爲百分之六、四九，即是說一千人中約病死六十五人。四二年至四三年敵新「圍剿」地區，災難空前，死亡率較以往任何時期都大。靈壽災情最嚴重的第三區三十二個村四三年八月的調查，已病死者佔未「食食」前總人口之七、四%，尙有多於此數的人在死亡的邊緣上。病死者之衆多，顯然是由於敵人的大破壞，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營養太劣所致。在敵人搶掠最嚴重的地區，老百姓沒有吃的，更發生餓死人的現象。

遇上災荒，情形就更爲嚴重。老百姓說：「沒有敵人，災荒來了還可以捱住，有了敵人，簡直捱不住」。冀南自一九四二年至四三年，接連大旱災，大水災（敵寇決堤造成）和大蝗災，據估計在敵佔區和游擊區，死亡竟達百分之四十六，加以逃亡，人口減少幾達百分之七十五！

關於敵寇對畜力的掠奪和破壞，抗戰初期敵「滿鐵」在河北境內平漢沿線的調查，自稱：「牲畜徵發甚多，馬騾既全歸軍用，牛豬亦全充軍糧」。在敵縣「馬減少七七%，騾減少四〇%，牛減一七%，其他牲畜減少八〇%」。由於此種情況之繼續，農村畜力根本無法恢復。據北嶽區四十二個村莊的統計，騾馬減少到戰前的五七%，而騾馬正是這些地區主要的耕畜。又如和（順）西四個村一九四二年與戰前相較，牲畜共減少四一%。牲畜減少原因，支不起差費是主要的，其次爲敵人的搶掠。搶掠的嚴重情形可舉一個相反的事實來說明：一九四二年曲陽游擊區，會發動一次等車鬥爭，總計經過各種辦法奪回的大車，達一萬二千餘輛（牲口在三四萬頭以上）。

牲畜不僅數量減少，而且質量大爲降低，一般都是不願養好牲口，大搞小，好換項。

至於敵寇對房屋、林木、農具等之破壞焚毀，這裡就不多談了。

無止境的敲詐勒索

人力畜力的減少，對於生產是一個直接的破壞；無止境的勒索負擔也起同樣的作用。

人民對敵物資負擔的苛重與複雜，是使人很難想像的。負擔對象大體有敵、偽、政（地方偽政權）、村（本村一切開支）、教（帶有特務性的教門）等等。總之任何階級人員都可以用任何濫賬的名義，向老百姓敲詐勒索。敵偽苛捐雜稅百餘種之多。負擔項目大致歸納，可分以下幾種：賦款，包種田賦派款等；村公費，偽幹部薪金及村公所費用；村雜支，修築物役用費，據點糧秣軍需，區公所的不定期徵收糧款等。但負擔比例以勒索爲最重，一般佔全負擔一半左右。勒索方式因地區而異。在敵佔優勢地區，主要通過轉務人員，勒索以小費爲主，如偽軍僱人員來往浪費，隨意勒索送禮等，是比較零星與經常的。在我能控制之游擊區，多由敵人直接出動，以敲詐爲主，如加以過八路名義，隨意捉人等，比較不是很經常的。

在游擊區，由於我們力量發展的不平衡，人民對敵負擔也極不平衡。根據太行的調查，一般有以下幾種不同情況：

（一）敵佔優勢地區人民對敵負擔重，我們能掌握地區對敵負擔輕（敵區人民對敵負擔，超過對我負擔三四倍，七八倍，乃至十倍，數十倍不等）。敵佔優勢地區之交通要道與非交通要道，幾個據點統治之交叉點與非交叉點（交叉點同時向幾個據點或交通要道），輕重亦有很大懸殊。但這些懸殊，在敵人壓榨日益加重的情況下，已逐漸走向平衡。

（二）敵新「躍進」「食食」之地區對敵負擔重，敵鞏固佔領地區對敵負擔較輕。如臨城兩個不同村莊負擔指數比較（以一九四〇年爲一〇〇），新食區，四一年爲七〇〇，四二年爲七五〇（由此又可看出對敵負擔指數之速率）。新食區新修封鎖溝溝等，需要大批人力物資，同時敵人又有意識地加重這些地區的負擔。如在臨城，敵曾迫索五年田賦。在武鄉提出「肅安區」負擔十分之一，「準治安區」負擔十之九的口號。但年來由於我游擊

區之擴大，敵人已大大加重其「治安區」的負擔，甚至向漢奸身上轉嫁，這

種嚴重差別就日漸減少了。
(三)主村的負擔重，敵村的負擔重。前者掌握派款派快的大權，更多的

的照顧本村利益，欺壓外村，這是游擊區比較一般的現象。經過我們工作的開展，這種情況也在變動過程中。
但不論何種地區，不論何種情況，人民對敵負擔在逐年增加着，特別在一九四二年以後，敵人已完全走向赤裸裸的搶掠，勒索行為無時無地或止。同時對敵負擔的加重，基本上取決於對敵鬥爭開展與勝利之程度，要瞭解敵剝削壓榨之嚴重，還必須對比人民的負擔與收入情況。現將北嶽區幾個對敵負擔較重的游擊區村莊，一九四一年和四二年(這兩年是這些地區敵嚴厲的頂點)對敵負擔和全村收入，比較如下(總收入為一〇〇%)：

村名	對敵負擔佔總收入之百分比
白土	一九四一 一九四二
白 沙(完縣)	一四九、九三 二五七、四二
東于家莊(完縣)	一九一、五〇 五二、八三
東五里崗(廣靈)	一六六、〇二 一一六、〇二
澧子東嶺(應縣)	六五、六二 八八、七九
白驢北極(平定)	一〇三、三九 一〇三、三九
迦城寺(平定)	七八、五一 一〇七、五三

這組統計中的四二年對敵負擔計算到十月為止。十月以後，由於敵瘋狂掠奪，負擔更重。事實上四二年大大超過四一年的負擔。白土、白沙、東于家莊等村，對敵負擔都超過了國民政府總收入，這些村莊當然破產了。

又如晉西北忻縣的關莊村，一九四三年平均每個老百姓對敵負擔數目，佔其總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一些地主的負擔，竟超過其收入的百分之七十。

敵入負擔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會照顧地主富農利益，但在其苛索日急，無不掙食的情況下，這種有限度的階級差別就必然逐漸模糊，以至根本不顧，刀鋒自然轉向富有者，向地主富農身上轉嫁負擔。所以實際上，敵寇統治的地區，不論貧富，都同樣負擔奇重。

爲了更清楚地了解敵人統治下各階層人民破產的實情，我們再找出北嶽區

白土、小西源、文德(曲陽)、廣莊、東孫家嶺(靈縣)、西回舍(平山)、柏家莊(應縣)六個村莊，貧農十戶，中農十戶，小地主十戶，富農六戶，

階級	每人平均收入	每人平均對敵負擔	對敵負擔佔收入之百分比
貧農	1.727	1.384	0.520
中農	4.117	2.188	2.649
小地主	7.556	8.420	10.896
富農	4.950	3.531	4.646

說明：富農一九四一年對敵負擔特別重，是因有幾戶被綁勒索甚重所致。

這些數字告訴我們：貧農一年所入不及二石！中農以上階層，所入是不敷出的。據其他材料證實，近年來地主對敵負擔一般均超過其總收入之半，而等於或超過其總收入者，並非個別例子。山東肥城區一個有廿多戶地主的「受難村」，一九四二年因敵勒索過重，內中有十多戶無法過活而全家下關東。

耕地縮小生產劇減

勞動力大量減少了，勞動強度大大減弱了(女的種田增多，有的地偶濟至雇用女長工)。生產工具整批被破壞了。撿取的日盆嚴重，單純的再生產農民也無力維持了。加以敵對土地之直接摧毀掠奪。諸此原因，就必然引起耕地面積的縮小，和土地質量與產量的急劇下降。

敵寇在華北強佔糧穀的土地，據孫德勝同志一九四二年底的估計，僅「將敵寇已修成的鐵路，公路，鐵路和公路兩旁的邊路溝，鐵路公路與鐵路兩之間佔地面積，以及封鎖線」，「這六項合計，佔地至少在八萬五千八百方里以上」(見「暴行與慘狀」一文)。

如加上一萬多個礦點，礦山，以及飛機場等所佔田地，華北民田被敵摧毀者將近一千萬畝！

但整個耕地面積之減少還不止此數。據敵昭和十八年版之「北支年鑑」及「滿鐵北支年鑑」公佈的數目，河北，山西，山東及蘇北一部：小麥、小米等十一種作物的耕種面積，一九四一年較半年(指戰前)減少百分之十六

，共三百五十萬公頃，大約五千二百餘萬畝，因敵偽實力所及地區有限，由此數字更可窺見耕地被摧殘之嚴重。

土地荒蕪在敵佔區游擊區，已成比較普遍的現象。據和西北四個對敵負擔較輕的村莊的統計，荒地佔全村耕地面積二五%。臨城三個老「愛護村」，荒地面積佔全部耕地的一半。半敵耕地被荒蕪，在冀南更是普遍現象。

土地質量的變壞，最基本的因素是勞力缺乏，與敵之擾亂破壞。如挖溝後水漲溝斷，耕種不能按時，秋天地翻不過來，不能大量積糞造肥等。於是大水地變旱地，兩季變為一季，上等地變中等，中等變下等，下等地則大部荒蕪。臨白土與小西澤兩村各等土地的產量，一九四二年時下降到這樣的程度（以一九三七年為基期）：

水地：上等和中等百分之六十，下等百分之五十。
旱地：上等百分之二十八，中等百分之四十，下等全部荒蕪。
又據太谷，平順一帶調查，一九四二年水地每畝產量比四零年降低六〇%，比戰前降低八〇%；旱地降低則為三〇%與六〇%。

關於農業經濟情形，敵偽自己公佈的數字仍可作為參考。一九三九年敵寇在華北製造大水災之後，自稱是年華北各省均歉收百分之四十五左右。以後兩年略有增加。但到四二年，由於敵之破壞劫掠空前加重，據前述統計。情況顯然比三九年更壞。華中方面，據敵偽遺棄軍事特務部一九四一年向稻米收穫調查（四二年敵偽調查會發表此項材料），如長江中游一帶沿線和鎮江附近等地，產量為平年百分之四十，常熟、江陰、杭州附近僅百分之二十。如此項材料可靠，稻米可作一般農產代表的話，則華中敵佔區農產情形或較華北尤為惡劣。

至於甘肅敵寇企圖增產的棉花（太平洋戰後重點轉為「增產食糧」），據「北支年報」所載，華北各省棉田面積，九四零年時（以後皆為官方未再發表統計），僅及戰前的二二%，收穫額則為二零%。華中江浙兩省（據敵「棉業年報」等刊），一九四二年之棉產僅及戰前四七%。由此可見，一般農作物耕地的減少，並未補充於棉花的種植。為敵人所抑制的農畜生產的代表——蠶絲的減產，更屬驚人，據敵「蠶絲日報」稱：一九四二年江浙兩省蠶絲產量僅及戰前五、七%，長江三角洲一帶敵佔區桑園，至少有百分之三十改為良田。

最近兩年，敵偽高唱「增產運動」，將此為「決定勝敗存亡」的關鍵。

但敵寇與日俱增的掠奪政策，自然使所謂「增產運動」，以「空前的破壞」（偽申報今年元旦評論）而宣告破產。偽「新中國報」說得老實：「在現狀之下官生產，似已無從設想。工業生產則斷不再，農業生產則治安不靖（指捐稅稅實治安問題之一）。如此現狀，如何能言生產！」（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社論）

由這些敵偽報紙的自供，不難看出敵寇統治後勢地區農業減產情形。最近兩年比一九四二年只有更惡劣。（轉為我佔優勢的游擊區，由於去年大舉產運動的發展，當有相當程度的恢復）。

土地大變減少，產量又大大降低，人民的農業收入當然銳減。臨白土村一九四一年產量較戰前的四四%，七%，四二年更降至三零、六%。小西澤四一年為三三、三%，四二年為三五、八%。農村副業和工商業的收入情形更壞。敵偽大吃大喝，農民再也不敢多喂養家畜了；苛捐雜稅，更給制鹽制糖結晶，工商業造成不地。小西澤，養馬等六個村的調查，副業收入戰前降至戰前的二六%，四二年為二五%。工商業收入（小西澤，白沙等六個村），四一年為戰前的二九%，四二年降至八%。

收入減少了，而且最大部份還為敵人所掠奪，這自然引起人民生活極端惡化。從下面幾個農家的調查中（磁縣是一九四一年，和四是四二年）可看出人民一般收入與支出之降低情形（以一九三九年各級指數為一零零）：

地區	成份	收入指數	生活指數	糧食支出指數	負擔指數	再生產指數
磁縣	貧農	二六·〇	二八·三	一零零	一三二	八零
磁縣	中農	五七·八	三零·零	八零·零	一四二	不詳
和四	中農	七一·四	六九·二	六六·六	一二五	二二

這些地際生產力的破壞還不至於嚴重。

人民生活水準之低，決非親臨者所能預料。臨城村料，一九四二年對糧三年，不少新老「愛護村」富裕中農以上的吃糧戶，在八零%以上。向陽鄉養馬村，位於平原，素稱「麥車」，一九四三年吃糧的很普遍，不少人搬往山地菜園區逃荒（過去只有山地往平原逃荒）。

各階層全體下降

所有上面敘述的材料，極鮮明地說明了一個問題，就是敵寇統治下的農村經濟已經完全破產，這極歷史的浩劫，農村中各階層階層無一倖免。階級關係變化的總趨勢是全體下降，但在各種不同條件與不同情況下，程度上又有差異。

屬北嶽區四十二個村莊的調查，由於敵我力量之消長變化，表現出三種地區的三種趨勢：

(一) 游擊區。這些地區多處於平原和山嶽地帶及大河流域，過去經濟生活還較山地富裕。其中除少數敵佔據點外，絕大部份是一九四一年敵大「掃蕩」後，才完全變成游擊區的。對敵負擔重，但我之政策一般能執行。到一九四二年止，經濟發展的特點是（時間由一九三七年到四一年，再到四二年，以下仿此）：

地主經濟很大下降：戶數在總戶數中的比重，由一·六九%到一·五八%；再到一·五〇%；土地佔有上，由二〇·四七%——八·四一%——七·六一〇%。

富農的下降如地主一樣顯著：戶數比重由七·九五%——六·九七%——一六·八一%；土地佔有由二六·九五%——二二·〇二%——二二·二五%。

中農由上升到停滯（一九四一年是轉捩點），如戶數由三六·一四%——四一·〇一%——四一·九三%。貧農則四一年後有增加，由四一·六五%——四一·九三%。

工商業大不如前。如曲陽文德村戰前年產土布十萬疋，四二年只一萬疋。完縣五里崗的手工業是典型的例子（由一九三七到四二年）；紡織由四五戶減到二三戶，綢緞由三九戶到一三戶，磨坊由三戶到一戶，小商業由一七戶到一三戶。

(二) 老「愛護村」。這種地區，敵寇勢力很早就佔着優勢，屠殺破壞比較厲害，抗日工作開關較晚，基礎很薄弱，和我們的政策一般能執行的游擊區不同。根據定唐的小西漲、龐白土、壽陽的解愁，櫻橋溝，廣靈的大梁

口五個典型老「愛護村」的調查，經濟發展的特點是：各階層全體下降，為破產。

地主大多數陷於破產：戶數比重由一·八三%——二·〇九%——一·〇五%；土地佔有由八·三五%——六·三六%——六·二八%。此外，地主的存糧和衣服財物之被敵掠奪搶劫，為數特鉅。

富農急劇下降：戶數比重由四·九九%——三·四四%——三·五二%。土地由一七·四一%——一〇·九八%——一·二三%；勞動力佔有，人力由六·一一%——三·八〇%——一·〇六%；僱傭人力由八五·二八%——七五·一四%——六五·七二%。

中農在戶口中的百分比，由三二·二八%——三二·一五%——三三·四〇%。數字上雖略有增加，但這是由於地主和富農下降的結果，並非由農上升。貧農則急劇增加：在戶口中的百分比，由四三·六〇%——四七·八五%——四九·八九%。貧農的增加，是農村破產最顯著的標誌。

手工業大不如戰前，或完全破產，工商業更是蕭條不堪。

這種地區，證明和四某村材料，也大致相仿。如地主由六戶減為三戶；富農由四戶減為二戶；中農大部離村，有八戶竟已死絕！

(三) 「無人區」（五台之南溝、腰腰、神廟、平山之田興，共四個典型村調查）。這是一九四一年秋敵「大掃蕩」時，以最殘酷的三光政策所摧成的。在這之前是鞏固區，四二年秋後又已開始恢復。但經此浩劫，農村面貌已迥非昔比。

地主經濟急劇下降，又趨回漲：戶數中之比重由二·八七%——二·四四%——三·〇三%；土地由二一·九九%——一六·五二%——一三·五八%。

富農經濟飛速下降，戶數由九·六八%——五·〇八%——三·一七%；土地由二八·八五%——一六·六一%——一〇·五二%。

中貧農情形是急起直落：中農戶數由三三·一三%——三九·七六%——二九·八三%；土地由三三·〇一%——四四·七九%——三三·九一%。貧農則反是，戶數由三四·〇四%——三〇·四九%——三八·一五%；土地由一五·四六%——一六·八一%——三一·三一%。

另外還有一種為敵摧殘少的敵人殖民地秩序較為鞏固的地區，如遼（陽）

與某鎮，一九四二年調查，地主與富農在經營上沒有什麼變化與變動（生活水平則下降），中農下降一四%，富農穩定約一〇%，佃戶遷走五〇%，只有幾戶參加佃政的富裕中農上升為富農。但由於最近兩年敵對其「儲保區」負擔加重，這種地區各階層變化趨勢，必向前述「愛護村」看齊。

關於農村各階層變化的具體情形，在游擊區，敵對人壓迫勒索很嚴重，因我們的政策一般能執行，基本政策是佔優勢的，所以變化規律基本上是兩頭向中間擠，而不是全體下降。如北縣四十二個村莊，自一九三七至四一年這一階段，佃農上升為富農者三〇%，上升為中農的二·七二%。貧農八七·七八%保持原來地位，一〇%上升為中農，很少一部分下降為佃農（但一九四二年敵統治優勢時，上升中農又復為困難）。中農變動不大，有五·四一%降為貧農或佃農，上升者極少。地主、富農的下降，亦多降為貧到中農為止（前者八·三三%，後者二二·四四%）。但在老「愛護村」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上述五個老「愛護村」的統計，從一九三七年到四一年這個階段，儘管有上升為富農的。貧農上升為中農的只有一·〇四%。中農下降為貧農者則佔七·三七%。地主變為富農者佔四%，降為中農和貧農者各佔一二%。富農變中農者二二·七三%，降為貧農者佔九·〇九%。由此看出：在老「愛護村」經濟上升者，到貧農為止，下降者又大都降為貧農。所以階級關係變化的規律是兩頭向貧農看齊。是中農停滯（九一·二三%的中農保持原來地位），而不是富農停滯（前述游擊區八一·七六%富農保持原來地位），是全體下降，而不是地主富農下降。

但必須說明的，就是有些階層，形式上能保持原來地位，實際生活則顯於破產，如太行九個縣二十二個主要地位的調查，現能維持原狀的地主僅二人，甚至依附敵人的地主亦不勝枚舉。又如樓溝的地主富農大多不能維持生活，大部份中農要下地當佃農。關白土地主富農破產，部份土地流入貧農中農手中，但對敵負擔太重，中農貧農生活並未改善。特別是封建勢力依然把持較廣的地區，負擔不合理，中農貧農之破產，就愈為嚴重。也有個別地區的地主破產，這多是城市中的漢奸，特務和投機商人。

總括起來說，在敵統治游擊和統戰過的地區，雖有情況和條件的不同，但各階層的經濟發展有一種的趨向——都在下降，已經破產或瀕於破產。地主的收入比較戰前減少比例，比那一階層都大（利息、租票、商業等收入

或微不足道說完全沒有了），下降最顯著。富農在土地經營上所受的打擊比較厲害，下降程度也不亞於地主。中農生產力經不起破壞，破壞之後不容易恢復，是經常受敵人打擊蹂躪的對象，特別是人力負擔最重。貧農經濟上所受摧殘與中農同，他們受了打擊，恢復生產也最不容易，因此離鄉外出者數他們多。健康實際工資極低（太行調查低四倍），生活最苦，無法贖家，由於農村儲備者減少，有不少改為短工，生活比較漂浮無定。

租佃關係與土地佔有的變化

吳民族的暴力摧殘破壞了農村經濟生活，使農村的階級結構起了變化，因此抗戰前農村中佔統治地位的封建與半封建的地主經濟勢力，就逐漸受到削弱。這主要表现在對租佃關係的變化上。

從租佃關係來看，據太行、北縣調查，有以下三種不同情況：

第一種是受破壞不嚴重，負擔不過重，生產力還可維持的條件下（這種地區是極少的），舊的租佃關係沒有什麼改變，封建剝削沒有減輕。在這種普遍降低影響下，租額雖然沒有增加，租率却增加了。例如武（鄉）西兩縣村十一個佃戶的平均租率統計：一九四一年為五八%，四二年為六三%。

第二種情況是負擔較重地區（這是最普遍的），生產力急劇下降。還租的租額和率均隨着減低。佃戶要求退租，地主不得不在租額上有所讓步，因壓榨重，不少地主允許「認種地」（種地者代地主拿對敵負擔，不出當價），甚至「倒貼錢」租出土地，或「白為地」。據縣一地主租出土地七十畝，拿出三百元錢分給佃戶，並訂立租約，約定五年之內不收租。這種情況在平漢沿線已經不是局部現象，而且在普遍地向發展着。

第三種情況是在敵人的暴力屠殺破壞之後，舊的租佃關係完全破產了，隨着社會秩序與我們工作的恢復，租佃關係有了新的變化。依據昔陽某村調查：一〇二佃租佃約中，新建立者佔七八%，舊約未變者僅二二%，出租土地與租入土地者之成份有了新的變化：二八戶出租戶中，富農三戶，中農一五戶，貧農一〇戶；三七家佃戶中，富農八戶，中農一五戶，貧農一四戶。貧中農租入土地的主要原因，是生產力大破壞後一時不能恢復所致。（這也附帶說明了這種租佃關係的複雜性）。

從高利貸的剝削關係來看也表現出一

些新的特點

放債人起了變化。戰前債主大部份是三位一體的地主商業高利貸者，戰後敵佔區商業倒閉，金融停滯，嚴重影響到地主的收入，因此他們無力放新債，舊債亦大部停付利息。新產生的一批債主，是投機商人、漢奸、毒販和個別附敵地主，放債總數與戰前相差甚遠，且只限於敵佔區域之內，未能普遍發展（但高利貸剝削則較戰前更殘酷）。一般游擊區的借貸關係已陷於停頓。

在土地佔有的變化上，其變動規律與戰前不同（與東北亦不同），農村破產結果，土地並未走向集中。

抗戰以來，敵佔區、游擊區拋出土地最多的，不是中農以下的階層，而是地主與富農。據北滿區白土、白沙、西回舍等三十一個游擊區村莊的調查（到一九四二年止），五年中賣出土地四七九六畝中，地主約佔三〇%，富農佔二八·二%（中農約佔二五%）。買入土地四三二三畝中，中農佔五一·七%，貧農佔二八·二%。賣出土地五二九七畝中，地主佔二六%，富農佔三四·八%（中農約佔二六%）。買入土地四五六一畝中，中農佔五四·一%，貧農佔三八·二%。抽回地一六五一畝中，貧農佔六一%，中農佔二九%。

土地價格跌落甚大，據長春、榆次、臨城、武安四縣的調查，一般比戰前跌一倍至六倍不等。特別自一九四二年我發動政治攻勢後，土地幾無買賣。負擔過重地區，土地則完全停止了買賣。有的地主寧願倒貼錢典出土地，過去典入押入土地的，都無代價要求原主贖回。敵佔一地主七百元債權押下的地，後來倒貼三百元將地退回。各階層都怕要地，因有了地要出負擔。所以上地糾紛不是爭地權問題，而是推出地權問題。

地主富農出賣當地及地價漲落，是與對敵負擔程度直接相關的。敵佔對敵鬥爭勝利地區，極少出賣地現象。形勢好轉後的游擊區，往往一畝地由白送入而漲到數千元。

雖然敵人利用封建勢力，也有一部份封建勢力依附敵人，但在敵之實際的壓榨勒索過程中，敵佔區和游擊區的封建剝削關係仍然逐漸被破壞消滅。

結束語

本文只就敵統治着和統治過的地區，農村經濟和階級關係的變化，講述了一個事實的概要。城市的情形和敵寇政治上的壓迫等都沒有談到。特別是最近兩年的材料較少。然而僅是這些事實，也可以看到：

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是與全中國的人民為敵的，它的統治基礎建築在剝削與屠殺上。今天因為它的武力優勢還存在，所以它還能在敵佔區和部份游擊區立足。敵寇的「確保統治」與加重壓迫是一對雙生子，這就使得它與中國各階層人民——從地主、資本家到工人、農民之間的矛盾，越益發展起來，這就使得民族矛盾越益深刻化。

敵人破壞了各階層人民的經濟生活，驅使他們走向貧窮，受盡苦難與犧牲；然而這又正為他們的日趨團結一致，擊決戰鬥，準備了客觀條件。

戰爭改變着一切。八年來的抗日游擊戰爭，在廣大的敵後劃出兩個世界：一個是光明，建設與繁榮，一個是黑暗，破壞與衰落；一個是（被敵）民主主義社會，一個是日本法西斯強盜統治的殖民地社會。八年來這兩個世界力兩個方向，一天比一天地激烈地進行生與死的戰鬥。廣大的敵後人民在這兩個鬥爭中受到考驗，受到教育，他們由親身的經驗看到那一個一定會勝利，那一個一定會滅亡。

（註）敵偽公佈數字，大多間接引自「經濟建設季刊」三卷一期「淪陷區農業生產之變化與戰後復原救濟問題」一文。

密洞「陣地戰」(解放區報告)

華山

武鄉是太行區豐饒的產糧區，鬼子常常出來搶掠牲口，真個是「三天一小掃蕩，半月一大掃蕩」。剛得老百姓沒法安生。一九四二年秋天，鬼子又調來三四千兵力，一股龐兒在武鄉「駐紮」了半個多月，大小村莊全安上「釘子」，這一百多裡八十的，鬼子兵沒日沒夜的圍圍轉着，這陣地戰那陣地戰來了，活像走馬燈一樣。

鄰近的老百姓都擔心着說：「這武鄉家可活不成啦！」因為他們知道：半年前鬼子在武鄉的陣地戰「陣地戰」，一傢伙就殺死一千多人，搶糧食兩千石，而用動向鬼子還沒有這次多呢！但是事情却完全兩樣。有很多村子，雖然給鬼子佔上半年多，可是連一粒米也沒丟掉，人更用不着說了。事後武鄉家都得意洋洋的說：「挑殘（摧殘）越兇，咱仇氣越大，辦法也越多！」而「密洞陣地戰」這個新的繁榮創造，正是武鄉人民戰勝敵人「駐紮清剿」的鬥爭辦法。

(一)「野戰不頂事」

前些年，鬼子「掃蕩」時，老百姓就遇到「野戰」去躲。武鄉這地方，到處都是些黃土層的斷崖。乾梁上看時也還開闢平展，可是河溝底却東倒西折，到處都是「迷溝子」。從前老百姓躲避官軍和強盜的「野戰」，大半是挖在「迷溝子」裡。武鄉會發生過一件有趣的事情：一個糧的敵人在吃藥上，發現河溝底下有藥中，兩個鬼子地下

去找了半天，沒找着。回到吃藥上一看，牛還在老地方。鬼子第二次下去拉牛，沒有找到。再回到山上，那隻牛還是一動沒動，於是六個鬼子分成三路，分頭下去尋找，由山上的鬼子嗚呼着方向，這麼的東找西找，一直鬧到太陽落山，還是沒辦法走到牛跟前，只好垂頭喪氣的走了。

類似這河溝的怪地形是很多的，所以老百姓一向認為「野戰」保險：鬼子找不到。只消把一家子老幼搬到「迷溝子」去受罪兩三天，經過鬼子的眼睛就沒事了。

村子裡找不到人，敵人全變成些亮眼的瞎子。沒有老百姓引路，別說敵人的暗探地察法找，就是出門去走路，也常常念到「迷溝子」裡，半天轉不出來，於是，從一九四〇年起，「掃蕩」的敵人到處玩起血風把戲，想把老百姓騙回村子，把大隊兵力分成很多小股，專門到山溝裡搜索民衆，連到十個殺十個，連到三五十就殺三五十，連連搜捕着的小娃兒也不放過。來不及離開村子的，反而平安無事。鬼子還故意拍着他們的肩膀說：「村裡的都是良民，良心大大的好，山溝裡的都是「共匪」，良心大大的壞！壞人撕拉撕拉的，好人皇軍保護的！」

自然，搜山是最危險不過的事情。民兵的冷槍保不住會從那裡打來，鬼子騎馬了還不知道是怎樣死的。所以暗藏在各村村特務漢奸，到處搜捕老百姓，不讓民兵打槍，「可不放打，旁人自己家就是

八路死對頭，一打槍就把日本引過來啦！」而敵人呢，也裝着只打八路的樣子，那裡有民兵打槍，就拼命往那裡搜索，那怕三兩百人在一條溝裡搜上三天兩天。

「野戰」的確不好我。但是它有一個大毛病：斷路絕路跑不了。殘暴的敵人，就在成村的民衆在裡面，活活用火燒死。又到處揚言：「這是因爲民兵打槍的原故」。

這時候，很多老百姓也開槍掃蕩，跟着特務漢奸們大罵民兵：「都是你們這些引火柴，把鬼子引到咱頭上來啦！」老漢聚着不聽丈夫打游擊，父親把兒子的步槍埋到野地裡。弄得年輕小夥子們，一個個垂頭喪氣，悶着不幹了。他們說：「打個鳥，咱要命保家鄉，連爺娘婆姨都反對，還有啥臉！」

沒有民兵積極活動，特務漢奸就成風起來，自然糾合「二土匪」偷東西，給「掃蕩」的敵人引路。百幾十年來沒有給州官和盜匪發現的「野戰」和糧食，現在却給鬼子挖開了，甚至光緒年間打下的秘密「套套」，也給掏得精光。老百姓愁眉苦臉說：「野戰不頂事啦！離開家門，不給打死也嚇死。橫直一個死，還是死在家裡好！」

鬼子的陰謀成功了，老百姓不願離開村子，糧食堆在家中，於是，一九四二年二月間，武鄉縣裏了空前的血洗，——鬼子在那裡殺害了一千多個無辜的民衆！

(二)「不打活不成」

但是即使在最痛心的二月「掃蕩」中，也不是每個村子都上了鬼子的當。×××村的老百姓沒有聽信特務漢奸的謠言，他們跟游民兵指揮部躲到山溝裡。鬼子往溝裡搜索了三次，每一次都碰上民兵的冷槍。——特務不難騙，鬼子難在後腦門上點着，特務回過頭去追吧，民兵却撒開兩腿溜掉了。你追得慢，他跑得快，你追得緊，他跑得更快。你待要丟下不追，民兵却索性坐坐不動了。掃蕩的鬼子們眼睜睜出火來，一股勁撲上山頭去。

比這翻騰還，民兵才不怕呢！他們故意把敵人引到自己這邊來，離開老百姓遠遠的，這事情告訴武鄉民衆一個真理：「敵人總是敵人；不打活不成！」

但是，怎樣打法呢？

民兵丟不下家產，是沒法打仗的。但如果是百姓不願離開村子，生命財產還能有什麼保障？沒有民兵打游擊，老百姓與加不會把糧食搬到野地去了。而糧食正是老百姓的命根；如果一家的食用全部放在村裡，誰又能放心躲到山溝裡去？——於是，中心問題給我出來了，當地的共產黨在總結這次經驗教訓的時候說道：「轉移家產，武裝民兵，埋藏糧食資財，是展開敵地游擊戰爭的三個基本環節，而轉移家產則是中心的一環。」

一九四二年秋天在武鄉所出現的「保險密」正是當地的黨和羣衆所共同創造的安全轉移家產的地方。

(三)「保險密」

新挖的密洞，是按照下面三個條件設計的：第一，「找不到」(像秘密野營那樣不易找)；第二，「進不去」(真一給發現以後，也可以和敵人鬥爭，守住密口)；第三，「悶不死」(有氣孔，有兩個以上的出口，不怕敵人堵死密洞)。老百姓把他們叫做「保險密」或者「悶眼密」。

我會經參觀過一個「保險密」。洞口就在路邊，以前在那裡來回走了幾趟，什麼也沒有看到，直到我爬上一道不很高的土坎，才發現不遠處有一個小密洞，洞口是那樣小，只能和蛇一樣往裡爬。幾乎有三丈深的一段路，我一直把腿伸到洞底來，略略一抬頭馬上就碰着土壁，牆面黑的什麼也看不見，只感到已鑽過兩個深坑。引路的老百姓說：第一個坑可以堆滿荆棘，把路堵住。第二個坑可以用石板裝成陷阱，誰個踩到石板上，立刻會跌到坑裡，同時另外一塊石板，也從上面朝他腦袋打下來。再往裡走，洞壁兩個開着兩孔小窗，負責保護密洞的人，就拿着火柱，菜刀，斧頭等埋伏在那裡。等敵人的頭剛剛爬到眼前的時候，突然把他打死——老百姓把這三道障礙，叫做「三關」。

過了「三關」還有「三關」。我又得像蛇一樣爬着。有時腦袋簡直往下垂着，不一會又感到腦袋往上直仰。這樣來回折了三趟，身子突然自由起來，也開始看見亮光。我到了另一個天地。一條狹長的通道，比頭還高出些許。通道兩側，排列着整齊的密洞，有糧食密，有廁所密，自然也有人住的大密。光線從通到外面斷崖上的氣孔，射到人住的密洞裡。

過道的盡頭，有一道樓梯一樣的長土階，可以通到另一層同樣的密洞。原來這叫做「樓上樓」，「天外天」，一層又一層的，他們簡直是把整個村子，搬到地下去了，三幾百個人也可以完全容得下。

我從另一端爬過「三關」，再爬過「三關」，整整爬了二十分鐘，才重新看到刺眼的陽光。不過自己却已經到了另一條山溝。如果繼續爬剛才的洞口，最少還得走上四五里的河溝和山路，當然，並不是每個「保險密」都是這樣打法，但是無論如何，武鄉的民衆，從老頭子到小娃娃以致小脚的老太婆和青年媳婦，他們雖然不能像民兵一樣翻吃滾打游擊，現在却找到一個和敵人鬥爭的堡壘了。

「三關」密洞陣地戰

但是密洞究竟是什麼東西。如果洞裡的人沒有決心鬥爭，「保險密」還是一樣不保險。而一九四二年的秋季「掃蕩」，恰恰檢驗了兩種不同心態的人。××村給鬼子佔領了。三天中民兵到那裡躲了三次，鬼子分明看見幾個拿着武器的老百姓鑽到村邊，但是剛剛追趕到一塊凹地附近，却碰上一個影子也——

那是一塊很奇怪的凹地，不知什麼年代，給大水沖陷了一潭很深的深澗。走下去一看，底下黑洞洞的，什麼也沒有。只是洞口放着一只酸棗。誰人不敢進去，就在凹地邊放了一個哨兵。

哨兵在那裏守了三天，什麼也沒有看見。第四天，洞裡忽然鑽出一顆女人的腦袋，伏到壘上去喊「擊水」。

於是來了好些鬼子兵，吆喝洞裡的人趕快出來。洞面沒有回聲，鬼子朝洞裡打了兩槍，還是沒有回聲。

兩個鬼子往洞裡爬進去。不久就抓出來兩個婦女。野獸們把她們強姦了，然後把她們雙腳提起。

落到崖底下去。

鬼子知道這洞裏還有人，但是不敢進去。他們用一捆捆的乾草堆在洞口堵着，薰着。等到八路軍把敵人打走，洞裏的十三個婦女，只有一個沒有給薰死。因為她正坐在氣孔的旁邊。從她的口中，我們才很痛心的得知她們慘死的詳情。

民兵會經過洞裏去過三次，要把她們轉移到另一個密洞去。因為那裏太靠近敵人了。但是她們不出來，她們說：『咱地不動，鬼子找不到這洞的。』民兵沒辦法，只好叫她們好好躲着，不要暴露目標。然而有一個婦女，却隨便爬出來喝水了，雖然旁人死命反對着。

鬼子往洞裏鑽進的時候，她們好些都拿着菜刀，火往，和鎗子剪刀之類的傢具，而鬼子却連身子也不能直起來。但是誰也沒有動手把鬼子打死，反而看着兩個婦女給拉走了。

在洞裏她們聽到哭叫，聽到兩個可憐的鄉親給摔到崖底。她們感到死的恐怖，而敵人真的又用煙火來殺害她們了。好多人都嚷着把洞口用棉被塞住。這是一個好辦法。但是誰也捨不得拿出自己的被子，她們怕自己的被子給煙薰壞了，……她們苟安，自私，不守公共的紀律，不敢和敵人鬥爭，甚至於捨不得自己的一條被子，終於給殘酷的敵人殺害了十四個。

XX村子和他們完全兩樣。那裡的密洞打在一道很深的夾壁底下。民兵用繩子把村民吊下去，然後才一個個鑽進旁邊洞裏。夾壁上看不見洞口，搜山的敵人用繩子吊下兩個偽軍，看看底下到底有什麼東西。

偽軍很高興，他們發現那裏有一個秘密密洞。但是，一只手榴彈卻突然從洞裏扔出來。當鬼子把繩子拉上去時，兩個偽軍早給炸的稀爛。

於是鬼子決定用火攻。一把把着火的乾草，

落到密洞口前。洞裏的人早想到是怎麼着，他們準備着很多沙土，男女老少搶着用沙土撒到火上去。他們把密洞當做陣地，這樣和敵人戰鬥到黃昏。

這時偽軍已經把洞口的夾壁堆滿。任你多大的也薰不到密洞去了。第二天，鬼子們又到那裏去，一心想探洞裏的老百姓弄死。可是民兵們却在黎明以前，把所有的老百姓用繩子吊出來，轉移到另一個『陣地』去了。

類似的事情多着呢。二百多偽軍，在XX村的『保險窩』跟前圍困了一整天，打算用鋤頭和鐵錐把洞口挖開來。正挖得起勁呢，不提防幾聲大砲，却轟到他們中間，打得幾十個鬼子滿身血點，眼，眼，眼，鼻子全給血污糊成一片。——原來這並不是什麼『大砲』，村裡民兵用榆樹幹做成的『榆木砲』。早在三裏路以外吃藥上安好了。土造的火藥把幾十個鐵砂和石頭，打得鬼子連哭帶叫的，鋤頭都來不及拿就砸掉了。好幾地方挖密洞的敵人，埋了埋在洞口的地雷，或者用乾草堆成密洞時，反而叫草堆埋的手榴彈炸死自己。尤其感動人的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反『掃蕩』中，柳溝的老百姓在密洞裡和敵人抗了半個月，一直到洞裡的糧食和水吃完了。正在這時候，八路軍的一個連和那村的民兵，突然在一個晚上打進村子，把洞裡的老百姓救出來，一個個全給送到五里地以外的地方。——進攻『密洞陣地』的敵人，不但遭到婦女，兒童和婆婆老媽媽們的頑強抵抗，而且還常常碰到民兵們的意外打擊。

(五)『密洞黑麻，心可亮咧』

XX村有三個『保險窩』，兩個是住人的，另一個是牲口窩，那一天敵人出動，帶入根據地四十多里，村子已經可以聽到機關槍聲，他們還留在村裡。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太婆一面炒麵一方說：『不怕，指揮部（村政府）和民兵組織的反『掃蕩』指揮部（不閉話，陰事情也沒有）。』

那時正是秋收農忙，好幾莊稼沒有收割，滿地堆着糧食。這些是不能讓鬼子踏踏的，好幾個鄰近的村子，臨時組織一個臨時指揮部，保衛家乘突擊搶收。情報員在山上佈成一個四道八達的情報網，老百姓把牠叫做『無線電』——前面山頭一喊呼，這裡的消息馬上又傳到後面的山頭去了。情報從這個山頭送到那個山頭，敵人一舉一動，十里地開外的村子都知道一清二楚。只要敵人沒朝着自己的村子前進，人們總是忙著收割，打場，打糧食，推炒麵。白天是這樣，晚上也是這樣。

一個十四歲的小孩子，整天拿着一隻『牛角號』，跟着指揮部來回周游。第一聲響，老幼婦女們開始撤退了，牲口趕到密洞裡，添好草料，偽裝起來。民兵戰鬥班拉上山頭，中年人攬着和民兵一起。『無線電』裡有一個『洞長』和一個情報員。所有的人都聽他們的話，情報員從外圍民兵那裡，不斷得到關於作戰和撤退的消息，甚至敵人佔領了村子，民兵轉移對村外，每天還可以從氣孔傳進幾次消息。從情報員口中，他們知道全村的糧食，都埋到村外三里遠的僻野山溝了，知道民兵打死了三個敵人和一匹洋馬，知道偽軍三天來也沒吃過一頓飽飯，知道XX村敵人找到三升穀子以後，也沒

一個老太太，從來沒有離開過自己的紡車，只要牛角號沒沒有吹響三聲，她的紡車總在密洞陣地

「好幾天他沒有歇過一口氣，她說：『從前做野戰，人像陷在泥裡，心裏着實悶得慌。如今有民兵在，這也不怕啦！別說着悶，心可亮哩！』」

「東子對那響明響明，外面眼兒也不要咱操心。這自來心頭穩穩當當的，該做啥做啥。」

「他的一點不錯。敵人在村裡『清剿』了八天，沒有一天不搜山找暗哨，也沒有一天不追捕民兵，驕傲地走的前一個晚上，一百多鬼子把皮鞋脫下，和狗一樣地悄悄爬出山溝，總想找出那村的老百姓來，可是什麼也沒有聽到。及至第二天往回撤時，乾像山不知怎地却佈滿了民兵，把騎着洋馬的『本寨』打落地上。而×××村呢，除了廁所裡的一隻破夜壺，給鬼子砸得粉碎外，什麼也沒有損失。」

（六）『不死照樣過時光』

一九四二年秋季反『掃蕩』以後，武鄉再沒有人應民兵做『引火柴』，也沒有人給東子引路圍剿。

洞了。各村的友『維持』鬥爭的退讓退款，過去是各戶分用的，現在都給民兵買了步槍。好些人家把祖傳的鑼和鐵香爐等古董，拿到兵工廠去給民兵換槍。父親對野地裡挖出生鏽的步槍，還給自已當民兵的兒子，婆姨們在丈夫的掛包上，用綠線綉上『保家鄉』之類的花字……

冬閑的日子，得閒得看不到有人在太陽地裡胡扯淡。他們或者到山溝打新穀，或者把舊窩改得好的。『閒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每個村民都會說出類似的話來。各戶人家除了鍋碗，炕席，和紡車以外，再難找到旁的東西。桌子板櫃只有小學校和村公所才用上幾張。但即使這些東西，在敵人出動時也搬光了。集市到了晚上，所有的店家都把門搬開着，因為門板是白天才重新安上的。老百姓把一切不急需的東西都埋到地下或者搬進『保險窖』，甚至每天吃用的糧食，經常也不過在家裡放著斗把七八升。

我聽着說現在武鄉倒有多少『保險窖』，但當一九四三年五月反『掃蕩』時深人根據地的敵人沒

有遇到一個老百姓。要是聽到的話，那就是全副武裝的民兵了。他到『皇軍』是『來時招待不周，去時好好款待』，從洪水到鋪龍直進武鄉城附近百里的大河灘，兩旁的吃糧全站滿了民兵——他們是站著而不伏着，給搬運的敵人，擦了一整天的『腦筋』，不讓抬舉的敵人，連頭也不點一點，一口氣搬運了八十里，沿途裝滿了洋馬，驢，和帶到根據地來運糧的牲口。

但是，一般老百姓並不聽這天在暗處。早上敵人剛撤走，晚上的村莊，就可以聽到勁勁的。敵人搬運着糧食時，洪水集（相距二十里）每天總有一次集市，趕集的老百姓不下五六千人，從早上一直擁擠到昏昏，甚至離離三里的地方，依然有老百姓到那裡種莊稼。……正如×××村裡位老太婆所說的：『鬼子不叫咱活，咱偏要活。他挑挑兒，咱仇氣越發大，辦法越多。咱老了又怕啥，『一』，『八十老漢去開荒，不死照樣過時光！』』

我聽着說現在武鄉倒有多少『保險窖』，但當一九四三年五月反『掃蕩』時深人根據地的敵人沒

當然這三條大道，也還是不能包括盡所有的大後方的知識青年，我們也承認，的確有些人沒有辦法，或者暫時的不可能，向這三條路走。不過這還是少數的特殊情形而已。大多數的朋友，一定可以在這三個方向中找出一個適合自己具體條件的去路。

第五、如果你自己不可能到農村以及敵後去，有時即可以用你的力量和社会關係去積極幫助其他的的朋友們到農村去，到敵後去。比如說：假設在經濟上我們有辦法，就可以完全不自私自利地集中一些錢，幫朋友們解決路費問題呀；介紹人軍關係呀；介紹農村工作呀；……像這一類事是很多的，能夠做得好，也是極有價值的事。

『真理永遠是具體的』，我們不能用某些固定形式來刻板地指出每個人應走的路，但求在各各的崗位，殊途同歸，尚同一目標分途合擊。不過，在考慮自己的方向的時候，要註意的是應該儘可能選取中間最要緊的環節，應該把自己的力量用到最可發揮的地方。

但是，這少數的朋友還是他可做而應做的事，因此第四、到學校里和其他的技術部門中去學習生產的技術。這一點在大後方是比較上便利的一件事，我們可以藉此好好地充實自己生活的能力，工作的能力，同時另一方面我們還是可以依據實際的

總之，我們的目標是堅定的；原則是不變的。在這目標和原則之下，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真實的具體情形條件，並不自欺欺人地，決定出個人的方向來。

個人的問題：苦悶、出路、……應該在一個大的整個的努力方向之下去同時解決，否則永遠不會有真正的解決。永遠地在時代的後面。

（被刪一段）

第一次筆談

知識青年怎樣推進民主運動(五)

大後方知識青年應如何爭取民主 亦為

今天生活在大後方的知識青年，除了極少數之外，都常陷入極端的苦悶之中。這些苦悶的形式很多：有感到生活困難的；有對人生乏味的；有對個人出路感到沒有希望的；戀愛失意的……種種不一，

(被問)

今天敵人還盤據着我們大部份的國土，抗戰建國的工作還存在着無比的艱鉅困難，如果在一個民主的進步的政治形勢下，會有無數的有意義有前途有聲有色的工作等待着我們去做，那裏還來得及苦悶呢？

但苦悶到底也不是很壞的事，它表示一個人內心的矛盾正在激盪，祇要這矛盾導向一個好的方向發展，馬上就會「在有意義的工作中解除苦悶」。我們相信，在任何具體的環境之下，必然有它的具體工作方針。語言環境不好而把自己的雙手捆綁起來，讓自己的「眼睛」墜入「泥潭」下海，那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辦法。

下面先我和十幾個友人對大後方工作所交換得來的幾點意見，現在寫出來，給更多的朋友們討論：

一、工作的目標

什麼是我們的工作目標呢？籠統地說一句，就是爭取民主實現！但是這祇是一個目標，一個方向。我們要從許許多多的具體的日常工作去努力，點點滴滴地去爭取。並不是整天在口裏喊着「民主」二字，民主就出現了。所謂「大處着眼，小處着手」是絕對的，爭取民主就是我們所要「着眼」的，是我們一切所「着手」的具體工作的目標。

二、幾個原則

所謂爭取民主，原則上就是爭取民主的力量，團結民主的力量！我們應該從自己的周圍做起，來擴展這一運動，我們要使已經有認識的朋友，積極起來，沒有認識的使他認識；認識錯誤的，說服他，使他改正！

在爭取中，我們使民主的力量，在數量增長；另一方面，我們還要使這力量組織起來，結合起來，使民主的力量在質量上加深！這組織我們不能太理想，以為可以憑空是舉，浩浩蕩蕩；我們也祇能從周圍，從自己所及的可能範圍裏做起，把個

那的集聚成小小的結合，然而這小小的涓滴也就是將來浩浩蕩蕩的江海的泉源。

爭取和組織民主的力量，這是我們工作的一個原則；從自己的周圍做起也是一個原則。但是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則却是與基層人民相結合，這個道理很簡單：如果沒有廣大的基層人民作為我們隊伍的主力骨幹，我們是多麼無能無力！

但是，大後方的知識青年，他的周圍多半也是知識青年，可能爭取的範圍不廣也不深，為了更有效地爭取和組織，我們應該儘可能地把自己移到有基層人民羣衆的範圍里去生活。然後在那裏面起作用，「和人民打成一片」並且「為人民服務」。

(答問)

民主的勢力是一天天地正在增長，但是我們在工作中，絕對要克服自己的衝動，避免不必要的「表現」，幼稚的興奮，

(被問)

有的人藉詞要「穩妥」，事實上是在那裏躲避，畏縮，屈服……當然也是不對的。

三、一般的工作

具體的工作可分為一般和個別兩種不同範疇。所謂一般的，就是不論職業，年齡，男女，與

總之，都可以進行的工作。這工作是什麼呢？剛才在原則上所提出的爭取和組織問題，表現在我們日常生活之中就是交朋友。我們要靈活地有意識地有意識地去接近周圍的人，去克服和影響老朋友，去爭取和迎接新的朋友。如果你已走入羣衆的範圍，那末你更應善於認識和結交這一次你向來不熱衷的朋友，爭取朋友，有意識地結交朋友，要入情入理，要真心地與人，否則就要變成巧言令色，使人一見就以爲你是要利用他，而來自持的。

單純地想交朋友是交不起来的，最要緊的還是要叫別人來想和你做朋友，因此，你在人羣之中應該有威信，有好評。這威信，這好評，決不是用手段所可造成的，必定是你自己真實的人格，待人接物的態度，工作的精神，對人的真愛……而造成的。

因此，你必須對你自己的事業，工作，做得更

好，精進，決不撒懶，人民大眾所公認的好人，第一特點就是誠懇忠厚和樸實。

此外，爲了在工作上更求上進步，爲了總結工作經驗，爲了接受新知識……必需加強學習是個用說的了。

四、個別的方向

根據各人不同的環境，條件，特性，和志趣，在向總的目標前進的時候，各有各的崗位。各有各的去達成這總任務——爭取民主——的方向和路線。下面是我們所想到的幾點。

第一、到農村去！

到佔全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羣衆中去！這一個方向是今天大後方知識青年最大的方向。它的意義，我們在很多文章早已講到，也在很多朋友談話中聽到，這是不必贅述了。主要的問題還在於「

怎麼去？」這才是一個具體而切實的問題。到農村去，當然不是背起一個包袱就可以走去的。農村不單是城市，一個人的到來和離去，在那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接前)

能「回鄉」的朋友，要比「下鄉」的朋友方便，而且這回鄉的朋友，在那些無知而而又想下鄉的朋友中……

祇要真有決心，在都市中並沒有什麼意思的朋友，要利用機會到農村去，是可能的！如果一時還找不到這機會，也應該在這段準備時間中做一點準備工作，應該充實一下自己對農村的認識。

城市的知識青年，總不免在文化上有所愛好，因爲對荒涼的農村總不免有所害怕，他們怕到了那既無談話的朋友又缺書本的地方，就會把自己的個性和愛好完全抹殺了。他們把「爲人民服務」當作完全「自我犧牲」的行爲，這是錯誤的。

我們認爲恰相反；祇有走入農村——代表中國社會的基本特質的農村——才能真正找出我們個人對文化所應做的工作。

我們今天所講的文化是什麼呢？應該是民族的，大眾的，科學的文化。然而在城市的知識青年腦中的文化，根據深淵地知識着非民族化的（如洋化的）非大衆化的（如貴族的）非科學化的（如復古的）文化……這些都必須到農村去治療。

農村是並不荒涼的，不過它所有的卻是樸素原始的村莊，這等待我們去提煉的。如果你從事文藝工作的，應該在那裏學習人民的語言，人民的生活……；從事音樂的可以收集民歌，研究社會的，經濟的，可以做調查工作；研究科學可以找出

人民真正的需要，發明創造適合人民需要的工具，在無窮的對知識的人民試驗中……幾乎沒有一種專科不可能就農村的特質而找出他應做的工作，又何嘗僅僅是爲農民服務呢？問題還在於我們是否能把洋式的，高超的，老式的「文化」從自己腦子裏拿掉。

第二、到工廠中去！

假設你沒有機會到工廠去，與工人羣衆團結在一起，當然也是很難的事，它的意義等於到農村去，祇是目前的工業不發達，這機會太少了，能到工廠去的知識青年，多半是夜間青年。在工廠中才最能和真正粗魯的勞動工人結合在一起，使他們服勞，取得他們的信仰，也是需要一番克服自己的工作。而且比在農村更困難些。

第三、到工廠去！

如果你不可到農村和工廠，深入人民大眾之中，假設你還可以到環境優美風景如畫一片光明的土地，它正需要着各種不同的知識青年技術青年去參加戰鬥和建設，去充實它，擴大它。

由於近年來敵後鬥爭的勝利，光明區域是非常廣大的，那裏並不如我們後方青年所想像的艱難困苦，却充滿着活力地堅強的戰鬥着，完全是另一個世界，真正自由人民所生活的地帶。

如果你的家鄉是在敵後，你應該打回老家去，和家鄉的兄弟們一齊爭取解放。

怎麼樣去呢？祇要有決心是不會去不成的。那些以種種藉口的商人尙且有辦法去，我們當然也會

到農村去！到工廠去！這是展開在大後方知識青年面前的三條康莊大道。這樣大的一個範圍，不說說說無孔不入，毫無辦法。

(下接四二頁)

他其及評醫

從古代史到近代史

推薦葛伯贊先生的「中國史論集」

懷 淵

讀歷史或研究歷史科學，往往是最能引起興趣的一件事。原因不但在歷史的內容複雜變化，超過其他科學，而且是在它和我們本身的現實生活的關係性。我們的生活就是歷史的內容，我們自己就是生活在歷史的進程當中的。我們研究歷史，是讀我們自己的生活，讀我們自己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研究歷史，是正在研究我們自己的現實生活的發生與發展；研究與我們現實生活最有密切關係的事。一種知識或一種科學，越和我們本身有密切關係，就越容易使人發生興趣。因為人總是不忘記自己，總是關切自己，對自己的「切感」最興味的。我們讀歷史容易有興味，理由在此。

「真如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鏡，可知得失。」——這是古人的歷史哲學。就是把歷史當作一面鏡子，來對照現實；從歷史的紛繁現象中，找出它們的相互關係，發展方向，變化的規律，歸納出歷史的發生與發展的規律，來說明歷史，並且根據這規律來改進歷史。——這是現代人的歷史哲學，就是從歷史科學當作一種認識歷史與改造現實的方法。不論從前一種觀點（消極的）出發也好，從後一種觀點（積極的）出發也好，總之歷史是與我們現實生活關係最密切的東西，明白歷史，不但最易有興味的，同時也是有此必要。

舉例來說，歷史上有過不少「英雄豪傑」式的人物，論本領，他不能算勇；論才智，他不能算靈敏；論力量，他往往在擁有最強大的威力；論機會，他也曾風雲叱咤過一時；然而失敗起來，却往往如摧枯拉朽，土崩瓦解，有覆無返的結局，這想不到的崩潰的迅速，歐洲的法西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近代中國的溥儀、袁世凱和曹錕之輩，就是這類失敗人物的典型。他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局呢？就因為他們沒有看清現實，他就是不明白歷史。

史：一不知道把歷史來當作鏡子，二不知道認清歷史的進程、歷史的方向、歷史的規律，所以他們走盡了切錯路，做盡了切壞事，然後在歷史的堅壁前倒下。拿這些人物最典型的袁世凱來說，與他的陰謀險詐，以他的風雲際會，何嘗沒有最好的成功條件呢？然而就因為他不明歷史，把辛亥以後的中國當作辛亥以前的中國，不知道歷史已經變了，總是在反中作爲王和帝國的夢，總在他眼前有一個維持獨裁統治而不可得的鴻溝，在歷史上更有許許多多野心家陰謀者的失敗史，但是他不肯回頭去看一看，把他對當作鏡子，以爲鑑戒，而一意孤行，要作中國的獨夫民賊。所以他失敗了，而且失敗得很慘。

所以不明白歷史（不讀歷史和不研究歷史）的人，不但失去一件最有興味的享受，並且也是一件最危險的事。

如此看來，研究最接近我們現代生活的歷史，應當是更有興味和最有意義的事了。譬如近代史要由古代史更爲親切，中國史要比世界史更爲吸引人入勝。然而就現在的情形來看，却不然。我們看許多歷史學家談「喜談古史」，以「大有吾人戰勝之餘地」爲樂。我們翻一翻新出版的歷史著作，讀得越研究兩字的，就很少是有關於近代史的。

爲什麼會有這個現象呢？我們可以從客觀中去找幾個理由：例如客觀上不容許談近代史，因為它和現代的關係太密切了，也太容易與現實問題混在一起，談起來，頗有未便；又如現代的史料，浩如煙海，都沒有經過搜集整理，研究起來，實在太麻煩；再如中國的新史學，建立的時期並不長，至多也不過二三十年左右，以這樣短的時間，要應付繁複複雜的現代史，不但時間所不許，力量上也有所不逮。

這些理由來說，除開第一個理由，是一個切實的問題，需要打破這個障礙，纔能解決之外，其他兩個理由，與其說是屬於客觀的困難，倒不如說是屬於主觀努力的範圍。譬如就歷史的繁重複雜來說，這只是一個搜集與整理的問題，比起古代史來，說它是複雜毋寧說是單純。因為歷史研究的材料——即所謂史料，不限於文字，還包括了器物，在古代史的研究範圍內，文獻和器物的研究就是繁複不過的問題；古代史料和現代史料在數量上雖是湖澤和海洋之比，但古代史料中問題的複雜，却往往超過現代史料多少倍。中國古代史的新史學的開闢者郭沫若先生在他的「古代研究的自批批判」中，就曾道出其中的痛苦。根據郭先生研究古代史的手續的經驗，他說：「研究中國古代史，大家所最感痛苦頭痛的，是僅有的材料都是真偽難分，時代混雜，不能作為真正的科學研究的素材」。這話而說包括了許多問題：材料多，固然研究起來感覺困難，材料少，又何嘗不研究困難？憑一種一葉而斷定一棵樹的形態，憑一磚一瓦而斷定一個城市的內容，這是何等渺茫而危險的事？其次，對於文獻的認識和辨偽工作，對於器物的辨別取捨審定考察的工作，其間所涉及的科學知識，範圍的廣大，是無限度的。這工作更不是幾個專門的歷史學家坐在書室中，向故紙堆中可以做完、弄得好的工作。

再講到新史家的方法和能力的問題。一種方法，只要是科學的，它的研究對象，自然不會限制於古或今、難或易。我們說新史學的方法不能研究近代史，這當然是一個笑話。新史學的創始者——唯物史觀的創造者——就是從研究近代的歐洲資本主義社會開始，而不是從研究歐洲的原始社會開始。從中國現在研究古代史的條件說來，抗戰以前在大的都會中如北平、上海，是文物薈萃之地，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書籍文獻，可以接觸到甲骨鐘鼎一類的古器物，作實物的研究考察；雖然這些書和物還不能集於一時一地讓我們研究，但是得到它們的機會究竟要多些；在中國史料看得不夠，我們還可以到外國的圖書館博物館去搜尋。可是這些條件，到抗戰以後，一件也不存在了，存在的是公家極少的一部分收藏，這不是平常人可以得到的，此外是私人的一些殘餘之物。研究歷史而不用史料，或史料不足，是不行的。然則我們此時憑什麼來研究古代史呢？

更就有限的一些史料來說，也是就新史家本身的能力來說，我覺得我們現在研究古代史的問題實在太多。卜辭是一種上好的史料，但是對這種史料的研究，却並不因為它好就成為容易。因為這個研究的本身，還在發展變遷

之中，而一鱗半爪，更增加着研究的困難。新史家如果不是直接參加這種研究的工作，而且確有所成，只是仰給於前人的研究成果，用它來作歷史判斷的根據，是極容易發生錯誤的。郭沫若先生是對卜辭有過直接研究，而且是有所貢獻的，然他在自我批判中，却很客觀的承認「把路引錯了」。這實在是對那些生平沒有接觸過甲骨而從事古史研究的人，一個當頭棒喝。對青銅器的研究，問題尤其複雜，因為青銅器作為一種史料來研究，已經有千年以上，這其間它們本身的變遷發展固然很大，器物上面所留下的遺痕（包括文字、花紋、形式、質料）可供研究的也很多，需要的知識更廣，尤其困難的工作，是分別時代，辨別真偽。只就這兩項說，是以造成一片混亂，條件不夠的新史家要來對付這樣一片混亂，得到真正的科學的結論，實在不是容易的一回事。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一件器物，一發文字或一句話、一個字，即使化去畢生的精力和時間來研究也是不為過的。如果我們只就前人的一些成果，來草率地作研究下判斷，不留沒有意義，而且也根本失之歷史學的科學精神，認真態度。至於文字中的史料，包括一切文獻，其煩瑣複雜的研究工作，是不用說明了，中國文字的變遷和偽書的繁複，所給與研究者的困難，是無窮盡的。一切文獻，離開近代愈遠，問題愈多，研究就愈困難。所以說史料研究的難易來說，近代史要比古代史容易得多。

此外近代社會發展時代不遠，以我們現實生活作根據來研究較接近的近代史，更加上容易搜集的文獻器物，實在比研究古代史更清楚把握。這只是就研究工作的一方面來說，研究近代史更比研究古代史可靠，容易着手些。

三

這並不是說研究古代史是不必要的或沒有價值的。作為歷史科學來說，古往今來全部的歷史過程，都應當是研究的範圍。問題是研究的條件，研究的時期。

研究古代史，據我這個非歷史學家來看，至少要有這樣幾個條件：有研究和辨別古文獻古器物的一項充分的準備知識。這是一項前提，沒有這個前提我相信不可能有研究。不存歷史學家僅僅是一個讀歷史的人，自當別論。

有充分的資料，包括文獻和器物。而且對這些文獻器物，經過嚴密精確的辨別考定的整理階段。這不是一人或一時的力量所能夠完成的，一方面需

社會的集體的努力，有這樣的環境便利，另方面更需歷史學家認真而嚴肅的民主的科學的精神，願意作一點一滴的小工作，而不急於作「偉大的表白」，操切的判斷。郭沫若先生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上的地位，是無人可以比較的，他的貢獻也是無人可以否認的，然而他在自我批判中的認真與謙抑的態度，實在值得史學家們的學習。他一再的譴責他自己過去的成就是「太草率，太性急了」，一再認為他自己「把路引錯了」，然而他在他後面很遠很遠的人，能够不謹慎些嗎？

有學術研究的充分自由。這是任何科學發展的一個基本條件。如果欽定了一些條例，不能逾越，地球本來是圓的却只能說是方的，中國本來是多民族的國家，却只能說是一個大民族包括小民族，那就沒有辦法研究下去了。充分的資料與集體的研究工作，也只有有學術自由研究民主的情形下，纔有可能。

在這些條件不具備的情形之下，據我的看法，研究古史，不如研究近代史。研究近代史有以下的便利：一、文獻容易蒐集，二、近代的文獻容易辨別，三、生活距離不太遠，器物也比較多，而實物的東西比古器物要少，甚至於沒有。我以後曾見過明清以下的骨董，即使用，也是較易辨認出來的。四、更重要的是近代史和現代的關係是密切的，我們從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中來找尋歷史的規律，對我們更有用處。我們常說秦漢以後的中國社會是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近百年來的中國是論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其中的變遷過程，實在大有研究的必要。而第五，我們好好的整理出一部近代史來，讓大家把最近幾十年來或幾百年反復不已的歷史認識清楚，作為教訓，不走或少走錯路，少做錯事，甚至不致做錯事，意義豈不更大，價值豈不更高？讀歷史或研究歷史，本來不是消遣或「象牙塔」(借用這名詞吧)內的工作，它的意義是在現實生活中起作用。這並不是功利主義，實在是一切科學的最後目的。我們自然不能要求每一個歷史學家都成為社會改革的實踐家，但是至少我們要求歷史學家成為社會的指導者，要求歷史著作，成為改造社會的參考書，要求這并不是過分的。

四

就因為這一個理由，我要推薦馮炳賢先生的「中國史綱集」。我特別要推薦的，不是這本書的前一部分，而是這本書的後一部分。全

書三百頁中，前一部分約佔三分之一，後一部分佔全書的三分之二以上。

這是一本「史論集」，論史的成分多，與一般歷史著作不同，但這還不是最大的特色，最大的特色是它超過近年來的一些歷史著作，把歷史的界限，從古史看到了近代史。打開全書的目錄，就可以看到，標題的二十篇歷史，除開前兩篇是一般的歷史學的評論之外，其他的十八篇，是從古到今依着序列排出來的。其中「論夏族的起源與史前之鄂爾多斯」到「論中國之母系氏族社會」，一共只有四篇是屬於古代史的範圍，從「西晉末年的「淝水」及其影響」的一篇起，就逐漸移向近代，直到「論中國抗戰的歷史原理及其發展的邏輯」，一共十四篇，不備是屬於近代史的範圍，而且除開「清代官廷戲園考」一篇以外，大部分是集中在中國民族與異族的鬥爭史，還有一部分是論中國的辛亥革命與中國的憲政運動史。中國當前的兩大問題——民族解放問題和民主自由問題——馮先生都在本書中作了一番歷史的觀察。這正是本書的第二個特點。

這些歷史的內容與我們現實生活的關係實在是大密切了。我們要知道中國民族與外患相繼民族侵略的原因，我們要知道在異民族侵略的當中，各階層的反應如何，動向如何，我們要知道漢奸的社會基礎是什麼，漢奸們表現形態是什麼，我們要知道人民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地位，作用與教訓，我們更要知道中國民族解放鬥爭成敗的關鍵在什麼地方……總之我們要知道在中國歷史上，中國民族鬥爭的一切經驗和教訓，中國民族鬥爭的歷史發展的規律。這些內容，當我們打開馮炳賢先生的中國史論集，從第七篇「論西晉末年的「流人」及其叛亂」以後，我們可以得一個全面的解答。

關於中國的民主運動，在本書的第十七篇與第十八篇「論辛亥革命與中國歷史之新的轉向」，「論五五與中國憲政運動之史的發展」中，有精確的敘述和評論。在後一篇中，指出當時的立憲運動，有改良派與革命派之分，改良派是失敗了，革命派終於在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的封建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本書更指出辛亥革命以後的歷史，是反動的軍閥專制主義勢力與中國民主勢力的鬥爭史：一方面是反動軍閥毀壞中國的第一部憲法——「臨時約法」而代以袁世凱的「約法」，段祺瑞的「憲草」，曹錕的「憲法」，——這一連串的偽憲，另一方面是孫中山先生護持約法的奮鬥，和他在護法鬥爭中的逐步進展，由消極的護法，進到徹底廢除憲政與民主的敵人——帝國主義與軍閥。

在這一篇中，最重要的地方，是回顧了中國憲政史的史的發展之後，他

根據孫中山先生在民主黨門中所留下的遺教，歸納成六個結論。這些結論，我們不必一一引述，不過其中最要的一點，却值得特別提出來：

第四，他（孫中山先生）指出要實行真憲政總能打倒假憲政。中山先生說：「中國共和垂六年，國民未有享過共和幸福，非共和之罪也，執共和之罪也；執共和而偽共和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專政之手段也。故今日變亂，非政府與民政之爭，非新舊潮流之爭，非南北意見之爭，實真共和與假共和之爭。……今日之患，非患其復辟者，正患假共和之名，心復辟而偽共和者」。這實在最當日孫中山先生的民主黨門中一針見血的大教訓。

有了真憲法，豈不是民主就有了保障呢？本書也同樣引述了中山先生的金石之言：

「憲法之所以能生效，全恃民衆之擁護，假使只有白紙黑字之憲法，決不能保證民權，俾不受軍閥之摧殘。民元以來，嘗有約法，然專制餘孽，官閥官僚，借端擅權，無惡不作，此輩一日不去，憲法即一日不生效力，無異廢紙，何補於民權？適者更現以非法行賄，尸位北京，亦未嘗不以所謂憲法爲文飾之具矣，而其所爲，乃血憲政若風馬牛不相及，故知推行憲政之先決問題首先在民衆之擁護與否。舍本求末，無有是處。不特此也，民衆果無組織，雖有憲法，即民衆自身亦不能適用之，縱無軍閥摧殘，其爲其文自若也」。

憲法能生效？民主能實現？「全恃民衆之擁護」；民衆如何纔能擁護憲法，保證民主呢？「民衆」要有「組織」，就是說民衆要有組織的權利，民衆要有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

這還不够明白嗎？中山先生所領導的民主運動，這運動的經驗和教訓，都精粹的提煉在蔣先生的「中國史論集」中了。在本書中反映了中國民主運動中的主流和逆流，反映了真共和與假共和的鬥爭，更提煉了中國民主運動鬥爭史中的全部經驗和教訓。這些教訓正是我們今日在民主運動中值得學習和值得發揚的。

只有這樣的歷史，纔是活生生的歷史，也纔是我們的現實生活最關切的历史。中國的新史家一定要這樣緊貼着現實生活，他的研究纔有意義，他的工作纔有前途。

我不是說中國的古代史不要研究，我是說在研究的條件不具備的時候，在研究的工作還不能直接產生有益的成就的時候，我們的新史家應當把目光從古代移到近代，點緊中國人民的現實鬥爭！

專 事 (四)

本期被扣文稿計有

- (一) 土地改良與經濟民主
- (二) 孟子「距相墨」的內幕
- (三) 孔子誅少正卯是怎樣一回事
- (四) 團結伙伴，爭取民主

謹向作者讀者致歉。

論蘇聯科學院版「哲學史」第三卷——對黑格爾哲學

思想解釋的錯誤與缺點

「布爾塞維克」雜誌

蘇聯國家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近年來準備印七大卷「哲學史」，其前三卷業已出版。第三卷中敘述黑格爾的一部分，由亞斯摩斯等人執筆的，他們不但沒有給黑格爾的哲學思想以馬列主義的估計，和指明黑格爾辯證法的局限性，並且還放過了黑格爾的許多反動思想（如讚揚普魯士的君主政體，表揚德國人為「特選」民族，贊成戰爭及侵略，蔑視斯拉夫民族等）。「布爾塞維克」雜誌的編輯部曾在一九四四年的七八期合刊中，批評了亞斯摩斯等人的錯誤，現特將這篇文章介紹於此，以供讀者參考。

編者

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在一九四三年出版了「哲學史」第三卷（由亞歷山大洛夫、倍雅夫斯基、米打、尤琴諾同志所編輯的）。這一卷的大部份，是對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德國哲學家的敘述與估計。

在「哲學史」第三卷中，在敘述與估計德國哲學上犯了嚴重的錯誤。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經典作家們，曾經區別黑格爾哲學的兩個方面：辯證的方法與保守的形而上學的體系。如果黑格爾的辯證法包括着「合理的種子」（辯證法的學說），並且這是黑格爾哲學的進步的方面；那末，他的唯心論的獨斷論的體系是保守的，要求發展的停止，並且與辯證法有着失鏡的矛盾。

可是在「哲學史」第三卷中敘述康德、費希特與黑格爾的文章時（這幾章的作者亞斯摩斯、倍雅夫斯基、車爾內休夫諸同志），抹煞了黑格爾哲學的進步方面（他的辯證法）與保守方面（他的獨斷論體系）之間的矛盾。

在第三卷中沒有估計到，就是黑格爾企圖建立究極的、應該以自己表現絕對理念的體系。實際上，黑格爾宣佈了歷史的終結，任何發展的結尾——人類經過黑格爾哲學似乎已經達到了絕對理念的認識了。當批評黑格爾企圖把自己的哲學當作絕對的真理時，恩格斯寫道：「可是這就是說，宣佈黑格

爾體系的全部獨斷論的內容與絕對真理。而這便和他的瓦解一切獨斷論的東西的辯證法處於矛盾中。這就是說，在適應生產力的保守方面底重壓下壓倒了革命的方面，並且不僅在哲學認識領域中，而且對歷史實踐也一樣。在黑格爾身上已經提高到認識了絕對理念的人類，在實踐領域中應該已經向前進得很快，以致可能把絕對理念實現於現實中了。絕對理念不應向自己的同時代人提出過大的政治要求。這在當時為什麼在「法權哲學」之末，我們看到，絕對理念應該實現在那個為威廉第三世所如此堅持和如此徒然地允諾其臣民的，以等級代議制限制着的君主政體中，即實為於當時德國的小資產階級關係的資產階級底局限的和他的間接統治之中。並且在結論中以思辯的方法證明資產階級的必要性」（見「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六三九頁）。

黑格爾的方法與體系之間的矛盾，滲透於其整個哲學見解之中，不難理解，在後來的時期中政治上和哲學上的各種各色的反動派緊抓黑格爾學說的保守方面，他的體系，而出現為黑格爾辯證法的鮮明的反對者。而革命的思想家則利用黑格爾哲學的進步方面——他的辯證法。

馬克思與恩格斯拋棄了黑格爾的反動體系。同時他們保持了黑格爾辯證法中所有的進步東西。在這種馬克思與恩格斯根本地改造了黑格爾的方法，

把它從用頭緒的變為用條理，這是一來，黑格爾的唯心論的辯證法就轉位於馬克思的唯物論的辯證法了。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序言中，「我的辯證法，在根本上不備是與黑格爾的不同，而且正是他的直接對立物。對於黑格爾，思維底過程（他在觀念的名稱下甚至把它變為獨立的主體）是現實的創造者，現實只是他的外表。對於我，相反的，觀念的東西不過是移轉在人的頭腦中並且在其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

所以，馬克思不能簡單的採用黑格爾的辯證法，因為在黑格爾那裡，辯證法與他的唯心論哲學體系不可分離的聯結着的。在黑格爾哲學中唯心論和辯證法結合為一個整體，而其辯證法的最後任務則是證明唯心論的真實性。

由此可見，馬克思的唯物論辯證法，按其實質說來是與黑格爾唯心論辯證法對立的。

大家知道，列寧曾經指出，黑格爾只是在概念的辯證法中猜測了事物的辯證法，「——正是到了，不勝多一點」（見列寧著「哲學筆記」第一八九頁）——和黑格爾的辯證法會需要「從絕對唯心論的窠堆中清理出來」（見列寧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九九頁）。

在「論辯證的和歷史的唯物論」第一卷中，斯大林補了黑格爾辯證法以真正科學的評價，並以詳盡無遺的鮮明性規定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對黑格爾辯證法的關係。斯大林這樣說道：「在說明自己的辯證方法時，馬克思與恩格斯將這說成是援引黑格爾，把他看做是規定了辯證法本要點的哲學家。但並不是說，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辯證法與黑格爾辯證法是同一的。實際上，馬克思與恩格斯從黑格爾的辯證法中只採取了「合理的種子」，放棄了黑格爾的唯心論的外殼，並且往前發展了辯證法，給了它以現代的科學形態」（見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一版第五三五頁）。

可是「哲學史」第三卷的作者們却離開了對黑格爾辯證法為獨斷的馬列主義的估計，沒有指明黑格爾辯證法的局限，沒有說明恩格斯的辯證法對黑格爾辯證法的對立性，而在好幾處把黑格爾辯證法說成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沒有區別。當談到黑格爾哲學時，第三卷的作者們雖然估計了黑格爾在肯定對自然與社會發展過程的貢獻，在肯定辯證法在認識論上的作用的學說上的功績。

在「哲學史」第三卷中不正確的描寫黑格爾的辯證法為獨斷的無所不包時，例如，在第二一六頁上說道：「黑格爾在哲學史上的歷史意義，就在於在他的學說中，辯證法的思維方法找到了自己的完成，並且得到了包羅萬象的百科全書式的規定。」

本道理解，在黑格爾哲學中並沒有這類東西。就因為黑格爾是唯心論者和社會觀點上的保守派這一點，他就沒有完成而且也不能完成辯證法的規定，此外，大家都知道的，在黑格爾時代，還沒有完成這類任務所必需的社會條件以及科學發展條件，因此，他的辯證法既不能是完善的，也不能是無所不包括的。

第三卷的作者們並沒有機械的便把應用辯證法於社會生活這一點在諸葛格爾身上。在第二一六頁上，作者們寫道：「加深辯證法方法，創造新的辯證的邏輯是黑格爾的偉大的歷史功績。辯證法方法的普遍性，應用辯證法方法不屬於自然而且於社會生活，辯證法使人類歷史——這些是他的第一歷史功績。」

大家知道，黑格爾沒有能夠應用辯證法於社會生活。更沒有根據把應用辯證法於社會生活這一點加諸黑格爾。應用辯證法去分析社會生活，將必然會使黑格爾對他當時所處的德國現實得出革命的結論；可是，大家知道，他並沒有這樣做。辯證法要求在變化中，在發展中觀察社會生活，而對每一個社會發展中已經達到了的階段，不把它看做是社會進步的最後的结果，而看做是社會以後發展的必要的出發點。可是黑格爾認為當時的德國國家制度是歷史發展的終極結果，而普魯士君主政體乃是絕對精神的體現，同樣不正確的，就是第三卷作者們的論說，黑格爾創造了歷史過程的新理論。在第二二一頁上說：「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底全世界歷史意義，是在他創造了新的深刻化的歷史概念，確立了新的發展概念」。在同一頁上又提出了如下的不正確的論語：「黑格爾在這種深刻的觸及了歷史底本質是規律性的，在其矛盾中統一的过程，是事物底活動的變動的互相聯繫。」

在這點上，作者們實際上並不屬於黑格爾的觀點。在社會上，較之孟德斯鳩和維特根，黑格爾在理解歷史上作了一定的進步。可是黑格爾的歷史觀，斯仍然停留在全部以前的社會學所同有的唯心論的歷史觀底基礎上。黑格爾的歷史觀，除估計其完全歐陽的優點外，不能沒有估計，列寧關於黑格爾曾經這樣寫道：「一般的「歷史哲學」所給予的東西非常少，而

這也可以理解的，因為正是在這一領域中，在這一科學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最大的前進。這塊黑格爾最陳腐和有古董氣味」。(見列寧的「哲學筆記」第二五一頁)

第三卷的作者們沒有注意到黑格爾的唯心論辯證法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的對立，反映着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宇宙觀底對立。大家都知道，黑格爾的辯證法完全用之於過去，它被應用於人類社會的過去的歷史、法律、美學、宗教與哲學的歷史。而且，就是對過去，黑格爾也是從預存的唯心論觀點上，從絕對精神的自我發展的觀點上去解釋的。和這相反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經典作家們，創造了和奠定了辯證唯物論的社會生活觀，他們不僅應用辯證法於過去，而且應用它於人類社會的現今的和將來的發展。當說到應用辯證法於社會生活時，斯大林寫道：「假如世界是處在不斷的運動與發展中，假如新的死亡與新的生長是發展的規律，那麼，很明白的，沒有什麼「不可動搖的」社會秩序，沒有什麼私有財產和剝削的「永恆原則」，沒有什麼農民必需服從地主，工人必需服從資本家的「永恆觀念」。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制度可以用社會主義制度來代替，正如資本主義制度在當時曾經代替了封建制度一樣」(見「列寧主義問題」第十一版第五四〇頁)。

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在應用於布爾塞維克黨的實踐活動上的基本特點之一，就在於不應當指望那些已經不再向前發展的，即使現時還是像動力量的社會階層，而應當指望正在發展着的有其將來的，即使現時還不是優勢力量的社會階層。——斯大林同志說：「這就是說，為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應當向前看，而不應當向後看」。

在第三卷中，康德費希特、黑格爾的哲學，被描寫為主要的是進步的哲學，因此，他們的保守的哲學體系被掩飾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經典作家，曾經尖銳地批判過德國哲學家的保守的政治見解，並強調在他們的宇宙觀中保守方面佔着優勢。例如恩格斯關於黑格爾曾經這樣寫道：「黑格爾本人，不管在其著作中常有革命情緒的爆發，一般說，主要的傾向於保守方面」(見「馬恩全集」第四卷第六四一頁)。
馬克思與恩格斯這樣講到黑格爾的「法權哲學」：「多少親近一些看一下，我們就可以發現，在這種，像許多別的地方一樣，德國唯心論只是批准了現存社會的法律和替它們加上一件超感覺的保護物」(見「死刑」一文，全集第九卷第八頁)。在「哲學

史」第三卷中沒有注意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指示，沒有批判德國哲學以及他們的這類反動的社會政治觀點：如辯揚普魯士君主政體國家，表揚德國人為「特選」民族，對斯拉夫民族的蔑視態度，替戰爭申辯，辯護殖民地侵略政策等等。這樣，在第三卷中，就抹煞了這一事實，即德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們，利用着康德、費希特與黑格爾哲學的反動方面。

例如，在「哲學史」第三卷中，對於黑格爾在其「法權哲學」中關於戰爭的下列反動議論，默不作聲。黑格爾是這樣寫的：「戰爭的高尚意義，正如我在另一地方說過的，由於戰爭才保持了人民底道德健康，它對最後規定性底僵化的冷淡，正如風吹使湖水不腐(如果長久無風則湖水必會腐爛)一樣，戰爭防止人民的腐化，這種腐化將必然地長期和平(更不必說永久和平)底結果」。黑格爾在下面又寫道：「成功的戰爭不給內亂叛亂發展起來並鞏固了國家政權，……：在和平時期公民生活擴展着，一切方面均處於日常生活中，而歸根結底，人民陷於泥潭中，他們的私人的特點日益鞏固與僵化，……：從戰爭中走出來時，人民不僅更堅強了，而且就是那些內部存在着不可調和敵對狀態的民族，也因為對外戰爭得到了內部的安寧。是向，戰爭帶來了財產的無保障，可是這假實在的無保障性不過是一種必然的運動，……：戰爭產生於事物天性喚起它的地方；播火文身，而在歷史的嚴重反復面前，空談對沉默下去」(見「法權哲學」第三四四——三四五頁)。

從上引的引語中，非常明顯地表示出，黑格爾最確定辯護戰爭的必要性。他在這裡是以戰爭的讚美者，辯護士出現的。

在第三卷中對黑格爾的反動議論，表揚德國民族為特選民族，其使命在統治其他民族，默不作聲。當論到世界精神的發展史的自覺意識的前進行進時，黑格爾做出一個一般的結論說，在全世界史上，對於特種的時代，一個民族成為統治的民族，它就可以組成時代：「在這他的成為世界精神發展階段負擔者的絕對權力之前，在今天，其他民族是無權力的，他們以及那些時代已經過去了的民族，在全世界歷史中已經不再計算在內了」(同上第三五六頁)。作者們引用黑格爾的這段議論，可是沒有說明，黑格爾辯護戰爭，是為辯護德國民族「特選性」和在歷史上的特殊作用。

黑格爾在自己的著作中散播着德國的民族主義及德國民族統治其他民族的純粹普魯士原則。
第三卷的作者們，對黑格爾的必需有系統的殖民地化其他民族的提綱，

他無不作聲。黑格爾在『法權哲學』中寫道：「市民社會看到自己被迫的要建立殖民地。人口的增長這一點就已經在這一方面上影響着它，可是特別有實義的是這一情況，即如果生產超過了消費需要時，一部份人民就不能以勞動來滿足自己的需要」（第二五七五）。

在該卷中也沒有揭破黑格爾關於斯拉夫民族的反動議論。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中寫道：「……在東歐我們看到巨大的斯拉夫民族，其居住區域在西方直至易北河與多瑙河流域……但是所有這一羣我們將不加詳述，因為它至今沒有在理性的世界顯示出獨立的契機」（三三〇頁）。

第三卷的作者們沒有指明黑格爾的讚揚普魯士國家的反動意義。在『法權哲學』中黑格爾說明國家是地上的神聖事物。黑格爾寫道：「國家底存在，這是神在世界上的行進，它的根據是理性力，這種理性實現自己為意志。在思惟國家時，應注意的不是特殊的國家，特殊的機關，毋寧是國家觀念本身，這個現實的神」（第二六八——二六九頁）。

國家的最高類型，黑格爾認為是立憲君主政體。他寫道：「國家發展為立憲君主政體是新世界底事，其中本體觀獲得了無限的形式」（第三九六頁）。往下繼續寫道：「在考察國家組織時，即在這裡，在考察立憲君主政體時，除觀念內部的必然性外，不應有任何其他顧慮。一切其他的觀點都應消滅。國家無非是偉大的美術的建築的宮殿，看做是體現於現實中的理性的象形文字」（第三〇六頁）。

在堅持他讚揚反動的國家類型時，黑格爾強調了君主的神怪不可侵犯性

與人民的無法無狀。在『法權哲學』中，黑格爾寫道：「人民，這不過是『無形態的羣衆』，他的行動是『本能的，非理性的，野蠻的和可怕的』」（第三二八頁）。

在第三卷中不正確的敘述了費希特的政治見解。在一六五頁上說道：「費希特的民族主義，首先是他的民主主義的形式，即包圍着費希特對人民有權力自由決定自己政治生活底基本原则的『信念的形式』，可是費希特在他的告德國民族書之一中寫道：『只有德國人，是獨立的人，不匯化在規定的形式中，才真正有自己的民族，外國人是沒有的。因此，德國人能夠有在字義底真正意義下的民族之愛，祖國之愛』。還有『如果德國人不能挽救人類的現代文化，則別的歐洲民族更不能挽救它了』。從上面的說話中，可以看到費希特不是民主主義者，而是普魯士民族主義者。」

這樣，在評述康德、費希特黑格爾哲學的『哲學史』第三卷中，給了德國哲學史以錯誤的敘述，誇大了它的意義，抹煞了黑格爾哲學的體系與之的矛盾，混亂了讀者的頭腦。在該卷中沒有批判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德國哲學家們的反動的社會政治觀點。

一九四三年曾給『哲學史』一二三卷以斯大林獎金。斯大林獎金委員會現在重新審查了這個問題，並決定所與已出版的三卷『哲學史』之獎金，並不包括本版的第三卷在內。

不必說，『哲學史』第三卷，應該根本改造過。在新的改造過的『哲學史』第三卷中，必將給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德國哲學底作用與實質以正確的馬列主義的敘述。

代 郵

奮邁先生：

筆談意見「團結伙伴，爭取民主」，已經收到，但被審查機關扣掉，登不出來。沈邁先生的意見亦已收到，對沈邁君這種關注的熱情，非常感謝，不過他的意見，在「筆談」發表的討論意見裡都已經提到，為着避免重複，只能割愛，盼代致歉意。

笠正先生：

你經過郵政寄的「筆談」討論意見一致沒有收到，謹此佈覆

本刊啓事

一：本期原定刊載毛澤東作「論聯合政府

」(一九四五年四月廿四日在中國共產黨七

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政治報告)，因審查關係

，刊不出來謹向讀者致歉

二：本期合刊因篇幅較平時增加一倍，且另增「哥尼斯基之陷

落」報告文學一冊，零售價格改為每冊一百二十元(附冊在內)。

對本刊原有訂戶，一律隨刊附送，不另加價。

三：「讀者之頁」自從發起「知識青年怎樣推進民主運動」的

「筆談」以來，感謝本刊讀者熱烈的參加討論，雖然這些意見有的

是刊不出來，有的是作者寄出了，我們却始終沒有收到，或者是爲

着避免意見的重複而割愛……惟就收到的這些意見看，可以證明

在時代進步精神的衝擊下，中國知識青年對於這一戰鬥的實踐任務

是在沉毅地探索與追求。

編者綜合了參加討論的諸位的意見，寫出了「筆談」的總結(

全文約一萬五千字)，本來準備在第十期刊載的，因爲審查來不及

，想改在這一期，但不幸全文被扣，以後會另行撰寫，但也刊不出

來，我們深信筆談的文章，雖然可以扣掉，但沒有誰可以阻遏今天

民主的潮流，而且在當前的戰鬥實踐中，中國知識青年是能够鍛鍊

和提高自己的。這一步「筆談」的討論，在這一期結束，希望以後

還能進行對其他問題的討論。

內政部發重新登記證警字第陸捌陸伍號

重慶郵政管理局第六七〇號登記執照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本期零售壹百二十元

羊 群 衆

第 十 卷 第 三 十 期

目 錄

柏林會議的前夕

于 懷

希特勒之戰的故事

P·杜 德

論戰略反攻中的解放區戰場

薛子正

冀中平原的民兵鬥爭

程子華

戰後資本主義的趨勢

許滌新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七 月 十 日 出 版

柏林會議的前夕

德 文

于 懷 (四二六)

希特勒之戰的故事

杜 德 (四三一)

美國的需要和任務(下)

白勞德 (四三五)

論戰略反攻中的解放區戰場

薛子正 (四三九)

解放區的各項統計

(四四三)

(一) 十九個解放區的各縣

(四四三)

(二) 全國人口統計

(四四三)

(三) 全國面積

(四四四)

(四) 全國城市總數

(四四四)

(五) 八路軍新軍及華南抗日游擊隊以來戰績

(四四四)

(六) 解放區主力軍及地方軍實力

(四四五)

(七) 解放區民兵數字

(四四五)

(八) 解放區的報紙總數

(四四五)

冀中平原的民兵鬥爭

程子華 (四四六)

地道戰(解放區報告)

周而復 (四五一)

研 究

戰後資本主義的趨勢

許漢新 (四五六)

書評及其他

人民有力量保障勝利

舒危震 (四六一)

讀者之頁

關於暑期工作

編 者 (四六四)

文化生活提高了

夏 風 (四六四)

羣 衆

第十卷 第十三期

三十四年十月七日出版

發行所 羣衆雜誌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刊價目

本報零售 三十元

六 期 一百八十元

十二期 三百二十元

全年 六百元

郵費在內 國內郵費

兩週評論

柏林會議的前夕

于 慎

三國會議——七十九屆議會——退出新加坡？——琉球之歸納
——空軍決定論者的政治背景——史迪威與五國軍——英印問題的新發展——舊金山會議——聯蘇共政策的真面目。

團結政策的勝利

好幾是風掃殘雲的一樣，歐戰結束後的一月內瀾漫在全世界每一個角落的混亂情勢終於澄清下來了。歐洲的潮流開始退潮，日本的和論終於平息，舊金山會議即行開幕，英美蘇三大同盟強國的柏林會議已經進入到召開的前夜了。

在歐洲處理戰後德國問題的解決是局勢澄清的第一步；在這一點上，六月六日德地盟軍管制委員會所發表的德地無條件投降的條款和管制辦法價值顯的條文有差別時期的波瀾，因為它表現了在處理德國的這一核心問題上，英美蘇所結的戰後戰勝了分裂的政策，一月以來締結份子和孤立份子所不斷鼓吹的分別處理德國的陰謀是徹底地失敗了。

德國問題是一個開始。除掉德國問題在歐洲最足以影響英美蘇三國關係的幾久懸而未決的波蘭問題。克羅米亞會議本已在原則上解決了波蘭問題，但波蘭問題一直是懸而未決，在這當中除掉某些技術問題而外，最足以阻礙波蘭問題的順利解決的有兩件大事：第一是四月中羅斯福總統的逝世。第二是五月初歐戰的結束，在某一程度上可以說，波蘭問題的能否解決是克羅米亞協定能否實現的關鍵。在歐戰結束後混亂的一月中，波蘭問題的僵局幾乎有釀成英美蘇分裂的危險，但現在這一危險的礁石終於從國際關係中開始清除出去了。六月十二日莫斯科，華盛頓和倫敦三方面同時發表於十五日召集波蘭國內外民主領袖在莫斯科會商擴大波蘭臨時政府民主基礎的具體步驟。十七日波蘭國內外民主領袖開始第一次的會議，真自發發願望着莫斯科會議的成功，從各方面的形勢看來，波蘭問題順利解決的日子已經近了。

向然戰後歐洲未解決的問題很多，但問題的性質有別。有些問題是非現在解決不可，不解決歐洲的和平會議就無從召開；有些問題則是目前不能徹底解決，要解決非等到和平會議不可。從這一觀點看，歐洲戰後管理有很多問題未解決，但德國和波蘭問題的開始解決已經足以給予英美蘇三國會議的預路了。

歐洲的局勢澄清，國際團結和國內民主的大勢已昭然若揭，這種大勢對於瀕瀕的法國份子，半法西斯份子，親共西歐份子和封建的專制主義者們是不利的，他們掙扎，他們在還可能掙扎的地方掙扎，那些地方可能掙扎的地方呢？以今觀昔，真不勝其感慨系之，他們能掙扎的地方已經很小了。過去他們生存的心是在京歐和巴爾幹，如今他們可能掙扎的地方只有西歐的邊緣和地中海北岸的一些零星地點了。這一批歷史的渣滓，已經從歐洲大陸擠出來，快被拉到大海裡去了。目前他們的掙扎不過是像一羣快要落水的入拚命地抓住岸上的泥巴而已。

這絕望的掙扎在希臘。這是一樁老故事，這裡的新發展是有保皇黨的跋扈。他們企圖用法西斯的辦法來阻擋民主進步份子的活動，把這些東西清除出去自然首先是希臘人民的責任，但不可不注意，沒有英政府的支持，沒有斯芬比的槍桿，這一批渣滓是不可能泛泛起來的。美國正在大選的前夜，美國人民應該從這渣滓有死去的事實來選擇他們未來的政府。

這絕望的掙扎在比利時，這也是一個老故事，這裡的新發展則有比玉的堅持復位（六月十六日）。比內閣為了反對比玉的這一舉已經辭職，人民的憤怒已無用罷工示威等形式表現出來了，事情的歸結現在還無從斷，但正如同在希臘的情形一樣，正在處於大選前夜的英國人民的責任是不能閃避的。

這國家的揮霍存意大和。這同樣是一個老故事。這國家的新發展則有關係於政治解放而促進政府改組的問題。這問題極其複雜性是在其軍事政變與經濟改良的進程；這政策是英法美意四國對德意法利宜等的實質和精神的，現在波蘭米內閣辭職，行動黨領袖巴里已率領王安伯托之辭職，日籍在對面上好像沒有問題，但正像在比利時一樣，意大利的社會黨不會放棄復仇的企圖的。所不同的，意大利的民主運動在共產黨和社會黨的聯合領導之下，日益堅強，特別是在意北解放之後；這就使得我們有理由相信德意外來的阻力和，意大利的人民是有力量把德意統帥的，意大利正定將法蘭西的道路。

這路徑和法蘭西在西班牙。這是一場出類拔萃一次歐戰後老的故事。歐洲民主了，西班牙再法西斯下去，法西斯有辦法不只好意了；怎麼辦呢？有辦法！佛朗哥將軍就以準備選舉，召開國民大會呀；法西斯政府，；；；有人相信沒有，法西斯沒有。在一個法西斯統治下面，有什麼民主好談？請問如何選舉？如何召開國民大會？太笑話了，收起來吧；法西斯是洗不掉的。事情的發展可能有很多曲折，不過像如第二次歐戰的崩潰點是西班牙的話，第二次歐戰的勝利具有當西班牙的法西斯崩潰的時機，才能算告成。人民的血是不會白流的，終於西班牙的歷史大翻身是誰也阻止不了的。

從歐洲的觀點來看，所有這些過程的複雜不過是一種歷史沉澱的泛濫而已，它可能誘出許多變數；但對於一個新生的歐洲大陸而言，它是沒有任何決定性的。其時，由於美英法使台維斯和賀爾斯頓的分訪英蘇的結果，決定歐洲，不，決定世界進程的三大盟國和柏林會議已經進入到召開的階段。

日寇的決戰態勢

和歐洲進程的進程同時，遠東東洋日寇的和平政策，這攻勢的發動當據東亞四月初蘇聯對日聯中協定當時，但其發展的高峰則在歐戰結束時之後。六月一日歐戰結束對日的國會各派給與和平政策以空前一律，混濁的局勢趨於澄清。及至最近，一方面由於歐洲形勢的急轉直下，另一方面由於遠東之局勢趨於明朗，日寇在和平的國際環境下，已不能不作進一步的打算了。六月八日至十一日的日寇第七十九國的臨時議會反映了這一形勢的發展。這是鈴木上台後的第一會議，在這樣重大的關頭，其意義是不能忽視的。

七十九國臨時議會決定了些什麼呢？和一些樂觀主義者所預料的相反，它所決定不是無條件投降，而是「普通」式的繼續作戰。它通過了三大主要法案：

國民義務兵役法——這是為了加強動員的；將法案把男女服役的年齡限制都加寬了，這就意味著後方軍機後人員的增加。

臨時緊急措施法——這是為了一旦盟軍登陸本土加強政府的獨裁權力的；這法案雖然未作滿足立即成立軍政府一派人主張，但已向這一方面走近了一大步。

成立地方警備部——這是為了一旦盟軍登陸，賦予各地方獨立作戰能力的。

統觀這三大法案，可以看出日寇的七十九國議會的主要任務是加強本土的防務。第一條是關於這一切以求求和的辦法，但從另一個觀點看，不能不指出：日寇七十九國會議的裏心依然是戰不降和，儘管這戰和是日寇不降的假和。

軍心在戰不降和，這不僅是表現在日寇防衛本土的新措施上，而是表現在它在中國大敵和南洋各地的美力部署上。甚至今日大敵再沒有人幻想以爲日本會從中國大敵不戰而退的了吧？剛週以來，日寇在粵北嶺南的新攻勢，指明了它西圍東一帶的撤退。它從某一方面撤退，但在另外一些地區却又進攻。雖然如此，我們不能把某一些方面的撤退認爲是一種大撤退的開始，而只能認爲它是一種兵力的新部署。而這一新部署的方向今天已經漸漸顯明起來了。直至現在為止敵人所有的撤退限於華南；而在那當中，敵人的原則顯然是以萬里華南東部的邊份突出地帶，避其兵力的過度分散，而將其主力集中於粵漢路兩邊。這樣一來日寇在華南的兵力就佔據了一個非常機動的地位。假如盟軍在廣州一帶登陸，它可以南下向中國海岸集中；假如盟軍在粵中沿海登陸，它可以北上向上海附近集中。這一種機動態勢在盟軍登陸時有在華中或華南登陸的今日是非常必要的。從這看，我們可以指出：日寇在中國大陸的新佈署，其目的不是為了逃避盟軍，而是為了迎接盟軍，雖然它是在不利用它的局勢撤退，作爲它發動反攻和平的資本。這是日寇在中國大陸的一把劍。

日寇在南洋——緬甸、泰國、馬來、蘇門達臘、安南、荷印一帶的大調動，是正如同有人希望美軍立即進攻日本本土，使其不致海軍中斷——最低限度退出華南的一樣；另外有一些人則一心希望美軍登陸日本本土，使其不致退出南洋。最低限度退出新加坡。這顯然是早在五月初日寇逼臨仰光時就已醞釀地產生了，但公認地這道一顧望是最近的事情，六月二十日倫敦每日郵報的記者估計有這可能，二三日來已經有很多的人在那裡猜測了。日寇在南洋是新的調動，但截至目前為止，我們看不出有任何確實足以證明它有退出新加坡的模樣，一個常常為那些自命為軍事家的人們所忽視的理由，不容許日寇不戰而退出新加坡：一旦日寇退出新加坡，它便沒有向英國發動政治攻勢的重大資本了，但日寇關係卻是日寇發動安南最大資本之一。單憑這一點簡單的常識，我們就可以斷定日寇在目前絕無退出新加坡的可能了。日寇在南洋是有新佈置，但新佈置的動向不是放棄南洋，而是把南洋轉變為一個獨立作戰的戰區。

不論是在日本本土，中國大陸或是南洋，日寇是「一併推」下去的，當時的問題是同盟國家——特別是擔負對日作戰的主要責任的美國盟邦如何以最小的犧牲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求得徹底的勝利。

美國的戰略動向

由於琉球之戰的結束（六月二十一日）這一舉動日本的戰略問題已經從上現實的隱憂日趨於了。在這種不能不指出，美國方面指導的戰略思想半年以來是經過了很大的變化。這在去年非馬之戰開始的時候，美國方面就有人主張直接進攻日本本土，在這一戰略思想影響之下，美國修正了它多年以來所主張的在中國大陸，配合中國的所有抗日力量擊敗日本的政策，這在舉世聞名的史迪威事件上，這件事發生在去年十二月。從去年十二月到現在，六個月過去了。六個月中，美軍在太平洋上有了劃時代的進展，呂宋之戰光輝地站在前頭，跟隨來的有硫磺之戰，這些都是神祕的紀程碑，把戰爭帶近日本本土的歷史性的大戰役。但，不可忽視，隨着戰爭的逐漸接近日本本土，戰爭的艱苦性也日甚一日地顯示出來了。硫磺之戰，在美洲國內所引起的情緒不去說它，近在眼前的琉球之戰是一個最生動的例證。六月十七日尼米茲元帥的建議以公開的承認戰事進展的緩慢和死傷的慘重超出預料之外；六月二十日美十軍軍長巴克納在大琉球前線的英勇犧牲推測地說明了琉

球作戰的艱苦。琉球之戰已復如是，本土之戰更將如何？

那麼什麼是最迅速而又犧牲最小的擊敗日本的戰略？

三種不同的戰略思想在鬥爭着：

第一，空軍決定論。如所周知，在空襲日本的戰史上，自從去年六月十日日寇空襲曼徹斯特地起算第一次為守九州以來，到今年六月十四日，整整一年了。在這一年中，日寇空襲曼徹斯特七十七次，日本海軍在工業城市：東京，名古屋，大阪，神戶和橫濱，除東京一地而外，幾乎所有的工作區域都空襲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偉大的成就。另一方面，從今年六月十四日起以後一年中，美國海軍向日本本土投彈二、〇〇〇、〇〇〇噸（六月十四日，安諾德），其破壞力之大是可以想像的。空軍決定論者，以為空軍的攻擊轟炸就可以使日本投降了。這種戰略思想在美國相當有力。在這種思想下在深入批評這一種戰略思想的時候，但需指出：這種戰後思想是和委員會主席，哈爾頓五將：「世界人士深信日本將於三月內投降，否則戰爭即將再延長二年」（六月十四日，華盛頓合衆電）；憑什麼叫日本三月內投降？空軍？真是無條件投降嗎？不是，有條件投降。這是一種非常有害的思想，但不幸太平洋波洋，不少美國人士還沉沒在這種思想裡。

第二，本土決定論。有很大一部分的空軍決定論者，化裝成本土決定論者，他們說空軍也是必需的，而且也是必需的，但經過空軍的轟炸以後登陸就容易了，因此他們主張上陸軍進攻本土，實際上這是以空軍為主的。因此，嚴格的說來，真正的本土決定論者在今天的美國是很少的，因為只要認真地考慮一下：把琉球之戰與到非馬事件是十個何等的困難，這是任何人都能得到的。這一派人的論據是空軍本非無條件投降軍火大一些，但一旦登陸成功，日寇和其他各地就會自動投降了。今天的問題是，一：在目前的形勢之下直接登陸日本本土，其犧牲之重大將是不堪想像，而另一方面，從日寇在各方面準備獨立作戰的佈置看來，本土決非無條件投降，它在中國和南洋的抵抗絕不會停止的。試一設想，假定空軍是無條件投降各國人民在後方境內給予援助那樣地進行打擊，盟軍在後方境內的戰鬥能那樣順利嗎？然而儘管如此，本土決定論者依然十分沾沾自喜，這不是因為他們準備付出那可怕的代價，而是因為他們在骨子裡還是相信空軍萬能的源故。

第三，大陸決定論。這一派人的思想並不以為在大陸登陸就可決定一切，不，他們了解：要打擊日本要經過三番五次的決戰，而在這當中，大陸的

決戰由於有中國人民武裝力量的配合，應該先行於本土決戰；無論從戰略或戰術方面看，這都是最合理的程序。代表這種戰時思想的典型人物是史德威將軍。

從所有的材料看來，這三種戰略思想好像還有一種在英國已獲得決定性的支配地位，很可能是三者兼而有之；即，一方面加強空軍的轟炸，作為未來登陸本土的預備，另一方面本志作大膽決戰的佈置。不過，必須指出，由於玩弄之戰的經驗和教訓，主張大膽決戰的一派戰略思想又慢慢地抬起來了。這是一種戰戰兢兢的轉變，這表現最近（六月七日，十六日）史德威將軍所發表的兩次談話。第一次，六月七日在大英球，他說：日本本土雖即淪陷，敵人在中國及越南繼續抵抗。第二次，六月十六日在馬尼刺，他說：沒有任何跡象足以說明日寇有從大陸撤退的模樣；要擊潰日本，必須在中國大陸進行決戰。史德威將軍注意的，是史氏已離巴克納將軍任第十軍軍長，指揮美軍的下一輪門行戰。六個月前，（被略）

現在，史德威將軍又歸來了，那麼一種新的轉變不是可說又在醞釀了嗎？

英印僵局的打開

在這場必須指出又一件對於遠東戰爭有重大影響的事件，英印僵局的打開。

六月十四日倫敦和新德里同時發表了英政府對於解決印度問題的白皮書，根據這白皮書的結論：英政府決定，改組印度總督下的行政會議為印度各黨各派共同參加的機關，印度政府除印度大臣一職仍由英人擔任而外，其餘各部（至於內政、外交、財政……）竟由印人擔任；各省行政會議亦根據同樣原則改組；同時，並決定印度政府在戰中的國民大會領袖，解除禁止國民大會活動的禁令。據英政府方面表示，這一打開僵局的努力對內為扶助印度逐漸取得自治的地位，對外為進行對日作戰。

白皮書將建議的詳盡內容現在還不知道，因此對於該建議本身還不能作進一步的批評；不過，無論如何，在這東戰爭進於決戰階段的今日，英政府這一打開僵局的努力是值得讚揚的。

自從一九四三年春克利浦斯訪印之行失敗，同年八月國民大會領袖被捕

入獄以來，快是三年了。三年來整個戰爭的形勢改變了，最顯著的改變是歐戰已經結束，英國已不復處於西歐多事，無暇顧的地位了；這就使得它有打開印度僵局的可能。另一方面，歐戰結束，對日作戰成為今後的唯一課題，而任何英國在遠東方面大規模的作戰沒有印度積極參與是不可能想像的，這就是使得英政府有打開印度僵局的必要。這其結果必然會造成了英政府漸漸解決印度問題的物質基礎。但這並不能說明將來的全部。英政府必須在這種時候解決這一問題，還有更迫切的理由在：第一，經過了這幾年戰爭的教育，在印度共產黨的團結進步政策的指導之下，印度人民已覺醒和組織更加提高和堅強了，馬尼刺夫人在舊金山的呼聲喊出了印度人民的要求；第二，當這國會雖然不是一個處理地方性的會議，但在這一會議中殖民地問題雖然已變成全世界以進步人民為中心的問題，在所有的殖民地問題中，印度問題是一概示的；第三，英國大憲章（七月五日），保守黨政府為了競選必須對這一感受人民要求採取一個起碼的表示，英國的進步人民是絕不容許一個把另外一個民族自由和憲法在後撤的，總督已囑咐大改組正的自由民主的政府組織當政的。總督的這，就大大地阻礙了英政府毅然打開印度僵局的決心和時機。事情的內容既如此複雜，我們對於這一建議書的內容就更不能粗下斷語了。

總督對新的對點是一目瞭然的，例如所有這一套改革只限於英屬印度各行省，這不在內，這顯然不是一個關於全印的方案，它包含著強烈的分而治之的氣味，這是一。其次，國防一職由英人擔任，這又顯然有意讓克利浦斯建議的老套，它維護真正的自治領地位很遠，從這山會議中我們僅得了自治和獨立的概念，但現在則連自治領談不上，這是二。有此二者，我們可以說這白皮書不應該是一個一成不變的定案，而應該是一個談判的起點。作為一個談判的起點，這白皮書的建議是有它的優點的。例如印度的外交事務由印人自理等都是值得讚揚的地方。

問題是複雜的，我們不希望這種複雜的問題能在一兩天之內就求得解決，但我們希望已經打開了的僵局之門不再關起，一個進步了的世界已不容許任何一個落後地區永遠的停留在落後的位置了。

得對白皮書言，沒有一個作為自由獨立的民族印度的積極參加，不可能取得迅速而犧牲最小的勝利；從戰後和平算，沒有一個作為自由獨立的民族印度積極參與，不可能有持久而鞏固的和平，中國人民一心一意觀察印度

人民的獨立與解放，問題的解決可以是最漸進的，但那漸進的進步必須是實質的進步。

中國是世界中心

千百道河流奔向舊金山，舊金山會議雖不討論全世界每一個角落因每一天所發生的每一件具體事件，但整個世界局勢的變化無疑的在會影嚮到舊金山會議的進行的，舊金山會議這一把鏡子，整個世界局勢的發展是反映在遠鏡子上的實體。由於歐洲逆流的退潮，由於遠東局勢的澄清，由於英美蘇三強關係的趨於正常化，舊金山會議已經到勝利結束的前夜了。舊金山會議是一個制定世界和平大憲章的會議，戰後世界和平與安全的能否維持與鞏固在本質上要看英美蘇三大同盟強國能否在全世界所有的具體問題上團結一致。舊金山會議的即將勝利結束，證明了英美蘇國結一致的意志，是能克服一切的。在歐洲，英美蘇的國結已經克服了最大的困難，而逐漸走上和平與發展的道路；現在，新的考驗又來了，新的考驗在亞洲，即將到來的三巨頭會議正是站在這過去的考驗和未來的考驗之間。

不論從任何觀點看，中國的民主團結問題已經變成當前世界政局中頭等重要的問題了；從戰爭本身發展說，琉球之戰已經結束，盟軍的下一步有非常大的可能在中國的海岸登陸；假如中國的民主團結問題不解決，從登陸的第一天起，嚴重的問題就將發生。有些人以為這些問題可以用斯考比將軍的辦法解決，他們忘記了這總是中國不是希臘。其次，民主團結的問題不解決不僅不能在中國大陸上進行目的決戰，而且本有可能的在，在這次戰役未到來之前，中國的內戰就已經爆發了。有些人以為速戰速決的內戰打一下亦無妨，當前的問題上，海峽內戰戰遺者的力量，使他能迅速的擊敗所有反對者的抵抗；這些人們很聰明，但他們忘記了中國的人民曾經進行過十年的流血抵抗，更何況今天中國人民的力量千百倍強於當時了？從英美蘇蘇中特別是美蘇兩國在遠東問題上的合作說，中國民主團結的問題更非解決不可。在這一問題中，人們已經懂得了遠東問題沒有蘇聯參加是不能得到最後解決的，這是一天進步。但可惜這道理是遲遲的，遲遲到不僅不足以加強三大同盟強國在遠東的合作，而且是在妨礙着蘇聯合作的展開。

臥室一側，以明真理。

「蘇聯的參加遠東戰爭將產生某些確定的後果：它將加速日本的失敗，它將帶進大批的蘇聯軍隊到亞洲大陸，它將使蘇聯成爲亞洲事務主要的決定者之一，它將消滅歐亞兩洲之間歷史的區分。橫跨着波羅的海和日本海之間廣泛無垠的地區，新蘇聯像徵着我們這時代中一件最大的地緣政治的事實，不是在單獨的歐洲或單獨的亞洲，而是在作爲整體的歐亞兩洲，它是這一個地球上最大的一個地塊（到這細爲止多多少少都是正確的——引用者）以蘇聯的現政策爲根據，蘇聯在這一片廣漠地區的東頭究竟有什麼目的和需要呢？

可以預料：它將要求合併或用別的方法支配新疆——外蒙古——和滿洲這一連串巨大的邊疆地區，這邊疆地區和蘇聯有四、〇〇〇哩長的共同邊界（注意啊！——引用者）

美國在中國的利益主要是地是經濟性的。這是全世界中唯一可供美國經濟和金融活動的最大剩餘地區。照華盛頓的觀點看，這一個機會一直到現在會延誤閃爍的，捉摸不定的；但目前只要中國能建立一個「穩定」的政府，它就可以變成現實。……這一個政權必須對美國利益「友好」，保證互相有利的合作。一世紀以來處於內憂外患中的中國一直未能建設成這一人已嚮往的目的。

蘇聯再已還需成年的時光才能把它自己的國內地區發展起來，只要它能修把亞細亞的邊疆（即上述三地區——引用者）併於它的控制或決定影響之下，它大概是不會反對美國實現它那偉大的夢想的（注意啊！注意啊！——引用者）（新聞週報，五月二十八日，伊薩克爾文）。

「這以帝國主義者的存心去揭發蘇聯，實際上地鼓動反蘇，至於拿這種醜聞去和蘇聯辦外交，那可以說是辦一世也辦不成功的」。不幸的是，這種態度竟支配了太平洋兩岸的好多人；「這是一種國際規模的所謂蘇蘇孤共的政策，但其實質都是既反蘇又反民主」。這樣的態度一天不改變，中美蘇蘇在遠東的全體合作是無法實現的。

問題的關鍵在那裡？人們企圖用這樣的方法來避免解決中國民主團結的現實問題；而實際上，這問題的不解決，中美蘇的在戰時和戰後的團結是無從實現的。

三巨頭會議不遠，孰是從「綠大的夢」中醒來的時候了。

六月二十二日

希特勒之戰的故事

P·杜德

希特勒的對歐洲及世界各自由民族的法西斯侵略戰爭，並不開始於一九三九年九月，它早在一九三九以前幾年就開始了。
希特勒之戰，法西斯侵略之戰的真實事實，可分六個主要的階段：

一、侵略的前奏曲

希特勒的侵略，開始時在於反對德國人民。以大規模的暴力，懲刑，集中營和屠殺，納粹主義設法在實質上殲滅一切共產黨人，誠實的社會黨人，工人階級的戰士，民主份子和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人。

在這些年間，民主國家能够復原易抑制希特勒，德國的軍備薄弱，民主國家的軍備要比德國強得多了。

然而反動人士贊成希特勒，把他當作反對歐洲進步力量的警察，並且希特勒用讓步來使他的侵略轉向蘇聯。

法國政府當時要求採取行動，以維持和平條約。英國反動派加以反對，而且以一九三五年的英德海軍條約，公開鼓勵納粹非沙皇暴政。

這樣，鼓勵了希特勒進行公開戰爭。他開始於一九三六年，在西班牙，用他的武裝部隊，和佛朗哥尼的武裝部隊在一起，推翻了合法的西班牙政府，建立了佛朗哥的血腥的法西斯統治。

一九三八年三月，他併吞了奧國。九月間，在慕尼黑，在張伯倫和達拉第的援助之下，他肢解了捷克。

在一九三九年春天，他揚長而入布拉格，併吞了捷克的剩餘領土，秋天，他進攻波蘭。

蘇聯有準備。

蘇聯一聞消息正準備了希特勒的威脅。從希特勒登台之日起，蘇聯

很快地增加武裝，以備將來的鬥爭，從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九年，它的武裝增加了二十七倍以上（從每年十五萬萬盧布增加到四百萬萬盧布）。

蘇聯偉大的國家審判，在戰爭爆發之前就粉碎了第五縱隊。

蘇聯曾毫不疲倦地努力設法和民主國家聯盟，以對付希特勒。一九三九年春天，它提出了英法蘇同盟條約的具體建議。

張伯倫在一九三九年四月在一篇演說中公開發表了這個建議。英法會和波蘭及羅馬尼亞訂許多條約，但不跟蘇聯訂條約。

在壓力之下，英國在一九三九年夏天派了一個代表團到莫斯科去，但該代表團毫無權力。蘇聯軍事專家們的防波蘭，以對付迫在眉睫的攻勢的建議，是被拒絕了。這樣，戰爭就變得無法避免了。

當爭取和平的每一個具體建議的建議都被拒絕，而戰爭無法避免的時候，蘇聯就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自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協定，粉碎了慕尼黑份子的陰謀。

二、「偽裝的戰爭」

納粹主義在九月間蹂躪了波蘭。英國和法國在軍事上並沒有援助波蘭。蘇聯的援助，則已在夏天的談判中被波蘭法政府拒絕了。這樣，造成了腐爛的波蘭國和波蘭軍隊的崩潰。

只有蘇聯的軍隊曾在波蘭東部的地區阻擋了納粹軍隊的前進，並且解放了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這兩個地方，是二十年以前波蘭從蘇聯那裏奪去的。邱吉爾曾對紅軍阻擋納粹匪幫的前進，極為稱頌。

而在西線，一切平靜無事。兩軍在馬其諾和齊格非防線消極地面對面。英國飛機空襲德國，只丟傳單。

這是「偽裝的戰爭」的時期，或如希特勒報後所說，是「不可避免地引

一九四〇年大維的假裝戰時的時期（見報一九四二年三月二日專電）

芬蘭之戰

英法的軍事準備，對納粹德國消極，對蘇聯是積極的。他們把軍火，坦克，大炮和飛機送給芬蘭和芬蘭法蘭西主義，用來在一九三九年至四〇年的蘇芬之戰中反對蘇聯。

英國送給芬蘭法蘭西主義的飛機數目多三倍。蘇聯緊要時英國送給蘇聯所有的飛機數目多三倍。

當時，會準備派一支英法法軍去對付蘇聯；張伯倫宣佈說，「在三月初，一支十萬人的遠征軍可以準備就緒」——這比芬蘭法蘭西主義所要求的早兩個月。

英法反動報紙，公開地說起「扭轉戰爭」，使它成為反蘇戰爭的企圖。所有這些計劃，蘇聯政府的遠慮和效率打碎了。紅軍粉碎了人類頭腦堅不可摧的曼納林防線，而在英法軍隊能夠到達芬蘭以前，在三月十二日結束了芬蘭之戰。

「扭轉戰爭」的企圖也完結了。這打擊在法國的右。納粹主義把其動員向西方。對蘇聯和蘇聯戰爭開始了。

三、征服歐洲

一九四〇年四月，希特勒發動了丹麥和挪威。英法派到挪威去的戰船而準備不足的軍隊，不得不撤退。

張伯倫倒台了，邱吉爾於五月十日取而代之，組成了一個聯合內閣，包括自由黨和工黨，但依然包括張伯倫以及許多慕尼黑派人在重要地位上。

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納粹對西歐的閃擊戰開始，德軍侵入比利時和荷蘭。

五月十五日，荷蘭被投降；五月十七日，比利時與法德投降，雖然他的行動比國內閣所希望。

受重大壓迫的英國海軍，面對極大的威脅，在五月末和六月初從敦刻爾德撤離。

英倫之戰

於是，全德閃擊戰指日可待。在考驗的時期，法國國家被德軍統帥的部隊佔領由於有第五縱隊從中活潑的深淵腐蝕性，就暴露出來了。

他們用反法內戰戰爭的名義，把壓迫的機器不用來對付法蘭西分子和第五縱隊，却用來對付法蘭西有經驗的官法西和威士非德黨人。

共產黨黨員的投誠人進來了，甚至被刺死；工人會被打碎了；人民為多費的市議會解散了；而法蘭西分子，却在一望無際的廢墟上。自由黨在親法內戰的災區則以當成為副總理，親法內戰的災區則以當為副總理。

軍事上無端到什麼程度，直接的寶圖，做開前線到什麼程度，英法軍隊來的官方調查最後加以揭露；但公認已經指明以當年早許多年即就準備投降德國了。

法蘭西的統治者們自己的人民比希特勒還厲害。他們把巴黎移交給希特勒，沒有經過戰鬥。在六月十七日，貝當組成賣國內閣，以簽訂停戰協定。

戴高樂將軍，當時流亡在倫敦，被英國政府承認為「一切自由法國人的領袖」。法蘭西共產黨在國內建立了武裝運動，以繼續法國的鬥爭。

墨索利尼，這非希特勒的「非交戰國」的盟友，認為德軍打到的時機已到，在六月十日對法國和英國宣戰。

由於法國的崩潰，考驗英國的時刻到來了。全國人民以毫不遲疑的勇敢和精力，對付危局。

英政府人員在五月間有了一些變動，這更動是恰當其時的，雖然還沒有排擊慕尼黑份子，至少削弱了他們的權力。

英國的領導權於是操在統治階級的愛國派手裡，邱吉爾代表著他們，主張對納粹德國進行不屈的抵抗，保持勝利信心，和工人運動的代表們聯合，英國的勝利，這就站在作戰的基礎上。

英倫之戰

除非擊破英國空軍，而對法英的無法克制的海上優勢，希特勒的入侵英國的志願是不可能完成的。

這是一九四〇年夏末歷史性的英倫之戰的問題所在。其時德國空軍的大部份，進攻這道英倫的英國空軍。

英國英勇地忍受了閃擊，在輝煌的空戰中，抵住了德國攻擊。

希特勒逼緊了。在德東方邊疆上，站著蘇俄及其強大的紅軍這一層，正如希特勒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宣言中稱呼這蘇聯的疆域時所說的「一線」，是阻止德國在一九四〇年夏用全部力量對付英國的障礙。

這線，希特勒之願的結果，希特勒是受到破壞了。他在一九四〇至四一年冬天，以其有強大破壞力的潛艇戰和空襲來對付英國，但並無決定性的效果。

一九四〇年九月，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簽訂軸心公約。

德國在一九四一年春天佔領希臘。進攻蘇聯的條件是成熟了。但當時南斯拉夫和希臘的人民鬥爭，已經顯示歐洲的民族抗戰的情緒日益增強。

四、進攻蘇聯

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發動了德蘇大的攻勢，進攻蘇聯，這，已經證明是大戰的轉折點，是決定大戰結果的關鍵。

並不立戰，希特勒使其全部武裝部隊——其時歐洲的主人們，對蘇聯進行閃擊，在他們後面的，有歐洲被奴役的三萬萬人的切實援助。他的閃擊戰企圖在六個星期之內粉碎蘇聯的抵抗，於是轉而進攻東方，稱霸全世界。

但一九四一年的情況，再不是蘇聯是或一九三九年時的情況了。蘇聯是主義的災禍奇大的結果，歐洲人們團結。

希特勒用蘇聯在五月初飛到英國，德蘇尼黑份子交援，企圖在攻蘇之際取得英國的合作，這個企圖是失敗了。

在德進攻蘇聯的那一天，即宣佈宣佈了英國完全而毫不遲疑的和蘇聯站在一起的立場。七月間英蘇同盟條約，更肯定了這一點。

美國在羅斯福總統之下，曾在一九四〇年給英國以支持和供應品，也同樣地資助蘇聯。

聯合國家

當日本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襲擊珍珠港，隨後蘇聯對美國宣戰，把美國捲入戰爭的時候，英美蘇建立了反希特勒的戰鬥台伴，並且在一九四二年初，在聯合國國家的同盟中充分實現了這合作。

雖然如此，在那危急的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蘇聯不得不單獨承擔一切粉碎希特勒的全部精力，納粹軍隊其時正是所向無敵的，威力達到最高峯，而且軍有背信棄義的奇襲的便利。

歐洲全部兵工廠以及六個附屬國的全部軍隊，都聯合於希特勒。東線以外別無其他戰線。德國戰力的優勢是排山倒海的。

盟軍方面的意見，認為蘇聯會使納粹蘇聯的其地國第一線，在蘇聯軍團之兩面進攻。當納粹蘇聯的攻勢而蘇聯的戰線，希特勒必是受其威脅「已崩潰了，再不會起來了」。

戰局個全世界為之驚奇。閃擊戰第一次贏了。納粹軍隊第一次遭到了失敗。

閃擊戰下場

德軍竭力趕到列寧格勒和莫斯科近郊。在邊境，他們給擋住了，於是

一九四一年的冬季降臨到他們身上，發覺他們已無準備。

在俄蘇聯的嚴冬，紅軍開始反攻，挺進達二百五十哩。

在一九四二年夏天，納粹軍集中更大的排山倒海的兵力，重新開始了攻勢。

這一回，他們不再企圖在北中南三線同時推進，却集中南線，向伏爾加河高加索前進。他們到達了伏爾加河上的斯大林格勒城。於是給擋住了。

一九四二年八月間，斯大林格勒的史詩開始了。一星期又一星期，一月復一月，納粹軍隊其軍隊進攻斯大林格勒。

希特勒宣佈道，「斯大林格勒一定是我們的——你可以肯定這一點」。但是德國人從沒有取得斯大林格勒。

到過年的時候，圍攻的軍隊被圍了。斯大林格勒之戰結束之際，德軍達了空前的災禍，鮑羅索元帥及其殘餘部隊，在一九四二年一月間投降了。

五、斯大林格勒到今天

斯大林格勒之役是大戰的轉捩點。這之後，蘇聯的反攻就一直向前了。納粹命運的衰敗繼續着。

北非的德軍在邁達尼進，退入埃及的一戰之後，這重要進攻，在埃爾阿拉曼打敗了。德軍的人數不多（北非戰場總共有四個師，德軍十一個師），而蘇聯戰線的德軍有一百七十九個師，蘇聯國家的軍隊有八十二個師）；但這一戰，標誌了德軍在北非的勝利進程的開始。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英美蘇聯在非洲西非戰場上，對一九四三年五月，北非全部肅清了。七月，西西里島佔領。到七月底，墨索里尼下台了。

盟軍於一九四三年九月攻入意大利，意軍的代替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統治的政府，和聯合國國家簽訂了停戰協定。

意大利之役一直延長到今年五月間，意國北部德軍投降的時候，才告結束。

第二戰

而斯大林一開頭就強調，認為最後擊敗希特勒所不可缺少的西線第二戰，却遲遲未開。

在一九四二年五月，英美蘇之間關於在歐洲建立第二戰場的迫切任務的協定，曾經公開發表。可是這個任務並未完成。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斯大林把他的演說的主要部份，談到歐洲大陸上的第二戰場問題。

到一九四三年夏天，企圖打意大利之役名為西線第二戰場的荒謬理論，以及通過所謂「軸心國的肚臍」攻入德國的說法變得誇張的時候，西歐登陸的問題，愈來愈迫切了。

在一九四三年七月，納粹向東線斯大林作最後的攻勢。雖然這次以空前密集的機械化部隊進攻，進攻勢在十天之內被粉碎了，而蘇軍的偉大的壓倒一切的躍進於是開始，一直推進到德國的心臟里。

十月間，過着西河。到十一月，解放了基輔城。

終於，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邱吉爾、羅斯福和斯大林，在德黑蘭舉行第一次會議。

德黑蘭會議，對於西線開第二戰場，對於調整推展納粹力量的聯合攻勢，達成了完全的協議。最後勝利條件，終於建立起來了。

德黑蘭會議第一次宣佈了三大強國在勝利之後，在和平時期繼續合作，以在國際合作的基礎上建設民主國家的大家庭的願望。

六、最後階段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英美軍在法國海岸的順利登陸，開始了大戰的最後階段。兩線戰線終於形成，註定了希特勒的命運。

經過激戰，盟軍奪取了納粹的機械化部隊，衝到瑟堡半島和諾曼第海岸地區以外。這之後，整個法國門戶洞開了。

法國內地軍會大大地幫助了盟軍的迅速挺進。

八月間，法國內地軍在五天的英勇戰鬥之後，解放了巴黎——這一戰洗滌了四年以前法國未經鬥爭而投降的恥辱。到九月間，布魯塞爾自由了。

納粹守住了法國沿大西洋海岸各港以及荷蘭的北部，盟軍在荷蘭北部安享的登陸，遭受了頓挫。

無畏的戰軍，却顯示了納粹陣營內部危機的日益增漲。

衆叛親離

同時，無法抵禦的蘇軍的攻勢，擴大了規模，掃蕩着東歐。從波羅的海起，到巴爾幹止，解放的前線着着挺進。

希特勒的衛星國被剝奪了。在五月間，羅馬尼亞和芬蘭簽下了停戰協定，十月間到保加利亞。蘇托，得到紅軍的協助，在南斯拉夫加緊順利挺進。

在蘇軍的挺進，納粹軍難於守住陣地，並被迫撤退。希臘人民解放軍解放了雅典。但後來由於英軍在斯考比將軍領導下闖入希臘，結果就有反對希臘人民的不幸的反抗，而實際的法西斯和實政份子，暫時重新建立了武裝暴力統治。

然而，這樣的陰影，並不能減弱整個歐洲解放的大進展以及整個歐洲的民主力量。

倫斯德德指揮下的納粹軍在西線進行了最後的反抗，這反抗開始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終於在一月間被打退了。

一九四五年年初，聯合國軍隊從東西南兩方面進入德國國土。正月間，華沙和波蘭被解放，最後一個衛星國匈牙利，簽下了停戰協定。

二月，邱吉爾、羅斯福和斯大林的克里米亞會議（羅斯福在四月間逝世以前的最後的會議）爲了未來，解放的歐洲，爲了解決德國，爲了永久和平的組織，爲了準備德意志會議的道路，制定了聯合國國家的綱領。

無暇喘息的速度

二月，蘇軍渡萊茵河。三月，盟軍渡萊茵河。其後事變的速度，令人無暇喘息。

四月間，蘇軍解放了維也納。到四月中，蘇軍對柏林的攻勢開始了。蘇美兩軍於四月間在托爾高會師，納粹德國的殘存領土，這就被分割爲二。

北意大利的軍艦奔騰起來的大推軍，和盟軍的攻勢一起，使墨索里尼及其幫兇受到迅速的處決。

希特勒設法投降西方的消息不斷傳來。在五月一日，德方宣佈希特勒之死和鄧尼茲將軍上將的繼任，明明白白地揭示了納粹統治部最後互解時期。

納粹繼續對「希爾塞維克主義」作戰，作最後五分鐘的努力，企圖分裂盟國，可是沒有效果，而在五月七日，德國最高統帥部宣佈了「德國一切戰鬥部隊的投降」。

尚未完成的工作，是完成並鞏固勝利，消滅全德國，全歐洲和全世界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最後殘餘，並在各民族在這次大戰中苦鬥得來的勝利的基礎之上，進行重新建設的工作，使法西斯主義再不能利用戰爭來威脅全世界，再不能逼阻人類日益迅速的進步。

(以沛譯)

美國的需要和任務(下)

W. 白勞德

三、美國戰後經濟計劃

政治的綱領，在最後的分析上必須具備經濟的基礎；經濟的綱領必須在政治上，有其表現。實際生活中政治和經濟的兩大側面是密切地互相關聯的，這其中任何一個側面的變動不可避免的要引起另一個側面的變動。必須再三重覆這一常識，因為那些庸俗主義者們正在那裡信口開河地認為德黑蘭協定的一純粹政治」的性質。

美國必須制定一個適應于它的作為德黑蘭協定主要參加者的腳色的經濟綱領。這樣的一個經濟綱領不可能憑空想像出來，也不可能是一個孤獨的天才的複雜的想像力的「發明」。它必須根據今日美國經濟中的一些既成因素建立起來，這包含了我們美國社會和政治制度的階級構成，它和周圍世界的聯繫。它必須從不同階級的利益衝突中找到一個共同利害之所在，從那一個共同點逐步建立起來。這就是要在不同的階級和集團中求得最大限度的協同，引起最小限度的對立；在這些不同階級中起着主要作用的是企業家（產業和金融資本以及他們的經理）和工人階級（產業工人和農人），這一共同利害的焦點已經在公開討論中揭露出來，它而一致要求：戰後應由美國經濟必須維持充分工作和全部就業。

對於我們正統的經濟思想，這是一個決定性的轉變。爲了了解這是一項完全新的思想，我們應該回憶下，直至一九四二年美國政治與社會學院應採取的完全相反的立場，那時它說：「一切關於戰後美國經濟的考慮必須認定一個不可懷疑的真理，那就是：鎊幣一停，一戰既之開，美國的國民收入就要從它的戰時高峯，跌落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但在一九四四年的今天，沒有一個機關或個人堅持這種觀點了。今天，除掉那些要求美國經濟發揮到它的能力限度的保障的以外，所有其他的政策都沉寂下去了。

讓我們看一看，能不能用最簡單的試把這一個問題的主要之點確定起來，不致迷失于繁瑣細碎的巨大森林裡邊。我們國民經濟戰後充分工作的意思，就是我們的國民收入，用貨物和勞役的生產來說，必須維持戰時已達到的水平（一九四三年是一八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一九四四年估計將爲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以上）。這個數目字需要調整的是，隨着武裝部隊的復員，現有的勞動力增加了，這可以看作需要調整的最小限度的估計。

問題的中心是這個數目字的一部份，那就是代表政府戰時訂貨的八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至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戰爭一停止，這個市場立即突然而自動地消逝了，除非是作爲一種救濟措施，把它的一部份，人爲地加以保持而外，我們的問題是立即找出一個代替戰時生產市場的平時生產的市場。任何新的考慮和設計，假如不針對這一中心問題，只能有次要的意義。巴魯區——漢可克報告中工業復員的問題只涉及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價格的作戰物資，但我以爲問題的要點不在商品的購買而在市場的特性，因爲前者只涉及，復員的技術問題，而後者——全部戰時市場——才是真正的經濟問題。因爲不論是戰時或戰後市場，或戰後戰時市場，或戰後戰時市場，問題是同樣性質的經濟問題。

換而來的問題的第一個特點是它的巨大範圍。這一次戰爭，替美國創造了兩倍於它在一九三二年的國民收入的一種特殊的市場。爲了代替這一種特殊的戰時市場，我們必須找到我們在平時未曾想到過的完全新的市場——兩倍於美國在經濟恐慌高峯時的全部市場。從什麼地方才能找到這巨大的新的市場？如何去找？我們不能解決這一空前巨大的問題，假如我們還是用戰前解決市場問題的方法來面對目前問題。很明顯的，要實現這種非常性的市場，我們必

然而要訴之於非常的方法和方式。

假如我們把問題縮元到它主要的組成部份，問題的真相更加清楚，首先讓我們檢討下潛在市場的兩大主要部門，海外市場和國內市場。海外市場首先引起我們注意，有幾個原因。戰後世界最大的需要，戰後難民的救濟和戰後經濟的復興，對於美國國內經濟而言，完全是國際貿易的問題。至於美國國內經濟，重工業和機械工業……對於市場的迫切需要只有在國外才能得到滿足，因為這一個戰爭所帶給美國的，不是像戰前一樣的生產的破壞，而是資本投資的急迫的躍進。在工業能力方面，我們所將進的並相對的過剩，而不是缺乏。戰前因為已經足以確定國外市場在戰後美國經濟問題上的首要性了。

那麼，國外市場所應吸收的部份，在我們必須為之找新市場的每年約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餘額中，必須佔據什麼樣的比例呢？似乎把問題這樣提出還是以顯示出一切正思想對於這一個問題可笑的無能了。關於戰後美國貿易的估計，一般的是在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左右，最樂觀的估計不出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對於這一些為傳統所束縛的考慮，我毫不猶豫的指出：作為為了他們自己的制度的生存條件之一，美國的資本家和经济學者必須把他們對於國外市場的估計擴張十倍，代替目前流行的平均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估計，他們必須開始作出最低限度輸出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現實計劃。

在前面討論世界幾個主要地區的那幾章裡，我已努力指出他們在美國國外市場問題中的潛在意義。現在我們來看看一看，能不能約略說明美國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輸出計劃分配到這些新市場以後，將是一個怎樣的面目。

任意假定美國的輸出將達到世界一半人口的手中，又任意假定對於每一區域的輸出是約略和它的人口成比例，如此算來，每一地區的每人每年將買進美國商品的價值將美金四十元。又任意假定我們的輸出對象將包括歐亞兩洲的各一半，全部南美洲和非洲，蘇聯的一小部份——各區域的分配將如下表：

南美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非洲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亞洲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歐洲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蘇聯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新市場總計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對於所有這些估計，有一個容易而顯明的回答：像這一套以假定始，以假定終，說起來容易，做起来難。

根據大家所接受的經濟思想的準則，證明所有這些為不可能，是並不困難的。不過，當你證明了它是不可能的時候，你已把你放到了一个非常為難的境地；因為這一來，你就證明了：戰後美國的全體就業是一種幻想，證明了：我們非進逐一個毀滅性的經濟恐慌不可；證明了：德黑蘭的前途是不能實現的；證明了：這一個國家或這一個世界的其他部份沒有別的希望，除拉攏着蘇聯走向社會主義。假如我們美國真的不能實現像上面所說的那樣巨大的國際貿易，那麼，蘇聯將是全世界唯一能夠給他們人民以充份就業的大國。

我們不能把更多的負擔放到國內市場的街上，來使得國外市場問題解決得容易些。因為當我們處理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國內市場的擴張，在正統經濟思想的範圍之下，要達到更顯著的困難。

無論如何，我不能同意美國經濟學者對於市場問題所採取的失敗主義的態度。在我看來，使他們預料的許多困難，完全是或大部份是歸根於地

們的思想方法，那是強迫他們自己造出來的銀額，爲了美國經濟不投向恐慌的深淵，美國的資本家和他們的經濟學教授們，必須認真地打碎他們自己造出來的銀額。

從美國這方面說，實現一個巨大市場最嚴重的阻礙，是政府不能在經濟業務中起任何巨大作用的教條。只要一旦承認，美國政府在獲得國外市場的問題上應該起着一個勇於的作用，正如它在贏得一個國外戰爭中所起的作用一樣，問題的面目就完全不同了。

在這種環境下，我不是向「自由企業」和個人進取的程度挑戰。我完全願意贊助自由企業者們用他們自己選擇的方法去實現所絕對必需的40,000,000,000元的國外市場。不過，當他們告訴我，那是一件不可能的工作，他們不能完成的時候，我可拒絕和他們一起走進深淵！我堅持，假如他們自己選擇的方法不行的話，他們必須找新方法，假如他們不曉得如何下手的話，旁的人必須告訴他們如何做。問題的核心是不管用什麼方法，如上規模的市場必須實現，這是美國戰後經濟不能逃避的一個絕對的必要。

只要個人進取和「自由企業」不能解決這一個問題，在他們不能解決的障礙上，美國政府必須負責完成這一任務的責任，用他們爭取戰爭勝利的那種不顧一切的決心去完成這一任務。政府能像做這一工作，假如「自由企業」證明做不了而束手無策的時候。

我們政府能舉立一系列的巨大的產業發展公司，每一個公司和一個或幾個其他國家的政府合夥，從事於大規模的鐵路和公路建設，開發農業和工業，把全世界破壞和落後地區完全現代化的計劃。美國有能力制定這些計劃，並且在決定了之後的六個月內，把它付之於實行的熱練的技術人材，只要美國一直說明了這計劃對於所有參加者的利益，資本主義世界中或殖民地世界中沒有一個政府是敢於拒絕或撤回他們的合作的。所需資本的規模將不會大於這一次戰爭所已消滅的規模。但其結果則不是生命和財產的毀滅，而是立即造成世界規模的人民生活的改善和財富的橫流，其所得將遠超過於最初的投資。在世界規模上，這樣一個聯合計劃在一個世代（二十五年）之內將能償還本息。這將是美國資產階級在它的歷史中所有的最好的投資。除掉作爲美國資本家投資的直接刺激的金錢利潤而外，這樣一個計劃將收到德黑蘭宣言中所規定的這一個世界幾個世代的和平和幸福的果實——而這一種利潤的價值是無價可估的。

把國內市場擴張到像上面所說的國外市場一樣規模，在戰爭結束的以後，同樣是必需的。這是比國外市場更加困難的問題。

首先，在資本主義的美國，已經沒有空隙，容得下一個每年投資幾百萬美元到生產部門中的巨大計劃，像投資於國外市場的一樣。戰爭已經把我們的生產能力擴張到對現有市場可能吸收的範圍之外——假如一旦戰爭停止，戰時市場從國內市場中消滅了的話。「公共工程」和鐵路計劃等即是發展到極端，對於我們所要求的新市場的海洋而言，它不過是涸轍之一粟。在增加新的投資方面，我們所能做的一切絕不能填補那消滅了的戰時市場的遺缺；同時，另一方面，用它們使得生產力更加增加，使問題更加尖銳化的後果。

國內市場的限度就是人民購買力的限度。很顯然的，有很少一部分人，他們的購買力是沒有經濟上的限制的；因爲根據政府方面的專家估計，美國有七百七十萬萬美元的無處可用的「閒錢」。不過當這筆巨款「閒錢」無處用的人們，無疑問的是已經達到他們消費能力的限度了。只有作爲資本的放款者，他們才供給新的市場。這些人向銀行會增加國內市場的一分毫，因爲他們已經購買了他們想像力所能想像的一切事物了，現在想像擴張的是那些儲蓄和願意購買他們目前所能購買的更多的東西的人們的購買力。這些人是不難找到的，因爲美國人民中的大多數就是這樣的人。

爲了無限制的擴張國內市場，所謂一般的購買力的缺乏是沒有的。使得這存在着的購買力活動起來才是唯一的困難；因爲那些可能使購買力活動起來的人們，由於這一種或那一種原因，已經失去了使這些購買力活動起來的活力。一方面是不能活動的購買力，一方面是不能活動的資本，這兩大因素威脅着國內市場的生存，威脅着整個現存的經濟制度。購買的慾望和購買的能力已經分開，任何國內市場的擴張必須使這兩者重新結合起來。

因爲最低限度，直至現在生產企業的產出能夠獲得穩定的市場，我們過剩的生產能力已經不復存在以前，我們不可能有大量生產性的投資的舉故，目前剩下來時只有一箇生產性的國內投資。那就是在生產過程中人的因素的投資，無就是以提高生產者的質量和能力爲目的的投資。提高生產者的生活水準的生產性的投資有兩條主要的路線：第一、是通過去規模的投資，使健康以及一般環境改良的政策，包含「全」社會保險的舉項；第二、更在我們傳統的思想中得來。路線是通過去規模提高每個生產者的收入的方法，其規模之大足以使生產大衆的購買力每年增加一倍，這一批生產大衆是慣於把他們的購買力使用到現有的能力的限度的。

這種方法是故意的把另外一個解決國內市場問題的辦法關閉不談的，那就是由政府直接控制有效購買力的增長，把那不能利用其他方法我們市場中的剩餘生產物完全購買進來，簡單的加以毀滅。從經濟的觀點看來，這和戰爭一樣同樣的可以釋放一個市場，得到同樣的經濟效果。但是在政治上，這種做法是非常危險的，其危險有如像戰爭的工人失業，它將形成各式各樣的社會和政治混亂的溫床。不，這是不行的。美國經濟，除非它找到一個方法，把它的生產爲買賣普遍的更廉價的分配給生產者而外，它已經不可能繼續的維持下去了，這一個問題，已經超越了倫理學和政治學的範圍，侵入到那最頑固最冷熱的經濟學的國地來了。

還備把生產者的購買力增加一倍的目的是不可能單靠自由企業的正常運用而得到的，那就姑說不可能單靠和自由企業家們的決定而達到的，任何一個企業家這樣做都「虧本」，除非所有的企業家都一致這樣做。只有在全社會都有的規模上，這種辦法才能有利；而當你一個企業家這樣做和那些不這樣做的企業家競爭之下，這是很顯而易見不利的。因此只有當政府支持它，把它當作一種國家政策強制執行，這種辦法才能實現。它可以在「自由企業」的形式之下完成，但絕不可能來自企業家們的個人主義的完成。

第一國家政策的主要目的定在提高工資的水準，因爲成年的就業人口的絕大部份是工資勞動者。從最初，人們必須認識：更高的工資水準絕不是爲了工人勞動的特殊利益，而是爲了全國民的國家利益。

可以從三個角度處理提高工資水準的問題，這三種處理方法都是可以順利採用，而不致引起很大困難的。它們是：一、提高所有工業中的最低工資的起點；二、應用「同工同酬」的原則，把所有從事同樣的工作的部門中最高工資上提高；三、打倒現在領導工資的最低限度，不使對於個別生產者而且對於整個工廠和整個企業採用保單每年工資總額和就業工資的原則。這些方法假如在一個工資局的強有力的領導之下實行起來，同時配合工廠方和有組織的勞工的合作，已經很能夠提高工資水準的整個過程被緩和和刺激起來了。

我的目的，不是對如何增加廣大生產者的購買力一併的問題又作一個詳盡的和完全的回答。我的初步目的在證明：爲了擴張國內市場，這是絕對必要的，而沒有國內市場的擴張，我對現有的經濟制度就一定破產，因此這成這一工作是國家利益之所需，是全國所有各階級的利益，而不是工人階級一個階級的利益。只要一旦認識了，這一個全國性的任務，關係於全民利益的事情，問題就可以在國家的集體考慮之下解決。

這不過是國內市場問題的一個開端。即使這爲了指出問題的主要特徵，我們現在必須注意：假如像以上所說的那樣大規模的國外市場完全實現了，國外市場只是暫時的解決了我們的代替戰時市場問題的一半。在國外市場是由美國的國外投資和長期信用貸款所造成的限度之內，國外市場暫時地局部地解決了我們問題。假如我們的國外投資減了錢或者信用貸款逐漸收則本息了，我們還必須想別法而得收入在入口貨的形態之下運來。美國從它的出口貨所得的代價和利潤必須減價付，而這個代價的數量就是美國國內市場必須比以上所說的規模更大地加以擴大的尺度。因爲我們的整個經濟制度完全依賴於支付過剩的元錢，國外市場問題不可免地要與國內市場問題打成一片，其中的不同值似乎只是延期支付在時間上的差池和輸出利潤使入口的數量更爲增加而已。

因此，從長遠的觀點看，代替戰時市場的問題，完全是二個或三一種方法，使美國人民能夠消費掉我們國民經濟的全部生產物的問題。在最後的分析上，美國人民不能生產比他所能消費的更多的東西，我們有如九州巨大的生產力，好多年來它就在阻礙着國家的發展。威脅着這是我們的國家。戰爭時把我們從這多餘生產的急意中解放出來，它更加擴張了我的生產力。我們戰後經濟問題的本質在最後的分析上，很簡單的說，是：通過消費的購買力強到它的生產能力的高度。我們必須完成這一工作，要不然——，用羅素的話說（他是不可能被懷疑爲有願望「自由企業」的企圖的）：

「令人，大部份的國家一致認爲消滅大批的失業是戰後時期的第一個需要。很多人因而至於認爲：除非大批的失業現象能在私有企業的制度之下被消滅掉，那麼，政府企圖的制將被另外一種生產和分配產品和勞務的制度所代替」（一九四四，二月二十九日同氏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的演說）。

（一九四四，五月，「德黑蘭」，第九章至第十一章）（譯）

論戰區反攻中的解放區戰場

薛子正

五、當濟南西告捷，桂南後撤之際，華北、華中敵後各解放區戰場的捷音，也相繼而至。據六月（五月）三十一日新華日報載稱：僅在今年一至四的四個月中就收復了二十二個縣城，解放區此類已有五十五個縣城在八路軍手中（按：如果再把最近一個半月來收復的縣城——晉之陽城，晉城，陵川，濟源，冀之靈邱，懷安，饒陽，安平，魯之東河，東平，蘇之鄭廟，皖之嘉山縣加在一起，則收復的縣城，當在七十五左右）。敵境或敵斷的公路十六條，沿路×××里，許多城鎮的敵偽機關被毀，成千成萬的敵堡壘被破壞了，許多敵偽機關的解放區，而今已逐一聯接起來了，而且蘇魯四省，在湘贛，亦漸漸有着新的發展。

這是多麼令人興奮而值得重視的消息！當此反攻的前夜，試問此捷音，使我們不能不聯想到中國解放區戰場對於打敗日本的作用是如何的重要！

中國解放區戰場，在整個反攻日寇的戰略部署中，起着極重要的作用，是無可懷疑的。在地理上說，無論盟軍將來在中國海峽對峙何處登陸，從葫蘆島到山東半島，從連雲港到杭州灣，以及廣東沿海，只舉一隅上大陸，就得闖進八路軍或新四軍的作戰地區，就非運用八路軍或新四軍這支強大力量而作戰無地不可。在人力上說，解放區目前已有二萬萬的人口，九十一萬的正規軍百二十萬的民兵，近千萬有組織又有訓練的抗日自衛軍。「他們（指一二線指自衛軍）且受過相當訓練，於敵情及情報之探察偵察，更為特長。以此與游擊戰術相配合，實有不可思議之點」。在物力上，首先是糧食，糧食根據建立交通，據點所積的器材，就地取給，是比較遠越六千個軍洋的供應要便利得多。

解放區戰場的勝利

八年來，不管戰局的變化如何錯綜複雜，敵寇如何施展其慘無人道的「燒光」、「殺光」、「搶光」，國內反動勢力如何的陰謀破壞，明暗時期，然而由於中共的正確領導，八路軍新四軍將士的英勇善戰，軍民團結一致，敵寇粉粹敵人的「豐食」，「掃蕩」與反動份子無數次的瘋狂進攻。在戰鬥中並且發展了主力軍，鞏固和擴大了解放區，奠定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基礎。據李德將軍「論解放區戰場」一文（見五月份解放日報）中所列舉的數字就可見解放區戰場的偉大戰績。

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游擊縱隊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四五年三月的七年半（華南抗日游擊縱隊除一九四三年以前數字）中，總計對敵傷大小戰鬥十一萬五千餘次，擊斃和殺傷敵偽計九十六萬餘名，俘虜敵偽軍計二十八萬餘名。投誠反正的敵偽軍計十萬餘名，敵偽共損失計一百三十六萬餘名。

「主要戰績，有總額共計一千零二十八門，輕重機槍共計七千七百餘挺，步槍或馬槍共計四十三萬餘枝，同時並攻克圍壘三萬四千餘座，攻克據點一萬二千餘個。

如果說中國戰場八年的艱苦戰鬥消耗消滅大量的敵人，則八路軍新四軍在解放區戰場定製了他們應有的力量。而且至今還抗擊着佔領日軍百分之五十六，抗擊偽軍百分之九十五。

如果說中國戰場牽制了近百萬的日寇，則八路軍新四軍至今正是牽制着敵人的大半數。

（被略一段）

解放區的建國大綱與八路軍新四軍的勝利發展，不僅使中國人士們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也打下了民族解放戰爭的基礎。迄今為止，他們不僅從日寇殘暴的統治下解放了遼北、冀東、津浦、魯南等地區，也從許多盟邦文員和僑民。最近一年間，且在各個解放區中救護了成百的盟邦飛行員。他們不僅供給盟軍對日作戰所必需的許多難得的情報，也提供了如何最終擊敗日本侵略者。而且是有着決定意義的力量。在配合盟軍登陸作戰上，他們不單能保護盟軍後方的作用，也將大量分散敵人，消耗敵人。並將盟軍之陸軍的進攻要角色，誰忽視了和不顧盟軍抗日力量，這對於最終消滅日本法西斯的戰略部署上，是非常有害的。誰忽視了和不顧盟軍這股力量，誰就是把這東戰爭拖延下去與不顧敵人的消滅日本法西斯帶來。

（根據一大段）

人民戰爭的方針

八年來，抗日戰爭的艱苦過程中，更加證明毛澤東同志對日戰爭的戰略指導的正確。這不僅是中國社會的轉點，指出抗日戰爭必是持久的，而且必須是三個階段的發展——即敵人的進攻階段，敵我相持階段，我方的反攻階段。這不僅是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必須改善民生，使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事做，特別是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有田種，受到解放，才做到全民族的心動員。必需是則大而廣泛的組織人民，武裝人民，在民主的原則下團結一致，堅持抗戰方針。敵後各解放區抗日軍人，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就是本著這個方針進行的而且進行得很好。

解放區近萬萬的人民，幾乎都是由工人的，農民的，青年的，婦女的，

文化的及其他職業與工作團體組織起來了。他們在勝利第一的號召之下，都踴躍各盡其才的熱烈地埋頭苦幹，成千萬以上的民族武裝與九十多萬能征慣戰的大軍緊密的團結在一起，互助互信的肩併着肩的戰鬥着。他們為了人民，又依靠着人民，進行了無數次的「反掃蕩」，「反圍剿」，「反清鄉」的鬥爭，粉碎了敵寇無數次的「圍剿」，「掃蕩」，「清鄉」，「反清鄉」的「三光政策」。熬過了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兩年來的艱苦鬥爭，克服了敵人所能克敵的困難，普遍的建立了抗戰民主政權的地區有十九個之多。這包括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鄂豫皖、湘鄂贛、湘浙等邊區及山東、蘇北、蘇中、蘇南、淮南、淮南、皖中、浙東、豫西、東江、海南島等區，再加上陝甘寧邊區。在這些解放區中，有了民主的政權，也有了民生的改革，進行了「減租減息」，「交租交息」，「三三制」等政策，也推動了「擁護農民」，「擁護軍人」，「擁護參政」的運動，於是軍民之間，官兵之間的關係改善了，政治的統一，軍隊的統一，以及政治與軍事的一也實現了。就是這樣，打破了敵寇歷次的「總力戰」，也打破了反動勢力歷次的陰謀進攻。

人民的軍隊

八路軍，新四軍的前身，是人所共知的紅軍，為了民主政治，為了民族解放，為了實現抗日救國的政治主張，他們忍受過人間的苦痛，遭過過反動派的摧殘，經歷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終於保全並發展為人民服務，受人民愛戴的隊伍。抗戰開始了，他們為顧全大局，欣然接受改編的命令，先後改編為中國國民軍第八路軍和中國國民軍新第四軍。英勇善戰的將士們，一踏上戰場，就是捷報紛飛，獲得了全國抗日軍民，堅決抗戰必勝的信心。更獲得了全國人民的擁護。等先鋒的參加這隻軍隊，就是這樣，由抗戰初年的幾萬人，在斷絕補給，缺乏外援的艱苦中發展成為百萬大軍。這的確是人類史上的奇跡。茲將八路軍新四軍發展情形列表如下：

年 代	八 路 軍	新 四 軍	合 計
一九三七年	八〇,〇〇〇	二二,〇〇〇	九二,〇〇〇
一九三八年	一五六,七〇〇	二五,〇〇〇	一八一,七〇〇
一九三九年	二七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三二〇,〇〇〇
一九四〇年	四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四一年	三〇五,〇〇〇	一三五,〇〇〇	四四〇,〇〇〇

一九四二年	三四〇、〇〇〇	一一〇、九六〇	四五〇、九六〇
一九四三年	三三九、〇〇〇	一二五、八九二	四六四、八九二
一九四四年上半年	三二〇、八〇〇	一三五、六七六	四七四、四七六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七八〇、〇〇〇
一九四五年四月止			九一〇、〇〇〇

各解放區的民兵統計如下（根據一九四四年五月統計）

華北	六三〇、〇〇〇	蘇中	一三〇、〇〇〇	中	
晉察冀	三二〇、〇〇〇	淮南	五五、〇〇〇		
冀魯豫	八〇、〇〇〇	蘇北	八五、〇〇〇		
山東	五〇〇、〇〇〇	淮北	七〇、〇〇〇		
晉綏	五〇、〇〇〇	鄂豫皖	一五〇、〇〇〇		
		蘇南	二五、〇〇〇		
		皖中	二五、〇〇〇		
		浙東	一〇、〇〇〇		
合計	一、五八〇、〇〇〇	合計	五五〇、〇〇〇		
總計	二、一三〇、〇〇〇				

附記：華南及新建湘鄂贛，蘇浙，豫西等區無統計

八路軍新四軍的英勇善戰，及其與人民之關係，在抗日戰爭中這也值得誇耀的，這也我們只要看看敵人對八路軍新四軍的估計：也就可以回答那些有意抹煞事實「別有用心」的人們的詭辯。

「游擊戰為八路軍特別注意者，則為與民衆之關係，八路軍由其裝備之點觀之，與普通之日本軍相比較，當然不成問題，然後等能進行游擊戰者，係因民衆有力後盾，換言之，用極力之政治力把握民衆，自在活用，即政治、經濟、文化諸工作，常謀與民衆，尤以大多數貧農利益之維護，軍隊與民衆求融和，於此，稱八路兵士為「子弟兵」，在敵下級兵士之謔語中，則有邊區子弟兵與邊區人民如魚水，應一救團結，掃蕩敵人，保衛我等家鄉，保衛我等邊區，保衛我等祖國」。八路軍將兵中有八項注意，言辭和氣，買賣公平，借物必還，破壞器物必須賠償。八路軍為人民如此，使與人民關

係良好，作民衆武裝組織，直接間接使之協力游擊戰。

「此種民衆各以年齡，力量，為游擊戰各執一役，對於八路軍之觀念，若想像為前鋒之兵士，則為極大之錯誤，冀即之住民，悉為八路，絕非謬言」。參看魯南報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號附錄北敵報××副時北支隊報導（附錄）

人民的戰略與戰術

根據抗日戰爭三個不同的階段，澤東同志指出：在抗日第一階段中，敵人具有戰略的優勢，敵人是進攻，我方是防禦的。這一階段中戰爭的形式，主要是游擊戰，游擊戰為陣地戰輔助之。陣地戰雖在此階段之第一線，由於主觀錯誤把進攻放在主要地位，但從全階段看，仍然是輔助的。……第二階段，可以名之曰戰略相持階段。……游擊戰在第一階段中與游擊戰後空虛，將有一個普遍的發展，建立了許多根據地，基本上威脅或佔領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階段仍將有廣大的戰爭，不過雙方作戰形式主要的游擊戰，而以運動戰輔助之。

……第三個階段是持久戰的最後階段，這個階段的戰爭形式主要是運動戰，但陣地戰將提到重要地位，這正是抗日戰爭的正規戰時期。

八年來抗日戰爭的發展，證明了澤東同志這一偉大的科學性的意見。在對日作戰中，誰能遵照這一戰略指示去部署力量，訂定各個階段的作戰計劃，誰就能得到勝利，也就能得到發展。

澤東同志根據抗日戰爭中敵我力量對比的特點，又指出抗日游擊戰術的基本原則，應該是發揚光大八路軍和新四軍具有歷史性的戰術思想。那種帶着模稜而又切實的運動戰和游擊戰，在抗日戰爭中是很容易為廣大抗日人民大眾所接受而又樂於運用的。堅持敵後抗戰的軍民大眾事實上運用了而且發展了這一戰術，根據「敵進我退，敵強我讓，敵退我進，敵弱我追」這一戰術原理，更發明了「敵進我進」，「敵強我分」，「開闢敵後的敵後」等戰法，以及民兵的地雷戰，麻雀戰，滾木礮石戰，隱蔽戰等等。這已成為廣泛的人民的戰術而且敵後軍民運用起來又那樣運用自如。

敵人運受到八路軍，新四軍，抗日民兵的打擊是很沉重的。偽山西新民報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連載該報記者張文心（發未署名）

行作戰紀評)一文中這樣寫道：

「一向即以狡猾著稱之共產黨軍，彼等確有不可漠視之獨特戰法，……事變發生後，竄擾於華北腹地之共產黨，……其所以幾年來仍未全滅者，實不能不歸功於其特有戰法，所謂特有戰法者，亦即彼等所謂得意之游擊戰……游擊戰前之主要點，乃在以少數之兵力於廣大地域中以與敵軍相周旋，更以擾亂為第一目標，……或藏於不備，乘敵於困憊，易致敵四面受敵之境地，使之立足不易，尤其於廣博深奧之山地中，更可利用山地之隱蔽，而以出沒無常，聚散無常之游擊戰。」

「此外尤不可漠視者，即與此游擊戰配合之政治活動，於共產黨地區中，滿分老幼男女，皆被彼等所訓練，於情報之探聽傳遞，尤為彼等之特長，……「化整為零」，「化零為整」，尤為彼等之拿手好戲。「化整為零」則兵員分散，易使追剿部隊喪失目標，難於搜查。「化零為整」，則力集集中，亦可收集中擊敵之效，以上所述，皆為狡猾共產黨之戰法。」

敵人一想到八路軍，民兵的地雷戰，就會心驚肉跳的，「在過去的傳說中八路軍的游擊戰和地雷戰，真覺得八路軍將有像演說中描寫的神出鬼沒和慣用埋伏的一流人物，所以在初次踏上「匪區」時，全員都懷着不安的心，正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在敵區中不敢說出踏地雷，遇八路軍等笑談，恐怕遇到他們，將不會平安的過去。」(北平僑民家報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載冀西邊區調查班追記之三)。

如何運用這個力量

很明顯的，要打败日本軍隊，要最終的消滅日本法西斯體制，擺在我們面前的困難正多，日本的抵抗能力還很強，日本的海軍即使不能出擊，但還有力能可在內海拚一下，日本的飛機生產還能補償他在前線的損失，尤其必需注意，日本還擁有龐大的陸軍——四百萬以上，日本的軍需工業遇到盟國的嚴重轟炸，固然也有不小的損失，但這些損失是有限度的。英國海相布拉格曾說明他對日作戰能早日結束一點，毫不樂觀，並且認為前途當有惡戰，日本的頑強，即使不在德軍之上，也和德軍相差不多。美國地面軍總司令史迪威將軍於此次觀察大琉球戰場時，關於打败日本一事曾發表談話，認為對日戰爭可能延長兩年之久。即使在日本本土登陸，東京陷落，日寇仍可能在中國東三省從事長期抵抗，並重申他多年以來所抱的一種理論，他認

為必須在亞洲大陸上擊敗日本，目前美軍在大琉球島登陸，已大功告成，而值得重視的是美軍的下一行動。如果盟軍打算在日本本土登陸的話由於交通線縮短的延長，五千到六千五百哩，補給增援的困難，則在盟軍進軍日本本土之前，盟軍統帥部將在日本本部附近一些地方，集結必要的兵力和裝備，而中國戰場，尤其是中國解放區戰線，真正是向日本本土登陸的最適當最便利的跳板，如何運用這個跳板，這是擊敗日本的老問題。

紐約時報六月一日社論指出，美軍可能在中國海岸登陸，如果像這樣的「大事」即將發生的話，建立中國聯合戰線，便更有理由了。事實上也是這樣，如果沒有這樣的聯合戰線，必然使美軍在中國戰場對日進攻。

(被略一段)

國內必須團結，抗日聯合陣線必須建立，民主改革，民生改革，必須實行，聯合政府必須成立，只有這樣，才能發揮中國人力物力在抗日戰爭中的效用，才能實現抗日的正確方針，爭取抗日消滅勝利的前途。

啓事

念良先生的「土地改革與經濟民

主」全文被扣謹向

作者致歉

★ 解放區各項統計 ★

解放區統計一

十九個解放區名稱

- 1 陝甘寧邊區
- 2 晉察冀邊區
- 3 冀熱遼邊區
- 4 晉綏邊區
- 5 晉冀豫邊區
- 6 冀魯豫邊區
- 7 山東解放區
- 8 蘇北解放區
- 9 蘇中解放區
- 10 蘇浙皖解放區
- 11 淮北解放區
- 12 淮南解放區
- 13 皖中解放區
- 14 浙東解放區
- 15 鄂豫皖解放區
- 16 廣東解放區

- 17 瓊崖解放區
- 18 河南解放區
- 19 湘贛解放區

解放區統計二

全國人口

全國人口(東北外蒙均在內)

460,555,000

一、淪陷的全人口(東北即省在內)

257,192,880 (佔全國人口 55.8%)

甲、敵後解放區人口 94,500,000

(佔淪陷區人口 36.8%)

乙、尚淪陷的人口 162,692,880

(佔淪陷區人口 63.2%)

二、未淪陷的人口 203,362,120

(佔全國人口 44.2%)

甲、大後方 152,884,820

(佔未淪陷人口 74.7%)

乙、陝甘寧邊區 50,477,300

(佔未淪陷人口 25.3%)

丙、外蒙西藏新疆 1,196,000

(佔未淪陷人口 0.2%)

八路軍新×軍及華南抗日 維隊抗戰以來戰績

解放區統計五

一、作戰次數	115、120次
二、斃傷敵軍	511、434名
三、斃傷偽軍	458、225名
四、斃傷敵偽總數	969、659名
五、俘虜敵軍	3、880名
六、俘虜偽軍	282、496名
七、俘虜敵偽總數	286、376名
八、投誠的日軍	222名
九、反正的偽軍	104、620名
十、敵軍總損失	516、261名
十一、偽軍總損失	844、816名
十二、敵偽總損失	1、360、877名
十三、繳獲長短槍	436、964支
十四、繳獲輕重機槍	7、783挺
十五、繳獲各種砲	1、028門
十六、我軍負傷	285、669名
十七、我軍陣亡	161、067名
十八、我軍傷亡總數	446、736名

註：以上統計時間係從抗戰
後至一九四五年三月底
，但華南只從一九四三
年今年三月底，以前
無材料。

解放區統計五

- 全國面積（東北外滿均在內）
11,174,662平方公里（100%）
- 一、淪陷區的全面積（東北四省在內）
2,753,254平方公里（24.6%）
- 二、敵後解放區全面積 865,569平方公里
（佔全淪陷區面積31%）
- 三、未淪陷面積（外蒙及陝甘寧邊區在內）
8,426,749平方公里（佔全圖面積75.4%）

三

- 全國城市總數（東北四省一五九個在內）
- 一、淪陷區城市：
甲、敵佔 九三三個（佔全圖城市83%）
乙、我收復 八九六個（佔淪陷區城市96%）
三七個（佔淪陷區城市4%）
- 二、未淪陷的城市
甲、大後方 一、〇三九個（佔全圖城市91%）
乙、陝甘寧邊區 一、〇二〇個（佔未淪陷城市98%）
一九個（佔未淪陷城市2%）

解放區統計四 全國城市總數

（九七二個）

解放區統計六

解放區主力軍及地方軍實力

總數

一、華北	470,286	(54.5%)
二、華中	293,982	(34 %)
三、華南	29,730	(2.4%)
四、陝甘寧邊區	80,649	(9.1%)

註：這是三月份以前的統計，據四月份統計，總數已達九十一萬。

解放區民兵數

總數	2,200,000	(100 %)
一、華北	1,615,000	(73.4 %)
二、華中	580,000	(26.37%)
三、華南	5,000	

(0.23%)

註：以上統計時間，除晉察冀，晉綏兩區為今年一

二月外，餘係去年年底。

解放區統計七

解放區報紙總數

計分日刊	二種	兩日刊	一〇種
三日刊	二七種	四日刊	三種
五日刊	一八種	周刊	二七種
半月刊	一七種	月刊	二八種
兩月刊	二種	季刊	一種
不定期刊		半年刊	六二種
一、華北報紙總計		兩日刊	一一五種
日刊	一種	四日刊	四種
三日刊	一八種	五日刊	三種
五日刊		周刊	七種
半月刊		月刊	一〇種
兩月刊		季刊	二種
不定期刊		半年刊	二種

解放區報紙總數

解放區統計八

二、華中報紙總計		兩日刊	三五種
五日刊	七種	三日刊	五種
半月刊	二種	周刊	六種
兩月刊	一種	月刊	四種
不定期刊		季刊	七種
三、陝甘寧邊區總計		兩日刊	三種
日刊	一種	五日刊	四八種
三日刊	三種	半月刊	一種
周刊	一三種	不定期刊	四種
不定期刊			四種

(統計時間在一九四四年八月)

冀中平原上的民兵鬥爭

程子華

(一)冀中民兵是怎樣成長與壯大的？

同人民利益深相結合

冀中平原，在異常混亂的局勢下，依靠共產黨和八路軍的領導，人民自衛隊在各地區組織起來了，雖然其裝備極其簡單，訓練極其簡陋，但它的精神使敵寇感到不可戰勝的勇氣，確實使小股土匪漸漸有所畏懼。它或多或少的捍衛了人民利益，所以它很快得到了普遍的發展。但也因為人民利益結合不緊，在敵寇更嚴重的進攻下，自衛隊大都解體了。當時自衛隊的幹部，都是自上而下的委派的，選擇幹部的標準，多以長於軍事為主，因此使一般農民和舊幹部等爬上了自衛隊的領導地位（應該指出，由於歷史的原因，在當時還不能沒有從門陣中選出來的人民自己的武裝人才），工作中的形式主義，強迫命令和打罵方式，再加上貪污腐敗，使不能不自衛隊脫離群眾，軟弱無力。武裝失守後，敵人集中力量掃蕩敵後，經過三九五五次戰役的考驗，自衛隊大部垮台，幹部紛紛逃竄，站崗放哨者則停止，敵人進剿，自衛隊同群眾一散，一跑了之。

適應新的鬥爭環境，在打敵人保家鄉的行動下，有些村莊就自發的出現了游擊小組，並很快得到了發展，這就是今日民兵之由來。以深澤民兵發展為例：最初敵人來時，許多村莊的自衛隊紛紛逃竄，不起作用。有一次敵人到了某村，羈索尚未跑開，青抗先向敵人投了兩槍，遲滯了敵人，掩護了羈索逃走，後來羈索回到家便說：「幸虧有青抗先，要不然咱們就給回住了！」又一處敵人來到另一村莊，游擊小組在村中作了初次的抵抗，結果嚇退了敵人，財物沒有受到損失，羈索很感激。有了這些經驗，羈索就給青抗先和游擊小組奉捐買槍械，拆開換武器，掀起武裝鬥爭熱潮，民兵大發展。

四〇年秋以後，各地成立武委會，並逐漸實行民選，大批新式的優秀幹

部，代替了許多舊式的人物，領導作用上有了很大轉變，過去亂打亂罰和強迫命令等現象，便很快克服下去了，民兵同羈索有了更好的發展。在民兵羈索組織發展與壯大中，也曾一度發生過某些脫離羈索的偏向，這就是：游擊小組脫離羈索吃糧（有一時期，全冀中民兵吃公糧，超過了三聯隊的數目），絕對不聽抗戰勤務，在各方面特殊化。如安國某游擊小組，自稱民兵的性質，實際上脫離生產，地也不種，房天穿上好衣服，背着槍在街上亂逛，也不找機會打擊敵人，好像警隊的保衛團那樣，會引起人民極大不滿，甚至如村莊圍人重稅。這雖然是在游擊中的缺點，是發展中的缺點，但畢竟是影響民兵的壯大的，我們也及時的把它改正過來了。

從民兵的發展歷史中，還可以看到，凡是民主民生工作做得好的地方，民兵也做得好，反之就做得不好。這又說明，民兵的發展壯大，不僅需要個人極的犧牲利益相結合，還需要同人民的民主利益及民生利益相結合，這樣才能顧到一方面是不行的。

共產黨的堅強領導

在整個人民自衛隊的組織系統中，黨是領導核心，離開黨的領導而談冀中民兵，是不可想像的事。特別是游擊小組（這是民兵的核心），是支部直接領導的武裝，沒有支部的村莊，就沒有健全的游擊小組。而支部堅強的地方，注意了對游擊小組的領導，即使最近敵區，甚至在敵據點之內，游擊小組也會活躍起來，各種工作也就能堅持下去。

游擊小組在最初建立時，由於黨的領導薄弱，常使地勢擁擠混入其中，也常用強迫的方式拉進一些落後份子，容易使游擊小組在工作中發生一些脫離羈索的行動。但在後期，特別經過武委會成立後的普遍整訓，清洗了一批不好的份子，規定自願參加，成份大體上就純潔了。支部對游擊小組的成份，非常注意審查，保證政治質量的絕對純潔，一般的都是貧農佃農佔絕對

優勢，中農次之，其他成份很少，較好武器都在優秀份子手裡，以保證游擊小組真正成爲堅強抗日和保衛人民利益的武裝。對於民兵脫離羣衆的一些行動，支部都隨時教育和糾正，經過民兵幹部中的黨員，保證黨的各種政策的實現。一般的說，民兵的鞏固工作是與支部的鞏固工作分不開的，因爲三九年以來我們在敵後根據地進行了鞏固黨的工作，健全了支部，就使民兵的鞏固工作有了可靠的基礎。

在鬥爭殘酷的敵區，參加民兵的大部份是青年黨員，如在歐縣的某村，游擊小組二十三個組員，只有兩個不是黨員。黨員在戰鬥中，一般都能做到你戰在前，退却在後。在破壞交通時，黨員冒險在懸崖附近刺電線，刺回後還要分給羣衆（電線可以賣錢）。有一次在破壞平大路時，敵人發覺即行圍捕，在千鈞一髮的情況下，有一個民兵裝得志不動了，兩個黨員立即冒險把他抬到安全地帶。黨員的模範作用，是黨領導民兵的主要依靠。

對於民兵工作，支部經常進行討論，檢討鬥爭經驗，批評偏向，解決困難等等；同時發動羣衆慰勞民兵，給民兵各種鼓勵，以提高其情緒。在敵後殘酷的鬥爭環境中，支部把民兵工作看做自己的主要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各方面關心與愛護民兵

僅僅要求民兵照顧羣衆利益，而不關心民兵本身的利益，從各方面愛護民兵，同樣不能使民兵壯大起來，這也是黨中民兵建設中的一项重要經驗。

爲了糾正民兵發展中一些脫離羣衆的偏向，黨中會指示游擊小組完全取消吃公糧，一度造成工作上嚴重損失。因爲在敵區糧食極其缺乏，或敵佔區，民兵的戰鬥任務特別繁重，事實上不能不影響生產，如不適當的解決民兵的吃飯問題，則必然影響到戰鬥等工作。還有的好的也有壞的經驗：深北縣某村是敵人的崗樓的村子，老百姓在民兵被取消吃公糧後，白鬍子提供給游擊小組吃飯，那裡的游擊小組也能給老百姓對敵鬥爭。而在別某些地區，民兵停止吃公糧後，未能適當解決吃飯問題，民兵的作戰又勢必受影響生產，於是許多村莊的游擊小組，把槍枝一緊，一鬆，也有因不能立即而逃走的，結果游擊小組終於垮台了。失去民兵保衛的村莊，不能不發財，而發財却是填不滿的洞。實際上，只要游擊小組積極活動，有效切打擊敵人，保衛了村莊，人民是樂於負擔游擊小組的有限糧食的，因爲這比查繳數目更少的多了。所以游擊小組的吃飯問題，要按其具體情形適當處理，一般規定不准脫離生產，但在有戰鬥活動時，可以而且應該吃羣衆的飯。

而發動羣衆愛護民兵。毫無，安國等縣，因見民兵作戰影響生產，曾起節約一頓飯的運動，指輪民兵，以解決民兵的生活問題。在過舊曆年時，人民集合慰勞游擊小組，有的老鄉親切的說：「保衛了一年，應該好好的過年吧！」對於民兵的犧牲者，人民開大會追悼，區幹部親往慰問民兵家屬，大大鼓舞了民兵情緒，老百姓很興奮的說：「這多麼光榮啊！咱村叫敵人用大砲打死的那些人，誰來追悼啊？還是模範班……」，在會場上當時報名參加模範班的有四十多人。

不僅要解決民兵的物質生活困難，還要提高民兵的政治地位，在黨中，游擊小組和青抗先都是有高度的榮譽的，人們把參加游擊小組當做一種很高的榮譽，所以它能夠大大的鼓勵民兵的情緒。

正規軍游擊隊負責培養民兵

正規軍游擊隊有責任培養民兵，這是有模範的例子，如安國二區的獨立小隊，它在生活上戰鬥上，總是與各村民兵打成一片的。該小隊每到一個中心村，都是首先了解民兵的具體情形，然後召集民兵，或作戰鬥檢討，或解決具體問題。同時經常抽調各村游擊小組的一部份，帶着他們行軍作戰，以作實際的訓練。每次戰鬥後，都召集羣衆大會上發揚民兵英勇果敢的精神，並分給獎品，以資鼓勵。當民兵作戰吃虧時，該小隊長即親往慰問，有一次某村游擊小組作戰損失一枝槍，有些灰心喪氣，他親前往慰問，並補給大槍一枝，游擊小組很受感動，情緒立刻高漲起來。

但當敵人的出動時，游擊隊轉移了，也不通知民兵，致使民兵挨了打。在德陽西里莊，有一次民兵在游擊隊伏擊敵人，在敵人集中時，游擊隊連開槍，民兵繼續堅持，等游擊隊人撤後，游擊隊又回來幫助追擊，打下很多軍用品，游擊隊完全把持，不肯分給民兵，使民兵情緒大受影響。正規軍與民兵聯合作戰時，一般派分給民兵一些獎品，以鼓勵民兵的情緒，但也不分給民兵勝利品，還有個別部隊作戰時，怕民兵在不利的位置，在撤出戰鬥時，又不通知民兵，引起民兵不滿，影響鬥爭情緒。有的正規軍忽視對民兵的培養教育，有些甚至感到民兵無大作用，而不與之配合作戰；在人民武裝訓練以前，有的把民兵看做損失部隊的組織，利用機會把模範隊向正規軍過渡，引起一些不良影響，這也是個偏向。

要正確認識民兵的作用，深刻懂得根據地軍事建設中正規軍、游擊隊

、民兵三位一體的眞諦，重視對民兵的培養，並看做自己的責任。在幾年來的鬥爭鍛鍊中，民兵已成為村莊的保衛者，如果正規軍游擊隊沒有上千萬的村莊保衛者的配合，在對敵鬥爭中將深深感到「必須集中則照顧不了，過於分散則到處無力」的困難，影響到根據地的堅持。民兵是村莊的保衛者，正規軍是一個地區的機動兵團，這是根據地整個武裝的具體分工，同時又是三位一體的有機配合。

正確的處理民兵的組織生活

在幾年的鬥爭中，人民武裝的組織機構，由政府武裝科改為黨委的武委會，武委會的組織，也經過一次改變。在武裝科時期，只看到軍事上的要求，不看到羣衆性的特點，領導上過於集中，加之當時幹部成份不好，在人民武裝中造成強迫命令的現象，影響人民武裝的積極性，也就影響了它的壯大。後來改為黨委的武委會，發揚民主，各級領導機關實行民選，改變幹部成份，人民武裝的積極性與戰鬥力日益提高，並得到猛烈的發展。但爲了糾正過於集中，強調民主，又有些矯枉過正，民兵中的青抗先與游擊小組各有其獨立性，武委會指揮不動，使武委會成了一個無力的組織，不能發揮人民游擊戰爭的威力。其次，武委會純粹成爲一個羣衆組織，與各羣衆團體平行，在戰爭動員工作上，也往往發生很多困難，削弱了武委會的作用。

根據幾年的經驗，人民武裝應確定爲羣衆性與軍事性（也是政權性）的不脫離生產的武裝組織。爲了保持羣衆性，就須有必要的民主（如民選各級武委會）；爲了保持軍事性，就須有必要的集中（不能到處是獨立系統）。強調任何一方面，都會影響它的壯大與發展。

經過幾度變遷，從四一年十二月以後，冀中人民武裝的組織機構是這樣的：從軍區到村都設立武委會，內分作戰、訓練、抗勤、爆炸等部，村武委會還設有婦女部，過去的組織，宣傳以及區以上的婦女部，因不合實際需要，都精簡掉了，還是爲了更加適合鬥爭需要。在編制上，有模範班（即游擊小組），由青抗先與模範隊中的積極份子組成，因秘密關係，不成立單獨組織，仍屬於原隊籍，不脫離生產，其任務是武裝鬥爭，一聞槍聲則棄車而參戰。有青抗先，十八歲至二十四歲男子組成，一般可與模範班執行同樣任務。有模範隊，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的男子組成，其任務是一般的參戰勤務，站崗放哨及交通鬥爭。我們所說民兵的涵義就是指的上述三部份，這都是自己

願參加的，是人民武裝（人民抗日自衛隊）中帶有較嚴格軍事性的部份，是最優秀的份子。其餘所有全體男女，則編入一般男女自衛隊，分別擔任後方勤務工作。爲發揚青年的積極性，各級武委會均設青抗先隊部，在青年運動上，受青委會領導，在軍事行動上，受武委會指揮。兒童多的村莊，在青抗先之下設少先隊，由十六七歲的男子組成，擔任站崗送信，發動慰勞、宣傳、站崗等工作。

村委會主任，須經人民選舉產生之。

(二)冀中民兵是怎樣同敵人作鬥

爭的？

如何做軍事鬥爭

軍事鬥爭的第一個課題是應付敵人的「掃蕩」。在「反清政策」的方針下，敵人依其精密如蛛網的監視，對我實行連環的反「掃蕩」，又吸取我們游擊戰爭的經驗，採取了很多狡猾的辦法，企圖包圍村莊和捕捉民兵。在民兵面前的首要任務是加強偵察警戒，因此從縣到村建立了統一的情報站組織，直屬各級武委會，負責情報的搜集交換與傳遞，在縣級附近或據點內也利用種種關係搜集情報，或臨時派人偵察，務使據點內敵人的一舉一動，都可以瞭如指掌。同時在村內外加強警戒，清查戶口，以防敵人活動，並將警戒線展至據點附近，一有敵情，馬上就可報警。當敵人出動時，民兵掩護人民撤退，進行麻雀戰，保衛村莊，到處襲擾敵人，使敵人坐臥不安，被迫及早撤退。

最初民兵見敵人來進攻時，總是在遠距離開槍，既費子彈，收效又小，在檢討經驗教訓中，逐漸改爲近距離開槍，後來進一步發展，就是捲起來，待敵人行至射程以內再開槍，這就產生了民兵的伏擊戰術。有時集中幾個村的民兵，聯合作戰，雖然起了不小的作用，但因過於集中，儼然造成第二個獨立小隊（即游擊隊），引起不必要的損失。如四〇年九月間，敵人佔領三總團與段村之後，敵縣五、六區的民兵，都是集中使用，完全脫離生產，與敵人週旋了兩個多月，及回來時，對自己家鄉環境的變化，感到生疏，有的人就不敢在家裡住了，影響了本村的工作。這是一個重要的經驗，民兵應聽

主要是分散活動，做爲村莊的保衛者，才顯發揮大的作用。

敵人的「掃蕩」，最初有一定規律，民兵偵察警戒都比敵容易，後來敵人採取游擊方式，就增加了偵察警戒，實行對敵人圍困。由於經常封鎖，敵費人力，乃採取輪流封鎖制，設斷望哨，規定戒嚴；在夜間任民兵游擊隊同圍釘木構架鐵絲掛鈴的辦法，敵一碰鈴，民兵即應變出動。清苑的民兵，更發明瞭敵人的封鎖，敵人一觸線就挨打，像過雲老鄉打游擊一樣。當敵人採取逐村圍攻的辦法後，民兵就實行了埋伏游擊，用炮筒封鎖敵人，這是敵有效的鬥爭方式，收到很大效果。

不同地區，民兵的鬥爭方式也不一樣，在根據地的基本區，因環境較安定，除了應付敵人的「掃蕩」外，就是一般防奸工作與訓練自己，鬥爭是比較單純的。在近敵區，是敵我鬥爭最尖銳的場所，武裝鬥爭是主要的形式，沒有武裝鬥爭，就不能順利地反對資敵，這類的游擊小組，因爲經常不分日夜的向敵人鬥爭，一般都由村中供給飯食（雖然花費不小，但比起資敵敵目來，不知少若干倍哩）。武裝鬥爭雖然最近敵區鬥爭的主要形式，但在鬥爭方式上，必須防止極端主義的形式主義，是強強弱弱，行動冒險等，因爲這種會遭受損失，如歐陽高家莊，距三鄉團據點僅三里，婦女自衛隊經常大唱抗日歌曲，故遭敵激激人，這種唱三次，就招致敵人包圍村莊，犧牲了兩個婦女幹部。爲防止個別村莊突出暴露，近敵區各村民兵，必須注意到必留的相互配合，先進村莊的民兵，須協助黨與武委會開展鄰近落後村莊的民兵工作。至於在敵佔區，民兵的鬥爭也是很必要的，凡有民兵的組織，漢奸就有所警懼，動搖份子就不敢公開當漢奸，這對保衛人民利益上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敵佔區的民兵組織，必須是短小精幹，絕對保守秘密，以免遭受敵人摧殘。

民兵除了單獨進行軍事鬥爭，還從各方面給游擊隊與正規軍的軍事鬥爭以配合，比如偵察情報工作，配合襲擊，設疑兵，誘敵等等，都起了很大作用。民兵、游擊隊、正規軍，已成爲根據地整個武裝中三位一體的東西，缺一不可的。

如何做交通鬥爭

在一九三八年秋季，自衛隊爲進行了巨大的交通鬥爭，破壞了所有的公路，並在貫通每個村莊的大道上，都挖成深四、五尺寬五、六尺，只能走大車，不能走汽車與坦克的道路，使敵之機械化部隊，在平原上減少了作用

，而對我們行動的掩護，避免敵人射殺的損失，都是有極大作用的。武裝失守，敵人集中力量「掃蕩」敵後，大修公路，因之我們的破路鬥爭也變成經常的繁重工作，區村各級都專門組織有破路委員會，負責組織與指導破路鬥爭。由零碎的散佈性的破壞，進到大規模的戰後性的破壞，如四〇年春，爲破壞敵人修築石路，敵一次在百里路一段內，曾發動人民三萬餘，進行了一星期的大破壞，四〇年秋配合百團大戰時，曾發動了三十五萬人，參加破壞交通的鬥爭。隨着鬥爭的發展，破路委員會組織性與計劃性，每次破路，民兵與游擊隊都担任破路，大規模的破路，更動員出動配合與破壞，以防遭敵人的襲擊。

從敵人實行「寬路」方針以來，交通鬥爭就更加緊張起來，敵人不僅修公路，還在路旁挖溝築牆，因此除破路外，還要平溝毀牆。爲了節省人力，交通鬥爭就不能不講求辦法，比如破電線，不單純用鋸電線辦法（敵人在電桿周圍設置保護，破壞很不容易），有的在電線的磁瓶上，另安一條鐵線，直通地下，使電流電，有的將電線剪下一段，接以非金屬，皆以部使敵人無法講話。這種節省人力，又不易被敵人發覺。同時由於公路的閉塞，也改爲利用一律破壞的辦法，而採取打探要害的方針，有中心的破壞，以節省人力。自爆炸活動和地道鬥爭開展以來，交通鬥爭又走入新階段了。

如何做經濟鬥爭

爲了對付敵人之物資掠奪與破壞政策，空室清野成爲我們的經常習慣，食糧、用具、日用品乃重門窗，都「堅壁」起來，完全過着一種鬥爭生活。同時，保衛生產也成爲民兵的重要工作，掩護春耕和秋收，組織對法封鎖，實行快和、快打、快藏，分割、分打、分藏。民兵協同正規軍和游擊隊，到處襲擊與阻止敵人的掠奪。特別在敵線附近，羣衆的生產必須與民兵的鬥爭結合起來，才能順利地進行。

在敵人殘酷的逼迫之下，近敵區人民受敵，並不是稀有的事，如果我們說人民拒絕受敵，是不難辦到的，但雖然停止受敵，敵人必然報復。爲使鬥爭達到勝利，有些村子組織了互助委員會，訂出被敵人打死一人，燒毀一間房子，拉走一條牲口，各應救濟若干，不論何家損失，均由全村分攤，以統一全村鬥志。同時加強站崗放哨，實行戒嚴，民兵積極動員起來，與出動報復之敵進行戰鬥，有時求得游擊隊或正規軍援助，務使敵之報復失敗，保證反受敵鬥爭之勝利。

為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並進行反封鎖，冀中的集市鬥爭也是從尖銳的。我們的集市與敵時時與地，由民兵進行警戒，以防敵人破壞。集市鬥爭外，還私鬥等也是民兵的經常工作，以防止敵人傾銷仇貨。但在集市鬥爭中，須防止民兵對敵市，由樓集發展成變相搶奪，在集市鬥爭中，也要防止亂解亂收的現象。

如何做政治鬥爭

在粉碎敵人歷次「治安強化運動」中，民兵曾不斷對敵人進行了宣傳攻勢，標語漫畫一直貼到據點以內。敵人登記戶口，發居住證，照像，民兵都進行了破壞；敵人有保甲會議，也始終沒有召集成功。敵人抓壯丁，民兵都從各方面設法援救；有時用武裝力量救出敵人的，有時領導青年逃避。

對於維持抗日秩序，剷除漢奸，民兵也進行了積極的工作，除了一般的站崗放哨查行人外，還時常舉行突然的戒嚴，以搜捕敵探漢奸。同時周圍據點，嚴密檢查出入據點的行人，以免漢奸奸細活動。在這方面，民兵的成績是很大的，曾經不斷地粉碎了漢奸的活動，粉碎了敵人的陰謀。

如何做爆炸鬥爭

爆炸鬥爭的開展，在冀中人民鬥爭史上創設了新的光輝的一頁。四〇年春「掃蕩」以後，在武委會佈置下，初步的運用了爆炸鬥爭，最初出現於安國、定興、唐縣、用埋手榴彈的辦法，炸死兩個敵人，此後各地仿效。四一年二月，七分區武委會首先召開爆炸訓練班，講製炸藥、火藥和地雷的方法，以及如何使用。到四、五月間，七分區大多數村莊，就都會做黑色火藥、地雷和土彈筒等。不久，各縣舉行展覽會，就召集革命幹部，到各地參觀。同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區黨委組織工作會議期間，又舉行了全冀中的大展覽。在這以後，各分區都開辦訓練班和舉行展覽會，爆炸運動成爲一個羣衆運動了。

爆炸的開始使用，一般都是在交通線上，用真假虛實的迷障，在交通線上埋設地雷，打擊行動的敵人。後來由於敵人經常包圍村莊，引起我們之損失，於是爆炸的重點，又移到村莊的附近與村內，漫地遍野，草叢堆里，門前門後，都埋上地雷，使敵人不敢在夜間或拂曉前包圍擊村莊，人民可以在家安心睡覺。當敵人「掃蕩」時，更到處埋地雷，如四一年秋，敵人「掃蕩」魏縣三區，在一個夜間，全區埋了四百多個地雷。每天夜間以後，民兵以打鐵敲鼓或點火爲號，以示已埋地雷，各村爆炸小組開始活動。老百姓往來，必須在距村二里許，停止前進，經爆炸小組許可，才能由一定地點安全通過，否則無論什麼人，即使不至受炸，游擊小組也是開槍打

的。每天太陽快出來時，如果沒有敵情，各村就仍以個個互編通知，把地雷埋出來。爆炸運動繼續開展，就進一步用來圍困敵人，在敵營周圍造成地雷場，使敵人不敢輕舉妄動，也就阻止了敵人向周圍的「圍食」或「突擊」。地雷的製造，要多種多樣，使用時也要反對千篇一律，才能發揮大的作用，同時，在爆炸運動廣泛開展，成爲羣衆運動以後，必須有很好的組織性，以免炸傷他村的老百姓，和增加我軍行動的困難，這方面冀中也有經驗的經驗，由於亂埋地雷，曾經炸死了自己的老百姓和部隊。因此規定平時在基本區，沒有敵情，不准埋地雷，埋雷時須留人看守，並通知鄰村，各村留一秘密通道，不設爆炸，以便軍民通行，使爆炸運動更爲發展，使敵人的利益，而又不束縛自己的手足。

如何做地道鬥爭

敵人不斷包圍村莊，人民要經常向野地逃避，既費時間，又不保險，因此首先是在少數村莊的個別人民或工作人員，採取挖地洞的方式，敵來則避入洞內，敵走便又出來，但不久感到這種死洞的危險，於是逐漸發展成爲活洞，有入口，也有出口。更進一步的發展，洞與洞間有了聯繫，村與村間有了聯繫，乃至挖成地下交通網的形式。於是人民可以不避敵道且不畏敵，工作人員可以不離開村莊，堅持工作而不遭逮捕，民兵在敵包圍以至進行，仍可作地道退走或與敵進行頑抗，以保衛村莊。地道鬥爭是人民游擊戰爭的新時期。

地道的築構必須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要設出入口和通氣孔，多設秘密洞，爲防敵人破壞，又挖些迷魂洞，多設岔路，有活路死路，設陷阱，翻板，並與爆炸鬥爭聯繫起來。當發生敵情時，人民即入地道的密門（即秘密洞）內躲避，民兵先在村外抵抗，如不敵支持，即轉至密門高房上打擊敵人，如敵人衝入村內，佔領密門，民兵即由地道轉至村中間的高房上，繼續抵抗，如敵上房包圍，即由地道轉入另一高房抵抗，再不能支持，即由地道轉至村外，從外線打擊敵人，並依靠地道，在村內出沒無常，使敵人不能不疲於奔命。這樣的勝利鬥爭是很多的，有些村莊敵人始終沒有辦法。

但地道鬥爭必須與爆炸運動及武裝鬥爭相配合，才能發生大的力量。同時，必須普遍開展起來，才免得一村突圍，遭敵人的集中打擊。定南北垣村，曾經發生八百餘人死於敵人的毒氣下的大慘案，是一個血的教訓，北垣村的地道鬥爭原是好的，但附近十餘村沒有開展起來，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敵三百餘人合擊北垣一帶，附近十餘村的人民紛紛逃至北垣地道避敵，漢奸就乘機混入，地道內秩序混亂，民兵無法活動，加以爆炸沒有做好，敵人就從頂上掘開，大放毒氣，遂致死八百多人。

地道戰

周而復

一 歷史的車輪，在新的軌跡上前進着

被稱為中國烏克蘭的冀中區，不僅是華北以至全中國最富庶的地區，而且擁有廣大的人力和物力，成為一切戰鬥力量的泉源。冀中區是全中國敵後鬥爭最尖銳的地方，同時，也是鬥爭最殘酷的地方。

它的周圍有兩條鐵道和交通幹線：平漢、津浦、北平、和石德線；這四條幹線的起迄點和交叉點的重鎮有北平、天津、石家莊、德州。這四個城市就位置在長方形的冀中區的四角。這些主要城市的主要交通幹線，在政治軍事經濟交通各方面，都有着它的特殊意義。

敵人對這個地區是不放鬆的。敵人佔領了冀中以後，曾遭受了軍民的攻擊與破壞，推翻了敵人「以戰養戰」的全圖，打破了他的「迅速肅清平原」的迷夢。於是乎新的殘酷鬥爭開始了！由點線向面的發展。他的「確保佔領地」的計劃是：每條鐵道預計在一定時期內，把四周一定範圍的地區的村莊，變為堡壘村，首先以鐵道內的敵偽軍反復「掃蕩」，實行清鄉掃蕩的殘暴政策，把各村堡壘和村莊，像人民風扇，派駐敵偽，建立堡壘村。此後，又將堡壘村，伸向新的更遠的地區。在已佔領的堡壘村，軍事或政治在次要地位，用少數敵偽軍和警察不斷出動，破壞敵偽民的組織，捕捉我們工作人員，備寫罪狀，以政治或經濟工作，而達到「確保佔領地」。

從其佔領區，又向我區發展，把我區用相連之線分成兩塊，將堡壘村內之面，作為其河間區，以點線對敵和切斷敵政民工作人員的滲入，而清鄉區之周圍邊線，就建立堡壘村，進行清鄉和掃蕩，達到其「確保佔領地」。

這正是敵人的毒攻政策。

在一九四四年以前，敵人在冀中的大平原上，建立了一千五百多個的據點，這些據點，在佔領區的點線之間，又縱橫地連繫着，對敵後，限

制了我們工作人員活動的空氣。而據點與據點之間的最遠距離，不到十里地，敵人兩個據點之間，或兩個堡壘之間火力，可以對領任何一個交通要道。

敵人的陰謀，是企圖使冀中解放區變質，真正達到他所夢想的「確保佔領地」。

不錯，在新的發展下，一部分主力部隊轉移了，政府和黨團體從公開轉入秘密，人民的武裝也遭到摧殘……然而鬥爭並不會停止，也不是退却，而是轉入了新的鬥爭方式。

新的鬥爭方式，要求人民游擊戰爭更進一步的發展，要求新的形勢。歷史的車輪，在新的軌跡上前進着。

英勇的軍民，依然在大平原上鬥爭着，經過兩年的時間，不僅恢復了組織，而且鞏固了組織；不僅鞏固了解放區，而且鞏固了解放區。

這由于什麼力量呢？

人民。

人民以自己的血肉之軀，築成了新的長城，流下了一切的痛苦和痛苦，站穩了陣地，築大了陣地。即冀中北敵派遺敵人在冀中區也不得不承認：

「冀中地區為平原，如以六兵團攻擊，不難將之毀滅。然彼等如何確據此等平原？第一，是完全人民的組織，其組織民團成一片，組織極為堅強。第二，將一區千里之冀中平原，由敵派遺為據地，因之，被為最大決心者，即為交通線，彼等令我軍行動困難，對主要道路破壞，不僅使我軍不能發揮能力，彼等以交通線，互相聯絡，其中且可通行戰馬，又在村落間有長一〇〇〇至三〇〇〇米遠之地下道，無論何處都可通行，彼等之軍事，政治，經濟五項均都有完善之組織，敵陣地據點由此等組織，長期固守抗日軍攻擊，此乃為敵之難攻也。」

聯隊救濟強大的敵人，是各方面力量的總和。在抗戰最艱難，我只憑先
談一談地地道，——這是人民游擊戰爭中的鬥爭新形式，表現了大平原上人
民光輝的創造力。

二 地道的發展

這在民國十一年，河南督辦張錫鑾的第十一師隊伍，開到冀中高陽縣。
看到冀中那麼富庶，而高陽更是一個富庶的商業區，就不走了。官不肯走，
兵當然也不走，一到夜里，成羣結隊地到處搶劫。十一師是新隊伍，路途
不熟，他們在城裏豎起了一個高竿，上面掛一個紅燈籠；這樣，搶完了，看
着那個紅燈籠的方向走去集合，準沒錯兒。有錢的人上竊賊去了，但是窮人
也要被搶，人民於是組織起聯莊來自衛，男的就和這些名義上帶稱械軍隊的
土匪作戰，女的則挖洞躲起。這時是小管子提土，築的很，洞也是個個別
人家有，不普遍。十一師給打走了，洞就炸下了，藏東西。到七七事變，
鬼子來了，村里有的人家不走，鬼子走了，他們就出來了。大家很奇怪，實
際是他家有地洞，不怕。

這人民爲了「防匪」發明了地洞。

但冀中有地洞，却在更遠以前。高陽有個教書的老先生，他知道當年費
爾墩從高陽小良口到邊渡口，會挖了一個長約六十里的地道，是相傳的。
抗戰後，他也用了這個法子挖了洞，土沒有地方出，就出在他所教書的小學
堂裏，變成一個講師壇。村里人很奇怪，那兒來了一個教師壇？老先生保守
秘密，沒說出來。

這時的洞，只是個別的在挖，還沒有形成一個羣衆性的運動。

羣衆性的地道鬥爭是這樣發展起來的：開初，敵人來了，就跑到村外的
窪地裏去躲起；四五年後，敵人掃蕩頻繁了，單躲窪地是不濟事的，跑到村外
，就挖土窩窩，上面蓋着草，敵人不到，是看不見的。後來覺得不如挖深一
點，上面不像是可以預注隊嗎？帶了木板去，挖得更深。有的人進一步在坡
裏里挖成洞，鑽進去，躲在裏面。安全倒是安全了，不過究竟是有有限的呀
，容納不了大平原上的八百萬人民。不久，大平原上就出現了許許多多的新
洞，有圓子，可以鑽出頭來，瞭望敵情。敵人掃蕩包圍時，在村子里找不到
人，就「拉大網」，到村外野地裏找，敵人對這做法，叫做「趕鬼子」，村
外站不住了。

敵人不肯在村裏找，人民就回到村裏來了：進村挖地洞。鬼只是在得上挖
，五家共一個洞口。敵人常常突然襲擊包圍，快得使村里人來不及下地洞，
改爲一家一洞，洞口都挖上彩到家里來了。

這是死洞。

然而這是未來地道鬥爭的一個有着決定作用的起點。

死洞是很危險的。當敵人進村時，就到坑搜索痕跡，手裏拿着二寸細錫
的有一二丈長的鐵棍，到處敲打，如敲透地面，或有迴聲，說明下面有洞。
這樣，有些家庭的地洞被破壞，捕捉到人，遭了損失。由此得到經驗，死洞
是不行的，要活洞。

於是這地洞和那地洞通起來了，可以從一個洞口鑽入，由另一個洞
口鑽出，當敵人圍住這一家進行搜索時，便能夠從另一家洞口走脫了。但是
敵人包圍整個村莊，進行更細緻的搜索時，僅僅兩家或者是幾家地洞相連
，也不能夠適應新的鬥爭需要了。兩個洞口的活洞，自然感覺不夠。新的地
道，出現了，它將一個村莊和另一個村莊，在地底下聯合起來了。地底下出
現了新的城市，出現了新的陣地。

三 內部構造的輪廓

地道的修築，遠較那平原上改變地形的物海運動是更加浩大的工程，所
需要的大方物力，據一般的估計，一個村需要修築地道，要動員全村大部分
勞動力參加，需要一個月的時間，并且一個頂棚所用的木料，竟需要到一二
千元之多。像這樣的消耗，人民爲什麼樂于負擔呢？

人民政治上的覺醒，堅決不當敵人的「編民」，和敵人進行頑強的鬥爭，
固然是主要原因，另外一個原因也不可忽視，那就是經濟原因。

讓我們來看一個查敵村莊的例子吧。

冀南縣的趙莊，在查敵的半年期間，被徵出款一千六百元，大開支費（
以查敵人爲准）四百元，保甲費七百八十元，照像費（良民證上的）三百元
，訓練費二百元，保軍儲備費（代替青年壯丁）二百四十元，醫務給員費四
百七十元，門牌費七百八十元，土木工程費三千二百四十元，標語被撕毀費
款四百二十元，每月給崗樓糧食，送雞蛋，酒，肉十餘次，每次百元，半年
共費六千元，此外，前後送雞五百餘隻，豬十五條，車子一輛，馬一匹，棉
花千餘斤，修崗樓要磚二十三萬塊，合銀二千五百元；過關要紅方桌十餘張

，發平五十餘條，種子十斤把，其他尚有糶糶食，木料，強迫訂購似報等，估計半年內，發款來均負損，約近四十元之多。

從前這一封封的條條負担上，回答了為什麼人民不惜以巨大的人力物力來修築地道了。因為修了地道，人民能夠生產，生產的收穫，較之修築前所費不知多了多少倍，並且還可以省去修築的種種繁重的費用。

許多村莊在幹部領導之下，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了地道的修築。地道修築的形式，洞口的設計，有各種各樣不完全的統計，有一百多種。如：在任邱的××莊，他村的地道修築是這種形式的：每穴人為一小組，每天挖三丈，每隔若干丈，挖一深八尺，長六尺，寬三尺之口，而後由內向外掘土，一般的高四尺，人可以在里面扇背而行。寬三尺，三人可以側身通過，兩頭地面至少三尺，這樣可以不影響到耕種。村內地道，就在街上挖，與各村相聯的，就在野地掘通，挖的時候定在下午，一般的到半夜停工，在黎明前之下，分段分工進行得很快。

地道內沒有大量的通氣孔和出入口，這些出入口大半按在秘密地方，使敵人不易發覺，只有這一家人知道，當門爭進入更險惡的時候，誰挖的地道，只有他本人知道，什麼地方有秘密的洞口和通氣口。地道內挖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孔眼（秘密洞），構架更為堅固，通氣孔也開的更多一些，這是當發生情況時，人民掩蔽的地方。地道內挖有許多迷魂洞（又叫做欺騙洞），在地道轉彎處，分開若干岔路，有活路也有死路。又利用枯井與地道相通，造成許多「陷阱」，一經跌入，便無法逃走。地道的各個洞口，挖下深坑，坑內插着尖刀，或者埋上地雷，上面蓋上翻板。當人民進入地道之後，即翻掉翻板，即使被敵人發覺，也縱下去，以為抽掉翻板，敵人下去，不是中了刺刀，就是中了地雷，在裏面送性命。敵人是不能隨便下地道的，叫偽軍下去，偽軍也不敢下去，他是很怕死的，一到下面即自己高聲呼救：「我是偽軍……」那意思是叫下面人民不要處死他，這樣，他雖然不活，但也不會再上來當偽軍了，——投誠了偽軍。

地道中間，都挖有凸凹通門，叫做「子口」，狹小得只容一個人側身通過，只要有一個人拿一根棍子便可以守住，真是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險要去處。每家的地洞，每村的地洞，如果沒有熟悉的人領路，不但是進不進去，縱或萬一讓你進去了，也進不出來的！村與村的地道，有「接合部」，到接合處，過村時即由另村負責領導。甲村的人如到乙村，吃飯時，付糧票，每日計算，由政府用糧食來調劑。

每個「子口」之處，並有防護設備，一經發現毒氣，即可放下吊板，用土堵住。另外洞中還有枯井，敵人即便放水，也不在乎，所有的水便會從井流掉。

地道內每段距離，便有一口大洞，能容二三百人，有人洞，有衛生洞，大洞裡經常放有熟食，開水，燈火，被蓋，廁所，在洞內備有幾天不成問題的。村與地道之間，和各村相聯之地道，又有很輕便的通訊線，一拉鐵絲，鈴聲響，從鈴聲多少，即可傳達敵人的多少，互送消息。

地道洞頂和洞上，遍埋埋有地雷，使得敵人無從下脚，一觸即死。萬一敵人到了洞口，洞口還有武裝警戒，隱藏在旁邊的掩體內，等候到地道來送死的敵人，第一是：敵人下不去，其次是：下去了，就上不來。

村莊與村莊之間，地道是貫通的，縱橫交錯，構成地下的驚人的地道系統，在地下創造了攻不下的堡壘，使得在地面上被敵人佔領和分割了上千上百的村莊，在地下，這些村莊連成一氣了，造成地下城市的新面貌。敵人將蘇聯的三區有兩個：一個是地上三區，一個是地下三區，敵人對之却絕束手無策！

有了地道，不僅人民可以生產，工作人員可以堅持工作，民兵也可以堅持鬥爭，進一步可以打倒敵人，堅持了平原的游擊戰爭，開展了平原游擊戰爭的新形勢。

四 血債是要用血來償還的

地道鬥爭是平原人民游擊戰爭的產物，這一新的鬥爭形式，是帶有很濃厚的羣衆性的，切地不普通開展，只是個地區有，而這個地區的地道鬥爭又是孤立的，那它不但不能發揮其應有的彈簧作用，有的時候就會遭到不應有的損失。

保定南縣北垣村的修築，是應該深記在腦海裡的。

在地道發展初期，定南縣的修築還不普遍，雖然北垣的地道修築得很好，但也無濟於事。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敵人從定縣的于位，新營，市莊等鎮出動了三百多人，向北垣村一帶大舉合擊。北垣村附近的村莊，大半都是沒有地道的，於是東西兩莊等十多個村莊的人民，都向北垣村的地道避去，沒有秩序，情形很混亂。上午八時，敵人開始向北垣村進攻，縣游擊隊和民兵做了五小時之久的頑強抗擊。敵人將接近村莊時，游擊隊

和民兵把敵人地道掘破抵抗，但當時地道內的秩序甚為混亂，使得他們無法展開攻勢。

因為地道內缺乏組織，這口也沒有必要的武裝警戒，附近各村恐被誘入地窖的時候，沒有詳細的檢查，給敵奸混了進來，到處遊蕩，使黨眾不知所往，拖在道上。縣游擊隊和民兵既然沒能展開兵力，有效打擊敵人，而村內又沒有廣泛的佈置地雷等爆炸物，地道頂上也沒有埋設地雷，使敵人得以從容挖掘。敵人從地道頂上掘開一個口子，放進了大量的窒息性的毒瓦斯，於是八百個赤手空拳的婦孺老少，被毒瓦斯擊斃而死，無聲地躺倒在地道口了。

八百人雖然倒下來了，但是平原上八百萬人站起來了，伸出一千六百萬隻手，向敵人討取這鮮血淋漓的債務！
血債是要用血來償還的！

五 輝煌的勝利

從北垣村慘案，平原上的人們，得到了經驗，得到了教訓，他們學會了怎樣運用地道這一鬥爭形式來和敵人搏鬥。

由於地道鬥爭的廣泛開展，即連在據點上周圍的村莊，人民有了退避之所，工作人員有了憑藉，可以大膽進行工作。

例如救護工作王同志，在一老百姓家居住着，發覺敵人要到這村來。房東告訴他不要緊，屋內有個地窖，但未說明在何處，就匆匆出去觀察敵情了。一會，一個敵兵來搜索院子，王同志被發現了。但是只是一個敵人，不敢進入，更不敢對他處置，那個敵兵回去報告，很多敵人來了；可是依然不敢進屋，就叫老鄉先進去。老鄉進去，見王同志沒鑽洞，連忙撤開洞口，讓王同志爬進去。這個洞口原來是在牆壁上，把牆挖一個窟窿，再用和牆一樣顏色的假壁封好，誰也難以看出來的。老鄉把洞口封好，出來告訴敵人裡面沒有人，敵人不信，進去一看，果然沒有。敵人把老鄉吊起來拷打，說他家在地窖，敵人到處搜索，用脚在地上踩，却無痕跡。王同志入了地窖，轉移到別村去了。而敵人見到處搜尋沒有地窖，也就只好算了。

這是地道消極作用的一面。
民兵鬥爭和地道鬥爭結合，從單純的防禦，進而為積極的進攻。

試以大曲堤村為例。

大曲堤村得到了幸橋縣敵人的要出動，這個村莊的民兵就決定：如果只有一兩個敵人來，就打；要是敵隊呢？就轉入地道。敵人只來了一路，民兵就迎頭痛擊，激戰戰鬥一小時，打得敵人摸不著頭腦，死了四個敵人。附近各村的民兵聽到這個消息，都紛紛出動，前來聲援，到最後村莊和土砲擊擊彈的聲響，敵人終於狼狽潰退了。

這之後，敵人出動，大曲堤村的民兵，首先在村外打擊敵人；但是抵抗不住，就轉移到村邊的高房頂上拿手榴彈爆炸物打擊敵人，如果敵人沖進了村子，又佔領了街口，民兵就由地道下面轉移到中村邊的高房頂上。繼續打擊敵人，要是敵人佔上房，把民兵包圍起來了，民兵就由地道轉移到另一個高房，跟敵人鬥爭。倘若這樣打不行，民兵就從地道轉移到村外，一方面堅持地道口，一方面從外線襲擊敵人。這樣，有了地道，可以出沒無常，縱橫自如，敵人對平原上的人們就無可奈何了。

地道鬥爭的開展，倘若只是做為退避之所，離開了武裝鬥爭，那會成為消極的逃竄主義。地道鬥爭和爆炸運動結合起來，就豐富了游擊戰爭的內容，創造了更加活躍的游擊戰爭了。

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掃蕩的時候，敵加島大隊長，率領了七百多名步兵，向冀南××一帶圍攻，首先我們得到了情報，民兵就配合縣游擊隊和一個連的正規軍，動員佈置。一部分武裝依據村莊土圍與墳地迎擊，其餘的則在村內準備，裝藥進入地道。有組織地到各個掩體內躲避，幹部和民兵在地窖內來往指揮。村邊，街口，地道口，地道頂，草堆中，房屋裡……到處都埋了地雷。村外武裝給敵人以致重傷之後，敵人才拚死沖到村口，馬上就響了很多地雷，炸得敵人屍骨橫飛。這時，及們武裝部隊已上了高房，又用手榴彈向下打擊敵人。待到敵人佔了高房，我那隊就入地道，在一個洞口出沒無常，不斷繞得高房下面，向上投手榴彈打擊敵人，敵人受重傷亡，也看不到我之蹤影。地道洞口的小掩體內，都有民兵警戒，觀察敵情，守衛洞口。通訊員提着小燈籠，往來聯絡，指揮部則發佈命令，不斷襲擊敵人。這幾次不斷打擊之下，敵人已經傷亡百餘名了。到這時，才發現一個洞口，於是派偵察下去，偵察一進洞口，就被守衛洞口的民兵一槍打死了。敵人馬上進行挖掘，企圖把地道破壞，消滅在地道下的無數人民和軍隊。但偵察一挖，地道頂上的地雷爆炸了，敵人給自已挖塌了墳墓。這時已到黃昏，當夜晚

到來時候！敵人知道這是大難臨頭的世界了。加島島長只身避開東來，帶着殘餘的隊伍，快快地離開了島嶼。

六 攻不破的堡壘

敵人果大遭受到英勇軍民的打擊，地道成爲敵人「迅速肅清平原」一個最大障礙，這樣，所謂「確保佔領區」，便成爲紙面上的事實了。

敵人對這問題感到棘手，而煩惱了。

大隊長以上的敵人上天津開會去了。這開會開了兩個月之久，會議唯一的問題是：如何對付大平原上人民的地道戰。最後，總算想出三個辦法：

第一個辦法，不要進佔地區，但是不行，不僅要繼續「佔領」，還要「維持」呢！

第二個辦法，把這地區的人民都殺光，這辦法，倒的確是很徹底，不過，在沒有人民的土地上，大概一個兵也活不了的，何況人民能保護敵人隨便殺光嗎？這敵人自己恐怕也不相信有這種可能。

第三個辦法，就是把平原的地道翻過來！一邊挖的很深，多餘出來的土，就堆高一邊，這叫「挖大溝」；二丈高，二丈深。這辦法實行以後，一時，的確殺了一些地道，也受了一部份損失。

但是，這高之尺，矮高一丈。新的門戶，產生了新的經驗，人民的智慧是無窮的，平原上人們，又創了新的地洞。

什麼是新的地洞呢？由於軍事秘密的緣故，在目前，還不是發表的時候。

地道鬥爭是平原敵我戰爭中人民新的經驗，他在發展鬥爭中，在鞏固和擴大解放區上，起了偉大的作用；在人民游擊戰爭歷史上寫下了燦爛的一頁。

可是要記取北垣村的血的經驗和教訓。

地道鬥爭需要普遍開展，使農村之間形成有機的聯繫，避免敵人集中力量突擊個別目標；地道的修築要有計劃，人民下地道要有組織，避免零亂和暴露；地道鬥爭不能孤立起來，必須和游擊運動結合起來，這不僅是保衛

了地道，同時也可以殺傷敵人，地道戰和武裝結合起來，才能發生大的力量。地道保衛了人民，人民也要在各個道口用武裝來警衛，保衛地道。

這樣，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就形成了生動的人民游擊戰爭。這樣，地道就成爲不落的堅強堡壘！

一九四五，六月十四日。

詩人節。

（上接第四六〇頁）

其力量的。但制約並不是消滅，獨佔資本總會有一定限度之內發展。以英國的社會保險而言，它並未制約獨佔資本的力量，只是設法在減輕工人在失業時的困難而已，何況，他們所設的法，有一部分還是從工人自己的血汗錢提積起來的。故戰後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特別是生產社會性與佔有私人性之間的矛盾，是沒有消滅的，頂多只能說，緩和一點吧了。

第一，國際間的經濟關係，雖有國際貨幣金融會議之舉行，雖有貨幣基金與國際銀行的建立，但並不是說，國際經濟的矛盾，就會從此消滅的。很明白，舊的矛盾消滅了，新的矛盾會跟着產生出來。戰前英美貨幣與關稅壟斷之戰，即在貨幣平準基金中，轉化爲英美的另一種方式的對立。在平準基金中，美國的壟斷佔百分之二十八強，而英國只佔百分之十三強；若連向自治領殖民地及台算起來，只佔了百分之二十五。九，比美國還少百分之二；在國際銀行的投票權，美國佔了百分之三十而英國只佔總票百分之十三。三，比美國減少百分之十八。英美在這方面的對立，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這種對立，只是一個方面而已，如果從全面看來，英美在經濟上的矛盾，是很複雜而微妙的呀！

第三，由於某些國家的獨佔資本之存在，國際市場上的操縱把持，是不會沒有的。你看，殖民地制度不是保持下來嗎？那些先進國家的獨佔資本，不是早已着手在國外市場奪定對象嗎？

資本主義畢竟是資本主義。雖然在戰後有着修正，在本質上，還是依然的如舊的。但如果從社會進化的眼光來看，它當然比封建生產進步得多，如果把法西斯主義的獨佔資本去與民主國家的資本主義比較，則後者是有益的前進的。至於民主國家的資本主義之能否有利於人民，那是以政治上的人民政權爲保障的。

一九四五，五，十九。

戰後資本主義的趨勢

——用答幾個讀者的垂詢

許維新

一 廢除法西斯帝國主義的經濟政策

希特勒德國已經是一敗塗地了。「無條件投降書」已經在柏林的里姆林宮訂，已經在柏林的里姆林宮與威爾遜南得轉角的一間灰色屋子裡簽署了。盟軍的統帥所獲准了。軸心國家，已去其二，只在東方，日本強盜佔領地孤立無援，但，無論如何，日寇是逃不了他的命運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聯合國不但在軍事和政治上擊潰法西斯國家，而在經濟上，打斷他們的骨幹，摧毀他們的基礎。「如果不從經濟上使法西斯主義解除武裝，那末，在政治上使它解除武裝，以及防止新的世界大戰，便都是做不到的事」。因此，克里米亞會議的聲明「德國的佔領與控制」一節中，很清楚的寫着：

「把所有一切合供軍事生產之用的德國工業排除掉，或者予以統制，……要削減納粹黨、納粹的法律、組織和制度，從德國人民的公共機關中，從文化生活和經濟生活中，消滅所有一切納粹的和軍國主義的影響」。

希特勒的匪黨是德國獨占資本和貴族地主的代表，故徹底摧毀德國的容克貴族的社會經濟基礎，和獨占資本，特別是排除那些供軍事生產之用的工業，乃是防止德國法西斯主義復活的重要辦法，但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到德國金融資本集團在國外的活動。舉個例吧，戰前波蘭的重工業中有百分之四十六是屬於德寇的；德寇在紙張、製糖等業亦佔着很大的比重；柏林的銀行家，控制了波蘭的外債及大部的對外貿易。這種情形造成了一九三九年波蘭的迅速傾覆。除此之外，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以至意大利，都有同樣的情形。在這次戰爭中，德國的獨占資本，越來越看出它們的失敗的命運，故千方百計，設法為將來的戰爭保持其經濟基礎。他們在葡萄牙、西班牙、阿根廷、瑞典及瑞士已設置了秘密巢窟，並保持住他們與國際托辣斯及國際金融團體的聯繫。他們打算在十年或十五年以後，又來一次毀滅性的大

屠殺。因此，要摧毀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經濟基礎，必須連它們的國際經濟活動，一齊排除。對於東方的日本強盜，亦須使用同樣的方法。

凡爾賽的錯誤，是被各國人民所深刻地體察到了。這種悲慘的歷史，最不會重演的吧！為了世界的持久和平，聯合國前接受這種歷史的教訓而毫不留情的摧毀德日法西斯主義的經濟基礎——摧毀它們國內的獨占資本集團生產的工業和國際的托辣斯與金融團體的活動，則將來的國際經濟，必定有重大的變動。這種變動將表現在德日在國際經濟舞臺中，結束其舊有的角色；表現在德日的國際反動與封建貴族沆瀣一氣的金錢集團，大大地削弱其力量了。這定是戰後資本主義之件重大的事情！

不過，戰後資本主義的特徵，並不僅僅如此。德日法西斯主義的經濟基礎之被摧毀是一個方面而已；除此之外，還有更豐富的內容，還有更感痛苦的事實。看吧！

二 「社會改良」和土地改革

為了國內的社會安全，英美在經濟上進行了若干改良，為了迅速恢復與農村，歐洲，特別是東歐的解放國家廣泛而深入地進行了土地改革。這種改良，這種改革，給與戰後的資本主義的影響是極其重大的。

先說美國吧！美國在費明頓羅斯福總統的「新政」之下，早就起了若干變化了。所謂新政，就是：收歸大銀行的投機操縱，限制工業托辣斯壟斷的操縱控制，給與中小企業以發展的機會；同時，向富人徵收重稅，以救濟人民的貧困；舉辦公共事業，相當的減少失業問題；提高社會購買力，相當地減少經濟恐慌的嚴重性。羅斯福的新政，雖未動搖了美國獨占資本的基礎，但對於中小生產的照顧，是不可忽視的。一九四四年一月他在其致國會咨文中，揭發經濟的人權宣言，大聲疾呼，要求保障獨立生產者、商人與公務人員的生活。這可說是新政的綱領化。的確，如果「沒有經濟的安全和獨立，獨

人自由是決不存在的」；如果沒有經濟的民主，則政治上的民主是不能堅實的。羅斯福的方向，可說是經濟民主的方向。可惜的是，這位巨人在戰勝納粹東的前夕竟逝世了！他遺留下來的新政，是否繼續下去呢？這是舉世事實來回答的。關於美國勞工運動的澎湃發展，關於美國廣大人民之懷念這位巨人，羅斯福的新政，恐怕不可能不再繼續下去。

美國經濟的另一個特點，是國家計劃的大工程之勃興。這種國家計劃的大工程可說是新政中舉辦公事業的最高峯。喻義人口的 TVA（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TVA 以政府的力量來管理一條河流。根據精密的科學技術和機械的通訊，使整個區域的雨量流量能迅速運到管理中新，復由中樞分流至各河，使每一段河流的流量，保持一定量的水準。這便一來，改進了航運，便利了灌溉，並產生了大量的電力。過去經常泛濫為災的聖約西河，過去比較荒僻的聖約西河流域，從那時起便成爲新興的工業區了。繼 TVA 之後，現在已經有好幾個類似的計劃或擬議，如 TVA（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與 AVA（阿拉巴馬流域管理局）是。前者已入實地計劃的階段。這種國家計劃工程是局部的區域性的建設，在本質上，顯然是不能與蘇聯的計劃經濟混爲一談的，水利、航運與電力的發展，可以便利小農和中小工業之生產，亦可以便利大托拉斯所經營的工業業的發展。但是，這種大工程並不一定能阻止托拉斯之吞併中小企業，甚且反有助長獨占資本的更加膨大的結論吧了。

其在英國，爲了戰後社會的安寧，英政府於一九四四年九月正式頒佈了一個大綱上採納比維里琪（Mr. H. Morrison）的計劃而略加修改的社會保險計劃白皮書，並表示將於可能的最短期內，採行立法手續成立一個社會保險部，負責執行計劃中所規定的在戰時便須實行的部份。這個白皮書的計劃是全國性的，它根據比維里琪的報告把全部人口分爲六類：第一類是雇員；第二類是自由專業的工作人員；第三類是主婦（包括在家庭外工作者）；第四類是已達工作年齡而無職業者；第五類是未達工作年齡的兒童；第六類是超過工作年齡而退休者。爲這六類人所分別規定的權利，包括失業津貼、疾病補助金、殘廢津貼、家庭津貼、退休金，此外，對於生產、死亡、家婦、孤兒、職業訓練亦有補助的規定。所有各津貼，除家庭津貼一項外，都是要撥費的。據計算失業津貼費用的三分之一，其他各種津貼的六分之五，是由

繳納而來的，不足之數則由租稅補足，故上列六類人中，經常消費的只限前三類。據估計，這三類人經常繳納所得之款，約達二萬八千三百萬鎊，佔實行全部計劃每年總支出的一半弱，其他一大半就要由政府撥款了。這個社會保險計劃的目的，若用邱吉爾首相的話來說，是要把「國家強迫保險制度推廣到社會特階層，應用於自搖籃起至墳墓止的各種用途」。這是一個大規模的社會改良。這種改良明明明白白沒有消滅英國的社會矛盾，但，如果實行起來，對於一般平民的生活，是不能說沒有補益的。

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是誰亦沒法否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革命運動，深深地教訓了英美的統治階級。這次大戰的經驗，更顯示了：要抵抗侵略要保衛國家民族，沒有調和國內各階層的利益是不行的。英國對新政與英國的社會保險計劃，在本質上，就是這樣一回事。一面保持資產主義的生產關係，保持了獨占資本的基本利益，兩面時，却又緩和了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相當地限制了獨占資本的活動（美國羅斯福總統的做法），這就是資本主義國家對內的一般趨向。

至於歐洲被解放國家，依據克里米亞會議的決定，是用民主的方式去指導其經濟問題的。用民主方式指導經濟問題的基木工作，是土地改革。在東歐進行這一改革最徹底的國家，要推新生的波蘭了。一九四四年七月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在其告波蘭、民衆中，就這樣的提出：

「同胞們，爲了迅速復興農村，而滿足波蘭農民對土地的要求，民族解放委員會將立刻在解放區中着手大規模的土地改革。抱着這一個目的，將設置土地基金，歸農墾和土地改革局管理。除了農具、牲口和建築以外，德國的土地，人民叛徒的土地以及超過五公頃的地主的莊園，在持人總意志帝國的領土上，大抵超過一百公頃的那些地主的莊園，也都將劃入農墾土地基金。德國的土地和人民叛徒的土地，都將予以沒收。地主莊園將移充土地基金，並不依照莊園的大小予以補償，不過原來的所有主將領得糧食。在對德寇作戰中，曾對祖國有所貢獻的土地，將領得較多的糧食。充移土地基金的土地，除了指定開闢模範農場的士地以外，都將分散給貧農、中農、家中人口多的小佃農，以及農業勞動者。只付最低代價而由土地基金中分配的土地，就歸去屬於個人的土地一樣，將成爲他們的私有財產。土地基金將開農場，或大小農場，以平均每一農戶領有可耕的中等土地五公頃，作爲基本標準量。在自己本國不能領到這種標準量的農戶，有權由國家幫助，將移植到有空

的區域去，主要是移殖到波蘭奪去的土地上去。

新波蘭的土地改革，徹底地使農民從封建剝削與異族（德國）的掠奪解放出來，用孫中山先生的話來說，這就是「耕者有其田」。這種辦法，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裡，轉移到農民手裡，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業從舊式的落後水平進到近代化的水平。而取消了超經濟的封建剝削，使農民都成為有能力有興趣以生產的獨立生產者，則為經濟民主的基礎的內容。因為大地主制度之存在，就使法使超經濟剝削，等級特權和人與人的隸屬等現象不存在。故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必以「耕者有其田」為最基本的條件。

波蘭的土地改革正在廣泛而深入的進行着。在民族解放委員會改組為臨時政府以前，蘭察夫省、盧布沙省以至華沙省都已執行這種改革，雖然大範圍的地主們陰謀破壞，一些工作人員甚至慘遭殺害，但因廣大農民之擁護與各民主黨派的協助，土地改革是進行下去的。東歐其他的國家，恐會步着波蘭的後塵，或先或後的實行這一政策吧？

土地改革為資本主義之發展，掃清道路，它提高了農民的購買力，擴大了工業產品的市場，而市場的擴展，就給與落後國家以工業化以可能。因此，東歐各落後國家的資本主義，在戰後必定大踏步在發展着。不過，這種資本主義並不是過去那樣的，它將在勞動保障、社會保險、照顧工人和機關職員的生活的種種辦法之下，被修正着！

三 國際經濟的動向

這裡所謂國際經濟，是指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貨幣金融關係，及先進國家對落後國家的投資關係而言的。

戰後的國際金融，可從一九四四年七月在布魯塞爾的國際貨幣金融會議的會議窺見它的傾向。國際金融貨幣會議的一項成就，是通過設立平準基金；另一項成就，是通過設立復興開發銀行。這些決議解決了將來的世界幣制，匯兌比率及國際間的短期資金與長期資本等問題，而這些問題，與戰後國際經濟的發展是有極大的關係的。

以目前的情況而言，國際通貨將有全盤貶值的危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經驗，大家都是認識得很清楚的。國際通貨基金的建立，其主要的任務，就是在於避免各國的新的貨幣貶值的危險。並將它的要點列之於下：

(一) 會員國應繳基金，其四分之一應繳納黃金，其餘可納相當數目之

外匯，在基金委員會中按標準，當以此出資額為正比。

(二) 貨幣平價以黃金表示，由基金與會員國商定之，一切有關交易，均須按照此項比率為標準，除非因改正根本的不平衡狀態，會員國不提議該國貨幣之平價。

(三) 在相當範圍以內，會員國得出售本國貨幣於基金，或用他國貨幣的基金收回本國貨幣，以圖對外交付之進行。

(四) 債務國如處於長期的逆調，至基金保管該國貨幣已超過該國所繳額全數之百分之二百時，則該國應向其他會員國進行貸款，或出賣黃金，以維持對外信用。

(五) 會員國如有大量或長期資金之輸出，必須動用基金以外之資金。這是一九四四年四月間世界貨幣基金聯合宣言的要點，這個宣言是在三個月內的布魯塞爾會議中被通過的。國際貨幣基金將使世界各國採用一種國際聯合的金本位制度。這種國際金本位制度的好處，是在於各國無須自己保存鉅額的黃金，而以大家的基金來維持各國的匯價。這好像各商中央銀行集中各商業銀行的準備金，來維持國內金融市場的安定一樣。這種辦法，可使各國匯價不至有大的波動。各國匯價的波動，是各國通貨貶值的反駁；而這種波動，又會為各國用作經濟戰爭的武器。匯兌傾銷的對面，是關稅壁壘與限制輸入，第二次大戰以前的十餘年間，國際經濟就是圍着這些把戲。國際聯合金本位的建立，在一定限度之內，是可能避免戰前那種紛亂的局面。

國際貨幣基金同時又解決了國際間短期信用的問題。上述第三點，就是這麼一個內容。短期信用的解決，是發展國際貿易的一個重要的條件。這些因為它解決了某一個國家對外交付的困難。如果與匯價穩定配合起來，則將來的國際貿易是可以圖滑進行的。

布魯塞爾會議所通過的復興開發銀行，主要是以供給長期資金為任務的。它對於戰後國際投資之推動，可以分為四點：

(一) 擴張債權國及資本雄厚的國家，對於產業落後國及新興國的投資。

(二) 在國際銀行的保證之下，債權國的私人投資，將必有巨大的發展，國際復興開發銀行所有資本百分之八十（即八十億美元）將用於這方面。

(三) 若私人投資比較難於喚發時，國際銀行採用與私人金融機構合作辦法。

(四) 除以上各方條件，國際銀行得承辦國際投資，不過，照舊業的範

定，直接投資所佔的業務成分，不若保證私人投資的部份之重要，只佔該行總資本百分之二十，再加計行盈餘數額。

國際銀行的這種任務，是戰前美國緊縮國際投資的否定。國際平準貨幣基金供給短期資金，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供給長期資金，二者之任務，同在增加資本輸出的流動，同在促進各國的生產與貿易，同在穩定各國的幣值與匯率，而兩者之間，又是彼此互相影響的。很明顯，資本的輸出，對於匯價的變動，是十分敏感的。

先進國的資本的輸出，過去所流行的觀念，在理論上，說是「白種人對於落後民族的負擔」；而在實際上，則惟恐落後國家之不落後。他們認為落後國家的經濟如果發展起來，就會使他們失去銷售市場的市場，因而千方百計地在落後國家破壞產和落後。但是，這種觀念近來被修正了。今年四月五日，美國國務卿斯退丁斯在芝加哥外交協會演說「美國外交與世界經濟」時，便明白的指出：

「別國工業產能有充分發展，並不就消滅了美國的主題，相反的，經驗已經一再替我們證明：向美國購買貨品最多的國家，固是經濟上最發達的國家。加拿大人口不過一千二百萬，而中南美洲國家人口九千萬，還是向加拿大向美國購買的貨品，遠多於所有中南美洲國家的總和。

「在經濟上講，未開發的國家因為它沒有足夠的收入以償付支出，決不是個好主題，因此世界銀行對這些國家發展了農業，所起的影响，對美國的輸出貿易有好處。這些國家生產愈發達，收入愈多，它們便向美國購買的貨品亦愈多，而售價的能力亦具備了。」

這種新的投資理論，是開明的，而且是合於事實的。在經濟關係上，資本主義先進國與落後國家，並不是沒有利益一致的地方。前者更使其國內能「充分就業」，就必須大量地以資本及技術扶助落後國家。這種互相幫助共同發展的情形，將為戰後資本主義的一個特色。

四 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

戰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將採取什麼關係呢？在政治上，蘇聯簽字於大西洋憲章，蘇英又訂了二十年的同盟條約，談到蘇美關係，在這次行禮禮的過程中，彼此都是很和洽的；政治上的談話雖然多，但，糾紛總不會超過了和語和結。談到經濟，則矛盾的地方更多，而合作的地方就更多了。威維思

(Thomas Davis) 在論「蘇聯的戰後政策」時，曾說：

「蘇聯希望由美國得到以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為期的長期貸款，數額約美金五十萬萬元。美國商會長約翰斯敦訪問蘇聯的時候，斯大林曾向他保證可以成立互相滿意的條款。一般都認為蘇聯將需要重機器、機車、及其他鐵路設備、築路、機械工具、鉛筆、消費品。蘇聯惟有在相當時期之內才能用金、糧、煤、木材、和皮毛等商品，將這一筆債還清。

「蘇聯在相當長的期間內，大概不會在國際市場上和其他國家從事激烈競爭，它的許多廣大地區都被敵人摧毀，建築物必須修理或重建的，以百萬計。……目前急需有新的消費品分配給全國人民，並提高一般的生活水準。這至少非有二十年不可。」

蘇聯則有剩餘的資本，和自己用不完的機械，這就使蘇美之間，可以建立一個長期的合作的經濟關係了。但，還有一些問題是值得考慮的，例如說蘇聯是否需要二十年才能恢復其國力；例如說，蘇聯將在長期內不會和別國在世界市場上競爭，這種看法和提法，都是成問題的。以前一點來說，有人估計為十年至十五年，我們在這裡不妄加揣測，還是讓蘇聯自己用事實來回答吧。關於後一點，就氏或許沒有了解蘇聯的社會性質！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他的生產，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他的公民的生活——日益提高的經濟文化生活，因此，他並不被迫便為征服和剝削市場而戰爭，以替那過剩的貨物找必需的出路，她不需要資本輸出的出路，她不把輸出作為主要的目的。斯大林在回答約翰斯敦時說得很明白：

「我們國內的需要太多太大。蘇聯從來沒有爭奪過國外市場。我們的政策是僅僅輸出與輸入品直接關係的東西，例如作為償付飛機器代價的原料之類」(引自約翰斯敦的「斯大林會見記」)。

蘇聯對於國外市場，是沒有什麼興趣的，她的輸出，僅僅為了償付輸入。這與資本主義國家完全不同的，唯其如此，故在經濟上，蘇聯反而可以與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合作。

希特勒德國被紅軍的鐵拳打垮了，除了法西斯主義，蘇聯是願意與一切國家和平共居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和平共居，將為戰後國際政治經濟一個重大的特色！

五 什麼樣子的資本主義？

根據以上所敘述，我們可以看出：法西斯主義的傾覆，並不等於整個資本主義的崩潰。日本強盜之快要失敗，只能意味著德國和日本所獨占資本的失敗，民主國家的「老一輩」資本主義，在目前的範圍內來說，資本主義還有它的前途！

從那裏看出來呢？

(一) 歐洲的解放國家，是以民主方式去推展政治經濟問題的。它們的土地改革是發展資本主義的重要的契機。這些國家，過去是德國或英國的經濟附庸，財政經濟命脈，都握在這些國外的大獨占資本的手裡。它們的輕工業是德國的；重工業則歸國防工業，是歸納得可憐。封禁制則與外國資本交關在一起。現在，它們都翻身了，民族解放戰爭的成功，粉碎了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掠奪的條件；而土地改革的徹底執行，則粉碎了國內的封建的貴族地主的經濟的剝削。這是一條，它的民族資本是將會失踏步前進的，它的工業化、現代化是將會迅速進行的。

(二) 過去先進國對於落後國的投資，多着重於政治投資，多着重於攫取落後國家的財政經濟的命脈，運用種種辦法，以加重落後國家的落後。先進國的工業的繁榮，是建築在落後國家或殖民地人民的自覺之上的。故先進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的條件之一，是以殖民地的經濟作爲基礎的。如果美國今後對落後國的資本輸出，能像斯退丁羅斯所宣佈的原則一般，不利於輸入國的產業落後，而利於輸入國的產業的發展，如果先進國家對於落後國，不再奉行傾銷與壟斷，而能在技術與建設上，給落後國家以幫助，則這些半獨立國家或半殖民地國家的經濟，在一定限度之內，可能有相當的發展。

(三) 資本主義的危機之爆發，是以它的生產社會性佔有私人性的矛盾，作爲基本矛盾的。這個矛盾再通過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就爆發爲週期性的危機了。過去世界經濟的矛盾的對立，是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更顯的表現，所謂貨幣戰爭，關稅戰爭等等，就是各國鬥爭的武器。而這種鬥爭與糾紛，又進而加強了國際經濟的矛盾，使世界資本主義趨於崩潰。如果今後的國際經濟，能在貨幣金融上，取得合作，則國際經濟崩潰的局勢，是可以相當減輕的。國際經濟的相對安定，是有助於各國的資本主義的。因爲國際經濟安

定的結果，會促進各國的進出口貿易。進出口貿易如與增進了，各個資本主義國家，不是可以繁榮起來嗎？

戰後國際資本主義是存在的，在某一地區，還要更爲發展，但是，這種資本主義並不是「老一輩」的，而是加以若干修改的，修改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英美社會改良，在一定限度之內，可以使勞苦的工人，減少失業，在失業或年老的時候，可以使他們不至完全失去依棲。如果戰時的工廠委員會能在戰後繼續下去，如果工人能繼續參加工廠管理，則在工作條件方面，是比較易於得到改良的。這就是說，經過社會改良，勞資間的對立，在某一限度之下，可以稍爲改善一點。

第二是先進國對於落後國的投資態度，如果能加以改變，則半殖民地國家的經濟，或可有相當的改善；落後國家與先進國之間的關係，亦或可有相當的改善。落後國與先進國的關係之改善，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第三，在過去，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極其不平衡的。在帝國主義時代，這種不平衡性，將更嚴重，德日趕上英美，美國超過英國，其他的國家，則將遠遠地落後。他們的財政經濟命脈，都握在先進國的手裡。這次反法西斯戰爭之後，德日垮了，它們在國際經濟的地位將更減輕，而一些解放國家，經過了土地改革，經過了先進國——特別是蘇聯的援助，牠們的國民經濟，必定可以大大發展，它們的發展，將使過去那種不平衡的形態，起了變化，落後的，將要前進了！

戰後的資本主義是有些修正的，如何修正，我們只能根據目前的情形，加以概括的推論。詳細的內容，是等待將來的事實來回答的。在這邊，我們還要回答一個問題，那些修正是不是能使資本主義的本質起了變化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因爲：

第一，如上所說，德日獨佔資本的傾覆，並不等於全世界獨佔資本的傾覆。例如民主國家的英美，其獨佔資本是存在的，一方面，並且因爲德日獨佔資本之傾覆，減少了競爭的對手，而得着更有利的發展的條件，另一方面，人民力量的興起，人民反對獨佔資本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視的。但如果美英的獨佔的政治家，能承繼羅斯福總統的精神，對於其獨佔資本加以若干限制，如果法國在戰後能繼續其精神，對於其獨佔資本加以限制，因而削弱了獨佔資本在法國的操縱力量，那末，獨佔資本在世界範圍以內，是會降低

(下接第四五頁)

他其及評書

人民有力量保障勝利

舒危震

——讀「法蘭西地下活動」走筆

「法蘭西的解放與復活，以及法國在明天世界中的地位，是我們今天努力和犧牲的報酬。……」

——多烈士

法蘭西的人民今天已經在為自由的復活，祖國的新生而歡呼了，但勝利不是苟安可以伸張的，而是憑着法蘭西人民的努力與犧牲。讓我們看一看，法蘭西人民所經歷的四年多艱難和試煉的道路，就充滿了大地的呻吟，人民的眼淚，戰鬥者的抗爭，受難者的鮮血。這就如愛倫堡在「巴黎的陷落」裡所說的：「勝利是艱難的」……從從把勝利想成帶着翅膀的，而現在它却有着沉重的破破的脚，帶着泥身的鮮血與污泥。」是的，法國人民的勝利，是從艱難與困苦中創造出來的，我們看到多少人的犧牲，戰鬥者的英勇赴義。憑着這，法蘭西像烈火中的鳳凰一樣，毀滅了的是舊的屍骸，復活的却是新的生命。

當昏庸、怯懦的官員當，在盧森堡林森，對侵略者簽訂了賣身契，法國人民都知道了祖國被出賣了，雖然德寇還沒有馬上認出侵略者的狼狽面貌，他們的內亂是在被分散、被分割的情況下，但他們很快就在魯維深重下甦醒過來。就在盧森堡林森訂投降條約的不久，六月十八日德寇將軍就在倫敦發出了「諾曼底」的號召：「法蘭西雖然打了一次敗仗，但並沒停止鬥爭」，一個月後，法蘭西共產黨的機關報「人道報」在法國出版了，標誌了這一個號召：「法蘭西雖然打敗了，但它永遠是一個獨立的民族。」

鬥爭開始了，戰鬥的意志在燃燒着。

老貝當在無恥的宣傳着，為了「和平」與「榮譽」，德法兩國應該「合作」建設歐洲新秩序；回答這號召的是「沉默的抵抗」。首先舉起反抗旗幟的是勞動人民，工人的組織被解散，工資被壓低到戰前的水準，工作時間延長到十四小時。工人的一切權利都被剝奪了，他們就在自己的崗位開始行動，實行怠工破壞，拒絕為德國生產。「勞工階級在抵抗鬥爭中居於主要的地位，在犧牲的名單中，他們也是佔多數」，一般法蘭西人民都懷着一種冷峻的仇恨，採取沉默的抵抗，「它的形式多樣化，而其目的都是在歐化敵人的統治」。譬如「維我警察奉命搜捕愛國份子，當他們到預目的地後慢慢地敲門，留出時間讓人脫逃，或者事先走漏消息，等到警察到時，一無所獲。」再

如：「三個地下活動的人在樊谷山遭義軍逮捕，交給維琪，當警察帶他們到車站，快車出發，其中一位警察向青年輕聲咬着耳朵說：「在前面一站，火車行駛很慢，那邊沒有納粹守兵，絕對沒有危險，你們可跳車脫逃，前途珍重等語。」這三位青年，就在前面一站，跳車脫逃。」（法蘭西地下活動，十五頁）。

在起初，這種抗敵鬥爭多半是一種個別的，報復性質的，這些鬥爭都缺乏嚴密的組織性，各種抗敵力量中間也都缺乏密切的聯繫。例如一個富有的少女，為了未婚夫被德國軍隊所殺，接連勾引了五個德國兵到家裡一一刺死。有一個父親因為八歲的女孩在逃難時人時死了，就每個晚上出外獵殺德國人，殺到第十五個德國兵的時候才被捕，被處死。」（「柯里爾」雜誌）。這種復仇性的抵抗，顯然是殺死了很多的敵人，但因為法蘭西那時期的人員制度，更多的法國人因此而犧牲了。而且因為這種私人向敵行動，阻礙了向軍事目標作有效的行動。後來法蘭西內地軍領導方面不贊成此種行動，一位內地軍總參謀部的上校就說：「假如我們以一個併一個，我們會失敗的，我們不能支付這樣的代價。我們必須使每件事情都最得合算。」（見上引雜誌）。

在抗敵運動蓬勃生長中間，地下活動的各政黨的行動更加活躍了。「最初成立的抗敵團體，在法蘭西南部有「戰鬥會」、「游擊隊」、「南部解放會」、「復仇會」、「抵抗會」、法國北部有「軍民抵抗會」、「北部抵抗會」，及共產黨在南北兩部領導下的「民族陣線」。在游擊隊中，共產黨員也是佔多數。」（本書一三頁）。在這些抗敵團體的領導下，分散的人民力量，已經變成團結和奮鬥的力量，復仇的行動已變成有組織的鬥爭了。

法蘭西人民這種抗爭的奮發，和戰鬥意志的昂揚，也並不是一開始就是如此的。尤其是在上層份子中間，對於貝當「榮譽合作」的謊言，開始的時候是少有一些沉醉和迷惘的。那裏以前希望從「德法合作」中收到些路的大小企業家和工廠老闆，當他們看到了侵略者的特種前途，嚐到合作的滋味，不過是「人和馬」的合作後，也竟轉過來反對「合作政策」，反對維琪了。

這種改變是從他們所受的苦痛所教訓成的。面對着法西斯的兇殘，祖國的危難，法國人民是捐棄了一切舊的成見，而團結起來了。一個在法國解放前途出來的軍官與紐約時報的記者說：他從前是一個工廠老闆，「在一九三九——四〇年，我仍是不團結的。我曾是資產階級。但德軍的佔領，却消滅了資產階級。今天我與我的工人一道並肩作戰了。……共產黨得到人民的贊同，這真是一個奇蹟。在德軍佔領時，幫助德軍的有教士、大廠主、保皇黨、警察、退職船長」。就憑着這種堅強的團結，法國西的人民終於取得了勝利。

法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得到人民的普遍愛護，是因為他們對於反法西斯事業的無比忠誠，對於人民的力量有着堅強不羈的信心。當老邁的貝當向侵略者簽定了賣身契後，地下的法國共產黨發出的宣言說：「這是一場無條件的鬥爭，在日前敵軍的困難，恐怖和痛苦的時候，共產黨人和過去一樣，在任何情況之下和人民站在一起。人民的命運即是我們的命運。我們對於我們人民的力量和前途，抱無限的信心，我們的人民是不能被摧毀的。賣國賊，投機者，掠奪者和征服的黑暗勢力，決不能破壞我們人民愛好自由的精神。」

就因為這種和人民共苦難，同命運，緊信人民，依靠人民，因此，法共就敢肯定：「我們知道戰鬥是艱苦的，可是，我們相信我們是一定要勝利的。」（多列士）。

因為對於人民事業懷着無比的忠誠，對於明天的勝利沒有絲毫的疑慮，無數的法共的戰士，帶着平等而傲岸的心去獻身：「我不是一個被宰者，我是一滴滾滾法蘭西國土的鮮血」。才能沒有懊悔，沒有不安的相信：「我是明天，殺我的劍子手已經絕了。」

德火花是從鐵擊和軋轢中迸發樣，法蘭西人民在走向進步的道路上是經歷了無數艱難和險阻的。從自由法國，戰鬥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到臨時政府，以及臨時政府的幾次改組。每一次的改組都使民主的基礎更加擴大，鬥爭更向前發展，反法西斯的力量也更有力的匯合。民主保證了團結，也鞏固了團結。

這些迂迴、險阻，表現在法蘭西解放後，譬如內地軍的合併，對托拉斯的統治不勝迅速、徹底，新聞自由所達到的某些限制……

在巴黎解放後，法國內部的一些懼怕人民力量的右派人物，就想着怎樣來「兼併」內地軍，因為武力和人民相結合，對於有些人總是不安的事情；他們忘記了這些是真正的人民的軍隊，他們是真正的來自人民，屬於人民的軍隊。為着保衛法國人民，為着法蘭西的復活，他們曾經和法西斯力量作生死的搏鬥，他們是法蘭西的真正的解放者。對於這種反人民的企圖，內地軍的領袖們就會經過正當的宣稱：「讓政府記住吧，我們代表着人民，我們也將頑

強的保衛人民的利益。」因此，最高榮將軍維希下令解散國內軍的婦女隊員，後來又想將國內軍「歸併」於正規軍，（保留原單位，但沒有決定指揮官是否繼續指揮原來的部隊），就因為遭到法國人民的反對，沒有實行。當時抗敵會議對內政部這道命令，通過了一致的宣言：

「關於內政部這道命令及武裝愛國份子復員一事，全國抗敵會議聲明，這些人民武裝團體是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受全國抗敵會議的號召之下而成立的。它們保衛祖國，殊多功勳，尤在巴黎解放的一役中，確定了勝利。它們受全國抗敵會議的命令，保全了人民的生命和財產，許多換取份子會全國騷動，都立刻被鎮壓下去。」

「全國抗敵會議聲明，凡是對於民間及武裝愛國份子的各項措施，須根據共和與民主的法律，同時，非經全國抗敵會議承認不能有效。內政部的決定。全國抗敵會議認為確係違法，……因為這些愛國人民的武力是從戰鬥中產生的，它的目的在保衛民主，它的工作是針對第五縱隊奸徒活動。」

經過這種反對，那種別具用心要內地軍把槍枝「呈繳」，「解散」的企圖是被粉碎了。對建立新軍法蘭西人民的意見如何呢？這如法蘭西諸議會的決議，以及法共領袖多列士的意見：是建立一支統一的國民軍，如何建立呢？是在民主的領袖之下，內地軍和正規軍合併。抗敵會議方面認為內地軍在德國佔領期間，是使法國復活的力，因此不是「整編」，而是民主的合併，結果，抗敵會議的軍事委員會和臨時政府的陸軍部商談之後，決定內地軍內約二十五萬人在民主基礎之上併入正規軍，他們是整隊參加的，原來的軍官仍然指揮着原來的部隊。

內地軍在改編後，士氣依然極高。英國新聞記者報的記者斯東曾參觀過其中一個師團，寫道：

「……這些兵士，多半是十八歲至二十歲的小伙子，和上次大戰中的老戰士們併肩而行，帶有勳章和獎章，雖然制服破爛，却有一股威嚴和自尊之氣，令人深深感動。」

至於一些人民自己掌握的武裝，如民團等，去年在有些地方雖然已經移交給軍事當局了，但如法共總書記杜克洛說的：「法蘭西人民能赤手空拳的在法西斯統治下建立自己的武裝，他們更有足夠的保衛自己的信心和力量。」

既讀夜讀，走筆成此，讀者也許會責怪，這書徵引的資料多半不是本書，請到「法蘭西地下活動」這本書的地方太少吧！這本書文筆很流暢，材料也很豐富，雖然一些地方還是根據部份法國官方人士的材料而不能代表法國人民的意見，但本書仍有助於我們去了解法蘭西人民的戰鬥的。尤其是當全面反攻在即，收復大城市的起義變成我們現實任務的今天，我們更應該從這一本書去學習法國人民鬥爭的經驗和教訓。

致 讀 者

一九四五年的上半年過去了，回頭看看走過的這一段路程，在讀有真誠的愛護與善意的督責下，我們又跋涉了一段險阻的路程；我們沒有懷抱任何倖幸的心理，民主中國的到來，還需要中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但我們沒有因為遭受任何困難而感到沮喪；因為我們看到夜毒已經沉沉下降，黑暗將暗夜的將是晨曦光照的黎明。而且我們深信在無窮的遠方，千百萬的人民，都和我们在一起；因此，我們能够以平靜而傲岸的心情去迎接這些困難與阻礙。

過去了的是一九四五的上半年，手續放寬出版的十二期，無論是從內容，從數量來看，距離我們的希望都還很遠；但細心的讀者不難看出我們是在不斷地探求着，如何適應讀者諸君的希望，也許今天我們還沒有作到，但我們要不斷的努力去作。

在十卷的六、六期合刊上，對去年底徵求的讀者諸君的意見，作了一個扼要的說明，雖然我們願感到各種現實條件，沒有提出無法兌現的預約，但我們是一直向着讀者諸君的希望求改進的。也許這些改進還很迂迴、緩慢，沒有見到顯著的效果，那是我們主觀努力還不夠的地方。

這半年裡，我們不斷的徵求讀者諸君的督責，有些讀者提出他們批評的意見，有些讀者寫出了他們讀後的感想，有些讀者把他們喜歡或不喜歡的文章寫出來告訴我們……方式儘管不同，但大家却都是把「羣衆」當作自己的刊物，毫無保留的提出自己的意見與希望。

我們已經步入一九四五下半年，希望本刊的讀者，不僅是聽憑「羣衆」刊載了一些意見，而是進一步的提出需要刊載些甚麼？對於過去半年的：

(一) 兩週評論這種綜合評述的方式，覺得是否適合你的需要，還有甚麼缺點？應該如何補救。

(二) 這半年裏，「特載」一欄曾經刊載了

好些文章，這些文章你覺得是不是適合，從這中間你是不是得到了甚麼？

(三) 「邊區報告」，「解放區報告」你感不感到興趣，內容上，形式上你覺得該怎樣去改進。

(四) 「書評及其他」一欄，你覺得如何？你覺得還是以簡短的評介方式，廣泛的介紹好呢？還是深入的分析而數量少一點好呢？已經刊出的書評你喜歡那些，那些文章還有缺點？

(五) 對「研究」性質的文章，你的意見怎樣？

(六) 對「讀者之頁」你的意見怎樣，對上半年進行的「筆談」討論呢？你應該怎樣改進。

(七) 對上半年出版的兩本「附冊」有何意見。

(八) 你喜歡些甚麼文章，你覺得那些文章不好，應該增加一些甚麼？減少一些甚麼？

(九) 對編排形式，文章長短，編輯方針，及其他各方面的意見

希望讀者諸君毫無保留的提出自己的意見。

讀之者

關於暑期工作

——覆博文、添竹……諸先生

這封信和你們見面時，也許你們正在忙於考試，也許是暑假已經開始，因為刊物出版時間的限制，不能使復信早日和你們見面，很感歉仄。

本暑期你們既然還準備編譯檢書，這理，我們就把討論範圍在如何利用這兩個多月的暑期的問題上。

就博文先生的來信看：一方面已經自覺到應當為人民大眾服務，並且會和朋友們考慮到解放區，到農村去的問題；但又感覺到今天自己還是應該「多學習」，以着在理論上「充實」一下，就擬定了一個龐大的計劃，下決心要查這個暑假裡讀完「社會學大綱」，「反杜林論」，「資本論」的第一卷，並準備對「亞細亞生產方式」作「深入」的「理論」性的考察。這種學習熱情，自然是可佩的，但我們不能不指出，這種專顧一面的想法是脫離實際的。

今天，中國知識份子正面臨着一個歷史變革的關頭，就全世界的規模講，民主國家正在為勝利歡呼，而擺在我們面前的仍然是民族的危機，人民的苦難；我們的任務就是如何運用自己這一分力量，使民族的危機，人民的苦難能夠早日解除，使遠的爭取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和民主的實施。我們要學習和掌握革命理論的武器，是為了甚麼呢？是為了要認識和變革社會，如果我們對於當前的現實鬥爭，民族的危機，人民的苦難，熟視無睹，漠然無動，我們學習革命理論又有甚麼用呢？革命理論既然是武器，就應該應該是用來戰鬥；而不是古董收藏家樣用來裝飾自己的牆壁。

「亞細亞生產方式」自然不是不能作理論性的考察，但是僅僅在程度，至少可以說並不是今天的當務之急。就離開一切當前的戰鬥任務不講，今天史料之缺乏，研究材料之困難，也決不是這樣一個短時間可以作好的。

因此，我們希望你把注意力從空談的理想回到今天的現實鬥爭生活來，就本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來看，他們也決不是從理論實際的書本裏面來完成他們光輝的業績，資本論就是從商品的研究與分析開始。我們再看看馬克

恩對於當時歐洲的革命運動那種全神貫注的關懷，就可以看到他們是如何的重視實踐的革命鬥爭。巴黎公社的革命鬥爭一場後，馬克思就丟開當時的一切研究，而專心注意於巴黎公社的領導，就是一件典型的例子。

添竹先生曾經提到一些暑期工作崗計劃，準備回到農村去，作一種為人民服務的事情；我們覺得這對於博文先生也是切當而可行的辦法。

我們既然已經建立了「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我們就應該隨時考慮如何善用自己這一分力量於人民事業，為人民解除痛苦，改善人民大眾的生活，而不是計較個人的得失，為一己的私利打算。

我們知道應該為人民服務，這還只是一種理論概念，對於人民的思想，生活、苦悶、追求，我們多半是一知半解，或者是完全無知的。譬如對今天佔全國人口比例絕大多數的農民大眾，他們對今天的抗戰貢獻最大，生活最痛苦，但對於他個體生活的痛苦我們知道得就不多，而且因為我們時常習慣於一羣城市生活，脫離勞動的教養使我們養成思想方式，生活方式，常常使我們和農民大眾中間隔着一層很高的障礙。我們如果能够真正的到農村去，就可以更清楚的去認識農民對抗戰的貢獻，他們身受的痛苦，使我們過去的一些理論概念，變成生活實感，也可以逐漸的改變我們從舊的教養所養成的，自我優越感，刻刻意識這些舊的思想，從而使我們能夠逐漸和農民大眾相結合，成為人民陣陣中一員健壯的戰士。

添竹先生的家既然在鄉下，四鄉下去自然方便得多。博文先生的具體情形我們不知道，但可以利用各種機會去；如果家鄉不在四川，或者是在四川而不在鄉下，可以利用同鄉的機會，一些在鄉下的朋友，可以帶一兩個朋友到鄉下，或者是介紹到鄉下土紳家裡作家庭教師，在四川一些鄉下的地主，因為子女要升學，常常在暑期裡要請一些教師為女子補習一學功課，我們就可以通過朋友的關係進行這一類的工作，我們當然不是為着自己混碗飯吃，但總可以使我們在鄉村工作上免除經濟問題的苦惱。如舉地方關係還形，可

以聯合一些鄉鎮的教師，辦一個暑期補習學校，晚間辦一點民衆夜校、識字班……前者可能是招收一些鄉鎮士紳的子女，無妨收一點費，這錢可以用來作爲民衆學校的開支。

其次可以儘可能利用一些學術團體、宗教團體、社會服務團所舉辦的暑期服務組織，聽說去年暑期，成都的學生救濟會就舉辦了一個成都各大學暑期外縣鄉村工作服務團；青年會也有過同性質的組織。如果感到沒有機會到農村去的同學，可以儘量的利用這類機會去，因爲這類團體多半是供伙食，住的地方是廟宇或者學校；住和吃可以不用自己操心。

到了農村並不等於到了農民中去，更不等於已經和農民結合了，爲他們服務；譬如一些家庭在鄉村的同學，家庭環境比較上說自然是富裕的，多半是些地主，最起碼都是富農；因爲一般的農民決定沒有能力供養其子弟在都市裡讀書。而這些鄉村的同鄉，富農和廣大的農民中間是存在着一些社會的藩籬，有些同鄉雖然同鄉了，仍然是活動在家庭的小圈子裡，或者是鄉村的土層份子中間，這就不需要爲農民服務而是到農村「消夏」了。

就是參加各種學術機關的鄉村服務團體，或者是通過地方關係，籌辦一些暑期學校，民衆學校，這些活動也常常只是偏於上述活動，甚至於活動範圍也多半偏於鄉鎮，如果我們暑期鄉村工作只能作到這樣子，仍然是失敗的。因爲這種偏於鄉鎮上的活動，我們只能看到一些農村裡落後、腐化、……的現象，我們只會看見貪污的保甲，很毒的豪紳和一切腐蝕農村的力圖，而看不到農民大眾的淳樸、熱情、心地的善良，對抗的執着，看不到他們對今天的抗戰貢獻出的偉大力量，他們生活上所遭受的折磨、痛苦，他們已經存在而且逐漸增強的民主願望，和他們潛在的可以決定一切的力量。目前存在的雖然只是腐敗的力量，就會對人民大眾產生懷疑，就會對中國人民怎樣取得抗戰的勝利，用甚麼力量來保障勝利的果實發生疑問。因此，到農村去應該是想辦法真正和農民大眾結合，尋求職業機會，爭取和農村上層份子建立關係，都只爲了我們對農村的進行爲農民大眾服務的工作。客觀環境是不容許我們這樣作呢？只要我們儘量的利用各種機會還是可能的，譬如我們辦識字班，就應該把主要的工作對象放在貧苦農民的兒女身上，在開辦的時候多向他們耐心的解釋，從他們的實際生活證明不識字所遭受的痛苦，照顧他們的農作時間，養成兒童很好的服務觀念，勞動觀念。如果我們是學醫的，或者有過一些醫學知識，我們應該盡力減除農民的疾病痛苦，慢慢的培養一點他們的衛生觀念。

因爲保甲的貪污，兵役的腐敗，農民今天最感痛苦的是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繁重的捐稅，我們如果能利用各種合法的手段，爲他們解除一些痛苦，也是很好的；但應該避免和惡勢力作正面的衝突，尤其要當心，舊勢力聯合起來和你作對。因此，我們對派竹先生提出的暑期回鄉工作計劃：「建立縣的參議會」

和「增設民代表大會」，「籌備鄉鎮人員的工作基金，以杜絕貪污」，姑不論派竹先生和共同回鄉的幾個同學，是否有力完成這些工作，即便能夠完成，也是缺乏堅實基礎的表面工作。在人民力量沒有真正發動和團結起來的時候，「參議會」，「鄉鎮民代表大會」，都不可能真正的代表人民的意志，四川各地這類組織的實際情形，就是證明。即使經過你和其他同學的共同努力，在建立的初期，這些組織，真正的給了人民一點好處，但你用甚麼力量來保障他不貪污，不會變成壓迫人民的工具呢？你以爲籌備一點少數的「工作基金」，就可以杜絕鄉鎮人員的貪污嗎？在這種貪污成風，上下相陳的官制制度下，這一點微薄的待遇又怎樣能杜絕貪污呢？

在派竹先生工作計劃的第二項，關於「教育鄉村的知識份子，到是中肯而可行的。

如果我們回到自己的家鄉，就一定帶着會見許多舊時的同學、朋友、親戚，他們也許因爲經濟環境失學了，或者因爲其他關係而留在家鄉，這些人對於你是作公務員，作小學教師，一些地主的子弟或者號開在家鄉，這些人對於從外地回來的朋友，都是極接近的，尤其是一些有進心的知識份子更是渴望着從這些人身上得到新的知識，我們可以介紹或贈送他一些書籍，幫助他們認識今天世界的發展的方向，誘導他們注意現實，只要我們能虛誠懇，就會把關係和他弄得好。我們回鄉去，就人言，總只是少數的，如果我們能團結這些鄉村的知識份子，作爲開展農村工作的核心。通過他們的關係，作一些對人民有利的事情，就可以少很多阻力。如果我們是由其他地方到這鄉村的，更不能不和他們把關係弄得很好，因爲要通過他們來認識具體環境。

要開展農村的民主運動，是長期、艱苦的，我們應該是一個短促的時間，我們不要急於使農村工作和暑期總結而同時終結。我們應該使教育和這些鄉村的知識份子，使他們建立起爲人民服務的觀念，使他們自覺到要爲農民大眾作一些事情，使他們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在暑期工作中，我們應該盡量吸收他們參加，在工作上來培養和提高他們的能力。以自己的誠懇，認真、刻苦的工作作風的實際行動來教育他們。培養他們獨立工作的能力。譬如我們來辦識字的補習班，農民識字班，就應該使他們在我們走後能繼續下去。在我們已經回到城市後，對這些鄉村工作的朋友，應該繼續的幫助，如能時事報導，書報供給，人際介紹等，這樣我們進行的短期工作可以轉化爲長期工作。

但我們得注意，在我們進行對農民，對鄉村知識份子的教育之前，我們先有向他們應負的任務，特別是由外邊去的知識份子。無論是農村的貧民，農民的生活習慣，農民的言語，我們都應認真的向他們學習，我們必須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決心，才可將他學情作好。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〇四號
廣州郵政管理局第六七〇號登記執照為第一期新聞紙

夏風作

文化生活提高

本期零售三十元

羊群衆

第十卷 第四十期

目 要

于 懷

巨風起自琉球

斯恩伯·E

資本主義的規律不是能改變的嗎？

馮 涵

論個性解放與發展

許 濤

論中國私人的資本

洪 沛

中國農業改革的道路

陶 端

在摸索試驗中成長的楊家灣小學(上)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版

巨國起自琉球

于 復(四七〇)

特 載

資本主義的規律是不能改變的嗎?

E·伯恩斯(四七六)

論個性的解放與發展

歐 涵(四七七)

論中國的私人資本

許滌新(四八二)

中國農業改革的道路

洪沛然(四八七)

法國內地軍的組織概況

曹若若譯(四九一)

在摸索試驗中成長的楊家灣小學(上)

陶端予(四九四)

讀者之頁

關於「發展資本主義」的問題

編 者(四九八)

書評及其他

談談青年對形式邏輯應有的態度

克 汀(五〇〇)

贅 語

張申府(五〇二)

羣 衆

第十卷 第十四期

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羣衆雜誌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總經售 新華日報館

本刊價目

本期零售 三十元

大 期 一百八十元

十二期 三百二十四元

廿四期 六百一十二元

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匯加

論 時 局

巨 風 起 自 琉 球

于 懷

波蘭國政府成立——奧地利問題解決——突突德軍開入柏林——民主陣綫戰後反動分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德民主義與新民主——何謂波蘭底經濟法因斯——舊金山會議兩月中的世界——舊金山會議的波蘭問題及其問題——舊金山會議的意義——波蘭等中的團結到團結中的鬥爭——持久和平何以可能——論波蘭之戰——舊金山的戰略政策——波蘭戰時和政時上的戰爭及其意義——波蘭決定戰和妥協和平陰謀的結合——日寇的宣傳和佈置——日本的滿蒙政策在獨立國家的身上——迎三國會議

一、歐洲問題的本質

三大問題的解決即解決了英美蘇三強會議的遺囑：三大問題——波蘭、奧地利和德國。

如所週知，波蘭問題早在今年二月初的克里米亞會議中解決了；問題從何處來？首先是所謂英法蘇對德兩邊協定的解釋不同，其實是英國方面故意曲解和推遲的協定，這將特別重因為蘇聯領袖在四月份的死亡，更加形其複雜。其次是所謂蘇聯捕獲波蘭十六民主領袖的事件，其實蘇方所逮捕的是十六名偽黨軍隊後方的法西斯份子，蘇方不察，一味盲從倫敦，五月中使問題頓陷於僵局。但所有這些問題，都一舉而廓清了。六月二十九日被捕臨時政府改組的義舉（五百名黨案中正式予以承認），一方面實現了克里米亞的協定，澄清了二月以來延誤了近四月的糾紛，另一方面奠定了民主波

蘭的基礎，拔去了自從十月革命以來就指回對蘇聯的皮鞭的劍頭。嚴格說來，這不是一個新歷史的創造，而是一段舊歷史的糾正。

其次，所謂奧地利問題是波蘭產生的，四月波蘭軍解放了奧國一部份領土之後，奧國人就在德納博士領導之下成立了奧地利臨時政府，英美不承認這一政府僅僅是因為事前和英美商賈，至於這一個政府民生的性質與倫敦的保守的泰晤士報也認為是符合其斯利會議對於奧地利的宣言的。五月中，歐戰結束後，英美又在奧國南部成立了華政府了這樣一來，蘇聯支持的德納政府和英美軍政府的對立形勢就形成了。現在，英美蘇決定仿照蘇軍分區佔領德國，共同管理柏林的辦法，分區佔領奧國，共同管理維也納，具體辦法不得而知，但這政府和德納政府各自為政的辦法總算是取消了。

最後，關於波蘭領土的問題，波蘭在克里米亞會議已決定了，但一則由於羅斯福總統的疑，二則由於納粹們在聖斯期間所發動的陰謀，三則由於歐戰結束後英美緩慢——孤立份子的乘機，差不多所有一切克里米亞所決定的有關於波蘭的狀態。言歸正傳，英美和蘇聯各專委員會，不相為謀，言歸正傳，英美某些人士始終對於實物賠償，特別是勞役價值不贊同；言歸正傳，因為納粹們的東擴應有的政策，英美的佔領區區域大於克里米亞所劃分給他們的

戰事，所以他們其中有些人對於重新調整佔領區域一事，根本不願考慮，他們至願英美法蘇各國繼續佔領其已佔領區域，共商管制沒有必要。這是一種混亂的形勢，但事經一月，所有這些混亂情況都一一澄清了。

在廢除問題上，蘇聯派代表參加美英的戰罪委員會，英美蘇共同處理納粹元兇的問題已無異於出來了。

在賠償問題上，英美蘇共同組織的賠償委員會已將在莫斯科開通第一次會，大家對於實物（包括勞力）賠償的應即應已無異於不討論賠償反對的語言了。

在佔領和管轄問題上，六月中英美蘇盟軍管制委員會在柏林商定了具體的辦法，七月一日起蘇軍開進英美退出佔領區域，而英美則則讓蘇軍單獨佔領柏林；七月四日英美蘇盟軍管制委員會在柏林舉行勝利大會議，這是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大開會，因為它顯露了：

盟軍終於獲勝了分裂，
進步終於戰勝了倒退，
民主終於戰勝了反動，

時代變了，一九一八年的重演是絕不可能了，這是一個團結的戰爭，盟軍終於戰勝了反動；這是一個民主的戰爭，民主的原則戰勝了一切；這是一個反法西斯的戰爭，民主團結的大旗飄揚在法西斯的巢穴——柏林的上空。

戰事結束，到今天剛滿兩個月，兩個月中世界局勢的變化非常之大，但到頭來，團結終於戰勝了分裂，民主終於戰勝了反動。

盟軍戰勝了分裂：這主要地表現在德蘇問題的解決上，試一設想，假定英美蘇對於德蘇問題不能執行一個共同的政策，今天的歐洲是一種何等情況？然而團結不能是沒有原則的。

民主戰勝了反動：這主要地表現在波蘭問題的解決上。試一回想，當蘇聯堅持雅爾達協定中的民主原則，對波蘭流亡政府中的法西斯份子表示沒有絲毫讓步可能的時候，全世界的反動派都在怎樣狂言蘇聯沒有安協精神呵！這是一種無原則的諷刺。一直到六月中英美蘇三方發表了被邀請的波蘭民主領袖名單，波蘭才未止息。這一批人有兩個法寶，一個是把法西斯說成民主，一個是法法主義。說說老實話，流亡政府有什麼法法就呀？它的法法根本就是不合法的，走開一間機關，漫遊飄飄的對刀，第一次戰後成立的波蘭政府可以想像嗎？

三大問題的解決，從一方面說是實現了，初步的實現了克里米亞的意旨，從另一方面說則又鋪平了英美蘇三強會議的道路；三強會議所討論的主要是歐洲問題，但波蘭、奧地利和德國並非歐洲問題的全部，更何況波奧德三大問題只是在一些基本原則上的解決，還有很多的側面——例如邊境問題就是一例——到現在還沒有談。

三強會議舉行在即，它所對峙的這場戰爭的烽火中產生出來的新的歐洲，把舊有的問題一一列舉出來不是我們的事情，但得指出法西斯宣傳的惡毒：

其中之一就是強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對立，例如六月二十日的東京英文日誌就發表了論德蘇賠償問題的文章，該文大意說：

「關於德蘇賠償的詳細內容還有待於莫斯科賠償委員會的決定，但已可看出英美蘇三強已決定放棄第一次戰後的賠償公式。從英美方面所得到的材料證明，這一次新的賠償，重點將是放在實物上，而不是像第一次戰後放在金錢上。這一決定的基本觀念是認為實物賠償是經濟上解除德國的武裝，使其不能復仇為一強大的國家。這道一個公式下，德國將被迫用生產機械，有質和勞動力量賠償它的征服者；；在這種情況下德國將在未來的若干年中陷於經濟的癱瘓狀態之中。這種經濟癱瘓的後果必然是政治的和社會的不安定，而一個不安定的德國是不可能在經濟上對其對它的鄰國產生影響，因為德國是戰前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中高度重要的一環。」

蘇聯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如何不得而知，但對於英美蘇維持歐洲資本主義制度的利益而言，却是極端不利的。戰後歐洲經濟的混亂和不安定只能在一個後果就是於另外一種經濟開闢路，而另一種經濟制度是利資本主義制度完全不同的。但對於那些相信戰後歐洲的資本主義的必須終結的人們，這種情況是再好也不過的。

從英美方面說，這是這一次戰爭一個最大的嘲諷，英美為了維持資本主義和德國打仗，德國打敗了，但英美也打敗了，因為他們在歐洲開闢了資本主義的墳墓。

其中之二，是強國新民主和舊民主的對立，六月二十一日東京日誌發表了一篇長文章，題名新舊民主之爭，該文大意說：

「反動心國家就他們的目的而說，是毀滅法蘭西，建立民主；但事實上，民主已變成英美和蘇聯之間一個鬥爭的根據了。蘇聯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它的外交政策却是嚴格的遵守着民主原則」

的。雖然蘇聯是共產主義者的支持者，但蘇聯在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實例卻是盡量獲得最大可能的民主份子的支持，在經濟上蘇聯主張農業改革和重工業企業的國有化，但在這些國家中蘇聯從未企圖破壞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

蘇聯公開宣佈要把歐洲民主化，它的民主化是把民主發展到理論上可能的最高度，但英美不同，英美對德國人民採取高壓政策，為了執行這一政策不惜起用反民主的份子，但同時，另一方面對於上層份子又採取較柔軟政策；左右搖擺，動搖不定。而蘇聯的政策却是堅定的，對納粹份子緊，對一般人民寬，在民主的基礎上，改善人民的生活，這就形成英美蘇在處理德國和歐洲問題上經常衝突的根源，雖然這衝突一時不致發展為不可調和的對立。

英美蘇之間對於處理歐洲問題上有相當程度的差別是真實的，但一，這差別沒有形成不可克服的對立；二，這差別在經濟上既不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差別；在政治上也不是，這就限度目前不是新民主和舊民主的差別。從歐戰結束後到現在的兩個月看來，英美蘇在政治上的差別與其說是新舊民主的差別無寧說是真民主的差別，而在經濟政策上的差別與其說是資本主義前途和社會主義前途的差別，無寧說是有沒有決心根絕法西斯的經濟基礎的差別。

問題只有一個：根絕法西斯還是容忍法西斯？要根絕法西斯就要有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政治民主是消滅法西斯經濟基礎的前提條件，而消滅法西斯的經濟基礎在歐洲就要做到兩件事：消滅土地關係上的封建制度（偏於東歐）和取締及管制大壟斷資本的活動（偏於西歐），而這兩者的實現是無損於歐洲資本主義制度的分離的。所這一些都是徹底消滅法西斯的不可避免的後果，實際上也是分明的寫在歐洲的解放宣言上的。總而言之，英美蘇對於歐洲問題的態度和政策是有差別的，但那差別一沒有超過團結所許可的範圍，二沒有、也不可能發展到不可調和的程度，誇大這些差別不過是法西斯沒落的一種分裂盟國的宣傳伎倆而已。

歐洲是新生了，一切把它拉回一九一八年的努力，不論來自何方，是徒勞的。

二、舊金山會議的歷史意義

舊金山會議順利地閉幕了。

舊金山會議的任務是制定一個世界和平與安全的聯合國的憲章，不管憲章怎樣美好，它不能創造和平，這是誰都了解的。在這一問題上，舊金山會議的成功是不難予以太高的估計。

世界和平決定於領導列強的團結，特別是英美蘇的團結，舊金山會議是英美蘇團結關係的一把鎖子，舊金山會議的成功證明了英美蘇的團結已經從戰時轉變到和平時的考驗，在這一意義上舊金山會議的勝利閉幕，其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舊金山會議開始於四月二十五日，結束於六月二十六日，前後經歷了整整的兩個月，而這兩個月的時間在英美蘇的關係却是充滿了重大考驗的一段歷程。

在這兩個月的前一些時，美總統羅斯福病去了，羅斯福總統自蘇德戰爭以來一貫就擔任着英美蘇之間橋樑的作用，但如今這橋樑是非其時地中斷了，這對於英美蘇的團結是一個重大的考驗。

在這兩個月的開始時，正是德國山崩水潰，希特勒發動狂熱政治攻勢的時候，它的西讓東併政策迷惑了英美盟邦中不少人士，這對於英美蘇的團結又是一個重大的考驗。

在這兩個月的第二週，歐戰結束了，英美蘇的團結在戰爭中生長的，歐戰這團結是基於英美蘇三方面的基本利益的，但英美盟方不少人正以和蘇聯合作為不得已為奇事，因此戰爭一結束他們就可以除去這和蘇聯合作的障礙了。從戰時過渡到平時，這對於英美蘇的團結又是一個重大的考驗。

在這兩個月的第三、四週，戰後問題來了，歐洲混亂，東亞昏迷，逆流高漲，不可終日，這對於英美蘇的團結又是一個連串重大的考驗。

兩月以來，反戰儘管層出不窮，舊金山會議的勝利閉幕證明了英美蘇的團結這些嚴重考驗，它已經走出這危險的長廊，單憑這一點事實我們已經可以看出舊金山會議的成功意義的重大了。

聯合國大憲章靜靜地擺在前面，但它其是從五十個國家的代表們在六十天的時間裡討論和爭執的暴風雨裡產生的。如上所示，舊金山會外，那一套的考驗性的事件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在舊金山會內，這樣一來，舊金山會內的爭執就益發帶上了狂風暴雨的性質。

很多事情到現在已經是昨天的陳跡了，但重溫一下在今天也還不失其歷史意義。

一、會議預備階段中阿根廷和波蘭問題

二、會議的第一階段中，美代表團在英美蘇共同提出的修正案時所提出的所謂聯合國應有權修改戰時所訂條約的問題。

三、會議的第二階段中的託治制度和區域制度的問題。

四、會議的結束階段中所爭執的常任理事的否決權和大會的相對權力的問題。

在這一系列的重次論爭中在表面上好像是英美代表常是力持民主原則，尊重小國利益，而蘇聯代表却力主權力集中不顧小國發言，但實際上這僅是表面的現象，中心的問題是英美某些個別代表藉民主的空洞形式，破壞克里米亞決定的民主精神，而蘇聯却堅持克里米亞的精神，力排空洞的議論。假如說英美是真的尊重民族自決的原則的話，為什麼對於蘇中兩國所提議的以獨立為託治的終極目標一案報以如彼猛烈的反對呢？這是一個小毛孔，但從這毛孔中可以看到真世界。

然而儘管經過了這樣猛烈而相持的論爭，所有的問題都在克里米亞的基礎之上，在英美蘇三大強國調和的範圍之下解決了：在團結，民主和進步的起點上，現實主義戰勝了空想主義（空想主義的背後是反動），合作主義戰勝了孤立主義（孤立主義的背後是倒退），集體主義戰勝了區域主義（區域主義的背後是分裂）。一個新的世界機構和一個新的和平憲章誕生了。

法西斯還有什麼話說呢？

有的，六月二十七日東京的朝日新聞寫道：

「所謂新的國際機構和舊的國際聯盟不同，新機構是在蘇聯的支持和參加之下形成的，而舊聯盟則是一開始在本質上就是反蘇的，誰都知道這是蘇聯在這次戰爭中作為一個世界列強而興起的後果，不過也正因为這個原因，英美也更加嫉視蘇聯的成功和懷疑它的意向。」

英美戰後政策的焦點是防止蘇聯的影響在世界範圍內的擴大。為達到此目的，英美有兩條路可以選擇——第一是向蘇聯發動一個全面的政治攻勢，第二條是緩靖蘇聯，用和平的方法達到他們的目的。很顯然的，英美已經決定了採取第二條辦法，成立一個國際機構通過它來把歐洲現存的力量對比予以一定限度內的永久性。

因此，這一種機構將成為英美和蘇聯兩種相反的世界政策一個激烈的政治和宣傳鬥爭的泉源。新機構的未來決定於這一鬥爭的結束。

我們不否認的確是有一羣政客者在監視蘇聯的成功，懷疑蘇聯的意向，從而到處防範蘇聯，甚至至不惜借言英美蘇必戰的夢話，但這絕不能代表美

美的進步人民及其支持下的政府的政策。那麼，問題的關鍵在什麼地方呢？團結之中有鬥爭；過去是戰爭中的團結，現在是團結中的鬥爭。而鬥爭的方向是向着民主，向着進步，向着團結，世界力量對比的改變和全世界人民的覺醒和組織保證了這鬥爭是一定勝利，未來幾十年的和平是可以保持的。

三、太平洋戰爭的新階段

六月二十一日尼米茲元帥正式宣佈琉球之戰結束，新任美第十軍軍長史德威將軍雖然表示琉球島上的掃蕩還要繼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但從實際的觀點看，琉球之戰是結束了。從四月一日起到六月二十一日止，大琉球的戰爭整整持續了八十一天。

北面大琉球之戰結束，南面的菲律賓之戰亦於七月五日由麥克阿瑟將軍正式宣佈結束。從去年十月二十日美軍登陸雷伊泰起至今年的七月五日，菲律賓之戰整整持續了八月有半。

此外還有兩個戰爭，一個是緬甸英軍還未完結的掃蕩戰，一個是婆羅洲新開始的美澳聯軍的東印度之戰。由塔拉甘，而婆羅乃，由婆羅乃而發展到目前的峇厘巴板。但這兩個戰爭在太平洋戰爭的全幅畫面上是次要的。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大琉球之戰勝利地結束。

由於大琉球之戰的結束，美軍在太平洋上全盤的戰略，擡上了軍事日程。美軍的下一步攻勢究竟向何處發動呢？

這是一個巨大的問題。

六月三十日美海軍部長在舊金山召開，尼米茲將軍親自去參加的太平洋海軍將領的戰略會議，顯然是討論的這一中心問題。我們不知道美海軍將領們究竟做了什麼決定，不過最近（七月三日）美第七艦隊司令金德爾將軍發表談話主張不必發陸中國而直接進攻日本本土是和這一會議有關的。

怎麼決定呢？

固然不是打關一樞太平洋地帶看大琉球的前後左右有什麼地方，這樞的決定太草率了，問題的核心在如何評價大琉球之戰的成敗得失，學習大琉球之戰的經驗教訓，這是決定問題的唯二指針。

關於大琉球之戰的歷史發展和船人員死傷的具體數字已經是眾所周知

的存實了，這裏不去重復，然而簡單的真理常常是容易被大忽視的真理，從大地球之所有幾次簡單的真理是值得提出的：

一、由於大地球距離日本本土近，日寇佔有局部的陸上空軍的優勢，這優勢包含著自性的戰術，使美軍的艦隻遭受了巨大的損害，這損害的程度不如此日趨直傳之盛，但有一件事實是公認的，琉球之戰差不多把美軍的太平洋艦隊艦船用到最高的程度，琉球之戰繼續一天，美軍不能在任何其他地區發動較大规模的登陸作戰，這是一件簡單的事實，但這事實對於未來的作戰却是有着深遠的影響的。

二、由於日寇在大琉球擁有充分的後備軍和各式國民義勇隊，本來估計為六萬人的戰鬥的，但到戰鬥結束時却增加了一倍以上，據盟方估計敵軍死傷十萬，殘餘者還有三萬，總數已達十三萬以上，這就使得大琉球的地面戰鬥在最後的五十天中呈現了空前艱苦的情況，這就所謂地獄一般的殘酷之戰而上之。所有這些地面戰鬥是差不多都在近接戰的情況下進行的，雙方死傷的慘重是可以想像的。

琉球之戰是未來的本土之戰的縮影，即軍應該怎樣決定他的下一步攻勢呢？

最後的決定不得而知，可能是最後的決定根本還沒有下，不過一個激烈的論爭已經在太平洋的那一邊展開着。我們從新聞報上所知道的是一鱗半爪，不過這這一鱗半爪反映起來已經可以看出那論爭的全貌了。那論爭的範圍從兵種性質一直牽連到戰略和政略。

一、在兵種性質上的爭論，決定戰爭的是海空軍還是陸空軍？主戰派海空軍決定戰爭的人，也承認陸軍必須完成佔領的工作，但他們對空軍的性質誇張到實際上是一決定戰爭的武裝。

二、在戰略上的爭論：迅速決定戰爭的戰略是直接登陸日本本土還是先登陸中國大陸。大陸論者並不以為在中國大陸進行決戰就不需要進攻日本本土了，海軍進攻日本本土，不過大陸的決戰應在登陸日本的全過程中佔有決定性的地位，一如俄羅斯平原之戰之於歐戰然。在這裏，要指出在二級理論上主張海軍決定戰爭的大部傾向於直接進攻日本本土，而以陸軍為戰爭中決定性的兵種時期又大部份傾向於大陸決戰。前者的代表人物如金開德，後者的代表人物如史德威。

三、在政略上的爭論：由美國一國單獨擊潰日本好呢，還是太平洋同盟國家聯合作戰好呢？從一方面說，海空軍決定論和直接登陸日本本土論者

的自然歸結是美國一國單獨擊潰日本主力的政略，而陸空軍——大陸決定論者的自然歸結則又是同盟作戰的政略；但從另一方面說，正是因為人們內心希望單獨致勝，所以才採取了海空軍決定戰爭的理論和直接進攻日本本土的戰略，軍事理論不過是政治生態的隱幕而已。

大琉球之戰激起了這一場論爭，論爭的結果雖不得而知，不過華盛頓方面目擊大琉球傷亡慘重，開始已開始在考慮修正過去那會經是一而再的本土決戰和單獨致勝的戰略和政略，而試探去準備大陸決戰和同盟作戰的戰略和政略的條件了。大陸決戰必須促成中國內部的團結，同盟作戰必須爭取蘇聯的積極參加，而這兩者又是互相聯繫着的；如所週知，在這兩方面華盛頓都採取了一些比較過去稍為積極的步驟。

巨風起自琉球，太平洋上空正湧着一股新的風向，事情在開始轉變着，但必須指出這種轉變是非常的不徹底的。這種轉變是非常的不徹底的，因為嚴格說來空軍——本土——單獨致勝的理論，戰略和政略直至今日還在太平洋的那一邊起着支配的作用。試舉最為典型的的一例：

六月十五：「美眾院撥款委員會主席加倫先生發表談話，認為假如日本不在九十天內崩潰的話，那麼「戰爭或時局會延長一個時期」，在那種情況下，美國將充分使用它的空軍，進行消耗戰，「我們寧可這樣把戰爭拖長些，一方面餓死日本，另一方面可以節約我們的生命」(同日紐約合衆電)。

這一段話一方面暗示非常清楚明白，但另一方面的意思却扭扭捏捏，說得乾乾一點就是這樣：三個月內單靠空軍就可以促使日本投降(實際上是否如此)；反正空軍的轟炸是必要的，假如到那時不投降呢？那末，再說吧，等到那個時候，再說吧。

大琉球之戰的教訓雖然叫過人，個人改弦之張，但一方面由於歐洲美軍的東調還需要三個月的時間才能完全，牛力未試，自信甚強，另一方面又相信空軍的轟炸，或者也可以促使日本的投降(妥協)——在這種情況下，它所能產生的效果是不會太大的。這就定今天的實際情況。

從理論上說琉球之戰結束，美軍的下一攻勢有兩個可能，一個是北上屯美島，一個是西來華甲登陸，作為建立空軍基地的攻勢，這兩方面都有可能，但作為本土或是大陸決戰的開端，美軍顯然還沒有下最後的決策。

不管美軍最後決策如何，由於大琉球之戰勝利的結束，太平洋戰爭已進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這是一個新形勢，敵人需要一個新的宣傳政策，一種

新的兵力佈署。

對於這問題，不能一一加以詳細的分析，僅僅僅僅提出：

蘇大新的宣傳政策在蘇聯本土之腹即歐戰來，國破家亡的苦痛，好這樣來激發起這海日漸消滅的士氣，但過不能無端而歸為日寇已走上即將崩潰的邊緣。須知這是一種宣傳政策，西方的領袖早在一九四三年初就一變而為過去的請大勝利的宣傳政策，轉而以歐戰之民之痛苦激發它的民心，推德它的動員了，但德寇的崩潰却是在一年半以後的「一九四五」的五月才實現的，以四洲東）彼此同理。不能說日寇已崩潰即將崩潰的時機，它還擁有很大的兵力，它正在準備新長期糾紛的新佈署。

根據兩月以來日寇本土，中國大陸，和南洋三方面的動向來判斷，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確定的結論：儘管日本在某些重要地區尚有局部撤退的可能（六月二十九日曼得沙所），它的新佈署是以分散獨立作戰為方針。因此，不難預料的下一步攻勢是在那裏，因為盟軍在日本本土登陸，日寇從中國大陸撤退，盟軍在中國大陸登陸，日寇在南洋撤退，而至於盟軍在華中登陸，日寇在華南撤退的可能性是沒有的。

那裏日寇希望在那裏呢？軍事上的權衡和政治上的考慮，軍事上於權衡，政治上的發動妥協協謀，促進盟軍的分化，特別是美英蘇在歐戰中的關係的加深，美蘇在亞洲問題上的不合作，而這一陰謀最其體面又表現於它對於中國問題的好感上。在這一個問題上，美國的空軍決定論者，所謂本土決戰論者和單獨發難論者在凌觀上正是中了日本法西斯主義者的下懷。

三強會議不獨，三強會議主要的議題自然是戰後的歐洲問題，可以想像這一會議所討論的範圍是涉及於全世界的，理由很簡單經過了這一次戰爭蘇聯已經變成了領導的世界列強之下，過去只是關於涉於英美的世界重大問題，如今不能不變成英美蘇三強共同討論和決定的對象了，例如蘇聯的提議召開四強會議解決波利和黎巴嫩問題，例如蘇聯的要求參加丹吉爾問題的決定，都是這一歷史趨勢的表現。在這當中，其將涉及遠東問題是十分自然的，

沒有蘇聯的積極參加，遠東問題是不能得到最後解決的。

日本法西斯的希望在哪裏呢？一在英美的投堵孤立主義者阻止所謂蘇聯的影響在世界範圍內的發展，要蘇聯以成爲歐戰的列強，但不得成爲世界的列強，好那樣來加強美蘇之間的「敵性的矛盾」，二在英美的投堵孤立主義者拒絕蘇聯參加遠東問題的決定，名義上承認蘇聯是遠東的領導列強之一，但實際上却是否認蘇聯是遠東的領導列強之一，好這樣來分化同盟國家在太平洋問題上的團結。

這是一條好夢，這好夢出現在如下的一篇短報中：
「此間（瑞士）以爲未來的三巨頭會議所討論的主題將限制於歐洲，但亦將涉及較爲廣泛的問題。」

英美的遠東政策是極可能的拒絕蘇聯參與遠東問題的解決……在過去一個時期蘇聯的遠東政策還不清楚，但最近幾種報紙對於中國問題的討論已經把這政策的面目描畫出來了。

在克里米亞會議時美蘇好像已經同意了遠東問題每對歐戰結束之後討論。歐戰結束，倫敦和華盛頓即開始徵詢莫斯科對於遠東問題的意思。費浦金斯在莫斯科好像就負有這一使命，美國則知道這蘇聯對遠東的要求是什麼，這些要求美國是否可以接受。

……作爲蘇聯不參與遠東問題最後解決的代價，美國放棄遠東對蘇聯作若干讓步的，目前有很多材料指示這種談判是未來三巨頭會議的主要問題之一」（六月二十九日路透社瑞士專電）。

這是日本法西斯的好夢，但亦得承認：一部份孤立——縱橫主義者的願望是懷抱着這樣的企圖，這種企圖能够成功嗎？不能，絕對不能，而且這好夢已開始在大地球幻滅了。

大地球之戰的收場咄咄之逼人，個人改裝更張，三巨頭會議不遠，忽到中國人民的力量，孤立蘇聯的企圖不能成功，事件的發展要求當機立斷，現在是面對現實，改變政策的時辰了。

（七月七日夜）。

？嗎的變改能不是律規的義主本資

員委央中共英

斯恩伯·E

當馬克思主義者說戰爭的結束，是制約階級的對立時，他並不在修飾詞藻。他們的意見是說，法西斯主義的敗亡，將產生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

我們不知道，也不能知道這些新條件的確切性質。但是我們能猜到目前就已發生的許多變化。這些變化的實質，在於人民能慢慢地，但最後確實地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主義——那就是說，反對獨佔資本家中最反動的一部份——而同時，各國人民的力量，日益超過過時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力量。

事實上已經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階級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團結，各國人民的新的政治威刃，建立持久和平的決心，以及他們在軍事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合作。

而克里米亞決議這些業已存在的事情，向前推進了一步，這些決議表示怎樣才能推進團結、民主和合作，使戰後時代成為真正的新時代。

在這種新時代中，主要的目標是聯合國家應該共同工作，以去除戰爭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原因。但是不完全掃除資本主義，怎麼能去除戰爭的根源呢？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不是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去除戰爭的根源麼？不是說資本主義是造成失業、經濟恐慌、各國大資本家的敵對，因此就造成戰爭麼？

總問題是這樣，是特定獨佔資本主義依然完全統治着一切。當馬克思，以及其後列寧，描述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則的時候，資本主義是世界上最強的一股力量。在沒有其他東西抑制資本主義的時候，他們所描述的規則不可避地是資本主義如何工作的規則。但馬克思和列寧並沒有說沒有東西能抑制資本主義。相反地，他們以整個生命致力於鼓勵工人階級來反對它。

他們的工作，以及各國共產黨工作的結果，使資本主義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動力了。有了一個社會主義的蘇維埃聯邦。由於打敗了法西斯主義，解放了自己，也出現了權力真正在人民手裏的許多民主國家。甚至在反法西斯的帝國主義國家裡，以民族利益為前提的各種管制形式也在戰時發展起來，阻礙了獨佔資本主義的自由自在。

在這些情況之下，「資本主義發展諸法則」並不能發生作用，彷彿整個世界是資本主義似的。當然，這些法則是可以作為一個趨勢，而且是強烈的趨勢。但這些法則並不是「不可避的」。資本主義的趨勢傾向是正在，而且能夠繼續被人民的力量制止的。

洛拉漢姆·謝拉斯有一次寫到馬克思在刪除「政治經濟學諸法則」的神話中所起的作用，他說，這些法則是資本主義經濟學家規定下來的，好像「腦腸滿的警察」一樣，攔住了進步的道路。

現在企圖把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法則，規定得像「腦腸滿的警察」一樣，攔住了實現克里米亞決議的道路的人們，是完全誤解了馬克思。他並沒有看到，對於馬克思，形成歷史的是階級鬥爭，而不是經濟法則。工人階級須懂得這些法則，但其目的並不是為了「腦腸滿的警察」一攔住他的手，就馬上煞住腳步。

想一想早年的蘇聯吧。其時蘇聯依然存在着資本主義，因此也存在着「資本主義發展諸法則」的許多傾向。但蘇維埃政權以及社會主義和集體經濟也存在着。列寧提出的問題是：「誰能勝了？」大家都知道，社會主義是勝了。在歐洲的一些民主國家內，可能也有其他的中間的經濟形式，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間的過渡形式。因此，在世界的範圍內，「資本主義發展諸法則」和家內，可能在其他方面表現着對抗獨佔資本主義的力量。

其他因素發生了矛盾，這些因素，經濟法則，甚至馬克思和列寧所描述的經濟法則，不能決定着是否去除戰爭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根源。決定因素是在於各國人民取得政治權力，使用來剷除戰爭根源的途徑如何。

英國的戰士和馬克思主義政治家們曾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完全隔離，這是英國工人運動接受馬克思主義時所採取的方式的許多悲劇之一。英國共產黨曾作為橋樑，彌補了這個隔離線，因此今天能將馬克思主義應用得正如馬克思所想的——不當作教條，而當作行動的指南。

(以前譯)

論個性的解放與發展

個性解放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內容之一。

如果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政治上是要推翻封建貴族的專制壓迫，在經濟上是要取消經濟的封建剝削關係，那末，在文化上，便是反對一切違反理知、違反人性的封建傳統的禮教，把它剝放在理知的審判台前重新審判，換句話說，就是要喚起個人的意識覺醒，而脫離那幾千年來束縛着他們的身體和心靈的桎梏。

擺脫一切地上和天上的傳統權威的束縛，肯定人的獨立、自由和幸福生活的權利，這可以說是個性解放的內容。這種個性解放的思想，在歐洲的文藝復興時代就已經產生了，他們抗議禁慾主義的宗教道德，而主張恢復人的自然情感。笛卡兒的所謂「我思故我在」，就充分表現他是怎樣推崇個人獨立思想的意義。每個人要以自己的意識決定自己的問題；支配自己的行為，反對盲從，要求人的獨立、人的自覺。這就是十六世紀歐洲思想內容的要點。直到法國大革命，宣布了那莊嚴的「天賦人權」、「人人平等」的人權宣言，資產階級革命在文化上的反對封建鬥爭，都是在個性主義的旗幟之下進行的。

大詩人歌德，當他在年青的時候，就會經過這種個性主義的熱烈歌頌。他毫不留情的抹煞了那些古老的強迫人們屈服於它的力量和權威，而謳歌了自己的力量與權利：

奧賽匹的驕傲的巫師，

他們對於我的力量

想要享受什麼權利呢？

力量是我的，它們的運用也得由我。

就是對於最高等的巫師，

我也是一步都不讓的。

我——大家也是一樣——

要承認在自己之上的

雷神的權力嗎？不的！

這就是個性主義者的驕傲的宣言。

在中國，個性解放的口號，也隨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高漲，在五卅時代就提出來了。反對舊禮教，打倒孔家店，主張個人的獨立自由，這和幾千年來的中國傳統思想水火不能容的新思想，曾經流傳在許多青年中間。可是從五四到今天，中國人民的個性解放一直沒有實現。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束縛着中國人民的個性發展，而且古老的封建禮教現在又穿上了高宗的衣冠，活埋和剝削並用，八卦與尼采結合，對於人民個性的摧殘、壓迫，是愈來愈毒辣了。

因此，反對這種壓迫和束縛，使廣大人民的個性得到解放和發展，是我們奮鬥目標之一。有些人對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贊成發展個性，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這是一種過慮。其實，不贊成發展個性的，不是共產黨，而是民族敵人和封建勢力以及一切反人民的勢力。他們不但贊成，而且是在實際上摧殘和束縛着人民的個性。在民族敵人的奴役下，人民不是做國民，便是被屠殺，個性解放是根本談不到的。在封建勢力和一切反人民勢力的壓迫下，人民連起碼的生存條件都沒有保障，個性解放也是根本談不到的。

一一

廣大人民個性的受束縛，當然首先是在政治上。個性的解放，必須以民主政治為前提。有兩種反民主的政治制度，一種是封建制度，一種是法西斯

制度，這兩種制度，都是殘酷地殘害人民的個性發展的。在封建社會里，一國的帝王奴役全國的百姓，一國的領主奴役着全國的農民，一家的家長奴役着全家的子弟。廣大人民便得在這層層的束縛下生活，沒有權利，沒有自由，在這里，是不可能有任何個性發展的餘地的。如果說封建主義是毀壞單個的個性的奴役，那末，法西斯主義是製造「全體」的奴役，它的「全體主義」對於每個個人有任何的自由權利？人民只有盲目的服從（被馴）……

……這是機器、工具，不是「人」，更不用說是有意識性自由的人了。而現在中國的及廣大的勢力，正是結合了這兩種因素，使管理下的摧殘着全國人民的個性。

廣大人民的個性受束縛，也是由於經濟上的原因。在封建性的社會制度下，人類是經濟的附庸，只能過着牛馬不自由的生活。廣大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的五種上面，每年交着地租，大部分是交作租稅交給了別人，他們的辛勤勞動所得在最低的水準上，他們不能過着作一個「人」所應當有的生活。而地主的剝削，就是他們無上權威。他們不能有自己的生活，也不能有自由的生活意志，終年辛苦，為人作奴，一切是為了滿足別人的慾望，實現別人的意志。在這樣的情形下，廣大農民的個性解放是談不上的。而對於勞動的階級的勞動，幼稚的生產技術，又使得廣大農民的個性發展，受着極大的限制。

經濟在經濟、政治、經濟基礎上的文化思想，是束縛個性發展的第三個因素。所謂忠、孝、節、義，說穿了就是人民是帝王們的奴隸，子女是父母的奴隸，妻子是丈夫的奴隸，僕人是主人的奴隸，這就是所謂忠臣、孝子、貞妻、節婦，但這里却沒有真正的「人」。法國大革命前的拉其美說：「我照樣稱上帝——父親」，而帝王則是「衆父之父」。可見在相稱的社會階級上，東西的尊卑是「反的」。在這層層「父親」的階級下，人的個性是被絕滅了，或者說壓打得不成樣子了。

在這樣的社會中，人民是受着成規的，機器，或者說多着會說話的奴隸。農民，這就是隨便可以踐踏的東蹄了，而一個個子造出來的機器，是說不盡什麼個性的。在革命以前，我們說，每一個個子造出來的機器，因為會勞動，會勞動，所以說，原樣在他們每一個人的身上。給它各種各樣機器，使他們（「機器」）和給它各種各樣機器的「機器」，你是個個

看出他們的區別來的。而O和小D，都同樣是機噐吃人的封建社會壓抑得精神肉體都成了畸形的人。

要求個性解放的鬥爭，常常表現為思想的鬥爭，表現為道德、哲學、宗教的鬥爭，因為這些是更直接表現着個性的作用。思想鬥爭，是實際鬥爭的前鋒戰，它的作用，是首先在精神上瓦解敵人的武裝。但是真正解決問題的，不是思想鬥爭，而是實際鬥爭。個性解放的鬥爭也是一樣，它必須以政治解放和經濟解放為前提。當人類在政治經濟上還受着束縛的時候，個性是得不到真正的解放的。法國革命在思想主義上表現出來的，是人的覺醒，是理性的勝利，但實際上，正如史家所說的：「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是所有的歷史」。這就是說加強了農民的所擁有的權利，而加強了封建的專制。個性發展是有政治經濟的基礎的，那末是空虛樓閣？是不現實的幻想。為什麼五四時代的個性解放運動，沒有得到實質的成功？這就是「一個最嚴重的原因。五四時代，多少青年受了新思潮的影響，從舊有的昏暗中醒過來，他們不願意再受舊教條的毒害的毒害，奮然醒來，要做一個獨立覺醒的「人」。他們（和他們）的勇敢，令人欽佩，但他們（和他們）的鬥爭却終於失敗了。歐陽先生先生的「覺醒」的人，就會明白當時覺醒了的知識青年所走過來的彎道。他們追求個性的獨立，顯微着自己的意識覺悟，就憑着這種精神的力量，來挑戰舊社會的一切，但他們是終於失敗了，這一點內心的熱力，終於敵不過社會的嚴威和冷箭，那末，那末，這是一場夢。這就是因為社會並沒有變，人們在政治、經濟上並沒有得到解放，在「娜拉出走後怎樣」一文中，魯迅先生就明白的指出，如果婦女沒有得到經濟上的權利，那末，一切都將是空的，出走的娜拉，如果婦女沒有得到經濟的權利，那末，那末，一切都將是空的，出走的娜拉，如果婦女沒有得到經濟的權利，那末，那末，一切都將是空的。這在當時可以說是一「真知灼見」。

三

對於個性自由，有從兩方面來的歪曲。一種是從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方面來的歪曲，他們把個性解放解釋為極端的自我中心主義。他們覺得自己是從人羣中精選出來的人，是那樣的美妙，那樣，不可缺少，因此，應該讓他們有特殊的、生活享受的權利，應該讓他們比別人都過得舒服，滿意，與衆不同，

愛怎麼就怎麼。只管自己的利益，不顧羣衆的利益，就是這種人的特點。這就把個性主義降低到市儈主義了。市儈主義也可以不講現實，但是他決不改選現狀，而是一面抱怨，一面就在現狀之下努力弄好他的精緻的生活。用霍秋白的話來說，這實際上也是一種「奴隸的心」，是想要在千千萬萬的奴隸中，做一個特別舒服的奴隸，充其量不過是高等華工而已。這不是真正意義的個性解放。

這種市儈式的自我中心主義者，常常把自己扮成超階級的特殊人物，他們自以為是「第三種人」，而抱怨於兩方面都壓迫他束縛他了，害得他們的精緻的個性不能發展了，於是左右開弓，向兩方面要自由。可是，他們的真簡是朝清工農發難的，而射向另一方面，則只是裝模作樣的紙箭，或者竟是在暗處進去的秋波。時間暴露一切，沒有多久，那伸手向上要自由的「第三種人」就落了用剪刀來宰任意剝奪別人的自由的「自由」了。「第三種人」和「第五種人」，原是非常接近的題目啊！

另一種歪曲，是從反動的統治者方面來的，他們把個性自由解釋為少數人的權力意志的自由。他們自認爲超人，而人民是「庸衆」，應該永遠被壓在他們的腳下。這是最反動的個人主義，這是「獸性」的自由，是暴君的自由，用高爾基的話來說，是爲了一門「我」的完全自由，而奴役其他一切他名詞（你和他）的。直接談話這種反動的個人主義的，當然屠刀和槍桿，但上述所談的市儈式的自我中心主義，也正好給他們掃清了道路，造成了極大的方便。這種反動的個人主義者倒並不掩蓋他們的階級面目，那死有餘辜的市儈們，就公開地說過：「要嗎，你保護我，否則，你的地位便在集中營裏面。」

這兩種歪曲的「個性自由」，都是我們所反對的，我們要的是大多數人的個性自由，是幾萬萬人民的個性自由。這里面，當然主要的是佔人口百分之八十的羣衆。把他們從極端的貧窮、愚昧、沒有文化和不衛生的狀態中解放出來，這正是我們目前革命階級上的首要任務。人是第一，帶着鎖鏈的人，談不到意志的自由，在飢餓和死亡線上掙扎着的人們，是談不上個性的發展的。

所以，我們爲個性解放，不是少數人建立在大多數人的飢餓和死亡上面的個性解放，而是廣大人民在共同的幸福生活中的個性解放。這樣的個性解放，只有在人民佔優勢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里才有可能。資產階級在革命的初期也以個性解放爲號召，不能不承認，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人民個性的發展是得到了一些自由，他們擺脫了某些封建的束縛，獲得了極少的一些政治上

的權利和受教育的機會，資本主義的生產，需要無比無知識的奴才更聰明一些，勞動者，但這只有在合乎資產階級利益的範圍內才被允許，超過了這個範圍，觸犯了他們的利益，個性就要被壓抑了。因爲在舊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社會里，少數的金融寡頭操縱了整個的國民生計，廣大工農依然過着貧窮的生活，飢餓的鞭子使得他們不能不犧牲出賣自己的勞力、肉體，甚至於愛情。有錢能使鬼推磨，在這里，金錢的魔力代替了封建的魔力（當然這魔力不是由金錢本身來的，而是一定的社會經濟關係的產物），人們向個性便在這個威力下被磨滅、被壓殺了。

馬克思說：「在資產階級社會里面，資本具有獨立性及個性的，而勞動的個人却不是獨立的，沒有個性的。」在那樣的社會里面，不但精神勞動和體力勞動依然互相分裂，而且人們被束縛在一種部分的機械上，不能不一輩子服侍這一個部分的機械。提螺絲釘的人一輩子是扭螺絲釘，割皮革的人一輩子是割皮革，人成了機械的奴隸，成了職業的奴隸。個性的和諧發展，是被阻礙而成了不可能。

四

在邊區和敵後解放區，因爲實行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政策，廣大人民個性的發展，得到了寬闊的發展。幾年來被壓迫的農民，從地下了起來，他們得到了政治的權利，得到了豐衣足食的生活，他們的一向被壓迫的眼睛，是突然睜開了，他們看見了更大的世界，同時也在這里面看見了自己的力量，他們就擺脫了自己的力量是熱烈的參加了這個改造社會、改造自然、同時也是改造自己的莊嚴的鬥爭。

這是一個新的現象，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現象。但人們對於新的事實，往往不容易了解它，認識它。有些人說邊區的人沒有個性，理由是邊區的人個個都差不多，太一致，太缺乏多樣性了。這完全是一種皮毛的看法。有兩種一致性，也有兩種多樣性。在不合理的舊社會里，由於政治經濟制度的惡劣和人們遭遇的複雜，的確造成了人的多樣：瘋子、妓女、乞丐、流氓、騙子、大財主、第五種人，哭的人和笑的人，吃得飽飽和餓得要死的人。真是五花八門，還有許多，活像一個光怪陸離的雜水池。但這樣的多样性，難道是值得誇耀和欣賞的嗎？而在這種多樣性的背後，正有着它的階級的一致性：一種是吃人者，一種是被吃者。在邊區，這樣的多样性是沒有了，反之，他們的確是很一致，在邊區，人人都有一樣的自由，都過着

一樣的豐衣足食的生活。在那里，沒有叫化子，沒有流氓，沒有強盜，也沒有吃得過飽和餓得死的人。他們大家都一樣的緊張工作，勞動生產，開闢馬路或者躺在靠椅上別人流汗出力的人是沒有的。每一個人臉上都露出掛着同樣的笑容，那來自他們的共同幸福、共同信念的笑容和根據於共同真理的革命的人生觀。這樣的一致性，難道不是最可寶貴的嗎？這正是大多數人所要求的一致性，只有少數的人才會覺得這太單調、太不新鮮了。

可是，另一方面，邊區和敵後解放區廣大人民的個性和才能，在優良的政治條件下，却真正得到了解放和發展。他們在舊社會里是受侮辱、被踐踏的對象，正像他們自己所歌唱的：「吃的豬狗食，受的牛馬苦」，他們的生括其實還不如牛馬，但現在他們却從沉重的壓迫下翻身了，一切束縛他們的身體和心靈的桎梏全都解除了，他們原有的優良品質和豐沛的才能，是一向被埋沒的，一下子便都獲得了肥沃的土壤，蓬勃地發展起來了，那真是豐采多姿，光輝奪目。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情，這才是真正的廣大人民的個性解放。

這兩種多樣性和兩種一致性，是植根於兩種不同的私有財產的基礎上的：前一種是少數人擁有最大部份的社會財富，大多數人則一無所有，這種私有財產制度破壞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造成了複雜多端的社会慘象；後一種是一切人民都獲得了自己的私有財產，人人都有自己的個體經濟與合作社經濟，因此也就人人有了個性。這種私有財產，將大力的使社會生產力向前發展，而使人們日益脫離那由於生產力的低下而來的過度辛勞和悲苦生活，而獲得享受輕快、幸福的文化生活的可能。陝北的老百姓，把種用叫做「受苦」，這個名詞充分表現了在舊社會里農民的悲慘命運；但現在，對於邊區的農民，種用已經不是「受苦」，而是為了他們自己的生活幸福而有興趣的勞動了。

現在，人人都知道吳滿有是邊區的勞動英雄，他得到人們的敬愛。可是，在革命以前，在舊社會里，他是一個窮得沒有飯吃，被逼着只好賣女兒的人。在革命以前，他租佃地，打七、八石糧，除了繳租繳稅，只能剩二、三石糧。在一九四三年他卻收穫了八十多石糧，除了繳公糧以外還够吃兩年。他不但自己生產好，還幫助全村的生產，領導全村的農工，把他所住的「吳家臺園」變成了模範村。現在，他是全邊區的勞動英雄。可是，如果不是在新社會里，不是在新民主主義的邊區，那末，誰都知道，吳滿有只有歐陽的貧窮、苦難折磨到死，誰也不會知道他，他的優良的品質，豐沛的才能，一輩子也沒有表現和施展的可能。勞動英雄孫萬福（他已經去世了，我

在這里對他致敬），當他看到毛澤東同志的時候，他就抱着毛澤東同志的厚脚，感動地說：「沒有你——毛主席，我們是永不會翻身的！」這一句話里面包含着多大的喜悅，可是也包含着多少悲痛的經歷和回憶啊！

像吳滿有這樣的從羣衆中湧現出來的英雄人物，在邊區是一天一天的增加着。人們常常說，農民是保守的、自私的。可是，保守是出於愚昧，自私是出於貧窮，這正是不合理的社會所造成的惡果。在一個優美的環境中，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這幾年來，邊區出現了多少急公好義，把幫助別人當做自己的最大快樂的農民英雄。比如馮雲鵬，他的拾己爲人的精神，是誰都要感動的，在他面前，那一個敢說他是「自私」、「保守」呢！在這里，我禁不住要抄一段關於他的文字：

「在馮雲鵬村附近的孟家灣，是一座長約二十里，寬約十里的荒山，一九四二年只住農民九家。因爲馮雲鵬常爲他們幫忙，所以他們選了他當孟家灣的村長，兩戶湖北人會炸麻雷，馮雲鵬就借給他們炸藥。他做借給吃糧一斗三升，和他們一起到山上挖藥，幫助農民度日。一九四三年政府號召安置難民，馮雲鵬積極響應這個號召，來爲難民解決糧食、醫藥、土地、農具、種籽等困難。春間被任爲難民委員，此後馮雲鵬就更加負責，努力安置難民工作，在雪天的時候，他冒雪出外調查安置難民的地方，共計十天，查出有可開平荒地四千多畝，坡荒地六千多畝，舊窖洞八十二孔，他計算至少可以安置一百戶人家。過年正月難民就來得不少了；從赤水方面來的，大部是經過了他的手，等到縣委來檢查工作時，他已安置好了一百二十多戶，其中經他一個人安置的，就有四五十戶。因爲難民來的愈多了，八十孔舊窖洞不够住，於是他又想法打了三十多個新窖洞。共成立了十四個自然村，組織了四個行政村，共安置移民一百七十四戶，約五百多口人，計全勞動力一百五十個，半勞動力一百九十個，紡織婦女八十個。一九四三年計開荒種地二千四百畝，秋收糧食一千三百石。又開秋荒六百畝。這些……計有河南人九十戶，陝南人二十多戶，山東人三十多戶，河北人十多戶，其餘幾戶未詳。」

這難道不是最優良的品質，難道不是最可貴的個性嗎？但這樣的個性，只有在新民主主義的邊區才有發展的可能。這就又在新的社會里面向新的人。這好像是奇蹟，然而事實，一個在舊社會里誰也不重視的人，一到新的社會，就發出了那樣的光芒。在那里不是束縛個性，正相反，而是真正解放

和發展了廣大人民的最好的個性。不但如此，在那裏還改造了那些由舊社會所遺成的二流子、寄生蟲，使他們從泥坑里跳出來，做一個真正的人。劉生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革命以前，舊社會壓迫他，陷害他，誘惑他，做各種各樣的壞事情：賭錢，抽大煙，……游手好閒，不務正業，逼得老婆也要和他離婚。但新社會却用盡方法扶他起來，區政府勸告他，說服他，給他糧食，給他本錢，幫助他做一個好人。不到兩年，他就獲得了豐衣足食的生活，由一個被人輕視的社會的渣滓變成一個受人敬愛的勞動英雄。他的人格、才能，這才真正受到了尊重。使廣大人民得到了政治、經濟的解放上、思想上（普遍邊區的文教運動，就是在人民得到了政治、經濟的解放之後，進一步洗去人民精神上的愚昧的烙印——這是由於新社會長期的惠民政策所加於人民的。）束縛着他們的身體和心靈的封建鎖鏈，而獲得政治的權利、經濟的解放和個性的自由，這就是我們所正在努力奮鬥的專業，而在邊區和敵後解放區是已經實現了。

五

那末，發展個性和集體主義的關係怎樣呢？

有人說：我現在先要激發的發展個性，而新的集體主義是將來的事情，在新的社會條件具備了的時候，新的集體主義就自然會發展出來。今天滿底個性的解放，甚至於新社會的條件之一。這種說法，可能使人發生一種懷疑，以為個性的激發解放和集體主義是截然分開的兩個階段的東西。

中國現在的民主革命，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它的特點，就是廣大人民成了革命的主要力量；而領導這革命的是堅強的無產階級，因此，革命的果實，必然是屬於廣大人民的。在這樣的情形下，個性的解放和集體主義並不是兩個階段的東西，它們正是相輔相成，統一在一起的。在新民主主義的社會里，舊階級的資產階級社會那樣的個人主義的個性觀是不可能存在，也不應該存在了。我們現在所要求的，是為廣大人民的個性解放，它本身就是集體性的，而個性的發展標準，應該是以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為依據，於人民有利的，就應該發展，使與滿有、馮雲鵬那樣的個性，就應該大大的發展，反之，如果反對人民利益的個性，那就不但不應該發展，而且應該受着限制。事實上，一切最有個性的人都一定是為集體的人，馬克思、列寧、斯大林、魯迅、毛澤東，他們都是個性最卓越最特出的人物，而他們的個性的偉大，正是表現在他們的為羣衆為集體而奮鬥的戰鬥上面。

在個人主義的社會里，所謂個性的個性為放是不可能的，在那裏，人和人的鬥爭激到極點，每一個人都不能不把大部分的精神力用來自我保衛，而自我保衛，則恰好是一種自我限制，因為當人們必須緊張着精神去進行自我保衛的鬥爭的時候，他的正常才能的發展，就不能不受限制了。完全激

底個性的解放，只有在互愛互助的集體主義的社會里才有可能，換句話說，只有在社會主義的社會里才有可能。但在新民主主義的社會里，集體主義的精神，也將得到蓬勃的發展，集體勞動互助，便是這種精神的一種。集體勞動不但提高了生產率，而且使小生產者不會由於個體生產的弱點，而被剝削階級所吞併；同樣，集體主義不但不會限制個性，而且恰好幫助了個性的發展，因為只有在集體協力的中，才能戰勝一切阻礙個性發展的社會的和自然的敵人。離開了集體，你是什麼也做不成功的，當然更談不到什麼個性的解放了。

（上接四九頁）

宗維善君問：縱然不能一下子跑到社會主義，難道不能比資本主義更進一步一點麼？——但是就社會經濟的實質說，不是社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並沒有介於兩者之間的東西。只是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時期，還有政治和歐美資本主義社會很顯著的不同的，那也不是不容忽視的。這種特點也僅僅得中國社會將來有可借順利地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有許多朋友，非常有興趣去討論將來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其實我們只要一想，在十年以前，誰能預料今天中國的具體情形，就可知道在現在推斷十年以後的事是毫無意義的事。而且過多地測度將來社會對現在的勢力懈怠。我們認真地看到，眼前還有一個侵略者沒有打倒，還有異常艱難的反抗建任務要我們去完成，為徹底完成這個任務，所應有的努力是幾年而幾十年的時間。完成這個任務不是一件小事。發展資本主義不與是為了將來消滅它，因為這本身就是使中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中脫離的大翻身，是對於全體人民有極大利益的事。當我們看到這一切的時候，就難道這能是僅僅的關心全力去從事，以最大的忠誠獻身的任務，不應該有絲毫的懈怠而遺誤思想。要知道，只有最能切實地擔負起當前的任務的人才能最有把握地掌握將來的前途，這也就是說，只有最徹底地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階級革命，掃除封建殘餘力量，在獨立自由的中國實現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於是將來順利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才能逐漸成熟。否則，一切社會主義的話都是無意義的。

對於張君所提出的問題，「中國社會為什麼停滯在封建狀態下」，要充分答覆，自非從全部中國歷史上來解釋不可，不在此此詳談。（按略）但就現階而言，促成中國解放封建壓力的轉變，一切條件都已具備。

這次我發覺已寫得很多，但無論還是不詳。新華日報七月十三日轉載放日報社論「論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也請參看。本刊以後也將有專文來討論這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或者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所談到的問題，宗張方三君和其他朋友們如還有疑問，希望一一具體地提出來。我們是願樂於繼續討論的。

論中國的私人資本

許滌新

一 小引

照資本的運動形態而言，中國的私人資本，可分為銀行資本，工業資本。商業資本與土地資本等四種，但此種分類不能是現出中國資本主義的特徵，若先從資本主義國家，亦何嘗不可作這樣對分？工業資本，商業資本與銀行資本等，只能說是社會資本運動中第一項資本所盡的機能，它們在產生及分配剩餘價值的過程中所盡的作用更了，這是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共通的特徵，以這種眼光來看中國的資本主義是十分不夠的？它只能給與讀者以一般的概念。

我認爲中國私人資本的對分，可以概括爲買辦資本，官僚資本，民族資本與華僑資本四類。茲將它們的特徵，述之於下：

二 買辦資本

想研究買辦資本，就不能不提買辦制度，中國的買辦制度或許是一七〇二年滿清政府正式批准之特許商人（其初此種特許商人僅及一名，嗣後名額漸次增加，一七三〇年達十三名，有「公行」之組織）之變體？但事實上，外人在華早已使用買辦。自南京條約承認外人自由貿易，廢止特許商人之後，外人利用買辦之範圍亦隨之而擴張。因爲地理的關係，買辦制度之發達，以南方爲早且盛，故買辦職務，殆爲廣東人所獨佔；其後，各處商埠，相繼開闢，粵人之從事此業者，日亦益衆，幾至壓倒廣東人之勢。

買辦的任務是在爲外商推廣商業，在交通範圍內，他對外國商行負有一定保證的義務，同時有向外商領取一定酬資與一定定率手續費的權利。帝國

主義列強在中國的高漲，都是以變換爲中間人而進行的，故買辦即是半殖民地中國的商業的產物。帝國主義列強在該經濟力是越擴大，買辦階級的人數及其勢力，亦就增加擴大。但是，帝國主義列強對於買辦的需要是不一樣的。在初期，外商對於買辦的要求，只要它對於某一項商業，能一個商社，負擔籌備與保證的責任，到後來帝國主義列強對於中國非限於商業活動，它們除了推銷商品和收買原料以外，還要從事銀行，保險，及其他各種實業之投資，更想進行對於鐵道、郵政、電報及其他種種之投資借款，因此，他們需要各種各樣的買辦，有商務買辦，有工業買辦，有金融買辦，有保險買辦，甚且在財政上的買辦。這些買辦在形式上雖然不同，但他們的共同的功能，乃在於爲外國資本推廣其在中國政治經濟上的勢力，乃在於讓外國的勢力，肉以壯大帝國主義者的利益。如以商業買辦而言，他們是以幫助外國資本對中國人民作不等的交換爲任務的。他們所得的利潤，並不是一般的商業利潤，而是包含中國農民的一部份血汗在裡面的。其他，如外資的工廠礦山與交通運輸的買辦，一面在幫助外國資本對中國吸收物資，對中國無產者進行剝削價值的剝削，同時，又在爲外國資本實力，打擊中國的手工業者和民族資本。因此他們所獲得的薪金或手續費，是以出賣中國物資，是以榨取中國無產者的血汗，是以促成大農工工業者和一部份民族產業的衰亡爲代價的！

在「原型的」買辦之外，還有買辦性的軍閥的銀行和商業。加以影響及作用而言，中國的銀行，其所盡的買辦作用，較諸外國在該經濟的商行，銀行及工廠礦山中所直接應用的買辦，不但不會呈遜色，甚且有「凌駕而上之」的姿態。因爲中國銀行，除了在金融活動上，爲帝國主義列強的經濟侵略服務之外，更在其附屬經營的商業中，爲外國商品及在華的外國工廠所出產的商品之推銷而努力，故中國的銀行所獲的「利息」，並不是普通的利息，並不是普通的所謂「資本的價格」，而是包含着買辦性的手續費在裡面的。

三 官僚資本

在本質上，官僚資本就是高級的買辦資本。橋樑在其所著的「支那社會研究」中，曾這樣寫道：

「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投資（鐵道、郵政、電報及其他種種政治借款）或者為了利用中國的封建政府，以榨取其人民，又不得不製造出那類中間人，由該類人所稱「官僚買辦階級」或「官僚資產階級」，我們不妨把這官僚資產階級之為金融資產階級，因為中國的銀行，大部分在他們手中。」（引自王漁村先生的「中國經濟讀本」第一一〇—一一一頁）

這種看法，大體是不錯的。官僚資本本質上是買辦資本；而官僚資本又以銀行為其基礎，故官僚資本，包括了買辦資本和銀行資本，但我們絕不能抹殺官僚資本的封建性。有許多官僚政客是以地產地主的，當他們還未與帝國主義列強勾結的時候，他們何嘗不可一而為官，一而作專賣的什麼企業家！同時，縱使他們為外國資本作中間人物的新式官僚，亦並沒有棄掉這一特質。這官僚資本，有許多是投資於土地，向農民作封建的剝削，這很多以商人資本的形態，在工業中作新資本主義的活動。故官僚資本亦即是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它具有二重性：一買辦性與封建性，在抗戰以前的上海，官商勾結買賣銅幣，在抗戰時期的後方，在囤積居奇的活動中，它比較地表現其封建性。

中國的獨佔資本，只有見之於官僚資本，換言之，中國所有獨佔資本，就是中國獨佔資本的具體形態。所謂獨佔資本，就是獨佔的銀行資本與獨佔的產業資本的結合，中國有沒有獨佔的銀行資本呢？中國有沒有獨佔的產業資本呢？中國的銀行資本與產業資本是不是結合起來了呢？這是我們在選讀該書要問的問題。

我說：中國的銀行資本是有某種獨佔的形態的。在戰前，以金城、大陸、中法及匯豐結合而成的「北四行」，是在一定程度之內，壟斷了華北金融業務的。民國十六年以前的南五行（由「中國」、「交通」、「上海」、「浙江興業」、「浙江實業」、「五銀行組成」）是在華北佔有極大的金融勢力的。據「中國」與「交通」兩行，與「中央」、「中農」及中央信託局郵政儲蓄局

，組織國家資本的四行兩局，更具有很大的威力了。剩下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浙江興業銀行與浙江實業銀行，亦有構成一個集團之趨勢。以地方性的銀行而言，亦未嘗不是如此。你看：四川的「川康」、「美豐」、「和成」與「川康平民銀行」，不是呈現一個集團的姿態嗎？雲南的「興文」、「雲南實業」、「勸業」及「益善」四個銀行，不亦是呈現一個集團的姿態嗎？中國到底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獨佔的銀行資本，較諸美國的摩根及洛克斐勒，當然更小更見大巫，但是，我們却不能因為這樣，就不承認中國的銀行資本有集中傾向。

中國產業資本的集中傾向，不及銀行資本這甚，但是集中的傾向正在漸漸地伸展着。戰前榮宗敬氏的「申新紡織有限公司」和「茂新」、「福新」麵粉公司是紡織業和麵粉業的巨擘。以新申而言，第一廠是民國八年合併「恆昌紗廠」的，第五廠就是民國十四年合併「德大」的；第六廠亦是民國十四年合併「常州紡織公司」的。新加坡潘國瑞氏家族所辦的永安紗廠，第二廠是合併「大中華紗廠」的，第三廠亦由合併而來。張季直手創的大生各廠，常州劉國鈞氏主持下的大成紡織，武漢汪德誠氏領導下的裕華系統，都是以集團的姿態出現的。劉國鈞氏的大申華火柴公司，毛織業及水泥業的經營，因其集團的姿態。大申華火柴公司是劉氏收買東南各地火柴廠而成的，此外，戰前盧怡麟氏的航業包括了三北、鴻安及青島三輪船公司，盧作孚氏的民生公司，潘慎微氏的實業包括了機器及各種機器，如華西機器公司包括機器、畜牧、製糖、製油、製鹽和貿易等部門，實業企業公司包括煤礦、運輸、油礦、酒精和地產等部門，中國興業公司包括電業、礦業、鋼鐵、機器、油礦、絲織、紙業、製糖等部門，這一切，證明中國的產業資本，已漸漸走上集中的道路，雖然集中的程度，還不及銀行資本。

銀行資本已集中，產業資本亦漸漸的集中，但，他們有沒有結合起來呢？我的答覆是肯定的。一般說來，是銀行資本與產業，或者是大銀行家與大產業家在產業上的合作，對於中小工業進行合併，這種形式時而在戰前的幾年，隨着銀行的集中而漸和民族工業的領袖而開始活動起來。抗戰以後，有更新的發展。民國二十三年，曾有的全國紗廠聯合會，因債務關係，交給中國銀行去了，翁耕漢先生在其「論目前中國經濟的景況」中，描寫抗戰前夜銀行資本進入工

情形如下：

「過去半年（指一九三七年——引者）間，產業投資的增加有兩種方式，一是擴充資本；二是新創事業……如大中華橡膠廠，增資百萬元，中國水泥公司增資九十萬元，此外如籌備多年的湖南酒精廠和溫漢造紙廠，亦於本年正式實現。——其中最可注意的，如中國棉業貿易公司增資八百萬元，由中國交通各銀行分担，湖南衡中紗廠由該省與中國銀行合辦，資本二百五十萬元……據說中國銀行還擬在滬再辦紗廠五家……鄂建設廳以棉產豐富，亦決定在鄂中鄂北各辦一紗廠，資本各三百五十萬元，將由中國銀行分行担任十分之八……江西鄱陽公司得到滬上各銀行合作，增資二百萬元……金城銀行與民生實業公司，已合資三百五十萬元。在四川巴縣設立嘉陵紡織廠……至於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對紗業向投資，據報載，還有更大的計劃，他們預備在川、陝、豫、甘、鄂五省，分設五大紗廠。」（「認識月刊」二期）

這些計劃，由於七七事變爆發，許多是流產了的，抗戰以後，各大銀行利用其種種有利條件，對於產業的侵入，更加活躍，計成立的較大的企業組織，如中國興業公司，大華實業公司，華西建設公司，貴州企業公司及川康興業公司等，都無不有各大銀行之投資，單以貴州企業公司而言，「中國」「交通」及「農民」三銀行所佔的股份，即佔百分之六十八·三三，其餘產業組織上未嘗不如是，例如渝綏鋼鐵廠的資金，是得自中國銀行與金城銀行的資助的。戰時中國的產業很可憐，銀行對於工業之投資在其資金的總額中所佔比重是渺小到不足道的，但這些材料，證明現在大後方的銀行資本，已經把它的勢力伸入產業了。銀行伸入產業是中國獨佔資本的一面，但中國的大企業家，亦有伸其勢力於銀行者。在抗戰以前，榮宗敬氏就是一個好例子。與榮氏有關的，不僅是中新紡織與「茂新」「福新」麵粉廠，而且還有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上海儲蓄銀行，及中和商業儲蓄銀行。他就是這些銀行的董事。火柴大王劉鴻生氏，亦是中國企業銀行的董事長，上海煤業銀行的董事，中國國貨銀行的監察人，到了後方，劉氏與國貨銀行的關係仍是很密切的。中國大企業家之伸其勢力於銀行，固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比較起來，總不及銀行伸入產業之普遍而有力。故從一般現象來說，中國的大產業組織，是逃不了銀行資本之控制的，抗戰以前之幾年，曾說教了「中央」「中國」「上海」及中和銀行的董事的榮宗敬氏，不是常常在這些銀行之前乞接嗎？

在中國大銀行資本是與產業資本結合者。中國是有獨佔資本的。獨佔資本乃是在大官僚的手中。陳伯達同志說得好：

「中國大官僚，在各種機遇上，經營了兩種「近代」的工業：大工業與銀行。歷來許多人把由中國人經營的近代機械工業，看成完全是官僚創始，而忽視了社會經濟各種的歷史結果，這當然是不對的，不過，許多較大規模的工業，除了外資創辦而外，確實是由官僚的形式首先派手經營的；近代機械工業的創辦亦是一批大官僚對外國銀行在滬發展之後，首先着手經營的。大官僚的所經營的這兩種事業，在實質上，結果都成了買辦式的事業。」

以前不要說，就是經過改組增加大量官股以後的中國交通兩行，仍佔有不少的私股，這些私股當然不屬於普通人員。不是官僚，就是銀行；而這些官僚又可利用國家資本以培養其自己的力量。據說，國家資本的一國營，就變成爲官僚資本的「官營」了。過去盧宜懷以梁士治之於交通銀行，王克敏之於中國銀行，現在，×××××等之於四行兩局，還不是如此麼？至於大官僚自己經營的私人銀行，如德和周新民等之於金城銀行——北四行的中樞，那就更不用說了。總之一句話，無論北四行也好，無論南五行也好，無論國家四行也好，無論地方性的什麼小四行也好，大股東，大董事，那一個不是官僚呢？中國的銀行資本是以官僚資本爲核心的。至於企業，屬於「官辦」的，名義上雖爲「國營」，但實際上，何嘗不是這些官僚手操？高叔京先生說得好，「以舊式官僚的態度而辦新式工業，是根本的矛盾，他們只做到新式工業的表面工作，并未創立工業不拔的根基。這樣的工業，一遇到外來經濟力的打擊，即不能自存，甚至經營公營實業以飽私囊，以前的官吏是站在生產圈外來到，現在的官吏可站在生產圈內來到，這到制都「官僚主義的特徵」（新經濟二卷八期）。高先生這話所說的「制前」似嫌籠統，我認爲該明白地指出這是屬於前資本主義的超經濟的剝削，比較切實些。至於商辦的企業，有一部份是由官僚投資的。新式工業之由官僚興辦者，自官督商辦後，日以滋多。如孫鴻生設豐利輪船局於上海（一八九〇）；李鴻章設倫章紙廠於上海（一八九一）；盛宣懷設華盛紗廠（一八九三）及大德機器榨油廠（一八九六）於上海；張謇設大生紗廠於南通（一八九八及一九二四）崇明（一九〇七）海門，及耀徐玻璃公司於宿遷（一九〇八）；魯督胡廷幹設博山玻璃公司於博山（一九〇四）；熊希齡設慶豐實業公司於醴陵（一九〇五）；鄭孝胥設白蟻呢廠於上海（一九〇六）；兩江總督端方設江西實業公司於鄱陽（一九〇七）；曹元洪設中興煤礦於山東

縣(一九〇八)及魯豐紡織公司於濟南；周學熙設華新紡廠於天津(一九一八)青島，衛輝及唐山(一九二三)；倪嗣冲等在職期間設紗廠於天津等處。民國十七年以後，新式官僚之投資於工業的，亦並不少。抗戰以來，後方許多重要私人企業，如中興興業公司，如華西建設公司，如華商烟草公司等，與後方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都是以官僚資本為支柱的。官僚資本滲透在大銀行中，同時亦滲透入大產業中。官僚資本或者以兩面投資的辦法，聯絡了銀行與產業，或者以吞併的方式，使銀行侵入產業，故官僚資本成爲中國獨佔資本的主體。在這種，我們還應指出一個特點，這就是銀行之投資於工業，是遠不及它對之投資於商業與投機的，故某種程度的銀行與工業的結合，並不顯示中國獨佔資本的特徵，必須指出銀行與商業之結合才顯示它的特徵。抗戰以來，官僚資本在後方所表現的恰恰是如此，有特種經濟背境的大銀行，不遺餘力的從事商品囤積，發揮其商業資本的作用。某銀行的私人因聯編編就是以一官銀行和三個商行構成的，這就是以官僚資本爲本體的銀行資本與商業資本的結合的典例。

一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官僚資本亦即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這種資本，侵入了銀行，侵入了商業，侵入了工廠甚至侵入了地皮，這一個資本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它具有政治上特殊的條件。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環境之下，這種資本，不斷地發揮其買辦性和封建性的作用，在全國上，他是便利帝國主義列強之公運貿易的。它在現代產業中，亦以其優越的信用，使「官辦」企業變成外資的俘虜，使「商辦」企業同樣成爲外資的附庸。而由買辦國家的企業家，又常常與大官僚流毒一氣，千絲百縷地在連綿着。這就是說，官僚資本在銀行資本之形態下，在其爲便利於外資之推銷的形態之下，與帝國主義顯得水火交融；在其爲產業資本的形態時，非與帝國主義的利益衝突，但同時又常常與帝國主義來往。而同時官僚資本的國籍居奇的特點，它的購買地皮農田而對農民收取高度地租的行爲，則是在發揮封建性的作用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官僚資本乃是中國特殊的獨佔資本。這種資本，是以中國的政治經濟爲土壤的。

四 民族資本

說到民族資本，那是指民族工業資本。中國民族工業資本的處境是很困難的，帝國主義的商品和在華的外資企業，不斷地給他們以打擊，而銀行資

本又以高利貸的吸數，對他們作乘火打劫，巧取豪奪。所以中國的產業資本雖有八九十年的歷史，雖在第一次大戰時曾經發展了一次，仍不免在過着辛酸的日子。

發展國民經濟的鎖鑰是冶鍊，冶煉器，是動力等工業。取我國這些工業的狀況是怎樣的呢？以煤炭來說，全國每年的產量不過三千餘萬噸，以生鐵來說，雖土法在內，全國每年亦只有四十餘萬噸而已，如果與列強比較起來，煤的產量，只佔英國的十七分之一，只佔美國的十一分之一，只佔德國的九分之一，只佔蘇聯的百分之四十八分之一。只佔英國的十五分之一，只佔德國的四十五分之一。至於動力，據建設委員會二十三年之統計，(我國東三省在外)發電量爲五四二，三九九瓩。這個數字，如果與英比較，那就微小得不可言狀了，更可惜的爲這些微小的產量，還不完全屬於中國的民族資本。以每年二千餘萬噸的煤炭說，自費的推銷佔了七百九十萬噸，英資的開採佔了五百四十萬噸，即總額之四分之一。若將其對外資產量計算在內，則自費開採的煤炭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輸往日本的佔百分之八十以上。以五千四百萬二千餘噸的發電量說，外資佔二十七萬三千餘瓩，即百分之五〇。由此可見，作爲工業基礎的冶鍊、冶煉、動力，是「太阿倒持」了，就是這一步，以民族資本比較建設的工業說，亦呈現「官資主義」的形勢。在一九三五年全國四百五十五萬餘噸煤中，自費佔了一百九十四萬，英資佔了二十萬，日資佔了二萬一千餘噸，其餘亦佔四百餘萬。同時，全國四萬八千餘架布機中，日資佔了二萬一千餘架，其餘亦佔四千餘架；英日合起來的布機佔全數百分之五十三。中國民族工業的脆弱性，還不只此。如果從中外的資本有機構成之高低，則可看出中國民族工業的脆弱性。以紡織業作例吧！戰前日資在華紗廠每錠佔六百八十元，而華資紗廠非用三百五十元至七百五十元不可，華商紗廠資本有機構成低，生產率自然落後。中國民族工業的脆弱性，就產生了民族資本的依賴性，這種依賴性，表現在華資工廠的五金機噐主要仰給於外國，表現在華資工廠所需要的某些原料，有的必仰給於外國，如製火柴的白粉，棉木，根木等，有的雖不仰給於外國，但却仰給於外資(特別是日資)所控制，如紡織業的棉花棉紗等；表現在華資廠因借外債之故，受到外資的支配和附庸——如「裕大」、「寶成」、「崇信」、「久興」等紗廠之受外人經營管理，河南之中原公司合併於英資福公司，六河溝煤礦併於中日實業公司表現在中國一些廠礦的用品受到

外資的熱心——如大治，象鼻山，鐵道各類的建設，發達的在日。...

民衆資本的這種脆弱性，依賴性，又形成它的投機性。因為它無力開...

民衆資本的這種脆弱性，依賴性，又形成它的投機性。因為它無力開...

民衆資本的這種脆弱性，依賴性，又形成它的投機性。因為它無力開...

民衆資本的這種脆弱性，依賴性，又形成它的投機性。因為它無力開...

民衆資本的這種脆弱性，依賴性，又形成它的投機性。因為它無力開...

五 華僑資本

華僑資本與英資資本主義國家對落後國家的商品或資本輸出，是不相同...

中國約有約一千萬人，絕大部分是在廣東，較小一部分在福建...

在國外，華僑資本雖然帶着買辦性，帶着前資本主義的商人資本的...

不過，華僑資本的前途，並不會因為這變一來，就愈趨於沒落的...

中國私人資本之所以劃分為買辦資本，官僚資本，民族資本，及華僑...

一九四五年五月勞動節後一天

中國農業改革的道路

洪沛然

「二月賣新絲，五月曬新穀，

醫得眼前虧，剝却心頭肉。」

——錄唐白居易詩——

這詩，是一千一百三十年前中國農村的寫照，在今天，如再以此吟給鄉間農民們聽，而鄉間的農民也絕不會感覺這就是一千一百年前乃祖乃宗的遭遇；因為一千一百年之後的他們的遭遇，並不會比一千一百年前有多少改進而，其頹敗之象，容或過之。

中國農村的變化，我們還難以之比作上樹的蝸牛（因為蝸步雖慢，尤在上升），最恰當的比法，它正像樹在風雨中被侵蝕的化石，一面是僵化了，一面却因風雨的侵蝕而又不斷在那裡潰敗。當我們讀到唐代陸贄的奏議，宋代謝方叔論土地兼併，以及明清諸人敘述農村遭遇的時候，我們對此並無隔世之感。比如陸贄說：「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貸其種食，貸其田廬……」難道今天不是這樣嗎？謝方叔說：「……權勢之家日盛，兼併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今日百姓之膏腴皆歸貴勢之家，有租及百萬石者。小民膏腴之田，頻年盡充保稅。官役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罄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減。」——這裏以今天的農村而論，謝方叔這話，只有使人有過無不及之感。因爲領有百畝之田的農民，在農村里並不多見，領五畝到二十畝的農民，倒佔多數，此等小農，就耕種地屬自己所有，其產物，也僅足糊口；如果再加上鄉鎮公所無休止的攤派，許多地方，直如謝方叔所說：「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事到結底，還是被迫離開土地了事。

抗戰八年，中國農民的貢獻特別多，然而遭遇也特別慘。
根據官方統計，四川近三年地權的變動，自耕農從民國三十一年到三十

三年，由百分之三三·一，會下降到百分之三〇·四，如果以民國三十一年自耕農的百分比作基數，我們可以計算出，此後兩年，全部離開，或部份離開土地的自耕農，在一百戶當中，至少要佔八戶。這數字，並不是一個輕微的數字啊！設使百戶之中，每兩年平均有八戶被迫離開土地，十年之後的農村，將變成怎樣的現狀，那是不堪設想的。

自耕農減少，不用說，這對政府建立自耕農地是一個最尖銳的諷刺，脫離整個政治經濟的構成，而修言建立自耕農地，恰等於說，在沙灘上蓋閣樓，這一座莊嚴而雄偉的廟堂，是一艘飄浮空書。桂平的油麻地，中國農民銀行有協同縣政府指定收買地主土地一千三百畝，但地主根據土地法提出抗議，一直起訴到行政院。雖是後來議定，按市價征收，一方面地主對該項地價並不領受，而另一方面，所征得的土地大部份因土質太差，佃農也不願意領取這塊的土地耕種。結果弄得一無所獲。其他根據自耕農的實驗區，其困難情形，雖不盡同，然而在事實上很多地方是失敗的。我們不要說今天的佃農不可能在兩重負擔——賦稅與高利貸資本——下保存他們所得的土地；舊有的自耕農，即便有足夠的農具，有不付利貸的優越條件，還都處在沒落的過程，這言何堪！

中國佃農，一般地說，在農村裏是一個沒落的階級。根據前面的同一統計，四川的佃農會由民國三十一年之百分之四四，上升到三十二年百分之四五·八。佃農數量之所以上升，主要的因爲自耕農的沒落所造成。被迫離開土地的自耕農，一部份流入都市，變爲都市的小商販，一部份則沒落爲佃農。據近幾年的情形而論，由於收成不良，與捐稅太重之故，實際上流入都市的自耕農較遺留下來作佃農的還要多。因爲戰時的佃農，較之戰前的生活條件，更爲低劣。在戰前，第一，租額少變動，第二，水租作爲正產物，依

此種納一定租額之後，旱地所產物則不另租；第三，耕地使用權較為固定，佃農中絕少一年一遷的現象；第四，押金不高，除非萬不得已，地主絕不願意多加押金，減少年收。在此種生活條件之下，一般佃農雖在進行單純再生產的時候，仍感覺吃力，但他們究還有比較安穩的環境，依舊自己在土地上的勞作，獲得最低的，必需的生活資料。可是，一到戰時則大異其趣。地主們因糧價飛漲之故，乃相率增高其欲求，加租加押，百般苛索。許多地方的租額，實已超過一般佃農負擔的限度，而地主尤以為未足，時或以撤佃逼佃相威脅，藉以達到獲取超額地租的過重剝削，戰時租佃制度一個最顯著的特徵，是：(一)田土並徵，除正產物之外，包谷、豌豆等雜糧也在應繳之列；(二)租額無定，地主可隨時撤佃，即使契約中間或有規定租期的，地主亦多未遵限。租佃制度之苛求如此，這也可以說是戰時未有。戰前佃農除以正產物繳納地租之外，還有雜糧足以糊口，如今僅足以維持最低的生活資料——雜糧，也都在應繳之列，佃農生活條件之低劣，其程度蓋可想見。其實，從租佃制度本身說，高額地租還是構成佃農生活低劣之一端，目前農村中之撤佃退佃的風氣，更進而對其維持低劣生活之生產手段，並威脅其存在，這更成為今天佃農致命的一擊，許多佃農，人口稀少的，則相率離開農村，流入都市作爲雇工或傭工，人口繁多的，則降低其生活水平，聽憑地主宰割，或者流而爲盜。

一般地說，戰時的農業生產，是在減少；單位面積的產量，是在萎縮；若干農地，是聽其自然，許多農產物的質量，是繼續降低，這些現象，是值得注意的，抗戰以來，經過七八年經營的農業推廣，耗費了若干人力，若干物力，然而成敗在那裏？許多地方的農業推廣僅成爲點點新設的「盆景」，對農民直接無益，則毫無疑問。以四川的情形說，各縣農業推廣所的设置雖不是少數，但這些農業推廣所的主任就多半不下鄉，平時忙於領經費，辦雜費，製法增產數字，即使少數附屬地區的推廣工作極爲賣力，但所有因改良品種與施肥等工作增加得來的收穫物，被大部份被地主搜刮，而一般直接從事耕作的農民，不僅徒勞，且反而增加其生產成本，不能得到任何補償，如此增產，誰又願意？如果生產關係不變，而稅收不良，捐稅奇重，鄉鎮保甲對農民之任意敲詐剝削等現象，在農村中仍繼續存在的話，農業新政即使年年翻新，歲歲設法，也僅只有滿足於表面的表面，對農業實際增產、改進，都會毫無關聯，那末目前農業生產減少，產量萎縮，農地荒廢，質量下降的這些現象，更不可能克服，農業危機且將繼續加深，農村崩潰的過程更將加

速。

今天中國的農業，是否仍是屹立在風雨之中的化石，或者竟已變動爲烈日之下的一堆融雲，這是值得研究農業的人重新考慮的。

一一

戰時在後方討論農業改革的，有這樣兩派：一派是以改良生產制度爲主體的「土地利用論」；一派是以改良土地分配制度爲主體的「土地分配論」。『土地利用論』者認爲今天農村問題的主要關鍵在「生產不足」，而生產不足的原因，是由於土地使用不合理，耕地面積過於狹窄，如果農民的土地面積能夠增加，而耕器具也就不會受到限制，農業的改進也由此獲得了基礎。農業生產既能在耕作方法上採取了新的技術，生產量也可能由此突增，而農民生活的改良與增進，也自無問題。然而，怎樣才能使耕地面積擴大呢？按照「土地利用論」者的辦法有這樣三種：(一)將狹窄的農民地租至寬鄉(即所謂整荒是)；(二)將鄉村人口移往城市(即所謂發展城市工業，吸收過剩人口是)；(三)打破宗族觀念，節制生育。認爲只有這樣，「才能便一切提高農民生活程度的辦法真正的對於農民發生實惠」，實際上，這論點恰就是一般地主階級的論點。一般地主階級代理人侈言農業改革的時機，最害怕觸到這樣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就是：土地所有集中與土地使用分散兩者何以發生矛盾的問題。在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國家里，土地集中，本是構成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可是在半封建性的中國農業經濟上，土地集中恰正造成土地使用分散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土地愈集中，土地分散使用的可能性愈大。無疑的這是一對矛盾，這一個矛盾，只有在資本主義普遍發展的時候，才會被統一起來；或者經過生產關係的徹底改革，土地集中與土地使用分散的矛盾，也可能被統一。在這里，我不準備把這問題弄得太深，有更深論列，僅舉這樣一件具體事實，說明今天土地使用的極端究竟在甚麼地方。

抗戰前十多年，四川中部會存在過應用長工二十人和三十人以上的富農農場，但這些農場，都不是從一個地主或兩個地主的手裡租佃得來，很多是從三個或者四個，五個以上的地主的土地折騰而成。以這些富農農場的耕作面積而論，并不會大於一個中等以上的地主的土地，可是，在事實上這些中等以上的地主并不願意把自己較爲集中的全部土地租給一個佃戶，這是全

租給一個富農，利於佃戶，也利於他自己，這雖並不違礙，他寧肯把自己比較集中的土地，分租給五戶、六戶、乃至八戶、十戶以上的佃農分租耕作。一般地主把集中了的土地分散使用，最主要的原因，據他解釋，如此才可避免「惡佃欺主」，並保障地租在年收方面的安全。這是構成土地分散使用原因的一面。在另一面，中國的佃耕農在地主極度剝削的，和鄉村封建勢力盤據壓榨之下，不僅失去了擴大再生產的任何有利條件，就是繼續單純的再生產，在今天來說，不免流於鄉村中的高利貸，難成爲不可說，如果我們要希望今天的佃耕農如何擴大其耕作面積，那是欺人自欺的空話。這話，如果我們從經濟學說，那就是：今天中國土地使用之分散，最根本的問題，不是人口過剩的問題，而是因整個經濟制度不合理，才構成今天加緊農業危機這一矛盾現象存在。可是那些拙劣的「土地利用論」者，却把這活生生的事實隱蔽起來，怕接觸到問題的本質。他們認爲「偏重分配」是「有助長階級鬥爭」，增加糾紛之危險。「可沒有想到隱蔽此種「惡佃欺主」者，獎勵寄生者」的經濟制度，恰正是加緊階級鬥爭，增加糾紛危險最本因素。

關於「土地分配論」，在主張上曾有這樣不同的兩部份：一部份主張土地所有，農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權，而無土地所有權；另一部份則主張土地所有權，農民不僅有土地的使用權，而且土地所有權。前者，在基本上是肯定「耕者有其田」的主張的，而後者在大體上是維護「耕者有其田」的主張。

如果從現實出發，我們認爲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正確的。孫中山先生說「我們解決農民的痛苦，歸納是要耕者有其田，這一個意思就是要農民得到自己勞動的結果，要這種勞動的結果不會別人奪去」，假若耕者由所得的糧食完全歸到農民，農民一定更高興去耕田地，人家都高興去耕田，便可多得生產。但是現在多數生產，都是歸於地主，農民不過得四成，農民在一年之中，辛辛苦苦所收穫的糧食，結果還是多數歸到地主，所以許多農民便不高興去耕田，許多田地荒蕪不能生產了。「農村的破壞，也就隨之俱來。這是事實，這是中國二千年來不可能爲任何宣傳家所曲解，所掩蓋的事實。不過中山先生在這裏却告訴我們一個不可或易的真理，這真理就是：中國農業的改革問題，很顯然地土地制度問題，也就是「耕者有其田」的問題，設若耕者有了他自己的田之後，促使中國農業走向現代化的道路，我們算是走了三分之二的途程。

「耕者有其田」，是開闢中國工業，開闢中國農業走向現代化最澈底的道路。因爲它使中國農業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之下解放出來，得自由地用土地

，並處理其生產物，無論在與產後，不受任何束縛和限制（在封建的土地關係下，農民不能自由使用土地，如租田或種麥田是）；其次，因農民生活改善，購買力提高，從而使工業可以在國內獲得更爲廣闊的市場；其三，因這有上述其一、其二條件存在，得使舊式的，落後的農業生產水平，可能轉化到近代化的水平。

我們主張「耕者有其田」，並不是倡導小農生產制；在以封建的土地關係爲基礎的中國農業生產上，我們認爲這是促進中國農業現代化的一個必要的過渡點。中國農業只有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下獲得解放之後，才可能有自由發展的機會。

我們並不是空想家；在以私有財產制作基礎的中國社會，我們絕不可能否認農民對土地有「使用」的興趣，也有「所有」的興趣。否則這樣一個具體事實而高唱「土地所有」，那完全是違背現實的一種空想。

我們也不是空談家；當國家民族須動員全國人民（包括地主在內）恢復國土的時候，我們應該正視現實：一面照顧廣大農民的利益，一面也要注視地主在土地方面應享的權益。因此，在「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上，我們就得緩步，必須採取兼顧雙方利益的土政策。一面實行合理的減租政策，鼓勵農民生產，提高農民抗戰情緒；一面保證按時交租的辦法，使地主的利益不致受到損害。這緩步是必要的；這樣，才可團結農民與地主進行全國一致的反攻進剿。但這緩步，在基本上和某些「分配論」者的主張並無相同之處。我們認爲中國土地問題的重心，仍然是「耕者有其田」；實行合理的減租政策，不過是達到「耕者有其田」的一個可能的步驟，但並不是唯一的步驟。某些「分配論」者一面空談實行「耕者有其田」，一面却把問題局限於地租分配上，在關鍵之處，向地主們提出這樣一條搖擺的尾巴，實際上這尾巴就是要抹去「耕者有其田」，把「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變成一幅供人欣賞的壁畫。

總之，我們主張耕者有其田，但我們並不是倡導小農生產制；我們贊同土地所有這種高遠的理想，但我們並不贊同今天就有此種可能；我們在今天主張減租和交租的並行政策，但我們並不認爲中國土地問題的重心就是地租分配問題，而不是「耕者有其田」的問題。

中國農業改革的道路，很顯然的只有這樣一條：使農民首先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之下逐漸解放出來，獲得土地獲得處理使用土地的一切自由！否則，現代化便無從談起。

三

國民政府首先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之下逐漸解放出來，這不僅是經濟制度上的改革問題，它同時也是政治制度上的改革問題；沒有政治制度上的改革，經濟制度的改革必然會變成紙上的空談。茲以地租問題為例。

國民政府對地租政策的確定，早在民國十五年十月第二屆中委會的時候，迄今已有十九年；政府頒佈土地法，規定地租不得超過正產物收穫總額百分之三七五，是在民國十九年的時候，迄今已有十五年；內政部公佈「保障農民利益法」，是在民國二十一年的時候，迄今已有十三年，可是，行的有幾條？行而合乎法令要求的又有多少條？政府曾經宣誓安定人民生活，便於動員人力，動員物力，這廣告又是否確實實行？在實際，我們且就農產促進會對抗戰以來租額變動的一段記錄為例：

「由於物價之激漲，原定額額，當為地主所不滿，故紛紛改為穀租或公租，其未改者，乃加重租額。是為年來錢租漲之主因。穀租及分租，因地主所得既為實收，價格上漲，有益無害，故其租額，遂與戰前相近。」（所謂「相近」，據該報告表所載，實有增加。——作者附識）結論上復謂：「是知農價之上漲，地主及富農收益增加，而一般農民未嘗實惠。再觀年來土地權分配情形，則佃農非但未能趨向自耕之途徑，仰且被逐佃者日衆，轉淪為佃農或離鄉改業，田地所有權仍多在地主手中，未見有何移動。」

根據官方記錄，足證歷年所頒減租或保佃法令均係口惠，而佃農實未得絲毫益處，相反的，加租擱佃之風，反愈來愈熾，迫使佃農「轉淪為佃農或離鄉改業」之一途。

合理減租，本是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之下解放農民的開端，是農村裡的一種民主事業；但這民主事業，顯非一紙法令所能成功，更不可能成功於非民主的政權機構。在中國歷史上談土地改革，早在一千七百年之前，並有所謂「均田」「限田」種種辦法，但這些辦法，均因立法執法都是操諸封建貴族，結果無一樣辦法不是失敗，而且破壞這些辦法的，恰就是這些立法與執法的封建貴族。

我們要知道，封建地主，是一個最保守的階層！減租，根據各解放區的經驗，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全憑政府一紙命令

所能奏效的。他們經過了種種困難，種種障礙，種種鬥爭，不過所有困難和障礙，經過不斷鬥爭之後，確都全被克服了。並且凡經過減租的地區，在農民的方面來說，生活確已獲得改善；生產情緒也由此增高；在地主方面來說，應收的地租，因農民生活改善，能如期收足；土地資金，因政府工業政策能適當配合，很多地主並願出賣土地以之轉向工業，想獲取比投資土地更多的利潤。在米脂曾有六家地主出賣土地兩千多畝，六家之中，有兩家投資工業，三家投資商業，一家投資合作事業。經過兩年的時間，六家地主的經濟收入，工商業和合作事業即佔百分之四十七；其中有佔全部收入百分之七十五的。此種經濟轉向，反映到農村社會階層，也有很大變動。在米脂的貧農們，有好些典買了土地。根據一九四二年春季米脂縣九保的調查：貧農買進土地的佔一十四戶；中農佔四戶，在農村一般陷於極度貧困的情況下，而解放區的農民獨欣欣向榮，發財之點，就在解放區能徹底執行減租政策，並以獎勵工業的政策和正在推行的土地政策相配合，這樣才使解放區的農業改進獲得了成效。

在這所謂「發財之點」，很顯然，絕不是把當前的政治改革問題放在考慮範圍以外，相反的，只有着重這二點，並在實踐過程中，真正給了農民以民主權利，真正使有組織的農民有發揮自己力量的機會，相信自己的力量，才可能使政策進行得徹底。否則，如大後方徒有冠冕堂皇之農民政策綱領，或者土地政策綱領，與農民政策綱領，政治不民主，農民不能徹底執行這些政策，這些漂亮綱領，究有何用？困難和障礙，是要經過不斷鬥爭之後才能克復的；所謂「鬥爭」，就要農民自覺有組織，有力量，有支撐此種組織與此種力量的民主政權存在。解決一個現實問題，就必須面對現實。

某些自譽為農業改革專家的先生們，一談到農業改革的時候，喜歡把農業改革問題孤立起來說這編纂版的空話，始終怕接觸到這樣一個最現實的問題——給農民以民主權利，讓農民自己組織起來，貫徹這一政策的執行。他們想把農民從舊式的奴隸改裝，變成新式的奴隸。我們應該告訴這些先生們，這企圖，只能把「農業現代化」這一動聽的詞句擺在紙上，却不能把它變成現實；日本的資本主義因掠奪國外市場獲得發展，但日本的農村却不會因此走上現代化的途徑。

我要着重的說一句：中國農業改革只有一條路：只有把農業改革運動和整個農村民主運動統一起來，中國的農業才有可能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之下解放出來，使生產方法通過一些必要步驟，逐漸提高到現代化的水平。

法國內地軍的組織概況

曹若茗譯

下面的譯文，第一部份，是由一九四四年九月二日出版的「Le Peuple de F.R.I.」裡摘譯出來的，作者是 J. P. 杜龍。後一部份，即「馬基的內部組織」，這是兩個文件，是由去年二月出版的「法蘭西小冊子」上的「兩內陣線」裡摘譯出來的。

人民的組織

法國最初的那些抵抗運動，是從一九四〇年九月間就開始了。但是經過一九四一年，甚至一直到一九四二年終，這些運動都沒有共同的行動，而嚴格地各自為政。到了一九四三年的開端，才真正地形成了三種抵抗運動的組織。當時我們可以辨別出三個基本的集團：抵抗組織（O. R. A.）他把那些來自投降軍的軍官和士兵組織起來，抵抗統一運動（U. F. R.）；它團結了「戰鬥」、「解放」、「抵抗者們」、「北方解放」等各種運動；游擊隊與伏擊隊（F. T. P.）它是共產黨領導起來的。同時，那些大的工廠和秘密地活動起來，這就是社會黨、游擊黨、中立黨和保守黨。到一九四三年夏，這些政黨都參加了抵抗運動，而「全國抵抗委員會」便成立了。這個委員會包含着：每區段選出三個代表，勞工總同盟兩個代表，基督教工人聯合會兩個代表，三個社會黨代表，三個共產黨代表，中立黨和保守黨各一個代表。總共四十個委員。但是，在德國的鐵蹄下，這個龐大的組織實際地與會是困難而且危險的。因此，它的工作，就信任於兩個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人民委員會——或稱高處——由五個委員組成。軍事委員會——或稱低處——由四個委員組成。這兩個委員會結合起來，則組成法國抵抗內閣。

領導保持一定的獨立性，並能對付地方環境。

宣傳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屬於「抵抗內閣」的各種不同部是什麼。其中一個最重要部的是宣傳部。它保證每個月刊出一百三十萬份報紙。報紙「散發部」發行，婦女們特別地組織在那裏面。對於她們的誘惑，人們將永遠說不盡；她們把那些秘密報紙帶到那些地方，把它們分發給那些大約差不多加入的人們。不要忘記那些秘密部：皮袋部、領袋部、領袋部、領袋部。抵抗運動經常給以幫助，好像一種職業。

「馬基」底組織

還有另外一個部門，任務是在於幫助工人們避免無期流刑；指示他們進行所帶的抵抗，並且在於領導那些在法國降落的飛機隊員首先到隱蔽地方，然後跑到西班牙邊境。為此，必須獲得店東們的協助，必須把抵抗者們隱藏起來，供給他們的吃和穿，必須建立適當的「馬基」在那裏，他們可以準備

安當，組織一個新機關，替換站，隱避所等等。人們想像得到，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

罷工和怠工

最後有一個工人行動部。它是專門管理罷工和怠工的組織的。在這個最後的部門裡，必須向法蘭西鐵路職工們發充榮的呼籲。他們以自己的勇敢和自犧牲性，去執行一種非常有效的工作，這種值得欽佩的，就是這個人也驚嘆。其實，德國人經常很嚴密地守衛着鐵路線，此外，他們還使法國職員充當車隊的偵察，對於他們使用一種新的方法，在每一列車裡，把法國的旅客和商品與德國的旅客和商品混合起來。如果人們再想一想，所有火車都經常遭受盟國的襲擊，人們就會知道法國的鐵路工人們會遭受經常的危險的。

社會互助

我們同樣需要及到，「社會服務部」，這和援助那些家長被犧牲了或者參加了「馬基」的家庭的。這些家庭因為避難子女，他們沒有來源，社會服務部負責解決他們的生活和住所，替他們的生活重新找到正常的辦法。光明來到了，這種社會服務，是一切互助團體中約一個組織。大家看見的法國，在和平時期往往被破壞，在戰時中為知識份子提供好地彼此互助了。

軍事的組織

我們曾經講述了抵抗運動的人們的組織，在讀過本文之前，必須講一下它的軍事的組織。行區委員會及總參謀部將法國內地軍的軍事動向，一直到六月六號盟軍登陸的時候。自六月六日起，它將就部分地級別率（Région）將軍及高特（Gauthier）將軍的戰術所代替。這做參謀部有四個辦事處：輪裝、軍需、聯絡、以及作戰。關於聯絡方面，應該向法國抵抗軍（F.L.F.）的那些英勇領導者致有功的敬禮，他們在危險的使命中專門運轉來往法國的人們。這個參謀部組織軍事內部的梯列。現在，法國內地軍的地方領袖

們，雖然沒有軍裝，却都有軍官的階級。

馬基的內部組織

抵抗運動委員會編寫了一部小冊子，供抵抗者到之用，這部小冊子極所載的那些基本指示，法蘭西國家電台已經把它廣播了。
經驗證明，——法蘭西國家電台會追述著——為組成一個隊伍，最好的規模是十個人左右，實數太高，給養則成爲嚴重問題。

一個隊伍要有一個首領。在他們中間選出一個最積極、最謹慎、最堅決的人，他是你們全體中最有威信，信任他指揮。他應當有一種兄弟友愛的態度中實現指揮。他應當掌握凡是有關安全及給養的主要事宜。因此，在指揮你們的首領中，就須深深考慮，他一經被選出來，就須以一種極佳的紀律去服從他，鞏固他的權威。這樣你們將在可能的範圍裡保證你們本身的安全。

接着首領就要爲他的隊伍選擇最初的高房。這個地方必須能夠防禦不測，很少人知道，而且要盡可能的隱蔽，比如，一個洞窟，幾個樹叢，一團用樹枝架起的茅屋，那些在地裡挖的地窖，有時就是那些被遺棄在森林中的住宅，那些山上的小屋，或者現在愛國份子住居的家庭。

在選擇高房中，必須注意給養，注意農產的情緒，注意隊伍的人數和他們的發生關係。

有了這些初步的來源，佈置就實踐了，但是，首領應注意其以後的給養，並準備好，隨時請求遠方愛國份子的指點，告訴他關於那些農民及商人同情份子，在完全安全及好的條件下，他可以向他們去買東西的，他應請求他們捐助糧食、金錢、以及一個援助抵抗者秘密委員會；抵抗者將極願地補助那些支援他們的人們。

另外一個主要問題，是安全問題，如果佔領軍或敵人的偵察機關知道你們所在地，如果他們知道那裡去沒有危險的話，他們就會企圖捉住你們，因此，你們必須盡最大可能隱蔽起來，同時必須具備武裝，並且必須有足夠的決心予突擊者以反擊。

爲着不致於被襲擊，應該有一個警衛（每個鐘頭更換一次）看守視野

附近，在警戒的情形下，隨時發出的報告，該伍就要迅速決定：撤退或者抵抗，倘若對警察的搜查逃脫成功，首領應該預先知道撤退的路線，以及那可以重設野營的替換地點，抵抗往往似乎是利於的，但是倘若抵抗，就必須要有武裝，自給武裝是不可能的；我們可以，比方，對德國人的軍械庫細去竊取。

在和德國憲兵警察遭遇中，警察解除他們的武裝，如果首領曾經預先研究好可能遭遇的地點，武裝力量會大大地增加；必要時，要選擇這些地點，在完全懷柔他們的，並以非常堅決的態度制止他們前進的時候，在一般情形下，條件下和憲兵及義勇兵，開始談判，相對敵軍，最好是迅速開火，這常常是軍官的職責，安全組織要盡善盡美，如同隊在困難地方受圍攻手及被圍攻者的野營獨立關係之要盡善盡美一樣。

另外一個文件，是由「戰鬥」，「解放」，「游擊隊」發行的，它指明允許加入「馬基」的條件如下：

(一) 凡是願加入「統一抵抗」的「馬基」的人，不僅是一個度德份子，而且要是一個志願的游擊隊員，是一個對高舉德意志及德意志民族委員會領導的法西斯戰鬥力量之秘密軍的發動者。

(二) 他接受遵守「馬基」的非常嚴格的紀律，並絕對地服從首領的一切命令，這個首領是由「馬基」組織的幹部所指定或推選的。

(三) 他要和他的家庭或朋友們斷絕往來，直至嚴守的結束，關於嚴守地的情形，關於他們首領及同志們的身份，他將絕對保守秘密，他知道：違反這個禁令，將被處死刑。

(四) 他表示他得：沒有任何一種特別援助可以給他的家庭，不要因此引起嫉妬和鄰人的苦惱。

(五) 他知道：不給他做任何一種正常薪資的許諾，就是他的生活費用和他的武裝也是不確定的。他表示他得給他的最小的事務，都是由經常的努力才獲得和被分配的，對於所有高級幹部和領袖機關都付出非常大的困難和極端危險的代價，他將尊重法蘭西公民（同盟者或中立份子）的生命及私有權，不僅因為「馬基」的生存依靠他們與民衆很好的合作，而且因為「馬基」的人物是國家的精英，因為他們應給一切人一箇榜樣，證明真正的法蘭西人是勇敢而廉潔兼備的。

(六) 「馬基」的被服和糧食貯藏，強迫我們去劫掠維希警察的倉庫，

或者他領的儲藏室或者去國家救濟會的或俘虜的糧食或被服貯藏。

為了無論如何保護抵抗者的生存，這些對象是有無限地不可磨滅的；這些對象將由對於通判的高貴品而獲得特別精選的精英人物去執行，武裝一經允許，就實行作戰，去專門偷劫佔領軍的貯藏。

(七) 自然，關於自願者的加入，沒有任何宗教或政治主義的區別，天主教徒、耶穌教徒、回教徒、猶太人、或無神論者、保皇黨人、激進黨人、社會黨人、或共產黨人、所有願意打共同敵人的法蘭西人，在我們中間，應被歡迎，志願兵要同意其同志的主張或信仰，信教自願是協助西人的最高美德之一，而企圖在法國創立過信主義（超信主義）的，那是希特勒的政敵們。

「馬基」的人物，不僅尊重同志們的信仰和主張，而且對於他們，他是一個忠實的朋友，一個武裝的兄弟；大家的精神都有關於此，並且，只有，一種許的朋友表現抵抗法蘭西地獄的堅強的生活。每個人應該忘記他的苦痛，自取，和嗜好，要為着一個同志而犧牲自己；當他受勞的時候，要去代他服勞務，在一切危險的情形中，強家人家屬於我們統地都是最惡劣的罪行。

一個受傷的人永不應被遺棄，屍體每次都要被檢閱而不被掩埋起來，這是可能的人道。

(八) 「馬基」的志願兵，只有當他的堅忍性、敏捷性、和紀律性使他適當於接受我們一發武裝的時候，才被武裝起來，他應以最大的注意來保護武器，應保持它非常的清潔，應經常隨身攜帶它，除非他可以把它存在野營的軍械庫裡。

凡是丟掉武器，將被處死刑，這種懲罰是嚴厲的，但為着大家的權利，是必需的。

(九) 自願兵要盡可能自己管理自己的財產和自己的身體；體格的體態和健康的健康有賴於此；它們對於國家的福利是必需的。

(十) 每一個「馬基」的人物，都是只當元帥及那些服從他的叛賊們的敵人。

告報區邊

在摸索試驗中成長的楊家灣小學(上)

陶端予

陶端予同志是延安楊家灣小學的教員。在她當小學教員以前，是個十足的小姐型的女孩子，喜歡音樂歌舞，她自己也許有希望成爲中國留音的願望。但整風以後，她放棄了個人的享受和願望，到農村去當小學教員，爲人民服務。原先，她「準備兩年的失敗經驗」，可是她僅僅花了不到兩年三分之一的時間，就創造了一座模範的楊家灣小學，並且榮獲了邊區第一屆文教大會的特等獎狀。從她這一篇報告里，可以看出一個知識青年和人民大眾結合的道路，從她從事民辦小學和教學方法上，又產生了一些新的經驗，可以供給有志到農村中去的青年和教員們參考。

編者

一、怎樣辦起來的

楊家灣，一連廿一戶，大半人家過着中農以上的光景，在北郊鄉說來，是個富裕的村子，同時近處城郊，騷亂也較閉過。

村上的十來個娃娃，一年年長大了，大人常說：「咱們這村子，就在這上吃了虧，可不能再叫娃娃們作呼喚驢子。」可是附近沒有一處小學，於是早在一九四三年冬天，侯學林、曹婉香等就提出：「咱們在村上立個學校，請政府給咱減價收費。」這個要求從鄉上直上轉到市上，無奈當時市府也苦於無人可派，只有暫時擱下。

一九四四年春上，我莊鄉和北郊鄉搞了聯辦，其中也訂了辦學校的條件，這更增加了幹部們辦學的心思。三月，楊家灣鄉黨到北郊鄉來開區民工作，由區府轉達了這個要求，並得到了滿意的答覆，於是籌備開始了。

先是，區黨政府發動了各村的村民會，作了初步的組織，大家籌公議，讓字是政府，應該辦個學校，所以在市府區署的督促下，鄉長就領導衆人，要請楊家灣居民工作小組的同志，進行第一次第三次的大籌備會議。在籌備中，楊家灣村長李德清提出了意見，鄉上的自備車，泥水匠們來自己蓋房，鄉長、鄉教育委員都親自動手，做了小工，大家辦的都很積極，同時也提出了一些問題。

每當會上，第一次就提出，而又討論最久的是經費問題，都說：「自家的事情，當然自家出錢辦。」可是出錢的方法，却大多數主張攤派，連幹部

都說：「這是老百姓的習慣。」如果這樣做呢，貧苦娃娃就難以入學了。爲此，公家進行了再三的解釋，三次會上，通過了這樣的辦法：以一個娃娃一斗小米爲標準，富的繳得多，貧的少出，實在困難的或移難民抗屬則免費。雖然軍家已經這樣決定了，但公家在參加籌備中感到全部經費的開支，在實費不接的時候，實在是一筆不小的負擔，爲體貼對羣衆辦學的苦心及困難，就支提出讓員個人的經費由公家暫時幫助的辦法，所捐經費，投入合作社，作爲教育基金，大家當然非常感戴，他們說：「公家幫助的實在好，秋後我們一定自己解決。」

秋後十月了，在北郊鄉的黨大會上，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討論。全鄉又自動捐助了四石多糧食，補助目前的經費，以後呢，全鄉分了九塊學田，由各村變工隊員自願幫助代耕，到次年秋收以後，楊小的經費就可全部自給了。

侯家的娃娃，王家的娃娃，一個個的都來報名了，可是，也還有人要算不開。有人說了：「我娃還要擱牛呢，駝不成……」。的確，上了十歲的娃娃，在家裡担水，做飯，糊牲口，零碎碎可以頂半個勞動了。移難民們則愁着臉說：「上學還不好好，就是供不起！」而高加貴的兒子，却正在這時不見了，爸爸說：「我娃走了外家，不在這擱住。」了！六月，兒子自己跑來學校，告訴教員說：「那時怕動員，又怕你打罵，所以不敢來了。」上了十二、三歲小女子的家長則說：「等等看，教員是女的，我們就聽！」在宣傳入學時，是碰了不少問題的，就是那些已經送娃入學的人中，也有有的在就心：「從前娃娃給了書，讀不下半，坐座也丟了，閃（弄）的娃

成了個「二流子」！

看到這種情形，幹部們都着了急，他們說：「一定要動員，就是得有點強迫才行哩！」公家又從旁說服和宣傳了：「有一個教一個，有兩個教兩個，可以宣傳，但不要強迫！」同時也提出解決的辦法，宣佈勞動報的制度，——家中有事，只要家長有話，即可隨時離校，以解決勞動的問題。經費問題的解決，前面已經述及，至於其他的疑慮，除了進行一些解釋外，也只有等待實踐的證明和爭取了。

解決了以上的這些問題及事實的爭取，報名的學生就由十一個到了十四個，十七個，開學時意外的到了廿三個，在開學後八週中每週都有新學生增加，至今已有一百三十七人。

現在來說，這個人地生疏的「公家人」——教員，是怎樣着手準備工作的。爲了便於了解情況起見，教員隨着居民工作組以幫助工作者的面貌下了鄉，怎樣下去的呢，首先調查到楊家灣今年新發展了的婦孺，可是現在紡車已全部壞了，沒人修理，教員就從解決這小困難插足楊家灣了。起初，大家那裏懷疑突如其來的「女同志」，到底想搞些什麼。高老婆見「女同志」已走進了院子，慌忙陪着向外送，邊走邊說：「你找誰？」「修紡車？我家沒紡車！」可是，幾天了，這女同志來了就是埋頭修紡車，修紡車一部又一部，高老婆也眼衆人一樣把她的這紡車搬來尋「女同志」了。在修紡車持家常中，又知道了她們更多的困難，於是協助着居民小組解決這些困難，做了一件之後，你也來找，他也來找，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曹家住在了高家的密洞，可是高家的密洞要壞了，曹家無處住，想搬到公家的密洞去住，却不知公家的意見，又缺人工修理，莊上的婆姨娃娃病的很多，怎麼辦。又是誰家的土地還有問題，現在已不是女同志背着被懷疑的身份，胆怯的去找他們了，而是他們在盼「女同志」了，常常叮嚀着：「明兒來呵！」

在給羣衆做事中，和他們交了朋友，並且初步了解了些實際情況，調查了有關學校和娃娃的事，有計劃的搜集了幹部和羣衆們對辦學教學的意見，對教員的要求，又配合着籌備會在下面進行宣傳和解釋，這一切，就是教員個人的準備工作。

經由於羣衆的努力，公家的幫助，楊家灣小學在四月廿五日開學了。那天雖然淋着春雨，幹部、大人、娃娃，還是滿滿的擠了一室，中宣部趙毅副同志及區署全體幹部均出席指導，以示鄭重。在會上，大家說着他們心裡的要事，同時也表示他們對學校的熱誠，撥菜地，借水缸，拿凳子，……侯大

樓說：「要大個有大個，要小個有小個，缺甚麼來甚麼！」這是可以代表羣衆人對學校的責任感的一句話。

二、羣衆辦學校

學校辦起來了，雖然已有了一位衆人選出的校長，但在摸索中感到還需要一個領導組織，於是在區上鄉上的幫助之下，召集了一個幹部羣衆代表的聯席會議，選出七個人，成立了董事會，其中有年高望重的王有富，精明能幹的侯學林等人，又推選了公正的老鄉長做董事長，聘了教員做秘書，學校的經常工作由董事長領導處理，必要時召集校董會或擴大校董會議。

大半年來，開過五次校董會，四次擴大會議，在會上，教員校長向大家做報告，報告教學情形，成績及缺點，經費的開支，羣衆作業等等，然後大家討論，他們討論過教什麼，研究過教員不打勝的辦法，議決過一些制度和假期的決定，討論培養羣衆教員的具體辦法，總結本校工作等等。領導檢查教員的工作，審查經費的開支，提出今後意見等等，這就是他們的權利，他們更負責衆人托給他們的義務，他們幾次的商量着如何籌劃基金，勸募經費，宣傳入學，照顧教員等等，他們自己工作着，同時也向鄉、區、市政府作工作報告，接受政府的領導和幫助。政府幫助經費的開支，解決困難，及時提出意見，鄉政府更時時予以具體扶植，對極小的發展，也是有重大作用的。

除此以外，教員不時要到各家庭訪問，訪問對娃娃前途的打算，家庭勞動的需要，家庭的一切表現，健康的情形，有何特點，要求教員什麼等等，同時了解家庭情況，以便配合進行教育。開學後訪問入學表現，勞動如何，進步了還是退步了，對學校對教育有什麼意見，同時反映學生在校的表現及成績。

他們的意見，就是教員工作的根據，他們的反映，就是教員檢查自己工作的標尺。

三、實際生活就是教材

教什麼呢？籌備中，搜集了教員一些意見，他們說：

「要學字，學應門戶的東西，像打條條，寫寫信，記記賬，糊對聯，打算盤等等。這就學了讀書，學一個頂一個。多識字，少唱歌，不要學了只會吟會唱。」「不光識字，還要教向娃娃講道理，教老人，愛勞動。」這就說沒有學過教育，也沒有教過書，因為村生活，農村生活完全無知的教員，就依着這些意見，依着對羣衆生活的初步了解，作爲最初的資本，開始教學了。

教學是分幾個組來進行的。

第一組：九歲至十六歲的大娃娃，雖然大部不識字，但有些生活實踐，所以接受能力高，進度快，這一組是學校的黨心，因為他們很快就會轉入家園及生產中去。

第二組：八歲至十二歲半大娃娃，都不識字，理解力也較差。

第三組：一歲不識字的娃娃：人數佔佔學校之半，但非學校的黨心，因為他們受教育的機會還遠。

第四組：新入校的學生，有的可以在學習中依從轉入他組。

教學的開始，全從教識字，從簡單的日課字入手，轉入環境事物名稱等，以後，隨着對羣衆生活的熟悉，隨着鄉紳學師，羣衆的學習以及參考現有的材料和經驗，教材的來源也就更豐富了。例如：由於對村長等人的接觸，感染到他們對建設村莊的理想，產生了「由青水接好莊院，楊家灣是我村的家，男耕女織全生產，書房還有小娃娃。」之類的教材，在幫助農工隊及團字組工作中，向他們學習着「一年荒了三不收」之類的豐富語言，及生產常識等。在幫助紡織工作中，深感到勞動合作及其方法教育的必要，就着就着這些都編成了教材，自新教材中改採用的，例如：「種豆子，結豆莢，種瓜子，結南瓜，種下什麼有什麼。」就是在形式上，語句上，也常在教學中，得到學生的傳頌和幫助。例如：一次，教員作了「在長上山打木瓜，來拜在家。」小歌」的句子，但在學生的講話中，却發現用「下川」來代替「在家」，就好了。

第一組的教材，有國語、算術、衛生常識、習字。

國語課程中，應用文，必要的生產知識，社會常識等是基本的內容，同時根據實際生活的變化，插入臨時活動的教材。

應用文——學的程序是：自簡單的收條、被條學起，漸漸到通知、條條、通行單、介紹信、借據等。開始只學應用文的本身，以後漸漸加學句和短文相結合。

爲了應用文的使用，羣衆提出學百家姓，於是先自學生，本村的姓開始，到本鄉、他們的親朋以及一切負責幹部的姓，邊區參議員、政府委員、勞動英雄的姓，依舊的形式編了新百家姓，如「高榮侯李，郭吳鄭王，馮劉曹任，高文唐張，孫韓史馬，嚴賈陶姜……」現已教了一百餘姓，以後再慢慢下去。

其他的內容都放在聯句和短文編，開始，僅僅配合所學的單字，進行簡單的聯句，如「夏天動車要加油，一年產了三小收」五月天，當麥忙，學生娃娃出書房。」之類發展成的長短句，短文，其內容可分以下幾類：
1. 有關個人、家庭、社會的

包括了個人及家庭的概況，親屬的稱號，村上鄉上的戶口統計，村鄉概況及幹部的介紹，市區的劃分，邊區的簡況及其主要負責人等等，也夾一些生活的寫實，現舉例如下：

「我姓張，名叫來娃，今年十三歲，陝甘寧邊區人，現在延安市北郊楊家灣村，爸爸張文才，現在楊家灣開場……」

「邊區政府在延安市，政府主席是林伯渠，副主席是李鼎銘……」

2. 什麼季節就講什麼季節的事。

要使娃娃能分四季的時序，在時序上爲照顧農村習慣，是應從農耕的，此外，隨着生活的演變進行着具體的生產常識，生活常識的教育，如夏秋時講蠶桑，秋收時講收割，近古歷臘月時教對聯等，現舉棉花的例于：

「四月裡來籽來發，家家戶戶種棉花，攪水泡紗染灰布，向陽川地把種下。」而關於打卡收花等的常識，都是在生活實踐中來學的。配合着這些，同時舉行勞動觀念的教育，例如：「布衣飯，粟米香，勞動日身強。」「地分上下中，勞動也不同，人要勤來地不懶，農米滿園好收成。」

3. 政府工作的設備也是教材

政府工作中，有一部份是直接參加的，如像延市十一運動中的獻款部分，衛生工作等不少可以作爲思想教育的材料，如割野草，勞動英雄會，徵集等等都是很好的教材。

鼓勵宣傳學校的：「老梁病下了，連忙到院找，治病吃藥不收錢，百姓方便實在好。過了幾年後，老梁又病了，急壞了老和少，原來醫院設走了，操心下好把式，方便不忘困難時。」

4、活的教材

以娃娃們自己的行為作教材，可收學文化和教導的兩種效果，舉例如下：木風熟了，一個叫在長約娃娃，成天想上山打吃木瓜，誤了勞動，學習又不安心，談話也無效果。一天，上課時，教員叫在長到黑板上來聯句，內容是這樣的：「黃瓜開花花，小雞叫媽媽，在長上山打木瓜，來娃下川翻小麻，像看誰是怪娃娃？」在長羞紅了臉，悄悄說：「姐姐，不叫大家寫我的名字，以後再不了！」大家學習的情緒也很高漲。

又如一次中宣部徐老，邊府教廳黃廳長來參觀，正遇着娃娃們自己上課，見來了客人，大娃娃出來招待，很有禮貌，於是也編成了教材，以熟識進步，發揚優點：

「九月秋陽晒芝麻，姐姐開會不在家，來了兩位老人家，恭恭敬敬招待他，風子娃來陪拉話，劉領教字給小娃，奉茶端了香客茶，二位老人真「喜拉」（陝北話，和善可親之意），臨行送到大門口，希望再來教教咱。」

5、一般常識也要知道

娃娃們也需要一定的科學常識，社會常識，教育常識，因為文化程度低，絕大部份就是口述的，例如：

「日月星是圓的，地也是圓的，站在高山頂上，遠處的地就不見了，所見到的地邊也是圓的，就是這個道理。」

B、算珠呢，主要的目的是學習實際應用上計算的能力，為了適應農村條件，以心算珠算為重心，學習的步驟是這樣的：

最初，學數目名稱的各種記法，度量衡單位的計法及其應用，如識票子、文布、量糧、過秤。之後，自心算開始，再到珠算，在這中間附加筆算的學習。在教學中，因感到這組娃娃算珠算的能力高於算減除的能力，所以心算的學習又是從自十位內加法或乘法開始的，以後再學減法除法就容易了（珠算開始不久，僅學了加法，總的尚缺）。這樣做，似可提高學習效果，但因時間短，尚未達到可觀的勝驗。

習題方面，先從單純數字計劃來開始，之後，就和實際生活的常識相結合，例如：「三畝玉米，六畝豌豆，共是幾畝？」「一畝山地三畝，四畝山地有幾畝？」「一畝中地地租六升，二畝地租多少？」「七米每升四百元，一斗多少錢？」「一畝好棉田能收十五斤花，二畝收多少？」等等。另外，在訂農戶計劃中，發現需要一些常識，如一年一人收多少糧，一身單衣需布

多少，一人一般一年吃糧多少之類，可以進行一些常識教育。

最後，配合了以上的學習，學記出入流水賬，變工公賬，織紡公賬。衛生常識課，這是由於環境的需要，黨業要求，而新設的一課，內容是根據農村的條件，講講農村的環境衛生，個人飲食衛生，常見疾病的衛生，牲畜的飼養和管理，及人畜傳染病的預防等初步常識，也介紹一點有女而方便的地方。

第三組的課程僅有國語和算術，內容是做為升入一二組的準備的。國語課主體是認字，為學習字的使用，及幫助記憶起見，也有長短句等，內容的性質和一二組基本上一致，但淺顯得多了。比如：

「月在天，日出山，人吃牛兒下了川。」

「一年十二個月，分春夏秋冬四季。」

「我姓王，名叫白旺，男娃，今年七歲，爸爸王有長……」

「咱們村，二十一戶，八十口人，大人三十四，娃娃四十六。」

「延安市馬市長，他的名字叫謙章。」

應用文的結構小娃不易學，少數理解較高的可以學收條以外，一般的可以做準備，例如：「小娃小，學收條，公榮都送到，小娃打麻條，收到公榮伍百斤，姓名年月取記好」之類。

小娃的算術課，開始也是學數目的名稱，之後學數數，教教是國語的具體情形來提高他們，再以後就學心算，筆算，自個位到十位的加法減法開始，一部份還學了度量衡，如量票子，文布，過秤等。

習題的出法不同於大娃娃，除了配合簡單的常識之外，還須以小娃娃本身來出題目，可提高情緒及效果，例如：「白旺的五個腳指，加起來四個腳指，是幾個腳指？」「愛鳳的一個眼，加牡丹的二個眼是幾個眼？」

前幾個月，學校初創，尚無威信，不得不顧及家長的意見，很少唱遊，在學校有了成績之後，唱歌，遊戲就發展起來，除了一些集會遊藝外，也扭起秧歌外。唱歌方面，是以歌詞來配合進行教育的，如勸草時教勸草歌，編文歌會時編了模範學生歌，也把學校的生活放在歌中去，例如：

「前流綠水，後面青山，遠遠看見楊家灣，一道好平川。」

「棉花滿樹開，翻起學校來，你用察測我出錢，校長把校長代！」

「吃的百姓的米，穿的百姓的衣，努力為百姓做好事，才不負百姓的意。」

（下期續完）

讀者之頁

關於「發展資本主義」的問題

——覆宗維善，張羈，方二，諸先生

(一)……讀了毛先生的「論聯合政府」後，許多同學都很注意在一般綱領中所提的「發展資本主義」的問題。有些覺得共產主義者主張發展資本主義，很奇怪；也有人覺得這話恐怕只是說了騙人的罷了。我相繼毛先生說的確是真話，但我不能給以圓滿的解釋。為什麼中國還只能發展資本主義呢？雖然不能一下子到社會主義，難道不能比資本主義更進步一點麼？發展資本主義究竟對誰有好處呢？是不是只對資產階級有好處？……這些問題，請你們公開答覆，一定是許多人願意知道的。……

(二)……中國社會為什麼停滯在封建形態而未範圍進資本主義社會？……
宗維善
……
(三)……何以主張扶助資本家？以後是否再來無產階級革命。有人說，假使養成了資產階級再來剷除之，豈非開子孫的玩笑麼？這又如何解釋？……
方二

宗、張、方三位先生來信，都涉及發展資本主義的問題。現在我們在這聯合答覆，因為這不僅是一個有興趣的問題，而且是意義非常重大的問題。

在毛澤東同志文章中，再三反覆說明了發展資本主義的問題。他說：「民族壓迫和封建剝削是阻礙中國人民的個性發展，束縛着私人資本主義發展與破壞着廣大人民的財產。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制度的任務則正是解除這些束縛與停止這種破壞，保障廣大人民能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個性，能自由發展那些不是一種國民民生計，而是有益於國民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保障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又說：「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為什麼不怕資本主義，反而提倡它的發展。我們回答是這樣簡單：發展資本主義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

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與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中國的資本主義，相反的，我們的資本主義太少了。……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的統治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與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及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獲得廣大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於國家與人民，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任何的空談與欺騙，是不會使它迷惑我們的清醒頭腦的。」

這些話說得如此明確，如此誠懇，實在是洞見了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的實質，並看出了它的今後發展規律而得到的結論，決不能從這些話的文字本身所含的意義以外另行找尋其意義。

那麼為什麼共產黨人如此主張了為什麼發展資本主義是必要的，而且是應該的事呢？

我們應該有一個根本的認識，就是討論這樣的問題，決不能從主觀的願望出發。一個人或嗜愛吃糖，或者愛吃辣子，他可以自由地根據自己的胃口來選擇他的食物。但人們決不能夠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根據自己的「胃口」作自由的選擇，來決定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假如一般地比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無疑的，社會主義社會是更好的，更進步的。但是假如現實條件並沒有立即實現社會主義的可能，那麼無論你怎樣好心地想促成社會主義，結果必然失敗，因此對於中國社會的進歩就一點好處也沒有。當現實條件決定了發展資本主義是中國社會經濟向前進歩的第一個步驟的時候，我們的努力也就該如此地進行，才是有意義的事。從落後的封建經濟發展到資本主義，這是一個極重大的進歩，其意義絕不輕視。也只有充分

發展資本主義之時，才可能具備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這並不是說，創造出一個資本主義，故意走迂迴的道路。這並不是「開玩笑」，而是嚴肅的歷史真理。假如不預備這條路，空談實行社會主義，那才是真正的開玩笑。

因此，我們首先必須對於中國社會經濟的封建性，有明確的認識和正確的估計。中國的社會經濟是以農業為主，而支配着農業的是封建性的社會關係。中國又是一個半殖民地社會（在日寇佔領區域內更完全是殖民地社會），帝國主義勢力的東進，阻礙了封建的復性。封建的復性好像是一個壓在中國社會身上的巨大的重負，使它在前進途中步履艱難。封建的壓迫使社會生產力極端低下，把廣大人民陷於貧困中，在這廣大人民的書齋上造成了少數大地主、大買辦的特權勢力，形成了政治上的獨裁現象；封建的壓迫又不僅束縛人民的物質生活，而且束縛人民的頭腦，造成了舊社會中一切落後的思想意識。解脫封建壓迫是一件巨大的，而且異常艱難的工作。假如我們只是在口頭上談論中國社會的封建性，但一到處理實際問題時，却忘記了這封建的大敵人，那麼我們就只能說些與事實無補的空話。譬如空談廢除私有財產，空談反對資本主義剝削，空談建立集體農場等等，但是這一切對於中國社會的進步毫無好處，因為這些是在實際上還做不到的事。假如我們是要求解決問題的，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為了使中國社會經濟進步，就必須爭取民族真正獨立，解脫帝國主義的壓迫，同時掙脫壓迫在自己身上的封建的壓迫。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就是在進行着一個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因為這樣的革命的結果，不管我們的主觀願望如何，在實際上總是在中國的土地上掃除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使民族資本能自由地生長起來。

那麼人們也許要問，發展資本主義只是一個不可避免的事情，而不是一個值得歡迎的事情麼？我說，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值得歡迎的。既然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掃除封建壓迫的結果，想封建的重壓從自己頭頂上解脫，打開中國社會向前進步的道路，那難道是不值得歡迎的事麼？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社會經濟上達成的結果，首先就是：（一）實現農村的改造，使佔中國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從封建壓迫下解放出來，使他們能夠不再過半飢半飽的生活，得到自己的土地；（二）造成工業的發展，使得現在在各種壓力之下奄奄一息的民族工業蓬勃生長起來。由於農業的改造和工業的發展，就使社會生產力能大大地提高，這些正是值得歡迎的事。

因此，不能以為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只是對資產階級有好處。首先是農民

得到利益。因為在農村中制訂和實施這些政策，這是工業發展的必要前提，而農民高產糧食也由此得到解放，脫離了幾千年來他們所過的貧賤的生活。同時工人也得到利益，因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的工人必須受這比資本主義剝削更得多的超經濟的剝削，並且沒有人身自由，沒有團結和組織自己的力量，只有有在去除此種剝削時，他的生活水準才能提高，他才有為自己的利益而組織起來的自由，也只有在此工業充分發展的時候，才能有少數農民走向城市，成為工人，使工人的隊伍擴大起來。

而且我們看到，由於民族資產階級軟弱的原故，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不能由資產階級獨力負擔。當工人、農民自覺地起來執行民主革命的時候，其結果必然和歐洲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同。資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的結果就是資產階級的專政，而使工人農民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是被剝削被壓迫者，並且在這種情形下，封建的任務並不能徹底進行，如在日本和東歐的許多國家便是如此。在這些國家中，資產階級不僅沒有徹底掃除封建勢力，而且還和殘餘的封建勢力勾結起來壓迫工農大眾。但是以工人農民為主力聯合了自由資產階級共同執行民主革命，發展資本主義的時候，其結果一定是另外一種樣子。那就形成新民主主義的特點，所產生的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權和社會制度。社會經濟的基本性質雖然沒有超過資產主義階段，然而工農大眾卻能夠在政治上在社會上有力量保證把反封建鬥爭不斷地向前推進到最徹底的程度，並且保證一切利益不完全歸資產階級所取去，而要照顧到全體人民的利益。

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主張「發展資本主義」，一方面，這並不是一句空話，而是要在實際上完成民族獨立和剷除封建壓力的任務，由此而使得資本主義獲得順利發展的條件，並且要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下切實保護私人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的可能，給以種種必要的幫助。在另一方面，這政策又不能只解釋做是「扶助資本家」。因為這是既照顧私人資本主義的利益，又要照顧工農的利益，既保障資本家獲得合法的利潤和資本積累的可能，又要保障工人生活水準的提高，既保障私人資本主義的經營，又要在國家為人民所掌握的前提下發展國家資本並發展勞動人民的合作社經營。這應該注意並不是所有資本家都能無條件地順利發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裡，資產階級中有許多具有濃厚的買辦性，並和封建剝削相聯結，這種封建性和買辦性是不能容許發展的。只有自由資產階級（不帶買辦性的和封建性的）才會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在新民主主義政治條件下獲得廣大發展的便利。

談談青年對形式邏輯應有的態度

——與張申府先生論「研究形式邏輯」問題——

克 汀

查最近出版的「怎樣自我學習」書裡，刊載了張申府先生的大作：「怎樣研究形式邏輯」。據「青年生活」月刊編者在序言中說：這一本小冊子的編成是為了要解決青年學習底態度問題的，也就是要告訴「青年人應當學習什麼，和應當怎樣學習」。因此，張先生的大作，也顯然是以青年人為對象的。青年人對於形式邏輯應當採取一種什麼樣的態度才算正確呢？這一問題是很重要的，因為這關係到青年人怎樣運用正確的思想方法的問題。而在實際上，只有掌握了正確思想方法的青年們，才能够在五花八門的複雜的現實生活環境中提出一個個新問題。不然，實在是很容易會迷失方向的。讀了張先生的大作以後，我覺得有許多意見是大大地能夠同意的，現在就把它寫了出來，請就教於張先生和各位讀者。

形式邏輯的學者常常有一種意見，認為邏輯這種東西原來是和實際的一切東西沒有任何關係的，不管事物在實際上如何，只就純粹邏輯上的推演過程而說就行了。因此，邏輯常常說：邏輯只是一種邏輯關係的必然推演，邏輯只是一種「型構」，和實際的東西沒有任何關係的。這樣，他們便主張用各種「符號」來代表這些「邏輯關係」，結果，他們便造成了許多和數學上方程式近似的一系列的「符號」。他們以為這些邏輯上的「型構」便是邏輯學的精華。這樣說來，邏輯學不見變成了一堆符號上的遊戲嗎？他對於我們有些什麼用處呢？於是他們便不得不「聰明」了，他們說這是為了要使我對說話正確和說話方便。張申府先生的意見也過水不出這一層理論的圈子，他說：「照我的說法，邏輯學的是怎樣說話，或應當怎樣說話。由此聯帶地乃請各位思想，請應當怎樣思想。更由此聯帶地乃請各位怎樣推演或推論，請應當怎樣推演或推論。」（見「怎樣自我學習」卷三〇頁）

其實這是不對的，邏輯研究的就人類從具體的對象到抽象的思維的整個過程，特別地它是着重於思維法則的探討的。邏輯在開始上和在本質上，決不是應用於說話，而是我們對待客觀事物的一種態度，觀點，方法，和根本原理，正因為這樣，所以它能告訴我們怎樣去認識客觀事物，特別地是怎樣

去思維。因為我們僅僅靠了具體的直覺那只能知道事物片段的表面的情形，而靠了抽象的思維即可以深入內部知道事物實際運動的規律。因此，辯證邏輯也「不外乎一般所說的平常道理，它只是比平常道理能夠照顧到更多的方面，更周到，能夠看得更深刻，貫徹得更久遠」（潘梓年：「自己怎樣學習哲學」）。

形式邏輯的毛病就在於它只顧到事物的片面，而且是靜止的（呆板的，或死的）和表面地來看的，這樣，自然對於事物內部的瞭解便不會周到，不會深刻，而貫徹得也決不會久遠的。誠然，任何一個問題總使表面看來是很簡單的，其實也是極複雜的，決不是一堆「符號」所能解決的，也決不能用邏輯符號間的關係能夠表現它。分明是一條迂迴曲折的羊腸小徑而我們偏偏要把它當作直線形的康莊大道走，這樣怎麼會走得通呢。

新哲學法照著外界東西原來的樣子而不加以任何增減地來理解它，邏輯就是照我們依據這些本來的規律去認識事物，改造事物，而使它合乎人類生活的進步要求。

形式邏輯是一種死的，呆板的思維方法這是無可否認的，但是，形式邏輯是不是可以把它簡單地消滅掉呢，這當然也不是的，形式邏輯有了很久的歷史，也曾解決過了很多問題，人類靠了它認識了許多事物，科學靠了它建立了許多科學體系（最明顯的如歐氏幾何學）。因此，在形式邏輯裡，一定有許多學得的東西的。這我們就要談到形式邏輯的拋棄問題了。

是的，張先生也承認「傳統邏輯式所關形式邏輯，許多部分都應不得」。『（見「怎樣研究形式邏輯」一書）怎樣自我學習』（二六頁）。而且張先生還把「要得的」邏輯稱為：「形式」邏輯以示分別。但究竟有一部分要得，有一部分不要得呢？這一點張先生却沒有明白說出來。

在五六年來，曾經有過一次關於形式邏輯與辯證邏輯的激烈論爭。在這次論爭中，反對了把辯證邏輯和形式邏輯「割地裂」。也反對了對於形式邏輯的某一部分的無條件的「拋棄」，而對於另一部分的無條件的「棄」。在這

論爭中，正確地指出了要整個地或全體地去「揚棄」。形式邏輯，把它的種種因素（要得的）經過了加工改造以後，吸收於辯證邏輯當中。這樣，被吸收入去的，便變成了辯證邏輯中的組成的部分了。可惜，近幾年來由於社會生活上的限制，使我們的「揚棄」工作還沒有全部完成，到了今天還沒有一本較適合於青年們讀的新邏輯學的教科書。

但是，由此我們證明了，形式邏輯是應當消滅的，它決不是與辯證邏輯可以「共存不朽」的東西，它在被「揚棄」了以後，便受到了要被送進歷史博物館中的命運。張先生說：「我也同羅素（他還是今日生存中的最偉大的邏輯大師）一樣，相信凡邏輯都是形式的」，這一點我不大同意，相反地，我認為正確的邏輯只有一種，這就是辯證邏輯。

張先生說「型式邏輯」是羅素的一部分，而所謂「型式」是什麼呢？張先生又回答道：「型式本不過就是結構的表示。而結構是關係的集合，格子的所由成。我出種種一般的型式來，我出種種一般的結構來，當然絕不脫於現實的，尤要及於可能的，以備人應用，并且以應天化人生，美化人生上的需要，這也是邏輯所應有的事。因為這個緣故，所以邏輯也可以說是型式之學，或結構之學，甚至陳示可能之學，或藝術可能之學，而且邏輯一個更明顯的實用目的，就是把話弄清楚，就是使人會說話，使人把話說得清楚，使人少誤會，使人在不應該說或說得少誤會少含混。」（見同上書頁三二）其實，弄了一些呆板的「死的」表面的一「型式」，結構，來說明事物的複雜糾纏的多方面的矛盾關係怎麼會有呢？即使是目前的說話語。這也是極複雜的。因為說話也是由社會生活來決定的。複雜糾纏的社會生活產生了現代的複雜糾纏的語言。弄了這些呆板的「死的」表面東西怎麼能使我們的說話完全不會錯誤呢？它所決定的不過是一些呆板的「死的」法則，最多只能規範片面的語言而已。說句空話，如果人類完全依照了形式邏輯的呆板法則去說話，那末，文學家便理首先反對，因為這時人們的語言不但內容貧乏，而且沒有什麼意義，而且說話的方式也要變成呆板，機械和枯燥了。

邏輯決不是沒有內容的，邏輯的內容是反映了外界一切東西的運動，變化而發展。許多形式邏輯學者常常把數學和邏輯列在一起，而稱它們為形式之學，或結構之學，這承認它們沒有任何實際內容的。因此數理邏輯的大師們說：「邏輯歸數學，數學歸邏輯。」張先生也把他與算學列為中立科學。其實，數學本身也是有着實際的內容的。用數學來做形式邏輯的「邏輯」或朋友是不適當的。數學反映了外界的數量關係和空間關係，因此它決不是一種純粹邏輯關係的推論。算學立基於現實數量的計算，並

何立足於空間的測量，代數立足於正負數的矛盾關係，所有這些都是現實的。是的，一般地說來，初等數學是處理不變量的科學的，因此大部分都是應用形式邏輯，特別是歐基里德氏幾何學。（當然，就是初等數學中，在實際上也是貫徹辯證法法的，很顯明的一個例子：離開了正負數的矛盾便沒有代數學。）但是，如果在高等數學中，便要處理變量了，這時候，形式邏輯便完全無能為力，正因為這樣所以非歐氏幾何學才會「揚棄」了歐氏幾何學，量子物理學才會「揚棄」了牛頓物理學，現代的物理觀，辯證觀，時空觀才會代替了古典的形而上學的觀點，非歐氏幾何學比歐氏幾何學反映了更廣泛的東西，而且反映得更深刻，更周到，貫徹得更久遠，因而也解決了許多現代的東西，而且許多束手無策的問題。同樣地，愛因斯坦和波蘭克也是這樣地「揚棄」了伽利略和牛頓。現代物理學和數學上的這些成就就是這一批集腋的天才們拋棄，過去形式邏輯的束縛（當然他們也沒有能夠全部拋棄）而不自覺地應用了辯證邏輯的結果，如果人們執業地守住了形式邏輯而不敢越其藩籬一步，那麼，我們就不會有二十世紀的科學，也決不會有愛因斯坦和羅伯切夫斯等偉大的天才。因為就形式邏輯看來（也就是在歐氏幾何看來）非歐氏幾何是荒謬絕倫的，因為它一開始便提出了點和線的運動。同樣地就形式邏輯看來（也就是就算術和代數學看來），微積分學也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它一開始便提出了運動變化的函數概念。

不但這樣，就在現代幾何學中也並沒有像羅素所說的一種是純粹邏輯關係的必然推演。誰都知道，歐氏幾何是在證明兩三角形全等時引用了重疊法的，邏輯關係間的推演沒有辦法證明它，於是只有引用人們的實際經驗，求助於實踐。所以，我們的導師曾經這樣地指示我們說：「純粹邏輯的推論是什麼也不能給與我們的。」

總之，形式邏輯今後決沒有存在的餘地了，在被「揚棄」了以後，被送進歷史博物館的命運已經無法推脫。我並不反對今天的人們來研究形式邏輯，因為不研究便無從「揚棄」，但是，我却不主張青年人研究形式邏輯，使青年人對於形式邏輯有一個簡單明瞭的認識，對於形式邏輯有一些基本的知識這是很重要的，但假如「我們不主張現代青年向舊紙堆中討生活一樣」，我們也不主張「教青年們研究形式邏輯。現代青年最重要的還是要掌握新哲學，以作為生活上，學習上，和工作上的指導，至於研究形式邏輯那只有職業邏輯學的人們去搞了。」

語 彙

——府申張——

對於這篇大作，想我現在不能多說什麼。一期，我自信，在我那篇「怎樣研究形式邏輯」裏，關於青年們為什麼也該研究（或學習）邏輯，理論的理由與事實的理由，都已說明或暗地提到了一些。二期，也因此忙於別的，實在不能對於這問題多說什麼。雖然對於這篇大作，不能不認為極淺不無一些誤解，甚至不解，但在現在也只有嘆息一聲而已！

我那篇「怎樣研究形式邏輯」也寫了千幾千字，竟一點兒也不能使一些人對於所謂形式以至所謂邏輯多少有一點兒了解！這在我現在也只有感汗而已！

我本知道有許多人對於邏輯，尤其對於所謂形式邏輯，有不易打破的成見（或成條主義）。所以在我那篇東西開端會問大家是否還覺得形式邏輯已過時的東西，是否還以為它要不得，這一提到它的名字就起反感或惡感之感，假使還是那樣子，那就最好不必看那篇東西。

本來，我那篇東西的題目（即「怎樣研究形式邏輯」）並不是我自己起的。假使由我自己命題的話，我一定只叫「怎樣研究邏輯」，而不叫「怎樣研究形式邏輯」。我雖然認邏輯為實質，但對於「形式邏輯」這個名字我却十分厭惡。那麼，為什麼竟用現在這個題目，這也有點兒故意——故意「挑虎鬚」！

無論如何，對於邏輯的成見却是非打破不可。理論的理由，事實的理由，既不中用，萬不得已，

只好也訴於教條主義或權威主義，把我在「民主與哲學」那篇文字中曾經徵引的幾句話，照原樣直譯在這兒：

「近年以前我們哲學工作上的一大缺陷，是缺乏邏輯，特別是邏輯式邏輯問題的著作。近年則已開始這些問題的處理，已着手創作一本邏輯教本，它的重要，不可等語，是大的。」

這是在蘇聯領袖哲學學家蘇聯科學院人米丁一九四二年十月革命二十五週年時所作的「哲學在蘇聯的二十五年」報告第四節中語。會登在那年最後一期的「馬克思主義之旗」；又見次年出版的「蘇聯科學院紀念會冊」（一三〇頁）。商務出版的東方副刊第二期登有根據倫敦「哲學」季刊去年四月號登的節譯文（該段只七七頁）的節譯文，成都大學月刊去年底的兩期登有較全的譯文，不難查對。所說的教本，如我會報過，去年已成兩卷稿本，一種的第一章，已在去年第四五兩期合刊的「馬克思主義之旗」發表了。

我不能不聲明，我一向所謂「型式」都不是空的，也不是什麼「呆板的，死的，表面的東西」。在表面絕我不出型式來。我丁向相信，事實上沒有離開內容（或最好說東西）的型式。但在講時，在研究時，為方便起見，却不妨單開來研究。假使這個不可能，那就必至什麼學問，什麼科學，都不可能。

什麼是型式，在我那篇東西裡，本已多少說了一點兒。就如所說型式「不過就是結構的表示。而結構是關係的集合」。也可以說，型式（至少邏輯所講的型式）就是東西與東西的同樣關係的共同點之所在，或事情與東西的同樣變動發展的共同點之所在。

假使不承認這個，那就什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至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所謂規律，都不可說了。什麼科學的豫言作用，哲學的真人類行動的最高指導或指導，也都空了。

我還要附帶聲明：我固然仍舊是辯證唯物論的信徒，而且簡直越來越相信的越堅；但我却不能不絕對負責地同時聲明：只有辯證唯物論與唯物辯證法萬萬不——就令只在方法一個領域內。

過去曾有動的邏輯與靜的邏輯之爭。我還要附帶聲明，我近來一個所得乃謂，靜的邏輯是沒有動的，凡是邏輯都是動的。假使不動，便無邏輯，不管形式不形式。無論如何，邏輯總要「動」想，講到推理；假使不動，能有思想麼？能有推理麼？

這就像我承認凡是真的辯證法，或辯證法的本身，沒有不是唯物的一樣。唯心的真的辯證法是沒有的。唯心的，神秘的，只是辯證法的外殼而已。

（四月八日）

代 郵

習人先生：

前信收到後，已有信交北

碯發行站待取

衆君羊

期五十第 卷十第

目 要

懷 于

機危協妥論

進野岡

路道的斯西法本日滅消

翰 舒

議會拉姆西論

版出日五月八年四十三國民華中

★ 錄 目 ★

論妥協危機

于 懷 (五〇七)

消滅日本法西斯的道路

岡野進 (五二三)

第一：日本的民主勢力

反對中途妥協——人民的厭戰情緒和反抗運動——日本共產黨及其活動——舊「日本無產黨」——舊「社會大眾黨」——舊「民政黨」——「政友會」及其他——國外反軍部團體——非民主的勢力——「穩健派」

第二：建設民主的日本

嚴懲戰爭罪犯——肅清封建的反民主的制度——實現民主政治——天皇與天皇制——改革教育——保證永久和平

第三：富強的日本（戰後的經濟問題）

第四：結語：建立人民政府

給西姆拉會議

舒 翰 (五二九)

匈牙利的土地改革

乙·拉晉 (五三五)

邊區報告

在摸索試驗中成長的楊家溝小學（下）

陶端予 (五三八)

事啓

本期社論：

「全中國人民起來，制止國民黨反動派已經發動了的內戰」

因審查關係登不出來

論評周兩

論妥協危機

于懷

美軍新佈署——三位一體的指揮系統——海軍空軍化——編置日寇本土——現階段的盟軍戰略——兩種戰
 佈署的鬥爭——琉球之戰與逆境——「改約」運動與妥協和平——天皇問題的本質——鈴木內閣的陰謀——
 保存皇室財閥——美國務院的日本政策——天皇是「唯一安定的勢力」——「大企業家是我們的朋友」——
 美國人民反對偽裝的妥協和平——妥協和平與三強會議——日本的四大希望——中國的民主團結是全問題
 的核心——對華的反動政策必然地引導到對日妥協的後果——中國人民反對一切偽裝的妥協和平

一、兩種戰略佈署的鬥爭

由於英美艦隊的轟擊日本本洲（七月十日），太平洋戰爭進入一個新階
 段。

欲知道一個新階段的真面目，先得一看美軍的新佈署。

六月二十一日琉球之戰結束，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一日美太平洋海軍將領
 在舊金山召開一個戰略會議，這一個戰略會議的具體內容雖不得而知，可以
 想見它的任務是進一步組織太平洋戰場的下一攻勢的。

舊金山戰略會議後，美軍在太平洋的軍事佈署上所採取的第一步驟是成
 立以史巴茲將軍為首的太平洋戰略航空隊。在此前，塞班基地的第二十航空
 隊直屬於安諾德將軍指揮，預定以琉球為基地的第八航空隊只能受華盛頓的
 聯合參謀部指揮；由於戰略航空隊的成立，這兩大指揮系統不同的航空隊統
 一起來了。這一陸上空軍指揮部的成立意味今後太平洋上陸上基地空軍的
 活動要加強了。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由於太平洋戰略航空隊的成立，美軍在太平洋上三位一體的
 指揮系統最後的完成了。如所周知，長時以來，美國方面就不斷有人要求太
 平洋戰區應設有一個類似於艾森豪威爾在歐洲戰場的統帥的機構，但由

於太平洋海軍將領的意見不一致，這一要求遲遲未能實現。四月初，華盛
 頓聯合參謀部發表尼米茲將軍為美太平洋海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為太平
 洋陸軍總司令，初步地解決了這一問題。這一問題解決的方式，一方面表示
 了海陸軍之間的意見並未得到徹底的統一，另一方面表示了美軍今後在太平
 洋的作戰將不是以分兩作戰為原則，而是以集中攻擊為目標；這種佈署就強
 烈的暗示着美軍不準備在中國陸上進行決戰，而將以直接進攻日本本土為第
 二階段的行動對象。現在，由於太平洋戰略航空隊的成立，這種不以區域，
 而以性能劃分的三位一體的指揮系統終於確立起來了。簡單的說是：

陸軍方面的最高統帥——麥克阿瑟

海軍方面的最高統帥——尼米茲

空軍方面的最高統帥——史巴茲

這是舊金山戰略會議後美軍新佈署的第一步。第二步，是調動太平洋作
 戰的海軍將領。據七月十四日美海軍長羅斯福的報告，這一來調動的範圍
 將達三十名高級海軍將領之多，調動的原則是以空軍將領來代替海軍將領，
 在機構上則新設海軍航空正副總司令一職。據美海軍長說，經此調整，美海軍
 的航空力量將為美海軍全部力量的百分之六十，一言以蔽之，海軍空軍化。
 總量加強空軍作戰在海軍中的比重，完成所謂空軍化的海軍。

應該從兩個角度去看美海軍的這一新調整：第一，根據戰術和技術的發
 展，空軍在近代作戰中的比重是加強了，從這一角度來看，美軍的調整不過

是適應新的戰術和技術條件而已。第一，環衛本環是為了技術的原因，而是為了第二階段作戰的要求，從這一角度來看，美海軍的新佈署亦強烈的暗示著美軍第三階段的作戰目標是擊破日本本土。

總括以上美軍在太平洋上的新佈署可以看出一個趨勢：從兵種上說，美軍非常重視空軍的作用，從戰略上說，所有這些安排都強烈的暗示，登陸日本本土的可能性比到大陸進行決戰為大。那麼還有什麼理由說美軍的最後決戰還在下呢？是的，我們會不斷指出這一點，我們現在還是指出這一點——但得說明，我們說美軍對於本土大膽乎的決戰未下，不是說人們在實際上還沒有下決戰，決戰是下了，但那不是最後的決戰，因為那一登陸本土的決戰是美軍的強大空軍能將日本本土的抵抗徹底軟化，軟化到它的陸上抵抗弱到不足顧慮的地步的。空軍真能完成這樣的任務嗎？這待事實證明，一旦發現空軍的威力並不如如此之大，那麼，事情就呈現出另一幅面目來了。

新佈署——新行動。

七月十日英美海軍聯合出動東京區，出動艦艇飛機和基地飛機予架以上此後轉而北上北海道，十四日轟炸北海道大濠空襲，十七日又轉而下，再度轟炸東京區；及至最近英美艦隊會一渡突入東京灣。

這是太平洋戰爭中破題第一道，其意義自然是非常重大的。

有些人以為這是盟軍即將登陸日本本土的前奏，然而至於有人以為登陸的地點將在北海道了。很顯然這從主觀願望出發的估計是不值讀者一笑的。

設的想美海軍這一次出動，其目的有三：第一是摧毀日寇海軍起飛的機場，第二，消滅日寇海軍分發了的空軍，第三，破壞日寇的軍需工業和交通系統。在過去，日本海軍是各出來應戰，每戰還是一個未知數，但今天它的艦隊已無幾是殘廢了。那一點海軍無論如何要留到盟軍真正登陸時用，現在出動非其時。其次要消滅海軍和分發的日寇空軍大部份要留盟軍出動的奇襲成倍的多。而在這一戰上航艦飛機固然有它的弱點，但七月十左右日寇在海面上發現盟軍的海軍及其行動方向的時候，北海道方面的日寇空軍顯然是早有戒備了，這，據我們想，就是為什麼十四日英美飛機飛往北群島的時候，美機被空軍的擊擊並不十分嚴重的原因。這樣一來，英美艦隊的出擊就只能集中在第三個目標上——破壞日寇的軍需工業和它的內部交通系統上來了。

一般的說，目前盟軍的戰術目標是集中在毀滅日寇的工業和封鎖它的內外交通上。關於後一點，尼米茲元帥在七月十七日的廣播有一段很好的說明，他說：

「太平洋戰局已由美艦砲轟日本諸城，而進入一新階段。在這一階段中，日本本土諸島間已遭受美艦海空軍的嚴密封鎖……美方對日所施的封鎖戰，已有積極的效果；日本因盟軍佔領菲律賓和琉球本島已無法獲得太平洋的天然資源，華中和日本間的航運已為美巡邏隊和水雷船隊所封鎖；前由中國東海運到日本的主要工業原料，現已不再改用漫長的鐵道運輸，路經東三省而到朝鮮，再以船裝而橫渡日本海——但就是這條前路，現在也很危險了；從阿留申羣島起，到北太平洋艦隊佈於千島羣島之旁，而橫掃日本鄂爾次克海。日本已逐漸成爲空中之艦，想從舊獲得海外大貨的煤油、鐵及其他原料已很困難了。

美軍一方面從事封鎖日本的一切重要原料，另一方面則藉藉發聲和航艦機隊的合力，對敵工業施以徹底的破壞。

這是杜魯門總統六月一日在他的國會咨文裡所宣佈的，支解日本帝國的戰略，支解日本本土和它的南洋佔領區的聯繫，由於菲律賓和琉球之戰的勝利結束，這任務是完成了；二支解日本本土和滿洲——華北——朝鮮的聯繫，這任務由於琉球之戰的結束只完成了一部份；三支解日本本土各島之間的聯繫，這工作現在剛開始。

為了針對美軍支解戰略的第一部，日寇佈署了分區作戰。

為了針對美軍支解戰略的第二部，日寇組織了日滿華聯運體系。對美艦隊的保衛是日寇生死存亡之所繫。

為了針對美軍支解戰略的第三部，日寇成立了地方總監部，地方總監部的設置無疑是準備對美軍登陸本土，本島各區可以獨立作戰的。

盟軍登陸日本本土最好的條件是一方面聯海空軍的協同把對海海峽完全封鎖起來，而另一方面則以航艦飛機和超級機隊合力，徹底的摧毀日本的工業，使日本完全處於癱瘓狀態。當前，以現有的基地能完成這一任務嗎？

一百天血腫的琉球之戰在美軍激起了兩股相反的浪潮，一股浪潮是繼續蹂躪它戰的經驗和教訓，認爲美軍空軍不能解決問題，直接進攻日本本土是難達到傷亡一定是驚人的重大，因此對於美軍的戰略和戰術必須加以再考慮的考慮。另一股浪潮是日寇大玩球的死傷慘重，認爲今後更應加倍藉重於空

應即廢止，而日本本土的軍備不變，但不妨以進攻日本本土的威脅作為要
求日寇投降條件。

二、「改約」運動與妥協和平

這高一尺，增高一丈，一方面是人改被更強的大國自玩球，另一方面
則是不妨妥協和平的遊說自滿。半月以來，太平洋上的逆流又一度高漲
起來了。

逆流的來源不同，但其趨向却是一致的。
首先是從軍事方面來的。

七月七日前美太平洋海軍總司令金西爾新近發表談話，認為「日本
的境內一日被毀，他們的工業家務就停頓」，有人問他「登陸日本是否必
要」，他說，「對於這點不打算有所評論」（七月七日舊金山路透電）。

這個值得注意的是一，第一，登陸日本不一定必要；第二，工業家務停
頓；第三，軍事高漲可使促使日本投降，必須指出，斯密斯少將不過是以此
主觀者中的一人而已，他以此種主觀者絕不為斯密斯少將一人。

其次是從政治方面來的：

七月三日美共和黨議員侯特與美政府宣佈日寇無條件投降的具體條
件，繼以有這種一宣佈可以縮短日本的抵抗時間。

從表面上看，這種主張並無什麼反對之處，因為這真是一種徹底的無條
件投降的具體條件，宣佈了不僅沒有妥協，而且有所防止妥協隱謀的好處。但
這只是一種理論上的看法，實際上今天在美國最熱心於提出此等要求者不是
為了防止妥協隱謀，恰好相反，它是一種妥協和平運動的一個表現。必須指
出這種主張在美國絕不只是侯特一人。

十月十日美國國務卿格魯發表談話，第三次的答案日本有向美政府提出
和平條件的傳說，美國對於日本所堅持的條件是無條件投降。但無條件投降
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呢？格魯先生不作正面答覆，他僅指出無條件投降並非奴
役日本人民之意。正如無條件投降一詞在今天並無實際意義一語，並非奴
役日本人民一語同樣是空洞的，不着邊際的。

格魯的談話是一個信號，美國各報紛紛的討論起對日無條件投降的具體
條件來了。議論之多，不勝枚舉；但值得注意的還是斯密斯先生的約時代週刊

的主張，它認為對日無條件投降應包括下列各項：「一，日本所有武裝艦艇
不論其現在何處都應放下武裝；二，根據開羅宣言，日本放棄其自一九一
四年所攫取或佔領之一切土地，包括朝鮮台灣澎湖羣島在內；三，日本本土之
軍事力量應一切解除；四，凡為滿足國際正義所必需之一切戰爭罪犯均應受
懲；五，一切賠款均應償付；六，美英在東京及其他各地實行短期之軍事佔
領後，凡能表示其才能足以協助履行上述各條件之日本當局，即由盟國及
其為日本之合法政府。至於廢除日皇之問題，目前不作決定，應由將來日本
人民自決」（十三日紐約中央社專電）

該刊對於日皇問題表面上看好像其介於保留和廢除的兩派之間，實際上
這只是表面，因為照它上述第五條的規定，假如天皇證明不能履行上述各條
件，其自然的結論不就是保留天皇嗎？

目前問題的爭執之點在保留天皇或廢除天皇，如所周知，去年二月二日
，格魯先生曾發表談話，說：

「我國意圖重聲明，無論公開或在私人談話中或通過意見，認為廢除日
本天皇是應該保持或不應該保持……」（一九四四年二月二日紐約時報）
但若干政府高級人員皆反對此項理由。

據美國國務院消息靈通之官員稱，美國代理國務卿格魯曾說在日本戰敗
後，暫時保留日皇和格魯深覺在日本本土各島佔領後，惟有日皇始有
充分權力可以強迫中國境內之日軍投降。格魯相信，日本軍事領袖不能
獨發生充分力量使日本完全投降，惟彼等應反對美國廢除日皇及日本所有軍
事領袖完全無條件投降外，不願受任何日本投降條件。但若干政府高級官員
皆反對此項理由。杜魯門總統對日皇問題極感興趣，乘於赴德參加三巨
頭會議前，曾召國務院官員會商（十六日，華盛頓合衆社電）。

問題發展到這樣，已經使後方的從民間理論研討轉變到政府的實際政策
了。

一連串令人不安的消息從太平洋的那一端傳來

「紐約先聲論壇報轉載德報記者報告道：美國正在討論考慮着在不佔領
日本情況下的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定義。

這道定義包含：一，日本放棄其一切由武力佔領之土地；二，解除其海
軍與空軍；三，拆散其船塢與重工業；四，盟國將派遣一象徵部隊監視其執
行上述投降條件。

據云，杜魯門總統在其吧裡赴歐前對此計劃「甚感興趣並有一般同意之
表示」。此計劃與杜魯門總統赴歐歸來之行程有關。（七月十七日，德

約國通電

何謂國行時行國？

「與於門總統本日(十五日)抵德一訊同時宣佈於華府者為總統於三
民頭會議後即將立憲政府，此乃預期屆時太平洋美軍將有重大發展之結
果。杜總統預定會後將訪哥本哈根，奧斯陸及其他各地；波茨坦之會可能延
長三星期之久，果爾則共離華府之時將達六星期之久。此間認為杜魯門臨
時變更行程計劃可轉日本早日無條件投降，對日戰爭提早結束有關，蓋當
此等事件發生時，杜魯門總統必須在華府也」(十五日華盛頓路透電)。

這些消息令人不安，但絕不是說所有這些消息是可靠的，把它引證出
來的意思，絕非是說明上面指出的那點道理，不僅是表現在某些個人的理論
機上而已，它已經波及到實際政治的範圍裡來了。

從理論上說，爭執的問題是保留或廢除日本天皇的問題，但實際上問題
的關鍵是對日無條件投降的條款應該是保存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政治——經
濟——社會的基礎呢？還是和對德國的無條件投降的條件一樣，消滅日本法
西斯侵略者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基礎呢？或隱或顯的主張保存天皇制
度的實際上是主張保存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政治經濟的基礎；再看一遍時
論陣陣的內幕，看那一條是指明要消滅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政治——經濟的
基礎的呢？正好相反，它的第五條在基本精神上正是積極的以保存日本法西
斯侵略者的政治經濟基礎為目的。

主張廢止天皇制度不一定就是等於消滅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政治與經濟
的基礎，但在太平洋的那一邊看不出來，但在太平洋的這一邊却一望而瞭如
指掌。例如以下的五條：一、解除武裝；二、剷除侵略組織及其教育制度；
三、放棄其佔領土地；四、賠款；五、交出戰爭罪犯——再加上一條廢除
天皇制就消滅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政治和經濟的基礎了嗎？

現在我們姑且問把消滅或保存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政治和經濟基礎的問
題簡單化為廢除或保留日本天皇的問題是否妥當，必須指出的是，在戰爭的
現階段中，這種所謂天皇保存論者的論調是極其危險的，因為這種論調所掩藏
的實質上就是一種妥協和平的陰謀。

從兩個意義上，這種說法的抬頭是危險的，第一在戰爭的現階段中，美
軍的進展正達到將登陸未登陸的邊際，太平洋的那一邊有人有妥協和平的幻
想，太平洋的這一邊有人有妥協和平的企圖——且以盟軍不登陸為條件而
與美商議降的條件已經不止一次在流傳了，可以想見，目前這一種策動

只有對盟軍減少。至於太平洋那一邊，我們早在本部開列的時候就
已指出了。這是一方面。

三、鈴木的陰謀與格魯的企圖

另一方面，從日本現內閣的構成上，這種實質上的妥協和平的企圖更
值得重視。誰都知道鈴木內閣是一個兩棲內閣，在職的一面我們曾不斷強調
過它的「拚搏」政策，但強調它絕不是忽視它的另一面——和的一面。

關於鈴木內閣的這一面，有一位觀察家的意見是值得重視的。
「我相信日本可能在今年十月一日以前投降，我這樣說是因為我深信日
本現內閣就是一個巴多格里奧內閣，它可能作持久的抵抗，但它是把無條件
投降的門大開著的。」

鈴木內閣是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東條內閣的一個遙遠的足跡。它為一羣
懶的、舊式的保守份子所支配，而這些保守份子中的很多人在過去是認為屬
於溫和派的。

珍珠港事件以前，格魯大使和他的助手杜曼先生所喜歡的正是鈴木型的
這一類溫和派，很顯著的，國務院在日本失敗後所願維持的也是這一類
的溫和派。

日本完全的失敗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日本統治者今天的問題是如何從
底下爬出來，好讓他們再來再爬進去。

日本的統治者希望從蘇聯和西方盟國間的裂痕中生存下去。他們指望著
英美的保守份子將歡迎或容忍一個相當強的，但是保守的日本作為緩衝蘇聯
的一個可靠的堡壘。

因此，他們希望，縱即他們不得不接受無條件投降，我們可能給他一個
秘密的諒解，不破壞日本的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機構——特別是皇室的
地位和對財閥對於經濟的控制。……

(鈴木和天皇非常接近，他是二二六事變的被難者，他和近衛平沼的親
切關係無一不指示出他之所以出任首相為了他是英美可能接受的人物)(大
意)。

日本的大資本家自然希望他們的所有財產被毀滅之前逃出戰爭。他們在現內閣中強有力的代表人物是軍需省大臣豐田貞次郎。他帶着海軍的頭銜，但他所代表的却是大資本家的利益，他和三井家族有親家之緣，他自己曾經是日鐵的總裁。

爲了處理日本退出戰爭時，把蘇聯孤立在一邊的微妙問題，外務省大臣一職任命了東鄉茂德，他是一個職業外交家，在一九三八年——四〇年間他任駐蘇大使，任內，他是和莫洛托夫相處甚得而聞名於世的。

值得注意的，是鈴木內閣中的兩位陸軍人物都是因爲他們徹底效忠於天皇而選拔出來的——沒有被檢校行動所沾染的一種效忠。陸軍大臣阿南惟幾曾經做過天皇的侍從武官，這是一個最被信賴的人才幹的差事。國務大臣安井藤治在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變時曾經做過當時的戒嚴司令部的參謀，負責撲滅當時的暴徒起義。

這兩個人的出任閣員好像是爲了——一旦鈴木內閣接受投降叫他們來防止少壯軍人的叛變的。

總而言之，日本現政府的組成指示了這一小羣頑強的保守份子已經準備好時機一到，就接受投降的政治基礎。六月初鈴木內閣向國會要求並且得到戰時緊急處置法案的大權不是偶然的（六月二十六日，紐約郵報，A·羅斯專論）。

這是日本法西斯的專制思想嗎？不是的。請再看圖畫的這一面。

「華盛頓年青的自由主義的遠東問題專家，已經得到這樣一個結論：戰後日本將仍然是在經濟的帝國主義者們的控制之下。僅僅是極端派的軍人和他們最密切的同謀者是註定了要被去掉。」

這一個結論是根據此處一些強有力者對於日本統治層裡的一些文治派的人物——特別是對於天皇和大金融財閥的領袖——公開表示尊重的態度上得來的。

國務院的公開表示和最能反映國務院主張的佛萊雪的文章認爲當日本戰敗之後，解除它的武裝，佔領了相當時間，然後最大可能是把日本政府還給日本現統治者那一些所謂溫和的和可敬的份子——三井、三菱及其他金融巨頭，被囚禁的皇室和普魯士式的官僚。

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參院外委會的諮詢席上，格魯認爲天皇證明是日本文「唯一安定的勢力」，他主張保留日本天皇。他警告，非然者，我們或許

不得不面對一個「在無定期的時間中維持和限制一個解體中的七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口的社會」。

最近，格魯先生在日本問題最信賴的一個助手杜曼先生在對一批日本軍政府訓練班的官員講話。在六月十六日民族雜誌的通信欄裡，一個受訓的來日本軍政府人員透露說：杜曼勸告他們，日本的大企業家過去是我們誠實的朋友，將來也是我們的好朋友，要他們來管理日本的經濟是很適宜的（六月二十七日，同報，同氏專論）。

太平洋的這一邊望着那一邊，一次傳情，心心相印——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必須對上面指出的逆流加以充分警覺的必要的理由。

警覺是一件事情，但事件本身的發展却又是另外一件事情。雖然太平洋的兩邊遙遙相望，一水傳情，事情的困難卻是非常巨大的。第一，儘管兩方面都無條件投降的大帽子下講妥協條件，雙方顯露出的條件在現狀下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這決定於戰爭的發展，盟軍最近的進展雖然非常之大，但謂其已足以縮短雙方的距離，顯然是太早的。其次，日本的這一邊，雖有鈴木等一千人願意從底下爬出來，但也還有不少少壯軍人不願出此一着，最低限度目前不願，這是一道難關。再其次，太平洋的那一邊，雖不乏強有力者願作實際上的妥協和平；但美政府中「若干高級人員」反對，而美國的人民不用說更是反對這一舉的。例如，七月十四日美自由主義的民族雜誌，就發表了四篇文章，批評國務院的現行政策，其中一篇就指出：「未來數月中，美國對日的和平條件將是美國人民所最關心的事件，但美政府直至現在顯然未能滿足美國人民的願望。故美國人民應即行干預政府，使對日和平的獲得和軍事勝利同樣徹底。美國對日無條件投降的最低原則是保證戰後日本人民能參加選擇並負責他們自己的政府」（遠大公報七月十九日專電）。人民反對，這又是一道難關。

四、問題的關鍵：中國的團結

問題的關鍵在那裡呢？

從表面上看，美國的孤立主義者目前之所以願意考慮日本在無條件投降後編單下的妥協和平是由於恐其有到底，死傷將不可想像。而日寇之所以加緊

無條件投降後和平的國際地位。這方面所應有的努力，但實際上，按照太平洋戰爭今日所達到的階段看，這兩方面的努力都顯

三、三強會議的主題在討論歐戰後歐洲的問題，但，大勢所趨遠東戰爭勢非在

討論之列不可。不問討論的結果如何，這一件事情本身對於美國的極端

獨立主義者和日本帝國主義者都將產生一種不絕望的壓力。且這希望在於蘇

聯國之能結束戰爭，而不能結束戰爭，亦可以用結束戰爭的可能性，來安排

聯國在他們提出的條件之下參與遠東戰爭。

獨立主義者的新目的現在如下的一篇通訊：

「假如中國問題如一般之所料在三強會議中提出來，它對於遠東形勢

特別是日本的途有着深遠的影響。

最近宋子文氏的訪蘇，其目的顯然是想證明蘇聯對於遠東問題的真意何

在。在太平洋戰爭的問題上，美國（應該說是美國孤立主義者——引用者）目

前所追求的是一兩重政策。它一方面希望蘇聯能在遠東對日本最大可能

的兵力，但另一方面它又希望蘇聯的影響不向其他更遠的地方深入。

由於這兩重政策的原故，杜魯門在波茨坦會議大膽不會向史大林直接提

出蘇聯應加進遠東戰爭的問題，因為杜魯門即提出在美國（應該是美國孤立

主義者——引用者）的壓力中，蘇聯多繳納代價將是不可思議……不遠，

所有的跡象指明，這一類的三強會議對於日本要以此以前任何時期都更有其直

接的影響」（七月十五日，東京，朝日新聞，瑞士通訊）。

一般的說：日本的最後希望有四：

一、美國人民目前對於要求亞洲戰爭迅速而又犧牲最少的結束，它將來

採取更強硬更趨重一個戰敗了的日本的負擔。

二、美日的同盟國家對於遠東問題團結的削弱。

三、日本可能作為防止「布爾塞維克主義威脅」的條索。

四、中國內部的民主團結不能實現，它將是一個分裂而又軟弱的中國。

但歸根結底日本的希望只有一個：美蘇兩國在遠東問題上的不一致，

這不一致又集中反射到中國內部的團結問題上來；實際上這種大問題是一眼

相通的。三強會議的具體結果，我們無從預言，不過正如同在國際範圍內事

件的發展往往有迂迴曲折的可能，但到頭來，總是英美蘇的團結統治一切

的一樣，中國內部的問題解決最後亦必定走上民主團結的道路。

只有一個民主、團結的中國才是同盟國家迅速而又犧牲最小地打敗日本

的鑰匙。

只有一個民主、強大的中國配合着積極民主進步的日本才是同盟國家消

滅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使其不能復活最大的保證。

只有一個民主、獨立、強大而又繁榮的中國作為美蘇兩國在遠東合作的

橋樑才是保障遠東持久和平與安全深遠的基石。

這是太平洋戰爭全問題的關鍵。

問題的本質不是美政府是否應該立刻對日宣佈無條件投降的具體條件，

而是目前現行的具體政策：一個在表面上高聲疾呼成中國團結，但實際上却讓

中國人民力量於不顧，專心致意於分裂性的活動的人（注意：國民黨反動派

所長期佈置的內戰策已趨於崩潰！），必然的也就使儘管表面上口口聲聲要日本

無條件投降，但實際上却是對於日本的民主力量心懷畏懼，而主觀妥協和保

的人；而這一類不願見中國今天的民主化，只怕明天日本民主化的人，他

必定就是在表面上願意和蘇聯合作，但實際上却是對於蘇聯的參與遠東戰爭

，抱着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的心情，暗中對蘇聯進行種種政策的人。

妥協和平的論說絕不能實現——中國人民不難它實現——現在是合

適宜改變政策的時候了。

（七月二十二日，星）。

消滅日本法西斯的道路

岡野進

（一九四五年五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大會上的演說。原題「建設民主的日本」）

岡野進（原名野阪鐵）同志，是日共中央代表，日本人民優秀的領袖，出生在一八九二年，今年已經五十三歲了，外號却像一個年青的學者。家裡是一個貧苦的電工人家，依靠自己所得供給學費，一九一七年畢業於慶應大學，一九一三年參加日本最早的工人組織「友愛會」（後改名為「勞動者同盟」）。一九一九年赴英國調查工運並研究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實際；一九二〇年英共成立時，他是首批活動者，因參加英共被當地政府驅逐出境。在二十三年前，日本共產黨成立時，他是最早的黨員。在以後的四五年中，岡野進同志被日本政府逮捕不下十餘次，到一九三〇年為止，他經過的牢獄生活凡四年之久，在日本共產黨擔任黨綱起草委員、中央監察委員。一九三一年奉日共中央命以代表資格出席共產國際會議，一九三二年參加起草著名的「關於日本的形勢與日本共產黨任務的提綱」，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他獲選為執行委員，同時並被選為主席團之一。會後，他很快就返回日本，之後，他就一直領導着日本國內的革命運動。因為日本反動政府追捕很急，他時常是奔馳於國境周圍，指揮革命運動。無論在怎樣艱苦的環境下，他始終是挺立在鬥爭的最前線，不倦的發動革命鬥爭。

在一九四三年，這位年逾半百的老革命家，經過了無數的艱難險阻，跋山涉水的化裝從平津到達了延安。這是東方反法西斯鬥爭史上一樁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事情，在他到達延安的消息發出後，各解放區的日本人民反法西斯組織及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日本工農學校，日本人民反戰同盟……均一致表示熱烈的歡迎。

現在他是延安工農學校校長，領導着日本人民反戰的革命運動。「聯合國勞工新聞」的記者愛羅斯坦在訪問延安後，曾說他是「聯合國地區中了解日本內幕最清楚的一個人」。

第一、日本的民主勢力

序言：反對中途妥協

我對於毛主席的政治報告，完全同意。特別是在他的報告中指出「現在日本侵略者正在暗地裡進行活動，企圖獲得妥協的和平，警告中途妥協的危險，主張「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不許中途妥協」，我認為這是最適合時宜

的聲明。日本帝國主義者面臨着軍事上的危機，為了逃脫自己滅亡的命運，總是苟延殘喘，正向政治的妥協上面努力找尋生路。最近成立的鈴木內閣的使命之一，也就在這種。

不過，現在的日本政府沒有像意大利的巴多格利奧政府那樣立即無條件投降的意思。

日本統治階級的意圖，在於以殘存的陸軍的主力 and 海空軍的殘餘力量，固守日本本土（以及朝鮮、滿洲、華北），頑強地進行抵抗，儘量地迫

軍「出血」(犧牲)；另一方面，則窺伺同盟國方面的縫隙，策動政治的陰謀；他們企圖這樣來動搖同盟國方面壓迫敵人無條件投降的決心，在對他們有利的條件之下來結束戰爭。他們的條件是什麼呢？想來最低限度也要保存「我國現在的專制」，獨裁機權和軍部及其他反動勢力，而且還要保持殖民地。

這樣的條件，不消說同盟國方面是絕對不能夠接受的。開羅會議的聲明中說道：「停止及懲罰日本的侵略，獲得日本之無條件投降。」而且，克里米亞會議對於德國發表了如下的聲明：

「我們堅持不移的目的，是摧毀德國軍國主義及納粹主義，並保證使德國永遠不能再擾亂世界和平。」

毛主席主張這個克里米亞會議的方針一樣適用於日本，這完全是正確的。日本的軍部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必須予以消滅。如果對於日本軍部及其支持者表示任何一點寬大，這只有使中國人民八年的抗日戰爭和三年的太平洋戰爭所償付的莫大犧牲，徒然付諸流水。因為被寬恕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又將秘密準備新的侵略戰爭。

可是，消滅日本軍部，決非容易。他們還保有有力的軍事力量。恰如逃回巢穴中的受傷的猛獸一樣，他們將動員一切的力量，頑強抵抗到底。這和歐洲戰場上希特勒的瘋狂抵抗是一樣的。

為了加速這種法西斯野獸的滅亡，而且要使我們的犧牲減少到最小限度，便不能僅僅依靠從外部進行打擊的同盟國方面的武力，還需要我國國內人民反戰，反軍部勢力的配合。這個人民的力量，不僅在結束戰爭上將起重要的作用，在戰後實現我國民主主義和確保永久和平上而，更將起決定的作用。日本的將來，將由這偉大力量與的強弱來決定，這樣說也並非誇大。因此，我們日本共產主義者當前的主要任務，就在擴大並加強這一和平的、民主主義的勢力。我們現在正盡一切努力來完成這個任務。

可是，同盟國內一部分人士之間，有否定、或忽視、或輕視我國民主勢力之存在的傾向。這不僅完全錯誤，而且，假使這樣的見解成爲有力的見解，則爲世界將來之不幸。

那末，爲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見解呢？其理由之一，便是因爲這些人對於我國究竟有什麼民主的勢力，並不十分清楚。

有人問道：

「能够背負將來的日本前進的政黨和勢力，到底在那裡？」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毫不躊躇地這樣回答：

「這樣的政黨和勢力都有。它們現實地存在着，潛在地也存在着。是什麼呢？那就是我們日本共產黨，其他的民主勢力，以及正在廣大人民當中成長着的反戰，反軍部的潮流。」

一、人民的厭戰情緒和反抗運動

1. 戰鬥意志的降落

軍部利用其煽惑人民的不平和對於軍部的責難，慘酷地摧殘反戰、反軍部的運動，同時他們又動員一切宣傳機關，在人民當中煽動反戰的鬥志，排外主義和戰爭熱。現在，使太平洋戰爭初期那種「精神是」的宣傳，已不可能，於是軍部利用着琉球島琉球人的失敗和對日本本土的威脅，宣傳所謂盟國的勝利，就是表示日本的殖民地化，人民被屠殺和搶劫爲奴隸；這樣地增加人民的恐慌心，憎恨和戰鬥意志。由於這樣的宣傳，不少的人民受了欺騙，追隨在軍部後面。這種現象，特別是在城郊中的青少年當中，甚爲顯著，而農村比都會又要厲害一些。這是我們必須承認的現實的事實。

但是，不管上述的頹廢和欺騙宣傳，自從塞班島失敗（一九四四年七月）以來，人民的情緒，一般地都經過了急遽變化的過程。從偷襲珍珠港到威遠康納爾島的喪失（一九四二年夏），這一期間，人民充滿着樂觀情緒。但是，隨着日本所佔的太平洋島嶼一個個被美軍奪回；隨着德國在歐洲不斷地敗退，人民對於勝利的不安和危險開始逐漸加深起來。不過，當時還相信着軍部所謂「誘敵深入而後殲滅之」的宣傳。然而，去年夏天以來接二連三發生的事件——塞班島的喪失，接濟美軍在菲律賓登陸，對日本本土不斷的轟炸，人民生活的極端貧困；另一方面，德國殘滅地敗退，這些事件，使我國人民的戰爭觀念根本發生了動搖。去年九月被八路軍俘虜的一個士兵，敘述日本士兵情緒的變化如下：

「直到塞班島玉碎爲止，還相信日本會勝利。可是，自那時以後，便想着有些危險。」（日本人民解放聯盟召開的「國內情形座談會」一九四五年三月）

對於國內一般人民，也可以說是同樣的情形。現在，人民的情緒如何，

待我用法西斯帶自己的話來證實吧。

人民對軍部的信仰開始喪失。關於這，中井良太郎陸軍中將憤慨地說：「我曾經聽了很多難聽的話，而最難聽的是『因為叫要信賴軍部，所以就信賴了他們，但是？鳥子不是一個跟着一個丟了嗎？』」

「所謂軍部不可信賴？這句話本身是反軍部思想」（『青年讀賣』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號）。

對軍部信賴的減低，就是「必勝信念的動搖」。對日本勝利的信心之喪失，連軍部自己都供認了。例如：「連法西斯的頭目稻本欣五郎陸軍大佐無意中從嘴裡滑出了下面的話：

「當此非常之時，我自己也時時疑神疑鬼地想，戰爭就是這樣子能行嗎？」（『現代』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號）。

在軍部當中，既然如此。那末，一般人民當然對於戰爭前途深懷不安了。這種現象，在知識階級當中特別強烈。關於這，某新聞記者做下面這樣感嘆道：

「德國什麼時候投降？」「其次就該輪到日本了！」在所謂知識份子的階層當中，不能說沒有陷入這種種的失敗主義的人們。（『同盟世界週報』一九四四年十月七日「時評」）。

由於上述這種心情，不管軍部怎樣大開的宣傳，但採取「戰爭勞働者」（大城戶憲兵司令官語）的態度的人是增加了。例如：反動的「讀賣新聞」，承認了這種現象，說道：

「臨到最近決戰之時，不可容許的戰爭意識的鬆懈，到底還是產生了，這種事實，隨處可見。」（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發行）

面對着這種事實，法西斯的思想指導者，大川周明發出了悲鳴：「像現在國民的心情，可能的事情也變成不可能了，要把不可能的事情變成可能，想也不要去想。」（『新亞細亞』一九四四年九月號）

這個問題，在今年一月召開的議會上，也成爲一個討論的題目，有個議員說道：「道德之十分頹廢，已成爲最近的風氣，其實例誠不勝枚舉。」（『朝日新聞』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對此，小磯首相回答道：「國民道德上，有不良之傾向，實堪憂慮，政府施策之不善，亦爲其原因，當力加改正。」

「戰爭意識的鬆懈」，在國民生活的各方面都表露出來，動搖並紊亂着

軍部的「次戰體制」。

雖然有經濟警察嚴重的監視，黑市交易却廣泛地進行着，某一法西斯分子憤慨之餘，公開說道：

「聽說石原君（石原莞爾陸軍中將）常說『日本人從來也沒有像黑市這樣墮落』，不作黑市買賣的傢伙，一個人也沒有。滿不在乎，公開地進行黑市的，就是日本人，在黑市的交易上，真是一億一心呀。」（『東亞聯盟』一九四四年十月號）

由於作黑市買賣，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爲止的十六個月間，檢獲了二百十八萬三千人之多。此後，政府停止發表關於這類的數字，但從最近關於黑市的言論看來，可以窺知檢獲的人數更爲增加。現在，促進日本經濟危機的通貨膨脹，其原因之一便是黑市。政府也承認這個原因，進行黑市買賣的主要動機，雖說是生活問題，但是，可以認爲這是人民對於軍部消極反抗的一個表現。

2. 農村。

農民也沒有像軍部要求的那樣勞作，關於這，報紙上這樣地感嘆道：「食糧必要的生產，爲今天的急務，但我農村青年，却令人感到缺乏皇國農民精神，真是遺憾。」（『朝日新聞』（東）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

農民對於向政府「供出」大米，非常不滿，用各種各樣的方法拒絕「供出」，或者是對於不公平的「供出」比率進行抗議。例如：去年春天由日本來到華北的九州和東北（日本地名）的農民，敘述了他們如何隱藏米穀，據他們說，除開極少數的「篤農家」（勤懇的農家），大多數的農民，差不多都巧妙地將大米和紅薯藏起來，避免「供出」。這樣的現象，現在，在我國農村中普遍地發生了。不僅如此，還發生了農民對「供出」的抗議運動。

「我附近的村子（熊本縣）裡有一個班，由於『供出』比率過高，全班十幾個老頭子一齊蜂擁到小隊長那裡去，結果把比率減低了。」（同上座談會）。

由於抗議而發檢舉的事件也發生了：「我那裡有個大日本農業會，這個會長在東京召開的模範農家表揚會上，演說道：『供出米太過於強迫了，農民肚子不能不吃飽！』結果被警察逮捕走了。農民大家都同情他，把他叫做『農民之神』。」（同上座談會）。

上「團體會」

團體，不啻政府如何適應，農民對地主的鬥爭並未停止。政府發表了下面的統計：

租佃鬥爭（厚生省調查）

件數	耕地面積（町）
一九四〇	一、九一八
一九四一	一四、五八二
一九四二	八、二二三
一九四三	五、五五〇

太平洋戰爭後，鬥爭雖然減少了，但仍然頑強地在全國繼續進行，我們必須注意這是在戰時條件下所進行的鬥爭。

3. 工人

當我們轉過來看罷工工人的狀況時，他們正用着缺工以及消極的和積極的怠工，回答軍閥的剝削。而今天使軍閥和軍閥資本家最感頭痛的問題，便是如何防止怠工，例如關於工人的缺工非常之多，「沖電氣會社」（東京）的一個幹部這樣說：

「我們廠已經編成部隊組織，每幾名集隊長會議，但缺工率一點也沒有改變。」（「實業之日本」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號）

據常盤炭坑的一個礦坑夫的談話，在該礦坑的礦坑夫，每月不過作二十天左右的工，餘下的一星期則十天，便藉口各種理由休息。會社對此毫無辦法。

而且，報紙上報導了如下的事件：

「警視廳」（東京）日前在整個東京都進行了最後十天的「不良行爲」對於不良行爲的大規模取締，被檢獲者當中，怠工的有六千五百五十九名。」（東京「朝日新聞」一九四四年十月七日）

以上的數字，僅僅是在街上被舉的缺工者的數目。除此以外，缺工者之多，可以想見。因此，在各種長期缺工工人，組織了「勞動隊」。

這是到了工廠前面，許多工人也懶得進廠。作夜工時特別厲害。據橫濱海軍工廠和日野重工業會社（東京）的工人說，在他們的工廠裡，夜十二點以後，便讓機噐空轉，自己却睡覺去了，這是很平常的事。這種現象，在別的許多工廠也可以說是一樣的。

甚至，工人們也還在進行着。就是比實際數目少得多的政府的統計，也發表了下面的數目：

工人鬥爭（厚生省調查）	件數	參加人數
一九四一	三三〇	一四、八七四
一九四二	二五九	一三、七五二

日本共產黨簡史

日本共產黨的成立是在一九二二年，恰好比中國共產黨成立遲一週年。

在日本這個資本主義國家裡，照說，對共產黨的組織，有若干有利條件，爲甚麼日本共產黨的成立遲於中國爲國呢？這就不能不探尋當時日本的社會條件，和革命運動的內在原因。

日本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雖然在一八九七年就已經開始，各種工會都以東京爲中心開始組織起來，在金屬、印刷、交通、纖維等產業中都成立了工會，鐵工工會一八九九年就擁有三萬會員。同時，社會主義思想也傳播開了。一八九八年就成立了「社會主義研究會」，一九〇一年日本最初的社会主義政黨「社會民主黨」由片山潛、幸德秋水等建立起來了（但旋即解散）。一九〇三年日本最初的社會主義報紙「平民新聞」公開出版。雖然工會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早在這時就已經開始，但一開始就受到統治階級的壓迫，「社會民主黨」剛一成立就給解散，「平民新聞」也因為刊載「共產黨宣言」而在一九〇四年被禁止。尤其是在日俄戰爭的時候，以幸德秋水爲首的社會主義者，都解決反對戰爭，勇敢的舉起了反戰的旗幟，但也更受到政府的殘酷壓迫。

一九〇五年俄國的革命運動，使得勞苦大眾更急進化，對日本的革命運動有大的影響。

如和戰前的一千件左右比較起來，雖有顯著的減少，但必須考慮這違反着憲法令（總動員法）而進行的。這個法令，要處參加者三年以內的刑罰。罷工主要發生在軍需工廠。舉兩三件事實為例：日本有數的飛機工廠，名古屋的愛知鋼鐵會社，一九四〇年秋發生了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這次失敗了，可是到了第二年春天，又組織了罷工，獲得了勝利。在同一時期，神奈川縣川崎市某軍需工廠，也爆發了要求縮短勞動時間的罷工。一九四一年三月五日起發生了有名的神戶市怠工事件。據有三萬五千工人的日本最大的川崎造船所的一部分工人，要求改良待遇，廠方沒有接受這個要求，結果繼續了幾天的怠工，不久就被破壞了造船部，機器製造部的最大的旋盤，接着波及各工場，破壞了幾十架重要的機器。但是，這個怠工被警察鎮壓下去，四名領袖被處死刑，其他二十多名被處重刑。然而，這一事件却擴大到神戶市別的王廠，約有十萬工人直接間接地參加了怠工。同年四月富士電機株式會社發生了罷工；同年十一月大塚船塢兩千名工人要求改善伙食，進行了一天的罷工。九州某城在一九四一年，曾發生坑在一九四三年，都爆發了朝鮮礦坑夫相當大規模的暴動。

4. 鬥爭意識

以上，我用具體的事實說明了我國勞動人民的情緒。這些職工，反戰的情緒，我們不能作過高的估計。這些情緒，一般地是自發的，而且還沒有蔓延到大多數人民當中去，不能認爲日本國內職工，在最近的將來，即將崩潰。即令如此，這些事實告訴我們，我們人民，絕對不該在國外一般所種的那樣，都已成爲軍部的走狗。多數的人民，經過了連續幾年的八年戰爭，已經覺悟了，在他們當中，厭戰情緒濃厚起來。而且，他們對於軍部的信賴和對勝利的信心，已開始消失。他們之中的一部分，已開始對於軍部消極的而積極的反抗，農民拒絕「供出」米穀，工人進行怠工，這對於軍需生產，是很大的障礙。然而最重要的是：這些怠工是由於下面的原因引起來的：

「人們指出商徵工人和其他從業員的標準低下，是阻礙生產的主要原因，但是，在今天的制度下面，如果從業員的標準充分發揮起來，誰得到利益呢？那便是私人資本的會社。有着公的性質的勞務，而是爲着增加私營會社的利益，本身不是矛盾的嗎？……」（「金剛鑽」一九四四年十一月）

工人們開始懂得這次的戰爭是爲什麼人的利益而進行的。這種自覺，在將來他們的鬥爭發展上，有很大的影響。

X X X

過去，我國人民大衆，爲了自由和生活的改善，勇敢地鬥爭過。一九一八年，數百萬的勤勞大衆，在全國各處掀起了「米區動亂」，使反動的寺內內閣垮台，獲得了不少的社會設施的改善。一九二二年，廣泛的民衆運動，獲得了「普通選舉法」。農民爲着反對封建的地主鬥爭，在各地組織了農會，進行了租佃鬥爭。在一九三七年，擁有二十萬七千的農會會員（一九二七年有三十四萬七千人），進行了四千八百次租佃鬥爭。工人爲着改善生活，組織了工會，進行了罷工。在一九三七年，擁有大約四十萬的會員

在當時殘酷的統治和鎮壓下，日本的工運會場除了無數次的革命鬥爭。統治者會也動了許多軍隊，才把人民的力量暫時壓下去。

再從日本革命運動的本質看，第一，在當時的日本共產主義運動中起指導作用的，是帶有「無黨派」（或消派），或「合法主義」傾向的櫻利彥、山川均等（十九世紀末以來的社會主義者）。這些階級的領導者對組織合法的工運聯合會極力推崇，來代替真正的「共產黨」（這在日本只能非法地建立）。當他們由這種怠工被革命的工人打破的時候，共產黨才開始誕生了。第二，是無政府工運主義的思想，在革命的前面却是年輕的日本工人階級中，保持極大的影響，共產主義者爲着這些思想，爭取革命的工人到共產黨方面來，必須要相當的時日。這也是使得日本共產黨的創立稍爲遲了一些。

日本共產黨當初創立的時候還是人數很少的黨。可是革命的工人，當與知識份子秘密地得知這黨的時候，他們歡喜而興奮的。所以不到半年之內，黨便得了將近幾百名的黨員，黨的支部在重要的都市成立起來了。在當時的黨員之內，著名的領導者有：日共的創造者，一生實現了日本革命運動發展的日本革命之父片山潛，一九二九年被警察所殺的優秀領導者渡邊政之輔，在獄中繼續鬥爭十七年的市川正一，現在延安的岡野進（以後更有九一八以後進行反戰鬥爭而被日本殘酷殺害的岩田義造，名作家小林多喜二等）。在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共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及同年三月第二次大會的時候，就集合了全副選出的三十幾位代表。

進行了二千一百二十六次鬥爭(參加者二十一萬四千人)。這些民衆，在一九三七年向社會大眾黨投了九十三萬的票。上述數字，在法西斯專政下的日本，決不算少。但是，九一八事變一開始，人民所得的東西，都逐一被軍部剝奪了。在軍部的鐵蹄下面，現在，人民被迫保持沉默。

可是，在這種沉默底下，脈脈地湧着民衆自由的要求和鬥志。他們只是等待着有利的時期。一旦軍部的統治開始動搖，那時他們將一致奮起，爲打倒軍部和建設民主的日本而鬥爭。

常盤塚一個礦坑夫說了下面的話，足以代表我國勞動大眾的意志和情緒。

「三十歲以上的礦坑夫，大家都回國着十幾年前轟轟烈烈的勞動運動，就是在現在的苦難中，他們的意氣也決沒有消沉。他們說：『一有機會就要起來的。』」

5. 士兵的情緒

關於前線士兵的情緒，有一談之必要。中國解放區戰場方面的日本士兵的士氣，一年比一年下降。這是遠杉山總軍大臣在議會上承認的：

「嚴正地維持紀律是戰勝的最大要素。因此，軍特別注意這個問題。但另一方面，軍有相當龐大的人員，似有一部分人不知自重。」(「每日新聞」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開小差的很多，已是大家知道的事實。假裝生病而不參加戰鬥的事例，在老兵當中已司空見慣。如獨立步兵三旅團的一個士兵，從獨堡的槍眼伸出手來，用手榴彈炸掉一隻鞋子，達到了回國的目的(一九四四年五月)。士兵反抗上級的事件，也屢見不鮮。這從下表所舉中國派遣軍法務部的調查中，可以看得出來。

對上級犯罪統計

	殺害上級	傷害上級	暴行威脅上級	侮辱上級	違抗命令	共計
一九三九	三	一五	三	二一		
一九四〇	五	二一	六四	六	一〇二	
一九四一	二	一八	六二	八	九四	
一九四二	五	一九	七一	九	一〇五	
合計	一五	六一	二二二	二六	一一一	三三三

在上面的統計當中，一九四二年十月湖北省應山縣，爆發了對中隊長長的暴行復仇的，襲擊中隊長的事件，有四十名士兵參加，主謀者被處死刑。又同年十二月山東省館陶縣，因憤恨中隊長長的處置不當而發生的傷害中隊長的事件，有十二名士兵參加，主謀者也被處死刑。日本國內也發生了同樣事件。例如，一九四三年七月普通寺陣野戰醫院內二百五十名衛兵因不堪中隊長長的虐待，計劃暴動。但事前即被發覺，全體受到處罰。

根據我們日本工農學校(延安)的調查，該校全體學生當中，開小差和自動投降的比率如下表所示

當時，日共還沒有明確的綱領。爲起草政綱和決定今後方針，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

這個大會的結果，藉着黨內思想，組織的變化，黨爲了獲得黨衆，大規模地踏出了有力的步伐。四月份的機關雜誌「紅旗」發刊了。黨的

影響在工會，農民團體，學生團體中間擴大了。在一九二五年九月，黨發刊了合法的機關報「無產者新聞」，先是每週出版一次，雖然飽受官方和憲兵的迫害，但以後連日出版五天出版一次，當一九二八年禁報之前，它發行到三萬

五千份受着廣大進步的工農、知識份子愛護。通過這個報紙，黨首先宣傳了共產主義的思想，擴大了黨在黨衆中的影響，加強了左翼的力量，發動了黨衆的政治鬥爭，組織和領導了罷工、農民鬥爭、學生運動……在日本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這個報紙佔着極其重要的地位。

日本共產黨一開辦就面臨着統治者的殘酷鎮壓，由於日共的活躍與影響的擴大，日本統治者遂策謀來打擊日共，秘密警察通過了內好，知道了日共第二次大會的情形。結果，在六月，出席這次大會的大部份代表被捕了。這

是年輕的日共所遭受的第一次嚴厲的試煉，但在日共的鬥爭史上，這只是苦難的開始。

雖然白色恐怖如狂風驟雨般的襲來，但牢獄，死亡一點嚇不住共產黨人，這就像古語正一之死時，一個日本的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曾經寫道：「像他那樣又長出來的荒郊的野草一樣，新的戰士和細胞又一個個的產生出來。」

在「九一八」事變後，日共堅決的反對這種侵略戰爭，戰爭一開始，日共就盡力地在日本人民面前發揚和宣傳，「滿洲事件」並非爲了「保護日本的生命線」而發生，而是軍部和大財閥的強盜的侵略戰爭。

因爲戰爭，日本統治者加強對人民的壓迫，而展開了「獻金」，「募集公債」運動以及「防空捐」等等，日共的反抗鬥爭就藉此而深入工廠，農村，學校，軍隊，而且把反戰鬥爭

和日本勞動人民的切身要求結合起來，這就使

，每年都有增加。

新來人員中逃亡者和自動投降者的比率（百分比）。（每年九月起至次年八月截止）

年度	百分比
一九三九—四〇	二〇・〇
一九四〇—四一	三一・八
一九四一—四二	二一・四
一九四二—四三	四〇・七
一九四三—四四	四四・二

上述所有的事實，說明了華北，華中日本士兵的士氣是怎樣的狀態。

但是，在最近膠州島，龍巖島，神戶島及其他南洋方面的戰鬥中，日本士兵士氣並不見得怎樣低下。為什麼中國解放區戰場上的士兵和南洋的士兵之間，有這樣的差別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有八路軍，新四軍和我解放區軍隊（反戰同盟）過去七年來對日本軍隊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政治工作。

二、日本共產黨及其活動

在我國革命的工人階級之間，有着勇於反戰鬥爭的傳統。如象所週知的，當日俄戰爭爆發時，當時還年青的我們社會主義者，即堅決的向這帝國主義戰爭作鬥爭。這個傳統，今天由我們日本共產黨繼承着。我黨一九二二年誕生之時，第一個行動，便是反對日本出兵西伯利亞的鬥爭。

此後，九、一八事變爆發時，從政友會，民政黨到社會大眾黨，所有各黨，都消極的或積極的擁護戰爭，而我們共產黨則毫不猶豫地組織了這個戰爭的侵略本質，集中全黨的力量對此進行了鬥爭。黨在東京，大阪和其他都市的街上，在「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立即撤兵」，「中日人民團結萬歲」的口號之下，組織了非合法的示威運動。又在許多工廠、農村、學校內，組織了反對軍用鐵金的運動，領導了反戰的罷工和怠工。而且，在兵營，軍港和軍艦內，組織了黨的細胞，出版了給士兵和水兵閱讀的報紙。在這些鬥爭中，數千黨員被捕，或被殺，黨的組織屢遭破壞，黨遭受了重大的損失。由於這些英勇的鬥爭，教育了廣大的羣衆，使他們知道行兇是日本勤勞階級對帝國主義戰爭必須採取的正確的態度。正因為有這樣的鬥爭，對此後的七、七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我們革命的工人階級能夠堅決的進行鬥爭。

然而，當對七、七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採取了和對九、一八事變不同的鬥爭方法。後者可以說是最少數人英勇的行動，而前者則採取了動員廣泛的羣衆起來鬥爭的方法。即提出「救濟出征士兵家族」，「支付出征士兵全體薪水」等民衆切身的要求，和改良主義工會內的羣衆結成一體，反對政府的戰爭政策。這個運動，擴大至相當廣泛的範圍，運動的威力使政府害怕起來，接受了以上的要求。和這些合法的鬥爭同時，不用說，黨還進行了非合法的示威活動。

鬥爭更加能够廣泛的發展。單是東京就組織了四十個不合法的金屬工會的支部，據警察的報告會舉出：在一九三三年最初幾個月之內，逮捕了屬於日共領導下的不合法工會工人一千七百名。

「七七」事變爆發的第二天，日共就在東京、大阪、北海道散佈了傳單，揭發了這個戰爭非正義的、強盜的、侵略的性質，號召日本人民起來反對戰爭；日共組織的反戰鬥爭不僅和人民的請求，願望相一致，而且盡利用合法鬥爭形式，譬如提出「擁護人權，反對軍都官俸獨裁，反對抽大衆的稅，反對物價騰貴，安定大衆生活。」日本政府對這種正當的公開要求無從禁止，這種要求的羣衆運動，一下子就擴展到全國，有些婦女帶了這種要求包圍了村公所，東京附近某村，士兵要子們組成隊伍到車站，喊着「還丈夫來」的口號，阻止兵車出發。煤礦工會的工人被禁止罷工，他們却採取全體罷工的方式。這就逼得在一九四三年二月的議會上，內務大臣也不能不承認：「共產主義運動，自中國事變以來，雖已逐漸衰弱，但仍不能完全絕跡，甚爲遺憾。」而在中國戰場上由日共所領導和組織的反戰反法西斯運動更是日形壯大，法西斯組織了人民進行侵略戰爭，然而它的真正意義，倒不是法西斯着人民掘墳墓，而是他們自掘墳墓，只要統治者把老農一捆拆穿，像煤油燭的火種，人民的革命運動馬上就會普遍爆發起來的，這是可以斷言的（岡野進）。

無論在中國戰場，在太平洋上，日本法西斯的命運已趨絕望，而在日本國內，他們的墳墓，也正由他們的掘墓人——日本共產黨——所準備着。

受着黨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因反戰，反軍部的言行而被憲兵和警察逮捕的，在這時期，不斷出現。例如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九年九月截止所發生的這種事件，憲兵部局的秘密文件記載如下：

反戰運動事件	二二〇件
反對軍隊事件	四二二
誹謗軍隊事件	一一〇
共計	七六三

「七七」以後兩年零兩個月之間，發生了七百六十三件，因此，每天有一次反戰事件遭受官局的鎮壓。

必須注意的是，共產主義運動也並未減少，相反地，却逐漸增長着，下面所舉的政府的統計，明顯地說明着這種情形：

違反治安維持法起訴的人數	一五八八
一九三六年	二一〇
一九三七年	二四〇
一九三八年	三八八
一九三九年	一四五

「治安維持法」是鎮壓共產主義運動的特別法，按上表所示，僅僅根據此法起訴的，一九三九年的數目就比一九三六年增加了二倍半。而這個數目只是起訴的，若將逮捕的以及逮捕了而未起訴的合計起來，顯然是個巨大的數目。

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東條政府在開戰第二天，即在全國逮捕了三千名反戰分子。然而，共產主義者一天也沒有停止活動。例如：如上所述，一九四〇年愛知鋼鐵會社的大罷工，是共產主義者所領導的。一九四一年川崎市軍需工廠的罷工，同樣是共產主義者所組織的。這個罷工廢了政府罷工禁止法的空子，全體從業者都個別的向工廠提出辭職書，進行實質上的罷工。這個職

術成功了，沒有犧牲者，罷工勝利了。
現在，我們共產黨為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肅清封建勢力和建設民主的日本的目標而鬥爭着，並避免「一九一八」當時那樣的街頭運動，盡量擴大和加強力量，保存幹部，這樣準備將來給軍部以決定的打擊的時機的到來。黨特別把力量放在軍需工廠內的組織上，那裡是黨的力量蓄水池，並且是打倒軍部的堡壘。

共產主義者的活動，今天還頑強地繼續着。這一事實，是一般公開地承認的。例如最近一個大學教授說道：

「適用治安維持法的思想犯，近年來減少了，但至今尚未肅清。」
（小野清一朗法學博士，「現代」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號）
從上面的話，可以知道我們共產主義者不顧一切的困難，怎樣在鬥爭着

上述的學者又繼續寫道：

「不敬罪（冒瀆皇室的罪），流官罪等，此外，違反出版法，報紙法，言論出版臨時取締法等，似乎達到相當的數目……這些作為反映國民思想動向的一個側面，實在不勝寒心……總之，是反映反戰反國家的精神態度的。」（同上「現代」）

這就是說，採取反戰，反國家態度的人民達到「相當的數目」，在我國內發生着這個軍部都利用「不勝寒心」的情緒。

我們共產黨的活動，及其影響之下的廣泛的，人民的反戰言行，成為我國統治階級一大威脅。例如在去年九月的臨時議會上，小磯總理大臣聲明，日本當前最大的問題，首先是國民的思想問題。

至於現在黨在數量上的力量如何，不能具體敘述。但從過去所發表的各種數字，可以得到關於現在以及將來的力量概念。

根據政府所發表的統計，自一九二八年起，五年之內，僅僅被逮捕的共產黨員和同情者，即達四萬人之多。當時在黨的領導下，非合法的「全國勞動組合協議會」會員，超過了二萬。

像日本那樣要求極端秘密的國家，對黨員數目不能有更多的期待。但是，黨的影響，却為黨員數目的幾十倍，例如：在一九二八年三月換換男子普通選舉法選舉的總選舉當中，黨支持了合法的「勞動農民黨」。左翼的和右翼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組織了另外的政黨。政府對勞動農民黨，加以殘酷鎮壓。雖然如此，選舉的結果，勞動農民黨佔壓倒的多數，在全國獲得二十萬的投票。這些投票者，間接地支持了共產黨。又當一九三一年——三二年，在黨的領導下出版的各種合法的左翼雜誌刊物的發行冊數，將近十萬冊，不用說讀者數幾發行份數的幾倍。根據可靠的材料，一九三九年被列為警察的

黑名單上的人數，約有二十萬人，其中大多數是左翼份子。
有些外國人根據報紙上警察的欺騙報導，以為日本共產黨僅僅是知識階級的小團體。但上面的各種事實，證明了這種認識是完全錯誤的。

現在，我們黨有廣泛的影響力。作為潛在的力量是偉大的。因此，顯而易見，一旦軍部的統治瀕於危殆，黨就將飛躍的發展，在我國政治上起決定的作用。因為在侵略戰爭和法西斯黨獨裁的十四年之間，人民能夠實際體驗到怎樣的政策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無論是民政黨、政友會、社會民主的社會大眾黨，儘管變遷一變，他們即出賣人民的利益，積極的或消極的支助戰爭，把人民趕上戰場，將億萬的負擔加在人民身上，制定鎮壓人民的法律。這些黨的大部分首領成了軍部的同謀者。而只有我共產黨，始終一貫反對戰爭和軍部，不顧一切迫害，為人民的利益和社會的正義進行了鬥爭，這個事實，人民用自己的眼睛看見了。

但是，我黨不僅在戰時是最勇敢的反抗，反軍部的戰士，而且在戰後的日本，在實現真正的民主主義建設永久的和平上，黨也是最可靠的力量。這是過去二十四年內日本歷史的證明。若有人想在日本實現民主主義與和平，但如忽視或是否不要共產黨，這是最危險的政策。這種政策，九折日本重新走九折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道路，是製造新的戰爭因素的政策。民政黨、政友會、社會大眾黨等之不可靠，從這些政黨過去的行跡當中，還看得不明顯嗎？

三、舊「日本無產黨」

除了共產黨之外，作為打倒軍部，建設民主日本的勢力之一，有舊「日本無產黨」，一般稱為「合法的左翼」。這個黨是因反對右翼的社會大眾黨領導者的反動政策，而在一九三六年為該黨所開除的左翼分子所組織的。日本無產黨在一九三七年的總選舉當中，獲得七萬六千票，做到選出黨的領導者加藤勘十為議員。在黨的領導下，約有二萬個工會會員。黨的力量，還不僅如此。在社會大眾黨，以及工人農民的團體內部，也獲得了不少的支持。黨公開提出了「統一反法西斯政治戰線」的口號，準備和其他各團體組織反軍部的共同戰線，在合法性允許的範圍內，勇敢地向軍部的政策。但因此，軍部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逮捕了四百名黨的領導者和黨員，用暴力解救了黨及其所屬的團體。

在這些黨的黨員中，有許多秘密的反抗，反軍部的戰士。他們現在正秘密地組織鬥爭。當然，他們是實現民主主義可以信賴的勢力。

四、舊「社會大眾黨」

不可否認，離開了「日本無產黨」以後的「社會大眾黨」內部的黨員分子，在打倒軍部的鬥爭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社會大眾黨當一九三七年的總選舉時，獲得九百三十萬的投票數三十七名國會議員；在其領導下，曾擁有約三十五萬的工會會員和農會會員，曾得到小市民層的支持。這個黨在議會中，大於民政黨和政友會，佔有第三黨的地位。

在該黨成立的一九三二年，該黨提出「維護勞動大眾的生活，打破資本主義和解放無產階級」這個進步的綱領。但是其領導部却腐化了。因此，隨着九、一八事變和七、七戰爭的發生，黨即一步一步地向軍部投降，背叛其初期的綱領，在一九三九年的大會上，提出了「親皇親國戚，新武運長久」的口號。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前一年，當政府徵集及共工農團體進行解散時，黨的領導部即不顧羣眾的反對，自願地解散了黨和工會聯合會，將其會員再編於軍部、資本案、地主所領導的「報國會」之內。黨的議員在議會上贊成龐大的軍事預算，對東條和小磯的演說鼓掌。今天，大部份黨的領導者同人民進行着「提高戰意」和「反英美的宣傳」，起着軍部的最忠實的走狗的作用。但上述情形，不能說是全體黨員的情形，在一部份領導者以及一般羣眾之間，也有不少反對戰爭和軍部的分子，還有共產主義者。所以看不到這些分子的活動，是因為他們受領導部的壓制。因此，由於共產黨影響的滲透和國內政治危機的發展，無疑地，他們為了反軍部以及建設民主的日本，將和我們採取共同行動。

五、聯「民政黨」，「政友會」及其他

其次，必須談談為資產階級政黨的「民政黨」，「政友會」。

這些黨曾經是資產階級和軍部（及官僚）爭奪政權的武器，同時，又是和軍部（及官僚）妥協勾結的工具。黨的最高領導權掌握在三井、三菱、住友、久原、中島及其他的大資本家手中，實行他們的反動政策。但因為這些黨是議會政黨，不能完全忽視選民羣眾的意見，因此有時也不得不緩慢地進

步的政策。而在國內，雖然不是有力的，但存在著反映中小資本家的利益的致治家。這些政治家主張某種程度的進步政策，在廣泛的人民大眾之間，獲得了支持。

這些黨和戰爭同時，暴露出大資本家的本質，變為完全支持軍部的團體後，在一九四〇年，自動解散黨，組織了「翼贊政治會」。今年四月解散後，重新組織「大日本政治會」。

但是，有長期傳統的這些黨，今天在中小資本家或市民之間，還有相當大的影響。在一部份黨的領導者和地方支部的領導者中間，雖然數量不多，但存在著消極的軍部反對者。

這種進步的力量，究竟有多少呢？我們難於正確地計算，這是因為所有這些力量，在現狀不能公開露面，而是在某種偽裝之下存在著。但是以現在衆議院內全體議員過去的政治傾向看來，可以得到這種力量的一個指標。全體議員數有四百六十六名。其中軍部色彩比較濃厚的，有廿多名（包括舊社會大衆黨員）。而估計和軍部共同運動最後的，約有五十名左右。其他三百二十名，屬於這樣的一類，即現在雖然支持軍部，但當軍部過激滅亡時，有的會發生動搖，有的會採取中立的立場，有的則將轉移對反軍部的方面來。這就是說，在議員當中，採取比較社會主義的立場的佔多數。

根據上面的分類判斷時，軍部的勢力，主要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利益，還只佔着少數，而且是分散的。他們對戰爭和軍部雖然沒有公開地進行鬥爭，但是比較鞏固的民主主義者。在他們之間，有像尾崎行雄（無黨派）那樣優秀的自由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必須和他們緊密的提攜，聯合起來。

機會主義者中間的少數份子，當有利的時機來到時，將投入民主主義的陣營，我們必須盡量努力，以爭取其大多數。

六、國外反軍部團體

最後，必須說一說，在國外組織的日本人反戰、反軍部的團體。

其最大的，有去年一月組織的「日本人民解放聯盟」。聯盟的中心目的，是即結束戰爭，打倒軍部，建設民主的日本，成立人民政府，這是由八路軍新四軍內的日本士兵、僑民，從國內來的反法西斯分子等所組成的。現在在華北，華中有二十一個支部，最近更發展到華南。由於戰鬥的激烈，和日本軍隊內厭戰思想的增長，其勢力與日俱增。和前年相比，去年發展了兩

倍以上。

大多數聯盟員是華北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指戰員一起，為了解日本軍進行奮鬥的活動，獲得相當大的成績。他們的活動從華北，華中日本僑民當中，更進而擴大到日本國內。由於上述前說的鬥爭，以及由於日本工業學校的閉校，聯盟正有系統的培養着在將來建設民主的日本黨中能起領導作用的幹部。不用說，聯盟對於打倒軍部和日本的前途，起着重要的作用。

並且，解放運動的範圍，也刺激了重慶和武漢方面，現在，在那些地方，可以看到組織和聯盟相類似的團體的趨勢。如果這些團體組織成功，國外民主的日本人的勢力便增大起來，這對於日本人民是有利的。

X X X X X

上面我講了在廣泛的人民中間反戰情緒的抬頭，日本共產黨，舊日本無產黨，舊社會大衆黨，農民政黨，舊政友會，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等反軍部的勢力，在這些當中，有的是積極的活動的，有的僅止於消極的反抗，有的是動搖的。而有的勢力，如像共產黨，則為現實的，其他的勢力則為潛在的。而且，這些勢力是分散的，未被統一的。即令如此，這些勢力，如果在國內為共產黨及其他勇敢的反軍部分子的活動所鼓舞和領導，在國外又為解放聯盟及同盟國方面的活動所援助，那末，這些勢力，在打倒軍部及建設民主的日本的事業當中，將成為偉大的統一的力量。

我們共產主義者的最重大的任務，就在於把上述各種不同的勢力和傾向，在共同的目的之下聯合起來，結成一個巨大的力量。

正是這些勢力，代表了廣泛的人民的利益，正是這些勢力，是我國真正的民主勢力，是保證將來永久和平的力量。將來的日本必須寄託在這股力量上面。假使輕視或忽視這一事實，來考慮日本的前途，便是極大的錯誤。毛主席他的報告中這樣說道：

「在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並無條件投降之後，為着徹底消滅日本法西斯主義，帝國主義及其所由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原因，必須贊助一羣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沒有這種日本人民民主制度，便不能徹底消滅日本法西斯主義與軍國主義，便不能保證東洋的和平。」

這種態度，才是真正保證東洋和平的。這才是同盟國方面正確的態度。但在同盟國一部分人士當中，存在著與此不同的錯誤的見解，甚為遺憾。

七、非民主的勢力——「獨裁派」

這種獨裁派是實行獨裁：第一種意見，認為在日本應有可信賴的民主勢力，只應以這種力量為基礎，組織實行民主與和平。

然而，第二種獨裁派的意见，是與獨裁方面一部分領袖人士所有的。這些人士不主張永遠以日本之來為基礎的民主勢力，而主張主權，則在太平洋戰爭前被稱為「獨裁派」或「強硬派」。

但他們對於獨裁派所應採取的態度呢？首先是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他們其中（尤其是三井）因在經濟上和歐美各國有密切的關係，害怕因關係而受其兩方面的利益。

這些大財閥不是和平的愛好者。今天他們所有的億萬巨富，是在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中起家的，接着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更由於九一八事變、七七戰爭、太平洋戰爭而更加膨脹起來。

過去日本所有的戰爭，是大財閥抱着統籌謀劃，投資市場，商品市場的目的，和軍部合作進行的。

大財閥的這種歷史，是和平軍閥安插勾結的歷史，三井和陸軍，三菱和海軍的具體關係，是眾所周知的史實。

這些財閥，是和平的愛好者，是和平的愛好者，民主主義者。他們是極可惡的破壞和平者，以和平為名，專制獨裁主義者。

其中可以用舉例下開的一些名字為例：即宇垣一成（陸軍大臣），南次郎（陸軍大臣），鈴木貫太郎（海軍大臣），米內光政（海軍大臣），廣田弘毅（前總理大臣），近衛文磨（前總理大臣），平沼騷一郎（樞密院議長），松平健（宮內大臣），池田成彬（三井財閥）等等。

財閥的勾結者，是其政治的代表，並且他們自己或者是侵略的軍部，或者是其同謀者。他們對於進行此次戰爭，全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第二、建設民主的日本

一、嚴懲戰爭罪犯

上面我們看到我國各種民主的勢力，看到只有這種力量，才能使我國建立民主主義與永久和平。那末，用什麼方法實現什麼樣的民主主義呢？

要在我們實現民主主義，有兩方面的事情非做不可。即消滅一切反民主的東西，和建設民主。

首先，說到應該消滅的方面：第一，就要嚴懲戰爭罪犯。這和懲罰，它底意義，還不僅僅是單純的懲罰，而是為保證未來日本的和平與民主主義所絕對必要的政策。因此，必須進行得廣泛和徹底。犯人之中，首先就是那些直接參與準備並進行一九三一年以來的戰爭的軍事指導者，以及曾在佔領區指揮或直接實行殺戮、破壞、掠奪、放火等暴行的指揮官。關於這點，美國有人主張只限於一九三七年以後的犯人，我認爲這是不對。因爲九、一八事變對於中國人民說來，還是記憶猶新的。而且，如果把這些犯人拋開不算的話，那末，像荒木大將（九、一八事變元兇）那樣沒有直接參與此後的戰爭，但却是危險的法西斯侵略者，就不受懲罰了，這是不公平的。

其次，必須對那些和戰爭、軍部積極合作的反動政治家（包括官僚），特別是那些作爲軍部走狗，在人民之中積極進行法西斯活動的法西斯份子，我們決不能放他逍遙過。還有，鎮壓人民的兇手——政治警察（特別高等警察），思想檢查等中的法西斯份子，也必須嚴懲處罰。

再次，便是那批成爲戰爭的實際推動力，在戰爭中獲得巨額利潤，以及和軍部公開或秘密地合作的大軍需資本家。對於他們，我想我們應該採取如下下的處罰：

- 一、由國家沒收這批資本家的全部戰時利潤。
 - 二、他們的企業收歸國有，這樣可以防止他們新的戰爭準備。
- 以上犯人的罪行，有讓日本及各佔領區人民配合同盟國來進行調查和審判之必要。對於那些罪惡，必須科以重刑，即使罪比較輕的，也必須絕對禁止他們參加戰後日本的中央或地方政治上的活動。

二、肅清封建的，反民主的制度

再者，爲了實現民主主義，必須剝奪軍部的特權（惟權上奏權，陸軍大臣現役軍人制），從政治、經濟、文化上肅清軍部的勢力。還有其他的封建機構與封建勢力，例如皇室、重臣、樞密院、貴族院、貴族院、貴族等等的特權與制度，或者廢除，或者必須使之無力化。

軍部領導下的一切軍事或反動思想的團體必須解散，團體的首領必須加以處罰。這些團體的數目，現在有一百個以上，名義上的會員數目，超過了一千萬人。其中重要的組織如下：

在鄉軍人會，警防團，國民義勇隊，青少年團，婦人會，大致覽贊會，翼贊壯年團，各種報國會（產業、農業、海員、勞務、言論、文學、美術、出版），與亞同盟，日德協會，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各種訓練所，赤誠會，黑龍會，大亞細亞協會，東亞聯盟等等。

這些都是合法的團體，但在青年軍人，法西斯黨之中，尚有秘密的組織，當然這一切必須加以解散。

再必須廢除一切反民主的，鎮壓人民的特別法令。這種法令，可以列舉三十種以上。如警官可以隨便逮捕與拘禁人民的「警察犯處罰令」，禁止罷工、集會、結社的「臨時取締法」，「不穩文書臨時取締法」，「治安警察法」，鎮壓共產主義者的「治安維持法」，「思想犯保護觀察法」等等都是反民主法令中的典型。

議會必須解散，議員必須廢職。因爲現在的議會，主要是由一九四二年東條內閣「推薦」支持軍部者而當選的議員所組成的。所以議會成了違反人民自由意志的軍部御用機關，當然應該解散。

在應解散的組織中，必須加上最近才創立的「大日本政治會」。這個政黨，是以上述議員爲主體，以南武郎大將爲首領的法西斯政黨。

三、實現民主政治

其次，談到應該建設方面，首先，除法西斯黨以外，一切政黨，必須立刻實行大赦，釋放出獄，今天在中國的牢獄、自市川正一，德田球一、國原重一郎、春日勝次郎、志賀義雄，以及其他同志等在獄中繼續鬥爭了十七

年的共產黨領袖直到反軍部的自由主義者，有數千名勇士在呻吟着。給他們以自由，這件事本身就表示着民主主義勢力的加強。

在我國憲法第二十九條與第二十八條上，祇有保證「言論、著作、出版、集會以及結社的自由」和「信教的自由」。然而，從憲法公佈之日起直到今天，這個條文完全是一紙空文。因此，我們必須完全實現這個條文所規定自由。軍隊對閉的進步的報紙，雜誌，書籍應該復刊；工會，農會，學生團體應該恢復，必須允許有集會，罷工，租佃鬥爭，示威運動等的自由；必須保證共產黨合法存在及其活動的自由，允許其他進步政黨恢復組織。這還，當加諸我國人民身上的束縛解除之時，這時真正的民主主義才達到保證。

我國的憲法，是依照傳統時代的君主專制立憲君主制而製成的。根據這個憲法，我國軍事，政治最高機關，操在天皇的手裡。我國也有議會，然議會而僅僅是「天皇」的「御前」機關，沒有政治權力。衆議院的決議，貴族院，樞密院，天皇有否決之權。政府由天皇負責，對議會可以不負責。而且，當政府遭受議會反對時，不是政府辭職，往往却是議會被解散。軍部可以不理議會，政府放在眼中，向天皇直接交涉。總而言之，我國的政治制度，是在「民主」的「議會」制度之下的，以天皇為首的專制獨裁制度。

我們必須根本改革這種制度。不是讓政權操縱在少數人的手裡，而是讓政權操縱在人民的手裡。就是說，政權應由議會和從議會選舉出來的政府來掌握。但是現在的議會，只是專制機構的附屬品，不應將政權交給它，必須徹底改造現在的議會，使議會成為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機關。因此，必須根本修改現行的選舉法。我國的選舉法有若干種限制，其二十五歲以上，有着一定居住期限的男子才有選舉權，三十五歲以上，能得過二千五百元保證金的男子才有被選舉權，此外尚訂了無數限制條件。我們必須廢除這一切限制，凡是年滿十八歲以上的男女，一律都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並且，由這些選舉人在沒有警察干涉的自由選舉之下，選舉議會，由這批議員組成議會，然後才能把政權付託給這個民主的議會。——將選舉人年齡規定為滿十八歲的理由，是根據以下的事實，因為現在的兵役年齡規定為十七歲，最近由於十二歲以上的男女被強迫動員，青年男女的政治能力已大為提高了。

四、天皇與天皇制

天皇與天皇制，在民主制度上應如何處理呢？

天皇有兩個作用，第一，我國的封建專制獨裁政治機構（或天皇制），

是以天皇為首，為中心而組成的，在制度上，天皇擁有絕大的政治獨裁權。第二，作為一個「神的化身」在人民之中起着半宗教的作用。這兩個作用，是互相結合着的，不過也可以分離。正如政權與宗教可以分離同樣的道理。因此，我們對第一個作用所採取的態度，和對第二個作用所採取的態度，應該有區別。

作為專制政治機構（天皇制）之首的天皇，或天皇的尊嚴，必須與這個機構同時立即廢除，以實現民主制度。這是目前已經實現的。日本人民對天皇個人雖有信仰，但並不是崇拜獨裁機構。我們必須立刻廢除作為專制機構的天皇制，實現民主。在這點上是沒有任何妥協的。所以我們主張——日本的民主主義化，和廢除天皇制是同一意義的。這是我們對天皇第一個作用所採取的態度。

但我們對天皇第二個作用——半宗教性的影響力，則必須採取慎重的態度。過去七十幾年來，在一般人民心中種下的對天皇的崇拜，是極其深刻的。例如我們曾收到住在南洋某地一個日本士兵（俘虜）給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的回信裡，他信備我們說：「反對戰爭和軍部滿然是好的，但在對待聯盟的價值沒有表示崇拜天皇之意，這一個遺憾。」又，與盟軍各方各地同盟對提問個日本俘虜調查的結果，確信日本勝利的為全體的幸甚，對最高指揮官有信仰者三分之一，可是崇拜天皇幾乎是全體士兵一致的回答。據八將軍俘虜不願的士兵，大部份都表示贊成解放聯盟的綱領，但如對天皇崇拜的話，那就反對。有這種種同樣思想的，在我國一般人民中，可說還佔相當多數。這是日本人民的不幸，然而又是事實。從這個事實出發，我們必須採取適當的具體的具體。

在我們解放聯盟的綱領中，沒有提出打倒天皇的綱領。因為解放聯盟，是一個在日本人民當前的目的——反對戰爭、打倒軍部、建設民主的日本的口號之下動員廣大人民的團體。當然必須爭取反對戰爭與軍部，但又不放棄崇拜天皇的人參加。如果我們提出打倒天皇的口號，當然能夠投入我們陣營起來的羣衆，也將因我們提出口號而離開我們，我們有從羣衆中孤立起來的危險。以上論解放聯盟綱領中所以沒有提到天皇問題的理由。

但是，如果因為我們這樣說了，便以為我們歡迎以後的日本保存天皇，那就不是這回事。天皇是現在的戰爭責任者之一，是反動政治和復古思想的象徵。戰後如保存天皇，那末殘存的反動勢力，就有可能以它為中心，重新集合起來擾亂和平和民主政治。這樣的東西，為了我國的民主化，是非

為除不可的。我們共產黨要求建立沒有天皇制，沒有天皇的徹底的民主共和國，為此目的，我們向人民大眾進行宣傳教育。但我們的要求違反了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即不能實現。如果，大多數人民熱烈要求保存天皇，我們對此必須讓步。因此對於天皇存廢的問題，我們主張：在戰後由一般人民的投票來決定。投票的結果，縱令決定保存天皇，這時的天皇，也必須是沒有專制權的天皇。

五、改革教育

為了摧毀殘餘的封建制度，并確立民主的制度，和上述制度上改革的同時，有改造人民思想上之必要。這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

過去七十年間，我國的學校和各種教育宣傳機關，都用全力向人民灌輸崇拜偶像，崇拜皇室，崇拜政治，絕對服從，軍國主義，征服他國思想，武士道等等，會收到相當的成果。如不肅清這種反民主的邪惡思想，真正的民主主義就難於實現。為此，必須改革現在的教育制度與教育內容，進行民主主義與和平思想的教育，全部教科書必須重新寫過。而且，必須從教育宣傳機關中清洗法西斯分子，訓練新的教師。

當然，這個教育的成果，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表現出來的，僅以訓練師資來說，也需要一定的時期。不過，如一部分外國人所主張的，認為日本完全沒有民主主義的傳統，因要改造人民的思想，恐怕要一個世紀以上；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我國也有光輝的自由主義運動的歷史。同時過去半世紀之而，曾實行過各種民主設施，如制定憲法，議會，地方自治制，男子普通選舉法，政黨，工會，農會，發行工人的報紙等等。雖然所有這一切都是欺騙的或歪曲了的民主主義。然而即使是一些碎屑，但也是民主主義的東西。所以不能說我國人民對於民主的東西無知或沒有經驗。只要摧毀殘餘的封建制度，實行民主的政治和教育，人民有民主的思想，熟悉民主政治，決不是非常困難的。

六、保證永久和平

戰後，為了不使日本再可能擾亂和平，應採一些什麼必要的措施呢？關於這個重大的問題，在聯盟國方面的一部分人士之間，引起了熱烈的爭論。

在這種爭論當中，值得注意的，是那種認為為了保證和平，不僅要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裝，毀滅日本的軍務工業，而且要抑制或禁壓一般工業的發展的意見。

同盟國方面的戰爭目的，如各次國際會議所聲明的，并非滅亡日本民族，而只在於根絕日本軍部與軍國主義，確保永久和平，所以上述意見是不正確的。

本來是否進行戰爭，不決定於工業的有或無。戰爭不是機械發動的，而是人造成的。換句話說，政治產生戰爭，所以講到對侵略戰爭毫無利益的日本人，來實行政治，管理工業，和平工業是發達了，但絕對不會製造侵略用的武器。質言之，從政治上解除武裝，是保證和平最確實的辦法。那末反對侵略戰爭的日本人是什麼人呢？不是大資本家，而是勞動人民大眾。勞動人民大眾的政治，即徹底的民主主義政治的實現，才是防止侵略戰爭重新發生的最好的辦法。如果這種民主政治得到保證，我國工業的有無也就不成為問題了。

以德國為例，在第一次歐洲大戰中敗戰以後，又重慶軍備發動第二次歐洲大戰，它所以能這樣，並不是因為德國有了重工業，而是由於法西羅斯蒂和軍國主義抬頭了。如果不是法西羅斯蒂，而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統治着德國的話，那末，這次大戰就不會發生，而相反的，德國高度發達的工業，對於世界文明之發展，將有很大的貢獻。問題不在於重工業，而在於政治。日本也是同樣的情形。我國工業，技術的進步，還在東方各國之上的。因此，對戰後東方各國的工業化，可以作不少的貢獻。而人工地阻止日本的工業的發展，或者消滅這個工業，對於東方民族有什麼利益？把日本拖回到半世紀前的農業國家，對於世界進步有什麼利益？結局是糾枉過正，難道不是世界文明的損失嗎？

第三、富強的日本

（戰後的經濟問題）

可以想到戰後日本的經濟破產，日本將面臨極度困難的經濟問題。首先由於海炸以及在本土作戰，大規模的工業設施將被破壞，衆多的生產人員

路更死傷，日本所有的大部份的船隻都要喪失，生產和消費資料的積蓄將蕩然無存。現在通貨已經極度膨脹，最後一定更難以控制。飢饉就會發生。其次，由於滿洲和各省佔領地，尤其是稱為「生命線」的華北，東三省，朝鮮之從日本帝國主義獲得解放，則使日本失去其豐富原料的供給和產品市場，失掉「生命線」。第三，重大的問題是龐大的失業羣眾。由於復員、移居海外家的歸國、國內工廠的破壞和修養停止等原因，將有一千萬人以上以上的失業羣。最後，賠款的負擔也必須加以預計。如此說來，則我國的經濟將趨於破產。

那末，我國能夠避免這種經濟的破滅嗎？我國能夠復興嗎？當然不能。這只有在政治以及經濟上實行斷然改革的條件之下才能實現。如果不斷實行大改革，我國就不能免於亡國的厄運。反之，如實行大改革，就必然能致富裕的幸福的新日本，而且，建設新日本的一部份基本條件，為了這目的戰爭的起點，已由軍部本身在戰爭期間準備就緒了。

至於將來日本之成為富裕的日本，在經濟上與向什麼方面發展才是最合宜而且最有利呢？我認爲應向以下三個方向進行。

一、高度的工業，特別是電氣，化學，精密機械之高度的發展。由此可以解決失業（或人口）問題。

二、土地制度的變革和農業的機械化。

三、國內市場的發展。

爲了向這三個方向發展，應該做些什麼？發展的基礎在那裡呢？

第一、在經濟發展上，最基本而不可缺的條件，就是政治的改革。即必須把軍部，財閥，封建主義的殘餘驅逐出去，建立代表勞動人民利益的民主的人民政府。如果不成立這樣的政府，讓現在的政府繼續下去，那決不能克服經濟發展的困難以進進而創造富裕的日本。因爲經濟的大改革是違反軍部、財閥、大地主的利益的。

第二、民主的政府必須對整個經濟實行強力的統制。在實行這點上，戰時期間已準備了有利的條件。軍部促進了中小工商業的沒落和企業的集中，軍需產業，金融固不待說，農業上也實行了國家的統制，甚至把一部分企業強迫國家。這對於將來民主政府，在管理獨占企業，實施計劃經濟上，是個重大的幫助。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主張以下的原則：

一般的，對於獨占企業（財閥，企業的聯合）實行強有力的國家統制，一部分企業（如金融、電力、海運、軍需等）收歸國有。尤其是關於戰

爭同謀者的巨大財閥如三井、三菱、住友及其他幾個大軍需資本家的資本，更歸國有。這是對敵命罪行的懲罰，同時也是爲了防止將來戰爭。如果國家僅將三菱、三井、住友三大財閥的資本變爲國有，那就有我國私營產業的百分之二五，金融（除去國家的）的百分之四十變成國有的了。這又是對於這些大財閥的破產勢力的重大打擊。對於這些財閥的打擊，一定會引起爲他們所壓迫的中小資本家和工人的歡迎。

第三、關於我國破產後的復興，和高度工業化，究竟從那裡取得財源呢？我們首先可求之於巨額軍事費的節約。在戰前和平時期，就有國家財政的百分之五十左右用於軍事支出。自一九三七年到現年，爲了戰爭浪費了一千四百億的巨額。將來和平的日本可以節約這筆巨額的資金，用在經濟的復興和建設上。另一財源是求之於下述的：（一）沒收大軍需資本家的戰時利潤，（二）統制和國營獨占資本，（三）下面要說的百分之土地國有，（四）採取累進稅制等等。

其次，高度工業化之技術的基礎和勞動力，可以說是相當存在的。在戰爭期間，我國的軍工業和機械工業急遽地擴大，技術也高度地發展了。自這些工廠設施由於爆炸和其他原因會受到大的破壞，可是即在戰後，這些工廠和技術也會殘留下來。對於將來工業的發展，有很大的供給。至於勞動力，軍部今天強制地動員十二歲至六十歲的男子以及十二歲至四十五歲的女子，使他們從事某種勞動，給了一般人民以勞動的習慣，這使我國的勞動力豐富起來。

但是，工業發展的資源怎麼辦呢？我國工業原料不豐富是事實，但直至今日軍需爲了作爲侵略他國的口實，把它濫於消耗了。可是：（一）軍部最近預料對南洋以及中國方面的交通將被切斷，便以全力開發國內資源。精製石油、鉛、及其他八十種原料在國內都有了某種程度的供給的可能性（多田禮吉中將「同盟通訊」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四日）。這些資源用國家的力量是可以充分開發的。又我國有豐富的水力，可以使之變成動力。從我國的海水裡面，也可以獲得食物以外的許多化學材料。（二）並且如果使工業向精密化方面發展，這也可以相對的減少原料的需要。（三）至於絕對不可缺而又不足的原料，便不得不仰賴外國。對於和平的民主的日本，各國從經濟的貿易立場上，也不至於拒絕供給的。

以上是我國高度工業化的途徑。

第四、農業方面的改革必須徹底地實行。因爲我國農業的半封建性，使

國內市場狹小，成爲工資低下的原因，妨礙了工業發展，成爲政治壓迫的基礎。所以發展近代化最爲重要。這就是說，首先第一，爲了儘可能地開發國內的土地所有關係和封建的剝削方法，就必須把地主的土地剝奪化；一方面給無土地的農民以土地，他方面使農業機械化。關於這一方面，我們主張以下的政策作爲實現它的第二步：

一、強迫地主的土地不在地主的手裏而歸國家代價收買，「町」(一町約爲中國廿五畝)以上的地主(佔全國農家總戶數百分之二)，佔全國耕地百分之六)的土地有代價或無代價的收歸國有。

二、國有化了的土地以低利租金貸與土地不足的農民。

三、減低耕種國有地以外的土地的稅額的例租。

四、在國家補助下，應用科學大規模的農業機械，獎勵共同耕作，使提供化學肥料，擴大飼養機械設備，除食糧以外，生產工業原料。(軍用爲了增產食糧和人力不足的困難，獎勵共同耕作與應用機械，目前各地農村，正在這種實行中。農業技術的革命也小規模地開始了。)

如採取以上的方案，農產物增加，食糧問題大體上就解決了，並且由於農民趨向富強，國內市場也就擴大了。

第五，是市場問題。如衆週知的，戰前日本工業生產的很大部份，不是爲了國內消費，而是以國外市場爲目的而製造的，它是按如下的方法之下進行的。這就是把廉價榨取工人和農民，使他們的生活降低，以這樣製造出來的廉價商品運往國外市場。將來的日本必須反轉過來，生產以國內市場爲主要目的，對外貿易應該在這樣的原則下進行：即爲了支付我國必需品輸入而戰。

爲此目的，就必須創造并擴大廣大的國內市場。而這一事實的實現，有賴於我國絕對多數的勞動大眾的生活的提高。由於上述土地制度的變革和農村與租佃的減輕，農民的生活改善，這在約佔我國人口百分之三十九的農村人口，就成爲商品購買者了。

而且工人及其他勞動者的生活必須大大改善，他們必須成爲有力的購買者。因此，國家必須保障(一)八小時勞動制，(二)增加工資和制定最低工資，(三)規定社會保險，(四)使工場法完備等等。

總之不是說我們不重視對外貿易，像我國這樣資源貧乏而又狹小的國家，爲了提高人民的生活，對外貿易是必須發展的。因此，相當數量的商船仍爲必要的。但是這種貿易不是像過去那樣爲了商品銷售和侵略，而是以有無

根據原則而進行的。

這就是我們對於將來日本的經濟政策。

第四、結語：建立人民政府

上述一切，都是我國勞動人民大眾的要求，是我們日本共產黨目前的綱領。這是建設民主和繁榮的新日本的綱領。只有實現這個綱領，才「可以備賴日本並承認日本爲尋求永久和平的國際團體中的一個成員」(羅斯福總統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演說)。除此以外，別無他途。

實現這個綱領，決不是依靠「維維派」的政府所能做到的。只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的政府——建立在從共產黨到民主的各政黨、各政派的聯合的基礎上的人民政府，才能做到。因此，我們當前的中心口號是「建立人民政府」。而這個政府，只有以廣大的人民大眾的動員和鬥爭爲基礎，才能成立。共產黨者以及一切愛好和平與自由的人們，在他們的各人的工作崗位上爲着目前切身的要求而組織鬥爭，在這種鬥爭中說明我們的綱領，從而團結羣衆的勢力在我們的口號之下。這就是我們當前必須出發的下一步。

同志們！

歐洲的法西斯主義崩潰了。東方軍閥法西斯主義崩潰了。希特勒後座的日子快到了。東方民族從所謂東方憲兵，據有東洋五十年来的日本帝國主義獲得解放的日子快到了。世界民主主義勝利之日快到了。

但是，如最近史迪威將軍所說，和日本軍閥的戰爭決不是容易的。他們將利用其有利的戰略地勢，瘋狂的抵抗，在我們的勝利之前，還需要許多犧牲。並且就是在勝利之後，中國，日本，滿洲及南洋各國的前途也還有許多困難問題。我們決不應沉溺於快樂的夢想。爲了這些國家的民族之完全解放，仍須進一步努力和犧牲。在這些民族的解放事業和將來的發展上，偉大的中華民族和產業發達的日本民族的合作，將起非常大的作用。中國人民決不會拒絕與和平的民主的日本合作的。

打倒日本法西斯軍閥！

中日人民團結萬歲！

論西姆拉會議

舒翰

「他們的失敗，將成為政治的破壞，民族的羞恥，和國際的普遍的震驚。他們的成功，將成為印度對英國的勝利，將給我們人民創造一個機會，去寫下他們自己的歷史，並且在自由世界陣線中，鑄造大而單純的裂縫，那裂縫正是目前我們國家的不幸。」

——P. C. 約希

印督魏爾遜爵士在倫敦整頓差不多三個月之久，終於擬定了解決印度政治僵局的新方案，六月十四日，倫敦新德里兩地同時公佈英國白皮書，建議將印度行政會議改組，容納印度各政黨代表參加。魏爾遜當即下令辭職，由阿沙德以及國民大會工作委員會委員等，並邀請甘地、真納和其他印度政黨領袖，於二十五日在西姆拉舉行會議，就新方案提出商榷。三年來，全世界自由人民所關切應付印度僵局，於此顯露了打開的希望。

西姆拉會議並未因真納的要求而延期，自二十五日起會舉行正式會議三次，同時進行會外商談。據新聞報導，當時情形良好，但至二十九日，因國民大會和國教同盟之間未能達成協議，必須取決於各自的領袖機關，以致會議宣告休會半月，到七月十四日重開。在這期間，國民大會工作委員會和國教同盟執行委員會分別召集會議，對雙方所執之條件最後決定。十四日國教同盟會議，不幸突告破裂，據說「情況變化太快，使印度領袖都很難於發表聲明。」雖然國民大會會保證不願同國教同盟反對，繼續和魏爾遜合作，實行他們的計劃，但印康的團結問題，仍然是個沒有解開的結。

英國為什麼提出新方案？

英印當局已經搖搖了三年，為什麼在這時候英國又提出了新的方案，想來打開僵持的局面呢？這理由由是甚明顯的：

歐洲戰爭結束了，印度國下一場便便地加速東戰爭的勝利，怎樣集中力量來對日作戰？是英國最當緊的課題。反法西斯戰爭是一個人民的戰爭，

只有獲得廣大人民的參加，才能贏得勝利。而對英國的問題是：既然仗是要打下去的，那就必須當地人民善意的支助。印度不僅是英東的主要戰場，也是物資供應和工業生產的主要基地，而且更重要的，印度是東亞亞細亞無窮人力的地方，只說這戰時的理由來說，如果向著大多數政黨和廣大人民的敵意，就不可能在印度進行有效的動員。對日決戰是艱苦的，需要大量的人員準備犧牲，英國不可能調遣大批軍隊東來，這就須得仰給印度人民的協助。此其一。

一九四二年八月事件以來，英國對印度所施行的苛酷的、消極的、高壓的政策，無論從政治上或經濟上來說，都經過到嚴重失敗的後果，證明這種政策是破產了。我們不難回憶：三年中一連串不幸事件損害着印度的力量。國民大會的領袖以及成萬的優秀幹部被關在牢裏（除尼赫魯等少數領袖外，其他都還沒有釋放），不使他們對反法西斯戰爭應有的努力；前年孟加拉省的飢饉，由於官僚政治和囤積居奇的人禍，餓死達五百萬人；日寇則利用印奸施虐，以一獨立舉動一來欺騙印度人民，進行以印制印的毒辣陰謀；並指使殖民主義軍隊，在國內進行種種破壞工作。這都使當局政策的毒藥，即使英國當局也已看到了。政治上，每一個印度人的心裡都充滿着痛苦，可能過或後反叛的威脅，經濟上，因為英國的私人自己經營着買賣，官吏只受賄，便可放任一切，所以無所不施種種剝削，而在戰後崩潰的邊野。印度已經不是安全的殖民地，而是一幅可怕的景象了。

英國國內人民反對殖政策的壓力，逐漸增加。自蘇聯戰後，英國共產黨與及勞動黨和自由黨中同情印度的人士，紛紛提出反對，接濟與輿界也多方批評，後來更獲得六百萬工會會員的支持，因而在去年十二月工黨大會中，以壓倒優勢對抗領袖機關，通過了如下的決議：

大會認為保證印度人民的自由，建立獨立的地區政府，是反法西斯戰爭中一切反法西斯力量中的決定因素，是結束戰爭，同印度人民的一切領袖和領袖們，組織負責的國民政府，以就完全印度人，參加反法西斯事業。為了易於取得協議，我們要求保證政治領袖。

國內人民這種政治上的強大壓力，迫使當局不能不有所考慮，特別是正當英國舉行大選的前夕，保守黨中一部分人，深感印度問題已不得解決，是爭吵選票的一大障礙，也正是工黨和其他黨派用以攻擊他們的最好的武器，因為英國人民是最大多數同情印度的。這樣造成了保守黨內部的分裂，要梅利等死硬派不得不同意放棄僵局政策，當然這種讓步是有限的，如像保留印督的否決權作為安全的保證。但是，上述這些原因，再也不能死抱往以不變應萬變的老一套了。此其二。

印度政局陷入僵持的狀態以後，印度人民深深感到過去不團結的錯誤，克利浦斯訪印的失敗，另一方面實際上也是印度人民的失敗。正因為印度自身的團結，於是賈人以口實，說如果給印度以自由，那將引起不堪設想的混亂。這種慘痛的經驗教訓，使印國的領袖們紛紛尋求出路。首先是印度共產黨在八月事件以前，即呼籲國民大會和國教同盟的合作，前瑪德拉斯省總理在理以及自由主義者薩泊魯，也為團結而奔走呼號。雖然去年促成了甘地和賈納的會談並不能完成協議，但在國民大會領袖們的三年中，印度共產黨領導的這種團結運動，獲得了驚人的效果。前年孟加加大變時，各地印人不分黨派，都團結在一起，主動地在實際上做了許多救濟的工作。在各省政權中，孟加加省的聯合政府最早組成，接着南也各省也形成了以國民大會為基礎的省政府，阿薩密省更組織了以國民大會與國教同盟合作為基礎的臨時政府。在中央立法會議中，國民大會領袖們與國教同盟領袖們合作地工作着，他們兩人協商的结果，擬定了一個計劃，提交魏非爾，作為打開僵局之建議。而此次魏非爾方案擬設即以這計劃作為藍本的。印度人民這種從實際中由下而上的團結，為印度歷史的轉折點，也是對英國政府最響亮的警鐘。此其三。

壓力不僅來自英國國內和印度人民，也來自世界各地。全世界人民對印度的同情，不斷地給以正義的援助，進步的輿論呼籲解決印度問題。反法西斯戰爭的進程，就是要求結束一切奴役制度，民族自決的原則，大西洋邊界早有明確規定，特別是歐洲戰爭的勝利，已顯示出未來新世界的一個獨

立、自由、平等的新世界，是人類已成為新世界的舵手，驅逐着人民與奴役，驅逐着不平等。

再說回國問題。印度問題。美國政府對印度的興趣，是大總統羅斯福，這不僅因為美國在印的經濟關係上來說，覺得印度需要改變目前的局勢，而更重要的是，印度獲得一些自由，將使美國對英法兩國利益。羅斯福對人與英國政府之間的這種關係，曾於訪問時談了一些話，結果羅斯福與英法兩國政府。羅斯福的政策，則一貫主張兩小民族獨立自由的，特別在這次由會議中，堅持世界各國中自由與平等地發展獨立自由的原則，這不僅是人民一個基本的權利。至於我們中國人民，一而於此而彼的解放鬥爭。此種國際間的關係，也在一天天加強。此其四。

關於上述的這些理由，才有魏非爾方案提出，所以我們如果說這是英政府自願，那是不對的。

對方案內容作什麼評價？

魏非爾方案內容，包括以下六點：

(一) 方案不在於以憲法途徑尋求印度地位之解決，因為印人本不能取得獨立。

(二) 在新憲法制定以前，解決目前印局的具體辦法是：改組總督行政會議，成立過渡政府，包括各主要宗派，「暫緩印憲法」和回教佔各佔半席，依照現在憲法行事，新行政會議除國防部長外，由英印印度總督任命外，其餘各部門包括外交、財政、內政等部由印人掌理，但總督仍有最高決定權，可以否決一切，但總督力不加蓋用。新行政會議將由總督，間接受命於印總督。英政府派專員駐印，總負英國政府自領事員同等任務，處理商務等項。

(三) 新行政會主要任務：①努力進行對日作戰，直至日本完全失敗；②在新憲法制定以前，轉行行政府各種職長工作；③過渡政府如認為可能，就進行立憲，英國政府希望獲得永久性的解決辦法，方案就是使這目的易於實現。

(四) 新行政會議的產生辦法：邀請印度各方面政治領袖和現任職最後一任總督共二十一人，定六月二十五日在西姆拉舉行會議，制定行政會議委員名單，交由總督決定呈請英王任命。各省自治政府也

望能自動恢復。但如非議會未散，那麼現有行政會議繼續存在。

(五) 擬定國民大會工作委員會委員，其他政治犯的釋放，由將來各省自行決定。

(六) 被選出那西姆維會議的人員：甘地、真納、議會上下院中的國民大會和回教聯盟的領袖，立法會議中歐人集團和國家主義派領袖，各省的現任或候任一任的總理十一人，錫克族一人，賤民階級一人，共二十一人。

此外印憲會議中，補充說明幾點：(一) 這方案絕不妨礙印度憲法；(二) 這方案只適用於目前英國印度，而不適用於各聯邦；(三) 克利浦斯的建議案當然有效。

這一方案，據說是以魯賓——阿星羅計劃為藍本的。德安和阿里罕是中央立法會議中國民大會和回教同盟的領袖，他們在中央立法會議的密切合作，產生一個建議性計劃，建議組織印度臨時政府，以國民大會和回教同盟各派代表百分之四十為基礎，其餘百分之二十由其他方面分派。這個計劃會經得到甘地和回教同盟的方面的同意。據甘地說，這個計劃不似魏非爾方案那樣富有宗教色彩，這或者就是不同的地方，而且這種不同是很重要的，是國民大會和回教同盟爭執的。

這一方案利克利浦斯建議案的比較怎樣呢？國民大會的一份報紙的批評，認為是進了一大步，提出了這樣幾點理由：

(一) 克利浦斯建議案還設法解決印度憲法問題，這次却避而不談；

(二) 魏非爾方案帶有更濃厚的宗教色彩，可能加深印回隔閡，譬如回教在新政府中和印族佔相同地位，而實際回教人口不到三分之一；

(三) 克利浦斯建議案對國防權還有一部份給印人管理，而魏非爾方案完全摒棄印人；

(四) 克利浦斯允許印人提出修正意見，或另外提出適當的新方案，魏非爾則不；

(五) 總督否決權仍使印人放心，而在這種情況下，英印互派外交專員的實施，自不能和加拿大、澳洲相比。

當然，兩方案的基本上是一樣的，都是只限於印度走向自治領的一種過渡辦法，因此，兩者的重要之點是相同的，譬如：英國必須掌握國防權；對英屬印度和印度聯邦分離；印督必須有否決權等。而前兩點正是當時國民

大會所最堅決反對的，認為印人自己不能確保印度，只在作聯上可應英方指揮以外，國防部也應由印人担任，而對於分離印度的辦法，認為是破壞印度的統一性。

但是我們今天來評價魏非爾方案，似乎更應該從現實觀點出發，正如約希所說，「不以憲法學者的資格」去看，而以實際求是的眼光去看，就是說，應估量這方案到底對印度人民「能引起什麼真正的作用」。

首先，方案的內容較克利浦斯建議案更得現實、具體，前者著重眼前，而後者則空談將來。正如魏非爾表示只求僵局的暫時解決，而在問題未得最後解決之前，不打算作任何徹底的憲法解決。這是很現實的，因為一個真正代表人民的自由印度憲法，只能由印度人民經過普遍自己來創制。其次，對過渡時期的新行政會議有具體規定，合理與否是另一問題，如權力、產生方法、代表成份等等，並明白規定除國防部長以外，其餘外交、財政、內政等都由印人掌理。

根據這方案，如果新行政會議成立，那麼中央各部長皆由印度人民領袖去代替一批官僚，這是進了一大步，使印度有機會在民主的基礎上進行真正的民族復興。特別是外交部長一職，原來是印督兼任的，如果由印人担任，則不僅意味事實上已承認了印度的自治領地位，而且使印度在外交上能自動採取積極步驟，這一點潘第特夫人說得很清楚，她說：「最適宜的一點，是讓印度執行本身的外交工作。我們可在遠東、中東、近東的鄰友和北方鄰邦聯建立友好外交關係，因為蘇聯會一再表示願和印度建立直接的接觸。」印度不但可以派遣自己的代表到各國去，因而改變目前不獨立狀態，並且可在建立繁榮、和平與自由的世界中，起着很大的作用。這顯然比克利浦斯建議案進步的。

再如各省自治政府的恢復，「將使愛國的政黨能結束警察統治，擴減黑市和官僚的腐敗，而迅速地採取有效的方法。」

當然這並不等於說魏非爾方案就能滿足印度人民的願望，不，印度人民所願望的所鬥爭以求取的，是完全的獨立，但在當前情況下，由團結印度各政黨特別是國民大會和回教同盟，由人民的代表來掌握印度自己的政權，從而展開爭取的獨立解放運動，那魏非爾方案是具有現實的意義的，是能夠對印度人民引起實際的作用的。因此，雖然魏非爾忽視了印度第三大政黨——印度共產黨（註：印度共產黨現有五萬以上的黨員，領導着這樣三個大的羣衆組織：一百萬人的全印職工大會，八十萬人的印度農民協會，幾萬人

的印度學生聯合會。沒有邀請他們參加，但印度共產黨仍願接受其方案，印度共產黨書記約希，在黨報「人民戰爭」上發表專文，在印度輿論混亂之中，指出印度可以接受魏非爾方案，作為一個起點，他說：

「我們黨是印度唯一的政治組織，明確而勇敢地說：可以接受魏非爾的方案，作為一個起點。」

「我們的考驗不是魏非爾方案給予什麼憲法權力，不給什麼憲法權利。我們並不天真到希望保守黨騎着的英政府將給我們自由。我們並無自由主義者的幻想的騷擾，從這點出發，有人高聲大叫反對魏非爾方案，實則還是含着着疑心思想的，我們深信只有我們的人民才能帶來一個好日子，使我們自己所擁護的代議制自由印度憲法。以我們所了解的歷史而言，權力的泉源是我們自己偉大的人民，而不是萬惡的外國統治階級。因此，我們並不以憲法草案的資格來看魏非爾計劃，而以其事實是人民的組織的資格來看魏非爾計劃，我們要人民在決定自己的命運時，能起什麼真正的作用。」

「我們覺得驚駭地，如果魏非爾的政綱組織，在中央和各省政府國家的行政首領，目前的政局是能夠完全改變的。在這些組織之後，站著魏非爾所高政治覺醒的團體。人民一看見政府中包括他們自己的領袖，這類的政治覺醒和激發浪潮就會湧來。……五年來的破碎希望，自由的壓制和必需品短缺，早在邊陲地帶進入空前的活動了。」

「我們的政治領袖受魏非爾計劃，將把我們人民帶到舞台的中心，而除去目前的塞滿了賄賂的官僚，除去搶掠我們人民的糧食和衣服以及小孩子的牛奶的囤積居奇者。人民將得到機會來對付人民之敵，爭取應有的新社會改革。民主生新的洪流開始不可阻擋。」

「我們並不否認我們自己之間有相互成見造成的陷阱，也有我們的敵人設在我們路上的陷阱。」

「我們要設法用我們自己的手來拆散陷阱，使兄弟們相處在一處。我們共同的力量，能使我們順利地翻倒桌子，把桌子按在共同的敵人身上。」

「轉變時局的關鍵任務是什麼呢？不是別的，而是國民大會和回教同盟之間，我國這兩個最先進的愛國組織之間，要成立協議。……」

（見新華日報七月六日孟買版）

民主主張接受，誰反對呢？

正由於方案有前以上所述的現實意義，所以提出後在印度的反應，並不像克利浦斯建議案那樣被各方面所反對，一般認為雖不能滿意，却都覺得應該加以最慎密的考慮。尤其因為政治領袖的先予釋放，使三年來在書閣空舞，為之惶惶不少。除了印度共產黨明白主張可以接受而外，查理和錫克族領袖辛氏，及德賽——阿里罕計劃的起草人德賽等，也都主張可以接受。印度職工大會領袖波烈，自由主義派薩波魯，以及潘第時夫人等，一致要求國民大會和回教同盟接受方案，取得共同立場，組織聯合政府，因為有人民黨為盾的政府，可以打破國內障礙。查理說：「我們得把那陷在泥濘裡的車子拉出來，如果我們能把它拉到硬地上就好，然後，我們總可以把它推上大路。」他認為印度領袖不應局限於政黨活動，而應挺身而出，過問政事，在這個大時代中抽身而退，實在是極大的損失，但假如有理想有計劃，那麼小利的形勢也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和人民的擁護而推過，改善的。他繼續說：「假使人民領袖們能站出來掌握中央或地方行政，那麼行政的總會就得多。」「德賽則說：他的方案曾得甘地與回教同盟的贊助，「兩者合作如像在中立法會議中一樣，是可以由此建成全印的結的。」

查理和德賽是代表國民大會領袖中贊成而德健的一派，這一派的影響在國民大會中逐漸抬頭。國民大會還有兩派不同意見，其一是黨後最顯有力量的右派，甘地與德健是代表，他們對即將把國民大會作為印區一體一體，極為不滿，他們認為不用政治觀點而用宗教觀點來處理印區問題，把「高階級印度族」和國民大會混為一談，是應極力反對的，所以堅持國民大會應維持回教同盟外的回教徒參加行政會議。但他們並不反對方案，因此甘地對西姆拉會議說：「如果到會代表能抱持適當態度，那麼一定有益。」另一派是中間派，尼赫魯，阿沙德是代表，他們對方案中印區人民所能獲得的政權限度雖然不滿，但認為假使通過方案而實行，可以推進獨立運動，服務人民的話，那麼還是值得作為過渡辦法而加以試行的。他們表示國民大會的性質必須弄清楚，但應以大局為重。尼赫魯說：「參加西姆拉會議的理商，是會議所作種種暫時建議，將能迅速引導印度走向民主自由之路。」回教同盟的態度，雖然與納沒有公開表示，但大體上是同意魏非爾方案的，因為他們能在新行政會議中得到與國民大會相同的席數。回教同盟的

進步派，認爲「印度將來前途問題，應請將將來印度人民自己來決定，我們希望如果國民大會決定接受方案，將不會不顧到印回共處的問題，反可以在摩斯地基礎上建立國民大會與回教同盟的協約，然後印度可以達到真正的目標。」這也主張消除一切異見，在回教同盟會議之前，組成聯合戰線。

所以，在印度的印度人民中，最大多數是主張接受方案的，他們希望他們的領袖抓住一切的機會，來達到印度自己的目的。

但是也有反對魏非爾方案的。魏呢？在英國，是保守黨中最死硬派的那部分人；在印度，則有羅埃一派和印度大會（馬哈薩巴）。在回教同盟中，魏非爾保留總督的不決權。他們把希望寄托在印度政府不能夠回絕這三點上，於是勇於同意提出方案。他們的企圖是：第一，利用部長的席位，在國民大會中引起議會派和軍人派之不和，而去壓服國民大會。第二，方案中規定國民大會和回教同盟相同應數一點，是以引起國民大會與國民大會以外的印族之間的爭論，如將國民大會接受方案，則可削弱國民大會與印族中的勢力；如果拒絕了，那麼又會使國民大會失去它的同族會員。第三，利用國民大會與回教同盟之間的異見，另一方面小黨派之間的異見。因此，一方面是國民大會與回教同盟之間的異見，另一方面小黨派之間的異見。因此，他們實際上反對魏非爾方案的，他們的打算就是使魏非爾同族的結果，使印回內部矛盾更加深，而保持的局而得以繼續維持下去。

羅埃正是這批保守黨死硬派在印度的代理人。他們在印所作為，是破壞印度民族團結，策謀主張不讓國民大會恢復自由活動的，說什麼「現在只須要魏非爾主義，爭取自由的鬥爭要在戰後以後再說。」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印度勞動聯盟主席馬尼拉，拉女士與馬尼尼克，公開聲明反對魏非爾方案，說在方案中「人民得不到地位」。印度大會是魏非爾方案的宗族團體，是極端的大印度主義者，該會主席穆克伊認爲魏非爾方案的主題目的，「是更趨就回教同盟，壓制印度政府的權力。」他們認爲國民大會和回教同盟團結之下所組成的政府，對印度教的利益比現存制度更有利。

保守黨死硬派，羅埃派，印度教大黨，說來各各不同，但反對魏非爾方案是一致的，因為他們都是站在回教人民敵對的立場上。「服裝不同，靈魂只有一個。」

西姆拉會議爲什麼失敗？

在西姆拉會議之前，有三個難題是解決了：第一個是甘地指出方案中把國民大會作爲「高階級印度族」的團體，深表不滿，認爲是有憲法具有全國性的國民大會以打擊，一時空氣很沉重，但魏非爾的答覆很婉轉地說：「高階級印度族」一點，不過是指該階級以外的印度族而言，並沒有什麼惡意。這總算和緩下來。第二個是，原來印督邀請甘地出席西姆拉會議，但甘地認爲他不能代表國民大會，拒絕出席，而請在會外備諮詢，同時提出國民大會主席應阿沙德出席。阿沙德是回教徒，這對回教同盟是極不樂意的一件事，當時回教同盟派代表「亞司」即表示不能容忍，但印督立刻接受甘地此語，真到後來也沒有加以反對，難關也就過去了。這一舉措，使國民大會方面對方案中「高階級印度族」一語的疑慮，更加減少了。第三個是，真納要求西姆拉會議展期到星期召開，但印督拒絕了，而真納隨後也沒有堅持。這樣，國民大會和回教同盟正式同意出席後，西姆拉會議就按期於六月二十五日開幕了。

會議一連舉行三天，因官方沒有宣佈內容，所以我們無從知道其詳。據新聞報導，似乎相當樂觀。國民大會和回教同盟在會外同時進行協商，特別是二十六日真納和國民大會總主席潘特特會談，都說獲得有利結果，因此大家對會談抱持極大的希望。三十日即休會兩週，原因是：國民大會和回教同盟雙方，不能對魏非爾建議獲得協議，必須須由雙方再舉行會議來討論解決，所以休會兩週之久而久，以便各自召集會議來作最後商討。休會期間，國民大會工作委員會和回教同盟的執委會都舉行了會議，所以西姆拉會議仍得如期於七月十四日復會。可是會議開後經過一小時又四十五分鐘的討論，「竟突告決裂」，「因情勢變化太速，使印回各領袖都趨於發表聲明。」這就是會談失敗的僅有的新聞報導。

西姆拉會議終於失敗了，但是失敗的原因在那裡呢？據印度官方公報說：「會議由於回未得協議而失敗」。這樣簡單的詞句，決不難即由此去下結論。的確，「回未得協議」是會議失敗的原因之一，或者說這是重要原因之一，因爲會議最後爭論的焦點，就是在國民大會和回教同盟對推選新行政會的名單上，意見不能獲得一致。國民大會的意見是一個全國性的組織，而不是只代表印度族的宗族團體，所以有權推選不屬於回教同盟的組織，而回教同盟則堅決反對，認爲它是對印唯一的一回教組織，真納會說百分之九十九回教徒應選回教同盟，所以對推選未舉行行政會中全黨回教代表之權。這一爭執沒有得到諒解，自然會談無法成功了。國民大會方面堅持自己的意見者，甘地爲最顯著，他雖沒有參加會議，但他的意見在國民大會領導機關中支配的地位。真納會對美聯社記者說：「假使不獲甘地同意，任何協議將遭受重大損失。甘地對國民大會的演說，無異命令。」這說明此次「印回未能協議」的原因，是空理，律實等極力主張回教合作的意見，被犧牲了，而以甘地爲首的保守意見却控制了國民大會的行動。

不過，這並不是說「印回未能協議」就是會議失敗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必須注意以下兩個消息：

◎在理在十三日會說：「國民大會反對英納爭執各點，並不如印督的假設，其納拒絕合作，而魏非爾亦不讓步，所以未能協議。」關於英納所提回教同盟代表印度全國回教人士一點，他說：「魏非爾對立即認爲過激辦法也不贊同，反之，國民大會方面則仍願繼續進行磋商。」查理在十四日又說：「魏非爾總督的建議，是印督的多麼大的損失（他曾勸說印督接受尼赫魯建議）。」而若干國民大會會員都相信：如果魏非爾總督能在選舉之前接受回教同盟的解決主張，那麼國民大會對這點也可讓步。（見七月十三、十四兩日中央社西姆拉電）

◎西姆拉會議失敗的直接原因，在印督魏非爾企圖在行政會議委員會中，加入非回教同盟會員的旁聽者回教徒一名，回教同盟主席真納堅持不答。魏非爾在七月九日回答真納的信中說，他不能保證回教代表都是回教同盟會員。（七月二十三日英新開德德里電）

從以上兩則電訊看來，可以表明了會議失敗的另外一面，就是印督好像也參與了回教之爭，並且對回教同盟的要求，拒絕得比國民大會還要嚴厲些。約希曾在六月二十四日說：「如果我們不能夠立即彌補我國政治發展內部的裂痕，那麼魏非爾計劃也能成爲一個國套。如果在西姆拉會議結束以前，印地和真納的個別回教非爾商，代替了兩人共同去協商，那麼所有魏非爾的作爲，是以國民大會的要求對抗回教同盟，以回教同盟的要求對抗國民大會，而拖延到英國大選之後，宣佈會議因印人的異見而破裂。」這正是英國保守黨中的死硬派如亞梅利之流的手段。當然我們不希望魏非爾此次的作法就是如此的。

印度人民要取得政治上的勝利，首先必須自己團結，這是一個真理。如果深層的國民支配着他們的心理，他們一定失敗；如果支配着他們心理的是共同的愛國主義，那麼他們一定成功。如果分裂的猜疑指導着他們，他們一定失敗；如果指導着他們的是兄弟般的共同一致，那麼他們一定可以克服每一個障礙。（約希語）團結是勝利的關鍵，只有印度各政黨特別是國民大會和回教同盟的團結，才能衝破困難的局面。

失敗會遭受怎樣的後果？

西姆拉會議假如成功了，那確是印度人民的一大勝利。第一，完全改變目前英印關係的局面，而將大大有利於印度；第二，印督否決將成爲紙面上的東西，而不會是一種威脅；第三，印度民族領袖的第一件工作，將鼓勵並且組織全國性的自救運動，使印度人民充滿着新的愛國主義的精神；第四，印督將在國際間盡她獨立的作用。她可以同蘇聯，同新歐洲的許多國家直接發生關係，特別和中東的回教國家求取密切的友誼。而在遠東，則印度將以全部力量來參加對日作戰。「印度的團結，不僅將縮短對日戰爭，同時將成爲支持中國民主份子有力的正義者，他們正在民主的基礎上爲了中國的

團結而鬥爭。印度問題的解決，將加強解決中國問題的力量。」

但是，極不幸地，西姆拉會議終於失敗了，這當然不只是印度的損失，不過無端地首先是印度人民的損失。這將表現在：英督將讓步下去，危機會要加倍地生長，印度人民將失掉希望，他將繼續受貧窮、飢餓、疾病、壓迫。在國內，主權政黨的關係，將更惡化，意見對偏見，猜忌與誹謗，全國人民的心將變成迷亂和憎惡。而在各政黨內部，現有的傾向將趨強，而更加強英國保守黨死硬派在印發言人的聲勢。在國際間，則印度更將被人們所不了解，假使一九四二年八月，人們能夠對印度表示同情，那麼現在人們會說，結束英印僵局的主動權，不是在印度領袖的手裡嗎？

因此，印度共產黨呼籲國民大會和回教同盟必須團結，而團結的原則，應在互諒的前提下建立：

第一，應該承認國民大會是一個全國性的組織，不是印度教的組織，但也不是包括一切的全國性的組織，而只是印度教佔絕對多數的組織，回教同盟應把國民大會和印度議會大會分別清楚，前者是民主主義的，後者是沙文主義的。而國民大會不應要正式承認回教同盟是最代表回教的組織，並且要減少對回教同盟的偏見。

第二，國民大會要承認德賽——阿里罕計劃的基本條件，就是國民大會與回教同盟在行政會議中相同的席數，這可以使回教同盟消除對回教利益受損害的猜疑，而克服一切困難。

第三，國民大會和回教同盟也要同其他的小黨派協議，不要利用他們來作爲彼此抵抗的工具。

第四，國民大會與回教同盟對印督的否決權，以及行政會議向誰負責的問題要取得共同的態度。

第五，國民大會必須在各省府中與回教同盟合作，不要使回教同盟存着「中央是聯合的，各省則國民大會佔絕對多數」這樣恐懼的心靈。

第六，國民大會與回教同盟在最近的綱領上，成立協議，不能有損於回教同盟巴基斯的要求，使兩者合作地去進行大選。

印共這種意見，不只代表着他們一個政黨或者在印共領導下的幾百萬印度人民的意見，而是贊同國民大會與回教同盟合作的最大多數的印人的意見。

現在，魏非爾在他的計劃失敗後，又宣佈將於八月一日召開各省總理會議，並且擬說即將定期進行印度大選。同時，國民大會領袖也已明確表示放棄過去的消極政策，將採取積極的步驟，這是值得讚譽的。西姆拉會議失敗了。現在，由於英國工黨的執政，保守黨死硬派對印政策將被修正的時候，我們相信印度共產黨和查理等進步人士的努力，是會將掃除一切障礙，求得國民大會和回教同盟的合作，逐步地走上獨立自由之路，使印度在自由世界中挺立起來的。

匈牙利的土地改革

Z·拉音作

當蘇聯的紅軍，將匈牙利的國土從德國法西斯軍隊的手中完全清除出來的時候，匈牙利的臨時政府，就通過了一個土地改革的法令。這個改革的實現，應該成爲在民主的基礎之上，改造全國整個政治與經濟生活的一塊基石。消滅了匈牙利的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就開起了反動力量最堅固的根基，而這種反動力量是曾經在這個國家中佔過統治地位的。並且決定了匈牙利的內政外交的整個行程。同時它也就奠定了另一些力量的經濟基礎，這些力量一向是以侵略的傾向，而進行的。這對於多瑙河流域各地民族的和平與安全的經常威脅的。

土地改革，應該能滿足匈牙利農民多少年來對於土地的理想。在匈牙利人民的記憶中，永遠留傳着一位傳說的英雄多姆加·喬爾加的名字，這位英雄在十六世紀初，曾經率領着一枝有威力的農民軍隊，進攻過地主。多姆加的軍隊被粉碎了，匈牙利手把他坐在「火爐的寶座」上，但是在匈牙利農民的心中，爲土地而鬥爭的火線是永沒有熄滅掉。這個鬥爭經過了好幾百年，並且是匈牙利人民反對德國奴役者爭取自由與解放的鬥爭，緊相交織着。那些爲了出賣匈牙利的民族利益而從奧國皇帝手中得到大批土地的大貴族地主們，他們經常是站在德國人的一邊，來反對自己的人民的。

在一八四八——一八九九年的民族解放戰爭中，由科蘇特所團結起來的匈牙利農民，擊敗了由匈牙利地主所領導的奧國皇帝的軍隊。匈牙利的民族會議，當時就通過了一個將農民從農奴制服役之下解放出來的法令。可是在民族解放運動一旦失敗之後，土地仍然是在大領主的手中。地主們更將匈牙利的命運，和奧國哈布斯堡王朝相聯結起來，在一八七一年之後，又經由它和帝國主義德國的荷爾斯泰因三朝聯繫起來。

由於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東歐的封建反動力量和最強的帝國主義的最主要的堡壘——奧匈帝國崩潰了。同樣的嚴重的打擊，也打中了哈布斯堡王朝的主要的支柱——貴族的土地所有制。戰後的最初幾年當中，在奧匈帝國的廢墟上所興起的一些國家，會進行過土地改革，由於這

些改革的结果，一部分的地主的土地，轉移到農民的手中。而在匈牙利，當反動力量靠了外來的援助鎮壓了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的人民運動之後，大地主們還是完全保有着自己的大領地。

在此後的許多年當中，統治階級時常扮演一套「土地改革」的喜劇。但來安定農村中不斷增長的不滿。所有這些「改革」的結果，不過是將大地主的幾萬公頃劣等的土地，在極不利的條件之下轉移給小農民而已。

匈牙利的土地分配，是一幅大地擁有者佔有極高的比重，而同時又有着廣大數目的毫無土地的農民的情景。根據一九三五年官方的土地調查結果，全國土地的百分之四四·五——即四百七十萬公頃，是屬於擁有「百分之十」的——波爾德等佔〇·五七公頃的一萬六千個大農戶，而同時每隻具有接近五倍面積的土地的一百五十七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家小農戶，只有一百三十萬公頃的土地，這就說，只佔有整個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二二·六。六十二家地主的貴族領地，佔了大地佔有者的最大部分，他們總共有八十二萬三千公頃的土地。在這些大領地中，愛斯泰爾哈齊公爵的領地，是二十五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公頃，波爾德公爵的領地是十七萬一千五百公頃；卡爾·波爾德公爵的領地是十四萬三千八百公頃，波爾德公爵的領地是十三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公頃。一方面，二千六百八十八個大領主每家有一千多公頃土地，總數是二百三十三萬公頃，而同時在匈牙利則有一百八十萬無土地的農民和農業工人。假如我們把匈牙利的全部人口是八百九十萬人。那麼這個數字的意思就顯而易見了。按照官方的統計，在三百萬個農民，農業工人和佃戶當中，一百三十萬五千人是一「盡應用生活的」，但其中只有二十四萬人有經常的工作，其餘的都是在工，每年可有三個月到六個月的工作，而其中一部分，一般地並沒有固定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一部分的農民，移民到國外去，去地地是到美國去，但在大戰之後，這種路就斷絕了。農村的失業現象，成了農民的重災，這不僅影響了農業工人的工資，同時也影響了農業工人的工資。

大地主的不可救藥的統治，使國庫空虛，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舞地土在鄉村中，甚至權的主入。他們在憲法中，在法庭和地方自治機關中，都有他們的代表。所有土地的所有者和農民工人。是佔據着大地主階級在匈牙利狀態中的。在三十年代末時，在匈牙利的文學中，出現了一些「農村研究家」的著作。這些進步的作家，暴露出地主統治的野蠻和殘無人道，描繪出千百萬農村的貧民，制定了要走向體力的死亡和退化的無出路的路上去。

那些在割斷捷克，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的領土中失去大部分土地的地主和地土，他們就成爲帝國主義和掠奪民族主義的受害者（首先是斯拉夫人的土地）的狂烈的主持者。他們組織了和羅馬尼亞及希特勒結成同盟而來實現自己的計劃。匈牙利的封建主，也想像他們得到支持，來反對鄉村貧民的不滿。

希特勒在德國奪取之後，匈牙利的地主就推舉匈牙利法西斯主義的精神之父漢斯希德爾。從那時起，匈牙利的外交政策，就是完全順着軸心國家的路走的。大地主們的一個有力量的組織「匈牙利經濟協會」，就將匈牙利農業完全適應於德國戰時經濟的需要。地主們爲了將匈牙利的農民經濟的一切資源供德國使用，曾獲得了很大的利益。

近二十五年來，對於「赤化」的恐懼，更縮緊了匈牙利對於蘇聯的敵對政策。一九三九年，在蘇維埃烏克蘭西方各區中，救濟了波蘭大地主的土地，和將他們土地分配給匈牙利不羈的農民，這就引起了匈牙利的地主們更大的憤怒。

匈牙利的地主爲了想掠奪鄰邦的土地，就大展開種族論的說法。他們提出了一個要求，說匈牙利人應該擁有多瑙河流域各民族領有的領地。匈牙利佔領軍在希特勒德國的幫助之下，佔領了捷克，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的一部分的土地，並在這些地區中建立了最可怕的罪行。匈牙利的地主，又更動搖回二十年前在農民中開分了的土地。匈牙利統治階級，只有靠着希特勒德國的支持之下，才敢保住這些被掠奪的土地。這就是匈牙利地主的計劃，把自己的國家變成德國的一個最頑固的附庸國的主要原因之一。當一九四三年意大利退出戰爭之後，匈牙利統治階級中較爲現實主義的一幫人，就想退出戰爭，但是親法西的的大地主們阻礙這些企圖，並準備着希特勒份子來佔領全境。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得農民受到進一步的奴役。大部分的農民，都被趕進軍事化的勞動區，他們是在法西斯的農用者監視之下爲大地主工作，既

沒有工錢，只能得到一份吃不飽的糧食。憲兵和警察組織了對於那些「躲避」工作的農民的經常的狩獵。由於封建主們的請求，當時就建立了「農工」農工人的勞動集中營，他們就在法西斯監獄制度的慘無人道的條件之下，被強迫去爲地主工作，直到精疲力竭爲止。

領導人民反對希特勒份子的匈牙利民族獨立陣線，曾經在自己的綱領中，提出了急激的土地改革的要求。但是只有在匈牙利大部份的領土被紅軍解放了之後，才創造出實現這個改革各種條件。在臨時政府的宣言中，土地改革被宣佈是一個首要的任務。自從政府通過了和公佈了相應的法律之後，已經過了四個月。這個土地改革的法令的，是根據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所公佈的國家農民黨和共產黨兩黨案而完成的。後來這個草案，大體上也得到民族獨立陣線中其他各黨的支持。

匈牙利的土地改革，雖然沒收屬於法西斯，叛國者和戰爭罪犯們所有的土地，並採用收買所有的一切超過一千公頃和其他一切從一百到一千公頃的土地的讓與辦法，而後一類的領主，是可以保有一百公頃的土地的。所有這一類或是讓與的土地，都歸爲國家的土地基金。再在沒有土地和土地很少的農民以及大家庭的中農家中，將普通的價格分配開來。土地改革是款不應用於擁有二百公頃的農戶的。

土地的所有主從國家可以得到讓與土地，農業和出產工具的補償，但此補償的數目和方式，要日後再依照國家的財政狀況來決定。

按照土地改革法令所規定的，將近有五十萬沒有土地和土地很少的農民，可以得到土地。農民爲了他所分得的土地，應該付出一定的代價，或者是贖物，或者是現款，在十年至二十年當中付清。沒有土地的農民和農戶，在付款上可以享受某種特權。大地主的生產工具，完全交給農業生產合作社，公共聯合使用。

土地的改革的法案，對於匈牙利和封地民動力是致命的一擊。在臨時政府的法令中，對於土地改革與全國民主的發展的意義時，曾這樣寫道：

「消滅大規模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可以保證全國民主的改革去其未來的發展。將地主的土地轉交給農民，就爲多少世紀受壓迫的匈牙利農民，打開了一條走向政治、社會、經濟與智識進步的道路。」

自從土地改革法令發表之後，就開始了匈牙利農民爲土地而鬥爭的決戰的階段。在全國經濟崩潰並有着大量的荒蕪了和沒有種植的土地的情形之下，土地改革法令之遲遲的擬定，其本身已指示出了反對人士方面對實行土地

農業的在工運動，這個人去不讀者在農民族獨立陣線的幹部，也存在於它的內部。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農民，雖然自己的領地，不經過鬥爭他們是不會自動地交出土地。他們已經企圖用恐怖的方法，用撤離和撤佈語言的方法，對地主的領地，被請以真誠的經驗，籌備示威，吸引最廣泛的農民群眾來參加土地改革而鬥爭，這是它成功的保證。必須動員農民組織切實獲得土地的農民的最高組織。要迅速地區區成實現土地改革，在某種程度上要與農民獨立陣線的各民主政黨，來幫助農民組織和保護自己的土地。可惜地，就是這些政黨，直到現在還沒有作出為實現這樣一個組織的工作所必需的「切實情形」。現在大體任的責任都落在「農村需要土地委員會」的身上。這些委員會的責任就在於調查沒收和說明土地，並將其分配給需要土地的人的名單等等。

土地改革應該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完成。因此，它的實現的時期，是聯邦新憲法生效的時期和聯合的。政府的機關，已決定有組織地幫助無土地的農民來開墾荒地和耕種於沒收的土地。希特勒份子差不多趕走了所有牽引的牲畜，掠奪了所有的農具和肥料。這種種情形之下，農民和小農只有依靠了給與他們的必要幫助的條件之下，才能處理他們所分得的土地。反動派和法西斯份子的高公行的殺傷和剝削被留在田裡沒有收割，而同時各城市和各工業中心的居民則挨餓。毫無疑問地，就反對全國實行民主的進入，他們想利用土地改革和耕種工作重工的方法，來更加惡化農村貧困的狀況，而同時還把這種責任加到全國的民主力量身上去。因此敵人的這些企圖，是必須及時地粉碎的。

匈牙利農民的進步階層，他們還是保持着他們祖先在拉科奇和科薩特維爾之下的反德鬥爭的光榮傳統，他們是憎恨德國奴役者的，他們從實際中已經確信了科薩特的對外政策的正確性，就是保證和參與河邊邊的各民族和平與友愛的關係，來進行對德國侵略的鬥爭。因此，在大地主和農民之間，不僅在內政問題上，就是在外交問題上，都有着一條分水嶺。一九四四年時，大部分的大漢土和希特勒份子一齊逃走了，而同時許多被動的農民羣衆，則留在被蘇軍所解放的地區。自從蘇軍到達之後，匈牙利的農民從自己的經驗中已經確信了一件事，就是由於愛自由的各列強，首先要感謝蘇聯，他們才得到了自由和獨立，並且還獲得了土地。

土地改革的實現，可以使匈牙利人民解脫了封建反動的壓迫，並為全

國對內對外政策的民主化，準備好一個先決條件。和波蘭及羅馬尼亞的土地改革並列地來看，在匈牙利消滅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這是在於消除法蘭斯影響，保證東歐各民族之間的和平關係的事業上的一個巨大的供獻。匈牙利消滅了反動的政治力量，和推翻了它的經濟基礎，同樣地也將它和左派各民主國家（這些國家已經實行了分配封建領地）之間的一個障礙消滅掉。因此，為了建立各河流域各永遠敵視的民族的良好關係，就創造了許多重要的先決條件。匈牙利堅立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它將會在歐洲各民主的民族中，得到它應有的位置的。這正是匈牙利土地改革，引起了德國法西斯及其全世界的應聲而起的狂叫的原因。同時也正因為這個原因，它才得到了所有民主進步的擁護者的同情稱讚。

（蘇聯自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第七期的俄文「戰爭與工人」）

代 郵

任明、林若冰、徐萌、張海諸先生：

承蒙及「國民黨反動派進攻陝甘寧邊區我黨內戰的真相」，我們曾在本期「讀者之頁」有所答覆，因查閱關係弄不出來，深感遺憾。

邊區報告

在模索試驗中成長的楊家灣小學(下)

陶端予

四、家長、教員、學生一條心

這樣一氣成天和泥土瓦片做朋友，打罵成性的娃娃們，怎樣帶法呢？在試驗中成功的根本辦法，就是使娃娃懂道理，使娃娃們的自覺心，要娃娃服從道理，而不是服從教員或家長，明白教育是爲了自己好，這樣就可以作到教員學生一條心，學校就好辦了。

常常上課的時候，還有娃娃在調皮，小先生一提醒：「學下本事是自己的，學不下，自己吃虧！」

跟娃娃說道理，就一定得耐心。一天，小珍珍找到教員後樓，頑皮的告訴說：「我把淘兒美美的搗了兩拳，誰讓他碰我來！」就是說，使娃娃敢於在教員面前大顯其鋒，說心無話，教育才會有下效。娃娃受了心悅誠服。至於在課堂上調皮，就更得耐心了。既然有單刀直入的教訓，教員就得放下架子，和娃娃們討論，徵求他們的意見，在娃娃的反映中，也有時會發現教員的疏忽或缺點，教員就需要修改或修正自己，只有這樣，才能求得教員和學生的相互了解，互相幫助。

家庭是娃娃生活的主要天地，所以配合並爭取家庭共同進行教育又是必需的，這項工作前面已述及，實際效果如何呢？

有個叫羅如的娃娃，寫字運動計劃總不能完成，一次在他家裏，媽媽向教員述說羅如的種種調皮，正談着談着，羅如在邊堵牆耳熱叫起來「得啦！得啦！以後再不放了。」原來他自己也羞得再也聽不下去了，於是教員就說適合情形進行談話，從此以後羅如的家庭計劃就完成了，爸爸媽媽告訴教員說：「從那以後，羅如進步了！」

就是說：使家長的心意，娃娃的全部活動，和教員的教育相結合，這樣就可以得到家長、教員、學生一條心，大家一齊辦學校了。

在上面的基本精神下，還採取了一些別的方法，這些就是：——

鼓勵與批評，舉行獎勵好學生，獎勵優點，鼓勵每一微小的進步，培養娃娃的上进心。同時作隨時的批評與幫助，不使小錯成大錯，在批評中勉勵進步。這一點對羅如的特別重要，因爲他常常不習慣用道理來約束自己，如八歲的招弟，雖然已高過了自己愛哭高馬的氣，但總是因不得要犯，一哭正和哥哥吵架，教員來了，說「招弟厚娃娃，誰敢說，一定不哭，誰道理！」雖然已淚水盈眶了，馬上低下頭去，忍了一會，以後就改了。在時間中進行批評，對改過從新，更爲有效，在每次整頓學生時提出他們的缺點，使好學生也不斷進步。

耐心、說服、獎勵，以上這一基本精神和步驟，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拉攏的，教員內容上一定是嚴肅的，道理一定要說明，那個道理要從何處說，有了前頭的基本，並不會造成教員和學生之間的隔閡。例如：來往常立教員嚴格的檢查寫字時，因寫字慢了甚至哭起來，可是不一會就又能又說說來我教員寫好的東西，原稿拿在紙上反省了自己的缺點，正如對策一次對教員說的：「有時候你罵我的厲害，可是不理，因為我寫慢了，以後就要改改了。」

這些方法，在開始時，是得不到擁護的，那時，黃森身每天從四時八方消來家裏的話，「教員說得對，看把娃娃信的了！」「小娃入了學，女娃入了學，一定要好，要學！」可是學校的學生都是日益增多的，珍珍是南區娃娃，到北區楊家灣來走親戚，就住下上學了，她外祖母在一次會上說，「真是看到這點，這的來，大人放心，娃娃高興！」

這也是接受羣衆意見的一點經驗。

娃娃帶娃娃，這更多的娃娃，只有一個教員，「小先生」就非常必要了，開始大娃娃怕課，小娃娃不服氣，只有採取隨時的或利用接近關係，因定幫助的辦法，同時，着手小先生教育，獎勵互助精神，以大家的學校大家

辦的這團團結了一部分好學生，和學生選出的競賽委員、組長、衛生委員、娛樂委員等，漸漸，他對於學校有了主人翁的責任感，成了學校的中堅，他們能幫助管理學校，代教員上課照顧小娃娃等等。

教員去開市文教會時，在半個月的會期中，娃娃們自動到學校去學習，請天時，也照舊站隊檢查衛生，大娃娃們自己學了三十來個算字，記了日記，學了寫信，還教了小娃娃，一次架都沒有打。這種小先生的精神不僅限在小先生們身上，又是全校性的教育，這樣就可減少不少的糾紛。例如有一次，七歲的白旺波六歲的霍五兒打了，正想打，忽然想起教員的話，含着眼淚，反轉身去說：「好娃娃，不打人，你為什麼打人？」大家都笑了，兩個人也笑了。

個人計劃，大家競賽，訂計劃，更能使學習，工作，勞動成爲娃娃自己的事，提高娃娃的自勵性。計劃的內容包括着：家庭勞動，學習，學校工作，衛生，社教等等，計劃是根據家庭的情形，家長的意見，由娃娃自己提出，教員幫助訂的。又依其娃娃各有不同，娃娃的能力不同，優缺點不同，計劃也不同，如小娃娃做不了大事情就訂打掃蠅，不尿床之類的計劃，調皮娃娃就訂聽話的計劃。

進行競賽的目的，是爲進行經常的比較，督促娃娃經常關心自己的進度，以或完成計劃的熱心，執守中避免一度緊張而致缺乏的毛病，競賽又可分爲兩類：

(一) 全體競賽：以全體共有的缺點爲條件，分期進行，如這一時期就競賽衛生，下一時期，這種競賽不能經常舉行。

(二) 分組競賽：以條件相近的娃娃，按需要來舉行比賽，往往是以個人計劃來做條件的，必要時教員也可參加，來往紅綠的學習都很好，但常因這起彼落，督促批評都沒結果，於是教員向紅綠提了職，條件是：一，起早。二，勞動好。三，不哭。請來賓作評判。競賽開始了，第二天，天還黑着，來娃就在教員的門前叫了起來，「阿姐，這回我可把飯後定定了！從此，每早，教員學生互相檢查，一時養成了好多娃娃早起勞動的習慣。」

計劃由教員每日檢查，牆上又有競賽表，以飛機、馬、雞、鴨、牛、羊、蠅等爲標幟，定期結束，檢查的標準是以進步爲主，因此人人都有機會被選爲「飛機」，假如大家都有進步，就可以不「選飛機」，消滅「蒼蠅」。

五、摸索中的幾種教學法

隨着課程的進行，也摸索一些教學的方法，試驗中有失敗的，也有成功的，現介紹一下幾種有效的方法：

一、聯系實際的方法

教字時，先舉實物，實物不便則畫圖，然後再教字，課則先舉具體事實，講解內容，然後再教文字，如教識字時，先說識字的好處，之後就本莊識字情形，以啟求願識字的興趣，成二次和蝦火嫂爲具體實例，引出：「高家二大頭家嫂，打條求人到處找，決心識下一千字，不用人前去央告」的句子。當然也看看情形實際應用，不一定都刻板這樣做。

又如學算術，教度會衡，先買幾塊布、幾斤糖，請秤，以後再學罷法，學九九表，算算錢，都先買幾塊，後學口訣。這過程如下：先學算數，定位、口讀用「上」「下」「去」「進」等字的解釋，在算盤上自然會作四則一的記法時，也就自然會用記法讀出「一下五去四」的口訣。這就是說，學的過程是先聽、再寫、再認、再用。這樣學得記憶極其容易。

在實際中進行學習，是很好的學習方式，會多練了幾句，氣喘吁吁，海政府過公樂時，就學認大秤，學了之後，到賣菜中實際用，又是教開放戲的最好的辦法，如發覺娃娃回家去認賬，打條，寫幾張單中於讀報紙，參加會聽歌記錄等。

這舉附帶說一下聯句的方法，最初，由教員讀，學生聽，慢慢，由字做題目，根據時間和學生的程度進行練習或口述的練習，如自讀、寫字、背誦他們，句子、文章，就是話的記錄，寫信就是在網上講話，信信了信信是以後的事，急練說的，急練想的，就定稿寫，寫完以後讀，讀了以後，再依附說話來改，這個方法訓練的效果如何呢？可以看看上列的幾個月後，兩個個原不識字的娃娃寫信：

「阿姐：我信上及天天起早每樣都聽了，衛生很好，學生不用檢查也很好，這幾天，杜家灣小娃娃動的人秋收，很忙，沒來上課，學校人很少。」

再看他們造的句子（一組的）：

「夏天來了，橋頭邊的一個人給我送了像，記得那個時候，白楊花開的很香。」

既然說文字就是話的記錄，方言問題就發生了，一次教員教了一個氣字，學生都讀做「氣」，原來地方話不稱做「氣」。又如教員說：「不管誰來都可以。」

五、時間的分配

休息時間，每天規定下午休息一次（熱天兩次），下午休息一次，假如...

六、集體教育和個別輔導

查初學時當要個別輔導，以後轉入集體教育，但個別輔導還是必要的...

六、介紹幾個小朋友

經過試用以上的方法，大半年來，許娃娃在不斷進步中，一組全組的...

許娃娃在不斷的進步中呢？現在從他到中間請出一位小代表來...

「小先生！小先生！」

真旺雖然學得好，但是對嚴勞動，天天對媽媽發脾氣，罵媽媽是「老...

再請出一位眼晴紅的...

再請出一位眼晴紅的，日漸爬上我的小代表。...

粗長空，像看調皮討厭不？」當首明白了，對教員說：「調肉肉討厭，替去真不易，我吸操心學好呀！」教員又給了他安慰和鼓勵，從此文富貴又繼續他的轉運道路了，現已受了兩次獎勵，家庭勞動也好，現在富貴已懶得教員是爲了自己替，雖然有時教員嚴厲的指出他的缺點，但在回家時常常明快的叫聲：「楊祖祖了再見！」

七、走出了學校的圍牆

在這樣一個缺少文化的鄉下，立起了一座小學校，住下了一個教員，他河應請教員做更多的事，做什麼呢？幫助一點行政工作嗎？生產工作嗎？開辦耕種嗎？甚至帶着娃娃參加城上的會議，做小招待員，燒水，送茶，勞動英雄的花籃等，他們都會做過。但是，更適合他的能力，時間，終於被認爲是社會工作的主要任務，這是教員的工作和衛生工作，通過這些工作來和社會結合。

先看看活潑在楊家灣的小先生吧！七月間，縣政府要在楊家灣開辦識字運動，於是學校配合着發動了這一工作，教員領着學生娃娃在村上寫傳單，按戶貼字片，實行包圍。先生，於是兒子教爸爸，妹妹教嫂嫂，愛女要求媽媽識字，小女子教鄰居，大家學子教工人，一時楊家灣的十個娃娃都參加了這一工作，最可愛的是在莊裏，却因不識字愛子之心而識字了，兒子還給媽媽訂了計劃，小弟弟兄弟二人給五十多歲的爸爸一個月教了五十多字，從前莊到後莊，一堆堆識字的人羣，牆頭門上的初學者的字跡，風塵坊車上的識字片，開會前後的比賽，連最落後的角落裡十來個娃娃都被掀起了，造成了當時普遍的羣衆識字潮，這羣小先生是有着功勞的。

雖然因爲其他因素，楊家灣識字運動，屢遭一擱再擱而中斷，但工作的熱心是始終堅持的，到了冬學時，他又出來解決了困難。因爲羣衆的生產條件，住地的分散，時間的不一致，尤其是羣衆，很難集中學習，但除了一個教員外，無其他成人教員，於是選擇了四個成績可靠的娃娃，按他們的住地，生活條件，協助了這一工作，教員來領導檢查，幫助解決困難，他們教兩個的，三個的，一組的。

劉錫在前莊教了一個婆姨組，教學耐心，環講求方法，心悶的寫字不更，儘不要求太苛，還鼓勵她，物質困難的，送給她本子鉛筆，識字，教條子，還唱歌，非常打氣。教員去教衛生課時，他也熱心的學習着衛生常識，可是幾場大雪之後，在從他家到上課地點的路上，晚上，狼嚎常出來，於是劉錫找了個鐵盆以壯胆，常在深夜時聽到一陣敲鐵盆的聲音，由近而遠了，那就是劉錫的婆姨組下夜學。婆姨說：「識不下字，對不起我們劉錫。」教員呢，也在這工作中跟羣衆互相學習着，認字，讀報，唱歌，學條子

以部發重新登記證警字第肆捌陸伍號

，該工作，按家當。正桂香說的好：「從前你不知道的事，現在你學會了，我從前都識不下字，現在也多少都識下了！」

衛生運動呢，開始是配合鄉政府的號召，教員學生帶上掃把，鉄錫盆和全村的大掃除，及至全村的衛生運動發動起來以後，要堅持下去，還不讓勞動，就須組織起婆姨和娃娃，經常負責這一任務，於是在學校中進行訂計劃，按能力劃出：打蒼蠅，掃院子，燒開水，拆拆洗洗，築毛坑等工作，並發動每個學生對他家庭所負責的區域（全村依家庭劃分衛生區域）進行清潔衛生。夏天，每天早起都到山上，山下城裡城外，每當教員陪帶衛生組長檢查衛生回來之後，都圍着問：「我家衛生還有那點做的不好，告訴我，好改！」對他家庭的衛生已漸漸有了責任感。六月底，楊家灣村選出了三個衛生模範家庭，其中有兩個學生是起了決定的作用的。

漸漸，不僅對他們家庭的衛生有了責任心，對全村的衛生也熱心關照，如衛生小組長和教員工作忙時，或開會去了，他們自動的在村上檢查衛生，督促勸說，還親自動手幫助，回家向教員彙報提意見。

爲了羣衆的需要，教員在中央總衛生處幫助之下，預備了一部份日藥藥品，學習着幫助羣衆解決一些疾病上的小困難。

經過這些工作，學校和更多的羣衆的需要相結合了，這也是一個鄉村小學校無旁貸的任務，也只有這樣才能有更廣泛的羣衆基礎，才能辦得好。楊家灣小學，就是在這樣的摸索試驗中成長起來的！（完）

羣衆

第十五期 第十卷

三十四年八月五日出版

編輯者

羣衆雜誌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總經售

新華日報館

本刊價目

本	期	零	售	六	十	元
本	六	三	期	百	六	十
本	十	二	期	百	五	十
本	廿	四	期	一	千	二
外	埠	郵	費	在	內	加

本明零售小元

羊 群 衆

第十卷 第六十期

目 要

新時代的黎明(社論)

毛澤東爲美共復黨覆福斯特電

三十四年第二季大後方經濟

論所謂「舉其功於一役」

論民主

如何進行農村調查

晉察冀行進

許滌新等

沈友谷

索柯洛夫

立 人

周而復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



羣衆第十卷第十六期目錄

新時代的黎明(社論)

(特稿)

毛澤東爲美共復黨與福斯脫電

專論

論所謂「舉其功於一役」

論民主

沉鬱悶熱的氣候

明天的憧憬解救不了今天的苦難

旱災威脅着大後方的農村

驚濤駭浪的金融市場

論糧產與糧價

如何進行農村調查

解放區報告

晉察冀行進

讀者之頁

關於建設資本主義化的農業

撒旦的歸還撒旦

絕望者的瘋狂

哭笑之間

結婚登記(木刻)

(五四六)

(五四八)

沈友谷(五四九)

索柯洛夫(五五四)

許滌新(五五八)

卓芬(五六二)

念良(五六九)

劉芳華(五六九)

秦彌堅(五七四)

立人(五七七)

周而復(五八一)

編者(五八四)

蘆蕪(五八〇)

蘆蕪(五八五)

荀寰(五六八)

古元(對面)





新時代的黎明

經過一番苦戰，在歐戰中，中國人民已經手觸到晨曦的曙光了。八年的苦戰，在歐戰中，中國人民已經手觸到晨曦的曙光了。

曾經在華北世紀以來，這道迫近我們的日本帝國主義，曾經在八年抗戰中使得中國人民遍體鱗傷，流盡血，流盡腦髓，現在終於在中國人民面前，在火與血的洗禮中，回過頭來，八年來艱苦的路程，真是充滿着大地的呻吟，人民的眼淚，善果者的受難和戰士們不屈的抗爭；今天，法西斯日寇終於被逐到最後的勝利，誰能阻止住人民的高呼：誰又能抑制住真心向歡欣。

中國人民在歐戰中站在歐戰的日法法西斯侵略者的面前，接受無條件投降，爭奪這苦難，半世紀的屈辱，今天是翻過了。勝利不是倖政的，中國人民所獲得的勝利的果實，是用自己的血肉來灌溉的，在前方他們奮身草野，擊退沙場，在後方斷手斷足，流汗流血，千百萬人民犧牲了寶貴的生命，換得了民族的再生，光榮啊！這些為祖國新生而倒下了的英魂們，光榮應該屬於你們，在祖國的新生中你們已經貢獻出自己最寶貴的一切了；中國人民將永遠敬愛你們的英魂，追憶你們的犧牲的。

勝利不是倖政，勝利的光輝是由中國人民的血淚所鋪築成的。

歐戰和上海的砲聲標誌出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中國人民從屈辱和苦難中甦醒來，對半世紀來壓迫中國人的強盜喊出了復仇的心聲。揮出正義的拳頭，這種壯烈的鬥爭，在今日稍一回想，仍然是恍如隔日，記憶猶新的。我們的武器是簡單的，但意志却是昂揚的，我們清楚面對的是一個武裝到了牙齒的兇橫的敵人，但我們却抱着正義終於戰勝的必然信念。從一九三八年武漢廣州的失守為始，戰爭步入了一個更艱苦的階段，中國戰場的形勢也起了

基本的變化，抗戰的主要負擔落在敵後戰場的廣大羣民的肩上了。從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起，敵後戰場就承擔了百分之五十五以上的在歐戰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傷亡，負起了抗戰最艱苦的主要任務，這八年來敵後羣民艱苦奮鬥，抗戰的勝利是離不開他們的。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中國的抗戰再不是自己孤立的奮鬥，而是同盟戰爭的一部分了。中國人民雖然得到了同盟作戰的聲援，但因為全世界規模的反法西斯戰爭的統一戰線，同盟國作戰的力量先其集結在歐戰戰場法西斯的力是；東方戰場的主要任務仍然是落在中國人民的肩頭上。當德國法西斯的命運已經確定了英美盟軍，特別是美英盟軍的注意力就逐漸轉移到遠東方面來。去年夏季馬里亞納一役，標誌出一個轉機。

德國法西斯的場合註定了日寇必然失敗的命運，法西斯的兇鬼其惡夢中只剩下日本法西斯在作垂死的掙扎了。

日寇法西斯雖然註定了必然失敗的命運，但是仍不甘於這種死亡的命運，歐洲戰事待東面同盟國力量優勢的優勢，雖然已經增加，但這種力量優勢還是在的，而沒有馬上轉變為現實的力量，同盟國兵員的調動、裝備、軍械、糧食的補給運輸還需要相當的時間。蘇聯雖然宣告了廢止蘇日中立條約，但還沒有正式對日宣戰。日本法西斯就利用這一時機進行其垂死的掙扎，正因其垂死，因此，掙扎也就愈為瘋狂。一方面以頑強的掙扎來進行討價還價，一方面儘量的企圖挑撥同盟國間的關係，希望覓致一個廉價的和平，希望維持對法西斯的體制，軍備和工業力，從而為法西斯的復活準備下未來的基礎。

然而，霹靂一聲，日本法西斯不能不從幻夢中驚醒了，八日，蘇聯對日

宣戰，蘇聯的參戰杜絕了一切日本法西斯的夢想——揚揚盟國關係，奪取一個廉價的妥協的夢想。

許多，破碎了；如果說波茨坦的對日的無條件投降公告發表時，日本還想裝腔作勢的討價還價的話，現在是決不能不破滅了，投降後問題雖然還很複雜，但投降的原則已經為盟國所接受了。

我們歡欣，我們慶幸，然而我們如果沈心靜慮一想，我們就會感到我們的兩肩仍然負着沉重的担子。我們贏得了戰爭，我們還要贏得和平與進步的。

路，仍然是很艱險的，迂迴的；我們得到了勝利，然而，我們仍然不是一個民主和團結的國家。中國人民半世紀的苦難、屈辱，八年的揮汗，灑淚，千百萬人民的流血，犧牲換取了勝利，我們用盡精力來保衛我們所取得的勝利的果實不致竊取，要怎樣才能建立起民主、自由、獨立、富強的新中國。民主世界的大家庭裡決不容許有任何變形擬態的法西斯存在，一個民主和平的世界也決不容許有一個倒退分裂的中國。新的世界要求一個新的中國。

，新中國的道路還需要我們的繼續奮鬥。

敵人雖然投降了，但負隅頑抗的情形却仍然存在，今天，我們必須立即承認一切敵偽解放區的抗戰軍隊，和敵偽政權，展開聯合作戰，消滅敵人的頑抗。一切敵偽的部隊必須限期在一定時間內，向當地抗日軍隊放下武器宣佈無條件投降，如果有拒絕投降，執予以堅決消滅，只有當全中國境內所有敵偽都已經放下武器，實行投降，才能算作投降的完成。

對於一切偽軍，我們要限期立即解除投降了。期立即解除其武裝，決不能容許任何兩面三刀番號一掉又算抗戰「英雄」。他們過去已經放棄了無效反日新的機會，今天決不是猶豫捕身一變可以洗清自己的罪惡的。對於一切漢奸傀儡，我們應馬上搜集他們的罪狀和名單，公開發表處置成冊以便人民公審，「漢賊不兩立」，對於這些漢奸，傀儡任何假藉、縱容、寬是對於百萬英雄死難的人民的罪惡。

一切國內民主的力量應加強團結，要求政府立即採取民主措施，實現國內民主的團結。中國人民贏得了戰爭，中國人民也一定要贏得和平與進步。

啓事

本期「兩週評論」題為：「是美國人民說話的時候」。評述美國現行對華外交政策，指出反動的綏靖——孤立主義份子執行的外交政策之違背美國人民意志；而且，是要把中國引到內戰的道路上去。因審查關係登不出來。此外登不出來的還有「根絕獨夫民賊的反動思想」，「沉渣的泛起」，謹向作者讀者致歉。

毛澤東同志祝賀 美國共產黨復黨特電

美國共產黨在改為共產主義政治協會十四個月後，現已重新建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特別大會曾於上月二十六、二十七及二十八日在紐約舉行會議，決定重建美國共產黨，通過新政綱並推選羅斯特為該黨全國主席。在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這次集會以前，羅斯特曾致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已去電申賀，下面是毛澤東同志覆電及羅斯特同志的來電：

毛澤東同志覆電

羅斯特同志及美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欣悉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特別會議決定拋棄白勞德同志的修正主義——投降主義路線，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方針重建美國共產黨，我們對於美國工人階級與馬克思主義運動的這個偉大的勝利，謹致熱烈的敬禮！白勞德同志在其過去工作中，對於中國人民的鬥爭曾經有過許多可感謝的幫助，但是他的那條機會主義——投降主義路線（這條路線充分表現於白勞德同志所著「德黑蘭」一書中），本質上是反映了美國反動資本集團對美國工人運動的影響，這個反動資本主義集團現在也正在力圖擴大其影響於中國，贊助中國國民黨內反動集團的錯誤政策，使中國人民面臨着嚴重的內戰危機，危害中美兩民族在戰爭中與戰後的利益，美國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美國共產黨人反對白勞德同志修正主義——投降主義的勝利，大會對於中美兩國人民目前進行的反日戰爭及戰後建設和平民主世界的偉大事業必將有重大的貢獻。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七月二十九日

羅斯特同志來電

毛澤東同志：

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定七月二十六日於紐約召開特別會議，其中中心議程是摺斥與糾正修正主義的白勞德路線，採取馬克思主義方針，重建共產黨並選舉新的領導機關，如承惠教，深引為榮。

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主席羅斯特

七月二十四日



論所謂「畢其功於一役」

沈友谷

一 問題的提出

中國必須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後狀態中解放出來，向前進步。但以怎樣的方法，怎樣的步驟向前進步呢？

首先，必須徹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爲什麼說，這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呢？因爲，「這個革命的對象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而是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這個革命的一切設施，不是一般地廢除私有財產，而是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產；這個革命，將爲資本主義掃清道路，而使之獲得發展。」（毛澤東：「論聯合政府」）徹底地完成這個革命就是使中國脫離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而大大地向前進了一步。

爲什麼這是大大地向前進了一步呢？因爲消除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就是在政治上實現民主，使中國人民能夠過自由的生活；就是使中國社會生產力獲得解放，使中國人民能夠過繁榮的經濟生活；就是消滅封建落後的文化生活的基礎，使中國人民能夠從愚昧、迷信、守舊的老習慣中解放出來。

只有在徹底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以後，才能漸漸產生定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可能。在社會主義概念中必須包含着廢除私有財產的屬性，一切生產手段——包括土地、工廠等等，都爲全體生產勞動者共有。社會主義當然不能容許資本主義制度之存在，不能容許依靠剝削而生活的資本家，而要使一切生產品根據「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按勞分配。假如這不能做到一般地廢除私有財產，消滅資本主義的階級關係，實現生產手段的社會公有制，那就不能說是社會主義。在中國現狀下，還沒有可能一步走向廢除私有財產，消滅資本主義，因此實現社會主義就不是當前迫切的任務，而是

在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相當時期以後的問題。

但是有人不贊成第一步，完成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然後，第二步走向社會主義這兩個階段的步驟。他們認爲，不必分開兩個階段，二者可以并進，可以「畢其功於一役」。就是說，目前中國就可以走向社會主義。

有不少人自以爲振振有辭地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只有政治民主，而沒有經濟民主；假如我們現在提出發展資本主義的任務，那就等於中國的民主性不全。所以實行政治民主，必須同時實現經濟民主，也就是同時實行社會主義。」——他們以爲，把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畢其功於一役」，也就是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和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畢其功於一役」。

在這種說法中，包含着很多錯誤的觀念。對於這些錯誤觀念略加分析和解釋，是必要的。

二 什麼叫做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

如上所舉出的這種說法，在本質上是由於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誤解和曲解而來，而這種曲解和誤解又是由於沒有明確認識近二三十年來的世界形勢的發展而造成的。

近二三十年，在西方各資本主義國家內，經濟危機曾表現得異常尖銳。定期發生的生產過剩的恐慌、巨量的失業飢餓的羣衆的存在，這些事實已無可掩飾地表現着資本主義的病態。贊成資本主義的人也不能隱瞞這種事實，所以他們就說，資本主義社會雖然已經實現了充分的政治民主，但是沒有經濟民主，一切病態都由於經濟民主的不健全而來。

另一方面，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崩潰的暴烈相對照着，近二十多年來，社會主義社會在一個國家中不斷地繁榮向上發展着。反對社會主義的人會竭力想把社會主義國家，描寫成是一種專制主義的，獨裁主義的統治。但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沒有經濟恐慌，沒有失業現象，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人民日益更趨過富裕的生活，這些事實也一天天更加顯著，就是反對社會主義的人也無法抹煞了。於是就有些人說：社會主義社會確實實現了經濟民主，那其他的成功，但是政治民主却沒有做到。這話的意思雖然就是：在資本主義中所沒有的，固然可以承認在社會主義中是做到了，但是在社會主義中所得有的，却也還得到資本主義中去找。

這種說法，歐美資產階級輿論中常可看到。中國的有些耳食之徒，聽到這種說法大驚。他們說：我們現在所做的事就是既採資本主義之長，實行政治民主；又要採社會主義之長，實行經濟民主。所以我們所做的將是關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二者之上。——這種論調所含有實質內容，我們將留待下面再去分析，現在我們先要指出，由這種論調看來，其實他們是既不懂得社會主義，而且也不懂得資本主義。

要知道，資本主義不僅曾經建立了一種政治民主，而且也曾建立了一種經濟民主；社會主義也不僅有經濟民主，而且也有政治民主。不過資本主義的政治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政治民主不同，資本主義的經濟民主也和社會主義的經濟民主不同。二者各有各的政治民主，也各有各的經濟民主，並不是這像有這樣，那時有那樣。因此就不能從這以而抽出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抽出經濟民主來，拼湊在一起。

假如說，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經濟民主是表現於一切生產手段和生產產品的公有制度，表現於任何經濟上的剝削關係的廢除，表現於人類在生產過程中合作互助的關係，那麼正是以這種社會主義的高度的經濟民主為基礎，實現了社會主義的高度的政治民主。從蘇聯的憲法上，我們也可以看到高度的經濟民主，也可以看到高度的政治民主。在蘇聯，真正實行了全民普選，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暗中阻止人民自由意志的表達；在蘇聯，真正根據民族自由與自決的原則，消滅了任何民族間的歧視，使任何少數民族都得到了自由；在蘇聯，真正實現了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信仰的自由，以一切必須的社會物質條件來保障這些自由，不僅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名義上的政治自由會因為某種物質條件（如印刷工廠，集會的廳堂）為資本家所控制而不能充分實現。——因此，以為蘇聯只有經濟民主，沒有政治民主固然不對；而若以為蘇

聯有和資本主義國家同樣的政治民主，只多了一點經濟民主，也是不對的。社會主義使國家政權為全體生產勞動者，也就是為全體人民所有，因此就能實現高度的政治民主，並且以這高度的政治民主保障了高度的經濟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的力量已在這一次反法西斯戰爭中最輝煌地表現出來了。

我們回頭來看資本主義社會。從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上看，它的確曾經打破了封建時代的等級制度的和專制主義的政治，創造了一種政治上的民主。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建立了代議制的國會和自由的輿論，使過去在政治上沒有發言權的人民現在開始有發言權了。和這種政治上的民主相適應，資本主義也創造了一種經濟民主，開闢了自由的市場，消滅了在生產過程中以外來控制生產的特權勢力，使自由競爭的生產制度成為可能，同時使勞動者不再是在人格上依賴於主人，生殺由人的農奴，而是獨立的自由的雇傭工人。……這些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民主。由於這種經濟民主的實現，就使得社會生產力從封建束縛下解放出來，大踏步地前進。但這種經濟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相比，顯然要殘缺不全的。工人雖免除了人格上的依賴，但因為他們沒有生產手段，仍不得不在經濟上依賴資本家，忍受資本主義的剝削，或被隨時提出工廠，落到敵人的深淵中。在生產上的自由競爭，雖在一定程度內起了提高社會生產力的作用，但由於資本主義經濟的殘缺不全，有利於大資本家，終於漸漸趨向了壟斷階段。社會財富集中於少數大資本家之手，他們有力量，能令個大人民的經濟生活。這是在資產階級階級下的經濟民主的必然的趨向。由於這種殘缺不全的經濟民主，也就只能產生殘缺不全的政治民主。倘以為資本主義社會中已有完備的政治民主，那無疑是對於政治民主的實質與基本上只是保障了資產階級。廣大的工農階級的民主是受着種種有形無形的限制的。

從高度的獨佔資本主義中終於發展出了法西斯主義這怪物。於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從內容到形式，完全消滅了。獨佔金融壟斷，直接運用國家的權力機器，統治全國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所以當反法西斯戰爭中和結束以後，在資本主義世界中不能不產生如何過渡到新的形勢問題和擴大民主的問題。這並不是原有的政治民主已很充分，只要外加上經濟民主就可以的問題。因為任何程度的經濟民主的改善都必須影響到政治民主的某種程度的改善，并以政治民主上的某種程度的改善為保障。

以上所說，都是常規範圍以內的事情。但就山道些，已可說明一定形勢

的政府民主必然地和一定形體的經濟民主相聯系的。所以以為實行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就是像英美和蘇聯之長，那是異常荒謬的說法。

三 不民主的經濟和政治

中國現在既需要經濟民主，又需要政治民主，那末沒有入能否認的事，因為沒有一定形體的民主就不可能建立一定形體的經濟民主；而沒有一定形體的經濟民主也將無從保障一定形體的政治民主的。——這並不是「舉其功於一役」論。因為主張「舉其功於一役」的人并不深究目前所需要的是什麼形體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不去認真檢討現實的情況，從現實出發來提出問題，却以社會主義的空論來自娛，以為實現經濟民主就是意味實行社會主義。

但我們必須從實際出發來看問題。

從實際上看，我們只能斷言說，我們現在無論經濟、政治和文化上都沒有任何民主。我們處於地產階級民主社會更落後的情況中。

從經濟上看，現在廣大人民毫無財產的保障。最大部分的人民以農業勞動為生，但土地并不歸農民所有。農民雖已不是農奴的身分，但由現行的租佃關係中可以看到，地主對於農民保有一切經濟特權。在租佃的期限上，農民得不到絲毫保障，地主有權隨時退佃，租率不僅極高，而且往往是由地主隨時自由地決定農民的租額，以致農民沒有一點積蓄來處分自己辛勤勞動的所得。還有數量也極多的手工業工人，他們也同樣在超額的剝削下生活，在各種手工業作坊中還普遍地存在着人身羈系的關係，像盤纏立的手工業工人，其社會地位和財產也是不穩定的，必須忍受種種特權勢力的剝削。至於產業工人呢，我們也可看到，中國的工人不只有受資本主義的剝削，而且受着高度的超經濟剝削，在有些工廠中特別對於童工，有着種種體罰的人身羈系關係；在有些礦場鹽井，更殘厚地保留着封建剝削關係，因為這些企業本是從封建時代繼承下來的；在有些官辦的企業內，工人更受着非藉藉口所掩護，喪失了一切應有的權利，工人沒有用組織的力量為自己的經濟利益有所主張的權利，他們甚至於脫不上自由的出賣勞動力的自由。

這就是中國社會中一切生產勞動者的生活的陰影。這些分明地表現着半封建的生產關係的濃重的陰影。這陰影扼殺了農民的命運，摧殘着手工業工人，並且侵入產業工廠，壓在工人的頭上。他使無產者的生活陷於赤貧的情況，而使一切小有財產者的生活極度下降，以至無任何財產之可言。從這

里，我們不能看到任何形體的經濟民主。

另一方面，自由的資產階級並沒有好的命運。他們的產業得不到合理的保障。在特權官僚資本的排擠和統制下面，談不到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原料被控制，市場被壟斷，自由的民族資本家的企業，要發展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而發展是不可能的。自由競爭時代的資本主義生產中，有一個與其本身範圍而言是公平的法則，誰能提高生產力，提高產品的質量，誰就能在自由的市場中取勝，這為一個民主的自由競爭，因此總在一定時期內有促進社會進步的作用。但是當獨占的官僚資本壟斷國家權力而壟斷市場時，就不會公平的競爭，於是正統的長官企業只能破產。自由資產階級與其自由企業競爭中不斷地擴大再生產，積蓄資本是不可可能的。結果是造成壟斷生產力停滯甚至下降的現象。

由此可見，經濟的不民主，既有害於工人，也有害於一切小有財產者（包括農民），同樣有害於自由資產階級，而且最有利於特權官僚資本和大地主，依據帝國主義勢力的買辦和地產階級壟斷權力而官僚。由此就產生了政治上的不民主。不民主的政治關係是民主主義的經濟關係基礎，而其目的則是為了鞏固不民主的經濟關係。

反映到社會與精神文化生活上，也同樣表現着壟斷階級民主主義的狀態。廣大人民羈繫在實際生活苦海中，沒有讀文和生活的可能。他們的生計欲望被遏阻，他們的知識慾望集中於如飢而求食，如渴而求飲，這一切事件上。特權者不承認勞動人民有獨立的人格，以為這只是一羈繫者，分不出每一個人的個性；而勞動人民在苦難生活中，苦難中也有悲劇和迷惘，這精神生活，不可能有自覺的意識和生命。這種精神生活的狀態，決不能產生民主的文化。

自由的思想是和獨立的經濟生活有密切的關聯的。封建時代很少有自由獨立的思想者，就是因為人們在經濟生活上都不得不得於經濟的「恩惠」，只有最大膽的人才會有反對權威的思想。甚至現在，社會主義的自願業者（甚至於教授）很難得有生活一保障，自由思想與獨立人格的發揚自然是受着摧殘。廣大人民聽自己勞力，所得到的這一點微薄的財產都沒有保障的時候，那種把個人的一切都歸於命運和天道的支配的迷信思想就是不可免的了。

在這各方面都極端表現着不民主的落後性的時候，中則要前進一步，就必需實現政治民主，又必需實現經濟民主，那是斷然無從設想的事。健全社會

說，實現政治民主，還是爲了實現經濟民主以求社會生產力解放封建性的束縛，而能加速提高；就廣大人民的要求說，假如政治民主並不能保證每一個入能過自由的生活並且生活得更好，那是沒有意義的。因此，沒有經濟民主，則政治民主將只是空洞的東西，也就不可能得到廣大人民力量的支持。

但和「舉其功於一役」論者不同，我們必須由認真地考察現實而指出現階級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方向到底是什麼？

四 保護私有財產和發展資本主義

由以上所述，已可看出，爲什麼現在需要「不是一般地廢除私有財產，而是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產」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

不主張廢除私有財產，並不意味着一時的讓步，而是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產的積極政策。這正是因爲在現實條件下，廣大人民的私產並沒有保障。農民沒有享受耕種的收穫的保障，工人沒有獲得必要的生活資料的保障，自由資產階級也沒有獲得合法的利潤的保障。實行種種措施，以使得人民普遍地取得私有財產的保障，那難道不是一個強大的進步麼？

拿古代的封建專制主義社會來看，固然在那時代也有私有財產，但是在法律上和實際上，全國的一切財富其歸屬於專制統治者所有。在國家的名義下，人民的任何產業都可以被括削甚至被剝奪。所謂「苛捐雜稅，橫徵暴斂」就是侵蝕人民的私有財產權的最通常的辦法。只有皇帝、貴族、官僚、大地主可以在國家權力的保護下以一切手段來吞併人民的財產而過其不事生產的寄生的生活。所以打破封建社會的條件而前進一步，就必然要提出保護私有財產這一問題。

不同於獨佔資本主義時期，在那時期，由於生產力已因生產過程的高度社會化而提高，社會財富更加集中在少數獨佔資本家的手裡，因此就不能夠提出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產的問題，倘若使社會財富（主要是生產手段）分散給衆人所有，那就是降低社會生產力。所以這時就必須提出社會財富的社會公共所有制，那也就是定向社會主義。但在封建社會條件下，生產過程一般地還是私人性的，少數特權者用強制力量來併吞社會財富，所以社會公有制不可能實行；而使財富分散爲多數人所所有，那正是促進社會生產力前進的唯一方法。

所以實行種種措施以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產，那是在現實條件下所必須採取實現的經濟民主。

——必須消滅利用特權勢力以侵蝕人民財產權利的活動，所以「要求肅清貪污吏，實現廉潔政府」，「要求取消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

——必須切實地保障農民的利益，所以「要求實行農村改革，減輕賦稅，適當保障佃權，對貧苦農民給予低息貸款，並使農民組織起來，以利於發展農業生產」。

——必須使民營企業家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消除對他們的障礙，所以「要求取消官條資本，要求廢止現行的經濟統制政策，要求制止無限制的通貨膨脹與無限制的物價高漲，要求扶助民間工業，給予民間工業以借貸資本，購買原料，與推銷產品的便利」。

——也必須使工人的利益得到保障，所以「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濟失業工人，並使工人組織起來，以利於發展工業生產」，並就是要「根據情況之不同而實行八小時到十小時的工作制，以及適當的失業救濟、社會保險，工會的權利等。」（均引自毛澤東：「論聯合政府」）

實行了這一切措施並沒有超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的範圍，但是使得人民不至於操心自己的財產被剝奪和剝奪，使得農人能享受其自己的勞動收穫，使得工人解脫超經濟的剝削，逐漸提高生活水平，使得民營企業家不再在不公平的「競爭」下被扼殺，這不是經濟民主麼？

要徹底實現這樣的經濟民主，沒有政治民主的保障是不可能的。中國所需要的政治民主也就必須能夠認真實施這一切經濟民主的辦法。假如是單獨由自由資產階級專政的民主主義的政治那也還不可能認真照顧到工人農民的利益，而且中國自由資產階級力量的薄弱也將使他們不能夠擴開力量，單獨完成解除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的任務。所以中國的必須實行的民主政治一定是如孫中山先生所說，「乃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這也就足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爲基礎的民主政治。

實現了這樣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一定能夠「爲資本主義掃清道路，而使之獲得發展」。對於這，我們是否害怕呢？一點也不。相反的，保護私有財產，扶植私人資本，正是對中國有利的事。

要知道，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徹底解除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的必然的後果。固然民族壓迫對建國迫迫不解除，也可以有資本主義，但那是買辦性的，

並且對建國勢力相勾結的資本主義，是激發強制權力以攻擊人民大眾，損害人民的、民族的利益的資本主義。中國人民反對這種資本主義，但不反對在解除封建壓迫後，民族壓迫為前提而生長起來的自由私人資本主義。在這種重壓迫去後，就產生了私人資本能夠獨立自由地生長的可能性，解放了並且漸漸富庶了的農都更是為資本主義開闢了廣大的市場。

要知道，發展資本主義不是維持剝削資本主義而是發展自由的資本主義。中國的資本主義還非常薄弱，並無力實行經濟上的獨佔，除非寄託在買辦性的、封建性的政治獨佔上。在取消了這種政治獨佔後，資本主義就會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上發展，這是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的，正如在十八九世紀，歐美的自由資本主義提高了生產力一樣。

更要知道，發展資本主義，是既要保障私人資本，又要保障獨立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小私有制的。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中，這種小私有制也是和資本主義制度並存的，不過歐美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以不斷地犧牲這些小私有者而進行的。在中國，一方面由於資本主義一時還薄弱，不能在全國國民經濟中佔絕對支配的地位；一方面這些小私有者在得到了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的條件後，將可以在合作社的方式下組織起來，提高其生產力。

由此可見，在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中所將實現的經濟民主，雖不超過資本主義的範圍，但是和歐美各國所走的資本主義道路是不同的。封建性的土地關係將按照民主主義原則逐步地完成徹底的解決——由減租減息到耕者有其田，依此土地制削的封建殘餘將徹底消除，不像歐美的許多國家中那樣，在這問題上半途而廢。勞動人民的小私有制將在經濟上獲得發展的便利與在政治上獲得充分的保障，而不是像在歐美許多國家中那樣犧牲了作為獨立資本主義生長的肥料。這絕對是人民有真正的利益的經濟民主，和那以人民大眾為基礎的政治民主相輔而行。由此我們也就不必擔心，由廣大發展私人資本將重蹈歐美資本主義的覆轍，形成對人民不利的獨佔資本主義。恰恰相反，我們倒可預見，當人民的私有財產一般地受到保護和自由的資本主義廣大發展的時候，中國的社會生產力必能加速地增長，在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完成的時候，就會產生和平地走向社會主義的可能；也就是走向更高度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可能。

五 「畢其功於一役」論的真象

社會主義不是讓人們在口頭上空談的。能否實行社會主義不能由主觀願望來決定，不能由空洞的革命的願望來決定，而要根據客觀現實，根據廣大人民實際生活所提出的要求來決定。廣大人民現在所要求的是什麼？他們對於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的兩層束縛，他們對於沒有任何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農民要求減輕負擔，要求土地；工人要求減少工作時間，提高工資；這些要求都沒有包含社會主義的內容。只有在發展資本主義，提高了社會生產力時，人民才會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的要求，在現在的條件下，「畢其功於一役」論不過是脫離現實，脫離人民的空話而已。

但我們要知道，「畢其功於一役」論者其實並不都是認真地在現在實行社會主義。他們之所以說這種空話往往不過是掩飾其不肯和不放諸諸君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的任務而努力。譬如，為了避免觸及股現實不過的減租減息的問題，他們就空談社會化的集體農場，為了使自由的私人資本不能充分發展，他們就空談社會主義性質的計劃經濟。在這裡，我們可以看見，實質上是前資本主義性質的獨佔壟斷，却自命為比自由資本主義更進步，以此為藉口來圖謀扼殺民營企業。——這就是許多「畢其功於一役」論者的真象。

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他們中有些人不由自主地傾向於「畢其功於一役」的說法。他們不提出正面發展資本主義的問題，害怕過渡無產階級的反對。其實，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階級矛盾固然是不可調和的，但是因為從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下解放發展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力，那是對資產階級有好處也對無產階級有好處，所以階級矛盾是可以調節的。要從之調節，却並不是，也不可能是在資本主義里加上一點社會主義。只要私人資本保持着他的獨立自由，並且使其生產事業適應於人民的需要，更照顧工人的經濟權利與自由權利，那麼他的廣大發展決不會遭受人民的反對。假如人民，空談社會主義為名，實際上却投到了對無產階級的獨佔資本的懷抱中，那就是自己走向了絕路了。

論 民主

索柯洛夫

對於「什麼是民主」這個問題，最近在同盟國及中立國家裡的某些報紙機關，曾經開展了很廣泛的研究。這些研究的性質絕對不是純抽象的，相反地，這些研究是由於對某些具體形式的所謂不滿而引起的，這種不滿的形式會導致一些歐洲解放國家裡的人民用來表達他們的意志；表示不滿的作家們常常在他們的著作詞上的研究中，得到一個而且是一個發現，那就是在民主的兩種「觀念」之間，存在着基本上的差別，——這用「觀念」就是蘇維埃和蘇聯的民主。

所以英國的帶自由主義色彩的曼徹斯特導報說道：「關於其些時代名詞的意義，看起來似乎應該取得國際上的一致解釋，」跟着它說「這些時代名詞是指向什麼。它顯露知道「什麼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什麼是一個希特勒主義者，什麼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而且更重要的是，什麼是一個反法西斯主義者？」另外一家英國報紙，傑出的「觀察家」，它向讀者，用了一個「歐洲的學生」這樣巧妙的筆名，寫了一篇東西，把自己表現得可為具體。它確實在蘇維埃「民主的意義在某些方面，與英美所了解的不同，甚至相反。」「觀察家」在「蘇維埃的差別」之外加上了「很大的政治重要性」。

蘇維埃所實行的民主，一些別的地區中所實行的民主，其中間不可否認地存在着一些非常顯著的差別。不成問題蘇聯的社會主義與資產階級和蘇聯蘇維埃國家是不同的，但無論如何，這些差別不應拿來作為聯合國精神合作障礙，這一層也並非不成問題的。自然，一個不知道人類利己的目的，一個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實行平等的國家，一個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實行平等的國家，而且社會生活的實質條件保障民主自由的國家，一個有各級民族真正平等的，而且曾經在其內建立起各民族間不能數滅的友誼的國家，——這樣的一個國家無疑地曾經在民主的道路上，做了偉大的進步。不能不承認蘇聯的民主與英國的民主等量齊觀，這一點也是同樣真實的，如所周知，蘇聯的社會基礎和英國的不同，這就直接影响民主這個問題，因為正是由於蘇聯的這種經濟組織才能確保我國的公民，有機會來實現他們的民

中權利，其中包括許多基本和重要的權利，如同做工的權利，受教育的權利，不受剝削，沒有國家或種族的歧視等。不要忘記，英國的民主權利只有在本國的居民可以享受得到，至於那更衆多的英國殖民地的居民，人數比英國本土的人口多十倍，他們仍然在無望的等待民主化的到來。那難道他們國家的自由和獨立。在這些情形之下，蘇聯的民主和英國的民主，其間的不同就不僅僅是「定義的差別」這個問題了。雖然如此，但並不是說，蘇聯人民和一些別的國家中的民主主義者們，就不能找出一個共同的主張和界說來區別什麼是應該視為民主的，和什麼是應該視為反民主的。

目前，對於希特勒主義這個禍色災難的戰爭正在進行着，同時，蘇聯法西新侵略不再發生，未來世界秩序的基石必得奠下，這將會使條件使得若干幾億特別容易消失，因為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裡，民主主義是在法西新主義的鬥爭中顯示出來的。今天一個民主主義者就是一個向法西新主義發覺決而殘酷鬥爭的人。一個民主主義者不但在實踐裡，而且在行進上，他應該鬥爭，直到所有法西新份子所有法西新的影響都完全消滅為止，因為法西新主義對毒的本質，以及它加在自由和人民生命上的巨大災害，對於每一個有正義感的人都很清楚。人民的自由就是法西新主義的滅亡。

正由於對於這個一般原則的承認，才產生了克里米亞會議的各種決定，——在這個原則上，蘇維埃的人民和一些別的地區中的民主的熱誠支持者，才能找到一個共同的主張。三個同盟國保證協助解放了的地區各國人民「用民主方式解決他們迫切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他們並且還準備了一個政策，要與「被解放的各國人民能平等地消滅納粹主義和法西新主義的最後形跡，並創設自己抉擇的民主制度」。三個同盟國一致同意，當着戰事情形變要時，協助各國人民「成立臨時政府，當使民衆中一切民主分子的代表廣泛參加，確保儘可能從速經由自由選舉以建立對於人民意志負責的政府」。

所以，克里米亞宣言承諾，必須用民主方法來解決一切因歐洲自法西新破壞的魔手中解放後所發生的各種急迫而重要的問題。關於這些決定的明

...以及貫穿在其中的那種對於歐洲各國民主權利的重視的精神，可能使
一個人覺得這一切將會杜絕有曲解的可能。但正如通俗話所說似的，爲了
符合任何人的宗旨，九九乘法表都可以按照不同的方法來解釋。

許多最近才想出來的民主擁護者，他們聲言爲了爭取民主的徹底勝利，
僅僅把戰前存在於歐洲各國的一切政治生活的方式恢復過來就夠了。只要回
顧一下過去就是這層論調的不合實際了。如所週知，在歐洲的許多國
家——自然不必提法蘭西的德國和意大利了，——其戰前的政治機構與民
主政治絕少相稱之點。

舉例說吧，回顧一下戰前波蘭的政治就足以說明一切了。這個政治一
九二六年，由畢蘇茨基所發動的那一次劇烈的反人民的政變所產生的
。一九三五年的法蘭西憲法^①，對於一千一百萬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和
立陶宛人的非人性的壓迫；對於工農與進步知識份子權利剝奪；像拉特齊
維爾和沙皮哈這樣的封建大地主，佔有新獲寧羅斯德土地；在拜達沙。卡
爾士希下的蒙所共有的集中營和布勒斯特中央監獄，其中關了所有那些敢
於批評那獨裁集團發動政變的人們；在政治上各方面的實利主義和反動政策，
外交政策上不顧一切地向希特勒德國投誠，和不斷的「反蘇聯」——這一切
就是那獨裁體最顯赫的特點。破產的拉茲凱威奇，阿齊謝夫斯基集團，他們
的叛變家，這同他們在許多同盟國家的反動集團裡的遠親近戚們，這仍然夢
想恢復舊一切。

誰都知道民主在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這些國家裡所遇到的情況
並不更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二十年裡，統制那些
國家的反動政府殺戮了強大人民力量。不僅是共產黨被趕到地下去；並且任
何進步政治思想的表現都受到嚴厲的壓迫。種族的仇恨和排外主義則有系
統地加以培植；帝國主義的傾向和侵略他人的最大計劃則加以鼓勵。在這種
情況之下，希特勒帝國主義的政治流氓們，在合適的機會下，很快地就和這
些小國家的反動集團取得了共同的立場，這些統制我們毫不猶豫地把他
們的人民拋進德國人所發動的侵略戰爭的漩渦裡。

從任何觀點來看，戰前南斯拉夫和希臘的政體，同樣也不能說是民主的
。例如在南斯拉夫，一九三八年，的托雅地維奇政府舉行議員選舉的時候
，政府指定的候選人雖然只得了十票二十票，也有他當選，但反對黨的無選
人即使得了上萬的票，也不能當選。在希臘，麥達克薩斯的獨裁政治在這次
大戰以前橫行了許多年。一九四一年春天和盟國遠征軍一齊在克基斯島上的

奧地利亞作家阿爾諾德茲，在他的「一本題名爲『海上之德』的小說中，非常
生動地寫出希臘游擊隊反抗那些德國侵略者（被稱作「鐵錘子的人」）的
鬥爭，正和他到過去反抗希臘的法西斯主義，反抗麥達克薩斯專制政體那種
自我犧牲的鬥爭的傳統。

假如我們不提一下那有名無實的芬蘭的民主，我們的認識可說不算完
全。戰前芬蘭的民主以一種機會供給芬蘭的軍閥們，使他們把整個國家拋入
反蘇的劇烈的戰爭裡去；請到這樣的民主還有什麼價值？沒有一個頭腦清醒
的人可以否認，這就是一個判斷芬蘭政治的最重要的標準。它曾經不讓一個
人民擁護政府有合法的地位，今天這個政府儘管它既沒有機關又沒有機會來
做這些各種準備，但在目前這種情況可以算有自由的情形之下，第一次
選舉就獲得全體選票總數的四分之一。僅僅看這一個事實，就可以知道維
多政體在波蘭作實了。

這就是東歐一些國家的情形。但就是西歐那些有過長久民主傳統的國
家裡，其戰前的政治機構甚至也隱藏了反動成分，從而使得法西斯的代理人
們能夠毫無阻礙地陰謀違反人民，並且進行通敵賣國的勾當。這不僅是在蘇
聯的情形，同時也是丹麥、挪威、比利時與荷蘭的情形。至於在比利時和
島上的各國內，反人民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體在那個時期間互于
在互交相一樣。

許多歐洲大國國內的這種顯然使人難以滿意的民主情形，主要地說明
了希特勒在戰爭初期，在他進攻蘇聯之前，何以那樣容易獲得勝利。如果民
主沒有這種衰弱，如果它真正統制着戰前的歐洲，世界上也許可能免去歐
戰而免於劫難，免於康邊森林國那可恥的滑稽劇，免於希特勒侵略者對於許
多白歐國家那些長年的佔領，並且大大地減少了愛好自由的各民族因爲被迫
反抗德國法西斯侵略者而引起的慘重犧牲。今天幾乎所有的人承認德國最
初的許多勝利是由於德國法西斯軍隊的「不可侵犯」，或者由於戰時國家希
勒的「鋼鐵的靈感」。但是這些勝利並不是偶然的——這種顯然不會發生，
基本上，所有沒有偏見和有思想的觀察家，儘管他們可以認爲極不相同的政
治制度，都承認這些勝利是由於一件事實，那就是在做了希特勒的犧牲品的
那些國家裏，民主是在沒落中，而在與希特勒聯合的那些國家裡，民主被殺
殺了。在另一方面，由於那那些名昭彰的鼓動侵略者的墨尼黑德政策，西歐的
廣大民主國家——英國和法國——完全不預備對那些德國法西斯匪徒們加以
阻撓。

歐洲被解放各國人民想要爭取一種民主政治，它沒有戰前那種致命的缺點，而且這個民主政治充滿了青年的生命力，難道這件事情值得驚異嗎？一個民主主義者是一個勇敢的往前看的人，而不是一個偷偷摸摸向後看的人。這些人們才是進步國家所引為驕傲的偉大的民主主義者和人民的領袖。受了這些最慘酷的戰爭磨練的人民，要求他們的意志，和他們的那個能保障永久和平和國際安全的進步政策能夠得到真正的尊重。

人民的意志在不同的國家裡我得到不同的表現方式，但歐洲——而且不僅僅是歐洲——的人民從這次戰爭的經驗裡，得出一些非常一致的結論來。他們要建立起他們的政治和社會生活，其中不給法西斯主義留下任何溫床。它不僅僅是一個根除目前法西斯主義一切殘餘和影響的問題，而且還要創造一些不允許新的法西斯主義產生的客觀條件。在外交條件中，人民不允許盲目政策，包括反動的盲目政策的再度抬頭。最後，各國人民，特別是東歐一些國家裡的人民，希望解決那些有關到生活的問題，例如像土地制度對和平和封建關係的廢除，和民族間壓迫和平等的消滅。

難道可以認為把對建大地主的土地分給小農不是一種民主方法，或者把反對土地改良的鬥爭看做民主的鬥爭嗎？難道可以認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和平友誼的道路，例如像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所採取的道路是不民主的嗎？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的排外主義者們，或者羅馬尼亞的「有歷史性的政黨」，這些用武力來阻止解決國內問題的人們，難道他們不是明白表現自己為民主的敵人嗎？

這些虛偽的民主擁護者們，當他們談到波蘭的時候，他們的馬蹄聲聽得最為明顯。從民主的觀點來看，所謂波蘭問題是一目了然的。從德國法西斯主義之下解放出來的波蘭人民，正在建立他們基於民主原則的新生活。重建波蘭國家的工作正由臨時政府在執行着，這個目前在波蘭執行任務的政府是由四個波蘭的民主政黨的領袖所組成的，這些政黨在波蘭愛國者所發動的反希特勒侵略者的鬥爭中，由於他們的自我犧牲而取得今天的地位。這個政府正在波蘭所有的領土上執行權力，它得到人民的支持並且正在實現着人民的意志。但是那些虛偽的民主擁護者們正在進行一個驚人的毫無忌憚的反波蘭臨時政府的運動，同時為那些流亡的拉茲凱依奇——阿齊爾夫斯基集團的破產的政客們呼籲。當波蘭的反動流亡陣營被稱為親法西斯的時候，他們覺得憤憤不平。但這個陣營能叫它別的名稱嗎？誰都知道這個陣營在戰前波蘭扮演了毒害人民的角色，並且對一九三九年九月四日的災難要負嚴重的責任。這些人們在各方面都表示出他們對希特勒的惡意和仇恨，並且把他們所有的計算放在同盟國間彼此不一致的可能性上。他們在整個戰爭中間曾經成為德國法西斯的喉舌和支持者，最後，假如還需要什麼來證明這些完全背叛了自己國家的政客們是民主的敵人的最後兇殘的敵人，從他們本身就可以找到證據，那就是他們對於克里米亞決定的仇視態度。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兇殘地攻擊那

從克里米亞會議所產生的協調一致呢？因為那種協調一致是基於民主原則，並且那些波蘭的反動者們十分清楚，除非在波蘭重新恢復過去的民主政體，除非重建一九三五年的法西斯憲法，除非對那塊土地所有權保存下來，他們就更要趨正廢了。

所以，並不需要若干特別的研究來判斷誰是民主的朋友，誰又是它的敵人。從民主的觀點來看——在這件事情上，不管你在波蘭民主立憲上或者站在英美民主的立憲上，都是一樣——不能否認那些大走生們，像羅馬尼亞的拉德爾斯古，芬蘭的林可邁，唐防和索捷，波蘭流亡政府的拉茲凱依奇和阿齊爾夫斯基，以及許多別的民族領袖的類似的政治人物，他們才是民主的敵人，親法西斯的，並且他們支持那些違反人民利益的因素。顯然，像這樣的「民主主義者」們的道路不是蘇聯的道路，也不可能是許多別的民族民主主義的真實擁護者的道路。

虛偽的民主擁護者們，常常提出這樣的理論，於像「觀察家」的「歐洲的學生」在下面所說的一樣：

「按照西方的習慣每個政黨自由反對，並且爭取人民（包括中上階級）的選票上，做自由競爭，這才是民主政治的精華。」於是就可以得到結論說集合人民的一切力量，站在這一條聯合陣線上反對親法西斯的集團和傾向是違反民主的，是走向總體主義，以及等等。揭發這種理論的謬誤是並不困難的。為什麼剛從納粹勢力解放出來的各國人民的力量，不應該組織在一個聯合陣線裡，反抗那被打破但尚未被根絕的敵人呢？為什麼他們必得取悅於那些曖昧的「學生」們和那些更曖昧的歐洲的盟友們，而參加自由競爭呢？換句話說，也就是為什麼當敵人仍在繼續進行陰謀並且用它的力量企圖重新建立它已經失掉的地位時，他們應該分散從而削弱他們的力呢？在「歐洲的學生」的本國裡，為了對敵人的共同鬥爭，為了團結全洲一切力量堅持戰爭，各政治派決定在選舉時放棄一自由競爭。假如在一個強大如美國或蘇聯的國家內尚且如此，則在歐洲各解放國家內，當他們剛剛走上一個新的道路時，怎麼該把所有民主的成分集合在一條聯合陣線裡而去。

民主陣營裡的不團結，民主力量的分散，正是造成許多國家建立了法西斯政體的最主要的一個原因。這些人民難道能忘記這一點嗎？法西斯們過去就善於利用戰前歐洲許多國家內民主分子不能找到共同立場這個事實，來造成他們自己的有利條件。特別是甚至於民主的支持者們也被反共偏見弄得眼花目眩，遂使他們堅決反對與共產黨取得任何合作，而看不出來，這樣他們就分化了反法西斯的陣線從而使得法西斯主義的工作更來得容易。過去幾年來血腥的教訓，告訴了我們不僅分散是有害的，並且團結人民的力量是有益的。共產黨和所有愛國份子，所有反法西斯的政體，集團和趨勢，並肩對希特勒侵略者作戰，其表現就是被那些最好的自由戰士的血所膠結起來的聯合

行動。歐洲各解放國人民不願重犯戰前政策的致命錯誤，他們不願重蹈分散民主力量的覆轍，克里米亞決議中說到確保歐洲各解放國家內的團結不是沒有原因的。但團結的實現只能由於聯合一切人民的力量而不是分散他們，只能由於聯合所有真正的民主主義者而不是拋棄一部份民主力量來反對其他部份。

民主是一個歷史的現象。沒有一種適合於所有時代所有人民的永遠不變的民主。正如社會生活中的每一種現象一樣，民主也在發展與進步中，例如今天的民主與古代雅典人的民主很少相似之處，並且英國現在的政治機構與和克倫威爾時代的政治和機構不相同，甚至在同樣的社會和經濟基礎上，也可以產生形式上絕對不同的民主國家。所以要求歐洲所有國家的民主都將依照英國或美國的模型而建立，這是完全不可能的。這種要求將會是干涉別國人民內政問題的無理企圖，也就是一種從外面把固定的政治法典加在別人身上的企圖。這種企圖自然沒有成功的機會，因為本身就違反了民主主義的精神，違反了人民的一創造自己抉擇的民主制度——這雖然當然權利。

這是不就是說今天當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命運已經注定的時候，民主的實踐維護者就可以不必關心在其他國家內所正在發生的事情了呢？要得這樣一個結論，至少還太早。拋開大家所知道的歐洲許多國家（像希臘）對於民主極端背道而馳的情形不說，單就中東歐世界的情形就夠了。今天誰也知道，在世界各殖民地國家中甚至一點民主也沒有，而那里居住着地球上最大部份的人口，這些地方才是作爲民主的擁護者們應該去努力的。

不過當他們擺出一付哈姆雷特式的姿態，並且對於已經走上政治改革的道路上的歐洲各解放國家裏，被壓迫的時候，他們的關心顯得有些做作而且不合時宜。我們切不要忘記德法西斯獨裁者們的政治手腕，如所週知，這些獨裁者們曾經有一段時期，聲言任何歐洲大陸上的國家內任何與政治生活民主化有關的事情，都是一種「克倫斯基」政體和「布爾塞維克化」。希特勒的匪徒們，把各種面貌絕不相同的政治領袖們，一視同仁地貼上「克倫斯基」的標記，並且把每一種進步措施，每一種民主的改革，每一種懲辦自己國內的戰爭罪犯和賣國賊的步驟都加以「布爾塞維克化」的烙印。這一切是不難從希特勒匪徒們的政治花箱中看出來的。他們唱着那詭辯而耐厭的老調子，說是在歐洲除了法西斯的統治就是一「布爾塞維克化」，並且說法西斯主義是唯一可以想像的「反對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堡壘」。誰都知道，英美兩國就是在德國力量最盛的時候，也沒有讓這套套詞勾住。在目前，當法西斯德國的死亡已不是不可避免而且危險的時候，這些煽動的技術就愈發顯得明顯。他們使英美人民相信歐洲大陸面對着僅僅一種抉擇，那就是不是法西斯主義就是蘇維埃制度。除了沒落的希特勒的冒險家們，誰還能靠這套套詞煽動中取利呢？

德國的帝國主義者們，已經正在準備第三次征服世界的企圖，爲了消滅他們的陰謀詭計，對於這毫無心肝的敵人必須加以最嚴密的監視，並且在歐洲各解放國家內，必須建立起精誠團結的民主國家。只有那些把個人集團的利益放在國家民族利益之上的自私的人們，才希望在蘇聯的社會機構中的性質和意識形態與它的同盟國有所差別，從而使希特勒的三大領袖們，不能在有關世界各國的各種問題上，取得解決它們的一致步驟。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深刻經驗告訴我們，嚴重的危機所以能夠潛伏是由於愛好和平各國之間時時缺乏團結。由於這個經驗的昭示，非常明白，關於歐洲各解放國家內民主政體的毫無根據的偏見，可能成爲各國間永久和平與一般安全建立上的嚴重障礙。

目前戰爭一定要這樣結束，那就是沒有任何漏洞可以使法西斯主義和侵略的力量重新再起。這樣才可以保證那些參加了反希特勒德國共同鬥爭的愛好和平的人民利益。

● 畢蘇斯基在一九二二年任波蘭總統的時候，擅自撤換內閣總理，遂引起國會的極大不滿，兩年十一月的選舉他就落選了。但在一九二五年他向當時總統提出最後通牒，要求立即罷免總理，並任命他自己爲全國軍隊總長。一九二六年五月，畢氏在全國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支持之下，再加上軍隊中深淵的擁護，遂發動政變，進兵華沙把總統逼下台來。這以後，他就一天天上獨夫民賊的道路，直接造成波蘭亡國的原因。

● 畢氏自再度上台後，就致力於改革憲法，到了一九二九年二月，一個佈置就緒，便在國會中提出憲法修正案七十餘條，其中基本出發點是提議總統的絕對權力，把立法司法權完全集中在總統一個人手中。當時儘管畢氏威風凜凜，而議會中的各黨派及人民爲了保衛民主，紛紛力爭，致未能會法通過於國會，這個鬥爭繼續下去，到了一九三五年，因爲畢氏長期壓迫摧殘反對政府各黨派的結果，於是制改後的新憲法通過於國會，當時國會已全部控制在捷蘇畢氏的「非黨大聯盟」派的手中。

● 雅布魯拉特時齊維爾公爵，一度曾任波蘭國會外交委員會的主席，是波蘭最大的一個地主，在西烏克蘭和西北俄羅斯有七十二萬公頃的土地。

● 拉茲凱依奇是波蘭流亡「政府」中的波蘭總統。

●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國的賣國賊貝當順俄國之流，在巴黎簽林德，向希特勒低首屈膝，簽訂了亡國條約。

● 莫尼烏魯在波蘭一九三八年九月廿九日——三十舉行，對希特勒侵略者協助和放任的政策達到了最高潮，參加的有當時英國的首相，張伯倫和法國總理達拉第。

● 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是南斯拉夫的兩個主要民族，前者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四十九，後者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二十四。

● 一九三九年九月，僅十八天之內，波蘭就在納粹鐵蹄蹂躪之下亡了國。

沉悶鬱熱的氣候

許綠新

——三十四年第二季的物價

一 「漲漲跌跌，跌跌漲漲」

本年後方第二季的物價，並不像第一季一樣，一直向上漲。某些地方的某些物品，在某一時節，是跌過價的，但是，跌了一下子之後，便又回漲了。有人說這是「亂漲物價」，並且用「漲漲跌跌，跌跌漲漲」八個字去形容它！後說這話者是不錯的。

中樞是一個物價優勢的社會，米價之漲跌，關係是極大的。四月第一週，重慶山熟米每石價為一萬五千四百元；到第三週，漲至一萬七千七百元。五月間，米價雖曾起過一落，但大勢還算平穩，一般是在一萬六千元上下。但是，入夏之後，各埠都起荒旱，米價亦驟然飛騰。六月十日重慶米價就突破二萬大關，至中旬，竟達到三萬三千元的滿峯。在這同時，蘇老天真忙了，米價又驟跌了。六月下旬山米價（由熟米）保持一萬八千元的水線。漲跌——跌漲的現象，結果仍是漲勢優勢，這從各地方的米價更可看出。以貴陽來說，四月上旬的中等米每石為三萬七千元；四月中旬為三萬七千四百元；五月下旬為六千元；六月上旬回跌至四萬三千三百元；六月中旬漲至五萬二千元。其在昆明，四月上旬中等米每石為三萬二千元；五月中旬漲至四萬五千元；六月初為四萬六千元；六月中旬為四萬八千元。其在重慶，四月上旬中等米每石為一萬三千五百元；五月上旬漲至一萬八千元；六月初為二萬四千六百元；六月中旬為二萬七千元；六月下旬漲至三萬七千元。「民以食為天」，米價的動向，就可以測見民生的疾苦了。在日用品方面，這三個月，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四月份一般是上揚的；

五月份則呈現沉滯向下跌，到了六月份似乎又在震盪。以布疋為例，重慶的布疋除丹布，四月第一週每疋為八萬六千元；第二週為九萬五千元；第三週為十一萬五千元，有幾天且突破十二萬的大關了。但一入五月，便逐漸降低，十日為九萬八千元；二十日跌至八萬一千二百元，以後一週，又回漲至九萬八千元之間；六月上旬中旬穩定於十萬零六千元之間；下旬又回漲至十一萬元了。至於布疋，情況亦大致如是。新光襪價每打由四月初為六萬八千元，下旬為九萬元；五月下旬漲至九萬七千元；五月末六月初，却跌至八萬八千元；六月下旬又回漲起來了。

糧食、布疋、布疋，在相對的數額上，為可以代表一般物品的；從它們的價格之起伏，便可以看出物價的大致動向。本年後方的物價是在定漲「漲漲跌跌，跌跌漲漲」的軌跡。但在這裡，跌是跌得少，而漲是漲得多的。跌跌（第一回跌）之價，比漲前漲得高；漲後之價比第二回跌漲得更高，這換到說，它的總方向是在漲，是在向上奔騰。因此，這回「跌」，不外是將廣上揚的「勢勢」吧了。

二 為什麼這樣的波動？

現在應該解釋這第二季的物價波動的形勢，為什麼是「漲漲跌跌，跌跌漲漲」的？為什麼四月間一般上漲，為什麼漲後米一個跌而跌後又回頭來漲呢？

在這裡，有幾個因素是必須注視的：

第一是通貨膨脹中，各地都在亢旱。長江上游一帶，呈現一片旱象；以四川兩省，川東的廣安屬等處是在旱象的；川北的蒼溪一帶是在旱象的；川西的樂山、峨嵋以至瀘州，亦曾經有一個時期在旱象的。貴州的貴陽、大定及正安等縣亦在旱象；湖南的漢陽和湘西各縣亦在旱象。一月來亢旱，農田乾裂，田禾枯死。陝西更甚，更為嚴重，秦嶺以北，洛川以南，鄂陽武功以東，均以西河乾涸，田禾枯死。三、四、五、六、秋禾棉花不露及時下種。到了六月，供區已擴大至六十二縣了，這區域是陝西的主產麥糧出產區，對於軍需民食，影響非常重大。此外，湖北、河南、山西、黑龍江至青海等處，都有旱災，尤早是糧價上漲的好藉口，那些有糧的人，就利用這機會而使糧價漲得更快，漲得更高。六月下旬及中旬，各地先後下雨了。這些雨，洗滌了暑熱的淫威，挽救了各地的農事，並且削弱了大戶囤積糧食的動機，於是各地米價便或先或後，或多或少，的壓低下去了。但糧價並不是一下子跌到地以雨水之有無為根據的，「天時」還須通過「人事」，才能在價格上起了作用。我們剛才說，亢旱是糧價漲的好藉口，就是這一個意思。由此可見，囤積囤積糧食而單談「天時」，是沒法得知米價漲跌的動向的。

第二是幣值的急遽下跌。今年的通貨發行是以前所不能比擬的。五月二十日重慶大公報所登載的數字，在幣元等五枚的「現階段」的物價及經濟問題」中，對於通貨問題，曾有精警的看法，他說：

「過去通貨數量增加的速度，已有逐年增加傾向，後來每年增發額，約為上年度的二倍。今天由於軍需的需要，財政支出沒有減縮，同時，由於豫湘桂贛諸省重要區域的淪陷，財政的收入又較前減少。在當此特殊仍未負其應負之職費的情形之下，財政虧缺更形擴大，結果通貨數量增加的速度，驟到一個新的階段。」

今年通貨的發行額，已進入天文數的數字的地步了。經過第一季物價的三次大跳躍，通貨自然隨着急遽增加了；四月份的物價是比三月份進了一步的，於是五、六兩月份的發行，又不得不大踏步而前進。通貨膨脹促進物價之飛漲，而物價的飛漲又回頭來使通貨更加膨脹。這三個月，物價的變方向所以向上揚，如果從一般的情形說來，通貨的急遽增加，幣值的急遽下落，固是一個主要的因素。

通貨之大量增加，使通貨得着變新而迅速更加升本起來，因為通貨增

發之結果，必定刺激物價，物價漲了，還有商品的囤戶，就必跟着增加其貨幣數量。這真是說，通貨膨脹太大了，通貨膨脹大的結果，又使黃金政策所能吸住的法幣，相對地降低下去。從三十二年開始黃金政策以來，政府已收回法幣二百餘億元。這個數字實在並不少。在市面中，聚集在黃金周圍的貨幣量，遠比這數更大。這對於法幣之活動，是發生了牽掣作用，可惜的是，游資太大了，游資跟着通貨之增而更增的壯大了。儘管有六七百億元法幣被黃金政策吸攔來，總算有上千億的法幣在市面中追逐法幣，但如果是這個數量的游資總量比較起來，去與通貨發行總量比較起來，那實在太渺小了。換一句話說，因為通貨膨脹得太利害，因為游資增長得太龐大，黃金政策並未能夠阻（更說不到阻止）它們對於商品之追求。因之，金融市場儘管在翻天覆地的波動着，商品並未完全絕望到「門前冷落車馬稀」的景象！

第三是歐洲戰爭之結束。本年一月四月，東德蘇軍與西德盟軍的攻勢，更如如火如荼的在進展。四月十三日蘇軍進抵維也納；四月二十二日蘇軍進抵柏林城下；四月二十五日蘇軍進入柏林，蘇美兩軍在突圍高會師；五月三日斯大林公佈佔領柏林，意境德軍無條件投降；五月七日德國無條件投降。歐戰勝利消息，一陣陣傳到遠東來；它對於後方經濟，亦引起了一些波紋，但在反面上，各種商品是不一樣的。一方面，它使某些商品漲價；另一方面，它又使某些商品沉滯以至於降低。出口品的生絲是屬於前者；入口品的百貨是屬於後者。因為歐戰結束使許多人認為生絲外銷的暢旺，可以預卜，因而把一部份生絲追逐生絲。故幾天之內，廠生絲每担由一百二十萬元，漲至一百三十萬元；雜絲漲至一百二十萬元；細絲漲至一百四十萬元；大車絲漲至七十五萬元。同時，某些存有百貨的商人，不免心驚肉跳，不免停止進貨，不免拋出存貨，因而形成了五月間百貨漲價而下跌的局面了。

第四是史迪威公路在這個時候，開始發生作用；中印航空運輸在這個時候增加了它的運輸量；中印汽油管亦在這個時候完工，把汽油從加爾各答運到昆明來。今年三月二十五日美國對外經濟政策宣佈：「第一批五百個美國機械師和較師，將在一個月之內往中國，準備訓練三千五百個中國司機，幫助中國解決它最嚴重的運輸問題；一萬五千輛特別按照中國需要的情形而設計的美國軍用卡車，正積極運進中國」。據某方估計，史迪威公路運輸量很快的以達到每月六萬噸。飛越駱駝的空運，在一九四二年五月為二二三九噸；今年一月是四萬四千噸，四月是四萬五千噸，五月是四萬八千噸。至於中印油

管的運油量，每月是在一萬四千到三萬噸之間。把空運、公路及海管三項運輸工具綜合起來，每月之運輸總量，至少可達十萬噸。而由於仰光之克復，從仰光港口經由瓦城運到雲南的運輸量，每月至少可增三萬噸；仰光開放的另一個意義是緬北軍隊的供應需要可以減少，供應物資更可集中輸入中國。如果把仰光的運輸量算在一起，則中國從西南的國際運輸線，每月至少可以有十三萬噸了。

每月十三萬噸物資的運入，的確是一個不少的數字。但，這是以軍用爲主的，對於與市場有關的人民日用品，關係還很很少。使人望眼欲穿的印棉、印紗和布疋，其數量實在太少了。據六月二十四日商務日報載由印抵昆之物品，計有布八萬疋，棉花五百餘噸，棉紗五十萬包，帶昆明花紗布局保管，但棉區軍用；據二十九日國民公報消息，緬昆之印棉有三千噸（合六萬担）；其中一萬三千五百担撥作美軍應用，五千担歸我軍部保管；其餘各紗廠可分得萬餘担。這種花紗布的總數，本來並不算多，而軍用的花紗，又佔去一大部份，因之，對於市價之低，就顯得極其微弱了。

這幾個因素的作用，並不是一致的，歐戰結束和國際運輸線的增進，對於物價具有壓低的影響，雖然實際上這二個因素並未起了不應的作用，但是，某一限度心理作用是不可否認的，大國戶之製造謠言和推波與浪，就使小國戶心慌脚軟忙於拋貨了。這可說是五月中旬百貨市價起伏一時的主因。在另一方面，老天下雨對於糧食，在二三個星期中，稍稍削弱其價格上漲的趨勢。反之亢旱和通貨膨脹，則強烈地在雲南其他促物價飛漲的作用。

這一季，後方物價之呈現「漲漲跌跌，跌跌漲漲」的原因，大約就是如此。

三 金融投機的狂熱

因爲後方經濟，是以黃金外匯爲特徵的，所以，最能吸引人們的注意力的，還是金融市場上的投機。這三個月的情況，自然亦是如此！

這三個月的金融投機，是產於由疲帶到緊張的過渡的。三月下旬的金融市場，可算是極端一時。一入四月，重慶的金融，便呈現極端而新的狀況，有變動，亦不太大，此時，銀根特別緊，外幣多忍痛拋出。五月間，「期貨」已未免現，仍不能割讓現貨之漲漲，故黑市亦呈膠着狀態。五月中旬，重慶金融雖對大批商印幣來，但購者仍有觀望之心，因之金市

仍不活躍，只有美鈔因受歐戰結束之影響，突破八百元大關，美債美鈔亦隨着「香幣」起來！

到了五月底六月初，市況就大大不同了。五月廿八日財政部停售期貨，這是黑市現貨的一個劃線；同時，由於調整匯率的傳說及美教會匯票價格之提高，外匯突破千元大關。因爲外匯的刺激，金價亦趨上揚。六月二日黑市金價突破十萬。六月八日官價提至五萬元，當日黑市就漲至十二萬。接續又有官價再提高之謠言，黃金市價即節上昇，漲至十三萬元，美鈔亦達一千五百元。六月廿五來財政部宣佈暫行停止辦理黃金存款。這是一個變遷，金價受此刺激而狂漲起來，當日黑市金價達十七萬，美鈔一千八百五十元。但因爲漲得太快，且因「六度比期」在即，故金價又一度下跌，廿九日收場只有十五萬八千元而已。

五月下旬以後，金融投機的熱狂，震動了重慶、貴陽、西安、昆明，更正確地說，它是震動了整個後方的大小城市的。爲什麼金價和外匯是這樣的香幣呢？很明白，這是黃金政策必然的成績。黃金政策是用黃金投機去代替商品投機的，黃金政策的本身是在於使游資因爲官價與黑市間有日益變大的差額之存在而感到興趣。官價提高一次，就更進一步的促進黑市；黑市越趨高，金融投機的利潤就趨加擴大了。事實上，這三個月正是在走這線路的。同時，因爲歐戰結束東線戰局日趨樂觀之關係，許多人把自己的資金轉換一個方向，找尋一個短期的出路了。在這種，外匯和黃金便成爲追逐的目標了。

黃金政策能不能牽制物價呢？在理論上，黃金吸住了一部份游資，就減少了游資對於商品之追求，此長彼消，所謂以金融投機代替商品投機的意義就是在此。但，一如上面所說，因爲通貨不斷的增發，游資不斷的增大，所以一定量的法幣之被吸於黃金，是沒法代替或減少另一部份游資之追求商品的，反過來，黃金漲得越高，就越加反襯出法幣的價格之相對低落。這是一來，物價不是相對地又提高了麼？這是一。同時，「一般商人因金價日高，暗中遂以金價爲其所售的貨價的利潤標準」。這樣一來，物價不是直接地提高了麼？這是二。合這二個原因，黃金政策對於物價，不但沒有了壓低的作用，而且有着促進的作用了。看吧，五月下旬以後的物價，並不因爲黃金和外匯的漲價而呈現降低，却在這個時候，亦邁步前進。難道這不是一個反証麼？

四 市情透視

物價在飛漲，外匯和黃金亦在飛漲！這真是一個市面，對於工商金融的影響是如何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回頭去看看工商及金融各業的營業情況；就必須看看生產是不是發展，商業的實際銷路是不是增加，銀根、利潤和社會購買力是不是鬆動了一點？

先說金融吧。銀根之緊，是與比期利率息息相關的，但比期利率如端午節之類——之所以緊，却又與做貨或黃金外匯有關。商品或外匯做太多，就會使銀根緊，轉不過來，因而形成比期或季節之困難。今年四月二十四日的徵信新聞曾說到銀根與做貨之關係，它說：

「本週銀根吃緊，因貨幣資金多投向外幣，又本週黑市黃金漲價異常，並相購存黃金之風益熾，平均每日達一萬兩以上，因此本週商業存款，並受存款，頭寸大部短絀，應付勉強，緊張萬分！」

不論貨幣也好，不論銀行也好，大家都在因商而或購黃金外匯，一遇比期或節期，就要感到週轉不靈，于金高揚了，這三個月來，六月的銀根，是比較緊的。這個月的十四日是農曆端午節之節期，十五日是比期，三十日又是銀行半年結算之「大比期」。難關重重，黑市利率，逐步高揚了。故中旬貼現日折，曾經高達四元以上。行莊對國家銀行交換札款，頗為普遍。六月三十日那一天，重慶的銀錢業有十一家是缺少兩寸的。這十一家共缺六萬萬元以上，至深夜十二時，始得轉平。能得轉平，真是萬幸了！

論到商業，其利潤是不及購買黃金或外匯之優厚的。當然，我們應該把零售與批發區別明白。現在後方市場的特點是：價格上漲，並不意味著銷路之擴大，反而是意味銷路之縮小。在這裏，商品價格之上漲，完全是取決於大戶的。大戶把商品當作投機對象而拋出，故零售價格在本質上，全是一種投機價格。這種價格是與社會購買力對立的。零售價格上漲了，零售價格亦不得不跟着上漲，但物價漲得越兇，則一般人越是不購買不起。這不是一個矛盾麼？這幾個月的商業，就是在這個矛盾中掙扎

的。

談到工廠，在表面上，當局未嘗不以發展生產為目的，戰時生產局對工業的貸款總額，截至五月底，已達六十三億七千一百餘萬元。此款以訂購成品定額最多；增產貸款，設備貸款及復廠貸款次之。生產局一百萬萬元的基金，現在已用過一年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但是，單純貸款，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因為工業之復蘇，並不是一路貨財所能奏效的。茲以鋼鐵業為例，後方鋼鐵業是受到生產局之援助的，但仍未能免於萎縮。中國鋼鐵公司（三十二年成立，現有資本一千萬元，辦有鍊鋼、軋鋼、機器等三部份）現在生產量，遠不如前，月產鋼材原為一百二十噸，平均最少五十噸，但目下只靠生產局與工程委員會之少量定貨（三萬餘噸）而已。鋼鐵業萎縮原因：「一為原料品質不良，影響成本；二為人力運輸困難成本；三為煉焦太小耗費原料；四為受產品成本間接提高之影響；五為動力之影響；六為設備不齊；七為財源日趨枯竭；八為管制問題；九為高利貸之誘惑；十為捐稅負擔與公債負擔；凍結流動資產」。這十個原因，可以歸納為基本的幾項：第一是設備動力之問題；第二是物價高漲影響到成本的問題；第三是利息高漲的問題；此與金融投機狂風狂有密切關係的；第四是管制問題的影響；第五是財政捐稅政策之不善。在這裏，除了技術問題之外，都與金融戰時財政政策有關的，與上面所說的商而投機及金融投機有關的。因此，少量的定貨或貸款，明明白白是沒法解決問題的。

鋼鐵業在停滯，煤焦生產亦在萎縮。一方面煤礦商因統購統銷，不肯生產；而另一方面，市民又買不到煤。煤致黑市猖獗，燃料缺乏。這是管制政策下煤價不修成本所造成之惡果，這個惡果，又推動了煤價之上漲。紡織業方面，亦因管制之關係，購不到花紗，只有以限制產量的辦法，作為唯一的出路；印棉印紗，叫了許久，在這三個月來，仍停留在「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局面。後方全部工業只能閉關自守，做著最後的桃色美夢。這只是在慘淡中更加慘淡而已。

黃金外匯的活躍只是象徵著少數一部份人在發洋財，廣大人民的生活，却因此而更痛苦了。失業的人，是到處可見的，單單重慶市失業就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人失了業。其他部門亦在停工減工之中。在業的工人，在物價高漲之下，感到生活的困難，這幾月來，罷工爭議之層出不窮是幾年來未有的現象。這種現象意味着什麼呢？難道不是他們的困苦的生活（經濟的）和經濟以外的反映麼？

這一季後方的經濟，正像這一季的天時一樣，又沉悶，又悶熱，這種沉悶而悶熱的氣候，使人感到窒息，感到喘不出氣來！不過，這種窒息並不是天然的，那是人們的「作品」。天時的沉悶只有靠天下雨；人們的沉悶呢？難道是等待所能解決的麼？

（七月十五日）

明天的憧憬解救不了今天的苦難

卓芬

——一九四五年第二季的工業

新的憧憬

五月初戰事雖暫告結束了，這一個振奮全世界的情緒，對於中國，像一塊石頭投入死水裏，激起了無數的浪花，它給予工業界的影响，不如金融界與軍事的激起了海湧的波瀾，但也帶給人們一些勝利的前景。未來的憧憬，大家預測着中國的抗戰不久也將結束了。因此不能不作一翻未雨綢繆，像北平、紡織、航運等民營企業，有辦法的已向美國商討借款，作爲戰後發展工業的準備。有些工業家亦便於眼前的困難且忍受下去，等待抗戰後再掙扎好了。民族資本把希望寄托於戰後，國家資本也這樣看來，資委會正着手於開發三峽的水利計劃，與許多大談戰後工業化的問題。YVA的建設成爲新航上受人重視的新奇的事件，有人覺得它是中國工業，國家的救世主。於是大家在憧憬着一個美好的明天！

灰色的園地——煤和鐵

煤和鐵是很美的，但對於這個痛苦的事實是無所幫助的。它不過作爲那開的蘇聯吧了。雖在目前的工業園地依然是滿目瘡痍！在荊棘的叢林中，工業的新苗無處的天折了，萎縮了，或者是在慘淡的香門。就煤鐵業來說，它們在困難中支持着，以煤的開採來看是比以前增加了，但是無助的。煤的開採是趕不上各方面的需求，甚至比

去年同時期要減少，如嘉陵江各礦及大河運轉交用戶煤焦數量，三月份爲七萬二千零五十九噸，四月份爲七萬二千噸，五月份爲七萬一千噸，去年三月份供應量爲七萬七千六百三十八噸，四月則爲八萬一千〇〇四噸，五月份則爲七萬一千七百六十五噸，倘照眼前趨勢，「重慶附近（以北至南充，南至萬縣）與軍事直接間接有關之各工廠，如一律閉工，連同電廠，除給一併計算，每月約需可燒煉之煤八萬噸，可煉焦炭之煤三萬噸，現時嘉陵江及南川各礦所產可供上項廠之用者總計不過八萬噸，尙短三萬噸。」（六月十七日大公報）各大礦產基本可達到增產三萬噸，但限價始終不敷成本，各礦依然在虧累賠本，據說天府每月份不敷七八十萬元，寶源不敷達二十萬元，小鐵經不起鉅大的賠累紛紛倒閉，大礦在苦撐待。商人們爲了儘量維持好景來臨，只好咬緊牙關挺下去。

從五月份以來，各礦對當局的要求是：「統籌各國資金，供給各種材料，在供給材料未實施前請給予貸款，工業用煤請改爲限價，限價，讓價兩種煤均應以限價爲不備，最好與國商同等看待」。煤業界爲了實現每月增產十萬噸的計劃，請求生產局貸調轉金十萬萬元，然而這些意見，並未能被接受。然當局救濟煤業的辦法是提價用獎勵的辦法。規定煤質含灰份百分之三十以下者給以百分之二十五的獎金。在貸款方面僅能貸甲種煤焦十個單位，共配貸款一八六、六一四、四〇〇元，這不滿二億元的貸款，對於負債累累的煤業，也不過是杯水車薪。獎金的辦法更不是解決困難的辦法，各礦也不能

一律受益。如歐陽致欽先生所舉的例子，就是很實際的。她說：

「寶源是採煤，要比二疊紀煤的開採煤成本高五分之三，這獎金仍不敷其用；煤質雖適合於燒鍋爐之用，揮發性極強，誰含灰份多，但以質量比例，與其他煤質能得失和價。」（五月廿二日新民報）

煤礦的開採的結果便造成煤市煤價，這個問題的廠務日趨作着這樣的分析：

「由於管制政策的全盤錯誤，不顧及煤業生產成本，注意煤價，在物價的狂奔之下，又要掩飾煤價困難，不允調整價格，另埋相的加給獎金，但獎金仍發給，也沒有平抑煤價的思市。隨煤結清這是煤價不敷成本，煤商不願長時賠累，對煤單向平價供應不感興趣，因此煤商尋求黑市出售，而這些黑市煤焦的順利通過嘉陵江一帶的檢查和關卡，這又是叫局外人士所不可解的。」

爲了迫切需要煤焦增產，當局不得不再來一次調整煤價。六月十四日宣佈實施新價，約照舊增百分之九十九，並將改善煤質獎勵辦法內臨時獎金百分之七十予以停止，甲種礦原有之煤煤津貼每噸千餘元照舊發給，這是臨時救急的辦法，對於病象深重的煤業，僅給以治標的藥劑，怎能使其活轉起來呢？頂多頂多只能使它苟延殘喘吧了！

讓我們把視線轉向另一個角落。

鋼鐵業已經從去年的「生產過剩」轉變爲「產量不足」，隨着兵工生產之增加，機器工業需購鋼鐵甚大，而鋼鐵的生產却異常萎縮，結果是存貨日少，在五月份存貨不及百噸，存貨僅千餘噸左右，因之黑市鋼價價格高漲，從六月調整後發生變態每噸爲二十萬

元，編爲六十萬元，需市方面生機每噸三十萬元，需每噸八十萬元，鋼鐵價漲並未解脫鋼鐵業的不景氣。例如資治鋼鐵廠一爐每月最大的生產量可達七百噸的生鐵，現在因原料與資金困難，每月僅能生產三百噸，甚至較大的基陽鋼鐵廠和一些小本經營的鐵廠都倒閉了。就是資本最多的東原鐵公司也停閉了一部份冶鐵廠。連年來川省鐵的減產益相嚴重，從民國廿八九年的年產十萬噸降至去年爲三萬噸，今年可能減爲二萬噸。翁部長××大會上的報告，曾謂今年鋼產可由去年的一萬二千噸增至三萬噸，如果這是事實的話，這一點增產的數字並不能算多的，但照目前鋼鐵困難的處境來說，這豈能不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

民營的機器業，經過一度擴張後又鬆懈下去了。新添的機器在擱置，工人多半又閒散着，廠家的面前掠過了一道陰影，新的希望的火光又漸漸灰暗上去了。數月前機器業的繁榮是因生產局的訂貨，最近生產局對於民營機器廠第二批地雷的訂貨有停止之說：「原因爲兵工廠每隻地雷估價爲千六百五十元，但民營工廠成本較大，需照三千五百元計算成本。民營工廠十家因合同規定製一年，大多數添置此項機器設備，一但停製損失甚大。故忍痛減至二千七百元一隻，但生產局仍無意續定。依目前情勢觀察，第一批二萬五千隻已無望。第三批是否可依兵工廠估價加三成定製。則在商討中。」（六月十四商務日報）最近對於第三批地雷定價生產局尚在考慮中，使工廠感到無工可做，在扶植民營生產事業上這種措施是難以使人了解的。從民營廠的處境而言，它們的成本分明較高，因爲折舊減少，設備較簡陋同時員工又沒有平價米，在稅制與原料的供給上，亦處於極不利的條件下，處處趕不上國營大廠，因之產品價格也要貴些，假如不從它的實

際困難着想，那是不公平的。

電力的缺乏，對於工業也是一個有力的打擊，如化學工業，原產總數每月一百二十噸，液體每月三百噸，隨時的停電使產量減至只有五分之一。如燒碱每月不過三十噸，險類更有停工狀況。人們要問：一問電力爲什麼不足？簡單的答案是缺煤偷電，這不是一個技術問題，也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影響所及使工業園地，呈現了灰黑一片。

「屋漏更遭連夜雨」——紡織業

織業

紡織界面臨多事之秋，四月中旬織布業與軍需的糾紛剛平息，重慶璧山成都等地土布業棉花紗布局陸續的事件又起，這一切的經過正說明紡織業在管制政策底下掙扎，求發，然而「屋漏更遭連夜雨」，棉花的驟變更加重了他們的困難。渝市各紗廠因缺棉花三月份減產三分之一，四月份在紗布局限令減產一半，到了五月中旬從減產一半中再減三分之一，六月會維持三分之二的給予開工，各廠在職工人每月僅有二十天工作機會。棉紗業合作社也奉令減產由每月一百件減爲四十餘件。土布業的總產量一月由一千三百九十件核減百分之六十，對產量也予停織，本市織造土布業工人約三萬餘人，經紗布局此次減產後，失業工人約萬餘人。其間接受失業影響者聞以數萬人計。（見五月十二日新報）在雲南，紡織業的困難也不遜色，雲南兩大紗廠因缺乏棉花，每日開工二十四小時減產十小時，並有停工之危險，該省紡織業年產棉花十餘萬担，從三十二年到现在十七個月中僅能供給棉花三萬七千担。成都的棉紡織業同樣陷於奄奄一息的狀態，減產百分之五十，四萬五千張織機的配紗也由七

五〇件減到三八五件，這是多麼可驚的數字啊！

紡織業衰落之咎該誰負責？毫無疑問的，是棉花紗布管制的「功績」。

棉花已經不是天時而是人爲的。土布業公會認爲棉花不能收購的原因：（一）是官價賤賤物價走，（二）搶路運棉花價高，（三）黑市花紗布價格飛漲，原產已舉國作手工業紡織之棉料。因爲官價極得太低使棉農虧本。如以四月來說，陝棉收購每担官價二萬餘元左右。棉農成本每担三萬餘元，相差太遠，無怪花紗布局預購陝棉七十萬担，至今僅購了二十多萬担，另一方面收購太遲，在新棉上市時，棉農密款甚急，花紗布局仍未收購，致棉花都爲商販所收買，流入敵區去了。然棉局對於管制辦法並未加以檢討，反而歸咎於棉農，給予種種不合理的壓迫，如今年四月監察委員嚴莊所檢舉的陝西建設廳專事搜束棉農的案件，檢舉書中說：

「棉花大漲每百斤售價三萬餘元，官價規定一萬八千四百元，日來沿戶搜查，沒收治罪，民情恐慌，秩序紊亂，挾嫌持勢，流弊至多，又報載陝西建設廳自三月十六日起普遍清查，凡經查獲之棉花，即以囤積處奇論罪，在陝西棉農種棉，平時皆以自給或以用於手工業之生產，（即土布）尚難以農民一年辛苦之收穫，加以囤積居奇之罪名，且官價如能持平，則棉也不待搜而自出。」

這段話敘述着棉農的苦痛，這種敲榨勒索的辦法，怎麼不使民怨沸騰？怎能提高生產者的興趣？怎能求得棉荒的解決呢？

現在當局解決棉荒的辦法不外三條出路，一是增加棉產，二是依靠印棉輸入，三是逐漸廢除官收買棉花。今年陝西的棉產是二十萬萬石，較前年增加四倍，棉產物價的上升，增加四倍並不過多，

旱災威脅着大後方的農村

念 良

一九四五年的第二季的農村經濟

一 楔子

一九四五年已經過了一半了。讓我們回頭看看後方的農村，在沿着什麼方向變化了？了解估我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在這漫長的歲月中，過的一些是什麼生活，對國家民族作了一些什麼貢獻。而我們又給了他們一些什麼報答。

二 紅荳爛掉了

今年，在大後方農村經濟中第一件嚴重的事情，可以說是川北的荳災。川北各縣土地瘠薄，氣候苦寒，產米很少，農民交租完稅之後，便全靠紅荳和一些別的雜糧爲生，不料去年入秋以後，暴雨爲災，連綿至冬，天氣寒冷加以一些所謂「瑞雪」，就把農民的生命——紅荳爛掉了。這真是一個大災難。中央社四月十日成都電，省府負責人談稱：「本省去年因氣候反常，雨雪過多，紅荳在未收割以前，即受影響，及至春融以後，因水份未乾，致有腐爛情事，加以入冬以來，時久不雨，小春成長稍受阻礙，川北各縣先後報災，計達十三縣……所幸賑濟得宜，全川各縣於清明前後又已普遍得雨，小春成長轉佳，人心至爲安定，據報告及考察所得，貧苦小戶自不免有困難。」（着重點爲筆者所加）可是三月二十三日商務日報成都通訊的報導，

則謂災區有南充、西充、蓬安、營山、儀隴、鄰水、廣安、岳池、三台、中江、遂寧、安岳、樂至、蓬溪、射洪、潼南、鹽亭、劍閣、昭化、廣元、南江、巴中、通江、南浦、蒼溪、閬中等二十六個縣，災民則有二十多萬衆，而一月三十一日成都快報登載了資陽荳災的情形，二月廿七日成都軍日報及四月七日日本新報皆有簡陽荳災之報導，似此，則荳災區不止二十六縣，至災情如何，是否人心至爲安定呢？我們還是多看幾個報導吧，本年一月，一日，成都快報便這樣報導資陽荳災的情形：

「該縣目前情況，益臻危殆，家長自縊自斃者有之，舉家自盡者有之，下毒食中而爲親鄰覺救者有之，甚至瀕路者亦有之，至若環而泣，則幾與哭于家。」

關於遂寧的情形：

「每日到處都看到成羣結隊的婦人小孩，尋找葉樹樹葉，拿回家煮食充飢，往年用做喂豬的紅荳葉，現在算是良食品了，這個月死的人好多，老人和小孩完全都是活活餓死的，叫人不看都不忍看。（四月十日新蜀報祝公偉：給救川北二十萬災民）。

橫山鄉四保農民田某發現紅荳全部腐爛，生機斷絕，當去衣被較暖後，買豬肉幾斤，酒一斤內放磁器，拜祀神後預備全家自盡，適其地主來看發現田某從不見肉食，而今紅荳全爛後忽然大打牙祭。看到酒瓶磁器共色發綠始

何況有增產的意義在內。但是在目前的政治機構底下，辦公文，不辦實事的官僚作風依然存在，領棉貨還不是領工貨一樣困難？加以對農民一貫的手段是欺騙，這二十萬萬的棉貨，究竟有多少棉農能獲實惠？這只有天曉得！

據外棉外布並不能解除棉農的難題，更結實業活躍起來，何況在目前軍閥割據比任何物資更爲重要？至全空運是不可能的。賦了很久的外棉外布，至今運來仍有與得，最近布疋的狂漲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如三月份預定空運外棉一萬一千噸，實際只來二百噸，至六月才來八萬疋布和五百噸棉花抵達昆明，最近又有三千噸印棉（六萬担）將陸續運來的消息：其中一萬三千五百担爲美軍用，五千担爲中國軍用，昆明紗廠萬餘担，至渝的最多爲一千五百担。這一類棉花，據說可以勉強維持半數幾月至十月。因爲印棉運費極高，且難以大量運來。因此不得不另找出路。於月中旬，財政部批准了二萬萬元赴瀘湖採辦棉花，另一方面是獎勵鹽商到鄂西一帶以鹽換棉，因爲迫於棉荒嚴重，只好用加緊收購棉紗的辦法，這不外是用半劫掠的辦法，用這種不顧實際情況的抑價辦法，給予棉農許多痛苦的教訓，在他們的血淚乾乾時，不管是否怎樣搶購與收購也難達到應有的數量。今年陝西三湘各地旱災，對於棉花的收穫影響甚大，棉農的苦命將會繼續的響下去。

需要民主的政治

以上所看到的不過是後方工業的一部份，在不景氣的波浪中浮沉的還有酒精業，煉油業，捲煙業與各種手工業，在同一遭遇中，它們如何能擺脫了厄運？這沉重的苦難，難道是天然的麼？從許多事實中告訴了我們是人的。是當前的經濟政策所造成。要擺脫這些災難就得先改造目前的環境。說說未來的工業化是美而輝煌，是吸引人去追求的，明天的花果難道不是要靠今天的耕耘麼？爲了發展未來的工業，資金與技術的計劃是需要的，但是不要忘了政治的民主才是有力的保障，否則這個明天將永遠是夢想的明天！

發現內放毒藥。至各鄉人民與屋裏驚愕，種種慘狀，目不忍觀。(四月一日新華日報成都通訊。)

關於鹽亭情形。

「鹽亭久旱無雨，紅荊腐爛，民食無着，嗷嗷待救，日前高給鄉居民彭某，家中大小五口，每日僅食乾荳菜一次以度一日，彭某窮迫無法，竟將其一女殺死，另二女見勢狂奔，縣政府以其犯殺人罪，將按照法律嚴懲云。」(四月三十日新華日報成都通訊)

「災民除了一部分尋死之外，他們用什麼方法掙扎呢？一位逃到成都的災民這樣告訴我們：『我們把種田的牛也賣了，田契也抵押了，有娃娃的把娃娃都賣了，還是過不到幾天！我們算是把命送到這里來了，那些老不動的，都還留在鄉里吃樹葉草根呢！據後來的一批說，現在鄉里連樹葉都吃光了，餓死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四月十日新華報)

看看上面這些。慘極人寰的慘境，可見川北若災情形是異常嚴重的，是不容我們漠視的，但糧食部據地報長於三月廿七日招待本報記者席上，謂川北若災嚴重，只是傳說，『而此種傳說，使未納糧者，有所藉口。』在這種認識之下，當局對災民的體恤，是可想而知的，儘管一方面在力竭聲嘶的報災呼籲，另一方面還是照樣逼着完糧，各種苛捐雜稅依然如故，『鎮押』『吊半』『吊鴨』『浮水』『還是這類的妙法。縱使就是有些救濟吧，救濟數款和辦法的是否切實而有效呢？』聽說田管處還想出一種直接了當的辦法，就是把這次賑谷全數作為歷年撥款折扣。『(洛人)：『如此賑災』只本年二月九日新報)既不必追尋，也省得發放，誠一舉兩得，像這樣異想天開的做法，又怎能顧這些災民

不壯者流離失所，窮在轉轉於溝壑呢？

三 好景不常

入春以後，一些地方雖算皇天助美，驟雨連時，夜裡一陣浙澌，甘霖下降；第二天又是長空萬里，大好晴天。麥子和葫豆都長得特別快，老農夫們對着這一片青蔥的顏色，心頭的重壓是稍為減輕一些了。據中央社成都五月二十八日電稱：省府發表川省本年八十七縣之小春物產量統計，以小麥產量為最高，為三千二百四十九萬市石，次大麥為一千三百七十九萬市石，豌豆一千一百九十二萬市石，葫豆一千二百九十六萬市石，芥子八百四十三萬市石，若與去年相較，計小麥約增百分之三三，大麥增百分之二六，葫豆增百分之二三，豌豆增百分之八，芥子增百分之三四。照這個報告看來，今年川省小春，比之去年，總算是豐收了。農民們拍手稱足，辛辛苦苦的耕作一年，就是這這點甜葫豆呀！今年小春既有六七成的收成，臉上的愁容是要稍為開展一下了。六月六日中央社長汀電又稱：『閩省各縣今春新麥豐收，粒粒飽滿，為多年來僅見。目前各地市價每百斤僅七千元左右，最近十日來全省青、黃、綠、稻苗盛長，一片綠茵，農村充滿豐年氣象。』這如果的話，真是抗戰之福。

但靠天吃飯的中國農民，好景是難以長久的。

四川一部分正慶小春豐收的農民，還沒有笑容現在臉上，各地報災的消息已紛至沓來，先拿陝西的大旱來說：六月初向省府報災的就是長安、咸陽、眉、興平、醴泉、乾縣、永壽、郿縣、柁邑、淳化、涇陽、三原、耀縣、同官、富平、宜君、洛川、高陵、蒲城、白水、澄城、大荔、郃陽、朝邑、韓城、平民、中部、潼關、華陰、華縣、渭南、臨潼、

藍田、渭南、商縣等三十五縣，六月中報災縣份已達四十餘縣，六月底則已擴大到六十一縣。災情之嚴重，可以說六月十日西京日報聯合訪訊中透露出來：如寶雞縣若干鄉麥苗被禾遭蝗虫毀食之後，『不料夏初以來，天久不雨，驟轉亢旱，兼之西風狂勁，晝夜不停，致使出土禾全行枯死，以現狀定山坡地收成最多不過二成，平原四成，水地五成，河土地一成五。』岐山縣『於農曆四月間先以赤霜，繼之亢旱，兼之大風揚威，晝夜不停，以致完豆有苗無穎，大麥秀而不實，小麥收割無望。』又據該省派出各縣勘災人員之報告，大抵西路各縣之收成在五成左右。長安平均四成，而受災最烈之縣如大荔，則收穫不足三成。而本月六日國民公報西安通訊報導，則謂全省受災縣份已達六十二縣之多。

就已勘災之十二縣之受災人口與全省人口比例計算，約為三分之一強，實際數目為三百九十萬人，同時因旱災而連帶引起之蝗災，時疫，又普遍盛行，如潼關縣播種面積共八〇四、二一〇畝，被災面積已達七五二、八七六畝，約百分之九十以上，全縣人口九二、七八九人，受災人口已達八三、九八五人，亦達百分之九以上，其結果終至無端無災。就已報災各縣之收成，平均不及一成。本月十六日國民公報訊：渭河流域樹皮草俱已食盡，將來恐有食人之虞。似此情形，則陝西之嚴重，及其日在發展中，可以想見。

河南現在正鬧蝗災，本報河南商會近來接獲各縣報災嚴重之報告，計有嵩縣、內鄉、南召、唐城、葉陽、鄧縣、固始、南陽、潢川、新鄉、光山、宜陽、開封、密縣、伊陽、洛寧、孟縣、息縣、長葛、清川、中牟、方城、登封等二十三縣，據高縣一縣在十日內竟捕捉三〇、四一六、八三斤，非特麥收無望，且危及秋禾播種。

至長江上游則呈一片旱象、川北沱溪一帶，連雨個多月沒下過一場大雨，天天不是刮大風，就是出大太陽，以致已收冬水的田畝，都出現三寸寬的裂紋！新秧還一苗都未移植，差不多已全部枯死；川東萬縣鄂都等處，亦久旱成災，包谷和一些雜糧都已無望了，其他川南川西各縣陸續報災者亦復不少，杜省對災及賑賑代表之多，使張主席不願親自接見。本月間各地頗告喜雨，然已遲農時，最多亦只挽救一小部分而已。貴州各縣亦紛紛告旱，貴陽晴空萬里，郊野田園多成龜裂，未插秧田畝已無法插下。而正安、大定、盤縣等縣災情尤為嚴重，四月二十八日商務日報貴陽通訊說：

「近由大定縣來客談到該縣因去年秋收太差，以致近來米價缺乏。每斗米六十斤賣到九千元，雖比省陽便宜些，但是農民太窮，根本無錢購買，多以樹皮草根野菜充飢，餓死和自殺的到處都是，如雨門外頭塘村中有十多戶，近來全郡人去屋空，因為飢餓所迫，不是餓死即是流亡去了。又聞于寨某戶夫妻先把兒女統統丟在塘裡淹死，然後雙雙也投塘而死。又畢節因幾年來旱、水、雹等災迭至，去秋更厲害，秋收只二成，現在鄉民無法生活，死亡轉徙，人口下降，樹皮野菜觀音土，都成了少有的珍品，全家自殺和拋子丟女的事情，都不是稀奇的現象了！萬國救濟會雖在該區放賑，但因災情太重，人數太多，仍無濟於事。」

六月十四日貴州日報大定通訊：

「本年入春以來，災情漸增，演成慘象，人民死亡流離，十室九空，懸崖自殺，閉門餓殍，轉死溝壑，感原野者數以千計，被棄嬰孩，比比皆然。而逃亡避徙者，尤屬不可勝數，哀號宛轉，慘絕人寰。」

慘絕之情形，真是令人不忍卒讀。

鄂西鄂北在繼兵燹之後，本年又告亢旱，其災情之慘，據謂為從昔所鮮見。至山西則有專食麥心麥芽之害蟲為災，如稷山、安邑、鄉寧、蒲縣等地所種之麥，俱已被食殆盡；人民叫苦連天，安徽各地入夏以來，久旱不雨，蝗蝻為患，蔓延區域日廣。太湖、懷遠、岳西、英山等縣復遭旱害為災，贛江上游，又遭洪水為災。日前中央社電稱充滿豐年氣象之福建，近亦電告已現旱象。順手拈來，幾乎無地無災，真是書不盡言，日前參政會上，糧食部部長報告之後，糧食詢問中，就有陝、甘、青、綏、德、鄂、浙、皖、川、滇、黔……等省顧慮救災，以致徐部長亦謂本年南北各省除雲南一省「風調雨順」外，其他各省都有天災。由此便可曉得我們靠天吃飯的農民所遭的厄運了。

四 難道是天災麼？

本來在平時，甚至在所謂豐年中，我們的農村就已經窮苦而淒涼。蔣仁先生在一豐收年中渠河流域的農村——文中提到渠縣農民生活狀況時說：「在一百個農民中，平時難看到有一二人有一套整齊的粗布衣服，手袖百綻，幾乎人人如此。談到吃的，平時多靠食雜糧，如紅苕、玉米。終年吃米之農戶，在鄉村乃屬奇蹟，而食小飽飽者，亦所在多有。再說住的一層，十九皆係草房，破爛不堪，人畜同居，雞犬聞風。」（見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大公報）所以一遇荒災，農民們除死以外，簡直就沒有其他路可走，可是豐年是少見，而荒災却常常有，因此我們的農民就常常面臨着死。好心的社會團體問了：「為什麼我們中國這樣多荒災呢？我們當然可以拿「土地貧瘠，氣候惡劣」來回答，但假再進一步追問：這些是否可克服的呢？我們的

答覆是肯定的。假如在政府能真正進行土地關係的改革，平時就向人民提出警告，要努力耕作，積蓄餘糧，以備荒年。如果旱象已經漸漸顯露了，政府就立刻進行各種防旱的措施，例如號召各級黨政人員嚴正地注視這一重大問題，指出要依靠廣大羣衆和部隊機關全體人員，大家動辦法，大家動手的方針，並且切實展開節約運動，嚴格保護食糧，絕對禁止蒸酒熬糖，各級政府和各級組織，都分別做了調查，擬出了切實的計劃，實行首長親自動手，領導幹部與羣衆相結合的辦法，要是遇着水災，政府就迅速利用有關水利機構或成立的機構，有計劃的發動與組織人民，進行堵口、培堤、挖河、開溝等工作；假如某地一帶現蝗蝻，政府就應該在各方面緊急動員，號召大家一齊動手去捕捉，政府可以提出競賽及給予適當的獎勵，要大家研究做到不毀禾苗、不損菓木、既要快而又徹底辦法。如果能做到這樣，則饑荒雖然嚴厲，然而在一定限度之內，人類是可以戰勝自然的。幾年來，邊區和若干解放區的政府已經這樣做，並且已經創造了不少歷史上的奇蹟。在某種意義上說，那裡的人民已經戰勝了天災的威脅，這難道真是天災麼？

五 一切都在制度上

然而人類要有效的預防天災，或戰勝天災，首先必須改善人與人的關係，一切不合理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必須予以徹底的改革，否則農民在備受剝削之後，平時已難得半死，又難能有餘力積蓄防災呢？而尤有進者，在不合理的制度下，一些少數人簡直在那裡促成天災。這些天災的人為成分，說來雖然還是老生常談，但在天後方，輪却轉來轉去本加厲的作祟，他促成了天災，又利用着天

費，天災事竟不盡地天災。

先拿租佃關係說，目前大後方租額之高，簡直使人難以置信，除附近的地租，通常佔正產物百分之八十以上，農民除了不到百分之二十正產物之外，其餘就得以雜糧補充，成都一帶的租額比重慶附近還要高，甚至要把正產物都交給地主，農民辛辛苦苦的經年勞作，所得不過是山坡坡的包谷和田裏上的葫豆而已。這還所謂佔百分之幾，並不是按當年收穫量來計算的，而是以豐年來作標準。

在重慶巴縣一帶，還有把租額增加到超過正產物產量以上（不乾加）迫使佃農賣了副產物才罷還清租谷的一種辦法。（本年七月五日商務日報王寅生先生：大後方農業經濟底變化與農民生產的減縮）因此悲劇也常常發生，本年五月二十五日新華日報就登載一個租谷太過逼殺佃農的故事：璧山來鳳鄉農民鍾樹堂因收成不好，收穫大減，這老頭的租谷都未帶起，到繳租時，地主李炳林却無論如何都要照往年收租，否則要他立刻搬家，鍾樹堂告貸無門，又無法另佃土地，在李炳林極度壓迫之下，還得活不下去，「就先將弟弟殺死，然後用刀子割斷了自己的喉管，自殺了。」如此租佃，試問怎能不促成天災呀！

其次說到高利貸，自古以來，高利貸和高額地租就是中國農民的兩支大吸血管，農民在高額地租壓制下，就只有欲為止渴的求助於高利貸資本，而高利貸又回過頭來壓得農民永遠不能翻身。關於中國高利貸的方式實在太多了，其榨取程度也太利害了。隨便翻翻報章，就抄兩段在下面吧：

（甲）「短期錢：鄉人每隔三日集市一次，稱爲「趕場」，如在「頭場」借款一萬元，到了三日後的「二場」，則須還一萬零五百元，每月以九碼計算，本利共該一萬四千五百元

再有利息的利息，按照複利法計算，則本利共該一萬六千餘元，故利率達六十分之銀。（乙）上場：此乃整借零還，如借錢一萬元，分三月本利償清，每月即償還一萬六千元，三個月就是四萬八千元。（丙）比期錢：如上錢一萬元，半月後的比期，即須還一萬零六百五十元。（丁）月期錢：以月期爲限，如借錢一萬元，滿一月後還一萬一千四百元，再付四十元的印花費。（戊）倒扣利：利息先存借款中扣除，稱爲「倒扣利」，如借錢一萬元，在借時即倒扣一千五百元，實得八千五百元，滿一月後，須還一萬元。（本年三月十二日大公報公誠先生：逃鄉民疾苦）

在目前內江資中一帶，普通是月息一角到一角七八分。有的蔗地主就逼着佃戶在還個時候將未成熟的甘蔗作價預費（除了三成地租以外）俗稱「賣賣山」，這種「賣賣山」，較賣現貨價格要低五分之一，一到甘蔗成熟，蔗農就忙將收割，送到地主糖坊里算帳：「萬一不夠償還債務，那不夠的部份，就要算作新債；」就這樣，使蔗農處處吃虧，他們的債務一年一年的加重。（本年二月七日新蜀報凡向先生：資中一帶的蔗農生活）

至於其他的情費谷，量出量入時所用的「日月斗」，借「關錢」，做「災錢」等等，真是舉不勝舉。本月十五日大公報昆明消息謂：「農民日趨貧困，高利貸月息達大五分，今年「拉秋谷」者更多，每石較市價低十分之三四，農村經濟凋敝可見一斑。」這不是助成天災，又利用天災的明証嗎？而目前直接破壞農村生產力的，尤莫過於「拉丁」。過去對於強拉壯丁，還有人伸正義向社會呼籲，可是現在這事情太多了，多到簡直使人感到平

凡，甚至因而不自覺的以爲他是合法的。我可以拉你的了，你也可以拉我的了，我們也可以共同拉誰誰的了，甚至拉在田裡工作的了，在好幾個川北省的報導中，就指出促成這次大災嚴重原因之一，乃由於一般農民害怕拉丁，不敢去挖紅苕，以致害饑過久，又遭以雨雪，才使地腐爛的，由於拉丁的盛行，使農村中不少壯丁無故天斃，或流亡外地，因而勞動力銳減。南田先生在「農村勞動力銳減問題」一文中，對廣安縣鄉十六歲到五十歲的男女作了一個調查統計：「二十五年有二千四百二十三人，其中男的佔一千一百八十六人；女的佔一千二百三十七人。但三十年的同上歲數人口，僅僅有一千八百九十個人；女的佔一千一百零五人；男的只有七百八十九人了。」（本年三月二十六日新華日報）這就是說，在八年間，男壯丁減少了三分之一，這當中固然有一部分是正式服兵役的，但因殺政腐敗，而致勞動力加速減少，是無可懷疑的，在生產技術並未改良甚或衰退當中，農村勞動力銳減，是意味着怎麼一回事呵！

最後還得提及目前捐稅之多及腐敗，亦爲天災的人爲成分之一，打仗是要用錢的，國家用錢當然要由人民來負擔，可是由於政府政治機構的腐敗，土豪劣紳在鄉村的無上威權，便使一切的捐稅都壓在農民身上。白鳥先生在農村爲什麼如此貧困一文中，以陪都附近某縣自知的捐稅項目便有：

- （一）在供地方基層機關開支的項目之下的。（甲）鄉公所辦公費，（乙）鄉公所官兵伙食費，（丙）保衛公所辦公費。
- （二）在衛戍及警衛地方治安名目之下的（甲）警備津貼費，（乙）駐軍茶菜費，（丙）駐軍馬料費，（丁）駐軍營房材料費，（戊）修理槍械費，（己）特種保衛費。

哭笑之間

費 衰

最近幾個月來，全國人民到處發起要求民主的聲浪，然而經過論客們「仔細分析起這件

事」之後，却使他們「不解」了。

爲什麼「不解」呢？

因爲，「在中國，民主的口號是誰喊出來的？」於是乎下面接着說道：「明白這些，可以知道民主的口號只有誰才配喊？」

原來，「喊喊民主」也得有資格，否則不配。

什麼資格呢？

按照論客的說法，第一是在中國，先喊出民主口號的人，第二是「從滿清帝制政府奪取來」的「民主的政治制度」的人，有此，才是喊民主的有資格人士。第一種人，雖然有資格，但是很難——有的死了，有的亡了，有的投敵，有的却走着和民主相反的道路，剩下來的人士不多，而他們的聲音也不容易喊出來，即使透露出來，又會使論客們「不解」了。第二種人呢？推翻滿清，功勞不小，但留存下來的就不多，不過搖身一變成了法西斯的遠親近戚，就是賣身投靠，昇了官發了財，他的聲望們至少也是當了雜誌編輯。更何況，滿清帝制雖推翻，「民主政治制度」尚未建立，那證據，便是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甚重塵上」。

按照上面說法，足見「喊民主」的有資格人士，的確不多。

如無資格，又不遵命，而要亂喊，自然使人「不解」了。

但有人提出了異議：說即使遵照那位論客的說法也罷，在中國喊民主口號的人是人民，推翻滿清主要力量是人民，凡是人民，都有資

格要求民主。民主這兩個字，最樸素和直率的解釋：就是「老百姓做主」的意思。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倘不給「老百姓做主」，則人民有要求民主的權利，即使給一些論客們「不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當一個國家「民主的呼聲，甚重塵上」，就可以知道這個國家的政治如何了。

你硬要民主也好，磨牌出來了！

「當一個國家在對外做着生死戰的時候，不能不爲爭取勝利而施行種種戰時措施。不但中國，在現代各種類型的民主國家，都同樣的有。這是任何政府必有的責任與權限，是政權運用的技術問題，與政體無關。」

中國國情不同，戰時措施也自然有別。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可以不必自由；特種人物，橫橫天下，官僚資本，充斥市場；教授往來，必須謹防自行失足落水；人民出入，切要

注意，這對於奔走火；凡此等等，真所謂「啓竹難寄」。

然而這是「技術問題」，「與政體無關」，與民主更無關，如果你「打在民主不民主的賬上」，論客曰：其罪狀有三：第一是「敏感」，第二是「不邏輯」，第三是「要挾」我們的國家斷送」。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鼻子里要笑，然

心裏却真真哭。」

不過，民主的呼聲是不會因此消滅雲散的，因爲人民已經站起來了，要做歷史的主人。

這背歷史方向的人，他的命運必然是在歷史的車輪下，充當舊時代的殉葬者。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日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日

(三) 在優待壯丁抗屬的名目下的。(甲) 壯丁安家費，(乙) 壯丁出征費。

(四) 在地方公益事業名目下的。(甲) 保國民學校辦公費，(乙) 保校設備費，(丙) 保校師資薪津及伙食費，(丁) 消防隊校閱費，(戊) 消防隊校閱伙食費，(乙) 積谷征募費。

(五) 在救國與愛國的名目之下的。(甲) 航空費，(乙) 飛機捐，(丙) 救國捐，(丁) 建國捐，(戊) 獻金捐。

這樣浩浩蕩蕩，五類二十二項，仍未能包括苛捐雜稅之全部，一些臨時攤派仍未在內，至於賦之不公，糧政之腐敗，已屬有目皆碑，目前參政會糧政質問中，糧政參政員說：「請部長不要再撥了，不要再伸手要了，老百姓受不住了。」可謂沉痛之至。本來是十分貧困的農村，在這層層重壓之下，怎麼能不逼出災荒呢？

在勝利前夕的今天，賣國債滿地民血淚和屍骸的農村，展望着前途，不勝危懼，然而我們不該建立一富強獨立的新中國則已，否則必須立刻下大決心去進行農村改革，而目前的具體步驟，便是實行減租減息，增加農貸，保證農耕等政策，藉以減輕農民的負擔，提高他們的生產情緒。只有如此，才能挽救當前後方農村之危機。但，這一切，必須以實行民主政治爲大前提。沒有這個大前提，一切良法善意，不但會變質，而且會變成對農民無重剝削的工具。

一九四五，七，十七。

一九四五，七，十七。

一九四五，七，十七。

一九四五，七，十七。

一九四五，七，十七。

一九四五，七，十七。

一九四五，七，十七。

一九四五，七，十七。

一九四五，七，十七。

一九四五，七，十七。

一九四五，七，十七。

一九四五，七，十七。

一九四五，七，十七。

一九四五，七，十七。

一九四五，七，十七。

驚濤駭浪的金融市場

劉芳華

——三十四年第二季的金戰

一 引言

時間過的真快，轉眼間又是三個月。回顧四月到六月的金融市場的動盪，即是充滿着風險投機的生活。黃金從六萬上升到二十三萬，美鈔從六百六十萬漲三千二百；最引為人們所擔憂的通貨發行，也在天文學數字的上漲，而投機家則在這種上漲聲中過着冒險投機的生活。瘋狂的投機，充滿整個金融市場的生活。

二 黃金

已經成金融市場主角的黃金，幾月來，演得有色有聲，轟動人。從本月初，黃金案揭發，五月廿九黃金案暫停，黃金官價提高至五萬元，六月八日又停止黃金存款，於是黃金政策是否繼續存在，也就成爲金融界的主題。現在讓我們簡述一下這期間黃金問題的底細吧！

(一) 黃金價格的波動

關於黃金價格，在這邊打算從官價與黑市價格分開來說。在這三個月來，黃金市場的兩價格都起了作用，但是官價與黑市價格一比，前者即然降乎其後，所以我們先從後者說起。

記得上期我們曾說過，從一月至三月間黃金官價從三萬七千高漲至六萬九，三個月只漲了百分之六十。可是在這一個時期，黃金市價的飛漲，簡直使人不可置信。

從三月底黃金加價後，引起了四月初黃金官市場的冷落，至四月七八日左右，終於盤旋於六萬元之間，到四月十日重慶的黃金市價，來了二次高漲，從七萬五一直上升至八萬二。而西安市場更有一日三漲之概，價格竟達九萬之巨，打破黃金市場的寂寞。及到四月下旬，大批游資向青島入手，於是游資轉入農村，造成市面銀根奇緊，黃金價格又低落至七萬八左右，五底各行莊不安通過，大家又攪到黃金上面了，六月一月上揚，已即九萬大關。於是投機與起，競相看俏，到二日又突破十萬。這種上漲趨勢，是五月間所未有，其所以上漲的原因，據一般的觀察，一則由於外匯在一週內上漲百分之五十的影響；一則由於美國黃金黑市上漲的消息之刺激。由於黃金市價繼續飛漲，八日黃金市價遂提高至五萬元。這是六月間黃金市場第一次的波動，至於第二次的波動，就是六月廿五日宣佈各種黃金存款。

自黃金存款宣佈停止後，對於各地金融市場立即引起了一場大波動，特別重慶的黃金市場，從廿五日開始，黑市金價就像海濤巨浪一般狂漲起來了，由十三萬九拾起而升，廿六日十六萬，經過六月的難關，七月二日，就過二十萬大關，七月六日達到廿三萬的高峯。至於昆明金融市場，據該商務日報廿六日昆明航訊稱：「黃金儲蓄停後，昆明市場重又陷入一片紊亂狀態中，金價黑市由十七萬二千元升至二十二萬五千元」。

至於黃金官價的改訂，此次六月八日黃金官價每兩由三萬五千元提高至五萬元，這是今年三月廿九日以後第二次的高價。這兩次提價，從時間相距來說，比上次約縮短了一半（按上次黃金提價爲三月二十九日，距離再上次十一月十五，恰爲四個月），再從比率來說，也較上次提價了許多（按上次提價是從二萬元提高至三萬五千元，增高百分之七十五，這次所增的比率，約爲百分之四十三）。再從兩次黃金價來說，這次黑市高漲之劇，遠

遠超過上次。這說明，在這種打草驚蛇官價與黑市價格分開來說。在這三個月來，黃金市場的兩價格都起了作用，但是官價與黑市價格一比，前者即然降乎其後，所以我們先從後者說起。

這幾次前次，(一)上次黑價約在二萬元左右，這次增高前數日，黑價曾高達至十萬零八千元，關於這次黃金官價的改訂，我們不打算說什麼話，不過前次官價的提高，爆發了一件黃金的黑案，而這一次呢，却招來了一場黃金市價的大波動。

(一)黃金案的下文

三月二十八日所發生的黃金加價舞弊案，這事情不但在重慶與各地，都引起社會指摘與批評。同時也驚動了國際友人對黃金政策施行的關心。到現在已經是三個多月，可是得到的結果如何？已經引起很大疑竇。爲着說明這案件處理經過的緩慢，那就必先知道這案情的爆發的內幕。據聞：「這次黃金加價，進行極爲秘密，因爲三月二十八日上午宋代院長召集有關負責人開會討論加價問題時，在座者僅宋代院長、財政部長俞鴻鈞、四聯總處秘書長劉政芸、中央銀行業務局郭景琨、行政院機要秘書林維美五人。下五四時，至宋院長復召各有關部分負責人開會，先討論其他金融財政事項，談會進行至五時，宋代院長始宣佈關於黃金加價事。並囑財政部及各負責人員從速宣佈。財政部宣佈調整黃金價格時，爲五時一刻。是時各銀行應已停止營業，而該日又爲三月二十九紀念休戰。但後據重慶各承辦行局收存之法幣折合黃金存款，共二萬餘兩，比較以往數日情形，超出一萬餘兩之鉅，計交通銀行六二五九兩，中央銀行五五一四兩，中央信託局四九九四兩，中國銀行二一八六兩，農民銀行一六五五兩，郵匯局八三九兩。共存款名字，且多以一本票或一支票化名分存多戶或收受帳申請書開存單的，其中大戶有李祖燕李祖永等戶共購存三千三百兩，錢理錢德馨等二千一百五十兩，程義澤等一千一百三十七兩，沙市紗廠七百五十兩，錢南銘等五百兩，張哲生等五百兩。」從上面事實來看，這案件所牽涉範圍是極端微妙與複雜的，但是這案件的真相也並非無法追尋，根據上面案件經過，就可以看出幾個事實：(一)決定黃金加價是什麼人物，(二)那一個銀行存款最多，(三)存款大戶的社會關係。但是當局對這案進行得如何，四月七日財政當局正式宣佈處理辦法：「凡昨日各行局收受黃金儲蓄，其手續不符定章者，作爲無效」，四月十八日行政院也發表處理經過，除行政處分外，全案則移交重慶地方法院偵查法辦。但對走漏消息的責任問題，絕無一字提及，而且沒有查辦的決心。及至七月十日地方法院才宣判黃金案套購部份的戴仁文等六人的罪刑

，但這些人們都是黃金案中所謂的小人物。至於黃金案清結部份，則說本月內可開審，有人說「高洪坊案件辦得徹底，黃金案也一定要嚴辦，否則高案坊將死不瞑目」。

(三)黃金政策的歧途

黃金政策的施行，已經過了一年半有餘。在過去人們把黃金政策捧得太利害，都把它當作解救財政經濟危機的仙方。可是實行的結果，黃金政策已經發生不少的破洞了，因此最近在輿論上已提出黃金政策經濟問題來了。黃金政策的目的，本來是在收縮通貨平抑物價，現在根據施行的結果，來研究黃金政策的成效。

先將黃金政策法幣回籠的成效吧！根據最近商務日報的報導：「黃金政策從三十二年開始到今年五月二十二日爲止，黃金現貨及黃金存款共售出黃金二百七十六萬餘兩，收回法幣六百〇一億九千七百〇三萬元。其中以法幣折合黃金存款到本年五月止共收回法幣四百二十九億餘」。到六月廿五日止開說法幣回籠已達八百餘億元。這個數目可以說最近而又是最高的。但目前發行已滿額天文數字指數，以有限的黃金來收縮通貨，最近此間某報已指出，「發行數額已漸近天文數字，而黃金政策只能吸收一極小部份的通貨，且極有限度」。同樣英倫經濟學者也懷疑黃金政策能否醫治通貨膨脹，此如排雲橫井，徒耗財源。

至於平抑物價的功效。實施黃金政策，原在吸收法幣，法幣回籠愈多，愈有穩定物價的作用，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上而說明了，其次說到用壓低金價的辦法去平抑物價。目前黃金官價較戰前漲三百五十倍，黑市亦不過漲八百倍。而物價據一般統計已漲至二千倍，特別是今年黃金官價提價不過兩次，而物價在今春以來不斷暴漲，可見黃金政策並沒有平抑物價的作用。

黃金政策的積極作用——收縮通貨與平抑物價——像前面所述已經失效了。但是相反的它招來不少惡果：

(一)黃金空虛，黃金秘密運往淪陷區，原爲特殊階級的發財捷徑，這些事實都是盡人皆知的。即使退一步，誠如伍啓元先生所指出：「如果黃金運往淪陷區係用來購買物資，則出售黃金仍會產生收縮通貨的作用。但事實上黃金運往淪陷區僅係用來換回敵僑公私手上的法幣及淪陷區人民蓄藏的法

幣……結果反增加大後方流通通貨的數量。這種事實，不但中國輿論作了極大指摘，就在美國輿論界，也有所指摘，比如美國新聞週報五月七日所載，最近我方曾要求解出存留美國的黃金餘額之一大部份，但美財政部不願破出所要求之數額，原因據該報推測，也許是為避去運到中國的黃金，已被用於黑市買賣，而且大部份落入日本佔領區內囤積者手中的原故。可見黃金流入於黑市的弊病，已為中外人士所不能忽視了。

(二)黃金政策成爲少數人發財的工具，黃金政策的推行，如果推行得好，一方面可使大量法幣回籠，減少發行數額；另一方面使黃金現貨落入平民手中，藏富於民，未嘗不可說黃金政策對於金融政策的作用，但以目前推行結果，只是爲少數特許人發財致富的工具，(1)黃金期貨，在過去中、農、國貨銀行規定黃金必須按四百兩整塊才能購買的辦法，又如目前五兩以下的黃金存款存戶到現不兌現的辦法，這都是便利特許階級，而忽視小戶的明顯例證。而且特許階級還不見此，他們還用低利借款購買黃金，又把黃金送回銀行，去抵押借款，轉展循環，結果，把八年來全國人民以血汗的代價所借來的黃金，盡入他們的口袋。(2)黃金舞弊案的發生也證明特許階級利用職權走漏消息，與套購黃金，(3)將原庫的黃金，交與中農與國貨銀行發售，此中底細如何，局外人亦是難明白的。

總之，黃金政策的實行，其利害已如上述，所以一般認爲黃金政策應該改弦易轍，或者主張局部的轉變。事實上，目前黃金的來源已成了問題，其所以成爲問題的，七月十二日商務日報曾透出一段消息：「黃金運東來，實因美國盛行黃金政策之反對論。美國經濟學家懷特（現任美國財政部總長）即認爲中國黃金如此消耗，至爲可惜，不若留作戰後之用」。以目前黃金政策的施行上，誠如商務日報所說，「黃金政策的兩具，一爲黃金現貨，其後爲期貨，一爲黃金存款。期貨自十一月以後已經絕跡，存款自四月廿五以後也已挫折。如此，黃金政策已經到存亡之秋了。」（該報六月一日）

三 外匯

外匯問題，在八年以前，從戰爭一開始就存在了，可是這個問題始終成爲一般國民所關心的問題。特別自本年以來，外匯的來源自漸豐裕（盟軍駐軍需要大量物資供應），歐戰結束，中國勝利在望，許多工商業者都在準備

戰後初期的經濟復員，都對外匯向國外購買各種器材。特別最近幾月來美國教會金庫在金融市場的活動，已成爲一種左右外匯市場的勢力，由於他們所受到的優厚與在黃金市場的推波作瀾，許多爲人所忘記的舊日的改革，也在這種瘋狂外匯的投機熱潮中被提出了，在這一問題上，我們準備把幾個月來的美鈔價格的波動與美國教會的匯率與僑匯的匯率的待遇如何的不平，略爲一述：

(一)美鈔價格的波動

美鈔在近幾個月來的走運，可與黃金價格媲美。從三月底的美鈔市價來說，當時不過六六〇，到了七月初頭美鈔更提高至三二五〇元，比之黃金在同期從五萬漲至二十三萬元，更駕乎黃金之上，可說是金融市場上的驕子。但是美匯之高漲與黃金黑價的高漲彼此互相影響的，現在讓我們把幾個月來美鈔上漲情形和它上漲原因略述如下：在四月間美鈔市價，從兩月來保持在七百元水平線上，與上月比較，高出一百元之譜；及至歐戰結束，給外匯帶來了高漲機會，五月廿八日，美鈔幣盤旋於八百元上下，二十九日即漲至八百四十元；三十日爲八百八十元，六月一日比期剛過，銀根轉鬆，就躍至千元大關；二日突漲至一千二百元左右。短短七八天美金從八百元漲至一千二百元，這是空前的飛漲。六月廿五日黃金備蓄停售後，外匯市場馬上受到影響，美鈔大票從一千四百二十元飛升至一千八百元，甚至漲至一千九百元。六月底此期，是重慶行莊最難渡的難關，外匯黑價稍低減一些。一入本月初頭，銀根鬆動游資又開始活躍，加以金融市場又傳出外匯有將改價及發行新鈔之謠傳，投機份子從中興風作浪。七月一日的美鈔是二千三百五十元，到了四日又突至三千元大關。財部鑒於銀錢市場爲造成投機份子操縱黑市的漏卮，故於五日重申命令，嚴飾錢業公會以身作則，限制外幣字號入匯，不得作美鈔黃金黑市公開交易，外匯價格暫時抑制而趨緩。但至本月六月，以教會匯票開盤後將牌價增至一六五〇，七日美鈔又因此刺漲至三三二五元，這創造本年來美鈔最高紀錄。

綜觀這次美鈔漲，其原因不外下列幾種因素。(1)歐戰結束，許多投機份子不敢在物資方面下手，甚至拋出存貨，於是將游資轉換一個方向，找尋一個短期出路。而購買黃金與外匯分明是最穩當最有利的辦法，(2)黃金市場的波動，也給與外匯的刺激，比如六月廿五日黃金存款宣告停止，黃金價格

引起波動。而外匯方面，也因黃金價值高漲而受刺激，由一千五百元逐步漲至一千八百元。教會美金匯票價值的提高，給市外匯市價帶來極大的影響。教會美金匯票價值的提高，給市外匯市價帶來極大的影響。教會美金匯票價值的提高，給市外匯市價帶來極大的影響。

(二) 教會匯率與僑匯

當前外匯市場，匯率是並不一致的，現價之外，還有多重的官價匯率。據說七月間的外匯市場，美鈔大票漲至三千一百元，這是一種。中政府間的劃算一美元合國幣四百元。教會學校聯合基金的美匯一美元換銀二千二百五十元。僑匯一美金合國幣百元，又是一種。種種價格之中，最價最高，教匯次之，而僑匯最低。各種價格相差之鉅，實令人不可思議的，我們準備在下面說明這箇原因，但是這箇敘述比較嚴重的還是教匯與僑匯兩個問題。

首先說對教匯吧，關於教會美金匯率。原由於我大後方物價高漲，政府對於美國派到我國來的教會，學校團體，和慈善機關所辦的經費與工作人員薪俸，如果按照美金一元合法幣二十元的匯兌比率，來應付前高漲的物價，自然感覺很大困難，於是政府在外匯的法定比率不更改之下，因此在去年春節，組織教會、學校、慈善聯合會，是准美國財政部函託我國政府特許在重慶的花旗銀行照市價代售教會的匯票美金辦法。這是教會匯率的起源。從一年中，教會匯率不但享有特殊待遇。而且它左右外匯市場的勢力。關於這一點，商務日報在六月九日給我們很詳細的說明：「外匯市場，最近有驚人動搖，五月二十日前後美鈔不過七百五十萬元，今天竟已達三千元以上。……投機市場上美鈔公債債券之一再上升，而且不再反跌，其原因是加入了教會美金匯票作為力量雄厚的股軍。每次美鈔券價的上升以後，本來有回跌的可能，但是美國教會的匯率却立刻追上去，只保五十元的差額，於是美鈔便不能回跌到教會美金以下。舉例來說，最近教會美金已漲至九百九十元，美鈔的退路便鎖住了，只能在千元以上盤旋，不能後退了。教會美金在外匯市場的比重，無疑地要越來越大。因為美鈔債券對於市場者每年不超過百萬美金，而教會美金每月一百萬，每年約千餘萬美金，教會聯合庫出售外匯的作風，却顯然是中國人同化了。心裏盤算到下週要漲價，本週便爭

出出售。漲價以後，再出售一批。市場上一聽說教會美金債券時候，就認為這必然又有一跳。這對於金融市場顯然有推波助瀾的作用。該庫的出售價格，由去年十二月的二百二十八元，到今年四月的三百八十元，到五月底的九百九，正好四倍，其增長的速度確實驚人。有人認為教會的活動，是極和的「治外法權」的復存，現在許多工商業家與經濟學者對這一種特權市場存在，莫不表示十分憤慨。

至於說到僑匯。我們政府對這種匯率保持在四十元，最近指示華僑匯款回國，一美元可匯國幣五百元。可是目前物價上漲如何，就依照官方報告，物價已漲至戰前四三三倍。若是依照通貨膨脹也不知比戰前增加多少倍。可是僑匯比戰前上漲不過一倍，這顯然是相去甚遠的。現行的僑匯的匯率，則足以阻遏僑匯，摧殘僑匯。根據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統計，去年一月至五月美洲方面僑匯，平均每月一萬萬元，而今年各月減少百分之八十，多數華僑返鄉為重大原因，而外匯比率低落影響亦極大，這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多年來，僑眷的生活已遭種種困難，僑眷之返鄉，實為僑眷之家的四邑與中山，僑眷早已得不到僑匯接濟而陷入死亡線上。(據六月十九日報載，因戰爭關係未能解脫之四邑僑匯有一億三千餘萬元。又據去年台山旅滬同鄉會的估計，單就台山一縣，去年就死亡人口四十萬，佔全縣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有人懷疑到政府對外人何以如此嚴酷，對自己的人民却又如此其苛。假如政府真正為人民利益着想的話，則僑匯應以特權的待遇。

四 銀行

黃金與美鈔的投機，就是銀行業在這些個月來最顯著的活動。在今天我們談論銀行業務如果離開投機活動的話，真不知從何談起，然而這種投機活動，是交織着驚濤駭浪的生活。

(一) 廿三日依樣再風潮

六月廿三日在重慶的金融市場來了一場金融狂瀾，它把許多銀行莊壟不遑氣來，甚至幾手淹沒了許多行莊。這陣狂瀾是這樣爆發的，廿三日，黃金

市場上謠傳着黃金儲蓄自五萬元一兩提高到八萬元，這謠言立即傳播整個市場，大家都相提款到四行兩局購金去了，全市行莊的所有存款都被提出，開晚在當天晚上各銀行的開寸比交，相差約八萬幾千萬，有三十五家銀行陷入週轉不靈。例外的如重慶銀行，即表一萬萬有餘，成大銀行，雖說存款揭充。加以中央銀行業務局又在監督比交，在這一天，各行莊真是沸水滾火熱上下煎迫，如果沒有好的方法解救，行莊危殆是不堪設想的，因此銀行公會理事長吳仲純乃就於當天下午，親向財政當局提出解救當前危機的辦法：一是即日資金提價，二是黃金暫行停售，以資各行莊提款過多，發生不可思議的大危險。……於是六月廿四日財政部才宣佈了黃金暫行停售的命令。全市六十七銀行和三十多家錢莊，得了這道護符，渡過了這場風險。

(二) 銀行業的糾紛

自上期發生永興厚與建立錢莊糾紛後，重慶行莊在這幾個月來一直未曾過着安閒平靜的生活。在四月底臨江銀行因內部人事的磨擦與虧空二千萬元關了門，這是本年來第三家的倒閉。其次江海銀行在春間因某項國家工程，借債四千萬元。最近和豐銀行與中國農產運輸公司也發生一百五十萬款項的糾紛。財政部以銀行業的保證業務危險甚大，特於六月十五日一律通令各銀行，禁止承辦一般保證業務。此外河南農工銀行重慶分行也發生了主管人員挪用行資，囤積貨物等事情。

(三) 金融市場的管制

由於統制的財政金融政策的不合理推行，形成大後方的金融市場定時時形的發展，銀行錢莊以投機囤積代替正當的業務，大多都在瘋狂的投機爭奪自己的生存。可是這種投機的幕後正是佈滿着引起市場暴亂的地雷，幾年來我們都可以找出許多事實來說明，每一次大瘋狂的投機，也就必然帶來金融市場的大混亂，這且不說，就以本年五月間與六月間的金銀市場的黃金與美鈔的投機，都可以證實這一點。因此在六月五日起，重慶銀業市場開始實施管理，提議者均須憑證入場。關於這次金融市場管理的產生，六月六日金融提報是這樣報導的：「週來渝市金融，因黃金市價之突升，投機之益復熾。市場所在地之陝西路銀錢業公會，每晨照例開會，戶限為穿，非行莊職員之

以投機為遊資出路者，趨之若鶩。據悉：財政部以該公會市場，應為銀錢業同業開辦內匯等業務之接洽場所，現在非同業份子，竟利用該處公開買賣黃金及外幣債券買賣，投機取巧，操縱黑市，對於國家金融管制及社會風氣，均有不良影響，特分令銀錢業兩公會，負責監督該處市場，嚴禁上項黑市交易，如敢恣肆為之，一經查出，決按擾亂金融治罪等語，即兩公會對財政部訓令，頓為重視，決定組織市場管理委員會，嗣後該處市場，即由該會派人場，藉以完全杜絕非同業份子混入與風作波云。……但是結果如何，我們且看禁令頒發第二日（七日）的新聞報導：「陝西路金融市場，須憑證入場。萬象森嚴，投機份子，無從混入，故場內一片沉寂，稍事寒喧，即一閃而散，而金融市場黑市買賣，轉移陣地到場外。」（世界日報）商務日報則更明顯指出：「記者查知新陣地已在民族路旁一貨幣之場所開闢（按此場過去以黑市子金著名一時）。」雖然，自從這禁令頒發之後，投機份子確是不敢在公開的金融市場作拋頭露面的活動，可是他已經開闢了第二戰場，黑市交易已改爲神出鬼沒的遊擊戰了，六月過去，黑市投機仍依然存在，七月四日，財政部再申前令，澈底管制市場。以目前囤積的金融財政的局面，如不加以澈底改革，欲以一紙空文來消滅黑市金融市場的存在，讀者早已認爲是滑稽之事，再以現下市場而論，外匯問題若不迅速予以合理解決，黃金兌現一週再遲，投機市場的花樣將更翻新，此亦非一紙「操縱市場，嚴以極刑」之命令，所能取消的。

預告

下期將刊載法共總書記杜克洛「關於美共解散的檢討」的長文，希讀者注意。

論 糧 產 與 糧 價

秦 彌 堅

近幾年來，政府差不多年年說豐收，年年說增產，既而又豐收又增產，則農村負擔離年年增加不也是可以的嗎？這首先就忽視了老百姓本來應該在今天極度慘慘的生活中改好一點，以刺激在萎頓中的農工商業微起色一下的必要。但就不談這話，近年來，大後方糧食生產以及一般農產生產，事實是並非增產而是減產，並非豐收而是歉收。今年四

川農務據省方統計，收穫平均僅六成，但據七月十日新華日報四版「關災的「喜」劇」一文中所報導，受災區域的災害程度並不能確實報上去，每畝收不了一斗的，查報起來便是二斗，三斗，四斗，全鄉六萬二千畝實收五六千市石，查報竟成一萬七千餘市石了。這情形實在是相當普遍的，因為政府糧食政策本來只以徵借為事，遇有災款如何再能徵能

三十四年度四川徵借數字和三十三年度同，三十三年度四川徵借總計徵實徵借二千一百六十萬石，縣縣公糧二百一十萬石，預谷三百二十萬石，以上共二千六百九十萬石，本年另加徵糧三百七十五萬石，合共三千零六十五萬石，這筆鉅大的數字，如果承認有災款自然收不起來了。故今年四川收成是否如官方之謂有六成還是可疑的。

川省農產二十七二十八兩年配合抗戰初期局勢，有一度景氣，以後逐年下落，三十三年糧食部徐堪部長說是「十數年來所未有」之「豐收」，實則不過和三十一年相彷彿而已。下面統計可說明四川戰時糧產的實在情況：（單位千市石）

	二七年	二八年	二九年	三〇年	三一年	三二年	三三年
小麥	三七,七三四	二六,〇五六	二一,六八四	二二,一一一	三一,七五八	二五,一九一	二六,三八〇
大麥	一九,六二五	一三,四〇九	一〇,四九五	九,八七八	一一,九五二	一〇,四八三	一一,八二一
雜糧	一二三,五七二	一一一,七二九	六〇,七一八	七七,六一四	八二,七六三	七八,一七二	九五,四六六

材料來源：四川農業改進所統計戰時四川經濟季刊二卷二期

於此可見四川三種主要糧食作物，小麥較之二十七年最高額減少一一，三四六千担，約百分之三十，大麥減少七，八〇二千担，約百分之四十，稻穀較二十八年最高額減少三六，二六三千担，約百分之二十七。去年收成據川農務調查冬麥六成半，稻谷七成，今年官方估計亦僅只六成，則今年農情之不振，在此也是表現得很明白的。

於此可見四川三種主要糧食作物，小麥較之二十七年最高額減少一一，三四六千担，約百分之三十，大麥減少七，八〇二千担，約百分之四十，稻穀較二十八年最高額減少三六，二六三千担，約百分之二十七。去年收成據川農務調查冬麥六成半，稻谷七成，今年官方估計亦僅只六成，則今年農情之不振，在此也是表現得很明白的。

勤修水利，植樹造堰，發揚地力，厚肥地種，天災的發生就可能減少，而即便發生，也可因農民平素之財力蓄積，人力組織，緊急挽救，而減輕其影響。中農月刊五卷五期合刊載張廷鳳、錢琳二君合著之「論近年來我國土地飢饉之循環」一文中，把「土地飢饉」，「報酬遲滯」與地權集中，民生憔悴聯繫起來看，認為「政府若能確立良善之政策，使土地分配，生產能得合理之進行，則未嘗不可防遏於未然」。這所謂「土地飢饉」雖然不是指災荒，但却是災荒的有力的助長。以言充代，「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於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牧畜。江南豪家，廣占農地，墾植佃戶，無餘地而有封君之貴，無餘佃而有官府之權，恣縱妄為，隨所不至。貧家樂於終身苦，窮年不窮，死亡，荆楚之地，至有鬻妻子者」。以言明代，「吳

糧產為什變減少？首先自然是天災，中國農民靠天吃飯，近年來，雖然逐漸更多靠地主高利貸與鄉鎮保甲長顏色吃飯，但天災總還是個重要因素。可怪的是這幾年差不多處處鬧災，年年鬧災，前幾年豫粵兩省的飢劫不用說了，以去年的四川說，四川田賦管理處長陳志學氏承認「災情極嚴重者」有三十二縣（見本年一月一日新蜀報）而實則還在去年六月，四川省臨時參議會副議長就呼籲：「今

除四川以外，今年陝西旱災已報災者有六十餘縣，河南未報區災達二十三縣，「秦收絕望」，貴州「七年的災情，事實上比三十二年的災災更為嚴重，受災縣分不下十餘縣。而自貴陽至獨山，黔桂沿綫及其附近各縣，直接間接受人禍也有十餘縣，其中多係貴州糧產要區」（二月二十八日貴州日報）此外，滇豫湘皖鄂等省災情亦均極為嚴重。然而天災實在是由於人禍。在民豐物阜之區，

勤修水利，植樹造堰，發揚地力，厚肥地種，天災的發生就可能減少，而即便發生，也可因農民平素之財力蓄積，人力組織，緊急挽救，而減輕其影響。中農月刊五卷五期合刊載張廷鳳、錢琳二君合著之「論近年來我國土地飢饉之循環」一文中，把「土地飢饉」，「報酬遲滯」與地權集中，民生憔悴聯繫起來看，認為「政府若能確立良善之政策，使土地分配，生產能得合理之進行，則未嘗不可防遏於未然」。這所謂「土地飢饉」雖然不是指災荒，但却是災荒的有力的助長。以言充代，「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於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牧畜。江南豪家，廣占農地，墾植佃戶，無餘地而有封君之貴，無餘佃而有官府之權，恣縱妄為，隨所不至。貧家樂於終身苦，窮年不窮，死亡，荆楚之地，至有鬻妻子者」。以言明代，「吳

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十之九。其賦甚重，而凡溝渠道路，皆悉其稅於田之中，歲值秋禾一熟，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過一石有餘，（注：據是遠指江南魚米之鄉說的哩！）而私租之重者至一二石，少亦至七八斗。田人竭一歲之力，……一畝之費可一緡，而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斗，至有今日之窮，而明實之實者。」在這種情形之下，土地日益趨薄，農村破產，生產規模日低，水利不修，地主青更剝削日甚，農民貧困也日甚，一遇災歉，自然祇有「高價買米，盡為兵匪，從亂如流，如癩斯癩」了。（附帶說，這種所謂土地飢餓，和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實在無甚關係，這是筆者所不同於張鏡二君的。）

我們今天情形如何？就租佃說，佃農納租達百分之七八十，地地權說，佔百分之〇。三的地主佔有土地百分之五五，八二（屬龍巖），百分之三三。三的地主佔百分之五三的土地（浙江），佔百分之二的地主，亦佔百分之五三的土地（廣東），另一方面，佔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貧農，却只佔有百分之二五或不足百分之二十的土地（一般估計）；就田賦捐稅說，各種捐稅佔佃農收入百分之七十以上（估計數），有的農民終年勤勞所得，還不足以繳納田稅，就勞動力與資金說，「農村青年，幾有三分之二，被徵入營，一切農事工作，大都以老弱婦孺負擔，既無充分精力，復少賸餘資金，以致田賦難繳，連年欠收，加以物價高漲，實有供不應求之虞」（四川經濟概況，四川經濟季刊，二卷二期）

在這種情形下，怎樣能不發生災荒，能不波瀾呢？
糧食產量，無不受影響了，糧價，跌價之虞，雖因原因不然是說，但波瀾甚重要原因之一。

壽邁氏在「戰時中國物價問題」一書中，引述了四聯總處編製之重慶市十五項物品售價價格指數如下：（基期——二六年全年平均）

年代	指	數	每年漲率
二六年十二月	一〇四·七八	一四·四	七八
二七、十二	一四五·八八	三九	
二八、十二	二八四·五二	九五	
二九、十二	一、二二五·七三	三三〇	
三〇、十二	二、四七八·六三	一二四	
三一、十二	七、五八四·九九	一七五	
三二、十二	二二、一四七·二四	一九一	
三三、五	四二、四四一·〇〇	一〇九	

壽氏指陳，二十九年漲幅遠較歷年為劇，是受戰價的影響，而糧價在這一年的漲幅是受兩因素所致：一、這年四川糧產收成皆受乾歉影響而減低，我們上列之四川各年度漲幅數字，二十九年最低，可證明此點，同時宜昌失陷，湘米運川通商阻礙，亦使用糧一時飛漲。又金陵大學農學院農產經濟系所調查成都市米之購買力亦可證明此點，計以二六年為一〇〇，二七、二八，以至二九年上半年，指數皆在基數之下，而二九年夏秋以後，則突然上昇，至卅年中達三二〇，三十年中糧價之昇高，則又是受田賦徵實之刺激，同時，卅年糧食收成亦欠佳。（見經濟通訊二二九期）

上面金大農學院的統計還證明一點，即不論糧價如何刺激一般物價，但整個說來，糧食價格較之一般物價都還是低的，因為由二六年至三三年，除二九——三〇這一時期米之購買力是飛漲狂瀾的之外，三十二年亦一度略超過二六年之基期，其它全部統計指數皆低於二六年基期，這證明在物價高漲中，糧食之購買力是減低了，戰時物價波動並未改變糧食與製成品間的不等價交換關係。這種

形的產生可有下列幾項原因：一、糧價特別受季節性影響，這因素，更因為地主高利貸商人及官僚勢力雖然一年年地更趨強佔操縱絕大部份的農產，但分散的小農們的糧食市場還是微弱的存在，同時，農村統治者則正不得不以按季節（收穫後二一三個月糧價必有一度跌落，即所謂「谷賤傷農」）來人工地壓低糧價的手段，來達成其盤算搜括和集中糧食的目的，於是農民永遠不得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交出糧食。二、雖然糧食的漲價立時刺激了一般物價的上漲，一般物價的上漲又增加了糧食的生產成本，但在高利貸和制度及非法掠奪的官商勢力下，生產成本是辛勤勞作的農民們的帳，而不是他們的帳，他則即便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出售，也還是獲利豐盈的。

但不消說，囤積居奇也是糧食漲價的一個主要因素。正因為糧產才引起了囤積，糧價漲了，土地產額和囤積之風就愈盛，土地壟斷，糧食集中，對農民的壓抑愈甚，糧食又愈不能減產，減產又給予了囤積者以更大的活動的可能。這一連串循環的過程同時也說明了有資金從糧食囤積的，是大地主、高利貸商人以及和它們聯系的金融官僚投機者，高利貸的囤積不能不超過了土地的壟斷，高利貸的囤積了官商們囤積以進而完成的。

本年以來，各地糧價漲風也是驚人的。以四川說，本年一月，四川各縣糧價最高者為綏江，每市石八千元，最低者為涪州，每市石三千元，但至五月，樂山米最高，每市石一萬五千五，樂山最低，每市石八千，同期，綏江一萬四千，約漲百分之七十，重慶年初山米每石九千元，現已漲至一萬九千元，漲了一倍以上，成都居全國米產最豐之區，亦由每市石一萬五千元漲至二萬七千元，算是漲率最低的。四川糧價之漲顯然是由於收成減少及軍公糧需

要則成，滋養重糧食產區今年既已絕望，則四川之糧食必必必，一方面供給減少，一方面需求增加，在此情形下，供求關係之平衡是很困難的。

但糧食運價之漲向遠有勢，一個重要因素，即是統制政策施行之不當。以昆明米價說，三十三年底每石不過九千元，至三十四年四月第漲達五萬元，可謂驚人漲價。昆明米價之漲，除由於上述之收成減少，(一)災情廣澤九十六縣，佔全省行政單位百分之八十，(二)征派兵馬，以致農村勞力缺乏，(三)糧食生產減少，(四)生產成本過高，負擔又重，(五)與黨軍新所得除報納捐課及應付各種雜項派捐外，常年衣食尚感不濟，更無餘力可作下一年之耕作費金，以致荒廢田地日見增多。見滇省糧食調查報告(四)糧食活動及軍公糧需要增加等原因之外，昆明觀察報曾指出：「造成私米狂漲之原因，自然不儘是公米價格提高。每一個社會現象都有它的一環一扣」。公米增價數千元而私米漲兩萬，這只是「表」；若再往「裡」看，恐怕公米在糧食方面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以鉅額借款分向各縣收購米糧來調濟民食，原則上不可非議，只是在採購時如果守法不嚴，手段欠妥，那就不能與強迫徵收糧路機關的行為無別，並且因公家似屬放任性質，利用經濟及其他勢力量投購之故，更形變到正當商人的買賣，因而刺激米價狂漲，市面混亂至於商人財困不可收拾的地步。(一)四月二十三(日)事實上，因糧糧及軍公糧行政收購糧食外，還額外負擔二、三倍以上的浮漲漲收，正是糧食問題的主要根源之一。

影響糧食上漲的因素固然不獨於此，主要因素，以貴州說，駐軍糧兵糧路阻礙，勢同故障，使糧食不足，以雲南說，接近戰區地方，軍事之後

，土地荒廢，糧產減少，以四川說，拉丁拉侯，使路斷人稀，運輸不暢；七步一關，十步一卡，使商運停滯，都是個別的原因。

糧價如此飛漲，在政府方面，財政負擔更重，通貨膨脹更鉅，軍公一切需要就增加了人民負擔；在經濟方面，正常工商活動一則是存形增加的稅捐負擔，一則是無形增加的生產成本中的消費需要，因此不得不更加速走向衰弱凋敝；在人民方面，生活程度愈高，衣食更形艱難；在農民方面，以佃農說，他們百分之七八十的收入歸納地主，其餘百分之二三十應付苛捐雜稅，他們的生活本來就很艱苦，小麥雜糧及農園蔬菜，糧食漲價的利益自與他們無關；以自耕農小地說，田租收入百分之七十以上歸納種種稅捐負擔，所餘的除自己食用外，尚供市場的很少，糧食漲價的利益也斷然到不了農戶頭上；反之，糧食漲價增加了生產成本，一般物價之漲漲增加了生活負擔，農民們正也不過是受糧價漲漲而下的犧牲罷了！

糧食問題是整個社會問題之一，它及轉來也有力的影響了整個社會和國民生活，如再不加以改革，前途實不堪設想！總結上面分析：糧食漲價的根源，租佃苛利，甚厲政治腐敗，各種有名無名的稅捐負擔，兵役工役，勞力缺少，天災頻仍等原因而年年減少，因此刺激了糧價高漲。糧價之漲又更因為囤積居奇，統制不良，行政腐敗，治安不靖而一發不可收拾。於是經濟破產，民生憔悴，國力傾覆。改革之道如何？追本溯源自應先求增產富民，然後糧價可以平穩，經濟可以發展，貧民食育可無虞。

其次，是嚴懲貪污，囤積，取消苛捐雜稅。而增產富民，糧食治國之道必須停止土地壟斷，糧食壟斷，執行正確的土政策，減輕減息，並實行民主政治，使一分民力，一分國用。然而地主官僚統治，

却是今日政治之基礎，因此，實行民主文必須要整個政策，機構，人事的徹底更新。這雖是老生常談，但問題結核全在於此！

八路軍新×軍及華南抗日

縱隊戰以來戰績

- 一、作戰大數 一一五、一二〇
- 二、獲傷敵軍 五一、四三四名
- 三、獲傷俘軍 四九八、二二五名
- 四、獲傷敵偽總數 九六九、六五九名
- 五、俘虜敵軍 三、八八〇名
- 六、俘虜偽軍 二八二、四九六名
- 七、俘虜敵偽總數 二八六、三七〇名
- 八、投誠的日軍 二二三名
- 九、反正的偽軍 一〇四、六二〇名
- 十、敵軍總損失 五一六、二六一名
- 十一、偽軍總損失 八四四、六一六名
- 十二、敵偽總損失 一、三六〇、八七七名
- 十三、獲長短槍 四三六、九六四支
- 十四、獲步槍重機槍 七、七八三挺
- 十五、獲各種砲 一、〇二八門
- 十六、我軍負傷 二八五、六六九名
- 十七、我軍陣亡 一六一、〇六七名
- 十八、我軍傷亡總數 四四六、七三六名

計：以上統計時間係從抗戰後至一九四五年三月底，但華南只從一九四三年至今年三月底，以前無材料。

如何進行農村調查

立人

中國是農業生產佔優勢的國家，而八年以來，農村更是支持長期抗戰的基礎。由於敵寇的摧殘與迫害，由於邊疆改革目標與努力程度的不同，國內的農村經濟情況，已起著巨大而相異的變化。在淪陷區，由於敵寇的佔領與搜括，農民呻吟於敵人鐵蹄之下，土地被掠奪，物資遭擄獲，生計完全斷絕，處於敵人之手，在那裡，敵寇正進行其經濟與經濟的剝削，落後的封建經濟勢力被維持着，而使農業生產走上徹底殖民地化的道路。在大後方，因為沿海口岸的淪陷，對外貿易的披掛鎖，經濟上本可由對外依存而走向獨立自給的道路，但由於租佃關係的未能改善，土地的繼續集中，因賦稅的加重，物價的不斷高漲，再加邊疆管制失當，農村經濟力無從補足，農民的減退，農民生活的惡化。在敵後區域，外來侵略的經濟勢力無從補足，軍費負擔了合於人民大眾要求而正確的發展政策，使租佃關係的改善，農民負擔的公允，以及生產運動的高漲，農村政治的革新，農村動員工作的擴大與深入，那裡的農業建設已有偉大的成就，農民生活日見改善，農民的力量對抗戰與建設有了更大的貢獻。

今天，我們要了解敵寇在淪陷區對農業的破壞與抗爭情形，我們要求大後方農業生產的減退情況及其根源，我們也要求研究敵後區域農業建設的成就，這都有賴於農村調查工作的計劃的進行。因為關於農村經濟或農村動員零星的消息或觀察，固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農村問題的某一方面，但如想要對某一區域的農村經濟情況作一個較深刻的了解，必須進行較有系統的農村調查工作，獲得可靠資料，作為了解事實，分析問題之依據。

而且今天正有不少人對於當前農村的問題，有着各種不同的意見，甚至基由事實的報導，例如有人說，這幾年以來，大後方的農村沒有什麼變化，還是老樣子，和抗戰以前一樣。也有人說，物價高了，糧食留餘了，農民只是無出產的糧食，生活也越過越好去了，所以農民生活並不見得怎樣困難，只是

農村治安頗有問題。大後方的農村，真的沒有什麼變化嗎？農民生活的確見得如何困難嗎？要是我們能實地到農村去，作一番詳細的調查，就可獲得肯定的答案，而且可以發掘到問題的根源。所以我們為掃除對農村問題錯誤的意見，獲得正確的答案，也有待農村調查工作的積極展開。

一

目前我們進行農村調查，究竟應該注意那幾方面呢？是否應該包括農林中的一切現象，還是選擇幾項重要問題？自然一般性的次要問題，我們不可能而且也不要一一考察，我們應該就能力所及，選擇幾項中心問題，做一個比較有系統的調查。就大後方的農村經濟情況而論，我們所應調查的，大概可分兩方面：一是農村經濟方面，一是農村政治方面，特別對於經濟與政治經濟與農村政治二者之間關係的調查研究，不但要查明今天農村經濟惡化的情形究竟到了什麼地步，而且應查明黑暗中的農村政治所給予農村經濟的影響，舉出具體的實例，數字，統計等，並指出其應有的前途。

在農村經濟方面，我們所要研究的中心問題，約有下列各項：

- 一、土地集中的過程和趨勢。近年，土地究竟集中到那些人的手裡？失去土地的是那些農民階層？爲何集中採取什麼方式？集中的結果怎樣？租佃制度有什麼變化？押租、租額的剝削程度和方式怎樣？在土地集中的過程中農民階層的分化達到什麼程度？
- 二、農業生產狀況。近年來農業生產一般的增減或減退？那些農作物是增加？那些農作物是減產，增減的原因在那裡？增減的農田面積和成數怎樣？此外勞動力的缺乏和浪費，對於農業生產起了什麼影響？事實變遷在什麼地方、種子、肥料的不足，耕畜的缺乏或品質低劣給予農業生產的影響怎樣？
- 三、農村物價問題。通貨膨脹，物價狂漲給予農村各階層的具體影響怎樣？

樣？其影響的程度怎樣？物價高漲以後農業生產成本和農民生活費用的支出究竟比前幾年漲了多少倍？農產品的實際售價是否有同比例的增加？農產品囤積者的轉售價格與農產品所有者的實際售價有何差別？由於物價上漲而得到好處的是那些人？受到嚴重剝削和損失的又是那些人？物價高漲下農村繁榮有沒有根據？

四、新式農貸和高利貸 在有農村合作社的區域，新式農貸是不是真正給予農民大眾資金融通的幫助？它跟農村高利貸的關係怎樣？彼此勢力的消長情形怎樣？銀行貸款是否能夠達到剝削剝奪資金的生產者的農民手裡，還是相反的剝削地主豪紳手裡轉為變相的高利貸？目前農村高利貸的方式有了些什麼變化？利率高到什麼程度？高利貸的貸放者是那些人？高利貸剝削創的重疊，主要是壓在第一階層的農民身上？這一階層農民的儲蓄在農村戶口總數中所佔的比率怎樣？

五、農民負擔問題 所有農村中奇形怪樣的苛捐雜稅，毫無限制的攤派，田賦征實征價的苛重負擔以及在徵收過程中的種種舞弊，地主紳糧的巧妙轉嫁，徵工和勞役的負擔，應分析它們的政治造因和給予農村經濟破壞的結果，苛雜攤派的名目、數量、方式，都應具體不遺的加以考察。

六、農業行政設施 抗戰以來，政府也曾舉辦了若干農業行政，例如農林部主辦的各地農業推廣工作，農業增產運動，農民墾殖事業，以及中國農民銀行主辦的扶植自耕農工作，在此種設施的區域裡，我們也要加以詳細考察。究竟農業推廣工作，有沒有真正達到農村，對農業生產是否發生影響？對農民有無實惠？糧食增產和冬耕運動等工作是否確實？抑係僅有政府命令與隨意編造的工作報告？墾殖事業對農民有無實惠？是否僅墾殖為名圖購土地，而仍然維持着租佃關係，剝削農民？扶植自耕農工作遭遇何種困難？它究竟扶植了若干戶？這些自耕農生活改善了沒有？為什麼此等設施不能獲得預期的效果？

其次在農村政治方面，我們所要研究的中心問題，也有下列各項：

七、保甲制度 在高唱實行憲政的時候，如果農村仍然漆黑一片，農民大眾不能起來參加政治，這問題與自己休戚相關的農村政治，那不管怎樣喊得好聽，也必然是一種粉飾。因此，當前的保甲制度是促進農村民主的工具還是壓抑農民民主的桎梏？保甲制度是掌握在那些人手裡？它在農村中所起的作用怎樣？保甲制度究竟有那些腐敗惡劣的事實？農民怎樣看待保甲制度？

八、兵役和農民離村 由於兵役的腐敗，故農民離村逃亡，農村勞動缺乏的事實，也是值得我們調查研究的。我們要考察農民對兵役已經有怎樣的貢獻？要搜集現有徵收腐敗惡劣的事實，農民離村現象以及對農村勞動力的影響。由於農民離村，勞動力缺乏，生產破壞，分析其因果關係，就可充分說明改善今天的農村經濟，使走向繁榮，是和農村政治改革，走向民主是不可分割的。

九、災荒問題 農業災荒，看起來，好像是自然（如水旱蟲災）的原因，直接影響農業生產而反映到農民生活的異常貧困災荒現象的造成。但我們如果加以深刻的研究，災荒的造成，擴大和深刻化，絕不如此簡單。如果我們誠心誠意為農民大眾服務，虛心而客觀地考察和研究農村的災荒，我們必然會發現一系列的實質的證明。災荒的發生指出災荒的根源在那裡？災荒的發展過程怎樣？在災荒過程中那些窮人受苦最深？政府是否給予及時的救濟，救濟的方式及其效果怎樣？

十、農民組織問題 各地現有的農會其組成份子怎樣？它為那些人所操縱？辦些什麼事業？此等事業對農民生活有無影響？或者是有名無實，而是箝制農民的組織？農民的參與自由等無保障，是否常受縣府和鄉公所或鄉鎮保甲人員任意拘捕和虐待？農村中原有的落後組織如幫會等，現在究竟還佔有何種勢力？對農民生活發生何種影響？此等有關農民組織的問題，也是我們所要考察的。

農村中經濟的政治的現象是非常複雜錯綜的，上面幾個中心問題，自然不能完全包括得了，但主要的，只要我們能了解有關於農村經濟的基本問題，同時對於通過複雜錯綜的現象，來把握問題的本質。

以上種種就大後方的農村經濟情形而論，要是調查論陷區或敵後區域，那麼我們應該注意的中心問題，也就有所不同了。

三

至於農村調查的方法，大體說來，我們要注意下列各項：

第一如何選擇調查區域 農村調查工作的進行，常受調查經費以及人力和時間的限制。因此，每一調查工作的舉辦，必須按照預算，決定調查範圍的大小，而尤其重要的，要能選擇調查區域，固然我們希望能了解各個農村的實際情況，但事實上不可能舉辦普遍的調查。我們要選擇代表區域，作有

計劃的考察。例如接近大都市的農村，往往受商業資本的影響較為濃厚，落後而偏僻的農村，其情況與都市附近的農村迥有不同。又如災荒區域或戰區附近，農村經濟的變動，必然與其他區域不相一致。區域選擇適當，我們可能較以小規模的調查，了解較大區域的實況。至於利用暑假或公餘時間舉辦調查研究，那只能選擇附近區域，而以該區域內可以代表的農村作為調查對象。

第二如何運用調查方法 農村調查的方法，本有概況調查、接戶調查、選擇調查、通訊調查等四種，概況調查的目的，是要了解某地農村一般情況，接戶調查是選定一個或幾個農村，向每一農戶詢問他們的經濟情況，然後把材料分類統計。這方法比較精確，但極繁冗，經費、人力和時間不許可時，是更難舉行接戶調查的。選擇調查是在調查區域的許多農村中間，選擇某一部分村戶來做調查的對象。例如某村有十家富農，二十家中農，六十家貧農，十家雇農，如果我們決定調查十家，那麼在這十家中間應有一家富農，二家中農，六家貧農，一家雇農。所以如採用選擇調查方法，要先做概況調查，然後選擇代表農戶。通訊調查，是到法舉行實地調查時，製成調查表，委託熟人代為調查的方法，此項調查雖然省事，但很難獲得正確材料。一般說來，實地調查時，先做概況調查，再進行選擇調查，事後如發現缺漏的事項，可以舉行補充調查，或利用通訊調查方法從事調查。

第三如何編製調查用表 出發調查以前，先要編印調查用表，作為登記和記錄的依據。否則隨意詢問，所得結果，一定殘缺不全，更無法分類統計。調查表格所列問題，應注意：一、問題要具體，以便答覆，且可獲得正確的答覆。二、要便於統計，所有答案都應用最明確的數字表現出來。三、所得答案要有明確的社會意義，例如農家的收入和支出，必須詳列其內容，例如地租收入和工資收入其所涵社會意義是完全不同的。四、要劃定調查時期，最好以最近一週年的情形，作為調查對象，詳細記錄有關材料。五、要能夠同時調查五年或十年來的變化情形，例如在太後方，以最近一週年的情形和民三十年以前或抗戰以前比較觀察，就能從事物的變動中把握問題之所在。六、調查表擬定以後，要先試用，根據試用結果，加以修正，然後製成，因為有許多問題或調查項目，一定要深入農村考察以後，始能發現，在研究室內擬製的調查表，不一定完全適用的。

第四如何選擇調查人員 調查工作能否獲得滿意的結果，對於調查人員的選擇，是很不關係的。我們認為優良的調查人員必須具備下列各項條件：一、是對農村經濟有正確的認識，要是這一方面沒有相當的修養，或者具有其他成見，那在工作中就無法獲得正確的材料。二、是對這一工作有相當的興趣，有興趣的人，才能不惜一切艱難困苦親自到農村去搜尋材料，發掘問題。

三、為認真工作的態度，調查時要是馬虎從事，那就容易獲得錯誤的材料，導致全功盡棄。必須認真工作，努力尋求。四、要熟悉當地情形，調查人員最好由當地青年中設法物色，因為一般說起來，農民的文化水準比較落後，對於外來的調查員，每因言語等的隔閡而拒絕調查，或隨便敷衍，而我們不能獲知農村問題的真相。

第五如何當地調查 我們既選定了調查區域和調查時期，而且有了完善的表格，和優秀的工作人員，實地調查時，技術上還是應該注意的。首先對調查的農戶，要請熟人一一介紹，使其祛除懷疑，能以真話和盤托出。其次要多方搜求，竭力設法獲得真實材料。例如調查地權的分配情形，地主是不一定肯以事實告訴你的，必須多方查問，比較考察，才能得一可靠結論，切忌為少數人或錯誤的材料所蒙蔽。同時，要活潑靈敏，善於應付。談話時注意對方的表情，抓住每一句話，聽得快，問得快，觀察得快，見解即發，務使對方有假造事實故意欺騙的可能。

第六如何分類統計 調查前的精密計劃，調查時的認真執行，以及調查後的詳細整理，都是調查工作成敗的關鍵，我們把調查材料統計之前，首先要考慮到分類問題。分類方法，可以按照數量劃分階段，例如在統計所有土地時，把全體村戶按照所有土地的多少，劃成「無土地者」、「一—一〇畝者」、「一〇—一〇〇畝者」……等等階級。這是比較傳統的分類方法。也可以按照階級性質來分類，例如把全體農民分為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僱農四種。或者更科學的根據土地關係和階級關係，分成「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僱農五個階級，然後將各該階級調查材料分別統計。

數字算出以後，為將要把數字間數字的關係，用最明顯的方式表示出來，還為求出各類問題的平數，百分數，或指數：例如某村十家地主，平均每家所有地一百畝，一百家農民平均每家所有地十畝，這是用平均數說明各類農戶土地所有的情況。百分數是要說明部份和全體之間的關係。例如某村農戶的土地使用，有自田，有租田，租田的租佃佔該村農戶使用土地的百分之二十，中農的租田佔該村農戶使用土地的百分之四十，貧農的租田佔使用土地百分之六十，這是用百分數來說明土地使用的分配。指數是用以表示數字的增減趨勢，例如戰前川米每石（每石斗一三、一三市斗）價六元，現在每市斗價一八、〇〇〇元，我們以二十六年的價格作一〇〇，那麼現在的米價指數是九三、九〇〇，就是較二十六年增加了九三、八倍。還可以根據統計數字繪製統計表或統計圖，然後根據統計所得結果，編寫調查報告。

農村社會調查是一件繁冗的研究工作，但也是極有意義的專業，我們可以從這一工作中了解農村，發掘問題，一定可以引起我們無限的興趣的。

且撒還歸的且撒

· 冀 蘆 ·

戈培爾博士是世界的第一流「撒謊」大家，在他的口頭，失敗可以變成勝利，死的也可以變得活起來。撒謊而有甚麼秘密的話，那戈培爾博士的秘訣就是「把這話說得極其相似的，絲毫不混氣，不走水，一不假，二不休，索興撒謊，到無可再撒的地步，達到最高級的程度，使得沒有一個理智正常的人會猜到究竟有人敢如此不顧一切的撒謊，經常的撒謊，永遠的撒謊，大量的撒謊，撒謊到底。」

「總不會一句也不真吧？」人們這樣想。但想不到在在一念之間，戈培爾就得到勝利了。因為「天下果真有這樣的撒謊，果真有半句也不真的話。」

戈培爾博士在播音台前死掉了，真是奮志以死，但他究竟「撒謊到底」應該是死無遺憾了，何況他的徒黨們已經繼承了他的衣鉢，說不定更是超越他的宗師呢？

對於這些存心撒謊，志在行騙的人，是決不能以常情常理來付度的，譬如說：行騙者懸羊頭而賣狗肉，雖然欺世騙錢，然而畢竟還拿出了狗肉，雖然趕不上羊肉，但竟還沒有大害；以指鹿為馬來說，雖然鹿並不是馬，但鹿和馬在形體上畢竟還有其相似之處；至於來滿為舖，以黑作白，就簡直連形體上也沒有絲毫相似之處了。行騙者就是窺視着人們善良意志的弱點，因為這種混淆黑白，顛倒是非的行為，是出於常情常理之外的。在善良人個一動念中間，以為，總不會一句也不真吧，總不至於這樣無恥吧，意志上稍為動搖，行騙者的詭計就得了。因為天下果真有這樣無恥的人，也果真有這種混淆黑白，顛倒是非的惡習。

法西斯日寇不就是這種最卑劣的行騙者嗎？明明是殘害，虐殺人民，但他們却撒謊「共存共榮」的大謊。強盜的屍體倒在被侵略者的土地上，却說這是人民對他的「不友善」。跟蹤着這種謊話後面，是槍刺，炸彈，侵略者也就搬棄了一切撒謊行騙的外衣。譬如說

吧！一方面宣傳着「容忍」，「政治解決」，一方面卻又磨利了刺刀去屠殺人民。頭上充滿了「悲天憫人」，「苦行救世」，「行善救世」的面貌；衣襟後却藏着含毒的利刃，甚至每一個毛孔都散着毒氣，隨時會射向善良正直的人民。這種行騙者的心腸是鬼惡的，陰謀也是毒辣的。對於這些行騙者意圖上絲毫的動搖，就是容忍這些行騙者詭言的流弊，就是放縱這些陰謀者的罪惡行為。

對於這些陰謀的行騙者，最好的辦法是毫不動念的觀察他們撒謊的外衣，發覺他們的本來面目。雖然在這種謊話的外衣被撕破後，他們會露出醜惡的真相，猙獰的面目，但陰謀者的本來面目一揭穿，人民就會用自己的力量來消除他的。

行騙者雖然殺了鬼賊的心腸，撒謊了天下的大謊，然而要讓其手統天下人的耳目畢竟是困難的。高明知戈培爾終歸不免於「毒志以欺」，行騙者的下場也就够悲慘了。法西斯日寇雖然高唱「共存共榮」，「共榮」，被迫害的人民是會從他們自己身經目擊的事實來考察一切的。侵略者雖然製造了中國人民對他們「不友善」的謊言，作為向東北進攻的藉口。強盜和人民的鮮血，雖然混流在一起而辨別不清了，但強盜們在被侵略的土地上倒下的屍骸，不就揭穿了陰謀者的謊話嗎？陰謀者雖然帶着一切偽裝的矯飾，和善的面貌，虔敬的表情，但人民不是好欺的，他們帶着發覺的巨眼，洞燭這些虛偽者的鬼蜮心腸。

在長期的陰害下，中國人民已經學會了「聽言觀行」，因為善惡和是非之辨，並不是刻在人們的口頭和面上，傳定見乎行為，而又深植在人們心裡的。

撒謊且的陰謀撒且，人民是不喝「孟婆湯」的。 七月廿五日



晉察冀行進

周而復

突過封鎖綫

在晉察冀解放區的邊境××莊，我們一行二十四個人，停留了三天。這二十四個人裏面，有二十二個人，是由延安十八軍團軍總部派到晉察冀解放區工作的幹部，我和黃君也是到晉察冀解放區去的，就集中在二塊，打一場封鎖綫。

過封鎖綫的準備，我們早做好了。根據晉察冀解放區八旅副團長的意見（他在我們來到邊境以前，對我們全體要過封鎖綫的人，做了一個報告），我們把每個人的行李，減少到最低限度，用秤稱了，總共也不超過十二斤，因為我們身體很弱，又沒有作戰經驗，再多了怕擔不動。黃君帶了一本硬面的「救國軍的婦女地」和「救國軍史」，這是他兩本心愛的書，但怕過重，把硬封面都扯掉了，正文的天地也忍痛切掉了，他拿着這兩本像是在裝訂房裏邊裝訂好的書給我看，笑着說：

「輕了，我怎麼也要帶着它，死也不丟掉。」

我們每個人帶了三斤乾糧，是用晉察冀解放區的特種物：被麥炒熟的，裝在一個白布細長的乾糧帶裏。我們還帶了四兩鹽，這是護送過路部隊告訴我們的經驗：在封鎖綫上和游擊區，常常買不到鹽，一個人應該吃沒有勁啊。此外，我們還怕鞋子丟了，在鞋幫上縫了兩個帶子，在脚面上一拴，任怎麼跑，鞋子也不好掉了。

吃過早飯，我和黃君兩個人正在炕桌上看封鎖綫附近地圖，和敵人佔據林莊的名稱，以免掉隊錯走連敵人的線路。支隊部的通訊員來了，我們跳下炕來，問住他，知道橋來了，一定有好消息。果然，是支隊長找我們去。

支隊部就在離我們住處三十來步遠的一座民房裏，支隊長住在左側的一個磨洞裏，他給我們說：「今天可以過路了。」

派一個連和縣游擊隊，由支隊部政治處張主任護送我們過去，馬上吃飯就出發。我們聽了這消息，是又高興，又緊張，全都回來準備了。

晉察冀解放區和晉察冀解放區，中間只隔着一條同蒲路的封鎖綫，但，現在把這條封鎖綫有區不恰當了，因為敵人的封鎖，已經把這條封鎖綫成爲了，應該叫封鎖綫。在敵人勢力封鎖下的封鎖綫，有二百二十里，一般地需要二天一夜突過，突不過，是很容易落入包圍，這就……

吃過飯出發時，縣游擊隊隊員們負着重要的任務，不能離隊，改派八區游擊隊隊員和支隊部同連送我們。這個縣的游擊隊人數很少，只有八個人，火力也不強，全是步槍，而且，其中有一條槍常常卡子，打不響。支隊部的那個連，并不滿額，只有五十六個戰鬥員，有四個打圍子，還有……武器有兩挺輕機槍，一個擲彈筒。我們對這支支隊送部隊不免有懷疑起來：它能夠完成這個任務嗎？張主任却很有把握地給我們說：

「我保險把你們送過去，我送過三十四次，連」

這一次，三十五次了，一次也沒出過事。」他指著區游擊隊給我們說，「你們別看區游擊隊火力不強，有了他們，過路更保險，你們看吧。」

他說得那麼肯定和有把握，又不得不使我們這些沒有經驗的人，對他信任了。

沿着微為汾水和漳沱河分水嶺的雲中山脈的山峯而下，是一條盤山的狹道，狹道左邊是深遂莫測的峽谷，密密雜雜地長滿着松樹、榆樹、檉柳……樹梢上浮着一層烟似的輕霧，我們這一支八十二個人的輕便隊伍，便在霧里悄悄地急行着。

下了雲中山的山峯，下面是一條鋪滿了鴨蛋石的山溝，踏在上面，幾個石頭發出亂紛紛的清脆的響聲。護送部隊在上面走着，就如同走平坦的土地一樣，我們這些人走起來就吃力，慢下來了。走在前面的黃君，一腳踏空，身子的小平衡馬上保持不住，差一點跌倒了，幸虧他手上有根手杖，支持住了。這一條山溝只有五里多地，我們却走了一小時，部隊時不時在前面等我們。

出了山溝，走了十多里路，已經快黃昏了，我們走到了××村。村口放着四桶開水，桶旁邊圍着許多老百姓，在仔細地看我們。原來張主任派了偵察員先來，動員老百姓燒好開水等我們。部隊一進村，馬上就停下來，大家吃晚飯。

所謂吃晚飯，就是吃乾糧，我解開扣在皮帶上的一個白磁缸子，把繞在脖子上的乾糧袋的結子打開，倒了半缸子炒莢麥麵，先前我以為這麵炒麵是不容易下肚的，現在走了五十多里地，又有點餓，又有點乏，吃起來竟然很香，吃完一缸子又是一缸子。

吃完了馬上就走。前面是一條狹長的山谷，兩邊的山峯高聳着，使得谷里深沉而又有點寒冷。張主任指著兩邊的山頭對我們說：

「山那邊就是敵人的據點……」

我們聽了，大家都緊張起來，好像什麼突然事情會發生似的，脚步不由地都加快起來，但是張主任還是邁着均勻的步伐，一步步走去，很安然地說：

「不過，不要緊，上面有我們民兵的哨，敵人只要在村子裏一集合，我們就會知道……」

我抬起頭來一看：山上並沒有哨。張主任大概察出我的神情，接着給我解釋道：

「這是隱蔽哨，下面看不見的，不然，不是被敵人發覺了嗎？他們藏在山頭上，經常移動的。」

大家緊張的心情又鬆弛下來，步子也就慢了。轟立在四野的山巒輪廓逐漸模糊起來，暮色蒼茫了。在我們左前方的山峯背後，升起一輪明月，放射出清冽的光輝，模糊了的山峯輪廓，又顯出它明晰的身影。我們踏着皎潔的月光，順着一條陡峭的山路爬上去，爬到半山腰，是一座二十多戶人家的小村落，村口的斜坡上有一座小山神土地廟，廟前立着一個兩個人抱不過來的大槐樹，我們就在廟前的斜坡上休息下來，張主任站在我面前，小聲地說：

「……現在離同蒲路還有二十里地，一下了這座山，我們就要走進平原，過對鎖線了。大家要注意，不要拉距離，不要掉隊，不要說話，不要抽煙，要抽煙的同志，現在抽，用手把火光遮住，這個村就是敵人的愛護村，帶牲口的同志，趕快喂牲口，前面就不能喂了……」

初聽到這個村就是愛護村，沒有到過解放區的後方同志，便都警惕起來，好像這個村的老百姓也和別的村不同的樣子。經過張主任的解釋，這個村表面上雖然還是愛護村，實際上是抗日村政權，全村沒有一個壞人，大家才又安心起來去準備。我和飼

養員去招呼我那匹靈紅色的蒙古馬，解下鞍子上的料袋，把黑豆倒在廟裏的碾磨上，讓她去吃，她今天一晚，也和我們一樣，是够幸苦的，她背上馱着我的全部行李，有時候，我還得騎上她走哩！

有烟繙的同志，這時都四散開來，躲在牆角落，用手蓋着發火光的烟鍋，拚命地一口口吸着。有的在喝水，有的在緊綁帶……

月光透過槐樹的枝柯間的空隙，照到斜壁上，牆的人影，在悄悄地忙亂着。

張主任看大家已準備好了，便倚站在他面前的這個村裏的一個民兵問道：

「德導來下沒有？」

「馬上就來……」民兵的話還沒說完，村里便有人答道：

「來了！」

走出來的是一個四十左右的中年農民，中等身材，有一臉絡繹鬍鬚，額骨很高，兩孔輪廓明確而有棱角，一看就知道是個強壯的漢子。張主任看見他，走上前來，拍拍他的肩膀道：

「又是你去，村長，好，咱們走吧！」

隊伍靜靜地穿過了山林，爬過山頭，前面便展開漫無邊際的原野，只是對面在烟霧氤氳中，借着月光，可以約略地看出有模糊的山峯影子，那邊就是晉察冀的解放區了。我的心急遽地跳動起來，恨不得一步跨過這二百二十里左右國宇對銀河。

在向前拉道的時候，是我們的才休息的，這個愛護村的第三任村長。這個愛護村，開始時敵人很信任，但後來派來奸細報告，村裏常常有八路軍過，是村長招待和擔任嚮導的。敵人便對這村懷疑起來，對這村的連絡員每天到橋樓上去送信，也常常懷疑起來。因為連絡員總報告沒有八路軍過。敵人把所有懷疑和憤怒都集中在第一任村長身上。一天，敵人偵察出又有八路軍過，把村長叫去，問有無

紅軍一過路，村長說沒有，敵人立時帶着村長走到鐵路邊上，把村長綁在電線桿上，三天三夜不給吃一點東西，然後叫他自己在鐵路邊挖一個坑，挖好了，敵人就把他砍了頭，埋在坑里。於是敵人又派了第二任村長，但是第二任村長依然抗日，而且很積極，敵人知道了，又捉去殺掉。現在我們拉運的，便是第三任村長。當我知道這個故事以後，我趕到前面去，默默地跟隨走了一段路，我發覺他是一個沉默寡言而又勇敢的人。我們慢慢熟了，我坦率地問他：

「村長，前任兩個村長叫敵人殺了，你怕不？」

「怕什麼？」

這一句反問，倒把我問住了。我就老實告訴他：「你不怕敵人殺你？」

「哦，怕什麼，敵人再殺死我，有第四個人出來擔任村長，還不是抗日，怕什麼？死是爲了抗日，也值得！」

從這幾句簡單的話里，我體會出解放區那敢不戰而勝的人民力量，走在我旁邊的，就是人民堅強性格的代表！

隊伍一走進平原，在村長的嚮導之下，便進入迷離的境地，簡直是一個神秘的旅行：走了很久，沒有經過一個村莊，盤旋的小道，田塍，河邊，有時竟從高粱地里穿過，這些地方，只有木村的人才會知道，外邊的人不進去，即便進去了，也一定走不出來的。但村長帶着我，走得頭頭是道，竟是不進村子，平原上的村子却永遠就在我們四周圍。我們的腳步又是那麼輕捷，呼吸是低低的，喉嚨裏也發出最低微的，所以沒引起平原上的狗吠聲。我們在這樣的地里穿過，如果不是借着月光和天上的星星，是一定不會辨出方向來了。

我們在一片高粱地里走了約莫二里多地，出了高粱地，橫跨一條大路，就進入一條田塍道，只有一尺來寬，兩邊是稻田，上面海起五寸來深的水，月光照着它，像一片明鏡似的。明鏡上垂拂着疎疎的田塍上柳樹的枝條。在這個小道上，人是可以走得過，牲口便有點勉強了。飼養員在前面小心地

牽着，後面還有一個人拉着牲口的尾巴，萬一掉下去，好立時拉起來。幸好我們這次過路，只有三四牲口，都平安地走過了。

前面隆起一溜土坎子，不遠便是一個村落。我們沿着土坎子的邊沿，無聲地走去，忽然聽到土坎子上面去展望的偵察員縮回頭來，對張主任耳邊說了兩句，馬上就叫大家就地蹲下來。大家不知道什麼事，便蹲下來。一會，土坎子上傳來響亮的馬蹄聲，劃破月夜的寂靜。馬蹄聲慢慢遠去而消逝了。張主任這才告訴我們：土坎子就是敵人汽車路的路基，剛才是敵人騎兵隊路過，所以我對你停下來，讓他們過去了，我們好過路。敵人雖然過去了，張主任還是謹慎地在公路橋上兩旁佈置了兩挺機槍，防備敵人回來。我們便在公路橋下，像一陣急風似的，衝過去，一口氣走了三四里地。

「向後傳：後面都跟上了沒有？」

「向前傳：都跟上了，沒有掉隊的。」

「一個個傳過去，比較鬆散的隊形，頓時緊湊起來。走了不一會，前面又傳過來：『馬上就要過路，不要掉隊！』大家心緒緊張起來，一個個跟着一個個的，把平原切成兩半，鋼軌在月光下閃閃地發亮。鐵軌上端站着兩個端着槍的戰士，他對我們說：

「快走，跟上隊伍……」

我們幾步是踏在前面人的腳跡，一步也不落後的跟着走去，誰要是走慢一步，後面的人便催他：「追上去。」

同蒲路的緊張的封鎖線，便讓我們這一支裝備得很差的小部隊突過來了。過了路沒有三里地，送我們的村長對那一帶便不熟習了，臨回去時，他對張主任說：

「你們好好走，咱們回來見。」他一人回去了。

一過路，在封鎖線上來往的八萬游擊隊可活躍起來，他們像是村長在那邊一樣地熟習道路，帶我們在各個小道上穿行，走上一片棒子地里，他指着

看遠的一點燈光的村落對我們說：

「那就是敵人的據點，離我們不到三里地，」旋即他又補上一句，「不要緊，敵人不放出來的，他經常吃我們的虧！」

在平原，上我們悄悄地急行着。

走到平原的盡頭，矗立在前面的是一座座山巒，幾度磨折之後，腿已經乏了，一聽說要上山，更覺得乏了，但又想馬上就到了山頂，又想休息，這是一個矛盾。體力上要求休息，環境却要求上山，一上山就比較安全了。有的掉隊，有的坐在路邊走不動了。

張主任叫戰鬥部隊在前面休息下來，零零落落掉隊的人去聽來，他說：

「現在還是在敵人的勢力範圍之下，隨時可以包圍我們，同志們上了山，再好好休息……」

大家振作起來，走進山溝，向山上走去。一進溝，迎回驟來夜風的寒風，一冷，倒反而精神抖擻起來，步子也快了。後面有幾個體質孱弱的同志，實在走不動了，我們的馬便讓他們騎，有的就抓着馬尾，借馬的力量，一步步上去。

上山的路，越走越暗，終於幾乎辨不清了，張主任傳下話來，叫我們一個個定一個定，叫下的逐漸從黑暗中發白來，天快亮了。

上了山又走了約莫二十里遠近，一向沉默的護送部隊有了談話的聲音，並且發出愉快的歌聲。我們在半山腰的一座村莊停止下來，張主任跑過來，笑嘻嘻地對我們說：

「同志們，平安地過來了！」

這時已近中午，將近一天一宿，我們突過了二百二十里圍的封鎖線，沒有一點意外發生。張主任催我們打水洗腳，好好休息，吃了飯：睡一覺，還得走，莫無過四五十里地的「無人區」，才能夠到達晉察冀解放區哩！

(未完)

絕望的狂

蘆 蕪

偉大的狂者，而絕望者也最狂。
會便使千百萬窮苦善良的人民流血，
死亡的網羅法西斯，可以說是變種之極致
了，但一朝日暮途窮，他們就由「金錢豹變
成了羔羊」——雖然他們洗刷不掉。「全身
的斑點」，更絲毫沒有改變其殘暴的
獸性。以我們八年血戰所抗擊的法西
斯日寇來說，槍彈只知道殺平民，
刺刀殺青歡追隨婦孺，殘殺掠掠，無
所不為，然而愛底羅中，却卑怯的藏
有幾張符籙，祈求神祇的庇佑。以歷
史上的暴君，獨夫為例，也可以證明
這一點，雖然在外敵面前，多半是奴
顏婢膝，苟安求活，甚至喘以為幸，
把抽掉了脊椎骨的背去對着敵人；但
他們對人民呢？却又摧殘，迫害惟恐
不及，獨用暴君的淫虐。一方面是殘
暴的野獸，一方面又是卑怯的奴才，
對着這種卑怯的殘暴，我無法抒寫我
的憤恨。

對於瘋狂者的心情，雖然無法以
常情常理來測度，但瘋狂者自身却多半由於
希望的絕滅而成。「困獸猶鬥」就因為已經
覺得逃無可逃，而對死亡的命運作最後的掙
扎，「鬼逼急了也要咬人」，雖然未必能够
咬得着人，但總是希望由這掙扎得到倖然
免脫。這慌了的鬼子的咬人，雖然是一種絕

望的瘋狂，但還是那小者對強者的反抗
，如果比之於歷史上的暴君，獨夫垂死的瘋
狂掙扎，小鬼子的行為是善良的，心情也是
可哀的。至於那些殘人以這的暴君們，平時
是用盡一切的槍刺，屠刀常壓人民，一旦人
民的覺醒增高，人民的力量震動到他們的「
寶座」，暴君們就會挖空心思，使盡腦汁，
想盡種種的方法來虐殺人民，想藉此來維持
其奴役人民的統治。

獨夫們雖然用盡了一切殘暴的統治，但
他們是自知其垂死底命運的，漢朝的郎中主
父德，就道出了這種絕望者的心願。郎中主
父德治長短（縱橫）術，善發人陰私，只有
送錢給他的人才可以免掉。有人問他為甚麼
要這樣做，他回答說：「吾日暮，故倒
行逆施之」，對於絕望者的瘋狂，「倒行逆
施」真是絕好的說明。

暴君「倒行逆施」，廢落者決定無法免
掉其滅亡的命運；暴君，獨夫們雖然在絕望
的瘋狂中間，用盡一切暴虐的手段來摧殘、
迫害、虐殺人民，但人民一旦由容忍的界限
轉向憤怒，就會是人心震盪，衆目睽睽，人
民憤怒的火山一爆發，獨夫、民賊就會被燒
成灰燼。

暴君，獨夫雖然註定了必亡的命運，但
他是不甘於滅亡的，他也不肯自願的承認其
滅亡的命運；雖然他垂死的掙扎，但正因其
絕望，所以也說特別瘋狂，我們切不可稍存
懈怠，或者是掉以輕心。對於這批絕望的瘋
人，歷史已經為他們掘好了墳墓，我們的責
任是早一點把他們送到墳墓去。

根本之點，就是要改變封建的土地關係，與廢除一
切超經濟的剝削制度。

由此回到本題，我們為什麼主張「耕者有其田
」？不錯，「耕者有其田」，說起來信所說，實足
以使耕地分散，大規模的機械耕種制度不可能產生
。但我們更希望先生這麼一點：真正做到「耕者有
其田」之後，第一、此種耕種，首先消滅了封建地
主對作為農業經營之主要生產手段——土地的
束縛和壟斷的現象繼續存在；第二、直接從事農業
經營的生產勞動者得自由使用土地，並處理其生產
物，不受任何束縛或限制，這種山「耕者有其田」
直接產生的結果，恰是能使農業生產向資本主義生
產方法轉化的一個必要步驟。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
條件，就是要使生產者獲得自由，獲得處理自己的
生產手段（包括土地在內），生產物，與勞動力自
由使用的一切權利；沒有這些權利存在，將後的農
業生產要向資本主義生產方法轉化，那是不可能的
。但這些權利的獲得，又必須以解除封建的土地關
係對農業生產者的束縛為其先決條件。所以，「耕
者有其田」的辦法，我們可以這樣說，它正是由封
建的農業生產向資本主義生產方法轉化的一個階梯
，而且是一個必要的階梯。

最後，我們還得申述一點，使中國農業向資本
主義生產方法轉化，并不等於說，就要在中國建設
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根據世界潮流與中國現存條件
，將來要建設的社會，我們可以肯定說，是民主主
義的社會，不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新民主主義社
會的經濟範疇，包括三方面：一是私人經營經濟；
一是國家經營經濟；一是合作社經營經濟。因之來
信謂「建設資本主義社會」一語，須待商酌。

內政部發重新登記證警字第陸捌陸伍號
 東川郵政管理局第六七〇號登記執照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刻元古

記登婚結

羣衆

第十卷 第十六期

三十四年八月廿五日出版

編輯者 羣衆雜誌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總經售 新華日報館

本刊價目

本期零售	六十元
六期	三百六十元
十二期	六百五十元
廿四期	一千二百二十元

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照加

本期零售六十元

羊 群 衆

第 十 卷 第 七 十 期

目 要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對目前時局宣言

關於美共解散的檢討

何謂無拘無束的選舉

警惕日本陰謀

農村調查的態度與方法

杜克洛

李 普

于 懷

蘆 蕪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九 月 十 五 日 出 版



羣衆第十卷十七期目錄

從戰爭到和平(社論)

特載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目前時局宣言

關於美共解散的檢討

警惕日本陰謀

何謂無拘無束的選舉

問題討論

讓人民來處治漢奸

勝利、和平、民主

書評及其他

農村調查的態度與方法

我見到了捷克的斯佛波達將軍

晉察冀行進

肅清法西斯細菌的溫床

讓法西斯的徒輩去哭泣去發抖吧！

衛生合作社(木刻)

(五九〇)

(五九二)

杜克洛(五九三)

于懷(六〇二)

李普(六〇五)

懷沛(六一二)

(六一四)

蘆藥(六一五)

西蒙諾夫(六一九)

周而復(六二三)

荀寰(六二四)

黎望(六二三)

彥涵(對底)





從戰爭到和平

社論

多少年來，中國人民，全世界人民一直窒息在戰爭的煙火下面過着艱苦的日子，現在真是一旦雲開忽見天，我們勝利地脫出戰爭的時代，就要走向和平的時代了。

自從八月八日蘇聯參加遠東戰爭，八月十日日本提出無條件投降的要求後，幾番每天有重大的事件環繞着我們而發生，國內國際的形勢都以千百倍於平時的速率而前進。這正是因為在過去若干天和今後的若干時間內是從戰爭時代轉向和平時代的緊要的關頭。如何一面結束戰爭，一面締造安定而持久的和平的基礎，這就是現在要解決的問題。這問題解決得好還是不好，就會決定今後我們自己和我們後代的子孫能否得到幸福的生活還是繼續遭受更慘重的災難。

雖然日本承認無條件投降後，一直拖延着最後簽字的時期，雖然在局部區域中，日本軍隊還在頑抗不已，但是無論如何，遠東戰爭總是已緊隨着歐洲戰爭的消逝而消逝了。在這裏就產生了一些問題：

一方面是關於解決日本的問題。因為日本軍國主義者不僅企圖拖延其最後死亡時間，而且還在陰謀利用時間，騙取同盟國家的寬大待遇，隱藏和保存其政治軍事經濟的力量，準備將來好復興。不僅日本軍國主義者這樣陰謀，一切由它的利刃所裁植出來的法西斯們也在作着同樣的陰謀。這自然是值得警惕的事。因為日本軍國主義者及其幫兇如不澈底肅清，那就是戰爭雖已結束，侵略戰爭的禍根還是留着，那麼今後的和平還是沒有保障，戰爭的恐怖還是會時刻壓在廣大人民的頭上。

另一方面是關於同盟國內部的問題。遠東的國際關係向來處於複雜錯綜的情況下，假如不能在戰爭結束期間建立協調而團結的國際關係，那就正

是給日本軍國主義者以陰謀活動的機會，也就使持久而穩定的遠東和平失掉基礎。我們中國的人民當然尤其關心中國的對外關係和中國內部的團結的問題。中國國內問題同時也是全世界關心的問題。因為中國是反日戰爭中的支柱之一，也是今後保持遠東和平的主要力量之一。假如中國內部在戰爭結束期間不能建立和協團結的關係，甚至形成激烈的內爭，那就給日本軍國主義者可乘之機，並且影響到遠東國際關係的調協，而危及遠東和平，危及世界和平。中國人民在打完了這八年抗戰後，決不願意再遭受內戰的慘禍，決不願意再遇到新的侵略戰爭；為了中國人民自己的利益，為了對於世界和平的責任，中國都必須確保內部的團結和平，因此，在這時候只要稍有內爭的徵象，就不能不引起全國人民的焦慮，引起全世界的關切了。

由此可見，問題雖然有這兩方面，但二者是相互關聯的。戰爭雖然結束，但是仍須要聯合國家用像戰時一樣的團結一致的努力，來根絕日本軍國主義勢力；而以聯合國家的團結一致為基礎，才能建立為全世界人民所要求的安定持久的和平秩序，在這和平秩序中，日本軍國主義和一切足以擾亂遠東和平，世界和平的禍根才永不能再起。

戰爭已經結束，爭取安定持久的和平秩序的實現，永絕戰爭的禍根——這就是當前全世界人民，全中國人民的迫切任務。法西斯主義者們一向宣傳說，結束一次戰爭不過是為了準備另一次新的戰爭，和平不過是兩次戰爭之間的暫時的間隙。對於這種侵略主義的思想根據這種思想而進行的活動，人民是要用最大的力量來加以抨擊的。

人民要求在戰爭後建立安定持久的和平，但有沒有實現和平的可能呢？有的。首先我們看到，在遠東戰爭結束以前，已經有了中美英三國的廣

英坦宣言，隨後蘇聯也參加了這個宣言。在這宣言上規定了徹底解決日本軍國主義，引導日本走向民主去的方針和辦法。簽署於這宣言上的每一個國家，現在自然都有義務忠實而徹底地進行。四國共同執行波茨坦宣言，這就是建立遠東團結與和平的基礎。八月十四日簽定，二十七日公佈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又給這同盟上了一重有力的保障。中蘇盟約的基本目標是戰爭的徹底勝利和戰後的安全與和平。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在條約及其同時發表的各項附件上具體規定了鞏固兩國友好關係和共同防止日本侵略勢力再起的辦法。所以中蘇盟約的成立正是徹底執行波茨坦宣言的一個有力保障，也就是建立和協的遠東國際關係，維持遠東和平，促進遠東的民主進步的一個有力保障。

回頭來看中國。經過八年抗戰，中國內部的面貌已經和戰前大不相同了。由於在戰爭中的鍛煉，中國人民已經表現為空前的覺醒與團結，保有着空前前的偉大力量，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正是人民的力量保證了抗戰的堅持到底和取得勝利，在抗戰的結束時期，解放區和淪陷區人民更堅決起來，給了敵寇漢奸以有力的最後打擊。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勝利就是中國可能以和平的中國的資格參與和平的世界的最大保證。世界要求中國國內的和平，因為和平的中國是和平的世界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國人民更堅決地要求中國國內的和平，因為有了和平，才能休養戰時的損害，才能談到新中國的建立。世界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決定了中國戰後和平的趨勢，誰想違背這趨勢，誰就不能不遭遇最大的困難。

正是在這情形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同志於八月廿八日應國民政府蔣主席之邀由延安到重慶，與蔣主席會晤並商談。毛澤東同志在機場發表談話：

「本人此次來渝，係應國民政府蔣主席蔣介石先生之邀請，商討團結建國大計。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國內政治上所存在的各項迫切問題，應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加以合理解決，以期實現全國之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希望中國一切抗日政派及愛國志士團結起來，為實現上述任務而共同奮鬥。本人對於蔣介石先生之邀請，表示謝意。」

毛澤東同志這次和蔣主席的會談引起了全中國人民全世界人民的關切和重視，這正是因為大家迫切感到中國國內和平的必要，而中國國內的和平問題，也正像在世界上的其他一切國際國內問題，只有在民主團結的基礎上才能實現。

編者執筆時，毛澤東同志與蔣主席的會談剛在開始。我們深信，和平、民主、團結是目前支配着世界局勢的總趨勢，也是中國人民的共同要求。全國人民，全國一切抗日黨派一定會團結一致，為實現這要求而作最大的努力，那麼中國一定能夠不僅在抗戰中獲得光榮的勝利，更在戰後獲得光榮的和平。

(八月三十一日)

啓事(一)

這一期因為本刊的印刷處遭受水災，雖然事後努力趕作，但出版日期已滯延將及二週，對本刊讀者謹致深沉的歉意。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對目前時局宣言

全國同胞們！由於日本的投降，我全民族八年來所堅持的神聖的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的結束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也勝利的結束了，在全中國與全世界，一個新的時期，和平建設的時期已經來臨了。

中國共產黨認為這個新的歷史時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務是：鞏固國內團結，保證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並協同英美蘇及一切盟邦，鞏固國際間的持久和平。

全國同胞們！對日戰爭的勝利結束，最後消滅了法西斯的暴政、奴役與侵略，在全人類面前展開了和平發展的前途。這是英美蘇中四大同盟國共同努力的結果，這是我全國軍民共同努力的結果。我們相信：我全國同胞必能以自己表現出的最大的努力與犧牲，為中外所公認，在今後的和平建設時期中，且應繼續作為全國民民主建設的模範與和平團結的中國，而盡其偉大的任務。

但是，在為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的道路上，不是沒有阻礙，沒有困難，沒有荆棘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還沒有執行波茨坦宣言，還沒有放棄其侵略的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企圖，他們還在放肆地施行挑撥之分裂與奴役中國的陰謀。他們在中國走狗們——中國的吉斯林們，正奉行其日本主子的指示，搖身一變，取得保護色彩，企圖繼續挑撥內戰，破壞團結，阻擾民主。他們這種企圖並沒有遭到打擊，他們的罪行並沒有受到懲處；相反，他們還受到了鼓勵，愈益橫行無忌。因此中國吉斯林們及其反動份子們的各種危險活動，重大的威脅着中國的和平、民主、團結，中國人民必須嚴密警戒與擊破敵人的陰謀。

- 中國共產黨認為在目前必須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實施若干緊急措施，以奠定今後和平建設的基礎，這些緊急措施是：
- ①承認解放區的民選政府和抗日軍隊，撤還包圍與進攻解放區的軍隊，以便立即實現和平，避免內戰。
 - ②劃定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接受日本投降的地區，並給予他們參加處理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權利，以昭公允。
 - ③嚴禁漢奸，解散偽軍。
 - ④公平合理的整編軍隊，辦理復員，救濟難胞，減輕賦稅，以蘇民困。
 - ⑤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礙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務機關，釋放愛國政治犯。
 - ⑥立即召開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人物的會議，商討抗戰結束後的各項重大問題，制定民主的施政綱領，結束訓政，成立舉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並籌備自由無拘束的普選的國民大會。
- 舉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並籌備自由無拘束的普選的國民大會。

中國共產黨聲明：我們願意與中國國民黨及其他民主黨派努力求得協議，以期各項緊急問題得到迅速的解決，並長期團結一致，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

同胞們！抗戰勝利了，新的和平建設時期開始了，我們必須堅持和平、民主、團結，為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關於美共解散的檢討

法共
杜克洛

白勞德加在本文前的按語

工人日報在這種發表了一篇關於我的長文，論述美國在世界關係中的地位，以及由於美國共產主義者所實行的政策而引起的一場馬克斯主義理論上的爭辯。作者是以法國共產黨的主要領袖之一。該黨對其本國的政策，不成問題，是正確的，且最近法國市議會選舉中，表顯了它的卓越的勝利。毫無疑問地，雖然這僅是傑克·杜克洛個人所寫的文章，但它却反映着歐洲馬克斯主義者對於美國意見的一般方向。因此它要求我們最嚴重的思考。

自從美國共產黨員在一九四〇年與共產國際中斷了組織上的聯繫之後，特別是一九四三年共產國際本身解散之後，便一直沒有一種機構，使美國馬克斯主義者可以通過它與全世界各地馬克斯主義者商討許多問題，不管這些問題是理論上的問題，或者牽連到世界力量對比的估計，其本質總是國際性的。必然地，在這種新的情況之下，各個不同國家的馬克斯主義者對於某些問題曾作了各種不同的評判。關於這一點，我們在杜克洛的文章中便可以得到一個表現得極為尖銳的例子。

因此，我們現在必需通過報紙來進行我們的檢討，因為報紙有傳統的交換意見自由與新聞自由之下面是我們進行系統商討的主要的可以用來應用的代替物，雖然這是頗不方便的。對於傑克·杜克洛利用這種途徑來進行國際檢討的啓示，我們只有表示歡迎。

大家一向都明白，歐洲戰爭的結束必定要求美國馬克斯主義者對所有問題做一番基本的回顧。我們必須估計我們過去的工作，並且面對未來的任務。我們必須作一個精密的清單，總結我們政治上的帳目，然後才能漸漸的了解，在我們進入到一個鬥爭日趨尖銳、緊迫、劇變的新階段時，我們究竟處在怎樣一個地位。杜克洛的文章可以供給我們一個進行這種基本回顧的起點。關於這回顧，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領導機構根據對大聯合的團結所累積的威脅已在若干時日以前獨立地開始進行了。

這個檢討的機構是在共產主義政治協會之內，作為自治的美國組織而進行的，並不關連到任何其他組織，同時，也是通過它自己已所建立的途徑和依照它自己的規律而進行的。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在它自己的檢討之後，將做它自己的決定，檢討時並將採納一切可用的材料與恰當的意見。

我們的敵人必將以狂喜的喧嘩來祝賀各不同地區均共產黨員與美國共產黨員之間的各種不同意見之公開討論。在的人會高呼這便象徵着共產黨員的分化，別的人會認為這就是共產國際的再現，而所有的人一定會利用這個機會來誹謗我們，盡可能地散佈出最多的混亂。

我們已經在多年的經驗中學會了漠視敵人的攻擊，因為我們明白，過去許多檢討的結果永遠是共產黨員的更加堅固的團結。在這一點上，我們與布爾喬亞是不同的。舉例來說，我們記得幾年前初時，英美報紙之間的尖銳爭論，其結果並沒有把這次所暴露的深根消除，反而毫無解決的遮掩了起來。再看另外的例子：例如美國布爾喬亞本身對羅斯福路線的政策上之深地分裂——種在他們之間意討論愈變本加厲的分裂。相反地，共產黨員的檢討總是引向澄清，引向一致，以及引向目的與行動的統一。

在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組織的機構之內，根據它的規程，由於杜克洛文章的發表所啓示的討論，將是完完全全自由的。全國局與全國委員會的委員們將作為個人來參加討論，而不需要作為這些組織的委員那樣必須在廣泛討論之前首先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然後再為這結論而發言。

全國委員會在經過一個足以結晶化了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會員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解的討論時期之後，便開會作出一個結論，並且同時着手使這理解對進未來新的暴風雨的時期而得出一個明晰的遠景。

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全國局在下一大集會時——為回顧一些最近的發展以及因發展而產生的任務而集會時，將無疑問地，考慮杜克洛所提出的一些主要問題。會議的結果在結束之後，將立刻在工人日報發表。

所有現在正在進行的工人與進步運動的實際工作，應按原訂計劃進行。每個人都不要在討論的結論還沒有正式記錄下來之前，各自揣測。現在正是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以及每個會員的堅實、理解，與成熟的一個考驗的時候。

關於美共解散的檢討

很多「共產主義手冊」的編者，曾經要求我們對於美國共產黨解散，以及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建立，加以說明。

我們曾經收到一些關於這個極重要的政治事件的材料，我們現在可以有充裕自由來提出我們對於美國共產黨解散的政治理由之意見。

關於美國共產黨的解散，以及美國共產主義者活動的「新路線」，其理由是由於黨內的一些正式文件和該黨前書記，埃爾·白勞德（E. P. White）所提出的。

埃爾·白勞德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所發表的這篇專門談到德黑蘭會議成果及美國政治形勢的演說中，第一次討論到美國共產黨（CPUSA）有改變途徑之必要。

德黑蘭會議造成白勞德一個轉變的開始，從這起他發展了他對贊成改變美國共產黨途徑的思想。雖然，白勞德公平地強調了德黑蘭會議對於戰勝法西斯德國的重要性，但由於對於形勢的分析不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對見出發的，因此他從這個會議的決議中，得出一些錯誤的結論。埃爾·白勞德便他自己成了一個對於一般社會進化——首先是美國社會進化——的種種方式，抱有錯誤觀念的主觀代表。

埃爾·白勞德宣稱，實際上，在德黑蘭會議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已經開始在一個而且是一樣的世界機構中，尋找到和平共存與協同合作的方法；他跟著說，德黑蘭會議關於共同政策，所達成的，關於預計中的共同努力，已經獲得了一種的正確，那就是這完全或盡可能的減少用戰爭手段來解決各

國內部問題中力量與力量的對立與鬥爭。

「那（指德黑蘭宣言）是我們這個時代繼續維持文明的唯一希望。那便是為什麼我可以接受，而且支持，而且相信德黑蘭的宣言，並且把它作為我思考一切國內與世界問題的出發點。」（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康州，布利維特所發表的演說）

★

從德黑蘭會議的決定出發，埃爾·白勞德對於世界，首先對於美國國內部問題，得出了一些政治上的結論。其中有些結論主張美國的一些主要國內政治問題，在未來必須專門用改良的方式來解決，因為無限制的內部衝突，同時會威脅到德黑蘭所提出來的國際團結的遠景。（「德黑蘭與美國」，十六—十七頁）

德黑蘭會議在埃爾·白勞德看來，認為大部份蘇聯以西的歐洲，將可能在布爾喬亞民主的基礎上，而不是在法西斯資本主義或蘇維埃的基礎上重新起來。

「但它將會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基礎，這個基礎將受各國完全民主的自決原則所限制，它允許各國內所有進步與建設力量的充分自由，並且對於按照人民各種不同慾望而發展的民主與社會進展，不加以任何絆腳石。它意味著一個歐洲的遠景，那就是縮小，或者儘可能的完全消滅這二次國際戰爭之後的任何內戰威脅。」（布利維特演說，「共產主義者」，一九四四年一月，第七頁。）

同時，埃爾·白勞德加上道：「不管在別的國家中是怎樣的，在美國，

這意味着一個這樣的政策，即在最近戰後階段中，要擴大生產與充分就業，以及現組織的機構中，加強民主主義，而不是一個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遠景。

「或者我們可以以把實現德黑蘭政策做為我們的目標，或者可以把美國立憲推進到社會主義做為我們的任務。顯然地，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兩樣都挑選。」

「第一個政策，雖然有它種種的困難，但確實是可以完成的。第二個政策是值得懷疑的，真的，特別當我們記起，即使是最進步的工人運動，也是在資產階級的把持之下，而且連英國工黨的那種空洞的社會主義都趕不上。」

「因此，美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政策便是而對着美國的一個資產階級戰後建設的遠景，以及其一切後果，在這一基礎上制定他們的計劃，並且在一個能實現德黑蘭政策，而足夠廣闊與有效的國內團結之下，積極的與國內一切民主與進步的多數陣營合作。」（「德黑蘭與美國」，第二十頁）

要實現德黑蘭的政策，白勞德認為必須重建整個美國的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

「在美國的每一個階級，每一個團體，每一個人，每一個政黨，必須按照這個偉大的立場，重新調整自己。這個偉大的立場便具體地表現在羅斯福，斯大林與邱吉爾所供給我們的政策中。到現在，我們的國家不過剛剛開始而對着這個問題，每一個人必須開始從這道裡得出結論來，把自己配合到那個按照它而創造的新世界中去。舊的方式和舊的偏見，對於領導我們走進這個新世界，已經沒有任何效用了。我們必須團結起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團體，帶着足夠的智慧來注意這個立場的巨大的重要性。並且我們必須了解我們的國家的命運，以及全世界文明的命運，都有賴於它的正確的解答。」

「我們準備與任何拒絕支持德黑蘭協議與英美蘇團結和拒絕為其實現而鬥爭的人決裂，我們必須準備對每一個為實現這個團結而奮鬥的人，伸出我們友愛與合作之手。如果J. P. 摩爾根支持這個團結，並且願意沿着這個團結走向前去，那麼，我，做為一個共產主義者，準備與他緊緊地握手，並且和他共同努力來促其實現。階級的分別與政治派別現在已經失去了意義，除非當它們反映着這個立場的這一面或那一面。」（布魯曼演說，一九四四年一月「共產主義者」，第八頁）

白勞德所說的關於摩爾根的一段話，在美國共產黨員之間，曾經引起了激烈的反對。關於這一點，白勞德向中央委員會的全體大會解釋道：

「我並未在言辭上廢除階級的差別，但我確摺斥以「階級與階級對立」的政治口號來做我們下一階段政治綱領的準則。我把摩爾根先生當做一個階級的象徵，而不是當做一個個人。——至於他個人究竟怎樣，我絲毫也不知道。」（「德黑蘭與美國」，第四十四頁）

如白勞德所指出的，在美國創造一個舉國一致的大團結，就預定共產主義者必然是其中的一部份。因此，共產主義的組織必須與其他更主要的力量，制定一個長期的同盟。從這些認識出發，白勞德得到這樣的結論：美國的共產主義組織應該更改它的名稱，以便更準確的來反映它的職責，也就是一個更切合於美國政治傳統的名稱。

「白勞德建議，把新的組織稱為「共產主義政治協會」，這個組織，在美國傳統兩黨的系統之間，將不以「政黨」的姿態出現，也就是在選舉時不推候選人；既不加入民主黨，也不加入共和黨，而在各黨之內進行廣泛的進步與民主的運動。」

在對美共中央委員會的全體大會，所作的報告中，白勞德深入地講到美國戰後經濟政策上的一些經濟問題，以及在各個不同階層間統一與合作的基礎上，這些問題的答案，白勞德指出，美國的商人，工業家，金融家，甚至反動集團，都不承認在美國國家經濟政策之內，存在着新的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只要在戰後能保存並維持戰時期間一樣的生產水平。

然而，問題的種種困難在於如何由戰時經濟活動過渡到和平時的生產，以及如何利用國內外市場來吸收那美國政府因戰爭需要而購進的價值九百億的補品商品，對於這一點，白勞德認為德黑蘭會議的決定，可以克服英美對外傾銷的敵對情形，而且美國政府，在與一切強大的同盟國取得協議之後，再加上有盟國參加，就可以創辦一系列的巨大經濟協會，來開發那些戰後地區與被戰爭蹂躪過的地區，如歐洲、非洲、亞洲與拉丁美洲。

至於擴大國內市場，使其能夠吸收那價值九百億的商品中的一部份，白勞德建議把每個普通消費者的購買力增加一倍，主要用增加薪金的辦法。

「馬克思主義者絕不會用任何形式的反對口號，來攻擊「自由企業」這個口號，從而幫助了反動集團，如：任何人願意把美國現存的資產階級制度描寫為「自由企業」，這對於我，是沒有問題的，並且我們坦白地宣佈，我們已準備在盡量減輕人民的負擔條件下，來進行合作，以便使這個資本主義，在戰後期間，起着有建設性的作用。」（「德黑蘭與美國」，第二十一頁）

更甚的，白勞德主張，國內團結不能再繼續循着一種針對獨佔和巨額資本

的日趨強化的政策來稱頌了。

「今天，要嚴厲地談到急劇的剝削獨佔資本，從而把它的權力引向毀滅，並違反獨佔資本的意志，把這些限制加諸在它的身上，這不過是建議立憲黨到社會主義的另一種形式而已……」（「德黑蘭與美國」，第二十三頁）

一九四四年一月，在他對美共中央委員會的全體大會所做的結束語中，白勞德試着使他自己的根據「理論」上的論點來證明美共改變途徑的正確。他發表了對他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以及它在現實情況下的應用。

白勞德認為，在宣告美共的解散與建立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中，美國共產主義者是遵循了一條正確的路線，解決了許多史無前例的問題，並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應該怎樣應用到實踐中去。

「馬克思主義從來不是一套教條或公式，也從來不是一冊禁例，列下所實行的不應該做的事情，也不管新的發展與新的形勢究竟是什麼樣的；它並沒有告訴我們，這些事情不能做，它告訴我們怎樣去做那些必須做的事情——那些歷史曾經示過是必須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工作。馬克思主義是行動的理論而不是「不要做」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因此是一種積極的，有效的，實於創造的力量；它是如此一個偉大的社會力量，恰好因為，作為一個科學的先見與方法，它用活生生的現實來做它的出發點，它曾經是把過去的科學假設做為基礎來處理新的，未曾有過的前程。而今天許多最大的問題在最新的意義上都是新的。」

「我們今天比過去任何時代都更需要在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傳統裡來洗刷我們自己，把我們自己完全從教條的和觀念的最後殘滓中解放出來……」

「真的，依照所有過去的教本，我們現在是與正統派分家了，因為沒有一本教本會先見或預卜到在社會主義普遍到來之前，世界上還有一段長期和不同的關係。」（「德黑蘭與美國」，四三頁—四四五頁）

★

由白勞德所策劃的新政治途徑，在美共的領導階級中，僅僅得到很少的反對者。在該黨政治局擴大會議中，激烈反對白勞德的便是威廉·羅斯特，美共的主席，和連四，中央委員和東本雷文尼耶的書記。

羅斯特在兩個文件中闡明他與白勞德意見相異之點——即一封致美共中央委員會的信，和一九四四年二月八日中央委員會特別會議的開幕演說。

在這兩篇文件中，羅斯特批評了白勞德的輿論性的論文，即關於美共對估資本性質的變更，戰後經濟發展的遠景，以及關於美共與國際社會主義的關係。

羅斯特在他二月八日的演說中，選擇了那些以白勞德的論文為根據而提議在戰後期間應停止一切罷工的人們。

但在這兩篇文章中，羅斯特却不曾明白而堅定地來反對共產黨的解散。白勞德同志在他的報告中，企圖把德黑蘭的決定應用到美國來，他對劃了一個穩穩當當地取得國內團結——包括美國金融資本的決定——的遠景，不僅在戰時如此，即在戰後亦復如此；這是一個可以引向「迅速恢復殘酷的戰爭創傷」的團結（他贊許地錄於「勝利及其後」），「一個在各階層的和乎合作中，無限制的延長下去，到一個長長的年月。在這過程中，美國帝國主義便在事實上消失了，一絲一毫的階級鬥爭都不存在了，而社會主義實際上並不担任任何角色。」（羅斯特致中央委員會信）

羅斯特嚴厲地批評了白勞德，因為後者雖然策劃了一個美共活動的新路線，但對於許多馬列主義最基本的原則却迷惘了。

「在我看來，白勞德同志對於資本主義類型的看法是建立在兩個錯誤的觀點上，其中第一個便是低估了世界資本主義因為戰爭而日趨腐敗的勢，當白勞德同志在政治局的檢討中發問到時，他同意資本主義有大大地被戰爭所削弱，但他的報告却傾向於提供出相反的含意。給人留下這種印象，即資本主義忽然返老還童了，並且現在正進入一個膨脹與擴張的新階段。」（引自前信）

據羅斯特的推測，世界資本主義確實可以指望着某一程度的戰後繁榮，但是如果認定資本主義，即使是美國的資本主義，能夠維持它在戰時所達到的生產水準，並且能夠用一種多少可以使工人階級滿意的方法來解決戰後必然要產生的許多複雜問題，那便錯了。

羅斯特並不降低德黑蘭會議的重要性，但是他認為，要設想德黑蘭已經全然改變了資本主義的階級本質，或者設想德黑蘭會議已經清除了階級鬥爭，正如白勞德的演講所表示出來的看法，那將是一個極端危險的幻想。資本主義已經學會了與社會主義和平共處與轉讓團結的這個事實，絲毫並不要將美國獨佔資本主義已經變得進步了，而且從今後它可以毫無保留的容納在國內團結與為實現德黑蘭會議決定的鬥爭中去。

「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的階級本質，」羅斯特斷言道，「就是反動

的。這便是爲什麼和它來談國內團結是不可能的，這些集團對羅斯福民主政府的瘋狂攻擊，難道這不是一個有力的證明嗎？根據這個，還有任何人能夠懷疑，美國獨佔資本者羣，如同白勞德所想的，不是德黑蘭決議的敵人，而是它的朋友呢？

「這個全部觀點的危險便是：在我們急切爭取德黑蘭會議的支持中，我們可能走入與德黑蘭的敵人嘗試合作的陷阱中，或者甚至於跌入他們的影響之下。現在大資產階級的尾巴之後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上的錯誤，因此我們一定要警惕地提防着它。」（羅斯特致中委信）

羅斯特批評了白勞德對全國製造家協會的態度，他認爲該會是美國獨佔資本的最反動的組織。然而，白勞德認爲他應該設法讓這個聯合會的一些經濟上的措施，他接受了它的中心口號——「自由私人企業」；從事實上看來，這個口號基本上是反動的，並且和羅斯福的政策是對立的，白勞德指望能夠看見工人薪金在戰後增加百分之百，並且還邀請許多美國獨佔資本家來贊助他的實質建議，他對他們說：「（你們）必須尋到那解答案來維持你們的工廠繼續開工。」

羅斯特在發引了白勞德的這些話之後，宣稱道：

「我的意見認爲工人運動如果接受一個這樣的計劃或概念，那麼將是它的極大的災禍，即使僅僅是暫時的也是如此。從這一個進入皆知的錯誤觀點出發，即美國的獨佔資本可以担當一個進步的角色，白勞德同志對於一切傾向於戰勝羅斯福的建議都是盲目以視的；其實共產主義者只有一個政策，那便是在現在和戰後控制這些大資本家，白勞德在號召各階層合作的時候，他在職工會會員的腦子裡，種下了尾巴主義的幻想。其實，職工會的工作便是仔細地策劃出他們的政策，然後強迫大業主們執行。」

至於戰後組織的諸問題，羅斯特解釋了關於獨佔資本能擔任自稱進步角色的一切幻想。美國，羅斯特宣稱，將在戰爭中生長成爲一個世界上的強國，工業界的大王們，更會傾向於獨裁的行動而不願意妥協讓步；他又加上這，我們幾乎很難從他們那里期待一個進步的綱領。

就金融資本的主要骨幹而論，從它在戰前的緩慢政策開始，經過戰爭的過程，它已採取了一種卑鄙的奸商的道路，並且時常對我國戰爭計劃中關於國內與國外——特別是前者——的各方面，公然加以破壞，雖然，這些因素顯然並不願意美國戰敗，但他們的確是不努力擁護無條件投降的政策。太

體而言，他們所認爲適宜的戰爭的結果，就是與德國反動力量取得某種程度的和平，然後普遍地造成一種局面，以便給歐洲所有民主國家澆上冷水。」（羅斯特致中委信）

羅斯特覺得，白勞德所談到的關於社會主義這一個問題，並不是這黨爭的後果，而如果要提出這個問題，其唯一的結果便是限制了國內團結的結構，這一點是正確的。但羅斯福的種種勝利的事實而言，必定會引起或導致社會主義的興趣，共產主義者必須向工人們解釋到這個時代中，社會主義發展的重要性，以及它對於美國的影響，否則社會民主黨也可以把他們自己當做社會主義的一部份了。

「德黑蘭決議的履行，就其國內與國際方面的意義而言，都要求職工泛可觀的國內團結，而在這國內團結中，一定要有工人、農民、專門人材、小商人，以及所有願意忠實支持這個綱領的資產階級的成分。」（羅斯特致中委信）

羅斯特致中央委員的信，以及他於一九四四年二月八日在中央委員會的特別會議上所發表的攻擊白勞德路線的演說，引起了許多與會者的激烈批評。大多數發言人駁斥了羅斯特的論點，而支持由白勞德所策劃的美共「綱領」。

達西在會議上發表演說攻擊白勞德，他說道，按他的了解，羅斯特的演說並不企圖降低白勞德的威信。和羅斯特一樣，達西激烈地批評了白勞德所作的關於德黑蘭決議的解釋，並且斷言，制定德黑蘭會議的三大強國在國際上的協同一致，並不應該就視爲他們在戰後若干主要經濟問題上的協同一致。

後來達西被大會開除了黨籍，大會所根據的便是以羅斯特爲首的中央委員會所提出的罪狀。因爲，如議決所言，他寫了一封對黨的領導者含有誹謗誹謗控告的信給黨員，企圖在黨內造成分裂，而且因爲他把該信交給了資產階級的報紙來發表。

中央委員會的特別會議結束之後，在黨的下層組織，區委會和黨報上，就展開了一個關於白勞德對中央委員會全體大會所作的報告的討論。

根據工人日報上所發表的材料，在討論結束之後，黨的下層組織和區委會一致通過接受白勞德的建議。至於羅斯特，他在中央委員會的特別會議上宣稱，他不願意把他和白勞德的各種分歧，公諸於黨的中央委員會之外。

美共全體代表大會（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日舉行）聽取了白勞德的報告，在報告中，他闡明了他對美國政治形勢的意見，同時他建議美國共產主義者在政策上採取一個新姿態。

白勞德在建議書中說：

「在一月十一日，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爲了國內團結的利益，爲了促使共產主義者改變了的政治情況下，起着更有作用的作用，以及爲了完成更大的供給，以便獲得戰爭勝利爭取持久和平，特建議美國共產主義者放棄黨派利益的目的和黨的組織形式。」

「爲了這個宗旨，我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並徵得這次大會中的最主要代表的同意，建議接受下列動議。」

「我因此提議美國共產黨應該而且現在解散……」（會議記錄，第十一頁）

美共全體代表大會在接受解散美國共產黨的決議之後，宣佈改稱爲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組織代表大會並且通過了該政治協會會章的綱領似的序言。在這個序言中說明：

「共產主義政治協會是美國人的一個非政黨組織，以工人階級爲基礎，在現代工業社會改變了的情況下，繼續華盛頓、傑弗遜、拜恩、傑克遜和林書的傳統。」

「作爲美國人民的民主多數陣營中的一個前進部門，它將尋求民主原則的有效運用，以解決今天的種種問題。」

「它維護獨立宣言，美國憲法，和其中的人民權利，以及美國民主主義者在反對公共自由的一切公敵中所獲得的成就。」

「它是因爲我們在作戰期間的需要所形成，並在空前艱巨的鬥爭中成型的；它看到自由人民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一定會打開一個新的並且對進步更有利的局面；它期望着一個由民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諸國家所領導的自由國家的大家庭，以便開始一個世界和平的時代，擴大生產和經濟繁榮，以及所有人民不分種族，教養和膚色的自由解放與平等。」

「它堅持科學的社會主義原則，馬克思主義，人類思想精華的遺產，以及百年來從工人運動的經驗所得來的種種原則——那些對於國家生存與各個獨立會證明爲不可缺少的原則，它展望着一個未來，在這未來中，我們本國通過美國人民的民主選擇，將會解決那因生產社會性與私人所有權之間

的矛盾所引起的許多問題，把所有人類最豐富的經驗，吸收到一個符合美國傳統與特性的形式與方法中來。（會議記錄的序言，四七——四八頁）

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組織代表大會採用了一個主要的政治決議：

「全國團結一致以求勝利，安全，與持久和平。」

這個決議案指出德黑蘭會議的決定在戰勝侵略者與建立一個永久和平中異常的重要性。它號召加強國內團結才是實現那些歷史性決定的必要條件。

所謂國內團結，即指所有愛國力量的聯盟——從共產主義者，工人運動者，到民主黨與共和黨的黨羽。一切觀念上的，宗教上的，以及政治上的差異必須從屬於這個團結，該決議強調一九四四年選舉的特別重要性，因爲國家的團結與命運，便有賴於這個選舉的結果。它承認無產階級在國內團結中所担任的日益重要的角色，它那正在擴大中的活動，以及它在政治上的影響。

這個決議嚴厲地批評了由赫斯特（Hester），麥可米克（McComber）所領導的集團之反對政策，這個政策的特點便是極法西斯主義與陰謀活動，它並且號召美國人民與這些集團做鬥爭。

該決議跟着便說明多數美國人民還沒有感覺到需要一個更激進的辦法——即以大工業國家化的幫助或建立社會主義的方法來解決社會上與經濟上的種種問題。

因此，下一步的工作便是在現存資本主義制度的機構中獲得一個更高的生產水準。按照這個辦法，私人業主們一定要接受各種可能的方法來解決生產與工人就業的問題。這問題的處理，還是和增加美國人民的購買力到最高程度與擴大對外貿易兩者連繫起來的。如果私人工業不能完成這許多任務，那麼政府一定要負責來促其實行。

該決議表示反對反猶太主義，反對歧視黑人，號召撤銷「第五縱隊」，及禁止「第五縱隊」與侵略者作妥協和平之呼喚。

該決議結束道：

「爲了國內團結的陣營，這種陣營是由所有階層的愛國力量（無產階級，也就是國家的中堅與推動力，還有它爲「贏得戰爭」的同盟者……）所組成的，必須要求勞工聯盟（AFL）產業職工聯合會（CIO）及鐵道工會聯合行動的擴大，並要求工人充份與適當參加政府工作，以便最堅決地發展其政治上的領導與影響……」

「……我們共產主義者，作為愛國的美國人，重申我們對祖國的神聖誓言，一切皆從屬於贏得戰爭與摧毀法西斯主義……」決議案，第七十頁。

除關於「國內團結」的決議之外，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全體代表大會還通過了一系列的其他決定：關於戰時過渡到和平時的生產，關於國際職工聯合會的團結，關於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薪金政策，關於復員士兵的政治生活，關於婦女工作，關於農民，關於南美洲的形勢，關於取消人權，關於對付反猶太人的鬥爭，關於西半球諸國家中的團結，以及關於美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二十五週年紀念。

大會一致選舉白勞德為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主席。

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大會致電給斯大林同志與紅軍，特別提到：

「在每個美國的城市與鄉村中，在我們廣大土地上的每個工廠與農場裡，男女老少談起蘇維埃聯邦的英雄成就，和它的英勇紅軍時，都帶着讚歎與深切的感激。自從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那殘酷毒辣的法西斯公敵侵犯你們的邊界開始，每一天都有更多的美國人民懂得了了解與愛慕你們的人民。」

「蘇聯政治與軍事的領導以及無懈有力的紅軍，不僅被我們的政治與軍事的領袖們所讚揚，且為我們的工人、農民、商人、專門人材、藝術家、科學家，以及青年所讚揚着。希特勒匪徒的擁護者和我們共同勝利的敵人們，雖然設法用希特勒的「蘇維埃魔鬼」來恫嚇我們，但是他們並沒有成功地使我們的人民對現實茫無所知。你們的行動每天都顯示出一種淹沒他們毒辣詭計的威力。」

「當你們那強大的隊伍以毫不鬆弛的反抗把納粹從你們的土地趕出去，而使得你們那共同的最後戰勝法西斯敵人的日子更接近於到來時，我們更感到我們對你們——偉大蘇維埃國家的領袖們、戰士、和人民們——所負的巨債。你們所解放的城市與鄉村的名字每天都掛在我們的嘴邊，斯大林的名字和無數英雄的名字都銘刻在我們的心頭。」

「每天，都有我們更多更多的人民了解到為什麼你們的，亦即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能給與全世界如此空前未有的團結，英雄主義，獨特的創造，以及在戰爭的藝術與戰爭的科學中的新紀錄。」

「所有愛國的美國人決定進一步加強聯合國家的共同行動，以及以保障勝利的美國蘇聯和英國的起領導作用的聯合。他們決定在未來和平中繼續而且加強這個聯合，同時擴大人民間的友愛，這友愛會把這兩個強國的聯盟

膠結起來，作為勝利，國家自由，與一個持久和平的基石。」（致斯大林書紀錄，一三一—一四頁。）

成立大會之後，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領導機構進行了一番解釋該協會的目的與工作的鬥爭。

白勞德在會的一個演講中說道：「……這便是為什麼我們解散了共產黨，放棄一切謀利之目的，以及從新把我們組織在一個非政黨的共產主義政治協會之中。這便是為什麼何以我們準備而且願意與任何願意把勝利放在第一位，並擁護我們所說最低綱領以解決我們戰後問題的愛國人士合作。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與任何其他政黨聯合，而寧願與一切政黨——光最廣大的人們攜手。」（「戰爭與選舉」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八日）

該會書記，威廉姆遜在解釋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任務時說：「至於協會所執行的任務，我們應當指出，那就是說要在全國，各洲及地方會社的基礎上，大大地在這各方面增加與改進政治教育的活動。我們必須讓世人皆知我們是這樣的一個組織，以它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掌握，使我們能夠對於那些面臨着人民的種種複雜的政治問題提供正確答案。當會員們加入積極地在每一個黨組織的形式——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友誼的——中活動時，協會本身便把問題與政策大膽而帶着啓示性地宣佈出來。」（威廉姆遜講話，紀錄，五十五—五十六頁）

自從大會開過之後，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實際活動就從屬於當前的主要任務——積極地參加到一九四四年的競選鬥爭中去。

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全國大會一致支持羅斯福為總統候選人，白勞德以及該協會的其他領袖，在他們的演說中支持羅斯福第四次連任的選舉，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分區各邦組織，以及地方會社進行了一個積極的宣傳戰，讚助羅斯福先生和那些親羅斯福的國會候選人。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一個紐約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為美國共產主義運動二十五週年紀念而召集的會議上，白勞德發表了一篇演說，其中說道：「每一個團體，不管多麼小，正如同每一個人一樣，都擁有那同一至高無上的責任，就是對勝利盡其完全與無條件的供獻。我們不僅要獻出我們的生命並且還必須準備犧牲我們所有的偏見，我們的觀念，和我們的特殊利益，我們美國的共產主義者已經把這個規程首先加諸在我們自己的身上。」

「我們知道希特勒和日本天皇打算用共產主義與反共產主義間的對立來引起聯合國家的分裂；我們知道敵人打算拿這點在目前的選舉中來分裂美國，藉此準備使我們退居二等，簽定妥協和平。因此我們替自己製定了一個特別至高無上的任務，即在這次大選中撤消共產主義者與共產主義，也就是直接間接地劃除了這個多少存在的對立。」

「爲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毫無遲疑地以不提後選人的辦法犧牲我們在競選中的被選權；我們甚至在未來若干期間內把共產黨本身加以解散，我們宣佈樂於熱誠地支持被極大多數美國人民所接受的自由企業之現存體系；並且不提出任何有害國家團結的基本改革建議；當我們走到職工會中去，或走到人民羣衆中去時，我們會直捷了當地，坦白地運用我們的影響，來確定國家團結的政策，我們竭盡所有力量來幫助阻止工人間一切罷工運動的動機，並且使工人準備在戰後繼續國內團結的政策……」

「作爲美國共產主義者的發言人，我可以代我們的小團體說我們願在羅斯福與杜魯門總統與副總統的選舉中與我們的國家，它的利益，以及大多數人民協力合作。」

「我們知道得十分清楚，羅斯福領導之下的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美國，而且羅斯福的使命之一便是維持其現狀，我們知道在那可預見的未來中，只有在我國遭到巨大災難時，才能把資本主義的遠景改換成爲社會主義的遠景。只有在不把戰爭繼續到勝利時，在處置和平失當時，或不能建立和平時，或者如胡佛時代一樣，又把我們的國家帶到另外一個經濟危機時，美國的人民才能轉向社會主義。」

「我們不願美國遭到災難，即使它的後果是社會主義也還是如此。如我們這操作的話，我們反倒幫助了杜威、胡佛、布里克和他們的股份公司。我們願在戰爭中獲得勝利，把所有的軸心國家以及他們的遠親拆成從世界上剷除掉。我們要一個世代和平的世界。」

「我們希望我們的國家經濟能充份工作，供給一個大大地增加了的世界市場，來恢復全世界的創傷，一個大大地擴張的，反映出人民生活標準提高了的國內市場，以及一個有秩序的，合作的，與民主的辦法來解決國內關係與國際關係，而在繼續不斷的國內團結的情況之下，這個辦法會削弱以致最後剷除大的國內鬥爭……」

「這便是何以美國的共產主義者，正如我們共產主義者的祖先在二八六一八六四年支持阿伯拉罕林肯一樣，我們現在一九四四年支持羅斯福爲

美國的總統……

至於白勞德對蘇聯的態度，頗爲蘇聯在聯合國中以及在最後幾種希特勒匪徒德國並在戰後建立一個持久和平的工作中所擔任的角色。白勞德不只一次的強調由列寧和斯大林所建立蘇聯國家便是構成那把金世界從法西斯奴役中拯救出來的舉世無雙的力量。他並且號召使所有美國人都能認識那促使蘇聯埃聯邦偉大與有力的一切科學主義……斯大林主義理論的實質

從組織的觀點來看，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機構有如下列所述：它的基層組織細胞便是地方會社，每月召集常會。在會員常會的開辦期間，一切工作皆由其委員會所執行，委員會由最積極活動的會員組成。這些會社隸屬於分區共產主義政治協會委員會。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領導是全國委員會，每兩年由協會的大會選出。由大會選出的協會主席和十一個副主席組成協會的永久領導機構。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大會提出保存民主集中制爲協會組織上的根據。威廉姆遜——協會的組織書記對大會用下列言語來解釋協會的民主集中制的應用：「我們雖維持着適合於一個馬克思主義政治的、教育的協會性質，一個組織機構和最低限度組織的要求，我們必須給予下級組織更大的自治，強調民主是兩面的，由上而下，和消除了組織底一切硬性。」（威廉姆遜講話，記錄五八頁）

政治協會的全國大會通過了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會章，其中隱隱地一個願意加入該協會的人必須接受它的綱領與路線。在解釋什麼人可以加入協會時，工人日報寫道：「我們可以在黨內徵求新會員，只要能忠於所有工人都已了解的那些原則，獻身於今日行動的最基本的種種任務；並願意和熱心學習那可以使他們成爲徹底的共產主義者的政綱、歷史及理論。而最主要的是在人類反納粹奴役戰爭中顯露戰鬥勇氣犧牲，乃是加入共產黨的第一個必需條件。」（密諾爾論文：工人日報一九四四年二月）

美國共產黨在解散的時候，根據白勞德的宣言，一共有八萬黨員，其數不包括在軍隊中服務的一萬黨員。根據大會的議決所有美國共產黨員都是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會員，並且必須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四日以前重新登記。按工人日報所宣佈，直到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六日止，前來登記的人幾乎不滿四萬五千人。

★

用不着深入分析白勞德對於解散美共（C.P.U.S.）及建立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全部論點，用不着對於這個論點做一個系統的批判，我們仍然可以得出下列的結論：
一、在白勞德領導之下所採取的途徑其行動的結果便是美國無產階級獨立政黨的終結。
二、不管白勞德與支持者種種關於承認馬克思主義的宣言，我們仍舊

總要看見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在作着惡劣的修正，這個修正正是用這樣的觀念所表達出來——即在美國有一個長期的階級和平，亦即在戰後期間抑制階級鬥爭，和建立勞資間之和諧的可能性。

三、在把聯合國各國政府所議定的，屬於外交性質的德黑蘭宣言轉變為戰後美國階級和平的政治綱領時，美國共產主義者根本在曲解着德黑蘭宣言的意義，並且在播種着危險的社會主義的幻想，這些幻想假如不予以必要的辯白，將對美國的工人運動引起消極的影響。

四、根據我們到此期所知道的情形，多數國家的共產黨都並不贊成白勞德的反對論點。且有一些共產黨（例如南非聯邦和澳大利亞的共產黨）曾經公開地反對這個論點。同時也有一些南美諸國（古巴，哥倫比亞）的共產黨認為美國共產主義者的論點是正確的，而且大致遵循着這條道路。

★

事實便是這樣的，根據這些所能理解的要素，我們便可以對美國共產黨的解散有所批判。法國共產主義者必定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批判眼光來檢點為美國共產黨所提出的辯護的論點。我們可以確信，正如南非聯邦與澳大利亞的共產主義者一樣，法國共產主義者一定不贊成白勞德所遵循的政策，因為它已經危險地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辯護切斷開來了，這個學說的嚴正的、科學的運用，只能引出一個結論，便是：不是解散美國共產黨，而是在頑強的鬥爭旗幟之下，去充實它來擊敗希特勒德國和毀滅法西斯主義在任何地方的伸張。

美共產黨沒有自動地到共產主義政治協會去登記，這一事實便證明該黨的解散，會引起了不少的焦慮，而且這些完全是正確的。

在美國，那些萬能的托派斯會是猛烈攻擊的對象。例如：大家都知道，前美國副總統，亨利·華萊士曾揭發過它們的惡劣的行動，以及他們的反國內團結的政策。

同樣的，我們在法國，也都是國內團結的堅決擁護者，且表語於我們的日常活動之中；但是，我們對於團結的渴念並不會使我們片刻忘記進行武裝我們自己的必要，來對付那些托派斯者輩。進一步來說，我們可以在白勞德的關於獨占國家化的問題上，以及他所謂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上，看到某種混亂的情形。

獨占工業的國家化，實際上，與某些人士所傾心相信者相反，並不就是社會主義的成就，不，作到工業國家化僅只是一個民主性質的改革而已。如果沒有預先奪取政權的話，社會主義的成就簡直是不可能想像的。

每個人都了解，美國共產主義者願為他們的國內團結而努力。但是令人不大可解的便是他們何以與那些托派斯者輩的「好心腸」來共同考察解決國內團結的問題，在故作牧歌型的情況之下，彷彿資本主義集團已經可以由某種未知的奇蹟改變了它的天性了。

其實，我們認為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證明美國共產黨的解散是正確的。白勞德對於美國資本主義的適當分析並非是馬列主義的應用。關於階級矛盾可以在美國類乎消失的預測，斷不是馬列主義的對於這個形勢的理解。至於把不直接參與總統選舉的必要這一論點，做為該黨解散的一個理由，根本起一個嚴肅的檢討。沒有任何東西來阻止共產黨改變它的選舉政策去適應一個既定的政治形勢，顯然，美國共產主義者在上次選舉中支持羅斯福總統候選是正確的，但絲毫也不需要為此而解散共產黨。無可懷疑的，如果不去解散美國共產黨而盡一切努力在發展一個熱誠的、全國的、與反法西斯的政策意義下來加強其活動，那麼便可以大大地鞏固其地位，且有利的擴張其影響。相反的，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形成，只必然地擾亂了工人羣衆的意向和蒙蔽了他們的視線。

在法國，某種結核政黨的建議於最近數月中多少謹慎的以抗敵團結為藉口在人們之間流傳着，但是我們之中沒有任何人曾經想到要嚴肅地去考慮類如此類的建議。並不是結束了政黨我們才能盡力於國內團結，相反的，正是加強我們的黨才能有助於它。就美國共產主義者而言，他們所盡力於其國內團結的願望，以及為人類進步的運動而置於他們面前的種種困難，首先需要一個強大的共產黨的存在。

★

繼德黑蘭決議而來的便是雅爾達決議，這決議表明了三國的意志去清算德國法西斯主義並且幫助被解放的人民去清算各個不同國家的法西斯主義殘餘。我們幾乎不須要重提法西斯主義的物質基礎是寄居在托拉爾斯中的，而這次戰爭的盛大目的，即法西斯主義的根絕，只有在一切民主與進步的力量能夠不無視那些國際法西斯主義的政治與經濟的環境時，才能獲得。

美國共產主義者在全世界進步力量與法西斯野蠻主義進行進行的鬥爭中，要担任一個特別重要的角色。無疑地，為了他們本國和人類進步，如果他們不進行解散他們的黨，相反的編織一切去加強它，使它成為團結美國廣大民主羣衆的要素之一，並且進行最後擊潰法西斯主義——二十世紀的恥辱——那麼它將會有一個更有利的形勢去扮演它所担任的角色。誰要想讓國際法西斯主義在歐洲，正如同在德國或其他國家一樣，多少讓屠殺共同情者這一事實是沒有用處的。

前美國副總統，今商務部長，亨利·華萊士說得很對，我們不能一方面在國外與法西斯主義進行鬥爭，一方面又在國內容忍奴隸制度的活動，這些奴隸制度的企圖在「舊憲政剛剛死亡，新的還未誕生之間這一縫隙」來談和平。雅爾達的決議破壞了這些陰謀，但是自由的公敵絕不會自願解除武裝的。他們只有在一切民主與進步力量實際聯合之下才能退却。

顯然，如果白勞德同志能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列寧主義者那樣，看到歷史上一刻所面對着愛好自由的人民的那許多問題的這一重要的一面，他一定會得到一個到迥然與解散美國共產黨不同的結論。（周啓譯）

警 惕 日 本 陰 謀

于 懷

日本失敗了，但日本失敗的事實，無論是在作戰前線或其國內，都還沒有發生。

日本失敗了，但日本在組織失敗；而組織工作，從八月十日到今天，已經進行了整整的兩個禮拜了。

日本失敗了，但它正在想盡千方百計，使這失敗的事實，不要過早發生，好這樣爭取時間，從四面八方法組織它的失敗；使得它的無條件投降，在實際上變成一種有條件的妥協。

這是日本目前所進行的一個天大的陰謀。如對於這一滔天陰謀不加嚴高的警惕和及時的阻止，那麼，他的有組織的失敗，一轉瞬之間，可以變成勝利，而我們在混亂中取得的勝利，到頭來却可說是一種失敗。

八月十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國家正式提出願意接受七月二十六日的波茨坦無條件投降的宣言，其唯一保留條件為保留天皇。十一日，美政府即以四強代表資格答覆了日本；對於日本的保留條件，在原則上表示接受，但天皇必須服從盟軍最高統帥的指揮；至於日本政府的終極形式，則留待日本人民自己決定。

盟國這一完全合理的條件，無疑地是早就達到日本政府手中了，但日本政府猶待十三日才接到盟國的覆文。在這當中，日本內部的鬥爭，顯然是使日本政府不能及早回答盟國的一個原因；但不可忽視，有計劃地爭取時間，組織失敗也是日本遲遲不予答覆的原因之一。我們不知道在這幾天中，日本內部的鬥爭內容，但它利用這時間來組織失敗，却是顯而易見的。怎樣組織呢？日本的統治階級，生怕他們的現存天皇，因服從盟軍最高統帥指揮之故

而失去了皇威，所以他們安排下昭和下台的後備。十一日，昭和曾封其十三歲幼子明仁為東宮，其目的就在此。

日本遲不答覆，美軍十三日恢復了進攻，日本答覆終於被攻出來了；十四日日本決定接受四國覆文，十五日上午英美中蘇四國同時正式發表日本無條件投降。

從十日到十五日，整整五天，這是多麼寶貴的時間啊！

日本既然接受了無條件投降，理應立即派出降使，簽署降書；盟方確定麥克阿瑟為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命令日本降使十七日趕到馬尼刺，但日本置之不理。

一

十五日天皇昭和下了一道荒謬的勅令。在這勅令中，昭和一不承認日本所發動的侵略戰爭是一個非正義的戰爭；二不承認日本戰敗的這一鐵錘的事實，而將日軍失敗之過歸於盟軍的使用原子炸彈；最嚴重的是他不僅不承認日本所發動的非正義戰爭的失敗，而且，三、他還在號召「建國」的背後埋下再圖報復的陰謀。這是日本組織失敗的一個公開的宣言。

十五日昭和勅令，十六日昭和下令陸海空軍停止作戰，但附帶聲明停戰最遲地區十二日始能達到，這又是一個拖延時間的藉口。

緊跟着組織失敗的宣言，來了組織失敗的事實。十五日鈴木內閣辭職，十六日昭和下令東久通親王組閣。東久通以皇族和本土防衛總司令的兩重資格而組閣，以一身而兼為日本式的巴多格里奧和鄧尼茲，本已令人注目，但更加荒謬的是十七日組成的東久通內閣的機構和人選。

在制度上，東久通內閣不僅保存了那供應戰爭的軍需省而且還保存了那

統治佔領區的大東亞省。武裝已經被解除了，何來軍需省？佔領區被剝奪了，何來大東亞？事情的荒謬，沒有比這更厲害的了。

機構荒謬，人選更加荒謬。一大批頭等戰爭罪犯，都擠在這內閣裡：米內、重光、中島、近衛……對於日本人民這是頭等戰爭罪犯。但對於獨立——投降份子，這些人却正是所謂「穩健派」，這就是東久通內閣人選的祕密。不用說，這些穩健派對於日本人民是什麼意思？是無須分析的，山崎岩以警察頭子而出任內相的這一事實，瞭如觀火的指出了這一關鍵。

東久通內閣組成以後，出現了一連串的嚴重消息：首先是六大城市禁止旅行，這是幹什麼呀？內幕不得而知，但誰能担保日本軍閥不把大量武器和彈藥藉此埋到地下了？盟軍要佔領日本本土的，但埋藏在泥土下面的東西，是不會被佔領的。

其次，是日本頭號法西斯組織大日本政治的解散，據云解散之後，將有四個新政黨的出現。這裡包含兩層意思：一部份法西斯份子化裝成民主面孔出現，一部份法西斯份子轉入地下，而惡名昭彰的法西斯組織，則搖身一變化整為零。這樣一來，日本軍閥法西斯不僅保存了它的組織，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而且保存了它公開和秘密的幹部。

最後，但最嚴重而却最易被人忽視的是另一事實，即東久通內閣組成以後，新藏相即不斷和金融界會商，這又是幹什麼呀？

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不僅要保存他們的政治制度和幹部，而且要保存他們的經濟基礎。在這些會商中，日本法西斯很顯然是想把：

- ①軍需工業化裝為和平工業，以免同盟國家的剝奪和控制。
- ②國營工業化裝為私人工業，使同盟國家不易處置。
- ③製造軍火的大獨占企業，分散為個別的和平企業。
- ④容易被沒收的大銀行存款，提出和藏匿起來。

一言以蔽之，千方百計保存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經濟基礎。所有這一些都需要時間，盟軍命令日本降使十七日到馬尼刺，日寇一再推延，拖到十九日才到達，二十日才完成會商，從十五日到二十日又是五天，而且日本的無條件投降還沒有簽字呀！

現在美軍決定二十六日降日本，二十八日登陸日本，三十一日舉行簽字儀式，直到簽字儀式舉行之日，日本還有十天的時間；十天的時間可以做不少的工作，更何況簽字之後，日本這一組織失敗的工作，還可以暗底進行呢！

三

潰敗之下的敵人，爭取時間，組織失敗，但勝利聲中的同盟國家，却在某些方面表現了某種程度上的分歧和混亂。重要的不是這一方面是有組織的失敗和另一方面是混亂中的勝利的事實，重要的是，組織了失敗的敵人在充分擴大這些分歧，加強這些混亂。嚴格說來，在今天可怕的不是敵人組織失敗，而是同盟國家的勝利不能徹底。

對於敵人，失敗是經過長期醜態和籌備的，但對於某些一些同盟國家，勝利却是突如其來的。

在德國無條件投降之前，同盟國家間有着德黑蘭和雅爾達——從軍事和政治上組織勝利的會議作為基礎，但在遠東，同盟國家間是沒有相應的會議，作為共同行動的基礎的。假如有德黑蘭和雅爾達作為基礎的歐洲勝利，在最初期間，這不免發生某種程度的分歧和混亂；那麼，沒有這基礎的亞洲勝利，其分歧和混亂在某種程度上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這不是說，在對日作戰的問題上，同盟國家間沒有相互之間的諒解和協調。不，這種基本的諒解和協調是存在的；所不同者，組織歐洲勝利的雅爾達會議產生在德國無條件投降之前，而局部含有組織亞洲勝利之意義的中國同盟條約，却簽訂在日寇提出無條件投降之後。

這就是亞洲勝利和歐洲勝利基本不同的地方。從這裡可以看出，儘管在整個遠東問題上，同盟國家間存在着某種基本的諒解和協調，而這種諒解和協調的某一部分，也的確是已經形成了成文的約章，但整個形勢是流動的，而不是凝結的。

這種情形反映在同盟國對待勝利不同的態度上。

首先是美國。關於這一點，大公報的胡霖先生說得好：「上星期四，杜魯門總統的迭次聲明，反映了對於力量相等的新的界說，即杜魯門總統在八月九日的廣播演詞裡，就會提到：『舉凡我們軍事專家認為德衛國家所不可少而現在又在我們手中的根據地，我們都要取得』，這在以前是向來沒有公開談論過的。……將來美國對於世界問題的發言，將更坦白而具體，甚而還會含有強硬的意味。這一點應為重要。」（八月十九日大公報星期論文）這一點的確是很重要。這是日本投降以前的事實。十五日日本正式投降，十六日杜魯門總統發表談話，表示佔領日本的主力將由美軍擔任（十六日美

新阿處華盛頓電），不特將來佔領日本究竟採取何種方式，這一番亦甚重要。因爲它好像更加証實了胡霖先生的觀察。

其次是蘇聯。從八月八日蘇聯對日宣戰的第一天起，蘇聯官方和輿論，都一致強調同盟國團結爭取勝利的必要。及至日本投降，蘇聯方面又再三警告日本法西斯的狡猾性。在這一團結作戰的指導方針之下，蘇聯紅軍的作戰，沒有因爲日本的投降而表示過任何動搖，這是和同盟國家中另一些軍事領導者的作風迥然不同的。蘇聯對日本不存幻想，對團結非常重視，這表現它的一往無前的作戰上，表現在八月十五日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上。

然而危險的不是某種不一致的事實，而是失敗的事實還未發生的敵人，在充分的利用這形勢，盡量擴大分歧，造成混亂，挑撥美蘇關係，引起國共糾紛。

關於挑撥美蘇之關係的，試舉一例：十七日舊金山合衆電：「日軍司令部發表阿瑟將軍之第四號電文中稱：蘇軍不顧日軍停火之命令，仍積極進行攻勢，蘇軍前已於十七日晨渡海以西基地，該電文迫切請求盟方最高統帥採取適當步驟，使蘇方攻勢立即停止」。日本投降的事實一日不發生，盟軍的攻勢一日不停止——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但日寇居然阻敢要求麥克阿瑟將軍阻止蘇軍攻勢，其存心挑撥美蘇關係，於此已昭然若揭。日本陰謀挑撥美蘇關係，同盟國家中沒有比這的內奸呢？有的，登陸占守島和關於蘇聯反對麥克阿瑟爲盟國最高統帥的謠言——這兩件事實表明了反蘇份子的活躍，在行動上和言論上都無不有徒。這些人是日本的朋友。關於這些人的行動和言論，讀者們幾乎每天在報紙上都可以看到，稍加留意，即知現實中的困難絕不如書本上那樣簡單的。

然而日本陰謀的中心還不在此。它還有一套，那就是今天它在中國戰場上所玩的一套，它堅持只能向實際上不能和無權接受它投降的一面投降，好這樣來促成中國內部的糾紛和混亂；它公開的說，它不能放下武器，因爲他「放下武器，八路軍新四軍就要破壞它八年來在中國建立起來的『秩序』了」。

四

日本組織着失敗，它的希望究竟何在呢？

一、保存日本帝國主義的政治機構（國體）和經濟基礎（財閥）。

二、離開同盟國家——特別的美蘇之間的團結。

三、促成中國內部的糾紛、混亂，甚至於內戰。

從一方面說，日本軍國法西斯主義者組織失敗的中心，在保存日本帝國主義的機構（以天皇獨裁爲中心）和基礎，因爲有了這基礎，它才有繼續生存的可能。但從另一方面說，它組織失敗的中心，却是在促成中國的內戰。陰謀上，因爲這內戰一旦爆發，勢將把美蘇兩國捲入漩渦，而美蘇兩國是日帝國主義復活唯一可以想像的根據。

問題的關鍵在何處呢？

戰爭改變了一切，它改變了世界，它改變了中國。

它改變了世界：在世界範圍內，經過了這次戰爭，世界的面貌完全變了。說得簡單些，英美蘇特別是美蘇兩國，經過了這次戰爭，對世界性的領導權，適應着力量比的改變，一切國際性的關係亦必隨之而改變；改變的過程可能是非常曲折，但改變的到來卻是必然的。誰在新的力量對比關係下，堅持舊的秩序，誰就必然在國際上引起不必要的磨擦。

戰爭改變了中國：在中國範圍內，戰爭改變了中國內部的力量對比。說得簡單些，人民覺醒了，人民組織起來了，人民揮起鐵錘了，人民有充分的權利去收復祖國。

這就是日本陰謀的全面目。

面臨日本法西斯侵略者這全套的陰謀，作爲擊潰日本的領導列強之一，我們偉大的盟邦美國，肩負着比其他列強更大的責任。奧又拉欽森先生說得好：

「在所有這些新的和變化着的關係之中，亞洲佔有頭等的重慶性。亞洲的將來，將決定着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能合作到什麼程度。新興的自由人民，他們所獲得的自由底價值和意義究竟如何，將決定亞洲的發展。因此，我們美國不能再把亞洲看做我們一個流連剩餘力的尾閘。亞洲將是我們美國所有理論和作風的一個試驗場。亞洲的失敗，將註定世界集體安全的失敗，亞洲的成功，則將證明我們所努力以赴的戰後世界的成功。」（「亞洲之解決」二〇七頁）

八月二十四日

何應無拘無束的選舉

李普

——從解放區的選舉論新民主主義的原則

一 主權屬於全體人民

「中華民國的主權屬於國民全體。」輝煌的民主戰士孫中山先生最初提出這個主張。在其手著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裡，他對他所主張的這種民權主義，更提出了明確的定義，他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爲壓迫平民之工具。蓋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

這是孫先生的偉大政治指示。中國共產黨所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原則，和孫先生的主張是毫髮不差的。這個原則，首先就表現在解放區各級政權的全民普選上面。

解放區所放區在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公佈的選舉條例裡面，規定了這樣一條：

「第二條，邊區參議員、縣參議員、村民代表，均由選民用直接、平等、普選制，無記名投票法，選舉之，論階級階級之不能直接普選者，得行間接選舉。」

前項行間接選舉之區域，其選舉辦法由該管縣政府擬定，呈准邊區行政委員會施行之。」（作者按：敵我爭奪的邊區區域，我們建立着公開的政權，若于論階級區域，我們也有隱蔽的政權，存在於廣大人民的掩護之中。）

陝甘寧邊區在三十二年十二月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二次大會通過的選舉條例裡面，有這樣的規定：

「第三條，凡屬居住邊區境內人民年滿十八歲，不分階級、黨派、職業、男女、宗教、民族、財產及文化程度之差別，除有五列情形之一

者外，皆有選舉及被選舉權：

- ① 有實際行爲無政府組織者；
- ② 經法院或軍法判決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 ③ 有神經病者。」

孫中山先生反對「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之下以財產的標準來限制廣大人民的選舉權。這一切不合乎的階級的平等選舉，而且其選舉的選舉，在各解放區首先實行起來了。由於文字上的比較簡明之故，我們解釋了上述兩條條文，除了字面上的差別而外，各解放區都有在本精神上完全相同的這兩方面的規定。一方面是人平等，一方面是直接選舉，這是新民主主義政治制度下面政權選舉的兩大基本精神，同時也就是體現新民主主義政治原則的具體辦法。

但現在的問題在這些：這兩條辦法是否真正行得通呢？

第一，廣大人民在文化上這塊落後，他們怎麼會懂得選舉？而且，如果他們連自己的姓名尚且不認識，他們怎麼能投票？

第二，在如此分散的農村社會之下，窮鄉僻壤裡面的廣大人民互不相識，而且無法過問自己村以外的任何事情，怎麼能實行直接選舉？

誠然，這兩方面的技術上的困難都是事實。但是無論如何不是根本問題。只要根本問題得到實際的解決，這些技術上的困難都不是道，都可以克服。

那根本問題是人民有沒有自由。如果人民真正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選舉基本的自由，任何技術上的困難，都不難迎刃而解。

解放區的實際的經驗將爲我們說明這一點。

這裡，我們不妨首先附帶的提一個反面的問題。就是說，如果我們不信任人民大眾的能力，如果我們斤斤局限於這些技術困難的顧慮，如果我們就只好走那條所謂從教育着手的水遠走不完的老路。那是永遠不會有

好結果的。如果不立即實行民主，教育永遠無法普及，人民的文化程度永遠不能提高，工業永遠無法發達，分散的農村環境永遠不能改進。那就恐怕不能是反對不動而已，而且甚至將淪為人家的殖民地。民國已是三十四年了，訓政也快滿十九年了，除了屈辱、苦難、窮困和落後之外，我們的國家民族收穫了一些什麼呢？我們的廣大人民收穫了一些什麼呢？

如果我們不了解這個事實，如果我們停留於表面的技術的顧慮，如果我們忽視了對人民的自由權利那根本問題的深切認識，那末我們就恰好幫助了法西斯主義者們，因為當他們在不得不裝扮一副民主面孔的時候，他們就同時把出這些技術的顧慮來掩飾招牌。

二 從鬥爭開始

各解放區在開始實行選舉的時候，歷史悠久的惡民政策的惡果的確曾經大大地阻礙了選舉工作的順利進行。

安徽來安某村第一次實行村選時，當選的村員有一半以上是「老好人」，最老好的一個得了最多的票數當選了村長。這些既沒有能力辦理事，也做不出任何好事情來的人。

這正是人們的心願。舊社會的政府所給予他們的創痛太深了。他們仍舊認為選出人是給公家做事的，而所謂公家的事務就是向他們要糧要錢要命。如今讓他們自己來選了，他們就選幾個木頭人來，讓你「甚麼也不能做，這就是他們的算盤。」

各解放區有許多老百姓打過這個可惡的算盤。今天他們應該翻過身來成為自己的主人，應該來掌握自己的命運了，但是除了一部分積極份子之外，其他的人却在畏首畏尾，猶豫不決。或者，他們更採取冷淡敷衍和懷疑的態度。

例子是舉不勝舉的。山東沂蒙區第一次改選村政權的時候，有一個村子的幹部們把事情看得太簡單，立刻組織了村選委員會，着手挨戶登記選民，凡十八歲以上的公民都有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但是村民們採取了極冷淡的態度，有的人對選舉這件事大發怪話，有的人對公認登記發生懷疑，以為這是要「拔兵」，因此有一個四十歲的父親報了五十歲，十七歲的兒子報了四十五。

這個村子的共產黨支部研究了這個問題。黨員們反映老百姓的情況

證明了一件事情：村民們不是不關心村政。恰恰相反，他們正在談論如何改善貧污的問題，他擔憂了三個月之久，而腦子一直沒有消理。對現任村員不滿民主作風，他們也有些不滿意。但是村幹部們却撇開這些實際問題不談，而且現任村長又參加在選舉委員會裡，因此他們就採取消極的態度。他們並沒有認識自己的力量，只能以冷淡敷衍作無謂的抵抗。

眼前的實際問題必須解決。於是共產黨鄉村支部推動黨員們首先應與救國會和婦女救國會討論了這個問題，領導他們展開反貧污的反不舉不鬥爭。人們極為興奮，搜集了許多證據，然後兩個團體聯合要求召開村選法會來公開解決。

三百多個人的村民大會上有七十幾個人說了話。一個老大娘指著村長的鼻子罵道：「你早先不准俺噴氣，俺現在可當面出了氣了。」這是一句大翻身。以前，這位村長敢不動就打人的嘴巴，而且隨隨便便就罵人「看起來」的。但是現在，羣眾的強大聲勢把他的氣焰壓倒了。現任村員也白的檢討了自己，承認了自己的一切錯誤。

於是，婦女們嚷嚷起來：「咱村是民主了，去年這時候，誰敢罵罵罵。以後再選就要選好人了。」

解決一件實際的事情，勝於說一千篇道理，做一大套實際的鬥爭，勝於好幾年書本的教育。人們從實際的鬥爭中受到了最有效的教育，人民大眾的政治認識飛躍地提高了。

人們的消極冷淡和敷衍一掃而空，以後，讓我們看他們怎樣以積極的鬥爭姿態投身到選舉的運動中去。

這是山東沂蒙區某村選中的情形，是解放區選舉運動中典型的現象：

時間是三十三年夏季。

五月三十日，各階層的競選更加緊張了。地主李××在這以前，就召集了上層份子開過兩次會，佈置選舉運動地主余××當莊長，現在更積極地坐在街頭，向圍在周圍的村民們說：「抗戰五六年，咱莊辦公這都是前幾年辦的，咱後辦一個也沒有，我看這回要來個大換班，連團長一個也不留，才徹底民主呢。」圍在一旁的富農楊××接口說：「俺老爺說的不差，俺老爺××當莊長還不差。」

全村貧農中農的積極份子互相奔告着：「後街大門裡人都滿村了，誰還敢說呢？」六月一日，農會、救國會、婦女會、青救會、抗協紛紛召開大會

會。請教會對面舉行的。他問他這人，現在莊長李××和教會會另一個年青的會員李××誰能人歡迎。新任的教會會長向會員們說：「明教會會是當選會長，請選每月開會，拉一團清軍，保證減租交租，保證發給長兵，保證看書，保證……」

「對呀，」會員們回答說：「咱去宣傳，公房小組開會，咱一定要提出來對大家說。」

這幾年來的會員李××又是青年救國會的會員，會救的大街上大家也都聽得，決定和教會一起，聯盟提倡他做候選人。青年人是聽慣的，會選的一閉眼就是種種道理和熱烈：

「請選李××，看行不行！嘴上無毛，辦事不牢！這回呢，叫它牢呀不牢呀！」

「可是另外也有人擔心：『恐怕不一定行，想那那那那，那裏巧就選上這些個貨物呢？』

「聯社！項項和救教會一腔勁，都保證，怎麼不行呢？就怕咱們不一條心！」

「就是他，要是別人，人家也不贊成。咱一個心願保證，當不上正的還當不上副的嗎？」

年有人這樣吵吵嚷嚷了一陣之後，會就散了。會後，他到一見人就問：「你聽誰？他有什麼長處，我看李××這不錯。」李××這小伙子勇敢而精明，他曾經領導村民鬥爭了一個貪污的經手人，這全村大家都知道。而青救和教會的會員們這種積極的宣傳，更給他打下了當選的基礎。

抗協和上層人物三天開了兩個會，也正式推選了李××做候選人，並且分別的向農救會會員活動。富農楊××更在楊家圍空家。他說：「現在的莊長要不得，工作上包辦。李××這小伙子倒是大，不怕事，不過到底太年輕，不牢靠。咱選他李××，人平和，又知書識字，咱就選他這樣能幫上忙下的人才行，要不，咱這可有吃不飽的虧了。」

這就是他們的被選演說。

選選運動就這樣激烈的進行着。

六月五日，各公民小組提出了候選人，大多數的小組推選青年李××，以及主任莊長李××和婦救會的候選人劉太嫂。

晚上，召開全村的候選人討論大會。

首先有人站起來支持李××，他說了一本理由，其他的青年也發言

來了。這時，李××站起來，他說：「余××？前年大『掃蕩』，他這鬼子，不該像這人養精。」但是地主何××站起來了，他說：「人家這鬼子一頓打，後就迎。」

這時一羣圍圍的尖銳的戰鬥。全場都緊張起來，人們默然地來聽這色，停了一刻，一個叫劉太嫂的青年女人打破了緊張的空氣說：「你這不知道余××可歡迎了，那一天，你這鬼子在山溝裡，看見余××打小自旗，迎著太陽走，鬼子……」

「對呀！他這鬼子……」會場的人全反對他。於是，余××的氣喘喘了！余××不會想到今天的。他是村裡一個惡霸，和何××那些人的關係一起，村裡人那怕他到！那時候，鬼子之後不久，鬼子就給八路軍打跑了，余××知道事情不妙，就到山溝裡，說：「誰敢造他余××的孽，老子就拚十兩地和他打官司！」

但是現在，世界變了！

然後，一個青年農民爲李××競選，他說李××爲人公正，生產又好，「能修路修田，能領頭領大家翻身發財！」青年們更高興起來：「誰說：『他這鬼子！』」

接着有一個青年站起來問道：「大家贊成不贊成？」回答的是一陣陣聲：「贊成——！」

大會上又選舉了監票，寫票和監票的人。六月六日，選票的日子到了，因為怕就誤發生，男女公民分做兩批投票，女的在早飯之後，男的在晚飯之後。早飯後，女公民分做四個單位投票，有的早把候選名單記熟了，和領頭指頭指着一口氣說出一個候選人名，有的說，你就代我寫李××，李××和劉太嫂吧，我看他們最好。」劉太嫂是婦救會的候選人，婦救和教會這三個團體，無形中建立了選舉聯盟。但這絕沒有隨聲附和的意思，當選會經過候選人名單，有的老大娘說：「不行，你得多說說，咱就選他這那一個。」於是他們一擁擁着，一邊批評。

最後，監票人地主何××把票包起來，鄭重的封了包。他對人說：「這活了這寨一大把年紀，第一次嘗民主的味道。」

晚間，男公民投票，地主何××放下碗就親自召集他那一班，隨後選選選那些。

男公民投票之後，隨即當家開票。全村大多數的人都來了。當晚開票

一年，各階層選人的票數都相近。會場異常的肅靜，只有唱票人慢悠悠

清人名，和粉筆擦在黑板上的聲音。監票人地主何××和富農楊××睜着眼睛，又看着黑板上的人名，全場的公民也都睜大眼睛，心懸着唱票人的聲音跳動。

結果，全部選票都開卷了，全村盼着的李××當選了村長，齊××和劉××當選了村代表，全體十一個委員的成份是：貧農二，中農七，富農一，地主的子弟。全村參加投票的公民，佔全村百分之八十。大會散會後，候選人劉××趕到在黑板前邊，屈指計算自己的選票。

第二天，村民們都說：「一動水都增得平平的，這些才是當家人呢。」

三 關鍵在於有無自由

上述的場面是一個典型的場面。

從這個門面的場面裡面，我們可以看出羣衆團體所起的巨大作用。如果沒有這種羣衆的羣衆組織，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日常的反抗鬥爭不可能，日常的民主鬥爭不可能，更無法掀起這運動的熱潮和發動激進的運動。同時，如果沒有實際的組織和鬥爭，便無法產生羣衆公認的領袖。所謂羣衆的領袖，是領導羣衆行動的人，是從羣衆的實際鬥爭中產生出來的。他們沒有三頭六臂，如果沒有廣大羣衆支持，他們什麼也不能做。

因此，問題是很明顯的，選舉問題的根本上是有沒有羣衆的自由，有沒有給社的自由，有沒有競爭的自由，有沒有反對貪污反對不民主的自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等的自由？是否真正進行全民選舉，能否把選舉羣衆的這種，也就是真正實行民主的基礎，也就是實行憲法的基礎。這種，就使我們組織中山黨或這民主的巨人來，對於有無真正屬於人民大眾自己的組織與憲法能否真正實行的關係，他會有個明確的指示：

「憲法之所以能生效，全恃民衆擁護，假使只有白紙黑字之憲法，決不能保障民衆，使不受軍閥之摧殘。……不特此也，民衆集無組織，雖有意法即民衆自身亦不能運用之，縱無軍閥摧殘，其爲具文自若也。」

人民大眾必須有自由權利，包括自由組織的權利在內，這是問題的根本上。同時，我們也可以看見，使領土上的困難實在不是這的，是可以克服的，使領土上的困難實在不是這的，是可以克服的。比如，有幾種

真會經試用過投票法，每個候選人背後或二雙線，這個人從他的背後走過，如果要選十一個人，每人就有十一個豆子，或鐵錘，或技一銅豆子，或鐵錘人的鐵錘。這種辦法當然能行之於村選，或或選區選的選舉便不適用。它的好處是不致於弄錯人，但是每得一個候選人坐在那裏未免太麻煩，而且不秘密，容易因爲礙於情面而妨礙真正意志的表達，因此後來隨即就改用許多碗，每一碗碗上寫一個候選人的名字，寫在會場一角的桌上，除了監票人之外，可以不准太多的人看見。但是監票人和選委會的人要向每一個本鄉字傳選民把每一碗碗上的名字都唸一遍，實在不勝其煩，所以後來有些地區就採用燒香法，把選票印好，選民們在自己喜歡的人的名字上面燒一個洞，實行這個辦法之中，許多認真的人，特別是青年的公民們，事先早就把候選人的名單的大序都背熟了。但是這個辦法也容易發生錯誤，因此後來一些地區都採用寫票法，由選民大會選出寫票的人來，一個一個的代寫。有些個別的地區的確也曾發生過弊病，寫票人違反選民的意思，偷偷地寫上自己所支持的人。但是這種弊病究竟發生得極少。因爲就選區鬥爭與尖銳，監票人寫票人總總是有着對的成份的，監票人睜大眼睛，絕不馬虎，寫票人就非得規規矩矩老實實不可。

此外，我們還要提到上級機關派出來的人以及黨團工作團的作用。這種工作團也是上級機關派出來的，他們輪流到每一個村莊去幫助進行選舉，主要的就是幫助解決一切技術上的困難。

我們前述的實例講的是一個村的村選，但是因爲存在着實際的羣衆團體之故，通過每個羣衆團體的各級組織，就保證了縣級或選區選舉的進行，各個羣衆團體由下而上地一級一級把自己認可的候選人提出去，各地的代表參加到上級的組織裡面共同最後決定了候選人之後，就交下去號召全組織的成員來支持和擁護。

去年十二月通過的陝甘寧邊區各縣參議會選舉條例第二十七條是這樣：「各抗日救國抗日羣衆團體可各提出候選名單及競選政綱進行選舉運動，此項候選名單，亦得由各抗日黨派各抗日團體聯名提出之。」

此外，條文並且規定一定數量的選民的權利，也可以提出候選人參加選舉。這也說明選民的選舉權範圍於這一項規定解釋得太長，我們且介紹新解放區和解放前放區的辦法，這兩個解放區有同樣的規定：這種公民的選舉權，只要有「公民五十人以上之連署，并出具履歷名冊，報請縣選舉委員會查覈，」即可行。

這項公民的自由組合主義的選舉的選舉。這地都是由居民小組提出。這是為了便利那些少數派有參加任何黨派和黨團體的人。雖然一般地說，各解放區的人民幾乎全都自願組織起來了，比如說農民有農救會，工人有職工會，商人有商會，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有「學生聯合會」，青年和婦女也有他們自己的團體，而地主紳士們也有他們自己的組織，或以個人會員的資格參加在「抗敵團體聯合會」裡面。比如在晉察冀就是這樣，在晉察冀的各種活動中，從動員抗戰，參加選舉，推廣文藝，到調解糾紛等等，「抗敵」的作用是極其巨大的。

因此，直接的普選毫無問題。各解放區參議會的選舉以縣為單位，縣參議員的選舉在陝甘寧解放區以鄉為單位，在晉綏和晉察冀解放區，則以區為單位，陝甘寧邊區的規定是不滿二萬人的縣市（等於縣的市），選舉邊區參議員二名；二萬人以上縣市，每增加居民二萬人，增選參議員一名。晉察冀解放區的規定是三萬人以下的縣，選舉五名，每增加一萬人口，增選一名。所有當選的人，不備是山抗日團體所保證的，而且是全縣知名的人士。

這裡也許我們須要附帶的說明一下，在整個的民主生活之中，人民大眾的文化水準和政治水準在不停地飛躍地提高着。以陝甘寧邊區來說，通俗的「羣衆報」深入於農村的每一個角落，因為紙張有限，每天只能出版八千份，每一個鄉公所，每一所小學校，每一個工廠，每一個婦紡小組，每一個勞動英雄，大致都可以分到一份。它所用的語言極通俗，僅限於一千個常用的漢字。每一個單位在工作的餘暇由一個識字的人讀給大家聽，其他許多的人也學習識字，學習讀報，現在能讀報的人一天天多了。報紙的內容大半是勞動英雄們的經驗，或某一個模範工作單位成功的原因和方法。內容與大眾自己的生活密切相關，因此極能引起人們的興趣。此外，也載一些生產的常識和國內外的大事。總之，經過這種報紙，全邊區的模範人物被為人民大眾所熟悉和學習的人。比如邊區的勞動英雄吳滿有，在邊區真可以說是婦孺皆知。慶縣太樂區的區長全萬明是一個打鐵匠，他善於為人民興利除弊，至少在慶縣全縣，就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他。除了全邊區性的「羣衆報」之外，各行政分區各縣都有自己的小型報紙，每一個村莊還有自己的黑板报，也都是以本分區，本縣，本村的事情為主，而不是僅僅一些遠處的國內外大事。如果辦一張小型的報紙需要相當的設備的話，黑板报是誰都可以辦得起來的。而且，在政治上毫無限制，言論出版是人民的基本自由，誰也不能干涉。

有人以為在農村環境中言論出版自由是一句空話，事實上完全不是那樣。新聞事業的發展與否，是民主政治的真假與程度深淺的測量器，這是一點也不錯的。通過這些報刊，解放區的人民再不是從前那樣閉塞的僻野之民了。民主政治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與文化的水平，文化的提高必然又推進了民主政治的深入。

但是我們不要以為勞動英雄制度僅限於「模範」，對於非工廠職工模範人物則有補救工作者的稱號，使他們愈近聞名。陝甘寧邊區的一位參議員靳體光先生便是合作社英雄，他是元蕪工廠的總經理，另外還有一位高合毛紡織廠的廠長姬伯維先生也是以模範的紡織業工作者聞名，而獲選為邊區參議員的。各地參議會裡，這樣的人物很多。

其他各解放區的情形大致相同。當然，這只是說明解放區的人民不再是閉塞的人民，直接的選舉并無技術上的困難。至於當選的各級參議員，自然不備限於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們而已。

剩餘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民衆團體會不會腐化，會不會為某些少數人所把持操縱呢？以各解放區的經驗來說，個別的把持操縱的現象，個別的領導人物之腐化墮落，都未曾發生過。但是，民主生活保證了一切！有了那一些基本的自由權利，廣大羣衆覺醒起來了，既然推倒了從前壓迫他們的腐化份子，他們就有決心不讓任何一個新的壓迫者爬到他們頭上來。他們時時在前進的鬥爭中，使把持操縱和腐化墮落不可能發生，即使發生了，也能很容易的克服和糾正過來。事實上，有些個別的羣衆團體不健全的地區，就是首先發動各團體的成員起來自下而上的整頓好了之後，才提高了廣大羣衆的積極性，才使村選的勝利完成成為可能的。

這種整頓就是一場由下而上的鬥爭，這一點極其重要。我們不該再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山東莒南某村村選時，鄉救會長自以為大兒是區中除前，二兒是分區X委員，媳婦是區婦救會長，女兒是識字班隊長，就自高自大起來，閉口修人，影響村政不民主，農救會長也是這樣一個仗勢欺人的官僚主義者。因此，村民們和農救婦救的會員們，就在下面唧咕：「什麼民主，還不是拿咱作個樣兒。」「選啥呢，誰不知道背後早就唧咕好了。」

幫助選舉的工作團到了該莊之後，馬上發現這種現象，於是分別發動農救和農救的會員，展開反對農救會長和婦救會長的鬥爭。最後在各自的會員大會上開除了這兩個人。

然後，選舉運動才順利地展開起來。

這理，我們不妨順便談談其性質的作用。所有這種鬥爭的場面，打先鋒的共產黨員，他們在黨內習慣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生活，如果他們自己犯了錯誤，應該教育他在黨面前坦白的反省，以教育自己，并且教育羣衆，提高民主的空氣，共產黨員們不是單獨地做這種鬥爭的，他們永遠和羣衆結合在一起來領，單槍匹馬，誰也成功不了什麼事情，他們不過是羣衆的動員和激發，而羣衆打先鋒而已。在選舉問題上也是這樣，中共提出候選人時，也必須是羣衆所擁護的人，必須經過羣衆的組織，以取得更廣大的人民的支持。

誰說共產黨員不能取得人民的支持，必須首先代表他們，代表他們的利益呢？！
羣衆已經覺醒，誰也包攬不了！

四 新民主政治的規律

只要人民有基本的自由權利，就必定有向前行進的尖銳的鬥爭。只要發動人民自由而鬥爭，平等直接普遍的選舉就完全可能。這就是新民主主義政治的規律。

在這種選舉制度之下，選舉的結果怎樣呢？

那裏沒有疑問的，它給中國的政治帶來一幅新的面貌，帶來一番新的氣象，簡單地說，就是工農們抬起了頭來了，青年們婦女們抬起了頭來了，開明的正直的士紳們抬起了頭來了，工農們和婦女們青年們從前被排斥於政治舞台之外，如今參加了政壇。

讓我們看一張表，這是冀中七個縣一九四〇年選舉結果的統計：

縣別	人口	共產黨	青年團	婦女	士紳	其他
平山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唐縣	48.9	78.7	92.9	84.1	85.7	189.0
大	11.8	21.3	7.1	18.9	14.8	0
青年	25.5	30.6	27.5	27.8	28.1	52.8

年齡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老年	25.3	18.8	17.9	17.2	11.8	4.8	0	0	0	0
青年	4.7	7.5	8.9	7.6	4.1	0	0	0	0	0
婦女	48.9	41.7	39.2	40.1	26.4	14.3	14.4	14.4	14.4	14.4
士紳	16.6	27.9	45.8	40.2	21.8	21.9	21.9	21.9	21.9	21.9
其他	8.3	7.9	7.4	6.7	14.8	23.8	23.8	23.8	23.8	23.8
共產黨	0.2	6.3	0.2	0.1	3.1	0	0	0	0	0
青年團	3.4	4.8	1.5	5.3	0.2	0	0	0	0	0

從上列統計中，我們可得出三個重要的問題：

第一，從階級關係來說，在抗日民主根據地建立以前，這地區或縣級完全由有錢的地主階級一手包辦。窮苦的人民是沒有一點兒地位的，現在則起了根本的變化。地主富農階級仍佔了很大的比重，但是工人和貧農中農們也佔了相當的數目。

從工人和貧農當選的比例來說，在村代表中佔四九·二%，縣議會中佔三〇·五%。按這個統計，佔全體公民人口五四·八%的工人和貧農，而當選的比例僅佔四九·二%——三〇·五%。也就是說，他們當選的比例（就是他們在政權中的地位），遠低於他們在公民羣衆中所佔的比重，但無論如何，他們已把自己上升為主宰自己命運的一極，則是極其明顯的。而且，如果再把作爲典型的農村小資產階級的中農所佔的數字加在一起看，那數目就更爲可觀。

地主富農，商人在這些縣分當選的比例是，在村代表會中爲二一·九%，在縣議會爲一七·九%，看起來似乎并不太大，但他們在公民人口總數中所佔的比重，僅爲七·九%，可見他們當選的比例遠遠地大過了他們在公民總數中的比重，可是無論如何，過去他們少數人的那種專政已經打破，這是極值得重視的事實。

第二，以年齡說，在舊社會裡，老年壯年地位比較高，青年在政權中幾乎毫無地位可言。今天則恰恰相反，在村選中，老年公民的比例佔三一·八%，而老年人當選到村政權機關的比例，在村代表會則只佔一六·三%，在縣議會只佔一〇·六%，當選縣長，副縣長的只佔四·八%，當選縣長的一期也沒有。當然在戰爭環境中工作緊張，老年體力不支也有關係，而青年則不同。他們在各級政權中的地位是：在村代表會爲二八·五%，在村主席中爲三〇·六%，在縣議員中則佔三七·八%，當選縣長的則爲四二·

八、這也說明政治制度已開始有變化的表現之一。

第三，「婦女解放社會黨」的組織，因為他們解放最困難。這一點在統計中也表現出來。佔全體公民總數的五〇·一%的婦女公民，在村代表中只佔二一·三%，在縣議會中只佔一五·九%，在縣議院中只佔一四·三%。這僅小的數字表示，在政權中的地位仍相當低下，但和舊式社會黨無權政治地位的情況比較起來，已經提高了很多了。

這三方面的新氣象給中國前途描繪出一幅美麗的遠景。通過新民主主義的政治，中國將一步一步走到光明寬闊的地方去。這便前途萬分值得樂觀的民主主義者歡欣鼓舞。

這裡，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從黨派關係上來說，共產黨所佔的地位怎樣？

從前文的論述之中，地主富農商人自有他們的組織，在選舉的運動中進行了有組織的競爭，這並不能抹殺的事實。但是另一方面，這並不是不許競爭的，各解放區，由於究竟仍處在過渡的農村環境，因此，地主富農階級還沒有形成過性的廣大範圍內的政黨，或者說，其他既成的政黨力量也還不夠強大。而將來，解放了大城市之後，情形必然大不相同，繁榮起來的工業資本家們，尤其將是一個大有前途的雄厚的力量。

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如果不加限制，共產黨的確可能佔到極大的比重。廣大人民當然要選舉他為他的利益而鬥爭，為他打先鋒，領導他們翻身發財的人作他的代表，而這些忠誠為人民服務的人，即使原來不是共產黨員，也很可能成為共產黨員，雖然共產黨的政策在於照顧到各階層的相互的利益，注意全民的團結合作，但是政策的施行不能離開人，如果要照顧到地主富農和工商業者利益而不讓他們參加政權的管理，也就正同要照顧到工人農民利益而不讓地主富農參加政權的管理一樣，都極容易毛病百出，招致極惡劣的後果。在今天的中國，無論誰要包辦獨斷，誰就要失敗，就要帶給人民以深重的災難！

因此，共產黨中央就提出三三制的辦法，約束自己的黨員在各級政權機構政府機關中，最多只佔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二以上的位置必須由其他抗日黨派或無黨派的人士擔任。從提議選人佈置選票的工作開始，共產黨各級黨組織就注意這項政策，當選之後，如果不足三分之一，當然沒有話說，如果超過了三分之一，就自動退出，共產黨反對任何一派包辦獨斷，同時採取這種明確具體的辦法以防止自己走上包辦獨斷的道路，以達成和各革命階級密切的合作，這就是三三制的基本精神之所在。

我們可以說，這是不合於底層形式的民主的。既然人民需要代表他們，你憑什麼可以限制自己黨員的數目，並且在選上之後，又有什麼理由可以不遵照人民的意志擅自退出？一切的理由就是客觀形勢需要這樣，這

是今日中國社會的規律。

共產黨在各解放區執行自己的約束，在許多地方的議會中所佔的比重目現在三分之一以下，這裏是陝甘寧邊區安塞等八個縣鄉市參議會的統計：

縣別	鄉市參議員總數	共產黨員總數	共產黨員所佔百分比
安塞	一一八一	三一七	一八·四
綏德	二八八九	四〇〇	一三·八
吳堡	八四九	二四七	二九·一
米脂	二七六二	五〇三	二八·二
合水	七六九	二二五	二九·三
環縣	五三九	八三	一五·四
新寧	五八六	二五三	二七·〇
合計	一〇五一	二〇七九	平均一九·八

在這些統計中，共產黨所佔的比例竟小到百分之二五·四（鎮原縣）。而在這八個縣總數一萬〇五百一十一個議員中，共產黨員僅有二千〇七十九個，八縣平均的比例僅為百分之二九·八。

另外，雖然在佈置選票的時候嚴厲限制自己候選人的數目，但既然是平等普選的直接選舉，不能指定國定，而要讓人民大眾自由的抉擇，那就一定不能夠控制得絲毫不得，使選舉的結果百分之百地一個不多一個不少地合於三分之一的標準。事實上，各地近年來的選舉顯示出來，百分之百地得百分之三之一的好結果，只是一件極其偶然的事，往往不是走了，就是多了。少了沒有話說，多了就盡量自動退出，這種事情是常見於各解放區的。

老革命家徐特立同志曾經選陝甘寧邊區參議員，就是因此而率黨的命令自動退出，一九四二年十月陝甘寧邊區（現陝甘寧解放區）臨時參議會成立時，選舉產生的正式參議員一百四十五人中共產黨員佔四十九人，雖然超過三分之一者不到一人，共產黨却退出了兩個人。這種事情在每屆選舉區都有過，到處都得到了各階層人民的稱讚和擁護，特別是堅定了開明士紳們對新民主主義的信心。這就真正避免了一黨一派的包辦，增進了全民族的團結，鞏固了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基礎，真正得到了全體人民這個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原則。

因此，對新民主政治的鬥爭規律也可以得到一個具體的認識，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是團結全民族各革命階級的政治，團結是根本的，人民大眾的必要的鬥爭是為了避免任何一個階級的獨佔，正是為了使真正的團結成為可能。鬥爭是為了階級的團結而不是為了階級的分裂，這就是我們特別值得注意的一點。這是新民主主義政治的精神所在，這就是「中華民族的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的具體與確實的保證。

問題討論

讓人民來處治漢奸

懷沛

編者按：當我們想到八年抗戰中間，中國人民身受的苦難，便自然的，我們就會想到在這些苦難中間，那些爲敵作僱的漢奸是有份的。血債應該索取償還，罪惡應該得到正義的懲罰；對於這些幫助敵人來進行奴役自己的同胞，圖謀滅亡全民族的漢奸，我們決不能稍存寬假，更不，那些在前方流血犧牲的將士，在後方揮淚灑汗的人民都會喊出他們的抗議的。

懷沛先生在這種提法下，「讓人民來處治漢奸」的意見，這當然是道出中國人民的共同心願；但懷沛先生還只是在原則上提出了這一個問題，中國人民要求處治漢奸，但那一套是應該被處治的漢奸呢？這就須要全國的報紙與輿論來進行調查，搜集漢奸的名單，揭發他們的罪行，動員一切人民的力量來共同檢舉。雖然全國人民共同要求懲治漢奸，但我們的戰時懲治漢奸的條例，今天已經顯得疏漏不全，我們應該發動全國抗戰團體，人民團體共同擬定懲治漢奸的條例，不使那些民族叛逆假藉條例來作護身符。爲着保證懲治漢奸能夠認真：公正的執行，一切抗戰的民主黨派人士，應該共同來成立懲治漢奸的組織，成立能夠代表民意的人民法庭；這些意見，有些已經爲輿論界所提出，我們希望懷沛先生的意見能成爲討論的起點。

敵人投降了，漢奸爲組織也隨着就要完蛋，但我們却不能就此做着空頭的勝利者而心滿意足，我們還有許多未了的工作，戰爭罪犯必須處理，漢奸定懲治，關於前一工作，有本美蘇中四大盟國根據共同的原則來進行，這固且不討論；關於後一工作，則單獨要由中國自己來負責。

千千萬萬人民的血淚，斑斑地紀錄了漢奸的罪行。祇要他本人不是漢奸，一定就會認爲漢奸應受懲治，絕無考慮商討的餘地，問題祇在於如何懲治漢奸。無數的人民正在關心着這一問題，有關漢奸的新聞最能引人注意，一些對漢奸侮辱的作法，會引起廣大人民的憤慨與不平，輿論上早紛紛表示了處治漢奸的意見，小報雖未必盡同，然大

都原則上主張要公平要嚴格，對那些忠奸不分，真偽合璧的現象，無不表示唾棄。這相當的反映了人民的願望。

由於目前中國人民缺少集中表現意志的機會，懲治漢奸的具體辦法，還沒有一個負責的意見。而少數幾位極端的人，以爲祇要有一個法庭之類的官廳組織，就能担任處治漢奸的工作，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看法；大多數態度慎重而且負責任的人民，都希望由人民自己來處治漢奸。因此，這裡特地提出「讓人民來處治漢奸」，作爲對當前處治漢奸問題的一個意見。

必須經過人民，才能有徹底的檢舉，那些大漢奸，已經罪惡昭彰，用不着什麼調查，就可以判處

，但中國的漢奸，除了這些之外，還要以數十萬計，他們犯罪的時間不是一時一日，而是從一九一八「起直到現在，其區域地域之廣，其受害人民之多，都不能簡單估計，且漢奸的罪目也多不相同，有的固然公開掛上了偽組織的招牌，有的表面上還掩蓋其面目如「秘密工作者」之類。舉凡全部漢奸的名單，個別漢奸的罪行，以及那些秘密漢奸的真相，無不需要嚴密的調查，否則脫漏一個漢奸，便是留下一團災禍，誰來負責這個調查責任呢？任何脫離了人民的個人或團體都是不可能的，祇有人民的耳目衆多，大漢奸固早在人民注視之下，其他各等各種漢奸的罪惡，人民也知道得最清楚，或由於目見耳聞，或由於週歷其境，任何漢奸都逃不脫人民的眼睛，人民所受的痛苦，就是漢奸罪行的證據，祇要人民申訴自己過去的某受，中間就包括了一些漢奸的罪行，就是對漢奸的最有力的檢舉，人民是控訴漢奸最好的與最有力的敵人。目前處治法的工作，進行得頗爲徹底，計被檢舉的在十萬人以上，就是由於人民的力量。這是值得我們參考的一個例子。現在，關於處治漢奸的問題，雖然還沒有一個整個的負責的辦法，然報紙上已經紛紛發表漢奸的讀者投書，工業界提出了懲辦與敵人合作的工業家，文化界提出了懲辦附逆文人，報界主張懲辦附逆報人，許多人民團體都開始了對漢奸的檢舉工作，這又證明了人民是檢舉漢奸最積極的一羣。

也祇有經過人民，才能有公平的審判，漢奸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罪犯，其罪行的性質與種類，實超出了一般的所謂刑法或軍法的範圍，過去祇有現成的法律條文可領，又沒有適當的判例可援，祇能會經頒佈有所謂「懲治漢奸條例」，實並不能概括一切的漢奸，成爲嚴重的缺點。審判漢奸，應

一個比較生疏的工作，而同時又是一個最宜慎重的
的工作。審判的目的，一方面是維護全中國的人們
對分別忠奸，同時還要從奸細中分別忠惡，各治以
應得之罪，何者應予以體面的拘留，何者應予以財
產的沒收，何者應予以身體的拘囚，何者應予以生
命的處決，以及對那些被追隨的人們如何予以可
能的寬恕等等，都不能憑空感情來決定，而需要
一個嚴密的公準，祇有人民共同意見最公平，人
民公審是一個最好的方式，公審的判決，就是處治
漢奸的最妥善的不成文法。

同時，也祇有經過人民，才能保證判決的執行
，漢奸份子中，有軍閥官僚，有特務黨棍，也有買
辦與投機份子，他們有各種各樣的社會關係，人
事因緣，獨和人民處於不可調和的對立地位，漢奸
的罪惡全部加在人民身上，人民的眼睛也特別注視
着漢奸，決不能容許漢奸脫罪。且經過了人民的選
審的檢舉與公平的審判，一切一般法律上的曲折麻
煩，變動更改，如「上訴」「覆判」「減刑」「緩
刑」之類，都可以一律免除，這樣就保證了判決的
執行。只當判處了死刑，從至今尚在人間，就又是
法國政府違背人民意志的結果。

特別是在當前中國的官場裡面，從檢舉，審判
到執行，存在了一系列的過渡，檢察的結果，常常
是「查無實據」，審判的結果常常是「大事化小，小
事化無」，執行的結果是「紙拍蒼蠅，不打老虎」。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由於這些過渡的存在，漢奸
應由人民來處治，尤為必要。

過去，解放區各地曾實行讓人民來處理漢奸，
設有告密箱，和人民可以實行秘密檢舉，由人民公
審漢奸以至處決漢奸的事例，在解放區也曾屢屢頻
見，因而保證了解放區抗戰陣線的嚴肅與整齊。
在全國其他各地，却並沒有同樣的措施，而且

相反，人民清算楚楚的看到漢奸招搖過市，也無由
檢舉，有時甚至還提出一個關於漢奸的質問，而
動輒待答。即使在人民憤怒之下，偶然逮捕了個別
的漢奸，終於也沒有有一個應得的審判結果。據「上
海風」所載：「近日報載電影界張善琨夫婦，於上
月廿四日在黃山被捕，即解屯漢，保安司令部以其
有惡敵嫌疑，由軍法官審問等事前一節，茲據屯漢
電訊：謂張夫婦經過關係方面證明其過去在滬，表
面上雖與敵偽有密切關係，實際則與我陸運工作人
員暗中尚有聯繫……現經關係方面證明確係釋放
，且將轉來重慶云」。這祇是偶爾拾得的一例，又
如過去汪精衛僅予以撤職除名的處分，又何嘗是一
個公平的判決。

再從整個的漢奸形成過程來看，還在汪精衛之
前，早已有大公開放敵，在汪精衛之後，又仍有不
少的漢奸潛伏在抗戰陣營裡，直到最近（八月二號
），潛伏的閻錫山又公開投敵去了，而且往往後一
批投敵的人去了，而前一批投敵的又有幾無其事
「歸來」了，這樣，漢奸來，漢奸去，如入無人之
境，以致形成今天的這一大批漢奸，和致國家民
族莫大的災禍。然而這些，在人民的眼睛裡早就看
得雪亮，祇使當時能保護人民來檢舉，審判，執行
，當不至引以今天如此嚴重的後果。這，說起來好
像是一筆添那的舊賬，但在今後的處治漢奸工作中
，不能不記取做為教訓。

人民的意志，是處治漢奸的最正確的方向指
，一切為漢奸辯護，對漢奸優容的論調，如「曲線
救國」「將功贖罪」等等，都是和人民意志完全背
道而馳的。

現在，雖然敵人投降了，而漢奸為組織還沒有
馬上完蛋，漢奸們仍在「維持秩序」的掩護下，攜
着原來的武器，並未向抗戰軍隊繳械，他們甚至企

圖搞一下旗號，插身一變而為抗戰的「功臣」。這
些最後掙扎與無恥投機的企圖，對於漢奸原無足異
，而且這足以表現漢奸的又一幅面目，但是，如果
縱容這些漢奸的搞法，却是白給於人民而必然為人
民所唾棄的。

最後，處治漢奸是人民的權利與義務，漢奸個
組織一天存在，人民的義務即一天未終了，站在人
民的立場，不開漢奸的是否武裝，總要前後地把他
們一個一個的來處治。人民是有這精力的，過去
既然能够打败敵人，難道現在還不能解決這些漢奸
？同時也希望人民這種處治漢奸的權利能够受到尊
重，而不遭到剝奪，因此這裡提出——讓人民來處
治漢奸！

代 郵

漢珍先生：

請示通訊處。

慧先生：

請示全姓名，以便作覆。

陣容先生：

請示通訊處。

編者

勝利、和平、民主

讀者先生：

日本無條件投降以後，中國抗戰已趨到勝利，我們的要務是徹底解決敵人，完成和平，建設民主政治。但是從最近的形勢看，國內團結民主問題，仍然是我們焦慮的一個問題。我們經過八年的痛苦和犧牲，換來了勝利，決不能讓再有內戰，我們連內戰兩個字都怕聽見，我們要求的是勝利，和平，民主。專此敬請

學方上，八月十九日

讀者先生：

拉薩巴已經走到臨頭，中國人民第一的要求自然是徹底解決敵人，徹底地取得勝利。

為了取得徹底的勝利，在中國大國上的敵軍一天不投降投降的時候，我們就一天不能放棄武力的進攻。自己放下武器，等待敵人投降是沒有害不過的。只有把絕對軍敵人的腕，才能使人無條件投降，這是值得再三申說的真理。不到敵軍真正停止抵抗，決不中止作戰，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裝，徹底消滅日本法西斯勢力，這是符合於波茨坦公告的精神，也就是中國人民所要求的徹底勝利。

為了取得徹底的勝利，漢奸賣國賊決不能寬恕。假如抗戰八年，結果只是讓那些賣國賊榮耀，認賊作父的好成再換一套衣衫，繼續爬在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那麼，千百萬中國人民的血都是白流的了。一場公開的漢奸，醜惡的第五縱隊，庇護漢奸，

利用漢奸的人都是日本侵略者的朋友，中國人民的敵人。他們繼續存在，就是給中國民族留下禍根，這不是中國人民所要求的徹底勝利。

勝利不是第一個人的功績，而是全體人民的犧牲奮鬥的結果。中國人民在八年抗戰中已經毫無愧色地盡了他們抗戰中的責任，在抗戰的結束時期，人民有充分的權利實現他們的徹底勝利的要求。尤其是最近切地受到日本法西斯和漢奸賣國賊的毒辣的陰謀，人民有最大的發言權利。決不尊重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聽就犯下絕大的錯誤。

臨死的敵寇想在中國的內戰危機中發現了他可以利用來最後掙扎的一個機會，漢奸賣國賊也從這裡找到改頭換面，繼續存在的生路，這是值得萬分警惕的事實。

誠如你所说，中國人民是連內戰這兩個字都怕聽見。難道中國人民在抗戰中的災難還受得太少麼？難道抗戰前十年內戰的教訓還不鮮明麼？難道中國人民的血在抗戰以後還繼續流在同胞相對的戰場上麼？經過抗戰中這樣慘重的破壞後，不經過長時期的和平休養，不能恢復民族的元氣，不經過長期的和平建設，更談不到國家的富強，實行民主，創造持久的國內和平的條件，這是全國人民的迫切希望。在這方面誰不尊重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誰也要犯下絕大的錯誤。

要求國內和平，必須就在此刻根據當前形勢去消除內戰的禍根。中國人民反對專制獨裁，主張

實現民主，就因為預感是內戰的禍根，只有民主，才能建立持久的國內和平。

內戰危機雖然可怕，但中國人民可以自信；是有能力克服這種危機，是有克服這危機的辦法的。只有真正實現民主，讓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能儘量充分地表達出來，決定國家大事，就自然能建立持久和平的秩序。

更應該知道，勝利和平與民主不只是中國人民的要求，也是全世界人民對中國的希望。在戰後和平的世界中不容許在一個內戰的中國來威脅世界和平，在民主的世界中不容許一個獨裁的中國，也不能容許在整個中國內，一半是民主，一半是不民主。中國人民為爭取徹底的勝利，主張和平，主張民主的努力是一定能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得到勝利的。

編者 八月二十三日

啓事

本刊上期刊登「毛澤東同志與蘇聯共復黨羅斯特電」，因為原電脫漏，個別地方有些錯誤，特更正如下：

毛澤東同志與蘇聯第四行「敵寇」為「祝賀」之誤，第六行「：反動資本主義集團」句中「主義」兩字係衍文，第九行「大會」二字係衍文。



書目評評 及其他

農村調查的態度與方法

盧 蕪

「農村調查」(毛澤東著)

讀「農村農村」(費孝通著：商務版)

「傳統的鄉村行政制度」(谷苞著：載自由論壇：一卷五，六期)

「我們怎樣深入農村和深入農民呢？」

這是今天已經進入農村的一些知識青年朋友所共同碰到的問題。我們知道這些青年朋友雖然地捨棄了長期依賴的城市生活，個人的習慣，愛好面對農村去，都帶着「為農民大眾服務」的赤熱熱情，完成「農村的民主革命」的偉大目標，都帶着熱烈的戰鬥意志和思想上大的變革與追求。但單是有了戰鬥的熱情和為農民大眾服務的決心，仍然是不夠的；因此，一些朋友已經進入農村，和農民生活在一起了，卻感覺到自己與農民大眾中間仍然隔着一層障礙，工作無從開展。

我們會經指出過，進入農村並不等於深入農村，和農民大眾生活在一起了，也並不就等於已經和農民大眾深刻結合；由於我們對農村生活的接觸，對於農民大眾的生活一知半解或者完全無知，使我們在面對農村時，對於新的事物仍然感到無從，或者感到「檢查羅毛當令箭」的把一些局部現象擴大成代全體，這種錯誤的認識，工作也就很難希望廣利的開展了。

要正確地進行工作，必須建立對於工作情況的正確的了解，而「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社會作調查，調查各階層的生活情況。(「農村調查」序言二)，農村工作自然也沒有例外。對於革命的知識份子而言，這種深

入的社會調查沒有其特殊的意義。一般的說，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還沒有來得及也永遠不可能預備完全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如同歐美日本的資產階級那樣。所以我們自己非做搜集工作不可。特殊的說，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着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須，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與實際相聯繫。」(同上引)。但從這面，決不應該得出這樣的結論：以為農村工作必須等到精密的農村調查工作已經完成後才能夠開始；相反地，離開了深入的農村工作，而希望完成精密的農村調查是不可能的。

在討論到各種進行農村調查時，一般地多側重在如何調查這些或那些採用的調查方法；甚至於有人在城市裡，先做好了調查單大綱，或者製定了一些表格，準備一到農村後就可以逐一的填寫起來。但這種得應用的方法是否合適，固然直接影響到調查的結果的成敗，但比方法更重要的還是我們以甚麼樣的工作態度來進行調查。

首先我們必須要有實際求知的科學精神；一些資產階級的學者，雖然由於這種方法的局限，使他們無法深入對事物的本質；但他們中間却有很多

人真正具備着實求是的科學精神，我們要勇於承認他們的優點，虛心的學習他們的長處。農村調查是一種嚴密的科學工作，它通過事物的各種表徵，找出內部發展的關聯，和各個矛盾的側面。「東張西望，道聽途說，決然得不到甚麼完全的知識。」我們進行農村調查，是爲着要對農村的實際情況得到具體了解。如果我們調查所得是一些不可靠的材料，據此而得出的就必然是錯誤的認識，從這種錯誤的認識出發而佈置工作，自然也難免於工作的失敗。而在傳統的脫離實際的教育下，我們又常是習慣於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粗疏、草率的非科學作風的。譬如一些準備到農村去的同志，爲着要進行農村調查，先在城市裡憑腦子的想像，擬好了大綱，或者擬定好表格，或者是尋找一兩冊別人的農村調查報告，抄上調查的項目，於是心安理得，以爲萬事俱備只待自己現現一項就大功告成了。這就是一種非科學的態度，事前的考慮自然很重要，但還只能是一種思想準備，決不能在心裡先就固定了一定的形式；別人的調查成果自然也有參考的價值，但也只能作爲一種參考，我們只應該細心的去研究別人運用了一些甚麼方法，那些地方是可以得對啓示，決不是可以原封不動的搬過來應用的。如果我們還沒有和調查對象發生直接的接觸，憑甚麼能斷定用一些甚麼項目來表現出這個調查對象的農村呢？如果我們先已經擬定了調查的項目，或者憑空地把別人在其他社會的情形來擬定調查的表格，這樣做，就是把沒有調查的農村也當成明白的了；這種不科學的調查方法，必然會和現實格格不入的。表格和觀念都是一些死的東西，我們必須能夠勇敢地以現實來修改既成的觀念，只有不斷地突破和變革陳腐的觀念，我們才能夠逐漸地接近客觀真理。

教條主義的餘毒，一方面是造成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自以爲是的作風；一方面並養成思想力萎縮，對新鮮事物熟視無睹的現象。我覺得要養成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就需要培養對新鮮事物的敏銳感覺。如果缺乏這種對新鮮事物的感應，在進行農村調查的時候，常常會一方面用了許多力氣，搜集了一大堆不能用的材料，一方面卻又輕視放過了那些可以看出問題的事物。在「傳統的鄉村行政制度」這篇調查裡，就顯出作者這種敏銳。譬如作者調查：「化城村的四倫，每倫都有一個專祀的神靈，本倫是大戶老爺，中倫是天王老爺，白呂倫是帝釋老爺，倉倉倫是土主老爺。」而作者在這個村子舉行神賽會時看到：「……在大佛寺內六神的神座是這樣的：最上的是祖師老爺，次是城隍老爺，三是中倫的天王老爺，四是白呂倫的帝釋老爺，五是倉倉倫的土主老爺，末座是上倫的作東的大佛老爺，接着是由中倫，白呂，倉倉倫的會。」……上流神像的位次正代表化城村各個階級的地位。這是一則很細微的事情，但調查者却從這中間看到四個階級地位的漸下。我們在進行農村調查時必須養成對新鮮事物的敏銳。

要把調查工作作好，必須有坦誠向下的，向羣衆學習的決心。帶着自以爲是的知識份子優越感，是決不能把調查工作搞好的。知識份子常常因爲受了教育，從書本學習上得到了知識，自視優秀的瞧不起農民大眾，認爲他們是愚昧、保守、沒有文化，懷着這種心理去作調查，往往弄成局限在一些鄉村知識份子或者是地主，士紳這些階級的上層份子之間，或者據拾一些官方的現成材料，而不管這些材料的可靠性如何，輕率的據此而得此結論，或者是把這些附合在一些前定的概念上，這種結論，無疑地會遠離或者背這實際的，從實質上講這是一種官僚主義的調查方法，在「蘇村漫田」一書裡，曾舉出行政院所作的雲南省農村調查就是一種例子，蘇村農田的作者指出：「以前有很多國內舉行的社會調查，依我們所知道的，是在調查之前，預先製定了調查表格，表格中每項字的意義，事先預爲規定，然後把表格發給調查員，由調查員依表格上的項目，去找人民來回答。這些填好了的表格彙集起來，再找人統計一下，有了結果，由「專家根據這些數字來推論所調查的社區的形態。」（本書一〇五頁）。而這些社會調查的缺點，在於：「規定概念和解釋現象的是一些「專家」，而實地觀察的却多是一些沒有很深科學訓練的人，甚至對於調查工作本身沒有多大興趣的「職員」和「學生」，和現實接觸的人，沒有修改概念的能力和權力，他們的工作是依照表格填寫。結果是出了死的表格來說明活的事實。」（同上引）。這種敷衍、支吾原本是官僚制度下的必然產物，倒也不是深怪；但我們必須警惕到任何採用同樣作風、方法的調查，必然得不到正確的結論。

我們應該明白到，雖然從書本上我們得到了文化知識，儘管這些知識都是前人總結他們生產鬥爭，社會鬥爭的經驗；但這些書本知識仍然是理性的、抽象的。儘有書本上已經讀熟了農作物的科別、種類、屬性的人，一旦接觸着農作物時，把小麥作稻子，把玉蜀黍當高粱而開笑話的。農民大眾卻是具有着豐富的生產鬥爭的知識，我們必須認真聽取農民大眾這種豐富的知識和智慧，虛心的向他們學習。在論到農村調查的工作時，毛澤東同志曾經着重的告訴我們：「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與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事情的。」（農村調查：序言二）。我們向農民作調查，是向農民學習，是希望從他們豐富的智

「我們，學到我們所不知道的東西，決不是揮來幾個農民，對他們進行整齊、審問，而這種『審問』式的調查，他們是由衷的憎恨的；從他們的經驗所告訴，也許這又是更征兵、催糧，或者是加稅，他們自然會是不言而喻而不動的。」因此，沒有滿腔的熱誠，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與衆共甘甘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羣衆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正確的知識。」（同上引）。

具有了科學的精神，向羣衆學習的決心還並不多，我們還必須對人民大眾的苦樂有感同身受的態度。乍聽之下，這可能會遭到反對，因為一般的社會學者的意見，總以為既然調查，總應該客觀、冷靜，不添雜任何感情的成份，而強調這種分明的愛憎是會損失調查的客觀性。這些學者在調查上是否過難主觀的感情，我們可以不深究，因為客觀的外貌下，作者仍然是有其同位或情感的。我們當然不是主張先持着一些既定的概念去進行調查，而調查的目的又是爲着要附合在這些既成的概念上去，我們可能已經有了原則的知識，但這種知識也是建築於對現實的科學理解與知識上，而社會現實是在不斷的變動發展，我們調查、研究，就是不斷的從現實生活來檢驗和發掘新的知識。必須把今天我們要作農村調查的性質和一般社會學者的調查的區別指出：我們不是爲調查而進行調查，我們深入農村是爲了完成農村的民主革命，我們的調查是直接的爲了認識中國實際和現實農村，是希望得到正確的認識而有助於推進農村的民主革命。如果我們不能從思想上認識農村調查是開展工作的重要條件，我們就不會對農村調查有足夠的注意，也不會有足夠的熱情來從事。我們對於人民的苦難感同身受，首先就該具體化在我們對工作的熱中上面。前面舉出的行政院調查例子就說明了，實地觀察與搜集材料的人沒有很深的科學訓練，沒有修成概念的能力和權力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他們懷着一種冷淡的職業心境，對工作缺乏足夠的熱情也是調查不好的重要因素。我們對人民大眾的苦樂感同身受，就是鐵錘堅定的「人民的立場」，對於一切事物就可以就其對人民的好壞，作爲衡量的尺度。資產階級的社會學者，雖然標榜着客觀，但仍然有其一定的立場，不過他們不大願意公然表明他們的立場而已。

態度與立場的不同，也表現在方法的差異上。在態度問題解決後，調查的成功與失敗就決定於我們採用的方法。本文舉出的幾種調查結果，就因爲他們採用了不同的方法，或者是採取

了不同的對象，從這些選用相異的方法所得出的結論裡，我們可以學習到不同的方法，汲取不同的經驗。

一般社會學者所採取的調查方法，「蘇村農田」的作者曾曾經提到：「概括的說：社會調查是某一人羣社會生活的開見的蒐集；而社會學調查或研究乃是依據某一部分事實的考察，來證驗一套社會學理論或「試用的假設」的。」（第五頁；作者引述A.R. Firth語）。作者並指出在過去的「江村調查」（作者的另一次調查報告）裡，就是由「社會調查」轉到社會學調查的過渡，作者並指出在應用「社會調查」的方法時，「……沒有理論作導線，所得到的材料是零星的，沒有意義的。我則則在這一堆材料中，片斷地綴成一書，但是全書並沒有貫貫的理論，不能把所有的事實全部組織在一個主題之下，還是件無可諱言的缺點。」（第五頁）。作者從實際經驗證明了，單純的收集材料的「社會調查」的方法並並不健全的，一方面是有理論作導線，一方面又「太不自覺自己無時不在用着些單薄、偏狹和無組織的理論。」（第四頁，作者引述別人對他舊的調查的批評）。因此，作者認爲從「社會調查」改變到「社會學調查」是方法上的一個進步，這種意見是可以被承認的。在本書的引言裡，作者就提出：「若是有讀者對於本書發生興趣的，我希望他特別注意本書所表現社區研究的方法，因爲我覺得若是在社會學上略有所貢獻的地方，這決不在它所敘出的事實，或者所提出的見解，而是在它所用方法上的試驗。」（第四頁）。

和「蘇村農田」這種全面的調查一個社區不同的，是在某一個社區裡選擇一個具體問題進行調查；雖然調查的範圍仍然是一個整個社區，但是調查的具體對象物却只是社區生活的某一方面。「傳統的鄉村行政制度」就是這一類的例子。照一般社會學者的說法，就是藉一典型的事實來說明事實的意義。

但無論對於一個社區作全面的調查，或者是在一個社區裡，選取個別問題作具體調查的具體對象，一般的社會學者總很難超越資產階級學者的思想局限。也可以說作爲他們社會調查的「理論導線」仍是不夠健全的，由於思想的局限，常常使他們不能勇敢地對許多問題，也無法深入到一些事物的本質。我們應該虛心地去學習這些社會學者的長處，汲取他們的經驗，但同時我們也要認清他們思想的局限。

在農村調查上我們所使用的方法，基本上是階級分析的方法，這就是我們向「蘇村調查」一書學習的根本之點。階級分析的方法，一方面是要我們根據既定的人民大眾的立場，一切問題以其是否符合於人民大眾的利益，

作為標準的尺度。另一方面，是要深入的分析農村階級關係，分析牠的階級成分，力量對比，剝削狀況——地租、高利貸、捐稅、階級分化的情形如何，力量的對比在甚麼樣的方式發展，以及在各種生產鬥爭，社會鬥爭中間不同的社會階級的情緒、態度，這些不同的社會成分他們怎樣思想，怎樣生活，對於民族戰爭，民主運動他們的具體態度和傾向；……這些，在一般的社會學者常常不願深究，或者是雖然論及也略而不談，或者是談而不詳，但這些如欲從調查來認識農村，這些問題是首要的問題。

「農村調查」和前述的兩種調查方法的差異，在於前兩種調查是以一個社區的全面或個別問題為對象，「農村調查」却是選擇典型，從典型入手，作者在「中國調查」時，就從永豐區着手，作者認為：「這一區亦在東、漢、唐之交，明白了這一區，晉、唐、宋三朝也就相差不遠，整個黃河出地帶門的情況也都相差不多。」這就是藉一個典型環境，或者是典型人物的調查來說明一種共和，這就不僅要接觸到一般社會學者所要調查的事物，而且還要接觸到各個具體的活的人物，不僅要研究這些人物出身、生活，這些外在的特徵，而且要進一步的去剖折他們的思想、情緒，對各個不同的問題的真誠態度。這與調查是遠較一般的調查為難的，但也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質。

對於我們，這種從典型着手的調查方法，還有其現實的重要性；今天，我們在農村裡進行全面的調查，有很多條件的限制，不僅時間不容許我們長期的去進行調查，環境也往往限制了我們這樣去作。普遍的調查既不可能也缺乏必要，那我們可以選擇幾個家庭，幾個人物，或者是一些重要的問題，作為調查的對象，運用階級分析觀點，作精密的調查，一般可以作爲調查對象的，如：

- ①以個別問題爲中心，如徵租佃問題，捐稅問題，財政問題，兵役問題等。
- ②以人物或事件爲中心：如以地主、豪紳、會門領袖、行政人員、豪農、貧農、佃農、遊民、土匪的一些典型人物作爲調查對象。或者是以各種具體事件，如糾紛、訴訟等。
- ③以地區爲中心，選擇要的力量最大，要改也只能選擇很小的地區，如像一保、一甲，以搜集材料，藉以掌握全局。而材料之搜集整理，又視你調查的對象，中心而定。

上述這些問題，自然還是大的方面，譬如我們以問題爲中心舉「兵役」一爲例，我們可以調查的事項就有：

- 一、兵役：
- ①徵調原則（三平，一甲一丁），②方法（抽籤，搜捕，擄掠，買賣等），③服役條件及實際情形，④年與比例，⑤成份比例，⑥適齡壯丁數，已出役人數，應召人數，⑦逃役情形（逃亡、死亡、墮落等）。

流爲遊民土匪，⑧鄉鎮保甲對逃兵役者的懲治辦法，⑨抗屬所受的待遇，⑩逃役方式（有無組織形式，如火刀會，刀兒隊等）。

二、勞役：

- ①項目（馬路，機坐，疏河，建築），②時間（佔全年月份或幾天），③人數（在一編一保應徵人工數），④月份（以何種人爲最多，何者最少，何者得免），⑤待遇（伙食、路費、衣服、沐浴、管理方法，工作規律），⑥醫藥，衛生（衛生設備，健康狀況，疾病，死亡的諸形）。

正如像我們在前面指出的，農村調查決不能把一些既成的概念，當作拘守不變的教條，尤其是這沒到調查的現實直接接觸的人，更不能死守既成的項目，上區所舉出的只是一可供參考的例子。現實既然變遷不常，應多變，我們若處理由來固守成規的條款呢？我們必須勇於突破舊的概念，不斷以新的知識新的材料來檢證，發展和充實舊的概念。

- ①人事件訪聞或實地的觀察。
- ②利用各種機關或者是官方的統計，調查材料。
- ③搜集縣誌，族譜，人物傳記進行調查。
- ④從佈告、公告、榜示、通告、傳事找材料。
- ⑤剪輯地方報紙或各報的地方通訊。

通過這些所得來的材料並不是就可用的，必須經過分析、研究、鑑定，譬如利用官方材料必須察別其可靠性如何。人事訪聞或實地觀察是比較可靠的，但需要的時間很多，對農民的訪聞必須虛心、誠懇，決不能官樣式的採用審問的方式，必須先和他們建立深摯的友誼，要使得他們能夠無不言，言無不盡。農民多半不習慣於很有條理的談話，我們不能漫無邊際的閒談，就必須先準備好訪問的大綱，隨時使談話導引到訪問的主題去。而最重要的是一要有耐心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才有可能把調查作好。

「農村調查」完成的時候，距今已有十四年，「農村調查」則距寫成的時候約三十年，就以「傳統的鄉村行政制度」這篇調查而言，完成時間亦早在民國三十年，中國農村早已經有很大的變異，抗戰戰爭所促成的變化，尤其急劇，調查的結果雖然已多半不適用於今日。然而這些調查所採用的方法，在今天是有其現實的重要意義。「農村調查」所採用的尤不局限於調查的方法，對於決心深入農村的讀者，會從這中間得到很多寶貴的啓示。

在歐洲解放的國家里

我見到了捷克的斯佛波達將軍

西蒙諾夫作
戈實權譯

斯佛波達將軍是捷克軍團的指揮官，是捷克人民的解放者之一，現在，已是五十歲的人了。他一九一五年出身在一個貧農的家庭，後來當過兵，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磨難。在這次捷克淪陷和世界大戰爆發後，他就逃到國外，在蘇聯組織了捷克軍團，為粉碎德國法西斯及解放捷克人民而戰，在捷克解放後，斯佛波達已被任命為國防部長。這篇文字是從西蒙諾夫的「捷克軍團」中譯出的，原文載「紅星報」。

我第一次遇見斯佛波達將軍，是在斯洛伐克的科息斯城，當時他正到那兒去，解決一些與德國新來的捷克斯克隊有關的問題。我和他在那兒相會了約莫二小時，可是，當時我總覺得他很快地就回到他自己的軍團裡去，因為在他看起來，這個軍團就正是他的家。這是一次到那兒的會見。在我們共同相處的這個短促的時間當中，還絕不能就瞭解和認識這個人；當時只能注意到他身上某些重要而特色的東西。人們時常講起一個人，說在一個人的身上可以感覺到軍人的氣概。有時候他們所瞭解的這種氣概，是指一個軍人的枯燥無味，嚴峻和忠於職守的那種固著的明確性，在這些情況之下，在很遠的地方，在十步之外，就可以感覺到一個人的軍人氣質。但也有別樣的情形。不看一個人的眼睛，就不能察看出這個人所生來的軍人氣概。只有在看了他那雙堅毅的鋼鐵似的眼睛，不管它們是什麼顏色，只有那時候才能感覺到什麼是所謂天生的軍人氣質。

在我看起來，斯佛波達將軍正是屬於這一類人的。他的那些安詳而文靜的動作，他的那身差不多像文官一樣寬鬆地穿在身上的軍服，他稍一發乏的鼻孔，濃密的像雪一樣白的向後梳過去的頭髮，

突然間還再加上那雙眼睛。這雙眼睛是天藍色的，凝視的和犀利的，在我看起來，這雙眼睛無論在什麼情況之下是忍受不了任何虛偽的。這是長在非常和善的面孔上的一雙非常嚴峻的眼睛。

這就是我最初到那兒的觀察。後來我到了捷克軍團。在不十分遠的地方，響着砲聲，但這時我已經很晚了，天也黑了，我心裏想：假如這位將軍整天都在觀察砲上，那麼這時候大概一定回來了吧。可是，當我走進軍團的參謀部，問道我怎樣能走到將軍那兒去的時候，大家都帶着差不多非常驚異的眼光看着我。

「將軍不在」，他們向我說道。

「那麼他在什麼地方？」

「在什麼地方？在觀察砲上」，大家驚異地回答我。

「他什麼時候回來？」

「大概很晚吧。他經常很晚才回來的」。

在走了很遠的旅程之後，我就決定留在軍團的參謀部裡，我熟睡得打死了，只有到第二天早晨九點鐘的時候才醒轉來。我趕忙穿上衣服，就走進參謀部。

「我可以到將軍那兒去嗎？」我問道。

「哦，到那兒去還得很」，參謀部的一個工作人員向我微笑着說道，「離那兒大約八公里。團騎乘車到那兒去。他在觀察砲上」。

「他走了很久嗎？」我問道。

「很久啦。正像往常一樣。他出去得非常早；他在清晨五點鐘天還沒有亮的時候，就對那兒去了」。

在這一天刮着可怕的雪風。前線上這一個地區的作戰行動，是在一條狹窄的低窪地進行的，低地的兩邊則被粗獷的長滿了密密的松林的斯洛伐克山地所合圍着。德國人把他們的兩翼緊守着蓋滿了幾尺深的白雪的峭岩，頑強地把通達峽谷的一條唯一的道路保持在他們的手中。

我們從大路上拐了個彎，現在要沿着森林裡長滿了樹木的道路前進了，這好像是一九四二年至四三年在蘇聯西北前線上某處地方情形。可是甚至就是林木的密叢，也免不了風雪。在長達五百公尺的開闊的陣地上，大路都結了冰，我和帶路的人不得不丟下「維里斯」（汽車牌號名）步行到最近的一個村子，再在那兒為馬裝上鞍子，騎着馬到觀察砲的將軍那兒去。風雪從西面刮過來，我當時心裏情不自禁地想道，在這樣的時候步兵隊是多麼不容易向前推進。迎風風雪看東西差不多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們只能用手遮着眼睛，讓馬感觸着雪下面的道路自己向前走。最後，在經過了這個不過幾公里而覺得好像是無盡長的路程之後，我到了了一個村莊，在街當中放着一門德國的軍用砲，它們的兩彈帶着咄咄聲響向德國人那邊飛過去。我們轉向在右邊的高坡上的一條溝，就到了將軍的觀察砲。最初我真是可惜，為什麼理所當然不多到這頂內茅屋，要簡易是觀察砲呢。在茅屋裡的長凳上，

率着幾個軍官，而在二張粗製的靠背椅上，靠着放着地圖的同樣的粗製的木桌旁，坐着的正是斯佛波達將軍本人。我很知道，今天這個日子，正像進攻時所常有的情形一樣，是個艱苦的日子；德國人不斷地進行反攻，而同時軍團在今天已經推進了一個相當的距離，而這個距離是我們情報部的公報上所沒有指出的。

「今天打得不好」，將軍說道。這就是他在向我說了一聲「你好嗎」之後的最初的一句話。「打得不好」，他接着又重複了一次。

我知道軍團已經完成了在它的目前所提出的進攻的迫切的任務，這就是在此之後應該來一次新的打擊，並且這個消息完全是合理的。但是在將軍的話語中，則表示出他對現狀的毫無掩飾的真實的不滿。看起來，這個合理的消息並沒有發奮他的精神。顯然地使他最激怒的，就是德國人竟放棄了力量來開始反攻，爲了如他所想的還向前推進，就將在今天將這些反攻擊退。正像一個老練的軍人一樣，他發下了一個適合於當時情況的命令，同時更準備了力量來作進一步的打擊。但是作爲一個已經六年沒有回過親愛的布拉格（捷克京城）的人，他是爲今天的這種延遲所惱怒了，以至他不能，甚至認爲沒有必要隱瞞了這一點。

「他對反攻了」，他說道，「我們要把他們擊退，但我們只推進了幾公尺。等到開始用尺寸來計算的話——我是不喜歡這樣做的」。

在進之前五分鐘，將軍派了一個負責某項任務的軍官出去了。現在這個人回來了，滿身蓋了雪，他高聲地喊了一下皮靴的腳後跟，這是捷克軍隊中報到時的通常規矩。

「哦，怎麼樣，可以看見嗎？」將軍問他道。
「是的，可以觀察」，他答道。

「哦，怎麼樣，一同到觀察哨去好嗎？」將軍轉過身來向我說道。「用你自己的眼睛去看看，我派了一個人去調查了一下，看是否看得見。大家都說是看得見的」。

我們就走出了茅屋，跨過院子，穿過某所大馬廄，就沿着高高的扶梯，爬上了乾草堆。將軍並不是爬上去的，我應該說，他是得便地用着差不多是年青人的脚步，沿着這把直立的扶梯走上去的，雖然這時他已是五十歲的人了。在乾草堆的頂上，挖了兩個洞眼，裝着測量的望遠鏡，向着西方和西南方。四周的風景是蓋滿了白雪的高地，被一條狹窄的盆地切割開來。最近的高地，是昨天才奪回的；在今天，較遠的高地還在德國人手中，——德國人今天整天就從這兒，從高地上的黑沉沉的樹林裡，從甚至肉眼都可以看得見的細長的黑色曲折的壕坑裡，不斷地進行反攻。可是在目前這時候，最後的一次反攻已被擊退了，相反地，捷克軍團的大隊正準備進攻，他們正爲了進攻而聚集在出發的陣地上。

寒風也正像常有的現象一樣，突然完全靜息了半小時，從觀察哨可以很清楚地看見第二梯隊捷克斯兵的黑色的體形，在向前移動，他們爬上高地，他們馬上就要從那兒開始進攻。重炮砲從後面村子裡發射出來，我們可以看到砲彈掉在德國人的陣地上，發起了灰白色的煙和白雪的圓柱。德國人並沒有長久地忠於他們的陣守；地雷是埋在路不遠的地方，而大隊是沿着這條大路向最前線推進的，——當地雷在大路非常近的地方爆炸時，將軍稍微縮了一下眉頭。雖然我知道他打仗已經打了很久，但這個動作並沒有使我驚奇。這只是一個偉大的心靈與和善的心的象徵。他他自己士兵們的父親，他關心他們，關心着他們的生命，雖然

這是他自己把他們派到有着死亡威脅的地方去的。我們在夜晚的時候，才乘車回到軍團的參謀部。雪風還是像先前一樣地夾着巨大的雪片刮過來。乘汽車走很不容易，因此我們就改乘了雪橇。

將軍坐在雪橇上，倚着一根粗大的當地出產的裹着銅的手杖。在他的頭上帶了一頂高高的毛皮帽，從它的下面露了幾根灰色的頭髮。面孔是微風吹雨打過的，泛着紅色，正因爲這樣，他的兩隻藍色的正直的眼睛，就更顯得明顯了。在森林的道路上，排着長列的士兵們，裝着砲彈的履帶車和輕重兵，迎着面走過來。當看到所有這些人向他致敬時，你就不難猜到，他在自己的軍團裡是怎樣享有威望了。在蘇聯常有這樣的情形，大家不僅稱呼他官爲指揮官，還用其他各種表示親愛的名字來稱呼他。大家稱他「小爸爸」、「父親」、「老頭兒」、「主人」；大家這樣稱呼：「老頭兒來了」，或者「我們的來了」，這就證明出大家對一個人和指揮官的敬愛。當我和斯佛波達乘雪橇回到軍團的參謀部時，我覺得每個在路上碰到的兵士和軍官，都帶着種種感情來向他行舉手禮。我有這樣一種感覺，就是他們在心靈裡叫他「小爸爸」、「父親」、「老頭兒」、「主人」、「我們的」，這是非常要緊的，因爲這表示出了愛。在這一天晚上，也正像此前各晚一樣，我沒有機會能和他談起他自己的生平。在第二天，同樣地也沒有可能。這位將軍固執地不願談他自己的事。也許，終結地講起來，這是種好的表示。像他這樣一個有着驚人的精神素質的人，絲毫沒有帶出一些我想從他那兒聽到的話。等到參謀部的軍官，以及那些曾經以一個普通兵士的資格和他一齊開始打過仗的人們，知道我有能和將軍談起這個題目時，他們就懷着對於一個人熱愛和溫情，把將軍的事情講給我聽，使得我知道他

生活中某些詳情，還告訴我他從前經歷過什麼生活，他先做過什麼，現在又成了怎麼樣的一個人。

他是在一八九五年，生在摩拉維亞高地貧窮地的一個小村子裡。一九一四年十九歲的時候，他成了奧匈軍隊的一個兵士。他也正像大部分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憎恨和蔑視當時的政府和他們所服役的軍隊，在一九一五年他利用最初得到的可能，就跑到俄國那邊去。他加入了捷克客籍軍團，一九一七年以第一捷克旅團的排長的資格和德人

在唐諾波爾區的工作作戰。捷克旅團參加唐諾波爾近郊之戰，是有着深刻的象徵意味的。這德揚·吉希卡的時候把捷克人當作一個武裝的力氣公然地反對德國人。一九一八年的冬天，他已是另一個新的時代了，這位在當時任連長的將軍，還是像往常一樣在捷克部隊中執行了自己作為一個士兵的愛國責任，又重新和德人作戰，但這一仗已是在烏克蘭的深後方，在巴赫瑪奇近郊了。一九一九年，斯

佛波連回到了祖國，他當時已是一個軍官。他所出生的家庭，是個農民的家庭，當他復員之後回到他的故鄉時，他看到假如他要和他的哥哥分遺產，結果兩個人都會變成貧民。他不願意分給哥哥的一部分土地，就又重新回到軍隊去。他服役期中晉升得很快。他是軍事才能在和平時不容易看得出來的那許多人當中的一個。只有戰爭的考驗，（他們在這些考驗之前是不害怕的，但同時也有些人是喪失靈魂的），只有這些考驗能改變了過去和平時的觀念和確定出人們的真實價值。一九三八年時，斯佛波連已經成了一個中校。

功夫想到來組織捷克的民族部隊了。軍團甚至也沒有來得及武裝起來。

斯佛波連中校和當時跟着他一齊走的三百個人，就在蘇夫諾區中最初和紅軍相會，並且從那個著名的日子起，就把自己和自已兵士們的命運，和俄羅斯的命運緊聯在一起。一九四一年秋天，斯佛波連中校開始在蘇聯組織捷克作戰部隊。這時候，當在前線上正展開了戰爭第一個時期的艱苦激戰時，在離開前線不遠的布茹魯克地方，就在斯佛波連的指揮之下，進行捷克最初的許多連的軍事訓練。他們想和紅軍並肩作戰，因此就按照蘇聯的軍事操典訓練，並學習把蘇聯的武器。在這個艱難的時期中，存在着的不只是一個訓練的問題，同時還是一個原則的問題。斯佛波連在當時和自己的軍官及兵士們說道：

「無論什麼，無論怎樣的艱難，捷克的將來，首先都必須和俄羅斯在一起。」

在一四二年最艱苦的夏天，斯佛波連寫了一封信給斯大林，其中要求把捷克部隊派到前線上去。他覺得無論他在什麼地方和德國人打仗，甚至連在俄羅斯的腹地，這都是為了他自己祖國的自由和為了親愛的布拉格的自由而戰。在這時候，斯佛波連以及他的軍官和兵士們，都非常憎恨那位波蘭的安得安斯，這位將軍在俄國組織了自己的軍隊，當蘇聯最艱難的日子，他們不但沒有把軍隊開到前線上去，却反而開到後方去了。但大家都珍貴捷克軍團。只有在一九四三年的冬天，他們才在布茹魯克接到開赴前線的指令，對於斯佛波連，這是一個幸福和勝利的日子。現在離開他接到指令的那個時候，不過只有一兩個騎車列隊的旅程，他就終於能執行他作為一個士兵的責任了。當在布茹魯克的練兵場上把俄國的新自動步槍分給士兵們時，他拿着自動步槍站在兵士的隊伍前面，吻着它：

「這不是一件單純的武器，」他說道，「這是我們勝利的象徵。」

在布茹魯克，現在就只剩了組織候補兵團的工作了，而現在由已經任升為上校的新佛波連統率的

部隊，已經開到哈爾科夫近郊的前線，這時候當地正發生了德國人的大規模的反攻。斯佛波連的部隊，在寬達十公里的陣地上，差不多防禦了兩個禮拜

。第一個成為蘇聯英雄捷克的軍官雅羅希，在當地犧牲了。在那兒，在潮濕的寒風之下，斯佛波連上校和自己的士兵一齊坐在戰壕裡，表示出對於死的真正的蔑視，無論左右兩方發出了什麼事，他從不退却的。這就是為兒，他的那句像帶着翅膀的話，傳到了所有的士兵和軍官的身邊：「殺盡德國人，儘一切可能把他們殺光！因為從任何一個德國人的下士，將來都可以長成一個希特勒！」

最後，部隊接到退的命令，斯佛波連把自己的汽車送到後方去，和兵士們向北朝尼亞捷步行了兩晝夜，停下來，開始又打，並守住德國人。這樣就開始了一個人走進這戰爭的戰鬥之路，而這個現在正統率着捷克軍團。在哈爾科夫近郊就開始了他為布拉格之戰，當你從別的人聽到這件事的時候，正像我在前面所講過的，他是不愛講自己的，——這時候你總會知道，他在自己的士兵和軍官之間是享有怎樣的真正的聲譽了。

他，不僅是一個普通的勇敢而聰明的將軍，他還是他自己國家的一個人民英雄。他之所以是一個英雄，是因為他永遠相信自己人民的自由。他只想帶自己的祖國而忘了他自己，可是更重要的，就是他以一個真正愛國者的感覺，瞭解到和感覺到離他自已祖國的真正而不移的朋友，——這就是蘇聯。只有在和蘇聯的友愛團結中，捷克的人民才能幸

福而自由。

德國人在捷克吊死了這位將軍的兒子，他的妻子和女兒也消失不見了。他不知道他的下落。個人的命運是並不輕快的。他和自己的人民飲盡了苦難之杯裡的滿杯的酒精，但雖然這樣，他還是一個幸福的人；他是他成千的士兵們的父親，他們愛他，相信他，正像一個父親一樣，他們相信他偉大的心靈，並且從沒有失錯。事實上，他已有一個像老父親似地灰白的頭，一雙兵士的凝視不動的眼睛和一顆偉大的心——這就是愛國者的心靈。

美國記者報道希特勒沒有死，而在阿根廷預備的別墅裡作起寓公來；接辦法勒爾政府雖然滿心不願，但也不能不出來否認，說是「更無其事」。如果希特勒真未死的話，恐也不免於悲哀之感吧；曾經奴役過十四個歐陸的國家，擁有統治全世界的夢想，曾經使千百萬善良正直的人民顛沛流離，膏身草野的獨夫暴君，曾幾何時，就到了這種死無葬身之所。人民的意志在「德黑蘭」的宣言上寫下了「把法西斯匪犯從天涯海角追回」的誓約，天下雖大已經沒有暴君，獨夫的一席容身之地了。

如果希特勒是帶着他奴役人類，征服世界的夢想而死掉，該說是「實志以成」吧！然而，希特勒是已經可以死而無憾了，他不僅已把戰爭的災禍，帶給全人類，不僅在生前受到一切法西斯的徒從，縱橫主義，孤立主義者的頌讚、頂禮；就在他的死後，他仍然有看徒從、同類、遠親、近戚，在謳歌，頂禮，膜拜，差一點你就會聽到「希特勒萬歲」的呼聲了。

如果你不以為然，那就請上距「大日爾曼元首」逝世之九十餘日，中國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而生死以赴的戰鬥八年之後，所看到的：「近代革命家如希特勒之流多忽略此點而致敗亡……」作者之概歎、感慨是溢於言表的。希特勒「忽略」的是甚麼呢！據說：「革命的事業有兩部分，缺一不可：一是武力，二是思想，思想的力量，難以度量，惟至少不下於武力……」希特勒的失敗，就是「忽視此點」。（按指「思想的力量」）。要，希特勒這位「革命家」一定成功無疑的。

這些
為希特勒
的「策士」
們會悲
嘆於自己

讓法西斯的徒輩去哭泣，去發抖吧！ 黎 望

的「時時
命變」或
者是「生
不遂辰」
吧，如果
希特勒不

死，並且在生前就接受了這些「策士」們的「獻策」（如果我們翻讀一下「戰國策」，「戰國」這些策士們對於這位「革命者」是關懷備至的，真是恨不得掏出心肝來向這位「革命者」——當時是叫做力人，英雄的——表露自己的忠忱，絞盡了腦汁來奉獻他們的計策的），又回致於遭受今日之敗亡呢？說不定「革命」已經成功，論功行賞，這些忠誠的策士們，也說不定早已恩賜有加了。

其實希特勒又何嘗忽視思想的力量，如果穆罕默德締結了可蘭經，希特勒不也拿出了「我的奮鬥」嗎？何況他更搬出了學者們所贊譽有加的菲希德、叔本華、尼采這些超人，力人呢？

法西斯徒戰鬥的卑劣是這不止此的，希特勒被歌頌成了「革命者」，全世界善良正直的人民所進行的反法西斯戰爭就成了消滅「革命」力量的一場革命「戰爭」了。真不知把那些在教訓爾克、巴黎、斯大林格勒、華沙、柏林、萊茵河、奧德河倒下去的爭自由的英雄們置於何地。如果那些在絞刑架上死掉的人質，在布肯瓦德被毒藥的人民，盧布林被火化的屍灰……死而有知，也將攥緊了拳頭向全世界人民控訴的。

讓一切既非是非，復非敵我，等獨夫於英雄，讓法西斯為革命者的法西斯徒輩們去哭泣，去發抖吧！法西斯已經臨到他們的末日轉了。人民已經立下莊嚴的誓約，要把「法西斯罪犯天涯海角追捕回來」，任何變形變態的法西斯思想也一定要在人民的巨手下，被剷除掉的。



警察翼行進

周而復

「東亞新秩序」寫照

在一條廣闊的山谷里，我們踏清嶙峋的石子，

驟然是在白天，但很奇怪，一路上竟沒遇見一個行人。難道是我們出動太早了嗎？或者是附近沒有村莊嗎？我仰起頭來看：四面全是山，山裡有錯落的樹林，山裡傳來潺潺的泉水聲，這是唯一的聲音，連飛鳥的叫聲也聽不見。在我們前面的其二三里光景，就有一個相當大的村落。

待我走到村口時，依然不見一個人。

這個村正在大路中間，我對村中間的一條大路走過去，村子黑漆漆得如同墓道一般，我對路不感到一絲兒恐懼，反而上竟長了一尺多高的荒草，正稠的房頂，沒有一家是有煙火的，完全沒有人煙了，只留下一張張如似何似的地盤，抵抗着陣陣襲來的山風。

我很快停下來，因為這是一無人區，離敵人據點很近的，隊伍要前進，不可能停下來。

在荒涼的山野裏行進，一路上，連一個可以問

路的人也沒有，幸好我們帶了一份十分之一的軍用地圖，上面很詳細地畫出我們要去的路線。偶爾聽到遠遠傳來一兩聲腳步聲，快接近時，這腳步便倉皇地消滅了。有時，也看到山那邊有一兩個人過來，但不等到接近我們，便飛也似的走了。好像恐懼什麼似的。

為什麼呢？

我不懂得。我們在路上，甚至想聽點水喝也不可能。一路上的莊稼地都荒蕪了，到處是半人多高的高草，彷彿走近了原始的山林，一切的事物都以其自然狀態生長着。

幸好這無人區只有五十來里遠，到黃昏時分，我們終於宿營了，停留在靈縣境內離平道嶺十八里的王家莊。在這個村子裏，我們開始看到了人，不過連人很少，只一兩個，一間，原來還是屬於敵人製造的「無人區」。

雖然這個原先有五六十戶，但所有的房子都叫敵人給燒了，只有村邊的幾間燒不掉的石房，算

是村里唯一殘存的房屋。一路上被我們曾經經過過辦事有能力的人，到這個村里來籌劃燒水做飯我房子却感到無能了。

首先是沒有房子，我們決定露宿，用油布蓋在山上，露水和小雨都不怕了。水還好辦，村邊就有一條溪流，最困難的是糧，全村的六十戶人家，全被敵人打破了，只留下了三口——這是村里人，當敵人來時帶到地裏去，緊壁起來，敵人退去才又帶回來的。現在還是每天隨身帶到地裏，回來做飯時帶回來。我們只好待老百姓做完了飯我們再做。

趁著這個空閒，我和黃君兩個人到村里走走，全村原來人口是二百九十四口人，在敵人的放火險後，到這一帶逃殺之後，絕大部分的人都逃走了，大部分逃到解放區去，一小部分的人又四散到山溝裡搭窩棚，不敢回來了。

現在村里只留下了十一個人，剛才我進村時所看到兩個，是方從山溝里下來，看看村裡的情況，敵人來了沒有。還十一個人，我都在村邊的那幾間的石房裏看見了。石房門口，依然是冷冷清清的，只聽得從石房裏傳出低微的喘息聲，像游絲似的，斷斷續續，斷斷續續，我打聽着手伸進頭

清法西斯細菌的溫床

葡 萄

日本投降消息傳出之後，轟動山城，一百三十萬人頓時投入狂歡的浪潮中，到處是歡呼聲，到處是爆竹聲。是的，人民經過八年的苦戰，用血汗和犧牲換來了勝利，難道不應該狂歡嗎？

日本投降，中國勝利，國土恢復有日，人民解放可待，半世紀的恥辱，五十年的壓迫，從此即將消除，難道不應該狂歡嗎？

就在這狂歡之中，却有人為日本惋惜，彷彿沒有擊潰中國在服世界是一件憾事，不備出於談吐，而且見諸文章，這妙文就登在大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的播報上，題目叫做「庸材毀滅了日本」。這庸材生，美不勝收，這兒且剪一段貼在下面：

「我們推原日本失敗之因，固係中國有一英明之領袖，能堅決抗戰，使日本不能脫出中飽泥淖，因而對世界各戰路均陷於動搖所致。然此並非無法解救，使日本有一大政治家，大軍略家，能利用時機，執行其侵略政策，則其戰勝希望，亦尚充分。」

可惜「惟其當局者是一批庸材，不識抗住機會，在進取時，固喪失時良機；而在投降時，亦多有贊成之屬，所以勝利之局勢，變成無條件投降之慘劇，則日本之亡，雖是入謀不慮所致！」

「勝利之局勢，變成無條件之慘劇，」真是可惜得極，「庸材毀滅了日本」。「這便有一萬種遺憾之政治家」，怎樣呢？讀者曰：「即不然，向中國全力進攻，以求徹底擊潰中國，亦不失為一種辦法。」我看到這兒，以為這篇文章是從日本中央公論之類的刊物上翻譯過來的，然而不是，仔細看看作者筆名，澈頭澈尾的是中國人，但文章聲調瀟灑，尾是日本人的，而且是類似日本法西斯政客的口吻。

然而這並不是矛盾，人是中國人，如果在日本久了，很可能就沾上了日本的氣味。東北四省淪亡了十四年，他們不以為是「慘劇」，喪失了二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他們不以為是「慘劇」，二萬五千多萬人民當了亡國奴，他們不以為是「慘劇」，等到宰割我們的民族敵人無條件投降時，我們慶賀之不暇，他却大聲疾呼地說：「慘劇！慘劇！這還不夠，更進一步說：『慘絕千古』，痛惜之意，溢於言表。難道是叫敵人『澈底擊潰中國』，才算是喜劇嗎？」

否則，讀者就嘆氣地惋惜了：「庸材毀滅了日本」，如果日本有如論者這樣的「英才」，那怎麼辦呢？「能利用時機，執行其侵略政策，」這取之道，遵照英才的政略戰略，首先當然是「向中國全力進攻，以求澈底擊潰中國」；其次「當法國失敗，英倫三島危急之時，日本如劍及履及，侵略南洋羣島，亦可不費吹灰之力，而佔領完整之南洋。然後利用其物資，從事備戰。……並且日本這種成功，可以鼓勵德國向美倫進攻，美倫失陷，則美國即不能援俄。且英倫即令不失陷，然日本既與德國一戰，即東西夾擊蘇聯，自在意中。蘇聯於兩面作戰，其失敗殆不可免。蘇聯失敗，世界戰局因為德日之勝利，美國德奧奈何，中國孤軍奮鬥，亦不能挽回厄運。」

這是一派，中國滅亡，壽終正寢，英倫陷落，美國獨立，遺憾的是日本缺乏英才，「這種機會輕

去，羣面頓時沖出一股難以言狀的臭氣，噴鼻更更。外窩黑洞洞的，地上雜亂地鋪了一地的草，大概就是臨時的床鋪了。里窩里有四個大人和三個孩子，都聚集在炕上，四個大人就有兩個女的躺在炕上，生病，嘆息聲就是他們發出來的。剩下兩個大人，其中一個是瞎子，另一個雖然沒病，但身體的體態已到了最壞的程度。三個小孩一律圍在炕邊，混身泥黑，柔黃的臉上閃着兩隻沒有光芒的眼睛。見我和黃君進去，小孩子顯得恐懼，大人却表現得愛慕的恭敬和率直。我很奇怪，後來才知道，因為這受難人的災禍太多了，以為我們是敵人。當他們知道我們是八路軍時，大人和孩子都驚奇地圍攏來，連炕上的病人也吃力地翻過身來望望我們，儘管地說：

「你們可來了啊！」

「你看，鬼子把咱們村子踏成個什麼樣子了！」

我看見他們的眼眶里溢出了淚水，躺在炕上的

一個老太太說：

「我們一壞八口，走不動啊……」

「你們還有兩個人呢？」我看那裏只有七個人，便問他們。

「還有一個小子，五歲，叫狼吃了。」

全家人都沉入到深沈的悲哀里去了。

村子里除了他的這少許人以外，就沒有任何生物，沒有豬，沒有狗，連樹林的鳥也很少，一到夜裏便成羣結隊地窺進村來，先是貪婪地吃被敵人打死的屍體，吃完了，便窺進人家吃小孩，三個月來村里被狼吃去了三個小孩，他家的就是其中之一。

敵人統治不了這個地區，就殘酷地造成了這樣一個空前未有的無人區，把三十里一帶的村莊燒燬了歷史少有的死亡機械荒涼的大災難里。這就是敵人在中國建立的「東亞新秩序」。

這里地區離解放較近，政府已派人開始調查設法救濟了。

易放棄」，惟哉！

然而機會難得，「但德國侵蘇，蘇軍陷入苦戰，假使日本乘機由東方來攻，蘇聯難免失敗。當時美國雖可援蘇，但在美國援助發生效力時，蘇軍已不能支，蘇聯失敗，德日在西伯利亞會師，戰爭亦無德日勝利。」

這是一幅何等美妙的圖畫，可惜的是，只不過是一幅美妙的圖畫而已。但從此，「英才」的政客的政治戰略，是不難洞悉的，這就是：中國滅亡，蘇聯失敗，英倫陷落，美國孤立，德日勝利，希特勒之野心，廣田之原則，於焉告成！

此所謂「夢囈」是也。然而因此，小丑們反英美，反蘇，反人民的嘴臉，也暴露無遺了。

戰爭之勝敗，不在於少數的「英才」和「庸材」，要看他所進行的是什麼性質的戰爭，凡是為人民，為正義，為和平的戰爭必勝；如果所進行的是反人民的，為少數軍閥財閥謀利益的侵略戰爭，戰爭開始之日，即奠下失敗之基；縱然在戰爭初期，可能獲得致勝，那結局，也還是失敗，要末，便是無條件投降，日本就是一例。這命運，「英才」和「庸材」都不能挽回的。

即令「天皇」的孝子賢孫，英才輩出，「有一高瞻遠矚之政治家」，更有如論客這樣「英明的政略戰略」，我看，也還是無濟於事的。戰爭的性質，決定了失敗的命運。當希特勒席捲歐洲，東西兩面作戰，照法西斯的孝子賢孫看來，真所謂「固一世之雄也」，但是，曾幾何時，「而今安在哉！」日本雖然無條件投降，但我們並不「以易暴暴」，想讓亡國亡種，只要日本人民願意，根絕法西斯的形跡，建設民主的日本，增進為平等國家都可以。只有民主的日本，民主的中國，才有和平的遠東。

如果以為日本投降，天下太平，可以高枕無憂，而說：「有蘇聯謀慮之人，還恐怕日本在短期內恢復，向我復仇。我敢保證：日本在百年內，能作到三等國之地位……已屬非常困難，至於頭等強國，則絕對作不到。」這種說法，非特無益，而且有害，是麻痹自己，幫助敵人，就等於——

一個弱者被強者拳足交加，打得遍體鱗傷，弱者努力掙扎，起而抵抗，終於迫使強者俯首就降，然後他却對強者說：

「你剛才沒有打中我的要害，如果向我全力進攻，我早就死了。可惜你失去了機會，庸材誤了你，慘劇！」

這是亡國奴相。等到強者投降之後，就以爲完事大吉，不設法如何根絕強者侵略野心，而自我安慰，並且保證強者百年內不再強，更不會向我復仇；這正好讓他恢復元氣，下次再來給你致命的一擊。

這強敵人是退而與聽的，我們的疏忽和鬆懈，法西斯強權便有機會保存，借此機會，他又可以偷偷摸摸準備下次的侵略戰爭。我是屬於「深謀遠慮」派之一的，如果不根絕日本法西斯的形跡，建設民主的日本，我是既不敢相信百年內日本不「強」，更不敢保證不「向我復仇」，「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第一次大戰後的德國，何消百年，二十年後，不是又發動了第二次大戰？

再看看，最近的事實，日本不是故意拖延投降時日，企圖保存實力，陰謀分化中國內部團結，離間英美蘇，想捲下第三次大戰的種種嗎？

戰爭雖然勝利，法西斯思想尚待肅清，在戰敗國內，固然要徹底根絕，在新的地方，也不允許存在法西斯細菌的溫床。在中國不是有人在痛惜日本投降如喪考妣，在高呼「慘絕千古」嗎？

一九四五，八，二十三。

我們走出來，黃昏一連聲地嘆息，我知道這嘆息聲是飽含着無限的憤恨和忿怒。

我們走到村後，在一溜荒蕪了的梯田那兒，用石子磚頭一層層疊得齊整的梯田正面，有一個地方，打了一個洞口，那兒露出一個女人的臉，披著錯亂的長髮，遮去了半個臉子，從披亂的頭髮當中露出兩隻可怕的眼光，在注視我們。我有兩寸石密的經驗，就高聲告訴她：

「不要怕，我們是八路軍。」

她果然不怕了。她手裏拿着一個小筐子，筐下面埋藏了兩個罐子，裏面是土豆和棒子她揀了半筐子玉米和土豆，旋即將罐子封好，慢慢從小洞口那兒走出來，迅速地又用磚頭石塊壘好，竟然看不出來裏面藏著東西。她的衣服原來就很破舊，從洞裏出來，更帶了一身的泥土。她有氣無力地說：

「不藏起來，鬼子要殺的啊！」

鬼子把人民逼到怎樣的田地啊！

到了月亮上升的時候，才輪到我們做飯，什麼菜也買不到，幸好我們每個人身上都帶了鹽，做了一點鹽開水，這菜，把兩碗小米飯送下肚去。

夜晚，我們加了崗哨。

我們集中在露天的一塊平地上睡，牲口也放在身邊。兩頭各有雙崗，防備狼的襲擊。

果然，不一會，山下便傳來狼的嗥叫聲，攔人心魄地在山村里蕩漾着。放哨的手里都有木棍子，見狼遠遠在月光下走來，便嘩嘩地走過去，搖晃着棍子，狼這才遠去了。

這一晚，我們沒有很好的睡，第二天起來，也沒吃早飯，便出發了。準備進入解放區再休息做飯吃。

沿途，我們一直在打聽部隊機關住在什麼地方，但是沒一個人肯告訴我們，（後來才知道是保守秘密。）可是對我們很客氣。人也多了起來，田野里，村莊里，都充滿着欣欣向榮的景象。我們碰到有人我們的階級，並且碰到服裝整齊的少數正規軍，我們知道，已進入解放區。

走了八十五里地，我們到了孟平縣的郝家莊。

（未完）

內政部發重新登記證警字第陸捌陸伍號
 東川郵政管理局第六七〇號登記執照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刻涵彥

社作合生衛

羣衆

第十卷 第十七期

三十四年九月十日出版

編輯者 羣衆雜誌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總經售 新華日報館

本刊價目

本期零售	六十元
六期	三百六十元
十二期	六百五十元
廿四期	一千二百二十元
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照加

本期零售六十元

羊群衆

第十卷 第十八期

要

論文化界的「拒檢運動」(社論)

新時代的輪廓

論中蘇條約產生的背景及其意義

目前局勢和今後任務

目

美國共產黨反對修正主義的教訓

如何處置漢奸資本

「民主」人

于懷

懷湘

美共中央決議

解放日報

韋中梁

洪深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論文化界的「拒檢運動」(古魯)

新時代的輪廓

論中蘇條約產生的背景及其意義

如何處置漢奸資本

美國共產黨反對修正主義的教訓

「民主」人

目前局勢和今後任務

世界職工大會的籌備工作

論科學預見(上)

問題討論

嚴懲漢奸與和平建國

排除民族的渣滓

晉察冀行進

租佃制度的調查研究

原子彈二題

極權主義的白日夢

復古論者的新裝

文 雜

(六三〇)

于 懷 (六三一)

懷 湘 (六三三)

章中梁 (六四〇)

解放日報 (六四三)

洪 深 (六四五)

美共中央決議 (六五一)

M·塔拉索夫
以 沛 譯 (六五六)

華西里也夫作
凱 豐 譯 (六五八)

公 敬 (六六五)

辛 固 (六六八)

周而復 (六七一)

怡 然 (六七六)

黎 望

(六六九)

(六七〇)



社論 論文化界的「拒檢運動」

重慶十六個雜誌社（中山文化教育季刊、東方雜誌、憲政月刊、中學生、現代婦女等）在九月初集議自即日起，不再把原稿再送檢査，這個舉動立即得到成都文化界的響應。成都十七個報紙、雜誌、通訊社也跟著決定了實行自檢停止送檢的辦法，接續渝蓉兩地其他雜誌和別的地方，也紛紛起而參加「拒檢運動」。許多大報對於報界一向也有檢査制度，現在這些報也開始停止送檢了。這個文化界中的拒檢運動又影響到了別的方面，工商業所組之四川復興協進會在九月十三日開會，決議中有一項說：「號召所有各界，響應新聞雜誌出版業自動停止送檢運動，對於一切戰時統制法規、捐稅、攤派，自動予以廢止」。

這是一個意義重大的民間運動。抗戰期間，在戰爭的藉口下，人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都蒙受了種種不合理的限制和束縛。其實中國的抗戰是一個民族解放戰爭，應該廣泛動員人民，使人民普遍地自動自願地參加戰爭。一切戰時的統制辦法在政治上只是造成了民意壅塞、民氣漸條的現象，在文化上只是造成了這八年來中國的文化思想教育的停頓甚至倒退的結果；在經濟上更使民營企業破產，生產極度萎縮，而工商大業陷於無限貧困狀態中。這種種限制、統治在戰時本已不合理，到了戰爭既已停止時，自然更沒有繼續保留的任何理由。國民政府在九月三日曾有命令說：「所有在抗戰期中頒佈之各種戰時法令，着各主管部會立即分別檢討，加以整理，其有未合平時規範者，得先申請廢止，以期符合約法之精神，而作實施憲政之準備。」但是自從這命令頒佈以後，已二十日，我們還并未聞當局正式宣佈廢止任何一種戰時的統制法令。

九月十一日當局頒佈國民政府中常會通過的「管理收復區報紙、通訊社、雜誌、電影、廣播事業暫行辦法」，其中有一項說在收復區內仍照實施「非常時期報紙通訊社管理辦法」，但到了十三日中央社發表更正說這條文應改為「依實際情形另定限制辦法」。查所謂「非常時期報紙通訊社管理辦法」是在民國三十二年公佈施行，完全是一種嚴格限制民間輿論的辦法，現在倘拿來行在收復區中，自然是極不合理的。譬如其中有一條說，「在人口五十萬以上之省政府或市政府所在地及其近郊地區，以報社五家，通訊社三家為原則，逾額得限制增設」，要是照這條文來做，那麼新收復的平津滬漢各地也都只能限制到五家報社了，誰都知道，假如這樣做，那是異常荒唐的，因為這些城市無論在戰前或在戰爭中為敵佔統治期間，向來都是有一二十家報紙的。現在在國民政府當局新訂的規章中雖已自動取消了實施非常時期管制辦法的明文，但這種管制辦法是否徹底廢除，仍未明白宣告。舉此一例，就可

知道，戰時對文化出版的統制，除了檢査制度外，還有許多不合理的法令規定等等，都是應該立即廢除的。其他有關於人民自由的，如「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綱領」、「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以及其他限制人民的結社集會的法令等，有關工商業的，如食鹽、茶類的專賣條例，生絲羊毛的統購統銷的辦法，煤炭、土鐵的管理辦法，以至對技工人員的管制辦法，——這些也都是不應再繼續存在的了。工商業和一般人民，多年來忍受種種捐稅和攤派，雖明知其中有許多是不合理的，但因為戰時的大帽子，也就被壓得一聲大氣也不敢出。現在要再不讓人民說話是已不可能的了。

政府當局在這個抗戰結束，建國開始的關頭，應該有決心，有毅力對於一切應與應革之事，斷然執行，把舊中國的一切壞現象澈底肅清，走向民主新中國的建立。但是這一切依賴政府當局是不行的。我們常說，這是人民的責任，那麼人民就應該負起責任，對於政府盡其提議、督促、協助之力。我們重視各地文化出版界的自發拒檢運動和工商業的響應，這就因為這表示了中國人民已經開始積極地從實際上努力於推動國家的進步和民主化了。要知道，中國在戰後假如還保留着一切不合理的戰時統制辦法，那是中國的恥辱，也是全體人民的恥辱。人民自動起來，以行動表示態度，促成改變，這是人民的不可推諉的責任，也是神聖的權利。

我們重視這件事，又因為這里表現着一種對於法治的新觀念的建立。人們常說，民主必須行法治，這話是可以說的，但問題是對於法治究如何了，假如按照封建專制時代的傳統觀念，以為法是上面規定好了，下面無條件地遵從，那麼這所謂法治與民主毫無一點相通之處。民主的法是應該是由人民的同意而決定，並且人民有權加以改變或廢止的。這就是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人民要有創制權和複決權，該看中山先生是怎樣說的，他說：

「人民要有什麼權，才可以管理法律呢？如果大家看到了一種法律，以為是很有利於人民的，便要有一種權，自己決定出來，交到政府去執行，關於這種權，叫做創制權。若是大家看到了從前的舊法律，以為是很不利於人民的，便要有一種權，自己去修改，修改好了之後，便要政府去執行修改的舊法律，廢止從前的舊法律，關於這種權，叫做複決權。」（民權主義第六講）

所以假如以為人民自動取消不合理的法令，是「與法無據」的事，那麼就應該讀一讀孫中山先生的話。人民應該改變過去的不問是非，只管守舊的態度，主動地執行創制權和複決權；政府當局也應該尊重人民意見，根據人民的表示而決定法令的存廢和改革。那麼中國才能成爲一個真正的民主的法治的國家。



新時代的輪廓

于懷

由於日本的投降，我們堅持了八年的抗日戰爭勝利地結束了，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全面地結束了。

一個新的時代降臨了；過去了的是對法西斯侵略者的戰爭，到來的應該是民主進步的和平；我們目前正站在這和平建設的新時代的門口。

由於對日戰爭結束的突然性及由此而產生的一連串的事件，不少人對於這正在到來的新時代不禁有些茫然，這種茫然的感覺或者是不可避免的，但並不是健康的。

我們有一看這新時代的眞面目的必要。

首先，從全世界方面說，這一次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使這世界起了怎樣重大而深遠的變化呢？這些變化對於我們有什麼意義呢？

第一、由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結束，法西斯的暴政、奴役、與侵略在全世界的規模上消滅了。這就造成了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和平發展的先決條件。

自然，這不是說，所有全世界的法西斯政權及其最後形跡都消滅了。不，如所周知，歐洲還有西班牙……，美洲還有阿根廷……，德國和日本法西斯政權的最後形跡都還沒有消滅；但從整個世界的規模看，法西斯主義的滅亡是已經確定了的，雖然肅清法西斯的殘餘還需要堅持的與嚴酷的鬥爭。

第二、由於德日法西斯帝國主義的毀滅，直接地受着它們威脅的歐亞兩洲的民族自由了，這就形成了新民主主義在許多國家中發展與勝利的起點。

這不是說，現在已不再有人企圖運用各種方式來保存、復活以至代替德日帝國主義者過去的地位了。不，作如此企圖者，還大有人在，但那企圖在覺醒了的和組織了的人民力量之前是到底不能成功的，雖然這一鬥爭將是非常曲折和迂迴。

第三、由於德日法西斯的毀滅，歐亞兩洲的這兩個直接威脅蘇聯安全的中堅力量是消滅了。這就保障了全世界第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的安全；並在反法西斯戰爭的過程中，使得全世界的政治形勢發生了一個基本的變化。蘇

過了這次戰爭，蘇聯已經變成了世界性的三大國列強之一，要決定任何一個重大的世界問題而沒有蘇聯參加的時代已無過去了。

自然，這不是說現在已經沒有人企圖公開蔑視蘇聯的存在從而至陰謀反對蘇聯的人了，不，這的人還很多，但他們的力量在全世界的範圍內究竟是何種了。

第四、由於德日法西斯帝國主義的毀滅，反動的獨占資本受到了世界性的打擊；反動的獨占資本在世界的統治力量是嚴重地和決定地削弱了。

但這並不是說，獨占資本在這次戰爭中不會在某些國家中獲得相當大的發展，但在世界規模上，那發展是充滿了深刻的矛盾，而且究竟不能補償它因德日帝國主義的失敗而遭受的嚴重的打擊的。

一般的說，這就是中國人民今天所遇到的世界新形勢。必須進一步指出這有利條件在遠東出現的具體面貌，遠東有些什麼改變呢？

首先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毀滅。不少人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部體制沒有在戰爭中受到普遍的毀滅的打擊，它在中國大陸所建立起來的吉爾林秩序很大的一部份，還是原封未動，從而擔心着日本這樣的投降是不是會幫助它在中國所發達的吉爾林，造成混亂，把中國拉回到戰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中去。

這種警惕是應該有的。但不加否認，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對於中國人民解放運動的偉大意義。一百年來中國人民的身上就背負着兩重任務！一反帝和反封建，五十年來所謂反帝的中心任務實際上就是反日，而如今日本帝國主義終於打垮了，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所小心翼翼保存着的封建的反動力量可隨由於戰爭結束的突然性，在混水中保存了若干力量，但失敗終究是失敗，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在長遠的宏觀上却是嚴重地打擊了中國的倒運力量。沒有日本帝國主義或明或暗的支持，五十年來中國的反動力量是不可能保持着如此強固的地位的。

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增台，遠東的局勢日益趨於動盪了；在過渡期中，由於蘇聯的強大及其參加遠東戰爭，一個新的進步力量進遠東的政治舞台來了，這一舞台大轉換的意義是不會估計得過高的。英美有一些評論家把中蘇同盟條約的意義估計得與日本投降相等，這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

這就是說：從此以後，遠東任何重大問題解決可以沒有蘇聯參加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蘇聯對遠東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發言權。所有這一些都包含在中蘇同盟的條約裡。有些人看見了中蘇條約有不干涉內政一條，就誤認為中蘇同盟條約對於中國民主運動的意義是消極的。事實怎樣呢？一百多年來，除了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時期與抗戰時期曾經得到過外國的援助以外，中國人民的民主運動一直是依靠自力更生來進行，中蘇條約在這一方面並未減少任何毫末；相反，中國人民所受外國反動派的干涉，由於中蘇條約的簽訂，却多少要受到影響，從而使中國民族的完全獨立得到幫助。

對於中國民族獨立平等的另一有利條件，就是在這次廢除舊約，英美對於中國的關係，最低限度在法律上，是變壞了，這在一九四三年，英美同盟國家已宣佈了廢除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中英美在法律上已建立了平等地位了。

自然，這不是說：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覆滅，中蘇條約的簽訂，以及中英美不平等條約的廢除，中國在國際上平等的地位已經變成現實了。不，還沒有，要把這平等獨立的地位使法律條文變成事實，一方面主要地要看我們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要看英美盟邦今後對於中國的具體政策。不是沒有少數個別的反動集團想藉身一變去代替日本帝國主義的地位，但鑒於上述各種情況的變化，特別是中蘇同盟的簽訂，這企圖是不可能順利地加以實現的。

概括的說，這就是中國人民在今天所遇到的遠東新形勢。

戰爭改變了世界，也改變了中國。

戰後的中國是一個什麼面目決定於戰爭究竟是怎樣進行過來的。在這種時候，我們首先不能不指出那在戰爭的全過程抗擊着敵寇始終佔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中國人民力量所成長。那就是：地區遍及十九省，人口幾及一萬萬以上

的中國解放區，它的民選政權，它的抗日部隊。

在戰爭中它曾經是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中堅，在和平時它是爭取民主進步在全中國實現的標桿。有不少好心的，因為看不到這力量發展到所有的淪陷區，致使今日名目上投了降的敵偽還高踞在中國人民的頭上而悲觀；他們忽視了，這力量在區域上雖然不是全國的；但在性質上，它是全國性的力量。有些人想以復員之名否定這一新的力量存在的事實；他們忽視了，不僅是假借什麼名義，人民在戰爭中已經獲得的基本權利是絕不允許喪失的。鬥爭是複雜的，艱苦的，迂迴的，曲折的；但誰與否定這一力量和這力量在中國和平民主團結事業中的標桿作用？是到底不能成功的。

八年來中國人民的鬥爭不但已凝結了一支爭取新民主主義進步在全中國實現的強有力的標桿，而且解決了幾百年來中國所未能解決的實際問題：不僅解放區的力量是新中國進步的標桿，而且解放區的經驗和教訓是新中國發展的指針，這指針是解決面對着全中國所有一切的重大的問題——這裡面包含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的重大問題。

戰爭改變了中國，戰爭教育了中國的人民，假使沒有這八年抗戰的經驗和教訓，中國人民是絕不會這樣看清楚抗戰陣營中如此不同兩個側面的：一方面流血和創傷，一方面是盆湯和酒館（塔希托斯）這一句歷史家的名言，八年抗戰中中國人民不是已在全國的規模上看清楚了嗎？只有親歷這一難未死去的事實，我們才能了解為什麼在那樣艱難的環境下，大後方的民主運動有那樣蓬勃而深闊的發展。中國的人民覺醒了。有人看見日本的突然投降，懷疑到這一切那的轉換是不是會模糊了人民的記憶；有些人是會懷疑的，但痛定思痛，實際的問題接踵而來的時候，問題的本質是終於會呈現出來的，人民終於是覺醒了。

戰爭結束了，有些人想借復員之名，行復原之實。不可忽視：這一股復原的力量是相當強大的力量，戰勝它需要長期而複雜的鬥爭；但中國究竟是不能復原的，國際的條件變了，國內的關係變了；以上述的標桿，指針和覺醒作基礎，在不倦的鬥爭中，中國人民是一定能把握戰後的中國帶上和平民主團結的大路的。



論中蘇條約產生的背景及其意義

懷湘

八月十四日，中蘇兩國三十年友好同盟條約在莫斯科簽字，八月二十五日由中蘇兩國政府批准，正式公佈。這是在中國和在遠東國際關係中一件空前的大事：第一、這是中國對外訂立的第一個友好同盟條約；第二、這不是為了取消一個不平等條約而訂立的條約，而是中國第一次真正以平等地位與他國訂立的同盟；第三、這不是一紙空洞的友好條約，而是有實際的價值，以及好互助的精神，平等合作的方法，具體而有效的保證兩國安全，鞏固遠東和平，維持世界的和平與安全。這是在中國和在遠東的外交關係上劃時代的一件歷史大事。

這條約的訂立，毫無疑問，是用來保證徹底消滅遠東侵略禍首的日本法西斯的，是用來加強中蘇兩國戰時與戰後的合作，以防止日本法西斯的死灰復燃和再起侵略的，是用來加強一切愛好和平國家的團結合作，以防止世界第三次大戰爆發，維持世界和平安全的。

但是由於這條約深刻而廣泛的影響，它在各方面造成了各式各樣的複雜反應：這條約對於中國人民以及全世界愛好和平國家的人民，是一個與東與世界和平的有力保證，所以全中國以及全世界人民，是熱誠的歡迎和擁護這條約的；這條約對於中國以及世界有遠見的政治家，是一個團結中美蘇英主要聯合國以防止侵略再起的新的因素，所以一切有遠見的政治家，對於這條約，表示着信心和讚揚；但是這條約對於日本法西斯以及一切侵略主義者、吉斯特份子、被法西斯宣傳腐敗的人們，却是巨大的打擊，它使得日

本法西斯及其同盟者破壞和平的陰謀不能得逞，它使得日本法西斯及其同盟者失去離開中美蘇英團結合作的機會，它使得日本法西斯埋藏實力，陰謀復興的企圖，受到意外的有力的阻礙。所以日本法西斯以及一切侵略主義者、吉斯特份子，對於這個條約或其如簧之舌，盡一切曲解污蔑挑撥破壞之能事。

日本法西斯及其同盟者與曲解中蘇同盟條約，企圖造成混亂的印象，是不足為怪的，重要的是許多不能徹底瞭解這條約意義的人們，有這個條約公佈出來的時候，曾一時感覺迷惑，不得要領的說出許多有害於中蘇兩國以至同盟團結合作的謬論。

這些錯誤的意見大抵是從兩種誤解來的：一是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只看成中蘇兩國之間的一個孤立的「交換」，認為條約的某些內容是蘇聯的「給與」，條約的另一些內容是中國的一付與。二是忽視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主要內容及其作用，只看到條約的附件與照會，斤斤於所得與所失之爭。

前一種看法是不對的，因為條約的主文已經說得明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重要目標——對日作戰徹底打敗日本法西斯，防止日本侵略者再起和加強兩國戰後合作，堅持合作的志願以維持世界和平——而訂立的條約，這是兩個國家對整個遠東以及世界的和平利益而努力的一種互助與合作，決不是兩國之間的單獨「交換」行為；後一種看法也是不對的。條約的主文是條約的基礎，是條約的目的與原則，附件與照會不過是實現這些目的與原則的手段而已。我們要真正認識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意義，必須從條約的本身及其產生條件的總合作起。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是在一個重要的時機和一種新的世界形勢之下產生的。

一個重要的時機：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瀕於崩潰，但不是徹底的消滅。

我們知道，中蘇條約的談判開始於今年七月，但由於波茨坦舉行美英蘇三強領袖會議，使中蘇談判中斷了若干時日，直到八月七日宋子文王世杰氏飛到莫斯科，繼續進行條約的具體談判。其時，蘇聯於八月八日對日宣戰，十日，日本侵略者向聯合國提出請求投降的牒文，十一日，美國政府代表四大強國答覆日本的投降請求，日本却遲遲不覆，拖延到八月十四日纔決定投降。這時機正是一個異常重大的時機：一方面是日本帝國主義拖延投降的期間，表明了日本的投降並無誠意，表明了日本侵略者的內部對投降還有爭爭不決的趨勢，表明了戰爭還有繼續的可能，尤其重要的是表明了日本帝國主義者正在利用拖延的時間，埋藏或轉移侵略的力量，佈置死灰復燃的陰謀。因此這是一個異常重大而且異常嚴重的時機。——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遠東戰爭到了一個決定的時刻：繼續或者是終結，不徹底的解決敵人繼續底時解決敵人。在這樣一個重要的關頭，而同盟國方面事先却顯然是沒有充分準備的，首先是軍事上，由於蘇聯的參加戰爭，許多同盟國作戰的工作並沒有具體的規定和計劃；其次是在政治上，雖然有開羅會議宣言

——波茨坦中英美三國聯合公告作為政治的基礎，蘇聯參戰首先就宣佈了參加中英美七月二十六日聯合公告，但是許多具體而必要解決的問題，例如如何徹底懲治日本戰爭罪犯，如何管制和佔領投降以後的日本，如何徹底消滅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日本侵略勢力，如何建立一個民主的日本，如何造成同盟國各國的防禦堡壘，以防止日本的侵略再起，如何加強同盟國在遠東的團結合作——這一類問題，主要同盟國中與蘇英，是事先不可能而臨事又來不及取得具體準備的。一如大家所知道的，歐洲戰爭的結束過程，是經過了德蘇盟會到克里米亞會議一長串的準備階段的，在這些準備階段中，許多具體問題，包括了全部歐洲範圍以內的複雜問題，蘇美英三國都已經得到了確定的協議，作為進行作戰的基礎。即使是有了這樣一個細密而確定的基礎，然而在此進行的當中，還是經過許多曲折的道路。但易在遠東，一直臨到戰爭爆發而後才開始，而主要的同盟國，事實上並沒有完成這樣一個政治的

準備。因此這是一個異常重大而且異常嚴重的時機。這是一個決定遠東戰爭與和平的時機，這是一個決定遠東以至世界和平的程度與和平的久暫的時機。

同樣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是產生於一個新的世界形勢和特殊的遠東局勢之下。

新的世界形勢，是主要的三個法西斯侵略國家，兩個（德意）已經完全被打倒了，剩下的一個也快要倒下來了。從一九三一年日本法西斯在遠東開始侵略，整個世界就進入戰爭的威脅之下，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正式揭幕，一九三九年歐洲戰爭爆發，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在東歐進攻蘇聯，日本在太平洋進攻英美，全世界從此就沒有了一個區域不捲入戰爭的慘禍之中；這血肉橫飛的戰爭，到今年八月，從遠東來說，已經進行了整整八年了，從世界範圍來說已經進行了整整六年了。到了今天，到了三個主要的法西斯侵略國家都已經倒下的時候，這殘滿目的世界，已經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願意繼續進行殘酷的戰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不熱切地希望和平，要求和平。

這是一個普遍於全世界的要求，也就是世界的一個新形勢。

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另一種形勢，就是法西斯被打倒了，却並不等於法西斯的消滅，法西斯的餘孽和侵略思想，還殘留在世界各地陰謀活動，尤其是在遠東，是在剛剛倒下的日本；更不能忽視，世界規模的團結，雖已經在戰爭時期建立了基礎，但是贏得了戰爭並不等於贏得了和平，而和平的道路並不是一條沒有阻礙的康莊大道。如果說戰爭需要同盟國的團結合作，和平就更要同盟國的團結合作。這種團結合作，在世界的和平上需要加強，在遠東的和平上尤其需要加強。因為遠東是在一個同盟作戰剛告完成的時機，因為遠東的法西斯比歐洲的納粹更狡猾，因為中國是遠東同盟國團結合作的一個基礎，而中國更需要加強它本身的關係。作為遠東各國團結的基礎。

在這樣重大的時機和這樣一個世界和遠東的新形勢之下，應在中國和蘇聯——遠東最大的和最主要的兩個國家面前，有三大緊急的任務：

- 一、徹底消滅日本法西斯，防止它的再起。
 - 二、鞏固同盟國在遠東的團結合作。
 - 三、中國國內必須鞏固民主團結。
- 如何來實現這三大任務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就是實現這三大任務

這是一項建議。

這建議全部包含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主文之中。為什麼要訂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呢？在條約的序言中說得明白：「是為了中蘇兩國「同盟及戰後合作」，加強中蘇兩國間的「友好關係」；是為了「共同對日作戰中彼此合作，以迄日本無條件投降為止」；是為了「兩國及一切愛好和平國家人民之利益，表示其堅定不移之合作志願。」

實現三國目標的具體方法，規定於條文之中。條文一共是八條，但是與同盟有直接關係的是從第一到第七條。其內容是：

一、協同其他聯合國對日作戰。——這是為了打敗日本法西斯。
二、「不與日本單獨談判」——這是為了防止日寇的妥協陰謀及不徹底

的和平。
三、戰後採取一切可能之措施，「使日本無再事侵略及破壞和平之可能。」——這是為了防止日本法西斯的再起。

四、「不締結反對對方之任何同盟」。——這是為了保證遠東以至世界和平團結。

五、「對維護主權及領土完整與不干涉對方內政」，——這是為了雙方友好合作，也是為了加強遠東以至世界的和平團結。

六、經濟互助。
七、「對聯合國組織會員之權利及義務」不受本條約的影響。——這是為了區域安全與集體安全的配合，團結整個聯合國共同維持和平。

這七項條文的內容，歸納起來，是三個中心：第一條到第三條，是一個中心，是為了徹底消滅和防止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和再起；第四條是一個中心，是為了保證遠東的和平，也就是世界的和平，第五條是一個中心，是為了保證中國內部的和平民主團結。第四第五和第七條這三條，總合起來也同時是為了對整個聯合國「表示其堅定不移之合作志願。」

簡單而明白的說：為什麼要有第一個中心呢？因為日本法西斯運動現在並沒有徹底消滅，它存在一天，遠東以至世界的和平就一天受威脅，為什麼要有第二個中心呢？因為和平的道路還不是平坦的，還存在着許多足以發生危險的阻礙。為什麼要有第三個中心呢？因為中國是遠東和平的基礎，中國沒有和平，遠東和世界也就不可能和平。

如果不能够真正認識這三個中心的具體內容，就不可能真正認識中蘇友

同盟條約的偉大意義和它對遠東與世界和平的偉大貢獻。因此在這一個問題上，我們還要進一步加以討論。

三

世界和平的道路還不是平坦的，在遠東的範圍內，至少還存在着幾個巨大的障礙石，要等待中國、蘇聯和一切愛好和平國家的人民來拔除。

第一個障礙石就是日本法西斯的存在。

日本法西斯打敗了，但是這並不等於日本法西斯的消滅；日本要求投降了，但是這並不等於日本法西斯放棄了侵略主義，放棄了危害和平的陰謀。我們只要看一看從八月十日日本提出投降要求以來，一個月內的事實發展，就可以瞭然於日本帝國主義者死灰復燃的企圖，是遠東和平怎樣一個可怕的威脅。

日本法西斯——日本的侵略禍首是至今還安然無恙的，從八月十日投降到九月二日簽訂降書，這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他們不但說得很多，也同時做得很多，從言語到行動，都表明了一個可怕的事實：日本法西斯在組織上的失敗，在準備它的再起。

首先是在在精神上不悔禍，不承認戰敗，從日皇的敕書，東久通的事務和演說，重光葵的談話，一直到日本朝野人士的言論中，從頭到尾沒有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句話是承認日本的侵略戰爭失敗的，沒有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句話是表示日本對發動侵略戰爭的悔禍之意的。他們衆口一詞，只認為這是「停止作戰」，認為停戰是由於日皇的「仁慈心腸」(東久通文告)，而不是由於戰敗；認為他們所進行的戰爭是「解放東亞」或「保證日本的自衛及東亞的安定」。並沒有想到妨害其他國家的主權或擴展領土(八月十五日日皇廣播救書)，並不承認這是一個發動侵略破壞和平的戰爭罪行。其次是行動上，除開阿南惟幾和其他少數人的剖腹自殺以外，其他的罪惡禍首，至今沒有一個人是認罪自殺的。這不是一件小事，這是與日本的傳統武士道精神完全不符的現象。這些侵略禍首為什麼不自殺，他們不怕盟國的懲罰嗎？他們對於戰敗之後，使日本從天落到人民受到空前的「委屈」，毫無愧作之心嗎？然而他們不自殺，這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不自殺，是他們不承認錯誤，不自殺，是爲了準備復仇，從他們切腹的遺書可致，而且立即停止切腹，足以證明這是他們共同一致商定的有計劃的行兇。

莫不是日本法西斯在這時期的一場偽裝，他們偽裝和平，投降以後就口口聲聲切實履行波茨坦無條件投降的條款；投降以後從佔領區到日本本土都伏伏貼貼，盡可能不發生任何一件意外事件；投降以後，重光葵就散播「日本人民早就在波茨坦宣言提出時，希望早停戰者大有人在」的妖言鬼話，而他是「二十年來，一直是堅信日本與中國及其他國家相安共處」(九月一日重光葵談話)的。日本法西斯不但偽裝和平，也偽裝民主。重光葵九月一日向中國記者談話，除開狂吹日本的愛好和平，就是狂吹日本「會有民主化之生活」。在這時期日本法西斯組織了內閣，但仍舊是換來一批戰爭罪犯；他們表面上解散了日本法西斯組織的「在鄉軍人會」，但這些份子仍舊是好好組織之下的；他們解散了法西斯政黨的大日本政治會，這些法西斯黨徒又換上「黨團」，準備化整為零，組織四個或更多的新政黨；他們召集了臨時議會，還請會以「神風」全體放棄，而不准任何個人發表戰敗責任的質問。

日本法西斯這一套和平與民主的偽裝是為了一個目的，騙取盟國的同情，取得寬大的待遇；是為了一個手段，掩蓋他組織失敗、佈置死灰復燃的陰謀。

他佈置了嗎？在佈置着，而且佈置得極順利。從八月十日日本請求投降，遲延復還延，一直延宕到九月二日纔正式簽訂降書；從八月二十七八美軍開始在日本本土登陸，遲延復還延，一直延宕到九月九日美軍纔開進東京，而且僅僅前進東京，日本的其他各地，至今還是「禁止旅行」的，美軍的行動也是按東得東，據日本政府說，這是為了免得發生意外。

一個戰敗的國家為什麼有這麼多延宕？沒有問題，日本法西斯是在利用這延宕的時間，佈置着一切復興工作。日本新首相東久邇宮登台之後，向全國發表的第一個文告，就是：「由於戰爭的結束，一切軍事和工業行將復原。我政府當局竭力保證國家的安全，並採取必要措施，使日本的重建是斷不容緩的。」東京廣播也立即出了森野教授的演說，大喊：「戰爭對於日本是一種真正的洗禮，我們現在必須從新的基礎上開始。」他們還個「重建」，這個「從新的基礎上開始」，包含了什麼一些項目呢？合衆社替他們開了一個賬單：

- 建設一切可能的重型軍備到深海的井欄及密內。
- 儘可能最大範圍解散正規軍、後備役，這樣使盟軍在日本本土只能找到少數正規軍。

- 把過去集中的日本兵工廠中儘可能大量的五金分給國內人民，對盟軍沒收原料。
- 迅速地使重工業轉成輕工業。
- 迅速解散一個政府而分成四個新黨。
- 迅速撤除沿岸工業，嚴防島上僑民，惟恐盟軍沒收沿岸及島上巨型大砲。
- 大皇與日本政府竭力規勸人民保持遵守波茨坦宣言，以使盟軍佔領期間達到儘可能最緩程度。
- 自主要城市分散人民到小的區域，惟恐盟軍統帥命令壯年人從事勞動。
- 急速組織地下組織，準備將來行動。
- 有系統地有計劃地策劃第三次世界大戰，使日本重新成爲世界強國。

不僅如此，而且迄今爲止，日本法西斯還保全了一個完整的政府機構，來執行這一套埋藏和佈置的工作，日皇口中的一帝國機構，東京港口中的「國體」與「政體」，正是執行這一套計劃的機構。盟國接受日本投降(八月十一日)後的一星期，東京每日新聞竟不自然，接捺不住的說出來了：「我們已經保持了一件珍貴的事物；就是我們那建築在皇上的國家機構。」這個機構有什麼好處呢？他說，「過去的歷史指明，種族的或國家的災難，仍然可以引導這個種族或國家走入勝利之路，並帶來新生，可以復興。」

日本法西斯這一套安排，可無疑問，對於遠東的未來和平是一個不可估計的威脅。但是它的危險還不僅僅是在日本法西斯陰謀佈置的一方面，而且是在容許他這種陰謀活動的另一方面。

首先是在太平洋中發了敵人的盟軍，對於日本法西斯，在思想上愛護如友的寬容；寬容到紳士國家的士兵「對於敵人的日人頗有，不採取嚴峻行動的命令，認爲殊屬不解。」(美國廣播公司廣播六月廣播)；寬容到日本本土的佔領軍，只是在日本政府同意之下逐步佔領；寬容到許多從東京從中國收復區拍回來的官方電報和寄回來的通訊，滿紙憤涼，說日本人「感念德華」，說日本人「嚼磨長嘆」，說日本人「衣裝襤褸」，說日本人「莊重偉並非僑倖」，「顯具堅決真摯性格」。這些說不完的人聽聞的措辭，一而再再而三，是寬容到同情和愛護日本法西斯。這真不能不使我們想到，公開稱頌日本人爲「我們的忠實朋友」(杜曼)，還不能算是最高的寬容。當重光葵在東京高談「日本必須與中國及其他國家相安共處」的時候，在上海復刊的官報，就已經在大唱「自日本投降以來，中日兩國已成兄弟之邦」了(正言報社論)。

有什麼思想，沒有什麼行動。在行動上，允許一個不用任何解釋就可以斷定是日本法西斯組織的政府機構繼續存在，這不算寬容日本的主要的職

等罪案，絕大部份至今還毫無恙，還不算；允許日本本土日軍的完全撤除，更等到三個月以後，還不算；允許「把已經解散的日本軍事警察警隊隊員，輔助東京和橫濱兩區的漢軍」，來維持日本的秩序，還不算；收編一切的偽軍，任用許多著名的吉田林份子，來鎮壓人民，維持日本人的秩序，還不算。據八月二十二日同盟社廣播東京朝日新聞的消息說：

「東京朝日新聞今日發表全國人民說：從美軍當局對日本投降使節的態度以及麥克阿瑟總司令部所提關於佔領軍登陸日本的規定條件這兩點來看，美國是將以諒解的態度來對待日本的。第一，馬尼刺會議時，美方代表並沒有輕視日本使節，而以公平和對等的態度來對待他們。第二，關於佔領軍在日本本土登陸的規定，若干軍事當局容許日使詳細解釋日本國內實際情形，提出合理的登陸辦法。第三，關於實施波茨坦宣言各條款，美國的政體似承認日本政府及大本營（按：九月十日麥克阿瑟已下令取消日本大本營）的主權，並且準備利用後者來實行宣言中的條款。第四，日軍撤出的各區和平與秩序，由日本警察及憲兵維持。——這幾點都是與盟國對待德國不同的地方。」

這是日本法西斯最大的希望，不能完全據為事實。但是九月七日路透社倫敦電訊，却部分地證實了上面的報告不是無用的：

「外相重光今日向報界說：盟國將不在日本設立軍政府，……重光聲明：盟國很明確地信任日本政府於投降後所採取的行動。」

我們自然不能說同盟國對於日本的管制和佔領，將到此為止，不再有任何的發展，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從日本投降，直到如今，這一切事實的發展，已經是一個嚴重的局勢。它至少可能產生這樣個危險的結局：

- 一、日本法西斯依然存在，無法徹底撲滅。
- 二、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陰謀繼續活動，以至再發展成爲遠東與世界的和平威脅。
- 三、一個真正的民主的日本，在現狀之下無論如何是產生不出來的。

八月二十五日美國廣播公司評論員史溫，替這盟軍對日本法西斯的政策，作了一個恰當的預言，他說：「日本投降與德國投降，基本上就有差別：德國失敗後，並沒有保留下政府，我相信戰敗國家是不能有政府機構存在的。……德國現在唯一的政府就是盟國的軍政府，軍政府繼續存在，直到允許德人自己建立政府時為止。但日本沒有運送到同樣的命運，這是基本的不同點。日本政府依然存在，而且是一個龐大與活潑的機構，他們將接受盟國的命令。盟國的政府與盟國總司令的政府，其間有很大的不同，這一點天皇左右的人當然很明白，他們現在希望的是，當盟國的條款先後實行與駐在日本的盟軍撤退回去時，天皇左右近臣又可以把他們的現政府恢復過來，然後他們又重振旗鼓再建設一個大日本！」

這是遠東和平的一個巨大的威脅。

四

但是，威脅着遠東和平的，還不僅僅是日本法西斯的復仇陰謀，還不僅僅是日本法西斯對寬大的待遇，而且是在這個對日本法西斯採取優容政策的後面，還掩藏着另一種危險。

日本法西斯死灰復燃的企圖，是寄托在兩大希望上面：他希望同盟國不團結，他希望中國國內不團結。儘管現時的兩個希望，在他的投降過程中，採取了毫不掩飾的許多步驟，包括文字和口頭上的挑撥與行動上的實施。

挑撥的對象首先是美國與蘇聯之間。八月十七日，我們看到了日本法西斯的第一個文件：「日軍司令部致麥克阿瑟將軍之第四號電文中稱：蘇軍不顧日本停火之命令，仍積極進行攻勢，蘇軍已於十七日晨進抵滿洲以西基地。該電文迫切請求盟方最高統帥採取適當步驟，使蘇方攻勢立即停止。」（合衆電）八月二十二日我們看到了挑撥的第二個消息：「東京廣播說：日本大本營爲日船三艘，二十二日在北海道海岸外遭受攻擊是蘇聯的潛艇擊沉一節，已向麥克阿瑟元帥提出抗議。」（合衆電）但是這些只是在蘇聯的作戰範圍內，日本還沒有正式簽訂投降文書以前，蘇軍是有自由行動之權的，因此在東三省內的借口，不可能發生作用；日本法西斯聽得，立刻進一步，八月二十四日東京的廣播是：「倫敦斯科特電台報告，蘇空軍部隊現在準備佔領日本本土最北島嶼北海道。日政府致麥克阿瑟電說，如果這個報告屬實，那麼日本政府認爲非常遺憾。日本現正努力實行閣下的要求，而將陸海軍和平民遷於嚴格管制之下的「日本人民」都希望盟國軍隊按照規定開入日本。」

這簡直是利用日本管制與佔領權的誰屬，日本向什麼人投降和聽從什麼人的命令！這一個重大的秘密問題，來進行挑撥了。這是何等詭譎的一個奸計啊！日本不是向全體盟國投降了嗎？日本不應當是接受全體盟國的管制和佔領了嗎？

但是，日本法西斯的這種挑撥，並不是無的放矢。日本正式宣佈投降之後，杜魯門總統就發表談話，表示「佔領日本的主力將由美軍擔任」（美新聞稿十六日華盛頓電）。這在日本投降前一天，八月九日杜魯門總統的廣播說：「舉凡我們軍事專家認爲保衛國家所不可少而現在又不在我們手中的根據地，我們都要取得。」軍事的需要是無價值的，要多少根據地就多少根據地，即使是在手中的也要取得，試想這將成爲怎樣一個結局呢？這並不是已成的事實，但由於杜魯門總統的「坦白而具體」，給了日本法西斯的一個挑撥的根據。

這是日本法西斯挑撥同盟國關係的一面，其次，日本法西斯的挑撥，集中在中國國內的團結。因爲只有中國國內的團結，日本法西斯才能

能施展其死灰復燃的陰謀。

日本法西斯對中國團結的挑撥從言論宣傳一直到行動，無所不用其極。對於中國的同盟國，他說：「我們雖曾經竭力避免衝突，但中國的局勢仍沒有好轉，非正規軍盜匪及軍樂等的騷亂，使日本在停止軍事行動及移交武器方面深感困難，所以請閣下對解除中國境內日軍武裝之時期及方法，惠加適當考慮。」（日方致麥克阿瑟元帥電文八月二十五日合衆社舊金山電）對於中國政府，東京廣播道：「規模相當龐大的中國空軍部隊，定二十六或這天以後收復南京上海北平等區，在華軍開到之前，各區日軍將維持秩序，並阻止沒有得到蔣委員長准許的任何軍隊通行。」（合衆社二十五日電）對於中國人民及其武裝部隊，不僥倖他們是「盜匪」，而且要毫不猶豫的加以武裝鎮壓。新華日報曾發表通訊，揭發這些事實：「天津日寇現集結兵力萬餘，並不時抽調居留民入伍，以加強守備。……漢口日寇現集結兵力萬餘，協助日寇守衛津市，並要求市民鎮守再鎮守，保護一切日軍與日僑，不得稍加怠慢。」

但問題還不僅是在日本法西斯惡毒挑撥的方面，而且是在被它所挑撥的另一方面。那些反應顯然是損害中國國內的和平民主與團結的。

但問題還不僅是在對於日本法西斯的挑撥，所引起的一切不良的不合理的損害和平與團結的反應，而且是在這反應的背後的支持力。中國八年來的抗戰局勢，主要是中國人民的血汗所支撐起來的，到了戰爭結束的時候，中國人民唯一的希望是和平，而和平則必須民主，必須團結。但是由於日本法西斯的挑撥和挑撥所引致的反應，却顯然造成了和平團結的困難。這困難，在中國人民一方面，是抱有熱切的希望和力量來克服的，但是在相對的另一方面，却由於一種偏袒的外在力量的支持，使得問題的解決，增加着阻力。試舉一例：日本於八月十五日決定投降，八月十六日盟國的某些軍事負責人，就公開表示，將空運中國部隊到各地接受投降，「假如遇有抵抗，不論其射擊我人者為誰，我們將予以還擊。」事實上日軍已經宣佈投降，按照歐洲戰場的先例，按照中國戰場的實際情形，日軍應該就地投降，中國戰場，當面的一切抗日武裝都應接受投降的權利。這是一個問題。其次，中國的團結，只有依靠中國人民自己公平而合理的辦法才能解決，任何不合理的干涉，是不會得到解決，只會增加糾紛的。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前述的人員却聲明：「美國的任何人員和物資，不應用於殺害中國人，除非是為了保護美國的生命和財產。但是租借法案所與中國軍隊的裝備，一旦到了他們的手中，就成了中國人的資產。」這就是說，可以作任何一種使用，包括進行內戰。

要指出，這是一種偏袒的「支持」，和直接干涉或參加中國的內戰是沒有差別的。這種方式存在一天，中國人民和平團結是一天受阻礙的。因此如上所述，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的時候，在遠東所存在的局勢，有三大問題：首先是日本法西斯的挑撥存在和繼續活動，對於遠東的和平是一個威脅；其次，是中美蘇英的國際團結合作，必須加強，而第三，中國

國內的和平團結，是中美蘇英團結的基礎。——這是三個異常嚴重的問題。

五

對於這三個問題，蘇聯有不斷的明確表示。

關於第一個問題，蘇聯的三大報紙——消息報、真理報、紅星報不斷的強調：「盟方應採取有效步驟共管日本，以防止日本帝國主義復活，與從事報復性的宣傳。」九月二日蘇聯真理報更明白指出：

「日本侵略者承認它失敗了，但是日本就這樣忍受了麼？相信沒有人敢於冒險回答這個問題。這並是一個不重要的問題，尤其是現在盟國對日勝利的條件必須明白規定，必須注意到組織和保持遠東和平的條件。日本失敗後的情況，是和盟國勝利後的德國情況大不相同的：作戰的和停戰的同一個日本當局，軍閥階層依然存在，真正日本人民的聲音還沒有聽到，戰爭罪犯和他們的責任問題還沒有提起，這些問題留待各大強國基於合作的經驗來解決。他們的武裝合作，保證了勝利，戰後的合作必須保證和平。」

關於第二個問題——加強盟國的戰後團結，蘇聯真理報曾強調「同盟國必須繼續合作」，並且說：「這是自然的，某些分歧意見曾經產生，但是一個重要的事實，這些分歧意見都在順利地克服中，全世界都有權利懷抱希望注視未來。」蘇聯的「新時代」雜誌，更說得明白：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維持世界的持久和平，已成為一切民族不可推卸的責任。為了實踐這項責任起見，我們必須嚴密注意危害和平的反動力量，一切國家必須真誠團結，並防止德日兩國的再起侵略。」關於第三個問題，蘇聯紅星報寫道：「多少年來，中國不但體驗到軍事和經濟的困難，而且還有政治上的糾紛。在對日本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的期間，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嚴重分歧，阻礙了中國的政治發展和國家民主主義事業的實現。……遠東戰爭的勝利完成，要求中國人民一切力量的迅速團結，藉以從事戰後建國和國家民主革新的事業。」八月二十八日蘇聯塔斯通訊社的廣播，坦坦而且具體的指出：

「日本帝國主義的許多問題，在戰時曾在中國統治集團中玩弄花樣，損害民族的團結，而有所成就。……要防止這些災禍只有一條路——那就是進步的民主的發展以及和其他民主強國密切合作的道路。」

蘇聯對於這三個現實問題的態度和方針，是鮮明而具體的。怎樣來解決遠東局勢中的三大問題呢？在遠東，沒有德黑蘭——克里米亞會議，迄今為止，也還沒有類似於歐洲的波茨坦會議，但是，現在有了八月十四日蘇兩國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定下了三個原則，來解決三大問題：
一、徹底消滅和防止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是最重要第一條

第三條。

二、加強同盟國的團結合作，防止一切危害和平的反動力量進攻蘇聯或破壞中國和平局勢的陰謀。——這就是第四條。

三、以尊重主權和不干涉內政的原則，造成中國國內的和平民主團結的有利條件。——這就是第五條。

有些不能真正認識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人，只看到條文和附件中的規定，蘇聯的「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同時蘇聯聲明「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這些人看到了這些，因而發生一種無名的樂觀或悲觀，認為這是一個最重大的問題。

不錯，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因為它是中蘇條約中的三大原則之一。但是我們必須進一步認清：第一、承認中國的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這並不是外交上的意外，只有條文中不承認交涉的對方存在，纔是意外的，倘使如此，就根本不可能產生條約。第二、承認，並不等於同意一切不民主不團結不和平的政策和現狀。正相反，蘇聯的承認，是表明蘇聯迫切地希望中國和平、民主、團結、進步。八月二十九日的蘇聯塔斯社廣播，和八月三十一日蘇聯紅星報的國際論文，足以充分證明這一點：蘇聯希望「中國人民一切力量的迅速團結。」（紅星報）蘇聯希望「中國不能依然是一個半封建的國家。避免新的災難的唯一方法，是國家的進步和民主的發展。」第三、承認中國的中央政府也並不等於否認中國一切民主和人民的的要求與力量。這也是不待解釋的。

其次是尊重中國主權不干涉中國的內政，這不但不是中國和平民主團結的阻力，正好相反，是中國人民和平民主團結的有利條件。一百年來中國改革事業的最大阻礙，並不是外國勢力的不干涉，正好是外國勢力干涉得太多了。只要這樣反動的干涉的力量抽出它的黑手，中國人民是可以迅速取得和平與民主，團結和進步的。

蘇聯的外交政策一貫的是不干涉他國的內政；這幾個月在希臘和巴爾幹各國的內政問題上，蘇聯的政策是如此，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上，蘇聯的政策也如此。現在的問題是，蘇聯以外的其他愛好和平的國家，也應該共同採取這個立場，遵守這個光明而磊落的方針。

六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再一次證明了一件事，證明了蘇聯的外交政策，是始終一貫地守著一定的原則和方針的。不是嗎？遠東一九三九年蘇聯領袖斯大林在聯共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就已經開得明明白白：

「一、我們主張和平，並主張鞏固我國與世界各國間的業務聯繫，只要這些國家也會對蘇聯維持着這樣的關係，只要它們不試圖侵犯我國

的利益。

二、我們主張和那一切與蘇聯交界的鄰國維持和平的親近的鄰邦關係，只要這些國家也會對蘇聯維持着這樣的關係，只要它們不來試圖直接或間接侵犯蘇聯埃國邊境完整性與神聖性的利益。

三、我們主張援助那些遭受侵略並為自己祖國獨立而奮鬥的民族。

四、我們不怕侵略者的恫嚇，並準備以加倍的打擊去回答那些試圖侵犯蘇聯埃國界神聖性的戰爭挑撥者的打擊。」

我們現在把這個聲明而確實的外交政策，來覆按「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我們能夠發現出它們有任何一點的絲毫差別嗎？是沒有的。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訂立對於遠東，可能得到什麼影響呢？九月二日魏爾納在紐約的論文，可以作為這問題的回答。他寫道：

「在政治重要性上，中蘇條約也許和日本投降相等。中蘇條約使中國成為強國，條約表示着蘇聯長期和平政策。

條約的目的，不僅在使中蘇關係恢復正常，很明顯地，中蘇條約是長期和平政策的一種工具，蘇聯的目的是使戰後亞洲安全，並與美國合作。中蘇條約又一次證明了，美蘇合作在蘇聯政策中佔有首要的地位。

中蘇條約消除了亞洲大陸的衝突與緊張的危險。中國是美國世界政策最後一片危險地帶，只有中國安定了，世界和平纔能組織起來。

必須亞洲大陸安定，對日勝利纔有阻礙。中蘇糾紛與美蘇爭霸，只是使得日本獲得政治逃避與軍事復仇的希望。

莫斯科、重慶、延安之間的談判，是世界和平的真實基礎。」（新開闢二日紐約電）

這不是已經說得明明白白了嗎？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是為了防止日本的侵略再起，是為了加強同盟——尤其是美蘇兩國的合作，是為了造成有利於中國的和平民主團結的條件。這三大問題，不是今天遠東與世界和平最重大的問題嗎？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對於這三大問題的解決，已經建立了一個重大的基礎，現在只等待着其他同盟國的共同努力，來建造遠東的和平天堂！

自然，必須指出：一個條約的簽訂和一個條約的嚴格執行，這兩者之間是有很大差別的，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不少意義重大的約章就是因為訂約者的一方表示了不能嚴格執行，而宣佈破產的。如以上之所分析，對於像中蘇條約這樣意義重大的約章，不少人是會用他們的「光明的語言和卑劣的行動」從四面八方來加以破壞的，為了嚴格的執行中蘇條約，進步的人民必須對這些中外破壞份子展開全面的鬥爭。

我們熱烈地擁護這鞏固中蘇人民友誼和奠定遠東進步和平之基礎的中蘇同盟，並願為其徹底執行而鬥爭。

九月二十日

如何處置敵偽漢奸資本

韋中梁

中國的抗戰，是民主經濟民族資本對於敵寇資本漢奸資本之戰。中國經濟在戰爭以來，分化為三大分野。一是敵寇資本和漢奸資本，獨佔了沿海沿江的經濟中心。二是解放區經濟，民主經濟的新型，在沿江沿海和廣大的華北的地區發展的甚熾，以農村與都市對立，建立了自給的農村經濟和中小工業，來對銷和削弱敵寇經濟。三是大後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在買辦資本與官僚資本的壓迫之下，民族資本在艱辛困苦中奮鬥，以保護軍用民需。由於勝利的前途，經濟的鬥爭，也到了決定的階段，目前正是解放區的民主經濟和大後方民族資本，起來清算敵偽資本的時候了。

敵寇資本通布沿海

我們首先要檢討敵寇資本在中國的成長。日寇對華投資，始於一八九七年，但大量增加，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截至一九三六年，竟達十五億元。其比例如下：

銀行金融業	九四、〇〇〇(千元)	六、〇(百分比)
紡織業	三一五、〇〇〇	二〇、一
一般工業	七五、〇〇〇	四、八
船舶運輸業	三〇、〇〇〇	一、九
貿易及商業	三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
礦業	九〇、〇〇〇	五、六
電力業	一六、〇〇〇	一、〇
鐵道業	二〇、〇〇〇	一、三
不動產業	三〇、〇〇〇	一、九
其他雜業	八〇、〇〇〇	五、一
一般政治借款	五〇〇、〇〇〇	三一、八
文化事業	二〇、〇〇〇	一、三
共計	一、五七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七七抗戰以來，敵人佔領沿海，其資本的發展，尤其迅速，組織華北開發公司，華中振興公司，作有計劃的開發，即此二公司，資本即達七萬萬元。在東北，則有滿洲重工業開發會社的組織。這類國策會社，運用軍部力量為後盾，威發華資參加，掠奪中國工廠，來完成其經濟的開發。

截至一九四〇年，據日人千葉威夫的調查，日資在華設廠達一百零二家，其中對廠在日本滿洲者十七家，總廠在上海者八十五家。由於我敵後解放軍力量之壯大，敵人一般工廠，全集中於青島天津上海三處，以防備我軍。東北由於敵寇經營多年，我游擊軍力量稍弱，其在東北設廠分設於各地。敵人在上海的工廠，總廠及分廠合計，約達一百九十七家，資本約為三億五千萬元。分類統計如下：

業別	廠數	資本額
機械工業	三一	三一、二九二、〇〇〇
電器工業	一一	四、九七五、〇〇〇
木材工業	三	一三二、〇〇〇
土石品工業	二一	一、〇三五、〇〇〇
化學工業	三五	二四、八四〇、〇〇〇
紡織工業	五五	二七七、七五五、〇〇〇
服飾工業	五	一四〇、〇〇〇
飲食工業	一九	一九、八七五、〇〇〇
文化工業	一〇	三、〇一〇、〇〇〇
雜項工業	七	一、四一五、〇〇〇
合計	一九七	三五八、四六九、〇〇〇

敵人在天津所設工廠，有五十三家，資金約為二億元。分類統計如下：

業別	廠數	資本
金屬品工業	一	三〇〇、〇〇〇
機械工業	一四	三一、〇六〇、〇〇〇
電器工業	二	五、〇〇〇、〇〇〇
木材工業	四	六、一四〇、〇〇〇
化學工業	三	四二、二〇〇、〇〇〇

紡織工業 八三、三二〇、〇〇〇
 飲食工業 七、七七〇、〇〇〇
 文化工業 七、五〇〇、〇〇〇
 雜項工業 一、三〇〇、〇〇〇
 共計 一八四、五九〇、〇〇〇

青島鐵道經營，以紗廠、火藥、機械業為主。戰前紗廠即達十八家，有紗錠四十八萬錠，線錠一萬六千錠，布機七千台。但戰後統計，尚未竣工材料。

整個華北地區，敵偽經濟的力量，一九三九年時，滿鐵會社曾有一個統計。其中輕工業工廠，日偽合計，共有紡織業三十五家，毛織七家，麵粉五十家，榨油十五家，糖廠十六家，火柴四十一家，染材十二家，造紙七家，造酸六家，製材十七家。僅物產大廠而言。

東北是敵寇經營工業的基地。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敵寇工業有迅速的發展，至一九四〇年擴充為一九三一年的六十四倍。目前工廠資本在十萬元以上者，達一百九十二家，資本十六億五千四百萬日圓。分類統計如下：

業別	廠數	資本
礦及冶煉業	三四	九四九、〇〇〇、〇〇〇
機械工業	一三	二八五、一〇〇、〇〇〇
電機工業	五	一〇、一〇〇、〇〇〇
木材工業	一七	一一、四五〇、〇〇〇
土石品工業	二一	三三、三〇〇、〇〇〇
化學工業	三四	一八一、八七五、〇〇〇
紡織工業	一八	三八、三五〇、〇〇〇
製糖工業	二	七〇〇、〇〇〇
飲食工業	三二	八八、七五〇、〇〇〇
文化工業	一	二七〇、〇〇〇
雜項工業	九	一八、〇七〇、〇〇〇
共計	一九二	一、六五四、〇六一、〇〇〇

由上項統計看出，敵人對於東北，華北，華中的經營，是有計劃的據據，七年來其力量，確已相當強大。

敵偽漢奸資本的混血兒

在敵寇自行經營的工廠之外，尚有敵偽漢奸資本的混血兒。此類工業的數量亦頗為巨大。據目前粗略的統計，有三百二十五家，其中半数廠家資本

即達五億四千萬元日圓，二億圓幣，其中一百六十五家尚未計入。

其分類統計如下：

(其中有日資的以千圓日元為單位，漢資以千元圓幣為單位，華資以千元，日資不加註。)

業別	廠數	資本	廠數	資本	廠數	資本
礦及冶煉業	16	132,100	2	480,000		
機械工業	38	168,000	5	55,000		
電機工業	19	9,780	7	1,145,000		
木材工業	4	14,800,000	4	10,400,000		
土石品工業	88	144,000	88	1,000	13	4,632
化學工業	21	4,500	39	74,850,000	3	12,181
紡織工業	43	50,985,000	31	13,630,000	2	52,625
製糖工業	180	470,718,000	127	102,000,000	18	70,407,000
飲食工業		86,825,000		106,015,000		

此類工廠，多為掠奪我國礦產，或經營。其方式有下列六種：(一)軍管理，(二)委任經營，(三)原主委任，(四)中日合辦，(五)租借，(六)收買。軍管理，是日軍直接經營。委任經營則為日本會社經營。原主委任，則為原主委託日偽合作，其辦法為：(一)日方提供技術與人材，(二)華方提供資本及修繕費用，(三)盈餘四六分，日方華四，中日合辦，多用於統制企業，由委託經營及原主委任進一步發展。租借類同收買，收買則亦近乎強購。以上三種，不論其原主為誰，均為敵寇工業資本提議者手中，而且成為敵偽經濟的一部份。

民族工業家的呼聲

勝利以來，大後方民族工業家發出了雄偉的吼聲：沒收敵偽漢奸資本，發給民間工業家經營。這要求，與解放區民族工業家專政治經濟文化力量，嚴厲懲治戰爭罪犯的呼聲，是完全一致的。

在戰爭結束後的第三天，吳越初潘仰山余名耀胡厥文諸氏就在瀘川工廠緊急會議中說：「凡是敵偽漢奸資本，就應該完全沒收！」這請案，得到大後方全體工業界的支持與擁護。吳與梅諸氏在華五家餐會上也大聲疾呼的說

政府當年爲了動員工廠搬移後方，曾經告訴我們，淪陷區工廠將來必然要沒收，我們搬遷到後方的民間工業家，可以分到敵偽的贖金。林權慶先生以這話正詞嚴的說辭，使我們一搬再搬，到大後方來與全國軍民同甘共苦。這幾年來後方工業的艱辛有目共睹，忍受各種管制的束縛，繳了多少稅捐公債，只剩下一些破爛機器以維持殘局。勝利的好音傳來，後方工業便陷於停產危機之中，如果政府不宣佈沒收敵偽贖金分配民間經營，則後方民族經濟崩潰可以立見。

爲什麼必須沒收敵偽漢奸資本？
第一，因爲敵偽漢奸資本與我民族資本勢不兩立。淪陷區敵偽漢奸資本，在七年的掠奪中壯大得可觀，後方資本相形見絀。如果說兩者並存，則結果必致漢奸資本吞沒民族資本。

我們的工業資本，自抗戰以來，由於政府管制政策的歧途，早就在日益削弱之中。沿海內遷，損失過半，沿江內遷又損失其半，湘桂之遷，反把西南實業毀於金城江。其實力的削弱是可驚的。大後方工廠，總計三千七百五十家，但資本不過三十八億，工人約二十六萬人，馬力十萬匹，工具機八千七百二十七部。我們工廠的家數雖多，但多爲中小工業，例如居首位的化學工業（約一千一百四十四家），大多數製的是馬場牙粉，製酸業者不及十家。資本類雖多，但三十萬萬的法幣，其實際價值，何異於戰前的三百萬。敵偽工廠與我民族資本力量對比之懸殊，在紡織業方面，尤其清楚。淪陷區域紡織業統計：

地區	紗	綻	布	機
華中區	一、七七八、六八八	一〇九、九九二	六、六六〇	
東北區	四八〇、七八八	四七、八五〇	五、五八七	
滬青津城區	二、二三七、五一四	四一一、二〇四	三六、五六九	
合計	四、四九六、八九〇	五六九、〇四六	五九、〇二五	

但大後方的紡織業祇擁有二十一萬紗綻，相差二十二倍之鉅！

潘仰山氏慨然說：「如果敵偽漢奸工廠留下來，那還用得着我們對敵？」這是道破了勢不兩立的情勢。

第二，爲了施行對於敵偽漢奸的懲罰，必須沒收其工廠。留在淪陷區的工廠，爲了自己的利益，與敵人相結納，往往成爲敵寇經濟的一部份。例如從事紡織的工廠，其織出的布疋，往往是敵人的軍需，修理汽車的工廠，其修理的汽車，往往便利敵人的輸送。雖然製造的不是子彈刺刀，其對後方人民的犯罪，與侵略者同等。抗戰初期，有堅壁清野的號召，凡是可搬的就搬，凡是不能搬的就破壞，這都是因爲現代戰爭是總動員，不容有任何直接間接的資敵行爲。但是有一部份廠家，竟昧於民族大義甘於爲敵人服役，復廠開

工，以貪圖利權。其生產力量對於敵人是大有貢獻，對我民族經濟却毫無補，對解放區軍民既未有經濟上的支援，對後方更是犯罪行爲。

在軍事上政治上我們決不能寬容僞軍僞政的漢奸頭子，在經濟上我們也決不放鬆這種「合作主義者」。我們應該效法法國人民，沒收與敵合作的銀行工廠，不論其規模的大小。

目前應有的緊急步驟

民間工業家要求沒收敵偽漢奸工廠，輿論也予以極大的支持。然而政府截至今日，尙無明確的表示。八月廿一日行政院通過的收復區工廠專業處理辦法，許多地方欠明確。

我們認爲在目前應該採取下列幾種緊急步驟：

第一，政府應即明白宣佈，凡是敵偽自辦工廠，或與敵偽合作之漢奸工廠，應即沒收。除部份應由政府經營者外，全數分配或租借民間工業家經營，以肅清漢奸資本，發達民族資本，並藉以補償有功抗戰之工廠的辛勞。還原主，應極其慎重，有若干工廠一方面內遷，小規模生產，一方面留下技術人員，補助敵偽經營廠，大賺其錢。這種兩面派的做法，今日應痛加懲罰，即以其與敵合作之罪，取消其原主資格。沒收的各廠，決不能公廠歸國營，私廠還原主了事。應該是公廠私廠一起沒收，分配給所有有功抗戰的工廠經營，同時有功抗戰的工廠，不論其是否在淪陷區原有財產，一律鼓勵其前往經營。

第二，敵偽漢奸工廠的調查清理，必須由後方有功抗戰工業人士參加，淪陷區各廠勞工參加，解放區軍民代表參加。最近兩年來，重慶街區，常常出現一種似漢奸似要人的，來往於大後方淪陷區的人物。按其辦廠時與敵人密切合作，他是漢奸，按其來到後方四處鑽營，又似是一身在番邦心思漢。但按其實際行爲看來，其行動却完全幫了敵人的忙。這類似官似商的活動方式，難保我們的官僚機構不受欺騙。爲了根絕一切說項求免，欺騙活動，應由民營工業家，政府當局，勞工，解放區代表共同組織敵偽漢奸廠清理委員會。獎勵人民的揭發與檢舉，並歡迎該廠勞工的提供材料。應該投以一切財產沒收之權，工廠恢復經營之權。單單任命一個經濟部特派員，是絕對無法把這一工作做得圓滿的。

總之，我們堅持經濟上必須毀壞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資本，漢奸的買辦資本，以培植民族資本，促成經濟民主。預防官僚資本的侵吞袒護，和獨吞經濟果實的金圖。因此，我們支持民族工業家要求參加敵偽廠接收受權，並要求分配民營廠經營。同時即解放區軍民和勞工，亦應有參加的必要與權利，以共同努力於民主經濟的建設。

美國共產黨反對修正主義的教訓

解放日報

美國共產黨人的清算白勞德修正主義，恢復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恢復黨的組織，這對於美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前途，是具有重大的意義的。而且對於各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也是一種有益的教育。

作爲白勞德修正主義的代表作，是他的「德黑蘭」一書。因爲交通的關係，我們看到這本書很晚。當白勞德去年把美國共產黨改組爲美國共產主義政務協會的前夜，我們看過白勞德的個別論文，所有他關於保存托萊斯制度，關於調和美國反動的獨占資本與美國工人階級的矛盾，關於擴充在獨占資本統治下的美國資本主義國內外市場，以避兔新的經濟危機的各種空想設計，即開始引起了我們的驚訝，認爲這是「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機會主義思想之復活，並認爲完全沒有實現的可能，但是尙不明瞭白勞德的全部綱領。在今年四月間看到白勞德「德黑蘭」一書之後，整個的綱領就完全清楚了。白勞德的所有錯誤，都環繞在他那種以「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爲中心的錯誤經濟綱領上面。隨後，我們即從外國報紙片斷地知道了以羅斯特爲首的美國共產黨同志們對於白勞德路線的鬥爭，知道了法國共產黨領袖杜拉克洛對於白勞德的批判。毛澤東同志和我們黨熱烈地歡迎這種和白勞德修正主義鬥爭的消息。現在美國共產黨在羅斯特領導之下已重新建造起來，毛澤東同志給羅斯特的賀電代表了我們中國共產黨慶祝美國共產黨人反對修正主義的勝利。

自從很久以前各國共產黨發起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以來，這種統一戰線即成爲各國廣大人民的運動。歷史已給人類證明：這種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是保證了並持續保證着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這種統一戰線的發起和堅持，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在這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運動中，無產階級內部的不穩定部分形成了或大或小的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潮流，這種機會主義者——投降主義者看不見：在統一戰線中，各種社會階級的成份是站在自己階級利益的立場上參加的，因此，除了反法西斯這個共同綱領之外，它們還各有其他不同的綱領，因此，在如何戰勝法西斯的方法上，也各有不同的路線。在戰勝法西斯之後，有的主張這種勝利的果實應當歸於少數人之手，

由少數人去壟斷；有的則主張它應當歸於絕大多數人民之手，由絕大多數人民所共有。機會主義者——投降主義者們看不到統一戰線中這些根本的東西，就不願意，也不能夠在統一戰線中對於各種違反人民利益和實際上幫助法西斯的東西實行鬥爭，就會把無產階級變成大資產階級或自由資產階級的尾巴，而極有害於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鞏固和擴大，極有害於反法西斯鬥爭的現在和將來。白勞德的修正主義便是這種機會主義——投降主義一種最顯著的典型。在白勞德的「德黑蘭」一書中，竟然完全在美國資本主義的前途上迷戀住了，他竟然只看到美國資本主義的前途，認爲美國資本主義的「青春」，而只要「由今天美國經濟的現存因素」構成美國無產階級的經濟綱領和政治綱領，把無產階級和獨占的大資產階級看成「一個共同利益」，要保護托萊斯制度，夢想在獨占資本主義統治下的美國可以領導世界，夢想經過「階級調和」可以避兔美國資本主義內在規律所必不可避兔的危機，而這種危機，甚至在美國資產階級及其經濟學者的聲譽中也是認爲無法避兔的。白勞德根據自己這種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看不到美國人民可能擺脫獨占資本的反動統治而有自己的明天，看不到美國人民有它的明天的經濟因素與政治因素，因而解散了美國共產黨，混亂了美國人民在經濟上政治上的願望。但在反法西斯英勇鬥爭中付出自己的血和汗的美國工人階級和美國人民，恰是應該有自己的明天，應該得到自己的報酬。顯然地，如果白勞德的修正主義不被糾正，就會妨礙反法西斯鬥爭的發展，就會使美國的工人階級和美國人民遭受極重大的惡果，就會幫助美國反動派的猖獗，而這種美國反動派的猖獗，事實上不但有害於美國人民自身，並且有害於其他國家。當然，和美國有很大關係的中國是在其內。

我們是處在反法西斯的大變革時代。各國無產階級內部有一部分人因受資產階級壓力的影響，缺乏清醒頭腦，掌握不住方向，這是毫不足驚奇的事實，問題是在這種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潮流在各國的表現形式不一，因爲各國的條件不同，這種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潮流在各國的表現形式不一，其爲害的程度也不一致。大體上說來，對於這種機會主義——投降主義潮

門爭得更好，更有功，則它爲害的程度就較少，並被克服得較快；反之，門爭得不好，門爭得沒有功，則它爲害的程度就較大，並被克服得較遲。我們中國共產黨，在進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當中，也發現這種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潮流，我們這種的機會主義與白勞德修正主義大抵異曲而同工。……這種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思想，在抗戰期間，受到我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所堅決反對，我們黨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和繼續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思想絕無地作了不調和的鬥爭，使得我們黨保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統一，因此，我們黨才能在八年抗戰的驚濤駭浪中堅持對敵鬥爭，不斷克服反人民、反國家的變態及其所給的威脅，而領導了人民向抗戰勝利與國家民主的方向前進。

爲中國革命的經驗所反證，也爲世界各國的經驗——更爲這次美國共產黨向白勞德修正主義鬥爭的經驗所證明：毛澤東同志所確定的關於在統一戰線中既須聯合又須鬥爭的政策，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策。這不但是中國無產階級最正確的政策，並且是對於各國無產階級的政策作了重大的有益的貢獻。只有又聯合又鬥爭，才能無產階級避免自己的孤立，又才能解明無產階級的政治原則，提高人民的政治覺醒，克服反動派反民族反人民反民主的政治企圖，也因此，才能鞏固統一戰線，才可能大統一戰線。如果對於這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策有所動搖，使無產階級的綱領降低到資產階級至買辦封建法西斯集團的綱領，使無產階級變成它們的尾巴，那就使無產階級投降資產階級，那就沒有什麼統一戰線，那就會把人民的事業引到失敗的道路。

白勞德的思想方法論是完全錯誤的。他自己雖是「學會了如何在地獄裏跳舞之中維持平衡」。事實上，「維持平衡」——就是他的思想方法論。從他這種「平衡論」出發，他就這樣變換種種「階級調和」去發揚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各階級的「平衡」，而不是要引導人民的鬥爭去克服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所存在而又必不可免的矛盾，他此夢想變換「階級調和」去維持在關佔資本統治下的美國資本主義經濟時與發展中的「平衡」，而不是要引導人民的鬥爭去克服美國經濟在關佔資本統治下所必不可免的「地獄與波濤」。這種平衡論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唯物論是完全相反的，毫無相似之點的東西，而且從來是各種機會主義者一種主要的思想方法論。在我們中國，不論在大革命時代的陳獨秀投降主義，不論抗戰時期所出現的新陳獨秀

主義，它們對於統一戰線所採取的投降政策，只要聯合不要鬥爭的政策，它們的主要思想方法論也即是這種平衡論。和這種平衡論的思想方法相反，毛澤東同志關於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恰是應用唯物辯證法一個最出色的模範。是平衡論呢？還是唯物辯證法呢？實際是真理的標準。實際擁護了唯物辯證法，打倒了平衡論。

美國共產黨人反對白勞德修正主義的勝利，即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世界各國的又一勝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敵的真理，又一次被證明了。我們中國共產黨因爲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特別很早就和我們黨內那種與白勞德修正主義類似的機會主義——投降主義作了不調和的鬥爭，因而得以避免它可能給人民事業更大的損害，但是美國共產黨人這次和白勞德修正主義的鬥爭，對於我們黨，對於我們全體黨員，同樣地是極有益的啟示。

美國共產黨人反對白勞德修正主義的鬥爭，對於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給予些什麼有益的教育呢？這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必須更善於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必須更善於向毛澤東同志學習，學習他如何應用唯物辯證法以決定中國人民命運的問題，他是應用得這樣精明，至於百發百中，毛澤東思想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而毛澤東同志這樣的人物就是列寧斯大林式的人物；他在戰鬥中是大無畏的和對人民公敵是毫不留情的，他在事情開始複雜化並當着在地平線上呈現某種危險的時候，不會發生任何猶豫失措或類似弱質失措的心理，他在解決複雜問題，需要開闢決定方向，周密估計正反面各方面的時候是明智而鎮定的。不說別的，八九年來，我們是在這樣政治複雜而變化無端迅速緊張的時代，我們經過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沒有迷失了方向，我們和中國人民在一起，戰鬥地向着勝利前進，這一個現實的生活就證明了：毛澤東同志是對的，而一切反對毛澤東同志的是錯了。毛澤東同志是我們有黨以來各個革命時期和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者鬥爭的模範，是我們有黨以來各個革命時期和機會主義者、投降主義者鬥爭的模範。毛澤東思想——這是我們和一切機會主義者區別的標誌。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如果不善於掌握毛澤東思想，那就一定會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就一定會被機會主義所變質，而破壞中國人民解放的事業。

提高學習毛澤東思想的課程，造成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新思潮——這就是美國共產黨反對白勞德修正主義的鬥爭所給我們的啟示。

（八月一日社論）

「民主」人

洪深

一、自我批判

本年三月杪，我收到新華日報一封徵求「學期專稿」的信。信是鉛印的，想必也寄給文化界其他不少的人。不過，在寄給我的那張信紙的後面，附有一位我的老友親筆寫的幾句話；我現在全錄在這裏：「在世界日報讀你寄的短文，甚佩。我覺得在今天談談『人與人』之間的生活態度上的民主，比什麼還重要；你能替我們寫一點關於這一類的文章否？」

因為我自己的為人，雖然誠懇坦白為友人所矚目，而有時不免太爽直，太嚴格，太堅持己見，可能客觀上成為頑梗與固執。我理解那位老友在信尾加的幾句話，是對我一種友誼的委婉的勸告，促起我的深切反省與自我批判的。我這樣大年紀，不應該明白我自己，反比旁人明白我還要少。在我的人格中，的確有許多地方是不民主的。每當我辨別出一件事情的是非黑白，我性急地要求旁人無條件地同意我的見解；有時甚至用熱情用厲色，強迫旁人接受我的觀念，不暇去公平地考慮一下別人的觀點，更不願從事耐煩、遲緩、理智的說服，去求取那和我觀念不同的人底諒解與同情。由於態度的武斷與僵硬，往往引起意外的困難，誤會與不諒，雖然我的存心是天下至善的；我所做的一切，全是為了幫助別人的。這是我生平悲劇之一——凡自以為存心善良與見解正確而一意抹殺那見解容或正確但存心未必不是同樣善良的反對者的，也似乎不免這種自招失敗，自蹈痛苦的悲劇的！

去年冬間，我曾為中術演說家之的所作劇「春寒」，曾聞周趨來先生看了演出之後，發過一個議論——我雖沒有親自聽到——要點好像是這樣的：在今天，不必在舞台上發揚像周大夫那樣的人物；他雖然主持正義，嫉惡如仇，而固執已見，剛愎自用，似乎忘記每個人都有他的自尊心；結果，連到那一向親信的幾個人，都不能澈底團結在身邊！周大夫如果從事實際政治，免不了要成為極權主義者；他的人格是不民主的。這一個對於劇本的批評，曾使我長次的深思。主持正義，是必要的做人的道理；那樣一個人才能成爲

正人君子。至於民主的人格，我個人以為，應當包括主持正義，並且超過主持正義——主持正義的目的，完全達到；而仍能不於沿途撞倒與打擊了其他有正義感的人底自尊心。

我不是一個深淵的思想者——我想我的友人都能原諒我的這弱點的——我此刻祇在根據一些淺薄平凡的常識，借助一些東翻西閱的學問，進行我的「語言化的思考」THINKING ALOUD。我的說話，仍照世界日報短文的方式；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絕對不受格式拘束，或許可以盡所欲言。不過，庸俗與嗜睡，在所難免，還望大家不吝介意。

我有這樣幾個見解——不對的地方，請糾正——第一，一個人的人格的形成，由於他的生活經驗與生活習慣。他生活於一種制度之下，這個制度，必然要求，也必然磨練某一種的人格。人格是制度的產物。同時，制度又是人為的。生活中有了新的因素新的事物（譬如說，科學上的新發現，技術上的新應用），人們必然會要求與實行一種制度底重建或改革。我相信，人格可以意識地科學地改造，正如制度可以意識地科學地改造一樣。第二，以一國論，僅有民主的制度，是不夠的，必須還有民主的人格，才能成爲真正民主的國家。第三，以一人論，僅有民主的思想，是不夠的，必須還有民主的情緒，才能成爲完全民主的人格。

善哉美國麥高密克在紐約時會上議論幾位功成歸國的將士之言，「堪注意的，是這些將士，並不以『戰勝的英雄』的姿態回來的。他們是戰爭的犧牲者；他們固然是成功的戰士，但他們厭惡他們在以往所不能不做的……他們爲了人類的受難而感動而震怒。他們自己是人，他們看別人也是人。他們的民主，不僅僅定屬於頭腦的，更是屬於心腸的。」事實如果確是這樣，那真是再好沒有了；但至少可以見出美國人對於「民主人」的要求。

二、他山之石

美國民主的道路，也許不是最理想的。即就制度本身而言，也還有應當

得求進步與改善的地方。但是，「政府是屬於人民的，應由人民主持的，爲了人民而存在的」這個觀念，最早是在美國具體地實現的（林肯所作藍德爾的演說爲最顯明），而美國人從事民主政治與民主生活的實踐，也有三百年左右的歷史了。在這裏，研究一下美國的民主思想與民主制度，看看「下他們所崇拜所要求的民主人物與民主人格」，再看「看在他們中間，是不是還有一不民主」的人，或許不是毫無益處的。

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曾用戲劇對話方式，寫成一部「共和國」說明他的政治理想。不久以前，美國一位歷史學者，也用戲劇對話方式，也寫成一部「共和國」，說明他對美國的政治理想。皮亞特（P. A. Piatt）所寫的「民主」具有四點：

「第一，人民，不是合法化的君主或階級，是一切政治權力的源泉。這並非是說全體的人民，但也不能不佔有「個大約用多數的人民。至於這個比例，究竟大至如何程度，此點，並或永遠將成爲一個爭執。投票人選擇政府中主要的行使職權人，再由這些人間接地選擇其他一切關於生命財產賦有政治權力的人員。」

第二，經過投票人選擇的行使職權人，建立一切法律。

第三，在固定的週期，所有政府中主要的行使職權人必須或者退休，或者如果企圖求留位的話，必須將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行動，通過投票的手續，交由大眾評判。

第四，在這個手續上，一切投票人都是平等的，那就是說，每一個人，不論知識的或道德的或經濟的資格，祇有一票，不得超過；選舉時，候選人獲得最大多數的選票的，不會是過半多數或比較多數，一般的作爲當選。簡言之，民主從理論上講即謂，投票的權利是平等的，尋求與持留職位的權利是平等的，選舉是由過半多數與比較多數決定的。

皮亞特又以爲民主制度的保障是成文的憲法。憲法是規定那「多數決定」的範圍與性質的；如果沒有憲法爲限制，多數何嘗不可作出那反民主的甚至專制的極端的決定！皮亞特說明美國憲法的精神，也分四點：

（一）治理我們自己的國家的規章，應由正式提議，公開討論，大眾投票決定的手續來建立的。

（二）一切官吏的權限，應爲人民基本權利所限制。

（三）所有行使職權的官吏應爲投票人直接或間接所選舉。

（四）凡是直接選出的人員，在一定期限內祇有規定的權力的，當然須

於那週期來行的選舉中接受評判。至於人民的基本權利，在美國的獨立宣言中，早有概括的聲明——「生命，自由，與尋求幸福」；又，「一切人民生來都是平等的」——而在憲法底第一至十條修正文中，更有成文的詳細的規定。

托利史史（T. O. D. Toland），美國紐約時報派駐日本東京的通訊員，在日本捕獲珍珠港之日，爲日警拘禁。三個月後，美日交換俘虜，托利史史回美國，寫了一篇稿短文，「民主對於我有什麼意義！」他說：

「民主的意義是什麼，從來沒有像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當一位日本檢察官逼問我，要我告知他，美國政府爲了什麼目的而存在的，那「天」的那樣有目的地刺在我心頭時。我已經過了寒冷而饑餓的三個月，隔別監禁在日本的牢獄中。我會經被日本警察以死刑威脅，我會經受酷刑，過我承認自己是間諜。現在那位檢察官，因爲我會經將日本的情形忠實地報告給美國的刊物，却更欲試用合法的日本形式，給繩於我的頸項，致我於死了。他根據地認定，美國的新聞記者都是間諜，因爲日本報紙的地位是這樣的……在日本，一切都在一個匪徒政府暴力控制之下，所以民主政府的作爲，是完全在他處理勝之外的。而這個「不理解」，會以個人的受難如此痛苦地迫我觀看，使我向所未有的那樣深切認識，什麼在美國人平時視爲平常而無足重輕的——那民主的可珍貴的傳統……我比一向更清楚的覺悟，這一次大戰所爭的是什麼——

生命——個人生存的權利。看起來是多麼平常的一回事。可是于千萬萬人民，在極權的統治下，依據如下的見解被培養——即是，除了作爲一個民族的或民族的集團底構成分子之外，他們沒有個人的生存；而任何對於狄克推多的反抗，必然致使生命喪失……

自由——「生活着一個自由人的生活」的權利，享有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以及那組織自己的生活而不受政府的或超政府的機構與他們底突擊除任意干涉的權利；不問一個人是屬於多數的，或屬於少數的，或是完全孤立的……

幸福與尋求——規定自己的生活目標並使用本人的全部能力去達這些目標的權利。這是最高的權利，從上面兩種權利發出來的；唯一應受的限制，是旁人應有的權利應如同本人的權利受到平等的尊重。

在我的心念上，這幾個權利，實可包括民主政治的至都意義與目的。這幾個權利，在一個個人與別人交往的時候，凡是把別人當作人的；或

是不能平等地尊重別人的權利，以毀損別人的生命自由或幸福的；或是自願或高，自覺比別人偉大，比衆人神聖；對於別人的存心或能力或知識，不問是同樣或那偶或大衆人民，不能放心，不會信任的；或者自信過盛，甚願爲人民謀幸福而不顧人民合作共謀幸福，勇於爲人民計謀決定而不耐那一正式提出公同討論大衆投票決定」的手續的；或甚意識地或潛意識地發揚英雄主義，對於任何限制都感煩懣，對於任何異議都生反感，甚至有錢不惜作英雄救世之舉的——這樣的行爲，這樣的人格，至少在美國，總不免被視爲是不民主的呵！

三、視人如己

全書只有二百三十頁，一冊林肯的信件公文與演講稿的匯編彙集，是在美國出版，專供高中學生閱讀，並爲訓練一般公民用的。作者泰增而 H. A. T. J. F. E. L. 以爲林肯是美國民主政治所送出的在智力與道德兩方面最完美的人格。他在「論國會內」提出一串自我學習的問題，要學生從林肯的傳記與林肯的作品中，尋出答案。我先將問題全文在後列譯出：

- (一) 關於一個人在民主政治中本身應當是怎樣的，什麼是林肯的觀念？
- (二) 有自尊心？
- (三) 自我信賴？
- (四) 自力發展？
- (五) 公衆的福利，放在私人利益之上？
- (六) 關於一個人在民主政治中和其他人的關係，應當是怎樣的，什麼是林肯的意見？
- (七) 關於一個做公僕的人在民主政治中和大衆人民的關係應當是怎樣的，什麼是林肯的主張？

(一) 他是如何種人民確有能力去想透一些公衆的問題而自行有所決定，這是相信人民祇是遺留或領袖的意見而已？

(二) 林肯如何所指，在他用「欺騙」人民這一言詞時？

(三) 什麼是你所稱的正誠與忠誠的領導人民的道路？

問題並不神秘，但一個人自己應當是怎樣的，如何與他人或敵人相處，如果居於公僕的地位什麼應是對人民的態度，這三者，一個人的生活在民主

政治下的人，怎麼可以不檢查自己弄弄清楚呢！

林肯的做與作品告訴我們他是怎樣一個人！他出身貧賤，從小體着在田裡耕作。「他的父親是不識字的，簽寫自己的名字都感覺吃力。」「林肯總共上了不滿一年的小學。」「他差不多到將近二十歲的時候，才感覺有學習文法的需要。」「往往在全日辛勞工作之後，捧讀一冊文法，就併合中車級的讀本，孜孜學習。他是真正懂得自尊自強與自力發展的人。他有一位異父弟（他的後母之子），似乎不吝有出處，時常向他借債。他有一次回信說：「我現在和你約定，從今天（一八五一年一月二日）至本年五月，大凡有一元錢是你用勞方賺來的，不管是我或還是誰借，我亦不給你一元錢……如果你願意這樣做，你不久便可將債還清，而且更妙的是，你會造成一種習慣，使得你以後不再欠債了。」

在他和杜格納斯法官競選伊利諾省政員而公認勝出後，他除廢除間題的時候，杜的指詞巧妙而林卻，在與國北商會會議爲一辯案，但在海部可解釋爲別一種主張。林肯曾問他說，使杜不能不明確地表示態度。杜所表示的態度，恰是那時伊利諾省的人民認爲適當的，這正是當選而林曾決選。林肯曾犧牲自己的前途，必求是非真確的明白。泰增說：「這時的道德畢竟是最佳的政策；兩年之後，林肯被提爲與俄國總統，就是有力證據。」

林肯是一個理想的對象，不至遺失。他後來結婚的那位夫人，原先在林肯方面不是完全主動的，在第一次約定舉行婚禮的那一天，林肯跑掉了！經過若干時間，兩人才又恢復舊情。他擔任總統之後，他原任命的國務卿西華德，以爲被派給一位「下下律師」，未能應付當時南北決裂的危局，曾提出辭職，暗示林肯應委指簡員一人，代其負責。林肯明白他的用意所在，自不願見這總統的權力，轉移旁人。但他並不生氣，並不以此爲心平氣和地提出他對每個閣員的在職，而對西華德始終保持友誼，合作到底。他在南北戰爭中擔任陸軍軍元帥，他關心軍事，願以主將，但他在人滿春。決不飽細干涉，事必躬親。他在「一八六四年四月三十日」這通國書中，一封信中說：「你既計劃中詳細每日，我既未知曉，亦不求知曉。他既既到，而又親自督領，我對此頗感欣慰，自不願再對你的來信，增加困難與阻礙。因爲我渴望大的收效或大數兵軍的犧牲不致發生，但此等困難事情，適量而注意，較之過量的注意，更加有利可觀。如果這缺什麼而我在我的權力之內可以供給的，務必不可不盡力知道。」

他是美國最早主張「女子有政權」的一個人——一八三六年他對報紙發表他的政見時說，「我贊成一切納稅當兵的人都有政權，女子亦不例外」。他也是最早承認「勞工的重要」的一個人——一八六一年他給國會的年報中說，「勞工先於資本，亦不依資本，資本祇是勞工的果實，而如果勞工不先存在，資本便不會存在。勞工實較資本為高，因之值得給予更大的重視。當然，資本也有他的權利，和其他權利一樣，也值得保護的。」他對於廢除黑奴，有兩種要求：一方面因他會目視黑奴販賣的慘酷，從人道主義出發；另一方面他堅持正義與公平的觀點——一八五四年十月，他在某次演講中答覆那些主張廢除黑奴與否各省可自作決定，外來干涉即是侵犯「自治治理」的原則」的謬論者云：「如果黑奴是一個人，那麼主張他也有權利治理自己，豈不根本破壞了自治 SELF-GOVERNMENT。」又在與杜格拉斯公開辯論中云：「我同意杜格拉斯法官的說法，在許多方面黑人不是我的平等——當然在膚色上他不是的。也許道德與智力的實質上此刻還不是的。但在享受他自己的手賺來的麵包而無須向任何人道歉這一點權利上，他是我的平等，也是杜格拉斯法官的平等，也是每一個活著的人的平等。」

林肯於那有利於美國南部經濟的黑奴制，與那有利於美國北部的工業經濟以及中西部的自耕農的雇工制，衝突決裂，幾至不可收拾的時候，就任美國總統。他的唯一願望，乃是保全聯邦，恢復團結。團結高於一切；為了面對現實，他不得不暫時放棄理想；他對於黑奴的全部解放，不復堅持，僅求黑奴制度不再蔓延於原無黑奴之地；甚至連這都不妨讓步——先求聯邦的完整與存在，祇要不起內戰，無事不可商量。他實有犧牲道義之嫌，但他的態度却是光明磊落的。他不作掩耳盜鈴之舉；他不從事於曲解粉飾，希冀冠冕堂皇地自圓其說，向解於人民；他未出一句欺人之言；而是忠實地坦白地簡單地將他的主張與立場，告知大眾，他作爾答復紐約論壇報主編立即解放黑奴的社論，便大抵的說：「我在這次鬥爭中最高尚的目的是保全聯邦，而不是保全或毀滅黑奴制。如果我能保全聯邦而竟不能解放一個黑奴，我要做的；如果我能保全聯邦而又能解放全部黑奴，我要做的；如果我保全聯邦而祇能解放一部份黑奴，其餘不得不得其自便，我也要做的。」他在另一篇講演中說：「一個人家，分發而對立着的，是不能存在的。我相信這個政府決不能永久地持續着一半奴隸，而一半自由人。我不預期聯邦會得解體——我不預期這個人家會得解散——我知預期它會停止分裂。它會或者完全走這一條道路，或者完全走另一條道路。」

林肯曾說過：「你可以永久地欺騙一部分人民，你可以暫時地欺騙全部的人民，但你不能永久地欺騙全部的人民。」林肯一生對人，不論對家人，最親戚，是朋友，是仇敵，是同儕，是路人，或是二般太聖，從來相信他們有區別是非與識得好歹的能力而不願欺騙的。因之林肯有一個綽號，叫做「忠實的呆伯」HONEST ABLE；「呆伯」是他的前名「呆伯拉罕」的縮寫；「忠實」是稱道他與人相處的態樣。忠實——在它的理解中，就是不愚騙人；不玩弄人；不欺騙人；不欺人；不巧地佔人的便宜；不圖藉藉個私人在身邊上排擠所不喜的人；不來京派戲子的一套，當面恭維無微不至而背後惡毒刻薄地形容人！忠實，在我看來，應是民主人格最基本的條件。

至於林肯的出身貧賤，幼年失學，隨婚走避，喜說笑話等等，其實是不值顧人言的；而何以美國人這津津樂道？或想或者因為在這些事情上面，正可以林肯的「與眾無殊」——和普通人同樣的平常，同樣的樸實，同樣的大情，同樣的人性，同樣的偉大，同樣的偉大，同樣的偉大，也同樣的可笑！總之，在民主的美國，大眾不喜欺人超人的。超人假如有可能的話，至多限於他的「一技一能」；至於日常生活與整個人格，他必希望他愈不遠離眾人愈好——如果眾人輕易承認有超人，那麼對於國事重大問題，何能更有「公開討論多數決定」的自信！超人的危險，是在慢慢地與大眾底甘苦好惡隔閡，本年去世的羅斯福總統，領導政治數十年，如此為多數民衆受敵，而他在會見新聞記者時，在一般的待人接物時，處處留意於給人以「非超人」的印象。而美國民衆的要求他們底「傳人非超人」這一事，似乎值得一切的一「候補超人」深長思的。

四、英雄主義

徐特立老先生在湖南當中學校長的時候，曾對學生說過一番話——我當然不能親聞，我是從他底一位學生那里間接聽來的，我想我的記憶大致不錯——世界上有四樣人可做，一聖賢，二豪傑，三英雄，四俗子。俗子不必論，聖賢不易得；但在英雄與豪傑之間，吾人應知所擇。英雄多不免自利自負自私，而豪傑却能隨時務，顧大局！這是在若干年前的話了。在今日，我誠感覺，自名的英雄，不論是那型的，亦不論正在從事那一種事業；總不免失敗的多，成功的少；譽世的多，濟世的多。英雄的努力雖可取，英雄主義

才月有。英雄應由漢人稱頌，這絕不可居之不疑。英雄主義和民主人格，是格格不入的。

在美國的民主政治中，還是可能有英雄主義的自視超人的不民主的人格。最顯著的例，是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總統威爾遜。在威爾遜執政的初年，國會曾通過不少為人民謀福利的法案：(一)一九一三年的減低保護關稅案，使得美國工業品的價格降低，廠家利益雖減，而人民生活較舒；(二)舉辦所得稅，使得收入多者，納稅的義務比例地增多；(三)成立聯邦儲備銀行十二磅，一舉而掃除私人銀行濫發鈔票的危險；(四)通過「查門及托辣斯法」(宜門保提案人名)，防止那獨佔性的商業聯合，制止大商業對中小商業不公平的競爭手段；(五)通過海員法，使海員對雇主處於較有利的地位，並規定船方必須改善海員生活的環境；(六)規定鐵礦工人每日工作八小時制……等等。關於這些法案，國會底功績，固然應當是多於總統的；但到底不能不算是威爾遜的貢獻——爲什麼不早一點在別人任內實施呢！不過，在威爾遜自己處理的一件大事，巴黎和會與國際聯盟，便可充分地看出，他底人格是如何的不民主了。

最近看到一張敘述威爾遜生平的照片，標而描寫他的家庭生活，日常與子女登歡聚歡唱，以及妻死後續棄的一些情形，也是極人情。又描寫他懷着永久和平的理想，主張美國應對世界前途多負責任，反對美國傳統的獨善其身的孤立傾向，更是值得佩服的。但片中描寫參議員洛其誠HODGES的爲人，不顧大局，盲於正義，惟洩私憤，舉凡威爾遜所作爲所成或所企圖，必盡毀滅而後甘心；並將巴黎和會與國際聯盟的失敗，威爾遜爲美國人民背棄，以致氣憤身死，一切責任，都歸之於洛其誠存心搗亂——影片給人的印象，是威爾遜一生的悲劇，爲威爾遜這個人對頭，如果洛其誠早死兩年，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威爾遜的計劃必可在國內得到通過。在國外順利進行，國際聯盟必然成功，天下太平，決無第二次世界大戰——未免過於歪曲事實，顛倒黑白了！其實失敗的責任，應由威爾遜這個人大半；由於他的不民主的人格，盡使這件大事不能不失敗的。

洛其誠是一位士君子式的學者，在國內聲望甚高，在國外的言論頗受重視與尊敬。我們中國人尤其應該感念他。在他討論巴黎和會規定以青島島嶼給日本的時候，他戲劇的在國會裡說，「我老了，但我還許許多多活著，我不願意有三天孫輩更替環境變遷問我，美國把中國的青島給日本，做了一件無名無譽不公正的事，祖父或曾祖父，必將降臨是參院外交委員會的主席，

你是怎樣主持正義的，你做了些什麼？我不願意到那時慚愧得無詞以對！」(大意如此，詳詞須查當年美國報紙)。由於洛其誠的反對(他主持的外委會提出修正三十九點)，巴黎和約未在國會通過，美國政府亦未簽字，這樣後來纔有華盛頓會議，以青島威海衛歸還中國，與簽訂九國公約之事。不管國會與公約的成果如何，評洛其誠爲不解正義與毫無理想的人，實在是不應該的。

洛其誠然是一個「美國主義」者。他深信美國對於任何國際糾紛，都應置身事外，除非它的安全與榮譽受到威脅。在真受到威脅的時候，美國應準備與決心作自衛的戰爭；但在戰事結束之日，美國應再謀從國際糾紛中解脫，獨行其是，不問軍事。這個傳統的美國外交政策，在現代或許可說是落伍或錯誤的，但不難目之爲不誠懇或無理取鬧，洛其誠在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的地位，以爲執行這個傳統政策是他底職務，而威爾遜以總統的身份，欲以一個人代表美國全部人民的公認，欲以一個人包辦美國的外交政策，對國際問題獨斷獨行地隨時讓步與提供諾言，乃是犯了美國憲法給予參院同意權與通過一切條約之權。洛其誠的主張，是爲當時美國不少數的人民所同情的。而威爾遜趕巴黎和會，不僅抹殺了洛其誠的主張，並且抹殺了洛其誠的地位，始終不理會參院的外交委員會。無非由於他的自負太深，個性太強，他才會有這樣相信，正義完全在他底一面，而成爲絕對有把握的——這不能不說是威爾遜英雄主義的表現。

關於威爾遜在巴黎參加和會的情形，我現在從亞倫所作的「宛如昨日」ONLY YESTERDAY一書中引譯一節；這是一部記錄一九二零年代美國社會生活的史集，在美國在英法以極流行的。——「現在德國是打敗了，一位位猶忌威爾遜的歐洲政客正在各自打算，在這次巴黎會議中，怎樣爲自己國家謀求私利，爲自己個人獲取光榮。他們願望這場這次戰爭的戰物。他們想說參院會對威爾遜喝采(註：戰事初止，威爾遜親遊法義等國，曾受法意總統的歡迎，萬人空巷，夾道歡呼)，但是他們也曉得，民衆是不堅定的，照樣可以對拓展國土與罰款賠款喝采的。這些政客決心要在巴黎製造一個可以使得他們滿載而歸的合約……世事的潮流，如果威爾遜可能聽得的話，正在這反着他。人性，在整個世界上，開始顯現一個新面，歷史在每一次戰爭結束之後都會如此顯現的。對於團結的迫力，已經消失，分裂代之而起。對於理想的迫力，亦已消失，現實却在得勢……而且命運的發展，不僅通過舊世界底外交家與新進派參院愛國者，亦通過威爾遜在心靈與性格上的特殊限制。

目前局勢和今後任務

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全國局的決議，通過於一九四五年六月二日。

▲這個決議是美國共產黨作爲一個草案，以供全國委員會以及共產主義政治協會全體會員討論和採取行動的。

▲全國通過決議的投票情形如下：

贊成者：莫爾頓·吉爾森，小本傑明·威維斯，歐琴·台尼士，伊麗沙伯·弗林，詹姆斯·羅斯，威廉·羅斯脫，吉爾勃脫·格林，羅勃·曼納，羅勃

·湯普遜，約翰·威廉姆生。

反對者：愛爾·白勞德。

棄權者：羅曼·羅特。

缺席者：威廉·許乃德。

第一部份

一

軍事上打敗納粹德國，是世界民主和全人類的一個偉大的歷史勝利。這個時代的勝利的達成，是由於英美蘇聯盟的聯合行動——由於紅軍決定性的打擊，由於英國和美國的攻勢，也由於抗戰運動的英勇鬥爭。這個勝利，給歐洲法西斯主義的徹底滅絕開了一條路，並且削弱了各地反動和法西斯的力量。它已經在歐洲各民族間形成了一個反法西斯的新的團結，這是由若干國家代表人民意志的民主政府所成立表現出來的。它同時也爲導致日本帝國主義的迅速敗北建立了先決條件。這一切，實現持久和平的巨大動打可能性已經打開了。

然而，一個尖銳和堅決的鬥爭必須繼續進行，以保證在歐洲和全世界法西斯主義的徹底毀滅，並且保證建立持久和平的現存可能性將來一定實現。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爲歐洲法西斯的經濟和社會基礎，還沒有完全被消滅。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爲英美的以托萊斯和加德爾爲中心的非常強大的反動力量，正在竭力設法把解放的歐洲置於一個反動同黨基礎上。再則，所以這樣做，是因爲美國的帝國主義中最富侵略性的集團，正在竭力設法使他們自己取得世界政治和經濟的霸權。

隨着反納粹戰爭的結束，美國資產階級中某些重要的，過去曾經討論過帝國主義的世界霸權的集團，現在正和獨佔資本中最反動和親法西斯的各集團——和全國製造家協會領袖中親法西斯的杜邦集團——攜起手來了。爲了消滅他們的帝國主義動機，這些大企業集團到現在爲止，雖然並不堅決，支持了反希特勒的戰爭，到今天，他們被勝利的民主後果驚慌了。

正像他們的英國的同類，他們驚駭於世界工人地位的增長，歐洲民主進步以及殖民地附庸國家種族解放運動的高漲。因此，他們設法要擔住民主的進程，抑制勞工和人民的力量。他們企圖保留德國和歐洲其他部份的法

西斯殘餘。他們正在設法組織一個新的「衛生帶」來反對蘇聯，而蘇聯則在這次反納粹戰爭中擔負了戰爭的主要負擔，它是民族自由、民主與世界和平的最堅強的戰士。德國失敗後英國資產階級的這種重新組合，已經由最近國務院的許多行動反映出來。舊金山會議上，美國代表團中多數人都在某些問題上向極端反動派讓步這一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這樣做，他們脫離了像德黑蘭、雅爾達所曾做到的，羅斯福的團結三強的外交政策。

資產階級這個重新組合，說明了為什麼羅斯福、紐斯和康納利會受影響而在最基本的問題上，和胡佛的代理人范登堡以及美國財政資本中最高掠奪性的各派攜手。這說明了海西斯阿根廷的出席和英美的不願在波蘭和德國問題上實行雅爾達協定。這就是為什麼舊金山美國代表團拒絕聯合蘇聯一起去保護委任統治地和殖民地的民族獨立權利，並且拒絕正式承認為六千萬有組織的工人發言的世界工大會的代表。

大資產階級若干集團的這一轉變，說明了對於的里雅斯德的反動的干涉以及用武裝力量對付我們盟邦南斯拉夫的威脅。這個發展，也說明了華盛頓和倫敦為什麼實施阻止中國強盜，團結和民主的危險政策……這個轉變也是新的反蘇強盜和煽動反動的原因，這運動企圖破壞美蘇友誼和合作，而美蘇之間的友誼和合作，則是打敗希特勒德國，取得勝利的基石，也是達成戰後和平的不可缺少的關鍵。

在國內戰線上，反動陣營正在阻擋一個令人滿意的政綱之發展，那政綱在隨着復員而來的經濟失調和嚴重的失業恐慌之際，是可以滿足人們的需要。反動力量，特別是全國製造家協會及其在國會中的代表們，正在計劃一個公開的行動，以削弱或摧毀職工會。他們正在設法阻止政府採取一些步驟，這些步驟，假如我國必須避免將來經濟危機的最嚴重的後果的話，是必須立刻採取的。同樣地，他們正在拚命準備在極端重要的一九四六年選舉中獲勝。

如果這些反動的政策和力量不受抑制，不被擊敗，美國和世界將面對新的侵略和戰爭，面對反動和法西斯主義在美國的蓬勃生長。

三

雖然，能够擊敗這個反動的威脅，能够使我國在世界事情中，符合美國人民的真正民族利益，而超進步作用的條件和力量，是存在着的。首先，納粹德國的軍事失敗，已經改變了世界力量的對比，有利於民主。它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作用和影響。它加強了俄國和其他地方努力維持和鞏固美蘇友誼和合作的力量。美蘇的團結現在必須擴大和加強。美國絕大多數人民，首先是工人，反對着反動和法西斯主義，擁護着體現在德黑蘭和克里米亞決議以及第二項宣言中的羅斯福總統的對外對內政策，這一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這大多數人民現在必須說出並肯定集體的力量和意志。工人和一切民主力量的團結的勢力必須以決斷的態度有所表現，以使國家堅決地向進步的方向走去。

美國人民必須堅決擁護社會門政府繼續實行羅斯福的為了勝利、和平、民主和六千萬人的職業的政綱的一切努力。同樣地，人民必須對實施此政策一切躊躇，作尖銳的批評，並且竭力反對反動派作任何讓步。必須不對反動派妥協——必須使它孤立，殲滅它。

為達到此目的，必須空前地加強全國民主團結。必須熔合並鞏固一切反法西斯和民主力量最廣泛的全國聯盟，其中包括擁護羅斯福反動心政策的一切人們。為了最有效地形成這個民主聯盟，為了使它對國事發生決定的影響，就必須加強工人階級，特別是進步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者的獨立作用和活動，並且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顯示選為巨大的主動性。必須發展產業職工大會，美國勞工聯合會以及鐵路工人聯誼會之間的最大限度的團結，並且做到使它們完全參加新的世界職工聯盟。

工人在和各界愛國的和民主的力量合作的時候，首先必須增加自己和黑奴、勞農、黑人、青年、婦女、無產者以及小商人及其民主團體之間的聯繫。

四

為了達成最廣大的民主聯盟以及全國最有力的反法西斯團結，至關重要的，是工人須提出一個行動的綱領，這綱領須促進法西斯主義的完全滅亡，加速擊敗日本帝國主義，抑制托派斯和俄國家的勢力，提出人民的經濟福利的建議，保護並擴大美國的民主。

共產主義政治協會認為這樣的政綱應該以下列行動口號為基礎：

(一) 加速廢除法西斯軍國主義的日本

- ▲揭發和驅逐主權和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軍閥妥協和平的人們。
- ▲以一切殖民地附屬民族的獨立之權保證亞洲的自由和民主。抑制設法使美國帝國主義控制遠東的人們。
- ▲促成中國在共產黨人和其他一切民主和抗日力量團結的基礎之上形成團結和自由的中國，以加速勝利。給與英勇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領導的中國游擊隊以充分的協助。
- ▲繼續不斷的戰時生產，堅守工人在戰時不罷工的諾言。停止偏主的煽動。

(二) 徹底消滅法西斯主義，建立持久的和平

- ▲鞏固美蘇友誼和團結，以保證實施德黑蘭和雅爾達的協議，保證持久的和平和全世界法西斯主義的消滅。
- ▲完全實現三強在克里米亞所作的決定。
- ▲懲辦戰爭罪行，再不延遲。處死一切法西斯戰爭罪犯。使德國以勞力與實物作充分的賠償，以供歐洲的重建。
- ▲加強世界職工大會，把它作為各國人民和各自自由民族團結的骨幹。
- ▲維護建立一個以明巴教條計劃和雅爾達協定為基礎的有效的國際安全機構。
- ▲保證各民族都有自由決定其自己的命運，以及建立其自己的政府的民主形式之權。停止英美干涉各民族如希臘、比利時和意大利等。
- ▲立即給波多黎各民族獨立。
- ▲和佛朗哥西班牙和法西斯阿根廷斷絕外交關係。
- ▲撤換國務院中一切親法西斯和反動的官員。
- ▲援助飢餓中的和久經戰亂的歐洲的食物和復興。拒絕胡佛的以反動的財政抵押和統治干涉為基礎的計劃。

▲通過布列頓森林貨幣建議案以及促進國際經濟合作及擴大世界貿易的其他民主辦法。放出大量的長期低利貸款和信用借款，以爲復興和工業化之用。

(三) 滿足人們在後戰中的需要——推動爲六千萬人獲得職業的鬥爭

- ▲使工作的權利和羅斯福的第二人權宣言成爲美國的法律。
- ▲增加購買力以促成最大限度的就業。當加工取消的時候，不減少每星期的淨得工資。
- ▲爭取立即增加工資百分之二十，以適合生活費用的增加。在全國範圍內規定足夠的每小時最低工資。
- ▲建立保障每年工資的原則。
- ▲爭取更短的工作週而不減少工資，足以阻礙戰時生產者則屬例外。
- ▲維護社會門的制定緊急聯邦法案，以擴大並補充現有失業保險福利的建設。開始在失業職業之時立即付給職業保險金之福利支付下去直至失業者獲得新職業爲止。對解僱工人發給足夠的遣散費。保證年輕工人的重新訓練，發育和重新就業。

▲開始大規模的聯邦、國家和市政公共工程計劃，如廢消陋巷，建造租金很低的房屋，農村電氣化，建造新的學校，醫院，公路等等，以避免復員和戰後時期的日益增加的失業現象。

- ▲不減縮政府所有的工廠。如果私人工業不能爲了和平時期的用途而使這些工廠儘量開工了那末政府必須經營。
- ▲繼續並嚴格加強房租和物價管制以及定量分配制度。加強物價管轄局的法律賦與的權力。摧毀黑市。
- ▲利用「工人——僱主憲章」以促進尚未組織的人組織起來，加強集體契約，保障職工會，使不受工賊的攻擊，提高生活水準，並促進爲爭取六千萬人的職業的鬥爭。
- ▲審判戰時囤積居奇者。不減少公司股份利得稅和富者的所得稅。
- ▲通過嚴格納稅——廢除——丁格爾社會安全法。
- ▲維持公平的農產品價格，並保證一切有困難的農民得到國家和聯邦的幫助。

(四) 報答以戰鬥取得勝利的軍人們

- ▲保證一切退伍軍人，不分種族、信仰、和膚色，都有職業及安全。
- ▲擴充「士兵人權法案」的範圍和利益，消滅退伍軍人機關的一官樣文章。保證每個退伍軍人都有充分的職業看護。
- ▲力促進速建立法案，以大量的款項作爲復員費，復員費的支付以重役

的時間和性質為標準，復員費的來源，是徵收收入較多的個人和公司的所得稅。

▲保證一切退伍軍人法定的權益。充分適用於黑種退伍軍人。

(五) 保衛並擴大民主

▲實現每個美國公民的平等權利，不論其種族、膚色、信仰、政治黨派或民族傳統如何。

▲停止奴隸制，禁止反猶太主義，取消一切反共的法律。廢除人頭稅和白種第一主義。停止武裝部隊中的各種歧視制度。

▲保護工人的權利，特別是組織和集體談判之權。

▲禁止一切法西斯團體和活動。

▲禁止危及國家幸福及世界安全的機關和托辣斯的權力和政策。檢舉一切違反反托辣斯法律的行動，以及設法恢復或繼續實施德美加法限制制度及營業的一切行動。保護小規模工商業，擴大聯邦對小規模工商業的援助。

這個綱領代表美國民族和國家的最迫切的利益。這不是一個爭取社會主義的綱領，而只有社會主義，才是完全消滅不安全感，剝削，壓迫和戰爭。這是一個當前的行動綱領，美國的進步人士今天正能夠團結在這個綱領周圍的。這個行動綱領將助成法西斯主義的消滅，促成更穩固的和平以及更大的經濟安全與民主。

這個綱領能獲得絕大多數的人民以取得一九四五年內市政選舉的勝利，以及決定命運的一九四六年國會議員選舉的勝利，這些選舉必須現在就加以組織和準備。這個綱領，經由工人的政治行動，經由強大的職工會代表會議以及團結的各業團體，經由其他的方式和組織為媒介，一定能在各工廠各工業中受到擁護的。

第二部份

五

上述綱領不是輕易就能取得勝利的。反動派將拚命設法分裂人民的行列

，使一個退伍軍人團體反對另一個退伍軍人團體，黑人反對工人，非猶太人反對猶太人，白人反對黑人，耶穌教反對天主教，美國勞工聯合會反對產業職工大會。他們將竭力設法破壞黨派間的聯盟，煽動種族的、種族的和黨派的衝突。為了這些目的，他們將利用希特勒及其共產主義這一種武器，儘量利用大衛·杜賓斯基和諾門·托麥斯之類的社會民主黨人，托洛斯基派人物以及約翰·羅易士和瑪修·伍爾斯之流的人物。

為了對付這個局勢，人民需要大大加強每一個進步團體，特別是工人的團體——職工會。他們需要忠實、勇敢和誠實的領導者——具有清明的眼光和堅定的原則性以及職场上的靈活性的。最重要的，他們需要一個更大、更強、影響更廣、更有活力的共產主義者的黨派組織。

共產主義者現在比歷史上的任何時期對工人和民族，負有更大的責任。而這些更大的責任，能由我們光榮地負起來，因為我們對於工人階級和人民的運籌，會長期艱苦和艱難，也因為我們堅守着馬列主義的科學原則。

共產主義政治協會面對着將來。這幾年來，我們以反對反動和法西斯主義的堅決而英勇的鬥爭為榮。我們促進蘇聯和蘇聯愛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鬥爭，是我們黨努力之所在，也是我們特別引以為榮的一點。在戰場上和國內職線上，我們共產主義者向來站在戰鬥的最前線，以保衛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在爭取建立反希特勒聯盟的鬥爭中，在爭取第二戰場，爭取全歐團結，爭取重獲蘇聯，爭取黑人的權利，爭取強壯和進步的工人運動，爭取不斷時時生產，以及爭取國際職工會團結的鬥爭中，共產主義者的貢獻，一向是誰也比不上的。

六

我們認識，工人和進步運動的將來，以及因此美國在世界大局中的將來的作用，在不小範圍內都將依靠我們共產主義者的政策的正確性，依靠我們的獨立的作用和影響，依靠我們的羣衆活動和組織力量。

這就是今天我們共產主義者必須不僅從我們在反法西斯主義鬥爭中的成績之中學習，而且也從我們的錯誤和錯誤之中學習的緣故。在最近期間，特別是一九四四年一月起，這些錯誤是在於從德黑阿協定的歷史意義中，引出一些嚴重的結論。在這些嚴重的結論中，有一個概念說，在德國失敗之後，大資產階級中的具有決定性的各派會加入完全消滅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並且

會和工人合作，以維持戰後的全國團結。不論從財政資本的階級實質說來，不論從以人民為犧牲，尋求帝國主義的擴張和鉅額利潤的托辣斯和加德爾的戰後目標說來，這個幻想是沒有實生活的根據的。近來的事勢，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在馬列主義的理論上關於對資本的作用，特別是軍事勝利之後的作用的這種修改，引向其他錯誤的結論，例如烏托邦式的經濟展望，以及殖民地附屬國家能在列強的安排之下獲得民族解放等等。這種修改也造成各種使資產階級民主的階級實質模糊起來的傾向，造成社會演化的錯誤概念，使工人階級的獨立和領導作用減至極小。

不僅如此，我們在我們的共產主義組織形式所作的變化，是在上述修正主義的錯誤同時發生的，這並不能不加強某些危險的傾向，傾向于瓦解共產主義運動的獨立和先鋒作用。要實現我們擬議羅斯福的正確選舉政策，也不必要採取解散黨的行動。

共產黨改組共產主義協會的結果，雖然並未減少會員的人數（共產主義政治協會一九四五年的會員登記，說明和共產黨一九四四年會員登記比較起來，人數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但同樣確實地，共產主義運動在產業工人中的生長無疑地受到了阻礙。

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組織的形式或組織的改變，並不是一個原則問題，然而，我們的共產主義組織，不論其地位如何，其性質必須是工人階級的獨立的，馬克思主義的組織，則是有關原則的。而現在，我們必須在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組織、政策和行動中保留這個原則。

當我們集中於戰時主要目標：即一如照從于戰時的勝利，擄獲納粹德國和軍閥日本的時候，這些錯誤由於一種過份簡化而只有一面的看法而變本加厲了。這些錯誤的造成，是由于我們在空前活躍地參加並促進全國團結的廣大陣營之際，下意識地讓我們的一些政策受到非工人的、資產階級的影響。由于我們不願以馬克思主義自我批評的精神來經常分析並檢討我們的政策和黨的工作，特別是由于我們沒有使全體會員討論和決定我們的基本政策，這些機會主義的錯誤是加深了。

我們過去犯下的機會主義的錯誤，並沒有主宰我們的戰時各項政策。雖然如此，它們不利地影響了我們的戰時工作，限制了我們反法西斯活動的有成效，而且使共產主義和進步的工人運動在戰後期間有迷失方向之勢。當我

們共產主義者開始檢討戰後建築，並且對國際上若干新的發展有正確的反響的時候，我們對於世界的新發展，還是適應得太慢，因為我們沒有了解過去爬入我們政策之中的基本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因此，在這一方面，我們必須認識羅斯福同志在反機會主義鬥爭中的重要貢獻。同樣地，我們能夠會杜克洛，法國共產黨最先進的領袖之一，在最近的文章中所表示的誠懇的兄弟般的、馬克思主義的意見的基本上的正確性。

七

顯而易見，要在戰後時期作為工人階級的和民族的利益的比較遠見而能幹的保衛者，來有效地完成我們共產主義的任務，其唯一的、最緊要的先決條件，就是迅速地決定地克服我們的錯誤和失策，特別是要在我們的政策和黨的工作中肅清一切機會主義的殘餘。為達到此目的，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的一切會員和組織必須立即對我們的政策和領導，作一次徹底自我批評的檢討。我必須在黨組織之中建立真正的內部民主和自我批評。我們必須清洗和加強協會中一切負責領導的委員會中的人員。即這樣做，我們必須對一切宗派主義，一切歪曲，一切削弱我們共產主義組織的基本團結的傾向作戰。

同時，我們共產主義者必須避免一切教條主義的傾向，並且勇敢有力地擴大我們自己的反法西斯黨派活動，積極地參加廣大工人和民主運動。我們必須堅決地加強我們獨立的共產主義的工作和黨派活動。我們必須特別是在產業工人中建設我們的共產主義協會。我們必須在理論上建設一個堅決的思想意識的鬥爭，提高我們組織和領導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

我們共產主義者重新保證盡一切力量，以擴張法西斯主義，以促進美國和世界的民主事業，民族自由和社會進步的事業。我們決心和一切反法西斯主義者和一切民主力量合作，以達到這些偉大的目標。

世界職工大會的籌備工作

蘇聯職工會
中央委員會書記 M·塔拉索夫

今年，我有機會和其他民主國家的職工會領袖們一起，參與幾次國際會議。在二月間於倫敦舉行的世界職工大會之後，該會組織了行政委員會，行政委員會先在巴黎，後來在華盛頓和舊金山開了會。今年，英國、保加利亞、法國和羅馬尼亞等國的職工會代表團，訪問了蘇聯，而意大利和美國的代團，不久以後也將訪蘇聯。蘇聯職工會領袖們曾訪問巴爾幹諸國及芬蘭；有一個蘇聯代表團現在美國，另外一個正在伊朗。加強民主國家的有組織工人之間的，特別是蘇聯職工運動者和外國兄弟之間的聯繫的工作，已經做得很多了。英美法蘇及其他國家的職工會領袖們，正努力從事創造一個世界職工聯盟的重要工作，以擁抱一切國家的職工會，保障工人的利益。

這項工作目前的情況如何呢？行政委員會在三月間於巴黎舉行的會議上，已經草擬了世界職工聯盟章程的初稿草案。行政委員會又在四月十四日起在華盛頓開會，繼續在舊金山附近的一個小城奧克蘭開會，直至五月初，在這些會議上，擬定了最後的草案。

行政委員會通過的章程草案，是在作為一個團體的基礎，這團體將是一個有效的武器，足以保障工人的利益——就廣泛意義上了解的工人的利益。

章程的序言說，職工聯盟的成立，是為了實現一九四五年二月在倫敦舉行的世界職工大會所規定的宗旨和目標。因此章程宣佈世界職工聯盟的奮鬥目標應該是：

「把全世界職工會都組織並團結在聯盟中，不問其種族、民族、宗教或政治意見如何；」

「在必要時，援助任何社會或工業較不發展的國家內的工人建立職工會；」

「繼續鬥爭，以決定地擊敗法西斯主義，消滅一切法西斯形式的政府以及法西斯主義的一切形跡，不管它採取何種形式活動，假借任何名義；」

「為消除戰爭及破壞的原因而鬥爭，以充實維護建立一個有力和有效的國際組織，來為穩固而持久的和平而工作；」

「使世界工人的各種利益，由各團體國際性的機關來代表，這些機關的責任是在解決世界機構的問題……」

「組織所有國家的職工會的共同鬥爭：反對對於工人經濟和社會的權利以及對於民主自由的一切侵害；爭取滿足工人對就業安全的需要；爭取工資、工時以及工人的生活條件的進步改善；爭取充分和足夠的社會安全，以保護工人及其家庭，使不致受失業、疾病、意外和老年的威脅；爭取採取一切其他辦法，以促進工人的社會和經濟福利……」

「為達到此目的，世界職工聯盟把它的工作以下列原則為基礎：

- 一、各國職工會內部的充分民主以及各國職工會之間的密切合作；
- 二、和各個參加聯盟的職工會組織經常

接觸，並對它們的工作作兄弟般的支持和幫助……」

根據這章程，一切國家的職工會中心，如果承認世界職工聯盟章程中規定的原則和宗旨的話，可以參加世界職工聯盟。由聯盟各國總代表所組成的世界職工大會，是聯盟的最高機關。大會每兩年舉行一次。世界大會選舉一個聯盟的總務委員會以及一個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包括委員二十一人，其中有總書記一人，是世界聯盟的主要執行人員，指導它的各機關和事務。執委會在自己之中選出一個主席和四個副主席，這五個人和總書記在一起，構成世界聯盟的管理局，該局將是執行委員會不開會期間的世界聯盟的執行機關。執委會每年至少開會兩次。章程草案中規定世界職工聯盟的總局是在巴黎。

行政會議在巴黎舉行的會議上所未及成立最後協議的各點之中，有兩點是很複雜的：一點是世界聯盟所通過的決議，對加緊各國團體是否有東德性的問題，另一點是所謂國際職工會秘書處是否應有代表參加聯盟的各機關的問題。行政委員會會化費了不少時間，討論這些有爭論的問題。但結果成立了令人滿意的協議，這一事實，應十分重大。

我不願遮掩下列事實：有些人確實在這些問題的意見分歧時投機取巧。他們希望那些分歧成為無法克服的困難，或甚至使起草章程之舉成為毫無結果的事情。這些希望是歸於破滅了。

在決議是否有束縛性的問題上，行政委員會所

制本的中議，是以下列考據為根據的，即章程上必

須保證世界職工聯盟不是一個無能的評議機關，不是一個聊天的場所，不是一個其決議無非是一堆廢紙的機關。我們認為加盟各國職工會中心應該由有權威的人物代表出席世界聯盟，這樣，世界聯盟才能成為各國職工會的利益的代理人和保护者。因此，聯盟領導機構的決議，對各國職工會中心必須具有約束性。要不然，組織一個世界聯盟就沒有什麼意義了。最後地分析起來，聯盟的決議是否應有的束性的問題，就是這些決議是否應該有效，因此也就是整個聯盟是否值得存在的問題。

章程草案第五條第四節，就是以這個原則為指導的，那一節說：

「在大會、總務委員會或執行委員會閉會之後，世界職工聯盟的各加盟團體須在三個月之內，把自己為了實施大會、總務委員會或執行委員會決議，把這些決議在自己國內實行而採取的步驟，通知總書記。」

至於國際職工會秘書處問題，是所謂阿姆斯特丹國際秘書處文納爾和國際運輸工人聯盟的奧爾登布勒克所發動的喧嘩不休的爭論的綜合和本質的問題，其目的在減低這些組織的數目衆多的代表，來沖淡世界聯盟的各種的作用。這種打算，顯然憑藉着一些動機，那些動機和國際職工會運動的加強以及世界聯盟組織的宗旨，毫無關係。那些動機是這樣的：以致使行政委員會，最後認為在章程草案中，最好簡直不提到那些所謂秘書處，因為行政委員會注意到，要確實證明那些所謂秘書處是否真正存在過，它們做過些什麼，或它們代表着什麼人，簡直都是不可能的事。

章程中同時規定總務委員會需要時，可以設立各業的「同盟部」。這些同盟部對總務委員會

和執行委員會負責。

由於章程草案成功，創立世界職工聯盟的工作，完成了又一重要階段。

行政委員會決定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召開世界職工大會第二次大會，以通過世界職工聯盟的章程。通過了章程之後，大會將繼續開下去，成為世界職工聯盟的第一屆大會。

開會的通告已經寄給曾經出席倫敦舉行的世界職工大會的各職工會團體，寄給曾被邀參加該會，但不及派代表出席的各職工會團體，寄給起初雖然沒有派代表參加倫敦大會，但後來在世界職工大會的委員會上通過入會的各職工會團體。

代表的原則如下：擁有會員十二萬五千人以下的全國性的職工會團體可派代表一人，十二萬五千人以上，五百萬人以下的團體，可以在每二十五萬會員中派代表一人，五百萬至一千萬人的團體，每五十萬會員可派代表一人，等等。在英國原則上，蘇聯各職工會有資格派代表至少四十人出席大會，英國各職工會代表的人數約等於蘇聯的一半，美國產運職工大會代表的人數則和英國彷彿。

各國職工會中心正在致力於審查並研究行政委員會所通過的章程草案。它們將把修正草案的意見提交巴黎的委員會。

這樣，面對着行政委員會的爭論問題，已經令人滿意地解決了。雖然如此，正如工人運動長期的經驗所指出的，創立國際性的職工會聯盟，不是一個輕易的任務。無論如何，這是一個以前從來沒有完成過的任務。以為工人階級運動的隊伍中不會有團結的敵人，就未免輕率了。有的「公開活動的和暗藏的」都有。有一些人正在竭力阻正有組織的工人隊伍的接近。他們準備繼續其毒辣的分裂職工，這個分裂職工會十分阻礙了反對法西斯主義的

戰鬥，其惡毒的後果，曾經在各國引起了很多的虛事情。

在行政委員會的工作過程中，我們還看過這類以這一種或那一種形式出現的傾向。不必諱言，這些傾向的後果的代理人，是所謂阿姆斯特丹職工國際的總秘書文納爾斯。客觀地回憶事實，使我們不得不承認，行政委員會的若干委員方面對於這些傾向，並未經常加以迅速而有力的駁斥。

使聯盟的會章失效，使這會章塔上古老同，不積極和無能的阿姆斯特丹國際的幹部的企圖，特別是承認該國際以代替世界聯盟的提議，反映不出這些份子的詭計，這些份子甚至現在還在國際工人階級運動的隊伍中進行分裂政策。主要的分裂者是美國勞工聯合會主席威廉·格林，他拒絕參加創立世界職工聯盟，他竭力在美國工人眼中樹起蘇聯職工會和美國產運職工大會，公然聲稱他們不和它打任何交道。格林破壞了使破產了的阿姆斯特丹國際復活的重擔。國際工人階級運動團結的敵人，顯然將繼續利用這個垮了台的「國際」的旗幟，努力破壞工人的團結。格林公開聲稱要用他的控制之下的美國工人團體的勢力和基金，來恢復阿姆斯特丹國際。該國際的總秘書文納爾斯是世界職工大會行政委員會的委員之一，並且曾參與起草世界職工聯盟的章程，那是真的。但不幸地，他認為，試法使阿姆斯特丹國際起死回生，就可能使阿姆斯特丹國際混入世界聯盟。法國訪談工人聯合會向領袖們會給我寫來信稱他給他們的一封信，日期是六月二十六日，信上說，他無意於結束他的組織。他明白宣佈「因為希望創立另一個國際而停止這一個國際活動，實在是不智之舉」。不僅如此，歐文納爾斯乾脆預料「這一切會使世界聯盟的創立遲延。他寫道：

(下接第 頁)

論科學的預見

華西里也夫作
凱 豐 譯

「神奇的預言是神話，科學的預言是事實。」——列寧
「為着領導，必須預見。」——斯大林

根據於研究自然和歷史的規律法則，為着作用於它們，並利用來為人類預見預見，科學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預見將來。
力圖預見將來變遷進程，意圖揭發掩蓋着而帶來的幕。這是很早以前就是人類所固有的。

自然，我們不是指那些以鳥獸鳴而定吉凶的一切種類的預言家，星象家，卜筮者以及類此的江湖好漢，這樣的人在古代有極多，而在資本主義國家內，現在也還存在不少。我們所說的是關於人類發展的智識，這種智識是科學地處理預見的問題，是根據科學的認識自然法則方法，並且依據這種認識，來學習作用於自然。——力於底變異和進程。

人類力圖去科學的預見將來，是根據科學的初步。古代希臘的唯物論者，以日食（法列士）和荒年（德謨克里特）的預言，來使他們自己的鄰居驚奇起來。

關於自然界的科學後來的發展，在自然科學的事實方面的預見是向前進展了。近代的天文學，氣象學，醫學，關於當前的日食和月蝕，關於天候，關於這種或那種疾病的進程和結果，常常給以數字計算的確切的預言。

但是，科學的提出關於歷史的預見問題，當人類社會發展的真實的，物質的法則停留在科學範圍以外時，是不能得到也沒有得到自己的解決。

只有對徹底地實行科學的唯物論的解釋一切現象——不僅是自然界而且人類社會——底宇宙觀，才能在堅固的科學的基礎上提出預見的問題，這種宇宙觀切地反映在自然和歷史發展的法則，給這些法則以正確的了解，並在這種基礎上才有可能預見變遷，這種宇宙觀把前人類的科學和哲學

所創設的一切優良的、一切先進的、有價值的東西體現出來。

人類長期地在社會生活現象的領域內——對科學是較複雜的領域，對預見的問題下了工夫。就是人類的這些天才家如烏托邦社會主義者聖西門、歐文、傅立葉也非例外的包括在這一隊伍內。他們關於人類社會將來的制度，給了許多天才的預見，許多預言，但是這些偶然說出的而沒有科學根據的猜測，還是烏托邦。這的原因，就在於這些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沒有看見和沒有了解社會底真實的、物質的法則，對社會的了解上他們仍是唯心論者。

民粹派在他們的俄國的「自給自足」的「社會主義」的計劃中，是烏托邦主義者，但是只是小的反動烏托邦主義者。他們的一切計劃，只是好的願望，無根據的幻想，無根據的藥方，這根本上任何科學的意義，因為不是科學的預見。大家都知道，民粹派在理論上是落後的無產階級的人，對社會現象的了解上是唯心論者。他們苦心孤詣的去「預言」俄國發展的進程，常常是而且一定是遭受了破產。

使有可能來正確的去了解所發生的變遷，它們內部的聯系，它們發展的法則底那種力量，預見它們在將來發展的趨勢底那種力量，這種力量就包含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內。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以為科學的預見所必備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武裝着，這種辯證法教導我們先了解變化的內部聯系，在運動中、變化中、不斷的革新和發展中去觀察自然界，教導我們去了解發展中革命的飛躍性規律性，這種辯證法脫離於向上昇進的永久的前進的運動底不可征服性，教導我們去揭露和解決一切發展所固有的生動的辯證的矛盾。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論這種卓越的武裝武裝着，武裝起哲學的理論，各種理論教導我們了解自然界是在它的實際上

去了解，教導我們要用唯一的科學的唯物主義去對待自然界的現象，這種唯物主義法則對於自然界的完全可認識性，說到關於人類能夠通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發展其目的法則，並使這些法則為自己所服務。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給予這樣一種卓越的武器，如像歷史唯物論：這種理論揭開人類社會、一切政治聯繫、思想和意識形態真正的物質的基礎。

運用辯證法唯物論對社會發展的法則。這就武裝了人類首先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以巨大的力量和精力來科學的預見歷史發展底將來道路，給了工人階級政黨「這樣一種武器，藉這種武器的幫助，它認識現在，預見將來。」(註一)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在人類前頭揭開資本主義社會必然死亡底法則，這就在共產主義的改造人類社會底理論下，安放科學的基礎。

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共產主義理論，武裝起對改造人類社會底道路之了解。馬克思列寧天才的學說說到社會主義革命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是人類從人到人類中解放出來必然的道路，是科學的預見底卓越的武器，這種預見在黨綱的經驗中如此光輝的證實了。

列寧和斯大林所製定的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戰略和策略，綜合世界無產階級運動巨大的經驗，就是馬克思主義關於預見科學上最有價值的寶藏。

「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力量，就在於它總以一種可能，去在周圍環境中判別方位，去懂得周圍環境的內部聯繫，預見事變的進程，並且不僅認識清事變現在是如何發展，並向那裏發展。」

「只有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政黨，才可能有信心的前進，並引導工人階級前進。」(註二)

政策就是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事件。預見各階級的運動，這就是說有着一個階級敵人底決定的工具在手裡。在工人階級的鬥爭中，理論的作用是不可估價的，理論幫助去了解各階級在現在和將來的運動，與革命階級的實踐，與革命鬥爭不可分割的聯繫的這種理論，表現出最偉大的力量：

「因為理論，而且只有理論，才給予階級運動以確信力。給運動以判定方位的力量，和對於四周環境內部聯繫的了解；因為理論，而且只有理論，才能幫助實際不僅去了解目前各階級如何行動，並向那裏行動；而且去了解在最近的將來它們如何行動，並向那裏行動。」(註三)

為着要指導預見，必需要獲得自然界發展的規則和社會發展的規則。沒有社會發展的知識，誰也無能力去不能去預見事變。沒有社會發展法則

的知識，要預見是不可能的。

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力量和意義，正如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所光輝的表示了的，就在於它科學地揭開社會發展的法則，並教導去運用這些法則來領導無產階級的革命行動。

註一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俄文本，三六頁

註二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俄文本，三三九頁

註三 斯大林：「關於列寧主義問題基礎」

二

布爾塞維主義根本仇視尾巴主義、自發論。這在一切方面都應當是階級底先進部份，和前進底階級去領導階級。列寧和斯大林這種教導我們。黨要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階級，就應當引導工人階級前進，比它更看到這一些，看到將來。為要執行這一任務，工人階級底革命政黨應當預見事變的進程。

「……要真正的成為先進階級，黨應當用革命的理論，對於運動規律的知識，對於革命規律的知識，來把自己武裝起來。」

「黨應當是站在工人階級的前面，它應當比工人階級看得這些，它應當引導無產階級而不是限制無產階級。」(註四)

我們黨的整個歷史，從它的出現起到今天為止，就是明證的證據，證明明列寧和斯大林所給予我們黨一切指示，是引導向前進的階級領導底光輝的模範。

沒有明證的前途，沒有明證的鬥爭目的，沒有對一般的鬥爭的道路和鬥爭的方法的知識，沒有對一般的勝利條件底知識，不看到將來，即是沒有預見，要為共產主義而鬥爭底正確的領導是不可能的。

今天美國地工作(因為今天的工作和鬥爭)——是準備和美國地工作的更廣闊的將來)，是因為想到將來，想到共產主義！自覺的對美國地工作底每一個步驟，都應當準備到新的更廣闊的將來去！自覺的每一個步驟都是與共產主義、為人類完全解放而鬥爭的最近目的相聯繫着！

斯大林同志在十五次大會上關於聯共中央的工作報告中，就分佈這的工作的缺點問題時，他指出自發論的害處，力圖「隨波逐流，安安靜靜地，不顧前途，不將將來地隨波逐流」。『隨波逐流，可是潮流會把我們沖到什麼地方去，不去管它。』(註五)

在引證斯夫的例子時，說到他們真誠地、手不停息的勞動，但是他們沒有看到潮湧要把他們漂到什麼地方去，斯大林同志作出下列的結論說：

「沒有前途的工作，沒有能沒有軌的工作——只是隨波逐流的願望，就要走到那地步。結果怎樣呢？結果是很明顯的：起初，他們漸漸生起騷來，後來，他們就要變成灰色的，後來，就使他們墮入庸人的泥坑中，而後來，他們就變成普通的一個庸人。」（註六）

這樣一種不善於預見的、失去前途的、不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工人人員，如像最近幾年來實際上所証明的一樣，人民的敵人、外國的偵探最想把他們組織起來。

要成為共產主義的堅定的和不動搖的戰士，要為着科學的領導工人階級的鬥爭，必得有明確的鬥爭目的、前途、懂得運動的方向。我們的高，我們的領袖——列寧和斯大林是這樣來領導的。

在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同志在分析關於沒有外國的援助我們能否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問題時，他肯定的回答說：

「不懂得要建設一些什麼，就不能真正的去建設。不懂得運動的方向，就不能前進一步。我們黨，習慣於在自己前面要有明確的和確定的目標的黨，關於前途的問題是我們黨最重要的一個問題。」（註七）

對於鬥爭前途的問題，我們的將來問題，斯大林同志與托洛茨基主義者進行了無情的鬥爭，他們一般的否認在一國內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特別是否認在蘇聯的可能。斯大林同志在反對托洛茨基主義與反對列寧主義底一切其他敵人的鬥爭中，堅持和發展在一國內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的學說，他在聯共（布）十五次代表會議上說：

「有人可以這樣問：為什麼要爭論我們革命的性質和前途這些問題，為什麼要爭論在將來會怎樣，或在將來可能是怎樣，——難道把這些爭論弄開，去費費費工作不更好些嗎？」

「同志們，我認爲問題的這種提法，根本上是不正確的，因為這與列寧主義沒有相同之處。」（註八）

斯大林同志的這些話指出了我們黨的力量，以及它與世界上所有一切其他政黨底原則的區別。新型的黨，領導着實現有科學根據的目的而自覺的鬥爭的黨，科學的指揮千百萬勞動羣衆運動的黨，善於科學的預見自己最近的目標和最終的目的以及鬥爭的任務的黨，這種區別是布爾塞維克黨顯著的特點。關於總的目的及達到這總目的的途徑底明確的意見，給予布爾塞維克

黨以可能來組織羣衆底積極的鬥爭，爲創造新的社會並爲迅速的消滅舊的剝削者的社會鬥爭。

國際修正主義的始祖伯恩斯坦，以及在他以後的，俄國的「經濟派」和孟塞維克派把革命階級的一切任務只是歸結於經濟的鬥爭，爲五個銅板的鬥爭，否認工人階級的最終目的——即爲共產主義的鬥爭。伯恩斯坦說：「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沒有什麼。」這就是根本式的改良主義的公式，無前途的奧公式，根本上仇視馬克思主義的公式。斯大林同志說：

「我們如果不知道指那裏去，不知道運動的目的，我們就不能推向前進。沒有前途，沒有這樣的信心——我們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我們可以完成這個建設，我們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沒有明確的前途，沒有明確的目的，黨就不能領導建設工作。我們不能用伯恩斯坦的藥方來生活，他說：『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沒有什麼。』恰恰相反，我們是革命者，應當使自己的運動向前進和實際工作服從於無產階級底基本的階級目的。如果不這樣，就必然的要陷入機會主義的泥坑而不能自救。」（註九）

斯大林同志所給予的關於在爲社會主義而鬥爭中的後來的進程所完全說實了的。

列寧和斯大林着重指出，對於布爾塞維克明確的了解前途和關於鬥爭目的底明白的意見，是有着巨大的意義，他們創造出了新型的有組織的覺悟到自己的目的、方法和行動的革命家，這種革命家在歷史的進程中擔負着最大限度的創造性的作用，羣衆底組織者的作用。這些羣衆創造新的歷史、創造新的共產主義社會，無情地和勝利地摧毀社會主義底一切敵人。

共產黨員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常加研究，並幫助勞動羣衆通過這個偉大的先進的科學底基礎，創造懂得自己目的和社會發展規律底羣衆新的組織力量，羣衆是歷史的創造者。我們布爾塞維克黨武裝自己，武裝我們的知識界和全蘇聯的人民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創造新型的有組織的社會主義的人，他們有明確的目的，認識自己的力量，克服一切障礙。在創造新型的人——爲共產主義鬥爭的自覺的戰士底這種事業中，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前途關於預見的學說實有偉大的意義。

「列寧主義的偉大意義，就是在於它不承認我們的建設是隨意的、盲目的，它也不幻想沒有前途的建設，它給予關於我們工作前途的這個問題以明確而肯定的回答；它申言，對於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的經濟我們有一切條件，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註十）

還在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同志對斯威特洛夫大學的這種回答，總過十一年的時間，當經濟學的勞動者在基本上建成了社會主義，並開始過渡到共產主義最高階段的條件，就完全證實了斯大林同志的話。

整個我們黨的科學的工作應當是建築在科學的預見上。在現在，無論是在執行我們的一切計劃，或是在揭破和無情的消滅很好地隱藏着的人民底敵人的殘餘：偵探、暗殺份子、危險份子，這都是特別重要的。

在我們社會主義的社會內，結束了社會發展的自目的法則，一切國民經濟部門都是按照計劃進行，那末完全清楚的，沒有預見就不可能領導。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

「坐在指揮台上，眼望着，當着情況還沒有某種不幸的事情攔到我們前面來時，什麼也看不到，這還不能叫做領導。布爾喬維主義不是這樣了，領導。爲着要領導，必須要預見。同志們，預見不是常常容易的事。當着少數的某些領導同志，到和注意我們工作的缺點，而工人羣衆不願意或者是不能够看到或注意到缺點時，這是一回事。在這裏就有一切機會來確定他們所到的，是大家所不注意的。當着千百萬工人與少數的某些領導同志一齊看和注意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揭露我們的錯誤，在總的建設事業中武裝起，並指出被遺棄的道路，這另是一回事。」（註一一）

這就是應當怎樣來了解真正的布爾喬維克的領導，來了解領導門爭的最高的階段，列寧和斯大林給予我們的這種領導底模範。

- 註四 斯大林：「關於列寧主義問題基礎」
- 註五、註六 均見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 註七 斯大林給斯威特洛夫大學的「問題與回答」
- 註八 斯大林：「再論我們黨內社會民主黨的傾向」
- 註九 斯大林：「再論我們黨內社會民主黨的傾向」
- 註一〇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
- 註一一 斯大林：「關於四月中中央全會工作」，一九二八年

三

馬克思和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給予我們對預見的光輝的例子，這些例子是顯示人類智慧空前的透入到社會生活複雜的事變底本質內去。

他們時常在十數年以前預言事變，後來，這些事變都是令人佩服的確切地實現了。雖然，如列寧和斯大林說過，預見事變的日期和時間是不可能的，可是馬克思主義的偉大領袖和創造者，絲毫不差的甚至連時間也預言中了。

現在來說一說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創始者某些傑出的預見底模範。

到一八四七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創造了一種宇宙觀，這種宇宙觀在「共產黨宣言」著作中得到了它的第一次完全成熟的表現。馬克思和恩格斯創造自己的理論，並運用這種理論來分析資本主義的表現，來分析資本主義將來發展的條件，將來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以及經過革命由共產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條件。列寧說：「對馬克思便自發地提出這個理論這比列寧主義的將來的破產和未來共產主義底未來的發展上的。」（註一二）

但是，這還是可能的呢？有什麼根據提出現在還沒有實現只有在將來才能實現的問題呢？列寧對這個問題給以回答：

「試問根據什麼材料可以提出未來共產主義之未來的發展問題呢？

可根據的，就是共產主義從資本主義之內產生出來，它在歷史上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它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社會力之動作底結果。馬克思絕對沒有要創造一個烏托邦和憑空構想一件不可推測的東西的那種企圖。」（註一三）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力量就在這裡。這一點也不是測字算命，還只是嚴格的客觀的科學，只是最嚴格的分析事實及其發展的趨勢。

列寧說：「馬克思研究共產主義問題，正確自然科學家研究一種新的生物形態底發展問題一樣。既然我們知道一物的來源，又知道此物變化的一定方向。」（註一四）

馬克思提出關於共產主義問題正是這樣。馬克思和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在同樣的情形下提出一切問題。因此，他們分析無疑的是如此確切的，因此，他們的指示是如此確切的，他們對事變和現象的天才的預見底力量是如此偉大的和驚人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在一八四八年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提出了下面的論點：

「資本存在的條件是僱傭勞動，僱傭勞動完全建立在工人中間的競爭之上。這種階級不得已地，不能抵抗地所造成的產業進步，使得因聯合而增廣

的工人們的革命團結代替了因戰爭而引起的他們的分裂。這樣，隨着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所藉以進行生產與佔有生產物的基礎本身就從資產階級的腳下被抽掉了。資產階級首先就產生了自己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死亡與無產階級的勝利同義是不可避免的。」（註一五）

根據這種分析，根據建立在現象底聯繫的聯繫上的分析，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了自己的、不能駁倒的無產階級革命底結論——預見。我們知道，這個結論——預見經過七十多年在蘇聯證實了。在俄國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實現了馬克思關於資產階級死亡與無產階級勝利底不可避的預言。

把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以及其他傑出的預言——預見放在一邊，我們來說一說一個很少為大家知道的預言，即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創立俄國公社的必然的預言，這個預見是在一八八一年向斯捷夫爾的聚眾大會致慶祝詞時說的，這預言是如此的新鮮，有如在一九一七年革命前所說的一樣。

「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名的預言——預見：

「當着……經過再變的屠殺後，國防派設立了「秩序」，巴黎公社是被摧毀了，可是勝利者很少想到不到十年在遠方的彼得堡發生了事變（大約這事所指的是——一八七六年在卡桑大學集合的學生和工人的示威——作者註），這個事變在鬥爭之後，可能以長期的殘酷的鬥爭，歸根結底是不可避的，要引到創立俄國的公社。」（註一六）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看得很遠。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俄文並非無目的的。他們看到了新的力量即俄國無產階級的增長，並對列的相信它的最終勝利。

在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開始後的第四天（七月二十三日）馬克思在國際總會第一個宣言內寫道：

「英國工人階級，兄弟般的將他們的手伸給法國的工人，正如他們伸給德國的工人一樣。他們相信，不論現在的可怕的戰爭如何終結，全世界工人的聯合，最後是要模範一切戰爭的。在官場的法國西與官場的德意志進行自相殘殺的搏鬥時，工人們却相互致送和平與友愛的祝詞。只是這一件事在歷史火與相相比的事實指示出，與經濟貧窮，政治荒謬的舊社會相反的新社會，是在誕生着了，這新社會的國際原則——即勞動。」（註一七）

馬克思的預言中了。現在有這樣一個國家，那種的統治就是勞動，那種的國際原則就是和平，——這就是蘇聯。

馬克思的職友——恩格斯，根據運用辯證法來分析事變，來分析階級力

量的相互關係，給我們不少的光輝的預見事變的驚人的模範。

列寧在一篇論「預言」的文章內說到關於絲毫不能預言中的許多科學的預言之一。在一八八七年，恩格斯為波爾克海姆的一本小冊子寫了一篇序言，在那裡他描寫到將來世界戰爭的描景。這是在第一次大戰前二十七年和十月革命前三十年寫的。這篇序言的每一句都是充滿了無限豐富的思想，並按其科學的真實性來說，對一九一四年所爆發的世界大戰以及由大戰所產生的對「預言」的後果，給了一個特別的模範預見。

「……普魯士意志如果要戰爭，除了世界大戰之外，就不可能了。這世界大戰，其範圍及其猛烈，都是向來所夢想不到的。幾百萬至一千萬的士兵，將互相屠殺，在他們互相屠殺時，把整個歐洲吞下了，把什麼東西都毀去，比一大羣蝗蟲還要利害。三十年戰爭的物質破壞，縮減為三四年，而且遍及整個大陸：飢荒、瘟疫、軍隊與民衆因生活極其困苦而普遍墮落；我們的貿易工業和信用！這些人造的機關，陷於不可收拾的混亂狀態；結局，整個破產；舊的國家及其傳統的國家智慧，崩潰到同樣的地步，一打一打的皇冠在路上滾着，沒有人去拾；絕對不可能預知勝利之條件。」

「準備相互戰爭的制度，推到極端，當它最後產生其不可避的結果時，其前途就是如此，這個地方，我們的王侯們和政治家們，就是你們的智識已把整個歐洲帶到的地方。當你們不得不開始最後的大戰時——那時我們正合適。戰爭也許把我們暫時推到後面去，我們所以奪得的地位也許有許多會被掠去。但是，當你們把你們所不能再統治的力量放出來時，事勢就將自然發展，到了悲劇之末了，你們就將滅亡，而無產階級的勝利，或已完成，或總是不可避的了。」（註一八）

這是何等的事變驚人的預言！列寧在自己的文章內對恩格斯的說：「何等天才的預言！」列寧說，雖然恩格斯的預告有某些與事實不同，但是從一八八七年起經過三十年不能不有所變更。「但是最驚人驚奇的，是恩格斯的預言有這許多都「照他所寫的」實現。」

到一九一八年，恩格斯所預言的，戰爭的直接結果是實現了；在一個國家，在俄國，工人階級的勝利是取得了，在另外一些國家造成了勝利「總是不可避的」條件。戰爭的結果，取下了俄皇、德皇、奧皇、土耳其王、波斯王以及其他較小的國家的皇帝皇冠。這種驚人的預見事變的基礎，就是無條件的確切的估計和分析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切條件，而首先是無條件的確切的估計階級力量的相互關係。

恩格斯以天才的預測，應當使現在進行新的人民的大規模的帝國主義者，尤其是現在的世界不是一九一四年的世界了。由共產黨所領導的工人階級的覺悟，大踏步的前進了。向資本主義階級的思想在工人階級的覺悟中成熟着。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已經有在基本上建成了的社會主義的國家，這與國家對任何一個新發生的社會主義國家將表示強大的幫助。

在一八九四年，恩格斯死以前的數個月，他給了另一個也是很有名的預見的模範，恩格斯在給社會主義工人雜誌（*Die Arbeiter*）編輯部的信中，他說：「全世界被壓迫階級都是處在新的優良的社會（即沒有人剝削人的）的曙光前面，被壓迫階級都在圍繞自己的隊伍，他們到處都在不顧國界不顧語言的差別而共同行動起來。組成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軍隊，而正在到來的新世紀裏使得它（無產階級的軍隊——譯者註）走向勝利。」（註一九）

恩格斯看到了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曙光，雖然他沒活到這個社會出現的時候，這個社會在恩格斯逝世後，在他死後的二十三年在蘇聯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這樣遠的看到前面，看到數十年的前面，驚人的確切的預言事實的進行和結果！

這種預見的基礎，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這是了解因果的相互關係或準確的指南針，使得有可能來看到發展的一般的方向，一般的趨勢，使得能夠看到將來，看到將來是為着在現在來領導共產主義的鬥爭。

- 註一二 「列寧全集」卷二二，四二八頁
- 註一三 同上
- 註一四 同上
- 註一五 「共產黨宣言」
- 註一六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一五，五五二頁
- 註一七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 註一八 引自「列寧全集」卷二三，一〇五——一〇六頁
- 註一九 「馬恩全集」卷一六，下冊，四三二——四三三頁

四

我對蘇聯的人民和全世界都知道列寧是近代偉大的人物，是科學底泰

創造性的掌握馬克思的科學，並發展它，列寧具有觀察事物的巨大的力量。列寧的這種能力在革命轉折的關頭，達到特別的偉大和明白。

「……列寧的天才的明達，都沒有像革命轉折時期那樣表現得顯露和明白。在革命轉折的時候，它們簡直像花草一樣地開起花來，眼光明白得像鏡子一樣，預先猜透各階級底運動和革命的必然曲線進程，他看見這些東西看得這樣明白，簡直像看手裏上的東西一樣。無怪乎俄國黨員中間時常有人說：『列寧會在革命波浪上游泳，好像魚兒會在水裏游泳一樣。』」

「由此，列寧所提出的策略口號，明顯得使人『眼花』，列寧所想出的革命的計謀，勇敢得使人『頭昏』。」（註二〇）

列寧早期的著作之一——「什麼是人民之友和他對社會民主派」，就是這種天才的洞察力的模範。這部著作是列寧在一八九四年寫的，當時列寧還才二十四歲，在這部著作中列寧最初提出五黨革命聯盟的思想，並指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

在這本書內，列寧徹底地揭破民粹派，並指出他們欺騙人民的面目，是富農利益的代言人，列寧說：

「社會民主派把自己的一切注意和自己的一切行動都集中到工人階級身上去。當它的先進代表通曉科學社會主義思想，關於俄國工人的歷史作用時，當這些思想得到廣大的傳播並在工人中創設出強固的組織，把工人現時分散的經濟戰改造為自覺的階級鬥爭時，那時候，俄國的工人階級就成為一切民主份子的領袖，推倒專制政體，率領俄國的無產階級（與全世界無產階級一道）用公開的政治鬥爭的直接道路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革命。」（註二一）

這是在四十四年以前寫的。列寧的預見以驚人的真實地說中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指出這一點，對列寧的這部著作作這樣的估計：

「……四十多年以前，列寧正確地指出了工人階級鬥爭的道路，確定工人階級的作用是社會上先進的革命的力羣，確定農民的作用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者。」

在一九〇二年，列寧在自己的一本著名的書「做什麼？」內，他給了馬克思主義黨底理論基礎的分析，他預測放在俄國工人階級身上的歷史任務和作用如下：

「現在歷史給了我們一個迫切的任務，這個任務是其他任何國家的無產

階級最迫切的任務中，革命的任務的一個。實現這個任務，不僅是歐洲最強的
的反動支柱破壞，而且也是（我們現在可以這樣說）把亞洲最強的支助支柱破
壞，這可以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爲國際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註二二）

在這本書內，列寧也給了第二個有名的預見，這個預見就是下列的一句
話：

「給我們以革命家的組織，——我們就會把俄國翻轉過來！」（註二
三）

我們看到，關於列寧的預見，是完全的實現了。蘇聯的工人階級是國際
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列寧和斯大林所創造的布爾塞維克黨是真正的把
俄國「翻轉」過來。在俄國創造了新的強大的社會主義的國家。

斯大林同志在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中說：

「從『做什麼？』一書出版以來，經過了三十年，誰也不能否認在這個
時期內的蘇聯光輝地證明了列寧的話。」

像「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所說的，在「兩個策略」一書內，列寧
給了「布爾塞維克黨的天才的根據」並給了「孟塞維克策略的經典式的批
判。」

在這些著作內，列寧製定了關於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是領
袖和領導者的作用這個問題。同時，由此在指出鬥爭的前途時，列寧製定了
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依據馬克思的思想，列寧製定了
社會主義革命新的理論。

在這些有名的著作中在一個地方，列寧以科學的政治的洞察力和透視力
，給了一個綜合的說明：

「壓倒全體人民，尤其是農民——爭取完滿的自由！壓倒一切勞動者和
被剝削者——爭取社會主義！這應該實際上成爲無產階級的政策，這應該成
爲階級的口號，這口號應該貫通於並用以決定工人政黨在革命時候的每一個
策略問題的決議，每一個實際的步驟。」（註二四）

在同一個時期內，孟塞維克反對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口號，他們的根據
是「在工人和農民不可能有『意志的統一』（在反對專制政府中的聯盟）
，列寧對孟塞維克說：

「無產階級和農民民主專政，也如世界上的一切東西一樣，有它的
過去和將來。它的過去——專制政體、農奴制、君主、特權。——在與這些
過去作鬥爭中，在與革命作鬥爭中，無產階級和農民可能有『意志的統一

」，因爲利益一致。

它的將來——反對私有財產的鬥爭，僱傭工人與僱主的鬥爭，爲社會正
義的鬥爭，這新『意志的統一』是不可能的。」（註二五）

大家知道，生活光輝地證實了列寧關於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思想，二
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蘇維埃的形式中實現了工農的革命的民主專政。在一九
一七年環境的特點就在於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叛賣政策的結果，在俄國
除了蘇維埃之外，還存在在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者的臨時政府（是兩重政府）。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說：

「布爾塞維克的口號和思想，一般的說，已成爲歷史所證實；但具體的
說，專制和任何人所期望的不同些、新奇些、複雜些。」

「在俄國革命中，『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已經實現了；因爲這個公式
所預見的，只是階級的對比，而不是實現這種對比、這種合作的具體的政治
機關。工農代表蘇維埃，——這就已由實際生活所實現了的『工農革命民主
專政』。」（註二六）

列寧在承認一九〇五年所預見的一般的公式是已經實現了時，他說到生
活常常是比預見複雜些，因爲在一切理論，在最好的條件下，也只是指出基
本的、一般的東西，只是接近於包羅萬象的生活。

列寧勸告說：「誰想成爲馬克思主義者，就要『估計活生生的生活』，『
現實的確切實態。』而不是堅守一般的舊的理論的論點。這就是創造性的馬
克思主義的本質。」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證實了列寧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
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天才的預見，一九一八年在「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
基」一書內列寧說過：

「實際的情形，正像我們所會說過的一樣。革命的進程證實了我們的理
論是正確的。起初我們同全體農民反對君主政體，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關
（因此革命還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然後我們同貧農，同年無
產階級，同一切被剝削者，反對資本主義，連鄉村中的富翁，富農，投機者
也在反對之列，因此革命成爲社會主義的革命。」

列寧精通唯物辯證法的方法，精通革命的創造性的行動底這種強行力的
和銳利的武器，他給我們從各方面估計階級鬥爭的條件及其發展的傾向和階
級力量的對比的模範。這就是爲什麼列寧能以絲毫不少的預見經過二十年後
所完成的事業。

（未完待續）

問題討論

嚴懲漢奸與和平建國

公啟

漢奸不容「寬容」

今天，在中國人民面臨的和平建國問題，是極其複雜和嚴重的，我們必須充分的戒備警惕地前進。六十年來中國人民最大最殘酷的一個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終於被打敗了，這是中國人民最偉大的「大勝利」，我們應該歡樂。但是日本法西斯還並沒有甘心它完全的是失敗，他們正應用一切狡計，企圖保存實力，準備再度的戰爭，準備再來發動中國大陸上的「九一八」，「一二八」，和太平洋上的「珍珠港」。雖然世界人民的力量是如此地強大，雖然我們很難認爲日寇的陰謀能夠實現；但因此，我們對於必須在今天這有利的時機下組織一切力量給日寇陰謀以致命的一擊。日寇在中國陰謀說「扶持」和「維護」一切反民主的力量，掩護法西斯帝國主義的種子，就是力求中國依然是一個封建落後不民主不團結不統一的中國，就是幫助一切漢奸種子，使它一變而合法化，正統化，就是準備隨時重演「中日親善」「日支提携」，「日華一體」的舊劇時在中國日寇政策的執行人。

我們必須充分的戒備警惕，因爲中國的民主政體還沒有最後的勝利，中國人民還沒有完全掌握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力，日寇法西斯的侵略的幻想也將永不離在中國重新找對它的知音。因此，可以得出結論說，爲了鞏固中國的和平，中國人民

還應該做更多的事情。

截至現在爲止，政府所忙碌的是派出一批一批的官吏——不是用武器，而是用委任狀——去「接受」敵人的武裝和土地。非常明白，這樣的「接收」就不得不仰賴於日偽軍隊和政權去「維持秩序」，很顯然，這樣的統治，難怪人們不但不發出深重的感慨，一件件的「備忘錄」，一件一件的照會，這就是我們對日本人的「統治」，軍事的和實際的權，却是敵對中國人民依然如舊的真正的統治。難道這是偶然的嗎？在這種情形之下，日本人的武裝順利地轉成漢奸的武裝，而漢奸的政權，僅僅改變了一個商標，它就成爲了合法的中國恢復區的政權。這就是周逆伸手的「行動總隊」，「確保治安」，「效忠黨國」，「棄暗投明」的本質，也是陳逆公佈的「國須統一，黨不可分」的本質。

政府對於懲治漢奸，幾乎可說沒有任何表示，而寬恕漢奸的言論却公開的濺灑的紛紛出現。被任命爲「北平市長」的熊斌先生說：「凡侵軍已給予名義者，可令其執行職務，並即電令廳屬，孫殿英等遵照約束所部，並轉知其他偽軍聽命，負責維持駐地秩序。僱軍多係環境壓迫，致入歧途，祇要能乘時自效，亦情有可原。」（見八月十三日西安各報及九月一日本報）被任命爲「上海副市長」的吳紹澍說：「國有常典，斷不容自山行跡，罪惡之輕重不同，或亦功過相當。」（九月九日大公報）什麼叫「國有常典」呢？難道說在長長的八年歲月當中

幫助敵人去蹂躪淪陷區人民的血脈統治的罪惡，在一夕之間，「官衙前改一塊木牌，兵士更換上符號」，就沖洗得無影無蹤而「功過相當」了麼？另一方面，從南京和上海傳來的消息，則不能不令人證實，這種「功過相當」的荒謬政策，正在實際的被執行着。例如：

「中國首都南京到現在還遍地是日本陸軍人員和他們從前的傀儡政府官員，與敵軍合作的偽政府官員們現在正力圖洗脫他們過去與敵軍的勾結關係，而在中央政府之前爲他們過去的行動作辯護。」

「日本投降後南京偽政府的自願解散，使淪陷區域找不出一個中國方面的領導中心，因之重慶的國民政府不得不在許多地方利用偽政府的行政來維持當地秩序，以待中央政府來接收。然而直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一個傀儡政府被捕。」（節自紐約前鋒論壇報記者斯希爾南京通訊，譯文刊八月十二日時事新報）

必須指明，在南京和上海的四周，是有着相當強力的中國人民的軍隊——新四軍的，然而他們被視作化外，被剝奪了真正去解除敵偽武裝的資格，因而就不得不讓漢奸們「維持秩序」以「將功折罪」了！這難道真是「不得不」的麼？

而中國人民却是決不容許這種荒謬行爲的，決不容許日寇法西斯再在中國埋藏下親日賣國的漢奸種子，決不容許這些漢奸賣國賊在「中日親

「合作防共」的老調下重新把中國拖回「九一八」「一二八」「何梅協定」時的民族的奇恥大辱時代中去的！

漢奸的本質是屠殺人民

漢奸在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中有其政治的和經濟的根源。中國社會經濟中缺少獨立的民族工業，農民是被封建地租追緊地束縛着的，鴉片戰爭以來，外國資本不斷地侵入中國，利用中國低價生活品廉價勞力，在中國市場上傾銷高價的商品。在這種活動中集結了買辦階級的一羣。它們利用外國的資本操縱了城市的金融和商業，它們利用壟斷的土產和原料高利貸活動操縱了廣大的農村市場。在這種買辦階級中，它們順利地進行外國資本和商品的獨斷的交換——買辦，因此而獲得巨大的利潤。它們的利益因此不是和中國人民的利益一致，而是和外國的侵略者一致。如果中國人民的經濟真正地發展起來，它們就再不能操縱和壟斷從城市到農村，從工商業到農業的中國經濟命運了，因此就不能再獲得巨大的買辦利潤了。

這種買辦階級的經濟利益表現在政治上，就是外賣國權，內壓人民，爲了發覺國財必須壓迫人民，爲了壓迫人民又必須借外力以肆行屠殺，這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汪逆精衛，王逆克敏，陳逆公博，周逆佛海，陳逆嘉謨的漢奸賣國行爲，並非從抗戰後全國作漢奸才開始。以汪逆精衛說，九一八時，擔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在「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下段階地壓迫人民的愛國運動，「馬尾送東三省，再而斷送哈爾濱，三而斷送莫莫。我們應該回憶起十年內戰。我們也應該回憶起「七七」以前救國運動不自由的時代。十年內戰主要是爲了反對共匪

黨的土地政策和民主政治，爲了使中國人民解放的先鋒隊共產黨歸於消滅，爲了使封建的土地關係繼續保持，爲了使買辦漢奸政權繼續操縱全國的經濟和政治權力。「九一八」以來，中國共產黨即不斷主張停止內戰，全國團結，民主改革，抵抗日寇。這些話，漢奸買辦階級自然聽不進去。內戰更急，國步更艱，外患日甚，買辦政客也更得意洋洋。於是救國而有罪，請願而「失足落水」，所有這些，今天三十歲上下的青年是能够沉痛地憶及的。

汪逆於廿八年公開投敵後在香港漢奸報南華日報發表的「舉一個例子」，列舉投降的理由，一則說：「我以爲共產黨是以搞亂爲天性的，主戰也搞亂，主和也搞亂」，漢奸賣國賊視共產黨爲「搗亂」，這是很正確的，共產黨正是「搗亂」他們禍國殃民的行爲的最大的力量。再則說：「對國家負責任的人，只應該爲攘外而安內，絕不應該爲安內而攘外」，先安內，後攘外，這是發揚反共內戰的陳腔濫調，汪精衛這種話正表明了漢奸賣國賊是怎樣生死不渝地以壓迫人民，壓迫共產黨爲其職志。不反對共產黨就不能壓迫中國人民，不壓迫中國人民，就不能進行其賣國發財的陰謀，這是漢奸賣國賊的真正的願望。

中國人民從來沒有享受過真正的和平生活。日本帝國主義一貫的利用中國軍閥漢奸反對中國人民，並挑撥軍閥漢奸之火併，使中國永遠不能成爲一個民主的強國，然後通過軍閥漢奸的統治來剝削中國人民的血汗。這一點，今天的南京「北京」漢奸們扮演的角色，較之以前的軍閥，只是更卑鄙，更無聊，更兇險，更殘酷了，本質上却是一樣的。直奉戰爭，直皖戰爭，浙皖戰爭，屠殺人民，浪費民財，這無一不與日本帝國主義有關，也無一不與漢奸賣國賊有關，今天漢奸中的不少人物如王克

敏，齊燮元及差不多所有「北京」漢奸們，都還是皖系軍閥的餘孽。

但是，中國共產黨崛起，一九二五年大革命運動在孫中山先生的指導下發動，國共合作，北伐戰爭，迅速地掃蕩了南北軍閥，中國有可能成爲一個民主富強的中國了。然而因此中國共產黨就成爲了日本帝國主義與漢奸賣國賊們的眼中釘，革命的腳踏不幸地破滅了，總發着軍閥混戰的就是十年內戰，這內戰把中國人民推到新苦痛的深淵中去，而一直繼續到抗戰的前夜。

這就是買辦漢奸賣國賊在民國以來的三十四年中壓迫人民，屠殺人民，破壞中國人民的和平的真面目。

爲了富強民主和平的新中國

因此，我們不能不得出這個最起碼的結論：如果不對今日南北的大批漢奸，作一次徹骨徹底的懲辦，如果仍然讓他們繼續統治中國人民，操縱國民經濟，一個富強民主和平的新中國是不能够實現的。

如果我們容許買辦階級繼續存在並掌握經濟命脈，一切經濟上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因爲買辦階級的利益和這種改革是直接的對立的。而沒有這種經濟上的改革，沒有土地改革，沒有正確的工業政策，不消滅統治階級上海南京巨大金融商業力量的經濟漢奸，一個富強的中國決不能建設起來。因此，談到懲辦漢奸，政治軍事文化漢奸，固應予以嚴懲，經濟漢奸也必須一體處理。漢奸的一切財產一定要沒收充公，華北華中的工業設備一定要移來補助在大後方的民族工業家，漢奸的土地一定要沒收分給窮農民。

如果我們容許漢奸依然活躍於政治舞台，依然繼續其壓迫人民，反對民主的罪行，中國的民主政治的實現就要碰到更大的困難。如果我們容許漢奸把持軍權，屠殺人民，國內的和平是不可能的，反共戰爭，反人民戰爭的陰謀是要繼續存在的，嚴懲漢奸偽軍，是消滅內戰危機，和平建國的一個最重要的前提。

我們應該注意一個重要的事實，即日本帝國主義並沒有自認於投降。它正在使用種種手段，挑撥國際的團結，尤其是蘇美的團結，以保存它的侵略本錢，它也挑撥中國國內的團結，企圖以此保存其在中國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的實力。因此之故，我們對於漢奸問題，尤其必須予以萬分嚴正的注視。如果目下法西斯的陰謀多少實現了，不久的將來，我們將看到今日被非法「寬恕」的漢奸，將重新活躍，重新執行屠殺剝削中國人民的創子手的權力。

怎樣懲辦漢奸？

怎樣懲辦漢奸，我們首先應該確定一項原則，就是人民的準確，民主的原則。

漢奸「一訴說」他們「情非得已」，漢奸們「放他們」負有特殊使命，官僚政客為他們「功罪相抵」來解脫，這些都不過是維護奸偽，反對人民的一種藉口。今天是民主的世紀，我們只能以人民的意志，民主的原則去解決這一問題，一切反民主，反人民的謬論和行為必須停止！

評判漢奸的罪惡程度及其是否真是漢奸，就要看老百姓的意見，如查它曾經幫助敵人屠殺和剝削中國人民，如果它藉漢奸行為獲得非分的利益，它們將被處死或沒收財產。

在全國範圍內組織民主的人民的法庭。屬於地方的漢奸由地方法庭審判，屬於全國範圍的漢奸由

中央法庭審判。地方法庭要包括各階層人民的，工業家，商人，工人，農民，士兵，學生，婦女，文化界代表，中央法庭除各階層代表外並應包括各黨派的代表。要保障人民審判和舉發漢奸的權利，要實行真正的地方自治，要實現收復區的民主政治。

無疑地，要求懲辦漢奸和執行懲罰，這是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政治的實現一樣，是一個長期的鬥爭，我們要求國內的團結和平和民主，我們就要求在這種具體的問題上表明中國是不是真正的團結和平和民主了。

(上接第 頁)

「完全可以料想，在九月的巴黎大會上，意料之外的環境可能產生新的延遲。」

這，顯然地，是歐文斯爾斯最近的希望。他是延遲創立一個組織，這組織必將應為保衛工人階級生死攸關的利益如經濟及社會權利，民主自由以及就業安全等，這樣的延遲，工人階級對之有什麼興趣呢？工人階級要求會發展成成立一個目的在於團結職工會，以從事決定性擊敗並消滅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並爭取各國間持久的和平的組織麼？不，我深信工人們並不願意有任何延遲，他們知道打鐵須趁熱，知道世界職工聯盟——一個實現工人階級團結的組織——之建立，是不容延遲的事。

只有歐文斯爾斯自己才有延遲的興趣。雖然他給在法國工人的信上聲稱他「對委員會在巴黎訪歐，倫敦和舊金山的工作的成功，貢獻很大」，事實却是：他的參加，並不是為了儘速創立世界職工聯盟的。正相反，在行政委員會的會議上，他竭力提出不合時宜的問題來討論，而且阻撓解決這些問題。現在，他竭力不惜一切代價要使阿爾斯特丹國際復活。這個機關的復活，對有組織工人的團結事業是否有利呢？沒有的，該機關的無效的堅持，無非

國際結的障礙而已，對工人階級是有害的。

法國總工會秘書及行政委員會書記奧蘭，曾在行政委員會開會時說關於阿爾斯特丹國際的殘酷的真理。他解釋法國總工會對阿爾斯特丹國際從來無意，現在也無意有所貢獻，他說，這個機關不僅在戰前沒有發生過什麼有益的作用，而且在戰時也沒有做過什麼有益的事。在反抗德國侵略者的艱苦的幾年地下工作期間，法國總工會從沒有從它那裡得到任何物質上或道義上的援助。在那整個時期，法國職工會領袖並未聽到阿爾斯特丹國際的一個字。法國總工會領袖利用自己來破壞工人階級團結的時候，這才令人知道它的存在。

在行政委員會在美國的工作中，我，作為國際職工會的代表，曾有機會遇到大批美國工人領袖，有機會參加工人會議，訪問工廠。在國內，以及過去六個月內在國外，我遇到許多民主黨內的職工運動者。可以毫不遲疑地肯定說，在普通工人和職工會領袖之間，有一種空前的確信，認為所要求的，是一個能夠成為國際工人階級團結的有效的工具的世界職工聯盟。一個人如果明白工人階級的心情，就可以以信心面對將來。

(以沛譯自「新時代」第十五期)

排除民族的渣滓

——因 幸——

作為一個在八年民族抗戰中吃苦受難的中國人民，對於今天我們目前得到的一些懲治漢奸的措施，不能不痛心疾首地訴說我們的抗議。

通過報紙、雜誌和其他可以表示意見的地方，中國人民表示了要嚴厲懲治漢奸的願望，無論是在前線艱苦抗戰的將士，或者是在大後方、解放區、淪陷區忠貞不移的和敵偽鬥鬥的中國人民，決不吝於用漢奸們所造作的罪惡。在前方為敵人引路開道的是

那些把槍口對着自己的同胞兄弟的偽軍，幫助敵人鞏固他們在淪陷區的奴隸統治的那些偽政權的漢奸，在淪陷區偵伺、告密、偵探敵抗日的志士犧牲的有他們，在敵人的轟炸下放槍號，指目標有他們，敵人的罪行一定要得到懲罰，漢奸的罪惡也一定要以清算。然而眼前的事實却不使我們疑慮，使我們憤慨。

我首先引述一樁大公報的記載：

「不過的確不少次舉的漢奸正忙著向孫院長長的舊日的官邸，或者作送一封『名正』的不明來歷的函件，投遞請軍前進指揮所的一位官員，開頭道一句，『某某某見久遠。』在中國吃政治飯的反正就是那幾個人，鄉證、學證、實證，攀來趨去，大家都可以拉上一點關係。敏惠的新聞記者學先反正，『中央日報』、『中報』已在『蔣委員長調示』，『我軍如何如何』，和重慶報的種種調子一致了。雖然編輯經營的人還是那批原先鼓吹『大東亞』、『和平救國』的附逆文化人。看到報紙與胡適談話，說到懲治奸逆，胡：『國有常典，不容自由行動，罪惡之輕重不同，亦或功過相當。』『大小的漢奸應受隨時地極刑，換命立功，處

幾可以與過相當！』（大公報九月九日；還京雜誌）

漢奸不僅沒有受到拘捕，受到懲處，而仍然是悠悠游哉，而且還親臨威的極身一變又成新貴；他們在敵人羽翼下進行了奴隸統治，今天，他們又在『維持秩序』，『功過相當』下而高錫在人民的頭上了。

在這種姑息，縱容下面，這種現象自然就必不可免了。

「日本一場台，別人儘管畏罪潛逃，周其（按指周佛海）却不那樣做，拉起『行動總隊』的大旗，說是確保治安，效忠黨國，依然神氣活現的做官。官衙門放一塊木牌，兵士們換一塊符號印章，不就完了。」

那些八年來忠貞不移的人民，目擊着『以前欺凌他們的人現在還是那樣身手可熱』，怎樣不怒而起來呢？讓我們再聽聽他們滿懷憤慨的心聲是：『假如這樣，下次再抗戰，孫子忘八蛋不作漢奸。』（見九月十二日大公報），這真是中國收復區人民血淚交迸的控訴。

從這些眼前的事實來看，中國人民對民族的忠誠沒有得到足夠的尊重，中國人民要求嚴厲懲治漢奸的意志是神聖的。

我們如果想一想，在過去的八年抗戰中，中國人民憑着最艱苦的武器，和強大的敵人戰鬥，誰都知道面對着的是一個強大的敵人，誰也知道戰爭是一種沉重的負擔；但中國人民更愛自己民族的生存，更愛自己能夠自由生活的意志，這是人民自由的意思，也是最可寶貴的民族氣節。徵諸中國歷史，對於民族氣節一直是非常重視的，任何一個人，如果是昧於敵我之分而向敵人屈服，企圖苟安求活，或者是幫助敵人壓迫自己的同胞都會遭到人民的唾棄，千秋萬世也洗不掉這種污點。對於一個國家，人民的自由生活的意志，對民族的忠誠，更應當用盡力量來愛護，發揚。王鶴山說：『作春秋，明王道，內中夏，外夷狄……可禱、可禮、可革、而不可使與類間之。』（費著原標語）。如果一個

國家不能珍愛這種民族氣節，保衛民族生存的戰鬥意志，就會使人民愛自由的意志變得消沉起來，宋朝因為人民民族氣節的消沉，至到後來，遭遇外族敵人侵犯的時候，就一點不能抵抗，對於當時這種民族氣節消沉，許多有識之士，都感到是一種危機，李綱在奏摺裡就曾說過，『謂國家要變，變於節死義之士，其受僞官而屈辱於其前者，不可勝數。黃龍宗平賊，污僞命者以六等官，宜懲之以厲士氣。』但當時宋朝的統治下，叛逃區漢奸處處，忠貞義烈之士沒有得到激發，人民沒有激發意志自強其消沉，消沉，不會有『伊尹死節之志』了。

今天，令我們憤慨的是：漢奸的醜態是這道法外，不僅未經懲處，而且仍然高踞人民頭上，沒有一個受到明令的誅罪，甚至這些賣國賊的漢奸，搖身一變又成政府要員，立刻原封不動的得到了各種重要軍政要職，這怎能不令八年來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感到絕望和憤慨呢？

漢奸賣國賊之醜態，不僅是中國人民的公敵，在其一切反法西斯的鬥爭中，也是由各國人民進行審判，法國的貝當已被判罪，波蘭的吉斯林被判處死刑，其他的背叛人民的偽僞也遭到了應有的懲處；法國的人民甚至把那些叛國賊的屍體拋入大海，把婦女剃光了頭髮。而今天，對於這些賣國賊，不僅違背了歷史傳統，而且更破壞了國家的綱紀，斷傷了民族的正氣。

中國人民不能寬容這些出賣國家民族的漢奸，有人喊出：『讓人民來處治漢奸』，我覺得如果有人還不同意『讓』人民來處治漢奸，那我們就覺得人民的共同力量是危險的。我們要求一切願意傾聽人民意志的報紙，來發動收復區的人民，檢舉各個大小漢奸，在戰鬥線線出來的解放區，他們在戰鬥中身受到漢奸的罪惡，有警察的人民曾經用紅黑藍筆來記錄他們平日的行為，隨時用戰鬥的行動來清算那些罪惡昭著的漢奸。在其他的收復區裡，人民還沒有這種有組織性的對漢奸罪行的搜集，但他們身受日軍的敵偽暴行的人是決不會忘記的。我們應該

原子彈二題

一 極權主義的白日夢

有這樣一位「教授」。

在勃特勒生前他曾經預言、預讀過這位大日耳曼的「英雄」、「力人」，在希特勒死後他更是傷心絕望的為這位「革命者」默哀而掉淚。他勸告的語氣過來的和平機構是「五條大漢」管理「四十七條小漢」的場所；他也曾說不知邪的向婦女們說教，要她們對於「生物的平等」，在「那一期那期」來平等的負擔種族延續的責任。……

不知道這因為悲傷過度而神志昏迷嗎？還是因為希特勒在作白日夢，這回不是為「力人」們說教而是「為原子彈而向西洋人進言」，複述這失實；傑作摘抄一段：

「原子彈如何能使之不殺人，使之維持國際和平呢？很簡單；使之始終在『多』的手裡。萬一落在『多』的手裡，則原子彈不但不足以維持和平，反足以促進人類毀滅，因為『多』之中，一定有些壞蛋，或想利用之報仇，或想利用之征服，總之，是致亂之源。」

「教授」才使原子彈始終在『多』的手裡呢？方法是：「不公開」，「藏之深淵」，決不能用於和平「工業」，因為「若用於『和平』工業上，則必須公開，一公開則難保無人不用之製造殺人武器」。本來應該為人類生活的幸福而服務的科學成果，竟而用在戰爭，使人類受到慘烈的破壞和殺傷，這已經是一件可悲的事情，雖然懷著哀矜的心情，但全世界人民堅信，這是用戰爭來消除戰爭，來消除殘酷的法西斯主義，是為了一消除暴政與奴役，壓迫和貧窮，不得已而使人類受到這樣巨大的破壞與殺傷。原子彈用在戰爭上，決不是任何正直的科學工作者，善良意志的人類的目的和願望，因此，我們必須要求這種製造原子彈的發明，造

成將來的國際和平，使其無比的破壞力量轉變為世界繁榮的永恆的基石（阿特利首相的聲明）。雖然人民的意志如此，然而，那些神志昏迷的科學家們是距離這種偉大的科學成果，不願意把這種偉大的原子「能」用於建設性的動力，而希望「藏之深淵」，「不拿出來」，這樣來維持世界和平。

我想，如果原子彈不僅能毀滅和殺傷人類的軀體，也毀滅無形的毀滅人類的智力的話，教授們的願望也許可能實現；因為原子彈毀滅了一切科學工作者，甚至一切人類的智力，這樣就能使絕一切人對於原子彈的探究和發明；原子彈的發明者也就可以永遠「獨家經理」的「藏之深淵」，既使這樣，是否能夠維持國際和平自然還屬疑問。

如果人類對社會不可能維持幾千年，一切科學工作者和人類智力不能毀滅盡，英美的科學家可以發明原子彈，其他國家的科學工作者又何嘗不能發明原子彈呢？你要「藏之深淵不拿出」，別人又何嘗不可以拿出來呢？現成的例子，英美科學家在研究原子彈的時候，德國科學家不也在研究嗎？如英不

是英美科學家的加速進行，不是盟國對德的轟炸阻撓了德國科學家的研究計劃，延滯了德國科學家的研究計劃，誰能担保法西斯德國不把原子彈用來殺傷同盟國人民呢？發覺利用原子彈的科學家不也有德國的斯德拉斯曼（Strassmann）和漢恩（Hahn）嗎？

「教授」擔心原子彈落在『多』的手裡，因為『多』之中，「一定有些壞蛋」……是「我亂之派」，如果『多』裡面原有壞蛋，但好人總比較壞蛋多，人民也不難用共同的力來監督、來控制，至少可以用共同的力來防止，如果保留在『多』的手裡，誰又能保證這『多』不用於侵略武之用

過報紙、雜誌和其他可以由人民發表意見的地方來揭發和檢舉漢奸的罪行，讓該用大家的力量來壓倒那些企圖潛形遁跡的漢奸。而一切形形色色為漢奸的罪行辯護的論調，在「情有可原」和「欲得當以報漢」的藉口下，使漢奸們得到了出脫的理由，都應該予以譴伐。譬如前些年時益世報就曾經為法蘭西的賣國賊貝當的罪行辯護；「是法蘭西的救主還是罪人」只有將來的歷史家纔能予以正確的判斷。這種為賣國賊的罪惡粉飾的行為，我們應該毫不寬容的予以口筆筆伐，對於其他一切企圖為漢奸罪行開脫的論調，都應該毫不留情的予以抨擊。

為了人民要求懲治漢奸的意志能夠真正執行，為了使那些行兇作惡的漢奸們不會漏網，希望今天的各民主黨派的領袖及社會的公正人士，自動的籌組調查，檢舉漢奸的組織，幫助人民發覺漢奸，並揭發漢奸的大小罪行，調查一切敵偽所造成人民的損害。

在各個收復地區，應該根據各該地區的具體情形，組織能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庭，進行公審，對於那一些為生計所迫而沒有積極協助的如何寬恕，應該根據當地人民的公意，其未積極協助也應該取得當地人民的證明。我以為對於以上所述的官員，委任以上的官員都應該進行嚴厲的懲處，委任及委任以下的官員應該懲處一切充當公職的機會。至於那些在敵方卵翼下的漢奸頭子，手上沾染了人民鮮血的漢奸部應嚴厲的懲處。

漢奸的財產，大半是剝奪人民的血汗，這些民族的流離流離了人民流離流離了財產，窮苦窮苦的生活；今天應該沒收他們的一切財產，這些被剝削的人民，特別是在敵人統治下遭受海陸重圍的同胞們，一切被沒收的抗敵志士的家屬，用來幫助恢復祖國的正常生活。

至於那些想寬容放縱敵人的滔天罪行，寬容不辦，忠奸混淆的任何企圖，中國人民都應該堅決的起來反抗，對於一切違反人民意志的「亂命」，應該要求立即收回或根本廢止。

如果我們不能徹底地懲處法西斯的幫兇走卒，無法保持持久的和平，如果不掃除這些民族的渣滓，就會斷絕中國民族新生的機運。

呢？

「深藏」既不可能，「獨佔」所引起的結果會是「前所未有之不祥的軍備競賽」(每日先鋒報)。

二

復古論者的新裝

「原子彈落在『多』的手裡，引起『教授』但心的另一股定：『原子彈如果用在工業生產上，就可以節省很多人力，這些多餘出來的人不就造了失業嗎？』

然而，科學的本身無罪，原子「能」的本身也是無罪的，如果原子「能」這種科學的革命的應用引起市場的爭奪與競爭，工人羣衆的失業，那末這無邊的發明不也就使無數手工業者遭到淘汰與失業，原子能如果不用在和平工業上，固然可以引起起被淘汰者的失業，如果人類能回到『懷氏之民獸』

雙重債務；科學的崇高目的是爲全人類謀福利，只有當科學的成果爲少數人所壟斷的時候，它就會帶給人類以災禍和戰爭，當機器爲少數人操縱作爲謀利的工具時，它才帶給人類以貧窮和失業。從生產的到消費的，從建設的到破壞的，從活人的到殺人的，這已經是科學精神的逆轉與變質了。然而，科學的本身是無罪的；當科學一旦從少數人的操縱和壟斷中解放出來，與人民大眾的利益更緊密的結合，爲人民大眾所保有、所使用、所控制，科學就不會是爲少數人專利的工具，不會製造戰爭與貧困，

而是改進人類的的生活，保障人類社會的和平與繁榮了。原子能既能提高生產效率，爲甚麼不能夠用來提高人類的的生活水準，使人類「免於恐懼」，「免於匱乏」呢？戰爭教育了人民，全世界進步人類正在探求一個能使科學合理發展的社會制度；這些，是那些發着謔語的教授們所無視，或視而不見的。

這位教授之反對把科學研究的最新成果用在和平工業，決不是洞燭了科學爲少數人所操縱、所壟斷的弊害，從而生長的對科學的戒慎與恐懼。如果我們透過那種惡天憫人的偽裝虔敬的表情後面，我們不難嗅到那古論者腐屍的臭味的。口說無憑，我們無妨耐心的來考兩段：

「我們中國人發明火藥，但連開山築路，都不用，只把牠來做點爆竹，到阿爺阿婆阿爹阿媽的生日，才拿出來拍放一下。外國人常拿這個笑我們，由今觀之，從人類生存觀點看來我們多麼聰明，他到那裏拍放！假如我們也做他們那樣傻瓜，立心用之於『和平的工業』上，則過不了多久，第二步便是用之於不和平的殺人上，正如今日的西洋。」

「……我對一向講究『吃』不講究『打』，火藥有助於『打』而無助於『吃』，我們這個現實的民族就把這法寶委棄於爆竹之中。但這是『委棄』嗎？從西洋人看來，的確是『委棄』，的確是『可惜』，但從整個人類看來，『委棄』云云，原是『善用』。」

這真是一樁可悲的事情，這些「教授」的貧弱與空虛真是出人意外，雖然有着一字句上並不同，但意思和內容竟和別人完全是一致的(讀者如果有興趣不妨看看郭任遠君「世界文化的危機」的講稿，曾發表在大公報)。這些人已經重談過一千次的東西，竟然有人披拾唾餘來作一千〇一次的反響，「教授」的貧弱真不能不使我們感到驚異。據說這是中國卓越的「科學態度」和「科學的人生觀」。這是中國人對科學的「善用」。

阿媽的生日，拿出來拍放一下」，當然是既供娛樂，又不傷人的事情。較之於把火藥製成子彈來殺傷血肉橫飛自餘聰明，中國人不僅不惜火藥用在戰爭上，而且不用之於和平的工業上，自然應該是杜絕一切的戰爭的災禍了，然而不幸得很，火藥雖然沒有用來製成槍彈(甚至沒有用來開山築路)，而戰爭殺伐却絲毫沒有因此而減少，「不和平的殺人」也從沒有停止，說起來似乎並不那樣值得誇耀，火藥之沒有用來製成子彈，倒不是不願不而而是不能不的開明，這在明末不就有人在向耶穌會人學習製造銃砲嗎？至於那些用人民的血汗向西洋人購買「不和平的殺人」武器，來殘殺中國人民更是統治者歷來的得意傑作，這從「中國的名將」的會圖濤起，不僅得西洋人買來了殺人的武器，甚至還請來了西洋人幫我到使用。假如這不算中國的一「聰明」人吧，在可以向西洋購買子彈以前，我們不仍然運用了刀、槍、箭、鏢……來自相殺傷了幾千年嗎？就在「有子彈可以買之後，我們也還有純粹的『子刀』的。」

科學不能自己製造戰爭，如果世界仍然充滿了「暴政」與「奴役」，如果千百萬人民的命運還操縱在少數人的手裡，還在忍辱壓迫和奇恥，既使一切的科學都已經絕滅，「不和平」的「殺傷」仍然會繼續存在的。如果我「用『不和平』的武器，來消滅了一切戰爭的根源，消滅了一切『暴政』和『奴役』，讓一切作惡人類最高智慧的科學成果，爲人民所掌握，所使用，(而不是一「藏之深處」的握在「一」的手裡)，一切的科學成果就不會成爲「不和平」的殺人利器，而是造福人類的工具了。

空談談破不了現實鬥爭，科學不會在任何人阻咒之下絕滅，要想斬斷社會文化的發源的道路，不過是披著頭髮想昇天的企圖而已。

無論披著甚麼新裝，仍然掩蓋不了復古論者的腐屍氣息的。

八月十八日



晉察冀行進

周而復

人民新生活的姿態

一走進平山縣那家莊，就有一種新鮮的印象。我仔細想想，這新鮮的印象怎麼形成的呢？

我到一德村，我的馬便被村口的一個兒童圍住了，他雖然頂多也不過十一歲，可是老練的很，孤零零的，問我：

「同志！路像呢？」

我把路指給他看，他並不言，旋即交給他旁邊的一個孩子，那小孩熱情的連村人看去了。一會回來，把路圖交給我，說：

「對不起，同志，就誤你路了。」

他拉着馬在街上給我引路了起來。這時，從側面又走過來一個青年農民，他問我們喝不喝水，這是我們所迫步的，他領我到村公所去，頓時提出兩壺開水來給我們喝。

當村長知道我們今天不走了，要住下，他派了一個人出去，兩袋烟的工夫，那個人回來，說是房子好了。他領我們去，在附近幾家，給我們弄了六間很清潔的房子，連喂牲口的地方也有了，就在院子裏有個牲口圈。

一會，米奉油，鹽……按照我們人數的總數都送來了。我們簡直像回到自己家裏一樣的舒適，村里的人如同就是我們兄弟姊妹一樣的對待我們，彷彿早就知道我們要來，一切都事先布置好的。其實不然，因為村長經常有軍隊過往，村公所交際委員，料理一切，這就減少了軍人路上的麻煩。

軍隊的說明天在這村休息一天，飯也還沒做好，我們行軍以來，在行軍路上很少說衣服腫，而何況又是許多人擠在一條炕上，每個人毫無例外地

都生了虱子，這時洗了澡，換下衣服自己在洗，洗完了，用開水一燙，有的就在炕上一蒸，把虱子都消了，身上也感到無限的輕鬆和舒適。

吃過飯，天已黑盡，大家紛紛到炕上，脫掉衣服，準備舒舒服服睡一覺了。——我們有好幾天沒有舒舒服服睡覺了。

我剛躺到炕上，就聽見炕上有規律地起落着許多人的腳步，一會止步走，一會又在起步，然後就聽見雄壯的喊聲：

「一——二——三——四——」

這喊聲使我很奇怪，天已黑盡，雖在村裡喊呢？越聽越不通，從炕上爬起來，披上衣服，好奇地走出去。

原來是村裡自衛隊員，白天種生產，晚上睡覺以前，就操練一個多小時。幾十個人打鼓場上，有規律地操練操練。

解放區有三件大事：第一是戰爭，第二是生產，第三是教育。所有的人都投入這三件大事去了。我回來的路上，聽見一個自衛隊員，手裏拿着一把雪亮的大刀到村口站崗去了。——白天是兒童團，晚上是自衛隊。

騎到炕上，一覺睡醒，村子里充滿了一片睡意。

一會，村里兒童組織的「喜促學起隊」來了，他個個我們房東快點起來，下地做活。剛才打鐵，就是叫村里人們都起來的，如果這不起來，兒童就來督促了。我也連忙穿起衣服，走到門外去看：家家戶戶的門里走出青年，壯年，老年的人來，肩扛着鋤頭，一個個像軍隊，漸漸成了一隊，向村外走去。這是村里才識所領頭的變工互助的集體的大開耕隊，一共四十二個人，他們已開了生荒三百多畝，共用了七百三十一個工，並且全播了種。全村四百九十多畝熟地，全都耕完，二百五十多畝散手山麥也播了種。

不僅在田里勞動上他們組織了進來，即連牲畜也組織起來。全村八百多隻羊和五十多頭牛和二十幾個驢子都組織起來，大家輪流放，供不起飯的人，由村里生產委員會和村合作社解決，秋天償付。原來一家有一頭羊一隻牛要派人去放，現在所有的人集中起來，只選四個人就夠了，可以節省出很多的勞動力。

村里青壯年的男子都下地去了，我回到家里，看見房東家的婦女，她們忙過早飯，現在已坐在紡車旁邊，在紡線了。現在全村已織了三十多付紡車，還不夠，不過合作社和市場上的紡車供應不綽綽有餘。只好慢慢補上。有許多婦女不紡的，就跟着學。此外婦女還把空餘的時間編出來，養豬養雞，每個婦女也和男子們一樣，都做了個人的生產計劃——除了養豬養雞以外，還要做鞋子賣，給機關部隊縫（機關部隊送麥子來磨麵，不單鞋子給窮的人，另外還要分紅，利錢很大），種樹，參加農業勞動（平均每人每月大概參加六天的樣子）。……全村計劃種桃樹杏樹各三千株，胡桃樹一千株，辦三百隻小雞，養五十口豬，現在已買了二十九口了。

我發現這村子裏沒有一個不生產的人。

如果因為生活困難，不能生產，怎麼辦呢？

村合作社發放貸款，全村人們又動員了五石六斗貸糧，在附近的XX友隊政治部也買了四石糧食送來貸給貧苦人家。這樣，生活問題解決了，就能參加勞動，生產了以後，生活問題自然解決，而且改善了。全村最窮的董榮和家，借了貸款，參加開荒隊，把自己七畝地種上了，生活也有了保障。

生活改善之後，人們自然就會注意到衛生工作。大人小孩都穿上新衣服，舊衣服也常洗了，吃碗碗飯都洗得乾乾淨淨，小孩子也每天洗臉了，廁所豬圈都收拾得很乾淨，牆上刷白灰粉了。村里人自動地每三天打掃一次，并且村里有個衛生檢查委員，三天檢查一次清潔。所以村里的街道那樣乾淨。

中午，開荒隊從地里回來，各人回去吃飯，約莫不到一小時，村里又響起鑼聲，人們三三兩兩地向村里的小廟前走去。一個大核桃樹下，聚集了三十多個人。我也走了過去，人聲當中一個人站了起來，他是村里的小學教員，手里拿着一張警察冀日報，在給他們讀報。報上正好登了一條新聞，說是一平山那家莊的人民組織起來了。教員就把這一段消息讀給他們聽，頓時人羣便浮出來愉快的笑聲。

「咱們的事也上了報了。」
「可要好好的，全邊區都知道咱們了。」
「咱們要組織得更好，和牛各莊比賽。」

聶榮臻將軍

到警察冀軍區政治部第二天早晨，我去和家莊訪警察冀軍區司令官聶榮臻將軍。

政治部在稻園村，離司令部五里地，騎上馬，一會便到了。

聶榮臻將軍是一個智識份子出身的軍人，是一位儒將。一八九九年他出生於四川江津的小地主家

從來和農民不發生關係的報紙，現在他們的生

活却成了報紙上的重要新聞，這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大變革啊。人民和報紙有了血肉關係，他們從報紙上得到許多農業上的知識，全邊區生產經驗的交流，人民的成長……讀報已開始成爲他們的日常生活之一了。有的人，很早的時候，也不忘記去聽讀報，不聽聽報上的事，彷彿生活中缺少了點什麼的，不能好好安心去休息。

讀完報，他們回家去歇晌，然後又下地，從事勞動了。當太陽偏西，他們結隊回村，從遠遠的田地里，唱着歌，愉快地歡呼着，響着，慢慢地走回來。羊兒，牛兒……也從山上、地里回來，把村里一條正街塞得滿滿的了。每一所羊圈一坐牛，都很快自己主人的任處，老於自家門口，便自動地進去了。

晚上，按照各人的編制，青拉先，自衛隊，婦女隊……都到自己的隊伍集合處，又開始操練了。

多麼活潑愉快的戰時生活啊！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的人民新生活的姿態！不僅是我一個人吧，我同行人也都有同樣的感覺。費君君得在大空而竟發揚了，他忘記回營睡覺，我們明天還得趕路哩。
三天之後的夜晚，我們到了警察冀軍區政治部。

里，過二十歲那年，在四川一備編制中，參加了「五四」運動，像一陣狂風似的，席捲了中國的大陸，新思潮從黃河流域而長江，一直流到天府之國的四川。年青的聶榮臻，挺身而出，迎接了這思潮，參加了這一劃時代的運動，并且組織了中學生，研究新思想，獻身於愛國運動。受了新思潮洗

他的弱質，抱負着當時自由主義的實業救國的思想，一九一九年，他參加了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冬天到了法國，半工半讀，開始是進入一個樹膠工廠，後來進法國最大的史乃德軍火工廠，進比利時勞動大學學習化學。回到巴黎，又進雷業汽車工廠，和托曼松電氣工廠做工。當一九二〇年，他在比利時勞動大學讀書的時候，完成了他的志願：他決心學習化學，求得實用的科學知識來挽救這腐朽的中國。

固然他在中學時代，受了「新青年」雜誌所介紹的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很深，把他從嚴復譯的赫胥黎大演說所受到的思想影響，向前推進了一步，可是實業救國的思想還是吸引着他。

但等到留法同學開始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時候，他從實業救國的思想轉到實際的政治軍事鬥爭方面來了，特別對軍事上戰略戰術的研究，吸引了他更多的注意。

當德國在一九二三年，革命運動高漲的時候，二十四歲的馬塞爾，從巴黎到了柏林，和德國革命黨人握手握手，在人民當中，高唱着國際歌在柏林的街道上前進。他從這一個運動當中，吸收了許多鬥爭的經驗。

一九二四年，他被放歐戰區的委員會派到莫斯科學習。他從巴黎到了莫斯科，進了東方大學和黨的軍事學校，這更使他對軍事方面，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他在一九二五年夏季回到中國，擔任廣東實業補習學校政治部秘書和教授。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春變，他被拘留在中山艦，脫險之後，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工作。之後，就隨從北伐軍出動，直到武漢。馬日事變之後，被派到九江組織前敵軍委，以十一軍總代表的資格，參加領導著名的南昌

起義，後來又領導廣州起義，直到他在一九三一從中央軍委調進江西，他始終沒離開過武裝鬥爭工作。

抗戰以後，紅軍改編為第十八集團軍，他是一五師的副師長兼政治委員，正師長是林彪將軍。三七年秋天，他到了五台山。這時候，敵人陷平津，下南口，危險極了，連大同，大軍蜂擁而到，在叫

雁門關了。張學良將軍和林彪將軍，率領一一五師戰士，進入雁門關以阻陣地，敵人所向無敵的飛機的板垣師團，遭受對林兩將軍嚴厲的一擊，這就是舉世所知的平型關戰鬥。

八路軍總部和一一五師主力，奉命馳援太原，於關一帶的危急形勢，張學良將軍委任命留守五台，深入晉察冀內外長城線之間的廣大敵後地區，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雖然他手下只留有一個兵團不精練的兩個連以及一個騎兵營，在他英明領導之下，終於開闢了抗日根據地，解放了無數的村鎮和縣城。

十一月七日，晉察冀軍區成立了，他是司令員。

當我走進司令部時，他在會客室裏接見了我。他穿着一身草綠色的軍服，馬褲，腳上穿着一雙草綠色的布底圓口鞋，扣着風紀扣，左胸袋的士

端掛着第十八集團軍的團徽章，給人一種整潔樸素的感覺。他的兩眼炯炯有神，特別是注視事物的時候，更顯出那銳利而又謹慎的光芒，在兩個高聳的額骨之間，是一條隆起的有突出鼻子的，嘴很寬闊，險些消瘦。他給我最初印象是一個嚴肅，寡言笑，沒有感情的人，這使人覺得不容易接近他，因為他老是那樣冷冷的，嘴裏永遠在閉着，即使給你講兩句話，旋即就又閉嘴了，在凝神地審視着你。他講話，處理事情，彷彿都草草有了準備，老是那樣安步就班，顯得安詳而又靜謐，

便在戰爭最激烈的時候，即使突然發生什麼重大事件的時候，他臉上也不會顯出一絲的緊張和忙亂的痕跡。在他那裏，什麼事都佔有一定的位置，一定的步驟，一定的處理方法，使你信任他。這股最初印象，大體上地說可以說差差不多，但不一定是完全對的。

在以後和他相處的時日裡，從我所見到的，所聽到的，所知道的，有些印象是要加以修正的。首先他是一個熱情的人，不過不輕易表現在外表上，在他的嚴肅的外表裏，充滿着溫暖的感情，他的眼光裏就充滿了溫暖和情誼，他對軍區每一指戰員有深厚的感情，關心他們的生計工作，關心他們每一件小事，就像是父親關懷他的親生子女一樣，戰士們常常給家寫信說：「我們司令員他記得我，可常給我們說話，教我們的事情可多哩。」而我們司令員自己也說：「離開了他（指戰士。）我就感到不安和孤單。」當他接到請願書，自求恩的遺書時，他更掩蓋不了他那熱情的感情：他看穿了頭兩行，眼淚便忍不住流下來了。這時他正在廬縣南端的紀念軍區成立三週年的大會場上，他頓時離開主席台，一個人走到這棵樹下，低頭垂頭，用手帕掩臉，眼裏流淚了。

他對人民更是充滿了熱愛。當一九三九年冬，軍區遭逢那數十年來罕有的大火災時，他傷心頓地，在設法把人民從水災的窘困里挽救出來，他這樣表了談話：

「……政府應撥款救濟，調濟食糧，種籽，挽救災民，盡力進行救濟工作，全體同胞要高度發揚民族友愛互助的優良傳統，同甘苦，共患難，共存亡！」

全邊區於是掀起救災的浪潮。人民在政府和軍隊的幫助之下，渡過了嚴重的春荒。如果從他參加革命二十多年的歷程上看，他對

人民大眾的事業是有着無比的忠誠和熱愛，一種熾熱的感情，貫穿在他整個的戰鬥生活里。

「敵人不確實的；應該說是不苟言笑，他的一舉一動都有分寸，一言一笑都有分寸。當他指揮大軍消滅敵人的時候，他的臉上常常露出笑容，甚至於放聲大笑。三八年冬季他指揮部隊向敵人的圍攻，當他從電報里知道各路敵軍潰退，五台敵人亦有徵候模樣，他就下令：『五台這股敵人，一夜行程深入到高洪口，一定要打掉它！』叫密道的部隊今天黃昏前，趕到河口設伏，等敵人退回去的時候，緊接消滅他！」

第二天正午，他和大家在院子裏吃午飯，捷報來了：

「河口戰鬥我軍跑步趕到指定地點，設伏完畢，敵已退至，我將敵全數殲滅，傷亡甚多。」

他馬上放下筷子，仰面放聲大笑了。然而他並不是滿足於自己的勝利而笑，更不是因勝利而忘記戰鬥任務。全邊區把敵人打退以後，各地湧起了親切的歡呼，千萬個聲音向新英雄將軍高呼。他通過歡迎的行列進入解放了的阜平城，去一個晚會上他說：

「敵人吃了一次虧，總要來報復一下的。敵人是很講面子的，丟一次臉，它是要顯發成怒的！」說完話，他志情的笑了，不過一會又恢復那驕傲的姿情，準備下一步工作了。

他不但不是寡言笑，而且他很有風趣，談吐很幽默的人。吾等算是敵人的心腹之患，桑木師團長在東京的師團長會議上就說：

「不願消山地『匪軍』，要想明朝華北，是很困難的。」

但是一些少不更事的年青法西斯軍人，却夢想消滅山地，敵酋田中部長，探知這軍區後方動靜

和抗日大舉進攻是難事。陳莊一帶，他準備了糧餉數千餘，企圖發動「紅軍大舉」——即指抗日大舉而言，並且寫了一封信給希特勒，這封信送到了敵人的手裏，在敵軍前山一帶找到了自己的墳墓，八百多敵人無首地倒在山下了，倉惶逃竄的敵人，連屍首也來不及帶走，只割下了八百多隻左手，企圖帶走，變成骨灰，帶回國去，做所謂「無首的凱旋」。後來狼狽地只顧逃命，這八百多隻左手也沒帶回去。

最後，孫司令到了陳莊。這時他才得到田中部長所寫給他的那封信，他看完了那封「親密」信，便哈哈大笑。原來是田中部長邀約他在陳莊會師，要他「和平合作」的「招降書」，他旋即散去笑容，對四處的人說：

「可惜的很，我現在到陳莊，已經看不見田中部長那官兵了，我只看見他們躺在戰場上的屍體的屍骨，憑吊一番而已！」

他雖然笑，也是很矜持的，雖然幽默，也是很莊嚴的。你在他面前，永遠感覺得他是一個長者，和他在一塊，彷彿天下什麼了不起的大事，都不值得驚奇，可以應付得轉轉有餘，顯得有條有理，一切事件的發展似乎都在他的意料之中。難怪得在他部下的指揮員，既敬畏他，也信任他，更是愛他。曾經在他指揮下戰鬥了十多年的老指揮員，甚而至於光很調皮的，但是孫司令員一說話，或者是他的命令一來，那說話也沒有話說，剩下來的是：

「行動！」

因為無數次的戰鬥經驗證明孫的意見和指揮是英明而又正確的。

甚至在最危險的時候，大家只要看見有孫司令員在，即連最胆小的人也會放心的。因為即使是在戰鬥最危險的時候，司令都距離敵人只有幾里地，他

還是那麼平靜的，不動聲色，鬥他愛情上說，你甚至會以為附近沒有敵人的，他還有這種過人的胆量。

自然，單有過人的胆量是不夠的，他還有過人的智慧。記得一九三九年冬天，我對敵地參加保衛戰，當軍區司令部通過了唐河，擴大到南北兩側一帶時，敵人亦趕給我包圍了二十里左右的距離，我們前進，敵人前進，我們休息，敵人休息，我們宿營；到後來，敵人以離我十里地左右，因為摸不清我們的實力，不敢驟然下手。而我們的行動，無形之中，被敵人監視住了。這時孫榮發將軍很安定地在地圖前觀察路線，最後他命令一部分武裝部隊浩浩蕩蕩公開宣佈向大路到劉家台去，其餘的部隊也向劉家台方向走去，可是走到半路上就對領任消息，所有的部隊都在途中往白沙村轉折入一條狹小的山谷，這是一條絕路，如愚敵人在兩側一對領，那所有的生命都死在敵人手中了，敵人絕想不到孫的司令部會走入這條山谷的。跟隨我們後面的敵人部隊，果然給我們武裝部隊引到劉家台去了。

敵人到了劉家台，很驚奇為什麼到了劉家台，八路軍就沒有了呢？八路軍就在他後面，而且襲擊上來了。

過人的膽量加上過人的智慧，等於勝利。這樣，跟着孫司令員打戰，誰會還有一點點不信任他嗎？

他不僅僅是個英明的軍人，而且是一個出色的文人。雖然他不會寫文章，但如他勸導軍區文章，字里行間，便充滿了一種藝術的深處的煽動力量，使讀了之後，永遠不忘記，他影響了你的思想，一直會貫穿到你的行動中去。他自己房子里有一個活動的白木書架，上面有條有理地放着他精讀的書，他對馬列主義理論與實踐的研究，有獨到的地方。對一般藝術作品，他也有深湛的愛好。

他不但自己這樣，而且把藝術工作放在軍隊政治工作的一個重要位置上，他說：

「文化生活是一個革命軍隊所不可缺少的，它不是軍隊的裝飾品，而是活的力量。軍隊需要有關門力量，就一定需要文化。」

同樣的，他對廣大人民的文化，也賦予極大的注意，他說：

「現在，根據地建設的條件更進一步需要我們解決廣大人民的文化食糧的問題。我們的人要吃飯，這首先要解決的；槍砲要有彈藥，這第二件要解決的大事！現在進一步要轉到人的腦子，要用大量的文化食糧去喂養它。」

他指出並且強調藝術最緊要地服從於一定的政治鬥爭目標，把藝術做為政治工作的武器，他這樣以為，也這是在廣闊的解放區上，展開了人民的文化運動。這是我過去所不曾見過的，文化是從勞動者羣中產生的，但是現在文化和勞動者羣是多麼遙隔啊。在新的地區，文化又回勞動者的手中了。

他是個軍人，是個文人，又是邊區的家長。

如果說軍區是個大家庭，那他便是這個大家庭的家長，他如家長愛護每一個子女，每一個指戰員又如子女一樣的尊敬他們的家長。

在孩子面前，他就顯得年青了。他和孩子接近，他臉龐上就不斷地浮上笑容，天真地和調子在一塊玩笑。甚至是敵人的孩子，他也一樣的愛護。

肥得在百團大戰時，部隊在井陘縣停留了兩個日本女孩，母親在砲火下死了，父親受傷，醫治無效，也死了。兩個女孩送到前方司令部來，他親自拿糖給女孩子吃，說：

「小娃娃，不要怕，吃這個糖，甜的很。」

女孩子在父親般的慈愛中接受了糖，像回到家裏似的，一點也不怕。第二天司令部寫了一封信

，派人把兩個日本女孩子送到敵人的據點里去了。這件事，會深深打動了敵偽的良心。他說：

「敵人雖然殘忍地殺害了我們無數同胞和兒童，但我們決不推傷害這些無辜的孩子，和日本人民！」

他對敵友的界限是何等分明，他對人民的愛是如此的強烈啊！

晉察冀在他的領導下，一天天成長起來，解放了遼闊的土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建立了人民的政權和人民的軍隊，帶領徒手和人民去打掃戰場，繳獲敵人的武器，來武裝自己。自己又建立了規模的兵工廠，修理武器，製造武器，我曾經看到軍區兵工廠製造的步槍，戰士們都喜慶使用，因為這自己造的步槍，那火力，那射程，竟然等於捷克式的。

美國大使館武官參贊，卡爾遜先生參觀邊區之後，他說：

「我實在覺得驚奇，在四面被包圍的敵人後方，能夠辦這許多事情，我從未見過；第一次歐戰，我在德軍後方，：啊，那是決不能與你相比的。」的確的，誰能夠走到邊區，而不驚奇呢！他在這地區，雖然被廣大人民所愛護，被大的戰士所擁護，但是敵人是恨他的。從敵人每一次掃蕩時所散發的傳單上，就可以看出敵人是怎樣的痛恨他啊。傳單上說：

「燕察察已陣亡！」

「燕察察病重垂危！」

「燕察察，身逃亡延安。」

他看到這些傳單笑了：

「可惜我沒有飛機，敵人也會知道，我還是靠潛回條路呀！告訴敵人，我始終和他保持最親密的接觸。」

敵人也知道他們經常在被司令部所指揮的部隊打擊着。

誰被敵人痛恨的人，就誰被人民所愛護。

燕察察將軍和他手創起來的晉察冀解放區，成爲抗戰中華北的一個堅強堡壘，解放了華北一千二百萬人民，他把祖國的旗幟一直插到北平郊外，爲「滿」的邊境……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這個堅強堡壘成爲解放華北人民的前進基地，燕察察將軍指揮着燕趙雄兒，在遼瀋的戰線上，向敵佔區反攻，解放了張家口，解放了平山，解放了天津西北六十里的楊村車站……大群敵人的心曠地區進……燕察察地看察冀人民的太陽，他的光芒照耀着解放區。

我在會客室裏和司令部談話了將近一小時，最後他關心地問我後方的文化情形，我很誠實地，我們做文化工作的人，面對着這一位根據地的創造者，我們在文化崗位上的努力情形，有什麼值得一提的呢？

隔壁屋子他還有客人，我便辭了出來，準備回到政治部去。

（未完）



商務印書館出版

租佃制度的調查研究

——評「四川租佃制度問題」

郭漢鳴子光宇合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怡然

在審功與版關於租佃制度之調查研究的書籍，「四川租佃制度問題」，要算是較為詳盡的，足資參閱。不過，在我讀過書之後，有兩點準備在還書時提出來：一是關於調查研究的方法；二是關於內容和結論。

作為一個獨立的問題，從專調查研究，方法是十分重要的。我們所謂方法，材料的蒐集是一端，最重要的是我們對待問題所採取的態度，把問題看成靜的？或者把它看成動的？如果僅僅把問題看成靜的？那末在蒐集材料上，我們僅注意於問題內部的方面；如果我們把問題看成動的，那末在蒐集材料方面，不僅止於注意問題的材料的蒐集，更須注意該項材料的發展。在研究分析上亦復如此。

方法可以影響到內容，更可以影響到對這問題的結論。如果問題作爲靜止的狀態看待，蒐集材料固然要簡便，而且要把各種是影響這一問題的因

素排外起來看，而不能從問題發展過程的本身看，誰是決定的因素？誰不是決定的因素？所謂決定因素，是從相對的意義上來了解的，因爲這因素的本身，也可能受其他因素的影響而發生變化。

研究問題，有時爲了方便起見，常把問題放在靜態的假定上，那是必要的；但只是一種假定。此於靜態的假定，如果真正從調查研究的時，那是不夠的，還必須進一步從動態，從問題的發展過程去調查，去研究，才可能獲得生動而豐富的內容，與正確的結論。

郭孟兩先生合著的這一本書，我看過兩遍。我對這書的認識的印象是：偏重在靜態方面的調查研究，無論從蒐集材料，調整內容，以至於兩先生對這問題所下的結論，均係如此。如果從從靜態的假定上來估計這書，郭孟兩先生材料的蒐集與調整方面，給一般研究租佃制度問題的人，確有許多寶

的。這調查，包括兩區域，與可能接觸的問題，非常廣泛的。據書中的第一節說：「自二十八年夏間起至二十九年冬止」，「是時四川四十九縣。凡二百餘鄉」。計四十九縣中共得鄉區租佃調查表二百二十八份。又每縣探採鄉區逐戶調查自二百戶至四百戶之間，共得農家外戶調查表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七份。其次由四川省土地陳報處分訪各縣土地陳報處或財務委員會，依地政學院製定之區租佃概況調查表從事調查，計收到回件七十二份，表九十七張。除此，并搜集租佃契約一百八十一份，作爲參證。被調查的七十二縣，按本書第二章第二節的分類，(一)成都平原區，共十四縣；(二)川西南區，共二十一縣；(三)川西北區，共十七縣；(四)川東區，共二十一縣。包括的區域是相當廣泛而且很多都是較爲重要的縣份，如成都平原區之成都，郫縣，溫江，大邑等；川西南區之嘉定，宜賓，資中，瀘順等；川西北區之三台，

綿陽，南充等；川東區之巴縣，涪陵，高縣，宜賓等。這些縣份，有的是平原地帶，有的是丘陵地帶，有的是近河地帶，有的是近山地帶。大體上算是包括了四川不同屬性的地區。

調查的方法，據作者自己的敘述，分作兩方面：一、由作者實地調查，一面採取通訊調查的辦法；二、由作者實地調查，一面採取通訊調查的辦法。

兩種辦法，作者是以實地調查為主。依據調查第一表，實地調查的成果，與通訊調查比較，是一千與七之比，在比重上，這書所依據之實地調查材料，顯然成為這書內容構成之主要部份。所謂「實地調查」，據作者敘述：「是踏遍四十九縣，凡二百餘鄉，各縣逗留之時間雖短，然所到之地，或直接或間接，或委託土地陳報處派員，用鄉區佃制調查表，分頭進行，深入民間，門到戶說，匪特訪諸父老，且亦險諸隨風。每至一縣，寧不登其公堂，必履其田野，每至一鄉，寧不識其豪紳，必親其民衆，蓋真知地方情形而能道出其原委者，乃為久居鄉間從事耕作之農民，聽其自述陳述，察其生活狀況，自能求所真實之必要步驟，故野跡涉窮鄉僻壤，亦不憚煩。」由此，我們知道作者實地調查的材料來源是有兩方面：一是直接派員；一是請托土地陳報處派員。此種實地調查的材料，雖作者說「深入民間，門到戶說」，嚴格地講，還不能目為直接材料。直接材料，必須作者自身深入民間，門到戶說，對「久居鄉間從事耕作之農夫」，親自訪問；而且在訪問的時候，還得要「眼睛向下」，具有「甘當小學生的精神」，否則，雖履田野，也不能獲得田野之真實情形。至於調查，假手於員司或土地陳報處派員，所得材料之真實程度，那更有限，這點，凡稍為了解一般公務員與農民之間隔膜情形的人，都無難知八九。

從調查方法上說，實地調查較通訊調查為重要

，為可靠；但如實地調查不是作者親身訪問，而是假手員司；或者，即使親身訪問，而非以「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求教於老農老圃，其所得材料之真實程度，和通訊所得，也不致相差太遠。如果我們要論及實地調查的話，對章孟兩先生所採方法，則不無商榷之處。

這書，在內容的處理上，曾就材料分類：佃農戶口；佃地面積；承租手續；租約種類與形式；租期；押租；納租種類；租額；交租時期與方法；荒歉減租；副租陋習與中間剝削；租佃糾紛；退佃；佃農生活與教育；地主及地主所有地而積與職業分類。除此，作者并有統計表三十二幅，凡有數目可稽的，作者均以之歸類統計。

作者在處理這些材料的時候，租佃問題所包括的各方面，大體上是接觸到的，而且在處理材料上，還提供了我們一些非常值得重視的問題。比如：關於租佃制度與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前途問題。

雖然，作者在主觀上并未把租佃問題的重要性，和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前途聯繫起來看，但從這書第二章，第十四章，與第六章第二節各部份的敘述歸併在一起考察，則足證現行之租佃制度，是障礙目前中國經濟發展最重要因素之一。據該書第二章關於佃戶比率與佃耕地比率的記載，四川省內被調查的二十九縣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七戶中，計佃戶數佔百分之四十八，幾達各類戶數總和之半，其他佔百分之十五的自耕農佃農，尙未計入。如以人口計，被調查的六萬四千六百餘人口中，佃農人口要佔百分之四八。三，自耕農佃農的人口佔百分之十六。如以耕地面積計，被調查的十二萬二千六百餘畝中，佃耕地要佔百分之七九。七（包括自耕

農佃農的土地在內）實佔耕地九萬六千九百餘畝，佃農在整個農業生產的地位上，實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這不僅是指四川而言，比如作者在第十四章第一節初，舉全國佃耕地面積和全國耕地面積比較，承租面積平均要佔百分之二、七三。自然，就租佃問題嚴重的程度而言，當推四川。根據這書第六章的記載，四川納租種類：「統計穀租佔百分之六與，上中下等田土，悉行此法，表成都平原尤為濃厚，穀租佔百分之八九。因為納租以穀計算，無國地主或佃農，都怕穀租受旱災歉收的影響，對一個「露天田」，則穀積積冬水，不種麥豆，名此為「冬水田」。」據中央農墾實地所於二十七年秋之調查，川省種稻冬季休閑者佔佃田百分之五十六其中蓋積冬水者佔三分之一，約一千萬畝餘。一個畝每年平均以產麥一石五斗（市石）計，以產晚一市石計，那末全川在總的收穫量上，至少每年要平均少收麥一千五百萬市石，或者少收晚豆一千萬市石，這還是僅就平年而論。『設遇次春乾旱，則高粱山嶺之冬水田，極易乾涸而不能插秧，此於川省中農為尤甚。蓋其全年雨量不過八百至一千公厘，在農期適宜，分佈均勻之年，勉敷水稻之生長，若遇旱偶早，蒸發容易，即遭乾涸。』如此，不僅產量損失，而秋收亦往往茫然。此種現象，如果從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角度上著，顯然是極不合理的現象。

然而，此種極不合理的現象，在抗戰時期，軍需急需的情形下，不能不會有減少跡象，在民國二十九年秋，反因「米價高漲，糧錢其他農產價格，地主貪圖厚利，絕令佃農番冬次，以備翌年種稻，具此靠天之稻田，幾全部蓄水」，足證此種帶有強制性的租佃制，障礙整個農業生產之發展，達到何等程度？農業生產萎縮，市場縮小，在對全國經濟的影響，又將如何？凡此，都是值得重視租佃制問題

曾增產的人，好好考慮的問題。

其次，關於現行租佃制與封建強制制問題。

封建性的強制制，是東洋農業生產最主要的主要因素。在現行農村中，強制制還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根據本書第七、第八、第九章，恰足以證明這一點。以最普遍的穀租額而論，「全川平均穀租額佔收益百分之六十以上」，在成都平原，「最高竟達百分之八十四最低亦在百分之四十」。除此，尚有種種租額制。關於租額制，作者列舉了六種：(一)力役；(二)送柴草；(三)送茶葉；(四)送年節；(五)送新粟；(六)送租雞。關於附帶部份，作者列舉了八項：(一)代種扣租；(二)合會担保；(三)升租加佃；(四)埋明酒(上下佃發生爭持時)；(五)請主議租；(六)掛紅禮；(七)押租利；(八)壓田法。在租額制中，尤以「代種扣租」為戰時佃農極端苦惱的事。因川省催徵，有「限田尋根」之制，一般地主於納田賦交地捐時，多令佃戶暫墊，俟交租時於租額內扣除，佃戶缺款，只得賣穀，至佃戶因此而欠租，地主於次夏照市價折合，賣於佃戶。此價與代上田賦時之賣價，相差甚遠；且所代墊之款，雖達八九個月之久，亦無絲毫利息。而到了到建時，沒煙酒供應，租額不足，則「到權坐卡」即在此種情形下，佃農亦不能不忍氣吞聲。蓋捨此，似無其他求生途徑。在國家經濟呈現着普遍困難的時候，農村中的強制制，將更加強。據本書第七章記載，三十年來，鄉村中租額之增加平均達百分之十。以四川的地租額而言，實已居全國第一位，然農民尤俯首聽命，任地主擺佈，考其原因，實由於現行租佃制度未臻合理所致，而此種不合理的租佃制度，恰又是構成地主對佃農強制制的根源，如想廢除農村中之強制制，改善現行租佃制，自屬當務之急。

其三，改善租佃制，必須從改變政治着手。

許多講改善租佃制的人，往往避開政治，把改善租佃制度的問題孤立起來，而擬具若干無法付諸實施的方案，結果，這些方案都停留在紙上，對現行租佃制並沒有絲毫影響。對此，本書作者亦不無缺點。不過，本書租佃制一章(第十章)，從樸素的敘述中，却告訴我們一條解決糾紛的途徑——必須從改變政治着手，沒有政治上的徹底改革，現行租佃制度想使之合理化，殆不可能。比如本書列舉糾紛解決的程序說：「糾紛既起，情事輕微者，尚能自行解決；但不論曲直，佃農例須請酒吃茶，案情重大者，則須調解。」其調解程序：(一)由糾紛當事人之一向鄉區調解委員會或鄉區長及士紳，用書面或口頭正式申請調解；(二)調解委員會或鄉區長及士紳接受調解，規定調解時日，以書面通知或牌示或口頭通知當事人；(三)屆時由調解委員會或鄉區長及士紳會同當事人，共同調解仲議之；(四)業佃自動履行仲裁所決定之一切和解條件，而不能強行執行。此種處理辦法，為時雖短，但當事人每當請求調解時，亦「須先在指定地點購買禮券一張，價格三元至五元不等，憑券申請，則此券實是調解費收據之別名；至調解時，所需之茶資，公差之「草鞋錢」尤其餘事。」倘經此次調解未能解決，則移至法院。法院的訴訟程序，「最少非三四月不可，而所需費用，如(一)審判費；(二)送達費；(三)抄錄費；(四)執達員食宿費，為數極大；故無論在時間上，金錢上，均非佃農所能負擔。」且無論調解也好，法院起訴也好，在事實上，勝訴多屬地主。本書第十章第三節會這樣敘述：「蓋在鄉區主持調解者乃地主階級之代表，佃農在權威下，惟俯首聽命而已。其在

法院起訴者，地主之法律知識較佃農為高，又較善於巧詐；且有資力延聘律師為之辯護，其勝訴機會，自較佃農為多。現法院審判乃根據書面租約所規定；而此種租約之成立乃地主片面制定；佃農對其程度極低，多有不識字者，不知計較租約之利害，蓋即已簽押章，便無法脫離拘束。」換句話說，在現勢下，從法律到政治構成，均不利於佃農，而租佃制度臻於合理途徑，當然不可能。

實現一種合理的經濟制度，必須以合理的政治制度為其前提，這合理的經濟制度才不致落空；作者對此，無疑的，是不會不注意的。正因為作者他這善租佃制度於孤立起來，在結論上，自難免留下大漏洞，落於紙上空談。

總之，就階級方面說，這書提供的材料和可觀接觸的問題，均較為廣泛，不過值得商榷之處，仍不少。自然，最理想的調查研究，不把它僅限於階級的假定上，進一步，從動態方面蒐集材料，說明問題，在估價上，在結論方面，當更為確切，深入。比如，對佃農的估價：究竟佃農是屬於農村中上升的階級？抑或是下降的階級？佃農中的中農、貧農都是上升或下降的階級呢？抑或佃農中某一階層是上升？某一階層是下降的階級？凡此，都應是靜態的假定可能說明的，必須從動態方面蒐集材料，再依據這些具體的材料才能加以說明。這是動態研究的一例。僅就這樣的例子，證明從動態方面蒐集材料，說明問題，是必要的，是更能夠透顯問題的本質。這是我讀這書的一個總的意見。





和平團結、民主統一的基礎 (代論)

挽救當前的經濟危機 (社論)

國共會談紀要

論軍隊國家化

農民在解放中

論愛國

戰後時期美孤立、帝國主義的威脅

馬克思怎樣學習的

論科學預見(一)

書評及其他

拉鐵摩爾論如何解決亞洲問題

晉察冀行進

(八二二)

(六八三)

(六八五)

于懷 (六八七)

李侯森 (六九五)

巴爾梯斯基作
李少石譯 (六九八)

W·福斯特作
盧景譯 (七〇三)

M·格略塞爾作
葆荃譯 (七〇七)

華西里也夫作
凱豐譯 (七一〇)

D·華思 (七一一)

周而復 (七一六)



代論

和平團結、民主統一的基礎

——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代表會談的結果

全國人民，全國各黨派，全世界各盟邦及我人民所熱心關心的國共商談，現在已完竣初步階段，毛澤東同志於昨日飛返延安，雙方代表並已共同簽字發表「會談紀要」。商談經過情形如何，其結果又如何，那些問題業已解決，那些問題尚待商榷，這一切我們都知道了。由此大家可以看到，這次毛澤東同志應蔣主席之邀而進京，並非徒然，雙方代表在此重大時機會談，月餘並非徒勞無功，各方面的熱烈希望也並沒有落空。這次會談的內容確不只是國共兩黨間的利害關係的問題，而是有關於全國範圍的民主進步，有關全國人民自由幸福，這次會談的結果對於保障和平，推動民主，加強團結，促進統一都有積極的作用。

第一，在這雙方共同發表的「會談紀要」中，首先確定了「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這符合世界潮流，也是符合全國各黨派和廣大人民的願望的。抗戰勝利結束後，不應再有內戰，中國必須進入一個和平建國的新時期；這固然是件很容易做到的事，但我們試回想一下，在八年前，從內戰時期轉入團結抗戰時期，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畢竟能實現了。今天的大勢所趨，比八年前對於和平的條件，更加有利，縱使今日困難比當年更大，但只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和平建國也一定能實現的。在和平建國時期中共坦率表示願意繼續承認蔣主席的領導，承認國民黨的地位，並繼續採取長期合作的方針，政府方面已同意這個基本方針，並承認黨派平等合法，這正是建立和平的有力保證。也即是說，這個基本方針，中我雙方對於各項具體問題提出若干主張，做了若干開明的讓步，已經得到抗戰的各黨派都足以保障和平，其未得協議的，也已奠定了今後尋求合理解決途徑的基礎。我們相信，根據和平建國的總方針，一切問題，是能够逐步獲得解決的。

第二，這次商談的結果，對於推動民主，是有顯著的貢獻的。中共的主張雖然從立即結束政治談判到為迅速結束談判，實施憲政，先行召開政治協商會，但對於和平的召開，自能有助於民主的推動。現在國共大會勢已不能

如原定日期召開，我們希望這問題能够在政治協商會中獲得合於民主原則的解決。「會談紀要」中的第四至第八項都是已得共同協議的民主實施問題。最近時期來，政府當局已在後方地區取消出版檢查制度，並解散了某些集中營，這些有益於民主的事都是值得歡迎的。現在商談結果既已公布，我們希望當局立即採取切實步驟，保障人民的全部自由，廢止或修正一切限制自由的法令，正式承認各黨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取消中統軍統的特權權力和特務活動，立即釋放政治犯，并在各地方開始實行自由的普選。那就更能使民主的實施得到良好的開端。至於在抗戰勝利中的解放區內，人民已經得到充分自由，且已經建立了民選的地方政府。在實施民主的總方針下，解放區人民所已經得到的權利自不應縮減，而應加以合法保障，民選地方政府的制度自不應取消，而應加以加強，更應在廣大的民主基礎上進行。

第三，國內的團結因這次會談而加強是很顯著的。這次會談的經過及其結果都足以表現雙方共謀團結的精神。毛澤東同志不遠千里而來，顯然是出於至誠和大信，來渝後承蔣主席熱誠款待，屢辭主席多次會談，亦都融洽無間，而雙方派出代表，進行商談，中間雖然有過停頓，但從沒有喪失他們加強團結的信心，並始終保持友好和睦的精神。昨日毛澤東同志返延，更顯張治中先生陪送，盛情尤為可感。所沒有解決的問題，我們相信，今後也一定會保持同樣的團結精神繼續商談的。「會談紀要」中最後一點，是在抗戰勝利後的最迫切的現實問題，也是有關團結的問題。我們認為，漢奸受法律制裁，偽軍解散需要妥慎處理，這些本無問題，希望政府速即明白頒佈符合人民願望懲治奸偽的法令和辦法，並即認真執行，以息人民的疑慮，而獲得一切奸偽都不能改頭換面，繼續為非作歹，甚至拿武器，進攻解放區，以致影響到國內的團結。重劃受降地區的問題，也是同樣，應一劃分且應速劃仍能有口，武裝行動，以遂其破壞中國團結的陰謀，這種不幸現象是必須趕快結束的了。關於解放區軍隊與解放區地方政府的問題，現在大家都可

應到，中共方面應已做了極大的讓步，繼續進行協商，以更加强團結而實現和平民主，這正是今後要做的事。

第四，說到統一，誰都知道，中國必須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才能長期建設。這是真理，而有了和平民主團結，也就一定能實現統一。中國所需要的統一正如孫中山先生一生所主張的，是和平的統一，民主的統一，而不是武力的統一，專制的統一。有了民主，這就有集中，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統一。這次會商的全部過程都表現着共同協商，集中領導的精神，也就是民主的統一的精神。在「會談紀要」中，不論政治協商會議，不論民主自由，不論整編軍隊，不論地方自治，都可看出是在力謀政令軍令之統一的。現在，中共及其他方面都承認國民政府與蔣主席的領導，中共更在協商中，贊助政府，力謀政令軍令之統一。那麼，只要繼續鞏固和擴大共同協商的精神，中國走向完全的統一是不成問題的。

以上說的，是這次商談中的積極成果。今後要保持和發揚這些成果，使和平、民主、團結、統一更能鞏固發展和加強，是否已沒有困難了呢？不，應該承認，困難是有的，而且還可能有很大的困難。但是有了這次國共商談

的成就做基礎，加上雙方繼續的努力，和全國各黨派，社會賢達，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一切困難是能克服的。在月餘來的商談中，有人因為不明真相或誤信謠言而致悲觀失望，以為商談決不能有好結果，現在實際情形已經完全揭佈，疑慮和失望是應該代之以努力和信心的了。但也許還有人因為商談至今仍有不少重要問題未得協議而失望的，那麼我們必須指出，這種失望也是不對的。要知道，中國的問題從來就是複雜難辦的，要求人們以堅忍耐煩的精神，不懈不怠的努力來解決。一步不能登天，幾千幾天的時間，雖然不短，但也決不能把一切困難一掃而淨。我們應該尊重政府與中共雙方代表經過這多少天的努力所已得的成就和已奠定的基礎，用人民的力量繼續努力，準備克服任何困難，那麼，我們深信前途固然還會經過多少困難和迂迴，但和平團結、民主統一，必能打破一切困難，通過一切迂迴而大放光明，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是終究要實現的。

因此，我們認為，月餘來蔣主席與毛澤東同志的會晤，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代表的商談，是一件歷史上的大事。「會談紀要」正在第十節於重慶簽字發表，這的確是值得全國人民來慶賀的。（新華十月十二日）

小農之破產，亦是顯而易見的，後方經濟危機的濶，是籠罩着各個部門了。

社論 挽救當前的經濟危機

經濟日趨的沒落，經濟危機在各地擴展起來了。大後方就是這樣，收復區亦是這樣。

經濟危機的形態，是與戰時不同的。抗戰的後半期，後方經濟，差不多完全沉沒在不景氣的深淵裡。戰時經濟危機的特點，是物價暴漲，而戰後的經濟危機，則為物價驟跌，失業驟增。物價暴漲的時候，雖則社會購買力被壓得更低，但國戶與商店，總可在提高價格中獲得其補償，到了物價驟跌的時候，局面就更壞了。在通貨膨脹和不合理的稅制之下，社會購買力是沒法提高的。物價跌，銷路依

然停滯，但成本和子金的損失，就沒法避免了。今天在後方各地所發生的現象，就是如此。

大後方目前的經濟，是戰時經濟的「反動」。百貨、布疋、西藥、顏料以至一些出口，都走着下坡路；黃金和美鈔日來雖有起色，但比起它在飛黃騰達的時候，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就是糧食，亦有江河日下之勢。這些情形，指明：商業因商品跌價而破產，銀行因做貸及資金而陷於停滯；工業死，商品跌價了，銷路斷絕了，它們就不能不關門。如果從糧食及一般農產品的跌價去推測，則中農

其在收復區，物價的指標，雖與大後方不同，走着另一個路向，但危機的本質，却無二致。從八月中旬起，上海南京以至武漢一帶的物價，不斷上昇，九月下半月比九月上半月高了一倍以上。如果

把收復區的物價來與後方相比，那是便宜得很多的。其所以如此，則是因為法幣與偽幣的比率，似乎規定得過高。在另一方面，大後方有特殊力量的人，正利用這有利的比率，把大量法幣到收復區去發「勝利財」。法幣由後方運往收復區，而商品則由收復區流入大後方，這便一來，大後方的物價就會跌得更兇而收復區的物價就會步步高昇了。收復區的物價之漲，使當地人民的生計更加痛苦。物價漲而偽幣與法幣的比率規定得太低，這是一點；因為接收工作之拖延，因為當局忙於抽收物資，許許多多的工廠停頓了，許許多多工人失業了。這是更重要

的一點。上海一處的失業工人就達到五十萬人。

在物價趨向上，大後方與收復區是不同的，但從人民的生活來看，從市場之枯澀來看，從工商的破產來看，和從金融市場之枯澀來看，大後方與收復區在這些問題的實質上是相同的。

造成大後方經濟危機的原因，是戰事結束，戰爭的帶累停止，同時，對鎖的威脅亦告解除了。對解除了，囤積居奇的條件之一亦就消失了。這就促進了投機因素的改變。大家都願存錢而不存貨，於是法幣流通的速度亦就比以前過緩了。通貨流通速度之降低，可以相對沖淡發行數量之增加。這又是促進物價之下降的。除此之外，收復區物價之內流與人民的購買力之枯萎，都是與物價暴跌有關的。

後方這種經濟危機，並非與戰時經濟無關。由於戰時的財政經濟，不但有在生產上自力更生，而以發鈔和依靠外援為能事，甚且在發展國家資本的藉口（其實是發展官僚資本）之下，對於民間生產事業，給與種種的束縛和不合理的負擔。於是生產日益衰落，物資日益缺乏，囤積投機之風亦就隨之而起。在這種，通貨的巨量發行，推動了物價；物價的上漲又增加了通貨之發行。於是法幣漸天飛了。人們對於持現金的辦法，是以黃金投機代替了。人們對於持現金的辦法，是以黃金投機代替了。戰事結束，囤積居奇的條件消失了，囤積居奇一齊破產了，銀根亦跟着緊迫起來了。銀根緊，促使囤積居奇破產，整個市場，都陷入動蕩之中。在這種，本報半死不活的工廠，就沒法不在勝利聲中

倒下去；千千萬萬的工友，就必然在勝利聲中失業了！至於收復區之經濟混亂，亦是人禍所造成成功的。漢奸敵人所以維持治安，飲差大臣只潛心於發財的勝利財。像解放區那樣的動員人民迅速恢復生產的做法，當然是不會有的。搶官職、搶地位、搶物資，發橫財的醜劇，正層出不窮的在收復區的每一個角落演出。像這樣，工廠怎能不停頓，市場怎能不蕭條呢？一切都是人禍！

這樣的經濟危機，有什麼影響呢？當然，影響是有的，這就是：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了，失業破產的災難，殘酷的打擊了他們；其次，戰時的一點經濟建設，完全被摧毀了，無數的中小生產，正在銷路無着資金困迫的的慘況中關門；再其次，現在因淪陷區變成收復區，法幣的流通量擴大了，與偽幣來比較，法幣的價值提高了，這樣便更大量的發下去。因為有種種條件的牽制，通貨膨脹似乎感覺不出來，但是，「發行」的列車，如果使足馬力的開下去，則全國性的最高度的惡性膨脹，終會有一天降臨爆發起來的。更深刻的財政危機，正在前面嗎！

戰後的經濟危機，並不是中國所獨有的。現在的美國亦已開始受到恐慌的威脅了。美國邱吉爾之下台，其原因之一不也是因為國內社會經濟問題尖銳化之所致嗎？但，中國是有它的特點的。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它的經濟機構是與英美不同的，故它的恐慌，處處表露它的買辦性和前資本主義性。因之，指理當循這個恐慌的途徑，更

非頭痛醫頭脚醫脚所能奏效。例如要求國家銀行發行本票，收購黃金及收回公債的辦法，要求政府增加工貸及商業貸款的辦法，未嘗沒有作用，但它們只是一些治標的辦法而已。發本票收黃金，只能使金融的枯澀，暫時得潤滑潤；增發工貸與商貸亦只使工商業在口乾時得喝一點開水吧了。我們認為更重要的是，對於民族工業應有整套的合理的政策，國家辦不了的，應讓民間資本經營，同時應立即停止只有官家才能接受做偽工廠與財產的不合理辦法；在稅制上，應該給與產業資本以極大的便利與保障；在金融上，應該使銀行面向生產；在交通上，應該做到貨暢其流，不再有留滯滯滯事。英美今天所怕的是生產得太多，而中國所患的是生產得

太少。故對付這個經濟危機，緊縮生產絕不是辦法。但緊縮工業能有銷路，就必須提高人民的購買力。在這種，二五減租和減息的第一步土地改革，是必須馬上實行的。沒有削削封建剝削，沒有減輕農民負擔，沒有提高他們的生產能力與購買能力，則工業化便失去了前提。

然而，要便這一切，能見諸實行，實有待於黨衆期待的切實的民主改革之實現。沒有真正的民主改革為前提，二五減租就成爲紙上空談；沒有真正的民主改革和切實的土地改革，則所謂工業化，就成爲外資和官僚買辦建築他們的樂園的途徑。在那種情況下，「復員」真變成「復原」，而經濟危機亦只有在這種過程中不斷發展下去了！

國共會談紀要

中國國民政府蔣主席於抗戰勝利後，邀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先生，商討國家大計。毛先生於八月二十八日應邀蒞滬，連見蔣主席，會作多次會談；同時雙方各派出代表，政府方面為王世杰、張羣、張治中、邵力子四先生，中共方面為周恩來、王若飛兩先生，憑在友好和諧的空氣中進行商談，已獲得左列之結果，並仍將在互信互讓之基礎上，繼續商談，求得圓滿之解決。茲將會談紀要如下：

一、關於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一致認為中國抗日戰爭，業已勝利結束，和平建國的新階段，即將開始，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雙方又同意蔣主席所倡導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

二、關於政治民主化問題：一致認為應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並應先採必要步驟，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現雙方正與各方洽商政治協商會議名額，組織及其職權等項問題，雙方同意一俟洽商完畢，政治協商會議即應迅速召開。

三、關於國民大會問題：中共方面提出重選國民大會代表案，延緩國民大會召開日期，及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選舉法，和五五憲法草案等三項主張；政府方面表示：國民大會已選出之代表，應為有效，其名額可使之合理的增加和合法的解決，五五憲法草案原曾發動各界研討，實屬修改意見，因此雙方未能成立協議。但中共方面聲明，中共不願因此項問題之爭論而破裂團結，同時雙方均同意將此項問題，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解決。

四、關於人民自由問題：一致認為政府應保證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應享之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現行法令，當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

五、關於黨派合法問題：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應承認國

民黨共產黨及一切黨派的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黨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為憲政常軌，今可即行承認。

六、關於特務機關問題：雙方同意政府應嚴禁特務機關和警察以外機關，有拘捕審訊和處罰人民之權。

七、關於釋放政治犯問題：中共方面提出：除漢奸以外之政治犯，政府應一律釋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準備自動辦理，中共可將應釋放之人提出名單。

八、關於地方自治問題：雙方同意各地應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惟政府希望不以此影響國民大會之召開。

九、關於軍隊國家化問題：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應公平合理地整編全國軍隊，確定分期實施計劃，並重劃軍區，確定編制編成，以謀軍令之統一，在此計劃下，中共願將其所領導的抗日軍隊，由現有數目縮編至二十四個師至少二十個師的數目，並表示可迅速將其所領導而散佈在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內）八個地區的抗日軍隊，着手復員，並從上述地區，逐步撤退應整編的部隊至臨海轉

以北京及蘇北的解放區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國縣編計劃正在進行，此次提出之各項問題，果能全盤解決，則中共所領導的抗日軍隊縮編為二十個師的數目，可以考慮。關於駐地問題，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討論決定。中共方面提出：由中共及地方軍事人員，應參加軍事委員會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應保障人事制度，任用原部隊人員為整編後的部隊的各級官佐，編餘官佐應實行分區訓練，設立公平合理的補給制度，並確定政治教育計劃；政府方面表示：所提各項均無問題，亦願商談詳細辦法。中共方面提出：解放區民兵應一律編為地方自衛隊；政府方面表示：祇能視地方情勢有必要與可能時，酌量編置。為具體計劃本項所述各問題起見，雙方同意組織三人小組（軍令部、軍政部及第十八集團軍各派一人）進行之。

十、關於解放區地方政府問題：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應承認解放區各級民選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區名詞在日本無條件投降以後，應成爲過去，全國政令必須統一。中共方面開始提出的方案爲：依照現有十八個解放區的情形，重劃省區和行政區，並即以原由民選之各級地方政府名單，呈請中央加委，以謀政令之統一；政府方面表示：重劃省區，變動太大，必須通盤籌劃，非短時間所能決定。同時政府方面表示：依據蔣主席曾向毛先生表示，在全國軍令政令統一之後，中央可考慮中共推荐之行政人選，收復區內原任抗戰行政工作人員，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與成績，酌量使其繼續爲地方服務，不因黨派關係而有所差別。於是中共方面提出第二種解決方案：請中央於陝甘寧邊區及熱河、察哈爾、河北、山東、山西五省，委任中共推選之人員爲省府主席及委員，於綏遠、河南、江蘇、安徽、湖北、廣東等六省，委任中共推選之人爲省府副主席及委員（因以上十一省或有廣大解放區，或有部份解放區），於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四特別市，委任中共推選之人爲副市長，於東北各省容許中共推選之人參加行政。此事討論多次後，中共方面對上述提議，有所修改，請委任省府主席及委員者，改爲陝甘寧邊區及熱察冀魯四省，聘委省府副主席及委員者，改爲晉綏兩省，請委副市長者，改爲平、津、青島三特別市。政府方面對此表示：中共對於抗戰卓著勳勞，且在政治上具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請政府決定任用，倘要由中共推薦某某省主席及委員，某某省副主席等，則即非真誠做到軍令政令之統一。於是中共方面表示：可放棄第二種主張，改換第三種解決方案，由解放區各級民選之政府，重新舉行人民普選，在政治統一之基礎上，

自監督之下，歡迎各黨派、各界人士踴躍參加選舉，凡一縣有過半數選民已實行民選者，即舉行縣級民選，凡一省或一行政區有過半數縣已實行民選者，即舉行省級或行政區級民選，選出之省區縣級政府，一律呈請中央加委，以謀政令之統一。政府方面表示：此種省區加委方式，乃非謀政令之統一，惟縣級民選加委可以考慮，而省級民選須待憲法頒布，省的地位確定以後，方可實施，目前祇能由中央任命之省政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俾即恢復常態。至此中共方面提出第四種解決方案：各解放區暫維持現狀不變，留待憲法規定民選省級政府實施後，再行解決，而目前則規定臨時辦法，以保證和平秩序之恢復。同時中共方面認爲可將此項問題，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解決。政府方面則以政令統一，必須提前實現，此項問題久懸不決，慮爲和平建設之障礙，仍亟盼能商得具體解決方案。中共方面亦同意繼續商談。

十一、關於奸偽問題：中共方面提出嚴懲漢奸，解散偽軍；政府方面表示：此在原則上自無問題，惟懲治漢奸要依法行之，解散偽軍亦須妥慎辦理，以系影響當地安寧。

十二、關於受降問題：中共方面提出：重劃受降地區，參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參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後，自可考慮。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國慶紀念日於重慶

王世杰

此處留有空隙以備張羣補簽

張治中

邵力子

周恩來

王若飛



論軍隊國家化

于 棧

一 軍隊國家化的前提

除掉極少數的例外，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是贊成軍隊國家化和國家民主化這兩大原則的。但問題在，這兩大原則之間的相互關係究竟是什麼？應該怎樣呢？

從形式邏輯出發，這兩大原則的關係有如下可能的三種：

第一種：軍隊國家化是國家民主化的前提，軍隊不國家化，國家是不可能民主化的。

第二種：軍隊國家化與國家民主化是平行的，軍隊國家化能進行到什麼程度，要看國家民主化到什麼程度；這是一種說法。還有一種說法是：國家民主化到什麼程度要看軍隊國家化的程度。這兩種在本質上對立的認識，可以概括到一種統一的說法，即：軍隊國家化與國家民主化這兩大原則都對，都須同時進行。

第三種：國家民主化是軍隊國家化的前提，只有國家真正的民主化了，軍隊才能真正地國家化，而不是化給一個非民主的個人或集團。

從形式的觀點出發，這兩大原則的相互關係可能有如上三種；在實際生活中，的確也有代表這三種不同看法的人。但，這只是表面的；實質上，這兩大原則的關係只可能有兩種不同的關係，即：

要麼是：軍隊國家化是國家民主化的前提；
或者是：國家民主化是軍隊國家化的前提。平行論者表面上雖然好像是折衷了兩者，但實際上他必須站在一種立場或後一種立場的。

假如是認為軍隊國家化進行到什麼程度要看國家民主化的程度的話；那麼，他就是在實際上承認了國家民主化是軍隊國家化的前提。假如是認為國家民主化到什麼程度要看軍隊國家化的程度的話；那麼，他就實際上接受了軍隊國家化是國家民主化的前提。在這裡，理論上固然沒有含糊，在實際生

活中，問題最後仍是不可能有含糊的。

這樣，我們就必須決定：

究竟軍隊國家化是國家民主化的前提呢？還是國家民主化是軍隊國家化的前提？

問題到了這裡，形式邏輯便不中用了。國家民主化，這不是一個具體的代變確定事實的概念，而軍隊國家化却如此，它沒有表明是使軍隊國家化到什麼程度去；是封建軍隊化於封建國家嗎？是封建軍隊化於民主國家嗎？是民主軍隊化於封建國家嗎？是民主軍隊化於民主國家嗎？這就是一個軍隊國家化，完全不能給予任何確定的答覆，把國家民主化作為前提，那麼所謂軍隊國家化便有了意義；民主的軍隊固然要化於民主的國家，就是封建的軍隊也必須化於民主的國家——改革為民主的軍隊。反之，把軍隊國家化作為國家民主化的前提，那麼在實行軍隊國家化的國家固然還是未民主化的封建的國家，也就是說，不但封建的軍隊要化於封建的國家，就是民主的軍隊也要「化」於封建的國家——被封建的國家所消滅。因時，在實際政治生活中，上述的問題其實也就是我們贊成用武力統一來建立與支持一個民主的國家呢，還是贊成用和平（民主）統一來建立與支持一個民主的國家？因為堅持軍隊國家化是國家民主化的前提的人，無論在理論或實際上必然走武力統一的道路。武力統一在今天不僅是事實上統一不了國家，即令統一了也絕對不會使國家民主化，而只能使國家繼續封建化，而且正是因為國家在今天與今後永不能武力統一，所以他那統一之後所要實行的民主云云也就對水不實行的藉口了。

袁世凱是這樣沒有交代而下場的。

曹錕是這樣沒有交代而下場的。

吳佩孚是這樣沒有交代而下場的。

但儘管有這許多人從武力統一的台子上滾下來，堅持軍隊國家化是國家民主化的前提者，依然絕大多數人在（我們不承認一件事實，不是所有的人對

從歷史中吸取教訓的。他們說：

「總之，我們要求憲政圓滿實施，則必須舉國一致積極團結，欲使舉國積極團結，必先軍事上的統一，其理至明，其義至簡」（本年五月十六日，成都軍軍日報社論：「再論團結與統一」）

那就是說：「要求憲政圓滿實施，必先軍事上的統一。」說是「其理至明，其義至簡」；我們老實說就看不出這「至明」的「理」和「至簡」的「義」來。首先所謂「統一」是統一在什麼基礎上呢？我們主張，這在六年以前，我們就主張：

「非統一於投降而統一於抗戰，非統一於分裂而統一於團結，非統一於倒退而統一於進步……」。我們並不是無條件地反對統一的，但是無條件的統一就是我們不許可的，而必須堅決反對的了。其次，為什麼一定要在軍隊國家化（無條件統一）了之後，才能開始國家民主化（圓滿實施憲政）呢？

這似乎並非一個「至明」的問題。於是，繞個圈子的回答來了：

「原則上，到了憲政時期，我國軍政軍令，固然是出自民選的中央政府，統一軍權問題似乎不難迎刃而解，殊不知，在軍權未統一以前，軍權分裂的國家，始終沒有所謂「憲法之治」，而祇有所謂「軍閥政治」，英美各國憲政之所以有光榮的歷史可說，是軍權從早統一的結果，而其餘他國憲政之所以未滿成效，也未嘗不是因為軍權沒有得到適當控制的緣故」（本年四月，胡秋原主編「民主政治」，該編者：「軍隊國家化與憲政」）。

英美是民主的宗邦，假如英美的只有存在軍權無條件統一了之後才能實施「憲法政治」，我們這一個才開始學習民主的國家豈非如此嗎？不少一知半解的學者以此而沾沾自喜，以為國絲有了這層一變歷史根據，大概軍權必須統一（無條件統一），然後才能實施民主政治的理論是理也不虛的了。

且慢，且慢！讓我們也來翻翻歐洲民主國家的老賬。我們說，無論是在理論上和歷史上，無謂論斷是錯誤的，沒有絲毫歷史根據的。

在理論上，西歐先進諸國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不是無條件地變成軍權統一，而是首先粉飾無條件的統一了的軍權（專制軍權）。在這一個基礎上，我們可以說歐洲憲政政治舞台的第一幕不是統一軍權而是分裂軍權，近代民族主義的激進派對抗、分裂軍權以至消滅那反動的絕對專制軍權。他

們不用統一軍權嗎？不，他們是專制一軍權的，但統一軍權一在國家民主化之後，而不是統一在國家民主化之前；統一在民主地實施憲政之上面不是統一在專制倒退的控制之下；那是有條件的統一，而不是無條件的統一。在歷史上，事情可以分成兩方面來說。

從一般的歷史發展來說，所謂統一的軍權在封建社會的初期實際上是有過的。只有當初期的封建社會解體，政權的中心慢慢地從分散的封建國王侯爵移轉到絕對專制的帝王手中時的時候，所謂龐大的僱傭軍隊和統一軍權專制中央集權專制在理論上成為可能和事實上實際發生。這種絕對專制的中央集權專制在某些地方也有些僥倖的統一的國家，但它基本的封建專制的特質即隨着了是新興的民主政治的對頭，因此，新興的民主力量，不能不在積極地採取了和這統一了的政權和專制對抗的形式。這也就是為什麼比英國的民主政治更早的意大利的民主政治不採取地方性的政權和軍權以對抗中央性的羅馬政權和軍權的緣故。

其次，讓我們看一看巴力門的宗邦——英國，它在歷史怎樣處理這一個問題的。在這裡，必須指出的是，作為英國十七世紀大革命的起點之一問題正是當時巴力門根本不承認英王有絕對的軍權，更不容許他有統轄民兵之權。早在大革命前六年的一六四二年，英國的巴力門不僅是有分裂軍權反對皇室的軍權的大不韙，而且要求英皇承認巴力門有其獨自的統轄民兵之權。時皇（查爾第一）有他統一了的軍權專制，國會對他們非受英皇准許的民兵——這還是英國的憲法政治開始發台時「軍權分裂」的實際情形。我認爲這問題，這有分裂軍權之名而英國民兵有助於英國的憲法政治呢，還是專制英國的憲法政治了是不是會有人認爲，巴力門放棄了民兵，讓英皇統一，擁有軍權的英皇就會自動地放棄軍權了呢？不是的，正好相反，在歷史學上，正是因為英國的民主力量擁有民兵，它才能在革命以後順利地廢除專制憲法政治。

這「軍權分裂」的情形，由於英國的特殊情形，與朱德革命成功前國內。這革命前後的復辟時期內，當時的保衛黨（克星黨）和自由黨（會黨黨），因為英皇的軍權沒有解除，始終沒有放棄過反對英皇擁有常備軍這一權利鬥爭。他認爲：這這等人民的軍權力量；他則主張：把英國的常備軍限制在二千人至三千人之間，把軍權完全歸於國會管理之下。想國會不能控制英皇常備軍，怎麼能呢？以假借限，以牙還牙。當英皇的常備軍武裝失守的時候，民主力量是一定要要求武裝。因此，這種情形與民主力量對抗英皇

軍隊係維持民主的保證，作為保衛他們獲得民主權利的保障。

有人以為：一個民主的政黨，不應是武裝的政黨，一個政黨一旦武裝了，就不可能再叫作民主的政黨了。這一番話出之於一個歐洲人之口，聽來好像是更有根據。但實際上，這是數典忘祖。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說：若說是武裝的政黨，在近代史上，第一個出現的民主政黨在當時就偏重是擁有武裝的政黨。聽來奇怪，事實上，這是一點都不奇怪的。當強大的武裝力量保衛着絕對專制的政權，妨礙着國家民主化的時候，民主的力量奉武裝自己，難道回專制力量投降嗎？只有武裝的革命才能打破武裝的反革命，反革命的武裝逼迫着革命力量武裝——這一歷史的注則不是東方的中國所特有的。

從英國巴力門的鬥爭史中，我們只能得到這樣一個結論：為了爭取民主政治的實現，在最初不是鞏固絕對專制的軍權，而是對抗乃至推翻那絕對對專制的軍權；在這過程中，武裝鬥爭的形式不僅是可能有的，實在有，而且幾乎是一定有的。然則，軍權不是一統一嗎？要統一的，但不是把人民的軍權統一在絕對專制的政權之下，而是把絕對專制的軍權統一在民主化了的政治之下。

這就是為什麼要完成真正的軍隊國家化（就是說，如今天絕大多數人民所要求的，把一切軍隊化於民主的國家），必須先完成國家民主化的緣故。假如這兩者都必須經過一個複雜而長期的過程才能實現的話，那麼，我們也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只有當國家民主化的過程真實地展開的時候，軍隊國家化才進一步的實現。

有人以為國家民主化是一個政治問題，應該取決於政治鬥爭，軍事問題究竟是軍事問題，武裝鬥爭總有些越出政治鬥爭的常軌。問題在那裡呢？問題在：我們今天在爭取這條政治鬥爭的常軌，這條常軌直至今日還沒有在中國存在。政治鬥爭而不得不出之以武裝鬥爭的形式不是主觀願望不要的問題，而是決定於一定的歷史條件。例如，在上面我們引證的十七世紀中英兩國議會鬥爭中，假使當時英王不用他的軍隊來威脅各民主黨派的權利，當時的保守黨和自由黨是沒有組織民兵的必要。不過假如有，一種反民主的力量經常地以一個武裝力量的姿態而出現，而且成爲一個長時期中的必然現象的話，那麼，在這種條件下，爭民主的政治鬥爭只有採取武裝鬥爭的形式，而且這一形式只有當反民主力量不復以武裝力量爲其維持反民主統治的主要工具的時候，它才相應地不復成爲爭民主的政治鬥爭的主要形式。這是中國

國史發展的規則。

關於這一點，陶孟和先生有過一段很好的分析：

「政治鬥爭因政治結構及社會情況不同而形勢各異。在獨裁政治的，顯然是個人的或是黨國的，與民主政治之下的，其形勢顯然各有不同。在貴族歷史中，平時從事政治鬥爭的，不外帝王、皇族、功臣、軍人、大吏、外戚、宦官、巨族、政客、官僚、儒生幾個重要份子。因時代不同，各份子主權的重要性不同。由他們合縱連橫，其間代興，爭奪傾軋，形成了政治鬥爭的種種方式。參加這些鬥爭的主要的個人或是由個人應請而結合成的派系，人民在內有份的。只有在一個皇朝統治衰微的時候，所謂盜賊橫行，劫掠而進，政治鬥爭場上才出現了新的有特別有力份子的份子，人民才有積極的參加政治鬥爭的機會」（本年一月二十八日，大公報專期論文：陶孟和「政治的鬥爭」）。到此為止是符合於客觀事實的。但陶先生接着說：

「但在這獨門等語，便已以武力爲工具，推翻政治鬥爭的規則，破壞政治鬥爭的道德與秩序，而進出於政治鬥爭範圍以外了」。從而也就不能說先生是政治鬥爭了。

現在的問題是：要麼就是沒有人民參加的政治鬥爭，要麼就是有人積極參加，但都已經不能算是政治鬥爭了。究竟是中國歷史上中國人民一貫地破壞了政治鬥爭的規則呢？還是由于中國特殊的歷史和社會條件決定了中國人民的政治鬥爭必須採取武裝鬥爭的形式呢？

陶先生根據理論的邏輯，認爲這獨門等語不能算是政治鬥爭，因爲中國人民在歷史上破壞了政治鬥爭的規則，但實際上中國人民這種破壞政治鬥爭規則的政治鬥爭却正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規則。其所以如此，不是因爲人民不慣於政治鬥爭的規則，而是中國歷代的專制統治者根本不讓中國人民有慣於政治鬥爭的規則。中國人民或者是根本不能起來，要起來只有一掃而空。永不起來呢，還是掃空而後？這是中國歷史下給中國人民的一份挑戰書。一代又一代地由中國人民決定了一掃而空而後，這並不是因爲他們有愛子「揭竿」，而是民爲在歷代專制帝王深重壓迫之下。不「揭竿」他們就根本起不來啊！

而且，所謂政治鬥爭的領導者是根據什麼說的呢？很顯然的真正政治鬥爭必定是有千百萬人民大衆積極參加的一種政治鬥爭，這是絕對不會有的；因爲，非然者由那些「個人」或「個人的感情對等」所結合成的「私黨」之間的「合縱連橫」、「黨門鬥爭」、「爭奪領袖」

而「人民沒有份的」，無原由的鬥爭也算是真正的政治鬥爭了。很顯然，這種無原由、無目的的鬥爭不能稱之為真正的政治鬥爭。

因此真正的政治鬥爭必須是有人民積極參加的一種政治鬥爭。這是所有「一切有意義的政治鬥爭的內容及其實質」；離開這一內容和實質，它就成其為真正的政治鬥爭了。這是一個標準，內容的標準。其次，它採取什麼形式呢？

以歐洲為例，必須採取議會鬥爭的形式才是政治鬥爭的人，其心目中的標準十之八九是英美的政黨政治。但他卻忽視了，這種議會鬥爭的形式即在「尚未形成之前，歐洲的民主政黨在某一些特定的歷史時期和特定的具體條件之下，是同樣經過過武裝鬥爭來的。這還不清楚嗎？要使議會鬥爭可能，先得更有一個不受黨派威脅的議事廳和言論集會結社的基本民主自由，而我們今天還沒有這一個議事廳和言論集會結社的基本民主自由啊！

假如說，民主運動在歐洲採取武裝鬥爭形式的時間短，而在中國所經歷的時間却為什麼這樣長呢？那是因為我們的歷史和我們的社會是這樣的一個歷史和這樣的一個社會。這就決定了在長時期內必須有這樣一種鬥爭形式。不少人埋怨中國的民主鬥爭採取武裝鬥爭的時間太長，他們忘記了人民無罪；他們怨了，他們應該想那些阻止國家民主化的人是那樣的兇狠以致使我們的國家不能迅速地民主化，而必須經歷一個很長時期流血而痛苦的過程。現在我們爭取國家民主化，就是為了縮短這一流血而痛苦的過程。中國人民的血流得太多了，誰再願意這過程多延長一天一日？

二 何謂軍隊國家化

什麼叫軍隊國家化？或者說，什麼樣的軍隊才是國家化的軍隊，什麼樣的軍隊不是國家化的軍隊？

在這種，我們必須再一次的具體規定一下所謂軍隊國家化的真實涵義。我們前面已經說過，軍隊也好國家也好，都有封建民主之別（當然還有其他歷史性質的軍隊與國家，這種不來說它），林林總總區別，問題就毫無意義。舉例說，中國的秦始皇，外國的希特勒，他們也都有他們的軍隊是國家化的，但是我們今天要這種所謂國家化的軍隊嗎？我們能承認他們的軍隊國家化嗎？當然不能。我們今天所說的軍隊國家化，是把軍隊化於民主的國家，

而不是化於任何其他的國家。

因此，我們這所說的軍隊國家化的國家，既不是絕對專制的國家，也不是法西斯獨裁的國家，而是主權在民的民主國家，因為只有一個主權在民的民主國家才是能代表這一個國家廣大人民真正的國家。

然而，什麼樣的軍隊才能是國家化的軍隊呢？我們必須從這四個方面，有四種主要的軍隊應該嚴格地區別開來：

- 一、封建的地方性的軍隊
- 二、封建的中央性的軍隊
- 三、人民的地方性的軍隊
- 四、民主國家的中央性的軍隊

這四種軍隊有什麼差別呢？不是所有地方性的軍隊都是封建性的軍隊，不是一切所謂中央性的軍隊都是國家化的軍隊，而真正民主國家化的軍隊一般的却正是從地方性的軍隊開始的。

問題的關鍵在那裡呢？

第一，從歷史的發展看，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秩序。

大規模的軍隊在封建歷史中出現的時候是封建社會發展到絕對專制王朝的時候。在絕對專制王朝出現以前，那時候的所謂軍隊不過是君主侯的私人武士而已，由於經濟發展的限制，這種軍隊的規模是不可能太大的。這就必然的註定了，它是一種地方性的附屬於封建色彩的武裝力量。這種軍隊所追求的政治目標只有一個：忠於王侯和保衛王侯的統治，除此而外，它是沒有任何積極目的的。到了封建社會發展到第二個，隨著絕對專制王朝的登場，以募兵制為基礎的大規模的封建兵制才在歷史上出現。這種大規模的封建軍隊之何以可能的呢？由於封建社會進入絕對專制王朝的第二個，一方面有封建建制度的開始破壞，大批的農業人口從封建農村中離開出來；另一方面則是城市工業和國內商業的逐漸興起吸收了一部份從農村中離開出來的人口；但由於城市工商業興起的速度趕不上封建農村崩潰的速度，城市工商業及收不了從農村中排除出來的全部人口，于是在歷史上就出現了一大堆的流民。一定的和經常的農業的流民軍，這就形成了封建帝王侯的軍隊的準備軍。其次，由於封建式的農田和城市的興起，專制王朝的經濟收入增加了，經濟增加了的收入就形成了封建帝王侯備軍隊的軍費來源。最後，所謂絕對專制的封建王朝，雖然按其本質說，不過是許多封建王朝中最大的一個王朝而已，

在事實上它是趨于統一的，因此所謂軍權是統一在他的手裡的；雖然這種統一在歷史上證明了是極端不穩定的。

但由於這種軍隊雖然在名義上是自命為屬於國家的統一的中央性的軍隊，但實際上和人民利益對立的一種軍隊，所以它始終不能順利地解決：

- 一、兵源問題
- 二、軍費問題
- 三、軍權問題

這三大問題實際上就是專制軍隊的三大基本矛盾和三大致命傷。秦漢以來中國兩千年的歷史證明了，絕對專制的封建帝王是命定了解決不了這些重大問題的。

按照每一個國家具體的歷史情況不同，一個封建的絕對專制的政權，愈是不能用別的方法來維持它的統治，愈是不得不更多的仰仗于它的專制軍隊。在這種情況下，新起的民主力量，就不得不以那統一了的專制軍隊為革命的對象。這樣就產生了民主革命初期，英國的民主階級組織民兵（Militia），法國的民主階級組織國家自衛兵（Garde Nationale）來對抗那中央性的統一的專制的軍隊的情況。什麼是民兵和國家自衛軍呢？這些人民的武裝，在它初起的時候都不是中央性的軍隊，它們都是地方性的力量。英國的民兵是按照縣（County）單位由人民自願組織起來的，法國大革命初期的國家自衛軍是按照區單位由人民自願組織起來的。把看守着巴黎第獄大門的法王底中央性的專制軍隊打垮的正是巴黎的地方性的部隊。假如說所有地方性的部隊都是封建性的軍隊，我們能說英國的民兵和法國的國家自衛軍是封建性的軍隊嗎？不，不能這樣說，正是這些地方性的軍隊才是英法軍隊國家化的基礎和核心。

近代中國的歷史，更豐富的更尖銳的證明了這個規律。滿清皇朝的軍隊是統一的封建的軍隊。太平天國與辛亥革命各省起義的軍隊先後破壞了這個統一，它們的軍隊是地方性的，但却是帶着民主性的。在辛亥革命失敗以後，繼袁世凱到曹錕吳佩孚的軍隊也是中央性的封建的軍隊，而孫中山先生在廣東所訓練的革命軍卻是地方性的。孫中山先生所開始訓練的軍隊，其革命的傳統到今天的一百二十萬人民軍隊所繼承。今天人民的軍隊也還是地方性的，但任何公平的觀察者都不能不承認這是中國今天最好的軍隊。因為它只屬於人民，而絕不屬於任何個人或任何少數的集團。正是這地方性的軍隊才是中國軍隊國家化的基礎和核心。

因此，我們就必須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不是所有地方性的軍隊是封建性的軍隊，不是所有中央性的軍隊是國家化的軍隊，我們必須區別出兩種性質完全對立的地方性軍隊和中央性軍隊，單看地方性或是中央性這一形式的規定，是完全不能決定問題的。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檢討：既然地方性和中央性這形式的規定不能區別出什麼是國家化的軍隊，那麼，我們就必須進一步追究究竟什麼是國家化的軍隊和非國家化的軍隊之間的差別呢？於是問題就發展到：

第二，必須從實質上來區別一個軍隊究竟是屬於那一種範疇。

有一種虛偽的資產階級的理論說，世界上有一種軍隊是超然于政治利害之上的，他們說這種超然的軍隊就是國家化的軍隊。但實際上，無論是一個國家或是那一個歷史時期，這種超然於政治利害之外的軍隊是不會有的，在過去不會有，在將來也是不會有的。和這種理論相反，在歷史上，任何軍隊都追求着一種政治利益，這種它所追求的政治利益正是決定一個軍隊的性質的決定性的因素。

封建王侯的軍隊——它所追求的政治目標是保衛封建領主的剝削和統治的絕對專制的軍隊——它所追求的政治目標是維持封建的社會秩序和封建帝王的專制統治。

這兩種軍隊，不管它在形式上或存在形態上，呈現出怎樣的的不同；在其基本性質上，都是屬於一類的為私人所有的封建軍隊。

但近代的國家化的軍隊是和此不同的。它是來自人民，為了人民和屬於人民的一種民主化的軍隊。只有這樣的軍隊才能順利的解決幾千年來專制帝王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兵源問題，軍費問題和軍權問題。

一個軍隊所追求的政治目標不僅決定着它的基本性質，而且還決定着它怎樣解決兵源軍費和軍權等所有問題的方法和形態。

一般的說：封建社會初期的軍隊，問題是比較少的，因為那時封建的王侯們經濟力量有限，軍隊的兵源大部份是他自己的家臣武士，再多不過是臨時找出來幾個奴隸家臣武士們給派哨而已。在這種情況下，兵源軍費和軍權都不大發生問題；兵源限於家臣武士，軍費限於采邑貢賦，軍權限於指揮數十人而已。

封建軍隊的矛盾到了絕對專制時候才充份地展開。首先是在兵源上。因為專制帝王並無一個正大的政治目的，足以鼓勵人

民去自願地從軍，他的軍隊的來源不能不仰仗於募兵制度；以金錢去利誘人民當兵的募兵制度有時又不能完全解決問題，於是又不得不利用強力的威嚇人民當兵的拉夫制來補充。跟隨具體歷史條件的變化一個專制軍隊在兵源問題上的矛盾一次又一次地爆發出來。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這是中國人民對於專制軍隊如何補充兵源的咒詛。

其次，是在軍費上。由於專制帝王的私慾無窮，往往無節制地擴充軍隊，但一個國家的生產力和人民的負擔能力是不能隨着這種無止境的擴充要求而增加的，因此一個專制帝王的窮兵黷武的結果往往就是民窮財盡。「至寒食案」——這是中國歷史對於這批野心帝王如何籌措軍費的警告。

然而專制軍隊所遇到的最大問題——應該說是最現實的問題，這是軍權問題。所謂馬上得天下，的意思就是說有了軍權就有了天下，但是你想得天下，我為什麼不能呢？「可取而代之！」這就是已經得了天下的中國專制帝王為什麼不得不想出千方百計去保持他的軍權的原因，但究竟因為這種軍隊一開始就是沒有一個為國為民的目的，儘管千方百計，怎樣去依然保持不住的。

然而對於專制帝王的軍權威脅最大的，不是什麼封建割據的舊勢力，而是新生的民主勢力。為了對抗這絕對專制的軍權，新生的民主的力量在歷史上第一次地組織了那真正是來自人民，為了人民和屬於人民的軍隊。

這「為了人民」的政治目標規定了這一人民軍隊的基本性質及其構成。在初期，首先是自願地來自人民，解決了兵源問題。人民的軍隊一開始就不同於專制軍隊的地方，它是由人民自願組織起來的，它在基本上是自願兵，而封建的絕對專制的軍隊所採取的却是利誘的募兵制和威嚇的拉夫制。為什麼人民的軍隊能這樣做，而專制的軍隊不能這樣做呢？那就是因為它有一個為民為國的巨大的政治目標，它是服務於現實的民主鬥爭，為了爭取和保障民主權利而存在的。因為它是「為了人民」的，所以它能夠源源不斷地自動地來自人民。

其次，正如「為了人民」的政治目標解決它的兵源問題一樣，這一目標同樣的解決了它的軍費問題。軍費的籌劃本來是絕對專制末期、新起民主階層限制封建帝王擴充專制軍隊和控制專制軍隊的有力工具之一。但是對於人民自己的軍隊，軍費問題却迎刃而解了。當軍隊不是「為了人民」的時候，軍隊對於人民的生產是一個巨大的障礙，因為消費的人多了，生產的人少了。但是「為了人民」的軍隊却完全與此不同，他們不僅不妨礙生產，而且

且幫助了生產。在兩種意義上他們幫助生產：誰護了真的民主權利，他們就接地幫助了生產；用具體的力量自己生產，或者幫助人民生產，他們直接地幫助了生產。他們是人民的武裝，他們是人民的人民，他們是「民兵」。這也就是為什麼這批軍隊在一定時期不能不離散他們所居住的地區而必須是所謂地方性軍隊的原因之一。

通常人有一種誤解，以為：附屬於某一個地區的地方性軍隊，就一應盡應對建國的軍隊；更可以隨着自如的準備就緒是國家化的軍隊；從而說：地方性軍隊和中央性軍隊的對立就是對建國軍隊和國家軍隊的對立。事實上，這不僅是在理論上完全錯誤，而且是在歷史上也是毫無根據的。

在歐洲的歷史中，最初組織近代性軍隊的是十三世紀前後的大利城市。這些自治的城市，由於長期開對專制王朝的鬥爭，取得了若干民主權利。為了保持這些既得的民主權利，他們組織了自己的軍隊，這種軍隊的組織目標雖然不是保護區域城市的民主權利，但顯然就一開始便是不能離開着民主自由運動的。但我們能因為這組織放說，這些自治城市的地方軍隊是與建國的部隊，而專制王朝反對的當備軍反是國家化的軍隊嗎？不，正好相反，那些自願自和和人民的對立的當備軍才是真正的封建軍隊，而那些附屬於地方及其人民的自治城市的部隊才是真正的國家化的軍隊。這是一種過渡時代的不得已的情況，但誰能說不是因為這一些自治城市的既得民主權利而時受着武力的威脅，它們的軍隊顯然是沒有附屬於這些特定地方的必要呢。

最後，「為了人民」的政治目標同樣地解決了軍權問題。軍權問題誰呢？屬於人民；當軍權從專制帝王完全轉移到人民手中的時候，也就屬於國家。這一種基本上是「為了人民」的目的的同時也就使得軍隊內部的民主生活成為可能。這是和絕對專制的軍隊完全相反的。絕對專制的軍隊只講絕對的服從，而認為軍隊民主化一事是完全不可想像，但人民的軍隊却與此相反，他們以為只有一個民主化的軍隊才是國家化的軍隊，組織是重要的，但組織是自覺的組織。

從來專制帝王控制軍隊的辦法通過控制軍官。從中國來說，過去約幾個帝王是如此，民元以後的軍閥同樣是如此。北洋軍閥之起家得力於小規模的軍官學校和其他各種軍事學校的控制建為軍閥以來大小軍閥們發展起來。中上級軍官既是由上而下，而且軍閥早就內化了，怎麼可能讓他的軍隊、兵、帶兵和指揮作戰成續來決定他的實和聲、功和權、聲和聲呢？人民

的軍隊是與此相反的。這自拿破崙所領導的法蘭西大革命，近至西班牙內戰中的共和軍和中國在抗日戰爭中成長起來的人民軍隊都是一反這種軍隊內部的階級制度的。在這些部隊裡，官兵的關係是民主的，軍官的權限是應當實實在在的軍功，而不是憑個人的派系關係的。

這就是那來自人民為了人民和屬於人民的國家化的軍隊的真面目。因為它是來自人民的，所以它的兵源不成問題，它和人民的關係有如魚之得水。

因為它是為了人民的，所以它的軍費不成問題，它不但不妨礙人民生產，而且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生產。

因為它是屬於人民的，所以它的軍權一開始就是取決於人民的。在它的內部有著豐富的民主生活，它是一支有紀律的軍隊，但是它的紀律不是強迫的，而是自覺的。

這種軍隊在平時能保護人民的民主權利，保證國內的民主和平；在戰時能保衛國家獲得光輝的勝利。它不僅是為了保護民主制度而存在，它是真正民主制度有機的一部份。任何民主的制度，假如沒有人民的軍隊作為它有機構成的一部份，那民主制度是不完全的殘廢的。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

◎國家化的軍隊和非國家化的軍隊的區別不在於它的形式是地方性的軍隊或是中央性的軍隊，從而軍隊國家化的意義不是簡單的把地方性的軍隊收編為中央性的軍隊。恰恰相反，歷史上有不少的例子，對於專制的帝王去消滅進步民主的軍隊是假軍隊國家化之名而行；自命為軍隊國家化，其實不過是軍隊私人化而已。

◎國家化的軍隊和非國家化的軍隊，其差別不在其表面的存在形態，而在於它的政治實質。從而軍隊國家化的意義必然是把那些在實質上和人民對立的軍隊轉化為「與人民相結合」的軍隊。

◎這一轉化過程不是發表一紙聲明和改變幾個機構，就可能完成的；它必須在從長遠問題一直到中上級軍官各種制度上，經過一番長久而徹底的改造。

◎民主的政治不能離開民主的軍事，人民的軍隊是人民的民主運動中不可缺少的和有決定意義的有機組成部分。當民主的政治還在地方範圍內充分實現，而沒有徹底推行於全國之前，地方性的軍事民主，地方性的人民軍隊，也就必然成為地方民主自治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不但是真正的軍隊國

家化的基礎和核心，而且也是國家民主化的重要動力。極重要保證。

引經據典，說了這麼多話，其實，這些話早為中山先生一語道破了。什麼是軍隊國家化的內容呢？「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只有反對中山先生的人才會把軍隊國家化的偉大原則轉變為實際上是掩護軍隊私人化的掩護。

二、如何軍隊國家化

軍隊國家化不僅是民主運動史上所必須經過的一個歷史問題，而且也是當前勝利結束的度涉西斯世界戰爭緊要地聯繫在一起的。一個現實問題，不僅是尚未民主的國家所獨有的問題，而且是那些轉稱民主國家在這次戰爭結束時所廣泛碰到的問題。

在這一問題上，軍隊國家化是一個世界性的現實問題。

誰都知道，戰爭教育了人民，改變了世界，在這些改變中，最大的改變之一是：由於敵人的侵略，不少戰前合法的政府不是被廢止，即被消滅了，不是流亡，就是在戰爭的壓迫之下不能不採取若干重大的改革。從表面上看，流亡的政府和不流亡的政府之間並有着那太差別，但實際上，戰爭在各國民主生活中所引起的重大變化，其方向是一樣的。

什麼是這重大變化的因素呢？這因素是國際國家和論陷區域在敵人的鐵蹄下自動起來武裝抗敵的民主力量。這些武裝的抗敵力量既然在勝利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和平中也就不能不是一個巨大的政治因素。

關於這一潮流，有一條觀察家知道如下的事實分析：

「正如同每一個國家在戰爭時期所發生的，恐怕促使流亡領袖迅速變化的主要因素就是那有組織的抗敵武裝的政治力量。當陷區域的抗敵力量既組織了和敵人或傀儡政府相對立的政權，當陷區域出境的時候，抗敵運動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地方性——假使不是全國性的話——的政權中心。大部份解放後回來的流亡領袖在他們的國家裡所碰到的不是「政治的真空」，他們發現：抗敵組織早已在那裡行使職權了。

不過，無論如何，在這些多國家中僅僅有希斯拉夫的抗敵運動在實際上變成了各國所一致承認的合法政府。南斯拉夫的抗敵運動是作為對於波蘭斯拉夫的獨裁制度和外來侵略者的雙重抗議而開始的，他們有着革命性的目標，他們在他們自己從敵人手中獲得的土地上，放手實現他們的目的。當大部份國土把敵人趕出去的時候，他們已經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包括法院，地方性區域性的議會和地方政府——只有米海洛維奇控制下的地方沒有徹底帶政治改革的狂潮所席捲。因此，當流亡政府繼續準備向新政府建議組織一個「舉國一致政府」的時候，他不過是把那被侵略者所承認

的合法政府的合法地位移交那在戰爭中早已存在的事實上的政府而已。

在其他的國家，抗敵力量對於解放國家新政府所產生的影響，只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沒有一個國家的抗敵運動是像希臘抗敵運動達到了那樣大的失敗的，希臘的解放陣線——在去年十月納粹被逐出境的時候，它已控制了全國三分之二的土地——在現政府沒有一個代表。……由於希臘抗敵運動被拒絕於政府之外，解放後的內部希臘政府始終是不穩定的。

法國、比利時和荷蘭的抗敵運動，它們的地位如像正處於那完全勝利的南斯拉夫和那完全失敗的希臘之間。因爲在解放的時候，這些西歐國家中的地方抗敵運動已發正常的國家機構所代替了。

怎樣代替的呢？

抗敵運動的領袖們被選來參加重要的政府職位。在二月十一號組織的比利時聯合政府中，八個抗敵領袖參加了政府；而這一聯合政府的總理本身，就是一位積極的地下運動的領袖。

戴高樂政府一共有二十一位閣員，其中十一位是抗敵組織的領袖。

荷蘭政府於四月六日改組，包括選去了兩名抗敵領袖……由於這種種抗敵運動和臨時政府之間的合作，「改編抗敵武裝」的問題才不復是現出去年秋天那樣的嚴重，去年秋天比利時京城爆發了抗敵組織和國家警察的衝突，法國發生了類似的情形……（紐約，六月一號外交政策彙報）

每一個國家的具體情況不同，西方和東方的差別很大；但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不管是在一種什麼不同的情況下，要無視人民抗敵運動的政治力量，不管在那裡是到底不能成功的。即便是在某些地區反動份子有些表面上的成功，但那種成功也是暫時的局部的不穩定的。

問題的癥結在那裡？爲什麼去年秋天西歐政府要解除抗敵人民的武裝發生流血不能成功，而現在改編抗敵武裝就能和平進行，而沒發生嚴重問題？因爲，儘管程度不同，聯合政府成立了，人民所要求的民主改革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保障了，整編抗敵武裝的辦法比較公平，比較合理了——一言以蔽之，正是因爲國家有了某種程度的民主化，軍隊才能相應地進行國家化。

概括地說，作爲一個從戰時過渡到平時，所有被淪陷的民主國家所必然遭遇的普遍問題，戰時人民抗敵部隊的正規化是在如下的條件之下和平進行的：

一、承認戰時抗敵運動的政治力量，組織反映人民意志的聯合政府。

二、接受戰時抗敵運動的民主要求，切實進行民主改革。

三、模範戰時抗敵運動的作戰功績，公平合理的待遇所有抗敵軍隊。

中國目前所遭遇到的軍隊國家化的問題，從一方面說是和上述的西歐各國相同的。因爲和西歐諸國一樣，在抗戰當中，敵後中國人民的抗敵力量有了空前的發展；他們實行了地方性的民主改革；他們對抗戰的勝利，在中國所貢獻的一份內，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現在，抗戰結束了，無論是在正面戰場作戰的部隊也好，或是敵後戰場的作戰部隊也好，國家都不需要這樣大的部隊了，因此包含着在正面戰場和在敵後戰場作戰的所有中國的抗敵部隊都必須加以整編。但爲能和平而合理地進行這一工作，我們也必須遵循着歐洲的方向，那就是：

一、成立民主的舉國一致的聯合政府。

二、承認並繼續推廣已有的地方性的民主改革（這裡邊包含着民選的地方政權及其與人民相結合的軍隊）。

三、根據公平合理的原則，整編所有抗敵部隊。

但是從另一方面說：中國軍隊國家化的問題又和西歐諸國不同。因爲，西歐諸國已經有了民主政治的「常軌」，而中國却正處於國家民主化的前夜。因此，中國軍隊國家化的問題就有了和西歐諸國截然不同的意義。在西歐，軍隊國家化只止於抗敵部隊的正規化；在中國，軍隊國家化的意義則是把與人民對立的部隊轉化爲與人民相結合的部隊；在這裡，八年來在敵後鬥爭中成長起來的中國人民軍隊本身不是國家化的對象，而是其他軍隊實行國家化的榜樣。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中國各地區發展不均衡的狀況，這種發展不均衡的形勢經過了這次抗戰而更加尖銳化了，即一方面已經執行了民主改革的解放區，另一方面是敵偽漢奸秩序至今原封不動的地區，這兩大地區的差別是無論如何也抹煞不了的。這種不統一的情況固然是不合理的，但其所以不合理不是漢奸敵偽的秩序未能統一民主改革的秩序，而是漢奸敵偽的秩序還未被徹底破壞，而代之以民主改革的秩序。

怎樣才能做到真正的軍隊國家化呢？承認既成的民主改革，並在全國範圍內逐步推廣這種民主改革，做到真正的國家民主化。一個國家真正民主化了，真正屬於人民了，本來就是屬於人民的軍隊，不屬於國家更屬於誰呢？早已應該屬於人民的軍隊，繼續屬於個人或少數人的集團有什麼可能呢？

農民在解放中

——解放區農村階級關係的變化

李侯森

將近一萬萬人口的解放區（編者按：目前解放區人口已至一萬萬以上了），八年來農村經濟發生了空前未有的大變化：封建半封建經濟勢力受到決定性的削弱，帝國主義經濟勢力已被排除，雖有戰爭的嚴重破壞和長期消耗，廣大農民階級——中農、貧農和佃農的經濟仍然向上發展。

抗戰以前的和現在大後方的農村，階級關係向兩種分化：廣大的農民都繼續破產為貧農和農村無產者；只有佔人口中極少數的地主、高利貸者，兼併土地，吸血而肥。資本主義性的富農經濟的發展，歷來是較困難的；現在的大後方，農民上昇為富農更加困難了。

解放區農村階級關係的變化，却循着與此相反的道路：兩極（貧農和地主）縮小，中間（中農）擴大。

據手頭的北隸（晉察冀）、太行、晉綏、冀東和濱海，五個區域的調查材料（註一）：將戰前與戰後農村各階層戶口與土地百分比的平均數比較如下：

階層	地主	富農	中農	貧農	佃農
戶數	戰前 三·六	戰前 七·二	戰前 二八·四	戰前 五四	戰前 五
戰後	二·四	六·七	三八·〇	四七	二·五
土地	戰前 二九·五	戰前 二二·〇	戰前 二九·五	戰前 一九	戰前 〇·八
戰後	一三·五	一七·五	四二·五	二二·五	〇·六

說明：其他階層如小工商業等未列入，故百分比的總和均不及一〇〇。由此可見，戰前，不及戶數百分之四的地主，約佔土地百分之三十（華北旱地區域土地較勞散，按全國範圍的統計，地主佔有土地一半，如按產量，因地主所佔多應地，則又將遠半數），佔戶數的百分之九子的中農和貧農，所有土地不及一半（產量更少）。而現在地主戶數和土地都大大減少了，中農以下階層的土地則增至百分之六十六。兩相比較，就可看出

農村社會中——過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今天新民主主義社會，農村階級

結構的變遷是如何鉅大！

具體說來，地主的戶數比較戰前減少約三分之一，土地減少一半多；富農沒有基本的變動；中農戶數增加三分之一，土地增加五分之二以上；貧農中農增加比例最少，如按四個地區統計，則兩者增加比重更大。貧農戶數約減少五分之一，土地約增加六分之一；佃農戶數減少一倍。上表只是一個概括性的數字，僅足表明這個變化的輪廓。其中材料又大多是一九四二年或四三年為止，現在中農的比重會更大一些。

兩極縮小，中間擴大，這就是今天解放區階級關係變化的基本規律。現在我們要進一步談談各階層變化的具體情況，及其發生變化的原因。

「為消滅日本侵略者與建設新中國，必須實行土地改革，解放農民。」這在理論上是不會有久提出異議的，（國民政府土地法第一七七條明明載着：「地租不得超過耕地正產物收穫總額千分之三十七五」）。值得大大煩瑣的便是「中國條條下，我們共產黨人是把這項主張看得特別認真的，不但口說，而且實做。」八年來，這一主張在解放區已真正變為事實：不管程度如何，快慢如何，貧佃地主經濟都是在逐漸分化和回弱，農民已經從對土地關係上獲得解放。下面是五個地區地主的戶數與土地的下落情形（百分比）：

地區	晉察冀	北隸	太行	冀東	濱海
戶數	戰前 三·八	戰前 二·四二	戰前 二·八	戰前 四·五	戰前 四·六五
戰後	二·四	一·九一	二·一	二·一	三·四六
土地	戰前 三〇·三	戰前 一六·四三	戰前 二六·三	戰前 四九·八	戰前 二六·九五
戰後	九	一〇·一七	一二·九	二〇	一五·六六

晉察冀與冀東兩區，原來土地更集中，因之地主戶數和土地都減少一半以上。其餘則均未超過一半。地主經濟下降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減租減息政策合理的果實的具體政策的執行。他們所獲藉的地租和高利貸兩大收入，

受到限制，大大減少了，一切超經濟剝削也都取消了，他們不可能再將負擔轉嫁與農民了（地主在舊社會是負擔最輕的階級）。其次是戰爭原因，「掃蕩」中，敵人的直接掠奪破壞，會使地主區年的積蓄和工商業經營受到嚴重的損失，收入減少，支出增多，和敵人的破壞，戰爭的影響，又帶來第三個原因：生產消極。不少地主為了避免賦租，逃避負擔，預防戰爭中的損失，就大量出賣或典與土地，緊縮經營，減少目標（這採取分家的辦法）。其他尚有奢侈浪費等較次要的原因。

黨的土地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削弱封建經濟，使資本主義經濟獲得發展，並不是馬上取消封建經濟。所以對於地主的生產消極，黨和政府會極力注意提高，如獎勵他們投資工業和合作事業，在不影響農民的生活條件下，允許他們抽回土地經營經營等等。因此部分地主已自動（或被迫）轉變其生產經營方式，例如北區下降地主，一九四二年秋調查，約有百分之三轉為富農；最近兩年這種比重將更大。目前解放區的中小地主參加勞動是相當普遍的情形。不少有資金的地主已轉向工商業和合作事業。這是一種自然的趨勢；減租減息以後，地主感到出租土地和放高利貸的利益不大，就會利用土地和資金來進行資本主義性的生產，和自已參加勞動。

富農經濟在一九四二年以前，一般說是停滯的和下降的。北嶽、太行、冀東三地區的材料，富農的戶數和土地都只有很小的下降（如北嶽的戶數四八·四五%到七·八八%，土地由二一·九三%到一九·五六%），晉綏下降較大，戶數由戰前的一〇·八%減至八·八一%，土地由二四·八%減至一七·五%。引起下降的重要原因，是敵寇的破壞。富農多經營作坊與商業，他們的房屋，工具和各種積蓄被敵人焚毀掠奪，因而損傷了元氣，竟一蹶不振。如晉綏下降原因，由於這種原因的佔三分之一。其次因中國富農一般帶有封建成分，兼營高利貸和另租一部份土地，在減租運動中，他們一時的部份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但對建性和半殖民地性的前弱和根絕，同樣使富農經濟起來。最近兩年特別是去年，由於軍事方面的勝利大生產運動的開展，使工互助的提倡，勞動政策中偏激的糾正，累進負擔扣除廢本，特別是吳滿有方向的統籌，富農經濟的發展便通暢起來了。北嶽早在一九四一年以後，富農經濟開始回復與上昇；戶數由四一年的七·七八%到四二年的七·八八%；土地由一九·二五%到一九·五六%。阜平胡順義村去年新增富農七戶，龍運葛存村去年新增富農五戶。而說明這一趨勢比較完整的材料，

則有漢海區和另外連水縣三萬四十戶的調查（註二）。

漢海區調查時間是一九四三年末，戶數由以前的五·八九%增至六·七五%，土地由一六·六九%增至一九·三二%。連東縣富農戶數由一九四二年的六·五%增至四四年的八·五%。這種還有另外的例子足以佐證，太岳陽城固隆村，四三年富農三十三戶，去年竟增至七十七戶（註三）

中農經濟更是大量而暢快發展着，已成目前農村中欣欣向榮的強大的經濟力量（有不少的部份中農在向富裕中農發展，也有一小部份上昇為富農）。下面統計說明了這一事實（百分比）：

地 區	晉	綏	北	嶽	太	行	冀	東	漢	海		
戶數	戰前	二五·七	戰後	三五·四二	戰前	四四	戰後	四四·三一	戰前	二七·五	戰後	四一·六九
土地	戰前	四九	戰後	四九·一四	戰前	三五	戰後	二六·五六	戰前	四八	戰後	二七·七一
地 區	太	行	冀	東	漢	海	戰前	三一·四	戰後	二八·九	戰前	二八·九
戰後	四七	二八·九	戰前	三一·四	戰後	二八·九	戰前	三一·四	戰後	二八·九	戰前	三一·四

在北嶽、太行和晉綏，中農已差不多擁有全部耕地之半。土地比重超過於人口比重。在勞動力的佔有方面，以北嶽為例，中農擁有全部人口的四八%，僱傭勞力佔總數的二八%，佔有半數以上的騾馬驢和約八〇%的牛刀。

中農之向上發展，無礙地；他們的租子比過去交得少了，負擔減輕了，加以各種獎勵與幫助，於是他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地高了，多開荒，多種地，多施肥，種棉，紡織，經營副業，他們的光景是越鬧越好了。（但也有極少部份的中農下降的，這主要是由於敵人破壞，勞力減少所致。）

佔過去農村人口一半以上的，絕大部份租入土地的貧農是租佃關係中的主角，又是欠債最多的階層，封建的枷鎖將他們束縛最緊；貧農的戶口比重一般大於土地比重三四倍。現在他們從地主的火坑中跳出來了。貧農上昇為中農（還有極少數上昇為富農）的戶數一般佔有五分之一，但在經濟上他們都向上發展了，「翻了身了」。他們的土地大大增加了（在地主拋出土地時，許多貧農將維持生活所必需的糧食賣了去買地），人口比重也大於土

總比重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了。相當大的一部分貧農在經濟上今天已接近於中農的水平。貧農這個階層將一天天地縮小。

貧農獲得發展的原因，與中農是相同的，政府對他們的照顧更多。特別在減租減稅之後，他們的勞動熱忱更加高度發揮，敵後不少勞動英雄都是從這個階層產生的。

佃農（以及手工工人）大部都上昇和經濟向上發展，一般沒有下降的。這都不詳談了。

總結以上階級關係的變化，有三種情況：第一是上昇——佃農，貧農和中農。第二是下降——地主。（富農一九四二年以前是停滯或下降，以後則開始恢復和上昇。）第三是轉變生產方式——地主及其他階層中之少數（如山從事農業轉工商業；敵人大破壞之後勞力不足將地出租，這是不正常的現象。）可見佔農村中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如今在經濟上都獲得發展或獲得發展的充足條件了。

關於引起階級關係變化的原因，最重要的當然是減租減息政策及其他各種正確政策的執行。如果執行中發生某些偏差，則易引起暫時的不正常的變化；政策未能貫徹的地區，則變化遲緩。勞動積極，以及種棉等特產和副業經營的好，一般上昇最快，富農和中農最具備後者的條件。引起下降和阻滯上昇的最普遍的原因，就是敵人的破壞。敵人破壞掠奪嚴重，必然引起急劇下降和不能迅速上昇。我們的勝利才能保護人民進行生產，改善生活。而戰爭中人力和畜力的減少（敵人捕殺搶掠，疾病死亡，和兵役等），也是直接影響各個階層經濟不能更快發展，或促使下降的普遍原因。

今後解放區農村中階級關係變化的趨勢，無疑將是上述規律的繼續；地主經濟日漸削弱，他們將逐漸改變經營方式；富農經濟會有通暢的發展；中農經濟更加澎漲，優勢且增；貧農繼續上昇，大量湧入中農隊伍。

解放區執行了中共的土地政策和其他各種正確的財經政策與社會政策，於是廣大農民從經濟上（以及政治上）獲得解放，積極抗戰，從事生產建設和其他各種建設，使抗戰勝利和新中国的建成立為可能。地主雖然暫時受了一些「損失」，但大敵當前，不動員農民抗日，自己已就運生存也成問題，特別是敵佔區地主普遍破產的事實擺在面前，變通道理一般地主都有所認識，許多開明的地主士紳已積極參加社會工作和政府工作。我們今天一方面削弱地主的封建剝削，但同時又保證交租交息，以調節階級矛盾；而更重要的是，乃在照顧地主階級的將來，這就是改造他們的經濟生活，幫助他們向資

本注續前化。

減租減息政策的徹底執行，能够達到土地改革的目的，這已為今天將近一萬萬人口的解放區的實際所證明。毛澤東同志已向全國宣佈，「這個政策如果沒有特殊阻礙，我們準備在戰後繼續下去，首先在全國實行減租減息，然後尋找適當方法，有步驟地達到「耕者有其田」。」

抗戰勝利之後，新民主主義政權如能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至少在已建立的廣大區域，在黨的現行許多正確政策繼續之下，中農貧農以及富農的經濟，自會得到更暢快的發展，特別是出於農村合作經濟的發展，無疑將為我們帶來一個新式的繁榮而富足的農村。

（註一）本文材料全屬解放區的鞏固區。北滿材料包括十三個縣、三十個村，係北滿區黨委作的調查，時間一九四二年秋。太行材料包括鞏固區二十多個縣，一百五十多個村，係太行區黨委作的調查，時間大都在一九四二年和四三年；其中鞏固數字為二二縣一五九村的統計，鞏固數字為一六縣一四八村的統計。晉綏材料包括興縣二個村臨縣三個村等，晉綏分局所作調查，時間一九四四年六月。鹽阜材料見四月九日本報附錄漢文。濱海材料包括莒南，濰縣三個區六個村，係山東分局所作調查，時間一九四三年末。

（註二）見附錄漢文。
（註三）太行參議會行委主任報告見三月三十日本報。

整風文獻

解放出版社 二五〇元

秧歌劇初集

周而復等著 二〇〇元

此係訂正本，內收整頓學風黨風文獻，反對黨八股，「農村調查」序言，改造我們學習的學習，為共產黨員的修養，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重要文件，凡二十七篇。
秧歌劇初集，內收「兄妹開荒」、「一朵紅花」、「牛水受傷」等三個秧歌劇，篇首并有周而復長篇序言，論述秧歌劇形成的特點及其發展的道路。

新華日報圖書課經售

論 愛 國

巴爾梯斯基作
李少石譯

少石同志是新華日報編輯部十八集團軍駐滬辦事處秘書，非九號，在本月八日午後用沙坪壩返城時中途被槍擊中彈，因傷重不治逝世。少石同志的不幸遇難是中國革命事業一個很大的損失。少石同志是一個不聲不響的忠實的共產黨員，他早年就參加了革命工作。民國廿二年因此入獄，監獄五年，堅貞不拔。抗戰軍興，少石出獄，時健康雖已大受損害，但仍以如火之熱情，繼續從事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少石同志的工作範圍是多方面的，他的才能也是多方面的。他用英文翻譯不少中國新文藝作品，介紹國外作品給中國讀者，只是他近年來未曾間斷過的業務工作之一。這種的「論愛國」是他任職前幾天譯好的。

少石同志死了，但少石同志幾十年如一日所不聲不響地從事的事業，一定會在千百萬中國人民繼續不斷的努力之下開花結果的。我們感到不無遺憾的心情，我們只能用加倍的努力工作來紀念他。他替我們翻譯了「論愛國」，他自己不是一位光輝的愛國者嗎？除指「愛國」還有什麼更確實的名詞來形容他的事業呢？

——編者

歷史的試驗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若干國家發生的愛國運動，是一個異常廣泛的運動，包括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和他們的社會組織。但本文祇論及這個運動中的一個單位，即關於工人階級的前衛，特別關於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為的是許久以來，他們的愛國心，是被人懷疑的，在某些地方，現在還是反動派攻擊的目標。

也許工人階級運動的反對者的思想或態度中，最常用的武器——坦白地說，是最危險的武器——就是這樣一種控訴，即說：共產主義者和一切左翼的工作者一般地都是不愛國的。甚至在蘇維埃國家建立了後，共產主義者已實際上證明其熱烈的自我犧牲的愛國心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人，以及和他們合作的社會黨人，還繼續被人指為「他們國家內部的敵人」，而共產主義的思想，則被描寫為與愛國主義對立的東西。隨着法西斯運動在許多國家中的

滋長，這個在愛國主義旗幟下的，對工人階級運動的進步男女戰友的追害，就日益厲害，日益以更惡毒的形式出現。不單是法西斯，而且一切法西斯的惡意者們——綏靖主義者和慕尼黑主義者——都說，共產黨人和許多社會黨人對國防的態度，最低限度，是可疑的。

但對於共產黨人和他們的控訴者的愛國心的歷史試驗，不久就到來了。德國法西斯帝國主義者奴役良好和平的民衆於掠奪戰爭，逼使社會各階層，各政黨，不能不以行動來證明誰準備保衛國，誰準備賣國。這個最高的火的試驗揭開了什麼東西呢？

第一，在歐洲被德國佔領的國家中，出賣自己國家的，却地希望在前甚至在戰爭爆發時自認爲「愛國」，而證實共產黨人爲「不可救藥」的，法西斯黨人和其他極端反動份子。出賣法蘭西的，就是共產黨的叛徒的敵人——貝當、賴伐爾，達蘭和他們的同僚，後台老板，佛耶（Othon Foye），施乃德克（Schneider）及其他大公司，托萊斯的財團。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的賣國賊是些什麼人呢？誰幫助了德國人

，把斯拉夫的民族保加利亞——種的人民對俄國幫助他們解放是深深感戴的——變成了德國反蘇的軍事基地？誰在波蘭、捷克、奧地利、南斯拉夫、希臘、芬蘭的屠夫奴役者們奮過氣力？可鄙的吉斯林，貪婪的銀行家和大地主們支持了德國人。當戰爭初期，德國侵略者一次又一次暫時地得到勝利時，那些甘心爲了一頓肉羹而出賣其祖國的反動分子，在淪陷的國家中，就一天多起來。

第二，共產黨人和許多社會黨人，在保衛他們國家的自由和獨立，反抗德國帝國主義者及其同謀犯的蠶食中，實際地證明了他們百折不撓的忠誠。無論任何地方，他們都是愛國份子的先鋒——反對德國侵略者暴行的工人階級的先鋒。

愛好自由的民族，對蘇聯英勇的士兵和游擊隊的愛國行爲，對南斯拉夫、法國、波蘭、希臘及其他被德國人暫時佔領的國家中的英勇的愛國者，無不表示羨慕，並以此爲值得驕傲的事。但我們知道，這些將來要記載在歷史上，作爲愛國英雄主義和忠誠的標榜的行爲，有許多是共產黨人和其最接近的戰鬥同志做出來的啊！

這些不可爭辯的事實，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邪惡的敵人提出的公案，給予強烈的打擊，人們總以爲他們應該聰明些，不再提出誰愛國誰不愛國的問題來了。但是，他們中間，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閉着嘴，獲得自己已被擊敗了的。比如，在美國，英國，和瑞典，就有一些舊日的反共大亨們，利用被壓迫的人民反共偏見的頑固性，仍在企圖與波作浪，散播懷疑的種子。因此值得我們檢討一下仍然留在他們武器庫裏的似是而非的論點。

愛國和戰爭

某些勞動人民的敵人提出如下的爭論：不錯，聯合國內的共產黨對反希特勒的戰爭，是採取了愛國的立場，但只不過是偶然的罷了，因爲共產主義的思想，并不保證他的信徒們在任何戰爭中都擁護他們的國家，因而，在另一戰爭中，他們也可以採取非愛國的立場。

這是一個由正確的前提作出來的不正確的推論。當然，共產主義者并不準備擁護任何戰爭，而祇擁護正義的戰爭，解放的戰爭。但祇有那些戰爭才是愛國戰爭。侵略的戰爭，並沒有什麼愛國的意義在內，不管他們怎樣把它塗上光榮的色彩。而且，某一國的罪惡的統治者所發動的侵略戰爭，是一

種暴行，不單對別個國家的生命不利，而且也有損自己國家的生命和榮譽。因此，假如反動的統治者要把他們的國家投入於非正義的戰爭，侵略的戰爭中時，真正的愛國主義要求該國的人民，不單絕對不去支持那戰爭，而且甚至要反對那戰爭。

不必從遠的地方去找例子，也用不着討論德國的事情，因爲腦子也該知道，假如德國人民的大部份能夠稍加注意於他們自己國家的命運，他們就早已起來，反對希特勒政府和他的可惡的帝國主義的冒險了。現在且談談德國帝國主義者從前的衛星——羅馬尼亞，芬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罷。二十多年來，這些國家行政和司法當局，就把共產黨人和與共產黨合作的工人團體的會員，當成是「叛徒」，要受長期的監禁。這事是很有意義的。當戰爭爆發時，安東尼斯古，李特，荷拔，費洛夫之流，打開城門進進德軍，使他們的國家和希特勒站在一起的時候，那些對國家忠心耿耿的羅馬尼亞人，芬蘭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亞人的愛國任務是什麼呢？自然，是不去支持法西斯戰爭，而且反對法西斯戰爭；因爲希特勒德國站在一邊來戰爭，必然要損害到這些國家的重要利益，戰爭勝利，損害愈大，因爲德國勝了，他們的獨立就完了。

這些國家的親希特勒的統治者們所做的事情，無疑的是要建立德國對全歐的統治，他們這樣子做，就把他們的國家帶到毀滅的邊緣。但是，這些一再出賣其國家的德帝國主義的工具們，却隱藏他們的罪惡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而同時把那些爲要從德國暴政及法西斯戰爭的破壞下將國家挽救出來，而自我犧牲地戰鬥的共產黨員及其他的真正愛國者，送上絞刑架或送入牢獄中去受審刑。

因此，歷史的試驗證明了共產主義的立場，是一貫的，積極的，忠誠的愛國主義的立場。

沒有民族的偏見

某些勞動人民的敵人，把愛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混淆起來，說共產黨人和一切誠實的民主戰士對於愛國是半條心的，因爲他們沒有把自己民族放在其他一切民族之上。這祇是幼稚的民族偏見和帝國主義者心的一種似是而非的詭辯，而這兩者恰和真正的愛國主義相反。

我們知道，民族或種族偏見，即認自己的民族或種族是最優秀的，比其

他一切民族或種族爲優，這種觀念，很久以來被爲反動份子所培植，目的是要在反民主運動的鬥爭中，爭取政治落後的羣衆。反動份子，經常煽起對別個民族或種族的仇恨和輕蔑，把民族的偏見，變成侵略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毒藥，於是那些方法如建設猶太人，私刑地害黑人或攻擊阿拉伯人等，來證明其民族的「優秀」。但當需要起來作愛國的鬥爭，以保衛他們的國家，使不受外人侵略的時候，這同一的侵略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便和敵人議和——如在歐洲的侵略國家——或者，如美國或英國或法國或法西的份子，起來破壞對敵的共同戰鬥，幫助敵人使他不至完全失敗，以求達到對敵人妥協。

這些民族主義者和侵略主義者喜歡引用一句格言：「我的國家，對也好，錯也好」。顯然的，他們以爲對他們的政府的政策，作僞爲愛國的支持，就可以使每一個侵略別國的生命和自由的行動，變成有理。這自然是對愛國觀念的一個明顯的曲解，是沒有歷史的或政治的根據的。

歷史上沒有一個愛國運動，是以損害別國平等自由爲目的的。十八十九世紀所有大的愛國運動，目的都在解放自己國家，使不依靠外國或擊退外國的進攻，例如一七七五——一八二二年的美國獨立戰爭，一七九二——一八四九年的法國人民的革命戰爭，一八二一——一八九九年的希臘民族解放鬥爭，一八三〇，一八四六，和一八六三年的波蘭解放鬥爭等等。

很明顯的，願意爲自己國家的自由而戰鬥是一回事，願意壓抑別國的自由而戰鬥又是一回事，前者是愛國，後者則否。例如，統治殖民地，和保存帝國主義壓迫殖民地人民的特權，這些並不能藉口愛國而認爲正當。據我看來，殖民地壓迫和民族壓迫的政策，並不是爲國內整頓的人民謀利益，而只爲一定的上層階級謀利益，這些階級，因剝削殖民地而得到物質的手段，又用這物質手段，來加強他們對殖民地及對本國的控制。他們階級採取一種狹隘的自利政策，以別國爲犧牲。那樣的政策在國際關係上散播不和，把災禍帶到各民族去。

甚至溫和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也把自已民族的利益（或其上層階級的利益）和別個民族的利益對立起來。反之，甚至是最熱烈的愛國主義，也尊重一切愛好和平的民族，相信各民族的不平等。偉大的俄國民主政論家，甚至在前一世紀就注意到和着重提出愛國思想的這一方面。杜布諾留波夫說：「真正的愛國主義和其他民族的仇恨是不相容的。」柏林斯基則誠實地宣稱：「愛自己的國家，就是說熱烈地希望達到人類的理想，在這國家內得以實現，并盡自己的可能，來推廣這個目的。否則愛國主義就變成野蠻主

義，後者愛自己的東西，祇因爲它是自己的東西，憤恨一切外國事務，祇因爲它是外國事物，對自己的醜惡，也熱愛不止。」因此，真正的愛國主義是利與族自大，自私，對別個愛好和平民族的仇恨，全無關係的。

勞動階級意識中是沒有世界主義的

勞動人民的敵人常常否認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階級性。他們說，這些人是主張勞動人民的國際團結的。我們的反對者時常把世界主義，說成是不管自己國家或輕視自己國家的意思。

這是完全的謬誤，共產主義和世界主義沒有什麼相同之處。雖然是在勞動人民國際團結的旗幟下戰鬥，共產主義運動在每一國家——作爲工人階級運動的先鋒——都是深深植根於其本國的泥土中的。共產主義並沒有把真正的愛國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對立起來，反之，它把它們結合起來了。

祇有懶惰和頭腦糊塗的人，工人運動的敵人，才敢說工人階級不能一方面愛自己的國家，同時又爲和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的兄弟般的團結而戰鬥。祇有說謊者和誹謗者才敢說，工人階級，在爲勞動人民的國際團結而戰鬥時，就已不再是愛國的，而成爲世界主義的，與他們自己的國家民族絕緣。這工人階級可與自己國家絕緣或拋棄自己國家的說法，本身就非常荒謬。因爲近代的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要肢體，不祇爲了它的數目，而且爲了它在政治上經濟上所扮演的角色。一個國家的將來，主要地依靠在工人階級的身上。因爲工人階級與國家的關係如此密切，作爲工人階級政策的基礎是絕不能拋棄它的國家的，除非它要自己所有的最重要的根基都斷絕。

工人階級的意識中，是沒有世界主義的。世界主義祇是國際大銀行，國際加進商，大股票投機家，國際軍火大王（即「販死的商人」）的代表們代理人所特有的東西。這些紳士們才真正相信「國家是在自己過得好的地方」那句拉丁的諺語。他們中間許多人說，他們并不忠於某「政治主張」。他們喜歡說「我們是商人，超政治的」。但他們的所謂超政治，是不能照價值接受的。不錯，他們真的是商人，買賣是等於他們生命的一切。但這並不能阻止他們憎恨人民的每一次民主運動，或阻止他們不去僱用法西斯或親法西斯牌子的政治代理人，去打擊民主運動。

而且，正是因爲他們對金錢的狂熱的崇拜，這些國際的投機家，不祇願賣出他們的貨物，而且尚繼續願意把自己也出賣於出價最高的外國帝國主義

考。許多國家在戰爭中是保持中立的，而且是在法國和蘇聯被擊滅後，他們才宣佈他們的中立。他們在法國和蘇聯被擊滅後，他們的加送爾或其他和德國人的協定，他們直接間接地對加強希特勒德國的軍事力量，作了貢獻。而且在戰爭中，有許多人爲了德國主義的利益，在自己的國家內，損害戰時生產。在美國，以杜魯門（現在是美國總統）爲首的委員會，曾發出若希和德國專利公司有關係的美國大專利公司的非愛國的活動。其他國家亦發露了類似的事實。

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國際間斷者和投機家的世界主義并非「超政治」的。反之，他是反民主親法西斯政策，與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險政策有極密切關係，如不遏止，他一定產生新的戰爭的危險。

和這個國際掠奪的致命政策相反，和侵略主義法西斯主義相反，聰明的工作者宜揚國際友好國際團結的政策，從工人組織行動的團結開始，歸結於一切民主國家的密切合作，以反對法西斯主義，保障各國的和平，自由與獨立。這一政治路線不是和各個民族的愛國情緒完全符合麼？讓工人階級的反對者試來證明，比方說，一九四五年二月在倫敦開會之世界職工大會的決議是使一切民主國家的民族利益不相容的罷。讓他們去說服人民，使他們相信，民主國家親善合作來消滅法西斯主義，保障各愛好自由的民族的自由與安全，不是各民主國家自由發展與繁榮的最佳保證罷。人民是不會相信這個的。

和蘇聯協調

但這是把愛國和國際合作聯繫起來的政策，這個政策，是共產黨人和一般進步的工農智識份子所主張的。

最後，人們懷疑進步工人的愛國主義，理由是他們總是和蘇聯一致的。譬如，他們會提出這樣的狡猾的問題：「不否認他們是一個外邦的忠實的盟友的人，怎能叫作愛國者呢？」

是的，沒有一個國家的聰明的工人，或進步的農民，或智識份子會否認他同蘇聯的密切關係的。但是這種協調，不是和任何國家的真正愛國者的感情密切的關係符合麼？這是對社會主義國家的一種協調、妥協，而社會主義國家是通過革命來達到目的，它尊重，維護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決的原則，并且是尊重和平的。它的目標是和蘇聯的。偉大的蘇聯國家的崇高的本質

起作用，現在已爲愛好自由的國家的廣大人士所認識，所稱許。祇有反動的親蘇份子，才繼續誹謗蘇聯。

一切反希特勒的國家都承認他們的利益，是和蘇聯長期合作以維持永久和平與愛好和平國家的安全，不可分離的。那麼，各國的真正愛國者，堅信與蘇聯保持友好關係和密切合作，最能保證他們國家的安全。又有什麼可能更明顯的，這一信念，是今天愛國主義的自然結論。

另一方面，同樣明顯的，反蘇的意向，是和愛國的信念不相容的。自然，有人曾企圖以偽愛國主義來粉飾他們每一反蘇的政策。但過去幾十年的歷史，已會一再指出，這樣的粉飾，不久終於會脫落的。在此次歐戰的前夜或戰爭中間，這表現得特別明顯，例如，德國的附庸國的統治者到曾極力企圖以偽愛的愛國主義來粉飾他們的可恥的反蘇政策，但不久這種偽裝便破裂了。現在大家都明白，安東尼諾斯古，墨爾，荷羅和波洛夫等所進行的是反愛國的戰爭政策，大有害於他們的國家。今天，在這些國家中，誰敢出來複述那些反蘇的假愛國的口號，誰就會變成人民眼中輕信的對象。現在波蘭還有誰相信皮爾蘇斯基，貝克和他們的同謀犯們的反蘇親希特勒政策，是以愛國爲目的的？

法國和英國的慕尼黑派的一「愛國主義」的命運，也同樣的可憐。這些人造罪了自己國家的利益，頑固地拒絕成立反德聯合戰線，企圖使蘇聯孤立，讓希特勒在東面行動自由。甚至在英法已對德宣戰後，法國的達拉第曾請政府與英國的張伯倫政府，還對反蘇陰謀，比對保衛自己的國家更感興趣，（首先是以此政治軍事的援助，給予反蘇的芬蘭，芬蘭那時已成爲進攻蘇聯的基地，後來更變成德國的附庸國）。

假如某些英國法國的定期刊物，不惡意地提起戰爭初期的事情。誰該共產黨的愛國心，我們也無須回過頭一切。這些煽動家大聲疾呼：「不否認一九三九和一九四〇年蘇聯和美國遠東對德宣戰的最近幾年的時期，那時我們的共產主義者并不支持他們的國家進行戰爭」。但假如必須回過頭歐戰中的這一段，我們何不也回過一下，在戰爭開始的八個月中，法國和英國政府曾並沒有對德作戰，并未作任何軍事行動，甚至并未有採取嚴重的步驟，不強迫他們的國家的行動力量，反之，法國政府那時正極力在安撫迫害共產黨人，并聯同英國的張伯倫政府供給武器與正在和蘇聯作戰的芬蘭反動份子（意大利的墨索利尼政府也同樣做）。而且，在一九四〇年二月六日的英法蘇海軍事務會議上，（即德軍侵入法國及蘇聯海軍在波羅的海的三個月）蘇聯海軍

普魯士伯倫說不久將派遣一個波蘭團到芬蘭去。

因此很明顯的，法國英國政府那時還未弄清誰是他們的主要敵人。自然，這樣的戰爭，並不是打算要喚起法國英國真正愛國的人們的欽羨的。但是，在一九四〇年五月，當諾達第可憐的戰爭遭到了失敗的時候，法國的愛國者，首先是共產黨人，並沒有投降，而且開始進行他們反抗德國侵略者的長期英勇鬥爭。

一九四〇年五月，當在張伯倫內閣中担任次要職位的，著名反對慕尼黑政策的邱吉爾，出來領導政府的時候，英國政策才開始好轉。但是邱吉爾也只好悲苦地逐漸地使英國政府帶入反希特勒鬥爭的新路線。他在國會裡，主要還須依靠前資助張伯倫在慕尼黑政策的那一部分人的支持。而在英倫外交政策多年的不幸的經驗之後，英國及其他國家的反希特勒的人們，還在某時間內採取觀望的態度，甚至在邱吉爾政府之下，也是如此，這在那政府以自己的行動充分證明英國已肯定地奉行新的路線。關於這方面，最重要的，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邱吉爾的宣言——說明英國支持蘇聯的解放戰爭的——和以後的英蘇對德共同行動的協定。這之後，英國就沒有一個正派的工人再持觀望的態度。工人階級都充滿了愛國的熱誠。共產黨人尤其活動，堅決支持他們國家反希特勒德國的戰爭。

這就是戰爭初期，英國情形的大概。後使共產黨人確實犯過某些錯誤——如在英蘇兩國戰前戰後都應聯名行動的問題上，這是他們曾被批評的主要問題——但是證明能真正維護英國人民國家利益的，還是他們——共產黨人——而不是批評共產黨的人，與蘇聯同心協力，不祇不會妨礙英國工人戰時的愛國情緒，反而激起了這種情緒的增長。這可以由英蘇軍事合作後，英國工人階級在歷史上第一次充滿了熱心勞動的精神的事實得到證明。

同樣地在其他國家，工人和蘇聯的協調，也激起了他們的愛國熱誠。這些事實，業已為法、南、捷、波、保及其他國家的公正觀察者所證實。甚至我們可以這樣說，在有政治覺悟的工人中，愛國情緒的發展，是在蘇維埃愛國主義誕生的那一天真正開始的。

當俄國的工人變成了他們國家的主人以後，其他國家的覺悟的工人自然而然地對我們蘇維埃國家感覺到一種深切的愛，而開始叫它作世界工人的祖國。他們對我們國家的愛，同時又引起了對他們自己國家更深切的愛，因為是他們感覺到他們的國家，是他們自己光明的未來的所在地。

自從蘇維埃愛國主義更廣到各國工人心中而產生出蘇維埃愛國主義

其力量之大，在他們進行的反對德國侵略者的游擊戰爭中最明顯地表現出來。德國的侵略者想永久奪去工人的國家和工人對國家的權利。

愛國與民主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強烈的愛國主義在許多資產階級的國家中重新生長，蓬勃起來。對德戰爭勝利後，它自然不會停止，而且必繼續生長。

從歷史根源上說，愛國運動是青年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運動的繼承者。百五十年前，法國愛國者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到十九世紀的後半，愛國主義才在大多數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失去其生動的民主精神，而被統治階級改變為一種迷信品，用來欺騙羣衆。今天在國家中得勢的資產階級愛國主義，是低級而且衰落了過去一世紀的偉大愛國運動的以後的傳統。它把反對外來壓迫者鬥爭中的自我犧牲的精神，和政治上強烈的民主和進步的趨向結合起來。它從對自由的愛好中，從反對剝奪羣衆權利，反對階級壓迫，和反對社會寄生份子處於工人的階級的剝削的意識形態中，取得其動力。

今天，當法西斯是世界各地民族自由的主要敵人的時候，沒有真正愛國主義不帶上明顯的對法西斯反對反抗的性質。以愛國主義旗幟為名的法西斯侵略者，是一種特別危險的偽愛國者，因為他們要阻止那主要的愛國任務的完成，即：根除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的任何遺毒。

在今天再生的愛國主義，並不是一種無聊的儀式，而是一種為着我們人民的自由和快樂的將來而獻身的鬥爭。在若干暫時為德國佔領的國家中，我們曾見到軍民壯烈鬥爭的例子，參加鬥爭的工人，而且有許多早就表現了沒有任何能力或意志去為推進社會的理想而進行真正戰鬥的份子。許多由民主知識分子出身的游擊戰士，青年的農民，和工人肩負起，證明了他們是真正的愛國者，能够接受崇高的理想的激勵，并且如果必要，能够為那理想，犧牲生命。

當然，共產黨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這一愛國運動的先鋒。因為共產主義同時以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理想，來激發及鞏固它的信徒，這是其他主義所沒有的。今天，共產主義是前進工人和知識份子間，他們的日常生活，對英勇的過去的回憶，對美麗的未來的憧憬，這一切的聯繫物。無怪乎

戰後時期美孤立、帝國主義的威脅

W·福斯特作
蘆·蕪譯

德國的軍事失敗，今天已是既成事實，日本發達後進的日于也因此帶得更近了；同時，這也是全世界反動力量紛轉性的失敗。由於法西斯主義的威脅，並不止於德國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為爭奪世界的權權而進行的殘酷的賭博，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度的任何地方，一些有力者，有法內斯思想的資本家，企圖建立一個世界法西斯體系這種企圖，也是法西斯的威脅。世界決不能忘記那些在法國、英國、美國、同其他國家的大資本家們，他們曾經積極支持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發展，他們希望希特勒毀滅蘇聯，同時造成法德聯軍對世界安全——在這一世界裡，資本主義的剝削者們不願被職工主義，議會民主和羣眾日益接近社會主義的傾向所阻礙。

在目前偉大的民主的人民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的過程中，法西斯國家德、日、意竭力爭取法西斯主義統治世界的事業，曾經得到民主國家裡反動資本家們乾脆的幫助。德日意三國如今在軍事上大部分是獲勝了。但如思得出結論說：由於聯合國軍事勝利，法西斯主義的威脅會自動地結束，那就錯了。

這種結論就意味：忽視今天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裡反動力量接近法西斯主義的傾向。世界資本主義是病了，病得很厲害；兩次世界戰爭和大的經濟恐慌，都在一代中發生，就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這個制度是空虛了現實的和潛在的矛盾；在生產能力和市場之間，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在殖民地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在大資本主義國家自身相互之間，都有矛盾；這上面還必須加上世界反動份子的惡毒的反蘇運動。通過誘導的反動份子們，積極企圖通過他們的走向法西斯主義，帝國主義侵略和戰爭的計劃，循着希特勒所走過的道路，來解決資本主義自身的矛盾。

這種威脅不採用軍事手段就可以驅退的。要緩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根本矛盾，還要去毀滅法西斯主義的源泉，就應在軍事上戰敗德國與日本之外，努力地採取整齊的政治經濟的辦法，這種辦法已經由羅斯福、邱吉爾羅斯太林在克里米亞會議所採取的綱領，明確的規定下來或清楚地預見到

了。

現在，法西斯世界正在被聯合國國家的武力擊碎了，要消除殘存的建設法西斯世界的大陰謀，從而剷除法西斯主義的真正的毒蘊，就不僅是進行清場而已。還需要許多重要的工作。許許多多強有力的法西斯團體和傾向，多半正在至少採用着一些辦法，要使法西斯主義在軍事失敗後還能存在下去，使把嚴重的阻礙，給與戰爭中所產生的新的民主主義的政府和綱領。

在解放了的國家同以前是法西斯主義的國地裡，大多數的大資本家和大地主們，那些法西斯主義真正的鼓吹者和支持者，不幸地，幾乎在全歐洲，並沒有作為真正的戰爭罪犯而懲治。因此，在戰後時期，這些法西斯主義的哺育力量必須被強有力的民主政府，強大約勞工運動團有效的政治和經濟的手段所控制。

在以前的軸心國家及其衛星國地裡，被擊滅了的法西斯黨徒，軍隊和其他的反動羣眾團體，也會有一些亡命的殘餘份子。這些，必須要給以毫無慈悲的清算。

至少在最近一段時間裡，像佛朗哥西班牙以及荷荷牙，也這會是法西斯主義的毒害中心。這些中心必須被他們的人民，在聯合國國家積極的幫助之下，予以消滅。

也還有強有力的法西斯第五縱隊在阿根廷和其他的拉丁美洲國家存在，這對於西半球和世界的民主，是很大的威脅，必須予以擊敗。

也還有對付梵蒂岡的親法西斯政策。在整個戰爭中，這種親法西斯政策曾經是一種有力的威脅，在戰後階段必須確定的予以反對。

但最有力的反動威脅的中心，是存在於美國國內，隨着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的垮台，在美國的反動份子們將負擔起在美國國內發展世界的反動中心的任務。這種反動核心，就是由胡佛、范登堡、杜威、赫斯特、惠勒、羅斯福、卡·斯希士、甘納特、林白、麥考米克、杜邦、蓋德勒、高克林等

所代表的舊有的帝國主義份子。

美孤立、帝國主義者的反動

決不是所有的美國資本家都贊成侵略的帝國主義擴張政策。他們之中很多人追隨着一般的羅斯福路線。在這些較有遠見的資本家中間，如開塞爾、克魯格、納爾遜等人明白他們的階級利益是和國家利益吻合的，他們明瞭在世界範圍內，美國採取單獨行動的任何企圖，結果必然是確切無疑的災禍，因此，他們接受德黑蘭和雅爾達所規定的一般政策。

資本家：比較好戰的帝國主義的部份，擁有着龐大的力量，國內的報紙大部份是在他們的手裡，在國會裡也有強有力的議員；他們相信，無論如何現在的世界局勢，對於美國要獲得世界的霸權提供了一個空前的機會。他們不惜任何代價以獲得世界霸權。這些反動份子們看到：在一方面，從前組成核心國家的帝國主義英國、日本和意大利是毀滅了，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法國、比利時、荷蘭甚至英國，因為戰爭，也大大地削弱了；同時，在另外一方面，美國，受到的戰爭的損傷很輕微，這就成爲在工業上，金融上同軍事上無可比擬的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了。因此，他們是決心把他們的力量，用在帝國主義統治上面。

胡佛、范登堡、赫斯特這些帝國主義份子，對於黨對帝國主義之憎惡，沒有詳盡地提出他們爭霸的宏大計劃。還在幾年前，亨利·魯斯和他的「美國世紀」的理論，正是這些人的心跡的最清楚的說明，但是，一般說來好戰的帝國主義者是不贊成這樣坦白的，因爲這樣會使他們成爲民主力量十分顯明的標記。然而，他們的政綱的頑固的帝國主義性，在集中圍繞着德黑蘭和克里米亞重大決定的當前問題的立場上，能够清楚地看到。

這些帝國主義份子們看來，在他們的帝國主義征服道路的最大障礙，就是蘇聯。他們認爲美國與蘇聯不能做朋友，這循着克里米亞的路線在和平時期也如像戰時一樣地共同工作，它們不是朋友，而是仇敵。他們的方針是要把美國造成主宰。他們對蘇聯懷有善恨，因爲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如今又添上了新仇——在他們看來，蘇聯是封鎖了他們的法西斯帝國主義道路的嚴重力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這些反動份子的態度是：設法使作戰努力的負擔加在

蘇聯身上；盡力和希特勒單獨的談判和平；企圖在解放國家裡保持反動政府當權；陰謀拒絕無條件投降的口號，而變成一個對德國的寬大的和平；陰謀保護戰爭罪犯等等。所有這些，都積極地表明了他們的帝國主義路線。

關於聯合國國家團結的問題，他們的態度是陰謀使美國在新的和平機構中成爲主要操縱者。他們努力造成三強之間的分歧；他們努力用轉移聯合國安全會議的大部份權力給聯合國大會的辦法，來削弱聯合國安全會議；在大會裡面，由拉丁美洲國家的大集團的幫助，他們希望控制主要的投票權；他們用培植各種反蘇的偽造的民族要求，希望這樣來使新心世界機構在混亂的狀態之中。

對於英國，他們的妄自尊大是很少掩飾的。他們貪婪的眼光投射到英國的統治地上面，特別是澳洲、新西蘭和加拿大。對於拉丁美洲，他們是滿懷着輕蔑，而且認爲在我們南方所有的國家，實質上是美國的附庸。他們對於中國的觀念，以爲中國是美國的剝削者的一片黃金的礦藏。他們希望美國的空軍和海軍基地遍佈全世界，而且，他們希望在戰後階段保持我國的軍事力量到一種過高的水平——顯然地，這是爲了最後的反對蘇聯的戰爭。

他們對於蘇聯的態度，是一種腐爛的敵對態度。他們把美蘇之間每一種分歧挑成爲危機，（如像關於波蘭他們所會經作的那樣），而且他們屢無恥的在美國人民的耳朵前，喧嚷着（一種有害的觀念，那就說對蘇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這種態度，范登堡在聯合國舊金山會議上表現得特別清楚。因此，美國的代表團，追隨了范登堡的領導，厚顏的拒絕了蘇聯關於民主的波蘭政府與會的提議。對於允許法西斯阿根廷的代表加入聯合國，他們應當負責，這種允許是對抗着蘇聯和其他國家強烈的反對的。爲帝國主義世界反蘇陣線奠定一塊基石，這是胡佛、范登堡這些反動份子們處心積慮的企圖。全部的事件都嚴重地削弱了美國的民主的威望。

胡佛、塔虎脫、赫斯特、范登堡這些帝國主義份子的國際經濟政策，是緊密地和他們的軍事和政治的政策相結合的。在戰後階段，他們希望完全自由在地搶奪市場，他們相信，美國因爲有偉大的工業資源，能超越其所有商業競爭者。因而，他們是羅斯福國際經濟政策強硬的敵人；羅斯福的政策最適合於克里米亞的協議的，而按照布里斯森林建議案所發展了的，爲了經濟的重建，這些協議號召低率的關稅和國際合作。這種狂熱的帝國主義份子看來，所有這些計劃，祇不過是一些「胡說八道」而已。

胡佛之流帝國主義份子的國家政策和經濟政策，自然十足的適合於他們

侵略主義的外交政策。他們經常對羅斯福政府採取敵對，而現在又企圖使羅斯福的政策成爲疑難，他們從不放過一個破壞國家團結的機會；他們在原則上反對充分生產與充分就業；他們唾棄故羅斯福總統新的經濟人權宣言，和他的六千萬人就業的綱領，說實際上那是社會主義；他們不斷地呼喊着「自由企業」，這說是在說：他們要放手地，大體上如像他們所希望的那樣去進行大的擴張。他們努力削弱勞工運動；他們加倍的努力來擾亂和抵制政府。在勞工運動方面，他們的傀儡們——烏爾、路易士、漢特遜、杜賓斯基等等——的活動完全適合於這些反動派們底帝國主義國家的。

必須防備的危險

美帝國主義的擴張計劃，是容巨大和強有力的力量作後盾的，這種計劃之法西斯主義性質和抑殺的戰爭威脅，特別是在戰後時期裡；應該是很明顯的。如果假定這種計劃真的實行起來，能夠除却不幸的後果而能得到別的任何東西，這種假定都是荒謬的。英國同其他的資本主義強國將抵抗美國的統治。大不列顛已經因爲美國的壓力和帝國主義野心而感到大大的煩惱了；假如胡佛和塔虎脫之流能夠引誘或者強迫美國政府採用他們的政策，結果，只龍是和英國發生大的衝突。如果想像強大的蘇聯也會屈服於美帝國主義的命令，這也是荒謬的。同樣地，如果企圖實行毫無限制的，國際經濟競爭的胡佛帝國主義政策，一定會產生一種空前絕後的世界危機。

美帝國主義種種的擴張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它將和仍舊還爲最大團體集合起的世界經濟和政治力量，以及和強大的勞工運動，和美洲其他的民主力量發生衝突。這是到達國內和國際的災害的寬泛而直接的道路。胡佛式的帝國主義將造成戰後世界主要的反動危機。要認清胡佛之流的贊成者如果得行其志，將會引到甚麼情況？我們就必須考慮，如果在去年秋天由於差以毫厘而失敗了的杜威，勝利地獲選爲總統的話，世界在現在是會處於怎樣的悲慘的境地。

胡佛、杜威、范登堡這些帝國主義份子，現在正積極的組織他們的力量，企圖在一九四六年舉行國會選舉中，爭取聯邦政府權力的制衡。他們在最近的過去，遭受過很多嚴重的挫敗，這些挫敗包括有杜威的失敗，德蘇蘭和克里米爾會議的成功，蘇美英法獨立主義，日益成長的軍事的對蘇的友誼，歐

工運動的政治覺醒等等，雖然如此，他們仍然是強本和危險的。從以前歷有幾來判斷這些人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特別是從龐大的戰鬥，做他們在一九四四年大選時所應行的戰鬥來判斷，如果過低的估計他們，這會是愚蠢的。他們是必須由反法西斯聯盟堅決地進行戰鬥的一種威脅，特別是在我們想起一九四六年的選舉，和我們進入復員階段，面對着很多重大問題的時候。

歐洲的戰事的結束現已來到了，根據戰時動員局長文森森的聲明，戰爭的結束將帶來戰時生產的減縮，這種減縮很快地就會到達百分之三十之多。顯然地，在這種局勢下，除非是採取了適當的防止辦法，這是重大的經濟危機。羅斯福政府製訂了很多計劃，這些計劃包括布萊敦森林計劃，低率關稅的提議，六千萬人的就業計劃等等；但是國會反對派的壓力下拖延了很長的時間，而沒有甚麼建樹。這種拒絕採取適當同迅速的手段，就會招致在戰後時期的經濟上的大破壞。

這樣的一種經濟破壞，顯然地，是胡佛之流的帝國主義份子所希望的。他們的全部推測，是建築在戰爭的結束後經濟混亂的前途上的。他們希望經濟的經濟危機，將會幫助他們成爲像「我早就告訴過你這孩子」的先知者似的反對派，來使得他們的黨徒在一九四六年被選進議會去，而一般地，這會助長他們削弱勞工運動的破壞把戲。這將會推翻雅禮達的全部計劃。這將挑撥起尖銳的國內階級鬥爭，放置下新的戰爭的基石，如像當時他們所認爲的好的一出路——那樣；這將會再度增強法西斯主義的威脅。目前國會內外的反對派們，對於現在建立對內和對外的政策的破壞，其包括的嚴重危險就是如此。

當前的鬥爭

美國正因爲它是這樣的強大，而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相對地又是那樣脆弱，爲了完成克里米爾會議的目標，担負着極大的責任。在更進一步的軍事戰爭這一方面說來，這是實在的，特別是在經濟的戰場上這是實在的。這個國家爲了自己和世界的利益，必須表現出民主的經濟領導，否則克里米爾的和平、民主和繁榮的社羣，就不能實現了。美國現在正面對着它無與倫比中間做偉大的世界責任。

美國在今天世界事務中堪足輕重的地位，使侵略的帝國主義傾向在我們

中間存在一事，成爲更重大的危險。這些破壞的力量必須被擊敗；決不能允許他們破壞有力的費德羅斯政策，決不能允許他們成爲新的集合起來的世界反動和法西斯主義的中心。

聯合國家勝了軸心國以後，假如美國要負起進步的任務，在經濟和政治上，和我們到德蘇英法美四國強國合作，像我們和他們聯合起來取得了戰爭的勝利那樣，那麼一個更沉重的責任就放在美國勞工運動的肩上。美國勞工運動曾經爲羅斯福的政策而戰鬥，是反法西斯聯盟的中流砥柱。工會必須團結他們巨大的力量，用強有力的政策政治行動，擊敗胡佛、范登堡、赫斯特的帝國主義份子們的陰謀。工會必須對社會門總統的政府施以壓力，使它走向一個確定的方向，迅速而堅定地支持那遠見的、實現聯合國家的綱領所必需的、經濟和政治政策。

職工會必須特別注意支持聯邦政府，使蘇聯和布魯塞爾的建議案，不能有任何困難的修改。這些是克里米亞會議計劃的最中心，假如反動和反對派被承認來刺穿計劃的活力，如像他們現在所企圖作的那樣，這是一種不幸。

職工會必須同樣地在要求關稅的減低，在工業進行發展起來的國家裡發覺工業的計劃，在一般地實施羅斯福總統新經濟人權法案，和他的六千萬人的工作計劃等方面，表現巨大的活動力。他們必須提醒全國，現在國會拒絕接受羅斯福的經濟計劃，就等於在戰爭結束時引起經濟失調，來威脅我們們。

有組織的勞工，應該比一般的工人更是增強國民反法西斯團結的衝鋒力量。可以用來有效地達到這個目的新的工具之一，是最近宣佈的「勞資憲章」。職工會以一種堅定、團結和明智的政策，處理種和大部份雇主新的合作協定之下，就大大地消除職工工業中的衝突，提高工人的生活水準，廣泛地擴展勞工組織到新的領域，使它到達一般職員和農業區域的工人裡去。職工會能修把新的很大部份的人，團結在羅斯福政策後面，在全國的反法西斯團結中間。然而，職工會必須防備社會民主黨有害的階級合作主義，這種合作主義將把勞工束縛在反動資本家利益的鐵籠下。

國際職工會的統一，是另一件必須受到同等注意的事務，特別是從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進步力量看起來，勞工運動的國際的緊密團結，是實行聯合國家的綱領所不能少的，特別是在戰後時期。全美國勞工運動，必須因此而參加正在誕生的、勞動者的新的世界職工會聯盟。孤立主義者，美國勞工聯合會及美國內閣事務，他們曾經幫助過胡佛、范登堡之流的侵略的帝國主義，他們必須受到打擊。

國主義，他們必須受到打擊。

在爲了國家的反法西斯的團結，在支持羅斯福政策，反對反動份子的全部的鬥爭中，職工會應該特別注意一九四六年的國會選舉。共和黨的反動份子們憑藉「遠離」大選的年代工人的犧牲，計劃着在一九四六年取得卑劣的勝利，如像他們在一九四二年所得的一樣大。他們如果得到勝利，那對於我們的國內局勢，和聯合國家的全部綱領，都會是一種真正的災難。因此，有組織的勞工必須在政治上團結起來，並準備使反動份子受到慘重的失敗，這樣子來參加一九四六年的選舉。這就是意味着爲了準備選舉，必須現在就推動起來，並且猛烈地推動。

在反對胡佛、范登堡、塔虎脫這些敵對者的戰鬥中，應該充分揭露這些人的帝國主義的計劃，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僅僅是宣稱他們是反動份子，這是不夠的。必須教育美國人民，反動的反對派是反對在各個國家之間具有合作的整齊計劃的，而且要爲了變帝國主義精神世界而進行戰爭的。由於這樣的揭露了胡佛和杜威之流的真實目的，標誌了他們計劃中早已存在的對於美國和世界的災害，反對這些帝國主義份子的戰鬥，將會大大地增強。

美國人民裏面的絕大多數，贊成偉大的莫斯科、德黑蘭同克里米亞會議所規定的一般目標。必須爲了這些目標而戰鬥，以便使其壓倒好維主義和對聯邦政府帝國主義者的陰謀詭計，我們的國家和我們全國人民的命運，依靠於職工會對於他們所從事的事務的戰鬥的基本性質，了解到甚麼程度，和他們在進行這種鬥爭中他們所使用的努力到什麼程度。

羅斯福總統之死，使得職工會爲着克魯米亞規定的目的而繼續這種政治鬥爭更來得必要。范登堡之流明白，由於羅斯福總統之死，世界的民主運動就要失了一個偉大的領導者，他們因此正在加強其反動的活動。

羣衆的政治活動是全國反法西斯團結內部的骨幹，因此，努力保證由羅斯福奠定下來的政策的主要方面有效實現，就是加在勞工運動身上的任務了。

(譯自七月份政治雜誌)

馬克思是怎樣學習的？

M. 格略塞爾作
葆 荃 譯

下面的這篇文字，是從格略塞爾的一本論馬恩列斯如何學習與寫作的書中譯出來的（原書名「論馬列主義經典作家們研究與寫作的方
法」）。在這段文字中，作者告訴了我們馬克思研究各種科學，閱讀書籍及學習外國語文的情形。馬克思把研究工作與學習外國語文，都
視為是生活鬥爭的一種武器，並且他的一切研究工作並不是脫離現實，而是由革命鬥爭的實際要求來決定的，這種精神，很值得我們在學
習時作為借鏡之用。

——譯者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列寧在蘇俄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演說的時候，曾經這樣講起馬克思：

「假如你們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馬克思的學說能夠緊抓住革命階級中的千百萬人的心呢？那麼你們就只能得到一個回答：這
因為馬克思是站在資本主義時代人類所獲得的各種知識的堅固基礎之上的；馬克思在研究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法則之後，就認識到資本主義的
發展，不可避免地要定向共產主義；而主要的，還是因為他根據了對於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所
作的最精確的、最詳細和最深入的研究，再靠了他完全把握住以前科學所提供的一切成果，
才能證明出這一點。」

「凡是人類社會所創造的一切，他無不批判地加以改造過，一絲一毫都沒有放鬆過。」（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三十卷第四〇六頁）。

馬克思一生都在學習。當他讀完了大學和得到博士學位時，他又重新研究科學，而同時還從事大規模的革命宣傳、鼓動與編輯的工作。馬克思的科學研究工作，時時刻刻都是因革命鬥爭的要求而決定的。馬克思本人在他所著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一書的序文中，曾經這樣描寫了他這個時期的科學研究工作的情形：

「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三年當我任「萊茵新聞」的編輯時，我最初才碰到了必須對所謂物質利害關係的問題發表意見的困難情況。萊茵省議會關於林木盜伐和土地所有權再加以劃分問題的討論，當時萊茵省省長馮·夏培爾先生關於摩塞爾農民情況的問題對「萊茵報」所作的官方的論戰，最後，還有關於自由貿易與保護關稅的討論，都給了我對於經濟問題的研
究以最初的激勵。從另一方面講，當「向前邁進」的善良願望正好多倍地趨於專門學識之
上的時候，在「萊茵新聞」上就可以聽到一種帶着輕微的哲學色彩的法國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反響。我自己發表了反對這種愛好的意見，但同時在和「奧格斯堡匯報」的論戰中，我又坦白地承認了我當時的知識，還不容許我對這些法蘭西思潮的內容作任何獨立的判斷」（見「馬克思全集」俄文本第十二卷第一分冊第五——六頁）。

馬克思的這段故事，告訴我們他善於正確而及

時地認識他自己知識上的缺點，並且絲毫不羞於承認這個缺點，他對於任何一個問題，假如他還沒有充分的準備時，他決不冒險地「作任何獨立的判斷」，而立刻就進而作更詳細的研究。

列寧在一九二〇年也曾向青年團員們講起這一點，警告他們要反對理論研究上的膚淺的毛病。他這樣講道：「假如我曉得我知道的事情很少，那我就想辦法多知道一點」（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三十卷第四〇七頁）。

馬克思為了要充實他在「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三年時所感到的那種知識上的不足，他是從不惜勞苦去加以研究的。」

一八四三年的秋天，恩格斯這樣寫道：「馬克思懷着狂熱在研究政治經濟學，法國社會主義者的思想和法國史。這個研究的結果，就是他本人轉向社會主義。」（見「馬克思全集」俄文本第十六卷第二分冊第二五六頁）。

馬克思對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在他所製定出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世界觀上，是起着巨大的作用的。馬克思一直到死的一天，都沒有中止他對於經濟問題的研究。他所遺留下來的原稿、抄本，據

總錄，以及他在其前地能將他所研究的各種問題時所做到的。這就給予我們一種可能，以從這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尖銳的創造工作的實踐中，抽出他最寶貴的經驗。

爲了達到馬克思所達成的那種對於社會生活的深刻認識，不應當需要有人似的天賦的智力，同時還需要對於科學與生活的一切部門有着巨大的知識。而馬克思本人就是完全掌握這些知識的。

保羅·拉斐爾(註)這樣寫道：

「馬克思的頭腦，是用歷史與自然科學部門中的以及哲學理論中的多得難以盡述的事實來武裝起來的，他並且善於卓越地利用他在長期思想勞動中所聚集起來的全部知識與觀察。」(見「馬恩選集」俄文本一九四〇年版第一卷第五二頁)。

馬克思善於精確地從過去的科學中，提取出科學在人類知識的各種不同的部門中所能提供給他的一切東西。凡是能爲了這個目的所需要的「一切生產工具」，他都利用他自己的手來爲自己鑄造出來。

馬克思用最精細的方法，時常多次返復地來研究這一本書或另一本書，他不僅研究了在他以前所出版的全部哲學的、歷史的與政治經濟學的著作，——他還研究了技術史、實用經濟、各國工業與農業的情況，統計學，甚至還研究意大利的複式簿記。他的記憶力是異常驚人的。他從年青的時候起，就學會了牢固地發展自己的記憶力。他按照黑格爾的勸告，學引用他不熟悉的語言來背誦詩歌。雖然這樣，他從不單靠他自己的記憶力，他時常在他自己的抄本裏，用極其豐富自己的記憶力的各種實際資料。他有一種時常重讀自己的筆記，並將他所聚集起來的材料再加以系統化的習慣。

從馬恩的抄本中，我們可以看出，馬恩在研究時，他用了多麼大的注意力於獲得正確的知識。他特別研究過新數學、物理學、化學、研究過自然科學，甚至還研究過生理學和解剖學。舉如馬克思在一八六四年七月五日寫給恩格斯的信中，就有這樣的話：

「在這個完全不能工作的時期當中(馬克思這句時候正患流行性感冒——原作者註)，我讀了加木特的生理學，洛爾德的一著作，克里爾關於組織學的學說，希普茲漢的腦髓與神經系統的解剖學，希萬和希萊頓的解剖學說……。在最近這個時期，我想多多地研究解剖學和生理學，除此之外，我還準備去聽當錫有實物解剖和解剖的課程。」(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二十三卷第一九三頁)。

當一八六三年正月間，馬克思在著作「資本論」時，他曾到地質學學院聽過威里斯教授的實用工藝學教程，研究過地質學問題，研究過土壤化學。馬克思不斷地工作着，他常以休息的形式，從這一個對象轉移到另一個對象，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多樣化。閱讀文學作品，閱讀莎士比亞、海涅、巴爾扎克以及其他他所喜歡的作家及詩人的作品，這對於他就是休息。

拉斐爾寫道：「除開讀詩人和小說家的作品之外，馬克思還有一個特色的休息方法：這就是弄數學。他對於專門科學有着特別的熱衷的……。」(見「馬恩選集」俄文本第一卷第九〇頁)。

當他的妻子生病的時候，他無法繼續他經常的研究工作，「就寫成了一篇關於無限微積分的論文，據許多看見過這篇文字的數學專家們的批評，它

是具有很大的價值的。」(見「馬恩選集」俄文本第一卷第九〇頁)。

當馬克思生病的時候，正像我們從前所引的傳中，他寫到的一樣，他就研究「一些比較輕鬆」的科學，例如生理學和解剖學。

至於馬克思怎樣組織他自己的工作和怎樣處理書籍的情形，拉斐爾曾經這樣告訴我們：「馬克思從不讓任何人整理，其實講得更正確一些，是弄亂了他的書籍和紙張。它們只有在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紊亂的；其實每一件東西都是放在它一定的位置上，他用不着尋找，很快地就能拿到他所需要的任何書籍或是抄本。甚至在講話的時候，他也時常會停下來，找出書中的一段引用的文字或數字給你看。他和他自己的工作室合而爲一個整體，在他的工作室裏的書籍和紙張，就像是他身體的四肢一樣地服從他的意志。」

「在排列書籍的時候，馬克思並不滿意於外表的整齊；各種開本的書和小冊子都一本一本本地排在一起；他不是按照它們的開本，而是按照它們的內容來排列的。對於他，書籍是智力勞動的工具而不是奢侈的裝飾品。『它們是我的奴隸，它們應該按照我的要求而爲我服務』；他在書本上劃線的辦法，使得他很容易找到書中所需的地方。」(見前書第八八頁)。

馬克思特別重視做摘要的工作。視爲是種通過他所讀過的材料的工作的過程，我們從這樣一點上也可以看出，就是他甚至還爲他自己個人的圖書館所有的書作過提要。但是我們知道，馬克思並不需要於單純的閱讀和爲書本做提要的工作。他批評地採取了它們的內容，檢查了書本中所引用的事實，給它們以最嚴格的分析，有時爲了證實某些原

實而研究了堆積如山的統計資料。馬克思從不利用任何沒有經過適當的資料來源之正確恩格斯所說的，「他是不採用間接得來的資料的，而永遠在努力尋求直接的資料來源；他甚至根據「直接的資料來源來檢查次等的材料，並取這件不借多到大英博覽會的圖書館去走一趟。在研究每一個對象和現象時，馬克思總要研究它的歷史來源和它的前提；因此很明顯地，就是每一個研究對象，都引起了他的許多新的問題。譬如當他在寫作「資本論」第三卷中地租一部分時，他特別研究了原始社會史、農學、俄國和美國的土地關係，地質學以及其他許多問題。為了能更好地研究俄國的土地關係，他還化了很多的時間專門認真地學習俄文。

為了遵守他自己和恩格斯的根據直接資料來做研究問題的方法，馬克思特別學習把握住他在研究工作的過程中所需要的外國語言，好用這國文字的原文來閱讀資料的原著。馬克思能閱讀歐洲各國文字的原著，並能毫無錯誤地用德文、法文和英文寫文章。除此之外，他還學了古斯拉夫文、俄國文和塞爾維亞文。馬克思非常重視學習外國語言。照保羅·特發格的說法，他喜歡重復這樣一句話：「外國語言是生活鬥爭中的一種武器」。我們從他在「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十日寫給他父親的信中就可以看出，當他十九歲的時候，他已經不只是單純地，換句話說，就是法文的幫助學習英意兩種語言，他還把很多東西從外國文翻譯成德文。從外國文翻譯，這是學習外國文的一個最好的方法，列寧後來也曾這樣說過。

馬克思努力學習俄國文時，他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
在一八七七年底寫給俄國「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中，他曾經這樣說過：

「為了具有批評現代俄國經濟發展的知識的可能，我學習了俄國語言……；此後好多年當中，又研究了和這問題有關的許多官方及其他出版物」（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十五卷第三七六頁）。

在馬克思的抄本中，到現在還保留有許多筆記，足以證明他是用了怎樣的頑強和勤勉的精神來研究俄國語言。他記下了每個生字的意義、格的變化、動詞變化表，還化了很多的力氣於把俄國文的特點，如動詞的各種形式和格的語尾等等。他第一本作為練習之用而讀的書，就是赫爾岑的「牢獄和流放生活」（見赫氏著的「過夫和恩德」的回憶錄）。在德國學習俄文的六個月之後，他已經能夠閱讀原本的俄國文學作品，他讀了普希金、果戈理和沙爾蒂科夫、奧德林的著作，再過了六個月，他在「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寫信告訴普希金里德」和「耶那爾」說他已能非常流利地閱讀俄文了。

下面就是從這封信中引出的一段話：
「我不知道會否告訴過你，我從一八七〇年初，就開始學習俄文，現在我並非非常流利地閱讀這國文字。這是因為有人說彼得堡，寄來了一本弗萊維斯所著的非常有趣的「論俄國工人階級」（特別對農民）狀況」的著作而引起的，同時我也想把恩格斯的「謝爾斯基的優越的經濟論著」（他會談談到西伯利亞七年之久）。在這種樣的年紀，要能把一種和古典的，日耳曼系與羅馬系的語言截然分開的數字，這是要化很大的氣力的。現在俄國的思想運動，證明出了一件事，就是民心的動搖不安是越來越深了。思想時時刻刻都是用許多看不見的線和人民的身體聯繫著的……」（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二十六卷第八七——八八頁）。

（註）拉發格是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又是馬克思的女婿，其所寫的「德馬克思」，是了解馬克思生活的最好文字，中文有趙冬嵐的譯本，學術出版社版。

（上接七〇二頁）

業對共產黨給予那樣有力的支持和信任，如我們今天在法國，南斯拉夫、波蘭、保加利亞、甚至意大利、芬蘭、羅馬尼亞所見到的。

在蘇聯——勝利的工人階級的偉大的國家——愛國主義自然達到更高度的發展。

蘇維埃愛國主義是為列寧斯大林對民族問題的偉大主張，和布爾什維克蘇維埃政府對這些主張的成功的事實應用，所激發的。蘇聯各民族文化的迅速度的進展，把他們融為一家——為相互友愛的牢不可破的緊密聯繫束縛着。

以社會主義民主原則為基礎的斯大林憲法，不僅是蘇聯政治制度的牢固的基礎，而且是蘇維埃社會主義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同時，如在這個全世界唯一徹底的民主憲法採用時斯大林所預見的，它共其他國家正在進行反法西斯野蠻主義戰鬥的人們的精神的後盾和真正的支持力量。

人與人間割裂的廢除以及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其他的歷史的成就，不斷地刺激起蘇聯千百萬勞動人民的愛國主義的生長。結果是，在偉大的愛國戰爭中，蘇聯人民獲得空前前的試驗。蘇維埃愛國主義已證明為一不可擊敗的力量。沒有人會懷疑，在我們目前已經進入的和平建設的新時期中，它將作出新的奇跡。

在國外，每一個國家的愛國運動無不將繼續為消滅法西斯反動，國家民主化，及保障安全與獨立而戰鬥。各國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真正愛國主義，都準備着抵抗一切帝國主義的野心，準備着在正義與和平合作的基礎上來改善與國際的關係。真正的愛國者將支持一切使壓迫民族的自決權，及為勞動羣衆生存的合乎人道的條件而戰鬥。

（譯自「新時代」六月號）

論科學的預見 (中)

華西星也夫作
凱 豐 譯

大家都知道，科學泰斗列寧偉大的發現，在一九一五年，根據詳細的分析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時代發展的條件——發現社會主義在一個單獨的資本主義國家內可能勝利。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切國家內同時勝利。根據科學的分析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經濟的許多事實，列寧勇敢地拋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帝國主義時代以前所規定的、舊的、過時的論點，即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不可能勝利的論點，並發現了新的規律。下面就是列寧著名的定義：在這個定義中給了天才的發現，即是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能夠勝利的預見：

「政治的和經濟的發展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的絕對定律。因此，社會主義最初在不多的、甚至於在一個單獨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勝利是可能的。」(註二七)

歷史由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光輝證實了列寧的這種預見。列寧是理論思想和革命實踐的巨人。不是屈服於馬克思主義的字句之下，而是勇敢的反對第二國際，在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切敵人，首先是反對托洛茨基的鬥爭中，明白而確切的規定了新的理論——即是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能夠勝利。如果列寧不這樣做，那麼當時黨、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將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回答這個問題時說：「黨就會迷於黑暗中，無產階級革命就會失去領導，馬克思主義理論會開始衰落，無產階級就會失敗，無產階級的敵人就會勝利。」

列寧的遠大的透視歷史事實，他的預見的天才能力，能夠熟視歷史事實的進程，領導羣衆的自發運動，組織它並引導它到勝利的道路上去，從表現他這種大才能力的許多著名的例子中，就是在十月革命前夜，列寧對俄國狀況的分析。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九月所寫的「臨頭的災難及怎樣與之鬥爭」一文中，他給這種環境以明白的估計。

在資本國內，列寧描寫在這個時期內俄國和勞動羣衆所處的那種可怕的

情景(飢荒，交通的被壞，資本家的怠工等等)，列寧發覺了消滅這種臨頭災難的整個計劃。列寧對於找出災難的條件，給了一個科學的、理由充分的分析。他指出這出路物質條件，社會主義勝利的物質條件成熟了。

「帝國主義戰爭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這不僅因為戰爭本身的恐怖產生無產階級的起義(如果經濟上沒有成熟，任何起義也不能造成社會主義)而且因為國家壟斷的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善的物質的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前門，是歷史階梯的這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與社會主義的階段之間，任何其他的過渡階段都是沒有的。」(註二八)

在這種分析之後，列寧作出結論，作出指示，革命的無產階級應該怎樣做，無產階級的政黨應該怎樣做：爲着挽救革命，爲着挽救國家，應當與資本家破裂。消滅資本主義。

「只有勇敢徹底的與資本主義破裂，在對外和對內的政策上才能挽救我們的革命，才能挽救東轉在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國家。」(註二九)

別的出路是沒有的，否則就是人類的死亡。如果人類想得救，它就應當把自己的命運委託於最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以使整個人類過渡到共產主義去。

「戰爭造成了這樣無窮的危機，使得人民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這樣緊張，給了整個現代社會組織這一種打擊，使得人類在兩者之間選擇：或者是死亡，或者是把自己的命運委託最革命的階級，以便最迅速的最急進的過渡到更高的生產方法上去。」(註三〇)

列寧這些預見，光輝的證實了。列寧在「臨頭的災難和怎樣與之鬥爭」一文內所指出的辦法由勝利的無產階級——蘇維埃政權所實現了。我們的國家把自己的命運委託英勇的領導者——工人階級，它把我們的國家引導到社會主義的光明的自由王國。

真正是在臨頭的夜(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列寧寫給黨中央的一封信。在通信內列寧說：

「我寫這封信是在二十四日的晚上（十月）。無論如何要在今天晚上，今天夜裡逮捕臨時政府，解除軍官團的武裝（如果反抗，就戰勝它）。不能等待，等待會喪失一切！」

「歷史不要求革命者遲緩，他們今天能夠勝利（大約今天將勝利），明天來冒險喪失許多，要喪失一切。」（註三一）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無產階級勝利了，推翻了資產階級的軍事力量，奪取了政權。列寧和斯大林所領導的革命凱旋了，勝利了，執行了列寧的計劃。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四年在克魯姆宮軍事學校晚會上的演詞中，對十月革命前的環境給了一個很明白的估計，它的複雜性，列寧預見的力量，以及這種以空前的真確性實現了，斯大林同志說：

「在這樣的時候舉行起義，這是什麼意思呢？在這樣的環境裡舉行起義，這就是孤注一擲。可是，列寧並沒有怕去冒險，因為他知道了，明眼看到了，起義是不可避免的，起義是會勝利的，俄國的起義會造成結束帝國主義戰爭的條件。俄國的起義會煽動西方的痛苦的重業，俄國的起義會把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國內戰爭，起義結果會成立蘇維埃共和國，蘇維埃共和國將成為全世界革命的堡壘。」

「大家都知道，列寧的這個革命的預見，後來已經毫不差的實現了！」（註三二）

列寧是馬克思主義最偉大的理論家，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特別複雜的環境中他沒有感到驚慌，而與斯大林一道給了一個革命的計劃，列寧向全世界證明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偉大和力量，他經常指出在達到預定的目的中不要有任何一點驚慌。要堅定、勇敢、果斷。

列寧說：「列寧的下列的有名的預言。

「列寧在第八次大會上，作了一個關於鄉村工作的報告，他說：『列寧說：『列寧的預言經過十年證實了，到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我們的鄉村已有七萬二千架耕犁機，共有一百萬匹馬力，我們蘇聯的農民大批的整齊整齊的加入集體農場。在一九二七——一九三〇年已組織了八萬六千個集體農場，有六百萬農戶加入集體農場。』」

「列寧說：『列寧的預言經過十年證實了，到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我們的鄉村已有七萬二千架耕犁機，共有一百萬匹馬力，我們蘇聯的農民大批的整齊整齊的加入集體農場。在一九二七——一九三〇年已組織了八萬六千個集體農場，有六百萬農戶加入集體農場。』」

直接與列寧的這個預言相關的，就是在一九二二年在「糧食稅」一本書內，他說出了另一個預見：

「十年——二十年與農民有正確的關係，就在全世界範圍內保證了勝利（即使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延遲的情形下），否則，就要忍受二十年到四十年白晝的恐怖。」（註三四）

列寧這樣詳細的和確切的估計了事實，在這種情形下，甚至與所發生的時間也相符合。這從後來的事實看得很明顯。在十三年後，即到一九三四年，斯大林同志在十七次大會上說：

「……勞動農民，我們蘇聯的農民，最後的和一往不復返地站到社會主義的紅旗下了。」

在一九三三年，在蘇聯農業中已有二百二十四萬五千個有組織的集體農場，包括蘇聯農民經濟百分之六五。

列寧對於革命階級的作用，關於必須經常估計社會主義各階級的階級反抗，這種預見也是很有名的。

在「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的資產階級」一書內，列寧說：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是整個的歷史時代。當這個時代還沒有結束時——判斷者必然還希望這時期，而這種希望便變為復辟的嘗試。在第一次嚴重的失敗之後，將推翻了的獨裁者——他們不會知道敵人推翻，他們不相信這事，沒有想到這事——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增長百倍的仇恨心起來鬥爭，謀恢復他們的已被奪去的一切。這，謀他們的復辟。——他們的復辟從前邊許多變遷的生活，而現在則變為敵一下敵人——弄得破壞和窮困（或有弄到從事一下賤的「勞動」……）。而在判斷者資本家後，有極大的小資產階級緊跟着。幾十年來各國歷史的經驗證明，小資產階級猶豫不決和動搖不定的，今天跟着無產階級走，明天則因革命困難而離，因工人的初次失敗或挫折而心慌意亂，神經錯亂，更弄到復辟，痛苦地痛苦，在兩個階級間跑來跑去。」

列寧的這個有名的預見同樣也為事實證實了。工人階級的敵人，從資本家和地主起，到托洛茨基派和哈林派階級止，不止一次的全國在蘇聯恢復舊制度——資本主義，這就向我們說明了關於列寧的預見的正確性，關於列寧的洞察力力量。

在一九二〇年，在共產黨國際第一次大會上，列寧警告全世界一切共產黨員：

在許多國家內，包括最先進的國家在內，資產階級在國內，在國際範圍內，在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都處在崩潰的邊緣。這正是我們進行鬥爭的方法之一，就是善於結合非法的和合法的工作。

列寧這樣教導我們關於對敵人的驚世性，對資本主義世界，對階級敵人的態度。

我們說列寧天才的預見，這些預見都足以驚人的確切性實現了。

天才的預見，是天才的個人天才之外，他的觀察力，預見將來，切的分析現實，並有思想上的準備，使他能預見將來。

最深刻透入到事實的深處的預見，社會發展法則，革命發展法則的知識，使列寧有預見將來。

「天才的預見，是天才的個人天才之外，他的觀察力，預見將來，切的分析現實，並有思想上的準備，使他能預見將來。」

列寧的天才的預見，有預見之明的領導，保證了俄國工人階級的勝利。

註二〇 斯大林：「論列寧」

註二一 「列寧全集」卷一，一四九頁

註二二 「列寧全集」卷四，三八二頁，四五八頁

註二三 同上

註二四 列寧：「兩個策略」

註二五 同上

註二六 「列寧全集」卷二十，一〇一頁

註二七 「列寧全集」卷一八，二二二頁

註二八 二九、三〇 均見「列寧全集」卷二一，一八七——一九一頁

註二九 斯大林：「論列寧」

註三〇 「列寧全集」卷二四，一七〇頁

註三一 「列寧全集」卷二六，三一三頁

註三二 斯大林：「論列寧」

五

我們的偉大的斯大林，創造性的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也如列寧一樣，給予天才的預見。

在領導黨的第六次大會的工作時，斯大林同志的特殊作用是為大家所知道的，這大會是在使黨準備社會主義的準備會主義革命的代表大會。

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在臨時政府殺害威爾遜人士兵和將軍之後，在革命的一派非常嚴重和負責的時候，在這次大會上，斥責了托洛茨基主義者對列寧和基諾諾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有勝利的可能，斯大林同志作了非常深刻的預見。

「資產階級那種陳腐的意見，說只有歐洲能指示我們的道路，有歐條

式的馬克思主義，也有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我是站在後者的立場上。……並不是沒有可能，正是俄國這樣一個國家，開闢着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斯大林同志所說的，正是這樣一個國家的實現了；在列寧和斯大林的領導下，俄國第一個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在斯大林領導之下，蘇聯的勞動羣眾已經在基本上建成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

一九一九年秋在南方戰線上，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在戰場上預見將來的模範。斯大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

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

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

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

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

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

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

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

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

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

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

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

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

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

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

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

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

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斯大林同志的預見，是精確地預見了斯大林同志的預見。



拉鐵摩爾論如何解決亞洲問題

——推荐拉氏新著：「亞洲的決策」——

D·華 思

編者按：拉氏新著「亞洲的決策」一書中譯本，即將由中外出版社出版，我們對拉氏一書中的論點雖不能完全同意，但在大體上，這是一本好書，是值得向中國讀者們再三推荐的。本文作者是紐約前鋒論壇報的名劇評家，去年曾來廈，他對中國和亞洲問題有很深湛的了解。

在目前大多數對遠東時事寫作的美國人中，沒有一個人能比拉鐵摩爾的話更值得傾聽的。他一身兼游歷家、學者、編輯、歷史家，及美國副總統和將委長的專家顧問，他對於政事及其理論也同樣精通。出版他著作的出版商說他的新著「亞洲的決策」一書對於戰爭及和平有直接影響，因為他的書會被全世界外交家拜讀的。這話是非常對的。因為「亞洲的決策」是他的鉅著之一，顯然他在現時代中佔有極重要的位置。

這本書定名雖似乎近誇大，但實際確未有自滿之處，這是讀者所應加以原有而亦為我們所應加以最天讚揚之處。這是因為拉鐵摩爾先生並未提供了任何容易治病的萬靈藥方。不過他這本最近的著作確實對於美國了解遠東問題之嚴重與具有世界重要性一方面，有極大之貢獻。這本書思慮非常沉靜，內容非常引人入勝，非常激動而充滿卓識與學問，又有普遍的開揚性。因此，它必然是對於美國大眾意見之啓發，有極大的幫助。這種對於大眾意見的啟發，如其美國要領在戰後聰明地表現其本身任務的話，是非常必要的。

假如在拉鐵摩爾先生所必須貢獻的關於遠東問題的卓識之中有一個中心點的話，那就是：東方實在是全世界民主的一個試金石，——包括東西兩方。四方帝國主義時代已經在珍珠港事變，新加坡及香港之陷落而終止了——

這至少是日本所造成的——自此以後，在東方各國將來的勢力上競爭，大體份將是在觀念領域內的競爭。倘若美國的民主觀念及理想並不能給予東方已覺醒的各民族以一個更好而更充實的生活，倘若英國人及荷蘭人並不對於這種覺醒的含義加以承認的話，在東方，蘇聯民主思想要求之實現一定會隨而趨大，而是在這條路上——不是經由戲劇性的叛亂——蘇聯的權力將在東方各領域內趨於顯著。

拉鐵摩爾先生說：「俄國人」及「蘇維埃聯邦」對於所有這些東方已覺醒的民族，具有一個極大的吸引力。在他們眼裡看來——在老一輩人看來這是疑惑不定，在年青一輩人看來則更為清楚——蘇聯變成戰略上的安全，經濟的繁榮，技術上的進步，神妙的新發明，自由教育，機會均等，及民主——這是一一個強而有力的綜合物。蘇聯也贊成民主，這一事實是不容忽視的。它贊成民主，因為它贊成所有其他的東西。在美國，我們常有對於外國要求實行民主之情勢出以狹隘目光之習慣。倘若中國或蘇聯或某些其他異邦民族不願照美國自己將益格魯撒克遜民主主義標準去辦，我們就說他們是不民主的。倘若我們仍舊牢守這種習慣的話，我們將始終是捕風捉影，而不能在政治中有所決策。

拉鐵摩爾先生相信，東方將是「黃金石」，不僅因為民主在「吸引力」的政治上是一個重要的力量，也因為我們在亞洲的工作將對於我們在國內所做的有莫大關係。正如拉鐵摩爾先生所說：「我們一定要讓受我們訓練的人所不能完全給予我們的一個教訓：內外政策密切的交互作用。我們不能對於遠東——或歐洲有一個坦白公正而民主的外交政策，而在國內却進行一個反對的政策，這正如我們不能夠生存在半奴隸半自由的狀態上一樣。威爾遜『天下一家』的概念在「亞洲的決策」裡得到一個深刻的再確認。

東方在美國人面前固然可以代表一個民主的試驗石，但它對於它自己也是一個試驗石，所以在這一點上中國民主的前途也成爲非常重要的了。倘若中國——一個爲了爭取並維持自己獨立而戰鬥，因而獲得承認爲世界上四強之一的東方國家——沒有能力使它自己成爲一個民主的國家，這將給予整個遠東方面的民主思想一個打擊，而使那些在世界上希望得到一個機會以發展民主的反動勢力感到滿足。

因此拉鐵摩爾是中國問題權威，他對於中國方面的寫作當然特別引人人勝，他過去因羅斯福總統的推薦而爲蔣委員長的政治顧問。

關於共產黨三三制之實行，使共產黨員在各種委員會及地方行政團體和延安區內較高級會議內，不超過總額三分之一人數一事，他這道證明了共產黨已脫離了永遠是一個小反對黨的階段而達到了一個在聯合政府內有良好要求權的黨派的地步。所以他不應被看爲一個輕易被共產黨宣傳所中的人。事實上，拉鐵摩爾仍繼續對蔣委員長表示崇高的欽佩，而於敘述一九二七年革命左右兩翼之分裂時，對於蔣委員長特別有裨。因此他對於中國共產黨之最後判詞與一九四四年夏訪問延安的所有美國記者具有同樣好聽是很有趣味，值得注意的事。

現在讓我們從拉鐵摩爾這本講稿再引一段對於中國將來有極重要關係的話：

「當日不人初逐出中國時，其逐出或迫逐日本人之軍隊的政治綱領將是一極端重要的事情……倘若政府實施的政策並非自由政治組織及自由政治代表，或許是虛不能代表多數的一個聯合政策，那就要發生非常可怕的感覺與經濟的不安。由此觀之，中國國民黨在抗戰期間已爲地主統治的趨勢所削弱，因爲地主的利益在中國論論區區解放以爲一定更趨於壓迫農民之一途，而決不讓他們有政治上的發言權，相反地，共產黨聯合政策的趨勢已經使中國論論區的農民在一個壓迫地位上廣泛地處於抗日聯合政府。在迫逐日寇

時，共產黨的軍隊與中央軍並駕齊驅進入收復地帶。

凡爾遜林語堂關於一九四一年中央軍與新四軍衝突中他認爲是共產黨卑鄙險惡陰謀的惡劣氣氛的描述的人，大概寧願知道新四軍雖確包含有共產黨份子及一共產黨副軍長，但本身並非一個共產黨軍隊。拉鐵摩爾說，事實上這支部隊在敵後作戰，依賴於組織優良，而在各種情形下之軍事，決不站在地主利益方面，因爲在日本最終戰敗之後，地主階級將被廢除，農民的組織已異常堅強，地主無涉加以控制。因此國民黨遠對新四軍加以攻擊。」

對於日本的批評，拉鐵摩爾把支持天皇或依賴於自由主義之日本商人將是毫無的利益的空話無稽之談完全打破，但對於於教育一般日本人民之可能却寄予甚高希望。他舉出許多美籍日人的祖先即是日本人而現在經過良好教育以後變成很好的國民的例子。對於我國這些勇敢的日本種的英國人，他的引證是一個很好的讚美，而他們也確是值得讚美的。在他對於荷蘭人在東印度統治的批評，我以爲他略爲失諸苛刻一些。無論如何，在這本書所有的批評裡，我們不能不稱「亞洲的決策」爲一本極有價值的書。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新共和)

毛澤東同志三大著作

論聯合政府

二〇〇元

新民主主義論

一〇〇元

農村調查

一〇〇元

新華日報圖書課經售



晉察冀行進

周而復

裝備落後的八路軍怎樣戰勝精銳的敵軍？

回到軍區政治部不到一個星期，敵人對晉察冀力量。

的秋季「掃蕩」開始了。敵後較大的掃蕩有這樣一個規律：總是在夏季麥子實時，和秋季莊稼快收割時。這樣，一方面敵人實行掠奪計劃，解決敵區的糧食恐慌，一方面同時也增加了解放區的糧食恐慌。軍事鬥爭不是為了完成政治鬥爭的任務，就是為了完成經濟鬥爭的任務。

往年敵人的「掃蕩」常常是先「掃蕩」一個解放區，然後把「掃蕩」這一個解放區經驗留用到其他解放區去。這次却不同了，敵人向察北華中各個解放區同時進行，而這次動員的兵力又較往常為大，單是對晉察冀北線就動員了四萬餘兵力，二六，六三，和一一〇等三個師團大部主力，獨立混成旅團與六十二師團的半數主力，獨一獨二兩混成旅團的一部，加上偽治安軍六團團的主力和三十三師團的保安隊。此外，還動員了全部的偽奸偽組織，如「剿共委員會」，如偽「合作社」，集體簽訂了掠奪計劃，企圖一鼓而摧毀解放區的經濟和軍事

力量。敵人的「掃蕩」和軍區的反「掃蕩」，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總力戰，是敵我實力的總考驗。在反「掃蕩」開始時，我隨着軍區司令部行動，不久，由於軍區的主力是在第一軍分區，而第一軍分區的主力部隊是三團，我於是到了三團的總部。三團是隨着軍區司令部一同行動的，我有機會經常和軍區保持了聯繫，這樣，我比較容易了解整個反「掃蕩」的過程。

軍區部隊的裝備我是知道的：砲很少，大半是繳獲敵人的，經常用的是迫擊砲；主要的武器是輕步機槍和步槍，而這些又非常不一致的，從國籍來說，有捷克式，有日本三八式，……從國內出品來說，有漢陽造，有太原造，有中正式，有土槍……子彈也是不充裕的。從軍事準備上看八路軍，的確是很落後的。但如果從指揮員的質量上來說，不僅在全國是第一流的，就是對敵寇來說，也是比較

優越的，特別是在政治質量這一方面，更是不可以比較的。

然而戰爭勝敗的決定因素，絕不僅止於此。當我開始跟隨八路軍向這據強頑的敵人進行反「掃蕩」的時候，在我的腦際浮起了一個問題：

裝備落後的八路軍怎樣戰勝精銳的敵軍呢？老實說，開初，我對反「掃蕩」的信心是不高的。經過整整三個月的反「掃蕩」，事實給我一個完滿的答覆。這三個月的反「掃蕩」，大致可以分做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敵人分進合擊，進逼解放區中心地區，然後大量分散兵力，進行所謂有重點的反「清剿」，搜索破壞；軍區部隊則針對敵人的分散「清剿」，實行集中兵力予以打擊，敵人因此不得不集中兵力來對付，這就粉碎了敵人初步的計劃。第二階段，敵人倉皇在搶掠滄河兩岸的產糧區；軍區部隊就變為積極防禦，分散兵力配合民兵，積極打擊敵人，奪回被搶種子；同時發動廣泛羣衆收收，於是敵人的計劃歸於烏有。第三階段是，敵人以主力奔襲合寧軍區部隊機關學校，只有極少數的機關，因為警覺性不夠，而遭到部分損失，其餘進犯的敵人都遭受到八路軍嚴重的回擊，把敵寇打出解放區，勝利地結束了三個月的

反「掃蕩」戰役。
反「掃蕩」的勝利，是軍事鬥爭和各方面鬥爭密切結合的成果。

首先是軍事鬥爭與人民的結合。

敵人的八路軍之所以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主要的是因為這支軍隊是人民的軍隊，它是爲人民的，故人民也不惜一切來擁護軍隊。在解放區的人民，從小孩到老頭都組織起來。反「掃蕩」一開始，人民第一件工作，便是堅壁清野，把所有能搬走的東西，像衣服、糧食、傢俱、日用品，……都搬到村莊外山上山下的窩裡，地洞裡。解放區的人民，即在平時，也早就有了瞻客地洞的準備，有些地方只留下一些必要用的東西在家庭，一有情況，就趕着牲畜，帶着一切東西上山了，留下給敵人的是空無一物的四堵牆壁。這還不算，敵人三光政策（即殺光、搶光、燒光）實行之下，人民又有了經驗，把能拆下的窗戶木門都拆下，另外財土填把窗戶和木門都堵死，這樣，敵人既進不了屋，也不易燒房子了。

敵人所到的地方，處處感覺困難，沒有糧食，沒有糧食，沒有用具，他連找一口鍋做飯也不容易；糧食肉是失去了耳目，地方上沒有軍隊，敵人從那裏了解八路軍的行蹤呢？而八路軍到一地方，那地方民兵哨見，不一會，什麼都有了。我會經有這樣經驗，一次我隨着第五軍分區司令員劉輝將軍在反「掃蕩」中，走過阜平縣董家村，村里開會一人，這一個個一鍋也找不到，糧食更不必說了，連金部帶的糧食也吃完了。我心想，這壁清野對敵人固然好，但是不要使前線敵人也沒有飯吃了。但不到半小時，山上的人聽說八路軍在此

宿營，敵糧到來了，一小時之後，糧食司令員都帶着哨的小米飯了。在各個頂頂敵軍的民兵的哨，那時一向我們報告敵人的行蹤。

此外，在反「掃蕩」中，人民還幫助軍隊送飯、帶路、慰問、拾傷員、送茶、送飯……必要時，就掩護傷員和擔架的個個戰鬥員。這次反「掃蕩」，黃峪村老鄉掩護了一個八路軍的傷員，是發熱病的，敵人從軍部中心地區撤退，路過此處，兩個治安警察把病員帶走去領路，老鄉不肯，被偽軍打得死去活來，結果把病員給走了。他醒過來後，連忙把要藏的自己的大兒子叫回來，追上偽軍，央求敵人，換回了八路軍病員，說他這個兒子地頭熟，好帶路。實際上他兒子在半路上跟敵人不注意時，就逃回來了。人民這種愛護自己的軍隊，請問：敵人有什麼辦法不敗呢？

其次是八路軍主力和民兵的結合。

在晉察冀解放區，民兵的組織是普遍到每一個山溝村莊。男自衛隊，女自衛隊，是每一個村莊都有的羣衆武裝組織，它的核心是基幹自衛隊，而基幹自衛隊的核心是游擊小組。在這一次反「掃蕩」戰役中，單是民兵和敵人進進退退，一九二二戰門，爆炸了四、四八個地窖。這些戰鬥都直接配合了主力作戰，阻礙和粉碎了敵人的作戰計劃。

民兵顧名思義是羣衆性的，敵人一進入解放區，除遇到八路軍的主力打擊外，還到處遇到各地民兵的打擊。如九月十四日行唐縣以北茶園和莊莊兩處的五百多敵人，想合擊劉家莊，馬北村、盧家莊等七個村莊的民兵，在二區民兵大隊部指揮下，他們在連環的二十多里的山嶺上，用土槍、地雷、手榴彈，把敵人的五百多敵人攔截住了，敵軍這樣

掛着的武器，就是這樣讓上進陸軍學校訓練的民兵，和敵人打了一天，這一天，敵人只走了十二里路，合擊的計劃粉碎了。八路軍的主力因此就非常有利的打擊進犯的敵人。

不妨再舉另一個例子。九月二十日，敵人經過平縣二區何家寨時，民兵中隊長何玉林，帶了二十一個民兵，依據有利的地形設伏。黃昏時分，敵人進入了伏擊圈，民兵先以猛烈的手榴彈向敵人，旋即扔出飛雷九個，繼之又扔出大石頭打擊敵人，用了這樣簡單的武器，一共打死了三十八個敵人，打傷九個敵人，還奪得大量勝利品，民兵卻沒有一個傷亡。

民兵在反「掃蕩」中，破壞敵人的交通線，是主要的任務之一。在敵人所到之處，凡是能通汽車的一切公路，那附近的民兵就有組織地分批去破壞，同時地理地使得敵人汽車不通，運輸線斷了，或者能通，但到處都彷彿有地雷，又彷彿沒有地雷，這得有工兵在前面探路，有時要起雷，有時要修路，使得汽車一天行進的速度慢到這樣一個可怕的程度：只走二三十里地，還沒有有人走的快。

敵人的通訊聯絡也不斷受到民兵的破壞，敵人在解放區臨時建立起來的通訊網，到處受到破壞。阜平的一個民兵，把敵人無線電報回來了，要屬的是西莊一個民兵，他割電線割到敵人電話線的窗外，還不甘心，公然伸手進去拿一人的電話機。這樣出其不意的動作，處處都發生。電線割斷了，人要派人出來修，修的人遭到民兵的伏擊，很少能回來的，於是這條修的人也不敢出來了。

最後敵人頭痛的是地雷。爆炸運動在晉察冀最普遍展開了。地雷多到這樣一個程度：即連八路軍，還有當地民兵帶路，也不敢隨便走一步。開初，去路上有地雷，敵人害怕，小路上有，敵人走

山邊；山邊也有，於是走亂地，那兒也有，隨地
 既然都有，敵人異想天開，從河東走（從王快領到
 草平縣境有一條沙河。）；行軍一天，還走不了二
 十里。以後就不行了，河東水西。這村也是供
 麻煩的，村口不敢走，只有走又遠；晚上宿營也
 不敢從正門進去，怕中地雷，從牆打一個洞，像
 打一樣的一個個鑽進去，這倒是很舒服，可是不敢
 睡上去，怕有雷，只好用繩子拴到屋梁上，發一個
 吊床來。

就是這小心。敵人覺得這地是地雷。這是一
 個民兵李勇（現在他已是百戰百勝的爆炸英雄了。
 在反「掃蕩」三個月中，就炸了六十九個地雷
 ，炸傷敵三百六十四名，殺傷敵人汽車三輛，其
 他的就可想而知了。

有的村莊，在村周圍佈滿地雷陣，敵人每次經
 過那兒，始終不敢進去，如所說的三道崗村便是。
 敵人對地雷表現了極大的恐慌。在這種的獨立
 戰線第六次戰役中，長城地帶的日記中，就這
 寫道：「地雷威力真大，當這地雷炸時，多數都
 骨折，大量流血，大半要炸死，地雷使我將兵
 精神上受威脅，使官兵成爲殘廢，尤其對這傷兵
 担架，如果有五個受傷的，那麼就有六十個士兵要
 失掉戰鬥力。」

從這一段日記里，我們可以看出這地帶看到民兵
 和地雷在反「掃蕩」中的作用，和給敵人的威脅。

第三是外線鬥爭和內線鬥爭的結合。

當敵人四萬大軍進入解放區「掃蕩」時，敵區
 便留下一個很大的空隙，這區部隊除了保持一定數
 量的兵力在解放區與敵戰鬥外，便分派在解放
 區邊界的部隊，深入敵後去，對敵人佔據的點線

勇猛反攻，牽制了敵人的主力，使得敵人不能完
 全集中兵力「掃蕩」解放區中心的地區，同時，也
 就是配合了內線的八路軍展開反「掃蕩」戰。在三
 個月當中，外線活動的部隊創造了輝煌的戰果。這
 些外線部隊，曾先後奪取了許多城鎮鄉村的
 據點，如十月六日，一小部隊一舉而下陳家莊關
 以東的陳家莊關，消滅了十五名守敵，十月十一日
 ，又攻入望都關，十月十八日攻入保定北關
 ，西關、與南關；十八日雁北部隊攻入渾源，在靈
 縣的外線部隊，在侯家一戰，擊俘敵偽三十多名，
 擊斃敵重機槍三挺……至於進攻堡壘，炸毀橋樑火
 車，更是經常有的事。

外線部隊除了集中兵力攻取預定目標以外，還
 經常採取零星的動作，也同樣取得了很大的勝利。
 如牛山戰鬥便是一個光輝的戰例：

牛山築集的日子。寒風，馬山，中山三個堡壘
 的堡壘，有二十多個人要到此地搶奪人民的財物
 ，由牛山堡小隊長帶着十幾個人乘上馬，爲班
 長帶十幾個人到村公所去監督老百姓做飯，當然
 是雞肉大米，不在話下。飯將要煮熟之時，敵軍在
 里而與高彩彩，說：「這集上八路軍不敢來，我來
 保護你們。」正在他吹牛皮的時候，八路軍外線
 部隊的一小隊分人已從房頂上埋伏好了，立時房上
 的八路軍接應道：「喂，我們來了，快槍吧！」

從天而降。這堡壘還想抵抗，門外八路軍的衝鋒隊
 已冲進了院子，向屋子裡投擲手榴彈，而在房上
 的八路軍把房頂打開，從上面扔下手榴彈來。當軍
 這時只聽得房上說：「不要打了，我們投降，留我
 們一條命吧！」一會功夫，八路軍帶着十二個俘虜
 ，擊獲了十二支步槍，六百多發子彈。這種神話似
 的奇蹟，在敵區游擊區到處皆是。

第四是軍事鬥爭與政治攻勢的結合。

解放區的政治攻勢不是在反「掃蕩」時才
 配合着一定的政治任務，常常有的，不過在反「掃
 蕩」時更爲加強罷了。在三個月中，對敵區的政
 治攻勢進行了兩次以上的大規模的武裝宣傳，這
 武裝宣傳組織，人數不多，一二十人，二三十人
 等，大半是輕裝，戰鬥力很強，即使這武裝宣傳
 身上也是帶着武器的。有些地區，奔着敵之老巢，
 演員都是化好了裝再去的，到了就演戲，寫信，
 散傳單，開大會，完了就走。動作迅速，而且
 警，甚至跑到堡壘附近和堡壘而去開會，這
 面派軍隊警戒敵人，敵人也無可奈何。又例如
 宣傳小組，經過敵人兩道封鎖線，進入了敵人的
 所謂「治安確保區」，召集十一個村莊的長老
 。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聽說八路軍來了，嚇得
 跑起來，趕到會場，流着淚說：「你們是來救我的
 八路軍，我老頭死了也甘心。」村里人紛紛地
 八路軍講解放區和國內外大事。聽的人聽入了神，
 捨不得讓宣傳小組走。

武裝宣傳組織的隊員，就在附近村莊
 被敵人蒙在鼓裡的羣衆，這見解無敵的宣傳戰
 了。

八路軍的傳單標語，通過武裝宣傳小組，隨
 堡壘上，車站上，鐵路上，甚至於敵人的堡壘
 門口，××縣城裡發現了宣傳品，這宣傳品
 到各處檢查行人，派人在街門口站崗，這
 王景岳，聽到手榴彈響，同時又發現宣傳品，嚇得
 他連夜上城守了一夜，在城裡則一夜巡邏
 次戶口。

在××，宣傳品貼到火車上，火車開了幾小時

地方才發覺，日本憲兵和東亞長把車停開，大事搜查，以為車上有八路了，這就鬧得敵偽非常恐慌，一直傳到偽華北新民會上去，在宣傳會議上敵偽都認為這是一件大事。

政治交鋒普遍展開，敵偽軍和偽組織人員都動搖了，有的逃跑，有的反正，有的自殺，甚至有的把炮樓都燒掉了。在敵偽壓榨下的村莊因此得以解放，人民起來反抗敵偽的勒索和奴役。在這樣政勢之下，大大影響了進入解放區的敵偽軍，使解放區中心地區的八路軍更加有利地粉碎敵人的「掃蕩」計劃。

第五是八路軍本身的戰鬥力量。

縱然是四萬裝備優良的敵人，但是一進入解放區，就遭背受敵，處處遭到困難，行動固然受到交通的阻礙和民兵的伏擊，宿營時也夢醒到地雷和民兵的襲擾，糧食用品都不易找到，逼得敵人每次「掃蕩」不得不帶了一長列的牲口和民伕，來運糧給養和彈藥，這個運輸線像一個爛爛的生長在脆弱精緻的隊伍上，大大妨礙了軍事行動。最糟糕的是：敵人所謂之「掃蕩」，沒有一個軍隊，像一個既強又聰明的人在解放區裏走路，八路軍一行動，敵人是很難了解情況的。這些不利條件，反過來，都是八路軍的有利條件，在羣衆的海洋里，八路軍自然就像生龍活虎一般的了。

敵人是頭強的，但八路軍更頭強，從政治質量上說，就是十個敵人也比不上一個八路軍。每一個八路軍都是有了思想覺悟的戰士，他知道爲什麼而戰，也知道爲誰而戰。敵人的最小的戰鬥單位是小隊，如果把小隊長打死，這一隊就喪失了戰鬥能力。而八路軍的最小的戰鬥單位，是每個戰士

，打到敵一個連，一個排，一個班，直到最後一個人，都能夠進行戰鬥。並且敵人的優勢，只有在一定地域和一定時候才能發生作用，如果敵人分散了兵力，分頭出擾，八路軍集中一定數量的兵力和裝備，來進攻分散了的某一隊敵人，這就使敵之優勢變爲劣勢，而變之我劣勢爲優勢。而事實上，八路軍經常在各種鬥爭的配合下，以極少的兵力，擊潰了敵大敵人的進攻。

總括三個月的反「掃蕩」，主力部隊和敵人進行了大小二、〇九三次戰鬥，在每次戰鬥中表現出八路軍的英勇和指揮藝術，到處伏擊，圍擊，側擊，阻擊，追擊敵人，阻礙了敵人的行動，粉碎他各個「掃蕩」計劃，使敵人每一回行動都付出很大的代價。這兒，我且舉些例子，便可以了解敵人和八路軍的實際戰鬥力如何了。九月底，敵偽四千餘，圍攻阜平東北部的神仙山，八路軍的守備部隊還不到敵人的十分之一，只不過四百人，可足足打了十二天之久，這還不算，又擊傷敵二百多，打落下一架飛機，擄獲了一挺重機槍，最後還把圍攻的敵人打退了。

另外像十月三日，七百多敵大進夜唐縣西北之曹山，八路軍不過二百餘的兵力，奮勇抵抗了敵四天之久，並且擊斃四十多敵人，終于敗退了。再像三百多敵人侵入了曲陽于家寨，八路軍以十四挺輕機槍和三百多隻步槍的猛烈火力了，在且里村南山設伏，當敵人到時，即同時向敵人猛擊，敵人隊形馬上混亂，經過半小時，都無力還擊，幾次衝鋒，全被打退，就在這次戰鬥里，曾經有一班人在一高山上，擊退了十倍以上的敵人的衝鋒。在且里山下，一百多個敵偽倒下來了，八路軍只傷亡了十六人。

軍事鬥爭和各種鬥爭的結合，八路軍成爲一隻攻無不取戰無不勝的勁旅。以上的事實，回答了我的疑問。我理解到：八年來爲什麼八路軍在敵後，不但沒被精銳的敵人消滅，反而一天一天強大起來的原因。(未完)

羣衆

第十卷 第十九期

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羣衆雜誌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新華日報館

本刊價目

本期零售 六十元

六期 三百六十元

十二期 六百五十元

廿四期 一千二百二十元

外埠郵費在內 國外照加

羊群衆

第 十 卷 第 二 十 期

要

怎樣認識今天的時局(社論)

越南的革命

法國人民的選擇

黃懷南

茹純

第三十四年第三季
大後方經濟

許滌新

關於國共會談

從「官發復員財民遭勝利災」說起

黎望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怎樣認識今天的時局 (社論)

江南新四軍開赴敵後

新四軍告別江南同胞

本報

法國人民的選擇

越南的革命

1945
第三大季
後方
經濟

勝利前後
工業遭逢着新的恐慌
在勝利中掙扎的金融
多災多難的農村

◇戰爭與土地改革◇

保加利亞怎樣解決了土地問題

論科學的預見 (下)

文 藝

從「官發復員財民體勝利災」說起
蘇體仁的「德政」及其他
如此省主席
石粉塘的子孫

蘇放軍報告

晉康實行進

讀者之頁

關於國共會談

如何興修水利

(七三二)

(七二四)

(七二五)

茹 純 (七二六)

黃復南 (七三四)

許滌新 (七四二)

方卓芬 (七四七)

劉芳 (七五〇)

念 夏 (七五三)

K. 蒂米特洛夫作
焦 敏 之 譯 (七五七)

華西里也夫作
甄 豐 譯 (七五八)

黎 望 (七五六)

舒危履 (七六一)

精 寔 (七六〇)

路 逢 (七六四)

周而復 (七六二)

編 者 (七六五)

編 者 (七六六)



社論



怎樣認識今天的時局

今天中國時局的特點，就是在一方面，從整個歷史階段來說，從全國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時局變化的必然趨勢來說，「一個新的時期，和平建國的時期已經來臨了」，而在另一方面，「在為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的道路上，不是沒有困難，沒有困難，沒有荆棘的」，「中國吉斯特林們及其他反動份子們的各種危險活動，大大地威脅着中國的和平、民主、團結，中國人民必須嚴密警戒與擊破敵人的陰謀」。在另一方面，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會談，已經取得了許多重要的協議，大大地幫助了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實現；而在另一方面，仍然有許多具體問題沒有能在這次會談中成立協議，而這些問題，尤其是迫在眉睫的解放區問題，却又在在威脅着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基礎；並且直到今天，仍然沒有尋得解決的途徑。因此，為了進入和平建國的時期，為了實現和平、民主、團結、統一，我們還必須沿着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會談所已經確立的方向，繼續奮鬥。

這次會談所已經確立的方向是什麼呢？方向就是：「關於和平建國的基
本方針：一致認為中國抗日戰爭，業已勝利結束，和平建國的新階段，即將開始，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雙方又同意蔣主席所倡導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方面就是：「一致認為政府應保證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應享受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現行法令，當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應承認國民黨共產黨及一切黨派的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應示：各黨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黨憲政常軌，今可即行承認。』」雙方同

意政府應嚴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機關，有拘捕審訊和處罰人民之權。」「中共方面提出：除漢奸以外之政治犯，政府應一律釋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準備自動辦理，中共可將應釋放之人提出名單。」「雙方同意各地應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惟政府希望不以此影響國民大會之召開。」

凡是這些雙方已經簽字同意的各項原則，就是中國人民繼續奮鬥的方向。對於雙方已經簽字同意的條款，我們現在的任務是什麼呢？是要求它們的確切和充分的實現。我們應該要求和平、民主、團結、統一，堅決避免內戰，而反對一切違反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方針，反對今天已經發生的內戰和明天更將擴大的內戰。我們應該要求徹底實行三民主義，徹底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而反對不實行三民主義或不准實行三民主義或取消已經實行的三民主義，反對政治不民主，反對軍隊成為一人一派實行武力統一的工具，反對黨派仍舊得不到平等合法的地位。我們應該要求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要求立即廢止或修正違反此原則的現行法令，而反對這些法令的繼續生效，反對對於人民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的繼續限制和剝奪。我們應該要求嚴禁特務機關的非法行動，要求釋放漢奸以外之一切政治犯，而反對對於特務活動的繼續擴張，和漢奸以外的政治犯仍不釋放。我們應該要求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而反對不承認、壓迫和消滅已經推行地方自治，已編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的一切地區。凡是這些，既經雙方簽字同意，就都是不容絲毫猶疑敷衍的天經地義。但是任何天經地義都少不得人力，都少不得人民的努力，人民今後的任務，就是用一切努力，把這些天經地義的法律變為天公地道的事實。

對於雙方還沒有獲得同意的問題，應該怎樣處理呢？應該根據什麼原則的原則求其迅速解決。譬如解放區問題，現在已成為直接關係千百萬人民生死存亡的嚴重問題，但是只要忠實於雙方已經共同確定的原則，就應該並沒有什麼大的困難了。在解決解放區的問題上，應遵守那項原則呢？第一，應該遵守和平團結、避免內戰的原則。中國共產黨對於解決解放區問題，在和平團結、避免內戰的原則下，已經提出了四種方案，可惜都沒有被政府所接受，政府在中也沒有提出具體的對案，但是在實際行動上却調集大軍，動員北上，劍拔弩張，如臨大敵；而且在八、九、十三個月中，已經佔領了解放區十個縣市，使更大規模的內戰一觸即發之勢。為了共同執行和平團結、避免內戰的原則，政府就應該立即停止向解放區進兵，就應該立即停止向解放區進攻，就應該立即撤退那些侵入解放區的軍隊，就應該立即召回那些向解放區進攻的軍隊，只有這樣，才能表示政府是忠實遵守自己所簽字宣布的和平團結、避免內戰的基本方針，忠實遵守蔣主席所再三宣布的和平解決政治解決的基本方針。第二，應該遵守政治民主化，徹底實行三民主義，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的原則。解放區是中國今天已經實行政治民主化、已經徹底實行三民主義、已經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的唯一地區，政府果能準備退政於民，而不是奪政於民，那麼，對於解放區實在不但應該承認，而且應該獎勵，應該提倡全國向解放區看齊，決不承認這個問題有什麼困難於解決，更沒有要加以取消，加以推毀，甚至污蔑為「土匪」的任何理由。第三，應該遵守統一的原則。雙方既然都主張和平團結，又都主張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徹底實行三民主義，積極推行地方自治等等，那麼，統一自然可以順利地實現，分裂自然可以確實地避免。只有一個地方實行民主，另一個地方反對民主，一個地方主張軍隊屬於民主的國家，另一個地方主張用軍隊來實行一人一派的武力統一，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才會遇到不統一的困難。現在既無這些分歧而在原則上消除了，中國當然沒有不統一的道理。這樣，在共同遵守這三個共同確定的原則之下，也只需要，只應該在共同遵守這三個共同確定的原則之下，解決政治問題及其他一切問題，都可以毫無遺憾地迎刃而解了。我們現在的任务，就是督促雙方按照雙方已經同意的原則，迅速解決這些未解決的問題，使中國迅速進入和平建設的新時期。

但是在實現這項任務的過程中，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調指出的：「不能否認，困難是有的，不指出這一點來，是不好的」。困難在什麼地方呢？困難就在中國今天還存在着這樣一些人，他們不願意中國的和平民主團結統一，他們害怕和平團結的合作，他們反對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會談中所已經達到的和平協定，並且實行破壞這些協定。他們對於雙方已經簽字同意的條款在種種藉口甚至藉口下拒絕實行或實行中怠工，並且企圖利用雙方還沒有獲得協議的問題，尤其是解放區問題，來發動大規模的內戰，

使這次會談中的一切協議根本化為烏有，使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前途，使中國人民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的前途，根本化為烏有。應該認識這個困難，並且認識這是一個嚴重的困難，因為這一羣人在中國並不是沒有力量的，相反地，他們不但有自己的傳統的力量，而且在今日還得着一切還沒有消滅的中國的吉斯林們，在日本與在中國的一切日本軍國主義者們與其他外國某些反動分子的合作。因此，要克服這個困難，還需要一個艱苦的複雜的奮鬥。

但是，讓我們再記起毛澤東同志的另一段話吧：「中國人民的面前現在有困難，將來還會有許多困難，但是中國人民不怕困難，國共兩黨與各黨各派團結一致不怕困難。不管困難有多大，在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方針下，在擁護蔣主席徹底實現三民主義的方針下，一切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這段話對於認識今天的時局特別重要。這段話表示兩個根本思想：第一，中國人民有足夠的力量克服現在和將來的困難；第二，克服困難的方針以及克服困難的目標不是別的，仍然是和平、民主、團結、統一，仍然是擁護蔣主席徹底實現三民主義。換句話說，中國人民確定了和平建設新時期的必然來臨，因此，無論是在這次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會談的以前、中間和以後，也無論國內一部分反動力量如何企圖破壞這次會談的已經達到或將要達到的結果，中國人民為迎接和平建設新時期的奮鬥方針和奮鬥目標是不變的。中國人民將絕不為任何曲折的彎路所迷惑，任何險惡的風浪所嚇退，而抱定最大的決心為和平、民主、團結、統一奮鬥到底，並且將必然能夠在這一奮鬥中克服困難而取得勝利。

中國今天固然存在着兩種不同的政治路線。一條是堅定地爭取和平、爭取民主、爭取團結、爭取統一，堅定地要求實現國共會談中所已經達成的協議，並根據雙方所已經同意的原則來繼續解決一切懸案，以便迅速在蔣主席領導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的路線；一條是動搖於和平與內戰之間，動搖於蔣主席與獨裁之間，動搖於團結與分裂之間，動搖於和平民主團結的統一與流血的武力統一之間，不願意實現國共會談的協議，企圖用軍事冒險來加以破壞和推翻的路線；前一條是人民的路線，符合於國內國際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路線；後一條是反人民的道路，不符合於國內國際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路線。只有在經過這兩條路線的一番不可避免的鬥爭以後，第一條路線才能得到勝利，和平建設的新時期才能穩定地鞏固地開始。人民的任務就是堅決擁護第一條路線，努力加速它的勝利，也就是努力加速和平、民主、團結、統一之實現。這就是今天中國時局的一個關鍵，認識這個關鍵，就能不被迷惑不被嚇退地認識今天已經發生與今後一個時期內可能發生的現象。

江南新四軍開始撤退

在「國共會談紀要」中，雙方都同意了和平團結，避免內戰的方針，但與這一方針直接有關的軍隊國家化問題，還沒有得到具體的協議。在這個問題上，中共方面曾經提出：「政府應公平合理地整編全國軍隊，確定分期實施計劃，並重劃軍區，確定徵補制度，以謀軍令之統一。在此計劃下，中共將其所領導的抗日軍隊由現有的約二十個師，至少二十個師的數目，並表示可迅速將其所領導而散佈在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內）八個地區的抗日軍隊着手復員，並從上述地區逐步撤退應編的部隊至臨海路以北及蘇北皖北的解放區集中。」大家都知道，直到現在，由政府方面來公平合理地整編全國軍隊，重劃軍區，確定徵補制度這些事都沒有着手。雖然如此，但從今日本報所刊載的新四軍發言人聲明中，可以知道中共方面已經開始執行他所允諾的從八個地區逐步撤退的計劃，首先撤退的是在長江以南的蘇南、皖南、浙江這三個地區。

中國共產黨向來在宣布一個諾言的時候，一定是抱定決心去徹底執行的，為了執行自己的諾言，中國共產黨不惜排除一切困難以求實現。——凡是守信義負責任的政黨本來都應如此。——新四軍的這個聲明又一次證明了這一點。須知新四軍從這些地區內撤退並不是一件平常的事。這些地區是淪陷在敵寇奸惡統治下的時候，當地愛國人民冒着一切艱辛危險武裝了自己，組成軍隊，在軍隊打退了敵奸無數次的進攻，保障了人民能夠自由民主的

生活。這軍隊是孫中山先生所理想的「國民之武力」，他們在八年的抗戰中不知流過多少鮮血，他們對國家民族有萬功而無一罪，他們是本地人民的子弟，他們與本地人民血肉相聯，情如魚水，現在忽然要撤退，軍隊中的官兵和當地人民的悲憤憤懣是可想而知的。既然如此，中共方面為什麼決心做這樣的讓步，新四軍為什麼立即按照決定斷然執行呢？這在這些地區的聲明中已說得很清楚，是為了避免在這些地區內發生紛爭，也就是為了促進全國的和平團結。自從日本投降以後，在江南地區，向來堅持在那裏抗戰的軍隊沒有得到投降的權利，反而由這些地區的後方運來軍隊接受投降，因此就形成了在那些地區內發生困難和紛爭。這樣，爭鬥的責任是顯然而不屬於中共方面，但是中共為了實現全國範圍的和平團結，決心委曲求全地做這個讓步，江南解放區人民及其軍隊立即予以執行，也充分表明了他們顧全大局的高尚自覺。

但是誰都知道，只靠中共片面的讓步還是不能實現和平安定的。新四軍發言人向國民政府和地方當局提出五項要求，簡言之，就是要求保證在軍隊撤退後必須留下的機關和人員的安全，保證解放區內的人民繼續享受民主權利與經濟權利。假如當局不能保證實施這五項要求，那就必然會使得和平安定的建立遇到障礙。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中共方面已經開始實行其在華南華中八個地區逐步撤退的諾言的時候，假如國民黨軍隊阻止這些地區的軍隊的撤退，必致重演皖南事變的故技，包圍消滅之

而後甘心，同時對於蘇北解放區依然繼續進兵，發動大規模的內戰，那麼國共會談中所已達成的協議的和平團結方針，就要受到令人痛心的破壞了。

現在全國人心嚮往寧治，渴求和平，大家都盼望全國交通恢復，前線地區的社會秩序安定，可以使流亡在外的人早日回鄉，使久處流亡的人早日脫離苦境。在這時，只有對於以留武器，繼續得援，凌虐同胞，萬惡不赦的偽軍才不得不得用武力，至於在國內一切問題，都應讓蔣主席和平解決政治解決的諾言。國共談判的初步結果已開啓了繼續和平協商解決問題的道路，任何一方不應該以武力來威脅對方。現在的事實是中共領導的解放區不但不會向國民黨軍隊防區進兵一步，而且還作了重大的撤退，但是相反的，國民黨軍隊對於華南華中尤其華北解放區大舉進兵，得寸進尺，有加無已，致華南華中許多解放區軍隊無法撤退，華北許多解放區軍隊無法生存。即以華北而論，大批國民黨軍隊目前每天在天津浦、臨海、膠濟、平漢、同浦、正太、平綏、北寧各線節節推進，向華北各解放區實行所謂「收復失地」，現已佔了許多縣市。而猶以爲不足，甚至如新華日報所揭露的河北偽軍竟改編為「北上先遣隊」，山東山西的敵軍竟改編為反共志願軍。利用偽軍已足喪心病狂的醜事，今不擇手段而至於利用偽軍，更足喪心病狂，舉世未聞，誠如一位要人所說，簡直「喪心病狂」了。不切實改變這些情形，只有中共一方面讓步，和平團結的局面仍處於重大危險中。我們要求全國人民，全世界的友邦注意這種極危險的形勢。

我們認為：在此時，應該在和平團結、避免戰爭一切糾紛用政治解決的總原則下，立即嚴格停止進兵，允許華南華北解放區軍隊安全撤退，立即制止國民黨內戰大軍的北上，立即制止利用偽軍敵軍的醜事，重劃受降區域，重劃軍區，只有這樣，才能夠使國內政局趨於安定，國內交通迅速恢復，國共商談與政治協商會議得以順利進行與召集，並使軍隊國家化的問題得到合理解決的基礎。

（新華十月二十五日）

新四軍告別江南同胞

自從江南陷入敵手以後，新四軍奉命深入敵後與偽偽作戰。感謝官兵的勇敢和當地人民的支持，我們能够在過去八年中打擊敵偽，建立了蘇南、皖南、浙東和浙西抗日根據地，解放了幾百萬國民，實現了民主政策，並且改善了人民生活，團攻了江南的大城市如南京、上海、杭州和寧波等，雖然這一切都是異常困難的情況之下進行的。

日本投降時，我軍有義務解除東南各省日軍的武裝；並在力量充分的各大城市裏接受敵人的投降。從遼遠的西南大後方運送軍隊來接受敵人的投降，就會不必要的陷全國於困難和紛爭之中。但中共中央爲了迅速實現和平與團結，並且爲了回答全國的要求，我們不在這些大城市如南京、上海、杭州和寧波等地，和國民黨軍隊發生爭執，這就可以使敵人和反動集團沒有藉口進行挑撥內戰。更進一步說，爲了實現共產黨在國共談判中所允諾的讓步，我們註在江南的部隊，包括蘇南、皖南、浙東、浙西等解放區的部隊，即將撤退到江北去。

中共這種光明磊落的舉動——中共的目的是爲國家與人民服務，爲和平團結而鬥爭——一定會爲全國人民所了解。爲了建立和平、民主、團結，我軍現在不能不讓讓步，而幾百萬諸敵父老兄弟姊妹告別。

在告別的前天，我們怎樣能不感到悲痛呢！因爲八年來軍隊和人民相處有如魚之與水！我們決不能忘記過去八年江南人民給予我們的支持、愛護和重託。爲了實現北上的命令，我們只能要求江南的男女老幼同胞，了解我們爲了和平、團結所忍受的悲痛。我們希望你們能增加團結，保證你們已經獲得的民主和經濟福利，並且繼續爲全國的和平、民主、團結而鬥爭。此外，我們希望在我軍撤退之後，國民黨政府和地方當局之間，能够真正的做到：（一）保證我軍復原士兵、受傷人員和抗日軍人家屬的安全，並且將他們以適當的補助；（二）保證我軍留下的機關的安全，和不能撤退的受傷人員的安全；（三）保證人民已得對的民主設施和民主權益，保證我軍撤退地區的中和其抗日黨派人士的合法地位；（四）保證在抗戰建國中曾有優越貢獻的軍隊和人民的的安全，希望他們不致受到歧視或惡劣的待遇；（五）保持在執行中的民主設施（如取消苛捐雜稅，減租減息等），並繼續不變更地執行下去。

我們非常盼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在中共的幫助之下，忠實地和真誠地迅速實現國共談判中所允諾的和平建國政策，避免內戰，實現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派合法地位等國民政府所答應的諾言，以便早日建成一個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八日



法國人民的選擇

莊純

——從法國三次選舉看法國政局動向

自從四月末到十月末的半年內，解放後的法國人民經歷了三次重大的政治考驗，也就有了三次選舉——兩次地方選舉，一次普選。這是法國歷史上最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大事件，也是飽經憂患的法國人民重建自由民主政治社會生活道路上的最燦爛的里程碑。在選三次選舉中，法國人民和法國主張民主團結進步的反法西斯政黨，贏得了一次比一次更輝煌更動人的勝利。三次選舉的結果都證明：豐碩的收穫是辛勤耕耘的報酬。誰在這次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中，領導人民進行抗戰最勇敢最堅決，也就越對抗戰運動的努力最大，對法國人民的解放最有貢獻，最能表現愛國主義和自我犧牲的偉大精神，最能代表民族和人民的真正利益，那末，誰就能夠獲得人民的衷心愛戴和擁護，誰就贏得了選舉的最大勝利。事實難道不比一切都雄辯麼？

越困難成就越大

法國的兩次地方選舉，就是省和市的選舉，普選就是國民立憲會議的選舉。按照法國的現行法律，地方選舉和普選，在選舉權上是一樣的。有權參加地方選舉的人，也有權參加普選。一九四四年四月，戴高樂領導下的法國臨時政府重新規定了普選、直接、平等和秘密的投票方式和原則，不管教育程度和財產，也不管宗教信仰和意見，凡是不曾被褫奪過公權而尚未復權的人，凡是沒有神經病的人，只要年滿二十一歲者便有選舉權，年滿二十五歲者便有被選舉權。法國婦女還是歷史上第一次享有選舉權。法國全國選民共二千四百零三萬二千一百六十九人，其中女性就佔了百分之五十三。關於婦女選舉權的規定，很顯然地給了三次選舉以極大的影響。

除了這一投票原則是一個新的規定外，法國的選舉制度基本上還是沿襲

着舊的傳統。這首先就是「非比例代表制」，即是不按照人口多寡一定的比例劃分選舉區。比如各市選舉，是把每市劃為若干選舉區，每區再按人口多少選出兩人以上的市議員。我們知道，法國的市和省在憲法上的地位不同。法國的市 (Commune) 是法國地方自治的單位，也是法國行政機構上最基層的組織。法國全國土地都劃入一定市區，每個法國公民都是屬於一定市區的居民。市區不分城市和鄉村，人口大小相差極大，有幾百人的市，也有幾千人的市，也有幾萬幾十萬乃至幾百萬人的市。市議會依照人口的多少由十位到九十位的議員組成。法國全國共有三萬八千零十四個市。一個選民只有五百人的市，每五十名可選出代表一名（這就是至少十名議員來說的），而一個選民有十萬人的市，則十萬人中才能選出代表一名（這就是至少多九十名議員來說的）。又比如省選舉：法國的省 (Departements) 也是地方自治的單位，它是由若干區 (Arrondissements) 組成，而區則是由若干市組成。全國共計九十個省，每省也是分區選舉，每區選出議員一名，而各區的選民數目同樣是相差極大的，像里昂就有選民三千三百九十九人，而阿洛貝則只有三百九十六名。相差幾乎十倍。據比如此次普選，臨時政府雖然對選舉法作了如下重新規定，即每省至少得選出一名代表，每超過二萬五千到十萬人得選出額外代表一名，並且稱這為「比例代表制」。但實際上這那算得是真正的比例代表制呢？按照這個規定，有的省區，二萬五千人以上五萬人以下可以多選一個代表，那有的省區則非五萬人以上十萬人以下不能多選一個代表。這種「非比例」的選舉辦法，本來是法國資產階級對付法國工人運動的一個傑作，其目的在限制左翼政黨首先是共產黨和社會黨的代表人數，造成他們競選的困難。因為工人階級及其政治上的代表的勢力都是集中在人數稠密的工業中心區域，選出的代表不見得會多，反之，在分散

的黨派，選票極少，選出的代表則不見得會少。這就造成一種情況，對右派政黨非常有利，只要他們能够掌握比較少數的選票，就有可能獲得較多的代表。這種辦法顯然是既不公平也不合理的。所以法國全國抗戰會議，在法國共產黨、社會黨、進步社會黨和人權保障同盟支持之下，曾一再向臨時政府建議，廢除這種「非比例」的選舉辦法，而實行平等基礎上的真正的比例代表制。蘇高樂藉口抗戰會議不是政黨拒絕了抗戰會議的建議，只是要這次選舉前，對選舉辦法略加修改說是「比例代表制」，敷衍搪塞一番就了事。因此，左翼政黨是在聯合投票也感到很大的困難之下進行這三次選舉運動的。

只要不在困難面前退縮，越困難，成就也就越大，難道選舉結果不正這樣說明嗎？

一次比一次更輝煌

市選是在今年四月二十九日舉行的，市選是在九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舉行的，市選是在十月二十一日舉行的。三次選舉的結果，都是整個的向左傾倒，左翼政黨獲得了壓倒一切的勝利，尤以法國共產黨的成就最足驚人，可以說是法國歷史上空前的勝利，空前的成就。

關於市選舉的結果，據法國內政部所公佈的還不完全的統計，在四千居民以上的市議會中佔多數議席的各黨所擁有的市議會的數目如下：

在各市議會中佔多數議席的黨派	市議會的數目
共產黨	二七一
社會黨和共產黨	二三四
社會黨	二五三
獨立社會黨和社會共和黨	九
社會黨進黨	五五
人民共和運動會	二四
獨立進黨	二六
共和聯合黨與共和民主同盟	三一
左派共和黨	二七
左派，但並非一黨或兩黨獨佔優勢的	一六四

溫和派，但沒有一黨或兩黨獨佔優勢的

黨派難以確定，用抗戰團體名稱的

一三七

這係統計還不包括巴黎和塞納省（巴黎市議會就是法蘭西議會）、下萊茵省、上萊茵省、美塞爾省、貝爾格和伏斯熱省等區域的市議會，單是就這係統計也可以看出，照大體所習慣稱為左翼政黨的那些黨派總共佔了六百七十五個市，而其中共產黨和社會黨就佔了四百五十八個市，在左翼各黨中，落後的是社會黨進黨、社會共和黨和獨立社會黨等，他們的黨派總數則共佔黨和社會黨總數了，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那些溫和的黨派，一九三五年選後有四百八十四個市，而現在只有一百一十個市，他們也落後了，他們的黨派也都跑到左翼政黨裡去了。此外，還有那些難以判定誰佔優勢而只有抗戰團體名稱的許多市，都有大量的左翼政黨人員當選，尤其是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當選的很多。共產黨的成就佔了第一，不僅是擁有的市議會的數目最多，而且其在人口最多的市裡佔優勢。像全國最大的巴黎市，人口就佔六百萬，而在巴黎市議會九十九名代表中，共產黨就佔了二十七席，幾乎三分之一，而在塞納省的八十個市議會中，共產黨佔優勢的就佔了六十個市。

市選舉的結果也同樣標誌出了這個傾向。據官方公佈的統計，在一千五百萬參加投票的選民中，共產黨得票三百八十三萬（包括塞納省和巴黎在內），社會黨得票三百七十萬（也包括塞納省和巴黎在內），社會黨進黨得票二百五十四萬。這三個人民陣線的政黨所得選票與總選票之比，佔了三分之二以上，還沒有把三黨所領導的抗戰團體所得的一百萬選票計算在內。各黨在這次選舉中所獲得的議席，若和一九三六年省選舉中的議席相比，見下表：

黨派（由左派到右派）	現在議席	一九三六年議席
共產黨	三二八	七二
社會黨	八一	三八〇
無產者同盟	一七三	二
抗戰會	一七	
社會黨進黨	六〇七	九六二
獨立社會黨	二六	七二
左派獨立黨	二二〇	
人民共和運動會	二二〇	（民主聯盟）六六

獨立黨

左翼共和黨與民主聯盟

二七〇

二七六

共和民主聯盟

一五八

四二六

各獨立派及獨立共和派

二六九

五一九

保守派

一〇八

一一四

其他

四八

七九

從這個統計看來，在選舉上，本來是共產黨超過了社會黨和社會黨超過了，而在所得的議席上，則是社會黨和社會黨超過了共產黨。這正是前面說過的「非比例」選舉制度的畸形結果。社會黨議席所以多過共產黨而佔了第一，是因為它在北部各省佔有極堅固的地位，從那裡的小城市和鄉村裡獲得新的選票，以補償了它在大的中心城市中所喪失的票數，同時得到了急進黨黨費及在較少程度上投向保守各黨的一部份選票。但是，無論怎樣說，增長得最快的仍就首推共產黨，共產黨所得的議席比一九三六年增加了四倍以上，在省議會裡，已從第七位躍到第三位，並且在巴黎及其近郊各地，在全國各大工業中心如盧昂、尼斯、馬賽、土倫、哈佛爾等都佔了極大的優勢。

這次選舉的勝利，左翼政黨仍以壓倒的優勢贏得了勝利。法國這次大選共分四個步驟，一個是選舉國民會議代表，一個是舉行公民投票，表決制憲問題上的兩個問題。法國國民會議代表人數共計五百八十六名，其中法國本土五百二十二名，海外帝國殖民地六十四名。選舉結果是，在五百八十六席中，共產黨獲得一五一席，人民共和運動會（左翼）獲得一四二席，社會黨獲得一三九席，社會黨獲得一四九席，其中右翼各黨獲得四十席，極右派則只有十二席，其他各小黨和無黨派人士四十席。共產黨領袖當選的有：多列士、杜克洛、馬爾梯等人，社會黨領袖當選的有奧里歐（人民陣線財政部長）、台讓東（國會議員代表）、費里浦和安安（現任諮詢會議議長）等人，社會黨領袖當選的有赫里歐，人民共和運動會領袖當選的有阿蘭和蓋依等人，此外還有台爾波斯（人民陣線時任外長）、考勒（前任空軍部長）、路易馬倫（共和聯盟領袖）。現任部長當選的有：司法部長、內政部長狄克歇、郵電部長湯麥斯、農林部長羅曼羅（都屬社會黨）、衛生部長比勞、航空部長狄隆（都屬共產黨）、外長皮杜爾（人民共和黨）、宣傳部長蘇斯戴（抗敵團體）、供應部長畢諾（總工會）、生產部長畢諾（全國解放運動會）、海軍部長夏德諾（民主聯盟）、軍政部長

長狄代爾（無黨派）、教育部長皮登（無黨派）。在這次大選中，有三千一百名婦女當選，其中有十四名是共產黨黨員，女共產黨黨員中有著名科羅索朗之萬（也是共產黨黨員）的女兒索索，在抗戰中被刺殺的共產黨領袖貝利的妻子，還有已死的文豪古列列的女兒瑪麗·克萊。

這次大選最大的特色之一是共產黨，社會黨和人民共和運動會聯盟時，三黨的議席，極為相近，共產黨只比人民共和運動會多九席，比社會黨多十二席，三黨議席相加共計四百三十二席，佔了全部議席的絕對大多數，只是任何兩黨相加，都還不能造成過半數（共產黨和人民共和運動會相加僅及半數）。特色之二是社會黨急進黨及其右派政黨，遭了慘敗，一瀉千里，不可收拾。尤其是人民陣線時代的第一大黨社會黨是遭了重大的失敗。這說明人民的飽經憂患的眼睛是善於區別和選擇誰是他們利益的真正的代表。

經歷着巨大的考驗

的確，人民的選擇，對於任何政權都是一個公正的考驗。讓我們進一步就來分析三次選舉所表現出來的人民的選擇的標準，以及各政黨所受到的實際情形吧。

首先，我們看見，經過這本血和火的鍛鍊，法國西人民中的洗滌和收斂已經大半被沖洗掉了。洛克上校的反動的「十字軍團」和共產黨叛徒阿蘭斯社會黨叛徒戴特的「法國人民黨」等法西斯第五縱隊，都和德國的「蓋世太保」一起在法國的土地被掃除了，賣國賊貝當和賴伐爾被判處死刑（貝當因年老沒有執行），十萬以上的法西斯份子和親法西斯份子都在受着人民的審判，而那些和貝當——賴伐爾狼狽為奸的財閥、政客、官僚、舊系軍官、保皇黨餘孽、農村豪紳和貴族，各式各種投機份子、冒險家、工賊和反共專家因為他們出賣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犯下了滔天的罪惡，受到了人民一致的唾棄。對於這幾次選舉，法國政府早就明令規定了：凡是參加反對賣國政府的官吏和議員，以及用文字活動，金錢或所作的事足以助長敵人的企圖，或是以破壞同盟國及法國人民抗敵行動的人們，以及在維琪政府的各種反動派和指使中得過或企圖得過利益的人們，都沒有參加選舉的權利，這就使反動派活動的範圍大大地縮小了。而那些殘留下來反動勢力也已經氣絕奄奄，在人民的面前不敢公開拋頭露面，而只能採取化裝的辦法。在選舉中，右派各反動政黨就用了寇瓦克皇的名義，結成寇瓦克（共和主義者保衛自由

「進步同盟」，來進行辯論，并在辯論上花費了數百萬大的法郎，而結果呢，不但在地方選舉中不占地位，就是在普選中，也只佔得十二個席位。這正生動說明，「二百家」及其家僕再也不能統治法國了。

其次，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和農民，都急劇的向左傾倒，和工人階級攜起手來，同情和擁護無產階級政黨的主張和政策，在無產階級政黨的周圍團結起來了。這種事實最生動的反映就是社會黨選票的沒落。社會黨選票本來是法國的第一個大黨，政策上代表著法國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原來是左右極端政治局勢的巨大力量，它佔在大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搖擺不定。在一九三六年，它和無產階級政黨結成人民陣線，抵抗了法西斯主義在法國的增長，而後來由於他們的領袖達拉第——雷諾等人的背棄人民陣線，而致分裂法國團結，壓迫法國人民，和出賣法國利益的慕尼黑政策，結果招致了德國的侵略，造成了法國的覆亡，給人民帶來了空前巨大的災難，而因為這樣，他們在人民中的威信就一蹶不振了。本來，如果社會黨能繼續從黨內洗滌那些敗壞亡國的份子，也未始不可能在法國解放後重振旗鼓，依然成爲進步的力量，社會黨選票的迅速失敗，特別是這次普選，僅得十八席，在法國這個傳統大政黨看來，實在是一個太慘的失敗。但毫無疑問，選民之所以拋棄它，完全是因爲它不願意把對國難負責任的敗類從黨的領導機關中清除掉的原故。在社會黨選票最後一屆的大會上，臭名昭彰的卑特第竟獲「榮譽主席」的地位，並且被推選爲候選人。社會黨選票的這種運動是由達拉第一貫的資產階級反人民階級調給弄得烏煙瘴氣，連持基本人選不敵公開的向軍隊演說演說，當他在被集中監禁的時候，就對軍隊來沒給他的臭名昭著和嘲諷。有一次，他在房裡裡面向軍隊演說的時候，也被軍隊逮捕了。

第三、社會黨保持了它的應有的地位。社會黨雖是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但在政治上却是資產階級的附庸。在戰前，社會黨扮演着一個不潔充的角色，而且有着醜惡的紀錄，這就是自一九二一年和共產黨分裂以後，就以分裂主義者的角色，在工人運動中散播資產階級的影響，分裂工人階級的團結。人民陣線的失敗，也是社會黨實行分裂政策的結果。法國淪陷後，社會黨最反動的份子，都投身去，投奔維希政府，在維希政府機關擔任高官大吏，而且附身負有「合作主義」的罪名，爲敵人服務。但是，社會黨約許大的下層黨員，卻在法國淪陷期間，和其黨派進行鬥爭，展開了反法西斯的地下運動，英勇地保衛了法國人民的利益，並在鬥爭中出現了新

的領導幹部。新的人物，他們和舊日的領袖們不同，就是充滿着工人階級的戰鬥品質和團結精神。這樣，由於社會黨廣大下層黨員自覺性的提高，新的幹部和新人物的出現，由於他們和共產黨員並肩作戰，共同流血，就在黨內生長起來了新生的力量，挽回了舊日領袖們所失去的光榮。但是，社會黨的舊日領袖，首先是萊翁勃倫，他們在政治上作爲資產階級之附庸和分裂主義者的影響，顯然還繼續存在着。經過他們，就使社會黨和左派各黨保持着某種距離而和右派政黨保持着某種聯繫。比方，在表決問題上，社會黨的支持「歐高樂」，就是爲了要取得各個極端右派政黨中「穩健」份子的選票。而右派政黨則因爲在目前環境之下，難以公開拋頭露面，因此就一心企圖托庇於社會黨，把自己寄希望於社會黨的舊日領袖上面。萊翁勃倫就坦白地承認了他和右派的關係。他說他的政黨現在擁有「太多的朋友」，「這些人就是在一九三六年曾經幫助我們是國賊，而現在看見我們原來是資本主義的救星的那些人」。所以，毫不奇怪，歐高樂所主張的「西歐軍團」，社會黨也拿來當做自己的口號，大肆宣傳了，他們還說着組織「西歐社會主義聯邦」，以與蘇聯和美國對抗的夢囈呢。社會黨舊日領袖們這種反動的政治態度，最和社會黨的廣大下層黨員的政治自覺性完全背道而馳的，這就在社會黨內部造成了嚴重的摩擦，這種摩擦，甚至於引起了像里昂馬賽等地方黨慶大的黨組織中的分裂。社會黨之所以選能在選舉中保持黨內頗爲鞏固的地位，不僅是因爲黨內增長了新的朝氣勃勃的力量，而且因爲在選前力量上的壓力下，違反着他們舊日領袖們的意志，而和共產黨結成了選舉聯盟，實行了團結合作的戰線。

第四、天主教的左翼，以天主教社會主義者爲號召的現外長皮杜爾領導之下的「人民共和運動會」，表面上是以左派政黨而實際上是以「新右派」政黨的姿態，出現在法國的政治舞台上，在這次大選中嶄露頭角，超越了社會黨，而成爲法國的第二大黨，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人民共和運動會」是由皮杜爾的人民共和黨、大眾民主黨和民主聯盟組織的一個共同陣線。就一般性質來講，人民共和運動會是一個反法西斯的進步政黨，因爲他們是在抗戰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他們的領導者大都在法國淪陷期間挺身參加了抗戰運動，如皮杜爾自己就會一度任全國抗戰會議主席，他們的黨員也都積極進行了對德寇的武裝鬥爭。在政治上，他們代表著開明的資產階級階級利益。在抗戰期間，法國的大資產階級都變成了「合作主義者」，與希特勒的「合作」，實際上就是投降希特勒，爲希特勒的戰爭機務服務，幫助希特勒

的領導幹部。新的人物，他們和舊日的領袖們不同，就是充滿着工人階級的戰鬥品質和團結精神。這樣，由於社會黨廣大下層黨員自覺性的提高，新的幹部和新人物的出現，由於他們和共產黨員並肩作戰，共同流血，就在黨內生長起來了新生的力量，挽回了舊日領袖們所失去的光榮。但是，社會黨的舊日領袖，首先是萊翁勃倫，他們在政治上作爲資產階級之附庸和分裂主義者的影響，顯然還繼續存在着。經過他們，就使社會黨和左派各黨保持着某種距離而和右派政黨保持着某種聯繫。比方，在表決問題上，社會黨的支持「歐高樂」，就是爲了要取得各個極端右派政黨中「穩健」份子的選票。而右派政黨則因爲在目前環境之下，難以公開拋頭露面，因此就一心企圖托庇於社會黨，把自己寄希望於社會黨的舊日領袖上面。萊翁勃倫就坦白地承認了他和右派的關係。他說他的政黨現在擁有「太多的朋友」，「這些人就是在一九三六年曾經幫助我們是國賊，而現在看見我們原來是資本主義的救星的那些人」。所以，毫不奇怪，歐高樂所主張的「西歐軍團」，社會黨也拿來當做自己的口號，大肆宣傳了，他們還說着組織「西歐社會主義聯邦」，以與蘇聯和美國對抗的夢囈呢。社會黨舊日領袖們這種反動的政治態度，最和社會黨的廣大下層黨員的政治自覺性完全背道而馳的，這就在社會黨內部造成了嚴重的摩擦，這種摩擦，甚至於引起了像里昂馬賽等地方黨慶大的黨組織中的分裂。社會黨之所以選能在選舉中保持黨內頗爲鞏固的地位，不僅是因爲黨內增長了新的朝氣勃勃的力量，而且因爲在選前力量上的壓力下，違反着他們舊日領袖們的意志，而和共產黨結成了選舉聯盟，實行了團結合作的戰線。

來領國內的人民抗戰運動。

可是，法國的中小資產階級，還有小部份與英美有聯系的大資產階級，則不堪忍受德國對法國所進行的有針對性的無情的掠奪；在這種有針對性的掠奪之下，他們面臨着破產的危險。因此，他們也就和廣大的勞動人民一起，湧進了抗戰運動，並對抗戰運動作了忠誠的服務和貢獻。他們在抗戰期間，和共產黨及社會黨組織了聯合戰線，共同領導了全國抗戰會議。這就是人民共和運動會能够在法國解放後在政治上和組織上迅速發展起來，並在幾次選舉中嶄露頭角的基本原因；但是，我們不能不指出：正是因為人民共和運動的政治影響有逐漸增高的趨勢，因此，法國資產階級就視人民共和運動為新的寵兒，企圖把它當做新的招牌和旗幟來重整資本家集團的陣容，並企圖把它變為自己維持舊日統治的工具。人民共和運動在憲法問題上同社會黨一樣支持戴高樂，在對外關係上也和社會黨一樣，高唱「西歐集團」或「西歐聯盟」，就是一個顯明的徵象。因此，戴高樂對抗戰運動的貢獻來說，人民共和運動基本上是一個傾向進步的黨派，而就目前它所處的地位來說，人民共和運動已經成了「新右派」的面具了。但是，我們也同樣相信，由於人民共和運動是在抗戰運動中成長起來，因此，人民共和運動份子，特別是以皮杜爾為首的領導集團，是深知團結合作的好處，他們是會珍重這段光榮的歷史，就是說珍重和共產黨人及社會黨人的民主合作。假如不是這樣，那麼，在法國國內階級力量關係發生了大變化的今天，極右派的前途也就會是「新右派」的前途，這是可以斷言的。問題的關鍵只在於他們願不願與舊日統治階級中的右派，那些最黑暗反動的部份實行堅決的分裂。

第五、也是最後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法國共產黨已經成了法國內部政治發展形勢中的決定性的因素。在這次選舉中，都標誌出了法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的急劇增長，它以領先的地位贏得了三次選舉的輝煌勝利。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共產黨在國會中得到這樣多的議席，而且佔居首位，這還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法國共產黨博得法國人民的熱烈擁護和信任，並不是偶然的，這是法國共產黨在抗戰運動中振臂前進為民先鋒的光輝成就和幹部黨員的重大犧牲所應得的報酬。戰爭是最真實的考驗。在反抗法西斯奴役的戰爭中，共產黨以他們的實際行動證明了他們的愛國謀國的赤忱。共產黨人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是法國人民廣大階層愛國運動的先鋒，而共產黨的最後目的，是那些反共專家——貝當、魏代爾和他們的同僚以及他們的後裔所不能理解的。法國的持械財閥們則是十足的賣國賊。無論按歷史的標準也好，按照它

的實際鬥爭也好，事實都說明，法國共產黨不僅代表法國工人階級，而且代表法國廣大的人民。法國共產黨執行的政策，不僅符合法國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符合法國人民的利益。和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人一樣，法國共產黨也是服務於人民，服務於愛國運動，為法國人民的民主自由而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經過三次戰爭烽火鍛鍊，法國共產黨就在政治上和組織上更趨成熟了。已經成長為法國目前政治生活中第一個大黨了。法國共產黨已擁有一百萬黨員和二十五萬青年團員，這是比法國其他所有政黨人數的總和還多的一倍數目。法共機關報「人道報」現在也是法國的第一家大報，每天銷行五十萬份，而由法共黨員、著名的詩人阿拉貢主持的「巴黎今晚報」，則是第二家大報，銷行三十五萬份。法國人民像潮水一樣湧進共產黨的行列。

許多著名的文化科學界人士，如世界聞名的科學家朗之萬和裘里·居里（居里夫人之婿）和現代大畫家皮加索等人都先後參加了共產黨。他們都說，這是他們的生活理想和文化科學活動的邏輯結果。他們的參加共產黨，曾在世界引為美談。足見法國共產黨政治影響之深且鉅。法國共產黨保護了人民的利益，而人民就愛戴它，擁護它，把共產黨人當做他們的真正的代表，選到市議會會議以至國民會議里去，這難道不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麼？有人驚嘆於這是人民「一時的衝動」，或驚嘆於這是「事出偶然」，這不是太荒謬太無知嗎？豈有「衝動」和「偶然」會成為人民的一個高深遠的政治運動麼？法國共產黨人的選舉勝利，從事實上證明了一切對共產黨懷有傳統偏見並視共產黨為該國的人，他們的思緒情緒原來和人民的思緒情緒完全是兩碼子的啊！

第六、我們特別提出的就是：作為法國選舉最重要發展標誌的進步黨派和團體間的團結合作，是廣大階層愛國進步人士間的團結合作，而且首先是法國工人階級的團結和互助。在抗戰運動中，各階層愛國團體和廣大階層愛國人士，並肩作戰，共同流血，在反抗法西斯主義的激戰中團結了起來，組成了全國性的統一戰線——全國抗戰會議。法國解放後，這種統一戰線又繼續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發展了下來，以保證勝利的果實完全屬於人民而不致被反動派所掠奪，也就是說保證人民的民主真正的實現，把法國建設成爲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法國共產黨在全國一切民主愛國人士的團結運動中，首先是在工人階級的團結運動中起着積極的領導的作用。在法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之下，全國抗戰會議對選舉準備進行巨大的準備工作，力求各階層愛國團體在選舉中更進一步團結起來，共同召開選舉大會，對

共同綱領，提出共同的候選人，以便使民主進步人士，人民的真正代表均能獲選。同時，法國共產黨還特別提出了「一個工人政黨」的口號，要求共產黨和社會黨合併，社會黨大會雖然拒絕了共產黨這一建議，但却不能不放棄傳統的分黨政策，而接受共產黨的成立選舉聯盟的建議，直到普選為止，兩黨共同實施一九三六年人民陣線時代所採取的合作步驟，並由一九四四年兩黨共同組織的聯合委員會草擬競選計劃。這個計劃就是在某一政黨力量太強的選區，兩黨共同提出一個候選人，合力抗爭。而在敵黨力量不強的選區，則各提各的候選人，如在第一次投票時，各黨候選人均未獲得超過半數的選票或登記選民四分之一的選票而未獲選出時，在第二次投票時，兩黨就以第一次投票得票最多的一人為共同的候選人，其他候選人撤消，共同就召選民集中選票在這一個入身上。所以各進步黨派團結合作的規模比一九三六年來得更大更廣泛，而進步政黨的選舉勝利也就比人民陣線時代來得更充實更動人了。

最後，這是必然的結果，由於左翼民主進步政黨的獲得選舉運動的空前勝利，自然就使大批的民主愛國人士，首先是工人、農民和民主知識份子，湧進了市議會省議會和國民會議的議事廳。工人、農民和民主知識份子的代表在各級議會中佔了最大數量，這就使法國的政權建設換一個嶄新的面目。換句話說，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的聯盟，這就保證了在法國進行真正民主的改革。讓我們看看這次普選所產生的國民會議代表的社會成份吧。

據法國今時報所載國民會議議員社會成份如下：

教授和教員	八六
律師	六一
職員	五九
工人	五一
工商企業家	四七
記者	四三
農民	三六
醫師和藥師	三二
官吏	三七
傳教士	二二
藝術家	二二
畫家	二二

這個數字還不够明白告訴我們，這次由普選產生的國民會議就其政治性質來說，就是工人、農民和民主知識份子的聯盟。國民會議必定能帶給法國人民以一個新的人民的憲法，這個憲法必能保證法國人民的所有的一切基本自由權利，保證新的強大的法蘭西一定能够在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建立起來。

從這一路來的分析中，我們便看見，為甚麼右翼的保守的政黨，甚至習慣稱為左翼的社會急進黨，在選舉運動中竟會遭到這樣空前的慘敗，而左翼的進步的政黨，特別是共產黨，却能够獲得這樣驚人的勝利，這完完全全是人民的真正選擇的結果。人民的選擇是有它高度的原則性的：誰是真正為人民服務，為保衛民族獨立而作了不懈的鬥爭？誰是在抗戰運動中盡過自己至善的努力，提供過自己最大的貢獻？誰是新的民主法蘭西的保衛者？明天的美麗的理想寄託者？誰是全國人民團結的核心和旗幟？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決不含糊的！

困難的道路還在前面

戰爭教育了法國人民，法國人民的覺悟性是空前的提高了。法國人民要求新的憲法，要求建設新的民主的法蘭西。

如前所述，在實行普選時，選投票表決兩個憲法上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你願意今天所選出的國民會議是個制憲會議嗎？」如果大多數選票回答「是」，那末，選舉出來的國民會議就是制憲會議，其任務就是制定新憲法。如果大多數選票回答「否」，那麼，所選出的國民會議代表就是下議院議員，一八七五年的舊憲法繼續有效，在兩個月之後再根據新憲法選舉參議院議員。第二個問題：「你贊成選舉背後所定的在新憲法生效以前時期的政府組織嗎？」如果大多數選票回答「是」，那麼新憲法生效以前的政府組織就是：①國民會議以過半數的票數選舉共和國的臨時政府主席；②主席得組織他的政府，政府本身和政綱得由國民會議信任投票和表決；③政府向國民會議負責，但政府交議的案件或法令如經國民會議否決，不得引起政府的辭職，政府必須在國民會議通過對政府的憲法建議之後才得辭職；④國民會議和政府具有同等的立法權，國民會議可以表決預算，但關於國家經費則沒有提案權；⑤新憲法必須在七個月內制定，否則政府得重新選舉和召集新的制憲會議；⑥憲法制定之後，在一個月內再交國民投票復決，如果被否決了，則由

國民會議組織議院，再根據一八七五年的憲法選舉參議院。這些規定實質上就是把國民會議的權力限制在只是制憲上面，而由國民會議選舉出來的過渡時期的臨時政府主席，則可以組成不受國民會議監督的政府，政府各部長只向主席負責，而不向國民會議負責。如果大多數選票對這個問題答「否」，那末，國民會議就是一個最高權力機關，可以任意決定政府的組織形式。這兩個問題及其解決方式就是憲法的實質問題。法國人民被限制了只能在這樣兩條道路中選擇其中的一條：一條是由普選產生的但被限制了權力的不能控制和監督政府的國民立憲會議；一條就是根據一八七五年而產生的舊的保守的二院制。

上述國民會議的方式是根據高樂的主張而由臨時政府決定的。七月九日，法國臨時政府通過了一個「立憲會議和臨時政府組織草案」的決議，在這個決議中就規定了如上所述的解決方式。在政府採取這個決定之前，並沒有經過人民的廣泛的討論，只是各政黨間對新憲法問題發生了爭論。左翼各黨派團體，包括共產黨、社會黨、人民共和運動會、總工會和抗敵團體主張由普選產生國民會議，制訂新的憲法；而右派各黨派和溫和派的社會黨則主張由參眾兩院議員組織立憲會議，來修訂憲法。反對派本修改和重訂一八七五年憲法的人也有，那就是極右派、如天主教派的右派報紙「黎明」報聲稱修改憲法是一件嚴重而危險的事情，只要稍為剷掉那些不適合的細節就夠了。但他們的聲音是非常微弱的。政府的法案公佈後，由於沒有廣泛徵求人民的意見，因此，曾在憲法的實質問題上和組織形式上都提出了紛紛的責難。就政黨來說，除了由戰前的幾個小黨所組織的「民主聯盟」、「共和聯合黨」贊同政府這個法案外，其餘各黨——共產黨、社會黨、社會黨、人民共和黨、所有抗敵運動各團體以及許多溫和的中間黨派，都一致指責這個法案。到底這個法案有甚麼缺點呢？第一、照法案和規定，國民會議的權力和期限都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的，這些限制在實際上就是把國民會議設成了一個只是擬定新憲法的學院式的機關；第二、國民會議既然是由人民選出來的代表組成的，就應該是能代表人民的機關，可是國民會議所擬訂的新憲法却還要再交人民表決，這也充分表現了國民會議的有職無權；第三、代表法定資格是模糊的，到底人民選舉的代表是參議院的議員呢？還是任期只有七個月的立憲會議的代表，人民弄不清楚，因為根據法案上的規定，若是憲法被複決否決了，就由立憲會議的代表組成參議院。

國民和運動會是兩個問題都贊成的。就是說，完全支持高樂的主張。共產黨和總工會則贊成第一個問題，即國民會議有制憲權，而反對第二個問題，即主張國民會議應具有最高權力而反對強權的臨時政府。對里歐領導的社會黨則贊成兩個問題都不贊成，這也就是說，主張國民會議沒有制憲權，選出的議員應該是參議院議員，一八七五年的憲法必須恢復。其他右派政黨生硬不一，有的附和社會黨和人民共和運動會的意見，有的則和共產黨恰相反，反對第一個問題，而贊成第二個問題；就說除了主張恢復舊憲法，還主張成立不受議會節制的強權的政府。

從這些關於憲法問題的爭論中，我們看見的不是別的，而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路線是：堅持實現人民的真正的民主，建設新的民主的法蘭西；一個路線是：堅持繼續恢復舊的統治，復活少數人可得而私的法蘭西。國民會議的結果，證明了法國人民選擇的是第一條路線，而不是第二條路線。據投票結果統計，贊成第一個問題的佔百分之九十六點三，不贊成的佔百分之三點七。贊成第二個問題的佔百分之六十六點八，不贊成的佔百分之三十三點二。這就是說，法國人民贊成廢棄舊憲法，制訂新憲法，制訂新憲法為七個月，七個月後，再交人民複決；制訂新憲法時期由國民會議以絕對多數選舉臨時政府主席，由主席組織強力政府，就是說，使政府不因任何議案遭國民會議否決而倒台，國民會議不能監督和節制政府。

我們如果把國民會議的選舉和憲法問題上的國民總表決的結果，聯繫起來觀察，便可對法國今後的政局得出如下的幾個推測和判斷：
 第一、選舉中獲得偉大勝利的三大政黨，都是參加全國抗戰會議的政黨。三個政黨鼎足而時，任何一黨既不是在國民會議中佔大多數，任何兩黨也不能在國民會議中佔絕對大多數。顯然，成立一黨的政府，像英國工黨政府是絕對不可能的，而且任何兩黨合組政府，而排斥其他一黨，雖有可能，但事實上是有很大困難的。比方，那兩黨合組政府呢？共產黨和人民共和運動會合組，當然不會，主要的要看社會黨的態度。共社兩黨合作嗎？兩黨共同政綱也許會更進步一些，但是，社會黨的「西歐集團」的外交政策，共產黨是不贊成的；共產黨的「單一的工人政黨」的主張，社會黨也拒絕了的。那麼，社會黨和人民共和運動會合組嗎？這倒可能性比較大的，特別是為了實現舊統治階級的陰謀達到排斥共產黨的目的。但是，社會黨和人民共和運動會都知道，這是辦不到的，特別是社會黨，它在阿爾薩斯和宗教問題上是和人民共和運動會不一致的，同時，天主教左翼的溫和政策是不能滿足

廣大的勞動人民和在戰爭中趨於破產的小資產階級的願望的，社會黨如果與人民共和運動會合作來排斥共產黨，那就可以贏得右派份子的支持，但一定會失去自己在勞動羣衆中的威信和地位，而其結果一定會使它在七個月後的大選中它失敗的危險。而人民共和運動會，除非把自己完全變為舊統治階級的工具，不會輕易放棄與共產黨的友誼，因爲，如所周知，皮杜爾的政黨——人民共和黨完全是在共產黨的幫助之下生長起來的。申言之，最大的可能是三黨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社會黨領袖萊翁勃倫不就發表過聲明，不願與任何一黨組織排斥另一黨的政府嗎？

第二，假如上面的判斷是正確的，那末，由三黨共同組織的新的民主聯合政府，其施政綱領和政策，必定基本上（不是完全）社會黨和人民共和運動會在政策上的共同傾向可能佔優勢）是以全國抗戰會議的政治綱領爲基礎，這樣，不僅在國民會議中可以得到完全的擁護和信任，而且可以獲得全國抗戰會議和各省解放委員會以及其他抗戰團體的一致支持。也就是說，獲得全國人民一致的支持。全國抗戰會議的政治綱領，一般地是進步的，比如內政政策上主張實行普選，制定新憲法，保證人民各項民主自由權利，廢除軍閥，沒收軍閥和地主的財產，取消一切反動法令和法西斯組織，從政府機關和軍隊中肅清一切法西斯份子和維希份子；在經濟政策上主張大銀行大企業收歸國有，取消和控製托辣斯，取消黑市；制止投機，沒收非法利潤，工人參加生產和監督等；在社會政策上主張：提高工資，改善職工待遇，實行社會保險，保障工農生活。準的提議，實施有利的物價政策，提高民間購買力等。在對外政策上主張：加強聯合國的團結合作，保證歐洲和世界的長期合作。全國抗戰會議曾提議高舉領導下的臨時政府，接受抗戰會議的綱領作爲政府的施政綱領，誠高舉沒有接受。新的民主聯合政府，如果根據抗戰會議的綱領施政，一定能帶給法國人民帶來更大的民主的利益。

第三，民主聯合政府成立後，法國共產黨在全國政治社會生活中的地位

（上接七五七頁）

保加利亞農民在光復前集體合作的農業。其至，在法西斯統治之下，他們也組織了生產的合作，但統治者反對派用一切方式阻止農民組織其理想。然而就在德國佔領期間，國內已建立了二十個農業合作單位。現在已有三百多個。愛國陣線新政府發給農民合作社以國家貸款，供應複雜的農業機器，給予多方面的援助。他的組織分給無地農民及土地少的農民以土地，實在是在幫助中農來開墾作進動發展的决定條件。在國家給予貸款及技術援助的

條件之下，農業合作社的成立，引起了鄉村中物質生活的改進與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如所周知，就在一九四三年，當法西斯的統治完全障礙了農業合作的發展之際，他們每公頃所產之谷，也比農民個人的經營要多些——計小麥七百九十二公斤，玉蜀黍一千一百五十公斤，馬鈴薯六萬四千公斤等。在合作農場中，耕耘土地所費的勞動力少了二倍至三倍，所以不祇使大家節省了勞力，而且把勞動力解放出來去擴充經濟。

的實力及獨立，並保證人民物質生活的幸福而實現了它的經濟計劃。政府祇是現在才感覺它的經濟政策對勞動大眾結果最爲索賄的。過去與德國佔領者有密切關係的大投機份子，採用一切方法去推展農業保加利亞的經濟政治獨立而進行的鬥爭。但大多數的保加利亞人民相信已經實行了的經濟計劃，今天已對農村經濟打開一個可能在最近將來獲得好戰及德國佔領軍所帶來的傷害，從而獲得了它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和作用，一定會更加增高起來。法國共產黨一年多以來，在臨時政府祇有兩個代表——航空部長狄昂和衛生部長比勞，在諮詢會議中也只有三十三名代表，這比一九三九年以前共產黨在國會中的議席還少，那時共產黨員七十二名國會議員。這種情形，顯然與法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適應的，早在市選舉以後，法國共產黨就提出要求臨時政府改組。市選舉所反映出來的人民的意志，被大改組，增加進步政黨的代數。這則提議被高舉拒絕了。現在，三次選舉結果證明，法國共產黨不但在全國第一個大黨，而且應該是政府黨中的領導政黨。任何排斥共產黨的企圖都不合時宜了。不獨共產黨，就是意味不要人民。作爲全國第一大黨和政府中的領導政黨，法國共產黨的政治威信必將更加增長增高；他在法國的民主改革中的作用必將更加充分發揮，這也是毫無疑義的了。

第四、公民投票結果，實現了高舉的主張，由於這主張也到了社會黨和人民共和運動會的支持，高舉以說可以繼續維持他的領導地位，而且由於高舉時期的臨時政府是一個強有力政府，不受國民會議制約的政府，高舉的權力一定比會相當的強大，而我們知道高舉的背後站着的不僅是法國整個舊日的資產階級，而且是英美的資產階級。就是說，這則提議力必定想盡方法，努力掙扎利用高舉的補位，拚命拖住法國人民的前進的步伐，拚命保持著統治階級的傳統地位和影響。不僅新的憲法的制定，是一場激烈的鬥爭，而且新憲法制訂以後，還要交出人民權決，如果人民否決了，就要恢復一八七五年的舊憲法。這又是一場激烈的鬥爭。七個月後的新的大選，鹿死誰手，誰能贏得選舉的勝利，更是一場激烈的鬥爭。

總之，一句話，前途是光明的，但困難還多得很，還需要進行艱苦的鬥爭。三次選舉，證明了法國人民覺悟和團結程度的空前高漲，在這種情形之下只要進行不斷的鬥爭，任何困難都能克服的。回顧過去，法國人民不是已經走了長遠的一段艱難的道路嗎？

越南的革命

黃懷南

一 越南民族的偉大傳統

一個研究越南歷史的法國專家說過：越南民族是非常愛好自由的，它的長期歷史充滿着反對外來侵略者的勇敢和堅持的鬥爭。

這句話是被越南民族幾千年的歷史所證明的。在過去，越南民族首先是向壓迫它，企圖同化它的中國封建勢力作長期鬥爭的。

自法國佔領越南到現在，在八十年中間，越南人民向法國帝國主義者進行了不斷的，不屈服的英勇的鬥爭。

下面我們將越南民族這一段歷史給讀者介紹一下。

二 法國佔領越南的過程

法國對越南內政的初步干涉。

在法國開始干涉越南內政的時候，即十八世紀末，越南是一個封建制度開始破壞的國度，雖然如此，法國佔領越南依然是一個長期的，艱苦的過程，而不是那像法帝國主義的所謂「歷史家」所說那樣的容易和便宜。

十五世紀初從中國明朝的統治之下解放了越南，並由此而上台的黎朝，十八世紀末，只在名義上統治越南，而在實際上政權已經完全集中於兩個封建集團手裏（即族在越南北部，阮族在越南南部）在二百多年中間，爲了爭奪霸權，這兩個集團進行了殘酷的鬥爭。統治集團中這種內鬥帶來了給農民無限的痛苦和災難，因此，十八世紀末，和法國大革命差不多同一個時期，在越南南部發生了農民起義，它不久以後就變成一個偉大的，有全國性的反對封建的農民戰爭。歷史家叫它西山起義。因爲它的出發地是西山村，在越南南部，西山起義是從一七七〇年開始到一八〇二年才結束，越南農民

衆，在由貴族出身的三個兄弟：阮文岳，阮文惠和阮文呂的領導之下，推翻了所有舊的統治集團，並勝利地保持國土和民族獨立，粉碎了清朝皇帝（越南北部）、法國和暹羅（在越南南部）的武裝干涉的企圖，第一次就使越南人民的革命力量粉碎了。

西山起義，勢力雖大，但是當時的越南社會缺乏了能使這個農民運動向前發展的必需的歷史條件，就是說沒有工業的發展，因此就沒有了一個城市的階層，它能夠正確地領導運動，提出一個改革社會的具體綱領，因此使西山革命內部發生分裂，西山統治腐化，以致西山運動最後滅亡成爲不可避免。這種情況給了舊封建集團的殘餘勢力一個很好的機會來恢復他們的反動政權，而外國侵略者乘機藉口「援助」所謂「合法政府」以便使越南變爲他們的殖民地。

就在那時候，在越南南部活動的法國教士們，更積極地和密地與會經辦西山起義所推翻了和在暹羅流亡的阮族的代表——阮嘆——發生關係，這些教士們促使阮嘆向法國要求援助，他們和法國當時的商界特別是東印度公司，保持很密切的關係，經過幾次談判，阮嘆才派其四歲的小孩子到法國與法皇路易十六簽訂友好和互助同盟條約，實際上該條約沒有被執行，因爲法國處在大革命前夕，法國的專制的死亡已經到來了，而路易十六和他的官吏只忙於自救，無暇及此。後來阮嘆所獲得的援助是由東印度公司給他的，而不是法國政府的。

這種援助，在西山起義已經被瓦解了的時候，使阮嘆比較容易的戰勝了西山軍隊，把整個越南收到他的手中，得到帝位，阮朝就開始統治越南，而阮嘆就自封爲嘉隆皇帝。

三 從嘉隆執政到法國公開侵略越南

阮嘆得到帝位後，到他死爲止，在法國和越南中間的關係，沒有發生什

變多大的變化，這是很簡單的。因為那時候，剛開推翻了封建制度的新興的法國資產階級忙於派他的代理人——拿破崙——征服封神的歐洲，而那時法國的工業發展還沒有感覺到佔領非洲和亞洲市場的必要；越南雖然死了，法國的拿破崙成推翻了，法國和越南中間的關係一步一步惡化了。在這一方面，在越南活動的法國軍士們起了挑撥的作用，他們不僅傳教而還利用一切的機會來干涉越南的政權和指揮反對阮朝政權的殘餘力量，這些挑撥行為引起越南政府對教士們和教徒們採取嚴格限制的政策，而這就給法國一個藉口對越南採取武裝干涉，除此以外，法國對越南政府還採取其他種種手段，比方說從法國運到安南的貨物大部份是不適合於安南人的需要，但是越南政府也應該收買這些貨物，有時越南政府對這些手段也採取回擊，這些事件引起法國實備越南政府破壞法越條約。

前世紀四十年時，法國派了軍艦到安南向越南政府提出通牒，要求恢復在越南的法國人傳教和貿易自由，這等於對越南宣戰。越南政府拒絕接受這些要求，法國軍艦就向順安（順化附近）港口開炮，由於越南政府準備大規模的反抗，法國終於放棄了這種計劃。

到十九世紀後一年，情形變了。拿破崙三世繼上台以後，法國進入了工業迅速發展的時期，第三帝國所帶來給法國腐敗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有利於資本的迅速集中，產生了少數大銀行家和搜括大資本家，他們開始壟斷和壟佔法國的經濟機構，資本主義在法國產生了。在這樣的條件下，拿破崙三世的政府進行了對內的反動政策和對外的侵略的冒險政策，在法國的歷史上，大規模的佔領殖民地的時期就開始了。

四 法國佔領越南

一、第一階段：法佔領越南南部

最初越南南部是法國侵略的最早的犧牲品，越南這一塊土地，中文叫交趾支那，當時叫六省，現在安南人叫它南圻。這個地區是非常豐富，主要的出產品是大米，它所出產的大米，在數量上，佔了全越南的產量的一半以上。它有海港，十七世紀前，該地是屬於東埔寨，以後安南人佔了它，從十七世紀起，它歸阮族統治，但是那時候大部份還是荒地，十七世紀中，滿清在中國上台後，忠誠於明朝的幾千中國人，坐船到安南去，請求阮族當局

給他們脫離，阮族當局把他們送到還沒有新人的南圻，在那裡他們建立了鞏固的基礎。現在的南圻的豐富，首先要歸功於這一代的華僑和他們的子孫的努力，「明鄉」這兩個字是指那些從這時候移居到越南的中國人。

法國佔領南圻的目的，除了南圻本身是一個很豐富的區域以外，還想把它作為深入並侵略中國南部的進路，因為湄公河（九龍江）是從雲南經過老撾，南圻，通到南海的。

一八六二年，法國軍隊在南圻登陸，經過幾天的英勇抵抗後，越南軍隊撤退，越南六省軍總司令阮知方投降及其宗室自殺，越南政府被迫和法國簽訂和約，把南圻東三省讓給法國，賠償法國二千萬法郎，割讓一個中圻的海港，承認法國在越南傳教和貿易自由，給法國在全越南設立商店和領事館，不得法國的同意，越南政府不能和任何國家發生外交關係。

當時越南皇帝——嗣德是個很聰明的人，學識很廣泛，但是包圍他的人是一羣腐敗無能的大臣，皇帝自己缺乏堅決性，一切國家大事的決定都託在這些大臣的身上，失掉了南圻東三省後，嗣德覺得，國家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早晚全部越南將落入法國侵略者的手裡。

那時候許多開明的安南人士向皇帝提議很多的改革方法，最著名的就是阮嗣德，他曾經到過香港和法國，回國以後，起草了改革的綱領，包括政治、社會、經濟、教育、軍事等項改革，但是在內閣會議上，皇帝提到這些問題的時候，就被大臣們拒絕討論。慈禧太后在改革方面也是一個回國傢伙，和大臣們同樣，她對嗣德的改革起了決定的作用，結果，越南政府除了排外，殺害教士們和用舊式武器和軍隊來抵抗西洋侵略者以外，想不到更好的辦法來對付危局。一年以後，一八六三年，法國又佔領了南圻西三省，全部南圻就在法國的手裡，六省國王——潘清講自殺。

但是越南政府放下了武器，越南人民是不投降的，南圻被佔領後，在十幾年中間，這塊土地是處在人民游擊戰爭的火網中——游擊隊員襲擊倉庫，切斷交通，殺法國軍官、士兵和教士，燒教堂等等，使法國佔領軍遭受了重大的損失，為了鎮壓游擊隊，法國軍政府，除了殘酷的掃蕩，和利用教士與越奸的手以外，還大規模地奪去了參加游擊隊的農民的土地。當時有個和南圻游擊隊作戰的法國軍官，在他後來寫的一本書裡，講過這樣的故事：他和他的部隊到了一個農村裡，聽說附近有游擊隊活動，他趕走兩個兄弟，強迫他們帶他到游擊區，走了一天，但是沒有發現游擊隊。這位軍官發生了懷疑，他問兩個兄弟，他們是否故意使他走錯了路，他們承認了，因此他們即

被解決，在結語時，這位軍官說：「我的政綱軍官的職責是解決他們，但是同時我的人類的成員的心不能不敬佩他們，這是真正的愛國者」。這一個故事證明了越南人民在反對侵略者的鬥爭中，表示了無限的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的精神。

一八六五年，法國又佔領東埔寨，佔領該地區也包括在深入中國南部的計劃中，因為南圻、柬埔寨和老撾，越南這三部份是湄公河的流域，可是很快法國就發現了不能沿湄公河駛往雲南，所謂巴維觀察團從南圻被派到雲南不久以後法國又回來了，因為湄公河流的險阻阻止他們到達目的，這以後，法國就放棄利用湄公河深入雲南的企圖，它想利用另外一條道路，這條道路是紅河，在越南北部（東京或北圻）。

二、第二階段——法國佔領越南北部

為了使法國有理由佔領越南北部，並把它變成深入中國南部的基地，一個法國間諜——杜普瓦——僱裝商人，不得越南政府的同意，自行溯紅河發向雲南，他按越南當局和留法法軍乘機會立即進攻河內，在越南軍民英勇抵抗之下，侵略者被擊退，法國進攻河內的失敗，在法國有了很大的影響，當時的法國（菲里（F. F.）內閣內河內事變而被台。

但是，代替第三帝國的第三共和國繼續加強了侵略殖民地的政策，一八七五年，法國更大規模地進攻河內，法國軍隊這次雖然成功，但是，遭受很大的損失，結果非州間諜作內應不可，河內失守，指揮保衛河內的河內總督——黃妙——自殺，全軍居岸在追悼黃妙那一天，把追悼會變成偉大的反法示威。

北圻的首府河內雖被淪陷，但是，在北圻其他省城，越南軍隊仍繼續和法軍作戰，如在南定、太原、山西、良山、高平等地方。同時越南也獲得中國的援助，中國對越南的援助在三種形式表現出來：一、清朝政府派自己的軍隊到越南和法國作戰；二、太平天國失敗後，其殘軍一部份跑到越南北部，在越華邊境，在十幾年中間他們對法軍進行了英勇的游擊戰爭，並給了法國人很大的打擊，他們被越南政府承認為正規軍，並予他們的領袖——劉永福——以越南軍將領的職位來指揮他們，「黑旗」是指在北圻活動的這些中國游擊隊，中國對越南第三種援助是在北圻許多地方，如南完，恭備組織成義勇軍，和越南軍並肩作戰，糧食和熱帶武器越南政府供給他們的。

中國對越南這種同情和積極援助是在共同危險與共同敵人面前——

主義——產生出來的，十九世紀中，四歐資本主義開始深入中國了，從此，給中國人民以無限的苦難，我們在上而已經說過，佔領越南的法國，同時也中國南部作為侵略的對象的。在兩個國家中間，越南和中國——如果一個國家遭到危險，這就影響到另一個國家的命運，因此當越南被法國侵略的時候，中國的援助無論此種援助是從清政府來，或從中國人民本身來，都共為了反對共同的敵人，反對外國侵略者，是正義的進步的。

最勇敢的，最堅決的抵抗運動是從越南人民來的，法國佔領河內及北圻其他大城市的第二天，越南人民的游擊戰就展開起來了，它首先發展在平原，以後慢慢發展到山岳地帶，關於北圻游擊戰爭，以後我們再說。

三、第三階段——法國佔領中圻

和北圻與南圻比較起來，安南（即中圻）在經濟上是最窮，並且在地理上，它沒有像南圻或北圻那樣大的河流，這使它在大陸交通方面，在鐵路交通缺乏的條件之下的處於不利的地位，這些原因使法國最後才佔領該地區，同時阮朝的首都是在順化，在中圻，阮朝上台以前，越南的首都一貫是在河內（北圻）。在法國侵略者的眼中，如果中圻以越南政府及其皇帝為首還保持獨立地位的話，抵抗運動不會很快結束的，他們以為失去了正式的官方的領導中心，越南人民就不能繼續抵抗下去，另一方面，他們希望越南政府和皇帝被投降後，就變成法國侵略者的傀儡和鎮壓人民的工具。

一八八三年法國佔領了中圻，那時候，剛德已經死了，十三歲的越南皇帝，咸儀和攝政是反法的，以挑撥的行為來促進中圻的佔領，先是法國在越南首都，集中了許多的軍隊，以攝政為首的越南政府首腦，夜裡進攻了法國軍隊，這就是越南所謂顯化伏擊，沒有近代戰術經驗的安南將領及缺乏近代軍隊的技術與組織性的越南軍不能不被法軍打敗，法國軍的戰利品是殘酷的，屠殺了成千成萬居民。

十三歲的皇帝被捕並被流放到阿爾及里亞（法屬北非），到現在他還在那裡，指揮越南軍的攝政宗室跑到老撾，以後跑到中國（廣西）去，順化事變使中北兩圻被法國完全佔領，使越南變成了所謂「法國保護區」。雖然二十五年以後，一八〇八年，越南最後一部份老撾才被佔領，但是越南的全都佔領基本上在一八八三年就完成了。

五 越南民族解放鬥爭

一、自法國佔領以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游擊戰爭時期

如果越南首都順化的失守意味越南政府的抵抗的告終的話，那麼對越南人民的鬥爭却正是從這裡開始。

在北圻，游擊戰爭是前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即在該地區，剛剛被佔領的時候，那時候，在那種游擊戰，主要的是在平原發展的，因為法國佔領軍都是集中在大城市裡，該運動的絕大多數的領導者是那些封建的舊官僚們，他們是舊統治階級的代表；該運動的名字叫「勤王起義」（即復辟運動），主要的目的為恢復被法國所奪去的越南皇帝的地位和權威。他們不承認越南政府的投降，他們配合和領導反法的農民起義，當時最出名的是「阮登述戰爭」（阮為其領導者），該運動在北圻東部維持了十多年。

那時候，北圻各省到處都有游擊隊，但是總的缺點是在於所有這些運動缺乏了一個領導中心，雖然他們的共同的旗幟是恢復越皇的地位，甚至在他們中間，互相聯繫也沒有，各人有各人的部隊，十七、十八世紀，在越南所發生過的一切農民起義曾經有過同樣的毛病，組織過於分散，沒有統一的指揮；直到十八世紀末，西山起義才有全國性，才有統一領導。在北圻「勤王起義」所以缺乏統一領導，因為該運動是由封建官僚，舊知識界領導，在他們中間存在着不少的個人英雄主義，除此以外，雖然在他們中間，大部分是真正的愛國志士，但是也有某些人，他們利用人民力量與恢復越皇主權的名義以獲得勢力並乘機上台，爭取帝位。

第二個缺點是沒有利用法國的統治薄弱的條件來建立起鞏固的根據地，不僅為了作為守勢和保持自己的力量，而且為了要發展自己的力量出發點，準備將來進攻法軍的基礎，因此游擊戰沒有發展的前途。

第三個缺點：就是和廣大人民缺乏聯繫，越南剛被佔領的時候，除了最少數高級封建官僚及那些充當越好的收錢份子流氓以外，每個安南人對法國侵略者都充滿着無限的仇恨，這是一個很好的條件去組織大城市廣大的地下力量，雖然游擊隊員都是農民，但是他們加入游擊隊以後，他們就自己建立起來，和一般人民幾乎不發生任何關係。

法國侵略者殘酷地鎮壓游擊隊，他們所採取的鎮壓手段不弱於希特勒或日本法西斯強盜所採取的手段，比方說參加游擊隊的人士的容容被捕，並作為人質；常常可以看到十幾歲的小孩子，因為其父親參加游擊隊，送上斷頭台受刑。

法國侵略者以為越南政府投降後，越南人民的抵抗就結束了，相反的，越南全部淪陷後，游擊戰在北西圻才轟轟烈烈發展起來，特別是前世紀的八十年代末與九十年代起，在那個時候，在這兩個地區，游擊戰進入了新的、更高的階段。

在北圻，八十年代末，開始了所謂「提探戰爭」，這是法國佔領越南以後，變持久的和最英勇的游擊戰爭。該戰爭的發起者，組織者和領導者是黃花探。他是貧農出身的，小的時候作過僱農，他所領導的游擊隊員都承認他為他們的司令官；那個時候，在安南僅在中國滿清時代一樣，一個地方或省級的指揮官叫提督，所以該游擊隊名字叫「提探戰」（提是提督，探是黃花探），提探戰從前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延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年以前，即一九一三年，才告終。

黃花探這位民族英雄，在北圻淪陷第二天，就參加了阮登述的游擊隊，據說他身體非常健康。他生在廣安，北圻北郡一個山岳的地方。在他的鄉村經常有野豬出來毀滅農民的田園，帶給居民很大的損失。據說，在一年之內，幾百個野豬被少年的黃花探打死，所以受了他的同鄉熱烈的敬愛，參加游擊隊不久以後，他達到相當高的指揮地位。但是經過十多年以後，這些游擊隊再不能維持下去（其原因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來），那時候年青的黃花探不因為這些失敗而悲觀失望，相反的他學會了過去的經驗教訓，並自己組織起新的游擊隊，使北圻游擊戰爭進入了新的階段。

首先他給了游擊戰爭一個鞏固的根據地，靠近兩廣邊界的山岳地方——安世——被選為根據地，在那裡的居民，除安南人外，還有少數土著民族。黃花探的游擊隊包括安南人，蠻人和土人，中國人也不少。在這些地方，如果不要本地的人，不和他們打成一片，不使他們把游擊戰爭的事業看為他們自己本身的事業一樣，那麼維持戰爭，到二十多三十年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些少數民族過去曾受受了安南封建官僚壓迫，而現在，他們對安南人還有成見的。

黃花探有另一個優點，他會和人民維持密切的關係，他嚴禁其部下掠奪農民的財產，所以農民到處都擁護他，不出賣他。

他還有另外一個優點，即他了解地下工作的必要性，而在這種工作中，他組織各社會階層的人士。廿世紀初，在北圻，已經有了政黨——義興黨，黃花探是該黨的組織者及領導者，義興黨的基礎和活動範圍是在大城市如河內、南定等。在黨的隊伍裡有女同志，也有個別中國人（商人），爲了和各城市的義興黨員發生關係，黃花探常常化裝爲商人、和尚、中國人、老太婆等樣子。黨的主要任務是配合游擊隊，比方說，一九〇八年，黃花探的游擊隊準備進攻河內的時候，義興黨計劃在法軍河內衛戍部隊施放毒藥，毒藥已經放好了，許多法蘭人已經中毒了，但是陰謀被奸細破壞而發現了，因此這次黃花探的部隊的進攻河內的計劃沒有成功。

河內事變以後，法國政府集中了一切的力量來消滅黃花探及其部隊，爲此目的，法國國主義派到北圻許多後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出名的法國將軍，如 Joffre 元帥，（第一次世界大戰，同盟軍總司令， Gallieni 將軍，）戰後巴黎軍事總督， Nogis 將軍（北非法軍總司令，因通敵被撤職高樂政府槍決）。除此以外，越南僑軍和俄國的高級封官僚也被利用來鎮壓黃花探，組織了特別越南僑軍團，以河內僑總督——韓軒黎——爲「總司令」，除了軍事進攻外，法軍還派奸細到黃花探那裡去作破壞工作和謀殺他，這些陰謀者被黃花探的極其高度的警覺性粉碎了，僑軍對游擊隊的進攻完全被粉碎。

一九〇八年，河內事變失敗和進攻河內的計劃沒有成功以後，在北圻黃花探的游擊運動就慢慢低下去，而在法國軍隊接二連三的打擊之下，該運動於一九一三年，在黃花探被刺死那一年，就完全結束了。

黃花探的游擊戰爭不能再維持下去，原因是很多，自一八九八年，法國在越南的行政機構就統一在越南總督領導之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法國在越南的投資，雖然規模非常少，但是帝國主義的經濟掠奪和政治壓迫已在越南社會機構中產生了一些變化，資本主義深入農村的過程是在封建關係的基礎上進行的，它帶給廣大農民破壞和飢餓，法帝國主義大規模地搶奪農民的田地。一部份法國人自己佔領，一部份給基督教會，一部份給那些曾經幫助法軍隊鎮壓起義的越好。殖民地的行政機構建立了起來，苛捐雜稅也來了，古代的農村公社的關係開始分化了，在這些新的條件之下的解放運動，首先要估計到這些變化，並且要反映廣大的越南農民羣衆的迫切要求。黃花探所領導的運動，直到它轉變爲止並沒有反映這些要求，法國統治越南二三十年以後，以恢復越南的主權作爲獲得國家獨立口號是不夠的。

其次，那時候法國在遠東的地位也比較穩定了，帝國主義間，特別是法、英和日本，在瓜分勢力範圍方面，已經得到了協議，一九〇七年法國和日本簽訂協定，一九〇八年法國和英國也簽訂了協定。

第三黃花探不能把他的活動的範圍擴大起來，在幾十年的戰爭中，如果只限制於一個地帶而不想辦法發展成許多根據地，敵人是很容易加以包圍、進攻和消滅的。

第四，爲了獲得人民長久的擁護，在幾十年中讓人民打敵人是不夠的，必需改善游擊區人民的生活，不然，人民是不見黃花探的統治與舊封建官僚的統治的差別處的。

第五，黃花探所領導的義興黨的行動的規模太小，黨只擔任一個任務——放毒以配合游擊隊的進攻，如果義興黨有一個較強的組織基礎，並能包括更多方面的地下工作，進攻河內是不會因放毒失敗而被停止的。

最後，黃花探沒有和其他地方的游擊戰爭（中圻）和全國的反法人士配合起來，和他們建立統一戰線。這些人士都是舊知識份子，他們在舊科舉中得到了學位，但是拒絕爲法帝國主義服務。廿世紀初，他們在中南北三圻成立了反法團體，他們派代表去和黃花探談話，建立行動的統一，但是他們的建議被黃花探拒絕了。當然，講到黃花探運動的歷史的時候，我們不要忘記他生長和活動的歷史條件，黃花探是貧農出身的，可是他的思想和行動不能不受當時的歷史條件重大的影響。

不管黃花探運動有很多嚴重的缺點，使它遭到最後失敗，在越南民族解放鬥爭的歷史上，該運動曾經寫下了很光榮的一頁，在幾十年中間，黃花探高舉了反對外國侵略者的大旗，毫不屈服同英勇的武裝鬥爭，在領導游擊戰爭的過程中表現了他是一個天才的軍事領袖。爲了消滅他，法國軍事當局和軍事專家曾經特別研究黃花探的游擊戰，河內大學的一位講師——波尼法希上校——他在很久的時間參加了鎮壓黃花探的法軍——講到一八八三年的暹羅化伏擊的時候，說過：「如果順化事變是被黃花探領導的話，局面會轉過來對安南人會有利的。」

黃花探對越南獨立事業的貢獻是很大的，直到現在，越南人民對這位民族英雄的尊敬是一個顯著的證明。如果法帝國主義的宣傳刊物，把黃花探叫做「土匪」，北圻的老百姓都叫他「黃花探將軍」。

與黃花探同一個時期，在中圻北部，潘廷逢也維持了十幾年的反法國侵略者的游擊戰爭，潘廷逢在爾德皇帝時代，曾經獲得元學位，而在政府

達到了其目的地位。法國把全部越南佔領以後，即一八八三年，安南酋長們却向法國投降，並變成它的傀儡，只一個潘廷逢放棄他的官職，跑到他的故鄉，在宜安省西帶一個山岳地帶，進行了反法國的游擊戰，軍事進攻的失敗使法國不得不採取政治進攻的方法，多少次他們經過已經變壞他的傀儡的潘廷逢，用舊同學和舊同事們向潘廷逢誘降，但是潘廷逢仍堅持他的立場。他也是一個很能幹的軍事領導者和組織者，在他的游擊區，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之下，他建設了會製造步槍的兵工廠，越南總督「D'Almeida」的副官「Comte de」——他曾參加過對潘廷逢游擊隊作戰的法軍，寫了「安南帝國」一本書，在這本書裡面著者公開承認潘廷逢的軍事天才。

潘廷逢的活動範圍太小，比黃花探游擊區還小得多，同樣的劇本使他的游擊戰遭到和黃花探游擊戰一樣的失敗，一九一〇年左右，潘廷逢死了後不久，他的殘軍也被消滅了。

「文親」運動——抗稅運動——秘密團體成立

俄日戰爭的結果，日本變成了帝國主義世界中的強國之一，這對當時領導越南民族解放運動的知識份子有了很大的影響。在「勤王」運動已經結束了，而黃花探潘廷逢的游擊戰的範圍不能大規模發展和擴大的時候，愛國的知識份子覺得，繼續採取舊的方法以爭取民族獨立是不可能的，因此從一九〇五年，大批舊知識界的代表和學生發起了所謂「東學運動」（到東京日本學習去）。據說在兩三年之內，有二百人左右到日本學習。該運動的領袖是一個安南老革命者——潘傳珠先生（一九一五年在上海被法國警察逮捕），在東京，他首先和那時還留在日本的中國著名作家——梁啟超，梁氏把他介紹給日本前首相大藏，經過大藏派潘傳珠到日本首相接見，第一次談話使潘傳珠失望了。日首相拒絕以日本政府的名義來公開援助越南，因為這會引起日本與法國發生衝突，他只在日本的越僑交結「東亞同文會」，並指示該會把他們安置在東京各學校裡，從此以後，在日本的越僑與日本官方，沒有再發生任何正式的關係，那時候，日本帝國主義剛得到勝利，他還需要鞏固他在遠東的地位，因此他還不能公佈他對東亞的野心，以避和歐各國帝國主義國家的衝突。

從那時起，「東學運動」一天比一天更低落下來，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對越南革命派的採取冷淡的態度，另外也有其他的原因，如越南法國政府對留日的安南學生的家長的壓力，法國當局迫使他們寫信給他們的子弟，要

求趕快回國，對越南革命者，軟弱傾倒以後，心懷不安，並紛紛回國。最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東學運動的人們中間，意見分歧，特別是在對日本「援助」的基本問題上的看法，一部分人贊成日本以武力來幫助越南恢復其獨立，另外一部分又反對此項主張。第二派的領袖是安南老愛國志士潘珠真先生，當時他曾經指出：「不能依靠外助（指日本），依靠外助等於死亡」。他主張到日本學習是可以的，但是不應請求日本出兵幫助越南爭取獨立，東學運動的發起者，潘傳珠及許多運動的領導者，和日本首相第一次談話失敗以後，也同意該項主張，只極少數還沒有放棄日本對越南武裝援助的希望，這一派的代名人是強盛親王，（嘉隆皇帝的孫子）他的觀點與他個人的利益是有密切的關係，強盛親王去，因為他希望日本打法國，以後幫助他得到皇位，東學運動容納他，因為他和安南地主們有密切的關係。經過他可以得到這些地主的物質援助，一九〇七年，法國和日本簽訂了「友好」協定，根據該協定，駐日法國大使要求日本政府驅逐日本的所有越僑。外交省下令，在二十四小時內一切越僑（強盛親王除外）要離開日境。日本帝國主義特別優待強盛親王，備將來在必需的時候，把他作為傀儡。越僑被驅逐以後，一部分回國去，留下來的很少幾人和潘傳珠跑到中國去，在那裡潘傳珠認識孫中山先生並成為朋友。

這些革命知識份子還在海外的時候（日本和中國），他們寄回許多宣傳品，大部分是由潘傳珠寫的，這是長篇的史詩，描述越南民族的光榮歷史，法帝國主義的殘酷統治及安南人的亡國奴的命運，號召全國人民起來打倒法帝國主義的壓迫。這些詩，曾引起很熱烈地，使人興奮。潘傳珠先生的作品在越南革命文藝上佔了特殊地位，留在中國的時候，這些越僑成立了革命組織，叫「越南光復會」。當時被舊知識界所領導的革命運動叫「文親運動」。

和東學運動在一個時期，即一九零五年後，在中南北三圻境內，革命的知識份子組織了他們的秘密團體，即「東京義熱會」，該會這樣叫，因為它首先產生在東京（即北圻），法帝國主義佔領全部越南後，仍保存舊朝廷，封建官僚和科舉（當然在法高級專員管轄之下），這些革命知識份子，經過舊式科舉得到了學位（舉人、進士等），但是他們拒絕為法帝國主義和傀儡朝廷服務，東京義熱會的領袖之一是潘珠真，東京義熱會的人士和國外的越僑（在日本）維持密切的關係，他們獲得國內的開明的地主們的物質援助。

一九零八年在圻發生了強大的抗稅運動，此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是東京義熱會，幾十萬農民跑到城市裡要求政府減稅，但是該運動不僅是一個

反法帝國主義的抗稅運動，它是一個反傀儡的封建官僚的一個強大鬥爭，在每個縣、府和省裡，承認黨派和這些偽政權的代表們發生衝突，他們許多人被打傷或殺死，二十年來帝國主義的統治告訴人民很多的東西，他們的理想發生了轉變，現在他們認識到越南朝廷和封建官僚已經作為法帝國主義的走狗了，它已不再是像過去那樣，「人民之父母」了，一九零八年的運動是越南人民給法帝國主義「以越制越」政策的一個有效的回擊，法國派大批的軍隊來蹂躪地鎮壓抗稅人民，幾千人被殺害，差不多一切東京義熱的重要人士都被捕，並在特別軍事法庭面前受審。成百的東京義熱的領導者被處死刑，或千被流放到南太平洋各島或入獄，東京義熱的領袖——潘珠貞——被越南傀儡政府處死刑，但是後來因法國政府「恩赦」而得免，潘珠貞對越南命運的前途有他的特殊看法，他激烈地反對越南朝廷封建官僚，他利用每種機會來公開指責越南舊統治集團的政類。在獄中，在他寫給法國當局有名的信忘錄中，他要求法帝國主義徹底取消越南的封建機構，但是同時他對法帝國主義的「文明使命」却保留着充滿的信心，他要求法國盡心教育越南人民和幫助它走上現代文明世界的道路。這種改良主義的思想使法帝國主義，對潘珠貞採取了「寬大」的政策，後來他被流放在法國到一九二五年才回國，直到他死為止（一九二六年），他仍保持他的觀念，雖然潘珠貞對於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的看法上從頭到尾是改良主義，但這種看法是政治理論的結果，而不是有意識的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好細的理論，但是因為他對越南解放事業有了很大的熱情，他是一個慷慨的，堅決的，勇敢的人，所以越南人民也把他看做一位愛國志士。

一九零八年的抗稅運動以後，東京義熱會就不存在了，該團體的殘餘力量分散各地，有的完全放棄政治活動，有的向法帝國主義投降，有的把恐怖主義作為鬥爭的基本方法，一九一三年，在北圻太平省所發生的暗殺傀儡巡撫阮維翰案，和同一年在河內法國報社所發生的爆炸案，都是舊東京義熱的恐怖份子組織的。

如果不算黃花探的義熱黨，東京義熱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在越南廣大的革命組織普遍於中南北三圻，比之於前一時期，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同時，該組織注意到黨派的鬥爭，並它能夠引導黨派向帝國主義的剝削走狗——安南封建官僚和士農——鬥爭，這也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是東京義熱會也有他的缺點，首先，東京義熱黨僅是舊知識界的一個宗派，如在他們的思想上他們把自己看做統治人民的最高階層，黨派鬥爭是應為他們服務而

不是他們的鬥爭服務人民。

因為上述的原因，所以他們不能了解黨派的迫切要求，特別是農民黨派的要求，而這種不了解人民的要求使他們沒有一個具體的綱領，在上面，分析黃花探運動的時候，我們已經說過，從越南行政機構統一以後，即一八九八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經濟及社會方面發生了某些變化，而這些變化的結果是深深壓在越南廣大人民羣衆身上。東京義熱會缺乏了一個反映這些變化及越南人民迫切的要求的具體綱領，在鬥爭的過程中，雖然東京義熱會也注意到黨派鬥爭的方向，但是東京義熱會的鬥爭目的還是很模糊的。

最後，東京義熱的缺點還在於它沒有和在北圻的黃花探的游擊戰，在中圻的潘廷達的游擊戰，和在南圻各地小規模的游擊戰配合起來，和黃花探談判的失敗不能怪黃花探一個人，失敗的原因，東京義熱的人士也要負責，主要的原因恐怕是雙方個人英雄主義的思想。

最後，講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越南解放運動的時候，我們不能不注意到一個重要的因素。那時候，越南還缺乏一個有相當經濟地位的民族資產階級；法帝國主義是一個高利貸的帝國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他主要地向東歐和東南歐比較落後的國家投資。其它的工業發展，比英國美國和德國還相當落後，殖民地的資源對它還沒有像戰後那樣必需性，因此戰爭以前在越南只有點礦業，樹膠及極少數的輕工業的小工廠，在這樣的經濟條件之下，民族資產階級是沒有可能發展起來的，那時候所謂安南資本家是在本國經濟，沒有任何地位的極少數實業、商人和包工頭。

戰爭以前的被舊封建官僚、舊知識界所領導的越南民族解放運動沒有向前發展的前途，因為當時越南社會還缺乏作為該運動的基礎的民族資產階級。

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期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在革命力量方面，越南還處在無組織的狀態中，上面我們已經說過，一九零八年中，抗稅運動被鎮壓後，當時唯一的，有力的越南革命團體——東京義熱會——就被破壞了，該團體的一部份領導者跑到農村組織黨，並對法國官吏及其走狗們，越南封建官僚進行了恐怖主義行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期內，中南北各處都有這些黨，這些黨大部份都由舊東京義熱會的愛國志士領導的。

戰爭的時期，關於法國最大的殖民地——越南方面——法帝國主義這書

怕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和越南人民的起義，雖然日本在同盟國方面參加了對德戰爭，但是這種「友誼」與「同盟」，還不能完全保證越南不會被日本侵略。在那個時候，法國和日本中間，是沒有談判和協議不得而知，因為沒有任何文件公佈出來。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確定的，就是那個時候日本採取等待主義，以便乘機混水摸魚，如果法國失敗的話，日本就立即出兵——佔領越南了，日本沒有這樣的機會，因為，那時候日本是孤立的，而在法國方面，有英國、美國、俄國（十月革命以前）和意大利，從一九一七年起，兩線戰事對德國轉為不利了。

對越南內部，法帝國主義有充分的理由不相信越南人民的「忠誠」，雖然在以前，黃花探海軍隊早被消滅了，東京義勇會也破滅了，但法帝國主義知道，他在越南的統治造成了越南對它極端不滿的情緒，越南人民的革命運動雖然一時一地可以告成一段落，但是革命力量仍繼續存在，而時機一到就爆發起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期越南革命高潮是一個顯著的證明。

那時法越兩總督是 A. Carraut（法國社會黨進黨，曾作過殖民地部長，法國人民統一黨以前的總理）想利用收買安南買辦資本家們和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的辦法來欺騙越南人民。關於收買買辦資本家方面，法國在戰時，給了他們某些優厚可能的可能，比方說在供應法國糧食（大米，玉米等）和供給油與鹽（橡皮和其他土產）方面，安南人的資本比較增加了，另外，因為戰時，法國向越南的投資暫時停止了，所以安南人也有可能辦些小工廠（紡織或其他日用品），對資產階級的新知識份子，法帝國主義給特別費，允許他們出版越語的報紙和雜誌，在戰爭的年代，在河內出版了「中北新聞」二週刊的報紙，主編為阮文永；「南風」一週、法和中三種語言的雜誌，主編為范禮；在西貢出版了「越南舞台」法語的報紙，主編裴光相和阮寬閣；在這些報紙和雜誌上，他們宣傳了所謂「法越合作」的錯誤，後者，在戰後時期，這些人都是積極的「合作主義」者，和安南資產階級改良派的領袖。

在政治上，法帝國主義贈給越南買辦資本家某些小小的禮物，在中北兩省成立了所謂「諮詢會議」，職員都是由法當局指定，他們只能討論諮詢向政府提議關於經濟及財政問題。

可是，在戰爭年代，越南廣大人民羣衆的負擔增加了，二十萬越南老百姓被徵調去修築防禦工事和修築工，在四年中間，法帝國主義抽了幾千萬越南盾以維持帝國主義戰爭，這些所謂「國債」都是從越南老百姓的血汗那裏來

的。

從一九一五年送到法國去的越南大米，玉米等糧食的數量不斷的增加，再加上農村勞動力的缺乏，因為許多能耕種的農民勞動者都已經被送到法國去了，所以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兩年當中，在中北折發生了嚴重的飢荒。

在這些條件之下，在越南全境，到處都發生了反法帝國主義的起義，越南人民利用了戰爭的有利機會，向法帝國主義進行英勇的武裝鬥爭，爭取他們的自由和獨立。

這些起義都是由過去「東京義勇會」的餘力量所領導的。一九一四年在老總羅鐵（音譯），在越北折達華道一帶發生了有安南人和老總人參加的起義，起義宣佈法國在越南的統治結束，並提倡越南各民族平等，革命軍從法軍掠奪了很多步槍軍用品和糧食，到一九一六年起義才被鎮壓下去。

一九一六年在中折首府——順化——的革命份子，企圖在被派到法國去的越南士兵中，發動起義，圖謀不遂起義領袖十六歲的安南皇帝——翁新——被捕並被流放到南非洲的一個小島，同謀的幾十個領導者被處死；幾百人被流放到南太平洋各海島或入監獄；在一年之內，順化宣佈戒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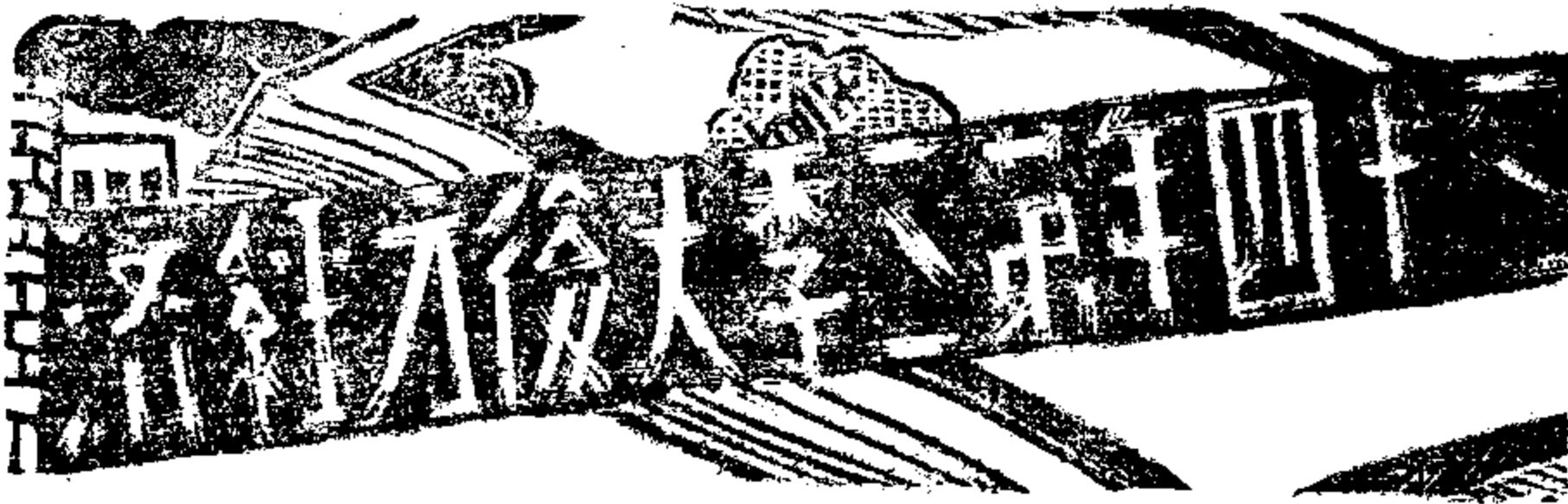
同一年，在西貢，革命份子進攻該城並打破監獄和放釋犯人，這些起義是由潘赤龍領導，除西貢以外，在其他地方如邊和等省也發生了起義。

一九一七年在北折，太原省，發生了梁玉瑣領導下的強烈的起義，梁玉瑣是一個安南革命家——他和他父親都是東京義勇會會員，他早就出外，一九一五年回國，被法當局逮捕關在太原省的監獄，在那裡，他向犯人和衛兵進行有力的宣傳，並得到他們的同情，以監獄為出發點，起義很快就發展到全城的越南軍隊，法國行政機關，法國官員和他們的家屬都跑到河內去逃難，起義軍控制了太原一個月，起義軍竟被鎮壓了，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兩年中間，成百的革命者，經機密機關的打打以後，而被殺。

此外，在這些年代，在廣西與越南邊界（同登）和暹羅與越南邊界（吳東）有越南革命份子進攻法國防軍的事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所發生的起義，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即：這些運動太分散，並缺乏了一個領導的中心，第二個缺點，即這些起義都沒有和廣大人民羣衆聯系，第三個缺點，即沒有一個有具體和明白的綱領的革命政黨領導革命運動。

（未完）



勝利前後

——三十四年第三季的概況

許蔭新

一 勝利前夜

這一季，是中國經濟劃時代的標結。八年一個月零三天的抗戰，在這個時候，勝利地結束了。這也就是說，它結束了戰時經濟，它又步入了復員的「平時」經濟。因此，這一季的經濟，可以劃分為兩個不同的時期：一個是以物價的不斷飛漲為特徵的勝利前夜；一個是以物價和金鈔的急激下降為特徵的戰後危機。八月十一日以前的四十天屬於前一時期；八月十一日以後的五十天（以本季而言）則屬於後一個時期。

現在，先說勝利前夜四十天的情形吧！

因為戰時後方的經濟，是以黃金政策為貫穿一切的線索的，所以我們不能不提到黃金和美鈔。本季後方的金融市場，是在政府停止各種黃金存款（六月二十五日）的情況下展開的。因為黃金存款停辦的結果，黃金現貨便成爲可居的現貨了。重慶的金市從六月二十五日的十三萬元拾級而昇。七月一日漲至十八萬二千元；四日竟達到二十三萬元最高峰。美鈔亦追蹙而至，從一千五百元昇至一千八百元；七月一日爲二千三百五；四日竟蹙至三千三百元的頂點。抗戰八年，黃金外匯亦跳了八年，跳到這種地步，這就達到頂點，此後，便要走上下坡路了。

七月五日以後，黃金美鈔皆呈回挫。差不多有十餘天的光景，黃金盤旋於二十萬左右，二十日跌至十九萬幾千元，之後，就在十八萬元上下波動。美鈔方面，五日亦落至二千八百五。七月中旬曾曾暴漲至三千二百元，但暴漲之後，又復回挫。此後便在二千六七百元間浮沉。這種情形，一直延至日寇投降的消息之到來。

黃金政策，在一定限度之內，確曾吸住了一部份游資。當游資金美鈔步步上騰的時候，游資在這個驚濤駭浪的金屬大海中的冒險家，雖亦在想辦法，在調借頭寸，打算一躍身手。到了金鈔越過頂點而下降時，這驚濤駭浪，便趨漸寒然了，特別是「七底」發現的時候，當局來了一個扣緊四成的辦法，對着這些黃金熱心的人們，更是澆了一瓢冷水。游資逐漸離開金鈔而傾向商品了；物價怎能不飛漲起來呢？

這個時期，震動的物價可以分爲三類，第一類是百貨，布疋和雜料。這些物品，因為來源不旺，故價格日益暴漲。例如華亭隆丹布從七月初之十二萬四千漲至月底之十七萬四千；八月初，又狂漲至十九萬元。線襪原爲七八千元者此時已漲至一萬五六千元。顏料中之藍，每百市斤漲至一百零七萬元，八月初，就呈現有行無市的狀況了。第二類是出口貨物。這一類物品，因爲歐戰結束，輸出有禁，故商人看漲。如生絲價格每担從一百四十萬漲至一百六十五萬。桐油從三萬餘元漲至四萬三千餘元。第三類是糧食。此類物品，因天氣乾旱，七月前二旬，廣慶河米曾幾

一萬八漲至二萬元(每市石)，一入下旬，便穩定於一萬八九千左右。總而言之，這個時期的物價，是在走上坡路的。上漲的速度，雖不能說一日一價，但一週一價却是事實，而且越來越兇，七月底八月初，那是在作瘋狂的飛騰。

這個時期，物價之步步飛漲，並不是偶然的。天氣在亢旱，使國戶更加有辭可藉；通貨在高度膨脹，使幣值不斷下跌，貨幣政策之加強，使生產事業更加衰落，物資的供應更加減少；歐戰的勝利結束，使出口品被人認是快更吃香的東西；西南國際運輸線邊未能發生實際的作用，使商人們看準國外物資的輸入並不是短期內的事情。至於東東戰局，日寇的敗象是越來越明顯了，但大家預料起碼還得半年以上的時間。在這種，戰爭的需要和囤積的條件仍然存在，商人們大致抱着看漲的觀度，在這種形勢之下，再加上游資的轉向，一部份游資從黃金轉向到商品來，物價便飛漲起來了。

物價在飛漲，但生產事業並不見有什麼好處。物價漲，銀根緊，工廠的成本增加了；工業的資金週轉亦就困難起來了。在這種，沉重的租稅和使人無所措手足的管制政策，又進一步的使生產事業更加困難。這個時期，南洋、錫登各烟草公司呼籲捐稅太重(去年該業所負擔之稅達四億五千萬元)，成本太高；渝市手工業因受共同當局限制，要求調稅稅額(今年改訂稅率後，對機製烟增加百分之二十，而對手工烟增加百分之五六百)。自實鹽業月來不斷減產，官方積欠鹽商鹽價，僅以四五六三個月而論，若照市面利率計算，自并一摺，即虧折于金二千三百餘萬元。因此，七月間自貢二棉鹽商又發出第三次的好願了。麵粉業方面，因原料與工價的問題(按此時每袋麵粉之加工成本，運費在內，為一千二百元，但中糧公司只給半數，原料則由各廠自行辦理)，渝市五大麵粉廠(復興、福民、天城、福新及嵐豐)竟被迫停工。貿易方面，重慶市商會等五團體亦為促進統購統銷的廢除而起來抗爭。

勝利前夜後方經濟，是在極度緊張的局面中。大家好像感覺着：一個大的波動，快要迎面而來。特別是黃金四成捐獻的規定公佈之後，游資更加企圖從金鈔中鑽出來的時候，這個感覺，更益明顯化了。可是，勝利前夜的消息好像一把利刃，一刀而後的把這個趨勢切斷成二段。跟着來的不是物價的暴漲，而是空前而急轉直下的暴跌。

二 一切都變了

日本投降以後，整個大後方的經濟，起了一個極大的波動。如果要用它的特徵的話，下面幾點是必須記取的。

第一是物價急劇的普遍的下降。後方各地在這一兩個月中，却遇到同樣的狀況，根據重慶各同業公會的調查，八月五日和九月二十五日的數字是這樣的。襪衫每打從十七萬跌到五萬，跌了百分之七十；中等棉花每担亦從十七萬跌至五萬，跌了百分之七十；洋釘每公斤從四萬六千跌至一千一百五，跌了百分之七五；中燕白糖每百市斤從十二萬五跌至六萬，跌了百分之五六；中等河米每市石從一萬三千五跌至一萬零六百，跌了百分之二十二；小麥從一萬四跌至五千五，跌了百分之五五。昆明的行市，比重慶跌得更兇，該地棉紗價格最高時，每古曾達八萬元，日本投降前夕，每古約售五萬元，到了九月十日便跌至一萬元左右。一個月內跌至百分之八十。從八月十日至九月十日的一箇月中，昆明布疋平均跌價約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百貨跌價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五；土雜跌價百分之五十五至七十五，米價下跌約百分之五十(見九月三十日大公報伍啓元先生：調整期的經濟恐慌)。不僅重慶昆明的情形如此，成都、蘭州以至貴陽等地，亦何嘗不是如此。各地的一齊跌價和各種物亦一齊跌價，這是這次經濟危機的普遍性的證明；而在短則一二個月間物價跌到了百分之三三到八九十，則為它的急劇性的證明。物價是這樣普遍和急劇的下跌，分明是年來後方市場一個劇烈的反動。

第二是除了商品之暴跌外，黃金和銀鈔亦顯著的下降。八月十日，渝市金價十六萬元，美鈔二千二百元；昆明金價十八萬元，美鈔二千一百元，到了九月十日，渝市金價漲至四萬八千元，美鈔漲至八百二十元；昆明金價漲至四萬元，美鈔漲至六百五十元左右。計在日本投降後一個月，渝市金價跌了百分之七十，美鈔跌了百分之六十；昆明的黃金跌了百分之七十八，美鈔跌了百分之二。金鈔的暴跌，反映了銀行和做金鈔的商號之破產。同時，亦說明：在這次的危機中，銀行錢莊是與工商業同其命運的。銀行做金鈔亦做商品，商號做商品亦做金鈔，商品金鈔都跌價，銀行錢莊與商號便不得不一齊下水了。「八牛」比期拖過去之後，重慶每日行幣之交換額常計四五十億，差額常達十億左右，黑市日折，每千元竟換到四九五角之譜；銀根趨緊，折息越高，就趨加重商業危機與金融危機的嚴重性。

第三、當這個經濟危機，不僅侵入商業與金融，而且波及了工業和農村。因為銷路驟停和物價驟跌，廠家要吃虧二方面的虧：物價跌得太快，但他們手中的原料等等，則是在物價高漲的時候購入的，這就使廠家大虧其本

至於定價停止和出不去，那就只好減工或停工了。後方較大的工廠，如中興興業、寶豐、寶和、博益、順昌、恆順以及中國製鋼等鋼鐵廠，洪發利、瑞生、育豐、利人、川大實業、新、鴻興等機器廠，裕華、沙市、中紡等紡織廠，都在這個時候，停止一二個部門的生產，或大規模的解雇工人了。至於規模較小的工廠或作坊，其慘狀之狀，更不必說了。重慶的土布業，六月份以前，月產在四萬疋，至九月份即減至九千餘疋，全部或部分停工的達三分之二。州府成都等處的小工廠，亦在這種困難的環境之下，「紛紛閉門」了。物價高的時候，成本雖然提高，但還可生產下去；到了物價驟跌的時候，簡直連站也站不住了，談什麼生產？其在農業、白糖、桐油、米谷、小麥以及棉花等農產品的跌價，給農民以無情的打擊。因為他到在生產時所投下的資，都是以高價的物價計算的，現在農產品突然跌價了，他們的成本是撈不回的。例如陝西棉花每担成本要十萬元，而現在竟跌到一萬五千元。這叫他們如何是好呢？如果他們是個農的話，則除了吃成本高而賣價低的虧之外，除了吃虧農資本之虧外，還有虧地主的虧。還要交納地主的商稅的地租。這是在火上加油。後方的農村經濟這種打擊，元氣又進一步的衰傷了。

第四、通水的經濟危機，大後方所呈顯的形勢，是與收復區不同的。收復區的物價一天比一天的不斷在提高。八月下旬的物價，比八月中旬高出百分之二三十；「九月中下旬比九月上旬高漲了一倍以上」（見九月三十日中央駐南京電）收復區的這種情形，在表面上好像與大後方對立，好像在走着相反的道路。但實際上，却又不然。在一對一百的比率之下，收復區的物價，比後方為便宜得很多的。據聯合會報告所說，九月二十日南京食物平均物價僅低八倍至十倍；衣服平均約低五倍至八倍；鴉片平均約低十倍，其他物品約低八倍至十倍。收復區物價這樣的低廉，可以說是由於法幣與舊幣的比率穩定得太高所造成的。這種辦法，一面使收復區舊幣持有者的人破產了（如果再把那些如狼似虎的錢差大臣及其爪牙之張牙舞爪的欺騙破產，那就更不可開言）；一面又促使收復區的物資流入內地，加強後方物價之下跌。因此，在這次經濟危機中大後方與收復區是息息相關的，是互相推動的。

第五、這次經濟危機是在戰爭結束，是在戰時的深刻轉變中來臨的。從民國三十年以後，後方經濟就沉重地一蹶不振。物價一月比一月的飛漲。飛漲的物價，窒息了生產，加強了囤積居奇的勾當。而這一切，是以通貨膨脹，管制政策和官僚資本之興波作浪為背景的。半生不死的後方經濟，已

經是奄奄一息了，現在，物價又從另一方顯——暴跌去打擊它，這猶之乎一個人大病之後又遇洗劫，它的嚴重性並可想見了。

或許有人以為這是戰後恐慌，這種恐慌會見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之歐洲各國，又見之於現在的英美諸國，但實質上，這是不相提並論的。人家的戰後恐慌，還有他們的工廠礦山和農場，人家的戰後恐慌，毛病是在於東西太多，沒法銷納。而我們呢？我們的戰後恐慌是什麼呢？除了黃金和外匯，除了滿天飛的法幣之外，還有什麼呢？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這種危機並不能看做資本主義國家的戰後恐慌。

抗戰勝利結束了，但是，國民經濟卻來了這個危機。從它的特點來看，實在是值得我們去深思警惕的！

三 危機底成因

為什麼中國經濟，突然來了這一下呢？我認其原因有這幾個：

(一) 戰爭結束了，戰爭的需要亦就停止了，戰爭的需要，不但包括中國部隊的需要，而且包括了在英美軍的購買。戰爭的需要一經停止，物品的需要便大大減少。在人民方面，因為戰爭的結束，許多人打算回家去了，許多人打算轉移地區，以前打算購買的東西就不再購置了，過去因為戰爭關係，大家想多購一點東西以備長期之用，現在這種情況亦完全變了。而另一方面，在短期內，交通雖不會完全恢復，但其鎖終止，物資之輸入是不絕的。這些原因，使物價趨向下跌。

(二) 法幣的發行額早已達到天文學的数字了，幣值之下跌，是不可避免的，但因勝利到來，它的使用的地區擴大了。使用地區之擴大，可以沖淡它的幣值之降低，同時，在一與二百的比率之下，法幣就顯得更吃香了。因為法幣有種種新的兌換的條件，而市場上各物又呈現滯銷，這就使一般人一反過去的心理——從存貨不存錢，改變為存錢不存貨。這種心理使通貨流通減少，過去一噸鈔票因轉手的次數較多可以作若干張鈔票之用，現因流通減少，過去一噸鈔票只作一張鈔票之用，法幣的「數差」，就因而減少了一了。這對於物價之下跌，是有影響的。

(三) 抗戰以來，囤積居奇之風，風靡整個後方，銀行直接間接都從事於囤積貨物，他們有的直接去從事囤積，有的把款項借與囤戶。或拿政策實行以後，銀行商號又多了一條搜括的道路。黃金美鈔的投機，雖然不能代替

商品投機，但收住一部分游資，則是實在的。這些投機的人們，不但使用自己的資金，而且使用了從別人借來的資金。在比例上，他們所得的款項，常常倍於自己的資本。戰事突然結束，銀行存戶爭相提款，債權人追迫債務人還款；但在此時，絕大部分的債務者，却把資金凍結在商品或金鈔上；欲向銀行再行借款是不可能的。為了償清債務，商人和國戶不能不減價拋出商品；銀行和金融投機者不能不忍痛拋出黃金和美鈔。故銀根緊縮，是促使商品和黃金美鈔下跌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四) 在談到收復區與大後方的關係時，已經可以看出：法幣與偽幣的比率定得太高，在短期內，勉強地提高了法幣在收復區的購買力，對當地產低了收復區的一般物價。在這種情形之下，收復區的物價低而大後方的物價高。這自然會促使法幣由大後方流往收復區；物資由收復區流入大後方。則在這二個月中，收復區的物價並未迅速漲入後方，但在影響上，這種作用是不論說沒有的。到了京滬一帶商品抵達重慶的時候，這個作用就從可能性變為現實的了。

(五) 由於上述這些原因的逼迫，商人們以至一般人，都改變了過去的心理，都以為商品必定要跌，都以為法幣必定吃香（特別是從其與偽幣的對比來說），因之，地貨物，抓法幣，便成爲一時的風尚了。大家既忙於拋貨物，抓法幣，物價怎麼能跌下來呢？

(六) 如果人民並不在法幣價值上，如果社會購買力並不那樣墜落，即物價下跌，正是人民補充物資的良機。像這樣，有供有求，相去不遠，則市場或許不會呈現通貨膨脹的。無如八華以來，我們的財政政策不是執行行錢用錢錢多多用的原則，而是執行無錢者既出力而又出錢，有錢者既不出錢而受錢的政策，這是一來，人民的血液便一欠比一天稀薄了。四川的川北，十一縣（三十一年度）農民要負擔五百二十餘種不同名稱的捐稅；陝西的八個縣十八個鄉鎮中，農民要負擔五百零二種不同名稱的捐稅（據今年七月九日新華日報）。川陝之外，各方其他各省亦無一不如。這樣的負擔，則老百姓怎麼能不一貧如洗呢？大家都在貧困，都買不起便宜東西，市面上，便只有供給而缺乏需求了。只有供給而沒有需求，物價自然更急速地跌落了。

這些因素，促使物價在百尺竿頭，忽然下跌，但物價暴跌的結果，又加強了這些因素的作用。這就是物價暴跌的影響的問題。

四 影響和趨向

這次經濟危機的影響，是極端嚴重的。如果單從物價的暴漲來說，則在長期漲價之後，來一個下跌，未始不可使人民舒一口氣，所謂「可以從高軍公教人員的實在收入；可以減少富裕階級的實在收益」；可以「糾正價格的平衡與脫節及產生其他調整作用」，當然是一種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看法，但是，物價的過分波動對於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並不是完全有利的。

過去幾年，後方各地工礦，雖在困難中掙扎，但生產還可拖下去，工人的失業，還不至於成爲一個嚴重的問題。現在却不同了。物價暴跌，銷路斷絕的結果，工廠只好停工減工了，工人只好成爲停工減工的犧牲品了。成都的失業工人已經超過三萬；重慶的失業工人已經超過五萬五千；昆明西安亦是如此。收復區的上海，他因爲接收工作辦得不好，大量工廠都停閉了，失業人數竟達到五十萬人。物價貴的時候，工人還有工做，職員還有職業，物價驟跌而無職業支持，現在失業了，物價暴跌，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呢？他們從那裡取得法幣來購買這些便宜的物品呢？何況日用品必需品並不跌價！其在農村，農產品跌價，但成本却是以高漲的物價爲標準的。過上糧食與農產品價格漲價的時候，獲利的是大地主大商人；現在糧食與農產品跌價了，但吃虧的不是大地主大商人，而是手無足錢的勞苦農民。因爲對於地租和商業資本的剝削之下，人們是可以把損失轉嫁給農民的。

或許有人認爲物價和金鈔的暴跌可以減少富裕階級的收入吧？但我以爲這問題是不好抽籤地一般地去推測的。沒有權力的小投資者，或者會吃到底物利金鈔暴跌之虧，至於那些佔有特殊地位的人們，却不相同，他們可以從物價暴跌中，帶走一筆巨款，放手地大發其「復員財」，放手地去「接收」或「挪用」敵偽的財產。他們真是一「錦上添花」；有辦法的到底仍有辦法。那被剝削減少他們的收入？

其次，這次的經濟危機，一如人們所希望的一樣，許多「底子」不好和效率不高的企業，都在「物盡其用」的原則下，被淘汰了。債務的迫近，銀根的緊縮，使他們不能不垮台；而人們的有意無意的幫助大企業犧牲小企業的做法，在「調整」的口號之下，發生不少的作用。一些沒有倒下去的中等企業，爲了存在和發展，就在這個時候，進行增資和改組，但增資和改組的內容，無非是充實於有力的人們。資本集中的趨勢，是來得更明顯了。

再其次，西南後方的一股民族工業，是在抗戰中建立起來的。廠家和職工的血汗，使人們夢想着「中國工業的」地域偏在，從此可以被修正。但

這一次大的經濟危機，却無情地把這個希望粉碎了。當然，據察西南後方工業的因素，早在幾次危機發生之前便存在。以打算盤的辦法，以純粹經濟的觀點去看後方的軍工業和國防工業底結果，寧可把自己的一些工廠放在一傍讓牠作自然的消耗，還是大家都知道得很明白的。現在勝利了，東北有廢礦可以接收，沿海一帶亦有廢礦可接收，人們更振振有詞的把西南的一點廢礦，當作燭羊羔了。不過，如果沒有這樣的危機來掃蕩，則國營工業雖會被入一腳踏掉，但民營廢礦，仍是可以進行下去的，然而經濟危機却像一陣烈風一樣，把這些民營廢礦的殘骸吹得蕩然無存了。製鐵品的價格跌得最慘，他們的銷路最成問題，而另一方面開支却不易縮小，週轉又感到不靈。除了停業或縮小規模之外，是沒有什麼路可走的了。這個經濟危機說不定要為後方的「遷徙」添緒！

還有一點必須指出的。這就是通貨膨脹無限度的膨脹下去，將要含有着深刻的財政危機。這幾年，通貨膨脹引起了社會經濟的種種惡果，通貨幣值之下跌，早為各方所深切注意的了，可是，抗戰勝利了，收復區日蓋擴大，法幣使用的地域日益擴展，膨脹的程度被沖淡了！而法幣與舊幣的一對二百的比率規定之後，法幣更是吃香了，在另一方面，為了「復員」，各種開支

各在擴大機構，增加經費，於是，人們便放手地在大量發行了。原來已經膨脹，現在又再膨脹；原來只有大後方膨脹，現在又加上收復區的膨脹，這種全國性的膨脹，不但孕含了幣制的大紊亂，而且孕含了財政的大紊亂。現在通貨膨脹是財政的積命湯，但將來，誰能說通貨膨脹不為財府的提命符呢？

這些影響，使中國經濟更加殘破，使戰後的復員工作更加困難。在這種情況下，縱然有人可以說，物價下跌可以淘汰一些沒有存在之價值的工業，可以糾正一般物價之脫節與失去均衡。但，根據上述所述，它的壞作用是多過於它的好作用的。

在現行的財政經濟政策繼續維持下的前提之下，在通貨膨脹以加倍的速率向前擴展的條件之下，物價可能在某一地區某一時期呈現回漲，但交相如果一旦恢復，外國的物資一旦源源而來之後，物價要作大步回漲，恐怕是不可能的。在遠處，商業和金融在貸款的辦法之下，可能相對地得到一點起色，但中國的民族工業，却分明不是打幾針強心劑所能救濟的。

要使中國的國民經濟能從這個危機中脫出來，只有大刀闊斧地切斷當前這一條充滿着投機性和買辦性的路線！

預告

本刊自第九卷十期起曾刊載尹啓民先生撰作的「中國歷史講座」，刊載至第二章一節後，因為審查關係，無法繼續刊登。繼刊後，得到許多讀者來信，希望續刊，現決定自

十卷二十一一期起接前刊各章繼續刊載。希望讀者諸君注意。

工業遭逢着新的恐慌

方卓芬

勝利的恐慌

假如說上一季的工業是灰色的，那末，本季的工業更是慘淡的了，在日本投降前夕，工業界忍受着無限的艱辛，大家企望着勝利來臨，一切的計劃，都圍繞着這個願望出發。為了戰後的工業建設，有的廠家不惜奔馳國外去籌備外資和器材，民營工業國外考察團也在這時候組織起來了，工業的座談會熱烈的討論着救救外資的問題，湘桂運輸的工廠也在這個時候部份復廠了，然而，這一切都不外是夢，不外是利那間一場夢罷了。

悲劇交演的日子，在八月裡出現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像一陣颶風似的捲來。這消息來得那麼突然，它帶來了狂歡，也帶來了嚴重的經濟恐慌。百貨驟然跌了百分之五六十，黃金美鈔則如江河日下，信用緊縮，金融紊亂，商場更是蕭條，這一切對工業的影響，是多麼的嚴重啊！勝利給予工業界的打擊是這麼有力，這麼殘酷，多少工廠的計劃被搗碎了，他們破產了。廠家在呼聲請願，對於政府及社會人士申訴，成羣的工人被拋於十字街頭，因為工廠裡不斷的泛起了工潮，工人們為着生存起來抗爭了。那指時的呼聲，那失業的血淚，交織成今天工業圖景的畫面！

「重工業要熄火了」

重工業的現狀，正像一個病人入沉痾的人，沒有從病源上去治療，單用興奮劑去苟延殘喘，到了強

心劑停止其作用時，一切亦就完了！幾個月來鋼鐵業和機器業是依賴訂貨來支持的，鋼鐵業生產一向是畸形的現象，不是「生產過剩」，就是鬧着「鐵荒」。鐵荒從上季延續到本季初期，統制政策和官僚機構的腐敗，迫使鋼鐵工廠陷於絕境，像「綦江南川區民營鐵廠」以國營之綦江鐵礦，統制鐵砂代兵工署抑價強購土鐵，規定收購土鐵辦法，以十六倍之砂價收購生版鐵，約合每噸價值十五萬元左右，但戰時生產局訂購之同質鐵價僅為二十萬元。各廠以不敷成本，遂向當局呼籲廢止，迄未照准。」（見七月十七日國民公報）這種不合理的剝削，對各鐵廠無異宣佈死刑。七月初旬，綦江十四家鐵廠被迫停爐，鐵荒就是這樣擴展着。

在勝利復員聲中，重工業將熄火了！政府對訂貨採觀望態度，原料價貴，出品價低，虧本太大，又加以成品滯銷，於是，各廠只好在裁員停工找出路了，九月中規模較大的中國興業公司已告停爐，資論也將停工，鋼鐵除一部份定貨可維持十分之一外，其餘的生產力即完全閒置，小龍坎的滄盛鋼鐵廠也一度在減產中停止洋釘部的工作，資獨飲廠却從三百多名工人裁去了二百五十餘人。此外如中國製鋼、順昌、恆順等大廠，都感到走頭無路。

機器業的情形更為黯淡，由於下江工廠大部份要搬家，本地和遷渝工廠在倒閉歇業，民間訂貨停止。政府訂貨的不確定，原料器材百分之百是在戰時高價購來的。目下成品跌價，工廠要開銷，債務要清償，一天天的虧空，資金薄弱的機器廠早就停

工了，在渝市該工者有洪發利機器廠，張瑞生鐵工廠，豐豐機廠，利人機廠，大川實業公司，新豐機廠，鴻發興機廠。其在西安，四十家機器廠中，已停閉的達二十餘家。

冶煉和機器業都在衰落了，談什麼重工業呢？

輕工業臨到死亡的邊沿

輕工業早就萬分凋零，今天更達到趨崩潰的時候了。恐慌最先襲擊着紡織業。由於缺棉，由於不合理的管制，各紗廠與織戶都已停工一半，他們靠存着，每天都在死亡線上掙扎。本年八月花紗布局債存棉數千担，再令各廠減工二分之一，但各廠已無棉可用了。花紗布局拖欠各廠代織工費共達二十餘億元，欠紗也不發還。既無資金的資金，又沒有加工對辦的原料，不要說小廠，就是大工廠也維持不下去了，沙市紗廠已於九月二十五日起暫時停工，中國紡織公司也在大批解雇工人。以上有業來說，渝市織布戶計一千三百五十七家，台機七千餘架，織布工人五萬餘人。六月份以前，月產土布萬疋，至九月份即減至九千餘疋，全部或部份停工者已達三分之二。九月來土布業會向花紗布局二次請願，可惜現在仍毫無結果。軍布不織戶，也處於破產的地步。因軍需署第二廠迫收織戶底紗，致引起糾紛，經過承織軍布業會請願，「軍需署於九月二十日始簽字同意」在欠紗案未清算以前，暫緩收紗，繼續承織一後，該署第二織布廠，突於二十三日出牌告，停發細紗，改發粗紗，此種一再違約行爲，引起全體織戶之驚異，現南洋織布廠，已被迫全部停工，宣告破產，工人已告失業」（見九月二十八日商務日報）

紡織業造成了今天這個地步，統制政策是應負全責的，年來要求解除管制的呼聲不斷，但當局却置之不顧。到了今天紗廠已到了無從生存的時候

一方面，無法收購棉花，另一方面，布疋又遇到滯銷。在紗布市場看，這很清楚，明白眼前的是無利可圖的，對於欠紗欠織已趨於停付，甚至廢管管制，獲得不少許多廢氣。由一位紡織業中人沉痛的話：

「經過抗戰幾年，紡織廠在統制政策下，比一個人，他全身血液都抽乾了，現在氣息奄奄。爲了抗戰，我們無盡止的忍受了輸血，但是今天勝利到臨，對這樣一個渾身無力的人，難道不應該扶一下嗎？」

在紗布局取銷統制的措施，雖然給予各廠以「生產自由」了。但是這門的「自由」，破壞的「自由」，不僅毀了紡織業，也摧毀了農村，使棉農陷入悲慘的境況，十月七日大公報登載着這樣一段消息：

「惟以政府取銷統制，紗廠補行因於資金，無力購進，致棉價已由每市担十五萬元驟跌至一萬五千元左右。而人工缺乏，田中檢收棉花一斤，工價達三千元，毛在四十斤僅值二十五斤乾棉，每担三十斤僅值十斤皮重，以檢收棉花四十斤計，需檢花工價一千二百元，而軋後皮棉僅八斤五兩，棉之市價合一千二百四小餘元，軋花費尙未計算在內。因之棉農棄在於田，不事收穫，不特棉農負債無法清償，且以缺錢購種，百萬棉農有餓殍之虞，如不迅謀救濟，農村經濟亦有潰崩之可能。除境紗廠通去均受管制，現棉業於野，而紗廠却以原料來源斷絕，而陷停工狀態，工人失業，工業破產，情況嚴重。如聽任棉在田中腐爛，不特目前工業無法維持，即本年冬季軍需民用必將發生嚴重恐慌。」

這段話道盡了棉農的悲哀，紗廠的困難也赤裸裸的呈現在眼前。棉農對於收復區與後方復民的紗

廠也是一個嚴重的威脅，據說接收日方的共有四百萬錠子，就需一千多萬担棉花，而中國只出幾百萬担棉花，假如當局不決心發展棉產，不獎勵棉農種植，不解決棉農的困難，則紡織業的前途，是沒法不使人憂慮的。難道這棉花棉紗棉絲棉線棉織品，難道這農村永遠陷於破產狀態嗎？

麵粉業也和各種同樣的產物生氣，本市僅有的復興，國民，天城，國新，豐豐等五家製麵廠，在中糧的統制下產量日趨下降。這五廠每月的產量本可達十五萬袋，中糧只准其生產七萬袋，實行加工製粉以來，加工費不能勝物價指數增加，每袋麵粉本爲一千二百元，中糧付價僅值半數，致各廠無法支持，七月二十日合約滿期，各廠要求增加加工費，中糧公司購備部不允，因之各廠被迫停工十餘天。矛盾現象是一方面重慶在缺粉，另一方面重慶市田糧管理處存有七萬袋粉在廠里，且有着一萬多袋在發霉。到了九月底麵粉的銷路漸停，原料供給成問題，生產總額（因爲盟軍需用減少了）中糧購備部各廠減產三分之一，至此本市五種粉廠只好停工。

經濟恐慌的浪潮不斷湧起，它泛濫到每一個角落，手工業如製綉綉，線絲綉，捲菸業都受到個個淹沒了。失業的工人，一天天在擴大。據報上所載，成都失業的職工，數達三萬餘人。渝市方面，據說也達五萬五千（是不完全的統計），西安，昆明等地也莫不如此。失業的職工多半是沒有遺留費的。冷天來了，飢餓感逼着這些無頭的流浪者。

工廠要生存下去，要復員，要建設新興的工業，廠家們的抱持苦鬥到底的決心，仍依然未熄滅的希望之火，他們一再呼籲，請願，算來也有下列數種。

八月十三日，工業界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復員問題，決議十七點，轉政府辦理。

八月十三日，工業界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復員問題，決議十七點，轉政府辦理。

八月廿五日，瀘川工廠聯合會，向全國工業協會，全國工業協會重慶分會三函，請向政府目前後方工廠之緊急救濟辦法，推舉代表向當局陳述苦況，請求百餘元的工資，從九月一日起，工業代表團數度進調財廳兩布。三五團團代表提出工業復員建議書。

九月上旬，中國經濟事業協會發表對棉局嚴重宣言，要求實現民主和平團結，立即停止管制政策，改組官營資本，嚴懲工商界漢奸，切實救濟工商業危機，救濟失業員工。

九月十二日，市商會舉行記者招待會，向政府提出四項要求：一、免除一切戰時捐稅，二、立即取消戰時管制政策，三、使工商業有直接貸款機會，四、嚴懲漢奸救濟失業員工。

九月十三日，四川復員會邀請工商界討論救濟辦法，決議派代表向當局請願。

九月廿一日，工業界代表對當局提出了六項救濟工業辦法的建議。

九月廿一日，及廿八日，瀘川工廠聯合會五聚餐會，各產業家對於當前工業危機有所報導，並提出挽救危機的具體辦法。

九月二十五日，嘉陵江煤礦公會，開第三屆會員大會，爲解決當前之困難，決議開採：請政府發貸十八億元，救濟煤礦，補發損失，並除免繳稅三年。

九月二十六日，南洋二十八家小工廠招待新聞界，請求當局救濟緊急工資。

十月二日，杜德倫代表代表總商會，報告瀘川工廠損失嚴重，就廠房和機器共達三百一

十億元，要求當局於商人賠償前由政府墊款貸給，以便進行復員。

這一連串的請願，含著多少辛酸的血淚！八年來後方工業界對國家的貢獻並不小，今天勝利來臨了，却無法活下去！

他們一個共同的要求是擴大工資，收購成品，繼續訂貨（最少在半年以上），沒收敵偽廠礦分配民營工廠，徹底解除統制，救濟失業工人。廠家們力竭聲嘶的奔走求援，政府的反應是什麼呢？認為不合標準的小廠只好讓其倒閉，開支小者無暇救濟，開支大者認為無法救濟，小廠應合併或由政府收購，批准的五十億元工資，小廠是無權享受的。至九月底十月初，申請工資者僅一〇七家，總額未超過十億元。未獲工資之廠礦尚有二百餘家。中南棧膠廠、中國植物油料廠等十餘家，在政府批准後又被認為不合格而退還。五十億的工資並不能解救工業界根本的困難，杯水車薪，頂多只能維持一二月吧了。因為工資手續的麻煩、拖延，「一部份工廠都不及等政府的救濟而紛紛停止生產，解僱工人，結束業務」。（見十月四日大公報）。請願的結果是使人失望的，高高在上的人物以「敷衍塞責，不負責任」和「剛愎自用，無視公論」的態度來處理火一般緊急的事件，怎能弄得好呢？

病原在那裏

工業為什麼演成這般慘狀，這還迅速？這不是偶然的。最後的經濟恐慌不過是一部份壓力而已。根源在統制政策的不合理，統制的鎖鍊加於生產者的身上，造成了原料的恐慌，工業品減產，「依據工業生產指數的指示，後方工業在三十年就開始了部份的下落，三十一年更演成一般的衰落；去年年底以來，雖有增產的號召與努力，但今年第二季

的指數較三十二年上半年下降百分之三七、八之多。再從每一計算期的各種產品的減產數來看：計二十八年六種，二十九年五種，三十年九種，三十二年十一種，三十三年上半年八種，三十三年下半年二十種，今年春季廿種，夏季十六種。同時，還有一個重要現象，即被統計的三十四種產品中，沒有一種能維持穩定趨勢而未減產」（九月廿二日商務）。減產、停工、虧蝕、使工廠的原氣漸漸消耗，到了經濟恐慌發覺來時，它們就馬上倒下去了。

另一根源是投機的財政經濟政策的結果，抗戰八年來，在敵人的封鎖下，當局沒有增加生產上去解決物資的困難，沒有從合理負擔上去解決財政的困難，只是「依靠外撥救濟，從增發通貨著眼，從黃金政策著眼，使金融技術代替了商品貨幣，造成物價急劇飛漲，使工商業凋敝，囤積者大發其財，生產者徘徊歧路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民族工業衰落的命運是註定了的。

走向那裏去呢？

現在我們還要問一問，工業的前途是怎樣的？假如從新中國的將來推測，則民族工業的未來，是可能大放光明的，然而，橫在眼前的還是重重的障礙，工業的民主化的條件還是這麼渺茫。傳統的幕外的心理並沒有減低，不管是物資或人才，都寄著美國源源運來，打算盤，食小便宜的结果是斷絕中國工業的生機。李燭塵老先生提供了歷史的材料來警惕今天的作法是有毒的。他說：

「民國五年，我從日本回來，曾到漢陽鐵廠住過，那時候正是要完成津浦路的時候，漢陽的鋼件一應俱全，可以應用，但是政府和英國打一打算盤，寧買外貨不用國產，於是使漢陽廠從此不振，只好從事修生鐵，供應敵國了。今天又是這樣一個時候，大漢口鋼鐵廠可以軋八十磅鋼而不肯用，爲了美國製五十元一噸，而國產八十元的緣故。時代變了，我望主持人也變一變，不要對自己專算成本……「懲前毖後」，這是一一個很好的例子，今天中

國已經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國了。取新生，要自強，應該自立更生，絕對不能回到老路去。外資是可以利用的，但我們應該利用它來幫助民族工業發展，而不是用外資和外貨來代替了中國工業的生產。

民族工業的另一個危機是國營代替民營之勢，政府中人都主張華北東北工業，全收歸國營，沿海廠礦所有極大的紡織工廠當局也似是決心國營，據有資格人士觀察：「最近花紗布管制局的撤銷，另設紡織管理委員會，即準備此機構前往接收收復再紡織廠，並負責戰後獨占式經營棉紗任務（和戰時在紗布管制局任務相同），民營紗廠恐難分享。其次，大後方殘破不全的中小工廠，當局似僅限於暫時應付性救濟而已。此外收復區極大工業，勢將成爲某種大財團所獨占經營。據最近消息，前建設委員會所轄南京首都電機等規模較大的國營事業，現已交予某財團所組成的揚子電氣公司接收經營，此舉可看出今後的趨勢。」（見十月五日新華日報）

在中國所謂公營事業，有許多是和官僚資本結了血緣的，倘若是在沒收敵偽工廠以後，不照顧民營事業，不以一部份廠礦來賠償民營工業的損失是不合理的。何況輕工業中的紡織業更不應劃爲國營呢？由於當局側重發展「國家資本」，對於民營工業之發展便抱歧視的態度，像美國對華貸款的問題，「政府希望整批貸款與通過政府處理，對范旭東氏永利化學公司，美金貸款一千六百萬美金，盧作孚氏民生公司加拿大貸款一千萬美金，陳光甫氏電燈廠貸款，迄未批准由中央銀行担保，美國若懷疑當局是否發展國家資本壓抑民營工業。」（見十月一日商務日報）民營工業未能得國家合理扶植，也不可能順利獲得外資之幫助，試想，一塊經過風霜摧殘的園地，沒有太陽光的溫暖，沒有雨霖的滋潤，它怎能生長起來。

如果不改變當前的政策，如果不消滅依賴心理，如果不調整國營與民營的關係，則中國民族工業，將走上什麼道路是可想而知的。我們希望工業界同人，廠家和職工，廠家和廠家，抱着共濟的態度，望着有利的風向，向民主的彼岸駛去罷！

在勝利中掙扎的金融

劉方華

一 黃金失色

這期金融恰適逢偉大抗日戰爭結束的前夜，因之起了很大的變化，這個變化應該是大審時書，但是爲着包括整個戰線起見，從七月轉入八月初所發生的黃金市場變化，加以敘述。

七月初頭，黃金價格曾一度上升至二十三萬，這可說是黃金潮的最高峯，也是一年來黃金市價最高紀錄。自此以後，黃金開始逐天逐地下降了，其下降情形是這樣的：

- 七月中比盤旋於二十萬上下
- 七月底比期迫近，它就下瀉至十六萬五千
- 八月中比又跌至八萬八千元
- 八底又驟降至八萬三四千元

及至九月十日黃金就急轉直下，慘跌至四萬八千元，打破歷次以來價格最低的紀錄，在抗戰的黃金者，在大量黃金面前，過去金色燦爛，現在已失去一切色彩了。回顧七月初頭金價高至二十三萬的時候，如有隔世之感。其後工商銀行界，當着不致使自已慘死於黃金下跌，紛紛向政府請願設法補救。九月二十八日政府終於將牌價改訂：「收進八萬五千，賣出八萬九千」，政府開始做無限制的按價買賣了，至此，黃金不再是像過去被按國家作爲角錢的雜兒，所以價格始終盤旋於八萬上下。

黃金爲什麼這樣慘跌，不外是由於下列幾個因素補充而成的。

首先就是由於七月中旬以來傳出的「黃金發現

」的傳說。自去年十一月以後，黃金的存款是很少的兌換現貨，黃金現貨在市場缺乏，於是黃金成爲囤積投機的對象，故價格日趨，但是自七月中旬以後，就傳說紛紛：「月來中央銀行每日均有分成小塊之黃金，由卡車送入該行，每車約三四十長條箱，同時每日亦有大批黃金送出分散」，這種情形，使黃金市場之說越證實。「黃金發現」使擁有現貨的失去居奇的可能，伊黃金少，阻量小的人陸續的拋出現貨，使某些畏縮持幣的幣口停止前進。

其次是比期關係，由於通貨膨脹已達到惡性階段，由於銀行信用的不合理，因此造成後方金融市場銀根奇緊與銀行不經營正常業務，前專注意黃金美鈔投機，故一到比期迫近，金融界里就需現貨現貨，彼此都要爭奪多量現貨，以應生死關頭，故此在這個時候金融投機者不能不靜觀時局，行証爲難應付比期也不能多量拋出而吸收現款。金價也在這種情形下下降了，比如以八月份兩次比期金價的變動，就可以說明，在八月初旬金價盤旋於十六萬上下，但一到中比迫近時候，就跌落至九萬九千元。八底比期也是一樣，在行莊應付比期喘息之後，金融漸漸穩定，黃金漸漸好轉（如十七日則是十萬上下）。但月底比期前一二日，金價又挫跌至八萬元。

再次是七月底黃金四成捐款所引起之反應，政府突然宣佈黃金兌換辦法「照官價捐獻百分之四十，二兩以下免捐」後，給與購存黃金者打擊甚大，市場造成很大混亂，一方面是黃金市場觀望不前，

無人過問，而行莊則小心翼翼，競相收買現款，準備提存風起，以防損礙。

第四，日寇突然投降，大後方的經濟條件起着很大變化，特別是敏感的金融，變化更加利害，因爲許多行莊受對投機的失敗而引起金融市場波動，有的銀行準備大量現鈔到收復區開辦地，存戶爲清還那也紛紛向行莊提存，於是整個市場都要現鈔，自然就拋出黃金，市價當然無法穩定。

最後，收復區黃金價格猛跌，後方金價也不得不受其影響。過去大後方的金價上漲，其中原因是由於淪陷區金價高漲，而引起大批走私現款，但自日寇突然投降後，價格低於大後方，（照最近來說，收復區黃金四萬元），過去作爲黃金銷場的地方，也因爲價格低落而絕跡了。

二 勝利到來了

八月十日晚上，它是中華民族的偉大日子，這一天民族所受日寇壓迫的災難被解除了，廣大的人民從戰爭結束中走向和平的歲月，所以舉國在騰歡，到處在慶祝，可是在另一個角落裏的人們，他們是懷着矛盾的心情，他們在狂歡中埋藏着混亂，因爲勝利帶來的物價普遍下跌消息，對於這批靠投機爲生的人們，自然是慘遭重大打擊。

首先讓我們來看一看物價如何跌落：

布疋下跌了百分之四十左右，百貨下跌百分之四十，麵粉下跌在前數日開始，亦在百分之四十左右。五金電料下跌百分之二十左右，油類，食糖，紙張下跌至百分之二十不等。至於黃金美鈔也在下跌，黃金由十七萬餘跌至十二萬元，期條跌至七萬元，存單跌至五萬八，美鈔由三千元下跌至一千二百元。

由於物價，黃金美鈔慘跌，在整個後方遭受其

實的自然銀行錢莊。因為黃金從二十餘萬跌至七萬，美鈔由三千元跌至一千二百元，平穩下跌至三分之一，這是使銀行本場台的因素。無容諱言，大部份的行莊，其開寸的運用，大都放在投機事業，投機市場跌落了二分之一，不僅使一年來投機盈利全部化為烏有，而且還要損壞了老本，所以隨而倒閉的銀行有同豐銀行（差款六千萬元），大同銀行昆明分行，倒閉的有華僑銀行（僅少開寸二億九千萬元），興華銀行（差款七千餘萬元）。

其次工商業也同樣的遭受嚴重打擊，過去商業界里，為着避免幣值跌落的損失，拚命囤積商品，可是這次物價驟跌，商品推銷不出，資金越聚越枯，因此許多商店就在資金週轉不靈之下，接二連三的關門了。至於工業界也更走入悲慘的命運，就是產品賣不出，資金無法調動，產業也就隨着停工。這就是物價普遍驟跌所遭到的慘象。

根據上列所報消息，勝利帶來的不是市面繁榮，而是這種情形：物價跌價壓倒了商業，銀根緊縮壓倒了銀行，產業停工壓倒了工廠，這顯然是暫時性的投機失敗所引起的一種恐慌，而不在戰爭突然結束所爆發的一連串的商業危機，金融危機與工商危機，同時他們彼此互相聯繫，互相推動。假如我們沒有辦法救濟目前的危機，中國人民不但仍然飽受戰時經濟所予的遺害，而且將要使人民生活永遠受苦。

勝利雖然到來了，但是它帶到大後方的，是一個慘淡的歲月。

二 在掙扎中的恐慌

上半年以來，渝市金融界連續遭過幾個大難關——六月二十三日的提存風潮，終於平安渡過

。因此財政負責人員對今後財政金融表示很大樂觀，各行莊本共過往的能力與技術，可能應付自如。所以會囑咐一時川省行莊為謀自救的「川省行莊聯合會」，也在這種情形之下已不太迫切需要了（見七月二十二日商務日報）。然而會幾何時，後方的行莊又重遭新的難關。在這一期金融中，特別顯出驚心動魄的是七月底政府宣佈黃金六折兌換辦法，與抗戰突然結束所遭到的八月的比期。

本來渝市行莊七底比期銀根平穩，各行莊也安然的渡過了比期，但是政府突然宣佈了黃金六折兌換辦法後，後方金融市場就引起很大的混亂，在金融界一方面受着黃金投機的打擊，一方面又因出分錢頭守，以應付存戶的提存，市面銀根極度緊急，市面利息黑市高漲，賬外銀子最高更達每千元日拆四元八角，可見當時銀根的緊急，至於昆明的金融市場，在當日消息傳到後，更是混亂不堪，其當時情形商務日報曾有如下的報導：「黃金市價，在此一日數變之中，跌對於此阿堵物中者與投資者，隨顯不乏人。其持有巨額黃金期貨或存單者，以損失太大，有患精神失常者，另有一種受影響最大者，則為以高價收進黃金存單之投機家，其不叫苦連天云」。所幸當時沒有發生重大的命子，可是這次黃金兌換辦法已種下了很大的禍胎。

給金融界以致命的打擊，還是在抗戰勝利後所遭到的八月間兩次比期。抗戰告終止，其所引起市場局勢是物價普遍急遽下跌，存戶大量提存，公司行號工廠不斷的倒閉，這些具體事實已如上述，可是基於上述的工廠的危機，加深了金融危機，所以在八月間兩次比期是後方銀行歷年所少有的難關，并非無因的。

八月比期，銀行業所表現具體情況是怎樣的？請看下列八月中比當時金融市場的報導：

「重慶市場正進入風聲鶴唳的時期，在商品市場隨時有一陣警告的呼喊：「××銀行倒了！」它的本票千萬不要收！」。

在銀行之間，一夕數驚：「某某貨行倒了！」，「某行被欠×千萬！」。工業家更坦白：「我們束手待斃！」。

八月中旬比期是重慶市場的一大難關，但是還好只是預行警報，小比以來市場日緊一日，八底大比將是暴風雨來臨的日子」。

至於八底比期，自八月下旬開始，金融界，商業界，工業界，就一連發出了呼救的警號，特別是銀行界，他們就認為三十一大比期是救頭的日子。事實上自下旬以來，銀根越發越緊，每日交換差額常在十二億上下。在資金調動上，同行間為着救自己的不暇，自然對別人的挹注也就困難，而國家銀行亦在此時亦率先縮緊開寸，更使缺乏頭寸的行莊定頭無路。因此九月一日同豐銀行差額六千萬而停止交換，九月四日又有華僑銀行及義亨錢莊相繼倒下，都是受到八底大比的影響，可見當時銀行界，如何在危險困難重重的難關掙扎。

金融界如何解開難關？

首先是銀行公會極力向財政部請求增加公庫證數額與提高黃金抵押標準。結果在八月中比，財政部答覆公庫證可增至二十億元，其抵押品三項：（一）變債券每元折合法幣五百元，（二）存款準備金百分之二十全部抵用，同房地產股市對折抵押。除了這些救命湯，中比才能渡過險境。至於八底比期，則由財部提高了黃金抵押的標準由五萬元升至九萬元，而現貨則以八萬元作抵，到期係于存單四萬三千二百元，未到期存單三萬三千六百元，因為黃金抵押標準增加，行莊就靠了動用黃金抵押放款，終於解決八底的困難。

其次銀行本身的自救，有些行莊到了大險境，董事與股東都極力協救，因為萬一關門，他們還得負無限責任，如果保存底子，則有很多的好處，所以他們就拿出辦法來彌補頭寸。

到現在，銀行界居然渡過九月至十月四日比期，但險境還未渡過啊。

四 轉移陣地

勝利的狂風驟然掃蕩整個後方的金融市場，但是倒下來的是可憐的民間小戶，那些半官半商的大戶人物，那些有所倚藉的官僚資本縱使受了一點微傷，但是稍經喘息後，他們又是找尋新的追逐對象，發現新的大財了。

自從日寇投降後，偽幣幣值大跌，而法幣與偽幣幣值比對起來自然都迅速增高，收復區內以法幣表現的物價，也就大為跌落，而且遠低於後方各地。例如渝市的陰丹士林布，跌價以後，每尺售價尚須七百元，南京的士林布，現在每尺，只要法幣八十元，滬市的新元標衫，跌價以後，每件售五千元，上海則每打售法幣三千元；渝市的山米，每石售價已跌至一萬三千元，南京的白米，每石僅售法幣三千元；鹽市紗價大跌以後，每件售價尚高達八十四萬元，而現在上海紗價，每件僅售法幣六萬五千元；黃金價格，後方盤旋於九萬上下，而京滬則在五萬左右。這境新的大陸，竟然發現了。因此在此後方就不斷出現重慶飛機的轟擊，東下京滬船期的黃魚，還有一批批特殊勢力的人物，所以這些冒險家便長驅直達新的陣地，又作新的試手，所以收復區在漸復不久之後，八月下旬比八月中旬物價開始高漲至百分之三三三，九月下旬比九月上旬月便漲至一倍有餘，在同期間後方物價則一跌再落，而收復區的物價日有上升，這就是收復區開了特殊機器的光。也是淪陷區民衆重獲自由的想賜。

其次應注意的，也是新近獲得最大利潤的業務。因為收復區的充復，法幣在那裏流通數量小，後方的廠商與民衆，都急於接濟彼地，銀行業在此流通接濟，就成爲最有利的業務之一，但是交通工具困難，現鈔輸送就成爲一種專利事業，所以匯兌也成爲特殊專利業務，故此匯兌費用便佔百分之三十。目前在渝市各行莊，都紛紛準備在京滬增設行莊，或者重新調整機構，或者通過種種特殊勢力將大量現鈔帶至京滬，作種種特殊的經營。所以目前後方各行莊雖然飽受幾次比期風險打擊，可是仍然站

(上接第七五頁)

百萬棉農有飢餓之虞，如不迅速救濟，農村經濟亦有崩潰之可能。這不但是陝西一地的情形，許多地方農民在投下生產成本（如種籽、肥料、人工等）的時候，是在物價暴漲的時候，而他們的生產成本又多半是用借債方式得來的，現在要收穫了，正巧碰上物價狂跌，就假設完全能順利脫手，也是不勝遺憾的呀！「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已經有不少農民在千思百慮之後，不得不拋棄了他們的田園家宅，四處逃亡了。這一個嚴重的現象，是不容等閒視之的。

(四) 幾句結語

由此，對於目前大後方的農村經濟，我們得到一個什麼印象呢？

由於水災，大後方若干地區的農業生產給直接的摧毀了。這樣的地區固然不是很廣，但當農民的生產工具是被沖走了，勞動對象——土壤也被冲刷淨了，甚至一部分的勞動力也消滅了，這就

得往，所以他們又以冒險投機的老態，作轉移陣地的嘗試。

在牛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金融體系，它始終是發揮投機作用，在抗戰前的上海這樣，在抗戰後的昆陽仍是這樣，他們雖然受經濟環境的打擊，可是他們未全部倒下來，經過喘息之後，又爬起來了，又追逐新的對象，找覓新的市場，現在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了，他們將釋放繁榮的市場——昆陽，又重回舊的買賣的安樂園——上海，展開新的活動。

會使受災地區的農業生產陷於停頓。要使它恢復，不是輕易，也不是短期所能辦到的。農產品價格的普遍下落，農民的收穫不敷生產成本，同樣也會使農業無法進行擴大再生產甚至單純再生產的。其對於農村的影響，從表面看來，固然及有像水災一樣的直接而迅速，但對農村的危險卻是普遍的，它將把整個農業經濟基礎。而在此時候，政府却忙著征糧，這對一般農民說，不啻火上加油。這便使數個月來大後方農村經濟的轉機。當然，除這指出出的幾點以外，其他摧殘大後方農村經濟的因素，如地主的集中，高利貸和食，吃人的高利貸，腐敗的基層政治等等，還是存在著，這些老問題，新的，經常的暫時的使農村經濟趨於崩潰的內憂，錯綜複雜的，作用於大後方的農村，已使大後方農村一天比一天更沉重下去，我，是聽其崩潰呢？還是努力謀其復興呢？如果選擇後者的話，那麼我便不應袖手傍觀讓事態惡化下去了！

一九四五、十、十三。

多災多難的農村

(一) 水旱競賽

在上一季大後方經濟趨於停滯時，筆者曾報導過旱災正普遍的威脅着大後方的農村，然而會幾何時，許多地方的旱災尚在日益擴展之中，不幸的西南幾省又鬧着異常嚴重的水災，雖然這次水災就其影響的地區來說，沒有像今年旱災一樣之遍及全國，然水災所到之地，田園盡舍，席捲一空，災情之慘，期又遠超旱災之上。

以四川說，今年的水災據說為數十年所僅見，早在七月初間，成都新新聞及本市新報就首先接獲開縣、奉節、鄂水、廣安、江油等縣雨水過多，已呈災象；其後，四川各地雷雨不晴，繼之以山洪暴發，於是便成巨災。這兩三個月間，僅就渝蓉兩地報登災情縣份，粗枝大葉統計一下，就有：涪江流域的綿陽、江安、安縣、綿竹、江油、中壩、彰明、中江、三台、射洪、蓬溪、遂寧、雅安等縣，沱江流域的德陽、廣漢、金堂、簡陽、資陽、資中、廣漢、內江、富順等縣，岷江流域的灌縣、彭縣、成都、漢江、新津、青神、仁壽、榮縣、宜賓、瀘縣、敘永等縣，嘉陵江流域的蒼溪、閬中、南充、蓬安、合川等；其他如渠江的廣安、大洪河上游的鄰水等縣，這種隨便一算，竟達四十餘縣之多。

其他省因久雨成災的，僅據重慶一地報紙所載，貴州則有錦江流域的三合、都江、榕江、下江、麻柳、黔東的岑盛、玉屏、貴溪、天柱、錦屏、丹

念良

寧、平遠等縣；在雲南則有昆明、安寧、昆陽、呈貢、貴寧、玉溪、昭平、江川等縣；在湖北則有公安之長江決堤，在西康則有羌河之泛濫。各地的災情究竟怎樣的呢？

就四川被災四十餘縣中，災情之慘重，首推涪江流域。涪江今秋連遭泛濫兩次，一次在八月下旬，一次在九月初間，第一次江水尚未退盡，山洪繼即暴發，於是江水復趨狂漲，加以此次水災，適在去冬及今春大旱之後，泥土疏鬆，水土無法保持，突遭此數十年來所罕見之大水，不但把禾稻帶走，把谷子和雜糧帶走，把農具和傢俬帶走，把畜牲帶走，把房屋帶走，把人也帶走，並且連土牆也一起帶走，像三台、遂寧、中壩等數千萬畝良田，幾被洪水冲刷殆盡，往日之膏腴沃土，而今却變成浩浩無垠之石田，這是多大損失啊！

我們隨便，幾備災情的報導吧！

涪江：「自八月以來，無日不雨，尤以廿九日至三十一日，連續三晝夜，各地山洪驟發，慘被沖毀。三十一日後，突然山洪暴發，勢若奔雷，立時平地水深數尺，房舍人畜樹木禾稻，隨波捲去。……附近居民數百家全部財產，化為烏有，尤以涪江中興橋情形更慘，全橋被水洗去，老幼隨波而逝達三百餘人，其沿河各埠亦遭洗劫，地勢狹窄者，被水冲刷，已顆粒無收，據縣中老人談稱，此次巨災為七十年所未有。」（九月七日成都新新聞涪江通訊。）

關於鄰水的災情是：

「沿東西兩河各鄉，街房均被漂沒，農田現狀，多遭摧毀，雨止田乾，禾苗枯萎，公田概於前年耗費百萬元所建之橋，亦被沖倒，各商家所存糧糧皆淹沒，總計農田房屋器具牲畜禾苗等之損失，約在二十億元以上，災情慘重，為近百年所未有。」（七月四日成都新新聞鄰水通訊。）

此次先後兩次水災，致縣沿江財產損失約五六千萬元，被水沖沒而死者達千人以上，尤以太和鎮街市之房屋物品及樹木之損失最大，水後房屋廢產器具一洗而空，全家老小棲身無地，生活無着，相對哭泣，滿目荒涼，慘狀已極。」（本市大公報九月十一日射洪通訊。）

對東南的災情則述：

沿江一帶「萬無俱發，只有烈日下蒸發的濁水和屍臭散發災後的慘景而已。由都江至榕縣，茫茫一片，沿江市鎮，全部隨沉，舟行途中，但見一片萎黃，不能自辨所到何處。記者沿江下行時，已是災後十餘日，而浮屍慘白的死屍，仍隨時隨地可以發見。……今夏荒旱，高地田畝尚未能復種，再加上這次洪水之禍，全部絕收，可說都已絕望。」（十月八日新華日報瀘縣對東雨水災景色。）

從這幾篇簡短通訊中，已可見一般災情之慘，而尤使人休言驚心的，便是此次水災人口死亡之多，據成都以北同鄉會理事長楊錫堯先生於十九日在蓉招待新聞界報告，謂僅在合川縣屬之涪江一處，則已撈屍屍體二千餘具，此數目已驚驚人，以此一處撈屍屍體，佔全體撈屍屍體幾分之幾？

而撈獲屍體總數又佔此次水災死亡總數百分之幾？更是無法統計。中國農民的命真是不值錢啊！死者已矣，那些沒有死的，他們所有的一切，都被水沖洗得光光了，劫後餘生，穿什麼？吃什麼呢？況寒多轉眼即屆，將會使情形更加嚴重，如得不到迅速切實有效的救濟，則去死又差幾何！

這是沿江沿河受災的慘象，那些離河江遠些地區，沒有經過洪水沖洗的薄劫，比較來說，當然幸運一些，但今年入秋以來，川西、川北、川東、鄂東、鄂南、漢池瀾湖區域，及其他若干地區，都驟雨水過多，又正巧是秋收時節，農民無法收割，以致成熟稻谷倒臥田間，不是被水漂沒，便是倒落生芽，其他已收割之黃谷，亦以秋陽不曝，多水未乾，到處都有生芽霉爛現象，這種災害也是不輕的，尤其是川北各縣，本已地瘠民貧，去冬今春之間，即遭若災，其後，又遭亢旱，現又遭雨災水災，一般農民困苦，自可想見，截至最近，川省報災縣份已達四十餘縣（十月三日新蜀報）。聞川省府決擬撥款六千萬元作急賑之用，此六千萬元自非小數，但以此之賑濟論，百萬千萬之災民，每人所得幾何！我們可以用除法一除，便知分毫，何況就是這樣微薄的數目是否不經層層中飽而達災民之手呢？又什麼時候才能賑到呢？根據過去的經驗，確實不能不使人發生恐懼，發生憂慮的。

（二）『加緊催收』

土地是這樣飢饉，但政府所加諸土地的是什麼呢？幾個月來，我們最熟悉的口號就是『加緊催收』，積欠要加緊催收，今年的田賦要加緊催收，『大戶』繳糧也加緊催收，先看『大戶』繳糧的情形吧。

所謂『大戶』繳糧乃是當局謀改善士兵待遇

，於去年由財糧兩部擬定以收益為標準的累進捐繳辦法。指定：地主收益在一萬市石以上的，捐繳其收益額百分之四十；在五萬市石以上不滿一萬市石的，捐繳其收益額百分之三十五；在三千市石以上不滿五千市石的，捐繳其收益額百分之三十；在一千市石以上不滿三千市石的，捐繳其收益額百分之二十五；在五萬市石以上不滿一萬市石的，捐繳其收益額百分之二十；在三百市石以上不滿五百市石的，捐繳其收益額百分之十五；在一百市石以上不滿三百市石的，捐繳其收益額百分之十，預定全川繳糧一千五百萬市石，原定由今年一月開始捐繳，至三月底辦理完竣。本來只按『繳』字字面解釋，是含有自願的意思的，事情倒很簡單，可是政府却名之曰捐繳，又規定標準，限期徵納，這樣，又會有租稅性質，問題便複雜了。辦法一公佈，於是議論紛紛，有關於『大戶』定義的爭論，有關於公平原則的爭論，有關於推行辦法的爭論。爭論由你爭論，繳糧是不能取消的。可是結果怎樣呢？那幾所

謂有糧的『大戶』想盡一切方法在推，在賴。四川繳糧的辦法，就是『大戶』推和賴的辦法，四川規定繳糧三百七十五萬担。但並不是照上述辦法向大戶捐繳，而是：（一）從三十三年度四川備荒積谷撥交一百萬担，（二）催欠三年來積谷尾欠，（三）催收三十一、三十二年加徵徵實未繳足之數湊起來的，如仍不足，才教『大戶』出。本來繳糧原意，乃本有錢出錢的宗旨，以『大戶』為對象的一種強迫捐繳。可是這樣一來，事情便變了質。備荒積谷目的是用以救濟貧民，防備荒年的，其來源乃隨賦起徵的，徵實加成也是隨賦起徵的，這都是「一般農民共同的負擔，而現在却做了『大戶』的擔擔。巴令人啼笑皆非。就是這樣，那些『大戶』還是不願繳糧，說那些不足之數，還是在用

說方法把它壓在小戶身上，儘管小戶根本是無糧可繳，可是在那保甲長威嚇、抓人、緝打之下，先指包款要緊，所謂『大戶』繳糧，幾個月來，報紙會經揭露了多少黑幕，一般農民為它流了多少血淚啊！

這種不推行『大戶』繳糧，計劃自然不能按期在三月底完成，於是政府明令延至五月底結束，不行，又令在六月底，又不行，又改在七月底，轉月八月過去了，九月又過去了。截至最近，四川繳糧值率規定三分之一，政府雖然說是三令五申，而繳糧總是結束無期，無怪乎就罵罵下：『加緊催收，限期掃解』的命令呢！

說到田賦積欠，那更非加緊催收不可。因為『糧民』『欠』的『太不成話』了，手頭一張本年七月十六日的湖南日報，標題叫『豁免舊賦與回繳法幣』的社論告訴我一些不盡的情形，該社論開頭說：『本省民欠舊賦，經省田糧處呈准自民國十六年至二十年份，一律豁免。』聽了這句，簡直想不到今年是民國三十四年的，因為從三十四年倒溯至十六年，中間整整經過十八年啊！是什麼會造成欠了十八年的賬呢？如果是貧苦糧民，的確無力完納者，早就應該豁免了，如果是大戶頑紳，恃勢抗繳，那早應該以有效的辦法使其完納，怎麼能讓它馬馬虎虎的拖了十八年之久呢！該社論接着說：『昨行政院又令本省，自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份民欠舊賦，一律照原價還物，回征法幣，每石折合法幣一千元，並規定自三十四年七月一日起實施。』按七月米價，市石都在一萬元以上，而院令僅作一千元，對富戶說自然太便宜了，但對貧戶，却仍是一項負擔。該報在盛讚一回政府德政之後，便主張『主辦糧賦者，須加緊催追，毋使今後田賦，再有積欠，以副中央恤民裕國之旨。』結論還

是領「催」字。

湖南的情形如此。四川的情形也差不多，據今年五月川省府准財政部代電稱：川省九十三縣市局歷年官民積欠共計六百四十餘萬市石，竟據本省三十四年度征實額三分之一強，徵實徵借總額三分之一弱。（按川省三十四年度征糧九百萬市石，備糧一千一百萬市石，粵配額一百六十萬市石。）數目之鉅，至足驚人，財部對這樣大的積欠怎辦呢？那也只有定下幾條催徵辦法，請省府「督飭清追，俾裕軍食」而已。

舊欠要催，新糧也要催，為什麼？拿徐堪部長的話來說吧，徐堪部長於七月五日在國民黨中央宜部招待記者會上報告說：「因若干地區因軍事或災歉關係，不能再行增加，而軍公糧需要所關，原有存額亦不能再減。」故今年全國征實征借數字乃照七年度最後核定數額配征總額共為六千四百七十九萬七千市石，另額征縣級公糧為一千零七十七萬石，共計約七千餘萬市石。一方面既然只是顧到「軍公糧需要所關」，另一方面又的確有「軍事和災歉關係」，所以也只有加緊催征，才能達成目的。目前戰爭結束，人民還未受到勝利的恩賜，却首先管到催糧的苦頭，八月十六日川省張主席電請所屬加緊征糧。之後，八月三十日徐堪部長又電川田糧處長康寶志：「……隨時嚴加督促趕辦，連成任務，所有沿江各縣，必須提前開征，一切準備工作，務應依限完成，一面多派幹員分赴各縣督促辦理，務使提前完成。」本年度征實已於九月一日起征，在這些徵差大臣的「幹員」督促辦理之下，又不知有多少農民要滴盡他們最後血淚呀！

上，那是要當政者好好反省，好好研究，並不是只靠幾條加緊催征的命令所能辦得好的。

(三) 跌得太慘了

這三個月來的農產品價格，大體說來，是和其他物品價格一樣可以分兩個時期：日本投降前一般是向上漲的，日本投降後則一般是下跌。但是不管價格的上漲和下跌，各種物品和在各個地區是極不一致的，拿糧食說，它上漲的速率，既趕不上其他百貨，也趕不上同屬於農產品的原料。以重慶為例：上等熟米每市担的價格，在七月一日為一八、八〇〇元，七月七日漲至二〇、〇〇〇元，可是到七月十日又跌回一九、〇〇〇元，從七月十日

至八月十日一個月內，始終徘徊在一八、〇〇〇元至二〇、〇〇〇元之間。上漲不到百分之七；可是在同一時期內，美亭陰丹從每匹一五、〇〇〇元漲至一八〇、〇〇〇元，並且在七月底會漲至一八八、〇〇〇元，漲了百分之五十六；桐油亦由每市担二七、〇〇〇元漲至四七、〇〇〇元，漲了百分之七十強。為什麼這個時期，百貨都在向上昂揚的時候，而糧價老是漲不上來呢？主要原因當然是秋收季節，新谷上市，農民急於脫手所致；但另一方面，也因為囤積者為了利於扒逃，故意多方的把糧價壓低，所以我們雖然在七月至八月間，常常看見米活騰的漲，但是米價總是爬不上來，其故即在此。過去每當糧價上漲的時候，有些人就以爲便宜了農民，這顯然是錯誤的。因爲糧價上漲並不是在新穀上市的時候，而是在青黃不接的時候，那時糧食不是在農民手裡，而是在囤戶手裡，農民不但無糧可賣，同時還要用高價買回曾經用賤價賣出去的糧食。好容易等到農民有糧求售的時候，糧價不但是向下跌便是變不過別的物品，這個時期便是一個

說明。據本市徵信新聞第一五七期所載：重慶八月上旬物價與二十六年上半年物價相較，約漲二千四百〇四倍，其中食料類一千六百九十五倍，燃料類三千二百二十八倍，衣着類四千七百十六倍，雜項類二千三百二十三倍。一般說，食料類多半是由農民供給的，而衣着類則爲農民所需要購買。假如在民國廿六年上半年農民賣一石谷子便能買一套衣服的話，那麼，在今年八月上旬，農民如果買同樣的一套衣服，便要付出三十石谷子了。由這種剪刀差的物價我們更可以看到農民等變了雙唇舌頭——賣買賤買——了。

日本投降以後，農產品的價格，也和其他物價一樣的一般是步步下跌，而有些物品有些地區簡直是在狂跌，在重慶，桐油會由最高的每市担七萬餘元跌至一萬餘元，粗絲由每担一、二〇〇、〇〇〇元跌至三〇〇、〇〇〇元，土棉紗由二十萬跌至三萬餘，大煙葉由每百斤六一、〇〇〇跌至三四、〇〇〇元，重慶的米價跌落速度是比較緩和的，上等山熟米由最高的每市担二一、〇〇〇元會跌至一三、〇〇〇元，河熟米由一八、五〇〇元會跌至一〇、五〇〇元，但我們不要忘記，這是重慶，四川幾條大江的水災剛剛過去，這當然是影響到重慶米的原因，何況四鄉的米價又必定遠較重慶爲低的呢！據十月五日新華日報昆明通訊謂：石屏米價每石四萬餘元之跌至五千餘元，開遠煙葉山每斤七千元跌至三百元。十月七日日本大公報亦報導陝西棉花由每市担十五萬元跌至一萬五千元，這種農產品價格瘋狂的下跌，將會在農村造成怎樣的惡果？大公報同一篇通訊中我們報導了一個可怕的解答，因爲棉價太低，人工太貴，「因之棉農棄花於田，不事收穫，不特棉農負債無法清償，且以缺錢購糧

(下轉第七五二頁)

從「官復財民遭難利災」說起

黎 望

從勝利的歡騰中靜下來，收復區和大陸方的人民漸漸感到「勝」而不「利」了。那些過去用繩索網網羅不盡，上戰場犧牲，無過九死一生，冷槍貼熱，好容易換得幾次昇遷的行伍軍官，沒有得到勳獎，却遭到「編餘遣散」；那些隨着政府流離轉徙，用生產支持抗戰的工業家，勝利聲中被迫停工減產；那些以生產資敵的收復區廠主，被要「待罪立功」，而這些已經為國家奉獻出自己的辛勤的工業却還要「立功待罪」。那些在流離前、車床間或者紡車上，用自己的汗血為勝利的道路打下基石的工人，勝利帶給他們的是裁員，遣散，失業和飢饉。至於那些在偽統治下忍辱不屈的收復區人民，淚眼矇矓引領望王師的結果，是物價的高漲，敵偽的橫行一如往昔。那些從天上掉下來的，或者從地下鑽出的一切一切，帶給他們的是更為深重的災難。他們渴望和平，但他們却目睹有人在蓄意的埋伏和散佈戰爭的種籽。他們渴望消滅敵偽，但他們却目睹着對敵人的「寬大」，對良好的「優容」；那些舊日壓迫他們的「暴君」，仍然高踞在他們的頭上。他們

渴望合理的生活，但他們遭到的却是物價的飛漲，失業的危機。無怪乎收復區的人民懷疑究竟誰是「勝利者」來了。至於那些帶着勝利的榮光到收復區去的呢？他們忙着的是與敵偽杯酒歡，感謝他們的維持秩序，或者是弄汽車，槍洋房，買黃金，洋澄湖的大蟹，南京的板鴨……反正袋裏有的是法幣、關金，大可「及時行樂」。也就難怪隨着勝利游行的行列裡，那些「衣衫破舊，隊形不整」的民衆，「制服褪色，滿面灰塵」的學生，使他們感到「不相稱」而發出「感慨」了。

雖然這些人是那樣的「愛敵人」，和那些酒醉着中國人民的鮮血的敵人握手言歡；對那些助敵為虐的漢奸「優容優遇」，但他們對人民却又是那樣的嫉恨和作踐，為着兌換三張鈔票，他們可以「一把火把烏山鎮燒光」（見十月廿四日大公報），拉走了壯年人，逼着老少流亡（這該叫「做勝利的流亡吧」）。忽想那些江東父老們在敵偽壓迫下，日夜以淚洗面，期待着祖國的反攻，在瀾天的轟炸中呼喚着自已的同胞，呼喚着祖國的援救；甚至在午夜夢迴的時候，也在凝神諦聽着祖國軍民反攻的腳步。然而，曾幾何時，他們已經由渴望、期待變成憎惡與厭倦。這是「誰為之，孰令致之」呢？收復區的老百姓日暮蒼黃仍依然竊踞高位，已經血淚交迸的控訴：「下次再抗戰，王八孫子才不作漢奸」，如果收復區的老百姓有一天竟然感到還不如做敵人的奴隸時，我真想問：究竟我們的勝利呢？還是敵人的勝利。

當黨義一器，忠奸不辨的時候，也正是民族的正義盡斃，義利和是非之辨被混淆的時候。

八年的抗戰已經鑄鍊了人民的自信，中國人民已經有足够的力量來反對一切不合理的災難；人民需要和平，期望團結，要求合理的生活，這並不可能希望誰的恩賜，也決不是乞討，或者叩首求憐可以得到的。當他們從絕望的期待，無助的呼號，跪地的懇求中醒過來，他們就會用集體的力量，來爭取一切的實現。一萬萬以上的人民，不已經做了光輝的榜樣嗎？

改革土地與爭戰

保加利亞怎樣解決土地問題？

第米特洛夫著 焦敏之譯

紅軍在打擊侵入蘇聯領土的法西斯軍隊之際，不僅以肅清在蘇聯領土上的危險為目的，而且還想幫助陷在法西斯德國鐵蹄下的歐洲的一切民族。斯大林元帥在戰爭開始之際時曾經這樣說過：「我們為我們祖國的自由而進行的戰爭，與歐洲及美洲為他們的獨立及民主自由而進行的鬥爭交織着。」

祇是因爲有紅軍的援助，保加利亞人民才得到解放，得到了建立獨立民主國家的可能。

保加利亞，是一個農業國。在保國的農業中農業勞動者差不多佔全體工人的百分之八十，百分之六十三的國民收入是來自農業。所以，保國人民的命運，簡直要看國民經濟這一部門的狀況而定。在民主的原則上去改造它的時候已成熟了，農業的發展更依靠這種改造，保國大部分人民物質生活的改善也要依靠這種改造。

保加利亞基本的農民是貧農。約百分之四十的農民土地所有者，不得不另外租種土地維持生活。地租的納納純爲貨幣形式，但是也保存着自然地租的形式，如：物品地租和勞役地租。無土地的農民及土地少的農民，是保加利亞農業發展的基本障礙，是勞動農民物質貧困的泉源。

谷類在農產品中佔第一位（百分之六十二），每年的收穫量爲三四—三五（百萬）公石。第二位爲工業的農作物，首先是煙草。牧畜業屬於附屬的地位。和牧畜形式的經濟是例外。

德國法西斯軍隊的侵入保加利亞，以及一九四一年春天保加利亞加入三國公約之後，便引起了國內整個經濟狀況的劇烈的惡化，尤其是保加利亞的農村。德國人操縱了保加利亞的農業部。保加利亞大部分生產產品的銷售，都被宣佈由國家獨佔。爲了保證糧食運入德國，成立了徵收農產品部，這一部分本質上就是德國駐保加利亞兵站總部的分部。低價收購保國農民的糧食，但工業品輸入保國後，還是以很高的價格出售。

大衆糧食的輸出，可由該國糧食的平衡來說明。後一滴牛奶也運走了，不僅是成人注定了飢餓，小孩也同樣注定了。皮革及羊毛也運走，保加利亞的人民都赤身露體。

德國人儘利用其它的方法剝奪保國人民。比方德國就竭力鼓勵保加利亞農民不種五谷而種水菓及蔬菜，以很多的利潤來誘惑他們。當許多區域專門種水菓及蔬菜時，德人又拒絕購買新鮮蔬菜及水菓，而對於罐頭廠則又將價格定得很低，使農民窮

全破產。

德國人使保國的煙草種植家也破產了。大多數保加利亞的區域，都出產上等的芬芳的煙草。但德人宣佈他們祇買下等煙草，結果保國的煙草生產家把上等煙草按德人規定的下等煙草出售，農民全家挨餓。

由於德國侵略者及其保國幫兇的統治，結果使國家窮困了，引起了尖銳的飢饉及商品的飢荒。保國農民中的貧農採用各種的手段，公開在議會中評論並在報上登載。保國人民痛苦的生活和他們在政治上全被壓迫，是在相並行着的。人民祇要表示對現狀有些微不法，多少有點懷疑，同情蘇聯及其紅軍，便被捕投入德國的秘密警察管制下的保加利亞集中營的地牢裏去。

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紅軍進入保加利亞領土。全體人民非常熱烈地歡迎解放者俄羅斯兄弟們。德軍被紅軍逐出保國邊界以外，在國內建立了民主的政權——愛國陣線政府。

保國新政府規定出了一個在廣大的途程上發展農業，並在這個基礎上拯救保國勞動農民於飢寒流離的任務。依照這個宗旨，愛國陣線政府草擬了一個方案：分給無土地及土地少的農民以他生活上必要的土地，這些土地由國有土地，寺院的土地，教會和給貧農的土地來供給之，並把超過二十公頃的土地也奪來歸社會。

同時民主政府又以保存土地爲藉口而援助願意組織合作耕作的農民。在援助農民以及組織合作耕作的時候，民主政府是根據着這個理由來領導：祇有鞏固破產的小農經濟，才可以建立利用農業機器的好條件，所以，這就是使生產品大增，勞動農民的

（下轉第七三三頁）

論科學的預見

(續完)

華西里也失作
凱豐譯

斯大林同志是卓越的科學家，他計算空間不是形式邏輯的，而是科學的、辯證的估計一切具體的條件。而首先是估計居民的階級成份。伏羅希洛夫說：「在國內戰爭中，普通算術是很不夠的，而且往往錯誤的。」從察里津到諾沃西伯斯克的路程如果照地圖上計算，形式上是會近些，可是要經過對紅軍不利的地區。從圖拉到諾沃西伯斯克的路程，照地圖上看是要長過一倍半，可是因為經過卡爾科夫頓巴斯工人區，那裡的礦工等待著紅軍，有他們的游擊隊與鄧尼金進行鬥爭。

黨中央採了斯大林的計劃，並開始實現了。伏羅希洛夫說：「國內戰爭局面就此改變了，鄧尼金的匪軍被趕到黑海去了。」

斯大林同志的預見完全證實了。

斯大林的這種光輝的科學的預見教育我們，應當怎樣來領導為共產主義的鬥爭，善於預見將來。

為着了解環境以及定出正確的決議和計劃，必須是嚴格的和最確切的分析和估計條件，空間和時間。斯大林在擬定自己的機械鄧尼金的計劃時，他從各方面的估計鬥爭條件的總和，鬥爭條件的一切優點和缺點；第一，進行鬥爭那裡的居民的階級成份；第二，有鐵路線，和鐵路在鬥爭中的作用；第三，鄧尼金的軍隊被兩股的作用；第四，有馬哈諾士匪存在及他們與鄧尼金的鬥爭；第五，可能使哥薩克與鄧尼金內閣——因此，瓦解鄧尼金的軍隊；第六，燃料（煤）在經濟上的重要作用；第七，道路的情況（無道路的）。

斯大林的這種全面的估計鬥爭條件，這種天才的機械鄧尼金的計劃，教育我們每一個人，為取得勝利，應該怎樣處理自己的工作，在鬥爭中應當怎樣來利用辯證法。

大家都知道，集體化和在全體的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是最深刻的革命變革，照它的結果來說，等於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底革命變革。這在一九二四年，斯大林就看到了這種的偉大革命動作。當時，在十月革命七週年紀念時，斯大林在「季拉真」工廠工人的紀念冊上寫了下列的願望：

「我願望於「季拉真」工廠工人，也有如願望全俄國的工人一樣，使得村莊達到頂點，使得俄國無產階級的數量在最近時期內達到三千萬，使得農村集體經濟旺盛，並使得私有經濟屈服於集體經濟的影響下，使得高度的工

業和農村集體經濟把工廠的無產者和土地的勞動者融合為一個社會主義的軍隊。」斯大林的願望——天才的預見，現在實現了。

還舉下列的一個事實。在一九二九年，秋季，開始了世界經濟危機。在危機開始的前幾星期，當時的美國大總統胡佛發表過演說。美國的學者，依照胡佛的指示寫了一本很大的著作叫做「美國經濟的變動」，胡佛根據這本書，斷定美國進入了永久不變的繁榮，在繼續演說後的幾星期，許多洋行和銀行開始倒閉了。胡佛狼狽的回答說：「不要緊，這只是暫時，部份的障礙。一切還是照前很好的進行。」只隔幾個月胡佛及其學者痛苦的破產。世界經濟危機開始了，以空前的大力量深入和擴大。資產階級的科學明顯的暴露了它的無能力。它不能預見事變。它的預見沒有被證實。馬克斯列寧主義的科學的預見，確切的指出了資本主義世界的事變的進程。

「我認爲在歐洲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危機底成份正在生長着，而且將來還是發生長着。資本主義可以局部的穩定，可以使自己的生產合理化，可以暫時的壓榨工人階級——這一切均當，資本主義現在都還可以做，但是，它已不能恢復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前那一種「穩定」和「平衡」狀態了。」（註三七）

事實上正如斯大林預言的。從一九二九年起，世界危機以空前的力量爆發了，延長到四年多。證實了斯大林的預見。馬克斯列寧主義的科學的預見是勝利的「科學」。

為社會主義勝利的革命鬥爭，沒有革命的覺悟性是不可能的。這種覺悟要求為社會主義的戰士揭破黨的敵人。斯大林同志這種教育我們。

在這方面，斯大林的預見的標本——就是他在一九三三年正月中央全會上所給我們的指示。這個預見明確的告訴我們，斯大林是革命鬥爭的天才的妙手，他武裝我們黨以鬥爭的前途，達到勝利的一般的道路和條件所必須的知識，紛紜和完全消滅敵人底條件的知識。

「要知道，蘇維埃國家的實力的增長將加強垂死階級最後一些殘餘的反抗。正因為垂死階級最後一些殘餘將死亡，末日將至，所以他們將要從一些掙扎形式過渡其他更激烈的掙扎形式，號召民衆中的落後階層，動員他們去反對蘇維埃政權。沒有一種侮罵和誹謗不會爲這些過去的人物用來反對蘇維埃政權，沒有一種侮罵和誹謗不會爲他們企圖用來動員落後份子。在這個基

礎上，社會革命黨，孟塞維克黨這些反革命的敗壞集團以及中心的和邊疆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底殘敗集團，能夠活躍和運動起來，托洛茨基派和右派組織的反革命的反對派份子底殘餘能夠活躍和運動起來。我們雖然不怕這點。可是，假使我們想迅速的和不作特別的犧牲而消滅這些份子，那就必須要注意這一切情形。

大家都知道，在國際問題上以及在蘇聯內部問題上。斯大林同志還有許多其他的預見。如關於戰爭的兩個策源地，關於蘇聯工業化，關於社會主義的進展和五年計劃等等。

黨在為共產主義而鬥爭的科學的領導，預見將來的領導明瞭的證據，就是已經公佈的莫洛托夫的「關於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第三個五年計劃」。斯大林所領導的黨，向全世界指明了，他圓滿的了解了社會發展的規則，並利用這些規則來自覺的指揮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及第二個五年計劃都指出，在蘇聯，人類生存的強勁的條件就是人為主腦和主宰，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自覺的運用社會法則。一九二七年在全國大會上斯大林同志說：「我們的計劃……是指令式的計劃，這種計劃對一切領導機關都是必須履行的，這種計劃確實在全國範圍內將來國民經濟發展的方向。」

這完全精通這種複雜的專業，如像在蘇聯這樣一個大的國家發展國民經濟的計劃性。

過去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它如第一個五年計劃一樣，指出了黨和政府正確的決定了全國經濟發展的方向。這就保證了並保證着順利的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建設成共產主義。

「由於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的結果在蘇聯，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歷史任務已經解決了——一切剝削階級都已經被最後的消滅了，產生剝削人現象和剝削社會為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種種原因，已經完全剷除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困難的任務已經解決了，農業集體化已經完成了，集體農場制度已經最後的鞏固了。在蘇聯，「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社會主義，在基本上已實現了」（斯大林）。社會主義的勝利，已用法字樣固定於蘇聯新憲法中了。」（註三八）

註三六 伏羅希洛夫，「斯大林與紅軍」
 註三七 「斯大林與外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
 註三八 莫洛托夫：「關於蘇聯國民經濟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報告提綱」

六

我們考察了科學的預見大體上說許多卓越的科學天才的預見是通過科學的

，列寧——斯大林預見這種事變進程的聰明才力。

馬克斯列寧主義的理論教導着：

（一）沒有預見，布爾塞維克的領導為共產主義的鬥爭是不可設想的。

（二）為預見，必須懂得離開人不依賴人而存在的自然和社會發展的規則。

（三）馬克斯列寧的理論給予對這些規則的知識。

（四）根據發展規則的知識，可以預見一般的道路，發展的一般的路線，一般的前途和鬥爭的目的，一般的趨勢。如果以為一切都可以預見得到，一切事情的細小的節目都可以預見得到，那是把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庸俗化。

（五）歷史的過程是非常複雜的。它是由各種各樣現象底相互影響而組成的。可以估計和了解只是必然性，這種必然性通過大量的偶然的現象，離開發展的基本路線的輔助的現象。可是，因此誰認識了發展的規律，發展的一般方向，發展的基本線索——誰就獲得了自覺性，誰就能預見。

（六）發展規則的認識——必然性的認識，就使得人類在自己的行動中成為自由的。「自由就是必然性的認識」（恩格斯）。自由的行動就是根據必然性的認識，根據發展的一般方向的認識的行動。

（七）誰懂得自然和社會發展的規則，誰就獲得了預見，同樣就不僅懂得解釋世界的武器，無且也獲得了變革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

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科學的理論，共產黨的理論，是唯一的獲得這一切的特質的理論。

（八）這種理論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內和在馬克斯和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全集解說過的。

馬克斯列寧主義的黨底理論，獲得特別的力量和活力。這種理論的力量在那裡呢？

「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的活力和力量就在它依在正確的反映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先進理論之上，把理論提高到應有的高度而認為必須澈底的使用它的動員、組織與改造的力量。」

偉大的斯大林所領導的我們的黨，武裝起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是無敵的，因為它懂得把事情引導到何處去，並怎樣去引導，而且它不怕困難。

這就是對蘇聯走向共產主義的勝利運動，對共產主義在蘇聯和在世界上完全勝利所必需的基礎的條件。

文 雜

如此省主席

荀 寰

當大敵當前，日寇國土百里的時候，一羣英雄

豪傑們頭腦所忙的是如何奮勇退却，怎樣激運

自己翻鞍，有的竟跪到了後方，有的雖在本省，也

不過是備處一隅，和敵人勾勾搭搭，相安無事，默

爾無言。但等到頑敵投降，就慌忙趕上前去，雄糾

糾、氣昂昂跑去收復別人早已解放了的國土；這還

不算，受降之餘，跑到後方來大談其抗戰八年的經

了。何等巧妙，何等方便！

這是山東省政府八年抗戰成績之一。

以這樣的人去辦接收工作，自然容易。抗戰雖

無殊功，受降却有妙法。妙法何在？曰：

第一必須媚敵：九月四日山東省主席何思源接

見「中日記者團」，發表談話，首先對濟市仍由日

軍維持秩序，表示「欣慰」與「感激」，并稱讚這

「討伐」。

因此，就有了任務。

第四必須反共：何思源有兩句名言，叫做：「

寧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以

不打。」日本既投降，更公開有了實因，於是就

起而「打共」。向解放區進攻八路軍。受傷的敵軍

，當然會得到大中華民國山東省政府主席何思源的

慰勞，上次慰勞一百萬元，有點窮；這次是向濟

他其及「政德」的仁德

震危

儘管傳說虛傳，昨夜又決不可能變成肉子，用不着甚麼照妖鏡，只要動一動眼，一睜口就會露出醜態巨獸，鬼氣陰森的眼光，縱是凡胎肉眼，只恐從堆砌的脂肪中間，也不難看出牠滿臉鬼氣。狐狸靈管靈裝，却掩不盡一身惡氣；孫悟空七十二變，還隱隱的却有一條畜生的尾巴沒處交代。口說無憑，無妨抄錄一段報紙，這是上距敵寇無條件投降兩月之後，閻錫山氏在重慶對記者的談話：

「太原敵軍司令薄田中將一文雅得很」能作中國詩，對中國老百姓「沒有」什麼傷害。三任偽省長蘇德仁，馮司直，王慶都在太原城，都是親民之官，未加以扣押。蘇德仁的「德政」碑，應老百姓之請，沒有推倒。偽保安隊也一直接護我方委派的縣長。所以太原城裡沒有漢奸可扣押，僅僅在外縣扣押了一兩個。」（十月二十八日新民報）

如果這段話是在敵人投降前，發表在敵偽的報紙上，我想一定不會有人感到懷疑，因為給以恩惠好的罪行開脫，偽黨中因抗戰的人民，原就是「好的傑作」，然而，這却是在抗戰時期的首都，由一位中國的軍事長官的口裡，這真不知道是「原行舉現」呢？還是「不打自招」！

丟開敵我之分的民族大義不說吧（對這些侮蔑中國人民，為敵偽粉飾的人是談不到這些的）！中國人民在敵寇的侵略下流的淚，流的血還算少嗎？這些吃苦受難的中國人民，不也有你的兄弟，我的朋友，他的親屬嗎？只要想一想敵人的燒、殺、淫、掠，「三光政策」，「盡滅掃蕩」，「無人區

」，那不能不令人髮指俱裂；敵人的暴行曾經激起全世界有正義的人士的憤恨。以山西的人民遭遇來說吧，流使他們流離轉徙，流血犧牲呢？中國人民的交難，雖然引起全世界有正義的人，但閻錫山君率隊人却是一文雅得「沒」，敵人所「中國人情」，連人類最低限度的同情心都消滅了民是不允許用這種奴才的唾沫來侮辱已死的活着的人民的。

蘇德仁之為漢奸已是鐵一般的事實，但在閻錫山氏的談話就成了「親民之官」，他是「親民」，「還是「親民」，是「官」還是「奸」呢？敵我不分的閻錫山氏當以偽官，中國人民的眼睛却認得雪亮的。雖然早在抗戰初期，閻錫山氏已經是兩面三刀，和敵偽勾結往還，勾勾搭搭，配合反共反人民，營謀三窟，但是人民的軍隊，抗敵的軍民却是「抬着棺材打死」，義無反顧的。

閻錫山對敵人的滿懷恐懼，對漢奸的頌讚有加，恐怕又是「三窟」！如果說敵人投降後曾經有過一些偷偷摸摸，企圖為漢奸洗刷和粉飾的事情，那些「知還不能不說要漢奸「戴罪立功」，「棄暗投明」，至少還承認了漢奸過天的「罪」和「暗」，在閻錫山的口裡，漢奸對不僅無罪而且是有「德」可「頌」了。蘇德仁究竟有何「德政」呢？在全國抗戰軍民眼裡，他固然早就聞名昭著，千夫所指了，但對於閻錫山，却真是厥功不可沒呢。遠在戰前蘇德仁就被閻錫山派與敵人秘密勾結，聲氣相通，抗戰時奔走敵間之間，真可是風塵僕僕，備極辛勞了。如果說是要為蘇德仁頌德歌功，該不是山西人民，而是閻錫山自己。

蘇德仁的「德政碑」雖然沒有推倒，與敵偽流寇一氣者的假面具却已戳穿；幸歎，不幸歎！

與事實不符」，諱其「徒速更正」。真是有路大路風景。然而事實終於是事實，無法掩飾。待得何主席又來一次談話，這次是自己打自己耳光，而且打得頗為臉紅耳赤；二十二日他說：「魯省各地災情極重，蓋本年由于旱澇並發，麥之收成僅及三成，民食已感不足，更加敵寇蹂躪剝削，農村有存糧被搜一空，城市糧食尤感缺乏……如今勝利已獲，而魯省人民反益陷水災火熱之中……」前後談話，不過相隔二日，實際情形是相距如懸殊！一則不僅自給，且有餘接濟他省；一則各地災情極重，城市糧食尤感缺乏。前後矛盾，自打嘴巴，請問：叫讀者相信那一次談話？何主席的話，究竟哪一句是真話？不得而知。何主席者，可謂黨中中之尤矣。

但是何主席恬不知恥，「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第二次談話兩日之後，于是乎登上飛機，真驕然，到山東上住去了。厚顏之術，何主席是深得其中三昧的。

如此主席，「魯省人民」怎麼會不「益陷水深火熱之中」？不過山東人民不會就此甘休的，請聽濟南廣大市民的叫聲：「難道日寇屠殺了中國人，還要我們感謝嗎？」「動不動就是一千萬，我們真是應付不了這些官老爺。」「咱們不知道誰投降了誰！」「這些東西辦不了好事的，漢奸又變成大官了。」

這反人民意志的人，他必一定會在人民面前食其後果的。



晉察冀行進

周而復

人類公敵的暴行 一個不完全的統計

這一次敵寇集中四萬兵力，「掃蕩」邊區，和過去不同，這次叫做「毀滅掃蕩」，敵人企圖徹底摧毀邊區，把整個邊區造成一個「無人區」。然而這只是一種幻想。

經過三個月的激烈的反「掃蕩」鬥爭，邊區一千二百萬的平民，終於把敵寇打跑了。

但是在這反「掃蕩」的三個月當中，在敵寇「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之下，邊區遭到野獸所給予的空前未有的災難。敵寇的罪行，應該公佈出來，讓全世界的人士都知道，東方法西斯日本海盜，在中國解放區所幹的什麼勾當。

不過，我這兒所得到的還只是些不完全的材料。

在晉察冀邊區的北嶽區二十一個

縣份，約有一百萬人的地區裡，敵人獻幹了這些罪行：

慘殺六千六百七十四人（內負傷者九百七十六人），

燒毀房屋五萬四千七百七十九間，

搶掠與燒燬人民食糧二千九百三十四萬斤，

搶走耕畜一萬九千三百三十七頭，

搶走耕牛五萬七千八百七十九隻，

搶毀農具十七萬二千六百二十五件，

搶毀衣服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三十三件。

顯然這統計是不完全的，比如敵人進入解放區到處搶劫人民所壓斃的

東西，人民留在家中的一切日用品，這就難統計了。而人民被殺害也絕不止六千多，並且敵人的殺害的方法：活埋，打靶，吊死，刺殺，滾水服，毒氣毒死，餓死，鎊死，碾死，喂洋狗，煮死，腰斬，懸崖摔死……以至於肢解，剝心，鑿眼，剝皮……這些，有的是在死前就肢解等，有的則在死後還要把心掏出來。

血海深仇

敵寇敗退以後，邊區的房子傾廢在廢墟中，甚至連每一村莊，墳地不被敵人燒燬了一部或大部，被屠殺的屍首更處處皆是，在自由的土地上，流着一片復厚的紫黑的血層。

最殘暴的是敵人在平陽的罪行。平陽慘案的罪惡是兇井，他部隊還有專門殺人的隊伍，叫做「紅部」。當他從黃口開會回來，「紅部」就忙起來了，在村裡逮捕了許多老百姓，驅使到屠殺場去，一天之內殺死了一百

四十人。當他的部隊被打敗，撤退的當夜，他集合了六十多個婦女，問她們是要跟隨走，還是回家。她們沒有一個願意跟着去被污辱的，都被敵人剝去衣服，砍了頭。另外，敵人還把村裡一些男女捉到廣場上，脫掉他們的衣服，強迫他們赤身裸體地跳「秧歌舞」，然後又強迫他們在大眾面前集體性交，不肯的，馬上就砍掉頭，有的就用褲子包着頭，推下懸崖摔死的。

曾經有一位孕婦，被敵人捉住了。失去了理性的日寇，把她放在一口棺材裡，另外叫來二十多個婦女，把她們衣服剝光，命令她們站在旁邊目擊獸行的進行；首先敵人破開她的胸腔，胸前的皮肉給撕到乳房旁邊，掏出了一顆鮮紅的心；接着又破開她肚子，用刺刀進去挑出一個未足月的胎兒，胎兒何辜，還沒有出世，就被日本法西斯的刺刀了！棺材裡流滿了血，母親就浸在血裡。二十多個勒令旁觀的婦女掩面不忍看下去了，

敵人趁此威脅她們：說她們如果要回去，就照樣的被殺，而且心裏炒了吃的。這並不是一句空泛的威脅的話。實實在在做了，並且不止一次。土山村李小更幾個人，就是被敵人擄下炒了吃的。羅村劉德梅領着被敵人擄去，敵人欲下她的頭，扔到井裡，同時從繩上割下肉來，去包餃子吃了。

過去，我總覺得「吃人的魔王」不過是憤怒到了頂點時候說出來的一句罵人名詞，現在才清楚用在敵人身上是證明一件事實。而且還不能完全說他殘忍的面目來。

這樣殘忍的罪行不止在平陽，在井陘縣黑水坪老虎窩村，村裡一百數十個老百姓中敵人烈性瓦斯彈而死了，皮膚變成了紫色，腐爛，最後化成了血水。村裡村外遍佈着屍首，有的被敵人燒死了，有的吊在屋樑上，有的被開水從頭上澆下燙死的，有的被石頭砸死的，有的六七十歲的老太婆被擄去後，死在牆角角落，陰戶裡塞了一根木頭。

在平山縣南村，十二月十二日敵人包圍了村子，村裏大部分老百姓給圍住了，敵人帶了十七個老百姓走到一條深溝前，叫他們自己解開鈕扣，反轉起來，馬上把他們推入溝內，野獸們就從上面刺下來。一個十五歲的小孩，不忍看見這種慘無人道的獸行，他掉過臉來，低下頭去，他底肚子上面印中了敵人的刺刀。這是一種

有的，敵人叫幾十個老百姓指高梁，帶到大溝裡，叫他們把高梁糧放下來，前面是一堆火，命令他們面對着火，然後幾十個敵人從背後山上沖殺下來，四處都是敵人，中間是火，這幾十個人便活活地燒死了。敵人看人被燒焦時發出那種慘厲的叫喊，竟然拍手狂笑起來！

這些，都是比較著名的，傳遍了邊區。至於敵人在平山焦家莊用鋼刀鎊死二百多人，敵退出時，人用的門板的血跡堆得有半寸多高，兩個水井裡是濃稠液體的屍體；又如柏葉溝，敵人退走時把村中所有的人，在路上把婦女的衣服剝光，強迫她們跪在路旁，然後把所有的男子全部殺光，這叫「陪殺」；其次像在柏崖村，敵人用一口大鍋澆水，把水燒開了，扔下兩個活活活活的小孩，活活煮死，一個婦女被輪姦後，也同樣被活活煮死了。——這樣的暴行幾乎到處都有，寫不完的！

這些事是人能做出來的嗎？即連野獸也不會殘忍到這步田地吧？只有披磨人的外衣的法西斯野獸才能做出來的。

暴行的自供

前面所記的，不過是傳聞開來，或者是暴行之後的遺跡，是很不完全的。一九四四年二月七日，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召開了一個座談會，又給我們補充了一些。當然，這也還是極少的一部分，因為工農學校的學生有限，出席的人不多，但我們從此可以更深一步看到敵人殘暴的面目。我這兒僅把那次座談關於警察翼之部記下來：

一九三八年六月，獨立第三混成旅團有一個長谷川中隊長，在河北臨縣捉了兩個八路軍，把他們背綁起來，帶下山下，連起眼睛，送在壕溝面前站着，讓我們五個幼年兵，去練習眼力，去刺殺。我們有些害怕，把眼睛閉起，只是刺上了眼睛他們就倒下壕溝裏去了。以後從溝裏又把他們拉出，又讓別人來刺。最後又由中隊長把他們的頭割去了。

一九四二年七月，我（月田自稱）在太原時，開村事次大將，每隔十天，就在太原門外集台六十個俘虜，排成一列，脫去上衣，背綁起來，讓幼年兵刺槍，還在痛得呀呀叫的時候，就用手頭土塊活埋了，一個月內殺了二百多名。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七師團小原大隊下面憲兵軍曹藤，在河北任邱，把二十八名八路軍放在棚中，胸圍被帶着槍的士兵看守着，讓二十四隻軍犬去咬他們的咽喉，胸膛，人臨死掙扎的時候，軍犬的咆哮聲，雜在一起，實是慘不忍聞。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混成第八旅團駐在河北省沙河縣，佐野中隊長的伊藤軍曹，解剖了一個老百姓，將肝取出，說是能治婦人病的一種藥，而

偷偷地販賣。還有一九四一年九月安部中隊長，渡邊軍曹，佐佐木伍長三人爲了醫治梅毒，將老百姓的腦袋打破，取出腦子來。

混成八旅團的田中中佐，在一九三九年「掃蕩」時，曾舉高懸着紅十字旗的八路軍醫院，把病人釘在牆上，挖掉眼睛，割掉鼻子，耳朵，生殖器，然後總死。

同時混成八旅團的井上中佐把一百多名的八路軍和老百姓，一部份用機關槍射死，一部份裝在棺材裡燒死。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師團長安達中將，在馬縣殺牙山將五十名難民婦女刺死，並將她們的屍體，送彈藥，並裝在彈殼裏。這把幾十個老百姓放入井裡，從上面丟下石頭砸死。

一九四〇年六月，冀南縣城門時，三十五師團又集三千多名老百姓，話，圍圍定「日軍殘殺中國人民」後，從四面用機關槍十幾挺將他們射死。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師團長桑本中將在宿縣射死一個抱孩子的母親，孩子不知覺地哭了，被當母親的奶啼哭。又同師團上校佐佐木在冀中，將婦女綁在樹上，用中國人的手榴彈炸死陰戶，屍體在六丈來寬的地面拉線炸死她。

一九三九年混成八旅團後澤中隊長，在晉縣用刺刀剖開兩孕婦肚子，拉出小孩來，劈開小孩的腦瓜，並在腦瓜上貼一張紙，上面寫上：「八路軍殺的」。

一九四二年混成八旅團水上少將，在定縣把避難在地道的八百餘老

大約是不常讀史之故，像許多天真的朋友樣，我也有過這樣的懷疑：爲甚麼舊時的統治者，對於外族敵人，常常不惜屈辱、妥協、苟安求活，自毀以求濟，連玉帛、送女兒、稱臣、稱弟、甚而當兒子也願意幹！但是對於自己人却是顯橫專恣，使用暴君的專橫淫虐。這種所謂「人而人，又顯敵事仇的勾當，到了清朝的「寧贈友邦，不與家奴」，可以說是集其大成。

其實，統治者的這種行徑，只要仔細的想一想，道理也似乎並不怎麼難解。因爲這些統治者就是和人民作對的，他們的統治是建築在對人民的奴役上，也可以說他們的統治是建築在隨時可能爆發的人民的火山口上。外來的侵略雖然也可能威脅到他們的統治，但人民大眾却是更直接的被損害者。在歷史上我們就不斷的看到，人民反抗異族侵略的血跡猶新，而統治者和敵人却已經是在杯酒言歡了。

付度這些屠敵事仇者的心理，自然是因爲既和全體人民的意志作對，則在統治的基礎感到動搖時，就繼續假手敵人的力量來幫助自己統治人民，至於因此而不免要獻出子女、玉帛、割地稱臣、犧牲人民的利益，在他們看來，自然還是合算，因爲子女玉帛反正是從壓榨人民得來，現在不過是加重賦斂，仍然是取償於民，雖然斷送國家民族的利益，他們會覺得畢竟還開了一己的統治。媚敵事仇者的如意算盤不成功，使國家變成了外族侵略者的附庸、奴隸，但這些爲一己私利之私打算的人看來，媚敵有功，總不難分到一杯殘羹冷炙。侵略者面前成了奴才，轉向人民仍然可以兇橫如狼。

從石敬瑭起一直到許多津津樂道的中興名將，衣鉢相承的幹着媚敵事仇，鎮壓人民的伎倆。沒有軍費不妨向外族敵人去借，沒有槍炮，也儘可以向侵略者去購買！壓榨人民的血汗，買來這些殺人的武器，又用來屠殺人民。更

驚險的是編組異族的軍隊來屠殺自己的同胞，這是滿清統治者被殺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傑作。

歷史的戲院不遠，而媚敵事仇鎮壓人民的例子又已層見於今日。而這些心喪病狂者的卑劣是還駕乎他們的先輩的。中國人民八年奮戰，創鉅痛深的時候，這些石敬瑭的「北先遣隊」，向八年血戰的解放區人民「收復失地」了。那些滿臉着中國人民的鮮血的敵人已經被頌讚成「文雅」，厚顏無恥的在歌頌助敵爲虐的「德政」，這不但發揚了一切死去的戰士，也污蔑了一切活着的中國人民。當發揚的中國戰士還在敵軍集中營裡飢寒交迫，收復區的人民啼飢號寒的時候，而媚敵事仇者竟然不顧人民的死活，勒索人民的巨款去慰勞敵寇；慰勞者的用心是不難理解的，因爲這些敵人雖然表面上投降了，但手裡仍然執着武器在進攻解放區的人民，而在這些人眼裡，解放區的人民是遠比敵人「可惡」的。如果歷史上的媚敵事仇者是向強大的異族屈辱求濟，而這些石敬瑭的子孫們已經下流到向敵寇的敵人，投降了的侵略者乞援了。

石敬瑭的子孫

路達

解放區的人民爲甚麼這樣的不惜拋棄敵人，假手敵人來摧殘毀滅而後快呢？難道他們不是在八年抗戰中用自己的生命，血汗來捍衛祖國的土地，難道那些被敵人屠殺的不是親如手足的同胞嗎？如果說他們有甚麼不同，不過是在八年抗戰中他們得到了民主，成爲自己命運的主人罷了。爲着和平團結，他們不是全屈求全，從那

些用自己的血汗，從敵人手裡解放的土地撤退嗎？但今天任何想使解放了的人民再回到被奴役的狀況下是不可能的了。江南的人民不已經響亮的宣告：「江南的人民，可比從前了！」

寄語一切媚敵事仇，多行不義的人們，人民的力量像海洋，任何狎戲水蛇的弄潮兒，都免不掉滅頂的命運的。

姓用毒瓦斯毒死……」

够了，不必再記下去了。

罪犯的名單

現在日本已經無條件投降，法西斯的野獸們，對中國人民的屠殺應該得到應有的懲戒，應該把這些罪犯送到各個舉行地點，由被難的人民親自處決屠殺他們的刽子手；誰要是寬容放縱刽子手，那就是自絕於人民，人民是不會答應的。

這些刽子手是：

首先是東條和岡村率次，因爲他們是犯罪的主謀者。其次是：一〇師團長桑本中將和林芳太郎，三六師團長安達中將，六十五師團長野副昌德，六十七族團長柳，湯成八族團長水少將，六十六族團長田中信勇，六十二族團長清水出，六十三族團長津田義武，獨立第三族團長毛利未廣，二十六師團佐伯，十三聯隊長安尾，一六三聯隊長上板凸，一三九聯隊長下松龍男，一一〇聯隊長黑須元之助，獨立一混成旅團長山松奇，及其他參加這次毀滅掃蕩的軍官，和那些製造各種慘案的刽子手，如荒井，一〇師團的上級大佐，獨立第三族團的長谷川中隊長，混成八族團的田中中佐，井上中佐，後澤中隊長……

雖然這些刽子手逃到海角天涯，中國人民也要把他們逮捕起來，交給人民公審，按照人民的意志來判決這些殺人不眨眼的野獸！

現在是清算賬的時候了！

誰想寬恕刽子手，誰就會遭到一切愛好和平和正義的人反對！

（未完）

讀者之頁 關於國共會談

趙時先生：

最近以來的時局的變化太快了，你的一些問題，有的已經用不着我們回答，客觀的事實本身，已經說明一切了。你對於時局的擔憂，不是無根據的，但是光是擔憂也沒有用，我們必須更加勇敢的正面視這個嚴重的現實，有了正確的認識，才有正確的行動。

關於國共會談紀要，許多人見解不同，有的人覺得不錯，有的人覺得沒有解決什麼問題，這兩種看法，都不能完全說不對；抗戰勝利了，全國人民是那樣迫切的期望和平，因此，都希望國共問題能夠立刻全盤解決，使大家趕快復員，開始建設新的國家。可是，看看會談紀要，幾個最重要的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這自然難免使人感到多少失望。但是，我們要知道，解決一個這樣複雜的政治問題，決不是容易的事情。從發表的會談紀要中，我們可以看到，國共談判不是別的，實質上乃是兩種不同的政治主張之爭，是民主與非民主和反民主的兩種勢力之爭。在會談紀要的十幾項問題中，可以大別為兩類：一種是怎樣使中國走上民主的道路，使全國人民享受民主的自由權利；一種是如何保障在解放區的人民已經獲得的民主權利。這一切都是由中共方面提出來的，關於民主黨權的問題，在會談紀要中大部份已經得到共同協議，但這一方面的問題，對於國民黨來說，能否付諸實行，還要看它往來的行動；但在那些更實際的問題上，如解放區問

題，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問題上，意見的軒輊就大了，因為這是一個既定的問題，是保障人民已經獲得的民主權利的問題，在這里，困難就多了。

雖然如此，會談還是有它的積極成果的。中共提出來的和平、民主、團結的方針，已得到一致的贊同，必須在這個方針上的求全國的統一。在這里，確立了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規定了人民應享的各種自由和政府方面取消的個人自由的機關，制度。這一切雖然還只是文字的規定，但有這個規定，人民可以根據它來作進一步的要求。我們當然要重視實質，但實質也必須有一定的形式來表現，文字的規定，自有它的意義。從前連自由也不許談，現在則有了要求自由的成文依據。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收穫。本來自由不是靠人恩賜的，比如新開槍的取消，就是靠大家幾年來努力爭取的結果。至於解放區和人民軍隊的問題，雖然沒有得到一致的協議，但中共方面在這點上面作了巨大的讓步，軍隊的縮編，許多解放區的自動撤出，向全國人民表明了中共要求和平締結的誠意，並且提出了許多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對還在繼續中的談判提供了一個基礎。一個多月的談判，不能說是白費氣力的。

可惜的其中共的誠意，沒有能得到相同的反應，相反，國民黨所採取的，是一面談判，一面動武的政策。在談判進行中，國民黨調動了八十萬大軍，大舉進攻解放區，這尾端撤還中的新四軍。

更可痛心的，是竟和敵人合作，借敵人的手來屠殺解放區的人民，要從人民手裏去「收復失地」。這情形，近來是愈更嚴重了，綏遠、山西、豫北、山東、蘇北……國民黨軍隊到處在襲擊八路軍新四軍。內戰危機又是空前嚴重了。

這些人為什麼這樣喪心病狂呢？除了這批人本的反人民的動機之外，是由於它正在押擠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寶。他們當中，有些人不相信世界和平的可能，天天夢想着第三次世界大戰到來，準備在戰爭中撈取一把。有個別人公開的說：現在不趁復員，而是局員。他們早就看中了那個職務，當「全世界人民」的「先遣」卒。因此，必須先把中國人民的力量消滅掉。

可是，主觀的願望，不一定能成爲事實，不管在國際間有許多矛盾和鬥爭，全世界必須有一個長期和平的局面，是不會變化的，因為全世界的人類都渴望和平，對於任何一個國家，經過了這樣慘痛的戰爭破壞或巨大消耗，也都要有一個和平建設的時期。那些人所押的惡意的賭注，是要輸掉的。這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由於中國人民的力量，到今天已經是一個強大不可戰勝的力量了。爲了求得全國的和平與團結，他們不惜作巨大的讓步，甚至於退出自己生於斯長於斯戰鬥於斯的存在。但退讓不能退讓到無以生存的地步，任何人要剝奪他們是不可能的。正是這種力量可以保障中國必須實現和平，因爲在今天的世界上，今天的中國，誰也不能再進行一個長期無止的戰爭。

問題是複雜多端的，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全盤解決，但我們的方針是堅定的——和平、民主、團結，在這基礎上求得全國的統一。有堅定的方針，又有保證實現這個方針的力量，我們相信和平的前途，有實現的希望。關心國家命運的人，對於目前不

幸的嚴重局勢，自不免滿懷憂慮，但是憂慮並不能解決問題。只有憑我們大家共同的努力，反對內戰，爭取和平，建設一個富強的新中國。要做的事很多，可做的事也很多。各人就自己的條件，說一句

如何興修水利

編者

話，寫一篇文章，爭取一個朋友，說服幾個鄰里，或大或小，都同樣是有意義的工作。

陳容先生：

你計劃回到家鄉去興修一個可灌溉二萬畝田地的水利工程，這確是應該做的好事。你是鄉人，對家鄉情況當然熟悉，又有着工程師的功友，想來技術上是不成問題的。但也應該估計一些困難，比如勞力，目前大後方農村拉了工及引會不安的結果，壯丁是極缺少的，怎樣把已有的勞力組織起來，這需要仔細調查你家鄉的經濟狀況：窮大貧，農民是不是對這水利工程實在有利或感到有利，或即使有利但因為怕過去受地主及保甲的剝削壓迫而有所疑懼不安，這些都不是一揮而就就可成功的，需要經過艱苦的組織與說服工作。又如資金，你提出了「公耕所得」，我們不清楚這是什麼意思，意思是發動大家開荒公耕吧，假使是如此的話，為了能組織足夠的勞力並且保障公耕地不被不肖的村士劣紳佔，恐怕就難於一個短時期內作吧。

在你的計劃中主張發動前線規定不讓地主（應該是指大地主）參加，這怕也不合實際情況。我們想，這種工作不論對農民和地主都是有利的，我們要防止地主獨占其成，但是不可使地主完全置身事外，這樣會阻礙他們的破壞的。在目前農村環境中，地主就是土皇帝，既給這件工作對他們也有利，那就應該去爭取他們的合作，假使你把這件事情做好，那工作的困難就會大大減少，否則，就會相反

的組織更多的阻方。至於小地主，自耕農那裏應該努力和他們合作。我們不知道你家鄉的租佃方式是什麼，如果是分租制，那在水利修好後，可以使佃佃都獲利；如果是分租制，那在水利修好後，可以使佃佃都獲利；如果是在前線得解決，我們覺得你一方面應注意對地主的照顧，吸引他們合作，藉以減少阻力，一方面更必須向廣大農民進行艱苦的說服教育工作，使他們了解你的計劃，支持你的計劃，這樣，在你和地主談判時，才會使地主不得不尊重你的意見。

從來信，我們想你是怕這多年不回家鄉了，那麼，你對家鄉情形就不太了解像過去那樣熟悉，農民們對你是不是還保持著信任，這都是需要事先考慮了解的。家鄉的經濟情況可以先到家鄉去，看看環境如何，也不必先拿出水利的大計劃來，先可進行一二較小的改良工作，以了解實際情況並獲得經驗然後，再布置原計劃的工作。至於你的身體在戰時一層，只要行動上還不困難，我們想你可以先回去，在鄉下也並不見得十分苦，一樣也可養病，一面學習，一面做點小事，一面養病，這比在都市中等待病癒好得再下鄉更經濟吧？因為病癒是要長期才的養病，而我們的工作是充分的要而迫切的，自然，關於這，你能够在醫院診斷一下聽聽醫生的話，那就更妥當。

羣衆

第十卷 第二十期

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羣衆雜誌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總經售 新華日報館

本刊價目

本埠零售 六十元

六期 三百六十元

十二期 六百五十元

廿四期 一千二百二十元

外埠郵費平寄每份四角按號三十四元
航空十六元郵費四十六元 國外照加

眾 君 羊

期 二 十 二 第 卷 十 第

目

要

解放區是取消不了的(社論)

動盪中的世界大局

越南的革命(下)

閻錫山批判

論土地改革與工業化

孫中山先生論三大政策

馬克思是怎樣研究和寫作的

于 懷

張 尙 民

陳 伯 達

曉 明

資 料 室

格 略 塞 爾

版 出 日 五 十 二 月 一 十 年 四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解放區是取消不了的(書評)

時 益

再一次呼籲和平

美軍應立即停止參加中國內戰

建設東北必須實行民主

紀念孫中山先生論國是問題的根本上解決

文 魁

莫洛託夫在十月革命二十八週年紀念的報告全文

專 論

動盪中的世界大局

越南的革命(下)

論土地改革與工業化

閻錫山批判

孫中山先生論三大政策

馬克思是怎樣研究和寫作的

解脫區報告

從村選看邊區民主生活(習慶雲行進)

談折扣

美國人民的利益與安全烏乎在!

讀葛琴的小說(書評)

國際職工會的組織及其權(讀者之頁)

(七七〇)

(七七二)

(七七四)

(七七四)

(七七五)

(七七七)

于 懷(七八四)

張尙民(七八八)

曉 明(七九一)

陳伯達(七九八)

資料室(八一五)

格略塞爾(八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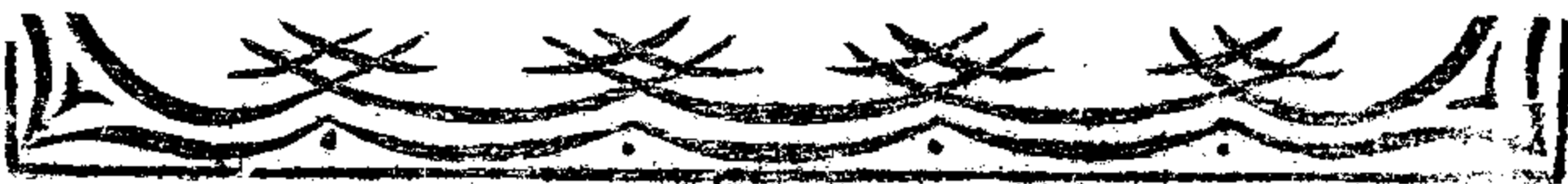
周而復(八二二)

褚 寔(八一二)

黎 望(八一九)

鉗 耳(八二五)

編 者(八二五)





解放區是取消不了的

在國共代表會談話中的第十項就是關於解放區地方政權問題。對這問題，中共在會談中提出過四種解決方案，都未為政府方面接受，最後雙方同意繼續商談問題。不料會談紀要方才發表，這四種解決方案的軍事行動已經大舉發動。反動派一面企圖用軍事行動來消滅解放區，一面又尋找種種理由來否定解放區。我們願意來談一談這個問題。

反對解放區的人有一種最幼稚不過的說法。他們說：解放區這名義在抗戰時期還有價值，現在抗戰已經結束，解放區自然就應取消。但要知道，解放區不是一個空名義，而是有它的實際內容的；因為這實際內容並非有消失，所以這名義就不能隨便取消。反動派所說取消的實際也並不是其名義而是其實際內容。

解放區的實際內容是什麼呢？抗戰時期在深入中國領土的敵軍的後方人民自動起來，拿起武器，趕走佔領的敵軍，使敵後極廣大的地區恢復中國人民的主權。這些地區不同於在敵偽統治下的淪陷區，稱為解放區，自然是誰也不能反對的。但是這些解放區，並不是在淪陷區相對比的時候，才顯出其特色，假如只是這樣，那麼現在抗戰結束，淪陷區已經開始沒有了，解放區的特色也就不存在。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的。

解放區人民為什麼能夠趕走敵軍，光復領土呢？他們必須有足以打敗侵略者的武力，他們更必須有能夠團結人民力量，照顧人民生活的地方政權。而過去原來具有守土衛民之責的軍隊和官員們都早已在敵人佔領時，紛紛跑到敵方不知什麼地方去了，雖然要他們回來也找不到。而且人民由編者的經驗，也已知道，假如把這種軍隊和官員找回來是一點好處也沒有。於是，人民不得不自己給自己組織。人民用民主的選舉方法選出了各級的地方政府，人民又根據自動自願的原則組織成了抗日的武裝力量。因為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人民的武力，所以就能很好的組織了人民，抗禦敵人

，和從事社會建設的任務。他們在那裏做到了孫中山先生所希冀的武力為人民所有，也在那裏真正實行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因此他們才能在敵人最慘酷的進攻下保持着大部分領土，並且不斷地牽制敵人打擊敵人；他們才能在最困難的物質條件下用合理的經濟政策調協着階級的利益，發展生產，提高最大多數人民的生活。他們真正做到了抗戰與建國並行，他們一方面直接對於抗戰盡了大功，一方面又以他們的民主建設來做了新中國的模範。民選的政府和人民的軍隊就是解放區的基本內容。所以在抗戰時期，解放區固然和淪陷區不同，和大後方也是不同的。

現在抗戰雖然已經結束，但是解放區在抗戰中的功績難道就可以一筆抹煞嗎？八年來許多敵人的大後方的人都得了「勝利勳章」，抗戰有功的解放區軍民得不到什麼勳章也就罷了，怎麼可以連他們已經得到的民主權利連同剝奪掉呢？到現在，因為敵人已經投降，淪陷區的實際和名義都應已不存在，但是解放區和全國其他地區不同之處却還存在着。這種不同就在於，解放區已經實行了民主，而且行之有效；人民已經得到充分的民主權利，已經產生了民選的政府和人民的軍隊，而在全國其他地區都沒有。這種差別，意義非常重大，誰也無法否認。既然解放區有這樣的實際內容，為什麼這名義不存在呢？但我們已經說過，名義不是重要的事，假如你不喜歡這個個字眼，你可以換用別的法法，你可以因為只有在那裏是真正實行了孫中山先生的主張的民主的地方自治，改而稱之為民主自治區，以別於其他還實行着一黨專政的地區，那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反對解放區的人又說：解放區有武裝，政治情形又和別的地區不同，所以這就是割據行為。這種說法更加不通。

解放區是有武裝的軍隊，但有了軍隊有什麼不好？假如解放區沒有軍隊，早在抗戰八年中被侵略的敵人消滅掉了。到了現在，事實證明，解放區

軍隊的存在也還很有必要。假如沒有軍隊，解放區的民主建設還不是被反動派大軍所一舉消滅了麼？假如解放區沒有軍隊，反動派就會不用武力進攻，這話誰也不相信，江南新四軍已因遵守雙十協定而撤出，但反動派還是一樣調兵遣將去「清剿」已經沒有軍隊的解放區，屠殺那裏的和平的老百姓，因為反動派對付敵的是解放區民主建設，沒有人民的軍隊來保衛，解放區的民主建設隨時都會遭到破壞和摧殘。

但是假如說，解放區只是靠武力而存在，那却是完全不合乎事實的。固然，解放區倘無自衛的武力，就會被摧滅，但是解放區倘若沒有民主政治，雖然有武力，也還是會失敗的。只要反對解放區的人沒有武力，那麼解放區就完全不需要武力。他沒自武力也一樣能生存發展。解放區之所以能生存發展，在基本上是民主的力量表現。

在封建時代有武力割據的現象。地方的割據勢力和中央的統治勢力，在政治上其實沒有什麼不同。在中央的是大皇帝，是依靠武力的專制統治；在地方上的是小皇帝，也是依靠武力的專制統治。這就叫做割據。所以拿割據之名加在解放區身上是最愚蠢的謬誤。難道可以說，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建立的政府對於北洋政府是割據麼？廣州政府是也有武力的，但我可不說這是武力割據，因為廣州政府是民主的進步的政治，而北洋政府是封建的，落後的。政治。要說割據，只能說北洋政府是割據，因為他是完全依靠武力而存在，失掉了武力，他就立時會自行崩潰。就這點說，現在的情形也正是如此。解放區政治和其他地區內的政治情形是不同的。其不同就在於解放區政治是民主的，進步的；而在國民黨地區內的政治是一黨專政的，不民主的，落後的。何況乎現在的解放區並不像孫中山的廣州政府那樣企圖以革命武力來推翻北洋政府，解放區之保有武力只是在萬不得已時作為自衛的手段，解放區的民選政府也居於地方政府的地位，只是企圖拿自己的民主建設的實驗來作為全國其他地區的模範。假如這就叫做「割據」，那麼中國人民是歡迎這種「割據」的。

反對解放區的人理屈詞窮，最後只好拿出抽象的「統一」二字來做文章了。他們說，不管怎樣，中國現在還是非求統一不可，解放區是統一的阻礙，所以非消滅不可。

我們並不反對統一。解放區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解放區政府是民選的政府，但解放區軍隊願意在全國軍隊合理整編之下縮減其數目成為正規的國

防軍中的一部分，解放區政府也願意正式承認為在統一的中央政府之下的地方政府。這豈不是為了達到命令軍令的統一麼，所以假如說現在中國還不統一，那麼其責任並不在於解放區，而在於不承認解放區的人。現在的事情是解放區願意統一，要求統一，而反動派却硬不願承認解放區，他們以不承認的手段來使解放區負分裂的罪名，他們以軍事進攻的手段來逼得解放區不得不以人民的武力自衛。

為什麼他們不願意承認解放區呢？因為在他們想來，既是統一，就要做到全國一切地區的政治完全一樣。其實我們也不反對全國政治都達到同樣的水準，問題只是：還是應該取消解放區的民主來做到全國政治一樣呢？還是使其他地區也和解放區同樣地實行民主政治呢？很顯然的，我們只應該教落後的走前進步去和進步的看齐，不應教進步的退後去和落後的看齐。

但我們並不覺空想的清一色的統一論者。全國一切地區都像解放區一樣的實行民主，雖然是全國人民所努力爭取的目標，但在現在還不能一下做到。我們不能不承認，全國各地區政治發展不平衡的事實，我們就要在這不平衡的狀態上根據民主的原則，建立統一的國家。已經實行民主的地區要更加民主化，同時引導別的地區也逐步向民主的方向前進，最後終於達到全國一切地區都實現高度民主。這種的統一，是可能的，也是有益的。相反的，企圖以落後的政治為標準來實現清一色的統一却是不可可能的。他們喊叫統一，不是已經喊叫了多少年了麼？但因為他們自己不願意任何民主進步的改革，同時還要破壞已經實行民主的地區，所以他們的統一也就從未實現過。他們只能依靠武力進行內戰來實現他們的統一論，萬一他們的統一竟能實現，那只是加深了人民和國家的災難。就過去的历史經驗看，就今後的世紀和中國的潮流趨勢看，這種清一色的統一舉步不能成功的。因為人民決不答應讓他們的民主權利被損害，更決不甘願跟隨反動者一起倒退。

由此可見，解放區並不是破壞統一而是促進統一的力量。是讓破壞統一呢？破壞統一的不該別人，就是那些反民主的反動派。因為他們堅持要消滅人民所已經獲得的民主權利，堅持要走向民主的倒退的方向，因為他們製造內戰，發動內戰，所以他們就成了破壞統一的罪魁。

以上所舉種種反對解放區的歪理根據，本來都不值得駁斥，我們之所以不據詞費，一一加以駁斥的，就是為了可以由此更清楚地看出什麼是解放區的特色？為什麼反對派企圖取消解放區，為什麼解放區不應取消而應該發

揚光大。

由此可見不要取消解放區，這在實質上，就是要不要取消民主的問題。民主不應該取消，所以解放區也不應該取消。民主的解放區願意做統一的中國中的一部分，而統一的中國也必須包含着民主的解放區。中國應該成為民主的中國，全國的從地方到中央，政府都應該成為民主的政府，這是誰也不能反對的。現在還不能馬上做到全國民主，但是有一部分地區在抗戰時期已經有了民主的地方政府，那正是中國人民的希望。中國的軍隊也應該做到孫中山先生的主張的武力與人民相結合，而且進一步做到武力為人民所有。現在雖然全國軍隊還不能都做到這一步，但是在抗戰中已經產生了一部分真正屬於人民的武力，那也是中國人民的光榮。統一的中國政府應該不應該排斥這種民主的地方政府呢？統一的中國軍隊應該不應該排斥這種人民的武力呢？當然不應該排斥。在抗戰時期早就應該歡迎他們，排斥了民主的地方政府和人民的武力的統一為人民所反對，人民所贊成的統一就是包含着民主的地方政府，包含着人民武力的統一，因為只有這種統一才是民主的統一，有進步意義的統一。

再呼一次呼籲和平

重慶現在正舉行軍事會議，國民黨的許多高級將領都到了重慶，路透社記者曾於八日由重慶報導說：「此間（重慶）的將軍們曾告訴我：政府對共產黨的全盤戰爭，是最後才採取的手段，但是他們並不否認，政府訂有作戰計劃。」又說：「此間廣泛認為中國總司令何應欽將軍憤同美國駐華陸軍參謀長麥克魯中將的最近北行之行，不僅與於日常的巡視」。這個報導雖然詞句含蓄，但可以推測：第一，國民黨政府已定下了對解放區的通

整作戰計劃，這一點從前吳國楨拚命否認，現在連政府人員也不否認了。第二，國民黨軍隊與美國軍隊將在華北共同有所行動，這一點從前魏德邁拚命否認，現在已成爲衆所週知的事情了。重慶的軍事會議如果其所討論的和所決定的正是這點，那末更大的戰爭，因之是人民更大的痛苦，都將是不可免的事情了。

抗戰八年了，抗戰不勝利，人民願意向日本投降，任何犧牲在所不惜。但是，現在抗戰勝利了

在國共會議中，中共方面曾提出一種最公道的辦法來解決解放區地方政府的問題，那就是，在這些地區內重新實行全民普選。各黨派各界人士都可以回鄉參加選舉，由民選產生省縣縣級的地方政府，並一律由中央政府加委。假如實行了這辦法，那麼解放區現有的民主可以更擴大其基礎，而全國政令統一也就能夠實現。這辦法這名字也未始不可以取消。解放區願意採取這辦法，正足以證明那里是真正已經有了民主的基礎，而這種辦法也不肯接受的人，就是見他對於實行民主是一點誠意也沒有的了。

所以我們應該指出，現在還沒有解決，而成為國內政治問題繼續所在解放區地方政府的問題，並不是共產黨和國民黨之爭，而是民主和反民主之爭。全國主張民主的人一定都贊成在解放區內鞏固和擴大現有的民主制度，民選政府的制度，而且贊成全國其他地區只要有可能實行民主制度，都立即實行，只有反民主的反動勢力才把民主的解放區看做非加撲滅不可的敵人。但是用武力是取消不了解放區的，因為解放區人民所獲得的民主權利和全國人民要求民主的熱望都不是用武力所能取消得了的。

，抗戰一勝利，人民一致的呼籲是要求和平，再不願意打仗了。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是明白的，在八月廿五日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中，就提出以和平爲當前全黨的第一個方針，第一個鬥爭目標。在四十三天的重慶談判中，中國共產黨作了許多讓步，包括退出八個解放區，和把一百五十萬解放軍縮編爲二十四師到二十個師，並在談判過程中及談判以後，即由長江沿岸幾個地區撤退。中國共產黨方面這樣的讓步，曾在許多進步人士、民主人士中引起「讓步過大」的批評。但是，我們還是堅決讓步，目的是爲了求得和平。平心靜論，中國共產黨方面是沒有什麼可以責備的了。

國民黨方面與共產黨訂了雙十協定，這個協定的方針，第一個也是和平，這是很好的。但是十月十日協定簽字，十月十二日發表，而九月十七日國民黨軍委會已經把「剿共軍事」送給國共兩山的命

全好了，十月八日這道命令的飛機已經誤落在河南無作，十月十三日的「委座西元節」已經叫胡宗南「剿匪」了，十月二十四日這道命令就轉達到高樹勳將軍那里了，十月十五日委座巧電就叫劉峙「負責圍剿伏牛山平漢路中段以西、黃河以南地區」，「奸匪」皮定鈞、王樹聲部而殲滅之。」這道電報到十月二十六日就由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裴昌會轉發給十五軍軍長武勝鵬了。一手簽定雙十協定，而另一隻手發出「剿共手本」和「剿共」命令，我們不說政治家風度，就說說普通為人的道德也實在不應該。

是非曲直，現在是弄清楚了，我們除了提供上述事實外，是一句話也不願多說，因為國共兩黨的是非曲直，和全國和平比較起來，究竟是非曲直專小，全國和平事大，只求能達到全國和平，過去的專情暫如昨日死了也罷。

現在事情發展到一個新的段落，重慶舉行軍事會議正是當前時局的一個標誌。在過去的一個階段中，從雙十協定到十一月九日一個月的時間，由於人民的要求和平，反對破壞和平者，由於國民黨軍隊的官兵直到高級將領反對內戰，在一百多萬進攻的國民黨軍隊中，有萬多人的起義，有八九萬人放下了武器，兩者共計十萬人，即達全部進攻解放區兵力的十分之一。這一個月的經過時間雖然不長，足以窺見人心的向背。這次重慶軍事會議究竟是壓壓勒勒呢？還是一不做二不休呢？照甘貝爾的報導看，國民黨當局是選擇了第二條路。

甘貝爾雖然那樣報導了，但是我們為了人民，為了民族，還要做一次呼籲。我們呼籲國民黨當局不要走內戰的迷途，而走和平的迷途。參照軍事會議的各位高級將領，誰無家眷？誰無親友？誰不是吃老百姓穿老百姓的？你們的兵其那一個不是

老百姓出身？你們之中有許多對於內戰漸漸覺悟的人，也有許多懂得內戰打不得的道理的人，在你們在這緊急關頭，把人民的意見反映到會議上，仗義執言，力爭停止內戰吧！中國實在不能再內戰了，實在要和平了，實在非和平不可了。在這時候，吃老百姓出的糧，帶老百姓出身的兵，却要挑動內戰，那實在是天理人情都難容許的了。國民黨當局不是說要「復員」麼？不是說要「恢復交通」麼？我們贊成得很，我們與其說贊成，不如說主動得更積極一些。因為華北解放區的人民，八年來受敵人「三光政策」的殘酷摧殘，實在迫切要求復員，迫切要求恢復交通，迫切要求休養生息，繁榮經濟。但如果你要打內戰，我們在作了仁至義盡的讓步之後，能夠不起而保衛自己的生命財產和民主權利麼？各大城市的居民商人，因為有內戰以致交通斷絕，冬季沒有煤燒，沒有糧食，沒有生意做，能夠不起而要求停止內戰麼？能夠不起而反對國民黨當局現在正在起草中的「對共討伐令」麼？為什麼一定要弄到「官逼民反」？為什麼一定要各階層人民都起來反對他們？

再請看看他們自己的隊伍，他們為了抗戰，吃盡千辛萬苦死了也還願意。但是，為了內戰，誰願意做無謂的犧牲品。現在連「青年軍」都要求「復員」，連高樹勳將軍這樣的高級將領都起來反對內戰，人民和軍隊裡的和平要求，就如一堆大火，飛蛾撲去，只有燒死的份兒。即是想出了稀奇古怪的辦法：如拉了把老頭子刺了鬍子穿上軍衣也算是兵？試問不會有第二個第三個以致成千成萬的夫夫大小的高樹勳將軍麼？

再其次，據說還有一個辦法，就是讓外國人的飛機大炮和技術，轟炸外國人的原子彈，轟炸外國人做開路先鋒，據說有了這一條就無往不利，那也不

見得吧？外國人極面的的確確有一小批反動派，口裡口口聲聲不干涉中國內政，實際上恨不得痛痛快快地一回帝國主義者，做一個東方斯考比。但是要知道外國人不止這一小堆反動派，還有廣大的人民和開明人士，他們同我國是有盟友之誼，他們對中國人民是友好的。退一萬步說，就算如願以償，得到了外國反動派的幫助又有什麼了不得呢？解放區人民裡沒有「唯武器論者」，我們打過日本人並不給他們，任何利考比也不成，因為中國不是希臘。而且如果我們還有點民族觀念，何苦要去把外國人引進來武裝干涉，使中國再陷於殖民地地位，使你們自己利子孫孫再嚐亡國奴味道？中國弱被打敗了日本和廢除了不平等條約，難道你們就獨立不起來了麼？

我們千萬萬語只是為了和平，依我們看來：和平有利，實在有必要，內戰有百害，實在要不得。而要達到和平也很容易，共產黨方面已經讓了步，只要國民黨方面努力一下就夠了。這種努力包括：取消「剿共」命令，包括明令停止內戰，撤退一切進攻解放區的軍隊，包括停止對解放區的進攻，停止對解放區的佔領，並停止進兵，包括以政治協商辦法解決受降、偽軍與承認解放區人民自治，和承認解放區軍隊就緒了，其餘問題，慢慢再談，政治解決，豈不甚好？如果不此之圖，在只言復員的掩護下，繼續派兵進犯解放區，則解放區軍民為了保衛民主自由的生活，唯有奮起自衛，如此內戰無法停止，和平無法實現，這一責任，完全應由國民黨當局負，蔣介石先生從國民黨六全大會以來不是高唱「政治解決」嗎？難道現在還請不作罷了嗎？如果作罷的話，為什麼一定要揮動刀兵？（轉載延安解放日報十四日社論）

美軍應立即停止參加中國內戰

今天，在中國，太規模的內戰不僅已經存在，而且正在擴大着，據本報昨日社論所指出：「內戰普遍地進行於海、南、贛、九、浙、江、蘇、安、湘、湖北和華北各省，且已擴大到山、陝、甘，並有向東北發展的趨勢」。這是中國人民的不幸，也是世界和平的威脅。凡是真正同情中國人民、維護世界和平的國家，都不應該站在一內戰的發動者方面，來支持和參加這一內戰。美政府統帥羅斯福的對華政策所以能獲得中國人民的讚美和擁護，就是因為它不主持，更不參加中國內戰。羅斯福總統雖然逝世了，但現總統杜魯門會一再表明仍繼續羅斯福總統的這一政策，並屢次聲明決不干涉中國內政。這是中國人民所歡迎的。然而不幸得很，事實上，美軍在中國內戰的行動已完全違反了美總統的對華政策。它不僅間接支持中國的內戰，而且直接參加中國的內戰！

首先，美軍以大飛機轟炸國民黨軍隊對華北解放區去，理由是為了保護國民黨軍隊能完成受降任務。其次，美軍對華北解放區的受降任務，以隨軍本可勝任，但美軍却偏要運送大批的國民黨軍隊去，現在受降儀式早已舉行了，而這些國民黨軍隊的受降儀式亦已停止。不僅如此，據安本月三日訊，美軍十四架飛機在河北安次縣，低空飛行，向華北解放區投擲燃燒彈，這難道也是為了完成受降任務所必須採取的步驟嗎？

其次，美軍不僅以飛機運送國民黨軍隊到華北

，而且以軍艦運送國民黨軍隊到華北，同時美海軍陸戰隊自身也登陸天津、青島，並在秦皇島作為國民黨軍隊的前鋒，用武力趕走堅持華北抗戰的八路軍。據美海軍官員兩利斯說：「美海軍陸戰隊派駐中國是為了履行美軍所負協助蔣委員長接受日軍投降和解除日軍武裝的義務」。美國國務院東亞司長范宣德也說：「美國軍隊派赴華北是為了幫助中國解除當地日軍武裝並遣送他們回國。」但實際上，據新華社所指出：平津青島以及北寧膠濟沿線的日軍並沒有被解除武裝，更沒有被遣送回國，反而是美軍聯合日偽軍協同國民黨軍隊向解放區進攻！

第三，據知以空運、海運幫助國民黨軍隊外，美軍還負責起所謂「鐵路」的任務，以便利國民黨軍隊通過鐵路，進行內戰。在北寧路上，美軍以「護路」為名，已公然站在國民黨方面，參加了進佔北戴河與蘆漢山海關的內戰，「護路」本來是無須「護」的，更無須「美軍」來「護」。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解放區，只要合理解決受降問題，不利用偽偽武裝進行內戰，交通便不會被破壞。以美國的武裝部隊來「護」中國的「路」，這明明是武裝干涉中國內政。

此外，美國繼續裝備和訓練國民黨軍隊也違反

雙邊和延長中國內戰。事實告訴我們，過去，美國所裝備和訓練的國民黨軍隊，在抗戰中，用以打日寇的並不佔多數。現在，却用來打內戰了。胡宗南的部隊，像作義的部隊，平漢路北寧路上的部隊，不都是這種軍隊嗎？如果在抗戰已結束的今天，美國仍繼續裝備和訓練國民黨軍隊，則除了是支持中國內戰外，還有什麼意義呢？當然，這並不是說，軍備落後的中國決不需要友邦在軍隊的裝備和訓練上，予以幫助；而是說，在政治上還沒有民主化，軍隊還沒有國家化的今天，單單裝備和訓練國民黨軍隊是有害的。

最後，美國在租借法案停止後，仍擬以約值六千多萬美金的軍需品及其他的物資，貸給正在積極從事內戰的中國當局，也不能不認為是對於中國內戰的支持和參加。我們認為，任何物資的供給，在內戰期間，都應該停止。

不僅是為中國着想，而且是為美國着想，美國在中國的這些措施，都必須立即改變。不僅如此，為了維護中國人民的利益，為了尊重中國國家的主權，為了保持中國人民對於美國的友好關係，美軍應斷絕停止參加中國內戰，決不干涉中國內政。這樣，中美的友誼，才能持續於永久，東亞的和平，也將得有保障。

建設東北必須實行民主

最近，官方有人去東北回來後說，東北情況和想像中大不相同，民氣十分激昂。——這話雖然很簡單，但說明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誰不願到這個事實而去「接收」和「建設」東北，誰就一定會犯

極大的錯誤。

十四年來在日本統治下嚐了殖民地奴隸的痛苦。在日本做主人的「滿洲國」裡，人民是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的，在日本人的殘酷的經濟掠奪下，東

非大多數人民無衣無食，飢寒交迫。但是東北人民的抗日鬥爭，却和日本的侵略相始終。東北人民抗日聯軍在一九四〇年有會發展到十二個軍的武力，雖然由於日本在東北拚命發展交通事業，使游擊戰的條件日益困難，但是武裝人民的鬥爭一直到日本失敗時仍舊存在。此外如工人的罷工，農民的騷動，青年知識份子的抗日活動，偽軍的轉變，在十四年間也日益普遍的發生。蘇聯紅軍之所以能在最短期間迅速解決關東軍和「滿洲國」偽軍，固然由於紅軍的英勇，同時也得力於東北抗日人民的協助。所以在解放後，東北人民立刻就建立了人民的愛國武裝，並在許多地區內成立了民選政府，和紅軍當局友好合作，維持地方秩序，肅清奸偽殘餘。現在東北人民一定因為他們能脫離奴隸命運重返祖國而歡欣萬分，同時他們也一定有決心永遠不在不民主的政治下做奴隸，他們要求在回到祖國懷抱後過真正自由民主的幸福生活。

所以我們現在去接收東北時，首先就應該認真看一看東北人民的意願是什麼。假如以為東北人民向來是「化外之民」，所以現在連忙搬去「大森」黨化」的辦法，去把東北人民「化」一下，連忙搬去所謂「訓政」的設施，去把東北人民「訓」一頓，那就是和東北人民的意願恰恰相反了。現在東北行營已經到達長春，中國當局更應該明白宣示接受東北後的政策如何，第一件要緊的事並不是忙着遣兵去到關外去。忙着遣兵去幹什麼呢？是去對付敵偽麼？但關東軍和滿洲國偽軍早已繳械的歸械，解散的解散了。是去維持地方治安麼？維持地方治安

無需乎派去這樣大的兵力，現在的東北人民自衛武裝已經在滿地組織起來了。中蘇盟好無間，自然用不齊動刀槍，東北人民傾心祖國，更無需用武力去示威。日本對待東北，是以殖民地主人自居，所以地竭力強化關東軍以實行武力鎮壓，但這種武力統治的政策畢竟也失敗了。現在東北回到祖國懷抱，政府當然該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政策和做法，才能使東北人民感到滿意。日本是把東北人民武裝視為匪類而企圖加以剷滅的，我們就應該首先承認這些在抗日鬥爭中生長起來的人民自衛武裝，在日本統治下，人民是沒有一點政治權利的，我們就應該首先承認已經由愛國人民所組成的各地方民選政府，並且在邊境有成立民選政府的地方，也實行民選制度。各黨派的地地位應該完全平等，廣大人民的利益應該受到尊重 and 保護。承認人民自衛武裝，承認民選政府，實行民選制度，保護各黨派各階層的利益——這就是東北實施民主建設的起點。能夠實行這樣的政策，才能够在東北確立和平安定的環境；才能够得到發展工業，開發富源；才能有利於東北人民，有利於全國人民。

平心而論，政府過去對於東北人只有對不起的地方，沒有領得今天去耀武揚威的地方。十四年來，東北人民受的苦難太重了，今後東北在中國的地位也太重要了。我們希望政府當局慎之於始，切實尊重東北民意，穩定建設東北的民主政策，使東北成為一個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模範區，這才對得起十四年來吃盡了苦，並且爲了回到祖國而苦鬥了十四年的東北同胞。

決解本根的題問是國論生先山中孫念紀

空話不足以紀念孫中山先生，在內戰及全國的今天尤其如此。爲了紀念孫先生八十年生辰，我們願略論目前國內政治的出路問題，以與國人商榷。

孫先生之所以爲偉大的革命家，因爲他始終堅持民主爲中國的唯一出路。他說：「余之從事革命，以中國非民主不可。」（中國革命史）又說：「我們希望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樂，願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權不可。」（民生主義第一講）。處在今日的形勢，重讀先生遺言，我們不能不感佩萬端。孫先生離開我們二十年了，今天我們不僅沒有得到「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樂」，而且內戰正使國運的艱危和人民災難達於極點，其中關鍵顯然就在於我們還沒有能使中國成爲一個民主的國家。目前成問題的一切問題，解放區自治問題，敵軍受降與偽軍解散問題，內戰問題，國大問題，根本上無非是一個民主問題。解放區爲什麼成問題？就是因爲解放區內已經實行了民主，有了民選的地方政府，而全國其他地區還沒有。受降問題爲什麼成問題？就因爲民主的軍隊雖在抗戰中立大功，但反民主的在抗戰中無功而有過的軍事領袖却不獨不許他們接受敵軍投降，反而指揮敵偽軍去進攻他們，爲什麼發生內戰？無非因爲不承認民選的政府和人民的軍隊，必欲加以消滅而快意。爲什麼有國大問題？所爭執的也無非是我們到底需要一個全民普選的民主的真國民大會呢，還是用一

個假國民大會來做幌子以蒙蔽黨治的實質？——既然眼前一切問題，開端都在民主，就不難不能實行民主化而軍國國家化。

如何實行民主？去年中共方面已提出了一個公平而具體的辦法，就是召開國是會議，結束一黨專政，成立臨時性的聯合政府以準備國民大會普選，由真正代表全國民眾的國民大會產生民選的正式的聯合政府。這個辦法提出以後，雖始終未為當權者所接受，却始終為全國各民主派派民主人士所熱烈擁護。直至今日，這個辦法仍為各方所堅持，如中國民主同盟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說：「中國民主同盟始終相信舉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是當前國家和平、統一、團結的唯一途徑，同時亦是全國通力合作奮鬥力共同建國的唯一途徑。……因此，我們所希望舉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能早日實現事實」。又如大公報十一月二日社論「中國政治之出路」一文，雖未提出聯合政府，但也明白主張政府當局應「立刻宣佈國民黨不再專政」，並召開國民大會（重選代表，改訂組織辦法），選舉政府（由民選政府而做到軍隊國家化），編制憲法（徹底修改五五憲法）。

中國共產黨雖然始終認爲只有如此，國是問題才能根本徹底解決的，但是爲了在抗戰結束以後迅速實現國內和平，在此大國共談判中不惜委曲求全，首先退一步提出實現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過渡辦法，才達到會談記要中的協議。關於政治民主化問題的雙方協議是：「一致認爲應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並應先採必要步驟，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選舉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事，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現在中共是一個重大的讓步，但這過渡辦法也還是爲了達到根本解決的最後目的，即徹底廢行政府

民主化和軍國國家化，而這兩大目標也只有有了民主聯合政府時才能完全做到的。但是結果如何呢？政府當局對於政府與中委議事會中有關保障人民民主自由的各點採取決而不行的老辦法，並且有種種政治協商會議成爲一個粉飾太平的空論機關，至於受降問題，解散偽軍問題，解放區民選政府問題，更是一種擱置不解決。政府在十月十三日公布會談記要後所做的唯一工作，就是在十月十三日密令全國實行所謂「剿匪」，以至國內形勢日趨嚴重，會談記要中的協議，竟被踐踏得如同廢紙！

爲今之計，欲求國是之解決，只有治標治本兩條路。治標的辦法，就是切實實行會談記要的一切協議，切實保障人民民主自由，立即解散偽軍，公平解決受降問題，並且立即承認解放區的地方民主自治。若說這在的解放區民選政府的基礎還不夠廣，中共也已準備重新進行全民普選，一切在外決之選。

的人士都可以同樣參加選舉，一切黨派也可去自由從事競選，試問天下還有什麼更公道更民主的辦法呢？如果政府對於這個漸趨趨向，今後仍無意推銷實行，那麼，會談記要的協議，就只有通過治本的辦法來實現。所謂治本的辦法，就是立即停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召集黨派會議，首先成立臨時性的聯合政府與聯合辦事部，統一政令軍令，實行全國普選，舉行真正的國民大會，從而產生正式的民主政府。

上舉二辦法，雖有緩急之不同，但都是政治解決的道路，其歸宿也是一個，就是實現孫中山先生民主理想，達到「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幸福」的目的。無論如何，我們不能用內戰來紀念孫先生，我們心頭回憶孫先生的遺訓，耳邊迴響孫先生的內戰砲聲，不能不迫切呼籲，呼籲全國共同爭取政治解決。

本刊啓事：

上期曾預告自這一期起繼續刊載尹啓民先生撰著之「中國歷史講座」，但尹先生略以：此書寫作時間在數年前，因爲限於史料、環境，未能盡善；現正着手修正，俟改定後，再爲刊載或另印單行本。因此本刊暫時不擬續載，謹向讀者致歉。

向讀者致歉。

莫洛託夫在十月革命廿八週年紀念的報告全文

同志們：報告戰爭的幾年以後，我們今天在和平以及對法西斯主義獲得光榮勝利的情況下慶祝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第廿八週年。爲反對曾經蹂躪我們的國家和全歐的希特勒德國而進行的四年的戰爭，以及今年秋天我們不得不參加了的爲反對侵略的日本而進行的東方的戰爭，已成陳迹了。在蘇維埃人民曾經起了決定性的重大作用的英勇的鬥爭中，已爲全世界的各國人民贏得了和平，在西方和東方的世界法西斯主義和軍閥侵略的主要溫床，已經被搗毀了。現在，我們已經贏得機會來重理和平的勞動，以便鞏固我們的勝利。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的：「我們蘇維埃人民曾經爲了勝利不惜貢獻出自己的一切精力和勞動。我們曾經度過艱難困苦的日子。但是，現在，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都能說一句：『我們已經打贏了』，從今以後，我們可以認爲我們的國家已經解除在西方德寇侵略的威脅，以及在東方日寇侵略的威脅。全世界各民族長久期待的和平已經來到了」。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蘇聯

德國在深信他們的強盜進攻的突然性會保證他們成功的情形下侵略我們的國家。不單在德國是如此，而且就在其他國家許多人也以爲蘇聯不會支持得長久，並且在幾個星期以內，無論如何在幾個月以內德國就會把蘇聯打垮，希特勒就慶慶祝勝利的。希特勒匪幫在西歐幾次的伴勝以後，許多人相信這是不難做到的。所以得到這樣結論的緣故是因爲：首先有些人平常不承認俄國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其次是一些人不能了解我們革命所創造的蘇聯國家的真正的人民性。德國對蘇聯的侵略對於那些在戰爭的第一階段中由於我們國家所經歷的異常艱苦而感到的我們國家的朋友也是一個偉大的考驗。不管進攻是怎樣突然，蘇聯還是站得住。在戰爭的初期蘇聯所受的物質損失和深刻的創傷並沒有能減少它的體力和精神力。紅軍證實了的確是能夠從最初所受的打擊中重新組織和恢復的。蘇聯人民支持它的軍隊並且保證了對敵人的粉碎反擊。每個人都記得我們軍隊轉守爲攻的時候，起先是在戰場的個別區域，然後是整個全線。

自衛的利刃便成了各大小民主國家反抗希特勒聯合鐵線的成形。大家都知道：

道：英蘇美聯盟在組織一切民主國家反抗希特勒主義的聯合鬥爭中，已經有勁地完成了它的歷史的任務。

大家也知道：當西歐第二戰場開闢的時候，德國就被鎖在兩個鐵線之間，使得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地位陷於絕望。同時，不應該忘記的是：蘇德戰爭的情況早在第二戰場開闢的一整年以前就已經發生根本的轉換。那時希特勒的軍隊已經在紅軍有力的和不斷增加的猛烈攻擊之下耗竭地潰退了。由此可見，十月革命所創造的國家不但在保衛自己免於法西斯進攻的災禍方面獲得成功，而且爲了撲滅法西斯主義和侵略的主要溫床所進行的攻勢也獲得成功。於是，人人都明白了蘇維埃制度和七次世界大戰的衰落的沙俄政權毫無類似之處。因此，復明地蘇維埃國家自衛能保衛自己並且能夠防禦自有國家歷史以來最嚴重的考驗。

希特勒德國不但威脅蘇維埃國家，即在進攻蘇聯以前，德國法西斯就巴攬有了挪威、比利時、荷蘭、法國西、希臘、南斯拉夫。德國在它的夥伴中，不但有法西斯的意大利，而且還有許多和德國簽訂軍事同盟的別的歐洲國家。西班牙和某些別的國家，曾經給予希特勒以半公開的支持。希特勒進攻的威脅，籠罩着英國。萬一向蘇聯的進攻在勝利中結束的話，整個歐洲是會要落在希特勒的鐵蹄之下的。

希特勒份子曾經極力維護他們要在歐洲建立的「新秩序」。法西斯走狗們，例如所有形式式的雷斯林份子到德代爾份子，早已唯他們德國主子的馬首是瞻了。在各地破壞所有一切民主制度，廢止勞動階級的一切政治權利，這樣子來確立希特勒主義的霸權，同時希特勒份子從被奴役的各國中強劫奪，任意榨取所有一切物資，來使他們強盜法西斯匪徒獲得更好的供應與武裝。向蘇聯侵略的最初的成就，使希特勒份子更加喪心病狂了。他們更加露骨地不顧國際公約，而且更開始欺騙他們也要求世界霸權了。他們的危險的計劃——日耳曼種族要對歐洲其他各國、而且不僅只是對歐洲各國確立霸權的冒險家計劃，已對全世界人士洩露出來了。關於「支配種族」對於歸入「下等種族」一類的其他各國實行征服的德國法西斯學說，已變成對於歐洲文明的生存的直接威脅。

在被希特勒匪幫侵略的各國中，人民曾對對於這擊法西斯侵略者準備不夠。只是逐漸地由於最初的爱國民主份子的努力，抵抗侵略者的民主力量，這才開始形成並且成長起來。但是，就運在那些國家中，例如在羅斯拉夫，儘管人民是支持反對侵略者而發動的起義，總缺乏一種力量以擊破希特勒的軍事壓力。決不是在我軍轉取攻勢并着手痛擊德軍，打破了德軍是不可征服的奇蹟以前，就已為那些被德國帝國主義奴役的各國人民的解放，開拓出廣大的機會。紅軍向西方挺進，以解放帶給我們的各鄰邦去，并且帶給歐洲的其它各國去。蘇聯和盟軍一同，這時以歐洲各國的解放者的姿態作戰，已經跟德國斷絕關係并且加入為消滅希特勒主義而戰的國家隊伍里來的那些國家，也包含在要解放的各國中間。由此可見，歐洲各國從希特勒壓迫下獲得的解放，必將銘記在我們勝利的紅軍歷史中，作為光輝的篇頁。

法西斯意大利是當德國在歐洲挑起戰爭的時候首先站到德國那邊去的。當德國進攻蘇聯的時候，羅、匈、芬各政府，已和希特勒德國締結了軍事同盟，就使他們的國家陷進為反對蘇聯而進行的戰爭中。保國，因為由希特勒代理人組成的保國政府，也已變成了德國的盟友。因此可見除了一些例外，歐洲各國有希特勒的統治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把他們的命運跟希特勒德國的命運纏結在一起了。德國的敗北，因而就不僅意味著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敗北，它也招致了法西斯主義在歐洲其他國家中的敗北。

因此，我們的勝利的意義，應該不只在德國法西斯主義敗北光照下，而且更在全歐洲法西斯主義在軍事上，精神上以及政治上敗北的光照下，來加以評價。

歐洲戰爭結束以後，同盟國當前的任務就是：粉碎日寇在東方的侵略，以便加速恢復全世界的和平。蘇聯決不能放鬆這個任務，因為蘇聯和它的盟國之間存在着相互的義務，也因為這是我們在東方的安全利益所迫切要求的。我們大家都記得：在東方，日本曾不止一次地進攻我國，我們的國家在東方經常遭遇日本入寇的威脅。所有這一切，就使蘇聯的參加抗日戰爭無可避免了。不難看出：自從德國法西斯主義在蘇德戰場上開始吃虧相繼不斷的敗仗的時候以來，就從那個時候以來，日寇在東方侵略的結果也已預先注定了。蘇聯終於出來反對日寇，這就加速日寇的敗北，這慶一來，就使東方戰爭的結束更快了。日本步着希特勒德國的後塵，也對同盟國投降了。

德國帝國主義要在歐洲稱霸的計劃，以及日本帝國主義要在亞洲稱霸的計劃，都被打得粉碎了，儘管在不久以前，西方和東方的法西斯匪幫曾把這些計劃只是當做走向世界霸權的一塊踏脚石而已，這樣就由它們本身的例子顯示出：在我們的時代中，這一類的侵略意圖，是多麼近視而且冒險呀。作為東方法西斯主義和侵略的主要溫床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敗北以及中國從日寇剝奪下獲得解放，對於亞洲各國的，而且不單對於亞洲各國的民主發展，都具有積極的重大的意義。所有一切民主國家的利益，都要求把這勝利鞏固起來。

所以，理所當然的：蘇聯認爲同盟國間商談如何由主要同盟國確立適當的監察機構，來督察日本投降條款執行一事，具有這極重大的意義。關於這個問題所會引起的困難，直到現在並沒有消除。但是，蘇聯從未相信：所有一切愛好和平的各強國，都充分認清必須鞏固對侵略的日本取得的勝利，并且必須鞏固同盟強國爲這個目標的合作創造適當的條件。

德國和日本都被迫向同盟強國無條件投降了。英蘇美聯軍去已達成了自己的目的。

現在，我國的人民很滿意地認清了：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符合各民主國家的利益而勝利結束方面，尤其是在把法西斯主義和侵略的最危險的溫床——希特勒德國打垮方面，會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蘇維埃人民把自己爲反對希特勒德國而進行的戰爭，稱爲偉大愛國戰爭。蘇維埃人民的典範，已變成其他各國中的愛國份子爲保衛祖國，爲祖國的自由與獨立而奮戰中的楷模。大家也都知道了：蘇維埃人民不僅解放了自己的國家，而且更爲確立全歐洲的和平與自由而英勇戰鬥過。一年以前，斯大林同志說過：「現在全世界認了：蘇維埃人民由自己奮不顧身的鬥爭，已從法西斯蠻夷剝奪了把歐洲

的文明無遺出來。那便是蘇維埃人民對人類史所佔的偉大貢獻。」

二 全世界和平的建立在與愛好自由的

各國的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的地方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在參戰國家的規模方面以及由於戰爭所引起的傷亡人數和物質損害方面。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民在不同的程度上參加到這第二次世界大戰來。在使外交的陣營中動員了一億一千萬人以上。在那幾年中實際上是不可能對任何國家是真正中立的。

人類由於擔任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就是說，由於沒有能夠採取適時的措施來對付這種空前無比規模的法西斯主義的侵略勢力，因而人類對於許多國家的人民生命和財產付無可計算的代價。戰爭強加到人類身上，他們對於侵略的受害者——宣佈偉大的愛國戰爭。

希特勒德國進攻蘇聯的目的不但是奪掠我們的領土和滅亡蘇維埃國家，而且希特勒注視着它的目的是要毀滅俄羅斯人民和整個斯拉夫民族。直到俄羅斯人民和蘇聯的其他各民族人民都按照斯大林的話「一切為了戰爭」把他們的隊伍完全刷新時，並且當他們最後打斷了德國軍隊的骨節的時候，殘酷的希特勒匪幫在它們掠奪的土地上并沒有一時停止追求它們的殘無人類的目的。如果忘記了這一點，對於那成千百萬人無辜而死亡了的人民，對於他們孤寡無依的家庭，對於整個國家的記憶上，將是一樁重大的罪惡。我們也不會忘記在許多戰月的過程中德國侵略者及其幫兇在蘇聯領土上的罪行所加予我們的重重大物質損害。主要的戰爭罪犯應該因此首先受到刑罰。德國法西斯侵略者全部或局部地破壞并燒掉一七二〇個城市和七萬多個村莊，燒掉或破壞了六百萬所房屋，使得近兩千五百萬的人民無家可歸。被破壞和損害嚴重的都市是我們國家最大的工業和文化中心，如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爾，列寧格勒，基輔，明斯克，敖德薩，斯摩棱斯克，哈爾科夫，佛羅內茲，頓河羅斯托夫以及許多其他城市。希特勒匪幫破壞或損害了三一八五〇家工業企業，這些企業中雇用了將近四百萬工人和職員。希特勒匪幫破壞和燒掉了九萬八千處集體農場，其中包括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大多數集體農場。他們把七百萬匹馬，一千七百萬頭牛，幾千萬隻豬羊屠宰或沒收

運到德國去。僅祇對我們國民經濟和我們人民所加的直接損害，德國國家非常委員會的估計就已達到六七九〇億盧布（按政府價格計算）。

我們不能忘記這些，並且要發動戰爭的那些國家至少要部份地賠償他們所造成的損害。蘇聯人民這種要求的公正是不能否認的。同樣不可忽視的是：三國柏林會議對於蘇聯賠償的決定還沒有滿意地進行。不過我們沒有人主張採取對於戰敗國人民復仇的政策，斯大林同志不祇一次地指出過：復仇的希望，正像蘇聯經濟的事情希望一樣，都於政治上和民族關係上無聊的政策。

我們對戰敗的各族人民，一定不是以報復的心情為指針，而是要阻止新的侵略的發生，儘可能的新的侵略者在各族人民之中，更加孤立起來。在過去，必不是侵犯領導者我們，而在戰後的斯，則是和平保障與各族人民安全的利益。用不着爭辯，經久和平牢固的利益，要求愛好和平的人民具有必要的武裝力量。這固無如何是指那些對和平的鞏固負有主要責任的國家說。但和平保障的利益，與大列強國家武裝的競賽政策，沒有絲毫共同點，而某些帝國主義政策的特別狂熱的擁護者在國外宣傳。

在這一方面，應該指在對日戰爭中應用時表現了驚人破壞力量的原子彈及原子彈的發明，說幾句話。但原子彈還沒有在做為警告侵略或和平保障的東西時而受到考驗。在另一方面，現在不可能有那種大規模的技術秘密可成爲某一國家或狹小的某一羣國家的成就，所以原子的發明，不應該鼓勵人們醉心於這種發明，而作為對外政策力量的把戲，也不應該對未來的愛好和平的人民加以漠視。

還有很多喧囂的聲言，在繼續絮絮不休，大談形成若干國家的集團和組合，作為維護外交方面某種利益的工具，蘇聯從來不曾隸屬於以對付其他愛好和平的各國為目的的任何列強的組合。然而，在西方，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却會一再作過這一類企圖。在過去，許多這類組合，都具有反蘇的性質，也是衆所週知的。在任何場合，西方強國的集團與組合的歷史，已證明了：與其說它們對於控制侵略者有所貢獻，毋寧說其相反，它們是鼓勵侵略，首先是鼓勵德國的侵略。正因為這個原因，蘇聯以及其他愛好自由的各國，在這一方面決不應該鬆懈自己的警覺性。

世界和平的再建，決不會引起、而且也決不能引起各國間的關係方面戰前形勢的再建。在相當時期中，德國、意國和日本，已退出了調整整個國際生活的偉大強國之林，這就使整個國際生活協調起來了。因此，這是一國

當的時期，同盟國對這些國家實施聯合管制，以防止這些國家的侵略死灰復燃為目的，但是，同時，並不妨礙這些國家作為民主的愛好和平的國家而發展，而與此。歐洲若干法西斯的和平法西斯的國家，已走上民主的道路，現在力求和同盟國建立友好邦交，這一個事實對於歐洲的將來也是具有頗大的意義的。似乎很明顯的：這些國家中民主原則的鞏固，應該予以支持，而不應加以阻撓。

我們不能不注意：在同盟國的陣營內，戰爭也已產生了並不是無關重要的變化。在這兒，反對勢力照例總已相當地被排除他們原先的地位，而為新的和新的民主政黨所消滅。在歐洲若干國家中：已經進行了根本的社會改革，例如除去大地主莊園的剝奪，把土地移交給貧農，這就摧毀了那些國家中反動的法西斯勢力的舊基礎，而刺激民主與社會主義運動的成長。有些國家如今已把這重要的經濟改革列上議程了，如：大工黨領袖陶爾有，八小時工作日等等，這就使歐洲和歐洲的民主運動日益壯大的隊伍，具有新的精神與信心。

有些反動的報紙，開始企圖把這些大膽的民主改革，主要歸因於蘇聯影響的增長。這些報紙的空虛，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敵人皆知：在進步的歐洲各國中，這類問題在以前就已經順利解決了。這並不是意味法西斯主義的勢力已經徹底粉碎，無庸再提了。你們大家都讀過三強關於被解放的歐洲的克里米亞宣言，其中說：「歐洲秩序的確立，以及國民經濟生活的再建，必須憑藉足以使被解放的各國人民能夠消滅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最後形跡，並且能夠創造他們自己選擇的民主制度的程序來達成。」

為了確保克里米亞宣言的適當的執行，還有許多事情要做。然而，毫無疑問，為反對法西斯主義而進行的戰爭，儘管有一切消極的後果，總已在勝利中結束了，現在許多方面都有助於澄清歐洲的政治空氣，有助於為法西斯勢力空前的更生與發展開闢新的道路。這種形勢，不容置喙地，是符合愛好和平的各國的利益。我們應該希望：對於「消滅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最後形跡」這項工作的必要性的認識，在歐洲各國中更加根深蒂固起來。

蘇聯一向忠實履行加強所有一切愛好和平的各國之間的互當邦交的政策的。在戰爭的年份中，蘇聯和大小列強及合眾國，和法國及中國，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而斯拉夫，都已建立了友好邦交，而今差不多所有這些國家都已締結了長期的同盟與互助條約，以防止在這次世界大戰中成為侵略者。那些國家，可能死灰復燃的新侵略。在我們這方面，已作了一切努力，

要和其他的已拋棄對蘇聯仇視和猜忌政策的那些國家，也建立正常而良好的邦交。對這同樣的目的也有貢獻的，便是我國和圈子越來越大的許多外國之間的商務與經濟關係的發展，和他們的文化關係，也正加強着。

在戰爭期間形成的英、蘇、美反希特勒聯盟，現在正受着力量考驗。這種聯盟，在新的情況下，當戰後時期的更多的新問題發生的時候，會表明依然是強而有力的，而且足以作出共同決定的一種聯盟嗎？倫敦五國外長會議的失敗，便是這一方面的一種警告。英、蘇、美聯盟在戰爭期間，也曾經過過困難，然而，三強的聯盟曾表明了：雖然未必是立刻能辦，然而總能辦。法正解決當前的問題，以符合大大小小各國全體及希特勒聯盟的利益，並且願到必須更進一步加強偉大民主強國的合作。

今年，新的國際組織「聯合國」已終於成立了。這就是根據英、蘇、美聯盟的發起而設立起來的，因此，英、蘇、美聯盟對於今後工作的成績，要負起主要的責任。我們大家都明白：「聯合國」組織，不應類似過去的國際聯盟，因為國際聯盟已證明了在抵抗侵略方面，以及在侵略行動開始後組織抵抗勢力方面，都是軟弱無能的。另一方面，這個新組織也不該變成任何偉大強國的工具，因為任何一個國家要求在一股的世界大事方面起領導作用，正像要求世界霸權一樣，都是輕率的要求。唯有曾經負起過戰爭的重荷，並確保各民主國家對法西斯主義獲得勝利的那些強國的共同努力，唯有這樣的合作，才能夠使新的國際組織的工作成功，才能夠對永久的和平有所裨益。要達成這個目的，單靠示好意的願望是不夠的。還要加以證明的，便是以符合所有一切愛好和平的各國利益的方式，實行合作的能力。

蘇聯，一向是，而且必將繼續是保障各國的和平與安全的堡壘，並且準備用行動而不是用空話來證明這一點。

三 蘇維埃國家進一步的鞏固與蘇維埃民主的發展

和德國作戰的四年，是蘇維埃國家一切力量的考驗。蘇聯黨羣是地地道道過了這個考驗。偉大不朽的列寧的多言，又一次地應驗了，他說：「如果一國的人民，其中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都理解到，感覺到，並且看到他們是在保衛着他們自己的蘇維埃政權——勞動人民的政權，他們是在保衛着一種事

業，這種事業的勝利，將保證他們和他們的孩子們有享受一切文化的幸福，一切人類勞動的創造的可能，那麼，這樣的人民就是決不會被征服的。

從戰爭中脫穎而出的紅軍，享受勝利者的光榮，它是蘇維埃戰鬥的精神。目前正從事於復興社會主義建設之偉大任務的各業團體、各工廠、各工廠以及我們全國所急需的數百萬工人，現在正重返家園，從事和平的勞動。蘇維埃人民現在比以前更緊密地團結在它的黨周圍，而且在列寧與斯大林領導之下，以有組織的行列前進着。在艱苦的戰爭的歲月，紅軍和蘇維埃人民，由明智而可靠的蘇聯領袖——偉大的斯大林領導前進，這是我們極大的幸福。我們軍隊光輝的勝利，將以斯大林元帥的名義，銘記在我們的歷史和世界歷史上。由偉大的領袖和組織者斯大林指引着，我們現在走向和平的建設，以求社會主義社會的力量真正的強盛，以副全世界我們的朋友的厚望。

人人都知道，蘇聯的國際威信已經增長得更多的宏偉，這是由於我們在軍事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成就才有可能的。一年以前，斯大林同志表明這一點，會一過這話：「正如紅軍在長久而且艱險的獨力鬥爭中，對法西斯武力獲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一樣，在蘇維埃後方的工人們，在我們抵抗希特勒德國及其幫兇而進行長期的鬥爭中，也對敵人贏得了經濟的勝利。」斯大林又說過：「希特勒匪幫在這次戰爭過程中，不但已經毀壞了軍事的財北，而且也毀壞了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財北。」這次戰爭，已經向每一個人表明，我國在軍事——經濟方面已經增強得更多的壯大。這次戰爭，同樣也表明了，蘇聯在道義上和政治上的威信。在別國人民的眼目中，也已增長得更多的宏偉。

在這次戰爭的早年，我們會感覺到異常的經濟上的困難，然而，我們的國家，却證明了能夠以所需的一切，包括在品質上比敵人的武器超越的頭等的軍備在內，供應我們英勇的軍隊。忍受戰時的窮乏和困苦，蘇維埃人民從不歇手地工作着，我們必須讚揚後方的我國工人，特別是更讚揚那些獻身的蘇維埃婦女，讚揚那些無限效忠於祖國的蘇維埃青年。容許我們在困難的戰爭時期保持我國人民生活水準的，正是這一層。

數百萬勞動階級的兒子們，被動員並且在前線作戰，然而各工廠和各工廠，由於特別是從婦女和青年中間產生的新幹部的流入，依然繼續不斷地工作。戰爭期間主要在我國東部各地區，建築了不少的工廠、電力站、鐵道和鐵道。社會主義競賽及其提高勞動生產力的新方式，始終不遺餘地是前進工人

和整個勞動階級主要開心的事情。工會和它的工人團體，在工人羣衆中間進行了深入的組織工作和教育工作，男女工人們比抽到在前工作更為努力，結果許多的困難都被克服了。集體農場的農民們，在戰時，以集體耕作的制度，表現了他們的自覺性和農業上的組織性。男女農民現在都已經透澈明瞭社會主義競賽在集體農場方面的重要性，並且出了很多氣力，彌補了德國侵略者暫時佔領我國一部分領土時所加於農業上的極大損害。這一切，使我們在戰爭的這幾年間，能夠始終擁有豐富的積穀，並且以農業的原料，供給那些必需的工業企業。貫徹這一切任務，並不是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我們如果想起：我們的紅軍主要就是由集體農民的組成的。

我們在戰時，所以能貫徹了我們在前方和後方的任務，也因為蘇維埃知識份子盡了對祖國的天職。戰爭已經證明顯地表示出我們的知識分子在蘇維埃制度下已變成了什麼樣的人物。我們已不再聽到關於舊的知識分子的話了，這個問題，已由生活自身予以消解了。極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在組織經濟工作方面，在訓練新的專門家幹部方面，在保障人民的健康和提高人民的文化水準方面，都忠實而有目的地盡盡自身高尚的任務。現在，我們可以懷着無限感奮的心情說一句：蘇維埃知識份子對自己的人民毫無愧色，而且忠貞地對自己的國家服務。

蘇維埃各族人民的友誼，在戰爭期間已經成長得更加壯大。我們的多民族的國家儘管在言語、生活方式、文化與歷史方面是不同的，却已變得更加團結，蘇維埃各民族人民已變得更加互相親密起來了。決沒有一個別的什麼多民族的國家，能夠受得住我們在戰爭期間已經通過的考驗。只有我們的國家，在其中沒有人剝削人的餘地，在其中沒有互相鬥爭的階級，而代替的是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作為平等的公民，以管理地方的事情和國家的事情，只有這樣的國家，而決不是軟弱無能與唯利是圖的那種俄羅斯，曾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的艱苦歲月中，抵擋住德國的侵略，並以自身的力量，粉碎意國的敵人，把敵人逐出國土，而且給與其他各國強有力的援助，以便把他們從外國奴隸主的繩縛下解放出來。

現在，在我們，沒有被壓迫的或受不平等對待的民族了，不久以前，那些民族的地位，在沙皇統治下，原來是殖民地民族或半殖民地民族的地位。在蘇維埃國家裡面，公認每一種民族都享有獨立權和自由的民族發展權，所有一切民族的人民，都被變成一種互相友好和尊嚴的精神，也變成一種依據每一個民族在發展本身民族文化和推進整個蘇維埃國家這方面所作的努力

蘇約，外喀爾巴阡烏克蘭也已經變成我國的一部份，現在，蘇維埃烏克蘭把所有一切烏克爾蘭土地都聯合了起來，那本是我們烏克蘭同胞的古老的美夢。由於和羅馬尼亞締結的條約，蘇維埃烏克蘭也已經把摩爾達維亞人居住的領土，完全聯合起來，這就為他進一步的民族發展開拓巨大的前途。我國的西伯利亞，並且由於哥尼尼斯州併入蘇聯而擴大起來，這就給予我們在波羅的海上一個良好的不凍港了。在波羅的海區域，蘇維埃立陶宛，蘇維埃拉脫維亞，和蘇維埃愛沙尼亞，都已再建起來了。

這便是我國目前西伯利亞的領土，從確保蘇聯安全的觀點來看，這是最具有極大的重要性的。

在西北方，我們已經恢復和芬蘭依照一九四〇年蘇芬和約而勘定的邊界。此外，在北方，貝拉湖（巴沙摩）地區的領土已歸還蘇聯了。

最後，要說到遠東。在這兒，蘇聯承受了庫頁島的南部和千島羣島，那對於蘇聯在東方的安全說來是很重要的。還要提到的，便是我國對於滿洲鐵路的權利的收回，還有我們對於滿洲南部旅順港區域和大連區域的權利的收回。我們對於所有這些區域，以及對於芬蘭領土上卡拉——烏得港中我們的海軍基地區域，都必須給予適當的注意，而因為這些都是蘇維埃領土，我們就應當加以特別注意了。

我們必須儘速解決和波蘭人暫時佔領的那些蘇維埃領土有關的迫切問題。德寇鐵路所至，留下了許多毀滅的城市，以及以千計的荒涼的遺棄的鄉村。把侵略者一經逐逐以後，各處復興工作馬上就開始了。但是直到現在，還只是做了比較小的一部份工作。全體蘇維埃人民，所有各蘇維埃共和國，都應該專心努力把這些地區在經濟上和文化上從早而完全復興起來。工廠和製造廠，集體農場和機器站和國家農場，學校和醫院的復興，以及重建住宅給予每一個市民和鄉區居民，使他本人和他的眷屬都有家可歸。所有這一切，便是我們的迫切的任務。

蘇維埃機關和職工會，黨的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組織，還有集體農場及其在鄉村的組織，都應該把照顧會作而令從軍隊中回家的人，並照顧榮軍和紅軍將士的遺孤，視為自身主要的責任。我們必須做一切事情，以有效的方式來貫徹這種負責的任務，從草草了事到創傷。這便是一種迫切的任務。

就從現在起，我們必須着手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基本任務，以便在幾年內就大大地超越戰前國家經濟發展的水準，並確保大大地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標準。這便是最近公佈的黨和政府為擬定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〇年蘇聯國民經濟復興與發展的五年計劃，以及關於鐵道運輸的復興與發展的計劃而通過的決議的含義。我國人民很清楚的知道構成我國實力并保護我們勝利的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力量。我們需要重工業的新的高漲，以五金、煤炭、石油、火車頭、鐵道車廂、拖拉機、農業機器、汽車、飛機、船舶、動力廠、以

及許多其他的東西，供給我們的國家。各城市和鄉村的居民，都希望大大的增加消費品的產量，并增進糧食的供應。關於滿足集體農場的需并滿足農業的要求的任務，已變成比一向更迫切的任務了。我們的文化要求，已經增長而且變成更加多樣了。

我們一分鐘也都不應忘記關於適當的國防的需要，紅軍的需要，以及海軍的需要，我們偉大的任務。

我們不會有過，而且將來也決不會有失業。在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工作，因為我們的國家是勞動人民的國家。我們應該對於改進工業中、農業中、運輸業中以及我們一切機關中的勞動的組織，加以更多的思考，務使蘇維埃公民的勞動生產力和工作素質，會產生出最好的成果。在技術高度發展，以及在生產中廣泛運用科學的我們的時代中，速利用原子能以及其他偉大技術發明，都已變成可能了的時候，在經濟計劃中必須對於技術問題、對於提高我們工業技術水準問題，以及對於訓練高度熟練的技術幹部問題，加以極大的注意。我們必須在工業和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中，和最新的現代世界技術成就並駕齊驅，並確保蘇維埃科學與技術的普遍的進步，獲得必備的條件。敵人會阻撓我們的和平建設工作，但是，我們必須迎頭趕上應有的一切，而不要使我們的國家變成繁榮昌盛的境地。我們也將有原子能，以及許多的東西。

所以，讓我們以我們所有一切用之不竭的布爾塞維克的精力，以蘇維埃人民的偉大精力，來着手這些任務。讓我們照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的那樣工作。最後，要說到我們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任務。蘇聯一向以最新列的地位給予了普遍和平與國際業務關係的發展，而對於和其他國家和平共處與合作所表示的關心。當我們生活在「各國的體系」中的時候，而且當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的根並不會最後拔掉的時，我們對於可能出現的新的和平擾亂者們的警覺性，決不該鬆懈，而對於加強愛好和平的各國的和平的關心，和以前一樣，將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

我們沒有比鞏固我們的勝利的任務更重要的任務了，我們的勝利是在堅強的鬥爭中取得的，而且向著我們國家的新的偉大的隆盛，向著我國人民的生活水準更進一步的改善，已開拓出一條道路。我們以前從來不曾向過在這邊龐大的規模的，或蘇聯力量成長具有這般無限的可能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前途。

我們人民對於他們的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事業充滿信心。
蘇維埃人民，勝利者人民，及其紅軍和海軍萬歲！
我們的祖國，十月革命的祖國萬歲而繁榮昌盛！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萬歲！
列寧和斯大林的黨——我們的勝利的激勵者和組織者萬歲！
蘇維埃人民的領袖，偉大的斯大林萬歲！



動盪中的世界大局

于懷

自從十月初倫敦五國外長會議結束以來，整個國際大勢即是動盪不安的狀態，西歐歐洲問題一無進展，東則日本問題陷於僵局，而東南亞則爆發了一連串民族獨立的戰爭。在這種混亂與混亂中，原子彈的幽靈盤踞在世界的心。原子彈是一個戰爭的破壞的武器，這一個問題今天顯得如此重要，是不是意味於戰後世界和平已不可保，第三次世界戰爭的陰影又投射到這世界上來了呢？

問題的關鍵在英蘇關係，特別是美國，請從美國說起。

無論是在軍事上，經濟上或是財政上，美國都是今天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因為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不是被粉碎了，就是被嚴重的削弱了。被粉碎的有德、日、意，被削弱的如英如法。在力量上具有蘇聯——社會主義的蘇聯能夠和它相比。美國反動力量清楚地意識到美國這種有利的地位，他們下決心要把這有利的地位利用到最大程度。他們的目的足顯可能地把全世界的人民控制在美國獨占資本家的經濟和政治的支配之下，他們企圖建立起來帝國主義者的世界霸權，把英法降為一個次要的伙伴。

這種政策的根源在美國的大獨占資本家。這一批大獨占資本家在戰爭當中發了空前未有的大財。

杜魯門政府儘管是保證了繼續執行羅斯福總統國際合作的政策，但無論從其本質看，或從其所處的不同環境看，它也不受這一強大力量支配和影響是不可能的。事實上，正好相反，自從世界戰爭全面地結束以來，一系列的發展證明了這一強大的壓力是起着支配作用的。

在這當中值得一提的如：
一、貝爾納斯國務卿的對蘇「擴張行專」政策。

二、赫爾利大使的對華所謂「不干涉內政」政策。
三、不承認巴爾幹各國民主政府的政策。
四、堅持美國單獨管制日本的政策。

所有上述各項政策，除第二項而外，在倫敦五國外長會議都遭到了阻礙。如所週知，倫敦五國外長會議是在：一、與巴爾幹諸國締結和約；二、蘇聯要求共同管制日本等問題上產生僵局的。

二

追求達到阻礙，如何辦理？
早在倫敦外長會議遭遇困難，但尚未宣告最後失敗的時候，美反動帝國主義者早就訂好了第二步的步驟了。美反動集團的發言人魯斯主辦的時代週刊，在它十一月一號出版的一期上，就有過如下的話：

「……蘇聯知道，它是敵不過英美兩國的聯合力量的，但他也同時知道，有兩件事是對於英美方面不利的：
一、華盛頓和倫敦，在沉重的業業壓力之下不得不把他們的軍隊復員。
二、不管美國政府最後怎樣決定對於原子彈的處置，原子彈的秘密是不可無限制的保守得任的。」（十月一日，紐約，同刊）

這是什麼話！這就是說：我的政策行不通，不惜以武力求其貫徹，保持強大的軍備，用原子彈——好一副劍拔弩張的面孔！
然而這一暗示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十月二日倫敦外長會議結束，從十月二日到十一月二日的整整一月當中，從太平洋的對岸傳來了五次國際軍事力量強硬的聲音。一月之內，美軍政界人作了五次關於戰後美國軍事政策的演說：

第一次，十月九日，美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元帥兩年一度向國會的報告。

第二次，十月十九日，美國軍航空隊總司令安諾德元帥在參院軍事委員會主張擴充陸軍航空隊的演說。

第三次，十月二十三日，美總統杜魯門在國會聯席會上要求實施海軍軍備的演說。

第四次，十月二十七日，美海軍紀念週日，美總統杜魯門在紐約港強明顯大武力為美國外交政策之基礎的演說。

第五次，十月三十日，美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解釋何以美國必須保持強大軍備的演說。

這五次演說各有重心，但其方向却是一致的。

馬歇爾元帥第一次說：「我們的外交政策必須明智而強硬，如果我們的外交政策不以明確的安全政策為範圍，其結果必然失敗；現代國家的有效防衛，是維持其力量。」（十月九日）

馬歇爾元帥第二次說：「在此時期，美國人民已發生情緒上的危機：即復員不僅實際上成為軍事力量的解體，且已隱然使美國對於世界所負的責任感歸於消失……由於將來有再度發生原子性戰爭的可能，我們更應刻不容緩保有強大的軍力，以促進世界秩序的合作。」（十月三十日）

杜魯門總統第一次說：「普通軍訓制是我們準備把我們的巨大力量投入戰爭的唯一方法。」（十月廿三日）

杜魯門總統第二次說：「我們認為原子彈這一新的破壞力量保存在我們手中是一種神聖的付託。」（十月二十七日）

所有這些話已經叫起一個個警覺的睡眼，然而更加驚人的話還有：

安諾德元帥說：「美國必須有更強大的陸軍航空隊，以便在未來的戰爭中控制天空，未來戰爭開始時，可能達到三千哩以外的基地的攻擊。美國現在能從國內大半基地派飛機與亞非三洲的大部份。」（十月十九日）

我們不準備在這討論美國戰後的安全政策，那是美國人民的事情——附帶的說一下，我們知道，美國絕大多數的人民是不贊成這種攻勢備戰的軍事政策的；現在我們所必須加以注意的，這樣的一種軍事政策表現什麼呢？它表現：一、對於今後比較持久的和平沒有信心；二、對於強國團結維持和平的前途沒有把握；三、對於美國的外交能力發生懷疑。

人們以為：①用維持強大軍備；②用實施普遍軍訓；③用保持原子彈秘密；④用不惜貶言「美國現在能夠從國內大半基地派飛機擊毀亞非三洲的大部份」的恐嚇，偶反可以維持「秩序」與「和平」了。誠如英國的一家報紙之所指出，假如用原子彈的恐嚇可以維持得了和平，那和平也不過是一種恐怖和平而已。請問恐怖的「和平」與和平的「恐怖」有什麼差別？和平而變成了恐怖，那和平有什麼意義？

不，恐嚇是解決不了問題的。說一句危險的話，現在儘管有一批反動力量不惜以發動第三次世界戰爭相威脅，來嘗試推行它的世界政策，但在今天的實際情況下，就是希特勒再生（假定他已死），他也不能、不敢發動甚至準備第三次世界戰爭。

實際的力量對比使他不能，人民的和平意志使他不敢。儘管時代週刊強烈地暗示美政府不應迅速復員，美政府依而不退步復員；這不就表明了千百萬人民的意志就貫徹在這些所謂「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的通常事物當中嗎？

三

美總統杜魯門說，美軍龐大的攻擊力量將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骨幹，那麼，什麼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骨幹內容呢？杜魯門總統列舉了十二原則（俱見杜氏二十七日演詞）；有人把他比做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威爾遜總統的十四條，言其重要。

從原則上說，這十二條在大體上是好的；但問題不在抽象的原則，而在具體的實踐。例如十二原則中第四條說：「準備自主的一切人民的一切民族，應能選擇其本身的政府形式」；這是贊成民族自決的原則，這是好的，但是美政府一方面不反對印度尼西亞人獨立，另一方面又不反對荷蘭對於荷印的宗主權，這叫什麼「贊成民族自決」？假如說是美國採取中立政策，不援助武裝衝突中的任何一方；但實際上美國所做的却只是要求英印二國把他們用以進攻荷印人民的租借設備上的美國標誌拿掉，這叫做什麼「中立」？十二原則中的第五條說：「戰敗國將協助以建立和平與民主的政府」；日本的幣原政府算不算民主的政府？十二原則中的第七條說：「一切國家對於海洋上及流經一國以上的內陸水道應有平等權利」，這顯然是指歐洲的內陸水道說的，很好，「世界大同」；但是為什麼忽然又來一個第九條，「西

全球國家應能自身解決其問題，不受外國國家的干涉？難道南美洲就沒有
一條流往一國以上的水道嗎？再舉眼前一例，美政府要求五強共同參加對巴
爾幹諸國的和約，說起來很好聽，又是「大同主義」；但，爲什麼美政府却
又堅持只有美國有權單獨管制日本，堅決反對英美中蘇共同管制？假如美國
「大國主義」的原則恰如有一些人所說的那樣崇高，何以歐洲就受「同」而
遠東却高萬「同」不得呢？諸如此類的問題都不能用一個「一以貫之」的原
則來解釋的。

這樣說來，是不是說美國沒有一個一貫的外交政策，或者說它的世界政
策沒有一定的方向呢？不，美國民主主義者的世界政策的性質和方向是確定了
的，當前的問題不是這一政策的性質和方向是什麼，而是這一個政策能貫徹
到什麼程度；在這邊我們就必須考慮到四個因素：一、美國是一個新興的世
界列強，不像英國，它沒有作爲一個領導的世界列強所具有的經驗，初生之
犢不畏虎，勇則勇矣，有時不免流於莽撞；二、目前的世界是一個完全新型
的世界，有許多的深刻變化不是一眼就可以被人看出，更不容易爲一些少年
氣盛之徒所承認；三、美國是一個有長遠民主傳統的國家，這一次戰爭更大
大地教育了美國人民，這就形成了上述政策執行時內在的阻力，這不僅包含
了民間的民主力量，而且還包含政府內部的反對派；四、除去內在的阻力還必
須指出強大的外在的阻力，這不僅包含蘇聯，而且還有英法——美國的
反動份子雖有氣吞山河之勢，但在事實上，我們知道，山河河都不是很容易
就一口吞下去的。

由於這種種原因，就產生了某種「舉棋不定」和「欲主頻回」的迂迴曲
折的形勢。

舉一個顯著的例子：正在美蘇關係發展到微妙階段的時候，十月二十二
日美國國家協會的發言人突然聲明說，美國已停止對蘇貸款的談判了；這一
個聲明是非常嚴重的。因爲，我們知道，信用貸款是美國外交資本中最大的一
一筆王牌，假如這聲明是真的話，那就等於說美國已打下它的最大一張王
牌了。但國家協會的發言未過兩天，二十四日，貝爾納斯又否認美政府停止
對蘇貸款談判之說。這一方面固然是表明了美方爲資本家集團對於美政府的
一種壓力，一種鬥爭；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美政府不能臨事而胸有成竹，而往
往自居於舉棋不定之中。

但最足以表現這種複雜情勢的莫如關於遠東顧問委員會一事的发展。
美蘇對於遠東顧問委員會的不同態度，我們在這邊不再敘述了。我們這

邊需要指出的僅僅是，遠東顧問委員會是五國外長會議後國際間唯一的一根
未斷的紅線，因此這一問題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十月二日外長會議不歡而散。十月八日，美參院外交委員會就召開緊急
會議，這一會議顯然是決定今後對策的會議。自此而後，就一方面有了上述
五次強調軍事力量的演說，另一方面就有十月十日美國務卿貝爾納斯決定在
十月二十三日召開遠東顧問委員會的聲明。假如蘇聯不參加呢？十月十八日
貝爾納斯說，蘇聯即不參加，會議亦如期舉行；態度強硬極了。

不知道事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知道的僅僅是：十月二十日美國
務院遠東司長范宣德發表了一篇演說，不啻這幕演說對於現實的問題（如管
制日本，如對華政策，如殖民地問題）如何爲既成事實辯護，對於原則的問
題如何空洞而抽象，他的強調中美蘇必須合作的一點是值得讚賞的。這顯然
是爲了緩和一下美蘇之間的緊張空氣。同一日，美國務院宣佈遠東顧問委員
會延期一禮拜再舉行，我們不知道這幕後發生了什麼事情，可能是代表大獨占
資本家集團要求繼續強硬，民間和政府內部的民主力量要求緩和，兩者相爭
而有此結果。不過無論如何，會議延期的這一舉表揚了美政府還是願意「要
有餘地」的。

這之後，十月二十五日杜魯門總統發表談話說，他有親筆信，已交哈里
曼大使轉陳斯大林。信的內容不得而知，但這一舉使我們想起了舊金山會議
時美總統的派遺資浦金斯和戴維斯的分訪蘇英。資浦金斯的訪蘇曾經是鋪墊
了柏林會議的道路，哈里曼的訪問是不是可能產生同樣的結果呢？問題的性
質不同，具體的條件不同，我們不願意說會產生輕易的樂觀，我們之所以推
出這一點不過是爲了說明山似窮而實未窮，水似盡而實未盡而已。

遠東顧問委員會之所以延期一週，其主要原因當然是美政府假定一週之
內，蘇聯的態度可以確定了。但一週過了，十月三十日到了，問題還未解決
；怎樣辦呢？會議如期舉行！但使人驚奇的是，會議舉行了一個開幕禮，立
即宣佈休會一星期，十一月六日復會。

舉此一例，我們就可以看出美國世界政策的方向雖然是確定了，但在實
行中，由於內外的阻力，它可以產生怎樣複雜和曲折的情況。

四

然而必須指出：美帝國主義者的方向不僅不能代表美國人民的意志，而

且我們還必須嚴格的區別開帝國主義者的方向和以蘇聯為核心的全世界人民堅持團結和平的方向，這是兩個不同的方向。

帝國主義者以為在一切國際糾紛的後面，他們握着一張最大的王牌：原子彈的秘密；他們認為，這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有了它，他們就可以在所有的問題上，不管有理和無理，都能貫徹自己的要求；他們得達到一種程度，認為窮的國家連原子彈的名字都不敢提。

這在他們的心目中形成了一個威脅全世界的巨大幽靈。然而實際上，這並沒有什麼可怕。

十一月六日蘇外長莫洛托夫就公開提出反對一個國家乃至幾個國家的集團保持原子彈的秘密，因為這種保持只能為害世界和平，而絕不能有助於世界和平。世界和平的保證不在於其幾個國家保持原子彈的秘密，而是加強那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形成的英美蘇三大領導列強的團結。

莫洛托夫的這一演說獲得了全世界廣大人民的一致支持，這就表明了：它集中地表現着千百萬人民大眾爭取團結和平的意志。

這是人民的方向。
帝國主義者的方向是和全世界人民的方向矛盾的，有矛盾就有鬥爭——這就是為什麼，自從十月初倫敦五國外長會議結束以來，整個世界大勢呈現出動盪不定的基本原因。

說動盪，是說世界人民堅持團結和平的總方向雖已確定，但在到達這總方向之前還可能經過嚴重曲折的可能，目前我們正是處在嚴重曲折當中；但不管帝國主義者怎樣企圖阻撓這總方向的實現，他們是不可能推翻這一總方向的。美國外交政策在某些方面所表現的若干迂迴曲折的情形一方面固然表示了當事者的「留餘地」；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全世界人民大眾堅持團結和平的壓力究竟是不容忽視的。

這樣我們可以說：整個國際形勢雖在動盪之中，但所動盪的限度絕不會超過和平協商的範圍之外；世界的方向是向着公平合理的和平，而不是向着另一次戰爭。

然而這不是說這一批破壞世界和平的份子不是一股危險的力量，不，低估了他們的危險性是錯誤的。今天，擺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問題正是集中火力向這批反動力量進行嚴厲的鬥爭，不遺餘力的阻撓，這批反動份子決不會自動地放棄甚至限制他們獨霸世界的企圖的。懂得了鬥爭本身就是世界和平的一個因素而且不懈地進行這一鬥爭，那麼我們就可以說，團結和平的

人民的方向是一定會取得最後勝利的。

有一批無知的但是野心勃勃的反動賭徒，看到了國際形勢的某一些側面，就以爲第三次世界大戰即爆發了；他們閉起眼睛胡說：現在是備戰的時代，不是和平的時代；當前的工作是動員不是復員。由於他們的無知，他們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出於他們害怕和平——國內的和平和國際的和平，因爲真正和平了，他們就沒有任何理由爲他們的腐敗無能辯護，拒絕那自翻湧的民主改革的浪潮了。對於這些人，必須當頭棒喝：趕快打住，你們的賭注押錯了。（十一月九日）

毛澤東同志三大著作

論聯合政府

二〇〇元

新民主主義論

一〇〇元

文藝問題

一〇〇元

新華日報圖書課經售

越南的革命(下)

張尙民

編者按：上期我們曾刊載黃懷南先生「越南的革命」一文的上篇，旋以黃先生因事離滬，該文後半部未及寫成。黃先生的文章敘述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越南革命運動的發展情形，張先生緊接着論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越南革命的發展，正好爲黃先生一文的續篇。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越南發生了革命危機，越南人民襲擊東京、富壽法國兵營，西貢等大城市出現越南反法的暴動。在這時期，一部份反對法國壓迫的越南皇室、地主、官僚和資本家，利用歐戰法不顧東顧西的時候，策動復國運動，維新皇帝於一九一六年的密謀，潘赤龍在西貢企圖及一九一七年梁玉媚和上士根領導下的太原起義，相繼發生，事後遭受法國殘酷的鎮壓而歸於失敗，維新皇帝被流放到非洲小島。這時期的鬥爭，帶有普遍的自發性，是由皇族官僚領導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越南民族運動的發展

一九二〇年以後，越南受西歐民主運動和十月革命勝利的影響，民族運動開始走向自覺的道路，特別是由於越南先進的知識份子當中產生共產主義的思想，行動，使越南的民族運動很快與工農大眾的反抗相結合。一九二四年間，爆發南定紗廠工人大罷工。夏烈廠工人罷工及括林五千餘農民的暴動，一九二五年罷工浪潮波及西貢兵工廠，尤其是越南水兵反對干涉中國革命的兵艦事件引起了法國當局恐慌，一九二五年於法國逮捕越南救國領袖而引起了有力的反抗運動，早在一九二三年還發生過工人范鴻森在廣州沙面炸擊法國總督府等的事件。這些事實，不僅說明越南人民有組織的鬥爭已經萌芽，同時，顯示出越南工農大眾已成了越南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鋒。

早在一九〇五年，越南人潘是模、阮誠等就組織過國民黨，圖謀復國，因事敗而逃亡，一九一一年日法簽字後，在廣東的越南流亡份子，也曾組成

立了光復會，但當時這些組織並沒有對越南的反法鬥爭起直接指導的作用。

資本主義穩定時期，法國利用戰後復原強化統治的結果，引起越南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不滿情緒的增漲，代表越南這些階層的黨派於此時先後誕生，越南民族運動因而獲得進一步的發展。一九二六年，越南留法生潘倍珠、梁世傳等在巴黎第一次成立越南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越南民族獨立黨；次年，進行改組，在自己的政綱裡吸收了革命的因素，並改稱為越南國民黨，綱領的主要奮鬥目標，是「反抗壓迫」，「民族自決」，「實現安南民族的獨立」，並宣言：「決定對法國帝國主義採取革命的鬥爭，且願與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親密合作」。越南國民黨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擴大了自己的影響。

此外，代表越南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有：越黨，越南青年黨。當時，越南還沒有出現無產階級政黨，以領導越南工農大眾並從而組織反法鬥爭，造成強大的力量；因此所有過的這些鬥爭，都顯露其脆弱性。

越共成立至第二次歐戰

在世界經濟危機年份，越南共產黨正式成立。在這以前，越共還只是以零散的和小組的形式出現。成立後便參加領導一九三〇年安南海防暴動，並在部分地區建立工人農軍組織的政權。法國出動大批的飛機、坦克、炸彈，並派軍隊，槍殺暴動的越南人達一千二百人。同年，交趾支那的薩得和安南的榮合也發生廣大的示威遊行，一九三一年「五一」勞動節，越共曾領導

費、河內、海防、西貢等大城市的黨業紀念大會。

經過一九三二—三四年的準備(低)潮時期，一九三五年，越南又處在民族運動高漲的飽和點。

二五年初在越南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反帝統一戰線的口號。爭取民主，改善工農生活，揭發法國反動派統治所引起經濟危機，及其對越南人的欺騙詭計，反對法國犧牲殖民地人民準備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陰謀。同時，教育和組織廣大羣衆，成爲越南鬥爭的中心任務。法國人民陣線的抬頭，大大有助於越南民主反帝運動的開展，越共的影響飛躍的擴大着，一九三五年交趾選舉中，越共黨員當選爲西貢市議員。

一九三六—三七年間，工人報紙和羣衆運動，在西貢、順化，河內以及全國都普遍出現，反帝統一戰線的運動取得了部份士著資產階級的參加和支持。

越共提出適合於人民的要求，主要的是：越南各民族享有與法人同等的政治權利和義務，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減稅、禁止高利貸、取消無報酬的強制勞動，八小時工作制，釋放政治犯。

第二、三世界大戰前夜，越共擁有兩萬有組織的羣衆，出版各種無期的越法文刊物和數十種小冊子，公開的，半公開的，秘密的讀者有十萬以上，包括各階層民族人士，到處都有公開的黨的支部和公開的共產黨員，深入到各種羣衆團體，培植自己的力量。

歐戰爆發，越共即爲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而努力，自九月中旬至十月底一個半月內，東京交趾一帶的城市，到處發現反帝的標語傳單，在越共領導下，交趾地方的農民，公開出來示威遊行，高呼「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口號。

正是這個時期，法國人民陣線的勢力在反動的達拉第上台之後被打擊下去，鎮壓、逮捕共和民主人士的白色恐怖也就開始。一九三九年正月，參加反戰運動被捕的革命青年，有一百五十多名。同年十月七日至十月三日內，法越政府封閉西貢、堤岸進行反戰宣傳的十八家報館，許多羣衆團體(如：工人互助社、新聞記者協會等)，都被解散。越共被迫，又成爲地下了。

達拉第、雷諾的擴張越南反戰反帝鬥爭，並沒有使越共的活動消滅，一九四〇年越共團結羣衆力量，發表「告越南華僑書」，號召越南華僑和越南各民族一致行動，參加反戰反帝的統一戰線。

越共正確的估計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老大腐朽的舊法蘭西的必然滅亡與日寇南進威脅的嚴重化，給越共提供了新的任務。於是它在一九四〇

年六月廿五日的宣言書，清楚地指出：「……現在日本向安南的侵略，已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了，我們爲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與法蘭西抗戰勝利，建國成功，號召反對對日妥協……立即與中國政府訂立互助協定，中越及其他各民族團結起來！」

反日戰爭階段

可見，越共在日寇進兵越南之前，早就提高了警惕性，動員和教育越南人民。

一九四〇年六月，法蘭西投降了，不出半年，日寇果然橫行越南，法越政府被日寇稍加軍事壓力便屈服，無能的對日妥協了。越南民族充滿了不可抑制的憤激，首先是越共領導了廣大越人，起來堅決爲反對日本侵略者而戰鬥。

當時，「越南獨立同盟」是越南抗日運動唯一的和最大的領導中心。「越南獨立同盟」是以越共爲中心的各黨派抗日聯盟的雛形，其中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及越南各階層人士。它的目的，是爲了驅逐日寇，爲建立越南民主國家而鬥爭，越南抗日戰爭時期。它的影響最大，一九四〇年西貢一帶的反日暴動和以後的三折抗日活動，就是在它領導下進行的。

越共直接積極參加領導一九四〇年十月反對德古叛黨行爲及由日寇的統治陰謀而策動的大暴動。這是越共領導越南人民進行抗日鬥爭的大規模的行動的開端，這次鬥爭蔓延到全越境，持續了兩三個月，革命黨人割斷了電線，沿公河的交通也完全切斷，政府機關和建築物被毀，法蘭西官吏及法國兵營的事件經常發生，日寇張貼的反動標語被撕毀，或者就改成革命口號(如：「把日寇驅逐出境」)。「發動全國人民的力量，爭取越南的民主獨立解放等」。德古勾結日寇集結大兵，費數月時間圍攻西貢，革命黨被捕殺者以千人計，僅在萊款一個地區，越共黨員被捕殺的就有三十名。其中有五名，就地被槍殺，西貢、堤岸各地，成百個村莊被燒毀、洗劫，統治者動員了飛機、坦克、裝甲車向越南人民，作極殘酷的攻擊，據各通訊社報導，參加反日鬥爭遭難的越人在五萬以上，其中有一部份是反日的法籍和越籍的士兵。

越南「統一黨」在日寇與德古指使下，參加了許多數萬民族利益的破壞活動，它們在諒山一帶掛着「光復軍」，「復國軍」的旗幟，成爲摧殘越南抗日勢力的幫兇。這個所謂「統一黨」，成立於日本投降以前，是少數越南的親日頭目份子在南滿洲鐵道的保護下，他們打起抗日招牌，藉爲日寇利用，進行特務的勾當，並且被越南民族黨中的少數反日派所同情。

發動失敗之後，越共爲積蓄自己的力量，爲團結越南各民族階層抗日人士。採取了新的對策。一方面揭露了日寇的政治壓迫和欺騙，反對德古的出賣行爲，另一方面，則和越南國民黨中的少數親日的親日份子及越、日特

殺作鬥爭。同時，協助擴大越南華僑的救亡運動，一句話，越共逐漸成為獨立越南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路線而邁進。

蘇德戰爭爆發，在遠東，日寇獲得越南作「跳板」這時候，準備立刻滅亡整個南洋各民族的野心已暴露無遺了。面對着新的局勢，越共又復明確的重新提出建立越南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呼籲：「越南全民族團結起來！」「配合中國抗戰與印度人民的解放運動，為趕走日本侵略者，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國而奮鬥！」這時候，越南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是完全必要的。

直至太平洋戰爭，以及中共中央關於太平洋各戰區反日統一戰線的宣言廣播之後，越共便盡其全力，發動抗日武裝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越南人民切身體驗到日寇「共存共榮」、「日越提攜」的內容，不過是把越南人民放在沉重的披枷、壓迫、屠殺、奴役的統治底下，因此，越南人民的反日情緒一天比一天高漲，反日鬥爭也日益澎湃。逃亡、罷工鬥爭，逐漸在擴大。一九四二年二月間，河內、義安及四貢等處的礦業被炸毀，河內、西貢的鐵道被破壞了三次，使清戰軍用品的火車出軌，滇越路上和東埔案等處，經常發生日兵被暗殺的事件；在統治者隊伍中，大批逃亡的現象在蔓延着。一九四三年工人反日罷工，比四二年更形嚴重，金邊、西貢各地的企業工人，因不堪敵人的壓迫與奴役，紛紛舉行罷工，日寇大批捕殺罷工工人，但是越南工人頑強抵抗，十二月開始的工潮延續至一九四四年春天才平息。甚至於連監獄中的差役，在他們經過獄中投下的越南華僑或英美僑民窺視時，也敢於向窗外叫喊：「中國萬歲！」「聯盟國勝利！」「取消半打倒V字手勢。」

日寇佔領越南期間，實際上內部都是不穩固的。

戰爭同樣也激育了各黨派，各階層人士。過去，越南的許多黨派，對越共一再提出的民族抗日統一戰線，沒有一致的認識，其各黨派因為堅持不同的政策及信仰，因而分散力量，給日寇以各個擊破的企圖。一九四四年初，越南成立了民族陣線委員會，越南各民族各黨派團結起來了。

越南民族陣線委員會，建立在反法四斯及要求民族獨立解放的政治基礎上，它包括越南各黨派，越南國民黨，越南共產黨，越南獨立同盟，越南社會民主黨，越南反侵略同盟，越南人民救國會等組織，華僑，法國的反法西斯勢力也被吸收進去，越南民族統一戰線由此形成。

越南民族統一戰線成立之後，越共的政治影響和組織力量顯得更為強大，威信也提高了。

越南反日運動的後期，在越共及其他黨派領導下，有顯著的成績。一九四四年夏天，越南革命勢力成立了臨時革命政府。越南全境內農村中，已經普遍的發動了游擊戰爭，除了正規游擊隊之外，還組織了廣大的武裝自衛隊，這些武裝得到各階層，各救國會的配合與支援，北圻上游諸省，實際上完全

控制在游擊隊手里。他們經常破壞交通線，反對敵人的糧食征發，襲擊敵人火車與火車站，他們的力量，一天天在壯大，成為同盟國在東南亞洲反攻的一支主力軍。

「三九」事件

自古犧牲人利益對日妥協，幫助日寇鎮壓越人的抗日運動，供給日寇以無數軍需資源與越米。但是，這些罪行只能部份的獲得日寇的歡心，日寇繼續通過談判的方式壓迫德古，以謀全面的控制越南整個軍政實權，割斷德古與美、英特別是與法國的微妙關係，這種關係，在希特勒崩潰前夜，尤其是美國在太平洋反攻節節勝利的情況下，已成為日寇南洋佔領區的一個心腹之患，到今年三月九日，談判破裂，德古與日寇的矛盾於是表面化。

「三九」事件沒有得到有組織的越南抗日運動的配合，很快就被日寇武裝鎮壓，此時，越南而對日寇直接統治的局面，但是越南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始終堅持着頑巨的反日陣地。

日寇投降越南要求完全獨立！

日寇投降，是越南民族運動的新的歷史轉捩點。反對法國在越南重行確立殖民地的統治，抗擊法國聯合英、美反動派及日寇對越南人民所發動的總攻勢，已經成為全面性的流血戰爭，九月廿六日法越衝突開始了，越南爭取民族獨立聲勢震盪了全球。

經過日本侵略者五年來的蹂躪，越南人民提高了自己的民族自覺，在越共的努力下，越南人民從未有像今天這樣的團結一致。越南革命黨派（特別是越共）的勢力，已經滲透到越南各種抗日與革命組織及工農羣衆中去，建立了廣泛的深固的基礎。越南有了五十萬在抗日戰爭中鍛鍊成長的武裝，並且成立了民族政權。這是越南人民流血犧牲換取的代價，對於抗日事業，越南人民是有貢獻的。

法越衝突以來，反法、日騷動普遍發生，會一度停火的大規模戰爭亦因談判破裂又展開起來，越南革命臨時政府，業已控制東京，安南及交趾支那各區地帶。

越南民族運動領袖凡·巴克，在談判中堅持越南完全獨立的要求，要求法國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允許越南獨立，要求英、美停止支援法國武裝干涉越南人民的獨立運動。

現在東方被壓迫民族，世界工人階級與各國進步人士，正在密切注視與聲援越南人民的獨立解放鬥爭。

論土地改革與工業化

曉明

一 問題的提出

中國抗日戰爭是在一種特殊情況之下進行的，主要的大城市與交通線，被敵人佔領，抗戰的主要依靠是鄉村和農民。所以蔣主席在抗日戰爭開始時就指出：「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戰之中心，不在各大城市，而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這是因為中國是一個經濟基礎在於農村的農業國家，四萬萬五千萬人民中，有三萬萬六千萬是農民，所以鄉村與農民才是抗戰的主要支柱。抗戰八年來的事實是：沒有充分的兵力，不能進行長期戰爭，尤其像中國的工業與軍備這樣落後的國家，如果沒有廣大士兵的血肉作長城，簡直就不敢抵抗敵寇和保衛祖國，然而糧食全部是農民所生產的，沒有足夠的糧食，也不能支持長期抗戰，然而糧食全部是農民所生產的，為了抗戰的需要，在各地辛苦苦建築公路與飛機場的，十分之九是農民；抗戰需要大量的財力，而這些財力的最後負擔者亦是農民。當然，其他社會層對抗戰也盡了相當的貢獻和作用，但農民對於社會國家出力最多最大，負擔最重，却是鐵錘成成的事實。這是中國抗日戰爭之所以能够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堅持八年多，打敗敵人無數次的進攻，終於獲得勝利的主要原因，這證明了農民是創造歷史的主力。

土地是農業經濟最基本的生產手段，是三萬萬六千萬農民賴以生存發展，賴以創造歷史創造社會物質財富，賴以支持抗戰需要的主要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基礎。然而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歷史偏偏作弄，封建社會一成立，農民一登上歷史舞台，普遍地農民就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權，土地問題就開始產生了。戰國秦孝公十二年，商鞅開始廢井田開阡陌，便有一「強農兼併，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的歷史現象。而且中國自後漢中葉以來，每次歷史上的興亡治亂之巨變的主要原因，都是土地問題尖銳化的結果。奇怪得很，仍有許多人硬要歪曲歷史，硬說事實地說：「中國從來沒有大地主」，硬說實

是取公正最合理的，它清楚地告訴我們：中國地主的「王國」一向是驚人的。這的不說，我們身處的湖南就是中國一個地主勢力很大的地方：新化縣一個陳姓地主「王國」領有土地五十萬畝。孫中山先生說：「中國革命也可以說就是土地問題的解決」，他早即看透了中國社會的病源，但我們從未大刀闊斧地去割治過，一直使它殘害着民族的健康，阻礙着抗戰力量的動員。儘管早在抗戰開始後即二十七年四月一日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就有「中國為農業國家，大多數人民皆為農民，故中國之經濟基礎在於農村。抗戰期間，首宜謀農村經濟之維持，更進而加以獎進，以謀其生產力之發展」的莊嚴而明確的規定，但自始即不曾切實的實踐過，以致農村問題加速地惡化。

抗戰任務的重心，在於打敗敵人，消滅敵人，爭取民族獨立，獲得國家的國際地位之平等，同時，並取得國內人民真正的自由民主和統一。建國任務的重心，在於迅速而切實地完成國家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的巨大的建設事業，使臻於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境界。現在，抗戰勝利了，今後的主要工作是和平建國。但這個更偉大更艱巨的建國任務和建國工作，也必然地要同抗戰一樣，非主要的依靠着全國廣大的農村和廣大的農民，即不可能順利地進行和完成。說而不做，不能改變事實，歪曲歷史，蒙蔽現實的真相，不是解決問題的態度。為了要真正地解決問題，我們必須嚴正地來研究問題，搞通問題，發見它的癥結所在，求得正確解決的途徑。

二 土地問題與農村經濟的特質和動向

中國土地問題與農村經濟的痼疾之沉重，本是一件由來已遠的事實。戰後以後，由於通貨膨脹無限制，物價糧價不斷飛漲，土地資本和官僚商人資本互相勾結壟斷於土地投機和物資囤積，以致地價高漲，地權集中，農民

失地，社會中產階層加速崩潰，地租加漲，高利貸橫行，生產迅速減少，經濟發展到非常嚴重的程度，實在再不容許全國人民等閒視之了！

抗戰中土地問題與農村經濟發展的特質和動向是這樣的。

第一，地權集中。中國土地分配不均與地權集中的情況，據抗戰以前的調查統計：全國三億三千六百萬的農民中，只有一小半即一億五千萬農民（領地一畝至十畝）是有土地的；其餘一半以上的農民包括佃農一億三千六百萬，雇農三千萬，游民兵匪等二千萬，共計一億八千六百萬的農民，都是貧無立錫的。同時，在一億五千萬領有土地的農民中，人口佔百分之五的大地主（領地百畝以上）即佔去了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十五，如果合計人口佔百分之三十的大地主，中小地主（領地五十畝至百畝，人口佔百分之九，佔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十九）和富農（領地三十畝至五十畝，人口佔百分之十六，佔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十七）即佔去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八十一，而且這些土地都是比較肥沃的水田或平地；然而在相反方面，人口佔百分之四十五的貧農（領地一畝至十畝）却僅佔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六，如果合計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貧農和中農（領地十畝至三十畝）也僅佔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十九，而且這些土地大都是很瘦瘠的旱田和山地。抗戰以前，地權集中的程度，由此可以概見。

抗戰以來，大後方農村經濟一個顯著的特徵，就是土地資本的畸形發展。在這種：一方面由於抗戰財政未能健全，通貨膨脹無法限制；由於一九三九年歐戰爆發與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國際金融活動極度不安，外匯波動劇烈，從前大批從事外匯投機與國際貿易的資金因失去活動地盤而回頭奔馳到大後方，同時東南地區的資金因不堪敵人的壓迫，又大量內流；由於商業利潤之肥厚壓倒了工業利潤，不僅巨額資金持有者對工業生產的投資不感興趣，反而使大批工業資本為了自救或者追求更多的利潤，而不斷地逃亡到商業資本的範圍轉運，因此種種關係，官僚商人資本和地主資本的勢力便被培養起來，龐大得驚人。另一方面由於物價高漲尤其是糧價高漲與通貨膨脹無法限制，幣值不斷跌落，使巨額資金持有者，認爲不惟土地是發財最好的對象，而且「土地是安插資金的保險箱」。於是那龐大得驚人的官僚商大資本和地主資本互相勾結，除囤積居奇，囤積物資外，更轉注於搶購土地，使地價扶搖直上，地拉地漲前漲幾倍後漲幾倍以上，使地權集中，農民失地，農村中產階層加速崩潰。此種現象開始於抗戰第二年以後，跟着資金內流游資泛濫的凶狂，土地投機的現象也更趨嚴重。距今四年前，第八戰區

經濟委員會出版的「東南經濟」三十四年四月號，就已披露了這一事實的真相：「擁有大量土地及特產的地主，烽火中的暴發戶，以及一部份不惜利用地痞流氓作走私和囤積居奇的非法買賣國難財的喪心病狂者，他們在國難中對法幣懷疑，他們很聰明的規避國幣田地的貶值的，大家不約而同的紛紛購買土地，從後方到前方，從東南到西北，潮湧了暴發戶爭購土地的狂潮」。近四年來，這種地價飛漲與土地投機的惡浪，是只有加高，而決不會緩和的。

在西南大後方，一方面因爲比較安全，同時又是游資擁塞的區域，地權集中的趨勢更爲猛烈。四川的情形最爲顯著，重慶與成都一帶的地價，比之抗戰以前，已經增漲七八倍以上。其他像昆明附近，桂東，粵北一帶，國難財者層集之區，爭購土地的惡浪也非常洶湧。不僅原來的大地主在搶購兼併，而且還增加了大批官僚商人資本的爭購。其影響所及，使大後方土地兼併與地權集中的趨勢，達到駭人聽聞的程度。據葉民先生在本年六月份「軍事」十卷第十一、十二合期刊，根據最近各種官方報告和私人材料研究現在大後方川、康、滇、黔、陝、甘、寧、青、新九省地權集中的結論說：「今後大後方農地，十分之六以上，而且都是比較肥沃的一部分，全在佔全人口不到百分之三的地主手裡」。此種影響之擴大，由於地價與糧價的飛漲，刺激了其它物價的高漲，打擊了人民的生活，造成社會的不安。

官僚商人資本與土地資本是無孔不入的，在地價高漲的區域，固然有它們長袖善舞的餘地，即連這災荒地價慘跌的地方，也可以成爲它們角逐的場所。例如自三十一年以來，河南、山東、浙江、安徽等地，由於敵入肆虐與人爭不修所造成的災荒，使廣大農民棄家陷於水深火熱，農村生產停滯。「在災情最嚴重的區域，土地價格一落千丈，有不及原價十分之一的；暴利獲得者因之大量購進，土地兼併的現象更趨嚴重」。地權集中的結果：一方面就是意味着大批中農或自耕農失去土地，佃農的負擔增大；但另一方面因爲大部份官僚商人資本所搶購的土地，不是當作生產手段去利用，而是當作待價而沽的奇貨，於是弄得許多肥沃的土地不能適當的使用，甚至讓它荒廢閒置，同時，大多數需要土地使用的農民，却又苦於無法求得土地，結果造成「地不能盡其利與人不能盡其力」的不幸結果。

第二，土地使用分散。這人口不及全體百分之三却佔有全部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是比較肥沃的土地的地主們，他們獲得這種廣大而肥沃的土地，並不能自己耕種也不是僱用工人作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式的現代化的農業經營

，而是次第地經過其土地管理人或持有資金的土地租當者之手，以五畝十畝至多不過三十畝的零散方式，轉租給一個三千六百萬而且正在飛速擴大其隊伍的佃農去作生產力極小極低的耕作。這種土地使用分散的實際情況，在全中國農村中和地租集中相形影隨地嚴重而尖銳普遍而深刻地在進行。試就我國農戶經營的面積來說，一個佃農最多能佃得三十畝耕地，而廣東農戶的經營面積竟有少至五畝九分五厘七毫的，在西康平均一個佃農能佃得八畝耕地，福建亦平均為八畝左右，廣西平均十四畝，而全國的平均數字亦不過為十五畝。這從充分證明地主的殘酷和佃農的貧困。因為佃農要能佃得一塊面積廣大的土地，情形就將完全不同了，可以生產比自己需用和繳納給地主而外更多一點剩餘產品。但地主儘得佃農貧困是愈利於剝削愈易於馴服的。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地主學會了將土地時形的分散，在細小的土地的利用上打算，使佃農永遠「束縛在土地上」，不能翻身。而佃農只能在極小面積的土地上從事生產，這就註定着他們永遠陷於貧困悲慘生活的命運。因為在一片片小土地上，他們不能以辛苦取得比土地所能生產的更多的收穫。而在這一些可憐的收穫中除了十分之七八要作為地租租給地主而外，所剩餘的東西供一家數口的最低生活尚且不足，即所謂「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樂極而終身者，凶年不為於死亡」，那佃農去有餘力購買肥料，採用良種，購買高價農具和提高生產力呢？所以他們永遠只被允許用極度的勞動去重複着那極低極小的單純再生產。所以土地使用分散的毒害，不僅使農民永遠陷於貧困悲慘的深淵之中，而且使農業經濟的生產力永遠無法擴大和提高。

第三，社會階層加速分化。土地兼併風行與地租集中的趨勢，其反面便是充分意味着中農或自耕農的迅速失地與崩潰，佃農隊伍的飛快增大，以及社會階層分化的益大與加深。

在大後方，四川佃農增加與自耕農減少之趨勢，可從下列前四川稻麥改進所製金陵大學農學院的調查統計表中看出來：

年份	佃農%	半佃農%	自耕農%
二十三年	四九	一一	三〇
二十四年	五〇	一一	二九
二十五年	五二	一〇	二八
二十六年	五三	一一	二五
二十八年	五四	一四	二二

從表中可見自抗戰前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即在抗戰前後五年之間，佃農

增加了百分之五，半自耕農增加百分之三，而自耕農減少的速度最大減少百分之八，表示中間階層崩潰的程度最大，這是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其次，自耕農減少與佃農增加的趨勢之速度，抗戰開始以後比抗戰前更快得多，表示抗戰以後土地資本開始活動的猛烈有力，這是第二個特點值得注意的。再次，自二十八年，自耕農與佃農在農村經濟的成份中即已成二二與五五這樣懸殊的比例，即佃農的隊伍為自耕農或中農的兩倍半，而且這還是在抗戰期中自耕農減少與佃農增加之趨勢發展的初期情況，以後他們勢力消長的變動，只有加重加速的，而決不會減緩或緩和的，這正表示着農村經濟中，土地改革要求之迫切性，這是值得注意的第三個特點。

再按陳翰笙先生在中國農村第八卷第五、六期合力根據朱述仁對清華調查所所作的一個粵北南雄縣佃戶成份表，可以表示出粵北農村分化的動向。

南雄縣戶成份變動表（以百分率表示）

年份	地主兼富農	中農	貧農	雇農
廿八年	七	一一	四〇	三五
卅一年	一〇	一八	二〇	四二
				一〇

表中明顯地告訴我們，地主富農與貧農雇農都在增加，只有中農在減落，而且三年時間就減少了三分之一，可見其沒落程度之厲害。這種地主富農與貧農雇農向兩個極端增加，而中農迅速沒落的現象，不僅表示地租集中於地主手，中農或自耕農失地，佃農或貧農的隊伍增加，而大大增強了地主對農民的控制和剝削的關係，而且說明了封建半封建的社會階級間之鴻溝正在加深。

第四，高漲地租的加劇，中國農村中佃農的成份普遍要佔全農戶的一半以上。據國府主計處統計局的數字，民廿六年中國佃農佔農戶的百分之三十一，半佃農佔百分之二十四，二者合計佔百分之五十四。據四川稻麥改進所金陵大學農學院的調查統計，四川二十八年佃農佔農戶百分之五十四，半佃農佔百分之二十四，二者合計佔百分之七十八，這佃農的比列成份是驚人的。據前段的研究，抗戰以後，由於通貨膨脹，土地資本畸形發展，地租迅速集中，農民失地，自耕農減少，佃農隊伍與日俱大。因而更加速了地主對農民加以剝削的條件。

由於農村中封建半封建的經濟關係，中國各地的租額都是很高。四川租

佃戶則比較嚴重，租額最高竟達正產物收穫的十分之九，普遍的為八成，即普通所謂「主八佃二」。廣東租額亦普遍為正產物收穫的八成。江浙則普遍為正產物收穫的七成。湖北各省如山東河北因農村產物最少，租額亦稍低，普通為正產物收穫的六成或五成，但沒有比五成再低的。抗戰以後，由於糧價高漲，剝奪地主從各方面極力增加租額。首先，就從正租方面增加：據三十二年一月廿六日大公報載，四川成都一帶普通將租額增加到正產物收穫的九成，甚至有全數撥給地主而僅以田賦及附近地地的出產給與佃農者。再在巴縣一帶，還有把租額增加到超過正產物總產量，叫做「乾加」的一種辦法，一戶只能產五十石谷子，租給佃農，可以硬要收五十五石或六十石的租，迫得佃農必須買了谷子來繳納田租（見民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新華日報）。

其次，由於通貨膨脹，糧食幣賤，以及政府實行徵實購實的辦法，地主則更從改錢租為收實以及加押減扣等方面無微不至地增加租額。他們不僅將自己在抗戰時期所受的通貨跌價與政府徵購的一切負擔，完全轉嫁於佃農身上，而且藉資剝奪農民更多的糧食。是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但是，租額增加得愈高，農民改良甚至維持生產的可能與興趣也就愈低，結果，就是農產品的產量減少，影響於抗戰所必需的糧食軍糧和公糧。例如，前兩三年川北大旱時，農民生視禾田變麥無力以救。因為農民們，與其去換高利貸來雇人車水，收穫所得全為地主奪去反而增加自己的痛苦和負擔，不如禾枯報荒還來得合算啊！

第五，高利貸橫行。租佃關係的高額地租同樣在農村演變一種殘酷的榨取作用的就是借貸關係的高利貸。它們不同的，僅在於前者是通過土地所有權的形式，後者是通過貨幣或實物所有權的形式，其殘酷榨取的程度前者尚有條件可言，後者竟無條件可言而已。

抗戰以後，農民在高額地租，捐稅苛重，兵役勞役（特別是保甲制度不健全與弊病百出下的兵役和勞役），物價高漲的重重壓迫之下，農村中佃農貧農和中農負債的情形是極普遍的。國立社會教育學院三十三年七月調查四川璧山附郭四鄉，除地主外，二百六十一家農戶中負債者達一百二十九家，約為百分之五十，平均每戶負債額九千三百五十三元。又據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調查湖南會同縣的統計數字，農戶負債者達百分之六十以上。河南蒙縣三十年（大災以前）據調查農戶負債者亦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由此可見，中國農戶一半以上是生活於債台之上的。

利率的提高，在抗戰以後本是普遍的現象。債權人處於通貨跌價與物價飛漲的不利地位上，拚命提高利率，那是勢所必然的。例如湖北某些地方在抗戰前利率普遍為百分之三十，至二十七八年則增加了一成。西南大後方游資最為擁擠，高利貸的勢力更因甚，利率提高當更厲害。然而單只提高利率，其榨取程度總屬有限，抗戰時期高利貸的特點，尚在不提高利率，而在把實物貨幣的趨勢，普遍實行「貸款收實物」的吸血方法。例如三十年以後，粵閩兩省高利貸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除了少數城市還有錢貨流行外，廣大的農村差不多一致是實物借貸，借的是錢，還的是實物。而在福建則「借息通常加九利，就是一石還九石，而借出時，是九斗作一石算」。高利貸吸血方法之厲害殘忍於此可以概見。

在抗戰期中，農民除受高額地租與高利貸殘酷的剝削而外，還要在善於籌劃的保甲制度下忍負捐稅的苛煩，兵役勞役的重担，以及受物價高漲和商品關係的剝削，這些有目共睹的事實，此地因篇幅關係不詳論。

三 土地改革是工業化的基本前提

中國如果要使國家儕於真正富強的境地，要使國家的社會經濟走上工業化的道路，建立強大的民族資本主義的工業基礎，要把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經濟落後的農業國家改造成為一個在國民經濟中工業比重佔巨大優勢，農業現代化的國家，在中國目前全部的歷史條件和社會條件中，首先必須徹底地消除阻礙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數千年遺傳下來的封建半封建的舊經濟關係，即必須實行徹底的土地改革；實行沒收日本侵略者及親國有權的重要漢奸份子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實行減租減息，確保租權等辦法，實行因父孫中山先生解決土地問題的兩大基本原则：即對於城市的土地，為抑制土地投機，以實行地價稅及土地增值全部歸公為根本主張；對於農村，則實行耕者有其田為根本要求，將全國廣大農村中三萬萬六千萬的廣大農民，從目前地權集中，土地使用分散，自耕農沒落，高額地租，高利貸橫行以及捐稅苛重等等封建半封建的舊枷鎖中解放出來，使他們的生產日益優裕，能夠有無限量的改進和擴大生產的充足的能力。只有這樣才能為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建設之發展，造成無限寬廣而平坦的道路，造成其必需的諸前提條件：

第一，自由勞動者 建立強大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第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

，是必須要有大批的從封建中解放出來的自由而獨立的產業勞動者。根據經濟學的基本常識，就知道自由而獨立的產業勞動者，在現代社會經濟生產力中是一個最決定的因素。如果一旦缺少了它，作為另一重要因素的生產手段（包括機器工廠原料土地等）都將馬上失去作用而變為死的廢物，而整個社會經濟的物質財富的生產過程亦將立即宣告停頓。

我們有三萬萬六千萬廣大的農民，他們在過去是中國封建社會時代兩千多年來社會物質財富與歷史的創造者，是抗戰八年來為爭取最後勝利爭取民族獨立所必需的人力和財力的主要供給者，是今後中國富強力量之根本源泉，更具體的說，他們是「中國工人的前線」，將來還要有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式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幾億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期過程。但是，這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期過程，在中國今天具體的歷史條件和社會條件下，必須經過如何的方式才能完成？更明白地說，就是採用如何的方式才能撥發大的農民從地權集中，土地使用分散，自耕農沒落，高租地租，高利貸橫行與捐稅苛重等的封建中解放出來，成為工業化所必需的產業勞動者？

這個問題，從歷史上來看，西歐諸先進的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例如英法，把人格不獨立身體不自由的農民從中世紀封建莊園裏的土地束縛和其他許多封建枷鎖中解放出來，變為獨立而自由的產業勞動者，即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而達到偉大的產業革命的過程，不僅經過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乃至十八世紀前後數百年，為城市資產階級影響幫助和領導的，無數次的長期的反對封建束縛的農民戰爭，與無數次的在長期反對封建束縛的經濟鬥爭，而且還經過英國一六四〇至一六八九年與法國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四年前後兩次以城市平民為先鋒隊，以廣大農民為後備軍的推翻地主貴族和僧侶統治之封建專制政體的資產階級大革命，徹底地（如法國）或半徹底地（如英國）解決了為封建社會之經濟基礎的土地問題。但是中國目前所有的歷史條件比英法當時更為有利更為進步，在日本侵略者被消滅，抗戰獲得最後勝利，民族獲得獨立解決，國內取得自由民主和統一的國家政權以後，只要我們決心繼承國父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的遺教，徹底地實行土地改革，把三萬萬六千萬廣大的農民從目前地權集中，土地使用分散，自耕農沒落，高租地租，高利貸橫行，捐稅苛重等的封建中解放出來，就能在幾年至十年左右，完成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過程，造成幾千萬自由而獨立的與現代化的工業

技術相適應的產業勞動者，同時並造成廣大的生活富裕而有採用機器擔任農業現代化之充分能力的農民，而為國家工業化與農業現代化開闢一條寬宏而平坦的道路。

第二、資本的積蓄 顯然，中國要進行巨大的工業建設，並非有幾十萬萬幾百萬萬的投資不可。在這種我們知道，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不少部份地是藉助於外國資金的流入而建立了自己的重工業的，即藉助於掠奪殖民地，藉助於向戰敗國索取賠款，藉助於外債。然而我們中國在抗戰勝利後，它剛剛從被壓迫被掠奪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火坑中踏出來，所以我們原則上不能而且不可能採用那樣卑鄙的來源，作為工業化的資金，如掠奪殖民地而向戰敗國的人民索取沉重的賠款。當然，在日本侵略者被消滅以後，發動侵略戰爭的日寇統治階級以及作它幫兇的漢奸分子的企業和財產，應該被沒收來作為工業化資金之一部，盟邦善意的投資也應當大量地歡迎。但是前者與我們巨大工業建設所需之資金比較充屬有限，後者又不能無條件無限制的採用。如像納爾遜先生所主張的那樣，中英合辦紡織工業，「美國資本佔百分之六十或七十」（註一）中國方面出資本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然後在「十年之後，美國一部份股份可由中國人買去，直至中國人管理全部財產為止」（註二）。但是，中國抗戰勝利以後，剛剛從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囚籠中解放出來，真正的民族資本還是非常的幼弱，而且它的半殖民地性質仍然還有完全地消失。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我們認為那種使外資與華資處於七與三之比的極不平衡的出發點上，中國實在沒有把握將來在十年之後逐漸收回百分之七十的外資。這決不是說我們不能夠利用外資，而是必須像過去美國在南北戰爭以後，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所已有的先例一樣，站在民族獨立的原則上而利用外資，那就是：無論如何要千方百計保證民族資本積蓄的規模和速度在全盤工業化過程中佔有主導地位。如果不然，那只有淪於殖民地的一途。這決不是消極的限制外資的意志，而是積極扶助民族資本更快更發展的意思。

因此，我們工業化資金的來源，主要的只有求之於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民自己來積蓄，外資是可以利用的，而且應該十分歡迎，但它只能是輔助作用的東西。然而廣大農村中的廣大農民，目前被陷在土地權集中，土地使用分散，自耕農沒落，高租地租，高利貸橫行，捐稅苛重等的封建中解放出來，生產力那樣低微，生活那樣貧苦，就是堅持那唯一賴以生存的單純再生產向非常困難，那總還有餘力從事資本的積蓄。

問題如同玻璃一樣的透明，要打開關稅這一條最合理的出路，那就祇有徹底地實行國父孫中山先生遺教中關於解決我國土地問題的兩大基本原则：即對於城市的土地，為抑制土地投機，以實行地價稅及土地增價全部歸公為根本主張。對於農村則以實行耕者有其田為根本要求。然後即將我們工業化資金開出三個最理想的來源：（一）在日本侵略者被消滅，抗戰最後勝利獲得以後，從前在抗戰時期，退居到西南大後方和農村中的大批巨額資金持有人，定將迅速地擁入東南或西部的中小城市去從事活動，而使全國的都市迅速地繁榮起來。因之都市的地價亦將隨着都市的日趨繁榮而高漲起來，如果徹底地實行地價稅和土地增價全部歸公這一基本原则，不僅可以抑制都市土地投機的惡現象，而且可以為我們國營重工業建設取得一個龐大的資金來源。（二）在日本侵略者被消滅以後，如果實行沒收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漢奸份子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實行減租減息，保障租權，更積極地實行扶助農民獲得土地的各種有效的辦法，例如實行大量低利或無利的借貸，幫助農民購買土地。務使廣大農村中的廣大農民達到「耕者有其田」的根本要求，使他們的生活日益富裕，生產力日益提高，生產規模日漸擴大。然後三萬萬六千萬廣大的農民始有充分的餘力，來不斷地大量地積蓄資金，向工業部門購進大量的工業品，農業機器，化學肥料，改良種子，使農業走上現代化的道路，為城市工業部門供給豐富的糧食和原料，使農村中無與倫比的資金源源不斷地流入城市巨大的工業建設中去，壯大工業化的資本，使國家工業的發展建立在一個最堅強最健全基礎之上。（三）在徹底地實行土地改革，逐步地使土地歸耕者之手，使農民生活日益富裕，使農業生產無限制地繁榮提高和擴大起來以後，從前在抗戰期中在大後方在農村中從事於土地投機，放利高利貸和囤積居奇的，禍國殃民的，巨大驚人的官僚資本，商業資本，土地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都將完全失去它們向來投機活動的地盤，而自然地或被迫地走入工業生產建設的正路上變為工業化資本的一個巨大來源。假若不然的話，它們還原巨大的洪流，仍將泛濫在全國的都市和農村中，無孔不入地從事各種投機事業，不僅使工業化失去一個巨大的資金來源，而且它們的洪流所到即將塞死工業化發展的一切道路。抗戰時期甲它們因股洪流所加於工業生產的災害，是值得全國關心國家工業化前途的人們的痛省並引為殷鑒的！

由以上所論，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只有土地改革才是解決工業化的資金問題的一把最銳利最健全的鑰匙。

第三，國內市場的開拓 更明顯的，就是如是要使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建設順利地建立起來並發展壯大起來，一個和資金積蓄同樣的重要的前提條件，即是工業品的市場之開拓。祇要一個具有經濟學基本常識的人就會知道：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法則的統制之下，商品的第一次再生產過程達到商品的第二次再生產或擴大再生產過程的中間，必須將第一次再生產出來的商品，拿到購買力充足的市場上去經過一度交換過程之後，把它轉變為比進行第一次再生產過程之前更多的貨幣和更多的商品（如原料和機器等）始有可能。不然，沒有市場或市場上的交換過程一經阻礙和停頓，工廠中的生產過程即將隨之而阻礙而停頓。同時，那可怖的經濟危機的驚濤駭浪，亦即迫緊捲來，因而工業品的市場之為工業化的前提條件，即為商品的交換過程之為商品的生產過程的前提條件之外的表現。

先進諸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所必需的市場，其中的一部份是求之於國內廣大的人民，其另外部份乃是求之於本國以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和國家。它們首先經過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在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的海外探險，發見了南北美洲的新大陸和非洲南部、印度、南洋、遠東及澳洲諸經濟落後民族和國家，而建立了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建立之後，使它們的工業化得到廣大而驚人的發展和進步。中國戰後工業化需要一片購買力豐厚的廣大的市場，那是沒有問題的，但以我們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經濟的性質來說，原則地不能也不應該求之於本國以外的殖民地或世界市場。如像納爾遜先生所主張的那樣，極力發展輕工業去承擔日本侵略者於太平洋戰爭之前在南洋、印度、近東、和澳洲山洲同英國競爭得異常尖銳化的世界市場。如所週知，日本過去之所以能够維持它在世界市場上角惠的地位，主要的依靠兩個支柱：一個是對外實行大規模的廉價傾銷政策，一個是對內實行殖民地式的極度的低額工資；而前者之存在的可能又是完全建於後者之上的。假若中國在世界市場上去代替日本的地區，據過去競爭的經驗，勢非承襲日本這種對外的廉價傾銷政策和對內的極度低額工資不可。然而這兩者無論從戰後同盟國的國際的政治團結與經濟合作的利益着想，或者從國家工業化之健全發展與國內廣大人民之幸福的利益着想，對於中國人民都是極端有害而必須加以廢除的。

然則，中國工業化所必需的市場，既不能求之於本國以外的殖民地或世界市場，當然就只好向國內廣大人民尤其是廣大農村中的廣大農民中去開拓了。因為三萬萬六千萬廣大的農民中具有着無限大的可能性，可能為城市的

工業供給豐富的糧食和原料，吸收廣大的工業品。但是，如果他們處在像目前一樣地權集中，土地使用分散，自耕農沒落，高額地租，高利貸橫行，及捐稅苛重等的封建半封建的嚴重壓迫之下，廣大農民的生活是那麼貧困，農業生產力是那麼低微，以強度勞動來維持其賴以生存的單純再生產尚覺十分困難。那裏能夠為城市工業供給必需的糧食和原料，和吸收龐大數量的工業品？問題在工業化資金的前途一樣要打破難關找出合理的出路，祇有實行徹底土地改革一途，即在日本侵略者被消滅以後，澈底實行沒收日本侵略者及重要漢奸份子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澈底實行減租減息，保障農民的租權，實行有效增產助農民獲得土地的辦法，例如實行低利或無利的貸款，幫助農民購買土地，務使三萬萬六千萬廣大的農民個個都能逐步達到「耕者有其田」的根本要求，使他們的生活日趨富裕，生產逐漸改良和擴充。然後農村中的農民，才能為城市工業供給豐富的糧食和原料。而且向工業部門購買工業原料、農業機器、化學肥料，使用改良的種子，使全國廣大的農業迅速走上現代化的道路，為工業化開拓一塊無邊無底的國內市場，使國家工業化的發展建立在一個最堅固最健全基礎之上。關於中國土地改革與工業市場之關係這個問題，美國工、籍辛格先生在「作爲戰後市場的中國」一文有一段精闢的見解，最值得我們參考和借鏡，他說，「要使工業化本身能健全，或能盡量全部力量於逐漸提高生活水準，則除非把農業不僅加以技術的改組，而且加以社會的改組，使得農民有力置來購買工廠的產成品，藉以形成一個廣大的國內市場（着重點係引者所知）。如果中國要完成工業化，而它的農民仍在奇高的租金，苛重的捐稅和普遍存在的高利貸之下來耕種小塊的土地，結果只能是加深窮困騷動和不安的危機。而同時，城市勞動者必然只能得到低微的工資，因為農村中的過剩勞動將隨時準備被吸收到工廠中去。這種情形下的工業，中國可能會重複日本的經驗，日本便是未能澈底改革其農村而僅樹立起工廠來的，結果，由於國內政治結構的壓制性，以及國內市場之全然無力以消納日本工業出產最終致被推走上了侵略的道路了」（註三）羅辛格先生是何等明確地爲我們指出一條使工業化健全發展與開拓國內市場的道路。同時又何等嚴切地警惕我們不要重蹈日本統治階級侵略與自取毀滅的覆轍！

第四，政治前提。如果要保證中國工業化能順利地發展，不僅需要獨立自由的勞動者，巨大數量的資金，和廣大的國內市場，而且需要一個獨立、自由、民主與統一的政治，民主與統一的政治，則

不可能有真正大規模的全國性的工業，沒有重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沒有人民的幸福便沒有國家的富強。這是政治對於經濟積極的領導作用。然而，據中國近百年來慘痛的歷史經驗，一個獨立、自由、民主與統一的政治，是不可能僅限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上。但是，要獲得獨立，就必須澈底地消滅日本侵略者，把全民族從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枷鎖中解放出來；要獲得自由，民主與統一，就必須在政治上澈底地實行民主改革，使全國人民不論個人和政黨在政治上都有合法平等的地位，都有充分過問政治，參與政治和管理政治的民權，必須在經濟上澈底地實行土地改革，剷除現存的地權集中，土地使用分散，自耕農沒落，高額地租，捐稅苛重與高利貸橫行的封建半封建的經濟制度，解放全國人數最多，束縛最大，苦難最深重的三萬萬六千萬農民，使之自由，使之富裕。然後一個真正獨立、自由、民主與統一的政治才有可能樹立起來。

有了一個真正獨立、自由、民主與統一的政治，我們的人民和政府才能手腦一致、同心協力地採取和實行切實而正確的政策，步驟和計劃，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起巨大的重工業，普遍的輕工業和現代化的農業，使中國農業的地位升到工業國的地位上去？然後才能國防鞏固，人民幸福，國家富強。同時，也祇有在大規模的在全國經濟比重上佔最大優勢的工業，比現時發達好幾倍現代化的農業，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交通，貿易和金融事業爲其實基礎，獨立、自由、民主與統一的政治，才能期於鞏固堅強。

總之，中國工業化所必需之根本前提——自由勞動者，資金的積蓄，國內市場的開拓，政治前提——都非經過澈底的土地改革，解放農民，依靠農民，不能找到合理而正確的解決途徑。真理只有一個，假若有人企圖走彎路去繞過它，不是遭到落空的打擊，即會墮入迷途，蹈進沒頂的深淵。我們願意提醒萬一有此企圖的人們：我們祖先留給我們最巨大最豐富的遺產，就是今天全國廣大的農村和三萬萬六千萬廣大的農民。他們是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這座莊嚴而美麗的華屋的主要建造者，沒有他們即一事無成。

註釋：
 ①見納爾遜作「中國也能幫助我們」一文，發表在本年六月十二日科里爾雜誌，譯文見本年六月十八日新華日報
 ②同註一。

③見本年六月二十五日蘇聯半月刊第十卷第十一、十二合期索爾夫先生的譯文。

閻

錫

山

批

判

陳伯達

（按：指一九四四年八月間）西安各報公佈了閻錫山對中外記者團的談話。其內容除了對於抗戰中流砥柱的中國共產黨和十八集團軍（八路軍）極盡惡毒諷刺之外，沒有其他的東西。對於閻錫山這個人，我們是熟悉的。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國主義者高唱反共，向華北伸出其侵略魔手的時候，閻氏就是首先成為反共應聲蟲的一個，那時候，他那「大套一大套的反共『理論』」都捧出來了。他在一九三一年居住日本帝國主義租借地的大連，為反共而寫的所謂「物產証券與按勞分配」，也於這時候發表了。為了達到其反人民反民主的目的，閻氏對於當時揭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旗的中國共產黨，不惜採取一切最無恥的造謠中傷手段，這和我們不想多費筆墨去敘述它。抗戰開始後，則則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在山西多方面幫助了他，希望他能夠在敵人的面前站得住腳，但是閻氏始終念念不忘於反共，把反共放在抗戰的前面，繼續他在抗戰前對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主義的造謠攻擊。不過這一時期，他的反共是隱蔽的，不公開登在報紙上。民國二十七年（即一九三八年）七月（有一個單行本文說九月），他在晉綏軍高級將領會議上發表一個建立中心思想的講話，全篇沒有向日本帝國主義射出一箭，一切的箭都集中向共產主義射來，對於他過去的造謠又重復一遍，並作了一番小小的概括，說什麼共產黨「欲實踐共產主義的主張，須繼續不斷天天殺人」，「更不能不提倡仇父，鼓勵女子裸體遊行」（見閻氏救國言論選集，第二輯）。這些，可以說是造謠到無聊之極了。可是，閻氏却還在那裡滔滔不絕地噴着唾沫，希望取得那些與民為敵的人的信任。共產黨因為還想團結他，這就對於他的各種無理取鬧，向來採取容忍的態度，即使有同志對他發過一點批評，態度也是溫和的。關於他勾結敵人的事實，一直希望他改悔，長期地沒有把它公佈。可是閻氏不但沒有中止對敵人的勾結，而且沒有因為共產黨人對待他所採取的容忍或誠懇是一種好意，反認為可欺，在他亦繼續進行一切反共的思想宣傳，最近對中外記者的談話，竟然是那麼信口開河了。對於閻錫山這種卑劣無忌憚的造謠諷刺，最好的回答，當然是揭發各種的事實，而解放日報八月十一日（三十二年）下開）所登載的太行電訊，八月十四日所登載的薄一波同志轉鈞同志的談話，八月十六日及二十四日所登載的續絕亭先生的文章，就是最好的回答。這些消息、談話和文章都暴露了閻錫山勾結敵人、反對人民的鐵的事實。我這篇東西，只是想闡明閻錫山的思想及其實踐的若干問題加以檢討。有的問題，以前有同志說過的，這裡就不再說或者少說。有的問題，如係比較次要的，這裡也不準備去說它。

一 閻錫山的出發點

抗戰以前和抗戰以來，閻氏各種花樣翻新「學說」，和他在政治與經濟上的措施（即所謂「新政策」），是有他的「出發點」的。他這個出發點既不是為人民，也不是為抗日，而是為維持他獨自在山西所已經營了數十年

之久的寡頭專制政權。這回中外記者團到克維坡（即閻氏政權機關所在地）的時候，那裡一個「負責政治責任的人」曾經這麼告訴其中一個記者：他們近來在山西所實行的那套「新政策」，「主要的理由，却環境所影響，非如此就不足以維持正常的政權」。「不完全是戰爭」，他坦白地說，「據我們的經驗，爭取民眾，還是比較輕鬆的工作……我們所最感困難的，是社會廣義的宣傳。為了維持正常的行政系統，我們不能不講求應付之道」。「我

們認為，對共產主義的活動，最好的應付方法……是健全自己的民衆組織，改善民衆生活的弱點」（見重慶新報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由此可見，閻氏的政策，只是簡單的爲維持他的寡頭專制政權和應付共產主義，而在閻氏看來，維持他的這種政權和應付共產主義乃是同義的東西，乃是同一的工作。至於抗戰呢？那就早放在他的腦後了。

這類的思想，從閻氏的講演和文章中，我們可以找得很多。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他有一個講話，在那裡，他認爲：只要「本政權者」（按：實際上是一堆沒有經過任何人民合法手續產生出來的政權篡竊者）善於「適生」，政權就可以「永不崩潰」（見閻錫山言論集第二輯二四九頁）。民國廿九年（一九四〇年）二月，他又有一個講話，公開說出：自從「九一八」以後，他「經過數年的回中樞要人在南京、太原迭次磋商」

；其中大問題，即爲「如何鞏固政權；即成爲抗戰的緊要問題」（同上書二七八頁）。閻氏這裡的意思是明白的，作爲中國抗戰的緊要問題的，並不是如何加強抗戰的力量，以取得勝利；却是如何鞏固他們原來所壟斷了的專制政治，以避免人民的染指。據閻氏這段話，回溯一下歷史，也是有趣味的。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七日，閻氏有復蔣介石先生函，同年十二月九日，閻氏又有對全省中等以上學校校長教職員之講話。那時日寇覬覦華北，提出「華北五省自治」，形勢極端緊迫。大家知道，十二月九日及正北平英租界的學生們舉行悲壯的示威運動，促進全國抗日高潮的日子。但是，閻氏在那裡提的問題，却絕不是如何抗日救國，而是如何「防共固本」。他說：「能自存與自固？聯日好，聯俄亦好。不能自存與自固，聯日無益，聯俄亦無益」。他又重複地說：「不能自強，靠英美亦無益，親日無益，親俄亦無益。若能自強，國難可解，英美亦可解，親俄有益，親日亦有益」（以上所引，均見閻氏言論集，線裝書，第九冊）。事實上，就時閻氏這函也還沒有着意到抗戰這一件大事，那時他所討論的，僅僅是「自存與自固」。

——像一批官僚階級的無恥的反應派一樣——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新日本帝國主義進攻及蘇聯的崩潰上，並計劃如何使自己在他們所預料的這一個「日俄戰爭」中專心從事「防共」的工作（見同上兩函文件）。那時閻氏所謂「如何鞏固政權」，費用就是這樣。既然他連做夢都沒有夢到抗戰這一件大事，所以也談不上有什麼民族意識的成份在內，而是「防共固本」，所謂「自強」，絕不是有什麼民族意識的成份在內，而是「防共固本」，所謂「自強」，即是鞏固閻氏及其同類者的寡頭專制政權。只要他及他的同類

政權可以「適生」，「永不崩潰」，據他的意見，即使是聯日，也不算壞，却也算「好」的。你看，閻錫山就是要這樣來處理我們的民族危機問題。

至於在閻錫山所壟斷的這個寡頭專制政權下面的情況究竟是什麼情況呢？他統治了三十年的山西，不錯，那也是個「模範省」。但是究竟是什麼樣的「模範」呢？不用我們多說，請看閻錫山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他的綏靖公署省政府紀念週上所自己供述的吧：「山西自身，爲國民經濟崩潰之自身」。「山西國民經濟，已成破產之勢，十家九貧，十村九困」（言論集八冊）。這就是閻氏在山西的政績。從他這個政績，可以看到他這個政權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了。這就是極端腐朽的反人民反民主的殘民以逞的寡頭專制政權。可是，閻氏無論如何，是必須維持他這個政權的。爲此，他可以支出一切代價，採取一切手段。爲此，他更加強反對人民，加強反對民主主義。而他的所以把反共的工作放在最前面，就正因爲中國共產黨是徹底地代表中國人民利益和中國民主主義，因此又是最堅決地代表抗日路線的政黨。爲了保持他的政權，他在人民抗抗日高潮中，竟敢提出「親日亦未嘗無益」，而毫不覺得羞恥。真的，這樣的話，如果不是這樣的統治者，如何能說得出口呢？

一九三五年，閻錫山和日寇的「華北防禦自治」唱雙簧，提出了「防共的兩個根本大法」。他說：

「……我認爲這兩條路，均可以徹底的防共。走前一條路，可以說是用法西斯主義的防共方法。走後一條路，可以說是用建設農工社會主義防共方法。法西斯的防共方法，是要富人增加負擔，與政府合作鞏固現有的政權，抵抗共產黨勢力（按：即指抵抗人民民主勢力）的侵入。以建設農工社會主義防共方法，是廢除土地私有權，樹立土地公有制，消滅共產黨發生的基礎。然而不能說走前一條路，就不能走後一條路；走後一條路，就不能走前一條路。其實這兩條路，均能達到防共的目的，可以說防共的兩個階段來看，不但不斷突，並且是前後相呼應。何以呢？因爲如果不走前一條路，就沒有建築走後一條路的基础；不走後一條路，則前一條路也絕不能持久。所以這兩條路，只有緩急的不同，沒有矛盾之相左」（消滅社會不平等與防共，言論集八冊）。

閻錫山原來是公然主張以法西斯的方法爲反人民反民主的基礎，而以所謂「建設社會主義」爲其補充的（關於他的所謂「建設社會主義」，見下

頭的分術)。他在抗戰前許多演講中，總是那麼熱心介紹德意兩國的法西斯
防共的運動，又那麼驚嘆地說：『這有今日德意兩國的政治的出現！』
『今天今日之德國政權！』閻錫山及中國境內和閻氏同類型的政權，實際
上最中式的法西斯政權。

中國人民中間，極豐富的潛存的反法西斯的精神，又加以中國共產黨為
中心代表的現實的民主主義的力量，並沒有阻礙閻錫山（及其同類）在抗戰
前所倡導的法西斯『防共』的道路，而是和中國共產黨在一起，走上抵抗
日本法西斯侵略和民主主義的道路。日寇大規模打進中國本部領土上來了，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起來了，抗戰爆發了，情況的發展，不能使閻錫山專
心從事反共的工作。日寇大舉到了山西，威脅了他的『無條件存在』，這
時候，他只好被迫地也進行了抗戰的投機，與共產黨及進步人士合作，表現
要『進步』，並採取共產黨的一些號召，作為『爭取民衆』的資本。但是大
家知道：閻錫山也定有一套『以不變應萬變』的哲學的，他這個哲學，據說
一部分叫做『母理』，一部分叫做『子理』。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我的『母
理是永遠不變』的，變的不過是他的『子理』。他的『母理』是什麼呢？就
是『黨國雙德』，就是『自存與自固』。他的『子理』是什麼呢？就是應付
一下抗戰（因此就要和共產黨進行一定程度的合作），同時在日寇那把仍留
了後路，即是『親日亦未嘗無益』（因此就要繼續佈置反共工作）。他的
『子理』不能不離開他的『母理』的，而且只能以維持他的『母理』為目
的。抗戰的困難越增加，敵人的誘惑越積極，他就越來越不成話了！這據
說，不管他表面上唱些什麼『民族生命』的詞句，有些時候甚至『激刺地』唱
過，但骨子裡所緊要的，却是另一回事。政權、政權，家頭、家頭，專
制、專制，還是閻氏全部活動的總目的。為此目的，他竟認爲利用敵人來『
肅清』八路軍和決死隊（即山西新軍）是『靈活策略』。他和敵人早已有
諒解，並已有了秘密的協定。敵人答應他在一定時機可以讓他回到太原去。
即如他現在的對西地盤，也是敵人和平地讓他在足，作為『防共』的試驗區。
這些都是路人皆知的事實。維持政權和『防共』，本來對於他是『一而二』和
『二而一』的東西，現在對於他更『二而一』和『一而二』的東西。不過在他看來，他
的政權已不能只限於單純的『一而二』了，他還需要『開展』，因為山西在抗
戰烽火中已建立有多處民主主義的政權了，所以還需要向這些抗日民主根據
地『開展』，即向共產黨領導抗戰實行民主的地方『開展』，才能達到『收
復』他原來所壟斷的山西政權的目的。總之，不論『黨國』也罷，『開展』

也罷，都光顧着在勾結日寇反人民反民主反共這一着上的，這已成爲閻氏野
心的總綱。

且看他那最近大吹特吹的所謂『兵農合一』吧。那訂訂的『全面突擊
統籌開辦辦法』，開宗明義第一條所列的目的，乃是『開展政權』四個大字
，並不是旁的什麼字句。這再看他自己對於實行『兵農合一』的真正的目標的
說法吧：

『你們對實行兵農合一，不但不敢認成是個補兵問題，就是認成是
實行我們主張也不够，我們還是打破地下組織，鞏固我們組織，惟一的
好辦法。』
看他又說：

『我們今天如果推不了他的地下組織，打不破他的基幹小組，就
不易開展。但我們今天有什麼辦法，可以摧毀他的地下組織？……我們
是拿上實行兵農合一來打破他。如大雨普下，很快的就可以打破他！
如何打破他的基幹小組？就是要用上堅強的組織小組來消滅他，他好比
是個魚鱗，我們是打鱗的，一定很容易的打破他！』（上面所引均是
本（三十三年）年三月間閻氏在征糧會議上講話）

這是什麼話！大家看，山西省這個『打鱗的』，不去打日本人，却去打
『鰻魚鱗』，却去打『他』。山西的『堅強的組織小組』，不去消滅日本人
，却去消滅『他』，却去『摧毀他的地下組織』。在這些不在報紙上發表的
話中，比他對記者團談話時所說的：『捉共產黨，訓練三天放回去』，『
八路軍打我，我忍氣不公佈』，那種似乎有很多仁義道德似的，還強就一
點仁義道德的花子也看不見了，看得見的，還是對人民對共產黨的萬丈殺氣！
閻氏的所謂『他』，是什麼呢？『他』就是人民，就是和人民在一起進行抗
戰、建設民主的共產黨。閻氏的所謂『地下組織』是什麼呢？那就是人民的
抗戰民主組織和支持這組織的共產黨。他所以要打破『他』——他自己的話——
就是這『他』，並不是敵黨。他所以要消滅的，就是這『他』，並不是
敵黨。閻氏所做的是這變爲親者所痛，而爲仇者所快！他的『兵農合
一』，竟是這變爲親者所痛，而爲仇者所快！

還有，什麼叫做『如大雨普下』，很快的就可以打破他？這在一九三九
年，閻錫山在秋林開幹部會議，準備襲擊新軍之時，他就告訴人們：『快要
下雨了，準備雨傘吧』。就是說要投降了。『大雨普下』，即所謂『全面和
平』，他後來估計，總有那麼一天的。他認爲到了這種時候，對於共產黨，

「很快的就可打破他」。作這種想法的，中國不只他一個，還有其他的人。然而時局的發展，不是「大雨普下」，而是日蹙中天，一定擊打到日寇「無條件投降」，這也就成了閻錫山這批人的永遠的悲哀。

要問：我們共產黨人和閻錫山的主要矛盾何在呢？要問：為什麼我們共產黨人特別受了閻錫山那樣的攻擊和仇視呢？問題的出發點就在於：我們共產黨人和閻錫山在思想上、實際上有完全不同的出發點。我們共產黨人思想和實際的出發點，乃是解放民族和解放民眾。我們在政權問題上的一切採擇，全部以此為出發點，以此為標準。毛澤東同志經常告誡我們共產黨員：如果我們這黨不能替民族人民辦好事，這個黨就是毫無用處的。毛澤東同志在邊區參議會一個極著名的演說，而且被日寇認為最可怕的演說，其中有幾句特別重要的話是這樣的：「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員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他本身決無私利可圖。他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志。他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這正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思想。這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實際。共產黨人和閻氏主要矛盾的出發點，就在於：共產黨無私利可圖（因此，堅決抗戰，解放人民，政權是人民所共有），閻氏一類人則唯私利是圖（因此，認為「親口亦未嘗無益」，束縛人民，固執着自己寡頭專制的政權，反對人民過問）。閻氏他們的攻擊共產黨，也就在於共產黨不圖私利；假如共產黨也是圖私利的，他們也就不會對它攻擊了。

把自己的私利放在精細的算盤上，把壓在人民頭上的特權放在「惟一的思想上，真實說被顛倒了，是非就被顛倒了，人民的擁護者就被看成「欲拔之而後快」的眼中釘了，造謠說被當成攻擊人民擁護者的得意工具了。閻氏說：

「宣傳與鬥爭不同，把自己的好意對人知道，把別人對自己的誤會給人解釋明白，這叫作宣傳。故意製造謠言，說自己如何好，別人如何壞，這叫作鬥爭」。我們的同志要將宣傳與鬥爭分清楚。宣傳有時可以不作，鬥爭一刻不可放鬆。不但不可放鬆，更要以鬥爭對鬥爭」（革命行動十卷十期）。

不過是那種隻眼睛只注在自己所壟斷了私人政權，而絲毫不以天下、國家、民族、人民的前途為念的一切人們所必採取的手段。閻氏這種「鬥爭哲學」所告訴我們的，却正是：凡是閻氏所說「自己如何好」的，一定是不好的，因為如閻氏所說，這些都是「故意製造謠言」。而他們所說「別人如何壞」的，一定又是很好的，因為他們所說的「如何壞」，又不過是「故意製造謠言」而已。

二 閻錫山的「經濟計劃」

就讓事實來證明吧！就讓山西的老百姓來表決吧！以下我們要檢查一下閻錫山的「經濟計劃」和「政治計劃」的各種事實，來看他從上述的出發點而實施在這兩個方面的具體結果。

閻氏最近對記者開大吹大擂他的所謂「兵農合一」。他是這麼說的：「根本上共產主義對勞動者是「先甜後辣」，與人土地，收入的糧食再行分配，無論如何巧妙的說法，根本的政治心理就得不到人的同情。我們是按勞分配，對勞動者是盡甜無辣，與人土地，不收人的糧，使人負擔，不要巧妙的說法，也能得到人的同情」。好吧，我們且按下閻錫山的所謂「共產主義對勞動者先甜後辣」，下面再說，先看看他的「盡甜無辣」吧！

閻錫山所謂「盡甜無辣」的「兵農合一」，按照他自己所述，是這麼一回事：

「兵農合一，就是把投槍（按：指從十八歲到四十七歲）壯丁，每三個人編成一個兵農互助小組，其中一個當常備兵，入營打仗受優待，其中兩個當國民兵，在家種地或做工優待人。

同時，當國民兵的，再與村中其他有勞動生產力的一至三人編成耕作小組，以國民兵為主耕人，其餘為助耕人，每一耕作小組分配地二份，由耕作小組合夥經營耕種，按勞動力分配其勞動生產的成品。

因此，這必須劃分份地，即把村中所有土地，按照年產量補收益二十石小麥或小米為標準，平均劃分成若干份地分給耕作小組耕種。

至於耕作生產的分配辦法是：一、田賦征購及村糧糧等稅賦負擔，約佔工作小組全產量百分之三十；二、地租按糧額正額款向地主交納，約佔全產量百分之五；三、種子肥料等一切備款開支約佔全產量百分之十五；四、餘糧約佔全產量百分之五十，作為勞動報酬，由三助耕人合

謀所訂分應享受。此外，每個當國民兵的主耕人，對其兵農互助小組中受優待的常備兵，每年約負擔小麥二石五斗及棉花五斤，作為優待，故每一常備兵每年可得優待之小麥五石棉花十斤（閻錫山：徹底實行兵農合一，革命行動九卷二期）。

閻錫山說：「這個辦法，不但我們中國從來沒有，就是世界各國也沒有，這是我與大家想下的」（革命行動八卷九期二頁）。聽他這「想」，竟想到把從前俄國沙皇東轉農民的土地制度拿了過來，閻氏的偉大也就可知了。

當然，閻氏的偉大，也還是有的。他這個「偉大」，是從他把農民變小，把生產變小來取得的。

為什麼說他把農民變小、把生產變小呢？因為依照閻氏的辦法，不但不能使得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而且更使得農民只好依附於一定的和固定的土地上。不但地主的所有權還保留，而且人們的人身、營業、財產、生活也更進一步地因受了嚴格軍事的政治的控制，而完全失掉了自由。且看下列的一堆事實：

第一：拿份地範圍了人，即所謂「以生活管理了他的行為」。除了編組當他的軍隊的準士兵以外，再不准別人耕種土地。「劃分之份地，非國民兵不准領用」（劃分份地問題的解答二二三。革命行動九卷十期）。

第二：隸屬於份地的「國民兵」所領的地，是不能超越份地的固定界限的。「一個國民兵不能領兩份地，如份地有剩餘時，可按照規定辦法實行借耕」（答三。革命行動九卷三期）。

第三：所領的份地，不許變大，只許變小。「如份地不足國民兵種時，准兩個國民兵領一份地，不准輕易離村」（一三四答。行動九卷六期）。

第四：婦女因為「無當兵的必要」，就剝奪了她們領地的可能。「男人領地，尙或不足，如婦女領地，勢不可能。且中國今日，尙無提倡女子當兵的必要，若轉飭各級幹部遵照」（二七九答。行動九卷十一期）。

第五：縱使是「國民兵」，但因生活所迫而往謀生，就被剝奪了土地。「因生活所迫，攜家他往未回者，按規定不准領地」（二六五答。行動九卷十一期。按：這是問答以下的問題：「襄陵縣國民兵，已有因生活所迫，攜家到他處謀生者，如何辦？」）

第六：一有改革，就不可能希望把份地當成謀生的後路。「中途改革者，奉田」（二四〇答。行動九卷十期）。

第七：不先交「優待棉花」，即不准領份地。「問：自育赤費優待了，擬准其領份地，收秋後，再出棉花，可否？答：不可」（行動，九卷八期）。

第八：「承受份地」後，要填「誓詞」，等於簽訂農奴契約。「誓詞」中有一條：「如期如數完納田賦，及徵購食糧」（行動，八卷九期）。

根據上述種種情況看來，閻氏一方面把農民變成他的份地的農奴，另一方面把農民轉化爲他的軍隊的隸屬。

閻氏不僅把農民和一定的份地聯繫起來（即把農民束縛於一定的份地單位上），而且又把農民和一定的村界聯繫起來（即把農民束縛於一定的村界位上）。除了上述「不准輕易離村」外，且再看下列的事實：

第一：把份地和人民放在村單位的基礎上，強迫劃分村界，使得份地和村界形成一條連環的鎖鏈，人民居住和謀生的自由更又都在這裡限制上了。

「這回劃分份地，一定要先確定村界……土地人民均應以村爲單位，離開村說土地，說人民，無從說起。所以今天一定要劃分村界」（閻氏在份地會議上講話。行動八卷十一期）。「村界非劃定不可，不劃村界，等於沒有村政，最後可由區派員會同強迫主持，不服從者懲處」（二三〇答。行動九卷十期）。

第二：領有份地的，以在固定的村入籍爲限。「劃分村地後，仍應到某村入籍，不願入籍，即是不願種地」（二四四答。行動九卷十期）。

第三：採取屬地主義，不准越村籍耕種；耕種別村的土地，要由這個村籍「依法」轉入別村的村籍。「應採屬地主義。張家莊人民向種山境內土地者，得請求改入山籍編組領地」（答之一。行動，九卷八期）。

第四：不准越縣籍耕種，耕種別縣的土地，要由這個縣的縣籍轉入別縣的縣籍，而且是以本縣「地不敷種」爲限。「仍按屬地主義辦理：汾陽小園村接近孝義，其耕地多在孝義境內，地不敷種，准向孝義請求入籍編組，領種份地」（十四答。行動，九卷三期）。

第五：離村他往，不出本縣，要回村編組領地的，如有保證，可准，已出本縣的，就不准再回來。「移住村不離本縣者，如人保證其確能歸原村編組，准之；移住村已離縣境者，不准」（答之一。行動，八卷十期。按：這是問答以下的問題：「移住他村他縣人民，願回村編組，應否照准？」）。

上述的一切告訴了我們什麼呢？那一切告訴了我們：閻錫山在那裡建立新式農奴制度。閻氏明明明白提出他的農奴制度的名稱，叫做「屬地主義」。

• 根據他這個地主，農民獨立的人格了。農民的自由經濟完全被取消了。這是超越古今極端反動的、軍事的、官僚的國家農奴制度。因為他這種農奴制度是以隸屬於軍事和官僚的直接控制為其特徵的。閻氏的確不愧是從前俄國沙皇實行「份地」制度的及門弟子，而且青出於藍了。根據閻氏的計算，他這個份地制度實行了以後，第一，「打仗的人多，可以保社會的安寧」。閻氏所以說「打仗的人多」，不是為着抗日，而是為着「保社會的安寧」。所謂「社會」，就是他這個新農奴制度社會。第二，「種地的人多，可以保社會有飯吃」。閻氏所以要「種地的人多」，並不是為着發展農民生產，而是指他這批新農奴主們可以獲得更多的糧食（以上引文，見行動八卷十一期）。據閻氏看來，如此就可高枕無憂了。你看他這得意地說：

「此次我們實行兵農合一，等於把家裡的堆的一堆錢，拿串子一串一串的串起來，不只好處理，而且好使用，也等於百川匯於海。所以今後政治上的管理也好管理了，並且我想大家也一定可以感到今後在努力上有了目標」，「兵農合一等於手掌，組（組織）政（政治）軍（軍事）教（教育）經（經濟）等於五個指頭，手掌作了五個指頭的根據，就可掌握運用屈伸自如，我們深信將來一定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好處，一切復興上的工作就有了着落」（本年三月二十六日，朝陽講話，革命行動，九卷八期）。

閻氏把農民當成錢貨，份地當成串子，拿份地把農民「一串一串的串起來」，就以爲「不只好處理而且好使用」了。這樣，就不怕他們「拿出錢來人來」，而且「必須拿出錢來人來」（閻氏的話，革命行動八卷九期），也即是必須讓他拿出錢來，拿出命來，否則就取消了他的份地，不給全家生活。中國古代封建制度，還有「罪不及妻孥」的，但在閻氏制度下，那就是懲罰一人，餓死全家了。既不怕人民不拿錢來拿命來，當然他的「組、政、軍、教、經」也就有了辦法，可以把人民玩弄自如了。這就是他的所謂「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好處。而據他自己看來，復興他在山西的私人政權的工作，因此也就「統有了着落」。

閻氏不止對於農民採取「一串一串的串起來」的辦法，對於整個社會人等，他都有這種的辦法。比如，他對於「綏遠商會」（即他那裡原來做生意的一些公務員）就這樣規定：「如原籍係我政權能達到之村莊，而又能實行編者，准其按規定我保返回原籍，否則不准，並不得到其他省份另謀工

作」（革命行動，九卷三期）。你看！連他編餘的部屬，謀生和遷居權的自由也都剝奪了。閻氏說：「不經許可的不准私自工作」。「工作上不依規定的，即奪其工作之權，發定期乞食證，使他改悔」。「拿上他的生活來管理了他，使他不敢犯罪，再拿上奪工作權來懲處他，使他犯罪以後，必須改悔；不改悔；無生活」（閻氏與高毅幹部談話錄。革命行動十卷一期）。就是說：凡是不服從閻氏的規定的，都準被奪去工作權；不服從閻氏的命令的，都叫做犯罪，犯罪不改悔，就無生活。我們過去只聽說有「褫奪公民權」的，閻氏竟創造出「褫奪工作權」了。這是軍事官僚直接控制的工作與生活的連坐法。閻氏正是要把農奴制度實施到全社會上的。這也是不足怪的，閻氏所統治的社會既然是建立在以農村封建份地為基礎的新農奴制度上，那末，這種新農奴制度就會反映到他所統治的各個角落上去了。

閻氏聽了我們的話或許是要生氣的，他一定要說他這個「兵農合一」制度是「實現了勞農合一，取消了剝削制度，執行了收負合一，取消了負擔的不合理和不公道」（見閻氏：徹底實行兵農合一），是實行「按勞分配」呀，是實行「農業社會主義」呀，怎樣會是「新農奴制度」呢？

是的，閻氏不是對記者們說嗎？他那個土地制度是「不收人的糧」的。不幸，他却還有「使人負擔」這幾個字。偏偏不幸的，就是這幾個字。按照前所引的閻錫山自己公開承認的數目（不幸的，這個數目字却又是絕對不可靠的，因為太少太少了。）來說吧：他所規定的田賦得糧，糧派和地租已佔了農民全產量「百分之三十五」，除此以外，還有所謂優待糧法等。這些當然是「使人負擔」。可是，照閻氏的特別邏輯看來，這樣「使人負擔」却是「不收人的糧」的，所以，「不收人的糧」也就是「使人負擔」。同時，閻氏的話又是合理的，因為「百分之三十五」的掠奪，照閻氏看來，是輕得太不成事體了，假如事實真的像這樣，那豈不是要算得是「不收人的糧」了嗎？

必須把實際的掠奪和閻氏口中的掠奪分別清楚，而且那裡的實際掠奪的數目，也還不必我們親自去調查，只從閻氏所辦的革命刊物上，也可以知道了。且看閻氏自己幹部的報告吧：

「孝義一二兩區，據城東數村指導員稱：該村土地每畝最高者小麥一官石二斗，最低者四官斗，平均約爲八官斗，每畝糧銀爲九分四厘，假定每份地六十畝，共計糧銀五兩六錢四分，應納地租、田賦、贖賦負擔，及調節糧麥或米一官石，每兩七石三斗，每份地四十一石

一斗七升二合，再加每份地飼料（按：這是最對閻氏政府負擔之一）三石三斗，種子一石九斗五升，共計四十六石四斗二升二合。按平均產量八斗，每份地可收穫四十八石，備可餘一石五斗七升八合。假定每份地為八十畝，可純餘三石二斗，假定每份地為一百畝，可純餘四石八斗三升，如每畝產量以平均一石計算，則每份地八十畝，方可純餘十九石二斗，惟人民多不承認一石之產量為恰當」（六八開。行動，九卷五期一六頁）。

大家看！這並不是什麼負擔「百分之三十五」。根據這種實際的數目，農民被閻氏私人政權掠奪去的，一般竟達全產量的百分之八十六（包括飼料在內，竟達百分之九十以上）。優待糧食還不算在裡面。按照閻氏的規定，每份地除了田賦征購、村黨派及地租等負擔，以至種子肥料這一部分生產成本外，還有「純餘」是百分之五十，作為「勞動報酬」（換句話說，作為農民種地的生活費），但根據這個報告：六十畝地的「純餘」僅可佔全產量的百分之三；八十畝地的，僅可「純餘」百分之五；一百畝地的，僅可「純餘」百分之六。我們這把閻氏的所謂純餘加上括弧的符號，就是說，實際上那並不是什麼純餘。閻氏既掠奪農民全產量至少百分之八十六以上，就不但掠奪了農民全部剩餘產品，而且還掠奪了農民大部必要生產品（即掠奪了農民為維持生活的必要生產品）。閻氏所留給農民的那點「純餘」，並不是農民必要生活的「純餘」，而只是閻氏掠奪後的殘餘。農民辛苦種地一年，所得的「享受」結果就是生活的完全沒有着落。絕大部分的收穫量都到那裡去了呢？都到閻錫山私人政權的倉庫中去了。但是：閻錫山說：這就是「不收人的稅」的「按勞分配」！這就是「勞動結果歸勞動者享有」！

閻錫山對於上述報告的回答是：他的幹部這種報告並不可靠。可是，在上邊同一個地區，同時還有提出同樣的問題的，並且還是載在他的革命行動第一期上面。那編說：

「孝義一二兩區各村糧銀每畝九分四厘，計每份八十畝，共有糧銀七兩五錢二分，除過負擔外，純餘不到二十官石，按去年實際產量，尚不夠負擔」（六五問）。

閻錫山的回答，又是認為不可靠，認為這種報告不過是他們「做了偽裝分子精神俘虜以後的一個表現」。奇怪的，閻錫山的下級幹部的報告，竟然有那麼多的報告是不可靠的，可靠的，却只有閻錫山自己的腦筋。奇怪的，閻錫山下級幹部報告的不可靠，卻是因為這些報告是從下面反映來的，所以

就和閻錫山上面的計劃不相符合；而閻錫山自己腦筋的可靠，正是因為他的腦筋比由「古人」來的，所以就比閻錫山的計劃完全相符合。閻錫山說：「古人九分四厘銀子的地，應該是能打一石八斗的產量，至多三十畝，就第一份地」。現在每份地到了八十畝，竟說是「實際產量尚不夠負擔」，你想：閻錫山怎麼會不冒火呢？

還有一個地區的下級幹部，也向閻氏提出了類似的問題：「新縣縣劉莊、永豐莊、中蘇村、南蘇村等村，地質特劣，各村土地，每畝產量均不足小麥三斗，而穀銀每畝均在一錢左右，每年收益，除田賦外，再無餘糧……」（二三八問。行動，九卷十期）。

閻錫山照例回答：「按古人定糧，一錢糧銀的地，管過產量在兩石左右，該村等為什麼原因，成了如此情形」。就照他所謂的「古人」是真實的肥地，但閻錫山竟聰明絕頂到這樣：連農村土地生產力經過了他收據下二三十年來的掠奪已經極端衰落下去，農民又無生產積極性，他卻絲毫不知道。就是這樣，所以他那些「妙絕人寰」的、「其味無窮」的、花樣翻新的所謂「學說」也就從這裡產生出來了。閻錫山的妙處，就是他有一副古人腦筋，於此自然而然地從這裡流出了許多古怪東西來。

閻錫山似乎也知道「土地有好壞」的，所以，他把份地分成了七等二十一級。但他對於「好地種的畝數少，用的人工少，種子少，收的糧多；壞地種的畝數多，用的人工多，種子多，收的糧食少」（雖然劃分份地實施大綱是這意思寫的）這類事情，却又似乎經常忘記了，特別是在製糧的計劃上和製糧的行動上忘記了。按照他告人：從一等級地的每份地三十畝起推測到七等二十一級，增加到一百五十畝的每份地。就便是這樣，由三十畝的份地到一百五十畝的份地，所要費的人工、種子、肥料，其間的差別已經是很大了。但情形還有更進的。看下面的一個報告：

「大寧道教編村反映：所屬十三團，地廣人稀，地質較其他處壞，每畝年產量，多為一易（即畝一年再種）二易（即畝二年再種）地，每份地約有三四百畝，種耕工較多，人少了，種不了，況該處水質太壞（俗稱湧流水），人在幼時吃了，不長高，僅發胖，漸變成矮子，高有三四尺，耕力甚弱，每份不下三四百畝，如何耕種？」（三〇七問。行動，九卷十二期）

可見份地竟有多至三四百畝的。這種畝數多的份地事實上都是分給窮

最窮的農民耕種的。閻氏計算這樣的畝數也可以有「五十石至六十石之間」的收穫量，因而他所給的負擔，也可以和那些種三十畝地的份地的，同樣優厚。至於種畝數很多的份地，需要花更多的人工、種子、肥料等等，是都不放在閻氏的算盤之內的，因為在閻氏看來，這些對他都是沒有關係的，對他有關的，只是份地的同量負擔罷了。同樣地，在各村之間的土地好壞，因而影響到人工等成本收穫量，或者有的村種地的人少了，種的地也少了，收穫量也因此更少了，這些對他都是沒有關係的，對他有關係的，也只是各村的「均糧」（依照該村舊定的糧銀收額）罷了。因此，這種就又有了閻錫山式的特別「公道」：「田賦負擔則懸殊甚大」。「份地畝數太多，耕作小組既種不了，負擔又感太重」（一五五問）。「份地多，糧銀重，負擔重」（二七二問）。「一級產量的份地，甲村與乙村負擔不一」（八三問）（以上見革命行動各期）。因此，這又值得閻氏自誇了：「不要巧妙的說法，也能得到人的同情」。閻錫山治下的「人」，性情特別不同，他們是「同情」於「糧銀重，負擔重」的。

可是，「同情」，閻氏自己也是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的。巧妙的說法也好，不巧妙的說法也好，實際的事情，總是那麼樣的。閻氏也知道說為什麼每份地除負擔種子肥料等成本外可「純餘」二十石，實在是不騙人太久，即是不「能得別人的同情」，所以後來在他那對老百姓說話，就不能不逐步減去其虛構的數量。有一回，他說：「總也說他他他到十五石糧食」（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五日。革命行動，八卷九期），少了五石了。又一回，他說：「亦可得純收穫量十石」（三十三年二月。革命行動，九卷二期），少了十石了。再過些日子，說不定還要減下來。這樣，閻錫山自己的古人腦筋，和他下級幹部「不可靠」的報告，豈不有接連起來了嗎？但是人們儘可放心，閻錫山決不會和他下級幹部一樣，說什麼「尚不致負擔」的，繼續撒謊是必然的。誰不欺人死不休，是中國一切腐敗統治者的道統，「有機會，他還是要盡其欺騙」。這回他不是利用了記者對當地情況的隔膜，就大施其騙技嗎？

中國農民大眾從來受舊統治者橫逆殘暴的掠奪，以致失掉大部農產物，他們只好被迫得去利用一些農餘的時間，從事各種副業，以抵償其牛馬不如的生命。但是，在閻氏那裡，不僅如上述的種種無情掠奪農民絕大部分的糧食，而且無情掠奪農民全部農餘的時間，叫做「義務勞役」，「定為每人每日不得超過（好慈悲呀！）四小時，全年至多（好仁慈呀！）以百廿日為限

」（見兵農各一施政綱領）。即是說，除了當當備兵的不算外，農民還要以全年三分之一的時間去為閻氏這個新農奴政權作「義務的勞役」，連不能領份地的「役齡婦女，每日亦須服四小時的義務勞役」（行動，十卷九期）。同時，不准農民從事其他的職業，並以取消他的份地為恐嚇，使他不致離開土地。這樣，絕大部分的租稅掠奪，全年三分之一時間的勞役掠奪，又不准農民從事他業，三者夾攻，真是使農民走頭無路了，這就是他的超越古今的新端反動性，他的統治基礎也就非常「鞏固」了。

閻氏拿了他這個「盡甜無辣」和「不收人的糧」的土地政策（即佔有農民全產量的百分之八十六以上和每日四小時——全年三分之一時間的義務勞役），來和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作比較，說共產黨「對勞動者先甜後辣」，「與人土地」又「收人的糧」。這到這裡，只好簡單地插一筆說一說我們這裡的事情。

不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有人民交公糧而政府收糧這件事。但我們這裡的人民對共產黨領導的三三制政府的看法，和閻錫山那裡的人民對閻錫山私人政府的看法却大不相同。首先，人民在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交納公糧，是交給自己的政府和軍隊為着抗日、救國、救自己的目的而使用的。交納是為老百姓自己的利益，是為保衛祖國、保衛家鄉。其次，各根據地都實行了減租減息，農民從地主那裡大大減輕了負擔，這在國民黨區域及閻氏區域都不肯實行的。又其次，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收糧是在從優可能減輕人民的負擔出發的。在戰爭條件或環境困難的時候，收糧多些，但只與情況稍好，不需要多的糧，收糧就減少了。政府又盡量發展公家生產，發動軍隊自己生產，發動機關學校自己生產，以減輕人民的負擔。又其次，軍隊軍費幫助人民發展生產，變工廠和合作社的組織大大地提高了生產力，邊區「耕三餘一」的任務，兩年就可完成，人民達到了真正的豐衣足食。支差動員，盡量減少，會也少開，「不違農時」定為政策之一。在這種條件下，一方面，人民生活逐年改善；另一方面，糧稅負擔逐年減輕。現在邊區全體人民負擔平均不過佔其全收入的百分之十四，而且全人口中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民因為他們比較窮苦根本免稅。但閻氏的說法，這就叫做「先甜後辣」，又叫做「給人土地又收人的糧」。照閻氏的說法，以為農民恰恰「同情」他所給的那百分之八十六以上的負擔和全年三分之一時間的義務勞役，以及那「不許改變的因循制度，反而不同情共產黨所給的那百分之十四的負擔和豐衣足食的生活。照他看來，農民不會同情自己的解放，却反而「同情」自

已的被壓迫者，這真是十足強奴主的觀點。閻氏獨家出版的政治詞典中所載詞彙，沒有一條與世人相同，這也名之曰「學說」，豈不令人作嘔三日！

隨着看閻氏怎樣在吹噓他這個新農奴制度。他說：

「去年各縣歡迎新戰士入營時，新戰士都是踴躍前往，入營壯丁及其家屬都是十分欣愉，毫無痛苦表現。今年劃分份地時，中隊留營村的人民說：『我們沒有修下好老子，可是我們今天修下個好長官，給我們自己一份大家產，也就如同自己的好老子；修下好老子，只能養活我們自己，修下好長官，能養活全村全縣人』。所以兵農合一的制度下，不但沒有逃丁、逃兵，及細細人營等病象，反而能使人人歡迎，人人興奮，做到打仗人多，備地人多，鞏固了國防力量，擴大了勞動生產，實現了勞享合一，取消了剝削現象，做到人盡其才，地盡其利」（閻錫山：徹底實行兵農合一）。

他又對那裡的民衆說：

「你們看看，到那鄉當老百姓，能得這個便宜？到那個隊伍當戰士，能受這份優待？」（革命行動，九卷十一期）

「啊！阿彌陀佛！不知道山西的老百姓有了幾世的積德，修下了這麼一個好長官！」

可是，我讀了閻氏那本出版的各種東西，除了閻長官這樣自己稱讚自己外，也沒有再看到對閻長官更加歌功頌德的文章了，這又作如何解釋呢？

可是，像我們這些還沒有讀到閻氏的「真理」，或還沒有被閻氏「真理」所「戰勝」的人們，却要發生點問題來了。

問題一：既然「兵農合一」是像你所說的「人人歡迎，人人興奮」，為什麼「國民兵」竟然「有不願意領份地者」呢？（見革命行動，九卷九期，二二七問）

問題二：為什麼「各村國民兵，有向村公所請求，自己願意設法交納優待糧花，不願意領份地」呢？注意「各村」二字。（見革命行動，七卷五期，六五問）

問題三：為什麼「國民兵已因生活所迫攜家到外地謀生者」呢？（行動，九卷十一期，二六五問）

問題四：為什麼很多地方「發生的現象，人民秘密聯合劃分份地，表面上與村政府：將來仍各自認自己的地，明分暗不分」，而要你去「打擊」呢？（見行動，九卷十二期，二二二問及其附屬閻氏文件）

問題五：為什麼「耕作小組之編成，因助耕人之勞動能力大小不一，耕作技術優劣不一，並與主耕人立場不同，照受份地後，雖加強政治管理，合夥耕作，亦不如樂於自動耕種收穫大」呢？（行動，九卷五期，六六問）

問題六：為什麼「國民兵，因劃分份地，令國民兵領種，該兵恐種不了逃跑」呢？（行動，九卷十二期，三〇七問）

問題七：既然你說：「當國民兵有地種，且是很大的一份家產」，為什麼「國民兵領種份地，有頂替情事」，不要你這份大家產呢？（行動，九卷十二期，三二二問）

問題八：既然你說：「過去在抄齡之內的，總說自己不及齡或過齡，想逃兵役的義務，今日是十七歲以下的想充一八歲以上的，四十八歲以上的，也想充四十七歲以下的，爲的是充當備兵可以受大的優待，當國民兵可以領一大份家產」（行動，八卷十一期二頁），為什麼你又會「感到滿齡的太多」，希望「謀有效辦法發覺之」呢？（行動，九卷十二期，三〇六答）爲什麼在一個編村就發現出隱瞞年齡的，有那麼多呢？（行動，八卷九期三五頁）

問題九：既然你說：「這次實行兵農合一的結果，常備兵入營，歡欣踴躍，盛況空前，他的好處，真有意想不到」（行動，八卷十一期六頁），為什麼在軍隊送時，竟會「有許多人哭叫聲」呢？（行動，九卷四期）

問題十：為什麼你說：「今天我倒優待糧花的戰士，可以說兩個牛上蹄不抵他一個」，而你竟說會聽到有「個編村，有五六十個編了以後潛逃了的」呢？（行動，九卷十一期十一頁）你說「這太糊塗」，為什麼糊塗的竟那麼多，有的「新入營潛逃的常備兵」竟然就這麼說：「把我補到那裡，我也要潛逃」呢？（行動，九卷四期）

問題十一：既然你說當了官校軍是那麼幸福，爲什麼你那「多數幹部反映，部隊派飯吃鹽，情緒異常不好」，「部隊已到瓦解的危險境界」呢？注意：這是「多數幹部反映」，這又是「已到瓦解的危險境界」啊！（行動，九卷七期附）

問題還可提出很多，但不在這裏再粘篇幅了。要知道，這些問題都還是根據閻錫山氏的官報提出來的，如果到閻氏統治下的民間去調查一番，那就更可以提出千萬個問題來。根據上述閻氏的制，我們可以斷定：這種的各種現象，決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行政上個別錯誤所引起的，而正是閻氏所建立的制度的必然結果。在那種制度下，這種現象必然逐步發展出來，

而且會日益大表現出來。

總之，實際的情況和閻氏的「巧妙說法」不一樣。那裡並沒有什麼「按勞分配」，而僅僅是「按勞掠奪」或「按人掠奪」。老百姓不同這這「按勞掠奪」的，就被看成「叛逆」；閻氏幹部對於這「按勞掠奪」提出疑問的，就被閻氏看成「做了偽裝分子的精神俘虜」。那「對勞動者既公道又通情，所以人人樂意勞動」（行動，九卷六期封面），但却是只准許在閻錫山一個人面前公道，為閻錫山一個人通情，只准許「人人樂意」閻錫山的農奴式勞動。

閻錫山說：「劃分份地是實行按勞分配」（行動，九卷八期六頁）。是的，這種份地制度，的確是閻氏所謂「按勞分配」的真相切實實地說明了。自從「九一八」前夜，閻氏在日本帝國主義租借地的大連，發明了一種什麼叫做「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的「學說」，隨後又在「一九三五年河北事件」之後把它公開以來，若干人士，對於這「學說」，「投機取巧」著名的老軍閥，山西的大財主忽然以「發明學說」叫震於世，不無覺得一些驚奇，雖然隨後又覺得可笑。這位以當軍閥和官債起家的大財主，對於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學說，雖則毫無所知，連書都沒有看過，但不知道在那一天他忽然聽人家說：「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當認爲共產主義包含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即是按勞動分配）；第二階段才是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第一階段叫做社會主義，如衆所週知，是在蘇聯早已實現了，並是在蘇聯斯大林憲法上寫上了「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這幾個大字的。閻錫山知道了這件一件事之後，想了一會，竟心血來潮，靈機一動：「有了，雖然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者主張先實行「按勞分配」，後實行「按需分配」，但我可以偷竊他的「按勞分配」名稱，算是我自己的發明，又裁縫他的「按需分配」，叫人駭怕，這樣，我反共就有本錢，馬克思主義就此可打倒了。於是他白晝見鬼，著書立說了：「按需分配，是共產主義把勞動者的勞動結果，全拿上走了」（行動，九卷六期封面）。「這是勞動人情中人人不樂爲的，必須強制，強制的最後方法是殺人，這殺勞動者勞動結果，是繼續不斷天天要做的，就是欲貫徹共產主義的主張，須繼續不斷天天的殺人」（閻氏言論選集，二輯二三頁）。「這這於人類的禍害，可就太大了」（閻氏言論選集，八冊五四頁）。「而誰呢？「按勞分配」，從此就算是他的「發明」。又從此他就以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批評者」自居了。世界上當面撒謊，頭純無恥的事，竟也有這樣的。我們

生當這個無線電發達的世界，每天聽到各種外國新聞，感覺快樂。但是外國人究竟沒有中國人幸福，如像閻先生這種「天天殺人」的土新聞，外國人怎麼聽得到呢？

但是也毫不奇怪。按照閻先生的哲學：「故意製造謠言，說自己如何好，別人如何壞，這叫做鬥爭」。他「批評」共產主義，是屬於「別人如何壞」一方面，下面還有另一方面。

他說他這個制度，既「合乎公道」，又「合乎人情」，又「適於生產」，是「無一人行不通，故可以永久不變」。他說：

「井田之制，行之三代，大同之說，俱於孔子；後世學者亦多欲復井田之制，惜有是志而無是力，不能見諸事實。倘倘有志者，得改造之大權，則「按勞分配」之制度，早實現於中國矣」（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六二頁）

「吾國今日之談改革經濟制度與講學教育，多效法西歐，此實爲我民族失却自信力之表徵。……返觀井田意義之制度，既公道而能永久，大同理想之學說，復趨趨乎古今，倘吾人本其意說及其遺教，發揮光大，規定制度，使適合今日之實際，則所謂經濟問題，自不難迎刃而解，此非特可以救中國，且可救世界也」（同書七五頁）。

閻氏的「按勞分配」，是以軍事方法恢復中國古代「井田」爲目的。就這點上說來，他的主義，是一種軍事的封建的社會主義。他的所謂「農業社會主義」，就是這麼一種軍事封建的社會主義。他想：他既「有志」，又「得大權」，實現就沒有問題了。果然，近年他和日寇實行和平共居之後，竟實現了這個「兵農合一」的「現代井田」，他說：

「我們中國古代就有井田制度，這制度實爲歷史上之至寶。歷代的多少聖賢豪傑力謀恢復這個井田制度，都是經過多少次的考慮，始終都不敢拿出來實行，孟子也曾極力提倡恢復井田制度，但後來也沒有實現了。現在共產主義者，恐怕出現了比他好的主義，故意的說「中國古代並沒有井田制度，那是孟子講的話」。大家應知井田不是個單純不知的的土地制度問題，實際是個兵農合一，勞享合一，收養合一多方面的公道完善制度。……今天的兵農合一，就是現代的井田」（閻錫山在各地會議上的重要講話）。

說來好笑：閻錫山竟然以爲我們怕井田主義比現在共產主義更好，所以故意否認中國古代有個井田制度，據我所知：懷疑孟子關於井田制度的描

「現在共產主義者」，倒不是早就發現了，而是「原始農村公社的存在，並且在封建社會中，仍有它的遺留（在封建社會中，農村公社的遺留，對於地主的束縛農民在土地上是有益的），而中國歷來所傳說下來的井田制度，則不過是這種原始農村公社的反映（雖則有些主觀渲染）。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分工的發展，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農村公社日趨瓦解，一去而不可復返。這是閻氏所謂「歷代的進步趨向」和孟子等主觀上想恢復而事實上不可能的原因。可怪的是，閻氏說：這種井田制度「既公道而能永久」、「合乎公道」、「合乎人情」、「適於生產」，為什麼後來又不能存在呢？為什麼後來「聚斂暴虐」要恢復而不能恢復呢？閻氏本來是一個「不可知」論者，他的哲學是「不止」是什麼「最後有個不可知」，「最後也有個不可知」（物產發展與按勞分配，四八頁），他在這裡也只好用「最後不可知」來答覆了。但閻氏既以為「最後不可知」，為什麼又能知道他的井田制度和他的「按勞分配」是「可以永久不變」的制度呢？

我們共產黨人是人民的利益為自己的利益的。如果真如閻錫山所說，有什麼別的主義比我們主義「更好」，那末，我們為什麼要排斥他呢？事實絕對不在這裡。事實證明：現代共產主義是最好、最能造福於人類的科學，並沒有什麼主義比它「更好」。閻氏充其量是歷史主義者，只看到過去，迷戀已死了的骸骨。而我們共產黨人是歷史主義者，不但知道過去，而且為人類現在和將來開闢新的幸福戰鬥。中國歷史發展到現在，社會發展到現在，古代井田是不可能再來了，就是閻錫山式的「現代井田」也必然很快要死亡的。現在的中國正需要大大發展生產力，把中國歷史推向前進，而現在階段發展經濟的道路，正如中國共產黨在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所實行的毛澤東政策，必須是經過農民的解放，經過經濟上、政治上的民主主義，也即是建立以解放農民為基礎的、以發展大衆經濟和農工幸福為目標的新式自由經濟、新式自由勞動和新式自由市場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這也就是把農民擴大，把生產擴大。而閻錫山的「現代井田」，却是以東農農民為基礎的、以破壞大衆經濟和農工幸福為目標的、反自由勞動和反自由市場的新農奴主義——新農村主義的經濟制度，這也就是把農民變小，把生產變小。這是幾千年前的古董、死屍，一點生命力也沒有了的。它是阻止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歷史注定了它要很快地死亡。

閻氏利用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的危機這一點，在那裡做煞有介事地咒罵

產資本主義。但他是從恢復過去封建農奴制度的「光榮」，去咒罵資本主義的。其次，他又是不對地地說去咒罵資本主義，因為現在中國經濟的主要危機不是生產過剩的危機，而是生產不足危機；而這種生產不足危機，正是由於民族壓迫、封建壓迫和官僚資本統制的壓迫而來的。現在中國人民所遇到的民族壓迫、封建壓迫和官僚資本統制的壓迫的痛苦，却遠大於所遇到的資本主義壓迫的痛苦。現在中國類似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對於德國所說過的：

「……德國是像歐戰大陸各國一樣，不僅受資本主義生產發達的痛苦，而且受資本主義生產不發達的痛苦。除了近代生活所特有的種種痛苦，還有許多舊傳的痛苦，壓迫着我們。這種種舊傳的痛苦，是古代生產方法依然殘存的結果，而這種古代生產方法的殘存，自然會引起種種時代錯誤的社會關係與政治關係。我們不僅吃生者的虧，且吃死者虧。死者叫生者煩惱」（資本論，一卷初版序）。

又類似列寧在一九〇五年對於俄國所說過的：

「在俄羅斯這樣的綱度裡，工人階級感受資本主義的痛苦，遠遠不如它所感受資本主義發展不夠的痛苦。因此，工人階級絕對需要資本主義最普遍、最自由、最迅速的發展。消滅國內一切障礙資本主義普遍、自由和迅速發展的舊制度的殘餘，對於工人階級是絕對有利的……」（兩個策略）

我們是科學共產主義者，正因此，我們承認資本主義一定的歷史進步性，承認自由商品經濟之一定的歷史進步性，這種經濟，比起封建經濟，發展起龐大的社會生產力，生長起最新型的社會勢力，作為推動歷史繼續進步的動力，走向沒有剝削沒有階級的社會的偉大動力。但閻氏和其一型經濟的進步性，而只談論過去的封建時代的政治經濟。他們否認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如閻氏之流，則主張封建的份地經濟，鎮村經濟。雖則閻氏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是主張「互通有無，使備供各得其利」的「交換經濟」，而反對「封鎖經濟」（見閻氏中日經濟提議問題，言論輯要九冊），即主張把中國變成日本帝國主義的自由市場（也即主張把中國變成日本帝國主義的壟斷市場），但閻氏對於人民則主張相反的東西。現在在他統治的地區，竟要人為地取消自由市場。他的井田主義正是「小國寡民」、「死後無出地」的鎮村主義，而用軍事力量來約束它。他的「社會主義」就是鎮村的軍事封建社會

主義。這種軍隊建設社會主義，不過是上述軍事官僚的國家奴隸制度的別名罷了。這完全是反動的東西。不錯，閻錫山也主張辦工廠，但一方面他仍主張村是經濟單位，另一方面他又主張以今日在營的常備兵或輪到的常備兵去擔任工廠的勞動，換句話說，他主張的工廠不是建立在自由勞動之上，而是建立在不自由勞動之上的。這種不自由勞動又正是束縛生產力的發展的。這種要稍為說一下閻錫山的物產證券。因為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他這個奇論提出批評，並批評得很好，特別是關於貨幣發展史方面，所以我在這裡不準備多說。只說一點事實罷了。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國民黨政府公佈法幣制度，停止兌換現洋以後，閻錫山旋即在山西成立「物產準備庫」，打算「以省鈔向人民購買長餘的物產……增發省鈔，發出省鈔一元，即收回一元的貨物」（二十五二年二月，閻氏關於物產準備庫成立的動機和辦法）。「人民拿值一元的貨物到準備庫裡可以換得一元的省鈔，庫中收了若干貨才發出若干省鈔去，有一元的省鈔發出，庫中就有一元的貨做準備，所以可稱為準備十足」（閻氏為設立物產準備庫事告山西商民書）。這是物產證券的「買進」。發出呢？「又規定貨物價格，只准（一）至多按成本加百分之三十五的手續費」。「準備庫往出賣貨，只准（一）按原來買入時成本加百分之三十五的運費等手續費」，如此人民仍可照原價增加一點向準備庫購買……閻氏說得極好：人民可用貨物去向他換省鈔，但卻不能用同樣的省鈔去向他換回同樣的貨物。當然，這種所說要增加的數目字，還是虛單得很。

事實上，這些貨物從人民的手裡拿到政府物產庫中去，就是不能再從政府物產庫中轉到人民的手裡的。據閻氏說：「就政府方面說，實行這個物產準備庫的辦法，不但無利可圖，而且還得賠錢，因為準備庫為換回貨幣，活動金難免見，不能不將本省貨物運到外省去賣，要運這些貨物，有時就非賠錢去出售不可……故物產準備庫成立以後，政府在財政上須增加一筆支出，這是政府的苦痛」（以上所引，均見前兩文件，閻氏言論輯要九冊）。你看！好容易好容易的閻氏政府向「實際上沒收了人民的物產，而給了他一條沒收的收據（閻氏自己這麼說）：「物產證券是收貨證券，等於百貨的價值收據，算多少貨可以開多少收據」（言論輯要，八冊八十一頁），但把這沒收來的物產往外省拋賣，換回貨幣，大發其財時，却又算是賠錢了。賠錢了誰呢？那只有天知道了。這就是閻氏「物產證券」的實際秘密。但是：大權山西人

民那時還沒有感謝他這個「政府的苦痛」，而竟加以抵制，所以就不見下文了。

按照閻氏所說：「農工商生活皆不安全的原因，是大洋貨幣制度造成的」（言論輯要，八十頁）。而閻氏的「物產證券」，按閻氏本來所規定：是給政府「賦予法貨資格」，「其尺度量位仍沿用已往貨幣七錢二分之銀圓單位，其名稱仍稱為元、角、分、釐」（物產證券兌換分配，十一頁）。那末，自從實行法幣制度、停止大洋兌換以來，可以說：你的主張業已實現了。但為什麼在你及你的同類者所統治的區域，農工商生活的不安不但沒有消滅，而且沒有減少，而且還在繼續大大增高，那末你的「偉大舉動」的「偉大」却到那裡去了呢？

閻氏關於「物產證券」的根本思想，是從利權小生產者對於市場的隔絕，以便於便宜佔取和壟斷他們的生產品而出發的。就是說：閻氏的「物產證券」不過是向人民強制徵收的一種形式。自從實行了「兵農合一」，已經那樣按捺了直接生產者的大部生產品，又迫令他們每年繳三分之一的「義務勞役」，那末，似乎可再榨奪的東西已不多了。因此，閻氏說：「兵農合一的實行，可以說超過了物產證券的效用」。……物產證券如禹之治水，能以其所無事，兵農合一根本將水漲地高了，當然用不着治水了」（行動，九卷八期三頁）。他這思想，經過「兵農合一」，已把人民的物產直接徵收得那麼徹底，似乎已用不着那種作為徵收人民物產的工具的「物產證券」了。但是，事實上，他卻還有一種所謂「合作券」。這種合作券，在閻氏官家拿來對人民時，拿來向農民購買「餘糧」，向手工業者購買生產品、向農家婦女購買手工業品時，是「貨物證券」。但人民去對閻氏官家時，却不准當貨物了。比如：人民要用合作券交換特種花去領用份地，是不被允許的。交換則不必說。（按：有人問：「可否以合作券交換特種花？受優待人可否以合作券向民購買糧食？」）「應出優待特種花，是否仍交合作券？」閻氏答：「可以產品換糧食，併交特種花現品」。「優待特種花須交現品」，——行動，十卷八期，對於可否以合作券向民購買糧食——即閻氏官家對農民糧食的問題「民食調節」——「食糧，閻氏就不手回答了」。只要人民那裡還有可被榨的東西，閻氏是不會放鬆一手的。

閻氏所從軍埔塞人民的冰禍，是事能終久維持的，一旦人民的大水漲決出來，看那閻錫山要怎樣呢？

總的看來，閻氏的「物產證券」，本來是山西落後農業經濟中小生產者

濟在代表大地主大壟斷商人這個統治集團中的反映，他的出發點就是在於鞏固這個代表大地主大壟斷商人的軍事官僚統治集團的利益。他的「兵農合一」乃是利用抗日戰爭的條件，在最後後的經濟地區，那裡自然經濟和家長制經濟原來盛行，加上地多人少，而進行的。以閻氏為家長的這個山西老軍事官僚統治集團，在抗戰的烽火中，企圖維持自己從黨權得來的統治權，一方面，「親日亦未嘗無益」，另一方面，必須向人民軍糧要命，所以就出現了這個「兵農合一」的計劃。這個計劃，把大地主大壟斷商人的某些利益轉移對軍事官僚統治集團手中（如地租的某一部分由地主之手轉移到閻氏這軍事官僚統治集團之手，大壟斷商由某些商人之手轉移到這集團之手），正是真的便利對於人民的統治，便利無產階級生產者，並便利犧牲中小地主和中小商人，屈服他們來服從這個統治集團。同時，這又是由於大地主大壟斷商人自身及其家屬屬員，大部分都加入了這個軍事官僚的統治集團，成為這個統治集團各級大小的一分子，充當其中各級軍事官僚機構的大大小小的首長或人員，所以，某些利益轉移到這個統治集團手裡，就等於又轉移到自己的手裡，而這種轉移，可以使他們對人民統治權更加集中，正如閻錫山自己所說，對於他們是有很大好處的。但是，經過閻氏這種苦心經營，施行未久，閻氏自己也有「好事多磨」（行動，六卷十一期）之感了。這種違反歷史、違反人心的措施，雖則閻氏自以為「能在廣大農村的經濟基礎上，築下堅固的基石，這個力量是永久不能消滅的，也是永久不可戰勝的」（行動，九卷二期），但歷史的鐵錘必將很快使閻氏這種幻想化為落花流水，那是完全可以預卜的了。

最好是由閻氏自己先來做些結論吧：

本年三月間，閻氏對他的下屬幹部說：「我近來最感不快者，即兵農合一之下，入營的新戰士的不少」。

本年七月間，閻氏又自己廣播說：「因各縣辦理兵農合一不力，損失我戰鬥員兩萬人」。

換句話說：閻氏實行「兵農合一」之後，不是如閻氏所說的「打仗的人多」，而是打仗的人少了。不是如閻氏所說的「種地的人多」，而是種地的人少了。份地和領村東博農民，但是，農民却是要努力走脫這個束縛。

閻氏不了解這種道理，他說：「兵農合一之下，不應該再有逃兵，如果有，是等於太陽從西方上來，因為酒透了，除已享受的優待糧在必須退出外，還得繼續優待人，並且關不上份地，被補種後，繳稅幾年！不但自己

無辦法，且連累的全家無活路，真太危險了！」可是：太陽終究是從東方出來，而不是從西方上來。你越用各種方法束縛「兵農」，而「兵農」却越跑得越多越快。「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個老子哲學，因被閻錫山真忘記了。在閻氏的「兵農合一」之下，如果兵農不逃亡，那就不合理了，那更等於太陽從西方上來了。如果大量逃亡，那就合理了，那恰是等於太陽從東方上來了。

至於閻氏「取消商業」的結果又如何呢？閻氏是說他已「廢除了公私商業」，事實上他是想廢除私人商業；官商却還要存在，並且更加集中在他做「局長」的山西省經濟管理局和各地官辦「合作社」之下罷了。但是：私人商業是否因為閻氏的廢除而不存在呢？且看閻氏自己說的呢：

「我們某種物價比黑市還賤，這說，你如何能保證無黑市」（經濟動力，第二二期）。又：該刊載有第二期經濟集訓合作部門對黑市問題討論總結說：「定價不合理」、「黑市比我們價低」。

這是說的什麼呢？這是說明了：閻氏官商商業（號為「合作社」）的官定價價格，是如何的高，私人商業所定的價格却要低得多了。這又說明了：不管閻氏的官家是如何地在那些「實行檢舉、突擊、保證做到無黑市」，「展開反黑市運動」，以求保證其獨佔的價格，但人民則仍在「地下」冒險進行自由的貿易。那種人民反對閻氏官定高價的斷斷價格，進行自由貿易的黑市，要算是進步的「黑市」。

閻氏說：「我們的新經濟制度是管理經濟」（行動，十卷八期）。也即是新農奴經濟的別名。但是山西人民究竟沒有被「管理」住，也「管理」不了。他這個「管理經濟」的必然破產，還有疑問的嗎？

閻氏自稱他這個經濟計劃是創造「公道森嚴的新社會」，這兩個字「森嚴」，使得我想起閻錫山王主席送開地獄的「森嚴」來：閻氏不過是在把那殘酷兇暴的陰間地獄轉化為人間地獄而已。但是覺醒中的山西人民必定會打碎他這個活閻王的森嚴及其人間地獄，還有疑問的嗎？

三 閻錫山的「政治計劃」

在第一個部分，我們曾經提到了閻錫山的政治企圖；在第二個部分，又用較長的篇幅論述了閻氏的經濟計劃及其實際措施，那末，他在政治上走的什麼道路，弄的什麼計劃？已經可以呼之欲出了。

談折扣

實有

有人形容兩個洋人打架：各自繞起圈子，齊拳揮舞，氣勢洶洶，說：

「你來，老子揍你！」

好像真的要打起來，但旋即說：

「好，明天在××地方見，有種的來！」

於是兩位英雄，拂袖而去，都很光彩，相安無事，過往往往使得好心的旁觀者捏一把汗，怕真的打起來。這叫做雷聲大，雨聲小，實際上，連雨都沒有；是一種折扣：無中生有，以壯聲勢。因此，就有人推論以為這是中華民族愛好和平的一例。

其實是不然的，中國也有這樣的人：分明是存心不良，早有準備，拳脚交加，打了你一頓，他表面上却說：「咱們有事慢慢談，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請過來，大家談談……」如果有人問他：「你剛才爲什麼打人呀？」他馬上便臉紅脖子粗地分辯：「沒有這回事，沒有這回事！」倘若掩飾不住，便改口道：「是他先打我，我才打他的呀！還是小事情，沒有什麼。」這是流氓手段的兩面政策，暗中踢你幾腳，明里又要給你交朋友。這是另一種折扣：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南京三道高井一帶有種黑市，是在夜間交易，黑市上賣的東西，大半是「來路不明」，而以小偷的贓物居多，有時也可以買到一些好東西，但對價錢得注意；賣者總是「漫天討價」，你得「就地還錢」，這里有很多的折扣。有經驗者編成了這樣的一個口訣：

「對半擱腰砍，八折九五扣。」

比如對價是十元，「對半」是五元，「擱腰」一砍是「二元五」，一個八折是「二元」，再「九五扣」，就只有「一元九角」了。所以討價十元的貨色，一塊九毛錢就可買下了。

但是，你不必吃驚，中國國情不同，如果不了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二月，閻氏向晉綏軍官訓練團演說，最近在各國演說，向世界要求重新分配殖民地。我

「剛才我聽到報告：德國元首希特勒，最近在各國演說，向世界要求重新分配殖民地。我因此感到飛機式進步的國家進步之驚人。」

……最近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想說甚就是甚，英國的張伯倫法國的達達尼爾以及美國的羅斯福的奔走和呼籲，可以說都是爲了應付他們。這是什麼原因？就因爲他們有現代化國家的組織，有力量，進步快，成了現代化的國家」（走上飛機式進步的路子，言論選集二輯）。

你看！他是這般稱讚了希特勒、墨索里尼這兩個法西斯妖魔。他認爲希特勒「向全世界要求重新分配殖民地」這種瘋狂的侵略要求，是「驚人」的「飛機式進步」。他欲頌這兩個人類創子手「說甚就是甚」。照他看來：法西斯的國家組織並不是墨索里尼這般橫暴的組織，而倒是「現代化」的組織了。法西斯並不是把他們的民族國家野蠻地拉向後退，而倒是「進步的快」了。在他「手筆」作爲訓練區村幹部教材的現代國家的國民中，到處稱讚了德意日法西三國國家，那還說：「希特勒這次作戰，在德國國民的精神大部是拿土雪恥報復去鼓吹民氣」。德國的士兵及國社黨軍人，就沒有信希特勒能打仗的，無論在如何的困難中，他總說希特勒有辦法，完全聽希特勒的指揮」。天津日報更有個「天津報社」，這還建立的一個大石碑，上邊刻的金字「日清戰役紀念碑」（甲午之戰），尊奉鐵錘網的，這石碑有一池沙土，係給兒童玩沙設的一種遊戲，意思是讓日本小孩當時紀念留印象，每當初經過此碑的人，都要向碑的方向，脫帽鞠躬致敬……諸如此類等等。對於（或者毫無仇視的觀念，而且竟拿這些鼓動法西斯侵略的東西去做教材，說這些東西就是「現代的國民」的模範，企圖在閻氏的統治下培養法西斯的奴才。對於日寇在我國領土內建立戰勝我國的紀念碑，不但予以其恥，而且在那裏那麼津津樂道，這就真不知是何心肝了。

意大利法西斯強盜的統治業已在去年垮台，這對於閻錫山是不會不知道的。可是，縱使在法西斯專政以後，他還是不放棄對它的歌頌。比如，今年二月十九日，他的朝會講話，又怎麼無恥地歌頌起來：「烏衣黨（按即黑衫黨）的黨員能人人保證意大利無盜案發生，且他還能下辛苦的戰在火車水雷中，破獲偷竊人的東西」（行動，九卷六期）。閻氏是拿這些話去做鼓動他所說的「革命團體」的「同志」的。法西斯本是世界最大的強盜，但在閻氏看來，法西斯黨是強盜的對頭了。在全世界民主勢力如日方中，法西斯末日已臨的時候，閻氏不拿民主制度的模範去鼓勵他的「同志」，而却去繼續拿法西斯去鼓勵他們，不正是證明閻氏始終一心一意地追求他的法西斯制度嗎？

閻氏的「政治計劃」，完全是以法西斯爲模範的政治計劃。他在那裡「組織」的那一套，完全是抄襲法西斯的。閻氏那個「民族革命」之名，而由他自命爲「會長」的所謂「民族革命同志會」，完全是侮辱民族革命、反民族革命的一種特殊法西斯組織。在那裡，閻氏具有絕對性、專斷性、獨裁者，那裡所採取的儀式，也完全是法西斯的儀式，例如：在閻氏統治地區，就有「集會及談話中間會長時段之規定」：

停這種折扣的學問，是復了中國一切事件的真象的。比如說，會談和要，白紙黑字，分明寫得一清二楚，要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然而這只限於紙上的和平。會談要談到未結，會談內容看猶在耳，第二天就頒發了一期匪「手令」，九年前收起來的「剿匪」手冊，又大為翻印，大小官員，人手一冊。接着調動二百萬大軍，敵偽共先，洋人發其後，浩浩蕩蕩，向解放區進攻了。

據說：這不叫內戰，叫做內亂。
其實這已是進步了，從前不是叫做「剿匪」嗎？現在雖然也叫，不過不敢明目張胆，只是偷偷摸摸叫喚幾聲而已。人民在歷史上有求，不是叫做「匪民」，就是叫做「亂民」，山來已久，不足為奇，既已有亂，當然要平，於是乎二百萬大軍的解放區出動了。這就有了解所謂「根據地」。

同時，一些聚斂的謀士食客之流，磨拳擦掌，搗起鐵來了。最近出陣的是國民黨政會的參議員孔庚，即袁世凱閣下的三等男爵孔庚是也，此人善變，然而不亂。從前可以在袁世凱面前俯首稱臣，幫助袁世凱消滅人民的力量，雖然并未成功，然而他健忘，歷史的教訓并不記得，現在又大聲急呼的喚內戰了。

「惟希我政府明令討伐，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一舉而殲之。」
二朝元老，發發瘋癲之聲，以討主上歡心，何足怪哉！不痛善變的孔庚之流，即連連入空門的太虛法師，近日也備出一股殺氣，不信，有時為證：
持蕩報易名利平日報觀詞

十年掃蕩妖氛盡。
一旦和平慶到來。
更有和平暗礁在。
迅行掃蕩莫遲回。
太虛法師時時遁入空門，但又離紅塵。他就在空門紅塵之間，左右逢源，悠悠哉哉，阿彌陀佛！至於十一月十一日的上海國民黨的民報日報社論「老百姓要改變眼光」，更公開主張：
「吾人平日號稱為老百姓者，從此應深戒戒權

「各種儀式之會議與茶集會及晚會中，即第一次編造會長時，一律立正致敬，蓋禮畢，自行稍息，或坐下，若再開會時，可以發聲致敬，不必立正。」
這些都是法西斯的鬼把戲。不僅如此，中國皇帝那一套把戲，閻錫山也用上了。例如，閻錫山的官話或命令，都一律稱「諭」，他的部下見他或稱「親見」……等。你看！這雖然是一個偏安小朝廷的小皇帝了！（可憐！只有那點小地方的芝麻土皇帝！）

這個小獨裁者，為着叫他的部下（等於臣子的身份）能聽命於他，他控制，不敢「異議上級」，便定了具體的自衛防衛辦法，如果沒有照狀上所填的做，就發令實行這種中世紀式與海爾斯式的威野蠻的自衛，並且已有些人就這做了閻錫山的羔羊。他還用他的部下給他上誓書，說如果有人對他說「領袖」的稱呼，就當場槍斃他打死，不然，就須自裁。這真是專橫極了。他設置了特務網，不但處處地監視人民，而且對他的幹部也是一樣監視。照他自己對幹部說：「……說到今天，我們的組織的同志，人人是監督你的。人人是監督你的。……你在工作上的一切言行，組織上就會很清晰的知道，敢斷你一點也瞞不了。大家要切實自衛，不要作了監獄之門內殺場之路上的犧牲者，大家千萬再不敢糊塗了」（行動九卷十期）。另一方面，又由他的特務實行所謂「突擊人」，要使他統治下地獄的一切人，個個納在他的控制之下。閻錫山對那種被「突擊」的人這樣說：「突擊你是為你堵監獄之門，斷殺場之路。……這正如你將有失足墮崖的危險，有人預先來拉你，真是你的救命恩人……」（行動十卷一期）。由此可見，閻錫山在他的統治地區，已到處設起了「監獄之門」，殺場之路，順之者生，逆之者死了。

在人民中，閻錫山要造成一種對他這特務法西斯組織的神秘觀念。他「對國民兵常備兵訪問團出發人員」訓話：「你們這出去，……第一要發覺個個國民兵腦筋中，統要知道組織，不情三十六以上，說他，和給他腦筋中輸送組織的名詞，組織的意義，組織的力量，組織的效用，一定要使他切實印組織，認識了組織，信仰了組織」。……使組織中……為組織是神聖的崇高的，使你們走了，他們也不知道你們是作什麼的，只是印發組織派派發給他們的」（行動九卷十期）。為什麼閻錫山要使人們對他這個組織形成一種神秘的觀念呢？因為法西斯是帶着把它的權威和神祕結合起來的；把它的權威變成神祕的權威，把它的權威變成神祕的權威，這是法西斯統治人民的法寶之一，是它赤裸的刀槍劍戟的「神祕」。

閻錫山把他的所謂「不容人」的波西斯精神，當成他這個組織的主要靈魂。所謂「不容人」的實際，就是：不容你不過樣，不容你不那樣。換句話說，就是：強迫你這這樣，強迫你那樣。如果你不這樣，不那樣呢？也即是：如果你不聽命於我——官從呢？那末有一「監獄之門」，殺場之路。在等清黨，讓你「殺豬羊」。據閻錫山說：「不容人」就是「保險不做豬羊」（參看行動九卷四期）。所以，要實行「不容人」的方法，就是「請君入彀」的方法。

就是「不容人」的方法，就是「請君入彀」的方法。
或者是顯從的奴隸，或者是犧牲的豬羊。閻錫山的政治計劃的精華，是在這上面了。

改變眼光，協助政府，努力剿亂，此時而願望政治解決者，非如白日夢，亦等於夢中囈語耳。這已是個人的呼喊助陣，發聲為其與論，內戰挑撥者在製造內戰的理論了。不祥的預兆，開始籠罩全國了。

但政府表面上是不承認有內戰的，不是說地方軍事衝突，就是說內亂。并且這一再說漂亮話，要和平解決，政治解決！

這是第二種折扣，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種折扣，如果不指出來，是很難明白真象的。但有一種折扣，一看就知的，像商店里面，分明掛着「真不二價」的金字招牌，門口却又掛了一個招牌，上書「大減價」三字，這是自打折扣，當然老得巧立名目，有所借口，如「夏季大拍賣」，「週年大減價」之類；不過，他這價開店，是永遠「真不二價」，永遠「不二價」，於是乎生意興隆！

中國武裝是一個折扣的國家。

然而，折扣的學問又豈止中國獨有，便流傳開去，也到了外國，而且學得頗為精通。十一月八日聲明：「不干涉中國內政」，第二天就是：「不直接干涉中國內政」，十日聲明却是「并無衝突事件發生」，十一日是：「僅三人受傷，并無若何意外。」到十二日則聲明：「美軍將保護美國的生命財產，倘或遇過攻擊，將必予以有力而制勝的抵抗。」華北非無美國的生命財產要保護，這點美國參院外交委員羅斯福早發聲明過了，何勞美軍與前敵去華北？

這就自打折扣，露出自己的嘴臉來了。然而這聲明是違背杜魯門總統的政策，也違背中美人民的願望的。

折扣的學問，於中外歐美，各領輝映，可謂「爾爾大觀」了。

但是中國人民是不講折扣的，事實的發展也沒有折扣的，說者必自焚其身。想想「十年一變內戰」，說者如何？還不是和平。當時人民的力氣那樣小，那不能「一舉而殲之」，何況現在呢！今天中國人民要求的是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發動內戰的人，是人民的公敵，是千古的罪人。果真進行下去，一定會被滅絕的，這是「一點沒有折扣的」。

十一月十六日。

因此閻錫山斥責了他一些幹部「作了人民的精神俘虜」。他說：「我們的村幹部盡作了人民的精神俘虜。人民說甚麼就是甚麼。一個黨政的人，如果盡作了人民精神的精神俘虜，就不能為政，也就是一天盡成了書獃，作什麼事也要無興趣」（行動九卷九期）。閻錫山說「不奪人不」，正是要人民作他的精神俘虜的。應該說閻錫山說得是甚，而不應該說人民說得是甚。但是，從閻錫山的斥責中，可見他不管如何賣力，他的法西斯組織究竟控制不了人民，甚至他統治下的村幹部也免不了受人民的影響，連類法西斯組織的脆弱不也可想而知了嗎？

閻錫山把人們分為四等：

一、人民；是組成國家的分子，不分種族男女老幼完全包括在內。

二、民衆；是人民能發生政治作用，表現政治行為的。

三、羣衆；是由民衆中經過選拔而組織起來的，受組織的影響，支配和領導不在紀律範圍以內者。

四、組織；組織是同志所集合，是在同一主義、同一目的統一領導下，有領袖、有幹部、有羣衆、有主義、有政策、有政綱、有紀律、有政治行為的集體。」

把次序倒過來，第一等人是閻錫山為領袖的統治集團，以閻錫山的那個法西斯組織為其代表，是全部政治的壟斷者。第二等人是已經受過這法西斯組織的政治影響或麻醉的，是上述政治集團的附屬物。第三等人是能起一定政治作用，可作為政治的搖旗吶喊、助統治之威的。等四等人是絕對大多數，則完全排在政治之外，對於政治毫無不得過問，只是純粹被統治的奴隸。

的確，閻氏把他在經濟上那一套新農奴制度完全反映到政治上來了。他「巧妙」地、可憐地、也可惡地，把人民、民衆、羣衆分裂為三個不同的階級，不同等級。他說他「建立民衆基礎的人心政權」，就是要建立以他那個統治集團的附屬物為基礎的農奴主法西斯主義的政權，在這政權下，人民（即他所認爲的第四等人）是完全被統治的，是完全沒有發言權的。

正如我們在他的「經濟計劃」上所看到的，他這個新農奴制度乃是反動的份地制度和領村制度；而符合於他這個新農奴制度的政治，世正是以村為統治的基本單位；他們要在基礎工作上做到：健全村支部，統一村組織」。閻錫山這個農奴主法西斯主義就是以其經濟上的新農奴制度為其目的。閻錫山那一套經濟上的新農奴制度，就需要這一套政治上的農奴主法西斯主義去加以控制。

閻錫山還要不要「人民」呢？當然還是要的。牛馬都要，為什麼人民不要呢？沒有人民，還有什麼農奴和士兵呢？沒有人民當農奴，誰去耕地呢？那糧食有糧草呢？沒有人民，他還有什麼可供統治的呢？他如何得成爲土皇帝呢？

但是：閻錫山却死記着孔夫子的愚民哲學，叫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的口號是：「拿起人民來」。就是說：人民只是可以「拿起」的，即像死的工具一樣，是可以「拿起」的，而不能是「喚起」的。「拿起來」做什麼呢？拿起來掠奪，拿起來奴役，拿起來做豬羊。

在閻錫山那裏，人民是農奴，是「死的工具」。閻錫山的政治，但是爲的去「拿起」這種死的工具來爲他工作。但是，閻錫山對於人民究竟就是知道「拿起」使用，而一點「仁政」也沒有嗎？是的，他

也有一些「仁政」。比如，閩錫山的「手諭」就有過以下的一些話：

「據報三十三軍補署長張宜生，於陰二月初三日在駐地高家吃探，經過村民鄭明慶之門口時，被大咬傷褲腿，該署長已將狗擊跑，怒猶未息，復進院內將犬主鄭某亂打亂罵，錫傷其小腹，並勒迫將狗交出，拴繫樹上，用棍擊斃，村中人民大為不滿等情。張署長此種行為，真是太不聰明，太違反軍人的德性，也太吃虧了。此事正當處法，應本愛人以德之心，為狗主設想，為今後不再設想，則切勿勒告犬主，將犬管住，免爾後再傷他人，滋惹事端，則犬主一定感激涕零。此保「仁者安仁」之處法。不能如此，亦應利用狗咬，表示寬宏大量，使聞者欽佩，藉狗咬的事實，做了要好的機會。這是「智者利仁」的處法。不能如仁智的處法，亦只可忍而不究，聽其咬人，日久自有人擒制。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鄭莊公之論智是也」(行動九卷十期)。

大家看！閩錫山的「仁政」竟把恩惠施到了狗身上去了，「可以人而不如犬」嗎？不過，閩錫山這套手法，不是他手下那些人能學的，大概只有閩錫山自己，或者加上其他一兩個「修養到家」的人，可以辦到。但是「仁者安仁」這一條，他也一定辦不到。假如閩錫山被狗咬了，他會取上「智者利仁」那一條，並在克難報的報上登一條新聞，將來還要寫在他的傳記，將這一個「仁」充分地「利」用一下。至於那班營長之流，靠得住把「領袖」的「手諭」拋之腦後，一遇狗咬，總會抓出狗主，亂打一頓的。因為在閩錫山訓練下的那批特務頭兒們，對於人民沒有絲毫的同情心，怎能有什麼真正的仁心仁德呢！

除此而外，是否還有其他什麼「仁政」呢？要說當然也可以找得出，例如：

「汾西區黨委會主任董全壽，為安插地方游散收類起見，會於上年十一月二十日特組織第十二區統委會，汾西及臨石組、政、軍、經、紀律糾查團各一。其作法如次：

- 一、目標：爲民愛民，主張公道，使人民安居樂業，人民得享安寧幸福。
- 二、途徑：除暴安良，維護地方治安。
- 三、方法：先斬後報，肅清地方壞人。
- 四、在行政上：(一)協助並完成當前工作。(二)保險並修繕工

作障礙。……(三)抗五抗：(一)抗戶不抗，(二)抗差不抗，(三)抗糧不抗；(四)抗兵不抗；(五)抗款不出」(行動九卷三期)。

閩錫山對於這個報告批了三個大字：「登行動」。雖然他批在他的官報革命行動上發表，當然是叫其他各地一體遵行的。對於這種所規定的東西，又應該倒讀上去的：行政是「劃除五抗」，方法是「先斬後報」。這就是閩錫山的「除暴安良」！這就是閩錫山的「爲民愛民」與「主張公道」！總而言之，這就是他的「仁政」！

但是，從有「五抗」的存在看來，究竟可以反證：閩錫山的「仁政」是如何的一種「仁政」了，他這個農奴主法西斯主義的政權是否有「鞏固」或「開展」的希望，也就不難明白了。

四 結束

事實上，閩錫山自己也是會感到他那個農奴主法西斯主義並沒有什麼力量，並沒有什麼前途可言的，他是會感到他那些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思想辦法之不可免沒落的悲哀的。所以，他又得求神庇佑了。且看這次新聞記者團關於閩錫山住宅的描述吧：

「三個密洞中，中間一個是會客的，就是那洞口壁上，發現一個凹進去的神龕，裡面供奉着一張花花綠綠的紙條，上面印有「天地三界十方真靈主宰之位」，神龕的外邊則貼着「天地交泰」和「天地須進步」(「地地要劃分」)的對聯。這大概是閩錫山先生自己的手筆吧！」(重慶新報，六月二十四日)

「地地要劃分」，就是他那種極端反動的份地經濟、鎖村經濟的新農奴制度思想，這一節既開命矣。「天天須進步」呢？就是說，必須天天要壓迫人民的新辦法。在閩錫山這種法西斯分子看來，壓迫人民愈兇就愈叫做「進步」了。但是我誰幫忙呢？雖然「親日亦未嘗無益」，又有國內其他法西斯勢力可為呼應，可是，在人民面前，閩錫山無異地是孤軍獨鬥，於是「天地三界十方真靈主宰」就被請出來了。然而古語不云乎，「神者聰明正直而一者也」。這個「天地三界十方真靈主宰」爺爺立在雲端，懸懸遙觀，不著猶可，一看可要氣破肚子。爲什麼呢？因為我們這位爺爺世修下的「領袖」兼「會長」兼「長官」的哲學，是「故意製造謊言，說自己如何好，別人如何壞，這叫做鬥爭」的。而且「宣傳有時可以不作，鬥爭一刻不可放鬆」。原來是一位撒謊大家，未免和「真靈主宰」爺爺的宗旨不合，叫他保佑，那是困難的。於是乎可以斷定爺爺是不會保佑的了。那末出路怎麼找呢？

——如果他不敢向人民悔罪的話——
要知出路怎樣，
請看墨索里尼！
(一九四四年八月稿)

孫中山先生論三大政策

資料室

一 革命三民主義的生命線：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總理遺囑，一九二五年）

二 聯合蘇聯

中國革命的目的，和俄國相同。俄國革命的目的，也是和中國相同。中國同俄國革命都是走一條路。所以中國同俄國不只是親善，照革命的關係，實在是一家。（與長崎新聞記者談話，一九二四年）

蘇維埃聯邦共和國與中華民國關係最密切，且蘇維埃聯邦共和國以推翻蘇俄帝國主義，解除弱小民族壓迫為使命；本大元帥夙持三民主義，亦為中國革命世界革命而奮鬥。現在貴國命令率艦遠來，定使兩國邦交愈加親睦，彼此互助提攜，掃除障礙，共濟大同，豈惟兩國之福，亦世界之幸福也。（歡迎俄艦祝詞，一九二四年）

蘇聯是中國真正的朋友
我們和許多國家立了不平等的條約……做了十幾個國家的亡國奴，最近新發生了一個俄國，自動的廢除了中俄一切不平等的條約，交回帝俄在中國所得的特別權利，放棄主人的地位，不認我們是奴隸，認我們是朋友。（「國民會議足以解決中國內亂」，一九二四年）

外國在中國訂了那些條約，便和中國處於不平等的地位，便用來壓迫中國，享種種特別權利。經過這次歐戰之後，德國和奧國廢除了那種條約，德國和奧國現在中國不能享特別權利。德國和奧國之所以廢除了那種條約的原

故，是因為他們是打敗了的國家，被我們中國廢除了的。近來俄國也廢除了那種條約，俄國之所以要廢除的原故，是因為俄國革命之後，復主張公道，知道那種條約太不平等，對於中國太不講道理，所以他們自己甘心情願要廢除那種條約，要送回俄國在中國所享的特別權利。（對神戶各團體歡迎安會講詞，一九二四年）

近來俄國革命成功，還不忘中國革命的失敗，所以中國國民黨同俄國國民革命之奮鬥，日加親善。（與長崎新聞記者談話）

吾幸得彼（指蘇聯）津梁，從事可日為接近……無論如何艱苦煩勞，必當留在軍中，與我在外之奮鬥相始終，庶幾有成，外間日日之進步，非紙墨所能盡，仲凱來此當能道這一二。總之數十年來，在今日為絕好之機會，吾人當要分送奮鬥，不可一時或息，殊不負先烈之犧牲，國人之期望也。（與蔣介石手札，一九二三年）

俄船已來過此地，以後再來，當更容易，如我確有可靠之兵，要槍米用，以後不成問題。此頭一批之械，不過到來一試耳。以後祇要問我有人耳，必可源源之接濟也。（與蔣介石手札，一九二四年）

若西南局面日有發展，當先鞏固西南，然後再圖西北，且最好能由西南打開一聯絡西北之交通線，如陝甘等地，則西北之經營乃容易入手，蓋西北所欠者在人，如無捷徑可通，專靠海道海外，殊屬艱難也。（與蔣介石手札，一九二四年）

本總理會接到海外華僑數次電，詢問此次改組，是否為改國民黨為共產黨，如為改黨共產黨則華僑同志決不贊成，蓋華僑處於帝國主義政府管轄之下，深受帝國主義國家宣傳破壞俄國革命論調之毒，故發生種種懷疑，不能自釋，世界上從前對於俄國革命之懷疑，本不獨華僑為然，即各國人士亦莫不皆然，不過彼一時也，此又一時也。多數華僑，不諳外

國文字不能依外國輿論之進步為轉移。三四年前，傳聞於外國人士者，至今猶以為是，不知外國人士之輿論亦依俄國之進步而變遷，近來俄國內政進步之神速，與前大不相同，故英、法、美、日等國之國會，均欲提議承認新俄聯邦，至於意大利則已承認，其他各國在此一二年後，亦必相繼承認，俄國已為各國所承認，故就利害而言，本黨與之聯合，將來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決無大害。（民生主義之說明，一九二四年）

今日中國之外交，以國土為據，關係密切言之，則莫如蘇維埃俄羅斯。其於吾國利害相之，毫無侵略顧忌，而又能提攜互助，實進兩國利益。……吾憶三年前，日本參謀本部員某，訪余於上海，問余是否贊助俄國之無政府主義者，余答其俄國列寧政府，組織完備，因為其黨正之政府，需得指於無政府耶？該員聞此，亦不知其言所自出，乃竟不能復答。……共事已逾一年，而國人不知，至今尚指其為過激派。其故蓋由某國不能發覺其侵略主義於東亞……宣傳其為共產黨，為過激派，以彼之恐怖而不相容者，忌人輸交親善，故特布此恐怖之宣傳。（一九二二年八月九日與蔣介石等談話，見蔣著孫大總統廣州談話記）

……中國革命
……必須長此
……繼續與蘇
……聯聯合。

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囑與被壓迫民

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為其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與彼護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獲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之翻轉。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須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新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獨立之中國，兩國在華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請以兄弟之說祝你們平安。（孫逸仙致蘇聯遺書，一九二五年）

三 共產黨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

……馬克思主
……義集幾千
……年來人類
……思想的大
……成。

從前講社會主義的人，都是烏托邦派，祇希望造一個理想上的安樂世界，來消滅人類的痛苦。至於怎樣去消滅的具體方法，他們毫無有想到。到了馬克思出世之後，便用他的聰明才智和學問經驗，對於這些問題，作一極透澈的研究，把古人所不知道和所不能解決的，都統統發明出來。他的發明是全憑著經濟原理。他照經濟原理作透澈的研究之後，便批評以前主張社會主義的人，不過是有個人的道德心，和羣衆的感情作用。其實經濟問題，不是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可以解決得了的。必須把社會的情狀和社會的進化，研究清楚了之後，才可以解決。這種解決社會問題的原理，可以說是全憑事實，不尚理想。至於馬克思所著的書，和所發明的學說，可說是集幾千年來人類思想的大成，所以他的學說一出來之後，便舉世風從，各國學者都是信仰他跟他往他走。好像盧騷發明了民權主義之後，凡是研究民權的人，都信仰盧騷一樣。（民生主義第一講，一九二四年）

……列寧是革
……命中的聖
……人。

俄國……革命的效果，比較美國一百多年以前所努力，還要宏大，成績還要圓滿，他們之所以能夠有這種圓滿成績的原因，就是由於俄國出了一個革命聖人，這個聖人便是大家所知道的列寧。（北上時對黃埔軍校學生告別詞，一九二四年）

大家都知道俄國革命在中國之後，而成功却在中國之前，其奇功偉績，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其所以能至此的緣故，實全由其首領列寧先生個人之奮鬥及條理與組織之完善，故其為人，由革命觀察點看起來，是一個革命大成功者，是一個革命中之聖人，是一個革命中最好的模範。……現在俄國的首領列寧先生去世了，於俄國和國際會生出什麼影響來。我相稱是決沒有的，因為列寧先生之思想體力奮鬥一生的工夫，全結晶在黨中，他的身體雖不在，他的精神却仍在。……現在提出大會名義致電莫斯科，對列寧先生之死表示哀悼，請大家議決。至於各行政機關，已由政府通令下旗三日，本會亦應休會三日。（致黨精神在黨員全體，一九二四年）

多數青年贊成共產黨，共產黨在中國進行激進的革命。

現在有很多新思想的青年出來……故此次改組……使力量增大，使革命容易成功。（政黨的神精在黨員全體，一九二四年）。

現在的革命需要青年，隨着世界大局所趨和中國的進步，我有許多新的看法，新的做法。現在國民黨的一般老同志，很多不能完全了解，也不能堅決執行。只有青年能跟得上我，能和我共同奮鬥。（一九二三年與張繼等談話，見李廣著中山先生論青年，載中蘇文化中山先生逝世十五週年特刊）

三民主義是共產主義的朋友。

本黨多數同志，對於此主義（民生主義），尚不盡留心研究，故近日因此主義而發生誤會，因誤會而發生懷疑，因懷疑而生暗潮，刻既有此現象，恐怕將來分裂，發生不良結果。故本總理對於此主義，必須再行剖解，庶幾本黨同志，因此主義所發生之誤會懷疑暗潮，可以完全打破……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毫無衝突。諸君既明白民生主義之真義，則新舊同志，因誤會而生之暗潮，從此便可以打消。（民生主義之說明，一九二四年）

爲什麼我敢說我們革命同志對於民生主義還沒有明白呢？就是因爲這次國民黨改組，許多同志因爲反對共產黨，便居然說共產黨與三民主義不同，在中國只要實行三民主義便行了，共產主義是決不能容納的……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與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主張民生

四 工農是革命的基礎、扶助工農

工人是革命的領導者。

在這個勞動紀念日，來開這個工人大會，要怎麼樣，帶個大會才不是空開的呢？依我看起來，要從今日起，立一個志願，組織一個工人大團體。現在文明各國的工人，都有很大的團體，我們近來發生工人的風潮，都是由各國

傳進來的，就是今天開這個大會，當然也做各國工人的。各國工人現在是

什麼情形呢？他們所處的是什麼地位呢？各國工人現在都有團體……就是生在文明的國家，工人也能够自己組合團體，提高自己的地位。譬如俄國工人在幾年以前，給成大團體，推翻專制的俄皇，改革政體，弄成工人的獨裁政治，無論什麼資本家都不許執行政權，只有工人可以管國事……其他各國工人的勢力，都是一日擴充一日，他們的地位，都是一日抬高一日，所以他們在本國之內，便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我們中國人……既有了團體，要廢除中外不平等的條約，便可以做全國的指導，作國民的先鋒，在最新的陣線上奮鬥。（中國工人所受不平等條約之害，一九二四年）

這次沙面工人的罷工，是什麼原因呢？沙面本來是中國的土地，是滿清送給外國人的。外國人設立種種苛例來壓迫中國人，工人便全體罷工去抵制，你們大家都知道中國向來是怕外國人的，凡是中外發生了交涉，中國總是不敢講話的，但是這次沙面的工人抵制他們，因爲很堅固的團體。所以遇到外國人發生苛例，便全體罷工，要求列強來取消，列強因爲看見工人有堅固的團體，所以不敢再壓迫，便要同工人來講和。由此可見工人要有團體才可以保護自己。（農民大聯合，一九二四年）

農民是革命的基礎。

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來參加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我們的革命便要失敗……農民就是中國的一個極大階級，要三個極大階級都能够覺悟，都能够明白三民主義，實行三民主義，我們的革命才是徹底……中國社會上的人，最辛苦的是農民，享利益最少的是農民，担負國家義務最重的是農民……現在用政治力量來提倡農民……要一般農民都有新思想，都能够自己來救自己的苦痛，還要農民自己先有覺悟。（耕者要有其田，一九二四年）

中國現在尚未脫農業經濟農民生產，農民既佔全生產百分之九十，爲要實行總理之三民主義，首先在解放農民，吾國人口既佔百分之八十以上，寧是則吾國四萬萬之人口，農民佔三萬萬有餘，所以中國之國民革命，喚言之即爲農民革命，爲要鞏固國民革命之基礎，亦惟有首先解放農民，基於以上之論點，則中國國民黨無論何時何地，皆當以農民運動爲基礎，無論政治的或經濟的運動，亦應以農民運動爲基礎，黨之政策首須著眼於農民利益之本身，政府之行動亦須根據於農民利益而謀其解放，因農民解放即國民革命大部份之完成，而爲吾黨三民主義實現之根據。（中國國民黨第二次

代表大會農民運動決議案，一九二六年

革命必特
工農之
加始可決
勝

中國以內，自北至南，自通商都會，以至於窮鄉僻壤，貧乏之農夫，勞苦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處之地位，與所感之痛苦，類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為迫切，則其反抗帝國主義之意，亦必至為強烈。故國民革命之運動，必特全國農夫工人參加，然後可以決勝，蓋無可礙者

國民黨於此，一方面對於農夫工人之運動，以全力助其開展，輔助其經濟組織，俾日趨於發達，以期增進以革命運動之實力。一方面又當對於農夫工人，要求參加國民黨與為不斷之努力，以健國民革命運動之進行。蓋國民黨現正從事於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為自身而奮鬥也（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一九二四年）

組織工農
武裝工農

今天開這個農民聯歡大會，這是革命黨和農民的第一次見面。我們大家見面之後，要做些什麼事呢？就是從今日起，要實行民生主義。民生主義如果能實行，人民才能享幸福，才是真正以民為主。民生主義若不能實行，民權主義不過是一句空話。民生主義能夠實行的責任，就在大家農民的身上。……農民的總數在人民里佔有百分之八九十，是佔極大多數。……中國現在是民國，要成國民國，是要多數人能講話的，多數農民如果能結成大團體，就有力量

以講話。本黨今日開這個農民聯歡大會的目的，就是在提醒你們農民，要你們回鄉之後，更揭發大眾，大眾都團結起來，結成團體便可以不做做人的奴隸。……從前被人搶去了的利益，便可以爭回來。若是不回來，或者被人壓迫，便可以設法來自衛，或者是抵制。……你們各鄉農民向來不知結團體練農團軍來自衛，所以總是被人欺負。如果要以後不被欺負，便要從今日起結成團體，挑選各家的壯丁來練農團軍。你們能够這樣進行，政府還可以從中幫助，用極低的價錢供給你們。你們有了槍，練成了很好的農團軍，便是中國第一等的主人翁，講很有力的話。（農民大聯合，一九二四年）

諸君結成了大團體，要擔任甚麼責任呢？就是要擔任提高國家地位的責任。……要抬高中國國家的地位，便先與中國脫離了外國的經濟壓迫，也是對資本家宣戰。現在中外的工人都是一樣的作戰，所向的目標，都是一樣的敵人，所以中外的工人，應該聯成一氣，中國工人聯絡了外國工人，對外國資本家去宣戰，便要學辛亥的革命志士，同心協力，一往向前，抱定破釜

沉舟的大勇氣。……現在中國同各國不平等的原由，是由於國際的束縛，譬如政治經濟種種的壓迫太多，要解除這種束縛，在工人一方面，並不是難事。俄國的工人，便是中國工人的好榜樣。（中國工人所受不平等條約之害，一九二四年）

新到之武器，當用以練一支決心之革命軍，其兵員當向廣東之農團、工團、並各省緊心革命同志招集。（與蔣介石手札，一九二四年）

和工農做朋友
農團

我素來最敬佩的是你們做工的人，所以，我喜歡與工人做朋友，因為工人是與世界、國家、社會最有益處的人。我所最痛恨的，就是軍閥官僚，資本家，因為他們是與世界、國家、社會最有害處的。（在機器公會成立大會時演說，一九二〇年）

你們這次畢業，到各鄉村去聯絡農民，這是我們做農民運動所辦的第一件事。……這回的宣傳是第一次，諸君去實行宣傳的人，居心要誠懇，服務要勤勞，要真是為農民謀幸福。要在最短的時間之內，用極好的聯絡方法，先把廣東全省的農民都聯合起來。（耕者要有其田，一九二四年）

現在文明進化的人類覺悟起來，發生一種新的道德，這種新道德，就是有聰明能力的人應該要替眾人服務。這種替眾人來服務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世界道德之新潮流，一九二四年）

青年具有勇敢犧牲的特性，實為國民革命的先鋒軍，在目前舊家庭之制度束縛之下，封建軍閥壓迫之下，舊禮教思想統治之下，買辦地主剝削苛待之下，帝國主義者經濟政治文化種種侵略之下，青年的生活教育各方面都感受特殊的痛苦，所以青年革命的要求，比其他民衆更為熱烈，本黨為求革命勢力的充實與擴大，對青年運動有特別注意的必要。……在農工羣衆已經能够公開領導民衆運動的地方，應極力促成工農學的聯合組織，使學生青年贊成工農運動，不致脫離工農羣衆，成為落伍的形勢。（青年運動決議案，一九二六年）

馬克思是怎樣研究和寫作的

M. 格略塞爾

在第十九期的「羣衆」中，已經介紹過馬克思學習的情形，現在這篇文章中所要介紹的，則是馬克思從事研究和著作的情形。在此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馬克思並不是一位書齋中的學者，而是一位革命鬥爭的戰士，他永遠是把理論研究的工作，和革命鬥爭的工作緊聯在一起的。

馬克思是用嚴謹的態度

從事研究和寫作的

馬克思在一八六九年所寫的一封馬克思傳中，曾經這樣寫道：「二十五年來，馬克思『是用一種無與倫比的真誠』在研究和思考自己的科學，『在他還沒有滿意他所作的結論的形式和內容之前時，在還沒有最後相信：他沒有留下一本尚未讀過的書，沒有留下一個尚未考慮過的問題，並且每一個問題都已經由他研究到透徹的程度之前時，這種真誠是不允許他用有系統的形式發表他的結論的』」（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二十四卷第八七——八八頁）。

馬克思這種最大的嚴肅工作態度，「他經常地、永遠地工作着，只要他有一點可說的話，儘速在散步的時候，他也隨身帶着一本筆記簿，不斷地在上面寫筆記」（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二卷第一六一六頁）。

拉斐格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曾經這樣描寫出馬克思的工作日：

「雖然他常常很晚才睡覺，但在早晨八九點鐘之間的時候，他是已經起床，在喝黑咖啡

和讀報紙了，然後就走進自己的書房，在那兒一道工作到深夜兩三點鐘……年青時，馬克思就已有通夜工作的習慣。工作成了他最喜愛的一件事情；這種癖愛佔有了他整個的人，以致時常使得他廢寢忘食。在他最後終於走進食室睡覺時，往往還要喊他對幾次，他又重新回到他的書房了」（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九〇——九二頁）。

馬克思就是這樣工作的。用巴比塞的形象化的說法，這位天才的思想家，「有着一個巨人似的身材，足以吹散思想的天空中的一切烏雲」（見巴比塞：「斯大林傳」一九三六年俄文本第二十五頁）。

馬克思把他所有的精力，都獻給了毫不疲倦的工作。他曾用這樣美觀的句子，表現出他對於他自己以及一切想把人類知識羣頂的人們的要求：

「在科學中是沒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些在攀登多石的小徑時不畏疲勞的人，才能達到光輝的頂點」（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十七卷第廿三頁，邊註是本文作者加的）。

不害怕勞作，不管它是多麼艱難、繁冗，而時時刻刻學習克服橫亙在道路上的一切困難，——這就是我們在研究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家的工作方法所應該汲取的一個重要的教訓。

有一頁不起馬克思著的一本論貨幣流通史的著作，而他當時正在寫作關於這一個問題的文字。他就寫了一封信給恩格斯，請他轉匯一筆所需要的書款給他，馬克思在信裡面寫道：

「在這本書裡面，大概對我沒有什麼更新的東西，但直接按照『經濟學』雜誌對這本書的重觀，以及我親自讀過的幾段摘錄的文字來看，不看一看這本書，我的理論上的良心是不允許我再繼續寫下去」（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二十二卷第三四〇頁）。

拉斐格在他的回憶錄中，又曾經這樣講起馬克思：

「他文字上的良心，正像他科學上的良心一樣，是同樣的嚴謹。他不僅從不肯引用他十分相信的事實，而且也決不允許他自己討論一個他事先未曾透徹研究過的問題。在他對於他所寫的東西還沒有作縝密的修正和多次的改作而求得一個滿意的形式之前時，他絕不發表任何東西。還沒有成熟的東西拿到公眾面前去的這個念頭，在他是受不了的。把還留着一個觀點沒有改正過的原稿拿給別人看，這在他簡直是種莫大的痛苦。在他心中的這樣感覺是強烈了，有一次他甚至這樣說過，寧可把他的原稿都燒掉，決不願讓它們沒有完成的留下來。

「在他的研究方法中所遇到的各種困難，那是讀者所不能想像的。譬如，為了要在『資本論』中寫一段將近三十頁的關於英國工廠立法問題，他不得不翻閱了包含著英格蘭與蘇格蘭專門調查團及工廠監察員的報告的全套藍皮書；我們只要從他在這些藍皮書中所作的許多記號上，就可以知道他是把這些書從頭一直讀到尾的」（見『馬克思選集』俄文本第一卷第九四—九五頁）。

在今天，大家已很不容易想像出馬克思著作『資本論』時所處的那種艱苦情況，用馬克思自己的話來說，「毫無疑問地，（『資本論』這本書）是一顆什麼時候要射向資產階級腦袋去的最可怕的砲彈」（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二十五卷第四八頁）。

這意味著馬克思家庭的那種物質上的絕望的困難，要求他不得不花費很大的精力來弄錢。假如我們再想到作為一個革命政黨的領袖與組織者的馬克思經常所做的龐大的工作，再想到他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許多敵對黨派不斷鬥爭時所耗費的精力與時間，那麼當他著作『資本論』時所預先做的那種巨大的準備工作，看起來就完全不像是個人所能為力的了。可是馬克思完成了這一工作；我們只要舉出一點就夠了，就是他為了著作『資本論』，曾經研究和做了一千五百多種書的提要。

馬克思著作『資本論』的歷史，是特別富有教育意義的。按照他所採用的作為科學研究工作的一種特別的制度，他在發表他自己的著作之前，先寫好許多專論形式的大著作，——這些著作不能不為了發表的，而是為了對自己闡明許問題用的。

馬克思在開始著作『資本論』時所寫的許多論

著，共包括七個抄本，大約五十個印張，這就是他對於政治經濟學所作的批判的最初的草稿，並且是作為一個大的開端的。為了他在一八五七年才開始寫的這個初稿，他還從一八四三年起就開始了龐大的科學研究的準備工作，最初是一個人，到了一八四四年底時，就和恩格斯一同研究，而從這個時候起，在革命工作上，恩格斯就成了他最忠實和獻身的朋友。

為了自己的工作，馬克思曾積聚了大量的準備材料，像摘錄，提要，表格統計，草稿以及圖書目錄等，馬克思儘力地將這些材料組織起來，以便在將來的研究工作中更輕易利用這些材料，並且做了索引。為了同一目的，他還為自己的著作的原稿做過索引。

在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七年這五年當中，馬克思研究了並且批評地分析了所有重要的經濟論著。我們不應該忘記的，就是馬克思在這一時期中間，還曾經努力於研究法國革命的資料及文獻，並且也沒有中斷他對哲學的研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兩個人合著的『神聖家族』一名『批判的批判』之批判』及『德意志意識形態』等書，就都是屬於這一時期的。

馬克思是把理論研究和革命活動緊聯在一起的

馬克思的這種大規模的理論工作，是和沸騰的革命活動相結合著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兩個人，並不只是在這本著作中，向『學術的』世界敘述出自己科學成果的學者。

拉發格在回憶他和馬克思的談話時，曾經這樣寫道：

一八四七年，馬克思寫了一本反對普魯東的小資產階級與反動觀點的著作『哲學之貧困』，在這本著作中，馬克思已給資產階級的經濟學作了一個總物的分析。一八四七年秋天，馬克思作了關於『雇傭勞動與資本』的演講，最後在同一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又因『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委託，寫成了斯大林稱為『馬克思主義的「雅歌」』的『共產黨宣言』。

列寧這樣寫道：

「在這篇著作中，馬克思以天才的明確性和顯明性，描繪出了新的宇宙觀，將社會生活領域也包括著的徹底的唯物論，作為最全面和深刻的論發展學說的辯證法，階級鬥爭的理論，以及為新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創造者——無產階級之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革命作用的理論」（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十八卷第六頁）。

在這些年代當中，馬克思還為各種報紙和『德法年報』寫過很多的文章。

以上所述的，就是馬克思在那些年代中，最初開始準備他主要的著作『資本論』時的規模的概括情形。

馬克思……認為一個學者，假如他不願降低自己的水平的話，就必須永遠不斷地積極參加社會生活，就必須永不把自己關閉在自己的書房或實驗室中，正像薩身在於階級中的蛆蟲一樣，離開他同時代人的生活和社會與政治的鬥爭。『科學決不是一種自私自利的職業，那些能够献身於科學的幸運的人，應該首先

把自己的知識貢獻給人類服務。」「為世界工作」，這就他最喜歡的一句話」(見「馬克思選集」俄文本第一卷第八六頁)。

我們知道，馬克思事業的偉大的繼承者——列寧和斯大林——，他們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是經常向我們表示出一個榜樣，告訴我們一個忠誠獻身於人類的革命戰士，應該是一個現出工人階級利益的科學的人，同時也表現出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家，應該具有多麼龐大的知識準備。

我們只要引出新大林在聯共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的一段著名的話就足够了：

「那種局限於自己的專門知識，譬如說局限於數學，物理學或化學，而除了自己的專門知識之外再看不到其他什麼東西的人，雖然他們自稱為列寧主義者，但決不能認為是真正的列寧主義者。列寧主義者絕不能僅僅是他自己所愛好的科學專門的專家，——他應該同時又是政治家與社會活動家，非常關心自己國家的命運，知道社會發展的規律，善於利用這些規律，並力圖成為國家的政治領導的積極參加者」(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一版第五九八——五九九頁)。

馬克思首先就是一位革命的政治家與社會活動家。他所掌握的那種龐大的知識儲藏，是他在為了創造無產階級的最有力的武器——革命理論時所必需的。

馬克思還在他最早的一篇文章「黑格爾法理哲學批判」的緒言中，就提出了一個著名的提綱：「只要當理論一被羣衆掌握，理論立即成為物質的力量」(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一卷第三九二頁)。

「黑格爾法理哲學批判」是年青的馬克思在

八四三年時所寫的名著之一，當時他還不過才二十五歲。用列寧的說法，在這本著作中馬克思已經作爲一個革命者出現，宣佈對「一切存在作無情的批評」了……(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十八卷第六頁)。

馬克思把他的每一個理論上的收穫，把他所有偉大的發現，都首先帶給羣衆，帶給無產階級。馬克思認爲口頭上與文字上的宣傳，是具有頭等的重意義的。

馬克思的同時代人，曾經告訴我們一件事，說一八四六年在布魯塞爾時，馬克思曾經召集了一次討論在工人黨中宣傳工作的方針，以及團結與組織工人從事革命鬥爭的特別會議。出席參加會議的，有一位是德國的空想共產主義者魏特林。

據當時出席參加會議的安年科夫告訴我們：「我們坐在一張不大的綠毯子旁邊，坐在毯子的另一頭的是馬克思，他手裡正拿着一枝鉛筆，低着頭在紙上寫什麼東西，而同時他的終身不可分離的同伴和宣傳工作上的戰友，身體高大的恩格斯，正在用沈重而嚴肅的英語致謝會辭」(見「歐羅巴通報」，一八八〇年第二期第四期第九八頁)。

在這次會議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主張必須把工人運動和科學及革命理論相結合起來，因爲只有這種結合才能保證勞動者從壓迫與剝削中爭取解放的偉大事業得到成功。而魏特林則反對馬克思的意見，並且發揮了他自己的理論，說必須在具體的階級上，用工人們組織起來參加具有集體化的設施的團體的方法，來直接幫助工人。

當魏特林還在繼續在提出反對的意見時，馬克思就帶着最大的憤怒說道，「無知永遠不能幫助任何人」，工人階級要得到勝利，那只有在他們能組織自己的鬥爭和依靠着社會發展的法則的鞏固基

礎才行。

馬克思從年青的時候起，就是一個傑出的宣傳家，羣衆工作者。據馬克思同時代人的回憶，他的宣傳的發言、報告、演講經常是富於形象化的，並且是工人們明白的和聽懂的。馬克思忍受不了庸俗化和簡單化；他把他自己的知識，他自己的革命的演講永遠是站在这个科學的頂點的。他用特別苛求的態度來對待他自己的演講，這些演講都是深思過和盡力地準備過的，並且他還要求別人也這樣做。

拉發格寫道：馬克思「僅僅抱着傳播他研究的結果的企圖，和爲在此前被空想的迷霧所籠罩的社會主義運動打下一個科學基礎的堅定決心，才從事寫作。他參加社會活動，也祇爲了一個目的，就是促進工人階級事業的勝利，這個階級的歷史使命，就是當它維持了社會的政治與經濟的領導權時，要立即建立共產主義……」(見「馬克思選集」俄文本第一卷第八七頁)。

(孫荃譯)

代郵

利斧先生：

請示通訊處。

編者



晉察冀行進

周而復

從村選看邊區的民主生活

在反掃蕩當中，一切的軍政團體，學校，政府機關，部隊，都集中全力在為了一個目的的工作：取得反掃蕩的勝利。等到反掃蕩一結束，各個部門的日常工作又開始了。

春天，是邊區一年一度的村選的季節。

一早，曲陽三區的張區長到軍區政治部來看我，他告訴我今天是郎家莊的改選，問我去不去，我當然是很願意去的，便一同走了。

郎家莊是一個五百多戶的村莊，選民（凡年滿十八歲以上的任何抗日人民）不論性別職業、貧富，都是選民。有一千一百二十五位。會場佈置在村邊的一個廣場上，這廣場，在收穫的季節是打穀場，冬閒的季節，是村區自衛隊的操場；春天，便成為人民的會場了。這時候，廣場上還沒有什麼人，只有幾個村幹部在佈置會場，場子四周豎起了一塊塊長的木板，上面貼着紅紅綠綠的標語，主席台裏對着廣場，那兒一排放着三張桌子，當中

一張桌子放着，一個大紅色描金花的小櫃子，上面貼着一張紅紙，寫了三個字：「投票箱」。一會，村幹部把一張開會日程貼在當中的桌子前面。

張區長為了準備這個村的改選，曾經在這兒工作了三天，幫助村長總結工作計算賬目，今天，他巡視了一下會場，又把村長拉到旁邊去談，檢查一下還有什麼工作沒有準備好。正在他們談的時候，走向村中去的護隊路上，忽然傳來整齊的步伐，接着是聽到雄壯的口令：「一二三——四……」我轉眼看去：原來是村自衛隊，帶着綠綫槍，四個人一排，向會場走來，他們到會場的中間，停止了，很整齊地排成了一個長方的隊形，坐下來。接着是兒童團，婦女自衛隊，青壯先，老頭隊等都排着隊來了，把場子填得滿滿的，兒童團坐在最前面。我看到一種嶄新的氣象，蓬勃的精神，充沛的力量。

聽說中國是一盤散沙？如果真是的話，那是統治階級壓迫人民成爲散沙，迫阻團結起來的力量，不說怪

人民自己。
新的社會里，人民組織起來，成爲這個社會的主人。

主席宣佈開會以後，老村長把過去一年的工作做了一個很詳盡的報告，說明這一年來在收支上，春耕上，優抗上，教育上……各方面的情形，像一個管家的僕人，向主人報告他的工作一樣。報告完了之後，主人——坐在廣場上的一千一百二十五位的選民，從各方面提出了問題：有的說去年冬學沒辦好，不能完全按時上課，這責任不能完全推到教育委員身上去，村長是領導全村工作的，教育委員不過是幫助村長辦理教育而已，冬學沒辦好，村長要負責；有的說這一年來優待抗日軍人家屬差，原來政府規定每月發優待糧，給抗屬送柴挑水，有些抗屬就沒有收到，甚至有把兩個月的優待糧合併到一塊發，沒有照顧到抗屬的需要；有的說救濟民的工作做得不好，反「掃蕩」以後，上邊規定募捐糧食，大人一年該六升，可是村裡沒有切實做到，并且還項救濟工作，只是附近駐軍給村子募了一筆款子賑災，村長沒有全心全力推動這一項重要工作……

各種不同的意見，從各方面毫無拘束地發表出來。我看見村長像一個忠實的僕人一般，坐在選民前面，回憶着這些事，臉上顯得有些慚愧。

最後張區長總結了大家的意見，並提出村政工作，是保證政權任務完成的，這一點卻有長級路了。這一年來的工作，用張區長的口吻說，就是：「檢討這一年的工作，優點只有三個，缺點却有七個，可以說這一年工作大體上沒有做好。」

張區長檢查一下選票，準備選舉了。村委會主任提出了農會會員做候選人，婦女會提出婦孺的會員來競選，青抗先也提出了自己人……候選人一個個或舉手擁到主席台上去，聽聽他們的競選演說，一個青年農會會員這樣說：

「你們大家要選俺當村長，俺一定要為大家謀利益，根據鄉親們的主張，把每一項工作辦好。希望你們熱心幫忙，我一定領導大家抗日保衛家鄉，把咱們的光景過得更好……」

婦女競選人也到台上說了話，要和別人競選，她要把村裡的工作做得比別人更好。這時候坐在選民前面的兒童團開始活躍起來，唱歌叫口號，鼓勵大家競選。

競選演說講完以後，就開始投票。這是一種不記名投票，村裡的小學教員，村幹部，農會會員等三個人擔任寫票，另外有群眾選出人來監票。每一個選民走到寫票台旁說出自己選那個人，寫好以後，由自己投進投票箱。有的扶牆拐杖，有的掛着小孩，從十八歲以上的青年男女，到七八十歲的老者，都走到投票箱前，選擇下一年給自己辦事的人。

選完以後，大家便有秩序地回到廣場四圍，說說笑笑，在估計誰可以當選了。

開票結果：是一個青年農民和一個中年婦女當選了正副村長。張區長把一疊選票送到他們兩個人手裡，慶賀他們說：

「這就是你們的委任狀，大家選的，你們要好好辦事，不要辜負了大家的希望……」

他們兩人笑嘻嘻地接過封好了的選票，點頭同意張區長的話，沒有盡職的舊村長，在羣衆的意見之下，解職了，第二天他開始移交給新選出來的正副村長。

鄰家莊的村選工作完了之後，我給張區長談到邊區的區級縣級和邊區一級選舉的事。他告訴我，「大致和村選不差甚。」所謂不差甚，是這樣的意見：

村裡每十五人劃分為一小組，每個小組提出候選人，成為村代表，這樣的代表組織成村代表會，也就成村議會。由各村的代表，又推選出按人口比例的一定數目的代表，當區參議員，出席區參議會，從區參議會裡選出區長來，成立區公所。又在區參議員里推選出席縣參議會的議員，縣參議會裡選

生出縣政府，縣長等。專員公署一級，是邊區政府的代表機關，沒有參議會機構，從縣參議會裡直接選出出席邊區參議會，各縣的代表組織成邊區參議會，這是全邊區的最高權力機關，也就是總的代表

邊區人民意見的機關，從這個機關裡產生了邊區政府委員和主任副主任。這些主任和委員，和各村的村長一樣，邊區參議會有一切權力可以改選罷免。政府的工作人員，他只是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他的去留不決定於村長帶帶關係私人關係或諸如此類的因素，而是取決於他的主人——就是人民。好的勤務員當然會繼續服務下去，壞的，也自然會被請走的。

像這樣以人民為主的政治生活，孫中山先生追求了四十年都沒有成功，臨死時還殷殷囑咐叫「同志仍須努力」。經過八年的抗戰，在全國範圍來說，依然只是一個希望，在大後方所實行的仍舊是黨治，或者也可以叫做民主，不過這種「民主」是：「我是主，你是民！」

人民的勤務員

全國人民的希望，孫中山先生的理想，首先在解放區實現了。

村選完了之後，張區長和我一塊回到軍區政治部來，三區的區公所就在軍區政治部這個村裡。一路上走着沙灘地，小河裡的水發出潺潺的聲音。我們邊走邊談着：我問他村長有沒有薪水，他笑臉地向我望了一下，然後嚴肅的搖搖頭，最後說一句：「舊政府時代是有的一。」

原來選出的村長和村幹部，是不脫離生產的，村長忙，實際上是不顧不上自己的生產的。然而沒有薪水，過去村幹部還能在村公所裡吃飯，報銷，現在節省村開支，這一點也取消了。實際上，村長是個無報酬的職位。他的唯一的報酬，就是替村裡人事情辦好了，大家的感謝，下一次再選他。可是他的任務是繁重的，要計劃全村的工作，領導生產，教育，武裝鬥爭……

區長幹都是脫離生產的，但那薪水，却少得可憐的很，只八塊錢一個月。就拿張區長來說，他穿一身粗布棉衣，戴個藍布帽，身上掛一個土黃色的飯包，整天的跑來跑去給老百姓辦事。比如，三年前遭水災，全區的人生活發生了問題，幾乎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要缺三個月糧食，據老年人說，這樣空前未有的災情，是要餓死不少人的。從前還沒有這樣嚴重的災情，都要餓死不少人的。張區長和邊區其他政權工作人員一樣，到處想辦法，以政府的名譽，向地主富農借糧，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得要三三兩兩的勸說，左一勸右一勸的說服，最後又開了士紳借糧會議，這樣才說動了。從地主那兒借來糧，借給大多數缺少糧食的農民，這樣才能渡過災荒，能夠生產，到秋天打下糧食，再還給地主。因此，在空前未有的水災下，全區沒有餓死一個人。只要老百姓有困難，有需要，他就去籌劃，去辦理，去解決。

像張區長這樣，在解放區根據地裡工作，工作雖忙，生活雖苦，但很平安。他給我談到冀中游擊區趙縣縣長的生活，那簡直是在生死線上鬥爭。

趙縣的縣長是陳翁儒。陳縣長不像從前的縣老爺，整天坐在衙門裡要飯、要錢、吃好的、穿好的，一個人找個老婆，出來的時候，威風凜凜，不是騎馬，就是坐車，從前更是鳴鑼開道，甚至街上連老百姓也不讓走。可是陳縣長就完全不同，他每月只拿十五元的津貼（這是邊區政權工作人員的最高津貼）。吃的和老百姓一樣的飯，穿的和老百姓一樣的衣服，甚至比老百姓還不如；夏天因為「掃蕩」緊迫，上級還沒顧及發下單衣，他仍舊是穿著一身的棉衣。老百姓愛給他擦汗，送一身單衣給他，他不穿，怕增加老百姓的負擔，說是上級不久會

發下來的。陳縣長就是這樣穿著一身棉衣，大熱天到處奔走給老百姓辦事，想活路。不認識他的人，在路上碰到了，誰也不會知道，這就是一縣的父母官陳縣長。他在敵偽軍羅旗佈的據點中間展開了民主政權，建立了民主的政府。開頭，因為環境緊張，人手不夠，他一個人便在敵人據點附近，做好幾個人的事，他自己說得好：「這時候，縣長是我，科長是我，秘書是我，交通隨員也是我。」可謂是身兼數職了，然而他的津貼也還是十五元，甚至有時拿不到。但是他腦筋裏沒有時間想這些事，他怎樣給老百姓多做點事，能够把老百姓生活改善。

說到趙縣的縣政府，誰都會吃一驚的，既不堂皇，也不華麗，更不威嚴，不但是不是一個縣政府，連縣政府的門房也不像。趙縣的縣政府是在海地里看水車的一間小屋子，陳縣長在這兒辦公，這兒就是縣政府。這不像縣政府嗎？是的，不像。可是有什麼關係呢？主要是在實質，不在形式；過去縣政府雖然堂皇壯觀，那是用權力從人民身上剝削下來的，這政府是和人民敵對的，是人阻死的對象。

看水車的一間小屋子固然不像縣政府，但團結了趙縣全縣的人民，他是人民力量的動力站，它是由人民組成的全縣總指揮部，人民的一切問題都來找陳縣長，人民關心這間小屋子，愛這間小屋子，擁護這間小屋子，因為這間小屋子和小屋子裏的人，給他們辦事。

陳縣長的生活很簡單，簡單到這樣一個程度：連伙房沒有，飯也不做，他身上只是經常掖着乾糧，他覺得這樣既省事，也節省時間，更可以避免繁瑣，因此能够抽出時間來給老百姓多做點事。

他在繁瑣的據點當中，開展了統一戰線的工作，使得過去曾經懷疑過民主政權的人，也舉起雙手

來贊成民主政府的措施。他在敵人的破壞之下，建立起趙縣的民主縣議會，包括各個階級的代表，團結了各個階層，抗擊敵偽當時所謂治安強化運動。

平時他到處為全縣人民工作奔走，掃蕩來時他就帶着縣里的地方武裝——義勇軍打游擊保護人民。去年二月里反「掃蕩」，他帶着少數的義勇軍被優勢的敵人包圍了，他一個人勇敢地頂着，企圖突出敵人的重圍。但是敵人又從營縣城開來了兩輛汽車增援，終於不支，陳縣長和他少數義勇軍都被打倒，陳縣長受了重傷，被敵人運到營縣政府的民衆醫院去治療。這時，敵偽開始了誘降，慰勞，送禮物，探問，勸解，他都一一拒絕了。起初是偽隊長來勸降，不肯；接着是偽縣長，派兵隊長，一個個來勸降，一個個被罵回去。最後偽趙縣的敵人小隊長來勸降，也被罵走了，他始終不肯爲了個人的生死，而出賣趙縣人民的利益。敵偽束手無策，無可奈何地把他槍決了。

陳縣長雖然死了，但是他勝利了。縣長，和一切政權工作人員，現在是人民的勤務員給人民服務的人。

過去的縣長老爺，和一切官員，是騎在人民脖子上剝削人民的。

這種爲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是解放區政府工作人員的典範，陳縣長不過是千千萬萬的政權工作人員當中的一罷了。

這樣爲人民服務的勤務員，怎麼會不受到人民衷心的愛戴，至誠的擁護？

張區長指手劃腳地給我說：聽說就有動了，不知不覺已走到軍區政治部的村口了。進了村，因為他疲勞了一天，又給我談了這麼久，便不敢再打擾他，和他分手，讓他回區公所去休息休息，讓一個人回到政治部去。

(未完)

繼其及評書

讀葛琴的小說

鉗耳

「總退却」，「磨坊」，「磨坊」，「伴侶」

過去自己寫過一些東西，都是就書論書，也還簡單。現在是把一個作者四本書擺在一起，這就不但與論作品也要論作者了。這實在力量所不能勝其任的，何況我與葛琴女士更無半面之緣呢！這篇文章不是說對作者葛琴女士的評論，只不過從作品中感覺到的幾點印象和意見而已。

九月一日鉗耳記

「總退却」出於一九三三年，是五個短篇的合集，「一天」，「磨坊」，「磨坊」，「伴侶」，「磨坊」，其中「磨坊」，「磨坊」二篇又收在「磨坊」中，「磨坊」是四篇短篇小說的合集，除了上述二篇外，還有「磨坊」，「磨坊」二篇，「磨坊」是篇中篇，出版於一九三七年，以上都是較前的著作，其中「磨坊」是在四二年才出版。伴侶包括八個短篇，「磨坊」，「磨坊」，「磨坊」，「磨坊」，「磨坊」，「磨坊」，「磨坊」，「磨坊」。

「總退却」中去的二篇是比較成熟的，剩餘的三篇可能是最初的作品，這三篇可取的地方都很少。「一天」和「磨坊」結構鬆懈，有時難于使人了解其主題。「總退却」中的人物，反映了當時創作中政治口號化的傾向。但到了「磨坊」和「磨坊」中，就顯出作者的大進步。這兩篇都從兒童的一個生活側面悲慘動人地表現了農村的貧困，不安與憤怒的醞釀。這種進步是由於作者觀察的深刻而來。到了「磨坊」，便更顯示作者生活和筆觸向廣闊的方向的開展。這個進步很重要。處理像「磨坊」這樣廣大的題材，在中國女作家中還是非常少見的，寫得刻劃了抗戰以前的時期在日本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的中國農村手工業的破產。如果，創作的廣大與深刻是不可分的，惟有在廣大基礎上的現實生活才能使一個作家能夠從容取捨題材，剪裁典型，在個別事件中寫出來週全而精確的形象。那麼，我們豈不應該特別重視在「磨坊」中所表現的作者的現實關懷才罷麼？

然而，就抗戰以後的作品而論，（我這裡所看到的只有八篇，也許是不公平地遺漏了作者別的重要作品吧？）我們一方面看到作者日漸在「小慧」方面，在題材處理與結構的精巧方面的成熟與動人，

讀者之頁

他其及織組的會工職際國

姜門先生：

來信所詢：「一、國際職工會之書處是怎樣一個組織了總書記文納爾斯以及這個組織對這次「世界職工聯盟」採取什麼態度？有研究國際職工運動發展的書籍嗎？二、國際職工分會，中國勞動協會的組織、目的及什麼？三、對現有的工人組織應採取什麼態度？」（餘從略）茲據我們所了解的，逐一簡答如下：

關於第一個問題：「國際職工會秘書處」是「國際職工會」的執行機構。總書記文納爾斯是英國著名的機會主義者，正如別的機會主義者一樣，其興趣是集中在破壞工人階級的團結去和資產階級求得諒解與妥協。這一個「國際職工會」的組織來源是這樣的：一九〇二年第二國際在哥本哈根成立「國際勞動組合書記處」，畫了「國際勞動組合運動之通信機關」的作用，是「國際職工會」的前身。一九一三年正式改名為「國際職工會」，成立「國際職工會秘書處」，本部設在阿姆斯特丹，又叫「阿姆斯特丹國際」，亦即「黃色職工國際」。它是在叛變了工人階級的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之理論的政治的指導之下，以各國之改良主義的勞動組合同盟為構成要素，是第二國際的基本部隊。

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一起，這些工人階級的叛徒們都去擁護和參加帝國主義掠奪殖民地的「祖國戰爭」去了，其組織就分解、腐敗和死亡了。但一九一九年凡爾賽和平會議時又在英法帝國主義聯盟之下復活起來，與國際帝國主義之工具的國際聯盟的勞動機關密切地配合起來，去破壞國際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散佈改良主義的毒素。國際勞工

一方面却感覺到作者向海「感傷」方面的廣大發展是停頓了。這也從下面事實中看出來：在「伴侶」中的八個短篇，「空地」，「伴侶」，「鬥士」，「守夜人」，「父子倆」六篇都相當好，其中尤以「父子倆」更非尋常好，都表現了抗戰中市民生活的幾個面；而「感傷」一篇雖然初期抗戰中一般救亡青年的活動與幼稚，已經使人感覺到描寫的過於生活的，多像是一篇文學的少像是一個真實了。

在「呂克勇」中，作者寫着呂克勇「在鄂爾天地裡，噴過許多學校風沒有讀過的書，故得步槍，捧得手榴彈，也和那青年一樣；跟着軍隊打過仗，他們完全忘記了自己，在千萬人的呼吸中呼吸，在千萬人的成長中成長。他們的眼睛永遠望着前方，望着千萬人一致所望的東西，千萬人一致尋求挖掘的東西」。但在故事中具有極端顯現出來的呂克勇，以及作者處理這題材的手法，都使人遠遠地離開了能使人在這種光輝的方面所應有的境地。從呂克勇的形象說，它像是一個鬥敗了但是個強烈的公雞，從題材的選擇上說，作者反映的並非是那種為千萬人一致所望所尋求挖掘的人民戰爭，而毋寧還是戰爭中後方生活的一個側面。這個側面，從一個人與戰爭中的戰士身上表現出來，而作者對這種戰爭中的戰士却並不熟悉，因而這個側面也並未能夠好地表現出來。

就作者處理題材的廣度來說，出現在作者筆底下的最多的是兒童，作者對兒童題材的熟練和深刻，實在是世世無二的。其次是工人，青年市民，農民，婦女和士兵，直接地以農村生活為對象的並不多，但主要人物的兒童，大部分都選擇村兒童，而以工人青年和士兵的面貌出現的，我們正也能從他們身上明白地嗅出泥土的氣息。魯迅先生在「雜感」的序中說作者寫農村優於寫工廠。我想，在中國雖然城市和農村是那樣的含糊不分（因為我們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沒有造成這樣尖銳的對立），但是在幾個大都市，真正現代化的無產階級也還是相當廣大的存在的，然而作者筆下的上海工人（一天）却是驚人的。「感傷」中的工人也充分具有農村氣質。就士兵說，「藍牛」，「總退却」都寫得不好。因此我們能說，作者所熟悉的兒童和市民，作者之顯得熟悉於農村，毋寧是因為作者所熟悉的人物都那樣充分地具有濃厚的農村氣質而為作者自然地反映出來了吧？

當然我不是認為一個作者非要廣泛地描寫一切人物並且要描寫得好，我以為作者是應該向着他所熟悉的題材繼續努力去發揮其獨特的風格的。但是，不論我們只是描寫某種人物，一個廣闊的現實生活的經驗和知識是絕對必要的。這理由很簡單，因為一切人物之間都是互相聯繫的，當作家企圖通過作品向讀者訴說什麼，此作家必須先真正了解，而了解之第一義必須明瞭我們社會的整個複雜的結構，至少是縱斷。我們儘可以集中力量描寫某種人物，但是我們不能不去探知我們的人物，在全社會中的地位以及它與其他的人物的相互關係。當此情形之下，我們才能給予我們的人物以正確的調色，我們才不致使我們的人物成爲被關在盒子裡的，從而才可能向詩般的雄偉闊大方向去發展。

在西安一個報紙的副刊上，曾經看到作者的一篇文章，題目大概是「女人與女作家」吧，作者強調作爲一個女作家應該在生括的一切方面去反抗社會的和男權社會的黑暗與壓迫，大意大概是如此。這種徹底的反抗精神，似乎是我們需要的，但是我們從作品中看到的作者這種深淵的不妥協精神，却

局長阿爾托馬以及國際勞動理事會的委員烏台格斯特，梅爾遜斯等，都是「阿爾托馬國際」的最高級幹部。梅爾遜斯的是資產階級壓迫和分化工人階級團結的工具。

這次，機會主義者們以歐文納爾斯爲首，千方百計地要破壞真正爲謀工人階級的團結解放的「世界職工聯盟」，原不足奇怪的。這正如法國總工會秘書所說的：「該國際彷彿只在它可能利用自己來破壞工人階級團結的時候，這才令人知道它的存在」。

研究國際職工運動發展的書籍，還沒有一本觀點正確內容豐富的可供參考者，商務印書館刊行過一本「各國勞工運動史」，也頗簡略。目前還沒有什麼適當的書籍可以介紹。如果你對這方面有很大的興趣，你可以到做研究的環境告訴我們，可以替你提供一一些意見及介紹參考材料的。

關於第二個問題：「中國勞工分局」，就是「國際聯盟」所屬的國際勞工組織的國際勞工局在中國所設立的。其成立的經過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國際勞工局長阿爾托馬來華一輪，一九三〇年三月派陳宗城回國籌備，於七月間正式成立於南京，在上海設立辦事處。一九三四年秋將上海辦事處改爲分局，南京分局改爲辦事處，一九四一年在重慶成立分局。

中國分局直隸於國際勞工局，分局長由總局局長任命之，經費由總局支給。在中國沒有工人羣衆組織。

其任務是根據國際勞工局的指示，約有以下數端：甲、與中國政府、勞資團體學術機關聯絡感情，增進合作。乙、搜集國內勞工材料及有關勞工之社會經濟材料。丁、介紹世界勞工消息。

這完全是一個在改良主義與帝國主義的代表們聯合控制下替資產階級政府服務的團體。不能爲工人謀利益的，也從沒有替工人作過謀福利的事情。中國勞動協會，於民國二十四年在上海成立，經推定陳宗士（社會部司長），陶百川（國民黨中

常常是表現于對於生活的細節以及生活的某一側面的觀察。我不以為這是不對的，但我們顯然是更難，有另一種的廣大的開展，把我們的憎恨與反抗在向歷史的嚴峻的寬闊的路上作更大的努力。

作者顯示得異常的成熟的生活的側面的精細描繪，這種風格自然應該繼續保持。這種風格，我們差不多從作者所有的作品中都看得到，從最初的時候的如「一天」中已經顯示了，「一天」描寫上海工人生活中的一種不應有的宗教現象，這是從工人生活中的一個片段並使用側面的象徵手法表現出來。——附帶說，我們顯然是應該過分強調與諷刺工人階級生活的新主題，我們應該從「宗派」現象中透視出工人階級集體主義的純粹和本質。就是在今天的重要，從「新華副刊」中勞動生活描寫里屢次所反映過的一些光輝的片段來看，不也能够證明這麼麼？例如，當阿金先生的「深夜」在報上發表了之後，立刻就在工人中引起了援助的熱情，那個被沉痛地描寫的實在的人物，因此獲得了從同階級伴侶中來的那麼動人的偉大的同情與援助。因此，從「一天」來看作者初期的創作意識，也表現了在當時文藝水準上慣常有的錯誤的現象。

繼續下去，在「磨坊」中，從一個童工的生活的片段，反映出他們的痛苦，在「枇杷」中顯出了作者的威功，從一個枇杷，從一個孩子的口腹慾望發展開去精細地抓住它，動人地呈現了農村生活深厚的痛苦；在「藥」中，從一個女人害病的側面集中地表現了工人生活中的粗魯與愛情；在「客地」中，從一個死了家長的孩子的半天生活中，描述了戰爭中流亡的人民的悲慘；在「伴侶」中，由一個醫院的孕婦的悲劇情緒，顯示了今天社會中孩子們的受難；在「鬥士」中，從長途汽車上的一個片段，作者含着苦笑地描寫了市儈的狡猾；在「父子節」中，從一個城市的街頭的一個平凡的故事，顯出了一個失業的小公務員的悲哀。……

從生活的萬象中尖銳地抓住了一個戲劇性的片段，然後緊張地集中地在這個片段中展開了被描寫的對象的全部悲慘和不幸，這而就是作者所慣用熟練了的手法。

我們在作品中的人物的對話和敘述中看出作者的另一個特點。如果我們把作者初期作品和其後來的作品對照，我們可看出人物的對話從單純激烈的叫喊發展到含蓄而悲涼的憂鬱，然而憂鬱中又常常流露出不少其明快的傾軋。而越到後來愛戀的成份越多。為什麼要叫喊？作者感到的太多，而看到的還不多，為了充分表現其所感，言語上就誇張了起來，「一天」，「藍中」，「離退却」就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典型的深刻發掘，典型的心理刻劃就不够。這自然不僅是技術問題，深入對象，據說生活不足，於是隨手採角處，有時就把政治論文也搬了出來。從叫喊的發展到含蓄的，這是個大進步。這從「伴侶」，從「呂克賽」，尤其是從「雪夜」中可看得出來。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却仍然不失其直率與傾軋，作者善于寫兒童，而尤善於寫兒童的天真明快的語言中映現人物。但這種明快已不同於初期作品中的單純叫喊了。在「離退却」中，作者對付軍隊中長官壓迫下殺士兵的惡劣行為是給予士兵以一連串的咒罵和絕然地反抗力，作者還寫了在舊式軍隊中士兵們傳統的無組織和怯弱的意識的束縛，忽略了反抗的意識的成長是要經過一個艱苦的長期的曲折的過程，於是士兵的反抗成爲了單純主觀的慷慨的呼喊。但在較後的作品

委），朱學範等爲理事，朱氏爲理事長。已呈准中央黨部及內政部備案，爲一公開合法之團體，二十七年遷漢口，同年七月間隨國民政府各機關遷址陪都。中央社會部特准中國勞僑協會代表中國工人加入「國際職工會」爲會員，二十八年七月朱學範代表出席國際工會聯合會。

這個組織，初僅限於研究性的，會員不一定全是工人，其宗旨是：「本會以根據三民主義，研究勞僑理論，建設勞動文化，協謀勞動福利，復興中華民族」。三十二年經過修正之會章上，在宗旨一條加進「……促進勞工運動」一句，自此以後，在工人中也進行一些宣傳組織工作。刊行有中國勞僑月刊，中國工人週刊。

這個組織對勞工的指導目的是：「勞資合作在理論和行動的引導，引導勞資發展親密的合作……」（中國勞僑月刊發刊詞）。

關於它的活動情形及對中國工人運動的見解，你可以訂閱該會出版的兩種刊物。

關於第三個問題：說得更明顯一點，就是現有工人組織不應參加，以及參加以後怎麼辦的問題。關於前者，我們認爲必須大加地參加到一切公開合法的現有工人組織中去進行工作。這雖你也要問在國民黨區域的工人組織都是不能代表工人利益的，參加進去的意義並不大。

是的，自中華全國總工會恢復以及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上海總工會（老工會）突被解散後，在國民黨區域一切的工人組織，就「必須在本黨（指國民黨）領導之下」（國民黨勞工政策八五頁）才能公開合法存在，這就是說，工人的組織都給官方包圍把持，變成爲不民主的方面的了。但是，我們無論如何要承認一個事實，這些組織多少是有黨策的，也可能在工人羣衆中間散播影響，正如來信

「枇杷」中，作者却描繪了一個透露了悠久的貧困與不滿的氣氛，而後在一個中子單黃酸（Benzene）的毒質的孩子身上，爆發了理所必然，事所恆有的憤恨與反抗。在「犯」中，經過了長期的屈辱，而後在一個童工身上噴發了憤恨與不屈的意志。

我們所表現的不僅是英雄的反抗與不屈的意志，我們所要表現的應該是這種意志怎樣從長久的歷史和現實中必然地曲折生長出來。

越到後來，作者的作品中就越流露出含著更多更痛苦的憂鬱，越後的作品差不多完全如此。但是在這種憂鬱中也同樣顯露出那種不屈的憤恨與鬥志的。這正是相反相成的。抗戰以來，殘酷的現實使人們認識了這長久歷史的痛苦的真相，當沒有解脫以前，客觀上令人怒氣沖天的在一切方面表現出來，社會政治經濟的漫長的黑夜，然後加上了主觀的焦渴與不耐，於是就會在人們，尤其容易在知識份子們身上發生一種被壓迫的痛苦的憂鬱情緒。如果我們不遇這，如果我們眼光堅定的看着前面，那麼這種憂鬱不是一件壞事，它正證明我們已開始深入於生活的裡層了。在這種意義上，「雲裏」中的：

「雪濛濛的街心裡，兩個模糊的人影對望著，許多時沒有動。
一陣遠巷的更聲，像什麼人在那裏拍翅似的，悽然地在嗚叫的北風裡迴響著。」

「呂克寧」中的：

「後院泥地上，滾着一層霜。呂克寧發瘋似地從那霜地上奔，直奔到池塘邊的西湖柳底下，他要摔碎自己似的狂的坐下，望着天壁上的一顆星。三更後，天上起風了，西湖柳發狂似的搖着，呂克寧依舊咬緊牙，望着天壁上那顆晶瑩發亮的夜星。」

雖然使我們感覺到不同於「雲裏」，「犯」，「枇杷」那麼深其激着積極的鬥爭的勇氣，可是如果說從「父子債」那個悲慘的故事中，從那孩子的天真明快的語氣中，豈不也是可以看得出作者在經歷了更多的痛苦，抑鬱着更少的時候中，仍然保持着她對於人生前途的希望麼？

憂鬱有時是難免的，有時是成爲更高階段之發展的踏脚石的，然而它不足爲訓。在一切場合，在一切時間，咬緊牙，忍着痛，跌倒了又爬起，始終撐住我們的筆，堅決地相信我們的筆將一點一滴地爲了人類歷史的進步而奮鬥，這是我們今天所必要有的克己奮鬥的精神。我們希望在一九四二年寫「父子債」的作者，到了一九四五年寫「女人和女作家」的作者，已經確實從若干憂鬱的失望的克己中在更高階段上復回到「枇杷」，「犯」中的堅決的奮鬥了。

至於作者的一切作品和一切人物中，永恆地迴響着悲哀，不幸，憤恨和反抗，這都沒有笑，沒有一切紳士淑女甚至小市民的閑情，這只有眼淚，只有熊熊地燃燒着的復仇的火與光芒。這種可貴的風格，從我上面敘述中，我已經不必再詳陳了。

一九四五、九月。

所說，你們的工會扼殺了一次工人的合理鬥爭而工人遭到他們抱濟幻想，就是很好的例子。從這點上來看，參加工會工作已是具有重大的意義。列寧說過這樣的話：「不在反動的工會內工作，就是犯十分覺悟的，或落後的工人羣衆，委棄於反動領袖的勢力之下，委棄於資產階級走狗，工人貴族或資產階級化了的高等工人底勢力之下」。

參加進去怎麼辦的問題，就是如何根據具體情況靈活地運用統一戰線的作法來保障工人利益的問題。這一方面是從實際的工作中得到進入工人羣衆中去的道路，進行宣傳教育，組織以及展開爲當時當地內外環境所許可的必要的鬥爭，以逐步地提高工人的覺悟程度，達到保障工人利益，使工人羣衆脫離反動的以及一切有害的影響；另一方面，在工人爲自身利益而鬥爭的每一個具體事件上，去調查研究這些工人組織所採取的態度和作法，深入地去找出它爲什麼要這樣的原因來，與我們的態度和作法有何不同之點，又有那些是相同的？或者根本是就沒有共同之點，從實事求是的調查研究中，來正確地決定我們在那些方面可以合作，那些方面應該加以排斥、揭露，或者作必要的容忍來增加對於教育和組織工人的有利條件。

只有這樣作，才能解決所謂態度問題，因爲對於現有工人組織的態度之最後抉擇，主要的還是依據於這個組織在每一個有關工人的切身問題上，對於工人利益保障的表現而定，不能離開了具體的事件來空洞地談態度問題的。

關於這個問題，我就談到這些，希望你把實際工作中遇到的實際問題提出來討論，我們是樂於盡量地提供意見，作爲你的參考。

編者 十一月十一日



美國人民的利益與安全烏乎在！

黎 望

當中國人民想起美利堅合眾國的時候，總是想起這出生過華盛頓、傑佛遜、林肯、威爾遜、羅斯福這些偉大心靈的國度。總會聯想起獨立戰爭，解放黑奴；想起揭發過的「民治、民有、民享」；「民主的政府永不能毀滅」的傑佛遜、林肯的思想；想起獨立宣言所保證的一切人的「生命、自由、與追求幸福」的「不可割讓的權利」；想起威爾遜的「民族自決」，不以武力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想起羅斯福總統標榜的四大自由；我們也清楚的記得，這德爾就申述了每一個民族的人民有自由決定他的政府形式的權利。當我們想起這些逝去的巨人，這一個曾經誕生過這許多先哲的國家，這許多懷會喚起過無數的人對自由生活的嚮往，鼓勵過許多為自由而鬥爭的戰士的信心。而且在中國人民經歷的艱苦戰鬥中間，美國人民從道義的聲援，物資的援助一直到併肩作戰，中美人民傳統的友誼在共同戰鬥中是用血汗來鞏固了。

然而，今天中國人民對美國的友誼却遭逢着嚴重的考驗，中國人民不能不對曾經併肩作戰過的盟友的行動感到困惑，對於美國友人不公平的措施感到滿懷憂懼了。

備自由世界的一切人類，美國人民也一定和中國人民一樣的渴望和平與民主的生活，但是今天却有一部分美國人違背了林肯、威爾遜、羅斯福這些先哲們的思想，在用「不公平的干涉」的「種種

政策」去扼殺那些曾經併肩作戰的中國人民，那些為着追求自由與民主生活的中國人民。在反法西斯戰鬥中間，中國人民沒有流完的血，又將在這種「不公平的干涉」政策下繼續的流滴，中國人民經歷了八年餘的戰鬥還是創痛猶新，今天却不能不繼續遭受苦難；而這些執行砲擊政策的人，無畏地是違背了美國人民的意願，是違背了威爾遜的「民族自決」的精神，是違背了羅斯福總統援助「一切自由民主的人民，不以武力干涉他國內政的遺訓」。

中國人民經歷的八年艱苦的戰鬥和今天所追求的正是獨立宣言所保證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割讓的權利」。中國人民用血汗爭取到勝利的戰果，但却有人夢想着獨佔和竊取勝利的果實。要便耕耘的人得不到收穫，要以一個專橫的主宰來代替法西斯的暴政與奴役，希望在掙脫了鎖鍊的人民的脖子上又加上一根新的鎖鍊。但，有一個驚人的事實，經過了八年戰鬥的錘鍊，中國人民已經空前的覺醒了。「從被奴役的狀況下解放出來的人民，是不會回到被奴役的秩序了」（日·華萊士）。我們「作戰以保持自由」，而今，曾經和我們併肩爭取自由生活的盟友，却轉而要扼殺我們爭自由的願望了。

這些深懷帝國主義思想者的面目，並不是自今日起才開始揭發的，印度尼西亞的人民不就在相當法案的軍火襲擊下，成千成萬的倒在血泊裡嗎？不

管像弄弄如何巧飾盡塗抹掉租借物資的標記，而這些由美國人民的血汗所製成的保衛自由的武器的標記，是會永遠烙印在那些倒在血泊裡的爭自由的人民的心上。而今天在華北，美國人民製造的武器，又用來屠殺中國人民了，從不合理的運兵受降，對反民主力量物資的接濟，軍事的指揮，公開的讓路，甚至於轟炸那些手無寸鐵的和平人民，所有這些都是嚴重的損傷了中美人民的友誼，嚴重的損創了美國在自由人類中間的威望的。

所有這些損傷中美人民友誼的行為，正如美國社會服務員工會所指出：「因為美國對華政策的趨向是在支持中國政治上某種少數力量，而這種少數力量是在維持中國的封建的落伍勢力，以阻礙中國民主的發展，同時美國這種對華政策已使美國許多官吏及記者給美國社會對中國一種不正確的認識。」正因為美國這種維持少數落後力量的行為，就使得這些少數反動力量能夠放手進行反人民，反民主的勾當。雖然僞善者口口聲聲說：「不干涉中國內政」，「不直接干涉中國內政」，而「砲擊政策」的直接結果，是中國人民的受難和死亡，反人民，反民主的力量愈益擴張，這種「不公平的干涉」，顯然是違反中國人民，違反一切自由人類的意願的。

像任何違背人民意志的事情，總不能不尋找一個騙人的藉口樣，這些「砲擊政策」的執行者尋找

掩飾到的是「協助」受降。在廣大的北平原野，中國人民的軍隊不正在和敵偽戰鬥，包圍着敵偽嗎？有何必要要遣送我們的友邦來「協助」呢？燕北人民還在抗戰初期，軟骨病者背向敵人倉皇潰敗，卑怯的遺棄了人民，但燕北的人民却始終沒有向敵人屈膝和妥協，堅挺的戰鬥着；爲甚麼這些八年堅苦抗擊敵偽的軍民沒有權受降呢？說那是「協助」受降，但平津的日軍不仍然在橫行無忌，甚至在改組敵人爲「反共志願軍」，改組偽軍爲「北上先遣隊」嗎？在這些所謂「協助」受降裏，敵寇的驕橫不是連美國士兵也覺得「頂不好」嗎？而在解放區，却是澈底解除了敵人的武裝，由人民的意志來懲處漢奸，這是任何不懷偏見者所共同承認的。北美新聞聯盟的記者斯蒂芬·安德列斯在對比了北平和張家口後，就坦白的指出：「北平一切漢奸和日本戰爭罪犯逍遙法外，繼續橫行，沒有受到管理上制裁，可是張家口却大不相同，我看見許多戰犯正被政府搜捕，廣大人民可以起來控訴他們的罪狀，這是真理與正義的表徵，這是該市市民擁護民主政府的原故」。從這裡，我們不難看清楚，還是中國人民無力受降而必須借助友邦呢？還是這種扶助少數及力量的政策，助長了這種不合理的受降呢？

如辭似乎並沒有因此而窮，據解釋這種不合理的干涉政策是「美軍將保護美國的生命財產，如果美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到損傷，將予以有力而制勝的抵抗」，不管法利賽人是如何偽裝，是無法掩蓋其貪婪與偽善的，美軍今天憑着砲艦登陸的華北，美國人究竟有些甚麼「生命財產」需要砲艦去保護呢？我們無妨聽一位美國議員孟斯菲爾德的話：「真的，在那裡（指華北）並沒有美國的商業利益，也沒有美國僑民住在那裡需要我們去保護；如果這個政策（指這種不合理的干涉政策）繼續執行的話，

那麼，我國在那個區域的士兵的生命就會被捲入到危險中去」。華北原來就沒有甚麼美國的「生命財產」需要保護，但却偏要驅使美國士兵捲入這種危險的漩渦，既然開去了美國的軍隊，因此也就有要保護的「生命財產」。循着這種奇怪的邏輯，美軍可以開到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去，因爲開去了，「生命財產」的安全要「保護」，就可以繼續派去軍隊與砲艦，「生命財產」愈大，保護的力量也就更需得大；如果誰表示拒絕，就可指爲這是受到「攻擊」，就可以放手去進行鎮壓自由人民的戰爭。這種不合理，不公道的干涉，不僅是破壞了中國人民對美國的友誼，扼抑了中國人民爭取「生命、自由與追求幸福」的不可割讓的權利，降低了美國在民主世界的威望；而且這也是直接指傷到美國人民的利益。遠見的美國人士早已洞見到：「中國的內戰可能威脅美蘇的友誼」，中國「長期的內戰，無疑地要阻礙中國成爲美國物資市場的恢復力」（上引文見「新共和」A·鮑思文），紐約時報也會指出：「幫助任何一方去進行內戰，這不是我們的事情。正當的事情是我們必須利用我們的影響來求得協議與和平」。

我們記起「下午報」的發行人藍納的一句話，世界不意分成了兩個，「一個是爲恐懼所苦惱，用殘暴去緊握住它的權力的資本主義。但我們却想正當這仗着權力而企圖左右別人，企圖用不合理的干涉來阻抑自由人民的願望者，中國人民已經空前的覺醒，任何斯考比的企圖，都將要受到最終的幻滅」。

對於一切繼承了林肯、傑佛遜、羅斯福民主傳統的美國人民，我想復述一句湯姆·潘恩（Thomas Paine）「常識」裡的話：

「現在是大陸的團結，信仰榮譽的播種期的。現在一點點的破壞，將像用針尖在一棵幼年的樹樹皮上刻一個名字一樣，那傷痕會跟着樹的生長而擴大，我們後代子孫所讀到的，將是長大的字跡……」

對於一切懷着民主思想的人，這自然只是膚淺的常識。

羣衆

第十卷 第二十二期

三十四年十一月廿五日出版

編輯者 羣衆雜誌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總經售 新華日報館

本刊價目

本期零售 一百二十元

六期 三百六十元

十二期 六百五十元

廿四期 一千二百二十元

外埠郵費平寄每期四元掛號三十四元
航空十六元掛號四十六元 國外照加

群

衆

第十卷 第三十三期

目 要

和平之路就是民主之路

社 論

竊國大盜袁世凱

陳伯達

中國經濟底道路（上）

許滌新

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和平之路就是民主之路 (社論)

竊國大盜袁世凱

- 一 出賣「百日維新」
- 二 竊取革命果實
- 三 討袁之役的失敗
- 四 御用國會的興亡
- 五 從總統到皇帝
- 六 從寶座上跌下來
- 七 「袁世凱」的復活

中國建國的道路 (上)

土地改革與民主

文 雜
 血，換取了什麼？
 墨寫的謊話，墨寫的輓歌
 三種場面

解放區報告

晉察冀行進

讀者之頁

我們反對內戰

從「人民的呼聲」說起

(八三四)

陳伯達 (八三六)

(八三六)

(八三七)

(八四〇)

(八四五)

(八四八)

(八五五)

(八五八)

許滌新 (八六一)

瓦爾加作
 焦敏之譯 (八六六)

蘆 蕪 (八六四)

黎 望 (八五二)

斯璜翦 (八四四)

周而復 (八六九)

洗 萌 (八七三)

吳曙天 (八七三)



社論



和平之路就是民主之路

世界和中國經過長期戰爭的慘重破壞後，都極需要和平安定，以求恢復元氣。和平是全世界和全中國人民所願望的。但是有沒有人不希望和平，而希望在這戰爭結束之時再起戰爭呢？這樣的人並不是沒有。人民希望和平，反人民、反民主的人希望新的戰爭。

德國日本法西斯，雖然戰敗，但在某些方面的「寬大」待遇下，法西斯勢力尚未連根剷除，這種戰敗了的法西斯殘餘勢力自然是「唯恐天下不亂」，但願馬上有一次新的世界大戰，好使他們重新得到抬頭復興的機會。德日法西斯戰時在大多數別的國家裡，也有他們的朋友和氣味相投的人，那就是在這些國家裡的反人民，反民主的份子。每一個國家裡的反人民，反民主份子，發現在戰爭結束後，全世界一切地方的人力量都已經或正在高漲着，這使他們感到恐懼。爲了撲滅人民的力量，他們甚至不惜求助於新的戰爭。所以這些反人民份子和德日法西斯勢力暗中應和企圖挑動第三次世界大戰。

在中國也有反人民，反民主的勢力。他們企圖抹煞人民在抗戰中的功業，消滅人民在抗戰中已經取得的民主權利，鞏固反人民、反民主的政策統治，爲了這個目的，他們不惜採取武力手段。事實上他們已經調動大軍向解放區人民進行着內戰；同時已運用武裝的憲警特務向和平的學生進行了內戰（昆明十二、一屠殺學生的慘案）。爲了達到這目的，他們甚至不惜參加國際間挑撥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謀家的行列。他們不惜把中國的領土作爲新的世界大戰的戰場，只求能實現他們的反人民、反民主的企圖。

中國反動派所已經挑起來的內戰，既違背中國人民的意願，又違背世界人民的意願，他們自己也感到前途的困難，所以才那樣熱心地去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機。又因爲中國國內的反動勢力本身實在還不够強大，足以來與人

民爲敵，所以現在雖然還沒有世界大戰，但他們已竭力用種種名義以求得外國力量的幫助，他們不僅在國內利用最爲愛國人民所痛恨的漢奸偽軍，而且利用侵略中國，佔領中國國土的日軍，他們又不僅利用敵偽軍，而且還把用協助受降開導中國來的美國軍隊也拉來做內戰的幫手。他們昨天還承認日本軍隊是敵人，爲什麼今天居然和他們攜手合作呢？美國對華政策，照故羅斯福總統所規定，本來是不干涉中國內政，幫助中國團結，爲什麼今天美國的一部份反動份子如駐華大使赫爾利和生活雜誌的發行人魯斯居然積極主張用軍隊來幫助中國的反動派進行內戰呢？原因是不難看出的，原來他們——日本殘餘的法西斯勢力，美國和中國的反動份子，在反人民反民主的一點上，發現了他們原來是可以做朋友，可以親密地站在一起的。

這一次世界規模的空前大戰本來就是民主對於法西斯的鬥爭。德日意法西斯本來是全世界反民主的最中心的力量，經次這戰爭後瓦解了。別的國家中的反民主力量在這次戰爭中或者甘心做德日法西斯的附庸，或者和德日法西斯暗中往來，或者消極地爲人民力量所迫促而參加了反法西斯戰爭，各國反民主力量，經過這次戰爭，一般說來，也都削弱了，或者相對於人民力量的增漲而削弱了。整個反法西斯戰爭是人民力量所取得的勝利，每一國家的人民都在這一次戰爭中壯大了他們的力量，並且爭取得了較爲廣泛的民主權利。人民力量保證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也就保證了戰後和平的實現。在全世界範圍內已經被削弱的反民主的勢力，是決不能夠遏遏全世界人民的力量而發動一次新的世界大戰的。但是也正因反人民的力量究竟還沒有絕滅，挑撥世界戰爭的陰謀仍在進行着，所以要鞏固和平，還是要人民用像戰時同樣的努力來爭取。戰爭的勝利是向反民主、反人民勢力進行鬥爭而取得的；和平的鞏固也是要向反民主、反人民勢力進行鬥爭才能實現。

必須保持人民在戰爭中所已經取得的民主權利，並繼續加以擴大，必須使反動派人民的勢力不能取得支配的優勢，並繼續加以削弱，那麼戰後和平才能持久鞏固。

所以，在全世界範圍內，爲和平而努力就是爲民主而努力。

中國國內的內戰雖然已經爆發，但我們相信，還是能够用人民的力量來加以消滅的。新的世界大戰或不像反動派所設想就會爆發，他們想投機取巧混水摸魚終於只是一個幻想而已。現在內戰的挑撥者已經從事實上表現出了他們是在反民主的旗幟下進行內戰的。他們不僅進攻解放區，企圖消滅解放區，消滅中國人民在抗戰中所已經建立的民主；而且他們還在他們所直接統治的區域內用一切方法來壓制和壓抑人民的民主權利。廢除檢查制度是人民所力爭取得來的一項民主設施，但當局却用一切其他的巧妙方法來統治輿論，限制言論自由；其他人身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都只是空話，甚至連反對內戰的自由，人民也是沒有的。昆明大學生集會討論反對內戰，受武力的干涉，甚至遭受屠殺，形成了流血的慘劇，就是最明白的例證。對於所謂收復區，當局所實行的更完全是一黨專政的統治，這就造成了收復區內人民生活極度困苦和社會秩序的極度混亂。很明顯的，假如中國人民在抗戰中所已經爭取到的民主沒有足夠的力量來保衛自己，假如中國人民不繼續爭取和擴大民主權利，不努力使中國成爲一個民主的中國，而讓反民主、反人民勢力繼續爲所欲爲，那麼內戰就不可能中止，也就不可能建立鞏固持久的國內和平。

所以，就中國國內來說，人民要爲和平而努力，也就是要爲民主而努力。要消滅內戰，鞏固和平，不從實行民主上來着手，總歸得不到澈底的辦法。

如何實行民主？當政的國民黨也會屢次宣佈要取消訓政，結束黨治，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開放黨權，還政於民，而且在最近的國共會議紀要中，國民黨派出的正式代表魏翰簽名，同意實行政治民主化，並且具體規定：政府要保障人民的身體、信仰、言論、出版、結會、集社的自由，要即行承認各黨派的平等地位，要嚴禁特務機關妨礙人民自由，要釋放政治犯，要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之督憲。國民黨的民主諾言因爲每次都由他們自己的手破壞，從未認真實行過，所以已不引起人民重視，但是要知道，他們之所以言行不符，做出這種漂亮的諾言，還是人民力量迫促的結果，因此人民

就應該繼續迫促國民黨實行他的民主諾言，尤其是最近國共會議紀要中具體協議的各點。

但是現在國民黨當局一面在前方進攻解放區人民，在後方壓迫人民，屠殺學生，一面捧着一個御製的國民大會來做實行民主的幌子，在這時候，國共會議紀要事實上已幾乎被踐踏成了廢紙。那麼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辦，才能保證繼續實行民主，鞏固和平呢？

認真實行民主，有兩條道路，一條路是從下而上，就是實行地方性的民主自治；另一條路是從上而下，就是成立全國性的聯合政府。地方自治是孫中山先生的主張，又明定於國共會議紀要中，自然應該實行，讓全國各地方人民自行選舉其地方政府，這是實行民主的一條路。聯合政府是中國共產黨、中國民主同盟、其他各黨派，國民黨中的民主派所一致主張，且在社會上得到普遍的贊同，也與國民黨當局所提開放政權之說相符，沒有反對的理由，主張結束一黨專政的局面，代之以舉國一致的臨時性的民主的聯合政府，由它來準備全民普選的國民大會，而由真正民主的國民大會來制定民主憲法，成立正式的民主聯合政府。這是切實實行民主的又一條道路。

這兩條道路並不相背，而是相互補充，可以而且應該同時進行。有人擔心，只行地方自治，或不免使人得到中國分裂的印象，這雖然多餘的擔心，因爲中山先生提出地方自治主張，就是爲了使全國各地方實行民主自治，而後在民主基礎上結成一國家，民主不會使中國分裂，這是我們可以深信不疑的。但爲了使民主統一的過程加速完成，那麼一面實行民主的地方自治，一面就可成立臨時性的民主聯合政府。假如只實行聯合政府而不實行地方自治，也可能使人感到全國性的聯合政府或不免於落空，而且又與中山先生的建國主張不盡相同，照中山先生主張，是要以地方自治來做民主基礎的。所以一面成立聯合政府，一面應積極推行地方自治，成立地方民選的政府，民選的地方政府也就是包括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地方性的聯合政府，這正是全國性的聯合政府的基礎。

走這兩條道路，就能大大發揚人民的民主權利，就能使反人民、反民主勢力無所依歸，就能澈底消弭內戰，而使中國走上和平建國的大道。

竊國大盜袁世凱

陳伯達

- 一 出賣「百日維新」
- 二 竊取革命果實
- 三 討袁之役的失敗
- 四 御用國會的興亡
- 五 從總統到皇帝
- 六 從寶座上跌下來
- 七 「袁世凱」的復活

一 出賣「百日維新」

雙重出賣發跡——「北洋正統」起家

毛澤東同志的「論聯合政府」說到近代中國的人物有兩個，一個是革命的民主派——孫中山先生，一個是竊國大盜的專制派——袁世凱。

袁世凱——他已死得將近三十年。但是，作為一個政治的人，這個人直到現在仍然是我們所時常接觸到的。他是死了，但是，他的思想的、政治的靈魂，却被他的後輩復活了。作為一種政治的象徵來說，袁世凱在現實的政治中，仍然高懸在中國人民的頭上，而由於發展的結果，現實的袁世凱，在手段的殘酷與陰毒上，甚至遠遠地超過了已死的袁世凱。

袁世凱——這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種政治結晶，一個集中的黑暗影。他並不是一個普通舊式的政治人物。袁世凱——這個政治人物是出現在近代中國維新與守舊、革命與反革命在相鬥爭的時代，在這種不平

常的時代，反動派為要更有效地集中力量來絞殺中國的前進，就鍛鍊出了一個這種不平常的人物。

袁世凱起初是由屠殺太平天國的劊子手——李鴻章和滿清朝廷的實力派接辦人，說是：「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一切反動派把他看成是中國的支柱，想經過他來抵擋中國人民對於舊中國的衝擊。為什麼袁世凱這樣特別被一切反動派所垂青呢？因為他在反對中國進步的事業和中國人民的專業上有特別的機智，特別的手腕，而在他的手裡還有一支反對中國人民的特別武裝力量。

袁世凱曾經做過維新派，參加過當時康有為等人所組織的君主立憲的維新團體——強學會。康有為等人當時代表一部份「開明」地主和一部分與大工業有若干關係，而在政治上帶有若干自由主義色彩的大資產階級，其所進行的總總皇帝和少數貴族的自上而下的維新運動，是脫離民眾，而且根本反對民眾參加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不但為戊戌政變自身所證明，而且為全部中國近代史所證明；關於這些，我不願在篇幅多說，我這裡要說的能

關於袁世凱在這個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戊戌維新運動之前，袁世凱雖則經過李鴻章與榮祿的賞識，得在小站練兵，但是，他在滿清朝廷的地位並不高。到了戊戌運動的時候，袁世凱因為參加過強學會的機關，經過維新派譚嗣同的保舉，就從光緒皇帝那裡（八月初一日被召見）取得了特賞侍郎專辦練兵事務的職務，就是說，袁世凱以維新派的關係，提升了自己滿清朝廷中的地位，但是，重要的，還不是因此取得侍郎的地位；就袁世凱本人來說，這地位固然是升了一步，但在朝廷中來說，這地位並不是很高的。對於袁世凱，對於當時整個反維新派，重要的，就是袁世凱以維新派的關係，參加了當時關於維新派命運的計劃，這計劃：要當那集中滿清朝廷黑暗統治的最後權威者——西太后準備於九月天津開兵利用榮祿軍隊廢立光緒帝時的時候，袁世凱的軍隊起而保護光緒帝，並誅殺榮祿。袁世凱在維新派這個計劃裡面，答應充當維新派的主角，但在實際上，他在維新派這個計劃裡面，在他談好這個計劃之後，却馬上充當了反維新派的主角。他把全部計劃獻給反維新派，因而使反維新派得以把維新派納在血海裡面。當八月初三日譚嗣同和袁世凱進行這種與虎謀皮的計劃的時候，譚嗣同曾告訴袁世凱：如果袁世凱不願意幹的話，就請袁世凱到廂和園向西太后告密，把他舉發殺掉，可以得富貴。袁世凱正色厲聲說道：「你把我袁某當成怎樣的人呀？」但是，一日之間，正是袁世凱，不是別人，就向西太后和榮祿獻功，告發譚嗣同及其同伴的密謀，結果，百日維新運動（從四月到八月初）就像曇花一現。站在光緒皇帝背後虎視眈眈的西太后於八月初六日重新臨朝執政，把譚嗣同等人殺掉了，又把袁世凱當時所稱為「購代之聖主」的光緒皇帝關閉起來了。譚嗣同的話果然不錯，袁世凱從此大富大貴了。他是維新派，轉過頭來，出賣維新派，這就是袁世凱第一次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所顯的身手。這種兩面派的「機會」，兩面派的「手腕」，就是袁世凱特別的機智和特別手腕之重要組成，或者更正當地說，是其主要的組成。這種兩面派的作為，使袁世凱在當時最黑暗的勢力中得到最大的愛寵。

戊戌政變之後，袁世凱的第二個拿手好戲，便是鎮壓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自發運動——義和團運動，而又對外按兵不動，觀望八國聯軍的侵略北京。這樣，袁世凱在受中國內部反動派賞賞之後，又再加上受外國人的賞賞了。隨後他就得獲李鴻章，擔任了當時舉足輕重的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的職任。

袁世凱的所以得在政治上進行大投機，大買賣，並經過這種投機的買賣，左宜右有，與妖作孽，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不消說，是因為他有一種資本，這就是他在小站訓練兵時所弄起來的所謂「新建陸軍」。這就是袁世凱可居的奇貨。在戊戌政變的時候，維新派的譚嗣同等所以特別要去結納他，就是因為他們是浮在天上，他們想依靠袁世凱帶頭的軍隊去結納他，不是依靠羣衆，而是依靠富庶的陰謀，不是公開向人民羣衆求救，而是秘密向軍閥求救，這是戊戌維新運動失敗的悲劇。袁世凱的得志正是利用了戊戌維新派這個弱點，把維新派引上釣鉤，而後來煮吃他們。在義和團運動的時候，外國人所以特別賞賞袁世凱，也就是因為他有一支帶有新式武器的軍隊，可以幫助外國人來血洗當時那種僅有原始武器或手無寸鐵的羣衆。

小站練兵——這就是袁世凱給自己的政治買賣事業建立了力量的基礎。他從這裡開始組織了作為竊國之用的北洋軍隊，培養了和團結了一大批竊國的爪牙（武的如馮國璋，段祺瑞，王占元，曹錕，段芝貴等；文的如徐世昌等），並造成了一種竊國的觀念——即所謂「北洋正統」。

以「新建陸軍」的力量為強，以兩面派的手段為用，袁世凱就這樣一步一步地得到中國的和外國的反動派的扶持，變成了近代中國的第一個竊國大盜。

二 竊取革命果實

辛亥革命的妥協性——「保存中國」

還是「獨攬大權」——「大奸大騙」

還是「大忠大信」

辛亥革命，這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這革命是人民歷來反對滿清朝廷所鬱積而大爆發的結果，革命的發展是很迅速的。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和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革命的活動地盤主要是以農民大眾舊形式的民衆組織（會黨）和新軍，而這種會黨和新軍主要的是以農民大眾構成的。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的孫中山民主主義（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是這個革命的政治綱領，起了很積極的作用。可是革命有它的弱點。工人們英勇地參加鬥爭，但那時中國無產階級還弱小，還沒有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起義民衆的自覺性和組織性顯然是很不夠的。而且起

黨內部又是各種矛盾的結合。各階級是在反滿的目標上結合起來，除此之外，自標是絕不一致的。反滿的革命同盟會本身就是這樣矛盾的組織，辛亥革命本身更是這樣矛盾的革命。領導革命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太過軟弱，和民衆的結合太不緊，並且不但不敢使人民勝利，乃至隨時可能把革命交給反革命，而小資產階級在反革命面前也不能形成堅決的獨立力量。原來一部份和工業有關的大資產階級和一部份「開明」的地主的君主立憲派因為體面立憲沒有結果，對清廷絕望，挺而走險，競相附和革命，在革命內部努力取得權力。各省區代表大地主大買辦的原來統治勢力——許多舊軍閥舊官僚知道清廷的命運不能久長（那時很多大官僚已預知滿清朝廷「皇祚之不永」），則紛紛掛起「革命」的旗幟，藉以企求避免真正的革命。清廷協統黎元洪從樓梯下階處被起義的人拉出來，說爲革命軍的第一個都督，象徵了這個革命的軟弱性和妥協性，這種革命的軟弱性和妥協性，便被當時大地主大買辦反動派最有力的首領——袁世凱看穿了。袁世凱憑藉北洋軍隊的關係，乘滿清朝廷搖搖欲倒的機會，以保持滿清朝廷皇帝的姿態，很順利地把滿清朝廷玩弄於自己的手掌中，取得了滿清朝廷統治下的全部權力，同時又利用了北洋軍隊的力量給那武漢幼弱的革命軍一個嚴重的打擊，遂又停止軍隊行動，這樣一打一拉，一張一弛，以作爲軟化革命的張本。袁世凱的箭，一方面要射倒滿清朝廷，一方面要射倒革命。他對滿清朝廷這末說：你如果不給我全部權力，那末，我就不能夠保護你。他又對革命方面這末說：你如果不給我全部權力，那末，我就能夠殺你。他命令北洋的軍隊打擊革命軍，但是同時告訴北方的滿清朝廷和南方的起義當局：他手裡是有力量，兩方面都應該向他妥協，由他來「建設一堅固之政府」，由他來「統一中國」。當他的部下在漢陽打擊革命之後，他就任滿清朝廷內閣大臣的時候，就這末宣布其政見：

「……尤有重大之問題，即在保存中國，此不能不仰仗於各黨愛國者犧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國之分裂，及以後種種之惡果。蓋中國之計，須立刻設立堅固政府。……余願進步黨人……與余通力合作……」

「余之志願既如是宏大，必有誤解余意者，或且疑四方之我輩，……願余不固稍受波折遂更變余最高應盡之職，蓋余之作爲，爲保護中國免於分裂計也。」

名義是很好聽的，什麼「保存中國」呀，「免中國之分裂」呀！但是

怎樣能達到呢？就是要愛國者犧牲其愛國的政策。據他說，扶助了他，那末，中國也就可以「保存」了，中國也就可以「免於分裂」了，因爲他的「目的」——當然這只有天知道——就是「保存中國」，就是「保護中國免於分裂」。袁世凱在這裡也宣布了他分化的政策：即利用起義內部革命派與立憲派的矛盾，爭取立憲派——袁世凱所謂進步黨人——去和他通力合作，以孤立並軟化革命派。

「或即中國」——這就是袁世凱最高的觀念。袁世凱表示不管四方對他如何攻擊，事業有何波折，他決不改變這個觀念，他決在行動上貫徹這個觀念。這是他所謂「最高應盡之職」。

袁世凱這種觀念，是反映了當時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觀念。滿清朝廷，這個統治機構，統治形式，是太腐朽了。這朝廷是代表大地主大買辦的集中統治，但是，在人民的衝擊下，這朝廷是再統治不下去了。大地主大買辦需要變更自己的統治形式來維持自己的統治，帝國主義者需要經過新的統治工具來奴役中國的人民。他們要一手打倒革命，又要一手推翻滿清朝廷，重新建立大地主大買辦的新的集中統治，於是他們就在當時的反革命人物中，根據袁世凱手裡的軍隊及其反革命的威望和手腕，找出了袁世凱，付給了他這末一番「最高應盡之職」。當時中國「上流社會」中所流傳的口頭禪是所謂「非袁莫屬」，在華外國人中所流傳的口頭禪是所謂「非袁不能收拾」，秘密就是這個。袁世凱就是這末得到他們的付託，宣布了自己就是中國的代表——他即是中國，中國即是他。

當時上海英文大陸報的北京電報正確地報導了袁世凱的計劃：「袁氏之意，實欲使北京政府（按：指當時滿清政府）、民國政府（指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並行解散，俾得使一人而獨攬大權。」

顯然的，袁世凱的活動，已引起了當時起義內部的紛亂。袁世凱武力的威脅，這是一。袁世凱狡猾的兩面派活動，這是二。在袁世凱武力威脅和兩面派活動下，起義內部的矛盾展開了。只要倒滿的目標達到，他們的上層人物差不多都可以和袁世凱成立妥協，把革命宣告結束。那稱掛「革命」旗幟的舊官僚舊軍閥，不用說願意奉袁世凱做自己的新主子。臨時附和起義的君主立憲派，希望經過袁世凱穩定自己的地位。資產階級的反滿革命人物很多也但願保留「共和」的形式，不願意再革命下去，他們只要袁世凱採取「共和」的形式，就同意他做起大總統。滿清朝廷不能再統治下去，起義內部不能再革命下去，袁世凱坐江山山就此決定。

北洋軍隊是袁世凱使革命和滿清朝廷都向他屈服的其本力量。當革命向總會的領袖孫中山在南京做臨時總統，組織起資產階級式的臨時民主政府（反滿革命派和君主立憲派的臨時聯合政府）的時候，袁世凱就使用了他的將校段祺瑞等人發出「誓死反對共和」的電報；不到一個月的光景，南方在談判中向他屈服，孫中山內定讓位，袁世凱又使用了段祺瑞等人發出「立探共和政體」的電報。革命把滿清朝廷的整個統治打得四分五裂，袁世凱手裡的武力無處如何已不能把滿清朝廷的統治重新恢復起來，但是，革命內部的上層人物，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領導者，却極害怕袁世凱手裡武力的威脅。他們既然不能充分信任羣衆的力量，就不能夠團結起來，並不能深入動員羣衆，去抵抗袁世凱手裡武力的威脅。至於滿清朝廷那時已經只剩下空架子了，若于王孫公子雖然不願袁世凱的篡奪，但是，畢竟毫無力量可以抵抗袁世凱手裡的武力。這樣，孫中山內定退位，薄儀也跟著決定退位。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薄儀宣告退位，命令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第二天（十三日）孫中山也便公開提出辭職，「推讓」袁世凱繼任總統。「民國政府」和滿清朝廷在同一時候都把權力交給了袁世凱。革命與愛新覺羅氏皇朝在同一時候宣告自己的結束。這叫做「全國統一」。

辛亥革命並沒有觸動過封建專制統治的年代久遠的、壓在人民頭上的軍閥官僚政治機構，這種機構幾乎原封不動，僅換些名稱而已，這樣就便利於把權力從革命交給反革命。辛亥革命更沒有觸動過近代中國反革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基礎——即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土地制度。雖然孫中山有平均地權、土地國有的口號，但資產階級並不希望，也沒有力量把它變成實際。這樣就更便利於反革命的統治在這個原來的經濟基礎上重建起來。

人民經過革命推翻了滿清朝廷，但革命的果實却沒有落在人民的手裡，而被大地主大買辦反動派代表人物袁世凱所篡竊而去。事理按照大地主大買辦和帝國主義的願望進行，軍閥官僚又都輝煌相慶了。

民國政府一些人物，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本來想叫袁世凱離開北洋軍閥官僚的老巢穴，到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以便約束袁世凱對民國的地位。但是既然是「民國政府」經過資產階級政治代表之手納權給袁世凱（就是說，「民國政府」向袁世凱投降），而不是袁世凱納權給「民國政府」（就是說不是袁世凱向「民國政府」投降）那末袁世凱就職的問題，就只得按照袁世凱的意志，而不可能按照「民國政府」的意志。按照袁世凱所說，他本來是先受滿清朝廷委任「全權組織共和政府」的，如果你以為這

樣說不安，但還有「北方各軍軍隊暨全體代表皆以函電擁舉為臨時大總統」，縱使你南京參議院不推舉我，我還不是仍然可以在北京做我的大總統？按照袁世凱所說，他所以接受南京的推舉，不過是因爲照顧南北的統一。並且「北方軍民意見」是不受他離間的，北京外交團，是「向以凱離此爲慶慶經言及」的，「若因凱一去，一旦變端立見，殊非愛國救世之志」。你孫中山和南京參議院一定與他離間這末一個地方，豈不就是「危害民國，破壞統一」？但是「民國政府」還是遣使迎袁南下，於是袁世凱的親信軍隊（就是後來以「賄選總統」著名的曹錕直接部隊）又即現神威了。北京、天津、保定出現了受命的「兵變」，迎袁專使的寓所擄劫，所謂專使也者，僅以身免。這當然就證明了袁世凱需要坐鎮北京而不能南下的理由。三月十日袁世凱在北京就職。迎袁的專使蔡元培曾經這樣大談其「民國的法理」：

「袁公當滬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爲法理上不可破之條件，蓋以立法行政之機關與被選大總統之個人職，機關爲主體，個人爲客體。故以個人就職則可，而以機關職個人則大不可。且當專制共和過渡時代，當事者苟違法理，有以個人凌駕機關之行動，則爲專制時代朕即國家之嫌疑，而足以激起熱心共和者之反對。故袁公之就職於南京，準之理論，按之時局，實爲神聖不可侵犯之條件……」

結果是什麼呢？結果是「機關就個人」了。「個人凌駕機關了」。神聖也可以侵犯了。袁氏在北京就職，居然也還是被專使們認爲「尊重法理」，也沒有「激起熱心共和者之反對」。袁世凱早已看穿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治代表的空談無用。袁世凱左右了法理，而並不是法理左右了袁世凱。袁氏「朕即國家」已不是一「嫌疑」的問題，而是袁世凱就任大總統的時候便已開始了。

當南北談判還沒有結果，「民國政府」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還沒有決定交出權力的時候，袁世凱給梁啟超的信說：「備有益堅盡瘁之初心，勉竭鄙力所能至，奮此愚忠，戰戰兢兢，但求皇統之匪保存」。又時常對人說：「余深荷國恩（指滿恩），雖時勢至此，豈忍負孤兒（指溥儀）寡婦（指隆裕太后）乎？」這正如「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的作者所描繪的：「其容貌，其言語，其態度，粹然一身新舊雜之大忠臣」。但是，一等到「民國政府」向他屈服的時候，他就對臨時政府這末說了：「共和爲最良國體，世界之所公認」，「從此努力進行，務令達到圓滿地位，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這些當然又是：其容貌，其言語，其態度，粹然中華民國之大忠臣。「袁

世凱與中華民國」的作者斷言是對的：「大奸大竊，其貌每大忠大信」。在袁世凱的字典中，大忠大信的註解，便是大奸大竊。當他在宣誓忠於滿清皇室的時候，正是他在進行轉移清祚到他自己手裡的時候。當他在宣誓忠於共和的時候，又正是在準備完全毀滅共和的時候。

中國出現新的皇朝，這就是袁世凱的皇朝。但這皇朝開始是採取了「民國」的形式。對於袁世凱，這是建立正式的、公開的袁氏皇朝的過渡形式。

三 討袁之役的失敗

「革命功成，革命黨消」——袁世凱的一面盾牌——「軍令」、「政令」的統一

辛亥革命的時候，社會各階級在反滿的目標下來一個向「左」走，革命的發展也就來得很迅速；在反滿的目標告一段落之後，參加起義的各黨派即來一個向右走，革命的失敗也就來得很迅速。

資產階級的反滿革命派和袁世凱妥協之後，放棄了革命，變成了在野黨；原來一部份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派則變成了政府黨。

原來的革命同盟會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的時候，已開始分化。袁世凱政府成立之後，同盟會和一些原來的君主立憲派（如譚延闓等）及一些舊官僚（如唐紹儀等）結合起來，組成國民黨（民國元年八月成立），是為在野黨；而原來的君主立憲派（如張謇、湯化龍等）及一些舊官僚或人（如程德全、黎元洪等）則又和同盟會的另一部份人（如章炳麟、張伯烈等）結合起來，組成共和黨（民國元年五月成立），是為政府黨。這是北京臨時參議院中並立的兩大黨。一不久，章炳麟從共和黨分裂出來，維持他原來成立的「統一」，而參加共和黨的一些君主立憲派（如湯化龍、林長民）和另一部份原來的君主立憲派（如孫洪伊）又以黎元洪為首領，另行成立所謂「民主黨」，打算操縱於參議院上述兩大黨之間。

作為這兩個政黨的政治分別，是在呢？國民黨的政綱是：（一）促成政治統一；（二）發展地方自治；（三）實行種族同化；（四）注重民生政策；（五）維持國際和平。共和黨的政綱則是：（一）保持全國統一

，採取國家主義；（二）以國家權力，扶持人民進步；（三）應世界之大勢，以和平實利救國。國民黨的政綱除了「發展地方自治」是比較共和黨表現得民主主義和急進外，其他兩黨的政綱在基本上已看不出什麼急進與漸進的分別。同盟會時代反映小資產階級要求的急進綱領（如孫中山所提出的「土地國有」、「平均地權」），本來是為着吸引會黨——下層社會來參加反滿革命的，現在反滿的「革命功成」，反滿的「革命黨消」了，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表現了消沉，會黨的下層羣眾被拋出黨外，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利益早被忘記得乾乾淨淨，僅剩下一條毫無內容的、極端抽象的所謂「注重民生政策」。其他如「男女平權」的資產階級綱領也沒有了。「力謀國際平等」的綱領也改成「維持國際和平」了。軟弱的中等資產階級在國民黨內的政治地位也已走下坡，有些同盟會黨員曾經因為同盟會與各種官僚政客的政治合併，完全拋棄同盟會的革命傳統，而痛哭過，但終歸沒有能力阻止宋教仁這種併黨的「政治手腕」（當時人們極稱讚宋教仁有政治手腕）。妥協是這時國民黨的特色。他們的口號是「新舊合作」、「朝野合作」。它是袁世凱中央政權的在野黨，但却是力謀對袁妥協，而不是要推翻袁世凱的在野黨。黃興、宋教仁是國民黨這種妥協派特出的代表。黃興甚至勸請袁世凱參加國民黨，以便為國民黨的領袖。

孫中山比較急進地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但又反映他們的弱點），在國民黨內也被認為「不能實行」的「理想派」，這時候陷於失勢的地位，但是，即使孫中山本人當時也是決心「盡讓政權於袁氏」，「宣言十年不預政治，俾國人專心信託之」。所謂「正式國會」的選舉結果，國民黨人佔大多數之後，孫中山仍然聲明：「余已力辭正式總統之候補，黃君（克強）亦必力辭，此事終不能不煩袁君」。國民黨與共和黨對袁世凱政權問題上的區別，就是：國民黨擁護而又企圖分袁的權力，共和黨則擁護並贊成袁集中權力。國民黨還帶有代表一部份中等資產階級利益的色彩，但實際上，兩黨又都是代表地主和大資產階級兩個不同集團的政黨：大部國民黨重於代表新起的地主和大資產階級，此其所以仍然被稱為「急進」；而共和黨則側重於代表舊存的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此其所以仍然被稱為「漸進」。但實際上，前者原來的所謂「革命」，已一變而為取消主義，後者原來的所謂「開明」，已一變而為守舊主義。兩黨人物傳統的政治鬥爭（同盟會與君主立憲派），無疑地影響了這兩黨在袁世凱面前的紛爭，又影響了袁世凱對這兩黨的喜憎態度。人民已開始感覺，那是與於爭權鬥爭，而很少原則

的鬥爭。人民對於他們的鬥爭，已開始感覺得有些不耐煩，但袁世凱看到這兩派的無原則吵鬧，則引為大樂，因為這種吵鬧不但有他在內中鼓動挑撥，而且這種吵鬧正使他可用作證據，以證明個人獨裁之好，而政黨則為無用。

國民黨分黨權力的主張，就是關於所謂責任內閣和地方自治的主張。這是袁世凱所認為他們擁護袁世凱中不足的主要東西。當時經過革命震動之後，帝國主義大地主大買辦需要袁世凱來代表他們，集中權力以穩定他們統治的秩序；而和大工業有關的大資產階級亦一部份人亦同樣地渴望經過他來形成一種穩定的秩序。袁世凱止以這種秩序的「救主」自居，他怎樣會肯分出一部份（那怕是很小的很小的）權力，他卻就不給你這樣便宜了。歷史上任何一個反革命反人民的大獨裁者對於權力都是極端吝嗇的。沒有一個反革命反人民的大獨裁者願意分出一些兒權力給人民的。相反，權力的貪得無厭，正是歷史上一切大獨裁者的特色。你看！西太后與光緒帝之關係是母子的關係（雖然是過繼的），但是西太后是絕不願意把一點權力分給她的過繼兒子的，甚至臨死的時候，還認為「我不能先你死」，而狠毒地把光緒帝先毒死了（有一種傳說，袁世凱怕西太后死後光緒帝會對她報復，會參與這個毒死的陰謀）。何獨對於袁世凱說來，國民黨還是異己的勢力，袁世凱怎能因為國民黨的擁護，而即出讓一部份權力？所以，不論責任內閣也罷，地方自治也罷，袁世凱都是不肯有所讓步的。

袁世凱雖然已取得了總統，但在他的看來，一切對他的獨裁權力有所礙手礙足的，都必須完全「掃蕩」，他必須繼續他的「統一」事業。特別由於辛亥革命在各省所造成的局面，當時國民黨人因為同盟會的關係，還佔有南方六七省的地盤（都督是國民黨人），這是他所必爭的。他不能因為「民國政府」已搬出中央政府，而就可認為滿足的。他也不能因為同盟會已改組為在他政權下的妥協黨，而就可認為滿足的。除此而外，還有其他派系的地盤，一切還沒有落在他的直接掌握中的，他都是要一一收拾的。你交出權力！再交出權力！還再交出權力！這就是他對一切異己者的要求。當他一登總統之台，他便逐步地，而且不遺餘力地，集中他在這方面的注意力。

袁世凱的「統一」旗幟，一個是「軍令」，又一個是「政令」。在就任臨時總統後二十天（民國元年三月三十一日），他就頒佈了「訓勉軍人令」，提出「服從統一命令」，這個命令就是為的要消滅辛亥革命後的各省起義部隊，以及其他一切異己的部隊，至少要把各省起義部隊以及一切異己的部

隊改編成他御用的部隊。四月二十九日，他出席參議院的演說，開宗明義提出「古今立國之道，惟在整飭紀綱，修明法度」，這個命令就是為的打整頓各省人民所自發取得的若干自由權力，以及其他一切在異己手裡的權力，以維持他所統治的秩序。固然，紀綱只是袁世凱的紀綱，法度也只是袁世凱的法度；但如果你以為他要求人家服從他的紀綱和他的法度，就要說他有私圖嗎？「此地無銀三百兩」。別人還有私圖可說，至於袁世凱，據他歷來莊嚴的聲明，那是一點私圖都沒有的。辛亥革命之前，他本來在老家，就是「私其抱」，長為老農以沒世；滿清朝廷向他求救，要他出來鎮壓革命之後，他就是聲明「一俟大局稍安，國勢粗定，便當退避賢路，翩然挂冠，成蔭之樂，東陵之瓜，足規此生，庶畢乃願」的；等到他用盡手段，取得大總統而甘心之後，他仍然說，這樣完全不是他的「私願」，他的私願本來是躬逢「共和政體」盛舉，就要「從此退休田里，共享昇平」的。但是，既然「荷國民委託之殷，膺茲重任」，他就只好硬下去，而且按照他的邏輯，「國民既託委託」他了，他就是「國民公意」的代表，反對他也就等於反對國民。在民國政體下面，反對國民是什麼意思呢？那當然就是反對民國、危害民國了，於是他就自負保護民國的責任，可以把這種「反對民國、危害民國」的人壓鎮下去。看他就職大總統後，不過三個月，他的姿態就已經是一個十足的「民國保護者」了。他說：

「……世凱所茲艱鉅，自不得不力為支持，冀挽狂瀾，乃當事者既極委曲以救全，而局外者終難開懷以相諒，殊不思世凱既負國民之委託，則天下興亡，安能漠視？倘明知不可為，而復虛與委蛇，致民國前途於不可收拾，縱人不我責，自問何以對同胞？區區此心，可質天日。但使內省不作，亦復遺他其他？……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壞，藉端發事，不顧大局，則世凱亦惟有從國民之公意，與天下共棄之！……知我罪我，付之公論。」

你看！袁世凱原來是一點私心都「沒有」的，他是共和得得，「深合天下為公之古訓」。有私心的是誰呢？那當然不能對他「開懷相諒」，不能任他「予取予求」的人，乃至是不滿意他、反對他的人。由袁世凱看來，他們都是「天下為私」的。對這種「不顧大局」的人，他已經極其委曲求全了，但是，如果他們還不願意完全投降，鑽出像私私，他「惟有從國民之公意，與天下共棄之」。這是他們該死，絲毫不能怪到他的。責備他專制自為，責備他專斷獨裁，都不過是「悠悠之口」，「擾亂之階」。

同時，他對於當時由他在背後操縱的各政黨，又以「民國內閣的保護者」姿態，出來教訓他們息爭了。

「方念民國初興，尚未鞏固，倘有動搖，則國之不存，黨將焉附？無論任何政黨，均宜獨除成見，專趨於國利民福之一途。若乃復挾陰私，激成黨氣，習非勝是，飛短流長，藐法令若弁髦，以國家為孤注，將使滅亡之禍，於共和時代而發生，揆諸經營締造之初心，其將何以自解？與言及此，憂從中來，凡我國民，務念國難禦侮之忠言，懷同室操戈之大戒，折衷真理，互相提攜，忍此小嫌，同挽大局，本大總統有厚望焉。」

你看：袁世凱多「愛國」呵！他是最沒有政黨成見的，他是只知道國利民福的，他是主張團結的，他的主張容忍的，他是主張外禦其侮的，他是反對內室操戈的！

民元八月間，孫中山和黃興北上。九月間，袁世凱的總統府秘書廳發表一個通告，聲稱：「大總統勞心焦思，幾廢寢食，久欲聯合各政黨，俾得用人我之見，商榷救濟之方，適孫中山、黃克強兩先生先後蒞京，過從愷洽，從容討論，殆無虛日，因議定內政大綱八條……」。末了又稱：「各國元首與各政黨領袖，互相提攜，商定政見，本有先例，從此進行標準，如車有軌，如舟有舵，無旁撓，無中阻，以專趨於國利民福之一途，中華民國庶有焉呼！」說得又是多末「誠懇」、多末「仁至義盡」呵！

但這個「民國內閣的保護者」正「勞心焦思，幾廢寢食」，一步一步地進行把中國變成袁世凱的私國。唐紹儀是一個平日在袁世凱下面做事，替袁世凱辦外交的人，他代表袁世凱南下議和，因而加入同盟會，旋被袁世凱選為袁世凱第一任內閣總理，但却敢以「民國內閣總理」的名義和袁世凱劃清責任，這個內閣不過三個月，很快地垮台了。那個辛亥革命遺留下來的，但已僅作為袁世凱專政粉飾的參議院，不肯通過陸徵祥內閣的名單，馬上有什麼叫做「北京軍警特別聯合會」出來發通電傳單反對了，又有什麼叫做「軍警會議公所」開特別會議主張武力解散參議院了，結果當然又於軍警聯勝了參議院，內閣的名單通過了。又過了不久，袁世凱手下的特務頭子——趙秉鈞，經過黃興的疏通，得到了參議院國民黨人的同意，公然被任為內閣總理了。而且這個「趙內閣總理」和他的「國務員」還填寫了入國民黨的願書。參議院原來是國民黨人佔多數，他們既一心一意只想搞一個「政黨內閣」的招牌，來滿足其「政治慾」，趙秉鈞當了國務總理，他和他的閣員便

邀請入黨，體內閣就變成所謂國民黨內閣，叫國民黨人一時大為高興。這樣，國民黨要求「政黨內閣」——正如當時新聞界所恰當諷刺的——却變成了「內閣政黨」。這樣，參議院與趙內閣也就沒有可「爭」了，袁世凱也就更「統一」了。

不久，宋教仁以國民黨黨員的資格，利用國民黨在「正式國會」的選舉中佔多數，一面主張選袁世凱為正式總統，但一面主張以國會多數黨組織責任內閣，而他自己便是活動作為這個政黨內閣的候選人，真正企圖在袁世凱的軍警刺刀下，分嗜一杯羹。宋教仁這個活動，這個可憐的幻想，當然和袁世凱平日吞併異己的原則，即「你的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是不符合的。對於袁世凱，可以同意那種趨避宋教仁的、以袁氏自己心腹當內閣總理的資格參加參議院黨，但決不能夠同意這種宋教仁所企圖的、以袁氏異己的國會多數黨的資格組織內閣。於是，正當召集國會的前夜，宋教仁於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在上海車站被刺殺了。袁世凱得到消息的時候，表現了「愕然」的神氣，說：「有此事乎？即命拿電報來！」看了電報之後，他又「愕然」地說：「確實！這是怎麼了？國民黨失去宋君，少了一大主腦，以後越難說話。」他又即電令江蘇的都督和民政長：「窮究主名，務得確情，按情懲辦。」確情確究的結果，主名不是別人，正是大總統袁世凱；經理就是袁世凱的內閣總理趙秉鈞和袁世凱的國務秘書洪述祖；直接組織行動的人，就是袁世凱在上海的巡警——「中華民國共進會」會長應桂馨。後來應桂馨被獄北上請功，但是正如嚴復所說：「左右擁護，炎涼變態，利盡則交亡。」袁世凱為滅口起見，就暗中叫人在車上把他刺殺。趙秉鈞感到死狐悲，向袁世凱鳴不平，謂「如此，以後誰肯為總統辦事？」沒有幾天功夫，趙秉鈞也突然七竅流血，嗚呼哀哉。應桂馨和趙秉鈞是都按照袁世凱的「法」嚴辦了。但並不是因為他們是謀死者而受到「嚴辦」，却是因為他們可能洩露袁世凱的秘密而受到「嚴辦」。至於謀殺的主名袁世凱呢？按照袁世凱的「法」，當然他是不受嚴辦的，倒是他要嚴辦那一切追究他進行謀殺的人了。

「不做，二不休。接着謀殺案，袁世凱從五國銀行得到一筆所謂「善後」大借款，就決心發動了剷除異己的大內戰，這就是民國二年所謂「鎮寧之役」的內戰，內戰的名義就是「統一」。在清末時，便為袁世凱爭權的政敵——岑春煊托人進言調和。袁世凱說：「今日並非調和南北問題，乃係地方不服從中央，中央宜如何統一問題。宋案自有法院，借款自有議會，我與岑君等皆不能說話。……至

袁世凱等地方長官，於行政之系統上，中央不能不遵統一之法。袁世凱，袁世凱多末「光明正大」啊！雖則法院傳不到宋案正犯，國會也還有通過借款，但袁世凱說：「宋案自有法院，借款自有議會」，他是絲毫沒有干預過的，而且還「不能說話」。他是「奉公守法」的啊！至於什麼「地方不服從中央，中央宜如何統一」呀，「於行政之系統上，中央不能不遵統一之法」呀，這話「理由」也當然堂堂皇皇，我們現在聽來，真是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袁世凱對強有力的軍隊之後，袁世凱發出了強硬的聲明：

「我現在已決心。★現在看透了（文）實（興），除搗亂外無本領。友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我受四萬萬人民付託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自備政治軍事經驗，外交信用，不下於人。若發等能代我，我亦未嘗不願，然今日賊未敢多讓。彼等若敢另外組織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據袁世凱通信，有此一句。）

袁世凱就是這末威風凜凜了。就是這末殺氣騰騰了。這話，我們聽在聽來，同樣地又是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當然，他依然是「民國忠實的公僕」。在內戰衝在弦上的時候，民國二年五月間，他和一個外國記者這末談話：

「外國記者：近有人評論總統並不實心贊成共和，擬復君主舊制，實事乎？」

袁世凱：予知此種謠傳，自不能免。然既為公僕，豈能逃誹謗乎？……余既為民國辦事，必當盡余之能力，以求民國之成功。倘有破壞之危險，決非自余而生，必由於一般暴徒，以破壞國家為主調者也。

外國記者：有人謂總統欲仿效拿破崙，信乎？

袁（笑）：余欲為拿破崙，非拿破崙也。拿破崙為歷史中最後有名人物，建國自有因，余何故欲為拿破崙而不為拿破崙乎？

外國記者：現在中國最要之事實為何？

袁：對內對外均以求和平，此為最要之事實。

「信不信由你」，而他的话是「誠懇」的。民國在他任內，華盛頓在德運德，和平也在他任內。可是，口沫未乾，民國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他就向那當時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殘存民主勢力——即向那「以破壞國家為主調」的「一般暴徒」——發出討伐令了。這個討伐令很長，文章唯在「統一」二字。據「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的作者說，他讀了這受過感動而原諒過他（所謂

「歷言為政國難各點，想其實情，未嘗不感動，而可相諒於其要求增加權力之用心」）這討伐令的後面部份是這樣寫的：

「今欲濟此時艱，勸求治道，條理雖多，本原惟一：首在規復政令之紀綱，建行國家之威信。此本奇撥，他復何難？本大總統昔以仁柔姑息，延茲厲階；今當以勇猛精勵，贈彼前惡。叛黨欲破頌民國，惟本大總統當保之，叛黨欲變炭生蠶，惟本大總統當拯之。垂涕伐罪，指心質天。紀綱所繫，威信所關，雖懷痛悼，其安得已。當此千鈞一髮之會，或亦除舊布新之機。方將集天下之才，共天下之事。則拯墜日於虞淵，塞滄海於駭浪，雖云甚艱，何遠無術？所賴國人共宏大願。本大總統老矣，六十老翁，復何所求？願斷不忍五十年神明古國，顛覆自我！但使一意尚存，亦不許讓國家之凶徒以自恣。冀與邦人諸友，含辛茹苦，冒險犯難，共此國基。他日作共和幸民，扶杖山谷，以觀治化，庶遂初志，敢告有眾。」

袁世凱口中的「規復政令之紀綱，建行國家之威信」，翻譯為比較新式的口號，就是：「軍令政令之統一」。按照袁世凱，除了全部權力都統一到他的手裡外，中國就再沒有出路，一切就都沒有附屬。「統一」是袁世凱「救國萬應丹」。當然，這並不是中國人民的統一，不是中國民族的統一。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這是袁世凱所追求的「反人民、反民族的」獨裁者的專制的統一。「據袁世凱自己的告白：他以前的罪過在於「寬大」，所以「統一」不起來，現在要給大家看看他的手了。」「以袁氏生平之歷史，對於滿清，惟知專權植勢，於屬吏，即專以貪贓不識字之流為爪牙，至於民事，則除却捕黨人、逼民氣、欺財肥己而外無所能。」可是按照袁世凱自己所說，他現在却是民國唯一的「保潔」，生靈唯一的「救主」，而創造民國有功的在野民主派孫中山等人，却是「破壞民國，塗炭生靈」的「叛黨」。對於這樣「謀復國家的凶徒」有什麼辦法呢？這位慈悲心深的六十老翁，萬不得已，只好揮淚起兵了。按照袁世凱，這不是反動，而是「除舊布新」；這不是專制，而是「方將集天下之才，共天下之事」；這不是他私心有「何所求」，而是他希望「作共和幸民，扶杖山谷，以觀治化」。雖然你讀了這樣的大總統，簡直是自生民以來所未有，袁世凱自比華盛頓，真太謙虛了。

除了袁世凱慈悲心深的動機外，袁世凱當然還有他討伐的法律根據。另一道討伐令就拿出法律根據來了：

「該暴徒等勾煽叛兵，廢廢土地，擅行宣佈獨立，破壞民國之統一

，擾害地方之治安，此等行爲，實爲亂黨，政府不得不依照國家法律以兵備警戒，是用兵定亂，爲行使約法上之統治權，民國政府當然有此責任。」

民國的「國家法律」，變成袁世凱的「國家法律」；袁世凱的「國家法律」，變成民國的「國家法律」。當時在野黨許多人也祭起「法律」的旗子，想透過這種「法」，制袁，但當時孫中山的估計是對的：「國會乃口舌之爭，法律無抵抗之力。」

袁世凱咄咄逼人，國民黨人一切的舉躬屈節都落空了。國民黨人本來擬在袁世凱政權下組織責任內閣，現在却是袁世凱的內閣，（此時由段祺瑞代理）要問國民黨人的責任。孫中山主張爲「純粹在野黨」，不問袁世凱的政治，專顧實業，但袁世凱的政治却要問孫中山的「實業」了。孫中山依然被叫作「亂黨孫文」，宋教仁業已因程德全而死，黃興也以程德全而列名爲逆首，罪名都是「破壞民國之統一」。安協者向食其報。國民黨人既放棄民衆，而和反革命作犧牲革命的妥協，既放棄同盟會時代的革命綱領，把他們的綱領降低到袁氏的與黨綱領差不多一樣，結果就把自己從民衆方面孤立起來，並且不復沒有解開袁世凱對於他們的敵視，反而更加引起了袁世凱對他們的卑視，與更加引起了袁世凱吞併異己的野心，同時也促進了袁世凱的與黨（此時共和黨已與統一黨、民主黨按照袁世凱的計劃合併起來，叫做進步黨）更堅決地站在袁世凱方面，而成爲袁世凱動員「輿論」的先驅。這種對反革命作妥協的妥協又在在野黨內部引起了精神的瓦解，政治的混亂，形成了離心離德和各找出路的現象，即促進了其內部的分裂，並鼓勵一大批賣身求榮的人，這就便利於袁世凱的襲擊。妥協變成了投降，因而妥協就注定了失敗。等到他們受袁世凱的大迫害，臨時抱佛脚，在民衆面前自陳曲直，重新向民衆求救的時候，民衆因爲受過一度拋棄，沒有從他們手裡真正得到過共和的利益，對他們的行動表示了懷疑，表示了冷淡。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和一般大地主、大買辦、大金礦家、乃至大企業家——如前兩面所說——却又正需要袁世凱的軍隊穩定他們的秩序。恰好巨滑的袁世凱看準了情勢，就對他們進行了突然的襲擊。他們就手足無措了。

當宋案暴露和袁世凱公開挑戰的時候，孫中山積極起來，主張對袁採取堅決的討伐行動，表示了民主主義者的氣概，但是却只限於單純的軍事行動，黃興遲疑不前；而各省國民黨都督的發難，則已在袁世凱軍隊南下四佈，

三種場面

斯璜前

日本宣布投降後，我們就看到三種不同的投降場面：一種是金剛怒目式——不容分說，以利刃逼其咽喉，厲聲叱曰：「放下武器，否則狗命難逃！」另一種是慈威並施式——「喂，識相點！原子彈的滋味還不够你嚐嗎？」最後一種是心安理得式——「因爲還看不見敵人，只好在老遠老遠就叫起來了：『喂，請你到某地去，我馬上就來隨你的槍啦！』」

自然，這是不足爲奇的。輿情不同，自然手段各異。在東京，日本人早就請麥克阿瑟放心，他們將做得包君滿意；而且果敢就按步就班井井有條地做出來，有著精密的計劃，有著靈敏的嗅覺；時而搖尾乞憐，時而危言聳聽，時而嚴重警告，時而推諉責任。那結果如何，此時斷之似嫌過早，但天皇——財閥——政黨的經濟帝國主義基礎，不是已隱然若現麼？

在中國，情形更加圓滿順利了，投降的消息一出，大小漢奸，紛紛來歸，各地偽軍，爭先反正，而且一開始就奉令維持治安，已算是擁護政府效忠黨國了。至於日本人，則日本報道部長西岡大佐在武漢日本新聞界歡宴中央社徐主任席上，就說過這樣精彩的話：「中日兩國經過此次戰爭後，情感當可日趨和好」；而徐主任也引了「梁山上的朋友，不打不相識」的俗語，「相信今後……兩國前途實呈現無限光明」云云。朋友而且是梁山上的，則親善合作，共存共榮，自屬至理。中國人民的血，也自然應當以一筆糊塗賬看，而且現在總算彼此都已經然而悟了呀！

曾經在報上看見過一個消息：濟南的老百姓說道：「咱們不知道是誰投降了誰！」我懷疑這位記者先生恐怕是弄錯了，因爲這句話好聽應該是出自某大員或其將軍之口才對。但事情亦並非都是這樣不分明，讓我來引幾段大公報的記者自德瀾先生對自長春的通訊吧：「……他們（指蘇軍）處置日俘及日僑的作風很像樣。現在的日軍

數十萬的軍隊，但因為他們和民衆是分裂的，他們內部是分裂的，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袁世凱的軍隊打得落花流水，袁世凱與高榮烈，喪了自己的「頭腦」。

這是袁世凱的又一次「全國統一」。袁世凱的權力又增加了一步。且再看袁世凱在取得了這又一次「統一」之後，如何實行他的「勤求治道」吧！

四 御用國會的興亡

袁世凱專政的花瓶——國會——要求不

盡的「統一」

在打散討袁軍之後，袁世凱就準備通過「正式國會」，把自己由臨時大總統升任為正式大總統。

我們這就先由國會說起。

所謂國會，這是中華民國的虛偽招牌，實際上，這和過去參議院一樣，不過是袁世凱的專政的花瓶。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特產的國會。

原來所謂國會議員並不是真正由人民選舉出來的。這只是一批政治的金錢買賣。在初選時候，各地方的所謂「候選人」（其中大部份屬於官僚，政客，黨棍和原來的紳士，土豪一類），他們任意假造選舉名冊，雇人投票「選舉」自己，並且各「候選人」之中又互相做一番買賣，誰的勢力越大，在錢越多，誰就越能當「選」。在初選中這本買賣之後，「當選」的，也就得了機會，可以在「復選」中做一番較大的買賣，看誰的勢力大，誰買票的錢多，他就賣給誰，這樣，他就不但撈回了在初選中投下的資本，並且還重新賺了錢；而誰花錢越多的，買票的票數當然也越多，也就可以「正式當選」做起國會議員了。這批議員一到了北京，便又可以做一番更大的買賣，賣給這黨，賣給那黨，而誰大的買主，並且在各黨背後操縱者，便是袁世凱。「其時收買方法，除說入黨外，有不必說黨入黨，投一兩贊成一事即有若干金者，且有不必投一兩贊成一事，止不出席便有若干金者……甚有賣買議員從中說合者，未能如法揭折扣之否，竟提出訴訟，以買賣議員之動機亦無中資本付為比者」（據魯：「中國國民黨史稿」）。「此輩有以一身兼賣與四五黨

已隨在通化一帶集中管理，留在長春的是穿著叫化子衣服在作勞工。有的打掃街道，有的清理垃圾，有的在地下開礦。這一切都使日本人感覺了失望，而讓我看清也似十足的勝利。日僑在街上只能作小販，或開小茶館……他們竟不能接觸我們的眼光。有一天我們住的門口有一對日人夫婦和兩個小孩子走過，站崗的蘇軍囑令他們快走，這軍日本人作臨陣式的急走，木底子鞋幾乎落下……

……蘇軍自入長春到今天，我們的同胞沒有一個傷亡……
「……大街上日本住宅不但貼着「敬賀中國人民解放萬歲」的標語。幾個日本人開的小雜貨店也請中國人維持場面……」

對於那些也是中國人的漢奸，則自「溥儀以下的各大官吏及聲名狼藉的警察及特務，和一般階級較高的武官，都給逮捕了。」雖然這些傢伙也會改旗易幟，組織了什麼維持會去歡迎蘇軍。

拿這事實去和東京對比，顯然多麼不同；和京、滬、平、津、漢對比，則更有幾重之別了。在東京，日本人是扭扭作態，玩弄花樣，在京滬等地，則還是神氣十足，而且驚同維持治安，受優待，得救濟，已是屬於貴賓的身份了。

據說南京人還念念不忘二十餘萬被屠殺的死難同胞的血，上海人也賭了「下次抗戰王八羔子才不留下來當漢奸」的咒。依我的意見，這些話就和濟南人的「咱們不知道究竟是誰投降了誰」一樣的值得重視，因為他們不明國情，不懂中國特有的邏輯，他們竟頑到不知道這次戰爭是出於誤會，兩方都應負責，一如某省主席所說的，而且大家原來是山上的朋友，不打不相識，一打過了，可就情如手足，將更提議合作共存共榮了。

但我總認為南京人的恨，上海人的怨和濟南人的憤，都有着極可憐的缺憾，偏聽那些話的人都留下姓名地址，則事情就將會有一個圓滿的答案。因為我們就會在短時間內，看到三期更正啟事；或者有人出來用不容置疑的事實，證明出說話者都是思想不純正，也許是鬼迷了心竅，也許是被誰買去了良心呢。

十月二十三日晨

者，賣完之後，一律說黨，自名厥黨爭，其實將等將來有大宗買賣時，做一回大買賣，免得受黨黨拘束」（黃進生遺著）。這樣的議員所組成的國會，當然只能成爲袁世凱玩弄的花瓶，而由這樣的議員所形成的國會政黨，又當然只能成爲袁世凱玩弄的工具。在選舉時，由於國民黨還有六七省的地盤，利用了辛亥革命的影響，「吸收無數的投機政客」，全力在選舉上角逐，竟得了國會的絕對多數。如前所述，宋教仁就是因爲國民黨的「選舉」勝利，而熱衷於計謀組織政黨內閣，袁世凱本來認爲他的武力足以戰勝一切，左右一切，對於這種選舉，沒有加以特別注意，後來看到選舉的結果，「始悟疏忽選舉之失策，乃別圖補救。」宋教仁被刺，便是袁世凱這種「補救」政策的一着。刺宋是在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不過二十天，四月八日，國會便正式開幕。五月二十九日，即當袁世凱策劃的內戰空氣瀰漫全國的時候，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三黨便在袁世凱計劃下「應運合組進步黨，大爲政府張目」。另一方面，國民黨議員在袁世凱的金錢和武力兩種東西的策動下，即開始陸續分裂爲各小政派。議員們只要有錢可賺，便可以身兼數黨，而看風轉舵，朝秦暮楚，便成爲他們的學問。國民黨既是國會的多數黨，於是國民黨議員便成爲袁世凱收買的主要對象。國會已完全在袁氏玩弄中。國民黨既是國會的多數黨，於是國民黨議員便成爲袁世凱收買的主要對象，國會已完全在袁氏玩弄中。

在袁世凱反人民的武力和財力的統治包圍之下，縱使在野黨原來是在國會佔多數的，但是國會畢竟只能做袁世凱獨裁的工具。

在續戰中，進步黨的熊希齡便由袁世凱提出爲內閣總理。熊希齡在清末是屬於康梁的君主立憲派。原來有名的君主立憲派如梁啟超張謇都是此時進步黨的首腦，也都是熊內閣的閣員。國民黨議員與進步黨議員共同通過選進步黨即原來君主立憲黨的內閣。袁世凱的策略是先取得與黨，孤立和拆散在野黨，暫且繼續利用與黨以內閣的名義及其言論機關相助，以便於自己用武力把在野黨打碎到底，並使這個與黨在這種打碎在野黨的事業中負有名義上的共同責任，表示他的行動是大公無私；而後在利用這與黨的過程中，一方面提防與黨的隱微，避免與黨的聲名過盛，另一方面便準備在利用它到一定程度時，倒轉過來，也把它收拾、拆散、搗掉。熊內閣的成立，便是袁世凱這種政策的運用。熊希齡辭職是在戊戌政變時候，是吃過袁世凱的虧的，現在却忘記了仇恨，願意成爲袁世凱手下的「第一流人才」（當時熊內閣稱爲「第一流人才」內閣），藉以爲袁世凱走狗可以不死，而且還以爲在袁世凱這個變相的「君主」之下，可以繼續借國會搞獨立憲的老花樣。

袁世凱在內戰勝利後，留在北京國會內的國民黨議員居然和進步黨議員合作起來，彼此都還想在袁世凱這個「大總統式」的新君主權力下啣一下所謂「立憲」的骨頭，想拿立憲作爲自己的遮羞布。這些「君主立憲派」放心袁世凱，可是一切反革命的大獨裁者都是最多疑的，袁世凱究竟放心不了一「君主立憲派」。地主資產階級（包括一部分的大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派」與大地主大買辦（大資產階級最反動的部份）的獨裁派之間還是矛盾的。另一方面，縱使袁世凱相信這些君主立憲派對他十分忠心，但是他們究竟染一些過去士大夫的學究氣味，做起事來還有斯斯文文的味，不痛快，而袁世凱却是耍大刀闊斧的。於是，袁世凱又在國會中收買一部份議員，製造一個更直接的御用黨，這就是民國二年九月十八日成立的所謂「公民」黨，以作袁世凱在國會的直接打手。

這個打手黨的「第二步政策則在選舉袁氏爲正式總統」。本來在當時國會中，有一種「先定憲法、後舉總統」的意見，就使進步黨的首領梁啟超開始也是這樣主張。可是袁世凱却迫不及待，急於要做一個沒有憲法的正式總統。這個打手黨出來活動，而進步黨也還是忠心於袁氏，於是事情便倒過來，先舉總統，後定憲法了。打手黨成立後不過二十天，十月六日，「由兩院組織選舉會，袁遣軍人到會，強迫投票，議員咸不得自由，院外有袁氏左右所買囑號稱「公民團」者數萬人，整齊嚴肅如軍伍，包圍衆議院數十匝，迫即自選出所屬望之總統，否則斷選舉人不能出議院一步。選舉人不得不俯首聽命，忍饑終日，以行選舉，直至袁世凱當選之聲傳出，公民始得高呼大總統萬歲，振旅而返。」

不是國會對袁世凱使用權力（不是國會授權給袁世凱），而是袁世凱對國會使用權力（而是袁世凱授權給國會）。議員餓了一天的肚，袁世凱就足了一天的餓。利誘加威脅，國民黨議員，進步黨議員和公民黨議員都一樣投了袁世凱的票，袁世凱如願以償，而且在選舉後四天的辛亥革命紀念日——十月十日就職。

袁世凱得到了「選舉」的勝利，國會在人民面前宣告了破產。袁世凱就職時，發表了一個宣言書，詳章明義，又是重複了過去在臨時參議院所說的「法門」：「立國大本，在修明法度，整飭紀綱。」他又還來敘述了他用兵的「善衷」，對大總統職位的「謙讓」，必須就任的「國民一份子責任心」……事權重疊，無可進行，夙夜彷彿，難安寢。然且忍之，忍，希望和平。乃本年七月間，少數暴民，破壞統一，傾覆國家，此事

盟初生之民國，惴惴焉將不保。余爲救國救民計，不得已而用兵。幸人心厭亂，將士用命，不及兩月，內亂教平，亟思解職歸田，長享共和幸福，而國民會議舉相推舉，各友邦又以余被選之日，爲承認之期，何敢高蹈鳴謙，以致搖動國基，負我父老子弟之期望？蓋余亦國民一份子，耿耿此心，但知救國救民，成敗利鈍不敢知，勞逸毀譽不敢計，是以勉就茲職。」

你看！又何常是他自己要權力？當然還是老調子：反人民的大獨裁者天天認爲他的權力仍不足，又天天認爲他是第一個不要權力的人。

在宣言書中，他「以極誠懇親愛之意」，向「國民」講述他的「共和」大道理：即所謂「道德爲體，而法律爲用」。但一切按照他歸納起來，「仍不外道德二字」，「約言之，則忠信篤敬而已」。「忠之本義，忠於一國，非忠於一人也，天天以國爲本位，勿以一身一家爲本位，乃能屈小己以和大利，……不以己之權利，妨害國家之大局……」。不消說，袁世凱是第一個「不以一身一家爲本位」的。「孔子云：民無信不立。文明各國有以詐欺行爲謂人者，其受辱若撻之於市朝……前清會國藩云：立身以不妄語爲本。不消說，袁世凱是第一個守信約，不妄語的。「奉公守法者則是爲善，越禮犯義者則爲非爲惡」。不消說，袁世凱又是第一個奉公守法，因而他所做的事又第一都是對的，也都是善的。總言之是什麼呢？就是只有他是第一個合格的國民，因而是第一個配當民國的大總統。所以，他結尾就這末幾：「余故以最誠懇親愛之意中告於國民曰：余一日在職，必一日負責。」「最誠懇親愛之意」，這句話在宣言書重複了兩遍，但後面所說，不消說乃是更其真實的，這是給人警告：他必堅持他的權力，他的權力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如是有誰或什麼侵犯到他的權力，他就將無情地把他繼續打碎下去。

袁世凱授權給國會，主要的只是「選舉」他做總統一件事。這一件事完畢之後，他就準備以大總統的名義行使自己的全權，不要再授什麼權給國會了。在袁世凱看來，國會如此便已完成了任務，功德圓滿。國會對於他已經不算是在花瓶，而且只是一個無用的累贅的廢物。可是議員們不知趣地總想：國會還可以在袁世凱面前爭辯，而且還足爲老態龍鍾的袁世凱增長顏色。袁世凱並不感謝這個大地主大買辦在經濟上對制人的殘酷無情，反映其在政治上對待人的刻薄寡恩，並且因爲有外國帝國主義者在金錢上武裝上的輸血，這個大地主大買辦集中的政治代表者感覺到這還年青貌美，精壯力強；而人民自覺性的不足，又加深了他的自信。他認爲這種花瓶有時候是有用的，但

有時候反而使自己減色。在他就職總統後的幾天光景，他就出面向國會公佈「憲法」的權力，說是「所有之法令，均須經大總統公佈，始能生效」。就是說，不經過他完全同意的憲法，不是經過他親自製定的憲法，就不能有什麼「憲法」。袁世凱也可以有他的「立憲」，但他限定只能是絕端專制主義的「立憲」，只能地把他他的絕端專制主義寫成文的「憲法」，而不能有任何越過這個界限的「立憲」。十月六日，他又向衆議院提出增修約法以便放任大總統的權力，「總攬國務之統一」。他說：「本大總統一人一身之受東縛於約法，直不啻吾四萬萬同胞之身命財產之重，同受縛於約法」。你看！他一人一身受約法束縛，就是四萬萬同胞身命財產受約法束縛！「朕即國家」的思想，公開露在紙上了。同月二十二日，他派遣了八個欽差干涉憲法會議，說他「對於民國根本組織之憲法大典，設有所知而不言，或言之而不盡，殊非忠於民國之素志」。可是那個「憲法起草委員會」覺得這樣對「憲法」的面子太難看了；憲法可以變成大總統權力的註腳，但是也要別人來代作註，而不便由大總統自己來作註。結果八個欽差沒有列席。袁世凱就於同月二十五日通電各省都督民政長，說：「那起草憲法的一些人，一始則託名政黨，爲虎作倀，危害國家，顛覆政府，事實俱在，無可諱言」，「聞其所擬憲法草案，妨害國家者甚多」，簡直是「國會專制」；「值此建設時代，內亂外患，險象環生，各行政官力負責任，急起直追，猶虞不及，若反消滅行政一部獨立之權，勢非亡國滅種不止」；「各該文武長官，同爲國民一份子，且各負保衛治安之責，對於國家根本大法，利害與共，亦未便知而不言」。於是袁氏的一批爪牙馬上亦以「國民一份子」的身份，都一致起來附和作牛馬嘯了。

袁世凱決心停止國會的存在，第一步便是設法停止國會的開會活動。於是，十一月四日便藉故下令（由內閣總理熊希齡副署）追撥四百三十八人的議員證書徵章，說：他們「但知構亂，以便其私，早已置國家危亡國民痛苦於度外，亂國殘民，于斯爲極」。這許多議員們雖然在討袁軍失敗之後還說情誠恐投票選舉袁世凱做總統，可是袁世凱畢竟還是認爲他們「願以民國政府爲敵國」；「願以民國國軍爲敵兵」；「願欲破壞民國之統一而不恤」；「願欲引起列強之干涉而後快」。下令後的第二天，袁世凱派遣軍警拿槍被追辦議員證書的名單，守住國會兩院的入口，一切到會的議員都要受嚴厲的檢查，國會開會就不足法定的人數。這是袁世凱迫使國會無法開會，作爲解散國會的第一步。

這樣，使得還沒有被追請議員證書的議員（大部份是進步黨的議員）即政府黨議員，也大搖其了。他們向那以進步為主的熊希齡內閣責問：「政府以去書案、扶正氣為前提，實與議員等素志符合，唯去之之方，是否適法，扶之之道，是否誠心，事懷疑慮，勢難誠然……。」「既以非法使國會永無開會之日，而又長首長尾，不欲居破爛國會之名，究竟奚所取義？是何居心？」

「這箇第一流人才內閣的總理給他們這樣答覆：『大總統於存亡危急之秋，為拯溺救焚之計，是非心迹，昭然天壤，事關國家治亂，何能執常例以繩。』總之，袁世凱做的事情，沒有一樣不是『光明正大』的，而且沒有一件不是『救國救民』的。袁世凱在停止國會活動之前，便已召集了一個御用的機關，即所謂『中央政治會議』，這御用機關，現在便代替了國會，『袁氏乃隨心所欲』。這些日子，袁世凱的各省『軍民長官』，根據袁世凱的意旨『復電陳所謂『救國大計』，請袁氏解散殘餘之議員。民國三年一月十日，由政治會議議決，請各省長官所謂『理由正當』，於是袁世凱即以命令宣佈停止兩院現有議員。選舉袁世凱做大總統的國會解散了。這是人民啼笑皆非的國會。它的解散，是在它選舉袁世凱做總統的日子起，便已決定的。離開選舉時，僅僅兩個月，離開召集時，也不過九個月。應該更恰當地說，它的召集便決定了它的解散。二月三日，又停辦各地方自治會，二月四日，又交政治會議議決解散省議會，題目仍然不過『統一』。熊希齡副署了這一切命令之後，也因功德圓滿，被袁世凱一脚踢出了內閣，一時興高采烈的進步黨，再無繼承遺囑，漸漸地消聲匿跡起來了。

袁世凱由他的御用機關『中央政治會議』製造一個『約法會議組織條例』，召集所謂約法會議，修改約法，把總統的權力規定得和專制皇帝的權力一樣，『又復訂定治安警察法，以箝制人民言論集會之自由。中央集權，元首獨裁，完全告成，袁益隨心所欲，一呼百諾矣』。五月一日，袁世凱公佈了修改約法的宗旨：

「查中國有歷史數千年，治亂興亡之迹，各代不同，然無論何種時期，其國之能治與不能治，率視政權之能一與不能一以為衡。是以春秋著大一統之文，孟子垂定於一之訓，……統治權惟一不可分，……方今共和成立，國體變更，而觀察政權之轉移，實出於因，而不出於創，故難易帝國為民國，然一般人民心理，仍實望於政府者獨重，而實望於議會者尚輕。使為國之元首而無權，即有權而不能完全無缺，則政權無由集中，羣情因之渙散，恐為大亂所由生。」

「優待條件，為統治權轉移所關，亦民國國家之所由成立……。」

「改造民國根本大法，首在力求實利，而不在于徒飾美觀，首在為多數人謀幸福，而不在于與少數人言感情。救國但出於至誠，毀譽不敢計及。是以此次增修約法之結果，名以隆大總統之權，而實以重大總統之責……。」

宗旨是什麼呢？說來說去，又是：第一是「統一」，第二是「統一」，第三還是「統一」。什麼是「統一」呢？按照袁世凱「統一」就是總統的權力等於大皇帝。袁世凱這理公佈他的總統「統治權」是從滿清朝廷轉移來的，是滿清朝廷委任的，因此，他的權力必須因襲滿清皇帝的權力。按照袁世凱，當他有了這種權力的時候，國會會治，就不會亂，而且大多數人還會因此有「幸福」。現在袁世凱是真正有了這種權力，並且把這種權力規定在他的「約法」上了。

袁世凱有要求不盡的「統一」，因為這個中世紀的奴隸主和大洋行買辦的最高代表人對於權力的要求是不盡的。當他得了一個「統一」，馬上便接上再來要求一個「統一」。民國二年的內閣，是因為「統一」，後來解散國會，是因為「統一」，現在修改約法，又是因為「統一」，這就是他的「勤求治道」。這樣，「統一」又「統一」，便一步一步地把他推上權力的尖端，同時也一步一步地把他送上墳墓的邊緣。

五 從總統到皇帝

喪權辱國——簽定二十一條，偽裝民

意——皇帝居然民選

在前面所述的時期，袁世凱是在民國總統的新形式下，發展專制皇帝的內容。把這個內容規定在御製的約法之後，他便逐步地要去掉這個新形式。這個在舊皇朝中撫育壯大起來的老軍閥官僚，非常羨慕皇帝形式的尊嚴，而大地主世襲財產的要求，正希望由皇帝的世襲秩序重新發現，並重新鞏固起來。為着要加封黃袍在自己身上，這個大獨裁者首先安置他的部下以皇帝時代同意味的官職。內閣總理制的國務院不在了，在袁世凱總統下面設下了「政事堂」，有一個和宰相相彷彿的職位與名義，叫做「國務卿」。這個新宰相，就是前清和袁世凱同僚，而又是前清的舊宰相徐世昌，當時人們已毫

不掩飾地叫他做「徐相國」。在左邊，還有一個叫做「左丞」，在右邊，還有一個叫做「右丞」。儼然是皇帝的排行了。隨後，他又把各省都督改名為將軍，民政長改名為巡按使。這些都是告訴了他的部下：「你們都已有皇帝時代的官號了，難道可以沒有皇帝嗎？」

「中央政治會議」與「約法會議」既完成了袁世凱個人集權所需要製定的條例，因此就結束了它的自身。政治會議的所有「議員」皆以次傳助章有差。民國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袁世凱公佈了參政院組織法，以參政院代行立法院。參政都是袁世凱委任的，共七十個人，按一個在袁世凱背後當太上皇之一的英國公使朱爾典的話，是所謂「中國昔時之老成物望者皆聯翩而出」，前清大老和袁朝寵眷都在其內。進步黨的人物本來是「婢學夫人」的，此時却由夫人降作婢，也在參政院中坐了幾把交椅，熊希齡梁啟超在內。副總統黎元洪當了院長，前國會秘書長進步黨林長民當了秘書長。六月二十日這個參政院成立，據一個新聞記者所述：「參政諸公紛紛入場，老者不見躊躇之容，少者亦無倉皇之狀，盛哉其彬彬有儀矣」。但是參政「諸公」固然有「威」有「儀」，「盛」則未必。那種一派古香古色，又是一片零零落落。開幕時，連宗旨都沒有說明，也沒有一人登台演說。因為：這實際上是籌備袁世凱帝制的專設機關，宗旨是不好公開說明的；「參政」們也都個個心裏明白，自己沒有什麼特別的話可說。

「約法會議」在「約法」上規定了總統等於皇帝的權力，而參政的工作，首先就是把袁世凱這個皇帝式的權力規定為無限期的權力。原先，在所謂修改「約法」的時候，有一個袁世凱的僚屬——四川城口縣知事姓陸的——揣摩了袁世凱的意思，呈請將大總統任期改為終身而止，就「內亂可滅，外患可治」。袁世凱假惺惺，「初聞之，極為震怒，因隨弁辭約法之故。但細思所陳理由，極可實行，故乃決意付各省都督民政長，徵求意見」。現在這個代行立法院的參政院，就把袁世凱這個認為「極可實行」的「理由」，在「總統選舉法修正案」上製成實際的條例。其要點有三：第一，總統任期十年，連任亦無限制；第二，凡屆總統改選之年，參政院參政得決議現任總統連任，無須改選；第三，總統繼任人應由總統推選。次期大總統候補者三人，實於嘉禾金簡，藏之金匱石室，現任總統當然得以繼續當選，現任總統的兒子同輩。袁世凱的終身總統制，就是這樣規定的。這是「代行立法院」的參政院為袁世凱設帝制的第一步「立法」。

袁世凱終要實行帝制，這早已是人們所窺見的秘密。民國二年二月間，

有一個湖北人姓袁的，「呈請暫改帝國之憲，擬國共和」，但是，那時，袁世凱知道在野黨還沒有倒，情況還有所待，而且覺得這個姓袁的這末一說，無異洩露「天機」，可能給在野黨以口實，於是這個姓袁的，不但沒有因此邀寵，而且因此大倒其霉。袁世凱那時命令說：

「本大總統受國民付託之重，就職宣誓，深願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濬蕩專制之瑕穢，永不使帝制再見於中國……凡所設施，悉以國家為前提，合共和之原則，當為全國人民所共信。不意化日光天之下，竟有此等鬼蜮行爲（指那姓袁的上書），若非喪心病狂，意存嘗試，即是受人指令，志在煽惑。如務為寬大，置不深究，恐邪說流傳，混淆聽，極其流毒，足以破壞共和，謀叛民國，何以對起義之諸人、死事之先烈？何以告退位之清室、贊成之友邦？與言及此，憂憤填膺……着湖北民政長嚴行查拿，按律懲治，以為猖狂恣肆不諱者戒！」

可是，自從內戰勝利、國會解散之後，袁世凱自己所說的「喪心病狂，意存嘗試」，「破壞共和，謀叛民國」，却由他自己逐步地大暴露出來。他「二心一意要很快地」使帝制再見於中國。當時事實上已有兩種帝制派，其一是建立袁的帝制派，其二是清朝復辟的帝制派。後者這部份人屬於滿清的少數遺老遺少，他們看見袁世凱在「祭天祀社，大事復古」，知道袁世凱快要稱帝了，但是，他們覺得袁氏和他們本來同是滿清朝廷的臣子，如果要恢復帝制，便不應該由袁世凱自己來做，而應該恢復他們本來的「君主」。袁世凱對於他們這樣公開倡議復辟的議論是不可容忍的。皇位雖然本來是清朝的，但是既然把握在他的手裡，怎麼能够再拿回去呢？於是，袁世凱就大發其雷霆了。先由袁氏的儲備所請「肅政使」夏壽康來一個呈文，說是「大總統受全國人民付託之重，值此安危呼吸，斷不宜避嫌姑息，致釀亂機」，而後由袁世凱「批令交內務部存辦」。他自己又下了命令：「須知民主共和，載在約法，邪詞惑眾，厥有常刑。」當然，袁世凱並不受這種「常刑」的限制。這種「常刑」的所以限制那主張滿清復辟者，僅是為着便於放手製造袁氏的帝制之目的。

俗語說得好：紙是包不得火的。袁世凱的準備帝制既路人皆知，而要实现此目的，袁氏正準備和全國作戰。袁氏了解這件事必須取得日本帝國主義的援助，才可以有為。日本帝國主義也正利用了袁氏的弱點，以實行其蠶食鯨吞的計劃，而西方帝國主義大戰又正是幫助了它的機會。於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於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向袁世凱提出了二十一條，把袁承認。當時日本公

使日寇益手濶條文的時候，儘很客氣地，而又平吞牛吐地說：「請大總統高
 陞袁氏美納其呈，低首而退。日寇益又對當交涉之曹汝霖說：『敵國
 向以萬世一系為宗旨，中國如欲改國體為復辟，則敵國必贊成。』當然，中
 國人民是不可欺侮的，近代中國人民為祖國的解放而鬥爭已流過無數的熱
 血。條件公開之後，『當下各國新聞紙上都登載，加以論斷，中國報紙
 才得轉譯出來。二十一條的內容，須期喚動全國，一致熱心志士，愛國人民
 ，都以為亡國慘禍，已露朕兆，莫不奔走呼號，奮臂而起，到處開會演說，
 冀圖挽救，有的刺血上書，有的斷指自誓……，風起雲湧，總算全國一致』
 （『中華民國史演義』）。袁世凱對於人民的愛國運動，採取了絕對的高壓
 手段。就使這種愛國運動是限於抵制日貨提倡土貨，也不許其活動。做這種
 運動的人物，都被官廳解散逮捕。比如，當時日本人的機關報都公開了諸如
 此類的電訊：『以鼓吹排日熱多數之印刷物自滬來漢之若干中國人，本日立
 被中國官憲逮捕，英界劇場方演奏排日戲劇，以中國官憲之要求停止之。』
 差不多日本人的報紙每日都登載了各地的袁世凱官廳遣捕鎮壓人民愛國運動
 的消息。同時，日寇的海軍則開進中國來巡邏，陸軍也進入許多地方『維持
 秩序』。袁世凱抄襲過李鴻章以夷制夷的政策。結果是：『各國公使皆向外
 交部勒令，中國須和平解決，切不可發生戰事。』五月七日，日寇送了最後
 通牒，並限四十八小時答覆，須完全應允，否則自由行動。袁氏為了『高陞
 』，完成了日寇的願望。偉大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就此開了新紀錄。

五月十日，袁世凱下了『密諭』。他說：
 『前清表遺，政失其綱，泄查成風，無人懲處，加以親貴用事，賄
 賂公行，各私其家，何知衛國……』

『經此次交涉之後，凡百職司，痛定思痛，應如何肅清心脾，力圖
 振作，倘仍復悠悠，再過輒意，恐大禍臨頭即至……』

『……持危扶顛，端資羣策。我國官吏，積習太深，不肯者竟敢假
 公濟私，庸謹者亦多玩物喪志，敵國外患，莫不動心，文恬武嬉，幾成
 國氣……所望凡百職司，日以亡國滅種四字，懸諸心目，激發天良，屏
 除私見……有利於國，生死以之。』

又，七月二十二日，『國務卿李大人總統論』：

『試問甲午庚子兩役，何嘗不肯臥薪嘗膽？而作偽日拙，以迄於亡
 ……來日大難，寸陰是競……心所謂危，涕泣而道，其毋忘五月七日之
 事！』

但是，『作偽日拙』的，恰又是袁世凱自己。日本侵略者取得了這末一
 個『外交大勝利』之後，就對於中國的統治者來一個嘲弄，那時東京，居然
 有人到中國使館前大呼『支那外交大勝利萬歲』者，於是袁氏竊徒也就做了
 東京嘲弄的應聲蟲，自己起來嘲弄自己，說這是『中國外交大勝利』，或『
 元首外交成功』。

這里且回憶一段內幕：日本人原來的二十一條要求一共分有五號，其中
 第五號是要求由日本掌握整個中國的政治、財政、軍警的大權，等於完全把
 中國變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這號要求，是預定不要袁世凱答應的，而是為
 的拿這號要求來便利於袁氏答應前四號要求。當袁氏已決定答應這第五號要
 求，並叫曹汝霖到日使館去表示『讓步』的時候，忽然得到了日本已決定撤
 回這號要求的消息，於是才改了語氣，而在最後覆文中變成了『日後協商』
 。袁世凱答應的東西，超過了日寇原來真正希望的東西，而從一月到五月七
 日關於第五號要求的往來周旋，實際上不過是一種虛偽的作態。可是，袁世
 凱和他的竊徒因此就有了『勝利』的題目了，而且袁世凱的竊徒還希望提議
 遊行、開會慶祝呢。日本侵略者拿二十一條作為援助袁世凱稱帝的禮物，而
 袁世凱則拿二十一條的『外交勝利』作為增加稱帝的掩飾。你看！直到十年
 之後，還有一個王雲生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替袁世凱辯護，說他在這
 幕交涉中『政策頗為正確』和『捷才機智』，為什麼袁氏竊徒當時不會喊『
 我皇萬歲』呢？

當袁氏告訴人們『痛定思痛，力除積疾，奮發進行』的時候，正是袁
 氏稱帝進行帝制的時候，又正是袁氏忙於『闢謠』的時候。民國四年七月，
 報載袁世凱對馮國璋『表明至為痛切』：『以余今日之地位，其為國家辦事
 之權能，即改為君主，亦未必有以加此……且自古君主之世傳不數世，子孫
 往往受不測之禍，余何若以此等危險之事，加之吾子孫也……余已在英購
 有少許田園，設他日有以此等事逼余者，則余惟有遷居他邦』。到八月間，
 袁世凱有一個美國『顧問』，叫做什麼古德諾的，寫了一篇『為中國
 適合於君主制，而不適合於共和制』。於是一犬吠影，百犬吠聲，那些袁世凱
 的走狗都一齊大吠起來。沒有幾天工夫，楊度等一批人『籌安會』也出現了。
 所謂『籌安會六君子』，楊度、嚴復在清末本是君主立憲派，孫毓筠、胡漢民、
 李燮和本是同盟會和國民黨的重要人物，劉師復本是同盟會員而早向滿廷告
 密的叛徒。『籌安會』的宣言是還末寫的：『美國人大政治家古德諾博士即言
 世界各國，君主實較民主為優，而中國則尤不能不用君主國體。此義非獨

歌輓的寫墨，話謊的寫墨

望 黎

昆明各校的同學喊出了全國人民要求和平的願望，街頭上貼出了「反對內戰」的標語；這可忙壞了一些惟恐天下不亂的人，他們忙著要領學生，忙著要塗改標語，於是在「反對內戰」的標語下，他們就加上「就是共產黨」的幾個字，他們將自炫還是得意的傑作吧！此間「和平」日報不就在叫「反對內戰就是助長『內亂』」嗎？這恐怕是作偽者的悲劇吧！既不能隻手退抑人民反內戰的意願，就只好搬出「反內戰」就是「共產黨」的老法寶了。不當心，却露出了馬脚，「反內戰」的既然是「共產黨」，那些禍想、製造、發動內戰的是誰，不是不言而喻嗎？

這大概是昨夜又攜菱花鏡，照出了自己的尊容吧！

打譚應請的報紙說：「青年們平日痛心學術不能自由，其實國民政府最尊重學術自由」，所不尊重的是「搗亂自由」。既然學術自由被「尊重」，而這些青年平日還要感到「痛心」，這顯然是還存「搗亂」，而這種「搗亂」又是早經預定為「陰謀份子」的。

其實，政府所「尊重」的，何止「學

「我大總統何苦以千金之軀，為衆矢之的；舍若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髮齠之心（灰老百機歸向之心），緊符符之志（長反對者竊發之志）？……是用椎心泣血，進此最後之忠言。」

梁啟超的言論反映了一部份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思想，同時也反映了中國人民革命危機的發展。他企圖使袁世凱取消帝制運動，而避免人民革命危險的爆發，他對於袁世凱的統治，表示了椎心泣血的忠誠，但袁世凱却聽之藐藐。反人民的大獨裁者把自己的權力推到了極點，要他那樣服梁啟超所說「治內的修明、百廢俱興」或「專精一慮、為國家謀大興革」，那是完全不可能的。相反，他只能製造無窮的內亂和外患，並「專精一慮」來對人民進行不斷的戰爭。

袁世凱的決定是不可挽回的。合起來有數百萬大數目的寄生蟲——軍隊、警察、憲兵、官僚和土豪，他們原來是為大地主大買辦的利益服務的，而由他們所結成的機構，又是舊皇朝傳下來的東西，保有極深固的舊皇朝的傳統，袁世凱就依靠了他來做總統，現在又決心依靠他們嘗試一嘗龍座的滋味，同時相信經過他們的「願之倒之」，一定可以顛倒出一種叫做什麼「民意」的東西來，以擁護他登上龍座。

先是，由籌安會通電各省將軍、巡閱使、巡按使、都統、護軍使、各地商會，請他們派代表到京，以便表決贊成「君憲」或「共和」。當然，這所謂「君憲」，並不是原來君主立憲派所活動的改良主義的「君主立憲」，而是袁世凱這個早已是不折不扣的新形式的君主，現在要採用公開的舊君主形式來統治全中國，而「立憲」乃是一種招牌。他說：「你們承認我這個君主吧！我給你們立憲。」如果有的說，這是什麼立憲呢？不是別的，這就是袁世凱式的極端專制主義的「君主立憲」。各省的文武長官，當然明白了袁世凱的意旨，都對於籌安會表示贊成，並紛紛「代表」到了北京。籌安會本來打算經過他這一這手續，便由袁世凱即做起皇帝來。後來又打算，還是經過一道參政院的手續更妙，因為那參政院叫做「代行立法院」，它既為袁世凱無限期的皇帝式權力立法，便可以更為袁世凱正式的皇帝大寶立禱，於是，那些各行的「代表」便變成各種「公正請願團」，由籌安會代草請願書，向九月一日開會時參政院請願了。

正當參政院開會討論、將付審查的時候，袁世凱特派「左丞」楊士琦到院發表宣言，照例（是千百次重覆地）說了：他「深望接替有人，遂我初願。但既在現居之地位，即有救國救民之責，始終貫徹，無可諉卸」。他又說了：「維持共和國體，尤為本大總統當盡之職分，近見各省國民，紛紛向代行立法院請願改革國體，於本大總統現居之地位，似難措容」。可是，在這下面，「然」字在文章上出頭了：「然大總統之地位，本為國民所公舉，似應仍聽之國民。」這就是說：他的大總統是由「國民公舉」的，假如「國民」現在不要他做大總統，而要他做大皇帝，當然他也只有服從了。他說：「國民請願，不外乎鞏固國基，振興國勢。」你看！「鞏固國基，振興國勢」，是為的「鞏固國基，振興國勢」，當然，皇帝是應該做的。不然的話，豈不是「破壞國基，削弱國勢」嗎？而反對帝制的罪名豈不是在此嗎？他說：「但如這種請願是『徵得多數國民之同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什麼是『自必有妥善之上法』呢？就是說，他自必『接受』帝位了。」

袁氏文章的意思是這樣的：正如「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的作者所說：「他所以特示鄭重者，無非欲

術自由」呢？其將軍不已經公開說：「學生們有在校內開會之自由，我有在牆外放槍的自由」，這種「放槍的自由」，也早就在被尊重之列了。

被尊重的自由還多呢？昆明各校教授、同學爲着說明事實真相，負責發表的真實消息各報沒有刊登，中央社就可以虛構事實，造作謠言，通過電報和通訊，刊佈在各地報紙，這大概是早被「尊重」的「新聞自由」，中央社可以分發各種「讀者投書」，命令各報一律刊載（這該叫做「人民的公意」吧！），第五軍軍長可以親身帶着「反亂委員會」（而這是經各按同學指明並無這個所謂「會」的）的啓事廣告，命令各報刊載，這應該早被尊重的「言論自由」吧！

對於那些誣謗欺世，殘民以逞的人，他們的自由倒的確是早就被尊重了。

那些無辜而被虐殺的死者的屍骨未寒，我們已經可以聽到一切泯滅了良知者的構陷了，而一切誣謗的陰謀，不過是想造成這些死者和被傷者是「罪有應得」而已。

因爲內戰使得他們不能安心唸書的六千多個純潔青年，爲着呼喊出人民的渴望、要求，而在學校裡舉行集會，這竟勞動

作艱難，這叫「民意」二字。

在參政院開會中，由梁士詒組織「請願聯合會」以便「同心激進，計日成功」。同時，各種請願團到處「聞風而起」，而各種「請願團」當中，「乞丐請願團」和「妓女請願團」（妓女在元春所發起）則完全象徵了這個帝國動亂的真實政治，即是乞丐式政治與娼妓式政治，而那批請願的人，不過是袁世凱收買下的一批政治乞丐和政治娼妓。

「請願聯合會」的聲勢代替了憲安會。梁士詒後來居上，比起楊慶來，或爲一個更急進的帝國急進派。在梁楊之間，因此惹起了一陣醋海風波（楊慶以梁奪他的功，甚憤），可是帝制則更提前了一步。「請願聯合會」根據袁世凱的意思，向參政院請願，請以國民會議爲解決國體機關，參政院將請願書八十三件送給袁世凱，並建議根本之法，或提前召集國民會議，或另籌徵求民意妥善辦法。於是袁世凱藉此發了命令，定於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舉行「國民會議」之複選，召集「國會」，解決國體。但是，這還需要個來月的時間。袁世凱和他的幫徒覺得夜長夢多，是不耐於守這兩個來月的兩時間的（僅僅是兩個來月的時間）。這正如「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的作者所說：「將校先縱，欲速故殺，又一種做作而已。」於是「請願聯合會」又以所謂「立法貴簡，審時貴速」再請願了。參政院以爲：「君主立憲爲救國良圖，必宜從速解決，而國民會議開會遲緩，且屬決定憲法機關，國體未先決定，憲政何自而生？非迅速特立正大之機關，徵求真正民意，不足以定大計而立國本。」因此，它建議即用「國民會議」的初選人爲基礎，選出「國民代表大會」，解決「國體」問題。袁世凱的民意傀儡，就這末製成了。以後，就根據這一製定的劇本，逐步演唱出來。

袁世凱從前一些秘密的電報，後來被公佈出來，這些秘密的電報表現出袁氏能演唱民意傀儡劇的經過，同時反映出清末和民國以來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統治民衆一種共同的秘密。這裡有大地主大買辦階級歷來的所謂什麼「選舉」、什麼「立憲」、什麼「國民會議」、什麼「國民代表大會」之實際的精華，而且可以說，如果不體驗這些精華，就不會理解中國大地主大買辦的政治（至少是其政治方式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會表現自己的幼稚。

這些電報是什麼呢？請讀者認真地、一個字一個字地讀下去吧！

- 一、段芝貴等十人八月十三日發出電云：「現擬第一次辦法，用各省公民名義，向參政院代行立法院上請願改革書，每省各具一體願書，由此開代辦防務稿底電聞，請將章名並貴省紳商列人。」
- 二、九月二十六日孫毓筠發出電云：「現擬另籌徵求民意辦法，由各省將軍巡按使都統就該省各縣紳民中，每縣擇定一人，召集臨時公民大會。」
- 三、九月二十七日憲安會代表團發代電云：「各縣投票人，事實上雖係軍民長官指定，而形式上仍須用各縣推舉字樣，以昭鄭重。一面指定各縣投票人，一面即將各縣投票人姓名，分飭各縣知事，補具詳文正式推舉，但須倒填日月耳。」
- 四、九月二十九日朱啟鈐等所發電云：「現正擬另組公民大會，即在各省地處開會表決，以明選

局出動了大批的武裝，搬出那些美國人民用血汗製造來保衛民主，維護世界和平的武裝——而這東西是曾經在昆明試用而頗有成效的——來鎮壓這些手無寸鐵的青年，卡車裝滿石塊，特務帶着手槍與手榴彈；無愛地，當事者是退用殘暴來鎮壓住這些不安份的學生的。

然而，敲着石頭，一定會迸發出火花，一下便會有一次抽搦，死難者的血跡，被破壞者的創傷，對於一切發行的領受者，死難者鮮血所澆灌的人，引起的却決不是恐怖；機關槍，小鋼砲不就沒有禁得住他們喉嚨嗎？它將使一切迷途者辨別是非，陰謀者露出他們的本相，怯懦者獲得堅強的信念，活着的戰士更會在這種殷紅的血跡中奮然前行。

在陰謀者的構陷，論客們的援嘆中間，還夾着蚊蚋似的喧嘩。

爲時不過兩三天，連那種滿含殺機，把青年定名爲「陰謀份子」，「助長內亂」的陰謀者，竟然而爲苦陸心腸，竟然「千行熱淚，一腔悲痛」起來了，這和那幾聲了已期梅毒的嘶擾，還在醞釀自己的貞操和清白有甚麼差別呢？

然而「實彈打出來的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於墨寫的謊語」，而且也「不勝於墨寫的謊語」的。

十二月七日於寒夜鳴呼中

定大計，能組織方法，雖由參政院議定，而組織之精神，則在各監督長官有以操縱之而利用之。

●此項公民每縣擬公推一人，能於在各機關中挑選此項人員，必不至於誤會宗旨。

五、十月七日朱啓鈞等十人發出電云：「國民代表大會推戴電中，須有『謹以國民公意恭請袁世凱爲中華民國皇帝，並以國家最高主權奉之於皇帝，承天授國，傳之萬世』等語。委託參政院爲國民大會總代表電，須用各省國民大會名義，至商軍政各界推戴電簽名者，尤多愈妙，將來宜昭登報時，國民代表大會及商軍政各界對賀書，亦請預擬備用。」

六、十月十日國民會政務局發出電云：「國民會政務局各縣之初選當選人，實爲產出國民代表之機關，尤宜特別注意，各縣初選監督，當能由會入議，普爲選用。儘可於未舉行初選之前，先將有被選資格之人，詳加考察，擇其性行純和，宗旨一貫，能就範圍者，預擬爲初選當選人。」

七、十月十一日朱啓鈞等十人發出電云：「初選當選人來省報到，必須設招待員，或派員隨同意見，由監督官以談話宴飲爲名，召之入署，將有意要旨，及中國大勢，並將擬定定案人名示之，須用種種方法，總以必達目的爲止。」

八、十月十五日國民會政務局發出電云：「擬定改革，果能於形式上得到利益無礙自足爲久，應速之，凡關於法律上之形式，除確有障礙者外，務必表示尊重。」

九、十月二十六日朱啓鈞等十人發出電云：「國體投票開票後，當即推戴，無須再用投票手續，即由公署派員推戴袁世凱爲大皇帝，如贊成，應即立，表決後即將擬定之國民推戴書，交請各代表署名。事畢，再由公署派員推戴大皇帝即位之事，可用國民代表名義，委託代辦法院爲總代表，即將預擬之國民代表代行立法院電稿，交請各代表贊成。至預擬書文內應加入字樣，已將原電奉達，此四十五字，萬勿更改。」

十、十月二十九日國民會政務局發出電云：「前次電達以後尊處用款，有無礙礙情形，請即隨時指示本局謹當竭誠補助，以便尊處放手辦事。」

十一、十月三十一日國民會政務局發出電云：「專外官署往來密商之件，實爲治亂安危所關，應或稍有洩漏，轉語事機不密之嫌，而事關國本，密令若傳於道路，尤恐貽及治亂之禍，應即對內對外，動關國家威信，務望特派親信人員，嚴密保管。」

十二、十二月二十一日國民會政務局又發出電云：「此項電文無論如何慎重，終涉嫌疑，應即外人偵悉，不免妄肆品評，更或乘機流傳，這實關國體，中央再四思維，以爲不如一律銷燬，更望趕速偵查辦理。」

讀者不難了解了吧？中國大地主大買辦的歷來政治代表們，今兒可以藉口人民幼稚無知，這謊言不准許開，那樣的會也不准許開，如果你要什麼『民選』，要求什麼『國民大會』，要求什麼『國民代表』，……等等，那他準定給你一看他的顏色，監禁，殺頭，不一而足。可是，等到他一會兒氣喘吁吁了，於是這些東西的出現，其速度是簡直使你難以相信，他本來說什麼，他就馬上可以拿出證據。

「民權」有，「國民大會」也有，「憲法」也有……。讓你來個應接不暇。當然，「民權」裝得正大光明，情願有介事。要編造一類的秘密，就必須藉袁世凱使這些電報。

民國四年十月八日，袁世凱公布了「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十幾天後，即十月二十五日便開始選舉，又三天後，即十月二十八日以後便開「國民代表大會」。到了十二月十一日，所謂「國民代表大會」的會議開幕會，「國民代表大會」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得主張君主立憲者一千九百九十三人。

當天，「國民代表大會」的國民代表大會，「全國民意」業經決定君主立憲國體，並以受委託為「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的名義，上書勸進。當天（又是「一個當天」），袁世凱答覆稱「復妙」：「在約法內載國民之主權，本於國民之全體，既經國民代表大會全體表決，改用君主立憲，本大總統自有討論之餘地。」你看！袁世凱就是第一個尊重民意的。可是，他說：「追隨故君……今若驟讓大位……於道德不能無憾。」又說：「曾向參議院宣稱願竭能力發揚共和，今若帝制自為……於信義無可自解。」因此，他希望國民代表大會執行推戴，並退還了推戴書。你看！他既那末尊重民意，又那末照顧到了道德和信義，而又那末謙讓之至，越發活該做大皇帝了。於是，

當天（這又是一個當天）代行立法院又再集會，在十五分鐘開成二千餘字的第二次推戴書，即晚進呈，禮部頒發袁世凱有六「功烈」，說是：「凡此六者，皆國家命脈之所存，萬姓安危之所繫……我皇帝之功烈，所以過越百王也。」接着又稱頌袁世凱的「盛德」，說是：「盛德功烈，猶恐不足以稱，千古鼎革之際，未有如袁之光明正大者……此我皇帝之德行，所以為萬絕古初也。」

十二月十一日一天之間，已完成了四個手續：第一，查票；第二，上推戴書；第三，謙讓；第四，再上推戴書。真是緊張得很。到了第二天，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凱就正式承認了帝位，說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予之愛國，詎在人後？國民實備慮，期望愈切，竟使予無以自解，並無可隱避。」到了第三天，十二月十三日，袁世凱就在居仁堂受百官賀朝，並冊封袁元洪為武義親王。

六 從寶座上跌下來

袁世凱估計錯誤——反袁軍愈剿愈多
——是皇帝又到總統——竊國者壽終

正義

袁世凱宣布自己是民意所推戴的時候，他當然深知那所謂「民意」不過是代表了自已專制權威的意志，而並沒有代表任何一個人民的意志。幾百萬的軍隊、警察、憲兵、官僚、士農和所有的軍閥官僚機構，是袁世凱權威的政治象徵，也是袁世凱權威的政治基礎。他們是向四萬萬幾千萬人民吸血而取得生活，他們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不可調和，但和袁世凱專制的利益却是可調和的。袁世凱經過了他們的手，盡量地利用他們的機構，而取得了「恭戴大總統為中華民國皇帝」的「民意」，正如一些外報所評論的，那不過是「以少數人之私心，詐稱合全國之同意」，而人民「固不願以袁世凱為帝，始終未曾請袁世凱為帝」。實際上這等於在激動民意起來反對他這個「中華民國皇帝」。一個著名的故事，孫權勸曹操稱帝，曹操說，是兒要把吾放在爐火之上。可是現在袁世凱正是把自己放在爐火之上。但是，當他在把自己置在「爐火之上」的時候，馬上感覺到爐火會烤死了他；和他受百官朝賀的同一個日子，他發出了這樣的「中令」：

「好亂之徒，謀少數黨派之私權，背全體國民之公意，或造謠煽惑，或勾結為奸，甚為同國之公敵，同和之夢民。在國為逆賊，在家為敗子，富國禍家，眾所共棄，國紀具在，勢難姑容。予維有執法以繩，免害良善。着各省之武官勸諭，嚴密訪查，毋稍疎忽！」

反人民的大獨裁者，又把人民的反抗人物叫做「好亂之徒」，叫做「奸」，叫做「公敵」，叫做「夢民」，叫做「逆賊」，叫做「敗子」；又把革命叫做「謀少數黨派之私權」，而把反革命叫做「全體國民之公意」。但是，這個反人民的大獨裁者在人民的反抗面前，是表現如何的胆怯呀！他既把自己放在爐火之上，而又怕被爐火烤死。但你已經自己放上去，烤死也就是必然的命運了。

稱帝是袁世凱權力的最高點，又是袁世凱權力的最低點。這個大地主大買辦的政治冒險家打算經過稱帝更高地集中無限的權力在其手，但却因此大踏步地瓦解了自己手腳的權力。他在集中一切權力的過程中，同時又逐步地集中了一切反對自己的力量。前幾年，一切反對派，改良派和帝國主義者把袁世凱當成秩序的救主，現在却認爲袁世凱這種稱帝的手段即將很迅速地破壞那業已由袁世凱建立起來的秩序，而原來的清朝復辟派，即在袁世凱的旁邊揮舞着。如上所述，梁啟超在「吳越所謂國體問題者」的文章中，已深深地嘆息袁世凱將因此一蹶不振。梁氏給他的黨徒的信中，更毫不遲疑地指出：「此人則既驚矣，路易十五，所謂朕死之憂，洪水其來，鼎沸之局，既無可逃，所爭者早暮已耳。」因此，原來積極擁護袁者，爲「自存」，現在也變成了積極反對者。

袁世凱的太上皇——外國帝國主義者也深感袁世凱行動的冒險。當袁安會開始出現的時候，英國人辦的上海「字林西報」，八月二十七日的北京通信，這樣寫道：

「……袁氏之得以鞏固其地位者，多賴外人精神上、財政上之助力。外人於此又焉可無言耶？數年來中國危亂之際，外人勢力影響於中國事者，其功甚偉，難以盡述。就事實言之，外人扶助袁氏使其得有今日，外人固望袁氏善用其因外人扶助而得之權力，以造福於國家也。今若以帝制而改良時局，則非此間多數歐人所敢信者也。不獨信其不能改良時局，且恐時局反因此而愈惡！蓋外人知國人對於袁氏計劃，必有激烈之反對，甚至非用兵不足以定之也。再袁氏長子入繼大位，果能較國民心目中所得信任之代表更爲安穩乎？此亦非外人所敢信者也。」

大家知道：日帝國主義是袁世凱稱帝的主要積極鼓吹者。但當帝制運動發展之後，它就直接向袁世凱政府勸告，應該中止自己的冒險行動：

「外觀雖似各地對於帝制之實現反對不甚激烈，實則反對之感情廣爲醞釀，不安之形勢深浸於各地。回顧袁大總統過去四年間之施設，已使國內秩序漸復，地方不安之狀態亦逐日消滅；大總統若維持現狀，無改已採之方針，則秩序全行恢復，各地關於安寧之日，蓋不甚遠。然今大總統如有突建帝制之舉，則上述反對之形勢或將立成，惹起意外之擾亂，使已形平靜之各地再成危險不安之域。在世界形勢有如上述之今日，目睹中國將發生此種危險之情況，帝國政府鑑於世界大局之利害，不勝憂慮。」

「……帝國政府本防患未然維持東洋和平之衷心，對於中國政府先告以中國今日之情況最堪憂慮，敢問果自信不致發生變而得平穩現狀耶？帝國政府既已坦率披瀝其所見，決以友誼，勸告大總統善顧大局，延緩其變更國體之計劃，以防禍未然，而固遠東和平之基礎。此乃最賢明之措施。」

但是各個帝國主義者制止袁世凱的冒險已來不及了。袁世凱雖然對他們忠心，到這時候，和梁啟超的進步黨人同樣，他們知道袁世凱已無從有希望維持他們所需要的秩序，他們只好以惋惜的心情，拋棄了袁世凱，而日本帝國主義且積極地幫助了梁啟超蔡鈞等人到雲南去進行反袁的運動。

人民的反袁運動，有它的特點。辛亥革命之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離開了人民，失掉了自己在人民中的政治信任，雖然他們繼續參加了反袁的運動，帝制發生的時候，並有過一些積極的行動，但是他們不論在實際的政綱上、在實際的行動上，都沒有明確地代表人民利益的東西，他們的政綱——如在日本東京成立的中華革命黨——雖然企圖恢復同盟會的革命傳統，但却只成爲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宗派團體，而和人民羣衆沒有真正的聯繫，不能成爲人民的首領。至於無產階級，因爲辛亥革命和歐洲大戰，中國工業有新發展，這無產階級就逐步壯大起來，但是，它還不够壯大對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還不够壯大到成立自己的政黨，因此，就還不能成爲反袁運動的領導階級，在這樣的情況下，雖則一方面，反袁運動有極廣泛的統一戰線，但另一方面，反袁運動即缺乏人民革命的主導。運動是廣泛的，但却是自發的多。梁啟超等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改良派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力爭反袁的領導權。按照梁啟超自己的話，就是：要「當此普天同憤之時」，自求「樹立」起來。

袁世凱決心不顧一切，和反抗運動較量，看誰定在更前面。十二月十九日，政事堂「奏請」設立大典籌備處，而事實上在九月間已由朱啟鈞周自齊等人組織起來。廿一日，袁世凱封了龍濟光、張勳等四十九人以五等爵位。三十一日，下令以明年一月一日爲洪憲元年元旦，預備登極。

當進行籌備登極的時候，袁世凱的命令是：「籌備事宜，務以簡略節省爲主。」「不尚虛文，重惜物力。」但據十二月廿七日「申報」所載，大體預算草案，其總數已定爲五百九十餘萬元。有一本書叫做「袁氏盜國記」說，洪憲中謀帝用費，可列出的，數在六千萬元，實數其未可臆斷。據民國五年九月六日申報所載北京電：財政部調查帝制耗款，實數達六萬萬元有奇。

。你看！這就是袁世凱所謂「用副總統返樸、移念民生之至意」呵！

十二月二十五日，雲南反袁派起兵了。蔡鈞當了反袁軍的總司令。雲南的力量雖不大，但是，按照全國的人心，袁世凱的失敗是注定了。當時英國人辦的京津泰晤士報社論「袁世凱之前途危險」一文，刻劃出了自己帝國主義的心理，同時，也刻劃出了袁氏之無可挽回的命運：

「無論勝敗如何，袁世凱之威望必落。今日者，正吾人渴望中國元首得保其威望之日也，而事實竟如此，吾人對於袁氏，不識取勸進之時機，以自保其威望，能勿致其惋惜耶！夫使袁氏當是之際，不受帝位而堅辭，吾知袁氏對內對外之威望，定較今日而益高也。而竟不然，以致淪陷於力爭帝位之地位，（原注帝位者非人民奉之袁氏，乃一班徇私官僚奉之袁氏者也）雖常人對於袁氏，未嘗不望其保有威權，以成中國現在之最良政治家，但因奉袁氏為帝，以致再生內亂，能勿覺其為值太大，而於國家無所裨益耶？」

帝國主義者對於袁氏的必然沒落，是這樣「三嘆有餘哀」的。

袁世凱在反抗的烽火業已舉起之後，繼續反覆地以「民意」的名義討伐反抗者。他說：「主張君憲，正為我國真正心理之表示，各省投票之時，概聽人民自由，並無絲毫限制。……不知君主立憲，既經國民公決，鐵案如山，無可稍易，舉國上下，皆無反對之餘地。若以一二私人私意，遂可任意違反，推翻不認，此後國家，將憑何者以為是非取捨之標準？無可為準，任聽人各逞其私，更復何能成國？……此時元首所以見信於國民者，斷即宜誓不再維持共和，方為格遵民意……夫共和元首，國民已有相當之敬禮，何況今日名分已定，天淵懷然，正宜嚴君臣上下之分，生亂臣賊子之懼……一方面改稱多末「民主自由」啊！一方面又皇帝的臭架子十足。這末卑鄙！這末下賤！這末醜惡不堪！」

民國五年，一月五日，袁世凱又發出了命令，認為「天生民而立之君」，而且只有他有治國的本領，沒有非分的慾望。他又這末地描寫了反抗者：

「民國成立以來，暴亂之衆，狂妄之徒，各趨於權利之極端，為非分之希望，或逞強力，或飾巧言，百計經營，務獲厥志，意者朝持魁柄，夕正首邱，亦所心願。其次即暫據一隅，猶足慰情勝。至於何以撫輯人民，何以統治軍隊，何以因應外交，概不之思。其暴烈分子，行同盜賊，惟利是圖，固無倫矣；即號為行政治思想者，但憑心理之偏倚，不顧事實之利害，肆意煽惑，大言炎炎，按之毫無實際。夫美紳尚不可

以學製，願可以信為生靈，供其經心試驗乎？……人民無罪，未可舉至國之重，任人試驗，實傷處此，無從諒卸……」

當然這是一套老調子。信為生靈只准許供他試驗。四年之間，供試驗的東西可算多了：一會兒內戰，一會兒五國大借款，一會兒由臨時大總統到正式大總統，一會兒解散國會，一會兒大捕大殺反對派，一會兒臨時約法，一會兒總統制，一會兒終身總統，一會兒簽訂廿一條，一會兒「國民代表大會」，一會兒大皇帝……這一切的試驗，由他說來，都是叫做「拯救生靈，保護祖國」。但是，他決不能「任人試驗」，激烈的份子既同於盜賊，有政治理想者又毫無實際，他們都是野心家，如果一經他們試驗，由他說來，則都叫做「發生變亂，顛覆祖國」。於是，他在這同一天，再發出了命令，對於起義反抗的軍隊，實行「一體嚴密防剿，毋稍疎忽」。二十五日，又命令將各將軍及統兵大員分途進剿，以保地而養生靈」。當袁世凱的先鋒的，就是後來著名的賄選大總統曹錕。

可是，袁世凱不「進剿」則已，一進剿就出現了更多的反袁軍。不久，又這一省獨立，又那一省獨立，袁世凱應接不暇了。「登極」的日子只好延緩下去了。

袁世凱本來向他的太上皇——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者誇口：「意外之亂，果或猝起，中政府自信無論何時，均有完全對付之力。」袁世凱不但對於他在全國的地位的估計，是幼稚的，而且對於他和他的太上皇之間的關係的估計，也是幼稚的。他沒有充分地估計到：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者如果看到他維持秩序不中用的時候，為什麼一定還要他呢？為什麼他們只要扶一個兒皇帝，而不可以多扶幾個兒皇帝呢？袁世凱原來預備以重要權利給日本，作為日本承認帝制的條件，派了周自齊作為到東京的特使，日本已經表示歡迎，可是，忽然加以拒絕了。當時梁士詒即嘆息地說：「周自齊不能去了，帝制不成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已決心拆袁世凱的台，以便扶持另一些新傀儡。

一月二十一日，日本帝國主義者直捷了當地說：「原來貴政府欲改帝制，本係保護無亂，今明明與南有亂，竟於此時斷行帝制，無視友邦勸告，則中政府之責任甚大，日政府當然不承認。」袁世凱說了他的太上皇這頓不客氣的打擊，敗壞極了。軍費又在迫近他，美國的資本家雖然有願意應付的，但是「洪憲」名義的信用却不足，而日本帝國主義也盡力阻止他這筆債美債的賂。袁世凱原來改在二月間登極，這想，又只好作罷。

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凱命令撤消帝制，廢除洪憲年號，仍然叫中華民國

年號，並在命令中，仍然自稱為「本大總統」。你看！他本來認為「應即宜登不再維持共和，方為格遵民意」，現在他卻不再格遵他的「民意」，而毫不知羞地要「再維持共和」了。

袁世凱的兩個大部下——馮國璋和段祺瑞，原來對袁世凱稱帝，是採取消極的態度。梁啟超所能够感覺到的這種稱帝的危險，馮段當然也能够感覺到。並且，帝制之後，大皇帝的位子只能交給他的兒孫去世襲，而他們却是希望世襲袁世凱大總統的位子。反人民的大獨裁者原來對於這兩大個部下的權力，仍然是吝嗇給予的。馮國璋在南京替袁世凱看江山，可是袁世凱並不放心，馮國璋的新夫人，便是袁氏派去替他作特務的。段祺瑞當袁氏的隨軍總長，可是，袁世凱却另設了「海陸軍統率辦事處」，以削弱了他的權利，又另組了「模範團」以削弱他所支配的隊伍，而當帝制運動發生之後，袁氏且索性免了他的職。當袁氏這四面楚歌的時候，馮國璋便在南京採取中間態度，一方面與袁世凱周旋，另一方面與段軍周旋，以便操縱其間，使自己形成為時局的中心。段祺瑞則在袁世凱苦愁之下再度出山，利用袁世凱的危險把段祺瑞的政權代替袁世凱的政權。有其師必有其弟，以其人之道，還之其人。袁世凱在辛亥革命時候對付滿清朝廷所使用的權術，馮國璋段祺瑞在這時候，也用來對付袁世凱了。

有一些昨天還在袁氏面前稱臣稱子的人，今天也馬上變成「亂臣賊子」了。又正如梁啟超所說：「左右難親，炎涼變態，利盡則交亡。」袁世凱既這樣對待他的部下，他的部下當然會這樣來對待他。十年之後，有一個號「蕭應宰」的，論述當時袁氏的情況，寫道：

「陳榮廷於稱帝之後，據應西南，陳官於俯跪稱臣，顧川任後，亦一電來請退位，此其時也，袁之聲色均廢，於電文讀呈之後，汗流浹背，目眩頭暈。其愚為可憐，其情亦為可憐。」

袁氏生命就於這忽促間進入了棺材（六月六日）。當然，袁氏之愚並沒有什麼可憐，其情亦沒有什麼可憐。袁世凱政治的邏輯，引導袁世凱必然走向滅亡的結局。

袁世凱——這個反人民的大獨裁者派外國反動派援助，依靠武力，依靠金錢，依靠金銀，依靠欺騙，假借「民意」，一朝權在手，荼毒人民，殺戮自由，無所不用其極，以盡天下萬子毒也已，但如今安在哉？只有人民是永遠不死的。

七 「袁世凱」的復活

北洋軍閥分裂——爬上去跌下來——

袁世凱蓋棺論定——癩國者應以為鑑

袁世凱倒了。但反對袁世凱稱帝的運動本身，並沒有解決那產生「袁世凱」這個政治觀念的社會根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剝削制度。反袁的勝利並沒有變成人民勝利的結局。運動的弱點既如前面所述。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去做這種解決，而無產階級又還沒有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由農民所組成的反袁的軍隊是掌握在投機的改良派和反動派手裏。他們所搞的，仍然是且夕開辦手為雲和殺手為雨的勾當。資產階級政治代表所掌握的武裝是弱小的，而且不是從人民運動中生長起來的人民武裝。它的力量寄托在外國帝國主義利用中國內部矛盾的援助上面（如山東的所謂「中華革命黨東北軍」依靠日本的直接援助），而不是寄托在中國人民的援助上面，因此，就絕對沒有可能有什麼真實的成就。反袁之後，武裝依然是軍閥的武裝，政權依然是軍閥的政權。人民依然被踐踏在軍閥的武裝和政權的足底下，袁世凱軍閥中的軍閥權力，變成分散的軍閥權力，事實上，當他把軍閥權力集中到最高點的時候，便已注定了這種軍閥權力之不可避免地由集中到分散。袁世凱還沒有死的時候，便已不可能挽救這種由袁世凱集中自身所造成之崩潰折的結局。袁世凱之死，只是這種變化局面的一個插曲而已。梁啟超原來所謂「朕死之後，洪水其來」，這是不錯的。但人民的革命洪水不是在袁世凱死後就馬上奔湧而來，而是——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相伴隨——還需要一個時間的積蓄和醞釀。人民嘗了滿清朝廷統治的經驗，嘗了袁世凱統治的經驗，但還需要一嘗袁世凱餘孽統治的經驗。

袁世凱這個北洋軍閥系統原來所包含的冤案與直系分裂的種子，在袁世凱死後，就日益表面化起來。先是表現為段祺瑞與馮國璋的矛盾，隨後更公開為段祺瑞徐樹錚與曹錕吳佩孚的矛盾。原來在袁世凱下而，而於直系直系之外自成一系的宣統復辟派——辦子軍頭子張勳，於袁世凱死後不久，曾暫走擔任總統位子的黎元洪，演了一幕復辟的鬧劇。但皖系段祺瑞於同意後又背約，十來天功夫，張勳這系勢力被瓦解了。山海關外吳佩孚起而為北洋派別支的奉系，則逐步形成獨立的勢力，以與皖系和直系的力量相抗衡。

黎元洪在袁世凱死後當選了大總統，實際上權力是在段祺瑞手中。袁世凱所解散的國會，又召集起來（民國五年八月一日），但被段祺瑞強迫因參加世界大戰問題所脅迫而宣告第二次解散（民國六年六月十三日）。張勳復辟事業（七月一日到十四日），利用這個機會幹起來。戊戌的君主立憲派在復辟的計劃中，實行了分裂：唐有為在張勳一邊，梁啟超在段祺瑞一邊。張勳失敗了。直系馮國璋以原來的「國會」所選的副總統資格繼任曹汝霖，段祺瑞又做了國務總理。段祺瑞藉梁啟超這人（比時稱為研究系）合作，另行選舉新國會（民國七年八月開募）。研究系雖然費了力，但這「新國會」却以段祺瑞的直轄御用黨——安福系為名，叫做「安福國會」，而研究系議員在成百個議員位置當中，不過有寥寥十幾個人做陪襯而已。馮國璋被段祺瑞所排擠，安福國會選舉了袁世凱的心腹伙伴、北洋派元老、但沒有直接軍權的徐世昌做總統，以便於段祺瑞的操縱。國民黨和南方的軍閥官僚合作，要恢復舊國會，進行了所謂「護法戰爭」，而段祺瑞則繼承袁世凱，堅持貫徹專制統一的政策。南方反對北洋軍閥——當時中國反動勢力的中心——的「護法戰爭」，在某方面說來，也有一定「進步」的意義，但因為和人民脫離，就被人民所冷淡。

袁世凱是各帝國主義在華的總工具。袁世凱死後，各個帝國主義各自找尋其得力的工具。代表各派大地主大買辦的各派軍閥的鬥爭，其背後乃是各個帝國主義在華爭奪權利的鬥爭。皖系與直系鬥爭，背後實是日本帝國主義與英美帝國主義在華的鬥爭。皖系段祺瑞徐樹錚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表現了無微不至的忠心，向日本大借款，得到了日本的武裝，組織所謂「參戰軍」，由日本軍官訓練，實際上是為的「掃蕩」反對勢力，進行專制統一。段祺瑞並與日本簽訂了所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八年二月），在日本直接鼓吹之下，參與了干涉俄國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直系和南方軍閥得到了英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以便削弱皖系的勢力。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中國在巴黎和會的失敗，激起了全國人民反日反段的運動。袁世凱死後，第一次人民的洪水真正湧出歷史的舞台了。這就是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直系軍閥吳佩孚以曹錕為首領，利用了當時人民反日反段的情緒和助力，並聯合了奉派，於民國九年七月間，一舉打敗了皖系。從這個時候起，直系便代替了皖系，在北京中央政府取得了權力。曹錕吳佩孚又繼承了袁世凱和段祺瑞，換「中央」以令諸侯，堅持貫徹專制統一的政策。

曹錕吳佩孚一方面繼續和南方作不調和的戰爭，另一方面和奉系的矛盾日

益尖銳起來。這時候，孫中山在廣東依靠舊國會的一些議員組織了「非常國會」，選舉了他當非常大總統（十年五月五日），進行和東北張作霖聯合的政策，以反對曹吳。十一年四月五月間，第一次奉直戰爭爆發，奉軍打了收仗。這進一步誘發了曹錕吳佩孚斷絕全國權力的慾望。於是曹錕吳佩孚於五月間採取了恢復舊國會（被叫做「恢復法統」）的口號，目的是一箭雙鵰：一方面迫得徐世昌下野（因為他是「新國會」選舉的），另一方面也使孫中山的地位失却根據（因為他本來是以「恢復法統」也即恢復舊國會為號召的），以便把曹錕抬上最高權力的地位。果然吳佩孚這一謀略發生了效力：徐世昌退位了。孫中山被他的一個和直系勾結的部下——陳炯明所逼迫而避難，離開了廣州。直系軍閥利用黎元洪作為過渡的總統。曹錕吳佩孚到處高壓民衆，而以十二年二月七日修設京漢鐵路大罷工的工人，為歷史上最大的罪行。十二年六月間，直系軍閥進行了「逼宮」，驅逐黎元洪。其中參加的，不但有軍警，而且也還有「公民團」。十月五日，五百幾十個國會議員們每人得了五千元銀行的支票，於是這個袁世凱的舊部下曹錕「獲選」了大總統。這個選舉曹錕做總統的國會，依然是十年前選舉袁世凱做總統的國會。這真是歷史絕妙的諷刺。「豬仔國會」、「豬仔議員」——這稱謂，就此變成了全國所咒罵的通俗的稱呼。這是舊民主主義的國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的完全的、最後的無恥破產。

曹錕吳佩孚爬上了權力的最高點，正如他的老師袁世凱的經驗，注定了他們權力很快跌下來的命運。全國人民湧起了反曹吳的運動，中國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成了這人民運動的先鋒。各反對派軍閥利用了人民反曹吳的情緒（正如吳佩孚曹錕當年利用了人民反段祺瑞反安福系的情緒一樣），和曹吳對抗；而曹吳則利用了「統一」的口號，要削平他們。十三年九月間，爆發了蘇浙戰爭。接着又爆發了第二次奉直戰爭。直系雖然在蘇浙打了勝仗，但在北方，却出現了馮玉祥的倒戈。橫行一時而自以為武力天下無敵的直系軍閥，土崩瓦解。曹錕變成了階下囚，吳佩孚變成了流浪漢。差不多每一派北洋軍閥的首領，都更番地爬上了權力的極端，而每一個都從那極端跌下來，結束了他自己。曹吳失敗後，段祺瑞又稱「執政」及其他北洋派種種的歷史，這些已經都是北洋軍閥統治的餘波。在人民怒潮的沖擊之下，北洋軍閥已是日暮途窮的了。

忘記了戊戌政變時候袁世凱的叛變、初為袁世凱職務、而反袁之後又為段祺瑞服務的梁啟超，對於袁世凱曾經還未寫過：

「袁氏自身……以為一切人類通性，惟見白刃刃波慄，見黃金則膜拜，若執此二物以臨天下，夫何求而不得者……袁氏據一國之最高權，日日以黃金誘人於前，而白刃脅人於後，務使硬制軟化一國之人以為

之奴隸。……其有能自製其弱而不甘受被利用者，則必設法屠殺之，驅逐之，窮蹙之，使其不能自存。……袁氏執政，已專用此策，以自保其勢力……及其為總統，乃益煽而揚之。……

袁氏這種政策，其實乃是近代中國一切人民的獨裁者通用的政策。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時期的政治或政治的特產。白刃與黃金——也即威脅與利誘，這是大地主大買辦維持自己統治的工具，權術與特務都必須依靠這兩項的東西運用起來，而其外國的主人則是這類工具的供給者。袁世凱及其政治的後裔「挾此二物以臨天下」，荼毒人民，戕害正義，其罪惡真是無限的。而由于人民運動的發展，袁世凱的政策後裔所採用的手段，比起袁世凱就更為殘酷，更為陰險，更為善於作偽。

袁氏及其後裔都有一種所謂「正統」的觀念，認為他們的統治系統乃是代表中國的正統，認為中國必須在他們這種「正統」的號召下實行「統一」，而不能由人民的民主主義去實行統一。民國七年，段祺瑞曾向北洋軍人發出一個密電，說他「私冀發揮我北洋同袍之實力，統一國家，奠寧宇內，庶幾人民得以安堵，法治乃得實施。」又說：「我北洋軍人分裂，即中國分裂之先聲；我北洋實力消亡，即中國消亡之朕兆。」伏願諸君子……時時以北方實力即國家實力為念，團結堅結……段祺瑞認為北洋派即中國，沒有北洋派便沒有中國。這是代表袁世凱以來北洋軍閥的「正統」觀念。民國十六年叛賣革命的新軍閥代替了北洋軍閥，新軍閥的獨裁代替了舊軍閥的獨裁，這種反人民的「正統」觀念又在新的獨裁者、新的統治者用另一種形式表現出來，以表示他們有用「統一」的名義來殺戮人民運動的權利。

毛澤東同志「論聯合政府」指出：「必須將分裂的中國變成統一的中國，這是中國人民的歷史任務。」毛澤東同志主張人民的正統，人民的統一。毛澤東同志設問道：「但是如何統一呢？獨裁者的專制的統一，還是人民的民主的統一？從袁世凱以來，北洋軍閥強詞專制的統一。但是結果怎樣呢？和這些軍閥的志願相反，所得的不是統一而是分裂，最後是自己從台上滾下去。國民黨反共民集團抄襲袁世凱的老路，追求專制的統一，打了幾十年內戰，結果把一個日本侵略者打了進來，自己也縮上了峨嵋山。現在又在山上大叫其專制統一論，這是在給誰聽呢？難道是還有什麼愛國的有良心的中國人願聽嗎？」歷史的教訓就是這樣的。

中國人民運動，中國歷史的前進，因為袁世凱及其政治後裔——這類大獨裁者的阻撓，經過許多曲折的痛苦。是的，中國人民及其世世子孫永遠不會忘記這種充滿了血和淚的痛苦。

但歷史前進的規律終究是不可阻止的。自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和民國十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中國歷史開拓了完全嶄新的時代，這是真正的人們的「洪水到來」的時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這是中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代。中國工人階級運動的發展，建設了自己的

政黨——即中國共產黨，這個黨總結了百年來人民鬥爭的經驗，在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規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政綱，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口號，規定了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和民衆運動的政策，使人民獲得了明確的政治方向，奮鬥的新步驟，發動了廣大的新形式的羣衆運動。這極大地鼓舞了民主派孫中山的革命熱忱，而且這種政綱和政策為孫中山所代表的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政派所同意。孫中山在許多失敗、挫折以及妥協的錯誤的長期經驗過程中，從此找到革命的新道路，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偉大三大政策，因而改組了國民黨，形成了第一次的國共合作，孫中山並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從舊民主主義走到新民主主義。這國共統一戰線就進行了第一次的中國大革命。北洋軍閥統治的時代就在這一次大革命中間總結了。在中國共合作的問題上，孫中山開闢了帝國主義和反動的阻撓和謗謔，表現了不顧一切的偉大的革命英雄氣概。這是孫中山革命民主主義最高的昂揚。這是孫中山的所以不朽。

是的，歷史出現了極不幸的悲劇。大資產階級背叛了大革命，依靠了帝國主義，把無數的人民網在血海裡面，建立了新軍閥統治的朝代——大地主大買辦統治的新時代。「袁世凱」穿了新裝復活了。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被踐踏在足底下。新袁世凱重覆了而又千百倍地發展了舊袁世凱在政治上的一切——其權術，其手段，其政策，其口號，新袁世凱所給中國人民的痛苦，引出中國民族的新災難，是不可計量的。但中國人民在自己的絕手——毛澤東的領導下，却超越一切險阻而前進，不屈不撓地為解放而鬥爭。十年內戰，八年抗日戰爭，中國人民經過自己史無倫比的流血，已創立了不可戰勝的基礎。中國民族必將依靠自己的力量，最後戰勝一切阻止前進的敵人，而頂天立地地站起來，這是有疑問的了。

中國人民的勝利，這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在中國的終結，這就是袁世凱的政治及其政治觀念的終結。

讓袁世凱這樣可恥的反人民大獨裁者永遠被人民所唾罵吧！讓各種形式的袁世凱政治制度和袁世凱政治觀念在新民主主義的面前永遠死亡吧！

在孫中山的革命民主主義旗幟下，在毛澤東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旗幟下，中國人民勝利萬歲！

後記

這個小冊子根據的材料，有白蕉編著的「袁世凱與中華民國」、譚彬著的「民國政黨史」、黃遠生著「王雲生編著「六十年來的中國與日本」、李劍儒著的「中國政治史」等書。主要的材料是關於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為免重複起見，文中所引材料，不再一一登記出處。

一九四五，九月

中國經濟史道路

(上)

許滌新

一 走回頭路麼？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是一條死路。這條路，不知犧牲了中國多少人民的血汗和生命。除了帝國主義者，除了援拾帝國主義者的殘羹剩飯的買辦階級和封建勢力，誰都是反對這條路的。儘管這些帝國主義者及其爪牙想把時代拉回頭去，但歷史是不會重演的。因為在客觀上，這條路沒法走下去，而主觀上，中國人民堅決地不許走回頭路。

中國經濟自鴉片戰爭以後，每况愈下。封建勢力因為帝國主義的扶持而更加加強對人民的剝削；帝國主義則掌握了中國的財政經濟命脈。中國的農民在沉重的掠奪之下，一天比一天的更加貧困；中國的工人在帝國主義的直接鞭笞與帶封建性的中國企業的壓榨之下，飽嘗了印度朝鮮工人的慘況；中國的手工業者在苛捐雜稅的榨取與外國商品的打擊之下，一天比一天的凋零下去。就是中國的工業資產階級，亦在外資的壓迫之下，喘不過氣來。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交相煎迫的中國，是一個充滿着天災人禍，民不聊生的中國，是一個普遍而深入的農村破產城市蕭條的中國。貧困、失業、破產、飢餓、疾病、死亡，就是這一個國度裡的内容。這種情形，又引起帝國主義列強，特別是日本強盜的新的進攻，於是半殖民地又淪陷為殖民地，真是如水益深如火益熾了。除非中國人民都甘於做奴隸，否則這種情形是絕對不會繼續下去的！

從太平天國運動起，中國人民就從事於推翻封建勢力與外國勢力的鬥爭了。這一次的抗戰，是近百年來民族解放戰爭中最偉大的一次。經過八年的苦鬥與犧牲，勝利終於來臨了。推翻日本強盜在華的統治，就等於擊碎了這一條鎖在中國人民身上最沉重的一個環節；而事實上，我們在敵寇的解放區

早就把日本強盜的統治，完全推翻了。截至民國三十四年春天，解放區的面積已將近百萬平方公里，人口超過九千五百五十萬了，這些解放區否定了不久以前的半殖民地經濟。不但如此，由於減租減息與交租交息的實行，地主的所有權雖然保留，封建剝削是大大減低了；農民的生活，在減租減息之後，又經過農業合作的推動，大大的改善了。在人民翻了身的地方，在帝國主義的侵略已廢除，封建剝削已減輕的地方，欲從事復辟，是不容易的。歷史上，曾經有許多以流血去鎮壓人民的慘劇，但在今天，國際的環境已經不同了；國內社會力量的對比已經起了變化了。誰想當鎮壓太平天國的漢奸劍子手會國藩，誰只有在時代的巨輪之壓榨之下斃命。

從全國的範圍來說，中國的政治經濟，的確並不完全走着上升的直線。民國三十二年一月，英美廢除在華特權之後分別與中國簽訂新約。在政治軍事上，中英中美新約的確解除了百年來加在中華民族身上的桎梏，不過，經濟方面通商口岸設廠權與採礦權等，尚未提到，而關於財產部分的某些有利於單方的權利，還在法律上給了保障。中國與英美間的經濟關係，是不能等量齊觀的。這種情形，使人們擔心，中國經濟將來不會成為某些國家的附庸。其在後方，因為物價的劇烈，因為征實征借的重負，地主對農民的剝削，不斷地在加重；押租及利息等等，無不扶搖直上，而買辦與封建混合的官僚資本之腐爛，更是炙手可熱。這種情形，使人們擔心：中國某些地區的封建剝削是否會深刻的繼續下去。

這是民族解放運動中的逆流，逆流畢竟是逆流，它是無法逆下去的。中國的人民必定粉碎強盜加在中國身上的經濟鎖鍊；中國的人民必定要求調劑中國與友邦的經濟關係，必定設法在利用外資的時候，不致再陷「太阿倒持」的覆轍；中國的人民必定要求減輕封建剝削；反對任何口惠而實不至的諾言。中國人民是覺醒了，這不是任何鎮壓與欺騙所能阻止的。

在客觀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只有使中國的國民經濟，瀕臨的破產，只有使中國的廣大民衆，過着牛馬奴隸的生活，此路是走不通的！而在主觀上，中國人民絕不允許這種情形繼續下去。這並不是一個主觀願望的問題。中國人民的有組織的力量，與倒退的力量對比，已經起了極大的變化。中國民族解放的國際國內的環境，又是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空前的有利。因此，我們可以說：這條回頭路是走不通的呀！

二 舊民主主義的老路呢？

那末，是不是能走歐美資產階級走過的老路呢？我們認爲這亦是不可能的。

因爲：

第一、所謂走歐美資產階級的老路，就是與建立一個純粹自由資產階級專政的舊式民主主義的國家。在這個國家裡，農民和其他獨立生產者，不斷地失去其生產手段而淪爲無產階級；許許多多的中小資本家，在競爭的大海中被少數的大資本家所吞併而沒落下去；廣大的無產階級，則在工廠中受到盡情的剝削；工作時間的延長，工作條件的惡劣，貨幣工資的相對的減少，都是在業工人的苦痛；至於那些被拋在十字街頭的產業後備軍的痛苦，更是不堪言狀的了。歐美的資本主義，是走這這條道路的。中國如果要走這條路，必須具備着下列一個條件。這就是中國的自由資產階級必須堅強有力；同時，國際方面必須具有這種有利於建立舊式資本主義的環境。但，可惜得很，這些條件都是很缺乏的。

先說第一方面吧，從十九世紀末葉起，中國的現代工業，即有中國人的投資，但中國的民族資本歷來就是很薄弱的。帝國主義列強都不許它發展。在國內的外國資本，壟斷了中國煤礦鐵礦以至輕工業的紡織捲煙，在國外的外國商品，又挾其排山倒海之勢，實過中國的關卡而進來傾銷。從原料資金的供應，一直到販賣市場的推銷，完全握在外資手中。日本帝國主義更加發橫，它打了一口吞下中國，欲使中國成爲它的原料供應地和販賣日貨的大市場。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時，中國民族工業雖有一個時期的發展，以後便一年不如一年了。這一次的抗戰，日本強盜又把東海沿海的民族工業，摧毀得相當徹底。七八十年的一點可憐的成就，可說是付諸東流了！看目前的

情形，日本強盜雖然垮台，它在中國淪陷區的經濟掠奪機關，不久亦可以一掃而空，但是那些在中國具有片面經濟特權的國家，挾其強大的經濟力量來與中國經濟平等，那是很值得我們考慮的。其在國內，中國的自由資產階級，基本上還沒有掌握過政權。他們是受到大地主大銀行家和買辦階級所打擊的；他們不論在政治上也好，在經濟上也好，都是顯得非常軟弱的。開同時，中國早已產生了一個覺悟了的，在中國政治舞台上表現了極其強大的，領導了廣大的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國無產階級的政治組織。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自由資產階級欲依照歐美的舊路，去建立一個剝奪農民及其他獨立生產者和盡情的無限制的剝削無產階級的舊式的資本主義，顯然是不可能的。

其次，讓我們說第二方面吧！經過這一次的世界大戰，國際資本主義將要受到若干的修正。最值得注意的是歐洲被解放的新興國家的土地改革與英美的社會改良。茲分述於下：

土地改革應以波蘭臨時政府的措施作爲代表。波蘭臨時政府的前身是波蘭的民族解放委員會。一九四四年七月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在其告波蘭人民的宣言中，提出要着手進行大規模的土地改革。是年九月初，頒佈土地改革法令，規定：除了教堂土地之外，所有超過一百公頃以上的土地，全部收爲國有；一切屬於波蘭流亡政府的，德國人的，及被法庭判爲叛國者及幫助德寇者的土地，一律充公；至於天主教及其他宗教團體的土地，則留待國會選成以後，再行決定；已充公的土地，分成不超過五公頃的單位，分配於無地或地少的農民和農業工人，領取土地的優先權則給予那些爲波蘭民主而戰鬥的士兵；土地被沒收的大地主，亦可以領到五公頃的土地，但却不是他原先的土地，若是不要，每月可以領到相當於政府中第六級官吏的薪俸。農民可以向政府購買土地，須先付現款百分之十，其餘在十年以內付清；以前本來無地的農民，頭三年付現款，二十年內償清餘額。這法令於十月十日起施行，而十月十一日，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又有「加速土地改革」的指令，並規定有十公頃以下的中農，亦可以領到土地，受到土地改革的利益的人，亦就更多了，波蘭臨時政府的政策基礎，亦就更加擴大了。而爲了更順利的推行土地改革，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改組農業部領導機關，設立省和縣的土地改革專員，其任務是在當地議會的支持與參加之下，在最短的程序中，進行土地改革。在十月十日及十一月十日的一個月內，波蘭解放區內已有三百六十五處的地產（佔應分的總地產三分之一）已經分配給農民了。結果，四萬農

民及佃農就分得土地。至十二月初，單單別洛托克一省二百二十六處地產（共三萬二千公頃），已有二〇六處（二萬五千公頃）的土地分給農民了。在民族解放委員會改爲臨時政府的時候（十二月三十日）已經有三十萬家農民分得土地。一九四五年三月中，波蘭的赤洛比週報說：

「波蘭九百萬貧農，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變爲豐衣足食的公民，這是波蘭人民歷史中未有過的奇蹟。」

這實在是奇蹟。在日下，歐洲解放國家中，波蘭以外，民主的匈牙利亦進行着土地改革。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匈牙利臨時政府成立。過幾天，農業部長那吉就宣佈要實行土地改革，使土地給予匈牙利鄉村千百萬小農和貧農。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七日，匈牙利臨時政府正式通過土地改革法，規定由國家建立基金，以分配土地給貧苦和無地的農民。這項基金將由沒收的土地，根據法令所買的土地和屬於國家的土地構成的。一切戰爭罪犯，賣國賊和敵人的土地，不論財產大小，一概沒收；凡超過五十七公頃的大地產，不論屬於私人或教堂，將被全部沒收；對於農民私有的大地產，法令規定最高限度爲一百四十公頃，但在反對德國及國內法西斯鬥爭中有特殊貢獻的人，則原有主可享有七十公頃的土地。凡分得土地的人，將對國家付出等於其一年純收益的二十倍的價金，這價金可用實物或現款交付，在十年至二十年中分批付出。這項改革將於本年四月至十月間實施完竣。隨着法令的頒布，各鄉村先後設立「需要土地的農民委員會」。土地改革的浪潮，廣泛而深入地淹沒匈牙利澎湃起來了。

東歐其他國家，如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以至意大利，亦都先後實行這一改革。在其具體辦法上，在改革的程度上，各國雖不盡同，但基本上大家都是朝清耕者有其田的道路走的。耕者有其田的意義，在於徹底清除農村中的封建剝削，提高農民的生產興趣與生產能力，使農民都能成爲豐衣足食的獨立生產者，而這一點，又正是城市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前提，因爲農民的解放，使工業獲得廣大的國內市場。這從民主主義在經濟方面的澈底的實施！

其在英美，經過二十餘年的騷動、恐慌和二次大戰的教訓，這二國的開明的人士，亦都認爲原封不動的照老樣子是不能維持下去的。在這裡，做得較好的，要以羅斯福及華萊士等所領導的新政了。

羅斯福的新政的主要內容，是取締大銀行的投機操縱，限制工業托辣斯的壟斷控制，給與中小生產以發展的機會；同時，向富人征收重稅，以救濟

人民的貧困；舉辦公共事業，相當地減少失業工人。喻文人口的 T. V. A.（即單納西流域管理局），就是國家計劃的大工程之成功例子。T. V. A. 以政府的力量來管理一條河流，根據精密的科學技術和靈快的通訊，使整個河流的雨量積流能迅速報導到管理中樞，復由中樞流至各閘，使每一段河流的流量，保持一定量的水準。這麼一來，改進了航運，便利了灌溉，並產生了大量的電力。過去經常泛濫爲災的單納西河，從此得到控制，並成爲新興的工業區和農業生產的樂園了。這和工程，解決了許多農民的農作，解決許多工人的工作，並增進了美國的龐大的國富！

羅斯福不但做了許許多多有利於人民的事業，並且提出了一個經濟改革的綱領來。這就是在一九四四年一月間他致國會咨文中所提到的「經濟的人權宣言」。他說：

「吾人業已認明一項事實，即如無經濟之安全與獨立，則個人自由，決難存在。貧窮者並非自由人。」

這是很正確的，沒有經濟上的平等，就無所謂政治上的平等。因此，他進而指出這種經濟安全與獨立的内容：

「在國內商店，農田或礦場，獲得既有利益且有利之權，有賺得足夠之生活費以供衣食娛樂之權；每一農夫生產所得，足使其本人及家屬獲得適當生活之權；每一商人，不論大小，有免受國內外不公競爭，而得自由交易之權；每一家庭，有獲得適當居處之權；人民有獲得適當醫療及發展享受健康機會之權，免受經濟恐慌，老年、疾病、意外及失業，而有充分保障之權。此各權利均所以產生安全者。待此次戰爭勝利後，吾人必須準備邁進實現此各種權利，以達到人類快樂與幸福之新目標。」

羅斯福的這種經濟上的人權宣言，是照顧了各階層的人民的，特別是中小生產和勞動者的利益。這種精神，分明與舊時那種扶植獨占，扶植資本集中的路途，大大不同的。可惜的是，這位巨人在德國大崩潰之前夕，溢然長逝了，美國今天的當局，是否願意承繼羅斯福這種偉大的精神，是否願意繼續羅斯福所舉行的新政，我們是不敢肯定的。但，無論如何，羅斯福的這種方向，乃是美國人民大眾的方向。他的新政，縱然可能被中斷；他的經濟的人權宣言，縱然可能被人束之高閣，但美國廣大的民衆，必定在他的感召與指示之下前進！他的主張，遲早必定會成爲事實！這是可以斷言的！

富於保守性的英國，亦着眼於戰後的社會改良。一九四四年九月，英政

？ 麼 甚 了 取 換 ， 血

——者死悼，者生致——

蘇 蘆

上距段祺瑞政府在北京處殺徒手請願的學生與人民的十九年之後，昆明各校同學因為憂心內戰，呼籲和平、民主，在學校內舉行時事討論，軍政當局却以大批軍隊加以包圍，且與同學之討論同時，機關槍、小鋼砲夾雜齊鳴，官家的宣傳大日又誣為「匪警」，昆明同學因為集會自由被侵害，軍隊之包圍、恫嚇，官方通訊社之誣蔑，乃於二十六日罷課，軍政方面乃施以殘酷之鎮壓，在木棍、石塊、槍刀、手榴彈的屠殺下面，已經有四人死去，受傷者達十餘人，傷亡者中間有青年學生、中學教員、勸業的教授，救傷的護士，昆明同學已經用他們的受難與傷亡，揭發了內戰挑唆者的野心，陰謀者猙獰殘暴的面貌。

死者的屍骨未寒，活著的創痛猶新，在我週遭目擊到的是燃燭的憤怒，無淚的控訴，陰謀者侮罵死者、構陷生者的卑劣行徑，論客們偽善的營營呻吟。

魯迅先生曾經把段祺瑞處殺人民的「三一八」叫做「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我們雖然沒有目擊到當時段祺瑞政府的暴行，但死難者的英勇曾經教育我們，死難者的血曾經浸透過我們，當想到這種「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有，便是在人類世界也極少有的」殘暴險狠的行爲，我們仍然是和當時的請願者同其激越，和受難者同其憤恨的。我時常想，爲甚麼當時的統治者如此惡毒卑劣，在堅不可拒的人民意志之前，要作這種險狠但却徒然的掙扎呢？不料泊乎末世，卑怯者的殘橫更超越了當時的段祺瑞的政府。如果魯迅先生還活著，一定會覺得當日稱爲「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的「三一八」，雖屬空前，却未絕後，段祺瑞的衣鉢是由他們的箕裘克紹的孫子們發揚光大了。

在生者的創痛，死者的血痕前，段祺瑞政府的一切聲聞，爲着粉飾這種血漬斑斑的暴行，是說這些學生和人民不該在街上遊行、請願、「自蹈死地」，所以這些人有「可死之道」；而今天，昆明受傷和死難的同學，却是既未「遊行」，也非「請願」，自然就不會是「自蹈死地」，但關着校門討論也竟然勞動了武裝包圍，用機關槍和小鋼砲的聲響來和討論者的聲音競賽。恫嚇還嫌不足，於是拿出了槍刀和手榴彈。傷亡者雖然未「自蹈死地」，但死亡的恐怖却由罪惡的黑手帶給這些手無寸鐵的青年；這些被難者真可說是一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不知道這一代的青年「三一八」的死難者更爲命薄呢？還是今天這些殺人者的險狠已經超過段祺瑞了？

如果段祺瑞當時是用的手槍和木棍，宋哲元用的是大刀和水龍，而這一次的受難者不僅聽到了機關槍和小鋼砲，而且也嚐到了手榴彈的威力；而這些鋼砲、機關槍却正是盟邦援助我們，要用來保衛人類的民主自由而戰的。我想，一定有人覺得如果有原子彈的話，是會更加爲驚駭的。其實，這並不希奇，這自會國蔣起，這種借重洋槍、洋砲來對付中國人民的事，就已經開始了。

那些持着帶血的屠刀的，其面目固然猙獰險惡，那些嗚咽噁道的幫兇們那種良知泯滅的行徑，尤其令人感到可憎可怖。構陷生者固然毫未懈怠，侮罵死者也從不放鬆的。至於另一些偽善者，雖然披著裂

府正式頒佈了一個大體上採納比維里琪 (C. W. ...)

的計劃而略加修改的社會保險方案白皮書，並表示將於可能的最短期內，採行立法手續，成立一個社會保險部，負責執行計劃中所規定的在戰時便須實行的部分。這個白皮書的計劃是全國性的，它根據比維里琪的報告，把全部人口分爲六類，第一類是雇員；第二類是自有事業的工作人員；第三類是主婦（包括在家庭外工作者）；第四類是已達工作年齡而無職業者；第五類是未達工作年齡的兒童；第六類是超過工作年齡而退休者。爲這六類人所分別規定的權利，包括失業津貼，疾病補助金，殘廢津貼，家庭津貼，退休金，此外，對於生產、死亡、寡婦、孤兒、職業訓練亦有補助的規定。所有各種津貼，除家庭津貼一項外，都是照總費的，據計算，失業津貼費用的三分之一，其他各種津貼的六分之五，是由繳納而來的，不足之數，則由租稅補足。故上列六類人中，經營納稅的，只限於前三類。這三類人經常繳納之款，約達二萬八千三百萬鎊，佔實行全部計劃每年總支出的一半弱，其他一大半就由政府撥款了。邱吉爾稱這個社會保險計劃的目的，是要把「國家強迫保險制度推廣到各階層，應用於自捕鯊起至墳墓止的各種用途」。

英國這種大規模的社會保險計劃，目的是在緩和英國的社會矛盾。它並沒有絲毫動搖地主貴族與獨占資本的經濟特權，主要是用勞工及自由職業者自己的血汗錢，去保險自己的失業、疾病與退休。較之美國的新政，是不能等量齊觀的。此次大選邱吉爾之所以下台，恐怕是保守黨的對內的社會經濟政策不爲民衆所擁護吧！

英美以外，新興的法國，正在激烈地籌辦那雙通敵賣國的托辣斯獨佔資本。這些民族叛徒的財產是嚴格地沒收了的。在這種情形之下，過去操縱

裝，戴着木魚，但却是每一個毛孔都藏着毒箭，準備隨時向那些死去的戰士，活着的青年射去的。他們對這些活着的和死去的青年製定的罪名，不就是「陰謀份子」，「助長內亂」嗎？其實，這一切審判的陰謀，放佈的流言，也還是服用段祺瑞等人的故伎的。當時魯迅先生也指出過：

「這是中國的老例，讀書人的心裡大概含着殺機，對於異己者總給他安排下一點可死之道。就我所見而論，凡陰謀家攻擊別一派，光緒年間用「唐黨」，宣統年間用「革黨」，民二以後用「亂黨」，現在自然要「共產黨」了。」（華蓋集續編）

這種傳統的故伎，在二十年後，似乎並沒有多大的改變，而這一切的企圖，不過要抹煞活着的和死者純真的願望，對民族的忠貞，他們所吐露的人民的願望，從而證明其「死有應得」而已。

這些「可死之道」之一是說：「青年關心國事，過問國事是應諱的，然而應該首先考慮用那種態度去關心國事，用那種方式去過問國事，必須選擇一種最正確，最有效的方法，走最坦蕩最安全的道路。」「甚麼才能算是「最正確」、「最有效」、「最坦蕩」、「最安全」的方法與道路呢？論客們沒有指出一條「官定」的道路，自不便妄加揣測。但這次昆明各校同學，在學校舉行時事討論，不僅有學生，而且也包括了學校的教授，這算不算「正確」而「坦蕩」呢？難道這不是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應享的基本自由嗎？這不是政府會一再宣稱，要尊重和允諾的人民的自由嗎？如果說青年不該「反對內戰」，那嗎，違反人民要求民主和平的意願，企圖摧殘人民的勝利果實而蓄意發動內戰的人們，不應該深夜們心，激發一點未盡的良知嗎？如果說：他們不應熱心國事，那我們要問：誰使得他們如此焦慮，而不能安心學習呢？如果說這些青年同學有甚麼錯誤，那該是他們太以自己純潔的心情來揣測那些陰謀者的奸詐奇詭了。如果說「集會討論」還不是「最坦蕩」、「最安全」的辦法，那也只能怪他們太真誠，太純潔，因為他們太相信民主國家集會自由是最起碼的自由了，把那些信誓旦旦的尊重人民自由的話太當真了。但這些同學受難和傷亡，不正揭露了一切陰謀者的面貌，辨別了一切善惡和是非嗎？不過，為這番慘的經驗和教訓，而付出這樣大的血的代價，這代價是沉重的。

我起，假如中國只剩下這些陰謀者的嗚叫，槍砲的轟鳴，和一些蟲蛆似的幫閒的嗚嗚嗚嗚，雖然聲聲欲碎，然而又是如何寂寞而荒涼的國度啊！

幫閒者的嗚嗚嗚嗚使人麻木，槍砲的轟鳴使怯懦者失魂落魄，陰謀者的詭譎使樸樸者吃苦受難；而這一切，又將使人覺得週遭的鬼氣陰森，涉足的並非人間。但幸而還有這些不屈的靈魂，年青的生命，發出響徹一切的嗚呼。先，他們也許如行荒原，聽不到四周的回響，他們也許會被扼喉嚨，他們的聲音也許會變成嘶啞，但他們的辛勤沒有白費，他們呼喊的聲音將會使戰鬥者堅強信念，頑強者鼓起勇氣，怯懦者獲得希望。

死者的血是不會白流的，他已經浸透和哺養了同時代懷着同一信念的人。死者已出他們的生命來敲開了民主中國的大門。

對於那些卑怯者的殘廢，我無法抒寫我的憤恨。對着那些已死的戰士，活着的還在戰鬥的時代的青年朋友，他們的行動已經是深深印在人心，而又明白的昭告了一切了！我能夠說甚麼呢？十二月七日於雲南大甲吹擊中寫於橫目村

法國財政經濟命脈的二百家金融寡頭，是一定會喪失其斷斷續續的能力的。沒有通融的獨占資本，不能說完全沒有，但經過這一番清洗，法國國民經濟的面貌，必定會煥然一新！經濟上的民主，必定逐步地在事實上呈現出來！

這些老牌的本主義國家，為什麼要加以修正，加以改良或緩和，這並不是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的愛好摩登，而是痛苦的事實使他們不得不如此做。要減輕經濟恐慌所引起的影响，不稍加改良是不行的；要緩和國內的社會鬥爭，不稍加改良是不行的；特別在這次戰爭中，沒有依靠人民，沒有動員人民，就無法取得勝利，而要依靠人民，要動員人民，就只有適當地改良他們的生活，或給與他們以一點保障。這就是說，過去那種盡情壓榨，不顧勞工死活的道路是沒法走下去了。

這是一個人民的世紀，舊日意的獨占資本金融寡頭，和那些與法西斯侵略者勾結的投降國家的大托辣斯，是被人民判處死刑的。英美的資本主義正在設法修正；歐洲的被解放國家正在大踏步地進行土地改革。這一切，證明舊式資本主義的舊道路是不能繼續走下去的。在這個國際環境中，試問中國還能走着人家現在正在設法修正的舊道路麼？何況中國的純粹的自由資產階級本身十分軟弱？何況中國國內的社會力量已經起了極其明顯的變化？

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中國經濟建設的道路，必定不能走着歐美的舊道路。

（未完）

土地與革命

土地與革命

瓦爾加作

東歐若于解放國中本年所進行的土地改革，是有最大的社會政治意義的事件。

所謂土地改革，就是意味著要消滅自中世紀以來一直保存到我們今天，而且在社會生活的各方面都烙了印的封建奴隸制度的殘餘。土地改革是要根絕反動勢力最堅固而最重要的柱石，為事實上至今還沒建立政治生活之民主形式的各國社會制度的真正民主化掃清一條大路。

自然，土地改革與解放人民之民主力量勝利的不可分割的聯系，是由其本性而產生的。在土地改革中所消滅了的大地主的財產，實質封建制度及貴族地主階級對社會其它一切階級公認宰治的封建關係的遺物。

地主土地私有的獨佔，這種制度是在國家社會貴族地主政治權力的維護之下產生，其後並在許多世紀以來由它來支撐的。

在十世紀以前，當歐洲人口還不甚多的時候，土地所有者階級用強制手段把勞動力固着於土地。當時人們認為寶貴的，不是土地，而是耕種土地的人們。據當時的記載，當時說到土地所有權的轉讓時，地界祇是大體上做一計算：如「由河岸到山岳」。後來才詳細地測量每一塊地。農民或手工業者所有耕種的莊園的面積，同時根據他的熟練的程度而規定，什麼工作他應完成，並且他必須於每年繳納多少東西給自已主人。土地是非常多的。但為便農

民不脫離地主的統治，同時使農民不能在離開自己所有的土地後而獨立生存，一切土地都被宣佈為貴族地主的私有財產。

「普天之下均為地主土地」，這就是封建制度基本的權力原則。封建奴隸不僅必須利用他原始的生產手段去耕種地主的土地，並且要把他從自己耕種的土地上所收到的大部分農產品繳給地主及教會。封建社會制度建立在農民的人身的隸屬及人身隸屬於土地的關係之上。農民被認為是土地的附屬品而附屬於土地。

跟着交換的發展與資本主義關係的發生，封建制度的上層建築與社會的經濟基礎矛盾起來了。封建農奴制的壓迫，使農民不堪忍受。在向農民掠奪生產品而且直歸地主及其家臣消費的時候，封建的剝削比較地還有一個狹窄的經濟的界限。地主除消費而外，向農民掠奪更多的東西是沒有意義的。但這個界限被打破了，農業生產品變為商品的可能性發生了。地主向農民徵收日益更多的農民勞動生產品。農奴的地位日益惡化了起來。

現在我們可以趁這個機會想一想那生活最壞的波蘭的農民。在五世紀以前就有一句俗話：「波蘭是不問農民的疾苦的」。由十三世紀到十九世紀這期間，農民在接連不斷的無數次農民暴動之中，都是想掙脫細縛他的那條鎖鍊。這些暴動屢屢被慘酷地壓下去了。但他們破壞了封建統治的基礎，準備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跟着資本主義關係發展的程度，勞動力對土地的依附，變成了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障礙，農民對地主的封建依附在各國逐漸衰落了。

但封建農奴制形式上的廢除，這祇是在它與大土地所有制的消滅連系着的時候，才是意味着農民的經濟政治解放。譬如十八世紀的法蘭西革命

，便是這樣的一個結果。凡是農奴制的廢除並沒有一道兒消滅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地方，地主的權力還是保存着。比方意大利、普魯士、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西班牙以及帝俄的情形就是如此。貴族地主以及和他們接近的上層金融份子共同攜起手來繼續掌管着這些國家中的對內對外政策。

貴族地主由他們當中推選出了官廳的頭目：部長、將軍、國家機關的領導人。在鄉村之中，有地方政權，憲兵及學校為地主服務。所有這些在人民面前代表國家政權的人們，都唯地主的馬首是瞻，或則與他們有密切的關係。在普魯士甚至到本世紀當中，還有所謂「地主公社」，包括了每一大塊土地所有者的「自由的」勞動力。在這些公社之中，行政權司法權及裁判權均歸於地主個人手裡。在審訊案件時，他本人就充任法官。不難理解，在大地主掌握了一切權力的條件之下，人民一切形式上的民主權利，祇是自紙黑字而已。舉例來說，在這些國家之中的議會的選舉，因為是關係到鄉村大多數的農民，簡直是一個把戲而已。儘管是「秘密」選舉，農民及農業工人也不得不選舉地主命令他們投票的人。

甚至在傳統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英國——之中，與大資產階級有密切關係的地主們，直到今天還保存着很大的政治影響。英國首相格蘭特，在一九一〇年以前說：「下院就是地主院」。哈克斯在他於一九三九年出版的書本很有興趣的書「議會的民主議員」自信地證明：保守黨的決定作用，屬於地主階級。自他證明：保守黨的決定作用，屬於英國上層地主貴族之家的少數人。下院保守黨的大多數以及保守黨政府的部長們，也屬於這一門閥。拉斯金教授在「一八〇一年到一九二四年英國內閣人員」書中指出，由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一六年這十年當中，五十一個部長之中，有二十五人是貴

此外，地主在上院也佔壓倒的優勢。

不久以前，英國大選時保守黨的失敗，證明保守黨的觀察者之中，也有更明理的觀察家承認：人民再也不想當少數人有這樣大的政治勢力了，因為這些人與人民大眾不同，他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環境中，並不關心人民們日常的生活和利益。

俄人皆知，英國是第一條走上工業發展之路的國家。農業在英國已居於次要的地位。在經濟政治關係都落後的國家則是另一種情形。在這些國家之中，農業是絕對多數人民大眾生活的泉源。毫不奇怪，在這些國家之中，大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在國家社會生活方面立於統治的地位。它是政治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當中的柱石及基礎。

當然，希特勒集團，已差不多把大地主所有制完全佔優勢的歐洲國家都併吞了。法西斯黨到處與大地主所有者發生了密切的關係。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黨，就是借用暴力與恐怖而開始了他的活動，解散了農業工人的組織，以保護北部意大利大莊園所有者的利益。

在德國，東易北河的貴族地主，在希特勒暴政的醜聞、存在以及他們所蓄意進行的罪惡的侵略戰爭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這個，祇要我們記得希特勒的當政，是得惠於一個貴族階級的首領奧登堡的直接幫助就夠了，他恐赫與登堡老人說，什列伊哈爾打算給東易北河的大地主以一個打擊。

至今存在於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還是以反對的大土地所有者為靠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實現了人民的民主國家的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等國，土地改革完全是在另一種條件下實現的。首先在這些國家之中，在他們的歷史上破天荒地成立了能夠保護人民利益的國家政權。在第一次世

界大戰之後，甚至在那些已經宣佈了某種形式上的民主及普選權的國家之中，當時還仍然是地主銀行家的國家。但現在則不然，在這些國家之中轉而立民主政府，則是由人民建立，並獲得廣大人民階層方面的協助的，如農民、工人、知識份子、手工業者、商人及工業家的援助。在民主方面的這種決定推進，便把它的烙印烙在土地改革之上。

現時的土地改革，是包容一切的，全面性的。其特點如下：

照例地，凡是屬於大地主所有者——地主——的土地，都交給勞動的農民，然而過去，所謂沒收土地，祇是沒收了地主的很少的土地。

現時的土地改革，整個的是為了全體農民的利益而實行的一種改革。因此，對地主的土地與農民的土地，有截然不同的態度。農民的土地，縱然它已超過了農民及其家庭所能耕種的限度以外，仍然留給農民，但如地主，雖然他也是擁有這多的土地，則予以沒收。

在實行土地改革之際，應注意土地改革的那些人們的立場。凡被捲出祖國，與希特勒佔領軍合作而為害本國人民的地主，其土地均無報酬沒收。至於參加過抵抗軍的解放鬥爭並有相當功績的地主，則其土地仍可有一部份留給他，（比如在匈牙利，則留給他的土地可到三百畝）。在分配土地之際，那些在抵抗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解放戰爭中助功卓異的農業工人及小農，均享有特權。

土地改革是着眼於農民的利益，而不是像在第一世界大戰之後着眼於地主的利益，所以，地主所收到的賠償的數目，並不是由大地主所有者所存積斷而故意抬高的地價而規定，而是以勞動農民即新的主人所能負擔的數目來決定。這個就是說，在土地改革中分到土地的農民，是在最優宜的條件下

去使用這些土地。他們對地主所付之款，比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少至不可限量。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國家付給地主的賠款，不僅非常之高，而且完全是壓在取得土地的農民的肩膀上。

現在，農民不祇是付給國家很少的地價，而且這筆支付的款子，還不是在分到土地後就一下子付給，而是經過相當時期，即是說，在他們已經把土地經營的很有條理之後才付這筆債項。

上述各國的民主政府，在保證農民以生產手段方面，也採取了一個嶄新的政策。這個問題，現在已不是推給每個農民個人自己去解決的問題了。這是國家的任務之一。許多生產手段如牲畜及機器等等，在戰時及德軍佔領期間宰殺和毀壞了。其次有些機器，不是在小田園上可採用的。國家對農民所使用的農業機器、農具、以及其他生產手段的裝備很關心。國家很注意現有的生產手段能很好的加以利用。它同時也鼓勵農民們聯合到集體的組合中去，以便共同消費其生產品，共同購買都市工業的製成品，以便消滅用限制從中取巧的投機商人。

國家注意的另一件事項，就是使農民在得到新的土地後，也能夠得到低利息的貸款。同時，利用這種方式，保護農民不至受到高利貸者剝削重利的危險。總之一句話，凡是可以帮助農民在經濟上繁榮興盛的事，國家都已做到了：不祇是利用土地的分配，而且還利用國家所有的其它一切設施以保護人民的利益。

土地改革的實行，東歐許多國家的整個面貌根本改變了。農民的生活狀況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舉例來說，在匈牙利，在改革以前，一八四個地主有九六二、〇〇〇畝土地，八六九個地主——一、三六〇、〇〇〇畝，三八七六個地主——一、

五三〇、〇〇〇畝。但現在，土地到三〇〇畝的大農莊祇有十三個。這些土地是留給那些在反對德國法西斯及其匈牙利門爭中卓著功績的人們使用。在匈牙利全國，被沒收及用於購買的土地，約有四百萬畝地主的土地。六十六萬一千貧農之中，現在分到土地約有一七七、七九〇個農業工人，五七、一二七個佃農，三三、二八〇個土地很少的農民，二二、九三四個小土地所有者及一五、一六五個農村的手工業者。每一箇新的田主平均得到四、五——五、五畝土地，足夠維持一家四——五個人的生活。結果，匈牙利的土地改革，使匈牙利農村不患不均了。過去的幾千個封建大地主的土地，現在是由幾十萬農民共有了。

在波蘭，十五萬戶沒有土地的農民及僱農，在本年已第一次不是種植主人的土地，而是自己的土地。在過去二十多萬土地少的農民，增多了許多土地。結果土地改革，得到土地的人，連他們家眷算在內，共約有二百萬人。

德國的土地改革問題有些特別。在三強領袖柏林會議關於德國經濟原則的決定中說：

「爲消滅經濟上過分的集中，特別是加特爾、摩狄加、托萊斯以及其它獨佔協定起見，德國經濟在最短期間就應實際上加以分散。」

難道能懷疑德國的大土地所有制是獨佔組織之外而在政治上爲德國最大及最強的經濟力量的集中形式嗎？

聯合國爲完全根絕法西斯主義及納粹主義而定的任務，同樣也要求消滅法西斯主義的經濟基礎。但在經濟基礎之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容克的土地所有制。在對給波蘭共和國的領土之上，德國容克世家的大莊園消滅了。但是在留給德國的領土之上，大的容克土地所有制仍爲一個大的危險的反動

力量，所以祇有這種力量的消滅，才成爲未來的民主德國的一個前提。除財政獨佔者蘇頭商外，容克地主也是希特勒德國的真正主人。他們老早就意識到侵略的挑釁者和仇視人類的狹義愛國主義意識的承擔者。地主的大地產充當了德帝國主義的支柱。

所以，用不着驚奇，現在，德國民主的反法西斯人士提出了一個必須實行土地改革的問題。這種改革，一方面，必須消滅它最重要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要滿足農民以及由鄰國遷入德國的德國人的土地慾望。祇回憶一件事就夠了，比如在勃蘭登堡省，適於耕種的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就爲大地主所操縱。在布羅斯勞邊區，一〇六、七八八公頃適於栽培的土地，其中七一、三〇八就由大地主所把持。地主實行怠工。在這種情形之下，舉例來說，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三十二，現在就荒蕪着。」

在新的民主的德國，不容構成着魯士軍國主義骨幹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和容克階級的存在。德國土地改革的實行，實國家真正經久的民主化的必要條件。同時，德國容克封建主大土地所有制的廢除，可給國際範圍的反動力量一個嚴重的打擊。

自然，大土地所有者是不甘心消滅他們一千年的統治的。對的，他們在人民黨中數量很少，不能單獨進行鬥爭以抵抗民主的人民政府。但他們也不祇一個人。各國的反動勢力都站在他方面。他們在各階層人民當中，散佈着公開的和秘密的走狗。這些走狗隱藏在都市大財主們當中，而地主就利用工商及信託企業和他們的家庭取得聯繫。工業利潤的過渡者，在國家機關當中，有許多官吏，有的是出身於大地主，有的是在物質利益方面和他們有連帶關係。最後，地主在鄉村的上層份子之中，也找他的走狗。

反對土地改革的鬥爭，是利用種種方式進行的

。某些農業「專家」抱怨說，大地產的分散，必引起農業的退化。地主在鄉村中的走狗惡毒地加土地改革的發展及農業工人說，地主在將來要向他們報復。舊行政當局的官僚們，則竭力拖延改革，希望來一次政變。

反對土地改革的行動，往往採取着殘酷的政治鬥爭的形式。舉例來說，前波蘭流亡「政府」爲保衛大地產的利益，就與波蘭臨時政府鬥爭，利用法西斯的煽動及對波蘭愛國份子卑鄙的暗殺手段，挑撥民族的和沙文主義的動機。

在另一方面，跟着土地改革的實行，成千成萬的農民及農業工人第一次參加了政治生活。這意思是說，他們過去地主統治的國家之中最廣大的民主人士的覺醒及組織。成立了上萬農村委員會去幫助民主政府實現土地改革並肅清反動力量。全面的土地改革，它本身徹底消滅了幾千年來地主的統治。甚至至今還不知道狹隘的表面的民主的東歐和中歐的國家（但在其它國家之中早已實現，並有依特落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公開或不公開的反動的統治），其新的民主制度鞏固的保證就在這裡。

同時千百萬農民大眾許多世紀以來關於土地所做的夢的實現，很顯明地特徵了這些在東歐解放的民主的收穫，如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廢除以及廣大農民羣衆的分得土地，在歷史的斤兩上，是比外國報紙上連篇累牘的關於民主的無數抽象的哀傷更重至不可限量。至於對人民的民主國家或解放國家所實行的「專政」，那麼這種誹謗，在不久的將來，最好也不過是一種盲目的驚人的果實。但土地改革的實現，將永遠是歐洲進步史與歐洲民主史上重要的一章。

歐洲若干國家之中的土地改革，喜愛好自由的人民在世界大戰中粉碎了法西斯奴隸主後最重大的收穫之一。它是這些國家人民民主的獨立及鞏固的基石，是保證各民族人民自由與各民族人民間的和平事業方面重要的因素。



晉察冀行進

在煤井裏

周而復

回到政治部第二天，恰巧是靈山鎮的集市。我久就想到靈山去看看，這天政治部的一位張教育幹事也要去有事，我們兩人便騎上馬，一同走了。

政治部去靈山，以二十里地，又是沙灘，越過一個小山，便放開馬，一會就跑到。集上人果然不少，黑壓壓的一片，遠遠就傳來集上叫賣和談生意的煩躁的聲音。

靈山鎮是曲陽的首鎮，在一九三八年，鎮上還有電燈，後在反掃蕩中被敵人破壞了，房子也燒掉不少；正因為是一個火鎮，雖然燒了一些，大體上還保存舊的面貌。靈山之所以大而富庶，因為它是在礦區的中心，周圍的村落有許多人工開採的煤礦。

在集市上繞了一圈之後，我提議到煤礦上去看看，張幹事願意充當我的嚮導。他在這一帶是很熟悉的。他帶我到離靈山五里地的一個老礦去。到了那裏，正好遇到白陽縣工人救國會的主任，他是到

這個礦的分工會來有事的，在縣工會領導之下，每個煤井有分工會，設主任，組織幹事，宣傳幹事，勞動保護幹事，教育幹事，抗戰動員幹事和青年幹事。分工會主任脫離生產，他的工資由礦方照付，每五個工人為一小組，推選一個組長來領導。工人自己救亡室，歌詠團，歌隊隊長（這是準備和別的井上工會在一個開會時，叫對方唱歌的），縣工會有一個留聲機，經常輪流到各分工會去唱；有時井上的工人，下了班，就擠到縣工會的小院子裏來聽留聲機，大家談談笑笑，然後才回去吃飯。

我們一到那兒，就被工人圍攔起來，坐在櫃檯裏的經理也跑過來招呼，東一句西一句，不知回答那邊的談話是好，寒暄了一陣之後，我提議先下井去看看再談（因為怕晚了，井裏的工人下工）。縣工會主任一聽說我要下井，他就拍胸脯說：「好，我陪你下去。」但是經理不同意，他伸出那隻雪白多肉的手阻止我，說：「同志，去不得，有危險

，出了事不好辦，……。」我是了解他的好意的，如果真一出了事，他怕負責任，實際上與他無礙。

危險，也許有，但是工人都不怕危險，我怕什麼呢？我轉過來，問張幹事他去不去，他也願意去，我們被縣工會主任和分工會主任帶到一間小房子里去，他們拿過幾套下井的服裝來，我們脫下身上衣服，穿起毛涼氈（是一種粗麻織的背心），用大包繩兒，（拴毛涼氈的束腰）把腰束好，繫上麻織的毡帽，我奇怪帽子為什麼這樣厚，這樣重，戴在頭上沉甸甸的。分工會主任告訴我，因為在井里時常有煤渣子落下來，戴下這帽子就不易打破腦袋。

穿好衣服出來，工人們都笑我，雖然是一個工人了，其實不然，我的臉和手證明我都不够資格成爲一個勞動者。走到井邊，一共有兩口井，一是上井，一是下井，下井是通風和出水之用。提提的工人見我們打扮好，他揀了一個篋子掛上，並且教我如何下去：應繼，用左腿站在篋子里，右腳在外邊抵着，以免打轉，那台發聲的，兩隻手抱着繩子。我按照他的指示，站到篋子里去，他在上面慢慢把我放下，像是坐電梯下樓似的，黑烏烏的，什麼也

看不見，也沒感到常，一會便到了，這是第一棚，那兒有一個火窩子，旁邊蹲着一個人在看火。因為風小，不易撲滅，所以在上井燒火，以吸下井的風來。看火的看見我，連忙扶我出來，他告訴我，這是第一棚，每棚二十丈深，還有四棚才能到出煤的地方。於是又到另一個井口，跳下簍子，比上次熟練了，一棚一棚，一直下到底層，這時我們離地面已是一百丈以上了。而離地面的井口也有一二里了。眼前一片黑暗，慢慢定下來，才又看到前面是一條深遠的甬道（就是路）彎彎曲曲地遠下去，左右疏疏落落放着一些燈籠，——五步左右，便有一盞。甬道不高——一個人都不能站起來走，要弓着背走，甬子頂上是用荆條編製的棚架，防止泥土落下來。迎面走來一個攆筐的工人，赤身肩背挑着兩筐煤，手裏拿着一個柱頭兒（小棍）在一步步走來。

甬道子走下去，一共有五道礦，煤層很富，出產保險道，青干柴，紅毛渣子，乾子地，中解渣子，老坦等有烟煤和無烟煤。每天分四班下井，就是：稍明，送黑，宵中，夜班，每班工作六小時，九十三人，出煤二十斗（每斗二十斤）即算完工。每班工人是：打鑛的十人，攆筐的三十二人，攪把的四十二人，半鑛工的三人；料理筐的四人，澆水的二人。

我參觀完了煤井，在甬道那兒，工人都把我圍了起來，要我給他們做一個政治報告。這實在「吓」了我一「軍」，我實在沒準備這一套，但盛情難却，便給他們約莫談了一下當時的政局形勢。講完以後，我反過來問他們：「八路軍來了以後的生活，和以前有什麼不同呢？」

他們告訴我，首先是工人有自己的組織，給自已說話辦事，工會，改善了生活，還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娛樂各方面生活，在政治上有了學習進步的機會，在文化娛樂上有了經常舉行的遊戲，更重要

的是經濟方面，像過去那樣被廠方剝削的情形沒有了。比如，減低工資，工人收入多就多減，這現象沒有了，應該「跌活」的，現在也可以跌了；——一天規定出煤二十斗，但是煤層越開越深遠，甬子遠了，套（每五尺為一套）多時，就應少出煤，要是多套出二十斗，一個攆筐的工人每天可以挑十担，多二十套，甬子長了，應該少挑，現在可以照跌了。過去工人因為工作晚了，不回家吃飯，向廠方支米做飯，廠主抬高米價，市價每斗七元，他以七元二角賣出，現在不允許這樣，一律按市價計算。過去發工資，包攬的有幾種：票子給你，拿出去以後不能用，也不換，工人就吃虧，現在不可以了。過去，工資是五天十天一支，但是支薪以後，常常感到錢不夠用，有時等不到十天，家里要錢買米沒有；現在能夠每天支。每天如果出不到二十斗，廠主不給工資，這叫「崩工資」，現在出活不夠，說明原委，可以照付工資。其次，廠方叫主斗的搗鬼，量煤時有意把煤散落在地上，這煤就算廠方的，每天多的能弄到一二斗，工人就得多出活，多流血汗了。如今這情形沒有了。

但這些還是比較次要的，主要的是調整了工資，減少了勞資的矛盾。抗戰以後，物價上漲，工資怎樣也追不過物價，工人一天的勞苦，換不了一個「飽」字，而廠方不肯隨物價的高漲而調整工資，即使調整，怎樣調整呢？物價漲落是有季節性的，在農村環境中，青黃不接時，物價漲；大秋以後，物價跌。如果按物價漲增加了工資，等到物價跌的時候，廠方就會感到吃虧了。結果工會政府和廠方議定了以糧食代工資，如一般工人就定為每天工資是一升八合八——農村物價漲落主要是以糧食為轉移，而糧食又是工人主要的必需品。保證了工人生活的安定，工人生產熱情也就提高了。

以上種種，就是邊區勞動政策的具體實施——

適當改善工人生活，把高勞動紀律，團結勞資雙方發展生產。邊區沒有勞動法和勞動條例，這因為：邊區產業落後，產業工人不多，各種生活水準不齊，規定一個統一的勞動條例和勞動法是困難的。邊區工人的最大部份是農業工人，而且短工長工為多，其中還有一部分是放羊放牛的牧工。工人在工會領導之下，生活都較前改善，一般的實行實物工資制，照顧了勞資雙方的利益。農業工人，其中曾實行過八小時工作制，結果起了很大的糾紛，因為在中國農業工作的習慣是早去晚歸，每年有忙有閒之不同，以後遵照農業習慣改變過來了。

在一般公營工廠里，試行每日十小時工作制，生活上採取供給制：供給吃，住，穿，並按技術的高低，每月發給八元到三十元的工資。

對於敵佔區的工人，邊區寄以無限的關懷，那些受災受難的工人，邊區會進行救濟和慰問，有許多家屬受各地區政府的優待。在敵人奴役下的工人，前前後後有不少到邊區來，和邊區工人一同享受民主自由的生活。

談完之後，我們又一棚一棚地吊上來，一到地面，見了西斜陽光，反而感到刺眼，慢慢才好。這時我臉上鼻子里和手上已是烏黑一團，吐出一口痰來，也是黑呼呼的。井上分工會的主任說：「現在你完全像一個工人了。」

我很高興，我有資格列在勞動羣里了。

洗了一個澡，換上衣服，和縣工會主任一同走出，經理站起來，笑盈盈地送我們到門口，彷彿在慶幸我們的安全和他自己精神上負擔的解脫，說：「你們下井里去，我真擔心，現在，好了，以後有空，請常過來玩玩……」

和張幹事騎上馬，跑到政治部，天已黑盡了。

地方性的聯合政府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邊區第一屆參議會開幕，我被選去參與這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民主政治建設的大會，這大會像是一根色澤鮮豔的紅線，劃出了邊區民主政治建設的新階段。

做為邊區最高行政機構的邊區行政委員會，就是在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在阜平召開的邊區臨時軍政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這里面有國民黨，共產黨，無黨派的人士，是地方性的民主聯合政府，經過國民政府批准的。

五年來，晉察冀邊區團結了各黨派各階層各民族和廣大軍民，在敵後殘酷的鬥爭環境之下壯大起來，收復了數萬里國土，建立了十三個專區，九十八縣，六百五十區，一萬五千三百六十六個行政村的民主政權，擴大統一職權，改善人民生活，實現了民族平等男女平等。

邊區人民在民主政治的自由生活下，早就迫切地希望邊區參議會的召開。在一九四〇年民主大選舉中，各地佔全體公民百分之七十到九十以上的選民，選出了他們所信任的愛戴的參議員。由於解放區的戰爭環境，和交通的困難，使得參議會不得不延遲到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這個邊區政府誕生的節日。）來召開。

會場是爲了參議會而建築的一個輝煌的洋式禮堂，在阜平縣的一個山溝里，離它五里地便有阜平著名的溫塘，（這個禮堂後來被敵人砲火所毀了。）禮堂里主席台前的雪白的牆壁上掛着蘇聯將軍親筆題字：

我們屹立在太行山、五台、恆山、燕山、
、旗幟指向長白山；
我們馳騁在滹沱河，永定河，潮河，深河，
、凱歌高奏鴨綠江。

台上一幅兩丈紅底黑絨字的橫聯，是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的祝詞：『爲爭取抗戰勝利與建設獨立統一和平民主繁榮的三民主義新中國而奮鬥！』到會的參議員一共是二百八十八人，代表着全邊區二十萬人民的意志，這里有各黨派各民族各階層的代表，請聽他們的聲音：

回民參議員說：『從來沒有得到民族平等的待遇，只有在共產黨八路軍和邊區政府領導之下，我們才知道什麼是民族平等的真正自由的生活。』

蒙藏喇嘛和尚說：『敵人毀滅了我們宗教聖地，沒有邊區，我們就完全失掉了依靠。』

七十多歲的耆紳說：『垂暮之年，得享自由民主之福，真不枉此一生。』

虛度在中華『民』國名義之下的人民，三十多年以來，在解放區第一次真正享受到『民』國的主權，第一次真正以一個主人的身份生活在自己的國土上，他們有權過問一切國事。

開會以前，在雞鳴堂約摸半里路左右的一片廣場上，參議員檢閱了自己的子弟兵，這些子弟兵在敵後生長起來的，矯捷敵人的武器，武裝了自己。許多從敵佔區來的參議員，看到這樣齊整強大的隊伍，增強了信心，有的五年沒看到祖國的隊伍，現在看到，感動得流淚了。

回到禮堂就開始進行大會預備會：籌委會報告，參議員資格審查，通過大會組織規程日程，最後全體選出主席團，結束了預備會。

下午正式開幕，蘇聯將軍代表中共中央地方分局和晉察冀軍區講話，郭飛天先生代表國民黨講話，對大會團結抗戰團結建國的方針，都寄以熱切的希望和信心。

第二三天是邊區行政委員會主任委員宋劭文的政府工作報告，第四天全體參議員展開廣泛而熱烈的討論：對於擴大統一職權，加強對敵鬥爭，克服

不平衡發展，加強生產建設，提高小學質量，注重優抗政策和防務衛生……參議員對政府嚴格的指責和公正的補充，都爲宋劭文代表政府一一接收，補入到報告中去，全體參議員這才通過以這個修正的報告列入第一屆參議會彙刊里去。

中共代表劉瀾濤提出：『請確定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關於晉察冀邊區目前施政綱領（雙十綱領）爲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施政綱領及施政綱領實施重點』，大會一致通過，劉瀾濤登台說明提案以後，邊區國民黨黨務聯合辦事處主任郭飛天起立發言：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晉察冀邊區目前施政綱領，是針對邊區客觀環境的需要，堅持敵後抗戰，鞏固邊區同胞的團結，保衛與發展邊區而製定的。中國國民黨在邊區的同志一向同意，並熱烈發動這一綱領的實行，今經劉瀾濤先生在大會提出，本席極表同意，願作爲邊區目前施政綱領，使成爲全邊區同胞共同的行動綱領，並願與友黨人士及各界同胞親密攜手，共策進行，爲實現三民主義新中國而奮鬥。』

從這一重要施政綱領的通過上，充分可以看出在民主的基礎上邊區共同團結合作的精神。

本來接着是討論通過邊區行政委員會的各種條例，因爲敵情突然緊張，把選舉提前了。每個參議員得到印着大紅印信的選票，慎重地寫上他們所要選的參議會議長和住會委員，政府委員和主任，結果是：

正議長成仿吾，副議長于力，駐會參議員楊耕田，關力宜，李××，安××（因爲在敵區，大會沒有向外公佈他們兩人名字），郭飛天，王斐然。政府委員：蘇榮發，宋劭文，呂正操，張蘇，三××，劉德基，胡仁奎，劉德風，王××，主任委員宋劭文，副主任委員胡仁奎。

郭飛天，胡仁奎和劉德基等都是國民黨員，而共產黨員佔的數目只是三分之一，一位經歷過民國以來的國會和地方議會的選舉的古老的議員，感動地說：

『這是我數十年來閱歷人間，第一次見到的真

正的民主的選舉，一切都無可非議，真正的民主，完全的民主，那些被選出的人都是才德兩全的有為人物，一定不會辜負選民人民的寄托與期望。這次選舉完全證明共產黨所提出的三三制，實出於一片真誠。你看那選舉的結果，有共產黨員，有國民黨員，有無黨無派的中間人物——這真是首行一致，本人十二萬分的欽佩！隨後李天德等議員在大会上提出彈劾完縣縣長案，因為與事實不符，大會以二百四十九票對五票否決了這一提案。接濟便討論和通過邊區行政委員會的組織條例，邊區法院組織條例，租佃條例及草案等一百五十五件提案。

一切政府的法規條例，通過人民代表的討論，修改，訂正，通過，然後交給政府去執行，這樣的法規條例和政府自然為人民所擁戴，也才能够貫徹實行到底，在民主的基礎上，一切的困難都容易解決，一切的前途都充滿了光明。只有在民主的聯合政府建立上，做為國民政府的一個行政單位的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在解放區才得到鞏固和發展，抗戰中它是一個堅強的堡壘，建國中它是一個有力的支柱。除了民主的地方性聯合政府，要想在敵後那樣殘酷的環境中生長壯大，是一件完全不可想像的事。這一政府形式，它給全國性的中央政權做了一個輝煌的示範。中國目前只有通過民主的聯合政府的道路，才能解決國內一切問題，才能夠走到一個民主團結和平富強的新中國！

貨幣的戰爭

委員會開會以後，我在阜平縣一個村莊里，對邊區行政委員會的行政長官劉文輝先生，劉先生不為不為，人很消瘦，甚至臉上都瘦得乾巴巴的，穿著一件工作人衣服，手上有幾道傷痕，也不抽煙，腳下更沒有皮鞋，這一切，都顯示了這一個村莊，生活極其一般，行員一樣，拿三十元一月的津貼——這是我所希冀過的一個兩袖清風的銀行行長。因為行長沒有從業務上發財，所以人民就得到了實惠。他是東北人，九一八事變時，他還是瀋陽的一個青年，親身參加了白山黑水之間的戰爭，後來到關內來，依然不是在大學里學銀行學貨幣出身的人，但是他的虛心學習，有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在理財界著名的邊區財政專家劉文輝先生領導下，在敵人的後方，給敵人的後方在貨幣戰爭上的白刃戰。

中國的貨幣一向是極為混亂的，過去全國就沒有過統一的貨幣，既有縣幣，省幣，縣省之間且不能相互流通，中央法幣也不能完全流通全國。這般的混亂情形，在以前三省邊界構成的晉察冀邊區來看，顯得更為嚴重。三省都有省本位幣，流通數量很大，但三省之間不能互相流通各自的本位

決，一切的前途都充滿了光明。只有在民主的聯合政府建立上，做為國民政府的一個行政單位的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在解放區才得到鞏固和發展，抗戰中它是一個堅強的堡壘，建國中它是一個有力的支柱。除了民主的地方性聯合政府，要想在敵後那樣殘酷的環境中生長壯大，是一件完全不可想像的事。這一政府形式，它給全國性的中央政權做了一個輝煌的示範。中國目前只有通過民主的聯合政府的道路，才能解決國內一切問題，才能夠走到一個民主團結和平富強的新中國！

大會在雪亮的電燈下，舉行閉會儀式，宋劭文先生率領全體政府委員宣誓就職，舉起了右手，高聲喊着：

「某等謹以至誠，接受大會的重託，執行大會的決議，矢忠矢勤，為人民服務，為完成抗戰建國的事業奮鬥到底……」

幣，使得貿易上所受損失至大。另一方面，各種各樣的偽幣，全向這塊沒有黨國基礎的金邊地帶上，浩浩蕩蕩奔流而來。

為了活躍邊區的經濟，開始進行經濟建設，打擊敵人的經濟建設，邊區行政委員會成立後，邊區軍政代表大會決議，抽資組織邊區銀行，劉文輝先生就擔任了行長。

在邊區銀行成立並發行邊幣的前十日，偽聯合準備銀行也成立了，也發行偽聯銀券，於是乎金融大戰的序幕揭開了。

「邊幣」是抗日票，「偽幣」是鬼子票，在全邊區人民的支持下，接受邊幣，拒絕偽幣。敵人看偽幣不行，就大舉偽造河北與平山官錢局的小票，用家私取物，此外還用大量雜貨運進邊區，在陣地上來斷殺。由於邊區準備充足，慎重發行，信用一天一天增高起來，再加上雜貨的嚴密運用，在回邊區偽幣一次進攻中，都打了勝仗。

敵偽偽造河北鈔票，邊區就禁止偽幣河北五元票流通，打擊河北鈔票和保商銀行鈔票出境，停用平津雜票，把河北省銀行鈔票逐步貶值，到二十九年初，邊幣發行到一定數量，就整頓各縣土幣，定期

收回，逐步肅清。二十九年二月，為了維護法幣，防止敵人吸收，奪取外匯，邊區銀行用邊幣兌回保幣，市面暫停流通。這年夏天，邊區有了自己的統一貨幣，打擊了敵人，穩定了金融，人民得到無上的便利。

但是敵人在金融上也是一個頑強的勁敵，前一戰術沒有成功，於是又想用偽偽銀來奪取物資。秋天就把偽偽銀打擊出去了。

三十年春，敵人又設了一計：用大量消耗品來奪取必需品，邊區旋即改訂出入口稅則，另一面又嚴密稽徵，這一戰，敵人又潰敗下去了。

隨後，敵人改領銷政策為封鎖政策，進行掠奪政策，全國推銷邊區貨幣陣地。但在全體人民的堅持與反政之下，這塊陣地依然屹立不動。一直到敵寇投降，偽幣跌跌，邊幣更是一日千里地提高它的價值，現在在張家口邊幣，十六元可以買一斤鹽，四十元可以買一斤白麵，一千六百元可以買一件棉大衣料子……

凡事只要為人民謀利，有人民擁護，沒有不得到勝利的。

邊區銀行是真正為人民服務的銀行，銀行既非政府主席私人所有，也非院長部長獨佔，一切資金完全全用之於民，他們的業務：一不是做黃金，二不是做美鈔，三不是囤集物資，四不是壟斷市場……總之，一句話，不是為私人做生意，而是替人民服務。它的放款存款匯兌，完全是為了活躍邊區的經濟，幫助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生活。二十八年以來，邊區銀行所放的款一千八百多萬，主要是用在救濟水災，開展合作事業，發展工商業，解決春耕困難，發展運銷事業。

放款貸款不僅在業務上是為了人民，而且在貸款的廣泛，深入，低利，解決問題這些方面，是中國銀行史上所沒有過的，是過去任何銀行所趕不上的。

在這樣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方針下，有什麼困難不能夠解決呢？發展前途能擔憂呢？

（未完）

讀者之頁

我們反對內戰

內戰的砲火威脅着全中國的青年，威脅着全中國的每一個人。我們一切升學、就業、從事和平建設國家的期望，都將要在內戰的砲火下面化為灰燼。

我們反對內戰，我們要求給我們一個安靜的讀書環境。把龐大的軍費，撥出來充實學校的設備，提高教授先生的生活待遇，改善我們的營養，同時在中國各地大量的舉辦文化教育事業。

我們反對內戰，我們要求保障每個青年的職業，把龐大的軍費移過來，補助生產事業，讓開了門的工廠開工，在全國廣大的農村發展新的大規模的生產事業，在中國的東、西、南、北到處展開建設，物盡其用，地盡其利，人盡其才。

我們反對內戰，我們要求停止無限制的濫發鈔票，無限制的要錢，使我們的父兄逃出物價暴漲和橫徵苛斂的摧殘，能够安心地過和平日子。

毫無疑問，今天的內戰是由於中國少數反民主集團，想完成全國的獨裁專制，所採取的最毒辣的手段。我們近十多年來，一直在統制思想，限制自由研究的武力強壓下過日子，每一個同學如果不健忘，就一定還記得一二九被屠殺了的，民國三十年春天被逮捕、被活埋了，成都被槍殺的，復旦被淹死的，以及無數還在集中營過着暗無天日的青年同伴，十二月一日的屠殺昆明學生事件，更是變本加厲，令人痛心疾首。反動派所以發動內戰就是為了要以武力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他們這個反動的政策。

昆明的同學們。為了反對他們這一陰謀的實現，又發動反動派武力彈壓了，武裝反民主的猙獰面目，已經赤裸裸地擺在我們眼前了！

共進門——反民主的反動派，剝奪了我們的一切自由，現在進行以武力征服敵人的毒手裡解放出來的每一個人。是他們和敵偽合流，而且利用敵偽繼續在各地屠殺人民，這行動是違背中國人作人的道德的。是他們請求美國把軍隊開到中國的領土上，幫助他們用飛機、坦克、火箭砲去殺害華北、東北的老百姓。這一切都是反動派用行動拒絕實行民主的鐵證。他們要把四萬萬五千萬人都踐踏在他們的獨裁之下，受他們的奴役；要我們所有的青年，都匍匐在黨國特務的刺刀下面，做牛做馬俯首聽命，把一切言論、思想、集會、結社、研究的自由都剝奪精光。這和袁世凱所想像的，和曹錕所想像的，和每一個軍閥所做的一樣，而且他們已經這樣做了十幾年，現在只是更加做得兇了而已。

但我們不讓他們這樣做下去。
我們要求政府立即實現「政治解決」的諾言，把開去打內戰的軍隊即刻撤回原防。
我們要求，即刻把華北的敵寇撤械，把偽軍解散，把大小漢奸一個一個都逮捕起來，聽候人民的審判。

非常榮幸，最近重慶的幾家官報報紙上，居然也出現了「人民的呼聲」了，參議會、同業公會、商會、工會……各式各樣的團體，長篇累牘的電文，熱鬧非凡，內容呢？無非千篇一律的「歷數」共產黨的「罪狀」，痛罵一通之後，然後「呼籲」中共「懸崖勒馬」，或者請中央「明令討伐」，文章

我們要求在對美軍即撤出中國。中國不是美軍的殖民地，不是美軍的保護國，美軍竟敢今天佈防疆路，明天槍殺平民，成了什麼樣子？說是受日本的降，現在受了三個多月，華北日軍並未完全撤械，美國的軍火運輸反而在沒有敵軍的東北射殺起來，「協助投降」的內幕，被參加中國內戰的實全部揭穿了。由於美軍在華支持反動派的陰謀，使內戰日益擴大，這後果，參加中國內戰的美軍，是不能辭其責的。我們堅決要求美軍必須即期從中國撤出去。

只有美軍撤退，敵軍撤械，偽軍解散，停止內戰，實現民主政治，才會有和平，也只有在這樣的和平基礎上，成立聯合政府才可以建立起民主、獨立、統一、幸福、富強的新中國。我們的學業、事業才會有真正的保障。

讓我們高喊：
反對內戰！
美軍立即從中國撤退！
同學們團結起來，要求立刻實現和平。
還我們青年的自由！

陪都一大學生洗萌

從「人民的呼聲」說起

吳曙天

都很精彩，洋洋灑灑，駢四韻六，不愧為名家傑作。

於是國民黨的論客們大吹大擂地說這是「輿論」，主張用這種輿論來制止「內亂」。如果這些文章的確是出自「人民」的呼聲，我們真應該為民主前途慶賀，因為人民居然也能夠在

官辦的報紙上講話，豈不是大大的進步了麼？但問題是：這許多會，這許多社團，是不是真正為人民所組織的，是否真能代表人民的意見呢？在種種限制人民集會結社的法令下，指派，圈定，或者受過「特種訓練」的人把持着這些團體，有幾個代表是人民選出來的，有幾句話能代表人民的真意？

對於這種一手包辦的「真意」，用意所在，揭穿了也說不足為怪。因為國民黨既不惜殘害民力來進行內戰，自更不惜以大量的油墨紙張來製造「人民的呼聲」，以假亂真，「合法」化。而他們最怕的也是真正的民意和真正的輿論，所以對於不合他們脾胃的言論和報紙，百般摧殘，百般壓制。

真金不怕火，真理必能戰勝，假使國民黨當局不怕暴露事實的真相，假使國民黨當局自認爲「理直氣壯」的話，那又何異乎共產黨的「宣傳」，要知道在重慶僅僅有一家新華日報在替共產黨說話，但是却有四家以上的報紙直接間接爲國民黨所主持，在這種力量懸殊的情形下，而國民黨反動派尚不惜用郵扣報紙，恐嚇定戶，甚至毀辱報館的種種流氓手段來阻礙新華日報的發行，這一切爲了什麼？

內地的新聞檢查制度總算已在全國痛心疾首的情勢下勉強取消了，但是在收復區却仍然保存着他們這一個「特政」，收復區的報紙都被國民黨的大員們所接收，而且清一色的「黨化」了。漢奸報紙照常發行，而真正愛國的報紙如郭沫若先生主持的救國日報（原名「救亡日報」）却在「撤銷登記」名義下遭了厄運。收復區的新聞界一片歌功頌德之聲，而人民水深火熱的痛苦，接收人員的污行，漢奸偽軍的罪惡，却無法表達出來，僅僅在內地的少數報紙上才能反映出十分之一二。這一切又爲什麼？這也算是實行言論自由嗎？

國民黨動輒說新華日報造謠，說是「焚滅人心」，我是新華日報讀者之一，現在無須爲她多辯，不過有一點是重要的：請人家造謠，只要能提出反證就行；國民黨能提出反證嗎？怕只提出來着實傷了他們的體面。舉幾個眼前的例子：國民黨軍隊進攻解放區，既是公開的事實，而他們却說是共產黨挑起的謠言。那末高樹勳將軍和新八軍將士的部隊起義爲了什麼？這難道是假的麼？國共雙方協定以前印發的「劃區手本」和「劃區命令」怎麼會落到八路軍手裡去呢？入證物證俱全，是誰將這些壞團結發動內戰，難道還不夠明白麼？國民黨勾結敵偽，縱容貪污，如果是新華日報說的話，請問時至今日，華北敵寇的糧食了多麼多？大漢奸大貪污殺了多少？餓了多少？再說，國民黨報紙宣傳解放區是「奸區」，是「對敵割據」，是共產黨把持的而「假民主」，如何黑暗，如何困苦，共產黨如何殘暴，殺人放火，「驅市人爲戰」……如果這都是事實，爲什麼不讓人民過去看看，「好將真相公開於世，不勝於空話千萬倍嗎？爲什麼說說八年，把邊區和解放區緊密封鎖，連水都澆不過一滿呢？而尤其可惜的，中立的中外記者訪問邊區後的報導，却跟他們的宣傳完全不同，難道都被「赤化」了麼？

內戰固然是殘酷的，然而誰在屠殺人民呢？是誰在殺人放火呢？爲什麼不讓全國的公正人士前去調查一下呢？

掩蓋事實真相，偽造人民輿論，這是獨夫暴君的一貫手段，民初袁世凱稱帝之前，不是也有各省「人民代表」齊聚勸進的嗎？又何怪乎發動不義的內戰者今日的行徑呢？不過人民也不是太剛伏的，占全國人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工大眾，已漸漸覺醒，他們的呼聲雖可以寂滅於一時，但是一旦迸發其力量，却足以使獨夫暴君們魂飛魄散的。

十一月二十六日

內政部發重新登記證警字第... 伍號

羣衆

第十卷 第二十三期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發行所 羣衆雜誌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總經理 新華日報館

本刊價目

零售每份 六十元

六期 三百六十元

十二期 六百五十元

廿四期 一千二百二十元

外埠郵費平寄每份四元掛號三十四元
航空十六元掛號四十六元 國外照加

本明零售陸拾元

眾群

期四十二第 卷十第



版出日五十二月二十年四十三國民



迎政治協商會議(社論)

駁大公報

附錄：質中共

危機並未渡過

工業指望着甚麼？

財政金融在動盪中

1946

第四季
中國經濟

原子能：是好是壞

東南歐的土地改革

中國經濟底道路(下)

書評

玄虛不是中國哲學的精神

雜

文

「尊崇」與「鄙棄」

解放區報告

晉察冀行進

讀者之頁

對政治協商會議的意見

怎樣研究馬克思學說

編後記

豐衣足食圖(木刻年畫)

(八七八)

陳伯達(八八〇)

大公報(八八七)

許滌新(八八八)

方卓芬(八九二)

劉芳華(八九四)

美·工人日報
科學委員會(八九八)

湯姆生作
蘆蕪譯(九〇二)

許滌新(九〇三)

林柏(九一〇)

艾思奇(九〇八)

黎望(九一四)

周而復(九一五)

文凡(九一九)

編者(九二〇)

(九二二)

羣(對面)



迎政治協商會議

政治協商會議將要開幕了。我們歡迎這個會議。

中國需要和平，民主，團結，統一。在日本投降前，為了要爭取抗戰勝利，需要這些；在日本投降後，為了完成建國任務，也需要這些。而作為實現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前提條件，召集一個各黨各派，無黨無派代表人物的會議，實在是最需要的。因此，我們中國共產黨在日本投降前，就提出了這般的主張；在日本投降後，仍堅持着這般的主張。日本一投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就於八月二十五日，發表「對於目前時局的宣言」，指出：「在一切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務是鞏固國內團結，保證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立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而為了完成這任務，主張「立即召開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的會議，商討抗戰結束後的各項重大問題，制定民主的施政綱領，結束訓政，成立舉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並籌備自由的，無拘束的普選的國民大會」。假使國民黨當局迅速地接受這主張，則中國早已邁進於和平建設之途了。不幸，國民黨當局雖然表面上，稱贊着「欲解決國難的所機，但實際上，並沒有放棄「武力統一」的企圖。他們沒有誠意，也沒有勇氣，迅速地接受這個主張。經過四十餘天的「國共會議」，雙方才在雙十節所簽字的「國共會議紀要」中，規定着：「關於政治民主化問題，一致認為應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並應先採必要步驟，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各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同時，記載着：「關於解放區地方政府問題」，由於國共雙方意見沒有能獲得一致，「中共方面認為將該項問題

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解決」。然而儘管有了這樣的規定，有了這樣的諾言，國民黨當局依然沒有放棄「武力統一」的企圖，依然對解放區人民進行着軍事上的進攻。這就使所謂「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變成白紙黑字的文字遊戲，沒有任何現實的意義。由於全國人民的鬥爭，由於國際輿論的催促，特別是由於美國的對華政策遭到美國人民的反對，由支持內戰開始轉向促進和平，使得國民黨當局不管主觀上願意不願意，而終於不得不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了。在我們，對於政治協商會議這件事的本身，是高級雙手，表示歡迎的。

依據「國共會議紀要」所規定，政治協商會議所要討論的主要問題是「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前者所包括的範圍很廣泛，像制定共同綱領，改組國民政府，擬定復員，善後辦法等都是；後者也包括增修國民大會代表改選問題，國民大會會期問題，憲法和國民大會組織法和選舉法等問題。此外，在今天，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是如何立刻停止內戰？烽火遍地，殺氣騰天，全國人民受着死亡的威脅，嗷嗷飢餓的痛苦，過着流亡的生涯，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人，誰忍安坐會議席上，拋開這個迫切問題，而去談論些別的事情？所謂「和平建國方案」，所謂「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固然都是關係整個民族命運的重大問題，但其如果內戰不停止，討論這些問題，實際上有什麼用處呢？因此，最好，是在政治協商會議開幕之前，就立刻無條件，無保留地，停止內戰。如果做不到，那末，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後，列入議程的第一件事就應是商討如何立刻停止內戰？有人說，依據「國共會議紀要」，政治協商會議無權討論停止內戰問題，內戰停止不停止了和政治協商會議毫不相干，政治協商會議不必去過問，這見解是不對

的。像前頭所已經指出的那樣，內戰不停止，則討論的問題，實際上沒有什麼用處的。試拿召開國民大會問題為例。如果不停止內戰，怎樣能夠召集一個由普選產生的真能代表全國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國民大會呢？不僅這，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停止內戰問題也並不違反「國共會議紀要」的規定。所謂「和平建國方案」在內戰沒有停止的時候，便應該包括「停止內戰的方案」在內。否則既有內戰存在，進行清，甚至擴大，怎能夠叫「和平」？怎能夠去「和平建國」？和政協商會應討論停止內戰問題同樣，在「國共會議紀要」中，明白規定着，國共雙方已經獲得協議並應付諸實施的許多項目像保障人民自由權利，釋放政治犯，黨派合法化，廢除特務機關，實行地方自治，醫藥漢奸，釋放軍等，究竟已否實施？實施的狀況怎樣？政府也應該向政協商會提出報告，由政協商會加以討論。如果還沒有實施或實施的程度還不夠徹底，政治協商會議並應加以嚴厲的督促。這些項目本來是應該在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以前就已徹底實施，不必等待政治協商會議來討論，來督促的。但事實上，既然還沒有徹底實施，就不能說「國共會議紀要」沒有把白列入政治協商會議討論範圍之內，便不必提到政治協商會議來討論。緣括上面所述，我們認為政治協商會議除討論「國共會議紀要」所規定的「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外，還應該討論如何立刻停止內戰和如何徹底實施「國共會議紀要」中所規定的保障人民自由權利等許多項目這兩件事。至於在「國共會議紀要」中沒有進行協議的「邊疆問題」，「解圍區地方自治問題」和「軍隊國家化問題」，當然也可以提到政治協商會議來解決。「邊疆問題」可在討論停止內戰的具體問題中去解決；「解放邊疆地方自治問題」可在討論全國實行地方自治問題下去解決；「軍隊國家化問題」可在和政協民主化的關聯中去解決。

政治協商會議所應討論的這一切問題，是不是可能獲得一致協議，而得到合理的解決呢？就問題的本身而言，我們沒有發現任何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決的因素。試問「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建國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這一原則不是大家所一致擁護的嗎？試問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這三件事不是大家所一致主張的嗎？試問停止內戰不是大家所一致要求的嗎？只要大家特別是在朝的國民黨能夠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維護人民的利益，尊重人民的意志，去忠實地，誠懇地，考慮問題，

討論問題，而不以為自己的個別利害打算，把自己的個別利害置於於一切問題之外，則一切糾纏不清的問題就不難迎刃而解。例如立刻停止內戰，若將這不是一容易辦到的事，其實的單得復，只要發動和積極進行內戰的國民黨當局放棄他們的「武力統一」的企圖，下一紙全國停戰的命令，不難而易得辦到了嗎？辦到辦不到的關鍵，不在客觀上能不能，而在主觀上敢不敢。中國共產黨出席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是抱着解決問題的誠意，勇氣和符合人民利益的具體意見而來的；相信如果其他各派無黨無派的代表也抱着同樣的誠意，勇氣和具體意見；只要在朝的國民黨不把政治協商會議當做一個裝飾品或御用工具，則政治協商會議所討論的問題，是可能得到解決的。

不過，一直到今天為止，國民黨當局在事實上的表現，還不能使我們相信他們已經放棄「武力統一」的企圖，而下一紙「和平解決」的決心。特別是對反對民主，反對人民，反對共產黨及各民主政黨的法西斯殘餘分子還在破壞和平，民主，團結，統一而活躍。在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前，他們曾竭力阻撓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在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後，他們必竭力破壞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我們可以想像：他們第一步是阻止政治協商會議獲得任何決議；第二步是造成政治協商會議的中途破裂或停頓；第三步是破壞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的效力，具體地說，就是不使國民政府去執行這些決議。因此，在政治協商會議中，我們還可能在會議內，會議外，在政治上，在軍事上，遇到很多的波折，很大的困難。為了克服這些波折和困難，還需要出席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和這些代表所代表的各黨派，各階層以及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在政治協商會議內一切維護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代表們，應該站在一道，不屈不撓地，堅持鬥爭，尋求解決。政治協商會議雖然不是一個最高權力機關，但也不是一個政府諮詢機關，它是站在政府之旁，透過政府對支配政府的機關。它的一切決議，雖然不能在法律上約束政府，但在實質是約束政府的。如果在會議中，由於鬥爭的結果而獲得一些合理的決議，則國民政府沒有拒絕或延緩執行的理由，另一方面，在政治協商會議外，一切維護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力也應該站在一道，和會議內的鬥爭相呼應，向那些法西斯殘餘分子，作無情的鬥爭，揭破他們的陰謀，打擊他們的活動，使他們不能發生任何破壞作用。這樣，政治協商會議的前途，是可以樂觀的。

駁大公報

陳伯達

十一月二十日重慶大公報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目叫做「實中共」。大公報以「大公」作為自己的報名，這篇社論却可作為衡量「大公報」究竟是代表「大公」或是代表「大私」的尺度。而且這篇文章既然是對中國共產黨而說的，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也就有責任實事求是，來對大公報作一番衡量。二十一日新華日報的社論，已對它作了正確的衡量，我們現在在這邊再加以申論。不過我們現在還只看到中央社的電文，沒有看到當天大公報的電文，只得以此中央社的電文為根據了。

第一個問題：什麼是今日內戰局面演進的根源？

日本投降以來，中國人民要求和平，可是現在却是內戰；中國人民要求民主，可是現在依然一黨專政；中國要求團結統一，可是現在正在擴大分裂。真實的情況是這樣。根源在那裡？大公報發表了「一個根源」，據說，這就是「日本宣佈投降之初，延安總動員會的朱德總司令的命令」。該報援引了朱總司令的命令，現在我們這就把朱總司令的命令全文轉錄在下面：

「一、各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部隊均得依據波茨坦宣言規定，向其附近各城鎮交通要道之敵人軍隊及其指揮機關送出通牒，限其於一定時間內向我作戰部隊繳出全部武裝，在繳械後，我軍當恢復待俘虜條例給以生命安全之保護。

二、各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部隊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偽軍偽政權送出通牒，限其於限滿後投降簽字前，率隊反正，聽候編遣，逾期即須繳出全部武裝。

三、各解放區所有抗日武裝部隊，如遇敵偽武裝部隊拒絕投降降械，即應予以堅決消滅。

四、我軍對任何敵偽所佔城鎮交通要道，都有全權派兵接受，進入佔領，實行軍事管制，維持秩序，並委任專員負責管理該地區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壞或反抗事件發生，均須以漢奸論罪。」

這個命令到現在，已過了三個多月，但是，假使我們把它再讀到千萬遍，也還是看不出這裡面有發動內戰的「根源」。這個命令只說是：各解放區的抗日部隊可以在其附近接受敵人的投降，繳除敵偽的武裝，可以接受敵人所佔領的中國領土。難道這命令所包含的內容不就是抗日反日的內容嗎？不就是抗日反日的神聖責任嗎？難道解放區附近的敵偽可以不投降、其武裝可以不繳除、而附近的失地可以不收復嗎？難道能够把接受日寇投降、解除敵偽武裝、收復失地這類的事情叫做發動內戰，又能够把抗日反日的命令叫做發動內戰的根源嗎？九一八事變發生到現在已十四年之久，偉大的中國人民號召抗日，有同樣長久的時間，而全國進行抗日戰爭亦既八年，可以說，我們真不料新開界中聽名如大公報者，竟然還不能區別抗日與內戰，還不能區別日本人與中國人，而它所謂「為國家前途擔憂」者，竟然是指變各解放區抗日軍隊在其附近真正把敵偽解決，而不是把變敵偽的還沒有解決！

大公報說：這種命令是「與中央的軍事委員會對立」。但是「中央的軍事委員會」是什麼樣的「中央的軍事委員會」呢？如果它是真正代表中華民族利益，是真正激發頭腦反對敵偽的，那末，它對於這種命令便不會有什麼分歧，而且對於各解放區抗日軍隊這種的英勇行動還會加以傳令嘉獎，那末，會有「對立」可說呢？如果它是代表某少數特權者的利益，而不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只是代表某一黨一派之私，而不是代表中華民族之公，他們企圖壟斷全中國為己有，企圖壟斷人民抗戰的全部果實為己有，這是「中央的

軍事委員會「自己先有問題，自己先與抗日軍隊對立，先與人民對立，這不正是值得全國各界起來糾正的嗎？」

在日本投降之後，為什麼這「中央的軍事委員會」竟發下了命令，要十八集團軍「應就原地駐防待命」，禁止十八集團軍新四軍向敵佔區前進呢？為什麼對於在抗日最前線英勇血戰的十八集團軍新四軍是這樣，而對於那種崇拜日寇做主人而魚肉中國同胞的偽軍，竟都封做「先遣軍司令」或其他種種司令，要他們「負責維持地方治安」、「維持秩序」呢？這不是忠之有罪，奸者有功嗎？這不也是竟然分別不出什麼是日寇，什麼是中國人嗎？難道這「中央的軍事委員會」如此做法，就叫做「天王聖明」，而八路軍新四軍繼續向敵人前進，就叫做「臣罪當誅」嗎？難道這「中央的軍事委員會」如此做法，不是太失掉偉大中國的國家體統，而令日寇竊笑嗎？難道這「中央的軍事委員會」如此做法，不是表示自己有極端的「對立」成見，而採取分裂的方針，它自己則站在「對立」的一方，要盡量壓倒另一方嗎？

是的，大公報社論的作者可以重覆這「中央的軍事委員會」的話，說這「是因為十八集團軍不聽命令呀！但是，先生呵！是非還是容易判斷的。果然如此，這「中央的軍事委員會」為什麼不下一道命令，要十八集團軍向其附近的敵佔區「積極推進」解決敵偽，要十八集團軍進入敵佔區「負責維持治安」、「維持秩序」，再看十八集團軍聽不聽命令呢？為什麼這「中央的軍事委員會」不肯下一道這般公正的、真正代表國家利益的命令，而却把「負責維持治安」、「維持秩序」的命令反落在敵偽的身上呢？大公報說：「一個國家於勝利之後，有兩個系統的軍隊爭地，已絕不應該，而爭地爭地復無止境，更如何得了。」但是，先生呵！你所擔憂的「如何得了」，却只要這「中央的軍事委員會」一道公正的命令，就可以「得了」了。如果有上述的這般公正的命令，兩個系統的軍隊不就可以變成一個系統，而所謂「爭地」，不也就不出現了嗎？

八路軍新四軍要求在其附近接受投降，進駐其附近的敵佔區，這完全是合理的。合什麼理？合民族的理，合人民的理。八路軍新四軍和解放區人民抗戰八年的無量犧牲，成為抗擊敵偽的主力，直到日寇投降時，還抵抗日軍在華（東北不在內）日軍的百分之六十九和偽軍的百分之九十五，屏障了中韓半壁河山，收復一萬萬人口左右的失地，為什麼不能有受降的權利呢？難道只有袖手旁觀、坐視勝利，或者一見敵人就望風而逃的國民黨軍隊，才能有這樣的權利嗎？並且我們所要求的，是在八路軍新四軍包圍之下的敵佔

區，而不在是國民黨軍隊附近的敵佔區，為什麼不能有受降的權利呢？我們平日是說得這樣清楚，而大公報的社論還問說：「附近到什麼地方？」這問題是無從的可笑。是重慶昆明與平津附近呢？還是對察哈爾與平津附近呢？是重慶昆明與南京上海附近呢？還是江浙各解放區與南京上海附近呢？諸如此類的問題，這難道還用再回答嗎？這難道能像做戲倒的問答嗎？凡是八路軍新四軍「附近」的敵佔區，而不是國民黨附近的敵佔區，這就是我們的所謂「附近」。而只要是在其「附近」還有敵人，八路軍和新一軍為神聖莊嚴的祖國利益和根據人民所付託的責任，便有權利去解決它，難道能說這是不對的嗎？這是損害祖國的利益嗎？不，先生！這所損害的，僅僅是日寇的利益。

「爭地」的發動者是誰呢？難道不就是國民黨當局嗎？若問共產黨，則是怎樣的呢？實際上，中國共產黨為顧全大局，在日本投降之後，即已準備讓南京、上海、杭州這些大城市由國民黨軍隊去受降，雖然南京、上海、杭州這些大城市是在新四軍包圍之中，而國民黨軍隊離開南京、上海乃在幾千里外。隨後決定撤退在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內）的八個解放區抗日軍隊，向臨海路以北、蘇北、皖北的解放區集中。這是極大的「為國讓讓」。這既沒有爭地，也沒有爭地。當我們為爭取和平，採取這樣讓讓的步驟的時候，這些解放區的人民對於撤退的八路軍新四軍的留戀，是那末的感人至深，這人們知道這類的消息的時候，都簡直沒有法子控制自己的眼淚。他們說：「子弟兵，我們永遠忘不了你們。」當我們解放軍的戰士們唱着那「備和我們過不去，不要傷害老百姓」的歌聲，為老百姓聽到的時候，許多人都哭了。我們共產黨和解放區人民對於國民黨是這樣的寬大，是這樣的相忍為國，是這樣像毛澤東同志在那麼會上大聲所說的「和為貴、忍為高」。但是，國民黨當局是否感動於中呢？國民黨軍隊當我們解放軍撤退的時候，既那末無情地和解放軍的戰士過不去，又那末殘忍地傷害我們解放區的老百姓。殘殺擄掠，其範圍，其方法，無所不用其極。我們真想不到人間有那樣倒行逆施的殘酷行爲，而這些却都是在這「中央的軍事委員會」的命令之下的行爲呵！

大公報質問我們「和了幾次，忍了多少」，但是，我們却正要質問大公報了：為什麼大公報不向國民黨當局問問：國民黨當局究竟「和了幾次，忍了多少」呢？

大公報完全錯了，內戰的根源是在「中央的軍事委員會」的命令，這不

在來總司令的命令。前所提到的這「中央的軍事委員會」所給的偽命令，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那原是內戰的一種假本，那就是這「中央的軍事委員會」在日本投降之後即準備國內分裂的藉口。隨後，關於內戰的直接命令，就陸續不斷的發出了。這類命令不但發給國民黨所屬的軍隊，而且還發給被給敵人。國民黨領袖、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先生都電報謝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並要蔣主席派代表到平津冀同來商討停戰的時候，何應欽於八月廿三日派員向日軍投降代表今井提出受降補充事項兩項，轉知岡村寧次遵照，內容如下：

「甲、中國境內之「非法武裝組織」，擅自向日軍追求收繳武器，在蔣委員長或何總司令指定之國軍接收前，應負責作有效之防衛。乙、根據現有「股匪」之開封、天津、鄭州等地，該地日軍對於現有各該地之肅清、即致中豫部，採取積極態度，未事防衛。關於此事，目前應特別注意，並應依中字第號號號號，迅速將指定之日軍，集中於上述「股匪」進政之地方及其編各地，作有效之防衛。如果各地或中字第號號號所列之其他各地，亦應委員長或何總司令指定之國軍接收前，為「股匪」所佔領，日軍應負責任，並應由日軍將其收復，再交還我接受部隊。」

什麼是「股匪」？所謂「股匪」者不是別的，即歷來中國反革命的統治階級對於革命的人民所加的稱呼，太平天國受過這樣稱呼，孫中山的革命黨人受過這樣稱呼，在十年內戰時期，我們受過這樣稱呼，在抗日戰爭中，日寇這樣稱呼偉大的抗日人民解放軍——八路軍新四軍，現在國民黨反動派又跟着日寇一樣，這樣來稱呼八路軍新四軍了。這個命令要日本侵略者在中國領土對抗日國的中國人作「有效之防衛」，要日本侵略者幫助偽軍防衛抗日的中國人對偽軍的進犯，要日本侵略者向中國人「收復」所退出的中國領土。這個命令和朱總司令的命令裏正作了完全明顯的「對立」。請你聽大公報說說：在這樣明顯的「對立」命令當中，你究竟站在對立的那一方呢？這個命令表示了國民黨的反動軍閥不但自己出馬和八路軍新四軍進行內戰，而且還毫不知恥地借用了民族不共戴天之仇的日本軍閥來進行內戰。請問大公報說說：誰是你們所謂「光榮勝利」的國民？所謂當做的事務嗎？創造這「一片威風凜凜氣象」者，究竟是那些人呢？請問大公報：這個命令裡面所表示的，國民黨當局究竟「和了幾次，忍了多少」呢？

好，這這給敵人的命令是在毛澤東同志到渝之前所發的，且看毛澤東同志到渝之後的事實。十月八日，毛澤東同志到渝下了一場進步方向的飛

，晚上有「剿匪手本」兩冊及軍委會九月十七日的代電一封，代電原文是這樣寫的：「吉縣第二戰區團長官助鑒：茲附寄剿匪手本兩冊，請查收。中正申德（即九月十七日）」。請問大公報：這「剿匪手本」是幹什麼的？是救平的手冊嗎？是「殺亂兇險」的手冊嗎？這是國民黨「和」了幾許，忍了多少呢？十月二十四日，胡宗南給高樹勳的電報，所轉的「奉委原電」原電開：「務本以往抗戰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訂剿匪手本，督同所屬，努力進剿，迅速完成任務……其遲滯貽誤者當必執法以罪。」這「奉委原電」發的日期是十月十三日，正是國共兩黨在重慶所簽訂的雙十協定之次日。在那協定上是這樣寫的：「堅決避免內戰」。請問大公報：當協定的墨汁未乾的時候，這國民黨「中央的軍事委員會」的命令所說的是什麼？是維持和平呢？是鼓勵內戰呢？這不是明明白白的說的努力內戰者有功、不努力內戰者有罪嗎？這是國民黨「和了幾次，忍了多少」呢？

大家看！「一片戰亂兇險氣象」的「根源」，不就是在國民黨這「中央的軍事委員會」的命令中嗎？「兵連禍結」的根源，不就是在國民黨這「中央的軍事委員會」的命令中嗎？大公報的作者們心焦思出另一條「根源」來，可惜白費了腦力，在明眼人看來，主觀的虛構終究是主觀的虛構。

「不擇手段」者是誰呢？請問大公報：聯合敵偽和保存敵偽以進攻抗日的中國人民，還是叫做「擇手段」嗎？請問大公報：為着爭奪地，不讓抗日的中國人去接受敵佔區，而却請求外國人去接受敵佔區，這是否叫做「擇手段」嗎？請問大公報：為着獨斷全國的一切利益作為一黨一派一家之私，不讓抗日的中國人參與內政，而却請求外國人來干涉內政，這是否叫做「擇手段」嗎？

請問大公報：當敵寇在淪陷區肉中國人民的時候，國軍軍隊逃得遠遠的，躲得遠遠的，那時大砲不拿出來，坦克不拿出來，飛機不拿出來，可是等到淪陷區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領導下，而想許多淪陷區變成解放區的時，國民黨即拿出各種外國供給的新式武器，請問自己有沒有犧牲部隊，對着解放區人民，大顯身手，這是否叫做「擇手段」嗎？請問大公報：一面談判和簽訂雙十協定，但另一面却把抗日的中國人叫做「匪」，這是否叫做「擇手段」嗎？而內戰的大軍且早在談判中回解放區進發，這是否叫做「擇手段」嗎？

請問大公報：解放區抗自軍隊向一切還有敵偽的地方積極進發，這是否叫做「擇手段」嗎？解放區人民的敵偽，解放區人民的敵偽，這是否叫做「擇手段」嗎？

這是叫做「不擇手段」嗎？請問大公報：難道這不是你們把「州官放火」便叫做「擇手段」，而把百姓點燈便叫做「不擇手段」嗎？難道這就是你們「為國家前途擔憂」的過渡嗎？

然而，大公報的作者先生呀！今日國家前途所可憂的，却不就是你們言論所代表的這種過渡時期、粉飾頹倒、是非顛倒、黑白顛倒的現實生活嗎？你們所擁護的統治勢力，為着把中國變成一黨一派一家之私，為着壟斷全國的權利和抗日利益，硬把壓迫放在人民頭上，把仇恨集中在解放區的軍民和共產黨身上，於是，就把一切合理的東西都顛倒過來。你們想想！如此顛倒，如此倒行逆施，如此和解放了的人民結仇，中國能夠「從此見到太平」嗎？中國人民是急切需要和平的，這是我們共產黨人所急切要求的東西。但是你們所擁護的國民黨統治勢力却顛倒了一切，抹煞了正義，造成了到處內戰的烽火，而當解放區人民起而自衛的時候，你們却拿出各種帽子要來加在自衛的人民的頭上，說自衛的人民有這樣的罪，又有那樣的罪。你們毫無顧忌，大為內戰張目，而你們却還說着「和平」，說着「人民」！你們以為中國政治的是非可以由少數人任意顛倒之，但是，你們錯了，完全錯了。中國人民在百年來的鬥爭中已自覺起來，已不是能夠像綿羊一樣任令獨夫民賊所欲殺，中國人民需要改變顛倒的生活，已經能够分別政治的是非，懂得自衛，當然也懂得內戰的根源之所在，這不是你們的擁護一黨一派一家之私的筆墨所能抹煞的。

第二個問題：國民黨發動的兵爭是幹什麼的？

大公報說：「政黨要爭取政權是應該的，問題在於應該以政爭，而不應該以兵爭。」我們問：大公報：為什麼你們不向國民黨當局勸一勸：要他們不要採取兵爭呢？為什麼你們單獨「贊中共」，却不去質問一下發動兵爭的魁首——國民黨呢？

我們告訴大公報：國民黨當局現在對內的「兵爭」，是與國民黨的「政策」不可分的。兵爭不過是政爭的繼續。國民黨爭奪地是為什麼呢？難道不是為着它的政爭嗎？國民黨之所以要採取兵爭的手段，就是為的要達到其加緊權上，在經濟上宰割全國人民的政爭之目的。你們要知道國民黨政爭的目的嗎？我們在前面已說到國民黨的政治企圖，你們或許說只是我們的成長，只是我們的宣傳。但是，先生呀！我們共產黨是主張科學反對成見的人，我們是真正心服理的人。是的，我們共產黨和一切政黨一樣，有宣傳工作這一項，但我們和一切其他有階級偏見的政黨不一樣，我們的宣傳工作，是

在向人民說明那種由事實而來，並為各種事實所反證的真理。說說最我們宣傳工作所深惡痛絕的一個破條。我們對國民黨的看法，就是實事求是的。現在我們根據這種實事求是的方法，停在這邊分析一下國民黨當局發動「爭奪地」的兵爭之政爭的動機吧。我們這種且不摘引我們自己報紙的一切事實單是從各地大公報的通訊摘出的。我們這種且不摘引我們自己報紙的通訊，也不摘引大公報以外的報紙的通訊，而單單摘引大公報的通訊，並且我們這種也還只限於隨便摘引大公報通訊的一些片斷，不能做詳細的摘引。

國民黨當局爭奪地的「政爭」目的，第一，保存敵區和保存敵偽所建立的奴隸秩序。國民黨「中央的軍事委員會」在日本投降後，命令敵偽「負責維持治安」「維持秩序」，已如前而所述。國民黨當局這種命令所完全說明秩序，不願有中國人民的解放秩序，已由國民黨當局這種命令所完全說明。十月十八日，國民黨內政部公佈所謂「收復區清查戶口辦法」，對於最下層的政治組織，更具體規定：「對當地原有（按：即指敵偽原有）保甲組織，應照實際情形，盡量利用，已被摧毀（按：即已被解放區軍民所摧毀）者應重新編織」。按照國民黨反動派，抗戰勝利了，而人民仍依然應當是奴隸——這就是國民黨一切政策的出發。因此，敵偽的奴隸秩序，對於國民黨當局，就需加以保留，而且還需聯合舊的外來奴隸主，更其需要保留那熟悉奴隸的奴隸總管。因此，國民黨當局就要磨平他們和敵偽的界限，就要和敵偽合流。這就說明了大公報「還京雜記」對於「恢復」後的南京所寫的，為什麼「南京並沒有解放或光復的氣象……一切都和平帶一樣（即和敵偽佔領的日子一樣）。」請再看上海大公報十一月十五日的一篇北平通訊中

「北平人最受不了的是外來人所加給的冷戰。大漢奸——特別是到重慶做了保護色的，逸然自得；而為了飯碗不得不虛與委蛇的甘萬公粉人員，到成為正牌漢奸。他們眼見過去敵人漢奸走狗，一躍而為抗戰英雄，過去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一變而為地下工作者。老特務表現，從容離平，踏着他所殺死的屍體，還說「再見」。操縱經濟的日人白島，經過一度資產轉移後，到山西落髮為僧。過去主持過新民會「幹，操縱「一幹，治安北京」的新民會會長、「新國民運動」起來的胡漢翔，仍以新貴出入社會，作「既得利益」黨中的不倒翁。更不能使人理解的是敵軍的不集中，不積極，不作工，以騙取萬丈的姿態，微笑着來大卡車東奔西走，搬運物資，除向國軍盟軍贈送一件軍，好像是「復員」了。日偽本決定電車道以西住戶全遷西直門外集中，如今却

自從在返來，西華東軍的商場內，木屐聲滿坑滿谷，各大餐館內，日也
大飽餐仍有最大的購買力，中國商人還在進進退退，平津頭一等火車內
，日人的冠蓋如雲。

「天下烏鴉一般黑」。凡是國民黨的所謂「收復區」內，其政策就都是
這樣，其政績就都是這樣。

國民黨當局爭降爭地的「兵爭」之政爭目的，第二是變由發「國庫財」
到發「勝利財」。不管大公報把這類事實寫得如何沖淡，但這種也還是只引
用大公報的吧。十月二十四日重慶大公報的南京通訊，於敘述了「重慶人」
（受國民黨當局重重壓迫的重慶人民，對於「重慶人」這名詞，是罵要大叫
要罵的呵！）的「氣憤」、「感憤」、「悶憤」、「忙憤」之後，還末寫
道：

「冷眼的江東夕老觀察了這兩個月得了一個結論，「重慶人」到了
收復區，第一件工作是做衣服，找房子，第二件是弄汽車，第三件是買
黃金，第四件是女人。他們原希望這些凱旋的英難來，地方秩序漸漸安
定，物價逐次平復，從此脫離了苦海。誰知道敵人却把生命享受，成了
抬高物價的因素，一開始工作就是把郵票加了十倍，鐵道客運加了九倍
，水電加了十倍，南京城內公然白晝搶劫，拘留所有人滿之患，一般物
價在跳加官。」

十一月十五日上午大公報的北平通訊寫道：

「日本投降之後，不過三個月，到處的物價都由狂跌到狂漲了。濱
海的物價反對到重慶，由重慶再正射到濟南……今天，北平已然是三天
三價價格。全城物價已不准自由出境了。」

「從京滬到北平，夜員就是復原，接收就是停頓……北平的重慶
「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中央來了民運隊。」中央來到物價委員會，配給反
而取消，中央來到，中央中央的處置，恰如給八年來的難民者迎頭潑了
一盆冷水。有形的物資容易接，無形的人心不易接，有形的物資今天的
接收已如此蒼白，無形的接收更是失敗到萬分。」

重慶人到了收復區，態度上有些像一個戰俘者，在經濟上，法幣的
購買力更比用敵幣力更予以抬高。」

「第一個禍端到北平後，」有一位深通內幕者道：「第一筆款會
向各銀行借了二十億元……這以後錢越越多，政府與金融的關係，因而

便難拾獲分了」。

又是「天下烏鴉一般黑」。凡是國民黨所謂「收復區」內，其政策就都是
這樣，其政績就都是這樣。

好了，國民黨政爭及其目的還有許多，但我們這裡所提到的兩個，却是
主要的。第一個目的，是關於「政治」，第二個目的，是關於「經濟」，但
政治又是為着經濟，經濟又與政治相連。因此，這兩個目的，是聯繫在
一起的。十一月一日重慶大公報的上海十月三十日電：「重慶人」一名詞
，近已成爲惡意嘲罵之稱謂。」「在一般心目中，辦事無能，及惟利是圖兩
點，現爲此一名詞之註脚。」「惟利是圖」是經濟，「辦事無能」是政治，
但所謂「辦事無能」固然太客氣了，而且缺乏分析：國民黨統治者代名詞的
所謂「重慶人」對敵人是無能的，但對人民却是兇惡的。請問大公報：你們
口口聲聲：「國家」，「國家」。但在國民黨的「收復區」內，國家放在那
裡呢？你們現在也口口聲聲：「人民」，「人民」。但在國民黨的「收復區
」內，人民放在那裡呢？你們說：共產黨不應該和國民黨爭降爭地。好像一
切都交給國民黨，則國家也，人民也，就都萬事大吉了。這不是你們的私心
是什麼？這不是你們的欺騙是什麼？

國民黨當局不但在抗戰前、抗戰中，把國家和人民弄得糟透，而且在日
本投降後同樣地更有糟無已。據十一月十五日上午大公報所載：連行政院副
院長翁文灝「談及收復區種種不良現象，請達到使人不敢相信的程度」。然
而你們却認爲一切都應該讓國民黨去收復，連解放區也都要交出，以便使一
切地方都「壞到使人不敢相信的程度」！你看！甚至你「報上通訊的標題都
要說「休說重慶來」（十月二十四日）但你們却主張把國民黨這類「征服者
」繼續從「重慶」以強力送到全國各角落去，以內戰的方法送到各解放區去
。這樣，你們的所謂「國家利益」，不是假的是什麼？你們的所謂「人民利
益」，不是假的是什麼？

大公報的先生！國民黨當局的所以來和解放區人民作兵爭，並且所以那
末地不顧一切和不擇手段，就是在於要保持敵偽的奴隸秩序和掠奪人民的財
富。國民黨當局認爲這是他們重新擴大壟斷全國政權和全國經濟的基礎。而
國民黨的政策在此，國民黨的政績也在此。這是你們自己的報紙所寫的。不管
你們對於這種可能苛痛的事實如何輕描淡寫，但究竟是天下人皆知的事實，
連你們也掩蓋不了。國民黨的專制制度、政策及其政績，乃是人民所不願受
的，所不能忍受的。因此，國民黨當局對於人民來只能用力鎮壓，使

「兵爭」。他們對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是依樣畫葫蘆，對解放區的人民是依樣畫葫蘆。對解放區的人民更其望用兵爭。這大概是天公無私所以不願黨國告國民黨其不愛兵爭的原故吧？但難道中國人民就可以不爭了嗎？難道中國人民不爭，就變成「光榮勝利」了嗎？告訴大公報：不爭是不行的。在這樣的統治情況下，如果不爭，中國就將永遠是黑暗，是悲慘，中國人民就將永遠是奴隸。

當然，我們是堅決主張用和平與民主的方法作政爭的。可是，解放區的人民對於國民黨當局所來的進攻解放區的兵爭，只好被迫採用自衛的「兵爭」。我們這自衛的「兵爭」，當然同樣地是一種政爭。我們的政爭是什麼呢？和國民黨的政爭的目的相反：我們共產黨的政爭是保護民族的利益，保護人民的利益。我們自衛的兵爭，僅僅是這種政爭不得已的繼續，而不是其他。

共產黨在解放區的政策、政綱，是徹底解除敵偽統治，徹底摧毀敵偽的奴隸秩序。這是和國民黨的所謂「收復區」完全相反的。

共產黨在解放區的政策、政綱，是徹底實行民主，改良民生。這是和國民黨的所謂「收復區」完全相反的。

你們又要說，這是我們的「宣傳」了吧？但是，這種實在的情形，不用我們宣傳，早已中外皆知。現在我們也不用指引我們自己報紙的報導，也不用指引過去中外記者寄到外邊去的報導，單單指引最近美國記者斯德爾給紐約的「先驅論壇報」報導的解放後的張家口的情形吧。雖然那通訊還存有一些錯誤的成見，但却說了以下這些事實：

「共產黨政府（這說法是不妥當的，應該是解放區人民民主政府）應用着他們在近幾年收復的地區中所使用，而巳得到某些成功同樣的方法，鼓勵人民繼續其正常的生活和私人的營業。政府控制一切公用事業及若干經營一般必需品的公司，但並沒有企圖進行共產化。」

「重大的經濟和政治的改革已付諸實行，或已計劃。」

「採取步驟以減少那過於苛重的地租和利息；在若干世紀以來，苛重的地租和利息曾經是中國農民底手錶的紀錄。」

「這些改革是為着要給一般的人民以經濟的好處，使他們擁護共產黨的政策。在其他的區域的同樣的改革，是共產黨政府能夠取得統治下的人民的如此擁護之最大原因。」

「共產黨所做的事情，有許多是很好的，——這是沒有疑問的。他們在這裡所提出要為人民做的事情，有許多是很好的，——這也是沒有疑問的。人們看到了共產黨領袖們之百折不撓和毫不貪污，不得不感佩。」

「在中國本部與內蒙古之間的長城口子的日本軍官告訴我，每天平均有五百人從這個口子向北跑入共產黨統治區域（按：應該是解放區）。

難道這是共產黨自己造的謠言嗎？請你大公報把我們共產黨為人民做的事情，和國民黨在人民中做的事情比一比吧！請把解放區的秩序和國民黨統治區及其所謂「收復區」的秩序比一比吧！共產黨的取得人民信任和擁護，不是依靠兵力，而是依靠政策和政綱。「這是沒有疑問的」。共產黨的兵爭——和國民黨軍閥的兵爭相反——不是對人民的，而是對反人民的武力所不得已採取的自衛手段。「這也是沒有疑問的。」

大公報有種特別奇怪的邏輯，它說：「天下事也絕不可諱之不得已，原諒了不得已，就一切都得原諒了。」當然這就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老邏輯。但是，不管你不原諒也罷，我們還是依然只好「不得已」。這「不得已」是為什麼？不是為別的，只是為了保衛中華民族的利益，為了保衛中國人民的利益。

大公報說：「以政綱政績勝的是和平民主之路，以武力勝的則必然是獨攬專制，那是禍亂之源，絕對與民主背道而馳。」這話說的不完全，應該這樣說：對於人民，「以政策政績勝的是和平民主之路」。共產黨正是這樣。這是共產黨在解放區所完全實現的了。對於人民，「以武力勝的則必然是獨攬專制，那是禍亂之源，絕對與民主背道而馳」。國民黨正是這樣。這是國民黨在其原來的統治區及其所謂「收復區」所完全實現的了。

我們共產黨本來是從中國人民中來，又到中國人民中去的。很可笑，大公報竟給拿了我們毛澤東同志經常告訴我們同志關於「共產黨應該生長於人民之中」的話來勸告我們。請讀大公報的「好心好意」吧！我們共產黨員是懂得我們自己應該如何做的，是很懂得我們毛澤東同志的教育。但是，你們更應該考慮你們究竟「生長於人民之中」有幾許？如果你們把我們毛澤東同志這種話轉勸你們自己和國民黨員，不是更好些嗎？

由上述的事實可見：現在中國有兩種政爭：一種是反人民的，因而也是內戰的，專制的。這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政爭。國民黨的政綱和政績說明了這一點。又一種是為人民的，因而和平的，民主的，這是共產黨的政爭，共產黨的政策和政綱說明了這一點。

這種不同的政爭決定了目前兵爭的情況：在國民黨當局方面是積極發動內戰，是為反人民、反民主、而假借外力以求貫徹其壟斷全國的企圖。在解放區人民方面，是被迫自衛的，是為保衛人民、保衛民主、而真正要求全國實行和平民主的統一。

難道要製造「南北對峙」？新華日報的社論說得對，這是國民黨當局，而不是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共產黨的和平、民主、團結、統一方針，中國就不會有南北對峙。根據國民黨反動派的內戰、專制、分裂方針，那就是在變南北對峙。請讀大公報：你們不「甘心」南北對峙的局面，而你們還在發動內戰，這不是正在鼓吹南北對峙嗎？請用你們的話問問你們自己吧：國民黨

質中共

十一月二十日大公報社論

如天之淵，我們的抗戰勝利了。我願日本宣佈投降三個月，全國同胞於抗戰勝利狂歡勝利之後，人人之心頭，又籠上一層深憂，又歷上一塊重鉛。這深憂重鉛的心情，甚至超過抗戰期中任何艱難危險時期。爲什麼？這是因爲人人滿懷希望得見太平且爲光榮勝利而來的國民，但是現實的演進，却是一片陰風鬼臉的現象。多少人焦急着勝利不得還鄉，更多少人重陷於水深火熱中，復爲亂世的魚肉。明明勝利到來，羣衆不得，紛紛亂起又相逼而來，誰不爲之憂憤惶惑？

這高懸在羣衆的頭上的，究竟確的政計中，政府與中共爭奪地，自由行動；中共政府進攻「解放區」，發動內戰。總之，中共是當前局面中的一個主角。我們憂國有心，要全國同胞共苦。我們對這局面會一再向政府與中共進言，以期有補於時局，今天特對中共提幾句話。

今天的局面演成，從文獻上尋索，日本宣佈投降之初延安總部發佈朱德總司令的命令是一個樞紐。那個命令，稱爲「建設總部命令」，命令各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部隊，得撤軍之械，受敵軍之降，編遣歸軍，「對任何敵僑所佔城鎮交通線，都有全權派兵接應，進入佔領，實行軍事管理，維持秩序，並委任專員負責管理該地區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壞或反抗事件發生，均須以漢奸論罪。」這命令，固然與中央的軍事委員會對立，而以獨特的執事，從事軍閥的進兵與受降。全國人看到朱總司令的命令，都爲國家前途擔憂。幸而主席主席王明，把毛澤東先生請到重慶，商討國事，全國人的心緒爲之一鬆。毛先生在重慶住了四十多天，團結商談連續舉行，雖無大結果，而從一般空氣上，從發表的「會談紀要」上，確曾給予全國人以企求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新希望。但事實上，當毛先生留在重慶時，山西的伊陽鎮已在開始，津浦線海軍漢三條鐵路的破壞已在進行。及至毛先生返國延安，廣大的北方到處起了殺殺之戰。在這些，山西的長治被八路軍佔領了，太原被圍攻了。殺殺的戰事起來了，到現在戰事已迫到了膠濟與包圍。在這時，豫西曾有動作，鄂北的襄陽被攻佔，陝北的三邊打起來，平津近郊，一日數戰。在這時，北方的鐵路被破壞，路軌拆掉，枕木搬來，橋樑拆斷，有的地方路軌且被拆平。在這些，接收東北無消息，共產黨的武力進入了大東北，山海關方面起了爭戰。這局面，已够亂了，而還在發展擴大着。這局面，若我是政府進攻「解放區」，則範圍之大，實不與於原來所稱「解放區」。若我是爲了爭受降，則接收的條件佔山等則是對國軍人，既不是敵人，更非過渡時期。毛先生既在重慶時，曾發表在抗戰勝利後

發動內戰，要破壞那樣的局面，則兵連禍結，更有無窮無盡的生命的財產的損失，國家要被精竭成什麼樣子，豈可不加顧念？「改進黨」的觀念是時候了。第三個問題：什麼是國家與什麼是「國家兵」？

大公報說：「中共可以說我們的兵是『人民的武力』。這是什麼『人民的兵』？只有國家的兵，人民不得有兵，也無所謂『人民的武力』。」

原來大公報的「國家」是和人民分裂的國家，不是人民的國家。大公報這想說出了自己所主張的「國家」，也說出了國民黨當局之所謂「國家」的真相。

世界上那還有什麼沒有人民的國家呢？是的，歷來剝削階級是把社會剝削起來的，國家也就被剝削了，國家被當成個人或少數人的私產，而把人民壓在足底下，不許人民掌權，不許人民過問國家大事。他對軍隊、監獄變成了壓迫人民的工具。但是，事實又是清楚的，如果那「國家」沒有人民存在，沒有人民在那裡做各種勞動，又沒有人民當兵，那也就不成其爲「國家」了。中國情況同樣。人民創造了國家的一切東西，但人民在國家中却被剝奪了一切東西；人民本來是國家的主人翁，但人民在國家中却只許當奴隸。這是歷史的大原則。你是維護了這種顛倒呢？還是要變更這種顛倒？

按照大公報的社論，它是主張維持原來的這種顛倒。你看！它是把國家和人民完全分裂對待的，它認爲國家和人民乃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而不是一致的東西。所謂「只許國家有兵，不許人民有兵」，這就是說：它所謂的國家乃是少數人的國家，而不是人民的國家。所以「人民不得有兵，也無所謂人民的武力」，而少數人反人民的武力也就可以叫做「國家的武力」，並且「只許」它是唯一的「國家的武力」。

按照孫中山先生和我們：必須根據新民主主義，變更原來統治階級的專制，把國家與人民變成一致的東西，人民應當變成國家的統治者。因此，人民的武力就是國家真正的武力，國家的武力必須是人民的武力，而反人民的武力就不叫國家的武力。

八路軍新四軍——這是從人民中來的軍隊，他們和解放區的民衆統統都是中國人民的武力。這是國家真正的武力。他們在保衛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中，雖無毫無外來的援助，直到日本投降時，僅抵抗着在華日軍的百分之六十九和國家的百分之九十五，難道這僅保衛國家的武力不是天下第一號的國家的武力嗎？難道這和手旁親、湯敵敵的國民黨軍隊其而是天下第一號的國家的武力嗎？

大公報這種反人民的國家觀念完全錯了。那是極其極其的荒謬。若這對於現代中國人民要求的老觀念，不適合於今日中國人民實際的處境。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中華民國應從人民建起。請把孫中山先生這句話仔細

的說「和為貴」，「忍為高」；目前這局面，試問中共會和了，誰許了，多少？

一個國家，於勝利之後，有兩個系統的軍隊爭地，已絕不應該；而爭地地復無止境，更如何得了？每安插一地的命令說：「各守其地，任何抗日武裝部隊，均不得……」其附近各城鎮交通要道之敵軍部隊及其指揮機關……「這道「禁區」一附近一帶地方？這道的大東北也在「附近」之中。陝北的三邊，是在後方，並非敵區，為什麼也打呢？看北方的戰局，很令人一驚一乍的暗示，是中共真欲擴充它的力量，憑它的武力，做到「會談紀要」中所要求的陝西路以北及蘇北皖北的特殊化。假使做到那樣局面，那便成了所謂「南北朝」的局面了，國家便分裂成兩半了。更何況那樣的局面，則兵禍無窮，要有多少無辜的生命財產被毀滅，國家要遭何等慘狀？這樣子豈可不加顧忌？縱使力征誼成，弄成兩半的局面，國家真個對成兩半了，請問全國人民是否甘心甘願？請問北方人民是否甘心甘願？共產黨應該先生要於人民之中，要實現這國大原則，也應該問問人民的意願。毛澤東先生和重慶時，曾屢次聲言國家應該統一，他也同意本黨「要變不要亂」的主張。今天的局面，很可能把國家弄成不統一，並導國家於大亂，那豈不也有違毛主席的本意嗎？

凡是一個政權，都是為了爭取政權而組織，所以政黨爭取政權是應該的。問題在於應該以政爭，而不應該以兵爭。以政爭，是以政策及政績決定勝敗；以兵爭，則是武力決定勝敗。以政策政績勝的，是和平民主之路；以武力勝的，則必然是強權專制，那是禍亂之源，絕對與民主背道而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可能博得眾人的同情，我們所最不能同情的，是以兵爭政。共產黨也許說有兵是一種手段，是一種不得已。但天下事，絕不可不得已，就一切都得原諒了。中共可以說，我們的兵是「人民的武力」。這是一值得一辯的。兵是國家的，只有國家有兵，人民不得有兵，也無所謂人民的武力。若使人民自己可以有兵，則人民是人民，我是人民，我也得有兵，雖說是「人民的武力」，而實際是私兵。建國紛紜，豈是私兵，則國家必然大亂。我們主張軍隊國家化，就是只許國家有兵，不許人民有兵，也不許黨有兵。我們這話雖對共產黨而言，其實也是對當天之下的政黨而言，凡是政黨，都不應該有兵。政爭可謂是非於人民，兵爭則必打到你死我活，人民都遭大變。被殺於爭王霸或政權的爭戰中，誰還顧問什麼民意？更有什麼是非？

事情鬧到不論是非專門武力的時候，那還不是天下大亂？被殺被殺，路路生於困獸，爭地爭地，而使血肉橫飛，無論如何，還不是人民的意志。在世界已進化到運用原子能的時代，我們還在以野蠻人為戰的方式打天下，也實在太落伍了。為共產黨計，應轉循政爭之路，堂堂正正，而不可在兵爭之場演演。我們希望共產黨為國家人民爭民主，爭憲政。在這方面，應該一切不讓步。那時我們也希望共產黨放下軍隊，為天下政爭不讓軍隊之場，放下屠刀，特赦政權，以爭全國的政權。與其爭地爭地，何如爭氣爭氣，爭氣爭氣，我們希望中共轉此一念，那不但不是國家民族的大幸，而延安諸公也將被全國同胞所唾棄而舉為萬家生佛了！

「國權」一語，孫先生道新國家觀念，正是他的新實力觀念——「國家之實力」——的基礎。國家應從人民造起，權道武力就不應從人民造起嗎？從人民造起的武力難道不是「人民的武力」嗎？

反對人民的武力，就是反對人民的國家，就是反對近代中國人民鬥爭的新國家觀念，反對孫中山先生的新民主觀念。

大公報說：「若使人民自己可以有兵，則你是人民你有兵，你是人民我也有兵，雖然這「人民的武力」，而實際是私兵，舉國紛紛變為私兵，則國家必然大亂。」這說法真是可笑。對於人民作選擇的了解，且落伍極了。就其幼稚，也幼稚極了。民國五年，孫中山先生的「建設方針」演講中說過：「不知合衆人而揭亂，其禍最難。」真實生活說明了孫中山先生的英明見解。要知道人民最會組織自己的秩序的。民國以來的大亂，恰恰都是北洋軍閥和國民黨軍閥的私兵所造成的。可以說是有史以來吧，中國人民第一次真正在解放區遇見了「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秩序，這種所統治的武力，却就是人民的武力。而沒有人民武力的地方，一直到現在，正如新華日報社論所說：「這還是沒有人民的武力之故？」

人民的武力才是國家兵；而人民的武力則一定是私兵。有人民的武力，則國家治，沒有人民的武力，則國家亂。兩種生活在中國都有具體的證明。不願承認這道兩極生活的經驗，而徒逞筆墨的詭辯，大公報可以休矣！

當滿清朝廷衰世亂離「中央政府」的時候，他們都是以「國家」、「中央」、「合法」的名義打擊人民，想奪一切，犧牲民族的利益。還老一套被國民黨反動派批襲下來，時間已很久了。抗戰八年，中國人民起來要求改變國民黨統治的醜態，而大公報則出來辯護醜態。人民經過無數的犧牲，希望管理自己的國家，以避免新的災難，以求得比抗戰前更好的生活，但如果武力不成為人民的武力，如孫中山的武力被取消的時候，如果武力依然是軍閥的武力，依然是國民黨一黨獨斷的武力，那末，人民的希望便會落空，人民便將繼續在劍子手的刀下過活，而中國將仍將是落後的封建的國家。

大公報的作者先生，你們要在人民面前抹煞這痛苦的經驗，血的教訓，你們是低估了人民的覺悟了。你們有辯護國民黨統治的私心，所以你們雖然口說國家，口說人民，但却全是顛倒的看法。你們把人民顛倒，把國家顛倒，於是對現實的一切問題，就都顛倒起來了。你們對於內戰根源的看法就顛倒了。你們對於兵爭與政爭的看法就顛倒了。但你們這一切顛倒，終究是無法抹煞真理的，因為你們沒有法子抹煞事實。中國人民的眼睛已經長得發亮了。你們還是少在談話方面用工夫，那末，中國有願，你們自己和你們的子弟也就会有福的。

三十四年大後方經濟

危機並未渡過

許滌新

一 物價之回漲與頓挫

日寇投降以後，各地物價，便急速地低落下去。這種暴跌，急遽地展開了戰後的經濟危機。這是我們在上一季中已經報導過的。

就一般的趨向而言，重慶物價下降的最低點，是在十月初。據某研究機關所編製的重慶二十二種主要商品零售物價指數，日本投降前夕較戰前上漲一七七〇倍，到了十月二日這個指數降至一〇二四倍，較八月十日下午跌百分之四二·七，這是最低點；從此以後，物價又重新上漲。十月份的總指數為一一八、四一七，十一月份為一三五、〇八五。物價實在在回漲。

不但重慶的情形如此，大後方的其他城市，亦未嘗不如此。成都的物價，在十一月上旬，比日本投降時漲了一倍或二倍；十一月中旬漲勢更陡，據十九日行市，「一週內麵粉漲價一百萬元以上（每百斤），其他金銀、食米、菜油、百貨、呢頭、文具，均往上爬」。昆明、西安及貴陽，均在這一兩個月中看漲。

不但後方的情形如此，收復區的大小城市，亦對後方各地，進行漲價競賽。據大公報的報導，十二月初南京之物價，較戰事結束時，漲了一千五百倍；廣州的物價，十一月半較勝利前漲七八倍，北平物價十月下旬較十月初，高漲四五倍以上。到了十一月，北平就弄到一天一個價格，全國物價不准自由出境了。上海的物價，漲得更快，十月十八日的商務日報的專電寫着：

「上海的商場正在混亂狀態中，一方面物價在無限制的上漲，使一般市民的生活感覺到空前的威脅，但同時南京路各大公司的顧客幾乎把玻璃窗都擠碎了，只爲了爭取每人限買一件的衣料。當局的限價政策使這裡的商人陷於進退兩難之境，正當商人不能不依照政府規定的價格出售貨物，但生產的廠家尚未開工，因此不接受定貨，大多數商家的儲蓄日漸空虛起來，營業時間也縮到每日五小時（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

到了十一月初，上海物價較之日本投降以前，漲了十倍至十五倍，一月數市，幾乎每天要漲一倍。各地物價是在進行着激烈的競賽。收復區影響了大後方，大後方又推動了收復區。互相推動，互相反射，物價就在這種情形之下循環上漲了。

但是，這種漲勢，到了十一月底，就遇到頓挫。十二月初，物價又有新下跌的姿態。據某研究機關所編製的「重慶二十二種主要商品零售物價指數」，十二月三日五八日一週的指數，平均較上一週減低百分之二·五，各種物品中，除雜糧類與金屬類分別增加百分之二·四與百分之二·一外，其餘如食物類減少了百分之二·九，燃料類減少百分之二·四，雜糧類減少百分之四。六西安、蘭州、成都等處物價之變動，均尚和緩，唯京滬一帶的物價，則跌落甚鉅，以上海而言，米

價一週內減低百分之八。九，小麥價格減低百分之二。八，煤炭價格，亦稍見回跌。物價之新下跌，並不能說偶然的。它的前途，很值得我們去注意！

日本投降以後，上海漸漸恢復其過去領導全國的地位。重慶的物價與金融，是更受它的影響的。其他地方，更不用說了。但比較起來，除了煤礦之外，無論米、花紗或金紗，上海的市價（十二月初）是較爲便宜的。這一季的物價之所以由跌而漲，又由漲而跌，並不是偶然的。這局面之所以形成，不但有舊的因素，而且有一些新的因素。

二 爲什麼回漲？

對於這次物價之回漲，有人認爲這是游資與季節的關係。游資在物價暴跌的時候，吃了一場大虧，有一個時期竟在觀望，竟停止不動，經過了二個多月的時間，久靜思動，它們又蠢動起來了。游資之重新出籠，救救物價，自然會使物價回漲。同時，冬季到了，年關就在眼前。這時候，乃是市面上購買較多的時候，因爲這樣，大家都想進貨了。這又是使物價非回漲不可的。

這二種說法，並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不過，游資之重新出籠，不能從游資本身去求得答案，爲什麼八九月間，它們不敢出動呢？爲什麼到了十月以後忽然又動起來呢？如果不從客觀環境之變化去探討，顯然是不能把問題弄清楚的。至於季節，亦不能簡單地去理解。如果季節本身能起決定作用的話，則何以在十二月初，物價又呈下跌？這價格不是更寒冷更接近年關麼？爲什麼偶而在這個時候有新的回跌呢？

使物價回漲的因素，比較重要的，我認爲有下列幾點：

第一是內戰在各地蔓延起來了。它的嚴重性，一月比一月來得兇；因爲內戰的發動者的部署，是一月比一月來得更週密的。那些醉心以武力統一全國的人們，對於抗戰是消極的，是傍觀的；但他們對於內戰，却極其熱心，極其英勇。因此，內戰的破壞性，是不會比敵人的三光政策來得輕微的。從漢南到華北，從豫西到東北，人民被殺害了，虛谷被焚燬了，農田變成地，糧食的產量減了。其次，內戰不但給與那些游資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的陽光的解放區和剛打退日本強盜和僑軍的新解放區以無情的打擊，而且沉重地打擊大後方和收復區以極大的打擊。這是可從田賦兵役和交通等問題看

得出來的。以田賦來說，當局會宣佈收復區本年應繳額，但實際上，山西、綏遠、江西、安徽、湖南、河南及浙江等，仍照常開徵，有的地方則豁免今年一年應繳額以前七年，有的地方則索性豁免八年總額。商務日報曾登載下列一則消息：

「晉省汾南各縣各種糧派仍繼續進行，一向較爲安靖之安邑，亦受其影響。縣長及國民兵團等隊尤爲橫暴，任意搶掠，渠等目前之意圖，厥爲追索八年糧賦，現拒絕交納者已有一人付之鐮刀」。

爲了打內戰，竟不惜把自己的語言撕成廢紙，被日本強盜和漢奸掠奪了八年後的今天，又來補這這一筆老百姓已經支付的田賦，這怎能使他們「吃得消」呢？以兵役來說，現在大後方各地的城市與農村，仍在拉壯丁了。爲了抗戰，叫農民離田生產，那是應該的，可是今天的砲火却是對準着自己同胞的。一面驅使他們去屠殺自己同胞，一面則直接減少了農村的勞動力。這對於農村生產的打擊，不是很大的麼？以交通來說，後方三分之二的輪船，都被搶去充當兵艦了。民生公司的十四條輪船中，只有五條是做復員工作的，其他如招商局及三北公司的輪船亦是在兵差的命令之下，不能進行復員工作。上海，南京及武漢所接收的數百艘敵偽船隻，更是全部配屬軍隊。到後來，連木船亦有大部份被劫差而沒法動彈的了。運輸交通的停頓，使大後方各大城市的人口沒法疏散，保持人口的集中；同時又阻礙了沿海一帶工業品之內運和內地一帶土產之外銷。在這種情形之下，物資問題依然嚴重，物價自然會上漲起來了。

第二是通貨之更加膨脹。通貨膨脹是一個總因素，這是八年以來，大家所深深認識的。但現在膨脹的速度，却非以前所及。去年每月的發行額是以前爲單位的，日本投降以後的今天，法幣每月的發行額，恐怕要以萬億爲單位了。去年的大票是五百元，今年的大票提高到二千元了；五千元的大票，已經印就，正在待命「出發」。日本投降後通貨的暴漲的原因有二：一個是內戰的軍費之支出；一個是復員與接收的經費之支出。爲了復員，各部的預算重新編了；爲了內戰，軍費的支出比抗戰的時候更加龐大。因爲抗戰時候的敵偽軍費是由敵偽支出的，現在這批參加內戰的敵軍軍餉的軍餉由政府支出了。在這種情況之下，通貨是沒法不急速膨脹的。通貨急速增加了，物價是沒法不漲下去的。

第三是收復區的財政經濟有不少不合理的措施。在人們的心目中。要收

發展着。今天的局面是對立的一些因素在互相牽制，互相影響的結果。但是，我們是不難在表面去把握這個問題的。從表面上看來，漲價的因素被跌價的因素所衝淡，這不是很好嗎？但我們如果進一步去看這種「衝淡」的內幕，那是很可担心的。今天整個物價漲勢的主要因素，乃是先聲奪人的外國商品，而不是民族資本所生產的中國國貨。龐大的外國商品雖衝淡漲價的通貨膨脹和內戰所遺成的其他影響，但同時亦切斷了中國民族資本的去路。

中國的民族資本，在抗戰的八年中比戰前顯得更脆弱。沿海的據點被毀壞了，後方新遷移的工廠是可憐得很的。八年苦戰的希望，是希望爭取得一個可以發展中國工業的良機，但，今天的情形是如何呢？大後方的工業是完完全全破產了，鋼鐵、機器、紡織及化學等業，無一部門不是如此。中小工業的破產，久已「司空見慣」，就是規模較大的第一流工廠——如中國興業公司、渝鑫鋼鐵廠及順昌機器廠等，亦在十二月間，宣告關門歇業了。二十九年間，風起雲湧的遷徙運動，竟支持不到六年就在勝利中途終止！為什麼這樣悲慘呢？戰時的管制和囤積居奇的壓迫，使他們沒法拾起頭來，勝利來臨了，但迎面而來的沉重打擊，是以官僚資本為內容的國營政策。紡織國營，蠶絲國營，甚至於麵粉及其他種種，亦都要國營了。在官僚政治之下，國營就是官僚資本的官營。今天收復區中的一些國營公司，今天對敵產招標的辦法，完全是有利於漢奸，官僚及買辦的。官僚、漢奸及買辦得了勢，民族工業資本就沒法發展。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有力量龐大的外國資本在面前。行將到來和現在就先聲奪人的外國商品，就是屬於這一項的。官僚資本以外國資本為後台，外國資本以官僚資本為爪牙，民族工業資本還有立足的餘地嗎？目下物價之下跌，目下這種畸形的「穩定」，是以民族工業為犧牲的。

物價波動的指標，同時亦就是中國經濟的指標。這半年，物價跌了一下，使許多人掉了一交；物價回漲了，又使許多人掉了一交（他們是漲跌跌買跌）。現在的新下跌，無幾會使一些人再跌一交了。商業越波動，越使人不得不存心觀望，商人越加觀望，則工業生產就更加沒法進行，失業職工，亦就無法減少了。

因此，問題的中心是在停止惡性通貨膨脹，是在保護民族工業，使其能供給中國自己的市場。如果通貨能穩定其幣值，如果傾注在中國市場的，不是外貨而是國貨，則物價之穩定是可能的，而且是有益的，但，要做到這樣，就必有一個大前提。這個大前提，乃是一個和平民主而統一的中國！

（上接第八九七頁）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處理偽鈔，這是收復區的一個重要問題，關於處理辦法，各收復區情形并不一致。目前較嚴重者決為華中、華南的偽中央儲備銀行鈔券，按二百對一的折合率，分四個月予以收換。由於偽鈔折合率的過低，的確使收復區人民生活陷於經濟絕境，因為最大多數的中國儲蓄，都存一般人民手裏。在鎮壓已經引起各方人士要求政府當局重訂比率，以蘇民困。偽儲券發行，原是敵人用以吸收法幣的資源與掠奪淪陷區人民的勞力與物資，所以牠本身是帶着一種掠奪性的證券。在淪陷區人民方面已經被掠奪了，所以不能再過低比率，使他們遭受過重損失。至於清理出的偽鈔有人主張原價於贖款，這點我們是同意的。

其次是外商銀行於本月間開始復業，復業中有美商的花旗銀行，大通銀行，友邦銀行，英商有匯豐銀行，有利銀行，麥加利銀行，比商有華比銀行，這些外商銀行復業，他們一方面挾其雄厚的金融，同時也又有過去在中國金融的基礎，今後給與上海金融的影響并不過於戰前的。

再次關於清理淪陷時所設立銀行錢莊，也是最近開始的，總計在戰爭結束前，上海銀行約有一百九十餘，其中七十多間銀行是在抗戰前設立，可能繼續經營。錢莊則有二百二十餘間，抗戰前設立的四十多間也能繼續營業，其餘不准繼續經營的銀行錢莊，並限於本年底清理完畢。從四百多間的銀行錢莊一旦縮減至四分之一，對於上海金融市場定會影響的，如果財政當局能夠迅速與合理的清理，自然不無補於上海金融事業。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場成為全國長城建設司令部的地方，大後方各地市場價格無不受上海波動所影響，所以大戶投機家都將視線集中上海以圖身手，據某報記者的報導，「距離四十天的上海市場之漲落，差不多等於過去四年，一般物價已漲了八倍到十倍」。十一月七日自由導報，還有：「後方的來客，腰帶大量法幣，不惜以六十萬元的巨額市價，爭購上海法幣，以半官半商姿態出現，利用各種便利，搜購物資，準備帶回後方；甚至更大的利潤」（十月四日國民公報）。這種反映不過是「物價狂瀾」而已，無疑的在今後上海投機事業的發展，正足方興未艾的。

工業指望着什麼

方卓芬

後方工業送終

嚴重的工業恐慌，越來越趨於深刻，越趨於擴大了，大後方的中小工廠垮台之後，連大工業也站不住脚了，前些時候工業仍希望緊急工貨，收購成品，但五十億元緊急工貨，僅貸出三十億元，而且每况愈下，對各工廠既無澈底的具體治療法，且連有聲的嗚呼也不可能了。工業界從書面的請求——「工業界對目前緊急情勢宣言」，到具體的請願，然而這一切都是徒然！任何呼聲，任何泣訴，都不能打動當局的心絃，廠家們八年來的辛苦，得到勝利的前途是走向末路——關門與歇業。政府現在的辦法是幫助他們歇業而不是幫助他們生產，四十億的工貨，從收購成品變為收購機器設備就是明證。

倒下去的工業已經不少了，重慶七百二十三家工廠，停工達二百〇一家，三百多家製革廠得到工貨的不過九家，得到救濟不足二十萬元之數。其餘的幾乎停工，植物油製煉廠由三十八家剩下不滿十家，酒精廠四十餘家已倒閉大半，酒精每月總產量由戰時的一百多萬噸減到現在為八十萬噸。紡織業方面則因為生命力的被花紗布管銷局吸乾了。雖然統購統銷的政策已於十月一日廢除，但困難情形並未改善。原料缺乏，負債，資金不等等問題，都是使廠家苦惱的。到十月份大後方十七萬錠子能開工的祇有四分之一，六萬錠子的豫豐紗廠也祇開工一萬錠，該廠存在宜昌沙市的棉花却無法運來，在重慶的棉棉在日下僅能維持三五天的工作，其他如裕華

，申新，沙市亦在減產中支持維艱。大廠如此。小廠的停頓，更是意料中事，據市土布軍布業三百餘家，全部結束，陞山織布業全部停頓，總工二萬七千餘人失業。蓉市的棉紡織業之破產，是管銷種下來的惡果，但管銷廢除之不適時也促成今天殘敗的局面。中國紡織公司與中國蠶絲公司的成立，是以獨占代替管銷，更是火上加油。民營紡織業有什麼前途呢？民營紡織業是輕工業的支柱，它的沒落，正意味着民營工業已趨於危亡。

重工業在勝利之初已感受到威脅，那時候是減工停工。到現在已不得不使工廠解散了。規模較大的中國興業公司就先倒下去了。據新新機器廠，中華鐵工廠，渝新鋼鐵廠，重慶機器廠，重慶生機器廠及華生電器廠都在着手解算，現在政府已批准停工。據工礦調查委員會消息：大後方八十一家鋼鐵廠除了鋼鐵運建委員會及二四，二八兩兵工廠外，其餘的均陷停頓，開工的生產力僅可維持十分之一。以第九區鋼鐵業來說，虧蝕達十餘萬萬元。因為各工廠相繼閉門，煤焦無銷路，對於煤業也是一大打擊。管制限價之不合宜，已使煤礦業萎縮虧蝕，嘉陵江區一百餘礦廠共負債二十餘億元，煤業管制至今仍未解除，生產局規定發給嘉陵江，瀘河，沱江的三十億元緊急工貨遲遲未發，嘉陵江區一部份廠礦已陷不得不得入睡狀態。如江北區煤礦已告結束，華興停產，華安亦成半停產，三才生兩個月未發工貨，被迫遣散工人歇業，資源，遂川，復興陸續各有銷路，但資金缺乏，也將無力生產。

據十一月十八日國民公報消息：「雲南鋼鐵廠為國內第二位設備完全之鐵廠，產量也大，刻因成品銷路停滯，被迫奉命停產，員工已予遣散，本月十五日正式辦理結束，現僅留十餘職員接管器材中。又資委會昆明辦事處所屬礦十四單位，及有關國際貿易成品之四工廠，亦已奉命停產，現該會已決定三項原則，以處理工廠不景氣中之各廠業務：(一)電工廠器材廠保留三分之一；(二)酒精化學工業工廠全部撤銷；(三)鋼鐵廠因設備產廢，擬暫予維持，並加緊縮。鋼鐵業機器業在復員建設工程方面，今天是極端需要的，如交通工具的船隻待修理，鐵路建築，農具製造，處處需要器材，無如當局的眼光並不放在復員，而是着手於打內戰，並不是着手於生產上，而是隻要外貨。以外貨與國貨的價格來比較，中國工業自給是難以發展的。一如美鋼鐵售價不過五十金元一噸，而後方鋼的生產成本約近百萬元，如美鋼為一、〇〇〇比一，則美鋼在中國售價不過五萬餘元，要賤於國產鋼二十倍。即除去品質不論，則民族工業亦無可以競爭生存的餘地」。在這種情況之下，不管國營也好，民營也好，中國的工業建設，將永成爲鏡花水月。

失業線上

由於工廠關閉日眾，失業職工，隨之增加，據勞務協會福利社十一月十二日在招待記者會所報告，渝市失業工人達五萬五千以上。現在當不止此數了。因為不合理的解雇工人，因為生活的惡化，而工的事件更層出不窮，十月份發生工潮的工廠，據不完全統計，計有中興毛織廠，龍門浩招商局機器廠，中紡公司，李家沱新中公司，慶華顏料化學廠

，中國化學廠，恆順機器廠，西亞電器公司，豐源機器廠，十一月份有大川公司工潮，中央電工廠工潮，中央造紙廠糾紛，崇得術公司，中國興業公司，滄泰鐵廠，三才生煤礦等工潮，被遣散的工人大多數沒有遣散費，沒有勝利獎金，沒有回家旅費，唯唯而歸，挨餓挨寒，特務軍警之壓迫更是常事。工，請願團就是在這種情形下組織起來的，經過了三次請願仍無結果，只好在十一月三十日辦理罷工了。所謂救濟也是有限的數目。因為手頭的麻類和限制過多，五萬餘工人一到救濟費者僅數千人而已。並且一條限期就到期得挨餓，失業的工人們救濟費總不是辦法。他們希望的是工作，可是在今天工業危機沒有解決之前，工人們也就只有在死亡線上掙扎。

誰造成了黑暗與混亂？

有意粉飾罪惡的人們，故意在宣揚收復區的一「德政」，說混亂的局面是很短的一個時期。事實上混亂與黑暗是有人故意擴大了的。事實勝於雄辯，在收復區內人民所遭受的洗劫並不見得比敵偽佔領區，政治上的腐敗、黑暗、加緊了經濟危機，工業建設是談不到的，就連原來的工業，也多半在強盜們的手下摧毀了。

由於法幣與偽幣的比率為一與二百之比，造成了勝利財者投機的機會，工業生產陷於停頓的狀態，但市場上却在追逐商品，追逐非法的利潤，再加以通貨膨脹的肆虐，物價的狂漲也就無法避免。人民的生活因法幣低與物價漲而益窮了。在上海，自日本投降以來，失業的工人達五六十萬，在蘇北工人因生活無法維持而工潮迭起，本年九月有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國貨公司，國華公司等罷工風

潮，法租界自來水工人也罷工，十月又有裁縫工人及黃包車夫等工潮。十一月電車工人的罷工，繼之郵局職工的罷工，許多工廠迄未復工，失業之數在繼續增加一個「繁榮」的上海市面，什麼經過了三個多月的時間收復區的工業仍不恢復呢？在這種又不得不歸功於當局的工業政策與接收大員們的功績？

後方民族工業家對於收復區的工業，會寄托着無限希望的，他們曾夢想着政府會分配這些由敵偽手中接收來的產業，他們八年來的含辛茹苦，在後方遭受極大的損失，希望收復區的工廠作為民族工業復興的基礎。然而事實上使人失望的。第一是當局對於敵偽的寬容，使敵人在投降後能從容的收集重要的物資，搬走的搬走，焚毀的焚毀，據大公報所記載：「受降之初的半個月內，北平到處都是汽油氣息與紙灰滿天的」。在敵人所遺棄剩下來而又經過了接收區接收人員們，用不同的招牌在五卅等奪，如中央機關與地方機關，甲部與乙部的爭奪，從搬運到出賣無所不至，在上海敵人的倉庫裏，有貼上二個機關的封條的。他們所憑藉的背景是私人的關係，那些帶有的特殊人物，更是有威權的，搶物資與洗劫倉庫，十一月廿五日大公報的一篇通訊，對廣州接收的情形寫得更有詳盡：

「各種接收，到現在已經三個月，可是亂糟糟的情形還到處皆是，究竟我們接收到了多少物資，至今還沒有比較明白的統計，更不該加以正常的利用了。大概在接收開始的時候，接收區被看成一個金銀滿地的寶山，誰腳步快，誰就跑去。其次物資都有主了，物資都給捷足先登的人拿去了。到這「接收競賽」告一段落之後比賽的不再是腳步快慢，而是手勢敏捷了，於是爭論爭執，互相攻訐，大約咬小咬，沒有大量的就爭到喉頭的東西也吐出

來。這樣的情形現在還未了結。所以始終是一個亂字——國家物資的損失，也只因這一個亂字，比方進步的廣東紙廠，經過一定的接收再交到經濟部生產局專辦國貨辦公室去的時候，重要的零件就損失了」。

這種混亂的局面，上海、北平、天津、廣州各城市到處皆然。為私人打算掠奪物資，這顯到什麼生產呢？物資從公開的搶劫到秘密的偷竊，已無損失不少，加上接收人員的技術知識也發生許多障礙物資的運送，如李鴻章氏由天津歸來所談：「一鐵工廠正在開爐，接收人員一到，馬上就勒令一切停止，於是一爐鐵就冷在爐子裡。化鐵爐也就無法使用了」。在官僚惡棍把持操縱的收復區工業就毫無白白的損失了它的元氣了。拖慢了它復工的時日，浪費了國家的物力。另一方面是當局的龐大國營機關政策的雷厲風行。首先我們看到國營的組織機構的林立，經濟的組織管理委員會是代花紗布管制局而起的。根據這一管委會的特別需要再設立中央紡織建設公司於上海接收敵偽紡織資產。據該紡織業經理國營二年再歸民營，照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的章程該公司營業期限二年，必要時呈准展期一年，無條件國營紡織業可能擴大至三年，在百孔千瘡的今日，又加上三年的佔，民營的紡織業，還能插足於紡織界嗎？中國國營公司內成立也是一個獨占機構，政府的國營政策已使工業發展到工業。想將來也將國營，據某報載：「百餘農業之工業，如加工工場工廠等也將執行國營政策，除投資改組大申棉公司經營外，所有接收敵偽之較大麵粉工廠皆由政府經營。除了國營之外，中小型工廠（在上海有四百八十家），全部估價收買，民營工業家請求用轉租等方式由政府手中接收一部廠房工廠，及採用官商合辦的辦法也還未得其

體結果，照目前大後方各工廠所負債的情況，他們是無法付出現款來收買這些工廠的。這一措施只便利於發國難財的買辦漢奸，而在抗戰中努力的工業家，則將被擄掠於工業領域之外。

在官僚政治之下發展國營工業，只是增加了官僚資本的力量，如范源實氏所說的：「現在中國國營公司組織起來了，這就說明了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又為官僚資本和買辦階級所佔據了。現在說是國營二年，必要時還得延長一年，其實三年一過，又安知道這批工廠不會從後門落到國人們的兄弟或親戚的手裡去。總之，政府對於救濟產業的處理，實在太使我們失望了。」官僚作風已經腐蝕了無數國營的機構，過去的經驗教訓，是足使使人驚心的。「官僚主義沒有補濟以前極端的國營政策必然要弄成一種包而不辦的局面，在消極方面，雖做到阻止私人企業發展，而在積極方面並不能發達國家資本，這種私人不准經營，官家又經營不好，將來豈不是兩頭落空？」這種獨占政策祇有促進工業生產衰

落，祇有摧殘了民族產業的發展，祇有助長外資在中國市場泛濫，破壞本國的工業而已！

收復區工業的困難並不止此，內戰也是一因素，因為內戰，交通被封鎖，船隻被拉為軍運，使原料無法運入，如華北華中棉花，不能源源運到。燃料奇缺，電力不足，影響到工廠停工，工人失業，同時在動盪的局面下，工業界對於生產事業的興趣也十分低落，截至目前上海的工廠，開工者很少，以紡織業為例，接收敵偽九十六萬紗錠中，開工者僅十萬餘錠，混亂，黑暗，腐敗，工業蕭條，到底是誰造成的？讓讀者們去判斷吧。

新的曙光

在抗戰中建立起規模的大後方工業，已經是一敗塗地了，民族工業家們的血汗與眼淚流乾了。工人在流亡，工廠則將成為廢墟。在收復區的工業已經成為官僚資本所獨占了，這一切都是令人嘆息的

，覺醒中國的民族工業是陷在黑暗的深淵裡。然而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一個充滿陽光的地方。這就是解放區，在那兒工業呈現一片蓬勃的新氣象。它象徵着中國的新興工業在生長，在萌芽中，因為民主政府的經濟政策發展私人經濟及合作社經濟，照顧勞資雙方利益的。民主政權，對於建設和發展工業是一件首先着手進行的工作，後方台停工七年

的工廠開工了，焦作的煤礦增產了。（每天售出煤四十五萬斤）邢台停閉千餘家皮坊和織復業，四萬多失業工人又有了職業。張家口的毛織業等部門在九月就正式復工。新的工廠也成立了，如電業公司、化學、冶煉、石油、蠶絲、棉皮、造紙等工廠，敵偽的工廠也已經接收開工，工人自動增加夜工，可惜在反動派配合敵偽的進攻中，許多工廠無法大規模的建設，有些工廠且在內戰的炮火中燬壞了。但是民主政治是發展工業極好的保障，新民主主義的工業是會在解放區發育起來的。

（上接第九〇二頁）

農民在民族解放鬥爭中，担負了這樣英勇和重要的一部份，新民主聯邦的南斯拉夫的臨時議會的首要任務就是土地改革。南斯拉夫政府沒收了第五縱隊和流亡地主的土地，減縮了土地所有者到四五公頃（一一〇英畝）的限度。受傷的游擊隊員，死亡者的寡婦和孤兒，那些家庭被納粹摧毀了的——這些人在土地分配上有優先的特權；被德隊第五縱隊遺棄下來的，五〇〇、〇〇〇公頃區的土地，是已經被農民游擊隊所耕種。

為更好的生活而合作

但單是重新分配土地，是並不足以解除巴爾幹農民經濟上的痛苦。農民合作社，結合起所有的裝備，政府支持同城市人民與農民之間相互合作——担負起在建設起來的農民的家園，貢獻出他們的一部份。一件重要的事實是：東歐的人民在歷史上第一次有了一個當權的政府，這個政府的目的，不是在剝削農民，而是為着他們的幸福，他們成為社會裡面不可少的和被尊敬的成員。若干世紀以來，東歐的農民和工人是被壓迫，

被剝削同被分割的，但是在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同波蘭的新政制之下，是建立一個美好生活的基礎；在這中間，農業和工業，農民和工人每一個人都負起重要的任務。這種美好的生活，這些新的政府是在創造和增進全歐的繁榮，因此，帶來的利益不僅是給巴爾幹的工人和農民，而且也帶給全歐洲的人民。聯合國救濟善後委員會對歐洲人民的援助是非帶緊迫的，但東歐的飢餓和不幸最後的解除，必須在計劃的農業和土地改良中來尋求。（譯自九月份世界新聞與評論）

財政金融在動盪中

劉方華

——三十四年第四季的金融

一 前言

抗日戰爭結束，接濟將是一切和平建設新時期。在財政經濟的領域裡，亦是從戰時經濟轉入平時經濟，物力財力的動員轉為復員，人民應要結束歷年來的顛沛流離而開始建設安居樂業的生活，就是說一切財政經濟的設施都應朝著這個和平建設的目標，可是現實生活沒有給我們展開一幅美麗和平建設的畫圖，相反的，在華北、華中都在內戰火藥氣所籠罩下，人民生命財產仍然得不到保障，工商業日趨困難，失業罷工也越來越多，通貨仍然是無止境的膨脹，而市場上照舊的充滿着囤積投機，這些就是戰後的中國一幅真實圖畫。二個月來，我們從耳聞目睹中，從實生活的體驗中，戰後的繁榮與戰後的經濟復員，只有在民主和平環境才辦得到，像過去的二月，內戰一天一天在擴大，使市場發生了混亂，動盪不安的狀態，維持尚且不易，那更談得上復員與繁榮。這就是這一時期經濟復員所給予我們的認識。

二 軍費壓倒一切

在戰爭進行中，國家總支出以戰費為首要。我國抗戰八年，軍費支出也是佔着主要，根據一般的估計，約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為着爭取抗戰勝利，全國人民沒有絲毫的怨恨戰費的過重。但是戰事結束，國家費用主要支出應是建設費用，可是根據實情，仍是以軍費為主要，這不能不說得諸反動階級在對日戰爭結束後而暗中進行着大規模內戰的賜與。所以軍費的支出不但不因抗戰結束減少，反而因內戰擴大而增大着。如果我們以今年度通貨膨脹數字來說明，就可以得到證明。在今年一月至八月，八個月間通貨膨脹約比戰前增加四百倍，到了十一月底便增至九百倍了。就是說從八月，九月、十

月、十一月，四個月中便超過了一倍。十一月五日商務日報又為我們報導：「國家預算空前，九月，十月兩月國庫開支已達一萬億元，十一月，十二兩月之預算，照各方擬在一億七千億左右」。這期間是在對日戰爭結束時期，所謂軍費支出也就是內戰的戰費。假如從軍費具體支出數額來說，照一般估計政府平常支出約一千億元，而內戰期間的費用更增加。

內戰的費用的籌措，在目前中誰也曉得是乞靈於印刷機，內戰越擴大，通貨膨脹則更形膨大，這已經是一種經濟常識了。以十一月各報的報導，財政當局對於通貨發行是不遺餘力的。我們且看十一月一日商務日報的報導：「最近各地本票發行，均在數千億元至百億元不等，為國付龐大軍費，中央印製廠，上海重慶二廠加工，每月發行約近千億，黃金美鈔之回漲，即為通貨膨脹之反應，如目前內戰不加制止，則今年歲末後方經濟基礎」。為了籌措軍費，當局不惜濫發偽幣此事本市某報曾報導在天津濫發偽幣經過：「八月中旬『偽中聯銀行』曾一度停止印發偽幣，但×××為解決偽軍組織人員的鉅額薪餉，乃於八月下旬仍『偽中聯銀行』北京總行繼續濫發偽幣，每日印刷達七千餘萬元，票額都為一百元與五百元……截至九月底止，新發行的偽幣，其發行額竟達二萬億元之多了」。

德國的馬克，是在戰敗遭受崩潰的結果，可是我們是一個戰勝國家，可是由於內戰軍費空前龐大，如內戰一天不停止，馬克的命運無法可以避免的。

三 二個月來重慶市場的變化

自日本投降以後，大後方的物價一瀉千里，市場上立時頓呈混亂狀態。但是一到九月，從漸趨穩定而轉入開始膨脹時期。一入深秋的十月，糧食、油類、食糧、燃料、百貨、紗布一齊回漲，一般的估計，將漲至百分之五十左右。例如白糖由六百元漲至九百元，三十二支紗由五百元漲至八百元，

新光耀彩由四千五漲至七千元。一度九月以前物價一跌再跌的現象，其原因不外乎：(一)通貨膨脹空前，(二)收復區的物資，由於特殊人物追逐，使當地物價高至百分之三十五一二百，因而影響了重慶的物價。(三)交通運輸困難，收復區的便宜物資和海外接濟物資不能迅速輸入太後方。

在四期間內，重慶市面上，竟然發生了現鈔香餡，千元大票每百萬貼水六七萬之多。讀者認爲政府雖然日夜加開印鈔機器，由於從大後方一直供給到收復區，各方面需要頗繁，自然求過於供，現鈔一時香餡，在所難免，但是這種現象不會多久的，其後不久，千元，二千元大票出廠甚多，收復區又能自給自足，果然在十一月裡，這個現象就告消滅。

至於黃金美鈔，在這一期間，始終盤旋於八萬二三，美鈔則在千三四上下，無極大的波動，交易重心已轉移至上海，而本市行情也就隨上海行情而西移。

從十月底轉入十一月間，內戰越見擴大，整個市場也是若動蕩不定，許多投資家乘混水摸魚，利用特勢，大造謠言，以獲厚利。從十一月初到本月中旬，黃金價格的波動，美鈔的起跌，無一不受「謠言攻勢」所波動。由於內戰全面爆發，使通貨膨脹更爲龐大，政府急需鈔票，各地已增設印製廠，在十一月間，各地發行的數目，中央印刷廠重慶廠約七百億，瀘州約五百億，北平台灣廣州各廠約三百億，五地合計約在一千五百億元，在同期間重慶銀風甚疲而上海的寸金超過二十分，因此大批游資竄入上海。

黃金曾在十一月下旬一度突破十萬元，美鈔會高至一千七百元，但是這期間黃金美鈔價格波動，當受內戰與謠言所影響。總之這時期，內戰的炮聲震盪着整個中國。謠言與投機也就支配着金融市場。

四 所謂銀行與保險業的復員

內戰瀰漫整個中國，一切談不上復員，可是銀行業是有其特殊性的，所以我們談到銀行復員時，就應討論其特殊性來談，我們打算從五方面去說明：

首先是國家銀行在戰事結束不久，就在各重要城市先後復業，這種復業是靠着官方的權益，便利到收復區進行接收與發行鈔票的。

其次是下江軍的銀行如北四行，中國通商銀行，過去他們在淪陷區大都

市原有總行或分行設立，在勝利結束時，他們就用正統名義去清算與接收便是了。

再次四川軍的銀行，這些銀行的經營重點是在四川，所以在局面混亂中他們還不急忙向下江發展。可是最近政府指定都南京後，這些銀行也開始向下江發展了，如聚興誠銀行擬在北平、南京、上海、武漢、長沙增設分行，美豐銀行擬在南京、武漢、上海增設分行，川鹽銀行則有在武漢、上海、南京、香港增設分行之說。

再其次是錢莊銀號，在復員期中，他們受到本年九月廿八日公布收復區商業銀行復員辦法所限制，無權利在收復區推設分支行處。這辦法已引起銀錢業公會不滿，要求修改辦法。目前還未有分曉，他們的復員，仍是在老地方重操過去的舊業。

最後該是輪到這些在復員中倒下的，與發生風潮的銀行，在十月初則有安康銀行，以缺項才一千八百萬而倒閉的。在本月十三日有和豐銀行，以差額七千九百多萬元而受令停止交換。在銀行內部發生風潮的，在十月間有聚興誠銀行發生員工要求改善福利、待遇、保障工作，曾引起大騷動，到本月間，董事長與總經理改組始告一段落。十一月間大同銀行被裁員工要求發遣散費三月，行方不允，曾有全體員工一致罷工之舉。

現在再說到保險業的復員，當不及銀行那麼活躍，這一二年保險業的設立雖然不少，但其經營業務，多在黃金美鈔商品等投機，根本沒有多大發展。就以本市有威信如官辦的中央信託局，中國保險公司，太平洋保險公司，中農保險公司，與商辦的興業保險公司，太平保險公司，寶豐保險公司等，業務也不怎樣發達，中央信託局的再保險業務，每天僅有五千萬到一萬萬左右的保險費，其他就可想見。

在復員期間，保險業不但沒有發展的鴻圖大計，而且還遭遇很多困難：

(一)由於內戰爆發與工商業危機四伏，一方面表現出無物可投保；另一方面保險公司又不敢承保，以免遭受損失，業務銳減是無法避免的。(二)物價高漲，使投保物產價值太高，使保險公司不敢放手承保，業務自不能發達，其次開銷過重，也使公司連連困難。(三)外匯匯率問題，目前政府尚未將新辦法頒布，也使保險公司業務困難，因爲許多保險公司與外國保險公司都有營業上的關係，如照目前匯率情形，自不能使得保險公司業務發展的。(四)在收復區看若干外幣的保險公司已開始復業，內中尤以美商最多，他們挾着巨額的資金，有豐富的經營經驗，將來在業務上，外商自然佔着壓倒

的優勢。

五 環繞外匯訂率問題

我國外匯價格，自三十一年七月改訂後，到現在也將近三年，政府尚未正式加以修改，但是中間曾經若干調整的，比如僑胞匯率從二十元增至四十元，以後又增至五百元；又有所謂教會匯率的調整等。這些改訂都是枝節的調整的。最近由於對日戰爭的結束，國際貿易就成戰後經濟主要問題，僑匯也成爲今後我國的主要的收入，如果過去曾經數度熱烈爭論修改匯率問題，認爲時機未到的話，現在該是解決外匯匯率的問題時候了。所以最近不但在輿論上的主張，而且許多出口商與廠家都一致主張修改。

關於匯率的修改，目前所爭持的，一是修改時間問題，就是說在什麼時候是最有利的時機；二是匯率的標準問題，就是怎樣使匯率能保護民族工業與獎勵貿易爲前提。關於這些問題我們從下面幾方面來論列：

政府統制外匯匯率，原爲戰時財政政策所必需執行的，但是由於管制的不可合理，使戰時中國戰時經濟受了不少損失，這給我們是不能不承認的。以估出口貿易主要的生絲、絲綢、茶葉等而言，過去都由政府統制，其中既使有商辦出口，結果也是以官價外匯率結算，使出口商蒙受很大損失，以致出口貿易除官辦外幾一停頓。還有一部份廠家，原在戰時向英美製造商訂購機器，以作戰後復員的基礎，但是由於匯率問題未解決，使廠家在戰後復員發生了機器與設備的困難。至於僑匯，對僑胞損失數目則更大。現在戰事結束，戰後對外貿易將是發展的時候，像上面所發生的不合理不應該再有所繼續。事實上目前由於外匯匯率而引起的，些經濟問題仍是復嚴重存在着，如政府不迅速解決，必使中國經濟遭遇到極多的危機。

就以進口貨價來論，最近海外交通恢復，美國商品已有入口，按照現下美鈔黑市價格，其出售價格比現在市面便多。比如以本月十日上海進口物價爲例：

洋米一包	美元二、九五
報紙一令	美元二、〇〇
凡士令每磅	美元〇、〇七
洋錫漆每磅	羅比一、三三

汽油一加侖 美元〇、二八

再以農產品爲例：美棉每担折合法幣約爲四萬五千左右，而國產棉花至少須要五萬五千元以上。上海四郊之太倉、瀏河等地，售價更超過七萬元以上。所以現在蘇浙皖紡織廠，已向美國訂購棉花。假如目前外匯價格不迅速調整，將來海運通達之後，外商商品源源而來，不獨民族工業無以生存，號稱以農立國的農村經濟，必會受到美棉美麥傾銷而引起崩潰。

至於出口貨物，也因為政府規定出口商的外匯必須存中央銀行，而中央銀行按官價一比三十算入，爲戰前七倍，而出口物實成本已上了千倍。出口商無法進行入口，最近十一月間上海也是因爲外匯官價問題，致使上海出口商已接洽洽裝載赴美三千餘噸出口貨品，終以外匯管理尚未取消無法裝載。事後總統公司上海經理凱氏曾表示憤慨：「勝利後已有『勝利』型船六艘空駛返美，目前運輸如此困難，而中國不知利用此種機會，殊爲不解，中國已有四年無貨輸出，其損失已不可勝計，今尙不知獎勵出口，實爲下策，而猶斤斤於管理出口外匯，實則外匯匯率與官價之差額，政府所得有限，但人民與國家經濟損失極重」。爲着發展國民經濟，對於出口貿易的獎勵，應該是政府財政政策主要的一環，那麼對目前外匯管理就應該予以改善。

僑匯匯率，僑胞與僑眷在過去外匯管制名義下忍受着很大的剝削，以致過着非人的生活。在戰後經濟復員中，政府爲着富裕國家的財政金融，彌補入超，僑匯不能不是國家的主要收入。就在開辦中國實業，我們也要吸收僑胞的游資。假如照目前匯率的限制，僑匯數目是有限的。

總之，外匯匯率的調整，是目前戰後經濟復員一個急迫解決的問題，至於匯率的標準，關係於國民經濟的榮枯，政府應該着眼於獎勵貿易，保持民族工業爲前提，不應爲外力所牽制。

六 上海市場的一瞥

冒險家的安樂園——上海，在收復後幾箇月中，仍是投機家所最活動的地盤，一般從天上飛下來的，或從地上鑽出來的，他們都能利用時機爭奪一切，倒斃的倒是上海人。在十里是我們并不想去描寫投機混亂的上海市場，而主要的還是將上海幾個月幾存金融市場所值得注意的略爲一述。

(下接第八九〇頁)

原子能：是好的是壞的

美·工人日報
科學委員會

自從卡爾·馬克思展開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全貌以來，比控制原子的方法這件事情所指示給我們的社會發展前途更清亮的遠景，人類還沒有看見過。

一般的人馬上就看出，原子方法意味著空前的失業和空前的富庶。

無論如何，且讓我們先討論一下這個問題的好壞部分，假如我們簡單地追述一下過去各種一般的動力來源，並且把它們和核能的動力來源比較一下，這將會使整個問題更清楚一些。

這裏應該說明一點，那就是沒有一個與「曼哈頓工程計劃」有關的人，參與了本文的寫作；任何尚不能公佈的東西都不設在本文洩露。

動力的普通來源

目前我們在工業、農業和運輸方面的發展水準，完全靠著機械的動力。今天所常用的這種動力的最大來源是煤，天然煤氣，石油和水力，在工業集中的地方，這種動力在用來帶動機器之前，大半先變成電的形式，如果沒有了動力，我們的城市將變成黑暗和寒冷，我們的機器安靜無聲，我們的大車停頓，我們的工廠設備停止不動，我們的輪船，飛機和坦克車變成無用，你只裏這樣想一下，你就會體會到，無論在平時或是戰時，我們是如何完全地依賴著動力。

所有動力的通常來源都有兩種性質是相同的，第一，任何一個引擎所用的燃料（煤，石油，天然煤氣等），雖然由於使用的結果，它在外表，形式和位置上有所改變。但總的重量是不變的。

例如：當成噸的水傾入TVA水電廠的水管去帶動電機而把水力變成電力時，每點鐘流出的水量等於每點鐘流入的水量，唯一的——有重大意義的——改變，就是水改變了它的地位，從水源較高的地位變到出口較低的位置。

另外一個例子：在爐子裡煤來發生熱量，用來製造蒸汽，蒸汽又直接加以使用，如同蒸汽機的情形，或間接加以使用，如同在發電廠的情形。在

開始燃燒時，煤有一定的重量，為了使煤燃燒，必須加上足夠的空氣。（沒有空氣中的氧氣，燃燒就不能進行，）要使一定重量的煤完全燃燒，必須要用一定重量的氧氣，最後，假如我們把燃燒下來的烟和灰收集起來並且量一下，我們發現這個重量和開始時煤和氧氣的重量的總和相等，除了原子彈所用的方法，這個一般的原則適用於所有從物質取得動力的各種方法。

過去各種方法的第二個共同之點就是：雖然從燃燒或爆炸（如汽油在自動引擎內的情形）所得出來東西，看起來不一樣，並且和燃燒開始時所加進去的東西形式也不一樣，但所有原來加進去的成分（化學元素），都可以從最後的結果中得出來，例如：汽油在爆炸之前含有炭、氧和氫元素，做為一個必須的成分而加進去的空氣含有氧氣，假如我們把一個自動車所排出的廢氣收集起來，我們發現所有原來參加的原子：氧，炭和氫，這些元素可以說是在重新混合了一次，而成為新的組合，但是它們和一開始的時候成分一樣，重量也一樣。

上述的兩點性質，歸納成一個普遍的原則，就是物質不滅定律。

鈾元素放射線的發現

這必須明瞭另外一個成立了許久的事實。那就是雖然不同的東西有成千成萬，（日常有用的東西如麵包，木材，肉類，空氣，布匹，鋼鐵，磚瓦等，總數比較多。）但它們全部可以用化學方法來分析並且歸納成九十二種基本的化學元素如氧，炭，硫，鐵等。

每一種化學元素都可以分而又分，一直小到一定的限度。任何化學元素這種最小的物質單位就叫做一個原子。九十二種化學元素每一種元素都有它獨自的原子，換一句話，一個鈾的原子與一個氧的原子不同，九十二種其他原子也都彼此不同，而且，直到大約五十年以前，人類一直相信任何種元素之下，這些原子都是永遠不變的。

發現這些原子並不一定永遠不變，起於一八九六年，那一年有一個法國

人叫白克瑞 (Becquerel)，發現鈾元素可以放出「射線」，這種射線可以穿過不透明的固體，像銅之類的東西。他和許多別人進一步的研究證明這種「射線」有三種。有一種後來證明是氦原子的主要部份，換一句話說，也就是鈾原子經常自動地放出氦原子，並且在這個過程中，鈾原子就變成別的元素的原子了，這種過程就叫做放射現象。

白克瑞的學生居里夫人 (Marie Curie)，後來又發現兩種別的元素，也有同樣的性質，而且放射性更強一些，一種她定名為釷 (Thorium)，為紀念她的祖國波蘭，另外一種她定名為鐳，這種元素中每一個元素的分解（自然變質過程，都有它自己特定的速度，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任何想加快或減慢這種速度的企圖，過去都沒有成功過。

不久又發現，不僅是鐳，還有許多別的元素也經常有放射性的變化，並且放出大量能量，做為動力的一個全新的來源，這個現象引起廣泛的研究，這一次原子的被解放出來，不像煤的燃燒是由於一種元素與另一種元素的化合，而是由於物質的一種基本形式變成其他形式而來。

物理學思想的革命

有些元素本身就在變，這對於許多保守的人很難接受，因此就發生了物理思想的一次革命。

若干年前，馬克思的偉大同伴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辯證法」中，就預見到這些發展。列寧在他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討論了這些發現所引起的物理學的危機，因為當時的科學家和哲學家對於自然抱了一種靜止的看法，所以這些發現使得他們不勝驚異。

直到愛因斯坦方才前進一步，由於他的相對論，他發現光——能量的一種形式——正如同別的物質一樣，也有慣性，愛因斯坦於是推論出一定量的能量，如同光線，可以說具有質量，質量，一點普通的物質，也可以認為等於一束能量。

相當於一定質量的物質的能量，其數量非常驚人，一點質量相當於十五萬萬小時，假如一個人能把很少量的物質變成能量，這將會產生大量的動力，物質不減定律消失了，代替它的更美的形式——質量不減定律。

人工放射性

愛因斯坦的理論學說和放射性變化各種實驗的綜合，很快就完成了，從

一種元素變成另外一種元素的若干變化，會發現物質的總量有極微小減少，這種微小的少，剛好相當於變化過程中所放出的大量能量，同時，天文學家開始相信，在太陽和星體內部也有類似的原子破壞和再組合的變化，這中間一部分的質量經常變化而變它們保持白熱狀態，並且給予我們在地球上顯以生存的光和熱。

但是若干年來都證明要利用這種原子能是不可能的，第一，自然發生放射性的元素如鐳，是很稀少而貴重的，一磅的鐳差不多要值一千萬美元，此外，這種自然分解的速度非常之慢，一磅的鐳要好幾千多年才放出一毫六十六瓦的燈，它確實可以使這種的一盞燈點一千多年，但要使原子能可以有任何實際的用途，顯然還必須得使這種過程加快。

物理學家於是設法製造人工放射性，那就是說，在實驗室內控制着的情況之下，把一種元素的原子加以打擊而使它變成另外的原子，這些變化發生在原子的內部，內部構造——原子核——的差別，才是一種元素和另外一種元素差別的原因，這種原子核是被包圍得如此的良好和完整，只有極端強有力的衝擊點才能達到它，而且能夠達到原子核的質點是很少的。在許多情況中，這些衝擊點如α質點和β質點，當是被吸收了，所以只有比較少的能量在變化中放了出來，總之，要達到這些變化所需要的能力要比解放出來的能量還要多，要發展一種有用的原子動力來源，這幾乎是一種不大值得費的辦法。

中子的發現

但是在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九年，有些新的發展根本改變了上述的情況，第一，從原子分裂中發現了一種新質點，因為它不帶電荷，所以叫做中子，也正如電荷的缺少，這些中子對於穿透原子內部的防禦更為有效，它們比過去所用的α質點或其他高速質點更為有效地使一種元素變成另外一種元素。

當鈾被這些中子所衝擊時，跟鐳就來了第一種過程，鈾核在核內 (Uranium) 所表明，速度慢的中子，衝進鈾原子的核心，就被後者所吸收，於是原子核就差不多全分為兩部份，變為鈾元素和釷元素，在這個過程中，質量消失了一部份，放出的能量大約比等量的炸藥所釋放的多二萬萬倍。和這種不太清楚的分裂本身一樣重要的還有一個現象，那就是在分裂時，爆炸的鈾原子核放出更多的中子，所以，只有一個中子核開始爆炸，在

爆炸過程中產生的中子可以像鏈式一般，又造成第二和第三個原子的爆炸，這樣下去，一直到全體看起來都像以一種不可思議的紛擾在分裂。

幸而並不是所有的中子全同樣的有效(慢的中子最好)，而且並不是所有的鈾原子都是這樣。一種叫「鈾二三五」的東西被慢中子所觸發，就會像，而所說的這種分裂，其所以叫做鈾二三五是因為它的原子的重量是二三三，常常和它混在一起更多的鈾，其原子的重量是二三八。這種鈾二三五在普通的鈾裡面只佔千分之一，其次，鈾在礦石裡又佔極少的成分，所以一塊礦石裡所釋放出來的中子在達到鈾二三五以前，很容易被別的原子核所捕獲而使它們不致有破壞作用，這大約就是使鈾能存在地球上而不致自己爆炸的原因。

各種不同的方法

第二步問題就在如何收集鈾二三五，使它可以用來放出大量動力，由於所要的這種原子，其重量比較豐富鈾二三八不同，許多方法都可以用，其中大多數用來分離別種元素的類似原子，(不論在紙上或在實驗室裡，這些方法都還簡單明瞭，但是它們的效率和速度都確實很慢。例如，曾經做過這樣的估計，一種特別的儀器要用七萬五千元才能產生一磅鈾，官方文件並未說明用的什麼方法，也未說明，為了便於控制是否在其中保留大量雜質反較為合適。但是，就是這些所知道而且公佈過的方法，在它的發展上去四年的時間，花了兩萬萬美元，有時用到十二萬五千人，無疑的也會產生足夠爆炸的分量。

從鈾二三五的原子發生爆炸的中子，其最有效的來源是用「重水」，這種水的質輕原子核，可以給予電荷，並且在一種叫做電磁加速管(Cyclotron)的機器裡，使它以高速射到鈾上面，鈾原子核分裂後放出中子，就可以用來引起鈾二三五原子的爆炸。(英國空軍在一九四二至四三年冬季的兩次轟炸挪威，把德國的「重水」儲藏毀壞了。)

說明原子彈尚不可能

在本文中，對於原子彈構造的說明尚不可能，關於控制是如何完成的，使鈾二三五分裂的慢中子如何在需要時被造成，而使一切在那個時期以前保持安全，本文也無任何闡述。我們可以確信，所有物理上的控制都已經完成，這使科學家能他們所願望進行進一步的實驗，至少要和他們實

驗者通炸藥時一樣安全，不過這種爆炸物要比普通炸藥強幾百萬倍。

但是這種科學控制的方式絕不足以決定是否我們現在學會駕駛和控制的這種力量(根據太陽能力的來源)，除在整個地球上造成無數的破壞之外，還有更多的用途，但是一個總重量四百磅，只可能有一小部份是鈾的炸彈，其效率估計是如此的低，甚至百分之九百九十九是浪費掉的，但一次就可以殺死二十萬人(這是第一顆原子彈在廣島殺人數量的估計)，這樣一個炸彈須要徹底公開討論並決定它的用途。

在討論到問題的這一方面以前，先要說明幾點。

(一)因為雷達，原子彈，盤尼西林等是在戰爭中發明的，就斷定戰爭刺激了科學和技術的進步是不對的，應當要明瞭，引向原子彈的工作，差不多可以追溯到半世紀之前，在這次戰爭中所發生的只是我們的歷史上的第一次允許把一個技術問題，這樣有計劃而慷慨地進行解決。(兩年間大約花了二萬萬美元。)其結果是進步的速度大大的增加了。應該接受的教訓是：在這樣的一種方式之下，沒有問題——物理的，生物的或是社會的，會常常得不到解決。

二、這個計劃的參與者的名字和國際，包括了世界上每一個進步的部門——男人和女人，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我們又再一次得到這個教訓，就是希特勒的種族優越說完全是沒有根據的。實際上上述的這句事實是一個極大諷刺。那就是梅特內博士，一個在柏林工作的英國女科學家，和許多別人都從梅特內放逐出來，這些人在原子方法的早期發展上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另外一個重大的教訓就是看起來不實際的天文物理學，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供獻了許多有價值的依據，因為天文物理學家早就相信，一個星體所以能長期的大量發射光熱，唯一的解釋是由於某種消滅的方法來維持。

科學和馬克思主義

(四)由於科學家的輝煌工作才帶來原子彈的迅速發展，但是這些人雖然充滿理想的動機，並沒有控制住這個方法。奧本海默博士(Dr. J. R. Oppenheimer)，一個美國人，曾經為他和他的同僚們這些人所抱的最高理想，給以最明確的闡述，並且他們全都熱切的希望這個方法將被用來增進公共利益，如何良好地達到這個目的，引起我們對於這個方法的社會意義的討論。

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基礎是認為社會發展從於某些發展規律。這些規律的

基礎就是社會的物質條件——土地、機器、氣候、生產與生產工具所有權的關係。這些基礎在它與人民相互作用中間，形成一連串鬥爭的來源，人類在解決這些鬥爭中，得到他的進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列基本的鬥爭是由於這個社會結構中的階級性質所引起的，理想的階級就是在一個社會中，人類對於他的知識和能力的利用和自然鬥爭，最後照他自己的利益控制了自然，這將是共產主義。今天世界上沒有一處存在這種理想的情況，在只有一面被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情形下，這種理想的情況也不可能存在。甚至蘇聯——過去幾年的歷史就是一個極好的證明——人民也不能把他們的生活和活動完全用於征服自然，改良機器的效率，發展新的和足以在不良好條件下繁榮的工廠等項工作上面，為了保衛他們的土地，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也不得不把大部份的努力和技術用來做準備工作，這一些工作，絕不是偶然地以人類從最嚴厲的而且影響到生存的危機中拯救出來。

社會裏新的特點

只要你稍為想一想，事實就說明，例如當發明並改進了飛機的時候，一種新的（其實是用新的方法從舊的東西中綜合出來的）東西帶到社會裡來了，這種新的東西大大地改變了我們生活的條件。這一點上最有力量不是唯一的例子就是飛機對於進行戰爭的影響。（我們一定不要陷入塞佛斯基學派（Severky School）的「空中威力」論的錯誤中去，這一派學說把事實加以歪曲而且看得過於簡單化，認為飛機可以整個改變戰爭的性質。

相同的，當一種新的而且是更大的動力來源發達和控制了的時候，在社會裡我們就會有一種新的特點——物質上的特點，這種特點對於我們的生活方式將會有重大的影響，在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這些影響總是由於新發展和當時存在的社會關係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舉例來說，假如今天全世界都實行了社會主義，沒有任何個人會用一秒鐘的時間來擔心這種新的原子方法可能的影響，每個人將會馬上意識到他已經變成無比的富有，並且為公共的福利，他可以更有力的控制和利用他的物質環境。他將會意識到這種方法一定要加以進一步的研究，並且使它完整，以便最後使生活變得更容易，更完善。他將會看到進步和征服自然的另外一種奇蹟，因為逐漸少下去的煤和油的供應，對於他在世界上的生存再不會是一種威脅了。

人民必須控制動力

所有這些和更多的事實，只有在全世界都實行了社會主義的時候，才有可能。

因為社會主義尚沒有在全世界實行，原子方法會怎樣改變一切呢？改變是很大的，只有當人民保有並且控制了原子方法時候，它才會完全為了人民的利益而被使用，在希特勒與興起的整個階段中，甚至在這次戰爭本身的進行中，我們得到許多痛苦的教訓，那就是大資產階級從來沒有堅定地採取過一個反法西斯政策，實際上更多的時候是剛好相反，只有在人民的最強大的壓力下，他們才能參加了反納粹和反法西斯的鬥爭。

我們能夠對於社會的組織成立一個委員會來管理這個方法的建議表示滿意嗎？我們不能。我們一定要有力地去監視，以便使這個委員會不致加入帶有胡佛的「偉大」傳統的工程師，不致使大的獨佔資本操縱了它的政策。代表美國人口最大部份的工人——美國最大的有組織的力量——和美國其他進步份子一定要控制住這個委員會。除了完全為了人民的利益，沒有別的保證可以使這個方法得到最快的應用和發展。

目前的計劃在減縮中

這個問題已經有了令人失望的事情了。當人力和動力大量用來有計劃地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已經表明技術的遠達將會怎樣的突飛猛進。但是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情呢？計劃在減縮中，成百的技術人員和成千的工人被遣散。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這些事不可能發生。在精進一種新的而且極端重要的方法上，正當我們處於門檻上的時候，這個方法被減縮而且慢下來，我們還是回到那陳舊、紊亂、無政府的工作中去，這是為了將來去接受一種有價值的教訓呢？這不是一個說來好聽的問題，答案握在人民的手裡。人民必須繼續快而且有力的行動起來，從而保證將來的政策服於人民的利益。

這個方法將來的發展和研究將會引起許多技術的和經濟的問題，讀單是兩個，如機器代替工人的問題，目前生產工具的私有制和隨這個方法而來的公有制，這兩者之間的衝突問題，答案不能照過去常有的情形一樣地由壓制新的發展，在所有這些意識上，這個發展把生產工具社會公有——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問題，更進一步地推向前去。

曼哈頓為紐約市的一區，「曼哈頓工程計劃」(Manhattan Plan) (Engineering Project) 和整個原子計劃最初的原則。

(李亞譯)

東歐農地改革

東歐農地改革

譯者 盧作孚 揚 姆 遜

在最近倫敦的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會議上透露出，波斯尼亞的小孩們，每隔一天才...

度的低下，特別是在波蘭和羅馬尼亞沒有土地的農民。在一九一八年以後，農民自覺的意識的生長...

種農業技術可以大大地補償羅馬尼亞的農民在德國人的手裡，和在連續的反動派的政府下面的損失。

英雄的戰鬥，遠比她的鄰國付出更大的犧牲的代價，但飢餓、貧窮和不幸却以各種不同的程度...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改革

在高度工業化的西方，我們很容易忘記那些廣大東歐的復員士兵，將軍補到在農村裏去...

波蘭在一九二一年，只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們，掌握了全國土地的一半以上。

但土地分割成小的農場，並不足以保證繁榮。羅馬尼亞的農民向來是最缺乏設備和農產器具...

這一次的公平分配

因此，這是明顯的，為人民大眾所想的東歐政府，首要的一樁責任，是把人民所賴以生活的土地...

同樣的改革發生在東歐的各個地方。南斯拉夫在戰前，三三七、四二九個有土地的地主中間...

中國經濟前途道路 (下)

許崇新

三 還未能走社會主義的路

中國今天不能走歐美資本主義的舊道路，那麼，是不是可以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呢？我們的回答，還是不可能的。

很明白，只有實現了社會主義，才能消滅人與人間的剝削，才能消滅人類社會中的壓迫，才能使人類真正的過着人的生活。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斷非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所能比擬的。而從全世界今天的情形來說，社會主義的力量，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前邁進！革命的導師告訴我們：

「共產主義是無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種思想體系與社會制度，是區別於任何別的思想體系與任何別的制度。社會制度的，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義的思想體系與社會制度，是進了歷史博物館的東西了。資本主義的思想體系與社會制度，已有一部分進了博物館（在蘇聯），其餘的部分，也已「日落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保夕」，快進博物館了。惟獨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與社會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於全世界，而保其美妙的青春。」

在這次反法西斯侵略的大戰中，在這次摧毀希特勒德國的血戰中，蘇聯所以能成爲主力軍，就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表現。中國的廣大的人民，是嚮往這一條道路的。但是，嚮往是一回事，能不能立即實行，又是一回事。嚮往是主觀的願望；而能否立即實行，則要看客觀條件是否具備。兩者是不能混爲一談的。

今天的中國，還未有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這可從兩方面來看：
第一、在中國的現階段上，中國人民的任務還是反對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自鴉片戰爭以來，資本帝國主義列強，就把中華民族踏在牠們的鐵蹄下

。在民族壓迫尚未解除以前，除了漢奸賣國賊以外，我們必須團結各階層的力量，必須照顧各階層的利益。在這裡，封建壓迫是不難與日寇尚待的。我們反對這種壓迫，因爲它會阻礙廣大農民對抗戰建國的熱情與能力，但是，我們並不能採用急激的辦法，並不能即刻推翻這種古舊的壓迫，因爲這會引起地主階級的反感，因而破壞民族團結。在戰時是這樣，在戰後亦仍維持這種方向。只要在抗戰中對民族有貢獻，他就能夠在戰後獲得他的適當的地位。在抗戰建國這個巨大的過程中，既需要各階級起來努力，因此完全否定封建制或資本主義制的所有權，來實行社會主義，那是不適合客觀的狀況的。

第二、要實行社會主義，必須有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中國是一個產業落後的國家，戰前重要的產業，完全握在帝國主義列強之手，民族工業是很微弱的。抗戰以來，民族工業的一點微弱的基礎，亦被打得七零八落了。不論解放區，不論大後方，分散的，小規模的農業及手工業生產，在數量上，仍是佔着極大的勢力的。當前的情況，需要我們去提高生產。不論農民亦好，手工業者也好，私人工業資本亦好，都是應該加以扶助的。要提高他們的生產能力和生產興趣，就應當盡量減輕他們的負擔，更談不到否定他們的私有權。既然今天的任務是在提高生產，是在使各種生產規模逐步擴大，是在保障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那末，否定私有財產權的社會主義，就不能在今天這個階段實行起來了。

總而言之，「在中國的現階段上，在中國人民的任務還是反對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在中國社會經濟的必要條件還不具備時，中國人民也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企圖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換句話說：我們雖以社會主義之實現爲目標，但是，「現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將來要發展到第二步，被壓迫社會主義。中國亦只有進到社會主義時代，才是真正準備的時代，但是現在還不是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中國現在的革命任務是反帝反封建的任

務。這個任務沒有完成以前，社會主義是談不到的。中國革命不能不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而且第一步的時間是相當的長，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們不是空想家，我們不能離開當前的實際條件」。

有人認為革命用不着分做兩步走，在經濟建設方面，亦可以在目前這階段，包含社會主義的設施於其中，這種說法，可以分爲二類來考察。

第一種人，可以說並沒有什麼惡意的，他們完全從純主觀的想頭出發。這種主觀的想法是不合於事實的。如果說現在是民主革命的階段，將來是社會主義的階段。兩個革命階段中，第一個爲第二個的準備條件，而兩個階段必須銜接，不容許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這是正確的。如果說，民主革命沒有自己的一定任務，沒有自己的一定時間，而可以把它能在另一個時間去完成另一個任務，例如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合併在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上面去完成，這就是空想，就是純主觀的念頭。這種觀點，混淆了革命的步驟，降低對於當前任務的努力。對於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對於中國的民主革命，是十分有害的！

另一種人，那是惡意的。他們打算以這種說法來打擊科學的社會主義，來作爲否定科學社會主義存在的理由。在問題的本質上，這是一種不要革命的理論。中國自有科學的社會主義以來，中國革命的面目爲之一新。數十年的歷史，處處證明着：中國的民主革命，如果沒有科學的社會主義來指導，是決不能成功的。因此，否定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存在，就等於否定了中國的革命。

一次革命論在表面上好像很輕快的樣子，但實際上，却是有害的。惡意宣傳家是在否定革命，否定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存在；純粹主觀的人們，則降低了人民對於當前任務的注意。在經濟方面，他們的持論，同樣的發生了有害的影響。試想想吧！否定了革命，還有什麼經濟建設之可言呢？乾脆說一句，否定了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前途，就是在理論上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或者爲歐美資產階級的舊道路，打一釘基礎吧了。可惜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沒法繼續下去的。歐美資本主義的舊道路是沒法在中國再重演一番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既然不能持續下去，歐美資本主義的舊道路既然不能在中國再演一番，而社會主義呢？則又因爲實現他的必要條件，尙未具備，不能在這個階段實行，那麼，中國經濟，將走什麼道路呢？

四 必須走新民主主義的底道路

一 問題的提出

我們的回答，是新的民主主義的道路，到這想，必定有人要反問我們，爲什麼中國經濟必定要走新民主主義的道路呢？好，就讓我們先來回答這個問題吧！

中國經濟爲什麼要走着新民主主義的道路，可以從三方面來回答：一方面是從新民主主義以外的道路來看。這是從反面來回答這個問題的。我們已經在上面把這些方面說過了。我們已經從中國本身的條件，從國際政治經濟的趨勢，說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歐美的舊民主主義之不適宜於中國了；我們亦已經從中國各方面的條件，來說明中國現階段的經濟，還未定着社會主義的道路了。另一方面是從新民主主義本身去着眼。這是從正面來回答這個問題的。現在，我們所要討論的，正是這一點。

爲什麼在現階段提出新民主主義？爲什麼現階段的中國建設新民主主義的經濟？

第一、實現新民主主義是中華民族必須實現的歷史任務。在政治上，所謂新民主主義，就是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爲基礎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這種的國家制度，乃是推翻外來的民族壓迫和廢止國內的封建主義的與法西斯主義的壓迫之後，必然的結論。因爲「這是一一個真正適合中國人口中最廣大成分的要求的國家制度。因爲：第一、它取得了與可能取得數百萬產業工人，數千萬手工業工人與僱傭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與可能取得佔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萬萬五千萬人口中佔了三萬萬六千萬的農民階級的同意；又其次亦取得了與可能取得廣大的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開明士紳及其他愛國份子的同意」。爲什麼能夠如此呢？因爲只有這種國家制度，才能保障他們各方面的利益——政治上的利益以至經濟上的利益等等。換言之，只有團結絕大多數人民，才能推翻外來的民族壓迫，和國內的封建的與法西斯的壓迫，才能使中華民族翻身，才能建立一個獨立自由的新中國。在這裏，沒有照顧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是不行的？要照顧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就必須實現新民主主義的經濟。

第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具有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與歐美舊民主主義

論經濟所沒有的優點。如前面所說，在學權地半封建的社會經濟中，沒有帝國主義列強、買辦階級、官僚資本和大地主階級的利益，而沒有一般平民的利益。在歐美舊式的民主主義社會中，只有自由資產階級的利益，亦沒有一般平民的利益。如果保留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經濟，顯然是不能團結廣大人民起來反抗外來的民族壓迫和國內的封建法西斯壓迫的。如果走著歐美的舊民主主義的道路，顯然是不能團結大多數人民起來推翻外來的民族壓迫和國內的封建法西斯壓迫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照顧了工人農民的利益，亦照顧了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和開明士紳的利益。只有這樣，才能把中國絕大多數的人民動員起來，團結起來。

第三、在現階段這種情況之下，只有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才能發展中國的生產，才能改變中國國民經濟的面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使中國經濟一天比一半的崩潰下去，失業、破產、窮困、死亡，就是它所帶給中國的毒物。歐美舊式的民主主義的經濟，只有造成少數資本家發富，極大多數人赤貧的對立，只有招來了週期性的毀滅性的經濟恐慌。這都是中國所不應走不能走的。新民主主義並不否定私有財產，但不在許獨占壟斷之存在。不准許少數人獨占壟斷，就保證了大多數人在經濟上能够從事其所願意的事業；不否定私有財產，就使廣大的獨立生產者與企業家，能够提高其生產興趣與擴大其生產規模。更具體的說，只有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才能照顧各方面，也照顧了廣大勞動人民的獨立生產，又照顧了私人資本主義的新式企業；它照顧了國家資本的經濟。又照顧了農業手工業的合作經濟，因為以當前的情形而論，單靠國家資本是不開辦中國的富源的；單靠私人資本的大企業亦是不能開發中國的富源的。而實際上，如果沒有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無法使國家資本不變成少數人壟斷營私謀國殃民的工具；如果沒有進行廣泛而深入的土地改革，就無法使工農業的資本主義能够有迅速的發展。除此之外，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使廣大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能盡量的發展，盡量的擴大其生產規模；它又使這些分散的個體經濟組織起來，組織成無數的合作社，經過合作社的組織，去提高他們的生產力與生產量。總而言之，新民主主義是無所不包地推動生產的，要發展中國經濟，這是一條最好的道路。

有人懷疑新民主主義為什麼這樣的寬容了資本主義，我們的回答是很簡單的。拿發展資本主義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與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的，

本國的資本主義實在太少了，應該大大地讓他發展才是！

這些理由，證明新民主主義經濟，是適合於今日中國的需要的。中國民族的歷史任務，中國政治經濟的現實條件以至國際上的民主主義的互流，無一處不在證明這一點，這並沒有什麼疑義的啊！

二 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特點

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內容是怎樣的呢？這是我們接應該回答的另一問題。在戰爭的時候，中國經濟已有新民主主義之存在，不過，在那裡，只是初期的新民主主義經濟而已，因為它才開始實行，日本強盜還未消滅，這就解放區還處在牙大交錯的局面中；戰爭的破壞還未停止；就是最近大後方的較爲安全的地區，亦仍未脫離軍事封鎖與威脅，這一切，使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實現受到某些限制。例如以幣制團結一切社會階級反對共同敵人，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權而只實行二五減租。爲什麼如此呢？很明白，因爲新民主主義經濟並不一定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起碼有幾十年的時間，須要我們爲這個目標而努力，但在這大階段的各個小階段中，情形是不斷在變化的。因爲情形變化，所以我們的做法亦不得不與之配合。在全國國民政府改革受到種種障礙而未能實行的今天，我們在施行經濟建設時，當然不能不受某些限制。現在，我們還須以新民主主義的觀點，把它的根本特點，簡略地敘述一下。

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的經濟。它的特點如下：

第一是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中山先生指示我們：「中、以鞏立國，而全國各階級所受痛苦以農民爲尤甚，國民黨之主張，則以農民之缺乏田地，論爲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並爲之墾殖水利，移殖荒廢，以均地力」。同時，中山先生在對農民運動講習會的訓詞中，更明確的提出「耕者有其田」。他說：

「我們解決農民的痛苦，歸結是要耕者有其田，這個意思就是農民民得到自己勞動的結果。要這種勞動的結果，不令別人奪去了。現在農民的勞動結果，在農民自己祇能分四成，地主得了六成。政府所抽的捐，都是由農民出的，不是由地主出的。像這種情形，是很不公平的。」

費行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就是掃清農村中的封建關係，因為地主的封建關係，使農民失去土地而淪為佃農及雇農，使農民不能享有自己勞苦的結果。只有否定了大地主的土地所有權，才能使農民獲得土地。但在這國，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而是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裡轉移到農民手裡，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上，獲得解放，使農業從舊式的落後的水準進到近代化的水準。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一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主張，而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主張。

第二、在工商業問題上，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指出：

「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路、航空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即節制資本之要旨也。」

這個方針，是很正確的。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亟需要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這個方針，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是像適合於中國經濟的客觀需要的。所謂「節制資本」並不是否定私人資本，而只是禁止那種操縱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而已。

第三、在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中，中國經濟必將由國家資本，私人經營與合作經濟三者構成的。這國家資本之所謂國家，一定不應該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而一定要是「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這種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將統治着國防工業，金融機構與交通機關，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將起着極其重要的作用。其次，私人經營的經濟中，廣大的勞動人民，更具體的說，廣大的獲得土地改革的農民，將佔着極大的比重。他們以自己的勞動，用自己的工具，耕種自己的田地，並且享受自己的勞動的成果。在實行初步土地改革——即減租減息的今天，許多獨立生產的農民，都直接地走上富裕農民的大道，與擁有及申長林的新式富農的方向，已經成為實行土地改革地區的農民的方向了。其他如手工業者，亦將有極快的發展。這就是說，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將佔有極多的數量，極大的比重。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是屬於私人資本的範疇的。他們自己參加勞動，同時亦僱傭一些長工短工，這些僱傭勞動，說明他們的資本主義性。實行了土地改革的地區的新式富農，就是具有資本主義

性的。在這些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之外，還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之存在。這就是工商業方面的私人資本。在這裡，民族工業的私人資本，應該它獲得廣大發展的便利，但對於那些商業資本，應該制其壟斷的作用。最後，所謂合作經濟，主要是指農業的生產合作與手工業的生產合作。這種農業生產合作社，初時還只能是建立在農民個體經濟基礎上的——即農民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互助的勞動組織，例如變工隊，互助組，換工班之類，但是生產力的發展與產量之增加，已屬驚人，手工業的生產合作社亦是手工業者個體經濟的集體組織。這種組織與大後方的所謂「工合」，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因為「工合」的許多合作社，並不是手工業者的合作組織，而是一些借了「工合」的貸款和掛上「工合」的招牌的舊式作坊吧了。真正的手工業合作社，應該是獨立生產者的集體組織。在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扶助之下，合作經濟將來一定會飛快的發展，一定會成為農民與手工業者個體經濟的出路。

第四、歐美舊式的民主主義經濟，是以否定獨立生產者之存在為其前奏曲的。馬克思在論及「資本主義蓄積之歷史的傾向」時，很明白的說：

「資本主義的原始蓄積，換言之，資本之歷史的發生，究竟是什麼呢？在不是由奴隸和農奴直接轉化為工資勞動者的限度內，換言之，在不僅僅有形體變化的限度內，那等於是對直接生產者的剝奪，即等於是生產者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財產的解體。」

在資本原始積蓄的時候，資本家以否定獨立生產者的私有財產為前提；到了資本主義生產成立之後，亦是不斷地以獨立生產者為犧牲的。所謂資本的聚積，就是由剝奪剩餘價值而來的資本的增殖；所謂資本的集中，就是由於大魚吃小魚，大資本吞併小資本而來的企業合併。在這裡，小資本滾落了；獨立生產者更是在大資本的打擊之下紛紛滾滾下去的！這是舊式民主主義經濟的一個特點，這個特點是不能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存在的。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不是大資本否定中小生產，而是獨立生產者——農民的個體經濟與手工業的個體經濟——的廣泛的發展，在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扶助之中，他們將逐漸被組織在合作經濟之中。這個特點是英美舊式的資本主義所沒有的！

第五、新民主主義經濟是走過社會主義經濟的跳板。如果從片斷來看問題，則這種說法，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新民主主義的歷史任務，它的實際的作用，是在於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你看，土地改革使農民從封建的

土地關係上得到解放，使農業從舊式的落後的水平進到近代化的水平。從而使工業獲得市場，造成了將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可能性。故土地改革不但展開了農村的資本主義，而且擴展了城市的工業資本主義。你看，作為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構成部份之一的私人經濟，包括了私人資本主義和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固不用說，就是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亦是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因獨立生產者的經濟，是小商品生產者的經濟，而小商品生產，是要產生資本主義的。像這樣，為什麼說新民主主義經濟是推進到社會主義的跳板呢？其實，這是一個很明白的問題，因為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三個構成部份中，除了私人經營之外，還有國家經營與合作經濟。只要國家是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是代表絕大多數人民「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國家，則這國家所經營的企業，是容易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其次，合作經濟，在初期誠然是農民或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底集體組織。這種組織，是容易推進到社會主義去的。列寧在論合作社一文中，辯證地指出合作社的性質。他說：

「在個人的資本主義之下，合作社的企業和資本主義的企業之不同，實同集產主義的企業和個人主義的企業之不同是相等的。在國家資本主義之下，合作社的企業和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之不同，第一是在私人的企業，第二是在集產主義的。在我們現在的組織中，合作社的企業，是集產主義的企業，而和私人的資本主義的企業相異，但這合作社的企業，如果在屬於國家——即勞動階級——的土地和生產手段之上的場合，是和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的。」

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國家經營與合作經營，在整個國民經濟的比重之提高，將會使新民主主義經濟，較容易地推進到社會主義去！

綜合上而所述，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歷史地位是很明白的。一般的社會發展，是從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因為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封建國家，它必須擺脫外來的民族壓迫與國內的封建壓迫，必須完成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但在中國的政治社會條件之下，不能走階級對立的舊道路，必須以廣大的工農小資產階級為主的聯合戰線。因之，在基本上，新民主主義經濟是資產階級性的，但又加上若干的修正。這些修正，揚棄了舊式資本主義的排他性，使這國度中的勞動人民有機會得到發展，得到提高其生產興趣與能力，使這經濟成為推進到社會主義去的過渡階段。

三 新民主主義經濟根據

對於現階段的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是很美滿的。但是，它有沒有實現之可能呢？它的根據又是什麼呢？這又是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

我們認為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根據有三：

第一是政治上的根據。這個問題之提出，或許有人在懷疑：「難道是政治決定經濟的麼？」是的，政治是經濟基礎所規定的，但反過來，政治亦能影響經濟。而這種影響經濟的政治，是受到經濟的規定的，在中國，如果沒有政治上的保障，則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是沒有實現之可能的。沒有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沒有實行土地改革——從二五減租一直到耕者有其田；沒有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沒有使廣大勞動生產者能夠避免大地主與大資本的吞併，沒有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沒有使國家資本不成為大買辦，大銀行家和大官僚資本所操縱。用政治權力來保障經濟，並不是新民主主義所特有的。列寧在區別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亦曾指出：就是在封建主義的政治統治毀滅以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早已萌芽於、且發展於舊的封建社會內部，同時，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則只有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才開始發展起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關係，當然不能與社會主義的經濟關係相提並論，新民主主義的構成部份如國家資本，私人經營，早就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存在著，但是要使它們能發展，却非待政治上的變化不可。

政治上，有根據沒有呢？我們認為這是毫無疑義的。

經過了八年的抗戰，中國的社會力量的對比，更明顯的起著變化。以王克敏汪精衛陳公博為代表的一部份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已變成漢奸而落落了；在戰爭的打擊之下，淪陷區的一些地主亦大大地降低其力量了；而沿江沿海的大城市的毀壞，使八九十年來中國的一些大工商企業亦受到嚴重的打擊；某些在後方作惡為非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更受到人民的唾棄的，反之，廣大的農民，特別是抗後解放區的農民，却在抗戰的洪爐中團結起來了；數百萬的產業工人，數千萬的手工業工人和僱傭農民，却在茹辛含苦為抗戰而貢獻他們的一切。在動盪中，他們已武裝起來；在後方，他們拚命的在生產，此外，廣大的小資產階級亦大大提高其對於政治的努力。中國的社會力量對比，明明白在變化了。儘管中古與買辦的混血兒，仍然保持它的力量，但它並沒有前途的。只有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即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才能適合於中國現階段的情況，才能取得

數百萬產業工人，數千萬手工業工人與僱傭農民的同意，才能取得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階級的同意，才能取得大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開明士紳與其他愛國份子的同意。中國要走新民主主義政治的道路，是決定了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集中表現」，前者以後者為基礎，但後者却以前者為前提。

第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不但在政治上有其實現的前提，而且在經濟上亦有其實現的條件。轉動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三個部份，都是或多或少地在中國存在着。按國家資本而言，它現在掌握了一些重工業和軍事工業，掌握了大銀行和鐵路公路以至航空。現在的問題是在於如何使這些國家經濟機關，不再成為少數人壟斷私有的工具。以私人資本經濟而言，從開採業一直到紡織、染色等等，都有一些基礎。這些民族工業，誠然很薄弱，但它的基礎和成就，是不能否認的。以農民的個體經濟而言，亦是廣泛地在中國各個角落存在着。現在的問題是在於如何使他們從封建剝削解放出來，使他們能夠避免其沒落的命運，並且走上向上發展的道路。以農業生產合作而言，像鹽工隊一類的合作組織，原來在農民中早就有了的，但在那時，不過是農民悲慘生活的表現。現在解放區的變工隊，形式與內容都起了變化，它使農民羣衆為發展自己的生產力，爭取富裕生活的基礎。

總而言之，實現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條件，是存在的，現在的問題，是在於推進他們，發展他們，改變他們的形態與內容，亦就是說，是在於給與他們以大前提，是在於進行土地改革，解放農民，肅清官僚機構，發展現存工業等工作。只有如此，才能使現有的各種經濟關係，能有機地成為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有機部份。

第三，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是以孫中山先生的學說為根據的。孫中山先生主張中國要成為一個「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國家。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裡說：

「近世各國所謂國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爲壓迫平民的工具。蓋國民權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

這就是聯合一切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政治制度，這個政治制度保證了國家資本不致成為少數特殊人物壟斷國民的工具，並且保證了土地改革，解放農民和建立現代工業之實行。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另一個地方，孫中山先生提出了平均地權與國有資本的宣言之後，又進而告訴了我

難

很多人在學習中提出這樣的問題，說：「讀懂文件並不困難，要從文件背後我更深的意思，才是大難。」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我以為更重要的是：「讀懂文件並不困難，記牢文件內涵的道理，在一行一行中都不要忘記這些道理，才是大難。」

由於各人的門戶經驗，學力基礎不同，對於文件的理解，就有深淺之分，深者見深，淺者見淺，淺者加上努力，可以漸漸加深，一步登天，自然做不到，但一般的了解，却做得到，力求進步，也做得到。問題是能夠學到一點，就與感情結合，變為行動，則能學在這一路上，革除舊的思想感情，脫胎換骨，這就是風雨飄搖所要求的思想革命！要學到這一步才是大難，而不學到這一步，就不學這革命的

目的。
譬如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無成」的道理，恐怕沒有人不能理解了。有誰敢於在討論會上，談話中，反對或一個指涉嗎？那人們不立刻對他指指點點，也要笑他糊塗，然而笑人糊塗的人，往往自己也糊塗了而不自覺。這就是「看實踐的考驗。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遇到這樣的情形，在討論會上，談話中，言者無罪，聞者無成」的道理作了混淆，在另外的場合，受到別人批評的時候，却把自己曾經說過的話，弄得乾乾淨淨，或者在事實上，在行動中把它修改成「言者有罪，聞者見疑」的道理了？

很顯然，這種情形是一定會遇到的，而且不但是個別的情形！在整風運動的長征中，小資產階級的靈魂所要跋涉。改造路途是艱難而苦痛的。在每一個大小的站口上，每個具體的行動步驟上，都要進行一個或大或小的內心鬥爭，舊的思想要反抗，要企圖辯解，一有機會，它就要起來支配一切。新舊思想的矛盾常常要引起當事人很大的苦惱，甚至於引起一時的更長久的消沈。常常要經過周圍的人多方幫助，打氣，甚至鞭撻，和本人自覺的努力，才能夠掙扎起來，才能夠繼續前進。

行。

「於此就有當為農民告者，中國以農立國，而全國各階級所受痛苦，以農民為尤甚。國民黨之主張，則以農民之缺乏田地，論為佃戶者，則定當給以土地，責其耕作，並為之整頓水利，移殖荒蕪，以均地方。農民之缺乏資本至於高利貸以負債終身者，國家為之設設關劑機關，如農民銀行等，供其匱乏，然後農民得享人牛應有之樂。又有當為工人告者，中國工人之生活，絕無保障，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為工人之失業者，國家當為之謀救濟之道，尤當為之制定勞工法以改良工人生活。此外如養老之制，育兒之制，周卹廢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輔而行之性質者，皆當努力以求其實現。凡此皆民生主義所有事也。」

由此可見，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是以解放農民工人為階級斷的。同時他又指出：要求民族解放，只有依靠廣大的農民和工人。這個宣言接着說：

「中國以內，自北至南，自通商都會以至於窮鄉僻壤，貧乏之農夫，勞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處之地位與所感之痛苦，類皆相同，要求解放之情，至為迫切，則其反抗帝國主義之聲亦必至為強烈。故國民革命之運動，必待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蓋無可變者。」

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而其生活又最痛苦，所以孫中山先生對於農民問題十分注意，十三年八月對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訓詞中，明確地提出耕者有其田；明確地指示我們：「解決農民的痛苦，歸結是要耕者有其田」。就是明證！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重要內容，是土地改革，解放農民，建立現代化工業和推動合作經濟，這一切，都是以孫中山先生的學說為根據的。

除了少數反人民的集團之外，中國各個民主派，都承認孫中山先生這種學說為中國今日之所必需，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這種理論已變為事實了，已經成為物質的力量了。這又是實現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保證！

新民主主義經濟在中國是有實現的根據和理論的根據的！這不是浮現在腦海中的烏托邦，而是實實在在的將要在中國展開的社會經濟制度。你看，在敵後解放區，在陝甘寧邊區，它不是已經在人民的生活中展開起來了嗎？新民主主義經濟航船的搖籃，已經露出地平線來了，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使它推廣到全中國去！

(完)

「廣則我都了解，但我的感情受不了！」這是在鐵砧上被錘鍊的小資產階級靈魂的灼熱痛苦悲鳴。從本人的主觀方面看來，這是原則和感情的矛盾。痛苦是由於感情和原則緊密地結合着，而這個原則的踐踏又必須要被革命的鐵錘所摧下。悲鳴，是從留戀舊原則的感情中發出的，因為在思想改造的鐵砧上面，要用強力把感情和舊思想打成一片。

黨風是反對教條主義的，但要發戒，不要又用教條主義的態度來進行學習，以致使黨風落空。舊的思想非常善於施行借屍還魂的魔法，它能夠用正風的言詞把自己偽裝起來，而到處留下歪風的行爲。實際上教條主義的一個最主要的特徵，就是言行不一致。教條主義，首先就要注意是否言行一致。「聽其言而觀其行。」不要把討論會上和讀書室裏所講和想到的，在工作中行動中忘記了。

我很喜歡讀荀子「力學篇」裡的這一段話：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肢，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有一支耳塞裡進，一支耳塞裡出的學習，這等於不學習。有耳朵裡進，只從嘴裡吐出來的學習，這是教條主義的學習。這樣的學習，的確是荀子所說，是很不漂亮的。要做得漂亮的，就必須收進耳裡深深地記在心裡，結合在影響全身的感情裡，表現在一行一動裡。

自然，荀子的話，有一點必須批評改正：他指的是「君子」之學，就是說學做壓迫人民的統治階級，然而壓迫人民的統治階級，都是需要欺騙的，都不能言行一致的。我們的學習，則是要努力站到相反的立場上：即學習做「老百姓的勤務員」，學習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只有為着這樣的革命目的的學習，才能够真正做到言行一致，才能够漂亮，「足以美七尺之軀」，也就是能在廣大人民面前顯得光彩。

艾思奇



玄虛不是中國哲學的精神

——評馮友蘭「新原道」

林 柏

馮友蘭氏發刊他的近著「新原道」，又叫它做「中國哲學之精神」，大體其所謂「內聖外王之道」，企圖藉以建立一個新道統。自以為他的哲學「後來居上」，「真正接着中國哲學的傳統」，足以代表「中國哲學的精神的最近發展」，他雖不諱其「新理學」是「無用底」「空虛之學」，但卻認它有「無用之用」，「也可稱為大用」。故雖喜玄談，但仍未忘世務。於是又刊佈「新原人」以標榜所謂最高的境界，——「天地境界」(神秘主義的宇宙人生觀——柏)，說「担水砍柴」，「專心事君」就是「經世涉險」(即玄虛——柏)。認為能够這樣，便足超人，不管他的社會地位和職業。「新原道」這本書，則「欲述中國哲學主流之進展，批評其得失，以見新理學在中國哲學之地位。所以先論哲學，後論新統」(引句傍點是我加的下同——柏)。

異同之說明，斯輪廓之述顯。庶幾世人可知新理學之稱爲新，非徒然也。——(自序)其所以以中國哲學史論的姿態出現，殆欲藉歷史的「敘述」，以證明該他繼承正統。(他不說繼承，而說是「接着」。——柏)正因為道統觀念在作祟，故不免歪曲史實，厚誣古人。而且這種經世涉險的思想也代表着目前中國一般愛弄玄虛的先生們的思想傾向。這種思想，對於中國今後和平建設的事業，對於青年爲學做人的進修，都是有害無利的。

我們認爲中國哲學的精神，不是「經世涉險」，而是「實事求是」；認爲我們爲學做人的需要，也是「實事求是」的精神。玄學是反科學的，歪曲事實，有損學者的風度，貽誤青年的學業，尤應糾正。

馮氏認爲中國哲學的主流，是「超世間底」。所謂「超世間底」，就是「即世間而用世間底」。又替它造了一個術語，叫做「極高明而道中庸」。他說：

有許多話說，中國哲學是世間底哲學。這話我們不能說是錯，也不能說是不錯。(新原道二頁)

要說「是錯」，無奈史實如山；要說「是不錯」，自己又實在喜歡玄學，不高興這樣說。於是他便說：

中國哲學有一個主要底傳統，有一個思想的主流。這個傳統就是求一種最高底境界。這種境界是最高底，但又是離乎人倫日用底。這種境界就是即世間而用世間底。這種境界以及這種哲學，我們說它是「極高明而道中庸」。(同上)

「極高明而道中庸」，據他自己的聲明，是「借用「中庸」中底一句話」，但這句話又「不必與其在「中庸」中底意義相同」。其實是一本店自造「的術語」。(馮氏著作充滿這種作風，或許也是道統觀念在作祟，這樣便於影射，讀他的書，此等處尤須留心。——柏)這句話，就是馮氏用來「敘述」(選擇)中國哲學史上各重要學派的學說，並以……評定各重要學派的價值「的「標準」(四頁)。關於這一「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標準本身的問題，留待另「機會檢討。這種所說的是：這個標準，絕不是由於客觀地研究中國哲學史所概括得來的特徵，而是由於他自己的形而上學所要求而杜撰出來的。他的新理學，本是一種玄而又玄的空虛之學，但他又未能忘情於「無用

之用」的「大用」。不如是，就不該「接着」他所見的「各重要學派」的「傳統」。故雖偏愛玄虛，也得略談世務。中間那個「而」字，就充分透露了那種「移花接木」的消息。當他在「敘述中國哲學史中各重要學派」的時候，「接」不盡的，就得到曲附會，使它符合自己既定的標準；實在無可附會的，便行捨棄，甚至抹殺了整個歷史時代的哲學，以保持其所謂「主流」。其所謂主流，明明是玄虛的，却偏要冒稱「中國哲學」。於是就得變換其辭：初則說「在表面上看，中國哲學所注重底是社會，不是宇宙」；繼則說「專就中國哲學主要傳統說，我們不能說它是世間底，固然也不能說是出世間底」。(三頁)不惜伸縮其觀察的範圍。然而結局還是均不過鐵面無情的史實，因而露出破綻。

試舉例吧。比方說孔子，向來都稱他為聖人。按照馮氏新原人所杜撰的「境界」次序說，聖人是屬於「天地境界」的人。有最高的境界的，於是他就引了「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章來說明孔子的境界。硬拿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三句話，去比附他的所謂「知天，事天，樂天」的「天地境界」三個階段。無奈孔子的所謂「天命」的「天」是主宰的天，實在太明顯了。所以，他又只得說：「所謂天命亦可解釋為上帝的命令。此似乎是孔子的意思。如果如此，則孔子所謂知天命，有似於我們新原人所謂知天」。(一四頁)「似乎是」，「有似於」，已經够勉強了。接着又「增字說經」，硬說「順是順天命，順天命有似於我們新原人所謂事天」。七扯八拉地湊成「若果如此，孔子最後所得底環境(即是「境界」字之誤植。——拍)，亦是「有似於」天地境界」(一五頁)的結論。「有似於天地境界」，自然不是天地境界了。但他又說：「五十而知天命」……孔子至此又知於社會之上，倘有天。於是孔子的境界，又將超過道德境界」。「將超過道德境界」，可見尚處於道德境界中，「將超過道德境界」而又「有似於天地境界」這究竟為怎樣的境界？究竟屬於那一境界？(馮氏在新原人中把所謂境界次分為自然，功利，道德和天地四種境界，本屬於武斷的杜撰，周谷城在民主世界第二期已批評其難通，證以此例良信。)如果把孔子的所謂「天命」，解作「天命之謂性」的天命，不更合於歷史的事實，更合於儒家的傳統嗎？然而這種解釋就不符合他的「標準」。

關於孟子，他的說法也是游移附會的，比如他解釋了孟子論浩然之氣一章之後說：「孟子所謂『養平天地之間』，『上下與天地同流』，可以說是

同天的意思」。「我們可以說：孟子所說到底境界，比孔子所說到底高。……孟子所說到底境界，則可說是同天的境界。我們說：『可以說』，因為我們還沒有法子可以斷定，孟子所謂『天地』的抽象的程度」。(其實孟子深受後下黃老學派的宋(鉅)尹(文)一派的影响，其所謂『浩然之氣』，就是宋尹學派的所謂『靈氣』，也是道家的所謂本體，決計不是抽象的，所以孟子所謂『天地』，也決計不是純粹形式的抽象，這是明白不過的。

「孔孟是早期儒家的代表。」馮氏把他們「知天、事天、樂天、同天」地附會得不亦樂乎之後，却又說：「儒家於實行道德中，求高底境界。這個方向，是後來遺學的方向。不過他們所以未能分清道德境界與天地境界(本來就沒有這種區分)，其故亦由於此。」(一八頁)這話却近史實。儒家既於是「於實行道德中求高底境界」，可是不是什麼「經虛涉曠」的了，可見馮氏所謂中國哲學的主流是「即世間而出世間底」這一見解，在他自己挑選出來「敘述」的第一章，就碰了壁，雖經過了他的牽強附會，到底史實並沒有那樣地聽話，隨他去自由伸縮。難怪他對於先秦後期儒家的大師——荀子，連提也不敢提了。因為荀子雖也受了宋尹學派的影响，但他却批判地接受了他們的自發天道觀(「天論篇」)和「解蔽篇」都充分表現了這一點。——柏)，而沒有孟子那種「神秘」的因素，提到了反而礙手礙脚，連附會也沒有可能。(這就證明了玄學不是中國哲學的精神。)於是乎先秦儒家的發展史就不不得不遭到被腰斬的命運了。

這種腰斬的手法，一樣地也施於先秦名家的發展史。名家一章(第三章) (幾乎全部用去敘述惠施和公孫龍的學說，尤其是熱烈地擁護着公孫龍。理由是，公孫龍的哲學及其方法，正是馮氏新理學直接的藍本之一，其重要不下於朱熹的。馮氏說：「新理學又接『接』宋明道學中處理學講說。」「其實，也是『接着』公孫龍的學說講的。他那種『過河拆橋』的方法，顯然是「公孫龍子」的翻版。可以說：『宋明道學，沒有直接受過名家的洗禮，所以他們所講底，不免著於迷象』(一一二頁)又說：「它(新理學)說理有同於名家所謂『指』。」「(一一三頁)這種所謂「名家」，主要是指公孫龍說的。

就客觀的史實說：先秦名家成就最大的，毋寧是荀子和墨辯(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和小取六篇)的作者們(墨家後學)。他們都屬於戰國末葉的學者，生在新社會即封建社會誕生的前後，所以有可能吸收和發展名家前輩的積極因素。例如荀子，就提出了心的「徵知」的作用，解決了公孫龍所

謂「指」的「自藏」而互相孤立的問題。所以說：「心有(又)德知。德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德知必將待天官之覺覺其類然後可也。」(正名篇)於是人可能同時見石之白，知石之堅而認識無類之堅白石，就得到了說明。荀子又指出了名的構成因素：(一)客觀的因素，如說：「物必有指實」，「知有所合謂之智」。這是承認外物存在的。(二)主觀的因素，如說：「凡物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應物也同，故比方之，異(觀)似之而通，是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這是強調主觀有辨別事物「同異」的能力的。(三)社會的因素，如說：「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所謂「約定俗成」，指出了名是社會的產物這道理。——這些，對於先秦名學都有重大的貢獻。再就墨辯來說，它的關於認識論的見解，關於概念和判斷的見解都有許多重大的貢獻，不但為公孫龍所不及，就是荀子的創獲也是遠不及他們。(請參看拙作「關於墨辯的若干考察」，載去年的「中華文化」)但是，荀子和墨辯作者是有唯物論傾向的，當然不會適合馮氏的脾胃，所以，在名家一章提及他們，只有：「墨經與荀子反對名家」，是與名家立於同一層次而反對之」，寥寥二十幾個字而已。

儘管馮氏對於公孫龍那套推測，公孫龍的學說和他的新理學的關係那麼密切，然而馮氏關於公孫龍的敘述，還是不大忠實，一樣地把自己的觀念硬塞在公孫龍學說上面。例如馮氏說：「他(公孫龍)發現了西洋哲學中所謂「共相」，他按共相為指」。又說：「公孫龍於是發現了一個超乎形象底世界，凡名所指底共相都在其中，而在其中共相，却未必皆有名以指之。」(三五頁)這是馮氏自己的見解不是公孫龍的意思。公孫龍的「堅白論」，不是明明這樣說嗎？「其不堅石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者」。又說：「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謝希聖對這句話解釋得很好：「彼皆自藏，非有物藏之也。故曰：「天下皆獨而正」。既然「指」一一「自藏」，「皆獨而正」，就不會藏於什麼「世界」之中，就是說，不能說「在這個超形象的世界之中「藏」有所有的共相的」。在現存「公孫龍子」六篇中，我們實在找不出一點表現「指」所構成爲，或被藏於，什麼世界的根據，而且他的「自藏」，互離，「皆獨而正」的理論，也和任何世界的觀念不相容。可見馮氏的說法和公孫龍毫不相干。祇因為他自己幻想了一個所謂「理世界」，硬把公孫龍在公孫龍名下以壯聲勢而已。所謂「而在其中共相，却未必有名以指之」云云，也是同樣的手法。

馮氏自以為他的哲學，「是「接續」宋明道學中底理學底」，所以名

書爲「新理學」。以爲中國哲學的主流在宋明理學以後便中斷了。明清之交的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顧(習齋)以及清代的戴東原等的哲學，在他，除了要替宋儒辯護而時一指斥之外，便再不願意提到他們。其故有二：一是他的哲學見解，即不是「經度涉廣」的，便不配稱哲學，所以說：「有些哲學，注重人倫日用，講政治，說道德，而不講，或講不到最高底境界。這種哲學，或不足正價值稱爲哲學。」(一頁)我們說他「偏愛玄虛」，一點也沒有冤枉了他。只這便是一個反證。二是他的建立新道統的企圖。這在下面說。大概，明清之交以來的學者，他都不願顧，所以這個時代寧願讓它空白。却又客觀地說中國哲學的進步，受了逆轉，好像責任這須那些學者去負似的。不信嗎？請他自己來說：

清朝人很似漢人，他們也不喜歡作抽象底思想，也只想而不思。他們喜歡漢學並不是偶然的。中國哲學的精神的進展，在漢朝受了一次逆轉，在清朝又受了一次逆轉。清朝人的思想，限於對道學作批評，或修正。他們的修正都是使道學更近於高明。他們的批評，是說道學過於玄虛。我們對於道學底批評，則是說它還不夠玄虛。

中國哲學的精神的進展，在漢朝受了逆轉，經過了三四百年，到玄學始入了正路。中國哲學的精神的進展，在清朝又受了逆轉，又經過了二三十年，到現在始又入了正路，我們於本章以我們的新理學爲例，以說明中國哲學的精神的最近底進展。」(一一二—一二三頁)

是說，明清之交以來的思想家，差不多都是反理學的，不僅「反於對道學作批評，或修正」而已。他們「反」的動機，出發點及徑路皆或不同，但終於「反」，則是一致的。比如黃梨洲，原在捍持道學的殘廢，但因他教王學的流弊而側重「工夫」，結果走到了道學的否定。如像顧亭林，則開始便提出經學與理學對立，而意識地反對理學。如像王船山，原先站在六經的立場去發展它的理論，而發展的結果，終於超越它的範圍，自然也和理學相反。顧亭林早年曾經篤信理學，並一一嘗試過程朱陸王的方法。由於理學不認現實的考驗，因而徹底反對理學而提出了實行的主張。他如費燕峯，則會奉全力以擊破「道統之說」。戴東原反對理學，至謂「人死於法，猶有實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諸如此類的學說，馮氏怎能看得順眼？

我們上面說：馮氏有「建立新道統的企圖」。這話也不是隨便說說。這得先略述道統說底歷史及其特徵。按道統說，可以說是暗承於孟子，提倡於韓愈，而究其於朱熹的。韓愈爲了對抗道統，寫了一篇「原道」，中

問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轉之而死，不得其傳焉。」而雖然以繼承孟子的遺教自居。但是朱晦庵却不買賬，他不承認繼承孟子的遺教。他說：「中庸之書……孟子以說不得其傳焉……至於本朝（宋）漢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聖，以著於篇。河南一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中庸集解序）朱晦庵是私淑二程的，把周程授上孟子的正統，當然自己也有份了。果然，他的願望沒有落空，孫奇逢著「理學宗獻」，竟把他（朱子）去上繼周程張子而下開陽明了。一幕的心門的開更，真虧他們排演得出！

舊道統說的特點，在於一方面恣意地造成自家的宗派，另一方面却一筆抹殺了漢唐以來許多儒者的勞績。二者都是歪曲史實去替自己的宗派捧場，都是對於真正的學術有害的。但既名為「統」，而又沒有歷史的根據，這就很難使人心服。所以過去反理學的人，就從這個漏洞入手，指出漢唐儒者對於六經學術的貢獻，而切實地給他們以嚴重的打擊。費燕峯就集中全力做了這一工作。

畢竟時代不同，我們的新道統論，比着古人確是聰明得多。雖然一樣地在建立道統，說新理學是承接宋明理學的，並以新原道的標題暗承接「原道」，但並不簡單地「形象」說誰「以是傳之」誰，也不拘拘於儒家的小天地，而把視野擴展到整個中國哲學的範圍，並且率直地以自己的新理學為例，「說明中國哲學的最近底進展」。可是，就作風說，就還是舊道統論的老作風：一樣地歪曲了史實，一樣地抹殺了前人的勞績，把近代學術史最有價值的二三百年的哲學一筆勾銷，反歸罪於清朝人「不喜歡作抽象底思想」。也不想如何以清朝人很似漢人，偏偏不喜歡作抽象底思想？有了甚麼歷史的根據？這也「不是偶然的」，這統思想，本來與所謂法統思想原是一對孿生兄弟，同是社會沒落的社會階層所產生的思想。如果單說它是玄學的精神的進展，倒也罷了，因為不敢正視現實的人，本來是慣於形式地思考事物的，要是說成中國哲學的精神的進展，就得提出證據了。

莊子天下篇說：「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這句說話，雖不免有點唯心的臭味，但却充分透露了，階級分裂的社會必然要產生不同的真理。客觀的史實所指示：也是如此。例如在道學正盛的南宋，與宋時應同時的楊誠齋，即以人事說「易」，反對其「空言性命為元，空究靈于卒之」，而斥之為異端。陳同甫也從正面反對：

「身處性命之說」以「盡心知性」相欺相蒙，以盡天下之實，而「歸於百事不理而已。」客觀的史實所示：思潮的復興，確如社會階級的代異一樣，唯物論與觀念論也迭為盛衰，時有偏倚，或繼承或批判，交織而成一條總流。其間實有一脈之潛通，但無道統的獨霸。就拿新原道所敘述的為例，它說：「漢人的著作」所表現底思想，却不能「超以象外」即玄虛——柏——這家的哲學是嚴注重超以形象底。但漢代道家所講底，也都限於形象之內。」（這又是玄學不是中國哲學的精神的又一個好例。這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漢代思想的「主流」。可見它不是決定於思想本身而是決定於當代的歷史。繼後而有魏晉的玄學，唐代的禪宗，宋明的道學，這些都是所謂「經虛涉曠」的，但同時也有相反的事求是的思想。及至有明末葉，王學勃衰，明清之交，黃顧王顏都重「致用」。前清樸學大盛，戴氏的哲學也痛斥宋學的玄虛，控訴「人死於理，其誰憐之」。這些都是實事求是的。馮氏自己也得承認清朝人很似漢人，「他們喜歡漢學」，「並不是偶然底。」於此，我們不能說，這一時代，思想沒有「主流」，就是馮氏至多只能說：「這種哲學，或不真正值得稱為哲學」。可見哲學的總流，不是可以那麼簡單地以玄學為主流的眼光去追蹤的，馮氏既知道「他們（清朝人）喜歡「漢學」，並不是偶然底」，就該知道，漢人的思想，都不能「超以象外」也不是偶然的，更該知道，這只有向它所由產生的社會的歷史去追究其所以然的根源，纔能得到正確的答案。孟子不早就說過這樣的話了嗎？「語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我想孟子的話，應該通得過吧。

馮氏說：「中國哲學的精神的進展，在漢朝受了逆轉……到玄學始入了正路。……在清朝又受了逆轉，到現在始又入了正路」。而由他「以新理學為例」說明中國哲學的精神的最近底進展」看來，「到現在始又入了正路」這句話，就等於「到了新理學始又入於正路」的委婉的表現。新理學可以說是屬於玄學一類的，玄學何得僭稱中國哲學之精神？然而，它竟被貼上了中國哲學之精神這一商標，那就是馮氏的建立新道統的企圖在作怪。因為要建一個新道統，不如此歪曲附會，湊成一個統系，便不足以表示它的源遠流長，也便不成其為「新統」呀！他說他「各處所見」，我說他，用心良苦。

「崇尊」與「崇尊」

人大概總免不了有一點好勝心的，喜歡聽聽那一點歌頌、讚美的諛詞。美國的海軍上將羅爾剛剛推重了中國的考試制度一下，竟有人受寵若驚，流着感激的眼淚，像尋找到了「一個真正的賞識者」的感觸起來了。眼着着外國人士而尊崇中國文化，不發又感慨於「中國人士而尊崇中國文化」的不該。論者是以最正統的中國文化的保衛者的姿態出現的，字裡行間，完全表現了「不遇時的感憤」和「被賞識的欣喜」，雖然沒有明確的指出人們所曾經歷過的是甚麼，應該尊崇的是些甚麼，但文章裡已有了明確的註釋。

望 黎

在說明了中國文化是「豐儉博大」，並且經歷了多次的變亂，而永無淪沒之時」後，跟着就指出：

「中國文化有一最大特徵，中國歷次的文化運動，無一次不以統一運動為其涵義，亦無一次不以獨立運動為其涵義。春秋是中國的第一部經典，春秋三傳都以大一統與辨夷夏為其基本主張。兩漢的統一局面，受了春秋的影響不能不說是很大。兩漢三百年統一之局既破，而以統一與獨立為涵義的文化運動綿延不絕，歷四百年而有隋唐的大一統國家。」

中唐以後二百年思想界統一運動，造成了宋元明清一千年的統一國家……」

然而：一歷史是過去了的，而過去的事實是不能改變的。所以，要談中國文化，似乎就不非「古腦兒的談所謂「統一性」；因為「統一」就得區別它的進步性，正義性與倒退性，反動性。忽略了兩種不同的統一，就會搞不清究竟是進步的，革命的文化還是反動的倒退的文化。結果就會發生誰統一誰和如何統一的問題。日本法西斯強盜和他的幫兇汪精衛不也喊過「日滿華一體論」，「大東亞共榮」，「中國和平統一論」嗎？憑着槍彈和刺刀，他們不還在廣大的收復區建立過反動血腥的所謂「統一」嗎？

既然不願就分辨「統一」的革命性或反動性，自然就無怪乎作者在儘量的歌頌宋元，滿清的「統一」了。論者的意見，對於任何性質的「統一」都應該無條件的擁護，要不然就是「破壞統一」；因此，曹夢炎、呂文煥、范文程、吳三桂、李光地這些大小漢奸們，正是贊助統一的中國文化優秀傳統的繼承人；相反地，文天祥，陸秀夫，史可法，鄭成功，顧炎武，洪秀全以至國父孫中山先生都成了文化統一的「破壞者」了，因為他們抗拒宋元、滿清，在元清的統治者看來，自然是作亂造反破壞統一了。

讓我們再看着元、清「統一」時代的文化吧，元尊喇嘛教，讀書人被列在八類九儒十丐

，真可說是「斯文掃地」了；清之大興文字獄，稍有良好的知識份子均遭殺戮；此即論者所念念不忘的「統一」時代，元清三百餘年的統治，漢民族却始終不甘於這種「統一」，不斷的掀起反抗，以破壞所謂「統一國家」。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大思想家，著立說都在反抗滿清的統一。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即以理論與行動，堅決反對清末保皇黨維護當時「統一國家」的漢奸路線。論者不懂宋明兩朝孤臣遺老的作品未曾閱讀，連國父的遺著亦未費目而大談其中國文化，寧非怪事。

近百年來中國人民曾經民族獨立，民主自由而生死以赴的奮鬥不懈，他們在這種長久的鬥爭中已完全知道了民主的重要，今天中國所需要的是民主的統一，撇開了民主而談統一，不過是法西斯專制的扯淡而已。

對於中國文化自然不是一古腦兒的尊崇，也不是「不分皂白」的完全歸棄，批判的接受中國文化遺產，正是今天中國人民當仁不讓的責任。

要談對中國文化的「尊崇」，要建立對於中國文化的「自信」，就決不是聽了一個「外國人士」的略加推重，就感激得流出眼淚（何況推重者還是一個將軍，按照我們的習慣應當說是武人呢？）懷着「一心追隨外國而惟恐不及」的奴才心理者所能語的。

十二月廿日重抄

解放區報告

晉察冀行進

周而復

稅收的革命

曾經有人這樣形容中國的苛捐雜稅的繁重，「如今只有屍無捐」，足見除了放屍無捐稅以外，其他東西幾乎都有捐稅。全國關卡林立，重重中飽，這些捐，這些稅，表面上雖然取之於商品製造者和商人，實際上，間接直接地還是取之於商品消費者，這就是人民。

毛澤東同志在「論新階段」中曾指出：「在舊有的原則下，改訂各種舊稅為統一累進稅，取消苛捐雜稅制度，以舒民力，而利稅收。」在中國這樣一個捐稅的大海裡，實行這樣一個統一累進的稅收制度，的確是一個空前的革命運動，一個偉大的艱巨的工程。

這項工程首先在晉察冀邊區完成了，在中國稅收史上寫下了新的一頁，給捐稅壓斃了背的人民，在新的稅收制度下面，開始舒暢地伸直了腰。

邊區廢止了一切的苛捐雜稅，只有為便利軍需民用與促進生產事業保護貿易制度以免資金外流而徵收外貨入境稅、和本產貨物出境稅！其次為了確保財產所有權買賣自由權而徵收買賣田房契稅，除這兩種以外便是統一累進稅。縣財政統一於邊區，田賦、營業稅公課等統一於統果稅，一年徵收一次，以錢糧林三種形式征收，擴大負擔而至百分之八十，勞動收入也納稅，但有免稅點和累進最高率。特別窮苦的人，不納稅，這樣便達到「取之合理用之得當」的正確稅收制度了。

統一累進稅的各種財產收入的計算單位，定名為「富力」。什麼叫做「富力」呢？如果是用土地計算的話，就是四標準畝為一富力；要是低租地，它的租額在土地總收穫百分之二十以下的，這個財產稅以收租每八市斗穀的土地，算做一個富力。地租和農業收入以每十市斗穀，算做一個富力。財產以每四十市斗穀之價，算做一個富力，實物用市價折算來計算。

富力既定，統一累進稅又按照富力的多少，定為十六等：第一富力前半個富力為第一等，後半個富力為第二等；第二富力前半個富力為第三等，後半個富力為第四等；第三富力前半個富力為第五等，後半個富力為第六等；第四富力為第七等，第五富力為第八等；第六富力為第九等，第七富力為第十等，第八富力為第十一等，第九富力至十五富力為第十二等，第十富力至三十富力為第十三等，第三十一富力至第五十富力為第十四等，第五十一富力至第八十富力為第十五等，第八十一富力以上為第十六等。

統一累進稅按等累進，從一至五等以點五為累進率，五等至十六等以點一為累進率。它的徵稅單位定名為「分」，按富力等數定分，富力少者計分低，富力多者計分高，如第一等每一富力以八厘計算，而第十六等則每一富力以二分一厘計算了。

統一累進稅以個人為單位計算分數，每人除一免稅點，各項財產收入合計共富力不足一免稅點的

，就免稅；超過一免稅點的，只就其超過之部徵稅；免稅點北嶽區定為一點五富力，冀中區生活程度較高，提高為一點八富力。沒有勞動力的孤兒寡婦，在統果稅進行調查時（統果稅每年徵收前調查一次）請求當地縣政府，把免稅點提高兩個富力。

而統稅的計分，至第十等即停止累進。有了這樣的免稅點和累進最高率，就照顧到各階層的利益，免去了舊社會負擔而集中在窮人身上，也免去過去負擔而集中在少數富有者的偏累現象，因為能輕微到取之合理；有錢出錢，錢多多出，錢少少出的理想。

每年徵收一次，怎樣進行調查呢？首先由各區縣政府根據各花戶自填自報的財產收入，負債，和人口數目進行調查，調查完後，政府把結果通知納稅人，如果納稅人以爲調查不對，在得到通知以後，可以請求政府重行調查。要是當地政府自行調查之後，納稅人還不服，怎辦呢？納稅人還可以請求人民代表機關（如區代表會，如縣參議會等）評議，一直到納稅人同意為止。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納稅人隱而不報，或以多報少，要被罰的。

稅收上的偉大的革命工程，在全邊區的人民幫助與支持之下，完成了。因爲負擔面擴充到全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納稅人口增加，每一個人的負擔便相對地減少了，各階層的負擔同時也相對地減少了。一些貧農說：「我打一兩天柴就可以交稅了。」許多人談到統果稅時，莫不笑顏逐開，說：「邊區真有這個人，想出這樣的好辦法。」

因爲這一新稅收制度，是公平合理的，是邊區人民負擔的，徵收時非常順利，冀中區原定兩個月完成，半個月就完成了，有些地方三天就完成

大生產運動

單是減輕人民的負擔還不夠，這是消極的辦法。積極的辦法，是增加人民的財富，才能真正做到改善人民的生計。在農村環境裡增加人民財富的路子，是開展農業生產。

「驚雷」(三月六月)時分，全邊區展開了大生產運動：各戶各村各縣都訂了生產計劃。

邊區經過這次殘酷的掃蕩以後，人力、物力、畜力都受到空前嚴重的損失，邊區政府首先補充了大批牲畜，貸糧一萬六千大石，賑糧九百大石，解決了沒具種籽的問題，恢復了災民和農民的生產力，羣衆生產與戰鬥情緒和勝利信心更加提高了。

從「驚雷」到春分(三月二十二日)生地已大部耕完，到四月底北嶽區土地已全部耕過，有不少地區還進行了復耕，旱熟作物統統播種，有些地區紡織和運輸事業大大開展起來了。

「種地沒錢白費勁。」這是一句農諺，邊區抓住這句農諺，做爲中心口號：推動造肥。曲陽縣號召一人一日一筐肥料運動。從舊曆正月初到三月，不過兩月之間，只是一個區就造了六萬多畝的肥，至於多獲秋熟則都送到地裡去了。定縣李縣長，安縣李縣長，出門工作的時候，肩上都揹着一個筐，李縣長說：「人家拾糞不拾稀的，稀的我也要。」

各地更展開了變旱地爲水地的運動，修渠鑿泉、護堤、鑿井，單是曲陽一縣就完成了三百九十四眼井，能澆地一千二百一十一畝地，而第三軍分區原來變旱地爲水地的計劃只希望三萬五千畝，在軍民熱情的支持下，結果竟超過了。

隨着農業生產的開始，家庭副業也熱烈展開了。

用完縣一個區做例子來說：進行紡織的就有一千零八十八戶，織布的四十八戶，五十七人，養豬的大大增加，一戶一豬的要求，部分村莊已可以做到。

合作社也跟着農業生產開展而蓬勃地發展了：曲陽三百二十二個村莊的合作社，三分之二以上已整理起來，在解決農具和種籽方面，他們有了很大的貢獻。合作社在羣衆中威信因之提高，股金自然就增加了，就連比較落後的張合莊的合作社股金，也從五百元擴大到一萬五千元了。

在機關部隊方面的生產同樣地活躍起來，僅僅是第三軍分區的部隊就種了六百多畝地，許許多多知識份子出身的幹部參加了勞動，曲陽縣一級的女幹部組織紡織組洗組，和男幹部變工生產，有的女幹部要求當電話員，讓電話員去生產。勞動改變了一切：改變了自然，改變了知識份子輕視勞動的觀點，改造了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的思想意識，加強了羣衆觀念，從實際中鍛鍊了自己。

由於大生產運動的開展，敵人掃蕩所帶來的災了。

勞動互助合作社

在大生產運動中，如何把邊區已有的勞動力發揮到最高的限度，有些沒有勞動力的家庭(如孤兒寡婦老弱者)怎樣幫助他們耕種。

這是一個大問題。

另一方面，幾千年來的中國農業勞動，都是分散的個體生產，一家一戶一人便是一個生產單位，這是封建統治的基礎。使得農民長期陷於奴役和窮苦的命运裡。要想從這樣悲慘的命运裡求得解放，

難，怨恨，暗影……一掃而空了。現在有的地方樣的熱情，鋼鐵的意志，鐵錘的信心，先前某些羣衆會擔心：「今年不知道要荒多少地呵！」現在把所有的生地熟地都耕完了。許多年老的人在這樣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前面，也不免吃驚地說道：「我見過耕地這樣快這樣徹底的。」

先前逃荒的人，現在都回來了。

在大生產運動中，政府又號召戰鬥與生產結合，勞力與武力結合。很多游擊隊員白天耕地，夜晚練習埋地雷，上多學休息時學射擊，開會討論戰時生產辦法，在邊區邊緣與游擊區，游擊小組掩護耕作，已經成爲家常便飯了。這時候主力更經常出擊，使敵不敢出來隨便擾亂和破壞春耕。

生產熱潮的沖激下，許多二流子都得到改造。比如懶漢經過勞動說還不生產，村裡就到處唱道：「懶漢懶整，光吃不做。」懶漢在這樣的浪潮裡是沒有存身的餘地的，很多懶漢聽到人們笑他，歌唱他，便哀求地說道：

「不要唱了，讓咱們也積極起來吧。」

於是全邊區的軍民，都捲入大生產的熱潮裡去了。

逐漸達到繁榮富裕的境地，唯一的道路，就是逐步走向集體化。這集體化，並非是蘇聯式的集體農莊的合作社，「我們的經濟是民主主義的，我們的合作社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勞動。這又有幾種式樣，一種是「變工隊」，「扎工隊」，「唐將班子」。這一類的農業勞動互助組織，從前叫做勞動互助，又叫耕田隊。」

在晉察冀邊區，叫做勞動互助合作社。第三軍

分區，已經出現了這類形式的合作社，如曲陽鄧家店，康家莊，李樹溝等村的便是，完全是羣衆自發建立起來的。我化了兩個星期的時間，訪問了這個人民自己創建的勞動互助合作社。

第三軍分區勞動力的組織，基本上有兩種形式，就是農工和包工。已經有的農工組織形式有三種：第一種是以主要勞動力爲主的農工，比如人與人的農工，牲口與牲口的農工，人與牲口的農工。這一種比較簡單，也比較普遍，許多已經組織起來的勞動力便是這一種居多。有許多男與女農工，男替女作地裏活，女給男做針線。

第二種是以戶爲組織勞動單位，所有勞動力都參加農工，是第一種農工的發展。唐縣大張合莊山主任的農工組織便是用這樣的辦法：全家所有的勞動力，如人、牲口、小孩、婦女、都組織起來，民主指定工率，要是有突擊任務時，像種大麥的時候，由農工組織領導，大家來做，做的時候，不以戶爲界，例如同時幾家婦女兒童可以給一家送飯，男的勞動力可以給另一家耕地，由組長計算活計。

第三種就是我所訪問的勞動互助合作社。這種形式，在邊區還沒展開來，還不够普遍，但是一個組織勞動提高生產的新形式，有着遠大前途的形式。

這種形式的合作社，它的特點概括起來說是：有錢入股，有物入股，有勞動力入股，折合工率等價入股。鄧家店合作社的規定是這樣的：

- 一、入股以成年男子勞動力爲標準，算做一畝。
- 二、牲口入股，該村都是驢，同時每個牲口大小強弱上下差不多，所以不作折合，一個頂一畝。（別的村有驢馬牛等牲口，則應按其勞動力的強弱，折爲股金。）
- 三、物股與錢股，根據當時情形，一個成年勞

動力一天吃的米和所掙的工資合計，爲二斤米十元錢作一畝。一個成年勞動力與一個雇等價（是一個時期的折合率，可變動的。）

這樣，使人工與畜工都有價值。女童工可用手工業生產額折合等價頂工。

鄧家店等三個村的勞動力互助合作社，通過工資形式把不等價農工變成爲等價，一次應還的工可以變成分期分期還。農業上的工，可以由手工業的所得分期分期還。這就是所謂「整撥零還，零撥整還」。

請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張富雲給六十一歲的張老婆婆變了一個工，可張老婆婆不能還張富雲的工，怎麼辦呢？合作社就給張富雲二斤米十塊錢，算是合作社還了他一個工，張老婆婆欠合作社一個工。張老婆婆會做鞋子，合作社買他的鞋子，在盈餘分期分期還，假如實在不能還，合作社另有辦法：立契行息，算做貸款，

一個勞動英雄的故事

訪問三個勞動互助合作社之後，我向海軍區北線走去。路過阜平八區朱家莊，我準備住下來，一方面休息，一方面想了解一下在大生產運動的浪潮下這一帶村莊和人民的生產情形。

朱家莊全村有一百二十多戶，在抗戰以前有九十多戶沒有吃的或者不够吃的，可以說是山溝裡一個典型貧苦的村莊，許多最窮的人家，經常以樹葉代飯，用棗代飯已是比較富裕的了；自己雖然是種地的，出產糧食，可是吃不到嘴裡，不是繳了糧納了稅，便是用小米換雜糧，這樣可以多糊幾天口。這是舊社會沒落以前的情形。

秋後再還。這樣一來，就是「整撥零還。」合作社的貧苦社員，平時沒有飯吃，可以向合作社借糧，積欠到二斤米，十塊錢，這人只要給別人撥一個工，便還了賬。這就是零撥整還。

通過這樣的勞動互助的方式，人民的生產力和收益增多了。比如唐縣北店頭一個人趕八個驢馱糞六，六畝地的糞需馱二十四天，結果十二畝地的糞六天就歇完了。

還有一種農業生產和貿易合起來的創例：曲陽三區灰嶺一個戶組成農工組，這個組有七個男勞動力經常抽出二人去貿易，五個人經營農業，集中使用資本，按照勞力分紅，生產既可增加，貿易更得多利。

經過這樣的廣泛組織勞動，全邊區約勞動力總形之中增加了，比如五百萬個勞動力，互助農工以後，至少可以增加到數十萬至百萬以上，人民的財富自然額外增多了，也自然可以都從窮困的泥濘裡逐步走出來。

抗戰以後形勢就變了，請先從我看見的一個人物談起。

這是一個六十三歲高齡的佃農，他的名字叫胡顯義。

我住的地方，離他家只隔兩個院子，每天不到東方發白的時候，便可以聽到他在院子裡的咳嗽聲了。等到天亮到村外散步的時候，他已經在地裡播種了；而當我吃過晚飯，黃昏時分，走到村口時，這時雖然天快斷黑，不能勞作，但是他還不回來。在暮色蒼茫裡，我總是在看他一個人站在田壟上，抽着羊骨頭的旱烟袋，鍋鏟，閃閃發着火光，他凝視地望著親愛的土地。

慢慢我同熟習了，便拉起話來。

胡順義是一個老佃農，謙虛樸實，待人熱誠，能為大家吃苦，自己辛勤勞動，他在村子裡被大家尊為的老人。還在民國十一年時候，村裡的財主們叫他當村長，目的不是為了別的，是想利用他向窮戶人家多攤款。村長做了，但是他沒按照財主的願望去做；他給財主攤的多，給窮人攤的少。這自然惹了財主們的不滿，於是乎在區裡告了他一狀。他不在乎，也不屈服，聯合了九十多家窮戶人家和財主們打官司，他勝利了。

抗戰以前，他租人家十八畝地，單是租子就要交十石零五斗糧。他苦笑着對我說：

「同志，說起來真傷心，那年頭種地多，還不夠吃，一年到頭在地裡辛辛苦苦，全是給地主拿去。那時時候自己只有常年吃樹葉吃糠的份兒了。」

八路軍到了邊區，邊區政府成立了，窮人這才翻了身。首先是實行二五減租，地主不能收高租，不管多少收成，租子不能超過正產物的百分之三五。胡順義十八畝地的租子，從十石零五斗減到三石一斗五，自己勞動的收穫開始大半為自己所有了。

政府又獎勵墾荒，因此從民國二十九年開始，每年除了種自己的四畝九分租地以外，每年還墾一二十畝荒地，這些地地極薄，都是輪荒地，每年種二畝半小玉米，半畝大麥，山藥，十六畝玉米，三畝穀子，除這些，還墾了三十四畝生荒，開了十五畝熟荒（就是從前開過的輪荒地）。因為他勤勞，上的糞足，鋤的細，年上二十三畝地，每畝比往年多打了一斗（兩斛半的斗），共收玉米穀子十一石多斗；開荒地收了二石多蕎麥，兩石多苦蕒，三千多斤山藥，三千斤蘿蔔，菜蔬，瓜豆還不算在內。

同養呢？胡順義養了三頭驢（其中有一頭驢駒，是邊區政府給他的勞動英雄獎品。）五隻牛，十二隻大羊，四隻小羊，三口豬。並且他還種了四十多株柳樹。

我和胡順義談的很接近，幾乎每天都要拉一陣子話，有時在地裡，有時在我住的院子裡。他常約我到他家去玩，他家的人就把我當做他家裏中一個成員似的，無話不談。

他家裡一共有九口人，一個八十二歲的老娘，三個小子，大的二十九歲了，第二個二十六歲的都娶了媳婦；第三個沒娶媳婦，方十八歲；另外還有兩個女孩。家裡沒有一個懶漢懶婆，兩個媳婦做飯，地裡忙的時候也下地幫着拔麥收割。他八十二歲的老娘也要參加勞動，她說：「一個人閒下，就嫌悶的慌，光吃不勞動是懶漢，也要幹個營生才對。」胡順義想來想去沒有適當的活好給娘做，便逗笑地問娘：「你捻線好不好？」娘同意，但是沒有棉花。胡順義給娘找棉花，勸娘不要多捻，累了就不捻。娘說五天準交一兩線，從此就捻起線來了。胡順義家養了十二隻羊，可是沒人會熟皮子。兩個大小子學會了，熟了十二張掛在屋子裡，媳婦縫皮子，冬天家裡都可以穿下皮襖了。過去，冬天沒有棉衣的日子，像是河裡的水一樣的流過去了，布新社會裡永遠不會再來了。

胡順義不僅自己勞動好，他還幫助了別人。

朱家營從前雖然有變工隊的組織，但那是一窩的「窩窩頭」的「窩窩頭」，給誰家做吃誰家的飯，不吃糕就吃豆，窮人是變不起的，胡順義把它改成「乾變工」，「窮的變窮的」，自帶乾糧，到地裡夥吃。這樣窮人變得起了，大夥都能參加變工小組了。去年他組織了十二個變工小組，把全村勞動力

的百分之八十組織了起來，牛工也頂人工。有一個胡漢叫做劉三妮，胡順義想辦法推動他，讓大家選劉三妮當變工小組長，各方面好意督促他，批評他，劉三妮變好了，成了一個好勞動力。大家組織變工小組，使得勞動力增加了，十個人可頂十二三個的活。全村墾了三百四十畝荒地。

朱家營附近有一道渠，年久失修，荒廢着，從前年度也修不回來。年上胡順義組織了一百二十多人的修工隊，四天就把渠修好了。能灌溉一百三十多畝地。胡順義知道了，又請到下關去領導紅草河和東西下關的渠渠去修。他每天來回跑二十里地，開頭自己還帶乾糧去吃，跑了將近一個月，這道渠又修好了，能灌三百多畝地。

在胡順義發動和幫助之下，不僅他自己翻了身，改善了生活，村裡的人也翻了。現在村裏多整了地，加上組織修工隊，全村不穿棉衣的（短二三個月穿的），九十多家只剩了十來家了。

胡順義成了這區的勞動英雄了。他聽到今年開展大生產運動的消息，想了好幾次，便做了如下的計劃：

農業方面：
做到深耕細鋤三遍，每畝多上十担糞，多整三十畝荒。與人輪修地十畝，比上年增加糧食十二石五斗，四千斤菜，一千斤山藥。這祿全年要收糧食四十五石，菜三千斤，山藥與家庭副業方面：
增養一頭牛、十隻羊、十五隻雞。

關於全村生產方面：
組織訓練變工隊，全村牲口合群，保證全村不荒一畝地，按時下種，把抗屬地種好，幫助本村牛數以上人家做計劃，在戰時堅持生產，好好墾荒。

所以胡順義就從拂曉到黃昏都忙得不可開交了，生活因之一天天好了起來，——一個貧農上升為富農了。

頁之者讀

對政治協商會議的希望

艾凡

我是一個公務員，我們這個機關有二百多個公務員。抗戰勝利之後，我們都以為能够早日回家，到家鄉去看看闊別已久的家人，去慶和平安樂骨肉重逢的太平生活。初以為敵人一場台，我們的夢想就可以實現，可是這却變成了泡影，內戰大規模地爆發了，戰爭影響了我們，戰爭威脅着我們，戰爭打破了我們和平安樂生活的夢想。

我們都處在痛苦的生活，我們迫切地等待着和平民主的日子到來，像一羣企鵝似的伸着頸等待着，好容易，終於等待着政治協商會議最近可以召開了，我們都非常歡喜，我們心裡有着許多要講的內心話。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先生及民主同盟方面都表示了願徵求各方面及人民的意見，作為老百姓一份子，我想提出我們這羣公務員共同感到的衷心話。

我們要求立即停止戰爭，軍事行動不能根本地解決問題，十年內戰，不但沒有如反動派的願望，把共產黨消滅，結果，反而勾出了一個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中國的領土上來了，經過八年人民的抗戰，才把頭敵打敗。當局應該接受歷史的教訓，走向和平和民主之路。

世界已經到了和平復員的時候，我們這塊國土上還要進行內戰，還在使老百姓流血，究竟是我們老百姓還沒有够戰爭的痛苦呢？還是內戰挑撥者看不慣一個和平的世界呢？他們想在內戰的火中奪取

勝利果實，我們老百姓有權，而且也有力量來制止反動派繼續進行違反人民意志的內戰。我們希望在政治協商會議以前立即停止內戰，一切問題在政治協商會議上去解決。

我們要求民主，我們要求各民主國家人民所享有的自由，當局所允諾了的選政於民，以及國共會談紀要上所明明白自規定的，政府都要不折不扣的實行。過去人民並沒有得到這些權利的實惠，昆明的一二·一事件不是已經證明政府把這些允諾忘記的乾乾淨淨了麼？這種身披着民主的外衣而裡邊却藏着野心的野獸，已經不能欺騙國際，更不能騙老百姓了。中國人民所要求的民主，不是「口惠而實不至」；不是美豔的文字，而是認真的實行。

我們希望國共雙方團結，而且要真誠的團結，世界各國國情如此，世界和平即可奠定；國共雙方能夠如此，中國的前途一定是無阻輝煌。要團結，首先就要實現民主，消滅一切的階級壓迫，誰好誰壞，讓人民自己去選擇去斷定，這話中傷的事情，都是瞞不過老百姓的，同時也為老百姓所不齒，所反對。抗戰雖然結束了，但擺在面前的須要解決的問題還多得很，一切復員建設的問題還有待於各黨各派以及社會賢達的先生們，還須得他們真誠的合作，一切問題都要以國家前途和民生幸福着想，非如此，中國問題不能解決。

最後，我們希望政治協商會議能解決問題，

它應該有權監督政府，督促政府實行已經決定了的問題，如果會議流了產，或者決定了若干問題，而政府當局根本不實行，像歷屆各政會似的，開會時非常熱烈踴躍，閉會後只得到了「決議」「通過」，但老百姓未見到一件議案付諸實行，這還不是以廣招徠的美麗的幌子麼？要使該會議能够解決問題，就須得參加會議的先生們，尤其是執政當局者要有誠心，要處處為人民着想，那麼，它就可以解決問題了，否則，仍然會像「雙十協定」似的，紀要是通過了，而且是公諸報端了，為老百姓們點頭稱讚了，可是，就在這時期，「則匪手本」散下去了，「則匪手令」散下去了，大規模的內戰就爆發開來，一直持續到現在，老百姓們還跟着吃苦受難。這就是發動內戰者不希望中國是一個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而是一個分裂的局面。我希望發動內戰者，回心轉意，遵照人民的意志走向和平民主之路。

今天的中國，並非枝節的問題，並非黨派間私利的問題，而是一個民主與反民主的問題，如果實行民主，那麼一切問題皆可迎刃而解，不會成為問題。同時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中國，又非和平民主不可，這是世界的潮流，不管誰願不願意，也得走這一條路。

會議本身之有無關係，全看政府能否誠心誠意實行會議中的決議。如果能夠實現和平民主停止內戰，那麼，一切交卸工具不必改做軍運，人民可以很快復員，實現我們八年來所渴望的家人團圓的和平生活。

這是我們公務員對政治協商會議的希望。

十二月二十日

怎樣研究馬克思學說

諸平
希明
習人
諸先生：

你們很重視研究馬克思的學說，讀過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對馬克思主義是很好。如今有許多人一勸告「青年不要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把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列為禁書，不許出版，也不許人研究，他們以為這樣可以使馬克思主義「絕滅」，使人民的思想黨化。但這是萬萬做不到的，思想自由終究要代替思想專制，馬克思主義也要戰勝一切，成為戰鬥人家的思想武器。這是因為維護真理和自由的人是如此之多，他們的鬥爭又是如此之英勇，反動力量阻止不了追求真理的浪潮。馬克思主義一百年的歷史，也就是被人熱愛和被人仇視的歷史，但仇視的人是越來越少，越來越無力，而熱愛的人則越來越多，越來越強大，今天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規模，就是證明。新的歷史時期已把共產主義運動與民主運動結合起來，這一方面加強了民主運動的戰鬥行列，另一方面也擴大了共產主義的陣營。在這種趨勢下面，馬克思主義必將有新的偉大的發展，研究馬克思學說的人是會越來越多的。因此通俗而正確地向廣大羣衆，首先是向革命的知識份子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基礎著作和學習方法是很有必要的。

許多人把馬克思主義，當作非常難以理解的東西，這是不對的。誠然，這些先生會對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下過「功夫」，絞盡腦汁，如像秦香蓮的奉命作文的傢伙，企圖把馬克思主義說成不近情理的學說，在他們連篇累牘的文章中抄引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辭句，但除去暴露他們的卑鄙心理外，也證明了他們對馬克思主義是一竅不通，想在馬克思主義中找點共產主義運動的破綻和一黨專政萬壽無疆的根據，那不是徒勞嗎？另外一些教條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神秘化了，當做萬古不易的公式，把一切生動的事實，人民鬥爭的新經驗都不去注意、汲取，死抱着幾條僵硬的公式，以為這就是「一切」，自然也無法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和實質，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沒有任何神秘，它只是一種老實實的事實，它誠實地告訴我們人類社會運動的規律，並告訴革命的人羣應把社會推向那裡和如何去推進。就是這件事實也不是根據神秘的玄想，而是根據客觀存在的種種事實，說出來的老實話。說它是老實實的事實，是因為它一切從實際出發，並永遠保持著完整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和實事求是的方法。只要我們老老實實對待一切客觀事物，並站穩這個立場，不絲毫玩弄玄虛，我們就可以理解這個學說的基礎精神，也可進一步掌握這一學說而應用之於實際的鬥爭。這個學說的這種根本精神，也就決定了我們對這種學說的學習方法。

有一類傳統的偏見：似乎學習一種學問非博覽羣書，非有很好的教養的人不能學會。誠然像馬克思主義這種「產生於資本主義時代人類所獲得的各種知識的堅固基礎之上的學說」，是需要豐富的知識準備才能精通的。歷來馬克思主義的大家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他們都有極豐富的歷史知識社會知識和人類鬥爭的其他方面知識，所以他們能對馬克思主義深刻的理解，靈活的運用，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充實了和發展了這個偉大的學說。豐富的知識對於精通馬克思主義是絕對必要的。但實際說來，具備這樣豐富的知識不是一天的工程，而有些知識，比如鬥爭策略的知識，我們就難以和實際鬥爭的人來比較，明瞭局部情況的人，也難以和明瞭全部情況的人比較，這種知識上的缺點，應該用各種方法來彌補，但實際上常是難以完全彌補的。但我們也無需因此就悲觀起來，我們仍然可以懂得馬克思主義，並能靈活的運用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這一種普通真理，在我們日常生活各個方面，都可以體認得到。以學習為例，學習問題上就有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的分別，如果運用了實事求是的方法，真正學懂了可以解決實際問題的學問，那末這種方法就是合乎馬克思主義的。教條的學院式的學習方法就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日常生活中的這些知識，我們一般人都或多或少具備的。有了這些起碼的知識，就可以幫助我們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觀點和方法，只要我們忠實於客觀事實不存着階級偏見，我們就可以逐漸地豐富我們的知識，並進一步掌握馬克思主義。

對我們初步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人說，最根本的是怎樣理解這個學說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目的，也就在學習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法，並用這種立場、觀點和方法去處理日常的實際鬥爭，這樣就可以把事情做好，少犯錯誤。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是完備地貫串在馬克思主義的一切著作之中的，我們可以從這些著作中去領會。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太豐富了，從什麼地方開始呢？資本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傑作之一，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都是應該看的，但這樣的巨著，對於一般初學者還是深了，所以我們不主張一開始就讀這部大書，這會事倍功半的。我們覺得從幾本著名的小冊子中來研究比較好些。如『共產黨宣言』，這本六十多頁的小冊子極清楚地說明了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生動的描繪出資本主義的即將沒落，具體地闡明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和鬥爭策略，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在這本著作中被生動運用着去處理極複雜的問題。此外，還有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也是一本馬克思主義比較通俗的小冊子，有吳黎平譯本。『兩個策略』是一

本專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策略的小冊子，它指出了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兩條路線，正確的策略原則，並劃定了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的區別。對於正在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中國革命份子，這本書應該是必讀的。此外『左派幼稚病』一書也需加以研究，它對於我們黨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幫助是很大的，以上各書都是比較重要的馬克思著作，坊間不難買到。如果時間充允還可以讀讀『聯共黨綱』。

對於我們最切實地馬克思主義著作，我們不能不推『論聯合政府』。這是一本輝煌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它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目前鬥爭環境下的具體應用。中國近二十年革命運動歷史沒有正確的總結過，這本書把它正確地總結了，中國當前的革命形勢也做了深刻的分析，明確地提出了當前革命鬥爭的目標和各種具體政策，從這本書中我們也可以學到個人的修養原則，找到為人民服務的道路。這些問題的解答是完全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的，是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的，因此我

們只要努力學習，方法正確，就可以從以上這些著作中學到並領會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是什麼？就是無產階級的立場和觀點，真正人民的立場和觀點，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和觀點。為什麼要站在無階級的立場？這是因為歷史的發展必然是奴隸社會要代替原始共產的社會，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代替封建社會，而社會主義又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社會。這是人類社會歷史的鐵定規律，被生產的發展決定着，人類是不能變的。我們現在基本上還處在資本主義的時代，馬克思主義也就是產生於資本主義成熟的時代。馬克思主義的任務是幫助人類認識這種規律，並引導人類走向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是社會進步的動力，歷史給予它的任務是把人壓迫的社會推動到真正自由平等幸福的新社會，所以無產階級是最進步的階級，只有這個階級才能真正代表廣大的人民。馬克思主義就是在這鬥爭中前進的階級立場，也就是在真正人民的立場上的。所以馬克思主義就首先要領會這個階級立場。反過來說，能夠站穩了這個階級立場或人民立場，就很容易通曉馬克思主義。你們的信中說自己『不是學文法的』，這並沒有關係，只要你忠實於現實，忠實於真理和志實於人民，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就不難懂得這個學說的基本精神。如果不能接受這個立場，學文法，甚至連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人，也仍然會對馬克思主義一竅不通。因此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是學習中首先應該認識和接受的。有了正確的階級立場和人民立場，就會產生正確的階級觀點和羣衆觀點。

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這個方法和理論，在聯共黨史第四章第二節中，有了最簡明正確的闡釋。你可以單獨選出來研究。如果你還有興趣，也可買一本沈志遠譯米丁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看看，它還可以告訴你，哲學的發展歷史和辯證唯物主義怎樣繼承了過去一切哲學的好傳統而揚棄了它們的渣滓。

以上幾本書你可以選擇研讀，要用功夫，但不可過於性急。在馬克思主義的學習中最忌死背馬克思主義的公式，或勉強地用它來套那些生動的鬥爭經驗。我們的思想應該活潑，而不該受到任何教條的拘束。因此，應該仔細閱讀這幾本基本著作，要用腦筋去思考，聯繫着實際的歷史或實際鬥爭去研究，要把每個理論原則懂得透徹，要存非想通不止的精神。總之要學學能用之於實際的鬥爭，這才能有意義，也才能學好。

馬克思主義是鬥爭的武器和行動的指南，它不是在書齋中所能研究好的。對於羣衆的鬥爭，尤其是當前的政治運動，不能漠不關心。許多從事實際鬥爭的革命工人或農民，他們也許並沒有讀什麼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但他們處理問題的方法，常是很合乎馬克思主義的。相反地，有些讀過一些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知識份子，只是熟記一些教條，公式地去處理實際問題，常常是不正確的，會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毛病。為什麼？並不是不研究馬克思主義著作，而是應該從實際出發，從具體事件環境出發，掌握理論的精神，去指導行動，而不是機械地把教條搬過來去套『實際』，這就不是一坐在書齋里的理論家所能勝任的了，應該參加實際鬥爭，實際鬥爭才能印證我們所學的道理，考驗我們是不是真正理解了這種理論。經過這一番印證與考驗之後，對理論的理解就會更深刻了。實際鬥爭又會提供更新鮮更豐富的經驗，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把這些經驗總結起來，這又是理論。理論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不是書本上產生理論，而是實際鬥爭產生理論。因此，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不應該停留在書本上，應該走進實際的羣衆鬥爭中去，並要使兩者適當的結合起來，實際鬥爭豐富了理論，反過來，理論又加強了實際鬥爭，這才是我們學習的主要目的。

編後記

今年——一九四五年本刊最後一期，現在是呈獻在讀者諸君的面前了，回頭看看過去的一年，真正是人類歷史劇變底重要而關鍵的一年，全世界人民經歷了頻年戰亂，現在是可以懷着信心來瞻望和平，可以預計到怎樣建立一個全世界的「民主的大家庭」了。雖然東西法西斯的殘餘力量還沒有最後根絕，法西斯的變態殘酷的野蠻主義存在，但人民已經贏得了戰爭，戰爭已經教育了人民，我們一定能從勝利走向勝利，贏得和平與贏得進步的。

與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相起始，本刊已經生長了八年，中國人民的歷史經歷着迂迴曲折的道路，本對所跋涉過來的這一段道路也是滿佈着崎嶇，阻塞着荆莽的。就以眼前而論，華北、華南、華中仍然滿眼是竊匪者所燃起的內戰烽火，全世界人民已經從苦難中掙扎出來，在計劃着和平幸福的日子，中國人民却還不能不受未盡的苦難。要爭取民主中國的早日到來，是還需要中國人民獻身的奮鬥的。

回顧過去八年的經歷，檢點一下過去一年的本功，對本刊的讀者諸君，我們只有愧慙，只有自責，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教導我們要全心全力的為人民服務，然而我們仍然是一個未盡其職的「勤務員」，我們沒有真正的作到和讀者聲息相通，沒有能夠作到說人民所要說的話，說讀者需要說的話，有些是我們主觀沒有作到，有些是阻於客觀的環境，讀者們當選記刊入幕不久的圖書雜誌的審查對於言論自由的禁錮。既使現在大後方宣佈了審查的取消，但它仍然可以借屍還魂，與妖作怪，許多地方的讀者不仍然是常常收不到本刊的嗎？

新的一年快要開始，我們也有些新的企望，但要使「羣衆」真的成為大家自己的讀物，仍還有待於讀者諸君踴躍的提供意見，這不但是例行公事的向大家要求，過去讀者的意見，我們都是認真考慮和研究的，我們想細心的讀者當不難感到我們是在不斷探求着如何能夠更適應於大家的需要的。

我們想到下面的一些問題，希望讀者諸君踴躍的給我們的意見。

- (一) 在已出的各期中，你對那幾篇文章比較感到興趣。
- (二) 你覺得從那些文章中有所收穫。
- (三) 你不喜歡那些文章，甚麼原故？
- (四) 你覺得本刊的文章一般地有甚麼缺點，那些文章你覺得有缺點，或者是錯誤。
- (五) 在編排形式，發行方面你有甚麼意見？
- (六) 你需要些甚麼？本刊應該如何始能符合你的需要。

羣衆

第十卷 第二十四期

三十四年十二月廿五日出版

編輯者 羣衆雜誌社

重慶民生路二〇八號

總經售 新華日報館

本刊價目

零售每期 六十元

六期 三百六十元

十二期 六百五十元

廿四期 一千二百二十元

外埠郵費平寄每期四元掛號三十四元
航空十六元航掛四十六元 國外照加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群众第十卷 >

作者 =

页数 = 9 2 2

SS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